中国历代军事战略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解放军出版社

中國軍事史

兵略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编

解放军出版社

中 国 军 事 史

第二卷 兵略（上）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编

王蜀生 王腾达 方人熙 田昭林
石声璧 白太常 陈西进 何少桓
邵　青 赵古松 赵秀昆 郭汝瑰 执笔
陶文焕 曹月轩

董　珍　审校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中 国 军 事 史

第二卷 兵略（上）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编

*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 $19\frac{5}{8}$印张 • 53万字

1986年 8 月第一版 1986年 8 月（北京）第 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85•43 定价：5.20 元

目　录

第一篇　先秦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最早的战争是部落之间为争取生存或血缘复仇而进行的暴力行动。这是战争的萌芽，在性质、意义上与阶级社会的战争不同，但阶级社会一切类型的战争，都是原始社会战争的发展。

先秦古籍根据传说记载的最早一次战争是神农伐斧燧之战。继后的主要战争，有炎帝与蚩尤榆罔之战，炎帝、黄帝联盟与蚩尤涿鹿之战，炎帝与黄帝阪泉之战，黄帝后人颛顼与炎帝后人共工之战、尧与驩兜丹水之战以及舜、禹对三苗之战等。这些战争的结果，加速了原始公社的瓦解过程，导致部落联盟的基础——血缘亲属关系的破坏和走向部落融合的阶段。禹战胜三苗后，在涂山召开上万名部落首领参加的大会。[1] 这反映当时已经形成了以华夏族为中心、包括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部落、氏族的大联合，为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这时，仍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当进攻别的部落，掠夺人、财时，或遭到其他部落袭击、劫掠而需要自卫时，部落联盟的首领，一般要召开部落联盟首领会议，取得各部落首领同意后，由最高军事首领执行。军事首领的作战指挥，十分简单，而且主要表现在战斗开始前的组织和战斗结束后的处理上，在战斗进程中则难以体现。作战方式和方法也很简单，当时还没有军队和专门的战斗武器，作战时是全体部落能战斗的成员或部分志愿人员参加，用生产工具进行搏斗，在军事首领率领下，不论人数多寡，皆各自为战，全凭体力和勇敢决定战争胜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当然谈不到战争指导艺术，也更无战略可言。只有进入奴隶制社会后，由于战争频繁和规模增大，战略及战

争指导艺术才逐渐得到发展。

注　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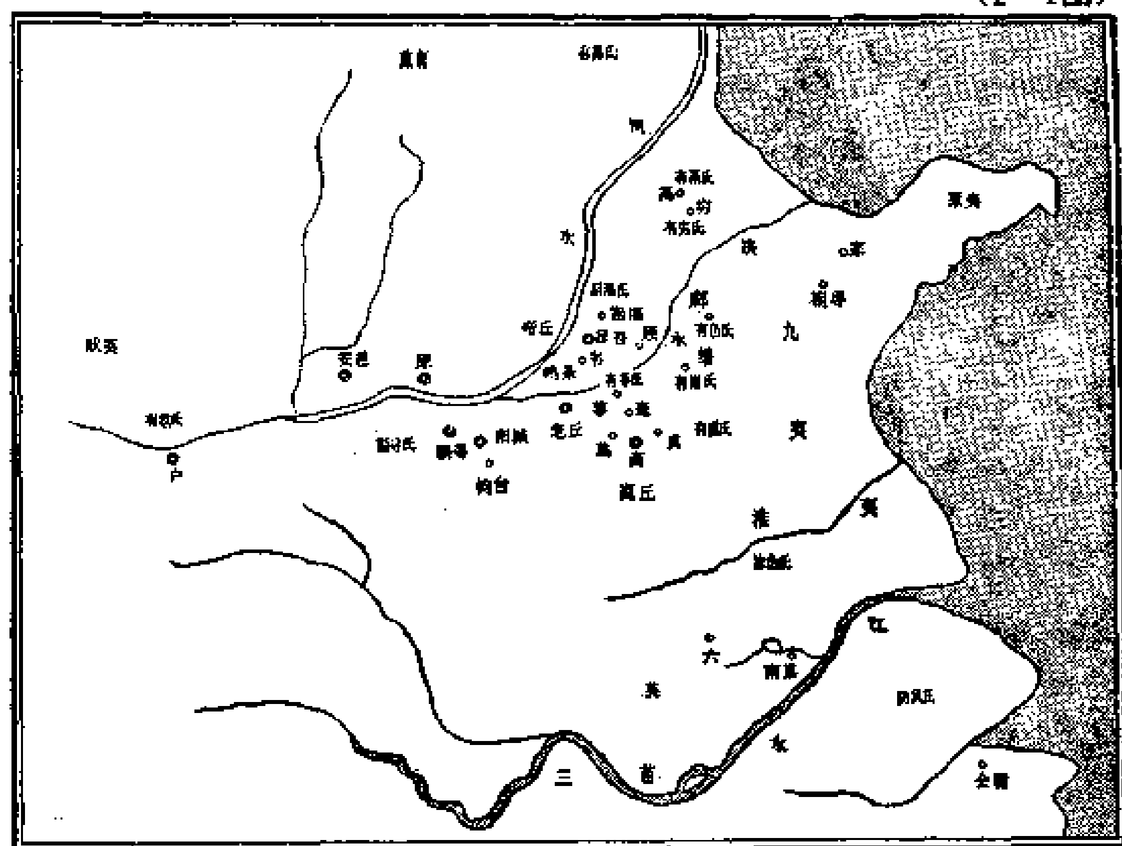
〔1〕《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第一章　商汤灭夏

第一　夏王朝的建立及其军事概况

夏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形势图

（公元前二十一至公元前十七世纪）　　（1—1图）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它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七世纪，大约存在了五百年左右。以中国原始社会最后一个由民主推举产生的部落联盟首领大禹的传子为标志，结束了原始公社制度，而开始进入阶级社会。

随着私有制的日益发展，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希望独占部落联盟首

领职位。禹虽然不得不顺应传统习惯势力推荐伯益，但禹的儿子启已掌握了许多权力。禹死后，启就轻而易举地继承了禹位，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王。

启建立夏王朝后，东方偃姓部落的伯益带领东夷的军队，首先起来反对夏启，经过激烈的战斗，启把伯益杀掉。[1]

反抗的势力不仅来自外部的东夷，也来自夏部落內部。在夏族西方的有扈氏（在今陕西戶县）也起兵反对夏启。启率领军队讨伐有扈氏，声称有扈氏犯了“威侮五行，怠弃三正”的罪行，要“恭行天之罚”，要“剿绝其命”[2]。双方大战于甘（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有扈氏终于被“剿绝”了。

夏启对有扈氏战争的胜利，意味着夏王朝终于站住了脚跟。夏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大会诸侯，举行宴会，诸侯纷纷前来朝贺。夏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诸侯（旧日部落新贵）的正式承认[3]。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位。由于他们的奢侈淫乐，人民不堪忍受其剝削与压迫，起而反抗。东夷有穷氏首领后羿利用这一机会，出兵赶走太康，夺取了夏王朝的统治权[4]。史称“太康失国”。

太康失国以后，他的弟弟仲康之子相投奔姒姓部落的斟灌氏和斟寻氏。这时，寒浞又取代“不修民事”、沉溺于田猎游乐的后羿的王位，用兵灭掉斟灌和斟寻，杀死了相。

相的遗腹子少康在有虞氏（在今河南虞城县）的帮助下，“有田一成”（方十里的土地），“有众一旅”（五百人），积极招纳夏的余众，作恢复夏王朝的准备。原夏臣伯靡在鬲（今山东德州），也收罗二斟的残余势力，与少康相互配合。最后，终于攻灭寒浞，由少康称帝，重新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5]。史称“少康中兴”。

这个时期的战争的特点，是充满着新与旧的斗争，集中地表现为王位世袭与部落禅让制的斗争。夏王朝因为拥有比较深厚的社会基础，才得以恢复和巩固它的统治。

当时，生产力已较原始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有了一些剩余产品，有了冶炼青铜等与战争有关的手工业，有了专门用于战争的兵

器，所以在经济上也就有了建立军队的条件。

夏启在讨伐有扈氏的誓师词中要求"六事之人"坚决执行他的命令."六事之人"就是军事长官，他们既管军队．也管政事。夏朝的主要兵种仍然是步兵，但已有少量的兵车参加作战[6]。

指挥系统是由国王亲自统率本族成员组成的王室军和一些近亲家族成员组成的贵族军。军队的组织尚未形成固定的编制、各支军队的人数也不一样。但已有了最初的军队纪律——赏罚，并和以祖庙和神社的神主为中心的原始宗教相结合。如《尚书·甘誓》上说夏启对六军的将领宣布："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7]

到夏代中期，夏王帝杼以坚甲和长矛武装自己的军队，战胜了以强弓硬镞装备的东夷军队，一直打到东海。这说明帝杼时已能制造兵甲[8]，军事力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夏王朝奴隶主贵族为了防止奴隶阶级和平民的反抗以及外族的侵掠．为了保护统治集团的利益，还修建了"城郭沟池以为固"。这种设防城市的出现，就是文明时代——国家出现的又一重要标志[9]。

少康中兴，十一传至夏桀。夏桀（履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名的暴君。他"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10]他为了制服叛离的诸侯，以武力威逼东方的许多邦国，在仍（今山东济宁东南）举行朝会，结果反而激起了有缗氏（在今山东金乡东北）等更多诸侯的叛乱。夏桀出兵征讨有缗，有缗虽然战败了，但夏王朝也为之元气大伤，加速了它的灭亡[11]。

就在夏王朝阶级矛盾和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黄河下游的一个商人部落，在其首领商汤的领导下兴起来了。

第二　商族的兴起和灭夏的准备

商人的祖先居住在孟诸泽畔的商丘[12]，不断开拓这一片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薮泽地带，逐渐发展起来，并向着黄河中游扩张其势力，从夏王朝的属国变为夏王朝东方的强大对手。

商部落的畜牧业很早就比较发达，《世本》说相土时已学会“乘马”，《吕氏春秋》说到王亥时又掌握“服牛”的技术。《管子·轻重戊篇》也说：“殷人之王、立帛（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13]这说明夏代中期，商人已驯服牛马，用于交通和生产，过渡到定居放牧的生活，形成农牧结合的经济，使这个部落很快兴旺起来。

畜牧业比较发达的部落，武力都比较强盛。在相土当部落首领的时候，乘夏王朝太康失位，对东方无力控制的机会，以商丘为中心，把势力伸展到黄河下游的广大地区。商汤继任商部落首领时，曾被夏桀召去囚于夏台（今河南禹县），但不久又释放了他[14]。

在夏桀的残暴统治下，夏王朝内外矛盾都极尖锐，不仅畿内人民纷起反抗，周边方国也纷纷叛离。夏王朝正面临着覆灭的命运。商汤针对这种形势，利用夏民痛恨夏桀的心理，积极展开灭夏的准备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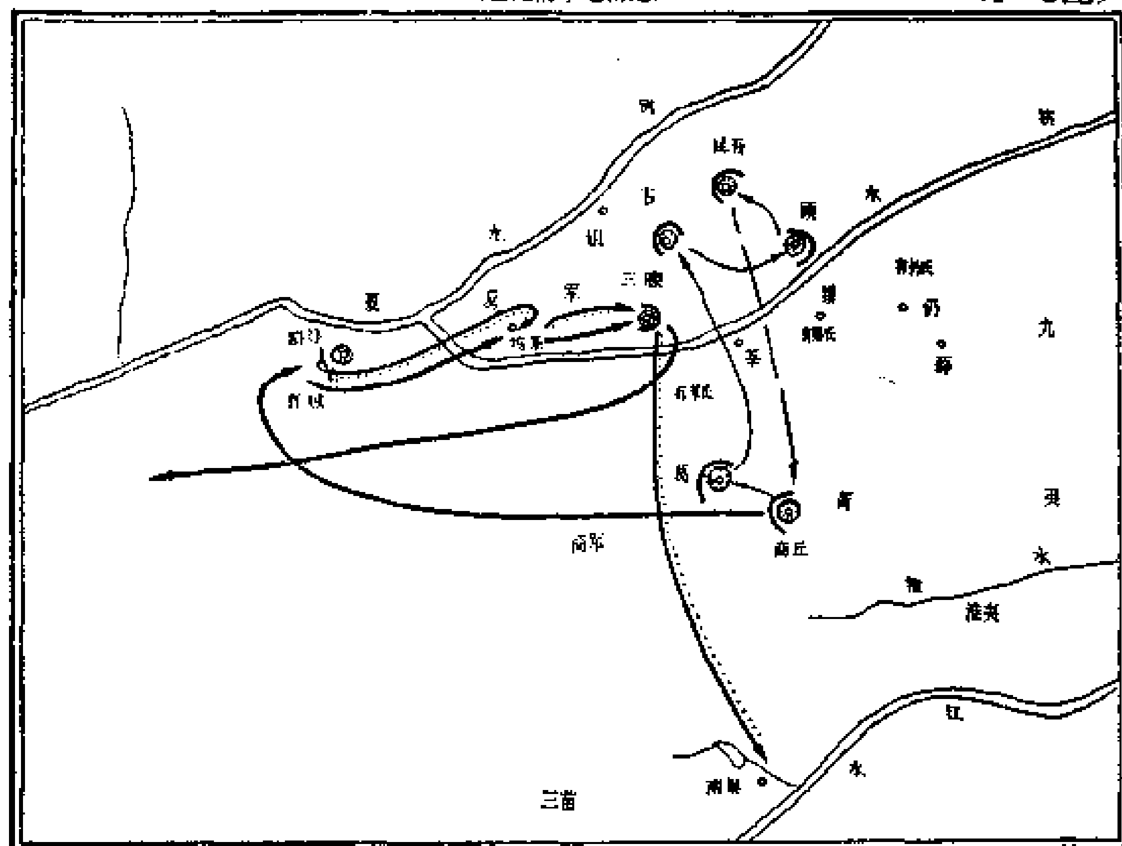
商汤任用贤人伊尹为相。伊尹为有莘氏（在今河南陈留东北）媵臣，有莘氏嫁女，他是陪嫁的一名奴隶，他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汤游说，受到汤的赏识，从而得以向汤进灭夏建国大计。汤派伊尹两次去夏，了解夏朝情况，进行活动，以改变夏桀对成汤的嫌隙，并从而进行“内间”工作。伊尹回亳（今河南商丘附近）后，夏朝内部君臣离心更甚，关龙逢被杀，费昌叛桀投汤。伊尹与夏人仲虺（huǐ毁）被汤任命为“尹”，成为最高执政大臣[15]。

伊尹经常与商汤议论过去一些国王施政的优劣得失[16]，以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为借鉴，认识到“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的道理[17]，注意对内“修德”，顺应人民希望安居乐业之心。在战前奖励生产，轻刑薄敛，以缓和阶级矛盾，获得人民的支持。并与有莘氏和曾为夏车正的薛族（在今山东薛城附近）结为联盟。

从以后灭夏战争的实践过程来看，商汤采取的是先弱后强，由近及远，逐个翦除夏桀羽翼，削弱孤立敌人，然后进行决战以取而代之的战略。在伊尹、仲虺等人大力辅佐下，做好了准备工作，便对夏桀发起了攻势。

第三　鸣条之战作战经过

商夏鸣条之战示意图
（公元前十七世纪）　（1—2图）



鸣条之战约在公元前十七世纪。

商汤伐夏桀是从灭葛开始的。葛（在今河南宁陵北）是夏朝的最亲近的属国，在商都亳地附近。汤要灭夏必须先拔掉这颗钉子。葛伯的放纵无道，给商汤提供了进攻的机会。葛伯不祭祀祖先，商汤便以助祭为名送牲畜给葛，又派人前去助耕。葛伯杀死了送饭的儿童，商汤以此为借口，出兵灭掉葛国，取得攻夏的第一个胜利。[18]

汤灭葛后，进一步展开了翦除夏桀羽翼的大规模行动，进攻夏朝的三个重要属国——韦、顾和昆吾。《诗经·商颂·长发》有描写这场战争的威武场面。

韦即豕韦（在今河南滑县东南），濒于大河东岸；顾（在今山东鄄

城东北）在济水中游；昆吾在洧水之西（今河南许昌东），号为“夏伯”。这三个分据在大平原中部的大方国与夏王朝保持密切的联系，是夏桀统治的重要支柱和屏障。商汤集中兵力分别击灭了这三个方国，翦除了夏王朝的羽翼，全部占领了兖、豫大平原，夏桀便势孤力薄，处于正面受敌的不利地位。

商汤击灭韦、顾、昆吾以后，与夏桀决战的条件渐趋成熟。尽管如此，汤仍然按照伊尹的谋划，先用停止对夏朝纳贡的办法，以窥察夏桀的实力。果然，夏桀大怒，下令“起九夷之师”来攻商汤。汤见九夷（在今淮河流域）还听夏桀的指挥，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不宜进行决战，便谢罪请服，又恢复对夏朝的纳贡，同时加紧准备力量，以便寻机决战。[19]

次年，汤再次停止对夏朝的纳贡．夏桀又召集邦国诸侯在仍（今山东济宁东南）会盟，有缗氏（今山东金乡东北）带头叛夏[20]。汤和伊尹见“九夷之师不起”，[21]夏桀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立即号召各邦国诸侯，兴兵伐桀。

汤在战前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誓师词，他谴责夏桀破坏生产，残酷剥削压迫人民，以致人们宁愿跟桀同归于尽。汤说，夏桀有罪，上天命令我消灭他，我害怕上帝发怒，不敢不讨伐夏桀。汤还申明，你们辅助我，奉行上天的命令讨伐夏桀，我会赏赐你们，我决不食言；如果不听从我的话，我要惩罚你们作奴隶，把你们杀掉，决不宽恕。[22]

商汤誓师后，简选“良车”七十辆，“必死”六千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绕道从西方出其不意地进攻当时的夏都斟寻[23]（今河南巩县西南）。桀率夏军仓促出战于有娀之墟，战败东走鸣条（今河南封丘东），商汤挥军追击。

夏桀收集夏军，与商军大战于鸣条，商军大胜，夏桀军再败而走依三朡（在今山东定陶东）。商汤趁势攻灭夏朝的属国三朡，掠取了当地的宝玉。桀仅率少数残部南逃南巢氏（今安徽寿县南），不久病死，夏亡。

商汤又挥军西上，攻取了夏朝的腹心地区。汤灭夏后，回师西亳

（今河南偃师西），召开了众多诸侯参加的“景亳之命”[24] 大会，得到三千诸侯的拥护，取得了共主的地位。我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正式建立了。

商汤建国后，又向四方征伐，统治地区有了进一步的扩展。《诗经·商颂·殷武》说：“昔有商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商周边部落前来朝贡的越来越多，加速了周边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第四　商夏鸣条之战的战略研究

公元前十七世纪，商夏鸣条之战，是中国奴隶社会中最早和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战争。从战争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战争的规模扩大了。商汤的战争指导，已从单纯的军事斗争向军事政治斗争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战略的运用主要表现有如下各点：

一、商汤已初步认识到“视民知治不”的道理，即人心向背影响胜争胜负

“葛伯不祀，汤始伐之”。商汤说：“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25] 商汤把人民是否拥护国王，作为衡量国家治乱兴亡的尺度。夏桀时，“百姓弗堪”。汤从此看出夏王朝败亡的不可避免，并针对“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的情况，顺应人民希望安居乐业之心，内修“德政”。在战前，奖励生产，轻刑薄敛，以缓和阶级矛盾；在战时以“今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获得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另一方面，外结诸侯，争取与国，出现了“诸侯皆归汤”的政治局面。所以孟子说：“汤始征，自葛载。”“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26] 因此，商汤的军队所向披靡，“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这种认识和措施，就为覆灭夏王朝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夏、商奴隶主的统治思想是把“天”视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敬事

鬼神；而商汤多少能看到一点人民的力量，这比简单的“天命”观当然是进了一步。

二、商汤伐夏桀前，创造性地运用了“用间”的谋略，起到了充分了解敌情和分裂、削弱夏王朝的作用

“伊尹去汤适夏”，就是进行“五间”。[27] 他探知了夏王朝的情况，分裂了夏王朝内部的团结，离间了夏王朝与各方国、部落的关系，孤立和削弱了夏王朝的力量，为覆灭夏王朝的作战创造了可靠的条件。

《孙子·用间篇》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又说：“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明确指出“用间”的重要意义和只有“用间”才能得到“先知”。

《孙子·用间篇》最后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故惟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明确地把汤用伊尹列入“用间”。这是中国战争史上最早“用间”的典型范例。这在夏、商时期统治者尊奉“天命神权”的宗教世界观中，在对待战争问题上能带有朴素地唯物主义反映论特点的思想因素，确是难能可贵的。

三、商汤采取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翦除羽翼，然后进行决战的战略方针，故能以弱胜强

商族原是夏的弱小属国，居黄河中下游。商汤时国力日渐强盛，但与夏王朝力量相比，仍处于劣势，不宜与夏朝正面冲突。于是汤采取先伐葛、韦、顾、昆吾四方国，以翦除夏桀羽翼。在掠夺四方国封疆、实力大增、基本上改变了夏强商弱的形势之后，方大举伐桀。这种战略步骤的处理是十分得体的。

葛和韦、顾、昆吾都是夏的属国。尤以昆吾号称“夏伯”，是夏桀最亲近的依靠力量和他在黄河下游的重要支柱。葛在商都亳地附近，力量较昆吾弱。汤在伐桀之前，先兴师灭葛，继而集中兵力逐次灭亡韦、顾，再攻灭实力较强的昆吾，摧毁了夏桀的支柱和屏障。此后，

方对夏桀发起全面的进攻。

这里可以看出，商汤实际采取了先弱后强，由近及远，翦除夏桀羽翼，然后进行决战的战略方针，使“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直至彻底胜利，得到了保证。

四、商汤慎重而可靠地选择决战时机，正确地决定决战方向，达到了速战速决的作战目的

商汤在攻灭葛、韦、顾和昆吾等国之后，封疆扩大，实力增强；夏桀国力有很大的削弱并处于正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商汤与夏桀决战的条件已趋成熟。尽管如此，汤仍慎重地等待可靠的决战时机，未立即与夏进行决战，而是依照伊尹的谋画，先用停止对夏朝纳贡的办法，试探一些方国、部落与夏桀之间的关系。起初“九夷”还听从夏桀的调动，说明夏桀还有应援的力量，遂推迟与夏桀决战的时间，继续准备力量。这正是战略上慎重的表现。

次年，“九夷”不听从夏桀的调动，纷纷叛夏向商，原来夏强商弱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夏桀已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夏桀的统治即将崩溃。形势表明：进行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商汤立即抓住战机，号召诸侯对夏桀发动强大迅猛的攻势。

商汤挥军出其不意地绕道从西方指向夏都，使夏桀不能在夏都进行有效的抵抗，以致在有娀稍一接战，即败退鸣条。汤挥军急进，在鸣条大战中，又败夏军，乘胜攻灭三朡。这种连续作战的行动，逼使夏桀无喘息的余地，终能迅速解决战局，一举覆灭强大的夏王朝。

商汤能及时抓住决战时机，正确确定决战方向，取得了决战的胜利，也体现了这次战争的指导艺术已超出了前代的成就。

五、商汤把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把夺力与夺心相结合，开创了全面战略的新范例

商汤进行政治攻势的基础，在于对“视民知治不”的认识，使他多少看到一点人民的力量。他的政治攻势的内容和方法，主要是揭露敌人剥削压迫人民的罪恶，同时宣扬自己的“德政”，瓦解敌军的斗志，解除敌人思想上的武装。并在外交上，争取同盟者，扩大自己力

量，孤立敌人。通过发布誓词，还能起到团结军心，提高士气的作用。

总之，商代以前，我们的祖先在战争实践中已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作战工具极其简陋，战争规模小而脆弱，所以人们对客观认识能力较低，对战争的组织和指挥的了解也都是肤浅的，零碎的。商对夏的战争，则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如认识人民的力量，懂得“用间”的方法，运用离间敌人和争取与国的策略，使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结合起来，以及决战时机的选择和决战方向的确定等等，都是在当时条件下前无古人的创造。对我国以后战略、战术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注　释

〔1〕《古本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

〔2〕《尚书·甘誓》：“威侮五行”（轻蔑地对待一切），“怠弃三正”（怠慢甚至放弃了历法）。“恭行天之罚”（我奉上帝的意志去惩罚他们）。“剿绝其命”（灭绝他的大命）。

〔3〕《左传》昭公四年：“……夏启有钧台之享……”

〔4〕《楚辞·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左传》襄公四年：“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5〕这一段史实，见《左传》襄公四年和哀公元年。

〔6〕《尚书·甘誓》：“左不攻于左（兵车左边的士兵），汝不恭命（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右不攻于右（兵车右边的士兵），汝不恭命（如果不善于用矛刺杀敌人）；御非其马之正（驾驶兵车的士兵），汝不恭命（不懂驾驶战马的技术）”，便是不具备完成任务的本领。这说明，在甘泽大战时，夏启的军队已使用过少量的兵车作战。

〔7〕《尚书·甘誓》：“用命（努力完成我的命令），赏于祖（便在祖庙（祭庙）的神主面前颁发赏赐）；弗用命（不努力完成我的命令），戮于社〔便在神社（社稷）的神主面前给予惩罚〕，予则孥戮汝（我要把你们这些不努力完成命令的人变作奴隶，绝不宽赦）。”

〔8〕《史记索隐》引《世本》谓“季杼作甲”。

〔9〕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10〕《史记·夏本纪》

〔11〕《左传》昭公十一年

〔12〕在今河南商丘、虞城以北到山东曹县、单县一带，古代的济、泗之间比较低洼的一片薮泽区，统称孟诸泽，为中原地区范围较广的薮泽区之一。

〔13〕《管子集校》引王念孙云：“帛”为“皂”之误也。“皂”以养马，“牢”以养牛。

〔14〕《史记·夏本纪》

〔15〕这一段史实，见《墨子·尚贤中》、《庄子·庚桑楚》、《吕氏春秋·慎大览》。

〔16〕 《史记·殷本纪》

〔17〕 《史记·殷本纪》

〔18〕 这一段史实，见《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19〕 《说苑·权谋》

〔20〕 《左传》昭公四年

〔21〕 《说苑·议谋》

〔22〕 《尚书·汤誓》

〔23〕 这一段史实，见《吕氏春秋·仲秋纪·简选》及《吕氏春秋·慎大览》："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

〔24〕 《左传》昭公四年

〔25〕 《史记·殷本纪》

〔26〕 《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27〕 《孙子·用间篇》

第二章 武王灭商

第一 商汤建国后的战争（军事）形势

商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形势图

商汤建立起来的商朝，二十传至盘庚时，又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西北），所以又称“商”为“殷”。再三传至武丁，为了巩固和扩大商殷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商不断对西北的舌方、土方、羌方和北方的鬼方用兵[1]。每次征发的兵力三千至五千人。对羌方用兵时，征调的兵

力一次竟达一万三千人。武丁伐鬼方，长达三年，杀敌多到二、三千人。战争的规模比商朝初年扩大了，持续的时间也延长了。这种战争带有明显的掠夺性质，并且极其野蛮与残酷。当然，在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方面，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随着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不断增加，各方国、部落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日趋频繁。商汤之时，号称诸侯三千，到周初略存千八百，大约六百年间，诸侯之国减少一半。当时商为大邦，经济和军事实力最为雄厚，与商相邻与相近的外邦外族，多被征服与吞并，其土地划归商王国，不再称“方”，而是商王朝直接管辖下的一个地区。当然，由于商人的物质文明，也使周围各族不断发动战争，对殷的周边地区进行掠夺。

由于千万奴隶在从事生产，社会生产的规模和分工日益扩大。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畜牧业迅速繁盛起来，驯养马匹逐渐增多，为进一步扩大“车战”规模提供了条件。

手工业也发展起来了。特别是青铜手工业，不只能铸造小刀、小钻之类，更多更大的如戈、矛、刀、斧、镞、盔等武器也能铸造出来。铜镞的出现，说明当时的青铜工业已经有较大规模和相当高的程度了[2]。

商代后期，不仅构成了庞大的、重叠的官僚机构，而且还组成了庞大的军队。武乙、文丁时代的卜辞有“王作三𠂤：右、中、左”的记录，“𠂤”用为屯聚之地，即作三营以屯驻三师。从商王朝征伐时用的人数推测，每师可能达到一万人左右，三师共三万余人。

商代后期，战车与徒兵配合作战。每辆战车驭马四匹，车上有甲士三人，一人御车，一人持戈或矛，一人操弓箭。作战时，战车后面和两旁还有徒兵配合。

商王朝的军队由商王和贵族的“王族”和“多子族”[3]组成，是军队的核心力量。甲士多数由平民充任，是军队中的基干。部分奴隶也被强制充当徒兵并服军事杂役。此外，商王还拥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武装部队，如驭马的“多马”和善射的“多射”、“新射”，是商王

的侍卫部队。

军队编成，有徒兵和战车两种。大概商朝前期是以徒兵为主，战车数量仍不太多。随着畜牧业养马和手工业的发展，这种适合贵族身份又适应于平原作战、具有一定机动性和冲击力的战车，才逐渐增多，成为军中的重要兵种。

商王朝凭借这些军事力量镇压奴隶反抗和不断向外扩展。在后期，商王直接统治的区域称王畿，以王都——殷为中心，包括今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和山西南部一些地方；在王都的远近周围散布着商王朝所属的若干诸侯的据点，据点之间还存在着若干不属于商王朝的方国和部落。王畿以外的方国、部落名义上也是商的属国，但这些方国、部落不是商王朝封的，土地也不是商王朝分配的。各方国、部落也不断对商王畿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掠夺，抢劫奴隶。商王朝为了开拓疆域，扩大直接统治区和掠夺财物、奴隶，也经常出兵征伐王畿以外的方国部落。所以战争异常频繁。

商代末年，国势衰微，商王盘庚以后，奴隶反抗奴隶主，平民反对贵族，方国侵扰商王朝的风暴加紧了。祖甲以后的殷王几乎全是淫暴之君，“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奴隶）之劳，惟耽乐之从”；因而他们在位的时间很短，“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4]。

商朝末年，江淮之间的夷人又强盛起来。武乙时，商朝“衰敝，东夷寖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5]，威胁着商朝的后方。商统治者不得不集中力量来对付夷人。到帝乙时，对夷方即岛夷与淮夷进行反复多次的战争，虽然也取得一些胜利，但未能彻底解决。

帝乙末年迁居到沬，即今河南淇县的朝歌。其子辛（殷人称之为纣）继位后，为要打退周围的强敌，安定商人的边疆，对西南、西北，后来又对东夷不断用兵。

商纣王是商王朝的末代国王，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6] 后世言商纣的残暴事实，可能有夸大之处。

"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7]但他和夏桀一样，是一个暴虐淫侈的国王。他自恃才智，好酒淫乐，在即位之后，就扩大商都的范围，"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8]。在宫殿中，还造了琼室玉门，收罗了珍马奇物，终日和贵族们饮酒作乐。为了满足他的贪欲，"厚赋税以实鹿舌之钱，而盈巨桥之粟"，[9]极力加强搜刮。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反抗，他又滥施酷刑和屠杀。他对其他方国部落尤其是对东夷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国力，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痛苦。

商纣王为了专制擅权，只任用跟他意见相同的人，因而扩大了贵族内部的矛盾。帝乙的长子微子启，因其生母身分微贱，由帝乙正妻的少子纣继承了王位。纣的勇智过人，但微子启的能力也很强，这就造成贵族内部两派势力的不断斗争，致使商王朝奴隶主贵族内部分崩离析，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总之，殷纣刑罚酷虐，政治腐败，连年对外用兵，加重了人民负担和痛苦，奴隶主贵族内部又出现大分裂，使得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10]的混乱局面。

第二　周族崛起

周族是一个古老的姬姓部落，大概在夏末的时候，这个部落在我国陕西、甘肃一带活动。到古公亶父时代，周族因受薰鬻戎狄的逼迫，不得不由豳（今陕西旬邑）迁到岐山以南的周原（主要包括今陕西的扶风、岐山、凤翔、武功等县）。这里土地肥美，宜于耕植，太公（古公亶父）喜之，因而他们开始自称为周人。周人迁到岐山定居后，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整顿了部落组织，规划了土田，营建了房舍居邑，设置了官吏，从原始社会跨入阶级社会，并逐渐强大起来。[11]

古公亶父开始臣服于商，共同对付鬼方等戎狄部落，保障了周族的生存和发展。同时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弓矢斯张，干戈戚扬"[12]，

军容整齐，装备精良。"其军三单"[13]，把部落成员分成三批轮班服役，亦兵亦农。

古公亶父传位于幼子季历，他继续执行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获得了附近部落的拥护。[14]季历和商朝奴隶主贵族通婚，积极吸收商人文化，促进了周族社会的发展。在商朝的支持下，季历对邻近的戎狄部落进攻，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周的势力因此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周族统治者也增加了大量的财富和奴隶，成了显赫的奴隶主贵族大家族。商王文丁封季历为"牧师"[15]，即商朝在西方的方伯。周族已经成了商朝西方一个强大的方国了。

由于周族统治者的日渐强大，加剧了他们和商王朝的矛盾。商王文丁为了遏制周族的势力，杀了季历。季历子姬昌继立，就是后来有名的周文王。姬昌"遵后稷、公刘[16]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王"[17]，"诸侯皆响之"[18]。在商王帝乙初年，姬昌曾出兵伐商[19]但未取得胜利，遂变公开反商为臣服事商，周名义上仍然是商的一个属国，暗中却发展扩大自己的势力，作灭商的准备。

姬昌的这种策略，被商纣王视为一种潜在的威胁，因此把姬昌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周闳夭等人深以为虑，"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20]，以及其他奇珍异物奉献给纣王，纣王才释放了姬昌，令他仍为西方的方伯，并赐与他弓、矢、斧、钺，使其得专征伐之权。

西伯姬昌被释放回国后，更加积极作推翻商朝的准备工作。

第三　文王翦商

姬昌由羑里释放回国后，任用熟悉商朝内部情况的贤士吕望，"阴谋修德以倾商政"[21]，"诸侯多叛纣归西伯"[22]。此时，西伯姬昌实际已在政治上宣布独立，"受命称王"[23]，由商的臣属变为与商纣相对抗的势力。周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转折时期。

当商纣王全力经营东南，无暇西顾的时候，周文王姬昌与吕望便趁机迅速发展自己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对商王朝都城——朝歌，采取进逼的政策：

一、恭顺事商，麻痹纣王

吕望是一个懂得文韬武略的人。他根据商强周弱的形势，认为要想图商，必须先恭顺事之，以免引起对方的警惕。待羽翼已成，把握有利的时机，再行征伐。吕望对文王建议说：

> "鸷鸟将击，卑身翕翼；猛兽将搏，俛耳俯伏；圣人将动，必有愚色。"[24]

大意是说，要推翻殷纣，必须在开始行动之前，装作无所作为的样子，以免引起对方的注意。吕望还说：

> "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击之"。[25]

文王采纳吕望的意见，在表面上对纣王采取恭顺的态度，率叛商的诸侯朝觐纣王，并在国都"为玉门，筑灵台，列侍女，撞钟击鼓"[26]，装作享乐腐化的样子，以欺骗纣王。纣王因此对文王放松了警惕，并认为"西伯改过易行，吾无忧矣"[27]。这些措施，对麻痹纣王，掩护各种翦商工作的进行，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修德行善，裕民富国

吕望与姬昌议论天下盛衰的规律时说：

> "祸福在君，不在天时"，如能"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亲其君如父母"。[28]

这是国家兴盛的根本。所以"爱民"是治理国家的"大务"。[29]

文王也鉴于殷纣的暴政受到人民的反对，知道一味用刑并不能维持其统治。于是在以"刑"控制人民的同时，还提出"修德"，即奴隶主统治者要以"爱民"为治国的"大务"，使阶级矛盾得以和缓。由于文王时期，周的奴隶主贵族还没有完全和平民脱离，彼此关系还比较缓和；尚未取得天下的奴隶主贵族，还需要利用民众，所以"德政"还是能够实行起来和有效果的。

在内政上，文王一反纣王的所为，禁止饮酒打猎，实行“裕民富国政策”：“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30]巩固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对殷朝造成很大的优势。

文王懂得要推翻强大的商朝，必须利用人民的支持。他为了使纣王直接控制的人民倾向于自己，于被释放时即以洛西之地献给殷纣王，请求废去炮烙之刑。[31]在国内对鳏寡孤独者的生活表示特别关心[32]。某次在掘沟开池时，发现有死人骸骨，文王为了笼络人心，要重新埋葬。主其事的官吏认为这是无主的。文王说：

“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寡人固其主矣”。

遂用衣棺厚葬之。这事一经传播，人民对文王更加爱戴，说：

“西伯泽及枯骨，况于人乎”![33]

因此，文王深得人民的支持。

三、广罗人才，发展生产

文王姬昌效法古公、季历的作风，礼贤下士，广罗人才，“济济多士，文王以宁”。[34]

相继辅佐文王、武王，在“翦商”事业中累出“兵权与奇计”[35]，在伐纣过程中，指挥作战的“文武师”[36]吕望，就是文王物色的贤才之一。吕望果然不负所望，七十高龄老当益壮。他替周文王谋划了许多军国大计，吏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37]以后辅佐武王伐纣，“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38]，在兴周灭商事业中，立功最伟。

此外，由于纣王荒淫暴虐，亲一些人，远一些人，许多有才干的贵族大臣，如太颠，闳夭、散宜生等，也都相继投奔周朝，成了文王的得力辅佐。[39]

文王还遵循后稷、公刘的事业，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周人赞美周原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40]这片膏壤沃野上生长的野菜，吃起来也象饴糖一样格外甜美。周人在这里划分田界，挖沟泄水，垦植耕地，“复修后稷、公刘之业”，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



四、扩大影响，争取与国

文王在准备武力征伐的同时，还大力开展政治攻势，扩大影响，分化瓦解商朝的附庸，争取更多的与国。史称“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41]据说当时虞国（今山西平陆）和芮国（今山西芮城）都是商的属国，两国发生领土争端，他们不找共主纣王而请求周文王裁决。说明商在小国眼中已无威信。河东的许多小国，纷纷前来归附，诸侯都把文王看作是足以取代商王纣的“受命之君”。周人也把这年看作是周受命称王之年。

文王还针对奴隶普遍逃亡的现象颁布一条保护奴隶主利益的搜索逃亡奴隶的法律[42]，即定期大规模清查逃亡的奴隶，规定任何人不得擅自收留逃亡奴隶，必须归还原奴隶主。这更获得奴隶主贵族的拥护，也稳定了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为灭商奠定了政治基础。

五、侦察敌情，重视“用间”

传说太公吕望曾在纣王那里做过官，也游说过诸侯，很了解商朝及天下的形势。他归文王以后，因而能掌握商王朝的情况，能适时提出建议而定下正确的决策。孙子说：“周之兴也，吕牙在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43]后来吕望辅佐武王，也是深得“用间”之妙，卒成大业。

六、翦商羽翼，进逼朝歌

文王在“断虞、芮之讼”的第二年，开始利用纣王给他“得专征伐”的大权，乘纣王有事于东夷之际，指挥军队，越出周境，对与周敌对的方国，发动一系列的军事进攻，对商王朝国都——朝歌采取进逼的政策：

文王首先向西北和西南用兵，以消除后顾之忧。他相继征服了西北的犬戎（今陕西彬县、岐山及以北一带）和泾水上游的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阮（今甘肃泾川东南）、共（今甘肃泾川北）等方国。[44]

接着，文王便组织军事力量向东发展，东渡黄河，进入河东、河内地区，进攻黎（耆）（今山西长治西南）。不久，周军又进攻纣王经常去田猎的邘（今河南沁阳西北），翦除商之右翼，构成了对商都朝歌

的直接威胁。无怪乎商朝统治者大为惊慌，祖伊在向纣王报告这个消息时，竟然惊呼："天既讫我殷命！"[45]

当周攻黎、邗获胜后，文王与吕望又亲自率军进攻商王朝的腹心大国——崇。崇侯虎是纣王的亲信，他早已看出周文王的企图，谮"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殷)帝"。[46] 使文王遭到囚禁。《诗经·大雅·皇矣》说，"崇墉言言"、"崇墉仡仡"，可见崇城的防御设施庞大而坚固。周军进攻三旬而崇不降，吕尚命令周军撤出战斗进行整顿，[47]然后集中兵力，修筑土山，并用钩、梯、临车、冲车等攻城器械，一举而攻克崇城，除掉周军东进的一个重要障碍，打开进攻商都——朝歌的进路。[48]

文王姬昌在相继灭黎、灭邗、灭崇之后，周人势力在东方达到江淮之间，南及江汉，西南深入巴蜀[49]。南方大部分邦国、部落，归服于周。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已完成了对商都——朝歌钳形包围的态势。为了便于继续向东发展，文王把政治中心从周原"岐"迁至沣水西岸的丰（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西岸马王村、西王村一带）。

文王姬昌为"翦商"大业作好了准备工作，但还没来得及完成推翻商朝的任务，在迁都丰邑的第二年死去。他临死前，召太公吕望、子姬发在侧，嘱咐说：

"见善而勿舍，时至而勿疑，去非而勿处"。[50]

他要姬发继承父志，看准时机，毅然去完成灭商大业。

第四　武王伐纣

一、纣克东夷

商纣末期，东夷浸盛，威胁着商王朝的后方，虽然对夷方即岛夷与淮夷进行过多次的战争，均未能彻底予以平定。在西方，周人的进逼政策，不断对商西部发动的进攻，已使商朝臣下普遍感到有覆灭的危险。同时各地诸侯也纷纷叛离，周边各部落也乘机内扰[51]，在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纣王决定对周用兵，以挽救其即将覆灭的局面。

纣王采取了先西后东的方针，集中大量兵力在太行山区的黎（今山西长治西南）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显示军威。显然这是为对付周人攻黎而采取的军事行动。但是，东南方面的兵力空虚了，东夷各部乘机起来叛离。这就是春秋楚国的椒举所说的："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52]。

接着，纣王把全部兵力转调东线，全力进攻东夷各部。由于东夷地域广阔，力量较强，使得纣王动用很多兵力，持续了几年时间，才取得对东夷各部战争的一些胜利，俘虏了"亿兆夷人"，掠夺了大批财物。但是战争消耗了商王朝的大量人力物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并使军队陷入东夷战场不能抽回。这就使本来日益严重的危机，更加处于不可挽救的境地。

二、观兵孟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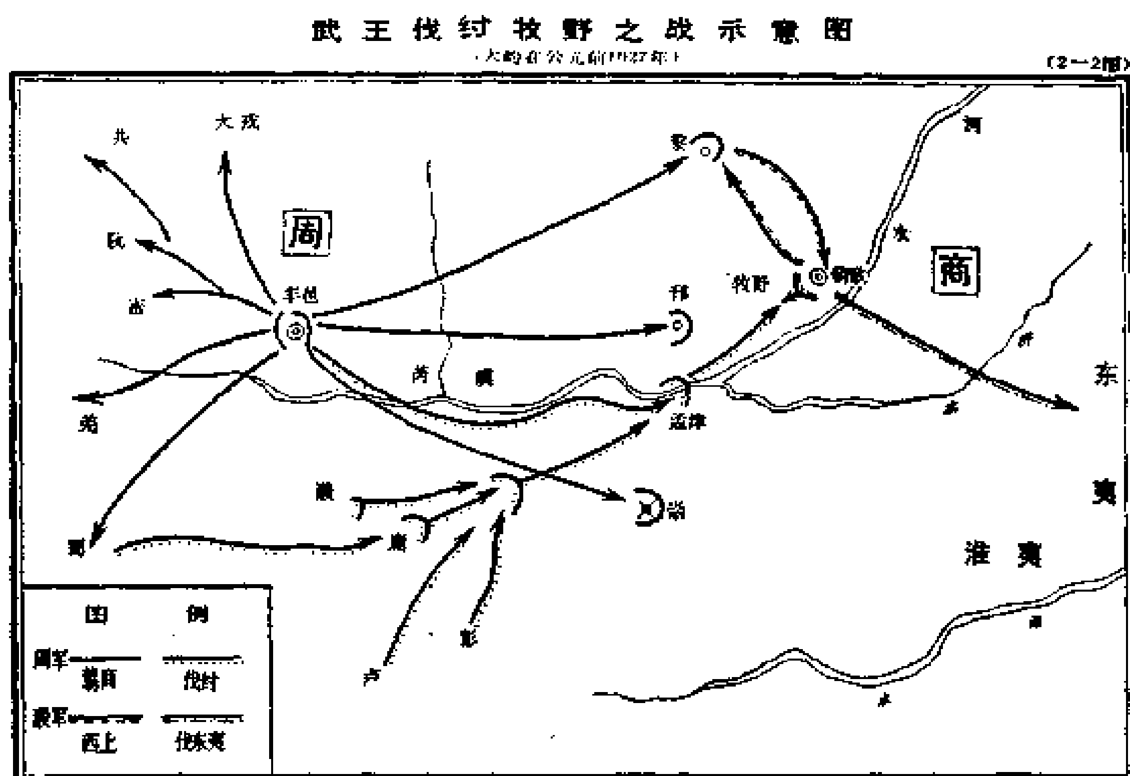
武王姬发即位后，以太公吕望为文武师，周公姬旦为辅，继续完成文王未竟的事业，周人灭商的大业已进入了最后实现阶段。但武王仍然小心谨慎，惨淡经营。为测验各方国部落对讨伐商纣的态度以及检阅军队完成作战准备的程度，武王祭祀文王姬昌后，利用文王在诸侯中的崇高威信，表示自己继承文王遗志，于即位后的第二年，载文王"木主"[53]于车中，与太公吕望一起，率军东下，"观兵"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有八百诸侯前来参加会盟。

武王先宣布说自己是受先王之命为讨伐商纣的统帅，然后开始军事演习。吕望宣布演习的行动和作战纪律："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54]部队遂分批开始渡河演习。登岸后，八百诸侯和部落首领皆宣誓愿接受周武王的指挥，并一致要求立即北上，讨伐纣王。武王观察当时的形势，认为时机还未完全成熟，且"观兵"的目的已达，推说"汝未知天命，未可也"[55]，便命令各诸侯首领率军各归本国，候命再动。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56]。所谓"观兵"，其实是一次军事大演习，大检阅，也是一次外交盟会。武王赢得如此众多的盟军，说明周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对商的优势。人心向周，灭商已有

充分的把握。

三、牧野决战（参看插图2-2）



纣王对东夷劳师远征，连年作战，国家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加剧了人民群众的反抗和斗争，军队也受到很大损失，并被陷在东夷不能抽回。同时，商朝奴隶主贵族内部的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有些大臣逃跑或叛投西周．微子见势不妙躲起来了。商奴隶主贵族内部出现了空前的大分裂，这使纣王陷于内外夹攻，众叛亲离的境地。

自武王“观兵”西归后，为了进一步了解商朝情况，以便确定发动战争的有利时机，不断派出间谍到朝歌进行刺探。当纣王进一步迫害反对他的贵族时，间谍回报说：“谗慝胜良”。武王认为时机仍不成熟。后来又得到“贤者出走矣”的报告，武王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最后得到“百姓不敢怨诽矣”的报告，[57]武王这才确认纣王已众叛亲离，讨伐纣王的时机成熟了，在“孟津之誓”以后不到两年（约为公元前1027年）的十二月，起兵袭击[58]朝歌。

武王遍告诸侯说：“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遵奉文王之命，

自己为统帅，吕望为“师”，率戎车三百乘、虎贲[59]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挥师东进，大举伐纣。

武王与太公吕望论“兵道”时，吕望说：

“兵胜之术，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60]

武王趁商朝奴隶主贵族大分裂，商军陷于东夷之时，兴兵伐纣，可谓“乘其利”又“击其不意”，准确地选择了决战的时机。

周武王大军东出潼关，进至孟津，会合了西南地区和江汉流域的庸、蜀、羌、髳、微、卢、彭、濮[61]等各方国的军队渡过黄河，向朝歌进发。于癸丑（二月初四）夜到达距朝歌七十里的牧野（今河南淇县南）。

甲子（二月初五）凌晨，武王首先向全军发表誓词，又历数殷纣的罪状：

“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62]

武王并规定作战行动和纪律：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于尔躬有戮。”[63]

周武王的战前誓词，对于周军士气，起了进一步高涨的鼓舞作用。它使兵士们更加了解纣王的罪恶，更加懂得这次远征作战的目的，掌握了作战的方法：就是在进攻作战过程中，要保持战斗队形的整齐，在一定的距离和几次战斗动作后就停止调整一次。因为车阵作战必须保持整齐的队形，如果一经混乱，就会失掉指挥和不能协同，难以发挥车战的威力。

周武王规定的作战纪律是很有意义的。规定不得杀害不抵抗的商

军，目的是使他们以后为周朝统治者服役。严厉地申明：将士都要奋力杀敌，谁要不执行命令，就杀掉谁！

周武王并向商人宣传说："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64]明确指出主要打击目标是纣王，争取商人的支持。

当周军渡河向朝歌进发的消息传到商都后，纣王才赶忙策划应敌的措施。这时候，商朝的军队，远在东南战场，一时调不回来。纣王只好将在商都附近的少数奴隶主贵族的军队作为骨干，并把大批奴隶和从各地主要是从东南战场抓来的战俘，匆忙地武装起来，拼凑了十七万[65]乌合之众，开赴牧野战场，以拒周军。

纣王把十七万大军编成梯阵，配置在牧野战场，把奴隶和战俘配置在前阵，将奴隶主贵族的部队配置在后阵，以为督战之用。

决战一开始，周武王命吕望率领一部虎贲、戎车为前锋，从正面向商军挑战[66]，一面观察敌阵虚实。接着，指挥以虎贲、戎车为主，徒兵配合的主力部队，猛冲商阵。商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奴隶和战俘皆不愿为纣王卖命，反而希望周军能迅速击败商军。当周军发起总攻后，在前阵的奴隶和战俘乃掉转矛头，倒戈以冲击商奴隶主贵族的部队，为周军开路。商奴隶主贵族的部队，拼死进行抵抗，死伤甚重。战场上"血流漂杵"[67]。

纣王的十七万军队，一个早晨就"瓦解而走，土崩而下"[68]，绝望的纣王逃回朝歌，登鹿台自焚而死。

《诗经·大雅·大明》对牧野之战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

牧野洋洋，
檀车煌煌，
驷騵彭彭。
维师尚父，
时维鹰扬，
凉彼武王，
肆伐大商，
会朝清明！

这首诗描写的场面，提供了这场战争曾使用了较多的战车，周军的强大攻势和“前徒倒戈”使商纣大军在一个早晨就被击破的历史实况。

武王占领朝歌后，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宣告周人正式继承商朝，建立西周王朝，从而结束了商朝六百年的统治，姬发成为周王朝的开国之君。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1027年[69]。

周武王攻克商都后，又分兵四出，基本上控制了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同年四月，便胜利班师，回到新建的镐京（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以东的昆明池北岸）。

第五　牧野之战几个问题的探讨

一、商纣王失身亡国的教训

（一）对东西两面作战的战略指导失宜

商纣时期，对其统治最有威胁的敌人，是东面的夷族和西面的周族。东夷族众地广，对商时服时叛，武丁以后，势力已扩展到淮河流域及山东一带，进逼日甚。周族的姬昌父子，蓄志不小，施“仁”争众，力图扩展，对商是个潜在的威胁。如何对付这两个强大的对手，是纣王面临的严重问题。

商统治中心朝歌与东夷、西周的地理关系是处在内线受夹击的地位。商朝对西周曾杀季历，囚禁姬昌，企图以此限制周人的发展。对东夷则不断用兵，企图用军事镇压的手段，将其平定。可见商朝统治者有避免两面同时作战而拟先击破一方的战略设想。但周人逐渐强大而东夷不能平定，使其采取的战略不能实现。

待至周人攻灭黎、邘后，右翼暴露，对商都朝歌构成直接威胁时，纣王才决定集中力量，进出太行山区，对周人采取军事行动。但是东南方面的兵力空虚了，东夷各部乘机起来叛离。纣王拘泥于过去的战略，忽又停止在西线的军事行动，把主力调转东线，改变了先西后东的方针。

内线作战的原则，要求在决战方面集中主要力量，速战速决；在非决战方面应有足够的力量，以保障决战方面的胜利。纣王受周人的麻痹欺骗，放宽了对周人的控制和防范；在对东夷决战时，又陷入长期作战不能自拔。周人力量壮大后，乘纣陷于最不利的情况时，放下"事殷"的假面具，采取突然袭击战略，使得毫无防范的纣王，不能不手忙脚乱，应敌无策，致使牧野一战而亡。

纣王改变先西后东的战略，主要是对西周和东夷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没作全面的分析；孰强孰弱，先后利害，缺乏周到的考虑。《孙子》上说："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史实证明，西周的各种条件都在东夷之上，所以纣王以全力投入东夷战场，对西线的周人又没有防范，使处于内线作战的纣王在战略上已输了一着。

商对东南的经营，使中原文化逐渐发展到东南，对我国历史有一定的贡献。

（二）牧野决战作战指导失当

《左传》上有"纣之百克而卒无后"的记载。商王朝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付分散的方国部落，纣王确有百战百克的战绩。牧野之战是周商一次大的较量，是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这一决战失败，纣王身死国亡也就注定了。

牧野决战，商纣王在作战指导上有哪些失当呢？

1. 是对东夷不能速战速决，最后虽然取得一些胜利，兵力不能西调，虽然俘虏"亿兆夷人"，也不能真正充实商的力量，致使朝歌空虚，对周军的东进又无力拒阻，遂给周人以可乘之隙。

2. 是对西周没有防备。纣王为周文王的恭顺事商所麻痹，并拘泥于对西周的"遏制"战略，使得西周翦商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使周师东进，能毫无阻挡地兵临朝歌。在周军突然袭击的强大攻势下，纣王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勉强进行不利的决战，战败是不可避免的。

3. 是驱战俘而战的不智。纣王遭到周军的突然袭击，束手无策，竟然把从东方战场上虏来的大批战俘编组成军，妄图一战。纣王不对

战俘进行教育以改变他们的不满情绪，必然会发生爆炸性的危险。纣王将战俘配在前阵，妄图依靠他们抵住周军的强大攻势，待战斗开始后，“前徒倒戈”，掉转矛头冲击后阵商人的部队。两大势力构成的强大冲击，致使商阵立即土崩瓦解。

力量较小的崇国，婴城固守，尚能抵御周军三旬的强攻。纣王不量敌我强弱之势，不知“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70]的规律，自恃兵众人多，冒险出战。这些，都是纣王在牧野决战的作战指挥上的最大错误。

（三）商纣王虐政和统治集团内部大分裂，加速商王朝的灭亡

纣王统治时，一方面“厚赋税”，修宫室、耽迷酒乐；另一方面又施各种酷刑镇压人民。人民希望尽早埋葬这个残酷的奴隶主统治者。因此，西周举起反商的旗帜，就得到商人的热烈响应。周军所过之处，“高城若池，商庶若化”[71]，纷纷归附。武王率领八百诸侯这样一支人马众多的大军到达孟津渡口时，由于人民的支持和帮助，得以迅速横渡黄河。当周商两军战于牧野时，“前徒倒戈”，殷阵立崩。这些都是商纣必然战败的根本原因。

商王朝奴隶主贵族内部的大分裂，主要是因王位争夺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冲击而形成的，商纣王的暴行又加剧了这种斗争。外部反商力量的迅速壮大和对商王朝的生存威胁日益增长，使得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和表面化，公开或暗地勾结周人，众叛亲离，四分五裂，严重地削弱商王朝的国力。

总之，纣王采取先东后西的战略，征伐东夷而陷入长期作战和对西周的麻痹无备，是殷纣王在军事上失败的主要原因，而纣王的暴政和奴隶主贵族内部的大分裂，则是促成商王朝加速灭亡的政治原因。

二、周文王姬昌翦商谋略的运用

偏居西方一隅的周族，实力弱小，能够推翻地广人众、兵强马壮的商王朝，最基本的是由于创造性地运用“翦商”谋略：

周文王针对纣王“修政不德”，腐朽败坏、脱离人民的情况，“阴行善”，实行“爱民”和“裕民”的政策。

在“裕民”政策实施中，首先发展农业生产，使“居者有积”，“行者有囊”[72]，然后在经济上使各种行业得到全面的发展。他实行的“爱民”政策，在内部“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既取得各级奴隶主贵族的拥护，也缓和了平民和奴隶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

商开始对周人在西方的兴起十分警惕，前有季历的被杀，后有姬昌的被囚。当此时，如周人仍放肆地发展自己的实力，将会受到商王朝的严厉镇压而不能达到壮大自己的目的。周文王姬昌吸取以前的教训，采取恭顺事商，麻痹纣王的谋略以隐蔽自己灭商的企图，使“翦商”的各项准备工作，在“事殷”的掩护下得以顺利地进行。

西周实力增大后，不是先直接进攻商纣，而是先攻灭与周为敌的商属国，翦商羽翼，削弱商的力量，孤立商纣，以求改变周商的力量对比。在攻灭商属国时，坚持由后而前，由近及远，先弱后强，力避两面作战，实施各个逐次击破、蚕食弱敌的战略。

周文王姬昌很重视在政治上发动攻势。如“请纣去炮烙之刑”，作《誓》以揭露纣王的罪恶，宣扬自己“共行天罚”等等，都能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结合起来。西周对商纣一场场强大的政治攻势，不但把许多商属国、重臣争取过来，而且还笼络了各国百姓之心，甚至促使纣兵阵前倒戈，赢得了牧野决战的大胜。总之，周人强大的政治攻势，对覆灭商王朝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文王实际上已完成了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翦商”工作，不仅使西周具备了灭商的力量，也为后来武王伐纣时长驱直入扫除了障碍。

三、武王伐纣军事战略的运用

文王“翦商”完成后，周武王姬发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在一朝之内，一次决战就取得彻底的胜利，并覆灭了商王朝，其成功的原因，除“翦商”奠定胜利的基础外，对伐纣军事战略的运用，在当时条件下也作出前无古人的创造。

首先是正确选择决战的时机。文王“翦商”，攻伐黎、邘、崇诸国时，正是纣王改变先西后东、对东夷大举用兵之时，使纣王无暇西顾。

武王率诸侯联军东进伐商，又选择在商师主力远征东夷未还，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之时，既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造成的大分裂，又利用敌人在战略上的过失而展开进攻和决战，使敌人在战略、战术上都处于劣势和被动。另一方面，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给敌制造错觉，使其在战略上出现失误，便我乘之。

周武王在战略指导上，采用突然袭击的战法。乘商军主力陷于东线、朝歌空虚之时而大举伐纣，乘隙捣虚，一战成功。这是在战略上突然袭击。在牧野之战中，"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激励本军斗志，牵制迷惑敌人；"以大卒（主力）冲驰帝纣师"，对商阵进行突然、猛烈的冲击。商师猝然遭受冲击，加之"前徒倒戈"，十多万之众顷刻瓦解，这是在战术上的突然袭击。周武王善用这种"突然袭击"战法，是很符合孙子总结的"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73]的理论的。在当时条件下，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在车阵作战的战法上，周武王也有所发展。关于车阵的作战，是以战车排成横队，列在前面，而徒兵则跟在车后和两旁前进。因此由战车和徒兵构成一个战斗整体，才能发挥其机动力和冲击力。正因如此，车徒的协同动作和指挥，极为重要。因此，车阵必须保持整齐的队形，才便于指挥，便于协同，便于战斗。若队形一乱，就将陷入不可收拾的地步。

周武王在战前规定作战方法，几步、几伐（刺）就停顿一下，调整队形，以保持车阵的严整和坚固并能充分发挥其作战能力。这是在原始的车战战法上的一大发展，并启开以后车战训练"坐作进退"、"疾徐疏数"[74]战法的先河。

在组织和准备战争力量方面，如何能使事先未经过统一训练的盟国军队在战场上同心协力，果敢坚决地发挥整体力量，以极大的优势击破敌军，确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很重要的问题。周武王紧紧抓住对敌政治攻势和对将士政治动员这一重要环节，反复进行动员，并组织军事演练，统一战斗行动，规定战斗纪律和对待俘虏的政策。从牧野之战的战例可以看出，这种利用人民的心理和迷信观念，实行政治教育

和军事训练的策略，对提高士气，增强作战力量，起了重大作用。

总之，文王翦商和武王伐纣的战略运用，都是适合以弱胜强，以小胜大的实际情况的，并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总结中国古代战争的经验，使之在战略的运用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文王翦商和武王伐纣的战略，又都是在吕望的帮助下形成的。

周人起自西方，经受戎狄的侵凌和商王朝的镇压，在吕望佐周以后，逐渐形成一套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

《史记·齐太公世家》上说："太公博闻，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西归周西伯。"这就是说，吕望很有学识，是最早"游说诸侯"的纵横家。他"游说诸侯"虽"无所遇"，但可断定他的阅历很广，对当时的天下大势也甚熟悉。[75]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76]这就是说，文王翦商、武王伐纣的谋略，多出自吕望。他实为中国最早的军事家，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注 释

〔1〕 𢀛方、土方是居住今山西、陕西北部直到内蒙河套以北的游牧部落。羌方是居于𢀛方、土方以西的部落。鬼方活动在今陕北、内蒙及其以北的强大游牧部落。

〔2〕 箭镞是战争中损耗最大而又不易回收的兵器，青铜产量不大的国家不能用青铜做箭镞。在世界其它青铜文化中，很少发现青铜镞，而我国郑州、安阳殷墟就出现大量青铜镞。这说明当时的青铜手工业已有较大规模和相当高的程度了。

〔3〕 商代奴隶主阶级的主体，是由与商王有着血缘亲族关系的"王族""多子族"，即所谓同姓贵族构成，而以异姓贵族为辅。"王族"是与商王有近亲关系的家族，"多子族"是与王室有血缘关系但稍为疏远的家族。

〔4〕 《尚书·无逸》

〔5〕 《后汉书·东夷传》

〔6〕 《史记·殷本纪》

〔7〕 《论语·子张》

〔8〕 《史记·殷本纪》集解

〔9〕 《史记·殷本纪》

〔10〕 《诗经·大雅·荡荡》

〔11〕 这一段史实，见《诗经·大雅·绵》。

〔12〕 《诗经·大雅·公刘》

〔13〕 《诗经·大雅·公刘》

〔14〕 《史记·周本纪》

〔15〕 《后汉书·西羌传》

〔16〕 后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曾在尧舜时代做农官，教民耕种。公刘是古代周族领袖，后稷曾孙。夏代末年率领周族迁到豳（今陕西彬县东北），观察地形水源，开垦荒地，安定居处。

〔17〕〔18〕 《史记·周本纪》

〔19〕 《竹书纪年》

〔20〕 《史记·周本纪》正义：文马是骊戎（今陕西新丰）产的赤鬣缟身骏马，目如黄金。九驷是有熊氏（河南新郑）产的三十六匹骏马。

〔21〕 《史记·齐太公世家》

〔22〕 《史记·周本纪》

〔23〕 《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证明文王称王前实已立国四十四年。周人推翻商纣统治，夺取全国政权的实际准备工作，是在文王称王后的七年中。此时，周在政治上已宣布独立，脱离商朝中央政权，由商的臣属变为与商纣相对抗的势力。实际上已经"受命称王"了。

〔24〕 《资治通鉴外纪》卷二

〔25〕 《六韬·文伐》

〔26〕 《资治通鉴外纪》卷二

〔27〕 《淮南子·道应训》

〔28〕 《六韬·文韬·盈虚》

〔29〕 《六韬·文韬·国务》

〔30〕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意思是：农业税率九抽一，做官的给以世代承袭的俸禄，在关口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任何人到湖泊捕鱼都不禁止，刑罚只及于本人而不株连妻室儿女。

〔31〕 《史记·殷本纪》

〔32〕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

〔33〕 《资治通鉴外纪》卷二下

〔34〕 《诗经·大雅·文王》

〔35〕 《史记·齐太公世家》

〔36〕 文武师："师"是辅佐国王的，一般兼领众宰，为最高执政官。平时用以治国（文），有事用以行师（武）。称吕望为师尚父。

〔37〕 《史记·齐太公世家》

〔38〕 《左传》僖公四年

〔39〕 《史记·殷本纪》

〔40〕 《诗经·大雅·绵》

〔41〕 《史记·周本纪》

〔42〕《左传》昭公七年

〔43〕《孙子·用间篇》

〔44〕周文王进攻犬戎、密须、阮、共等方国的史实，见《诗经·大雅·皇矣》，有"帝迁明德，串夷载路"，"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的记载。

〔45〕《史记·殷本纪》、《尚书·西伯戡黎》：祖伊失声惊呼："上天已结束我们殷朝的大命啦！"

〔46〕《史记·周本纪》

〔47〕这一段史实，见《左传》僖公十九年："文王闻崇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48〕这一段史实，见《诗经·大雅·皇矣》："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又"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信连连，攸馘安安。""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

〔49〕《周原·卜辞》有"伐蜀、征巢、楚子来告"等记录。

〔50〕《资治通鉴外纪》卷二下

〔51〕《韩非子·十过篇》："纣为黎丘之搜，而戎狄叛之。"叛离纣王者，不只东夷。

〔52〕《左传》昭公四年

〔53〕木主即灵牌

〔54〕〔55〕《史记·周本纪》

〔56〕《左传》昭公四年

〔57〕《资治通鉴外纪》卷二下、《吕氏春秋·慎大览》

〔58〕《诗经·大雅·大明》："……保右命尔，燮(袭)伐大商。"

〔59〕虎贲：有勇力之徒士。

〔60〕《六韬·武韬·兵道》

〔61〕庸居今湖北西部，蜀居今四川北部，羌居今甘肃境内，髳居今河南西部，微、卢、彭均居今湖北西部，濮居今湖北北部。

〔62〕《尚书·牧誓》

〔63〕《尚书·牧誓》

〔64〕《孟子·尽心章句下》

〔65〕《史记·周本纪》载："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距武王"。七十万疑为十七万之误。陈子龙：《史记测义》也认为："纣只发畿内之兵，疑无七十万之众也。且三代用兵亦无近百万者。"又，《太平御览·皇王部八》："纣有亿兆夷人，起师自容闾至浦水，与同恶诸侯五十国，凡十七万距周于商郊之牧野"。

〔66〕致师：左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进行挑战，以激起全军的战斗意志。

〔67〕古文《尚书·武成》："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68〕《淮南子·泰族训》

〔69〕关于西周建立的年代，即武王灭纣的年代，众说纷纭，到目前为止，有不下十七、八种说法，从公元前1027年到1130年说都有。据《竹书纪年》说，"西周武王灭殷，以至（于）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西周灭亡于公元前771年是准确的，由公元前771年上溯二百五十七年，为公元前1027年。一般据此推断这年为西周建立之年。

〔70〕 《孙子·谋攻》
〔71〕 《逸周书·武寤解》
〔72〕 《盐铁论·盐铁取下篇》
〔73〕 《孙子·九地》
〔74〕 《周礼·夏官司马》
〔75〕 《史记·齐太公世家》
〔76〕 《史记·齐太公世家》

第三章　春　秋　争　霸

第一　春秋争霸战争的出现及战略探讨问题的提出

奴隶制的周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将周室同姓和功臣亲信分封在全国各个重要地区，让他们建邦立国，以为周朝的屏藩。这些分封的诸侯，拥有封土，世代相袭。他们可以在封土内修筑城池，设置军队，行使一切统治权，因而形成许多从属于周与周有宗法关系而又相当独立的封国。

周王朝后期，统治日渐衰落。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因受犬戎侵扰，周平王放弃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迁往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此后，史称东周，开始了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

我国春秋时期，共历294年(前770年到前476年)，是我国奴隶社会逐渐瓦解并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代；是西周分封和宗法制度破产，王室无力控制诸侯，诸侯相互兼并的时代；是我国古代边疆各少数民族部族在商周文化影响下，发展了社会生产并与中原华夏族融合同化的时代。可以说这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封国与王朝、封国与封国间的矛盾……都汇集到一起来了。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于是战争频繁，斗争不已。仅鲁史《春秋》记载，在242年当中，就发生大小483次军事行动（孔子作《春秋》自前722年开始至前481年止共242年)。由于分封各国各部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及战争的胜败，有的国家强大起来了，有的衰弱甚至灭亡了。新兴大国以尊王攘夷为号召，都企图控制中小国家，以对付竞争对手并谋取小国的贡赋。而中原腹地诸国地当冲要，自然就成为大国争夺的对象，它们只好依违于大国

之间，以图倖存。这就出现了大国争霸中原的局面（“霸”同“伯”，是盟主的意思，与后世的恶霸等贬词不尽相同）

春秋争霸战争的规模由小到大；战争的地域由平原发展到山地、河川、湖沼地带；作战的类型由车战为主发展到步战、水战，也孕育着骑战（春秋以前，经传无骑字，但战国时期出现骑兵，这当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必定有一定的孕育过程）；使用的兵器，也逐渐由铜兵器发展到铁兵器。在这样复杂频繁而丰富多彩的战争历程中，熏陶出了不少具有机巧权变的卿相和英明果断的国君。他们所作的富国强兵的策划，料敌制胜的谋略，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这不特为我国古代灿烂辉煌的兵书——《孙子》《司马法》等的作者总结战争经验教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现在批判地接受祖国军事遗产，加深对某些战争规律的认识，进一步了解祖国战略、战术、军事思想的演进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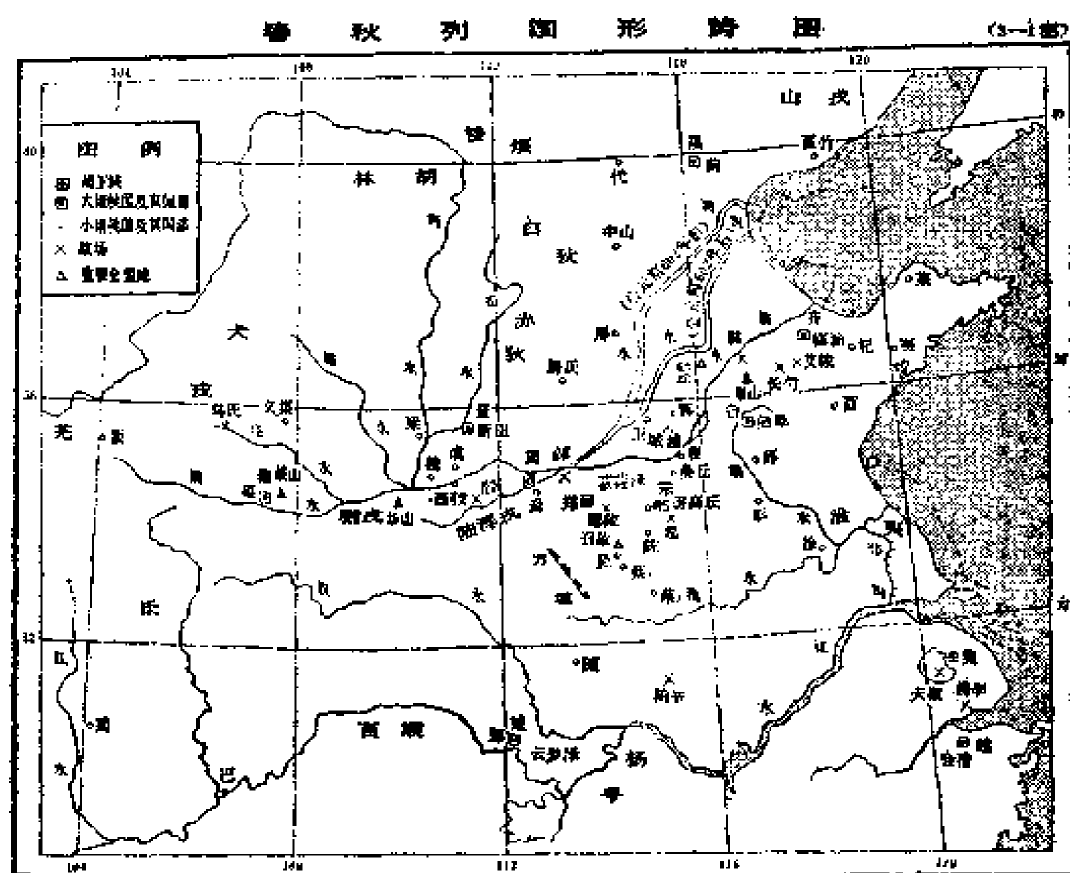
为了便于研究，本章依争霸战争的演进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探讨。第一阶段，由平王东迁到齐桓公死亡(前770年到前643年)。这是中原诸侯及戎狄混战，和齐桓公独霸中原时期。主要研究：为什么称霸的不是西周所封的鲁、卫等大国而是齐国(以后为晋、楚、秦)？为什么“五霸桓公为盛”？齐桓公霸业的历史作用及其战略运用的得失等等。第二阶段，由齐桓公死至宋大夫向戌提倡弭兵会议之年为止(前643年至前546年)。这是晋楚长期争霸时期。主要研究：宋襄公为何霸业不成？晋、楚长期争霸在战略上的原因何在？关键性战争——城濮之战、崤函之战、鞍之战……等的战略运用得失及深远的战略影响如何？第三阶段，由弭兵会议之年至越灭吴为止(前546年至前473年)。这是吴越争霸时期。主要研究晋联吴制楚，楚联越制吴的战略运用，吴越两国战略运用上的得失，关键性战争——柏举之战，笠泽之战的战略影响及其成功与失败在战略上的原因何在？

第二　齐桓公的霸业

一、齐桓公称霸的客观形势

周平王东迁至齐桓公始霸之年，周釐王三年(前679年)，历时九十一年。在这九十一年当中，周天子直接管理的国土很小，力量渐微，共主已名存实亡，不能继续有效地控制各诸侯国，中原诸侯，自相攻伐，处在一片争夺兼并的混乱状态中。郑、卫、鲁、宋诸国，或为王室近亲，或者爵位显赫，本有挟周室以号召诸侯的有利条件。但他们受宗法影响较深，陈腐的东西过多，加之处于四战之地，领土狭小，没有发展余地，而且互相削弱，不能富国强兵，成为大国。所以鲁国只能维持中等国家的局面。郑国虽曾称盛一时，终不够强大。郑庄公死，他的两个儿子争国，国势就一蹶不振。齐北邻的燕国与中原远离，单独地存在于北方，国力不强，不能独自对抗戎族。在今日的陕西省，秦国兼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扩大了领土，但戎族的威胁仍然存在。晋国吞并了霍、魏、耿等国家和北狄一部分部落，据有今山西省南部地区，成了一个比较大的国家，秦晋两国与在今日山西、陕西北部的夷狄杂处，民性强悍，崇尚武勇，而且地处中原边缘，有较大的扩展余地。但秦生产落后，晋内乱不已，亦不能阻止戎狄的侵扰。齐国“自泰山属之琅琊(今山东胶南县南)，北被于海(指今日的渤海)，膏壤二千里”[1]，在这时期中，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兼并了一些小国。但齐襄公时，政治混乱，齐桓公即位之后，才开始安定下来。就在这周室王权衰落，中原混战的时候，夷狄的势力，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戎族占有西周故地的一些地方，且继续向东发展。伊洛之戎威胁着东周，山戎侵入燕国。鬼方的一支狄族，据有今陕西、山西北部。周平王四十一年(前730年)，北狄曾进扰晋国至晋都城绛(今山西翼城县)附近。从今日的河北直到山东的一些地区，还散布着狄人的许多部落。邢、卫、齐、鲁、宋诸国，都受到扰乱。在今日湖北境内的楚国，原被中原华夏诸国视为南蛮，这时逐渐强大起来，灭了群蛮、百濮、卢戎等

部落，并北上灭了汉水流域的诸姬姓小国，进出中原，灭了申、息等国，给中原诸侯国以极大的威胁。《公羊传》说："南夷与北夷交，中国不绝如线"，就是那时局面的概括。在这中原乱成一片，戎、狄、蛮、夷纷纷进扰，中原诸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有人振臂一呼，领导各国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当然是很容易为中原各国所接受的。这时秦、晋两国国力还远不如齐国，不能成为齐国的竞争对手。楚国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其国力亦未达到与齐国势均力敌的境地。所以盟主的责任，当然落在管仲治齐后的齐桓公肩上了。这就是"齐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的客观形势，也是"五霸桓公为盛"的客观原因。（参阅插图3-1）



二、齐桓公图霸的战略方针和重要措施

齐国地方千里，土地肥沃，宜于农耕，滨海之区，富渔盐之利，

便于发展经济，人民又勤劳智慧努力从事生产。齐国这些有利的因素，无疑具有称霸的客观条件。但是同样是这块土地，同样是这些人民，齐国在齐桓公之前及其以后都未能称霸，则齐桓公与管仲通过主观努力，把客观的可能变成现实是很不寻常及不能等闲视之的。

齐桓公于周庄王十二年（前685年）即位后，任用管仲执掌国政。

管仲初见齐桓公时就提出“君霸王，社稷定”[2]（国君能建立霸业或王业，政权才可以巩固）的主张。但齐桓公无意建立王业，勉强同意图谋霸业。管仲知道，地大国富，人众兵强[3]，是霸业的根本。要“计必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4]（如果计划不周就出兵，战就会自己失败，攻就会自己毁灭）。所以当齐桓公即位不久，“欲诛大国之无道者”，管仲即阻止说：

“不可，甲兵未足。”[5]

同时管仲还认为“诸侯合则强，孤则弱”[6]，主张“尊王攘夷。”由此可以看出，齐桓公、管仲图霸的战略方针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7]，尊王攘夷，争取与国，向外建立霸业。

根据这个方针，管仲因势利导，采取各种重要措施，从事改革。

首先，他采取重农政策。他认为：

“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8]

因此，他实行“均土分力”[9]（把公田变为份地），“相地而衰（差别）征（征收）”[10]，以调动奴隶们的积极性。因此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其次，他推行工商政策。他将齐国都划分成二十一个乡，工商之乡六，令工商之民居之，使直属于齐桓公。设专官以督导之，而且还令世守其业，使子孙世代相传，以求各行各业技术专精。齐国本富渔盐之利，工艺、铁器也相当发达，经他这样奖励生产，于是齐国渔、盐、工艺及铁器等，畅销于中原各国。因为盐与铁是人人所需，所以他把盐铁作为专卖品，统制统销，国库得到充实。为了交换方便，管

仲还制造金币，作为贸易的媒介，并且用以平衡米粟与物品的价格。谷贱，则政府收购谷物，谷贵，又卖出以利工商，所以工商业又很发达。

富国的同时，管仲又“作内政而寓军令”[11]。他把齐国都二十一个乡中的十五个乡，令士民居之，世代为兵。桓公与高子、国子各率领五个乡。乡的组织是五家为轨，设轨长；十轨为里，设里有司；四里为连，设连长；十连为乡，设乡良人；五乡为师，分属于齐桓公及高、国二上卿。内政上的轨，里、连、乡，同时又是军事组织。轨每家各出战士一人，故五人为伍，轨长率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率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率之。五乡为师，故一万人为一师。士农之乡十五，故可编成三个师，分别由齐桓公和齐国世卿国子、高子统帅。工商之乡不参加军队。

人民殷富，兵源充足以后，管仲就着手充实兵器，加强训练，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认为，“是故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12]，“以教卒、练士击驱众（驱赶而来的老百姓乌合之众）白徒（民夫）”[13]，才可以百战百胜。所以他采取每年春秋二季举行两次田猎来练兵，春天叫“蒐”，训练得胜收兵回国。秋天叫“狝”，训练出兵作战。他实行“薄刑罚以厚甲兵”[14]的办法令人民以兵器赎罪，来充实兵器。这样，齐国兵强卒练，国威大振。

管仲于是以实力为后盾，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以会盟为手段而图霸中原。《史记》有如下两段记载：“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隰朋、高傒修齐国之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15]，“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16]。

史称齐桓公九合诸侯，事实上不止九次，其重要的会盟如下：

周釐王二年（前 680 年），齐桓公请命于周天子，以天子之命召集陈、曹两国，与齐及周王派来的单伯会师伐宋，宋国只得屈服。明年春，齐又在鄄（今山东鄄城县）与宋、陈、卫、郑五国会盟，争取

了宋、郑、卫等国服从齐国，这是齐桓公霸业的开始。

周釐王四年（前678年），齐桓公为了争取郑国和鲁国，与鲁、宋、陈、卫、郑、许、滑、滕等九国会于幽（今河南兰考县东）。周惠王五年（前672年），楚文王死，成王立，锐意进图中原。陈、郑两国慑于楚国的形势，都暗中与楚国联系。齐桓公为了坚定陈、郑二国的信心，又于周惠王十年（前667年）与鲁、宋、陈、郑会于幽，这样就把中原诸侯团结到齐国一边来了。

周惠王十三年（前664年），山戎进扰燕国，燕向齐国告急，齐桓公就率兵讨伐山戎，灭孤竹国（今河北卢龙县一带）而还。燕庄公送齐桓公入齐国境内，齐桓公说："非天子，诸侯护送不出境，吾不可无礼于燕"，于是割燕庄公所至之地给燕国，叫燕君恢复召公的德政，并要燕象周成王、康王时代一样向周天子纳贡。诸侯听闻之后都称颂齐桓公，并乐于尊他为霸主。

两年之后，即周惠王十六年（前661年），狄人扰掠邢国（今河北邢台县西南），邢军大败。次年，狄人又侵入卫国，杀死卫懿公，灭亡了卫国。齐桓公就联合宋、曹二国的军队，大败狄人。然后为邢筑夷仪城（今山东聊城县西），供邢国的人民居住，筑楚丘城（今河南滑县东），恢复卫国的政权，还派兵帮助卫国守备。

齐桓公"尊王攘夷"的政策，大大收到了效果。北方后顾之忧解除了，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也更加巩固强大。恰好这时楚国也国力强盛，向中原发展，屡次进攻郑国。于是他转而向南，阻止楚国对中原的进扰。

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率中原诸侯之师侵蔡伐楚，进到楚国边邑陉（今河南郾城县陉亭）。楚国见诸侯之师强大，遣他的臣子屈完求盟，齐桓公就乘机退回召陵（河南郾城县东）。由于双方都不敢轻于开衅，于是楚和齐所率的诸侯在召陵会盟而还。这次会盟之后，楚停止了向中原北进，中原因而得到短时期的安定。

周惠王二十五年（前652年），周惠王死了，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于洮（今河南濮县西南），以定周襄王之位。

这时齐桓公北服戎狄，南威荆楚，又定襄王之位，霸权达到了顶点，于是周襄王元年(前651年)，又作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境）之会。

这年(前651年)晋献公死了，国内大乱，齐桓公又遣使会同秦穆公立晋惠公。

周襄王三年(前649年)，王子带引伊洛之戎寇王京。秦穆公、晋惠公兴兵驱逐戎部落，齐管仲也率兵会师，戍守洛邑。

周襄王五年（前647年），齐桓公会诸侯于咸(今河南濮阳县东南咸城)，解决王室戎难，讨淮夷，保障杞国（今河南杞县)。由于戎、狄、夷文化较低，进扰抢掠，目的在财富而不一定占领土地，经过齐桓公与中原诸侯多次征伐，威胁逐渐减除。只有楚国，恃国力强大，召陵盟会之后，又改变方向，进攻淮泗流域的夷族小国。因此，齐楚之争也转向淮泗地区。

周襄王七年(前645年)，楚成王伐徐（今安徽泗县南)，齐桓公又作牡丘之会(今山东茌平县东)，率宋、鲁、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师救徐。

次年(前644年)又会于淮(今河南柘城县附近)，筑鄫城(今河南睢县东南)以御淮夷，防止楚势力向东发展。

周襄王九年(前643年)春，齐徐联军伐英氏(今湖北英山县)。夏，又遣鲁师灭项(今河南沈丘县)，企图阻止楚国向东北发展。但这年管仲与齐桓公相继逝世，齐国五公子争立，齐国霸业就此衰歇，但仍始终不失为一大国。

三、齐桓公霸业的历史价值和战略运用的得失

齐桓公的霸业，主要得力于管仲。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17]，孔子虽是站在当时华夏族的立场，讲这一番话，但历史地看问题，齐桓公、管仲的霸业，既对当时齐国的社会发展有一定的作用，也保护了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经济免遭戎狄的破坏，然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华夏与戎狄夷越等族融和，才有发展成为汉族，产生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

的可能性，对祖国确实是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的。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司马迁也说诸侯“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18]但是事实上争霸战争，促进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演变，加快了民族融合、同化的过程。春秋之初，见于经传的，有一百六十余国，争霸的结果，就只剩大小十几个国家了，这就为全国统一准备了条件。所以争霸战争是逐渐实现统一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齐桓公首创霸业，是有其历史作用的。

齐桓公采纳并推行管仲“富国强兵”积蓄雄厚国力、争取与国、计定于内然后兵出于外的战略方针，是十分成功的。

齐国本来就相当富庶，经他们按上述方针进行准备，不数年、齐国不仅经济发达，兵源充足，而且由于作内政寄军令，组成的军队，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乱，战斗力极强。“以守则固，以战则胜”[19]，使中原诸侯畏服，愿意接受领导。所以齐桓公、管仲励行富国强兵，奠定争霸的物质基础，这是他们主观努力最根本最成功的一着。齐桓公号召“尊王攘夷”，以争取与国，使师出有名，对于他“九合诸侯”，是有一定作用的。

当时，周王室衰微，失去控制诸侯的能力，但是齐桓公又为什么打出周天子这面破旗呢？原来当时的诸侯，都是周天子分封的。“共主悉臣之义，犹在人心”[20]。诸侯还重祭祀，论宗姓氏族，朝聘盟会不绝，这些周室的老规矩也还影响人心。挟天子以令诸侯，便可争取与国，也便于压服敌对的诸侯。鄄之会，齐桓公请命于周天子，周天子派单伯来会师，于是迫使陈、曹都会师伐宋。宋也就借天子之命，保全体面而表示服从，于是宋、卫、陈，郑等国，承认齐桓公为盟主。这样就把邻接齐国的诸侯争取到自己一边来了。召陵的盟会也是这样，楚国派使臣责问齐国为何入境进犯，管仲于是抬出周王室的命令，摆出侯伯（诸侯之长）的架子说：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

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楚使咨见大帽子扣来，马上就避重就轻地认罪说：

“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意思是说昭王是在汉水翻了船淹死的，与楚无关）”。

最后楚王又遣屈完与齐桓公交涉，齐桓公把诸侯的军队列成阵势，与屈完一同观看，显示威风并表示希望与楚修好。屈完马上表示这是“寡君之愿也”。齐桓公恐吓屈完说：

“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屈完软硬兼施地回答说：

“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21]

齐桓公知楚国有一定的实力不可小看，只要口头认输，也就趁势让楚国及诸侯会盟而还。这样齐桓公挟王命以讨不臣，表示师出有名，楚国只好表示怀德而不畏威，使齐桓公可以顺风转舵，因而缓和了矛盾，没有发生大战，而暂时遏止了楚国的向北发展。

至于攘夷，由于华夏诸国，象一盘散沙，一旦戎狄进扰，形势就更危殆。只要有人号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就正合各国需要，所以齐桓公听信管仲“戎狄豹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暱，不可弃也”[22]的建议，执行攘夷的方针，北伐山戎救燕，西伐北狄救邢存卫，并于救燕后，割地赠燕，要求燕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室。攘夷、尊王，做得仁至义尽一下就将中原诸侯，团结到齐国周围来了。北方戎狄的气焰被压下去了。在诸侯承认了齐国的盟主地位之后，齐国才大举南下，与楚争斗，遏止楚国北进中原。齐桓公与管仲“尊王攘夷”的号召（也可以说是战略手段）确实是有助于他们完成霸业的。

齐桓公霸业，战略上不足之点，似在于他对楚专守，既不歼灭敌人，也未消耗敌人。召陵之会，未与楚决战，未给楚以决定性的打击，使其国力国威都受损失而不敢也不能再轻于进犯中原，是很失策的。齐桓公所率领的诸侯之师，肯定战斗力不齐一，但越过蔡国伐楚之初，就应该估计能不能一战胜楚，如估计不能，伐楚就是冒进。既伐楚进

到了陉，当然是有不惜一战的决心的。从他"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一语来看，兵力显然处于优势。兴师动众，越国远征，不趁此机会迫楚一战，消灭其主力，当然有"一日纵敌，数世之患"的缺点。事实上也留下以后楚国改变方向，进攻淮泗流域诸小国的后患。而且以后齐桓公对此也只作牡之会、淮之会，筑鄫城对楚进行防堵，这样专守防御的战略，造成到处防堵到处薄弱的局面。结果楚国到处攻占领土，国力日强，势焰益彰。这就清楚地看出齐桓公战略上的缺点。这也是楚国能进出中原长期争霸的原因之一。

从屈完"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的话来看，楚国的战略方针是"据险自守"，对此齐桓公似乎是求战不易，攻坚难克。但是深入一步追究"昭王南征不复"，迫楚归还诸小国的侵地，或"攻其所必救"，迫楚出战，还是可能的。齐桓晋文，时代相去不远，晋文能这样作，齐桓不这样作，确实使人有"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感觉。

再说，即使召陵不与敌决战，也应继之采取消耗战略，消耗楚国。不采取这样的步骤，致使以后楚国势力弥漫中原，不能不说这是齐桓公战略上的失策。

"而今四海为家日"，荆楚、华夏早已融合成一个民族，我们论的是齐桓公的霸业，是就当时齐桓公争霸的战略立论的，不是出于左袒华夏，敌视荆楚。

第三　晋楚长期争霸的战略

齐桓公死、齐霸业衰落。楚国力日益强大，楚成王锐意北进。宋襄公图霸不成，未能阻止楚国向中原进攻的狂澜。恰好此时晋国崛起于西北，晋文公企图取威定霸，因而与楚国北定中原的战略发生矛盾。晋楚争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一、宋楚泓之战

《孟子·公孙丑篇》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在大。"从军事角度看，前两句话完全正确；后两句话，则是

迂阔的空话。宋襄公争霸不成，连性命也送掉了，就是很有力的说明。

宋襄公一贯标榜仁义。当他作世子时，就曾向他父亲宋桓公请求，立他的庶兄目夷（即子鱼）为宋君，因此得了“让国”的贤名。齐桓公也非常器重他，还把自己的世子姜昭继位的事拜托宋襄公。齐桓公死，五公子争立。宋襄公仗义兴兵领导诸侯平齐内乱，立世子昭为齐孝公。宋国有战胜的威风，又是公国，爵位最高，宋襄公于是就自以为他仁义昭著，应当继齐桓公为霸主。他一见楚国进入中原，就想起而领导诸侯，与楚抗争，但宋的国力远不如楚国。楚成王很英明，专任令尹子文，把楚国治理得很好，兵威很盛，郑、卫诸国都亲服于楚。宋襄公不考虑客观形势，而只以“仁义”为政治号召，以会盟为手段，谋求作盟主。周襄王十四年(前638年)，他以“仁义”约楚成王及诸侯在盂(今安徽霍邱县)为衣裳之会(不带军队的盟会)。不料楚成王带了军队来参加会议，把盂围了起来，活捉了宋襄公，并押着他攻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幸太宰子鱼坚守，楚围攻数月未下，才把宋襄公释放了。宋襄公归国后，恨郑国亲楚，于是于周襄王十四年（前633年)，兴兵攻郑。郑求救于楚，楚于是伐宋以救郑。宋襄公被迫由郑撤军，回到宋境内泓水（涡河的支流，经今商丘、柘城间东南流)，与楚军相遇而发生战斗。这就是泓之战。《左传》有以下一段记载：

> “冬十一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未渡河完毕)。司马(即子鱼)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列阵完毕)而后击之，宋师败绩(打了败仗)。公伤股，门官歼焉(守门的人，战斗时在宋襄公左右，全被歼灭)。”[23]

这一仗宋军兵力虽然处于劣势，但在形势上却占先制之利，本可乘楚军半渡而击之。然而宋襄公放过了战机打了败仗，还说：“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俘虏头发花白的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向未列阵的敌人冲去）。这一仗宋襄公可算得仁义到了极点，但战争的胜败，并不

以“仁”为转移，而是以智之大小力之强弱来决定的。对比齐桓公成霸业与宋襄公图霸不成的事迹可以看出，只有富国强兵，积蓄雄厚的实力，然后才可以图霸，徒借空虚的“仁义”为号召，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要“以力假仁”才能称霸。这是争霸战略上的重要前提。宋襄公不明此理，不注重实力，空谈仁义，所以战略上先输了一着。但是战略全局，不能脱离局部的战役而独立，关键性的战役胜利了，也可挽回战略上的不利。泓之战，宋有乘楚军半渡而击的机会，有以少胜众的可能，然而宋襄公又讲仁义，坐失机会，结果图霸不成，国家弄得一蹶不振。毛泽东讽喻其为蠢猪式的仁义。至于王不在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全非事实。汤以六百诸侯放桀，武王以八百诸侯伐纣，还是依靠实力。

二、城濮之战晋、楚双方的战略

（一）中原形势及晋楚争霸企图

楚成王击败宋襄公之后，声威很盛，中原诸侯郑、许、陈、蔡诸国早已屈服，于是在军事、外交上双管齐下，以囊括中原。他娶卫文公之女为夫人，与曹国通好，厚待来降的宋成公，又趁齐鲁交哄，应鲁国之请出兵援鲁，占领齐国的穀邑（今山东东阿县），立公子雍以窥伺齐国，并留申公叔侯戍守，一面用齐桓公之子七人为大夫，企图分化齐国使其屈服。

泓之战后二年，周襄王十六年（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晋公子重耳，由秦穆公援助，回到晋国，立为晋文公。晋国据有今太原、隰县以南的山西南部，及陕西的韩城、澄城、白水、合阳、大荔、骊山、临潼、华县、华阴、潼关，河南的灵宝、陕县、渑池、济源广大地域。晋献公时已把晋军扩编为上下二军，兵力也相当强盛。只因晋献公死后，国内陷于混乱，无力过问中原。晋文公回国后，修明政治，广用人才，委任狐偃、赵衰、先轸等以军国重任，重新团结了统治集团[24]，并整饬纪律，树立威信，兴修水利，减轻关税，通商宽农，崇俭省用。数年之间晋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逐渐兴盛坚强。晋国君臣图霸之心日渐滋长。就在晋文公即位这一年，周襄王被王子带赶了

出来，逃到郑国。第二年，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年），秦穆公准备派兵送周襄王返国，晋狐偃向晋文公说：

"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25]

晋文公同意他的建议，并与秦穆公协定，由晋就近派兵送周襄王回洛阳。周襄王认为晋文公勤王有功，就赏赐他"南阳之田"。晋于是得以占有阳樊（今河南济源西南）温（今河南温县）原（今河南济原县北）横茅（今河南修武）一带地方。这一下晋国既获得了尊王的美名，又为进入中原准备好了安全渡过黄河的进出路[26]，为他争霸中原创造了有利条件。就在这年，晋文公还派兵协助秦穆公攻占楚国的商密（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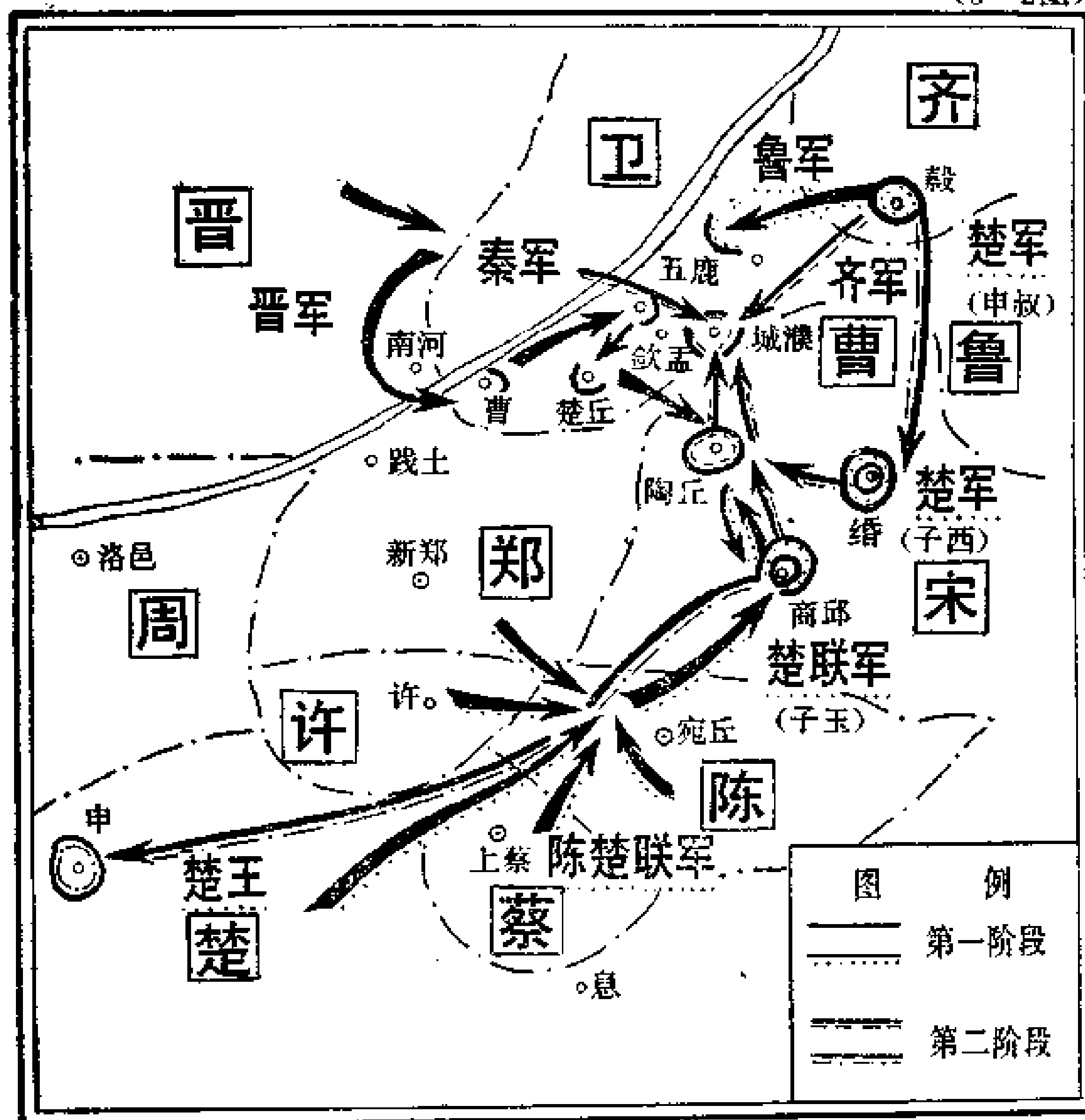
秦穆公内修政治、外结好晋国，国势也日益强盛，唯国力尚不及晋、齐、楚诸国。

从以上这些情况分析：此时中原只秦、晋和齐国还未屈服于楚。楚趁齐鲁交恶，齐国内部不稳之际，向东北进军，虽有劳师远征的缺点，但齐国内外交困，易于压服。待齐国屈服，楚国控制黄河以南广大地域后再转锋对付秦晋，有先弱后强，各个击破之利，所以楚国此时的战略是未可厚非的。

晋国君臣积极图霸，内修政治，整军经武，为霸业打下基础。然后对外结好秦国，打出尊王的旗帜，争取中原诸侯倾向晋国，以与楚国竞争，战略上是非常成功的。"尊王"在中原还有市场，"攘夷"又可加深中原各国与楚国的隔阂，借以增加楚国的阻力，而为自己争取与国造成有利的条件。尤其高妙的是拉拢秦国：勤王让秦穆公分享美名，使自己获南阳之田的实惠而秦不疑嫉；助秦取商密诱其向南发展，既讨好秦国、减少秦晋摩擦的机会，又导致其与楚为敌，增加楚国后顾之忧；晋国此时虽有一定的实力，但楚国毕竟是兴盛几十年的大国，兵力对比还是楚强晋弱，拉拢秦国，就可以部分改变这一形势，增加晋国争霸的资本。真可以算得一举三得。

晋国强盛，秦晋和睦，引起了中原形势变化，也加快和加深了晋楚的矛盾。晋楚战略上针锋相对，旗鼓相当，就只待最后战略决战了。

（二）城濮之战晋楚双方的战略决策（参看插图3-2）



泓之战以后，宋成公降楚，原是出于威逼，并非甘心屈服。他见晋文公勤王之后，威望日高，国势日强，于是就转而与晋国通好。楚成王因宋背楚从晋，就于周襄王十八年（前634年)冬，分其援鲁伐齐的兵力之一部围攻宋的缗邑（今山东金乡县）。宋成公仍不肯低头。楚成王就于周襄王十九年（前633年)冬，率领陈、蔡、郑、许联军攻

宋，包围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宋成公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这时楚国强盛，晋文公返国仅四年，虽然全国一派兴盛气象，晋国君臣一直雄心勃勃，图霸中原，但面对这重大的关键性决策，历尽险阻艰难，通达人情世故的晋文公，当然不能不深思熟虑：如救宋，就要远程奔赴宋国，有侧背受楚的与国曹、卫威胁的危险和以劣势兵力与优势敌人进行决战的不利。如不去，宋国力尽援绝就会降楚，争霸中原就大成问题，犹豫再三。先轸为坚定晋文公的决心，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27]就在此一举。狐偃针对远道救宋不利的情况，想出了攻其所必救，调动楚军北上，从改变主客形势的办法，说：

"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28]

晋文公采纳了这个调动敌人变被动为主动的战略。并把晋国的二军扩编为三军，于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正月，集中兵力于晋卫边境、借口曹共公在晋文公流亡时对他无理[29]，现在兴兵问罪。向卫国假道，卫成公不许。晋军于是秘密撤回，绕道从南河（今河南汲县南黄河渡口)，渡过黄河，突然袭占卫国五鹿(今河南清丰县西北)。并进军敛盂(今河南濮阳县东)、与齐昭公盟会。卫成公见齐晋同盟，声势浩大，请求加盟不成，又向楚告急。卫人起而驱逐卫成公。晋国兵不血刃占领了卫国。鲁国本来派兵援卫，及见齐晋联盟，晋军势盛，也转而讨好晋国。晋军既解除了后顾之忧，就由敛盂攻破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西北)，俘虏了曹共公。

晋攻曹卫，原是为了调动楚军解宋之围，但楚军不受调动，围攻宋都更急。宋向晋告急。晋文公见调动楚军北上的计谋未成功，而宋情况危急，于是忧虑地说：

"宋人告急，舍之则绝。告楚不许，我欲战矣，齐、秦未可，若之何(怎么办)?"[30]

从战略上看，楚国不受调动，而急攻宋国，就变被动为主动，反而迫使晋国非南下救宋不可。晋国此时虽然已占领曹卫，南下救宋，已解除了侧背威胁，但不得齐、秦两国协力，单独对付楚国与郑、

许、陈、蔡诸国的联军，兵力仍居于劣势。兵处劣势而又远离本国，很容易遭受歼灭性打击。晋文公考虑到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中军元帅先轸又提出了争取齐秦参战的策略，说：

“使宋舍我而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能无战乎？”[31]

晋文公实行了这一策略，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两国的调停，齐秦两国终于出兵参战。这样一来，战略形势就完全变了，不仅齐、晋、秦、宋四国联合对楚，兵力由劣势转为优势，而且战略态势也大大不利于楚国。楚国漫长的战线，最北的在谷邑，主力在商丘，后方空虚。齐晋秦宋联合，如果夹击并击破在商丘的楚军主力，则谷邑方面的楚军，便退不下来而遭歼灭。如果秦国再由荆紫关进攻申邑，楚国腹背受敌就更不利了。所以楚成王不争取齐秦中立，轻率地拒绝调停，促成齐、秦、晋三国联合是战略上最大的失策。

楚成王看到形势对楚国不利，就下令令申公叔侯撤离谷邑，楚军统帅子玉撤离宋都，并告诉子玉“知难而退”，避免与晋国决战，自己则率军退回申邑，以确保后方。楚成王在不利的情况下避免决战，保全实力，以待后图，是很正确的。因齐、秦、晋也有矛盾，等待其分裂乘机再举，战胜的可能性就大得多。但子玉骄傲自负，企图打一次胜仗，以抬高他在国内的地位，因此请求楚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楚成王因子玉不听他避免与晋军决战的指示，非常生气。但他既不坚决制止子玉，又不为子玉多增加兵力，而只派西广（楚王的亲兵部队的名称）、东宫（太子的卫队）、若敖六卒（子玉的族兵六百人）前往增援。楚成王既判断情况不利，决心避免决战，就应毫不动摇，不能因退到申邑，侧背无虞，经子玉请求，就又存侥倖的心理，允许子玉的请求；既允许子玉的请求，就应该给子玉以足够的兵力，使其可以获得决战的优势。他这样迟疑动摇，无疑是会给楚军带来不利的结果的。

子玉得到楚成王的微弱增援，就派宛春向晋文公交涉，要晋国许曹卫复国，楚国也解宋围。晋国君臣因形势有利，谋求决战，但若不许

子玉的请求，违反宋、曹、卫三国的利益，会遭三国仇恨。于是一面暗中许诺曹卫复国，并唆使其与楚绝交，一面又扣留楚使宛春，以激怒子玉，使他向晋齐秦联军求战。子玉果然一怒就向曹都陶丘进逼。晋文公见子玉已上圈套，被调动北来了，就又后退三舍（九十里）。他名义上说是履行流亡楚国时曾许下的"避君三舍"的诺言，报答楚王的恩惠[32]，实际上是使疲敝的楚军更加疲敝，使子玉更加骄傲轻敌，把楚军调动更远，然后后发制人，在预定战场上集中优势兵力与楚国决战。楚国官兵，见晋军后退，就想停止前进，子玉却坚持要与晋、齐、秦、宋联军决战，继续北进。于是于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夏四月初一进至城濮（今河南濮县临濮集），逼近晋军。晋文公是一个"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人，到了决战前夕，他还在考虑战胜有无把握。子犯鼓励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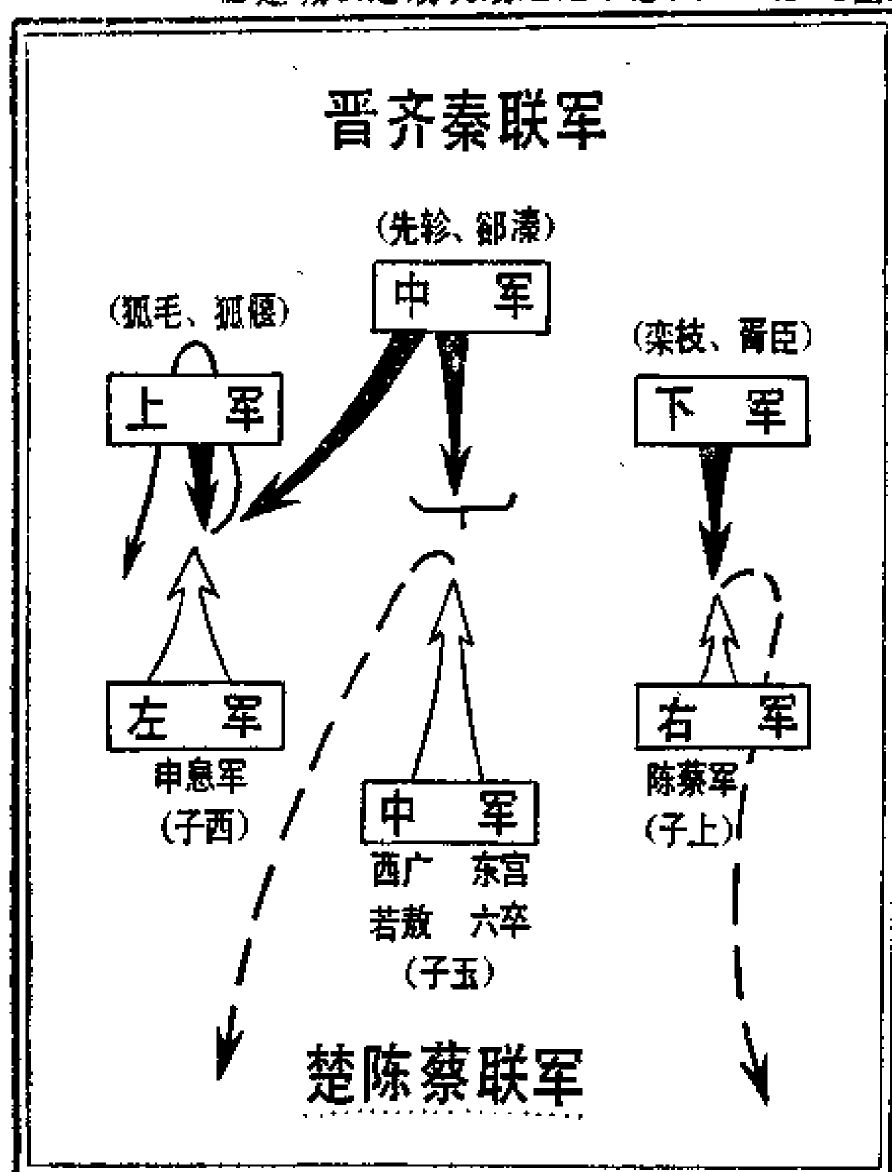
"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33]

子玉请战，晋文公应战后，又登上有莘之虚（城濮以南），检阅晋军。晋文公看见晋军七百乘装备齐全，纪律严明，认为"可用"，有了信心之后，又下令伐当地的树木，增加兵器。初二，晋、秦、齐宋联军的上、中、下三军与楚、陈、蔡联合的左、中、右三军在莘北相对列阵。子玉骄傲地说："今日必无晋矣"[34]。殊不知晋军看准楚、陈、蔡联军的弱点在右军陈、蔡方面，就先以下军攻楚右军，一举就击溃了楚右军。晋上军伪退，诱楚左军进击，使其露出侧背便于晋中军侧击，然后回军与晋中军夹击楚左军，又将楚左军击溃。子玉收住中军，才幸免全军败溃。楚军战败后，退到连谷（今地不可考），子玉羞愧自杀。（参看插图3-3）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郑州西北荥泽）朝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

晋文公一战定霸，使屈服于楚国的鲁、曹、卫、陈、郑诸国都脱离楚国，回到中原集团。自此以后，在晋国的领导下，与楚国抗衡达

晋楚城濮之战决战经过示意图 (3—3图)



一百余年之久。所以城濮之战是春秋争霸关键性的一战。

（三）城濮之战，晋楚双方战略得失

古人评论齐桓晋文，总说“五霸桓公为盛”，“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其实，晋文公成霸业之难，远比齐桓公为大，晋文公的才能远比齐桓公为强。齐国地理位置优于晋国，有渔盐之利，经济条件远比晋国好。齐桓公溺于声色，习惯于接近左右谄媚的人，得国二十余年才能北逐戎狄，南威荆楚，其所以能独霸中原，是由于晋

乱，秦未强，没有争霸的强大对手。晋文公在宋襄公失败，楚国势力弥漫中原，鲁、卫、宋都屈服于楚国，齐国危急不能自保之际，仅用四年的时间，就能振兴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进而击败楚国，扭转中原局势，其成功之难，其才能之高可以想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要求晋文公意志坚强，顾虑周到，运用各种谋略争取与国，并愚弄敌人，使其增加失败的因素。《孙子》兵法说：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35]

就说明兵不厌诈，理所当然。晋文公对敌人诡诈，以劣胜优，正足以表明他有军事才能，是不能责以谲而不正的。同时“晋军七百乘，韅（腹带）靷（胸带）鞅（颈带）靽（后带），”装备齐全，“少长有礼”纪律严明。可见其决战的实力也是雄厚的。对比宋襄公空讲仁义，不重战机，不重实力来看，晋国争霸是“以力假仁”，奇正兼备。所以也不能责备晋文公谲而不正。

“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36]。打仗是不可以逞意气的。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楚国中军元帅子玉易怒，理智胜不过感情，所以常刚愎自用，被晋人牵着鼻子走。尤其是他向楚成王陈述准许他与晋作战的理由时说的：不是为了战胜立功，而是为了堵塞进谗言人的嘴。[37]这简直是为泄私愤而把国家命运当儿戏。楚成王听子玉“堵塞进谗言人的嘴”一语，就不冷静，不但不坚决制止子玉与晋决战，且少给子玉兵力，意思是看子玉出丑。这又是把国家的命运当作儿戏。晋文公却是君臣协和，临事而惧，处处小心，谋定而后动，了解晋国“表里山河”，地理条件优越，晋军“少长有礼”，军队可用，就坚决一战。相形之下就可以知道晋楚城濮之战的胜败，并不是偶然的。

《左传纪事本末》卷二十五，高琦批评晋文公说：

“城濮功高，而信先轸之诡谋，许复曹卫，拘留宛春，一意败楚，而无按兵修礼之风，比之召陵诚所谓谲而不正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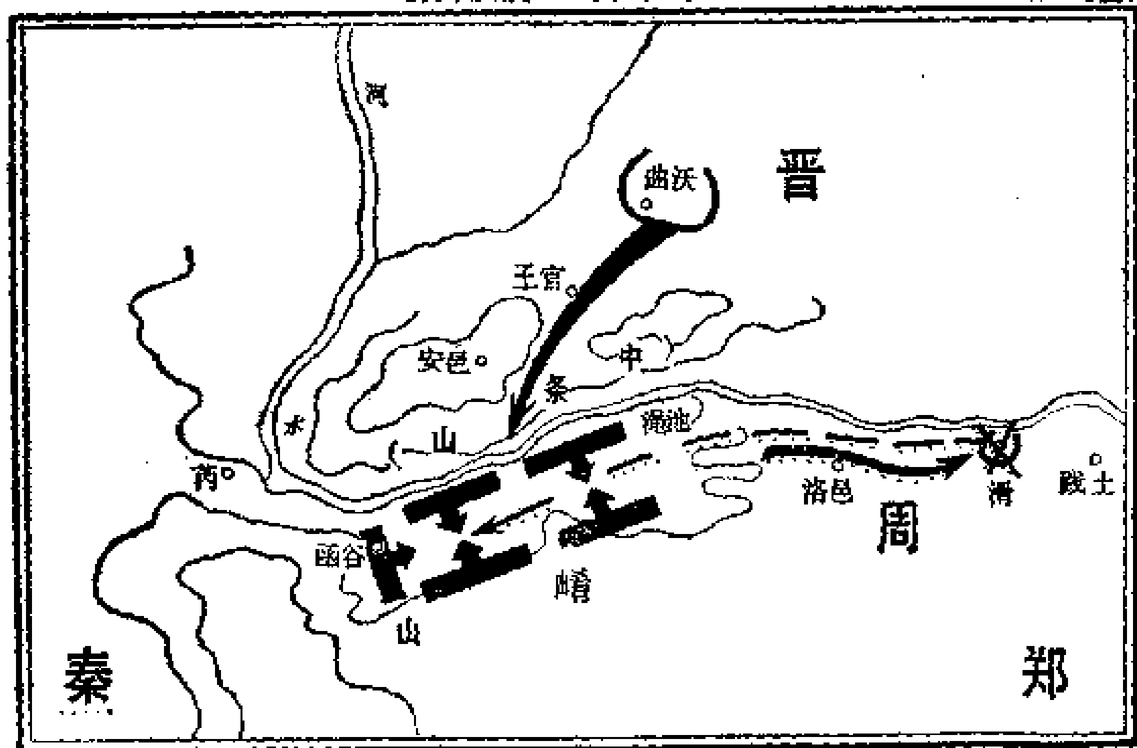
这完全是迂腐之论。须知齐桓公伐楚，召陵之会，未损楚国实力，未堕楚国威信，所以楚能继续向淮、泗流域进逼。及齐桓公死，楚国势力就弥漫中原。城濮之战，子玉请晋复曹卫，楚亦解宋之围，晋文公不特不效召陵之会，与楚妥协，反而施展谋略坚决求战，一战而予楚国以甚大的打击。晋向周王献俘，就有"驷介百乘"，可见楚国损失不小，尤其中原诸侯知道楚国不是无敌于天下的，所以以后一百多年，晋能领导诸侯与楚斗争且经常占有优势。

既然"兵者诡道也"，城濮之战是晋国取威定霸的关键，狐偃、先轸等明白这个道路，在军事上运用权谋，以求战胜敌人，正表明他们通晓军事，有战略眼光。所以责备先轸诡谋，是迂腐的论调。我们倒是认为管仲是政治家，不是军事家，用后代的语言来说，他有相才而将才不如先轸。召陵之会，按兵修礼，正是战略上的失策。"军事是政治的继续"，政治目的是"攘夷"，而军事手段采取按兵修礼，从军事角度看，是不足取的。

三、秦晋矛盾对晋楚争霸的战略影响

（一）崤之役秦晋双方战略都有缺点（参看插图3-4）

秦晋殽之战示意图　（3—4图）



中原诸侯利害不一致，在戎狄内扰、荆楚进逼的形势下，中原诸侯暂时可以联合对敌。齐桓晋文的霸业就是建立在这个客观基础上的。城濮之战，晋文公高瞻远瞩。他欲与楚国决战，就顾虑“齐秦未可，如之何？”用尽谋略，争取齐秦参战，造成华夏团结对楚的南北对立状态。但战后秦晋利害不一致。晋国强盛，阻塞秦国东向过问中原事务的出路，所以践土（今河南广武县之荥泽城）会盟，秦穆公不肯参加。晋文公察觉这一点，就在周襄王二十一年（前631年），举行翟泉（在洛阳城内）之会，密许以后秦晋联合过问中原事务。周襄王二十二年（前630年），秦晋根据翟泉之会的决定，共同出兵讨伐郑国。不料秦穆公受郑国烛之武的离间[38]，与郑结盟，并使杞子、逢孙、杨孙三大夫留郑，协助郑国，而自己率兵返国。晋文公从霸业的战略全局着眼，知秦晋不可破裂，所以大度包容，也与郑言和返回晋国。周襄王二十四年（前628年），晋文公及郑文公逝世。秦留戍郑国的杞子使人密请秦穆公迅速秘密派兵袭取郑国，秦穆公不听蹇叔、百里奚的劝告，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率兵前往。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年）二月偷越晋境进到滑国境内（今河南偃师县南）遇到郑商人弦高犒师[39]，知道郑国有备，顺便灭滑而还。晋文公的继承人晋襄公闻知秦国袭郑、灭滑，听从先轸“一日纵敌，数世之患必攻秦”的建设，就穿着孝服与先轸率军去崤山（今河南陕县境内）隘路设伏袭击秦军，将其全部歼灭。崤山这一仗秦晋两国战略都有缺点。从秦国的情况看，秦郑两国相去约一千五百华里，中间要通过晋国控制的崤山地区，迢迢千里，行动不易秘匿，所以蹇叔战前劝阻秦穆公说：“劳师袭远……郑必知之”[40]。郑有备则袭击不能成功。其次秦军袭郑要通过晋国的崤山地区，妨害晋国利益，必惹起晋国敌视，若晋国扼崤之险，疲敝的秦军归路断绝，有遭受歼灭的危险。所以秦军出发时蹇叔哭送他的儿子说：“晋人御师必于崤”。“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蹇叔从情况判断，秦袭郑，定与晋国利害冲突，晋国必不肯轻易放过秦军。又从地形判断，晋国阻击的地点当在崤山地区。此一判断非常正确。再其次秦郑相去千余里，中间有晋国国土隔断，即使

袭击成功，也无法保持。二年前秦晋围郑时，烛之武就曾对秦穆公说过越过晋国辖地，戍守远方的属地是不行的。这些明明白白的道理，秦穆公都应该懂得。头脑冷静一点，就能听从上述的劝告。可惜他利令智昏，劳师远征，白白牺牲了秦军且与晋变成仇敌，是很不明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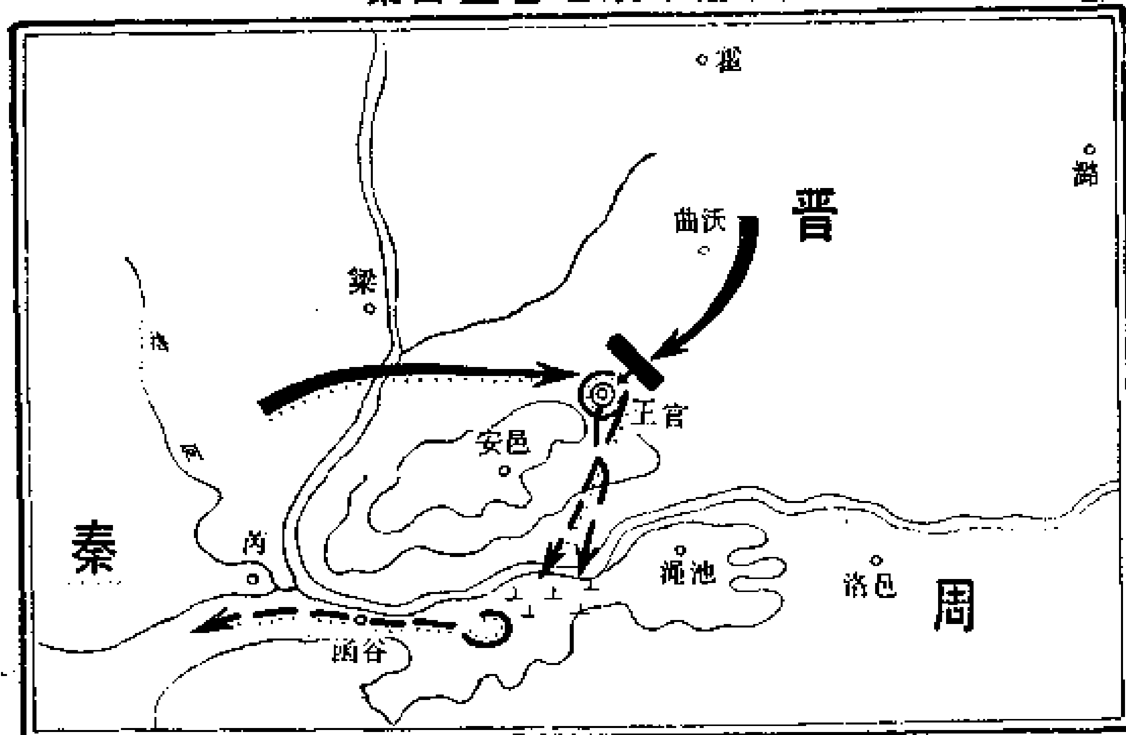
从晋国方面来说，崤之役，战役上似乎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但从长远的战略上看，完全是干了孟子所说"养其一指，而失其肩臂"的蠢事。晋与楚争霸，不把注意力集中于主要矛盾方面的楚国，而与秦争小利，两面树敌，为以后留下无穷的祸患，这在战略上非常失策。就当时形势看，向楚申息地区发展，使秦楚为敌，如此晋可无西顾之忧，又可使楚两面受敌，疲于奔命。如果怕这样养痈遗患，那么就应着眼"灭秦"或"弱秦"；就应利用晋楚两国于前628聘使往还，言归于好的机会，趁在崤山歼灭秦军、秦国内震恐且兵力空虚之际，直捣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把秦灭掉，或使其国势贫弱，短时不能恢复，这样弱小的秦国就不会为大患了。解除了后顾之忧，然后转而专力对付楚国，势必轻易得多。所以崤之役，由于晋国的战略失策，使秦转而助楚，是演成晋楚长期争霸的战略原因之一。

秦国当时应采取的正当战略，当是壮大自己，然后解决东向的出路，进图中原，以后事实证明，只有这样才能成功。

（二）秦晋交恶给晋国的争霸战略以不利的影响

崤之役的当年（前627年），太行山地区的狄人大举进扰晋国及齐国。（参看插图3-5）这年八月，先轸虽又败狄于箕（今山西辽县）。但秦穆公一意要雪崤之役失败之耻，连年与晋作战。周襄王二十八年（前624年），王官（今山西闻喜县南）之役，秦国终于打败了晋国。次年，晋又要雪王官之役失败之耻，收复王官故地。五年之间，秦晋接连打了五仗。楚国因晋国为秦所牵制，就趁机灭江（今河南息县西南）灭六（安徽六安县）灭蓼（今河南固始县），进而控制陈蔡，北进声势又大大增长。秦穆公在王官之役"封崤尸而还"后，出了一口气，也知晋实力雄厚不可侮，于是就向西发展进攻戎族，灭戎族之国

秦晋王官之战示意图 (3—5图)



十二，“益地千里，遂霸西戎”(就成了西戎的霸主)。从这时情况看，晋国北有狄族，西有秦，南有楚，三面受敌，只对中原北部还有一点控制力，战略形势非常不利。(参看插图3-4)

周襄王三十一年（前621年），秦穆公、晋襄公死后，晋国谋立长君，派人去秦国迎文公之子公子雍，借以与秦国言归于好。这本来是个好主意，但不久又改变主张，立襄公子夷皋为晋灵公，并派兵拒公子雍，打败护送的秦军于令狐(今山西猗氏县西)，于是秦晋间旧仇未消，新恨又起，相互攻战，数年不息。楚国于是以武力迫使郑、宋、陈、蔡均依楚国。秦穆公的儿子秦康公一意联楚以对晋。此战略看来还是对的，他的目的是东向争霸中原。周匡王二年（前611年），他助楚灭庸（今湖北省竹山县东南）。秦楚联合既坚固，楚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楚庄王趁晋国内乱，问鼎中原，要取周天子而代之了。

晋国不仅对外战略上失败，内政也纷乱不堪。当年晋献公文公注意到了公族树党纷争之弊，任用异姓贵族为卿，但他们也各有采邑，

各有部属，子孙相袭，日久也尾大不掉。诸卿也争权自相残害，晋灵公见卿权太重，所以欲去赵盾但力量不够，反而被赵党杀害。晋成公立，内部较为安定，又北和北狄及赤狄以牵制秦国和安定后方，如此才稍有可能对付楚国。此时英明的楚庄王在令尹（宰相）孙叔敖的辅佐下，改革内政，训练军队，国家富足，于是雄心勃勃，北上争霸，晋楚邲之战就是在这种战略形势下发生的。

四、邲之战晋楚双方的战略得失及对争霸的影响

周定王六年（前601年），晋成公死，晋景公立。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庄王伐郑，晋遣荀林父将中军，先縠佐之，士会将上军，赵朔将下军前往救援。到黄河边，闻郑已附楚，荀林父欲还，但先縠不同意，他以中军中他所属的部队渡河，荀林父不得已从之渡河。于是楚王遣使向晋求和，晋同意了，但晋国的卿大夫们意见不一致，赵旃故意挑起战争。他借故在楚军约定会盟日期，夜间到楚军门之外停下来，使随从的部属进入楚营，楚王率亲兵追赵旃，晋军出兵车接应赵旃。楚军以为晋军进攻，于是出战，"车驰卒奔"，进攻晋军。晋军和战不决，除上军外，毫无准备。中军元帅荀林父见楚军冲来，"不知所为"，就击鼓高叫"先济者有赏"。这样，晋中、下两军大溃退，渡黄河争夺渡船，死伤很大，终夜不停，才渡过黄河。楚军进到邲，未再追击。

邲之战是在楚国力量上升晋国力量下降，而且晋诸卿跋扈，先縠不听指挥，荀林父无力驾驭的情况进行的。后来《孙子兵法》说：

> "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邲之战，晋中军元帅无能，临战不作准备，而又将帅不和。从上面《孙子》的"知胜"条件来看，楚胜晋败早就可以判定了。这是邲之战晋国失败的原因。邲之战，晋上军有备不败，下军大夫荀首为救其子荀罃而举行反击，将楚军先头部队主将连尹襄射死，并俘楚公子穀臣，得以掩护晋中军，下军渡河，不被全歼。从此可以看出晋军战斗力仍甚坚强，只是战役指挥上，主帅迟疑寡断，和战不决。决战已在目

前，仍不作战斗准备，及楚军“车驰卒奔”，向晋军冲击而来，荀林父手足无措，只好指挥退却。这样晋军就不战而溃。所以战斗力虽强，仍未能挽救因战役指挥错误而导致的失败。

邲之战失败，晋国在中原诸侯中的威信丧失殆尽。楚庄王确立了霸权，趁战胜之威，遂于周定王十二年（前595年）伐宋。晋被秦和赤狄所牵制，无力援救。次年五月，宋力尽与楚盟。这是晋楚争霸中楚获得胜利的高峰。这时适逢齐鲁相攻，鲁向楚求援。楚庄王明白齐国是北方大国，攻齐会迫使齐晋联合，对付楚国，因而遣使聘问齐国，与齐鲁修好。楚庄王这一战略，此起晋攻秦，促成秦楚联合，以致晋国两面树敌的战略高明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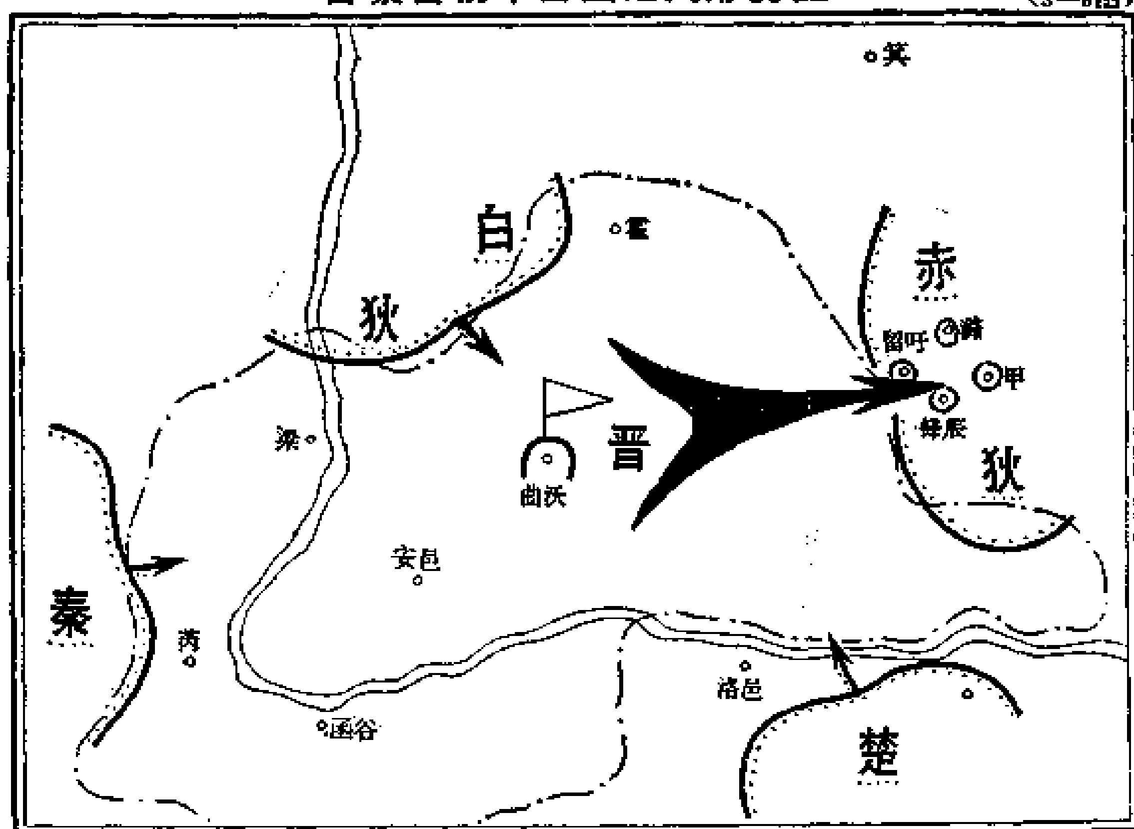
五、晋国霸业复兴的战略

（一）团结内部北破诸戎

楚国在春秋时代吞并六十几个诸侯国，在江淮流域顺利发展，成为大国，因而可以有条件争霸中原。中原诸国视楚国为南蛮，齐国富强，齐桓公号召攘夷，诸侯响应，形成中原各国联合制楚的局面。晋文公时代，联合齐秦，对楚也是南北对抗的形势，是半个中国对半个中国。崤之战后，秦灭国十二，霸西戎，国力有所增长。秦楚联合对晋，晋以今山西南部及河南陕西之一部地域，处三面受敌的形势之下，与秦楚竞争，自然处于劣势。但一个国家的强盛，不仅依赖国土广狭及战略形势，而内政修明，人心向附，更为重要。内修政教，整军经武，外并弱小，增强国势，这才可能打胜仗成为霸国。晋国邲之战失败，主要在于内部诸卿不睦。及至齐鲁附楚，战略上也处于四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晋国君臣，痛省前非。于是晋景公与士会，郤克，栾书，韩厥诸卿，戮力同心，保持团结，发展经济，扩充军备。基础既固，然后争取与国，对敌国各个击破，以改变不利的战略形势。（参看插图 3-6）

晋国北方的狄族部落，频繁扰乱晋国，成为肘腋之患，但在地理上和军事实力上都易于击破，所以荀林父、士会先后兴兵击灭潞氏之狄（今山西长治市、潞城县一带），赤甲氏、留吁及铎辰（在今山西

晋景公初年晋国四周形势图 （3—8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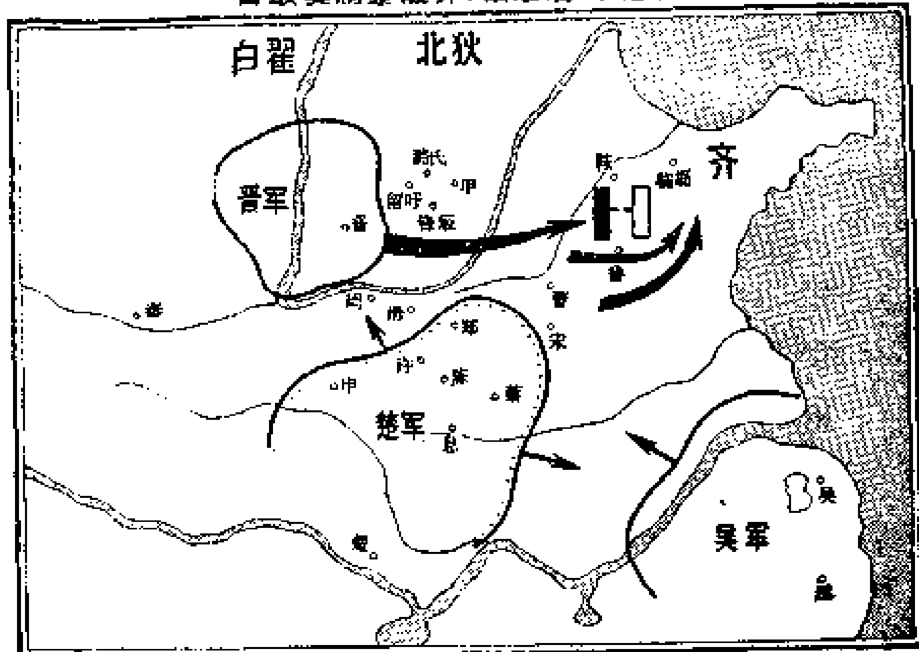


屯留县黎城县一带）诸狄族部落，并有其地，越过太行山把国土扩张到邢（今河北邢台）郧（今河南安阳市北）一带。这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也增强了国力。

（二）争取齐国（参看插图3-7）

此时，中原诸侯，都已背晋附楚。秦国更死心塌地联楚制晋。齐国为北方大国，虽与楚通聘问，并不等于依附楚国，而晋国扩充领土到邢、郧地带，与齐国已成近邻。所以晋景公争取与国，齐国便成为第一个目标。不料晋国使者郤克聘问齐国，谋与齐顷公作断道（今山西沁县西之断梁城）之会时，齐顷公让他的母亲在帷幕的后面窥看使者，见郤克跛一足，不禁与侍从的群妇大声发笑。郤克认为受辱，大怒返晋，致使齐顷公未亲赴断道之会。齐顷公侮慢外国使者，自然是无礼之至．但晋国为改变全盘战略形势而图谋联齐，郤克就不应不忍小

晋联吴制楚破齐（鞍之战）示意图 （3—7图）



忿，而破坏联齐的战略，尤其不应返国后主张伐齐，以报私愤。幸晋景公与士会能着眼全局，不肯同意，未惹起齐晋纠纷，并且于周定王十六年（前591年），与齐顷公会盟于缯（今山东阳谷附近）。但齐鲁两国在春秋之世，经常发生边界争夺战。周定王十八年（前589年），齐顷公背盟联楚，并兴兵伐鲁，卫国与鲁联盟，出兵助鲁，齐又击败卫军，于是鲁卫两国均向晋求援。晋景公以齐背盟联楚，晋联齐的战略已无法实现，于是即出兵联合鲁卫两国的军队向齐国进攻，这就惹起了鞍（在今山东济南市东北）之战。齐军战败，晋鲁卫联军追击直至齐都临淄（今山东临淄县）。齐顷公割地求和，四国罢兵。周定王十九年（前 583 年），晋因领土扩大，国力日强，又恢复六军。[41]齐顷公鉴于晋国又强盛起来，就于同年冬亲自到晋国结好。晋景公厚礼相待，于是齐晋言归于好。周简王三年（前583年），晋景公又与鲁国商量，把鞍之战齐国割与鲁国的汶阳之田归还齐国，晋齐联盟更加巩固。晋景公联齐战略，遂告成功。

晋景公联齐的战略着眼无疑是很正确的。齐顷公背晋联楚，没有衡量齐晋接壤，晋军朝发夕至，齐晋两国发生战争，楚国远水不救近

火这一时间，空间的关系，而且夜郎自大，要"翦灭"晋军"而后朝食"，不知己彼，所以致败。幸战败后齐顷公明白与晋保持友好，可以保境安民，让晋楚斗争，自己可以独霸一方，因而与晋言和。这就使齐晋两国暂时相安。晋景公见齐顷公倾向楚国，当机立断，趁周定王十六年（前691年）楚庄王与令尹孙叔敖去世的机会，于周定王十八年（前599年）联鲁卫向齐进攻，然后又软硬兼施，一打一拉，争取齐国完成联盟，这样虽未必能得齐国很大的助力，但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倾全力对付楚、秦。这一战略的运用无疑也是很成功的。

（三）联吳制楚

晋国至此，已摆脱四面受敌之困境，但秦、楚联合，楚无后顾之忧。晋从正面进攻，仍不易制服楚国。于是联络吳国，离间秦楚的关系，就成了晋国的当务之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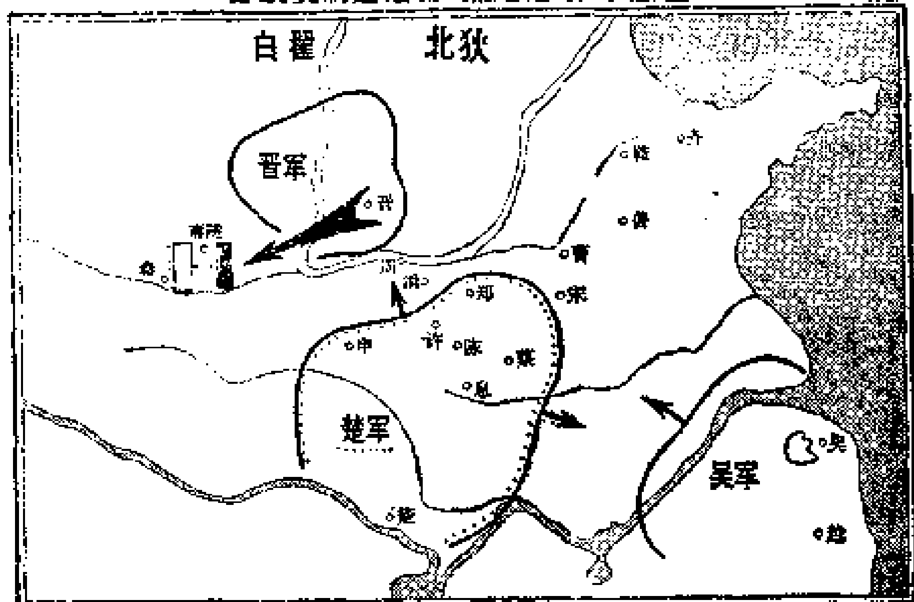
吳国原来经济、文化很落后，春秋中叶才逐渐发展，青铜冶炼技术——尤其制剑的技术水平逐渐优于中原各国。吳国公子季札出使北方，对周代的礼乐很熟悉，并能作出适当的称颂和评论，可见吳统治集团文化不低，兵力也渐强盛，有能力远征郯国。这当然引起楚国有战略敏感的人注意，楚国的申公巫臣就是其中的一人。

齐晋鞍之战的时候，申公巫臣因为娶夏姬之故，投奔晋国，[42]晋景公任命他为邢（今河北邢台市西南）大夫。楚人尽灭巫臣的族人。巫臣大怒，于是他于周简王二年（前584年）献联吳制楚的战略，自请出使吳国以完成此一任务。晋景公同意，派遣巫臣父子随带兵车及步卒作示范队，教吳人射箭、驭马、车战、步战之法，使其反楚。于是吳国便日渐兴起，在楚国的东南不断进犯，使楚国陷于两面作战而疲于奔命。巫臣的这一战略以后就使得楚国一蹶不振，并开启吳越争霸的序幕，这对春秋争霸的形势转变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四）各个击破败秦国（参看插图3-8）

晋国联齐联吳之后，就以全力慑服中原诸侯。由于晋楚两国势力在中原消长不定，郑宋诸国常依违于晋楚之间。周简王四年（前582年），郑成公先与楚公子成盟会，后又亲自朝晋，晋景公就把他扣留起来，

晋联吴制楚败秦（麻隧之战）示意图



并兴师伐郑。这年冬天，楚国亦兴兵伐陈、莒以救郑。郑为了响应楚国，也出兵伐许。秦国趁机又联络白狄，向晋国进攻。晋景公见三面受敌，就实行各个击破的战略，首先把进攻矛头对准秦国。为了避免受楚国的进攻，不能狠狠打击秦国，于是利用楚国受吴国攻扰，疲于奔命之机，释放俘虏的楚将钟仪，使之向楚国通好。楚国正企图以全力对付吴国，以除后顾之忧，就派人报聘。晋楚互相聘问，对抗的形势就有所缓和。恰好郑国因郑成公被扣，诸公子争立，晋景公就与郑成公结盟而出兵平定郑国内乱，送他回国，既威胁又利诱也把郑国安定下来了。周简王五年（前581年）晋景公死去，儿子厉公立。周简王六年（前580年）晋厉公约秦桓公会于令狐（今山西猗氏县西），但秦桓公回国就背盟，约楚国与狄族共同伐晋，楚共王拒绝秦国的建议，并将情况转告晋国。次年，周简王七年（前579年），由宋国的华元调解，促使晋、楚去宋都西门会盟，约定互不攻伐。这样，晋国东南两方都暂时安定了，就专意对付秦国。恰好这年秋天，秦国约狄人攻晋，晋人击败了狄人，乃于次年周简王八年（前578年），派大夫吕相与秦绝交，一面集合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国联军进攻秦

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趋麻隧（今陕西泾阳县北）。五月四日，两军大战，秦军抵不住优势的联军，在泾河以东的部队全被歼灭。联军渡过泾水，直追至侯丽（今泾阳县西）才停止。秦国麻隧之战惨败后，国势不振，就不再成为晋国侧背的威胁了。

崤之战后，秦一直与晋国为敌，联合楚国及狄人，使晋三面受敌，数十年困窘不安。麻隧之战后，晋国才解除了西侧的威胁。可见晋国安抚楚国，对秦各个击破，狠狠打击秦国的战略，是正确的而且很成功。麻隧之战，晋国之所以能以优势的兵力，速战速决，严重地打击秦国，还在于安定中原和与楚作西门之会。楚国之所以愿与晋国在西门盟会，则由于吴国兴起为肘腋之患。由此可见，晋国采取巫臣联吴制楚的战略是使晋国摆脱出战略不利形势的根本原因，也是离间秦楚，使他们毁弃秦楚联盟的重要原因。

（五）击败楚国于鄢陵（参看插图3-9）

晋既败秦于麻隧，暂时解除了侧背威胁，又联吴使楚有后顾之忧，战略上已处于优越的态势。从军事上看，晋国应趁机进一步打击楚国。恰好次年即周简王九年（前 577 年）郑国攻许国。许为楚的盟国，于是楚国于周简王十年（前 576 年）兴兵进攻郑国。晋国正议出

兵援助郑国，而楚国因郑国一支军队威胁其后方，自行撤退，因而晋楚两国未发生战争。不料这年，宋共公死了，宋国内部的亲晋亲楚两派发生斗争。亲楚派失败，其头子逃往楚国，怂恿楚国攻宋。这时，晋国的三郤（郤錡、郤犨、郤至）专横跋扈，擅杀晋大夫伯宗及栾弗忌。伯宗的儿子伯州犁逃往楚国，楚国主战派司马子反认为晋国将发生内乱，楚国可趁机进图中原。晋国则因这年冬，吴王寿梦曾与晋、齐、鲁、卫、宋、郑等国会盟于钟离（今安徽凤阳县钟离城故址），认为晋吴联盟巩固，可以南北策应，攻击楚国，所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正好前575年楚诱郑叛晋，郑国又兴兵击败宋国。晋国于是纠集齐、鲁、卫等国兴兵伐郑以救宋。周简王十一年（前575年）六月，晋楚发生鄢陵（今河南省鄢陵县西南）之战。

六月二十九日，楚军直压晋军营前列阵，企图在齐鲁各国军队未达到之前，先击破晋军。

晋中军元帅栾书认为：

"楚师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

新军统帅郤至认为：

"其二卿（指楚子反及子重）相恶，王卒以旧（用旧家子弟），郑陈而不整，蛮军而不陈（南蛮不知列阵）……在陈而嚣，合而加嚣，各顾其后，莫有斗心。旧不必良（王卒皆旧家子弟，未必战斗力强）……我必克之（战胜楚国）。"[43]

晋军于是填井平灶，在营地内列阵。晋军了解楚军精锐在中军，所以先集中精锐攻击楚国右军及郑军，准备击破楚左右军之后，再合力攻击其中军。当晋军向楚军进攻时，楚共王迎战被射伤左目，负伤而退，楚军知楚王负伤，军心动摇。楚右军又受晋重兵进攻，支持不住后退，楚中军及左军也因此向后退却。楚共王以"王卒"据颖水北岸，收容败军退过颖河。晋军追来，天已入暮，就停止攻击。楚左军在退却中鼓勇再战，直至夜间，双方才停止战斗。晋楚两军均准备再战。楚王召中军元帅子反商议军事，子反酒醉不能来，楚王见元帅如此，就决心连夜退走了。

鄢陵之战，楚国是在不利的战略形势下决战的。楚国与晋国西门之会，背弃秦国，让晋国有各个击破秦国的机会，及秦国一蹶不振，已失去对晋国侧背威胁的能力，而又背西门之盟，与晋国争夺郑、宋，因而惹起鄢陵之战，战略上是非常不智的。鄢陵之战，子反着眼不待齐鲁各国军队到来，先各个击破晋军，因而迫近晋营列阵，使晋居于被动，战役指导仍有可取之处。但晋国如"固垒而待之"（待诸侯之师到达），在兵力优势的情况下再转取攻势，楚国仍然没有胜利的可能。如果晋军等楚军"退而后击之"，可能楚国失败更大。因此，楚共王乘夜退军，非常明智。如果不借楚军元帅子反醉酒，连夜退出战斗，明日再战，齐卫等诸侯之师到达，楚军兵力劣势，战胜显然无望，损失必然大增。从战略全局看，自然以保持中军与左军不败而退，国力不大受损失较为有利。否则国力大大削弱，吴国乘其后，处境就更困难了。

鄢陵之战后，晋国的战略形势和兵力都较优势，照理可以威服诸侯，维持较长时间的霸业。但卿权太重，各拥军队，内部不团结，政出多门，诸侯多不信服。及晋厉公杀三郤（郤犨，郤锜、郤至），逮捕栾书、中行偃，而栾书中行偃又废晋厉公而立晋悼公，内乱不息。楚国在中原的势力又有所抬头，晋楚争霸中原，仍成胶着状态。

由于晋国卿权太重，晋厉公企图削弱诸卿的权力，以巩固公室，着眼未尝不佳，可惜处理失当，终归失败。但晋悼公立，晋国君臣都警惕到内政紊乱，霸业中落，而加以改革，不使诸卿平时统率军队（"卿无共御立军尉以慑之"），但又未能剥夺卿大夫的军权。所以，以后晋国终因卿权太重，尾大不掉而霸业不振。

鄢陵之战，楚实力并未大减。晋悼公初立时，郑国死心塌地附从楚国。因此，楚在中原仍控制郑、许、陈、蔡、江、六诸国。由于宋国坚决附晋，所以宋国北方的鲁、卫、曹、齐诸国都附于晋国。从全盘战略形势看，晋楚两国实际是对抗于今日河南及江苏北部的陇海铁路两侧，东起徐州，西至巩县一带地区。楚国的与国秦国本可以拊晋国的侧背，但麻隧战后，秦国势力衰落，对晋威胁不大。晋的盟国吴

国则日渐兴起，对楚国的侧背威胁日益严重。中原战场上，晋国能保障宋国，则齐、鲁、曹卫诸国都可不受楚国进犯，楚国能坚强控制郑国，则许、陈、蔡诸国都可不受晋国影响。因此，晋国的战略是联吴保宋进图郑国，楚国则须联秦保郑而进图宋国。

（六）筑虎牢城以制郑

周简王十三年（前573年），楚郑两国进攻宋国，取彭城（今江苏徐州市），留下宋国逃往楚国的亲楚派大夫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戍守，进图宋国。宋求救于晋，晋于周简王十四年（前572年）春，会同鲁、卫诸国的军队救宋，攻克彭城，俘宋叛臣、亲楚派的大夫而归，宋国的形势便大大巩固了。五月，晋将韩厥率齐、鲁、曹、邾诸国的军队进攻郑国，击败郑国的徒兵，趁胜进攻楚国的焦夷（今安徽亳县）。集中在陈（今河南淮阳县）、六（今安徽六安县）之间的楚军，不战而退。晋即罢兵回国。晋罢兵后，楚郑两国又进攻宋国，欲借此以使晋国疲敝。周灵王元年（前571年）六月，郑成公逝世。晋趁机会同宋、卫两国进攻郑国，郑不肯背叛楚国，于是鲁国大夫孟献子建议筑虎牢城来制服郑国。这时，黄河是从今河南省温县南经滑县北东流入海的。虎牢在温县之南，筑成这样一个桥头堡，晋军攻郑，可以朝发夕至，对郑国威胁非常严重。这年冬，晋会同齐、鲁、宋、卫、曹、邾、滕、薛诸国占领虎牢，楚国此时内乱，无力援郑，郑国于是背楚从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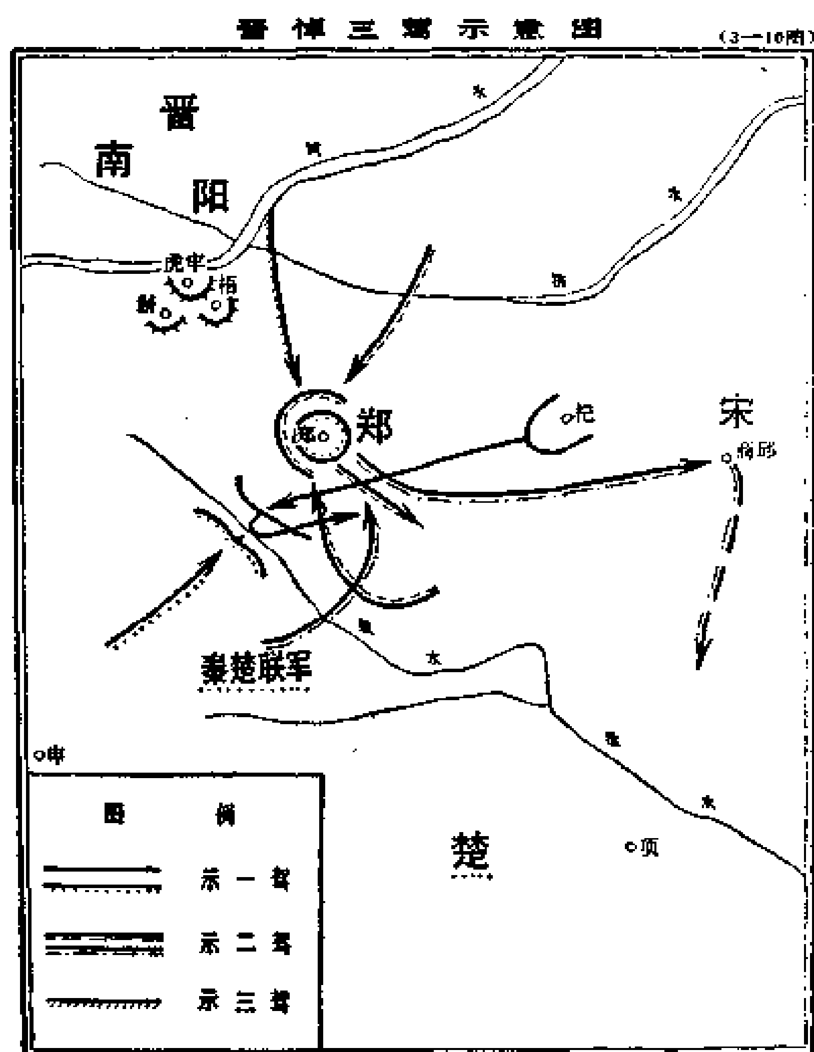
筑虎牢城这一着，战略着眼是非常高明的。这样在郑国侧背给予威胁，使郑畏服。下一步便可进图陈、蔡，使中原形势发生变化。所以周灵王二年（前570年）晋悼公与齐、鲁、卫、郑、宋、莒、邾诸国会于鸡泽（今河北永年县西南），陈国也来参加。这样，晋国争霸中原的战略形势就大有转变了。

（七）和戎以释后顾之忧

周灵王三年（前569年）春，楚共王因为陈国叛楚，就进军繁阳（今河南新蔡县北），准备讨伐陈国，恰好此时山戎（今山西太原县东）的无终（国名）子嘉父，请和诸戎，晋国的司马魏绛分析形势，

认为陈新附于晋，楚准备进攻陈国，如晋国在国境北方与诸戎族发生战争不能救陈，陈必叛晋，这等于放弃诸侯，所以建议和戎。晋悼公同意，就与戎言和了。这一战略的实现，不特以后晋楚争霸，晋国再也没有戎狄从北方来扰乱后方，而且周灵王四年（前568年）及周灵王六年（前566年），楚两次进攻陈国，晋国都能率诸侯之师及时救陈，这对于晋国中原争霸的战略形势也是很有利的。

（八）“三分四军”以疲楚（参看插图3-10）



晋楚争霸，郑、宋两国地处两大国之间，首当其冲。国小而又无力抗击大国的进攻。周灵王七年（前565年）冬，楚国进攻郑国，郑国的执政大夫子驷说：

“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44〕

于是就又附楚，一面还遣使赵晋，说明苦衷，这就说明此时中原小国，只好晋强附晋，楚强附楚，什么盟誓信守，根本就不管用了。所以周灵王八年（前564年），晋率诸侯之师攻郑，郑又降晋。晋军返国，楚又攻郑，郑又降楚。可见楚国此时已看清争夺郑国，不必与晋决战，而采取敌进我退的办法，与晋国周旋了。

晋悼公看出连年用兵，敌我俱疲，须巩固根本，采用新的战略。于是对国内赈济贫困，厉行节约，对外则“三分四军”把晋国的上、中、下军、新军（三行）及诸侯的军队分成四个集团，轮流作战，以疲劳楚国。并于周灵王九年（前563年）与齐、鲁、宋、吴诸国在柤（今江苏沛县东）会盟，加强与吴国的联系使向楚进攻。于是造成“晋悼三驾（三次兴师）而楚不敢与争”的局面。

就在相会盟的这年九月（前563年），晋会集诸侯之师攻郑，郑国内乱，晋悼公表示宽大不趁乱进攻，而令诸侯之师增筑虎牢而戍守起来。晋军则由士鲂帅兵筑梧（今河南荥阳县），魏绛帅兵筑制（今河南汜水县的汜水关）戍守，郑国于是又附晋。楚令尹子囊为了救郑，率兵北上，晋中军元帅荀罃即率兵南下，与楚军夹颍水列阵。三分四军是荀罃提出的战略，见疲敌的目的已达到了，也就率兵北返，这是晋悼的一驾。

次年，周灵王十年（前562年）四月，晋将荀罃又率新军及齐、宋、卫三国的军队进攻郑国，进军至向（今河南洧川县西南）、旧许（今河南许昌县），欲诱楚军出迎，使其疲敝。楚军不出，于是又还军围郑，郑国就又附随晋国，这就是晋悼的二驾。

楚国见晋国强盛，于是又求助于秦国，于这年秋，会合秦国的军队进攻郑国，郑又降楚。九月，晋悼公又率诸侯的军队伐郑，郑又向晋请和，楚国见诸侯之师强大，不敢决战而退。十二月，郑及晋、鲁、曹、卫、齐、宋等诸侯会盟于萧（今河南原阳县东），郑从此附晋二十

余年。这就是晋悼三驾。

（九）击败齐国于平阴

这时期，晋国兵威强盛，吴国又不断攻扰楚国。楚虽联秦以对付晋国，但力量的对比仍居劣势。不幸晋悼公壮年即去世，（周灵王十四年（前558年）冬十月逝世，年仅三十岁）晋齐又发生战斗。中原形势因之就不能继续向有利于晋国的方向发展。

晋齐发生战争一是由于齐灵公攻鲁，策动卫国伐曹，并与楚国通好。晋国乃于周灵王十七年（前555年）夏进攻卫国，迫使卫国降服，然后于十月会同宋、卫、郑、曹等十一国的军队进入齐境。齐灵公举兵在平阴（今山东平阴县）进行防御。晋、鲁、宋联军以主力攻平阴，一部沿鲁、莒国境迂回过沂蒙山区，进袭齐国都城临淄。齐灵公探知晋鲁军已进袭临淄，又见当面晋军强大，乃利用夜间撤军东去。晋军猛烈追击，并联合诸侯的军队，攻破临淄。齐灵公率部突围，逃往邮棠（今山东即墨县南）。晋鲁等国联军继续追击到潍水，因闻楚国兴兵伐郑以救齐，乃撤军西归。

齐晋发生战争，对晋国战略全局无疑是很大的不利，但晋国见势已无法挽回，就当机立断，趁齐楚联盟未坚即向齐国进攻，实施各个击破。这个战略决策是未可厚非的。尤其战役指导，以一部兵力迂回攻击齐都临淄，迫使齐军退走，并发起猛烈追击，直下临淄，追至潍水，给齐国以严重打击。战役上速战速决的辉煌胜利，对战略上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时，进攻郑国的楚军见晋军很快回师，也就撤兵回楚，所以齐国叛盟，对中原局势有影响，但并不很大。接着，齐灵公死，齐国内乱。齐庄公向晋请和，齐晋纠纷，本可告一段落，但晋国也发生内乱，士匄逐栾盈，杀逐栾氏党羽。栾盈逃往楚国，复至齐国。齐庄公就利用栾盈袭晋，企图助长晋国内乱。轻装精锐的齐军越太行深入晋国，予晋以若干人员杀伤，但未能与栾盈之党会合，栾氏不久被消灭。齐庄公袭击太行之役，于晋国国力并无甚大的影响。就全盘战略形势看，晋国国力较强，齐、秦均为侧背之患；楚国国力较弱，吴国给楚国的威胁亦大。齐、楚、秦、晋、吴五国相互纠缠，略

呈势均力敌的状态，同时中原疲敝，郑宋各国都盼望大国息兵。于是宋国大夫向戌提议弭兵，就得到各国的同意。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晋、楚、齐、卫、鲁、曹、宋、郑、许、陈、蔡、滕、邾等十三国会盟于宋之西门，秦未参加。晋楚平分霸权，其他参加会盟的国家须同时向晋楚两霸交纳贡物。晋楚虽仍尔虞我诈，不断发生纠纷，但一直到春秋末年，两国在中原未发生战争。这实际是由于各诸侯国卿大夫势力已发展起来，内部争夺代替了诸侯争霸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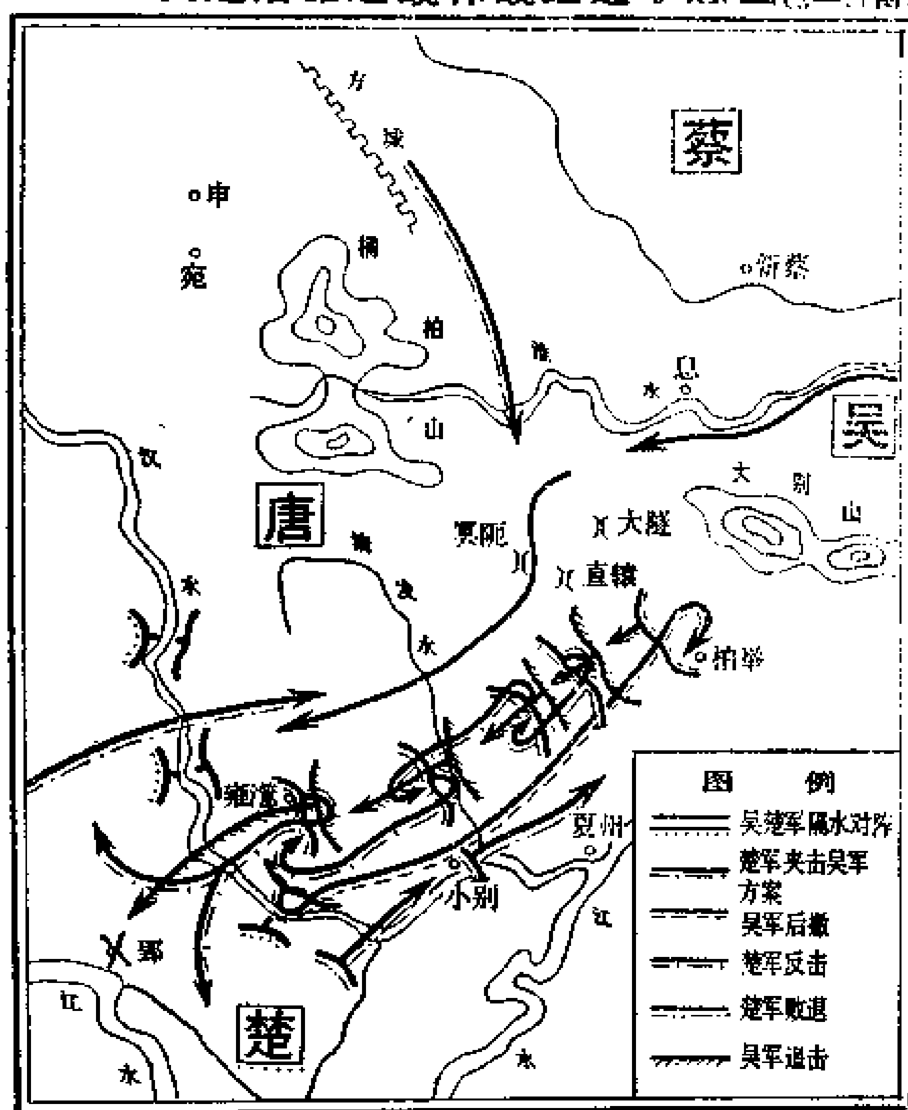
第四　晋楚争霸与吴越争霸的战略关系

一、晋楚战略对吴越的影响

在中原大国争霸斗争中，晋楚二国势均力敌，形成对峙局面。两国都难以自力打开僵局，于是各自寻求与国，以利霸业的发展。晋国介于齐秦二大国之间，而又南向与楚争霸，所以晋联合齐秦，以增强力量，而与楚国以侧背威胁，则战略上居于优势。但齐秦都是大国，不易受晋国控制，而三国间利害也不同，所以联盟很不稳定。及秦晋为敌，戎狄部族进扰，晋国三面受敌，则楚国战略形势，一时又转居优势。齐国有时也附楚与晋为敌。所以晋国常居于内线不利地位。虽然晋国在时间空间上巧于安排，各个击破秦、齐、戎、狄，一时转变了战略态势，但始终未能摧破楚国的国力，于是晋国采取和戎和联吴的战略，以安定后方而置楚国于两正面作战的地位。楚国于是也联越以制吴。正是由于晋楚两大集团都互相争取与国，以便对敌方构成有利的外线作战的战略态势，才将吴越两国拉进了争霸集团的行列，并将春秋后期争霸战争，从中原扩大到淮南和长江下游。因此可以说吴楚、吴越的军事斗争，除了三国本身存在着其内部因素，三国政治经济上发生冲突，各欲扩大疆土，发展生产如吴越二国“争三江五湖之利”，晋楚争霸，争取战略外线的影响，是导致吴楚、吴越战争的外在因素。

二、吳破楚入郢的战略（参看插图3-11）

吳楚柏举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3—11图）



宋国向戌弭兵会议之后，晋楚两大集团在中原地区已形成休战状态。但此时申公巫臣的联吳制楚战略经三十八年的发展（前584年至前546年）发生了特大的效果。吳国兴起，与楚作不断的斗争，不但战地由中原移向淮河流域及长江下游，使楚国疲于奔命，以后而且发生了吳国破楚入郢的战争，楚国就一蹶不振了。

吳国在春秋初期，还是楚国的属国。以后在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下，逐步发展。到吳寿梦时期，国势开始强盛。铸剑的技术水平

已超过中原的一些国家。寿梦二年（前584年），寿梦采纳了晋国使臣申公巫臣的建议，联晋制楚。由巫臣教吴以中原的射法、御法和车战阵法，水陆军都日渐劲强，遂与楚国不断发生战争。由于当时楚既在中原争霸，都城郢（今湖北江陵附近）距东方千里之遥，中间又有大别山脉的阻隔，内政复日趋腐败，就未以全力与东方的吴国斗争。所以吴国先后夺占了楚国的一些地方。楚国两正面作战，疲于奔命，于是也企图在吴国后方造成威胁。周景王八年（前537年），楚灵王召集陈、蔡、许、徐、越诸国大举进攻吴国，越大夫常寿率军越长江北上，与楚会师，吴军在鹊岸（今安徽无为南江岸一带）击败楚南路军。这说明楚联越制吴的战略已具体化了。周敬王五年（前515年），吴王阖闾即位。他做了许多收揽人心的工作。他生活朴素，遇天灾瘟疫，亲身到民间访问，救济贫苦，因此得到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国势也更较强盛，他又能重用楚国逃去的大臣伍员、伯嚭和伍员推荐的孙武等，整军经武，处心积虑地图谋楚国。楚国此时政治腐败，对吴作战已渐居守势。周敬王八年（前512年），吴王准备大举攻楚，孙武劝阻说"民劳，未可，待之"。[45]伍员是楚国的逃臣，最了解楚国的情况，于是提出疲敝楚国，造成楚国错觉的办法。他说：

> "楚执政众而乖（不和），莫适任患。若为三师以肄（扰乱疲劳）焉，一师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楚必道敝（被困于道途）。亟（极力）肄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46]

阖闾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出兵先后袭击楚国的夷（即城父，今安徽涡阳附近）、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并围攻弦（今河南潢川县西南）。忽南忽北，扰乱楚国达六年之久，使楚国军队疲劳沮丧。楚国总认为吴国是扰乱而无大举进攻的企图，这就为吴国攻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伍员这个"三师肄楚"，"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的战略，比晋国的旨在疲敝敌人的"三分四军"，要积极而巧妙得多了。伍员疲敌是手段，目的是麻痹敌人使其发生吴国不会大举进攻的错觉，然后出其不意，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以极大打击。

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机会终于来到了。这年秋楚国围攻蔡国，蔡求救于吳。唐（国名）成公也因三年前楚令尹子常索贿，曾扣留他[47]三年才放回国，为了报仇，他愿与吳、蔡联合，共同进攻楚国。唐、蔡都是小国，但地处楚国侧背，战略地位重要。此时，州来（今安徽凤台县）、居巢（今安徽巢县）、钟离（今安徽凤阳县的临淮关）等地都为吳国所占领，因此吳国由此秘密出兵绕过大别山脉，沿淮水进入蔡国（今河南新蔡县），从蔡国前出到楚国东、北，发起突然袭击，比較以舟师溯江而上，由东进攻有利得多（吳楚之争，由淮者多，由江者少，因当时长江两岸未开辟，交通不便）。因此，当年冬天，吳王阖闾出兵攻楚，乘船沿淮河西进。过州来后，把船留在淮汭（淮水弯曲处，具体位置不详，推测当在河南潢川县东北），部队登陆，沿淮河西进，在蔡国及唐国的向导下，经豫章（今安徽六安、河南固始、潢川一带地区）迅速通过楚国北部的大隧（九里关，在今河南武胜关东）、直辕（武胜关，今湖北、河南交界处的京广铁道上）、冥阨（平清关，在武胜关西）三个要隘，直趋汉水。楚国为了阻止吳军向楚国都城作更深远的进攻，就命令令尹子常、左司马沈尹戌、武城大夫黑及大夫史皇等仓促率军沿汉水右岸进行防御。吳国使楚国疲敝，并使楚国判断不清吳的进攻方向，然后趁机联合唐、蔡二国，实行深远的战略迂回，出其不意，从楚国守备薄弱的东北部长驱深入楚国境內千余里，行动果敢迅速，充分发挥了战略奇袭的作用，使楚国来不及调集足够的兵力与吳军作战。可以说吳国的战略是成功的，沒有敢于冒险犯难的卓越指挥才能和坚韧顽强的军队是办不到的。《孙子》兵法上说：

“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48]

这很能说明吳军战略大迂回，趁虛直下冥阨三关的妙用。两千多年以后的法将拿破仑率部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的米兰[49]，并在马兰哥战役中大胜奧军的战例也颇与此类似。

楚国毕竟是大国。方城（今河南、鲁山、泌阳县境）以外对付中

原的兵力及东方对付吴国的兵力，当然还不在少数。所以为楚国计，此时宜利用地障与吴军相持久，待兵力集中之后，再以优势的兵力，与吴作战，才有胜利的把握。所以左司马沈尹戌向统帅令尹子常建议说：

> “子（你）沿汉（汉水）而与之上下（与吴军周旋），我悉（台集所有）方城外以毁其舟，还塞（阻塞）大隧、直辕、冥阨。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后击之，必大败之。”[50]

子常同意这个建议，沈尹戌就按此计划去召集方城以外的军队去了。但子常听信武城黑及史皇的怂恿，采取速战方针，改变原来商定的计划，不待沈尹戌军队到达而单独渡过汉水向吴军进攻。十一月十九日，吴楚两军在柏举（说法不一，当在今湖北汉川县北较为合理）交战。

吴王之弟夫概认为楚子常不仁，他的部属没有斗志，先攻子常的部队，必定溃走，然后吴大军继续进攻，必定可以打败楚军。因此夫概率领他的五千部属，先击子常的军队，子常的军队溃乱逃走。吴军乘势进攻，大败楚军。楚军战败，令尹子常逃往郑国，史皇战死。吴军猛烈追击。追至清发水，又趁楚军渡过一半之际，消灭了未渡河的楚军。吴军再追击至雍澨（今湖北京山县西南），再败沈尹戌回援的军队，终于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占领楚国都郢（今湖北江陵县东南之郢县故城）。

沈尹戌的建议，战略着眼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只是战略企图要由战役指导去完成。如果关键性的战役失败了，则再好的战略决策也会全盘皆输。吴楚当时的形势，吴军利在速战。各个击破分散的楚军，攻克郢城；楚军利在一面持久，一面迅速集结兵力，歼灭入侵之敌；双方都要尽量争取时间。沈尹戌着重毁吴军淮汭的船只，还师阻断冥阨三关，然后再配合子常夹击敌人，就丧失了时间，因此不如集结兵力后，迳直南下，争取早日配合子常击破吴军。因为子常军被吴击破，吴军直趋郢都，楚即使塞冥阨三关，毁淮汭之舟，都无损于吴。如能配合子常击破吴军，则不塞冥阨，不毁淮汭之舟，吴军也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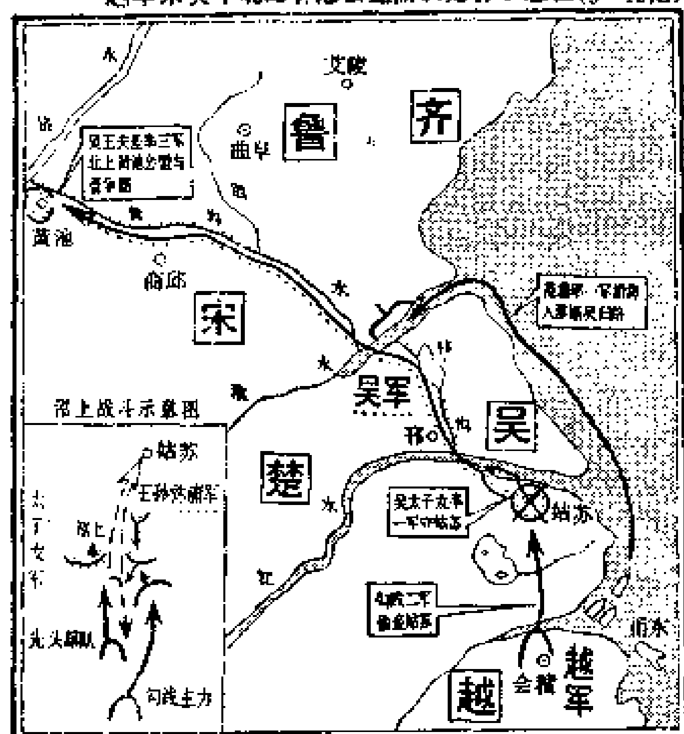
从逃脱被歼灭的厄运。子常沿淮河与吴军周旋，并非轻而易举。江河防御，正面辽阔，敌情不明，敌人到处可以渡河。攻者一旦渡河成功，则防者兵力分散，就会全线皆溃。所以子常的汉水地障，并不足恃，而险境则随时都可出现。吴军统帅是精明积极的人，很难想象他们会阻于地障而无所作为。所以子常即使不渡汉水求敌决战，也不能排除吴军渡汉水以求决战的可能性。因此，沈尹戌的军队要分秒必争，早日出现在敌人侧背，才能及时在关键性的一着上，旋乾转坤，扭转败局。以后沈尹戌在雍澨战死，他的战略雄图未能实现，使人惋惜。至于子常挟私念而渡汉水进攻，就不值一论了。

吴军柏举战胜后，立即发起深远的战略追击，不给楚军从重振旗鼓的机会，为顺利地进入郢都创造了条件，这是符合追击战的原则的。吴军这样远距离追击，和他绕道大隧、冥阨、直辕三关，千里奇袭，高度发挥军队的机动性，在春秋时代，是个创举。这当然是时代发展，兵器进步，军队素质改变（已非车战为主），军事思想也随之变化的结果，不能尽归功于统帅人物的创意。又吴军追击至清发水，让敌人半渡然后击歼其余，是符合古代战术中“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追”的思想的（冷兵器作战，追急了，败退之敌会作困兽之斗，攻者会增大伤亡）。但溃败之敌，指挥体系混乱，军心涣散，如能另选渡河点，渡河作平行追击，超越追击，则敌人损失将更大，崩溃也更迅速了。所以近代的战略战术原则都提倡尽人马最后一口气作平行或超越追击。

联系中原全局来看，这年，晋国曾作召陵之会，谋进攻楚国，虽未成事实[51]，然而肯定牵制了楚国大量兵力，也转移了楚国注意方向，这也是吴王阖闾能趁虚远程奔袭成功的一大助力。晋联吴制楚，这也是消极的配合。如晋国积极出兵，则楚国的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

三、吴越争霸的战略运用（参看插图3-12）

吴军入郢，吴国君臣，见楚国宫室之富，妻妾之美，于是“以班处宫”[52]（按尊卑之次序住进楚王宫室），“君居其君之寝，妻其君之



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伍员（子胥）报杀父之仇，竟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本来楚国臣民，不满意于楚国的虐政，及见吴国君臣的倒行逆施，对吴仇恨油然而生，因此楚臣中无一降吴者。如此数月，吴终不能安抚楚国人民，建立新的秩序。周敬王十五年（前505年），越王允常趁吴国内空虚，举兵进入吴国，秦又出兵助楚，阖闾弟夫概又率兵回吴，自立为王，吴王阖闾不得已引兵回吴。

越王允常奇袭吴都姑苏，见吴王阖闾引兵东归，也就撤兵回越。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5年），允常病死，子勾践即位。吴王阖闾为了遂行“南服越人”的方针，报入郢时越袭吴之仇，就于阖闾十九年越勾践元年亲率大军攻越，在檇李（今浙江省嘉兴县附近）被越军击败，受伤而死。其子夫差即位，积极准备出兵攻越，以报父仇。越王勾践任用楚人文种，范蠡革新内政，国力日强。为了先发制人，于周敬王二十五年（前494年）出兵攻吴，在夫椒（今江苏太湖中的椒山）

被吴军击败，损失严重。吴军乘胜追击占领越都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县），勾践以残余五千人退守会稽山（绍兴县东南），被吴军包围，于是一面派文种向吴王夫差请降，一面以美女、财宝贿赂吴太宰伯嚭，求他劝吴王夫差，允许越国作为吴国的属国。文种向吴王说，如吴不允越王的请求，“勾践将尽杀其妻子，燔（烧）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53]。伯嚭就劝吴王说：

“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

伍子胥反对，劝阻吴王说：

“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勾践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敌。”[54]

夫差终不听，于是许越国请和，率军回国。

吴王夫差不趁机灭越，是战略上最大的失策。这是他亡国丧身的起点。因为吴既志在北威齐晋，争霸中原，就应当彻底解除后顾之忧，扩大领土，增强实力，然后才全力以赴，争霸中原。当时，齐晋距离吴国很远，对吴并没有直接的威胁，时机既不紧迫，自无放弃已到手的越国，急急忙忙转而向北对付齐晋的必要。这与晋国魏绛和戎的时机大不相同。当时戎部族没有定居，无中心领导人物，不足为后患，而且楚国伐陈，晋必须出兵相救，如灭戎则误援陈的时机。所以必须暂时安定一方，抽出力量对付另一方。这是符合内线作战的原则的。夫差此时，时间和形势完全许可从容灭越，今不灭越一劳永逸安定后方，就始终未脱两正面作战的困境。这是很错误的。吴王夫差否决伍子胥的劝告，允许存越时说：

“孤将有大志于齐，吾将许越成（和）。而（你）无拂（违背）吾虑。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55]

这就见得吴王夫差明知越“改”与“不改”，都有可能，若越“不改”而吴又远出争霸，则吴后方空虚，越便有从后袭击的危险，那时能否及时回军讨伐既是疑问，能否战胜又是问题。若多留兵力备越袭击，就会减少北向争霸的力量，甚至可能两方面都兵力不足。攻既不克，守亦不固，而两头失误。所以吴王这一战略上的失策是他霸业不

终的重大原因。

越王勾践，自会稽山被围，卑词厚贿向吴称臣请为属国后，亲去吴国臣事夫差三年，才被释回国。他"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生聚教训，不遗余力，一面又恭谨备至，麻痹夫差，其用心的深刻，历史上亦属罕见。吴王破楚服越，领土扩大，兵威很盛。夫差好大喜功，胜利冲昏头脑，果然受其蛊惑，毫不觉察，一意争霸中原，遂其"北威齐晋"的迷梦。周敬王三十六年（前484年），夫差闻齐景公死，国君新立，大臣不睦，就要出兵攻齐，伍子胥劝阻说：

"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癣也。愿王释齐先越。"[56]

夫差不听，率兵败齐军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县东南）。于是就更加狂妄自信，不以越国为意。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夫差约晋定公和各国诸侯到黄池（今河南封丘南）会盟，太子友劝阻说：

"吴悉境内之士，尽库内之财，暴师千里而攻之；夫吴徒知踰境征伐非吾之国，不知越王将选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吴国，灭我吴宫，天下之危，莫过于斯也。"[57]

夫差也不听。他主观片面地追求中原霸权，不全面权衡战略形势，只以为艾陵败齐，中原慑于吴国威势，霸权已水到渠成，不可失去机会，而轻视了越国袭击后方的危险。于是派太子友，王孙弥庸和寿余姚等人率老弱一万人留守姑苏而自率精兵三万，北上黄池会盟。他这样顾前不顾后，就为勾践造成了趁虚奇袭的机会。

在战略上吴王夫差最大的失策是没有在会稽灭越，消除后顾之忧，养痈遗患已见前述；其次便是在艾陵之役前，未采用伍子胥"释齐先越"的战略，虽此时进攻越国比起会稽时要多付出代价，但仍有较大的胜利公算。因为这样可争取主动，士卒未受损失，国力无大消耗，夫差也不如艾陵之战后那么趾高气扬，还可以一战。及到空全国精锐争盟黄池，置国本于不顾，那就错误得不可收拾了。

周敬王三十八年（前482年），勾践闻夫差北上会盟，最初顾虑夫差"兵始出境未远，闻越掩其空虚，其还不难"[58]。所以等到数月之后，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年）春，待吴军已到黄池后，"乃发习流

（水兵）二千人，教士（经过训练的士卒）四万人，君子（奴隶主阶级从军的人）六千人，诸御（在军有职掌的官员）一千人伐吴”[59]。分二路：一部由范蠡率领，由海道入淮，阻断吴军自黄池返国的归路。主力由勾践率领从陆路袭击姑苏，在泓上（今江苏苏州西南横山）击败吴军，俘太子友等，进入姑苏城，掳获大量物资，取得辉煌的胜利。

夫差正在黄池与晋定公争作盟主，听说越军袭破姑苏，急忙回军。由于长期远征，急行返国，人马困乏，国都失守，军心涣散，夫差估计反击越军无胜利把握，就派伯嚭带厚礼与越求和。“越自度（估计）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和）”[60]。

勾践以弱胜强的主要原因，在于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发展了生产，坚强了军队然后趁虚奇袭。孙武在《孙子》兵法上说：“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就说明了，吴国君臣乖戾，对越不多作戒备，而越国上下一心，处心积虑，谋雪会稽之耻，看准吴国空虚，趁虚捣隙，取得胜利。

勾践不趁吴王远道返国，人困马乏，士无斗志而一举灭吴，战略上是否失策？值得探讨。他为什么“自度亦未能灭吴”呢？历史上没有记载。这大概是判断吴军尚有相当的兵力，警惕“归师勿遏（拦阻）”的原则，兼之在泓上（今江苏苏州市西南横山）与太子友作战及进攻姑苏，人马损失也不少，远道跋涉，也很疲敝，尤其攻入姑苏，抢掠子女玉帛，不在少数，奴隶主官吏和士卒，都私囊充盈，不愿再战，也不堪再战。所以勾践认为不如让大家满载而归，抚治伤亡，消化战利品，充实国力，伺机再战。勾践忍辱负重，文种、范蠡深谋远虑，君臣配合，战略运用，确实考虑深远，判断准确，行动果敢稳健。考虑夫差出国不远，易于还师，而必等待他到达黄池，然后出兵，而且还以偏师阻敌归路，取胜后许吴求和，都是坚决稳健的表现。

由于连年战争，“吴士民罢（疲）敝，轻锐尽死于齐晋”[61]。国内又闹饥荒，夫差就于和议成功之后，“息民散兵”[62]（解散军队，使人民休息），以求恢复国力。四年之后，周敬王四十二年（前478年），

越国实力更加强大，于是就趁吴国大饥，人民多就食于东海之滨，姑苏空虚的机会，大举进攻吴国。三月，进至笠泽（苏州市东南的吴淞江），吴越两军夹水而陈。勾践利用夜暗，以左右两军，分别于上下游佯渡，中军趁吴分兵两路迎战，一举渡河，大败吴军。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越进围姑苏，一面监视吴军，一面发放吴国粮食以争取吴国人民，最后尽有吴地。至周元王三年（前473年）十一月，姑苏城破，夫差自杀，越灭吴。（参看插图3-12）

勾践灭吴是利用吴国饥荒，人民就食东海之滨，姑苏空虚，而采取突然袭击的。但这次吴国的空虚，不仅在姑苏，而是整个国家虚弱，因为轻锐既尽死于齐晋，人民又饥饿就食于海滨，不要说当敌人袭击，仓卒之间动员集中不起来，就是有足够时间，也不能使饥民成军，即使集中起来成军，身体虚弱也不能打仗，所以越国选择这个时机进攻吴国，是非常有利的。对吴国来说，越人来袭，不是出于意料之外，苦在于敌强我弱，无力对付而已，所以夫差此时应知如何持久，以保存自己而削弱敌人，待敌人疲敝，自己兵力集中起来，条件有利，再行决战。查姑苏东南笠泽一带，是水网地带，很容易避免决战，并且姑苏城池坚固，可以持久固守。如一面与敌持久，一面发放粮食安抚人民，待人民复苏，组成军队，四出扰敌，断敌归路，未必就不能转劣为优，取得胜利。可惜夫差性情刚愎，没有远虑，竟赌国家命运于一战而在笠泽作江河防御。而江河防御，敌情不明，被动性很大。古今中外战例，江河进攻，成功的战例多，而江河防御，成功的战例少，就在于防御的一方对攻者的确实的登陆点难于判断，“敌不知其所守”的缘故。笠泽之战，勾践两处佯攻，夫差被诱惑分兵应战，战术上又失败，就全盘皆输了。

夫差连战皆输，以残余兵力退守姑苏孤城，在政治上又不知全国境安抚激励人民，使之抗越，反而让越人以吴国的粮食，争取吴国人民，尽有吴地，也是战略上很大的失败。古今中外战例，困守孤立的要塞，总是陷落的多，保全的少。没有外援，再坚固的城塞也守不住，这就是“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的说明。越王勾践散发吴国粮食

争取吴国人民，因而尽有吴地，因而也才能围困夫差。对比阖闾入郢，倒行逆施，楚臣无一降者，就可以看出两国争取群众策略的高低，也就影响了战略的成败，国家的兴亡。“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丧失人民群众的拥护，而能战胜敌人，是不可想像的。

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选贤纳谏，争取民心，发展生产，奖励生育，建立城廓，训练军队，使国富兵强，为击破吴国，争霸中原打下物质基础，这当然是他争霸成功的主要因素。

勾践灭吴后，周元王命他为侯伯。这以后中原各国，因新兴的封建势力迅速壮大，诸侯间的兼并和争霸战争，逐渐为诸侯国内部不同集团间的争夺所代替。及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历史便进入了战国时期。

综 合 论 述

春秋争霸战争历时既久，战略上机巧权诈，又变幻莫测，从争霸战成败，可取得不少的经验教训，现试谈几点肤浅认识：

一、争霸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列宁说：

> “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像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加速地破坏极端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列宁全集》第21卷第279页）

春秋大国的争霸在客观上超出了战争的本来目的，对社会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首先表现在各国在战争中竞相争取胜利，不得不在政治、经济、军事上作某些变革。这些变革的目的固然是各国奴隶主为了加强军事力量和增加财富的收入，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私有和阶级变化，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其次，争霸战争促进了民族大迁徙，大交流，大融合。如齐国在东方融合介、莱夷、根牟、淮夷、余成、郯、莒等族；秦在西方融合了阳柜泉皋、伊洛之戎、戎蛮、大戎、骊戎、朐衍等族；晋燕在中原和北方融合了貉、北戎，和大部分狄人；楚和吴、越在南方融合了百濮、荆蛮、越等族。这些大国又相互往来，取长补短，从而使当时各族以华夏族为中心融合为一体。所

以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形式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

二、齐、晋、秦、楚、吴、越，都有一个富国强兵的过程；都知道"足食足兵"、"节俭爱民"为争霸打下物质基础。"兵强者战胜"，而强兵则需要足够的兵源，犀利的武器，严格的训练和丰裕的供给。这就需要人口众多，生产发达，军民训练有素。管仲治齐，"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及勾践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对这个道理显示得十分清楚。与现代国家要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文化教育，装备和训练军队，精神完全一致。古代生产不发达，要装备和训练出一支优良的军队，需消耗相当多的财富，所以除齐桓公以外的霸主都讲究"节俭爱民"，积累财富，来维持强大精锐的军队而保持霸业。

三、各国霸业衰落，主要都由于内部矛盾，不团结、闹分裂。频年战争，生产停滞，实力削弱，有以致之。齐、晋霸业的衰落，都是由于分裂。吴楚的失败主要在于腐朽奢侈、贪污和穷兵黩武。楚国国土广大，但春秋后期，贵族们搜括无止境弄得到处都看见饿死路旁的人，盗贼遍地，所以新兴的吴国，可以破楚入郢。吴王夫差，为报父仇，日夜勤于建军练兵，演习阵射，虽然训练出一支强劲的军队，但是他不能如他父亲阖闾那样"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而是"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欢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他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兴师动众，超出了国力许可的界限，一面给敌人趁其国力虚弱而攻灭之的机会，一面也加深了奴隶们的阶级仇恨，不肯用命，因而招致身死国亡的惨祸。这就见得任何国家，对内必须发展生产，使民安居乐业，使士大夫（官吏）有理想，有共同奋斗的目标，做到内部安定团结，对外树敌不可太多，不可长期争战，使士民疲敝。《孙子》说：

"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弹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吴子》也说：

"天下战国，五胜者祸，四胜者弊，三胜者霸，二胜者王，一胜者帝。所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这都说明战争是消耗国力而关系国家存亡的。任何强大的国家都不可轻于从事战争。

四、称霸诸国，一无例外，都有一个"得人"的问题。广义的"得人"是得人心，获得人民的拥护，"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狭义地讲，就是要得人才，不仅考察"将熟有能"便可预知战争胜负，国家也要有治国良臣才能富国强兵，所以齐桓公有管仲、鲍叔；秦穆公有百里奚、蹇叔、孟明；楚成王有令尹子文；楚庄王有孙叔敖；晋文公有狐偃、赵衰、先轸；吴王阖闾有伍子胥、孙武；越王勾践有文种、范蠡而称霸中原。但认识人才，颇非易事，管仲、百里奚、伍子胥、范蠡等能得重用都有曲折的戏剧性的过程，因此古人有"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感叹。这在科学不发达，由君主任命百官的封建时代确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科学倡明的时代有培养人才之方，选择人才之法，策励人才之道。这就是健全学校教育，严格考试制度，励行对干部严格考核的制度。因此，与其靠伯乐知人善任，不如健全教育、人事制度。

五、春秋争霸，大小诸侯互相兼并、削弱，各欲置对方于两正面作战的境地，而使自己脱出两正面作战的困境；外交活动，会盟，抢占战略重要地位，纵横捭阖，极尽拆散对手的联合，拉拢自己与国的能事。"太上伐谋、其次伐交"，外交上眼光远大无疑可为国家战略上谋得长远的利益。而目光短浅，图近利，不忍一朝之忿，"为渊驱鱼"，往往留下无穷后患。而预先布局，争取与国，使发生作用于未来，则往往可以获得战略上很大的利益。由此可见战略决策，必须配合外交政策双管齐下，才能够达到战胜的目的。

六、春秋霸业，出于齐楚秦晋，就地理形势看，是由于有发展空间，且侧背比较安全。可见国防地理位置良好，侧背无后顾之忧，且有发展余地的国家，可避免两正面作战，经常处于较优越的竞争地位。相反，四面受敌的国家，即使在外交上和战斗上费尽很大力气，仍患不能脱出困境，如果盲目树敌，那就更难摆脱战败国削的悲运。德国老毛奇和史蒂芬都明白两正面作战不利的道理，然而两次世

界大战，又都因此失败，这岂不发人深省吗？中国有“乱世务边”之说．观察春秋争霸及历来战乱时代负隅割据的情况，就可以知道兵要地理，对军事的影响，研究战略的人，对此不可不适当留意。

注　释

〔1〕《史记·齐太公世家》

〔2〕《管子·大匡篇》

〔3〕《管子·重令篇》

〔4〕《管子·七法篇》

〔5〕《管子·中匡篇》

〔6〕《史记·管晏列传》

〔7〕《管子·治国篇》

〔8〕《管子·乘马篇》

〔9〕〔10〕《管子·小匡篇》，即废除集体无偿耕种公田的劳役税制，将公田变为份地，改集体耕作为个体生产，按土地土质好坏，面积大小，征收不同等级的实物税。

〔11〕〔12〕《管子·七法篇》

〔13〕《管子·中匡篇》

〔14〕《管子·霸言篇》

〔15〕《史记·齐太公世家》

〔16〕《史记·管晏列传》

〔17〕《论语·宪问十四》

〔18〕《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19〕《管子·小匡篇》

〔20〕《左传纪事本末·王朝交兵》

〔21〕《左传·僖公四年》

〔22〕《左传·闵公元年》

〔23〕《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24〕《国语·晋语四》：“昭旧族，爱亲戚，明贤良，尊贵宠，赏功劳，事耆老，礼宾旅，友故旧”。

〔25〕《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26〕当时黄河经今河南省滑县南，流经浚县北入今河北省境入渤海。

〔27〕《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流亡时曾受过宋襄公的厚待。

〔28〕《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29〕晋文公流亡时，过曹，曹共公听说他肋骨并成一块，趁他洗澡在帘子后偷看他。

〔30〕〔31〕《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2〕晋文公流亡时楚成王招待他，说：“你如果回到晋国，用什么来报答我？”晋文公（当时是公子重耳）说：“如果托君王的福回到晋国，一旦晋楚两国军事演习，在中原相

遇，我就退避三舍"。

〔33〕〔34〕《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5〕《孙子·计篇》

〔36〕《孙子·火攻篇》

〔37〕《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8〕《左传·僖公三十年》

〔39〕秦国袭郑的军队到达滑国，郑国商人弦高去成周作买卖，碰到秦军，就假借郑穆公的名义送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使秦知郑已有准备。

〔40〕《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41〕城濮之战后，晋扩三军为六军，晋襄公时，缩编为五军，此刻又恢复为六军。

〔42〕夏姬貌美，楚国讨伐陈国，得夏姬，楚庄王及令尹子反都想娶她，巫臣劝阻，楚王乃以与连君襄老。邲之战，襄老战死。巫臣诱夏姬借口迎襄老之尸去郑国，然后去娶她。夏姬果然去郑国。巫臣借出使齐国之便，到郑国，娶夏姬逃到晋国。

〔43〕《左传·成公十六年》

〔44〕《左传·襄公八年》

〔45〕《史记·吴太伯世家》

〔46〕《左传·昭公三十年》

〔47〕《左传·定公三年》唐成公朝楚，有二匹名肃爽的骏马，子常想要，唐成公不肯因而被拘留三年，献马后才被释放回国。

〔48〕《孙子·虚实篇》

〔49〕1800年5月法国第一执政拿破仑采取大胆的迂回战略，率部翻过阿尔卑斯山，直奔意大利北部的米兰，进出奥军背后，大败奥军。

〔50〕〔51〕〔52〕《左传·定公四年》

〔53〕〔54〕《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55〕《国语·吴语》

〔56〕《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57〕〔58〕《吴越春秋》卷三、卷六

〔59〕〔60〕〔61〕《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62〕《吴越春秋》卷三

第四章　战 国 兼 并

自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起，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止，是我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1] 由于铁工具在各类生产部门的广泛使用和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促使生产关系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秦、楚、魏、赵、韩、齐、燕七个强国的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国力的壮大，是通过“变法”——对政治制度进行改革而获致的。各强国的变法，在客观上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比春秋时期有很高的增长。各国的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富国强兵，采取了“礼贤下士”，重用知识分子的政策，使战国成为我国古代“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各国变法图强的目的，是为了建立和巩固封建政权，对外争取兼并战争的胜利。于是李悝、申不害、商鞅等著名法家，张仪、苏秦、公孙衍等长于策略的纵横家，吴起、孙膑、乐毅、田单、赵奢、廉颇、李牧、白起、王翦等一大批优秀的军事家便先后应运而生。国君和谋臣们的战略决策及其实施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于各国的盛衰成败。本章主要探讨三晋的盛衰之由；战国合纵连横战争中有关重要战略的运用；秦国削平群雄，统一中国的原因。温故可以知新，对古为今用，或可有所裨益。

第一　七强并列的形势和变法图强的概况

一、七强并列的形势

春秋时期见于经传的国家（包括少数民族），大小约一百六十多个。经过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的兼并战争，到战国初年只剩下“战国七雄”——秦、楚、魏、赵、韩、齐、燕七个强国和一个地大而不强的

越国，以及宋、鲁、郑、卫、莒、邹、杞、蔡、郯、任、薛、滕、曾等十多个小国和东胡、匈奴、楼烦、巴、蜀、中山、义渠等近二十个少数民族的部族和国家。周天子虽名为天下共主，局处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北）及其附近数县之地，实际上已成为小国。

七强的疆域及其四邻如下：（参看插图4-1）

楚国：位于南方，土地最大。其国都为郢（今湖北江陵西北纪南城）。其疆域：自今四川东端起，包括湖北全省，湖南东北部，江西、安徽两省北部，陕西之东南隅，河南的南边，江苏淮北中部。其四邻：西边是巴，西北为秦，北边为韩、魏、宋、鲁，东北为莒，东为九夷与越，南为百越。

韩国：在七强中土地最小。其国都于前416年由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迁宜阳（今河南宜阳西），韩景侯时迁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前375年灭郑后迁都郑（今河南新郑）。其疆域：有今山西东南部和河南中部，周在其包围之中。其四邻：西边是秦，南边是楚，东南为郑，东为宋。其大部分土地皆处于魏国的包围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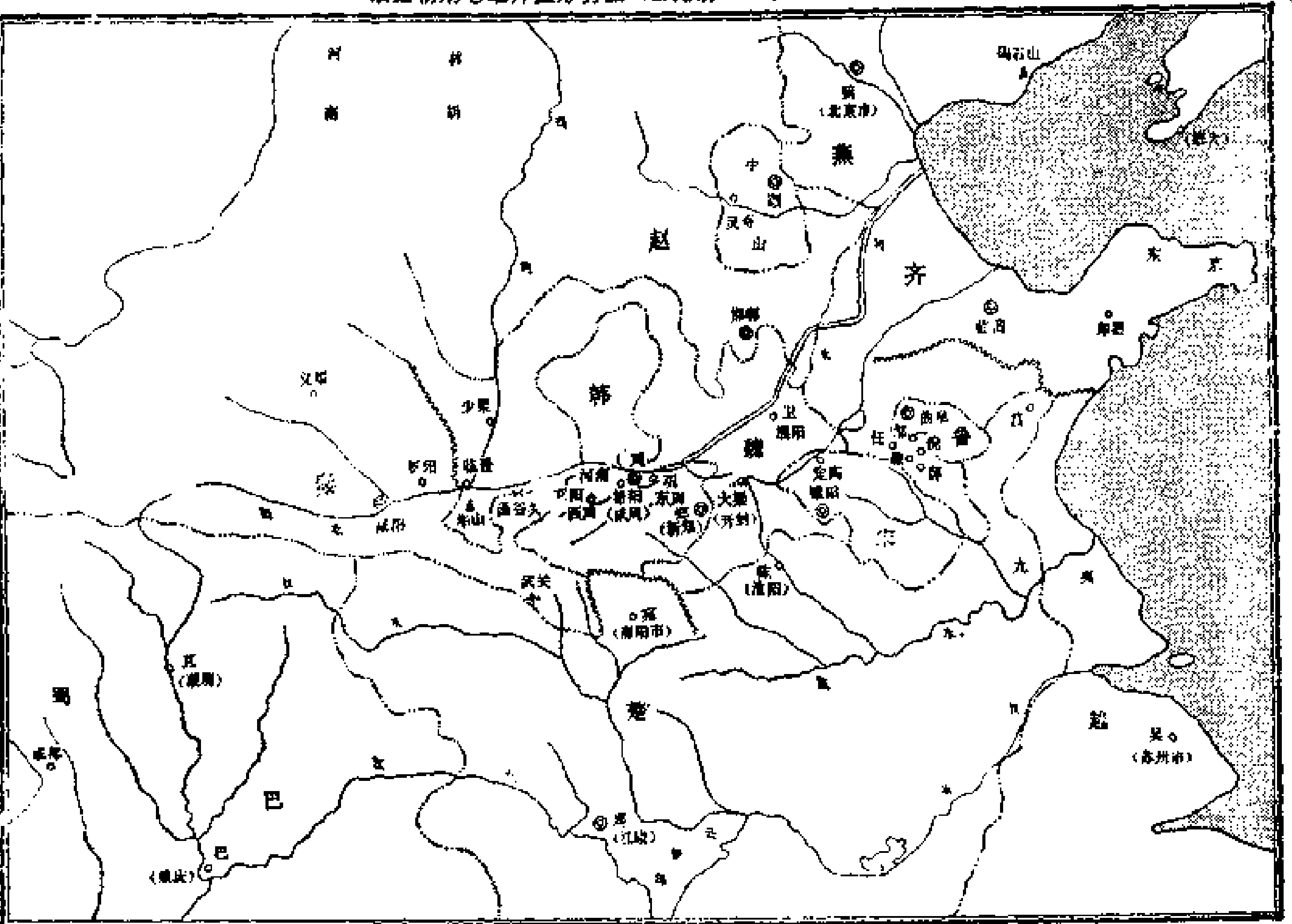
魏国：位于中原中心地区。其国都于前316年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其疆域：在今陕西境内，沿黄河有今韩城之南部，在渭河以南有今华阴左右附近之地，并有今山西西南部及东南部，又通至河南北部，兼有黄河以南沿黄河一带部分之地。其四邻：与秦、赵、韩、郑、楚、齐、卫为邻。

赵国：位于北方。其国都在前425年由晋阳（今山西太原南）迁中牟（今河南鹤壁西），前386年迁邯郸（今河北邯郸）。其疆域：有今陕西东北部，过黄河有今山西中部及东北部和东南部，河北的东南部，山东西边的一隅之地和河南的北端。其四邻：北有楼烦、林胡，东北为燕与东胡，东为中山与齐，西与韩、魏交错接壤。

燕国：位于东北。国都为蓟（今北京市西南），燕昭王始设下都于武阳（今河北易县南）。其疆域：有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部，并有山东北端的一小角。其四邻：北为东胡，西边是中山和赵，东及东南靠海，南与齐为邻。

战国初期七雄并立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4—1图）



齐国：位于东方。其国都为临淄（今山东临淄北）。其疆域：有今山东偏北之大部及河北之东南部。其四邻：北为燕，西为赵、卫、魏，南为宋、鲁、莒、杞、越等。

秦国：位于西方。其国都原在雍（今陕西凤翔东），后迁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前383年迁栎阳（今陕西富平东南），前350年迁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其疆域：自今甘肃东南部，沿渭河两岸据有陕西之腹部，有一部直达黄河沿岸，另有一部分自今陕西东南伸入河南灵宝。其四邻：西为獂、绵诸、乌氏等戎国，南为巴、蜀，东南为楚，东为韩、魏，北有义渠。

二、变法图强的概况

战国时期，在一些国家内，新兴的地主阶级先后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了巩固其统治，加强封建制度的建设，对外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以攫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他们都着意于招贤纳士，进行社会改革，掀起了变法运动。其中变法最早的是魏国。

魏国的魏文侯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诸侯。他于周定王二十四年（前445年）继位后，招纳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2]、李悝、西门豹、吴起、乐羊等人为他治国。他任用李悝为相，实行政治改革。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废除奴隶制时代遗留下来的官爵世袭制，按照“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来选拔官吏，“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实行“尽地力之教”[3]的措施，废井田，湮沟洫，提高了农业生产；创立“平籴法”[4]，用“收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即丰年储粮，荒年平价卖出，以保证人民生活的稳定；坚持法制，制定“法经”[5]，以巩固封建政权的社会秩序。又任命西门豹治邺（今河北磁县西南的邺镇），建设了引漳水灌邺的水利工程[6]，使河内（今河南黄河北岸及其西北附近一带地区）富庶。又派遣军事家吴起改革军事制度，创立“武卒制”，对士兵进行严格的挑选、训练和考核。平时根据不同的素质和特点来编组训练，战时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交互或配合使用，使士兵的优点得到充分的发挥。他统率魏军一举攻占秦国的五座城池，设立了西河郡（今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

东、黄河以西地区）。吴起任西河郡守，“秦兵不敢东向”[7]，魏国成为战国初期最强大的国家。

赵烈侯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以公仲连为相[8]，又任命牛畜为师，荀欣为中尉，徐越为内使，依靠他们整顿吏治，改革统治机构，根据功德和能力大小授予官职，注意节省财政开支，实行“节财俭用”，因而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使赵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封建国家。后来，赵武灵王（前325年——前299年）又改革军事制度，实行“胡服骑射”，组成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使赵国强盛起来。

楚悼王时，吴起由魏至楚，于周安王十三年（前389年）被任命为令尹，进行变法。吴起改定法令，裁汰冗官，提高了军队的待遇和战斗力，楚国因而强盛。在楚悼王时，曾败三晋，西向攻秦，各国皆以楚之强大为患。前381年楚悼王死，吴起被旧贵族杀害[9]，反对改革的旧势力抬头，楚的朝政又趋于紊乱。

秦孝公于周显王八年（前361年）即位后，发奋图强，下令求贤，重用商鞅进行过两次政治改革。自前356年开始，制定连坐法，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举奸告密，告密者赏，有奸不告者腰斩；实行按户按人口征收军赋，鼓励开荒，家有二男以上不分居者加倍征收赋税；定爵禄为二十级，按军功大小予以赏赐提升，无军功者虽宗室也不能受爵禄；严禁私斗，私斗者按情节轻重判刑；从事农业生产成绩好的可以免除劳役，游手好闲而致贫困者要没收妻子为官奴。至前350年又进行第二次变法，开阡陌封疆（挖掉奴隶制井田的边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彻底废除井田制，确认地主和自耕农的土地所有制；在全国普遍推行县制，设置县一级的行政机构，将全国的政权、兵权集中于中央；统一全国的度量衡，以利于赋税的征收和商业的发展[10]。秦国推行新法，“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富强，诸侯称贺，[11] 成为西方的强大国家。前318年秦孝公死，秦惠王即位，反对变法的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谋反，杀商鞅并于死后处以车裂之刑。由于秦国的变法比较周密彻底，以后的各代君主又皆以帝王之业为志，遂使商鞅之法不衰，

从国力上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础。

齐威王于周显王十二年（前357年）以邹忌为相，加紧整顿朝政，进行政治改革。广开言路，提倡进谏，赏罚分明，任用贤才。他还任用军事家孙膑训练军队，加强武备。当时齐国名为“击技”的士兵，具有较高的战斗力。又以檀子守南城（今山东费县西南），楚人不敢东逼；使盼（音“班”）子守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赵人不敢东至黄河，使黔夫守徐州（即“薛”，今山东滕县南），燕、赵震惧[12]。齐国成为东方的强国。

韩昭侯于周显王十四年（前355年）以申不害为相，进行政治改革，建立了“循功劳，视次第”[13]的按功行赏制度。在申不害为相的十五年间，韩国加强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政局比较稳定，国势也比较强盛。但是，韩昭侯、申不害以实行“术”治为主，用“术”有余，而定法不足，没有创立统一的法律和宪令。而行“术”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因此，当韩昭侯一死，人亡政息，韩国便陷入了混乱的局面，韩国的国力也就衰弱，始终赶不上魏、赵两国。

燕国的政治改革较晚，燕王哙于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年）让位于相国子之，欲求振兴燕国，因太子欲夺回君位而发生内战。齐国乘隙进攻，曾一度占领燕国[14]。领土小，人民少，与其他六国相较，燕国是最弱的。

总之，在战国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相继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改革，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力量强弱不一样，因而反映在各国的变革过程中，时间的先后，变革的方式和程度也都不一样。在中原地区，一批从旧贵族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地主阶级，通过斗争逐渐取代了旧势力的代表者公室，然后进一步通过变法革新，把已取得的胜利巩固下来。这是一种已取得政权以后的改革，如三家分晋后的魏、韩、赵，田氏代齐后的齐国。在边远地区，则是新兴的地主阶级支持和利用国君励精图治，打击旧有的世卿贵族特权，来实现本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这是一种尚未取得政权以前的改革，如秦国、楚

国等。总的说来，改革得早的，早富强；改革得比较彻底的，国力强盛而且长久；改革得不大彻底的，国力虽暂盛而易衰。

三、变法与兼并战争胜败的关系

战争是敌对双方比智斗力的竞赛，故国力的强弱，政治、军事人材的多寡，是战争胜败的物质基础。

战国时期各强国变化的情况，虽因史料残缺而致不全，但其中心内容，变奴隶制的生产关系为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和奖励耕战等等都是相同的。其目的在富国强兵，充实物质基础，以利于进行兼并战争，吞并弱小，扩大霸业，进而统一天下。商鞅就说过："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15]

由于变法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力量有很大的提高，人民生活相应地有所改善，而赋税的收入则更为增多。于是有较为丰富的粮食供给广大的军队，有更多更好的武器、服装、车马等装备强大的军队。据《孙子·作战篇》所记，"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春秋末期一次战争所用的兵力在十万左右，到战国时期军队数量大增，前260年长平之战，秦将白起俘虏的赵卒就达四十万之多，战争规模大大地扩大了。兼并战争也比春秋时期更加频繁而剧烈了。

富国强兵，必须先有通晓政治、经济、军事的优秀干部；巩固政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做到令而行、禁而止，必须加强法制，强化政令军令，赏罚分明。"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16]，是言之中肯的。各国变法图强，都首先实行了重用知识分子的政策，因而获得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军事人才，对变法和推行新法起了积极作用。有法不行，等于无法，各国都采取了强化法令的有力措施。如商鞅行法，令出必行，不避权贵，因而秦法大行，国以富强。

由于各国变法富国强兵的结果，军队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提高了。各国的兵力概数如下表：

国别	兵力概数	时期	资料来源
秦	带甲（或作"奋击"〔1〕）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秦惠王时期（前337年—前311年）	《战国策·秦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韩策一》、《楚策一》张仪语。《秦策三》范雎语。
魏	带甲三十万（或三十六万），守边和后勤部队十万。最强盛时有武卒〔2〕二十万，苍头〔3〕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4〕二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	魏襄王时期（前318年—前296年）	《齐策五》策士所造苏秦语。《魏策一》张仪语、《魏策三》须贾语。《魏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
赵	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	赵肃侯时期（前349年—前326年）	《赵策二》策士所造苏秦语。
韩	兵卒不过三十万（包括厮徒），除守边之外，见卒不过二十万，苏秦说有带甲数十万。	韩宣惠王时期（前332年—前312年）	《韩策一》张仪语。《韩策一》苏秦语。
齐	带甲数十万（约近百万）。	齐宣王时期（前319年—前301年）	《齐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
楚	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楚威王时期（前339年—前329年）	《楚策一》苏秦语，江乙语。《秦策三》蔡泽语。《史记·楚世家》。
燕	带甲数十万，车七百乘，骑六千匹。	燕文公时期（前361年—前333年）	《燕策一》策士所造苏秦语。

〔1〕 奋击：能奋力击敌的勇士。

〔2〕 武卒：魏国考选的常备兵。能穿重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盛弩箭的圆筒）矢五十个，带戈带剑，携三日粮，半天能走一百里的强健士兵。（《荀子·议兵篇》）

〔3〕 苍头：头裹青巾的士兵。

〔4〕 厮徒：来源于奴隶，是担任养马，炊事及管理服装等后勤工作的杂务兵。

第二 魏的盛衰

一、三晋联合，魏霸中原

春秋战国之交，秦国于前461年攻灭大荔（今陕西大荔东南）[17]。楚国于前461年灭蔡（今安徽寿县北部地区），前445年灭杞（今山东安邱东北），拓土至泗水（源出山东泗水陪尾山，经曲阜北而西南流，会荷水东南流，经徐州，过邳县南，经泗洪东流入淮水）之上，前431年灭莒（今山东莒县及其附近地区），又不断攻郑（今河南中心地区），至前400年楚悼王时已据有大梁（今河南开封）、榆关（今河南中牟南）一带之地[18]。越国（自山东瑯琊起，而有沿新沂、清江、扬州、南京、芜湖、祁门以东之地区）于前414年和前413年，先后灭滕（今山东滕县西南）灭郯（今山东郯城西南）。齐国于前412年至前480年之间，攻占了鲁国的莒（今山东莒县西）、安阳（今山东曹县东）、郕（今山东泗水西北），前407年又攻占了卫国的贯丘（今山东曹县南）[19]。强吞弱，大并小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

地处中原腹心之地的魏国，在魏文侯变法强盛之后，便连年征伐，四向扩张。在西方，魏国自前413年至408年的六年之间，不断西向攻秦。先后攻占了繁庞（今陕西韩城东南）、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洛阴（今陕西大荔西南）、郃阳（今陕西郃阳东南），全部夺取了秦的河西（今陕西河套南部黄河以西地区）之地，逼使秦国退守洛水（在今陕西北部）[20]。在北方，魏国于前408年至前406年，越过赵国灭了中山国（今河北西部完县、定县、灵寿、石家庄、高邑一带地区）[21]。在东方，与韩、赵两国联合于前404年攻入齐的去城（今山东平阴东北至瑯琊台一带），前380年攻齐至桑丘（今山东济宁市北），前378年攻齐至灵丘（今山东高唐南）[22]，并于前373年独立伐齐至博陵（今山东茌平西北）。在南方，于前400年与韩、赵联合伐楚到乘丘（今山东巨野西南）；并于前375年独立伐楚榆关（今河南中牟南），前371年攻占了楚的鲁阳（今河南鲁山附近）[23]。三晋声威大振，周威王

也于三晋联合攻齐之时，在前403年正式命魏、赵、韩为诸侯[24]。魏国因实力最为雄厚，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国家。田和虽早已取得齐国政权，但其正式取得国君地位，也是前387年浊泽（今河南白沙水库东）之会时，通过魏武侯向周安王请求，才在次年正式列为诸侯的[25]。魏声威之盛，可以想见。在魏文侯、魏武侯时，魏国已成为中原霸主。后来魏惠王与孟轲商讨振兴之计时，追述魏之强大，曾有“晋国天下莫强焉”[26]之语，也说明对往昔的强盛十分眷恋。

二、利害冲突，三晋分裂

在魏文侯初年，韩、赵两国发生冲突。韩国向魏借兵攻赵，魏文侯说：“寡人与赵兄弟，不敢从。”赵也向魏借兵攻韩，魏文侯说：“寡人与韩兄弟，不敢从。”后来韩、魏两国都知道魏文侯对他们很好，不借兵是使他们归于和好，于是韩、赵都朝于魏。由于韩、赵亲附，魏国俨然成了三晋的首领，势力强大，各国都不能与之争衡[27]。其后，三晋向外扩张，韩国曾先后伐郑，攻占了雍丘(今河南禹县东北)、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伐宋，曾俘虏过宋君。取得了不少土地。前375年魏国攻楚于榆关的时候，韩又乘机灭郑，并迁都于郑(今河南新郑)[28]。赵国于前386年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这年，赵烈侯死，敬侯即位。公子朝（《魏世家》作“公子朔”）争夺王位失败后奔魏。魏武侯企图乘机控制赵国，出兵助公子朝袭击邯郸，被赵击退[29]，赵与魏开始发生矛盾。加以在三晋联合伐齐伐楚的战争中，赵国在扩展领土方面未捞到好处，赵敬侯于前383年便出兵攻卫(卫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卫国向魏求救，魏武侯出兵救卫攻赵，大败赵军。次年，卫国凭借魏的力量乘胜反攻，占领了赵的刚平（今河南清丰西南）后又进攻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赵国战败后向楚求援，楚悼王欲乘机削弱魏国，便从南方攻魏，一直打到黄河边。赵国也乘势反攻，占领了魏的棘蒲(今山东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西)[30]。由于赵国从附魏变为反魏，魏国对远隔赵国的中山国已无力控制，中山也乘机在前380年前后复国了。前372年，赵成侯又出兵攻卫，占领了七十多个乡邑。魏也出兵攻赵，败赵军于蔺(今山西离石西)[31]。赵、魏两国的矛盾加

深。前369年魏武侯死，惠王继位，因公中缓争夺王位内讧，赵、韩两国联兵攻魏，在浊泽（今河南白沙水库东）大败魏军，并包围了魏惠王。魏的强大，是对韩、赵两国的威胁。赵成侯主张除掉魏惠王而立公中缓，割取魏的土地后撤军。韩懿侯则主张使魏惠王与公中缓分魏而治，魏分为两，力量削弱，就可以免除威胁。两国意见不一，韩国在夜间撤军而去，使赵陷于孤弱。魏惠王反攻，杀公中缓，打败赵军[32]。次年，魏国又败韩于马陵(今河南新郑东南)，败赵于怀(今河南武陟西南)[33]，战胜了韩、赵，保住了霸主地位。因三晋由联合走向分裂，魏国势孤，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此后，韩、赵、魏三国在有共同利害的时候也采取联合行动，但主要的是自谋发展，在利害冲突的时候又因争夺土地而互相攻杀。

三、齐秦崛起，魏霸业衰

在三晋分裂的前后，位于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日益强大起来了。齐国在过去经常被魏国打败，田和通过魏文侯列为诸侯之后，是服从于魏国的。齐是东方大国，富于山林(林产品)、渔（水产品）盐之利，田氏夺取政权后赋税比过去轻，得到人民的拥护。当生产发展，国力日渐强盛之后，就不再受魏国的控制了。在三晋分裂的第二年，齐就出兵攻占了魏的观（今河南清丰南)[34]，以后又迫使原来向魏国朝贡的泗上小诸侯向自己朝贡[35]，成为魏国霸权的竞争者。秦国在前408年——前375年间，进行了一些改革，国力有所提高。秦献公为了收复失地，于前364年与魏战于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斩首六万。周显王还赐黼黻（读“甫弗”。绣黑白两色花纹的诸侯礼服）表示庆贺[36]。前363年，秦又攻魏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虏魏将公孙痤，取庞城(今陕西韩城南)[37]，前361年秦孝公变法图强后，魏国便处于齐、秦两强东西夹击的态势之中。

四、迁都大梁，图固霸业

魏惠王在齐、秦两强夹击的不利形势下，为了巩固其独霸中原的地位，采取了迁都大梁，增强国力和缓和与韩、赵矛盾的措施。

魏国的主要领土，在今山西西南部河东及今河南北部的河内和大

梁一带，被韩国从中央梗阻，分为东西两部。国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僻处西部，与东部只一条走廊可通，只有通过崎岖的山地上党才能通达东部。安邑既不便于统治东部地区，又处于秦、赵、韩三国的包围之中。而齐国迫使向魏国朝贡的泗上小诸侯向其朝贡，是公开与魏争夺霸权的行动，威胁比秦还大。魏惠王为了便于统治东部地区，加强对东方诸侯的控制，于周显王八年（前 361 年）四月，将国都从安邑东迁大梁[38]。为了加强对秦国的防御，又于前358年命龙贾筑长城于西边[39]——南端起于郑（今陕西华县），越渭水，洛水，经大荔至澄城及其西北地区，巩固西部边防。

在增强国力方面，迁都大梁的次年，魏国便积极地兴修水利，在大湖泊圃田（今河南中牟西）与黄河之间开运河，引河水入圃田，再从圃田开运河引水灌田[40]，提高了农业生产。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魏惠王又恢复考选“武卒制”，组建了一支二十万人的“武卒”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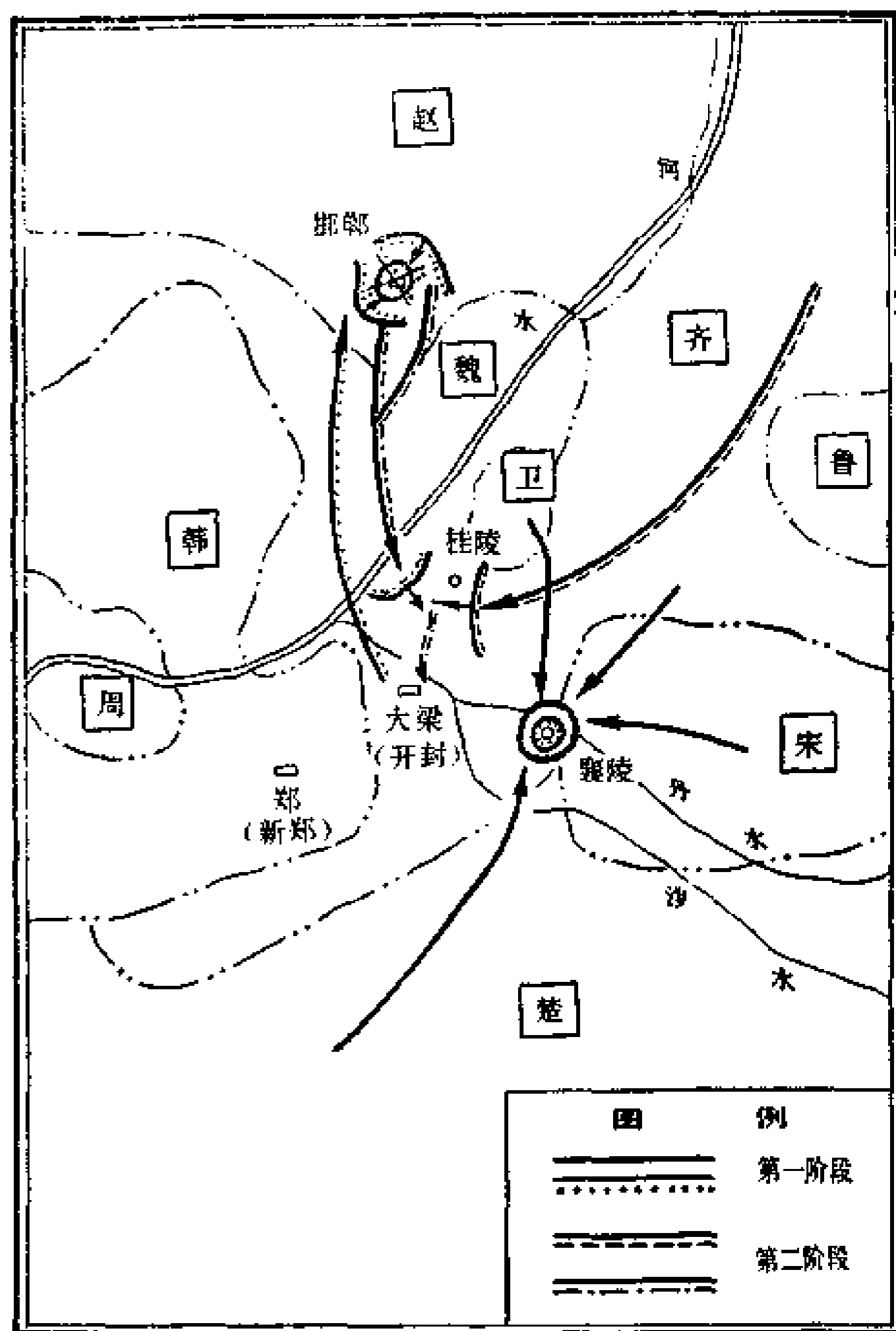
魏惠王也意识到三晋分裂，对魏极为不利，于是用软硬兼施的手段，与赵成侯于前 358 年在葛孽（今河北肥乡西南）相会，次年又在鄗（今河北高邑东）相会；与韩昭侯于前 361 年在巫沙（今河南荥阳北）相会，并于前357年包围韩的宅阳（今河南郑州北原荥泽县之地），迫使韩昭侯与魏惠王在巫沙结盟，以释宅阳之围[41]。

魏国迁都大梁，控制了东部地区，又发展了生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与韩、赵的关系暂时得到缓和。前 356 年，鲁、宋、卫、韩等国又皆入朝于魏[42]，魏又暂时维持了霸主的地位，但从长远看，并未脱出四面受敌的困境。

五、齐赵联合，魏败桂陵（参看插图4-2）

魏国采取了许多措施，巩固了霸业，而齐、秦两国的力量也在不断发展。齐威王于前 357 年继位后即以邹忌为相，进行政治改革；秦孝公也于前 356 年重用商鞅，进行变法。两国的国力进一步增长，而且矛头都指着魏国。魏惠王虽然对韩、赵两国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但并不能使矛盾解决。赵、韩两国自身的利益在于向外扩张，

齐魏桂陵之战示意图 （4—2图）



兼并小国，如不摆脱魏国的控制，就无法达到目的。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鲁、宋、卫、韩四国之君朝魏的时候，赵成侯没有参加，反而和齐威王、宋桓侯在平陆（今山东汶上北）相会，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保定市东安州镇）相会[43]，争取与国抗魏。齐国为

了削弱魏国，争夺中原霸权，与赵国一拍即合，很快就联合起来了。魏国处于齐、秦两强东西夹击的态势之下，为了摆脱两面作战的不利局势，便于前 355 年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东）相会，与秦国妥协，以便集中力量于东方对付齐、赵两国。

周显王十五年(前 354 年)，赵国再度出兵攻卫，取漆（今河北长垣北）、富丘（位置待考）[44]，迫使卫国朝贡。魏惠王为了巩固其霸主地位，就征调宋国军队攻赵[45]，魏将庞涓率魏军包围了赵都邯郸。前 353 年，赵国分别派使者向齐、楚两国求救，导致了齐、魏桂陵之战。

赵使者至齐，齐威王和他的大臣们认为：如果魏国吃掉赵国，对齐很不利，所以非救赵不可；要让魏、赵两方都在战争中遭到削弱才对齐有利，因此不能马上出兵救邯郸，应该南攻魏国的襄陵（今河南睢县西）以牵制疲敝魏国，等魏国打下邯郸，赵、魏都精疲力尽的时候再用主力攻魏[46]。于是齐国命田忌率兵，并迫使宋、卫两国出兵与齐军一同攻魏国的襄陵。

赵使者鷹皮至楚求救，楚相昭奚恤很快就允诺出兵，并叫鷹皮先回赵，救兵随后就到。鷹皮看透了楚国答应出兵是诈，企图使赵国恃有楚兵相援而坚决抗魏，等两败俱伤然后出兵，以便控制赵、魏两国。鷹皮回赵后便劝赵成侯与魏国讲和，免使两败俱伤[47]。赵成侯摇摆不定，魏国终于攻破邯郸。

邯郸被攻破后，魏、赵两国都拖到了疲敝的地步，齐威王才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师，率大军救赵。田忌欲引兵趋赵，孙膑指出：魏、赵两国相攻，魏的精锐部队用于攻赵，国内都是老弱留守，不如引兵疾走大梁，占领交通要道，冲击其空虚的国都，情况发生变化，魏军必然回救，可以一举而解赵围，并获致陷魏于疲敝之利[48]。田忌同意孙膑的方案，率齐军向大梁疾进。庞涓得悉齐军直走大梁，仓皇率军回救。齐军事先在魏军必经之路的桂陵(今河南长垣南)，占据有利地形，以逸待劳，打败了魏军[49]。

在魏国将要打下邯郸的时候，楚宣王命景舍率兵救赵。魏国一打

下邯郸，景舍便乘机抢占了睢水与涉水之间的一些地区[50]。

当魏国出兵围攻邯郸时，秦国乘其西部空虚之际，于前354年攻占了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前352年攻占了魏的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禹王村）。

不过，齐虽败魏于桂陵，并没有歼灭魏军主力。魏国又于前352年调用韩国军队，打败了齐、宋、卫攻襄陵（今河南睢县西）之军。齐威王自知还无力战胜魏国，只好通过楚将景舍与魏国讲和[51]。

魏国要两面作战、同时粉碎齐、秦的进攻是不可能的。要想在短期内摧毁齐、赵也是不可能的。秦国乘机攻占旧都安邑，使魏的西部地区有全部变色的危险。魏惠王又采取了缓和齐、赵矛盾，以便转用兵力于西方的措施。魏国继前352年与齐讲和之后，前351年又与赵国在漳水结盟，将邯郸还给赵国，使东方的关系趋于缓和。前350年，魏国就西向攻秦，围定阳（今陕西宜川西北）[52]，迫使秦孝公与魏惠王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相会修好。前348年，魏惠王又和赵肃侯在阴晋（今陕西华县东）相会修好。魏国又暂时稳固了霸权。毕竟秦与齐、赵的挑战和桂陵之败是有损霸主尊严的，魏惠王为了重振声威，又于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举行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之会[53]，召集诸侯会盟。魏惠王并于会后率领诸侯，朝见了周天子，此次会盟，不仅是小国参加，秦孝公还派了公子少官与会，连赵肃侯也参加了，对魏国行将衰亡的霸业增加了不少光彩。

齐、魏桂陵之战是战国时期的著名战争，是魏国为了巩固霸权、齐国为了与魏国争夺霸权而举行的战争，也是赵国为了反对魏国的控制而联齐反魏的战争。

从战略决策而论，前386年，齐国强大之后已经出兵攻占了魏的观（今河南清丰南），以后又迫使原来朝贡于魏的泗上小诸侯朝齐，公开与魏国争夺霸权。前356年，鲁、宋、卫、韩四国朝魏之时，赵成侯不但不参加，却反而跑到平陆（今山东汶上北）去和齐威王、宋桓侯相会，又和燕文公在阿（今河北保定市东）相会，其争取与国反魏的企图是昭然若揭的。前354年赵攻卫时，魏国既没有考虑如何拆散

齐赵联盟，也没有考虑北上攻赵时，如果齐国乘衅击其侧背，应如何挫败齐国的进攻，只是孤立地盯住赵国，看不见赵国与齐国的联系，轻率出兵攻赵，在决策上就首先输了。

从齐国来说，以齐一国之力而与魏争夺霸权是势不相敌的。但齐国能及时抓住赵与魏的矛盾，顺应事机，联赵反魏，将原来为魏所用的力量拉过来为己所用，使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魏而有利于齐的变化，这也是能战败强大的魏国的原因之一。

齐国在救赵战争中，是先让魏国和赵国两败俱伤之后再出兵攻魏，其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因为与魏国争霸，不仅要打垮强大的魏国，而且还要能控制赵国，否则便不能成就霸业。在救赵攻魏的战争中，如果不先使魏的力量在攻赵时遭到重大损失，要战胜魏国是不可能的。赵也是强国，如不使赵国受到削弱，将来要控制赵国也是很难的。所以使魏、赵两败俱伤之后再出兵，是费力小而收功大，一箭双雕的良策。其中为了保证达到魏、赵两敝的目的而以一部兵力南攻襄陵，是一个重要环节。如不南攻襄陵以坚定赵国抗魏的决心，赵国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连打两个败仗之后就可能与魏国讲和。赵、魏一讲和就一切都化为泡影了。其运筹之周到精密，可谓算无遗策了。

桂陵之战，孙膑创造了"围魏救赵"的光辉范例。如按田忌之意，齐兵直趋邯郸，这是一般的解围方法。其缺点：在交通和运输工具极不发达的战国时代，军队千里跋涉，必因疲劳而减弱战斗力，如遇敌人在前进路上组织伏击，还会遭到出乎意料的损失。孙膑的"围魏救赵"，则是调动敌人，使敌人听我调度而陷于被动，而我则在最有利的时间、地点，预有准备地以逸待劳，伏击敌人。这是稳操胜算的。而关键问题则是如何才能使敌人听我调动。孙子在《虚实篇》中提出的"攻其所必救"的原则可以说是很有效的。孙膑之所以能调动魏军，其"引兵疾走大梁"的行动正是符合了这个原则。因为大梁是魏的国都，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魏集中主力攻赵，大梁守备空虚，如不立即回救，便有丧失国都的危险。魏国要想不听调动也是不行的。所以桂陵伏击，便能一举打败魏军。"围魏救赵"之妙，

妙在善于调动敌人。调动敌人的要诀，则在"攻其所必救"。这在近代战争中的许多场合也是适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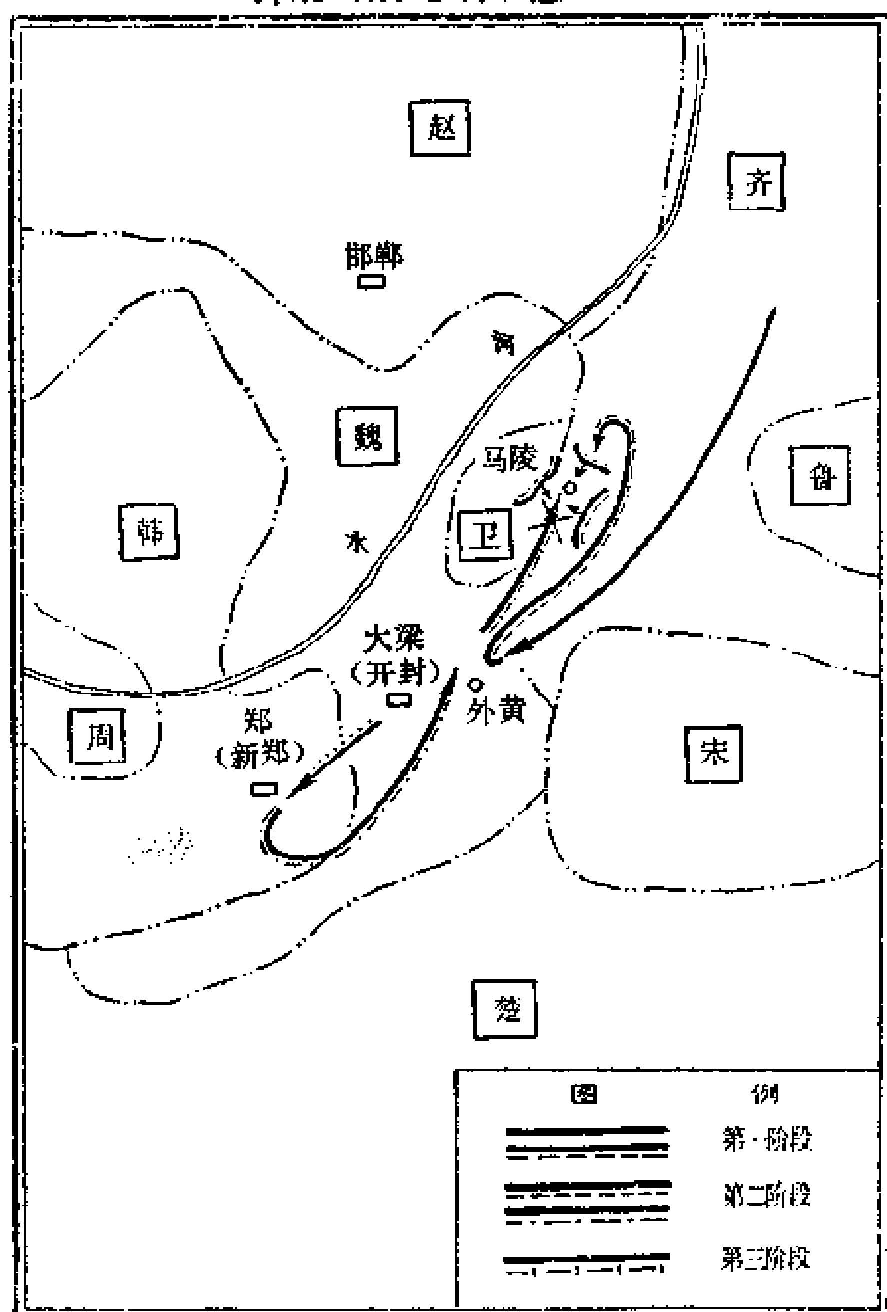
六、再败马陵，一蹶不振（参看插图4-3）

魏惠王行逢泽之会，率诸侯朝天子，可谓一时之盛。然而时至战国，搞霸业早已不合时宜。只有一些小国，还幻想借周天子天下共主之虚名以图苟全于一时。强国之利，利在兼并。对于朝天子之类的活动是反对的。当魏国召集逢泽之会时，房喜就向韩昭侯说："不要听魏国的。大国厌恶有天子，小国才利于有天子。王与大国不听从，魏国怎么能够和小国将周天子扶持起来呢！"[54]所以韩国予以抵制而没有与会。

魏惠王为了惩罚韩国，于周显王二十七年（前342年）命庞涓率兵攻韩。韩遣使向齐国求救。齐国的成侯邹忌主张不救，田忌主张早救。孙膑认为："在韩、魏双方的军队还未疲敝的时候出兵救韩，是代替韩国去承受魏军的攻击，而且被动地受了韩国的支配。魏国的目的在于摧破韩国，韩国见有危亡之祸，必东向求救于齐，只要深深地结好于韩，晚一点出兵去攻击已经疲敝的魏军，可以获大利而得尊名。"[55]齐威王遂允许韩国使者，齐愿出兵相救，但又不很快出兵。

韩国仗恃有齐国相援，倾全力抗魏，五战皆败，只得于前341年再次向齐求救。齐威王才命田忌、田婴、田盼率兵并以孙膑为师以救韩。齐军乘魏国空虚，再一次直指大梁以调动魏军。庞涓闻讯，急撤军回魏。魏惠王怒齐国两度乘衅相攻，便大举兴师，使庞涓为将、太子申为上将军以击齐军。孙膑利用三晋之兵勇悍骄傲、向来轻视齐军的特点，因势利导，用减少军灶的方法引诱魏军穷追。第一天挖掘了十万人造饭的军灶，第二天减少为五万人用的，第三天再减为两万人用的。庞涓尾追齐军三日，错误地认为齐军向来胆怯畏战，刚入魏境三天就逃亡了一大半。于是丢下步军，只率领轻车锐骑急行军兼程穷追。孙膑计算魏军行程，日暮时必然到达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马陵道路狭窄，两旁地形险阻。孙膑预先部署好伏兵，并集中优秀弩手夹道设伏。庞涓日暮追至马陵，进入齐军伏击阵地。齐军万弩并发，魏

齐魏马陵之战示意图　（4—3图）



军大乱，庞涓兵败自刎。齐军乘胜全歼魏军十万，俘虏了太子申[56]。魏军主力被歼，此后在齐、秦、楚三强夹击之下便一蹶不振了。

前340年，魏国即遭到齐、秦、赵的三面进攻[57]。前334年，魏惠王采用惠施的“以魏合于齐楚以按（休）兵”的策略，率领韩昭侯和

一些小国之君卑躬屈节地到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去朝齐，尊齐威王为王，齐也将王号回敬魏惠王，演出了一幕“会徐州相王”[58]的喜剧。

魏附于齐，齐国虽然对魏国暂时停止了进攻，秦国却连年攻魏不息。至前330年，秦迫使魏国将河西地（今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全部献给秦国。过两年，又迫使魏国将上郡（今陕西洛河以东，黄梁河以北，东北到子长、延安地区）十五县全部献给秦国[59]。

前323年，楚国为了控制魏国，要废除魏太子嗣而将流亡于楚的魏公子高送回魏国立为太子[60]，命柱国昭阳攻魏襄陵，占据了八个邑[61]。

过去称霸中原不可一世的魏国，却变成了四处礼拜以求苟全，连太子的废立也要遭人干涉的弱国了。

称霸是以尊王、挟天子以令诸侯为标志的。自齐、魏会徐州相王之后，秦和其他各强国都相继称王。诸侯既已称王就不能再朝周天子了，群雄争霸的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频繁而残酷的兼并战争。

马陵之战，孙膑因势利导，减灶诱敌，马陵伏击，全歼魏军，又创造了一个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

马陵之战与桂陵之战的情况有所不同。桂陵之战，孙膑是在魏军回救大梁的归途中设伏，能以逸待劳，发挥伏击的突然。而马陵之战，魏军是由郑（今河南新郑）从西向东回救大梁，距离比齐军近。齐军从东向西直走大梁（今河南开封），只能调动魏军回大梁以解韩国之危，没有截击魏军的可能性。而且魏惠王已经调集十万之师迎击，准备在齐军立足未稳之际，以其“武卒”之优势痛击齐军。在这种情况下，齐军要战胜魏军是没有条件的。孙膑善于因势利导，用退军减灶的手段，制造齐军怯战、逃亡过半、不堪一击的假象，促成了庞涓追歼齐军的必胜之心，又一次调动了庞涓，使之丢下步军，只率轻锐兼程急追。因为只带轻锐，使将魏军的优势变成了劣势；因为兼程急

追，不但将魏军变成了疲敝之师，又给了齐军马陵设伏，以逸待劳，发挥突然性的大好机会。这就注定了庞涓败亡的命运。太子申后军继至，在庞涓覆灭、军心惊乱、丧失指挥的情况下，也就相继为齐军所歼了。

孙膑的因势利导、调动敌人、变劣势为优势、力争发挥突然性的作战指导，是颇有参考价值的。其退军设伏的战法，也给了后人不少启示。例如公元198年，曹操在安众（今河南镇平东南）设伏大破张绣追军，公元231年，诸葛亮从祁山退军时，在木门（今甘肃天水西南九十里）设伏歼灭张郃追军，都用退军设伏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七、魏之盛衰

战国初期，各国都想变法图强，兼并弱小，以扩大霸业。而魏国何以能首先成为强盛的国家呢？这是因为三家分晋后，魏国分得了今山西西南部的河东地区。那里原来是晋国藉以创建霸业的基本部分，自然条件优越，生产发达，经济基础较好，加上魏国的第一代君主魏文侯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诸侯，他招纳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首先进行政治改革，成效卓著，使魏国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地主政权逐渐巩固，国力也大大增强，成为三晋之冠。他又联合韩、赵，共同征伐。三国本脱胎于晋，国土毗连，三晋联合，势力强大。魏国挟其富强之资，便自然地成为三晋的领袖。当三晋联合之时，西攻秦，则夺取秦河西之地；东攻齐，则长驱高唐（今山东禹城西南）、博陵（今山东茌平西北）；南攻楚，则破榆关（今河南中牟南），占鲁阳（今河南鲁山）。合三晋之力以行各个击破，自能无往不胜。魏亦因此威慑天下而成霸业，“天下莫强焉”。

魏国的霸业为何又由盛而衰呢？其原因：

一是由于三晋的分裂。

三晋既然是联合则强大，那分裂就必然衰弱。但长久的联合是不可能的，那分裂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魏、赵、韩三国虽然都脱胎于晋，但三国都已经成为独立的诸侯国。三国都各有其自身的利益——向外扩张，兼并小国，争夺土地、税收和劳动力。其离与合皆根源于各自的利害，因利而合，无利则离。

三晋联合对外扩张，打了许多胜仗，夺了许多土地，首先就有一个如何分配胜利果实的问题。韩国地处中心地区，在战争中夺占了不少土地。但这些土地不是魏国分给的，而是在战争中先造成事实，魏国只好默认。有些土地则是韩国乘魏国无暇照顾的时候掠取的。如前375年，韩乘魏攻楚榆关之际灭郑。《战国策·魏策四》："郑恃魏以轻韩，(魏)伐榆关而韩氏亡郑。"即指此事。赵国的地理位置偏北，每次追随魏国作战皆一无所获。魏国也从不将战争中夺来的土地分给赵国。赵国出兵出粮参加作战，胜利果实为魏独吞而一无所获。这是赵国所不能容忍的，因而有攻卫之举。魏国是霸主，卫朝贡于魏。魏国为了维护霸权，当然要出兵攻赵。赵、魏之间的几次战争皆因此而起，这是无法解决的矛盾。

魏国为什么不能将三晋联合向外扩张所获的土地分给赵、韩两国？因为从魏国的利益来说是不允许的。赵、韩、魏三国在地势上紧密相连。他们都竭力追求兼并之利，其所以能暂时联合，就因为你暂时还无力吃掉我，我也暂时无力吃掉你，而周围还有一些小国和一些尚未变法的大而不强的国家可供掠夺。合则力强，可以保证胜利，是在这个前提下才联合起来的。魏国已成霸主，是将赵、韩两国作为打手来利用的。如果将战争中夺来的土地分给韩、赵，韩、赵一经壮大，便会失去控制而生反噬之祸。所以魏国是不能将战胜所得的土地分给韩、赵的。

当谁也暂时无力吃掉谁的时候，只要一有机会，总是不遗余力地要去控制对方，就必然发生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

前386年，魏武侯出兵助公子朝袭邯郸，就是要以兵威立公子朝为君，以便控制赵国。魏国的强大，对韩、赵是很大的隐忧，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可能。所以韩、赵总是要找机会削弱魏国，控制魏国。前369年，韩、赵两国乘公中缓与魏惠王争立之机，出兵包围魏惠王。赵国要杀魏惠王，立公中缓，韩国要使魏惠王与公中缓分魏而治。办法虽然不同，但都是为了削弱魏国，控制魏国。赵国几次攻卫是反对魏国的控制，魏国几次攻赵是为了加强控制。魏国逢泽之会朝天子是为

了借此加强对诸侯的控制，韩国拒不与会是反对魏国的控制。他们不断明争暗斗，联盟只能是暂时的，其分裂则是必然的。三晋分裂则魏的势力自然衰落了。

二是由于秦、齐的崛起。

魏国地处中原，在秦、齐两国的夹击之中。在战国初期，秦、齐两国尚未崛起时，魏国首先变法图强，自然可以独霸中原。及至秦、齐两国又因变法而强大起来时，以魏一国之力而敌齐、秦两强，在力量对比上自然相形见绌了。加以原来追随魏国的韩、赵两国又转而联齐攻魏，使魏愈弱而齐愈强。所以在三晋未分裂之前，魏是"天下莫强焉"的中原霸主，及至三晋分裂之后，魏国便成为诸侯打击的目标一变而陷于"东败于齐，长子死焉（马陵之战）；西丧地于秦七百里（献河西于秦）；南辱于楚（楚破襄陵占八邑），寡人耻之"[62]的凄惶失措之境。

魏国为了摆脱困境，也曾作过不少努力。如开圃田泽以提高农业生产，选练"武卒"以加强军队的作战能力，都使国力有所增强。又如齐与魏争夺泗上小国的朝贡时，能与秦孝公在杜平相会，缓和矛盾，而专力对付东方；当秦国乘隙攻河西、占安邑时，又能与齐讲和，转用主力于西。这些有关全局的战略措施，也曾稳定霸权于一时。然而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区，欲以一国之力而敌群雄是不可能的。并力于东则西虚，并力于西则东虚，这种拆西墙补东墙的办法反而授人以隙，长期飘摇于齐、秦的夹击之中，几个回合下来，连招架之力也没有了。只好东朝于齐，西献地于秦了。

三是由于战略指导上没有着眼于脱出内线作战的困境。

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当秦、齐、楚三国崛起而魏与韩、赵两国分裂之后，魏国四面受敌，韩国更是魏国腹心之忧。魏国为了摆脱四面受敌的困境，也曾做了不少的努力，时而联秦，时而亲齐，但终未能各个击破强敌，脱出内线作战的不利地位。分析魏国在强盛时期所处的地略形势，它向外扩展的战略方向是值得研究的。当时，秦、齐、楚三国尚未变法富强，而韩、赵又亲附。如魏国乘攻占西河的威

势，再向西扩展，夺取泾、渭水流域，甚至兼并秦国，然后据山河之险，拥物产之饶，东向以争天下，战略形势就会大大不同；或者先兼并赵国，向北扩张，也有可能脱出内线的不利地位，只不过这样有与齐、赵为敌的可能，不如西向兼并秦国容易。魏国不出此两策，而跨越韩国国境向东扩展，钻入四面受敌的口袋；又跨越赵国国土而略取中山，都是白白消耗国力，未能改变地略上的不利态势。以后迁都大梁，使形势更坏。魏国的主要领土，被韩国从中央梗阻，分为东西两部。西部与东部只有一走廊地带可通，即绕道跨越北部崎岖的山地上党，才能通达东部。魏国不兼并韩国，使东西两部连成一片，没有一块完整的国土，又处于四战之地，何以立国？后来，张仪说魏王时亦指出："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凑，无名山大川之限……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梁之地势，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地"。[63]魏国在战略的运筹上失误，在桂陵、马陵之战的战役指导上又相继出现错误，导致两次战役失败，魏国也就难免于衰落了。

第三　秦统一六国的战略

秦国僻处西陲，河西地为魏国夺占，被封锁于关中地区，一筹莫展。秦孝公重用商鞅变法富强之后，面对魏、韩、赵、楚、齐、燕六强的存在，其所采用的东向以争天下，"连横以斗诸侯"，"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是成功的，对六国打击的先后顺序也基本上是正确的。现分五个阶段予以论述。

第一阶段　聚力蓄势　东向以争天下

一、攻魏控河山之险，开拓东出之路

魏在马陵大败之后，商鞅即向秦孝公提出：魏国与秦为界，不是

魏国吞并秦国，就是秦国吞并魏国。应该乘魏国东败于齐、诸侯叛魏的有利时机攻魏，迫使魏国放弃河西，秦国就可以据河山之固，东向争天下以成帝业[64]。秦孝公采纳了商鞅的攻魏以扫清道路，东向争天下的战略方针，并命商鞅率兵攻魏。周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秦军虏魏公子卬，大破魏师。两年后，秦又败魏于岸门（今山西河津县南），俘魏将魏错。周显王三十七年(前332年)，魏献阴晋（今陕西华阴东）于秦，秦将其更名为宁秦。前330年，秦又败魏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南)，俘魏将龙贾，迫使魏国将河西地（今陕西华阴以北，黄龙以南，洛河以东，黄河以西地区）献给秦国。

由于河西地区的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阴晋横隔于郑县（今陕西华县）与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之间，秦军要由郑县向南绕道商县再转向东北，才能与其东部天险函谷关相连系；秦国收复河西之后，其土地便与东部的函谷关直接连成一气。形势不利时可以闭关凭河自固，形势有利时即可东出攻魏攻韩，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不败地位，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二、迫魏攻楚，连横以斗诸侯

在魏国称霸中原期间，战争的目的主要是大国争夺对小国的领导权（获朝贡之利）和兼并小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国不断消失，大国与大国的领土直接相连，形成了大国间互相吞并的局面。这种大国间你死我活的斗争，使战争更加频繁而剧烈。力量最强的国家力谋兼并比较弱小的国家，而较弱小的国家在无力单独对抗强国的时候，便互相联合起来对付强国的进攻。每当小国的联合抵抗失败之后，又纷纷被迫暂时听命于强国以求自存。于是在魏国衰落、形成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局面之后，各国之间便展开了合纵连横的斗争。合纵，即“合众弱以攻一强”。南北为纵，是以魏、韩、赵为中心，北连燕，南联楚，联合起来对付强国兼并的策略。在抗秦时往往联合齐国，在抗齐时也联合秦国。连横，即“事一强以攻众弱”[65]。东西为横，是齐、秦两国用武力迫使弱国听命，为了兼并其他弱国的策略。在济西大战齐国衰弱之后，连横便成为秦国所专用的手段了。

周显王四十年（前329年），秦越过黄河攻魏，占领了汾阴（今山西万荣南）、皮氏（今山西河津西）及河南的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次年，秦以张仪为相，实施连横策略，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欲迫使魏国附秦以攻楚[66]。秦派公子华和张仪围降了蒲阳（今山西隰县）之后又还给魏国，并将秦的公子繇送到魏国为质。张仪随即到魏国说魏惠王，“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无礼”[67]，迫使魏国将上郡十五县献给秦国。下一年，秦又将焦和曲沃退还魏国。到周显王四十五年（前324年），秦又攻魏占陕城（在焦之西）。

秦国在收复河西之后又获得上郡，既可以从东北方向威胁赵、魏，又在河东和河南控制了许多军事要点，增强了东向争天下的基地，于是秦之声威大振。

魏惠王在前324年采用惠施“合于齐，楚以案兵（休战）”的策略，虽与齐国会于徐州尊齐威王为王，仍不能免除秦的连续进攻。前323年采用公孙衍“五国相王”的策略，将燕、赵、中山、韩、魏五国联合起来对抗秦、齐、楚三个强国，又遭到齐、楚的反对。齐国要攻中山，废除中山的王号[68]，而楚国则竟然出兵攻魏，夺占了襄陵八邑。张仪乘机于前323年与齐、楚两国的执政大臣相会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69]，故作调停的姿态以拉拢魏国。于是魏惠王接受了张仪的“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的策略，并于次年任张仪为魏相。

张仪与魏连横，不仅是要使魏攻齐攻楚，还有一个目的是“欲令魏先事秦而诸侯效之”。魏惠王联秦并不是真心投靠秦国，只是暂时借秦之力以抗齐、楚。当魏国“不肯听仪”之后，秦又出兵攻魏，占曲沃（魏有两曲沃，此在山西闻喜东北）、平周（今山西介休西）。魏与秦的关系又趋于恶化。

由于秦、魏连横对其他各国都不利，各国纷纷起来支持魏国起用公孙衍搞合纵。魏国于周慎靓王二年（前319年）以公孙衍为相，将张仪驱逐回秦。魏、赵、韩、楚、燕合纵成功，推楚怀王为纵长，于周慎靓王三年（前318年）出兵攻秦。但实际出兵的只有魏、赵、韩三国，

在攻函谷关时被秦打败。次年，秦庶长樗里疾又大败三晋联军于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虏韩将申差，斩首八万二千[70]，第一次合纵攻秦宣告惨败。

魏国合纵攻秦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参与合纵的国家各怀异心，不能真正合力以对付秦国。燕国僻处北方，秦祸远，故不热心参加。楚国虽名为纵长，实际是想隔岸观火，使三晋与秦相互削弱，获致向北发展的有利条件。第一次合纵攻秦，合纵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

秦国要东出以争天下，必须首先彻底征服韩、魏或者能牢固地控制韩、魏。秦国与魏连横之所以失败，其原因在于：如果韩、魏为秦征服，便使赵、楚、燕、齐受到威胁而引起合纵攻秦；其次是秦国的力量还不能牢固地控制韩、魏，也不能对可能支援韩、魏的其他各国予以沉重的打击而使之失其所恃。秦国还有待于努力加强国力。

三、攻义渠，灭巴蜀，创统一之基

秦国要向东发展，必须先解除后顾之忧。义渠据有今陕西北部、甘肃北部和宁夏一带地区，是当时西戎中最强大的部族，也是秦北边的近邻。前 318 年秦国东向反击三晋时，义渠曾乘机袭秦，大败秦军于李帛之下[71]。秦国为了解除后顾之忧，于周赧王元年（前314年）攻义渠，夺占二十五城，削弱了义渠，巩固了西北地区。

周慎靓王五年（前316年），因苴国（都葭萌，今四川昭化南）是蜀国（在今四川西部长江上游以北地区，兼有陕西西南部分之地）所封的小国，蜀国与巴国（在今四川东部地区）长期为敌，而苴侯却与巴交好。于是蜀王伐苴，苴侯逃奔于巴，向秦国求救。秦惠王想伐蜀，嫌路远道险，又遇韩国来攻，伐韩伐蜀，犹豫不决，于是召集群臣商议。张仪主张伐韩，他认为：亲魏国，善楚国，进兵三川（韩国的三川郡，今河南宜阳一带），攻新城（今河南密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兵临东周西周，可以造成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形势，诸侯谁敢不听从，这就能成帝王之业。所谓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三川、周王室就是今天天下都想争夺的朝市，不争此而去争偏远的巴蜀戎翟之地，这就离帝王之业远了[72]。

司马错则主张伐蜀，他认为：要富国必须广开疆土，要强兵必须先富其民，要成王业（统一天下）必须多布恩德。秦国地小民贫，要扩土富民，应选择容易成功的地方着手。蜀是僻处西陲的戎狄之国，又发生战乱，以秦攻蜀，如豺狼驱群羊，得其地可以扩大国土，取其财可以富民强兵，灭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全据西蜀富饶之利而天下不以为贪，是一举而得美名、获实利。如攻韩、劫持天子，周与韩合谋，以齐、赵为声援，又求救于楚、魏，秦国既得恶名，也未必有利，不如伐蜀好[73]。

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命张仪、司马错等人从石牛道（即剑阁道，今四川剑阁东北）进军，相继灭亡了蜀国、苴国和巴国。

秦国要东出争天下，如不能摧垮地处中原的韩、魏两国，便不能顺利地向东发展，而且以秦一国之力而对山东六国，其国力显然是不足的。秦惠王用司马错伐蜀之谋，攻占巴、蜀广大的富饶之区，对富国富民强兵，支撑长期而频繁的战争，创造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否则，要削平六国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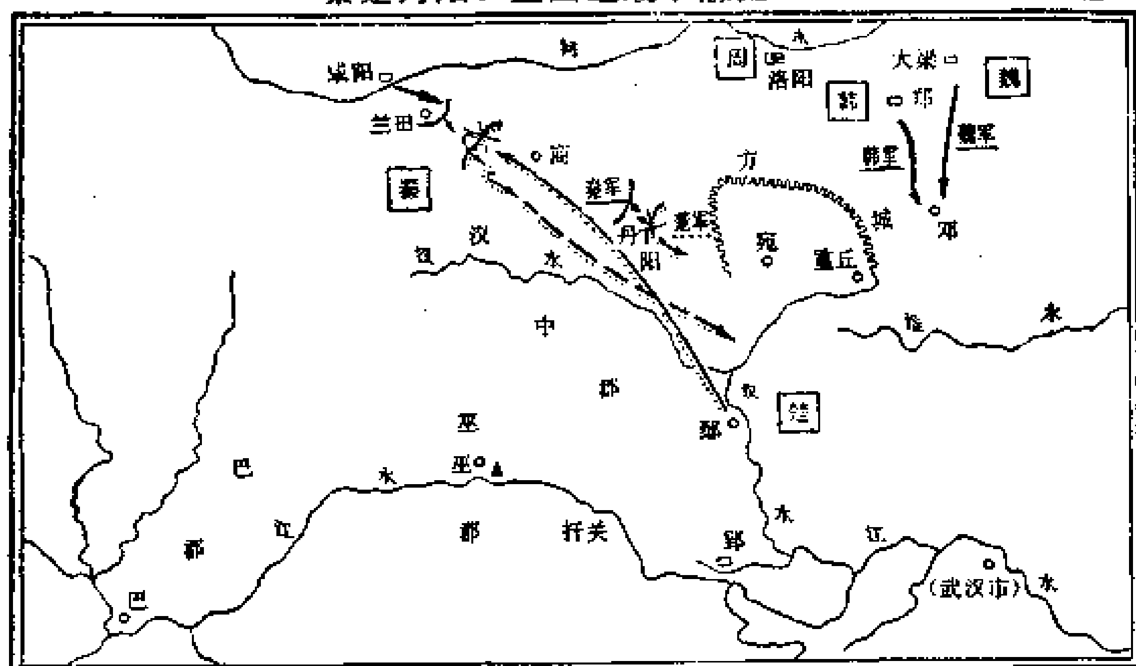
再从战略形势上看，秦据巴、蜀，浮江而下，不到十日就可以东攻楚国的要塞扞关（今湖北宜昌西），进而威胁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摧破楚国以后，韩、魏就失去了南方的支援，秦国即可从西南两面对韩、魏形成包围，对打垮韩、魏，北攻燕、赵，东并强齐都是极为有利的。晋人常璩在其所撰的《华阳国志》中也认识到：“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这是很有见地的。

第二阶段　南向攻楚　解除东进威胁

秦在攻义渠、灭巴蜀之后，便着意于向东发展，征服韩、魏。周赧王元年（前314年）秦出兵攻取了魏的焦和曲沃，败韩于岸门（今河南许昌西北），迫使韩国送太子仓入质于秦以求和。次年，秦、魏两国会于临晋（今陕西大荔东南），魏国按秦的意旨立公子政为太子。秦在威服韩、魏之后便图谋进一步向东发展。但楚国在南方对秦国的东进构成很大的威胁，秦要解除南侧背的威胁，必须削弱楚国。

一、诳楚绝齐、攻取汉中（参看插图4-4）

秦楚丹阳、兰田之战示意图　（4—4图）



齐国在三晋合纵攻秦失败后，曾乘机联合宋国败魏于观泽（今河南清丰南），又乘燕国内乱之际于前314年攻占燕国。其后虽因齐军的残暴遭到燕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撤出，由于齐国的强大，新立的燕昭王仍然被迫听命于齐。齐的声威也盛极一时，形成齐、秦两强东西对峙、互争雄长的局面[74]。

秦国想出兵打齐国，因齐、楚是联盟，关系密切[75]。秦攻齐，怕楚国攻其侧背。因而又改变打击对象，先削弱楚国以解除侧背威胁。于是秦惠王派张仪入楚，进行拆散齐、楚联盟的活动。

张仪对楚怀王说：秦王对大王是最悦服的，对齐王是最憎恶的。因为大王与齐王交好，秦王就没有侍奉大王的机会了。大王如能与齐断交，秦愿奉献过去取之于楚的商于（今陕西商县至河南西峡一带地区）之地六百里，大王即可派使者随我赴秦受地。既削弱了北面的齐国，又和西面的秦国搞好了关系，还能获得六百里土地，是一举而得三利的好事。

楚怀王唯利是图，任张仪为相，天天设宴招待张仪，并宣称：我

又重新得到商于之地了。群臣为此道贺，只有陈轸持反对意见。陈轸认为：秦国之所以重视楚王，是因为楚王与齐国交好。未得地而与齐绝交，楚就先孤立了。秦国为什么要重视孤立的齐国呢！秦国不愿先出地却要求楚国先与齐绝交，如果与齐绝交之后再向秦国索地，必然要受张仪的欺骗。大王感到受骗必然攻秦，齐国因为绝交必然恨楚，这样会招致秦、齐两国的进攻[76]。楚怀王利令智昏，不纳忠言，竟然与齐绝交，派一位将军随张仪赴秦受地。

张仪返秦后伪装酒醉坠车，诈病三月不出。楚怀王不知是张仪故设的圈套，还以为是张仪怪楚国与齐断交不彻底，又派勇士北赴齐国去辱骂齐王。齐王在大怒之下就转而和秦国交好。张仪才告诉楚国受地的使臣：我有封地六里愿献与楚王。使者还报，楚怀王大怒，发兵攻秦。此时陈轸又劝说楚怀王：攻秦不是好计策，不如用土地赂秦，与之联兵伐齐。虽然失地于秦，却能取偿于齐，国家还能保全。楚国既已和齐绝交，又出兵问秦欺骗之罪，是促使齐、秦交好，联兵来攻，国家必然大受损伤。楚怀王仍然不听，又与秦国断交，派将军屈匄率兵攻秦，秦国也发兵使庶长章击楚。周赧王三年（前312年）春天，秦军大败楚军于丹阳（今陕西商县东南及河南内乡西北之丹水以北地区），斩甲士八万，虏楚大将军屈匄及裨将等七十余人，乘胜攻占了汉中郡（今陕西东南隅直至湖北西北隅一带地区）。楚怀王大怒，又征发全国之兵袭秦。秦又大败楚军于蓝田（今陕西蓝田西）。韩、魏两国乘楚军大败，又联兵攻楚至邓（今河南漯河市东南），楚才引兵而归，最后被迫割了两城与秦讲和。

秦得汉中，既加强了南部边防，又可沿汉水进攻楚的邓和鄢（今湖北宜城南），进而威胁楚都郢，为下一步攻楚创造了有利条件。前311年秦国又向楚提出：以秦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以外之地换取楚黔中郡（今湖南西部及贵州东北部）的要求。因为秦既得汉中，武关东南地区对攻楚已失去重要性，而楚之黔中，北与巫郡（今湖北清江中，上游和四川东部地区）相接，西邻秦之巴郡，东抵楚腹心之地的高蔡（今湖南常德）、涔阳（今湖南澧县东北）。如占据黔中，则可以

与长江水军配合，水陆并进，直捣楚都，是利于秦而极不利于楚的。楚怀王却答复说：不愿得武关以外之地，只要秦国将张仪交与楚国处治，就将黔中献给秦国。由于张仪早就用财物收买了楚国的权臣靳尚，而靳尚又和楚怀王宠姬郑袖互相勾结，因而不怕赴楚。张仪到楚后，楚怀王将其囚禁，准备处死。张仪通过靳尚为之活动，郑袖日夜向楚怀王进言，楚怀王又释放张仪并以厚礼相待。张仪乘势诱说楚怀王与秦连横，结为婚姻之亲，不相攻伐。楚怀王为了不割献黔中，便允诺了张仪的要求。主张联齐抗秦的楚大夫屈原劝楚怀王杀掉张仪。楚怀王拒不采纳[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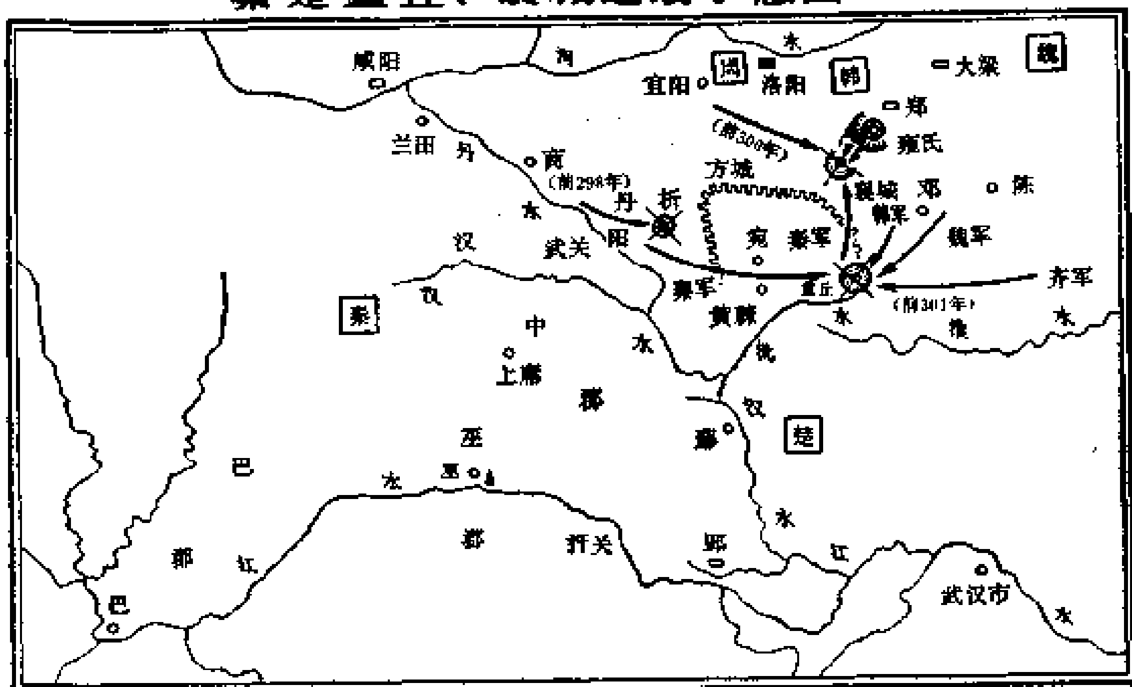
秦国东出争天下而强大的楚国处于其南侧翼，无论攻韩、魏还是攻齐，楚国对秦都是巨大的威胁。秦本欲攻齐，因齐、楚交好联盟而先击楚，为了解除东进威胁而改变打击对象的决策是正确的。秦国利用楚怀王对土地贪婪无厌的欲望诱其与齐断交，陷楚于孤立，既赢得了攻楚战争的胜利，又恶化了齐、楚两国的关系，埋设了齐攻楚的导火线。其策略运用是巧妙的。

二、乘齐攻楚之机击楚，诈囚怀王，楚一蹶不振（参看插图4-5）

楚怀王许张仪与秦连横之年，秦惠王死，秦武王于周赧王五年（前310年）即位。因楚已亲附于秦，秦武王便转锋东攻韩、魏。周赧王七年（前308年），秦命甘茂攻韩宜阳（今河南宜阳西），至次年攻克，并北渡黄河在武遂（今山西垣曲东南）筑城。八月，秦武王死，秦昭王于周赧王九年（前306年）即位。此年，楚怀王乘越国[78]内乱，灭了越国[79]，并在越地建立江东郡。秦昭王于前304年与楚怀王会于黄棘（今河南南阳市南），将上庸（今湖北竹溪东南）还给楚国以稳定秦、楚关系。次年，秦即攻取了魏的蒲阪（今山西蒲州）、晋阳（今山西蒲州南）、封陵（今山西风陵渡）和韩的武遂。

齐国对楚国违反纵约，背齐亲秦，非常憎恨。韩、魏两国此时又遭到秦国的进攻，遂转而交好于齐。于是齐、韩、魏三国便联合起来攻楚。楚使太子为质于秦以求救，秦命客卿通率兵救楚，三国引兵而退。

秦楚重丘、襄城之战示意图 （1—5图）



周赧王十三年（前302年），楚太子杀了一位与之私相搏斗的秦大夫后逃回楚国。秦与楚和好仅是一种暂时的手段，为了进一步打击楚国以解除其南侧背的威胁，便于周赧王十四年（前301年）以楚太子杀秦大夫逃亡为由，乘机与齐、韩、魏共同攻楚，大败楚军于重丘（今河南泌阳东北），杀楚将唐昧，取重丘[80]。次年（前300年），韩国的公子咎与公子虮虱争立太子，虮虱失利奔楚。拥护虮虱的势力要求楚国出兵雍氏（今河南禹县东北）送虮虱回韩。如韩国附楚，楚既可免除韩国对其北部的压力，又能增强其抵御秦、齐两国的力量，楚国即出兵十余万包围了韩的雍氏。韩国求救于秦，秦又乘机攻楚。楚军退保襄城（又名新城，今河南襄城），秦军大败楚军，杀楚将景缺，攻占了襄城[81]。楚怀王在恐惧之余，为了摆脱与齐、秦两面作战的困境，使太子入质于齐以求和。周赧王十六年（前299年）秦攻楚，取八城。秦昭王写信骗楚怀王到武关结盟恢复和好，将其拘送咸阳。秦国要挟楚怀王割让巫郡和黔中郡，怀王不允，被扣留于秦。当年，楚国将为质于齐的太子横接回国，立为楚王（即楚顷襄王），并告诉

秦国，楚国已经有王了。秦昭王大怒，发兵出武关击楚，大败楚军，攻占析（今河南西峡）等十五城。周赧王十八年（前297年），楚怀王逃走，被秦国追回，第二年病死于秦。至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楚在秦国军事力量的威胁之下，又被迫与秦和亲连横。

楚国在与秦连横遭到两次沉重打击之后，既损兵折将，又丧失许多土地，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对秦国的向东发展，已经不能构成大的威胁。秦国在前312年第一次攻楚之后与楚连横，是为了稳定侧背以利东出。但这种侧背的稳定性是暂时的，楚国一旦反复，便成问题。所以秦、楚间的连横也只能是暂时性的。秦国如不进一步削弱楚国，其南侧背的威胁是不能解决的。秦国能够及时抓住齐、韩、魏攻楚的时机，以楚太子横杀秦大夫后逃亡为借口，在同一个时间之内给楚国以加倍的沉重打击，为东进创造了较好的条件，其决策是可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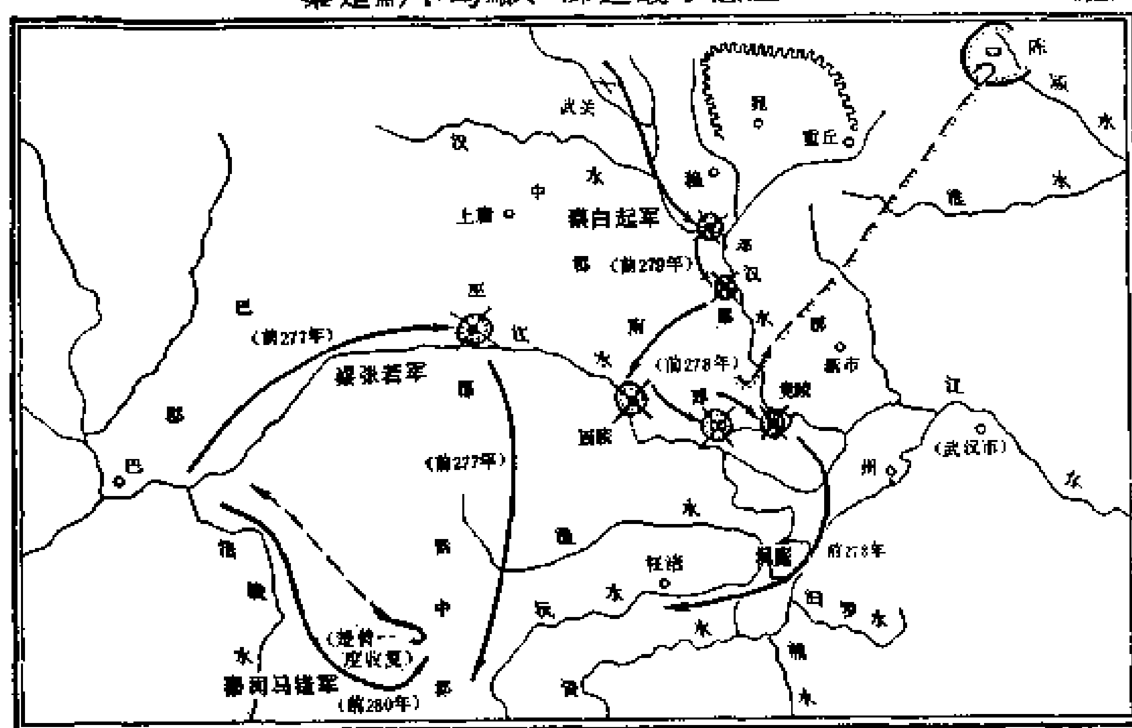
楚国位于齐、秦之间，楚合齐则齐胜，合于秦则秦胜。齐国要和秦国决胜负，对楚国是只能拉、不能打的。再以楚和齐的唇齿关系而论，秦东出攻齐而楚击其侧背，则不免于危败。楚固则齐安，楚弱则齐危，也是必然之理。当楚国被迫连横附秦时，齐国只能从政治上、军事上支持楚国，使之摆脱秦国的控制转而与齐联合抗秦。齐国攻楚，实质上是帮助敌手解除了侧背威胁，在战略上是极其错误的。

三、三次攻楚，反复削弱楚国（参看插图4-6）

秦国第二次攻楚，解除侧背威胁之后，便东服韩、魏，并于周赧王三十年（前285年）发动秦、魏、韩、赵、燕五国合纵攻齐，摧破了最强大的敌手齐国。两年后秦又出兵攻魏，因燕、赵两国救魏而罢兵。

秦攻魏受阻，转锋南向攻弱楚而兼并土地是最有利的。又值楚顷襄王于周赧王三十四年（前281年）欲报楚怀王之耻，遣使交通诸侯，背连横而合纵攻秦，秦即大发兵攻楚[82]。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秦命司马错征发陇西（今甘肃临夏、临潭以西、宕昌、礼县以北地区）兵由四川的涪水攻楚，拔黔中。楚将汉北（汉水以北地区）及上

秦楚黔中与鄢、郢之战示意图 （4—6图）



庸（今湖北竹溪东南）献给秦国，但后来黔中郡又被楚国收复。周赧王三十六年，秦命白起攻楚，取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邓（今湖北襄樊北）、西陵（今湖北宜昌西北）。次年，秦将白起攻楚，拔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东攻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并南下攻至洞庭湖及其以南一带地区。楚兵溃散，不能再战，楚顷襄王将国都向东北迁于陈（今河南淮阳）。秦即以郢为中心建立南郡（今四川巫山以东、湖北武汉以西、襄樊以南、监利以北地区）。周赧王三十八年（前277年），秦又命蜀守张若取巫郡（今四川东部和湖北清江中上游地区）及江南（今长江以南之四川云阳东南部至湖北巴东南部地区），并向南再度攻取了黔中郡，将巫与黔中合建为黔中郡[83]。次年，楚国收东地之兵十余万，向西收复了长江近旁的十五个邑，并以之设郡抗秦[84]。

楚国因丧失了大量土地，汉中、巫郡、黔中、南郡皆被秦占领，而宛一叶以北又被韩、魏夺去。山河破碎，财力、人力都无法抗击强秦的进攻。到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年），只好以太子为质，与秦讲和。至周赧王五十三年（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又将州（今湖北

监利东）送给秦国，楚国更加衰弱了[85]。

秦国在周赧王三十年合纵攻齐，已经比较彻底地摧垮了位于东方的最强大的齐国。现在又进一步打击楚国，使之弱而愈弱，无还手之力。秦从兼并战争中不断获得大量的土地和人力，国力日益强大，而山东六国则日益衰微。以力量专一之强秦，攻矛盾重重、合纵难固的六个弱国，只要不犯大错误，自可无往不胜。但此时灭楚的条件已经具备，如能一举灭楚，则更胜一筹。

第三阶段　东败强齐　摧折合纵后盾

一、齐、韩、魏合纵，秦东出受阻

秦国在周赧王十五年（前300年）第二次沉重地打击楚国之后，即转锋东向以争天下。此年，秦昭王派其弟泾阳君入齐为质。次年（前299年），泾阳君回秦，秦又请齐国以孟尝君田文入秦为相。秦、齐联合，秦的目的在于拉拢齐国，有利于东攻三晋；齐与秦暂时妥协，则是为了先打击楚国，回头来再打击秦国，以便兼并宋国，取淮北之地[86]。三晋处于齐、秦两强之间，特别韩、魏位于中心要冲之地，多次受秦侵夺，在威胁大时只能东附于齐以抗秦。如齐、秦两强联合，三晋便有东西两面受攻之危。赵国此时正准备集中力量灭亡中山，感到齐、秦联合对赵不利，赵国便促使秦国免除孟尝君田文的相位，派楼缓入秦为相，派仇郝入宋为相[87]。秦国则因能联赵，则秦攻韩、魏时赵不会援韩、魏；能联宋，则宋处齐、魏之间，可以牵制齐国而有利于攻韩、魏，并有利于尔后攻齐。宋国则企图借秦、赵两国的声势以利于兼并其邻近的小国。于是秦、赵、宋便联合起来。针对形势的变化，齐国为了打击秦国，韩、魏为了抗秦，三国也就合纵攻秦了。

周赧王十七年（前298年），齐、韩、魏三国联军与秦军相持于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赵国因忙于吞并中山，没有支援秦国。宋国也未助秦。三国联军与秦对垒三年，在周赧王十九年攻入函谷关。秦向三国求和，归还韩的河外（韩的黄河南岸邻近地区）、武遂（今山西

旧垣曲）；归还魏的河外（魏的黄河南岸地区）、封陵（今山西风陵渡东）。秦东出之计暂时受阻。

二、秦、齐联合，秦攻韩、魏

赵武灵王于周赧王十九年（前296年）灭了中山。次年，国内发生争位叛乱，武灵王被困，饿死于沙丘宫（在今河北巨鹿东南）。赵惠文王年幼，平定叛乱之公子成和李兑遂长期专断朝政。赵武灵王死后，秦即撤换赵国所派之楼缓而以魏冉为相。在齐国方面，贵族田甲谋害齐湣王未逞，事发后孟尝君田文奔魏，魏任田文为相。齐湣王亲自执政之后，便舍韩、魏而与秦、赵联合，并以秦的五大夫吕礼为相。秦国的目的是为了攻取韩、魏的土地，而齐国与秦、赵妥协是为了有利于灭亡宋国。同时，齐国在前296年就曾经帮助赵国灭亡中山[88]，齐国拉拢赵国的另一目的则是联赵以制秦。

周赧王二十一年（前294年）至二十六年（前289年）的六年之间，秦出兵攻占了韩的武始、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败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东之龙门），斩首二十四万，俘韩将公孙喜，并连续攻占了魏的垣（今山西垣曲东南）、轵（今河南济源东南）和韩的宛（今河南荥阳西北）、邓（今河南孟县西）。逼使魏国将河东方四百里之地、韩国将武遂方二百里之地献给秦国。献地的次年，秦又攻魏，取大小六十一城。

秦国除了夺回周赧王十九年归还给韩、魏的武遂、河外之外，还攻占了韩、魏许多土地，使韩、魏益弱而秦益强。又因占据了宛、邓两个著名的钢铁生产基地，武器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也随之进一步加强了。

三、秦约齐东西称帝而攻赵，燕诱齐攻秦灭宋以覆齐

周赧王元年（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国争夺君位内乱之机攻占燕国，杀燕王哙与子之。因齐军残暴，燕国人民纷起反抗，齐被迫撤军。燕昭王即位后，处心积虑欲报齐破国之耻。昭王与百姓同甘苦，礼贤下士，广招贤才。乐毅、剧辛、苏秦等一些优秀的军政人才纷纷至燕。燕昭王积极改革政治，遂致“燕国殷富，士卒轻轶乐战”[89]。

因与齐大小强弱不敌，只能俟机而发。表面上仍然对齐表示忠顺，以致齐国在对外用兵时，连部署在北边防备燕国的守军都撤走了。

苏秦与燕昭王秘密商讨确定的打击齐国的策略是使齐国“西劳于宋，南疲于楚，则齐军可败，河间可取”[90]，即齐国在攻楚攻宋遭受重大削弱之后就可以打败它。其中诱齐灭宋是问题的关键。宋国西北部的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是当时中原地区最繁荣的大商业城市，手工业和商业的税收很高。齐湣王早就想占有定陶，在秦国专政的穰侯魏冉和在赵国专政的奉阳君李兑也都想夺取定陶作为自己的封地。如能诱使齐湣王灭宋，就挑起了齐与秦、赵两国之间的激烈斗争。而且魏在宋之西，楚在宋之南，齐出兵灭宋，又将导致魏、楚两国与齐争夺宋地。这一来便将齐国置于三面受敌之境，要摧毁它就不难了。其次是赵在灭中山之后，其强大已略与齐、秦相当。齐国既然联赵制秦，为了战胜齐国，还须拆散齐、赵的联合。苏秦为了诱齐灭宋和拆散齐、赵联合，为燕国四出活动，皆未得满意的结果。周赧王二十七年（前288年），苏秦为了上述目的，又再度由燕赴齐。

秦国在免除楼缓的相位后与赵国的关系已经趋于紧张，又见齐、赵联合对自己不利，便企图拆散齐、赵联合，摧毁赵国这个新发展起来的敌手并从而孤立齐国。于是秦昭王先自立西帝，派穰侯魏冉赴齐尊立齐湣王为东帝，相约伐赵而分其地[91]。苏秦正好于此时至齐。齐湣王征询他的意见时，这位长于机变的纵横家即提出：齐、秦两帝并立，天下只会尊重秦国而不会尊重齐国。如果齐国取消帝号，天下就会敬爱齐国而憎恨秦国。伐赵不如伐宋有利。应该发动合纵攻秦，齐国利用各国攻秦的时机即可吞并宋国[92]。从齐湣王的角度来说，将齐秦称帝、相约灭赵与合纵攻秦并进而灭宋两相比较，后者既可削弱强大敌手秦国，又可乘机吞下宋国这块肥肉，当然后者的利益大于前者。于是齐湣王改变决心，立即废除帝号，并命苏秦为之游说赵、韩、魏、楚等国，与齐国合纵攻秦。

齐湣王只见眼前利，堕入苏秦的圈套而不自知。而苏秦则是因势利导，将原来的“离齐、赵之交”临机变为合纵攻秦，既加剧了齐、秦矛

盾，又达到了诱齐灭宋、导致天下攻齐的目的。苏秦机变万端，不愧为纵横家之佼佼者。

苏秦随即以齐湣王代表的身分，先后赴魏等国串连合纵，并随齐湣王与赵惠文王会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相约齐去帝号，合纵攻秦[93]。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年），齐、赵、韩、魏、楚五国攻秦。燕国为了表示忠心服从于齐，一面派兵助齐攻宋，一面又派兵随军攻秦。各国虽然出兵攻秦，但又盯住齐湣王恐其独吞宋国。因而各怀异心，联军停顿于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而迟迟不进。秦国因见合纵声势很大，为了摆脱困境，也就废除帝号，将过去夺取的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东南）、高平（今河南济源西南向城）还给魏国，将王公（未详）、符逾（未详）还给赵国[94]。齐国便于次年（前286年）灭了宋国[95]。也正因为灭了宋国，齐国变成了众矢之的。

四、秦国乘机合纵以摧强齐，燕乐毅覆齐而功败垂成

（一）秦国主盟合纵

齐国灭宋之后，又据有宋国过去所占有的楚国的淮水北部地区，声威之盛，一时无与伦比。史称其有两遏三晋（韩、赵、魏），吞并周室，取代周天子之势。泗水流域的小国都被迫向齐称臣，诸侯恐惧[96]。各国为了自保，也纷纷反齐。燕国多年来所追求的陷齐于孤危的形势出现了。燕昭王与亚卿乐毅商讨伐齐之计。乐毅认为齐国地大人众，必须联合赵和楚、魏才能成功。乐毅是魏国名将乐羊的后裔，又在赵国做过官，与赵、魏两国有关系。燕昭王除了派使者与魏、楚联系之外，又专派乐毅赴赵，与赵定合纵之约，并促使赵国劝说秦国伐齐。这一来各国都争相合纵，与燕国共谋伐齐了[97]。秦和齐是当时对峙的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各国攻齐必须借秦国之力。连从齐国出亡跑到魏国为相的孟尝君田文，也不顾齐国是祖先坟墓之所在而劝说秦国的专政大臣魏冉合纵攻齐[98]。对秦国来说，借天下合纵之力摧毁最强大的敌手齐国是求之不得的好机会，而魏冉又早就对宋国的商业名城定陶垂涎三尺，于是秦国便乘机以盟主的身分正式出面组织合纵攻

齐。周赧王三十年（前285年），秦昭王与楚顷襄王在宛（今河南南阳市）相会，与赵惠文王在中阳（今山西中阳）相会。为了号召天下，秦还带头攻齐，命蒙武率兵越过韩、魏的土地攻占了齐的九个城。次年（前284年），秦昭王又与魏昭王在宜阳（今河南宜阳西）相会，与韩厘王在新城（今河南伊川南）相会。燕昭王也入赵见赵惠文王再度订约，天下合纵攻齐的活动便顺利完成。

（二）联军大胜济西，燕军长驱下齐（参看插图4-7）

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年)，秦派尉斯离率兵与三晋之师会合。燕昭王起倾国之师，以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遂统率燕、秦、赵、韩、魏五国之师攻齐。齐国也征调全国主力与五国合纵联军大战于济水之西(今山东高唐、聊城一带地区)。由于齐湣王在灭宋之后异常骄横凶暴，随意杀害人民和臣属，军民离心。济西一战，齐军溃败，统帅触子逃亡，下落不明，副将达子收残兵退保国都临淄。齐国遭到了从来未有的惨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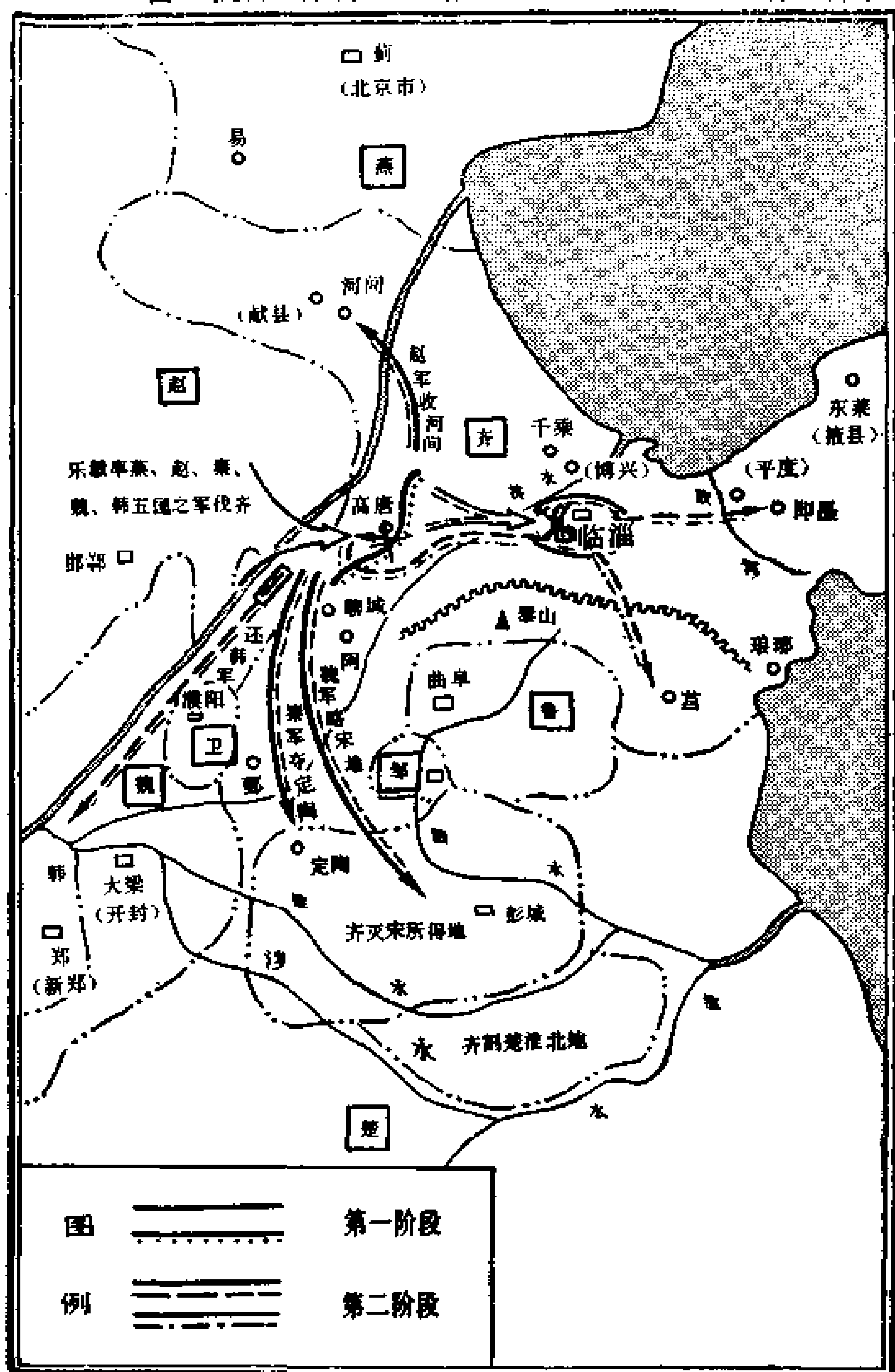
乐毅率合纵联军在济西消灭齐军主力之后，一面归还了秦、韩两国的军队，一面部署军队准备一举灭齐。乐毅派魏军南略宋地，派赵军北取河间，自率燕军直捣临淄。秦军并未西撤，却乘势南下夺占了定陶。燕军发展迅速，齐湣王由临淄逃往莒城(今山东莒县)。楚国没有参加济西之战，此时才佯以救齐为名，命淖齿率兵入齐。齐湣王于危亡之际任命淖齿为相，淖齿劫杀齐湣王，乘机收复了淮北之地。乐毅率燕军实施战略追击，攻克了临淄。燕昭王亲到济水劳军，封乐毅为昌国君，并赋予灭齐的任务。

乐毅占领临淄之后，一面休整军队，严禁掳掠，一面大力争取人心。如祭祀齐桓公和管仲、用官爵和表彰的手法笼络齐国有号召力的人物，又减轻赋税，废除齐湣王的残暴法令，取得了“齐民喜悦”[99]的成效。于是乐毅分兵五路攻取全齐：（参看插图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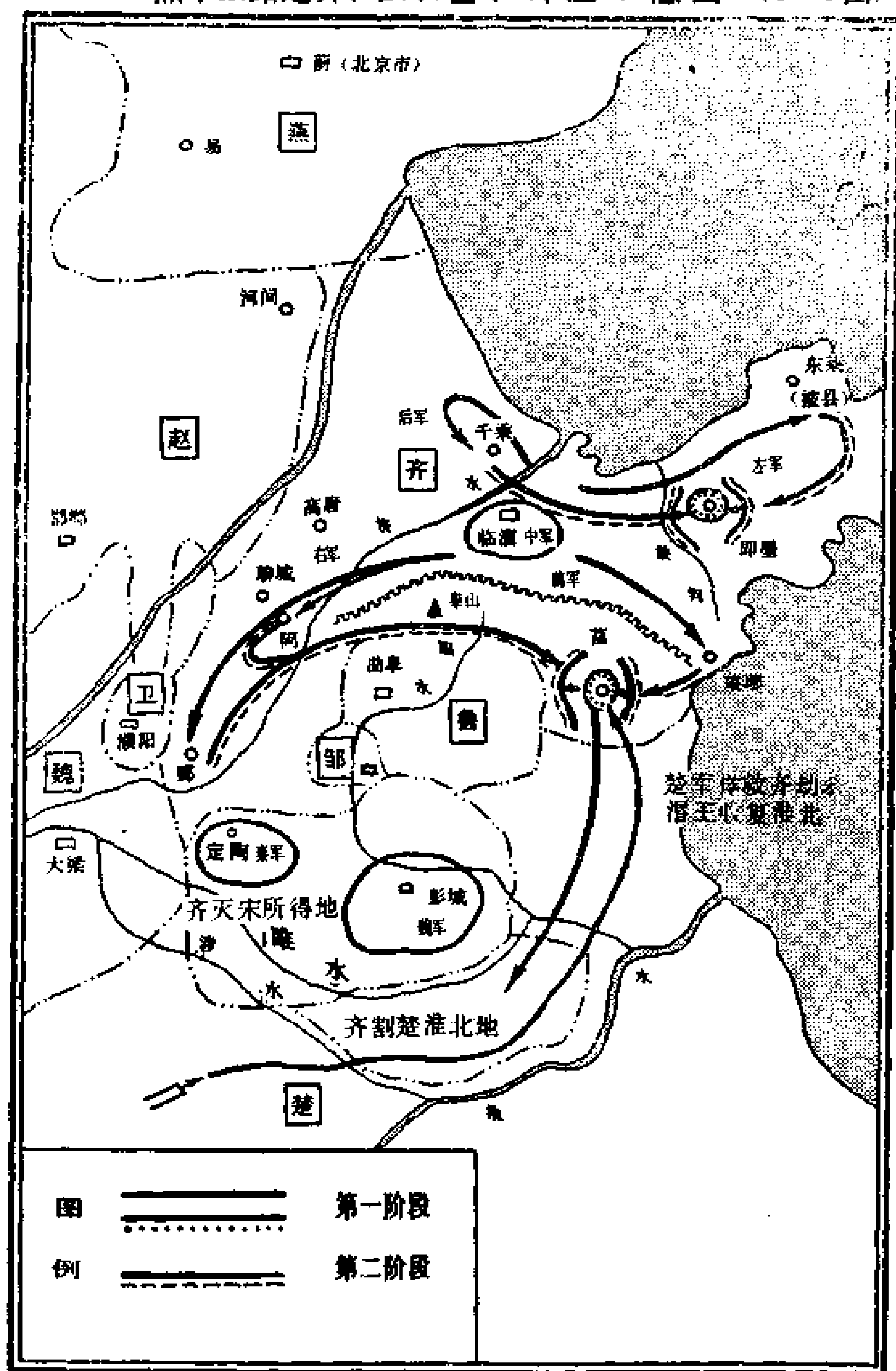
遣左军渡胶水(今山东胶莱河)攻取胶东（今山东胶县、掖县、莱阳、即墨一带地区）、东莱(今山东黄县至荣成一带地区）；

前军沿泰山麓以东至海，攻取琅玡（今山东沂南、日照至琅玡台

合纵伐齐济西决战和燕军直捣临淄示意图（4—7图）



燕军五路定齐和围攻莒、即墨示意图 （4—8图）



一带地区）；

右军沿黄河、济水，进屯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山东鄄城北）与魏军配合作战；

后军沿北海（今山东临淄东北沿海一带）攻取千乘（今山东高青东北）一带地区；

中军镇守齐都临淄[100]。

燕军以破竹之势，在半年之内连续攻占七十余城，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除莒和即墨之外，齐地均顺服于燕国。

（三）燕军功败垂成，田单反攻复国

周赧王三十二年（前283年），齐臣王孙贾等攻杀楚将淖齿，立湣王之子法章为齐王（即齐襄王），坚守莒城，并号召全齐军民抗燕复国。齐国仅存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六十里）两城。乐毅调整部署，以右军、前军围攻莒，以左军、后军围攻即墨。即墨守将战死之后，具有将相才能的田单被推为将，继续抗燕。齐国的贵族和上层人物先后逃到莒和即墨，使两城成为抗燕的顽强堡垒。燕军围攻两城，一年不克。乐毅改用攻心战，命燕军对两城撤围九里，筑垒相守。又下令居民有出城的不准拘捕，有困难的加以赈济，以利于安抚新归附的齐民[101]。齐国的统治集团为了抗住燕军，也使用了许多笼络手段，争取两城人民顽强抗燕。以致燕军撤围九里、相持三年，两城仍坚守不降。

乐毅是具有军政才能的燕军统帅。齐国如不除掉乐毅，要想保住莒和即墨两个据点、进而驱逐燕军以求复国，是根本不可能的。周赧王三十六年（前279年），燕昭王死，惠王继位。惠王为太子时就对乐毅不满，对长期不能攻克两城又有怀疑。田单即乘机派人入燕，大造流言。宣扬齐王已死，只两城未克，乐毅与燕新王有隙，畏诛不敢归燕，借伐齐为名而实欲拥兵留齐为王，其所以缓攻即墨，是用怀柔政策等待齐人降服，齐国最怕燕王另派主将，若派，即墨就完了[102]。燕惠王轻信反间流言，命骑劫代替乐毅为将，并召乐毅回燕。乐毅知燕惠王不怀好意，遂由齐国投奔赵国。燕军将士亦因此愤愤不平，军心涣

散。

骑劫到任后立即猛攻即墨，仍不能克。齐国要反攻复国，关键在于人心向背。田单为了扭转人心，不惜派间谍散播谣言，诱使燕军采用暴行，以激励军民的反燕斗志。骑劫毫无政治头脑，便想用恐怖手段慑服齐军。他将俘虏的齐军鼻子割去，置于攻城的前列；又挖掘齐人坟墓，焚烧死人。于是激起齐国军民同仇敌忾、誓死复国的决心。田单见人心可用，即命即墨富豪携重金贿骗燕将，请求在即墨投降之后不要虏掠其家族妻妾。燕军以为即墨指日可降，更加懈怠无备[103]。田单秘密准备反攻，收集了千余头牛，披上绘有五彩龙纹的缯衣，角上绑扎利刃，在规定的夜间，点燃缚了牛尾上的饱蘸油脂的草束，出其不意的用火牛夜袭燕营。骑劫在混乱中被杀，燕军大溃，不可遏止。田单乘胜率齐军连续追击，所过城邑都纷纷归属田单而攻击燕军，终于将燕军全部逐出齐境[104]。

乐毅大胜于济西，进据临淄，收人心而连下齐七十余城，可谓将相长才。其所以功败于垂成，则在不早拔莒和即墨二城。论城之大，城之固，即墨和莒皆远不如临淄。挟全胜之师而攻外无援救之两孤城，势如以石压卵。既连下七十余城，绝无不能攻克两城之理。"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105]。武王以仁义之师而攻独夫纣，战于牧野（今河南汲县东北），尚且"血流漂杵"而后成灭纣之功[106]。乐毅奢谈仁义，遂致围攻一年不克，又继之以撤围九里而三年不攻。"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107]。欲以不切实际的怀柔政策坐待两城归顺，结果是累年待降不成，反授敌人以行间之隙。其谬误也是罕见的。

对齐国来说，魏衰之后，秦为齐争天下之最大敌手。由于韩、魏横隔于齐、秦之间，齐欲胜秦，舍合纵之外无他途。当齐、楚联合之时，秦欲攻齐而畏齐、楚之联合，不得不离齐、楚之交而从事于攻楚。其攻楚之旨则在慑服楚国以孤齐。秦败楚于丹阳、蓝田之时，齐因楚绝从约之小忿而坐视不救。其更甚者，又于周赧王十二年攻楚，实为毁藩蔽以自孤。其后，周赧王十七年及二十年，齐两度合纵西攻函

谷而挫强秦，再再说明齐欲胜秦，关键仍在合纵。惜其于灭宋之后，不知以小利合三晋以制强秦，反而欲两逼三晋，遂成众矢之的，合纵之主动权亦随之转奉于强秦之手。加以湣王骄暴凶残，内失臣民之心，其亡国丧身便势在不免了。田单虽智，得成破燕复国之功，然而元气大伤，齐于战国末年仅能恭谨奉秦以图倖存而已。

六国合纵抗秦，对秦兼并天下是最不利的。在齐、秦两强东西对峙的条件下，以六国合纵抗秦时的相互关系而言，魏、赵、韩、燕、楚五国是齐国的屏障，齐国是五国的后盾。秦攻五国而齐出兵为之应援，则秦国不能逞其志；秦欲先摧破齐国，则越国攻齐而又势所不能。除了利用天下合纵攻齐的机会之外，秦要进攻齐国是办不到的。秦国能抓住五国反齐的大好机会，及时带头发动合纵，即摧毁了最强大的敌手齐国，又使六国失去了后盾，合纵抗秦便趋于无力了。六国中只剩下一个较强的赵国尚可与秦略事周旋，然而以大小强弱之势而言，赵远不如秦。秦国吞并六国的道路大大地缩短了。

第四阶段　重创赵国　造成席卷之势

一、决心不定，摇摆于灭楚与灭魏之间

秦国主盟攻齐，夺取了定陶作为魏冉的封地。秦国并未动用主力，只是利用燕和三晋的力量摧毁了齐国。当燕、赵继续攻齐之时，秦自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起，连续五年攻楚，夺占了大片土地，逼使楚国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

秦在第三次重创楚国、进一步解除侧背威胁之后，立即东攻韩、魏。周赧王三十九年(前276年)，白起率兵攻魏，取二城。次年(前275年)，魏冉攻魏至大梁。韩派暴鸢救魏，魏冉大破韩军，暴鸢败走开封（今河南开封市东南）。魏国虽然献地求和，魏冉仍然率兵攻魏，击败芒卯，由北宅（今河南旧原武西南）进围大梁。魏割温（今河南温县西）求和。周赧王四十一年，秦又攻魏，拔四城。次年（前273年），魏与赵国联合攻韩。秦命白起救韩，大破赵、魏军于华阳（今河南新郑北），斩首十五万。魏又割南阳(今河南温县西北地区)与秦

媾和[108]。

韩、魏两国在武力威慑下听命于秦之后，秦昭王便命白起率兵与魏、韩攻楚。将要出兵之际，楚国的使臣黄歇至秦。黄歇恐秦国乘楚国极度衰弱之时一举灭楚，便上书秦昭王，陈说：秦国长期攻韩、魏，韩、魏与秦有十世之深怨，韩、魏不亡，是秦社稷之忧。秦不灭韩、魏而友与之攻楚是大错误。秦、楚两国兵交不解，魏国必乘机攻占宋国的全部土地，齐国必然攻占泗水地区，使齐、魏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为秦国打算，最好是和楚国联合，攻灭韩、魏，进而夺取齐国的南部地区，隔断燕、赵与齐、楚之间的联系，然后击燕、赵，攻齐、楚，不用费大力，便可使四国归服[109]。秦昭王为黄歇之言所惑，停止了攻楚的行动，并遣使与楚约和。

二、远交近攻，东收韩、魏

秦昭王自即位以来，军政大权一直控制在舅父穰侯魏冉和宣太后的手中。秦国合纵攻齐夺得的大商业城市定陶，也成为魏冉的封地。周赧王四十五年（前270年），魏冉为了扩大其定陶封地，派客卿[110]灶率兵越过韩、魏两国的领土，攻取了齐国的刚（今山东宁阳东北）、寿（今山东东平西南）地区[111]。

由魏入秦的谋士范雎向秦昭王提出：魏冉出兵攻齐国的刚、寿是错误的，中间隔着韩、魏两国，攻占了也难于固守。范雎谏议采用“远交近攻”的战略，使攻取的每一寸土地都能可靠地为秦所有。范雎认为：地处中原的韩、魏两国是天下的枢纽，要兼并天下，应该用武力使韩、魏亲附于秦，再进而威服楚、赵。如楚国强大，就先以兵威使赵国附秦，再迫使楚国亲附；如赵国强大，就先威服楚国而后迫使赵国附秦。楚、赵附秦，齐国也必然恐惧而相率亲附，到那时便可一举吞并韩、魏[112]。以后，范雎还提出“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113]的着眼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范雎的意见得到秦昭王的赞赏，任命范雎为客卿，参与军事谋划。

周赧王四十七年（前268年），秦国便按照远交近攻的战略，攻占了魏国的怀（今河南武陟西南），第三年又攻取了魏的邢丘（今河南温

县东）。魏国屈服之后，范雎又向秦昭王提出：秦、韩两国的土地交错，韩是秦的心腹之患，请收取韩国。范雎并指出：只要出兵攻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即可隔断巩（今河南巩县）和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与韩都新郑的联系；出兵北断太行山的通道，上党郡（今山西沁河以东地区）的韩军便孤立失援。一攻占荥阳便将韩国截成三段，韩国见有灭亡的危险，只能听命于秦[114]。秦昭王随即准备攻韩，对范雎更加信任。秦昭王还根据范雎的意见，废宣太后，将专断朝政的穰侯魏冉、高陵君（昭王弟）、泾阳君（昭王弟）、华阳君（宣太后弟）驱逐于函谷关外，收回了政权，并以范雎为相，封为应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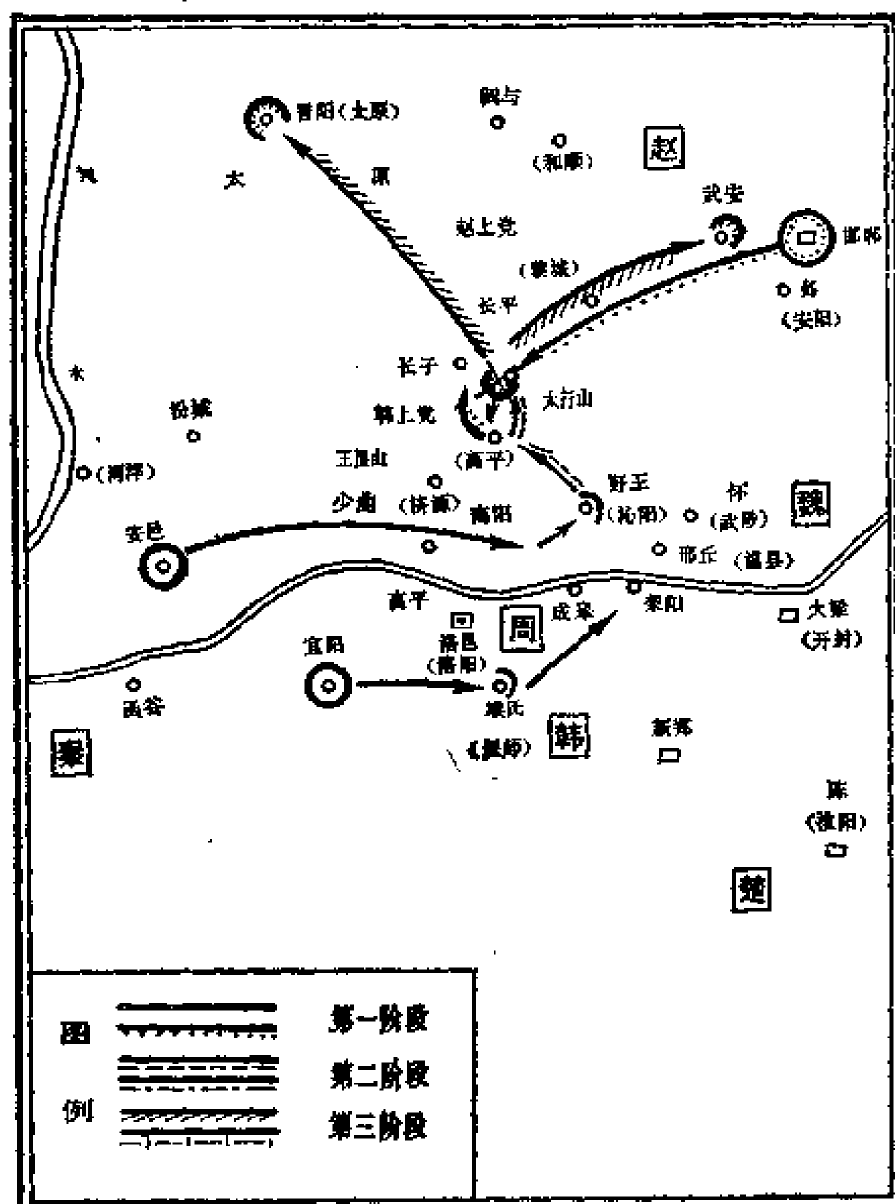
周赧王五十年（前265年），秦大举攻韩，攻占了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少水湾曲处）、高平（今河南孟县西）。次年，秦武安君白起攻占韩的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第三年，白起攻占韩太行山南的南阳，截断了韩上党郡和韩国本土之间的孔道。第四年，白起攻韩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完全断绝了上党与韩本土的联系，将韩国拦腰截为两段。韩桓惠王异常恐惧，派阳城君赴秦献上党郡求和。上党郡守冯亭不愿献地于秦，却将上党郡十七县转献给赵国。其目的是：如赵国接收了韩的上党，秦必然攻赵；韩、赵两国联合起来便可以抗住秦的进攻[115]。由于冯亭献上党于赵，诱发了秦、赵长平之战。

三、歼赵主力，大胜长平（参看插图4-9）

赵武灵王在周赧王八年至十九年（前307年至前296年）的十二年之间，胡服[116]骑射，训练骑兵，西破林胡（今内蒙以南、陕西榆林以北的河套东北地区）、楼烦（今内蒙呼和浩特以南至山西平原东北地区），扩地至榆中（今河套东北部）、云中（今包头以西地区）、九原（今包头市西），灭了中山国（今河北完县、冀县、高邑、平山、阜平地区），成为战国的北方之雄。秦国曾于周赧王四十六年（前269年），派胡阳率兵通过韩的上党郡进攻赵国的阏与（今山西和顺），被赵奢打得大败而归[117]。在齐国衰落之后，能与秦相抗的只有赵国了。

冯亭献上党于赵时，平阳君赵豹认为韩国不以上党入秦而转献于赵，是企图嫁祸于赵国，反对接受韩上党。赵孝成王和平原君赵胜则

秦赵长平之战作战行动示意图 (4—9图)



认为不战而得上党十七县，是不可放弃的大好机会。赵孝成王遂命赵胜率兵从冯亭手中接收了韩的上党郡[118]。

韩已将上党献秦，而赵国又轻易地从冯亭手中夺去，秦国是绝不干休的。秦相范睢认为，秦国过去攻占了楚国的大片土地，又曾围攻大梁、新郑，震慑韩、魏，其所以不能称王于天下，是因为赵国还未

屈服。只要乘机一举攻占上党，进兵东阳（此处指邯郸以西的太行山东部地区），赵的国都邯郸就有如食在口中的一粒虱子一样[119]。谏议秦昭王出兵攻赵。

周赧王五十四年（前261年）初，秦以一军攻韩缑氏（今河南偃师东南）以威胁荥阳；命左庶长王龁率大军攻上党。赵军由上党退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王龁于四月进攻赵军、赵以廉颇为将与秦军战于长平。赵军前锋在长平之南失利，裨将茄战死。六月，秦军攻赵，赵军丢掉了两个重要据点，损失了四名尉及其所辖的部队。七月，赵军筑垒[120]而守，又损失两尉，西壁垒也被秦军攻占。在秦强赵弱，数战不利的情况下，廉颇凭借有利地形，坚垒不战[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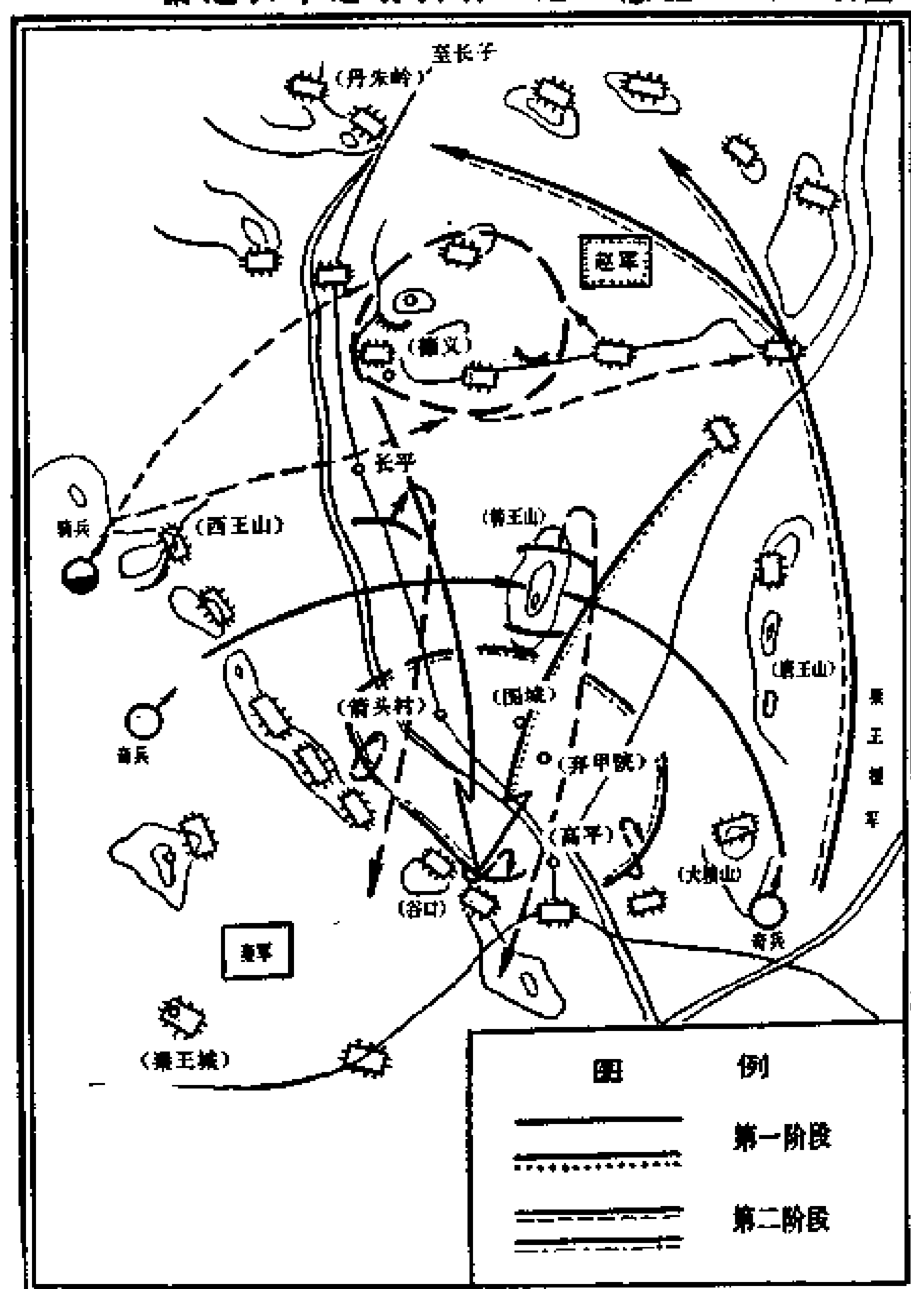
当赵军在长平初战不利、损失一尉之时，赵孝成王准备亲赴前线决战。楼昌认为无济于事，不如派地位重要的大臣与秦国讲和。虞卿则认为秦国不遗余力地以求摧破赵军，单凭遣使求和，和议是无望的。应该先派使臣携带贵重珍宝去联络楚、魏，使秦国惧怕天下合纵，议和才能成功。赵王不听虞卿之谋，派显贵大臣郑朱赴秦求和。秦国故意用隆重礼节接待郑朱并大肆加以宣扬[122]，却在暗中加强进攻准备。秦国尊显郑朱的策略起到两种有利的作用，一是使赵国以为和议将成，懈怠了作战意志；二是楚、魏等国早已慑于秦国的威势，见秦、赵媾和，便不会再存合纵救赵的念头。秦国暗中还向魏国许愿，将韩国的垣雍（今河南原阳西）预先割与魏国，使之不出兵救赵。秦国顺利地排除了诸侯合纵的因素之后，随即放手进攻赵国。

赵孝成王见秦军攻势受阻，就以为秦军力量有限；又见秦军多次挑战而廉颇坚守不出，便以为怯战而几次加以指责。对秦国来说，廉颇采取战略防御的方针，固守不战以老秦师，对秦军是极不利的。不去掉廉颇，要想战胜赵国是不可能的。秦昭王根据范睢的意见，派间谍入赵大造谣言，宣扬说：秦国最怕赵王用赵奢之子赵括为将；廉颇是最容易对付的，都快要投降了。赵王早就对廉颇不满，又轻信秦国的间谍谣言，拒绝了蔺相如和赵括的母亲提出的赵括不能为将的谏议，撤换了廉颇，改用夸夸其谈而不能灵活运用兵法的赵括为将，安

图击败秦军[123]。(参看插图4-10)

秦国探知赵括代廉颇为将，即秘密地以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以王龁为裨将，并下令有敢泄露武安君为将者斩，采取了严密的保密措施。赵括一到任就改变了廉颇的防御部署和一切规定，更换将吏，组

秦赵长平之战决战经过示意图　(4—10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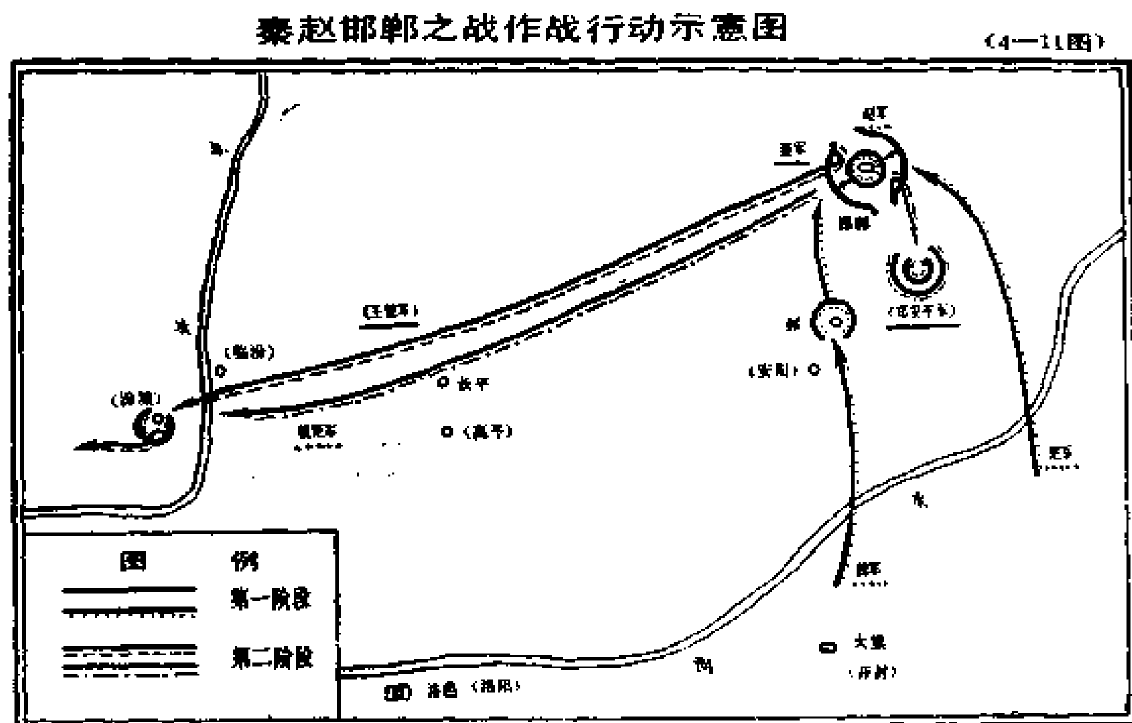
织进攻。白起针对赵括鲁莽轻敌的弱点，采取了诱敌入伏，分割包围而后予以歼灭的作战方针。八月，赵军大举进攻。秦军的诱敌部队佯败后退。赵括不查虚实，率大军穷追，直抵秦垒，被阻于坚壁之下。秦军预先部署于两翼的奇兵二万五千人及时地截断了赵军主力的退路，另外的五千骑兵也截断了赵垒的留守部与主力之间的联系，将赵军分割为二，并完成了严密的包围，赵军的粮道也被阻绝。白起用轻锐部队进攻赵军，赵军失利，只好就地筑垒，坚守待援。秦王闻知赵军被围，粮道被断绝，又亲自到河内征发十五岁以上的丁壮编组成军，开赴长平之北，阻断赵国的援军和粮运，保障白起歼灭赵军[124]。

至九月，赵军已断粮四十六日，到了内部暗中相杀而食的境地。赵括将军队编为四队，多次轮番冲击突围，皆为秦军所阻。赵括在绝望之余，亲率锐卒搏战，被秦军射死。赵军长期被围困约四十万极度饥疲之师，全部解甲降秦。白起认为秦攻占上党，上党的军民不愿降秦而归附赵国，赵军士兵反复无常，不尽杀，恐其为乱。于是残酷地坑杀了降俘四十万，只放回幼小的二百四十人，用之宣扬秦国的军威以震撼赵国[125]。长平之战，秦军前后共歼灭赵军四十五万[126]，而秦军也死伤过半。

周赧王五十六年（前260年）十月[127]，白起一面请秦王增兵增粮，准备一举灭赵；一面军分三路，乘胜扩张战果。王龁率一军攻占邯郸以西的要点武安（今河北武安南侧）；司马梗率一军北上平定太原郡（今山西句注山以南至太谷一带地区）；白起留镇上党，待命进攻邯郸。

秦大胜于长平之后，韩、赵两国异常恐惧。两国合谋派苏代携重金游说范雎。苏代指出：如果灭了赵国，秦王便会称王；白起功大，必为三公[128]。君能居于白起之下吗？不如利用韩、赵求和的机会，许其割地媾和，不要使白起成灭赵之功。于是范雎向秦王谏议：秦兵疲劳，请允许韩、赵割地媾和，以便休整军队。秦王听从范雎之议，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前259年），允韩割垣雍、赵割六城讲和，并于一月罢兵。白起因中途罢兵，对范雎大为不满[129]。

四、不纳忠言，受挫邯郸（参看插图4-11）



秦赵邯郸之战作战行动示意图（4—11图）

秦国罢兵之后，赵孝成王将如约割地。虞卿认为：秦国兵疲而罢兵，现在又将其力量不能攻取的土地送予，这是帮秦国打自己。如果每年割六城给秦，秦因不战得地而益强，赵因多失土地而益弱。赵的土地有限，秦的贪欲无穷，赵国必因此而亡。但赵郝、楼缓则认为：如不及早割六城与秦，天下诸侯会利用秦国怒而攻赵的机会，乘隙出兵瓜分赵国。赵国将亡，又怎能对付秦国。虞卿力排割地媾和之议，劝赵王用六城去拉拢齐国。因齐与秦有深仇，得赵六城，必然愿与赵国合力西向攻秦。赵虽失六城于齐，却可以取偿于秦。既能报齐、赵两国之深仇，又向天下显示赵国还能有所作为。以齐、赵联合抗秦为号召，秦国反而会向赵国求和，韩、魏两国必因而重视赵国，赵国便可以与齐、韩、魏三国结成合纵抗秦的亲密联盟，共同对付秦国[130]。

赵王采纳虞卿之议，决心合纵抗秦而不割六城，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在外交方面，派虞卿东见齐王，商洽合纵抗秦之计；利用魏使臣来赵请求合纵的机会，与魏订合纵之盟；以灵邱（今山西灵邱）为楚

相春申君黄歇的封地，结好于楚，并极力拉拢韩、燕两国。在内政方面，赵国君臣以抗秦为号召，与人民同心协力，大力发展生产、抚恤遗孤、整顿军备、加强国防[131]，使国力逐步得到恢复。

秦昭王因赵国不如约割六城，反而与各国合纵抗秦，遂于周赧王五十六年（前259年）九月准备命白起为将率兵攻赵，但白起不同意。秦昭王提出：前年国虚民饥[132]，你不量百姓之力，请增兵增粮以灭赵。现已休兵息民，发展了生产，储备了粮食，三军的俸禄也比过去提高了一倍，为什么不能攻赵？白起说：赵国长平大败，死的得不到收葬，伤的得不到治疗，人民涕泣相哀，举国戮力同忧，积极耕种以增加财用。现在虽然加倍发兵，我预料赵国的守备已经十倍于前。赵自长平大败以来，君臣忧惧，勤于国政，又卑词厚礼结连燕、魏、齐、楚，以抗秦为务。本身有实力，对外又完成了合纵，所以现在不能攻赵[133]。

秦昭王不采纳白起的忠言，命王陵为将率兵攻赵。秦军虽进展迅速，但在攻赵都邯郸时却未取得战果，因而秦王又增兵进围邯郸。赵国军民对秦军在长平坑赵降卒的残暴行为极端愤恨，誓死坚守邯郸，并不时以奇兵反击秦军。至十月，秦军损失了四千多人。

秦攻邯郸失利，秦昭王又要命白起为将。白起仍然拒不从命，并说：邯郸确实不易攻取，而且诸侯的救兵将至。往昔虽大破赵军于长平，但秦军也死者过半，实力不足。跋山涉水而远攻赵的国都，赵与诸侯之军内外夹攻，破秦军是必然的了[134]。

秦王又命范雎去传达意旨，要白起率兵攻赵。白起又再度指出：在长平歼灭赵军主力之后，不及时乘赵人震惧无力抗拒之时一举而灭之，使其得到喘息备战的机会。现在赵国已经积蓄了粮食，修缮了兵甲，加强了防御措施，从国君到士卒团结一致，象平原君之流的大贵族都将妻妾编入行伍担任缝补工作，做到了上下同心同力。现在攻赵，赵必固守；出兵挑战，赵必不应；围攻赵的城池和国都，必不能克；在其四郊掠取粮食，必无所得。兵出无功，诸侯的援军乘衅而至，我只见其害，未睹其利。白起又称病拒绝了秦王的任命[135]。

秦王仍然坚持继续攻赵，又增派军队，命王龁代替王陵为将围攻邯郸。经过八、九个月的战斗，秦军招致很大的伤亡，邯郸仍不能攻克。秦王听说白起对秦军的失利有非议，十分震怒，又第三次采令白起为将，要他赴前线带病指挥。白起严肃的说：但愿大王考虑我的意见，放弃攻赵，休兵养民。然后根据各国对秦态度的变化，安抚畏惧的，打击骄慢的，诛灭无道以号令诸侯，天下即可平定。何必一定要先打赵国呢？白起仍然拒不受命，并坚决表示宁肯受重诛而死，也不忍为辱军之将[136]。秦王一怒之下，将白起贬为士伍，最后又赐剑逼令自杀。

赵国君臣根据秦强赵弱和天下诸侯对秦不满的形势，在战略上采取了避免决战，固守疲敌，外联与国，合纵破秦的持久防御方针。在政治上，不断采取措施，激发军民同仇敌忾、誓死抗秦的决心。平原君赵胜又带头将家财充作劳军费用，将妻妾派到军中为士兵缝补衣服。因而能上下团结一致，奋勇抗秦。赵军又经常以精锐部队从侧背伺机袭击以疲敝秦军，使秦顿兵坚城之下，不断遭到损失，虽一再增兵换将，仍不得逞。在合纵方面，赵国用虞卿之谋，在战前早已做了大量工作；当秦国发动战争之后，又积极争取有关国家出兵援救。由于各国震慑于秦国强大的兵威，却观望徘徊，不敢行动，致使赵国的求援活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路程。

当邯郸被围，赵国向齐借粮时，齐国又因畏惧秦国而不肯支援粮食，使赵国的抗秦战争遭到了很大的困难[137]。平原君赵胜率毛遂等人赴楚求救时，楚考烈王也怕祸连本国，对出兵救赵抱推脱态度。双方会谈，从日出到中午毫无结果。后因毛遂用楚国曾蒙受秦军攻占鄢郢、焚烧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楚王的祖宗坟墓和迫楚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等耻辱激怒楚王，楚王才派春申君黄歇率兵北上救赵[138]。平原君赵胜是魏公子信陵君无忌的姐丈，战争开始后赵胜写信给魏王和信陵君求援，魏王即命晋鄙为将率兵十万救赵。秦王为了破坏合纵，派使者威胁魏王说：很快就可以攻下赵国，诸侯中谁敢出兵相救，一俟攻下赵国，必定回军先打他。于是魏王恐惧，遂命晋鄙屯军于邺（今

河北临漳），观望不前[139]，又派将军辛垣衍从小道入邯郸，企图通过平原君劝说赵王尊秦为帝以平息战争。平原君赵胜见邯郸长期被围，援兵久久不至，抗秦的决心也曾摇摆不定。主张合纵抗秦的齐人鲁仲连分析了尊秦为帝的危害，指出：如果尊秦为帝，国君必将被秦监视、控制而失去权力，臣下必将被撤换而丧失旧有的尊荣。折服了魏将辛垣衍，使之停止了尊秦为帝活动，从而坚定了赵国君臣抗秦的决心[140]。

魏晋鄙军留邺不前，平原君不断催促信陵君设法使魏军救赵。信陵君多次劝说魏王，魏王因畏秦而始终不肯进军。信陵君用侯生之谋，使魏王的爱妾如姬窃取了魏王的虎符[141]，赶赴邺地，杀了狐疑不交兵权的晋鄙，挑选精兵八万，直趋邯郸[142]。

周赧王五十八年（前257年）十二月，秦又增派军队，命郑安平率领赴赵，与王龁合力围攻邯郸，并另派一军进驻汾城（今山西新绛东北）以为声援。魏、楚两国的援军赶到后连败秦军。平原军又精选敢死士三千配合出击，内外夹攻，大败秦军。王龁率残军逃回汾城。郑安平被包围，最后率两万人降赵。魏、楚军乘胜进至河东（今山西西南部），又败秦军。秦军被迫暂时退过河西（今山西、陕西两省间黄河南段之西），进行补充休整，积聚力量，伺机再图东进。

范雎的"远交近攻"和秦赵长平、邯郸之战

秦国在前285年合纵攻齐、摧破六国合纵抗秦的后盾之后，于前280年至前274年之间第三次大举攻楚是正确的。但在攻楚取得大胜，迫楚迁都于陈之后，惑于黄歇之言，没有乘楚国极度衰敝之机及时灭楚，遗患未来，而有楚军参加合纵，协同魏军救赵之举，致使秦军大败邯郸，在战略上是失策的。

穰侯魏冉为了扩大其定陶封地，使秦军越过韩、魏的土地而远攻齐之刚、寿，是重犯魏文侯越过赵国的土地去灭中山的错误。"越人之国而攻"，其结果必然是"势不能有"。范雎对攻齐刚、寿的批判是正确的。

范雎针对"越人之国而攻"的错误，提出了"远交近攻"的方针，历来的多数政治家、军事家都认为秦国之所以能蚕食诸侯，统一天下，"远交近攻"起了很大作用。如果根据当时的形势，进一步加以具体分析，也并不尽然。

从"远交近攻"的概念而言，"近攻"指对于邻近的弱国发动近攻，使所取土地处于自己军事力量的有效控制之下。"远交"是指对远隔于我而又与"近攻"对象相邻之国，用一切手段（如威胁、利诱之类）使之不支援被攻之国而使"近攻"易于成功。这当然是正确的。

范雎"远交近攻"的目的，是为了"进攻"韩、魏而"远交"东方的齐国，使之中立而有利于吞并韩、魏。但范雎为了"远交"齐国而提出的具体步骤是先威服韩、魏，再相机采取楚强则先服赵，赵强则先服楚，楚、赵皆服之后再迫使齐国屈服，然后再回头吞并韩、魏。这个方案是迂阔的，而且与当时形势是不相符的。第一，为了减少吞并韩、魏的阻力而远交齐国是正确的。但以当时实际情况而言，齐国在济西大战之后已经一蹶不振，不需要再经过一个威服楚、赵的阶段，只要用威胁、利诱的手段即可达到"远交"的目的。第二，楚国在连续遭受打击、被迫迁都于陈之后已成积弱之国，也不存在楚强则先服赵，然后才能迫使楚国屈服的情况。第三，当时只有赵国是六国之强，又与韩、魏有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赵国才是当时秦国吞并韩、魏的最大阻力。要吞并韩、魏，齐、楚、赵三国都应该是"远交"的对象，但其中尤应特别重视赵国。当秦军攻占野王之后，出兵干涉的也正是赵国而不是齐、楚，也证明此时将赵国作为"远交"的重点才是比较正确的。当然，在长平、邯郸战后，秦以独强之势而临众弱，为了釜底抽薪、以远交齐国为重点从而减少统一战争的阻力，则又是正确的。

关于长平之战，上党郡守冯亭违韩王之命，不以上党降秦而转献于赵，促使赵与韩合力抗秦，与束手听秦宰割相较，其策略运用也是巧妙的。

赵国接不接受冯亭献地，实质上是能否与韩国联合抗秦的问题。

从积极意义上讲，可以削弱秦国，争取进一步发展；从消极方面讲，韩、魏是赵国抗秦的屏障，韩、魏亡则赵孤，出兵联合抗秦，不仅为了救韩、魏，也是一个自救的问题。当秦国东攻韩、魏之初，即应主动与韩、魏合纵抗秦。及至冯亭献地，才出于贪十七县之利而出兵上党，这是战略上的近视病。

赵国长平惨败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当韩、魏早衰，楚弱齐破之后，秦于六国已成独强之势，赵虽因灭中山而兴起，但其大小强弱是不能与秦抗衡的。自秦据河西、上郡以来的六十余年之间，各国三次合纵抗秦尚自两胜而一败，此时赵欲抗秦，更非合纵不能成功。赵王昧于强弱之势，舍合纵而敌强秦，欲求不败是很难的。第二，赵王不明强弱之势，不知攻守之宜。始而令廉颇进攻秦军，初战失利又惧而求和于秦，当廉颇遏止秦军攻势之后又强以为可一战而胜。终于中秦离间之计，以空谈兵法的赵括为将与秦决战，无异以卵击石，便注定了长平覆灭的命运。

对秦国而言，六国中五国已被削弱，唯有赵国较强。韩、魏地处秦、赵之间，赵国为了自身的发展，必然要利用秦与韩、魏之间的战争以削弱秦国；赵国为了自存，也应该支援韩、魏以巩固其西南屏障。因而赵国是秦国东攻韩、魏的阻力。如果秦国不沉重地打击赵国，要想据韩、魏而断天下之脊，是难于成功的。赵国口中夺食而受上党，当然是秦国所不能允许的。再从秦国兼并天下的全盘战略计划着眼，此时不予赵国以沉重打击，是不能迫使韩、魏屈服于秦的。范雎提出秦国之所以不能称王于天下，原因在于赵国尚未屈服，谏议出兵攻赵，可谓抓住了战略上的重要环节。

秦国取得长平大胜的主要原因有三：一，能巧妙地利用赵王遣使求和之机，尊显郑朱，排除了各国与赵合纵抗秦的可能性；抓住魏国既畏秦又贪利的心理，以预割韩之垣雍为饵，使不出兵救赵，陷赵国于孤立无援之境。二，当秦军攻势被阻之时，能看透赵王对廉颇固守不战大为不满，急欲以进攻侥倖求胜之心，用离间计促使赵王以赵括为将；而秦军则以长于攻战、累建战功的白起为将，造成了以强攻

弱、以智攻愚的必胜条件。"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的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143]。指挥员的优劣，关系于战争的胜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三，当秦军对赵军完成包围之后，秦王能主动及时地征调部队并亲自率赴长平阻绝赵国的援兵和粮运，可靠地保障了秦军歼灭赵军。

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是最大的错误。第一，这位封建将军不懂得"胜敌而益强"的道理。《孙子·作战篇》中曾指出：俘获敌人的战车十乘以上，应该奖赏首先获得战车的人；将俘获的战车换上本军的旗号，派自己的士兵夹杂乘坐；对俘虏的士兵要好好优待他们，这是战胜敌人而使自己更加强大的途径。因为歼灭战并不是要全部消灭敌军的肉体。在交战时消灭敌人，又能将放下武器的战俘转化为自己的力量，这等于双倍地歼灭了敌人。第二，杀降是剥削阶级军队的残暴行为。白起也不懂得残杀战俘并不能起到威慑敌方的作用，却反而激发了敌方军民同仇敌忾、不惜牺牲、团结御侮的坚强意志。这是造成日后邯郸之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实践证明是极端错误的。与此相反，优待和释放俘虏，使敌方军民知无必死之虞，却能瓦解敌军的战斗意志而有利于战胜敌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将优待俘虏的政策作为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即"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144]。在举世闻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也明确地规定了"不虐待俘虏"的严格纪律[145]。对于加强自己和瓦解敌人两个方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我军战胜国内外敌人的一个重要因素。

关于秦军在长平大胜之后是否可以一举灭赵的问题，应该全面而深入的予以分析。白起主张在赵国全国震惧之时乘胜灭赵。在秦国阻止了诸侯合纵、赵国外无援救的情况下，秦国虽有"国虚民饥"的困难，但赵国的困难比秦国更大。秦军于此时一鼓作气打下邯郸是有可

能的。但是如果不能采取措施进一步阻止诸侯合纵，不能象乐毅破齐那样采取有效的收拾人心的政策，虽然打下邯郸也是站不稳的。以白起之残暴是无法与乐毅相提并论的。在赵国军民对坑降卒的暴行衔恨入骨、纷起抗秦的情况下，必然和齐宣王攻占全燕后的结果一样，只有被迫狼狈退出。而且当主力陷于赵国之时，诸侯乘其弊而合纵攻秦，则失败是无疑义的。秦王虽然没有估计到坑降卒之后赵国军民抗秦的坚决意志，但能根据国虚民饥的情况，罢战休兵，在战略上是稳妥的。

关于邯郸之战秦赵双方的得失，对赵国来说，首先是如约割地以求一时之安，还是积极合纵抗秦使国家免于灭亡的重大战略决策的问题。割地则国土愈割愈小，国力也随之愈割愈弱。秦国则因割取的土地愈来愈多，国力也随之愈来愈强。虞卿提出的赵的土地有限，秦的贪欲无穷，反对割地求苟安，主张合纵抗秦图久存，能洞察存亡之机，是值得赞许的。基于虞卿的主张，赵国君臣在战略上所采取的避免决战，固守疲敌，外联与国，合纵破秦的持久防御方针，是切合秦强赵弱的客观实际的。要破秦必须待援，要待援必须先能固守。赵国君臣能在存亡危急的关头，利用广大军民对秦军坑降卒的极大仇恨，而平原君之流又能礼贤下士、倾家财以充军用，与军民同甘共苦，造成了举国团结一致、誓死抗秦的巨大力量。在作战指导上又经常以精锐袭击秦军。在攻城器械不甚发达、易守难攻的条件下，遂能不断地给秦以消耗而达到固守待援的目的。其次，齐、楚、魏三国之君由于怕引火烧身而忘却了唇亡齿寒之理，也说明当时合纵之不易。秦挟独强之势以攻众弱，已成为六国共同的敌人。赵亡而楚、魏等国亦必相继覆灭。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毛遂激发楚王出兵和信陵君窃符救赵，对邯郸大破秦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秦军邯郸之败，是由于秦王只知己，不知彼，而又不纳忠言，在战略决策上犯了错误。秦国“远交近攻”的目的是为了吞并韩、魏，先断六国合纵之脊而后予以各个击灭。由于赵国受韩上党而移兵攻赵是必要的。但在长平歼赵主力而又停战休兵之后，还是应该集中主

力实现其攻韩、魏断天下之脊的既定战略步骤。因为此时强赵已弱，赵国在丧败之余再度出兵干预的可能性是绝少的，甚至此时一举灭韩、魏也有可能。但在韩、魏尚存，楚、赵等国未被分割，而又没有可靠地排除诸侯合纵的可能性之前，再度出兵攻赵，是大为失算的。因为韩、魏虽然屈服，但这种屈服只能是表面的暂时的假象。只要一旦出现了可能击败秦国的机会，是必然要采取行动的。秦军通过韩、魏的土地攻赵，悬军于坚城之下而不能以速决灭赵，则出现诸侯合纵救赵，使秦军腹背受敌的可能性是极大的。秦王对长平坑赵降卒四十万的恶果毫无认识，只看到自己强大的一面，看不到赵国军民团结一致、誓死抗秦、难于速决的一面；只看到楚、魏等国惧秦声威的一面，看不到各国为了自存，有可能援赵抗秦的一面。遂致越韩、魏而远攻不可胜之赵，使秦军顿兵坚城，求战不得，屡遭挫败，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当楚、魏援军未至之际，如能听白起的忠告，及时罢兵息民以观诸侯之衅，尚可免于倾败。惜其愠怒任性，迷途不返，铸成邯郸之败的错误。“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146]。这是一切指导战争的人应该深刻考虑、慎重行事的。

以长平、邯郸之战对我国兼并战争的影响而论，是继济西大战齐国衰落后的又一个转折。由于赵国变弱而六国俱衰，仅仅三十六年的时间，秦国便统一天下了。

第五阶段　翦灭六国　完成统一大业

一、邯郸战后秦国统一天下的战略和策略

在长平、邯郸大战之前，韩、魏、楚、齐等大国早已衰落。赵国在长平之战元气大伤，虽然借楚、魏合纵之力在邯郸打败了秦军，却又使国力再度遭到严重消耗。其土地、人口远不如秦，恢复不易，遂成积弱。秦国虽然兵败邯郸，由于早已兼并了广大的土地，人多，经济力雄厚，恢复极易。于是形成了六国皆弱而秦独强的局势。

邯郸战后，秦国为了吞并六国，仍然坚持其"远交近攻"的战略。即远交齐国，先灭韩、魏，断山东六国合纵之脊，而后予以各个击灭的方针。秦国为了破坏合纵，争取齐国中立以削弱六国抗秦的力量是正确的。周赧王五十一年（前264年），齐王建即位后，其母君王后专政。史称："君王后贤，事秦谨（对秦很恭顺）"，为了求苟安，不敢支援其他五国抗秦，因而"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147]。证明秦国远交齐国，使之长期保持中立的方针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六国虽弱，但合纵还是对秦不利的。为了有效地瓦解合纵和削弱各国抗秦的力量，秦王（始皇）根据顿弱[148]、李斯[149]、尉缭[150]、姚贾[151]等人的建议，又采用了收买和暗杀并用的策略。曾经多次派人携带大量金玉财物，四出游说，收买各国的将相大臣，使之顺服于秦；或离间其君臣关系，使坚决抗秦的将领遭到贬斥、杀害。对于不接受收买的将相，则予以暗杀之后随即对该国用兵。这些策略对于瓦解合纵、削弱各国的抗秦力量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二、灭两周，攻韩、魏，断六国合纵之脊

楚国乘秦、赵战于长平之际，于前261年攻鲁，占领了徐州（今山东滕县南），并于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年）灭亡了鲁国。

秦国在邯郸受挫，稍事休整之后，为了灭韩并魏，断六国合纵之脊的目的，于前256年出兵攻韩，克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负黍（今河南登村西南）；攻赵，夺得二十余县。韩、赵、楚、魏等合纵抗秦，西周君也参加了这次合纵，率师出伊阙（今河南洛阳西南的龙门）攻秦，企图切断秦军至阳城的通路。秦军攻西周（周都王城，今洛阳市之西北部），西周君亲向秦王附罪，将国土三十六邑全部奉献于秦。不久，周赧王与西周君皆死[152]。仅存天下共主之名的赧王一死，周朝也随之灭亡。

秦昭王五十三年（前254年），魏安厘王出兵攻取了秦国远悬于魏国之东的定陶，并灭了卫国（今河南濮阳）[153]。秦军攻魏，夺取了吴城（今陕西平陆北），迫使魏国"委国听令"，"韩王入朝"[154]。秦国又再度威震天下。次年，楚国为了避秦军东进锋芒，又将国都由陈（今河南淮阳）暂时迁到巨阳（今安徽太和西）[155]。前251年秋天，

秦昭王去世，各国都派将相大臣参加葬礼。韩桓惠王不但亲赴吊祭，甚至于还披麻戴孝地讨好秦国[156]。

此时，燕、赵两国不仅不合纵抗秦以求存，反而打了三年相互削弱的战争。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年），燕王喜派其相栗腹结好于赵。栗腹回报时却向燕王说：赵国的“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幼小的）未壮，可伐也”。乐闲认为“赵，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不可伐”。燕王却说“吾以五（五倍兵力）而伐一”。乐闲仍然说“不可”。结果在燕王发怒，“群臣皆以为可”的情况下决定了攻赵之计。燕王命栗腹率一军攻鄗（今河北高邑东），命卿秦率一军攻代（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赵军反击，廉颇大破栗腹军于鄗，乐乘破卿秦军于代。栗腹被杀，卿秦被俘。次年（前250年），赵军乘胜进围燕都蓟（今北京市）。到第三年（前249年），燕国求和，赵国才解围罢兵[157]。

秦昭王死后，前250年孝文王即位，三日而死，候由庄襄王继位。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因东周参与各国的反秦活动，秦相吕不韦率兵吞并东周（今河南巩县西）。于是东西两周皆为秦所灭。秦国乘燕、赵两国互相攻战的机会，又使蒙骜攻韩，夺占了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和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连同灭东、西周的土地和以前攻韩所占的土地建立三川郡（辖黄河以南，灵宝以东，中牟以西，临汝以北地区。郡治洛阳），不但对韩的国都郑（今河南新郑）构成了三面包围的形势，而秦的国土也和魏的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接界了[158]。

秦庄襄王二年（前208年），赵国又使信平君廉颇率军协助魏国攻燕[159]。秦国乘虚而入，使蒙骜攻占了赵的太原郡（辖境相当于今山西句注以南，霍山以北，五台、阳泉以西，黄河以东地区，郡治晋阳，今太原市西南）。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秦军攻魏，占高都（今山西晋城）；攻赵，取榆次（今山西榆次）、新城（今山西朔县南）、狼孟（今山西太原市北之阳曲）等三十七城[160]；攻韩，又全部攻占了韩的上党郡。秦军连败韩、赵、魏三国之军，势不可当。秦军日夜攻魏，魏安厘王被迫将流亡于赵国十年的信陵君无忌请回魏国。信陵

君派人通告诸侯，发动合纵，遂率魏、赵、韩、楚、燕五国之师破秦军于河外（今河南西部古黄河南岸之原阳以西至滑县以东地区），并乘胜追击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而还[161]。此年五月，秦庄襄王死，其子嬴政即位（即秦始皇帝）。李斯劝秦王乘六国衰弱的大好时机，迅速用战争统一天下。否则坐待诸侯复强，相约合纵攻秦，纵然有黄帝那样的才能，也不能吞并六国了[162]。秦王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加快了统一战争的步伐。河外之败，是秦军在邯郸战后遭受的第一个挫折。秦国派人携万金入魏，收买了晋鄙的门客，诬告信陵君企图篡夺王位。安厘王便解除了信陵君的兵权。魏国自黜良将，秦国则排除了一个东进的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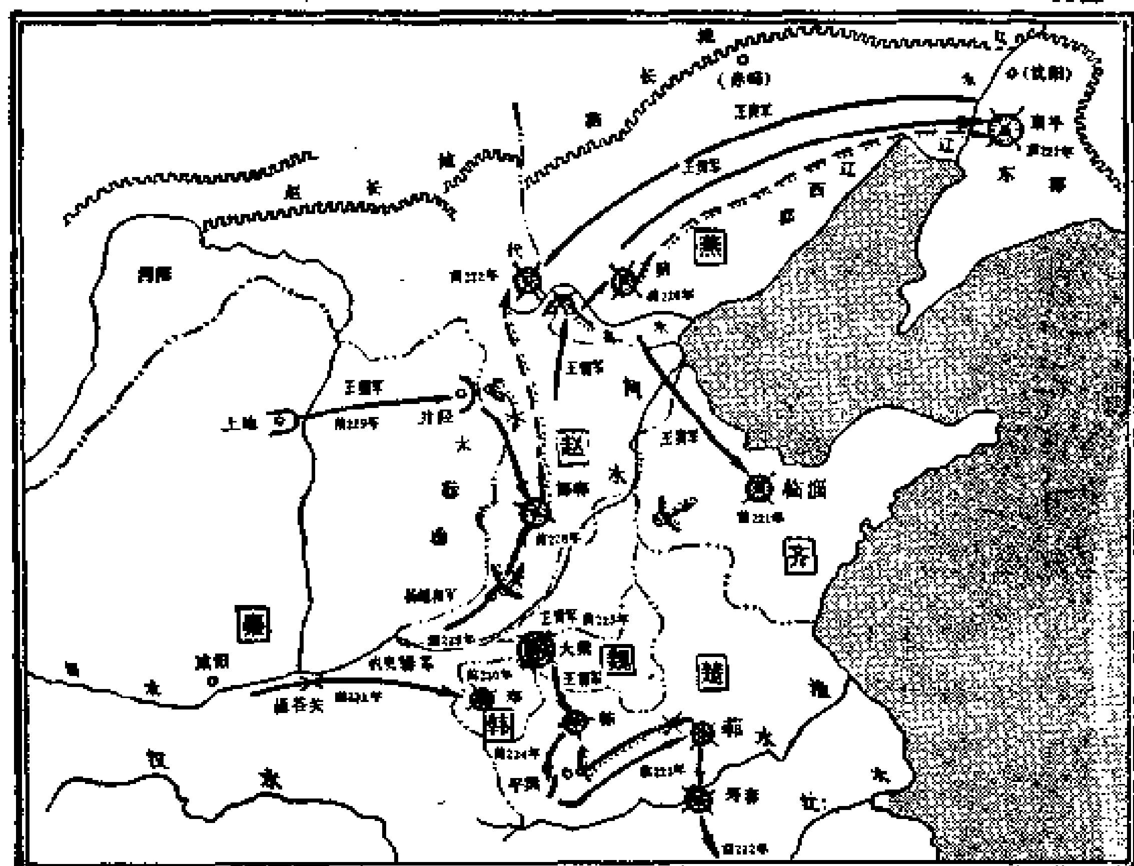
秦王政元年（前246年），晋阳的赵人反秦，秦派蒙骜平定，重建太原郡。秦王政二年（前245年），秦攻魏国的卷（今河南原阳西）。赵国不但不援魏，反而命廉颇攻占了魏的繁阳（今河南内黄西北）。秦王政三年（前244年），秦命蒙骜攻占了韩国的十三座城。燕、赵两国又于此时互相攻伐。赵将李牧攻占燕的武遂（今河北徐水西）、方城（今河北固安西南），庞煖又大败燕剧辛军。秦利用燕、赵交兵的机会，连续大举攻魏，到秦王政五年（前242年），攻占了魏国的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燕（今河南延津西北）、虚（今河南延津东）、雍丘（今河南杞县）、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南）、桃人（今河南长垣西北）等二十城，建立了东郡（今山东东阿、梁山以西，定陶、成武以北，河南延津以东，清丰以南，长垣以北地区），使秦的领土直接与齐地相连接，隔断楚、赵两国的联系，对韩、魏两国构成了三面包围。断六国合纵之脊的目的达到了。

秦王政六年（前241年），秦又攻取了魏的朝歌（今河南淇县）。由于山东各国已处于被秦国分割的态势，危亡迫在旦夕，又不得不联合抗秦。于是楚、赵、韩、魏、燕等五国进行了合纵。楚考烈王为纵长，以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主持合纵事务。当联军进至函谷关时，秦国一出兵反击，遂使战国时代的最后一次合纵的军事行动，以“诸侯兵皆败走”[163]的结果而告终。五国攻秦失败，秦的声威愈盛。六国被分割

之后，合纵已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加以各国间矛盾重重，互不信任，此后再无合纵抗秦之举。秦国以绝对优势而攻各自为战之众弱，已成泰山压卵之势。楚国为了避秦兵锋，又将其国都再一次向东南远迁寿春（今安徽寿县），也不过苟延残喘而已。

三、灭六国囊括天下成一统（参看插图4-12）

秦灭六国统一战争示意图 （4—12图）



（一）残赵破燕，吞韩灭魏

秦国在粉碎五国合纵之后，便致力于吞韩灭魏。此时赵国虽弱，由于经过了十余年的恢复，又建立了象名将庞煖、李牧等所率领的几支精悍骑兵，在六国中仍居于众弱之强的地位。秦国为了不使赵出兵援魏，便先发制人，于秦王政七年（前240年）命蒙骜率兵攻占了赵国中山地区的龙（今河北行唐附近）、孤（今河北唐县北）和庆都（今河北唐县附近），又攻取了魏的汲（今河南汲县西）。因汲东与朝歌、濮

县，西与山阳(今河南焦作东南)连成一片，便隔断了赵与魏的联系；北又与太原郡和龙、孤、庆都相呼应，对赵国也构成了战略包围的态势。次年(前239年)，秦命长安君成蟜（读"桥"）攻赵上党，成蟜在屯留（今山西屯留南）叛秦降赵。这是出于秦王意料之外的小挫折。魏国也因邺（今河北磁县南）孤悬赵境之南而将邺给了赵国。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秦派杨端和攻取了魏的首垣(今河南长垣北)、蒲(今河南长垣东北)和衍氏(今河南郑州东北)。次年(前237年)，秦王嬴政免除了吕不韦的相位，由自己处理国事。秦王政十一年(前236年)，赵国又命庞煖再度攻燕，夺占了狸（今河北任丘东北）和阳城（今河北保定西南)。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秦乘机命王翦、桓齮、杨端和攻赵，占领了阏与(今山西和顺)、橑阳(今山西左权)和邺与安阳（今河南安阳）等九城。次年(前235年)，魏国因处于秦的包围之中，已被迫听命于秦。秦国征调了四郡之兵，以助魏攻楚为名会同魏军攻楚，不过是挟持魏军以抑制楚国，不使其干扰攻赵的行动而已。于是秦国便从秦王政十三年(前234年)起，又连续三年攻赵。秦将桓齮攻赵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次年(前233年)，桓齮又攻赵宜安(今河北藁城西南二十七里)。赵以北备匈奴屡建战功的良将李牧为大将军，大破秦军于肥（今河北藁城西南七里)。前232年，秦大举攻赵，一军至邺，一军由太原攻番吾(今河北灵寿西南)，又被李牧击败。赵国两胜秦军，秦国怕因此而齐与赵联合增加破赵的阻力，便派荆苏出使齐国，劝齐与赵断交而后攻赵[164]，这种防患于未然的措施是稳妥的。李牧虽然两胜秦军，但赵军也损失惨重。结果是"赵亡卒数十万，邯郸仅存"[165]。在韩、魏、齐皆服于秦的情况下，李牧还要"南距(拒)韩、魏"[166]。楚国远隔，燕、赵矛盾重重，合纵无望，败亡之局早定，欲求积小胜为大胜已全无可能。

李斯早在前237年就建议秦王"先取（灭）韩以恐他国"。秦使李斯攻韩，韩国危急。韩王安与韩非密谋削弱秦国，遂于前233年遣韩非入秦。韩非上书劝诱秦王先灭齐、赵而后定韩，企图使韩国获得喘

息的机会以观形势的变化。李斯却认为“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疾也”，谏议秦王以召韩王入朝为名扣留韩王[167]。韩王安拒绝入秦，仅于秦王政十六年（前231年）将南阳地区（在太行山南）残余的土地献给秦国。秦王在攻赵的间歇命内史腾前往接收，并兼任南阳太守；次年（前230年）即命内史腾攻韩，俘虏了韩王安，灭了韩国。

秦国在休整两年并灭韩之后，将处于包围之中无所作为的魏国暂时搁置，乘赵国大饥荒国力脆弱，遂集中力量攻赵。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以王翦率上地（今陕西绥德附近一带地区）军及上地羌瘣（读汇）[168]率领的羌兵直捣太行山的要地井陉（今河北井陉）；以杨端和率河间兵攻赵都邯郸。赵命李牧、司马尚抗击秦军。因李牧曾数挫秦军，败秦大将桓齮、王翦对之有所畏忌[169]。秦国便用重金收买了赵王的宠臣郭开，使之诬蔑李牧、司马尚欲附秦叛赵。赵王惑于宠臣的谗言而自毁干城，命赵葱、颜聚代李牧、司马尚。李牧因不接受命令被杀。次年（前228年），王翦遂大破赵军，杀赵葱，颜聚逃亡。秦军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奔代（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自立为代王，收残部与燕国合军守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南）以延残喘。

王翦欲乘胜攻燕而屯军于中山（今河北完县、冀县、高邑、平山等地区），燕国君臣恐惧。鞠武主张：“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构（结好匈奴）单于”，合纵抗秦。这是极不现实的。此时的三晋、韩被消灭，魏被包围，赵国仅存一部分残余势力逃于代地，齐、楚又皆畏秦服秦，合纵已毫无可能。太子丹虽然看到了燕国弱小不足以当秦和“诸侯服秦，莫敢合纵”的现实，却企图派勇士劫持秦王，使之归还各国的土地，或刺杀秦王，陷秦国于混乱，造成诸侯合纵的机会以击败秦国[170]。这也不过是垂死挣扎中的幻想。即使侥幸刺死秦王，既不可能使秦国抛弃其自秦孝公以来吞并六国的战略方针，也不可能改变各国的积弱而又互相猜忌、病入膏肓的危亡局势。燕太子丹派荆轲和秦舞阳携带秦叛将樊于期的首级和燕国最肥美的督亢地区（今河北易县、涿县、固安、新城地区）的地图入秦，荆轲献图时用藏在图中

的匕首刺秦王不中，被肢解而死。秦王命王翦、辛胜攻燕。燕、赵联合抗秦，秦军大败燕军于易水之西(今河北易县南部地区)。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秦王又增派兵力，王翦攻下燕都蓟(今北京市西南隅)。燕王喜只得收残兵远逃，东保辽东(今东北沈阳、丹东、营口等一带地区)。

当秦军攻燕之时，秦王又命王翦之子王贲为将，率兵南下攻楚，夺占了十余城。秦王政二十二年(前 225 年)，秦王命王贲以胜楚之师回军攻魏。魏王假困守孤城，王贲引鸿沟（魏都大梁北部通黄河的运河）的黄河水灌城。是年三月，大梁城崩坏，魏王假投降被杀，魏国灭亡。

（二）席卷楚燕赵，唾手并齐

秦国一经吞灭韩、魏，远逃于东北方的燕、赵残余势力有如釜底游鱼。处于魏国南方的楚国，在前228年楚幽王死后，又发生了楚王负刍杀楚哀王而夺权的内乱。秦国在灭魏的同时就打算发动灭楚的战争。秦王问王翦灭楚需要多大兵力？楚国虽弱，但在吞并鲁国之后，其土地、人力、财力都有所增加。王翦提出非六十万人不可。青年将领李信却说只要二十万人便够了。秦王以为王翦年老怯敌，决定由李信和蒙骜之子蒙武[171]分率二十万人灭楚。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年)，李信攻楚，大败而回。秦王按王翦的要求，发兵六十万命王翦攻楚。秦王政二十三年(前 724 年)，王翦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攻占了陈（今河南淮阳）以南至平舆（今河南平舆北）地区之后，楚国集中全部兵力抗击秦军。王翦坚壁不战，伺楚军求战不得、军心懈怠、引兵东走的机会，挥军追击，大破楚师，俘虏了楚王负刍。楚将项燕随即在淮南（楚都寿春在淮南）拥立昌平君反秦。次年(前223年)，王翦、蒙武在蕲大破楚军，昌平君死，项燕自杀，楚国灭亡[172]。

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秦国大兴兵，命王贲扫灭残余的燕、赵势力。王贲以迅雷之势，东攻辽东，虏燕王喜；西攻代，虏代王嘉，灭亡了燕、赵两国。王翦也乘胜平定了楚国的江南地区。只剩下一个臣奸主昏、苟安自娱的齐国了。

齐国在前264年至前249年君王后专政的十六年之间，由于君王后志在苟安，而秦国又采取了适应齐国以减少统一战争阻力的方针，内外因相结合，造成了齐国"事秦谨（恭顺）……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173]的局面。邯郸战前，虞卿虽曾东赴齐国订立了合纵盟约。秦攻邯郸之际，秦国已经有"齐、楚救赵，亲（指出兵救赵）则退兵，不亲遂攻之"[174]的打算，而齐国仍然不顾唇亡齿寒的利害关系，既不供粮，又不发一兵。君王后去世，后胜相齐之后，后胜又被秦国重金收买，多次派人入秦与秦结好。秦国又一次用重金收买他为秦国做反间工作，劝齐王"去从（弃合纵）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因此）灭五国"[175]。齐国的苟安政策加速了五国的败亡，也加速了自身的覆灭。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齐王建与后胜在五国皆灭、丧钟已响的时刻，才与秦国断交，把素无训练的乌合之众派去防守西部边境。秦王采取了出敌不意，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命王贲率军从燕国之南进军[176]。秦军进入临淄，没有人敢和秦军战斗。齐王建终于听了后胜的最后一计——"不战，以兵降秦"[177]。

六国既灭，结束了起东周、历春秋、战国，长达三百余年的诸侯割据分裂、相互混战的局面。秦国一统天下，秦王嬴政称始皇帝。为了巩固政权、发展生产和消灭诸侯割据分裂的因素，秦朝在全国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普遍实行郡县制，又统一法令和文字，统一度量衡和货币，统一车轨和历法，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创建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伟大国家。

秦统一六国的战略

自平王东迁，周室衰微，裂土受封的众诸侯国遂强凌弱、众暴寡，以战争手段进行兼并。历春秋大国争霸长达二百余年的兼并战争，皆未能完成统一。及至战国，僻处西陲的秦国能够消灭群雄，囊括宇内，完成全中国的统一，而且这个统一是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全国性的统一，胜利来之不易，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也是巨大

的。秦之所以能达成统一，在客观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主观上是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富国强兵；秦惠文王用司马错之计，开疆拓土，并巴、蜀而据天府之饶，在人力财力物力方面为战胜六国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秦孝公又能纳商鞅之谋，利用魏国东败于齐由强变弱的时机，收复河西，造成据山河之固，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形势，而后东向以制诸侯，争王天下。秦孝公、商鞅、司马错对秦国统一天下，在战略上起到了奠基人的作用。

秦国的六代君主所推行的一些军政措施，首先是顺应了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广大人民群众要求统一的愿望；其次是战略策略运用正确。

秦国以雍州和巴、蜀之地东向而争天下，面对山东六强和豫、兖、荆、扬、青、冀、幽、并八州的辽阔土地，只能灵活地利用合纵连横，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秦的统一是在长达百余年的兼并战争中，经过蚕食和鲸吞两个战略进攻阶段达成的。即先对六国各个击破，予以极大的削弱，并逐步扩大和巩固占领地区，不断增强自己的力量，造成席卷之势，然后以至强临至弱，逐个予以击灭。撮要论之如次。

（一）推行进步政策以争取民心；重视延揽人才以壮大自己

战国时期，长期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使兵灾、病灾、水旱灾害相继，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无不渴望天下统一，过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只能欢迎政治上较好，经济上对人民比较有利的统治者来完成统一。当时的荀子在其所著的《王霸篇》中指出“天下归之之谓王”，说明了谁能统一，取决于谁能争取民心。山东六国的土地在兼并战争中不断丧失，国力日益衰弱，为了进行战争，必然要加重对人民的剥削。秦国则相反，得地愈多，国力愈强，对人民的剥削自然要比六国轻些。据《商君书·徕民篇》记载，秦国曾利用其地多人少的条件招徕三晋人民，实行“利其田宅（给好田好屋）而复之三世（三代人免除徭役）”的优惠政策，因而三晋的不少农民都逃亡到秦国。前222年五月，当韩、赵、魏、燕、楚五国为秦所灭之际，出现了“天下大酺（读蒲）”〔178〕的盛况。所谓“大酺”，即广大人民群众自出酒食，相聚欢乐大饮五日以庆祝统一。充分说明秦能完成统一，是推行进步政策、争

取民心、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的结果。

战国时期，在卿、大夫夺权斗争的过程中，在各国变法改革的活动里，都有大批各种身份的士（主要指古代的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各国诸侯亦都重视招贤纳士，进行政治改革，以求富国强兵。秦国对于“纳士”、“用士”，更特别重视，定为传统的国策。秦孝公重用卫人商鞅，进行变法，国富民强，伐楚攻魏，拓地千里。秦惠王任用魏人张仪，倡言“连横”战略，拆散东方六国的“合纵”抗秦阵线，迫使各国割地奉秦。秦昭王任用魏人范睢，废穰侯，逐华阳君，使贵族权力削弱，王权大大加强；实行“远交近攻”战略，逐步蚕食关东诸侯。这几代君主都由于重用客卿，对秦国的富强作出很大的贡献。秦始皇继位后，秦国的宗室权贵和一部分大臣认为来秦的客卿都不可信任，建议秦王下令逐客，把客居的“士”一律驱逐出境。当时，楚国上蔡人李斯也在被逐之列。他向秦始皇上《谏逐客书》，列举秦国历代君主重用客卿对秦国的发展壮大所作的贡献，认为对于客卿应作具体分析，不能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179]的一概排斥的政策。他还进一步指出：当时统一是大势所趋，各国有志之士都向往秦国，不远千里前来投奔。一个谋求统一海内的君主应该襟怀广阔，兼收并蓄，不分地域，不论贵贱，广泛地招纳天下的人才为自己服务，才能无敌于天下。如果把非秦地出生的“士”赶走，就是“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就是“藉寇兵、赍盗粮”[180]，势必影响统一战争的胜利。“逐客”与“留客”不仅仅是如何“待士”和“用士”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秦国在进行统一战争中，要不要广泛延揽人才，以壮大自己、孤立敌人的战略问题。秦始皇批阅李斯的谏书后，翻然领悟，果断地采纳他的建议，废除逐客令，召见李斯，恢复他的官职。于是魏国大梁人尉缭又投奔秦国，进献离间诸侯的策略，配合“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战略，逐次翦灭六国，胜利地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可见秦国历代重用客卿，对发展壮大、完成统一，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二）变法改革彻底，历代坚持，使国力富强

战国时期各国皆先后变法以求富国强兵。废井田，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重视农业，抑制工商，奖励耕战；废除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度。选贤任能，循名责实；制定并强化封建法令，赏罚必信。这些顺应生产力发展，符合人民群众改变生产关系的要求的政治改革，各国大体上是相同的。但有的国家在改革上不够彻底，有的则半途而废。如楚国在楚悼王死，吴起被害之后，军政大权又被旧贵族攫取，新法也随之废弛。秦国的变法比其他国家彻底，而且始终巩固变法成果，《韩非子·问田》篇中曾提到“楚不用吴起（之法）而削乱，秦用商君（之法）而富强。”富强是统一战争必须具备的条件，而富强要靠变法改革。秦国自秦孝公到秦始皇，经过六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政治上坚持变法图强，不开倒车，历时一百四十年，终于完成统一大业。这其间，孝公以后的五代接班人：惠文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秦始皇，都比较英明，善于知人用事，不是昏庸之辈，故能继承前业、坚守国策，招贤纳士，改革图强，使秦国的国力日增强大，终能“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181]。楚国在战国初年是土地最大的强国，济西之战以前的齐国也曾盛极一时。但由于两国的接班人楚怀王、齐湣王的骄暴昏庸，以致由强转弱，终为秦灭。如果秦国也出现一两个楚怀王、齐湣王之类的国君，不但统一无望，欲求免于灭亡亦不可得了。秦的统一非一世之功，五代的君主创业垂统，苦心经营，到秦始皇时，统一大局已达水到渠成之势。秦师挥戈东向，天下自然定于一了。

（三）政治措施配合军事占领以巩固兼并的土地

战国七雄谁都想统一天下。究竟谁能统一，还得看谁能够有效地巩固其兼并所得的土地。如果旋得旋失，最后连自己也会被别人兼并了去。范雎认为越国攻人，虽得地而不能守；只有远交近攻，才能巩固所得的土地。这只是看到了军事方面的原因。得地之能不能守，取决于在已兼并的地区所推行的政策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齐宣王挟其强大的国力五十日而攻占全燕，因齐军烧杀抢掠的暴行激起了人民仇恨，人民纷起反抗，齐军被逐出燕境。又如燕国利用合纵攻齐而

占领齐国，也因为骑劫指挥燕军所犯的种种暴行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田单一反攻，燕军便如过街之鼠，所占七十余城全部丧失。这说明了不讲政治而单靠军事力量，要巩固所攻占的土地也是不可能的。荀子总结当时的战争经验，对此提出了“凝”的理论。他认为：兼并是容易做到的，唯有坚凝（巩固）是困难的。他根据齐、燕、赵等国得地而不能凝的情况结论说：“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则必（为人所）夺；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不能巩固自己的土地），则必亡；能凝之，则必能并之矣”。又说：要改善政治，用封建礼制来对待士人；要减轻剥削，使人民安居乐业。“礼修则士服，政平而民安，夫是谓之大凝”[182]。荀子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的。

秦国在兼并战争中，不但善于战胜攻取，而且随即将所得的土地建为郡县，设官置守，推行秦国的新法——强本弱末，抑制豪强，使人民少受剥削。奖励耕战，生产成绩好的即免除徭役，在战争中立功的按功计赏。由于符合了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安居乐业的要求，因而对兼并的土地收到了巩固的效果，故能由蚕食以至鲸吞，灭六国而终成统一之功。

（四）东向以争天下的战略决策正确，打击顺序灵活

商鞅东向争天下的战略决策，认为“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把中原的魏国作为主要打击对象。到秦昭王时代，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更进一步具体而明确地指出“韩、魏中国（指中原）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指韩、魏）以为天下枢”，主张先亲韩、魏，威服楚、赵而后威服齐国，然后再灭韩、魏，也仍然是以中原的韩、魏作为主要战略方向。以七国的地理分布而言，楚在南，燕、赵在北，秦、韩、魏、齐四国处于从西向东的中央横线之上。当时的谋臣策士，将处于中心位置的韩、魏作为“天下之中枢”，或称为“天下之脊（脊梁）”。秦国始终以韩、魏作为主要战略方向，是采用的中央突破的方针。先断六国合纵之脊，使楚不能北援燕、赵，赵、燕不能南下救楚，分割楚、赵、燕、齐各国而后逐个予以击灭。在六国间矛盾重重，合纵不固，能够以强对弱、各个击破的条件下，中央突

破的战略方针是可行的。

为了达成断天下之脊的目的，秦国能够根据各国强弱不同和不断变化的情况，不拘泥于专攻韩、魏，在削弱韩、魏之后，灵活地对楚、齐、赵三强逐个击破，给以严重的削弱，造成据韩、魏而席卷天下的形势，在打击顺序上也基本是正确的。

秦国收河西、取上郡，进一步削弱魏国之后，其最大的敌手是东方的齐国，其次是南方的楚国。对合纵抗秦来说，齐国处于合纵后盾的地位。秦攻韩、魏，既可遭到三晋与齐之合纵，更危险的是楚国威胁其南侧背。如果不削弱齐、楚两国而欲吞并韩、魏是不可能的。秦东出攻韩、魏，败三晋合纵之师于修鱼之后，即转锋南向，离间齐、楚的联盟关系，于前312年和前300年两次攻楚，先后攻占了楚国的汉中地区和重丘（今河南泌县东北）、襄城（今河南襄城）、析（今河南西峡）等大片土地，予楚国以沉重打击，基本上解除了南侧背的威胁，解决了东出攻韩、魏的第一个难题。

齐国是山东六强之首，各国抗秦有赖于齐国的支援，齐国欲称霸天下也必须利用合纵的机会打击秦国。韩、魏处于齐、秦两强之间，秦攻韩、魏，齐与韩、魏合纵则秦无胜利之可能；欲先予齐国以极大的削弱而后成并韩、魏之功，又不可能超越韩、魏而攻齐。这是秦国不易解决的第二个难题。还是齐湣王这位既贪婪又昏庸无知的国君，眼光浅短，死盯住定陶馋涎欲滴，不知利用三晋和楚国与秦的宿怨，全力组织合纵，先摧毁最强大的敌手秦国，而后再相机对其他各国各个击破，却在灭宋之后头脑发昏，“南割楚之淮北，西逼三晋，欲并二周，为天子”，使“诸侯恐惧”，将自己变成众矢之的，给了秦国合纵攻齐的大好机会。秦国则能看准时机，带头发动合纵，借五国之力摧毁了最大的敌手齐国，创造了断山东之脊的有利条件，解决了灭韩、魏的第二个难题。

在楚弱齐破之后，六国之强只剩下一个灭中山而兴起的赵国。以土地之大，人民之众、财力之丰相较，赵虽远不如秦，但赵与韩、魏合纵抗秦，仍然是秦灭韩、魏的阻力。当长平之战摧毁赵国的主力之

后，六国皆弱而秦独强，断山东合纵之脊，席卷天下便成定局了。

长平、邯郸战后，六国俱弱，只有全力合纵抗秦，才能保持微弱的优势。齐国远处东海之滨，意在苟安，做了秦国远交近攻战略的俘虏而不参加合纵。燕、赵两国，不仅不合纵，反而五年内两度相攻，自相削弱，又使秦国得以专力攻韩、魏。特别是秦攻韩、魏之时，赵国不仅不救魏，反而于前245年出兵攻魏，取繁阳，自毁南方屏障。魏国虽曾于前 247 年一度合纵，败秦军于河外，由于各国同床异梦，秦施离间计，魏国废黜信陵君，合纵便瓦解冰消了。及至前242年，秦攻魏，建东郡，陷韩、魏于包围之中，达成断山东六国合纵之脊的战略目标之时，各国也曾推楚为纵长合纵攻秦。但大势已去，强弱既不敌，五国又慑于秦之军威，最后一次合纵遂告崩溃。在没有合纵的条件下，秦国以至强攻至弱，灭六国便形同拾芥了。

秦国不机械地专攻韩、魏，能灵活地依据当时形势，按赵、楚、齐的顺序各个击破，实现其中央突破的战略方针，故其打击的顺序是基本上正确的。

当秦国东出攻魏之际，就有谋士（佚其名）上书秦王，陈说攻魏不如攻楚的意见。书中形象地将山东六国比作一条蛇，将魏比作蛇的中身（即腰脊）。认为秦攻魏是向天下表示要拦腰斩断六国之脊，蛇的头和尾必然要回救其中身。六国见有危亡之祸，必然要合纵抗秦。六国尚强，秦国会立即招致败军之忧。并指出：不如南下灭楚，“从事于南方，其兵弱，天下必不能救。地可广，国可富，兵可强，主可尊”[183]。以后秦始皇召见韩非时，韩非也曾批评说：砍树要刨根才能免遭后患。秦大破楚军，楚君臣东迁于陈，“当此时也，随荆（楚）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其民贪（占有）也，地是利也，东以弱燕、齐，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荆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国君），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以固失霸王之道一矣”。[184]

韩非为秦出谋划策，主张先灭楚国，其用心在转移秦国的打击目

标，意在保韩。就当时六国的强弱形势来分析，先灭楚的打击顺序是值得研究的。秦、楚两国的国力对比，固然是秦强楚弱，但楚国毕竟是南方的一个大国，国土辽阔。秦国对楚用兵，只能采取蚕食，逐渐削弱，不可能一口气鲸吞，毕其功于一役。楚军被秦军击破后，楚国"收亡卒，聚散兵"，迁都于陈。秦如不巩固所攻占的楚地，继续向东进军，想一举灭楚，恐有鞭长莫及之忧，师老而无功。齐、赵、韩、魏见秦国悬军深入，直逼楚都，焉能坐视不救。一旦组成合纵，并力击秦，秦军整个左翼暴露，会招致败军之忧，所以秦不先兴师灭楚是至当之策。

（五）利用六国不能合力抗秦的弱点，进行分化离间，各个击破

根据苏秦游说赵王时所提出的六国与秦的力量对比："以天下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经济力量是五比一；"料诸侯之卒十倍于秦"，兵力是十比一，力量占绝对优势。据此苏秦得出结论"六国为一，并力西向攻秦，秦破必矣"[185]。苏秦所设计的六国合纵摈秦的作战方案是：如秦南下攻楚，则齐、魏两国以精锐之师救楚，韩军断其粮道，赵军南下为后援，燕军守常山（即恒山）之北以防秦军奇袭燕、赵；如秦军东攻韩、魏，则楚军断其后路，齐、赵两军从东、北两个方向救援，燕军守云中（今内蒙包头以西地区）以防秦军奇袭燕、赵；……[186]。如能照此实施，则秦无取胜之可能。所以秦国也最怕合纵而不遗余力地加以破坏，用利诱与威胁诸种手段，"连横而斗诸侯"[187]。

从合纵连横的角度来推究秦能战胜六国的原因，主要是六国不能真正的同心，也就不可能真正的同力。心不同则力分，力分则弱。秦国则是专一的，力专则强。故秦国能达成各个击破的目的。

六国为什么不能齐心合力抗秦？根本性的问题是战国七雄皆以兼并为目的。兼并对象远则势所难及，不能不以近为利。于是相邻之国总是你想吃掉我，我想吃掉你。三晋联合未破之前，东攻齐，西攻秦，南攻楚，都是对近邻土地的兼并。三晋分裂之后，韩、赵、魏互相攻伐也同样是近邻交争。魏国衰落，齐、秦两强东西对峙之后，燕、赵、韩、魏、楚等五国变成了齐、秦争夺的中间地带，而地处中

原要冲之地的韩、魏更是两强争夺的中心。当秦大举攻韩、魏时，各弱国见秦东逼不已，构成了对自己的威胁，为了解除眼前的危急，不得不暂时联合起来抗秦。齐国为了不使中原地区被秦国抢先兼并，也必然要参加联合行动的行列，因而有合纵抗秦之举。如齐国大举西逼，中间地带的弱国也同样与秦联合起来抗齐。但是只要中间地带的弱国暂时没有秦、齐两强的战争威胁时，便立刻旧性复发，搞互相兼并。如前318年合纵抗秦之后，当前312年秦南下攻楚之际，韩、魏不但不支援楚国以巩固其南翼，反而乘楚蓝田之败，一直攻楚至邓（今湖北襄樊市北）。又如前284年合纵破齐之后，赵国也乘秦国攻楚之机，于前 276 年连续两年攻魏，攻占了魏的几（今河北大名东南）和防陵（今河南安阳西南）、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侧）。前273年，赵、魏两国又联合攻韩之华阳（今河南新郑北）。不仅大国兼并小国，甚至小国也企求兼并大国。燕与齐强弱悬殊，以弱燕而谋强齐，虽名为报覆国之耻，其实质仍然是兼并土地。甚至到了长平战后，六国俱弱，非合纵无以御强秦之时，燕、赵两国仍互以兼并为利，连兵不解而相互削弱，给秦国造成了各个击灭的机会。可以说以兼并为利的剥削阶级统治集团，不分强弱大小无不以兼并为目的。中间地带的各个弱国当共同受到威胁时则合纵，情况稍缓则转而互相兼并，这是其阶级本性决定的。可见各国之间根本就没有长期坚持合纵的可能。即使一时打败了秦国，合纵也只能是暂时的。加以秦国逞其连横之术，用利诱威胁的手段，打进去（如收买齐国的后胜），拉过来（如多次用武力迫使楚、韩、魏等连横），合纵更无长期坚持的可能。不能长期同心合力地坚持合纵，要想彻底摧破强大的秦国是毫无希望的。纵散约解，秦国予以各个击破，仍就是以强对弱。

山东各国不但不能长期坚持合纵，就是合纵组成之后，也因同床异梦而不能扩大胜利摧毁秦军主力，有时甚至以大败告终。如齐、韩、魏合纵攻秦，于前 296 年攻入了函谷关，因主宰合纵大权的齐国孟尝君听了韩庆的意见，认为不能使韩、魏两国因攻秦大胜得地过多而强大难制。为了使秦国不致太弱，让三晋经常有威胁之感而东附于齐，

一面派韩庆入秦，以秦释放楚怀王、使楚割东部地区与齐为媾和罢兵的条件，一面又使韩、魏不再深入攻秦[188]。齐军是合纵攻秦的主力，主力军媾和，韩、魏势孤，虽欲扩大战果以摧破秦军主力，实非力之所及。秦军主力未受大损，仅三年时间又卷土重来，大破韩、魏联军于伊阙（今河南洛阳东南之龙门）。又如前318年之楚、魏、韩、赵、燕五国合纵攻秦，空有五国合纵之名，实际出兵的仅韩、赵、魏三国，遂以三晋大败于修鱼而告终。

又因各顾私利，在具体作战上亦常因力分而致败。如前293年的伊阙之战，秦军兵力不及韩、魏联军之半。韩军兵少，盼望魏军先战；魏以韩军悍锐，想推韩军打前锋，各自为了保存实力而互相观望。秦将白起以一部兵力牵制韩军，集中主力出其不意地打垮魏军，韩军亦随即溃败[189]。

以上种种，充分说明战国七雄皆以相互兼并为利，合纵只能是形式上的联合。虽然六个一相加在形式上等于六，由于不能同心合力，实质还是六个分散的一。在作战上往往因以致败，打胜了也不能扩大战果而彻底地摧毁秦军主力，更不能长期坚持合纵以挫强秦。胜败之数，不言可喻。六国合纵之无成，秦国早已洞若观火。秦惠王认为，诸侯之不能同心合力地合纵，就象一条绳子缚起来的一群鸡，不能共同栖息于一个鸡架之上一样[190]。张仪在劝说魏惠王与秦连横时也曾明确地指出，同父母所生的亲兄弟还有相互争钱财的，合纵之不能成事，道理是很明白的[191]。秦国能明察各国合纵的弱点，对于坚定其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决心，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分化六国，坚持其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是有其重大意义的。

此外，秦国能及时地运用各种策略手段分化合纵力量予以各个击破，离间敌国君臣关系而使之自黜良将……等等，已详见于各节之中，就不用赘述了。

合纵连横的实质

不论是“合众弱以攻一强”的合纵，还是“事一强以攻众弱”的

连横，都是战国的七个诸侯国在相互兼并的战争中，根据情况需要而采取的联合行动。所谓纵与横，不过是按七国分布的位置，以南北联合为纵，东西联合为横而已。合纵也不全是“合众弱以攻一强”。齐国合纵攻秦，秦国合纵攻齐，齐秦本身都是强国，只有齐国衰落之后，山东各国联合抗秦，合纵才成为“合众弱以攻一强”。又如齐、秦东西称帝相约伐赵是两强连横而攻一弱，也说明连横并不全是“事一强以攻众弱”。合纵与连横不过是七个诸侯国在纷争对抗的战争中，为了赢得兼并战争的胜利，根据应当争取谁，孤立谁，打击谁的需要而采取的分化削弱敌方和争取同盟加强自己的联合行动。

各国自身的利害是合纵连横的基础。合纵连横的构成，则是各国在兼并战争中利害交织，层层相固，既吸引又排斥，相互制约的必然结果。由于事物都存在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之中，而分化敌方，争取同盟，便成为战争中夺取胜利的普遍规律。

世上无不变之物。联合之极不稳定则是战国合纵连横的一大特点。七国间的兼并战争连绵不断，由胜败造成的强弱形势的变化和各国自身利害的变化，导致了合纵连横的急剧分解与重新组合。强者鹰逐而趋利，弱者索援以救亡。如韩、魏之反复于齐、秦两强之间，冯亭之献韩上党于赵。又或两强争利，利变而联合之形式亦变。如齐、秦两强，始而东西称帝连横以伐赵，一变而为齐合纵攻秦，再变而为秦合纵攻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真是纵横捭阖，变化无常，从来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长期而稳定的两相对抗的集团。在合纵连横反复多变的条件下，败者多败于不能明察事机，丧失同盟而自陷于孤弱；胜者多胜在善于因势利导，能分化敌人而益强。如长平之战，赵不积极合纵抗秦，秦能显郑朱而阻止合纵。如邯郸之战，赵能合楚、魏以抗秦，秦未能有效地阻赵合纵。胜败之理，灼然可见。

利诱与威胁是战国兼并战争中各国用以组成合纵连横的重要手段。无论合纵或连横，都必须分化敌方，争取同盟，才能达到联合的目的。其手段各因当时的形势而异，可谓变态万端。但任何一国在政治军事斗争中采取行动所依据的准则，无不根源于与外部有关各国相

互联系，相互影响而产生的利害关系，并据此利害关系而趋其所利、避其所害。故分化敌方，争取同盟的手段，也只有利诱与威胁两类。利与害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利有久暂之分，害有远近之别。诱之以利，使之惑近利、忘远害而为我所驱；胁之以害，使之避危亡之近祸而就我范围。利诱与威胁，正是利用了人们都想趋利避害这一普遍现象。

利诱之为用：如秦之攻楚，利用楚怀王贪利无知的特点，伪以商于之地诱之使与齐国断交，在"齐王大怒，折节（放下大国架子）而下秦。秦齐之交合"[192]，陷楚于孤弱而后进攻。天下没有无因而至之利，楚怀王为贪欲所迷，却将外蒙糖衣的毒饵吞了下去。又如秦之合纵攻齐，利用了"齐南割楚之淮北，西逼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193]所造成的诸侯恐齐病，诱各国以伐齐免祸之利，一拍即合，遂成合纵之功。秦国合纵的目的，是为了摧破强大的齐国以利于虏韩、魏，断天下合纵之脊而对各国各个击破。五国纵能识破此机，也只好先击败齐国以救燃眉之急，将合纵攻齐作为"续命汤"而甘之如饴。概而言之，"福兮祸所伏"，以利诱之，实质是以利害之。

威胁之为用：秦连横而斗诸侯，如张仪说楚事秦，则以"秦兵之攻楚也，危难在三月之内，而楚待诸侯之救，在半岁之外，此其势不相及也"；以"恃弱国之救，忘强秦之祸"[194]相威胁。又如张仪说韩事秦，则以"夫塞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绝上地（断山西韩上党之通道），王之国分矣。先事秦则安，后事秦则危"[195]相威胁。听则可获一时之安，不听则立见败军破国之祸。皆能在一定时间之内，取得威服邻国，组成连横的效果。

由于战国七雄皆互以兼并为志，其合纵连横的目的，都是为了达成兼并而绝无互利互存之可言。其组成联合的手段也只能是利诱与威胁。今天联甲攻乙，明天又联乙攻甲。联甲攻乙，既联甲则甲不助乙而减少攻乙之阻力，并可借甲之力而成破乙之功，待乙破甲孤，乙无力助甲之时再回头攻甲。也可以说今日之联甲攻乙，即是为了有利于明日之攻甲。其联合之实质如此而已。惟其如此，今日是联合中的成员，一旦图穷匕首见，便立刻成为以性命相扑的冤家。这也正是合纵

连横复杂多变，极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国的兼并战争是中国的历史发展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重要时期，七个新兴的地主阶级集团相互斗争的必然产物。没有国家的统一便没有国家的发展和繁荣，也没有人民的安宁。对一个封建割据四分五裂的大国来说，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不通过兼并战争便不可能达到统一。秦国的新兴地主阶级集团，“奋六世之余烈”，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扫除封建割据，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的伟大国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今日之中国，早已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原理为建国之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一切剥削阶级的尔虞我诈的行径是持批判态度的。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强凌弱、众暴寡的霸权主义行为。举世闻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对外政策不可动摇的基石。我们公开声明反对霸权主义，也严正地声明我们永远不称霸。霸权主义是当今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根源，了解合纵连横的实质及其纵横捭阖的种种手段，对认识今日的霸权主义有一定意义，所以我们才重视它，研究它。

注释

〔1〕《史记·六国年表》
〔2〕《史记·魏世家》
〔3〕〔4〕《汉书·食货志》
〔5〕《晋书·刑法志》
〔6〕《史记·河渠书》
〔7〕〔9〕《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8〕《史记·赵世家》
〔10〕〔11〕《史记·商君列传》
〔12〕《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3〕《史记·韩世家》
〔14〕《史记·燕召公世家》
〔15〕战国商鞅语。
〔16〕《荀子·议兵篇》
〔17〕《史记·秦本纪》
〔18〕《史记·楚世家》

〔19〕《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0〕《史记·秦本纪》及《史记·魏世家》

〔21〕〔22〕《史记·魏世家》

〔23〕《史记·楚世家》

〔24〕《史记·魏世家》

〔25〕《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26〕《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27〕《资治通鉴·卷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28〕《史记·韩世家》

〔29〕《史记·魏世家》

〔30〕〔31〕《史记·赵世家》

〔32〕〔33〕《史记·魏世家》

〔34〕《史记·魏世家》

〔35〕徐中舒著《陈侯四器考释》

〔36〕《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五年》

〔37〕《史记·魏世家》

〔38〕〔39〕〔40〕《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41〕〔42〕《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43〕《史记·赵世家》

〔44〕《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45〕《战国策·宋策》

〔46〕《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47〕《战国纵横家书·二七·麛皮对邯郸君章》。"麛"读"迷"。

〔48〕《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49〕《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明：

桂陵之战的作战经过，本文采用《史记》和《战国策》而不采用《孙膑兵法·禽庞涓》的论述，后者疑点颇多，仅略举二端如下。第一，《禽庞涓》中所论述的地名位置大多数很紊乱。例如说平陵是"东阳战邑"，又说位于宋、卫两国和市丘之间。据《方舆纪要》卷四十九"南阳城"的注文："马季长（即东汉马融）曰："晋地是朝歌（今河南淇县）以北至中山（今河北石家庄地区）为东阳。"则东阳不在宋、卫两国之间。其次，平陵在今山东济南之东，自春秋至战国，始终是齐的腹地而非"东阳战邑"，齐攻平陵岂不是自己打自己。所谓"当途有市丘"，据《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韩魏图，市丘远在今郑州之西，是韩国的领土。齐攻魏而不攻韩，又何能称市丘为"当途"。仅以平陵与东阳的地理位置而言，便不可能构成《禽庞涓》中所说的战争行动。第二，从《禽庞涓》中所记述的作战行动来看，不能不令人发生疑问。孙膑明明知道一进入平陵就要遭受"粮道绝"的厄运，却偏偏要"徙舍而走平陵"，而且不是以齐军之一部而是将全军八万人投入"粮道绝"的绝境。断粮自古是兵家大忌，《孙子·军争第七》中曾谆谆告诫："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作为孙子的后代而又是大兵法家的孙膑对如此极为重要的军事原则应当是熟知的，岂能将全军投入绝境？庞涓也是一时的名将，如果那样的话，恐怕就不是由孙膑来写《禽庞涓》，而是由庞涓来写《庞涓兵法·禽孙膑》了。其他许多疑点就不用赘述了。

〔50〕《战国策·楚策一》

〔51〕《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52〕〔53〕《战国策·齐策五》

〔54〕原文见《战国策·韩策一》。

〔55〕〔56〕见《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二十八年》。

〔57〕《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58〕《战国策》的“魏策一”、“魏策二”及《资治通鉴·卷二·周显王三十五年》

〔59〕《史记·魏世家》

〔60〕《战国策·韩策二》

〔61〕《史记·楚世家》

〔62〕《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63〕《史记·张仪列传》

〔64〕《史记·商君列传》

〔65〕《韩非子·五蠹篇》

〔66〕〔67〕《史记·张仪列传》

〔68〕《战国策·中山策》

〔69〕《史记·张仪列传》

〔70〕《史记·秦本纪》

〔71〕《战国策·秦策二》

〔72〕〔73〕《史记·张仪列传》

〔74〕《史记·楚世家》

〔75〕《战国策·秦策二》

〔76〕《史记·楚世家》

〔77〕《史记·张仪列传》、《史记·楚世家》

〔78〕越国的疆域，东边靠海，自今山东琅琊台起，沿海而南，有今苏北运河以东和全部苏南地区、安徽皖南、江苏东边的部分地区和浙江的北半部。

〔79〕楚灭越之年，采《战国史》杨宽之说。

〔80〕《资治通鉴·卷三·赧王十一年至十五年》

〔81〕《战国策·韩策二》、《史记·韩世家》和《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王（魏襄王）十九年：“楚人雍氏，楚人败。”及《史记·六国年表》楚怀王二十九年：“秦取我襄城，杀景缺”。

〔82〕《史记·楚世家》

〔83〕《史记·秦本纪》、《史记·楚世家》、《韩非子·初见秦》

〔84〕《史记·秦本纪》及《史记·楚世家》。古今史家多认为楚收复了秦黔中郡的“江旁十五邑”是欠妥的。白起已占领郢、邓、鄢及郢以南之江南地，楚的东地兵不可能突破上述地区而收复秦黔中郡所属归巫郡南部之“江南”地区。此“江旁十五邑”应在白起所攻取的“江南”地区之内，但史无明文，其位置不能确指。

〔85〕《史记·楚世家》

〔86〕《战国纵横家书·八》

〔87〕《战国策·赵策四》

〔88〕《史记·六国年表》

〔89〕《史记·燕世家》

〔90〕《战国策·燕策一》"苏代谓燕王"之苏代，据考证应作苏秦。

〔91〕《战国策·赵策一》

〔92〕《战国策·齐策四》

〔93〕《战国纵横家书·四》："齐赵遇于阿，王（燕昭王）忧之。臣与于遇（录与），约攻秦去帝"。

〔94〕《战国纵横家书·二一》："齐乃西师以禁强秦。使秦废令（称帝之令），素服而听，返温、轵、高平于魏，返王公、符逾于赵。"

〔95〕《史记·六国年表》

〔96〕《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97〕《史记·乐毅列传》

〔98〕《战国策·东周策》："薛公（田文）故主，轻忘其薛（田文的封地），不顾其先君之丘墓。"又《战国策·秦策三》："薛公为魏谓魏冉曰：'……君不如劝秦王，令敝邑卒攻齐之事。齐破，文请以所得封君。"

〔99〕〔100〕《资治通鉴·卷四·赧王三十一年》

〔101〕〔102〕《资治通鉴·卷四·赧王三十六年》

〔103〕〔104〕《史记·田单列传》

〔105〕《司马法·仁本第一》

〔106〕古文《尚书·武成》

〔10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108〕《资治通鉴·卷四·周赧王三十九年至四十二年》

〔109〕黄歇上秦始皇书，见《史记·春申君列传》。

〔110〕客卿：战国时，用其他诸侯国的人任卿职时称客卿。

〔111〕《史记·秦本纪》

〔112〕〔114〕《史记·范雎列传》

〔113〕《战国策·秦策三》

〔115〕《资治通鉴·卷五·周赧王五十三年》

〔116〕改穿北方少数民族胡人的服装，便于骑射。

〔117〕《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附《赵奢传》

〔118〕《史记·赵世家》

〔119〕《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说四》。其中"驰上党在一而已"的"驰"，古通"驶"。此处有急速进军之意，应解为"进攻上党在此一举而已"。有的注家将"驰"解作"松弛"、"缓解"，便成了"放弃上党"，与上下文意皆不合。

〔120〕垒：垒就是壁，有时合称壁垒，是古代用土、木、石等坚固材料垒筑而成的方形坚固工事，四周是很高很厚的壁墙，四面开有壁门——军门。四周掘有象护城河一样的深沟，叫做"堑"。壁内还筑有曲折的石土墙用以抵抗敌人的进攻。壁垒很大，一座可容"一校"，约八百到一千人。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临时性的小城堡。（见黄坚叔著《中国军制史》上）

〔121〕《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122〕《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123〕〔124〕〔125〕《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26〕《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述的"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不全是赵的正规军。据《秦会要订补·兵上》所载：秦用商鞅变法，制定二十等爵，按作战中所斩获的首级多少讨功受爵。每当战胜，老弱妇人多被杀死，计首功多至万数，被称为"上首功"之国。又据白起坑赵卒的原因是"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可见被杀者包括了由冯亭手下转到赵军中的韩军和由上党逃到长平后临时编入赵军、或为赵军服杂役的上党人民，以及被乱杀的老弱妇孺在内。

〔127〕《史记》根据秦历记叙战国史事。秦以十月为岁首，秦军于九月歼灭赵军，此十月即歼赵军之次月。

〔128〕周代称最高执政大臣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战国职官无三公之称，此处是借指最高官爵。

〔129〕《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30〕《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131〕〔133〕见《战国策·中山策》白起对秦昭王语。

〔132〕国虚民饥：《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说二》有秦国发生饥荒，范睢曾请求秦王开放五苑，用其中的果实蔬菜拯救饥民的记载。"苑"是面积广大，种植花木果蔬，养有禽兽，供帝王游乐、打猎的场所。

〔134〕《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35〕〔136〕《战国策·中山策》

〔137〕《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王建立六年，秦攻赵，齐楚救之。……赵无食，请粟于齐，齐不听。"下文又说："秦破赵于长平四十余万，遂围邯郸。"《史记》将此事列为长平之战的有关事件是欠妥的。按王建六年即周赧王五十六年，此年九月，秦军王陵攻赵至邯郸，应是与邯郸之战有关的内容。而长平之战赵军被歼则是上一年周赧王五十五年九月之事，这是时间上的紊乱，而且长平之战，赵国不搞合纵，各国皆不救赵。只有邯郸之战，赵与齐、楚、魏有合纵之约，才会有齐、楚救赵之事。

〔138〕《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139〕《史记·魏公子列传》

〔140〕《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

〔141〕虎符：形如伏虎，是国君指挥军队行动的信物。战国时的虎符用青铜制成，符分两半，一半交带兵的将领收存，一半留国君处。传达国君命令的使者，必须带有国君留存的半个虎符并能与将领执存的半个相对合，命令才能生效。

〔142〕《史记·魏公子列传》

〔14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论持久战》之（八一）

〔14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

〔145〕《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146〕《孙子兵法·火攻篇》

〔147〕《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48〕《战国策·秦策四》："秦王曰：'山东之建国可得兼（并）欤？'顿子曰：'韩，天下之咽喉；魏，天下之胸腹。王资臣万金而游，听之韩、魏，入其社稷之臣于秦，即韩、魏（听）从；韩、魏从而天下可图也。'……顿子曰：'天下未尝无事也，非纵即横也。横成则秦帝，纵

成则楚王。秦帝，即以天下恭养；楚王，即王虽有万金，弗得私（有）也。'秦王曰：'善'。乃资万金，使东游韩、魏，入其将相（使其将相顺秦意旨）；北游于燕、赵，而杀李牧（赵将）；齐王入朝（于秦），四国（燕、赵、韩、魏）毕从。顿子之说也。"

〔149〕《史记·李斯列传》：李斯说秦始皇："'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扫除（扫除灶上不洁之物，言其极易），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为长史，听其计，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

〔150〕《史记·秦始皇本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臣但恐诸侯合纵……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

〔151〕《战国策·秦策五》："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王召群臣宾客六十人而问焉。……（姚）贾对曰：'贾愿出使四国，必绝其谋而安其兵。'乃资车百乘，金千斤，……姚贾辞行，绝其（合纵之）谋，止其兵，与之为交以报秦。"

〔152〕《史记·周本纪》

〔153〕《韩非子·有度篇》："魏安厘王攻燕（前272年）、救赵（邯郸之战），取地河东；攻尽陶（定陶）卫"。

〔154〕《史记·秦本纪》

〔155〕《史记·六国年表》

〔156〕《史记·秦本纪》

〔157〕《史记·燕召公世家》

〔158〕《史记·秦本纪》

〔159〕《史记·赵世家》

〔160〕《史记·秦本纪》。按：《赵世家》将秦攻赵取榆次等三十七城系于赵孝成王十八年（前248年）是欠妥的。应据《秦本纪》定为庄襄王三年（前247年）。

〔161〕《史记·魏公子列传》

〔162〕《史记·李斯列传》

〔163〕见《史记·春申君列传》。按：此次合纵，《史记》有三种不同的记载。《赵世家》是"庞煖将赵、魏、楚、燕之锐师，攻秦蕞（今陕西临潼北），不拔，移攻齐，取饶安（今河北庆云西北）。"当时六国俱弱，不可能攻入秦腹心重地的蕞；在退兵后更不可能拖着四国联军奔波数千里，跑到河北去打齐国的饶安。赵于此年攻占齐的饶安，当是攻秦失败后赵军的单独行动。《秦始皇本纪》是"六年，韩、魏、赵、卫、楚共击秦，取寿陵。"《史记·正义》说：寿陵在常山，是赵地。此时秦虽占有太原，但还没有东进攻常山地区的行动，寿陵亦非秦地。故本文从《春申君列传》。其次，《秦始皇本纪》所载的五国是"韩、魏、赵、卫、楚"，但卫国早于前254年为魏国所灭，"卫"显系"燕"之误。

〔164〕《韩非子·存韩》篇中所附李斯复秦王语："秦与赵为难，荆苏使齐，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若不绝，是悉秦而应二万乘也（用秦的全部力量对付齐、赵两个万乘之国）。"

〔165〕《战国策·齐策一》。是当时的策士假借张仪之名对此次战争的评语。

〔166〕《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附《李牧传》

〔167〕见《韩非子·存韩》及篇末所附李斯复秦王书。

〔168〕羌瘣：是战国时居于上地（今陕绥德附近一带）的少数民族羌族的首领。

〔169〕《战国策·赵策四》

〔170〕《史记·刺客列传·荆轲传》

〔171〕《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及《资治通鉴·秦始皇二十二年》记此事皆作蒙恬。按蒙恬为蒙武之子，蒙骜之孙，此时尚幼，不大可能成为重要将领，故本文从《秦始皇本纪》作蒙武。

〔172〕《史记·秦始皇本纪》及《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173〕〔174〕〔175〕〔177〕《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76〕《史记·秦始皇本纪》

〔178〕《史记·秦始皇本纪》

〔179〕〔180〕李斯《谏逐客书》

〔181〕贾谊《过秦论》

〔182〕《荀子·议兵篇》

〔183〕《战国策·魏策四》

〔184〕《韩非子·初见秦》

〔185〕〔186〕《史记·苏秦列传》

〔187〕贾谊《过秦论》

〔188〕《战国策·西周策》

〔189〕见《战国策·中山策》白起自述战胜韩、魏的原因。

〔190〕《战国策·秦策一》

〔191〕〔192〕《史记·张仪列传》

〔193〕《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194〕〔195〕《史记·张仪列传》

先秦时期战略运用的特点和发展

先秦是我国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三种社会形态依次递嬗的时期，在我国军事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军事角度看，它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一、远古时期，由部落成员使用生产工具进行的、争取生存或血缘复仇的原始战争阶段。二、夏、商、西周时期，由奴隶主贵族为骨干的兵、民一体制军队，使用石、铜兵器进行的掠夺性征服战争阶段。三、春秋、战国时期，由平民、农民为主体组成的、已具有车、步、骑、水四个兵种的军队，使用铜、铁兵器进行的争霸兼并战争阶段。最后发展为秦国的统一战争。战争本身在当时曾给社会经济和人民带来破坏及灾难，但在客观上又对社会的发展、民族的形成、国家的统一，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军队武器装备的改进，组织编制的改善，士兵成分的改变，以及对征服地区资源的利用，战争也相应地向前发展。战争样式逐渐增多，战争规模逐渐扩大，战争持续时间逐渐延长。因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法——战略，也不断地丰富和提高，并进而上升为理论。

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就已产生了战略。但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不高，在井田制基础上，靠集体协作进行生产，每人的剩余劳动产品很少，不能养活过多的脱产军队和官吏，所以这个时期的军事特点是：军队数量不多，没有专职的指挥将领；装备不足，除甲士有铜兵器外，许多徒（步）兵仍使用木、石兵器；作战方式基本上是以密集队形进行集团肉搏；以简单的音响、目视信号在战场上直接指挥作战；靠残酷的纪律维持军队战斗力；作战双方均以进攻手段进行交战；在战场上只能直线运动、正面进攻，军队的机动性极差；战争规模小，战斗时间短，双方接战后，某方队形一被冲垮、失去指挥，胜负便见分晓，战争与战斗不分；战争受迷信的影响极大，甚至由占卜、观察星象等来决定战争行动。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战略，当然还很幼稚。但尽管如此，从当时战争的实践来看，毕竟已

是有了战略。

例如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商汤已初步认识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懂得了人心向背影响战争的胜负，从而根据敌我双方的政治实际、决定了自己的战争指导。主要内容有三点：一、针对夏桀暴虐荒淫、遭到一些贵族、平民和奴隶们不满的情况，注意“修德”，争取国内民众的拥护和各诸侯小国的同情和支持，以壮大自己。二、“用间”。派伊尹到夏王朝去执行了解敌情和从中破坏其内部团结、离间各诸侯方国与夏的关系，以孤立夏桀。三、选择发动灭商战争的有利时机。一再试探，直至有緡氏叛夏而“九夷之师不起”、人心尽丧之时才起兵灭夏。仅从以上三点来说，作为战略，还很不全面，只包括战争准备阶段。但毕竟属于战略范畴。这个时期是战略萌芽阶段。

经过商代四百年的战争实践，到西周时，战略已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如周灭商的牧野之战，姬昌、姬发、吕望等除和商汤一样，针对商纣王腐朽暴虐的情况，采用“修德”等措施取得各级奴隶主的拥护，积极增强实力作灭商准备外，还采取了一些比商汤更高的战略措施。主要内容有四点：一、使用隐真示假手段，制造假象。故意表示臣服，献出洛水以西土地，并“率殷之叛国以事纣”，麻痹纣王的警惕，使其放心大胆地将军队使用于东方。这样既损耗了商的实力，又为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和机会。二、开展政治攻势，广泛争取人心。当时阶级矛盾尖锐，奴隶逃亡很多，周即颁布“有亡荒阅”的法令，规定任何人不得收留逃亡奴隶，必须将其归还原奴隶主，以取得各国奴隶主的拥护；针对纣王以酷刑镇压奴隶、为奴隶痛恨的情况，“请纣去炮烙之刑”，并大肆宣传自己的这一主张，使奴隶们也感觉周王比纣王好些，愿意拥护周朝，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较牢固的基础。三、利用心理因素，鼓舞士气，瓦解敌军。临战前，周武王发布公告和举行誓师，揭露纣王的暴行罪恶，宣布自己是“行天罚”，利用民众的感情和迷信，实行“夺人之心”的攻心战，既鼓舞了己方的士气，又起到瓦解敌军的作用，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四、运用突袭战法，夺取决战胜利。周军将具有较大机动性和冲击力的战车，集中至三百辆之

多，向商军方阵实施迅猛、突然的冲击，商军临时以奴隶组成，既缺乏对付集团战车突破的可靠手段，又上下均无斗志，“前徒倒戈”，于是一场决定两个王朝命运的大战，一个早晨即告结束。这种战法，在当时尚系创举。

偏处一隅、实力较弱的周朝，能够战胜地广人众、实力强大的商朝，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战略运用的得当。这个时期的战略，已包括了战争准备、计划及实施各阶段。但内容仍较简单，尚处于战略的早期阶段。

春秋、战国，是社会大动乱、大变革的时期。由于铁的发现，牛耕的使用及推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田制、赋税、剥削方式、生产方式与社会的阶级结构等，都在逐渐改变，由奴隶社会发展到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军事领域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飞跃的发展。当时的主要特点是：兵器数量增多，质量提高，杀伤破坏力增大，出现了攻城兵器如飞石机、冲车、云梯等，远射程的弩也普遍装备于军队；各国先后都实行了郡县征兵制，兵源大为增加；军队由单一兵种发展到步、车、骑兵及水军四个兵种；军队的训练加强，出现了弩兵、“超足”、“习流”等专业性队伍；文武分家，军队有了专职的将领及指挥系统；战斗队形由一兵种、一单元的密集方阵，发展为多兵种、多单元的疏散配置（相对而言）方阵，并有了“阵法”，根据不同的敌情及地形可以变换不同的队形；军队的机动性大为增加，不但有战略机动，也有了战术机动；迂回、包围、伏击、奇袭及江河战斗、城垒攻防、野战防御等已成为战争中常用的方法和方式；战争规模扩大，不但参战兵员多、杀伤损耗大，而且战场幅员广，持续时间长。更由于这个时期的战争特别频繁，它关系着各国的生死存亡，所以战争成了各国统治阶级的头等大事。上自国君，下至士人，不论兵家、法家、儒家、墨家、道家，无不研究战争与指导战争的方法，于是逐渐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外交的关系，以及时间、空间、地理等自然条件对战争的影响等，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各国的战略，基本上都是根据当时各国和本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实际制定出来的。较之商周时期，

有了很大的提高。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

一、懂得了军事力量对国家经济的依赖性，将战略建立在富国强兵的基础上。如齐桓公的争霸战略方针，就是富国强兵、争取与国，计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外。这一方针的实质，就是改进剥削手段，缓和阶级矛盾，以提高被统治阶级的生产积极性，发展经济。有了发达的经济，武器装备可以增加、改进，兵源可以增多，士气也相对提高，军事力量自然强大，获得胜利的公算就大得多。晋文公的改制扩军及战国时各国的竞相变法改革，其战略目的亦莫不与此相同。

二、充分运用政治、外交手段，以至利用矛盾、制造矛盾以壮大自己实力，孤立主要敌人。如齐桓公、晋文公利用周天子这个共主、大宗在诸侯心目中的影响，和中小国家恐惧戎狄攻扰等因素，高举"尊王攘夷"大旗，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就争取了大批小国的拥护，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晋文公城濮之战制造秦、齐与楚的矛盾，造成秦、齐与晋联合敌楚的局势，以及后来晋联吴以制楚，楚联越以制吴，秦联楚以制晋等，都是争取与国、使敌陷于两面作战不利境地的战略运用的例子。至战国时期，这一特点就更为突出。当时七雄并立，相互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国无宁日，岁无宁日"，为了统一或为了不为别人统去，各国都致力于争取同盟、孤立对手。频繁的"连横"、"合纵"活动，就是最有力的说明。而且由于当时战争形势变化极快，各国从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所制定的战略，也就不断变化，"邦无定交，国无定土"，外交与战争的结合也就益加紧密，比春秋时又进了一步。

三、随着迷信对战争影响的减弱，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逐渐为人们认识。重视军队建设与训练，特别重视对战争指挥人员的选用，也是这一时期战略的特点之一。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各国都注意选择才能之士担任统帅或谋士。齐桓公、晋文公时，就已一反惯例，不用无能的宗室贵族掌权，而任用出身低微阶层的"士"充任卿相，指挥军、政。至战国时，更进而争取、延揽别国的知识分子来为自己服务。如吴起、孙膑、乐毅、白起、尉缭、商鞅……等，都为完

成其召聘国的战略任务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巧妙地争取战略主动权。作战时将主力使用于敌人最关痛痒的方向，"攻其所必救"以调动敌人，使敌被动挨打，是战略运用上的重要原则之一。城濮之战当宋向晋告急时，晋不直接援宋攻楚，而将战略进攻方向指向楚的属国曹、卫，图调动楚军，楚军继续攻宋不受调动，晋又"退避三舍"诱敌深入然后决战。马陵之战当赵向齐求救时，齐不直接救赵，而直趋大梁攻其所必救，更进而诱敌入伏而加以歼灭。这些战略运用都是比较成功的。

五、正确选择作战时机。战机掌握的是否得当，对战争胜败影响极大。马陵之战赵向齐求救时，齐不立即救赵，只南攻襄陵以坚定赵国抗魏的决心，必俟邯郸为魏攻陷，魏、赵两国军事实力都有相当削弱之后，才出兵攻魏，这不仅保证了对魏作战的胜利，也使魏、赵两败俱伤，对尔后进一步控制和兼并两国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晋、楚邲之战楚的先发制人和齐、鲁长勺之战鲁的后发制人，都是掌握战机的较好战例。宋、楚泓之战，宋襄公坚持不肯乘楚半渡而击，死抱住"不鼓不成列"等商、周时期的过时原则不放，自动放弃有利战机，将主动权送给敌人，战败当然也就不可避免了。

六、重视军队后勤供应。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春秋以来，各国都非常重视后勤——特别是粮食的供应。战国时，还进一步知道如何在战略上运用这一条件来争取胜利。如长平之战，赵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秦军断绝了赵的后勤通道，致赵军四十六日无粮食供应，饥饿到人互相食，不得不拚命突围。结果离开了既设营垒阵地，主将战死，全军覆没。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战略，也同当时的哲学、文化等上层建筑一样，处于大发展、大繁荣的阶段，是我国古代战略趋于成熟的阶段。

先秦时期，不仅在战争实践中产生了战略，并在运用上日益巧妙灵活，而且随着战争经验总结的积累，还产生了许多在世界军事史上处于领先地位、系统地阐述战争理论的专著。如西周时期的《军志》[1]，

春秋时期的《孙子兵法》，战国时期的《孙膑兵法》、《尉缭子》、《司马法》等。冷兵器时代指导一般战争的主要战略原则[2]，在这些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诸如战争的准备、实施，敌情研究，军队训练，统帅作用，司令部组成，预备队建立……等，都有论及。有些作战原则，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避实击虚"……等，不仅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适用，在现代战争中也仍有其一定的生命力。

注　释

〔1〕《军志》已佚，但尚保留少量内容于先秦古籍中。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等；昭公二十一年有"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等。《孙子兵法》中也有引文。

〔2〕先秦时期并无"战略"这一概念，但有"谋略"、"权"等概念。就内涵而言，两者近似并部分相通。古代所说的谋略（军事谋略），一般说包含在战略之中，正如列宁所说，没有无谋略的战略，但战略所包含的某些内容，则谋略或权并不具有。

从先秦兵家著作看，全为综合性军事理论，还没有对军事学术进行科学的分类。战略、战术不分，更没有战役法。很多兵书上所说的作战原则，既是战略原则，也是战术原则。

第二篇　秦汉三国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第五章　陈胜吴广起义和刘邦项羽灭秦

第一　秦末暴政导致农民起义

秦始皇兼并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国家，把我国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他对祖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不愧为一个杰出的历史人物。但是，与此同时，他在其施政上却又做了许多民不堪命的事，他为了巩固统一，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集中大量军队戍边并修筑万里长城及驰道，又派出庞大军队经营岭南。所有这些措施，虽有着历史意义，但却给当时人民带来极其沉重的负担。特别严重的是他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生活和宣扬他的功德和威武，筑阿房宫，修骊山墓，不断的出游、出巡，所费财物，无法统计。劳动人民承担着繁重的兵役、徭役，“丁男被甲，丁女转输”[1]，许多人在服役中被折磨致死。秦朝的赋税也很繁重，“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2]。在残酷的压榨下，人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3]。秦朝为了防止人民的逃税、逃役和反抗，又制定了严刑苛法，“诽谤者族（灭族），偶语者弃市（处死刑）”[4]，赴役误期者斩首。一人犯罪，罚及三族。一户犯禁，邻里连坐等等。因而造成“赭衣（罪人穿的红色衣服，赭衣表示罪人）塞路，囹圄成市”[5]的惨状。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年）七月，秦始皇在出巡途中病死于沙丘（今河北广宗县西北）。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矫诏立少子嬴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非常昏庸，而且比秦始皇更加残暴，对广大人民继续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徭役、兵役十分繁重，“力役三十倍于古”[6]，不但壮年男子被征调，就是妇女也要服劳役，而且时间很长。这样，就使得大量的劳动力长期脱离生产，造成农业生产的萎缩和破坏，加速了人民的贫困化。秦二世的残暴统治，弄得民不聊生，危机四伏，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终于爆发了以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大起义。

第二　陈胜、吴广起义军的兴起

一、大泽乡起义的谋议和策略（参看插图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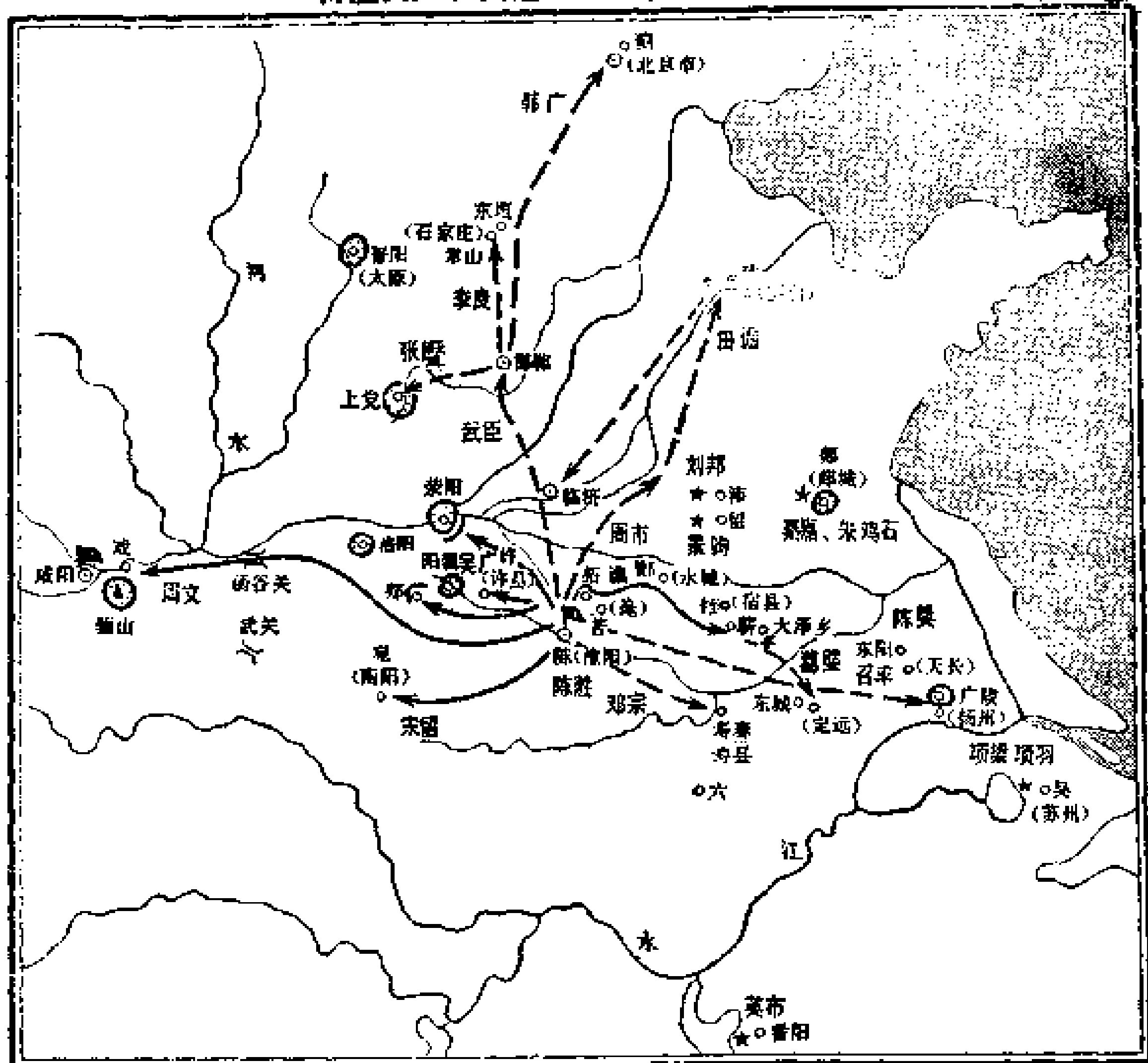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七月（秦历法以十月为岁首），秦廷征发一批贫民去渔阳（今河北密云）戍边。阳城（今河南登封）雇农陈胜和阳夏（今河南太康）贫农吴广都在被征之列，并担任了屯长。

这一批被征农民行至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西寺坡），遇上连日大雨，不能前进，无法如期到达渔阳。按秦的法律，误期是要处死的。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情况下，陈胜和吴广暗地商量：“今亡（逃亡）亦死，举大计（起义）亦死，等死（同样是死），死国可乎（不如拚着一死，干一番大的事业）”[7]。陈胜又说：

> “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不应当继承始皇帝位），当立者乃公子扶苏（始皇帝的长子）。扶苏以数谏故（缘故），上使外将兵（始皇派他在外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还不知他已经死去）。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倡导起义），宜多应者（定会得到很多人响应）。”[8]

吴广听了表示赞同，于是决定鼓动戍卒起义，历史上有名的大泽乡起义就从而爆发了。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进攻战略示意图 （5—1图）



陈胜、吴广明确提出“伐无道，诛暴秦”〔9〕的政治目标以为号召。由于秦的暴政，广大人民无以为生，反秦是深得人心的。故在起义后不久，各地农民纷纷响应。“诸郡县苦秦法，争杀长吏以应涉”，其他“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10〕，革命烈火很快就燃遍了全国广大地区。

他们又采取了一些策略来发动群众、鼓励士气、造制舆论，如借扶苏、项燕之名起兵，以争取同情；利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11〕等迷信办法以号召百姓，杀死押送戍卒的秦将尉，以示决心。陈胜、吴广并鼓动大家说：

"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弟令毋斩（假使不被杀），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12]

以此激励士气，得到参与起义的农民坚决拥护。

陈胜自立为将军，以吴广为都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13]向秦封建统治政权展开了进攻。义军首先攻占了大泽乡，继克蕲县（今安徽宿县南蕲县集）。为了扩大战果，兵分两路，乘胜进军：一支由符离（今安徽宿县符离集）人葛婴率领，攻打蕲县以东地方；另一支是起义军主力，由陈胜率领，向西推进。义军很快攻占了铚（安徽宿县西南）、酇（读挫，今河南永城西南）、苦（河南鹿邑东）、柘（今河南柘城北）、谯（今安徽亳县）等地。同时，并攻占曾为楚都的重镇陈县（今河南淮阳）。起义队伍很快壮大起来，成为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千人、步兵数万人的浩荡大军。由于起义形势的迅猛发展，犹如潮水，卷进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其中六国旧贵族原士大夫已隐姓埋名、窥测时机以"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14]的人，如张耳、陈余、田儋，也乘机而起，加入了陈、吴领导的起义军，使反秦阵线内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

二、在陈县的战略决策和战役布势

建立张楚政权：陈、吴农民起义军占领陈县后，陈胜召集各乡掌管教化的"三老"和地方上有势力的"豪杰"会商大计。多数人认为陈胜领导农民起义反秦，一举恢复旧楚地，论功应该称王，建立政权。但张耳、陈余认为：

"今始至陈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将军毋王（不要称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国后（后代），自为树党，为秦益敌也。敌多则力分，与众则兵强。如此，野无交兵，县无守城，诛暴秦，据咸阳，以令诸侯。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则帝业成矣！今独王陈，恐天下解也。"[15]

陈胜拒绝了张耳、陈余的"不称王"、"立六国后"的建议，决心建立政权，乃自立为王，号"张楚"（张大楚国的意思）。这一决策是

正确的。因为攻占陈县后，起义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为了适应反秦形势的发展及时建立政权，不但显示了农民抗秦的坚决意志，而且树立了众望所归的起义领导中心，扩大起义军的政治影响，更有利于组织力量，统一行动，继续与秦进行斗争。事实证明，陈县政权建立，义旗高举，“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16]（赢粮是携带粮食，景从是跟随的意思），“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17]各地人民争杀秦官吏，纷纷响应，参加起义军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旧六国贵族、官吏、游士，如魏咎、周市、蔡赐、周文、朱房、胡武等，也有孔鲋为首的一些儒生，说明建立政权起到了伟大的号召作用。以张耳、陈余为代表的旧贵族分子，反对在陈县建立政权，显然是错误的。他们建议立六国后代，表面上说是“为秦益敌”，实质上是企图利用起义军的力量，实现他们恢复旧国的政治打算。如后来陈胜派遣武臣为将军，北徇赵地。张耳、陈余竟唆使武臣闹分裂，自立为赵王，拒绝接受陈胜“发兵西入关”的号令，“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18]，独自去扩张势力。陈胜如果明令立六国后代，把六国贵族残余分子的地位合法化，必然会导致他们据地自雄，各自为谋，保持其既得利益，不会听从提调，共同击秦。如六国并立进而恢复到各国争雄，将把历史拉向倒退。所谓“为秦益敌”，实则是分散反秦力量而已。张耳、陈余立六国后代的建议，是不可取的。

击秦的战役布势：起义军的战略企图是：主力西进，乘虚入关，占据咸阳，号令天下；分兵略地，消灭关东秦军，发展壮大自己。根据这一企图，其战役布势概要如下：（参看插图5-1）

主力西攻咸阳：以吴广为假王（代理陈王之意），指挥诸将西攻荥阳，夺取关中门户，准备入关[19]，后因荥阳未能迅速攻下，又派周文为将军，率军绕过荥阳、洛阳，直捣关中；并派宋留率兵攻南阳，奔武关，由南面迂回咸阳。

分兵攻取郡县：以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率兵三千攻取赵地（今山西大部、河北西部）；派汝阴（今安徽阜阳）人邓宗攻取九江郡（郡治今安徽寿县，苏北、安徽大部和江

西一部地区）；派魏人周市攻取魏地（今河南东北部）；派广陵人召平攻取广陵（今江苏扬州）。

从以上的布势可以看出，陈胜以主力西攻咸阳，把矛头指向敌人统治的心脏，打击目标非常明确。张楚政权建立后，声威所至，关中震动。但秦二世不愿听起义军消息，反自欺欺人地认为"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追捕，今尽得，不足忧也"[20]的谎报是真实的。陈胜乘势想西击秦，一举攻占咸阳这个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因直接摧毁秦政治中心，对灭秦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而这时秦军主力远在边疆，扼守长城和五岭一带；新征集的警卫咸阳的部队共只有五万人；各郡县的武装则慑于起义军的声威，各自为守，关中空虚；统治集团矛盾，二世昏庸无备，提供可以顺利进军的条件；特别全国人民反暴秦的士气高涨，直捣秦王朝腹心，是可以得到人民大力支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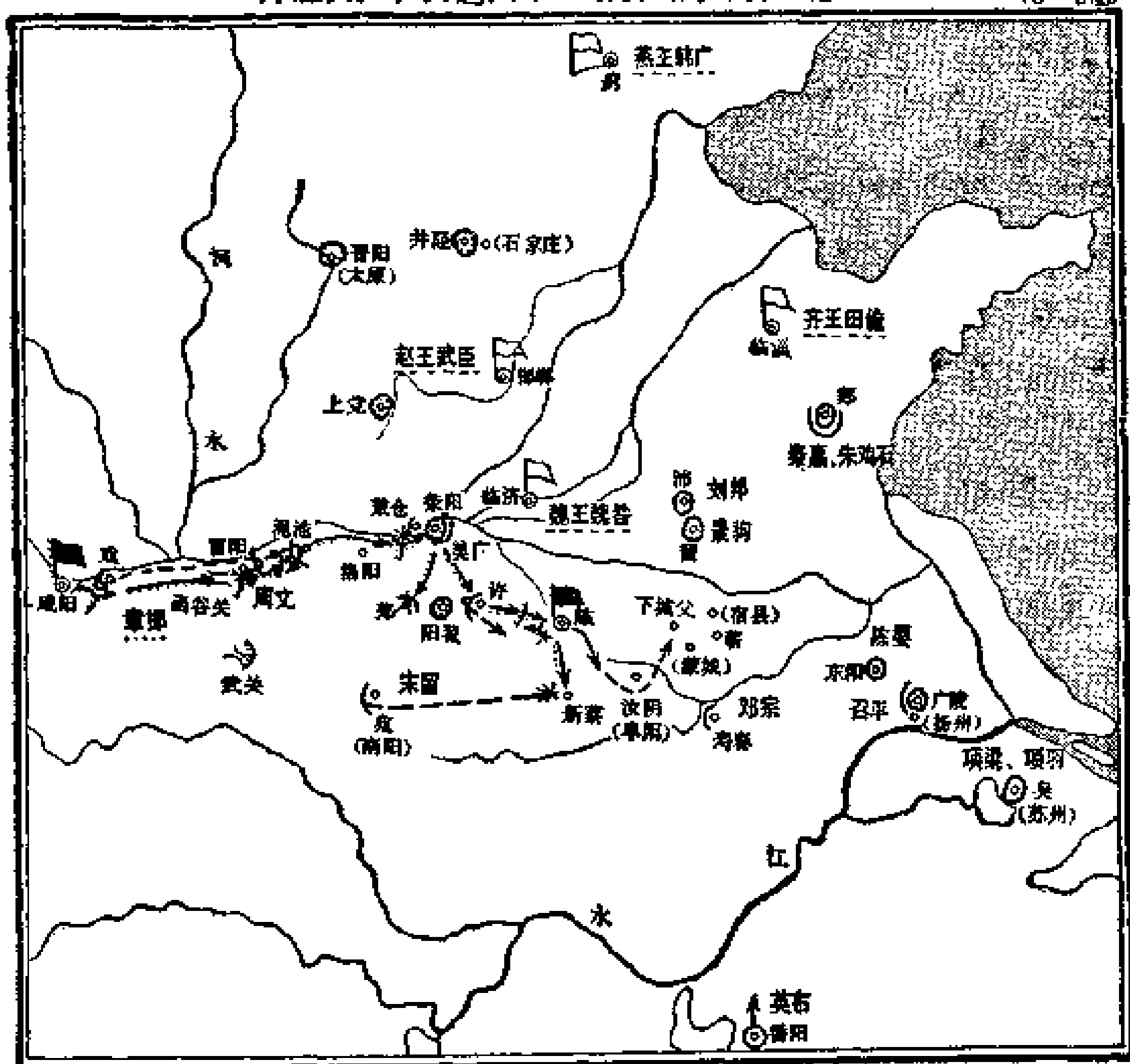
分兵攻取郡县，亦显示了起义军领袖们的指挥才能，部署上有主有次。主力军直捣秦之腹心，南、北两路军既与主力军形成策应之势，又可攻城略地，不断发展起义军实力，既有一举摧毁秦王朝统治的可能，又有利于瓦解秦王朝在东方的统治体系。

第三　陈胜、吴广起义军的挫败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兴起后，能于短时期内发展壮大，动摇秦王朝的黑暗统治，是由于他们的反秦政治目标明确，符合广大农民反秦暴政的迫切要求。在策略运用上也显示灵活，发动了一些反秦力量，壮大了声势。在军事战略上，西击秦的方针，符合当时形势。在战役布势上，体现了攻其腹心和分兵略地相结合的形势，因而使起义军形成过一时的战略优势和主动。但起义终于遭致挫败。分析研究其挫败原因，在于政治、军事经验不足，战略运用和行动亦有不少的错误和失当。现综合论述如次：（参看插图5-2）

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挫败及当时形势示意图

（5—2图）



一、西征军没有一个长远的战略

（一）吴广顿兵坚城是战略失误。西击秦的吴广军原为主力，被阻于荥阳，长期顿兵坚城，无所作为，这正合秦军所望，也是起义军战略上严重的失误。陈胜及时改命周文向关中挺进，弥补了这一错误。但当周文军发展顺利以及周文军挫败时，而吴广军仍顿兵荥阳，不予支援，错误就更深了。如果这时他能采取较积极的行动，起义军顺利进军咸阳尚有可能，至少可保存一定实力与秦军继续周旋。吴广始终顿兵在已失去战略价值的荥阳城下，使起义军整个战略形势被

动，是起义军遭到挫败的重要原因之一。这说明主力军战略运用的得失，关系到整个战争的胜败。

（二）周文军停军于戏，使功败垂成。周文军不顾险阻，远离根据地，行动勇敢、果决，直插敌人心腹，是值得称道的。但越过函谷关后，忽然停军于戏（今陕西临潼东），这一战略行动，失去战机，是起义军由胜转败的关键。根据史料记载，没有说明周文停军于戏的明确原因，但加以分析，不外是因长期作战想略作休整后，再继续进军；或者是因迫近秦都，怕秦防守坚固，等待援军再并力前进。无论哪一种原因，都是战略上最大失策，使功败垂成，令人惋惜。1.周文军当时兵力已远远超过秦军若干倍，乘势而进，更收骊山刑徒，兵力就绝对优势，攻破咸阳，完全有可能。2.函谷关为关东唯一险阻，秦军尚不能守且无兵力增援，就足以说明关中确实空虚。继续挺进，正可乘虚蹈隙。反之，会给秦军以组成军队、进行反扑的机会，使自己由战略主动变成了被动。3.周文军虽是孤军深入，如一鼓作气，攻下咸阳或围攻咸阳，那时战略形势就会迥然不同，不仅便于号召全国反秦力量，有些势力会主动来增援，就有可能完成起义军一举灭秦的方针。及至秦组织反扑，怀有割据之心的赵、魏，观望不前，吴广仍顿兵荥阳，周文军孤军作战，前后失据，安得不一败再败。关键性的战略行动错误，导致战争全局的挫败。周文军停军于戏的教训是值得研究的。

（三）宋留军亦未完成迂回关中任务。宋留军于七月从陈县出发，曾经攻下南阳，但无发展。直到十二月，仍停滞在南阳附近，未能按照陈胜的企图进入武关，迂回咸阳。

二、只号召反秦而无一定的政治主张

陈胜在陈县建立政权后，只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而未提出一定的鲜明的政治主张和如何巩固政权的措施，这就难以号召和团结各地纷起响应的反秦力量，使他们有共同遵守的行动纲领去打击秦朝。因为“诛暴秦”只是革命的第一目标。打倒敌人后，下一步自己如何办，要有一套政治主张。陈县政权建立后，对如何巩固政权

地未采取适应形势的措施，这就难以发挥政权的力量来长期持久地支持各地反秦斗争。敌人一反扑，起义军就无后继力量去扑灭敌人的气焰，以巩固已取得的胜利。

三、没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

因为来势太猛，涌进来的人各怀二心，自立为王，没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驾驭不了这形势。武臣率三千人，于七月经白马津（今河南滑县东）北渡黄河后，攻下三十余城，队伍扩大到数万人。八月，进入邯郸，张耳、陈余怀恨陈胜未给予兵权，不能实现其割据的愿望，趁机怂恿武臣自立为王。武臣经不起诱惑，便自立为赵王。陈胜闻报大怒，欲杀武臣等家属。上柱国（最高武官）房君（蔡赐）说：

> "秦未亡而诛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贺之，使急引兵西击秦。"[21]

陈胜为了顾全大局，采纳了蔡赐的建议，派人去祝贺武臣，并催促他赶快发兵入关，协助周文。张耳、陈余又挑唆武臣说：

> "王（指武臣）王赵，非楚（指陈胜）意，特以计贺王。楚已灭秦，必加兵于赵。愿王毋西兵，北徇燕（今河北北部）、代（今山西北部），南收河内（黄河以北的豫北冀南地区）以自广（扩大势力）。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必不敢制赵；不胜秦，必重赵。"[22]

武臣遂不肯派兵入关，却派部将韩广略取燕地，派李良略取常山（郡治在今河北正定），派张黡攻上党（郡治在今山西长子），忙于自己的扩地割据，竟不配合起义军的灭秦作战。周市在攻占了魏地后，擅立旧贵族魏咎为魏王，实际上脱离了陈胜而独立。葛婴到了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立襄强为王。后闻陈胜称王，就杀襄强还报，表示悔过，陈胜却又杀了葛婴。这就大大地削弱了反秦力量。这些分裂活动，造成割据，就谈不上统一指挥与协调动作了。

四、没有把各地纷起的反秦势力联合起来

在陈胜、吴广起义的影响下，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如燎原烈火，

迅猛发展。在南方，英布和鄱阳（今江西鄱阳）县令吴芮起兵，有三千人；项梁、项羽叔侄杀会稽郡守殷通起兵于吴（今江苏吴县），得各县精兵八千人。在东方，刘邦起兵于沛（今江苏沛县东），有三千人；东阳（今安徽天长县西北）人民杀县令，立陈婴，发展到二万人。在北方，彭越起兵于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北）。各地起义军的蓬勃发展，形势非常有利。可惜陈胜这个起义领袖缺乏这方面的谋略，沒有把这些新起的反秦力量及时地联合和组织起来，形成反秦巨流，这是令人惋惜的。

五、陈胜个人缺乏领袖的才干

陈胜因起义初期的胜利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只看到秦统治集团的腐败，而沒有看到起义军的弱点，在军事方面竟不续作准备。博士孔鲋劝他说：

兵法上讲：不能把希望寄托于敌人不来进攻，应当有充分的准备，使敌人无法进攻。现不做好准备，将来一蹶不振，后悔就来不及了。[23]

陈胜却认为关于他军事上的事情，不用孔鲋操心。[24]陈胜在这一点上是欠考虑的。在战争中，对敌人估计不足是最危险的，它会招致战争的失败。不仅如此，在尔后周文退出关中时，陈胜对新的形势又沒有足够的认识。他不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重新研究，制定战略，主动地去指导战争的进行，而是坐守陈县，因而在指挥上就多失机宜，无所作为。加之他又以苛察为忠，听信旧官吏朱房、胡武的谗言，轻杀了一些有功的将领和部属，以致影响了內部团结。胜利时尚可勉强维持，一遇挫败，就上下离心，难于挽回危局了。

六、遭到章邯军反击穷追

秦二世听说周文军到戏，大惊，群臣震恐。秦将章邯献策说：

敌人已到，而且势力强大，如从附近各县征调兵力，已经来不及了。骊山做苦工的罪人很多，请赦免他们并发给武器，命他们去迎击敌人。[25]

二世遂下令赦免“刑徒”，利用他们和咸阳储存的兵器、物资，很

快地组织和装备了一支军队，由章邯指挥向起义军反扑。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一战，周文军大败，不得不向关外撤退。秦廷得到了喘息机会，一面抽调防守长城的部队增援，一面整训“刑徒”组成的部队，积极进行反击的准备。周文军退出关中，在曹阳（今河南灵宝东北）停留两个多月。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一月，章邯率军出关，开始反扑。周文军奋战，不能取胜，由曹阳再退到渑池(今河南渑池西)。十多天后，又被章邯军追击，全军溃败，周文自杀。这支浩浩荡荡的大军，在孤军无援的情况下，首先被章邯击破了。

吴广率军围攻荥阳不下。当周文兵败、秦军逼近荥阳时，内部在新的形势下又发生了分裂。部将田臧、李归等私下计议说：

> “周章（即周文）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不)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留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很难和他商量），非诛之，事恐败(难免失败)。”[26]

于是，他们假传陈胜的命令杀了吴广。陈胜因大敌当前，无可奈何，只好以田臧为上将。田臧即留李归率一部兵力监视荥阳，自率全部精兵西去迎击秦军。两军在敖仓（在荥阳西）遭遇，一场搏斗，田臧战死，部队溃散。章邯接着进攻李归军于荥阳城下，李归兵少又遭秦军内外夹攻，也战败牺牲。

章邯解荥阳之围后，分兵南下，相继击破邓说和伍蓬军，进逼陈县。秦二世又增派司马欣、董翳率军出关，协助章邯作战。这时，陈县只剩下西郊的一支张贺军。陈胜见秦军已逼近陈县，亲自出城督战。十一月，张贺战死，陈县已不能守。十二月，陈胜退走汝阴（今安徽阜阳），想再回原起义地区，走到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时，被叛徒庄贾（陈胜驾车人）杀害。南阳的宋留听说陈胜已死，就率军向新蔡撤退。途中遇上秦军，他丧失战斗意志，率军降秦，后来落个被车裂咸阳的可耻下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高潮，暂时低落下来。

第四　起义的伟大意义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从起事到挫败，只经过短暂的六个月。这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但对推动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则具有极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一、首倡反秦，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为彻底灭秦创造了条件。以“伐无道，诛暴秦”号召天下，顺应了人民的要求，使广大人民认识到暴君统治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可以推翻的。故起义风起云涌，浪潮澎湃。这种无所畏惧，敢于斗争的气魄，是值得后人尊敬的。起义虽然遭到挫败，但燃起了全国农民起义的火焰。陈胜死后，他的后继者不仅惩治了叛徒庄贾，还终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便推翻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专制的王朝。司马迁认为灭秦“由涉（陈胜）首事”[27]，这充分说明了陈胜、吴广首倡起义的伟大功绩。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起义不仅直接打击了秦王朝，还深刻地教训了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西汉前期之所以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才被迫对人民让步的。这样使广大人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减轻，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因而也就把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三、为后代农民起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给后代千百次农民起义指出了道路，树立了榜样。从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止，都是沿着陈胜、吴广的道路前进的，都打击或推翻了当时的封建王朝。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具有悠久的光荣历史的，而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则在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第五　项羽刘邦的灭秦战争

一、陈胜吴广挫败后的革命形势

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虽然没有推翻秦王朝的统治，遭到失

败，但在其影响下，各地起义军仍在风起云涌，并不断发展壮大。趁机而起的齐（都城在今山东临淄）、赵（都城在今河北邯郸）、魏（都城在今河南开封）、燕（都城在今北京大兴）等旧势力，虽然畏惧秦军强大，拥兵观望，各据一方，但表面上也还打着反秦的旗帜。（参看插图5-2）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春，原来奉陈胜之命略取广陵（今江苏扬州）的召平，听说陈胜兵败、秦军东来的消息，就渡江到会稽（郡治在今江苏吴县），用陈胜的名义封会稽起义的项梁为楚上柱国，并向他建议："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28]项梁接受他的意见，同其侄项羽率八千精兵渡江北上，在东阳（今安徽天长西北）汇合了陈婴的起义部队两万多人，进到盱眙（今江苏盱眙），英布、吕臣、蒲将军等都率军前来相会。起义军力量日益壮大，进至下邳（今江苏邳县南）时，已发展到七万多人。此时，在郯县（今山东郯城北）割据的秦嘉，企图阻挠项梁军北上，项梁乃进军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追杀秦嘉，编并了他的军队，进一步壮大了力量。项梁在栗县（今河南夏邑）同章邯军交战不利后，暂时回师到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原在沛县起义的刘邦也率军到薛，接受项梁的指挥，这支起义军便发展到十余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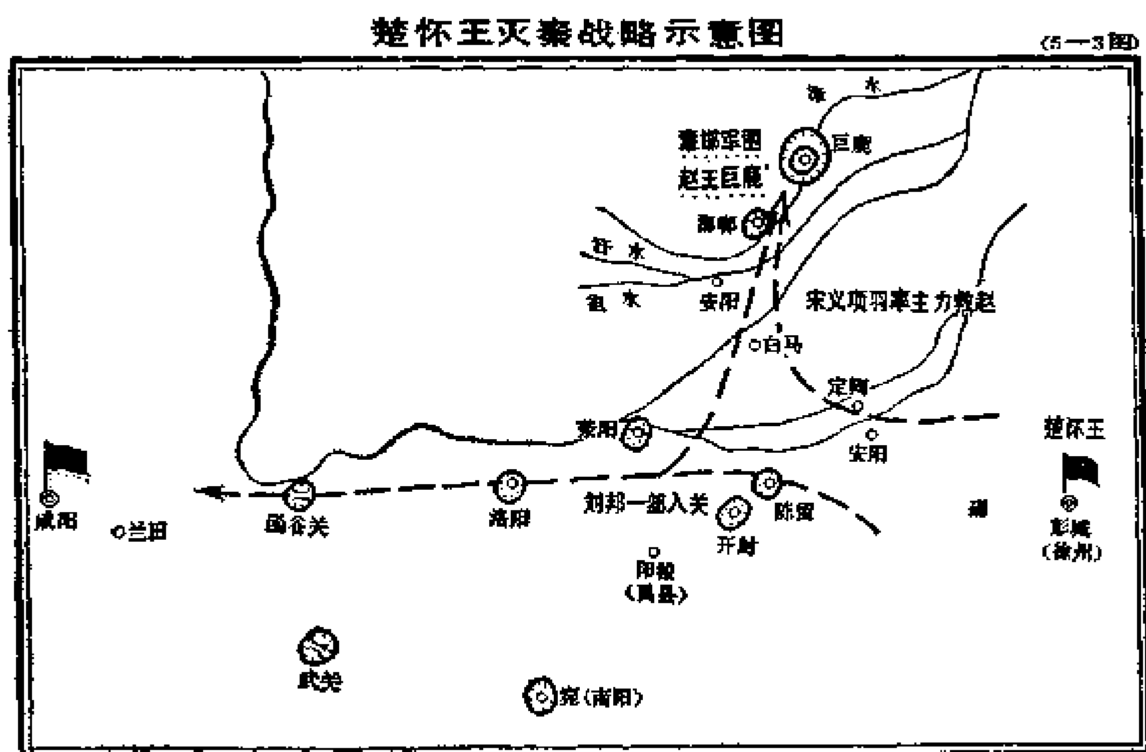
项梁在薛，为了便于号召，采纳谋士范增的建议，于六月拥立前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王，建都于盱眙，仍称楚怀王。从此，秦末农民起义战争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章邯在栗县挫败楚军后，企图乘胜逐次消灭魏、齐、赵等国割据势力，就回军夜袭临济（今河南封丘东），击败魏军，魏王咎自杀。七月，章邯进攻齐国的东阿（今山东东阿西南），项梁为了支援反秦势力，急率军往救，章邯败走濮阳（今河南濮阳南），环水自守。项羽、刘邦率军攻占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八月再攻雍丘（今河南杞县），大败秦军，杀三川郡守李由（荥阳解围后来此），切断了章邯与洛阳间的联络。项梁率主力进攻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再败秦军。整个形势的发展，对起义军非常有利。

项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后，产生骄傲情绪，对情况缺乏正确的分析，低估了秦军的力量，放松了警惕性。九月，章邯在得到充分的补充后，夜袭定陶，大破楚军，项梁战死，农民起义又一次遭到严重挫折。项羽、刘邦在陈留听说项梁败死，为了避免被秦军各个击破，主动东撤，与各部退保彭城。吕臣驻军于彭城东，项羽驻军于彭城西，刘邦驻军于砀，结成犄角之势，严阵待敌。楚怀王也自盱眙迁到彭城，对起义军进行了整顿，把吕臣和项羽所率领的部队合并，由自己亲自统率，驻砀的部队则由刘邦率领。

章邯在大败项梁后，对形势发生了错觉，认为楚名将（项梁）已死，“楚地兵不足忧”[29]，就确定了舍楚击赵的错误方针，率秦军北上击赵，起义军因而得到休整的机会。

二、楚怀王击秦的战略决策（参看插图5-3）



楚怀王灭秦战略示意图（5—3图）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闰九月，秦军攻赵，大破赵军，章邯乘胜进占邯郸。赵王歇和张耳退守巨鹿（今河北鸡泽北），赵将陈余收得常山（郡治在今河北正定）兵数万人，驻在巨鹿城北。章邯派王离包

围巨鹿，自己驻军在巨鹿南面的棘原，并修筑甬道（两侧有墙的运粮道路）以补给王离军。王离兵多粮足，急攻巨鹿。赵王歇在危急的情况下，几次派人向彭城求救。

这时，整个形势已发生变化，与陈胜、吴广起义时有所不同。秦军方面，主力远在河北围攻巨鹿，顿兵坚城，表面上气焰嚣张，实际上屡战疲惫，而关中空虚无备。统治集团内部又互相倾轧，危机四伏。起义军方面，有广大人民的拥护，并在战争中锻炼得更为坚强，经过集中和整顿后，力量更加强大；而六国旧势力虽拥兵割据，对秦军也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在此大好形势下，摆在楚怀王面前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策定击秦战略和选择执行这一战略任务的将才。这时，齐王在楚军的使者高陵君显建议楚怀王，重用宋义，他说：

> "宋义论武信君（项梁）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知败徵，此可谓知兵矣！"[30]

楚怀王乃召宋义计议军事，非常高兴。于是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准备北上救赵，其他诸将皆归宋义指挥，号为"卿子冠军"（卿子是一尊称，冠军即在诸军之上），至于进攻关中的任务，诸将因畏秦兵强盛，没有认为以先入关为有利的。独项羽怨恨秦杀了项梁，愿同刘邦西入关。楚怀王诸老将都说：

> "项羽为人，慓悍猾贼，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无侵暴，宜可下。项羽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31]

楚怀王根据大家的意见，没有批准项羽的要求，决定派刘邦"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伐秦"，[32]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关中者王之"。

从楚怀王的上述决策来看，他的击秦战略是：以主力北上救赵，寻求秦军主力决战；以一部西向入关，直捣咸阳。这一战略是符合当时客观情况的。因为章邯顿兵坚城，已经陷于被动。起义军的主力救赵，内外夹击，就有打败秦军的可能。同时，章邯既以全力围攻巨鹿，如不

以主力救赵，不但巨鹿之围难解，而赵国且有灭亡的危险。赵亡，章邯再乘胜转用兵力南下，起义军会被各个击破，而乘虚入关的企图也就难以实现。刘邦率一部兵力（约万人）西图关中，兵力诚然较少，但有北上救赵的起义军牵制秦军的主力，又可利用当时反秦的大好形势，“扶义而西”，“收陈王、项梁散卒”，以政治配合军事，入关是可能成功的。由此可见，北上救赵和乘虚入关，是起义军在战争全局中的两个重要方面，而以歼击秦军主力为重点。这两个方面的起义军的互相配合和呼应，使得秦统治集团顾此失彼，应付不暇，可以收一举灭秦之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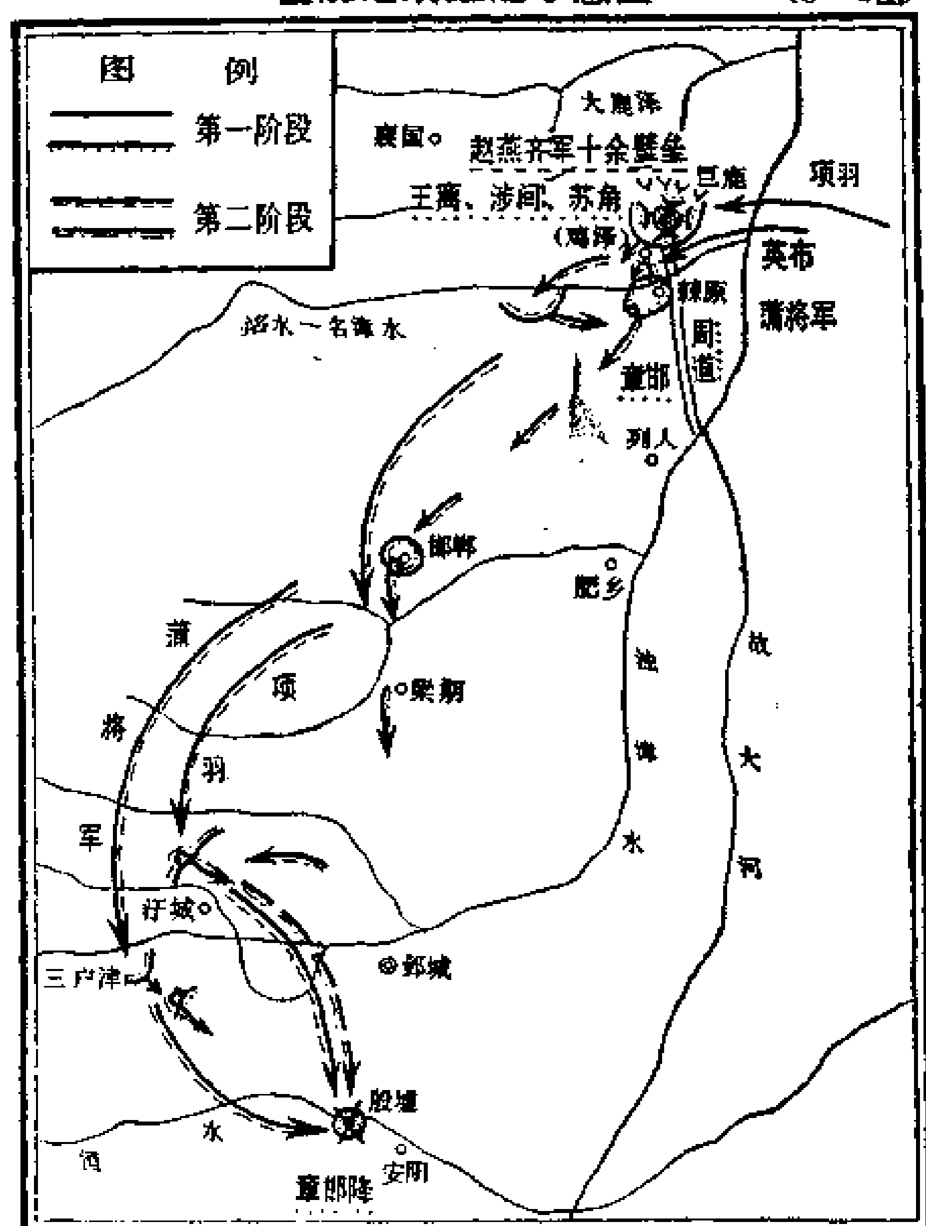
有人认为楚怀王的决策，以主力北上救赵，是以起义军的主力去对秦军的主力，在战略运用上值得研究。不如以一部北上救赵，牵制秦军主力，而以主力急趋关中，捣毁秦王朝的巢穴。避实而击虚，攻其所必救，这是孙膑“围魏救赵”、“批亢捣虚”的战略，趁秦王朝精兵外调、关中空虚之际，直捣秦都咸阳，必然迫使围攻巨鹿的章邯军全部释赵而回救，或以王离军的一部围赵而以主力回救。待章邯军回兵时，乘其长途跋涉，士卒疲惫，中途予以截击，定能取胜。这一方案似乎可行，但毕竟未经实践证明，实难断定其必胜。孙子曰：“兵者诡道也”，老那么重复“围魏救赵”的格局就胜负难知了。必须审时度势。

楚怀王在选将用人上亦值得研究。（一）他轻信高陵君显的吹嘘，便认为宋义是知兵之将，擢为上将军，统率起义军诸将领。而在北上救赵时，他与项羽在谋略上的争论，实践证明他并不真正知兵。他“论武信君必败”[33]，不过是不幸而言中。（二）项梁、项羽叔侄起兵会稽，渡江西击秦，八千子弟兵皆项氏归属。项梁战死后，楚怀王不从项氏归属中选拔将帅，统御其众，而独拔宋义于稠人之中，号为卿子冠军，使膺北上救赵的重任，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想抑制项氏的势力，但宋义威不足以服众，又“不恤士卒而徇其私”，实难以御众。（三）楚怀王乃项梁叔侄所拥立。项梁战死后，他想抑制项氏的势力，自树党羽。他与诸将约：“先入关中者王之”，独派遣沛公入关，而不遣项羽，又只任命项羽担任“次将”，北上救赵，屈居于宋义

之下，造成起义军内部矛盾，将帅不和。楚怀王在大敌当前之际，不考虑实际情况，不顾大局，过早地抑制项氏的势力，实为不智。苏子瞻评论楚怀王，还认为他“是天下之贤主”，[34]从军事斗争的观点来看，我们是不能苟同苏氏的论断的。

三、巨鹿之战中项羽的料敌决策和战役指导（参看插图5-4）

巨鹿之战是项羽、刘邦灭秦战争中的关键性战役，作用巨大。秦



巨鹿之战经过示意图 （5—4图）

二世三年（前207年）十月，宋义率军北上救赵，他害怕和秦军决战，不敢渡河。到达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后，即停止前进，一连驻了四十六天。项羽建议立即进兵河北，劝他说：

“秦军围赵王巨鹿，疾（速）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35]

宋义想保存实力，乘秦赵相斗，坐收渔利，他说：

“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疲），我乘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破）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

并挖苦项羽说：

“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36]

他还下令军中：“有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37]。这显然是针对项羽而言，想以权力压服项羽，使屈从其意见。

宋义拒绝了项羽的建议之后，不但不进兵，反而亲到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大张宴席，送他的儿子出使齐国为相，以图日后割据，而置士卒于冻馁之中而不顾，由此更引起项羽的激愤。这时，天气寒冷，又下大雨，军中缺乏粮食，士兵忍饥受冻，巨鹿又十分危急，反秦力量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项羽又据理力争，他说：

“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利用）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建立）之赵，其势必举（破）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那有什么疲敝可乘）！”[38]他又指责宋义：

“国军新破，王坐不安席，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为自己打算），非社稷之臣。”[39]

项羽激于义愤，一天早晨他进帐参见宋义，乘机杀了宋义，并号令军中，“宋义与齐谋反楚，楚怀王阴令诛之”。全军欢呼，诸将都听他指挥，并一致拥立项羽为假上将军。楚怀王于十一月任命项羽为上将军，令他率军救赵。

十二月，秦军仗恃兵多粮足，围攻巨鹿甚急。城中的赵军，兵少粮尽，危在旦夕。救赵的各路诸侯大军在巨鹿城外。陈余率数万人在城北，张耳的儿子张敖率万余人，燕将臧荼，齐相田都也先后率军来到巨鹿，均在陈余军附近扎下十几座营垒，但因畏惧秦军，互相观望，谁也不敢出战。

项羽取得指挥权并整顿了军队后，挥师渡河决心与秦军决战。他进到漳河南岸与秦军隔岸相峙，首先派英布、蒲将军率二万人为前锋，先渡过漳水（一说黄河），切断秦军运粮的甬道，分割章邯与王离的军队，随后项羽亲率主力渡河，并下令破釜沉舟，凿沉船只，打破釜甑（炊具），烧毁庐舍，每人只带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接着，以雷霆万钧的气势，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杀奔秦军，充分表现了起义军反秦的战斗决心和英雄气概。项羽的军队一到战场，就包围了王离军，猛打猛冲，不给秦军以喘息的机会，九战九捷，大破秦军，俘虏秦军的大将王离，杀死秦军副将苏角，迫使另一副将涉闲自杀，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解了巨鹿之围。《史记·项羽本纪》生动地描写了这场激战的场面：“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垒）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害怕）。”起义军大破秦军之后，诸侯都很佩服，一致拥戴项羽为诸侯上将军，指挥所有的军队。

秦军章邯在巨鹿战败后，把部队集中在巨鹿以南的棘原（今河北平乡县南）。项羽乘胜进至横漳水南岸，两军暂时形成对峙。陈余写信给章邯，指出白起、蒙恬很有功劳，但都遭到杀害。秦朝是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劝章邯与诸侯联合起来，共同攻秦，分地为王。[40]这时，秦朝内部，矛盾加剧。由于秦军屡次败退，二世派人责备章邯，丞相赵高也因战争失败，怕受连累，想拿章邯来作替罪羊。章邯获悉这个情况，非常害怕，曾秘密派人向项羽求和，约尚未成，就率军后撤。项羽派蒲将军等率一部兵力昼夜渡过三户津，兼程追击（今河北临漳西南），击败了秦军，切断了章邯主力军的退路。项羽又率主力猛攻，再破秦军于汙水（漳水支流，在今临漳附近）上。章邯迭遭失

败，既无援军，又怕遭二世和赵高的杀害，再次派人乞降。项羽也因军粮不足，便允其所请。秦二世三年（前 207 年）七月，章邯率秦军二十多万人，在洹水南岸的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向项羽投降。项羽立章邯为雍王，留置楚军中，立司马欣为上将军。起义军获得了全歼秦军主力的伟大胜利，当是时，秦王朝的统治已濒于崩溃。接着，项羽派秦降将司马欣率秦军为前锋，渡过黄河向关中挺进。与此同时，刘邦则已逼近武关。

历史上有名的巨鹿之战，是灭秦具有决定性的一场大战。由于起义军的英勇顽强全歼了秦军的主力，扭转了整个战局，决定了秦王朝覆灭的命运，为刘邦入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巨鹿战前，项羽和宋义在救赵的决策上的斗争，宋义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他的坐山观虎斗，会坐致秦军强大，是坐等秦军各个击破，是极愚蠢而消极的战略。秦强赵弱，秦军攻赵，如虎搏兔，何来两虎相斗，一伤一敝。“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宋义的“先斗秦赵”、“我承其敝”的主张，是立脚于看，置同盟军的危亡于不顾，不但破坏了联合抗秦的策略，对楚军自己也是不利的。秦军如果破赵，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诸侯援赵军队的瓦解和秦军力量的增长，章邯势必集中全力把矛头转向起义军以行决战，那时，不但无敝可乘，起义军且有被击破的危险。

项羽反对宋义的消极观望、牺牲同盟的态度，而采取积极进攻的行动，毅然渡河救赵，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起义军的战略是以主力救赵，进攻秦军的主力；以一部入关，直捣咸阳。南北两军互相呼应，而全局安危，成败关键，则在于巨鹿一战。如果起义军不“急引兵渡河”，合力击秦，则章邯军以强大的兵力攻打一个新建的赵国，诚如项羽所说，“其势必举赵”，这样，整个局势将发生严重的变化。所以救赵是关系到反秦力量的团结与分裂的问题，是关系到反秦事业成败的问题。项羽洞察全局，主张迅速渡河北上，乘秦军顿兵坚城，士卒疲惫的时候，“楚击其外，赵应其内”，事实证明，项羽的决策确是破秦救赵的上策。

巨鹿之战，起义军一举全歼秦军主力，战役的胜利保障了灭秦战略的成功。这一胜利是由于起义军的勇敢善战，但项羽的指挥功绩也是不可磨灭的。他的卓越的战役指导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具有破釜沉舟的胆略和决心。楚军渡过漳水后，项羽下令“破釜沉舟”，每人只带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有还心。这充分地表现了坚定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因而起义军能以一当十，勇气百倍，向王离军勇猛进击，发扬了勇敢战斗、不怕牺牲、和不怕疲劳的作风，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创造了历史上速战速决的光辉范例。

（二）能以弱击强，以寡击众。当时秦军以重兵围巨鹿，兵强势盛，诸侯军救赵者十余壁，莫敢发兵击秦。项羽虽率全军渡河，增援当阳君、蒲将军，但仍然是以寡击众，以弱击强，项羽能利用沉舟破釜之计，以激扬士气，增强斗志，故能主宰战场，大获全胜。

（三）善于分割、孤立敌人。楚军渡河后，先以一部兵力分割章邯与王离军，使围城的秦军陷于孤立，造成楚军局部的绝对优势，然后阻绝章邯甬道，断绝王离军粮食，予以各个击破。以后又命蒲将军南下三户津，切断章邯军退路，形成前后夹击，对迫降章邯起了重大作用。从巨鹿之战全过程，看出项羽在作战指导上很善于运用分割、迂回。

（四）长于连续作战。起义军渡过漳水后，不顾疲劳，九战九胜，连续作战，说明了项羽在作战指挥上能利用军队的锐气，长于乘胜连续作战，不获全胜，决不休止。回顾周文的停军于戏，和项羽成为鲜明的对比。

（五）能实施远距离追击，彻底歼敌。项羽在巨鹿之战中，指导卓越之处，除表现在作战求全胜外，还能果敢地实施远程追击，力求全歼敌人。如在击破王离军后，毫不停顿，转而南向追歼章邯军，迫使章邯无条件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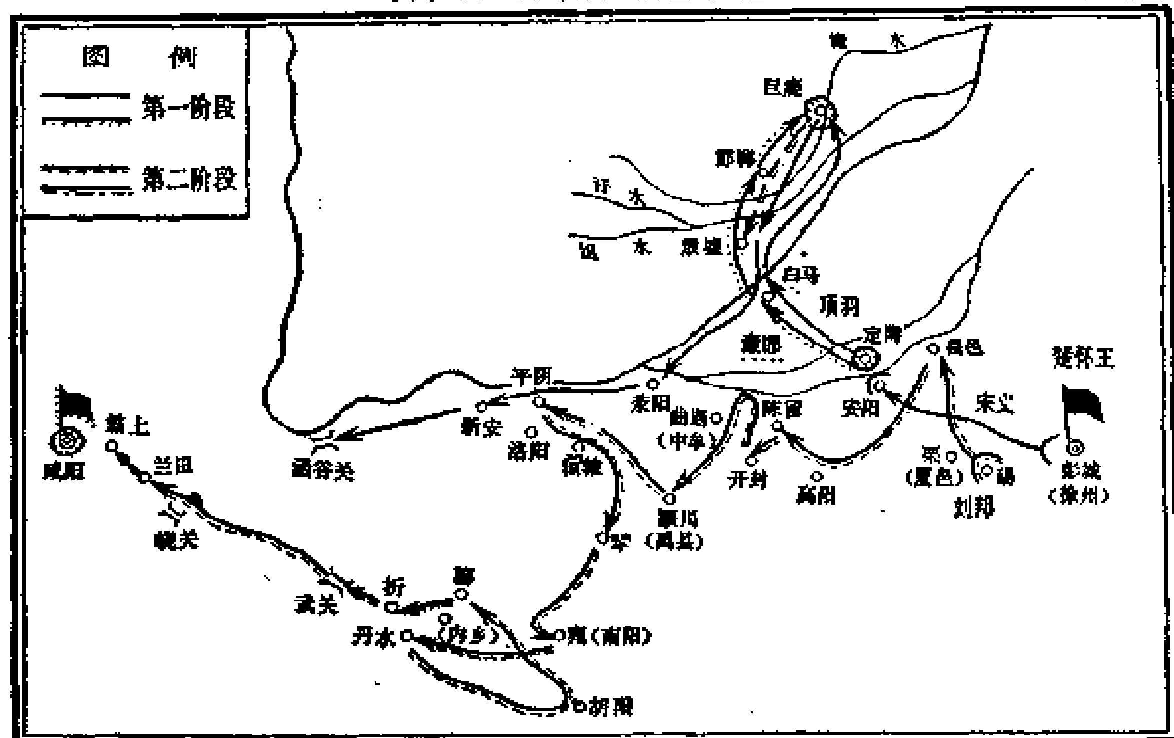
（六）善用军事压力配合政治攻势。乘敌人内部将相猜疑、军心动摇的时机，给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再配合政治攻势，会迫使敌人投

降。继巨鹿之战后的汙水之战，军政配合对全歼秦军主力起了重大的作用。

秦军的失败，除政治上腐朽没落，不得人心的因素外，还有章邯在主观指导上的错误。他对当时形势缺乏正确的分析，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尤其是对新生力量的内在的坚强因素更不理解。在击败项梁后，便以为“楚地兵不足忧”，错误地确定“舍楚击赵”的方针，转战河北，给起义军以整顿、发展、壮大的机会，并使自己顿兵坚城，陷于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尔后在击赵作战中，使王离军长期顿兵巨鹿，坐待疲惫，为起义军各个击破造成机会，这都是秦军失败的重要原因。

四、刘邦入关的决策谋略和战役指导（参看插图5-5）

刘邦项羽灭秦经过示意图　（5—5图）



秦二世二年（前208年）闰九月，章邯北上击赵后，秦军主力远在河北，黄河以南的秦军除保障其后方联络线外，没有较大的机动部队，但开封、荥阳、洛阳、函谷关、南阳、武关等重镇和关口，都有重兵防守。刘邦所指挥的部队也不过万人，虽有一定的战斗锻炼，但

西入关中，如探虎穴，困难仍然是很大的。

刘邦为了完成乘虚入关的艰巨任务，受命后，即采取边进军、边发展的战略，积极准备，扩大部队。他编并了栗县刚武侯的部队四千多人，并联合魏将皇欣、武满共同行动，进攻秦军，声势渐大。前207年（秦二世三年）二月，刘邦乘巨鹿决战的时机，由砀率军北上，联合彭越领导的起义军，进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遭到顿挫后，折而向西。过高阳（今河南杞县西）时，他采纳郦食其(读异基)的建议，攻破积粮甚多的陈留，得到了充分的补给，并收编郦商军四千多人，壮大了力量，为西进击秦创造了有利条件。三月，他进攻开封受挫，绕道西进，大败秦将杨熊于曲遇（今河南中牟）东，杨熊退入荥阳。刘邦继续率军西进，攻占了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又北至平阴（今河南孟津北），封锁了黄河渡口。在洛阳以东与秦军战不利，折向南采取大迂回，出轘辕关（今河南偃师东南）险道，进迫南阳，准备由武关进入关中。此时，张良率韩军加入起义队伍。

六月，刘邦在犨（今河南鲁山东南）东大破南阳郡守吕齮的部队后，就越宛（今河南南阳）西进。张良建议：

> "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41]

刘邦采纳了张良的建议，连夜偃旗息鼓，绕道还军，黎明时包围宛城，迫降了吕齮。七月，起义军继续西进，发展很顺利，在丹水（今河南淅川县西南）接受了高武侯鳃、襄侯王陵的投降。刘邦又东取胡阳（今河南唐河南），西克郦（今河南内乡东北）、析（今河南内乡西北）两城，肃清了南阳地区的秦军。

八月，刘邦攻破武关。这时，秦朝在关东的主力军章邯、王离部已被项羽歼灭。秦统治集团在起义军的威胁下，异常恐惧，内部矛盾更加尖锐，引起了政变。丞相赵高逼杀二世，立子婴为秦王，准备重整旗鼓，进行反扑。九月，子婴又诛杀赵高，并派兵防守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企图阻止起义军的西进。峣关前据峣岭，后枕蒉山，地形险要，是武关以西靠近咸阳的最后一关。刘邦准备发起进攻，张良

认为不宜强攻，并建议说：

> "秦兵尚强，未可轻。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以利诱之）。"[42]

以麻痹敌人，松懈其斗志。刘邦依计而行，秦将果然愿意联合反秦，疏于戒备，刘邦遂乘隙指挥军队绕过峣关，翻越蒉山，向秦军发起猛攻，大败秦军于蓝田（今陕西西安东南）。这一战粉碎了秦王朝的最后抵抗，决定了它灭亡的命运。刘邦胜利地逼近咸阳。起义军纪律严明，秦民都很喜悦。

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十月，刘邦率军进至坝上（今西安市东），秦王子婴无力抵抗，只得捧着秦国玉玺，在轵道（今西安北）迎降。秦朝统一天下后十五年的残暴统治，终于在农民起义的烈火中土崩瓦解了。

刘邦以较少的兵力由砀西进，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攻入武关，进逼咸阳，摧毁了秦的统治中心。这一胜利的获得，一方面是他能高举反秦的旗帜，"扶义而西"，因而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另一方面是项羽北上救赵，牵制并全歼了秦军主力，给他西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刘邦的战略运用和战役指导也很成功，现归纳有如下几点：

（一）避实击虚，行动积极。刘邦的西向入关和项羽的北上击秦军主力是灭秦战略方针双环的有机连系，息息相关。项羽的行动在击实，为刘邦的乘虚创造条件，而刘邦的乘虚能顺利发展也影响到项羽战略任务的完成。乘虚则要求行动坚决、积极、迅速，抓紧战机。刘邦的行动无论从战略和战役上都贯彻和体现了这一点。如他发现洛阳、荥阳、开封都有秦军防守，坚城难攻。如果留之不顾，有受前后夹攻危险；攻下再进，又有顿兵坚城、贻误战机的可能。因而毅然避开函谷关，向南作战略大迂回，这是最大的乘虚。既甩开了几个坚城，又出秦军之无备或少备，故能以较少兵力，较短时间，取得最大战果。战役上每遇坚城，能取则取，不能取则绕道而过，绝不受坚城牵制，因而争取了时间。

（二）采用边进军、边发展的战略。刘邦起义军出兵时，兵力仅

万余人，如果等待兵力扩展后再进军，有失去战机的可能；如果不壮大兵力，又难以完成西行入关的战略任务，他采用边进军、边发展的战略，完全适合当时的形势。刘邦在扩展实力的手段上，表现得很灵活，就是军事、政治手段并用。能击败的，就以兵力取之；能召降的，就以诱降的办法降之；能联合的，就采取联合的办法接纳之。这样，既不影响进军速度，又不过多消耗兵力，取得了扩大实力的效果。实力扩大又促进了进军速度，体现了进军和发展的一致性。

（三）快中求稳，置自己于不败之地。刘邦起义军虽希望迅速入关，但不是一味冒进，而是注意快中求稳，置自己于不败之地。如他发现司马卬企图南渡黄河利用起义军的胜利声势西入关中以扩展封建势力时，就不惜北攻平阴，塞住黄河渡口。又如他越过南阳西进时，采纳张良的建议，先潜回军迫降吕齮，继又扫荡南阳地区的秦军，都是快中求稳的行动。

（四）战役指导机动灵活。刘邦在作战指导上，也很灵活。如他采取张良的建议，利用秦将谋和，乘其疲懈不备，不顾险阻，出敌忘表，绕过峣关，不战而取得很大的胜利。军至蓝田，利用声势，不顾疲劳，连续战败秦军，打好最后一仗，都体现了指导作战的灵活和坚决。

（五）刘邦讲究政策和策略，优待俘虏，攻心为上，攻城为下。注意政治影响，注意宣传，军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而受到老百姓的拥护，进军顺利。

秦末农民大起义的灭秦战争，从陈胜，吴广起义军奠定了灭秦战争胜利的基础，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刘邦乘虚入关一举取得灭秦战争全胜，共经历了二年零四个月，有一个从挫败到成功的过程。就政治条件而言，陈、吴和项、刘所处的情况相同，陈、吴挫败而项、刘成功，比较突出地说明了战争中战略运用和战役指导的正确与否决定战争的胜败。项羽、刘邦所领导的起义军，在战争中受到锻炼。他们的军事经验比较丰富，军队战斗力比较坚强，楚怀王的战略方针比较正确，项、刘贯彻也比较坚决，再加之项、刘各具有一定的军事才

能，战略运用、战役指导正确，故能顺利地完成灭秦战争的胜利。

在秦王朝被摧毁后，项羽、刘邦各自形成一个新的政治集团。他们都想利用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谋求建立全国统一的封建统治，由此转入“楚汉战争”。

注　释

〔1〕〔2〕〔3〕《前汉书·食货志第四上》

〔4〕《史记·高祖本纪》

〔5〕《前汉书·刑法志》

〔6〕《前汉书·食货志》

〔7〕〔8〕〔9〕《史记·陈涉世家》

〔10〕《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

〔11〕陈胜以朱砂在丝帕上写上“陈胜王”字样，暗中塞人鱼腹。戍卒们从渔民手中买到后，发现丹书，以为陈胜“王”是“天命”；吴广又乘黑夜在驻地附近荒庙中，烧一堆野火，并假装狐狸嗥叫声，带出“大楚兴，陈胜王”的音调，听到的人广为传播，就认定陈胜“王”是“天意”。采取这些愚昧人民的办法来提高威信，使戍卒服从领导的办法本是不足取的，但据当时情况，作为一种策略，却也起了一定作用的。

〔12〕〔13〕原文见《史记·陈涉世家》。

〔14〕〔15〕原文见《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16〕〔17〕《史记·陈涉世家》

〔18〕《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

〔19〕陈胜派吴广西击荥阳的后续企图是否人关，史料无明确记载，因此解说不一。综合有关史料加以研究，其后续企图应该是人关。理由是：(1)陈胜派出武臣、邓宗、周市等都是“徇地”，独派出吴广是“西击荥阳”；(2)《史记·张耳陈余列传》有“大王举梁楚而西，务在人关”，及“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句，足以说明“徇地”与“西击秦”的任务性质显然不同；(3)结合宋留攻南阳、入武关的任务来看，吴广军有人关的任务也比较明确。

〔20〕〔21〕〔22〕〔23〕〔24〕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二世皇帝元年》。

〔25〕《史记·秦始皇本纪》

〔26〕《史记·陈涉世家》

〔27〕《史记·秦始皇本纪》

〔28〕〔29〕《史记·项羽本纪》

〔30〕〔31〕〔32〕《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二年》

〔33〕《史记·项羽本纪》

〔34〕《古文观止·苏洵·范增论》

〔35〕〔36〕〔37〕〔38〕〔39〕〔40〕《史记·项羽本纪》

〔41〕《史记·高祖本纪》

〔42〕《资治通鉴·卷八·二世皇帝三年》

第六章　楚汉战争

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后，项羽、刘邦为了争夺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和最高封建统治权，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战争。这场战争自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十一月项羽率军入关起，到高帝五年(前202年)十二月垓下合围、击灭项羽止，历时四年多的时间。战场的广阔，规模的巨大，为秦汉以前所未有。战前，楚强汉弱，力量悬殊。但因双方战略运筹，得失互异，强楚犯了错误，逐渐丧失优势，终于兵败垓下；弱汉多操胜算，逐渐由弱转强，最后击灭项羽，建立了汉王朝，统治中国达四百余年。

这场战争的经过概约可分为五个阶段：项、刘初期斗争，刘邦还定三秦，楚、汉彭城大战，荥阳、成皋相持和垓下围歼楚军。现逐段围绕若干问题来论述楚汉双方战略运筹的得失。

第一阶段　项、刘初期斗争

——自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十一月项羽率军入关起，至同年夏四月刘邦忍忿去汉中就国止，历时六个月——

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十月[1]，刘邦入关，秦王子婴投降，秦王朝的统治结束了。根据楚怀王“先入关者王之”[2]的约言，刘邦以关中王自居。他进入秦宫后，看到富丽堂皇的宫室和珍奇瑰异的宝藏，很想留居宫中享受，诸将也争取金帛财物。樊哙直率地向他提出意见：

“沛公(刘邦)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3]

刘邦未采纳，张良又劝谏说：

“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

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所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4]

刘邦才接受他们的劝谏，安抚秦民，严明纪律，封存了秦朝的重宝、财物、府库[5]，还军霸上，并派兵防守函谷关，以拒止诸侯军入关。

刘邦宣布废除秦朝的一切苛政，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6]并留用秦朝的一些官吏，以维持社会秩序，还派人会同秦朝的旧官吏到各县、乡、邑去宣布他对人民所痛恨的秦王朝的严刑峻法所作的一些措施，颇受关中人民的欢迎，起到了收揽人心的作用，同时也获得了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他们"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7]都"唯恐沛公不为秦王"。[8]

刘邦的重要谋士萧何把秦王朝丞相府的律令、图籍收藏，使沛公得以了解天下的山川形势、关隘要塞、郡县、土地、户口的多少及经济情况[9]，为刘邦建立封建统治预为准备条件。

项羽在河北巨鹿之战中消灭秦军主力后，取得诸侯上将军的地位，声威显赫。他统率诸侯军四十万和章邯的降卒二十万浩浩荡荡地向关中进军。在途中，他听说秦朝的降卒有不满的呼声，怕他们哗变，竟在新安（今河南新安）把降卒全部坑杀。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十二月，他率军至函谷关，听说刘邦已定关中，并派兵守关，极为不满，即命英布破关而入，进军至戏(今陕西临潼东)。刘邦的左司马曹无伤派人向项羽告密：

"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10]

项羽得报后，极为愤怒，即犒赏士卒，准备明日进击刘邦。项羽的谋士范增也认为沛公居山东时，贪财好色，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主张"急击勿失"[11]，以坚定项羽的决心。项、刘在关中的一场斗争即将公开化，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项羽军四十万，号称百万，驻扎在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潼），刘邦军十万，号称二十万，驻扎在霸上。双方力量悬殊。不料

项羽的叔父项伯暗地亲自把全部计划泄露给他的友好、刘邦的谋士张良。并劝他即逃走。张良急把此消息告诉刘邦，刘邦大惊，自度力量不敌，为避免冲突，采纳张良的计策，竭力拉拢项伯，与项伯结为婚姻之好，并请项伯为他向项羽调解，约定明日亲自到鸿门请罪。果然，项伯在项羽面前为刘邦疏解：

“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12]

项羽认为项伯言之有理，此时，如进击刘邦，会引起诸侯的疑虑和不满，遂同意他的意见。次日，刘邦同张良、樊哙等率百余骑兵亲自到鸿门谢罪说：

“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13]

刘邦卑躬屈节地向项羽解释误会，一点不敢居功。项羽留他共饮于鸿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鸿门宴”。刘邦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来饮这杯苦酒的。在宴会席上，范增几次举他所佩带的玉玦暗示项羽杀害刘邦，项羽默然不表态。范增又指使项庄拔剑起舞，企图刺杀刘邦，又被项伯舞剑掩护。这时，刘邦的侍卫樊哙带剑拥盾进去，立于席旁，怒目视项羽，词严义正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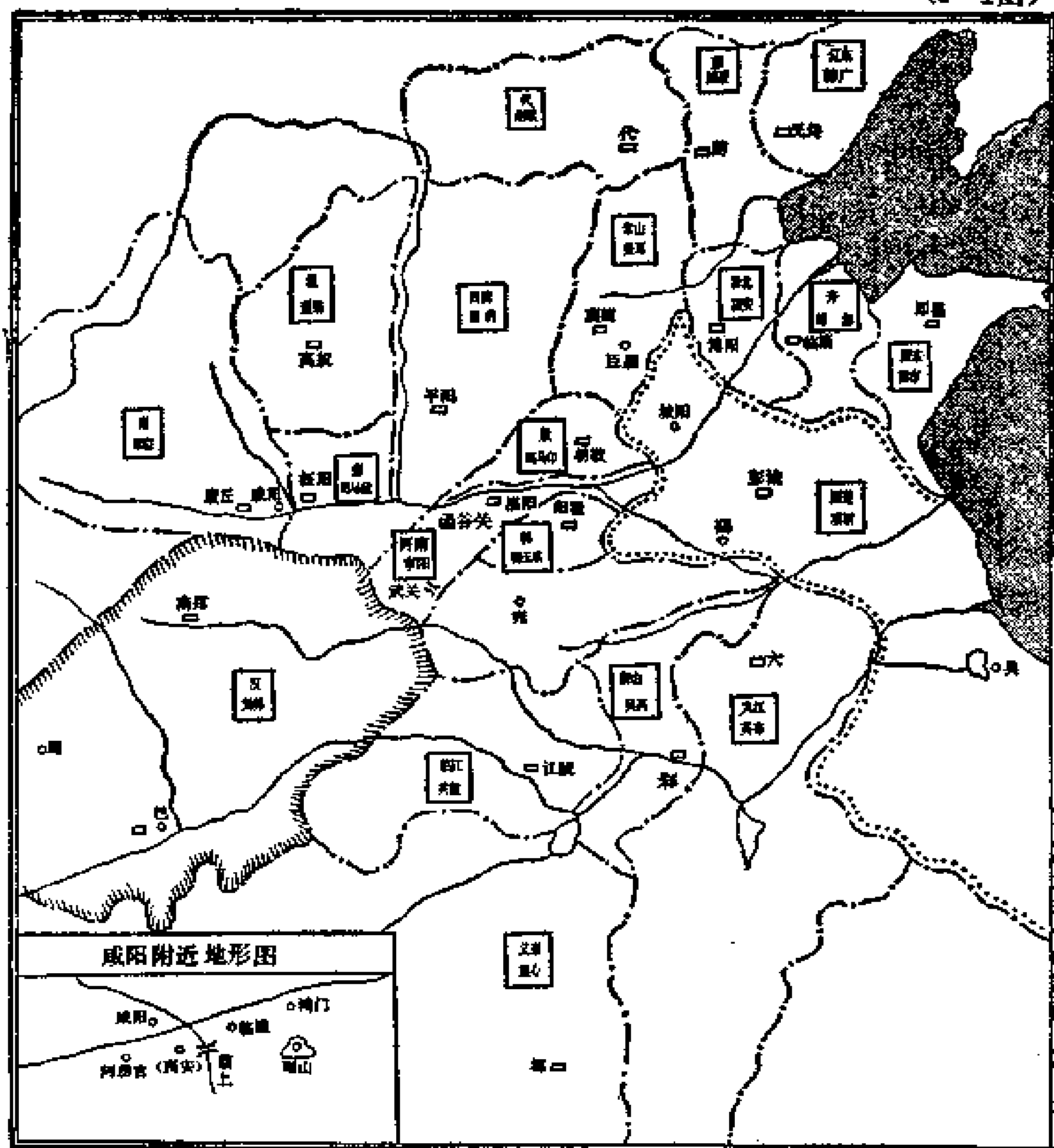
“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还军霸上以待将军。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赏，而听细人之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将军不取也。”[14]

这番话可以说是击中了要害，使项羽默然无言。一会儿，刘邦籍故退席，并召樊哙出来，相与商议。刘邦想告辞而走，樊哙说：“如今人方为刀俎，我方为鱼肉，何用告辞”于是刘邦同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逃回霸上，留张良辞谢。“鸿门宴”是楚汉战争中一场关键性的政治较量，由于刘邦卑辞请罪并利用项伯从中调解，改变了项羽击杀他的决心，致使一场战争没有爆发。

不久，“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15]，项羽肆意烧杀、掳掠的暴行，引起关中人民强烈反感，因而丧失人心。

同年三月，项羽挟其在军事上的压倒优势，以诸侯上将军的身份，发号施令，主宰天下。他自立为西楚霸王，取梁、楚之地九郡（占有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部分地区），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同时裂土分封了十八诸侯王（参看插图6-1）。项羽蓄意要把刘邦驱逐

项羽分封十八王概况图　（6—1图）



出关中，但他已与刘邦和解，又怕诸侯说他"负怀王约言"[16]，就同范增计议，"以巴蜀道险，秦之迁人（罪人）皆居之"[17]，正好用以困锁刘邦，遂借口"巴、蜀亦关中地也"[18]，将巴蜀、汉中之地封刘邦为汉中王，定都南郑(今陕西汉中)，并胁迫他离开关中。项羽为了制服刘邦，又分关中为三部，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企图通过此三人控制关中，将刘邦困锁在边险地区，使之不能东进。田荣、陈余、彭越等拥有部分实力，因未跟随他击秦，为他所不满，故均不封王。这样分封的结果，造成割据局面，为后来扩大纷争播下不良的种子。

当项羽分封时，韩生向他献策：

"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19]

项羽见关中已被他焚烧残破，人民对他的屠杀有反感，又眷念彭城，思东归故里，他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20]，拒绝了韩生的建议，于四月间率部回彭城。

刘邦自认为先入关灭秦有功，应王关中，对项羽不封他为关中王，而被徙于放逐罪犯的巴蜀之地，极为不满，想以武力与项羽争夺。周勃、樊哙、灌婴诸将都认为力量不敌，应退让一步，暂时屈就，才是上策。萧何亦劝谏：

"虽王汉中之恶，不犹愈于死乎？""今众弗如，百战百败，不死何为！……愿大王（刘邦）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21]

刘邦采纳他们的建议，于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四月，忍气吞声地离开关中，前往汉中。此时，韩信也离楚归汉，一同前往。途中，刘邦烧毁所过栈道，防止诸侯军的偷袭，并借此表示没有东向的意图，以麻痹项羽。他到达南郑后，征收巴蜀租赋，以供军用。积极备战，伺机东进。

在项、刘初期斗争这一阶段中，有关战略运筹上值得注意的有三个问题。

一、项羽在鸿门宴上为何未杀刘邦

在鸿门宴上，项羽未杀刘邦，范增认为是"君主为人不忍"。[22]刘邦逃走后，范增气愤地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将军天下者，必沛公（刘邦）也。吾属今为之虏矣"。[23]我们分析当时项羽未采纳范增的意见，而让刘邦逃走，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刘邦实有先入关灭秦之功，并无过失。没有显著正当的借口而杀他，怕诸侯不服，责项羽负约。樊哙在鸿门宴上词严义正地这番话可说是击中了要害，使项羽感到要杀刘邦，实无理由。项羽当时以上将军的身份，驾凌于诸侯之上，对刘邦当时的地位与势力，尚未引起严重的注意，未认为刘邦将是与他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而且刘邦亲来请罪，表示对他俯首臣服，又有项伯为之疏解，杀之，"不如因善遇之"。当时，各路诸侯云集关中，"政由羽出"，如何区处天下大局，是项羽当时刻不容缓、急待审度的大事。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情况，杀了刘邦可能缓和一些矛盾，但杀了刘邦还会出现另一个刘邦。因为项羽后来的失败问题不在于未杀刘邦，而在于他的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没有顺应民心，没有推动社会进步。

二、评论项羽分封诸侯的失策

项羽分封，恢复封建割据，违背历史发展潮流，开历史倒车。考其所以出此，实由于他系楚国贵族后裔，满脑中充满贵族封建思想。在农民起义灭秦战争的过程中，一部分六国贵族加入反秦队伍，他们也有浓厚的贵族意识。当主要敌人秦王朝被推翻后，那些六国贵族便想割地称王。这种思想也影响当时一些农民起义将领，他们亦想裂土封王。在这种思潮支配下，项羽便充当了这股反历史潮流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以为已灭秦而有天下，即可分封诸侯，使他们各守疆土，而他的封国疆土比诸侯为大，兵力较诸侯为强，号西楚霸王，驾凌于诸侯之上，便足以号令天下，相安无事。他不知历史发展已经历春秋、战国到秦代，条件已与西周初期迥然不同。那时，祖国大地，荒芜未辟，人口稀少，交通亦不发达，人民尚停滞于诸氏族独居状态之中，生产仍为自给自足。那时，分封诸侯，使各守领土，辟草莱，开荒

地，足以建立和繁荣其奴隶主统治的国家。但自历春秋、战国以来，诸侯逐渐强大，人口逐渐繁衍，工商逐渐发达，交往逐渐频繁，新兴城市迭起，城邑各地林立，诸侯兼并之风甚为炽烈。周初分封的大小诸侯国，经历春秋、战国时代的争霸兼并，演变而为战国七雄，最后统一于秦。秦始皇统一全国，结束了分封制，建立郡县制，符合历史发展。

项羽灭秦后，"政由羽出"，实具有宰割天下的声威与势力。但他对如何巩固胜利，胸无成竹。如何安邦定国，缺乏宏规。对不愿释兵柄的六国贵族如何翦灭，对灭秦有功的农民将领如何妥善安顿，都无适当对策。他不知沿用秦制，设郡置县，以安天下，而却大搞分封，在六国残余势力割据局面的基础上，进一步"封裂天下，而分王侯"[24]，把全国划分为十八个王国，使一批六国残余势力的代表人物和秦朝的降将，重新公开登上封建割据的历史舞台，把这些头目的地位合法化，让他们据地自雄，各霸一方。项羽这种分封，实是倒行逆施，树敌召乱。他将其已形成的强大力量自行瓦解，而诸侯分封授地后，各诸侯国对霸王（项羽）具有相对的独立自主性，遂各自为谋。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保持其既得的利益和如何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不再关心霸王的利益，不再听从提调指挥，使项羽失去控制诸侯的权力。且不说一些六国残余势力受封后是持此种态度，即以跟随他起兵的英布而言，受封为九江王后，亦各自为谋，不听项羽提调。项羽北上击齐，征兵九江，英布称病不去，祗派将率军数千人前去助战。刘邦进击楚都彭城，项羽远在齐地，英布拥数万之众在淮南坐观成败，不引兵渡淮，急救彭城。这都足以说明项羽分封，把他已形成的强大力量自行瓦解。在楚汉战争中，项羽东奔西驰，孤军作战，未见有一个诸侯王对他做过真正有效的援助，这都是分封体制给他带来的军事上的孤立。兼之，他分封虽有一定的原则：论功行赏，无功不封。跟随他北上救赵，西进关中的有功诸将，多封善地；未随他入关作战的"故主"，徙于恶地；反秦无军功的，不封。如"田荣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陈余弃将印去，不从入关，亦不封"，"韩

王成又无功，故不遣之国”。[25]但他把巴蜀、汉中之地分给刘邦，把关中之地分给三个秦降将，就难做到尽满人意，使诸侯心服，也就使六国贵族残余分子如陈余之流有所借口，从中挑拨煽动，遂引起一些未受封的割据势力和拥有兵力的“故主”不满，怨恨项羽“为天下宰不平”，加剧了互相间的矛盾，为后来的纷争播下了种子。从此亦可以看出有人认为项羽搞分封，目的借以笼络人心，达到最后号令诸侯、统一天下的看法是不实际的。历史证明，这是把历史拉向倒退，把统一的国家搞得四分五裂。

巴蜀、汉中之地，沃野千里，物产富饶，关隘四布，形势险要。进可攻，退足守。项羽封刘邦为汉中王，让他统治这些地方，就如同以乳哺虎。刘邦还定三秦时，《华阳国志·汉中志》上说："高帝东伐，萧何居汉中，足食足兵”。在楚汉战争时期，隋何也说："汉王收诸侯，还守成皋、荥阳，下蜀汉之粟”。[26]可见巴蜀、汉中是汉军粮食供应的重要基地。巴蜀、汉中为前线提供大量的兵员和物资，成为汉军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项羽把巴蜀、汉中封给刘邦，可说是养虎自遗患。

“关中之地，金城千里”，历来都为兵家所必争。刘邦入关后，自以为按楚怀王的约言，他应王关中。他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收揽人心，取得关中地主阶级的拥护，也得到人民的支持。秦人都唯恐他不王关中。项羽把他排挤出关中，他忍忿去汉中就国，岂肯轻易放弃这块重要基地，他时时伺机东出。萧何为他制定的战略："收用巴蜀，还定三秦，以图天下”，已把还定三秦作为东出以图天下的第一步，可见“其志不小”。项羽防范刘邦东出是必要的，但以什么人来防范，事关大局，必须有深谋远虑。项羽分封时，鼠目寸光，把这一战略要地分给三个秦降将，实是战略运用上的大失策。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这三人已失关中人心，兵少力弱，怎能守着关中？怎能困锁刘邦，使他不得东出？韩信登坛拜将时，分析关中形势，认为“举兵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果然不久，田荣起兵反楚，项羽北上击齐，刘邦遂乘机率军出陈仓，迅速平定三秦，据有关中作为他图

取天下的根据地。这都是项羽缺乏深谋远虑，在战略上的失误。

三、项羽不都关中而都彭城的失策

项羽拒绝韩生的建议，不在“金城千里”的关中建都，而在“四战之地”的彭城建都，实是失策。就地略而言，关中是四塞之地，“带山阻河，地势便利”[27]，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据险以定都，对敌可获得主动与行动之自由。张良对关中的地形有精辟的论断：“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28]。彭城，“地势陆通，骁骑所骋”[29]，东南西北交通的冲要，中原地区的战略要地，无险以为固，四处均遭受敌人的进攻与骚扰。就经济而言，关中地处泾、渭河谷，土地肥沃。自西周以来，即已开发。经秦孝公废井田，开阡陌，长期从事水利建设，使关中成为天府之国。而彭城处淮、泗地区，战国以来，虽亦逐渐开发，但仍多荒芜未辟，兼有黄河为害，故其经济条件，不如关中。就交通补给而言，一旦有事用兵于关东，自关中沿渭水、黄河顺流而下，运输补给堪称便利，人力节省甚多，即张良所谓“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彭城虽有淮水泗水可供运输，但流量甚小，又处逆流，冬季水枯，运输多赖输卒。

项羽放弃关中，使刘邦后来乘隙还定三秦，据以建都。加以关中毗连富饶的巴蜀、汉中，在楚汉四年多的战争中，萧何转漕关中，使前方的军资和兵员的补给，不虞匮乏。而楚都彭城受彭越的袭扰、破坏，使楚军的后方补给常遭中断。项羽终因经济不敌，粮食缺乏而告失败。

综观项羽、刘邦在关中的一场斗争中，从表面上看，项羽是胜利了，而实际上播下了以后失败的种子。在这场斗争中，刘邦在策略、谋略的运用上：1.讲政治，军队守纪律，约法三章；2.卑躬屈节，利用项伯为之疏解；3.忍忿去汉中，伺机观变。这都显得高于项羽一筹。

刘邦还定三秦及向关东扩张势力经过示意图

（6—2图）

第二阶段　刘邦还定三秦

——自汉高帝元年（前206年）五月田荣反楚起至同年冬十月汉王迁都栎阳止，历时六个月——

（参看插图6-2）

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五月，田荣、陈余因未得封王，掀起反楚战争。田荣因未得封地，起兵反楚，夺占三齐地盘后，自称齐王。七月，他又指使彭越反楚。关东反楚战争爆发后，项羽感到对楚都彭城威胁甚大，急忙发兵进击田荣，这就使他无暇西顾，给雌伏在汉中的刘邦造成乘隙东进的机会。

经萧何的推荐，刘邦拜韩信为大将。韩信深知楚军内幕，他向刘邦详细分析天下形势和项羽为人，指出：

> 项羽不能任用贤能，不过是匹夫之勇。……至于用人，有功当封爵位者，他把印绶刻好，却舍不得给予，此所谓妇人之仁。项王虽称霸天下，使诸侯臣服，但他不都关中，而都彭城；违背义帝约言，以亲疏分封诸侯王，不公平；逐放其故主，而王其将相；又迁逐义帝，安置在江南；楚军所到之处，无不残灭；百姓归附他，实屈服于他的威势。名称为霸王，实失去天下人心。故其强大是易转变为弱的。今大王诚能反其道而行，任用天下武勇之士，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给功臣，何所不服；利用思东归之士以击东方之敌，此敌无不败散。且三秦王为秦将……秦父兄怨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项王强借威势封此三人为王，秦人是不爱戴的。大王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大王为关中王。按诸侯之约，大王应当王关中，关中人民咸知之。大王失职入汉中，秦民无不抱恨。今大王举兵而东进，三秦可以传檄而定。[30]

刘邦采纳韩信的建议，当即定下"决策东向、争权天下"[31]的决心，并作了东进的部署：

——命萧何留守汉中，镇抚百姓，并收取巴蜀租赋，以补给军队；

——命将军曹参统率郎中樊哙领兵数万为前锋；

——亲率大将韩信指挥将军周勃、太仆夏侯婴、中谒者灌婴等统兵约十万人续进。

同年八月，汉军潜出故道（今甘肃两当附近），袭击雍地，连败章邯于陈仓（今陕西宝鸡）、好畤（今陕西乾县），进围章邯于雍都废丘（今陕西兴平），又分兵略取陇西、北地、上郡，迫降了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刘邦实现了还定三秦的战略目的。为了有利于出关东进，他不顾废丘残敌，立即派遣薛欧出武关，联合南阳的王陵，迅速向东发展，但被楚军阻止于阳夏（今河南太康）。

这一阶段中，楚汉双方战略运筹的得失：

一、项羽战略运筹的失策

田荣、陈余起兵反楚，对项羽的声威是一重大打击。而齐地在彭城的侧后方，战乱发生，对项羽的统治也是一大威胁。项羽为了平定叛乱，安定秩序，维持声威，决心北击田荣，扑灭乱火，这一战略决策是未可厚非的。但他对各诸侯王的态度缺乏分析和认识，特别是对刘邦的实力和意图以及关中三秦王的力量不足以困锁刘邦东进，估计不足，没有预先制定妥善的应变方案，在战略准备上先输了一着。

二、刘邦战略运筹的得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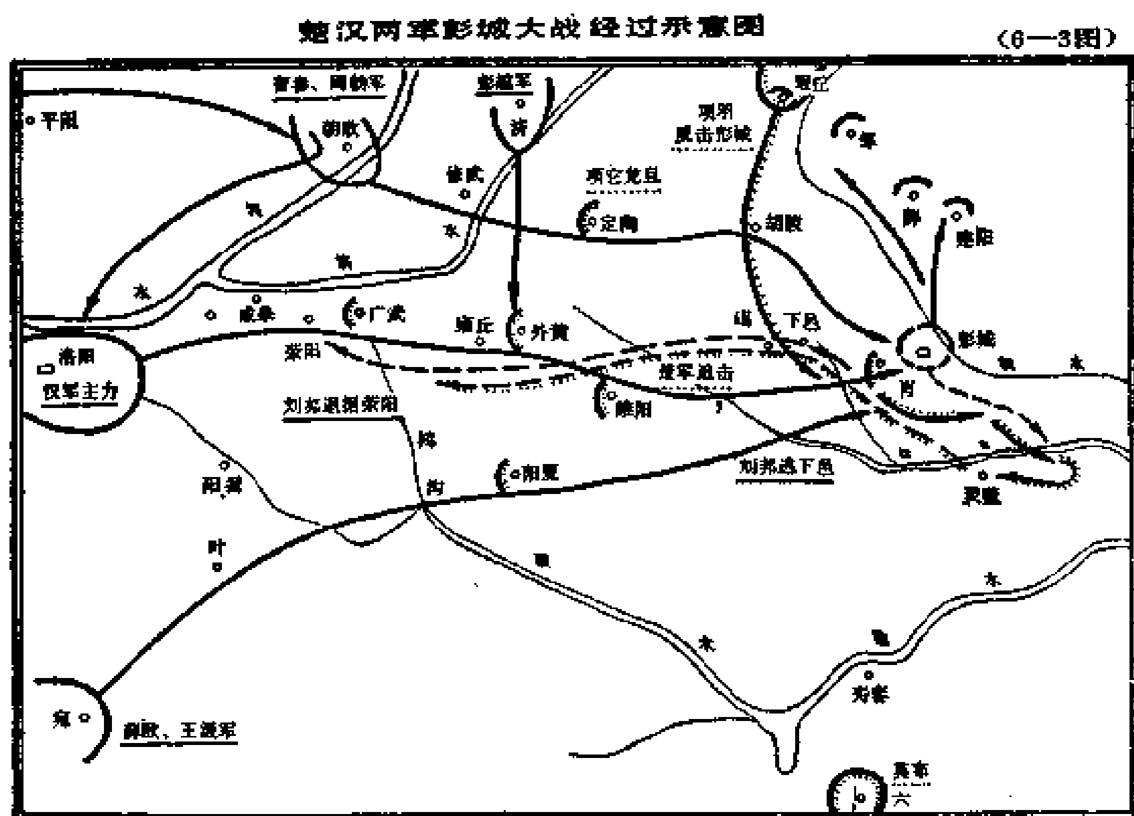
刘邦就封汉中时，兵寡力弱，不敌项羽。他为对付强楚，采取忍让待机、积极备战的方针，利用巴蜀财富，养民致贤，壮大实力，为东进争天下作准备，战略决策是明智的。当关东反楚战争爆发，他采纳韩信的献策，采取乘隙东进的战略，及时部署军队，迅速东进，以奇袭战法，利用栈道已毁所造成的秦人懈怠的心理，潜出故道，出其不意地袭击陈仓，给予章邯以晴天霹雳的打击，迫使他逃保废丘。刘邦迅速地还定三秦，在战略运筹上又先项羽一着。韩信向刘邦提出“不如决策东向”的建议，着重强调了士气的运用和进击时机的选择。他认为汉军的吏卒皆关东之人，日夜盼望东归，为汉军在汉中久安之后，士卒皆求自宁苟安，士气必会日趋怠惰。关中经项羽破坏后，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社会人心混乱。乘三秦王刚就国而情势尚混

乱之际，起兵袭取，自可迅速奏功。如果待天下诸侯已就国，给项羽以时间平定叛乱、稳定其宰制天下的局势，则楚军根基巩固，必不易动摇，故应乘其各地情势尚不安定之际而进击之。韩信这一献策，可说是洞察了天下大势，而刘邦毅然采纳，亦堪称果决善断。故汉军一出，即迅速取得辉煌的胜利。

第三阶段　楚汉彭城大战

——自汉王刘邦二年（前205年）春正月项羽在阳城击灭田荣起至同年四月刘邦败退到荥阳止，历时四个月——

（参看插图6-3）



楚汉两军彭城大战经过示意图　（6—3图）

由于田荣于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五月起兵反楚，七月，项羽北上击齐，使刘邦乘机于八月潜出故道，迅速还定三秦，并积极准备向东发展。刘邦为了麻痹项羽，还要张良写信给他，假意表示“汉王失职（未得为关中王），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32]又特意给

项羽送去田荣、彭越反书"齐欲与赵并(联合)灭楚"。[33]项羽因此错把田荣继续当成主要打击对象，"楚以此故，无意西，而北击齐"[34]，继续采取"先齐后汉"的战略方针，以主力攻齐，对刘邦暂取守势，只派曾任吴县（今江苏苏州）县令的郑昌为韩王，率少量兵力去阻击汉军东进。

汉王刘邦二年（前205年)春正月，项羽在阳城（今山东鄄城北）大破齐军，田荣败死于平原(今山东平原)。项羽立田假为齐王，进军至北海(今山东北部)。楚军沿途"烧夷城郭、室屋，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所过多残破"[35]，以致引起齐民群起反抗。田荣之弟田横得以乘机收集散兵数万人，立田荣之子田广为王，占据城阳（今山东莒县）一带，继续与楚军相抗。项羽进击田横，连战失利，被牵制在齐境。

刘邦利用项羽陷入齐人长期抵抗而不能自拔这一大好时机，一面巩固关中，一面扩张势力。

一、刘邦巩固关中的政策和措施

——汉王刘邦二年（前205年)冬十一月，刘邦迁都栎阳，以便统筹全局；

——派出诸将分兵略地，号召"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因此降者接踵而至；

——部署关中诸守备，命周勃守备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武关并修缮河上关塞；

——同年春正月，又派周勃率骑都尉靳歙等北定北地郡，西平陇西六县；

——二月，把秦朝的花园、猎场分给百姓耕种，以增加粮食生产；

——规定巴蜀、汉中百姓服军事劳役的，免租税二年，关中百姓从军的，再免一年；

——选举百姓中年满五十岁以上、有德行、能带领百姓做好事的一人为乡三老，选举乡三老中的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及廷尉共同执掌教育，免服徭役，借以安定地方。

二、刘邦扩张势力的战略行动

——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九月，派将军薛欧、王吸出武关，联合南阳的王陵，向东扩张势力；

——汉王刘邦二年（前205年）十月，刘邦亲率军出函谷关，进至陕（今河南陕县），河南王申阳首先投降；

——又派韩王信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击降了郑昌，控制洛阳附近有利地形，逼近楚地；

——同年三月，刘邦亲率曹参、灌婴等自临晋（今陕西朝邑东黄河西岸，亦名蒲津关）渡河，迫降了魏王豹，又攻下朝歌（今河南淇县），俘虏了殷王司马卬；

——平定殷国后，南渡黄河到洛阳，接受董公“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明其为贼，敌乃可服”[36]的建议，以项羽杀楚怀王为口实，分派使者向诸侯宣称天下共立义帝，而项羽竟杀害他，真是大逆不道。我愿尽发关中之兵，与诸侯共击项羽，为义帝报仇[37]。这一宣传攻势立刻得到不满项羽的诸侯的响应。陈余就首先发兵助汉，另一些诸侯则抱观望态度，不愿为项羽出力，使项羽相当孤立。

四月，刘邦乘项羽军胶着于城阳之际，率诸侯军约五十六万人即向楚都彭城进攻。其进攻彭城的战略布势如次：（参看插图6－3）

——命萧何镇守栎阳，筹集军资，以补给前方；

——命韩信负责继续围攻废丘的章邯；

——命曹参、周勃、樊哙、灌婴及赵军由朝歌经定陶、胡陵、出萧县、彭城；

——命薛欧、王吸、王陵由宛经叶县、阳夏，出彭城；

——刘邦亲率夏侯婴、卢绾、靳歙、司马欣、董翳和殷王司马卬、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信、魏王豹等由洛阳经雍丘、睢阳出彭城；

——大军进抵外黄，彭越率军三万人来会，刘邦命他继续袭扰梁地，掩护汉军侧背。

从刘邦的布势可以看出其战略方针是乘彭城守备兵力薄弱之

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袭取彭城，逼使项羽进退失据，予以歼灭。

项羽虽探知汉军由洛阳东进，但不愿改变继续攻打田横的决心，仍坚持"欲遂破之（齐），而后击汉"[38]的战略方针，仍以主力进击田横，对彭城的守备，只在定陶、曲遇（今河南中牟）、阳夏（今河南太康）、陈县（今河南淮阳）等地配备防守兵力。定陶重镇由魏相项它、将军龙且守备。

汉军进攻，进展顺利，沿途未经大的战斗，即进占彭城。刘邦占领彭城后，命吕后兄周吕侯驻军下邑（今江苏砀山东），封彭越为相国，命他略定梁地。命樊哙向北攻取邹、鲁、瑕丘（今山东滋阳西）、薛（今山东胶县东南）等地，以掩护彭城的安全。他自己在楚都"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宴会"[39]，以庆功绩。

项羽得知彭城失陷，才感到局势严重。一面留诸将继续击齐，一面亲自统率精兵三万人还救彭城。他率军出鲁（今山东西南部）南出胡陵（今山东鱼台），进至萧（今江苏萧县），乘刘邦在彭城尽情欢乐、毫无戒备之际，由西向东反击汉军侧背。早晨开始进攻，中午便大破汉军，将其压迫于谷地及泗水（在彭城东），死者十余万人。汉军向南方山地溃退，楚军追击至灵壁（今安徽宿县）以东的睢水上，又歼灭数十万人。刘邦率数十骑冲出重围，逃奔下邑。沿途收集散卒，逃回荥阳。（参看插图6-3）

三、楚汉双方战略运筹的得失

（一）项羽战略运筹的得失

刘邦还定三秦后，积极巩固关中，扩张势力。汉王刘邦元年（前206年）九月，即派薛欧、王吸出武关，联络南阳的王陵。十月，他又亲自出函谷关，招降了申阳。此时，项羽已在阳城大破齐军，击杀田荣于平原，另立田假为齐王，进军至北海。而田荣之弟田横拥立田荣之子田广为王，继续反楚。齐地叛乱未平靖，关中烽烟又掀起。项羽已处于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盱衡全局，是应留一员大将协助田假安定齐地，而自率楚军主力西向以进击刘邦呢？还是继续以主力扫清齐地反楚的残余势力，而只派一部兵力去阻挡东进的汉军呢？这是项羽

当时在战略运筹上面临的重大决策。分析当时的战争形势，齐地只有残敌未消灭，而刘邦欲出关东向、与项羽争夺天下的企图已很明显，已是项羽的主要敌人，其锋锐之势不是微小的力量所能抵挡的。项羽应预计击灭田广再挥师西向所需的时间和汉军可能的进展，转用楚军主力西向以迎击刘邦，才是上策。项羽当时未认清他的主要敌人是刘邦，竟被张良的两封书信转移了他对汉军的注意力，而继续采取"先齐后汉"的打击步骤，轻重倒置，不能不说是战略决策犯了错误。他在"先齐后汉"的错误决策指导下，不能关照好一系列的重要问题，以致影响全局。例如：

1. 以主力继续北上击齐，对西方采取的措施不适当。只以弱小兵力对西方防御，致使刘邦获得从容收拾关东及大河南北各诸侯之时机，使项羽的威望顿失，汉军在局部上造成优势，得以各个击破，乘隙东进，攻占彭城。这是项羽未能很好地关照好两个战场之间的关系，而影响了全局。

2. 击破田荣，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但不知道从政治上采取措施来安定齐地，巩固胜利。反而到处烧、杀、掳、掠，激起齐民的群起反抗，使田横得以再据城阳与楚对抗，以致连战不克，主力受制于齐，陷于齐人反抗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这是不注意政策，而影响了全局。

3. 项羽忙于前方作战，没有做好后方的巩固和保卫工作，以致彭城根据地被汉军轻易袭破。这是没有关照好前方与后方的关系，而影响了全局。

4. 反击彭城，行动果断坚决，能出其不意，以少击众，给汉军以歼灭性的打击，战役指导是十分出色的。但因主力留在齐地，反击的兵力不大，没有关照好下一阶段的作战问题。结果，虽然反击胜利了，但没有后续兵力投入战斗，勇猛追击，全歼残敌，致使刘邦得到喘息机会，整顿再战。这是兵力调配不当，没有把战役胜利发展为战略胜利，而影响了全局。

项羽反击彭城获得胜利的原因是他所统率的三万精骑，都是巨鹿

之战中俘获秦将王离所率的蒙恬北击匈奴的三十万人中的一部骑兵，内中多楼烦骑兵，行动快速，精勇异常。项羽获得这些优良的马匹与骑士，编成强大的骑兵集团，临阵突击，故能获得赫赫的战果。由于项羽使用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向彭城侧后方猛烈突击，切断汉军大后方的补给线，远出刘邦及诸侯军的意料，因而使汉军及诸侯军惊慌失措，数十万大军迅速溃败。

（二）刘邦战略运筹上的得失

刘邦还定三秦后，即迁都栎阳，实施一些发展生产、稳定关中根据地的政策和措施，并逐步向外扩张势力。在短期内各个击破韩、魏、殷，占领了中原及晋南的广大地区，造成继续东进的有利态势。战略实施步骤是稳健的。

他出关东进时，要张良给项羽写信说：刘邦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进；又说：齐欲与赵联合灭楚，促成项羽错误定下“先齐后汉”的决心，北上击齐，未遑西顾。从而使刘邦迅速扩大占领地区，壮大了力量，利于袭击彭城。

到达洛阳时，为义帝发丧，号召诸侯共同击楚。这一政治攻势有力地配合了他的军事行动。

但在夺占彭城之后，刘邦未能根据敌我及各方面的动态，乘胜决策，灵活指导作战，反而在彭城寻欢作乐，这是极大的错误。刘邦乘虚袭占彭城后，以为项羽的根据地已破，项羽失其凭藉。殊不知项羽的力量重心是在军队，而不在彭城。若不能击灭项羽的军队，即不能解决战争。刘邦攻占彭城，取得的是表面上的胜利，并没有消灭楚军的主力。由于刘邦对上述的关键性问题认识不清，故进入彭城后，竟日日置酒高会，产生心理上的懈怠，战备上的松弛，加之刘邦部队虽多，号称五十多万，但战斗力不强，而且由诸侯之军凑合而成，行动很难协调一致。虽说占领彭城，楚强汉弱的基本情况并未改变。根据当时情况，汉军攻占彭城以后的行动，应在巩固既得胜利的同时，继续贯彻乘隙进攻的战略，机动灵活地指导作战，有利就进，不利就退。但是，刘邦既没有乘项羽军胶着在齐地时，联齐夹击楚军，贻失了战

机，也没有整顿部队，激励军心士气，做好应敌措施。强敌当前，竟麻痹大意，在彭城恣意享乐，致使将士亦苟安懈怠，予敌人以可乘之隙。项羽乘机回军反击，他仓皇应战，遭到歼灭性的打击。

第四阶段 荥阳、成皋相持

——自汉高帝二年(前205年)四月下旬刘邦退至下邑起至高帝四年(前203年)八月楚汉双方划鸿沟为界议和为止，历时二年零三月——

彭城大战，刘邦的主力被歼，关东诸侯如河北的陈余，魏王豹看风转舵，又纷纷背汉向楚。关中的司马欣、董翳也乘机逃奔项羽。战争形势对刘邦非常不利。

汉王刘邦二年(前205年)四月下旬，刘邦退至下邑，认识到楚军兵强势盛，攻势凌厉，汉军势力不敌，不可能一举取胜。他企图让出关东地区，建立反楚联合势力，共同对付项羽。他问计于张良：

“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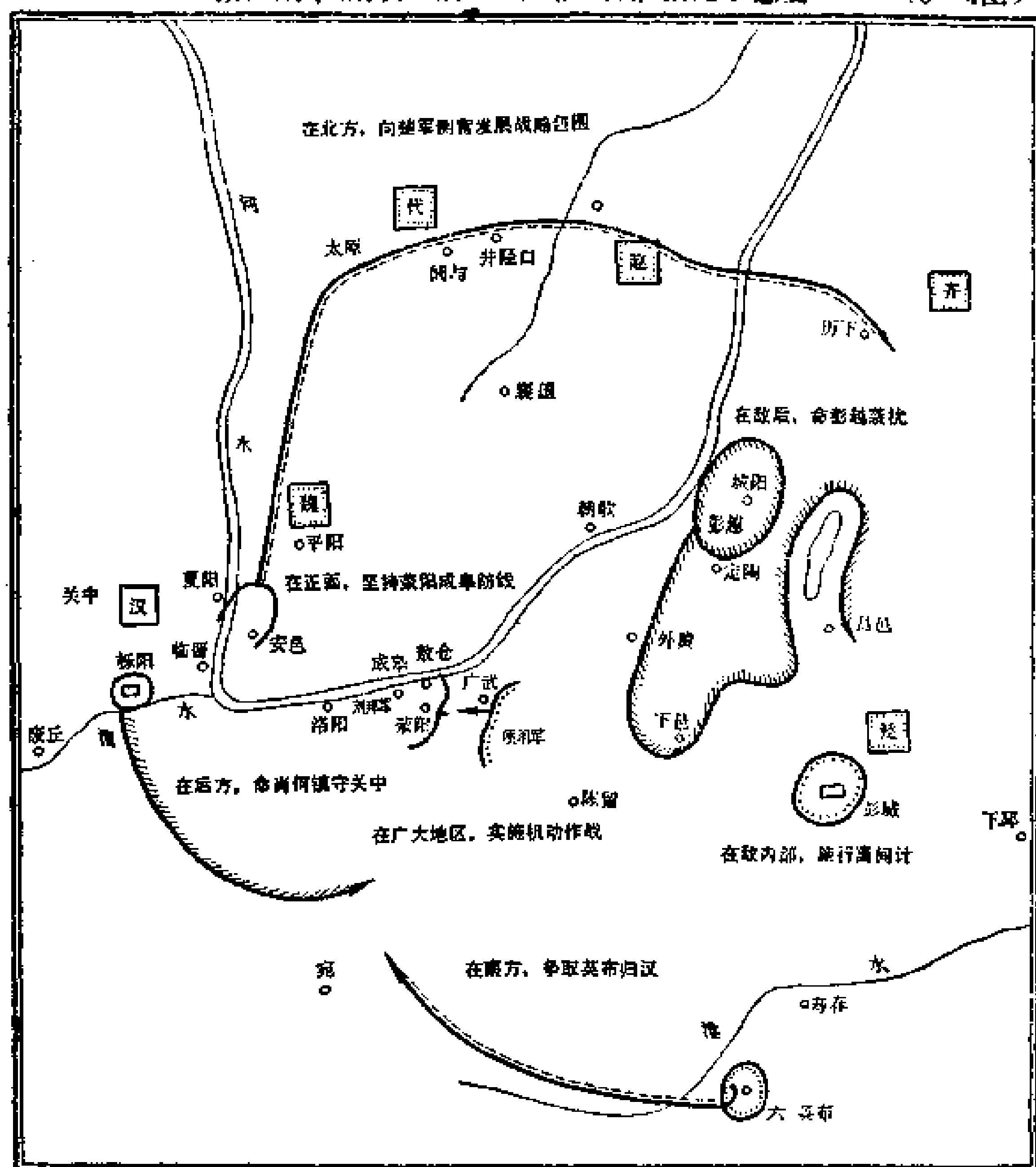
张良向他献策：

“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41]

张良建议刘邦，争取英布，重用彭越、韩信，从各方面结成反楚的联合力量。刘邦同意他的意见，随即率所剩余的部队，退守荥阳、成皋，分兵扼守险要，深沟高垒，进行持久防御，阻遏楚军的攻势，以争取时间，发展实力，消耗对方，待机破敌。两军在荥阳、成皋之间争夺共历二年零三月。在这两年多的时间中，项羽挟其优势的兵力，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企图从荥阳、成皋正面突破汉军防线，直捣关中，消灭汉军。而刘邦则逐步形成了一个坚持正面、发展两翼、袭扰敌后，并配合谋略运用以消弱楚军、伺机反攻的战略方针。其主要措施是：(参看插图6-4)

——在正面，刘邦亲率主力坚守荥阳、成皋、广武之线，阻遏项

荥阳成皋相持初期汉军战略形势和措施示意图　（6—4图）



羽的凌厉攻势；

——在后方，命萧何镇守关中，做好支前工作，保障汉军正面坚持和两翼发展；

——在北方，命韩信率一部兵力逐次击灭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向楚军侧背发展，形成战略包围；

——在南方，争取九江王英布背楚归汉，削弱项羽势力，并从南面牵制楚军；

——在敌后，命彭越在梁地积极活动，牵制和袭扰楚军；

——在敌内部，施行离间计，破坏其内部团结；

——在广大地区，实施机动作战和开辟新战场，以调动楚军，使之疲于奔命。

这些战略措施，自然不是同时并举，而是适应形势发展、分段逐步实施的。而坚守荥阳、成皋防线，不被楚军突破，是这一阶段中的轴心，是汉军转弱为强、转败为胜的关键，其他各项部署和措施都是围绕此项而实施的。如果正面不能坚守，防线被楚军突破，直逼关中，则汉军的处境也就不堪设想了。

这一阶段的斗争非常艰苦，汉军的战略运筹亦诡谲多端，分三项来论述。

一、建立荥阳、成皋战略防御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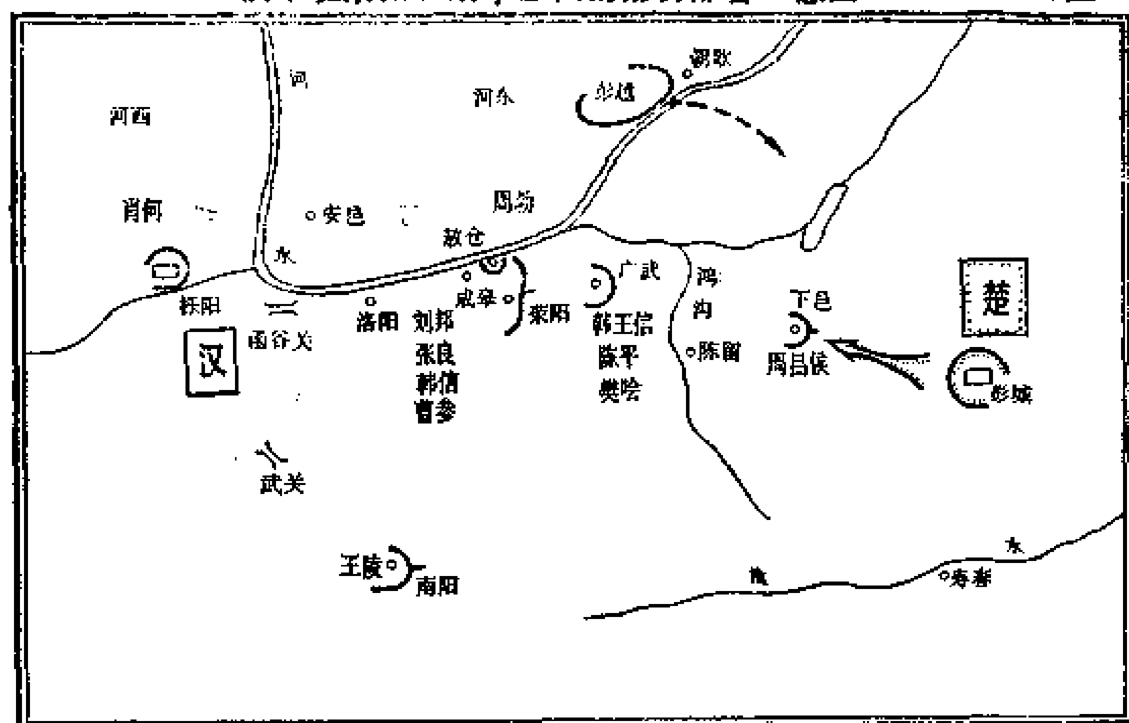
荥阳北据黄河，南依嵩山、伏牛山脉，西通关中。它的东南是开阔的平原。境内的敖山有敖仓，存储有大批粮食，中间有广武连接荥阳、汜水，地略上易守难攻。刘邦退据此地，收集残部，重建防线，萧何也征集关中兵员，补充前线，并派韩信率军增援，会师荥阳，使汉军的军势复振。楚军追击至荥阳以东的京、索间地区，企图突破汉军的荥阳防线，歼灭楚军。楚军拥有精锐骑兵，给汉军很大威胁。但楚军亦连战疲敝，无新锐部队投入，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刘邦利用秦的甲士李必、骆甲，迅速组建一支新骑兵，归灌婴统率，配合韩信的新锐部队，实施反击，击破楚骑于荥阳以东，使楚军不得再越过荥阳西进。刘邦巩固了这一战略重镇后，即以荥阳为核心，依据这一带战略地理的优势，组建了一条持久的战略防御线，修筑甬道与大河连接，输送敖仓粮食，以补给前线军食并调整部队的配备。（参看插图6-5）

——留周吕侯防守下邑；

——命韩王信、陈平、樊哙防守广武；

——命周勃防守敖仓；

汉军在荥阳、成皋正面的防御部署示意图　（6—5图）



——命王陵防守南阳；

——命彭越率军三万人驻守河东；

——刘邦亲率张良、韩信、曹参、灌婴防守荥阳。

在这段期间，还进行了以下四项重大的战略措施：

（一）巩固关中根据地，做好支前工作

汉王刘邦二年（前205年）六月，荥阳、成皋前线暂时稳定后，刘邦为了进一步巩固后方，留韩信防守荥阳，亲自统率周勃、樊哙等回到栎阳，作巩固关中的部署：

——立其子刘盈为太子，命萧何辅佐之，并赦免罪人，以安关中人心；

——令萧何镇守关中，制定法令，设置郡邑，调查户口，加强治理，转运粮食、兵员，不断支援前线，事有不及奏决者得以便宜施行，然后上报；

——亲率周勃、樊哙诸将围攻废丘，引水灌城，迫使章邯自杀，平定雍州，置河上、渭南、中地、陇西、上郡，至此关中地区完全平

定；

——发关中士卒加强四境边塞的守备，其主要者为临晋关、函谷关、峣关、武关；

——迁徙关中饥民，使就食于巴蜀、汉中，以消弭因关中大饥而可能引起的灾乱。

八月，刘邦以关中后方部署已定，仍回到荥阳前线，指挥作战。

（二）派韩信灭魏、下代、破赵、降燕，消除侧翼威胁

汉王刘邦二年（前205年）五月，汉军在荥阳正面阻止了楚军的西进，但由于魏王豹据河东（今山西南部）反汉，使汉军侧背上出现危局，对关中方面也造成极大威胁。刘邦为了拔掉侧背的这根芒刺，曾派郦食其去游说魏王豹，未能生效，就决心派韩信、曹参等击魏。同年八月，魏王豹集结重兵于蒲坂（今山西永济），塞断临晋（今陕西大荔东）交通，阻止汉军渡河。韩信采取"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役指导，集结船只，在临晋佯渡，而暗中却调动军队，"出其不意"地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用木罂（小口木桶）渡河，奔袭魏军后方安邑（今山西夏县南）。魏王豹仓皇应战，兵败被俘。刘邦平定了魏国，把魏降卒全部补充荥阳的汉军，加强正面的防御。

击灭魏王豹后，黄河北岸的代（今山西北部）、赵（今河北南部）、燕（今河北北部）以及山东的田齐等四个脆弱的割据势力，虽投靠项羽，但只图据地自保，也互不援助。韩信针对其弱点，即向刘邦提出"北举（占领）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42]的战略包围计划。刘邦同意，增给韩信兵力，并派熟悉河北情况的张耳去辅佐他。

同年闰九月，韩信率军擒代国的相国夏说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西北），攻破代国。接着越过太行山东进，乘胜进击赵国。汉王刘邦三年（前204年）十月，赵将陈余集中号称二十万的兵力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占据有利地形，立下壁垒，准备与汉军决战。谋士李左车分析敌情和地形，向陈余献策：

韩信、张耳"乘胜而去国远斗，其锋不可当。臣闻千里馈粮，

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行数百里，其势粮食必在其后。愿足下（指陈余）假（派给）臣奇兵三万人，从间道绝其辎重，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彼前不得斗，退不得还。吾奇兵绝其后，使野无所掠，不至十日，而两将之头可致于戏下。……否，必为二子所禽矣。”[43]

陈余认为韩信兵少而疲，不应避而不击，拒绝了李左车的建议。韩信侦知陈余未采用李左车之策，便指挥部队进至井陉口以西。夜半派出轻骑两千，各持一面红旗，从偏僻道路前进，隐伏在赵军壁垒附近。正面则以万人先出隘路，进至绵蔓水（今河北井陉东）东岸，在赵军壁垒之西背水列阵，故意引起赵军的轻视，以为韩信不知用兵。拂晓，韩信、张耳率主力到井陉口，诱引赵军出击，又佯装败退，进入背水阵。安置在壁垒内的赵军，认为汉军已败，遂空壁出击。汉军伏兵乘虚进入赵军壁垒，拔下赵旗，换上汉军旗帜。赵军攻背水的汉军，久战不胜，正欲撤退之际，突见壁垒上汉军旗帜招展，误认为将帅被俘，顿时大乱。汉军乘势夹击，大破赵军，斩陈余，擒赵王歇和李左车，平定赵国。

在韩信破赵之后，项羽虽几次派骑兵北渡黄河，袭击汉军，但因时机失去，未起作用，反使韩信、张耳来往救应，把赵地巩固起来，收赵、代精兵，以补充荥阳正面。

韩信向俘虏的李左车虚心请教破燕之策，李左车说：汉军虽破魏灭赵，威震天下，但众劳卒疲，其实难用。如只凭军事进攻，可能旷日持久。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方今为将军计，不如休整兵马，安抚赵国军民，摆出进攻燕国的态势，然后派遣一辩士前去宣扬汉军的声威，劝其归降，燕国就不敢不服。[44]这一建议即兵法上说的“先声后实”。韩信照计行事，燕国果然投降。

韩信、张耳破赵降燕后，率一部兵力南下，驻扎小修武，与成皋成犄角之势，以确保河内的安全。

（三）派随何说降英布，削弱项羽的势力

九江王英布在灭秦战争中屡建战功，是项羽帐下的一员勇将，封

地较大，拥有相当实力。九江王封地邻近楚地，可从南方威胁彭城。因此英布的背向，对楚汉双方关系甚大。英布与项羽有矛盾，双方表面上虽未破裂，但猜疑日深，因而给刘邦以离间的机会。

汉王刘邦二年(前205年)四月下旬，刘邦在败退途中，即问他的谋士隋何：

> "孰能为我使九江王，令之发兵倍(背)楚，留(牵制)项王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45]

隋何当即自荐，愿去说降英布。刘邦即派遣他出使九江。同年十一月，隋何到九江对英布说：

> 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而愿北向做他的臣子，必以为楚国强大，可靠以立国。项王北上击齐，身先士卒，大王理应亲率九江之兵为楚前锋，而却只派四千人助战，这岂是做臣子应有的态度。汉王进占彭城，项王远在齐地，大王理应引兵渡淮，急救彭城，却又拥数万之众而不发一兵一卒，坐观成败，这又岂是靠别人立国所应有的态度。大王空有向楚的虚名而想投靠项羽以自重，这样态度，实不足取。[46]

这一番话揭露了英布和项羽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击中了英布疑虑的要害。隋何接着又分析楚汉双方的强弱形势，诱之以利，说：

> 大王不肯背叛楚国，必以为汉弱小。其实，楚虽强大，天下之人都认为他行为不义，背弃盟约，杀害义帝。汉王收集诸侯之兵，退守成皋、荥阳，转运巴蜀、汉中之粮食，深沟高垒，分兵扼守要塞，楚军深入八九百里，老弱转粮于千里之外，汉军坚守而不动，楚军进则不得攻，退则不能解，可以说楚兵是不足恃的。如果楚战胜汉，则诸侯会人人自危而互相救援，故楚之强大适足以招致天下的反抗，因此说楚不如汉，其形势显而易见。现在大王不与万全的汉联合，而依靠危亡的楚，我实深为大王感到疑惑不解。我亦不认为九江之兵足以灭亡楚国，大王发兵而背楚，项王必受牵制。牵制数月，汉之得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指挥所属归附汉王，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淮南必大王有

也。[47]

随何说词从楚弱汉强的形势和反楚的利益加以比较，并以扩大九江王封地为引诱，故英布听后，心里同意，不过还不敢立即表态，与项王公开决裂。适值项羽派人到九江催促英布发兵，随何抓住这个机会，当着英布的面，向楚使宣布："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待发兵"。英布骑虎难下，不得不杀掉楚使，立即举兵[48]攻楚。

由于英布背楚归汉，项羽的侧背出现新的威胁。因此，他不得不分兵一部由项声、龙且率领前去进攻九江。双方战斗五十余日，英布兵败，收集残部数千人退走成皋。楚军虽进占九江，并未乘势向西发展胜利。而汉军既解了南方的威胁，并在南翼开辟了新的战场，达到了牵制项羽、分散楚军兵力的目的，减轻了荥阳正面的压力。

（四）派陈平施行离间计，破坏楚军内部团结

汉王刘邦三年（前204年）十二月，楚军数次侵夺荥阳甬道，使汉军补给发生困难。刘邦向郦食其征询破楚之策，食其建议立六国的后人以分楚势。这一危险的主张，幸而为张良所谏阻。刘邦又问计于陈平：

"天下纷纷，何时定乎？"[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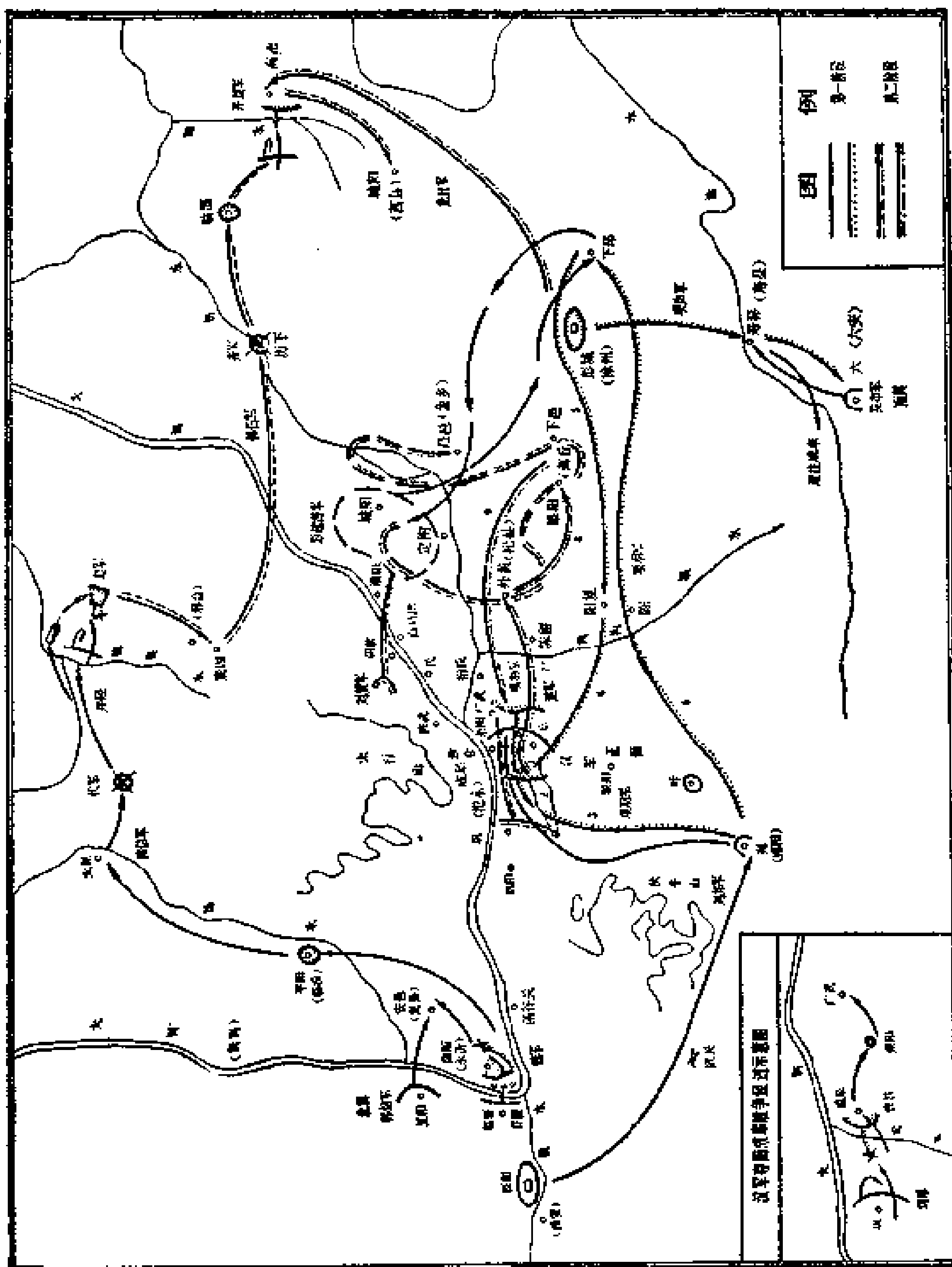
陈平献"离间计"。他分析楚军内部情况，认为项羽得力的将相，不过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数人，最好利用大量金银，施行反间计，使其君臣猜疑。项羽为人忌才，听信谗言，必引起内哄，自相诛杀，汉军乘机举兵进击，必能击破楚军。[50]

刘邦采纳陈平的计谋，给予黄金四万斤，使广布间谍，散播谣言，说：

"诸将钟离昧等为项王将，功多矣，然而终不得裂地而王，欲与汉为一，以灭项氏而分王其地。"[51]

果然使项羽怀疑其部属，不信任钟离昧等。楚军内部被分化，领导核心也逐渐趋于分裂。

二、楚汉两军反复争夺成皋（参看插图6-6）



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相持阶段中战役实施经过示意图

楚军夺占成皋：汉高帝三年（前204年）四月，楚军又开始大举进攻荥阳，采取在巨鹿之战中击破章邯的故技，数次袭击和破坏汉军运粮的甬道，荥阳危急。刘邦施用缓兵之计，请与楚议和，约以荥阳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归楚。范增劝项羽拒绝和议，积极进攻。适值此时，项羽的使者到汉营，陈平的离间已收效果，项羽怀疑范增与刘邦有私约，因而稍夺其权柄。范增发觉后大怒，说：

“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请让我告老归田）。”[52]

范增气愤离去，未到彭城，疽发背而死。

五月，楚军进攻荥阳益急，刘邦采纳将军纪信的“假投降计”，并派他伪装汉王，夜间簇拥出荥阳东门，扬言城中食尽，汉王出降，以欺骗楚军，刘邦乘间与数十骑出荥阳西门，逃走成皋，留韩王信与周苛、枞公等守荥阳。项羽发觉刘邦逃走，急追至成皋，刘邦西走关中，楚军夺占成皋。

汉军收复成皋：刘邦在关中收得一部分兵员，企图再东出，以恢复成皋。谋士袁生认为不是善计，向刘邦献策：

“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勿战，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安辑（安定）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防备）者多，力分（兵力分散）；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53]

刘邦听了袁生“调动敌人、分散其兵力”的作战方案，亦认识到从正面增兵去固守城池，被动挨打，终难免为项羽的猛烈攻势所击破，应采取主动的机动作战以调动敌军，藉以确保荥阳、成皋正面的战局。于是采纳袁生的建议，五月，率兵出武关，进军至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又命英布收集九江兵，作在楚军南翼发展攻势的姿态，果然迫使项羽留终公防守成皋，亲自率主力南下迎战汉军。刘邦坚壁不与交战。这时，彭越的游军正在梁地活动，刘邦为了把楚军向更远方向调动，便令彭越袭击楚后方，攻破下邳（今江苏邳

县)，大破楚将项声、薛公，夺占楚军粮运枢纽，并威胁楚都彭城。项羽首尾受敌，急忙率军东击彭越。楚军主力东调，刘邦急率大军及英布的九江兵北击终公，夺回了成皋。

楚军再夺占成皋：同年六月，项羽击破彭越军后，得知汉军又夺回成皋，即引兵西向，竭其全力，攻破荥阳，杀汉将周苛、枞公、俘虏韩王信，乘胜西进，又夺占成皋，汉军退守巩（今河南巩县）地区。

项羽在这一阶段作战中，自率精兵东奔西突，在各个战斗中虽获得胜利，但从全局上看，已开始疲于奔命，陷入被动地位，攻势无力，始终未能越过巩县西进。

汉军再收复成皋：刘邦第二次败出成皋，渡河入小修武，到韩信大营，收回了他所指挥的大部军队，增加于巩县正面，仍深沟高垒，消耗楚军。为了威胁楚军侧背，加强敌后活动，减低楚军对巩的攻势，刘邦拜韩信为相国，命他收集赵国兵率南下击齐，又派张耳守备赵地。八月，复派将军刘贾、卢绾率兵二万人、骑数百匹，从白马津（旧黄河渡口，在今河南滑县北）渡河，深入楚地，协助彭越烧毁楚军仓库、物资，断其补给。彭越得到有力支援后，于八月攻占外黄（今河南杞县东）、睢阳（今河南商丘）等十七城，截断了楚军成皋、彭城之间的联络和补给。楚军后方所受威胁越来越大，迫使项羽不得不停止对巩县方面的攻势，再次转用兵力东击彭越。九月，项羽率军东去时，留大司马曹咎防守成皋，临行告诫他：

> “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54]

项羽率军东击彭越，很快地收复了睢阳等十七城，但未能消灭这支游军，他们仍在梁、楚间积极活动，始终威胁着楚的后方。

在楚军主力未东调之前，刘邦感到楚军攻势凌厉，本想放弃成皋，谨守巩、洛。谋士郦食其深知成皋、敖仓地位重要，不应轻易放弃，他向刘邦提出建议：

>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夫敖仓，天下转输久矣，

臣闻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荥阳，不坚守敖仓，乃引而东，令适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资汉也。……愿足下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制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55]

刘邦采纳郦食其的建议，于高帝四年（前203年）冬十月，乘楚军东调、兵力分散之际，再度反攻成皋。曹咎最初遵照项羽的指示，坚守不出，但他经不起汉军数次挑战和辱骂的刺激，终于在一怒之下，率部出击。在未渡汜水（在成皋西）时，遭到汉军的攻击，曹咎兵败自杀。汉军再次收复成皋，乘胜推进至广武（在荥阳东北），并包围钟离昧军于荥阳以东。

三、楚汉两军广武对阵相持

前203年十月，项羽在睢阳得知成皋又失守，急忙由睢阳率军反击成皋。汉军依据险要地形，以逸待劳，坚守不战。楚军几次东奔西驰，部队未得喘息，精疲力竭，后方又不断受到彭越的游军袭扰，使楚军补给困难，战斗力衰退。此时，韩信入齐，破齐历下军，进至临淄，又迫使项羽分兵二十万援齐，既分散了兵力，又陷入两面作战，因此，对汉军正面攻击力量不足，两军对阵相持于广武。“数月，楚军食少”[56]，项羽求战心切，刺激刘邦说：

“天下匈匈（喧扰之意）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57]

刘邦给以答复的是：“吾宁斗智，不能斗力”[58]，并在两军阵前展开政治攻势，揭露项羽十大罪状，[59]以打击其军心士气。项羽受此刺激，欲战不得，欲退不能，被牵制在广武，“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60]，“兵罢食绝”[61]，实力锐减，丧失优势，形势极为严重。而汉军荥阳正面巩固，得到关中兵员、粮食的大量补充，“汉兵盛，食多”[62]，韩信又击破齐楚联军，进至城阳（今山东莒县），包抄楚军背后，完成对楚军的战略包围。汉军由弱转强，由劣势转为优势，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战略态势极为有利。

同年八月，项羽智穷力竭，“自知少助，食尽”[63]，不得已与汉军

订立和约，划鸿沟（在荥阳东）以西属汉，以东属楚，暂时休兵罢战，求得喘息以后，再卷土重来。

两军在广武对阵相持期间，影响战争全局者一为韩信东向击齐，发展顺利，完成了对楚军的战略包围。二为项羽运用策略争取韩信失败。现简述如次：

（一）韩信下齐完成对楚的战略包围（参看插图6-6）

韩信破赵降燕之后，北方仅存的田齐，早已附楚。田齐为了防止汉军进攻，在历下（今山东历城）作了抵抗准备。汉王刘邦三年（前204年）九月，刘邦派郦食其先以威胁利诱的外交手段，说服了齐王田广撤去守备，与郦食其饮酒言欢。韩信乘齐无备，于高帝四年（前203年）十月，袭破历下，进占临淄（今山东临淄），齐军败退高密（今山东高密），向楚求救。项羽派龙且率军二十万救援，与齐军会合于高密。当时有人建议用深壁持久战法以拒韩信，但龙且素来轻视韩信，早存轻敌之心，急于与汉军决战。十一月，齐楚联军与汉军夹潍水布成阵势。韩信秘密地派出万人，用囊盛沙，乘夜在上游把水堵起来，天明后，率主力进攻龙且，又佯败诱敌。龙且不察情况，还以为韩信怯战，盲目追击，上流汉军及时决水，把齐楚联军冲成两段。韩信挥军反击，全歼已渡河的齐楚联军，龙且自杀。在潍水东岸的军队，也不战而溃。韩信乘胜追至城阳，俘虏齐王田广，完全占领齐地。

韩信又命灌婴率骑兵深入楚地，纵横扫荡楚之大后方，捣项羽的家乡下相（今江苏宿迁），尽降徐（今安徽符离集）、僮（泗水东北）各城邑，又南渡淮河至广陵（今江苏江都东北）。灌婴对楚军大后方的扫荡，破坏项羽在淮河南北的粮仓，实予项羽以一致命的打击，益使楚军在荥阳、广武前方的将士，粮食缺乏，而不能再与汉军对阵相持。

韩信定齐后，名闻天下。他派人进言于刘邦：

“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请为假王以镇之”。[64]

刘邦得书大怒，骂道：

“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65]

张良、陈平蹑刘邦的足，附耳说道：

“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为守；不然，变生。”[66]

刘邦恍然大悟，即改口道：

“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67]

即派遣张良持印绶，封韩信为齐王，命他率军进击楚军。

韩信在北方战场上出奇制胜的三次河川战役，是他实施战略包围成功的关键。用兵制胜之道，不外“奇”与“速”两字的运用。而求达此两者，则又颇着眼于“因”，“因敌之势”，“因地之宜”，“因人之情”。韩信用兵，出奇制胜，可以说是极尽《孙子兵法》“兵因敌而致胜”的能事。他在定魏、破赵、下齐的三次战役中，均面临河川。他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指挥，出奇制胜。他以佯渡与奇袭相结合，声东击西、避实就虚的战役指导，击虏魏王豹，平定魏国。以背水为阵，诱敌出击，用奇兵袭取赵军壁垒的战役指导大破赵军，斩陈余，灭赵国。用囊沙堵水，诱敌半渡而击的战役指导，歼灭了龙且指挥下的齐楚联军，占领了齐国。这三次河川战役充分体现了孙子“战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原则。

（二）项羽运用策略争取韩信的失败

项羽得知龙且战死，大为恐惧，亦企图运用策略争取韩信背汉与楚连和。他派遣武涉去说韩信：

“今足下虽自以汉王为厚交，为之尽力用兵，必终为所擒矣。足下所以得须臾至今者，以项王尚存也。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项王今日亡，则次取足下。足下与项王有故，何不反汉与楚连和，参分天下王之！今释此时而自必于汉以击楚，且为智者固若此乎？”[68]

韩信未听从他的游说之词，谢绝他道：

“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背）

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69]

齐人蒯通深知当时韩信举足轻重，亦借相术游说韩信闹独立，与楚、汉“三分天下，鼎立而君”。他分析天下形势，说：楚汉分争，三年未决胜负，弄得智勇俱困，百姓疲极，无所归倚。观其形势，除非天下有贤圣之人，实不能平息天下战祸。如今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立而居。以足下（指韩信）之贤圣，拥有甲兵，因民之欲，为民请命，天下会风起而响应，孰敢不听从。割大弱强，以立诸侯，天下之人都会归德于齐，相率而朝于齐。愿足下深思熟虑。[70]

韩信认为汉王遇他甚厚，他岂可向利而背信弃义，蒯通又列举史事以切身利害挑动他说：

“大夫种、范蠡存亡越，霸句践，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归乎？”[71]

韩信婉言推谢说：

“先生且休矣，吾将念之（容我考虑）。”[72]

数日后，蒯通又劝说韩信早下决心，说：

“夫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也。时乎时，不再来。愿足下详察之。”[73]

韩信犹豫难决，不忍背弃刘邦；又自以为功高，刘邦终归不会剥夺他的权位，遂辞谢了蒯通的游说，忠贞不贰地尽忠于汉。

武涉、蒯通之徒劝说韩信背汉闹独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有的评论此事，认为两人观察天下形势的透辟，分析事物的精密，实少有人能与之匹俦，韩信不能用其谋，以致后来终归死于吕后之手，惋惜韩信对现实政治缺乏认识，毫无远虑。我们认为武涉、蒯通之徒实似战国时代的游说之士，鼓其如簧之舌，以巧言诡词劝说韩信“割大弱强以立诸侯”，实是制造新的分裂，不是“因民之欲”。楚汉分争，“天下之人肝胆涂地，父子暴骸骨于中野”，“百姓罢极怨望”。要息平天下

的兵革之祸，只有早日完成统一。两人劝说韩信闹独立，搞割据，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韩信未采纳两人的狂言，不愿"向利而背义"，举兵闹独立。"士为知己者用"，"虽死不易"，这是封建将领的高尚品质。韩信实不愧为古代一位智、仁、勇三者俱备的忠贞不贰的名将。刘邦平定天下后，吕后诬以"谋反"罪名，杀害他于未央宫。韩信不背叛于楚汉分争、兵权在握之际，岂叛乱于天下安定之日。对开国功臣，创业元勋，罗织罪名，妄加诛杀，实是封建统治者为消灭潜在威胁而采取的一种诈伪手段。

四、楚汉双方战略运筹的得失

在荥阳、成皋相持这一阶段中，楚汉双方的战略运筹的得失。

（一）刘邦战略运筹的得策

刘邦在彭城战败后，吸取失败教训，深知汉军兵寡力弱，不敌项羽。要争取胜利，须先采取战略防御，扼守险要，以阻遏楚军凌厉的攻势，争取时间，壮大自己，削弱楚军，待改变劣势后，再伺机反攻。在这一战略意图的指导下，其战略运用机巧灵活。现分几点加以论述。

1．坚持正面，阻遏楚军攻势

成皋枕山带河，毗邻梁楚，屏障关中。汉军凭藉之以阻遏楚军西进，楚军亦须夺占成皋，才能越过巩、洛，直捣关中。因此，它是楚汉两军必争的战略要地，亦是汉军机动兵力的轴心。汉军始终控制荥阳、成皋的优越地势，坚持正面，配合南北两翼的发展，派彭越游军袭扰楚军后方，迫使楚军不得不分兵南下九江，北上救齐，东击睢阳，分散兵力，减低楚军对荥阳、成皋正面的压力，才使成皋防线得以坚持。

2．运用谋略，策动英布归汉

楚军猛将英布拥有相当实力，占据淮南，可以西进南阳、武关，或配合项羽夹击荥阳，给汉军很大的威胁。刘邦运用谋略，策反英布归汉，等于折断了项羽的左臂，既解除了汉军南翼的威胁，又造成对楚军侧背的威胁，并牵制了项羽的西进。项羽分兵南击英布，减低对

荥阳、成皋的攻势，有利于汉军正面的坚持。刘邦派隋何策反英布这一着，是成功的战略运用。

3． 调动敌人，使之疲于奔命

刘邦失去成皋后，入关收兵，出其不意地南趋宛、叶，调动项羽率军南下求战，使正面所受压力得以减轻；又命游军袭扰彭城，调动项羽回军救援，疲于奔命，汉军乘隙夺回成皋。项羽转兵西向，再夺占成皋后，刘邦又派游军截断楚军粮道及后方联络。项羽为解救危急，不得不亲自率军东击睢阳，汉军又乘机夺回成皋。项羽再转兵西进时，因部队往返疲劳，未得喘息，攻势无力，已成强弩之末，难以突破汉军的防线。汉军采取机动战略，屡次调动楚军，使之东奔西驰，部队疲急，战力消耗。汉军逐步由弱转强，掌握主动，胜算也就在握了。

4． 争取外线，实施战略包围

汉军退守荥阳后，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都反汉附楚，荥阳正面几面受敌，汉军处境险恶。为扭转不利的战略态势，刘邦派遣韩信率军北渡黄河，一举击灭魏国，拔去背上芒刺。接着，韩信又实施北举赵代，南下击齐，西与刘邦会师荥阳的战略包围计划。汉军乘势破代，扫清东进障碍，东出井陉，击灭赵国，说降燕国，略定太行山以东地区，既解除汉军左侧威胁，又便于向楚军侧背发展。继又南下攻略齐地，进至城阳（今山东莒县），包抄楚军后背汉军东进数千里，争取外线，造成对楚军的战略包围，这一战略行动对楚项战争全局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项羽战略运筹的失策

楚军向西进攻时，项羽的战略运用缺乏全局眼光，未能适应战略形势的变化，掌握战机，争取主动。其战略措施往往轻重倒置，缓急不分，失策之处很多，导致损兵折将，削弱战力，丧失优势，终于陷入败局。

1． 专鹜正面强攻，造成顿兵挫锐

项羽驱使其精锐的楼烦骑兵对汉军的荥阳、成皋防线实施正面

突破，企图一举突破汉军的防线，歼灭汉军，收速战速决之功。故其所追求的打击目标，亦惟一意企求指向汉军的“重心”防线而粉碎之。因而只是强打硬攻，实施内线作战，凭军事实力去“力争”。形势变化时，未能采取有效的战略措施以主宰战局，致使主力被阻遏于荥阳、成皋间，旷日持久，一筹莫展。

2． 缺乏全局眼光，忽视翼侧发展

魏王豹据河东反汉，战略形势对楚有利。项羽未能掌握此良好战机，联魏夹击荥阳，或援魏直捣关中，或命魏王豹南下截断汉军前后方的联络和补给，实是战略运用上的失策。击破英布后，未乘势西取南阳，趋武关，威胁汉军的侧后方，这是没有把战役胜利发展为战略胜利，去影响战争全局，改变相持局势。

3． 忽视联合同盟，削弱反汉力量

彭城战后，陈余据赵背汉，项羽未及时与陈余结为盟好，为楚北藩，扼井陉之险，以阻止汉军在河北发展，项羽在战略运用上已先输一着。当韩信破魏灭代，挥军东进，欲越太行南下捣楚军侧背的企图已很明显时，项羽未及时援赵拒汉，藉以自固，而坐视赵国被击灭，实属失策。汉军灭赵之后，项羽才数次派骑兵渡河袭击汉军，反使韩信在来回救应中，把赵地巩固起来，更利于放手南下，入齐攻楚。这是项羽在战局急剧变化中，不能掌握战机，当行的不行，不当行的盲动，以致影响了全局。

4． 疏于巩固后方，以致疲于奔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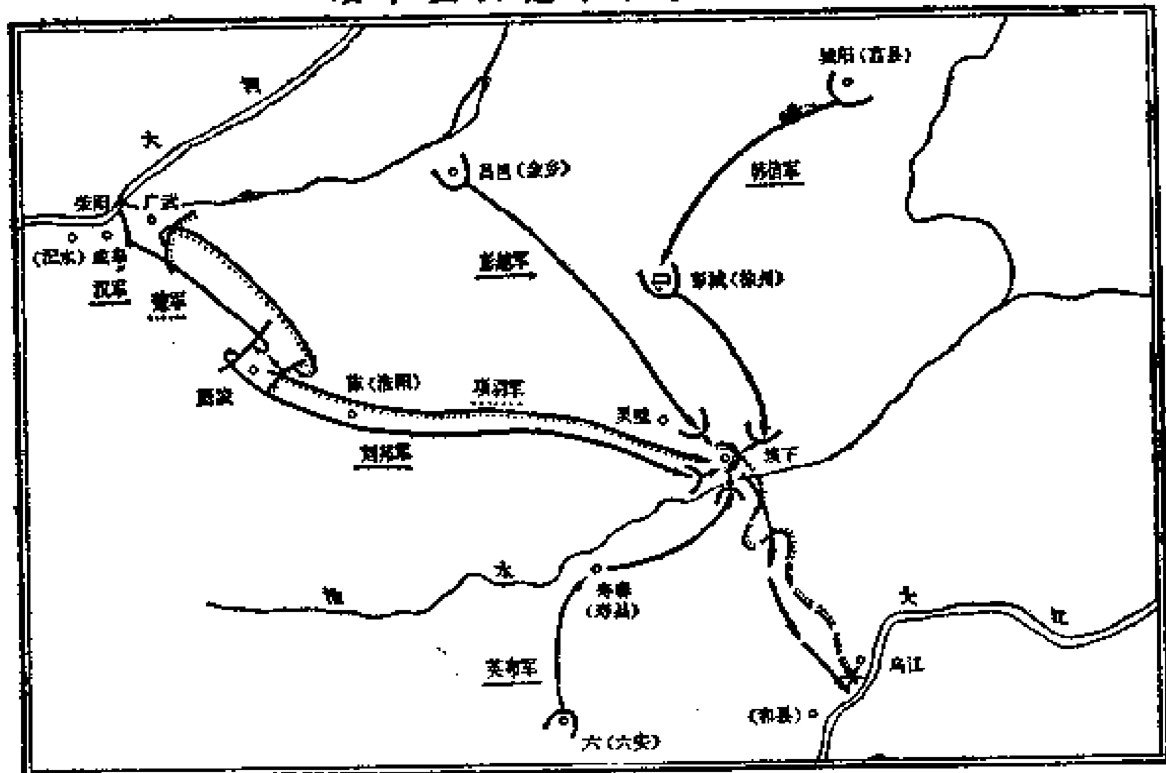
楚军虽然两次夺占成皋，未能进取巩、洛，都是因为后方不巩固，受到彭越游军袭扰，战略要地受威胁，粮道被截断，迫使项羽不得不一度回军救援彭城，再度回军东击睢阳。东奔西驰，兵力疲惫，对荥阳攻势无力，使成皋两得两失。后方问题是战略问题，项羽未统筹全局，注意巩固后方，未认真对付彭越的游军，给以歼灭性的打击，以致被游军调动，疲于奔命，影响了全局。

第五阶段　垓下围歼楚军

——自高帝四年(前203年)九月楚军引兵东归至高帝五年(前202年)十二月项羽自刎于乌江之畔止,历时四个月——

(参看插图6-7)

垓下围歼楚军示意图　(6—7图)



楚汉两军划鸿沟为界，订立和约，罢战休兵。九月，项羽向东撤退时，刘邦也打算西撤。但张良、陈平一致认为不能纵敌。他们说：

“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疲食尽，此天亡之时也。今释弗击（纵敌不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74]

刘邦遂决心利用项羽订立和约东撤时的麻痹疏忽，突然发起追击，并约韩信、彭越南下会师，全力歼灭楚军。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十月，刘邦追击楚军至固陵（今河南淮阳西北），但韩、彭按兵不动，未如期会师，楚军反击，大破汉军，刘

邦被迫坚壁自守。项羽滞留在固陵。刘邦问计于张良，张良认为楚兵且破，韩、彭没有得到封地，所以按兵不动，如能给予封地，他们自然会立即出兵[75]。于是刘邦划出睢阳（今河南商丘）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之地，封彭越为梁王。以陈（今河南淮阳）以东至海之地，封给齐王韩信。封地之后，韩、彭二人均来会师。

十一月，刘邦令刘贾率军南渡淮河，进围寿春（今安徽寿县），楚九江守将大司马周殷降汉，迎回英布与刘贾合军北上。彭越率军由梁南下。韩信率军由城阳西进，进占彭城。项羽四面受敌，才向彭城撤退，但为时已晚，乃转向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壕城集）撤退。十二月，刘邦调集韩、彭、英、刘各路军队四十多万人，包围项羽于垓下，楚军不过十万人，屡战不胜。楚军闻汉军四面楚歌，军心瓦解。项羽眼见大势已去，乘夜率八百骑突围南逃，至乌江。乌江亭长备船等待，对他说：

“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79]

项羽感到兵败途穷，无面目再见江东父老，不愿渡江，他对亭长言道：

“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77]

遂自杀于乌江之畔（今安徽和县东北长江边）。汉军全歼了垓下的楚军，获得了彻底的胜利。刘邦完成了统一事业。

在最后阶段中，楚汉两军的战役指导：

（一）楚军东撤到固陵进行反击，迫使汉军失利而坚壁自守时，项羽未趁机脱离敌军，迅速向远方撤退，保存实力，整顿再战，反而在固陵滞留不前，稽延时日，致使刘邦得以调集优势兵力，围困楚军于垓下，造成不良后果。这是项羽临危无决，不能果断行事，而陷入包围，以致全军覆灭。

（二）汉军及时实施追击，获得围歼楚军的彻底胜利。当项羽气

衰力竭，引兵东撤时，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不给敌人得到喘息而卷土重来，乘其疲惫疏忽，立即转入追击，把战役胜利发展为战略胜利。当楚军滞留固陵时，即调集各路兵力，形成绝对优势，围困楚军于垓下。项羽感到四面楚歌，大势已去，突围南走时，韩信派灌婴率五千骑兵紧随追击，其企图在于穷追而尽歼之。设非如此，将使项羽得以整顿兵力，卷土重来。因知追击是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战法，“宜将剩勇追穷寇”，切勿认为“穷寇勿追”。

综 合 论 述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项羽在战略运筹上的得失，已分段进行了评议。现就影响楚汉战争全局的五个战略性的问题，再作对比的论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论，往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管窥之见，一得之愚，提供研究参考。

一、人心向背是战争胜败的根本原因

刘邦、项羽入关，虽结束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而衰败破残的局面还未改变。当时人民愿望统一而厌恶割据，希望局势稳定而能安居乐业。谁的政治主张能符合人民的愿望，谁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就能获到战争的胜利。拥护刘邦的是广大农民，特别是旧秦朝的农民。他从入关时起，就注意稳定社会和安抚农民，发展生产，减缓苛税又采取为秦民所欢迎的措施“约法三章”，“除秦苛法”，“大赦罪人”，“秋毫无犯”，询问“民间疾苦”等。他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政权，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的，因而在客观上也就符合了人民的愿望。刘邦“反项羽之道”行事，获得人民一定程度的拥护，这是他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

项羽醉心于分封，扶持六国贵族的残余势力。他裂土分封的十八个诸侯王，六国后裔多达十余人。他杀掉韩王信之后再立郑昌，打败田荣之后再立田假，使割据混乱的局面更有所扩张，违背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反历史潮流倒行逆施。他行为残暴，“所过无不残灭”，在新安坑杀秦降卒二十余万。入关后，“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

灭，略其宝货、妇女而东”。攻占齐国后，“烧夷城郭室屋，皆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这些烧、杀、虏掠的暴行，引起人民的极度仇恨。这是他战败的根本原因。

二、争取同盟是壮大自己、孤立敌人的要略

项羽分封十八个诸侯王，让其据地自雄，他们的向背，对楚汉的胜败影响很大。故争取这些割据势力的亲附以孤立对手，在战略运用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刘邦兵寡力弱，为了战胜对手，始终贯穿着联合诸侯以制敌的方针，以对付兵多力强的项羽。他借口项羽杀楚怀王是“大逆无道”，加强政治宣传，“明其为贼，敌乃可服”，这就争取了诸侯的亲附，共同对楚。他联合陈余，招抚彭越，说降燕国，乘英布同项羽之间的猜忌，争取他背楚归汉。刘邦联合多数诸侯王以孤立项羽，壮大了汉军的声势和阵容。

项羽自恃强大武力以威慑诸侯，而诸侯不亲附。他缺乏政治眼光，不注意争取同盟，使借以困锁刘邦的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都背楚归汉。在他北上击齐、彭城失守、成皋大战时，各诸侯王都袖手旁观，不予支持。彭城战后，陈余、魏王豹等诸侯背汉，出现很好的形势，他也不能利用。诸侯附汉，亲信背楚，使项羽陷于孤立无援的不利境地。

三、人才是建业之本

将相组建军队，决胜负于阵战，关系着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和战争的胜败。故延揽人才以作股肱，有重大的战略作用。刘邦注意“招致贤能”，选择人才，用其所长，不存个人恩怨，不分亲疏内外。萧何、曹参是小吏，张良是破落贵族，灌婴是布贩，周勃是吹鼓手，但都是当时的俊杰，刘邦都予以重用，他从偏裨校尉中拜韩信为大将，排除非议而重用陈平。弱汉能击灭强楚，与他们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刘邦完成统一而置酒庆功时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填国家，抚百姓，给餉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78]刘邦具有统帅才能，善于将将，善于用

人，这是项羽所不及的。

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79]韩信、陈平皆当世俊杰，闲置不予重用，不得已而投奔刘邦。其余将相如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等被谗，范增愤而出走，周殷守九江时乘机降汉，其他诸人消沉自保，不愿为项羽出力。项羽不能用人，招致众叛亲离，领导核心分裂，军心士气因之涣丧。刘邦灭楚后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80]这是对项羽极为切实的评价。

四、善于运筹，才能决胜

要善于运用计谋以辅助战略的贯彻。运用计谋，善于斗智，才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杜预说：“以计（谋）代战一当万”。[81] 用计谋要同军事力量配合，以军事力量作后盾，计谋才易于实现。但是“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82]，要广集思益。刘邦重视智谋，也善于采纳他人的献策。他采纳韩信之策，抓住项羽、章邯的致命弱点，乘隙进攻而夺占关中；采纳张良之策，以韩信、彭越、英布独当一面，合力消灭楚军；采纳袁生计策，率兵趋宛、叶，调动项羽南下，解除成皋之危；采纳陈平之策，离间楚军内部，分裂其领导核心，瓦解其军心士气。刘邦还能虚心纳谏，如纳张良之谏，立即停止“复立六国后世”，避免一场危机；听从张良、陈平的劝阻，乘项羽东撤的机会，立即进行追击，获得垓下大捷。汉军将帅运用这些巧妙计谋，收到良好效果，使战略目的能顺利实现。

项羽“匹夫之勇”，刚愎自用，不纳良谋。他拒绝韩生建议，不控制“阻山带河”的关中，以致轻易失守；已闻刘邦由巩、洛东进，仍固执先破齐而后击汉的成见，遂失彭城；集中重兵攻荥阳，不能以计谋同军事配合，全凭斗力，以致旷日持久，顿兵挫锐，最后败退东撤。项羽在战场指挥上颇负盛名，不愧是一员叱咤风云的勇将，旌旗所向，敌军披靡。他具有一定的将兵用众的“将才”，但他不具备统帅三军，将将用士的“帅才”，更不是创业开国的“命世之主”。他取得许多战役上的胜利，如破田荣于齐地，败刘邦于彭城，打垮英布，击败

彭越，两次突破成皋，最后固陵反击。但他战略运用失策，全盘皆输，七十二战，战无不胜，忽闻楚歌，一败涂地。项羽自知兵败途穷，难以得脱。在垓下"悲歌慷慨，泣数行下"[83]，只得徒呼"奈若何"[84]了。"屠龙霸业输刘季，华表千年语夕阳"，这是后人在乌江霸王墓前留下的凭吊诗章。他"输"在那里呢？太史公评论项羽失败的原因，说他是"自矜功伐，……欲以力争，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85]，实属智者之论。

五、后方巩固实为战略运用的重要条件

后方巩固，补给充足，做到供应不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战争的胜败。刘邦一直重视后方工作，使社会安定，人民能安居乐业，以便征调租赋丁壮支援前线。在汉中时，他即令萧何收巴、蜀租赋以供军用。还定三秦和进略中原后，仍注意后方的建设，并发展农业生产。成皋大战时，在荥阳修筑甬道通黄河，与漕运联接，便于运输补给，也便于取敖仓之粮以供军用。并及时赶回关中整顿后方，运粮食兵员支援前线。他派萧何镇守关中，立法令，设置县邑，清理户口，加强治理，使社会安定，便于调兵集粮，源源漕运前方，使之"兵盛，食多"。刘邦还注意就地补充，减轻由后方的远程输送，把占领地区改为郡县，直接控制，便于利用人力物力，收魏、赵降卒补充荥阳。因而汉军无后顾之忧，与楚军持久，兵员军粮不感匮乏。

项羽不重视后方的建设和巩固工作，与对手相持荥阳时，因后方不巩固，粮道被截断，使前方补给遭到困难。项羽不注意政治策略，攻下齐地因暴行引起齐民反抗，使占领地区的人力物力不能利用。事实证明，兵员粮食不能有力支援战争，是楚军无力西进和尔后兵少粮尽，败退东撤的原因。

注　释

〔1〕 汉承秦历法，以十月为岁首，全年各月的顺序是：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月。

〔2〕《史记·高祖本纪》

〔3〕〔4〕《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

〔5〕〔6〕《前汉书·高帝纪》
〔7〕〔8〕《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
〔9〕原文见《前汉书·萧何、曹参传》
〔10〕〔11〕〔12〕〔13〕〔14〕《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
〔15〕〔16〕《史记·项羽本纪》
〔17〕〔18〕《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
〔19〕〔20〕〔21〕〔22〕〔23〕〔25〕《资治通鉴·卷九·高帝元年》
〔24〕《史记·项羽本纪》
〔26〕《史记·黥布列传》
〔27〕〔28〕《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
〔29〕《资治通鉴·卷六十八·建安二十四年》
〔30〕〔31〕原文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32〕《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二年》
〔33〕〔34〕《史记·高帝本纪》
〔35〕《史记·项羽本记》
〔36〕〔37〕《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二年》
〔38〕《史记·项羽本纪》
〔39〕《资治通鉴·卷九·高帝二年》
〔40〕〔41〕《史记·留侯世家》
〔42〕《前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43〕〔44〕《史记·淮阴侯列传》
〔45〕〔46〕〔47〕〔48〕〔49〕〔50〕〔51〕〔52〕〔53〕〔54〕〔55〕《资治通鉴·卷十·高帝三年》
〔56〕〔57〕〔58〕〔59〕《资治通鉴·卷十·高帝四年》
〔60〕〔61〕《史记·项羽本纪》
〔62〕《史记·高帝本纪》
〔63〕〔64〕〔65〕〔66〕〔67〕〔68〕〔69〕《资治通鉴·卷十·高帝四年》
〔70〕〔71〕〔72〕〔73〕《史记·淮阴侯列传》
〔74〕《资治通鉴·卷十·高帝四年》
〔75〕〔76〕〔77〕〔78〕《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
〔79〕〔80〕《史记·高祖本纪》
〔81〕《晋书·杜预传》
〔82〕《兵经百篇·谋字》
〔83〕〔84〕〔85〕《史记·项羽本纪》

第七章　西汉平息内忧与消除边患的主要战争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刘邦胜利地结束了楚汉战争，建立起统一的西汉王朝。当时由于秦王朝的残酷统治和长时间的战争破坏，社会残破，民生凋敝，外有匈奴的严重威胁，内有异姓诸王的心腹隐患。因此，发展生产，平息内忧，消除边患，就成了西汉统治者为了安邦定国必须迅速解决的三大战略任务。这三大任务经历刘邦、刘恒、刘启、刘彻四代的不断努力，耗用了六十年的岁月，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对内，休养生息，发展生产，消除隐患，巩固内部，主要进行了平定吴楚七国之战；对外，和亲息边，争取时间，做好战备，富国强兵，实施了大规模反击匈奴之战，才使汉室江山，臻于巩固富强。至于武帝对西南夷、东、南越和西羌等兄弟民族的战争，无重大战略问题可资探讨，故不一一论列。

完成三大战略任务非一代之功，是逐步实现的。在完成过程中，刘邦的宏规，文、景的治绩，刘彻的雄才大略，将帅的运筹决策，相互为用，稳健灵活、影响深远。本章特就重大的战略问题作初步的探索。

第一　西汉王朝建立后的内忧与边患

西汉开国初期的内外形势：

内忧：民生凋敝国力弱，异姓王是心腹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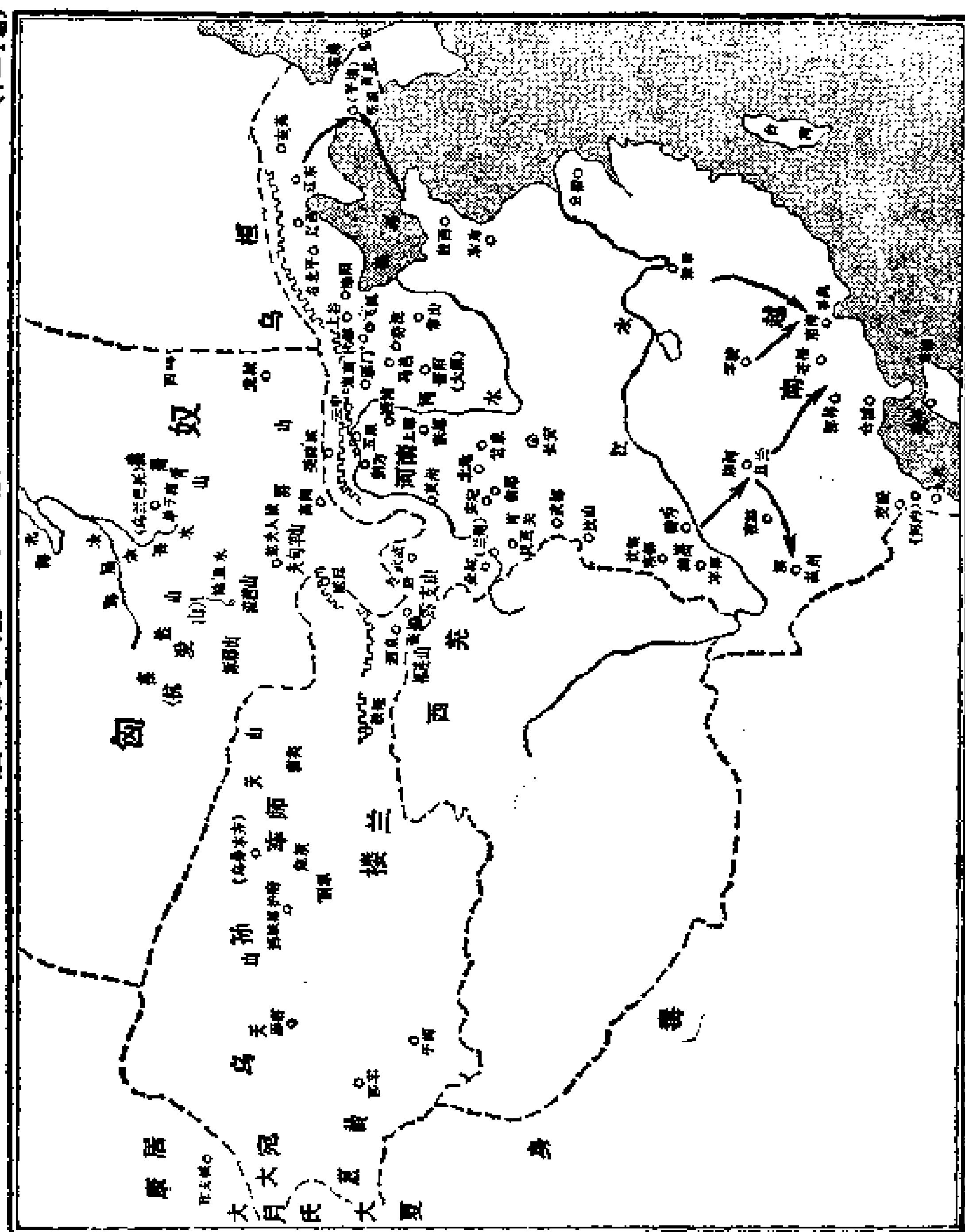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刘邦即皇帝位，定都洛阳。这时楚汉战争刚刚结束，人口锐减，田园荒芜，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物资财富消耗殆尽，死于战乱和饥荒的超过了人口的半数，“大都名城散亡，户

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1]汉高祖路过曲逆(今河北完县东南)，那里原来有三万多户，战争以后，仅剩下五千多户，他还称道这个城市的繁荣同当时的洛阳差不多。当时海内贫困，百废待兴。“自天子不能具钧驷(四匹马也配不成一色)，而将相或乘牛车”。[2]而西汉又存在着心腹隐患。韩信、彭越、英布是汉军的得力将帅，掌握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在楚汉战争中举足轻重，刘邦为战胜项羽，不得不封他们为王。他们既有封地又有军队，在消灭项羽完成统一之后，就成了汉室的严重隐患。特别是刘邦年事已高，他死后，缺乏统治和作战经验的小皇帝，制服不了能征惯战的韩信等人。这是西汉统治者深以为忧的。

边患：匈奴袭扰北方边郡，威胁西汉安全。

匈奴是我国北方一个强大的兄弟民族，聚居在阴山南北的广大草原上，长期过着“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3]的游牧生活。春秋战国之际，匈奴不断发展、壮大、南进，威胁着中原的安全。战国时代，秦、赵、燕为了防御匈奴，都在北部边界修筑长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置了陇西、北地、上郡、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等郡(参看插图7-1)，并把这些长城连接起来，用以加强对匈奴的防御，这就是“万里长城”。秦始皇又命大将蒙恬率十万人进击匈奴，匈奴逃往漠北，有十多年不敢南下。秦亡，楚汉相争，冒顿单于崛起，拥有“控弦之士（指骑兵）三十万”。[4]他英勇善战，东边灭了东胡，占有今内蒙东部和东北西部地区；西边，把原在河西走廊的大月氏赶到葱岭以西，占有祁连山、天山南北地区；南面，并吞了楼烦王、白羊王，重新占据了蒙恬所收复的全部河南地（黄河河套地区，今内蒙伊克昭盟)，不断袭扰汉西北各郡，直逼朝那（今甘肃固原东)、肤施（今陕西榆林南）和燕、代(今山西、河北两省北部)，控制了中国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一个全族男子皆兵的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建立起来，对西汉王朝构成了严重威胁。

匈奴的政权组织和军事组织是合一的。匈奴的最高统治者叫单于，单于之下设左、右贤王（即屠耆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称贤者为“屠耆”，所以常以


西汉边郡图

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大当户，都是世袭的贵族，共二十四长，由他们分别统率军队，大的有骑兵万余，小的也有数千。二十四长以下又各自设置千长、百长、什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单于又将全部疆土分为三部：左贤王统治东部，与西汉的上谷郡（郡治在今河北怀来南）及其以东地区接壤；单于直接统治中部，与西汉的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东北）、云中郡（郡治在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南）接壤；右贤王统治西部，与西汉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南）及其以西地区接壤。

匈奴骑兵作战的特点据《汉书·匈奴传》说，匈奴成年男子力能弯弓，全部都是甲骑。平时随畜群迁徙以打猎为生，有事则练习攻战，从事攻伐。他们使用的兵器是弓矢和刀铤（铁把小矛）。"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匈奴奴隶主发动战争的目的是掠夺奴隶和财物，供其奴役享用。《汉书·匈奴传》载，匈奴打仗时，能杀死敌人就赏酒一卮（酒具），所得虏获就给予个人，抓到俘虏就是他的奴婢。所以打仗时"人人自为趋利，善为诱兵以包敌。故其逐利，如鸟之集，其困败，瓦解云散矣。"[5]

概括起来，匈奴骑兵作战有以下特点：

——重虏获，人人身为趋利，利则进，不利则退；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骑和射，既是生产手段又是战斗手段，所以战斗力强；

——飘忽不定，聚散无常，机动力强；

——善于突然进袭，诱敌和包围。

西汉初期国内外的形势，正如刘邦自己说的"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西汉王朝能否存在下去和得到巩固，还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　刘邦治国的战略措施

刚刚建立的西汉王朝，实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刘邦为了巩固统治，

在他死前七年之间，先后采取了下列战略措施。

在平息内忧方面：

一、建都长安，充实关中

汉高帝五年（前202年）夏，齐人娄敬到陇西去戍守，过洛阳时，入见汉高帝，建议建都长安，他说：

“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6]

刘邦问张良，张良也说：

“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7]

刘邦决定入关，迁都长安。拜娄敬为郎中，赐姓刘。

刘敬从匈奴回来，又提了一条建议，他说：

“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可益实。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皆各国的豪强、贵族）莫能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民，东有六国之强族；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8]

刘邦接受了这个建议，迁十余万口充实关中。对防备匈奴袭击关中也是一条有利措施。

二、翦灭异姓王，大封同姓王

汉承秦制，加强中央集权，以巩固国家的统一。当时妨碍国家统一的障碍，是据地称王的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衡山王（后改称长沙王）吴芮、闽越王无诸（越王勾践的后裔）、南越王赵佗。这些异姓王除了吴芮、无诸、赵佗三人在本国内起着保境安民的作用外，其余诸王皆

拥有强大的兵力，各据一方，和朝廷分庭抗礼，大大削弱了中央政权的力量。刘邦从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到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利用了七年的时间，处心积虑地把他们一一加以翦灭，消除了肘腋之患。

在翦灭异姓诸王的同时，刘邦"惩秦孤立而亡"[9]，认为秦虐用其民固然是速亡的重要原因，而秦始皇废分封，"子弟为匹夫"，"孤立而亡"。因此，他又大封刘姓子弟为王：刘交为楚王、刘恒为代王、刘肥为齐王、刘恢为梁王、刘友为淮阳王、刘长为淮南王、刘濞为吴王、刘建为燕王、刘如意为赵王，并与大臣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10]

刘邦认为异姓王侯，分封割据，拥有重兵，容易滋长叛乱、夺权的野心，危害中央皇室。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应当翦除。他认为大封刘姓子弟为王，凭藉血缘之亲，以共同拱卫中央皇室，方可维系刘氏江山于千秋万代。殊不知权位之争，无论亲疏。春秋时代，子弑父、弟杀兄的篡夺之争，屡见史册。刘邦所接受的这一历史教训是错误的。分封同姓王制造分裂，同样不利于社会发展，同样不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削弱中央集权，为后来吴、楚七国之乱种下了祸根。

三、休养生息、恢复生产

汉初，由于社会残破，民生凋敝，和对秦法苛烦的厌恶情绪，"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占统治地位，认为统治者少搞点措施，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如萧何死后，曹参为相，"萧规曹随"，凡事皆循旧例，百姓歌之曰：

> "萧何为法，较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11]

这对当时情况来说，是有利于人民的。

刘邦为了安抚人心，克服经济困难，恢复社会秩序，采取了以下一些措施：

（一）复员军队。赐给军吏卒以爵位，根据军功爵位高低赐给土

地，并在一定年限内免其徭役，“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免其徭役）十二岁，其归者半之。”[12]“令吏卒从军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复终身勿事（免其终身徭役）。”[13]“令士卒从入蜀、汉、关中者皆复终身。”[14]

（二）招抚流亡。“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户籍上没有的），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官吏应晓以理义而不应体罚）。”[15]

（三）释放奴婢。“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16]

（四）鼓励生育。“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免役二年）。”[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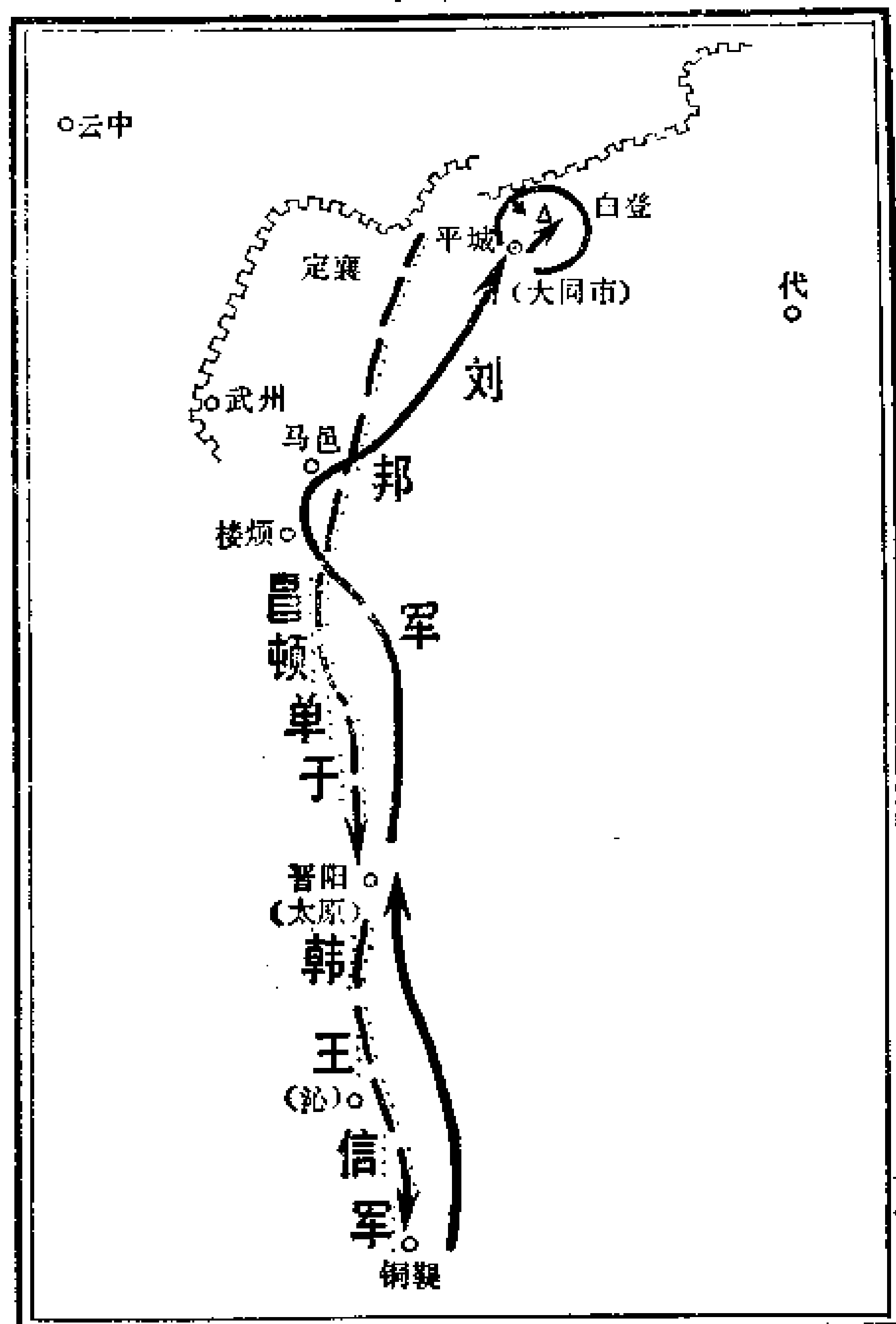
（五）减少赋贡。为了减轻赋敛，“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以户口计算），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18]

在消除边患方面：

一、抗击匈奴、平城被围

汉高帝六年（前201年）秋，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今山西朔县），九月，韩王信投降，引导匈奴军南下攻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韩王信所部一直深入到铜鞮（今山西沁县南）。汉高帝七年（前200年），刘邦亲率步骑三十二万（参看插图7-2），从晋阳北上迎击，连战皆捷，乘胜追击，克复楼烦（今山西宁武）马邑等地。刘邦见匈奴骑兵北走，以为匈奴军力不过如此，滋长了一举荡平匈奴的念头，就连续派人侦察冒顿军情。冒顿得知这一情况后，为引诱汉军深入，把壮士和肥壮的牛马隐藏起来，看得到的都是羸瘦老弱的人畜。所以汉军侦察都说匈奴人马老弱可击。刘邦竟等不及直接派往匈奴窥探军情的使节刘敬的回报，就要率军北进。御史阻谏也不听。大军越过句注（今山西雁门山）时，刘敬回来向他报告：匈奴是故意示弱诱敌，不可轻进中伏。刘邦大怒，竟将刘敬关押。汉军步多骑少，刘邦亲率骑兵向北急进，到达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地区）时，步兵还远在后方。刘邦又前出到白登山（平城东北三十里）。冒顿遂纵精骑四十万把白登团团包围。刘邦被困七日，粮草不继，人马俱困。刘邦无奈，用陈平秘计，派人厚赂阏氏（匈奴的皇后）[19]，匈奴军才撤出一角之围，刘邦由此逃出白登，与大军会合，引兵而归。

刘邦平城被围图 （7—2图）



二、怀柔政策，和亲睦邻

平城之围后，刘邦看到匈奴军力雄厚，而且都是骑兵，汉军难与争锋。更重要的是他还有内顾之忧，也沒有力量支持战争，所以他悄悄地撤回对匈奴的大军，把眼光转向内部，这是明智的。汉高帝八年（前199年）匈奴又数次扰边，刘邦问计于刘敬，刘敬献计说：

"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缺），数问遗（给他），因使辨士风谕以礼节……可无战以渐臣也（可不战而逐渐达到臣服的目的）。"[20]

刘邦审时度势，同意了他的意见，于第二年，以庶人家女，名之为公主，嫁给单于，叫刘敬送去并缔结和亲之约。

平城之围是一次轻敌冒进的严重挫折。楚汉战争中，刘邦倾全力战胜项羽，无暇顾及匈奴，对匈奴的情况缺乏了解。及至战胜强敌项羽，又感到"威加海内"，不可一世。在收复晋阳，挥军北追时，又见匈奴军屡次败走，于是不待了解敌情，不作全面的计划部署，就想乘胜猛进，一举歼敌，以致中了单于诱敌之计，遭到平城之围。这个教训是值得吸取的。随后，他知难而退，悄悄收兵是明智的。和亲政策也未可厚非，和亲可以换取边郡的暂时安宁和休养生息的时间，以便腾出手来去解决更为迫切的内部问题。当然，和亲只能缓和边患而不能消除边患，而缓和又是有限的，时起时伏的。从此，和亲政策一直执行了六十多年，边境上出现了时松时紧，匈奴进攻的规模和间隙时大时小的局面。

第三　文、景两代息内忧、消边患的战略措施

刘邦死后，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帝懦弱，吕后专政，大封吕氏子弟为王，刘氏皇族与吕氏子弟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惠帝、吕后死了，大臣陈平、周勃联合齐王刘襄、朱虚侯刘章，夺回军权，一举平定了诸吕之乱，立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西汉王朝遂由建国粗安走向蓬勃发展。

在消除边患方面：

从平城之围到汉景帝后期，西汉王朝对匈奴一直采取防御与和亲相结合的方针。这期间和亲凡六次，匈奴较大的进攻达十余次，每次和亲只能换取数年的平静，边塞烽烟，迄未清息。汉文帝前六年（前

174年），贾谊向汉文帝陈述汉、匈形势说：

天下之势方倒悬。……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恭敬，为天下患，至无止境。而汉年年送金、絮、采、缯以奉献之。……今西、北边郡虽受高爵之赏，犹将御寇，不得复除逸豫。边民无论大小皆当自为战备，斥候瞭望烽燧，不得安卧，将吏身被甲胄而睡。……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以往，何以了解。[21]

汉匈两方的形势如此颠倒而不能扭转，贾谊为此而流涕，建议文帝要“猎猛敌”，全力对付匈奴。汉文帝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寇掠狄道，数为边患。晁错又上书文帝，陈述防御匈奴的方略，说：

“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殴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砥厉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以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有大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22]

晁错又引申言之说：

“兵（兵器）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矢锋）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23]

晁错还陈述守边备塞、劝农力本，为当世的急务，建议汉文帝利用“以夷制夷”之策并徙民、输粟实边，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综合西汉文、景时代对匈奴进攻所采取的防御措施是：

一、在边关要地配置边防军

汉代的边防军由边境上的郡国兵和屯田兵充任。对付匈奴的进

攻，主要依靠边郡太守和都尉率兵防堵。边郡上的太守大多知兵。如名将李广就长期在边郡担任守备，他先后充任上谷、上郡、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的太守，与匈奴对阵几十年。由太守统率郡兵守卫边疆，只有在匈奴入侵兵力强大时，方征发车骑、材官（步兵），并派出郡号将军（如陇右将军），加强防守。

二、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守边

这是晁错向汉文帝提出的建议。他认为：

"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不）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加配）边郡之良骑，命令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之良将，以陛下（指皇上）之明令统率之，使其守备险要之处，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扼守，两军互相策应，各用其长技，配合边民共同守边，此万全之术。"[24]

三、徙民、输粟实边

这亦是晁错提出的"筹边策"。他认为：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游牧为生），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往来转徙……时至时去……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窥察）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边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更换），不知胡人之能。"[25]

因此，他提出"徙民实边"的建议，其办法是：

（一）在边境要害之处、通川之道，建立城邑，高城深堑，以防袭扰。每一城邑统计徙民不下千家。

（二）在城邑之中修建房舍，配置农具，如设置医、巫，以救疾

病、修祭祀，使男女有婚配，生死相䘏。

（三）愿徙居的人，有罪者，免其罪，无罪者，拜爵位，并免除他一家的征役，鼓励其迁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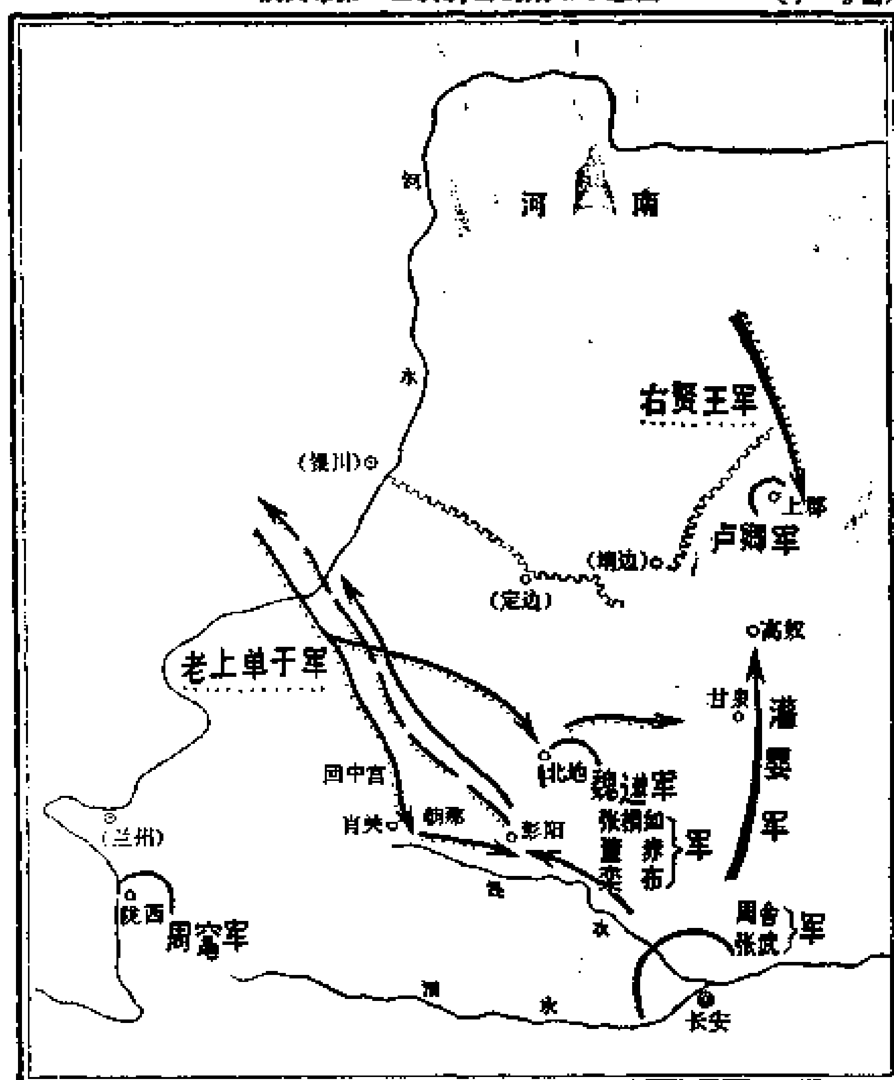
（四）初徙迁时，供给徙民的衣食，直到能自给时为止。

（五）在城邑之中，建立伍、里、连、邑制，选择邑中有才能、习风俗、知民心的人充任首领，平时使徙民操习射法，战时则教徙民如何应敌。定居后，使各安其业，不令迁徙。

（六）奖励人民输粟实边，依输粟多少，赐给一定的爵位，或赦免其所犯的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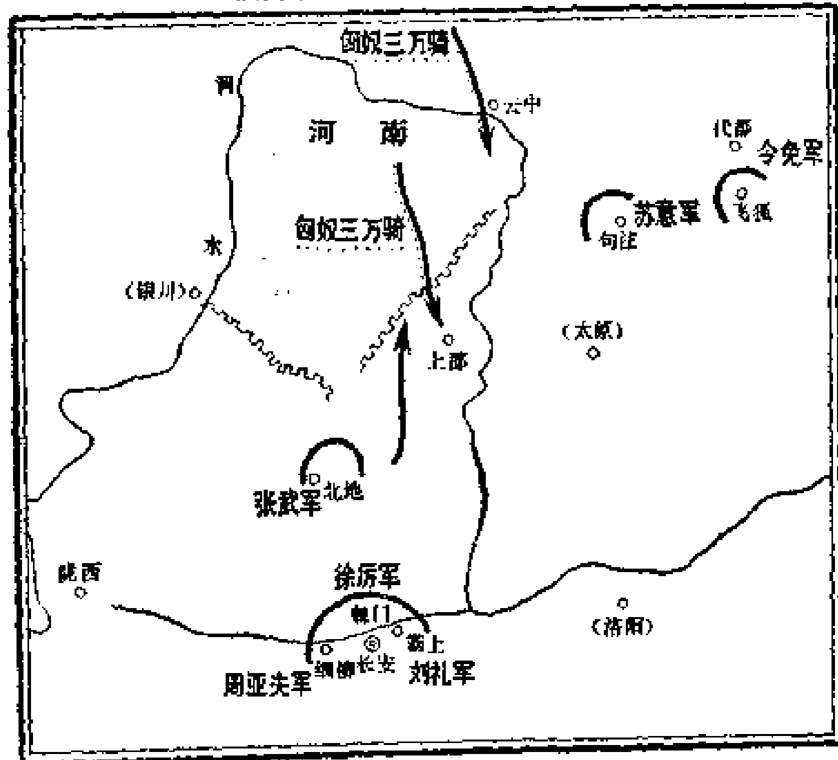
（七）平时慎选良吏去治理，战时慎选良将去统率。

汉文帝第一二次反击匈奴军示意图　（7—9图）



尽管西汉对北方边防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但并未能阻止匈奴的不断进扰。汉文帝时匈奴有三次大规模袭扰，直接威胁长安。第一次在汉文帝前三年（前177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攻掠上郡，杀戮人民。汉文帝派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到高奴（今陕西延安附近）抗击右贤王，发中尉材官由卫将军指挥保卫长安，汉文帝自己也到甘泉（今陕西甘泉西南）巡视。右贤王见汉大军出动，乃出塞而去。第二次，汉文帝前十四年(前166年)(参看插图7-3)，老上单于率十四万骑攻入朝那、萧关(朝那西南)，杀了北地都尉孙卬，虏去人民牲畜甚多，并进到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侦骑还到了甘泉，距长安只两百里，京师震动。汉文帝派卢卿为上郡将军，魏遬为北地（郡治在今甘肃环县东南）将军，周灶为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将军，进驻三郡，加强防守；以周舍、张武为将军征发车千乘、骑卒十万保卫长安；并以张相如为大将军，董赤、栾布为将军，率军迎击匈奴军。一个多月后，匈奴退出塞去。这次，西汉动员兵力很大，但也只是"逐出塞

汉文帝第三次反击匈奴军示意图　（7—4图）



即还，不能有所杀”。[26]

第三次在汉文帝后六年(前158年)，(参看插图7-4)匈奴三万骑攻入上郡，三万骑攻入云中杀掠甚众，烽火直达长安。汉文帝派令免、苏意、张武分别率军防守飞狐(今河北蔚县东南六十里)、句注、北地；令周亚夫、刘礼、徐厉为将军分别集结在细柳、霸上和棘门（均在今长安附近)，以保卫长安。经过一个多月，匈奴退出塞去，汉军亦至边而返。

这种单纯防御，是被动挨打的，正如晁错所说：“卒少则入”，“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27]晁错的分析十分精辟，消极防御是不解决问题的。但边郡人民的损失则十分巨大，陇西、上谷、云中、辽东(郡治在今辽宁辽阳）等郡经常遭攻袭，特别是云中、辽东，每年被匈奴杀害和虏去的人口在一万以上。

防御与和亲相结合的方针，从军事上看是消极的，但从政治上看，它是“与民休息”方针的体现，尽管未能有效地消除边患，但它赢得了时间，保证了内部的统一和国富民强的实现，而这又正是大规模积极军事行动的必要准备，是彻底消除边患所必不可少的。因此，从对匈奴战争的整体来看，它仍然具有积极的一面。

在平息内忧方面：

一、与民休息，富国强兵

汉文帝即位，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施政方针，就是“扫除烦苛，与民休息。”“顺民之情，与之休息。”[28]

其主要措施有：

（一）奖励农耕。汉文帝“诏开藉田，上亲耕以率天下之民。”[29]并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爱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30]汉景帝也“朕亲耕、后亲桑，为天下先。”[31]对农事有成绩的，适当的减其徭役，以资鼓励；

（二）减轻田赋。汉高帝减轻田赋，规定十五税一，汉文帝又减为三十税一，从公元前167年到前157年的十一年间，完全免收田租；

（三）鼓励生育。汉景帝规定民女十五岁到三十岁不出嫁，要分五等罚钱；

（四）抚恤“鳏寡孤独穷困之人”；[32]

（五）崇尚节俭。汉文帝规定国家税收要“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33]（《汉书·食货志》）需要多少征多少，避免多征。皇帝的“私事养”只靠山川、园池的租税收入开支，不增加人民的负担。“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34]临死前，留下遗诏说：“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霸陵（文帝葬地）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因山为藏，不复起坟）”。[35]

上述“与民休息”的方针，汉文帝、汉景帝兢兢业业地执行了半个多世纪，于是社会安定，政权巩固，人口增长，生产发展，粮食、马匹、财富成倍地甚至数倍地增长，终于初步实现了国富民强的目的，也为以后开展对匈奴的战争准备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二、削弱同姓王，加强中央集权

同姓诸王封地甚大，共有三十九郡，占西汉整个领土的大半，而皇帝直辖的不过十五郡。在平定诸吕之乱时，同姓王有功于汉室，随着社会日趋安定，经济日益发展，同姓诸王的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他们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可以掌握军队，任免官吏，征收赋税，铸造钱币，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逐渐成为割据状态，汉室与诸侯王的矛盾日趋尖锐。拥护中央集权的策士如贾谊晁错等都认为事态严重，应速谋解决，发展下去，为祸甚烈。汉文帝前六年（前174年），贾谊向文帝上“治安策”，说道：

“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谄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置）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何以）可谓治。……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

相方握其事（还掌有权）。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年满二十），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遵礼义，即服从汉中央），国小则亡邪心（不起叛乱之心）”。当今“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成痼疾。”[36]

贾谊认为如不及早解决同姓王的割据自雄，必将“制大权，以逼天子”，这是可痛哭的，这是当今天下的大病。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剖分王国策”，于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年），分代为两国，分齐为六国，分淮南为三国，还把自己的儿子刘武封为梁王（封地在河南东部），以控制中原要地，屏障中央。这些措施并没有使西汉政权得到巩固，反而使诸侯王与汉中央的矛盾加深了。晁错数上书陈述吴王过失，应削，文帝宽厚，不忍心处罚，这样吴王日益骄横。

汉景帝即位后，晁错再献“削藩之策”。他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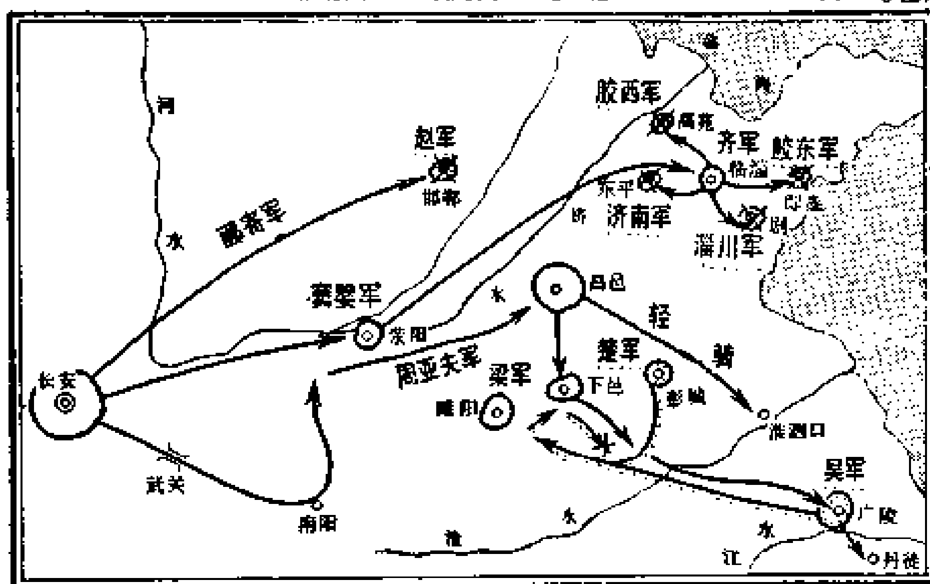
“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反益骄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37]

汉景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先后夺取了楚的东海郡（今苏北、鲁南），赵的常山郡（今河北保定、石家庄以西地区）和胶西的六个县，并下令夺吴的会稽（今苏南、浙江、福建）、豫章（今江西）两郡。诸侯王不甘心藩地被削减，对汉中央的削藩政策极为不满。汉景帝前三年（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联合楚王刘戊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借口，起兵反叛。汉景帝派兵进击。于是发生平吴楚七国之乱的战争。

第四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双方的战略运用

一、吴王的战略计划（参看插图7-5）

汉景帝平七王战争经过示意图 （7—5图）



七国之乱的首脑是吴王刘濞，吴王的都城在广陵（今江苏扬州西北），辖有会稽、豫章等郡。封土广大，财力富足，早就蓄谋夺取朝廷大权。汉景帝前三年（前154年），吴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首先起兵，并纠合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胶东王雄渠、菑川王贤、济南王辟光等六国一同起兵，反对朝廷。此外还遣使去闽、越联系，闽、越答应出兵相从。

吴王出兵之前，大将军田禄建议：

> “兵屯聚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38]

吴王太子反对说：

> “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借）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39]

吴王拒绝了田禄的建议。

吴少将桓将军又提出扬长避短的建议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粮仓，在今河南荥阳北），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交，事败矣。”[40]吴王以问老将，老将说：少年人，只能冲锋陷阵，哪里知道军国大计！吴王又拒绝了桓将军的建议。

吴王亲率二十万人，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并力向梁进攻。同时发信遍告诸侯，声称吴有地方三千里，精兵五十万，还有南越兵三十万听从调遣，足以"匡正天下"[41]，并向诸王提出了作战计划。其企图是：以诸王国军，分南、东、北三方面合击关中。其战略部署如下：

——以南越兵先攻占长沙以北地区，再西趋巴、蜀、汉中；

——东越、楚、淮南、济北诸王会同吴军西取洛阳；

——齐、菑川、济南、胶东、胶西诸王与赵王先攻占河间（今河北献县东南）河内（今河南武涉西南），再或入临晋关（今陕西大荔东），或与吴军会师洛阳；

——燕王北取代郡、云中后，再联合匈奴南下，经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迂回长安；

——吴王率吴军，与齐、赵军会师，直取长安。

二、汉景帝、周亚夫的战略运用

汉景帝的战略决策。吴相袁盎受吴王财物，被御史大夫晁错检举，废为庶人。吴楚反，晁错与丞吏商议：

> "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审问袁盎)，宜知其（应能知道他们的）计谋。"[42]

事为袁盎所知，入见景帝，献计说：

> "今贼臣晁错擅适诸侯，削夺之地，以故反名为西共诛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43]

汉景帝"默然良久"，接受了这个建议，斩了晁错，遣袁盎使吴。袁盎到吴时，吴、楚兵已攻梁，听说景帝有诏要他"拜受"，他笑着说："我已为东帝，尚谁拜！"[44]不接见袁盎且要扣留他，袁逃归，汉景帝这才决心平叛。

汉景帝杀晁错当然是愚昧的，吴、楚蓄谋已久，岂是为了一个晁错。且斩晁错、退削地，即便暂时妥协，吴、楚气焰高涨，更是后患无穷。

汉景帝平叛的战略企图是：以一部击齐、赵，集中主力一举击破

吴、楚军。其战略部署如下：

——以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击吴楚军；

——曲周侯郦寄率部击赵；

——将军栾布率部击齐；

——以宿将窦婴为大将军，集结在战略要地荥阳，支援各方。

这一计划既积极又稳妥，七国兵初起，声势虽大，但行动不一，只吴、楚军渡淮西进。擒贼先擒王，打掉吴、楚军这个带头的，其他就不难。窦婴军控制荥阳，巩固了后方，掌握了交通枢纽，既能防止吴楚绕过梁地迂回洛阳，又便于及时支援各方。

周亚夫受命后，向汉景帝建议说：

> "楚兵剽轻，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让吴、楚军去进攻梁都睢阳，以迟滞、吸引和疲备吴楚军，为主力决战创造条件），绝其食道，乃可制也。"[45]

汉景帝同意了这个建议。周亚夫为了能迅速前出到荥阳以东不走潼关、洛阳大道，秘密取道蓝田、武关，出洛阳。崤山、渑池（在今河南洛阳、陕县之间，南有崤山北有黄河，是一条战略隘路）间果然有吴楚伏兵，被汉军搜获。周亚夫率主力进至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坚壁不战，与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成犄角之势。

周亚夫的战役企图可以归纳为：迅速前出到荥阳以东，协同梁军，扼吴、楚军进路、挫其锐气、断其粮道、待其饥疲而击破之。

三、双方的战役指导

汉景帝前三年正月，吴、楚军向梁进攻，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一战，歼灭梁军数万人，乘胜西进，又连败梁军，梁军退守睢阳，被吴、楚军围攻。梁王多次求援，周亚夫不予增援，梁王上诉于景帝，虽景帝下诏，周亚夫仍按兵不动，只派轻骑迂回到吴楚军背后的淮泗口（今江苏淮阴西泗水入淮之口），切断吴、楚军的粮道。直到吴、楚军攻梁受到相当消耗时，才将主力南移至下邑（今安徽砀山），迫近吴、楚军侧背，仍然深沟高垒，坚壁不战。

吴、楚军久攻睢阳不下，屡受损失，西取荥、洛的企图无法实

现，退路又受到威胁，乃转移兵力进攻下邑，企图孤注一掷，求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坚壁不出，未能得逞。接着，粮道被切断，粮尽兵疲，士卒叛逃，吴、楚军不得不引兵退走。周亚夫养精蓄锐，乘机追击，大破吴、楚军。楚王戊被迫自杀，吴王刘濞逃至江南，在汉军威胁利诱下，被东越王诱杀。吴楚两国的叛乱，历时三月，以全军溃败而告终。

其他战场，山东方面齐王临时背约，据城自守，济北王受其郎中令监视不得出兵。胶东、胶西、菑川、济南四王改变了进攻洛阳与吴楚军会师西击长安的计划，转而进攻齐王的都城临淄（今山东临淄北），激战三月，未能攻克，这就为汉军从容集中兵力创造了机会。栾布率汉军到达齐地时，四国叛军兵疲意沮，丧失战斗力，全部被栾布军击破，胶西王自杀，其余三王被杀。

河北方面，赵王刘遂暗中联络匈奴，并集结兵力，待吴、楚军破梁后，西攻长安。当郦寄军向他进攻时，退保邯郸，负隅固守。栾布平山东后，转用兵力与郦寄合力攻破邯郸，赵王自杀，吴、楚七国皆平。

南越并未进至长沙以北，燕王也未南下萧关。

汉景帝平定七国叛乱的战略决策

西汉王朝建立后，为了安邦定国，当时面临着必须妥善解决的三大战略任务：发展生产、消除内忧、弭息边患。经过四代的休养生息，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财富的累积，出现了史学家所谓的“文景之治”。第一项战略任务算是基本完成了。但是，当时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如贾谊、晁错都看出内忧与边患的严重，认为这两者如不消除，不能认为“天下已安已治”。

纵观当时的形势，应先消除内忧？还是应先弭息边患？这是西汉统治者汉景帝面临的重大战略决策。贾谊在向汉文帝呈“治安策”中，早已认为可为痛哭的是内忧未消，可为流涕的是边患未息。他是把消除内忧放在首要地位的。他认为如果不及早解决同姓王割据分裂的局面，必将发展到“制大权，以逼天子”。他提出“剖分王国策”，主张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以此来逐步消除内忧。晁错也建议削藩，认为"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灵"。贾谊、晁错可以说是洞察了当时应解决的两大战略任务的先后缓急。因为不先消除心腹之忧，不先排除肘腋之患，是难以集权中央，团结众庶，调动国力去抗击匈奴统治者的进扰，弭息边患，保障边境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的。

有的认为吴楚七国的叛乱，实由于晁错建议削藩挑起的。这是庸俗的议论。分封之弊，播种已久，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吴楚七国的经济势力的增长与汉中央相埒，分权的焰张，必然导致集权与分权的矛盾，滋长诸侯王中的强大者阴谋攫取中央皇权的野心。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招纳亡命子弟，蓄谋叛乱已久。请"诛晁错、清君侧"，不过是他倡乱的借口。当时邓公早已看出："吴为反数十年，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他企图联合不满汉中央的诸同姓王并勾结匈奴，以颠覆汉中央，夺取政权。"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贾谊的"剖分王国策"和晁错的"削藩策"都是企图及早消除这一内忧，防患于未然。在客观上是符合广大人民要求和平、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愿望的。汉景帝采纳先削藩以安内的建议是明智的，最后定下以武力戡乱的战略决策是当机立断的。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保持了国内的安定团结，积蓄了国力，为反击匈奴，弭息边患，作好充分准备，这也是符合边境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汉初五六十年间，雄踞北方的匈奴统治者是西汉王朝生死存亡攸关的头号强敌，也是边塞汉族人民遭受苦难的根源。同姓诸王理应重视人民的利益和维护汉中央的统一，团结御侮，共同对付匈奴统治者的进扰。在边患频繁的情况下，诸同姓王只顾贪求私利，置大义于不顾，勾结匈奴统治者，破坏统一，破坏已经取得的和平安定，当然要受到广大人民的唾弃，也就注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

可叹息的是"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而汉景帝误听袁盎的谗言，把他诛戮，以为"斩错，发使（派遣使者）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不）血刃而俱罢"，

事实证明是愚昧的想法，晁错"为国远虑"，不惜毁家殉身，可算是西汉王朝的忠直之臣。汉景帝自毁他的"智囊"，是很错误的。班固著《汉书》，盛赞晁错的忠贞，为他立传，记述他的言行以传于世，是很得体的。

汉景帝平定七国叛乱的战略

七国叛乱初起时，其战略意图是以吴楚联军的主力先攻略梁国的首都睢阳，打通孔道，抢先占据荥阳，然后与齐、赵军会师洛阳，西击长安。汉中央的军队当时在战略态势上是处于内线。按内线作战的一般指导原则，汉军应乘叛军分进尚未构成合击之际，集中兵力，迅速行动，先击破其一方，然后转用兵力，逐行各个击破，以求取全局的胜利。但按当时的战略态势看，在东南方面，吴楚联军的主力被阻于睢阳；在东北方面，因齐王背约，胶西、胶东、济南、淄四国的军队正围攻齐国的临淄，并未西进；在北方，赵国的军队也未从邯郸南下。七国会师洛阳的计划业已落空。汉景帝根据上述情况，决心命周亚夫统率汉军主力，东击吴楚联军，命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并以窦婴为大将军，屯兵荥阳。这样的战略部署是适应当时的战略形势的。

荥阳是中原战略要地，兵家必争。汉军占据此地，东捍吴楚，北拒齐赵，西屏关中，巩固了后方，掌握了交通枢纽，并保障了梁国和周亚夫所统率的汉军主力后侧方的安全，同时，还能防止吴楚联军绕过睢阳，迂回洛阳，又便于支援各方。这样，汉军遂完全稳定阵脚，立于不败之地了。

周亚夫进据昌邑，深沟高垒，与睢阳成犄角之势，在战略态势上处于俯击吴楚军侧背的有利地位，使吴楚军不敢放手围攻睢阳，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

栾布乘胶西、胶东、济南、淄川四国军队被临淄吸引之际，进击齐地，正符合灭秦战争中项羽渡河救赵"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的战役指导原则。

从汉军兵力的整个布势来看，汉军已摆脱了被动的局面，主宰了

战场，为尔后战役上的胜利创造了良好的态势。

周亚夫进击吴楚军的战役指导

周亚夫是平定七国叛乱的主要军事统帅。他是诛吕安刘的功臣绛侯周勃的次子，是一员深晓韬略治军严谨的军事家。汉文帝时，他屯军细柳（今陕西西安北），防备匈奴。汉文帝劳军时，他以治军严谨有度博得文帝的赞誉，说：

“嗟乎！此真将军也。向者（以往之意）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矣。至于亚夫，可得而犯耶。”[46]汉文帝临终时，嘱咐景帝：

“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47]

所以，当吴楚七国举兵反对汉中央时，汉景帝就任命他担负进击吴楚军的重任。周亚夫提出“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的战役指导方针。从地形情况和双方形势来看，吴楚军渡淮后，南有淮河水系，北有黄河、大野泽（今山东巨野郓城之间）的限制，吴、楚军只能沿彭城（今江苏徐州）、睢阳、荥阳方向前进。睢阳扼制吴、楚军的进路，城廓坚固，可以坚守。汉军以梁为饵，梁固守睢阳吸引和消耗吴楚叛军，使其顿兵挫锐，然后乘其疲困而击之，则不需要打硬拼战，胜利就有绝对的把握。这是灭秦战争中，卿子冠军宋义北上救赵时所主张的“先斗秦赵，我承其敝”这一作战指导原则的活用。在灭秦战争中宋义想运用这一作战指导原去解救巨鹿之围，我们则评论他料敌决策错误；而周亚夫运用这一原则以对付吴楚军，我们则认为是运用正确。这是因为当时情势与秦时殊异。睢阳城廓坚固，梁国是同姓王中的大国，拥有雄厚的军力和财力，有防边宿将韩安国坐镇指挥，足以抗击吴楚军的进攻，梁王与汉景帝是亲兄弟，太后健在，有援可恃。周亚夫进驻昌邑后，援军近在咫尺，更加坚定了梁王死守睢阳的信心和决心，即使形势十分险恶，牺牲增大，梁王必将拼死力战。这样，吴楚要力拔坚城，梁军要据城死守，双方倾全力进行你死我活的决斗，吴楚军必然逐渐被削弱，士气由盛而衰，以至兵疲意

沮，丧失优势。周亚夫再派游军绝其粮道，吴楚军必然陷于饥疲困境，然后乘其疲困而击之，胜利就十拿九稳了。周亚夫的任务是进攻吴、楚联军，但敌军轻锐，战斗力强，双方兵力对比，自己只稍占优势，猛打硬拼，必然遭受很大的伤亡，而胜利并无把握。因此他首先抢占敌人所必攻的战略要点，以防御手段创造条件，然后转入进攻。周亚夫攻势防御的战役指导也是很成功的。

反之，如果周亚夫不坚决执行"以梁委之……"的战役指导，而应梁王的请求和遵照汉景帝的诏令，过早地使用汉军主力去解救睢阳之围，其结果，势必遭到重大伤亡，或与吴楚军胶着于危城之下，数十万大军集聚一地，虽有敖仓之粟，也难以为继，势不能久；或者双方演成长期相持，胜负难分，万一出现胶西四国击破临淄后，会师洛阳，赵国勾结匈奴，进军长安的情况，汉军主力不仅将完全陷于被动，丧失行动的自由，汉王朝亦将有覆灭之忧。由此可见周亚夫的战役指导为赢得战役准备时间、查明敌情、休整军队，争取行动的主动权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是"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这一孙子兵法的正确运用。

吴楚七国之败

吴楚七国表面上联合成一体，反抗汉中央，实则心怀互异，各具野心，都想染指中央皇权，南面称孤，谁都不甘为臣仆。诚如胶西群臣说："假如事成，两主分争，患乃益生"，何况尚有七主。吴王自以为是汉高帝的侄子，辈分高，地广兵多，登高一呼，必然天下响应。殊不知西汉政权正处在上升阶段，经过休养生息，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对战争带来的苦难尚未忘怀。吴王举兵反叛，并无社会基础，当然为人民所反对。

吴王的战略计划，似乎宏大，实际上都是主观愿望。诸王中只有胶西王听到事成之后可以"两主分割"，是与吴王面约的，楚王是与吴王通谋的，越、闽只是吴王遣使相约而已，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诸王则是胶西王遣使相约的。诸王相约，并不同心。他们只能是

貌合而神离，同床而异梦，既不能齐心，更难以合力，叛乱一开始。南越王就未向长沙以北进攻，燕王也未南下萧关，匈奴坐山观虎斗，所谓南北两路的犄击，攻势并未形成，化为泡影；齐王临时背约，胶西等国的叛军不西进而包围临淄；赵国初则观望，继则退保邯郸，会师洛阳的计划也宣告破产。这样，只剩下吴楚军一路孤军攻打梁国。幻想的分进合击，只能是纸上谈兵。吴王刘濞在战役指导上，不听田禄伯的建议，以奇兵入武关，迂回崤、渑，与主力会师长安的奇正并用的方案。又不用桓将军急取洛阳，占领河淮平原地带，堵塞汉军于荥阳以西的山区，使汉军车骑不能发挥长处的建议，对全军粮食命脉的淮泗口也不设防，输掉了关键胜的几著，把数十万大军用在对汉军有利的平原之地，顿兵于睢阳坚城之下，不能自拔。苦战三月，毫无战果，自遭损折，终归失败。

第五　汉武帝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

一、汉武帝即位后国内的大好形势

西汉前期，朝廷一直采取和亲政策，对匈奴忍让，企图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与此同时，对内采取了一些进步措施，以稳定其统治。汉高祖刘邦消灭了异姓诸王，汉景帝刘启又平定了“七国叛乱”，使西汉内部统一，隐患消除，中央集权得到巩固。在经济上，汉高祖减轻了田租，规定十五税一，汉文帝时，又规定三十而税一，并有十几年全部免除田租，对人民作了较大让步。“休养生息”的结果，使一度衰退了的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起来，文、景时期已呈现出一片富庶的景象。史书上说：

>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48]

人民粮满仓，国家有余粮，府库有余财。文、景二帝为了对匈奴的战争，在军事上也作了充分的准备。为了建立强大的骑兵，鼓励公

私养马，收到显著的成效。史载：当时民间“众庶街巷有马，而阡陌之间成群”，公家喂养的马也多至四十五万匹。汉景帝时，由于经济繁荣，军事实力逐渐加强，匈奴只能“时小入盗边，无大寇”。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变化。西汉王朝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就，为反击匈奴准备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准备

匈奴对西汉的骚扰、进犯和掠夺，遍及从辽东到陇西的广大地域，有时则烽火直达京师。对西汉王朝来说，这是个必须消除的威胁。但西汉建国之初，无力解决这个问题。经高、惠、文、景四帝的努力，化去了六十年时间，安定了社会秩序，消灭了异姓王，削弱了同姓王，加强了中央集权。人口的增殖，生产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又使国家仓库里有了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为战争准备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同时在军事上积累了不少对匈奴作战的经验，健全了军制，充实了边防，繁殖了大量马匹，至此，皇帝已能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战争。在这个基础上，汉武帝即位后的十二年间，又作了不懈的努力，有关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准备就大体完成了。下面集中谈一谈军事、政治、经济方面的准备情况。

在军事上：

（一）健全军制。汉初军制，承袭秦代，分为京师军和地方军。京师军就是禁卫军，是全军最精锐的。秦有京师军五万人。汉袭秦制，到汉武帝时，有所增加。京师军分为南军和北军，分别由卫尉和中尉统率。南军守卫皇宫，北军保卫首都长安。地方军就是郡国兵。主管郡国兵的，在郡是都尉，在封国是中尉。地方军分骑士、材官和楼船。骑士就是骑兵和车兵，西北各郡多为骑士。材官就是步兵，中原和山地各郡多为材官。楼船就是水军，南方各郡多为楼船。汉代的兵役制度规定：凡男子年满二十三岁，直到五十六岁为止，每年要在郡县服役一个月，叫做“更卒”；一生中要在京师军充当卫士一年，在地方军服役一年，叫做“正卒”。遇有战争，需随时应召。除此之外，根据战争的需要，还可由皇帝下令征集兵员、选募勇敢之士和发谪徒

(罪人)从军。

（二）建设骑兵和选拔将校。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万”，西汉准备战争最重要的课题是建立强大的骑兵。没有一支强大的骑兵，要抗击匈奴骑兵，进而战胜它，是不可能的，甚至想阻止匈奴骑兵入侵也是难以办到的。为了增加马匹，汉文帝提倡民间养马，规定“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49]就是说，有马一匹，可以免三个人的兵役。汉景帝时开始养苑马以备军用，苑是国家养马的场所。汉景帝时有“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分养马三十万匹”。[50]到汉武帝时已有苑马四十五万匹，民间马匹也很多了，城市里街巷有马，田野上马匹成群。

有了马匹之后，京师军和地方军中的骑兵建立起来了。汉武帝为了增加京师军的骑兵，在南军中增设期门军千人和羽林军左骑八百、右骑九百，选召精于骑射的“六郡良家子”为郎，担任皇帝的侍卫。汉武帝经常带期门、羽林打猎，并从中培养人才，选拔将领。抗匈名将卫青、霍去病就出身于此。在北军中汉武帝创置八校尉，募兵训练。八校尉是：屯骑校尉（掌管从各地征调来的骑兵），越骑校尉（掌管越人组成的骑兵），长水校尉（掌管长水宣曲胡骑组成的骑兵），胡骑校尉（掌管三原、池阳胡骑组成的骑兵），虎贲校尉（掌管轻车兵），射声校尉（掌管待诏的射声士），中垒校尉（掌管北军垒门），步兵校尉（掌握上林苑门屯兵）。每校尉有兵七百人。此外，为了训练骑射，又大量雇用善于骑射的匈奴人当教练。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骑兵建立起来了。

（三）修筑道路。雁门（郡治在今山西右玉南）道路险阻，汉武帝发卒万人，修筑道路，以便大军进出。

此外，汉武帝在政治、外交、经济上也继续作了一些准备。

在政治上：

（一）汉武帝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威，有意裁抑丞相的职权，他一反汉初丞相都由功臣列侯担任的常例，任用布衣为丞相并封为列侯，使以往位极隆重、权力很大的丞相，改为以丞相为首的执行一般政务

的机关。同时，下令全国"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从中拔擢了许多"贤良文学"和上书言事的人如董仲舒等高级侍从——侍中、给事中。这些人与皇帝很接近，出入禁闼，还可以参加有关国家军政大事的讨论，这就形成了以皇帝本人和亲近侍官为主的决策机关。

（二）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主父偃进《推恩法》说："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在封国内，把土地分给子弟为侯），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削弱矣。"汉武帝同意照办，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51]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三）派彭吴开路通涉貊、朝鲜（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东夷涉君南闾等共二十八万人降，建苍海郡，以阻止匈奴向东发展。

在经济上：

（一）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下令"初算商车"[52]（开始征收商人车船税）以增加储备。

（二）同年，大司农郑当时建议："穿渭为渠，下至河（黄河）漕关东粟径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万余顷。"[53]汉武帝发卒数万人修渠，三年而通。

为了能以战争手段消除边患，当然必须进行长期的战争准备。而战争准备能不能为战争的胜利创造所必需的条件，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西汉六七十年有针对性的积极准备，为消除边患起了重大的战略作用。

三、和战的争论与战争的序幕

由于长期采取战略防御，几次反击都没有超过边塞，对匈奴军情的了解也不够充分。因此，在转入大规模出击前，必然需要一个摸索过程，马邑伏击和关市反击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战争的序幕也由此而揭开。

（一）和战争论与马邑伏击（参看插图7-6）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匈奴来请和亲，汉武帝交臣下议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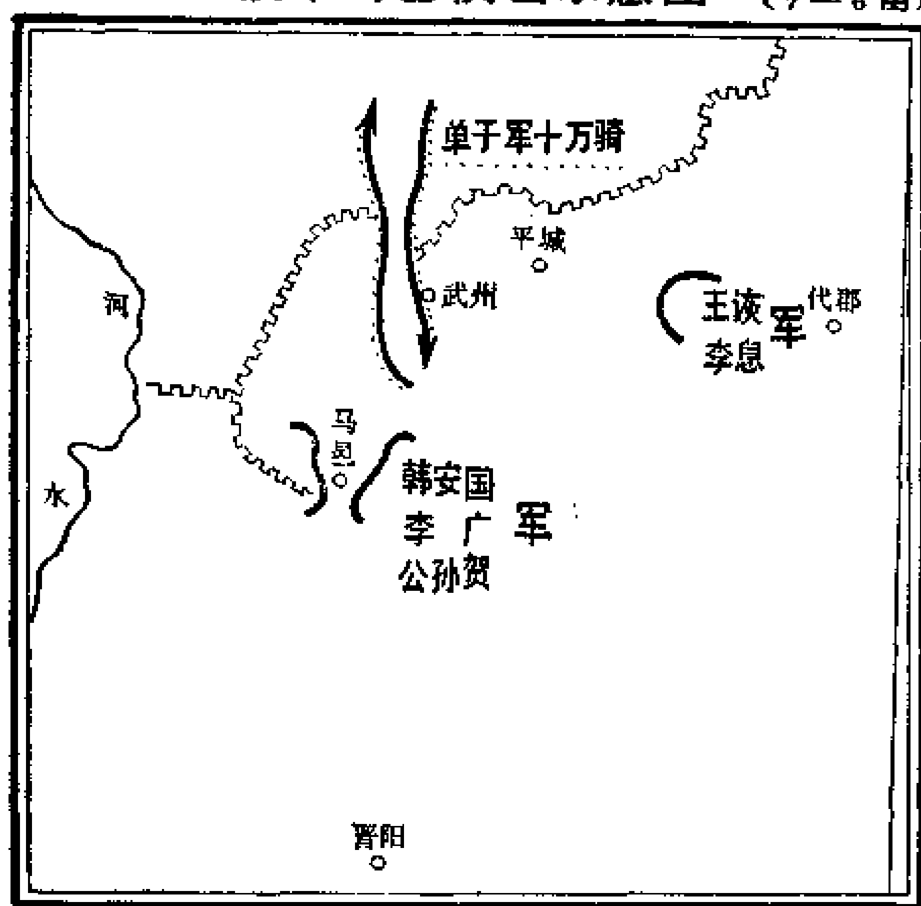
大行王恢熟悉匈奴情况，建议说：

“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背约。不如勿许，举兵击之。”〔54〕

御史大夫韩安国反对说：

“千里而战，即兵不获利（用兵不能获利）。今匈奴……迁徙鸟集，难得而制。得其地不足为广，有其众不足为强，自上古弗属（自古以来就不属于内地）。汉数千里争利，则人马罢（疲），虏以全制其敝（匈奴乘疲全力来攻），势必危殆。臣故以为不如和亲。”〔55〕

汉军马邑伏击示意图　（7—6图）



群臣多赞同这个意见，于是汉武帝允许匈奴和亲。

明年，雁门马邑土豪聂一通过王恢提出了伏击匈奴的建议：

“匈奴初和亲，亲信边（相信边防不会有备），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56]

汉武帝听了对公卿说道：

“朕饰子女以配单于，币帛文锦，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轻侮），侵盗无（不）已，边竟（境）数惊，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57]

王恢回答：

“臣闻全代（战国时的代国）之时，北有强胡之敌，内连中国之兵，然尚得养老长幼，种树以时，仓廪常实，匈奴不轻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内为一，天下同任（有事天下同赴），又遣子弟乘边守塞，转粟輓输，以为之备，然匈奴侵盗不已者，无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窃以为击之便。”[58]

韩安国不同意反击。他认为：

“臣闻高皇帝尝围于平城，……及解围反（返）位，而无忿怒之心。夫圣人以天下为度者也……故乃遣刘敬奉金千斤，以结和亲，至今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尝一拥天下之精兵聚之广武（今山西代县西十五里）常谿（水名）（指汉文帝的几次反击），然终无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民）无不忧者。孝文寤于兵之不可宿（久留），故复合和亲之约。此二圣之迹，足以为效矣。臣窃以为勿击便。”[59]

王恢再申前议：

“高帝身被坚执锐，蒙雾露，沐霜雪，行几十年，所以不报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边境数惊，士卒伤死，中国槥车（小棺材）相望，此仁人之所隐也，故臣曰击之便。”[60]

韩安国又反驳：

“且匈奴，轻疾悍亟之兵也，至如猋风（疾风），去如收电，畜

牧为业，弧弓射猎，逐兽随草，居处无常，难得而制。”“且臣闻之，冲风（疾风）之衰，不能起毛羽；强弩之末，力不能入鲁缟。……今将卷甲轻举，深入长敺（驱），难以为功，……疾则粮乏（进快了粮食不继），徐则后利（进慢了得不到好处），不至千里，人马乏食。……则未见深入之利也。故臣曰勿击便。”[61]

王恢坚决主张反击说：

“今臣言击之者，固非发而深入也，将顺因单于之欲，诱而致之边，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秘密埋伏预为准备），审遮险阻以为其戒（选择险阻加以戒备）。……单于可擒，百全必取。”[62]

汉武帝最后采纳了聂一、王恢的建议，决心伏击匈奴军。六月，以韩安国为护军将军，李广为骁骑将军，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王恢为将屯将军，李息为材官将军，率车骑材官三十余万至马邑伏击。其中以韩安国、李广、公孙贺率主力埋伏在马邑旁边的山谷中；命王恢、李息率部隐伏在代郡境内，以截击匈奴的辎重；令聂一去诱匈奴进军。聂一对单于说：“吾能斩马邑令丞，以城降，财物可尽得。”[63]单于相信了聂一的话，同意进兵。聂一返回马邑，斩了一个死囚，假说是令丞的头，悬挂在马邑城下，叫单于的使者去叫单于前来。于是单于率十万骑兵，越过边塞，进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当进到距马邑百余里时，单于看到漫山遍野都是牲畜，却无人看管，起了疑心，就派兵夺取附近的亭塞（哨所），抓住雁门尉史一问，尉史如实招供，单于大惊，急引兵退走。汉军闻讯，追之不及，只好罢兵而归。王恢、李息听说单于退走，但兵力很大，也不敢出去截击。后王恢畏罪自杀。

这次战役，劳而无功。以几十万人在边境上埋伏，是很难保密的，加上匈奴骑兵机动力很强，成功的公算很小，一般来说是不可取的。伏击计划也不够周详，缺乏在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下的应急措施，伏击的保障措施亦有疏漏，尉史泄密，是失败的直接原因。

（二）关市反击（参看插图7-7）

关市是汉匈边界上的通商地点。匈奴喜爱汉人的铜、絮、锦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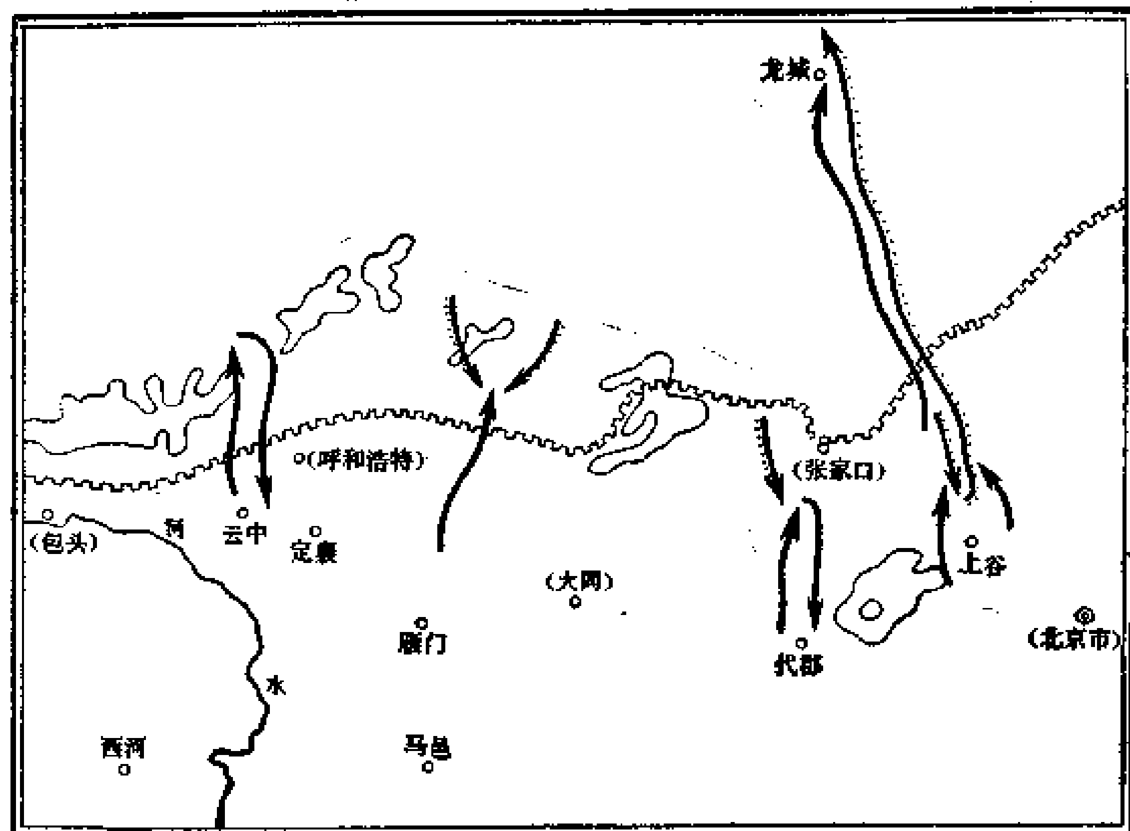
手工业品，开辟关市，使匈奴可以以买卖、交换等方式获得所需的商品，以减少其对边境的掠夺。马邑战后，汉匈关系恶化，但关市仍照常开放。

马邑伏击四年后，即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冬，匈奴入侵上谷，杀掠吏民。汉武帝决定组织一次关市反击战。令车骑将军卫青出上谷，骑将军公孙敖出代郡，轻车将军公孙贺出云中，骁骑将军李广出雁门，每路各万骑，“击胡关市下”。[64]

卫青杀敌七百，追至龙城（在今内蒙正镶白旗附近）；公孙敖失利，损失七千骑；公孙贺没有斩获；李广失利，被胡骑擒获，李广装死夺得马匹弓箭逃回。卫青有功，赐爵关内侯。公孙敖、李广有罪当斩，赎为庶人。

这次战役，胜少败多。从战略上看，匈奴主力正在阴山以南，机

汉军关市反击战示意图 （7—7图）



动方便。汉军兵力分散，难以适应战场上敌情的变化，难以互相支援，易遭各个击破。

四、汉武帝的战略反攻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位很有作为的帝王。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起，一场决定汉匈双方命运、影响极其深远的战略反攻展开了。战略反攻的作战正面，东起辽东右北平（凌源）沿整个万里长城，西至天山车师（乌鲁木齐东南)；纵深从河套越阴山，直达大漠以北。一系列战役所耗用的时间，从元朔二年（前127年)到征和三年（前90年)，连续达四十七年之久。双方投入了以骑兵为主体的近百万大军。规模之大，空前未有。

战略反攻前后共进行了十一次。其中，汉军获得较大胜利，带有深远影响的是前五次反攻——五大战役。(史学界有的归纳为三大战役）后六次反攻的战役，多以失败告终或无功而还。

为什么前五次反攻获得较大的胜利？后六次反攻多以失败告终呢？为了有重点地探讨重大的战略运用问题，我们分前后两部分来论述。前一部分论述五大战役，后一部分论述六次战役。

（一）前五大战役的实施

——袭击河南，击破白羊、楼烦王所部，作为尔后深入漠北的出发基地；

——击破右贤王主力，把匈奴割裂为东西两段；

——击破单于本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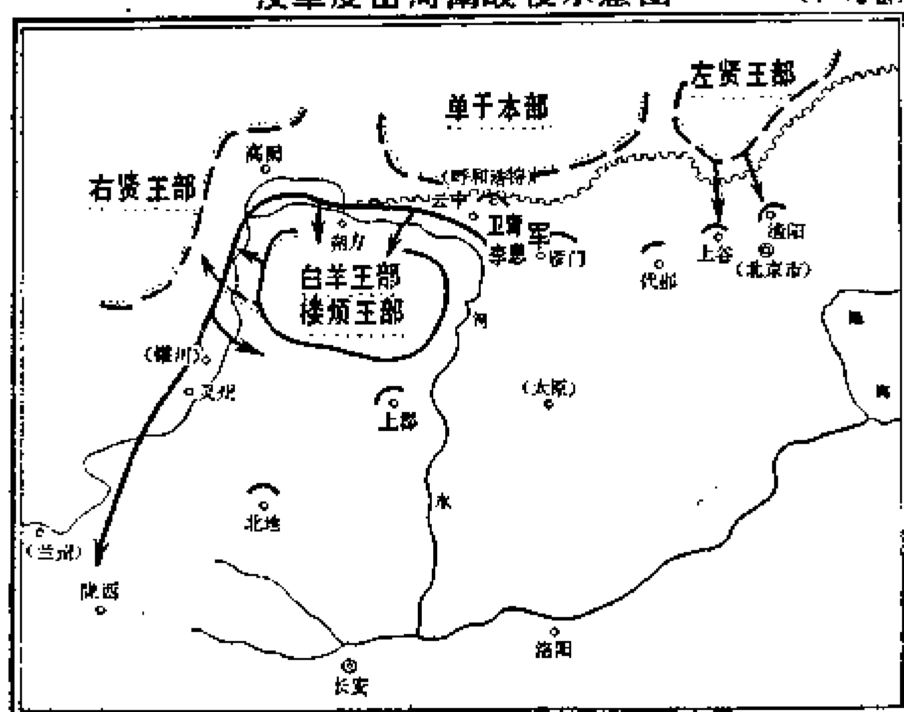
——摧破河西走廊的各部匈奴，断其右臂，打通西域；

——集中全力，深入漠北，求匈奴主力决战，并摧毁其战略后方。

第一次战役——反击河南。(参看插图7-8)

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春，匈奴入侵上谷、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杀掠吏民千余人。汉武帝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避实击虚的战略，令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部(兵力史无记载）由云中出发，沿黄河河套进行深远迂回，直指陇西，包围白羊、楼烦

汉军反击河南战役示意图



王所部而歼灭之。卫青率军直插高阙（今内蒙杭锦后旗东北），渡过灵州（今宁夏银川以南）附近的北河[65]，（《史记·卫青传·注》）最后到达陇西。汉军大获全胜，斩首二千三百级，虏获三千余人，牛羊百余万头，汉军全甲而还。卫青战功卓著，被封为长平侯。战后，汉武帝建立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南），筑朔方城，并重修秦时所筑的旧长城，募民十万徙居朔方充实边防力量。

这次战役，首战告捷，是十分重要的。河南是秦代领土，是北部边防要地。河南水草丰盛，是匈奴南侵的出发基地，由河南至关中仅七百里。收复河南，对整个北部边防、对巩固关中都具有重要意义。河南又是阴山南麓的屏障，当时匈奴主力就在阴山及其南麓，夺取河南，匈奴主力所在地就暴露出来了，所以河南又是深入阴山和漠北的优良出发基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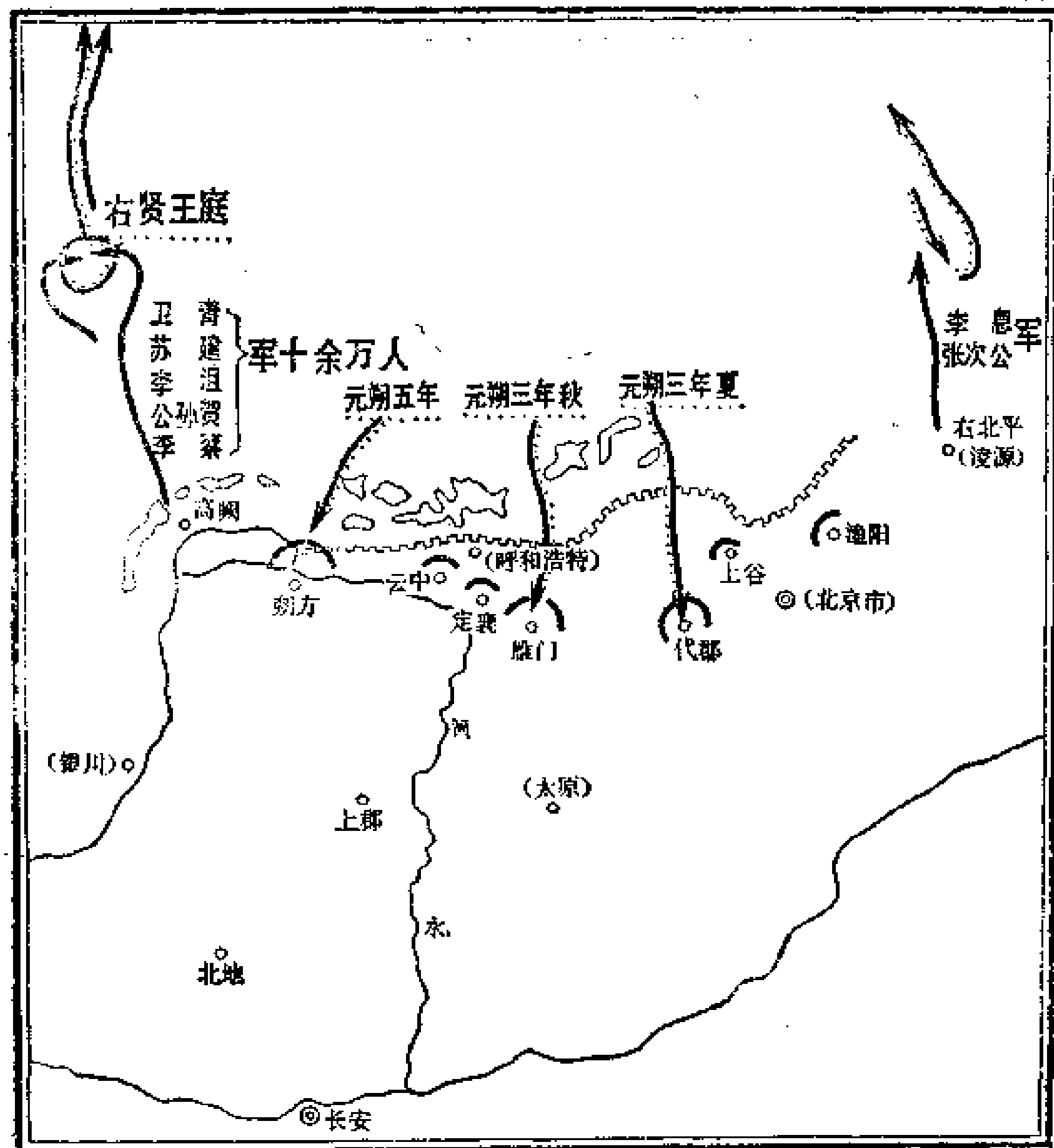
这次战役表现了战略上的主动性。当时匈奴入侵西汉右翼上的上谷、渔阳，汉武帝没有受它的牵制，坚定地按自己的企图袭取河南，彻底改变了汉初六十年来被动挨打的局面，获得了出敌意料的效果。

在作战方式上也有很大的特点。这次的迂回是集中全部兵力从白羊王、楼烦王与右贤王辖区间穿过，深入千余里，割裂开右贤王所部，而把白羊王、楼烦王聚而歼之。

白羊、楼烦王并非匈奴亲信，河南既是匈奴的突出部又是弱点，符合序战期其必胜的要求。

第二次战役——袭击右贤王庭。(参看插图7-9)

汉军袭击右贤王庭战役示意图 (7—9图)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冬，匈奴军臣单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为单于，军臣单于子于单降汉。同年夏，匈奴数万骑攻入塞，杀死代郡太守，掠去千余人。秋，匈奴又攻入雁门，杀掠数千人。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夏，又攻入代郡、定襄、上郡，杀掠数千人。次年，右贤王数次攻扰朔方，汉边郡受其扰害，不得安宁。

汉武帝为了反击匈奴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命将军李息、张次公率数万人，从右北平（郡治在今辽宁凌源县南）出击，牵制东方的匈奴军；以车骑将军卫青率三万骑从高阙出发，并指挥游击将军苏建、强弩将军李沮、骑将军公孙贺、轻车将军李蔡从朔方出发，远程奔袭右贤王庭（在阴山以北，高阙北六七百里）。总兵力达十余万人。这是一支步、骑、车的合成军队，而卫青亲率的骑兵显然是袭击的主力。

卫青率主力进军神速，夜间到达目的地后，立即投入战斗，包围了右贤王庭。右贤王以为远在塞外，汉军不能到达，正饮酒醉卧。汉军突至，惊慌失措，仅带爱妾一人及数百骑突围北走。卫青立命轻骑校尉郭成率骑兵追出数百里，未能追到。此役，活捉右贤裨王十余人，虏获男女一万五千余人。李息、张次公方面亦略有斩获。

此役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远程奔袭，掌握敌情准确，行动秘密神速，发挥了骑兵快速部队的特长，获得了惊人的战果。从战略上看，目标选择得当，继河南战役之后，继续给右贤王以致命打击，达到了各个击破，把匈奴分割为东西两段的目的。

经过两次大捷，汉军士气大振，战争的主动权已掌握在汉军手里。汉武帝赏罚及时，得到捷报后，立即派使节持大将军印，到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受命统帅诸军。

第三次战役——袭击单于本部。(参看插图7-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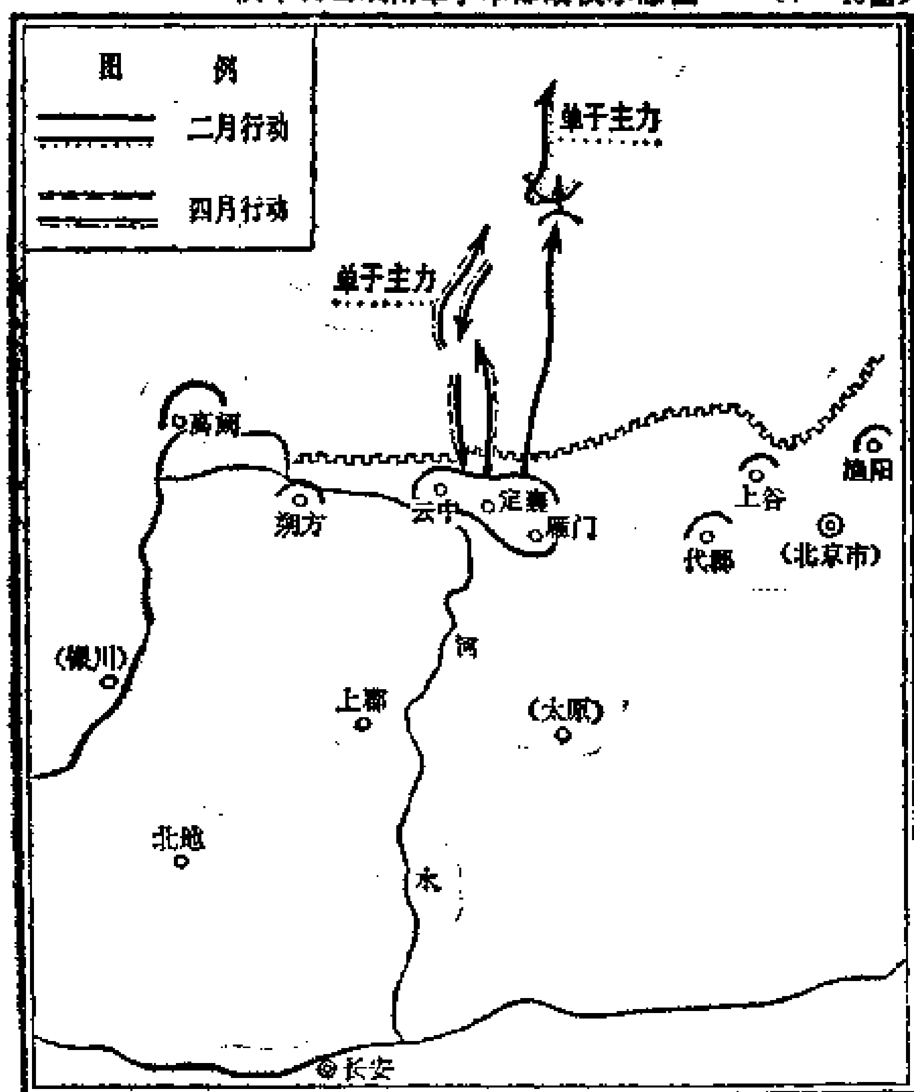
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秋，匈奴万骑入犯代郡，杀死都尉朱英，掠去千余人。汉武帝为了打击匈奴的主力，于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年）二月，命大将军卫青率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共十余万人，由定襄出发，进击单于，企图乘单于右侧暴露，一举击灭之。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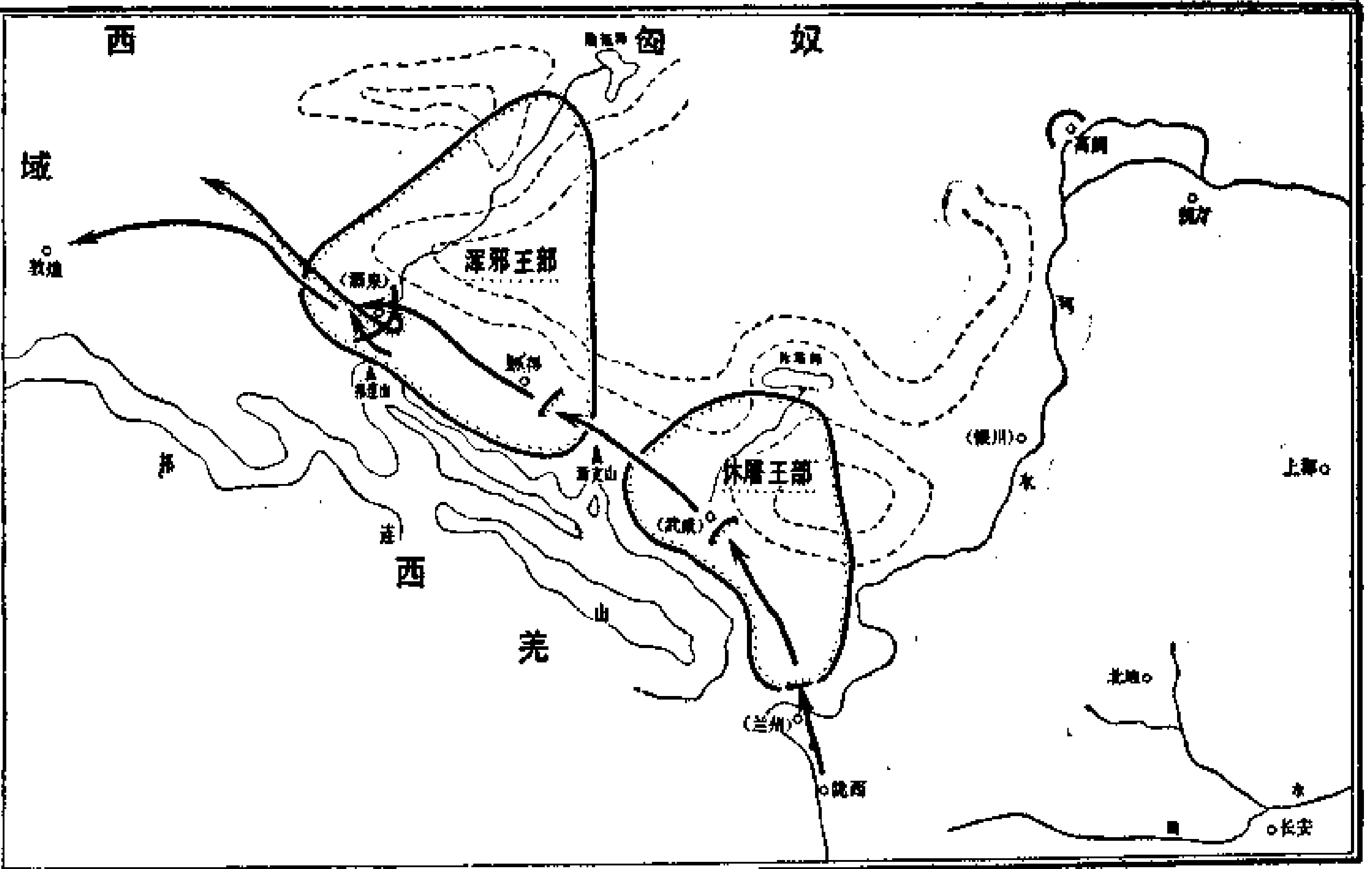
卫青率军出定襄后，途遇单于主力，打了一次击溃战，歼敌数千人，卫青率军返回定襄、云中、雁门休整。

同年四月，卫青率众将军，再次由定襄出发，进击单于，再度与匈奴主力作战，击灭匈奴军万余人。在作战中，右将军苏建、前将军赵信所率骑兵三千与匈奴单于遭遇，经过一天多的激战，伤亡殆尽。苏建只身突围逃回；赵信原是匈奴小王投降汉军的，汉封为翕侯，在失败后又投降匈奴，匈奴单于以姊妻之。

此次战役，从战略上看，在击破右贤王本部之后，乘单于庭右侧暴露，选为袭击目标是恰当的。在部署上也集中了优势兵力，所以基

汉军袭击漠南单于本部战役示意图 （7—10图）




汉军河西战役示意图之一
匈奴
西域
西羌
浑邪王部
休屠王部
敦煌
(武威)
(兰州)
陇西
北地
上郡
长安
(银川)
高阙
朔方
焉支山
祁连山
山

本上达到了战役目的。

此役歼敌近两万，战绩是主要的。单于本部受到了严重打击，东部匈奴大举入侵的可能性大大的降低了。但汉军的损失也不小，前、右两军三千骑被歼。损失的原因是第二次出击失去了突然性。第一次出击打成击溃战，没有解决问题，退回出发地，休整两月，仍由原地出发，匈奴就可能预先采取一些措施，例如令左贤王向西靠拢。

在这次战役中，霍去病崭露头角，霍与卫青都是汉武帝的外戚，都是汉武帝亲自从侍从中选拔出来的青年将领。霍去病善骑射，英勇善战，这次随卫青出征，曾率精骑八百前出大军数百里，杀虏二千零二十八人，斩了单于的祖父辈藉若侯产，虏获单于的叔父罗姑比及相国当户等，受封为冠军侯，时年仅十八岁。

第四次战役——袭取河西。（参看插图7-11）

河西系指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区，因位于黄河以西，古称河西，或称河西走廊，历来是中国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汉文帝初年，匈奴驱走月氏，占有河西后，将今酒泉地区封给浑邪王、武威地区封给休屠王统治。他们借此西控西域各国，南与羌族结合，常常向东侵扰汉朝的西部边境。当汉武帝第一、二、三次反击匈奴诸战役结束后，单于采纳汉降将赵信的建议："益北绝幕（撤到更北的大漠以北去），以诱罢（即疲）汉兵，缴（遮留）极而取之，无近塞。"[66]远遁漠北。匈奴在沙漠以南的广大地区，只剩下东面的左贤王和河西走廊的匈奴军。从这两支匈奴军的力量比较，左贤王较强，河西匈奴军较弱。但对汉王朝的直接威胁来说，河西匈奴军又较左贤王严重，而且又控扼着通向西域的咽喉要道。

汉武帝又从前出使西域被匈奴扣留十多年后逃回长安的张骞处了解到西域诸国的情况，他为了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北的边防，决心组成强大的骑兵集团，进击河西。企图击灭匈奴右翼，打通河西走廊，通西域，切断匈奴与西羌（在祁连山及其以南地区）的联系。这次战役分为春季、夏季两次行动。

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匈奴万人入犯上谷，杀死数百人。

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春季，汉武帝以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率精骑万人，突袭河西匈奴军。霍去病率军自陇西出发，向西北挺进，历五个王国，对降服者予以安抚，对抵抗者击破之，几乎抓住了单于的儿子。转战六日，过乌支山（今甘肃山丹县南），向西北挺进千余里，与匈奴浑邪王、休屠王所部遭遇，短兵相接，大获全胜。杀死了匈奴折兰王、卢侯王，虏获浑邪王的儿子、相国、都尉和休屠王的祭天金人等，匈奴军十分之七被歼，共计斩俘八千九百六十多人。汉军进到敦煌附近，河西走廊一举打通。

这次战役从战略上看，在连续给予北线匈奴以严重打击之后，突然改变战略方向，转向河西突击，完全出于河西匈奴意料之外，所以战功卓著，收到了突然袭击的效果。在部署上，只用了精骑万人，缩短了准备的时间（战役间隙只一年），减少了军费开支，增大了行动

汉军河西战役示意图之二

的快速性。在作战行动上，进军神速，连破重重阻挡，深入敌后两千余里，一举击破当地的匈奴军，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同年夏季，汉军再击河西，采取分进合击，主力从北侧进行深远迂回。（参看插图7-12）

战役部署是以合骑侯公孙敖率一部从陇西出发，向祁连山突袭；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主力数万骑从北地出发，从北侧实施大迂回，会师祁连山（《史记·匈奴列传》）；另派李广、张骞率部出右北平击左贤王，以为牵制。

公孙敖由于迷失方向，未能如期与主力会师。（罪当死，赎为庶人）霍去病的迂回路线大体上由今宁夏灵武附近西渡黄河，越贺兰山，直奔西北，绕过居延泽（今甘肃额济纳旗东）折向西南，过小月氏（未迁走的月氏人）进到祁连山、觻得（今甘肃张掖）一带地区，一举击破了浑邪王、休屠王所部，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以下两千五百人投降，俘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共斩俘三万两百多人。河西匈奴只残存十分之三。

右北平方面，李广率四千骑先进数百里，张骞晚到，李广被左贤王率四万骑所围，李广列成圆阵，沉着奋战，鏖战两日，死伤过半，杀敌亦相当。张骞军到，匈奴解围而去，汉军亦归。

这次战役，两次行动虽然间隔很短，但由于采取了不同的作战方式和进军路线，不但没有减少突然性，反而使匈奴军没有喘息时间，惊魂未定。汉军采用大迂回行动，由河西走廊以北，深入两千多里后，突然由西北转向东南，展开进攻，从匈奴完全意想不到的侧后猝然开刀，匈奴军不知所措，只好望风披靡，掀翻锅底，给敌人以毁灭的打击。这次大迂回，过的都是旷无人烟的大沙漠，战争史上亦是罕见的。霍去病所选骑兵十分精悍，有特强的战斗力和持续力，本人又善于识别哪里有水草，否则也难于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

战后，单于恨浑邪王与休屠王为汉军所败，拟召去问斩。二王派人向汉洽降。休屠王后悔，浑邪王将他杀了并并吞了他的部众。汉武

帝恐其诈降袭边，令霍去病率军前去迎降。霍去病渡过黄河后，逼近浑邪王所部，浑邪王的裨将见了汉军多不想降，并有人逃走。霍去病率精骑突入，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想逃的八千人，遣浑邪王去朝见汉武帝。投降的共四万人，号称十万。汉武帝将降军分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塞外，称为“五属国”。于是西方的边患大为减轻，汉武帝遂下令将陇西北地、上郡的戍卒减少一半。

河西之战是汉武帝继一、二、三次战役之后，在战略上采取的又一重要军事行动。当时，大漠以南，在东面是左贤王的匈奴军；在西面的河西走廊地区，是浑邪王、休屠王的匈奴军。而匈奴单于远遁漠北。这样，在东西两部匈奴军队之间，存在千里之遥的空隙，在战役、战术范围内，无法协同作战，势存孤悬，彼此不相救。是时，汉王朝已收复了河南，歼灭了右贤王的匈奴军，匈奴单于主力也已远移漠北，河西的匈奴军势孤力弱。但这对汉王朝来说，他接近关中，易于向长安进扰，直接威胁汉王朝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以一部兵力牵制左贤王，而集中主力用以消灭河西地区的匈奴军，扫清通西域的通路，采取牵制强敌、打击弱敌的战略决策，是明智而有远见的。

河西作战全胜的结果，不仅消灭了在该地区的匈奴军，还断绝了匈奴与羌族的联系，进一步孤立了匈奴单于；更重要的是还打开了汉王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他为后人创建丝绸之路，加强跟西方各国的友好往来创造了条件，这是汉武帝的伟大功绩。此后，从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黄河以西，沿着祁连山，一直到盐泽，匈奴的势力几乎绝迹。汉朝陆续在河西走廊设置的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镇），既使汉朝对该地区行政统治权得到巩固，又保护了通西域的交通要道。

第五次战役——深入漠北求匈奴主力决战。（参看插图7-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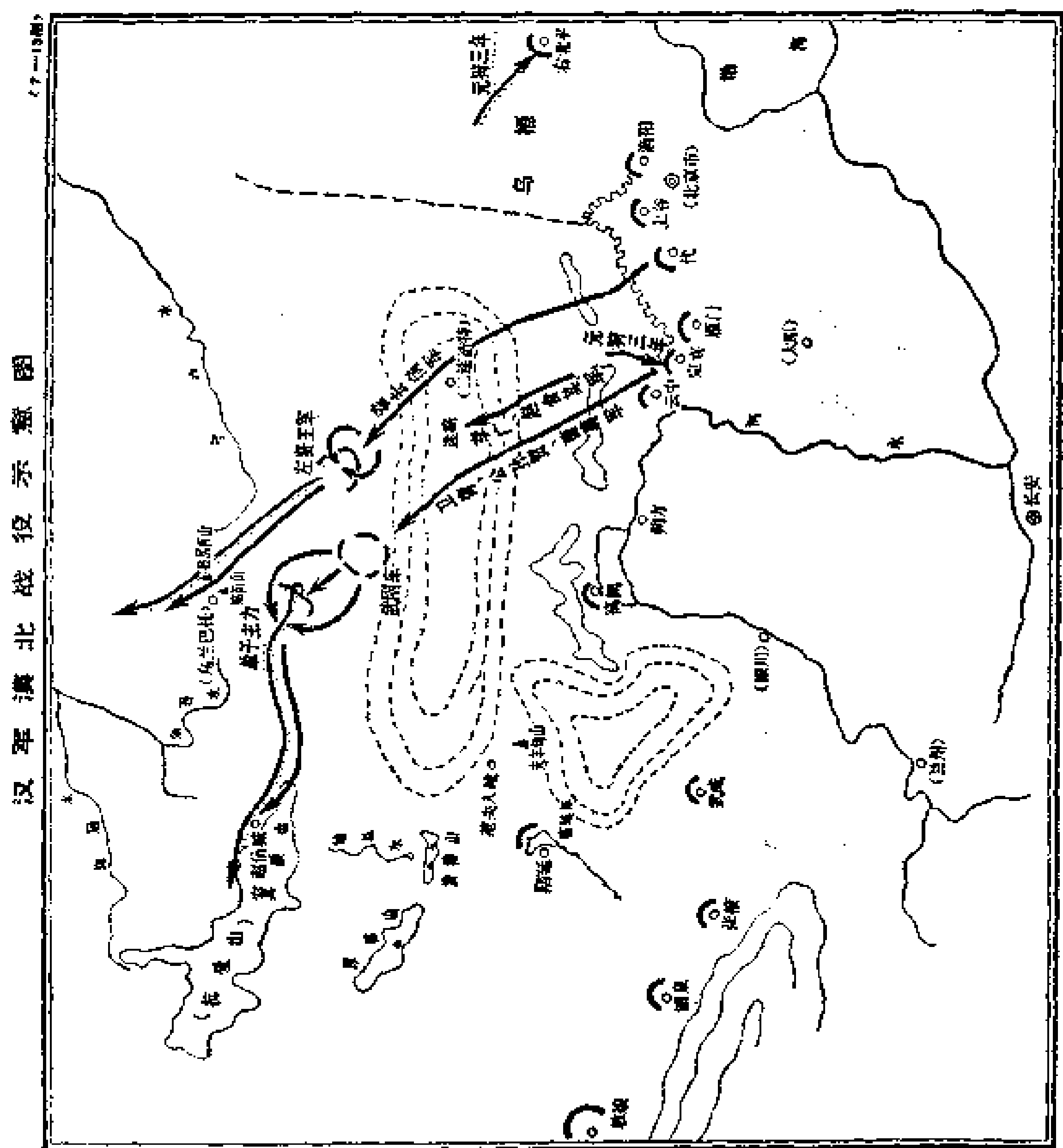
汉武帝元狩三年秋，匈奴各数万骑进扰定襄、右北平，杀掠千余人。

汉武帝与诸将商议说：

“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轻留，今大发士卒，其势必得所欲（实现出敌不意求匈奴主力决战的企图）。”[07]

汉军的企图是将计就计，以强大兵团深入漠北，求匈奴主力决战。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春，汉武帝令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以骑兵五万为主力，由代郡出发，求左贤王主力决战；以骠骑将军霍去病（编成内无将军，以李敢等为大校以充裨将），率骑兵五万为主力（凡战斗力强，敢于深入力战的都属霍去病），从定襄出发，求单于主力决战。此外还有汉军编制外的“私负从马”四万匹分随卫、霍两集团前进。



汉军漠北战役示意图

在两集团之后，还有步兵数十万掩护辎重跟进。

赵信向单于献计说：

“汉兵既度幕，人马罢，匈奴可坐收虏耳”。[68]

单于采纳这个办法，将辎重撤到远后方，将精兵集中漠北，以待汉军。

前几次大战役，汉军虽取得很大胜利，但人力物力的消耗也很大，筹措军费已感困难，而对匈奴的战争又不能功亏一篑，汉武帝乃下令改革币制，起用理财专家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

汉军出发前，俘虏供出：单于主力在东（实际上这个情报是错的），汉军立即变更部署：卫集团西调，改从定襄出发；霍集团东调，改从代郡出发。

卫集团出塞后，捕获俘虏，知单于所在位置，乃分兵两路：以李广、赵食其为右路；自率主力为左路前进。卫青率军出塞千余里，在渡漠到达漠北时，发现单于正陈兵等待。卫青以武刚车（一种有边有盖的古战车）构成环形阵地，以防匈奴骑兵冲击。派出骑兵五千冲击匈奴军，单于亦派万骑迎战。日将落时，大风起，砂砾击面，两军不相见。卫青乘机令左右两翼进入战斗，包围单于军。单于看到汉兵多而士马强，自料不能取胜，遂带壮骑数百突围向西北逃去。这时天已昏黑，两军互相撕杀，伤亡大致相当。随后汉军左校抓到俘虏，得知单于已于天黑前突围而去，卫青立派轻骑追击，自己率大军随进。匈奴军溃散而走。追了两百多里，天亮，未能抓到单于。卫青率军进到寘颜山（今蒙古杭爱山南端）赵信城（赵信降匈奴后所建），获得匈奴大批屯粮，除补充军食外，尽烧其城和余粮而回。这路汉军共歼敌一万九千余人。右路李广、赵食其因无向导迷路，卫青还军至漠南时才与右路会合。李广自刎。

霍集团出代郡两千余里，至漠北遇左贤王军而大破之。一直追到狼居胥山、姑衍（均在今蒙古乌兰巴托以东），祭告天地，得胜而还。捕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虏获共七万四百四十三人。逃走的仅十分之二。

这次战役汉军伤亡亦大，损失数万人，官私马匹返回的已不足三万匹。

此役，单于及左贤王所部遭到惨重的打击，“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69]汉从朔方郡到金城郡（郡治在今甘肃兰州西北），派去五六万人在一些地方修水利屯田。由于马匹大减，大规模进击也停下来了。

漠北决战，是汉武帝反击匈奴作战的最高峰。为了歼灭匈奴主力，使用了全国精锐骑兵，还调集了步兵、辎重兵数十万人参加会战，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由此看出汉武帝反击匈奴和永绝边患的决心大、信心强。

从第一次反击之战起，匈奴屡遭削弱，汉军屡战屡胜，形势逐渐变为有利于汉而不利于匈奴。赵信为匈奴献策，以为“汉军不能度幕轻留”，可以乘隙取胜。汉武帝“顺其所料”，周密准备，以雷霆万钧之势，由东、西两个作战方向长驱深入，乘胜穷追，予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在战略上的因势利导，是这次决战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大军深入沙漠作战，必须解决源源不断的粮食、水、草等供应问题。为此，汉武帝不但有大量“私负从马”，而且有数十万步兵、辎重担任战地补给，使大军的供应得到圆满解决。这一创造性的战略措施，既保障了战略决战的胜利，还对沙漠地区作战的后方勤务工作树立了光辉的范例。

卫青、霍去病在第五次反击匈奴作战中，又高度发挥了骑兵的快速、灵活、机动的特点，大胆深入，猛打穷追。卫青在遭到预有防御准备的敌人时，先为不可胜，作好应变措施，立于不败之地，继而迂回敌军两翼，包围匈奴单于，一战而胜，在作战指挥上是很出色的。霍去病当时只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将军，素有大志，河西之战后，因军功卓著，武帝为其治第宅，令往观看，霍去病说：“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也”。[70]武帝更加爱重他。漠北作战，汉军五万骑在他的指挥下，在没有一员将军，仅有大校李敢等数人临时提拔为裨将协助的情况下他亲统汉军深入二千余里，渡沙漠，一举长驱，封狼居胥山，禅于姑

衍，登临瀚海；他这种匈奴不灭不言家的杀敌效忠决心和作战勇敢、不怕疲劳、一往无前的进攻精神，以及与左贤王作战的战术指挥艺术等方面，都令人赞叹不止，可资为后世借鉴。

汉武帝的反击匈奴战争，他的战略指导和战役指导具有很多特点和创造。

1． 骑兵集团的建设与运用

自战国时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以来，骑兵逐渐在战场上出现。但以强大骑兵作为战争的主力兵团，在战场上追奔逐北，则从汉武帝开始，这是新的兵种划时代的创建与运用，也可以说双方大规模利用骑兵集团作战，历史上这是第一次。现代的装甲机械化部队组成的"快速兵团"就是古代"骑兵集团"在现代条件下的发展。它使当时的战略、战术和后勤都引起了重大的变化。根据当时匈奴土地辽阔、骑兵强大、行动飘忽、各部分散的特点，要战胜以骑兵为主的敌人，如果没有比之更强大的骑兵集团，是难以奏效的。汉武帝从现实情况出发，在文、景二帝养马的基础上，大规模地组建和训练骑兵，使之成为战场上独立作战的主要兵种。汉武帝有了强大的骑兵，在战场上才能以机动对付敌之机动，才能远程奔袭，才能实施迂回、包围、割裂、围歼，才能在战场上力争主动，才能有行动的自由。汉武帝扩建骑兵集团，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创举，在对匈奴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 青年将领的选拔与擢用

汉武帝反击匈奴，是一场历史上双方在沙漠地区首次使用强大的骑兵集团的作战，是以机动对机动的战争。原有的一批防边宿将为韩安国、李广、程不识等人，思想保守，缺乏运用骑兵集团在广袤的沙漠草原地带进行大规模运动战的指挥才能和胆略。从这情况出发，汉武帝为了训练好、指挥好新建的强大骑兵，不拘一格地选拔、培养、重用卫青、霍去病等善于指挥骑兵集团作战的青年将领。他们利用熟悉边情的汉人和匈奴降卒，解决了汉军骑兵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沙漠、草原地带作战中的方向和水源等困难，始终保持着比匈奴骑兵

更为强大的攻击力和运动力，成功地执行了攻势作战的任务。他们每次出击，都表现出积极进攻、出敌不意、速战速决、灵活机动的特点，发挥骑兵作战的优越性。这也充分表明他们这批青年将领指挥作战的灵活性，善于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对手，运用不同的战役指导，使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抗架；充分表现出他们高超的、有创造性的指挥艺术，从而取得了歼灭匈奴主力的巨大胜利。

3. 防边战略思想的转变和新战术的创立

自战国以来，对匈奴在北方边郡的袭扰，燕、赵、秦国所采取的对策是防守。筑长城，修关塞，设烽燧，严刁斗。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虽曾派遣蒙恬"北逐匈奴七百余里"，但仍重在防守。他征发千万民工把燕、赵、秦所修筑的长城连接起来，加以修缮，称为"万里长城"。征发戍卒，轮番守边。西汉初年，承袭汉高祖刘邦"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防守思想，对匈奴的袭扰，在边境关塞采取专守防御，以保境安民。在这种战略防御思想的支配影响下，一批防守边疆的宿将长期以来形成了习惯于"守边"、"堵击"的消极防御战略，每当匈奴骑兵南来袭扰，他们习于依托边关要塞，调兵遣将，进行防堵。胡骑快速机动，东西驰骋，飘忽无定。汉军虽分兵堵击，森严刁斗，亦难以取胜。胡骑进入边关，掳掠人畜财物，满载而去，汉军即使开塞出击，往往劳而无功，甚至损兵折将。胡骑去又复来，以致边境烽烟不息。如李广长期在汉王朝边塞地区住守，他先后担任过十一个郡的太守，与匈奴直接对阵几十年，在防御作战上积累了一套丰富经验，得以力战闻名于当世，匈奴称他为"汉之飞将军"。他为汉家王朝守备边疆，可以说是付出了汗马之劳。但他在边防建树上，并无赫赫之功。是何缘故呢？在消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长期支配下，缺乏新的战争工具以对付匈奴快速的骑兵，又怎能追奔逐北，痛歼敌骑，创建奇勋呢？至多把匈奴赶出塞外而已。溯自汉高祖在平城战败到汉武帝即位之年，汉匈在北方边境对阵已六十年。由于双方参加作战的兵种的性能不同，双方的战略、战役的指导思想亦殊异。这正是朱德元帅所讲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

起动，汉军参加作战的是以步兵为主编成的步兵集团；匈奴军是以骑兵为主编成的骑兵集团。步兵行动迟缓，机动性小，突击力弱；骑兵运动快速，机动性大，突击力强。因此，在边地攻防作战中，汉军采取战略防御。在战役指导上，利用边关重塞，分兵把口，进行防堵。匈奴军则采取战略进攻，在战役指导上，集中兵力，找寻弱点，乘隙钻入。战场主动权完全掌握在匈奴奴隶主手里，汉军怎能不被动挨打呢？文、景两代的有识之士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认识到必须增强国力，养殖马匹，建设骑兵，"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方能击败匈奴，保障北方边境的安宁。汉武帝即位后，在文、景二帝为他积蓄了雄厚国力和繁殖了大量马匹的基础上，创建骑兵集团作为主要兵种去对付敌人，使边防作战的指导思想由过去的专守防御转变为攻势防御，进而有骑兵新战术的创立。一批青年将领指挥汉军骑兵在沙漠草原上成功地执行攻势作战的任务。如第一次反击的河南战役，先从东向西横扫，腰斩河南，再由前向后大迂回；第四次反击的河西战役，先从正面连续猛打猛冲，继之以深远的大迂回行动；第五次反击的漠北战役，以远程奔袭、直捣匈奴心脏，然后两翼包围，猛打穷追。战争实践表明骑兵集团的出现，使当时的战略战术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新战术的运用，如快速机动、猛打穷追、连续突击，千里迂回、两翼包围、远程奔袭等，是车战、步战所不能企及的。大骑兵集团在广阔的沙漠草原地带进行数以千里计的机动，又带来后勤问题，既不能因粮于敌，又不能就地补给。如果补给不上，骑兵就不能发挥作用。为解决极为重要的补给问题，汉军调集了大量的"私负从马"，使用了数十万步兵组成辎重纵列，担任粮秣补给，以支撑前方作战，这都是创举。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舰载飞机为主要攻击力的海军，组成特种混合舰队作为海军航空兵的移动基地以从事作战，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只不过前者驰骋于瀚海之上，后者破浪于大洋之中。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上，除了以这样的辎重纵列作为移动基地支持骑兵集团作战外，实在也找不出其他替代办法。

4． 巩固边防的长远筹谋

加强北部边防，汉文帝时，晁错就认为是筹边急务。他在《言兵事》中，指出过去征发内地戍卒去戍边，一岁一更的办法不好。戍卒“不知胡人之能”，而且“为费甚大”，不如“徙民实边”[71]，可以“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72]。但他的这项办法虽较“征发戍卒”为优，却未收到大的成效。基本原因是匈奴未遭到严重打击，时去时来，塞下烽烟未靖，边郡的城邑未修，室屋未建，徙民迁到危难的边地，安家落户，扎不下根，又不习射教，怎能去担任防边固塞的任务。汉武帝时，在反击匈奴、迫使其远遁漠北之后，塞下烽烟暂息。这时，采取大量移民垦边的办法，方卓著成效。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7年），第一次反击胜利，卫青从匈奴手中夺回了河南地区。这一带水草肥美，形势险要。西汉政府在河南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西北），置朔方、五原郡，从内地徙民十万人到那里安家落户。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 年），又一次移民七十余万，与边地的屯戍部队几十万人一起，加强北部边防。政府在东起朔方西至令居（今甘肃永登县）的地区内，设立田官，督率戍卒屯田，由官府供给牛犁谷种，把以前的草原牧场，变成了使用牛犁耕种的农业区，开垦出一片片碧绿的农田。为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又筑新的长城，自敦煌郡起连接老长城，沿长城全线每隔五里、十里的地方列置亭障，设立烽火台，设戍卒瞭望。遇到敌情，白天燃燧，夜间举烽，递传几百里，用以防备匈奴的突然袭击。

汉武帝不愧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他一面反击匈奴，夺取胜利；一面加强北部边防，巩固胜利。他实行的这种屯戍部队与大量移民共同守边的办法，军民协同，耕战结合，较“徙民实边”更为扎实。

5．匈奴“益北绝漠、无近塞”的战略

匈奴在第三次战役失败后，采纳赵信“益北绝漠，无近塞”的建议，撤出河南，远遁漠北。赵信这一建议实是匈奴对付汉军强大骑兵集团凌厉攻势的至当战略。因为汉武帝组建骑兵集团，在三次战役中击败匈奴后，战场的主动权已转入汉军之手。匈奴骑兵如果仍采取过去的

战法，前出到汉家边塞附近，寻求决战，易遭到汉军强劲的骑兵集团的包围歼灭或割裂围歼。这等于把头伸出去"送礼上门"，让汉军用屠刀宰割。撤到漠北，暂时龟缩，控置精兵，休养士马，以待汉军越过沙漠，前来进攻，使之补给线延长，粮秣追送不上，匈奴军以逸待劳，乘其人困马乏的时际，再行反攻，可以不费大力"收虏汉军"。这一作战方案是可行的。可惜的是赵信这个方案被汉武帝得知，他预为对策。在汉军十万精骑前出漠北时，组织"私负从马"四万匹跟随前进，还有步兵数十万掩护辎重跟进，以保持持续的战斗力。汉军出塞千余里，在渡漠到达漠北时，发现匈奴军严阵以待。卫青率精骑两翼包围，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想乘汉军疲敝而进击的计划落空，"自度战不能如汉兵"，乘夜暗率数百骑突围逃走了。"益北绝漠"的作战方案未能实施，漠北之战，匈奴也就又遭失败。

（二）汉武帝后期的六次战役

五大战役后，匈奴军大部被歼，人畜骤减，远遁西北。西汉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人力物力消耗巨大，也伤了元气。从汉武帝元狩五年到元鼎四年(前118—113年)，出现了五年休战状态。

在此期间，汉武帝再派张骞出使西域各国，乌孙(在今天山北路、伊犁河流域)、康居(在今中亚细亚)、大宛(在今葱岭西北)、于阗(在今新疆于阗一带)、大月氏(在今葱岭以西)、大夏(今阿富汗境内)、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都遣使报谢，与汉建立了友好关系。这就等于斩断了匈奴的右臂，在外交上孤立了匈奴，还打开了以后的"丝绸之路"，促进中国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的交通。这都展示汉武帝具有远略。此外，他还采取了鼓励养马、整理货币、经营边郡等措施，以恢复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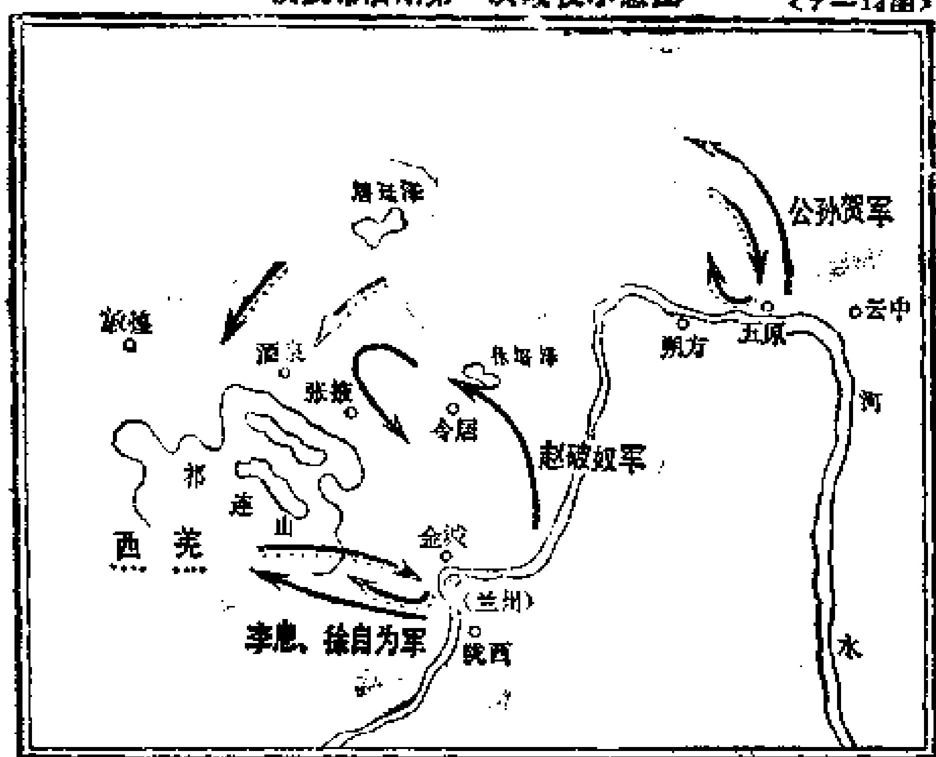
匈奴余部逐渐聚合，在新疆东部、蒙古西部稳定下来，力量逐渐恢复。

从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到征和三年（前90年），西汉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在雁门、天山、杭爱山一带地区，继续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战争，先后又反攻六

次——六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年）匈奴小部侵扰河西，时常遮断西域通路，又进扰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包头西北），杀了五原太守。并联合西羌进攻陇西、金城两郡。第二年汉武帝派李息、徐自为率十万人平定西羌。又派公孙贺率骑兵一万五千出五原，赵破奴率万骑出令居（今甘肃民勤境内）数千里击匈奴，均未见一人而返。汉武帝乃置张掖郡（郡治在今甘肃张掖北）和敦煌郡（郡治在今甘肃敦煌西），连同原有的武威、酒泉，称为河西四郡。并徙民实边，巩固河西。（参看插图7-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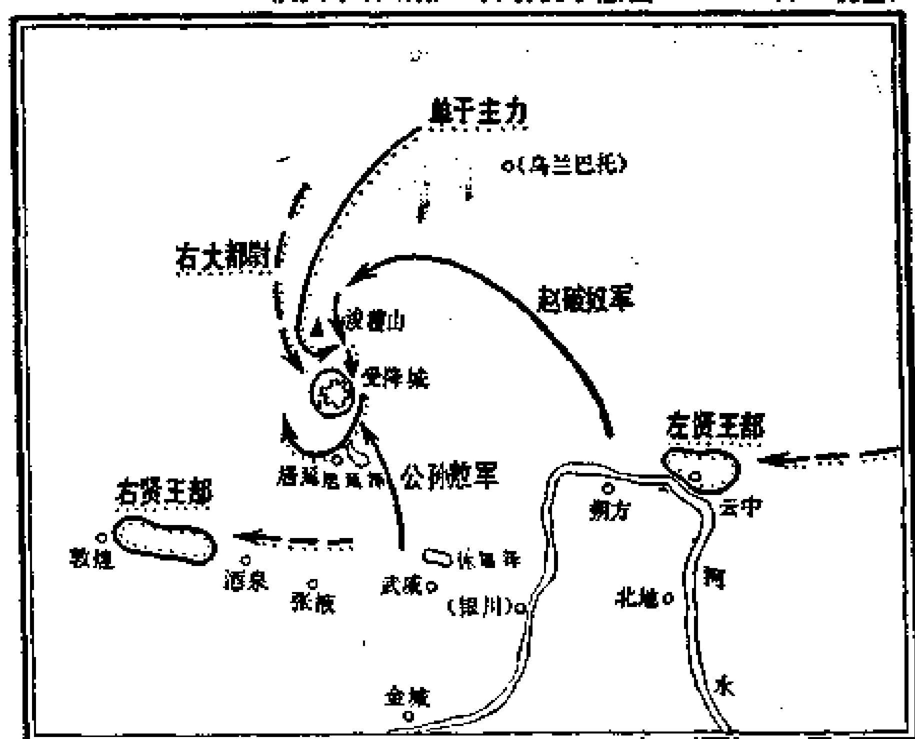
汉武帝后期第一次战役示意图 （7—14图）



第二次战役：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乌师庐继立为单于，因年少，号“儿单于”。从此以后，单于更往西北迁徙。左贤王移驻到云中，右贤王移驻到酒泉、敦煌地区附近。由于匈奴儿单于残暴，嗜杀成性，内部不安。匈奴左大都尉派使者至汉，洽降，请派兵相迎。汉武帝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在塞外筑“受降城”（在居延北、今甘肃额济纳

旗以北）以为接应。汉武帝认为受降城区离匈奴单于太远，派浚稽将军赵破奴率骑兵二万余，远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到浚稽山接应匈奴左大都尉。儿单于发现了他降汉的企图，将他杀死，发兵向赵破奴军进击。汉军初战获胜，俘首虏数千人，但在撤回途中，距受降城约四百里的地方，突然遭到匈奴八万骑兵的包围，赵破奴黑夜自出寻水时，被匈奴活捉，匈奴军急击被围汉军，汉军全军覆没。匈奴乘胜猛攻受降城，未攻下，入边大肆掳掠而回。不久，赵破奴乘隙逃脱，回归汉朝。（参看插图7-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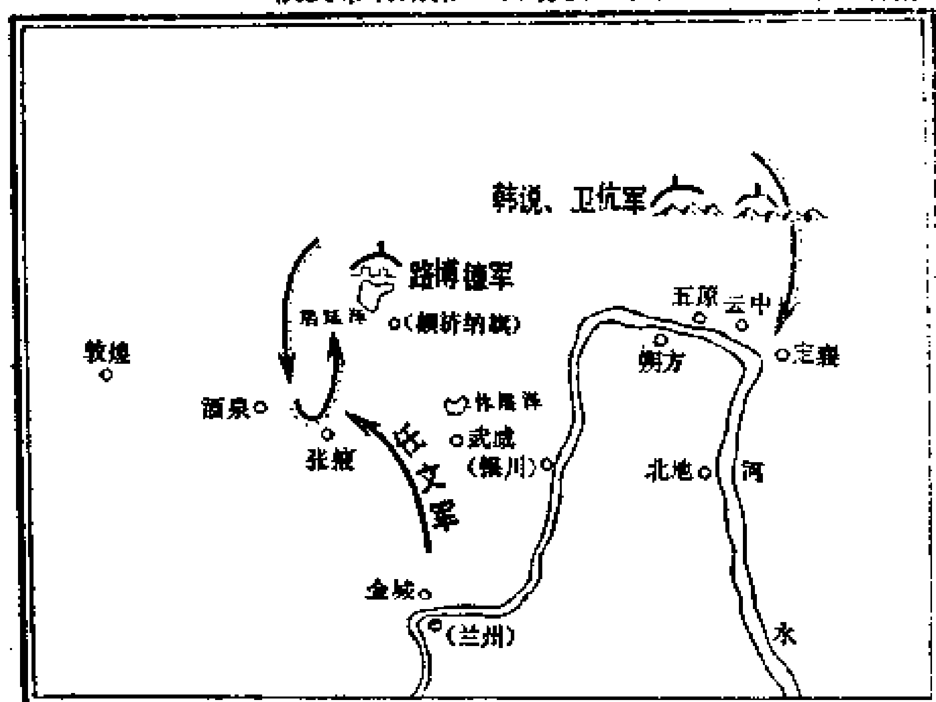
汉武帝后期第二次战役示意图　（7—15图）



第三次战役：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汉武帝派徐自为在五原塞外数百里、远者千里的地方筑城障、列亭，西北到了卢朐，又在居延泽（在今甘肃额济纳旗西北）筑遮虏障，令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沿着城障布防，还令强弩将军路博德在居延泽上筑城屯兵。这年秋，匈奴大举侵入定襄、云中，杀掳数千人，糟踏边关人民的禾苗数千石，还破坏了汉军所筑的城障、列亭。同时，匈奴右贤王又侵入酒泉、张掖，掳走数千人。汉军正任文率军赶到，猛击匈奴，将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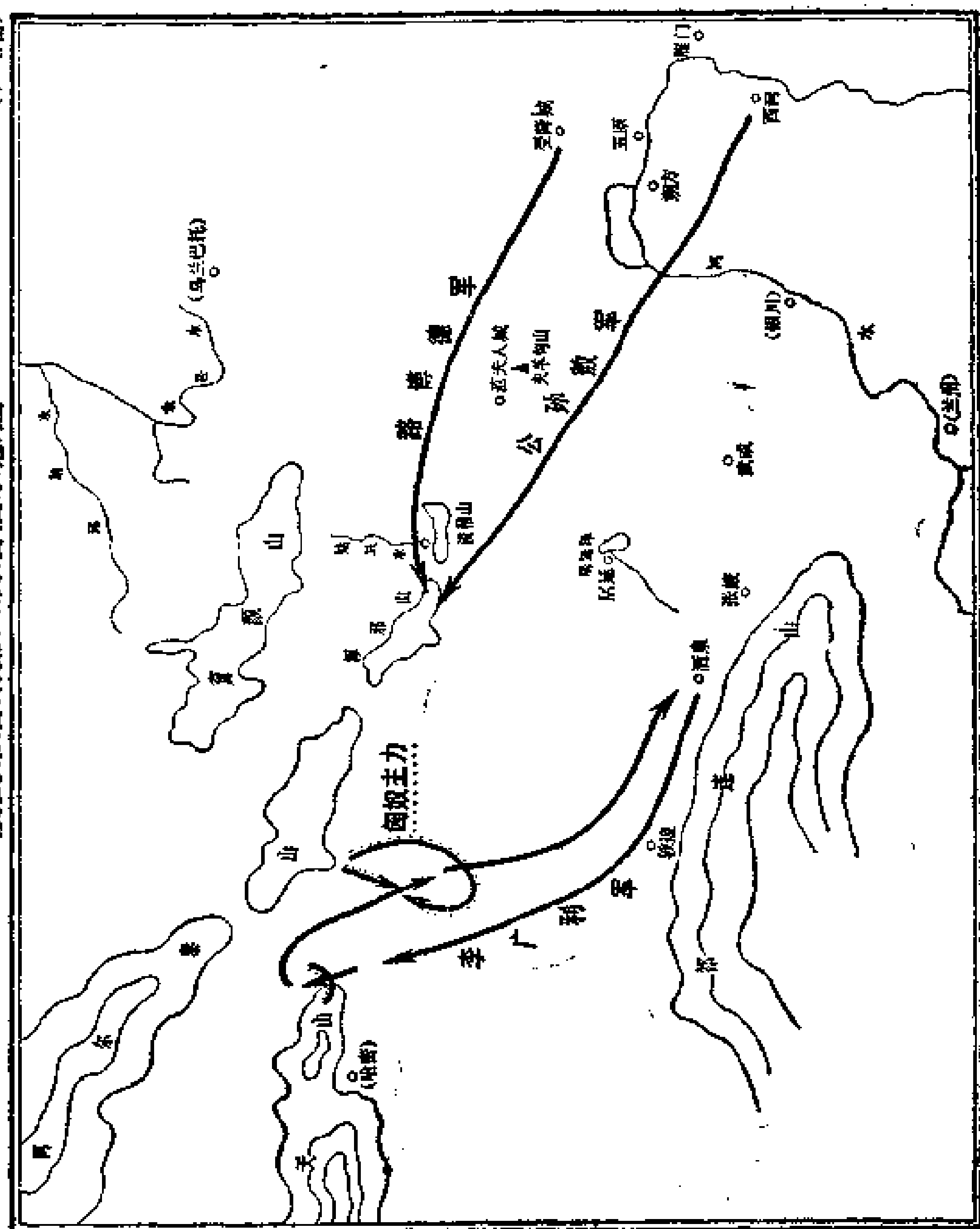
掳掠的人畜，全部夺回，匈奴军败走。（参看插图7-16）

汉武帝后期第三次战役示意图　（7—16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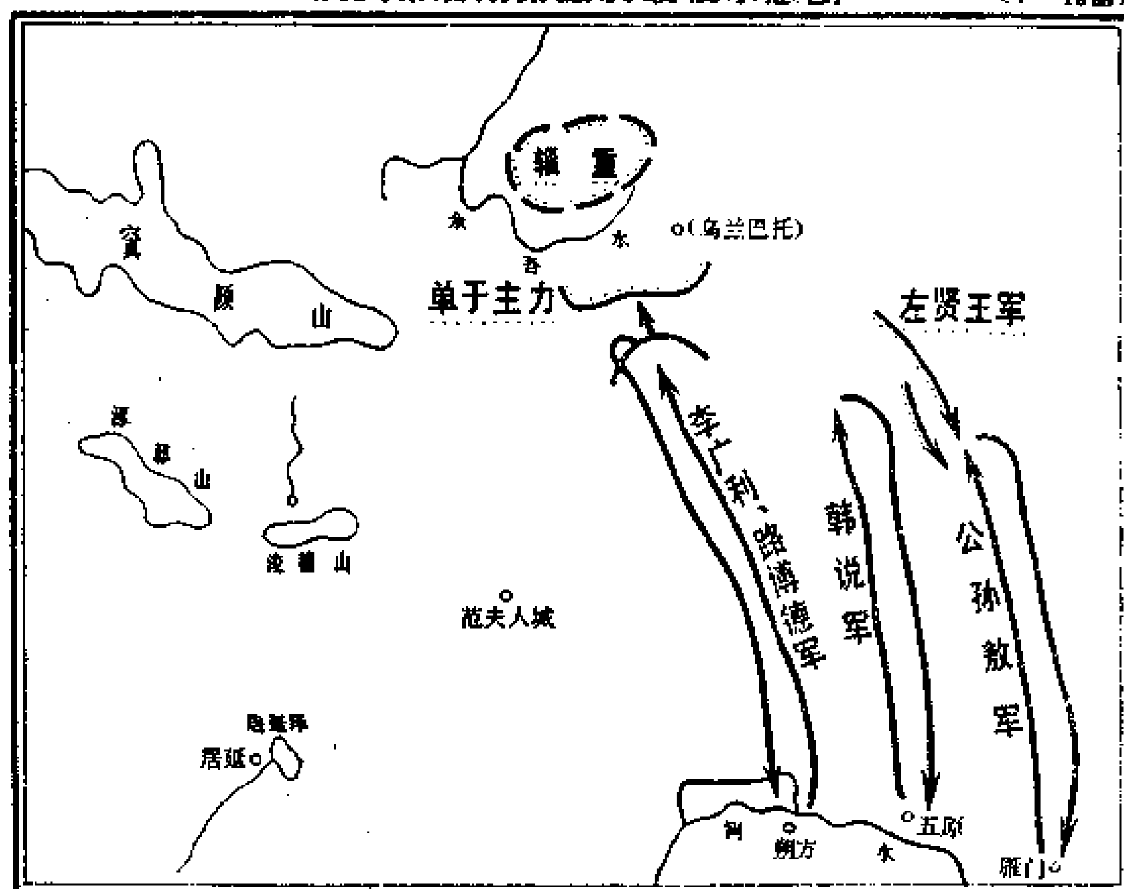
第四次战役：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五月，因匈奴扣押苏武[73]及击杀汉使，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出酒泉，进击右贤王于天山（即祁连山）。初战，俘获匈奴首虏万余。在回军途中，突然遭到匈奴大军的包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很多。假司马赵充国奋发当先，亲率敢死之士万余人，披甲操戈，冲破重围，李广利率军继之，才得解围。这次作战，汉军死伤十之六七，赵充国负伤二十多处，幸不得死，可谓勇矣！为了策应李广利的作战，汉武帝还派因杅将军公孙敖和强弩都尉路博德，东西游弋，约会涿涂（邪）山（在高阙塞北千里），无功而还。（参看插图7-17）

第五次战役，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匈奴袭扰雁门，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六万、步兵七万，由朔方向匈奴进击；强弩将军路博德率万余汉军协同李广利作战；游击将军韩说率步兵三万人出


汉武帝后期第四次战役示意图
路博德军
公孙敖军
李广利军
匈奴主力
酒泉
张掖
武威
居延
朔方
五原
西河
受降城
范夫人城
涿邪山
(乌兰巴托)
(兰州)
(银川)
(哈密)

五原；因杅将军公孙敖率骑兵万余、步兵三万人出雁门。三路汉军同时向匈奴发起强大攻势。匈奴单于得知汉军大举进攻的消息，先将全部辎重物资远徙余吾水（在今蒙古乌兰巴托西北）以北地区，单于本人带领十万骑兵于余吾水以南，迎击李广利的汉军。两军战斗余日，汉军游击无所得。公孙敖与匈奴左贤王作战，亦不利。汉军兴师动众，无功而回。（参看插图7-18）

汉武帝后期第五次战役示意图　（7—18图）



第六次战役：汉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匈奴分道袭扰五原、酒泉，杀两都尉。三月，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率二万人出西河；重合侯马通率四万骑出酒泉，进击匈奴。匈奴得知汉军大举进击，将辎重撤到郅居水，自率主力南渡姑且水（浚稽山以北）以待汉军。商丘成军出塞后迷失方向，未遇敌军，将还，单于派三万骑追击，转战九日，匈奴军不利，退去。马通军至

天山，单于派大将偃渠率两万骑迎击。偃渠见汉军强，不战而退。这时，汉恐车师（匈奴的与国，在今新疆吐鲁番、奇台一带）腰击马通军，派开陵侯成娩发楼兰（今新疆若羌附近）、尉犁、危须（均在今新疆库尔勒附近）等六国兵大破车师，尽得其众。李广利率主力进至夫羊句山（浚稽山东南），击破匈奴右大都尉及卫律部，追至范夫人城（在夫羊句山北），匈奴奔走，不敢交锋。这时，长安发生一起宫廷事件[74]，李广利得知后，十分忧惧，企图“深入要功”以减轻罪责。遂派二万骑北渡郅居水，击破左贤王，并击杀左大将，匈奴军死伤甚众。李广利的长史见他“危众求功，恐必败”[75]，密谋逮捕李广利。李得知后，斩了长史，退至燕然山（即今蒙古杭爱山）。单于知汉军疲惫，自率五万骑拦截汉军归路，汉军战败，李广利投降。（参看插图7-19）

评汉武帝后期的六次战役：

五大战役之后，汉武帝对匈奴又持续进行了六次战役。一次小有斩获，两次无功而还，三次是全军覆没。为什么前五大战役获得较大的胜利而后六次战役多以失败告终呢？

西汉王朝在五大战役中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夺回河南、阴山地区，迫使匈奴远走漠北，不敢再到长城内外袭扰，但文、景时代所积储的国力，在五大战役中大量消耗，原来丰盈的国库变得空虚了。军力的损耗亦大，如第五次战役，出发时，精骑十万，“私负从马”四万匹，胜利归来时，官、私马也不足三万匹了。继续又进行六次出击，长期用兵，消耗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元气大伤。这如同勇士一样，长期与人决斗，消耗体力，身体逐渐虚弱，后来拳击也就无力，所谓强弩之末难穿鲁缟了。五大战役后，卫青、霍去病这些优秀将领病故，将才后继无人。汉武帝重用亲戚李广利，而他并非将才，指挥多失误，以致丧师辱国。加以每次出师，汉武帝在战略部署上显得兵力分散，急于求成；又偏信巫卜“匈奴必败”，“贰师最吉”[76]等阿谀之词，主观任性，轻易出师。汉武帝晚年也自知劳师远出的过错，下诏罪己，并采取一些“思富养民”的措施来制止不良后果的扩大。如

汉武帝后期第六次战役示意图

（7—19图）

果汉武帝在五大战役胜利后，能明智地改变战略方针，不进行大规模的、以求歼匈奴主力为目标的战役，而是以消弱匈奴力量、使其不得安定为目标，每次只使用数万精骑(有时还可更小一些)，轮番交替地按匈奴放牧规律，不定期地、忽东忽西地进行突然袭击，以加速匈奴的衰落、分化和瓦解，再辅以一些引导匈奴放弃战争手段的政治措施，则必将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汉军亦不致于付出这样大的代价。

第六　西汉从战争中取得短期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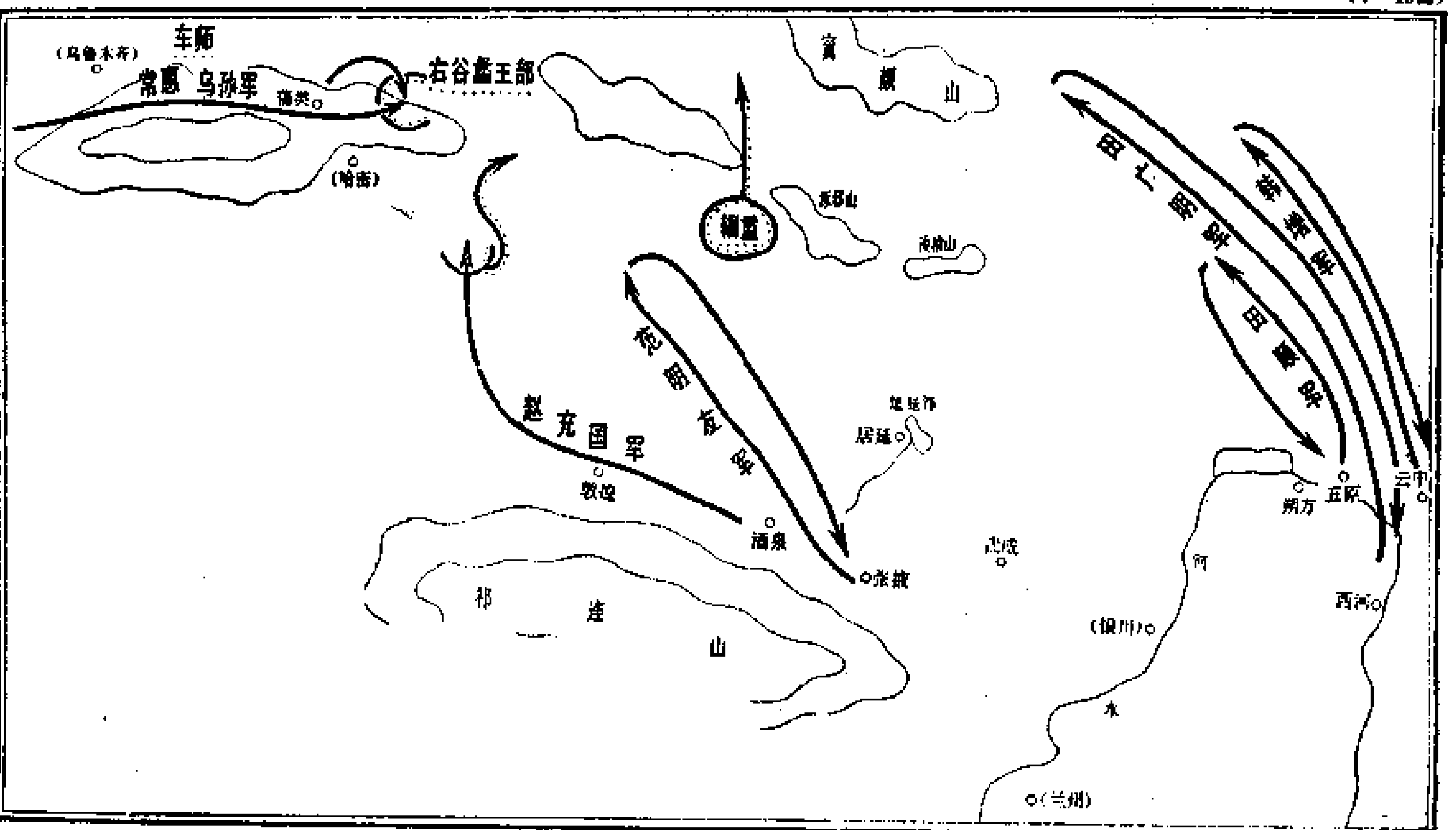
汉昭帝即位，从汉昭帝始元元年到汉昭帝元平元年(前86—74年)的十三年间，承汉武帝“思富养民”的遗训，“轻繇薄赋，与民休息”[77]，除派度辽将军范明友击平乌桓外，对匈奴不再出击。此期间匈奴内部不和，求和亲不成，犯边又多失利，实际上汉匈成僵持状态。

汉宣帝即位后，西汉国力逐渐恢复，又开始对匈奴用兵。

西域乌孙，自汉公主嫁给乌孙王后，一直与汉保持着同盟关系。这时匈奴联合车师，侵逼乌孙，乌孙向汉宣帝求援，并愿出精兵五万，协助汉军夹击匈奴。汉宣帝本始二年（前 72 年），发骑兵十六万分五路击匈奴（参看插图 7-20）：祁连将军田广明率四万骑出西河；前将军韩增率三万骑出云中；虎牙将军田顺率三万骑出五原，合击东部匈奴主力。度辽将军范明友率三万骑出张掖；蒲类（在今新疆东部）将军赵充国出酒泉，合击西部匈奴；并命校尉常惠持节监护乌孙兵夹击西部匈奴。各要求出塞两千里。五将军从长安出发后，匈奴得知汉军大出，老弱奔走，尽驱牲畜远遁。五路大军都只略有所获，只常惠和乌孙兵击破了右谷蠡王王庭，获单于父行、嫂、名王、骑将以下四万人，得牲畜七十余万头。这次出击虽未获重大战果，但匈奴知汉军复振，避战远遁，人畜死亡不计其数，开始走向分化瓦解。

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年)至元康元年(前65年)，汉军击降车师、莎车（在今新疆莎车附近），威震西域。神爵元年（前61年），赵充国屯田金城平定了羌乱，巩固了河西。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虚闾权

汉宣帝五路击匈奴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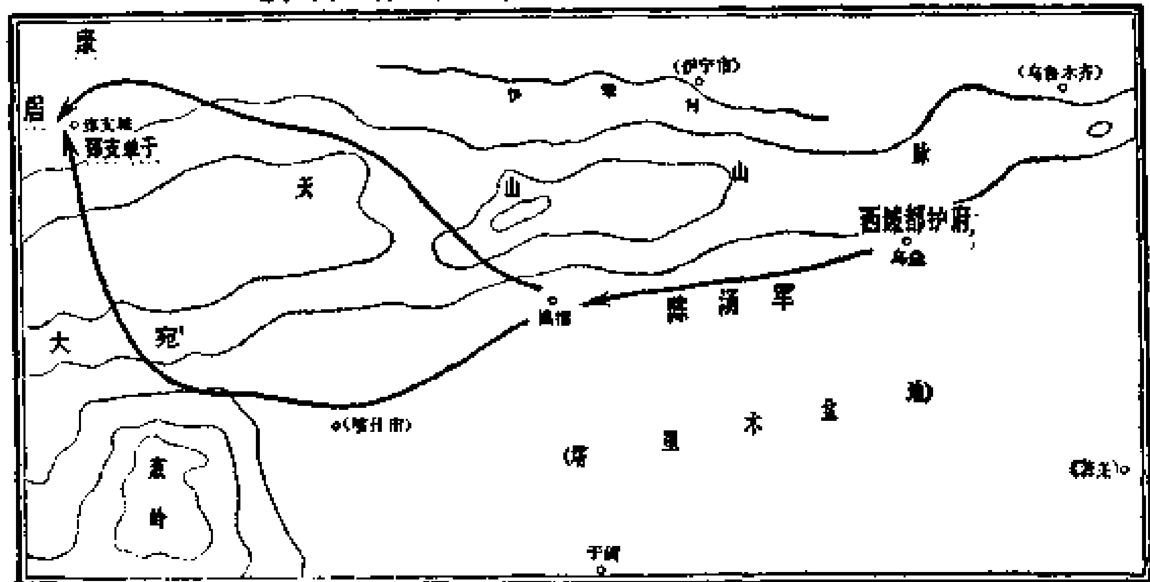


渠单于死后，内部倾轧，日逐王降汉，汉宣帝以郑吉为西域都护。匈奴更弱，不敢争西域，西域三十六国均听汉号令。甘露元年（前53年），匈奴分裂后，呼韩邪单于与郅支单于对立，呼韩邪单于降汉，郅支单于西迁。康居王与乌孙为敌，迎郅支单于到康居东部筑城而居，以防乌孙。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年），汉西域副校尉陈汤，独断专行，矫诏发西域诸国兵，得汉胡共四万人，分南北两路攻郅支城（在今苏联塔什干东北的江布尔）。（参看插图7-21）南路越葱岭，经大宛；北路由温宿（今新疆乌什）经乌孙，分进合击，攻破郅支城，杀死郅支单于，传首京师。汉元帝竟宁元年（前33年），呼韩邪单于来朝，“愿婿汉氏以自亲……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78]汉元帝把单于的请求交付群臣讨论。议者都认为从边境撤退汉军，由匈奴替汉防守边塞，是好办法。郎中侯应，熟悉边事，力持异议，不同意撤守边塞汉军，更不同意由匈奴军守边。他向元帝陈述了十点理由[79]。归纳其主要的几点是：

一、自周秦以来，匈奴常袭扰边境。汉朝开国后，更受其害。到孝武帝时，出师征伐，夺回所掠占阴山地区，迫使其远遁漠北。在边地建设关塞小路，修起亭舍隧道，构筑外城，设置屯戍，以进行防守，

汉陈汤军击郅支单于示意图　（7—21图）



才使边境得以稍安。如果撤罢守备边塞吏卒，会给匈奴以大利。

二、今匈奴被征服，俯首来称臣。但匈奴性情，处于困窘时，则卑顺；一旦强盛时，则骄逆。过去已经罢撤外城，简除亭隧，只够了望，传送烽火。古人说：安不忘危，切不可再撤守备。

三、中国虽有礼义之教，刑罚之诛，愚民犹尚违犯禁令，何况单于，谁能保证其众不破坏条约。今罢撤边塞守备，会使匈奴产生欺侮之心，逐渐引起纷争。

四、自武帝修筑边塞以来，百有余年。所有边塞都不是土墙，是利用山岩、石块、树木、谿谷、水道加以平整，征发士卒构筑修治，所费工程时间，不可胜计。我担忧议论者不深思熟虑，就想以一时权宜之计，精减戍守。十年以后，百年以内，如果突然发生事变，那时，遮障、关塞已破坏，亭舍、隧道已毁绝，再征发戍卒屯守缮治，恐怕耗费一年功夫，亦难修复。

五、如果罢撤戍卒，减少堠望，单于自以为保塞守御，有恩德于汉，会请求无已。稍为不满足其意愿，后果就不可推测。让匈奴钻空隙，破坏中国牢固边防，这不是永保治安、威服匈奴之长策。

侯应列举上述理由，驳斥了"罢边备塞吏卒"的谬论。汉元帝赞赏侯应的深谋远虑，随即下命令："勿议罢边事"，并派车骑将军许嘉面告呼韩邪单于，说：

> 单于上书请罢撤北方边塞吏士屯戍，愿子孙世世代代保卫边塞。单于向慕礼义，所以为人民计谋者甚忠厚，这是长久之策。朕（皇帝自称）很嘉勉。中国四方皆设有关卡、渡口、遮障、要塞，不是独用以防备塞外之人，亦用以防备中国奸邪放纵，出为盗寇，为害边地。故明定法度以齐一众心。敬告单于已知晓其善意，朕无疑虑，望单于不怪汉不罢撤边备。[80]

呼韩邪单于答谢说：

> 我愚昧不知大计，幸蒙天子（指汉元帝）派遣大臣告谕，实甚仁厚。[81]

呼韩邪单于请娶汉女、当汉婿以自亲，汉元帝答应了他的请求。

以后宫女王嫱字昭君赐配单于，昭君系南郡秭归良家民女，早年被选入宫，这次嫁给单于，封为宁胡阏氏，在匈奴年余生一子，名伊屠牙斯，后又生二女，直到老死塞外。其墓上草色独青，称为青冢。昭君出塞，成为汉朝与匈奴和好的历史佳话，千古传诵。以后，终西汉之世，边郡人民一直过着边境平靖、“靡有兵革之警”[82]的和平生活。

侯应不同意因汉匈联姻，就“罢边备塞吏卒”的陈词，就西汉当时的情势而言，实是富有深谋远虑的筹边大略。

匈奴战败、衰落的原因：

匈奴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强劲的兄弟民族，人民骁勇善战。冒顿单于崛起，整军经武，驱使匈奴人民与西汉对阵六十年。初期因匈奴骑兵优势，利用其机动实施急风骤雨般的袭击，汉军防不胜防，常居于劣势。及到汉武帝时，汉军亦建立了强大骑兵，匈奴便失去骑兵的优势了。匈奴受到汉军五次大规模的反击，猛打穷追，人畜遭受重大损失，又失去阴山、河南水草丰盛的牧地，远走缺乏水草的漠北。漠北天寒，“马畜孕重堕殰，罢极，苦之”[83]，人马的损失恢复不易，所以其势渐衰。

匈奴在抗击汉武帝后期的六次反击中，由于汉军也相对减弱，因而取得了一些战役上的胜利，但自己的损失亦大。战争不息，迁徙不止，人畜伤亡众多，人畜的出生率和存活率锐减，虽然还有一定的军力，但总的力量在急剧下降。

乌维单于死后，乌师庐继立为单于。他不耐漠北苦寒，率部逐步向云中、河西徙居。人马的生活、生存条件比在漠北有所改善，但为了争夺牧地，与西域诸国又发生新的矛盾。徙居河西，阻挠西汉通往西域的通道，使汉匈的关系继续恶化。匈奴在大漠南北时，相与敌对的只有西汉一家。迁徙到西北后，敌对势力就不只一国了。西汉结好西域诸国，使匈奴更加势孤力弱。

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和郅支单于等五单于为争夺统治权和地盘，互相攻杀，内部分裂，势力遂衰。后来，呼韩邪单于亲汉，率部向南迁徙，靠近汉五原塞。郅支单于继续与汉为敌，西迁到康居东部，

投靠康居。汉元帝时，郅支被西汉使者陈汤联合西域乌孙诸国所击杀，匈奴全部土地复归呼韩邪单于统治。他与西汉和亲，两族的人民友好交往，逐渐融洽，最后融合成一个民族了。

综 合 论 述

一、汉匈之间的战争是一次国内民族战争。秦汉之际，匈奴已进到奴隶社会，冒顿单于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国家。而西汉则已是发达的封建社会，有先进的农业、商业和手工业，汉族人民需要安定以从事各种生产。匈奴奴隶主贵族为了获得奴隶、粮食和铜、锦缯等手工业品，以及获得天气较为温暖、水草丰盛的放牧地，不断南下掠夺。刘邦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时，正值匈奴冒顿单于崛起后的兴旺时期。他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万，时时袭扰北方边郡，历高、惠、文、景、武五代，都以匈奴的袭扰为忧。汉武帝即位后也说："今中国一统而北方未安，朕甚悼之"。[84]从平城之围到击灭郅支单于和呼韩邪单于和亲内附，这场战争进行了一百六十五年之久。这其间，汉武帝的五次大反击，对汉军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

从战争的结局来看，经过五次大战役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85]河南、阴山和河西，水草丰盛，气候温和，是匈奴南下袭扰的两大出发基地。匈奴失此，十分伤心。"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86]匈奴远迁漠北苦寒之地，人畜锐减，开始走向衰落。匈奴被歼的累计数字是十五万，加上被俘人数当在二十万以上，损失是惨重的。汉军的伤亡，估计在五万到十万之间，马匹在十万到二十万之间，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这次战争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突出的意义，它挫败了匈奴奴隶主的掠夺，保卫了边境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了生产的发展，加速了边疆的开发；它解除了东北、西北各少数民族所受匈奴的威胁，送去了汉族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和文化，促进了各族人民的通商和友好往来，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内向，加速了中华民族的大融

合，奠定了中国今日的疆域；它还促进了中国与中亚、西亚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

二、作为战争的决策者和组织者，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是值得称道的。他对这次战争，决心之坚，气魄之大，动员人力、物力之多，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当然，如果没有文、景二帝的“与民休息”，为战争积贮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财力，要由文、景时代的专守防御转为汉武帝时代的战略反攻，确非易事。因为宏伟的战略意图，必须建立在稳固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之上。战争准备与战略运用同等重要。汉武帝的武功是建立在文、景的文治上的。而文、景二帝不特为反击匈奴积累了雄厚的实力，也积累了对匈奴骑兵作战的经验。在前期决战中，他善于掌握双方情况，善于组织战役，善于选择战略目标，善于部署兵力，善于使用骑兵，善于集中优势兵力和发挥突然性，善于组织后方供应，善于提拔和使用青年将领。而且“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87]所以他的功绩和作为，可以称得起“雄才大略。”[88]但他的错误也非常突出，在后期对匈战争中，主观指导脱离了客观情况，战略上急于求成有一定的盲目性。元鼎五年（前12年）的六次出击部署上都不恰当，重用李广利更是个严重的错误。赵破奴、李广利的全军覆没都是可以避免的。尤其不恤民力的是，既然对匈奴战争已经消耗了如此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汉武帝还同时进行了平西南夷，平南越（今两广）的战争。还亲率十八万骑巡边，以耀兵塞上。[89]为了宠李夫人、让李广利去立功异域。派李广利率六万人，随带运粮的牲畜十四万头，仅仅为了获得名马而远征大宛。以致弄得百姓疲敝，民穷财尽。加上其他方面的错误，如“穷奢极欲，繁刑重敛”，“信惑神怪，巡游无度”[90]，他的过错就非常大了。所以“雄才大略”和“穷兵黩武”成了集中在这个历史人物身上的一对孪生子。只是由于他的功绩更大些和能够“晚而改过”，加上文、景两代祖先为他储备了雄厚国力，昭、宣二帝所继承他临死前制定的“思富养民”的方针，恢复了民力，避免了蹈秦始皇的复辙，才保持了他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注　释

〔1〕《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

〔2〕《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后三年》

〔3〕〔4〕〔5〕《史记·匈奴列传》

〔6〕〔7〕《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五年》

〔8〕《资治通鉴·卷十二·高帝九年》

〔9〕《资治通鉴·卷十一·高帝六年》

〔10〕《史记·吕太后本纪》

〔11〕《资治通鉴·卷十二·惠帝二年》

〔12〕〔13〕〔14〕〔15〕〔16〕〔17〕〔18〕《汉书·高帝纪》第一、下

〔19〕陈平秘计：《汉书·高帝纪》注释，应劭曰："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己宠，因谓单于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于是匈奴开其一角，得突出。"

〔20〕《资治通鉴·卷十二·高帝八年》

〔21〕《汉书·贾谊传》

〔22〕〔23〕〔24〕〔25〕《汉书·晁错传》

〔26〕《资治通鉴·卷十四·文帝前四年》

〔27〕《汉书·晁错传》

〔28〕《汉书·艺文志》

〔29〕〔30〕〔31〕〔32〕〔33〕〔34〕〔35〕《汉书·文帝·景帝纪》

〔36〕《汉书·贾谊传》

〔37〕《汉书·晁错传》

〔38〕〔39〕〔40〕〔41〕《史记·吴王濞列传》

〔42〕〔43〕《汉书·爰盎晁错传》

〔44〕《史记·吴王濞列传》

〔45〕《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前三年》

〔46〕〔47〕《汉书·文帝纪》

〔48〕《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后三年》

〔49〕《资治通鉴·卷十五·文帝前十二年》

〔50〕《资治通鉴·卷十六·景帝中六年·汉仪注》

〔51〕《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四年》

〔52〕〔53〕《资治通鉴·卷十八·武帝元光五年》

〔54〕〔55〕〔56〕〔57〕〔58〕〔59〕〔60〕〔61〕〔62〕《汉书·韩安国传》

〔63〕《资治通鉴·卷十八·武帝元光二年》

〔64〕《资治通鉴·卷十八·武帝元光六年》

〔65〕《史记·卫青列传》注

〔66〕《资治通鉴·卷十九·武帝元朔六年》

〔67〕〔68〕〔69〕《资治通鉴·卷十九·武帝元狩四年》

〔70〕《汉书·霍去病传》

〔71〕〔72〕《汉书·晁错传》

〔73〕汉武帝太初五年(前100年)，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张胜、常惠等持节出使匈奴，匈奴骄横无礼，无端扣押苏武，并把他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北海地方牧羊。他受尽悲惨折磨，"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仍持汉节，卧起操持，节旄尽落。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匈奴壶衍鞮单于立，国内乖离，恐汉兵袭之，谋与汉和亲。汉使要求索回苏武、常惠等人，方可言和。匈奴诡言苏武已死，不愿遣返；使者说："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系帛书，言武在某泽中"。单于大惊，承认"武等实在"，允诺释放。当年苏武出使匈奴时随行百余人，回到汉朝时，只有九人偕还。苏武出使时，年方四十，在匈被扣十几年，回汉时，须眉如雪，手中尚持汉节，旄头早落尽无余，长安都人，无不嘉叹。昭帝拜武为典属国。苏武坚贞不屈，宁死不忘祖国，保持了民族气节，至今流为美谈。现在流传的"苏武牧羊"和"鸿雁传书"的佳话，就是由此而来。

〔74〕宫廷事件：李广利出师时，与姻亲丞相刘屈氂商议过要李夫人（李广利之妹）之子昌邑王为太子。后事发，判为大逆不道。刘屈氂被斩，李广利之妻亦被逮捕。

〔75〕〔76〕《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四年》

〔77〕《汉书·昭帝纪》

〔78〕《资治通鉴·卷二十九·元帝竟宁元年》

〔79〕全文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九·元帝竟宁元年》。

〔80〕〔81〕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九·元帝竟宁元年》。

〔82〕《资治通鉴·卷三十·成帝建始四年》

〔83〕《资治通鉴·卷二十三·昭帝始元元年》

〔84〕《汉书·汉武帝纪》

〔85〕《资治通鉴·卷十九·武帝元狩四年》

〔86〕《资治通鉴·卷二十九·元帝竟宁元年》

〔87〕《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后元二年》

〔88〕《汉书·武帝纪》

〔89〕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北巡，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领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里，威示匈奴；派使者郭吉面告匈奴单于说："南越王头已悬于汉北阙。今单于能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必徒劳远走亡匿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无所为也"！单于听了这番话，十分愤怒，扣留汉使郭吉，并迁囚于北海。而匈奴气馁力弱，终不敢侵犯汉边。

〔90〕《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后元二年》

第八章　绿林军摧毁王莽政权的昆阳决战

第一　农民大起义的形成和发展形势

西汉末年，封建王朝的赋税徭役，日益加重，贵族、官僚和地主“多蓄奴婢，田宅亡限”[1]，造成农民大批破产，饥馑流亡，土地兼并和奴婢、流民的数量恶性膨胀，使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全国各地呈现出动荡不安的局面。

这时候，上层豪强的代表王莽以汉室姻亲的关系（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成帝的生母）登上政治舞台，做大司马录尚书事，取得了政治上最高的职权。他一方面通过大封爵位来取得统治阶级上层豪强的拥护；一方面对劳动人民也制造了一些好的影响。如公元二年，郡国发生旱灾、蝗灾，他献出钱一百万、田三十顷，官吏豪富二百三十人也献出田宅，请大司农分配给农民。对捕蝗者给以酬钱，对疫区人民腾出房子，给以住宿医治，又在长安城中造住宅二百区，让贫民居住。他这些做法取得明显的影响。他又征集天下通晓各方面的士人数千人到京师，又扩大太学生名额，以此来博得无市籍地主的拥护，有四十八万人上书颂他的功德。公元18年，王莽看到篡代的时机成熟，遂废西汉刘氏皇朝，建立起国号“新莽”的王氏皇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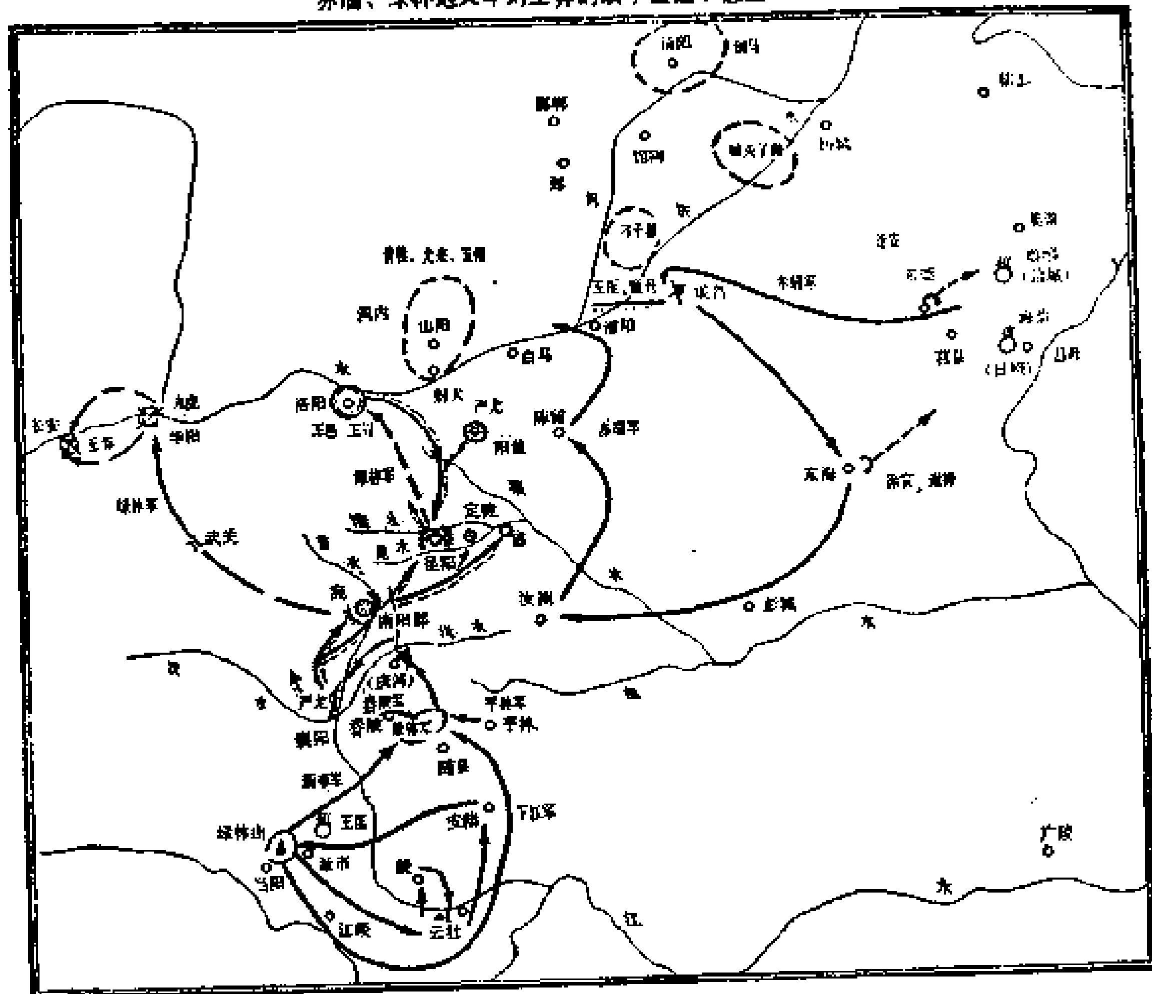
王莽代汉以后，进行复古改制，如改民田为“王田”[2]，改奴婢为“私属”[3]，均不得买卖。他又改变币制，先后用了二十八种货币，用不合理的比价，以轻易重，以小易大，大量套取民财，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他还推行“五均、六管”[4]等。这些苛捐杂税，横征暴敛，断绝了人民的生活。他为了推行这些新政，竟采用严刑峻法。

人民稍有违犯，即被杀害，或罚作官奴。“春夏斩人都市，百姓震惧，道路以目”[5]，人民的生存权利也被剥夺了。在全国人民极端不满的情况下，他又大开边衅，引起各少数民族首领宣布脱离新莽的藩属地位，并乘隙骚扰边境。王莽调动军队发动大规模的对少数民族的战争，强征农民出征，前后人数达数百万。徭役繁苛，天下骚动。加以连年水旱蝗灾，民不聊生。劳苦人民的生机断绝，除了起义反抗，别无他路可走。

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琅琊海曲（今山东日照县境）的妇女吕母首先举起反抗王莽统治的义旗。接着，在黄河南北和江汉地区先后起义的有绿林、赤眉、东海刁子都、城头子路、铜马、高湖、重连、青犊、大彤、五幡、尤来和大抢等数十部分，达数百万人，以燎原之势遍及全国，其中以绿林和赤眉两支起义军的实力最强。（参看插图8-1）

王莽天凤五年(公元18年)，青州农民在琅琊(郡治在今山东诸城)人樊崇领导下，发动起义。接着，琅琊东莞（今山东沂水）人逄安、东海（郡治在今山东郯城西北）人徐宣、谢禄和杨音也聚众参加，共推樊崇为领袖，很快发展到十余万人。农民起义的蓬勃发展，震撼了王莽集团的统治。王莽为了加强对农民起义军的镇压，设置了前、后、左、右、中五个“大司马”，分别指挥各路兵马。各州、郡、县的地方官吏，均分别兼任大将军、偏将军、裨将军和校尉等职，共组织了百万以上的军队，并在洛阳设置指挥中心，对起义军采取了全面的军事镇压。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派遣将军景尚和王党进攻樊崇起义军，遭到失败。次年夏，又派遣太师王匡（与绿林军首领王匡同姓名）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军十余万再次发动进攻。(义军与新莽军交战时，为了识别，全军用朱红涂眉，由此被称为“赤眉军”)成昌（今山东东平西）一战，王莽军全军覆没，廉丹及其校尉二十余人被杀，太师王匡逃回洛阳。赤眉军乘胜转战东海(郡治在今山东郯城西北)、挺进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汝南（郡治在今河南息县），活动于黄淮大平原，兵力达三十余万人，从东方威胁王莽在关东的战略要地洛

赤眉、绿林起义军对王莽的战争经过示意图　　(8—1图)



阳，同时有力地掩护和支援在荆州地区的绿林军的发展壮大。

在赤眉军起义的前一年（王莽天凤四年，公元17年），荆州地区（今湖北、湖南及河南南阳一带）发生大饥荒。新市（今湖北当阳东北）的贫苦农民数百人在王匡和王凤的领导下，起兵反抗王莽暴政。不久，南阳（今河南南阳）人马武、颍川人王常和成丹等也聚众前来参加。这支起义军选择绿林山（今湖北当阳北大洪山）为根据地，因此，历史上称为绿林军。绿林军为了避免敌人注意，向王莽统治力量薄弱的附近乡村发展。几个月后，就组成了一支八九千人的农民武装。王莽地皇二年(公元21年)，王莽派遣荆州牧率领精兵二万，围攻绿林军。绿林军主动出击，在云杜（今湖北京山）附近设伏击溃王莽

军，缴获全部辎重，并俘获荆州牧，乘胜攻占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回师攻占云杜、安陆（今湖北安陆北），又俘获王莽派去巡视河南的大司马士（大司马府中的最高级官员）。绿林军的威名大震，人民踊跃参加，力量迅速发展到五万多人。王莽感到这支起义军对他的统治威胁很大，又派遣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由洛阳率军南下，进攻绿林。此时，绿林山一带瘟疫流行。绿林军为了离开疫区，并避免同严尤、陈茂军决战，于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四月，分为南北两路向外发展。一部由王常和成丹率领为南路，称"下江军"，西入南郡(郡治在今湖北江陵)，吸引王莽军的注意力；主力由王匡、王凤、马武和朱鲔等率领为北路，称"新市军"，北向南阳，准备相机进图关中。七月，新市军进到随县一带时，平林（今湖北随县东北）人陈牧和廖湛聚众数千人，称"平林军"，响应绿林起义。汉宗室没落贵族刘玄也在这时加入平林军。同年冬，舂陵（今湖北枣阳南）的刘姓宗室刘縯和刘秀兄弟，亦聚集宾客、子弟七八千人，称"舂陵军"，加入新市、平林的起义队伍。此时，"下江军"亦转移到随县（今湖北随县）地区与主力会合，力量大为增强，声势更为浩大。地皇四年（公元23年）正月，先后在沘水（唐河支流，此处指泌阳西一段）、淯阳（今河南新野北）击破王莽的荆州军甄阜、梁丘赐、严尤和陈茂诸部，俘获大批俘虏和装备，部队扩大到十余万人，乘胜以主力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以一部向北推进，攻下昆阳、定陵和郾城，威胁长安、洛阳。

在河北，农民起义军城头子路和刁子都有众二十余万，活动于河（黄河）济（济水）间；铜马有众数十万，活动于清阳（今山东临清）地区；青犊、尤来和五幡活动于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射犬（今河南武陟西北）地区，牵制敌军。

这三方面的农民起义军对在洛阳的王莽军主力已构成合围之势，处于外线。王莽军的兵员虽多，但素质不良，又处于内线。这是当时的战略形势。

第二　昆阳大决战

昆阳之战是绿林军加速王莽政权崩溃的一次战略性决战，也是历史上以少胜众的一个光辉范例。王莽的兵力有四十二万人，而绿林军守城和外援的总兵力不过二万人。在双方总兵力二十比一、局部兵力则为四十比一的十分悬殊的情况下，绿林军竟能取得全歼敌人的光辉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本文仅就双方的战略企图、战略决策和重要作战指导加以论述。

一、王莽军的战略企图

当绿林军击破王莽的荆州军时，赤眉军进入豫州，活动于濮阳（今河南濮阳南）、陈留（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一带，威胁关东的战略要地洛阳。王莽开始决定使用主力于东方，派太师王匡和国将哀章率兵三十万东攻赤眉，派严尤和陈茂等率兵十万南击绿林。后得知绿林军已拥立刘玄为帝，建立更始政权，并围攻宛城，进到淯川[6]，严尤军仍停滞于颍川郡。王莽感到关中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慌忙变更战略部署，把主力转用于南方。淮阳王更始元年（公元23年）三月，王莽派大司空王邑和司徒王寻到洛阳，征发各州郡精兵四十二万，号称百万，向绿林军进攻，并征发诸明兵法者六十三家，以备军吏。王莽的大军向颍川南进时，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妄图以压倒的优势一鼓而歼灭绿林军。从王莽军的战役行动来看，其战略意图是想确保宛城，击破绿林，安定荆州，以保障洛阳、长安的安全，并阻止绿林与东方的赤眉会合。

就当时的战略形势而言，在东方的赤眉军虽已进入兖、豫二州，但东方的战略要点洛阳，仍控制在王莽军手中，王莽又加派大将军阳浚守敖仓（今河南荥阳北），足以阻止赤眉军西进；在河北的铜马和青犊诸部，被大河阻隔，尚难向南发展；而在南方的绿林军正乘胜向北发展，并已在淯水建立更始政权。如绿林军攻克宛城，可以西入武关，直接威胁王莽的统治中心长安。王莽军处于内线作战的形势下，如何先击破一方，脱出不利态势，是一重大的战略决策。王莽盱衡全

局，决心改变战略部署，把主力转用于南方，企图先击败绿林军，这是适合当时情况的。这一企图并不愚昧。

二、绿林军的战略企图

绿林军在淯阳建立更始政权后，声威壮大，士气高涨，即以主力围攻宛城，另派王凤、王常和刘秀等率一部兵力，乘严尤和陈茂军停滞于颍川郡之际，先敌一着，向北推进，阻止王莽军南下，以保障主力攻略宛城。王凤等到达滍川地区，攻下昆阳（今河南叶县）、定陵（今河南舞阳北）和郾城（今河南郾城南），与宛城形成犄角之势，造成尔后作战的有利态势。从绿林军的战役行动来看，其战略意图是想攻略宛城以为根据，分兵北向洛阳，可与赤眉会师；一面经武关西入长安，击灭王莽政权。

绿林军借旺盛的士气，向北推进，既着眼于一举攻占关东的战略要地洛阳，可与东方的赤眉军会师，还注意谋取适当的根据地，壮大势力，以西攻长安。这反映绿林军的将领洞察当时形势，具有稳中求胜的战略眼光。其意图是可取的。

三、绿林军的战略决策

王邑和王寻军由洛阳南下在颍川郡与严尤和陈茂军会合后，四十二万大军继续向南推进。五月，刘秀率领数千人由滍川进至阳关（今河南禹县西北），与由颍川南下的王莽军先头部队遭遇。他了解到敌我力量悬殊，遂全部主动撤回昆阳。敌人即将迫近，面对四十比一的悬殊力量，形势十分严重，当时对如何抗击这一强大的敌人，绿林军将领们开始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城中只有八九千人，众寡悬殊，不易取胜，亦难以御敌，“欲散归诸城”（即避免与敌决战，化整为零，回到根据地另图再举之意）[7]，而刘秀却主张坚守昆阳，待机破敌。他分析当前的形势说：

> “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胜利可能取得）；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破，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8]

在议而未决之际，王邑军的先头部队已逼近昆阳城北，情况非常紧

急。刘秀再度向诸将画图，说明成败关系重大，终于使诸将的意见趋于一致，定下决心：由王凤和王常等督率八九千人坚守昆阳城，由刘秀、李轶和宗佻等十三骑乘夜出城，到郾城和定陵一带去调集兵力，准备破敌解围。从绿林军的决策和行动可以看出，其战略方针是坚守昆阳，迟滞、消耗王邑军，保障主力攻取宛城，然后调集兵力，伺机内外夹击，击破敌人。

昆阳是宛城东北的屏障，也是自宛城通达颍川郡及入伊洛必经的要点，遂为绿林军与王莽军所必争之地。绿林军坚守昆阳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原因是：

（一）绿林军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形势

从当时整个形势来看，东有赤眉军在陈留一带威胁敌人；北有河北农民起义军铜马和青犊的声援；南有围攻宛城的绿林军主力的呼应；附近还有定陵，郾城可以调集的兵力，处在各地农民军相互配合，牵制王莽军兵力的大好形势下，绿林军是具有可守的条件的。如果放弃昆阳，会使全局陷于不利。

（二）绿林军具备可守的主客观条件

绿林军在云杜、沘水和淯阳连续击败王莽的荆州军之后，士气高涨，战斗力强，有战胜王邑军的信心和经验。何况昆阳城小而坚，利于固守。坚守昆阳，可以稳定阵势，巩固内部。放弃不守，会使军心涣散，士气低落，招致失败。

王邑率四十二万大军南下，气势汹汹。但他的军队是临时凑集，貌似强大，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士气低落。同绿林军相比，尽管数量上占优势，但内部存在着尖锐矛盾，兵无斗志，这是绿林军能以少胜众的客观条件。

（三）坚守昆阳，可打破王莽军的战略企图

王莽集中四十二万大军南下，其战略意图在于消灭绿林军攻宛的主力，稳定荆州局势。绿林军坚守昆阳，就有力地牵制住王莽军的兵力，掩护进攻宛城的主力军，打破王莽军的战略意图，并保障主力攻取宛城。如果撤离昆阳，攻宛主力势必腹背受敌，使全局陷于不利。

（四）坚守昆阳可避免遭敌人各个击破

当绿林军主力正在围攻宛城、一部退到昆阳之际，王莽的大军突然南下，出现了一种前有敌人重兵压境、后有坚城未下、欲进不得、欲退不能的险恶境况。如放弃昆阳，会演成刘秀所说的“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何况王邑的大军已迫近昆阳城下，绿林军“欲散归诸城”已为形势所不许。即使昆阳部队能撤走，王邑也会以全力去进攻宛城的绿林军主力，绿林军腹背受敌，就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更谈不上歼灭敌人了。因此，刘秀的“集中兵力、并力御之”的积极防御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基础。

（五）调集兵力内外夹击的决策符合当时情况

当时绿林军主力围攻宛城未下，不能分兵相救。若闭城固守待援，城中兵乏粮缺，相持日久，必会坐以待毙。只有一面坚守昆阳，一面派人突围出击，调集兵力。这两者是互相依存的。沒有前者，就不能使敌人顿兵坚城，给刘秀以调集附近郡县兵力的时间；沒有后者，就不能摧毁强敌，以解昆阳之围，获得全歼敌人的胜利。

四、王莽军的战略决策

王邑和王寻军刚到昆阳，就遭到绿林军的坚决抵抗。王邑恃强逞威，立即命先头部队十余万人将昆阳包围。严尤不同意这样的战略指导，主张先打宛城。他向王邑建议：

“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指刘玄）在宛，亟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9]

但王邑认为哪有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攻克的道理，未采纳严尤的建议，还傲慢地说：

“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喋血而进（踏着血迹前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10]

他决心倾全力先破昆阳，陆续使用全部兵力把昆阳层层包围。严尤又向他提出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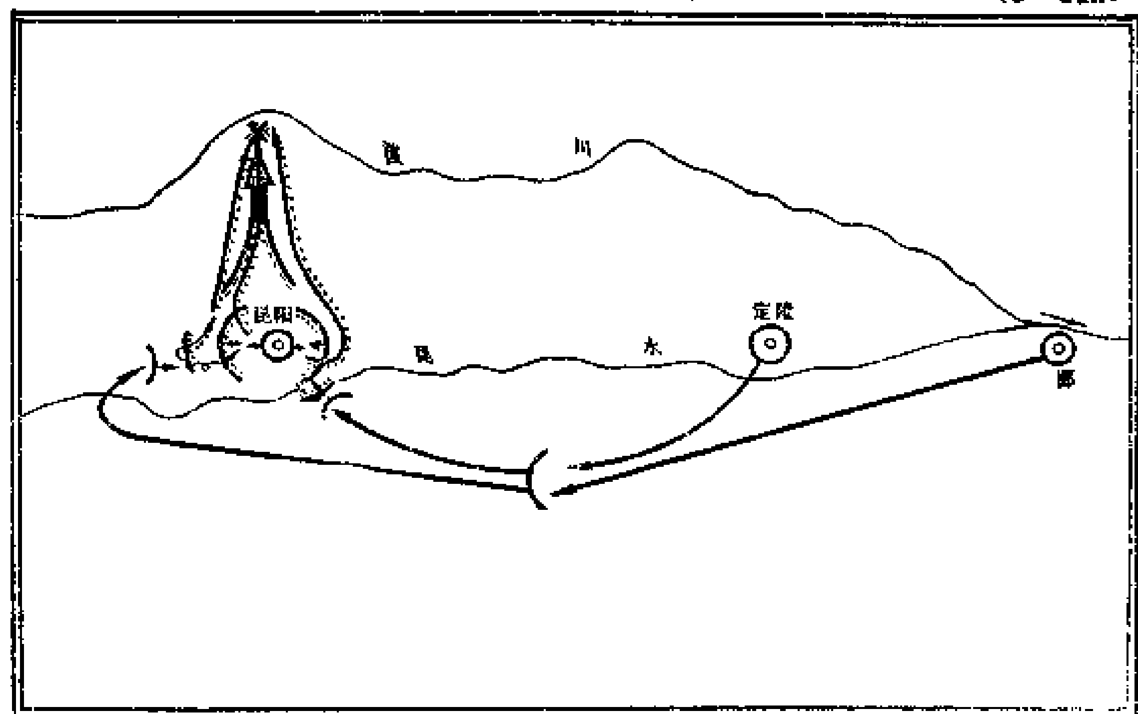
“围城为之阙（围城须让开一面），可如兵法，使得逸出（逃走），以怖宛下（使攻宛城的绿林军恐惧）。”[11]

王邑还是未采纳，仍一意坚持四面包围，全力强攻。从王邑的决策和行动可以看出其战略方针是先倾全力破昆阳，再转用兵力攻打宛城的绿林军主力。

宛城是荆州地区南北交通及经济的重镇。北出洛阳，南通荆襄，西入武关，是荆州的战略要地。王莽军确保此地，即是以控制荆豫两州的形势；绿林军夺得此地，则北进可以略取洛阳，西向可以威胁长安，因此它是双方必争的要地。王邑和王寻不知兵略之要，狂妄轻敌，骄傲自大，既不知兵，也不会用兵。率大军南下，拒用严尤的正确建议，把战略目标选择错误，不去攻打围攻宛城的绿林军的主力，而却误用全部兵力去攻打昆阳，以致使四十二万大军被一个小小的昆阳所牵制，顿兵坚城，给绿林军造成集中兵力、内外夹击的机会。决策错误影响战争全局，结果宛城失守，大军亦溃败，加速了王莽政权的崩溃。严尤的建议当时如被王邑采纳，则荆州战场上的战争形势可能会暂时引起不利于绿林军的变化，使王莽政权得以苟延寿命。

五、绿林军的战役指导(参看插图8-2)

昆阳大决战经过示意图 (8—2图)



王邑和王寻对昆阳城加紧围攻，鸣金击鼓之声闻于数十里之外。为了加速破城，王邑命掘地道进攻，并出动了高楼一样的巨型“冲车”，冲击城门；又下令万弩齐发，箭如雨下。在形势非常危急的情况下，绿林军依靠城内人民的支持和配合，英勇顽强地击退了王邑军的多次进攻，坚守危城，屹立不动，给王邑军以重大的消耗和挫折。

在解昆阳之围的战斗中，刘秀的战役指导是很出色的。他发挥了善于捕捉战机和机动灵活的特点。他重视初战，善于乘敌松懈而击之，发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慨。当他与李轶和宗佻等率领从定陵和郾城调集来的援军一万多人前来解昆阳之围时，为了消除军中惧敌心理，他亲率精锐的步骑兵千余人为前锋，前进至昆阳城，距王邑军四五里列成阵势，王邑和王寻恃众轻敌，只派出数千人迎战。刘秀率军进攻，斩杀王邑军数十人。诸将大喜说：“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今见大敌勇，甚可怪也。且复居前，请助将军”[12]。经此小胜鼓舞，将士们斗志昂扬。刘秀亦发觉王邑军士气低落、不愿打仗的弱点，指挥部队乘胜冲杀，连续突击，又斩杀约千人，取得了初战的胜利。此时，绿林军主力已攻克宛城三日，但捷报还未传到昆阳。刘秀为了鼓舞全军士气、动摇敌军斗志，便制造攻克宛城的战报，用箭射入昆阳城中，又故意将战报遗失，让王邑军拾去传播。这一消息一经散布，昆阳城中绿林军的士气，更加高涨，守城更加坚定，而王邑军则由于久攻昆阳不下，又闻宛城失陷，士气更为沮丧。战场上的有利形势便转向绿林军方面了。

刘秀在取得初战胜利后，又善于捕捉战机，乘敌人士气沮丧和主帅轻敌的弱点，精选“死士”三千人，迂回到城西，出其不意地涉过昆水，向敌人的要害——指挥部发起猛烈的冲击，摧毁敌人的指挥中枢，使王邑的全军陷于瘫痪，王邑军经绿林军的猛烈冲杀，阵势大乱，王寻被杀。昆阳城内的守军见敌军阵容混乱，也乘势出击，内外夹攻。王邑全军崩溃，互相践踏，积尸遍野。这时，正值大风暴雨，滍水暴涨，涉水逃跑而被淹死的成千累万，只有王邑和严尤等少数人狼狈逃回洛阳。昆阳之战就在绿林军歼灭王莽军主力并尽获其全部装备和辎

重的光辉胜利中结束。

两军作战是智与力的决斗。智是指挥员的卓越指挥，力是将士们的英勇战斗。昆阳之战正是绿林军的指战员的智与力的结合。指挥灵活，战斗英勇，因而取得了以少胜众的光辉战绩。

六、王莽军的战役指导

在围攻昆阳的战役中，王邑未意识到把数十万大军拥塞于昆阳小城之下，对彼极为不利，还以为攻占昆阳，易如反掌，忙着向附近郡县勒索贿赂，竟把攻城之事搁置一边，坐待绿林军开城出降。

当刘秀率军回救昆阳时，王邑不阻击之于远方，仅以数千兵力迎战，致使首战失利，影响军心士气。当刘秀率“死士”三千人向其指挥部冲击时，王邑见绿林军兵力不大，仍盲目轻敌，只以万余人迎战，他又怕部队混乱，下令各军不准擅自行动。王邑军的士兵都是被胁迫而来的，本无斗志，诸将遂借口王邑有令在先，互不救援，从旁观战。指挥官的愚昧无能，有强大优势的兵力而不能发挥，使优势变成了劣势，主动变成了被动，导致全军覆没。这也说明战争的主观指导是否正确，对战争的胜负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三　胜利进军长安推翻王莽政权

昆阳之战是决定性的大战，王莽的主力军在昆阳被歼后，农民起义的风暴很快席卷全国，原来在观望中的各地的地主豪强包括王莽的某些地方官吏，也乘机起兵反莽，割据土地自称将军。王莽政权摇摇欲坠。王莽忙于调兵遣将，妄图固守仅有的洛阳和长安两大战略要点，

击败王莽的"九虎"将军和波水将军窦融部，乘胜进逼长安。十月一日，绿林军攻入长安，莽军纷纷投降，王莽被商人杜吴砍死在未央宫中的渐台。经过七年艰苦斗争的绿林军，终于推翻了王莽的反动统治，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从绿林军七年的斗争历程来看，能以少胜众，斗志昂扬是主要的，因而能从零星分散的战斗发展到合聚整体的作战，由伏击战发展到运动战。在斗争中，注意建设根据地来积蓄力量，重视容纳各方面反莽的势力来壮大阵营，培养了一批能征惯战的将领，利用了良好的战略形势，战略运用正确，战役指导得当，方有昆阳之战的胜利，才有乘胜下洛阳、入武关、攻克长安，推翻王莽政权的胜利结局。因此，可以说昆阳之战是决定王莽政权覆灭命运的一场关键性的决战，是战略决战。王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广大农民憎恨王莽，要推翻他的统治。而刘秀除决心坚强，指挥有方，运用了许多新战法外、还运用了战场宣传，鼓舞斗志。他的运筹指挥在昆阳大捷中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刘秀的胆略实有可称者。他不愧是绿林军中的一员杰出的将领。

注　释

〔1〕《汉书·哀帝纪》
〔2〕〔3〕《汉书·食货志上》
〔4〕《汉书·食货志下》
〔5〕《汉书·王莽传下》
〔6〕《纲鉴易知录》注：滍川泜水，源出今河南鲁山西，东南流经叶县。
〔7〕〔8〕〔9〕《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10〕《汉书·王莽传下》
〔11〕《汉书·王莽传上》
〔12〕《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第九章 刘秀统一战争

刘秀在昆阳之战中，出谋划策，亲历战阵，显示其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立下了巨大的功勋，但因其兄刘縯遭到更始帝刘玄的忌恨而被杀害，他也受到排斥。他虽心怀不满，却隐忍不敢露，委曲求全，卑事刘玄，从不谈自己在昆阳作战的功绩，终于取得刘玄的宽恕。更始六年（公元23年）十月，刘玄从洛阳西迁长安时，派他以大司马名义，持节北渡黄河，去安抚河北州郡。这给了刘秀以伸展抱负、图取天下的机会。从他去安抚河北到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十一月消灭公孙述，完成全国的统一，前后共历十三年。他统一天下的战斗历程可概略区分为四个阶段：略定河北、进图两京、挫败赤眉和消灭割据。现就有关战略运用，提出若干问题加以评论。

第一 刘秀略定河北、图取天下的战略意图

一、有利的形势

当刘秀北渡黄河去安抚河北期间，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大军和大河以北起义军的动态以及河北地方割据势力的形势概要如下：

（一）绿林方面

绿林军拥立的刘玄自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由洛阳西迁长安后，对如何整顿内部、如何团结各地起义军、结束分裂割据的局面，未能提出相应的政治、军事措施。他滥赏官爵，大封宗室及统兵大将为王，制造分裂，出现了拥兵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

赵萌（刘玄的党羽）控制长安；

申屠建、李松、廖谌、胡殷和陈牧诸部分屯关中；

王匡、成丹和刘均拥兵十余万，分据河东，朱鲔、李轶、田玄、

陈侨和武勃拥兵三十万，共守洛阳；

鲍永和田邑守并州，李通守荆州，王常守南阳；

刘玄对外又打击、排斥赤眉军，导致后来的互相火并，绿林军由于领导集团的变质，从此失去人心。

（二）赤眉方面

当刘玄迁都到洛阳时，赤眉军正活跃在濮阳、颍州一带。樊崇等亲赴洛阳，想与绿林军合作，不料遭到刘玄的歧视和排斥。赤眉的几十万大军不仅未得到妥善的安置，反而受到绿林军的袭击。樊崇等不胜愤懑，在刘玄西迁长安之前，潜回颍川。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赤眉军分兵去建立根据地。一部由樊崇和逄安率领，占领了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宛（今河南南阳）等地；一部由徐宣、谢禄和杨音率领，占领了阳翟（今河南禹县）、梁（今河南临汝西）等地，继续开展新的斗争。

（三）河北方面

在大河以北地区，绿林军、农民起义军和地方割据势力占据郡县，星罗棋布，各不相属。计有：（参看插图9-1）

绿林军：

谢躬据邺城（今河北磁县南）；

农民起义军：

铜马有众数十万，活动于清阳（今山东临清）地区；

城头子路有众二十余万，刁子都有众六七万，活动于河（黄河）、济（济水）间；

青犊、尤来、五幡活动于山阳（今河南焦作市东）、射犬（今河南沁阳东北）地区；

此外，尚有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和大江等部农民起义军，分布在河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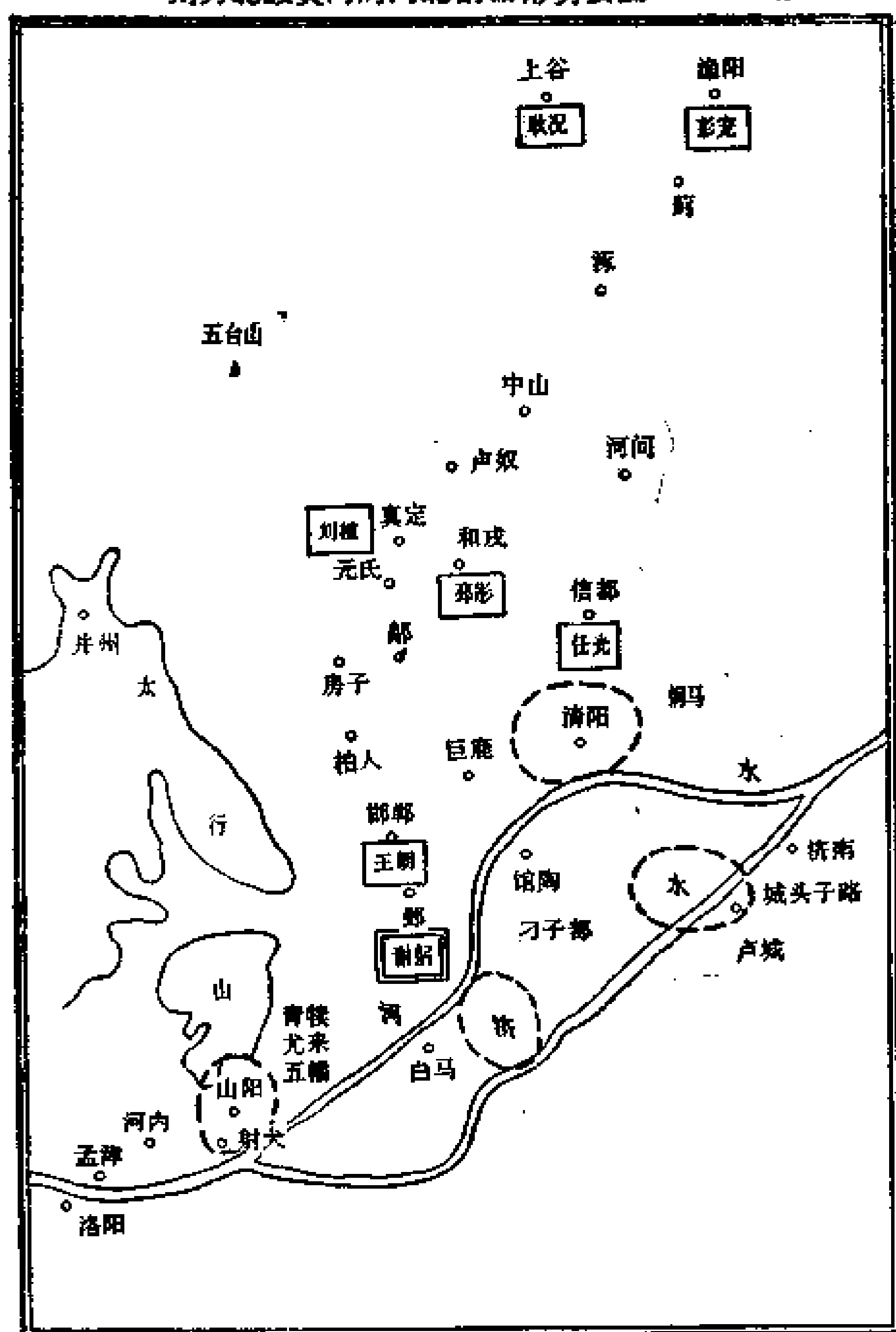
地方割据势力：

王朗占据邯郸（今河北邯郸市）；

刘植占据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

刘秀北渡黄河时河北割据形势要图

（9—1图）



信都太守任光占据信都（郡治在今河北冀县）；

和戎太守邳彤占据和戎（郡治在今河北束鹿）；

渔阳太守彭宠占据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西南）；

上谷太守耿况占据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东北）。

从整个形势看，大河以南两京地区的绿林与赤眉两支起义大军，未能合作，且互相敌对，失去了控制中原局势的力量。大河以北的绿林军、农民起义军和地方割据势力亦互不相属，各自为谋。这在客观方面就给刘秀以在河北发展自己势力的大好形势和机会，而刘秀能否因利乘时，崛起河北，就在他主观的努力了。

二、正确的决策

刘秀一到河北，就利用绿林军在昆阳大捷的声威，打着汉宗室的旗帜，采取接纳、安抚、拉拢、打击的政策、策略和手段，翦除各种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他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略定了河北，为他建基立业打下了基础。关键性的一着是他善于采纳意见，定下正确的决策。

更始元年（公元23年）十月，刘秀刚到河北时，他的幼年同学邓禹由新野（今湖北新野）前来投奔，向他分析天下形势，品论当时人物，陈述"图取天下之策"说：

> "今山东未安，赤眉、青犊之属，动以万数，三辅假号，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自听断，诸将皆庸人屈起，志在财币，争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虑远图，欲尊主安民者也。四方分崩离析，形势可见。明公（指刘秀）虽建藩辅之功，犹恐无所成立。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以公而虑天下，不足定也。"[1]

刘秀听取了邓禹向他陈述的宏图大计，正合他的心意，甚为心悦，当即定下了"延揽英雄，收拾人心，先略定河北，然后图取天下"的战略意图。更始二年（公元24年）二月，刘秀到达信都。当时，局面尚未打开，处境仍然困难。他召集诸将商讨今后进退之策。诸将多主张利用信都的兵马，护送他西返长安，往依刘玄。和戎太守邳彤力排

众议，反对西归。他向刘秀恳切陈词，说：

“议者之言皆非也。……卜者王郎，假名因势，驱集乌合之众，遂震燕、赵之地；况明公奋二郡（指信都、和戎二郡）之兵，扬响应之威，以攻则何城不克，以战则何军不服！。今释此而归，岂徒空失河北，必更惊动三辅（指关中地区），堕损威重，非计之得者也。若明公无复征伐之意，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何者？明公既西，则邯郸（指王朗）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离散亡逃可必也。”[2]

邳彤以当地的人分析当地的人心，极为确当。刘秀听取邳彤的意见，决心留在河北，徐图发展。

同年五月，刘秀攻破邯郸，消灭王朗，打开了河北的艰困局面。此时，刘玄怕刘秀留在河北，势大难制，想调他回长安，加以控制，遂派遣使者到河北，封他为肖王，要他罢兵，与有功诸将返回长安；又派苗曾为幽州牧、韦顺为上谷太守、蔡充为渔阳太守，谢躬驻军邯郸。这实际上是翦除刘秀在河北的势力。在刘玄此种部署下，刘秀处于进退维谷之境，不得不商定对策。耿弇私下向他献策：

“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乱，诸将擅命于畿内，贵戚纵横于都内。……虏掠财物，劫掠妇女，……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其败不久。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闻使者从西方来，欲罢兵，不可从也。”[3]

刘秀听从耿弇的建议，拒绝刘玄的任命。

邓禹、邳彤和耿弇三人剖析当时的局势后所提出的谋议是通达时务的，而刘秀的三次决策亦可以说是英明果断。如果当时他放弃河北，西返长安，他的壮业雄图可能也就付诸东流了。

三、至当的措施

刘秀在略定河北时期，推行的几项措施是卓著成效的，这对他打开艰难的局面，迅速发展壮大，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重视布施惠泽，争取民心

昆阳之战后，冯异曾乘间劝说刘秀：

“今更始诸将纵横暴虐，所至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戴。今公专命方面，施行恩德。……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分遣官属，徇行郡县，理冤结，布惠泽。”[4]

刘秀赞同他的意见，因此他一到河北，就对上至郡守，下至佐吏的各级官员，进行“考察黜陟”、“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5]于是吏人喜悦，争持牛酒相迎。他在邯郸时，有人向他建议“赤眉今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6]他拒绝这种残害人民的残酷战术。他采取废除王莽苛政、罢免污吏、宽释囚徒等对人民有利的措施，取得了河北人民一定程度的好感。

（二）注意延揽人才，兼收并蓄

他采纳邓禹“延揽人才”的建议，在用人方面，主张兼收并蓄。他一到河北，先后接纳了姚期、吴汉、寇恂、邳彤、任光、耿纯、耿弇、贾复、刘隆和陈俊等一批精明干练的人物作为骨干，发展他的势力。刘秀长于识人，善用权术去驾驭，形成一个在政治、军事上强有力的集团。如吴汉为人，质厚少文，深得他的信任，进击王朗时，吴汉劝说渔阳太守彭宠出兵帮助刘秀，立功甚多。刘秀到卢奴（今河北定县），耿弇前来相见，他知道其父耿况是上谷太守，遂推心接纳。以后，他略定河北，始终得到上谷出兵相助，都是耿弇劝说之功。刘秀破邯郸，“收文书，得吏人与朗交关毁谤者数千章”，他全部予以销毁，说：“令反侧子自安”[7]，这就取得了敌对势力中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官吏的信任和拥护，起到了分化和瓦解敌人的作用，从而使他在河北的势力逐渐发展壮大。

（三）收编地方势力、义军，壮大力量

刘秀到信都，得到地方实力派信都太守任光及和戎太守邳彤的支助，才有栖身立脚之地。他消灭河北最大的割据势力王朗时，又得到真定（今河北石家庄市）刘植拥兵十余万归降。刘秀击破铜马于馆陶（今河北馆陶）收编其降卒，悉封其渠帅为列侯。降者犹不安心，疑虑满腹。刘秀察知其意，敕令各归营勒兵，而亲自乘坐轻骑入营，按

行部陈。降者便互相传话说："肖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为他效死力"[8]，由是皆降服。军队增至数十万人，故有"铜马皇帝"之称。刘秀不仅收编了一支巨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他尔后进图两京、消灭割据、完成统一的资本，而且在长期战争中，不再频繁征丁扰民，还把编余的农民军士兵遣送回乡，予以妥善安置，这也就保存了数十万精壮的劳动力，对日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起到有益的作用。

（四）巧用权谋，消灭敌对势力

进击邯郸王朗时，任光为刘秀作檄文，假借农民起义军在河北的声威以虚张声势。檄文上说："大司马刘公将城头子路、刁子都百万之众，从东方来，击诸反叛"[9]，派遣轻骑驰至各县散播，使吏民纷纷传告。刘秀所到之处，县城吏民多迎降。进击谢躬时，他施用"调虎离山计"，去信邀约谢躬共同出兵攻击尤来农民军，将谢躬的军队调离邺城，随即暗派吴汉、岑彭秘密率部偷袭邺城。待谢躬返城时，出伏兵击杀之。他又派吴汉、耿弇去幽州，以打击铜马、青犊为名，骗取幽州牧苗曾出城迎接，乘其不备而捕杀之，并编并他的部队。

从战略形势上看，当时大河以南的两京（长安和洛阳）是两大农民起义军争夺的中心。刘秀避开这争夺的旋涡，利用河北发展势力，"乱世务边"，极为明智。河北地区依山靠河，形势稳固，又有丰富的人力物力，可资利用。进有所据，退有所守，实为创业的良好基地。刘秀定下"先略定河北，以河北为根据地，然后图取中原"的战略决策是很正确的。他妥施政策以收揽人心，又善用策略和谋略消灭敌对势力。两年之间，迅速略定河北，他有了创业的基地、骨干和军队，羽毛丰满，又取得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自然可以南向以争天下了。

第二　刘秀图取两京的战略方针、战略部署和谋略运用

当更始二年（公元24年）冬天，赤眉军向长安进军、打击更始政权时，刘秀在河北袭并了刘玄派遣的谢躬军，公开和更始政权决裂。他击破青犊、五幡于射犬（今河南沁阳东北）后，又乘机南下，略取了河内郡。此时，他认为河北局势大体已定，其他地区的割据势力一时尚不足虑，只有绿林和赤眉力量强大。现在这两支农民军自相残杀，正是他坐收渔利的好机会。他深知绿林内幕，判断刘玄必败，赤眉将是他争夺天下的主要对手，就决定趁赤眉西攻长安绿林应付不暇的时候，先消灭绿林分散在关东、河西的势力，相机抢夺长安、洛阳，为下一步打赤眉预作布局。因此从他的部署和行动可以归纳他在这一阶段的战略方针是"巩固河内、进图两京，观衅而动，击破绿林赤眉"。他作了如下的战略部署。

——派寇恂为河内太守，行大将军事，负责兵马粮械的补给；

——派冯异为孟津将军，率领魏郡、河内郡的部队，防守孟津渡口，加强河内的守备，以防备洛阳的朱鲔、李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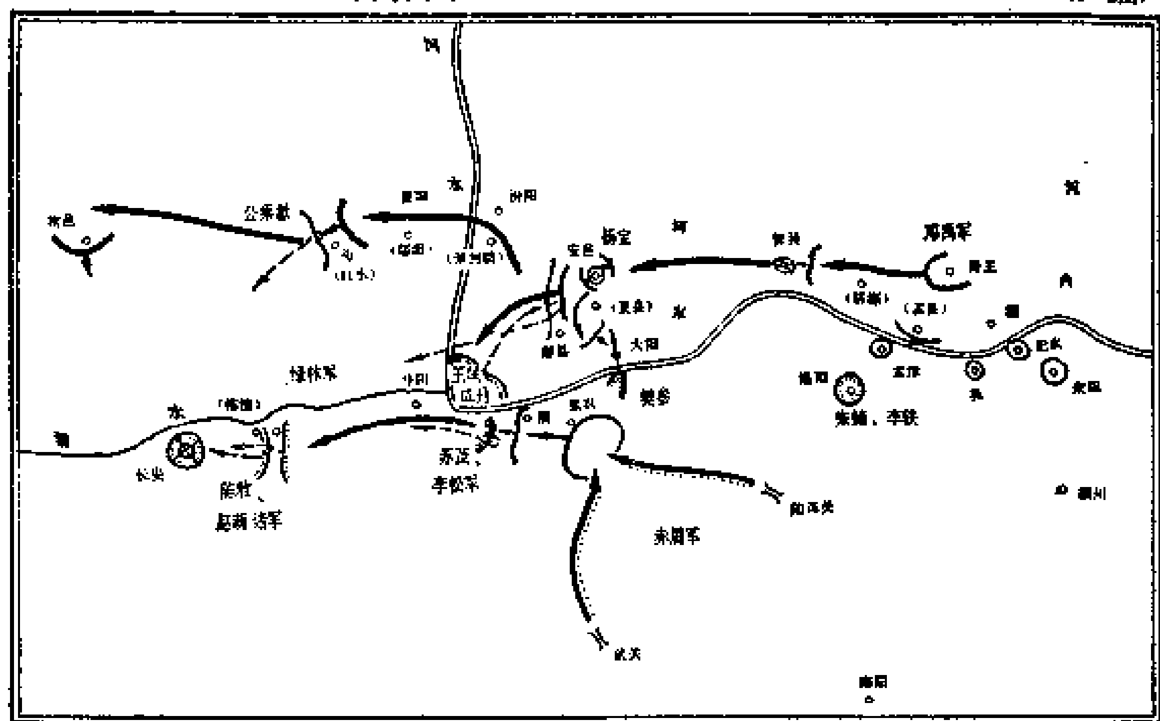
——派邓禹为前将军，率兵二万，西入河西，乘衅夺取关中；

——刘秀亲率主力北上，继续消灭元氏（今河北元氏西北）的尤来、大抢、五幡等农民军，稳定河北。

一、西夺关中（参看插图9-2）

更始三年（公元25年）一月，邓禹率军由野王（今河南沁阳）出发，经箕关（今河南济源县西王屋山）入河东，进围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先后在解县（今山西解县南）、安邑击败刘玄派遣的樊参、王匡、成丹和刘均诸部，占据了河东，继又西渡黄河入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在衙县（今陕西白水北）击破更始左辅都尉公乘歙部十余万，继续西进。此时，赤眉军在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击破绿林军王匡、陈牧、成丹、赵萌和李松诸部，长安危急。绿林军内部分裂，

邓禹西夺关中的作战经过示意图　(9—2图)



自相残杀。赤眉军乘乱攻入长安，消灭了更始政权。邓禹的部将多主张乘乱攻取长安，邓禹不同意。他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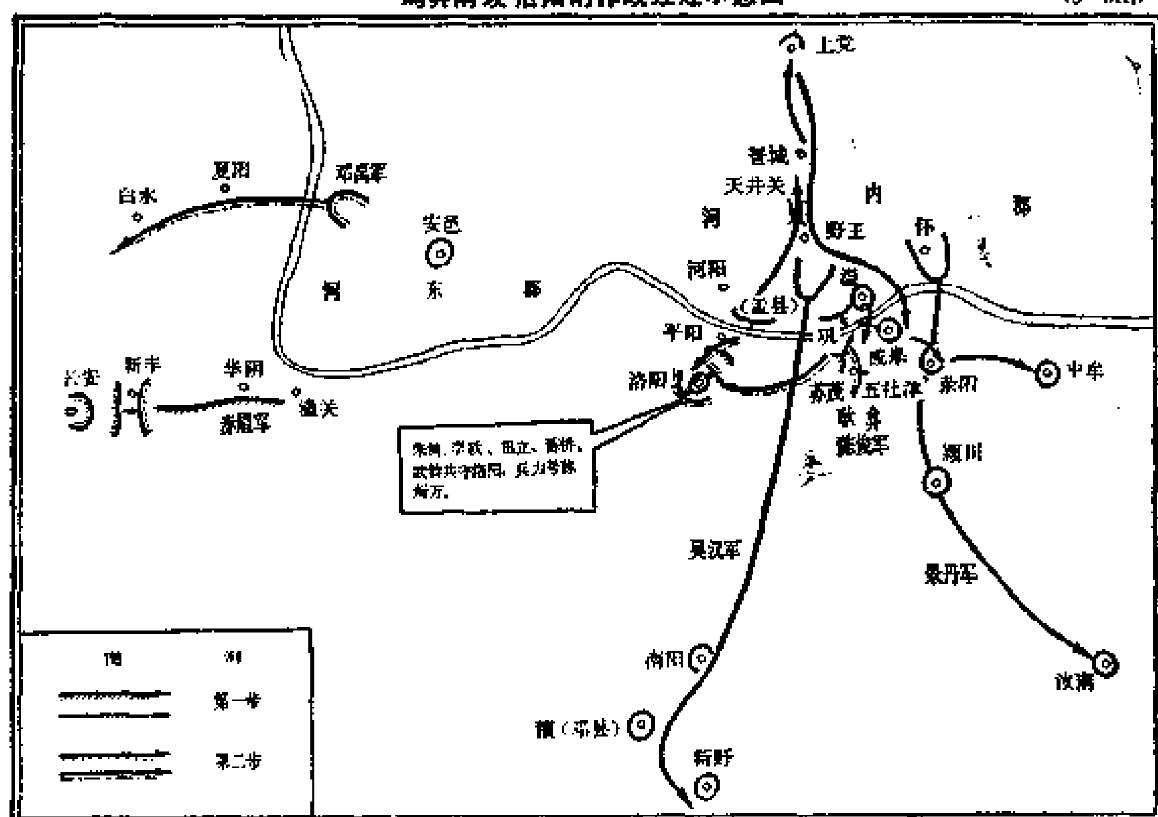
> "吾众虽多，能战者少，前无可仰之积，后无转馈之资，赤眉新拔长安，财富充实，锋锐未可当也。夫"盗贼"群居，无终日之计，财谷虽多，变故万端，宁能坚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广人稀，饶谷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乃可图也。"[10]

于是，他引兵进占栒邑(今陕西旬邑)，控制三郡，作为休兵养马、窥视关中的基地。

二、南图洛阳（参看插图9-3）

绿林军将领朱鲔、李轶和武勃等统率号称三十万兵力防守洛阳，这是绿林军在关东的一支强大的力量。刘秀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诱降两手并用的手段，逐步离间、分裂、消灭了这支绿林军，占领了洛阳。

冯异南攻洛阳的作战经过示意图 (9—3图)



冯异屯兵孟津时，对洛阳采取守势。他利用刘秀与李轶曾在南阳共同起兵的关系，写信给李轶，说明更始必定失败，晓以利害，劝他归降刘秀。李轶看到长安已危，为了个人打算，便与冯异暗通书信，从此按兵不动。冯异见离间成功，便乘机抽调守河的兵力，北攻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占据上党郡的两城。随即南渡黄河，进据成皋（今河南巩县东北）以东十三县，诱降了绿林军十余万人，并在土乡（今洛阳境内）击杀了河内太守武勃。刘秀又故意将李轶的信件泄露给朱鲔，以加深绿林军内部的猜疑，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朱鲔得信后，果然派人刺杀了李轶。

不久，朱鲔分兵两路北渡黄河，向河内发动进攻，被寇恂击败。冯异也乘机渡河实施反击，迫使朱鲔退守洛阳。冯异军先后攻占颍川、汝南以及南阳郡内的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穰县（今河南邓县)、新野等城，使洛阳完全陷于孤立。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七月，刘秀乘绿林军与迫近长安的赤眉军激战于新丰附近、根本无暇东顾的机会，对孤立的洛阳发动攻势。他派建威大将军耿弇和强弩将军陈俊屯军五社津（今河南巩县以南），警备荥阳以东的刘永，派大司马吴汉统率朱祐、岑彭、贾复和祭遵等十一将军、兵十余万，围攻洛阳，他也由怀县进驻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州五里）亲自指挥。

洛阳城十分坚固，围攻两月，未能攻下。刘秀派岑彭去劝降，但朱鲔因曾参与谋害刘縯并排斥刘秀等往事为虑，不敢归降。岑彭回报，刘秀指河水为誓说：

> 建大业的人，不忌小怨。朱鲔今日若归降，官爵可保，不受诛罚。河水可作证，我决不自食我的诺言。[11]

此时，长安已破，朱鲔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终于投降。刘秀封他为平狄将军、扶沟侯。

刘秀策定的"巩固河内、进图两京……"的战略方针是切合当时中原的客观形势的。当时赤眉军正西进，两支农民起义军在关中火并之势已形成。刘秀占据河内，利用此险要富实之区作为进攻退守奠定统一事业的重要根据地，并选拔寇恂为河内太守，负责兵马粮械的补给，又派邓禹西夺河西，冯异南图洛阳，以争取外翼，而寇恂、邓禹和冯异的行动均主动而符合总的意图，说明刘秀部署适当又颇有用人之能。

再就两京形势而言，长安自西汉以来，即为中国政治的中心、争夺中原的战略基地。关东无机可乘，则闭关息民，讲武强兵；一旦有衅可寻，则进兵以俯瞰中原。占据长安，进攻退守，运用自如。洛阳在当时是天下的财富之区，也是关东的战略要地。就其周围的山川形势而论，可称冲要之地。两京对中原实有形制之胜，故凡意图夺取中原的，必先夺取两京。当时争夺中原的三支强大力量已汇集两京。刘秀占据河东、河内，从北侧控制两京，战略态势已处于有利地位。而在长安的更始政权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据守洛阳的朱鲔和李轶，名虽隶属于长安的更始政权，实则孤立无援。邓禹抢占河西，不仅扩大了

刘秀的地盘，缩小了绿林军的控制地区，而且进据长安外围，配合冯异在洛阳的行动，对尔后抢占关中具有重大的作用。刘秀为图大业，不忌小怨，争取朱鲔归降，实是器度宏阔，运筹巧妙。洛阳既下，绿林军在关东的主力全部解除武装。刘秀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配合邓禹的西进，就掌握了中原的形势，为尔后专力对付赤眉，造成了更有利的态势。

第三　刘秀挫败赤眉的战略指导和战役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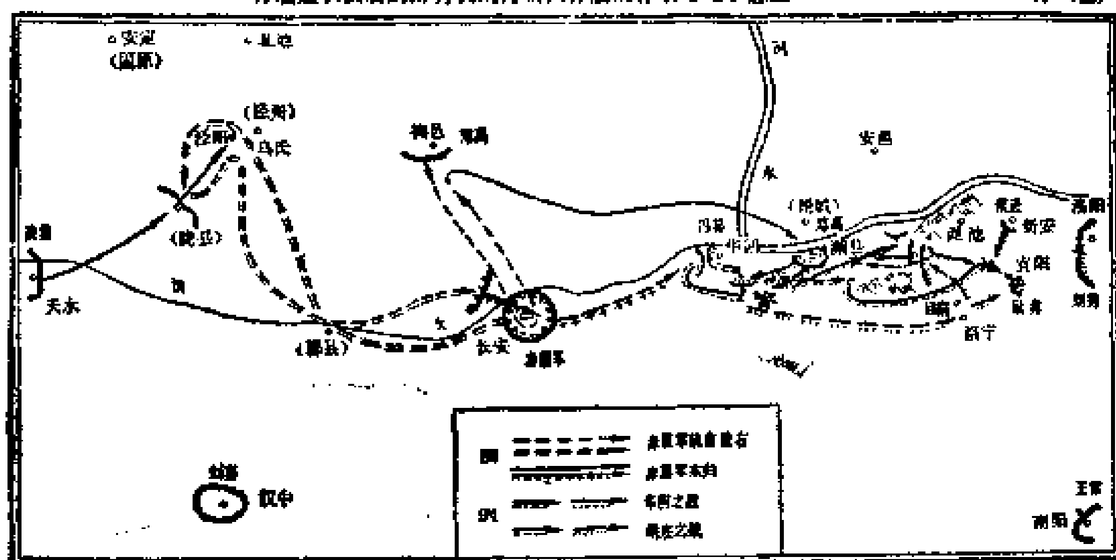
一、赤眉的困难处境

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九月，赤眉军攻占长安，消灭更始政权后，便以为功成业就，盲目自满，"诸将日会论功，争言欢呼，拔剑击柱，不能相一"。[12]那时，关中迭遭战乱，人民饥馑。地主豪强又隐粮聚众，坚壁反抗。赤眉军的补给发生困难，军纪也就逐渐废弛，大肆抢掠，恶化了军民关系。"三辅苦赤眉暴虐，皆怜更始"[13]，赤眉丧失了农民起义军的优良本质，因而失去了人民的支持。此时，刘秀已建都洛阳，截断了赤眉与东方的联系；南阳的王常、汉中的刘嘉扼住了赤眉向西南的活动；隗嚣占据天水、邓禹又据栒邑，阻止了赤眉向西北的发展。赤眉已处于四面受敌、孤立无援的困境。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一月，长安粮尽，赤眉军向陇西就食，受到隗嚣的袭击和大雪的阻拦，又回军关中，击败了乘虚袭占长安的邓禹军，再入长安。其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14]赤眉军二十余万人由于粮食无着，又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不得不放弃长安东归。

二、刘秀的战略指导和部署（参看插图9-4）

刘秀在略取河西、攻占洛阳后，即集中全力来对付赤眉。他首先用政治手腕拉拢南阳的王常、汉中的刘嘉、天水的隗嚣以孤立赤眉，同时命邓禹乘赤眉向陇西就食的机会，袭取长安。当邓禹在长安被赤

赤眉进长安后的形势及刘秀消灭赤眉的作战经过示意图　（9—4图）



眉回军击败后，他判断赤眉缺粮，必定东归。赤眉还有二十余万人，有较强的战斗力，与之硬拚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还难期必胜。于是他决定撤换急于邀功的邓禹，另派冯异为征西大将军，担任围困赤眉的任务。他指示冯异：

> “三辅遭王莽、更始之乱，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百姓）涂炭，无所依诉。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好掳掠。卿（冯异）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勑，无为郡县所苦。”[15]

刘秀抓住了赤眉缺粮的致命弱点，策定了“以饱待饥、以逸待劳”[16]的战略指导来疲惫赤眉，并定下了“东西合击”的战役部署：

——命冯异占领华阴，向西阻击赤眉；

——命侯进等屯兵新安（今河南渑池东）；

——命耿弇等屯兵宜阳（今河南宜阳）。

这样，就截断了赤眉东归的要道，构成袋形合围。他还指示诸将：

> “赤眉若东走，可引宜阳兵会新安；赤眉若南走，可引新安兵会宜阳。”[17]

他企图以这样的战略指导来围攻赤眉，待其粮尽力竭时，一举而消灭之。

三、华阴之战

冯异率兵西进，与赤眉东归的先头部队遭遇于华阴，相持六十余日。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邓禹率领车骑将军邓弘等由河西回到湖县（故城在今河南灵宝西），因西征无功，想侥倖取胜，邀约冯异共击赤眉。邓弘首先发起进攻，受到挫折；邓禹与冯异合兵救援，又遭失败，邓禹仅率二十四骑逃回宜阳，冯异也弃马奔走，与部属数人逃至崤底，收集溃散部队，坚壁自守。

四、崤底之战

赤眉军虽在华阴附近击败邓禹和冯异，但并没有改善饥疲的困境，仍急欲东归。冯异看清了赤眉的致命弱点，又于同年正月十八日约赤眉会战。冯异先派出一支部队穿着赤眉军的服装夜伏于道旁。次晨，赤眉军以万人进攻冯异的先头部队。冯异故意示弱，仅以少数兵力赴援。赤眉中计，以全力投入战斗，冯异也使用主力抗击，双方相持半日，赤眉军攻势渐衰，冯异突出伏兵袭击，赤眉溃败，被冯异追至崤底（即崤山，在今河南洛宁县西北），追降八万余人。赤眉军的主力遭到重大损失，三月十八日，余部十余万人折向东南，又在宜阳被刘秀亲率的重兵包围。樊重领导的这支赤眉军虽经苦斗，始终未能突出重围，被迫向刘秀投降。

五、胜败原因的剖析

（一）刘秀为什么能取得胜利

刘秀对赤眉的战争，是他能否建立起东汉政权、夺取天下、实现国家统一的关键性战争。王莽政权覆灭后，社会危机仍极严重，出现了农民军和贵族、官僚、豪强、地主武装等各种力量分裂割据的局面。结束这种局面，建立安定的社会秩序，调整被王莽搞乱了的社会秩序和经济关系，使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走上正轨，就成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提出的任务，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意愿。因此，这时期的战争性质已由反封建的农民战争转化为统一力量与各派

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赤眉及其他农民军已经变质，走向分裂割据，不能担负起统一国家的任务。其他的封建割据势力，更是只求割据自保。刘秀所进行的统一战争是符合当时人民的意愿和历史前进潮流的。他采取一些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和措施，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也得到了地主阶级的拥护，因此，他进行的统一战争是积极的、有进步意义的，也必然取得胜利。

当绿林赤眉两大农民军在关中火并时，刘秀命寇恂巩固河内根据地，派邓禹进取河西，乘衅抢占关中，自己去清除河北分散的农民军，不但扩大了地盘、增强了势力，而且坐山观虎斗。待绿林被消灭，赤眉也受到削弱的时候，再用全力去打击赤眉。他的战略指导是切合客观实际的。在更始政权濒于危亡之际，他迅速派冯异率大军围攻洛阳，不念旧恶，劝降朱鲔，抢占关东的战略要点，扼住赤眉东归的咽喉要道，同时拉拢王常、刘嘉和隗嚣，派遣冯异进据华阴，实现其四面困锁赤眉的目的。他分析赤眉的情况，抓住赤眉缺粮的致命弱点，策定"以饱待饥、以逸待劳"的战略指导，并利用崤南险道，定下"东西合击"的战役部署，使赤眉这一支英勇善战的农民军，无法打破他的困锁罗网，终于粮尽力竭，遭到全军覆灭。刘秀既知己，也知彼，善于用兵，故获得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二）赤眉为什么遭到失败

赤眉是一个纯朴的农民军。领导集团无安邦定国的政治人才，缺乏政治远见，没有通观全局的能力，认不清当时复杂的形势，不去打击对其威胁最大的刘秀集团，却西入长安，同绿林军火并，消耗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极大的失策。在消灭更始政权之后，亦同当初绿林军进入长安一样，能以军事得之，不能以政治安之。在恢复社会秩序和安定人心诸方面没有提出和采取任何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对关中周围的地方割据势力，也未采取任何争取、安抚的办法，致使他们被刘秀拉拢共同来困锁赤眉，迫使其由于粮食无着，不得不又放弃长安东归。

赤眉军英勇善战，在战术上具有机动灵活的特点，多次获得战

役、战斗上的胜利，但由于在政治上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在军事上没有全盘的战略指导，斗争方式始终停留在初起时的水平上，东驰西击，流动作战，未重视建立根据地，对几十万大军的补给，也没有一个统筹规划，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吃光一处，另走一处。西攻长安是为了解决粮食的困难，"虑众东向必散"；而放弃长安东归，也是由于补给发生困难。这一致命的弱点无疑是赤眉军失败的一条重要原因。

由长安东归，不出武关走南阳，而却走崤函险道，钻入刘秀在潼关以东预先布下的罗网，在转移路线上已经犯了错误。此时，尚有二十余万人的雄厚兵力，不采取迅速果敢的行动，一意向东，脱离困境，而在华阴与冯异军进行长达两月之久的消耗战，这都是作战指导上的失策，终于粮尽力竭，突不破重围，全军覆灭。

第四　刘秀消灭全国割据势力的战略运用

刘秀挫败赤眉，结束了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也奠定了他统一全国的基石。他为了夺取全国的最高统治权，从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就开始了消灭各个割据势力的封建统一战争。这场战争共历时十载，经历若干个战役，获得全面胜利，决非偶然。现就关系战争全局的战略方针、策略运用、战略决策和战略指导等加以评论。

一、刘秀消灭全国割据势力的战略方针

全国割据形势：当时，在西汉十三州中，刘秀只占有冀、豫、并、司隶四州（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的大部地区），当时就有人说："洛阳地如掌耳"。[18]其余九州多为地主豪强所割据。刘秀处于黄河南北的中原地区，他的四周的割据形势是：（参看插图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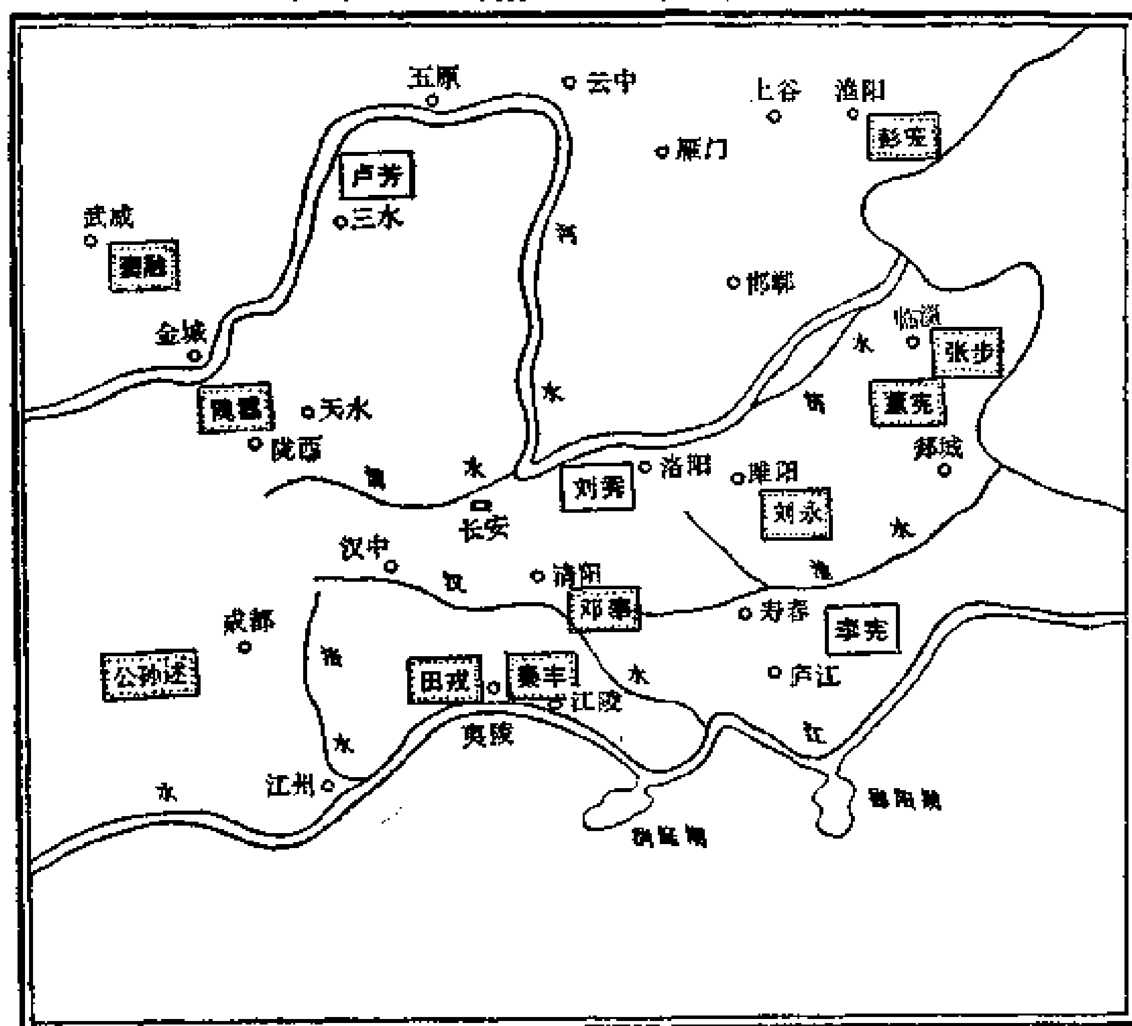
东有：

青州的张步（州治在今山东临淄北，占据今山东黄河以东胶东地区）

东海的董宪（治所在今山东郯城西北，占据今苏北东海县以东及

关东、关西割据形势要图

（9—5图）



鲁阳地区）

睢阳的刘永（今河南淮阳，占据今豫东地区及安徽北部）

庐江的李宪（治所在今安徽庐江西南，占据今安徽巢湖附近地区）

南有：

南郡的秦丰（郡治在今湖北江陵西北，占据今湖北襄阳、江陵地区）

夷陵的田戎（今湖北宜昌，占据今湖北宜昌地区）

西有：

成都的公孙述（今四川成都，占据今四川及陕南地区）

天水的隗嚣（郡治在今甘肃通渭西，占据今甘肃大部地区）

河西的窦融（占据今甘肃兰州、武威、敦煌一带地区）

九原的卢芳（今内蒙古包头西，占据今甘肃固原直内蒙古五原地区）

北有：

渔阳的彭宠（占据今河北北部地区）

根据当时九州的割据形势和洛阳所处的战略地位来看，刘秀是处于中原四战之地，为割据势力所包围。不过，这些割据势力是各自为政，称帝称王，互不统率，难以结成联盟来对付刘秀。而刘秀要想一举消灭各个割据势力，亦力所难及，只有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才能获胜。刘秀分析当时的形势：

在关西的隗嚣、公孙述、窦融，均与中原地区遥隔。冯异已占据关中作为洛阳的战略前哨，故关西的几个割据势力之于洛阳，尚未构成直接的威胁，但这种形势如不予以缓和、稳定，则关中的局面会随之动荡不安，而中原地区的局势亦必随之动摇。故对关西的几个割据势力必须采取先和后战之策，能拉拢者，极力拉拢之；能使其互相制约者，则尽力促成之。

在关东的刘永称帝于睢阳，与刘秀的首都洛阳近在咫尺之间。两人都是刘姓宗室的后裔，而刘永的族系是西汉帝室的近亲，远较刘秀的关系为优。两人又都以“兴复汉室”为号召，亟谋争取青徐二州的割据势力以自大，形成直接对峙争夺之局，此种形势如不转变，对刘秀的声威将大受贬损。

在荆州宛、邓地区的邓奉、秦丰，直接威胁两京的安全。这一方面的割据势力如不消灭，乱源滋蔓，会影响刘秀的军心士气。

在渔阳的彭宠拥有精锐的骑兵，对河北威胁亦大。如河北不守，则洛阳会动摇。

根据以上东西南北四方面情势的分析，刘秀在权衡轻重缓急之下，策定“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待东方平定后，再挥戈西向，实为符合当时客观形势的明智的决策。

二、刘秀联陇制蜀的策略运用

刘秀为了先集中兵力与东方的割据势力作战，不能东西兼顾，两面用兵，又必须减除陇蜀对他的威胁，特别怕他们联成一气，乘他无力西顾之际，夺取关中。所以早在建武三年（公元27年）十一月，刘秀就曾问计于熟悉陇西情况的太中大夫来歙：

“今西州（今四川）未附，子阳（公孙述的号）称帝道里阻远，诸将方务关东，思西州方略，未知所任，其谋如何？”[19]

来歙向他提出一个联陇制蜀的策略，刘秀立即同意。因为联陇以制蜀，使陇蜀互相攻伐，既打击了公孙述，又相对地削弱了隗嚣，解除了他用兵东方的后顾之忧。他派来歙出使陇西。正好隗嚣也想争取外援，独霸一方。通过来歙的说合，隗嚣派遣使者到洛阳聘问，刘秀以国礼相待，勉慰备至。但那时隗嚣对于联蜀还是助汉，仍然骑墙观望，举棋不定。建武四年（公元28年）十月，为了探望西州虚实，隗嚣又派绥德将军马援出使成都。公孙述对这位同乡友好，接待傲慢，大摆皇帝架子，马援大为不满，回到天水对隗嚣说：“子阳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不如接交刘秀）”[20]。于是隗嚣再派马援到洛阳，刘秀以礼贤下士的风仪，虚心接待，推诚相语，乘机收买了马援，要他促成隗嚣助汉，结成联盟，刘秀争取到可能的同盟者，从而达到了以敌制敌的目的。同年十一月，公孙述派遣将军李育等北出陈仓（今陕西宝鸡），联合当地的吕鲔进攻关中，隗嚣出兵帮助刘秀，击败李育的军队。刘秀为了进一步利用隗嚣，去信深加慰勉，公孙述多次出兵，均因隗嚣助汉，遭到汉陇联军的打击而告失败。从此公孙述不再北进，刘秀解除西顾之忧，得专力对付东方。

三、统一关东之战中刘秀的战略指导

刘秀根据策定的战略方针，开始对关东各个割据势力逐步实施各个击破。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刘秀命虎牙大将军盖延统率马武和王霸等四将、约五万人，东击刘永。次年，攻占睢阳，击杀刘永。其残余势力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被全歼于垂惠（今安徽蒙城境

内)。刘秀消灭了关东最大的割据势力，解除了洛阳侧翼威胁。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公元26年)十一月，刘秀在基本上解除刘永在东方的威胁后，即命廷尉岑彭为征南大将军，统率王常和朱祜等八将军、约九万人，进攻淯阳（今河南新野北）的邓奉和在堵乡（今河南方城）起兵的董訢。次年三月，追降了董訢，击杀了邓奉后，岑彭率军三万余人乘胜南击秦丰。秦丰坚守黎丘（今湖北宜城西北），被围困二年，最后投降。夷陵的田戎率兵增援，被岑彭击败后，率残军投奔公孙述。刘秀控制了荆州的战略要地南郡夷陵，为尔后西进造成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南方平定后，刘秀采纳大司徒伏湛向他提出的“北守东攻”的战略指导，派朱祜和耿弇等率一部兵力入河北，防备渔阳彭宠，继续集中主力东攻刘永的余部及齐地的张步。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二月，彭宠被其部下杀害，刘秀乘机占领了渔阳，统一了燕蓟。

建武五年(公元29年)七月，刘秀亲率主力东攻东海的董宪，于次年二月击杀董宪于朐县（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

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十月，刘秀命耿弇率军进攻青州的张步，耿弇采用围城打援的战法击杀张步的大将费邑于矩野附近，再用声东击西战法攻占临淄，最后用以逸待劳、以实击虚、乘其疲困的战法，歼灭了张步。

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八月，刘秀即派扬武将军马成率军围困李宪于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李宪被围困一年多，城中粮尽，于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正月，城破被杀。

关东的各个割据势力在四年之内，就次第被刘秀各个击破了。

纵观刘秀平定关东割据势力所处的位置，从战略态势上说，他是处于内线作战、四面受敌的态势。但从发挥其战略指导的主观作用而言，正可以洛阳为轴心(根据地)，向东、南、北三方的割据势力，利用机动使用兵力的优越地位，以施行各个击破。而在此种攻势作战中，主力的集中使用，则可依敌对势力的远近、缓急等程度之不同，而灵活调度使用，具有选择打击目标孰先孰后的自由。观其用兵次序是首

先东击对洛阳威胁最大的睢阳刘永，东方的威胁基本解除后，即南征邓奉、秦丰、田戎，肃清荆州地区的割据势力，然后北抗渔阳彭宠，最后再东攻董宪、张步，围困庐江李宪。以刘秀集团人才的众多，兵力的强大，军资的富饶，加上战略指导的巧妙，远非关东的割据势力所能比拟。故其对各个割据势力所实施的各个击破，其威力的强大，宛如铁锤高压，自非他们独自所能匹敌。刘秀的军力愈战愈强，各割据势力又难以构成联合阵线以行对抗，自然一个个终不免俯首降伏。

四、平定陇蜀之战中陇汉争取河西窦融的策略运用

刘秀在消灭关东各个割据势力时，便考虑下一步如何解决关西的陇蜀。陇西的隗嚣威胁关中，而陇西又是他进攻成都公孙述的必经之地。因此，刘秀决定首先对隗嚣用兵。而河西的窦融处于隗嚣的侧背，因之刘秀决定拉拢他以孤立隗嚣。

河西的窦融本是汉家外戚，世代在河西做官。更始政权分裂时，他乘机控制了金城、武威、张掖、酒泉和敦煌五郡。在复汉的幌子下，他表面上拥戴隗嚣，实际上是独树一帜。由于河西地位重要，所以窦融成为隗嚣与刘秀极力争取的对象。

隗嚣之帮助刘秀，原想借其力量以确保陇西。待刘秀势力壮大、削平关东群雄、转而用兵陇西的形势日益明朗时，隗嚣也就愈感不安，想另结外援以自保。但陇蜀关系早已破裂，他只好去拉拢河西的窦融。建武五年(公元29年)四月，他派辩士张玄去游说窦融：

> "今豪杰竞逐，雌雄未决。当各据其土宇(疆土)，与陇蜀合纵，高可为六国，下不失尉佗（至少可以象汉初南越王赵佗那样割据一方）。"[21]

当时，河西领导集团对张玄的游说之词，看法并不一致。窦融因系汉室外戚的关系本来倾向于刘秀，他派刘钧到洛阳联络，刘秀厚予接待，并致书窦融：

> 现在益州有公孙述，天水有隗嚣、陇汉两方交战，将军举足轻重。如愿意助汉，就应始终如一；如要搞割据，也望早作决定。天下尚未统一，汉与河西地不接壤，不会互相吞并。[22]

刘秀明明要拉拢窦融，但丝毫不加强制、威胁，却抬高他的地位，说他举足轻重，又封他为凉州牧。那时，刘秀已称汉帝，势力、声威都大于隗嚣，并给他加官进爵。而隗嚣只是空谈利害，毫无实惠。窦融为名位所动，权衡利害，自然归顺刘秀。一场争夺河西的谋略战，隗嚣失败了，从此更加孤立。

五、平定陇蜀之战中刘秀的战略决策（参看插图9-6）

刘秀在平定关东各割据势力之后，即决心西图陇蜀以完成统一大业。他平定陇蜀的战略指导仍贯彻既定的集中兵力，由近及远，先陇后蜀、各个击破的方针。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三月，刘秀借口公孙述进攻荆州，派人通知隗嚣，将取道天水攻蜀。如隗嚣同意假道，则可顺手牵羊，取得陇西。但隗嚣知道这是假途灭虢之计，借词推托。刘秀召集诸将商议对策，多数将领主张暂缓进兵，宜用加官进爵的策略去分化隗嚣的内部，只有征虏将军祭遵认为隗嚣久怀异心，如果再按兵不动，拖延时日，会贻后患，应立即采取行动。刘秀采纳了祭遵的意见，当即定下进攻陇右的决心。于同年四月，亲到长安作进攻部署，派遣耿弇、盖延等七个将军分兵数路攻陇。

陇蜀本是互相关联的一局。平陇即是为了灭蜀，不平陇而先击蜀，侧背上有极大的顾虑；如果对陇蜀同时用兵，则两面作战，分散兵力。山地作战，兵力转用不便，难以支援配合，而且当时由长安攻蜀，不论由子午谷或褒斜道进兵汉中，地形均不便于大军运动。只有先平定陇西后，大军从天水南下，绕过秦岭，由武都（今甘肃成县西）直趋阳平关，最为捷便。为了保持一个拳头打敌人，并使大军行动便利，先陇后蜀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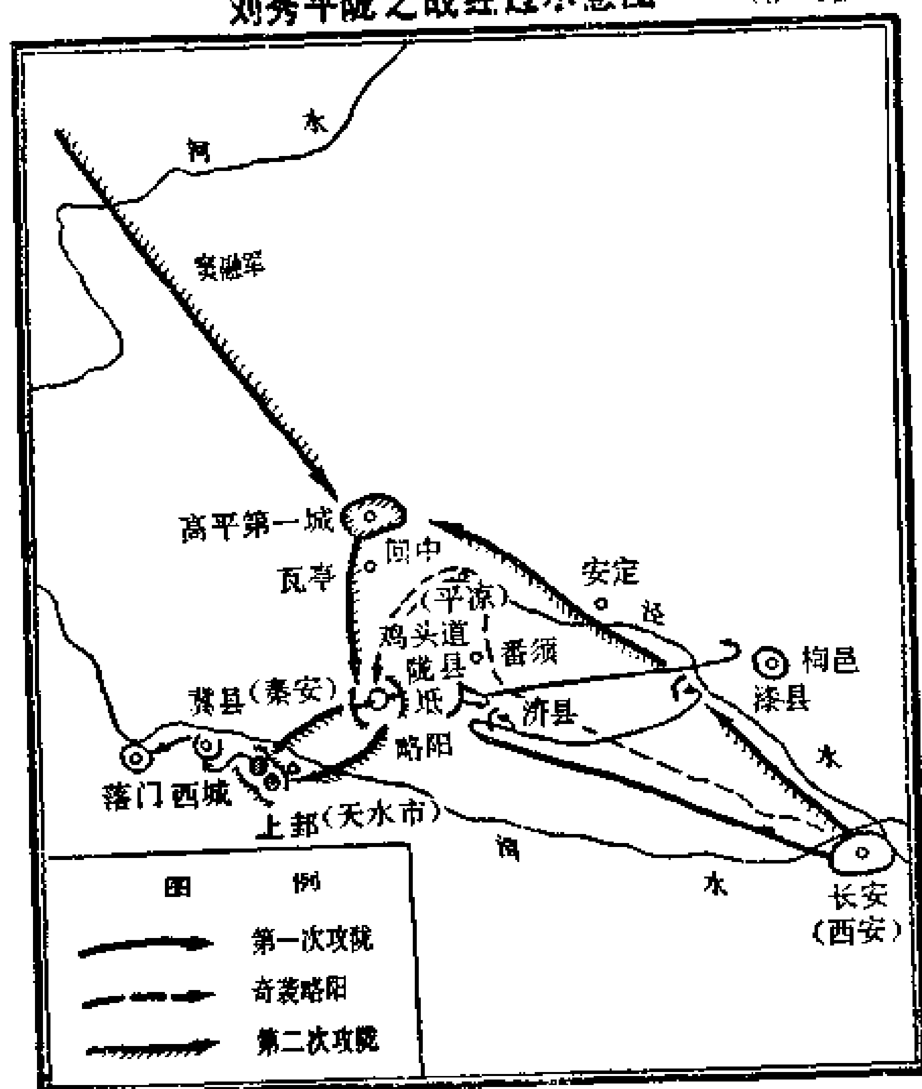
六、平陇之战中隗嚣的战略决策（参看插图9-6）

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冬，刘秀对隗嚣施加压力，以高官相诱，劝其入朝。这是调虎离山计。当时，隗嚣内部的文官武将有两种主张。班彪、申屠建等人力劝隗嚣臣事刘秀，不宜反复无常，自取灭亡。大将王元则坚定主张独立，反对向刘秀称臣。他说：

“今天水完富，士马最强。……元（王元自称）请以一丸泥

（比喻用一部分兵力）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时也（这是万载难逢的机会）。若计不及此，且蓄养士马，据隘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图王不成，其弊（其少）犹足以霸。”[23]

刘秀平陇之战经过示意图 （9—6图）



隗嚣采纳了王元的意见，拒绝臣事刘秀，亦不入朝。但他在军事上既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也没有进行周密防御的措施，直到刘秀的大军压境时，才决心抗击，派遣王元据守陇底（今陇山，又名陇坂），伐木塞道，以阻击汉军。

从隗嚣的战略决策来看，他既无图王定霸的远略，亦缺乏运用策略的机智，其应变的才识，较之刘秀，实逊一筹。他举兵反汉的时机

实在过晚，如果当赤眉出关东归之时，即南联公孙述以窥取关中，或当刘秀正用兵于关东之际，举兵东向，则关中恐非刘秀所能据有。如此，则王元的“请以一丸泥为大王东封函谷关”的计划，庶乎可达，陇西内部的文臣如班彪之流亦不致于携贰，河西的窦融亦不致于背离，王霸之业尚可以一争。隗嚣失去上述两个时机，而当刘秀用兵关东时，反而助汉以阻击公孙述，替刘秀解除用兵东方的后顾之忧，实是缺乏通观全局的能力，未认清主要对手是谁，这是他在战略运用上的失策。及至刘秀已平定关东，天下形势已基本上由刘秀掌握之时，隗嚣始萌图霸陇西之念，而不愿臣事刘秀，为时显然太晚了。王元“以一丸泥为大王封函谷关”是空吹大气，要想“蓄养士马、据险自守、旷日持久，以待四方之变”，亦是不识时务之见。关东的大局已定，仅余陇蜀残余势力，还有什么“四方之变”可待？王元此时主张独立是自取灭亡，隗嚣的决策实不明智。

七、平陇之战中双方的战役指导

刘秀平定陇右，历时近四载，经历进攻陇底、奇袭略阳、围攻西城三个主要战役。而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性的一役是奇袭略阳。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公元30年）四月，刘秀命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进攻陇底。隗嚣军居高临下，以逸待劳，汉军遭到失败。刘秀接受失败教训，一面命大司马吴汉到长安集结兵力，以图再举，一面拉拢河西窦融，出兵相助，并派马援煽动隗嚣部属和羌族豪长。隗嚣感到形势孤立，内部动摇，派遣使者向公孙述称臣，联蜀反汉。公孙述封他为朔宁王，并出兵援陇。隗嚣得到西蜀援兵，于建武七年（公元 31 年）秋亲率步骑三万进攻安定（在今甘肃镇原东南），另派一部进攻汧县（今陕西陇县西），企图夺取关中，分别被冯异、祭遵击败。

第二年春，刘秀乘隗嚣戒备松懈，派来歙率两千人秘密从番须（山谷名，在今陕西陇县北）、回中（今陕西平凉附近），南起汧水河谷，北出萧关，伐木开道，袭占了陇西的战略要点略阳（今甘肃庄浪县西南）。刘秀闻捷报大喜，认为略阳是隗嚣仗恃的险要，腹心已被破坏，宰割其肢体就容易了[24]。吴汉诸将听说奇袭成功，亦要求即

从这个方向进军，刘秀未同意。他认为隗嚣丢失要地，势必集中兵力反攻。等他久攻不下，士卒疲敝时，再乘机进攻。[25]果然，隗嚣派王元、行巡、王孟和牛邯四将军率兵封锁陇山各要隘，亲自指挥精兵数万围攻略阳。公孙述也派兵援助，引水灌城。来歙与将士坚守，城中矢尽，"发屋断木以为兵(兵器)"[26]。隗嚣攻打数月，略阳仍屹立不动。直到四月，刘秀判断隗嚣兵疲力困，即派吴汉、岑彭、耿弇、盖延诸将分兵向陇山前进，占领高平第一城（今宁夏固原），窦融也率军前来策应，招降了防守瓦亭（今宁夏固原西南）的牛邯，打开了进军道路，向南直捣天水后背，迫降隗嚣军十余万，隗嚣率残部逃奔西城（即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岑彭水灌西城，快要攻破之际，不料王元率领西蜀援兵赶到，把隗嚣救出，逃奔冀县(今甘肃天水西北)。汉军亦因粮食已尽，被迫从陇山东撤。吴汉等回长安，岑彭还津乡（今湖北江陵东）。陇西安定、北地、天水数郡复为隗嚣所据有。汉光武帝建武九年（公元33年）正月，隗嚣病死，陇西形势急转直下，隗嚣部属拥立其次子隗纯为王，逃奔落门（今甘肃武山东北），企图苟延残喘。建武十年（公元34年）十月，来歙迫降隗纯于落门，历时近四载的平陇之战，胜利结束。

刘秀平陇之战是以大击小，以众击寡，而竟历时近四载（几乎相等于消灭关东各割据势力所用的时间），始取得胜利。就战争的全部过程而论，隗嚣封锁山隘，依险固守，刘秀初期调兵遣将，集中其精兵良将，分路向陇山实施正面进攻，而竟被阻于陇山诸要隘之口，不能逾越一步，这说明在山地作战中，攻者在山隘之前展不开兵力，正面仰攻只会增大伤亡，难以攻克。后来来歙率两千精兵用迂回钻隙的战法袭取隗嚣陇山防御体系中的战略要地略阳，使其守隘诸部队互不能相救，迫使隗嚣以主力反攻，企图夺回略阳。刘秀俟其疲惫，以大军迂回进击，打开通路，会师高平第一城，一战迫降隗嚣的军队十余万人，来歙奇袭略阳这一着，如"腹内挖心"，使陇山诸要隘失去价值，隗嚣的山地防御体系亦因之迅速瓦解。论功行赏，来歙之功当推第一。

来歙仅以两千之众坚守略阳，使隗嚣率四万人围攻数月，未能拔

掉这个钉子，亦足见汉军的英勇顽强。

反观隗嚣的战役指导实是劣拙，当刘秀的七将军进攻陇底失败后，隗嚣虽乘机反攻，但未倾全力，因而未能重创汉军。略阳被袭取后，隗嚣封锁诸要隘，亲率主力围攻略阳，其战役指导未可厚非。而他亦以为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拿，殊知数万"精兵"竟不能攻下一个小小的孤城。顿兵挫锐，给刘秀以可乘之隙，其部队的攻坚能力如是低劣，焉得不败。

八、灭蜀之战中公孙述的战略决策

公孙述初据益州，自称蜀王。公元23年刘秀称帝于鄗（今河北高邑东南）时，他采纳其功曹李熊的建议，亦称帝于成都。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28年)，他进攻关中失败后，退守巴蜀，不图进取。谋士荆邯认为消极自保是坐以待毙，向他提出"东守北攻"的建议。他分析当时的形势，指出刘秀平定了关东，四分天下有其三。西蜀以一州之地，内有宫庭消耗，外要供给三军，会使百姓怨困。应趁天下大势未定时，急发国内精兵，一面令田戎车据江陵，筑垒自守，一面令延岑北取关中，这样才有机会取得胜利[27]。但博士吴柱不同意出兵，他认为没有听说外无援助而能出兵千里之外去略取土地的[28]。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公孙述始终徘徊犹豫，定不下攻守决心。

刘秀进击陇右时，公孙述几次援陇，都是兵不满万人，而且是直接投入战斗，从未调动大军，向关中实施战略进攻，以分散牵制刘秀的兵力。其战略意图只在帮助隗嚣保住天水，使汉军不致从武都（郡治在今甘肃武都北）入蜀。这对自救救人都不能发生重大作用。汉光武帝建武九年（公元33年）三月，隗嚣的政权快土崩瓦解时，公孙述才派田戎、任满等率数万人由江关东下，夺取夷陵，占据长江天险荆门、虎牙两山，控制三峡的门户，阻断水陆两路，防止汉军沿江西进；北面则派王元、环安据守河池(今甘肃徽县西)，防止汉军由天水南下。他的决策和部署是北靠秦岭、东据三峡，凭险自守，消极防御。

当公孙述称帝成都时，益州的情况正如他的功曹李熊在建议中所说：

“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扞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杨。所谓因天因地（利用天富资源之意），成功之资。[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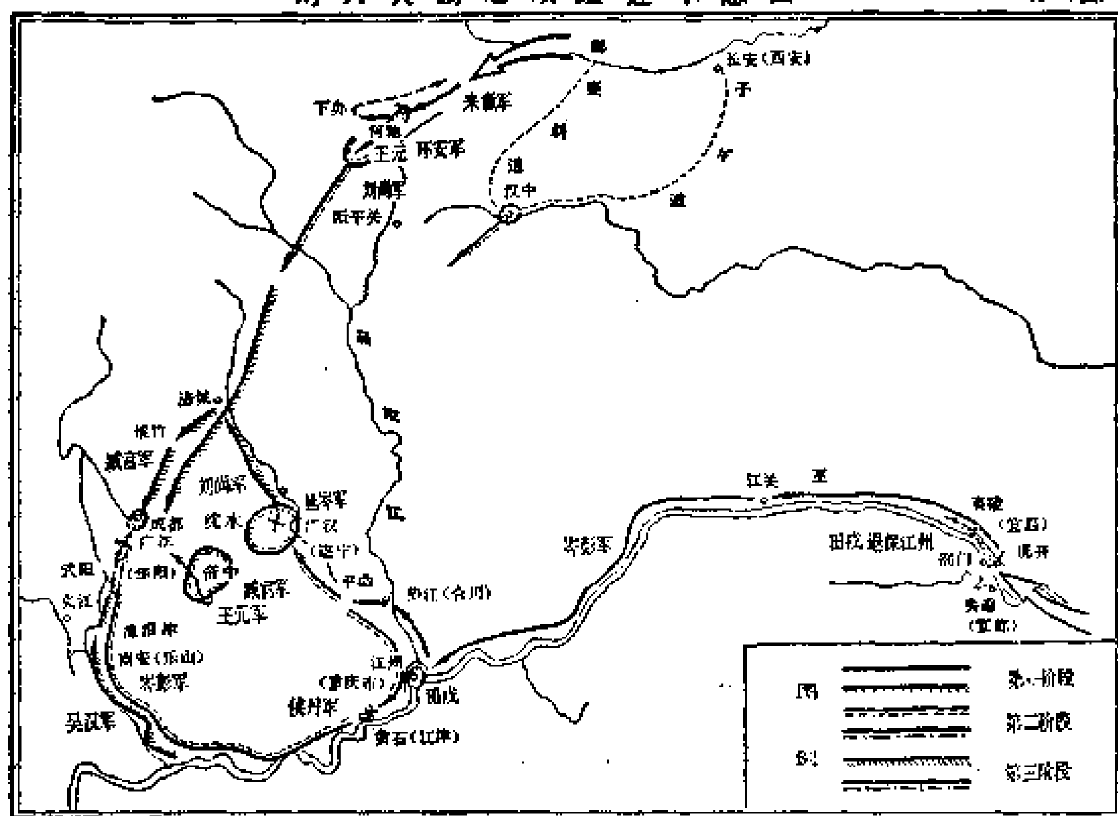
公孙述在经济上拥有巴蜀富饶的资源，以养兵备战；在地略上又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位置。当刘秀刚刚定都洛阳时，四面受敌。从力量对比上看，他并不弱于刘秀。当刘秀用兵关东、关中空虚之际，他曾乘机出汉中，取三辅，在战略指导上是有一定见地的。但在进兵时，他只知联络陈仓的吕鲔等，却忽视了隗嚣这个强有力的近邻。马援出使西蜀，正是他结好陇西的大好机会，而他却以傲慢失之。在进攻关中受挫之后，再去争取隗嚣，已经晚刘秀一步了。因而使他以后进图关中都遭到刘隗联军的打击，而告失败。他在进取无功之后，政治上日趋腐败，军事上消极自保。他不注意争取人心，又未看到陇亡蜀寒的危险形势，尽一切可能去争取隗嚣，合力抗刘，在战略上力争主动，而却闭关自守，坐待敌人来攻。这就必然导致敌军压境时内部动摇、军心沮丧、险阻不守的结局。采取这种消极挨打的战略部署，必然失败。

九、灭蜀之战中刘秀的战略决策（参看插图9-7）

早在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春天，刘秀派岑彭击破田戎，夺占夷陵后，就曾经计议对蜀用兵。当时因该地区粮少水险，漕运困难，即令岑彭屯兵津乡（今湖北江陵附近），等待时机，并防止公孙述沿江东下。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公元32年）八月，刘秀督师进攻陇西的上邽、西城时，又曾指示岑彭诸将：“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30]那时，刘秀想乘击破隗嚣的声威，一举而定巴蜀。但后来因粮食耗尽，进攻失败，罢兵回长安，攻蜀之议，暂时中辍。次年三月，公孙述派田戎和任满等率军攻占荆门、虎牙，据险防守。刘秀亦派大司马吴汉等发荆州兵六万人、马六千匹，与岑彭会合于荆门，准备攻

刘秀灭蜀之战经过示意图

(9—7图)



蜀。吴汉与岑彭意见不合，刘秀认为吴汉习用步骑，不晓水战，遂把荆门战场的指挥重任，交由岑彭承担。同年夏天，击败隗嚣后，来歙提出建议：

“公孙述以陇西、天水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得以苟延残喘）。今二郡平荡，则述智计穷矣。宜益选兵马，储积资粮。……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馑，若招以财谷，则其众可集。”[31]

刘秀同意他的建议，下令在汧县积谷六万斛，准备招兵攻蜀。当来歙击破隗纯于落门后，刘秀即定下灭蜀的决策，其战略布势是南路方面命岑彭率荆州诸军由夷陵西进；北路方面命来歙率陇西诸军自陇西南下，两路大军向成都采取钳形攻势。为使两路大军的进展获得战略上的协调，规定两路军的攻击步骤：荆州诸军先采取攻击行动，俟南路大军越过三峡、进占江州后，陇西诸军始向河池发动进攻。其战略部署概括为水陆并进、南北钳击、会师成都。

刘秀灭蜀的战略，实系贯彻其平定群雄的一贯战略。就当时的全

盘态势而言，除卢芳勾结匈奴尚占据九原外，东南方的割据势力皆已次第荡平；西方的隗嚣已破灭，窦融已归附；南方的零陵、桂阳、长沙等郡，亦望风归附刘秀。公孙述已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刘秀为统一全国而战，对为保境而战的公孙述已具压倒的优势，胜负之数毋待龟卜了。刘秀深知陇蜀及荆州诸战略要点所构成的军事形势，故能依据兵要地理作适切的战略部署：南北两路大军对所要最后夺取的战略目标成都作求心的合击，并为协调和统制两路大军的攻击步骤，规定在南路大军没有攻占江州、进至战略上利害转换线以构成南北合击的有利态势之前，北路大军不得孤军先行南下入蜀，遭到各个击破。这个布势显示了刘秀的知兵。

十、灭蜀之战中刘秀的战略指导

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春，岑彭大军攻陷夷陵诸要隘后，乘胜长驱入江关(今四川奉节)。田戎放弃三峡，退保江州（今四川重庆）。岑彭的部队军纪严明，所到之处，百姓迎劳，顺利地进至江州。同年六月，北路的来歙、刘尚也击败了王元、环安诸部，攻占河池，下辨(今甘肃成县)，乘胜入蜀。公孙述大为恐慌，派人暗杀了来歙，刘秀派马成继续指挥。适值羌族发生叛乱，马成军主力转用于陇西方面，至此，灭蜀的任务便主要由岑彭军独立承担了。

岑彭军长驱抵江州，以江州城固粮多，难以立即攻占，岑彭留冯骏监视田戎，亲率主力直指垫江(今四川合川)，攻破平曲（在合川西北涪江湾曲部），夺得大批粮食。此时，吴汉亦由夷陵率军乘船续进。

岑彭军进抵江州时，成都震动。公孙述急调王元军南下增援，与延岑、吕鲔、公孙恢等集结重兵于广汉(今四川遂宁北)、资中地区，部署一条自北而南、向东防守的防线，以保卫成都，并相机转取攻势；又命将军侯丹率二万人防守黄石(今四川江津、璧山间)，以确保其主要防线侧翼的安全。刘秀亦命北路的刘尚率有力的一部迅速南下，以策应南路岑彭军进击之势。

岑彭针对上述情势，决心分兵两路，进攻成都。他派臧宫率降卒

二万进据平曲上游，以对付蜀军延岑部，自率汉军折回江州，溯江西上，袭击黄石，大破侯丹军，迅速向蜀军主要防线的侧背进军，经江阳（今四川泸州市）、僰道（今四川宜宾市）、南安（今四川乐山市），日夜倍道兼行，疾驰二千余里，进据武阳（今四川彭山县东），派精骑闪击广都（今四川双流县东南），逼近成都。公孙述闻报大惊失色，以杖击地说："何其神也"。

平曲方面的臧宫军初先因军粮不继，处境窘迫。幸刘秀所派遣的援兵到达，且有马七百匹。臧宫遂利用援军的声威，虚张声势，进击延岑军，迫降十余万人，进抵平阳（今四川绵竹县）。

公孙述又派人刺杀了岑彭，刘秀改派吴汉指挥岑彭军，并指示他："直取广都，据其心腹"。[32]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七月，刘秀对如何攻取成都，向吴汉下诏书指示方略：

> "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指吴汉）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33]

吴汉急于求胜，未遵照刘秀的指示执行，乘胜率步骑二万余进攻成都，距城十余里，在江北扎营，作浮桥，命副将刘尚率军万余人在江南设营。两军相距二十余里。刘秀得悉吴汉这样部署，大为吃惊，派遣使者诘责吴汉：

> "比敕公（指示你）千条万端，何意临事勃乱（何故临事竟无章法）！既轻敌深入，又与尚别营，事有缓急，不复相及（相救）。贼若出兵缀公（阻击你部），以大众攻尚，尚破，公即败矣。幸无他者（希望不再有其他打算），急引兵还广都。"[34]

刘秀的诏书尚未到达，而公孙述果然派其大司徒谢丰率兵十余万，分为二十营，并列出击吴汉军，派别将率军万余人牵制刘尚军，使其不能相救。吴汉军与蜀军交战一日，兵败，入壁坚守。谢丰派兵围困吴汉军，准备转攻刘尚。在此危急之际，吴汉召集诸将并激励他们说：

> "吾共诸君逾越险阻，转战千里，所在斩获，遂深入敌地，

至其城下。而今与刘尚二处受围，势既不接，其祸难量。欲潜师就尚于江南，并兵御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为战，大功可立；如其不然，败必无余。成败之机，在此一举。”[35]

诸将赞同吴汉的意见，于是休兵养士，闭营三日不出战。又多树旗帜，使烟火不绝，以迷惑蜀军。夜间突然撤走，与刘尚会合于江南，谢丰等并未察觉。天明后，仍分兵监视江北，自率主力攻江南营。汉军集中兵力迎战，蜀军大败，谢丰、袁吉皆战死。吴汉命刘尚留在原地抗拒蜀军，自率军回到广都。在这场决战中，吴汉初先部署错误，几致覆灭；幸能及时改变部署，机智行动，乃得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吴汉回到广都，向刘秀呈报战况，刘秀再予指示：

今还广都，甚得其宜。公孙述必不敢舍弃刘尚而进击广都。如果他先进攻刘尚，你由五十里外的广都集中步骑兵增援，乘其危困相机进击，必能破敌。[36]

此后，吴汉与公孙述交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进据成都外城。十一月，臧宫攻克繁(今四川新繁)、郫(今四川郫县)，与吴汉会师于成都近郊。

成都危急，公孙述采纳延岑“死中求生”的建议[37]，拿出大批金帛，招募了五千“死士”配属于延岑，准备背城一战。两军经过一场拚死搏斗，蜀军溃败，公孙述临阵身负重伤，逃回成都，当夜身死。延岑见大势已去，只好开城投降。至此刘秀胜利地结束了灭蜀之战。

纵观灭蜀之战中，刘秀的战略指导颇为允当适切。善于运筹帷幄，自然能决胜千里。

灭蜀战争发动前，吴汉以大司马掌管军政，认为岑彭所备战船数十艘及诸郡水兵，多耗粮谷，主张遣散。刘秀获悉后，认为吴汉只习用步骑，不晓水战，把荆门战场的指挥全权委托娴熟水战而又熟知蜀中情况的岑彭。战争中，岑彭的勇敢果决，臧宫的机断行事，都说明刘秀善于选将用人。

当南路岑彭军攻克夷陵诸要隘、乘胜长驱抵达江州之际，北路马

成军尚在武都附近地区，刘秀即命刘尚率有力的一部迅速南下，以助张南路军进击之势；当岑彭以疾风骤雨之势迂回广都，迫于孤军深入，刘秀却在行动上未加以任何制约；当吴汉下广都、追逼成都、连战皆捷、形势十分有利时，刘秀却力戒轻敌，主张坚守广都，敌疲再打；当吴汉将其部队隔江分驻时，刘秀下诏书痛责其部署错误。战争实践证明：刘秀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因为岑彭进军时，公孙述的重兵集中在广汉、资中地区，成都空虚。岑彭果敢地实施深远的战略迂回，就可能出敌不意地一鼓而直捣成都。吴汉接替岑彭指挥时，情况已变。这时，蜀军主力已龟缩到成都附近，必将背城一战，拚命反扑。如果汉军轻敌求战，而无后援，就会顿兵挫锐。刘秀主张据敌心腹，诱使公孙述来攻，使敌劳我逸，然后乘其疲困、削弱，予以歼灭。这样的战略指导，看来好象过于持重，实际上都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始终坚持先疲后打的原则，因而最终获得胜利，凡此战略指导皆可见刘秀善于用兵，其将略实在诸将之上。

岑彭于攻克夷陵诸要隘后，即悬军深入，直捣江州，创历史上从三峡进军入蜀的先例。他在垫江获悉蜀军在广汉、资中之间采取攻势防御后，又以疾风迅雷的行动，从敌人的南翼侧进行战略迂回，疾行二千余里，风驰电掣般地直捣敌之心脏——广都，使十余万配备在广汉、资中防线上的蜀军陷入自行崩溃的厄运。岑彭用兵可谓有智谋、有勇略。其攻势的出奇制胜正符合孙子：“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军有所不击”和使敌“前不能顾后、后不能顾前”的原则。

吴汉隔江设营、为蜀军所挫败时，局势至为危险。他幸能迅速改变决心，行动机智，转移兵力于江南，并力打击敌人，始得转败为胜。吴汉指导这一战役可谓成败之机，决于一发。吴汉亦不失为一果毅之将。

公孙述初据益州时，颇能理政，安定一方。但在天下纷扰之际，他仅赖时势与机运以创建其局部的绩业，并不是具有雄才大略、深谋远虑的命世之才。蜀中诸将如王元、田戎、延岑、谢丰，其将略亦远不及来歙、岑彭、吴汉、臧宫，是以在军事上处于破败之势。可见人

才的得失，关系王霸之业的盛衰。

注　释

〔1〕 《后汉书·邓禹传》。
〔2〕 《后汉书·邳彤传》。
〔3〕 《后汉书·耿弇传》。
〔4〕 《后汉书·冯异传》
〔5〕〔6〕〔7〕〔8〕 《后汉书·光武帝纪》
〔9〕 《后汉书·任光传》
〔10〕 《后汉书·邓禹传》
〔11〕 原文见《后汉书·岑彭传》。
〔12〕 《后汉书·刘盆子传》
〔13〕 《后汉书·刘玄传》
〔14〕 《后汉书·刘盆子传》
〔15〕 《后汉书·冯异传》
〔16〕 《资治通鉴·卷四十·光武帝建武二年》
〔17〕 《后汉书·刘盆子传》
〔18〕 《后汉书·岑彭传》
〔19〕 《后汉书·来歙传》
〔20〕 《后汉书·马援传》
〔21〕 《后汉书·窦融传》
〔22〕 原文见《后汉书·窦融传》。
〔23〕 《后汉书·隗嚣传》
〔24〕〔25〕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四十二·光武帝建武八年》。
〔26〕 《后汉书·来歙传》
〔27〕〔28〕〔29〕 原文见《后汉书·公孙述传》。
〔30〕 《后汉书·岑彭传》
〔31〕 《后汉书·来歙传》
〔32〕 《资治通鉴·卷四十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
〔33〕 《后汉书·吴汉传》
〔34〕〔35〕 《后汉书·吴汉传》
〔36〕 原文见《后汉书·吴汉传》。
〔37〕 《后汉书·公孙述传》

第十章　黄巾大起义

第一　黄巾起义波涛动摇东汉王朝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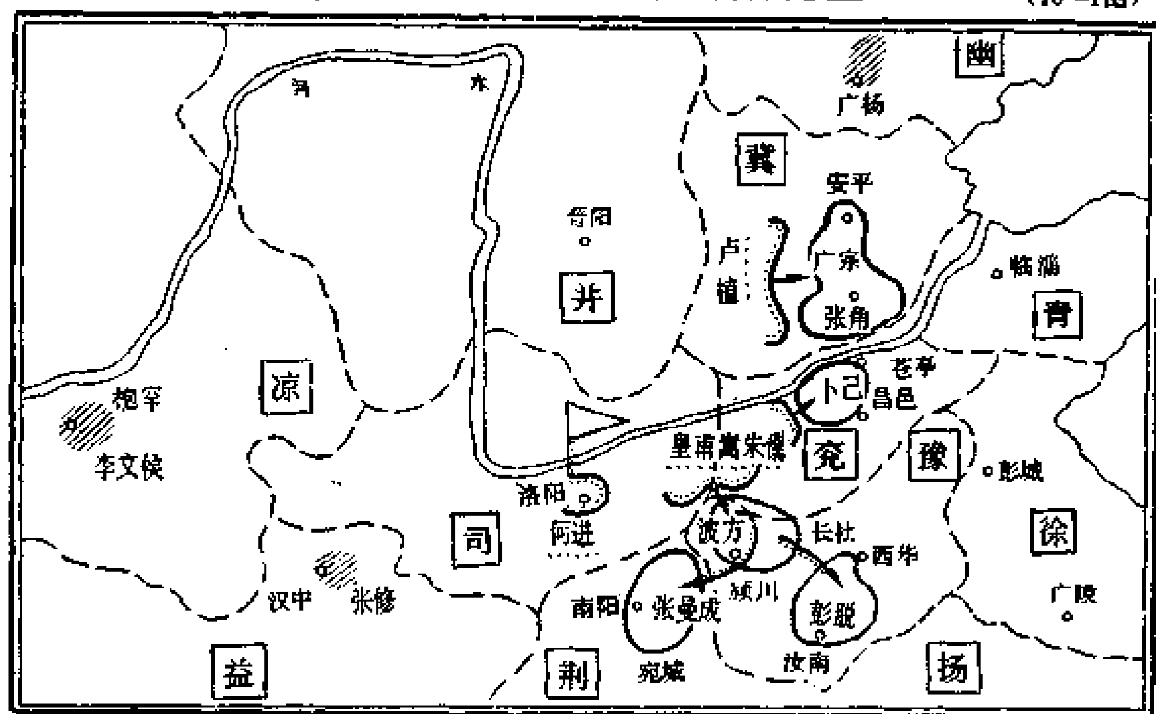
东汉王朝是维护豪强大地主利益的。豪强大地主的势力在东汉一代得到顺利的发展。他们大量兼并土地，剥削农民，迫使广大农民丧失耕地和人身自由，沦为奴婢或徒附。到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又交替出现外戚与宦官之间的夺权斗争，倾轧激烈，而他们贪残横暴，对人民巧取豪夺，与豪强大地主是一丘之貉。外戚和宦官权力的膨胀，又阻挠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官僚机构中一些士大夫官僚的升迁上进，堵塞一些大学士的仕途，引起新的矛盾和斗争，终于酿成东汉历史上有名的两次党锢之祸，更加深东汉末年的政治危机。到汉灵帝时（公元184年），东汉王朝的政治腐败，达于极点，卖官鬻爵，贿赂通行，对人民的剥削勒索，日益加重，以致"虐遍天下，民不堪命"。[1]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一场波澜壮阔的黄巾起义终于爆发了。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起义。领导人张角利用"太平道"进行宣传做了十多年的秘密准备工作。黄巾军发动起义后，"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2]起义群众头上裹着黄色的头巾作为标志，所以称为"黄巾军"。他们焚烧官府，捕杀官吏，攻打地主坞壁，给东汉王朝的各级统治机构以沉重的打击。起义军的主力分布在三个地区：黄巾军的领导人张角自称天公将军，活动于冀州地区，形成革命的中心；张曼成自称"神上使"，领导一支黄巾军活动于南阳地区，成为南方的革命主力；波才、彭脱领导的黄巾军活动于汝南、陈国（今河南淮阳）地区，成为东方的革命主力。各方面的

黄巾军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威胁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参看插图10-1）

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概况图

（10-1图）



东汉王朝急忙调集部队对起义军实施镇压。

——命北中郎将卢植率领一部分军队镇压河北起义军张角部；

——命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各率领一军共约四万余人会攻对洛阳威胁最大的颍川、汝南黄巾军波才部。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四月，波才部击败朱儁的进攻，乘胜围攻皇甫嵩于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但因黄巾军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戒备不严，被皇甫嵩利用夜暗，乘风纵火，实施夜袭，起义军被迫后撤，遭到皇甫嵩、朱儁诸部的联合进攻，数万人惨遭屠杀。接着又于五月被皇甫嵩击败于阳翟（今河南禹县）。不久，彭脱部也被皇甫嵩击败于西华（今河南西华县），八月，东郡卜己部又被皇甫嵩击破于苍亭（今山东阳谷北），卜己阵亡。至此，东郡、汝南和颍川三郡的黄巾军先后被各个击败了。

南阳黄巾军张曼成部自三月开始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与南阳

太守秦颉相持一百余日，张曼成不幸战死，赵弘代为统帅，继续战斗，攻克了宛城，部队发展到十余万人。六月，朱儁在镇压颍川黄巾军后，转移兵力，会合荆州、南阳地区的地方武装，围攻宛城，黄巾军坚守两月，粉碎了朱儁的多次进攻，但不幸赵弘又战死。后来，黄巾军被朱儁的佯退所骗，出城追击，中途遭到伏击，损失甚重，被迫撤回宛城固守，终因众寡悬殊难以久守，余部由孙夏率领于十一月向西鄂县（今河南南召东南）西南的精山转移。朱儁跟踪追击，孙夏战死，起义军一万多人牺牲，从此南阳地区的黄巾军也遭失败。

河北黄巾军在张角亲自领导下，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阳曲（今河北晋县西）。卢植率军全力进攻广宗，被张角所率起义军击败。东汉王朝改派东中郎将董卓接替卢植继续围攻两三月，广宗，下阳曲仍然屹立不动。十月皇甫嵩又代替董卓为帅，再发起进攻。此时，黄巾军主要领导人张角病死，其弟张梁继任统帅，继续与皇甫嵩在广宗展开激战。后因起义军久战之后，戒备松懈遭到皇甫嵩的夜袭，张梁战死，三万多人英勇牺牲。十一月，皇甫嵩又转攻下阳曲，黄巾军主帅张宝战死，军民被屠杀者达十余万人。至此，黄河南北的几支黄巾军主力在反动统治阶级的联合反击镇压下，仅仅九个月都被击溃了，继起的其他黄巾军如青州黄巾军、白波黄巾军、徐州黄巾军和冀州黑山军亦先后遭到地方州牧军阀的镇压。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失败了。

第二　黄巾起义的进步意义

从秦末以来农民起义战争的发展过程来看，黄巾大起义比之陈胜吴广起义和赤眉、绿林起义有相同的进步意义；而在起义的策略上更较为进步。

一、黄巾大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8]（简称“黄天太平”）作为政治口号，既指出了苍天（东汉王朝）必然要消灭，并明确了黄天（农民政权）一定要建立。比之陈胜

吴广只提出“伐无道、诛暴秦”[4]更为进步。这个口号表达了人民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慨，亦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对号召和团结人民参加起义军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起义事先有秘密的领导人张角。他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组织形式进行了十多年的长期秘密准备。在青、徐、幷、冀、兖、豫、荆、扬八州都拥有信徒，多至数十万人，张角把他们组成三十六方（部），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设有渠帅统率，统一归张角指挥，使发动起义有了骨干力量；

三、起义前，事先拟定“三月五日、内外俱起”[5]的大规模起义计划，后来因起义计划暴露，临时飞告各方，提前于二月起义，幷规定起义人员都头戴黄巾作为标志，这都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组织力量。所以起义一爆发，就能够“遐迩动摇，八州幷发，烟炎绛天”[6]，如火如荼地给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

四、利用宗教，在传道治病的掩护下，进行宣传组织，便于麻痹官府，接近群众，所以有些官吏认为“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7]，不加禁止，这就有利于发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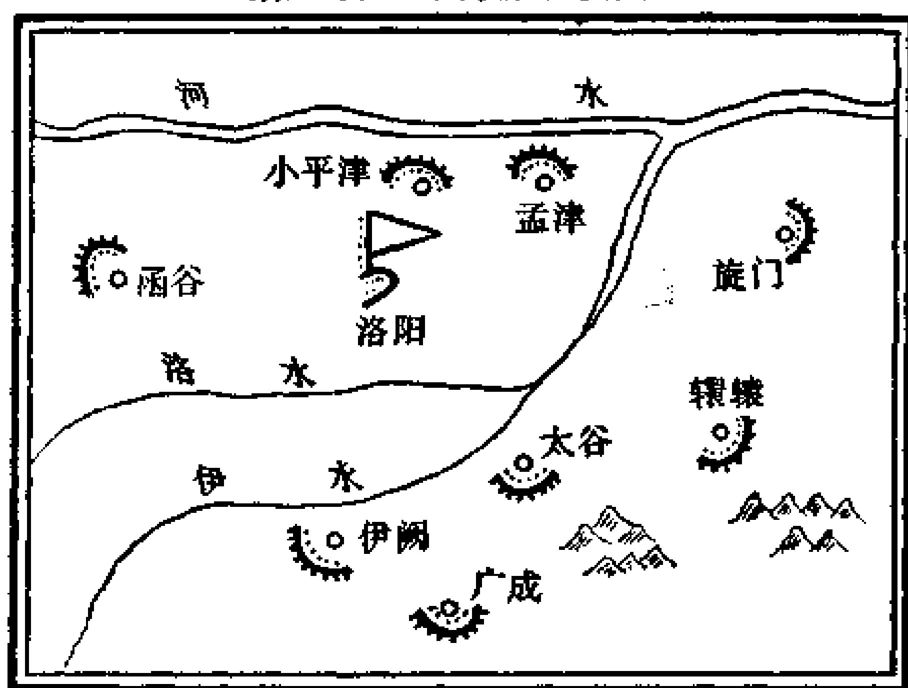
第三　黄巾起义失败的教训

黄巾大起义失败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客观方面有它难以战胜的敌对势力：东汉朝廷虽然是腐朽的，但东汉统治阶级比起秦二世和新莽的统治却凶顽有力。它手里直接掌握有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不比秦二世和王莽，把大量的军队调去戍边或用于对外战争，当农民起义风暴掀起后，东汉统治者不象秦二世那样惊慌失措，而是下令“大赦天下党人，还诸徙者”[8]，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鼓励各地豪强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修筑坞壁，扩大武装，组织起来与黄巾军对抗；下令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9]幷向朝廷推荐有作战经验的人听候调用；增设西园八校尉[10]，编练新军，镇压起义军；还发出宫中藏钱收买官兵，用西园马匹装备军队，扩充骑兵。可以说东

汉王朝是联合和统一了统治阶级各方面的力量来共同对付黄巾军。这是因为农民起义直接危及统治阶级的生存，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之间的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促使统治阶级内各个集团自然地联合起来对付农民起义军。而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各统治集团反对黄巾军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且想在农民起义军动摇东汉王朝统治的波涛中，发展他们自己的势力，实现他们各自的野心，这就增加了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疯狂性和残暴性。黄巾起义军遭到失败，除了自身的弱点外，这是一条重要的客观原因。

在军事部署上，东汉王朝采取了“进剿与防堵”两相结合的措施：一方面调派部队进行镇压，并命南阳一带的地方官加强防守，隔绝各部黄巾军的联系，把三支黄巾军的主力封闭在起义地区，予以各个击破。另一方面派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统率左右羽林军，屯兵都亭（洛阳附近）以保卫京师，并星夜派兵进驻洛阳外围的函谷、广成、伊阙、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个关口，以加强京师外围的防御，使起义的波涛不能冲垮东汉王朝的指挥中枢，影响它的发号施令。（参看插图10—2）

洛阳外围八关设防概要图 （10—2图）



这些部署都看出东汉王朝统治阶级的凶顽和有力，给黄巾军夺取胜利在客观方面造成大的困难。

再从主观方面去探索，黄巾军有它自身组织领导上的缺陷和军事战略、策略运筹上的失误。

一、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

起义领导人张角既然利用带宗教迷信色彩的"太平道"进行宣传组织，所接收的信徒，包括后来担任各方的渠帅，不免多为市井的平民和农民。他们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不懂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他们参加起义，攻州郡，打坞壁，杀官吏，斗豪强，有破坏旧制度、旧秩序的豪情壮志，但缺少巩固胜利，建立新的统治政权的才干韬略。革命力量愈壮大，破坏的地方愈多，给它本身带来如何安定社会秩序的问题也就愈多。他们提出"黄天当立"，但应如何"立"，没有一套具体的章法。结果"黄天当立"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只能鼓动于一时，壮阔的起义只是昙花一现。

二、没有建立起后方基地和有组织的战斗部队

组成起义军的基本力量起初是大量的贫苦农民和流民，以后加入了在地主坞壁内受尽苦难的徒附和农奴。他们扶老携幼，全家随军。起义军中既有精壮男丁，亦有老弱妇幼。表面看起来，阵容庞大，声势浩荡，但打起仗来，部队行动受拖累，将士有后顾。自古以来，家属随军作战，兵家所忌。起义军的主要领导人在领导广大农民群众杀贪官，清官府，打坞壁，没收他们的财产后，没有重视建立自己的地方政权，安置将士家属，从事生产，以减除部队行军作战时的拖累，起义军受到敌人重兵攻击时，遭致失败，这亦是原因之一。

三、缺乏统一的指挥和互相的配合，各自为战

在战略指导上，缺乏统一的指挥。起义开始时，有统一的行动计划，所以出现"八州并起"，天下响应的大好局面。但是起义以后，失去了统一指挥，各自为战，互相之间难以支援和配合。起义的领导人张角和他的兄弟张梁、张宝只坐镇河北广宗一地，既未能建立统一的指挥以指导各地起义军的行动，也未能主动与其他起义军配合，当皇

甫嵩、朱儁率军镇压颍川的波才部时，其他起义军纠缠于当地的敌军，未与波才部进行有力的配合，以致敌军击破波才部后，又转用兵力反击南阳地区的黄巾军张曼成部。结果，各路黄巾军被封闭在各个起义地区，互不连系，致遭各个击破，这是黄巾军在战略指导上重大的失误。

四、未运用流动作战的战役指导，攻坚守要，消耗实力

起义发动时，攻官府，打坞壁，诛贪官，杀豪强，使起义在广大地区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是必要的，但在敌人集中力量开始镇压时，继续胶着在一个地区，攻打坚城，或困守孤城，给敌人以“聚而歼之”的机会，都是失策的。如波才部长期攻打长社，张曼城部坚守宛城，他们打得虽然英勇顽强，但消耗了自己的精壮力量，终遭失败。如果起义军领导人认识到敌强已弱的整个形势，在作战指导上有统一的战略行动，避免在没有必要略取或坚守的地区如长社和宛城与敌人打硬仗，拼消耗，而采取机动作战，避实击虚，与敌人周旋，积蓄力量，壮大自己，可能会逐步导致胜利。

五、没有政治号召

起义军的领导人张角领导起义后，没有政治号召，不善于运用策略去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来壮大革命阵营。黄巾军起义后，应树立核心的领导力量，再争取团结各阶层的人士来共同对付腐朽的东汉王朝，与敌人既斗力又斗智。义军的领导人不懂此策略，结果以胜利起事，却以失败告终。

黄巾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是沉重的，值得吸取。而黄巾起义波涛动摇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打击了统治集团，导致群雄割据，使以后有远见的政治家如曹操、诸葛亮之属，不得不改良政治，缓和与人民的矛盾，其影响是深远的。

注　释

〔1〕《后汉书·单超传》

〔2〕《资治通鉴·卷五十八·灵帝中平元年》

〔3〕《后汉书皇甫嵩传》

〔4〕《史记·陈涉世家》

〔5〕《后汉书·皇甫嵩传》

〔6〕《后汉书·百官志五》注引应邵《汉官》

〔7〕《资治通鉴·卷五十八·灵帝光和六年》

〔8〕《资治通鉴·卷五十八·灵帝中平元年》

〔9〕《后汉书·皇甫嵩传》

〔10〕西园八校尉：蹇硕为上校军尉，袁绍为中军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左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夏牟为左校尉，淳于琼为右校尉。

第十一章　三国的形成及其关键性的战争

魏、吴、蜀三国的历史共历九十年，包括三国的形成、斗争和统一三个阶段复杂的演变过程。

魏、吴、蜀三国正式建立的时间是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开始的。而史学界叙述三国形成的历史，一般是从公元190年军阀混战开始。这是因为曹操、孙权、刘备三大势力是在黄巾起义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出现军阀割据、混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魏、吴、蜀三国政权正式建立之前，三足鼎立的础石就已基本奠定。

在军阀割据、混战的初期，中原地区所形成的相互斗争的中心是袁绍、袁术兄弟二人的争夺。曹操据有兖州，是由袁绍所扶植；孙策开拓江东，则系袁术所派遣。因当时二袁以"四世三公"的声势，割据的州牧莫能与他们争衡。二袁离析，互相火并，遂使具有雄图大志者得以观变待时，乘势崛起。经过长期的混战、兼并，曹操统一了北方，孙策平定了江东，使当时州牧割据的大分裂的混乱局面，逐步走向各个地区的局部统一。而曹操在官渡击败袁绍，是他统一北方的关键性的一战；孙策决心渡江，也是他独霸江东的关键性的决策。

曹操统一北方，孙权崛起江东，刘备寄寓荆襄，三家都觊觎荆州。曹操兵下荆州，扩张势力，又惹起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击败曹操，基本上奠定了三国鼎立的础石。曹操在赤壁霎兵，退回北方后，对孙、刘两家采取战略防御，转用兵力去经营关中和陇右。孙权致力于扬州、交州的开拓。刘备乘间袭取益州。从而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

在三国形成经历三十年的过程中，战争频繁，兼并激烈，群雄争

竞，人才蔚起。其谋国料敌，机巧权变，识见深远，决策明智，足供后人借鉴取法的比比皆是：袁绍“四世三公”，声威显赫，他拥有北方四州之地，兵多将广，何以在官渡一战，一败涂地；曹操兵下江南，“舳舻千里，旌旗蔽空”，何以兵败于赤壁；孙策、刘备初先并无尺寸的凭藉，何以能乘时崛起，鼎立建国。一些历史人物的浮沉，事功的盛衰，战争的胜败有它的因果轨迹可以探索。曹操、孙策、孙权、刘备以及他们的谋士荀彧、郭嘉、周瑜、鲁肃、诸葛亮这些风流人物的英雄业绩，吕布、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这些人的愚昧活动，从政治、军事斗争正反两方面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少的经验教训。本章就形成三国鼎立的四个关键性的战争，从战略运用的角度作些探索。

——曹操统一北方之战

——孙策开拓江东之战

——赤壁之战

——刘备袭取益州之战

第一　论曹操统一北方之战

——官渡击败袁绍、奠定统一北方基石——

黄巾起义军的主力被消灭后，东汉王朝一度缓和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余焰复炽。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以大将军何进为首的外戚集团和以西园新军统帅蹇硕为代表的宦官集团，又展开了夺权的斗争，互相厮杀，因而导致董卓拥兵入洛阳，窃取了军政权柄。从此，外戚与宦官虽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又转变为州牧[1]武装割据的冲突，即所谓军阀混战了。经过长期的混战，曹操统一了北方，孙策兄弟平定了江东。而曹操统一北方，尤非易事。他处于内线作战地位，四面受敌，而能成功地击败强劲的对手，历史上是罕见的。其成功之道也是多方面的。

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不列于世族。宦官本来是不能生育子女

的，但由于东汉后期宦官势力很大，汉顺帝便下令允许他们收容干儿子继承爵位。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继承曹腾的费亭侯爵位，先后任司隶校尉，大司农等职。在东汉末年宦官专权的几十年中，曹氏家族的势力却是相当大的。

汉灵帝熹平三年（公元174年），曹操二十岁的时候，就以孝廉的身份，被推为郎，出任洛阳北部尉。他执法严正，不避权贵，受到好评。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黄巾起义，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随皇甫嵩、朱儁镇压颍川黄巾军，后迁任济南相（今山东历城东）。汉灵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他被任命为东郡太守。第二年，汉灵帝为了加强京都禁军的力量，成立了西园新军，设置八校尉统领。曹操被任命为典军校尉，成为京师禁军首领之一。汉灵帝死后，曹操和袁绍都参与了外戚何进集团诛杀宦官的斗争。事情泄露，何进被宦官杀害，董卓拥兵入洛阳，曹操逃到陈留，招募军队，参加关东诸军在袁绍统帅下讨伐董卓。讨伐董卓失败后，曹操感到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依靠自己有独立的武装力量，于是便下扬州募兵。走到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他的堂弟曹洪带领家兵千余人前来投靠他。他凭着这些家兵家将，组成了自己的基本武装，在黄河南岸展开了建立基地的斗争。

曹操要创建基业，是颇不容易的。他名位低微，不比一些州牧占有固定的地盘，握有军政大权，以作为创建基业的资本，也不比袁绍的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可以凭借名望，以资号召。他在群雄逐鹿的时际，只能白手兴家，创建基业。从他于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2]起兵陈留，参加讨伐董卓的军事活动起，到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北征乌桓，完成北方的统一止，在这十七年间，他东征西战，奔走风尘，"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3]。他在创建根据地时期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和策略，在各个击破、翦灭群雄时期所策定的战略方针、部署和作战指导，以及在巩固胜利时期所施行的许多安邦定国的宏伟措施，都充分显示了他政治军事方面的雄才伟略。试举其荦荦大者加以论述。

一、创建兖州根据地的政策和策略

早在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他到河北依附袁绍，想凭借其势力以徐图发展时，济北相鲍信就向他建议：袁绍以盟主的资格利用权力，发展势力，必将发生变乱，成为第二个董卓。现在要制裁他，力量还不够，可以在黄河以南地区先扎根基（建立根据地），以观天下形势的变化。[4]

曹操很赞成他的建议。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曹操率兵击破黑山黄巾军白绕部于兖州、濮阳（今河南濮阳），袁绍任命他为东郡（郡治在今河南濮阳南）太守。曹操在东郡站稳脚跟后，即着手根据地的建设，他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青州黄巾军进入兖州，杀死刺史刘岱，兖州无主。陈宫又劝说曹操利用兖州为基地，以兼并天下，图霸王之业。经陈宫的游说，济北相鲍信等公推曹操出任兖州牧。曹操拥有兖州地盘，积极扩张势力，羽毛日渐丰满，开始与袁绍分离。但在他出任兖州牧不久，即遭到南阳袁术的进攻。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曹操在陈留（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南）东部击败袁术，迫使他退守淮南。曹操南面的威胁减轻后，先后两次向徐州的陶谦发动进攻，企图向东方扩张势力。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 194 年）四月，当曹操第二次进攻陶谦时，陈留太守张邈和陈宫等反叛曹操，拥立吕布为兖州牧，兖州大部分郡县丧失，仅保有甄城、范县、东阿三城。曹操被迫率军回救，与吕布大战于濮阳。相持百余日，双方均因军队缺粮罢兵。曹操退到甄城。此时，兖州地区蝗灾严重，粮食难于筹集，兵士逃亡，曹操的处境相当困难。袁绍派人来游说曹操，要他继续归附，送家属到邺城，作为人质。曹操打算接受，谋士程昱极力反对。他认为：

> 袁绍割据河北，有兼并天下的野心，以将军的威望能做他的韩信、彭越吗？现在兖州虽然残破，尚有三城可守，能征惯战的将士不下万人，将军与文若（荀彧）和我把他们组织起来，善为调用，王霸之业可成，望将军再加考虑。[5]

曹操最后采纳程昱的意见，拒绝依附袁绍，决心独立经营兖州。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春正月，曹操重整军旅，展开收复兖州失地的战争。他先后击败吕布于定陶（今山东定陶）、垣野（今山东巨野南），进军乘氏（今山东巨野西南）。此时，得知陶谦病死，刘备继任徐州牧。他想乘徐州局势不稳定的时机，先攻取徐州，然后再回军击灭吕布。荀彧不同意他的作战方案，引古论今地向他分析形势，陈述利害，劝他先打吕布，巩固兖州根据地。荀彧说：

> 过去汉高祖保关中，汉光武帝据河内，都是先巩固本（根据地），再进取天下，才进可以战胜敌人，退可以据地自守。……兖州是天下的冲要之地，现在虽然残破，犹易据以自保，亦是将军的关中，不可以不先巩固它。如果放弃吕布不打，而东攻徐州，……吕布乘虚侵扰，百姓恐惧不安，只有鄄城、范县、东阿三城可望保全，兖州的其他郡县不会为我所据有。那时，就会丧失兖州根本，如果徐州又攻打不下来，将军又到何处去？……请将军详加考虑。〔6〕

曹操采纳了荀彧的先打吕布的作战方案。吕布率军万余人前来进攻，曹操设伏兵击败吕布，乘胜攻占定陶，进围雍丘（今河南杞县），并分兵收复附近一些反叛的郡县，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八月，雍丘城破，至此，在兖州反对曹操的地方势力全被消灭，曹操占领了全部兖州。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他又进军豫州，击破了汝南（郡治在今河南息县）、颍川（郡治在今河南禹县）两郡的黄巾军，占领了许昌，巩固了兖豫两州的统治权，在几度艰危之际，他能善纳群议，坚持斗争，终于在兖州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这里也展现他的英雄胆识。

从曹操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可以看出历代兴亡之际，凡是具有雄心、想创建基业的人，莫不首先重视巩固根本，然后进图王霸之业。古代所说的巩固根本，即现在所谓的建设根据地。有了巩固的根据地，才能“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足见创建根据地非常重要。曹操在争夺和巩固兖豫两州统治权时，推行的下

列四项政策和措施是卓著成效的，这对他的统一北方的事业，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致力于军队建设

曹操在酸枣孤军进攻董卓失败后，更感到在群雄割据的时际，要成就一番事业，依附别人，难以为济，必须建设自己的独立的武装力量，要有兵马才能定中原。他依靠陈留起兵时的家兵家将如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等人，组成他的军队的骨干。他领有兖州东郡后，以兼收并蓄的政策接收兖州一些豪强地主李乾、李典、吕虔等率领的宗族、部曲、家兵来扩大他的军队。典韦、于禁、乐进等亦投奔他的帐下，后来都成为他的重要将军。他收编青州黄巾军，选拔其精锐组成“青州军”。

他不断注意接收各方面的力量来充实壮大他的战斗队伍，这是他不断取胜的因素之一。

（二）不拘一格用人才

曹操又以兼收并蓄、“唯才是举”的政策，招贤纳士，广求人才。他极力拉拢出身士族的知识分子来壮大他的阵营。颍川富有声望的、被士族誉为有“王佐之才”的荀彧，到东郡投奔曹操，曹操非常器重他，高兴地说：“吾之子房也”[7]。经荀彧的推荐，荀攸和郭嘉这两个富有智谋的人亦投奔曹操。曹操很赏识荀攸，任命他为军师。曹操对荀彧说：公达是个不平凡之人，我能与他计议军国大事，治理天下还有何忧虑。[8]郭嘉投奔曹营，曹操与他谈论天下大事，发现他很有才干，命他参与机要。曹操对人说：“使孤（我）成大业者，必此人也。”[9]此外还有陈留的毛玠、淮南的刘晔和钟繇、杜袭、赵俨这些颍川的名士，经曹操的延揽，亦先后进入曹操的幕府。他还主张从基层选拔人才，如满宠出身于郡邮，张既出身于郡吏。这就扩大了他的统治阵营，加强了他的统治力量，这些人都成为他的智囊团中的重要人物，在他战胜群雄，统一中原的事业中，出谋划策，做出不少的贡献，这都足见曹操的器度恢宏，知人善任。在天下骚乱、风云幻变的时际，一个想图王霸之业的开拓者，如果没有阔达的襟怀，兼收并蓄的

政策以招纳各方面的人才，而阐孤家寡人，抱门户之见，是不会有所成就的。不拘一格用人才是曹操能够建树一番事业的另一重要因素。

（三）办屯田以蓄军资

自汉灵帝中平以来，中原离乱，人民流亡，田园荒芜，到处出现"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10]的惨象。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军队缺乏粮食供应。曹操与吕布争夺兖州时，也因粮食不济，只好罢兵。他亲身经历，感到粮食对军队作战的重要性，不首先解决粮食的供应，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要扫荡群雄，完成统一大业是有困难的。早在他被推任兖州牧的时候，兖州从事毛玠就向他提出建议：

> 现在天下分裂，王室流离，百姓不能从事生产、饥饿流亡。公家没有一年的储备，百姓得不到安定，这是难以持久的。现在袁绍、刘表虽然士民众多，貌似强大，但都无雄图远虑，不是建树基业的人，攻战取胜要靠正义，保持地位要靠经济力量，我们应该奉天子以讨伐叛逆，发展耕植以充实军资，这样霸王之业才可以成功。[11]

曹操认为毛玠的建议很好，不过那时时机尚不成熟，未能施行，当他在兖豫二州的统治地位巩固后，枣祗又向他提出屯田的建议，他即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招抚流离的百姓，在许昌举办屯田。这不但供应了前线的军队粮食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同时招抚流亡，使一些流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安定了社会秩序，也就巩固了他统治地区的统治。施行十年，"所在积谷，仓廪皆满"。[12]曹操在击败袁绍后，追述枣祗开办屯田的功劳时说："设施屯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是枣祗的"不朽之功"。[13]屯田对曹操势力的发展壮大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四）奉天子以讨叛逆

早在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毛玠就曾提出奉迎献帝的建议。曹操取得兖豫二州的统治权时，汉献帝在凉州军阀杨奉、韩暹的护送下，亦由河东回到了残破的洛阳，荀彧又向曹操建议：

过去晋文公礼遇周襄王，诸侯拥护；汉高祖为义帝发丧，天下归心……今皇帝已回到残破的洛阳，忠义之士都想拥戴他，老百姓亦还怀念他。如在这时迎接献帝，是顺应人民的愿望的；用忠于王室的行动去制伏割据的群雄，是很重要的策略；如果不当机立断，使天下的豪杰又怀二心，那时再考虑及此，也就后悔莫及。[14]

董昭亦劝曹操借口洛阳无粮，把汉献帝迎接到许昌，以便于挟制。曹操即派曹洪领兵把汉献帝接到许昌。在封建皇权时代，皇帝毕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谁能把皇帝控制在手里，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取得优越的地位。因此时东汉王朝的政权虽已崩溃，拥兵割据者虽然多有"秦失其鹿、先得者王"[15]的思想，而一般的世族和官吏缺乏变的思想准备，还幻想奉迎献帝，重振汉室以安天下。汉献帝这块招牌对这个阶层还是有用的，他们本身仍恋恋于汉室所给予他们的特殊地位，想依靠汉室来一展抱负，不想改朝换代的变革，因此，——利用汉献帝的名义来发号施令，对割据势力加官进爵，拉拢分化，在斗争的策略上，就显得主动而灵活。诸葛亮在隆中与刘备讨论天下形势时，也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争锋"[16]，足见曹操奉迎汉献帝，在策略运用上是成功的。

二、击破中原群雄的战略运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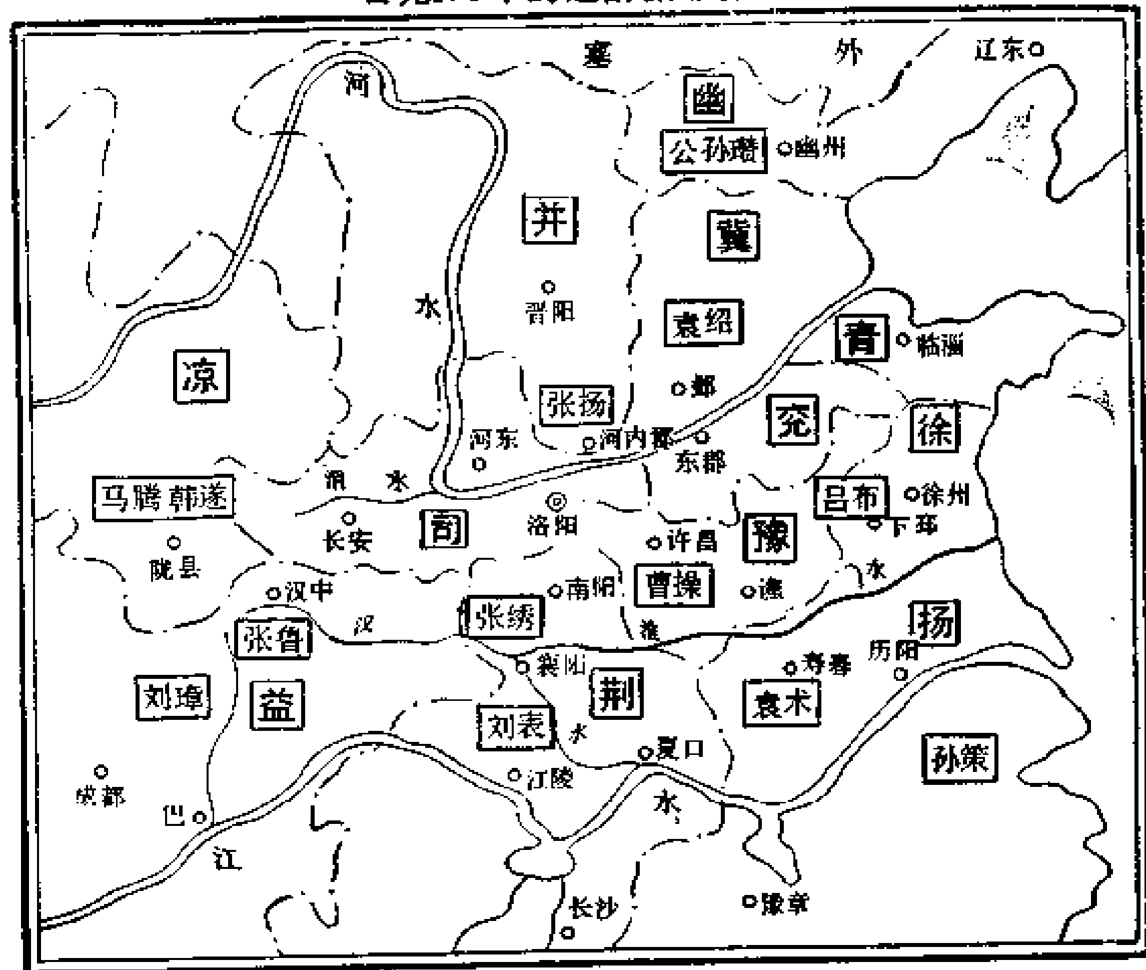
曹操自建立兖豫二州根据地至击败袁绍，历时四载，共进行了五个战役。如果说官渡之战是奠定他统一北方的基石的关键性的一战，那么这以前各个击破群雄、解除后顾之忧的各战役，都是决战胜利必不可少的前奏。兹分别加以论述。

（一）对兖豫二州周围割据势力实行"先弱后强、各个击破"

当汉献帝建安六年（公元196年）曹操占据兖豫二州时，在他的周围有下述几个主要的割据势力：（参看插图11-1）

河北的袁绍：汝南人，出身于世代官僚地主家庭。他是士族地主的代表人物。袁氏家族在东汉末年是"四世三公"，袁家的门生故吏满天下。袁绍曾任西园新军副统帅，关东军讨伐董卓时的盟主，颇有

公元196年封建割据形势要图 （11—1图）



声望。当时，他已占据青州（今山东）、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及并州（今山西），地广兵强，是曹操的劲敌。袁绍所代表的是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在北方统治的结果是“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不但使广大农民贫困破产，也侵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同时豪强之间互相倾轧，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都很尖锐。而且公孙瓒还割据幽州，使他有后顾之忧。

徐州的吕布：他先依靠丁原和董卓，后投奔袁术、张扬和袁绍。自汉献帝兴平二年（公元195年）与曹操争夺兖州失败后，他逃到徐州依靠刘备，以后袭取刘备的下邳（今江苏邳县），自称徐州牧。此人“刚而无礼，匹夫之勇”[17]，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典型人物。

淮南的袁术：他是袁绍的异母兄弟，但两人不和，各立党羽，以相图谋。他初据南阳，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与曹操争夺兖州失败后，退据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因他肆意搜括，弄得淮南一带，生产破坏，人民相食，士卒冻馁，内部离散。袁术本人是勇而无断，已成"冢中枯骨"。[18]但他自不量力，正图谋称帝。

荆州的刘表：他是东汉的名士，是"八俊"之一。他任荆州刺史，占据荆州七郡，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势力较大。但他"不见事变，多疑无决"[19]，抱中立观望态度，只想"保江汉间，观天下变"[20]，是一个无四方之志的人物。

南阳的张绣：他是董卓的部将，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随同他的叔父张济由关中流窜到南阳一带。张济死后，张绣率领所部投靠刘表，驻扎在南阳。南阳靠近许昌，对曹操宛如芒刺在背。不过，张绣是一支沒有地盘的游军，暂时寄食于刘表，是为形势所迫，刘表也不可能长期供养。张绣本人沒有大的抱负，他的谋士贾诩，富有谋略，倾向于曹操。

河内的张扬：他亦是董卓的部将。汉献帝初平二年（公元191年）即被董卓任命为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武陟西南)太守。此人性情软弱，威不服众，沒有什么大的作为。不过，他占据的河内郡，北面依托太行山，南面控制虎牢关，是当时中原地区的战略要点。

此外，关中的马腾、韩遂，益州的刘璋，幽州的公孙瓒，也具有野心。不过，他们距离许昌尚远，力量也比较小，江东的孙策，正致力于在江东发展势力，长江阻隔，对曹操威胁不大。

兖豫二州处在四战之地，从割据势力的形势分析看，曹操处在敌对势力四面包围之中。曹操想逐步扫荡这些割据势力，与他的谋士们分析形势，研究打法。

曹操问荀彧和郭嘉，"今欲讨不义，(我打算攻打袁绍)而力不敌，何如"？[21]荀彧主张先打吕布，他认为"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图"。[22]郭嘉也主张先打吕布。他说：

袁绍现正在北方围攻公孙瓒，可乘他远征，东取吕布。不先

取吕布，如果袁绍来侵犯，吕布出兵援助他，是大的祸患。[23]

曹操谈他内心的忧虑：

我所担忧的是又怕袁绍侵扰关中、西乱羌胡、南诱蜀汉（指益州刘璋荆州刘表），使我单独以兖豫两州抗御天下的六分之五的势力，如何是好？[24]

荀彧向他分析关中的情况，说：

关中的将帅上十个，谁也统一指挥不了，只有马腾、韩遂两人的势力最强大。他们看见关东在争夺，必定各自拥兵自保，现在如果抚以恩德，派人去与他们连和，即使相持不能长久，在平定山东局势以前，可以相安无事，关中的问题，如委派钟繇去处理，就可无用忧虑。[25]

从曹操与他的谋士们对北方形势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们已认识到是处于内线作战、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袁绍是主要的敌人，而吕布是凶恶的敌人。又担心袁绍勾结其他豪强，形成外线包围，合力并击。因之主张用政治手腕安抚、笼络关中的豪强马腾、韩遂，首先击败徐州的吕布，然后集中兵力与强大的敌人袁绍决战。因此我们可以归纳说：曹操所采取的统一北方的战略方针是"先弱后强，各个击破"。以后虽因形势的变化而变更了打击的次序，但这个方针的精神是贯穿和指导全局的。

根据战略方针，曹操策定了几项重要的策略：

1. 羁縻袁绍：派孔融为专使到邺城，以汉献帝名义任命袁绍为大将军，兼督青、冀、并、幽四州；

2. 安抚吕布：下达诏书任命吕布为左将军，并在信中加以慰勉，笼络他，使其疏于戒备；

3. 厚结陈登：陈登父子在徐州颇有声望，吕布派陈登为特使到许昌拜谢，曹操厚结陈登，任命他为广陵太守（郡治在今江苏扬州），命他秘密地纠合部队作为将来进攻吕布的内应；

4. 西抚关中：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二月，曹操采纳荀彧的建议，任命钟繇为司隶校尉，持节[26]督关中诸军。繇至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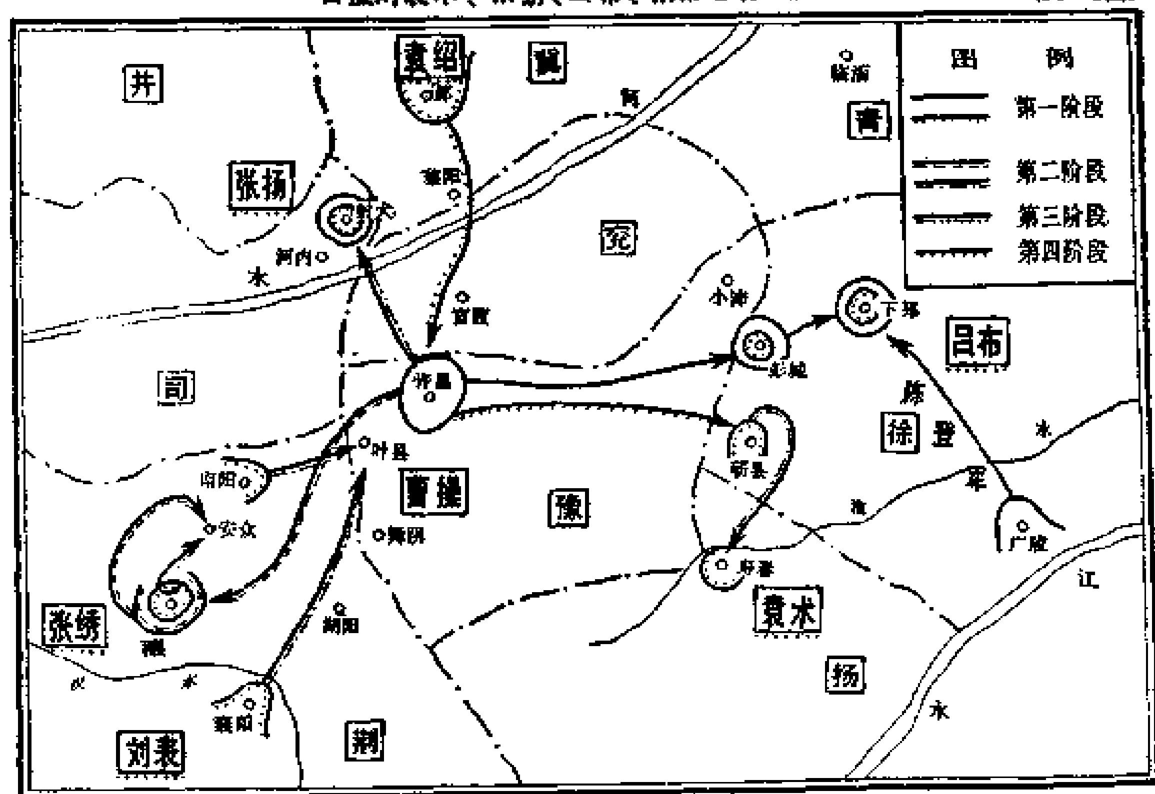
致书说服了马腾、韩遂，他们各派遣儿子入侍归附；

5. 东联孙策：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夏，曹操派遣议郎王浦下达诏书任命孙策为骑都尉、领会稽太守（郡治在今浙江绍兴），命他联合吕布和吴郡太守（郡治在今江苏苏州）陈瑀，于攻打袁术时配合行动；

6. 北抚渔阳：当袁绍击灭公孙瓒时，曹操下达诏书任命渔阳太守鲜于辅为建忠将军、督率幽州六郡，以迫使袁绍在幽州遭受困扰。

部署既定，于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曹操乘袁绍正在河北以全力围攻幽州的公孙瓒、无暇南顾的时机，开始各个击破的军事行动。（参看插图11-2）原定计划是要先打吕布的，适值此时，袁术在寿春称帝，这是反汉的表面化。曹操既“奉天子以令不臣”，攻打袁术就师出有名了。九月，曹操进攻袁术，迫使其向淮南逃走，其不久就病死了。在曹操进攻袁术时，张绣和刘表的联军曾数次进攻叶县（今河南叶县南），威胁许昌。因此，曹操又回师进攻张绣。第二年三月，在安众（今

曹操对袁术、张绣、吕布、张扬之战示意图 （11—2图）



河南镇平县东南）设伏击败张绣刘表的联军。同年十月，曹操东攻吕布，进占彭城，吕布退守下邳。曹操引水灌城，吕布投降，为曹操所杀。河内的张扬在曹操进攻吕布时，出兵野王（今河南沁阳），声援吕布，但不久张扬被他的部将杨丑所杀。接着，眭固又杀了杨丑，投靠袁绍。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四月，曹操派曹仁攻占射犬（今河南沁阳东北），杀了眭固，控制了河内郡。两年多的时间，曹操各个击败了袁术、张绣，消灭了吕布、眭固，改善了战略态势，逐步由弱转强，为全力对付袁绍创造了有利条件。

曹操在击败中原地区几个主要割据势力的战争中，是处于内线作战的态势。内线作战的基本指导原则，一般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力求速战速决，避免两面作战，遭到敌人的并力合击。曹操在击破袁术、张绣，消灭吕布、眭固的战争中，正确果敢地运用了这一指导原则，使策定的战略方针顺利实施。他针对不同的对手，采取安抚、拉拢、分化、麻痹的策略，运用也是很成功的。

（二）官渡之战中袁曹双方的作战方针和部署

为了从战略上展开论述这个问题，有必要先说明战前双方的形势、人力、物力的条件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就双方的形势来说：袁绍于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三月击灭了幽州的公孙瓒后，消除了后顾之忧。河北有山河之固，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战略形势是有利的；曹操在击败袁术、张绣、消灭吕布之后，扩大了占领地区，但兖豫两州是四战之地，仍未脱出内线作战的态势，要巩固比较困难。荆州的刘表和南阳的张绣对曹操仍有敌意，使他还有后顾之忧。

就人力物力的条件来说：袁绍的冀州本来是富足之地，号称“带甲十万，谷支十年”。[27]但由于连年对公孙瓒用兵，消耗很大，已经“百姓疲敝，仓库无积”。[28]曹操在所在郡县内实行屯田，经济条件有了相当的改善。但由于中原地区受兼并战争的摧残破坏，比起河北来仍然较差。

就军事力量来说：袁绍拥有军队数十万。部队装备有步兵用的大

铠万领，马铠三百具。但号令不一，内部不和。对公孙瓒连续作战三年，军队已相当疲乏；曹操的军队约三万余人，部队装备只有大铠二十领，马铠不到十具。不过，内部比较团结，纪律也较好。进攻袁术、吕布，连战皆捷，作战时间不过两年，部队休整时间较多，士气旺盛饱满。

袁绍的作战方针和战略部署：

早在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关东军起兵攻打董卓的时候，袁绍就曾对曹操说：

> 我要南面据守黄河，北面控制燕代，然后率领大河以北的将士，南向以争天下。[29]

第二年，袁绍占据了冀州，沮授就劝他东定青州，还击黑山黄巾军，北攻公孙瓒，然后拥四州之地，率百万之众，迎接汉献帝以号令天下。这样只要数年，就可以统一中国。[30]沮授劝他迎接汉献帝的意见，他未采纳。但其他的建议是正合他的心意的。所以在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六月，在消灭了公孙瓒后，他占有青、冀、并、幽四州之地，军队增至数十万人，势力更加壮大。他就企图南下进攻许昌，以实现他"南向以争天下"的野心。他召集他的将领和谋士们研究作战方案，在讨论时，意见分歧，展开了激烈争论。

田丰、沮授认为：

> 袁军连年作战，军队疲劳，百姓穷困，府库空虚……宜先发展生产，安定百姓，然后进军黎阳（今河南濬县东北），经营河南。一面添制舟船，修整兵器；一面派遣精骑，扰乱曹操的边境，使他不得安宁。我军以逸待劳，三年之内，胜算可操。[31]

郭图、审配不同意沮授的稳重方案，认为不是捕捉战机的好方略。他们认为：

> 以明公（指袁绍）的英明，统率黄河以北的精锐部队去攻打曹操易为反掌，何必那样过于稳重。今不及时攻取，后难图治。[32]

袁绍的另一谋士崔琰还反对以上两种意见，主张不打。他认为：

> 天子在许昌，深得百姓拥戴，不可攻也。[33]

袁绍最后采纳了郭图、审配的意见，策定了“立即进攻，集中兵力，直捣许昌”的作战方针，并作了以下的战略部署：

1．留三子袁尚镇守冀州，中子袁熙镇守幽州，甥高干镇守并州，青州别驾王修镇守青州，以安定后方；

2．命军师审配、行军司马逢纪主持后方留守、运输诸事，并按时征发粮草，以支援前方作战军；

3．挑选精兵十万，精骑万匹，另有胡骑八千，以加强战斗力量，编组为南征大军，由袁绍亲自统率指挥，向黎阳、许昌进攻；

4．调整军队编组，削弱不主张立即进攻的沮授的指挥权，分其军为三部分，由监军都督沮授、监军都督代行军司马郭图和监军将军淳于琼各统率一军；

5．前锋由将军颜良、文丑统率。兼大将军幕府长史、青州都督袁谭、步兵校尉高览、屯骑校尉张郃、越骑校尉韩荀和步兵校尉蒋奇，以及主簿陈琳、参谋许攸等皆随军从征；

6．组织联合战线，派人联络南阳的张绣、荆州的刘表，以为外援。

袁绍拥有四州之地，选拔精兵十万，骑万匹，南下攻打许昌，地广人众，态势有利。但官渡一战，他失败了。从军事上来评论，他败在那里呢？他先击灭了公孙瓒，巩固后方然后倾全力南向以争天下的战略意图是稳妥的。但当曹操在南方打袁术、张绣、吕布的时候，他把全部兵力投入围攻易京，未及时分兵南下袭击许昌，拖着曹操，使他得以集中兵力，顺利地完成了各个击破，脱出了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

在官渡之战中，沮授、田丰和郭图、审配的两种不同的作战方案，历来评论不一。有的认为袁绍未采纳沮授、田丰的稳重方案而采纳郭图、审配的速决方案，致有官渡之败，这是以成败论事。就当时双方的力量对比，袁强曹弱的情况来看，郭图、审配主张集中兵力，立即攻打许昌，打垮曹操的速决方案是可行的。但袁绍的战略部署是错误的。

就当时战地的交通情况而言，冀州、邺城至豫州、许昌之间，相距约

五百里。最近的道路如经过黎阳、白马、阳武、官渡以直达许昌之线。其左右可以由北向南的包围迂回道路，至少尚有两条：在官渡以西，可以取道修武，渡过孟津，直趋阳城，叶县，以进击许昌的背后；在官渡以东，可以取道兖州，沿济水至定陶，直趋睢阳、陈县、郾城，以袭击曹军的后方。因此，在战略部署上，袁绍拥有精兵十万，又处于外线作战的有利态势，如果分兵几路，从几个战略方向上实行分进合击，可能使曹操的劣势兵力，难以应付。而袁绍放弃了纵横辽阔的外线作战的大好条件，却把十万大军局限在一个战略方向上，只想下黎阳，夺白马，直捣许昌。这样，就使曹操得以集中他的有限兵力，在事先部置好的官渡阵地上与袁军决战，使袁军陷于被动。这是袁绍在战略上的失策。

曹操的谋议决策和部署：

曹操的一些文臣武将听说袁绍要攻打许昌，都心存恐惧。大名士孔融向荀彧发出悲观的论调，说：

> 袁绍地广兵强，田丰、许攸是谋士，为他出谋划策；审配、逢纪是忠臣，为他处理政务；颜良、文丑是勇将，为他统率军队，恐怕难以击败。[34]

曹操为安定军心，对他的将帅们作解释：

> 袁绍野心很大，才智浅薄；外面严厉，内心胆小；猜忌刻薄，缺少威信；军队虽多，指挥不明；将帅骄傲，政令不一；土地虽广，粮食虽丰，恰好是为我准备的。[35]

荀彧接着针对孔融的悲观论调，分析袁绍的内部情况，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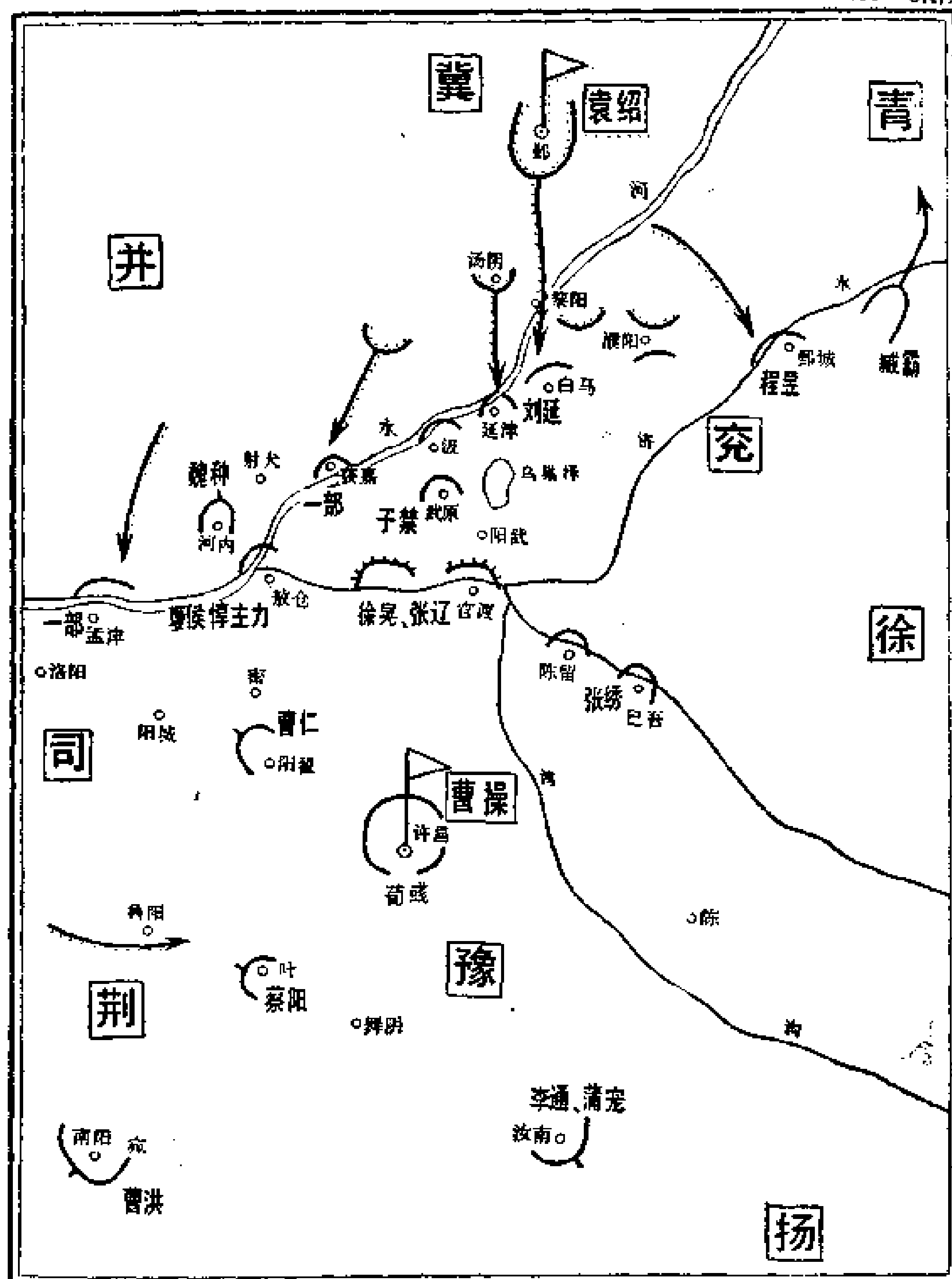
> 田丰刚强傲上，许攸贪鄙枉法，审配专横无谋，逢纪刚愎自用。这几人势不相容，必发生内哄。颜良、文丑是匹夫之勇，一战可擒。[36]

曹操根据以上的分析和判断，决心率精兵二万，抗击袁绍。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于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八月，进军黎阳，先后作了如下的防御部署：（参看插图11-3）

前线部署：

官渡之战中曹操防御部署要图

（11—3图）



——命河内太守魏种牵制袁绍从并州方面的进攻，保障左翼侧；

——命建武将军夏侯惇率部防守敖仓，派一部防守孟津（今河南孟县南），以掩护左侧安全；

——命平虏校尉于禁率领步骑两千驻守延津（今河南延津北），东郡太守（郡治在今山东朝城西）刘延，扼守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共同阻击南下的袁军；

——继续留东平相知兖州事程昱率兵七百人防守甄城，以保障右翼安全；

命琅琊相臧霸率精兵入青州，攻下齐（今山东临淄一带）、北海（今山东寿光一带）等地以牵制袁军；

——九月，曹操分兵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命裨将军徐晃、裨将军张辽率步骑万人布置防线，以阻挡袁军，自己回到许昌；十二月，曹操率关羽、乐进、许褚诸将及郭嘉、荀攸诸谋士移驻官渡，组织防御，指挥战斗。

二线配置：

——命厉锋校尉领广阳太守曹仁防守阳翟（今河南禹县），以掩护左侧背；

——命蔡阳率部驻守叶县，以防止汝南黄巾军刘辟、龚都等部；

——命扬武中郎将曹洪率部驻守宛县，以防御荆州刘表；

——命裨将军李通率部与汝南太守蒲宠驻守汝南，以备孙策；

——命侍中兼尚书令荀彧镇守许昌，知后方诸事；

——命司隶校尉兼督关中盐运使司钟繇督运关中粮草；十一月，加派卫凯到关中，统制盐政，招抚流民，进行屯垦；

——命督军校尉颍川太守夏侯渊督运粮草；

——命典农中郎将领长水校尉事任峻典造军器与粮运。

曹操当时实有兵力约三万余人，与袁绍的兵力十一万八千人相较，实居劣势。

这时，西、南方面割据势力的态度：

南阳的张绣：当袁绍派遣使者来联盟时，张绣因自己与曹操有

仇，犹疑不决。他的谋士贾诩力主投靠曹操，向他解说："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愿将军无疑。"[37]张绣听从贾诩的意见，投降曹操。曹操果然不计私仇，与他握手言欢，封他为扬武将军，命他率部驻守已吾、陈留，并娶他的女儿作儿媳，以厚结之。

荆州的刘表：当袁绍派遣使者向他求援时，刘表的谋士韩嵩、刘先都劝他投靠曹操。他们认为现在袁曹两雄相持，天下举足轻重在于将军。如果想有所做为，应乘时崛起以承他们的疲敝；如其不然，就应当有所选择以归顺之。岂可拥甲兵十万，坐观成败。求援而不能相助，见贤又不肯归顺，袁曹双方都必集怨于将军，恐怕就难以保持中立了。曹操善于用兵，贤俊之士多归依他，观其势力必定能击败袁绍。然后转移兵力以向江汉，恐怕将军不能抵御。今天的上策，莫若举荆州以归附曹操。[38]刘表认为"天下未知所定，"[39]依然保持中立（按：自讨伐董卓以来，刘表与袁绍即长期互相结盟）。曹操争取刘表保持中立，不出兵袭扰许昌的后方，使他陷于两面作战，对曹操说来，也算满足了。

凉州的韦端：当袁曹相争之际，凉州牧韦端派遣从事杨阜到东方观察形势。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一月，杨阜回到凉州，对诸将说："袁公宽而不断，好谋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能，必能济大事。"[40]凉州遂交纳贡赋，附从曹操。

关中的马腾、韩遂：亦骑墙观望，不愿卷入东方的斗争。

江东的孙策：于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四月举兵北击陈登时，在丹徒出猎中，被前吴郡太守许贡的宾客射杀，因重伤身死，使曹操消除了南方的顾虑。

综合上述情况，这就使曹操在西方、西南和南方均暂无后顾之忧，得以倾全力以抗击袁绍。乃抽调原驻扎在宛城的曹洪军和颍川的曹仁军，悉集结于官渡，严阵以待，相机击破袁军。

在官渡之战中，曹操的部署结合尔后的行动可以看出他根据敌强

我弱的具体情况，采取“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把决战地点选在官渡，为此而采取了一些部署是稳妥的。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也提到这次战争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取胜”的战略防御原则。曹操不在黄河南岸沿河设防，抗阻袁绍，而把主要阵地选在官渡，是有道理的。

从双方兵力和态势上看：袁绍兵多，曹操兵少。千里黄河，袁军处处可渡。曹操如果分兵把口，防不胜防。何况青州在黄河南岸，已为袁绍所据有，沿河设防，态势不利。

从曹操的作战方针来看：他采取的是决战防御。在削弱敌人后，寻求战机与袁军决战，而不是消极防御。如沿河设防，就限制了自己的机动。不如后退一步，主动选定于己有利、于敌不利的战场，集中兵力，待袁军师老兵疲后，与之决战。

从地形上看：官渡地处鸿沟上游，为汴水的起点。当时，鸿沟运河西连巩洛，东下淮泗，而官渡实为枢纽。荀彧给曹操的信上也认为扼守住官渡是“扼其喉而不得进”。可见官渡在东汉末年是许昌北面的门户，是一个重要的渡口，也是保卫许昌的屏障。

从后勤供应上看：退守官渡，靠近许昌，曹军的供应方便；反之，使袁军的补给线延长，供应不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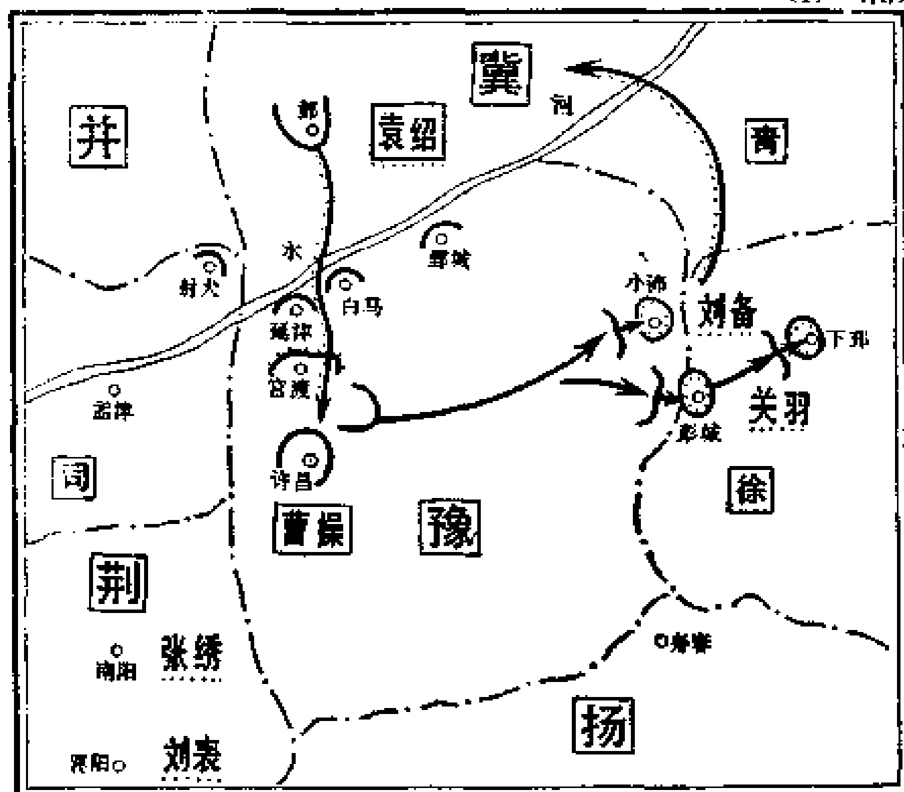
（三）官渡之战中曹操与袁绍的战役指导

在官渡之战中，曹操精明卓越的料敌决策和战役指导表现在东击刘备、坚持危局和夜袭乌巢三个重大情况的处理上，而袁绍料敌的粗疏，决策的迟疑和战役指导的劣拙，亦暴露于此三者，兹分别论述之。

东击刘备的决策和指导：（参看插图11-4）

汉献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十二月，当曹操正部署对袁绍作战的时候，原来依附曹操的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而自据徐、邳等地，与袁绍呼应，反对曹操，东海（郡治在今山东郯城）及附近郡、县亦多归附刘备，军队增至数万人。曹操面临这意外发生的情况，认为要避免两面作战，必须迅速击溃刘备，准备亲自出征。他的帐下诸

官渡决战前曹操击破刘备之战示意图　(11-4图)



将却不同意，说：

与公争夺天下的是袁绍，他正率兵南下，放弃袁绍不打而去东攻刘备。如果袁绍乘机袭击我后方，如何办？[41]

曹操解释：

刘备是人中豪杰，现在不击灭他，必为后患。[42]

谋士郭嘉赞同曹操的意见，他认为：

袁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刘备刚反叛，众心未附。迅速进击他，必定可以把他击败。[43]

曹操果断地定下决心，亲率精兵兼程东进，袭击刘备，迅速攻占彭城、下邳，迫降了关羽。刘备全军溃败，只身逃往河北，依附袁绍。

曹操这一决策非常正确。如果不迅速扑灭刘备的反叛势力，就会

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他果断地定下决心，乘袁军尚未南下的战机，亲自东征，奔袭刘备，打他一个措手不及，速战速决，回军官渡，表现了曹操的指挥才能。

反观袁绍当曹操东击刘备的时候，田丰向他建议：

曹操与刘备正交战，战事不可能迅速解决。公举军袭击他的后方，可以一战而取得胜利。[44]

袁绍却以他的儿子有病为借口，未采纳田丰的建议，按兵不动，失去了乘虚袭击曹操后方的机会。直到曹操回军官渡后，袁绍才考虑怎样攻打许昌。这时，田丰认为曹操既然已击破刘备。许昌不再空虚[45]，良机已经丧失了。

坚持危局的决策和指导：（参看插图11-5）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袁绍进军黎阳，派颜良围攻白马，以保障主力渡河。曹操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袭杀了颜良后，率军南撤。袁绍派文丑渡河追击，又被曹操设伏击杀。曹操回军官渡。

袁绍屯兵延津，派遣刘备自延津绕道趋汝南，协同汝南黄巾军刘辟、龚都等部击斩蔡阳于叶县（今河南临颍东），进至濦强，袭扰曹军的后方根据地许昌；另派越骑司马韩荀为别部，率千余骑兵绕道敖仓以西，进入嵩山之东，以切断曹军后方补给线，均被曹仁击败。

七月，袁绍继续进军阳武（今河南阳武），企图寻求曹军的主力决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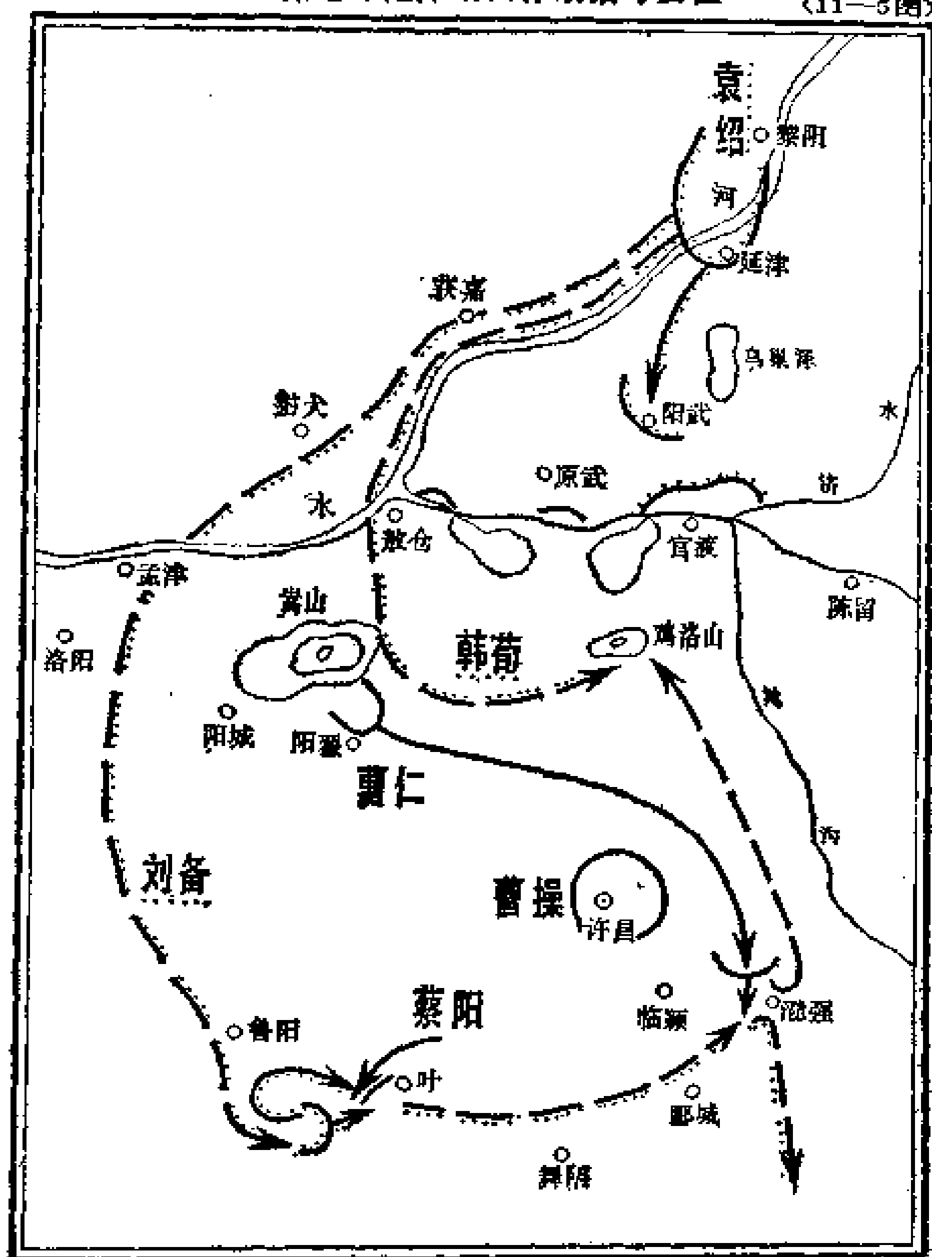
八月，袁军的主力逼近官渡，两军对峙，相持数月。校尉张郃向袁绍献策：

公虽然连获胜利，但最好不与曹操决战。应秘密派遣精锐骑兵，抄绝他的南方，曹军自会溃败。[46]

袁绍没有采纳。在这期间，曹军兵少粮缺，士卒疲乏；豫州各郡县受袁绍招降；官兵多有叛变，后方不稳定；许昌的官员和军中的将领，也有暗与袁绍通消息的；曹操的军粮道几次被袁军抄袭，情况危急。曹操写信给荀彧，打算放弃官渡，退守许昌。荀彧反对退兵，回

袁绍屯军延津期间作战指导要图

（11—5图）



信说：

袁绍倾全力会师官渡，企图与明公（指曹操）一决胜负。明公以弱对强，如不能争取主动，必被敌人控制。……现在粮食虽少，还比不上楚汉在荥阳、成皋相持的情况。那时，刘邦、项羽都不肯先撤退，就是因为谁先退兵，谁就会处于被动。明公以

十分之一的兵力，据守官渡，扼制袁军的咽喉，使其不能进展。已经半年，相持的局面很快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出奇制胜的时候，机不可失。[47]

曹操接荀彧回信，又与军师荀攸、参军贾诩等商议。贾诩说：

“公明胜绍，（明达胜过袁绍），勇胜绍，用人胜绍，决机胜绍，有此四胜而半年不定者，但顾万全故也（过于求万全之策）。必决其机，须臾可定也（只要能捕捉战机，当机立断，顷刻之间，可操胜算）。”[48]

曹操采纳他的建议，决心加强防守，坚持危局，寻求战机，击败袁军。

曹操的这一决策，非常关键。因为战局已到胜败转折关头，谁能坚持下去，谁就会有获胜的希望。如果放弃官渡，退守许昌，很可能造成“先退则势屈”的不利局面，一退即溃，给袁绍以捕捉而歼灭的机会。

袁绍在战役指导上，单纯地实施正面突破，未采取战役、战术上的迂回、包围、奇袭，调动曹军脱离既设阵地，以求决战。把十万大军摆在官渡，形成对阵顶牛。当绪战失利、屯兵延津时，虽曾派遣刘备袭扰曹操的后方，并另派越骑司马韩荀去切断曹军后方补给线，这在大军战略运用上，原属要着。可惜的是他派出的兵力单薄，各无应援部队，而皆在尝试，没有预定他们的进击目的。及至牵制不成功，粮道未切断，刘备败走，韩荀殉职，袁绍也就放弃此等企图，不再分兵远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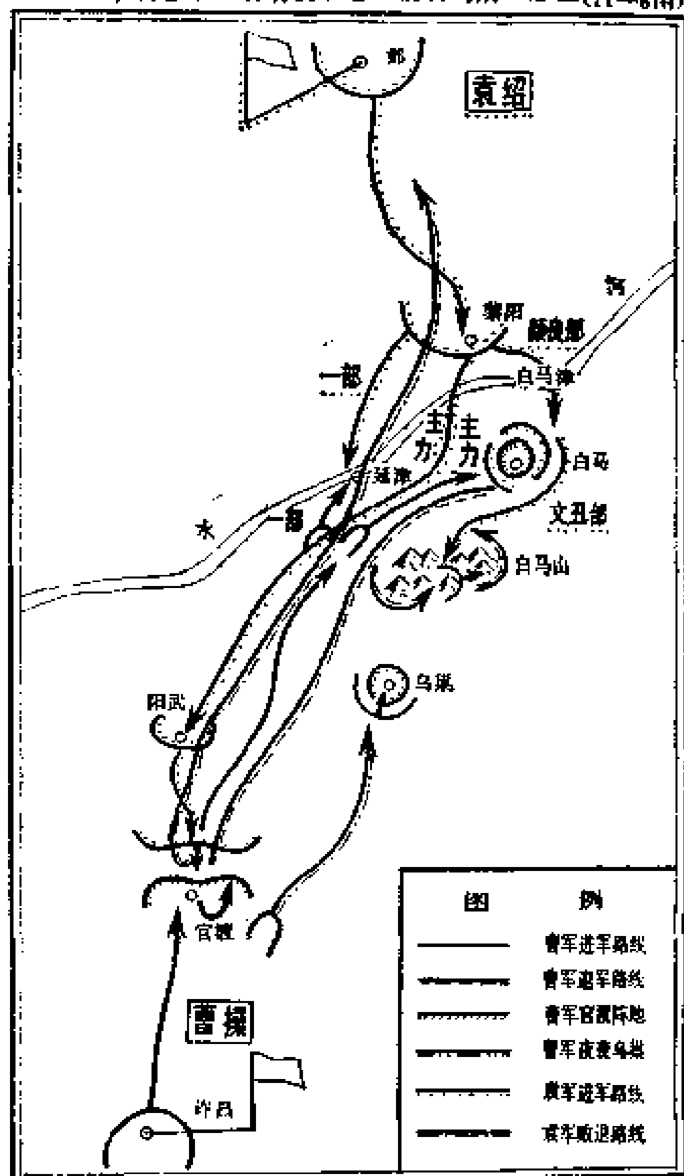
在官渡相持期间，许攸又曾向他提出袭击许昌的建议：

曹操兵少，而倾全力以抗拒我军，许昌留守兵力少，必然空虚。如果派遣轻骑夜行袭击，许昌可下。打下许昌，奉迎天子以攻打曹操，他势必被擒。即使不能打下许昌，也使他首尾奔命，一定可以击败他。[49]

许攸的建议是可行的，但袁绍未采纳，并固执地坚持“我要当先取操”[50]的决心，使良机坐失，结果陷入被动。

夜袭乌巢的决策和指导：（参看插图11-6）

袁曹官渡之战战役经过及夜袭乌巢示意图(11—6图)



十月，袁绍又派车运粮，并命淳于琼率兵万人担任掩护，屯积于袁军大营以北四十里的故市、乌巢。沮授建议：派蒋奇率军驻扎在粮库外侧以防曹操的抄袭，袁绍未采纳。不久，许攸的家属在邺城犯法，被审配扣押起来。许攸在一怒之下，投奔曹营，受到曹操的热情接待。

曹操抚掌笑说：

“子卿（许攸字子远，今呼为子卿，尊称之意）远来，吾事济矣。”

许攸问曹操：

"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粮食还有多少）？"

曹操说：

"尚可支一岁。"

许攸说：

"无是，更言之（没那么多，再说说）。"

曹操又说："可支半岁。"

许攸说：

"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为何不说实话）。"

曹操只好向许攸说实话：

"向言戏之耳（刚才是说笑话）。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许攸就向他献策：

明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食已尽，正处在危急的时候。袁绍的辎重万余辆，在故市乌巢，屯军防备不严。如果派轻兵去袭击，出其不意，烧毁他的积储，不过三日，袁绍必定失败。〔51〕

许攸提供的这个情报，正符合曹操寻求战机，出奇制胜的作战意图，他当机立断，决心夜袭乌巢，焚烧袁绍的粮草。他留曹洪、荀攸坚守大营，亲自率领精锐步骑兵五千人，使用袁军的旗号，利用夜晚悄悄地从小路去偷袭乌巢。半夜到达后，即围攻放火。淳于琼退入营垒坚守。曹操夜袭乌巢的消息传到袁绍，引起一场争论。袁绍企图急攻曹操的大营。他对他的儿子袁谭说：

即使曹操击破淳于琼，我夺取了他的大营，他必然没有归路。〔52〕

他派高览、张郃等去攻打大营，张郃主张先救乌巢。他说：

曹操亲自率领精兵去袭乌巢，必定击败淳于琼。淳于琼等失败，大事去矣，请先去救援他。〔53〕

郭图附和袁绍的意见，再三坚持攻打大营。他说：

攻打曹操的大营，势必迫使曹操引军回救。这样，不直接救乌巢，而乌巢之围自解。〔54〕

张郃一再申诉，说：

曹操的大营坚固，攻打必不能破；如果淳于琼被俘，我们全体亦都会做俘虏。[55]

袁绍最后决定还是用主力攻打大营，只派遣一部轻骑兵去救援乌巢。果然曹营坚固，攻打不下，当曹操急攻乌巢时，袁绍增援的轻骑兵逼近乌巢，曹操左右的人请求分兵阻援，曹操愤怒地说：

"贼在背后，乃白（敌人到达我背后，再来报告）。"[56]

他坚决果敢地指挥将士拼命冲杀，大破琼军，杀了淳于琼，并烧了袁军的全部粮草。

乌巢粮草被烧的消息传到前线，袁军军心动摇，内部分裂，郭图害怕袁绍追究他的责任，就向袁绍进谗言，说：

张郃对战败幸灾乐祸，出言不逊。[57]

张郃听到这消息，在气愤之下，与高览焚烧进攻器材，投降了曹操。曹军乘势出击，大败袁军。袁绍和他的儿子袁谭仓皇地带了八百骑兵退走河北。官渡之战就这样以曹胜袁败而告终。

在官渡相持阶段，粮食是双方斗争的焦点，取决胜败的关键。许攸献策袭乌巢，曹操果断地加以利用，亲自出马去指挥。《六韬》上说："善战的人，见利不失，遇时不疑"，这都显示出曹操善于捕捉战机和抓关键。当曹操攻打乌巢时，袁绍的援军逼近，曹操拒绝分兵阻援，倾全力猛攻乌巢，这一决策也显示了指挥的坚定。作为一个将帅来说，在关键时刻，应有这样的英勇果决。因为那时成败取决于顷刻之间，只有抱破釜沉舟的决心，抓紧袁军还未会合的时间，全力拼杀，迅速打下乌巢，才能主宰战场，有胜利的希望。如果分兵阻援，兵力分散，乌巢势必难以迅速攻下，时机一错过，拖到天明，曹军的处境就不堪设想了。

曹操夜袭乌巢时，袁绍不以主力救援乌巢，而坚持攻打曹操的大营，这一决策是不当的。因袁军攻打大营已数月，没有攻下，这证明不是一夜之间所能打下的，使用主力续攻，势难立即奏效；用一部分轻骑去救援乌巢，也没有击败曹军的把握，这样使用兵力，两头都不

解决问题。而乌巢的粮草被烧，曹军大营又打不下来，袁军的处境就危险了。郭图认为“攻打曹操的大营，势必迫使曹操引兵回救”，这可以说是不知兵要。袁绍如果以主力速救乌巢，即使不能在乌巢大败曹军，至少可望保存粮食，再坚持下去，这样，曹操由于缺粮，而其处境就更为危险了。纵使曹操烧掉乌巢的粮草，袁军以主力邀击曹操的五千步骑于归途之中，有可能将曹操击败，亦比攻打曹操的大营为有利，袁绍对于这一关系全局胜败的情况不深思熟虑，不采纳张郃的建议，而贸然决策以主力攻打大营是非常错误的。这就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评袁绍“矜愎自高，短于从善”。这八个字评得非常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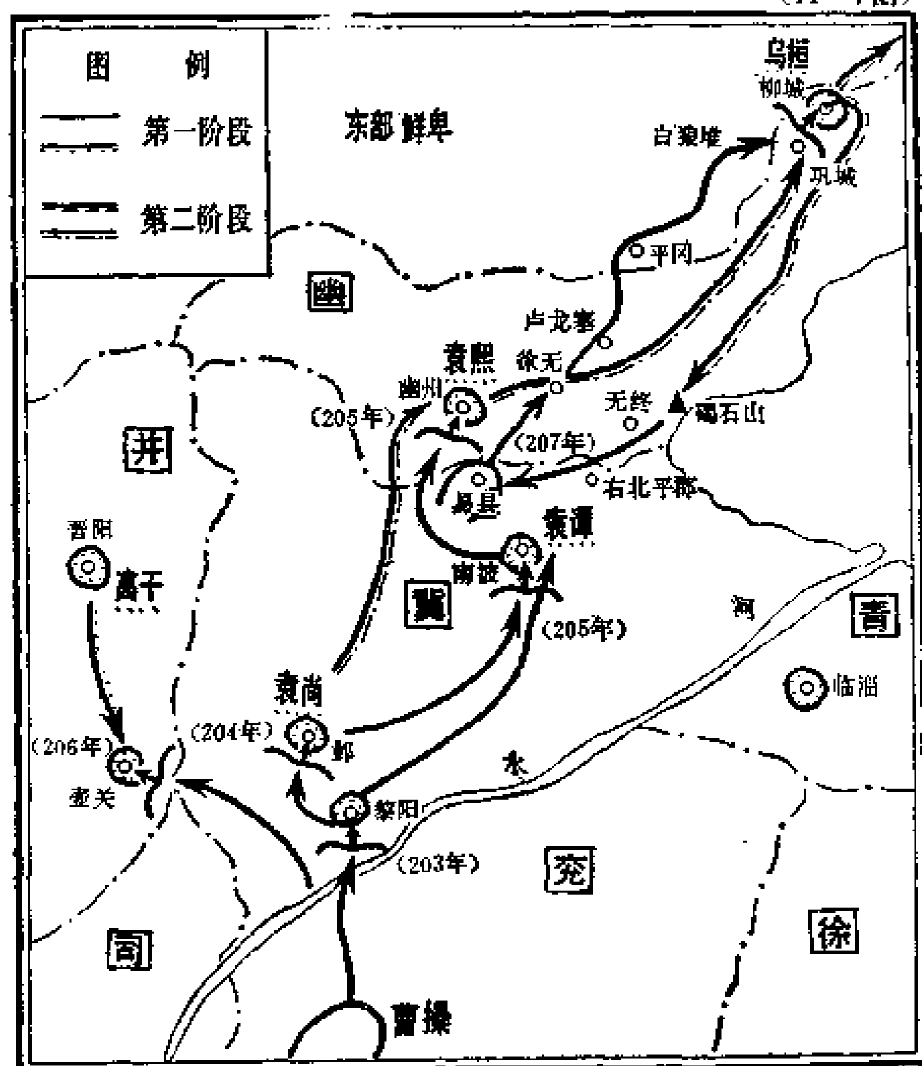
袁绍军队的素质也很有问题，实远不及曹操的军队顽强果敢。攻打一个公孙瓒，用了几年的时间；十万精兵被曹操的二万人扼阻在官渡阵地数月，一筹莫展；淳于琼率一万人坚守乌巢营垒，一夜之间被曹操的五千步骑兵突破。袁军的统帅指挥无方，部队的素质又如此劣弱，焉得不败。官渡之战，曹操是以少胜众，以弱胜强。

三、巩固胜利、安定北方的政策和措施

官渡之战后，曹操统一北方的大局已经奠定了，袁氏在河北只剩下残余势力。曹操采用了郭嘉“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的建议，听任袁绍的诸子自相残杀，然后各个击灭。六年之间（公元201年至公元206年），进行了攻打黎阳、邺城、南皮、幽州、壶关五个小战役，于汉献帝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完全占领了青、冀、并、幽四州。第二年，又率大军出卢龙塞（今河北西峰口），在白狼山（即布祜图山在今辽宁凌源县东）打败乌桓。这样，北方地区除辽东与关陇以外，就全部统一于曹操统治之下了。（参看插图11-7）曹操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军事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如何在战后采取一些安邦定国的军政措施来巩固已得的胜利，是曹操必须善为处理的战略性的大问题。曹操把混乱多年的北方统一了，从此北方局势安定下来，未再出现乱子。曹操在这方面所推行的一些安定社会秩序的政策，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新兴的统治者的雄才伟略，确是值得加以分别论述的。

曹操肃清袁氏在北方残余势力及北征乌桓示意图

（11—7图）



（一）曹操在占领冀州之后，于汉献帝建安九年（公元204年），颁布«免河北租赋令»，首先宣布免除河北地区百姓当年的赋税。然后又发布«收田租令»[53]，这一减轻人民赋税负担的政策，是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也有利于新占领地区统治秩序的稳定的。

（二）他选拔和起用青、冀、并、幽四州的一些名士如牵招、崔琰、陈琳、仲长统、常林、杨俊、王象、荀纬和王凌等人，出任官吏；又任用袁氏的一些部将焦触、张南等，体现了曹操兼收并蓄的用人政策，这就使得北方的人士归心。

（三）为迅速安定新占领地区的社会秩序，曹操注意选派一批

"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的干员如杜畿、梁习[59]去担任郡守。两人在河东、并州平定叛乱，安定社会的智勇和治理地方的政绩，都显出曹操的知人善任。

（四）对仍怀敌意的袁氏在北方的残余势力，采用惩抚兼施的政策，翦除了一些"拥兵拒守"的袁氏门生、宾客。征发他们的部曲去服兵役，剥夺了他们的武装力量，再把他们逐步异地安居，同时下令：过去跟随袁氏作过坏事的人，准他们改恶从善。这就有利于在政治上孤立和打击那些抗不从命的豪强地主。

（五）重视整兴文教，整齐风俗。汉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他颁发《修学令》，命令各郡国都要整兴文教，一县满五百户的，设置校官，选拔乡中的英才而加以教育。汉献帝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他又颁布《整齐风俗令》。指责结党营私是古代圣贤都所痛恨的。曹操所施行的这些措施，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地位。

（六）加强军队建设，重视以法治军，贯彻赏罚严明的原则。献帝建安八年（公元208年），他颁布《论吏士行能令》和《败军令》。[60]还颁布了一些官兵必须共同遵守的条令，如规定军队不得砍伐民间的桑树，行军时不践踏田间的禾麦，要严格执行，违令者斩首，加强了军队的纪律，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也有利于争取老百姓的支持。这对他战胜中原的割据势力，完成北方的统一，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操统一北方，是符合当时黄河流域广大人民要求结束长期混战的迫切愿望的。对乌桓用兵的胜利，使北方边境的农业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北方人民的和平安定生活有了保障，也是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的，对历史的发展起了好的作用。宋代最保守的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曹操"有大功于天下"。纵观曹操在整个统一北方战争中的料敌决策和作战指导，处处突出地表现在力争主动，指挥灵活；面临危局，指挥坚定；善于捕捉战机；善于抓关键；还善于听取部属的意见，集中群众的智慧；对正确可行的建议，马上采纳，立即执行，全力以赴。郭嘉评论曹操："得策辄行，应变无穷"。曹操后来的主要对手诸葛亮说：

“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孙权也说：“至于御将，自古少有，比之于操，万不及也。”

可见曹操在三国时代是公认的一位虚怀善断、富有统帅才略的军事家。

曹操在官渡之战中，缴获了一批文书，其中有的是许昌和军中的人暗中与袁绍相通的书信。有人建议加以追究。曹操说：

面对袁绍的强大，我都不能自保，何况众人。

他不加追究，下令将这些书信全部焚毁，以释有关人员的疑惧。这亦同于汉光武安反侧的举措，足见曹操也是一个颇有气度和远见的政治家。

陈寿在《三国志》中评论曹操：

太祖（指曹操）运筹演谋，用兵海内。采用申不害、商鞅的法术，运用韩信、白起的奇策，按能授官，因材使用，克制感情，不念旧恶，终能掌握国家大权，完成宏伟事业。说明他明察善断，谋略出众，真可称之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

晋代王沈在《魏书》中也评论：

太祖行军用师，大体依据孙武、吴起的兵法。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策略，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这些评论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曹操称得上如鲁迅所说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

第二　孙策开拓江东之战

——孙策独霸江东，北与曹操分庭抗礼——

一、江东的割据形势

当曹操在兖州、袁绍在冀州消灭割据势力、扩充地盘时，江东扬州地区内的割据形势是：（参看插图11-8）

——扬州刺史刘繇割据曲阿（今江苏丹阳），派遣他的部将樊能、于糜、张英等扼守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当利口（今安徽和县东南

孙策渡江前江东扬州地区郡守割据形势略图

大江中的浦渡口），以抗拒袁术派遣的督军中郎将吴景；

——彭城相薛礼据守秣陵（今江苏江宁东南），下邳相笮融据守秣陵东南。两人都依附于刘繇；

——吴郡太守许贡割据吴郡（今江苏吴县）；

——会稽太守王朗割据会稽（今浙江绍兴）及其附近地区；

——庐江太守刘勋割据皖城（今安徽潜山）；

——豫章太守诸葛玄（以后为朱皓、华歆）据守豫章（今江西南昌）。

二、孙策的战略决策

孙策的父亲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黄巾大起义之后，孙坚率“乡里少年”和招募的丁壮一千多人，随同右中郎将朱儁镇压起义军。由于作战有功，被提升为别部司马。后来他又随同车骑将军张温到凉州，进攻地方势力边章、韩遂，回京后，拜为议郎。汉献帝中平四年（公元187年），孙坚被朝廷委任为长沙太守。他先后镇压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农民起义，被封为乌桓侯。关东诸

军讨伐董卓时，孙坚也起兵北上，一路上诛锄异己，力量逐渐强大。他到鲁阳（今河南鲁山）会见袁术。袁术表他为破虏将军、豫州刺史。他在同董卓军作战时，曾杀死董卓的大将华雄。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袁术同刘表争夺荆州时，孙坚为先锋，连败刘表的大将黄祖。在进围襄阳时，被黄祖的士兵暗箭射死。

当时，孙策在寿春(今安徽寿县)，年十七岁，英年有为，好结纳豪俊。因其父孙坚奉袁术之命进击刘表时，被刘表的部将黄祖的士兵暗箭射死，他常怀复仇之志。汉献帝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十二月，他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求教于江淮名士张紘，咨询以当时的世务。他问张紘：

> "方今汉祚中微（汉朝统治中衰），天下扰攘……先君与袁氏（指袁术）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卒为黄祖所害。策虽暗稚（愚昧幼稚），窃有微志，欲从袁扬州（袁术）求先君余兵，就舅氏（指吴景）于丹杨(郡治在今江苏江宁)，收合流散（收集散兵流勇），东据吴会(今江苏吴县)，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61]

张紘向他陈述对时局的意见：

> "今君绍（继承）先侯（指孙坚）之轨(遗业)，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杨可一(可以平定)，仇敌可报。据长江，奋(奋扬)威德，诛除群秽(群丑)，匡辅汉室，功业侔（比侔）于桓(齐桓公)、文(晋文公)，岂徒（岂只是做）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乱多难，若功成事立，当与同好俱南济也（应当纠合志同道合之士南渡江东，图谋发展）。"[62]

孙策接受张紘的意见，定下图取江东的决策。汉献帝兴平三年(公元195年)，孙坚的旧部朱治见袁术政德不立，亦劝孙策图取江东，开创基业。时值吴景进击樊能、张英，一年多未攻克，孙策遂再向袁术献策：

> "家有旧恩在东，愿助舅讨横江；横江拔，因投本土招募，可得三万兵，以佐明使君（指袁术）匡济汉室。"[63]

袁术喜欢他去帮助吴景进击刘繇，遂任命他为折冲校尉，率兵渡江。

孙策一面统率其父的旧部程普、黄盖、韩当、朱治、吕范等及士兵千余人、骑兵数十匹东进，在寿春的宾客愿随从渡江的还有蒋钦、周泰、陈武等数百人；一面驰书告知周瑜。周瑜率兵迎接并助以资粮。他到历阳（今江苏和县）时，收容部众已五六千人，遂南渡长江，展开他平定江东的雄图壮业。在前后仅四年的时间内，他削平江东的割据势力，开拓丹阳、吴郡、会稽、豫章、庐江、庐陵六郡（今江苏、安徽、江西大部、浙江北部地区），独霸江东，创建基业。其开国时间的迅速，远胜于曹操、刘备。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探索他能够开拓江东的关键性的一着棋，是他渡江以前的战略决策。这一决策展示他"乱世务边"的卓见远识，勇决果断。

东汉末年的扬州拥有丹阳、吴郡、会稽、豫章、庐江、庐陵、鄱阳、临川、新都、临海、建安十一郡，辖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区。而当时的兵要、富庶之区，则为前五郡。滨海带江，阻山倚湖，形势便利，资源富饶，是江东的鱼米之乡。黄巾起义动摇东汉王朝的统治后，中原地区展开州牧割据势力的长期互相兼并混战，弄得田园荒芜，人民离散，而江东的扬州地区，破坏较小。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虽比中原地区落后，但社会比较安定；又因江南鱼米之乡，自然条件较好。中原混乱期间，大量的北方人民为逃避战祸，渡江南迁，带来北方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而当时据守江东扬州的一些郡太守，都同徐州的陶谦、荆州的刘表一样，是一些只图保境苟安、无四方之志的庸碌之才。如豫章太守华歆，"久在江表，时思北归"[64]曲阿的刘繇、会稽的王朗，亦正如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上所评论的那样："各据州郡，论安言治，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割据寿春的袁术，虽处近水楼台之地，亦无图霸江东的大志，却在淮南醺醺地做"称帝"的黄粱美梦。这都说明当时江东的河山大好，而人事不臧，正是具有雄图大志的时代风流人物的骋驰用武之地。张紘劝孙策纠合志同道合之士渡

江开创基业、图谋发展的建议是明智而可行的。而孙策决心渡江开拓江东根据地，以创建齐桓、晋文的事业的战略决策也是非常英明的。他渡江以后，仅用四年的时间，就荡平江东的割据势力，又在于他的政策措施，深得人心；战役指导，非常正确。

三、政策措施方面

（一）收揽人心：孙策渡江进击曲阿的刘繇时，江东的百姓闻听孙郎至，皆失魂魄。孙军所过之处，长吏及人民委弃城邑和家园，逃避于深山茂草之中。孙策进入曲阿后，号令军中不得掳掠，鸡犬菜茹，一无所犯。于是百姓喜悦，争持牛酒劳军。孙策的军队纪律严明，毫不扰民，争取了民心的归附。

（二）整饬纪律：孙策在曲阿，因兵众骤增，良莠不齐，部队的纪律不严。吕范向孙策建议：

> "今将军事业日大，士众日盛，范在远（远处），闻纲纪犹有不整者，范愿暂领都督，佐（辅佐）将军部分之（整顿）。"[65]

孙策初先认为士大夫应该立功于战场，岂应去处理军中细务。吕范给他解释后，他才同意他的意见，传令军中委任吕范整顿军中纪律。于是军中肃然，威禁大行，这就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攻战必克。

（三）广纳人才：孙策"性情阔达，善于用人，关心士民，见者莫不尽心，乐为致死"。[66]他信任他父亲的旧部程普、黄盖、朱治、吕范等，倚为创业的骨干。他与周瑜推诚相接，亲如手足。他委任广陵张纮为正议校尉、彭城张昭为长史，常令一人留守后方，一人随从征讨。广陵秦松、陈端等亦罗致帐下，参与谋划。孙策待张昭以师友之礼，把他比作管仲，文武之事都委他去处理。张昭的才干何足以比侔管仲，而孙策推诚信任他，可见孙策的胸怀阔达，善于用人之长。

（四）结好曹操：孙策渡江开拓江东的次年（公元196年），拓地日广，势力壮大，羽毛丰满，遂想脱离袁术而独立。他听说袁术在寿春阴谋称帝，遂借此与他断绝关系。汉献帝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正月，袁术称帝后，派遣使者到阳陵（今安徽太平西北），联络丹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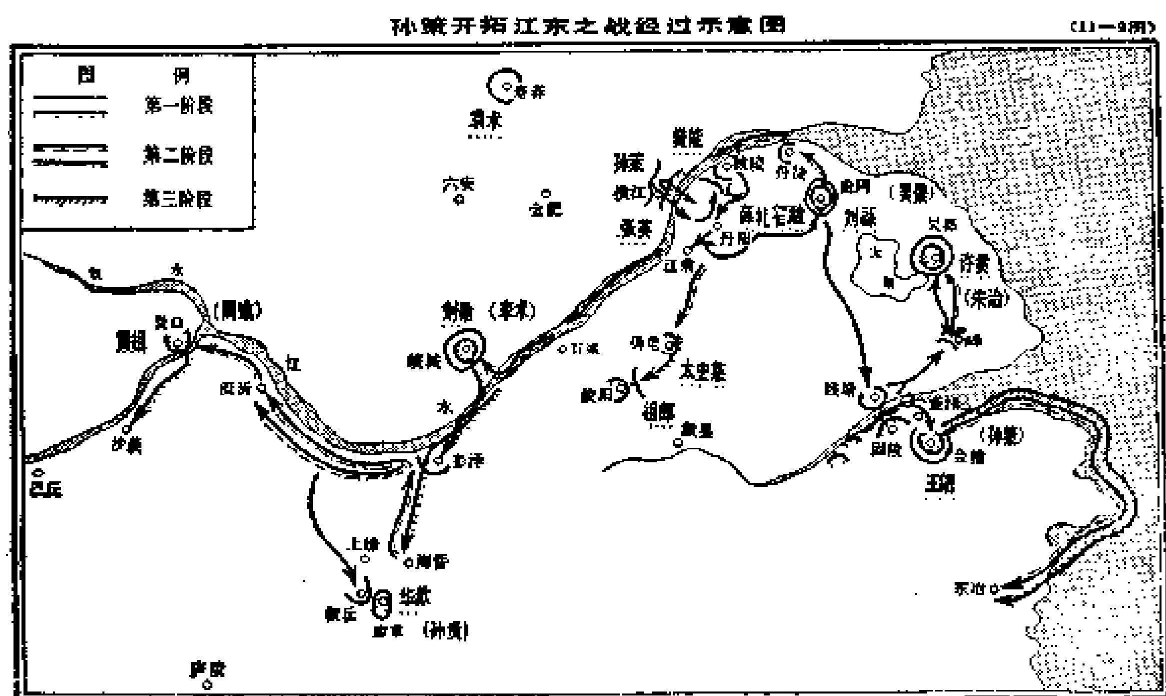
（今安徽当涂东丹阳镇）宗帅祖郎，要他策动山越族人，共图孙策。孙策就采取北结曹操以抗袁术的政策，与曹操结好，曹操表封他为骑都尉，袭乌程侯、领会稽太守。

（五）善纳降将：孙策善于安抚降将降卒，使他的势力迅速发展壮大。当他击破刘繇后，即在各县张贴文告，晓谕刘繇、笮融等故乡的部曲前来投诚的，一概不加追究；愿从军的，接纳，并免除他们的门户赋税。因此，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破会稽后，录用王朗的故吏虞翻为功曹，待以交友之礼。开拓豫章时，俘获刘繇的骁将太史慈，孙策不念旧恶，[67]即任命他为门下都督。这都可见孙策有容人的雅度与豁达而富有韬略的襟怀，争取敌对势力的归附。

四、战役指导方面

孙策用兵"猛锐神速，所向皆破，莫敢当其锋"。[68]他领兵渡江时，虽然年仅二十一岁，确具有大将的素质。在江东作战中，显示了他卓越的战役指导。（参看插图11-9）

孙策开拓江东之战经过示意图　（11—9图）



他率部由历阳渡江，迅速击破樊能、张英诸部，乘胜进攻秣陵，大破笮融、薛礼的部队，然后转而攻取丹阳（今安徽当涂东丹阳镇）、江乘（今江苏句容北）等地，进击刘繇于曲阿。刘繇败走丹徒（今江苏镇江），继又西走豫章。

进击吴郡许贡时：他不由曲阿直取吴郡，而是先夺取钱塘（今浙江杭州附近），使吴郡许贡不能与会稽王朗构成联盟，以相抗拒，然后转移兵力北上，一举击灭许贡，攻占吴郡。

攻打会稽王朗时：他率军急渡钱塘江，与王朗的部队相持于固陵（今浙江萧山西廿里）。王朗"负阻城守，难可卒拔"。[69]孙静建议从固陵南面的查渎（今浙江萧山东南）绕道袭取王朗的后方。孙策认为这是一个"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好方案，立即采纳。他命令，夜间在固陵正面多燃火种，以为疑兵，而分兵疾趋查渎道，袭击高迁屯（今浙江萧山西），大破王朗军，乘胜穷追猛打，直到东冶（今浙江临海东南），俘虏王朗。

西击刘勋、黄祖时：他探知刘勋将远离皖城去袭取上缭（今江西德安东），遂设计先袭击刘勋。他派遣使者卑辞厚礼，致书刘勋，加以鼓励，说：

> 上缭宗民几次侵扰我郡邑，想进击之而道路遥远。上缭很富实，望你去讨伐，我愿出兵以为外援。[70]

刘勋接信后很高兴，不听谋士刘晔的劝谏，亲自率军潜入彭泽（今江西湖口），远袭上缭。孙策探知刘勋已离皖城，即扬言引兵西击黄祖，溯江而上。到达石城（今安徽贵池西）时，派遣从兄孙贲、孙辅率领八千人进据彭泽，阻止刘勋回师，亲自与周瑜率兵二万人袭取皖城，俘获刘勋妻子及部曲三万人。刘勋闻讯率军回救，行至彭泽，遭到孙军的邀击，败走流沂（今湖北鄂城）。黄祖派遣其子黄射率水师五千增援刘勋，被孙策击破，乘胜追击黄祖于夏口（今湖北汉阳），迫使他退守沙羡（今湖北嘉鱼北）。孙策采用此种"调虎离山"、"攻城阻援"，以破刘勋的战役指导是正确的。

取豫章郡时：他先派遣太史慈去侦察豫章情况，察知豫章太守华

歆只求保全自己，毫无战备，不堪一击，他亲率大军进逼椒丘（今江西建兴北），再派虞翻去劝说华歆，晓以利害。孙策兵临城下，华歆果然开城请降。这种"先声后实"的战役指导，不费一兵一卒的攻战之劳而取得豫章郡。

以上战绩都显示孙策在用兵上的卓越才能，是一个英年有胆略的将帅。他以狂风扫败叶的声势，击灭割据势力，独霸江东，决非因缘时会，来自"天幸"。其弟孙权继承他的基业，发展壮大，进而能与统一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礼，耀武扬威于赤壁，也与孙策有关。

第三　赤 壁 之 战

——孙刘联盟破曹，奠定三国鼎立基石——

曹操统一北方后，企图一举兼并荆州和江南，统一中国，同割据江东的孙权和崛起荆襄的刘备在荆州的江陵（今湖北江陵）和夏口（今湖北汉口）之间的赤壁进行了一次战争。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赤壁之战。这是奠定魏、吴、蜀三国鼎立基石的一场关键性的战争，也是一局三角斗争，两弱联盟，共抗一强，以兵多将广的曹操败退北方而告结束。

曹操为何会兵败于赤壁？为了探讨这些问题，有必要先论述赤壁之战以前，孙、刘、曹三家的基本形势和战略意图，以及曹操夺占荆州后孙、刘联盟抗曹的料敌和决策。

一、孙、刘、曹三家的基本形势和战略意图

（一）孙权继承父兄遗业，据有江东

当曹操正在北方扫荡群雄、开创统一中原局面的时际，孙权继承他的父兄孙坚、孙策的遗业，担负起巩固江东的重担。他占有扬州的吴郡（今江苏吴县）、会稽（今浙江绍兴）、丹阳（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庐江以西）、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江西吉安）等六郡。这些地区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比中原地区落后，但土地兼并和阶级矛盾却不如中原地区严重，社会比较安定。又因自然条件较好，中原混

战时期，大量的北方人民南迁，带来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了江南农业的发展，东吴的国力也就逐步有所增强。

孙权注意“延揽俊秀，聘求名士”。他一方面注意团结跟随他的父兄征战多年的宿将如程普、黄盖、甘宁等，并特别推心置腹地信任周瑜，视为兄长；一方面注意取得以张昭、鲁肃为代表的北方流亡士族的支持和以顾雍、陆逊为首的吴郡士族的拥护。东吴政权的统治基础基本巩固。孙权集团的战略意图，从孙策的遗言和谋士们的谋议中可以探索。

早在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春天，孙策遇刺身死之前曾对张昭说：

> “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辅佐）吾弟。”[71]

他又告诫孙权要“选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72]同年冬天，鲁肃向孙权提出先保江东，进图荆州的建议：

> “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察天下之衅。规模（形势）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73]

当时孙权只想保有江东，没有重视鲁肃的意见。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孙权的统治日趋巩固，甘宁又向孙权献策：

> “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诚国之西势也（西防要地）。宁观刘表，虑既不远，（既无远略），儿子又劣，非能承业传基者也。至尊（指孙权）当早图之，不可后操（不可后于曹操）。图之之计，宜先取黄祖。……破祖军，鼓行而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矣（可以逐步进图巴蜀）。”[74]

孙权采纳了他的意见，即派他去西击黄祖，占领了夏口，准备相机夺取荆州。从孙策的遗命和鲁肃、甘宁的建议，可以看出孙权的战略意图是“保江东，观成败，相机夺取荆州，据有长江中流，进图王霸之业”。

（二）刘备寄寓荆州新野，准备摘桃创业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县）人，是西汉宗室的衰微后代。他幼年时代以织席贩鞋为生。十五岁时，曾同公孙瓒一起，向同郡名士卢植学儒家经典。但他“不甚乐读书”，而好结交“豪侠”。与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关羽，和同郡人张飞相友善。在镇压黄巾和州牧混战中，他树立名声，聚集了一批势力。刘备是一个有政治抱负、不甘寄人篱下的人物，但他没有固定的地盘，辗转依附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官渡之战时，他南逃荆州，投靠刘表。外貌文雅、心多疑忌的刘表，对他表面上欢迎，但内心有顾忌。先命他屯兵新野，后又移驻樊城，目的都是利用他作为北拒曹操的前哨。不过，刘表当时采取保境安民的政策，在中原地区军阀混战时期，他保持中立，坐观成败，对外很少用兵，所以荆州地区比较安定。中原地区的许多士族知识分子也到荆州躲避战祸。刘备在新野喘息之际，正值曹操用兵幽并，北征乌桓。他就乘此时机，广招人才，组建军队，积蓄力量，待机发展势力。“荆楚群士”如马良、马谡、伊籍、陈震、霍峻、向朗等，看到刘表“非霸王之才……其败无日”，[75]也都先后归附刘备。当时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亦是在这时接受刘备的迎请，进入他的幕府。

诸葛亮在中原州牧混战时期，到荆州躲避战祸，居住在襄阳城西的隆中，躬耕垄亩，自比管、乐。他在隆中十年，与中原地区躲避战祸到荆州的知识分子交往，扩大了他的政治视野和见解。他对当时中原、江东、荆州和益州的形势，通过调查研究有深刻的了解，形成了他的政治见解和经营天下的宏规伟略。正在此时，因庞德公、徐庶的推荐，刘备“三顾茅庐”，来登门向他求教。

诸葛亮感念刘备三次拜访，态度谦逊，于是把天下的形势向他作了一番精辟的分析，说：

> 自从董卓作乱以来，豪杰并起，割据一方，不可胜数。曹操同袁绍相比，名望低微，势力亦弱。但他能击败袁绍，由弱变强，这不是由于形势对他有利，而是由于他自己的势力。现在曹

操已拥兵百万，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实在不可与他争锋。孙权割据江东，已历三代。江东地势险要，百姓归附，有才能的人为他效命．可以与他联盟．作为外援，而不可去图谋他。荆州北面依托汉水，沔水，南面直达南海郡，东西连接吴郡、会稽郡，西面通往巴郡、蜀郡，是一个用武之地。而荆州牧刘表没有能力守住它。这是将军的一个好机会，将军是否有略取的打算？益州地势险要，沃野千里，号称天府之国。汉高祖就是凭借它完成了帝王之业。但州牧刘璋昏庸无能，张鲁又在北方威胁他。他虽拥有众多的百姓和富饶的资源，却不知道如何去治理，使百姓都安居乐业。益州有智谋和才能的人都希望得到一个贤明的君主去领导他们。……

接着，诸葛亮向刘备提出完成霸业、复兴汉室的战略意图，说：

将军是汉室的后代，信义著于四海，延揽英雄，思贤如渴。如果你能跨有荆、益二州，据险固守，与西边的诸戎保持和好，对南边的夷越，采取安抚政策，对外结好孙权，对内修明政治，天下有变化，就命一位得力的将帅率领荆州的军队进攻宛城、洛阳，将军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攻打秦川（今陕西南县），那时，百姓谁能不箪食壶浆来欢迎您呢？如果能够这样，将军的统一事业，可以成功，汉室也就可以复兴了。[76]

诸葛亮在隆中向刘备阐述东汉末年天下形势和立国大计的一番谈话，在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儒林学者中间，广为传颂。这寥寥数十句话，显示了诸葛亮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也是他深入了解和研究当时社会实际和政治斗争形势所作出的精辟的情况判断。他在《隆中对》中，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和人事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向刘备纲领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统一全国的战略、策略、步骤和做法。这个《隆中对》的基本精神在于首先夺取荆益二州为根据地，然后安抚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对内修明政治，巩固政权，对外则与孙权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曹操，等待时机成熟，就两路出兵平定中原。这是一个稳健而进取的战略。刘备不仅用它来指导赤壁之

战，也用它作为建国图王霸业的总方针。

刘备非常赞同诸葛亮的战略，邀请他出山相助。诸葛亮感激知遇，也愿效驱驰。他一到刘备军中，就采取清查无籍游户的办法，在短期内把军队由数千人扩大到数万人，由宿将关羽、张飞、赵云等统率，编成一支基本力量。刘备得到诸葛亮的辅助，扩编部队，羽毛逐渐丰满，崛起荆襄，独树一帜，"鱼水君臣"的契合，对他以后势力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刘备政治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唐代诗人杜甫写了"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的诗篇来赞颂诸葛亮未出茅庐预知天下三分的远见卓识。诗人李白也写下"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的诗句来颂扬这个风流人物辅佐刘备联孙破曹、占有荆州、进取益州、建立蜀汉政权、企图复兴汉室的宏图壮志。这些歌颂之词并不过誉。

（三）曹操意图兼并江南，完成统一

曹操统一北方后，除据有兖豫二州和司州的一部外，又占领了青、冀、幽、并四州，形成了独霸中原的局面，因而也滋长了立即乘胜南下兼并荆州的雄心。他在争夺中原的战争过程中，在政治上、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良，如抑制豪强兼并土地，减轻人民赋税负担，选用较有才能的官吏治理地方，"劝农桑，课畜牧"，举办屯田兴修水利等，使北方残破的社会，得到一些恢复。但在长期的战争之后，北方军民还需要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曹操改汉朝的三公制[77]为丞相制，自任丞相，大权独揽，"挟天子以令诸侯"，造成了政治上的优势。他在击败北方的割据势力中，又招纳了不少的谋士和武将，如司马懿、贾诩、张绣、张辽、张郃，改编和锻炼了一支精练的军队。他早在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北）开辟玄武池以训练水师，作兵下荆州的准备，但在他发动向南方进军之前，水师的训练是不成熟的。

荆州是曹操南下首先要夺取的战略目标。因为荆州跨长江中流，当时是南北交通的要道。他占有荆州，就取得了下一步兼并江东的跳板。如果荆州先为孙权刘备所占有，对他下一步兵下江南是不利的，

所以他非首先夺占不可。早在消灭袁氏在北方的残余势力的战争期间，他就几次想乘刘表老病、其二子不和的机会，夺取荆州，而许昌、洛阳距荆州很近，近水楼台，也有袭取的有利条件。只是因北方袁氏的残余势力尚未彻底肃清，不好两面用兵。汉献帝建安十二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平定乌桓、统一了北方后，采纳荀彧“先声后实之策”，认为“华夏已平，南土知困”，采取“大军显出宛、叶，而间行轻进以掩其不备”[78]的行动，挥师南下，直取荆州。当时正值刘表新亡，荆州无主。他迫降刘表的次子刘琮，追击刘备于当阳的长坂（今湖北荆门西），迫使他改向夏口方向退却。曹操乘胜占领了荆州的战略要地江陵，基本上控制了荆州北部。

曹操由于轻易地占领了荆州，收得刘表的降兵、降将和大量的军用物资，助长了他的骄傲轻敌情绪，就想以他在荆州的水陆军，乘胜沿汉水与长江顺流东下，直向江夏郡的夏口前进，企图再席卷江东。他的将领们亦认为“此实为震荡扬州之良会，廓定南方之大机”。[79]

曹操军队的战略部署如次：（参看插图11-10）

——曹操亲自统率在荆州的水陆军主力由江陵出发，沿长江向夏口前进；

——另以一部水陆军由襄阳出发，沿汉水向夏口前进；

——命后军都督、征南将军曹仁、军粮督运使夏侯渊驻守江陵；

——命厉锋将军曹洪驻守襄阳；

——命汉侍中尚书令荀彧、汉前将军夏侯惇留守许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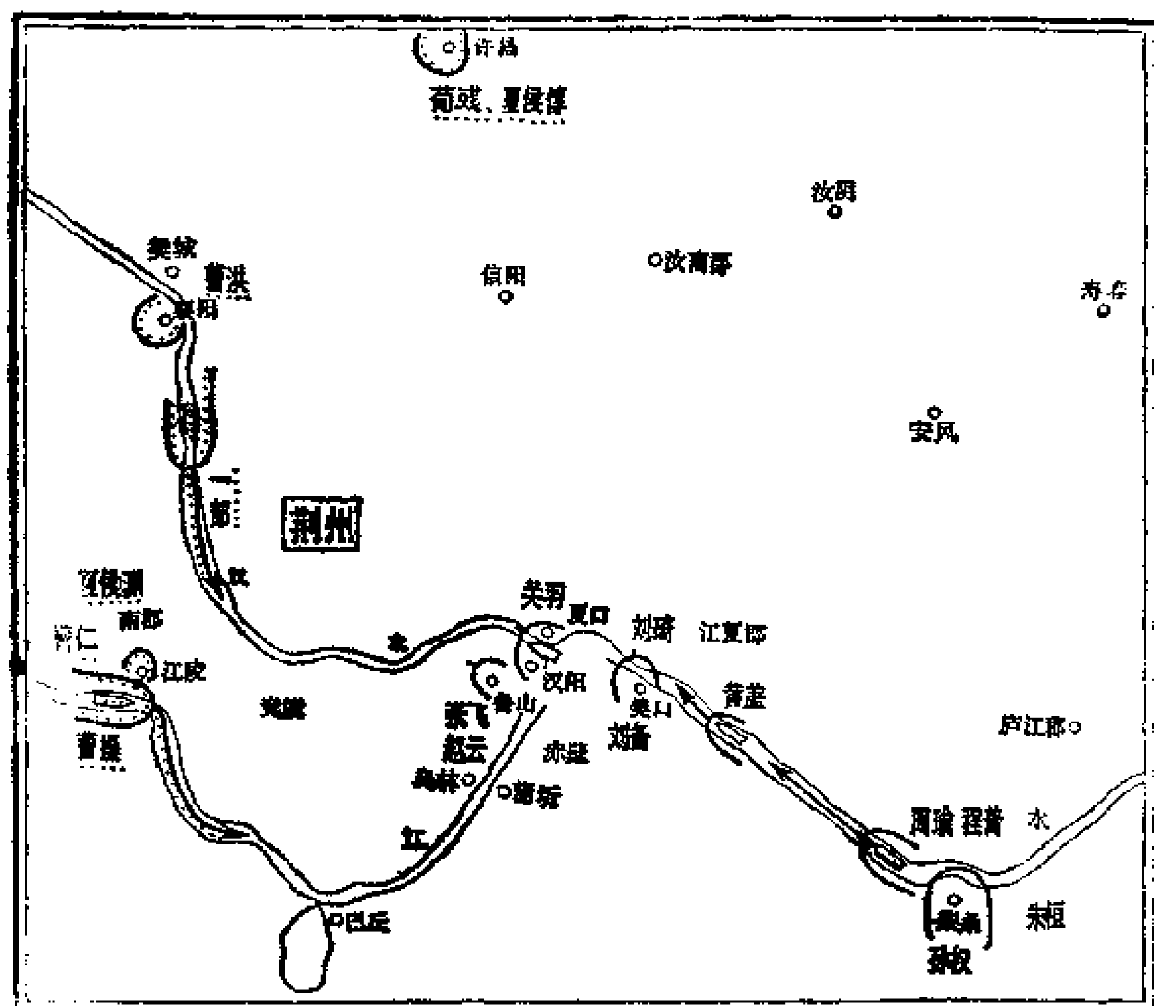
以上在长江、汉水方面曹军的总兵力将不超过二十万。曹操满怀骄傲轻敌的情绪，写信威胁孙权，说：

> 近来我奉诏讨伐叛逆，大军南下，刘琮束手投降。现在我整编水师八十万，正想与将军会猎于江东。[80]

曹操企图用一封恐吓信迫使孙权不战而降。从他的企图和行动可以看出他的战略方针是“利用一举破荆州的声势，乘胜再下夏口、兼并江东”。

荆州这个地区、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策》中所说：“北据汉沔，利

赤壁之战曹军与孙刘联军战略部署示意图　（11—10图）



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是用武之地”。从孙权、刘备、曹操三家的战略意图来看，荆州是三家必争之地，是三角斗争的焦点。孙权想夺占荆州作为他西防的要地；刘备想把荆州作为他将来出兵宛洛、进图王业的基地；曹操把荆州作为他再兼并江东的跳板。从客观态势来看，孙权击灭了黄祖，占领了江夏，正想染指荆州；刘备则早已鼾睡在刘表卧榻之旁，想等待他一死，荆州无主之际，就近水楼台，顺手夺占；曹操却先下手为强，抢先夺占了荆州北部。孙刘都晚了一步。在曹操的强大压力下，促成孙刘两家联合起来与曹操对抗，展开了三国时代有名的赤壁之战。

二、孙刘联盟抗曹的料敌和决策

孙刘联军在赤壁之战能击败曹操，赢得胜利，主要是诸葛亮、鲁肃、周瑜的情况判断正确；刘备、孙权联盟抗曹的决策英明；周瑜、诸葛亮的战役指导卓越。试从诸人的谋议、决策、指挥方面展叙史实，加以论述。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秋，鲁肃听说刘表病死，急向孙权献策说：

荆州与我国邻接，江山险固，沃野万里，百姓殷富。如果据有这个地区，是创建帝业的基础。现在刘表刚死，他的两个儿子不和睦；军中诸将，各怀异心。刘备是天下的枭雄，与曹操对立。他寄寓在荆州，刘表妒忌他的才能而不重用他。如果他与刘表的儿子齐心协力，上下一致，我们应加以安抚，与他们结盟；如果他们各怀二心，就应另作打算，以成大业。我请求奉命去荆州吊丧，慰问刘表军中当权的人并劝说刘备安抚荆州士众，同心一意，共拒曹操，刘备必定喜而从命。如能这样，天下可定。现在如不速去，担心曹操会先插手。[81]

孙权采纳鲁肃的建议，立即派他以吊丧为名，去荆州了解情况。鲁肃行至夏口，就听说曹操已向荆州进军。他昼夜兼程前进，刚到达南郡时，刘琮已投降，刘备正向南撤退。鲁肃迎会刘备于当阳的长坂，向他转达孙权的慰问和联合抗曹的意图说：

孙讨虏（指孙权）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表英豪都归附他。已据有扬州六郡，兵精粮多，足以成就大业。现在我为你打算，不如派遣你的心腹之人去与东吴结盟，共图大业。[82]

刘备欣然接受鲁肃的建议，他同诸葛亮、赵云、张飞等数十人逃至汉水，与关羽的水军万余人和江夏太守刘琦率领的万余人先后会合退守长江南岸的樊口（今湖北鄂城东北）。此时，曹操已占领江陵，正准备乘胜顺流东下。诸葛亮对刘备说：

“事急矣，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83]

刘备即派遣他随同鲁肃到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会见孙权。诸葛亮见到孙权，针对他尚存有怀疑的态度说：

“海内大乱，将军起兵据有江东，刘豫州亦收众汉南，与曹操并争天下。今操芟夷大难，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无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84〕

孙权听后激愤地说：

“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我决心抗曹）！非刘豫州莫可以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85〕

诸葛亮针对孙权对刘备的力量的怀疑，着重分析曹军的弱点说：

豫州军虽败于长坂，今战士还者及关羽率领的精锐水军一万人，刘琦会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敝。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射穿鲁缟，故兵家忌之。……且北方士兵，不习水战。又，荆州民众归附曹操，是迫于军威，并不心服。今将军如能派遣一员猛将统兵数万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操军必矣。操军败，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86〕

孙权听了诸葛亮的这番分析判断，非常高兴，也增强了他抗击曹操的信心。他决定与他的群僚再进行讨论，以统一认识和行动。正在这时，曹操的恐吓信到了。在东吴内部，对“抗曹”或“降曹”问题上，发生争辩。以张昭、秦松为代表的主降派被曹操的声威所吓倒，主张迎降。张昭认为：

曹操象豺狼，挟持天子以征伐四方，动不动就以朝廷名义加罪于人。今日拒之，情势不利。将军以前可以抗拒曹操，是依靠长江天险。今曹操已占据荆州，收编刘表所练水军，各种战船不下千只。曹操还有步兵，水陆两路俱下，与我共有长江天险。我们已失去此优越条件。况且双方力量，众寡悬殊，不能相提并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我认为只有迎降，才是上策）。〔87〕

孙权听后未表态。鲁肃反对投降，向孙权陈述降曹的切身利害，劝孙权早定抗击大计。他说：

我刚才观察诸人议论是想害将军，不足以同他们共商军国大计。今天，我鲁肃可以投降曹操，以将军之地位，岂可投降。何以言之？我投降曹操，还可以让我回到家乡出任小官，结交士林，升迁可充州郡之任。将军投降曹操，想到何处去找归宿？请早定大计，切莫听投降议论。〔88〕

孙权很感慨地说：

诸人持议论很使我失望，今卿廓开（你坦率阔达）大计，正合我心意。〔89〕

鲁肃劝孙权急召周瑜共商大计。周瑜从鄱阳（今江西鄱阳）赶回来，他是坚决主战的。他首先给孙权壮胆鼓气：

“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继承父兄遗业），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尚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90〕

接着，周瑜向孙权分析情况，指出曹军的弱点：

现在北方尚不安定，马腾、韩遂尚在关西，为曹操后患。曹操舍弃习惯的鞍马，登上不习惯的舟楫，与我们较量，这是舍长就短。现在已是寒冬十月，马缺藁草，给养不足；曹操驱使北方战士远涉江湖之间，战士不服水土，必生疾病。这几点都是兵家所忌，而操皆冒（冒险）行之。将军要生擒曹操，宜在今日。请将军给我精兵三万人，进往夏口，我保证为将军击破他。〔91〕

孙权听完周瑜的慷慨陈词，激动地说：

我与曹操老贼势不两立。你说应当抗击，很合我心意。他当即拔刀斫前奏案，说：

诸将吏敢有再说投降曹操者，与此案同。〔92〕

当天晚上，周瑜又进见孙权，把曹操的兵力再作了具体的估计：

那些人只看见曹操书信中说有水陆军八十万，就都害怕了，不再去弄清虚实，就主张投降，太无道理。现根据实际情况判断，

曹操从北方带来的军队不过十五六万，而且已经疲惫不堪；所收编刘表的军队最多有七八万，还抱有疑惧的态度。曹操统率疲劳病困的军队，指挥心怀疑惧的降卒，人数虽多，没有什么可怕。给我精兵五万，就足以击败曹操，请将军放心。[93] 孙权听后很感动地说：

公瑾，你这样分析，甚合我的心意。子布（张昭）、元表（秦松）这些人，各顾妻子，存有私心，很使我失望。唯独你和子敬与我的态度一样。……五万人一时难以齐备，已选出精兵三万，战船、粮草和军械，均已备齐，你同子敬、程普先出发，我随后再征集士众，多载物资粮草，为你作后援。你能击败曹操，就与他决战。如果遭遇曹军，不能击败它，就回来与我会合。我当与曹操一决胜负。[94]

孙权当即任命周瑜、程普为左右军都督，率军与刘备会师，抗击曹操，并任命鲁肃为赞军校尉，协助筹谋策划。

周瑜率精兵三万沿长江西上以迎击曹军，孙权亲自统率后方诸军以为策应。

孙权军队的编组与战役部署大约如次：（参看插图11-10）

——前锋：丹阳都尉黄盖；

——本队：当口令甘宁、横野中郎将吕蒙、中郎将韩当、宜春长周泰、征虏将军孙贲、竟威校尉陆逊、武猛校尉潘璋等；

——水陆军左都督周瑜、右都督程普、赞军校尉鲁肃；

——后方守军：给事朱桓防守柴桑（今江西九江），以备援各方；

刘备军队在樊口时的兵力和部署如次：

——关羽率水军约万人驻在夏口；（今湖北汉口）

——张飞、赵云各率陆军四千人驻在鲁山；（今湖北汉阳西）

——刘琦率军万余人驻在樊口；（今湖北鄂城附近）

——刘备本人在樊口。

周瑜率军到樊口与刘备会合后，继续沿江西上，与顺流东下的曹军遭遇于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曹军初战失利，退据乌林（今湖北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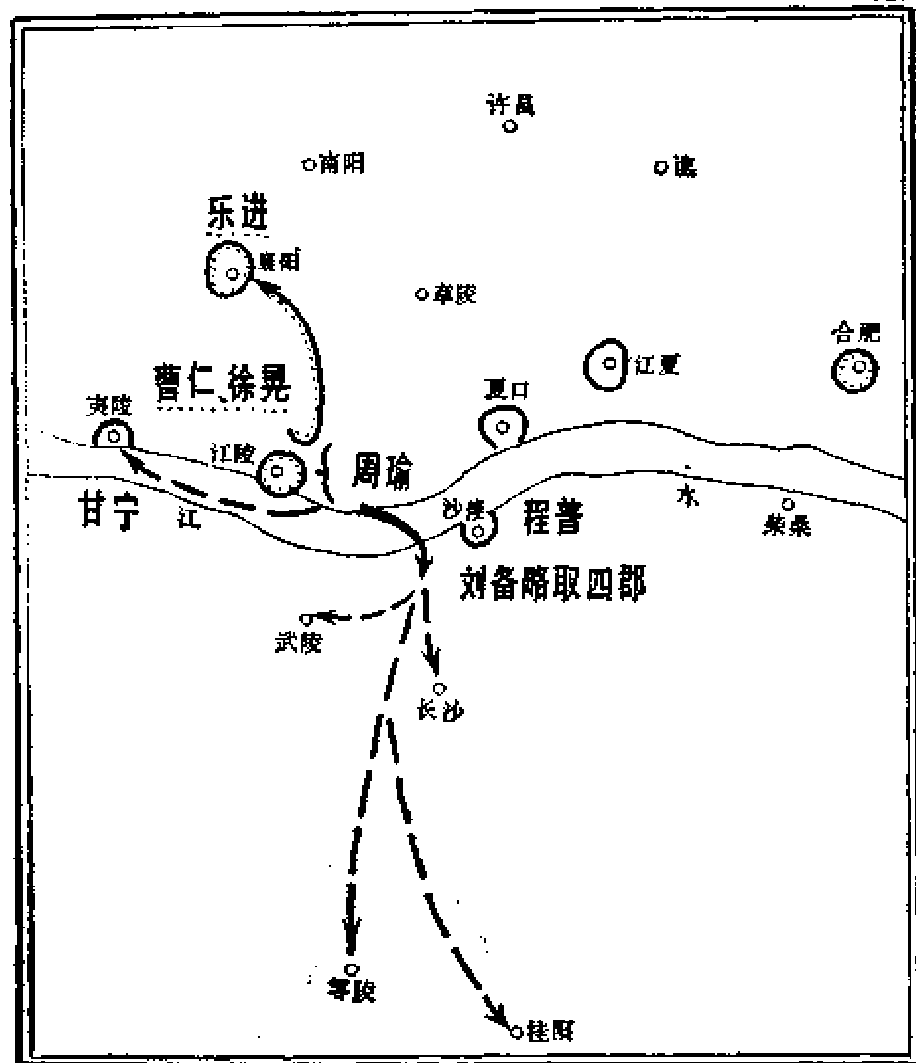
鱼西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曹军大部分是北方人，不惯于水上的风浪颠簸，便用铁环将战船首尾互相联接起来。周瑜采纳黄盖采用火攻的建议，命黄盖诈降，用蒙冲斗舰[95]十艘暗载燃烧器材驶向北军水寨纵火。一时烟炎弥天，火势波及岸上的营垒，曹军大乱，人马烧死溺死的极多。此时，曹操以水寨被烧，陆寨亦将难守，又因营中多病卒战斗力锐减，遂烧毁余船，移军西走。在南岸的周瑜急率精锐，擂鼓进击，大败曹军。曹操率残部由陆路向江陵撤退。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击至南郡。曹军又饿又病，死者过半。曹操命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自己率余部北退谯郡（今安徽亳县）。赤壁之战，以曹操败退北方而告结束。次年十二月，曹操以江陵方面受周瑜所率吴军攻击，屡战不利，夷陵又被吴将甘宁袭取，形势孤立，就自动放弃江陵，退守襄樊。周瑜占领江陵后，孙权即命周瑜为南郡太守，镇守江陵。程普为江夏太守，镇守沙羡（今湖北武昌西）。东吴在长江中游的形势更加巩固了。刘备在战后也乘机略取了荆州在江南的长沙、零陵、武陵、桂阳四郡，命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都督零陵、武陵、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食；命偏将军赵云为桂阳太守。刘备结束了他多年来寄人篱下的政治生涯，开始建立自己较巩固的立脚地，三国鼎立的基石基本奠定了。（参看插图11-11）

孙刘联盟抗曹的料敌和决策

曹操乘北方战胜的余威南下荆州，想乘胜再兼并江东。当时的力量对比是一强对两弱。孙权刘备能够正确分析敌我形势，定下联合抗曹的正确决策，不但赢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而且奠定了尔后三国鼎立的基石。王船山先生评论此事，认为“一时之大计，无有出于此者”。船山此说可以说是很中肯的论断。曹操、孙权、刘备三家为争夺荆州，酿成赤壁之战。孙权、刘备能击败曹操，两家联盟是起着关键作用的。孙、刘的胜利可以说是联盟的胜利。在三角斗争中，只有两弱联盟共抗一强，才是至善的战略。如果两弱各自为谋，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当曹操的大军南下，破荆州，下江陵，其锋不可犯。刘备势孤

力弱，败走当阳，逃奔夏口，投靠孙权。当时他处境艰危，几无立脚之地，他如果不与东吴联盟，共同抗曹，势必只有南走苍梧。联吴抗曹，是他解脱当时困境的唯一可采取的战略。所以当鲁肃迎会他于长坂，向他提出，“遣腹心自结于东”(派遣心腹去与东吴结盟)时，他欣然同意，即派诸葛亮随鲁肃去江东。而孙权在接到曹操的恐吓信后，也感到曹操的兵强势盛，只有孙、刘联盟，增强力量，才有争取胜利的条件。因之在主降主战的争议中，他不为强敌所吓倒，能断然采

赤壁之战战争结局示意图 (11—11图)



纳主战派的意见，拔刀砍奏案以定下联刘抗曹的决心，表现了他的勇断果决。这些都是关键性的战略决策。两家联盟抗曹，虽是当时曹操的

大军压境的客观形势所促成，而孙权、刘备能果断地定下这英明的决策，实由于他们两人在战略设想上有共同的看法，都认识到两家联盟的战略意义，自然一拍即合，全力以赴。而鲁肃在曹军压境、荆州危急之际，涉险犯难，赶到当阳长坂，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劝说刘备不要南走苍梧，即派心腹之人去江东与东吴结盟，共图大业；诸葛亮亦认为东联孙权是他《隆中对》所拟定的战略，在此情况紧急时，请求亲去江东商讨联盟大计，都显示出临危不乱，不失时机提出应变方略的才干。其敏捷果断、才智胆略，实有足称者。而刘备屯兵江夏，权充东吴的战略前哨，掩护东吴得以从容从事战争准备，方使东吴君臣有判断情况以策定和战大计的自由。当刘备投奔孙权时，在曹营中，众议认为孙权必杀刘备，不会容他及寄寓于吴会，养虎遗患。惟独程昱持异议。他认为"孙权新立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初举荆州，威震江表。孙权虽有谋，不能独当也。刘备有英名，关羽、张飞皆万人敌也，权必资之以御我。难解势分，备资以成，又不得而杀也"。[96]程昱此种论断，可以说也是精通三角斗争中联盟战略的运用。

诸葛亮、鲁肃、周瑜诸人，不为曹操的虚声恫吓所吓倒，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能从分析敌人的弱点中，找出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作为孙权最后定下决心的依据，对取得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赤壁交兵，水战是关键。也可以说是大规模水陆联军作战之始。北方人不习水战，周瑜在作战指导上，善于以长击短，发挥水军的威力，争取劣势中的优势。他采纳黄盖的建议，出其不意地发动火攻，先歼灭曹操的水军。这样在战争关键时刻，使兵力上原来的优劣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使弱者的军队变为强者。曹操的水军覆灭，陆军虽众，不能克服长江天堑，而大势定矣。毛泽东在讲主观指导的作用时说："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81页）赤壁之战中的胜败情况，便是历史上的一个典型例子。诸葛亮和周瑜向孙权的几番陈词，也可以说是古代战史中很好的敌情判断。

刘备志在略取荆州作为他创业的基地，所以他乘曹操败走北方、周瑜与曹仁正相持于江陵之际，即迅速渡江，略取了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并上表朝廷请以刘锜为荆州刺史，另派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督诸郡赋税，以充军实。这是利用刘锜作招牌，而自己收其实惠。继又以"地少不足以安其民"[97]和共同抗曹为借口，向东吴借得荆州北部的南郡，扩大了地盘。赤壁之战，孙刘联盟击败曹操，赢得丰硕的胜利果实者，应是刘备。裴潜向曹操论述刘备的才能说："使居中国，能乱人而不能为治也。若乘间守险，足以为一方主"[98]。这实是识人之论。

曹操在赤壁失败的原因

曹操拥有号称八十万的人马下江南，却在赤壁折戟沉沙，丢盔弃甲，败走北方。探索他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他因胜而骄，想乘胜再下夏口、兼并江东的战略方针失策，一路进军的战役布势失当和以短击长的战役指导错误。他兵下荆州，以"间行轻进，掩其不意"的行动袭取了襄阳，迫降刘琮，击溃刘备，进占江陵，基本上控制了荆州的江北地区。曹操战略行动的第一步是可取的，他取得了胜利。他的战略行动的第二步应当如何走呢？当时他的谋士贾诩曾向他献策：

> "明公（指曹操）昔破袁氏，今收汉南，威名远著，军势既大；若乘旧楚之饶，以飨（犒赏）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俯首降服）矣。"[99]

贾羽建议的实质，就是劝曹操进行战略休整。为曹操计，应在夺占江陵以后，暂缓兵下江东，乘机先略取荆州在江南的四郡，占领全部荆州，取得西可以进窥巴蜀，东可以威胁江东的优越战略地位，然后扼守江陵战略要点，巩固占领地区，进行战略休整，安定内部，训练水师，静观孙权、刘备的动向，仍然采取统一北方战争中所善用的离间、分化、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政治上，用汉献帝的名义，封官进爵，拉拢孙权；在军事上，集中兵力，进击兵败势穷的刘备，迫使他南窜。然后再与孤立的孙权较量。诚如是，则江东的统一很可能不会

待到六十年后“王濬楼船下益州”，才使“金陵王气黯然收”了。

曹操计不出此，主观上犯了骄傲轻敌的严重错误。他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只看到自己的部队是在北方久经战阵的胜利之师，又收编了刘表的水军，兵多将广；而未看到北方将士不习水战，荆州的水师新附，心有怀疑，内部不稳，战志不坚。虽然攻取了荆州，人心未附，而长江天堑，北马克服不了南船，没有优势可靠的水师，是不能顺流而东下的。他以为乘北方战胜的余威，破荆州，下江陵，一举可以兼并江东，用一封恐吓信就可以使孙权俯首听命。在取得荆州北部后，既不进行战略休整，也不调整战略部署，就轻率地进军江东，舍长就短，置军队于不能用武之地，这是失策的。曹操当时占领了长江北岸的广大地区，又兵多将广，在战略部署上，正应该多路进军，迫使孙权分兵应付，不能集中全力与刘备会合，同曹军决战于赤壁。曹操亦犯了袁绍在官渡之战中，以十万大军使用于一个战略方向上的错误。他又留重兵于江陵、襄阳，在江陵一个战略方向上轻敌冒进，既打刘备，又击孙权，促使孙刘两家紧密联盟，增加了自己的敌对力量；并以己之短（不习水战的陆军）去击孙刘之所长（长于水战的水军），决胜负于波涛汹涌的长江之上。曹操在统管全局的基本战略上运筹失策，是在赤壁失败的主要原因。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凭吊赤壁古战场，赞叹曹操当年“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的浩大声势，“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雄壮军容，称曹操是“一世之雄”。而结果呢，因骄傲而轻信黄盖的诈降，因麻痹而疏于防备吴军的纵火，在周郎与诸葛亮的“羽扇纶巾谈笑间”，曹操连江的樯橹就“灰飞烟灭”了。史载：曹操在赤壁兵败回去后，曾哀叹地说：“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我）至此”。[100]他在吃了败仗之后，为何想起郭嘉呢？曹操当年击败袁绍，占领黄河北岸的战略要点黎阳以后，虽想乘胜攻打邺城，一鼓作气扫荡袁氏在北方的残余势力。而郭嘉却不赞成他这个不进行战略休整的作战意图，向他建议说：

袁谭、袁尚二人，势力相当，各树党羽。如果进攻太急，他们会团结一致，对付我们；如果暂缓对邺城进攻，他们就会互相

火并。不如作南攻刘表的姿态，待其内部发生变化，然后再进攻可以一举击败。[101]

他当时采纳了郭嘉这条"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102]的作战指导，回师修整，暂缓进攻。果然不久袁氏兄弟互相争夺地盘，使他取得各个击灭袁氏兄弟的胜利。曹操南下用兵，因胜而骄，忘掉了这条记忆犹新的成功经验，赤壁兵败后，才发出哀叹。骄兵必败，历史的教训是发人深思的。

第四　刘备袭取益州之战

——刘备据有益州，形成三国鼎立局面——

益州辖今四川，也包括今云南、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东汉末年刘焉、刘璋父子统治时期，益州却是一个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复杂的地方。

刘焉进入益州时，带了很多客籍的亲戚故旧随他入蜀。他又把由南阳和长安一带流入益州的流民编成军队，号称"东州兵"，作为他统治的支柱。因此，以"客籍"为主的刘焉集团与本地的"土著"地主集团之间争夺权利的矛盾，便很尖锐。刘焉死后，刘璋继任益州牧。益州官吏赵韪联合地方豪强大姓又起兵反抗。他虽然依仗"东州兵"平息了这场内乱，但"土著"与"客籍"的矛盾，并没有缓和。刘璋对他的"东州兵"侵扰益州人民的暴行，未加限制，更引起益州人民的反抗。同时，益州有才能的人对刘璋也不满。他们希望有作为的人来治理益州，以改变腐朽衰败的局面。这就是诚如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因此，在赤壁之战前后，刘备处心积虑地想夺取这"天府之国"，孙权和曹操的谋士们也想去染指。在刘、孙、曹三家明争暗斗中，孙、刘两家争斗尤烈。而刘备在赤壁之战后因占据了益州的门户荆州南郡，在地略上获得近水楼台的便利，加上时机与谋略的契合，使他因时乘势，进入益州，以两年半

的时间(公元211年—公元214年)，不费大的攻战之劳，就夺取了刘璋的政权。《隆中对》中“跨有荆益”的计划，得以实现，三国鼎立的局势，因此形成。

在这一段云诡波谲的局势中，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有三个问题值得论述：

一、孙权、曹操想染指益州的谋略运用的得失

（一）孙权方面

早在赤壁之战以前，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甘宁曾向孙权提出“夺取荆州、进占楚关、渐图巴蜀”的建议，孙权非常同意。赤壁之战以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周瑜到京口见孙权，又陈述西取益州、进图北方的战略意图：

> 现在曹操兵败于赤壁，威望顿损，内有隐忧，无力与将军进行攻战。我请求乘此时机与奋威将军孙瑜共同出兵，西取益州，兼并张鲁，然后留孙瑜将军固守汉中，与西凉马腾结盟。我回师与将军共占襄阳，以抗击曹操，北方可图。[103]

孙权采纳周瑜的意见，命他回江陵进行战备，一面写信给刘备，要求假道荆州，共同进取西蜀。孙权在信上说：

> 张鲁割据汉中，为曹操耳目，企图进取益州。刘璋不修武备，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刘璋，再进讨张鲁，首尾相连，统一南方。那时，纵有十个曹操，亦无所忧虑。[104]

刘备接信后，识破这是一个“假途灭虢”的阴谋，回信拒绝孙权。他在信上说：

> 益州民富地险，刘璋虽弱，足以自守。张鲁虚伪，未必尽忠于操。今暴师（用兵）于蜀汉，转运于万里，欲使战克攻取，举不失利，恐吴起、孙武亦难办到。议者见曹操失败于赤壁，就认为他力量削弱，再无远大企图。实际上，他现在三分天下已有其二，还想统一南方，用兵于吴郡、会稽郡，岂肯坐在北方，按兵不动。而我们同盟之间，无故自相攻伐，把攻战主动权让给曹

操，使他钻空子，这不是长久之计。[105]

孙权没有接受刘备的阻谏，想单独出兵，进图巴蜀。他命孙瑜率水师进驻夏口。刘备获悉孙权已在进行战备，决心不让他假道荆州，写信警告孙权：

你想夺取益州，我当去救援，不失信于天下。[106]

刘备又派关羽屯兵江陵，张飞屯兵秭归（今湖北秭归），诸葛亮镇守南郡，他亦亲自进驻孱陵（今湖北公安县西），以防阻吴军越境西上，进图巴蜀。正在此时，周瑜病死巴陵（今湖南岳阳），孙权不得已召还孙瑜，取消进图巴蜀的计划。及至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西取益州，孙权骂道：

"猾虏！乃挟诈如此。"[107]

根据上述史实来评论，刘备西取益州，孙权骂他是挟诈的猾虏。而孙权想夺取益州，亦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一厢情愿的幻想。赤壁战后，曹操虽然败退北方，力量的优势，依然在握，只不过他扩张势力的战略意图转向关中。周瑜向孙权分析形势，认为曹操"威望顿损，内有隐忧，无力与将军进行攻战"，是把东吴的力量估计过高了。刘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比较切合实际，符合客观形势。

当时刘备占据荆州五郡，控制进入益州的大门，并时时想袭取益州，这也是客观形势。孙权要刘备让他假道荆州，去夺取益州，扩张势力，刘备是不能同意的？无论孙权是真想假道荆州去取益州，还是想玩弄"假途灭虢"之计，都必须先驱逐刘备这个"拦路虎"，这就势必要破坏孙刘联盟。大敌曹操在北方虎视眈眈，如果孙权要举兵入蜀，必会演成孙刘两家鹬蚌相争，既满足不了自己的利益，反而使曹魏坐收渔人之利，这是孙权的不明智。

（二）曹操方面

早在赤壁之战以前，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赶走刘备、夺占荆州时，益州牧刘璋派遣张松为专使到荆州，向曹操致敬，表示友好。主簿杨修劝他礼遇张松。曹操却因胜而骄，蔑视张松，接待疏慢。张松羞愧抱怨，返回西川后，力劝刘璋与曹操断绝来往，结

好刘备。刘璋采纳了他的建议。如果当时曹操礼遇张松，先插手巴蜀，结好刘璋，则以后刘备就不可能轻易地入据益州以为根本。这是曹操谋略运用的失策。习凿齿评论此事说：

“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十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108]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璋听说曹操派遣钟繇图取汉中，怕唇亡齿寒，心怀恐惧，遂邀请刘备入蜀讨张鲁以自固。刘备乘机进入益州，并于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赶走刘璋，自领益州牧。第二年七月，曹操亦占领了汉中。此时，刘备在公安与孙权争夺荆州地盘。司马懿向曹操陈述乘机取蜀的建议：

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归附），而远征江陵，此机不可失。现在我们攻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入蜀，势必瓦解。圣人不能违时，亦不可失时。[109]

曹操未采纳他的意见，还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110]。谋士刘晔又建议：

刘备是一个人中豪杰，但有计谋而却迟慢。取得西蜀不久，蜀人尚未归附。我们现已取得汉中，蜀人震恐，其势力自会倾覆。以我公的神明，乘其倾覆而进军，没有不攻克的。如果稍为迟缓，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关羽、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蜀民既定，据险守要，就不可进犯了。今不进取，必为后忧。[111]

曹操终未采纳两人的乘机取蜀的建议。

任命夏侯渊为都护将军，督率张郃、徐晃诸将镇守汉中，并派丞相长史杜袭为驸马都尉，留督汉中事，自率大军回到邺城。

曹操占领汉中后，不乘时进取益州，论者认为他贻失战机，留下后患。曹操的谋士们只判断刘备“得蜀日浅，蜀人未附”，而未看到曹操也是陇右初平，羌人新附；汉中虽定，张鲁未降。（张鲁是同年十二月才投降）当时，刘备虽然远在公安与孙权争荆州地盘，而诸葛亮仍坐镇成都。如果曹操举兵深入，蜀军拒险守要，会使曹魏的大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曹操用兵老练，实担心关陇不稳，又忧虑孙权进

攻淮南。法正后来对此作了比较明允的分析，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中，不因此势以图蜀，而留夏侯渊、张郃屯守，身遽北返，此非其智谋不逮，力量不足，必将内有忧逼。[112]果然，同年八月，孙权率军十万大举围攻合肥。曹操在下荆州时，慢待张松是一失策。而定汉中后，未即进图巴蜀，未可认为是他料敌决策的失算。

二、刘备袭取益州的谋略运用的得失

早在荆州襄阳隆中时，诸葛亮向刘备陈述建国的战略意图时，就提出首先夺取荆益二州作为根据地，所以刘备在占有荆州五郡之后，对夺取益州是处心积虑的，只是窥察机会，待时而动。而早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益州别驾张松返西川后，曾劝刘璋结好刘备，刘璋同意。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十二月，张松又劝说刘璋派遣使者去荆州结纳刘备。刘璋问："谁可使者(充任使者)。"[113]张松推荐军议校尉法正。于是刘璋派遣他出使荆州。法正表面推辞，佯为不得已奉命而行，而实则"自负其才，恃度刘璋不足与有为"。[114]他返蜀后，阴与张松勾结，密谋迎接刘备入蜀以为州主。那时，适值刘璋听说曹操将派遣钟繇向汉中讨伐张鲁，他怕唇亡齿寒，心怀恐惧。张松乘机问刘璋：

"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115]

刘璋说：

"我固忧之，而未有计。"[116]

张松即向他建议，邀请刘备入蜀，协助进击张鲁。他认为：

刘豫州是刘璋的宗室，又是曹操的仇敌，善于用兵。如果利用他去讨伐张鲁，必定能取胜。张鲁破灭后，则益州强大，曹公虽来，无能为力了。现在益州的诸将庞羲、李异等皆恃功骄傲，正想依附外来势力夺取权位，不得刘豫州的辅佐，曹军一到，敌攻于外，民攻于内，必会遭致失败。"[117]

刘璋既有外忧，又有内惧，当即采纳张松的建议，派遣法正率领四千人去荆州，迎接刘备入蜀。法正到荆州，秘密向刘备献策：

“以明将军（指刘备）之英才，乘刘牧（指刘璋）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响应于内，以取益州，犹反掌也。”[118]

刘备犹豫未决，庞统又向他进言：

“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指孙权），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今可权借以定大事。”[119]

刘备又提出问题：

“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义于天下者，吾所不取也。”[120]

庞统再向他作解释：

“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121]

刘备遂同意法正和庞统的谋议，定下乘机袭取益州的决策，并向法正询问“蜀中阔狭、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122]，法正一一详为陈述，并呈献出西川地图。于是他策定入蜀部署：（参看插图11-12）

——留诸葛亮、关羽和张飞镇守荆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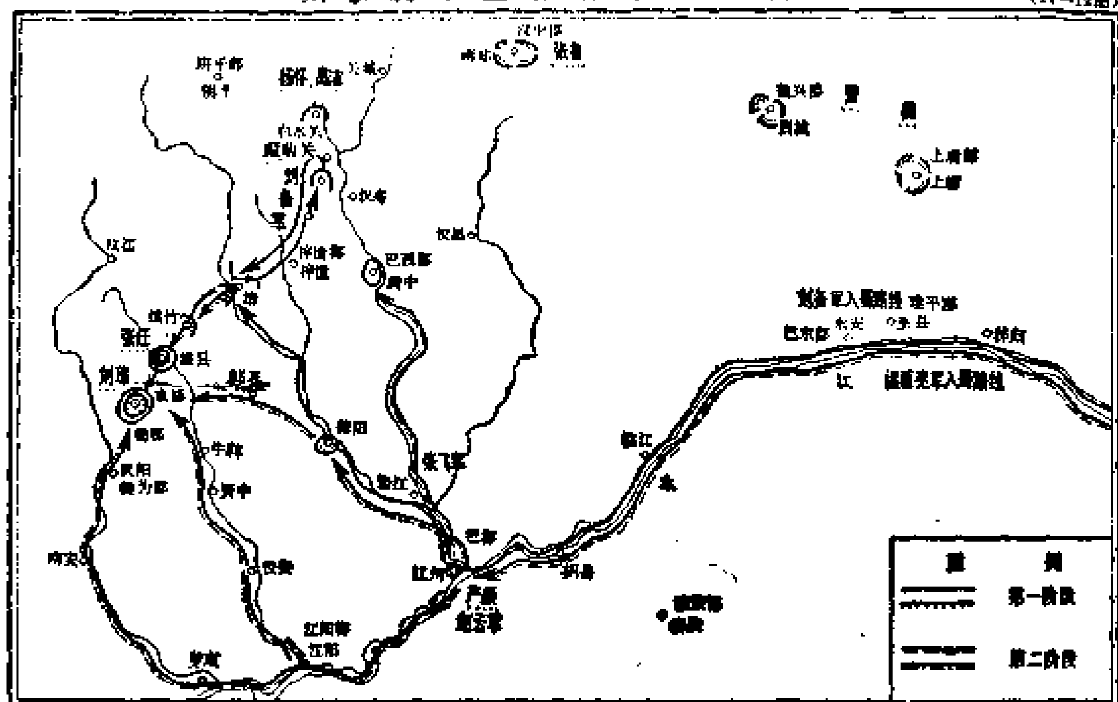
——以赵云领留营司马，掌管留营军事；

——自与庞统、法正、黄忠和魏延等率步卒数万人入益州。

此时，东吴孙权因交州内乱平定，民心初附，又担忧曹操进攻淮南，故仍愿与刘备保持联盟。荆州方面，平静无事。

刘备到达涪城（今四川绵阳），刘璋率步骑三万人前来迎接。张松暗中指使法正向刘备及庞统献策，相机于会所袭击刘璋。刘备认为这是大事，不可仓卒。庞统则认为现在利用会晤机会，相机扣留他，则将军无用兵之劳，就能坐定一州。刘备未同意。他认为初来他国，恩信未著，这样做是不可以的。

刘璋推荐刘备行大司马领司隶校尉，而刘备亦推荐他行镇西大将



军领益州牧。双方所率将士互相交往，欢宴百余日后，刘璋增添刘备兵卒，厚加资给，命他进击张鲁，并指挥白水军杨怀、高沛的部队。于是刘备率三万人北到葭萌（今四川昭化东南五十里）。但他并没有立即进击张鲁，而致力于厚树恩德，以收揽人心。

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十二月，刘备在葭萌已屯兵一年，庞统又向他陈献袭取成都的上、中、下三策：

现在阴选精兵，昼夜兼程前进，直接袭取成都。刘璋既不谙军事，又素无战斗准备。大军突然到达，益州垂手可得，这是上计；白水军主将杨怀和高沛是刘璋的名将，各拥精兵，据守关头。听说他们曾多次有函劝说刘璋，遣送将军回荆州。将军可派遣使者相与通报，假说荆州有急，欲还救援，并命部队整装，表面上作返回荆州的姿态，这两人既佩服将军英明，又高兴将军准备回荆州，必轻骑前来送行。藉此机会拘捕二人，并夺取他们所统率的军队，就向成都进军，这是中计；返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同荆州连络，再徐缓图谋进取益州，这是下计。如果总是不采取行动，沉吟下去，会陷入困境，是不会长久的。”〔123〕

那时，正值曹操亲统大军东征孙权于濡須（今安徽巢县东南东兴镇），孙权向刘备求援。于是刘备采纳庞统的“中策”，一面准备行装，一面致书刘璋：

曹操东征，吴忧危急。孙权与我本为唇齿，而关羽兵弱，乐进又在青泥（约在今湖北襄阳东南），与关羽相对峙。现在不回去救援关羽，其忧患甚于张鲁。张鲁不过是自守之贼，是不足忧虑的。[124]

他在信中还要求刘璋资助他一万士兵及粮草军资。刘璋接信后，很不满意，但又不好全部拒绝，只应允供给一半。张松听说刘备将回荆州，不察内情，即致书与刘备和法正说：

“今大事垂手可立，如何释此去乎！”[125]

不料张松的哥哥广汉太守张绣恐惧祸延及己，向刘璋揭发张松与刘备勾结的阴谋，于是刘璋捕杀张松，并通令各关戍诸将，不许再放刘备通过。

白水都督杨怀和高沛听说刘备将东归，果然前来送行。刘备借口斥责他们无主客之礼，加以捕杀，并借此以激怒其部众说：

“我为益州征讨强敌，部队辛勤劳累，无暇宁息。而刘璋却积财吝赏，何以望我军将士为他出力死战。[126]

于是，刘备作了如下的处置和部署，向成都进军。（参看插图11-12）

——率部进占杨怀和高沛所据守的关头，收编他们的部众，并留质诸将士的妻子；

——召命诸葛亮由荆州率兵入蜀，会师成都；

——留中郎将霍峻统率数百人驻守葭萌；

——派遣黄忠为前锋；

——亲自统率主力部队在后续进。

益州从事郑度听说刘备举兵南下，向刘璋献抵御之策：

左将军（指刘备）孤军深入，袭击我们，兵不满万，士卒未附，军无辎重，靠野谷补给。对抗之策，最好是把巴西梓潼一带人民强迫疏散到涪水以西，把这一带的仓廪野谷，一概烧除，

高垒深沟，静以待敌。彼来请战，不与交战。日子久了，就会补给缺乏。不过百日，必将自退走。乘其退走而击之，必定俘虏刘备。[127]

刘璋没有采纳郑度的计策，他对其部下说：

“吾闻拒敌以安民，未闻动民（扰民）以避敌也。”[128]

刘备军所过辄克，进至涪城，先后击溃刘聩、冷苞、张任、邓贤、吴懿、李严、费观诸部，于汉献帝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五月，进围雒城（今四川广汉）。吴懿、李严、费观诸将投降，张任战死。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四月，诸葛亮在荆州奉刘备召令，即留关羽镇守荆州，自与张飞、赵云率兵溯江西上，到达江州（今四川重庆）后，分遣赵云攻取江阳（今四川泸县）、犍为（今四川彭山东十里）；张飞攻取巴西（今四川阆中）、德阳（今四川遂宁）各郡县，向成都进军，与刘备会师。

是时，刘备围攻雒城已将一年，犹未攻下。庞统在围城之战中被流矢射死。雒城不久攻克，刘备乘势进围成都，诸葛亮、张飞、赵云诸部亦前来会师。马超亦自氐中前来投降刘备，参加攻城战斗。那时，城中尚有精兵三万，谷帛足够支持一年，吏民都愿死战。刘备围城数十日未能攻下，派遣简雍入城劝降。刘璋感到：他们父子二人在益州二十余年，无恩德以施加于百姓。百姓攻战三年，肝脑涂地于草野，都是为了保我，我何心能安，[129]遂开城出降。纵观刘备袭取益州的谋略运用，有得亦有失。庞统劝刘备“乘时进取益州以为创业基地，……如果今日不取，终会使他人获利”的一段陈词，可以说是知世务的情况判断结论，是积极精辟的谋略。刘备如不进取沃野千里的益州，单靠荆州数郡的人力物力，是实难与独霸江东的孙权、雄踞北方的曹操抗衡，稳定三国鼎立的局势的。鲁肃说“庞士元非百里之才”，可谓知人。但他长于治政，短于用兵。他建议刘备利用“涪城之会”的时机，扣押刘璋，以为这样就可以“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实是昧于情势的鲁莽冒险行动。初入西川，恩德未孚，众心未

附；刘璋前来相迎，拥有精兵三万。扣押刘璋，激起兵变，何以善其后。刘备认为此是大事，不可仓卒，没有采纳。这一决策和处置是正确、持重的。

庞统提出的袭取成都的上、中、下三策，详加分析，他所陈献的所谓"上策"，实为下策。就当时情势而言，刘璋的名将杨怀、高沛拥有重兵，据守关头，后顾之忧没有翦除，就想进取成都，以为"大军猝至，一举便定"。后来战争实践证明，攻取雒城，费时近一年。围攻成都时，城中兵精粮足，吏民愿死战。如果刘璋拒城固守，刘备顿兵坚城之下，军无补给，杨怀、高沛攻其后，刘备军会两面受敌，难免遭到失败。后来刘璋开城出降，实因他的部将有的被杀，有的战死，有的投降，外援断绝；而刘备的荆州大军入川，会师成都。刘璋不愿苦战，不忍残民以逞，才开城出降的。刘备采纳庞统的"中策"，是正确的决策。

刘璋听说曹操图取汉中，怕唇亡齿寒，心怀恐惧，竟采纳张松的建议，想利用荆州的刘备代为征讨张鲁，以保西川。当时主簿黄权劝谏他说：

> 刘左将军（指刘备）有骁名，今请他到益州来，如果以部属对待，则不会满足他的心意；如果以宾客之礼待他，则一国之内不容有两个主人。如客人有泰山之安，那主人就会有累卵之危。不如封闭国境，以待局势的变化。[130]

刘巴亦劝刘璋不要邀请刘备入蜀。他认为刘备是英雄，进入益州，必定会制造祸害。刘备入蜀后，他又劝谏刘璋："若使刘备讨伐张鲁，是放虎于山林也"。[131]这些意见，刘璋都未采纳。他利令智昏地欢迎刘备入蜀，可以说是引狼入室，干了一桩"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蠢事。正为巴郡太守严颜拊心叹息所说："这就是所谓独坐穷山，放虎自卫。"[132]

刘备进军成都时，郑度建议采用"坚壁清野"之策以破刘备，刘璋未采纳，对他的部众说："未听说扰民以避敌的"，成都被围时，吏民都愿死战，刘璋检讨他父子在益州二十年，无恩德于百姓，不忍再

为保全他自己的爵位，而使百姓肌膏草野，开城出降。从这两桩事看出刘璋虽懦弱，亦不知兵，但他还不是一个残民以逞的军阀，不失为三国时代的一个忠厚牧守，与徐州牧陶谦是一流人物，不能与董卓相提并论。

三、刘备取益州后安邦定国的政策措施

刘备运用权谋，不费大的争战之劳，就赶走刘璋，取得益州的统治权。从此，蜀汉建国，与魏、吴形成三国鼎立的局势，统治延续几十年。

刘备取得益州后，为了安定局势、收揽人心、巩固政权，所采取的一些安邦定国的政策，确是很值得加以论述的。他推行的几项政策和措施是：

（一）封赐将士以赏功

他重用随从他由荆州入蜀的立功将士，倚为巩固蜀汉政权的亲信骨干，对他们封官进爵，厚给赏赐。如

——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

——拜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诸畿，内为谋主；

——任命张飞为巴西太守；

——任命赵云为翊将军、黄忠为讨虏将军、马超为平西将军、魏延为牙门将军、简雍为昭德将军、孙乾为秉忠将军、糜竺为安汉将军；

——任命蒋琬为广都长、伊籍为从事中郎、马谡为绵竹成都令；

——追赐庞统为关内侯，谥曰靖侯。封他的父亲为议郎，并录用他的子弟皆为吏。

（二）收用故吏以容士

他对刘璋政权时代的故吏，也厚于笼络和录用，以显示他用人唯才，能纳贤秀士，争取"土著"和刘璋旧部的支持和合作，如

——任命清俭公直、为民夷所信爱的蜀中循吏、刘璋的益州太守董和为掌军中郎将并署左将军府事；

——任命勇于直谏的广汉长黄权为偏将军；

——任命归降的李严为犍为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费诗为牂牁太守、张裔为司金中郎将；

——任命庞义为司马、刘巴为西曹掾、彭羕为益州治中从事，李恢为别驾从事。

（三）厉行法治以定国

诸葛亮辅佐刘备治理益州，为了迅速稳定社会秩序以巩固统治，他崇尚法治，执法甚严。初先，蜀人多怨叹。法正亦曾劝谏他说：

过去汉高祖初入关中，约法三章，秦民知德。现在君假借威力，跨据一方，初建国家，还没有施恩惠于地方，按着主客的关系，我们也应该多行点恩惠才对。望你缓刑弛禁，以慰蜀人的愿望。[133]

诸葛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回信向他作解释：

现在的情况和高祖时候不一样，不能一概采用。刘璋暗弱，从刘焉以来，文法羁縻，互相承奉。法令不明，刑罚不严。蜀土人士（指豪强官僚），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君臣上下的关系逐渐废弛。……所以造成弊病，实由于此。现在我们推行严明的法令，人们就会知道什么是恩德；限制爵位的赏赐，人们就会感到爵位的尊荣。恩德和尊荣相辅而行，赏罚并用，上下就有秩序了。治国安邦的要领在此。[134]

法治推行，使刘备在益州的统治地位，初步稳定下来。

（四）清理财政以足用

刘备围攻成都时，曾与士众约法："如果城被攻破，城中的府库百物，我不取给"[135]。成都攻占后，士卒都舍弃武器，奔赴各府库，争取公家财物，归为己有。因之，当时军用不足，秩序亦不安定，刘备甚为忧虑。刘巴向他提出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即铸造直百钱，平抑各种物价，派诸吏兴办官市"[136]。刘备按照他的建议办理，这样，数月之间，府库充实。

（五）归还田宅以安民

刘备占领益州后，有人建议把成都城中的宅舍及城郊的园地、桑

田分别赏赐诸将士。赵云提出反对意见：

> 霍去病因为匈奴未灭，不考虑安家立业。现在国贼不仅是匈奴，天下未定，不可追求安乐。……现在益州人民遭受兵革之祸，应该把土地房宅都归还给他们，使他们安居复业，然后才可以征调赋税徭役，这样才能得民心，也有利于满足我们财政军事的需要。不应夺占他们的田宅以私分给将士。[137]

刘备采纳赵云的具有政治远见的建议，归还田宅给人民，因之，西蜀人心益加安定巩固。

刘备取得益州后，安邦定国的各项政策措施中，最显著而又取得最大成效的是"用人才"、"行法治"、"安民心"。

刘备在荆州时，就注意延揽人才，所以当时荆楚群士多归附于他。他取得益州后，为了缓和益州统治机构内原来存在的"土著"和"客籍"两大地主集团的对立，他除了重用随他入蜀的"荆州吏士"作为统治和巩固蜀汉政权的骨干力量外，也注意吸收和起用一些有才干的"益州吏士"来支持和加强他的统治机构。刘璋时代的一些故吏，不论是刘璋所信用的董和、黄权、李严，刘璋的姻亲吴懿（璋兄刘瑁娶吴懿的妹）、费观（璋母费氏）还是刘璋所摈弃、忌恨的彭漾、刘巴，只要他们有才干、得人望、愿为蜀汉新政权效忠，他都分别量才录用，升以高位。还不断提拔新进，如任命杨洪为蜀郡太守、邓芝为广汉太守，这样就取得"客籍"和"土著"的文臣武将的团结合作，迅速组成一个得力的干部集团来治政、整军、理财，发挥统治效率。

刘备厉行法治来维护和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为此而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法令、条例。这些法令和条例就其本质来说，自然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主要是针对老百姓，防止他们犯上作乱的，但对于一些豪强地主们的骄横跋扈、不利于集权统治的行为和不利于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行为，也给予一定的限制。这对刘焉以来法令不明、刑罚不严，如他在给法正的信中所提到的一些积弊，有所纠正。法治施行，各级官吏依法办事，政策贯彻，令行禁止，社会也就安定了，政

权也就巩固了。

刘备很重视安抚人民，争取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他早在荆州樊城遭到曹操的精骑追击、南走江陵时，荆州人民多愿归附他。他行抵当阳时，有众十余万人，辎重数千辆跟随他，日行仅十余里。有人劝他抛弃人民，速行退保江陵，不然曹操追兵到达，难以抵御。刘备说：

> 要成就大事，必定要以百姓为根本。现在百姓愿归附我，我们能抛弃他们单独逃走吗？”〔138〕

他入益州后，在葭萌致力于厚树恩德，以收揽人心。攻取成都后，亦重视安抚人民。他采纳赵云的具有政治远见的建议，不夺占人民的田宅以私分给将士，都是对巩固他统治的有效措施。

在论述了《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孙策开拓江东之战》、《赤壁之战》和《刘备袭取益州之战》四个问题之后，可看出东汉末年天下纷乱、群雄逐鹿的时际，一些新兴的统治者能够崛起垅亩、开创基业，绝不是太史公所说的是由于“天幸”、“数奇”。他们自有其成功之道。我们探索三国时代魏、吴、蜀三国的开拓者曹操、孙策、孙权、刘备在军阀混战的激流中，能够乘时崛起，都是由于他们有一套兴邦建国、论安言治的宏规伟略。而重要的一环，又在于他们都有恢阔的气度，能用兼收并蓄的政策去广纳各方面的贤才来组成坚强的领导集团，理政治军，建立起坚强的统治力量。在对敌斗争中，正确而机智地运用谋略，发挥他们团结坚强的力量去击败对手，开创基业，曹操统一北方，孙策、孙权兄弟开拓江东，刘备占有荆、益二州，都是由于重视罗致人才，善于识人用人。反之，如董卓、吕布、袁绍、袁术之流，没有不破败毁灭的。

而在开基创业之后，培养接替人才又是重要的问题。如果治国之人英明睿智，国运会继续昌隆；如果阘弱无能，政权就会日趋衰败。古人说：“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个“人”字，不仅指庶民百姓，今之所谓人民群众，亦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治国的“人才”。“徒善不

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就是说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一定要根据正确的路线、方针，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制度和政策；有了良好的法规、制度和政策，还要有人才去贯彻执行，否则法规、制度和政策不会自行生效的。“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任何良好的政治制度，都赖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去贯彻。创业需要人才，守成亦需要人才。培养人才，使后继有人，历来为能高瞻远瞩、有深谋远虑的人所重视。

我们阅读历史，探寻治乱轨迹，就在于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以资借鉴。

注　释

〔1〕 州牧：西汉武帝时，分全国为十三州，州分若干郡，郡下设县。州置刺史，郡置太守(长行政)，县置县令(长)。刺史本是低于郡守级的巡察官，后曾改称州牧，或复旧。到东汉灵帝时，为镇压黄巾起义，把一些重要州的刺史改为州牧，居郡守之上，掌握一州的军政大权。同时对未改州牧的州刺史，也加大职权兼管军政。

〔2〕 汉献帝刘协是东汉王朝的末代皇帝。他在位三十年(公元190年——公元219年)，用了“初平”、“兴平”、“建安”三个年号。初平四年，兴平二年，建安二十四年。

〔3〕 引自曹操的诗篇。

〔4〕 《资治通鉴·卷六十·献帝初平二年》

〔5〕 原文见《三国志·魏书·程昱传》。

〔6〕〔7〕 原文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8〕 原文见《三国志·魏书·荀攸传》。

〔9〕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10〕 引自曹操诗篇《蒿里》。

〔11〕 原文见《三国志·魏书·毛玠传》。

〔12〕 《资治通鉴·卷六十二·献帝建安元年》

〔13〕 《曹操·置屯田令》

〔14〕 原文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15〕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

〔16〕 引自诸葛亮《隆中对》。

〔17〕 《资治通鉴·卷六十一·献帝兴平元年》

〔18〕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19〕 《资治通鉴·卷六十二·献帝建安元年》

〔20〕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21〕 《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注引《傅子》

〔22〕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23〕 原文见《三国志·魏书·郭嘉传》裴注引《傅子》。

〔24〕〔25〕 原文见《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26〕 持节：对地方掌军政的官加"持节"的称号，给以诛杀中级以下官吏之权。头一等称为"使持节"，再次的称"假节"。

〔27〕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

〔28〕 《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裴注引《献帝传》

〔29〕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四·献帝建安九年》。

〔30〕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献帝初平三年》。

〔31〕〔32〕 原文见《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世语》。

〔33〕〔34〕〔35〕〔36〕〔37〕〔38〕〔39〕〔40〕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三·献帝建安四年》。

〔41〕〔42〕〔43〕〔44〕〔45〕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三·献帝建安四年——五年》。

〔48〕 《三国志·魏书·贾诩传》

〔46〕〔47〕〔49〕〔50〕〔51〕〔52〕〔53〕〔54〕〔55〕〔56〕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三·献帝建安五年》。

〔57〕 原文见《续后汉书·张郃传》。

〔58〕 《收田租令》规定征收田赋，一亩四升，一户出户调绢二匹绵一斤，除此之外，不得擅自巧立名目，额外征收。

〔59〕 杜畿，梁习：杜畿为河东太守，"劝耕桑，课畜牧，百姓家家丰实"，梁习为并刺史，"勤劝农桑，令行禁止，长老称咏"（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四——六十五·献帝建安十年——十一年》

〔60〕 他颁布《论吏士行能令》。令文中说：我从来没有听说无能力的人和不勇敢作战的士兵会得到俸禄和赏赐，会建功立业，使国家兴旺的。所以贤明的君主不授官与没有功劳的臣子，不奖赏不勇敢作战的将士。天下太平年间，可以崇尚德行，但战乱时期，要奖赏有战功的人。他在《败军令》中又说：自从我带兵出征以来，只是奖赏战攻而不追究失败的罪责，这不是国家的正法。现在宣布，将领带兵出征，打败仗的要按军律治罪，造成损失的要撤职罢官，削除封爵。

〔61〕〔62〕〔63〕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注引《吴历》及《江表传》

〔64〕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65〕 《三国志·吴书·吕范传》注引《江表传》。

〔66〕 《资治通鉴·卷六十一·献帝兴平二年》

〔67〕 孙策进击刘繇时，与太史慈酣战于神亭（今江苏丹阳县西界），孙策刺慈马而夺得慈项上手戟，太史慈亦夺得孙策的兜鍪。

〔68〕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69〕 《资治通鉴·卷六十二·献帝建安元年》

〔70〕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三·献帝建安四年》。

〔71〕〔72〕 《三国志·吴书·孙策传》

〔73〕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74〕〔75〕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献帝建安十三年》

〔76〕 原文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77〕 三公制：汉末以三公分掌朝廷大权：太尉掌军事，司徒掌行政，司空掌司法。
〔78〕 《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79〕 《三国志·魏书·贾诩传》引裴注
〔80〕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五·献帝建安十三年》。
〔81〕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82〕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五·献帝建安十三年》。
〔83〕〔84〕〔85〕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86〕〔87〕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五·献帝建安十三年》。
〔88〕〔89〕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90〕〔91〕〔92〕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93〕〔94〕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95〕 蒙冲斗舰：以生牛皮蒙住船的复背，两厢开孔，以便摇橹，左右有弩窗、矛穴，敌人不能接近，矢石也不能攻破它。船并不大，并不靠它来战斗，只是用来快速袭击。斗舰，船上设有女墙，墙上开孔，以便摇橹，向内五尺，又建棚，与女墙等高。棚上又建女墙，派重兵驻守。上面没有复背，前后左右树立旗旌，设置战鼓，这才是战船。
〔96〕 《三国志·魏书·程昱传》
〔97〕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献帝建安十五年》
〔98〕 《三国志·魏书·裴潜传》
〔99〕 《三国志·魏书·贾诩传》
〔100〕〔101〕〔102〕 原文见《三国志·魏书·郭嘉传》。
〔103〕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104〕〔105〕 原文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106〕〔107〕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献帝建安二十年》。
〔108〕 《资治通鉴·卷六十五·献帝建安十三年》
〔109〕〔110〕〔111〕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献帝建安廿年》。
〔112〕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二十二年》
〔113〕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114〕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献帝建安十六年》。
〔115〕〔116〕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117〕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献帝建安十六年》。
〔118〕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献帝建安十六年》
〔119〕〔120〕〔121〕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122〕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123〕 原文见《三国志·蜀书·庞统传》。
〔124〕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献帝建安十七年》。
〔125〕〔126〕 原文见《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注引《魏书》。
〔127〕〔128〕 原文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129〕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献帝建安十九年》。
〔130〕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献帝建安十六年》。
〔131〕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献帝建安十九年》。

〔132〕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献帝建安十六年》。
〔133〕〔134〕〔135〕〔136〕〔137〕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献帝建安十九年》。
〔138〕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五·献帝建安十三年》。

第十二章　三国鼎立时期的三角斗争

赤壁战后十年之间，在三国鼎立的新形势下，吴、蜀、魏三国发生过“三争之战”：魏吴两国争夺淮南之战，魏、蜀两国争夺汉中之战，吴、蜀、魏三国争夺荆州之战。争夺淮南，虽是五次交锋，但都是战略防御性的进攻，打成平手，双方罢兵；争夺汉中，刘备胜利，曹操损兵折将，退保长安。从三国鼎立的总战略形势来看，淮南和汉中的争夺，是两弱攻一强，孙、刘两家互为犄角。这两局的胜负对三国鼎立势力的消长，影响不大。而吴、蜀、魏三国争夺荆州，特别是吴、蜀两国为了争夺荆州的局部利益，拆散孙、刘联盟，转而互相厮杀，破坏了三国鼎立的均势，而吴、蜀两国鹬蚌相争，使曹魏坐收渔利，势力壮大。它所占据的中原地区，生产恢复，军事力量也增强。在三角斗争中，曹魏又重新掌握了主动权。

蜀汉在夷陵兵败后，元气大丧，势孤力弱，蜀汉政权在三角斗争的夹缝中生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幸赖诸葛亮的贤能，抓住关键。对内，他致力于振兴军政，使国力得以逐渐恢复，对外，他深知在三角斗争中，只有两弱联盟，共抗一强，才是立国的大计。因而在外交战略方面，他力谋恢复与吴国的联盟。他所策定的“联吴抗曹”的战略，不仅他一生坚持不变，而且与蜀汉政权相始终。这对保持三国鼎立的局势和对维持蜀汉政权的寿命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可以看出在三角斗争中，三方的战略运用的得失，影响国力的盛衰，很值得军事学者加以研究。本章将就下列两个关键性的战争进行探讨：

——吴蜀魏三国争夺荆州之战；

——诸葛亮联吴攻魏之战。

第一　吴、蜀、魏三国争夺荆州之战

——吴、蜀鹬蚌相争，曹魏坐收渔利——

荆州争夺，由来已久，这是荆州的战略地位和孙、刘、曹三家的战略意图所导致的。吴、蜀、魏三国为争夺荆州，引起樊城、江陵和夷陵三个战役，胜败得失，对三国鼎立的局面影响深远，关系到吴、蜀、魏三国国力的盛衰。因此，很需要讨论三家争夺荆州之战中的三个战役中的战略问题：

——关羽的进攻樊城；

——孙权袭取江陵；

——刘备攻打东吴。

还是应先探索赤壁之战后孙、刘、曹三家的战略意图和孙、刘两家在荆州长期暗斗明争的历史积怨，才能得出比较公正的论断。

一、赤壁战后孙、刘、曹三家的战略意图

荆州有八个郡。赤壁战后，刘、孙、曹三家瓜分荆州地盘。孙权占有南郡、江夏二郡；刘备占有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曹操虽然败退北方，仍扼守南阳、襄阳二郡。这时，除刘、孙、曹三大集团外，其余的残余割据势力，只有关中的马腾、韩遂，汉中的张鲁，益州的刘璋和辽东的公孙渊了。三家瓜分荆州，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而三角斗争表现在荆州问题上的明争暗斗，也就尖锐复杂。

（一）孙权的战略意图

孙权在赤壁之战后，感到北方的威胁暂时解除，便积极向南方扩大地盘，并进攻山越，把掠夺来的村社农民，补充军队。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交州（今广东广西一带）全部为东吴所占有，孙权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早在赤壁之战以前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甘宁曾向孙权提出“夺取荆州，进占樊关，渐图巴蜀”[1]的建议，孙权非常同意。赤壁之战后，汉献帝建安十五

年（公元210年），周瑜到京口见孙权，又陈述西取益州，进图北方[2]的战略意图。

孙权采纳了周瑜的意见，命他回江陵进行战备。可是刘备不甘居人下，出面阻挠，不幸周瑜又病死，使这个进取巴蜀的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从以上这些建议可以看出赤壁之战后，孙权的战略意图不仅是“保江东，观成败”，而是“夺取巴蜀，进占襄樊，向北方发展”。刘备独树一帜，荆益二州地居上游，足以威胁江东，所以此后在三角斗争中，孙权把刘备与曹操都看成是敌人，想在曹操与刘备势不两立的空隙中讨便宜、图发展，对刘备表面上联盟友好，而内藏私心；对曹操既敌对，又不惜妥协求全。

（二）刘备的战略意图

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建立了在益州的统治权。益州有人口五十多万，物产丰富，号称天府之国，战争的破坏较小，立国必要的经济条件也就具备了。但荆州仍然是刘备必须控制的战略要地，刘备要跨有荆、益二州，才好实施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两路出兵以兴复汉室的战略计划。如果失去荆州，则“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这一路破灭，蜀汉要进攻曹魏就只有“率益州之众出秦川”这一路，困难就大了，所以荆州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赤壁之战后，刘备的战略意图是跨有荆、益，贯彻《隆中对》的方针。刘备始终把曹操看成是主要的敌人，势不两立，在外交上主张联吴抗曹，对东吴未怀敌意。

（三）曹操的战略意图

曹操在赤壁之战后，看到孙权和刘备的势力，一时尚不能消灭，而他占领的北方地区，长期的战争，使生产破坏，人口大量死亡流散，如不招抚流亡，发展生产，是没有力量战胜孙、刘的。所以他集中主要精力，一方面整顿内部，保持相当安定的环境，以便恢复生产，一方面转而经略西北，并企图向汉中、巴蜀扩张势力，想先统一整个北方。因此，他对孙权、刘备采取战略防御。在长江北面，控制

几个战略要点，在荆州方向，扼守襄阳、樊城；在淮南方向，控制合肥、寿春。在三角斗争中，曹操对刘备抱敌对的态度，针锋相对，不妥协；对孙权采取一打一拉，破坏孙、刘联盟，孤立刘备，控制孙权。

从三家的战略意图可以看出赤壁之战后，曹操的矛头转向西北，在荆州地区采取战略防御，而孙、刘两家却都想占领荆州，进图中原。这就使三家在荆州的矛盾激化，孙、刘两家的矛盾突出了。

二、孙、刘两家在荆州长期暗斗明争的历史情况

在赤壁之战中，孙刘联盟击败曹操，孙权出力较多。战后，孙、刘两家分享胜利果实，瓜分荆州。刘备占有四郡，孙权却只占有两郡，刘备占得多一些。当时孙权想控制刘备，供他驱使，又借给南郡。而刘备刚在荆州占有一席之地，羽毛未丰，需要安定喘息。大敌在北，他要立国，亦还需要孙权的支持。联合抗曹，仍符合孙刘两家的共同利益。因此，赤壁战后数年之间，孙刘两家仍维持联盟。汉献帝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刘备还上表推荐孙权为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孙权亦推荐刘备为荆州牧，承认其领有荆州的四郡，并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以结盟好。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北方的压力减轻，刘备是一个不甘雌伏的人，久怀独立创业的雄心，岂愿充当马前卒，听从孙权的驱使。加上战后孙、刘两家的战略意图都要据有荆州，进图巴蜀，这就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孙、刘两家在荆州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尖锐，终于由盟友转变为仇敌，公开断杀，而曹操却在一旁利用形势，煽风鼓火，坐收渔利。

试从双方长期的暗斗明争中，探索两家的谋略运用。

（一）汉献帝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刘备亲自到京口见孙权，要求都督全部荆州，并把南郡借给他。当时，孙权方面在对待刘备的态度上，有两种主张。

周瑜和吕范反对借荆州与刘备，并主张把他扣留在东吴。周瑜向孙权上书说：

刘备是一个枭雄，而且有关羽、张飞等熊虎之将，必定不会

长久甘心供他人驱使的。我认为最好的计策是应当把他软禁起来，为他大筑宫室，用美女玩好来消磨他的意志；再把关羽、张飞两人分隔开，由我挟制他们以供驱使，大事可成。现在，如果再以土地资助他，使他们三人聚在一起，就好比蛟龙得云雨，终久不会困处于水池之中。[3]

鲁肃反对扣留刘备，还主张把荆州借给他。鲁肃认为"曹操力量强大，是一劲敌。目前我们占领荆州，恩信未立，民心不一。把荆州借给刘备，使他安抚民心，又给曹操多树一敌，要他在荆州为我们抵挡曹操，这才是上策"。[4]

孙权亦认为："曹操在北，方当广纳英雄"，[5]没有采纳周瑜吕范的意见，让刘备返回荆州。

（二）同年不久，周瑜回京口见孙权，建议略取巴蜀。孙权同意，写信给刘备，要求假道荆州。刘备回信拒绝，孙权没有接受刘备的阻谏，命周瑜回江陵进行战备，又命孙瑜率水军进住夏口。刘备获悉孙权已进行战备，写信警告孙权、正在此时，周瑜又病死，孙权不得已下令召还孙瑜，取消进图巴蜀的计划。

（三）周瑜死后，孙权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替周瑜领兵。鲁肃是主张联刘抗曹的。在他的坚持下，孙权把南郡借给了刘备，分豫章为鄱阳郡，分长沙为汉昌郡，仍命程普为江夏太守，鲁肃为汉昌太守，镇守陆口（今湖北嘉鱼）。

（四）汉献帝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兼并了益州，引起了孙权的不满，认为刘备狡猾，当初阻止他进取益州，而现在他却兼并了益州，竟如此骗诈。孙权派诸葛瑾（诸葛亮的哥哥）向刘备索还荆州各郡，刘备以"我正想取凉州，待我取得凉州后，就把荆州全部归还"为借口，支吾不还。孙权恼怒，就直接派出官吏去接管长沙、桂阳、零陵三郡，但都被镇守荆州的关羽赶走了。孙权恼怒之下，派遣吕蒙领兵二万夺取三郡，派鲁肃率军一万屯驻益阳，抗阻关羽，并亲自进驻陆口，指挥诸军。刘备亦亲自率军五万人来到公安，派关羽率军与吕蒙争夺三郡，双方剑拔弩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恰值此时，

曹操进攻汉中，刘备恐怕益州有失，即派遣使者向孙权求和。双方达成协议，再结盟好，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湘水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属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属刘备。和议达成后，鲁肃镇守陆口。鲁肃是一贯主张“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6]的，因此，双方相安无事者两年。

（五）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鲁肃病死。代替鲁肃领兵的是吕蒙。他和周瑜是一派，与鲁肃的主张不同。他认为：“羽素骁雄有兼并心，且居国上游，其势难久”[7]。他上任后，秘密向孙权提出进攻关羽的建议：

如果能从刘备手中夺得荆州，由征虏将军孙皎守南郡，潘璋守白帝，蒋钦率领水军万人在长江上下巡游，由我率兵前去占据襄阳。如此，何必怕曹操，又何必要依靠关羽。而且刘备、关羽狡诈反复，不可以心腹对待。今天关羽所以尚不敢领兵东向，是因为至尊（指孙权）英明和我们这些人还健在。如果不趁我们东吴实力强大时图取荆州，一旦势力衰弱，再想用武力夺取，那就困难了。[8]

孙权问吕蒙：

“今欲先取徐州，然后取羽，何如？”[9]

吕蒙不赞成攻取徐州。他认为：

今曹军队远在河北，安抚幽冀，无暇东顾徐州，守备兵力薄弱，固然可以夺取。但徐州地处平原，四通八达，曹操精骑，驰骋方便。至尊今日取得徐州，曹操来日必来争夺，即使用七八万人也不容易守住。不如攻取关羽，全据长江上游，对我们有利。[10]

孙权佩服吕蒙的见解，表面上与关羽保持友好，还派人为他的儿子求婚于关羽，而暗中却在寻找机会，袭取荆州。战略意图的矛盾，历史的纠纷，难以消除，必然导致兵戎相见，战争的爆发只是等待机会了。关羽北攻曹操镇守的樊城，自然就成了导火线。

三、樊城之战中关羽、曹操与孙权的战略运用

（一）关羽的进攻樊城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刘备夺取了汉中，又派孟达、刘封占领了汉中郡东部的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东南），势力更加扩大。七月，孙权又进攻合肥，曹操的诸州兵马，东调淮南，与孙权作战。关羽利用这有利的形势，留南郡太守麋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亲率主力北攻樊城。当时，曹操方面由曹仁镇守樊城，于禁、庞德等军驻在樊城北侧，徐晃驻在南阳，相机策应曹仁。八月，大雨，汉水泛滥，于禁等七军被水淹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曹军数万人被俘。关羽乘势围攻樊城，又派一部攻打襄阳。曹操所置的荆州长史胡修和南乡太守（郡治在今河南淅川东南）傅方均投降。关羽的先头部队进占偃城（今湖北襄阳北五里）。陆浑（今河南嵩县西北）人民也起兵反曹，响应关羽。当时关羽的声势浩大，"威震华夏"。曹操感到不安，准备迁都。司马懿献策：

> 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可派人前去劝说孙权偷袭关羽后方，许以事成之后，把江南地方封给他。这样，樊城之围自然会解除。[11]

曹操采纳了这个利用和扩大矛盾，从中取利的策略，派遣使者去见孙权。不久，孙权的使者来到洛阳，向曹操交了一封密信。信中说：

> 即派兵西上，袭击关羽。江陵、公安是两个重镇，关羽如失掉此二城，必定会自行溃走，樊城之围，不救自解。但请为保密，以防关羽有所戒备。[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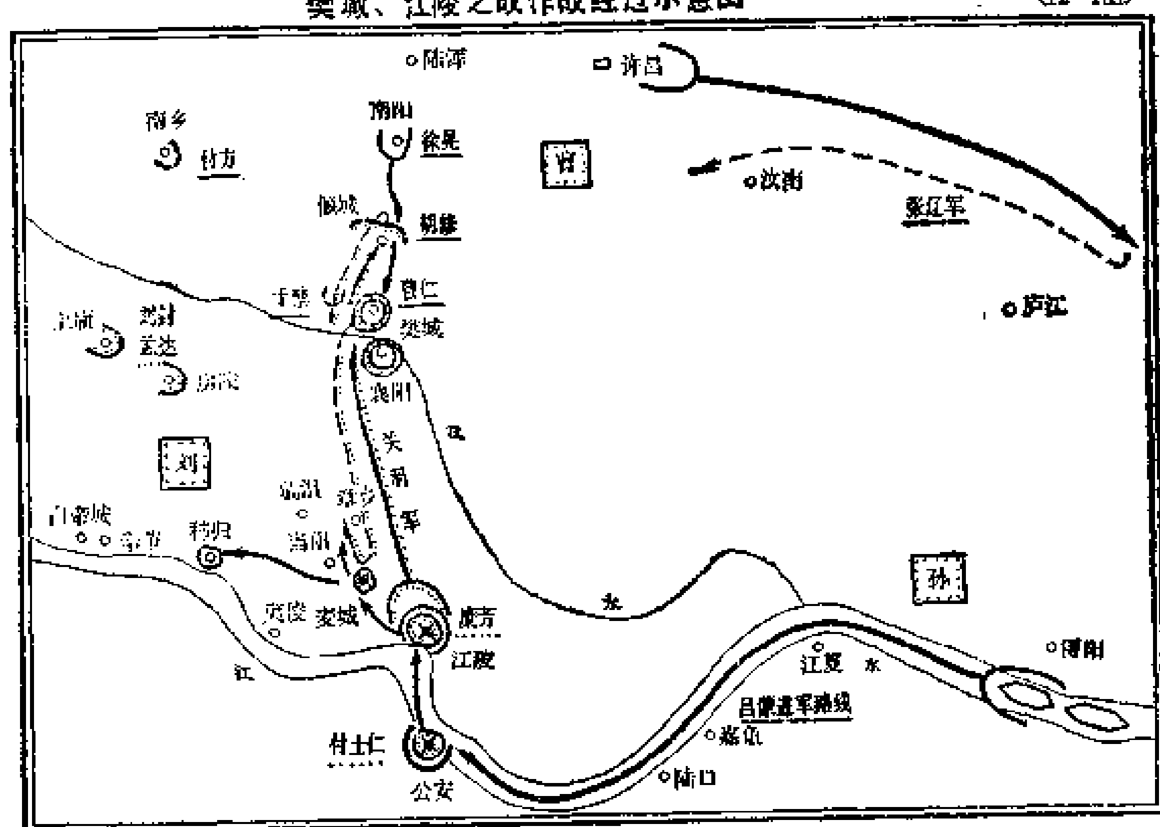
曹操阅信后，询问他的僚属。许多人认为应该为孙权保密。谋士董昭却不同意保密。他认为：

> 处理军务要通权变，以期合乎机宜。应该表面上答应孙权为他保密，而暗中将内容泄露出去。关羽听到孙权率军北上，如果撤兵保护后方，樊城之围，可以立即解除。关羽南返与孙权交战，两敌相斗，我们坐收渔利。如果为孙权保密，使他得逞其志，这不是上策。再者，我被围将士，不知有救，担心粮食不足。产生

恐慌，如果发生意外，局面就难以收拾，应把机密泄露出去为好。[13]

曹操认为董昭的意见很好，即命徐晃用箭将孙权书信的内容分别射入樊城和关羽的营中。被围困在樊城的将士得信后，果然士气倍增，坚定了守城的决心。关羽得信后，一方面疑心是曹操用的离间计，不肯轻易相信而撤兵回江陵，使前功尽弃；一方面又担心孙权真的背盟，偷袭荆州使他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徘徊犹豫，进退难决。（参看插图12-1）

樊城、江陵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12-1图）



（二）关羽应不应该进攻樊城

关羽北攻樊城，导致后来东吴袭取江陵，既失荆州，又遭杀害，历来对他多有责难，说他不该冒险。这个问题值得探讨。蜀汉的基本战略，就是要确保荆州，作为出兵宛洛的基地。但孙、刘两家平分荆州后，蜀汉只占有三个郡（实际上只有两个半郡）地区狭小，要从荆州直向宛洛的条件就不够了。失之于东吴，只好相机取之于曹魏，不能只

是镇守南郡，坐着不动。从荆州的地略上看，江陵与襄樊对峙。“江陵去襄阳步道五百里，势向唇齿。无襄阳，则江陵受敌不立”[14]，这说明襄阳是江陵的门户，要保江陵，非争取襄阳不可。在东吴把湘水以东的桂阳、长沙两郡取走之后，江陵后方空虚，而且处在曹孙两家的夹缝之中。只有北取襄樊，才能依托汉水，摆脱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从当时的形势上看，刘备略取了汉中，刘封孟达占据了上庸，曹军主力又东调淮南，关羽乘机攻打樊城，这是蜀汉的基本战略和当时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无大错。但关羽最后失败了，荆州全部丢失了。错在那里呢？关羽错在两点：（1）未防备孙权背盟。这作为军事家来说是不应该的。历来是有利则盟，损利为敌。（2）处在那种形势下，竟调用全部兵力北上，后方空虚使敌乘虚而入。加之傅糜投敌，可谓不知彼，也不知己。刘备、诸葛亮更应注意、此次关羽的失败，刘备、诸葛亮也是有一定责任的。错在他忽略了保守荆州根本。有人认为关羽擅取东吴在湘关的大米，激怒孙权发兵袭击江陵。孙权要袭取荆州，早有预谋，难道不取他的大米，他就不发兵偷袭了吗？有的评论说“孙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15]，增加了政治上的裂痕，拆散了孙、刘联盟。两家联盟是双方早先的国策所决定的，是双方利害的结合。有利可图，联盟可固；无利可图，联盟则散，儿女姻亲之谊何能作为巩固联盟的重要纽带。刘备与孙权是郎舅之亲，又何能保障两家永结盟好。

关羽坐镇江陵，前有曹操是明敌，后有孙权是暗敌。特别是在一场斗争平分荆州之后，孙、刘联盟名存实亡的情况下，关羽应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处境，对孙权不特应虚与委蛇，防其败盟，更应随时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为关羽计，应与刘备配合，不时聘问东吴，以观动静，军事上应稳步向北发展，力求在巩固后方的基础上作有限目的的进攻，速战速决。即以蚕食的手段，捞一把就回固根本，以达扩张的目的。能取则取，不能取绝不恋战，不应在攻取樊城不下的时候，调守备江陵的兵力北上增援，使后方空虚。在获悉孙权有袭取荆州的阴谋后，不应自恃公安、江陵守备坚固，仍胶着于坚城之

下，徘徊犹豫，不迅速回军，毫不警觉傅、糜二将怀有贰心，使吕蒙兵不血刃地袭取了南郡。当年曹操围攻张绣于穰县，听说袁绍有南下袭击许昌的谋议，曹操立即解围，撤兵回许昌，避免两面作战，巩固基地。关羽在战役指导上，忽略了基地的保卫，这是一个典型战例。民间传说的"大意失荆州"，从军事上说，不是什么大意，作为镇守荆州重镇的统帅关羽，如是麻痹大意，骄傲轻敌，不固本而去逐末，是应受到谴责的。

曹操在赤壁战后十年之间，曾与刘备争夺汉中，与孙权争夺淮南，但对这三家必争的荆州重地，尽管他处在近水楼台，始终谨守襄樊，没有主动用兵，来与孙、刘争夺，这可以说他吸取了赤壁鏖兵的教训，领悟了郭嘉的"急之则相保，缓之则争心生"的策略。他不贪急功近利，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谋虑深远，主动撤守襄阳，把南郡的江陵这个骨头抛出去，让孙、刘两家去争夺，给他们制造矛盾，而坐收渔利，以及他故意泄露孙权偷袭荆州的阴谋，企图使二虎相争，都显示曹操在三角斗争形势下运用谋略的高妙。

四、江陵之战中，关羽、吕蒙和曹操的战略运用

（一）孙权袭取江陵

早在关羽进攻樊城时，吕蒙就认为这是东吴袭取荆州的有利时机。他向孙权写了一封密信，说：

> 关羽进攻樊城，却多留备兵（预备队），这一定是怕我领兵袭击他后方，我常有病，将军可以治病为名，把我调回建业（今江苏南京）。关羽闻此消息，必会撤出后方预备队，增援襄樊前线，这时，我大军沿江昼夜兼程西上，袭其空虚，南郡可以拿下，关羽可以俘获。〔16〕

孙权赞同吕蒙这个"用而示之不用"的计谋，公开发布命令，调吕蒙回建业治病，秘密与他策划袭取荆州的作战方案。吕蒙过芜湖，定威校尉陆逊前来探视他并对他说：

> 关羽炫耀他的骁勇，盛气凌人。北攻襄樊，初建大功，便趾高气扬，一心想北进，对我们未怀戒心。如果他听说你因病离

职，必定更疏于戒备。这时如出其不意，发动进攻，就容易取得胜利，见到孙将军时，请同他很好策划。[17]

陆逊的想法与吕蒙不谋而合。但那时吕蒙为了保密，不便向他透露回建业就医的真正意图，还向他解释说关羽占据荆州，恩信昭著，现在攻打襄樊，又著功劳，气势更加旺盛，不是可以轻易图谋的！

他回到建业，孙权问他：何人可以代替你的职务？吕蒙即向孙权推荐陆逊说：

陆逊计虑长远，才能出众，观察他的运筹规划，是可以担负重任的。而且他的名声不大，关羽不会注意他。如果任用他，要他外表上隐晦我们的意图，暗中窥察形势的变化，伺机袭击，一定会成功。[18]

于是孙权任命陆逊为偏将军、右部督，接替吕蒙职务，镇守陆口。陆逊到职后，为了进一步麻痹关羽，助长他的骄气，用孙子"卑而骄之"的计谋，写了一封信恭维关羽：

樊城一战，于禁被俘，远近无不敬佩将军的功勋，足以流芳百世……。但曹操是个狡诈的人，不会甘心失败，恐怕要增调援兵，以求一逞。虽说曹军师老，还很强劲，有相当的战斗力，从另一方面说，战胜之后，常会产生轻敌思想。古人用兵，军胜弥警（打了胜仗要愈加警惕）。希望将军多考虑方略，以期获得全胜。我是一介书生，没有能力负此重任，幸得同将军这样德高望重的人相与为邻，愿意把我所想到的向将军倾吐，虽然是不一定合策，可供参考，望将军察纳。[19]

关羽接到陆逊的信后，被信中的恭维之词所蒙蔽，便"意大安，无复所嫌"[20]，把后方的预备队抽调一些去增援襄樊前线，不再防备东吴。此时，关羽俘获于禁部队人马数万人，因粮食缺乏，擅取了东吴屯积在湘水东岸关卡上的粮食以充军食。于是孙权以此为借口，命吕蒙率军袭击江陵。

吕蒙率军进至浔阳（今湖北九江附近）时，率津右护军蒋钦、偏将军潘璋、朱然、平虏将军周泰、中郎将韩当、骑都尉虞翻诸将西上，

把全部精兵隐藏在大船中，使士兵都穿上白色的商人衣服摇橹，昼夜不停地溯江而上。关羽在沿江所设的了望哨所，全部被吴军破坏，关羽完全不知道。吕蒙利用关羽军内部的矛盾，派人先后说降了傅士仁和糜芳，公安、江陵两个荆州的重镇，就这样兵不血刃地被吴军占领了。从军事上说这是保密、伪装、突然袭击的典型战例。

吕蒙占领江陵后，一面为了争取人民的同情和瓦解蜀军的斗志，立即抚慰蜀军将士的家属，并下令军中，不得侵扰居民，经常派亲信去慰问老人，有病的给医药，饥寒的给粮衣；一面派陆逊继续西进，攻占夷陵（今湖北宜昌）、秭归，招降少数民族，控制益州的门户，切断关羽入川的退路。

关羽得知南郡失守，即率军南撤。曹仁部下诸将大多数认为应乘势追杀关羽，但赵俨不同意追击，他认为：

> 孙权乘关羽进攻襄樊的时机，偷袭关羽的后方，他害怕我们乘关羽回救江陵时，进攻他们，所以向我表示和好，愿为我们效力。现在关羽已经势穷，应该保存他，让他去向孙权搏斗。如果深入追击关羽，会引起孙权改变对关羽的态度，转而防备我们，对我们是会不利的。望对此深加考虑。〔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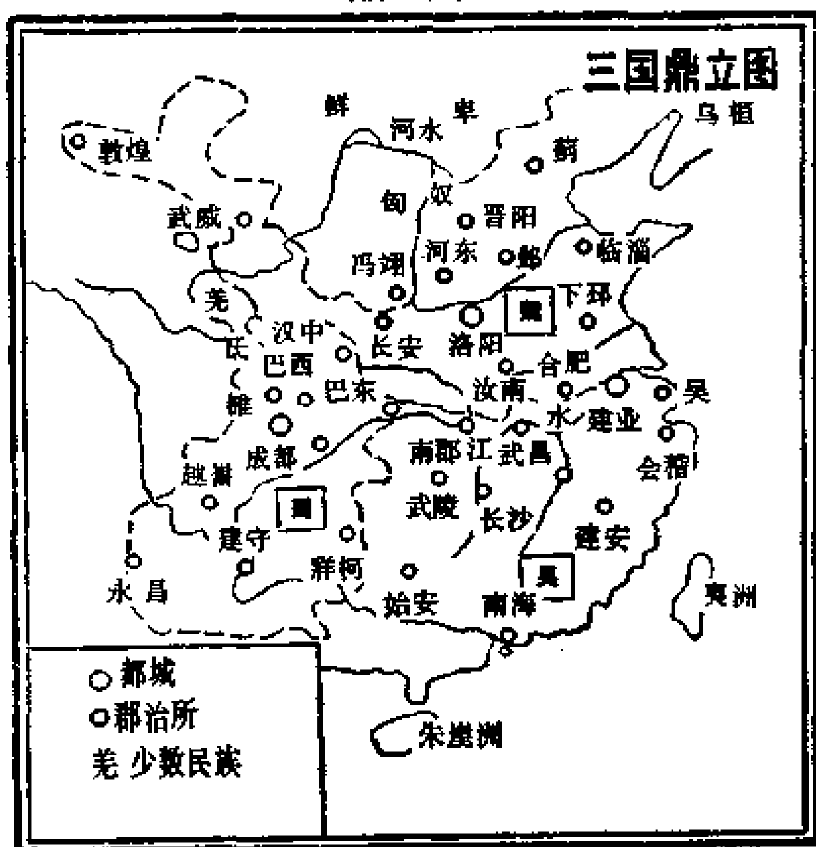
曹仁同意赵俨的意见，便下令停止追击。曹操得知关羽撤退的消息后，担心前线诸将发起追击，也赶快派人送来不许追击的命令，道理与赵俨所说的计策一样。

关羽在回军途中，数次派人去江陵探听吕蒙的动向。吕蒙每次都厚待使者，让他们周游城中，一家一家地去访问蜀军将士的家属。使者回去后，传播了吴军优待家属的消息，于是蜀军将士全无斗志了。

关羽派人去上庸，要刘封、孟达发兵前来救援，两人却以上庸初定为理由，拒绝发兵。关羽自知势穷，不敢回江陵。十一月，西走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五十里），士卒离散。十二月，至章乡（一说在沮临，均在今湖北当阳境内），归路被吴将朱然、潘璋切断，为吴军擒杀。于是刘备的荆州各郡全部为孙权所占领了。第二年秋天，上庸守将刘封与孟达不和，孟达以上庸降曹。至此，刘备在大巴山以东的

地区就全部丢掉。三国鼎立的疆界便最后出现了。（参看插图12-2）

魏蜀吴三国鼎立图　　（12—2图）



（二）孙权袭取江陵的得失

纵观吴蜀争夺荆州之战中的江陵一役，东吴胜利了，占领了全部荆州，达到了“全据长江”的目的。就东吴当时的局部利益来看，似乎是有利的。可是从三国鼎立的全局和从长远利益来看，东吴争夺荆州过早，破坏孙、刘联盟这是失策的。因为赤壁战后，曹操虽然败退回北方，但仍占有荆州的两郡，孙权得交州，加上原有的扬州，孙、刘的地盘都有所扩大，但曹魏国力强大，孙、刘国力弱小的基本形势并没有改变。刘、孙两家联合抗曹，才可保持三国鼎立的均势。鲁肃和诸葛亮很有战略眼光，看到了孙、刘联合的重要性。鲁肃主张继续联刘抗曹，建议把南郡借给刘备，是具有较为远大战略意义的策略，对东吴的切身利益来说，在避免南北夹击，给刘备一个抗曹正面以分曹势这一点上，也是有利的。对长江下流的安全，当然也有不利的一

面，但从整个形势说，如果东吴不向蜀汉挑衅，蜀汉主动大举攻吴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形势变化，曹魏变弱，那当然又当别论。

孙权评论鲁肃说："惟劝吾借荆州与刘备是其一短"。[22]金圣叹批评说："正是其长处，何云短耶"。金圣叹批得很好。鲁肃具有远见卓识，不愧是东吴的第一流将才。

就赤壁战后长江上游的形势看，刘备占有的荆州四郡，在长江以南，而孙权占有的南郡，在长江以北。江陵与曹操扼守的襄阳顶牛对峙。当时，曹操对荆州战场虽然暂时转取战略防御，另图关中，但他仍数次调集大军到长江下流的合肥前线与孙权争夺淮南，曾数次交锋。如果长江中流的江陵防务，也由东吴来承担，而让刘备的军队处于长江以南的第二线，孙权在江陵合肥两线同时受敌，是非常失策的。把南郡借给刘备，实际上是把江陵防务让给刘备，让刘备去充当抗曹的战略前哨，而把东吴的力量全部集中到合肥，抗击曹操，这样共同抗曹，曹操也就难以发展其势力。鲁肃建议借南郡与刘备的目的，不是让刘备壮大，兴复汉室。用鲁肃的话来说："帝王之起，皆有驱除，羽不足忌"[23]，就是使关羽为东吴承担"驱除"的任务。史载曹操"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24]，可见曹操对孙权把南郡借给刘备这件事，反映是很强烈的。鲁肃在三角斗争中下的这着棋："借南郡与刘备"，比周瑜、吕蒙是高一着！

赤壁战后，孙权采纳周瑜、吕蒙、甘宁等人的建议所策定的战略意图："夺取巴蜀，进据襄樊，向北方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谋国者既要有远见，也要重视现实。在"无四方之志"的刘表盘据荆州的时代，东吴想从刘表手中夺取荆州，巩固长江上游，向北方发展，这一战略意图是可取的。但在赤壁战后，三家瓜分了荆州，刘备占据了荆州四郡，控制着入巴蜀的峡口已成为客观存在的现实。此时，孙权还只看见荆州"居国上游，其势难久"，认为"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关羽骁勇，有兼并心"，总想把刘备的势力兼并或全部赶出荆州，全据荆州进取巴蜀，而忽视强大的敌人曹魏还雄踞北方。把曹操当做敌人，把刘备也当做敌人，这就很不现实了。在三角斗争中，首先应用

"卞庄刺虎"之策，让两虎相斗，以乘其敝，或助弱以攻强，或两弱联合共抗一强，而不应两弱互相厮杀，使强者坐收渔利。

战后，刘备在荆州理应占有一席之地。关羽单刀赴会，与鲁肃阵前谈判。鲁肃奉孙权之命，责备关羽不归还三郡。关羽反驳说：

> 赤壁之战，左将军（指刘备）亲历战阵，协力破敌，岂能徒劳，无一席土地。而足下（指鲁肃）欲来收地。[25]

可以说是理直气壮。不过，刘备占得多一些，双方应通过协商来解决。所谓"借荆州"与"还荆州"的问题，实际上"借"亦只是借赤壁战后周瑜所取的南郡的南部江陵地区，并不是借全部荆州（曹操退出江陵后，仍占据南郡的北部地区另立襄阳郡），让刘备充担抗曹的战略前哨，孙权退处第二线，对东吴也是有利的。后来两家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刘备让出长沙、桂阳二郡与孙权等于换取了原借的南郡，也等于"还了荆州"。当时，刘备作了让步，由原来的五个郡减为三个郡，仍承担抗曹的战略前哨，孙权占了上风，由原来的一个郡增加为三个郡，也弥补了战后两家分配的不平。应说这是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孙权当时派诸葛瑾报命，愿重申盟好。和议达成后，孙权应该守盟约，共同联合抗曹，削弱曹操，壮大自己，对双方才有利。为孙权自己利益计，值曹刘相争之际，应助兵助粮，助关羽围攻樊城，打击共同敌人曹操。待关羽节节胜利，曹操大受损失，兵威不振的时际，才突然袭击江陵，使曹、刘两败俱丧，自己坐收渔利，以期最后主宰中原。所以从战略全局来看，孙权过早袭取江陵是很不明智的。关羽败亡，东吴也不是胜利者，而是把最后胜利拱手送给了曹魏。

吕蒙向孙权献策，主张"先取关羽"并自告奋勇愿"为国家前据襄阳，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他反对利用关羽去作挡箭牌，而愿自己去充当挡箭牌，其勇敢可佳，其运用策略实拙。吕蒙这个吴下阿蒙，中年发愤读书，有所增益。他治军严明纪律，不侵扰百姓，是一个好将领。孙权称赞他"筹略奇出，次于公瑾，图取关羽，胜于子敬"[26]，但他学兵略，只学得决胜疆场的一些诈谋诡略，如诈病回建业，白衣渡长江，他没有学得安邦定国的雄才大略。

在江陵之战中，关羽率军回救江陵时，曹操下令不许追击，让关羽回去同吴军搏斗，既减少自己的损失，又可坐收渔人之利。这是战国策士们所谓的“两利而俱存之”的计谋。这又显示曹操用兵的老练。

五、夷陵之战中刘备、陆逊和曹丕的战略运用

刘备怒而兴师，攻打东吴，挑起吴蜀夷陵之战。结果，蜀军大败，元气大伤，一代枭雄亦忧愤成疾，病死永安。历来对刘备此举，评论不一。杜工部诗：“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古今论者在“失吞吴”三字上有争论。我们赞成“失吞吴”是说吞吴失策。为了展开论述，应先叙述夷陵之战中蜀、吴、魏三国的料敌决策来提供论证。

（一）蜀国方面

孙权败盟袭取荆州，关羽被杀，对刘备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隆中对》中所拟定的两路分兵，北取中原的战略计划遭到破产，刘备不甘心这场失败，决意用武力夺回荆州。蜀昭烈帝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后，于同年七月便亲自统率五六万大军攻打东吴。刘备要打东吴，蜀汉的群臣很多都不赞成，翊将军赵云也反对出兵，他说：

> 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如果我们先灭掉曹操，孙权自会降服。现在曹操虽死，但曹丕执政。应当利用百姓对曹魏不满的情绪，早日出兵夺占关中，控制黄河、渭水的上游，以讨伐奸逆。因此，不应把曹魏搁在一边，先和东吴作战。战争一打起来，短时间不能解决，这不是上策。[27]

吴国的南郡太守诸葛瑾也写信给刘备，陈说利害关系，要刘备从全局考虑，停止用兵。信上说：

> 忽然听说蜀军从白帝城来攻打东吴。有的担忧你的谋士们认为吴王曾袭取荆州，杀害了关羽，双方已怨深祸大，不应再谈和议。这是着眼于小节，没有留意于大局。我试向陛下（指刘备）衡论此事的轻重和大小。陛下如能忍一时之忿，详细审度我所向你陈述的这番话，大计可以立即裁定，不用再询问你的群臣了。

陛下把你与关羽的关系和你与先帝（指汉献帝）的关系比一比，又哪能比得上先帝呢？把荆州局部问题与海内大局比一比，又哪个大哪个小呢？如果都应视为仇敌，予以打击，也应考虑哪个应放在先，哪个应放在后，如能审度这番道理，处理此事就易如反掌了。[28]

刘备都未采纳。

孙权亦派遣使者来求和，刘备也拒绝了。

魏文帝黄初二年、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六月，刘备将出兵东征东吴，命车骑将军张飞率军万人自阆中（今四川阆中）会师江州（今四川重庆）。临出发前，张飞被其部将张达、范强杀害，持其首级奔降孙权。刘备遂留诸葛亮在成都辅佐太子刘禅守国，留赵云在江州为后军都督，亲自统率黄权、张南、冯习、吴班、陈式、关兴诸将、兵四万余人东征。随备出征者还有刘巴、张绍、马良、王甫、程畿等。

（二）吴国方面

孙权于袭取荆州、击杀关羽之后，常虑刘备报复，对刘备的大举进攻是早有防备的。

——把都城从建业迁到武昌（今湖北鄂城），以便扼守荆州；

——任命陆逊为镇西将军，镇守夷陵，所部李异、刘阿等进驻巫县（今四川巫山）、秭归（今湖北秭归），以加强西线的防务；

——任命周泰为汉中太守、奋威将军，相机图取汉中；

——任命刘璋为益州牧，驻守秭归，以图蜀汉（按刘备迁刘璋于公安，孙权击杀关羽后得刘璋，因以利用之，不久刘璋病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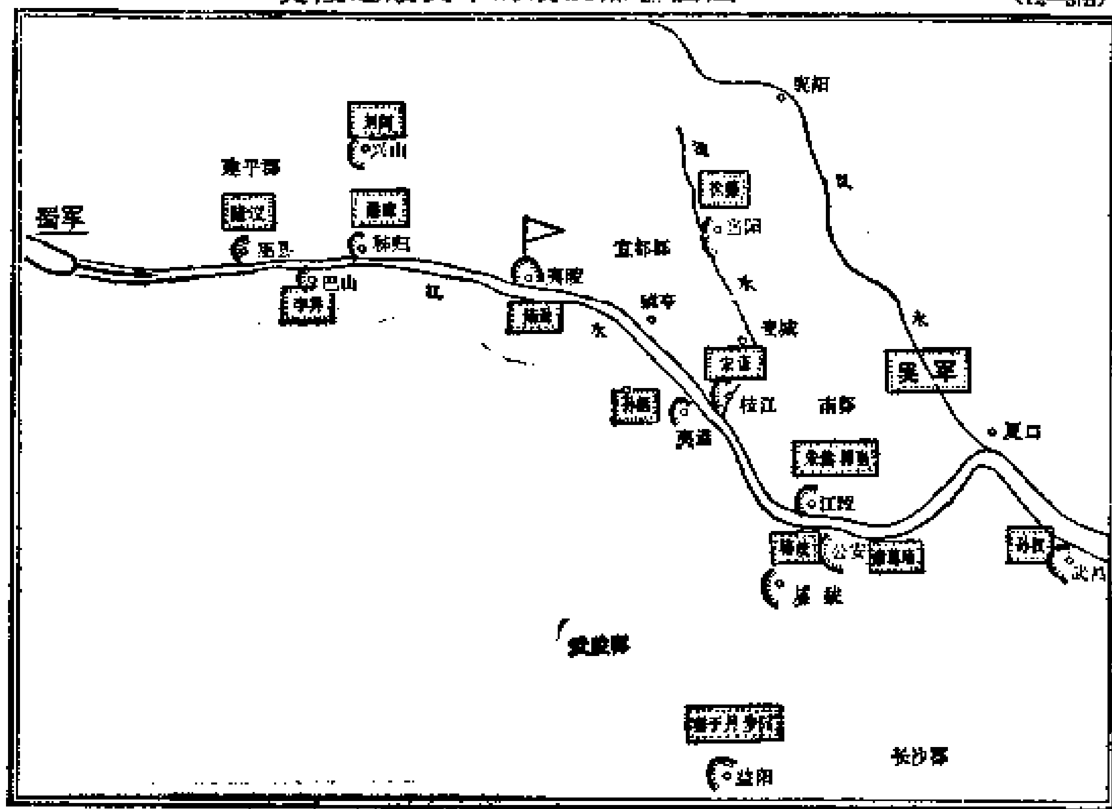
——派遣使者到蜀汉，要求议和，重归于好；

——又派遣使者卑词上表向曹丕称臣，又遣还魏将于禁、朱光等，向魏国靠拢，以免曹魏出击，使他两面受敌；

刘备率军东下后，他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领朱然、潘璋、韩当、徐盛、诸葛瑾、鲜于丹、步騭、孙桓等部五万人西上拒蜀。其军队的战役部署如次：（参看插图12-3）

建平郡方面

夷陵之战吴军的战役部署要图 （12—3图）



振威将军领固陡太守潘璋督诸军防守秭归；

将军陆议防守巫县（今四川巫山）；

将军李异防守巴山（今湖北巴东东北）；

郎将刘阿防守兴山（今湖北兴山）；

宜都郡方面

右护军镇西将军娄侯陆逊防守夷陵；

将军宋谦督水军防守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之江北）；

安东中郎将孙桓率万人防守夷道（今湖北宜都县西北）；

南郡方面

昭武将军西安乡侯朱然防守江陵，偏将军领永昌太守韩当辅之；

建武将军领庐江太守、都亭侯徐盛防守当阳；

绥德将军领南郡太守、宣城侯诸葛瑾防守公安，兴业都尉周胤（周瑜之子）率千人属之；

建忠将军中郎将骆统率三千人防守孱陵（今湖北公安西南）；

武陵长沙郡方面

平武将军广信侯步骘、武陵郡都尉鲜于丹督万人防守益阳；

孙权在武昌督其余诸将士，以备向各方支援。

（三）魏国方面

当孙权派遣使者卑词上表，向曹丕称臣时，刘晔对曹丕说：

孙权无故派遣使者来求降，国内必有急难。孙权前次袭杀关羽，夺取荆州四郡，刘备必定大举出兵讨伐他。东吴外有强敌压境，内部百姓不安定，又怕我国乘隙进攻它，才愿称臣求降。一方面是想阻止我国出兵，一方面是想假借我国的援助，以增强其力量，而疑惑敌人。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国和蜀国各据有一州之地，阻水依山，有急相救，这才是小国的利益。现在还自相攻伐，必致灭亡。我们应该大举发兵，直接渡江袭击东吴。蜀国攻打它的边境，我国袭击它的腹地。吴国的灭亡，会不出旬日。吴国灭亡了，蜀国就孤立，即使把吴国的地盘割让一半与蜀国，蜀国也不能长久生存。何况蜀国是取得吴国的边远地区，而我国是占有吴国的腹心地域。[29]

但是曹丕主张乘机袭击蜀国，他对刘晔说：

“孙权向我称臣投降而我去攻打他，会使天下向我归降的人增加疑心。不如接受吴国的投降，而出兵袭击蜀国的后方。[30]

刘晔不赞同袭击蜀国的战略，他具体分析了当时的地理形势，认为：

我国距蜀国远，距吴国近。孙权听说我国进攻他，即使回军，亦不能阻止我国的进攻。现在刘备已愤怒，正出兵进攻吴国。听说我国也出兵攻打吴国，料定吴国必会灭亡，就会感到高兴而迅速进军，与我国争割吴国的土地，必不会改变他原来的计划，抑制愤怒去救援吴国的。[31]

曹丕没有采纳刘晔的“大举发兵，直接渡江袭击东吴”的作战方案，接受了孙权的投降；但也没有乘机实施“出兵袭击蜀国后方”的方案。直到夷陵之战结束，陆逊已胜利收兵之后，曹丕才三路出兵攻打东吴。

蜀昭烈帝章武元年（公元 221 年）七月，蜀军先头部队击败防守

巫县的吴军，进占秭归。陆逊率军向东实施战略退却，一直退到夷道（今湖北宜都西）、猇亭（今湖北宜都古老背）之线后，才停止退却，转入防御。次年正月，蜀军吴班、陈式的水军占领夷陵，屯兵长江两岸，刘备也进抵秭归，他派黄权为镇北将军，指挥江北诸军，以防魏军进击蜀军的翼侧，自己亲率大军从南岸翻山越岭前进。二月，蜀军主力进至猇亭，前部到达夷道，将孙权的侄儿孙桓率领的一部分吴军包围。吴军一些将领认为孙桓是公室贵族，已被围困，主张派兵前往救援，陆逊不同意，向诸将解释：

"安东(孙桓)得士众心(深受将士爱戴)，城牢粮足，无可忧也。待吾计展(待我用计谋取胜)，欲不救安东，安东自解（安东将军之围自解）。"[32]

诸将认为陆逊畏敌怯战，并自以为是孙策时期的部下，或公室贵族，各自矜持，心怀不服。听到陆逊如是解释，众起哗哄，不听号令。陆逊立起按剑、声色俱厉地对诸将说：

刘备是天下知名、曹操所畏惧的人物。现在进入吴国国境，是一劲敌。诸位将军共受国家恩泽，应当互相和睦，协同剪灭敌人，以报答国家。而现在不听从号令，是说不过去的。我虽是一个书生，却是受命于主上。国家所以委屈诸位将军归我提调指挥，是以我有尺寸之长。尚可称职，能忍辱负重。希望各守职责，不讲二话。军令有规定不可触犯。[33]

诸将听到他词严气壮的诘责，默然不语。遵照军令，各守不战。但对战局安危，心怀忧惧、抱怨孙权用人不当，对这位懦弱而又骄横的大都督，敢怒而不敢言。适值蜀将吴班率数千人立营于平地，向吴军挑战。诸将又向陆逊建议，争请出军进击蜀军。陆逊从兵力、士气、地形等条件分析说：

刘备举兵东下，锐气正盛。且凭藉高处，占守险要，难以一举攻破、即使攻破，也难获全胜。如果出击不利，影响大局，那就不是小的事故了。现在我们应奖励将士，多多出谋划策，以待形势的变化。如果此间是平原旷野，倒担忧会有颠覆的忧虑。

现在蜀军沿山地行军，态势难以展开，自会疲敝于崎岖的山道之间，我们可以慢慢抓住他的弱点制伏它。[34]

陆逊对蜀军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陆逊转入防御后，刘备以一部兵力围攻夷道的吴军孙桓部，自己率大军从巫峡建平（故治在今四川巫山）连营至夷陵界，一路立了几十个屯。陆逊扼守阵地，坚不出战。刘备急于求战，派兵引诱，陆逊亦不出击，两军相持半年后，陆逊发现刘备的锐气已被遏止，他上书吴王：

夷陵要害是国家要地，易得亦易失。失掉夷陵，不但丧失一郡之地，荆州亦可忧。现在与蜀军相争夺，应当寻求妥当之策。……我当初担心蜀军水陆具进，现在反而舍船上陆，处处结营。观察蜀军部署，不会有其他改变。望至尊（指孙权）高枕无忧。[35]

六月，陆逊准备反攻，一些将领困惑不解，陆逊向他们解释：

刘备是一狡猾敌人，经历多，识见广。他的军队开始集结时，各方面考虑得很细致，士气也旺盛，我们不应同他硬拚。现在他们驻扎很久，没有得到进攻机会，兵士已经疲困，斗志已经消沉，策划不出好的计谋。所以现在正是我们发动反攻、打败蜀军的好机会。[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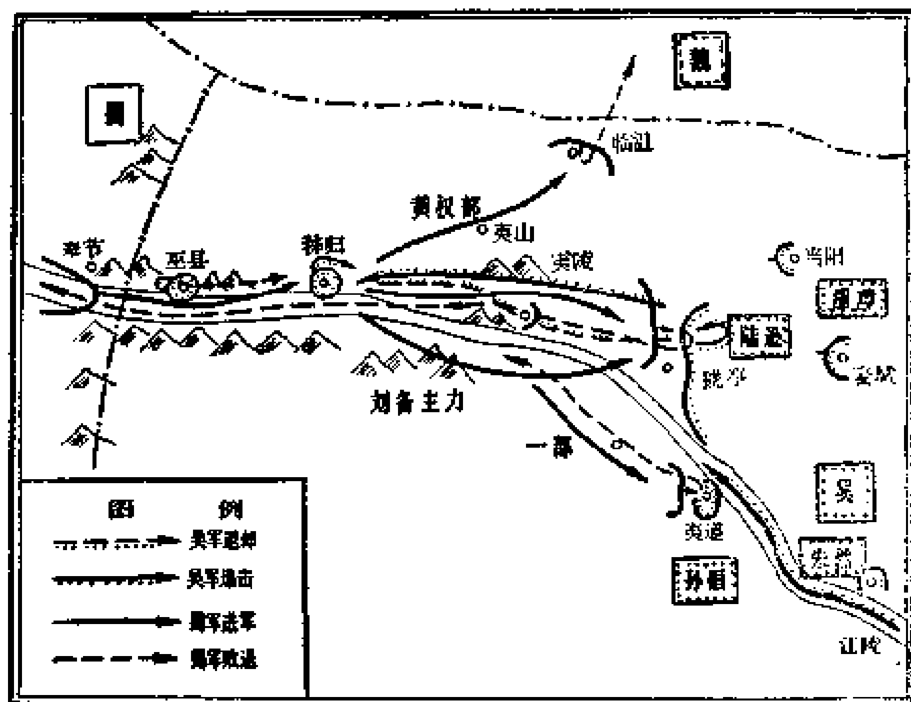
陆逊作试探性的进攻后，决定采用火攻，焚烧蜀军的营寨，蜀军大乱。陆逊乘势发起进攻，很迅速地攻破了蜀军营寨四十余座，蜀军土崩瓦解，死者无数。刘备带领少数人马，乘夜突围，逃回白帝城。蜀军人马大部分损失。“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37]，元气大丧。在江北的黄权，由于道路被截断，不能回蜀汉，被迫率部投降了曹魏。（参看插附图12-4）

刘备逃回白帝城后，吴军的一些将领徐盛、潘璋等主张乘机追击，捉拿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回答说：

曹丕集结大军，表面上假托支援我军攻打刘备，腹内实藏奸心，请决定大计，下令退军。[38]

孙权采纳了陆逊的建议，乘胜收兵。九月，曹丕果然三路发兵进

夷陵之战吴蜀两军作战经过示意图 (12—4图)



攻东吴。因东吴早有准备，相持了半年，曹魏罢兵。

（四）陆逊的战略运用

夷陵之战开始时，形势对东吴是不利的。陆逊的兵力少而分散地守着峡中的几个孤立的要点，武陵的少数民族又反对吴军，刘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在这种情况下，急于与蜀军决战是不利的。在作战指导上，只有先让一步，才能保存力量，待机破敌。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吴蜀夷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对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上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03页)陆逊让出峡口，向东实施大胆的战略退却，历时半载，坚守不战，终于疲惫了蜀军，分散了蜀军的兵力，使蜀军意志沮丧，使刘备一筹莫展。而吴军则摆脱了初期的不利态势，集中了兵力，改善了兵力对比，掌握了主动。通过调查研究，在有利的情况下，选择反攻的时机，掌握反攻的方法，实施火攻，取得决战的胜利。

当陆逊抗拒刘备于猇亭时，使他最感棘手的事是由于他初任统帅，素乏声威，诸将以为他畏敌，怯战，心怀不满，各自矜持，不听

节度。设非他善明法度，调度有方，折节下士，忍辱负重，实难克服此种困难。在夷陵之战中，陆逊的卓越的统帅指挥才能在于果断地实施战略退却、坚定地坚持“敌疲而后攻”的战役指导和喜明法度以统御诸将。至于战术上的火烧蜀军的连营，实乃刘备不知兵所致。

在夷陵战胜后陆逊根据对全局形势的分析，及时回军，不穷追刘备，是正确的。曹丕在北方，虽然接受了东吴的投降，并封孙权为吴王，他深知曹丕内藏奸心，观望是暂时的，友好是表面的，东吴两面作战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陆逊并沒有为曹丕的友好态度所麻痹，沒有因胜利而矜骄，建议孙权“请早定大计，下令退军”，这都表明陆逊具有将略，不图急功近利，能从全局考虑战略行动的得失。

（五）刘备打东吴的得失

荆州争夺，由来已久，有的评论者认为：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平分荆州后，刘备让出荆州的两郡对孙权是让步。双方达成和议后，孙权不应背弃盟约，袭取江陵。在击杀关羽独占全部荆州之后，又装出一副笑脸来与刘备讲和。这等于强盗夺占了邻人的房屋，杀死邻人的亲属，又伸出手去要邻人与他握手言欢，这是《水浒传》上牛二卖刀的赖皮行为。刘备为报杀关羽之仇，雪失荆州之恨，出兵攻打东吴，惩孙权背信弃义之罪，这一决策是未可厚非的。刘备在夷陵兵败，败在部署错误，指挥失当。在兵力部署上，七百里连营扎寨，兵力分散，攻不能集中兵力，以求决战，守不能机动兵力，以照应首尾。当时，曹丕就批评：“备不晓兵，岂有七百里连营可以拒敌者乎”！[39]刘备一生戎马，创业艰苦。他有统将用士的雄才，却不长于担任疆场指挥的重任。他亲率大军东征，随行沒有一员能征惯战的宿将，幕内沒有一个出谋划策的谋士。只有一个老将黄权，亦派去指挥江北的蜀军以防魏军，而面临的东吴对手，则是深通韬略的陆逊，在指挥才能上先输一着了。认为刘备攻打东吴的战略决策未可厚非，他的失败在于战役指导错误，这种论断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战略全局失败，战役胜利也难以补救，何况他的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都是错误的呢！

评论刘备打东吴的利害得失，我们认为应从三国鼎立形势下一些

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去探索。

1. 从蜀汉的建国图王业的总方针来说，蜀汉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主要的敌人，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不是孙权”。诸葛亮亦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说明在三国鼎立形势下，蜀、魏两国的矛盾是主要的。为贯彻建国图王业的总方针，在用兵上要有重点，不能同时树立两个敌人。在外交策略运用上，应极力拉拢孙权，维持友好。集中力量，先攻曹魏。东吴的诸葛瑾亦写信劝刘备“如果都应视为仇敌，予以打击，也应考虑哪个应放在先”。刘备急于报仇雪恨，不忍一时之忿，不从战略全局考虑，而把曹魏搁在一边，先和东吴作战，这是失策的。

2. 从三国国力来说，赤壁之战，曹操败退北方，对孙、刘两家的压力暂时减轻。但曹操拥有九州之地，而孙、刘两家只占有四州之地。就国力来看，优势仍然掌握在曹操手里。江陵之战后，曹魏坐收渔利，在北方虎视眈眈，而吴、蜀两国的势力亦有消长。刘备损兵折将，又失荆州，只拥有益州一州之地。三国之中，蜀最孤弱。单从刘、孙两家的力量对比来说，也是刘不如孙，根本没有速战速决、一举灭吴的可能性，势必兵连祸结，旷日无功。即使不打败仗，长期拚消耗，拖也要拖垮。这是曹魏不插手，坐观成败的结局。刘备不计虑及此，不顾国力、再兴起吴蜀战争，两面树敌，加深破坏三国鼎立的均势，又是失策。

3. 从三角斗争的策略运用来说，曹魏掌握优势，吴、蜀两国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理应长结盟好，共抗曹魏，才能争取形成鼎力的均势。孙权只图局部利益，不深思全局安危，破坏联盟，袭取江陵，袭杀关羽，是很不明智的。而刘备愤而兴师，又步孙权的后尘，挑起两国争端，同样是不明智的。荆州争夺之战后，蜀国两次挫败，元气大伤，吴国也只能自保，而曹魏在国力上的绝对优势已成定局。三国的疆域从此没有大的变更。三国之中，哪一国来统一南北的趋向也就逐步可以看出了。以后，蜀吴之所以为魏晋所灭，固然在政治、经济上有许多因素，但孙、刘两家为争夺荆州互相削弱，也不能不说是其

中的远因之一，关系全局的战略同盟运筹失策，影响深远。孙权袭江陵，刘备打东吴，对吴蜀两国的后果都是沉痛的。

4．从进攻曹魏的战略部署来说，曹魏是蜀汉的主要敌人，荆州丧失后，《隆中对》中所预定的两路分兵"向宛洛"、"出秦川"的战略部署破坏了。蜀汉要进攻曹魏，只有孤军越秦岭、出秦川一路，势孤力弱，更应争取东吴的外援。在孙权遣使求和之际，刘备应忍小忿，就大谋，与孙权恢复和好。在蜀汉北攻曹魏时，即使孙权不能在东线出兵配合出击，只要保持友好，也是对蜀汉有利的。诸葛亮后来在第四次攻魏前，论述与东吴结盟的得失时，曾作过精辟的论断。他说：如果我大军破魏，东吴不会不采取行动的。即使它不配合行动，而与我们友好相处，我北伐曹魏就可以无东顾之忧，曹魏也不敢把它配备在河南以防备东吴的军队调到西线来进攻我们，这就对我们很有利了。这可以说是精通了三角斗争中策略的运用。"朱鲔喋血于友于（兄弟之意），张绣刺刃于爱子，汉祖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40]。刘备小不忍、乱大谋，为报关羽之仇怒而兴师，缺乏创宏图、建大业的大度卓识。

5．刘备打东吴，如长期胜负不决，曹魏乘机捣隙，可能采取的行动：

——乘虚由汉中攻蜀，刘备会两面受敌，有丧失根据地的严重危险；

——如曹丕采纳刘晔的意见，利用刘备攻其边地的机会，出兵直捣东吴腹心，则魏国灭吴而益强，刘备虽胜而益弱，败亡可待。

即是说，吴蜀交兵，曹丕不插手，刘备会拖垮；曹丕如出兵，无论由汉中攻蜀或南向攻吴，刘备都有终归败亡的危险。刘备打东吴这个有败无胜的决策应该说是很错误的。

（六）曹丕的战略运用

在夷陵之战中，吴、蜀在夷陵交兵，数月不解。刘晔详细分析"蜀远吴近"的情况，建议"应大举兴师，直接渡江袭击东吴"，这确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好机会。当时，魏国内无隐忧，亦有备战兴

师的充裕时间，只要乘机兵出南郡，取江陵，占夏口，就会使陆逊统率的吴军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困境。刘晔认为这样配合行动，"蜀攻其外，魏袭其内，吴之亡不出旬日"，三国鼎立的形势会全面改观。可惜曹丕没有采纳。但等待七月陆逊在夷陵战胜收兵后，曹丕在九月才出兵江陵、洞口、濡须，三路攻打东吴，战机早已丧失了。曹丕批评刘备说："备不知兵"，他自己又何尝知兵。

第二 诸葛亮联吴攻魏之战

——诸葛亮鞠躬尽瘁，撑持蜀汉危局——

蜀汉在夷陵兵败后，"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41]，元气大伤，而陆逊建议退兵，曹魏未乘机进攻，是三角斗争形势和巴蜀地利的关系。不然，吴魏再施加压力，蜀权实难幸存。因从当时三国鼎立的总形势来看，蜀弱吴孤魏坐大，而益州内部的土著豪强和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又发生变乱，影响内部的安定。蜀汉的处境正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上所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在此艰危的时际，受命辅政，撑持危局，负起治理蜀汉的军政重任，要实现"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42]的政治目的，担子是沉重的。当时的益州，尽管是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有盐铁之利，蜀地的织锦业亦非常发达，但要动员上十万士兵来和曹魏进行战争，仅靠这些收入作为"决战之资"，还有困难。诸葛亮也看到这点，所以他说："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

诸葛亮认识到蜀汉的艰危处境，应以安定团结为主，不宜妄动干戈。他策定了"闭关息民，务农殖谷，民安食足而后用之"[43]的治国总方针。他治理蜀汉在内政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厉行法治、广纳人才、奖劝农桑、组训军队等四大项。在外交方面，他极力主张恢复吴蜀联盟，共抗曹魏。然后安定南中，巩固后方，其目的都是为了进攻曹魏。而攻魏也是为了自存。因此时形势已与隆中对策时不同了。他主持蜀汉的军政重任十二年，施展他的政治长才，取得显著的成效。

政绩斐然，光昭史册，永垂典范，足资取则。

一、诸葛亮治蜀在内政方面的主要措施

（一）厉行法治：早在他随刘备入蜀时，就积极辅佐刘备推行法治，严明赏罚，他认为“赏不可以虚施，刑不可以妄加”[44]。如果赏罚不严明，就会造成“忠臣死于非命，而邪臣起于非功”[45]，给国家带来危害。“政之大体在于刑赏；刑赏不明，政何以成”[46]。诸葛亮治蜀，首抓立法明刑，可以说是抓住了治政的纲要。由于他赏罚严明，使蜀汉政府官员的工作效率提高，有力地推行各项政策，使统治秩序日趋稳定。

（二）广纳人材：他继续推行随刘备入蜀时采用的兼收并蓄的政策，注意争取客籍和土著文臣武将的合作来加强蜀汉政权的统治。他主张任人唯贤，把一些富有才干而又忠于蜀汉政权的人，选拔、安置、擢升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使他们能发挥治政的才干。如蒋琬是荆州的一个善写文书的小吏，他随刘备入蜀后，担任广都县长。诸葛亮发现他“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47]，认为他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48]，很器重他，把他提拔到蜀汉中央政府的重要岗位上，临死时，还向刘禅推荐，作为他的接班人。扬洪本是犍为（郡治故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太守李严的功曹，诸葛亮发现他有才干，就推荐为蜀郡（郡治在今四川成都）太守。诸葛亮在«出师表»上，强调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是先汉兴隆的根由，亲小人，远贤臣，是后汉衰败的原因，劝刘禅记取历史教训，任人唯贤。“为政之道莫大于用人”[49]。诸葛亮能吸收西蜀地区一些有才能的人参加蜀汉政权，做到“能尽时人之器用”[50]，使蜀汉在诸葛亮辅政时期及其死后都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三）奖劝农桑：诸葛亮承袭法家“奖励耕战”的思想，在农业上积极推行“务农殖谷”的经济政策，努力发展生产。他又提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敛赋，无尽民财”[51]的主张。在和平年代，他注意“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在战争时期，他利用间隙“休士劝农”或分兵屯田。他还施行盐铁官营，以增加蜀汉财政的收入，达到

"利入甚多，有利国用"[52]。他又鼓励人民植桑养蚕织锦，使蜀锦的生产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了支持战争的一项重要资源，"决战之资，唯仰锦耳"[53]。

他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推行，使蜀汉出现"田畴辟、仓库实、器械利、蓄积饶"[54]的繁荣景象，为北攻曹魏的战争在物资供应和军费开支上做好准备。

（四）组训军队：在吴蜀争夺荆州之战中，蜀汉两次失败，损折了许多久经战阵的将士，军事力量大大削弱。要进攻曹魏，兴复汉室，不能不建设军队。诸葛亮看到蜀汉是一个小国，不能动用过大的民力，因此主张在精兵省将、精练能战的方针下，建设一支战斗力强的军队。他在建军用兵方面，重视：

1． 严明赏罚：史载，他在军中"赏罚肃而号令明"[55]。他对马谡和王平的处理，表明他的赏罚严肃。马谡是他很器重的参谋，第一次攻魏时，马谡为前锋，不遵照他的部署，导致街亭兵败。诸葛亮按军法挥泪把他处死。裨将王平，在街亭兵败后，能遵履法度，收容马谡的散卒，抗击曹爽的追兵，安然退军，立了功劳，诸葛亮破格提拔他为讨寇将军。

2． 加强训练：诸葛亮平时对军队训练非常重视。他认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如果由一个才能不高的将领去指挥，不见得就必然失败；如果一个很有才能的将领去统帅一支没有训练的军队，也很难取胜。[56]所以经他训练的军队。"戎阵整齐，号令明肃"[57]，"止如山，进如风，调动自如"。[58]

3． 改进兵器：诸葛亮为达到兵少器精，重视兵器的改进。他把战国以来使用的一种武器弩改进成为一种新式连弩，叫元戎，一连能发出十枝箭，晋人李兴称道："神弩之功，一何微妙"。他又命蒲元为蜀军炼制一种很锋利的钢刀三千口，用此精良兵器来补救国小兵少的缺点。蜀汉地区多山，道路难行。蜀军在前线作战，军粮供应，靠人力背负，缓慢而又困难。为了解决军粮的运输，他设计制造了木牛流马。

4． 讲究阵法：凡是部队行军、宿营、作战以至挖井、垒灶、掘

壕、设障等，他都有严格的章则规定。诸葛亮死后，司马懿视察蜀军留下的营垒，叹为"天下的奇才"[59]诸葛亮的八阵图，很受人重视。西晋的李兴指出："推子（诸葛亮）八阵，不在孙吴"（孙子吴子以前所无）。

经诸葛亮数年的苦心经营，培养出一支十万人的戎阵整齐的节制之师，"法令明，赏罚信，士卒用命，赴险而不顾"[60]，"进退如风，调动自如"。[61]他五次攻魏，除第一次因用将错误，有街亭之失外，其他四次攻魏，做到进则敌人不敢战，退则敌人不敢追，而自己始终立于不败的地位。司马昭灭蜀后，特令军事学家陈勰学习诸葛亮的兵法兵制，推行为晋朝的军事制度。马隆曾用八阵法夺取凉州，北魏刁雍主张采用诸葛亮的八阵法以抵击北方的柔然族。唐朝的军事学家李靖根据八阵法创造了六花阵法。足见诸葛亮用兵的法则对后世的影响。

除上述所论之外，诸葛亮在"严法与正身"方面也堪称后世的楷模。

在魏蜀吴三国中，魏吴两国统治集团内，一些统治者如曹睿、孙皓等，生活荒淫，穷奢极欲，不惜民力。而一些辅政大臣则结党争权，互相攻杀。为排除异己，消灭敌对，往往用严刑峻法，妄加诛杀，甚至因一言一事的忤意，就遭杀戮，祸及三族。而在蜀国，上下团结，内部稳定，在三国之中是治理得最有条理的一国。诸葛亮辅政时期是如此，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执政时期也是如此。这是诸葛亮英明治理蜀政所留下的德泽。他治政的德政是什么？最主要的是"严法"与"正身"两桩。"严法"不是严刑峻法，刻薄寡恩，而是严明赏罚，用心平明。他主张"明刑"，也反对"滥刑"，不以个人的喜怒爱憎而滥施刑赏。而是"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罪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62]。他"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63]。马谡违犯军令，他不能不杀他以明法。马谡死后，他亲自临祭，为之流涕，抚其遗孤，恩若生平，使蜀汉将士感奋。他惩办李严，不罪及其子李丰，仍任命他为中郎将，使参军事，并亲予教勉，情意殷殷地对李丰说：

我与你们父子戮力以匡扶汉室，任命你父亲为都护，署汉中，委你以江州重任。自问诚心诚意，始终如一，未想会中途乖离。如果你父亲思其罪负而一意为国，你与公琰（蒋琬）能推心从事，开诚相见，则过去的过失，还可补赏，请详思这番过失，体察我的用心。[64]

这就可以看出诸葛亮用刑执法的厚重。他罢免了廖立，把他流放到汶山郡去。诸葛亮死后，廖立哭泣说：吾终究要为左衽，老死边区了[65]。廖立受到惩办后为何有这样的反映呢？这是诸葛亮"执法不枉，所以受罚者不能不服"。诸葛亮死后，廖立感到他没有因悔改而再被召回起用的机会了，才发出这样叹惜。所以陈寿在«三国志»上评论说："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再看看诸葛亮的"正身"。诸葛亮的作风行仪，在封建时代，道德标准是很高的。而他所倡导的道德不是为了损害人民，其后果也不是直接为害人民。他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效忠蜀汉。他在整治内政时，还特别注意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培养集思广益、身体力行、严于责己的廉洁无私的作风。

集思广益：他认为要把政务办好，就要多闻多见，注意听取臣下的建议，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如果"人君拒绝忠谏之言，忠臣就不敢进其谋略，而邪臣就可以专断独行，这对国家是有害的"[66]。因此君主要虚心纳谏，实行"纳言之政。"他在«与群下教»中对集思广益的重要性作了详尽的说明：

丞相府设置参谋署是为了集思广益。如果为了回避个人的嫌疑，不愿提出不同的意见，反复进行磋商，事业就会受损失。如果经过反复磋商，得到正确的处理办法，就如同丢掉了破鞋而获得了珠玉。

他在«出师表»上劝刘禅"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谘諏善道，察纳雅言"。

身体力行：诸葛亮的工作作风，表现在他的忠勤职守，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主簿杨顒看到他"自校簿书流汗终日"，很为他

的健康担心，引用“丙吉不问横道死人而忧牛喘；陈平不肯知钱谷之数，云自有主者”[67]的故事来劝他不必事必躬亲，多注意身体健康。他对杨的劝告很感激，但他感到重任在身，对事业的责任心，使他对许多事情不能不亲自过问。他感酬知遇，效忠蜀汉政权，确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严于责己：街亭之战失败，是由于他错用了马谡，他颁布《劝将士勤攻已缺教》，说：

我们在祁山、箕谷，军队比敌人多，但是未能取胜，反而被敌人击败，这毛病不在兵力多少，在我一个人身上。现在我打算……检查缺点，研究将来改进工作和方法。……凡是忠虑于国的，要勤攻我的缺点，这样事业可定，敌人可灭。[68]

他除了“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让人们都知道他犯的过失外，还请求把自己的官职贬下三等。这表明诸葛亮敢于承认错误，严于责己，不文过饰非。

廉洁无私：他不增殖私产。他上表刘禅说：

“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作经营，增加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69]

由于诸葛亮自身廉洁，不贪污，所以为人所信服。因为他不贪污，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这对人民是有好处的。

诸葛亮不因为自己身居高位，利用职权，为子孙谋求特殊爵位。他领兵屯驻沔中时，安排他的儿子诸葛乔和其他将领的子弟一样，率领一部兵卒，沐雨栉风，跋涉在崇山深谷中，押运军需物资，接受艰苦的锻炼。

他有这些好的作风和行仪，所以虽集中权力于一身，但不跋扈欺上，后主亦不感到他的威胁。他代替主上行事，朝臣并不感到他的僭越，不怀疑他有篡代的野心。他留下的治政的德泽使蜀汉国内始终保持团结和睦状态。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诸葛亮是正身的典型。尽管王朝在更替，时代在演变，而诸葛亮“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给千秋万代的后人以深远的影响。

二、诸葛亮恢复蜀吴联盟共抗曹魏的外交战略

“结好孙权”是诸葛亮历来所主张的。但吴蜀两国由于争夺荆州，联盟破坏，已成敌对。夷陵战后，诸葛亮认识到在三角斗争中，蜀汉国小力弱，如再两面树敌难以生存，亟应改善与吴国的关系，恢复联盟，共同抗曹，才能维持鼎立局面。这是蜀汉立国的至善战略。因此他派遣邓芝出使东吴，说服孙权与魏国断绝关系，同蜀汉再结盟好，改变了荆州战后蜀汉孤立的不利处境。这在当时对诸葛亮安定南中和进攻曹魏都起了有利的作用。特别是蜀后主建兴七年（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称帝，派遣使者到蜀汉要求双方以平等的皇帝地位交往。这是对蜀汉正统地位的挑战。如承认孙权称帝，就等于放弃蜀汉正统的说法。因此蜀汉的许多大臣主张与他断绝盟好。诸葛亮肝衡全局，权度名实，对群下作了一番分析，说：

孙权老早就有称帝之心，我国所以未与他计较者，是想与他保持互相支援。今天如果与他公开绝交，必然对我国更加仇恨。这样，我们必得抽调部队到东边去戍守，与他对峙还得兼并他的土地，才可以再计议用兵中原。东吴的贤才尚多，将相和睦，不是一朝所能制伏的。双方顿兵相持，坐以待老，使曹魏有利，这不是上策。……现在一般人认为孙权只图维持鼎立局面，不能与我们同心协力。他的志向在保江东，不会出兵攻打曹魏。这样推测都是似是而非的论调。……如果我大军破魏，东吴首先就会要求分割魏国土地以为后图，其次也会乘机略取曹魏的土地与士众，以显示它的力量，不会按兵不动的。即使它按兵不动，而与我们友好相处，我北伐曹魏就可以无东顾之忧，曹魏也不敢把它配备在河南以防备东吴的军队调到西线来进攻我们，这也就是对我们很有利的”〔70〕

诸葛亮说服了蜀汉内部的一些持正统论的人，派遣陈震出使东吴，向孙权道贺，两国结盟，相约平分天下。这展现了诸葛亮作为一个大政治家的深谋远虑，通权达变，他说服蜀汉群臣中持所谓正统论

者的一番议论，可以说是很精辟的。这亦可以看出在三角斗争中联吴抗曹的战略意义。

三、诸葛亮安定南中、巩固后方的战略措施

“思惟北征，宜先入南”，安定南中的目的，是为了北攻曹魏。

南中地区包括蜀汉南部的越嶲、益州、永昌、牂柯四郡（今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一带），是少数部族（当时统称西南夷）与汉族杂居的地方。夷陵之战后，益州郡大姓雍闿在东吴的挑动下，发动叛乱，越嶲郡（郡治在今四川西昌）的夷王高定和牂柯郡（治在今贵州关岭附近）太守朱褒也先后据郡反蜀，响应雍闿。当时，广大南中地区，除吕凯守永昌，李恢守平夷（今云南陆良）两个孤立据点外，其他地区已整个卷入叛乱。蜀后主建兴三年（公元225年）三月，蜀汉内部经过两年的整顿，已趋稳定。吴蜀联盟又恢复，雍闿的外援断绝，诸葛亮遂决定对南中用兵。诸葛亮率军出发时，参军马谡向他提出“攻心为上”的建议：

> 南中的少数部族依仗地势险要偏远，不服从朝廷已经很久了。即使今天用武力打败他们，大军一退，他们还会反叛。现在公（诸葛亮）要倾师北伐与曹贼周旋，南中少数部族知道朝廷内部空虚，必会加速反叛。如果用武力残杀镇压，以除后患，既不是仁者的手段，亦不可能短期间平定的。用兵的道理应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丞相不要专用武力，要注意征服他们的心。[71]

马谡的建议与诸葛亮的“南抚夷越”政策的精神是一致的，诸葛亮采纳了他的意见。

蜀军的进军分为三路，最后会师益州郡。（参看插图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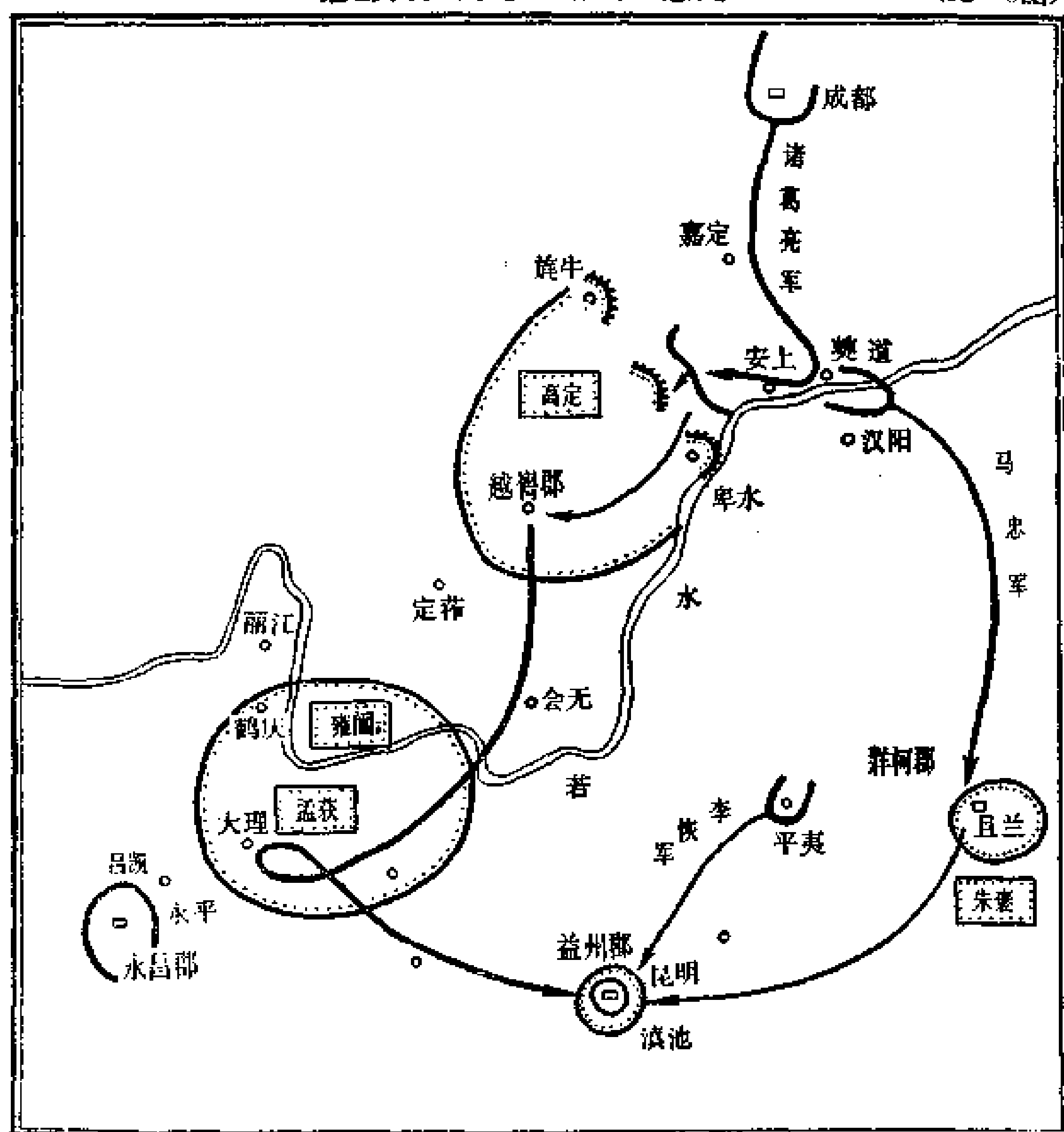
——诸葛亮亲自率主力由成都南下至金沙江北岸，从西路进击越嶲的高定；

——马忠由僰道（今四川宜宾）向东南进击牂柯朱褒；

——李恢自平夷向益州郡方向进攻，以吸引和牵制反蜀首领雍闿的叛军，以等待诸葛亮主力军的到达。

诸葛亮所属的蜀军主力到达金沙江北岸后，即经安上（今四川屏山），沿江西上，向集结在旄牛（今四川汉源）、卑水（今四川昭觉附近）、定笮（今四川盐源）等地筑垒防守的高定的军队突然发起进攻。结果高定被杀，蜀军顺利地占领了越嶲郡。此时，雍闿亦为高定的部下所杀死。在汉、夷人中较有威望的孟获代领其众，继续在泸水（金沙江）以南抗击蜀军。与此同时，东路的马忠军击败了朱褒，占领了牂柯郡。

诸葛亮安南进军路线示意图 （12—5图）



李恢由平夷（今云南陆良）进至昆明（今云南晋宁东）时，由于兵力薄弱，被当地少数部族包围。诸葛亮对南中用兵的第一阶段虽获得初步胜利，但李恢被困于昆明，吕凯孤立，孟获仍率军抵抗，必须继续进军，才能最后安定南中。

同年五月，诸葛亮从越嶲以南渡过波涛汹涌的泸水，深入人烟稀少的南中山区。孟获率军抵抗，被蜀军俘获。诸葛亮为了贯彻“南抚夷越”、“攻心为上”的政策，将他释放。经过七擒七纵，孟获终于心悦诚服地投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72]诸葛亮降服孟获后，继续挥兵南进。马忠也向益州郡推进。在诸葛亮降服孟获时，被包围于昆明的李恢，扬言愿与南人合作。南人松懈戒备。李恢乘机出击，击破了南人。至此，三路大军终于消灭了南中地区的叛乱势力，在滇池（今云南晋宁东）胜利会师，结束了对南中的用兵。（参看插图12—5）

南中平定后，诸葛亮对南中的统治，采取了“即其渠帅而用之”[73]的政策。以此来缓和民族矛盾，巩固胜利果实。当时有的不同意采取这种政策，诸葛亮详为解释：

> 若留下外地人去治理南宁，那就必然要留下军队。留下军队会没有粮食吃，这是困难之一。夷人新遭破败，父兄死伤于战场，留下外地人而没有军队驻守，必会酿成变乱，这是困难之二。再者，夷人多次发生废杀郡守之事，自己深感罪恶很重，若留下外地人去统治他们，始终不会相信，这是困难之三。现在我想只有不留外人和不留军队，不运送军粮，而使秩序逐渐安定，夷汉两族人民亦就可以逐步相安无事。”[74]

诸葛亮采取了安定南中秩序，改善民族关系和发展南中生产的一些战略性的政策和措施：

（一）把南中的四郡，增改为越嶲、建宁、永昌、牂柯、云南、兴古六郡，缩小郡区便于管辖；

（二）选用本地人和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当各郡太守。如建宁太守李恢（建宁人）、云南太守吕凯（永昌人），都是当地土著；永昌太守王

伉、越嶲太守龚禄，原来都是南中地区的官吏，熟悉当地情况；

（三）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不变更他们的部落组织，保留原来渠帅的首领地位和特权，县以下的官吏，基本上由少数部族中的上层人士担任，通过他们去统治该地区的少数部族；

（四）吸收少数部族上层中有威望、原先和蜀汉政权敌对而以后转变的一些人到蜀汉中央政府中去，给以较高的政治待遇，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建宁的爨习官至领军将军，朱提（今云南昭通）的孟琰官至辅汉将军；

（五）把一些态度恶劣的大姓豪绅强制迁居到成都和内地，使他们离开本土，不再干涉地方行政，以便加强对南中地区的控制；

（六）把少数部族中一些强壮的男子编入军队（号称飞军）连同其家属一万多户迁到蜀中。这支军队骁勇善战，以后成为蜀军中的一支劲旅；

（七）把一些民户配给焦、雍、娄、爨孟、量、毛、李等大姓为部曲，他们不愿意依附大姓的，就劝令豪帅们出金帛收买，对拥有部曲多的给以优待，这样，客观上对南中地区社会的进一步封建化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八）把汉族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传授给当地的少数部族，使他们会使用牛耕，改变原来的刀耕火种的落后方法，使生产得到发展；一些原来居住在深山密林中过原始狩猎生活的少数部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75]，生活逐渐改善；

（九）在南中地区设置盐铁官，管理冶铁煮盐，派人传授织锦技术促进手工业的生产；

（十）在永昌太守张嶷的主持下，修复了旄牛道（从今四川雅安到西昌的古道）和沿途亭驿，便利商旅往来，有利于汉夷间的经济交往。

南中地区安定后，南中地区的一些物资如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不断运往蜀中，以充军国之用。利用南中地区出产的质坚、弹力大的竹作箭杆，解决了造箭的重要原料，所以说"军资所出，国

以富强”。

在安定南中方面，诸葛亮采取“攻心为上”的战略，不专用武力镇压，而注意征服夷人的心，这突破了三国以前历代汉族统治者“德以柔中国(中原地区)，刑以威四夷”的传统战略，改变了过去对“异类”、“夷狄”(少数民族)专杀立威的镇压手段。他在南中地区平定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民族关系，发展生产的政策和措施，既利用了南中地区的人力物力来加强蜀汉的力量，对尔后汉族和西南少数部族联系的加强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唐朝诗人胡曾在《泸水》一诗中，对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安定南中的丰功伟绩，给予热情的赞扬歌颂：

> 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
> 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

四、诸葛亮攻魏之战

诸葛亮进攻曹魏的战争从蜀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正月起到蜀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止，七年之间，共进行了五次。(所谓五出祁山)。诸葛亮亲督戎师，越陟秦岭，沐雨栉风，殚精竭虑，可以说尽了他自己最大的努力。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使他出师未捷，浩志难酬。只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蜀汉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南中安定后，解除了后顾之忧，诸葛亮便“治戎讲武”，积极准备北攻曹魏。蜀后主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曹丕病死，其子曹睿即位，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认为这是北伐曹魏的最好时期。次年，他率军进驻汉中，以完成最后的准备工作。临行之前，他给刘禅上了一个表章——《出师表》，说明出师北伐的条件和目的：

> 现在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在表上，他对朝庭中的事务处理和人事安排，都向刘禅提出了恳切的建议。为了适应和配合北伐的要求，他还调整了军政部署：

——命前将军李严移驻江州（今四川重庆），负责后方军政工作；

——命护军陈列驻扎永安以防东吴；

——命长史张裔，参军蒋琬总理国内行政事务；

——派人劝说魏国新城太守孟达归蜀，威胁南阳，以牵制魏军（孟达阴许归蜀，事泄，被司马懿袭杀）。

当时，从汉中北进，必须经过几百里的高山险谷。自古以来，有两个方向，四条通道。一个方向是出秦岭入关中。这个方向上有三条通道，谷长路险，均有栈道，大军行动比较困难。另一个方向是由汉中经阳平关、武都（今甘肃略阳）、建成（今甘肃西和）、祁山出天水，道路较远，但较为平坦，

蜀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春正月，诸葛亮在第一次出师前，同他的将领们商议进军的方略。丞相司马魏延建议出子午道袭取长安。他分析情况说：

> 听说夏侯琳是魏太祖的女婿，胆小又无谋。只求丞相给我精兵五千，背负各人干粮，从褒中出发，沿秦岭东行，出子午谷北上，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夏侯琳听说我军忽然到达，必定弃城逃走。长安城中仅留下御史京兆太守（只留下一些文官）。横门仓库和百姓的粮谷，足供食用。等到魏国从东方调兵来会合，亦还要二十多天，那时，丞相率大军从斜谷来亦可以到达了。这样，一招举而咸阳以西都可以平定。[76]

诸葛亮认为魏延的进军方案有危险，“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77]，没有采纳魏延的建议。

从诸葛亮以后五次北伐所取的进军路线和行动，可以看出他进攻魏国的战略方针是“稳扎稳打，先夺取陇右，再相机进图关中。”

（二）曹魏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魏明帝曹睿听说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用兵。他想先发制人，出兵进攻蜀汉。他征询散骑常侍孙资的意见，孙资不同意出兵，列举往事为陈述利弊。他说：

> 过去武皇帝（曹操）进攻南郑，击败张鲁，阳平关一战，是先遭遇危险，最后才获得成功的。武皇帝亲自去救出夏侯渊军，

常说：南郑简直是一个天狱，中斜谷道是五百里的石穴。直言其深险，能救出夏侯渊真不容易。武皇帝善于用兵，察知蜀贼栖于山岩，吴虏窜于江湖，都避免与他们交锋。不责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这正是所说的见胜而战，知难而退。现在如果率军到南郑去攻打诸葛亮，道路险阻，估计要动用精兵和转运粮草的后勤兵，还要留兵镇守南方四州，以防御东吴，共需十五六万人，那就必定还要有所征发。弄得天下骚动，费力广大，这实在是陛下（指曹睿）应深思熟虑的。……今日用兵应分命大将，据守各险要之地，声威足以震慑强寇，镇静疆场，将士枕戈备战，百姓安居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益强盛，吴蜀两个敌人必会自行疲敝。[78]

曹睿采纳孙资的建议策定了对付吴蜀的基本方针——分兵守险坚壁不出，以待国力强大，寻衅灭蜀。并作了如下的防御部署：

——命安西将军夏侯琳都督关中，镇守长安；

——命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驻扎在斜谷北面的郿县，以防御赵云；

——派名将张郃率军五万驻防陇右一线，以西拒诸葛亮，归曹真指挥；

——命司马懿都督荆、豫两州军事，镇守宛城；

——曹睿亲自到长安坐镇，以张大声势。

后来他派曹真，司马懿先后都督关中诸军，西御诸葛亮。他们与蜀军五次交锋的部署和指导，可以说是都依据这个基本方针来策定的。

夷陵战后，诸葛亮主持蜀政，恢复吴蜀联盟，共同抗曹。在三角斗争中，曹魏又处于两面受敌的地位。在曹营中，一些谋士如贾诩、辛毗诸人都认为不宜急于对吴蜀用兵，主张"绥之以文德，而俟其变，则平之不难"[79]，"养民屯田，十年然后用之，则役不再举"[80]。孙资的建议，可以说亦都是重申曹操自赤壁罢兵以来所制定的战略防御方针："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关中"[81]。控置这三个战略要点，若吴蜀进攻，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这个战略方针，可以说是稳

妥持重的。

诸葛亮进攻曹魏的战争共有五次。

蜀后主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他扬言要由斜谷攻取郿城(今陕西眉县北)，派赵云、邓芝率一支部队作为疑兵，进据斜谷(今陕西眉城北)，以吸引魏军；他亲自率主力沿西汉水上溯，北出祁县（今甘肃西和县北祁山堡)，以夺取陇右。魏派大将军曹真督关右诸军迎战。蜀军前锋进至街亭与魏军张郃部遭遇。前军指挥马谡部署错误，魏军进攻，蜀军大败，街亭失守。诸葛亮因出师不利，只好退回汉中。

同年冬十一月，诸葛亮探知魏将曹休被吴国大都督陆逊击败于石亭（今安徽怀宁、桐城之间)，魏军东调，关中空虚，遂乘机出兵攻魏。十二月，他第二次北伐，率军出散关，围攻陈仓，魏将郝昭筑城固守。双方相持廿余日，蜀军粮尽，只好又罢兵。

蜀后主建兴七年（公元229年）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派陈式攻取武都（今甘肃成县西北)、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

蜀后主建兴九年（公元231年）二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再出陇右。曹睿派司马懿迎击蜀军。他凭险拒守，坚不出战。六月，蜀军粮尽，主动退军。

蜀后主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二月，诸葛亮集中最大的兵力十万人，第五次北伐，并派遣使者去东吴，约吴同时出兵攻魏。诸葛亮率大军由斜谷道进至渭水之南的五丈原（今甘肃眉县西南)，他鉴于前几次出师，都因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这次采取分兵屯田，为长久之计。五月，吴国亦应约，三路出兵，进攻曹魏，以配合蜀军在西线的攻势。

——派陆逊、诸葛瑾率军万余人入江夏（今湖北鄂城)、沔口（即今湖北汉口)，指向襄阳；

——派孙韶、张承入淮水，指向广陵(今江苏扬州)、淮阴（今江苏清江市)；

——孙权亲率军（号称十万）进驻居巢（今安徽巢县东北)、湖口

（巢湖口），指向合肥（今安徽合肥市）、舒城（今安徽舒城）。

曹睿对蜀吴的联合进攻，采取“西守东攻”的战略。派征蜀护军秦朗统率步骑二万，以助司马懿抵御诸葛亮，并告诫他：

“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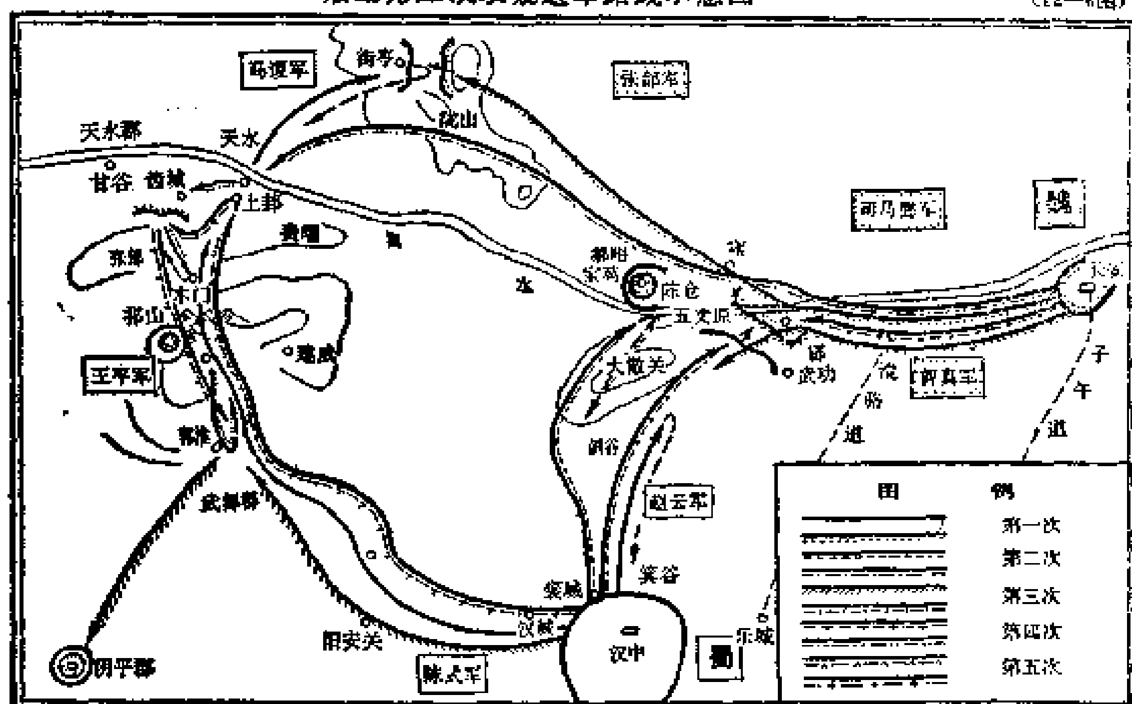
七月，曹睿亲督水师东击吴军。孙权初先判断蜀军在西线进攻，魏军不会大举东调。及后探知魏军东下，遂不战而退走。孙韶亦撤退，只陆逊一路进击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等地，略有斩获。

吴军既撤退，曹魏的群臣认为司马懿正与诸葛亮相持于渭水之南，劝曹睿亲到长安督战。曹睿未采纳，回到许昌，他认为“权走（孙权退兵），亮胆破，大军足以制之，吾无忧矣”。[83]

诸葛亮与司马懿对峙百余日，积劳成疾，病死军中，攻魏战争，遂告结束。（参看插图12-6）

诸葛亮五次攻魏进军路线示意图

（12—6图）



（三）诸葛亮攻魏未能取得胜利的原因

诸葛亮在襄阳隆中第一次与刘备畅谈天下形势时所提出的战略计划首先夺占荆州、益州，然后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

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即分兵两路，一路率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一路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直捣中原。这个计划在曹魏内部还未十分稳定的情况下，两路出兵，实施钳形攻势应是一个或许可行的计划。当关羽进攻樊城，威震华夏，许昌以南拥汉反曹的人起兵响应，曹操也曾考虑迁都，就说明了这点。但后来孙权败盟，袭取江陵，关羽被杀，荆州丧失，两道出兵的计划遭到破坏。夷陵战后，三国鼎立的形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魏国拥有东汉十三州的九个州。魏文帝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曹丕派张既攻占河西后，鄯善、龟兹、于阗遣使奉献，西域复通，后方获得巩固。曹魏也很注意修治农田水利，如修新陂，小戈阳陂，通计广渠等，使生产发展，经济得到进一步的恢复，拥有二三十万久经战阵的军队，谋臣勇将，接班有人。蜀汉只有一州之地，虽然经过诸葛亮四年的努力经营，务农殖谷，使蜀汉的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国力有所增长，重建起一支十万人的军队，但宿将凋谢，后继乏人。与曹魏的人力物力军力相比起来，魏强蜀弱，力量悬殊。

诸葛亮《隆中对》，本想再走光武中兴的道路，扶汉兴刘。他在《出师表》上提出“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号召，认为人心思汉，攻魏是“据正道而临有罪”，这仅是他的主观想法。蜀魏战争实质上是两个封建地主集团争夺统治权的兼并战争，无正义与不正义之分，不是什么“有道”伐“无道”，因而也就不能“得道多助”。曹魏自承认士族有做官的特权之后，就得到了士族的拥护。士族中原有的拥汉派逐渐消失了。诸葛亮于公元223年第一次攻魏时，魏文帝曹丕已死，魏国统治阶级内部早已不是拥汉派与拥曹派的争斗，而是曹操集团与司马懿集团的权力的斗争。对中原地区的士族说来，“兴复汉室”已经是一种过时的号召，不能起什么作用了。当时的形势不是谁应该来统治，而是看谁有力量来统治。蜀汉的人力物力居于十分劣势的地位，客观上不存在取胜的条件，给诸葛亮留下的只有主观努力的一面，尽心力而为之了。明代民族英雄于谦《过南阳挽孔明》诗句：“三顾英雄正角持，孤臣生死系安危。大星不向营前坠，混一寰区未可

知。"前两句诗的意思说在魏蜀吴三国三分天下、各据其一而分庭抗礼的局面下，诸葛亮的生死关系到蜀汉的安危盛衰，这是允当的论断。而后两句诗的意思，说如果诸葛亮不病死军中，也许他能够统一天下，这就只能说是于谦的主观设想了。在当时魏强蜀弱的历史条件下，以一州的物力人力而要与拥有九州之地的魏国争夺天下，诸葛亮纵有盖世才能，能九出祁山，恐亦难以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去扭转乾坤，"混一寰区"，也只能"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了。唐代诗人温庭筠在《过五丈原》诗中，总结这一历史事件时咏道："下国卧龙空悟主，中原逐鹿不由人"。

诸葛亮也深知"天下三分，益州疲敝"，"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命"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辅政十二年，在主观努力方面，的确是尽到最大的努力，达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他为了进攻曹魏，在治政、用人、劝农、建军、联吴、安南诸方面，凡是一个统治者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到了，可以说是尽心竭力，披肝沥胆。他上给刘禅的《出师表》，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表现了他为国辛劳，赤胆忠心，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他五次进攻曹魏，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壮志难酬。他这种百折不挠，力图统一的献身精神，极为后世所称道歌颂。

（四）诸葛亮攻魏的战略方针

诸葛亮进攻曹魏的作战目的是先夺长安，再取洛阳，以达"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政治目的。但他不采纳魏延建议的轻兵出子午谷，大军出斜谷会师长安的作战方案，而西出祁山，以趋秦陇，从薄弱处下手，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相机夺取关中。论者多说诸葛亮过于谨慎，不肯冒险。陈寿在《三国志》上也认为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一就当时魏强蜀弱的总形势来看，如果荆州不丢失，仍能按诸葛亮在《隆中对》时的两路出兵，北定中原，则魏延的出子午谷袭取长安的作战方案是可取的。荆州丧失后，两路出兵的计划破坏；夷陵战后，蜀汉的元气又大伤，只能率益州的至多十万之众一路出秦川，犹如螃蟹被砍去右前爪，只剩下左前爪，势难钳击，还要袭取长安，确

是有些冒险。长安是曹魏在西方的战略要点，城郭坚固，地处渭水流域的关中平原，交通四达，骑兵往来驰骋方便。即使蜀军能乘夏侯楙疏于戒备，实施突然袭击，加以占领，曹魏必然要倾全力来争夺，蜀军需用七八万人去防守。为一城而把蜀军大部甚至全部兵力投入，蜀军补给困难，后备力量薄；而魏军补给方便，后备力量雄厚，相持下去，蜀军孤军远守，可能会全军困毙。如万一袭取不成功，长安未能夺占，蜀军以不大的兵力顿兵坚城之下，而曹魏把潼关以东的大军调来增援，蜀军会进退失据，可能遭到各个击破。

二就当时战地资源和补给情况来看，关中地区虽是沃野千里的富饶之地，但自董卓造乱以后，继之以李傕、郭汜、樊稠、张济的骚扰掳掠，战乱相寻，弄得田园荒芜，人民离散，避难流入荆州的有十万余人，逃到凉州、汉中的亦不可胜计。曹操后来虽曾派遣钟繇去镇抚关中、卫恺去镇抚凉州，推行招抚流民、劝耕殖谷的政策，以充军用民食，使关中荒芜饥馑的现象有所好转，但他用兵关陇，击破马腾，征讨张鲁，追赶马超，征调频繁，又使关中人心不安，多弃业逃走，地荒未耕，资储殆尽。如果骤然率领大军进入，实难就地补给，因粮于敌，就有从遥远的汉中输送粮草以补给军食的不利。陇右地区物产富饶，人口稠密，以祁山一地而言，就有人民万户。大军进入就地取粮，可供一部分军食。而祁山以西地区又多产马，更为战争准备上所必需。这应是诸葛亮出祁山，夺陇右的另一原因。三就以攻为守的稳慎行动来看，王船山在《读通鉴论》中《论诸葛亮不出子午谷》，认为诸葛亮是从全局着眼，审度了敌强我弱的形势。“知魏之不可旦夕亡，而后主之不可起一隅以光复也。其出师以北伐，攻也，特以为守焉耳。以攻为守，而不可示其意于人，故无以服魏延之心，而贻之怨怒。”他师出祁山，本不是他的初意，而因情移势异，“主闇而敌强，改图以为保蜀之计”。五次出师北伐，“名为攻而实为守计”，以攻为守。秦岭是西蜀的门户，陇右高原在战略地位上居瞰制关中之势。夺取陇右以为外落，武都阴平都在怀抱之中，“蜀汉就可巩固以存，而待时以进”。诸葛亮用兵谨慎，实因蜀汉国力薄弱，必须谨慎，不能

把仅有的十万之师作孤注一掷。船山此说，是颇有见地的。诸葛亮进攻曹魏，屡次兵出祁山，夺取陇右，实为争夺地略上的优势，为后勤补给上的便利，为利用陇右丰富的资源，为“以攻为守”以图保蜀。凡此数点，都兼而有之。

（五）诸葛亮的战役指导

汉中与秦陇之间横贯着秦岭和祁山。从五次攻魏来看，蜀军每次从汉中进至陇右或渭水附近进攻敌人，都必须首先解决如何通过秦岭山区，其次如何计划击破或歼灭敌人的机动部队以巩固和扩大所占领的地区。这是诸葛亮攻魏作战指导上的两大关键问题。前者，他很好地解决了，而后者，他始终没有很好解决。

十万大军通过秦岭山区几百里的高山狭谷，本来是不大容易的。如果被敌人发觉了，很容易被敌人堵塞在山谷内，如象长蛇不能出洞，甚至遭到伏击。诸葛亮针对这种情况，以出敌不意和从薄弱处去选择进军路线，是符合山地作战原则的。在五次攻魏之战中，除第三次出师的目的只在夺取武都、阴平外，其余四次都顺利地通过了山地的高山狭谷，这是诸葛亮的成功之处。

蜀军以攻为守，在战略上是持久，而在战役上则利在速决，局部击破或歼灭敌人的机动部队以巩固和扩大所占领地区，从而逐次增大人力物力，逐步地改变双方力量的对比，如果不能歼灭魏军，就会因兵力的逐次被消耗而遭失败。但这个问题，诸葛亮始终没有解决。其中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1． 主观的原因

第一次攻魏，未能击破张郃部，主要是诸葛亮作战指导的失着。蜀军一出祁山之后，三郡响应，并已占领了陇右的门户街亭，态势有利，击破张郃部是很有可能的。但诸葛亮选将不当，不用宿将魏延、吴懿为先锋而用马谡。刘备临死时，曾告诫过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84]，诸葛亮不以为然。街亭兵败，使最有希望取胜的第一次攻魏就这样失败了。

以后几次攻魏都未能击破或歼灭魏军，主要是兵力不足和粮食不

继。这两者都严重地影响了蜀军作战的持续力。为了解决兵力不足的问题，诸葛亮想尽了一切办法：从南中地区扩大兵源；重视部队训练，使其精练能战；改进兵器，创造一些新事物来加强战力；用木牛流马以减少运输的人力，增加作战兵员；调用镇守后方和防备东吴的兵力，联合东吴同时大举进攻，以分魏军兵力。

但曹魏地广兵多，后备力量雄厚。兵力不断增加，最后甚至比进攻的蜀军还居于优势。蜀军在兵力劣势的情况下实施进攻，取胜自然就不容易了。

为了解决粮食不继的问题，诸葛亮也想尽了一切改进办法：先取武都、阴平，推进进攻出发基地；在斜谷建立邸阁，提前屯粮；改进运输工具，用木牛流马代替人力运输，增大运输力；就地刈麦，因粮于敌；分兵屯田，为长久之计。

可是第二、四次攻魏，还是不得不因粮食不继而退军。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越过几百里的高山深谷去劳师远征，正如韩信破赵时李左车所说的："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85]魏国少府杨阜论述在秦岭山区作战粮食供应的困难时亦说："转运之劳，担负之苦，所失已多，若有不继，必违本图"。[86]诸葛亮竭尽心力，始终未能解决粮食供应问题，也就使他几次出师都因"运粮不继，使己志不伸"。

2．客观的原因

曹魏对抗蜀军的进攻，始终坚守自曹操以来就采取的战略上的持久来消耗蜀军的方针，控制合肥、襄阳、祁山三大战略据点，见可而进，知难则守。对抗诸葛亮的攻势，则利用秦岭山脉和陇右诸山脉妨碍蜀汉大军的粮食运输，使其攻势难以持久的弊害，始终采取"坚壁拒守"以挫敌锋，待其粮尽退走而追击之，以获全胜的战略指导。因而使诸葛亮虽然殚精竭虑，创制木牛流马、提前屯粮、就地刈麦、因粮于敌、分兵屯田诸种办法，以补救蜀军后方运输这一缺点，终仍困顿于武功而不得进。蜀军进攻时，魏军就采取分兵守着隘口，不与蜀军主力决战的方针。"不费将士之力，不争一朝之忿"。[87]诸葛亮第

四次攻魏时，遇到的对手是善于用兵的司马懿。他掌握蜀军“粮远而难继”，难以持久的致命弱点，采取筑城守口、主力机动的战法，用很小一部兵力迟滞蜀军的行动，分散蜀军的兵力，以保障魏军主力的集中使用和及时的机动。而机动部队遇到蜀军，就“敛军依险，兵不得交”。[88]蜀军利在速战速决，而魏军在战役上始终避免决战。蜀军退，就稳步尾随，蜀军进，就凭险拒守，拥有优势的兵力，亦“无擒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89]

诸葛亮第五次攻魏时，又遇到对手司马懿。他坚决执行曹睿的指示：“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90]蜀军多次挑战，魏军始终坚守不出，把诸葛亮急于寻求决战的企图破坏了。史载：诸葛亮派遣使者至魏军，司马懿只问及诸葛亮的寝食和事务的烦简，不问及军旅之事。当他得知诸葛亮事必躬亲，日夜辛劳，饭量不大时，他料定诸葛亮“食少事烦，其能久乎”。[91]可以说司马懿是坚守持久作战的方针，用一种“拖死战术”来对付诸葛亮。使他师出难捷，终于积劳成疾，病死五丈原。

注 释

〔1〕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五·献帝建安十三年》。
〔2〕〔3〕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周瑜传》。
〔4〕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鲁肃传》注引《汉晋春秋》。
〔5〕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献帝建安十五年》
〔6〕〔7〕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
〔8〕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9〕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10〕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11〕〔12〕〔13〕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
〔14〕 《南齐书·州郡志》
〔15〕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
〔16〕〔17〕〔18〕〔19〕〔20〕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21〕 原文见《三国志·魏书·赵俨传》。
〔22〕〔23〕〔24〕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
〔25〕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献帝建安二十年》。

〔26〕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献帝建安廿四年》
〔27〕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文帝黄初二年》。
〔28〕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诸葛瑾传》。
〔29〕〔30〕〔31〕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文帝黄初二年》。
〔32〕〔33〕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34〕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文帝黄初三年》。
〔35〕〔36〕〔37〕〔38〕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陆逊传》。
〔39〕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一·明帝太和三年》。
〔40〕 《昭明文选》邱迟《与陈伯之书》
〔41〕 《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文帝黄初三年》
〔42〕 引自诸葛亮《出师表》。
〔43〕 《三国志·蜀书·后主传》
〔44〕〔45〕 引自柳春藩《三国史话》二五。
〔46〕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武帝泰始二年》
〔47〕〔48〕 《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49〕 《资治通鉴·卷七十三·明帝景初六年》
〔50〕 《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51〕 《诸葛忠武侯文集·十六集·治人》
〔52〕 《三国志·蜀书·董和传》
〔53〕 《太平御览》布帛部引《诸葛亮集》
〔54〕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55〕〔56〕 引自柳春藩《三国史话》三〇。
〔57〕 《资治通鉴·卷七十一·明帝太和二年》
〔58〕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59〕 《资治通鉴·卷七十二·明帝青龙二年》
〔60〕〔61〕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62〕〔63〕 《资治通鉴·卷七十二·明帝青龙二年》
〔64〕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二·明帝太和五年》。
〔65〕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二·明帝青龙二年》。
〔66〕 原文见《诸葛忠武侯文集·十六集·纳言》。
〔67〕 《资治通鉴·卷七十·文帝黄初四年》
〔68〕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一·明帝太和二年》。
〔69〕 原文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70〕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一·明帝太和三年》。
〔71〕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文帝黄初五年—六年》。
〔72〕〔73〕〔74〕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文帝黄初六年》。
〔75〕 杨慎《滇载记》
〔76〕〔77〕 原文见《三国志·蜀书·魏延传》。
〔78〕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明帝太和元年》。
〔79〕 《资治通鉴·卷七十·文帝黄初四年》

〔80〕《资治通鉴·卷七十·文帝黄初五年》
〔81〕〔82〕〔83〕《资治通鉴·卷七十二·明帝青龙二年》
〔84〕《资治通鉴·卷七十一·明帝太和二年》
〔85〕〔86〕《资治通鉴·卷七十一·明帝太和四年》
〔87〕《资治通鉴·卷七十·明帝太和元年》
〔88〕〔89〕《资治通鉴·卷七十二·明帝太和五年》
〔90〕〔91〕《资治通鉴·卷七十二·明帝青龙二年》

第十三章　魏灭蜀和晋平吴

夷陵之战后，三国鼎立的总形势是蜀弱、吴孤、魏壮大。在东汉十三州中，魏拥有九州之地，吴占有三州，蜀只一州。魏国国富兵强，人才荟萃，人力财富远非吴、蜀可望项背。但魏国何以未能很快地击灭蜀、吴两国，统一中国？而使三国鼎立的局面延续五十年，到司马氏执政时代，才进行统一战争呢？这是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的。

一、蜀吴两国的统治者诸葛亮和孙权在国内都实行了某些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对稳定内部起着有益的作用。特别是蜀汉的益州，在刘焉、刘璋父子割据的二十年中，境内比较安定，天府之国具备了一定的立国条件。刘备入蜀后，有坚强的统治集团，大政治家诸葛亮治理蜀汉，做到了主观上最大的努力。凡是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了。因此，蜀汉在三国中是最有条理、内部最稳定的一国。吴国的扬州地区，自然条件也较好。孙权统治初期，内部也比较团结安定，所以它们能与魏国分庭抗礼。这是魏、蜀、吴三国在三分鼎立之后，都各自在其所统治的地区缓和了阶级矛盾，得到人民一定程度的支持，使三国同时存在，谁也暂时不能消灭谁的内在政治因素。

二、吴、蜀恢复联盟，共同北抗魏国，使魏国不能再坐收渔利。而且这一联盟持续了四十年，使魏国为了抗蜀防吴，不得不在关中、淮南分别配置重兵，这就相应地使魏国减低对蜀、吴两国单方施加压力，或发动长期深入的进攻，因而使三国鼎立的局势得以维持。

三、得力于地利与人和。蜀汉有夔门险要剑阁雄，吴国有长江天堑限南北。两国在诸葛亮、孙权统治时期，内部稳定，人和与地利相结合，使强大的魏国暂时也难于得手。魏文帝曹丕在公元223年至225年间，也曾三次对吴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但由于长江天堑不能飞

渡，只好临江浩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1]，对蜀汉亦因道路险阻，不好用兵，只好息兵养民，待机进取。魏国的谋士贾诩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作过明确的论断：

> "吴、蜀虽是蕞尔小国，依山阻水。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治国，孙权识虚实，陆议（逊）见兵势，据险守要，泛舟江湖，皆难卒谋"。[2]

四、魏国内部发生过两次篡代的斗争，曹丕篡汉，司马昭篡魏。特别是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为争夺统治权，斗争激烈，杀戮残酷，为了安定内部，巩固统治，曾三次平叛，因而无暇对外用兵，使蜀吴两国衰弱的统治得以延长。

三国鼎立的局面持续五十年。在此五十年中，三国的政治、经济的消长，军事的变迁和人事的浮沉，而国力强弱的形势亦殊异。

魏国自曹睿死后，魏宗室已无人才。魏国的军政大权落入司马懿父子之手，遂使魏国的统治有渐易之势。

司马懿是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出身于世代官僚地主家庭。祖父司马儁是颍川太守，父亲司马防是京兆尹(相当于郡守)。司马懿跟随曹操征战多年，富有谋略，对政治、军事都有一套经验。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为丞相，他任丞相府文学掾，不久转为丞相主簿。公元218年，司马懿转为魏王太子中庶子，辅佐曹丕，很受曹丕信任。曹丕称帝后，司马懿的地位逐渐提高，官至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公元227年，曹睿继位后，任命司马懿为骠骑将军兼督荆豫二州诸军事，领兵屯驻宛城，防备东吴。公元231年，曹真死后，司马懿全面负责对西蜀的战争，由于阻击西蜀军队有功，被提升为太尉，主管曹魏军事。公元239年，曹睿病死，他受遗诏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公元 249 年，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曹爽集团，魏国的军政大权遂全部归司马氏父子掌握了。公元260年，司马昭杀魏帝曹髦，曹氏集团的势力完全被摧毁后，司马氏的统治地位巩固，司马氏兄弟注意发展生产，使魏国统治的中原地区的经济超过了蜀吴两国。当时吴国的张悌就曾评论说：

曹丕曹睿时，刑罚繁多，徭役沉重，东征西伐，没有安宁的时候。司马懿父子多次立大功，执政以后，减免百姓的一些沉重负担，关心他们的疾苦，民心归于他们已经很久了。所以淮南三叛（指王凌、毌丘俭，诸葛诞），腹心之地并未惊扰；曹髦被杀，四方也未骚动。司马氏父子任贤使能，各尽其心，统治的根基已经巩固。[8]

因此，魏祚虽衰，而其国力富强，自能灭蜀平吴，完成统一。蜀汉在三国之中是最弱小的一国。夷陵兵败后，国力大丧，赖诸葛亮的贤能治政整军，撑持艰危局面，但终因只拥有一州地盘，国小力弱，虽有励志图强，恢复中原的鹄志，终于五出祁山而无功。诸葛亮死后，仅有的二三守成人才如蒋琬、费祎等又相继凋谢。刘禅昏庸，黄皓用事，遂使蜀汉在民困力弱与内政日衰的情况下，终于灭亡。

吴国自孙权死后，上无明主领导，下无良臣辅弼；加以孙皓的残暴，诸葛恪的败丧，孙峻的造乱，孙綝的废立，内政腐败，人心背离，国势因之日趋颓丧。吴国的终归覆灭亦概可预见。

三国分立的局面至此已不能继续存在，魏灭蜀，晋平吴，全国归于统一，这已是大势所趋，只待时机到来罢了。以下就魏灭蜀、晋平吴两大战役论述双方战略运用的得失。

第一　魏灭蜀之战

——邓艾偷渡阴平，刘禅政权土崩瓦解——

魏灭蜀之战是三国末期强大的魏国对弱小的蜀国所进行的一次战争，是完成全国统一的前奏。从军事战略上看，这次战争是以邓艾偷渡阴平，实施突然袭击取得成功的，带有乘虚蹈隙的特点。现先展述魏蜀两国的强弱形势，然后就几个战略问题加以评论。

魏国自曹芳以后的魏帝都是十几岁的孩子，生长深宫，不知民间疾苦，也不懂政治，一切军政大权落于执政大臣司马懿之手。司马懿

在对抗诸葛亮和平定辽东中，树立了他的势力和威望。他在辅政期间，对人民采取一些休养生息的政策，积极广修水利，举办屯田，发展生产，如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支持邓艾在淮河南北大办军屯，穿广漕渠；又在河南开淮阳、百丈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他还多次上书要求罢免一些徭役。他平定辽东后，下令："中国人欲还旧乡，恣听之"[4]，使逃避战祸、流亡在外的农民逐渐回乡参加生产。他又上书要求罢除在京师服役的一万多人，"节用务农"。这些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使魏国的国力大大超过了蜀汉。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政，继续用灭族的酷刑来杀戮曹氏的宗室和旧臣，经过三次平叛和两次废立，司马氏的政敌几乎清除殆尽，统治地位日趋巩固。曹氏成了名义上的皇帝。魏曹奂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八月，司马昭认为灭蜀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准备对蜀用兵。其主要企图在于立功于国外，以提高他国内的威望，以便取魏而代之。

蜀汉在诸葛亮死后，由蒋琬、费祎相继执政。蒋琬执政时，认为"魏国跨有九州，根深蒂固，平除不易，应联盟东吴，逐步吞食"[5]，但不久他病死了。费祎主持蜀政时期，认为我们远不如丞相。丞相尚且不能定中原，何况我们。[6]可以说他既有自知之明，亦洞察蜀汉的情况。他提出了"保国治民，谨守社稷"的稳重的治国方针。所以姜维每次想大举出兵，费祎常限制他，给他的兵力不过万人。费祎死后，姜维任大将军，掌握了军队。他主张西连羌胡，夺取陇右，相机进图关中。在他主持蜀汉军事十年中，曾多次出兵伐魏。但每次取得的战绩不大，反而损兵折将，使蜀汉的国力削弱。史载：维数出兵，蜀人愁苦。[7]蜀军将领张翼和廖化等都一再反对用兵，认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兵不戢，必自焚……智不出敌而力小于寇，用之无厌，将何以存"[8]。谯周还作«仇国论»来讽刺姜维，说："射幸数跌，不如审发(轻率发射屡发不中的，不如审慎发射)……极武黩征，土崩势生"。[9]后主刘禅整天在深宫吃喝，不理政事。宦官黄皓参与朝政，胡作非为，政治日趋腐败，边备不修。聘问过蜀汉的东吴使臣薛翊对蜀汉的国情曾有过这样的评论："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

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10]当时襄阳人张悌也评论说：现在蜀汉宦官专权，国无政令，而且穷兵黩武，民劳卒疲。竞于外利，不修边备。论力量，魏比蜀强；论智谋，魏比蜀高。乘蜀汉垂危之际，发动进攻，定能取得胜利[11]。从蜀汉当时的国力来说，一州之地，人口不过九十四万，而兵士多至十万二千，还有官吏四万。适龄的男丁不是被迫当兵就是苦于徭役，生产受到严重破坏。平均九个人负担一个士兵，七家民户，供养一个官吏，人民的负担非常沉重。

蜀汉政权已到苟延残喘、不亡何待的境地。姜维请杀黄皓未遂，怕危及自己，又率军远驻沓中（今甘肃岷县南）避祸屯田，使汉中正面防守兵力空虚，铸成破败之局。

一、蜀汉在汉中方向上的边防部署和战役指导

汉中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式重要，为魏与蜀必争之地，亦为蜀汉北方的边防要地。蜀将黄权认为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12]蜀汉太守杨洪亦说：“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13]

蜀汉在汉中方面的边防部署，早在刘备留魏延镇守汉中时间，都是充实兵力坚守汉中外围秦岭各要隘，以御外敌。敌前来进攻，使不得入。兴势之战，王平抗拒曹爽的进攻，都是采取此种防御部署。姜维任大将军后，认为：防守重迭交错的外围各要点，只可以抗拒敌人，不能获得大胜。他向刘禅建议：不如待敌人来时，外围各要点都收兵聚谷，退守汉、乐二城，使敌人进入汉中平地，并以重兵防守各关隘，抗拒魏军，另派游军侧击敌人的空虚。敌人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运粮，自然疲乏。待敌人退却时，防守要点的蜀军一齐出击协同游军，并力搏战，这才是歼灭敌人的良策[14]。后主刘禅采纳了他的建议，命汉中都督胡济退驻汉寿，监军王含防守乐城，护军蒋斌防守汉城。

我们认为在蜀汉国力不济的情况下，充实兵力，坚守汉中外围各要隘，以御魏军，是较为稳妥的方策。姜维的诱敌深入击其惰归的边

防作战方案，如果兵力部署适当，亦尚属可行。在魏军兵力不大，进行小规模进攻的情况下，易收到积极的歼敌效果；即使在魏国大举进攻的情况下，亦可能收到敌疲而后反击的好战绩。但部署边防，利用地形设置袋形阵地，袋底必须坚牢。如果袋底很容易地被敌人的矛头戳穿，袋形合围的部署就会破产，因此，实施这一方案的关键性的一着是在汉中这个主要防御方向上必须配置蜀军的主力，作为强大的机动部队，先顶住敌人攻势的矛头，才能在敌疲之后，配合诸围友军，并力反击，歼灭敌人。姜维的兵力部署与他的边防作战方案的战略意图是不协调的。他率领蜀军的主力远屯沓中，在汉中这个主要防御方向上，未控制有强大的机动部队。这样，放弃汉中外围各要点，让敌进入平地，如此诱敌深入，等于开门揖盗，是不够恰当的。这是他平时筹划蜀汉边防极大的失误。当他探知"钟会治兵关中欲窥进取"之后，感到汉中兵力薄弱，就应当立即变更部署，把控置在沓中的蜀军主力转移到汉中这个主要防御方向上，扼守诸隘路，以抗击魏军的大举进攻，才是比较妥善的部署。姜维未能机断行事、率部转移，只上表刘禅建议遣派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陕西阳平关），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东南)，以防未然[15]。这是姜维战役指导上的再次失误。结果，就是这个请求增调兵力的建议也为宦官黄皓所误，刘禅没有及时采纳施行。直到魏军已开始大举进攻时，刘禅才急忙调廖化率军去沓中支援姜维，调张翼和董厥率军去防守阳安关口，以援外围要点。但廖化到阴平（今甘肃文县）时，听说魏将诸葛绪部将向建威（今甘肃成县西北）前进，即留驻阴平，没有及时占领桥头孔道，以阻止魏军，结果被魏军诸葛绪部夺占，阻断了在沓中的姜维的归路；张翼、董厥部行动迟缓，也未能及时赶到阳平关。这时，姜维部还远在沓中。这样一来，外围的部队已撤下来，后面的援军还上不去，姜维的主力又过不来，汉中的蜀军的防务部署就完全陷于崩溃了。

如果魏军的庸将诸葛绪不因姜维实施战略机动造成他的错觉，自动后退三十里，而始终坚守阴平桥头，阻止姜维的主力东调，则钟会的大军直扑空虚无备的剑阁，张翼、董厥的弱小部队恐难抵挡魏军的

强大攻势。魏军长驱直入，蜀汉政权可能就会土崩瓦解。魏军的庸将诸葛绪犯错误，让出道路，使姜维大军幸运地通过阴平桥头，会合廖化、张翼、董厥诸军退守剑阁，堵住虚隙，方使局势暂时转危为安。但是，新的虚隙又被邓艾找到，奇兵偷渡阴平，终于导致蜀汉政府的覆灭。身为大将军的姜维对大山区的防御部署和指导是有重大失着的。应该说如果不为避祸移住沓中，平时重视汉中正面的边防筹划，在部署山地防御时，重视隘路设防，堵塞虚隙，象阴平这些虚隙之处，早就应该配备兵力的。由于没有照顾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兵力部署不当，因而产生虚陷，终于因一二着之误，使全盘皆输，而马邈的不战投降，诸葛瞻的未能速行拒险，扼守隘路，刘禅的不能坚守成都以待援，才使邓艾冒险成功。由此可知战场的胜败，亦决定于战场将帅料敌决策的优劣。

二、司马昭灭蜀的谋议和决策

魏曹奂景元三年（公元262年），司马昭准备出兵灭蜀，召集群臣传达他对吴蜀两国的情况判断和攻取蜀汉的战略，说：

> 自从平定寿春叛乱以来，停止用兵已六年了。整军经武以备消灭吴蜀两敌。吴国地广而卑湿，进攻它较为困难，不如先灭蜀汉，三年之后，因流顺之势，水陆并进，乘势灭吴。这就是灭虢国以取虞的布势。我估计蜀汉战士有九万人，驻守成都和其他地方的不下四万人。这样余下的兵力不过五万。我们采取牵制姜维于沓中，使他不得东顾，大军直捣汉中、骆谷，出其空虚之地以袭取汉中的战略方针。以刘禅的昏阍只要边城被打破，内部百姓震恐，蜀汉的灭亡，是可以预知的。[16]

群臣多不赞成用兵，只有司隶校尉钟会赞同。于是司马昭任命他为镇西将军，先去关中作进攻蜀汉的准备工作，同时命令徐、兖、豫、荆、杨各州准备船只，扬言攻吴。

司马昭自从平定寿春叛乱、稳定内部后，就整军经武，以备消灭吴蜀两敌。但一石不能同时弹二鸟，势必有先后。应先灭蜀而后平吴呢？还是应先平吴然后再图灭蜀？这是司马昭当时在战略决策上应

考虑的重大问题。从他对吴蜀两国的国情所作的情况判断来细致深入的分析，我们认为“先蜀后吴”的战略决策是切合实际的，是明智的。

（一）从地略上说，攻吴要实施江河进攻，攻蜀要进行山地进攻，都是在特种地形地带作战。在当时作战工具条件的限制下，吴国据江守险，魏国无大量的舟楫，要实施渡江作战，尚有一定的困难。早在曹丕当国时期，魏国已曾三次对吴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但由于长江天堑不能飞渡，曹丕只好望江兴叹：“固天所以限南北”。[17]加上“吴国地广而卑湿”，北方士兵未经过训练，贸然渡江到南方作战，气候水土难以适应，故不如先攻取蜀汉。对蜀汉用兵虽在山地作战，但可以乘虚蹈隙。只要一点突破，冲入腹心，就会使防者的防御体系解体。灭蜀之后，在益州大制舟楫，训练水师，因“顺流之势，水陆并进，乘势灭吴”，也就易如反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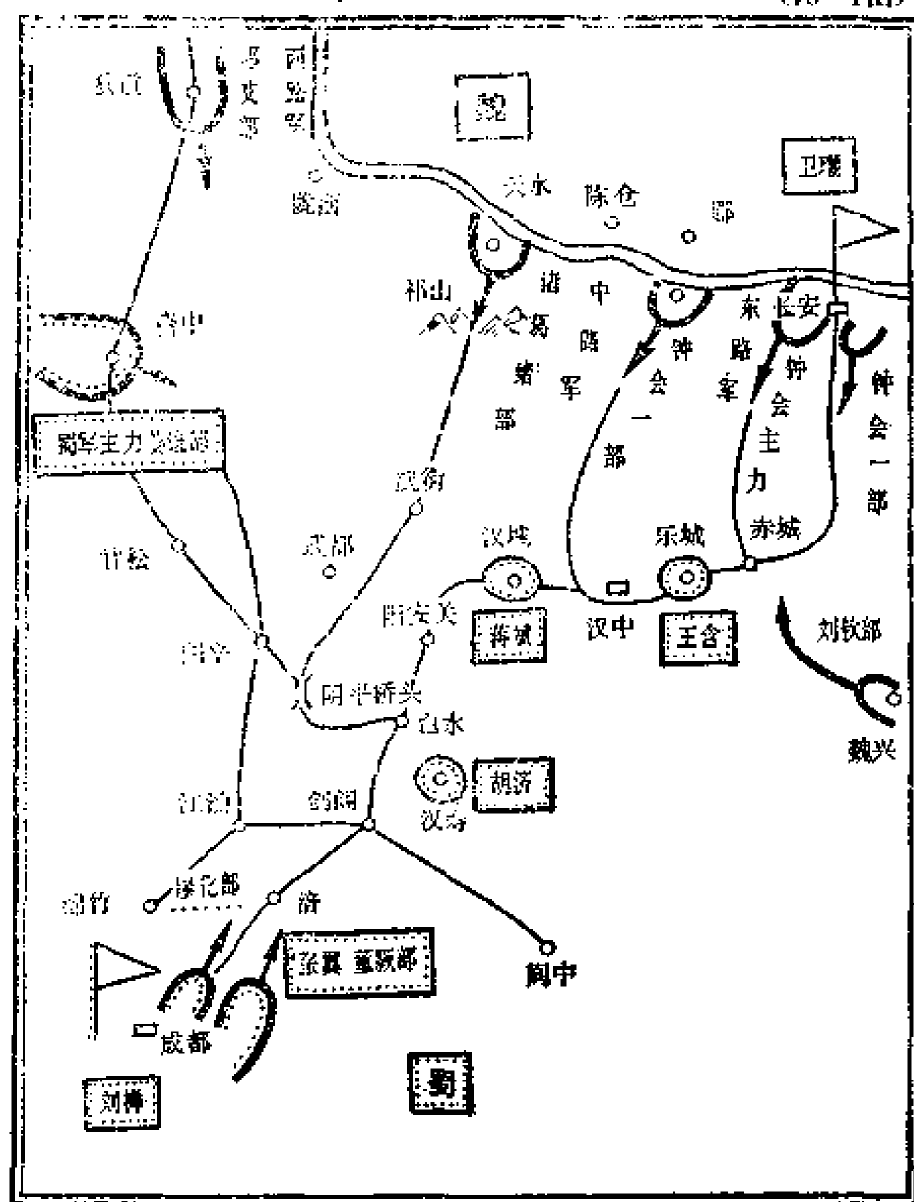
（二）从吴蜀两国的国力来说，当时，吴国据有三州，而蜀汉只占有一州。三国之中，蜀汉最为弱小，加上姜维多次用兵，蜀军将领都认为“国小民劳不宜黩武”，“用之无厌，将何以存”。频年用兵的结果，使益州兵疲民困，边备不修。按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用兵原则，先向弱者开刀。灭蜀之后，“胜敌而益强”，再图消灭吴国，自易成功。

（三）蜀汉当时的边防部署出现漏洞。姜维收缩汉中外围各要点的兵力退保汉、乐二城，而他又亲率蜀军的主力，远屯沓中。这就使蜀汉北方的边防要地汉中的防务空虚。司马昭发现了这个空隙，制定了以一部兵力牵制姜维于沓中，主力出其空虚、直捣汉中的战略方针，可以说是击中要害。

三、魏军的战略部署和战役指导

魏曹奂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二月，司马昭根据他的牵制姜维于沓中、大军出其空虚以直捣汉中的战略方针，决定进攻蜀汉，各路大军的战略部署和任务。（参看插图13-1）

西路军：



蜀军边防部署及魏军进攻布势示意图 （13—1图）

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陇右诸军事、邓侯邓艾统率司马师纂、将军惠唐亭侯邓忠（邓艾之子）、天水太守王颀、陇西太守牵弘和金城太守杨欣共率军三万人自狄道（今甘肃临洮西南）向甘松（今四川松潘西北）、沓中进军，以牵制姜维。

中路军：

雍州刺史诸葛绪统率将军庞会和田续以及南安、广魏、安定、武

部和阴平各太守共率军三万人自祁山向武街（今甘肃成县）、桥头（阴平桥头，在今甘肃文县东南）进军，以遮断姜维归路并阻止蜀军进援沓中。

东路军：

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关内钟会统率长史杜预、护军胡烈、荀恺、前将军李辅、参军爰彰、皇甫闿、司马夏侯咸、将军句安、王买共率军十二万人，分由斜谷、骆谷、子午谷三道并进，分头乘虚直取汉中然后南下攻蜀。

另令魏兴太守刘钦先期率军万人自魏兴向汉中进攻，先敌占领子午谷与骆谷的南口，保障钟会的大军进出容易。

监军：

待中卫瓘率军千人持节监三路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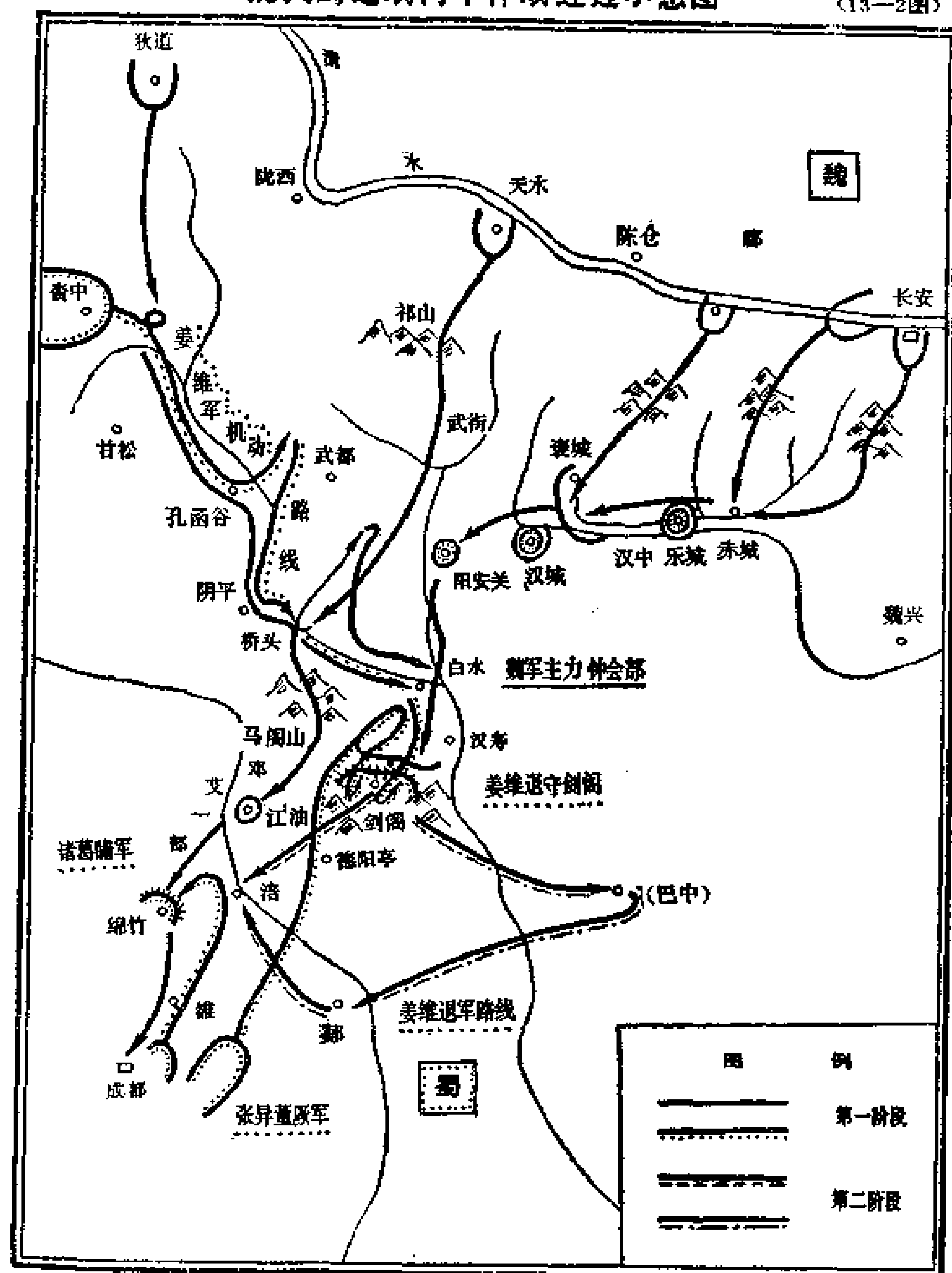
魏元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春，司马昭下诏命诸军大举进攻蜀汉。姜维在沓中探知钟会的主力已入汉中，恐怕阳安关有失，危及剑阁，成都兵少力弱，难以抗击，就决心摆脱邓艾部，立即向东进行战略机动，退回剑阁，凭借天险，设防固守。钟会所部，屡攻不克，十余万魏军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加之粮已不继，钟会准备退军。此时，邓艾在阴平探知钟会准备退军，急向他提出出奇制胜、偷渡阴平的袭击方案。他在建议上说：

> 蜀军已摧折，应乘机进攻。如果从阴平出发，由小道经德阳亭（今四川江油东北）出剑阁以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以奇兵冲击蜀国的腹心，剑阁的守军必定还救涪城，则我大军可以长驱直入；如剑阁的守军不撤退，那它应援涪城的兵力就少了。《军志》上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现在掩袭它的空虚，定能击破蜀军。[18]（参看插图13-2）

钟会采纳他的方案，邓艾选精锐一万人，轻装从阴平出发，沿山谷小路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凿山通道，越过马阁山山险，直奔江油。守将马邈不战而降。刘禅急派诸葛瞻率军迎击。诸葛瞻到涪城后，其部将黄崇再三劝谏："宜速行据险，无令敌得入平地"[19]，他迟疑不

魏灭蜀之战两军作战经过示意图

（13—2图）



决。邓艾乘机长驱直入，击杀诸葛瞻，占领了绵竹。刘禅得知绵竹兵败，成都难守，逃走无路，遂自缚请降，并敕令姜维投降。至此建国四十三年的蜀汉政权被魏灭亡。

司马昭灭蜀的战略部署：派邓艾与诸葛绪牵制及阻遏姜维于桥头以西至沓中地区，以关闭姜维军于无用武之地，以使钟会的主力得以越过汉中的阳安关口而直趋剑阁如入无人之境。又为了牵制蜀国在汉中的守军，以保障钟会的大军能迅速越过汉中而南下，另派魏兴太守刘钦预先攻取子午谷与骆谷的南口，袭扰蜀国汉中守军的侧背，诚可说是筹谋周密，部署适当，有足称者。很可惋惜的是由于诸葛绪的无能，而蜀将姜维实施机动的卓越，竟使司马昭此项周密的战略部署遭到破坏。由此可知卓越的战略计划和部署，必须赖有优秀的战场将帅去执行，始能付诸实施，达到预期的战果。否则，尽管周详地运筹于帷幄之中，亦难以决胜于千里之外。

魏灭蜀的战争，从战役指导上来研究，主要特点是突然袭击，实施山地进攻，乘虚蹈隙。姜维率蜀军主力长期偏处沓中，使蜀汉北方边防要地汉中的防务空虚，这就给魏军以可乘之隙。司马昭发现并利用了这个空隙制定了出其空虚，直捣汉中的战略方针，钟会又能不为汉、乐二城所牵制，绕过二城直趋阳安关，因而取得了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使蜀军陷入极其不利的境地。姜维及时地实施战略机动，魏将诸葛绪没能达到截阻姜维归路的任务，使姜维侥幸地退守剑阁，堵住了这个漏洞，粉碎了司马昭的进攻部署，使蜀军的处境转危为安。从汉中正面来看，钟会的大军被阻，似乎是已经无隙可乘，无虚可蹈了。姜维忽视其他谷道空隙的防守，于是新的漏洞又被邓艾找到了。魏军出敌不意地偷渡阴平，袭击其空虚，冲入腹心，符合了孙子所说“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原则，也扭转了魏军功败垂成的不利态势，使战局急转直下，使扼守剑阁正面险阻的蜀军，又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这都显示魏军战役指导的卓越。

第二　晋平吴之战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晋灭吴之战是强大的晋国对弱小的吴国进行的一次统一战争，也是三国时期最后的一次大战。这次战争结束了三国分立九十多年的局面，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从军事战略上看，这次战争也是以突然袭击取得成功的，是经过长期的周密准备，水陆并进，在长江上中游广大正面上进行的一次江河攻防战争。羊祜、王濬、杜预、张华诸人的灭吴谋议、晋的战争准备、战略方针、部署和战役指导以及吴国必然灭亡的原因是值得探讨的战略问题。现先略述战前形势：

魏国自司马昭公元263年灭蜀以后，不仅扩大了疆域，且收编了蜀汉近十万将士，军力大有增加，从而更加巩固了司马氏在曹魏政权中的统治地位。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遂在晋武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废掉魏帝曹奂，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后，即有灭吴之志，但因长江天堑的限制，未能即时出兵，可是灭吴的准备工作却暗中在积极进行。

吴国到孙皓统治时期，政治腐败，人心背离，孙皓除残暴外，还异常昏庸。他又迷信巫卜，自以为可以统一中原，多次出兵进攻晋国，劳民伤财。蜀汉灭亡后，吴国已唇亡齿寒。晋国在积极备战，待时而动，而吴国却江防废弛，麻痹无备。及至晋军六路分兵，大举渡江，金陵王气又怎能不黯然沉消。

一、羊祜、王濬和杜预诸人的平吴谋议

武帝咸宁二年（公元276年）十月，羊祜上书司马炎，提出灭吴的战略计划。书上说：

> 蜀汉平定时，天下的人都说吴国应同时灭亡，但自平蜀以来，又是十三年了。谋议虽然多，而决策在一人，凡是靠险阻得以保全的，是由于双方势均力敌如果力量不等，强弱悬殊，虽

有险阻也是保不住的。蜀汉地势不是不险要，都说一夫荷戟，千夫莫当。当我军进兵之日，藩篱没有起多大作用，乘胜席卷，进至成都，汉中诸城的蜀军，都如倦鸟栖巢而不敢出。不是没有战志，是因为他们的力量不足以与我们对抗。等待刘禅投降，蜀军营阵就全部瓦解。现在江淮的险阻，不如剑阁；孙皓的残暴，过于刘禅；吴人的困苦，甚于巴蜀；而晋国的兵力，盛于往时，应该乘这个时候平定吴国，统一海内。如还再阻兵相守，使天下劳困于征戍，使兵将经历营阵，至于衰老，这是不能长久的。

现在如果王濬、唐彬率梁、益之兵，水陆俱下，祜可统率荆州之众，进逼江陵，胡奋、王戎直指夏口，王浑司马伷所统率的徐、扬、青、兖之众，会师秣陵。吴国以一隅之地，抵挡我各路大军，兵分势散，防不胜防。我把巴汉的骑兵出其空虚，只要一处被我突破，吴国上下震荡，纵有智谋之士，亦不能为吴国筹划保全之策。吴国江防东西数千里，受敌面大，无有宁息，孙皓恣情任意，与下多虑，将帅疑于朝廷，士卒困苦原野，没有保国之计、一定之心，平常时候就想离去，我大军一到，必有响应的。他们不会齐心合力，拚死搏战，这是可想而知的。吴军习于速战，不能持久。他们的弓、弩、戟、盾不如我国的精利，只有水师是他们所长。我大军一入吴境，长江不再可持，退保城邑，舍其所长而就其所短，那就不是我们的对手了。我军深入吴境，人人有必死之志，吴人心怀内顾，各有离散之心。情况如此，不用多时，定能取得胜利。[20]

晋武帝非常嘉许羊祜的建议，但众人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凉州树机能的叛乱未平定，不宜伐吴。羊祜认为：

只要吴国平定，凉州叛乱，自然平息，应当迅速处理大事，收大功才是。[21]

杜预与张华赞成羊祜的计划，而贾充、荀勖、冯统诸人反对甚烈，晋武帝暂时未下决心。

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 278 年）正月，羊祜因病请入朝。他到洛

阳后，又向晋武帝当面陈述伐吴应抓住时机，晋武帝赞同，派张华去向他询问方略，羊祜认为：

孙皓暴虐已甚，现在伐吴可以不战而胜。如果孙皓不幸病故，吴国另立明君，晋国纵有百万之众，长江亦未可窥测，还将留下后患。〔22〕

张华赞同羊祜的看法。晋武帝想派羊祜带病统帅诸军，羊祜以年老恳辞。

同年十一月，羊祜病故。死前，他举荐杜预以自代。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的诸军事。

第二年四月，益州刺史王濬又上书，请求抓着时机，出兵灭吴。

晋武帝正准备出兵，此时，适值安东将军王浑表报孙皓企图北伐，沿边戍守部队戒严，于是朝议待明年再出师。

杜预在荆州，听说要改期到明年才出师，又一再上表力争，说：

自七月以来，敌人虽严格下令，长江下游没有兵力上调。以理势推断，敌人势穷力竭，不能上下兼顾，必定想保夏口以东，以苟延残喘，无法多抽调兵力西上，使建业空虚。陛下如听取反对出兵的意见，就会委弃大计，纵敌患生，实在可惜。……自秋天以来，进攻敌人的布局已暴露。现在如果停止行动，孙皓可能因恐怖而另生别计，迁都武昌，加强江南诸城的防守，疏散沿江居民，使我军城不可破，野无所掠，那明年计议出兵，就会一无所得。〔23〕

杜预的表报到了洛阳宫苑，正值晋武帝与张华在下围棋，张华乘机又劝晋武帝排除群议，早下决心，他说：

“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24〕

这样，晋武帝司马炎才最后定下决心。贾充及其党羽荀勖、冯紞诸人仍反对出兵，固执力争，惹得司马炎大发雷霆，贾充才免冠谢罪。

羊祜两次向晋武帝司马炎提出灭吴的建议，从地利、人和、时机各方面来分析论述吴国必然覆灭的形势，是十分中肯的论断。他提出

多路并进水陆齐发一举灭吴的战略部署，在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后来，晋武帝策定的灭吴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可以说完全是羊祜遗留的计划的翻版。羊祜不空谈高论，而善于把他们的宏伟设想付诸于具体的战备与怀柔两手政策中，他举荐王濬为益州刺史，在巴蜀训练水师，大造船舰，以备顺流东下；他减少戍逻士卒，垦田八百顷，“其始也，军无百日之粮，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积”。[25]他在荆州“务修德信，以怀吴人”[26]，临死前所推荐的杜预也十分得力。后来在灭吴战争中，杜预指挥运筹，着眼全局，谋深虑远，可以看出羊祜举荐得人。吴国灭亡后，群臣朝贺庆功，司马炎举杯流涕地说：“此羊太傅之功”，[27]可以说这是论功行赏时对羊祜公正的评定。羊祜堪称是晋朝开国的功臣，也可以说三国时代末期的第一流将才。

反观贾充、荀勖和冯紞之流，凭宠信用事，结党弄权，他们再三反对羊祜陈述的灭吴计划，却又提不出反对灭吴的至当理由。他们为何要再三反对呢？杜预在向晋武帝的奏议中，揭露了贾充诸人的肺腑。他认为：羊祜未先谋于朝臣，而秘密与陛下共施此计划，故益令朝臣多异同之议……直切言之，是他们认为计划不是出于他们所拟，捞不到功劳；又对他们反对过这个计划，而感到羞耻，因而固执地坚持意见，矢不改口”。[28]灭吴是军国大计，是军事秘密，要通过秘密准备后，才能付诸实施，怎能事先与朝臣广泛商讨。贾充、荀勖之流自以为是朝中权贵，元老重臣；又怨恨羊祜不向他们攀附，因而挟私怨，再三反对羊祜提出的切实可行的计划。历史上总有贾充之流这样的宠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二、晋在平吴战争准备中两手政策的运用

司马炎发动灭吴战争之前，采取在军事上长期准备和在政治上怀柔策略互相结合的两手政策。

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委派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征东大将军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守临淄；镇东大将军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守下邳；同意羊祜在荆州减少守备巡逻的部队，进行屯田，以充军食；委派王濬为益州刺史，在巴蜀训练

水师，大造船舰。另一方面运用怀柔政策：优待投降的蜀汉君臣，量材录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倾吴人之望”[29]；派遣使者通好吴国，以消除吴人的敌意；重用和重赏吴国的降将孙秀，孙楷，以瓦解吴军的斗志；遣还吴国的俘虏及家属，“降者愿去皆听之”[30]，以开广大信；特别是羊祜在荆州，“绥怀远近，甚得江汉之心”。[31]行军过吴境，粮食缺乏，收割了吴人的庄稼，回去之后，按照粮食所值，用绢偿还；他率部队会猎于江沔，常停止于晋地，不入吴境；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又被晋军捕获的，都送还吴人；他与陆抗比邻而处，亦持友好态度，常遣使者通信问好，互赠酒药，以昭信义。

司马炎把战争的胜利寄托在充分准备的可靠基础上，这是切合晋国内外情况的。吴国的国防是依靠长江天堑。曹操下江南，兵败于赤壁。曹丕三次攻吴，都只好临江浩叹。在当时的条件下，北方的军队要克服长江天堑，是比较困难的。这是晋国对吴国用兵的关键问题，要解决它，就必须从制作舟舰、训练水师着手，战争结果证明：水师在灭吴战争中起了主要的作用。这是王濬在巴、蜀七年作舟舰、练水师的结果。这都表明进行长期充分的准备是必要的。在进行长期军事准备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攻心政策，特别是羊祜的怀柔政策，是颇见成效的，消除了吴国军民的敌意，对孙皓也起了麻痹作用，为尔后的军事行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来杜预平定荆、交两州，几乎是兵不血刃，吴人望风而降，郡县传檄而定，达到了“攻心为上”的要求。由此可见，充分的军事准备和有效的攻心策略，也是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

三、晋灭吴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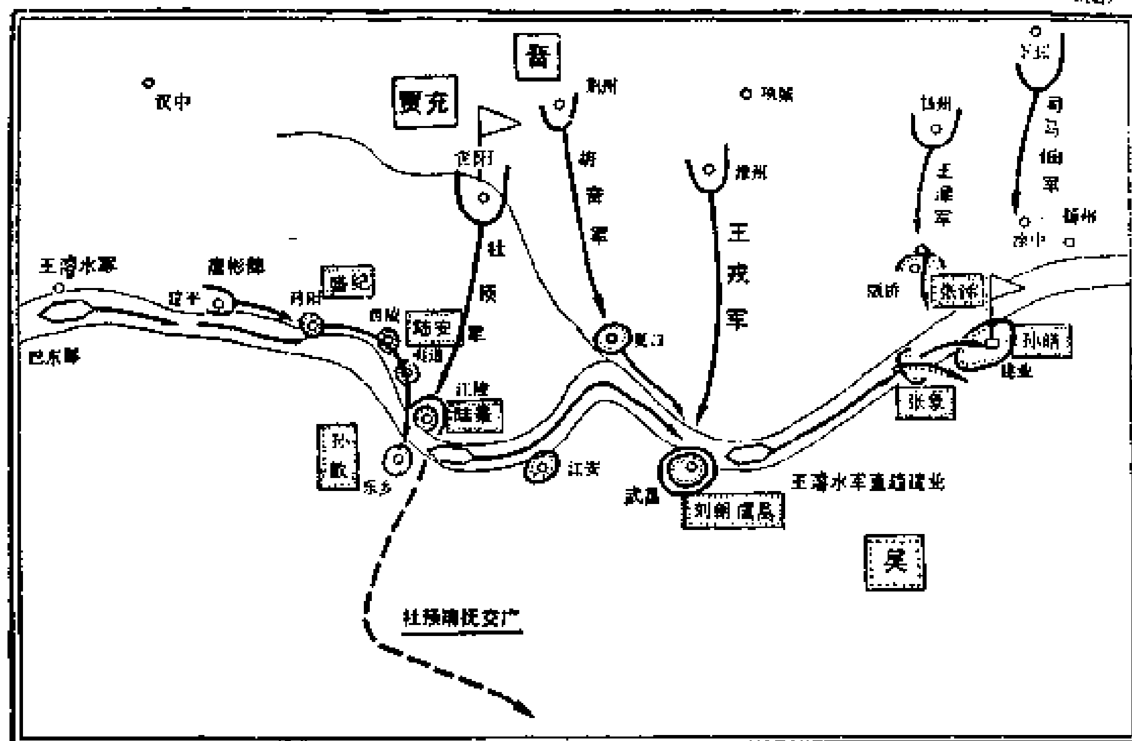
晋武帝采用羊祜生前所建议的战略计划，策定了“多路并进、水陆齐发、突然袭击、一举灭吴”的战略方针，并作了如下的战略部署：（参看插图13—3）

——镇东将军琅琊王司马伷自下邳向涂中（今安徽滁县）方向进军；

——安东将军王浑自扬州（州治在今安徽寿县）向江西（指今安

晋平吴之战晋军战略部署及作战经过示意图

（13—3图）



徽芜湖一带长江以西和以北地区）方向进军；

——建威将军王戎自豫州（治在今河南汝南东南）向武昌（今湖北鄂城）方向进军；

——平安将军胡奋自荆州（州治在今河南新野）向夏口（今湖北武昌）方向进军；

——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向江陵方向进军；

——龙骧将军王濬和巴东监军唐彬自巴蜀顺江而下，直趋建业（今江苏南京）。

以上六路兵力共约二十余万人（包括水师），以贾充为大都督，冠军杨济为副都督，统率中军，南屯襄阳，统一指挥诸军，并以张华为度支尚书，量计运漕事宜。还规定王濬的水师到建平（今四川巫山）后，受杜预指挥，到建业时，受王浑指挥，以便水、陆军协同作战。

江河防御，正面甚宽，江面辽阔侦察搜索均受限制，敌情不明；千里江防，一点被突破，则全盘皆输。所以攻者常实施奇袭强袭，秘

密企图，声东击西，以迷惑敌人，使敌判断不清攻者的渡河点。尤其广正面多处渡河，就会使防者无法应付。

司马炎所策定的灭吴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多路并进，水陆齐发，的确是比较好的，也符合江河进攻的原则。

——吴国的兵力已居劣势，江防东西数千里，备多力分。晋军六路并进，水陆齐发，实施广正面的进攻，便于把吴国的江防截成数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上下兵力不能互相调动支援，处处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晋军王濬、杜预、王浑、王戎等任何一二处渡江成功，逐渐扩大，吴国都会处于失败。所以晋军于长江上、中、下游广正面实施进攻，战略上已必胜无疑。

——蜀汉灭亡后，吴国已失去上游形势。晋与吴国共有长江，天堑不能飞渡的难题解决了。从巴蜀、襄樊水陆齐发，顺流而下，就充分地利用了地略上的有利形势，使吴国难于应付，王濬楼船即使迟滞于中游或被击破，不能直抵石头，杜预取荆交二州，东吴也归失败。如王浑也渡江，则韩擒虎灭陈的历史，早就出现了。

——多路并进，水陆齐发，声势浩大，军威逼人，从精神上大大地威慑敌人，史载“濬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吴人大惧”[32]，有利于战争的迅速解决；

——为了水陆两军作战的密切配合和防止敌人各个击破，事先规定王濬水师到建平后，归杜预指挥；到建业后，归王浑指挥。这是我国古代用兵在战略上组织协同的一个好的范例。

四、晋军的战役指导

（一）长江上游的战役指导

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00年）一月，杜预向江陵推进，王浑军向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方向进军，灭吴战争的序幕揭开。二月，王濬、唐彬的水师击破丹阳（今湖北秭归）的吴军盛纪部，顺流而下，破坏了吴人在长江要害位置所设置的拦江铁锁和铁锥，相继攻下西陵（今湖北宜昌东）、荆门、夷道等地，杀吴国夷道监陆晏。继续

前进，击杀吴国水师都督陆景。与此同时，杜预派周旨等率奇兵八百人乘夜渡江，袭取乐乡（今湖北松滋东），俘获吴国长江上游的军事统帅孙歆，乘胜攻占江陵，胡奋军也攻克江安（今湖北公安）。晋军所到之处，吴军大都不战而降。于是风声所播，沅水、湘水以南、交广州郡相继请降，由杜预进行绥抚工作。至此，晋军以荆州已定，调整部署。

——命王濬、唐彬与胡奋、王戎共同平定夏口，并顺流东下，直捣秣陵；

——命杜预安定零陵、桂阳两郡，绥抚衡阳郡，传檄平定荆州南部，并分兵以增强王濬、唐彬两部；

——令太尉贾充移驻项城。

王戎派遣参军罗尚、刘乔率兵配合王濬围攻武昌。吴国江夏太守刘朗和武昌守将虞昺相继投降。

长江上游的战斗胜利结束后，杜预召集各军会议，商讨下一步行动的决策。有人主张暂时停止进军，认为：

> 百年之寇不是一朝能平定的。现值春水上涨，难于久驻，应待来年冬天，再大举出师。

杜预主张应乘胜进军。他认为：

> 过去乐毅借济西一战胜利的声威兼并了强齐。现在我军兵威已振，势如破竹，数节之后，皆迎刃而解，无复着手处也。[33]

他遂即定下决心，向各将帅指示方略，并写信给王濬要他挥军直趋建业。

此时，在洛阳宫庭内，只有张华坚决认定攻吴必克，而许多大臣却认为未可轻进，主张罢兵，贾充还上表请腰斩主战的张华，以谢天下。

晋武帝看表后说：继续进军是我的主意，张华不过是与我的意见相同罢了。[34]荀勖又奏请按照贾充的意见行事，晋武帝未采纳。不久，吴国投降，贾充才感到惭恐，向晋武帝请罪。

当长江上游的战争发展极为顺利、势如破竹之际，杜预统筹全局，

计深虑远，对王濬的水师，不妄加制约，勉励他率水师扬帆东下，径取建业，并批驳"宜候来冬更为大举"的议论，指示各路大军，直捣建业。这都展现身负长江上游的指挥重任的杜预能着眼全局，机断行事，而王濬能乘胜长驱，突击敌人的心脏，致敌人于死命，亦是符合兵贵神速的原则的。

当晋军已势如破竹地下荆州、平交广、顺流而东、吴国指日可定时，贾充和荀勖等人还奏请宜召诸军还，以为后图，真是拙谋浅见，而这一争议的史实说明在出师灭吴这一重大决策上，斗争是激烈的。

（二）长江下游的战役指导

同年二月，孙皓探知王浑率军南下，命丞相张悌指挥丹阳太守沈莹等率军三万渡江迎战。军至牛渚（今安徽当涂采石矶附近）时，沈莹向张悌提出先与晋军水师决战的建议：

> 晋国在巴蜀训练水师已久，我上游诸军，素无戒备，名将皆死，幼小当任，恐不能抵御。晋国的水师必定会到达此地，应积蓄众力，以待晋军前来与它决一死战。如果幸而获胜，江西自然靖平。现在渡江与晋国大军会战，如果不幸失败，则大事去矣[35]。

张悌不同意沈莹的建议。他认为：

> 吴国将要灭亡，明智和愚昧的人都早已知晓，不是现在才清楚，我担心晋国水师到达此地时，我军众心惊骇，不可复整，趁现在渡江去，还可以与敌决战，如果失败，同死社稷，亦无遗恨。如能战胜，北面的敌人退走，我军兵威大振，就好乘胜西上，迎战晋国的水师于中途，不担心不能击破敌军。如果按照你的计划，恐怕士众散尽，坐待敌人到来，君臣都只好缩手投降，无一人死难，岂不羞辱。[36]

三月，张悌等渡江与晋军王浑部战于版桥，遭到夹击。吴军大败。张悌、沈莹等均战死。吴国上下大为震动，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此时，王浑、司马伷部逼近长江北岸。王浑的部属扬州别驾何恽建议"速引兵渡江，直指建业"，他认为：

> 张悌所率全吴精锐歼灭于此，吴国朝野莫不震慑。王濬既

已攻破武昌，乘胜东下，所向辄克。吴国已呈土崩之势，应速引兵渡江，直指建业。我大军猝至，夺去敌军胆气，可不战而俘虏敌人。〔37〕

"阇于事机"的王浑未采纳何恽的建议，还说：

我奉诏令只屯兵江北以抗击吴军，不使轻进。你们扬州的部队虽然英武，又岂能独立平定江东，现在如违背诏令行事，胜了不说，如果失败，罪过就重了。何况诏令规定王濬受我节制，只应当准备好舟楫，等待一齐渡江才是。〔38〕

何恽申述他的意见说道：

王濬兵驱万里，所过必克，要他成就了大功，还来受你节制，未听说过有此事。明公（王浑）身为大将，见可而进，岂能一一听诏令行事。现在乘胜渡江，必获全胜，还有何疑虑而迟滞不进。〔39〕

王浑谨奉诏命行事，终究没有采纳何恽的合理建议，按兵不动。

早先诏书规定：王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建业，受王浑节度。但王濬的水师到达西陵时，杜预对他的行动不妄加制约，并写信鼓励他径取建业，所以王濬攻克武昌后，就率水师顺流东下，直追建业。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师万人抵抗，但军心涣散，未战而降。孙皓又凑集二万人命陶濬率领抵抗，但出发前，官兵全部逃散。这时，王浑、王濬、司马伷各部都到达建业附近，王濬的水师越过三山（在今南京西南五十里），王浑派遣使者邀王濬过江议论军事，王濬扬帆直指建业，派人回报说：江风正利，不便停泊。当天，王濬率领"戎卒八万、方舟百里"〔40〕冲入建业，孙皓只好亲到王濬军门请降。九十多年的分裂局面至此宣告结束，三国归于统一。"从今四海为一家，不用长江限南北"〔41〕了。

晋国灭吴的战略部署是水陆并进。王濬楼船所运载的水师由武昌乘胜东下，王浑所统率的扬州诸军由江北南来，会师建业。晋军处于外线作战的态势。吴军抗击之策是死守建业孤城，待晋国的水陆两军兵临城下，再与之背城一战呢？还是应乘晋国的水陆军正分进、尚未

构成合击之际，先击其一路呢？吴将张悌和沈莹都不赞成坐以待毙，主张乘其分进之际主动出击，我们认为这一决策符合内线作战的指导原则，是正确的。

沈莹主张积蓄兵力，先与顺流东下的晋军水师决战，而张悌认为应先渡江迎战王浑统率的陆军。如果战胜会使吴军的兵威大振，再乘胜溯江西上，迎战王濬的水师。这两种作战方案，我们认为以先迎战王浑的陆军较为有利。可惜的是吴军已军心涣散，士无斗志，败亡之局早已铸成，虽有智者亦难以善其后了。张悌亦深知不战亦亡，战亦亡，宁愿"同死社稷，亦无遗恨"，而不愿束手投降，蒙受羞辱，张悌堪称是一员义烈之将。

晋军负责长江下游指挥的王浑，在击灭吴国丞相张悌统率的精兵后，不机断行事，采纳何恽"速引兵渡江、直指建业"的建议，及时转入追击，乘胜渡江，迅速攻克建业，赢得战争的胜利，却谨守诏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按兵不动，实不配担任一方面的指挥重任。后来，他还与王濬争功，上表说王濬"违诏不受节度"，诬以罪状[42]而不反责他自己"缓师失机"。灭吴以后，王濬亦自以功大而为浑父子及党羽所挫抑，每次晋见司马炎，陈述他伐吴之劳及见枉之状，或不胜忿愤，不辞而行。司马炎每次对他都容忍。益州护军范通劝王濬说：

> 将军的功劳诚大，但对待功劳的态度则不尽善尽美，将军凯旋之日，微服家居，闭口不言平吴之事，如有人问及，就说："这是主上之德，群帅之力，老夫何力之有"，这就是蔺相如所以能折服廉颇所持的态度，王浑能不感到惭愧？[43]

王濬才认识到他的胸襟窄狭。后来司马炎察知王濬实是"功重报轻"，升迁他为镇东大将军。

兼论羊祜、贾充、杜预、王濬、王浑诸人的行议，虽是弦外之音，但这有关将帅修养，属战略范畴，值得叙述，以供借鉴。

五、吴国灭亡的原因

吴国孙权死后，嫡庶争立。宗室大臣分成拥嫡、拥庶两派，争权

残杀，怨恨加深，使吴国政局动荡不安。吴孙皓元兴元年（公元264年），孙皓即位，“法禁转苛，赋调益重”[44]。他常用各种残酷刑法来杀戮大臣，上下离心，人人自危，感到“死不保，仕者以退为幸”[45]。他又穷奢极欲，追求生活享受，开花园，修楼观，力役费用，以万钱计，弄得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广大人民不堪奴役和搜刮，纷纷起来反抗。孙皓还认为晋国无力对吴国用兵，因而骄傲轻敌，麻痹无备。一些忠诚谋国的将帅如陆抗等屡次上书进谏说："现在应该培养国威，以图自保，如不力农富国，审官任能，明黜陟，任刑赏，用德望来感化部下，用仁政来安抚百姓，而听从诸将去追求名利，穷兵黩武，动费万计，使士卒劳瘁，这样敌人未衰弱，而我们却已大困，现在还想入主中原，而昧于长远利益，不是国家的良策"。[46]

陆抗劝谏孙皓对内改善政治，对外加强防守，特别提出依靠长江天堑是靠不住的，是"守国之末事，非智此知所先"[47]，孙皓置若罔闻。吴孙皓凤凰三年（公元274年）陆抗临死前，以老臣忧国的心情，再上书孙皓，劝他们加强长江上游的防御，防止敌人泛舟顺流而下。书上忧心忡忡地说：

> 西陵与建平是国家的外藩，既处长江上游而又两面受敌。如果敌人泛舟顺流而下，舳舻千里、星奔电驰，顷刻即至。倒悬之危，不是调他部驰援可以解救的。这是国家安危的枢纽，不只是侵犯边疆的小害。我的父亲过去承担西防重任时曾陈述过：西陵是国家的西门，虽然说是容易防守，也容易丧失。如果西陵不守，不但丧失一郡之地，整个荆州就不会归吴国所有。如西陵有事，应倾全国之力以争之。我以前曾请求先给我精兵三万，其主其事者没有如数拨给，自平定步阐叛乱以后，更有所损耗。现在我所统辖的地域千里，对外要防御强大的晋，对内要安抚少数民族。而全部兵力统有数万，而且疲敝日久，实难以应变……我请求下诏精简一切兵员以补充疆场常受敌攻击之处，使我部能补足八万人，精简其它事务，以并力防御，庶几无患，如果不这样，局势很可忧虑。我死之后，请注意西方的防务。[48]

建平太守吾彦发现晋国在四川造船的废料木屑浮江而下，判断“晋必有攻吴之计”，请求孙皓“增建平兵以塞其冲要”[49]，都未引起孙皓的重视。吴国毫无戒备，不加强守备兵力，以至在晋军突然袭击之下，完全陷于被动，手忙脚乱，无法应付。晋军兵临建业城下，吴国君臣只好面缚请降了。羊祜在给晋武帝司马炎的奏议中，早已论断了东吴政权的必然土崩瓦解。吴国在孙权时代，政局安定，水师精强，凭长江天堑，坐江东，观成败，“魏国虽然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而到孙皓时期，人事不臧，天堑就难限南北，铁索横江未为固”[50]了。

吴国灭亡后，司马炎问东吴旧臣薛莹：“孙皓灭亡的原因安在”？他回答说：“孙皓亲近小人，刑罚妄加，大臣诸将，人不自保，所以灭亡”。[51]薛莹的话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孟子说：“地利不如人和”。内部团结，非常重要。

注　释

〔1〕《资治通鉴·卷七十·文帝黄初五年》

〔2〕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文帝黄初四年》。

〔3〕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帝景元四年》。

〔4〕《资治通鉴·卷七十四·邵陵厉公正始二年》

〔5〕原文见《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6〕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六·邵陵厉公嘉平五年》。

〔7〕《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高贵乡公甘露二年》

〔8〕《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帝景元三年》

〔9〕《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高贵乡公甘露二年》

〔10〕《资治通鉴·卷七十七·元帝景元二年》

〔11〕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帝景元四年》。

〔12〕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献帝建安二十年》。

〔13〕《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14〕《资治通鉴·卷七十七·高贵乡公甘露三年》载：“听敌入平”；《三国志·蜀书·姜维传》载：“使敌不得入平”，两说不同。我们采“听敌入平”之说。

〔15〕《三国志·蜀书·姜维传》

〔16〕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帝景元三年》。

〔17〕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文帝黄初六年》。

〔18〕原文见《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19〕《资治通鉴·卷七十八·元帝景元四年》

〔20〕〔21〕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咸宁二年》。

〔22〕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咸宁三年》。

〔23〕〔24〕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咸宁五年》。

〔25〕〔26〕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武帝泰始五年》

〔27〕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武帝太康元年》

〔28〕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八十·武帝咸宁五年》。

〔29〕〔30〕 见原文《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武帝泰始四年》。

〔31〕〔32〕〔33〕〔34〕〔35〕〔36〕〔37〕〔38〕〔39〕〔40〕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武帝太康元年》。

〔41〕 引明代诗人高启的诗句。

〔42〕〔43〕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武帝太康元年》。

〔44〕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武帝泰始六年》

〔45〕 《三国志·吴书·贺邵传》

〔46〕〔47〕 原文见《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武帝泰始八年》。

〔48〕 原文见《三国志·吴书·陆抗传》。

〔49〕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武帝泰始八年》

〔50〕 引明代诗人高启的诗句。

〔51〕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武帝太康元年》

秦汉三国时期战略运用的特点和发展

从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经历两汉、三国，到西晋咸宁六年（公元280年）晋武帝司马炎平定吴国，结束了三国分裂割据局面，使南北又归于统一。在这五百余年间，朝代更替，治乱分合，发生过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战役，概略归纳起来有：农民起义战争、封建统一战争、反击边疆少数民族掠夺的战争、镇压少数民族抗暴的战争和消灭地方割据势力的战争。

在秦、汉、三国时期，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当时新的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繁荣，交通状况的改善，作战工具的改进，参战人员成份的改变和数量的增多，作战地域的扩大和交战时间的延长等，对军事战略的运用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现试从几个方面去探索在这一历史时期中战略运用的特点和它的发展。

一、在农民起义战争方面

秦汉三国时期，发生过三次较大的农民起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是去渔阳戍边的戍卒，因雨误期，被迫斩木揭竿，反秦苛政，事先是没有准备的。他们利用“篝火狐鸣”、“鱼腹丹书”等迷信手段来号召，利用扶苏、项燕的名义来倡导，并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政治目标。只是没有一个长远的战略，没有提出一定的政治主张和如何建立政权的措施。

王莽代汉时期，赤眉军始终未注意作战基地的建设。走到哪里，吃在哪里；吃光一处，另走一处。最后西入长安，与绿林军互相火并，造成同归于尽的历史悲剧。

绿林军初步注意根据地的建设，重视联合各阶层反莽的势力来壮大力量。因而有昆阳大捷，成为历史上以少胜众（40:1）的典范，也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推翻封建王朝的先例。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特点是起义领导人张角明确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口号，比陈胜吴广只提出“伐无道，诛暴秦”是更进一步了。

张角并利用宗教组织形式来进行十多年的秘密准备，这也是前所未有的特点。

二、在民族关系方面

秦统一六国后，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纠纷，主要是对北方的匈奴族。秦始皇派遣蒙恬北击匈奴后，筑万里长城，采取战略防御。西汉初年，刘邦被匈奴冒顿单于困败于平城。由此，汉高、文、景三代对匈奴采取和亲与守塞相结合的防御战略，整军备战。到汉武帝时才转为战略进攻，五次开塞出击，取得重大的胜利，迫使"匈奴远徙，而幕南无王庭"。但汉军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东汉和帝时，派遣窦宪大出塞，把匈奴打过金微山（今新疆东北的阿尔泰山），但汉族与兄弟民族间的融和关系始终未解决。三国时期的诸葛亮是处理民族关系较好的一个。在对南中用兵时，他不采用专杀立威的镇压手段，而采用"攻心为上"的战略，注意收服南人的心。平定南中叛乱后，他采取的安定南中秩序，改善民族关系和发展南中经济的一些战略性的政策和措施，在历史上是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的。

三、在战争规模方面

楚汉战争历时四年多，战场广阔，分为几个战略阶段，几个战略方向，规模的巨大，是秦汉以前所未见的。这场战争概略分为五个阶段。刘邦先忍辱退处汉中，养精蓄锐伺机而动，可以说是战略退却。当项羽出兵东击田荣之际，他采取战略进攻，还定三秦，东陷楚都彭城。项羽由山东挥师南下，实施战略反击，迫使刘邦退守荥阳、成皋，转入持久防御。在荥阳、成皋相持阶段，楚汉两军坚持正面战场，反复争夺成皋。刘邦为了调动楚军，实施战略机动，出兵宛洛，并命彭越袭扰楚军后方，使项羽疲于奔命，在敌后方开辟战场，进行袭扰，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又派韩信开辟北方战场，实施战略迂回，韩信破魏、灭赵、降燕、下齐后，完成了对楚军的包围，迫使项羽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退却。刘邦乘势进行战略追击。三路大军会师垓下，楚军也就一败涂地了。

晋平吴之战中，司马炎六路分兵，指向江南。其渡江战役的巨大

规模也是我国战争史上的第一次。

四、在战略部署方面

秦末，农民起义军纷起反秦。项梁、项羽拥立楚怀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怀王分遣部队击秦：一路由宋义率主力北上进击章邯所统率的秦军主力，解巨鹿之围；一路由刘邦收陈王、项梁的散卒，乘虚西取关中。这样两路分兵，有主有次，相互配合，使秦首尾不能相顾，收到灭秦之功，这在先秦战争中是少见的。

刘秀略定河北后，一面命寇恂据守河内以巩固基地；一面派遣邓禹进入河西，相机袭取关中；一面派遣冯异南渡黄河，图取洛阳。后来，因势利导，攻占了长安，略定了洛阳，控制东西两大战略要点，奠定统一大业。刘秀这一部署的特点是侧面展开，坐收渔利。

三国时期，在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随着战争对象的多角化，及敌我双方所处的战略态势的不同，内、外线作战的战略部署，变化多端，先秦时期亦属罕见。尤其曹操处于内线态势，兵少势孤，他却善于运用各个击破的原则，西降张绣，东破刘备，最后集中全力与袁绍在官渡决战。战略运用是十分巧妙的。

曹操迫降刘琮占有荆州；追击刘备，又强占江陵。遂企图顺流而东，师法"先声后实"战略，迫降孙权，但不习水战，终于在赤壁折戟沉沙，败退回北方。曹操的失着不仅在于没有培养出克服长江天堑的水师，也还在于他不在长江广大正面上的战略要津展开部队，多路分兵，使孙权首尾不能相顾，而把全部人马使用在荆州一个战略方向上。这是他在战略部署上的失着，却启发了晋平吴时，采取广大正面渡江的战略部署，故能收平吴之功。这样大规模的江河进攻，先秦是鲜见的。

五、在谋略运用方面

楚汉战争中，刘邦对付项羽的战略是"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刘邦多智谋，而且能用别人的智谋。他的谋略运用，丰富多姿。他善于政治宣传，并采取联合、拉拢、劝降、离间诸种手段，配合军事斗争，以逐步分裂、削弱、瓦解楚军。而项羽全凭斗力，终于力竭势穷。刘邦利用张良拉拢项伯，与约为儿女婚姻。项伯为他在项羽面前

疏解，使他逃避了鸿门宴上的刀俎；他派遣随何去劝说项羽的骁将九江王英布背楚归汉，割掉了项羽的左臂；他用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施行离间计，去掉了项羽的谋士范增。这些谋略的运用都是巧妙的。

在刘秀开国战争中，绿林军将领朱鲔、李轶等拥兵三十万镇守洛阳。刘秀先诱降李轶，继又施行离间计，使朱鲔杀了李轶，然后再派岑彭去劝说朱鲔归降，兵不血刃地略取了关东的战略要点洛阳，为尔后消灭赤眉军创造了有利态势。

在扫荡全国割据势力战争中，刘秀先联合陇西的隗嚣以制蜀，继又争取河西的窦融以制陇。这些谋略的运用都是很成功的，为先秦时期所少见。

三国时期，在三国鼎立形势下，曹操、孙权与刘备三家争夺荆州的一场斗争：吕蒙诈病回建业，暗图袭南郡；陆逊写信恭维关羽，以促其麻痹；曹操故意把孙权偷袭荆州的阴谋泄露与关羽，以加深两家的猜疑，以及董昭劝曹仁不要追击退军的关羽，使二虎去相斗。这都显示在三角斗争中谋略运用的高妙精采。

六、在选将用士组建统帅指挥机构方面

在春秋时期，战争规模小，参战人员不多，交战时间也不长。两军相接，一次交锋，即可决定战争的胜败，因此统帅多凭个人才智指导战争，不多借助于参谋人员。

在秦汉三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参战人员的增多，一次战争往往旷日持久。因之，面临战争烽火之际，除统帅料敌决策，指导作战外，还需要有一批策士协助运筹，决胜千里；有一批战将披坚执锐，独当一面；有一批谋臣主持后方，筹运补给。这样，统帅指挥机构自然随之扩大加强。而如何选将用士来充实、健全统帅指挥机构，使分工负责，各司其事，便成为统帅必须提到战略运用的高度来考虑的大问题。

刘邦用张良参与帷幄运筹，（参谋部）命萧何主持后方补给，（后勤部）派韩信负责独当一面。（指挥部）刘邦自己都说："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

以为我禽也"。

东汉开国的刘秀，亦选拔罗致了一批智能之士，如邓禹、冯异、吴汉、寇恂、耿弇、岑彭、马援、来歙、马武等，辅佐他平定群雄，完成统一大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中，刘秀统御将帅的才干是比较突出的，他帐下能独当一面的将才之多，也是少有的。

三国时期，曹操统一北方，孙策、孙权兄弟开拓江东，刘备跨有荆、益二州，都是由于他们善于罗致人才、团结录用一批文臣武将为他们策划和进行战争，所以都能开创局部地区统一的局面，鼎立三分。

七、在骑兵使用方面

秦统一六国后，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逐匈奴七百余里。蒙恬的军中就编组有王离率领的"楼烦骑兵"。巨鹿之战中，章邯降楚。"楼烦骑兵"被项羽收编。在楚汉战争中，刘邦攻占楚都彭城，项羽亲率以骑兵为主的三万精兵由鲁（今山东曲阜县）南下击溃刘邦所统率的诸侯之兵于睢水上。楚汉两军交战于荥阳之际，刘邦为了对付项羽的骑兵，选派原秦朝骑士李必、骆甲训练骑兵，由灌婴指挥，击退楚军的骑兵于荥阳以东，使楚军不得再越过荥阳以西，稳定了败退后的阵势。项羽兵败垓下，灌婴率精骑五千实施战略追击，迫使项羽自刎乌江。平城之战，匈奴冒顿单于指挥三十万骑兵围困刘邦于白登。可见在秦和西汉初年，骑兵已代替车兵，与步兵联合作战或独立作战，成为战场的主要兵种之一了。

汉武帝时，为了对拥有强大骑兵的北方匈奴作战，编练了大量的骑兵部队，改变过去防塞守关的消极防御战略，转为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他派遣卫青、霍去病几次开关分道出击，扫荡漠南，转战河西，深入漠北。汉军的强大骑兵集团在塞外广阔的草原和沙漠上，对匈奴的骑兵实施集团冲击、分进合击、远程奔袭、战略迂回、包围、追击，猛打穷追，发挥了强大骑兵集团的突击力、机动力、快速力，成为与匈奴决战的主要兵种。交战双方都使用强大的骑兵集团，在中国战争史上是罕见的。骑兵的运用已由战术部队发展为战略兵团了。这是汉武帝时代骑兵在战略运用上的特点和发展。

三国时期，曹操在官渡之战的白马延津序战和夜袭乌巢袁军的粮草时，使用了骑兵。他北征乌桓，挑选乌桓骑兵编入自己的军队，成为“天下名骑”——曹营中的劲旅。以后，他兵下江南，破荆州，追击刘备，进占江陵，亦使用了骑兵，迫使刘备逃奔夏口。可见骑兵在一些关键性的战争、战役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已发展成为战略运用上的一个强大兵种了。

八、在水军运用方面

三国时期，赤壁交兵，水战是关键，可以说这是中国有史以来以水军为主、水陆两军配合作战之始。晋平吴之战中，司马炎六路分兵，进军江南，“王濬楼船下益州”，水师成为主力部队。水师在这场战争中已发展成为战略兵团了。为了水陆两军作战的密切配合和防止敌人各个击破，司马炎还事先规定王濬的水师到建平后，归杜预指挥；到建业后，归王浑指挥。这是我国古代用兵、在战略上组织水陆两军协同作战的一个好的典范，也是创举。

九、在“火攻”运用方面

战国时期，燕齐即墨之战中，有田单以“火牛”大破燕军的记载。秦、汉时期，利用大规模的“火攻”以取得战争、战役的胜利的不多见。

三国时期，战争频繁，战争指导亦多样化，“火攻”运用于战争、战役，屡见不鲜。在黄巾大起义中，起义军波才部队围攻皇甫嵩于长社。由于起义军缺乏作战经验，依草结营，戒备不严，被皇甫嵩利用夜暗，乘风纵火，实施夜袭，使波才军惨遭失败。在著名的三大关键性的战役中，也是以“火攻”取胜的。官渡之战中，曹操火烧袁绍乌巢的粮草。赤壁之战中，周瑜火烧曹操的战船。夷陵之战中，陆逊火烧刘备的营寨。火攻既决定了三个关键性战役的胜败，又各有特色。

十、在后方补给方面

秦汉三国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交战时间的延长和参战人员的增多，军队的后方补给成为大军统帅战略运用上必须计筹的重要问题。后方补给的充裕或匮乏，往往影响到战争的胜败。楚汉战争时

期，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际，敖仓的储粮是两军反复争夺的战略目标。萧何转漕关中，使汉军后方补给不虞匮乏；而汉将彭越数扰梁地，断绝楚军的粮道，使楚军粮食不济，迫使项羽不得不与刘邦签订鸿沟和约，引兵东归，导致垓下之败。韩信、张耳统兵二十万进攻赵国，赵国谋士李左车认为汉军是“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他向陈余建议：深沟高垒，不与汉军决战，另派奇兵三万人从小道去断绝汉军的后方辎重，这样定可以获胜。韩信探知此情况，不敢冒然进军。待获知陈余未采纳李左车的意见后，他才出兵井陉。

汉武帝反击匈奴时，强大的骑兵集团几次开塞出击，采用“私负从马”和步兵纵队掩护的移动基地的办法来解决快速骑兵的补给供应，这是战争史上的创举。

三国时期，在袁、曹官渡之战中，曹操夜袭乌巢，烧掉袁军屯储的粮草，使袁绍的十万大军败走河北。诸葛亮五出祁山，几次都因后方粮食供应不上而退兵。战争的实践使明智的统帅和图王定霸者认识到，要有巩固的后方，才能支持前方的持久作战；认识到战争与经济的依存关系。刘邦据关中，刘秀据河内，曹操据兖州，都说明他们重视了后方补给基地的建设。

第三篇　两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第十四章　羯族石勒统一北方的战争

第一　西晋建立后中原的形势

一、“八王之乱”导致西晋的衰落

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建立晋朝。公元280年晋灭吴，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帝惩魏氏孤立之弊，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1]封司马孚等十人为王，“又封群从司徒望等十七人皆为王”。[2]诸王拥有军队。以后他陆续派诸王都督各州军事，假节，得斩违令者。这样，诸王不仅掌握了封国的军政大权，而且还掌握了晋室州郡要镇的军政大权，导致了后来的“八王之乱”。

晋武帝在灭吴、大封诸王和罢州郡兵后，认为外无敌国，内无隐忧，遂“怠于政事”，恣意享乐，“掖庭（后宫）殆将万人。”[3]世家大族在司马炎保护下，贪暴恣肆，胡作非为，公卿外戚，竞为奢侈，历史上有名的王恺与石崇斗富，就发生在这时候。傅咸曾警告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4]西晋王室及世家大族一开始就是一个贪婪、奢侈、腐败、残暴的统治集团。

司马炎死后，惠帝昏庸，杨太后与贾后专断争权，援引诸王、外戚以排斥异己，于是诱发了“八王之乱”。从晋惠帝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贾后联络楚王司马玮杀了杨太后和后父杨骏及其家属党羽数千人起，到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先后杀死了

司马颙、司马颖、司马乂，晋惠帝也被毒死。司马越立晋怀帝的十六年间，诸王之间为了争夺统治权，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战，史称“八王之乱”。它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大量死亡、流徙。

西北边陲的许多少数民族，陆续向辽西、幽并、关陇等地迁移，同汉族人民犬牙交错地杂居一起，他们受着本民族贵族和汉族地主的双重压迫，不少人被贩卖为奴。西晋王朝又经常强征匈奴、鲜卑、乌桓或羌人组成军队，驱使他们参加夺权内战，为他们拼死卖命。由于水利不修，无年不旱。晋惠帝元康七年（公元297年）以后，秦、雍二州大旱，在“八王之乱”的反复杀戮下，“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5]秦雍各族人民不得不徙至梁、益、荆、豫就食，并州人民流至冀、豫、兖就食、流徙的人口，见于记载的就有三十万户。一场规模空前的流民和少数民族的反晋大起义开始了。

首先起义的是流徙入巴蜀的秦雍流民十余万口。晋惠帝永宁一年（公元301年），公推賨人李特、李流兄弟为首，据绵竹（今四川德阳北）反抗强迁，攻克广汉，进军成都，攻成都少城。次年正月，李特不幸战死后，李骧（李特弟）及其侄李雄坚持斗争，收军反击，袭破晋军，李雄军势复振，流民共推他为大都督、益州牧，治郫城（今四川郫县）。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率军攻陷成都，建立官属。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称帝，国号大成，是十六国中最早建立的国家。西晋王朝精疲力竭，机能瘫痪，末日也就来到了。

二、刘渊建汉灭西晋

刘渊是南匈奴单于左贤王豹的儿子，晋武帝时受命为北部都尉。“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结刘渊为外援，叫他回并州调发匈奴五部之众，并授他为北单于。晋惠帝永安元年（公元304年），刘渊至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有众五万，胡人及晋人归之甚众，于是就在左国城建国，后迁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国号汉，自称汉王。

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称帝。当时聚众青、徐的王弥、曹嶷，起兵赵、魏的汲桑、石勒，上郡四部鲜卑和氐族皆拥众归汉，以刘渊为共主。刘渊命石勒东下攻赵、魏各郡；命王弥攻略青、徐、兖、豫，并一度攻占许昌，逼近洛阳。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刘渊死，其子刘和继位，其第四子刘聪杀刘和自立为帝。十月，刘聪遣刘粲、刘曜、王弥、石勒会攻洛阳及其外围各州郡。这时洛阳饥困，晋太傅东海王司马越为自保计，率太尉王衍及甲士四万出洛阳东去。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六月，刘曜攻破洛阳，晋怀帝被俘。晋怀帝永嘉七年（公元313年），秦王司马业在长安即帝位，是为晋愍帝。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刘曜进兵关中，晋愍帝出降，西晋亡。

三、司马睿建立江东政权

西晋怀帝时，东海王司马越专政，他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命琅玡王司马睿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镇建邺。从此司马睿就开始在江南建立基业。司马睿素无重望。他依靠以琅玡大族王敦、王导为首的北方南迁大族，拉拢以顾荣、纪瞻为首的江南大族，逐步在江南站住了脚跟。

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司马睿得知愍帝在长安投降了刘曜，就在建康（即建邺）称晋王。明年称帝，建立了东晋政权。东晋政权是西晋高门大族统治的继续和发展，形成了琅玡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几家北方大族轮流执政的局面，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当权士族与王室之间的尖锐矛盾。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发生镇守武昌的荆州牧王敦的叛乱，攻入建康。不久王敦病死，这次叛乱才风息云散。成帝时，帝舅庾亮执政，又发生了豫州刺史祖约和历阳（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的叛乱。庾亮依靠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温峤和荆州刺史陶侃，才平定了这次叛乱，使东晋政权暂时得到稳定。

东晋的建国方针是稳定在江南的统治，正如王导所主张的，“以清静为政，抚绥新旧”。[6]当时根本无意恢复北方，只少数以祖逖为代表的有志之士，积极要求北伐。但得不到东晋的支持，祖逖仍然

"中流击楫"，慷慨北渡，得到中原人民的积极响应，屡败石勒军，收复了河南。"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7]正当祖逖准备乘势渡河，扫清河朔的时候，晋元帝派戴渊都督兖、豫等六州诸军事，使祖逖受到掣肘，忧忿而死。不久，河南的许多郡县就得而复失了。

四、刘聪死后北方再分裂

刘曜入长安、灭西晋，中原的广大地区皆属刘聪的统治范围，达到刘汉匈奴王朝的极盛时期。这时，东北有慕容廆的鲜卑政权，凉州有汉人张轨的儿子张寔的政权，四川有成汉政权，晋阳还在晋并州刺史刘琨手中，幽州还在晋幽州刺史王浚统治之下。而刘渊、刘聪又不过是各少数民族贵族的共主。随着军事的发展，各族割据势力迅速形成。早在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石勒就火并了王弥，"有跨据赵魏之志"。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曹嶷（原是王弥的部将）攻略齐、鲁，众至十余万人，也"有雄据全齐之志"。[8]鲜卑的势力向南推进，也渐渐布满燕、代。刘聪实际上所能统治的地区，不过晋南和关中而已。

晋元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刘聪病死，太子粲继位，匈奴内部开始互相屠杀。大司空、司隶校尉靳准杀刘粲，自立为汉天王。刘曜在长安闻变，自立为帝，发兵会同石勒共讨靳准。靳准为左右所杀，推尚书令靳明为主，派人奉传国玺降于刘曜。石勒猛攻平阳，靳明奔投刘曜，刘曜把靳氏男女也不分少长都杀戮。刘曜返回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石勒派王脩献捷于刘曜，刘曜授石勒为赵王，但又听信谗言斩了王脩。石勒返回襄国得知此事，大怒曰：

> "彼之基业，皆孤所为，今既得志，还欲相图。赵王、赵帝孤自为之，何待于彼邪！"[9]

刘曜共有兵二十八万五千人，在他出兵的时候，"临河列阵，百余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10]

刘曜好色，大兴宫室，性残忍、好杀戮，杀了大批贵族大臣，专宠宦官王沈，从晋怀帝永嘉七年（公元313年）起就不理政事，嗜酒，

或三日不醒。实际上已是一个没落的政权。

第二　石勒的开国

一、石勒的崛起

石勒，羯人，史书说他是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羌渠是匈奴入塞的十九个部落之一。他生于上党武乡县(今山西榆社东南)，幼时曾行贩洛阳和种过田，晋惠帝末年被并州刺史司马腾贩卖到山东，在茌平(今山东茌平西)人师欢家为耕奴。后来石勒联结王阳、郭敖等为"骑盗"，号称"十八骑"，曾参加过公师藩和汲桑的队伍。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他从上党投奔刘渊，收乌桓张伏利度之众两千人，刘渊命他为辅汉将军，督山东征讨诸军事。石勒率十将东下赵、魏，百姓望风归附者五十余垒，选其精壮五万为军士。晋怀帝永嘉三年 （公元309年)，他已有众十余万，"集衣冠人物，别为君子营，以赵郡张宾为谋主，……并州胡、羯多从之。"[11]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他渡河南下，与王弥合兵攻略徐、豫、兖三州。二月渡河北上攻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县)各郡，民从之者九万余口。十月与刘曜、王弥会攻洛阳。石勒攻占南阳，南略襄阳。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石勒攻新蔡，占许昌。四月，追歼晋太尉王衍军十余万人于苦县宁平城，与刘曜、王弥攻占洛阳，俘晋愍帝，达到了北方各族人民推翻西晋统治的目的。但为了夺取北方的统治权，刘汉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王弥建议刘曜建都洛阳，刘曜认为"天下未定，洛阳四面受敌，不可守，不用弥策而焚之（焚洛阳)。"[12]王弥"遂与曜有隙"，引兵东屯项关（今河南项城附近)，"徐观天下之势"。[13]

"王弥与勒，外相亲而内相忌"。同年九月，当石勒得知王弥已遣使吕曹疑来图谋自己的时候，抢先下手，请王弥至已吾（属陈留郡)赴宴，于席间酒酣时，石勒手斩王弥，并併其部众。事后石勒上表奏刘聪，说王弥叛逆，已把他斩了。刘聪大怒，遣使责石勒"专害公辅，有无君之心"。[14]但石勒并王弥后军力更强大了，刘聪为了羁縻石勒，

又不得不加石勒为镇东大将军，督幽并二州诸军事，领并州牧。

二、北据魏、冀为根据地

石勒火并王弥后，引兵掠豫州诸郡，屯于葛陂（今河南新蔡北），筑垒为守，课农造舟，将攻建康。琅玡王司马睿集中江南晋军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纪瞻为扬威将军，督诸军准备攻石勒。

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春，大雨三月不止。石勒军中闹饥疫，死者大半。石勒会集将佐商议对策。右长史刁膺建议：

“请先送款于睿（寿春），求扫平河朔以自赎，俟其军退，徐更图之。”

石勒听后“愀然长啸”。中坚将军夔安建议“就高避水”，石勒说：“将军何怯邪！”孔苌等三十余将请各将兵分道夜袭寿春，……要以今年破丹阳（当时建邺为丹阳郡），定江南。石勒说：“是勇将之计也！”并对张宾说：

“于君意何如？”

张宾说：

“将军攻陷京师，囚执天子，……奈何复相臣奉乎！去年既杀王弥，不当来此，今天降霖雨于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此也。邺（今河南安阳市北）有三台[15]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宜北徙据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晋之保寿春，畏将军往攻之耳；彼闻吾去，喜于自全，何暇追袭吾后。……将军宜使辎重从北道先发，将军引大兵向寿春。辎重既远，大兵徐还，何忧进退无地乎！”[16]

勒攘袂鼓髯曰：“张君计是也。”黜刁膺，擢张宾为右长史，号曰“右侯”。

石勒率军北行，所过皆坚壁清野，掠无所获，军中饥甚。六月，得知汲郡（治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太守向冰聚众数千筑垒守枋头（今河南滑县西南），石勒击破之，尽得其军资，军势复振，遂长驱至邺。

当时邺城为并州刺史刘琨之弟魏郡（治邺城）太守刘演所据守，诸将欲攻邺城，张宾建议说：

"演虽弱，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之未易猝拔……方今王彭祖（指幽州太守王浚，彭祖其字）、刘越石（指并州刺史刘琨，越石其字），公之大敌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顾也。且天下饥乱，明公虽拥大兵，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非所以保万全，制四方也……邯郸（今河北邯郸）襄国（今河北邢台），形胜之地，请择一而都之。"

石勒赞同这一意见，遂进据襄国。张宾又建议说：

"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堑未固，资储未广，二寇交至。宜亟收野谷，且遣使至平阳，具陈镇此之意。"〔17〕

石勒从之，分命诸将收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县），郡县壁垒多降，收其粮谷，运集襄国。同时上表于汉主刘聪，聪以石勒都督冀、幽、并、营四州诸军事，冀州牧。（参看插图14-1）

张宾建议以魏、冀为根据是有远大战略眼光的。

一、"游行羁旅，人无定志"，指出石勒过去那种乘乱而动，乘虚而进的抄掠性军事行动，虽"拥大兵"亦不能"保万全"，道出了建立根据地为根本的重要性，使石勒遂可脱离掠夺性军事行动，向争夺统治权阶段发展，并为开始向封建化过渡创造了条件。

二、"制四方"，"此霸王之业"，说出了石勒想脱离刘聪自立为王的打算，"去年既杀王弥，不当来此"，暗示石勒，火并王弥已引起刘聪愤怒，将来不可避免地要与刘聪决裂，应及早作自立的打算，更加重了建立根据地的迫切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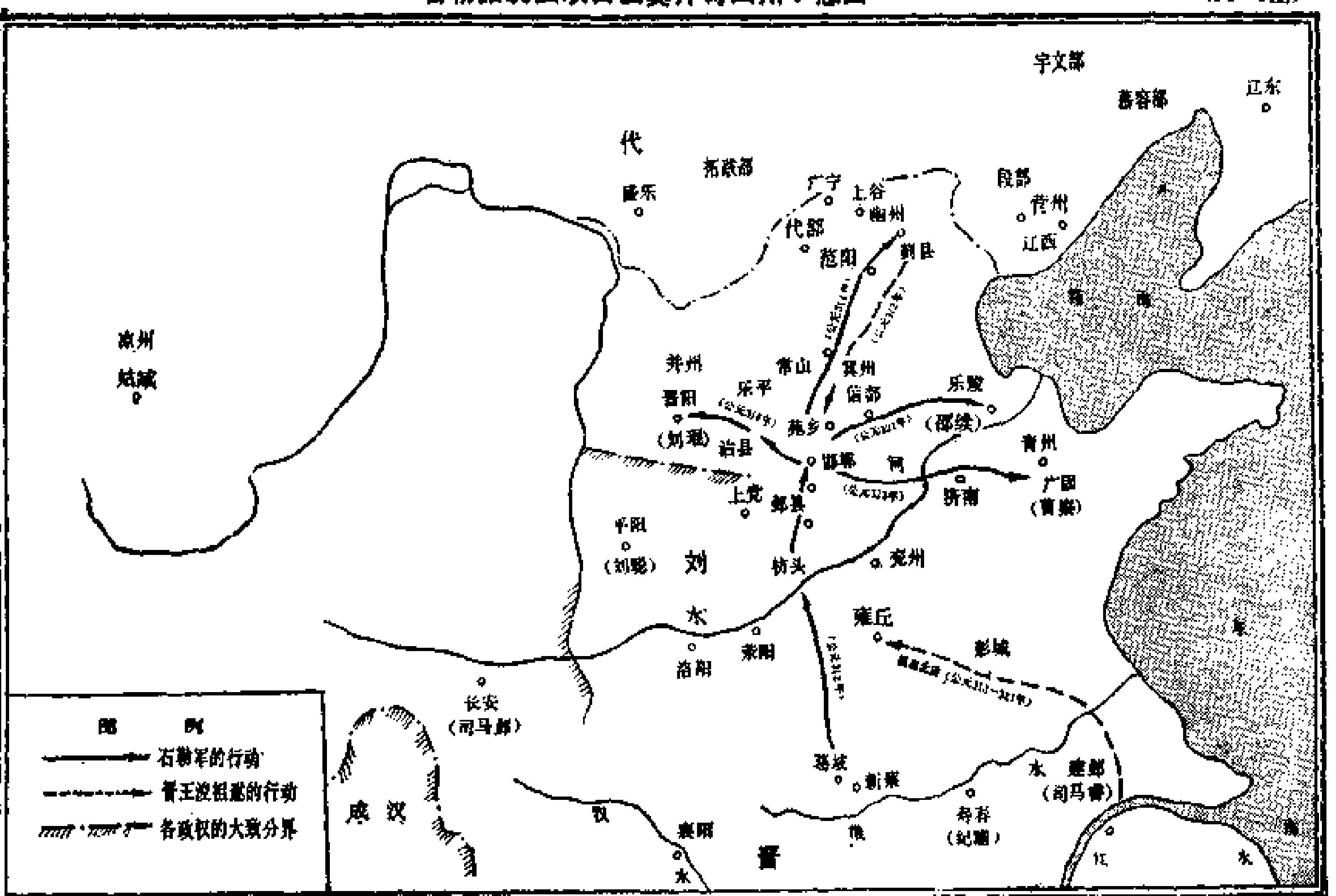
三、指出江淮不能作立足之地，不仅河多雨多，不适合北方军队长驻，更重要的是南有长江天堑和晋军抗击，北有刘聪虎踞背后，将来势必陷入遭受夹击的境地，是十分不利的，故曰"不当来此"。

四、河北地形形势较好，刘聪方致力于夺取关中，长安得而复失，尚在晋秦王司马业手中，刘聪暂时还腾不出手来对付石勒。幽、并、兖还有晋的残存势力，但力量都不强。辽东慕容廆和代北拓拔猗卢都尚无问鼎中原之意，取河北为根据，可以守可以发展，是比较有利的。

五、石勒目前还不强大，无论眼前立足还是将来向幽、并发展，

石勒据襄国攻占幽冀并青四州示意图

（14—1图）



都必须讨好刘聪，以尽量延迟决裂的时间，暂免西顾之忧。为此，"遣使至平阳，具陈镇此之意"，从策略上看十分必要。

三、兼并幽州

王浚为西晋幽州刺史，刘曜入洛阳，俘晋怀帝后，王浚拥立宗室（佚名，不知为谁）称皇太子，承制封拜，备置百官。

在幽州的北方和东方，鲜卑族正在兴起：慕容氏在辽东郡一带；段氏在辽西郡一带；其北为宇文部；代北为拓拔部。晋武帝时，慕容廆率部移居辽西，与晋通好，晋封他为鲜卑都督，开始经营农业。中原大乱之际，一批汉族官僚、地主和人民投奔慕容廆，他们教慕容氏一套统治办法，如不要仇视汉人，承认晋的宗主国地位，令鲜卑贵族子弟学习汉族文化等。西晋亡，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

刘琨为西晋并州刺史，西晋亡，结好代北鲜卑拓跋猗卢部，与猗卢结为昆弟，招抚幽、并三民，据晋阳自固。幽州所属代郡、上谷、广宁（治下洛，今河北涿鹿）之民多归之，引起与王浚的矛盾。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汉主刘聪派刘粲、刘曜进攻并州，刘琨去常山（治真定，今河北正定西）、中山（治卢奴，今河北定县）收兵，刘粲、刘曜乘虚袭占晋阳。代公拓跋猗卢遣其子六脩率众数万助刘琨反攻晋阳，六脩击败刘曜、刘琨重占晋阳。

石勒据襄国后，攻略河北州郡，进图幽州。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十二月，石勒派夔安、支雄等七将攻苑乡（今河北任县东北）。苑乡为王浚所属的游纶、张豺的地主武装所据守。石军破苑乡外垒，王浚派督护王昌率鲜卑辽西公段疾陆眷及其弟段匹磾、文鸯、从弟末柸部众五万人攻襄国以援苑乡。

（一）襄国之战

石勒派诸将出战，都为疾陆眷所败。疾陆眷大造攻城器具，将攻城。石勒部众甚惧，石勒召将佐商议，说：

> "今城堑未固，粮储不多，彼众我寡，外无救援，吾欲悉众与之决战，何如？"

诸将都说：

"不如坚守以疲敌，待其退而击之。"

张宾、孔苌说：

"鲜卑之种，段氏最为勇悍，而末杯尤甚。其锐卒皆在末杯所。今闻疾陆眷刻日攻北城，其大众远来，战斗连日，谓我孤弱，不敢出战，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凿北城为突门[18]二十余道，俟其来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柸帐，彼必震骇，不暇为计，破之必矣。末柸败，则其余不攻而溃矣。"[19]

石勒接受这一建议，秘密挖好突门。疾陆眷果然来攻北门。石勒见鲜卑军懈怠，有的放下武器睡觉，乃命孔苌督锐卒自突门出击，直扑末柸帐，但未能攻克。末柸追来，入垒门，被石勒军擒获，疾陆眷收众稍退。

石勒诸将都劝石勒杀末柸，石勒说：

"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仇雠，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而结一国之怨，非计也。归之，必深德我，不复为浚用矣。"[20]

遂与疾陆眷和，遣石虎与疾陆眷结盟，结为兄弟。于是疾陆眷引兵退去，王昌不能独留，也收兵还蓟。（今北京市）石勒召末柸，誓为父子，遣返辽西。从此段氏专心与石勒结好，王浚之势遂衰。游纶、张豺以苑乡降石勒。

晋怀帝永嘉七年（公元313年）四月，石勒攻占邺城，以石虎守邺城。

石勒释放末柸并与段氏结盟是很有策略的，为孤立幽州王浚起了重大作用。在防守襄国的战役指导上，采取张宾的建议，潜开突门，乘敌懈怠，攻其无备，并集中精锐打击末柸也是成功的。突门在《墨子·备突篇》上曾提到过，但见之于实战，大概还是第一次。

（二）破幽州，杀王浚

晋怀帝永嘉七年，秦王司马业在长安即位，是为愍帝。晋祖逖击楫渡江，进屯淮阴。王浚令疾陆眷共击石勒，疾陆眷不至。王浚大怒，发兵击疾陆眷，不胜。从此疾陆眷与王浚决裂。

王浚谋称帝号，前勃海太守刘亮、北海太守王抟、司空掾高柔谏

阻，为王浚所杀。于是“士民骇怨，而浚矜豪日甚，不亲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调发殷烦，下不堪命，多数入鲜卑”。[21]本来王浚依赖鲜卑、乌桓以逞强，至此皆叛去，加以蝗旱连年，兵势益弱。

十一月，石勒谋袭幽州，张宾分析说：

“浚名为晋臣，实欲废晋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从耳，其欲得将军，犹项羽之欲得韩信也。”

故建议石勒，对王浚“卑辞厚礼，折节事之”，只要骗得王浚信任，幽州可唾手而得。石勒同意，派人多带珍宝奉献于浚曰：

“勒本小胡，遭世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窃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中原无主，……为帝王者，非公复谁！……伏愿殿下应天顺人，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当视之如子也。”[22]

王浚得书大悦，遣使报聘，酬以厚币。

游纶之兄游统，任王浚的司马，镇守范阳(今河北涿县)，遣使私附石勒，石勒斩其来使，送给王浚，于是王浚愈加相信石勒的“忠诚”了。

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王浚的使者到襄国，石勒藏起精甲、劲卒，“羸师虚府”给使者看，北面拜使者而受书，再命董肇上表于王浚，说：

“期以三月中旬亲诣幽州，奉上尊号。”

王浚的使者返幽州，告王浚：

“石勒形势寡弱，款诚无二。”[23]

王浚大悦，益骄怠，不复为备。

二月，石勒准备就绪，将袭幽州，但犹豫未决。张宾对石勒说：

“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准备完毕)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

石勒说：

“然，为之奈何？”

张宾对石勒说：

“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谓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若脩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

石勒听完后说：

“吾所未了，右侯（指张宾）已了之，吾复何疑！”[24]

石勒立即率部袭幽州，火把夜行至柏人（今河北隆尧西南），杀主簿游纶，因纶兄游统在范阳，恐其泄漏军机。

石勒遣使奉笺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浚以自效”。[25]刘琨大喜，移檄州郡，准备南攻平阳。

三月，石勒军到达易水，王浚的督护孙纬驰报情况，准备阻止石勒北上。王浚得知后将佐都说：

“胡贪而无信，必有诡计，请击之。”

王浚大怒说：

“石公来，正欲奉戴我耳；敢言击者斩！”[26]

众人皆不敢再讲，王浚还准备酒宴以招待石勒。石勒率军早晨到蓟，叫开城门。石勒怕有伏兵，先驱牛羊数千头，声言是上贡的礼物，使牛羊塞满街巷，以阻王浚调动军队。到这时，王浚才感到害怕，起坐不安。石勒军入城后，纵兵大掠，王浚左右请派兵抗御，王浚还不同意。等到石勒进至王浚府第的中庭，王浚才走出堂所，被石勒的兵将擒获。石勒派五百骑把王浚送回襄国，王浚投水自尽，被捞起斩于襄国。

王浚的将佐争到石勒军门谢罪，石勒只斩纳贿乱政的，“不忠所事”的，对其他将佐皆不追究。对为官清廉的都授以官职。分遣流民，各返乡里。以原晋尚书刘翰为幽州刺史留兵戍守，自返襄国。遣使将王浚首级献给刘聪。刘翰不愿从石勒，归降鲜卑段匹磾。段匹磾入据蓟城。

这年秋，石勒命州郡查实户口，规定每户出帛二匹，谷二斛，开

始向封建化过渡。

（三）兼并并、青二州

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十一月，石勒率军围攻刘琨所派的乐平（治沾县，今山西和顺北）太守韩据于沾县。刘琨率军赴援。石勒据险设伏大破其前锋步骑两万，并州大震，司空长史李弘以晋阳降石勒。刘琨进退失据，奔蓟城依段匹磾，后为段匹磾所杀。晋元帝大兴二年（公元319年）四月，石勒派孔苌攻占了幽州所属各郡，段匹磾奔乐陵（治厌次，今山东惠民东）投靠晋乐陵太守邵续。这年冬，石勒自立为赵王，称元年，以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以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史称后赵。晋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三月，石勒派石虎攻破厌次，邵续、段匹磾均被俘获。于是幽、冀、并三州皆为石勒所有。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八月，石勒派石虎率步骑四万攻青州曹嶷，青州郡县多被攻下，石虎率军围曹嶷于广固（今山东益都），曹嶷出降，送至襄国被斩。至此，幽、冀、并、青均归石勒所有。

（四）石勒兼并幽州的策略运用

石勒兼并幽州是石勒能否立国的关键。石勒虽据襄国，但地盘不大，仅占有魏郡及其附近地区，处于战略内线。西北有并州刘琨、东北有幽州王浚，东南有青州曹嶷，南方有东晋，西有刘聪的根本、晋南地区和首都平阳。石勒势必向四周扩张，但这时刚刚有一块立足之地，显然还必须依靠刘聪，不应也不可能过早向刘聪和曹嶷动手。刘琨结好猗卢，目前还较稳定，且晋阳紧连平阳，即便取下并州，也难以据为己有，否则就会过早与刘聪决裂，使自己陷入不利地位。所以，石勒以王浚为第一个进攻目标，无疑是正确的。

王浚虽久据幽州，但不得人心，他主要是依靠鲜卑的支持而称霸幽州的。对刘琨，虽因刘琨势力向东扩张而"实为仇敌"，但他们同为晋臣，对刘聪、石勒也有利害一致的地方。因此，石勒想兼并幽州，首要的问题是孤立王浚。石勒释放段末杯并与段疾陆眷结盟是很有远见的，由此导致王浚进攻段疾陆眷而彻底破坏了王浚与鲜卑的关系。

对刘琨，石勒采取了张宾的谋略"遣质请和"、"自陈罪恶，请讨浚以自效"，争取到了刘琨的中立，达到了孤立王浚的目的。

对幽州，针对王浚狂妄自大，刚愎自用的弱点，用张宾"卑辞厚礼，折节事之"的谋略，以"早登皇祚"投其所好，完全骗得了王浚的信任，而且还以"亲诣幽州，奉上尊号"为奇袭幽州预作铺垫，不仅使王浚毫不为备，还使王浚准备设宴招待，兵不血刃地夺得了幽州。

石勒在消灭王浚之后，依次各个击破并州刘琨、鲜卑段匹磾、乐陵邵续和青州曹嶷，统一了幽、冀、青、并四州，同时在辖区采取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使力量迅速增长，为与刘曜一决雌雄准备了条件。

四、前后赵洛阳决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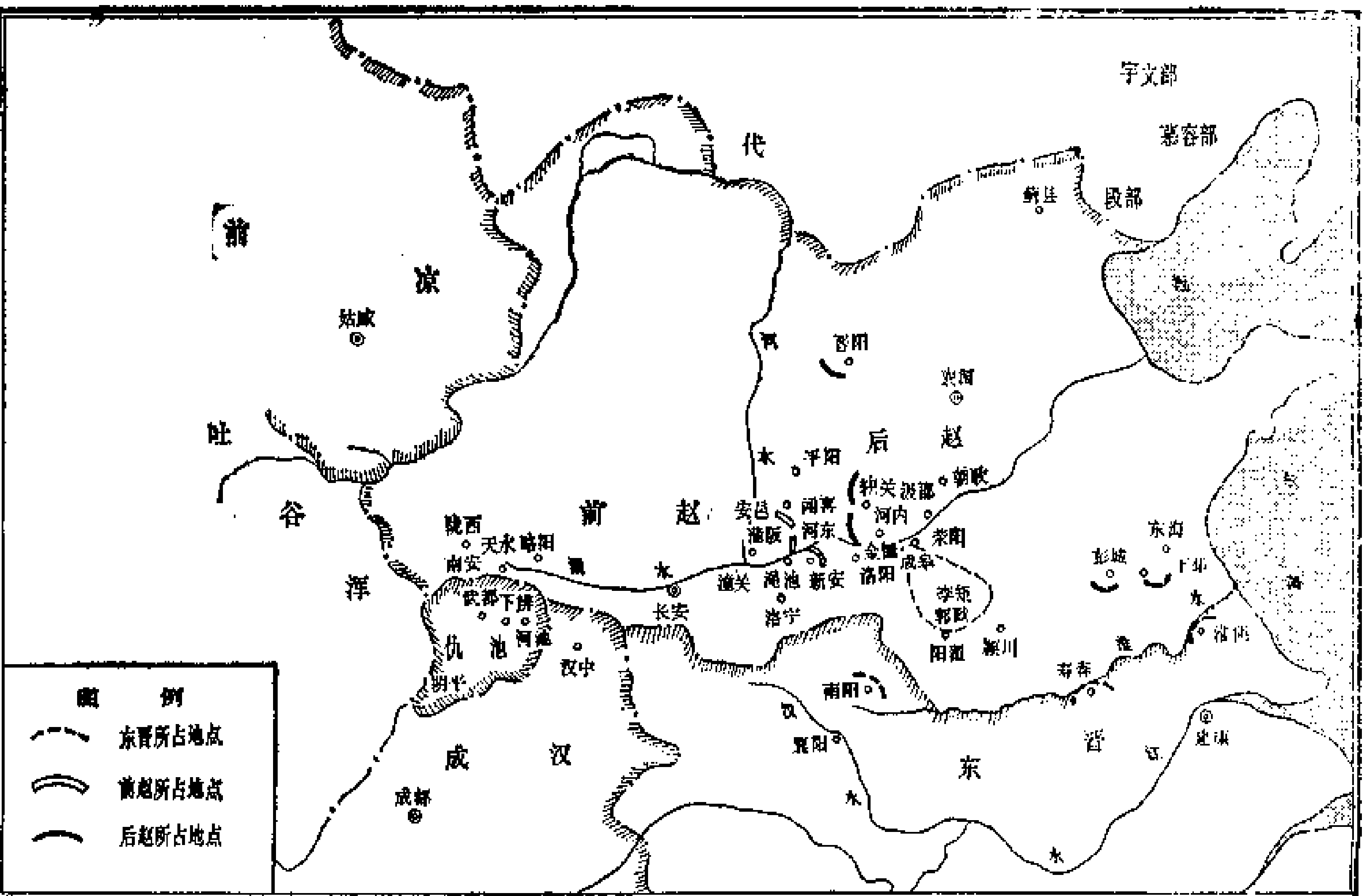
（一）战前中原形势

1．后赵与东晋：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豫州刺史祖逖进屯太丘（今河南永城西北）、谯城（今安徽亳县）。晋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年），祖逖击退后赵将桃豹，进戍陈留郡的封丘（今河南封丘东南）、雍丘（今河南杞县）。先是在荥阳一带坚持的司州刺史李矩、河内太守郭默及后赵降将赵国等互相矛盾，祖逖遣使和解，诸将皆受祖逖节度。黄河以南郡县多数趋归晋。晋元帝太兴四年（公元321年）祖逖死后，祖逖之弟祖约代为豫州刺史，祖约无统御之才，士卒不附。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晋荆州刺史王敦举兵东下，东晋王朝陷入内乱之中，徐、兖间诸坞多降于后赵。十月，后赵攻河南，祖约不能抗，退屯寿春（今安徽寿县）。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三月，后赵攻彭城，晋徐州刺史卞敦退守盱眙（今江苏盱眙北）。晋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后赵攻下邳、东海（今山东郯城），晋刘遐退保泗口（在今江苏宿迁境内）。次年，李矩、郭默屡次失败，遣使投降前赵。（参看插图14-2）

在此期间，石勒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政治上，石勒主要依靠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由他们组成强大的禁卫军作为政权

中原形势图 (公元324年)

(14—2)



的支柱。他竭力提高羯人的地位，称为“国人”，不准汉人称他们为胡。他采取胡、汉分治，专设大单于来统率胡羯。他杀戮西晋的大官僚，夺取汉族官吏的财产。但他很注意拉拢地位较低的地主官僚来帮他进行统治，如以张宾为谋主，称为“右侯”，言听计从。攻占冀州时，设“君子营”，对他们进行保护。又下令不准胡人“侮易衣冠华族”[27]，并恢复九品中正制和通过察举、考经等办法，为汉族地主参政敞开门户，从而取得了相当一部分汉族地主的支持。

在经济上逐步减少掠夺和强迫坞主输粮，下令各州郡核实户口，规定每户每年出帛二匹、谷二斛，对各族人民开始实行封建剥削。比较重视农业生产，督劝农桑，赏赐“力田”，通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使北方农业生产有了恢复。在石勒统治下，北方人民比西晋末年和刘聪统治区生活得要好一些。

2． 前赵与仇池：晋元帝建武元年（公元317年），氐王杨茂搜死，其子杨难敌立，号左贤王，屯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前赵主刘曜进攻杨难敌，杨难敌败，退保仇池（今甘肃文县、成县一带）。

前赵与前凉：晋凉州牧（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张轨于晋愍帝建兴二年（公元314年）死去，其子张寔代父位。晋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张寔被部将刺杀，其弟张茂代立。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张茂取陇西（今甘肃陇西）、南安（陇西东），置秦州。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323年），刘曜亲率二十八万人进攻凉州张茂，后以张茂遣使称藩而暂告妥协。

3． 巴人起义反前赵：晋元帝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前赵将军解虎及长水校尉尹车，连结巴人酋长句徐、库彭等谋反赵，事泄，解虎、尹车被杀，刘曜并尽斩句徐、库彭等五十余人，暴尸十日，再投于水。于是巴人尽反，推句渠知为首，自称大秦，改元平赵，四山氐、羌、巴、羯响应起义的达三十万户。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刘曜下令内外戒严，准备大肆镇压，经光禄大夫游子远多次力谏，刘曜才以游子远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游子远实行安抚，降者十余万。氐、

羌十余万落以虚除权渠为首据险不服，与游子远战，五战皆败，权渠之子伊余战败被俘，虚除权渠才降。句氏宗党五千余家，还是遭到了镇压。

前赵的南方为成汉，以秦岭为界，汉中属成汉。

前赵刘曜仅据有晋南、关中与陇右。南有成汉，西北有前凉，西南有仇池。刘曜虽多次用兵，都未能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一旦东方有事，他们都可能出兵攻赵，使刘曜陷入两面作战。前赵政权不得人心，激起巴、羌起义，所以前赵政权是不稳的。

（二）后赵石生进攻新安，揭开了二赵大战的序幕

晋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正月，后赵司州刺史石生率军进攻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今河南洛阳、新安之间。这时洛阳已是空城）。石生斩尹平，掠五千户而归。

晋明帝太宁三年（公元 325 年）四月，后赵西夷中郎将王胜杀后赵并州刺史崔琨、上党内史王眘，据并州降了前赵。（参看插图14-3）

五月，石生率军屯洛阳，攻略河南。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在荥阳、颍川一带坚持）屡次失败，又乏军食，遣使投降前赵。前赵主刘曜派中山王刘岳率军一万五千趋孟津（今河南偃师北），

前赵、后赵金墉、石梁之战示意图
（公元324年5－6月） （14－3图）

图例
前赵刘岳、呼延谟的行动
前赵主刘曜的行动
后赵石虎的行动

派镇东将军呼延谟自崤（崤县，今河南渑池西南）、渑（渑池，今河南渑池西）而东，会合李矩、郭默攻石生。

刘岳攻占孟津、石梁（在今洛阳北），斩获五千余级，进围石生于金镛（在今洛阳城北）。

后赵主石勒派中山公石虎率步骑四万入成皋关（即虎牢关），援救石生，与刘岳战于洛阳城西。刘岳战败，中流矢，退保石梁。石虎在石梁周围作堑栅，断绝内外交通。刘岳军缺粮，杀马而食。石虎又转锋击斩了呼延谟。

前赵主刘曜亲率军来救刘岳，石虎率三万骑迎战。前赵前军将军刘黑大破石虎部将石聪于八特阪（函谷关以东）。刘曜屯兵于金谷（今洛阳西北），夜间军中无故大惊，士卒奔溃，刘曜退屯渑池。夜，又惊溃，只好退回长安。六月，石虎攻破石梁，擒刘岳及其将佐八十余人，氐、羌士兵三千余人，皆送襄国，就地坑士卒九千人。

石虎转锋北上，攻破晋阳，杀了王腾，坑其士卒七千余人。石聪击破郭默，郭默逃奔建康。李矩率众南归，众皆逃亡，李矩死于鲁阳（今河南鲁山）。长史崔宣率余众二千人降后赵。于是司、豫、徐、兖四州又归后赵所有。后赵与东晋以淮水为界。

（三）石虎进攻前赵河东

前凉主张骏（张茂之侄）得知前赵为后赵所击败，去前赵所授官爵，复称晋大将军、凉州牧，派武威（治姑臧）太守窦涛、金城（治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太守张阆、武兴（姑臧西北）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率军数万攻掠前赵秦州诸郡（指陇西、天水、略阳诸郡），尽管刘曜派南阳王刘胤率军击败了前凉军，但还是转移了前赵的注意力并调用了兵力。

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六月，后赵向前赵晋南发动攻势，石勒派石虎率军四万自轵关（在今河南济源西北十五里，为入晋孔道，是太行八陉的第一陉）西入，攻略前赵河东郡（治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应之者五十余县。石虎遂进攻蒲阪（今山西永济西的蒲州）。关中大震。七月，前赵主刘曜派河间王刘述调氐、羌兵守秦州

（治上邽，今甘肃天水）．以备张骏、杨难敌东出；亲自率精锐水陆诸军出潼关北渡黄河，以救蒲阪。石虎军侧后受到很大威胁，向东北撤退。刘曜率军追击。八月，追至高侯（今山西闻喜县北），大破石虎军，斩后赵将石瞻，枕尸二百余里，获资财以亿计。石虎将军向朝歌（今河南淇县）退却。

刘曜并未追击石虎，而是转锋南向，从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茅津渡附近）渡河进攻据守金墉的后赵石生，决千金堨（今河南洛阳北）灌金墉；同时分遣诸将进攻汲郡（治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河内郡（治野王，今河南沁阳）、荥阳郡，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于是襄国大震。

从晋元帝永昌元年到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2年到329年），东晋接连发生王敦、苏峻之乱，无暇北顾。

（四）洛阳决战

晋成帝咸和三年（公元328年）十一月，后赵主石勒拟亲自率军救洛阳，僚佐程遐谏曰："刘曜悬军千里，势不支久。大王不宜轻动，动无万全。"

石勒大怒，按剑叱退程遐等，召徐光入对。石勒说：

"刘曜乘一战之胜，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曜带甲十万，攻一城（指金墉）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怠，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也。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州（指进攻襄国），自河以北，席卷而来，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为何如？"

徐光回答说：

"刘曜乘高侯（战胜）之势，不能进临襄国（追击石虎，直指襄国），更守金墉（反而去围攻金墉），此其无能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临之，彼必望旗奔败。平定天下，在此一举，不可失也。"

石勒笑着说："光言是也。"遂调集军队，向洛阳以东地区集中，与刘曜决战[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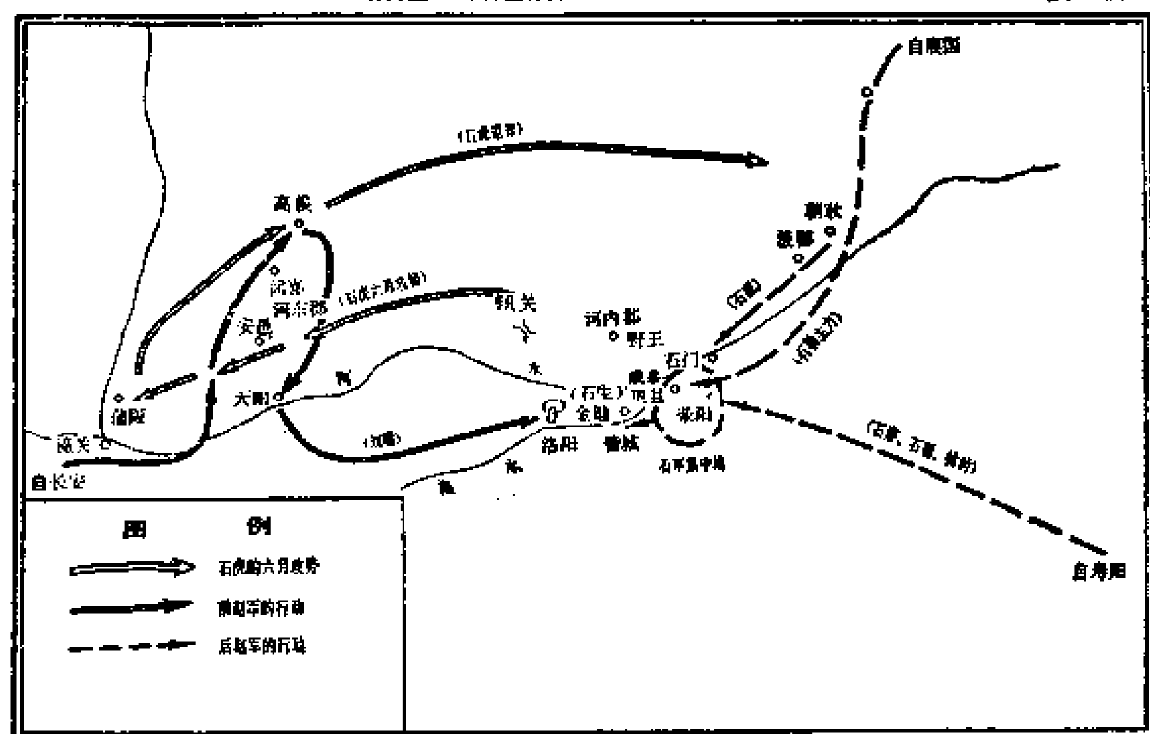
石勒命令：六月间攻占东晋寿春的石堪、石聪、桃豹各率所部集

中于荥阳；石虎率所部进据石门（荥阳北，遏浪荡渠入黄河处）；自率步骑四万赴成皋集中。十二月，后赵诸军集中完毕，共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石勒与徐光分析敌情说：

> “曜盛兵成皋关，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此成擒耳。”[29]

遂卷甲衔枚，诡道兼行，出于巩（巩县，今河南巩县西）訾（訾城，在巩县西南）之间。（参看插图14-4）

前赵、后赵洛阳之战示意图（公元328年）　（14—4图）



前赵主刘曜专与嬖臣饮酒赌博，不抚士卒。左右有进谏的，刘曜大怒，以为是妖言惑众，将他们斩首。当刘曜得知石勒已渡黄河，才开始议增兵荥阳，守黄马关（成皋附近）。接着，洛水斥侯捕得后赵前锋的羯兵，刘曜亲自询问：“大胡（指石勒）自来邪？其众几何？”羯兵答：“王自来，军势甚盛。”刘曜闻之色变，赶快撤金墉之围，收军列阵于洛阳城西，共十余万人，南北达十余里。石勒望见，大喜，对左右说：“可以贺我矣！”[30]统亲率的步骑四万入洛阳城。

次日，石勒部署进攻，其战役部署如下：主突方向指向刘曜的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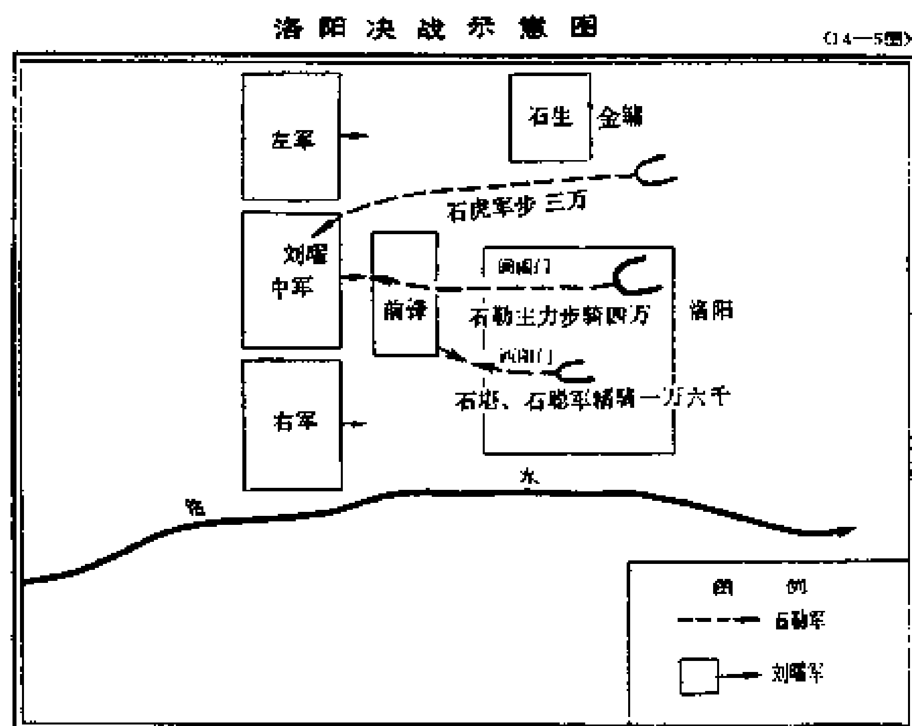
军，实施中央突破。

——石虎率步兵三万从城北向西，攻前赵中军；

——石堪、石聪等各率精骑八千从城西向北，击前赵前锋；

——石勒自率主力出阊阖门（洛阳西面北头门）夹击之。

石堪、石聪军与前赵前锋大战于西阳门（洛阳西门）。（参看插图14-5）



洛阳决战示意图 （14—5图）

刘曜从小嗜酒，末年吃得更凶。将出战时，饮酒数斗。他的坐骑无故不能伸腿，只得改乘小马。临出，又饮酒斗余，至西阳门，挥中军前进，进入平地。石堪乘机率精骑猛冲，前赵军大溃。刘曜昏醉退走，其马陷入石渠，堕于冰上，受伤十余处，被石堪俘获。石勒挥军大破前赵军，斩首五万余级，余者纵其逃散。

石勒收军班师，刘曜被带回襄国。石勒命刘曜作书给其太子刘熙，令其速降。刘曜只书："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31]石勒遂斩刘曜。

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正月，前赵太子刘熙率刘胤等百官奔上邽，关中大乱。前赵将军蒋英等在长安集众数十万，投降石勒。

石生自洛阳率军入长安。八月，刘胤率众数万自上邽反攻长安，石生据守长安，石虎率骑二万驰援。九月，石虎大破刘胤，刘胤逃还上邽。石虎乘胜追击，枕尸千里，上邽的前赵军溃散，石虎俘获刘熙、刘胤及王公卿校以下三千余人，皆被杀死，前赵亡。石虎继续进军，攻破河西集木且羌，俘获数万，秦、陇悉平。氐王蒲洪、羌王姚弋仲均降于石虎。

明年（公元330年），石勒即皇帝位，改元建平，迁都邺城。后赵占有南止淮河、北至燕代、西起河西、东至海的广大地域，基本上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它的声威远播西域和辽东塞外。河西鲜卑，凉州张骏，西城的高昌、于田、鄯善、大宛，以及东北的高句丽、肃慎等，都遣使进贡，成为与东晋王朝南北对峙的大国。

（四）石勒崛起的原因

刘曜占领关中即帝位后，嗜杀、好酒，溺于享乐。政治上一味压榨，激起巴、羌起义，对石勒日益强大，凌驾于自己之上熟视无睹，对北凉、仇池连连用兵，都未能解决问题，始终摆脱不了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他的失败是理所当然的。

石勒却利用刘聪、刘曜用兵羌中，东晋无力北进的有利形势，以襄国为根据，善于利用汉族士人，在魏、冀推行封建化措施，对王浚、刘琨、曹嶷等割据势力，实行各个击破，占有了幽、冀、青、并等州广大地域，使自己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都超过前赵。他的下一步就是夺取洛阳和晋南，最后消灭前赵，统一北方。

（五）洛阳之战中石勒的战略决策和战役指导

洛阳之战，是前后赵间决定谁统治北方的一次决战。石勒对石虎在晋南失败，刘曜转而南下围攻金镛、掠取河南郡县时的情况判断和决心都是正确的。刘曜在高候大捷之后，不敢乘胜猛追，直指襄国，的确表明是胆怯的，不敢寻求石勒主力决战；而南攻金镛和略取河南郡县，则又分散和疲惫了刘曜自己的兵力；而石生坚守金镛则又为石勒的攻势行动提供了有利前提。石勒判明了这几点，于是就不顾石虎晋南之败，定下了集中全力，抓住有利战机与刘曜决战的战略决策。

石生坚守金墉，使洛阳成了刘曜的包袱。刘曜不能据守洛阳或在洛阳以东与石勒决战，从而不得不把洛阳丢给石勒。石勒则正好入据洛阳，在洛阳、金墉掩蔽、支撑下与刘曜决战。

石勒在战役指导上，集中兵力指向刘曜的中军（包括前锋）是洽当的。石勒见刘曜列阵南北达十余里，说："可以贺我矣！"即指刘阵很宽，兵力分散，又在洛西，石勒则可以利用洛阳城，荫蔽地开进，集中兵力突其中军。这是适合以少击众的。石勒有洛阳、金墉作依托，不怕刘曜两翼包围，只要一举击破刘曜的中军，大破前赵军的目的就可以达到。

在作战方式上，石勒的步兵不经列阵，在洛阳城和金墉掩蔽下，从行进间进入战斗，突然向刘曜的中军发起冲击，这在以前的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种作战方式可能来自北方少数民族骑兵从行进间直接袭击敌人的那种战法。

（六）石勒的将略

石勒在南北朝少数民族统治者中是比较好的一个，石勒出身农耕，受过被卖为奴的悲惨生活，对晋末北方人民的艰苦生活有所了解。虽然实行胡、汉分治，也有民族压迫和屠杀、掠夺，但比较注意抑制对汉族人民的欺压，对降服他的世家大族也比较优容，并能吸收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参加他的政权机构，帮助他向封建化转变，使久经战祸的北方人民生活稍有改善，经济也逐步得到恢复。

石勒不识字，但爱好文学，常叫人读史书给他听。他的理解能力较强，他评论历代帝王的是非得失，往往很中肯。在少数民族统治者中，他是比较能吸取封建统治经验和战争经验的。他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例如重用张宾，是比较突出的。他对武将主要依靠羯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将领，特别是石家的石虎、石生、石堪、石聪等，由他们统帅强悍的少数民族士兵，组成禁卫军，由石虎统领，称为单于元辅，依靠他们冲锋陷阵，斩将破敌，保卫羯族政权；对文臣，多依靠汉族士人，依靠他们实行封建统治，征粮、征帛、征兵、征役，为他提供资财与劳役；对作战指挥，则依靠张宾等士人为他运筹帷幄，出谋献

策，配合运用是较有成效的。但这种配合平衡，主要靠他本身的统帅才能，他一死，政权落到残暴的石虎手里，胡汉分治的恶果就充分暴露出来，造成了一场空前残酷的胡、汉大屠杀。

石勒由十八骑起家，二十五年完成了北方的统一，战略运用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军事统帅，不仅在羯族中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在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也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他自比古人，说："与韩（信）彭（越）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32]是多少有一些道理的。

注 释

〔1〕〔2〕《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武帝泰始元年》
〔3〕《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武帝太康二年》
〔4〕《晋书·傅玄传·附其子传咸传》
〔5〕《晋书·食货志》
〔6〕《资治通鉴·卷八十六·晋怀帝永嘉元年》
〔7〕《晋书·祖逖传》
〔8〕《晋书·刘聪载记》
〔9〕《资治通鉴·卷九十一·晋元帝太兴二年》
〔10〕《晋书·刘曜载记》
〔11〕《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晋怀帝永嘉三年》
〔12〕〔13〕〔14〕《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晋怀帝永嘉五年》
〔15〕邺有三台：三台指邺城西北的铜雀台、金雀台、冰井台。
〔16〕〔17〕《资治通鉴·卷八十八·晋怀帝永嘉六年》
〔18〕突门：杜佑曰："突门，凿城内为暗门…令五、六寸易穿，……于敌初来，列营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
〔19〕〔20〕《资治通鉴·卷八十八·晋怀帝永嘉六年》
〔21〕〔22〕《资治通鉴·卷八十八·晋愍帝建兴元年》
〔23〕〔24〕〔25〕〔26〕《资治通鉴·卷八十九·晋愍帝建兴二年》
〔27〕《晋书·石勒载记》
〔28〕〔29〕〔30〕〔31〕《资治通鉴·卷九十四·晋成帝咸和三年》
〔32〕《晋书·石勒载记》

第十五章　氐族苻坚统一北方与淝水之战

第一　苻坚统一北方的战争

晋成帝咸和八年（公元333年），后赵主石勒死，太子石弘继位。明年，石虎废杀石弘而夺得帝位。石虎以残暴闻名，纵容贵族官僚、地主侵夺百姓田地山泽；大兴宫室，仅长安、洛阳二宫就征役四十万人；诸州造甲，又是五十万人；"夺人妻室，十万盈宫"；又"苦役晋人，以压其气"[1]，有意制造和加深民族矛盾，终于挑起了一场民族大屠杀，使北方再次陷于分裂。

石虎的太子宣恐石虎立其弟石韬，杀了石韬，石虎又杀了石宣，并谪东宫卫士十余万人戍凉州。东宫卫士行至雍城（今陕西凤翔南），推梁犊为首起义反赵，后在荥阳遭到镇压。晋穆帝永和五年（公元349年）石虎死，诸子争立。汉人冉闵（石虎子石遵的部将），乘机夺取政权，称帝，号大魏，屠杀胡、羯几十万人，许多高鼻多须的也被误杀。后赵新兴王石祗据襄国起兵反冉闵，冉闵率军围攻襄国。这时后赵所迁青、雍、幽、荆之民及氐、羌、胡、蛮数百万人，各返本土，在中途相遇，互相杀掠，死亡大半。中原饥疫，人相食，土地无人耕种。

辽西慕容廆之子慕容皝，于晋成帝咸康三年（公元337年）在龙城（今辽宁朝阳）建立前燕。晋穆帝永和八年（公元352年），乘虚南下，联合石祗，大破魏兵，擒杀冉闵，夺占黄河以北州郡，在蓟城称帝。后迁邺城。

苻坚的祖父苻洪，氐族人，世居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境内），为氐族小帅。刘曜占长安，投刘曜，曜败，转依石虎。晋成帝咸和八

年（公元333年）与羌帅姚弋仲受命率关中豪强及氐、羌十余万户东迁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滠头（今河北枣强东）以加强石虎对东方的控制。石虎死后，河北大乱，苻洪有众十万，自称三秦王，率众西归。途中击败了羌帅姚弋仲，但苻洪被降将麻秋毒死，其子苻健代领其众，入关中、据长安，晋穆帝永和七年（公元351年）称天王、大单于，建国号大秦，次年称帝，史称前秦。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苻健死，其子苻生立。苻生暴虐，即位不久，即杀大臣多人，肆行杀戮，"勋旧亲戚，诛之殆尽，群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2]苻健之侄、苻雄之子苻坚"素有时誉"，苻生将杀苻坚兄弟，苻坚兄弟引兵入宫，杀苻生，群臣拥苻坚为主，称大秦天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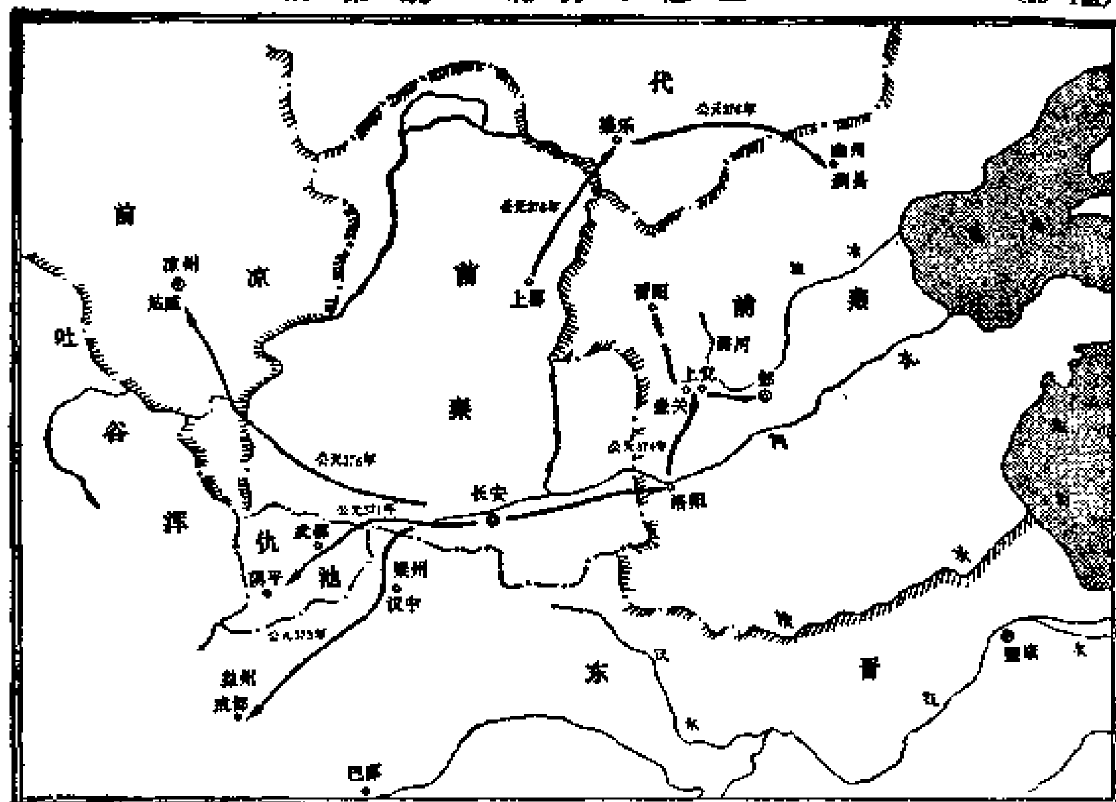
苻坚即位后，重用汉人王猛。王猛北海剧县人（今山东寿光东南），少时家贫，博学，好读兵书。苻坚召王猛与谈国事，"坚大悦，自谓如刘玄德之遇诸葛孔明也。"[3]王猛主政后，主要采取措施抑制氐族贵族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如苻健妻强太后之兄强德，"酗酒豪横，掠人财货子女，为百姓患。猛下车（上任）收德，奏未及报，已陈尸于市，……数旬之间，权豪贵戚，杀戮刑免者二十余人，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4]苻坚高兴地说：

"今吾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5]

王猛为相达十六年之久，史称："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尸居高位，无所事事），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6]这当然有溢美之词，但前秦在王猛治理下，政绩在十六国中的确是较好的。（参看插图15-1）

晋废帝太和五年（公元370年），中国许多政权中，力量最强的为西方的前秦，北方的前燕和南方的东晋。秦燕潞川（今山西潞城东北）之战，是决定由谁统治北方的一次决战。王猛不仅是一个封建政治家，也是一个统兵打仗的将帅。晋废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前燕太后及太傅慕容评忌吴王慕容垂，密谋杀之。慕容垂自洛阳奔秦。慕容垂素有威名，苻坚闻垂至大喜，亲自郊迎。十二月苻坚派王

前秦统一北方示意图



猛率军三万进攻洛阳，前燕荆州刺史慕容筑献洛阳降。明年三月，苻坚再命王猛率步骑六万“伐燕”。王猛率主力沿上境、邺城方向进军，克壶关（今山西潞城西）、占上党，一部由杨安率领攻占晋阳。八月，前燕主慕容暐命太傅慕容评率精兵三十万拒秦军。潞川（即浊漳水）一战，王猛大破燕军，斩俘五万人，燕军大败，王猛乘胜猛追，又歼俘十余万人。秦军长驱围邺（燕都）。邺城北门开门出降，前燕主慕容暐出走，被秦军追获，率文武降秦。至此，前秦在北方已取得决定性优势。晋废帝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又兼并仇池（今甘肃文县、成县一带）氐族杨纂。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夺取了东晋的梁、益二州。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灭掉了鲜卑代王什翼犍，击降了前凉主张天锡，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它极盛时的统治区域，“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7]拥有骑兵近三十万人，步兵可征集达六七十万人。

前秦发展虽快，但内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统治很不稳固。苻坚为了加强氐族对占领地的控制，采取了以氐族散镇各方，将各族豪富调集关中的错误办法，反而削弱了统治力，使自己处在表面安静却危机四伏的火山口上。晋废帝太和五年（公元370年）灭前燕后，迁燕主慕容暐、后妃、王公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晋废帝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又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处乌桓于凤翔（今陕西大荔）、北地（今陕西耀县），丁零翟斌于新安、渑池；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灭凉之后，又将凉地豪强七千余户迁到关中；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公元380年)，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九嵕（今陕西醴泉东北）、武都、汧（今陕西陇县南）、雍（今陕西凤翔南）氐十五万户，使诸宗亲分领之，散居方镇，如古诸侯。送别时，诸氐父兄皆恸哭。苻坚送苻丕至灞上，当时赵整侍宴，抚琴而歌曰："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8]以讽苻坚，苻坚笑而不纳。氐族内部也矛盾很深，宗室苻柳、苻双、苻廋、苻武、苻洛、苻重等都据地起兵反过。

这时前秦由于连年用兵，弄得"兵疲于外，民困于内"[9]，原先那种"百姓丰乐"[10]的所谓盛世，已不复存在。

前秦灭代降凉的前一年（即公元375年），王猛就病死了。王猛当时就看出一些问题，他临终前曾告诫苻坚：

> "是以古先哲王，知功业之不易，战战兢兢，如临深谷"，"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没之后，愿勿以晋为图。鲜卑、西羌，我之仇敌，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11]

苻坚这时正踌躇满志，急于灭晋，以统一天下，对王猛的忠告没有重视。

第二　桓温"北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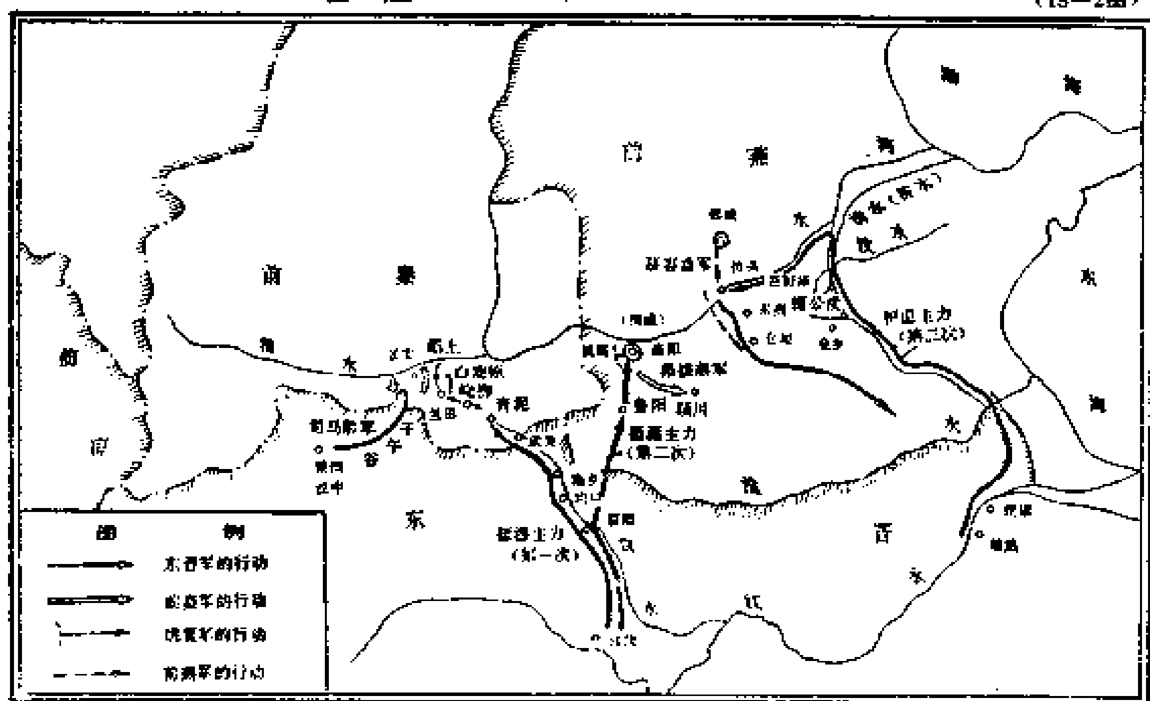
东晋从祖逖"北伐"之后，又进行过几次北伐，如庾亮、庾翼出兵攻后赵。由于东晋内部矛盾的牵制，都没有成功。其中规模较大的

是桓温所进行的三次"北伐"。

桓温是谯国（今安徽亳县）士族，东晋明帝的驸马都尉，他既有收复中原之志，又有代晋称帝之心。晋穆帝永和元年(公元345年)，桓温代庾翼任荆州都督。明年，率军沿长江西上攻蜀，成汉主李势战败投降。桓温的声望日高。这时北方正值梁犊起义、石赵趋于瓦解之时，桓温多次奏请乘机"北伐"，晋廷怕"北伐"成功，无法控制桓温，每次都搁置不复。石虎死后，赵徐州刺史王浃降晋，形势更有利了，晋廷乃派外戚褚裒和名士殷浩，先后搞了两次"北伐"，以堵桓温之口。褚、殷都非将才，很快以失败而告终。桓温上表弹劾殷浩，内外大权都落入桓温手中，晋廷再也无法阻止桓温"北伐"了。（参看插图15-2）

晋桓温"北伐"示意图

(15—2图)



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桓温进攻前秦苻健。恒温率步骑四万自江陵、沿汉水、取道襄阳、入均口（今湖北均县）、经淅州（今河南淅水县均水）、趋武关，同时派梁州（今陕西汉中）刺史司马勋出子午道，进攻关中的前秦苻健。晋军在青泥（今陕西蓝田县南）、峣柳（即峣关，亦在蓝田南）、蓝田连战皆捷，进至白鹿原（灞上东南）与秦军

相拒。司马勋在子午谷被秦军袭破，恒温亦失利，死万余人。这时军粮不继，桓温原打算割秦麦为粮，但秦已坚壁清野。桓温乃退回襄阳。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桓温第二次“北伐”，进攻洛阳。二月，桓温上表请晋穆帝移都洛阳，穆帝不许，只令桓温进讨姚襄。姚襄是羌帅姚弋仲之子，弋仲死后，姚襄代领其众，曾降晋，后又反晋投燕，屯于河南。这时洛阳为周成所据守。周成本为冉闵部将，后降晋，不久又反，据守洛阳，时姚襄正率部攻洛阳。六月，桓温自江陵北进，八月至伊水（洛阳南）击姚襄，姚襄大败，西走关中，为前秦主苻生所杀。桓温入洛阳，周成出降。桓温派颍川（治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太守毛穆之戍守洛阳，自己率军返江陵。

晋废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攻前燕。四月，桓温率步骑五万从姑熟（今安徽当涂）出发，经淮入泗到达金乡（今山东金乡北），凿巨野泽（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以下又名清水），自清水入黄河，屡败前燕军，进至枋头（今河南滑县西南）。枋头距燕都邺城只两百余里，前燕大震，急派慕容垂率军五万以拒晋军，并遣使赴前秦求援。苻坚怕燕败势孤，派将军苟池、邓羌率步骑两万，经洛阳援燕，进至颍川。桓温与慕容垂数战不利，又闻秦军将至，而水路又枯，只好焚舟弃辎重，自陆路经东燕（今河南长垣西北）、仓垣（今河南开封东北）退还。退却中又遭慕容垂伏击，损失三四万人。

桓温“北伐”总的战略布局是可取的。首先取蜀，取得西线有利地位，再由荆襄、梁、益击秦，再依托关中东出河南，然后并力击燕。从当时北方分裂的形势看，不是没有成功可能的。但由于得不到晋廷的全力支持和桓温主观指导上有缺点，除得梁、益外，其他方面一事无成。

第三　秦晋淝水之战

桓温攻燕失败后，认为“不为伊、霍(指商伊尹和汉霍光辅佐幼主事）之举者，无以立大权威，镇压四海。”[12]还建康后，于晋废帝太和六年(公元371年)十一月废晋简文帝，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晋孝武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桓温讽示朝廷求九锡，在大臣王彪之、王坦之、谢安的抵制下，未能如愿。七月，桓温病死，把兵权交给他的弟弟桓冲。桓冲与桓温不同，是个以大局为重的人。在主幼国疑、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主动与谢安合作，把地处京畿、权大任重的扬州刺史职位让给谢安，自己则请求出任外职(荆州刺史)。谢安也推诚与桓冲、王彪之、王坦之等合作，并注意改善南北士族的关系，从而出现了“君臣辑睦，内外同心”，“民为之用”[13]的合力御秦的气氛。

东晋自晋成帝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平定了苏峻之乱以后，境内没有大的战乱，获得了几十年安定的环境。北方战祸频繁，几十万人避乱南迁，大大增加了江南的劳动人手。加上东晋也做了一些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如兴修水利，开垦屯田，劝课农桑，减轻田租等，使南方的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

在军事上，东晋的军队仅二三十万人，但它有一支组训精良的北府兵。晋孝武帝太元二年（公元377年)，谢安的侄子谢玄出任兖州刺史，坐镇广陵(今江苏扬州)，监江北诸军事。他以刘牢之为参军，召募南下的徐、兖骁勇之士组成“北府兵”。这些士兵还乡心切，抗秦意坚，又经长达七年的严格训练，遂成为东晋军队的精锐，在淝水之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北府兵的战斗作风和出身于北府兵的将领，如刘牢之、刘裕、檀道济等还对晋、宋两代有着重大的影响。

因此，淝水战前，东晋虽“僻处江南”，但政局稳定，内外团结，经济发展，具有一致抗秦，救亡图存的决心。

一、双方的战略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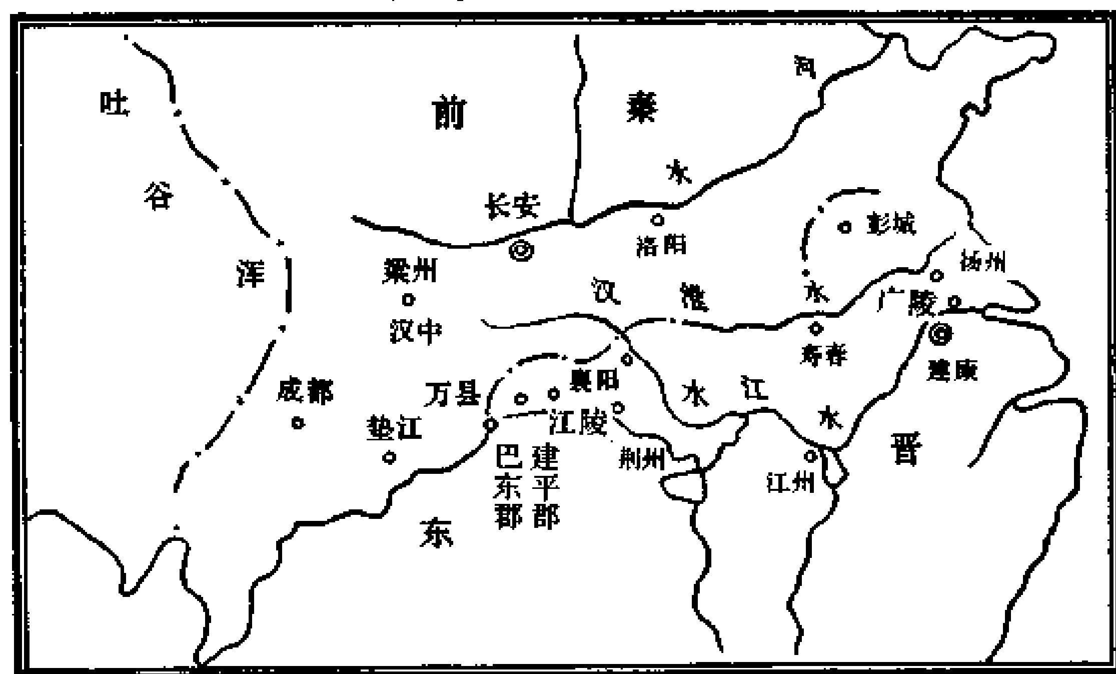
淝水战前，秦、晋双方的态势大致如下：前秦于晋孝武帝宁康元

年(公元373年)，占领东晋梁、益二州，镇守成都、垫江（今四川合川)，万县以西大体上以长江为界；三峡和建平郡(治巫县，今四川巫山)、巴东郡(治白帝，今奉节东)仍为晋所有；襄阳、寿春、彭城为双方争夺的前线要点。

（一）苻坚的战略企图

苻坚早在王猛去世前，即有"混一四海"[14]之志，即灭晋以统一天下。所以王猛临终前有"愿勿以晋为图"的遗言，苻坚未采纳。苻坚的战略步骤大致是：先取梁、益二州，控制长江、汉水上游，以威胁东晋的西翼；再夺占襄阳、寿春、彭城等战略要点，以迫近长江；最后一举灭晋。(参看插图15-3)

前秦东晋形势图 (15—3图)



（二）东晋的战略企图

桓温"北伐"失败后，接着就是前秦灭燕，统一北方，强弱之势已很明显，桓温的奏章中也指出要"外御强寇"。[15]谢安的施政方针是"镇以和靖，御以长算"。[16]即从长远打算要镇之以静，以稳定政局，应付多变的局面。所以，东晋的战略企图是实施战略防御，以抗击强秦，确保东晋的统治。主要防御方向在扬州、荆州。扬州直接掩护建

康，比荆州更重要些。

为此，东晋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起陆续调整部署如下：

——任命桓冲都督江、荆、梁、益、宁(治五城，今四川中江)、交、广七州诸军事，领荆州刺史，镇江陵（后移到长江南岸的上明，今湖北松滋县北），负责长江中游及汉水方面的防御。下面主要有：右将军毛虎生守巴东；梁州(原治汉中，因战乱寄治襄阳)刺史朱序统率沔(即汉水)北诸军镇襄阳，负责汉水方面的防御；江州（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桓嗣(桓冲之子)镇江州，负责扬、荆两个方向的接合部。

——任命谢安都督扬、豫、徐、青、兖五州诸军事，坐镇建康，负责长江下游及淮水前线的防御。下面主要有：平虏将军徐元喜守寿阳(即寿春)；沛郡太守戴遂守彭城；幽州(遥领)刺史田洛守三河（今江苏高邮北）；兖州刺史谢玄，领广陵相，负责长江下游江北防务。

二、襄阳及彭城地区的争夺战

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二月，苻坚为夺取第一线战略要点，便于尔后进出长江，进攻东晋，发动了对襄阳的进攻，同时以一部进攻彭城，以策应襄阳方面的作战。其部署如下：

以其子苻丕为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分四路会攻襄阳：

——荆州刺史杨安率樊(城)邓(县)之军为前锋；

——征虏将军石越率精骑一万出鲁阳关(今河南鲁山西南)；

——京兆尹慕容垂、扬武将军姚苌（姚襄之弟，姚襄死后，姚苌率羌部降秦），率众五万出南乡(今河南淅川西南)；

——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率众四万出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

——苻丕亲率武卫将军苟长，尚书慕容暐，率步骑七万直趋襄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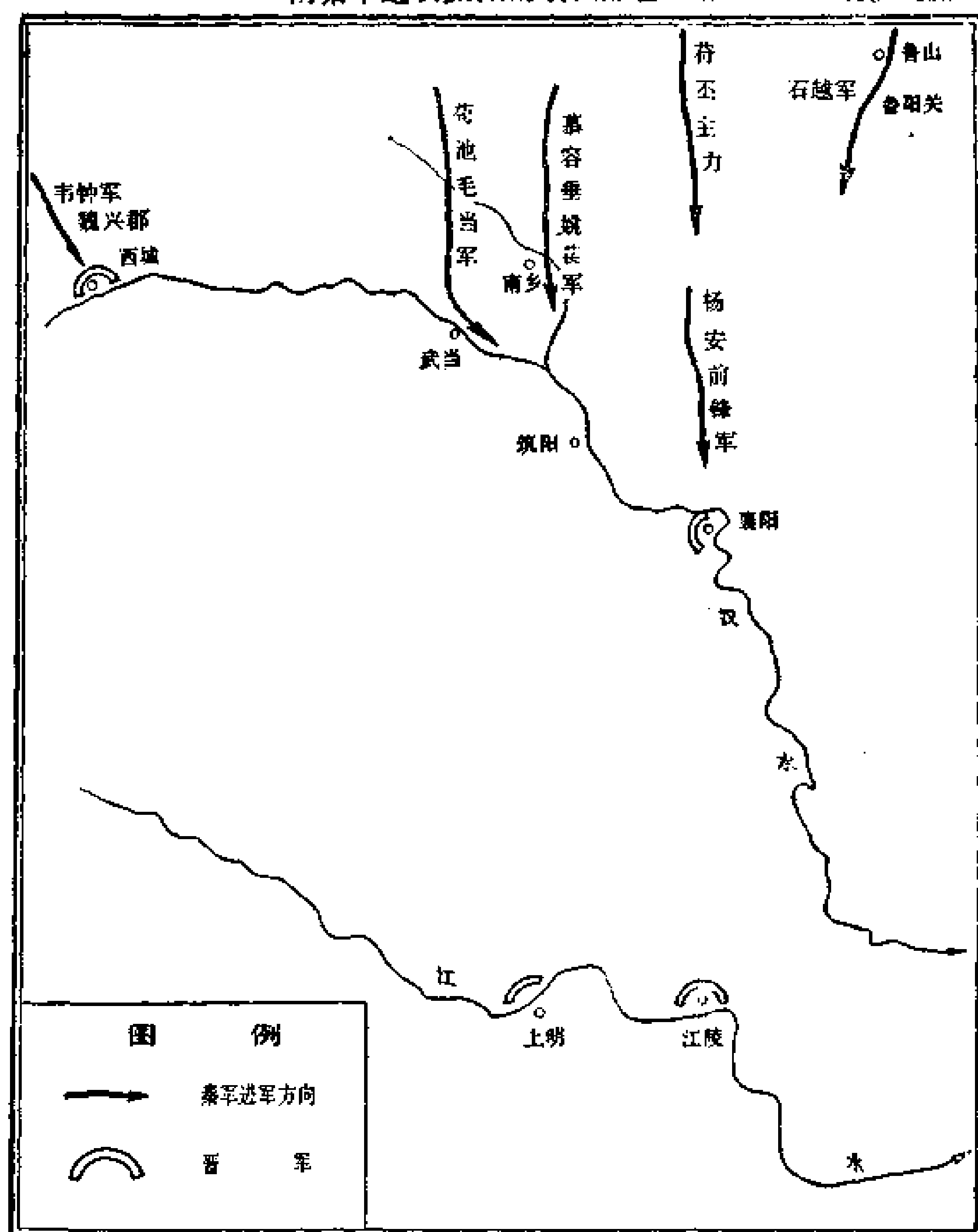
另派梁州刺史韦钟进攻魏兴(治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以掩蔽翼侧。

在彭城方面，七月，苻坚以秦兖州刺史彭超为都督东讨诸军事，指挥后将军俱难、右禁将军毛盛、洛州刺史邵保率步骑七万进攻彭城、

淮阴(今江苏清江市)、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等地。(参看插图15-4)

(一) 襄阳方面作战经过

前秦军进攻襄阳的战役部署示意图 (15—4图)



四月，秦军石越部进抵汉北，东晋襄阳守将朱序以为秦军无舟楫渡河，未加戒备。石越率骑兵五千人浮水渡汉，袭占襄阳外城，夺船

百余艘，渡主力过汉水，朱序退守内城。苻丕率秦军主力到达，合力督攻内城。襄阳晋军仅万余人，在当地人民支援下，顽抗秦军。朱序的母亲也率城中女丁巡视城垣，见西北角不够坚固，就率众增筑一道斜城。后西北角果溃，晋军退守斜城，抵住了秦军的进攻，襄阳人称之为“夫人城”。在晋军坚守下，秦军十余万，顿兵坚城达数月之久。后苻丕采取苟长的建议，改强攻为围困，把汉沔地区的人民强迫迁往许、洛，以孤立襄阳，切断东晋与襄阳的连系。这时桓冲见秦军势大，拥众七万于上明，不敢渡江北上援襄。朱序多次出击，屡败秦军。秦军稍退，离城稍远，朱序遂疏于戒备。年底，襄阳已坚守达九个月之久，苻坚知久攻不下，诏苻丕：“来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复持面见吾也！”[17]苻丕得诏惶恐，督诸军并力攻城。东晋命冠军将军刘波率众救襄阳，刘波畏秦不敢进。二月，晋襄阳督护李伯护暗中降秦，作为内应，城破，朱序被俘。苻坚以中垒将军梁成为荆州刺史，配兵一万镇襄阳。（参看插图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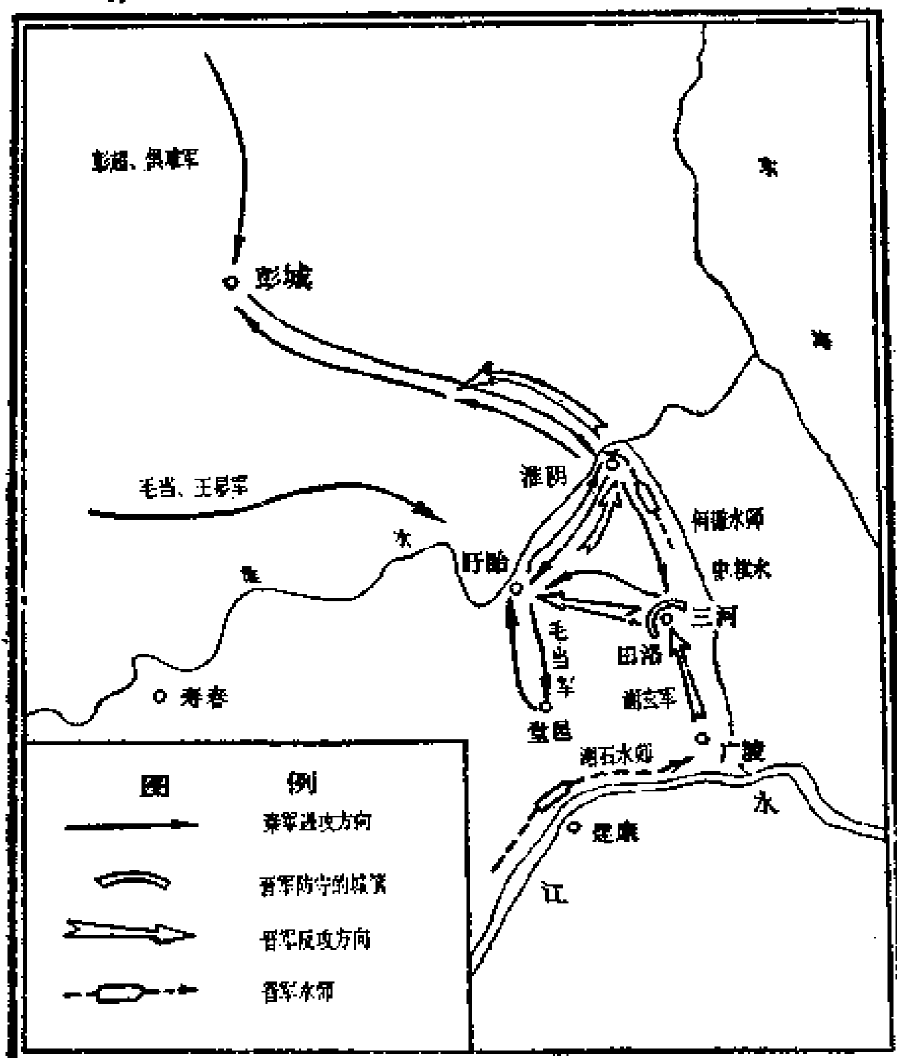
（二）彭城方面作战经过

晋孝武帝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八月，秦彭超进攻彭城。明年二月攻占彭城、淮阴，南攻盱眙。四月，襄阳战役已结束，苻坚调毛当，王显率军二万自襄阳东下，协同彭超、俱难攻淮南。五月，彭超、俱难攻占盱眙，以六万人进围晋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广陵仅百里。与此同时，秦将毛当、毛盛率骑兵二万袭占堂邑（今江苏六合西北），晋右卫将军毛安之所率四万人惊溃。于是建康大震，晋廷即命征虏将军谢石（谢安之弟）率舟师沿江防守，并进驻涂中（今江苏滁河流域）；命兖州刺史谢玄自广陵救三阿。秦彭超、俱难战败，退守盱眙。六月，谢玄、田洛率众五万进攻盱眙，秦军又败，退守淮阴。谢玄派何谦之等率舟师乘潮而上，焚烧淮河桥，截断秦军退路，秦将邵保战死，彭超、俱难退淮河北，晋军追击，大破秦军。彭超、俱难仅以身免。谢玄率军还广陵。

这次秦军攻取第一线战略要点的行动，汉水方面夺占了襄阳，为下一步进军长江中游打开了门户，但遭到晋军顽强抵抗，花了一年时

间，并付出了一定代价；淮南方面，秦进军迅猛，连占彭城、淮阴、盱眙、堂邑。但遭晋军坚强的反击，北府军初露锋芒，并发挥了水军的优势。秦军连连败退，损兵折将达六、七万之多。最后晋军止军不追，才保住了彭城。

秦晋彭城盱眙地区作战经过示意图 （15—5图）



苻坚如果不是一厢情愿，是不难从这次行动中，对晋军的战斗力和士气，以及江淮地形条件作出必要的判断的。但苻坚一心只想“混六合以一家”〔18〕，满足于夺占了襄阳和彭城，仍按预定计划，准备一举灭晋。

三、淝水决战

晋孝武帝太元五年（公元380年），秦幽州刺史苻洛于和龙（今辽宁朝阳）起兵反秦，苻坚派苻融为征讨大都督，指挥窦冲、吕光、都贵等率兵四万讨平之。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公元382年）四月，苻坚为了南下灭晋，任命其弟苻融为征南大将军。八月，又任命裴元略为巴西（郡治在今四川阆中），梓潼（郡治在今四川梓潼）两郡太守，秘密准备舟师。

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五月，晋都督七州诸军事桓冲发动了一次攻势，他率军十万攻襄阳及四川。晋军猛攻襄阳、筑阳（今湖北谷城北）、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一线，同时分军渡沔北进，攻沔北诸城；入川晋军杨亮也连占五城。苻坚不得不调用苻睿、慕容垂、姚苌、张蚝等秦军主力分道援救襄阳及四川。秦军主力一到，晋军立即收兵，桓冲退回上明，还守江汉。桓冲这次攻势，起到了打乱秦军进攻部署，破坏秦军进攻准备和疲惫秦军的作用。

（一）秦廷的谋议决策

晋孝武帝太元七年十月，苻坚以为大举"伐晋"的时机已到，与群臣开展了一场谋议。苻坚认为：

"今有劲卒百万，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遗晋，若商（秋）风之陨秋箨（笋壳）。"[19]

大臣中绝大部分都反对"伐晋"，尚书左仆射权翼说：

"今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江南）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

苻坚听了嘿然良久。太子左卫率石越又说：

"且彼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

苻坚反驳说：

"夫差、孙皓皆保据江湖，不免于亡。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

群臣各言利害，久议不决。等群臣退出，苻坚独留其弟苻融，对他说：

"今众言纷纷，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

苻融进一步剖析说：

"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群臣言晋不可伐者，皆忠臣也。"

"且臣之所忧，不止于此。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京城附近），此属皆我之深仇。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腋，不可悔也。"

苻坚不能决。于是朝臣进谏者甚众。苻坚始终认为秦强晋弱，为什么不能"伐晋"呢？所以对进谏之言都听不进。因苻坚信佛，素来信重释道安，群臣就请释道安乘间进言。道安以"东南卑湿，沴（音丽）气易构（因气不和而生灾疾），虞舜游而不归，大禹往而不复。"指出南方卑湿，委婉地加以劝阻，并退一步说，如"必不得已，陛下宜驻跸洛阳，……不必亲涉江淮也。"甚至苻坚所宠幸的张夫人和幼子苻诜，也加入劝阻，但苻坚都不听。支持"伐晋"的只有慕容垂、姚苌和临时征集来的良家子。苻融点破说：

"鲜卑（指慕容垂）、羌虏（指姚苌），我之仇雠，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

又指出良家子皆富饶子弟，不懂打仗，讨好的话也不能听，但苻坚仍不理会，多次议而不决。[20]

直到次年（即晋孝武帝太元八年）七月，苻坚一意孤行，最后定下决心，下诏大举"伐晋"。令平民每十丁出一丁，富家子弟二十以下从军而有材勇的，皆授为羽林郎，共得富家子弟三万余骑。

八月，苻坚的进攻战略部署如下：

——令苻融督张蚝、梁成、慕容暐、慕容垂等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直趋寿阳（今安徽寿县）；其中慕容暐、慕容垂两军由襄阳趋郧城（今湖北安陆）；

——令幽、冀之兵经彭城南下；

——以姚苌督益、梁州诸军事，沿江顺流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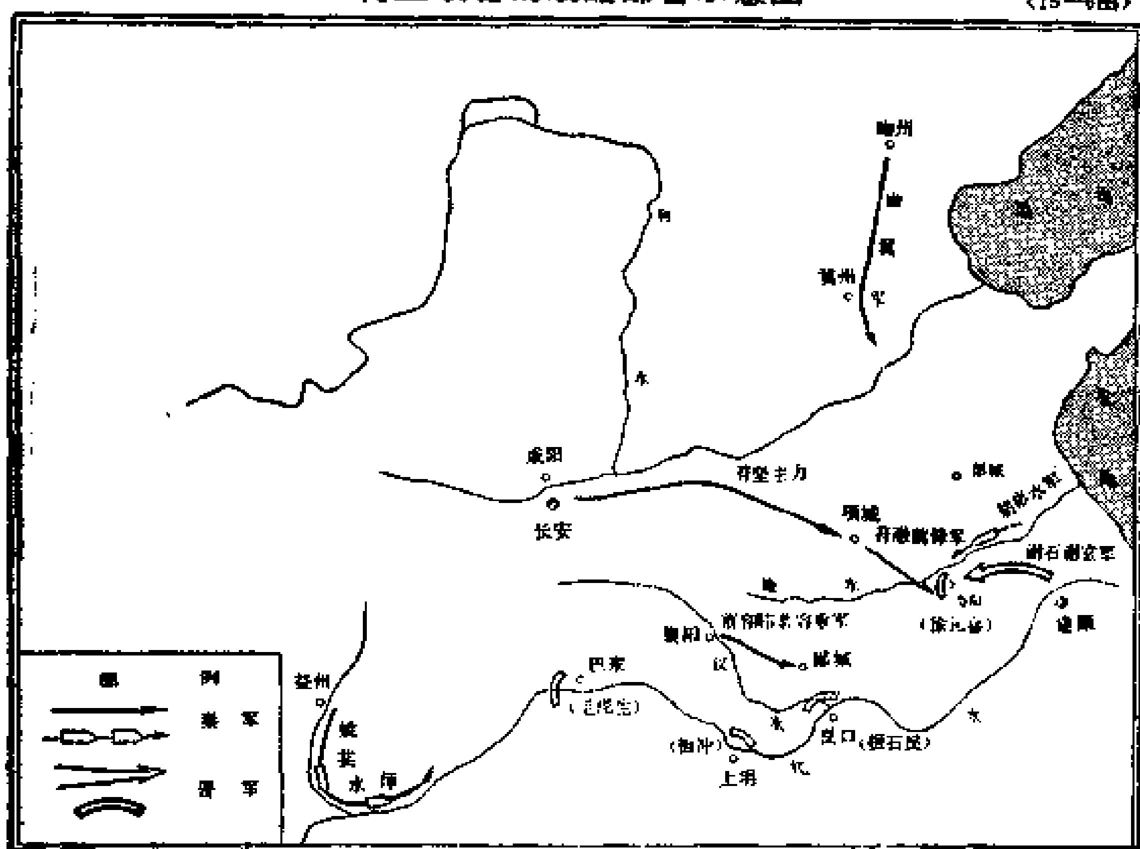
——苻坚亲率主力戎卒六十万，骑二十七万由长安出发，经项

城，趋寿阳。

其战略企图是三路大军，会师建康，一举灭晋。

九月，苻融率先锋军抵颍口（今安徽寿县西南正阳关）；苻坚率主力先头到达项城（今河南沈丘），而其中凉州之兵才到咸阳；蜀、汉之兵也才开始顺流而下。“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21]（参看插图15-6）

苻坚攻晋的战略部署示意图　（15—6图）



（二）东晋的战略防御部署

晋军仍在荆州和淮南两个方向上加强防御，主要防御方向在淮南。

1．荆州方向：都督七州诸军事桓冲的防御方针是“全重江南，轻戍江北。”[22]右将军毛虎生守巴东；桓冲亲自镇守上明；领襄城太守桓石民守夏口。

2．淮南方向：八月，晋廷得知秦军大举进攻，以尚书仆射谢石

（谢安之弟）为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率辅国将军谢琰（谢安之子）、西中郎将桓伊率军八万赴淮南以拒秦军；令龙骧将军胡彬率水军五千由洛口（今安徽寿县东北）援寿阳。

晋前锋都督谢玄在出师时，曾就防御方针多次请示宰相、都督五州诸军事谢安，谢安只说“已别有旨”[23]，指皇帝已下诏命将出师，此外，游弈终日，无一语相告。这可以理解为重申镇之以静的既定方针，也可以理解为皇帝既已任命，就应按职权范围行使指挥权，不要有所依赖或过于紧张，应慨然负起重任。

（三）洛涧之战

十月，秦苻融率前锋攻占寿阳，俘虏了晋守将徐元喜。寿阳是两淮水陆交通枢纽，陆路控制着兖、徐至建康的要道，水路控制着西北由豫入皖的淮、汝、颍各水道及从淮水经淝水入巢湖通长江的南北水路孔道，历来为兵家所必争。

晋胡彬的水军在增援途中，闻寿阳失守，便退守硖石（今安徽凤台西南，寿县北，淮水北岸）。苻融率军进攻硖石并命卫将军梁成率军五万进至洛涧（在今安徽淮南市以东，从南向北流入淮水），以阻晋军西进；并在洛涧入淮处（洛口）立木栅横截淮水，以阻晋军水师。这时由襄阳东进的慕容玮、慕容垂军已进抵郧城。

谢石、谢玄的决心：他们得知前线情况后，在洛涧以东二十五里处停止不进，准备抗击秦军的进攻。

胡彬在硖石粮尽，秘密遣使向谢石求援说：“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使者被秦军截获，苻融遣使告苻坚：“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苻坚遂留大军于项城，引轻骑八千驰赴寿阳，并遣朱序（破襄阳时所俘）去召降晋军。朱序到晋营，私下对谢石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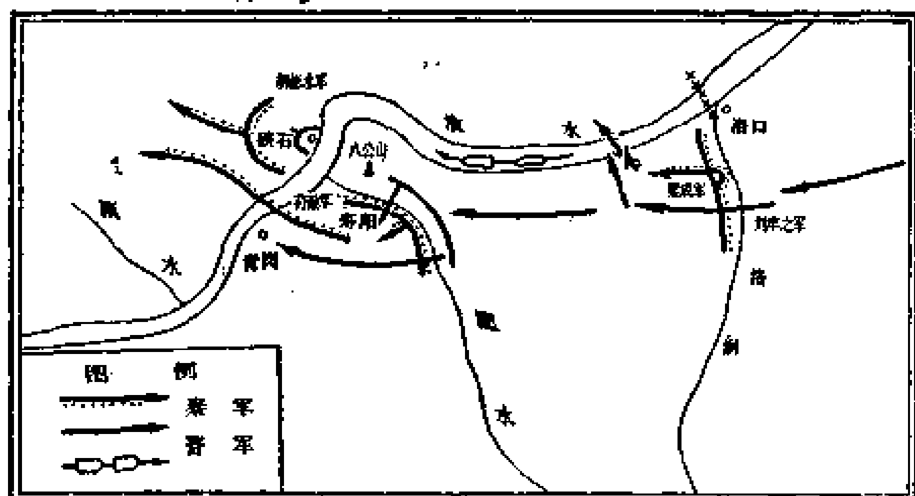
“若秦百万之众尽至，诚难与为敌。今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若败其前锋，则彼气已夺，可遂破也。”[24]

对朱序的情况判断，谢石以为苻坚已到寿阳，不能接受朱序的建议，应坚守不战，以老秦师。谢琰则认为朱序的分析和建议是正确的，力劝谢石按朱序的建议速击秦师。最后三谢统一了认识，确认朱

序的建议是正确的，决心立即转为战役进攻。（参看插图15—7）

十一月，谢玄派广陵相刘牢之率精兵五千，进攻在洛涧西岸的秦梁成军。刘牢之率军强渡洛涧，猛击梁成军，大破之，斩梁成及秦弋阳太守王詠，并从南翼包围秦军，断其归路，将秦军压迫到淮水之滨。于是秦军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死者一万五千人。晋军掳获秦扬州刺史王显，并尽得其器械军实。谢石诸军，水陆俱进。

淝水之战示意图　（15—7图）



这时苻坚、苻融在寿阳城上望见晋军“部阵严整，又望八公山（寿县北）上草木皆以为晋兵”，苻坚对苻融说：“此亦劲敌，何谓弱也。”〔25〕

洛涧之战秦晋双方战役指导的得失：

洛涧之战是淝水决战的序战，对双方都很重要。

苻融作为宰相，在政治上和战争上反对“伐晋”是很正确的；但作为秦军前锋司令官，拥有步骑近二十万之众（除去慕容暐、慕容垂的几万人），面对八万晋军，采取消极保守的军事行动，如在破寿阳、围胡彬之后，初战胜利，形势极好，不是乘胜进军，求晋军决战，而是派梁成率五万人去守洛涧以拒晋军；在得知胡彬粮尽时，不是留一部围攻胡彬，自己率主力绕而过之，去进攻晋军，却把胡彬仅仅五千人的处理上交苻坚，叫苻坚上来处理，不仅自己只看到胡彬这五千人，也引导苻坚也只看这五千人，说明这兄弟两人都没有战略眼光，

都胸无全局，都只看到自己鼻尖下的一个小点。刘牢之渡洛猛击，梁成军危急时，苻融亦未采取措施，以挽回败局。洛涧之战，秦军不仅失去了梁成的五万人，失去了乘胜进攻的大好时机，更重要的是大大的打击了军心士气，给秦军包括他兄弟二人在内，罩上了一层浓重的畏敌气氛。

朱序的乘机泄密和所提建议，对晋军是起关键作用的。这可以说明，将士还心向晋国。谢琰、谢玄能抓住意外出现的胜利闪光，立即抛弃原来的防御战役计划（在洛涧以东二十五里处组织防御），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形成一个崭新的进攻战役计划——"乘诸军未集，宜速击之"。即迅速组织进攻，击败苻融的前锋军。说明他们很有胆识，能根据情况的变化，当机立断，并能说服谢石，立即转入进攻。

刘牢之的渡洛进攻非常成功，以精锐的北府兵，强渡洛涧，猛冲敌阵，然后向右席卷，断敌退路，压迫梁成军至淮水而聚歼之。首战告捷，创造了以五千人胜五万人的光辉战例，加强了三谢对北府兵的信心，巩固了正在实施的战略转变，对全局胜利起着重大作用。

（四）淝水之战

洛涧战后，晋军水陆并进，向淝水东岸开进。晋军先头与秦军在淝水东岸的张蚝军接战不利，稍退，谢玄、谢琰率主力列阵以待。张蚝退回淝水西岸，秦军逼淝水列阵，两军隔河对峙。

晋军不易在敌前渡河，谢玄派人到秦营对苻融说：

"君悬军深入，而置陈逼水，此乃持久之计，非愿速战者也。若移陈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26]

谢玄的说辞是很巧妙的，以"置阵逼水，此乃持久之计"这顶帽子送给苻融，这是拥有百万大军的苻坚和握有近二十万人的苻融所万难接受的。谢玄更以是否敢与晋军决战来将苻融的"军"，逼秦军后撤，从而为晋军渡河决战创造了战机。

秦军诸将以为"我众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万全。"这种拥百万之众以求万全之计显然是贻笑大方的，是苻坚所不能接受的。苻坚想乘晋军半渡而击，他说：

"但引兵少却，使之半渡，我以铁骑蹙（蹋或踩的意思）而

杀之，蔑（无）不胜矣！”[27]

苻融也认为这样打好。于是下令秦军后退。秦兵一退，不可复止。谢玄、谢琰、桓伊等立即引兵渡河，猛击秦兵，朱序在阵后大呼："秦兵败矣！”[28]秦兵开始大奔。苻融骑马入阵，想去阻止后退，马被乱兵冲倒，苻融为晋兵所杀，于是秦军崩溃。谢玄等乘胜追击，直至青冈（在安徽寿县西北三十里）。秦军大败，自相践踏而死者，蔽野塞川。逃走的“闻风声鹤唳，皆以为晋兵且至，昼夜不敢息，草行露宿。”[29]加上又饥又冻，死者达十之七八。晋军收复寿阳，俘获秦淮南太守郭褒，缴获苻坚所乘的“云母车”(以云母为窗，可四面瞭望)。

前秦苻坚百万大军的进攻，至此宣告彻底失败。朱序、徐元喜奔还东晋。

（五）战后情况

1．东晋方面：西线乘胜进军，桓冲遣军攻占魏兴（治西城，今陕西安康西）、上庸(治上庸，今湖北竹山西)、新城（治房陵，今湖北房县)、襄阳、鲁阳(今河南鲁山)，进驻城固(今陕西城固东)。秦梁州刺史潘猛败走，梁州为晋所有。同时派兵入蜀，攻占巴郡（今四川重庆市)，秦梓潼（治梓潼，今四川梓潼)太守垒袭以涪城(今绵阳东北)来降。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克成都，益州归晋。晋军进占洛阳，秦洛州刺史张五虎据丰阳（今陕西山阳）来降。东线乘胜追击，刘牢之占谯城(今安徽亳县)。晋孝武帝太元九年（公元384年），谢安请乘“苻氏倾败，开拓中原”，“自求北征”[30]。晋廷以谢安都督扬、江等十五州诸军事，以谢玄都督徐、兖、青等七州诸军事。谢玄进占彭城，刘牢之攻占鄄城(今山东鄄城北)，河以南城堡皆来归附。刘牢之占碻磝，郭满据滑台，刘肱、刘袭渡河北上，占黎阳。刘牢之曾入据邺城，后召还。

谢安声望日高，遭晋室猜忌。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宗室司马道子专权，谢安自请出镇广陵以避之，十二月病死。

2．前秦方面：苻坚身中流矢，单骑走淮北，秦军溃散，只慕容垂一军独全。苻坚至慕容垂军中，沿途收集散兵，返回洛阳，年底返

长安。前燕主慕容暐之弟慕容泓召集马牧鲜卑于华阴，众至十余万。苻坚派其子苻睿及姚苌进攻慕容泓，睿兵败被杀。姚苌奔渭北，召集羌人，自立为万年秦王，史称后秦。慕容垂以去邺城祭祖为名，脱离苻坚，至河北，自称燕王，史称后燕。慕容泓被部下所杀，慕容冲领其众，史称西燕。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 385 年），前秦主苻坚出奔，被姚苌俘杀。慕容冲入长安。次年，西燕内乱，慕容冲被杀，慕容永代领其众，迁至晋南长子（今山西长子）称帝。后秦姚苌乘机入长安，称帝。此外还先后建立了北燕、南燕、北凉、西凉、南凉、后凉、后魏、大夏等少数民族国家（其中西凉、北燕为汉人所建）。北方再次陷入了分裂混战的局面。

前秦失败的主要原因

苻坚要统一中国，但当时条件还不具备。北方虽然统一了，甚至西域诸国、高句丽、西南夷都来朝贡，但实际上还停留在归降、归附状态，是强大军事压力下的暂时慑服。苻坚的政令尚未统治整个北方，王猛的措施，也大都限于关中。其他各地实际上处于分治状态。苻坚的军队号称百万之众，但实际上是各少数民族军队的杂合体，没有统一的制度，军队的将帅也仍是原来归降他的少数民族贵族，如、慕容垂、姚苌等，甚至还有归降他的国君，如慕容暐，而这些少数民族贵族又是与苻坚同床异梦、各有打算的。再加上苻坚本族氐族的分散外镇，鲜卑及其他各族豪强集中关中，正如苻融所指出的那样，会变生肘掖。淝水战后，果然如此。所以貌似强大，而实质上却很不稳定。但苻坚却只看到这个“强大”而踌躇满志，目空一切，以为投鞭可以断长江之流，因此听不进反面意见，一意孤行而归于失败。

其他弱点如连年战争、兵疲民困，士卒厌战等群臣也都指出来了，但苻坚根本不愿听，这是前秦失败的主要原因。

苻坚的战争准备和战略进攻计划

在战略上，由于苻坚的指导思想是以大吃小、急于求成，所以也

犯了许多错误。

苻坚花了很大力气打下了梁、益和襄阳，以便沿长江、汉水顺流而下，这步棋无疑是正确的，但实际上却未起作用。苻坚命裴元略去四川准备舟师，但急于求成，仅一年之后就大举进攻，一年时间是完不成造船和训练水师的。襄阳是汉水的门户，由襄阳下荆鄂是十分有利的。但苻坚并未部署一个方面军，他仅派了前锋军中的一部，即慕容時、慕容垂部向郧城进攻，任务既不明确，又无协同指示，实际上这部分军队未起任何作用。

三路大军会师建康，着眼也好。但沒有行动计划，沒有协调措施，实际上是一句空话。

苻坚在七月间下达动员令，规定"十丁遣一兵"，但八月初八，大军就出发了，整个北方，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要集中召十万民丁，有多少能如期到达呢？"百万大军"应该打一个很大的折扣。

苻坚亲自统率的中路是起主要作用的，但中路既沒有集中，也沒有战略展开，一路纵队长达千余里，给了晋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与晋军交战的仅仅是前锋的不足二十万人，这二十万人也不是集中使用的。

以上说明苻坚缺少一个切实可行的战略进攻计划，沒有接受前人的战争经验，还沒有运用百万大军的统帅艺术。

苻坚的战役指导

在战役指导上，苻坚实施的是战略进攻，苻融的任务是充当前锋。在夺占寿阳，取得序战胜利之后，苻融应乘胜进军，进攻晋军；苻坚应迅速展开主力，协同前锋，求晋军主力决战。但苻融只想歼灭胡彬这五千人，令梁成去阻止晋军，把战略进攻搞成了战役防御。苻坚只带了八千骑到寿阳，却把主力留在项城。两位统帅都忘记了战略进攻，一个组织防御，一个停止不前，把主动权让给了晋军，给了晋军以行动自由，使梁成、苻融先后遭到了各个击破。

淝水之战，苻坚又上了谢玄的当。把晋军主力吸住在淝水东岸是求之不得的，苻坚正好分遣一部兵力从淝水上（下）游渡河，侧击包

围晋军，采取积极进攻，那有退让之理。敌前退却是愚蠢的，即便预先准备好并进入了预备阵地，完成一切准备，也很难阻止敌人紧跟第一线退却部队实施脚跟脚的冲击。

这些错误都是严重的，是绝对优势败给绝对劣势的最直接的原因。

东晋取胜的主要原因

东晋立国已半个多世纪，虽无恢复中原之志，但稳定江南的目的已达到。统治阶级内部发生过三次大的冲突，但王敦、桓温两次，最终尚未导至大的战祸；苏峻、祖约那次，虽已发生武装冲突，但时间不长，规模也不算大，比起北方战祸连年，死亡几百万人来，就好得多了。加上北方人民大量南渡，增加了劳动力，也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谢安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宰相，能够"不存小察，弘以大纲"[31]，能顾全大局，缓和社会矛盾，团结地主阶级的各个集团，减少内耗，促进了社会生活的安定，使许多人还对东晋政权留有指望。桓温的弟弟桓冲，在桓温事件之后，也能一反桓温的作法，主动团结谢安等人，出现了所谓"君臣辑睦，内外同心"的局面。再加上一支组训精良、士气很高的北府兵，这就是淝水之战晋军所以能以弱胜强的主要原因。

晋军的战略指导

从战略指导上看，东晋战略防御的部署是得当的。东晋必须利用长江天堑以阻止北军南下，但守江又必须守淮，上游要巩固巴、蜀，中游要控制汉水，否则长江为南北所共有，北军可以直抵江边以建造船只、训练水师，则数千里长江就防不胜防了。所以在前秦夺占梁、益的情况下，东晋以荆州、扬州为防御重心，加强荆襄、扬淮两个方向的防御，上游确保巴东、建平二郡，以锁住三峡，中游巩固襄阳，以控制汉、沔，下游确保沿淮要点都是十分必要的。宋代李纲曾总结说："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即江南）者，以强兵巨镇尽在淮南、荆襄间"[32]故也。苻坚下诏"南征"后，谢安判定其主要突击方向在淮

南，把扬淮方向的主力北府兵悉数调往淮南，去抗击秦军的进攻。当时桓冲有点惊慌失措，想从荆州调三千人来保卫建康，被谢安阻止，并指示他把兵留下，要注意荆州方向的防御，这些都是洽当的。

对谢玄的请示，谢安认为主要防御方向和使用的兵力既已确定，其他问题无须多作干预，应由前线统帅去根据情况处理，示以镇定，提醒谢玄要沉着应战，不要有所依赖也是明智的。

朱序所提供的情报和建议是准确的。苻融的前锋军二十五万人，分出慕容暐、慕容垂的若干万人，再除去围攻胡彬的人马，苻融能使用的不过十几万人。这十几万人也不集中，据守洛涧的只梁成五万人，其他的在寿阳附近。洛涧距寿阳不下五十里，苻坚的主力远在项城，这就为晋军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各个击破的战机。从兵力对比看，以苻融所能使用的兵力和晋军相比，不过是二比一，以北府兵的素质加上指挥得当，取胜的可能性是有的；如以晋军与梁成相比，不仅质量上占优势，数量上亦占优势。谢玄、谢琰看准了，认为机不可失，于是当机立断，立即对梁成发起进攻。洛涧的胜利，显出了两军质量的优劣，而消灭梁成军则苻融又少了五万人，只剩十万多一点，序战失利，秦军士气又受到很大打击，晋军的斗志则更高了。所以，淝水决战取胜的可能性就大了。

朱序的情报，三谢的当机立断，北府军的勇敢善战，都起了重大作用。

与二苻把战略进攻打成战役防御相反，三谢出色地创造了以战役进攻来完成战略防御任务的光辉战例。当然，这种情况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发生。

注 释

〔1〕《晋书·石季龙载记》
〔2〕〔3〕《资治通鉴·晋穆帝升平元年》
〔4〕《资治通鉴·晋穆帝升平三年》
〔5〕《晋书·苻坚载记》
〔6〕《晋书·苻坚载记·王猛附传》
〔7〕《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8〕《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五年》
〔9〕《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元年》
〔10〕《晋书·苻坚载记》
〔11〕《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宁康三年》
〔12〕《资治通鉴·晋简文帝咸安元年》
〔13〕《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七年》
〔14〕《资治通鉴·晋简文帝咸安二年》
〔15〕《晋书·桓温传》
〔16〕《晋书·谢安传》
〔17〕《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三年》
〔18〕《晋书·苻坚载记》
〔19〕《晋书·苻坚载记》
〔20〕〔21〕《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22〕《晋书·桓彝传、附桓冲传》
〔23〕〔24〕《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25〕《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26〕〔27〕〔28〕〔29〕《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30〕《资治通鉴·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31〕《晋书·谢安传》
〔32〕《宋史·李纲传》

第十六章　刘裕“北伐”

第一　战前南北形势

一、东晋

东晋自谢安死后，政局又陷入内部纷争。孝武帝司马曜溺于酒色，不理政事，会稽王司马道子总揽朝政，帝相之间发生矛盾，孝武帝以后兄王恭为南兖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来制约司马道子。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孝武帝死，其子德宗继位，是为安帝。安帝是个白痴，口不能言，寒暑不辨，司马道子遂以太傅摄政。王恭两次举兵讨司马道子，殷仲堪和广州刺史桓玄（桓温之子）都起兵响应。王恭的前锋刘牢之中途倒戈，反击王恭，王恭败死。殷仲堪在浔阳（今江西九江）推桓玄为盟主，桓玄又火并了殷仲堪等部，占据荆州。晋廷只好以桓玄都督荆、襄等八州诸军事，荆州、江州刺史。从此桓玄在荆州“树用腹心，兵马日盛。”[1]

司马道子的儿子元显为杨州刺史，左右朝政。他为了对抗荆州兵和北府兵，想自建一支新军，下令强征浙东诸郡“免奴为客者”当兵[2]，引起这些佃客的反对，加上州郡官吏乘机驱民为兵，侵占田产，终于在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爆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攻占浙东八郡。起义军发展到几十万人，曾泛海攻下番禺（今广州），再北上攻占江西、湖南许多州郡，兵锋直指建康，给了东晋王朝以沉重的打击。最后于晋安帝义熙七年（公元411年）遭到晋军残酷的镇压而失败。

桓玄利用晋廷全力镇压起义军的时机，于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在江陵起兵反晋。晋廷下诏讨伐桓玄，以司马元显为征讨大

都督，以刘牢之为前锋。刘牢之素恶元显，倒戈降桓玄，桓玄遂入建康，自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揽朝政，杀司马元显，放逐司马道子。桓玄为夺刘牢之的兵权，调刘牢之为会稽内史。于是刘牢之又据江北反桓玄。刘的僚佐以刘牢之"一人三反（指反王恭、司马元显、桓玄）"多散走，刘牢之走到新洲（今江苏南京市北大江中，与幕府山相对）自缢而死。桓玄为控制北府兵，趁机大杀北府将领高素、竺谦之，刘袭等，唯独重刘裕，认为"我方平荡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关、河平定，然后别议之耳。"[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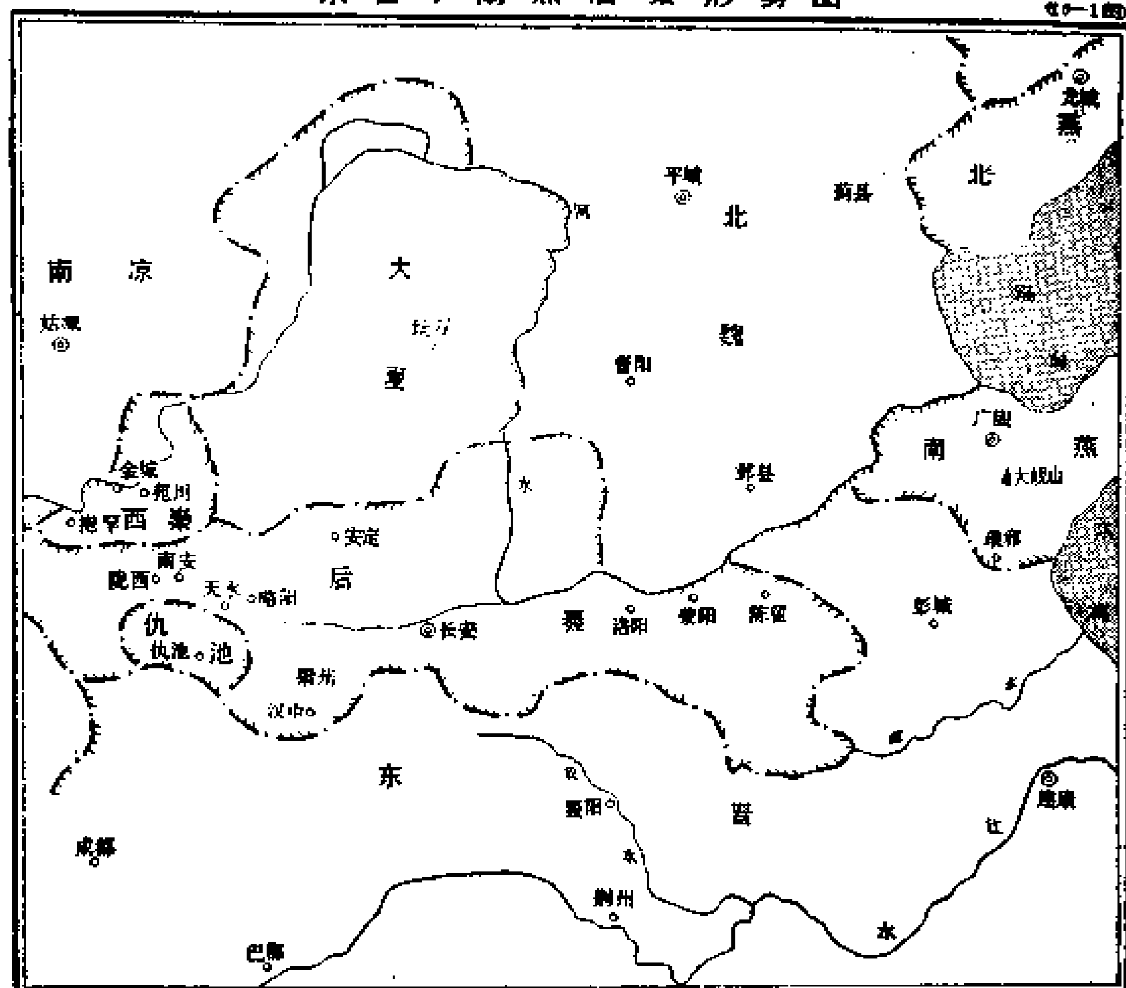
刘裕原籍彭城，虽出身士族，但南渡后衰落，种过田，割过荻，后参加北府军，为刘牢之的参军，以镇压浙东农民起义有功，升至建武将军、下邳太守。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玄代晋称帝后，刘裕团结北府军中下级军官，密谋推翻桓玄。

晋安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刘裕与刘毅等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广陵起兵反桓玄。桓玄派兵堵击，被北府兵击溃。桓玄退往江陵，大聚兵众，顺流东下。峥嵘洲（今湖北鄂城东）一战，桓玄的水军主力二万被刘毅打垮，桓玄退回江陵，被益州兵杀死。刘毅迎晋安帝还建康复位。刘裕起兵成功，被任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南徐州、南兖州刺史，杨州刺史，镇京口。北府兵都归刘裕掌握，刘裕实际上掌握了东晋大权。

刘裕以刘穆之为谋主，重大政务多委刘穆之处理。这时"晋政宽驰，纲纪不立，豪族纵陵，小民穷蹙。"[4] 刘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刘裕以身作则，"威禁内外"[5]，百官皆肃然奉职，旬日之间，风气一变，政局遂趋稳定。（参看插图16-1）

二、南燕

南燕主慕容德是前燕主慕容皝的幼子、后燕主慕容垂的幼弟。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慕容垂在河北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建立后燕，不久，南下攻占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消灭了丁零族翟氏所建的政权。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又攻下长子，消灭了西燕。全盛时"南至琅琊，东迄辽海，西届河、汾，北暨燕



东晋、南燕后秦形势图

代。”[6]

鲜卑什翼犍所建立的代国，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被苻坚击灭，什翼犍死。前秦淝水战败后，什翼犍之孙拓跋珪纠合部众，于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在内蒙河套地区重建政权，改国号曰魏，史称北魏，从此力量日益强大。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公元395年），慕容垂命太子慕容宝率军攻魏，参合陂（今内蒙凉城县东北岱海南）一战，拓跋珪大破燕军。次年慕容垂亲率大军攻魏，拓跋珪退保阴山，慕容垂因病还师，归途病死，其子慕容宝继立。拓跋珪乘胜进军中原，夺占山西，河北许多郡县，进围中山，慕容宝奔龙城（今辽宁朝阳），魏军占领中山，后燕被切断为南北两部。这时

慕容德镇守邺城，为避魏军进攻，率民户四万，由邺城南迁滑台。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慕容德夺占青州、兖州，建都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称燕皇帝，史称南燕。最盛时"有步兵三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7] 其疆域"东至海，南滨泗上，西带巨野（今山东巨野西北古巨野泽），北薄于河。"[8] 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慕容德死，其侄慕容超继位，"信用奸佞，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重。"[9]

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慕容超想乘晋内乱，南下掠晋。二月，派慕容兴宗、斛谷提、公孙归等率骑兵攻占晋的宿豫（今江苏宿迁），俘晋阳平（原治在今河北館陶）太守刘千载和济阴（原治在今山东定陶西北）太守徐阮，大掠而去。又派公孙归攻占济南（指侨置于淮北的济南郡），俘太守赵元，掠男女千余人而去。彭城以南晋民纷纷筑堡自卫，以抗南燕军。

三、后秦

羌族姚苌入据长安建立后秦后，势力发展很快，渭北羌、胡归附他的有十余万户之多。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姚苌死，其子姚兴继位，统一了关中。西燕亡后又取得了河东。并乘东晋内乱，出兵潼关，夺占了东晋的洛阳，"自淮、汉以北诸城，多请降送任（送质子）。"[10]后秦的版图"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11]这时期，中原地区后燕慕容垂和后秦姚兴是比较强的。

姚兴比较留心政事，他以天水大族尹律为尚书仆射，采取了一些改善政治、经济的措施：下令"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消灭前秦残余力量后，"散其部众，归复农业"；"立律学于长安"，以训练狱吏，整饬刑狱；还大兴儒学等等。[12]对收揽人心，安定社会，恢复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到了姚兴统治后期，由于长期争战，民疲财尽，各族人民普遍不满，羌族人民也有起而反抗的。

晋安帝元兴元年（公元402年），姚兴派姚平率军攻魏，夺占柴壁（今山西临汾西南六十里）。魏主拓跋珪发兵迎战，大破后秦军，秦军退守蒲阪。

匈奴族首领赫连勃勃，原是后秦的安北将军，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据陕北、河青、陇东起兵叛秦，自称大夏天王，多次重创秦军，对后秦威胁很大。姚兴诸子又争夺继承权，弄得宗室、大臣派系林立。在这种情况下，姚兴仍不断出兵攻晋，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姚兴派晋的降将、秦荆州刺史桓谦，联合四川谯纵（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晋益州兵变，益州参军谯纵率众入成都，杀晋益州刺史毛璩，自称成都王）联兵攻晋，由长江顺流而下，直逼江陵，结果败于枝江（今湖北枝江）。晋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姚兴又以司马休之为镇南将军，率军攻扰东晋的襄阳等地。

第二　刘裕灭南燕之战

一、刘裕的进军

刘裕灭桓玄后，虽有再造晋室之功，总揽朝政，但刘裕志在代晋，为了树立更高的威望，慑服朝士和与他一道起兵讨桓玄的刘毅、诸葛长民等人，以南燕入侵兖、徐，上表要求“伐燕”。这时朝议多不赞同，只有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参军臧熹认为“伐燕”必克，支持刘裕“北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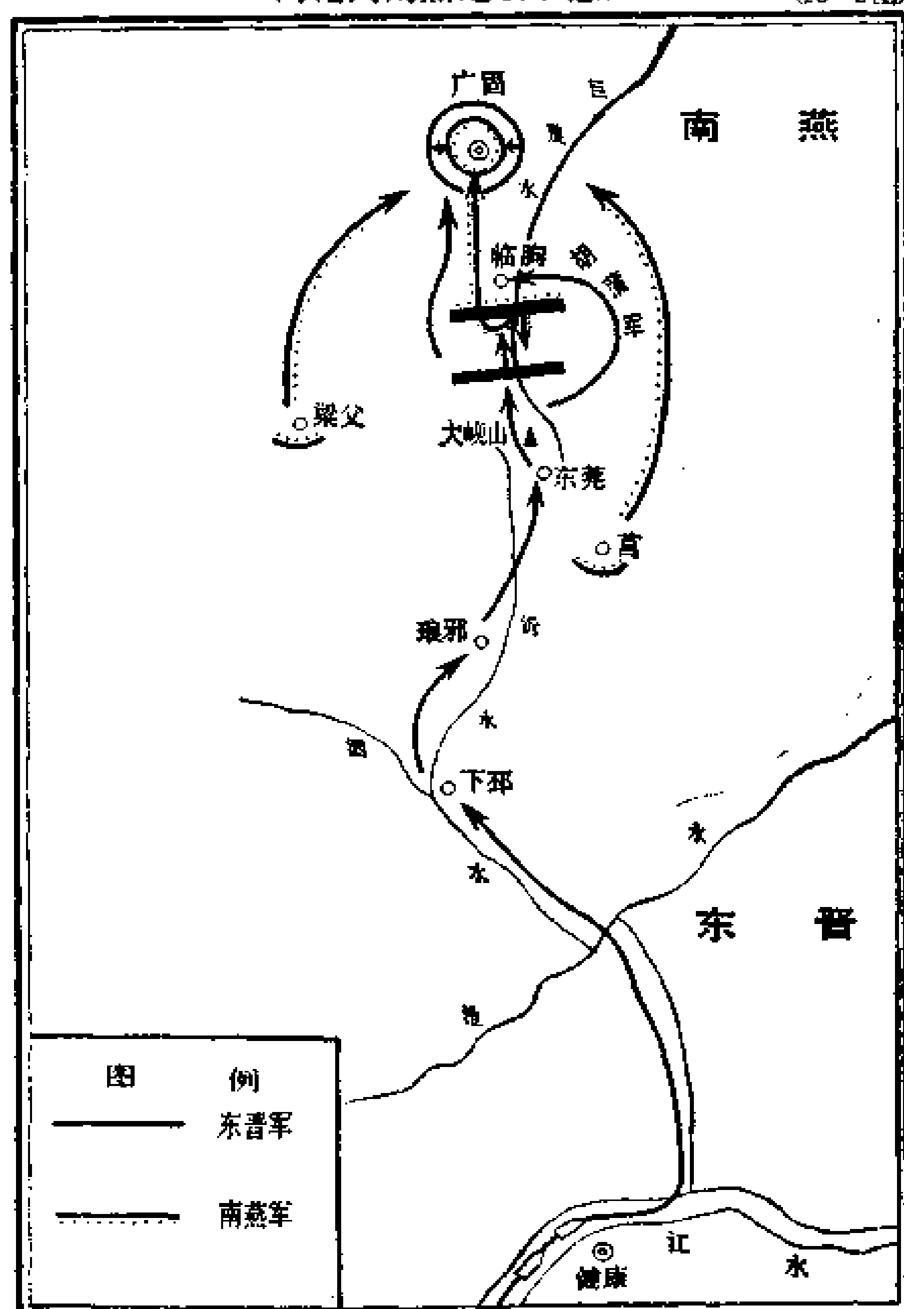
这时从全国形势看，北魏拓跋珪崛起，力量已达黄河北岸。后秦屡败于北魏和大夏，无力东顾。南燕与北魏夹黄河对峙，而北魏又是南燕的宿敌，时刻受魏的威胁。慕容超继位后，内部争权夺利，杀戮颇多，虽有相当大的军力，但毕竟只占青、兖二州，人力物力有限。东晋方面政局已稳定，人力、物力、军力都大大超过南燕。但西方，刘裕派刘敬瑄进攻据蜀反晋的谯纵，因饥疲退军，没有解决问题。南方，卢循所领导的起义军尚在广州。不过，从总的形势看，北方诸国互相牵制，东晋攻燕是具备一定条件的。（参看插图16-2）

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以左仆射孟昶监中军留府事。四月，自率十余万人从建康出发，舟师自淮入泗。五月，到达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刘裕留下船舰、辎重，率军徒步取道琅琊（今

山东临沂北）北进。所过之处，皆筑城堡，分兵留守，以防南燕骑兵袭击粮道和退路。

刘裕灭南燕之战示意图

（16--2图）



有人向刘裕提出：

“燕人若塞大岘之险（大岘山，即沂山，在今山东沂水、临朐之间，山势险要，上有穆陵关，是齐南天险。大岘以南，处处狭

隘，不能双车并进），或坚壁清野，大军深入，不唯无功，将不能自归，奈何？”

刘裕分析说：

“吾虑之熟矣，鲜卑贪婪，不知远计，进利虏获，退惜禾苗。谓我孤军远入，不能持久；不过进据临朐，退守广固，必不能守险清野，敢为诸军保之。”[13]

二、南燕的防御方针

南燕主慕容超听说晋军北上，召群臣会议，讨论作战方针。征虏将军公孙五楼说：

“吴兵轻果（晋兵带的辎重不多），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宜据大岘，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然后徐简精骑二千，循海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帅兖州（南燕的兖州，治梁父，今山东泰安南六十里）之众，缘山东下，腹背击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禾苗，使敌无所资，彼侨军无食，求战不得，旬日之间，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纵敌人岘，出城逆战，此下策也。”

这一意见是很有见地的，但慕容超不听，他说：

“彼远来疲弊，势不能久。吾据五州之地，拥富庶之民铁骑万群，麦禾布野，奈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纵使入岘，以精骑蹂之，何忧不克。”

诸将苦谏皆不听。太尉慕容镇说：

“陛下必以骑兵利平地者，宜出岘逆战，战而不胜，就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岘，自弃险固也。”

燕主亦不听，下令撤回在莒县（今山东莒县）、梁文的守军，修筑燕都广固的城垣，挑选士马，以待晋军[14]。

刘裕军过大岘，见燕兵不出，喜形于色，对左右说：

“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粮在田里），人无匮乏之虞，虏已入吾掌中矣。”[15]

三、临朐广固之战

慕容超知晋军到达东莞（今山东沂水）时，先遣公孙五楼、贺赖卢、段晖等率步骑五万屯临朐。后知晋军已入大岘，又亲率步骑四万增援临朐，命公孙五楼率骑兵进据巨蔑水（即瀰河，源出沂山，从南向北流，经临朐城东，向东北流入渤海）。晋军前锋孟龙符击破之，公孙五楼率部退走。

此时晋军已出山地，进入平地，刘裕采取如下临战队形，以防燕骑突击：以车四千乘为左右两翼，“方轨（双车并进）徐行（边走边准备战斗），车悉张幔（以能挡箭矢之物制成，挂在车上），御者执矟（一丈八尺的长方）”[16]；步兵夹在车兵间行进；骑兵在两侧及车后警戒掩护。

晋军进抵临朐以南数里时，慕容超派精骑前后夹击，晋军奋力迎战。日已过午，胜负未决。晋参军胡藩向刘裕建议说：

“燕悉兵出战，临朐城中留守必寡，愿以奇兵从间道取其城，此韩信所以破赵也。”[17]

刘裕采纳了这个出奇制胜的意见，派胡藩、檀韶、向弥率军潜出燕军之后，直取临朐城，声言“轻兵自海道至矣。”[18]向弥擐甲先登，占领临朐。慕容超单骑南逃至城南段晖营。刘裕知已占临朐，纵兵奋击，燕军大败，段晖等十余将被斩，慕容超逃还广固，其玉玺、辇及豹尾均被晋军俘获。刘裕乘胜进围广固，夺其大城，慕容超收军守小城。刘裕筑垒围困之，“抚纳降附，采拔贤俊，华夷大悦。”[19]并就地取粮，停止江淮漕运。

慕容超派尚书郎张纲、尚书令韩范向后秦主姚兴乞援。这时后秦与大夏赫连勃勃正在交战，只能派卫将军姚强率步骑一万会合镇守洛阳的姚绍随韩范救燕，同时遣使对刘裕说：

“秦已遣铁骑十万屯洛阳；晋军不还，当长驱而进。”

刘裕识破了这虚声恫吓之计，认为：

“夫兵贵神速，彼若审能赴救，必畏我知，宁容先遣信命，……是自张大之辞也。晋师不出，为日久矣。羌（指姚兴）见伐齐（指燕），殆将内惧，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刘裕即召秦使，对他说：

“汝语姚兴，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当取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20]

不久，姚兴被赫连勃勃打得大败，不得不把姚强调回长安。

张纲、韩范返回时均被晋军截获，刘裕叫他们绕城而呼：“刘勃勃（指赫连勃勃）大破秦军，无兵相救。”[21]燕军丧气。江南每次发兵或遣使来广固，刘裕都让他们于白天张旗鸣鼓而至，不断对守军开展攻心战。慕容超请割大岘以南地为晋藩臣，刘裕不许。慕容超派贺赖卢、公孙五楼挖地道出击晋兵，又遭失败。燕军伤亡日多，久困缺粮，城中患软脚病者日多，军民不断出城降晋。

围至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二月，刘裕下令四面急攻，燕尚书悦寿开门迎晋军入城，慕容超率左右数十骑逾城突围出走，被晋军追获，送至建康斩首，南燕亡。

这时，卢循、徐道覆乘晋大军攻燕，正率起义军自广州北伐，连克长沙、豫章（治南昌，今江西南昌），锋芒直指建康。晋廷急召刘裕率军还建康。

刘裕“北伐”时机和目标的选择

刘裕攻燕，时机洽当，计划周到，准备充分，是一次成功的战略进攻。

这时北方正处在前秦亡后的再分裂时期，战乱较多，北魏虽已崛起，但还没有主宰北方的力量。北魏、后秦、大夏、南燕几个较大的国家，互相攻杀，力量抵消；东晋肥水战后，力量增长，虽然平桓玄之乱和镇压孙恩、卢循起义消耗了相当大的力量，但平桓玄之乱时间比较短，仗也打得不大。平乱之后，事权归一。在整个南北朝时期，只有淝水战后，到后来的刘宋初期，南方的力量是超过北方的。刘裕攻燕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能取得胜利。

刘裕“北伐”的目标是南燕和后秦，先燕后秦的战略方针是洽当的。南燕占地较少，力量也较弱，也比较孤立，进攻时，水路由江入

淮，由淮入泗，由泗入沂，由建康可直达东莞，军运、补给都比较方便。慕容超继位后，政治腐败，内部离心，所以刘裕先击燕是洽当的。

刘裕灭南燕的进军路线

刘裕的进军路线，可以取道徐、兖，也可以取道琅琊、大岘。前者地势平坦，大军行动容易，后者经过沂蒙山区，行动较为困难。但刘裕却选择了后者，这是很有战略眼光的。因为取道徐、兖接近秦、魏边境（陈留郡，今开封东，为秦所占；黄河以北为北魏所占），翼侧暴露，易遭秦、魏袭击，且地势平坦有利于燕骑驰突；取道琅琊虽经山区，但不受秦、魏威胁，步、骑、车密切配合，加上沿途筑城留兵，易于抗击骑兵袭击及保障后方安全，也有利于发挥步兵的作用。

从上述分析和刘裕随带车四千乘及大量器材、辎重来看，这次进攻，计划是周到的，准备是充分的。

由此也可看出，南军北进，步、骑、水、车联合作战，必须携带大批粮食和抗骑兵、攻城等器材，辎重的数量比以往大大的增加了。进军路线必须尽量利用水路，如同现代作战不能离开公路一样。水路往往是断断续续的，有的地段必须挖沟开渠，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进攻准备的复杂性。

刘裕抗击南燕骑兵突击的措施

晋军的行动表明，南军"北伐"的一个关键性任务是抗骑兵突击。为此，刘裕采取了下述措施：取道山地而不取道平原；沿途筑城留兵，步步为营；重新使用战国以后早已弃而不用的车兵。当然车兵的任务已不是担任主要突击，而是担任抗骑兵突击，并采取步、骑、车协同作战的方法；在接敌和交战时，采取车兵在两翼"方轨（双车并行）徐进"，步兵在中间，骑兵担任警戒，掩护和机动的任务。

南燕的失败

燕主慕容超不接受公孙五楼的建议，既不利用大岘之险，以阻击

晋军，纵敌长驱直入；又不坚壁清野，据守广固，坚壁不战，使对方顿兵坚城，同时以轻骑抄袭晋军的翼侧和后方，俟晋军攻势顿挫，士卒饥疲，然后一举破敌。只依仗自己的骑兵取胜，以致在刘裕“方轨徐进”下，不得不过早在临朐以南与晋军决战，这是南燕失败在主观指导上的原因。

第三　刘裕灭后秦之战

一、战前形势

刘裕灭南燕后，本准备“留镇下邳，经营司（州治在今洛阳东北）、雍（州治在今陕西西安西北）”[22]，紧接着就西击后秦的，后因国内情况变化，不得不推迟了七年。自晋安帝义熙六年——十一年（公元410年—415年），刘裕先后镇压了卢循、徐道覆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消灭了荆州刺史刘毅及豫州刺史诸葛长民等反对势力；派朱龄石领兵入蜀讨平了据益州的谯纵；击败了荆州刺史、东晋宗室司马休之于江陵、襄阳，休之奔长安降后秦，使东晋恢复了对黄河以南的山东、豫南、鄂北及巴、蜀的统治，实力进一步增强，政局稳定。刘裕又遣使结好北凉沮渠蒙逊，蒙逊上表说：“闻车骑将军裕欲清中原，愿为右翼，驱逐戎虏。”[23]对北魏也保持着守境相安的状态，为发兵灭秦，准备了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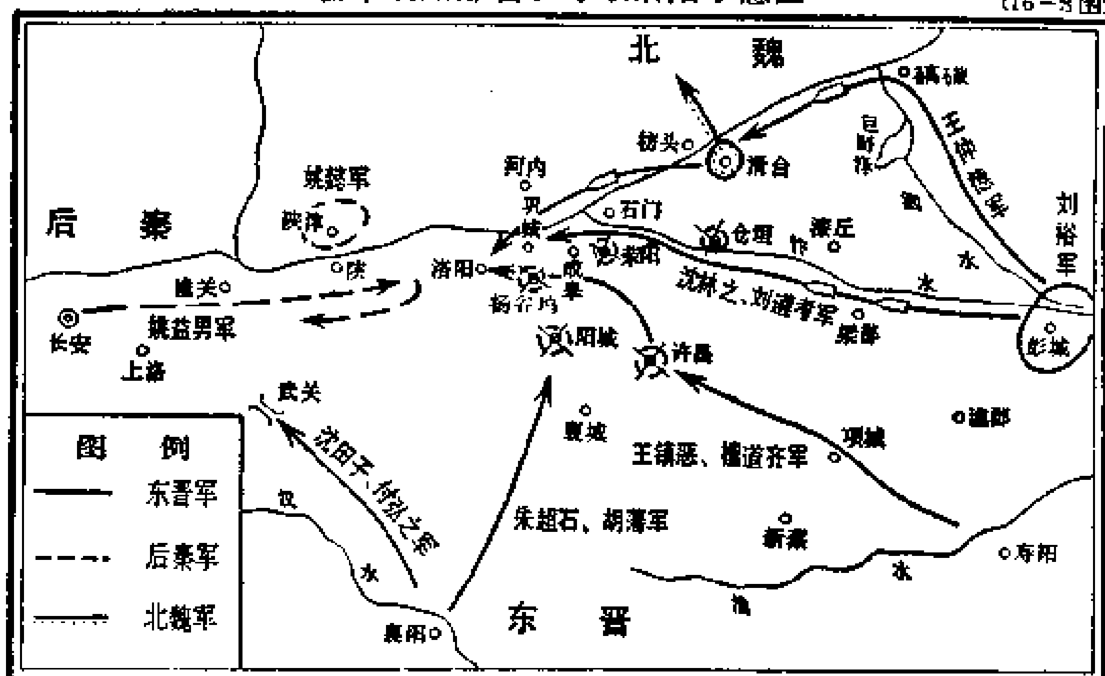
后秦姚兴于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死，其子姚泓继位，姚兴诸子姚弼、姚愔、姚耕儿争夺帝位，发生内乱。北方大夏赫连勃勃、西方西秦王炽磐、西南氐王杨盛不断入侵，处境困难。

北魏已与后秦结为姻亲，但拓跋珪于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被其子拓跋绍所杀，拓跋嗣又杀其弟拓跋绍即帝位；北方柔然不断入侵；国内河西胡人张外、河西胡人曹龙、离石胡人出以眷、河内人司马顺宰、河西胡人白亚栗斯及丁零人翟猛雀等不断起兵反魏；魏又连年霜旱，云、代之民多饿死，所以魏亦无力援外。

后秦与东晋的第一线，大体上在东起梁郡（郡治在今河南商丘

晋军战略部署和夺取洛阳示意图

(16－3图)



南)、谯郡(郡治在今安徽亳县)、新蔡(郡治在今河南新蔡)、襄城(郡治在今河南襄城)、上洛(郡治在今陕西商县)、汉中(郡治在今陕西汉中),西至武兴(今甘肃略阳)之线。(参看插图16-3)

二、刘裕的战略进攻计划

战略企图:灭后秦。

战略步骤:第一步以洛阳为进攻目标,并打通由淮、汴入河,及由淮、泗入河的水路,以保障大军及辎重沿水路西进;第二步,夺取关中灭后秦。

(一)第一步的战略部署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以其子刘义符为中军将军、刘穆之为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以徐羡之为副,总摄内外,代行自己职权;以左将军朱龄石统禁军,以徐州刺史刘怀慎守卫京师。其进攻部署如下:

——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锋诸军,开巨野泽入黄河;

——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率水军出石门(汴水经浪荡渠入黄河处,在今河南荥阳北),自汴入河;

——龙骧将军王镇恶(王猛之子,为刘裕所器重)、冠军将军檀道

济率步军自淮淝（指寿阳地区）向许（昌）洛(阳)；

——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向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

以上各路会攻洛阳。

另派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趋武关，以牵制关中秦军。

刘裕自率水军劲旅屯彭城，待水路开放，沿黄河西进，会同前锋诸军并力取关中。刘裕告诫前锋各军："若克洛阳，须大军至，未可轻前。"〔24〕

（二）刘裕进攻洛阳的战略部署得当

刘裕这一部署，即以强有力的水陆军组成先锋各军，会攻洛阳；自率水军劲旅屯彭城、在后跟进是洽当的。洛阳是前秦关东要点，但尚非根本，在西有大夏、西秦两面作战的条件下，后秦不可能倾全力来洛阳与晋军决战，前锋各军有力量攻占洛阳；晋军必须以彭城、寿阳为主要后方，沿水路进军，以发挥水军的作用并补充军食；交界地带，水路不修，开放沿途要点并加以疏浚需要时间，轻舟先发、重舟后继，可免沿途停滞而浪费体力；北魏态度不明，后军控制彭城，可起监视魏军行动和掩护后方的作用。但入关与秦军决战则必须等大军到达，全力以赴。

三、洛阳之战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率后续劲旅自建康出发，九月到达彭城。

前锋各军进展顺利。王镇恶、檀道济军所向皆捷。秦将王苟生以漆丘（今河南商丘北）降王镇恶，秦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今河南沈丘）降檀道济。檀道济攻占新蔡(今河南新蔡)，斩太守董遵，进克许昌，俘颍川（治许昌）太守姚桓及大将杨业。沈林子、刘遵孜由汴入河，攻占仓垣(今河南开封北)，秦兖州刺史韦华降。

王仲德军开通巨野泽进入黄河，溯河而上。北魏在黄河南岸的唯一据点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守将兖州刺史尉建弃城逃走，被王仲德占领。于是魏、晋之间发生纠纷。魏主拓跋嗣派长孙建、公孙表自河

内（今河南沁阳）趋枋头(今河南滑县西)，斩尉建，质问晋军犯境。王仲德答以晋军“自河入洛”是去“清扫山陵”（去清扫晋室祖宗的坟墓），“于魏，晋之好无废也”。拓跋嗣又派叔孙建质问刘裕，刘裕答曰：

“洛阳，晋之旧都，而羌（指后秦）据之；晋欲修复山陵久矣。诸桓宗族(指桓玄的宗族)，司马休之……皆晋之蠹也，而羌收之以为晋患。今晋将伐之，欲假道于魏，非敢为不利也。”[25]

刘裕戒备充分，措辞洽当，既达到了通过黄河的目的，又避免了与北魏开衅，处理是得当的。

十月，晋王镇恶、檀道济、王仲德前锋逼荥阳，秦守将降，晋军进占成皋。与此同时，朱超石、胡藩军开进㧐阳城，秦守将降。秦镇守洛阳的征南将军姚洸向长安求救。

秦廷对当时情势有两种处理意见：一是认为：

“安定（今甘肃泾川北，是后秦与大夏争夺的重镇）孤远，难以救卫，宜迁其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虽晋、夏交侵，犹不亡国。”

一是认为：

“若无安定，虏马必至于郿（今陕西郿县东北）。今关中兵足以拒晋，无为豫自损削也。”[26]

秦主姚泓采纳了不放弃安定的意见。实际上后秦两面作战的困境早成定局，不放弃安定固然兵力分散，难以击退晋军的进攻；而放弃安定，任大夏长驱直进，也同样免不了要失败。

姚洸求援，姚泓派越骑校尉阎生率骑兵三千，武卫将军姚益男率步卒一万救洛阳；另派并州牧姚懿屯陕津（在今河南陕县，黄河北岸）以为声援。

对如何守洛阳，秦宁朔将军赵玄向姚洸建议：“宜摄（收拢）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师之救。”[27]当时洛阳兵少，收军守金墉是正确的。但司马姚禹已暗通檀道济，极力反对集中兵力守金墉，说：“婴城示弱”[28]会受秦廷责备的。姚洸竟接受了姚禹的意见，派赵玄、石无讳分兵去守柏谷坞（今河南偃师东南）和巩城（今河南巩县

西南）。

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率军长驱而进，石无讳中途折回，赵玄战死于柏谷坞。檀道济军进逼洛阳，姚洸出降。晋军俘秦兵四千余人，皆释而遣之，于是"夷夏感悦，归之者甚众。"〔29〕秦将薛帛据河曲（指蒲阪以南至潼关以东的黄河北岸弯曲部）降晋。秦援军知洛阳已失，止军不进，河南郡县悉为晋军所有。

四、晋军夺占潼关

后秦在洛阳被占后，接连发生两起内乱。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十二月，秦并州牧姚懿在蒲阪反秦，自立为帝，欲进袭长安，被姚泓之叔姚绍率军平定。次年正月，征北将军姚恢在安定起兵反秦，直逼长安，姚绍急由蒲阪回军，击破了姚恢军，使长安又趋稳定。姚绍的内线机动，各个击破是出色的。

刘裕原令前锋各军到洛阳后，在刘裕大军到达前"未可轻前"，王镇恶等将见后秦内乱迭起，潼关空虚，出现了有利战机，当即机断行事，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二月，由洛阳分兵两路西进：一路由王镇恶率领，进军渑池（今河南洛宁西），袭占弘农（今河南灵宝北），直抵潼关城下；另一路由檀道济、沈林子率领，沿黄河北岸，进攻蒲阪。不克　为集中兵力，即回师南下，与王镇恶并力攻潼关。

这时秦大将军姚绍，已用极快的速度平定两起内乱，率步骑五万来守潼关。但姚绍见晋军不多，引军出关迎击晋军。檀道济、沈林子奋击，大破之，抢占了潼关。姚绍收军退定城（在潼关西三十里），据险坚守。（参看插图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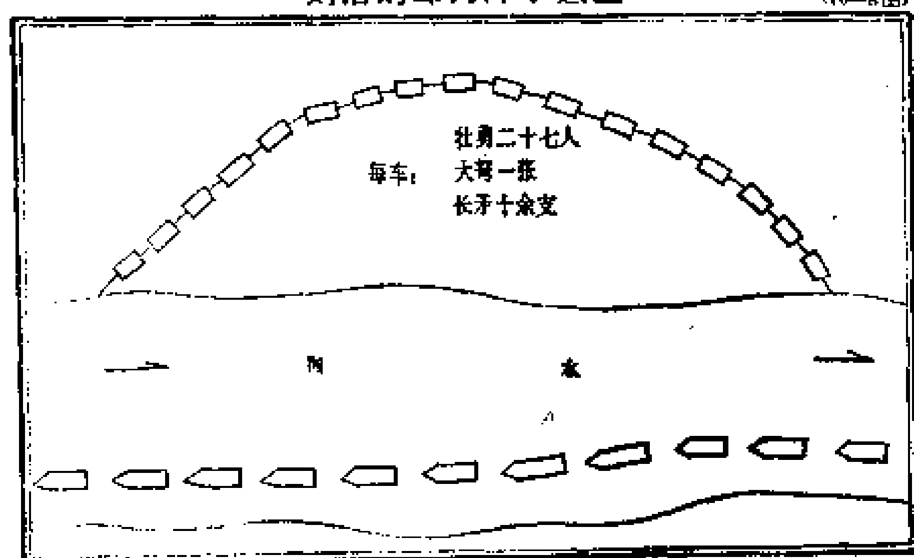
姚绍对诸将说：

"道济等兵力不多，悬军深入，不过坚壁以待继援。吾分军绝其粮道，可坐禽也。"〔30〕

遂遣武卫将军姚鸾屯大路以绝晋军粮道，但为沈林子所袭斩。姚绍又派姚讃屯河上以断水道，又被沈林子击败。日子一久，晋军食缺乏，众心疑惧，有的想弃辎重，退就刘裕大军，沈林子杖剑怒曰：

"今许、洛已定，关右将平，事之济否，系于前锋。奈何沮

刘裕的却月阵示意图 (10—5图)



乘胜之气，弃垂成之功乎！且大军尚远，贼众方盛，虽欲求还，岂可得乎！”[31]

于是军心乃定。王镇恶遣使驰告刘裕求援，并亲至弘农，向百姓求粮，百姓竞送义租，军势复振。

四月，姚绍又派长史姚洽、安鸾、姚墨蠡等率两千人屯黄河北，仍企图断晋军粮道，又被沈林子邀击，大破之，将士全被杀获。姚绍是后秦的名将，三断粮道都被晋军击歼，愤恚，发病呕血而死，秦主派姚讚代统其众。

晋前锋坚守潼关达五个月之久，直到七月刘裕率大军到达。

王镇恶等前锋诸将，机断行事，乘虚进击，无疑是正确的。但姚绍是后秦名将，在极短时间内平定两起叛乱，赶来迎战晋军，虽然大意出关，丢了潼关，仍能坚守定城，使局势重趋稳定。沈林子等孤军坚守潼关，三次击破姚绍企图切断晋军后方的行动，表现出晋前锋诸将出色的指挥才能，和晋军坚强的战斗力，也可以看出晋军的士气是顽强的，中原人民是倾向东晋的。

五、刘裕水军在魏军侧击下，强行通过黄河水道

刘裕率水军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正月从彭城出发，留其子刘义隆镇彭城。二月，水军入黄河，将溯河而上。为避免魏军沿

途阻挠，刘裕遣使假道于魏 这时秦主姚泓亦遣使求救。魏主拓跋嗣召诸将商议，群臣多认为：

"裕声言伐秦，其志难测"、"其势必声西而实北也"，"且秦，婚姻之国，不可不救也。宜发兵断河上流，勿使得西。"

但博士祭酒崔浩认为：

"裕图秦久矣。今姚兴死，子泓懦弱，国内多难，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是我代秦受敌也。""今柔然寇边，民食又乏"，"不若假之水道，听裕西上，然后屯兵以塞其东。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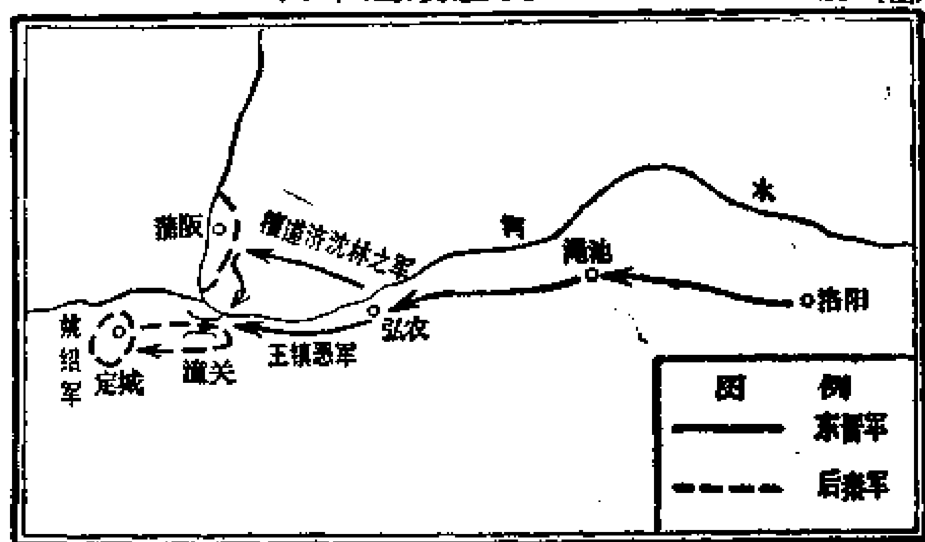
拓跋嗣倾向崔浩的意见，以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派振威将军娥清、冀州刺史阿薄干率步骑十万屯河北岸。

刘裕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留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自己率水军西进。

魏军以数千骑沿河北岸，随晋军船舰西进。晋军逆水而上，需军士背牵，风水迅急，船只有漂到北岸的，常被魏军杀掠。晋军上北岸击之，一登岸魏军就走，一退则魏军又来，晋军船舰受很大阻滞。四月，刘裕为掩护船队加速通过，派白直队主（白直队是从白丁中选壮勇者所组成的卫队）丁旿率执兵器的壮勇七百人，车一百乘，登北岸，在水滨立"却月阵"[33]（车辆列阵如缺月，中央离水边百余步，两端向内弯至水边，每车配七人）。布置完毕，阵内树一旗帜。魏军不知其意，皆未动。刘裕事先命宁朔将军朱超石完成行动准备，待旗帜一树起，朱超石立即率二千人渡河进入"却月阵"，每车增加二十人，每车配大弩一张，车辕上加设防冲击障碍物，另外还携带大鎚及千余张矟。（参看插图16-5）

魏军见阵已立好，就围了上来。长孙嵩派三万骑从四面肉搏攻阵。晋军弩已制不住，朱超石命军士收矟折断为三四尺长，用鎚鎚矟，一矟常能洞贯三四人，魏军挡不住，一时奔溃，死者相积。晋军临阵斩了魏冀州刺史阿薄干。朱超石率胡藩、刘荣祖等将追击，又破魏军，杀获以千计。晋水军遂得加速通过。拓跋嗣又命长孙嵩、叔孙

晋军进攻潼关示意图 （16—4图）



建各选精兵，等刘裕过后，自成皋渡河，侵扰彭城、沛县。如再有晋水军通过黄河，则引兵随之。

刘裕以“却月阵”来掩蔽水军强行通过敌前水道，是一个创举。实战表明，“却月阵”是一种可行的办法。却月阵的翼侧和后方是安全的，因为水道由晋军控制；晋军还可以源源增援却月阵；也可以依托却月阵出击敌人。战例表明，步车结合，弩、矟相辅，再配备必须的战斗器材和障碍物，是可以抗敌骑突击的。

六、晋军以精兵迂回和水军奇袭，攻破长安、灭后秦

七月，刘裕到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和潼关时，为迂回、包围定城秦军主力，先后作了如下部署：

——令沈田子、傅弘之率军入武关，出秦主力之后；

——令朱超石，徐猗之，会合降晋的薛帛军于黄河北，进攻蒲阪；

——刘裕率主力屯潼关。

沈田子、傅弘之率军入武关，秦戍将皆弃城走。沈田子等推进至峣柳（即峣关，在今陕西高县西北）附近的青泥时，被秦将姚和都阻于峣柳。（参看插图16-6）。

秦主姚泓正拟亲自率军正面抗击刘裕的进攻，当得知沈田子军已

东晋水军袭击长安示意图 (16—6图)

到峣柳，恐沈田子袭其后，亲率步骑数万来至青泥攻沈田子军。沈田子所率本为疑兵，只千余人，得知姚泓大军至，沈田子想乘其立足未稳，先发制人。傅弘之以寡不敌众加以劝阻。沈田子说：

“兵贵用奇，不必在众。且今众寡相悬，势不两立，若彼结围既固，则我无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营陈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34]

于是沈田子抚慰士卒，以死里求生。这时秦军已合围数重，晋军士卒踊跃鼓譟，持短兵奋击，斩首万余级，秦主姚泓奔还灞上。刘裕知沈田子兵少，增派沈林子率军增援，一同追击，关中郡县多暗中归附。

黄河以北方面，朱超石、徐猗之进攻不利，被坚守蒲阪的姚璞击败，徐猗之战死，朱超石退回潼关。姚璞又派司马国璠去引北魏军蹑刘裕大军之后。

这时南翼胜北翼败，情况变得错综起来，王镇恶提出建议：请率

水军自黄河入渭直袭长安。这是一个出奇制胜的大胆方案，刘裕同意，王镇恶率水军溯渭而上。

秦守卫香城（今陕西大荔东）的秦恢武将军姚难率军西撤，王镇恶跟踪追击。秦主姚泓由灞上率军还至石桥（长安城洛门东北），接应姚难，并派镇北将军姚疆与姚难合兵守泾上（今陕西高陵境）。王镇恶派毛德祖率兵进攻泾上破之，姚疆战死，姚难逃往长安。

正面据守定城以阻止刘裕大军西进的姚讚，见晋军由渭水逼近长安，便退守郑城（今陕西华县），刘裕亦进逼郑城。

这时后秦在长安附近尚有数万人。姚泓急忙部署诸军守渭桥（长安城北）、石积（长安城东北）、灞东等长安四周要点，自率军守城西逍遥园。

王镇恶军乘艨艟小舰，到达渭桥，弃舟登岸。水流湍急，船舰大部被冲走。王镇恶激励军士，后无退路，只有决一死战。他身先士卒，挥军进击，士卒腾踊争进，大破姚丕于渭桥。姚泓引兵来救，被败兵蹂踏，不战而溃。姚谌等战死，姚泓匹马还宫。王镇恶挥军入城。次日，姚泓被迫投降。不久，姚讚亦降。姚泓被送至建康，斩于市，后秦亡。

刘裕攻克长安后，陇右民众希望他继续西进，规复西北，刘裕本人也有迁都洛阳之意。但由于刘裕的亲信、最得力的助手刘穆之病死，大权有旁落之虞，将士也久出思归。所以，刘裕只在长安停留了两个月，留下其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和王修、王镇恶、沈田子、毛德祖、傅弘之等将镇长安，自率大军东归。

以后大夏乘机进攻，诸将又自相残杀，使晋军大为削弱，刘义真也被迫于晋安帝义熙十四年（公元418年）退出长安。东晋所占领的关中地区，不到一年半时间，即被大夏夺去。

刘裕灭后秦时机的选择

刘裕灭后秦，选择的时机也是恰当的。当时后秦正处在内外交困之中，大夏、西秦、氐杨与后秦为敌，秦虽多次用兵，但始终未能摆

脱两面作战的困境；王室内部，姚兴死后，诸子争夺帝位，宗室的叛乱不断发生；北魏虽已成为姻亲之国，但内忧外患也无力支援后秦。东晋方面，灭南燕和平蜀之后，国力增长，军威提高。北府兵虽因刘牢之三次倒戈，一批将领被桓玄杀死，但刘裕团结北府兵中下级军官，一举击败桓玄，重建晋室，平燕灭蜀，战功显赫，勇敢作战的作风得到保持和发扬，军心士气再次高涨。王、谢等高门士族，在桓玄之乱和孙、卢领导的农民起义中，受到沉重的打击。刘毅、诸葛长民等反对势力，先后被刘裕除掉，事权归一，更易于在全国范围内调动人力和物力。这时，北方诸国，民族矛盾还严重存在，中原百姓仍怀念晋室，南军北上，受到民众普遍支持，所以这时发动灭秦战争是较为有利的。这些，也是东晋所以能获得胜利的主要原因。

刘裕的战略进攻计划

这次战略进攻有两个特点：一是要中途变更方向，即先北然后转向西，主要突击保持在从寿阳、彭城向洛阳、长安方向上，刘裕原打算"留镇下邳，经营司、雍"，也就是这个着眼；二是要侧敌进军，右侧完全暴露给北魏，刘裕虽然力争北魏中立，但北魏毕竟是后秦的姻亲，拓跋嗣的夫人是后秦姚兴的西平公主。

采取上述转向进攻的主要原因是必须沿水路进军，由江入淮，由淮入泗、入巨野泽入河，或由淮入泗、由泗入汴入河。晋军由步、骑、水、车四个兵种合成作战，要携带补充四个兵种的武器装备、抗骑兵和攻城、筑垒等器材，进军两千里，要由夏至冬，由冬至春，要携带所需的粮食和被服装备，随军辎重是很庞大的，离开水路运输很难完成。水军是东晋所特有，沿水路进军可以使用并发挥水军的特长。后秦的荥阳、洛阳、潼关等要点都背靠黄河，东晋的水军控制了黄河，这些要点的北侧和后方都随时受着东晋水军的威胁，并切断了这些要点与北魏的连系。反过来，晋军自己的北侧和后方也得到了保障。正因为这样，刘裕也才敢于面对北魏的铁骑，进行侧敌行军。最后在奇袭长安时，水军还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变更方向和侧敌行动的进军，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只有在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和掌握有效保障措施的条件下才能实施。

这种进军给进攻计划和进攻准备带来很大的复杂性。这次进攻，由于晋军受到魏军的袭扰，耽搁了刘裕大军到达洛阳的时间，使前锋各军袭占潼关的有利形势几乎成为泡影，这是组织这样的进攻所必须特别关注的。

刘裕的战略进攻计划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前锋各军夺占洛阳，开放水路，保障水军劲旅和辎重到达战场；第二步全力夺取关中。这样做是适当的，也是必要的。这样远的距离，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复杂的进军，想一举夺取长安是不可能的。

刘裕"北伐"成功的根本原因

刘裕"北伐"是一个全局，包括灭燕、灭蜀、灭秦。是东晋南北朝272年间（公元317—589年）所有"北伐"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它恢复了整个黄河以南地区，是东晋和宋、齐、梁、陈五朝疆域最大的时期。

这次"北伐"所以能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南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超过了北方。东晋建国到刘裕灭秦已整整一百年(公元317—417年)，虽然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大，也发生过战乱，但毕竟保持了统一的局面，比起北方来，刘渊、石勒、苻坚，起得快，落得快；合得快，分得更快；战祸连绵，从未停止过；民族矛盾和向封建化过渡都还沒有解决，北方人民基本上处在各族贵族的军事统治之下。相比之下南方人民的生活就安定得多了，也好过得多了。经济上当然也比北方发展得快。军事上，谢安、谢玄组建了一支由北方流民组成的、训练严格、士气很高、战斗力很强的北府兵，这支军队屡战屡胜，人才辈出，在晋军中起着骨干作用，连骑兵力量很强的北魏也存有几分畏惧，沒有这样一支军队也是难以取胜的。

刘裕的将略

刘裕本人也有较强的统帅才能，主要表现在治军、用将和战争的

组织计划上。刘裕治军的事迹，史书缺乏记载，但他所统率的军队，的确保持并发扬了北府兵良好的战斗作风，能面对强敌，英勇奋战，以少胜多。刘裕能识人也能大胆放手使用，能从北府军中下级军官中提拔大批优秀将才，如朱龄石资望很浅，但刘裕能大胆任命他为伐蜀的统帅，一变过去东晋主要以高门士族如王、谢、庾、桓出任将帅的沉闷局面，胡藩、白孙、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沈田子、朱超石等都是有勇有谋、能独当一面的将才。在这次战争中，精兵良将的重大作用，反映得极为明显，特别表现在前锋诸将王镇恶、檀道济等机断行事、乘虚夺占潼关和坚守潼关，沈田子以少击众、袭破姚泓的主力和王镇恶以水军奇袭长安等几次关键性的作战上。

这次“北伐”的严重缺陷是关中未能巩固，刘裕为怕大权旁落，未能在攻克长安后，积极巩固和扩大战果，就匆匆率军南返；对关中的留守也处理不当，以致造成诸将自相残杀，使长安很快得而复失。

注 释

〔1〕《晋书·桓玄传》
〔2〕《晋书·简文三子传》
〔3〕〔4〕〔5〕《资治通鉴·晋安帝元兴三年》
〔6〕〔7〕〔8〕《读史方舆纪要》
〔9〕《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四年》
〔10〕《晋书·姚兴载记》
〔11〕《读史方舆纪要》
〔12〕《晋书·姚兴载记》
〔13〕〔14〕〔15〕《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五年》
〔16〕《宋书·武帝纪》
〔17〕〔18〕〔19〕〔20〕〔21〕《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五年》
〔22〕《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六年》
〔23〕《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一年》
〔24〕《宋书·王镇恶传》
〔25〕〔26〕〔27〕〔28〕〔29〕《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30〕〔31〕〔32〕〔33〕〔34〕《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

第十七章　鲜卑拓跋焘统一北方和宋魏战争

第一　拓跋焘统一北方的战争

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鲜卑拓跋珪建立北魏以后，在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二十一年（公元395、396年）两次击败后燕主慕容垂父子的进攻，乘胜南进，攻占了晋阳、真定（今河北正定）、信都（今河北冀县）、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和邺城（今河南安阳市北），尽取黄河以北今山西、河北各地，隔黄河与东晋相持。慕容垂之子慕容宝从中山突围，逃往龙县（今辽宁朝阳）。晋安帝隆安二年（公元398年），拓跋珪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称帝，即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残忍好杀，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被其子拓跋绍所杀，拓跋绍之兄拓跋嗣又杀拓跋绍，继位，即为魏明元帝。

晋刘裕"北伐"后，地位日隆。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逼晋恭帝让位，自立为帝，国号宋，即宋武帝，史称刘宋。刘裕为争取人心，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抑制豪强、整顿吏治、奖励农耕、发展生产等措施，使政局得到稳定，经济也有所发展。刘裕称帝三年后就去世了。宋武帝永初三年（公元422年），太子刘义符继位，是为少帝。徐羡之、付亮、谢晦辅政。

魏主拓跋嗣闻刘裕死，乘丧南下，夺占洛阳、金墉、虎牢、滑台、碻磝等地，掠青、兖二州。

宋少帝景平元年（公元423年），魏主拓跋嗣死，其子拓跋焘继位，即北魏太武帝。

拓跋焘依靠中原士族，继续沿着封建化道路前进，政权巩固，生

产发展。拓跋焘“壮健鸷勇，临城对阵，亲犯矢石，左右死伤相继，神色自若；由是将士畏服，咸尽死力”。“性俭率”，“命将出师，指授节度，违之者多致负败”，“听察精敏，下无遁情，赏不违贱，罚不避贵”“明于知人，或拔士于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长，不论本末”。“然性残忍，果于杀戮。”[1]信任中原士族清河崔浩，拜侍中、特进。战略决策多采纳崔浩的意见，他对新降的渠帅说：

“然其（指崔浩）胸中所怀，乃过于甲兵。朕虽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决，前后有功，皆此人所教也。”

又敕尚书说：

“凡军国大计，汝曹所不能决者，皆当咨浩，然后施行。”[2]

拓跋焘东征西讨，终于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一、拓跋焘的战略方针

在十六国相互兼并之后，拓跋焘继位时与北魏对立的只剩下北凉、大夏和北燕，此外还有北方的柔然和江南的刘宋。

拓跋焘最终的战略目的是凭藉他精锐的铁骑以统一中国。他的战略方针是：先统一北方然后南下灭宋。拓跋焘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给宋文帝刘义隆的信中说：

“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指柔然的骑兵）。……以彼无足，故不先讨耳。”[3]

刘裕死时，拓跋嗣想乘丧南进，崔浩也指出过：

“国家今日亦未能一举取江南也。”[4]

其着眼是很清楚的：江淮之间，河道纵横，地势潮湿，夏季炎热，不适合大骑兵作战；刘宋地幅广大，山川相连，难以一口吃掉；宋军缺少骑兵，对魏威胁不大，刘裕“北伐”时崔浩曾指出：

“且南北异俗，借使国家弃恒山以南，裕（指刘裕）必不能以吴、越之兵与吾争守河北之地，安能为吾患乎！”[5]

刘裕“北伐”时，军威很盛，那时拓跋嗣有所畏惧，尚且如此，更何况刘裕死后，军力已有所下降呢！所以，拓跋焘的战略方针是先

统一北方，再南下灭宋。

北燕远在辽东，北凉，在大夏之西。对魏威胁较大的是西方的大夏和北方的柔然。大夏据有今陕西、河套和宁夏，而北魏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是北魏的根本，北魏南进，大夏是肘腋之患，时刻威胁着平城。柔然是游牧民族，居北魏的北方，骑兵来去飘忽，多次入侵北魏。北魏处在南有宋，北有柔然，西有大夏的三面夹击中。为摆脱这种形势，北魏首要的进攻对象是大夏和柔然。（参看插图17-1）

二、魏灭大夏之战

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夏主赫连勃勃死，其子赫连昌继位。

魏主拓跋焘诏问公卿：

“今当用兵，赫连、蠕蠕（指柔然）二国何先？”

崔浩对曰：

“蠕蠕乌集兽逃，举大众追之则不能及，轻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敌。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政刑残虐，人神所弃，宜先伐之。”

随后魏主闻夏“诸子相图（指赫连勃勃诸子，昌、伦、璝互相攻杀），国人不安。”〔6〕就决意攻夏。

魏主派奚斤，周几率军袭蒲阪、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自率大军袭大夏都城统万（今内蒙乌审旗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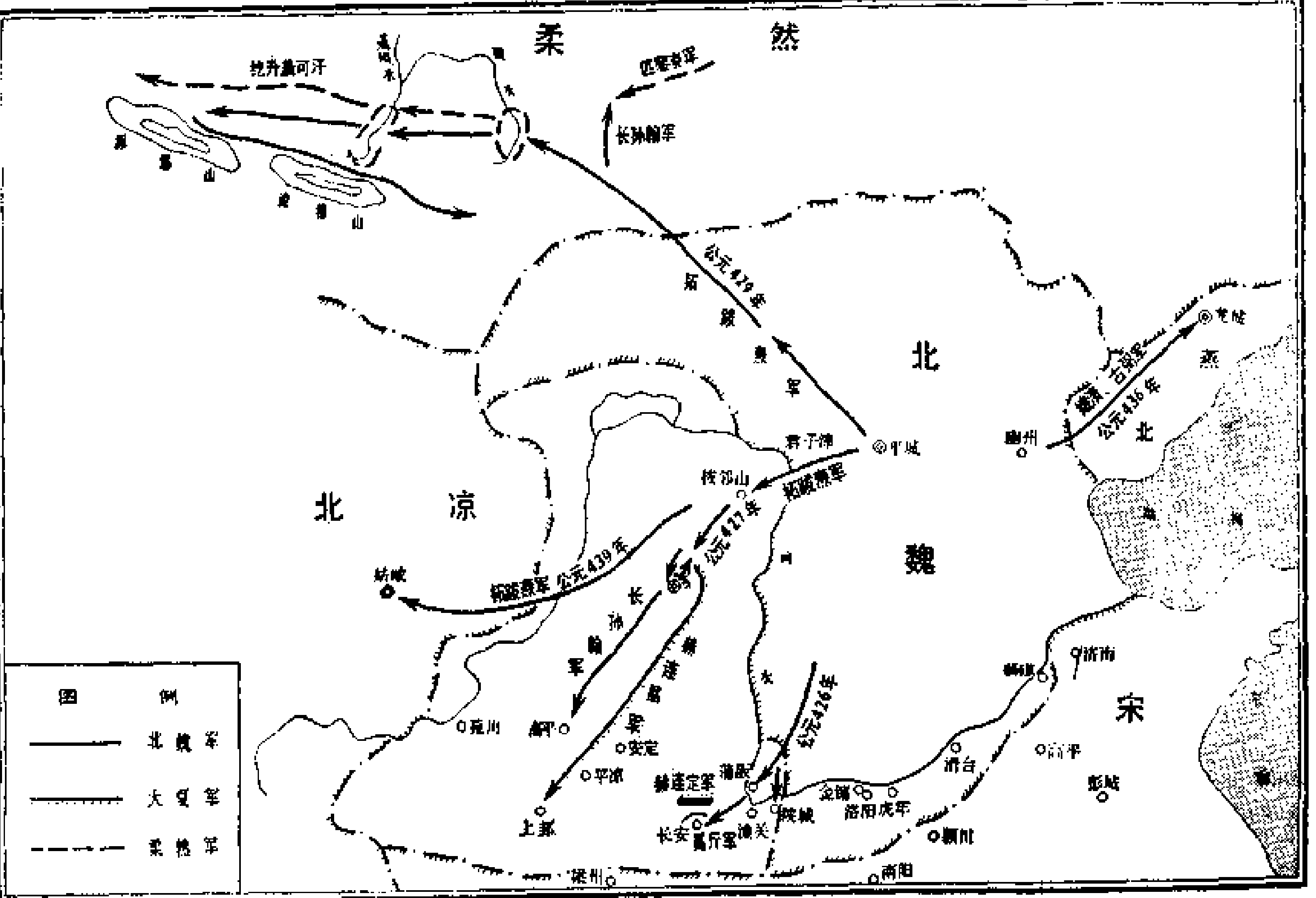
魏主袭统万不克，分兵四掠而还。但南路进攻顺利，奚斤、周几克蒲阪、陕城，乘胜夺占长安。秦、雍氐、羌降魏，河西王沮渠蒙逊及氐王杨玄也遣使附魏。

宋文帝元嘉四年（公元427年）四月，魏主拓跋焘知夏主赫连昌派赫连定率众两万反攻长安，与奚斤相持，再次亲率大军乘虚袭统万，其部署如下：

——将军贺多罗率精骑三千为前候；

——司徒长孙翰率三万骑为前驱；

——常山王拓跋素率步兵三万为后继，伏真等率步兵三万运攻具；



北魏拓跋焘统一北方示意图

——龙骧将军陆俟督诸军镇大碛（指阴山北沙漠），以防柔然。

五月，魏军在君子津（今内蒙托克托东南）渡过黄河，到拔邻山（今内蒙准格尔旗）筑城，留下辎重。魏主拓跋焘亲率轻骑三万倍道而行。群臣谏曰：

“统万城坚[7]，非朝夕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与步兵、攻具一时俱往”。

拓跋焘说：

“用兵之术，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后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进，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食尽兵疲，外无所掠，进退无地。不如以轻骑直抵其城，彼见步兵未至，意必宽弛；吾羸形以诱之，彼或出战，则成擒矣。”[8]

拓跋焘的战役方针是：诱夏军出城而歼之。

魏主至统万，分军埋伏于山谷，只以少数军队进抵城下。夏将狄子玉降魏，魏主得知夏主正坚守统万，企图等赫连定在长安破奚斤后，回师统万，再内外夹击，歼灭魏军。拓跋焘根据这一情况，采取退军示弱之计，以诱夏军出击。这时有魏兵逃奔至夏，说：

“魏军粮尽，士卒食菜，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宜急击之。”[9]

夏主赫连昌遂率步骑三万出城击魏军，魏主收军伪遁，夏军分为两翼鼓噪追击。追了五六里时，风起从东南来，拓跋焘分骑兵为左右队，迎风雨夹击夏军。魏主马蹶而堕，几乎被夏兵擒获，魏将拓跋齐死战掩护，魏主上马刺死夏尚书斛黎文，挥军奋击，夏军大溃。魏主追夏主至城北，杀死夏主之弟赫连满等万余人。夏主来不及入城，奔向上邽（今甘肃天水市）。魏将长孙翰率八千骑追至高平（今甘肃固原），不及而还。魏主入统万，获夏王、公、卿、将、后、妃、宫人以万数，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

赫连定知统万城破，亦退军上邽。拓跋焘留拓跋素镇统万，自率军还平城。

统万城坚，强攻势必旷日持久，诱夏军出城而击破之，是最好的

办法。

大夏军力从此大为削弱。次年，魏、夏战于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夏主赫连昌被俘。赫连定在平凉（今甘肃华亭西）继位，曾率军反攻，再占长安。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赫连定避魏西迁，被吐谷浑（今青海地区）所俘，大夏亡。

三、魏破柔然之战

柔然，《魏书·蠕蠕传》说它是“东胡之苗裔”，公元五世纪初在漠北建立柔然政权。其控制区东起大兴安岭，西逾阿尔泰山，南自大戈壁，北至贝加尔湖以南，是当时我国东北的一个强大的游牧地方政权。柔然的骑兵几乎每年都要侵扰魏边，魏军多次反击，但每次都是柔然早已退走，魏军扑空。

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魏主拓跋焘决心亲率大军北击柔然。尚书令刘絜等以天象不利，极力谏阻，独崔浩赞同。公卿问崔浩说：

> “今南寇（指刘宋正拟“北伐”）方伺隙，而舍之北伐，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强寇，将何以待之？”

崔浩回答说：

> “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则无以待南寇。南人闻国家克统万以来，内怀恐惧，故扬声动众以卫淮北。比吾破蠕蠕，往还之间，南寇必不动也。且彼步我骑，彼能北来，我亦南往；在彼甚困，于我未劳。……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制，自宽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钞。今掩其不备，必望尘骇散。牡马护牝，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不过数日，必聚而困弊，可一举而灭也。”[10]

四月，拓跋焘亲率军发平城，五月，到漠南，留下辎重，率轻骑兼马（预备马匹）远程袭击柔然。到栗水（在浚稽山东北，窦宪故垒东北，乌兰巴托西南数百里），柔然纥升盖可汗果不设防备，“民畜满野，惊怖散去，莫相收摄”[11]纥升盖可汗焚烧庐舍，向西逃走，不知去向。纥升盖可汗之弟匹黎先主管东部地区，闻讯赶来，魏平阳王长

孙翰邀击大破之，斩其大人数百。纥升盖可汗既走，部落四散，窜入山谷，杂畜满野，无人收管。魏主率军沿栗水西进，到菟园水（栗水以西，浚稽山以北），分军搜讨，范围很广，斩俘甚众。魏主又率军西进，至涿邪山（浚稽山西）。柔然前后降魏者达三十余万落，获戎马百余万匹。七月，拓跋焘率军东还。后得知"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12]

纥升盖可汗失败后，悒悒而死。其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

至此，魏主拓跋焘已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吐谷浑遣使附魏，北凉主沮渠蒙逊接受魏封为凉王。次年魏军攻北燕，围和龙（今辽宁朝阳）。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北燕主冯弘（冯跋之弟）怕魏军进攻，烧宫殿，东走高丽，北燕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魏军灭北凉，沮渠牧犍（蒙逊之子）降，十六国时期结束。

北魏封建化进程比较快，政权巩固；以强悍的鲜卑骑兵为核心，统御各族降附的大量军队，形成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拓跋焘以崔浩为谋主，战略运用也比较好。所以能在十五年间，采取先北后南，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将依托江、淮，人多地广、政权稳定的刘宋，暂时放在一边，待北方统一后再进图南方也是较为明智的。

第二　刘义隆第一次"北伐"

宋少帝刘义符继位后，与左右狎昵，游戏无度。辅臣徐羡之、傅亮、谢晦废少帝，立宜都王刘义隆为帝。

刘义隆就是宋文帝，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刘裕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改革。他下诏求贤，整饬吏治；修复学舍，并亲至国子学策试诸生；常于延贤堂听讼，力求刑狱平允；劝课农桑，对缺乏稻种的，下令贷给；下令减免人民积欠政府的"逋租宿债"等等，使自耕小农不致破产，使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后世的历史家对"元嘉小

康”有如下评论：“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壑，于是可免”。[13]“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三十年间，四境之内，晏安无事，户口蕃息；出租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14]

宋文帝即位以来就有“恢复河南之志”。[15]

宋文帝元嘉七年（公元430年）三月，刘义隆下令收复河南，其部署如下：

——以右将军到彦之率甲卒五万，并指挥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黄河，进攻碻磝、滑台，是这次“北伐”的主力；

——以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骑八千、豫州刺史刘德武率步兵一万后继，直指虎牢；

——以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率军三万，控制彭城，监征讨诸军事，是这次“北伐”的主帅。

以上各部宋军共十余万人。

一、北魏的对策

拓跋焘得知宋军将北进，召公卿大臣商讨迎战方针。魏南线守将都主张先发制人：

> “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并请“悉诛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绝其响导。”

公卿都同意。但崔浩则主张后发制人，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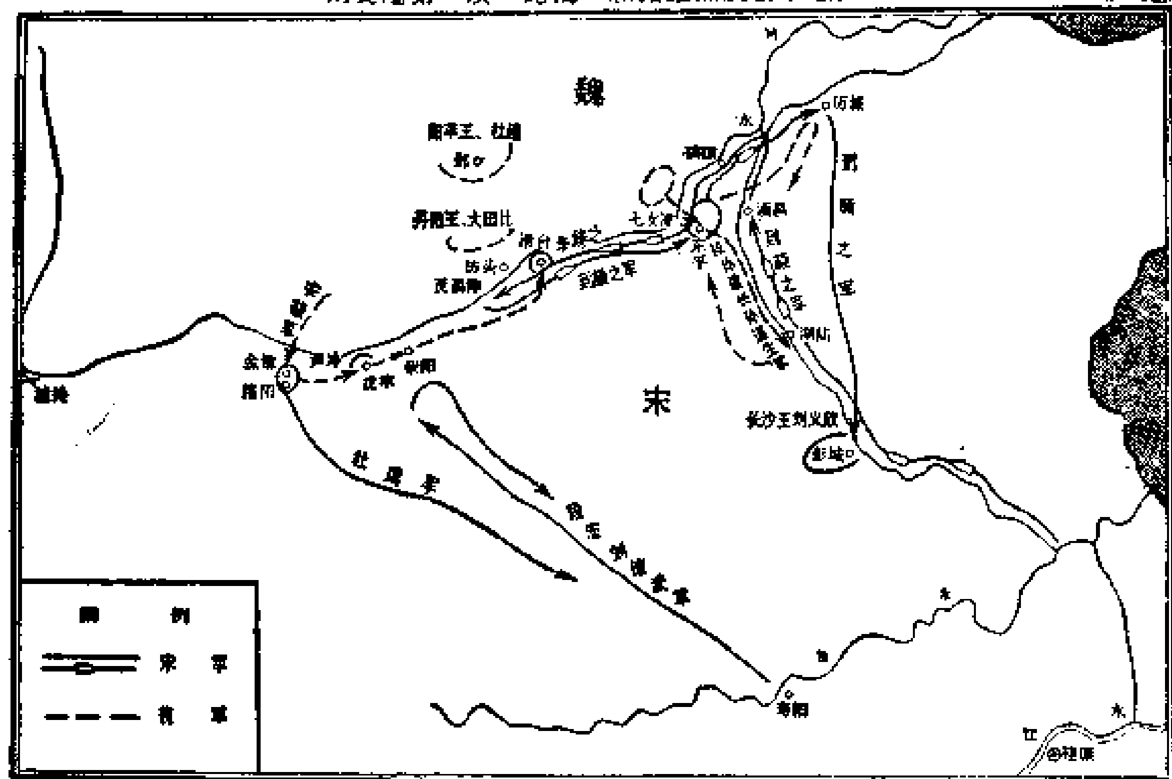
> “南方下湿，入夏之后，水潦方降……易生疾病，不可行师。”“彼若果能北来，宜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此万全之计也。”[16]

拓跋焘同意后发制人，令丹阳王大毗率军屯河上；选幽州以南戍兵集中河上备用；以阳平王杜超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镇邺，为诸军节度。另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备用。

当宋军接近黄河时，拓跋焘下令河南四镇（碻磝、滑台、虎牢、金墉）全部收军北渡。（参看插图17-2）

二、宋军的行动

刘义隆第一次"北伐"和拓跋焘反击示意图



四月，到彦之军由淮入泗，由于渠道渗水（漏水），日行才十里，到七月才到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然后溯河而上。由于魏军北撤，宋军顺利地占领了河南四镇。收复了司、兖二州，宋军随即转入防御。

到彦云以朱脩之守滑台，尹冲守虎牢，杜骥守金镛，列守南岸，东起碻磝，西至潼关以东，主力屯灵昌津（今河南汲县东）。

这时夏主赫连定尚在平凉负隅顽抗，八月，赫连定知宋军已抵黄河，自率数万人，击魏平西将军隗归于鄜城（今陕西洛川东南）以东，并遣使至宋，"约合兵灭魏，遥分河北：自恒山以东属宋，以西属夏。"[17]

拓跋焘得知夏攻鄜城，准备伐夏，群臣都说：

"刘义隆兵犹在河中（河之中流），舍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义隆乘虚济河，则失山东矣（指太行山以东）。"

魏主问崔浩，崔浩分析说：

“义隆与赫连定遥相招引，……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此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18]

崔浩的这一分析极为精辟。拓跋焘留河北诸军对付宋军，自赴统万调兵袭平凉。

宋廷对赫连定的建议未作反应。十月，到彦之、王仲德率主力退屯东平（治范县，今河南范县东南）。

此时已秋凉马肥，魏军按预定计划，分两路渡河南下反击。

西路魏军由冠军将军安颉率领，渡河南下攻金镛。宋将杜骥见金镛不治已久，又无粮食，弃城南走。安颉占洛阳，歼宋军五千人。安颉率军东进又攻占虎牢，宋守将尹冲及荥阳太守崔模降魏。

东路魏军会于七女津（今山东东平西北，黄河北岸）。宋到彦之恐其南渡，派裨将王蟠龙溯流夺魏船，被魏阳平王杜超击斩。

十一月魏叔孙建、长孙道生率东路魏军渡河南下。

宋文帝见魏军渡河南下，宋军不利，派檀道济为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率军增援。

到彦之知洛阳、虎牢不守，不顾王仲德、垣护之等将的反对，自率水军退至历城（今山东济南），弃甲焚舟，徒步逃回彭城。竺灵秀亦弃须昌，南奔湖陆（今山东鱼台东南）。魏叔孙建率军攻湖陆，竺灵秀大败，死者五千余人。叔孙建还屯范城（今山东范县东南）。

彭城将佐见魏军大至，劝长沙王刘义欣率军还建康，刘义欣不从，守彭城。

魏军攻济南，太守肖承之只数百人，以空城计，偃旗息鼓，大开城门。魏军疑有伏兵，退去。

檀道济所率援军至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正月才赶到寿张

（今山东梁山西北），孤军深入，向济南挺进。檀道济率王仲德、段宏等军奋击魏安平公乙旃眷，大破之。又击斩魏济州刺史悉烦库结。二月进至济南。二十多天中，前后与魏军三十余战，宋军多捷。这时魏叔孙建等军纵轻骑前后邀击，焚草烧谷，宋军乏食，檀道济不能再西救滑台。

这时宋将朱脩之守滑台已数月之久，粮尽，士卒蒸鼠而食。二月初十，被魏安颉、司马楚之、王慧龙等军合力攻占，魏军俘王脩之及宋军万余人。

檀道济粮尽，自历城南撤。魏军知其粮尽，跟踪追击。檀道济于夜间用“唱筹量沙”[19]之计，故意叫魏军听见，以所剩的少量米覆盖在沙堆之上，让魏军白天看见，以欺骗魏军。此时魏兵甚多，骑士四合。檀道济命军士披甲，自己穿白服乘舆而出，魏军以为有埋伏，不敢近逼，檀道济才得全军而还。

至此，刘义隆的第一次“北伐”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魏主拓跋焘攻克大夏的平凉，赫连定逃往上邽，关中又全部为魏所有。

宋军第一次“北伐”失败的原因

（一）“北伐”时机选择不当

宋军失败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进攻时机选择不当。刘裕灭秦后，由于怕大权旁落，匆匆率大军南返，让赫连勃勃很快夺占了关中，使河南西侧失去了依托。刘裕一死，拓跋嗣乘丧南下，夺去了河南四镇。当时大夏、柔然从西、北两个方向威胁着北魏的后背，宋反击河南是比较容易的。但由于少帝刘义符游戏无度，不理政事，内部堪虞，就无力反击了。接着宋廷又搞了一场废立，徐羡之、傅亮、谢晦废刘义符，杀刘义符、刘义真，立刘义隆。刘义隆又反过来杀徐羡之等三人，当时谢晦领兵镇守荆州，刘义隆还派兵攻打了荆州。这样就伤了元气，而且调整内部、平息事故都需要时间，反击河南的时间就耽搁了六年之久。等刘宋政治上稳定了，经济上发展了，北魏已先后大破赫连昌和柔然，摆脱了三面作战的不利态势，得以集中主要力量来对

付刘宋。这时刘义隆再进攻河南，取胜的可能性自然就少了。

（二）进攻的组织和计划有缺陷

这次进攻的组织和计划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两路进攻，把主突方向保持在东路，按刘裕的老路子，由淮入泗入河，是可行的。问题出在对下一步没有计划，夺回四镇以后如何转入防御，如何抗击魏军的反攻等都没有考虑。按当时的情况来说，魏军对坚城还难以很快攻克，宋军的防御必须以四镇为重点，修城屯粮，集中兵力为持久之计；纵深内再增设几个据点作为支持，配上一、二支战斗力强的机动部队，以备适时增援。“东西列兵径二千里”那种处处设防，处处薄弱的办法当然是错误的。秋高马肥，兴兵南掠，是北方骑兵多年来的行动规律。宋军选三月出师，就着眼到这一点。虽然渠漏水浅，到彦之的水军耽搁了三个月。但宋军七月到达黄河南岸，到十月魏军渡河南下，中间还是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如果事前计划周到，准备充分，携带大批粮食和筑城器材，修固城垣，屯储粮食都还是来得及的。但前线统帅到彦之，陶醉于眼前的胜利，根本没有看到魏军是主动北撤，秋天还要来的。他除了布置列守南岸外，此外无所事事。王仲德曾提出警告说：

> “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堕其计。……今敛戍北归，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将复南来，岂可不以为忧乎！”[19]

但到彦之仍然未予重视。诸将中只王脩之重视了，他守滑台一直守到了第二年二月。宋军如能抓紧时间，加强以确保四镇为主的防御，顶过魏军的冬季攻势，到第二年三月以后，春雨一降，春水方生，魏军又只好北撤，宋军再继续加强守备，收复河南的成果就可以保住了。

（三）用将不当

以上分析表明，到彦之缺乏战略头脑，不是一个将才。他是跟刘裕在南方镇压孙恩、卢循起义军起家的，被任为南蛮校尉，属宜都王刘义隆管辖。刘义隆即位后，到彦之就成为王府旧属，受到特别信任。所以，这次他被任为前线统帅，是宋廷发生废立事件产生内部矛

盾的结果。檀道济是刘裕指定的第四位顾命大臣，地位、威望和统帅才能都远比到彦之强，只是因为檀道济被徐羡之召去参与废立，虽未参与杀害刘义符、刘义真而免予追究，但毕竟参与了废立，而受到宋文帝的猜疑。檀道济威望很高，如果“北伐”成功，大权旁落，宋廷就不好办了。所以北伐的将帅中没有檀道济，直到后来魏大举南渡反击，才起用他率军去增援。但为时已晚，只能收拾残局而已。

这次失败，刘义隆和到彦之要负完全责任，这是废立事件所产生的重大后果。这一后果不仅反映在主帅的选择上，对其他将校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这就损害了宋军的军心和士气。

这次“北伐”失败的三个重要原因，它们的根子都是宋廷废立事件所产生的内部矛盾。这就是刘宋在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总的对比并不比北魏差的情况下，所以遭到失败的关键所在。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公元436年)，檀道济终于被宋文帝无辜杀害。

北魏方面，战略运用比较成功，崔浩精辟的情况判断，及时的撤出河南四镇，及时的两路南下反击，在判明宋军的战略企图和军力后，同时进攻赫连定，两个战场都取得了胜利。

第三　刘义隆第二次“北伐”和拓跋焘的南征

宋第一次“北伐”失败后，经过二十年恢复发展，出现了小康的局面。北魏方面，卢水胡人盖吴、河东蜀人薛永宗、金城边固、天水梁会、略阳王元达、安定卢水胡人刘超等先后起兵反魏，但除盖吴外，规模都不大。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公元446年)，魏军攻扰宋兖、青、冀(设在青州境内)三州，杀掠甚众，北边骚动。

一、宋廷的“北伐”谋议和部署

刘义隆见国内“大治”，又有“经略中原”[20]之志，群臣中企图迎合取宠的就纷纷献策。王玄谟、徐湛之、江湛等都主张“伐魏”，御史中

丞袁淑甚至提出：

“今当席卷赵、魏，检玉岱宗。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21]

但比较有战略眼光的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前御史中丞何承天都力加劝阻。沈庆之说：

“我步彼骑，其势不敌。檀道济再行无功，到彦之失利而还。今料王玄谟等，未踰两将，六军之盛，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22]

何承天主张：

“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弊。”[23]

刘义隆则认为：

“虏所恃者唯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台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城，馆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固。比及冬初，城守相接，虏马过河，即成擒也。”[24]

魏主拓跋焘本来趾高气扬，准备大举“伐宋”，听到宋军要北攻的消息，故意以极其轻蔑的态度和讥讽的口吻写信给刘义隆说：

“今闻彼（指刘义隆）欲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随意而行，来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厌其区宇者，可来平城居，我亦往扬州，相与易地。”[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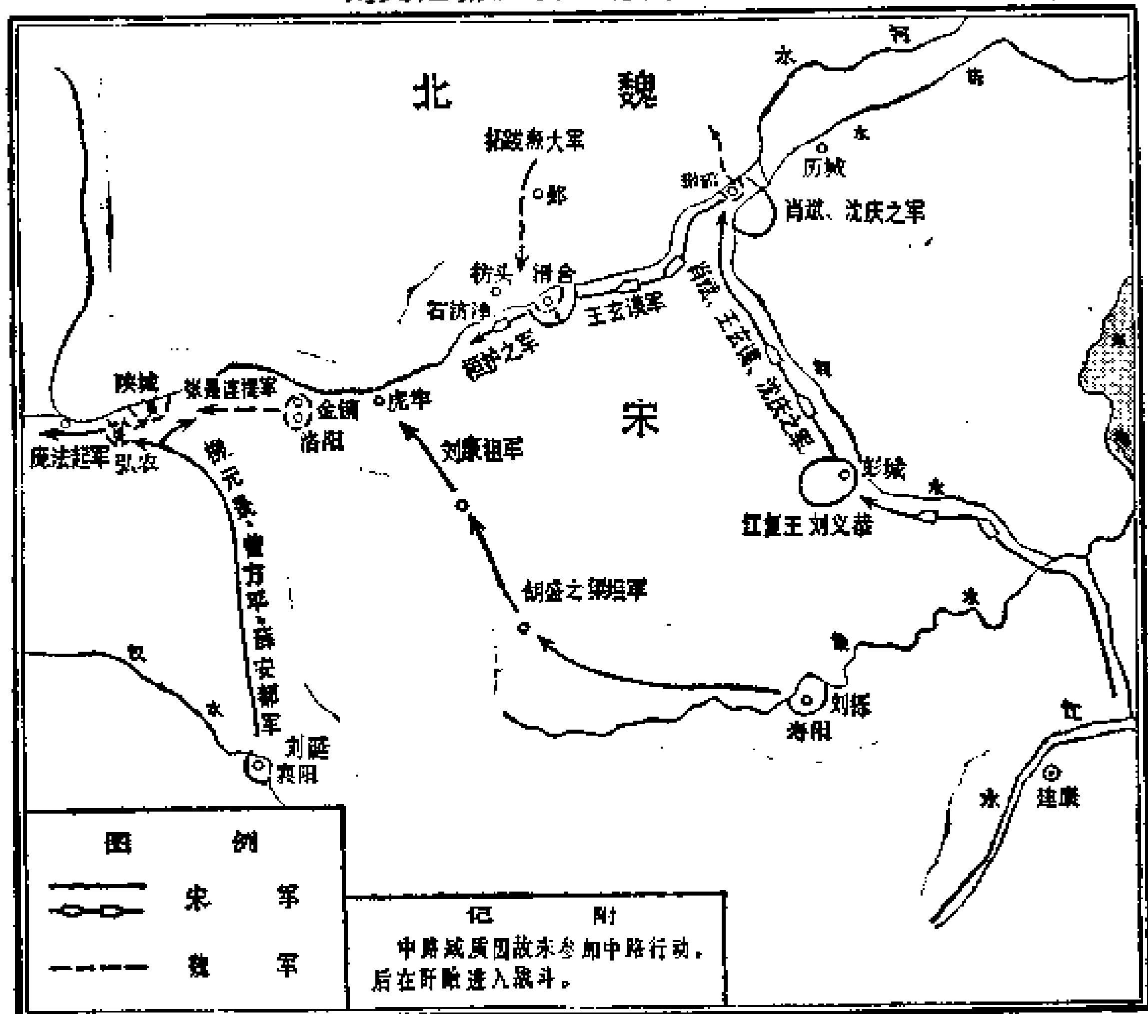
刘义隆被激怒，决心“伐魏”，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七月，下达进攻部署如下：（参看插图17-3）

——东路由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谘议参军申坦，水军经淮、泗入河，归青、冀二州刺史肖斌节制，进攻碻磝、滑石；徐、兖二州刺史武陵王刘骏率所部配合行动；

——中路由太子左卫率臧质、骁骑将军王方回率军直趋许昌、洛阳；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率所部配合行动；

——西路由雍州刺史随王刘诞率领，进攻弘农（今河南灵宝）；梁、南秦、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率兵袭扰汧（今陕西陇县南）、陇（今甘肃清水北），配合行动；

刘义隆第二次“北伐”示意图



——太尉、江夏王刘义恭进驻彭城为众军节度。

宋军的战略企图仍是收复河南，主突方向仍然在东。

中路臧质因故未参加进攻，后在彭城、盱眙方面加入战斗。

为动员人力物力，宋王公、大臣、妃主、牧守，下至富民，各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下令悉发青、冀、徐、豫、南兖、北兖等六州，三丁发一，五丁发二，令到十日内束装完毕；又下令向富家和僧尼借资以充军用。

二、北魏的对策

北魏群臣闻宋师“北伐”，多请魏主派兵救河南。拓跋焘却认为：

“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

山避之。国人本着羊皮袴，何用棉帛！展至十月，吾无忧矣。”[26]

直至九月，魏主才率军南下，令太子拓跋晃屯漠南以备柔然，下令发州郡兵五万分给各军。

三、宋军的行动

东路宋军在肖斌指挥下，申元吉攻碻磝，魏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走，宋军占碻磝。肖斌、沈庆之随即进屯碻磝，令王玄谟率军进围滑台。王玄谟派钟离（郡治在今安徽凤阳东北）太守垣护之率战船百艘为先锋，溯河而上，进占石济津（枋头南黄河渡口），自率军围攻滑台。

王玄谟士众甚盛，器械精良。河洛人民竞出租谷，带兵器来投军的日以千数。由于王玄谟“贪愎好杀”[27]，对前来投军的人民，不是从其中挑选人才，命其统率，而是将他们配给他所私昵的亲信，于是众心失望，以致攻滑台数月不下。

中路豫州刺史南平王刘铄派中兵参军胡盛之，梁坦由寿县出汝南（治上蔡，今河南汝南）进攻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魏荆州刺史鲁爽弃城北走。幢主（军有幢主，队主）王阳儿击破魏豫州（治虎牢）刺史仆兰所部，仆兰逃向虎牢。刘铄派安蛮司马刘康祖协同梁坦，进攻虎牢。

西路雍州刺史随王刘诞派中兵参军柳元景、振威将军尹显祖、奋武将军曾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起等率兵自襄阳北上，进攻弘农。宋军攻占弘农，俘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率部进攻陕城（今河南三门峡市），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率众二万自洛阳救陕，柳元景、曾方平、薛安都等部大破之，斩张是连提及将士三千人，俘二千人，宋军夺占陕城。庞法起率军攻占潼关，关中豪杰四起，与四山羌胡都来送款，形势对宋军甚为有利。

宋中、西两路，特别是西路进展顺利，只东路王玄谟顿兵滑台。

四、拓跋焘大举“南征”

九月，魏主亲率大军南下，号称百万。十月，至枋头，鞞鼓之声，震天动地。

围攻滑台的宋军闻魏军将到，请王玄谟“发车为营”[28]，王玄谟不

听，垣护之请加速强攻，以争取时间，不必再顾士卒伤亡、疲劳，王玄谟也不听。

魏军渡河，王玄谟大惧，仓皇逃走，也未通知垣护之的水军。魏军追击，宋军死者万余人，余众散亡略尽，丢弃的军资器械，堆积如山。

魏军以所获王玄谟的战舰连以三道铁锁，拦断黄河，断垣护之水军的归路。垣护之乘迅急的河水，从中流而下，以长斧断锁，魏军无法拦阻，垣护之全师退回，只损失一只船。

肖斌打算率主力固守碻磝，沈庆之认为："碻磝孤绝"，"青、冀虚弱"，不必"坐守穷城"。[29]正在这时，诏书至，不同意肖斌退军。肖斌召诸将商议，并表示应照办。沈庆之反对说："阃外之事，将军得以专之。诏从远来，不知事势。"[30]肖斌遂留王玄谟守碻磝，申坦、垣护之守清口（今山东梁山南，为清水南通泗水，北入黄河之口），自率诸军还历城。

拓跋焘在反击胜利的基础上，转入战略进攻，分兵五路，直插淮河一线：

——高凉王拓跋那自青州趋下邳（郡治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

——楚王拓跋建趋钟离；

——尚书长孙真趋马头（今安徽怀远南）；

——永昌王拓跋仁自洛阳趋寿阳；

——拓跋焘亲率主力自东平趋邹山（今山东邹县东南）。（参看插图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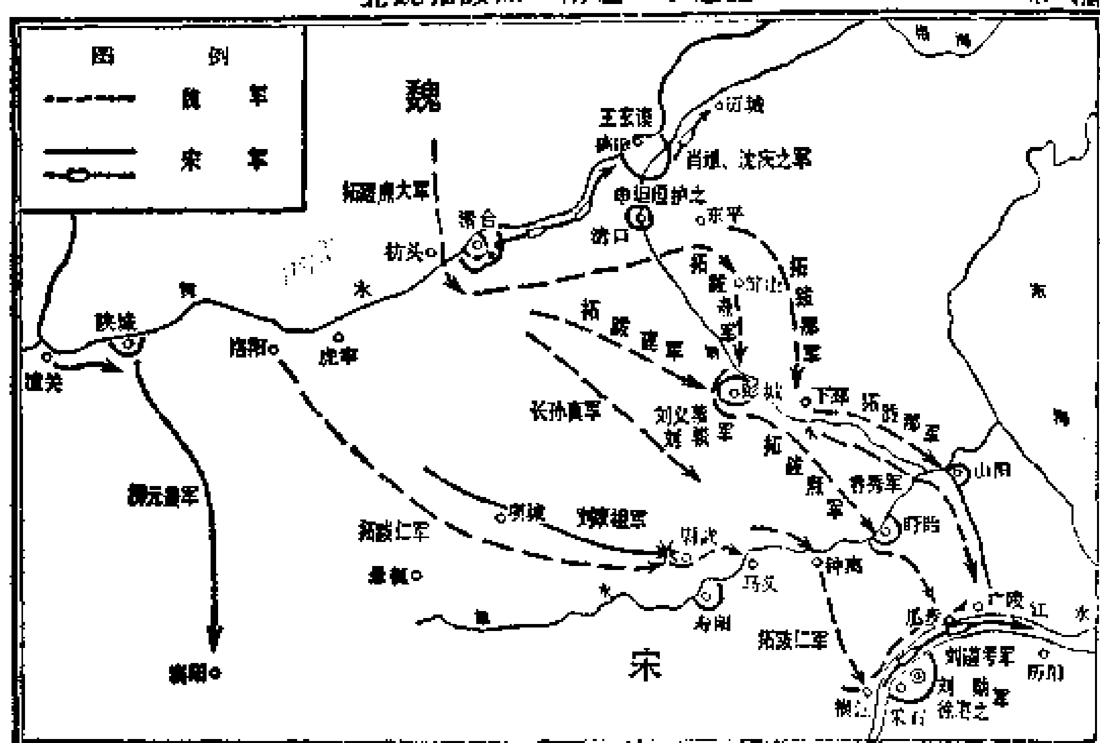
（一）魏军的行动

十一月初，拓跋焘率主力进至邹山。拓跋建进至彭城附近，宋江夏王刘义恭、武陵王刘骏守彭城，外围战斗各有胜负。

宋文帝以王玄谟败退，魏兵深入，西路柳元景等不宜独进，召还。柳元景率军返襄阳。诏以柳元景为襄阳太守。

魏永昌王拓跋仁率军自洛阳攻占悬瓠（今河南汝南）、项城（今河南沈丘）。

北魏拓跋焘"南征"示意图



宋文帝恐魏军攻寿阳，召安蛮司马刘康祖返回寿阳。刘康祖率八千人还至寿阳以北数十里的尉武（亭名）附近时，被魏永昌王拓跋仁率八万骑赶上。刘康祖结车为营沿大道而进，魏军四面进攻，宋将士皆死战，激战一天，杀死魏兵万余人。刘康祖身被十创，仍奋勇杀敌。魏军分三批轮番进攻，并乘日暮风急，负草烧宋营。刘军众寡不敌，刘康祖中流矢堕马而死，余众被魏兵掩杀殆尽。

南平王刘铄守寿阳，魏永昌王拓跋仁进逼寿阳，焚马头、钟离二郡。

魏主拓跋焘率军抵彭城，攻彭城不克。

十二月，魏主见各路魏军已达淮河一线，但彭城、寿阳未下。当即决心继续向纵深穿插，目标直指长江之滨，其部署如下：

——高凉王拓跋那出山阳（今江苏淮安）；

——中书郎鲁秀出广陵；

——永昌王拓跋仁出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

——魏主自率主力直趋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

十二月初三，魏诸军渡淮南下，进攻盱眙。宋太守沈璞以此城地当要冲，与辅国将军臧质奋力坚守。魏军攻之不克，以一部监视，主力绕城南下。宋城邑望风奔溃，所过无不残灭。

十二月十五日，魏主拓跋焘率军抵瓜步，其他各军亦到达长江北岸。

魏军在长江北岸，大肆破坏民房，割苇作筏，声言要过江攻建康。刘宋君臣大为震惊，建康内外戒严。宋文帝为阻止魏军渡江，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令丹阳（宋首都建康地区）地区征发所有丁壮，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军；命领军将军刘遵考率禁军把守各重要渡口，派水军沿江巡逻，从采石到暨阳（今江苏江阴东南）"陈舰到营，周亘江滨"，[31]形成东西六七百里的沿江防线；以太子刘劭统率水军，镇守石头（即石头城，今南京城西）；命丹阳尹徐湛之守石头仓城；吏部尚书江湛负责军事指挥。

此时魏军由于到处烧杀抢掠，激起江淮人民的强烈反抗，民众自动坚壁清野，逃避躲藏，使魏军"抄掠无所得，人马饥乏"。[32]魏军没有水军和渡江准备，前有天堑难越，后有坚城未下。拓跋焘无可奈何，于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公元451年）正月，掳民五万余家，撤军北归。经过盱眙时，魏军想攻城夺粮，遭到宋军坚决抵抗，死伤上万，攻城三十日不克。拓跋焘只好于二月停止攻城，继续北撤。魏军经过彭城时，因怕宋军追击，竟残杀一万多被俘民众，而镇守彭城的江夏王刘义恭却不敢挥军出击，使魏军得以安然北返。

（二）战后情况

这次南北战争，是继桓温"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之后的第四次南北大交锋。此后，直到南北朝结束，中间就不再有大的交锋了。

刘义隆死后，王室内部不断互相杀戮。公元479年都督中外诸军事、扬州牧萧道成代宋建齐，以后是萧衍代齐建梁，陈霸先代梁建陈，这几朝都只能力图自保，无力"北伐"了。

北朝自拓跋焘死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都有所发展。孝文帝拓跋宏继位后，有意识地采取步骤促使鲜卑族汉化，加速了封建化的进程。但同时也发展了鲜卑族的内部矛盾，发生了平城六镇士兵起义和各族人民的反魏起义，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以后高欢、宇文泰代替东、西魏建立了北齐和北周。北方复杂的矛盾和内部分裂，互相对立，也无力进攻南方。北周武帝宇文邕是较有作为的，又作了一些改革，公元577年他灭了北齐，使北方重归统一。中国大统一的时机也渐趋成熟了。

宋魏战争的特点

一、这次战争从过程看，刘义隆开始发动战略进攻，魏军处于战略防御；然后魏军反击，转入战略进攻。但实际上双方的战略企图都是进攻的，刘义隆想“经略中原”，拓跋焘要饮马长江，他给刘义隆的信中明白告知“来秋当往取扬州，大势已至，终不相纵。”[33]拓跋焘根本不是搞防御，只不过刘义隆先动了手，拓跋焘让了一步而已。所以实际上是一次战略性遭遇战，是一次南北方力量的迎头相撞，是一次南北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总较量。这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二、这次战争所以打成了战略遭遇战，是因为双方都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而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实际上，统一中国的时机尚未成熟，南北方力量大体上平衡，谁也没有条件吃掉对方。刘宋方面虽然获得了几十年休养生息的时间，出现了小康局面，但从东晋以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依然存在，王敦、桓温、桓玄、甚至刘义隆自己的父亲刘裕企图篡代的阴影始终威胁着刘义隆，使他唯恐大权旁落，不敢使用将才；不敢委托有才能的人去组建一支能起决定作用的军队；作战时“每命将出师，常授以成律，交战时日，亦待中诏，是以将帅趑趄，莫敢自决”。[34]所以，刘宋虽有一定政治、经济条件，但想以之“经略中原”是不够的，特别在军事力量上是比魏弱的，但刘义隆恰恰看不到这一点。

拓跋焘有几十万强悍的骑兵，军事上确占优势，但也有重大的缺

陷，即骑兵不适合在南方江河地区作战，没有水军，没有在短期内攻克坚城的能力。在经济上，许多地方还没有恢复、还谈不上发展。政治上虽已开始了封建化进程，但民族矛盾还远远没有解决。特别是拓跋焘继位以来，连年征战，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已搞得兵疲民困。更重要的是拓跋焘所进行的战争仍带有很大的掳掠性，必然遭到江淮人民的坚决反抗。拓跋焘也同样的只看到自己的长处——铁骑，而看不到自己的短处。

这次战争，刘宋当然失败了，从此“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35]北魏虽然突进到了长江之滨，但由于魏军烧杀虏掠，江淮人民“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余”。[36]遭到人民坚决反对，弄得“抄掠无所得，人马饥乏”，而不得不仓皇北撤，而“魏之士马死伤亦过半”。[37]所以，拓跋焘也没有胜利。明年，拓跋焘被中常侍宗爱杀死，宗爱专制朝政，魏廷也陷入在内部矛盾之中。

三、从战略上看，刘义隆的进攻计划和部署，主要部分和第一次“北伐”相同，西翼增加了一路，由襄阳出弘农。进攻开始时间比第一次晚了四个月，当时左军将军刘康祖曾提出“岁月已晚，请待明年”，[38]但刘义隆不同意。第一次是没有完成防御准备，遭到了魏军的反击，第二次是进攻尚未完成，滑台久攻不下就遭到魏军反击。不仅没有接受第一次的教训，反而显得更为狼狈。

宋军的战略指导

下面对魏军渡河南下以后宋军的战略指导作一些研究。

宋军西路柳元景、薛安都、庞法起等将打得很好，攻占了弘农、陕城和潼关，并击破了魏洛州刺史张是连提二万人从洛阳来的反击，关中豪杰四起，形势十分有利。但王玄谟败退后，宋主立即召柳元景等返襄阳，这一指导是错误的。柳元景等不仅不应撤退，应该站稳脚步，东取洛阳，以威胁魏军的退路，牵制魏军的南进，起码魏永昌王拓跋仁那一路就无法南攻寿阳，可以大大灭杀魏军南下的气势。

魏军主力由枋头过河，直插彭城。宋军主力除王玄谟一军在滑台被击溃外，胄斌、沈庆之，垣护之等宋军都完整无损的被隔在青、兖地区。沈、垣所部战斗力都较强，但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有起任何作用，这是极为可惜的。这是宋军的主力兵团，背靠青、兖、东海，并未受到威胁，如果与西线柳元景等部配合起来，侧击南下的魏军，威胁魏军的退路，战局就可能完全改观。

再看魏军渡淮后，彭城、寿阳、盱眙、山阳（今江苏淮安）仍在宋军手里。宋军主帅江夏王刘义恭坐镇彭城，南平王刘铄尚在寿阳，他们掌握的军队都未受到损失。这四城成四边形，距离都不甚远，如果积极出击，互相配合，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阻截地区。

上述三个宋军兵团连系起来看，宋军被歼的并不多，见之于史料的，主要是王玄谟的一二万人和陈康祖的八千人。如果这三个兵团精神上能不被魏军铁骑所压倒，能积极主动的采取行动，中原人民必将起而配合，他们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可能牵制住或至少大大缩小魏军的攻势，以保障江淮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魏军疲困缺粮而北撤时，扼南北交通要道的彭城、寿阳、盱眙、山阳等四城宋军截击魏军于前，柳元景等西线宋军据陕、洛东出虎牢；胄斌、沈庆之等东线宋军从青、兖西出枋头、滑台，以切断魏军的退路，那样，宋军将不是失败而可能是胜利了。

上述三个宋军兵团所以未能起到作用，主要是由于宋文帝缺乏战略头脑，只看到长江对岸气势汹汹的魏军铁骑和自己的皇帝宝座，对前线将帅"成律"太多，卡得过死；前线将帅被魏军铁骑所吓倒，只顾保全自己，不敢主动积极行动。

魏军的战略指导

拓跋焘及时反击，针对宋军广正面推进的情况，主力从中央（枋头）突破，撕开宋军的部署，直插彭城，以及及时地发展为战略进攻，指导上都是成功的。

拓跋焘是第一个饮马长江的少数民族统帅，他战略战术的特点是

大胆向纵深穿插，以往的战争史中还没有出现过这样不顾坚城在后，向深远纵深大胆穿插的战法。这种战法使刘义隆不知所措。

拓跋焘在战略上也有两个最大的弱点

一个是没有歼灭战思想。他的战略、战役企图都是攻城、略地。他没有歼灭宋军的计划，实施中也只歼灭了少数宋军，宋军的大部分是自己溃散的。在他的部署和行动中，都只有分进而没有合击，只有穿插而没有包围。这是拓跋焘发动战争的目的所决定的。在他的目的中，掠夺占有很大的比重。攻城、略地都是为了掠夺。拓跋嗣曾就先攻城还是先掠地召集公卿讨论过一次，崔浩主张先掠地，“列置守宰，收敛租谷”[39]。但鲜卑将帅奚斤、公孙表等都坚持应先攻城，拓跋嗣最后也同意先攻城。城市是财富的集中地，掠夺的首要目标是攻城。

第二个弱点是存在奴隶制战争的残余。魏军“不赍粮用，唯以抄掠为资”[40]，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所过无不残灭”，“其中幸者，不过躯还北国作奴婢耳。”[41]因此，遭到广大人民的坚决反抗。魏军进攻，还以汉人和鲜卑以外的少数民族人民打头阵，“虏驱民使战，后出者灭族，以骑蹙（踢、踩）步，未战先死”[42]。拓跋焘攻盱眙时，写信给守将臧质说：“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若杀，无所不利。”[43]这是奴隶主的思想意识，只能加深民族矛盾并激起人民的反抗。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对历史发展的作用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大分裂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北方有过石勒、苻坚，拓跋焘、宇文邕四次统一北方的战争。南北方之间有过较大的四次交锋：桓温“北伐”，淝水之战，刘裕“北伐”和刘义隆“北伐”及拓跋焘“南征”。北方的四次统一和南北的四次交锋，对民族的大融合、大团结，都起着重大的作用，特别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四次大分合，对中国的大统一起着促进作用。

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进入黄河流域，建立国家，最多时达十六国

之多。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长期存在，易于激化，因而战争十分频繁，从而导致不断地产生分裂、割据、兼并和统一。但是在这不断的战争进程中，由于各族人民的斗争，以及统治集团中的有胆识、有见地的人物（如各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与汉族知识分子的结合），他们在战略上的着眼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本身。因而，在战争混乱或相对稳定的间隙中，使得社会进展——特别是各民族在大团结、大融合上，以及生产发展上，有着不同程度的进展。两晋、南北朝（特别是在北方的几次统一战争中）的战争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存在时间长短不一，起落快、变化快。其原因就是他们都处在不断的战争进程中，战争亦促进了他们的发展。如公元439年北魏拓跋氏统一北方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比之前期都有着显著的效果。这也就完全可以肯定：我国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的战争历史发展进程中，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也可以说这是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民族大团结，大融合，共同提高的一个鲜明的历史时期。

在南方，东晋依靠南北大士族的支持建立了政权，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长期严重存在，曾出现过夺权战争；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王室和高门士族日益腐朽，普遍存在着偏安一隅和享乐腐化的倾向；能用于对付北方的军事力量经常受到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抑制；只能偏安江左无力问鼎中原，徒使后代诗人发出"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的浩叹。到隋文帝杨坚建国，才完成中国大统一的历史任务。"从今四海为一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了。

注 释

〔1〕《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四年》

〔2〕《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六年》

〔3〕《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4〕《资治通鉴·宋武帝永初三年》

〔5〕《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

〔6〕《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年》

〔7〕统万城为夏主赫连勃勃征集夷、夏十万人所筑，城高十仞（东汉末年，一仞五尺

六寸)，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蒸土筑城，甚坚，锥不能入，如锥入一寸，即杀作者。

〔8〕〔9〕《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四年》

〔10〕〔11〕〔12〕《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六年》

〔13〕《宋史·良吏传序》

〔14〕《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五年》

〔15〕〔16〕〔17〕〔18〕〔19〕《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七年》

〔20〕〔21〕《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

〔22〕〔24〕〔25〕《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23〕《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

〔26〕《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27〕〔28〕〔29〕〔30〕〔31〕〔32〕〔33〕《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34〕〔35〕〔36〕〔37〕《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38〕《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39〕《资治通鉴·宋武帝永初三年》

〔40〕〔41〕〔42〕《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43〕《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两晋南北朝时期战略运用的特点和发展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大分裂时期，也是民族大融合时期。这时期频繁的战争尽管有某些特点。但战略运用上创意少、变革微、试论述如下：

一、许多次战争缺乏深谋远虑的战略指导

（一）晋武帝大封同姓王，导致“八王之乱”，十六年间，战乱不已）使社会经济遭严重破坏，逼迫各地流民和内迁的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反晋，造成大分裂大破坏的局面，但这些战争等于群鼠斗于穴中、没有什么指挥艺术可言。

（二）内迁各少数民族纷纷进入黄河流域建立国家，先后达十六国之多，但存在的时间一般都较短，起落速，分合快；民族矛盾和民族内部矛盾长期存在，易于激化；各国的军队多是各民族、各部族军队的杂合体，组织训练的程度都较低，所以战争频繁、国家和军队的稳定性都低，战争持续的时间比起秦汉、三国时期的战争来一般较短，指挥艺术也较低。骑兵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兵种，还缺乏攻城能力。

（三）西晋灭亡之后，司马睿在江南依靠北方、南方士族的支持重建了政权，因此，统治阶级内部长期存在矛盾，东晋及其以后的宋、齐、梁、陈都时刻戒备着掌握军政大权的大士族的篡夺；随着王室和高门士族的日益腐朽，普遍存在着安于现状与享乐腐化的倾向；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能够用于对付北方的军事力量受到很大抑制与抵销，因此在整个东晋南北朝时期都未能形成能够统一北方的力量；祖逖和刘裕北伐，虽然一时形势颇好，都因缺乏远略和内部矛盾未能发生较大的作用。

（四）南北交锋，规模较大的共有四次；北方统一时，力量超过南方，曾有过苻坚和拓拔焘两次“南征”，前者淝水战败，主要由于军

队庞杂、战略运用拙劣。后者的南征恰好与宋文帝刘义隆的"北伐"迎头相撞，形成历史上罕见的"战略遭遇战"。然拓拔焘有强大的骑兵，可以长驱进出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瓜埠)，但无法克服长江天堑、且不能攻克进军路线上宋军坚守的城邑，后方受到威胁，也只饮马长江，无功而还。次年，拓拔焘被宦官杀死，北优于南的形势也随之消失。当北方分裂时，力量就低于南方，曾有过桓温和刘裕两次规模较大的"北伐"，但由于东晋内部矛盾的牵制和力量不够，都未能成功。

二、战略战术运用上的一些发展

(一)前后赵洛阳之战，刘曜列阵于洛西，南北长达十余里，石勒利用洛阳城为掩蔽，从城北和城中荫蔽接敌，不经过列阵，直接从行进间进入战斗，集中主力突然冲击刘曜的中军，歼敌五万，擒获刘曜，灭了前赵，使北方基本上归于统一。石勒这种不经列阵，利用地形隐蔽接敌，从行进间进入战斗的战术和集中主力于主突方向的战役都是前所未见的，可能来源于骑兵的突然袭击。这比先列阵然后再突击的战术提高了一步。

(二)秦、晋淝水之战，晋军在众寡悬殊的条件下，以战役进攻完成了战略防御的任务，是一次特殊的战例。这次训练有素的北府兵发生了较大作用，也有赖于前线将领谢石、谢玄等准确的情况判断和当机立断的指挥艺术。

(三)北魏拓拔焘在三面受敌的内线作战中，成功地进行了各种击破：公元427年以诱敌出城的战法大破夏赫连昌，夺占夏都坚城统万(今陕西横山西)；公元429年，拓拔焘亲自率军深入漠北，大破柔然；公元430年，宋刘义隆派到彦之率军"北伐"，魏主拓拔焘为避开夏潦季节，放弃河南四镇(金墉、虎牢、滑台、碻磝)，收众北渡。八月夏赫连定约宋"合兵灭魏"，拓拔焘在宋军已到黄河一线的情况下，亲率军西击夏，再次大破夏军。十月，河北魏军渡河南下，大败宋军，击败了宋军的"北伐"。这是南北朝战争中，最成功的一次战役指导。

(四)在抗骑兵突击方面，车兵重新出现，军队由步骑水车组

成。公元279年西晋马隆以"扁箱车、鹿角车营"(《唐李问对》)通过狭窄山路，破凉州鲜卑树机能。鹿角车是抗击骑兵的移动障碍物。公元409年晋刘裕击南燕，自下邳经琅琊步行北进，为防燕骑袭击，"所过皆筑城，留兵守之"，出大岘入平地后"以车四千乘为左右翼，方轨徐进"，并以奇兵"潜师出燕兵后"，大破燕军，灭南燕。公元417年晋刘裕"北伐"，水师沿黄河西进，北魏军在北岸沿河威胁，刘裕创"却月阵"在北岸占领滩头阵地，抵抗敌骑兵突击，从而掩护水师强行通过黄河，进入关中。

(五)东晋及南朝军队北进时，由于作战的人数多，途程远，需要大批粮食和作战器材，因此辎重、车辆大量增加，行军保障变得异常复杂，大军不得不沿水路而进。桓温第一、二次"北伐"沿汉水进军，第三次"北伐"沿淮、泗，开渠野泽，引汶水会清水，由清水入黄河，北击燕，后败归。刘裕第一次北击南燕也沿淮、泗至下邳，再徒步北进。刘裕第二次"北伐"，西击后秦，他所率的主力仍须沿淮、泗，开渠野泽入黄河，再折而向西，沿河西进。这些都说明：东晋和南朝，发挥所长，不仅以水师抗击北方的骑兵，也利用水师"北伐"。

中国军事史

第二卷 兵略（下）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编

陶文焕 韦镇福 石声璧 田昭林
冯祖海 许耀钧 何寿全 迟宝钺
杨伯时 陈寿颐 赵秀昆 倪定逸
梁明泉 执笔

董 珍 审校

解放军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北京

中 国 军 事 史

第二卷　兵略（下）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沈阳七二一二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8.875印张 743千字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沈阳）第1次印刷
印数1——10 000
ISBN 7-5065-0191-0/E·122
定价：8.90元

目　录

第四篇　隋唐五代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第十八章　隋统一中国的战争

第一　隋王朝的兴起

南北朝后期，北方最后一个朝代是鲜卑族宇文氏建立的北周。北周末年，社会危机加深，统治很不稳固，及至周宣帝即位，荒淫暴虐，国势更危。周静帝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宣帝病死，静帝宇文阐年仅七八岁，大臣郑译、刘昉等人乘机假借皇帝意旨，命杨坚入朝总政，委以“总知中外兵马事”。杨坚自此在李穆、高颎（jiǒng）、李德林等人的支持下，掌握了军政大权。杨坚之父杨忠原从北周太祖宇文泰起兵，立有战功，为当时十二大将军之一。杨坚袭爵隋国公，娶鲜卑贵族独孤氏为妻，长女为周宣帝之后。因而，杨坚是门第显赫，位高望重，手握大权的关陇集团（宇文泰在西魏时揉合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所形成的军事官僚贵族集团）上层成员。

杨坚一开始执政，就“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而自己“躬履节俭”。〔1〕他原即为关陇高门，和鲜卑贵族关系密切，同时又重用山东士人高颎、李德林等，因而他在地主阶级内部得到了较为广泛的支持，在朝的官吏争着向他表示好意。但杨坚企图篡代周室的行动并非一帆风顺，也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大象二年六月，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举兵反对杨坚，郧州

（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今四川）总管王谦等先后举兵响应。这些人都是北周官僚贵族，不甘心政权落于杨坚之手，各有自己的打算。由于他们起兵是打着保护王室的旗号，因而“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2〕一时形势颇为紧张。杨坚一方面搞好与南方陈朝的关系，一方面派宗人杨希尚率宗兵守住战略要地潼关，然后派韦孝宽、王谊、梁睿分别率军去镇压尉迟迥等军。由于杨坚处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得到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在军事上他又及时将有实力的北周宗室诸王召到长安，避免他们和尉迟迥联合行动，且得到握有精兵的并州（今山西）李穆的支持，减去了后顾之忧，所以出兵不久，就大获全胜。叛乱平定之后，杨坚开始杀周室诸王，为自己篡代周室铺平道路。周静帝大定一年（公元581年）二月，杨坚借“受禅”为名，废周静帝而自立，改国号为隋。隋王朝建立后，进而北降突厥，南灭陈国，继秦汉第一次全国大统一之后，结束了南北朝几百年的分裂局面，完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全国大统一。杨坚称帝之后，接受前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有所改革。因此隋虽然立国不到四十年，但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是我国历史发展上一个承先启后的时代。杨坚死后，隋炀帝杨广继位。他穷奢极欲，好大喜功，三次入侵高丽，兵役、徭役严重，致人民无以为生，激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隋朝政权在很短时间内就被摧毁了。

隋王朝所以能顺利结束南北朝几百年分裂局面而兴，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隋建国后，统一中国的条件已渐趋成熟。首先，南北朝后期，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推动之下，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门阀地主被大大地削弱，山东士族丧失了割据一方的政治、经济势力；南朝士族也更加衰败。而士族地主的存在和发展，是造成近四百年分裂割据的主要因素。其次，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进行民族斗争的同时，各族人民之间由于长期的交往，民族融合的进程随之

加快，特别是南北朝后期，这种融合更加显著。大量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相融合，使得造成四百年分裂的另一重要因素——民族矛盾也大为减轻。

另外，南北朝时期，南北农业经济都有了相当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进步，增强了南北经济交流。人为的南北分裂所造成的南北人民的交往障碍，不符合人民的愿望，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这种分裂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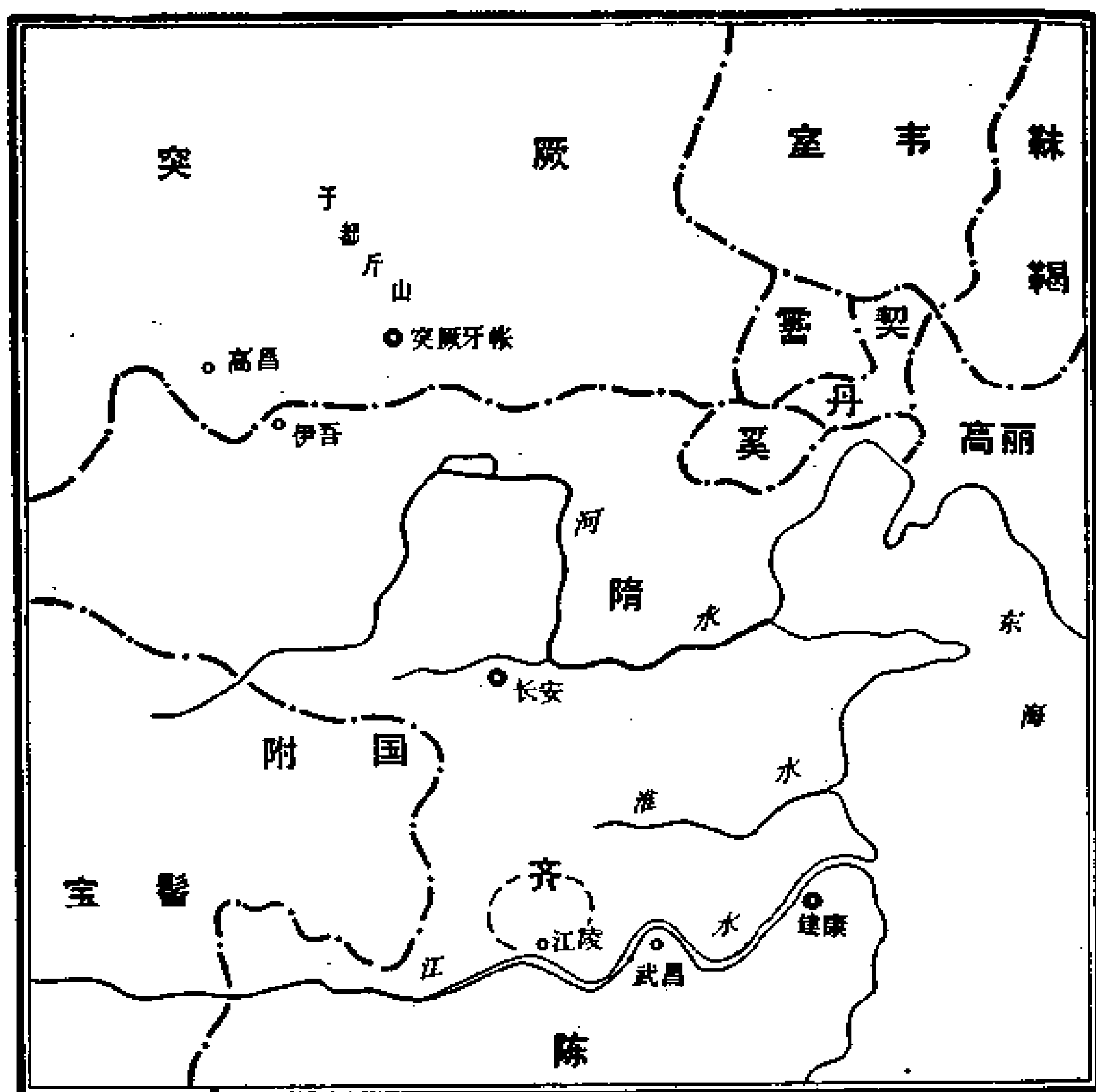
以上说明，结束分裂割据局面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是隋王朝顺应时势得以兴起、统一全国的客观条件。杨坚建立隋王朝后，接受前朝灭亡的教训，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有所改进。他在政治上完善吏制，政府官吏都由中央任免，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以减少层次，便于掌握；选用一批有能力的官吏和将帅，提高军政机构的效能；废除一些酷刑峻法，并取消了强迫改姓等作法，以缓和阶级矛盾及民族矛盾。在经济上，他采取了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如颁布均田和租调的新办法，把荒芜的土地拨给农民耕种；把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服役期限由一个月减为二十天；减轻赋税、徭役，兴修水利等等，而且在各地设仓储粮，以备战、备荒。在军事上，他改进北周以来的府兵制，将军权集中于皇帝，增强了军事力量。凡此，都说明杨坚为了隋的兴起和统一全国，的确做了一些主观努力。但隋王朝得以顺利统一全国，使隋王朝迅速兴起，其中一个直接因素，还在于战略运用的得宜。

第二　杨坚先破突厥、后灭陈国的统一战略

隋继承北周建国之初，疆域只有今长江以北、长城以南，东抵海、西至四川的地区，共有县千余，人口八百三十余万户。杨坚建国后，虽有统一全国之志，但面对北方的突厥和南方的陈国两大对手（在江陵残存的后梁政权，是北周卵翼下的政权，民少

兵弱，不足为虑），应该如何用兵，颇费踌躇。

隋初一般形势示意图 （18-1图）



突厥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北方逐水草而居的一个游牧民族，是匈奴的别支，兴起于北魏末年。到北齐、北周时，已很强大，占有今长城以北，贝加尔湖以南、兴安岭以西、黑海以东的辽阔地区；拥有骑兵数十万。北齐、北周时期两国相互火并，争对突厥和亲，输纳金币，以乞求暂时安宁，使得突厥更加嚣张。当时的突厥主佗钵可汗曾对部下说："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常孝顺，何患贫也！"[3]杨坚建立隋朝后，想改变这种状态，停

止向突厥输纳金币，因而突厥不时侵扰隋的边境。突厥的强盛，开始于六世纪中叶，其首领土门领导时期，它的社会经济日趋发达，并长于制造铁器，武器有弓、矢、鸣镝、甲、矟、刀、剑等。牲畜的产量也很多，故与北朝交往时，动即献马数万匹。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制度也随之逐步建立。

隋代周之后，在南方还存在着两个政权。一是建都在江陵的后梁，皇帝为肖琮，号令不出都门。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废梁帝，后梁灭亡。另一个是陈朝，拥有今长江以南、三峡以东、东南抵海的广大地区。自西晋末年以来，北方人大量南迁，与南方土著人民共同努力，使陈朝经济上有较大的发展，具备一定实力。但陈朝在末代皇帝陈叔宝统治下，政治极为腐朽。陈叔宝本人荒于酒色，不问政事；国内税赋苛繁，刑法酷暴，城市萧条，农村衰败，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集团内部上下猜忌，相互攻讦，且贪污成风，造成“主昏于上，民讟(怨恨)于下”〔4〕的状况；军事上兵力虽众，但将骄卒惰，举国上下，都以为有长江天堑可恃，失去对北朝的戒备。

上述情况表明，对隋朝统一大业的最大阻力显然是突厥；陈国不构成对隋的威胁，主昏兵弱，易于攻取。隋朝当时处在战略内线，面对一强一弱两敌。为了统一全国，杨坚曾有过先弱后强，先平定江南，然后集中力量战胜突厥的考虑。为此，建国以后，杨坚即以杨广为并州总管，坐镇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贺若弼为吴州总管，坐镇广陵（今江苏杨州市）；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坐镇庐州（今安徽合肥市）。这一战略部署，一为巩固内部，防备突厥；一为预作准备，便于进军江南。隋开皇元年（公元581年），杨坚命高颎统率诸军伐陈。正行动间，突厥联合原北齐营州（治和龙，今辽宁朝阳）刺史高宝宁，攻陷隋的临榆关（今山海关），准备大举南侵。杨坚意识到强敌在北，如不先解除后顾之忧，不仅不能统一全国，且有失去根本的可能。其时，恰值陈宣帝病死，遂借“礼不伐丧”之名，收南下之兵，并确定

了先击突厥、后灭陈国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的改变，说明杨坚战略运用的灵活和果断，也比较切合实际。突厥为北朝历代边患，其根据地在广漠无涯的北方，且仗恃强大的骑兵，行动迅骤，飘忽无常，有机可乘，就入袭掳掠，如遇强敌，则奔驰远去，避免决战，因此很难应付。如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陈国虽力弱国朽，易于征灭，但江南地区辽阔，回旋余地大，一旦用兵，非短时间可以解决，反有为突厥所乘而动摇国本的可能。如南北同时用兵，当时隋朝建立不久，国力、军力都不充实，国内尚不十分安定，且此种两个拳头同时打人的用兵方法，历来为兵家所忌，更何况陈对隋的威胁也不大。所以杨坚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先北击突厥，除去主要威胁，然后稳步进军江南，以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是稳健而切合实际的，使胜利有了可靠的基础。以后战争的结局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　隋对突厥以瓦解，削弱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战略运用

杨坚决心先击突厥、后灭陈国，但在战略运用上考虑建国未久，有待巩固，大规模用兵实施全面进攻，还要经过长期准备。适突厥佗钵可汗病死，其内部争权夺利。佗钵之子菴罗被迫让位，佗钵之侄摄图为首领，即沙钵略可汗，建牙帐于都斤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沙钵略封庵罗于独洛水（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土拉河）流域，称为第二可汗；封从兄大逻便（佗钵兄木杆可汗之子）于阿尔泰山之东，称为阿波可汗；封从叔玷厥（佗钵堂弟）于乌孙（今伊犁河上游）故地，称为达头可汗。他们都各拥部众，与沙钵略存有矛盾，因而貌合而神离。沙钵略之弟处罗侯管辖东部奚、霫、契丹地区，初先为得封可汗，与沙钵略也不和睦。在这种情势下，曾经出使突厥，深知突厥内部矛盾

情况的长孙晟上书杨坚，陈述对付突厥之策说：

"今诸夏（指国内）虽安，戎虏（指突厥）尚梗，兴师

的袭扰，敌忾同仇，士气甚盛。突厥经隋朝的分化、瓦解，实力有所削弱。杨坚遂决心利用有利形势，全面向突厥进攻。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杨坚以杨爽为行军元帅，七路出兵，其战略部署如下：

——命秦州总管窦荣定出凉州（今甘肃武威）；

——命河间王杨弘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

——命夏州总管豆卢勣出夏州（今陕西横山西）；

——命卫王杨爽出朔州（今山西朔县）；

——命幽州总管阴寿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一带）；

——命内史监虞庆则出原州（今宁夏固原）；

——命左仆射高颎出宁州（今甘肃宁县）。

上述部署企图在河套地区集中杨爽、杨弘、豆卢勣等路，形成主力打击沙钵略，各以一部打击东西两侧的高宝宁、阿波。

同年夏，东路阴寿率军出卢龙塞，向和龙进攻，高宝宁弃城奔契丹，为部下所杀，隋军占领和龙地区。

中路杨爽率军出朔州，正遇沙钵略率军南下，两军相遇于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杨爽派总管李充率精骑五千袭其无备，大破之，沙钵略弃金甲，潜伏草中逃生。其众无粮，加以疾疫，死者甚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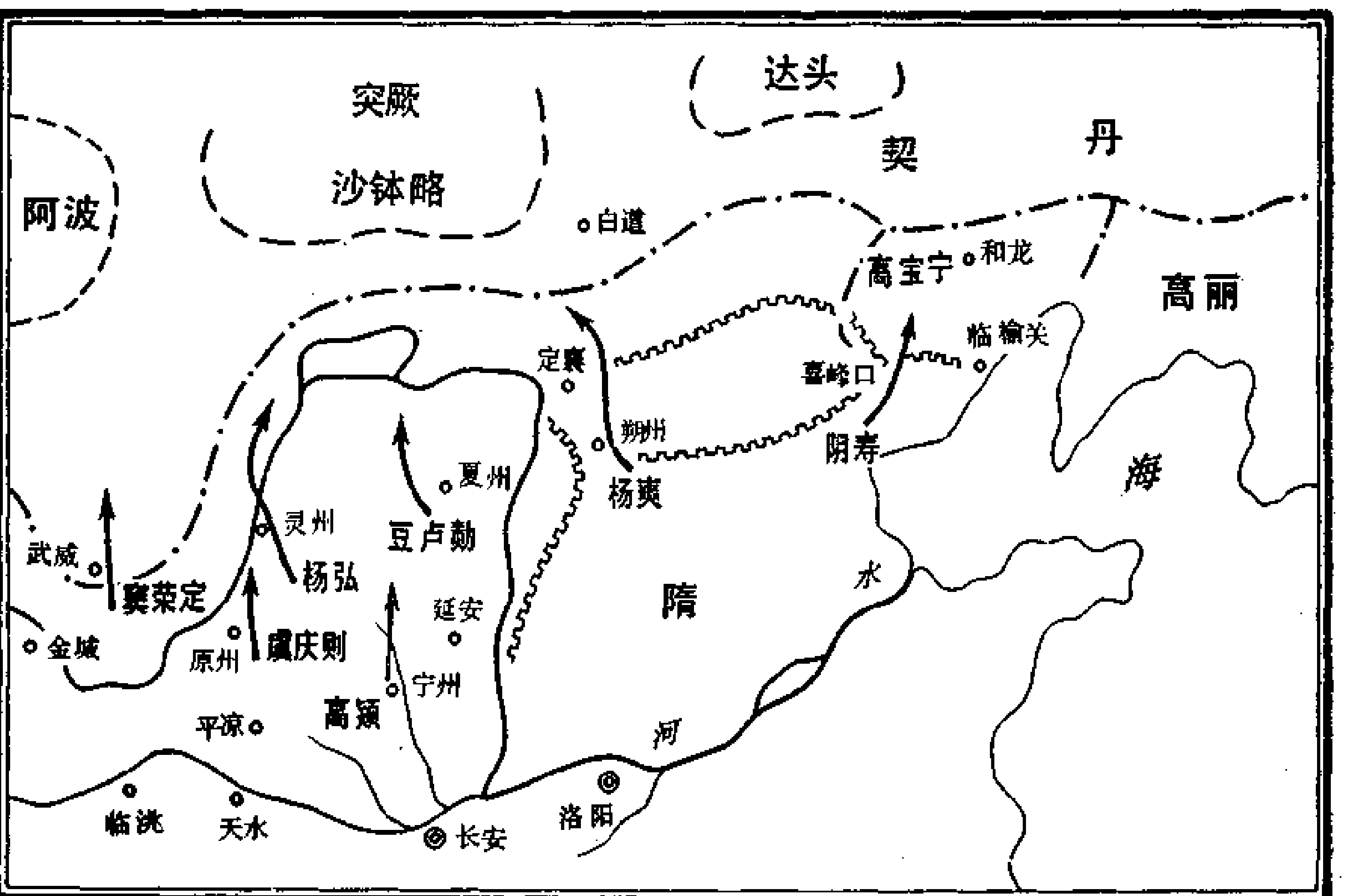
杨弘率军出灵州，击破沙钵略另一部，歼敌数千人。

西路窦荣定率军出凉州，在高越原（今甘肃武威西北）屡败阿波军。

此次隋军出击，重创了沙钵略军，使突厥内部矛盾更为严重。隋继续施展"离强合弱"的谋略，终于导致突厥连年内部攻杀。

长孙晟在窦荣定军中，乘阿波数败，说阿波降隋，联合达头，共抗沙钵略。阿波果遣使随长孙晟入朝。沙钵略恨阿波降隋，袭其牙帐，杀阿波之母。阿波西奔，联合达头，率军还攻沙钵略，屡破之。双方连兵不已，各遣使至长安请和求援，杨坚一概

隋击突厥的战略部署示意图　　(18-2图)



不允。

隋开皇四年（公元584年），达头可汗请降于隋。明年，沙钵略为达头所困，又怕契丹袭其后方，向杨坚求援，并请求率部寄居漠南白道川（今蒙古呼和浩特北）。杨坚准其所请，并派杨广往援，击败阿波军。同年秋沙钵略也向隋投降，请“永为藩附”。至此，隋北方的威胁暂时消除。

杨坚根据突厥族的游牧特性和隋国力、军力的情况，对突厥采用以瓦解、削弱为主，军事手段为辅的战略是灵活而成功的，费力小而收效大，获得了仅靠军事手段所难以收到的效果。在整个对突厥斗争过程中，隋始终贯彻离强合弱，远交近攻的战略，以孤立沙钵略。在突厥被削弱之后，继之以军事行动，分兵多路出击，但打击目标，仍主要集中在沙钵略。在军事行动开始以后，继续运用分化瓦解策略，使其自相攻杀，收到了事半功倍之效。汉武帝曾北击匈奴，用兵数十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此时的突厥虽也很强大，但隋立国不久却制服了它，为统一全国创造了条件，应该说，长孙晟的战略建议实居首功。杨坚在战略方针既定之后，能始终坚持，并灵活运用，对取得胜利也至关重要。如当各突厥可汗互相攻杀，都谋求与隋和好，企图加强自己地位的时候，杨坚一概不允所请，以促使其矛盾进一步深化，力量进一步削弱。又如阿波归附后，其势力超过沙钵略时，杨坚转而命杨广助沙钵略击败阿波军，其目的是不愿见阿波更强，使沙钵略能与其并存，互相制约，但又都必须依赖隋的支持，以此来控制突厥，消灭边患。

突厥之败，原因很明显。它貌虽强大，但内部矛盾重重，为隋所利用。隋的离间、瓦解，使突厥力量分散、削弱，其中损失于自相攻杀者多，损失于被隋军击溃者少。最后势散力分，各部不得不降隋以自保。又突厥以掠掳为生，多次侵扰，所到之处，对人民祸害极重，造成各族人民愤恨突厥，支持政府对突厥的斗争，军民士气旺盛，也是突厥失败的重要原因。

第四　隋灭陈长期准备、多路并进、一举袭取的战略方针

杨坚在建立隋王朝之后，就有灭陈以统一全国的决心和行动，只因突厥威胁后方，不得不改变计划，先击服突厥，然后再用兵江南。所以击服突厥也是灭陈长期准备中的重要环节。另外，灭陈需渡江作战，如无水战工具和水军训练，兴兵后必然费时、费力。因此早在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杨坚即派杨素为信州（今四川奉节）总管，准备舟师。杨素在该地制作大舰，名曰"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余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高五十尺，可容战卒八百人；较小的船还有"黄龙""平乘""舴艋"等等，可容战卒百人以下。除军事和物质上的准备外，高颎向杨坚建议：

> "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复更烧之，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7〕

这是一个多方误敌，使敌麻痹、困疲的策略，既破坏陈国的经济，又麻痹陈国军民，为隋顺利进军准备了条件。杨坚还有意令杨素将制作木船的废料，顺流漂下，以威吓陈人，瓦解其军心民气。隋沿江戍军，也多采用麻痹陈军的策略。如每次换防，都遍野大列旗帜、帐幕，并令军队沿江射猎，人马喧哗，作出要渡江的模样，等陈军调兵遣将准备防守的时候，隋军就收兵，如此反复多次，陈军习以为常，遂不惊、不备，为以后袭取创造了条件。隋将贺若弼将军中老马卖到江南，买回船只，将其中好的藏

之内湾，坏的陈之江上，使陈军误以为隋军缺船，难以渡江，因而不备。杨坚还多次派间谍潜入陈境，破坏陈的物资，扰乱陈的人心。这种多方面破坏、疲敌、误敌的策略行之数年，造成了陈国经济穷困，使其军心瓦解，作战无备。可见杨坚长期准备的战略，是把弱敌当强敌打，以周密的准备周来力争主动，是“先胜后战”的战略运用。

隋文帝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臣争献平陈之策，崔仲方建议说：

“今唯须武昌以下，蕲（今湖北蕲春）。和（今安徽和县）、滁（今安徽滁县）、方（今江苏六合）、吴（今江苏扬州）、海（今江苏连云港市）等州，更帖（部署）精兵，密营度计；益（今四川成都）、信、襄（今湖北襄阳）、荆（今湖北江陵）、基（今湖北钟祥南）、郢（今湖北钟祥）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流头、荆门、延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湓城（均长江上中游要隘）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诸军鼓行以前。彼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非恩不能自立矣。”〔8〕

这是多路并进而置重点于长江中下游的战略部署方案，适合长江地理形势和陈军备多力分的特点。隋文帝开皇八年（公元588年），杨坚认为统一江南的时机已至，又用先声后实之策，揭发陈叔宝罪状二十条，抄发三十万张散布于江南。同年十月，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安徽寿县），以杨广为行台尚书令，高颎为长史，统御灭陈军事；以杨广、杨素、杨俊并为行军元帅，兵分八路击陈：

——命杨素自信州率水师顺流东下；

——命杨俊自襄阳出汉口；

——命杨广自寿县出六合；
——命刘仁恩出江陵（今湖北江陵），
——命王世积出蕲春（今湖北蕲春）；
——命韩擒虎出庐江（今安徽合肥）；
——命贺若弼出广陵（今江苏扬州）；
——命青州燕容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

以上合计九十总管，军力五十一万八千人。史书形容其军势之盛：“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9]

十二月，杨素首先率水军出三峡，军至流头滩（湖北宜昌市西），陈国大将戚昕以船百余艘，兵数千人扼守地势险要的狼尾滩（今湖北宜昌市西）。杨素认为：“胜负大计，在此一举，若昼日下船，彼见我虚实，滩流迅激，制不由人，则吾失其便；不如以夜袭之。”[10]遂率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又派遣大将王长袭引步兵自南岸袭击戚军的别栅。刘仁恩率甲骑于迟明赶至，攻击戚军北岸守寨，大破戚昕军，悉俘其众，戚昕仅以身免。陈国沿江各镇戍，闻隋军大至，相继奏报陈后主，但陈国近臣施文庆，沈客卿怕受陈后主责备而压匿不报。先是陈后主拟召南平王陈嶷、永嘉王陈彦参加元会之庆，命沿江防船悉从二王还都，由是江中无一斗船。陈水军都督周罗睺、荆州刺史陈慧纪等军则被杨俊阻于汉口，不能东下。后有人建议京口（今江苏镇江市）、采石（在今安徽当涂境）都是近畿要地，各须锐兵五千，并出金翅（船名）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也为施、沈二人阻止，并向陈后主诳报说，隋军出扰是常事，边城将士能够应付，如更出人船，反增加惊扰。因而当隋军临江，间谍骤至时，陈国君臣还在议而不决，陈后主甚至大言不惭地说：

> “王气所在，齐师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11]

于是奏使、纵酒、赋诗如故，军事上没有采取应战措施。同时，由于隋军长期准备，麻痹陈军的结果，当贺若弼于隋文帝开

隋灭陈经过示意图

（18-3图）

皇九年(公元589年)正月引军自广陵渡江时,陈军竟未发觉。韩擒虎亲率五百人自横江（在今安徽和县境）乘夜渡江袭采石，守备的陈军皆醉卧，因而不战而克。杨广此时率大军由寿春移屯六合，陈国君臣才仓皇应付，命樊猛率舟师出白下（今江苏江宁），皋文奏将兵镇守南豫州（今安徽当涂）。还重立赏格，并僧尼、道士尽令执役。不久，贺若弼夺占京口（今江苏镇江），将所俘六千人尽予释放，付予隋赦书，使分道宣谕，继续瓦解陈国军心。隋军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贺若弼分兵一部南下阻陈援军，亲率主力进据钟山（南京市紫金山）。韩擒虎部也继续深入,攻克南豫州,与贺部对建康形成了合围。上游隋军也分路而下，陈军降者相继。至此，陈国君臣手忙脚乱，虽尚有甲士十万，陈后主却不知如何应付，日唯啼泣。正月二十日，陈叔宝孤注一掷，令陈军出战。陈军在城南布成一字长蛇阵，南北长达二十里，既未指定诸军统帅，又无背城一战的决心，各军行动互不协调，被贺若弼军击溃，隋即全军瓦解。此时，韩擒虎引隋军入朱雀门,守将欲抵抗,陈将任忠说:“老夫尚降,诸军何事!”〔12〕陈军于是一哄而散。贺若弼生擒陈将肖摩诃，自北掖门入城。隋军入城后，陈后主偕宠妃张丽华躲入枯井内，隋军呼之不出，便扬言投石， 陈后主始出而投降。 长江上游各地陈军， 知建康已失，陈后主已降，均解甲投降。隋灭陈战争前后不过用了四个月时间。

隋灭陈之战，由于战略方针正确，得以迅速战胜，统一了全国，体现了“先胜后战”的原则。在当时，客观上已具备了以大击小、以强击弱、以治击乱的有利条件，但隋仍认真对待，长期准备，使这些条件得以更加充分的发挥。特别是长期采用破坏、瓦解、麻痹等等手段，破坏了陈国的军力，物力，并使陈军疏于戒备，从而有了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灭陈战争中值得吸取的经验是，对任何敌人，都必须认真对待，周到准备，把弱敌当强敌打，方可争取主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灭陈之战采取多路并

进，水陆俱下的战略部署，大体上与晋平吴之战相似，是我国战争史上第二次渡江大战。这个战略部署是针对陈军依托长江设防的特点而定的，只有如此，方可使陈军备多而力分，首尾不能相顾，易于一击成功。部署的另一特点，是置重点于长江中下游，用崔仲方建议使下游诸军可以“择便而横渡”，在上游诸军与陈军交战的同时，下游诸军即乘虚直捣陈腹心健康，这对促使战争迅速解决，起了很大作用。总的看，隋灭陈之战，是以有备打无备，是一次战略奇袭作战，而每个重要战役，也多运用袭击手段。这说明无论对强敌或弱敌，也无论在战略、战役、战术范围，袭击都是费力小而收效大的作战手段。

陈国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是政治腐朽、人心背离、军心涣散。但陈国拥有广大的地区和一定的军力，并有江河作屏障，失败如此迅速，军事上的麻痹无备也是重要原因。

隋在统一全国以后，为了加强对南方的统治，改变江南士族欺压寒门、称霸地方的局面，决定采用北方吏制，地方官吏由中央直接委派，以加强国家对农民的直接控制。这些措施严重危及南方世家大族地主的政治、经济特权，遭到他们的反对，叛乱随之而起。叛乱在沿海一带最炽烈，如婺州（今浙江金华）的汪文进、越州（今浙江绍兴）的高智慧、苏州的沈玄桧等，皆自称天子，署置百官。此外、庐江、泉州（今福建泉州）京口、晋陵（今江苏常州）、歙州（今安徽翕县）等地的“豪族”、“豪杰”也相继起兵，或自称刺史，或自称太守，一时旧陈之地普遍反隋。杨坚派杨素率大军平叛，首先攻占京口，而后转战晋陵、无锡，活捉了沈玄桧。高智慧扎营在钱塘江东岸，杨素用来护儿之计，偷渡过江，用火攻取胜，高由海路逃走，往依泉州王国庆。隋军分两路紧追不舍。一路由史万岁率领，由婺州南进，转战千里，大获全胜；一路由杨素亲率大军沿海岸进击，在乐安（今浙江临海）讨平汪文进，在温州（今浙江温州）击破沈孝彻，然后攻克泉州。王国庆弃城而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执

高智慧投降。在平定江南的同时，巡抚岭南的隋将裴矩在高凉郡（今广东阳江西）冼太夫人（原梁时高凉太守冯宝之妻，陈朝时也曾助陈）的协助下，平息了在岭南起事的少数族豪酋王仲宣等。

南方豪族叛乱的平定，严重打击了南方豪族地主，使隋真正得到统一和巩固而兴旺起来。此时，隋朝的疆域东西约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余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今新疆且末），北至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南），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统一。

注　释

〔1〕《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二年》

〔2〕《隋书·卷一·高祖纪》

〔3〕《隋书·突厥传》

〔4〕《隋书·卷六十·崔仲方传》

〔5〕《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三年》

〔6〕《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四年》

〔7〕《隋书·高颎传》

〔8〕《资治通鉴·陈长城公祯明元年》

〔9〕〔10〕《资治通鉴·陈长城公祯明二年》

〔11〕同上。"齐师三来"，指的是梁敬帝绍泰元年，齐师袭建康据石头；梁太平元年齐师破采石，同时又逼建康；陈文帝天嘉元年齐师攻破芜湖。"周师再来"，指的是陈文帝天嘉元年周师南入湘川。

〔12〕《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九年》

第十九章 隋末农民战争

第一 隋炀帝的暴政和入侵高丽

隋统一全国后，虽社会财富激增，然搜刮十分苛刻，史书上形容当时的情形说："开皇十七年，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所有赉给，不逾经费，京司帑屋既充，积于廊庑之下。"又说："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至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1〕这些财富都是隋统治集团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得来的。曾以"仁俭"欺人一时的隋文帝杨坚，为了尽情享受，不惜以累累白骨作代价，建筑了华丽的仁寿宫。史称："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复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2〕贵族官僚也是奢侈豪华，杨素两次得赐田一百三十顷，"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3〕

隋炀帝杨广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他即位后，穷奢极欲，滥用民力，穷兵赎武，横征暴敛。其统治之残暴，远超其父。史称：

> 登极之初，即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导洛至河及淮，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筑长城东西千余里，皆征百余万人，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及亲征吐谷浑，驻军青海，遇雨雪，士卒死者十二三。"〔4〕

他为了个人享受，不断地出巡、出游，每次都要带大批军队、官吏和宫女，多时达五十万人。所到之处，在数百里范围内的官府都要预为修路和供应精美食品。官吏们尽情搜刮，一方面满足杨广需要，一方面借机自肥，人民的生活却惨苦到极点，阶级矛盾日

益尖锐，这是爆发农民大起义的根本原因。

杨广的穷兵黩武，入侵高丽，是使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农民大起义全面爆发的导火线。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杨坚首次入侵高丽，以杨谅、王世积并为元帅，周罗睺为水军总管，水陆军共三十万。陆军因洪水暴发，粮运不继，水军遇风，船多沉没，均无功而返，人员死亡十之八九，给人民造成莫大灾害。杨广不接受教训，变本加厉，自隋炀帝大业八年（公元612年）起，连续发动入侵高丽的战争。第一次入侵高丽，用兵号称二百万（实际百余万）。杨广"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5]命淮南、江南造兵车五万乘送至高阳（今河北高阳）载运衣甲幔幛，令士兵自拉。又命黄河南北，江淮民夫以船运米至涿郡（今北京市南）。这样大规模的兴师动众，其兵役、徭役之重，人民痛苦之深，是可以想见的。历史记载其情况说："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6]

杨广把全军分为左、右两路，每路十二军。出征时，一军走完后，一军继之，用了四十天才走完。左、右各十二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长径达九百六十里，后面还有御营长达八十余里。隋军在天寒地冻、气候多变的北方地区，行动缓慢，补给困难，再加上战争的不义，受到高丽人民的坚决抵制，战争的失败是当然的。九军渡辽时三十万五千人，退到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只剩二千余人，可以说是全军覆没。这次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仅在战争准备时期，就动员了数百万人，以致"耕稼失时，田畴多荒……重以官吏贪残，因缘侵渔，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剽掠则犹得延生。"[7]广大人民忍无可忍，不得不奋起反抗残暴统治。就在杨广积极准备战的大业七年冬，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章丘境）首举义旗，自称知世

郎，并以“无向辽东浪死歌”号召群众，其词为：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8〕

这只歌表现出起义军的英雄气概，表现出广大人民反对入侵高丽，反对隋暴政的坚强意志。义军声势所及，群起响应，先后有窦建德、孙安祖在高鸡泊（今山东武城东北），刘霸道在豆子航)(今山东惠民境），高士达在蓨县（今河北景县），张金称在鄃县（今山东夏津）起义，少者万余人，多者十余万人，势如燎原。杨广面对这一形势，一方面派军队镇压起义军，一方面又在大业九年（公元613年）再次发动入侵高丽的战争。隋军围攻辽东城，久攻不下，而统治集团内部已开始分裂，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粮草，乘杨广远征，人心怨愤，以船民、运夫八千人起兵，声言：“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众皆欢呼，踊跃相从。此时，李密也前来投奔。李密是个贵族，是北周佐命功臣李弼的曾孙，袭爵蒲山郡公，曾为隋炀帝的左亲侍，因炀帝不喜其“瞻视异常”而称病引退。李密投奔后，向杨玄感出谋献策说：

“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去幽州犹隔千里。南有巨海，北有强胡，中间一道，理极艰危。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据临渝之险，扼其咽喉。归路既绝，高丽闻之，必蹑其后，不过旬月，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此上计也。”

杨玄感不愿采用此策，复问其次。李密说：

“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

杨玄感仍不采用，令李密再言其次。李密说：

“简精锐，昼夜倍道，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illegible]祎（任河内郡主簿，杨玄感起兵时在黎阳，已逃归河内。）告之，先已固守，若引兵攻之，百日不克，天下之兵四面而至，非仆所知也。”

玄感以为李密的下策乃是“上计”，他认为：

“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其心。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9〕

李密的上策是具有战略远见的，当时人民苦于入侵高丽，如起兵后按李密计划，直袭杨广大军之后，必得军民拥护，杨广归路被阻，其众溃乱，可能一举而灭杨广。但杨玄感却采用下策，攻取洛阳坚城，给了杨广以回军的机会。杨广发军攻杨玄感于前，又令关中军攻其背。杨玄感见形势窘迫，想舍洛阳而入关中，但军力削弱，已成强弩之末，终于遭到惨败。

杨广虽消灭了杨玄感，却镇压不了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大业十年（公元614年），杨广不接受前两次入侵高丽的失败教训，又发动第三次侵高丽的战争，下令征兵，准备百道并进。可是在农民大起义影响下，人民没有那样顺从了，士兵沿途逃亡，征调的部队也都公然抗命。杨广不得已，只好借口高丽求和，下令撤兵。

杨广入侵高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战争的非正义性，受到全国及高丽人民的反对，激起了全国农民大起义。

第二　农民起义军的战略运用

农民大起义首先爆发于山东地区（太行山以东，包括今山东、河北、河南各一部），有几个原因。一是自北朝以来，一直是大姓士族盘踞的地区，对农民剥削异常惨苛，阶级矛盾尖锐；二是这一地区，灾荒严重，山东、河南大水灾，淹没了三十多个郡，人民无以为生；三是杨广将这里作为入侵高丽的人力、物力

基地，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因而当地人民受剥削最重，反抗也最激烈。农民大起义在全国普遍展开后，受到隋统治者的镇压，起义军意识到分散容易被各个击破，于是逐渐汇合，形成了以中原的瓦岗农民起义军为中坚，以窦建德、杜伏威分别领导的北、南两支起义军为两翼的三大支农民起义军。虽然他们没有统一的领导，但客观上却起了战略上相互配合和支援的作用。起义军消灭了隋军主力，基本上摧垮了隋朝的统治。隋朝统治集团内部，也随着四分五裂，出现了一些封建割据集团，伺机窃取农民起义果实。如李轨在武威（今甘肃武威），薛举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市），梁师都在朔方（今陕西横山西），罗艺在涿郡，刘武周在马邑（今山西朔县），肖铣在巴陵（今湖南岳阳），李渊在晋阳（今山西太原市）等等。隋王朝实际上只剩下了长安、洛阳、江都三城及其附近地区，如同三个孤岛一样，而杨广还不知死之将至，在江都巡幸不返。

一、瓦岗军

（一）发展壮大，威逼东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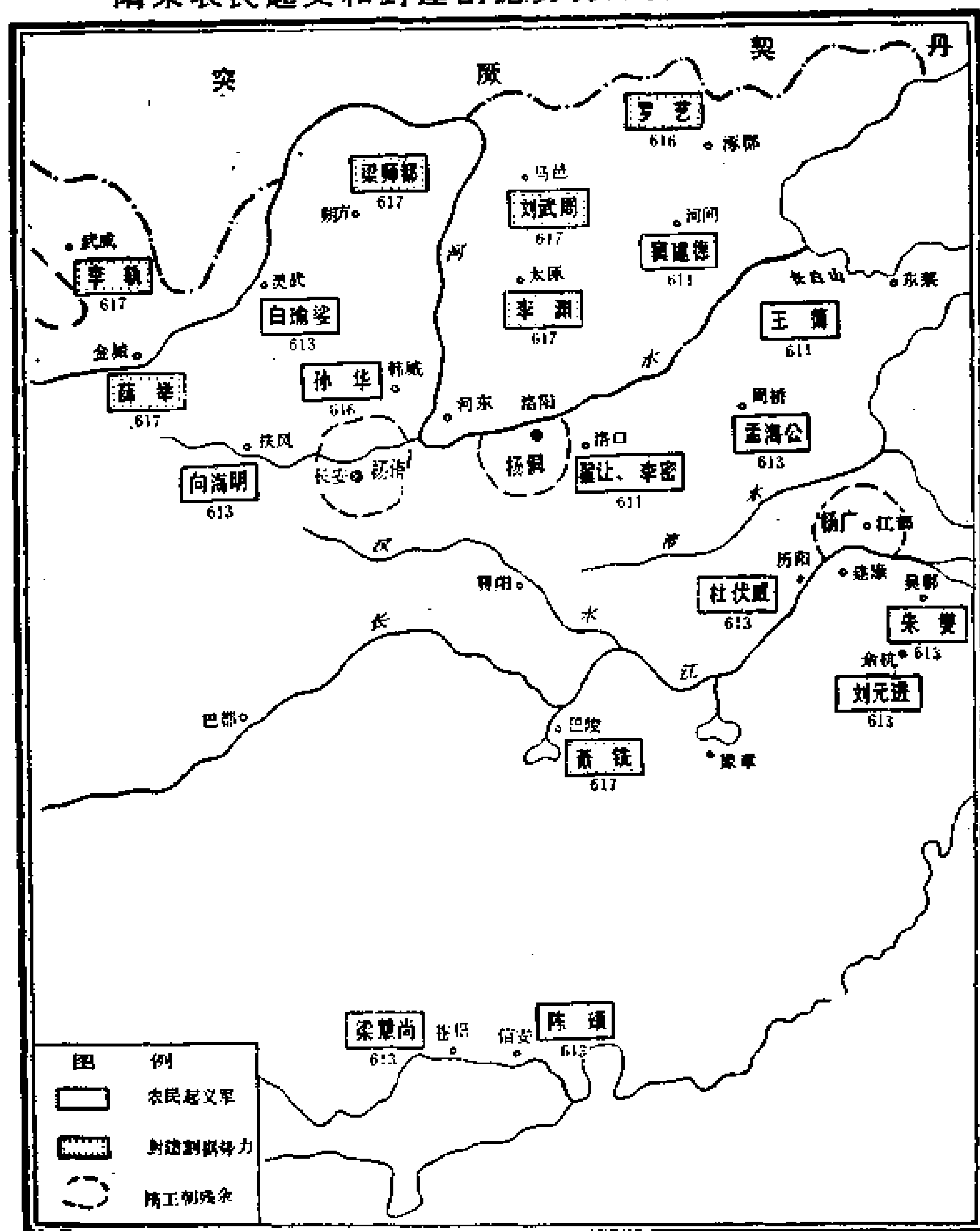
瓦岗起义军的最早领导人翟让，原是东郡（今河南滑县）一个小官吏，因案被判死刑，经人救出，约在隋炀帝大业七年至八年（公元611—612年）于瓦岗寨（今河南滑县境）聚众起义。单雄信、徐世勣也来参加，很快发展到万余人。隋军虽多次派队镇压，瓦岗军多系善用长枪的渔猎手，战斗力强，仍能长期坚持。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李密投奔瓦岗，并说服附近几支小起义军并入，于是瓦岗军声势大振。李密向翟让建议说：

> “刘、项皆起布衣为帝王，今主昏于上，民怨于下，锐兵尽于辽东，和亲绝于突厥，方乃巡游扬、越，委弃东都，此亦刘、项奋起之会也。以足下雄才大略，士马精锐，席卷二京，诛灭暴虐，隋氏不足亡也！”

翟让识见不如李密，对此犹豫不定，李密再劝其说：

> “今四海糜沸，不得耕耘，公士众虽多，食无仓廪，唯

隋末农民起义和封建割据势力形势示意图 (19-1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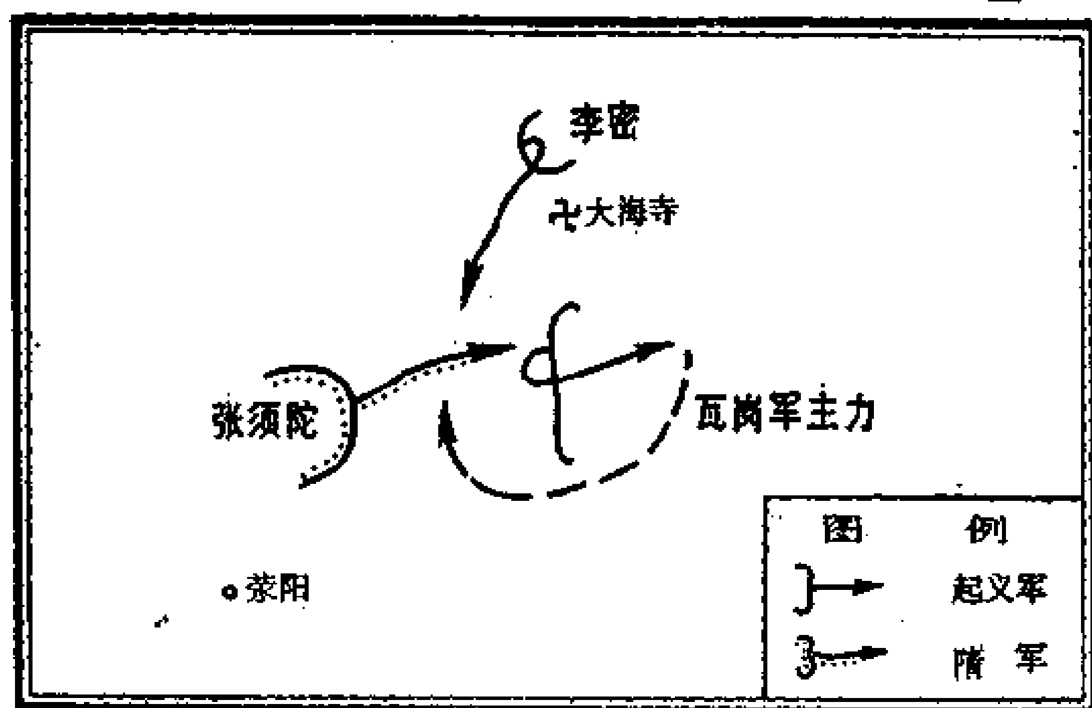


渉野掠，常苦不给。若旷日持久，加以大敌临之，必涣然离散。未若先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后与人争利。”〔10〕

按李密建议，“席卷二京”的战略目标，“诛灭暴虐”的灭隋政治目的，都是正确的；“休兵馆谷”作为发展壮大起义军的初步战略步骤，更为时势所必须，故终于得到翟让的同意。于是起义军先破金堤关（今河南荥阳北），并取得荥阳附近诸县。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月，杨广派荥阳通守张须陀镇压瓦岗军，翟让前曾数败于张须陀，想避而不战。李密鼓励他出战，自己分兵千余人埋伏于大海寺（今河南荥阳北）。张须陀轻视翟让，方阵而前，翟让率主力败退十余里，李密发伏兵掩袭张军，张军大败，被瓦岗军合围。张须陀往返冲杀数次，终未突出而战死。张须陀军是隋军精锐部队之一，是河南道十二郡中的唯一主力，张军的失败使隋的“河南郡县为之丧气”，而瓦岗军却因此役而大大振奋了士气，初步发展了力量，为以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大海寺之战示意图 （19-2图）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杨广仍在江都，洛阳由其孙杨侗镇守，长安由其另一孙杨侑镇守。留守洛阳、长安的官吏政令不一，搜刮严苛，以致饥民遍野，荥阳周围饿死的人很多，而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大业二年杨广所筑，周围三十里，穿三千窖，每窖容粮八千石）却堆满了粮食。李密向翟让建议说：

> “今百姓饥馑，洛口仓多积粟，去都（指东都）百里有余，将军若亲率大众，轻行掩袭，彼远未能救，又先无预备取之如拾遗耳。比其闻知，吾已获之，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枕威养锐，以逸待劳，纵彼能来，吾有备矣。然后檄召四方，引贤豪而资计策，选骁悍而授兵柄，除亡隋之社稷，布将军之政令，岂不盛哉！”〔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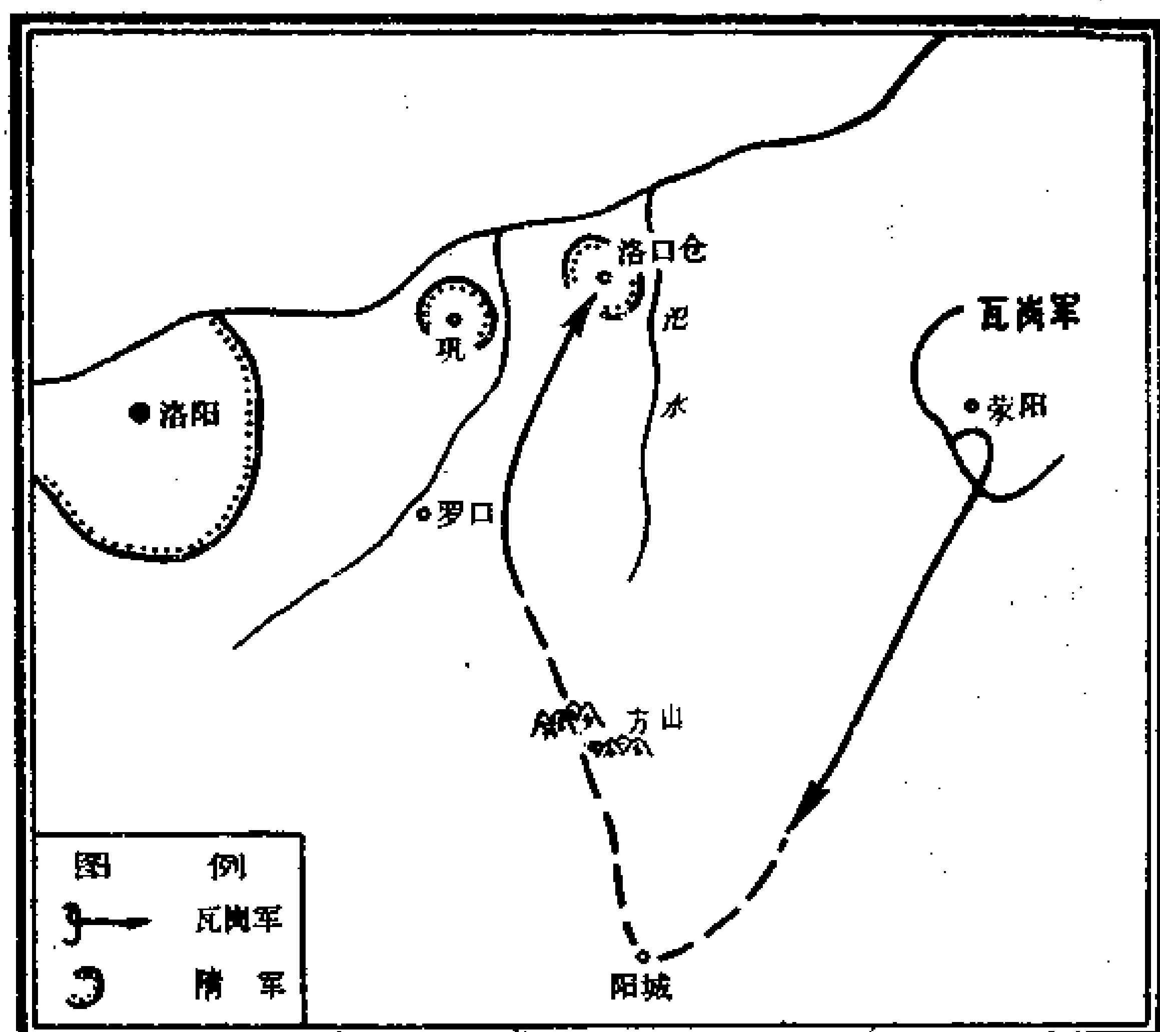
翟让采纳了李密意见，令李密率精锐七千，经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越方山（今河南巩县东南）、从罗口（今河南巩县南）向洛口迂回，一举就袭占了洛口仓。

瓦岗军占领洛口仓后，当即开仓济贫，每天就食的人难以数计，农民纷纷自愿参军，使瓦岗军的发展壮大达于高潮。瓦岗军袭占洛口仓的战略意义是巨大的：（1）由于开仓济贫，广泛地动员了群众，扩大了革命队伍；（2）断了洛阳粮源，迫近洛阳，使在洛阳的隋统治集团残余，处于更加困难的地位；（3）解决了军食问题，得以支持长期作战，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4）士气、民心更为旺盛。以上说明瓦岗军袭占洛口仓的战略行动是极为正确的，采用迂回手段，突然袭占，表现也很灵活。

（二）巩固胜利，屡破隋军

洛口仓是洛阳的粮仓，关系到隋在洛阳残余的生死存亡。杨侗为挽回颓势，派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自洛阳东向，令裴仁基自虎牢出汜水以掩袭瓦岗后方，并约期在洛口会师。瓦岗军事先侦知隋军计划，乃抽精锐编为十队，以四队埋伏在横岭（今河南巩县东），准备袭击裴仁基军；以六队在石子河（今河南巩县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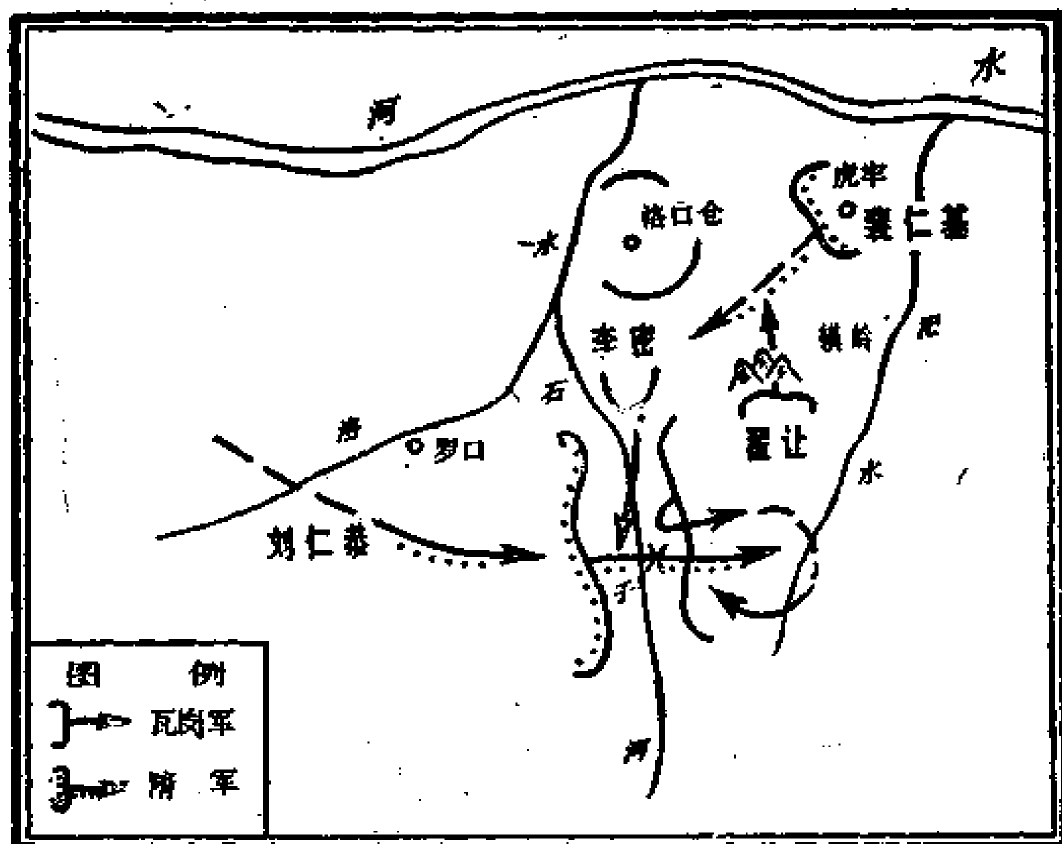
瓦岗军袭占洛口仓示意图 （19-3图）



南）东布阵，以待刘长恭军。刘军先到，渡过洛水，在石子河以西展开，南北亘十余里。刘长恭见瓦岗军兵少，且不知裴仁基失期未到，就贸然发动进攻。瓦岗军初战不利，略向后撤，李密亲自率军自侧方横击隋军，刘长恭军大部被歼。裴仁基亦退至百花谷（洛口东南）。

石子河战役的胜利，具有战略意义。瓦岗军巩固了原有的成果，进一步壮大、发展了革命队伍，为建立革命政权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在战役指导上，当时瓦岗军和隋军对比，还处在相对的劣势，采取以逸待劳，相机袭击的作战指导，是正确的。

石子河之战示意图 （19-4图）



瓦岗军再次歼灭了隋军主力部队，获得大批军械、辎重，军势大振。战后，翟让不计个人得失，主动将瓦岗军的领导权让与李密，表现了他忠于农民革命的朴实农民领袖品质。李密建立政权，号称魏公，发布揭露杨广罪恶的檄文，号召人民共同讨伐。于是河北南部、江淮北部各小支起义军，莫不响应归附，史称："密悉拜官爵，使各领其众，置百营簿以领之。道路降者不绝如流，众至数十万。……河南郡县多陷于密。"〔12〕隋将裴仁基、巩县长柴孝和也献地归降，起义军又袭占了回洛仓（巩县境，周围十余里，穿三千窖），军民食用更为充裕。继而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等各率部来归，军力更盛。至此，瓦岗军已成为威震中原的灭隋主力大军。

（三）围攻洛阳，顿兵坚城

就在瓦岗军发展、壮大的同时，窦建德起义军在河北也发展到十余万人，建立政权于长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杜伏

威所领导的起义军在江淮间也有发展。瓦岗军派徐世勣率隋降将北渡黄河攻占黎阳仓（今河南浚县境），开仓任人民取食。不久，得兵二十万，附近郡县均降，与在河南的主力形成犄角之势，形势更为有利。当时对瓦岗军下一步的战略动向，有过如下谋议。泰山道士徐洪客建议李密说：

"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可成功。"

"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13〕

李密虽赞赏他的建议很积极，但没有采用。柴孝和在此之前，也曾劝说李密西入关中，他认为：

"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

李密认为：

"此诚上策，吾亦思之久矣。但昏主尚存，从兵犹众，我所部皆山东人，见洛阳未下，谁肯从我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如此，则大业堕矣。"〔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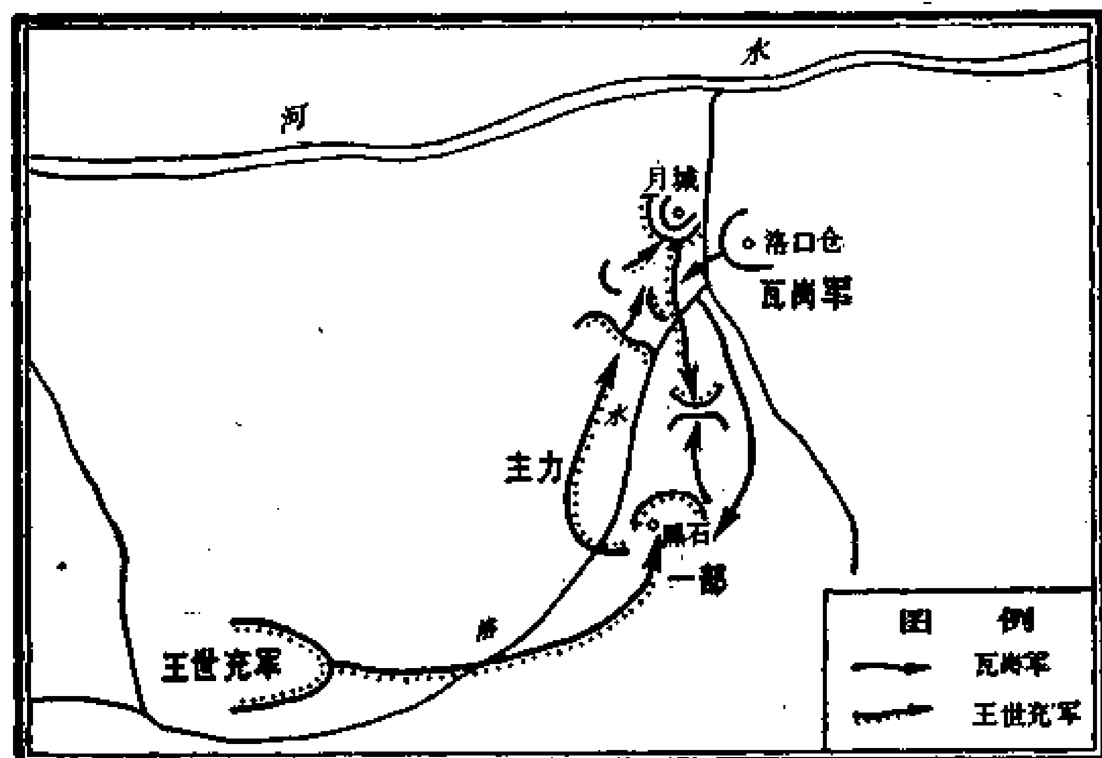
以上两种谋议，都是积极进取的方案。一个东向，一个西入，两相比较，后者尤具战略远见。如果实行此案，可先李渊集团而入据关中，再与留河南的兵力相呼应，瓦岗军实有可能领有天下。李密曾劝过杨玄感舍洛阳而取关中以为根本，如今临到自己头上，却因小失大，顾虑重重，知为上策而不能用，说明李密不是真正有战略远见的人。李世民曾评他是"顾恋仓粟，未遑远略"，可谓一针见血的评论。李密不愿放弃先攻占洛阳的战略抉择，是战略上的最大失误，以致瓦岗军的胜利果实，后来为李渊集团所窃取，而终归失败。李密当时所持理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是瓦岗军士气正盛，西向入关更可振奋士气，将士会踊

跃相从；二是瓦岗军内部团结虽有问题，但翟让威信很高，可以统御留河南各部继续发展；三是隋政权对军队已失去控制，且士气低落，函、潼之险，也无法阻止瓦岗军的西入。

此后，瓦岗军虽在战役上与隋军时有胜败，且胜利居多，但滞留原地已陷入战略被动。

杨广以洛阳告急，派王世充率精兵增援，并从河北抽薛世雄南下，企图解洛阳之急。薛世雄被河北窦建德起义军阻截消灭，王世充军进入洛阳，合原有兵力不下十余万人，不断与瓦岗军作战。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九月，杨侗命王世充率军向洛口瓦岗军反攻，与瓦岗军夹洛水而阵。十月，王世充夜渡洛水，在黑石（今河南巩县东南）扎营，明日分兵守营，自己率主力回屯洛水北岸，企图分散瓦岗军兵力。李密率军渡洛水迎战不利，一部回防月城（今河南巩县西北），被隋军包围。李密为了调动隋军趁机消灭之，亲率主力回洛南直捣黑石，大败该地隋军。王世充不得不解月城之围，引兵渡洛水援救黑石。瓦岗军乘

黑石之战示意图　（19-6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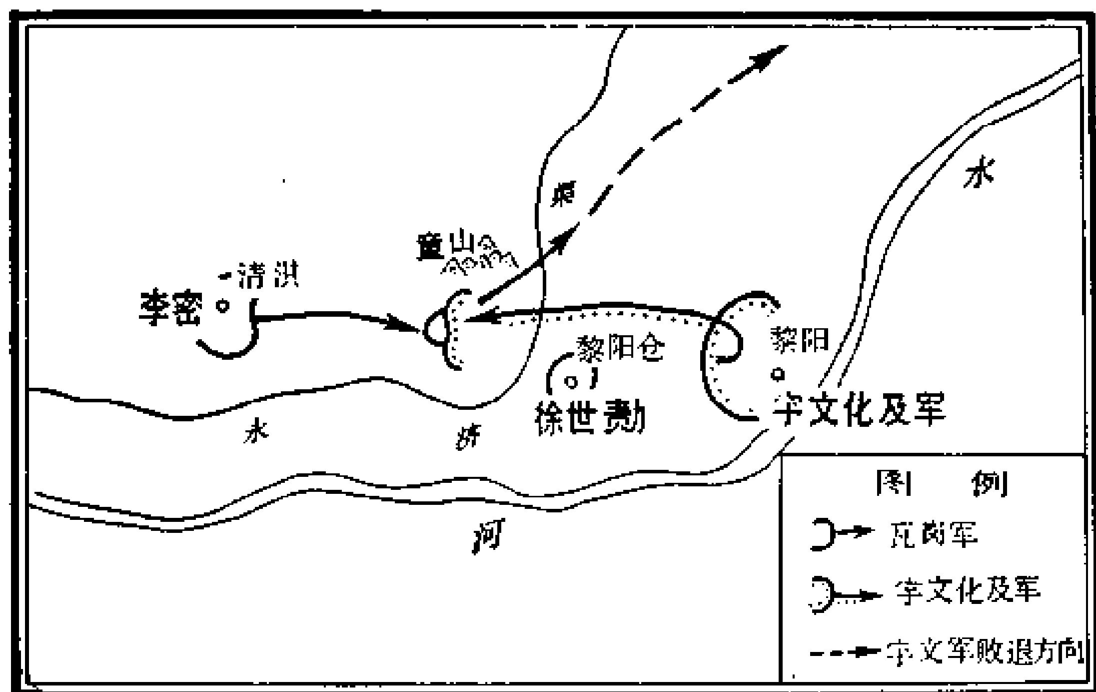
其在运动中猛烈向其进攻，斩首三千余级，王世充军大败。

黑石之战，李密运用调动敌人，使其处于不利情况，然后袭破之的战役指导，是很机动灵活的。此时瓦岗军军力、士气已胜过洛阳隋军。此后王世充率军多次向瓦岗军进攻，均告失败。隋恭帝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正月，王世充又向瓦岗军发动进攻，命各军造浮桥渡洛水，因桥成有先后，缺乏统一指挥，秩序紊乱，瓦岗军趁势猛击，王军再次大败，仅为争桥而落水淹死的就有万余人。王世充兵败不敢回洛阳，向河阳（今河南孟县）溃逃，因风大天寒、沿途冻死者又以万计，到河阳仅余兵数千，经杨侗抚慰，始返回洛阳。瓦岗军进占金镛城（今河南洛阳城东），以三十万之众屯驻北邙（今河南洛阳市北），南逼洛阳上春门，偃师、柏谷、河阳、河内等地隋军均降，但洛阳城坚，未能遽下。而瓦岗军长期攻围攻洛阳，却为李渊集团牵制了隋军，造成了李渊乘虚入关的大好机会。因此，瓦岗军顿兵坚城，虽战役上屡获胜利，但却造成了战略上的被动。与此同时，瓦岗军内部分裂，李密出于阶级本性，重用降将、降吏，杀害了瓦岗首义者翟让，因而威信大减，瓦岗军的内部团结遭到破坏，士气也大受影响，开始走下坡路。

隋炀帝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江都隋军兵变，禁军将领宇文化及利用士兵想回关中家乡的心理，杀了杨广，率军十余万人扬言要回关中。这是隋军仅余的精锐兵力，战斗力较强，对瓦岗军以及洛阳隋军残余，都构成了威胁。杨侗采纳元文都使"两贼自斗，吾徐乘其弊"[15]之计，召降李密，许以太尉高位，企图使李密去抗击宇文化及。六月，宇文军攻占黎阳，瓦岗军徐世勣部退保黎阳仓。李密亲率军二万人去支援，屯兵在清淇（今河南浚县西），每当宇文军攻仓城时，李密便袭其后，就这样防守着黎阳仓。这时杨侗派盖琮前来召降，李密竟接受了洛阳提出的条件，向杨侗称臣，集中精锐对付宇文军。以后又利用宇文军缺粮，伪与媾和，许供其军粮，宇文化及遂让军中随意食用所带

粮食。粮尽，发觉中计，乃率军过永济渠与瓦岗军大战于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宇文军大败，仅余残部约二万人败走魏郡（今河北大名）。

童山之战示意图 （19-6图）



童山之战，瓦岗军虽获得胜利，但实力已大为削弱，史称："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16〕李密在童山战后，仍以徐世勣守黎阳，自己率军退回巩、洛。

宇文化及率军西返，主要目的是与洛阳隋统治残余争夺领导权。如瓦岗军能运用策略保存实力，甚至暂作妥协，使其与王世充交锋，待其两敝之后而两乘之，扫清中原，重整军威，是尚有可为的。但李密却中了元文都使"两贼自斗"之计，把坐山观虎斗的有利条件让给了洛阳，失去了最后一个战略转机。结果虽打败了宇文军，但自己也伤了元气，为最后失败种下了恶果。特别降隋一著，政治影响极坏，失去了人心，影响了士气。

唐高祖武德元年，洛阳发生政变，王世充控制了洛阳隋残余政权，东都大饥。李密回军巩、洛后，仍据北邙和金镛城。九月，王世充抓住瓦岗军喘息未定的战机，简选精锐二万人，发动

了对瓦岗军的进攻。李密以王伯当守金镛，自己率主力依北邙山以御王军。多数将领主张立即决战，惟裴仁基认为应先疲敌，然后决战，他说：

“世充悉众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还，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我有余力，彼劳奔命，破之必矣。”

李密同意裴仁基的作战指导，他认为：

“今东都兵有三不可当：兵仗精锐，一也；决计深入，二也；食尽求战，三也。我但乘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斗不得，求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头可致麾下。”

魏征也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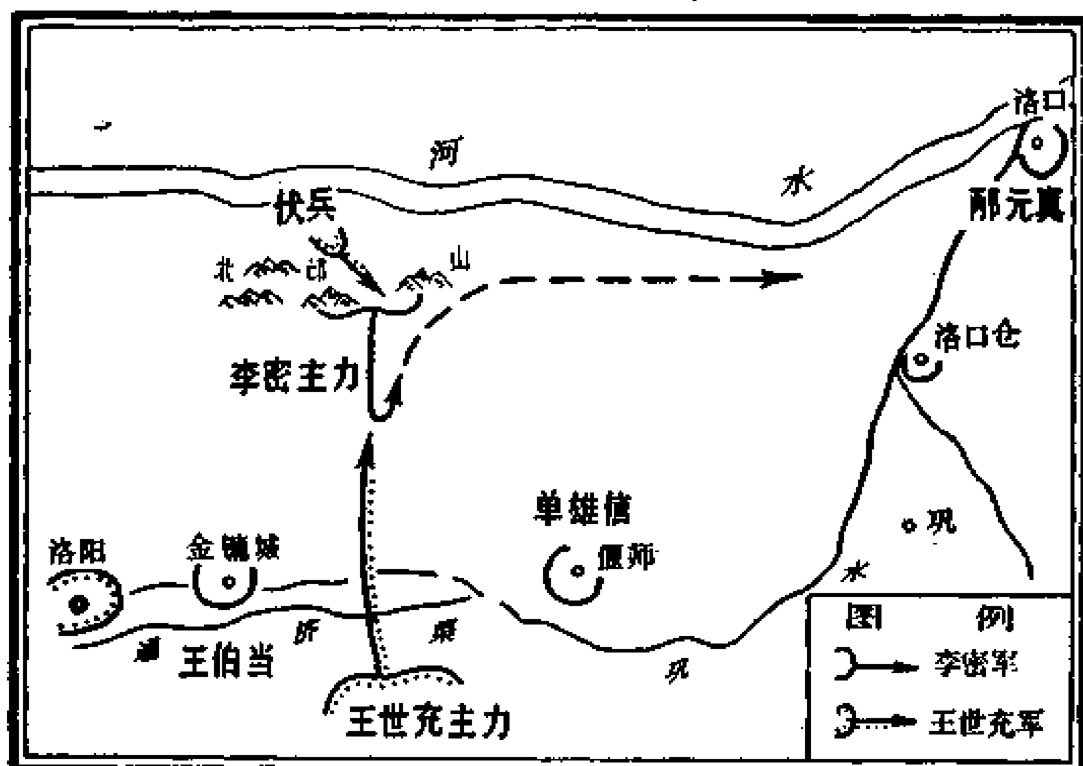
“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多死，战士心怠，此二者难以应敌。且世充乏食，志在死战，难与争锋，未若深沟高垒以拒之，不过旬月，世充粮尽，必自退，追而击之，蔑不胜矣。”〔17〕

这种以逸待劳，待敌敝粮尽后再行出击的作战指导，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之上，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多数将领的请战要求迫切，这一作战指导未能实行，以致造成了瓦岗军的最后失败。

李密率主力与程知节部骑兵屯在北邙山，以单雄信部骑兵屯在偃师（今河南偃师）城北。李密以新破宇文军，骄傲轻敌，不设壁垒。王世充先用一部兵力攻单雄信营，李密派裴行俨、程知节前去支援，互有伤亡。当夜，王世充派二百骑潜入北邙山，伏溪谷中。次日晨，王引军来攻，瓦岗军还没有来得及列阵，王军就纵兵进击，伏兵也自高而下，从背后冲击瓦岗军，并焚烧营寨，瓦岗军遂大败于北邙。

北邙败后，李密原想退据洛口，但守将邴元真已叛变投敌，单雄信也投降了王世充。李密又想退守黎阳，而众将不附。李密

北邙之战示意图 (19-7图)



自度无法挽回败局，仅率残部两万人西入关中降于李渊。威震一时的瓦岗军，就这样失败解体了。

瓦岗农民起义军在灭隋战争中，是消灭隋军的主力军，如隋军精锐张须陀、裴仁基、宇文化及等，均消灭在瓦岗军之手，立有突出功绩。瓦岗军胜多败少，这是由于抗隋立场坚定，士气高昂，战役、战术指导机动灵活，善于利用袭击等得来的。瓦岗军进军洛口以求发展壮大，以及黑石之战挫败王世充以求巩固的战略运用，都是正确的。但在发展壮大后“顾恋仓粟”，没有向西发展，占有关中，而是顿兵坚城，这导致了以后的失败，是战略上的最大失误。童山之战虽然取得了战役上的胜利，但战略上中了杨侗使“两贼自斗”之计，既因降隋瓦解了军心士气；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又由于死拼硬打，大大伤了元气，导致了最后的失败。这说明纵然战役胜利多，但战略指导错误，也是难以取得战争胜利的。李密个人对瓦岗军发展壮大起过积极作用，但在西进

还是攻占洛阳的关键性战略决策上，却作了错误决定，使瓦岗军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以后也未能运用正确的策略和作战指导，挽回危局。因而李密对瓦岗军的失败负有主要责任。至于杀害翟让，一度降隋，是他企图建立地主阶级政权的表现，有玷瓦岗军的荣誉。

二、窦建德起义军

窦建德，清河漳南（今山东武城东）人，出身农民，曾为里长，因助孙安祖起义，家属被杀害，遂率部起义投高鸡泊高士达起义军。这支起义军经常和张金称、郝孝德、孙宣雅、杨公卿等部与隋军作战。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杨广派杨义臣率军到河北，加紧对起义军的镇压，斗争极为残酷，张金称起义军营于平恩（今山东馆陶西北），被杨部击败，张本人被隋军杨善会部杀害。

隋涿郡通守郭绚将兵万余人攻高士达起义军，士达自知才略不如窦建德，乃以窦为军司马，指挥所有部队。建德请士达守辎重，自选七千人拒郭绚，并伪称与士达不和而叛离，愿为前驱以击士达。郭绚信之，引兵随建德至长河（今山东德州市东），不复设备。建德回军攻袭，大捷，杀死郭绚。张金称余部亦归入窦建德军，于是声势大振。杨义臣镇压张金称后乘胜到平原（今山东平原县），欲入高鸡泊攻讨起义军。窦建德对高士达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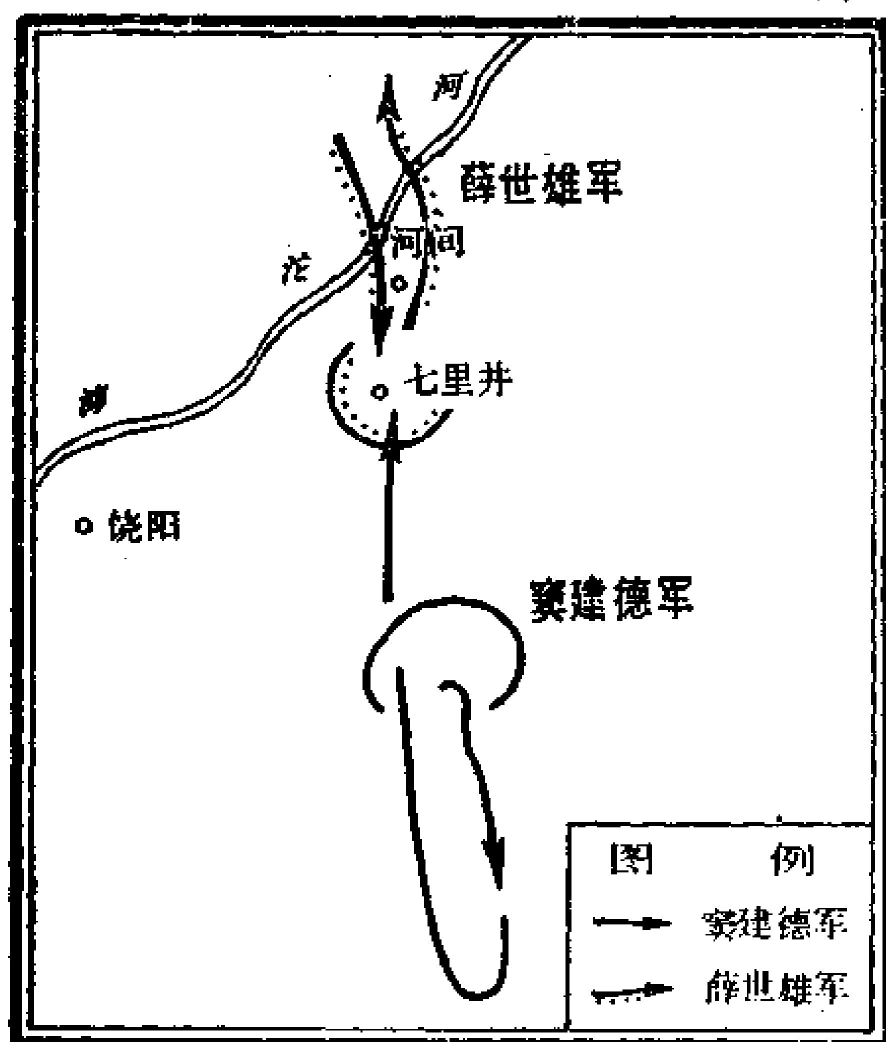
> “历观隋将，善用兵者无如义臣，今灭张金称而来，其锋不可当。请引兵避之，使其欲战不得，坐费岁月，将士疲倦，然后乘间击之，乃可破也”。〔18〕

建德这一战略方案，知己知彼，较为稳妥。它利用杨义臣之骄，避而不战，更助其骄，使其师老疲怠，士气衰竭；而起义军则以逸待劳，蓄精养锐，待机破敌。可惜，高士达未能采用此方案，亲率主力迎战，被杨义臣击败，士达被杀。窦建德仅率百余骑至饶阳（今河北饶阳），击败守军，得兵三千余人。等杨义臣离平原后，建德复返平原，收容士达残部，军声复振。继后又收

降附近郡县隋兵，义军壮大到十余万人。过去，各支起义军对隋官吏士族子弟多予杀戮，唯建德加以宽释纳用，因而得降众较多。其后，又归并深泽魏刀儿起义军十万人并据有其地，实力大增。建德乃建政权，称夏王，设官属，分治郡县。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杨广派涿郡留守薛世雄将精兵三万南讨李密。薛军至河间（今河北河间），屯于七里井（河间南），窦建德起义军士众慌惧，放弃附近城镇南逃，扬言还入豆子䴚。薛世雄以为窦军怕隋军精锐，不再防备。建德抓住战机回军袭其无备。这时，两军相距约百四十里，建德率敢死队二百八十人先行，令余部续进。建德至薛军营前时，天将明，但适有大雾，遂率队突入薛营。薛军始料未及，乃大溃，越栅而

七里井之战示意图 （19—8图）



逃，薛世雄仅率左右数十骑逃回涿郡。七里井之战有力地打击了在河北的隋军，客观上起了支援瓦岗军在中原作战的作用。这一战，表现了窦建德有智有勇，行动果断。战后，窦建德起义军乘势包围了河间。

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七月，隋河间郡丞王琮以城降。这时，河北大部已为窦建德所有，窦遂移都乐寿（今河北献县）。继而连克邢（今河北邢台市）、洺（今河北永年东）、赵（今河北赵县）沧（今河北沧州东南）、卫（今河南汲县）各州，降滑（今河南滑县东南）、齐（今山东济南）、济（今山东东阿西北）各州，并北克冀州。进攻幽州（今北京市西南），因罗艺固守未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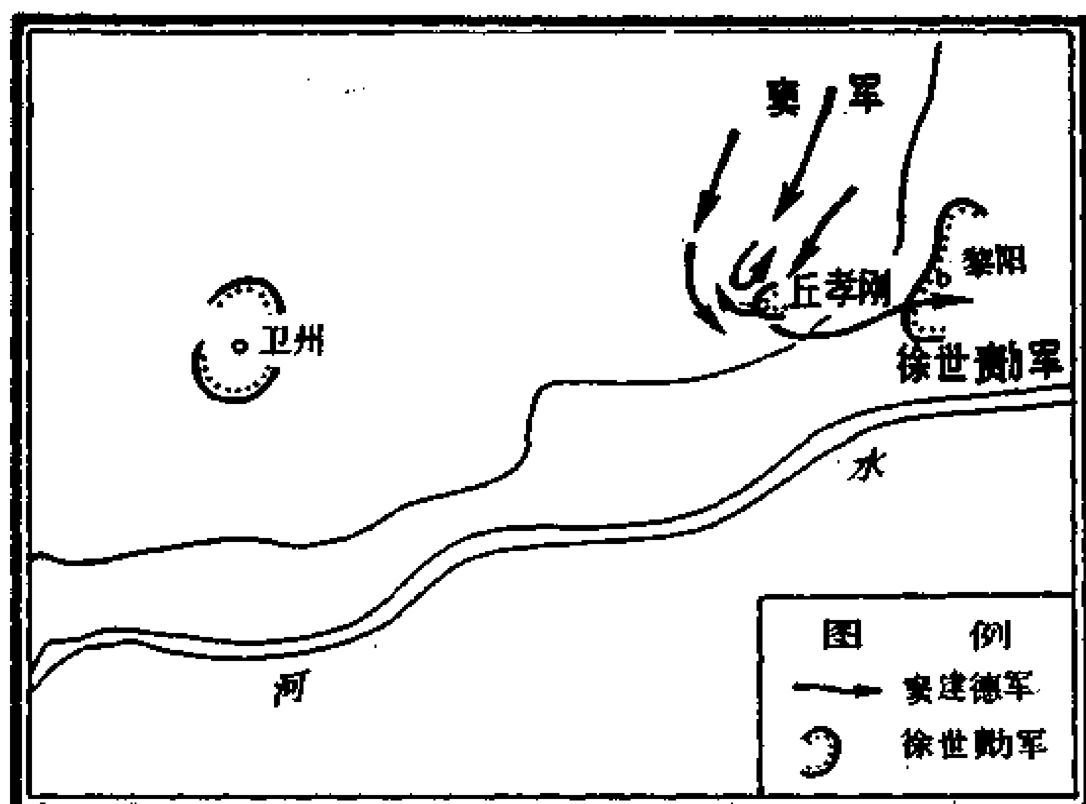
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闰二月，窦建德在聊城（今山东聊城）大破宇文化及，并擒斩之。

同年十月，窦建德引军取卫州。这时徐世勣已降唐，任黎州总管，仍守黎阳，见窦建德率千骑过黎阳趋卫州，派骑将丘孝刚率三百骑侦察窦军行动。孝刚骁勇，善用马槊，与窦建德遭遇，建德败走，窦军主力右方兵赶到，击斩了丘孝刚。窦建德转锋攻破黎阳，俘获唐淮安王李神通、徐世勣之父徐盖、唐同安公主及魏征等。徐世勣先渡河逃走，后因其父被俘，复归而请降。建德留其父为质，仍命徐世勣守黎阳。建德回军，河北几全为所有。

卫州之战，说明窦建德在战略上并不满足于占有河北，有渡河南向以问鼎中原的意图。其廓清河北，先巩固后方的措施，是可取的。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窦建德率军渡河攻周桥（今山东曹县北）孟海公（山东济阴人，隋炀帝大业九年起义，据屯周桥，有众数万）。在进军途中，洛阳王世充因唐军的围逼而向窦求援。谋士刘彬建议说：

“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王世充自立称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

卫州之战示意图 （19-9附）



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王世充曾侵黎阳，窦建德破殷州今河南获嘉以报，从而交恶），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19〕

这是颇有见地的战略谋议。窦建德虽同意这样做，一方面许王世充赴援，一方面遣使见李世民，请罢洛阳之兵，但行动上不积极，继续攻打孟海公。数月之后，破了孟海公，才举兵西向。这时唐军已肃清了在洛阳周围的王世充军，形势对唐军更为有利。窦建德军到虎牢后被唐军所阻，谋士凌敬建议建德说：

“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今河南沁阳)、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20〕

这个战略方案，是积极的，是化被动为主动的唯一可行方案。如能执行，胜则可进而与唐争夺天下；纵不全顺利，也可保有实力，徐图发展。但窦建德不从凌敬的建议，反求唐军决战，以致在李世民亲率精骑袭击下，全军溃败，窦本人也为唐军所俘。

窦建德起义军在河北发展壮大，先后击灭隋军精锐涿郡通守郭绚、涿郡留守薛世雄等部，占有河北大部，在灭隋斗争中军事上的成就仅次于瓦岗军，而政治上则更深得人心。窦建德出身农民，深知民间疾苦，起义以后，一直与士卒同甘苦，"每平城破阵，所得资财，并散赏诸将，一无所取。又不啖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21〕移都洺州后，在河北境内，劝课农桑，境内安定，商旅野宿，因而深受人民爱戴。到唐统治后期，河北各地仍设庙祭祀他。

窦建德军所处形势，不如瓦岗军，如北有罗艺西阻太行，南限黄河，回旋余地小，在发展上受到一定影响，但在占有黎阳后，如能乘唐、郑相持不下，及时进军中原，按刘彬建议"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是可大有作为的。可惜窦建德行动缓慢，丧失了战机。这是战略上的最大失误。及至已陷被动，又不纳凌敬建议，一误再误，造成了完全失败。窦建德是一个智勇兼备的起义军领袖，指挥作战胜多败少；但他战略眼光不足，且不够果断，这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

窦建德起义军在河北深得人心，他失败后，旧部刘黑闼曾聚众再起，终以和唐军实力悬殊过大，未能成事。

三、杜伏威起义军

隋末的农民起义军最早都发难于山东，因隋军的镇压和筹粮困难，很多支起义军失败了。其中有一些向富饶的江、淮地带转移，杜伏威、辅公祏所领导的起义军就是他们中有代表性的一支。

杜伏威是山东章丘（今山东章丘）农民，他与临济（今山东济阳东）辅公祏受郡县官迫害，亡命在外，于隋炀帝大业九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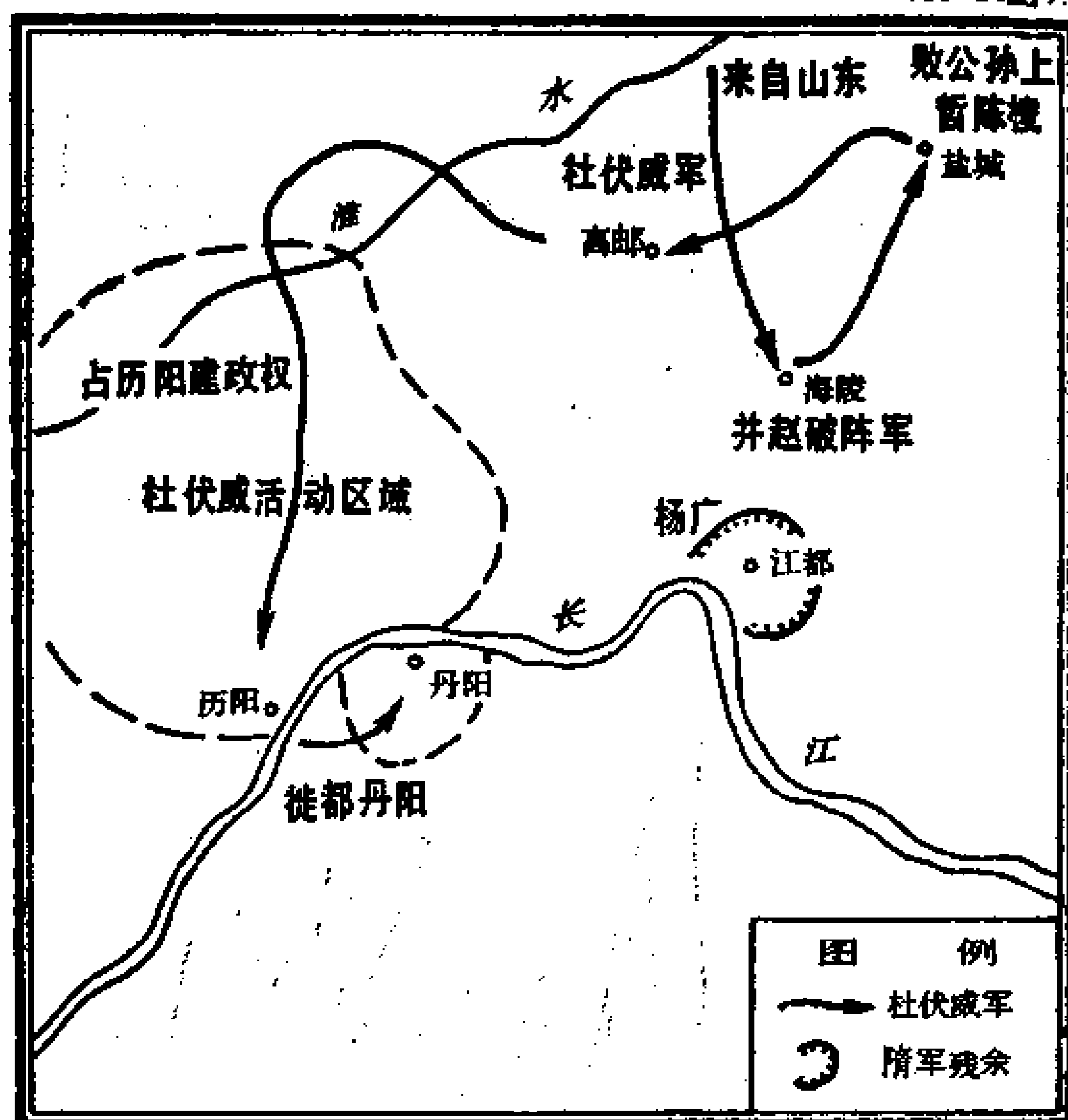
（公元613年）聚众起义，进入长白山一带。杜伏威年仅十六岁，但勇猛过人，出则在前，退则在后，被众推为首领。后下邳苗海潮也率部来归，实力增强，遂转战江淮，杜自称将军。隋曾派宋显来镇压，伏威与之交战后，佯为不胜，将隋军诱入芦苇丛中，然后自上风纵火烧之，隋军官兵都被烧死。海陵（今江苏泰州市）起义军首领赵破阵以伏威年少，轻视他，召之归附。伏威率部前往，使公祏严兵居外，自领十余人携牛、酒往见赵破阵，赵以酒宴待之，伏威就席前杀了赵破阵，其众救之不及，遂归附，合众数万人。稍后，伏威军曾败于隋将来整，伏威负伤，部队损失惨重。后与公祏收余众八千，加以整顿，大败隋将公孙上哲于盐城（今江苏盐城），尽灭其军，起义军声势复振。

时杨广巡幸在江都，感到起义军的威胁，派大将陈棱前往镇压。陈棱坚壁不战，伏威送以妇人之衣，称为"陈姥"，以激怒陈棱出战。陈棱果被激怒，全军出击，伏威率部奋勇迎战，大败陈棱军。陈仅以身免。当迎战时，伏威额上中箭，毫不顾及，并愤怒地说："不杀汝，箭不拔！"驰马冲入陈军阵中，大呼冲杀，激发了士气。此后，杜伏威进破高邮（今江苏高邮），据历阳（今安徽和县），建立政权，自称总管，分兵攻取附近郡、县，江淮间各小支起义军也多来归附，成为一支强大的起义军。

杜伏威善于选锋、用锋。他选精锐五千作为敢死队，名为"上募"，待遇较厚；伏威与之同甘共苦，每攻战，以之为前锋；战后查阅伤势，创在背后的则杀之；如有俘获，必分与部众，故人自奋战，勇不可当。

以上说明杜伏威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和杜伏威个人有智、有勇是分不开的。以后杜伏威徙都丹阳（今江苏南京市），改称大行台，开始进用士人，"缮利兵械、薄赋敛、除殉葬法，民奸若盗及吏受赇，虽轻，皆杀无赦。[22]可见他在政治上也想有所作为。可惜这支起义军政治目的不明确，缺乏战略眼光，满足于既

杜伏威起义军发展情况示意图 (19-10图)



得成果。杜伏威在江淮间屡败隋军后，具有一定实力，如乘唐在中原用兵之际，巩固历阳、丹阳基地，麾师乘虚南向，待领有江南后，再与李唐争衡，形势就会有利得多。但杜伏威见不及此，反在李世民与王世充于中原鏖战之时，降附唐朝，为唐攻取了王世充的梁郡（今河南商丘），并为唐攻破李子通起义军于杭州，占领歙州（今安徽歙县），几乎尽有淮南、江东之地，为唐平定了东南。虽然如此，杜伏威起义军除本身对消灭隋军作出重大贡献外，对瓦岗军、窦建德军的反隋斗争，客观上也起着战略上的

策应、配合作用，其灭隋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

第三　隋末农民大起义的深远历史影响

隋末农民大起义推垮了强大的隋王朝，镇压了一批压榨人民的士族豪强，解放了生产力。从打击士族势力和调整生产关系来看，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以来阶级矛盾的大爆发。从此，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和繁荣时期。毛泽东同志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23]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农民大起义缺乏明确的政治目的，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又没有统一的领导，致力量分散，为李唐各个击破，灭隋的胜利果实为其所窃取。但大起义的影响却极其深远，它为后世人民所继承，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这次农民大起义，也给了略有识见的封建帝王以深刻的教训，不得不向人民让步，用相对减轻剥削和压迫的方法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其统治。这种情况最早反映在李唐的“贞观之治”，从李世民的以下言论，可以看出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隋亡的教训，他教育其后代及臣下说：

“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24]

由此可见，唐初社会历史之所以有较大的发展，曾出现一个较为繁荣强大的时期，其功绩主要应归功于农民大起义。

注　释

〔1〕〔2〕《隋书·食货志》

〔3〕《隋书·杨素传》

〔4〕《通典·食货》

〔5〕〔6〕〔7〕《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七年》

〔8〕杨慎：《古今风谣》

〔9〕《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九年》

〔10〕《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十二年》

〔11〕〔12〕〔13〕〔14〕 《资治通鉴·隋恭帝义宁元年》

〔15〕〔16〕〔17〕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18〕 《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十二年》

〔19〕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20〕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21〕 《旧唐书·窦建德传》

〔22〕 《新唐书·杜伏威传》

〔23〕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88页《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4〕 《贞观政要·论教戒太子诸王》

第二十章　唐统一中国的战争

第一　利用了隋末的有利形势

李渊集团建立唐王朝的战争，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统一战争之一。李渊为陇西大贵族，其祖父李虎曾帮助北周宇文泰建立关中政权，是西魏、北周的八柱国〔1〕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继承祖爵，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受隋炀帝杨广之命，任太原留守。他老谋深算，富有封建政治经验，颇具雄心，受任后曾对其次子李世民说：

> “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2〕而李世民更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史称：“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3〕

说明李氏父子早有乘时利势，争取天下之心。

李渊集团建立的唐王朝，是窃取农民起义胜利果实和兼并割据势力而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其剥削奴役农民的阶级本质虽没有改变，但他们能重建和巩固中央集权，恢复统一的局面，推行较多的革新措施，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其积极的一面。从而使社会的经济基础逐渐扩大，使封建经济的发展远远超过前代。而在群雄逐鹿的时代，要建立和巩固一个新兴的政权，首先有赖于军事上的成功。李渊集团取得建立唐王朝战争的胜利，统一海内，仅用了四年时间（公元617—621年），他们既利用了客观上的有利形势，也尽了主观上的最大努力。

对李渊集团统一全国的有利形势可以综合为以下几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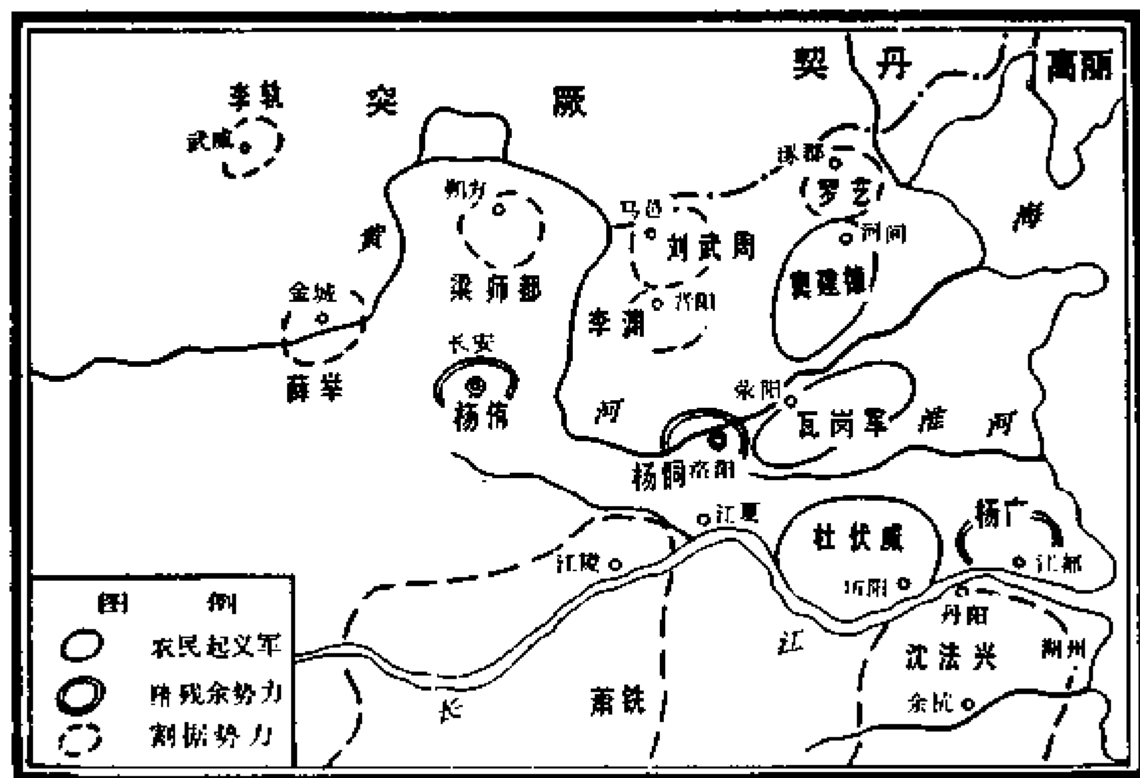
农民起义军摧毁了隋军主力，隋政权基本上已土崩瓦解。隋末，由于杨广的暴政和用兵高丽，激发了全国农民大起义。经过几年战争，逐渐汇合为三支强大的起义军：即中原李密瓦岗军、河北窦建德军、江淮杜伏威、辅公祏军。其中势力较大的首推瓦岗军，威震中原，击杀了杨广的大将张须陀，攻占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起义军一时扩大到数十万人。杨广派王世充率江淮劲卒增援洛阳，但多次被瓦岗军打得溃不成军。洛阳连系着长安和江都，又是最大的粮仓，是隋末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瓦岗军长期围攻洛阳，无异是卡住了隋的咽喉，使隋的国家机器无法运转。

建德起义军在河北发展壮大，消灭了隋涿郡通守郭绚所部，占领了河北广大地区。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又在河间以南消灭了杨广从涿郡调去增援洛阳的薛世雄所部精兵三万人，有力支援了瓦岗军的战斗，肢解了隋对北方的统治。杜伏威、辅公祏先在山东起义，后领军向淮南发展，联合当地的几支起义军，势力日益雄厚。杨广派陈棱去镇压，被起义军击灭。从此杜伏威占有江淮间广大地区，直接威胁江都，遮断了江都与整个黄淮流域的连系。除上述外，林士弘的一支起义军曾控制北起九江、南达番禺（今广东广州）的广大地区，并在虔州（今江西赣州）称楚帝。瓦岗军、窦建德、杜伏威和所有其他起义军，几年间打击、消灭了隋军主力，南北呼应，使长安、洛阳、江都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三个孤岛，基本上摧毁了隋的统治。

在全国农民起义的大好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进一步分裂，促进了隋王朝的灭亡。许多大贵族、官僚、豪强地主纷纷脱离隋王朝，有的是妄图保存自己，免为起义军所消灭；有的是怀有野心，想窃夺农民胜利果实，以求发展。其中较著名的有：罗艺自称幽州总管，割据涿郡（今北京市）；朔方（今陕西横山西北）将领梁师都自称大丞相，以后又接受了突厥的封号“解事天子”；马邑（今山西朔县）将领刘武周，占领本郡，依附突厥，

被突厥封为“定阳可汗”；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起兵，自称西秦霸王；李轨据武威（今甘肃武威）附近各郡，自称皇帝；李渊父子继之在太原起兵；稍后，旧梁后裔肖铣以县令起兵，建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占有两湖及江西、广东部分地区，相当于过去半个南朝；在江、浙地区，吴兴（今浙江湖州）大族沈法兴起兵，占有余抗、丹阳十几个郡，差不多又是半个南朝。隋王朝已经分崩离析。杨广虽知末日将临，但无可奈何，只好坐以待毙。宇文化及利用随同去江都的骁果思念北归，发动兵变，杀掉了杨广，领兵北上，想争霸中原，结果被瓦岗军李密击败，窜入河北，最后被窦建德起义军消灭。洛阳虽然打着隋朝旗号，而大权已落入王世充手中，隋朝实际上已灭亡了。但各起义军之间互不相属，存有矛盾；起义军和各割据势力之间亦存有矛盾；割据势力各集团之间也存有矛盾，相互攻杀，争战不已。以上种种都是李渊集团窃取农民起义果实，夺取全国政权的有利条件。

隋末农民起义军、割据势力形势示意图　（20-1图）



连年战乱，使生产受到破坏，人民生活濒于绝境，渴望统一成为人心所向，所以进行统一战争，是能够取得人民支持的。

杨坚父子横征暴敛，使国富而民穷，连李世民以后也批评过："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4〕隋朝征敛来的米粟、布帛，广设仓库积储，虽极度挥霍，但库藏之多，仍为前朝所未有，直到隋亡，洛阳的布帛还是堆积如山。太原的粮储可以再用十年，唐建国二十年后，西京隋时的储积，还没有用尽。这些储存也为李渊集团进行统一战争准备了物资条件。

能充分利用客观有利形势，本身就是主观努力的重要部分。这方面，李渊集团表现得是很出色的，以下就李渊集团的战略运用分别加以论述。

第二　制定了较正确的战略方针

李渊集团在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五月起兵。当时关中隋军东调洛阳、河东，镇压农民起义军，关中留守兵力不多，故李渊集团起兵之前，有过如下谋议：

李世民、李渊、刘文静（太原令）都认为应先乘虚入据关中。如刘文静曾对李世民说：

> "今主上（杨广）南巡江淮，李密（瓦岗军）围逼东都，群盗殆以万数，当此之际，有真主驱驾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盗入城，文静为令数年，知其豪杰，一旦收拾，可得十万人，尊公所将之兵复且数万，一言出口，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成矣。"〔5〕

世民深以其言为是，即以此劝说李渊。李渊决定起兵，去信连络李密。李密想当盟主，李渊为此曾向其臣属表达战略意图说：

> "密妄自矜大，非折简可致。吾方有事关中，若遽绝

之，乃是更生一敌；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为我塞成皋之道，缀（牵掣）东都之兵，我得专意西征。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之势，以收渔人之功，未为晚也。”[6]

从以上谋议中，看出李渊集团是想先入据关中；尔后“据险养威”边巩固边求发展；然后在各敌对势力相互兼并、削弱、之后，去收“渔人之功”，亦即相机统一天下。这个战略方针是当时形势下必然的产物，因而也是正确的。因为：

1．李渊欲谋取天下，须先占有较巩固的根据地。太原僻处一隅，北受突厥及依附突厥的梁师都、刘武周的威胁，有后顾之忧；南则鞭长莫及，无以“号令天下”。而关中有山川之固，为秦、汉、隋旧都所在，便于号召；且关中地区受战争破坏较小，人力、物力资源较丰富。特别是当时关中空虚，易于乘虚袭取；洛阳隋军遭瓦岗军围攻，也无力西顾。

2．李渊集团和当时三大支起义军及所有的割据势力相比，力量不算强大，要想战胜各方对手，必须有一个“据险养威”以壮大自己的战略阶段。关中从地略上讲，北托长城，西依陇右，东阻潼关，南靠秦岭，易守难攻，既可避开突厥等的威胁，又可不过早地与瓦岗起义军、窦建德起义军冲突，易于实现这一阶段的战略目的。从人事关系上讲，李渊出自关陇贵族，关中亲属故旧较多，容易得到支持。

3．当时，起义军和各敌对势力实力都较强，李渊集团想争夺中原必须有步骤地进行，不可能一举实现。因而预定在边巩固、边发展中，坐看鹬蚌之争，去收渔人之利。这样，费力小，收效大，是极好的战略运用。

李渊集团谋取统一建立唐王朝的战略方针，是在隋王朝已被起义军摧毁之际，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形势制定的，其实质是进取的，而在运用中又是稳健的。战略目的的实现，一般以军事手段为主，但兼用政治策略分化瓦解对手也很重要，在这方面李渊集团的运用也很成功。

这个战略方针的优点，还表现在各个战略阶段相互关照，连系密切。没有前一个战略阶段的胜利，就不可能有后者。而在实现每一阶段的战略目的的过程中，又必须考虑为下一战略阶段创造必要的条件。如李渊集团在巩固关中和与刘武周作战期间，就派人去经略河北、河南，为下一阶段进图中原准备条件等等。

李渊集团由于战略方针的正确，又能坚决贯彻执行，所以成为统一战争的胜利者。

第二　灵活地运用了政治策略

李渊集团深知在当时众多的、不少还比自己强大的对手面前，仅靠军事手段求得统一是不够的。因而在政治上很讲究策略，以争取分化、瓦解对手；对人民，则接受隋朝的教训，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策略，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些策略，运用得很灵活。其主要的有：

1．卑事突厥，减除后顾之忧。隋末唐初，东、西突厥再度强盛起来，在北部的各割据势力，慑其威势，多臣事突厥。李渊起兵之初，也不得不"自为手启，卑辞厚礼"派人向突厥求援，假以"尊隋"为名，说什么"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突厥也看透了李渊心思，表示："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7]但李渊只欢迎突厥的马，不欢迎以兵相助，希望以突厥的马加强骑兵，谨防突厥军队来多了会造成后患。因而李渊对派往突厥的使者刘文静说："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8]当突厥派来兵马时，李渊谢绝了助兵，只购买了突厥的马。李世民事后常以李渊曾卑事突厥一事为耻，曾说："突厥强梁，太上皇（李渊）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9]但在当时，由于这一策略运用，起兵之初避免了突厥以及依附突厥的刘武周等从背后的威胁和牵掣。

2．麻痹李密，得以专意西征。足以影响李渊集团向关中进军的另一势力是瓦岗起义军，它据有洛口附近各仓窖和要隘，进而围逼洛阳，实力扩展到号称十余万之众，控制了河南大部地区。如瓦岗军领导者李密能舍洛阳而西趋关中，则可能捷足先登。李渊考虑及此，派人连络李密。李密复信要李渊去河内（今河南沁阳）会盟，李渊表面推崇，实为麻痹，在致李密的信中说：

“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唯弟早膺图箓（民间有李氏继有天下传说），以宁兆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复封于唐，斯荣足矣……。”〔10〕

这种推崇策略，果然麻痹了李密。他认为李渊尚无争天下的野心，因而继续围逼洛阳，无西向之意。这一策略不仅避免了李密争夺关中，而且还为李渊集团牵掣住洛阳隋军，使它顺利地达到了“乘虚入关”的目的。

3．向人民让步，缓和阶级矛盾。李渊集团起兵之初，就接受隋衰败灭亡的教训，对人民采取让步政策。如军到西河（今山西汾阳）时，李渊亲自慰劳吏民，开仓赈济贫乏。凡是年在七十岁以上的，都给以散官。还亲自挑选人才，口问技能，手注官秩，一天之内，除官千余人。以后每攻克一地，都仿此办理，以收揽人心。攻克长安后，更宣布废除隋一切苛政，与人民约法十二章，规定只有杀人重罪，才处死刑。这些缓和阶级矛盾的策略，得到地主、豪强的支持，也骗取了人民一定程度的信任，对扩大势力起了一定作用。历史上记述当时情况说：“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县长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携，来者如市……”〔11〕表面上看，李渊集团对人民的压榨似乎是轻了一些，但剥削人民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

4．利用政治手段，争取、瓦解敌对势力。李渊集团起兵之后，积极采用政治手段，争取、瓦解起义军及其他割据势力，取

得一些成功。如争取江淮起义军杜伏威的归附，减去一大阻力。又如在进入关中后，为了集中力量对付薛举集团，曾争取到李轨的归附；但当发现李轨另有他图时，又从其内部进行瓦解，因而兵不血刃地消灭了李轨的势力等等。

除上述外，李渊集团在起兵之初，还移缴各郡县，谕以尊立隋代王杨侑之意，以取得隋官吏支持，减少阻力。攻打长安时，命诸军“毋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违者夷三族。”[12]攻克长安后，迎代王杨侑即皇帝位，遥尊杨广为太上皇以缓和隋宗室、重臣的敌意。所有这些，都是灵活的政治策略运用。

第四　进行了周到的作战准备

李渊集团的起兵，作战准备工作也很周到。太原原为北方重镇，贮存有九千万匹布和无数粟米，且为贵族、地主、豪强逃避起义军及中、小地主躲避隋残酷征调的所在，这就为李渊集团起兵提供了人力、物力条件。早在李渊决心起兵之前，李世民、刘文静就已暗中有所筹划和准备，主要的准备，有如下几项：

1．扩大军队，特别是骑兵。李世民、李建成（李渊子）兄弟分别在太原、河东（今山西永济）暗结豪强，培养实力，但军力仍远不敷起兵的需要。因而令刘文静诈作隋王朝敕令，要求太原、西河、雁门、马邑诸郡，年在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的男子都要应征，在年底前到达涿郡去攻打高丽，借此骗得了不少人投靠李渊。此外，李渊很注意骑兵的建设，当他到太原之初，就曾对马邑郡守王仁恭说：“突厥所长，唯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13]

所以简选马邑军之半数，仿效突厥军训练骑兵的办法予以训练。当突厥愿以兵马相助时，裴寂、刘文静等都认为：“今义兵虽集而戎马殊乏，胡兵非所须，而马不可失，”[14]劝李渊选购突厥马五百匹以加强骑兵，已降隋的突厥旧将史大奈也率众来

归，其部众为骑兵。故李渊起兵时，骑兵已有一定实力。当进军到龙门（今山西河津）时，刘文静及突厥康鞘利送来兵五百，马二千匹，李渊喜对刘文静说："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马多，皆君将命之功也。"〔15〕道出李渊喜其马多，有利骑兵扩建的心情。但李渊集团对骑兵如何编组、训练，历史上记载不多，不过从历次有名战役的胜利看，骑兵往往起到主宰战场的作用，说明在统一战争的过程中，李渊集团已逐步建成一支较强的骑兵队伍。

2．招揽人才。李渊集团为了统一天下，在统一战争中，十分注意招揽人才。只要有一技之长，不问门第，兼容并包，量才使用，使各尽所长。到初唐时期已是贤臣华集、猛将如云。文臣武将中，有原是隋王朝旧吏的裴寂、刘文静、房玄龄、李靖、殷开山等；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徐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也有来自敌对势力的降将尉迟敬德、屈突通等等。其所以使人乐为之用，不问出身、用人唯才的政策起了很大作用，李世民气度宽宏，平易近人，对部属结以诚信，不乱猜疑，不吝勋赏，使人愿为效命，史载"世民倾身下士，散财结客，咸得其欢心。"〔16〕他接纳宋金刚的骁将尉迟敬德，足以说明他的明察善断，善于用人。史载：刘武周的降将寻相降而复叛，诸将怀疑尉迟敬德，把他囚禁军中，并请杀之，以绝后患。李世民极不赞同，认为"敬德若叛岂在寻相之后"，急下令释放，并召入卧室，赐以黄金说：

> "丈夫意气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终不信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助，表一时共事之情也。"〔17〕

尉迟敬德由此感激。及后，李世民统兵围逼洛阳，率五百骑巡行战地，在北邙山（在今洛阳北）猝然被王世充所率步骑万余人包围，世充骁将单雄信持槊直扑世民，尉迟敬德奋不顾身地拼命冲杀，保护李世民冲出重围。战后，世民对敬德说："公何相

报之速也！”并厚加勋赏。

3．建立军事机构。为了便于指挥，设立了最高指挥机构大将军府，由李渊自任大将军。府下辖左右军，以长子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统辖王长谐、姜宝谊、阳屯三统军；以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统辖长孙顺德、窦琮、刘弘基三统军。府下分设官吏，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温大雅为记室。其余文武，随才授任。李渊率甲士三万人由太原出发时，以幼子元吉为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北防突厥，南援主力。同时，派张纶镇抚稽胡（少数民族，居今山西、陕西北部山谷间），以保障向关中进军右侧背的安全。

从以上种种措施，可以看出李渊集团起兵时的作战准备工作，是颇为周到的。

第五　战争进行中决策果断，指挥卓越

李渊集团按照入据关中，边巩固、边发展，然后相机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指导战争进行，在每个战略阶段都产生过重要决策和一二次关键性战役，它们都属于关系到战争全局“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问题。如入据关中过程中“退”与“进”的决策和霍邑之战；边巩固、边发展阶段的浅水原之战、河东决策和柏壁之战；决胜中原阶段的“一举两克”决策和虎牢之战等等。而这些问题多由于李世民的决策果断和卓越的作战指导，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

一、入据关中

（一）“进”与“退”的决策和霍邑之战

当李渊集团起兵的消息传到长安后，隋代王杨侑就派宋老生率兵三万进屯霍邑（今山西霍县），屈突通率军扼守河东（今山西永济西），防其西进。李渊军沿汾河南下，到了贾胡堡（在霍县西北），距霍邑仅五十余里。因连日阴雨，军队前进困难，且

军中乏粮，刘文静向突厥请援也尚未归来，又传说刘武周将联合突厥进袭太原，李渊遂召集将领会商，讨论行止。

裴寂等认为：

“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

李世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认为：

“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武周虽远利太原，岂可近忘马邑！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今遇小敌，遽已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何以自全。”〔18〕

这是一个很精辟的全面情况分析，李建成同意世民的意见。但是，李渊却同意裴寂等的主张，且已命令退军。李世民力争，继之以泣谏说：

“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19〕

李渊这才改变主意，世民、建成亲往追回已退走的部分军队，继续向霍邑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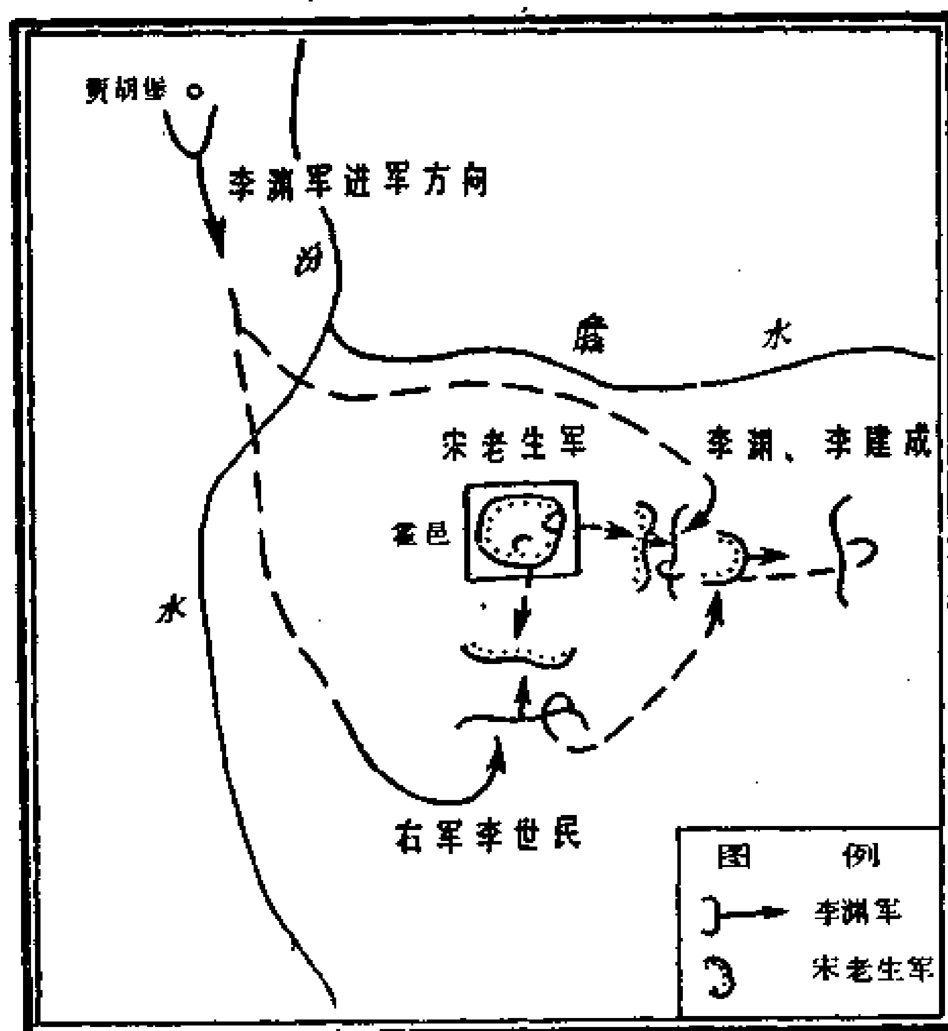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八月，雨止。李渊军沿山间小路奔趋霍邑。李渊怕宋老生据城固守而不出战，而建成、世民认为：

“老生勇而无谋，以轻骑挑之，理无不出；脱其固守，则诬以贰于我。彼恐为左右所奏，安敢不出！”〔20〕

李渊认为判断正确，亲率数百骑兵到霍邑城东等待步兵，并命建成、世民各率数十骑，举鞭作势，若将围城状，且诟骂之，同时召后军继续前进。宋老生大怒，率军三万自东门、南门分路而出。这时李渊后军已到，李渊打算让部队先食而战，但李世民认为时不可失。李渊遂命建成的左军在城东门布阵，世民率右军阵

于城南。两军接战后，城东李渊、李建成交战不利，稍向后撤，宋老生遂离城向东推进。李世民在城南发现宋军右侧翼暴露，即引兵自城南直插宋军阵后。李渊、李建成军士气复振，回军再战，并扬言已俘宋老生，宋军遂溃。李渊军斩宋老生，攻克霍邑，并以所俘宋军充实了军力。

霍邑之战示意示意图　　（20-2图）



霍邑之战是李渊集团入据关中战略阶段的关键性战役。由于初战胜利，大大鼓舞了士气，打击了隋军，为入关铺平了道路。“进”与“退”的决策，更是关系统一战争成败的战略决策。因为当时形势特点是李渊集团实力并不强大，而且刚刚起兵，士气至关重要；关中战略地位重要而空虚，觊觎关中地盘的还大有人在，如薛举就有意关中；柴孝和也曾向李密建议舍洛阳而入关中

以图天下，因而李渊集团这一阶段战略行动的要点在乘虚，要求行动迅捷，稍一迟疑，良机即失。如关中先为其他势力捷足先登，则李渊集团在统一战争中的形势就很不利了。李世民在这一决策中，对情况的分析全面、深刻、正确，决心果断，说明他头脑清晰，着眼全面，富有积极进取精神。

霍邑之战在战役指导上，避免攻坚，诱敌出战，也很可取。否则，旷日持久，就会影响迅速进军，达不到乘虚的目的。李世民在战斗中发现敌人暴露翼侧，及时勇敢坚决地进行侧击，是战役胜利的另一重要原因。李世民在起兵后初露锋芒，显示了他的指挥才干。

（二）河东决策和攻克长安

霍邑之战后，李渊军乘胜连克临汾，绛郡（山西新绛），进抵龙门，骗取了农民起义军孙华的归附。李渊率主力围攻河东（郡），派王长谐等在孙华的协助下渡黄河设营，以切断河东隋军退路。由于隋将屈突通在河东凭坚固守，李军没有进展，由此李渊军中发生了一场攻打河东还是进取长安的战略争论。薛大鼎主张不攻河东而直趋长安，他向李渊建议：

“请勿攻河东，自龙门直济河，据永丰仓，传檄远近，关中可坐取也。”

李渊想同意他的意见，但不少人反对，主张先攻取河东。

裴寂认为：

“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退为河东所踵，腹背受敌，此危道也。”

李世民不同意裴寂意见，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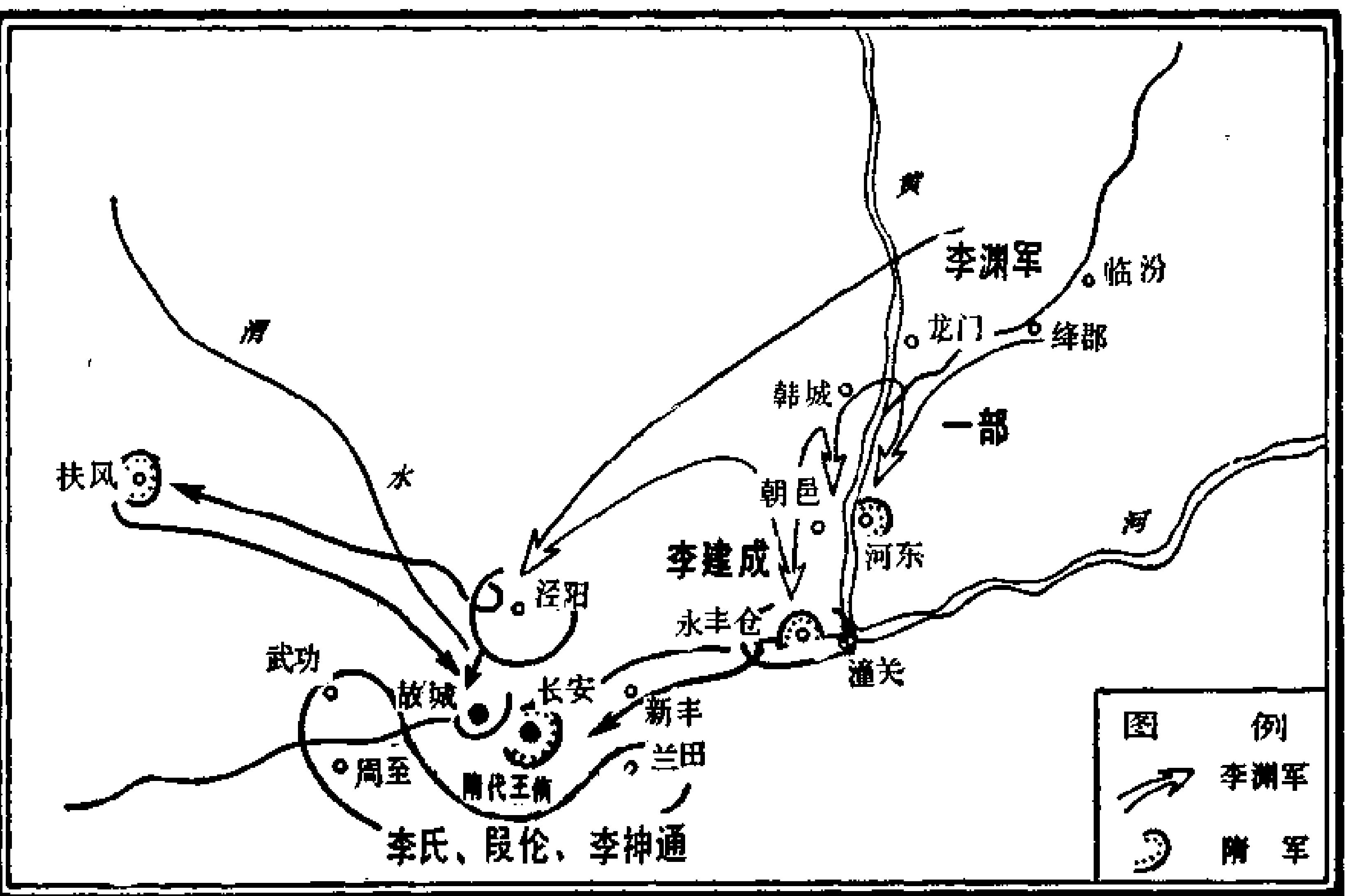
“兵贵神速，吾席累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西，长安之人望风震骇，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取之若振槁叶耳，若淹留自弊于坚城之下，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坐费日月，众心离沮，则大事去矣。且关中蜂起之将，未有所属，不可不早招怀也。屈突通自守虏耳，不足为虑。”〔21〕

李渊对以上两种主张，采取兼顾而以进军为主的决策，即留部分兵力继续围攻河东，亲率主力向关中进军。这一战略决策对李渊集团原定的“乘虚入关”方针，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形势变化急骤，稍有迟疑，能否顺利入关就成问题。因而这一决策既着眼于进军速度，又考虑了后背的安全，是较为稳健的。李军渡河后，声势大振，李孝常以永丰仓（在今陕西华县境）降，靳孝谟以蒲津（今陕西大荔东）、中潬（在今蒲津西黄河中）二城降；关中郡县、地主豪强降者接踵而至。由于李孝常的投降，李建成等得以顺利占领了永丰仓，不仅保障了军民粮食，且切断了洛阳、长安间连系，可以防东方之兵，使李军战略形势更为有利。李渊自己屯朝邑（今陕西大荔东南）指挥，派李世民率军经略渭北。李世民军所到之处，收编隋军和诱降小支农民起义军，短期之内，号称“胜兵九万”，设营在泾阳（今陕西泾阳）。在关中的李渊亲族，如其女李氏，婿段纶、族弟李神通等也起兵响应，并招纳各小支起义军，人数多达十万人，占领兰田、盩厔、武功、始平等地。继而李世民派刘弘基攻取扶风（今陕西凤翔），收众南渡渭水，李世民率所附诸军屯军在长安故城。此时，李渊亲族部队，也统归李世民指挥，陕北各郡县纷纷请降。李渊见攻取长安的时机已至，便推进到冯纶（今陕西大荔）指挥，命李建成自永丰仓经新丰(今陕西临潼)到长乐宫（在今长安东北），与李世民军完成了对长安的合围，李军实力达二十万人。李渊遂又推进到长安东北，指挥攻城。因双方兵力悬殊，未经激烈战斗，就攻占了长安，完成了入据关中的战略任务。

李渊集团自起兵到攻克长安，完成第一阶段战略任务，仅用了四个月时间。霍邑之战是关键性战役，战役进行前，“退”与“进”的决策是关键性决策，奠定了入据关中的基础。河东决策继续贯彻乘虚，快速精神，果然使长安隋代王杨侑等“智不及谋，勇不及断”。另一重要原因是李渊集团利用瓦岗军牵掣着洛阳隋军，并骗取了关中不少小支起义军的归附，扩大了自己军

李渊集团进军关中、攻克长安示意图

（20-3图）



力。李渊集团向关中进军的战略部署，也是很成功的。如派王长谐等占领河西，就保障了翼侧安全，孤立了屈突通；以有力一部占据永丰仓，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李世民的经略渭北，既扩展了实力，又孤立了长安，迫使关中郡县降服；且渭北在地略上对长安有屏障作用，屏障已失，长安纵有强兵，也难长期固守了。李渊集团亲族的起兵，直接从南、西威胁长安，造成声势，对攻取长安，也起了一定作用。

李渊集团战略第一阶段的胜利，为统一战争下一阶段的进行，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

二、边巩固、边发展

李渊集团占领长安后，仍以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到隋炀帝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杨广在江都被宇文化及所杀。五月李渊就皇帝位，国号唐，改元武德。宇文化及杀掉杨广之后，留陈稜守江都，自己想西返长安，但在童山（今河南浚县西南）被瓦岗军击败，宇文化及率残部北逃。在此之前，唐为巩固关中，扩大地盘，派刘文静等出潼关略取新安（今河南新安）以西地区；派郑元寿、马元规等略取南阳（今河南南阳）、荆襄地区；李孝恭略取汉中、巴蜀地区。唐还曾趁王世充（以后代杨侗称帝）和瓦岗相争之际，派李建成、李世民率军东出潼关，欲收渔人之利。但当唐军到达时，瓦岗军对洛阳的进攻并不积极。洛阳隋残余势力内部有人见唐军势盛，想作内应献洛阳城，李世民认为关中尚不巩固，过早地占有洛阳与瓦岗军直接敌对，与总的战略形势不利，因而仅在新安、宜阳（今河南宜阳西）设郡、留兵镇守，自率军返关中。李世民这一战略着眼，目光远大，颇合兵法“城有所不取”[22]的原则。李孝恭顺利进入巴蜀与关中合成一片后，唐的势力范围已超过任何一个对手，但刘武周盘据于北，薛举集团窥伺于西，梁师都在朔方，李轨在武威，都威胁关中，如何对付这些割据势力，仍是唐这一阶段战略的中心任务。

（一）浅水原之战

当时关中形势是，刘武周远在马邑，且有李元吉在太原对他监视，一时不致为患；朔方梁师都想勾结突厥进犯关中，被唐以金币贿突厥而未实现；唐对李轨采取安抚策略，争取了他的中立。对关中威胁最大的是薛举集团，当李渊到长安尚不及一个月，薛举就曾进攻扶风，被李世民所击退。李渊称帝后，薛举再次进攻长安，李世民于高墌（今陕西长武北）抗击，因轻敌，在浅水原被薛军掩袭而大败，损失兵力十之六、七，李世民率军回长安休整。薛军原拟乘胜直扑长安，因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果继位，暂时停军折墌（今甘肃泾川）。唐为消灭薛军，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冬，再次以李世民为元帅，出兵进击薛军，发生了唐王朝这一战略阶段中有名的关键性战役之一——浅水原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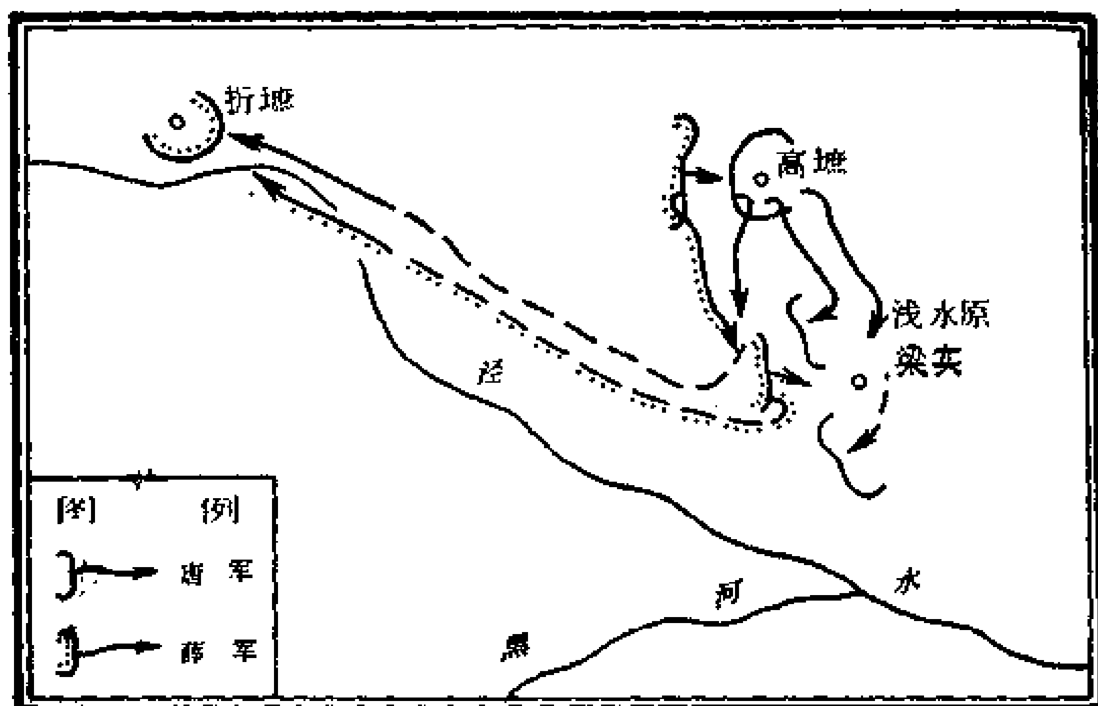
李世民第一次浅水原之败，旧史记载是因李患病疾，将军务交刘文静等指挥所致，可能是事实，也有可能是为李世民战败掩饰。但李世民却在那次战败中吸取了教训。唐军再次到高墌后，就坚壁不出，采取了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作战指导。薛举派其大将宗罗睺挑战，唐军将领多次请战，世民均不许。认为：

“我军新败，士气沮丧，贼持胜而骄，有轻我心，宜闭垒以待之。彼骄我奋，可一战而克也。”[23]

两军相持六十余日，薛军粮尽，其将梁胡郎等来降，李世民判断薛军将士离心，认为决战时机已至，乃命梁实布阵于浅水原（今陕西长武西北）以诱薛军。宗罗睺求战心切，尽力来攻，但梁实扼险据守，在营中乏水，人马不饮者数日的困境中，坚决抗击薛军攻击。李世民见薛军已疲，又增派庞玉在浅水原南布阵，增强吸引薛军的兵力，自己亲率大军自浅水原北出其不意地出击薛军背后，李世民率精骑冲入敌阵，前后夹击，薛军大败溃走。李世民率二千骑追击，窦轨叩马苦谏说：仁果犹据坚城，虽破罗睺，未可轻进，请且按兵以观之。”“世民说：“吾虑之久矣，破竹之势，不可失也”。[24]遂率兵疾追，进至折墌城。仁果先背城列阵，见唐军攻势急猛，又引兵入城据守。唐军继续围攻，薛

军士气低落，纷纷缒城投降，仁果计穷力拙，也被迫出降，唐军收编薛军精兵万人。

浅水原之战示意图　　（20-4图）



第二次浅水原之战的胜利，使陇右地区尽为唐所有，既巩固了关中，又扩张了实力，消除了西顾之忧。战后诸将争问李世民在一战而胜后，舍掉步兵，又无攻城工具，只率轻骑追击而能轻取折墌的道理。世民说：

> “罗睺所将皆陇外之人。将骁卒悍；吾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斩获不多。若缓之，则皆入城，仁果抚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则散归陇外，折墌虚弱，仁果破胆，不暇为谋，此吾所以克也。”〔25〕

诸将听后，莫不悦服。浅水原之战，是李渊父子起兵以来，由李世民指挥的歼敌比较彻底的一个战役，是以兵法“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26〕原则为指导的，充分表现了李世民的指挥艺术和他的机智、勇敢。如诱敌出击，有意制造敌之暴露侧翼，为出敌不意创造了条件；又如对薛军的追击，猛而急，使薛军来不及

收容和重新组织抵抗等等。这些出色的作战指导和行动，是建立在深刻分析敌情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上的。说明作为战役指挥员，必须善于知己，长于知彼，然后按照自己的意志，主宰战场，灵活地运用攻、防、追、退各种作战方式，达到彻底歼敌的目的。通过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得到了锻炼，为指挥以后诸战役取得了经验。

（二）河东决策

经过浅水原之战，李渊在关中得到进一步巩固。但在此战役前后，各方面形势也起着对唐有利或不利的变化。其主要的有：瓦岗军在击败宇文化及后，力量有所削弱，且内部出现矛盾，结果在洛阳附近被王世充击败，瓦岗军解体，李密率残部降唐，驻黎阳仓（河南浚县境）的瓦岗军将领徐世勣也降唐，仍驻守该地。这样唐不仅扩大了地盘，而且收集了瓦岗军余部，大大充实了军力。王世充战胜瓦岗军后，实力也有所增强。但王虽在洛阳称帝，其内部并不巩固，瓦岗军降将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等转而投唐。窦建德起义军在河北消灭了宇文化及，实力大增，正压迫唐派往河北的李神通部，李被迫退向河南，依附徐世勣。河北罗艺、江都陈棱因敌不过附近起义军，罗艺降唐，陈棱降杜伏威。杜伏威在江淮地区有所发展，但也表示归附于唐。江南萧铣、沈法兴等势力虽有发展，但无力与唐争夺中原。河东屈突通在李渊攻取长安时曾率兵回救，受阻于唐军，被迫投降，仅隋将王行本仍困守河东。同时，唐通过李轨部将安修仁之兄安兴贵，从内部对其进行瓦解，河西悉平，西方的威胁完全消除了。其他较小的割据势力及小支农民起义军，对唐在关中的统治已无重大影响。综合以上形势，各割据势力和起义军中能够与唐争夺中国统治权的只有王、窦两大集团。唐本可乘胜东向，平定中原，但在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月，突厥唆使刘武周向唐发动进攻，袭陷榆次（今山西榆次）。此时，易州（今河北易县）起兵将领宋金刚被窦建德起义军战败，投靠刘武周。武周令宋金

刚进攻太原，唐军数次增援，均被宋所败。九月，李元吉放弃太原逃至长安，晋州（今山西临汾）以北除浩州(今山西汾阳)外，全落入刘军之手。十月，宋金刚又攻下浍州（今山西翼城），夏县农民吕崇茂因反对裴寂的坚壁清野，聚众起兵，响应刘军反唐。据守蒲阪的隋将王行本，亦与武周相呼应，河东有尽失的可能，因而关中震动。在上述形势下，唐廷对如何应付河东形势，发生了“争”与“弃”的分歧。

李渊认为：

“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

李世民不同意这种消极主张，上表说：

“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富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27]

李渊同意了李世民意见，尽发关中兵，令世民统率往讨刘武周。十一月，唐军乘坚冰由龙门方向渡过黄河，屯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浍州宋金刚军主力对峙，进行了这一战略阶段的第二次关键性战役，即柏壁之战。此时此刻，河东决策关系到唐统一的战略全局，如按李渊主张，放弃河东，宋金刚与王行本会合，引兵西向，唐不但无法东向以争天下，关中失去河东屏障也势难巩固。李世民的主张，是积极的，是从统一战略全局考虑的，只有恢复河东，巩固关中，才能贯彻原定统一的战略方针；向河东进军，由龙门方向渡河，处于战略外线，便于出兵汾、隰，进扰刘军后方，着眼也是很好的。

（三）柏壁之战

李世民屯军柏壁后，秣马休兵，坚壁不战。十二月，唐军李孝基部攻夏县吕崇茂，宋金刚派尉迟敬德、寻相来救，内外夹击，唐军大败。但当尉迟等回军浍州时，李世民派秦叔宝、殷开山邀击之于美良川（今山西闻喜南），大败之。不久，尉迟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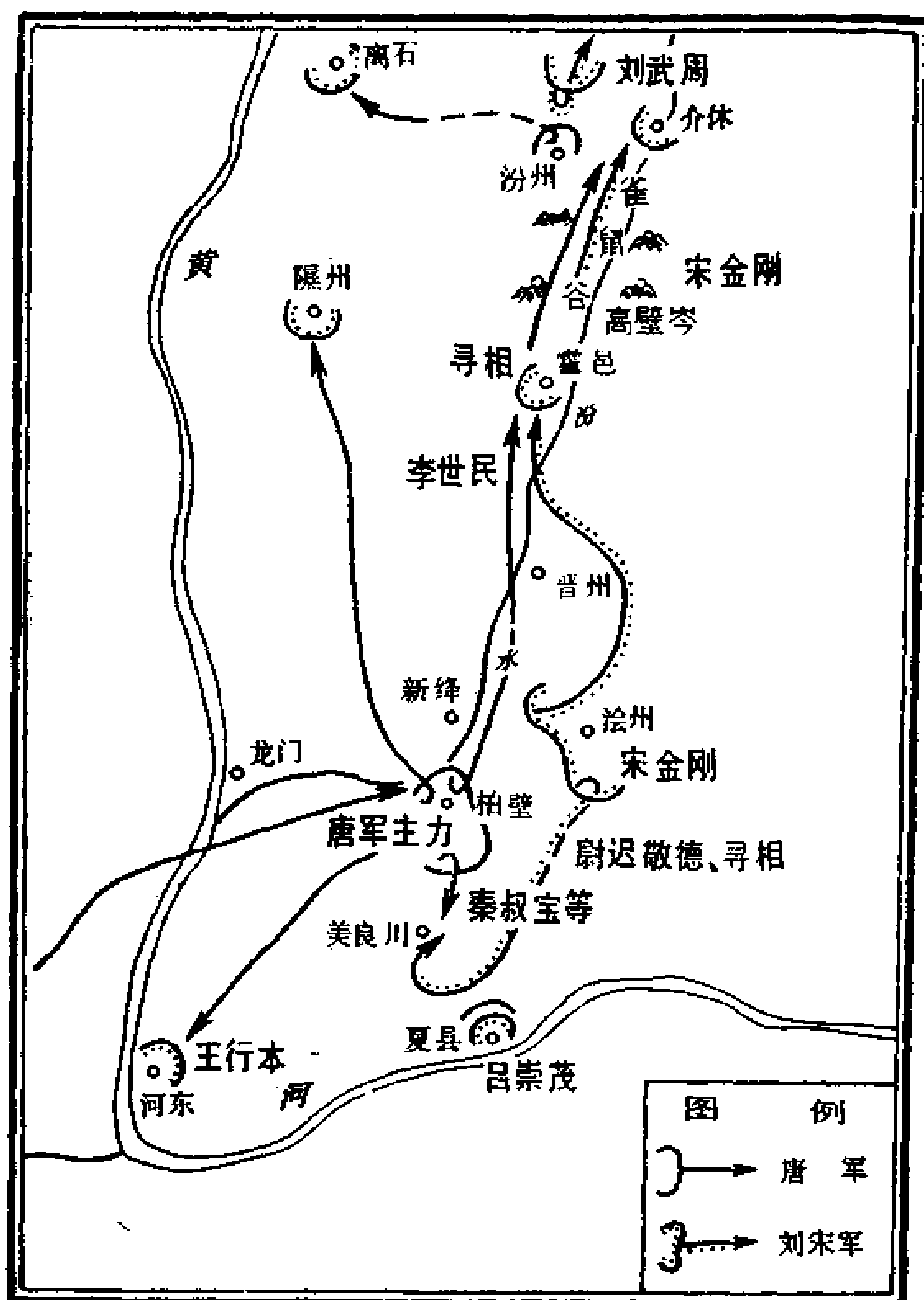
德、寻相又暗引精骑往援河东王行本，李世民亲率步骑三千从间道截击，大破宋军，尉迟敬德、寻相仅以身免，全俘其众，回军柏壁。于是唐军士气大振，诸将都请李世民与宋军决战，李世民向诸将分析情况，认为时机还不成熟，他说：

“金刚悬军深入，精兵猛将，咸聚于是，武周据太原，依金刚为扞蔽。军无蓄积，以虏掠为资，利在速战。我闭营养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28〕

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正月，唐军击降王行本于河东；三月，李仲文、张纶又击败刘军于汾州，进至石州（今山西离石），战略形势对唐军更为有利了。四月，宋金刚军中粮尽，向北逃走，李世民紧追不放，追及寻相于吕州（今山西霍县），大破之。乘胜再追，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次。到高壁岭（今山西灵石南），刘弘基拉住李世民的马辔谏说：“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已足矣，深入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留壁于此，俟兵粮毕集，然后复进，未晚也。”李世民说：“金刚计穷而走，众心离沮，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计立备成，不可复攻矣。吾竭忠徇国，岂顾身乎！”〔29〕遂策马而进，进入雀鼠谷（山西介休西南）峡谷，追及宋军主力，一天中八战八胜，俘杀共数万人。李世民至此不食已二日，不解甲已三日了。以后，又追歼宋军残部于介休，尉迟敬德、寻相投降，刘武周、宋金刚逃奔突厥，李世民留李仲文镇守太原，自己率主力回军关中。

柏壁之战的胜利，唐军恢复了太原重镇，消灭了刘、宋军及隋残余势力，使河东更为巩固、安定，军队在作战中得到了锻炼，为统一全国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在作战指导上，李世民再一次采用后发制人的行动也很成功。特别是他不避艰难，不顾疲劳，猛打、穷追连续作战的顽强作风，是古代战役中较典型的战例，给后人以极有益的启发。

柏壁之战示意图　（20-5图）



三、决胜中原

唐军在河东作战期间，东方局势继续起着变化。各割据势力兼并大、小农民起义军。以洛阳为中心的王世充集团，续有发展；肖铣集团地盘扩展得很大，但志在保守，无问鼎中原之志；河北窦建德起义军，多次击破隋军，并俘唐将李神通、徐世勣，占领黎阳，实力增加，且颇得人心。因而此时对唐来说，较大的对手仍然是窦、王两大势力。但唐除已确保关中外，陇右、河东、巴蜀广大地区已全在某控制之下，实力已超过任何一个割据势力。特别有利于唐的形势，是窦建德因王世充称帝，与王发生矛盾而断绝了往来，窦建德占黎阳后和王世充的势力已直接对抗。

（一）围逼洛阳

还在河东作战期间，唐已为这一阶段战略行动作了一些准备。除派兵遣将和派游说之士到东方活动外，以李孝恭、李靖经营巴蜀，训练水军，伺机出击，以牵掣肖铣。在军事上进行了重要改革，就是"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30]这种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对巩固后方、补充兵员、供应军食都起了良好作用。柏壁之战的胜利，振奋了唐军士气，因而不待休整，即举军东向，目的在于各个消灭窦、王两大对手，以达到统一全国的目的。

唐高祖武德三年（公元620年）七月，李世民率大军进入河南，王世充也加强了洛阳的防守。但唐军一经压境，洛阳附近郡县，就呈现了动摇，纷纷降唐，使唐军得以顺利地完成对洛阳的合围：史万宝自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南据龙门（今洛阳市南），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今河南沁阳）；王君廓自洛口（今河南巩县北）切断王军粮道；黄君汉自河阴（今河南孟津）利用水路攻占回洛（今洛阳市东北），李世民率主力屯军北邙（今洛阳市北），策应各军围攻洛阳。王世充在唐军临近的时

候，曾向窦建德求援。窦的谋士刘彬认为应该同意王的请求，他分析形势说：

“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王世充称帝，国号郑）得河南，夏（窦建德称帝，国号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举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矣。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既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31〕

窦建德采纳了刘的建议，一方面答立去援救洛阳，一方面派人去劝说李世民罢洛阳之兵，自己率军继续攻打孟海公。李世民有意不遣返窦的使者，继续围攻洛阳。但洛阳是坚城，发挥不了李世民善于野战的长处，因而自八月到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初，屡战无功，将士多疲惫欲归。刘弘基向李世民建议回师，李渊也有休兵之意。但李世民认为：

“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

乃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32〕以表示决心，稳定士气。

唐高祖武德四年三月，窦建德军在周桥（今山东曹县东北）兼并孟海公部起义军后，亲率军十余万人援救洛阳，连下管州（今河南郑州）、荥阳、阳翟（今河南禹县），水陆齐发，向西进逼，屯军在成皋（今河南荥阳西）的西原。

（二）“一举两克”的决策

唐军面临坚城未下、强敌骤至的情况，内部产生两种不同主张。

宋州刺史郭孝恪认为：

“世充穷蹙，垂将面缚，建德远来助之，此天意欲两亡之也。宜据武牢（即虎牢，唐祖名李虎，故讳而改武）之险

以拒之，伺间而动，破之必矣。”

记室薛收同意郭的意见，并进一步分析情况说：

“世充保据东都，府库充实，所将之兵，皆江、淮精锐，即日之患，但乏粮食耳。以是之故，为我所持，求战不得，守则难久。建德亲率大众，远来赴援，亦当极其精锐。若纵之至此，两寇合从，转河北之粟以馈洛阳，则战争方始，偃兵无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率骁锐，先据成皋，历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

李世民很赞同他的分析和建议，但肖瑀、屈突通、封德彝等认为唐军已疲惫，洛阳也不易攻下，窦军锐气正盛，有腹背受敌危险，不如“退保新安，以承其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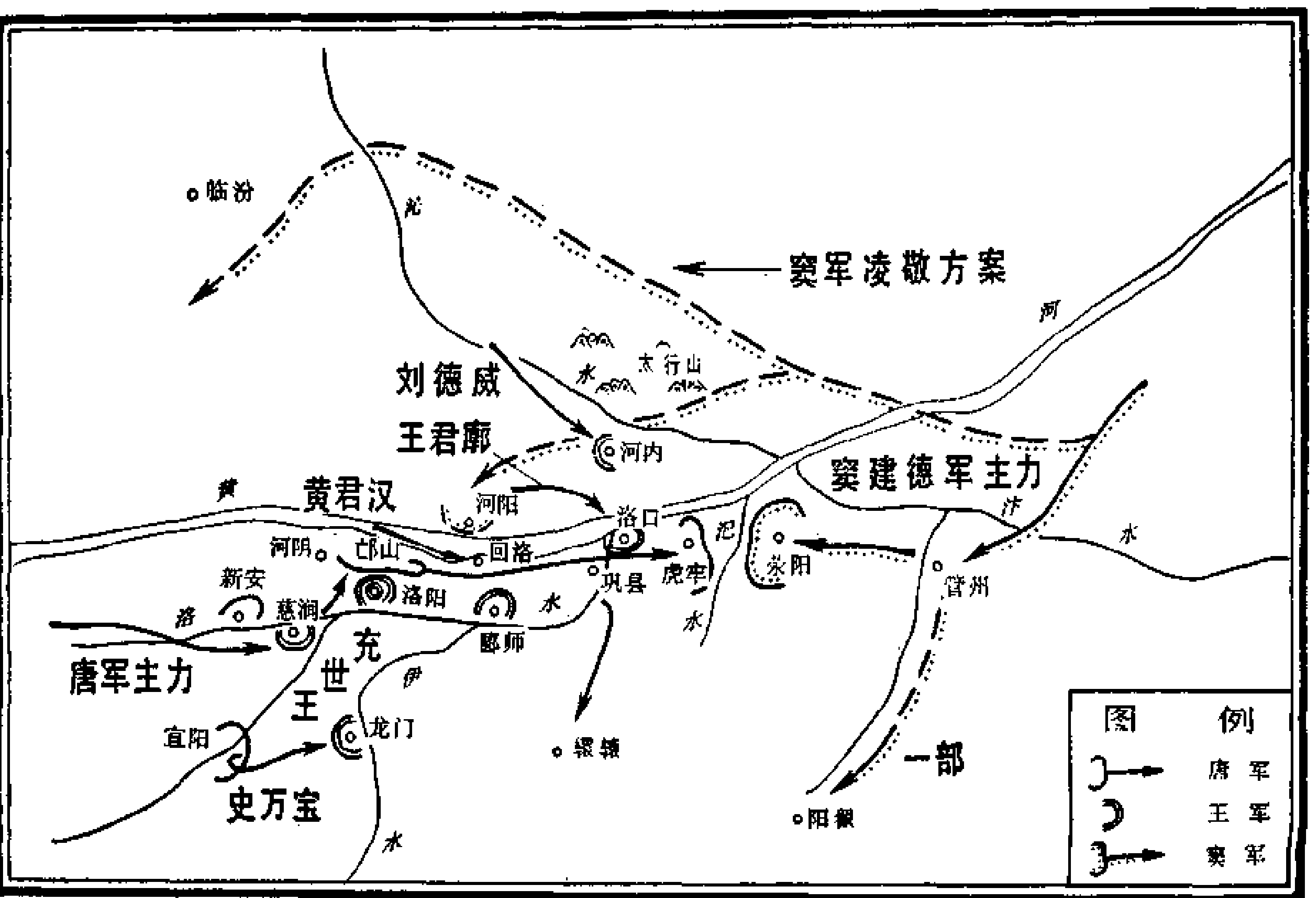
李世民对以上两种不同意见决断说：

“世充兵摧食尽，不烦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将骄卒惰，吾据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旬月之间，世充自溃。城破兵强，气势自倍，一举两克，在此行矣。若不速进，贼入武牢，诸城新附，必不能守；两贼并力，其势必强，何弊之承！吾计决矣。”〔33〕

这个“一举两克”的决策，决定了中原决战的胜利。李世民所以断然出此，基于对洛阳“可以坐克”的判断。按史书记载，因唐军断洛阳粮道，城中乏食，绢一匹只换三升粟米，布十匹才换盐一斤，“服饰珍玩，贱如土芥”，草根木叶都吃尽了，军民都身肿体弱，已临绝境。其次，对窦军“将骄卒惰”，判断得也很准确。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各个歼灭两大对手是可能的。如果采取消极的退守主张，旷日持久，对唐军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影响到统一战略的早日实现。

李世民决心既定，命李元吉、屈突通等继续围攻洛阳，亲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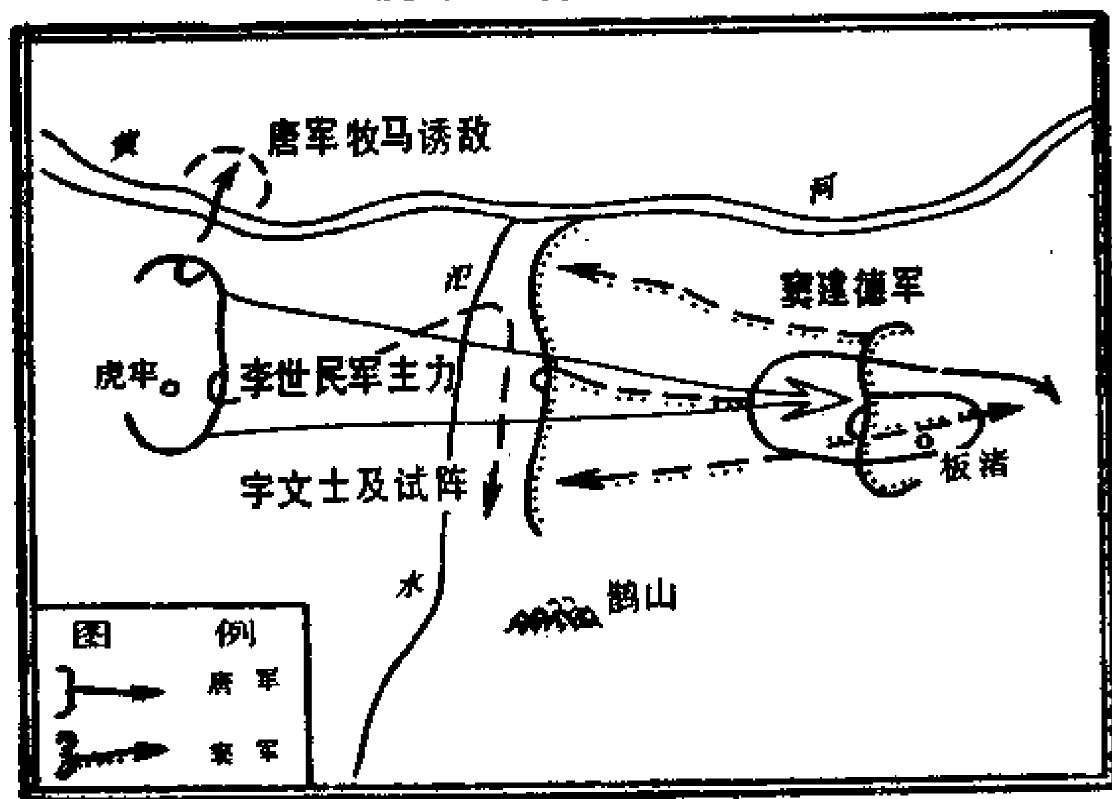
唐军围攻洛阳经过及“一举两克”决策示意图　（20-6图）



骁勇三千五百人作先锋，东奔虎牢（今河南荥阳西）。

（三）虎牢之战

虎牢之战示意图　（20-7图）



唐军和窦建德起义军虎牢之战，是唐军与王、窦两大对手决胜中原的战略决战。窦军到达虎牢（河南汜水）东原，立即占领附近各要点，又分兵占领阳翟，但犹疑不决，没有继续发展，失去战略外线的有利形势。

李世民亲率精锐白天经洛阳城外驰奔虎牢，王世充在城头望见，摸不清唐军意图，不敢出击，唐军顺利到达虎牢。李世民到虎牢后，率精骑五百东出二十里，侦察窦军情况，并诱其出击，然后设伏消灭小股窦军，以挫其锐气，使其不敢逼近虎牢。两军相持月余，窦军数失利，将士思归，士气开始低落。稍后，唐将王君廓又抄袭了窦军粮道，俘其大将张青特，更陷窦军于不利。此时，窦建德的谋士凌敬建议：

“大王悉兵济河，攻取怀州、河阳，使重将守之，更鸣

鼓建旗，逾太行，入上党，循汾、晋，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则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形势益强；三则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以易此。”〔34〕

建德犹疑未决，而王世充遣使告急，不绝于途，并以金玉贿赂窦军诸将，暗中阻挠凌敬方案的实行。建德以为士气甚高，如果决战，可以取胜，虽凌敬固执力争，也不采纳。建德妻曹氏晓兵略，也劝建德说：

“祭酒（凌敬官国子祭酒）之言不可违也，今大王自滏口（太行八陉之一）乘唐国之虚，连营渐进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关中，唐必还师自救，郑国何忧不解！若顿兵于此，老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35〕

建德仍坚持此来是救郑，不能背信舍之而去，不考虑她的意见。凌敬方案是针对当时形势化被动为主动的方案，如果实施，虽洛阳未必能救，但可远袭唐军侧后，威胁关中，既可避免被消灭的危险，且可扩大实力，有继续与唐军抗衡的可能，就当时情况说，是有战略远见的可行方案。

武德四年五月，唐军得到窦军将趁唐军马料食尽去黄河北牧马时，袭击虎牢的情报。李世民将计就计，亲率军渡河牧马，并留马千余匹于河边以迷惑窦军。窦建德果然中计，命令全军出动，自板诸出牛口布阵，北依大河，南抵鹊山，西抵汜水，宽约二十余里。窦军这是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李世民亲自登高觇视窦军情况后，对诸将说：

窦军“起山东，未尝见大敌，今渡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陈（阵），有轻我心；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陈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与公等约，甫过日中，必破之矣。”〔36〕

果然，窦军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都坐在地上，并争取饮水，队伍混乱。李世民令宇文士及率三百轻骑经窦军阵前由北向南驰行，并告诫他如见敌阵严整不动，应迅速回军；如阵势

动摇，就趁势冲击。宇文士及率队出动后，窦军阵势果然动摇，适唐军放牧的马也归营，李世民立命全军出击。他亲自率轻骑先进，大军继后，过汜水，直冲敌阵。窦建德正在和群臣朝会，唐骑骤至，仓促应战。李世民率史大奈、秦叔宝、程知节等轻骑冲入窦军阵地后，卷起唐军旗帜，直贯敌后，又复张其旗帜，使窦军陷入大混乱，向东溃退，唐军追杀三十余里，俘窦军五万余人，窦建德也因伤被俘。李世民回军洛阳后，以窦建德示王世充，王不得已请降，实现了李世民“一举两克”的企图。

中原决胜后，唐军又先后两次击败窦建德旧将刘黑闼于河北。李孝恭、李靖乘势消灭了萧铣集团；李靖又镇压了杜伏威部辅公祏起义军。其余较小割据势力纷纷降唐，由是唐统一全国的战争以胜利宣告结束。

王、萧两集团，是隋王朝的残余，内部腐朽，矛盾重重，其灭亡是必然的，惟窦建德起义军在灭隋作战中，功绩昭著。窦建德虽然也建立了封建王朝，但他个人始终保持农民本色，生活俭朴，政治清明，深受河北人民的拥戴。他的失败，在于军事经验不如李世民，也未能采纳比较稳健的凌敬方案，以致遭到覆灭，是值得惋惜的。李世民在决胜中原之战中所以能“一举两克”，在于他战略眼光远大，斗志坚强，坚持积极决策；在执行时，对强大对手仍采取后发制人的作战指导，用种种方法迷惑、欺骗对方，以创造战机。虎牢之战的作战指导，采用以精锐从中央突破直捣对方统帅部，并突贯阵后再回军冲击的办法，使窦军陷入混乱，以局部胜利，影响全局，创造了我国古代以少击众的典型战例之一。

兼论李世民的军事才能

李渊集团所以能够取得建立唐王朝战争的胜利，和李世民的卓越军事活动是分不开的。李世民在战略上不畏强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为贯彻统一战略方针，他总是积极、主动战略决

策的主张者或支持者。就是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也不为敌人表面现象所吓倒，而是以自己的主观努力，化弱为强，化被动为主动，从而战胜对手。在战役指导上，他基本上是采取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方针，非常重视敌人，持重、稳健，条件不成熟，虽诸将百般请战，他都不许。不是一遇到敌人就想打，而是先创造条件，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一经出战，就锐不可当。兵法上“始如处女，动如脱兔”这句话，形容李世民的战役行动是很恰当的。从李世民在建立唐王朝战争中的功绩和表现来看，他不愧为我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但也应该指出，李世民的才能不是天生就有的，他的才能很多是产生在群众智慧之中，就是善于采纳正确意见而作出决断。而战争的锻炼，使他在军事上日渐成熟，是更重要的条件。他较为突出的军事才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一）重视敌情，善于掌握情况，分析情况精辟深入，判断准确

李世民无论是在战略决策或战役指导上都很重视敌情的掌握，与敌相遇，首先是掌握情况，而且不惜采用各种手段，并常亲自出马，侦察敌情，观察敌阵。柏壁之战时，他曾仅带少数人去侦察敌情，几乎为敌人所俘。这种作法作为统帅是不足取的，但也说明了他对敌情的重视。虎牢之战他命宇文士及以三百骑试阵，近似现代作战中的威力侦察，说明他侦察敌情方法的多样化。敌情既明，能否作出符合客观的正确判断，则全赖指挥者的军事素养和经验。李世民对情况的分析非常精辟、深入，透过现象看本质，从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因而能作出正确判断。如霍邑之战前的“退”与“进”的决策，他分析刘武周不会舍马邑而袭太原，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宋老生轻躁，不足一战等等，说明他善于遵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兵法原则。如不能“知己知彼”，从全局着眼，又不具体深入地分析情况，就难以得出正确结论。如虎牢之战，李世民亲观敌阵，认为窦军“度

险而嚣，是无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我心……”分析得多么深刻，因而得出“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势将自退，追而击之无不克者”的决心。这方面例证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善于选择战场，力争主动

李世民在战役指导上多采用后发制人的手段，故战场是否有利就成了先决条件。李世民为了争取主动，善于选择能扼制敌人、既便于守又利于攻的战场。首先坚壁不出以疲惫、消耗敌人，养己方锐气，挫对方士气，给敌方制造种种困难，然后相机出击。如浅水原、柏壁、虎牢各役都是主动选定战场，造成对方不利因而战胜的。

（三）善于捕捉战机和创造战机

捕捉战机和创造战机是军事统帅的指挥艺术。李世民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战机往往出现在敌人经过疲惫、消耗发生动摇时；敌人的处置发生错误时；敌人在战争过程中发生可乘之隙时等等。但这些机会往往转瞬即逝，因此必须善于捕捉。李世民柏壁之战的追击，就是克服困难，紧握战机以求彻底胜利的一例。创造战机更难于捕捉战机。如浅水原之战，在主动选择有利战场的条件下，诱宗罗睺出击，造成宗军翼侧的暴露，为唐军直插敌后创造了条件；又如虎牢之战，将计就计，牧马河渚，诱使窦军出击，都是创造战机的典型战例。

（四）善于选定主突方向

李世民用兵，绝不平均使用兵力，而是以其精锐主力从敌人薄弱部分突入，着眼于全歼对方。如霍邑之战，发现东门宋老生军翼侧暴露，便舍掉南门敌人而直冲东门宋军侧背，因而大胜。浅水原之战也是在造成敌暴露翼侧后，将主突方向指向该处而获胜的。但有时李世民又有出奇的设想。如虎牢之战，双方兵力颇为悬殊，他由中央突破，如一把利刃直刺对方心腹，并突贯敌阵，造成对方大混乱，因而取胜。这说明李世民用兵非常机智，善于在不同情况下选择敌方既是弱点又是要害的部分作为自己的

主突方向。

（五）善于选锋、用将，亲做统帅，以己之强击敌之弱，冲陷敌阵，反复冲杀

唐军虽在战争中发展成长，但发展并不平衡，将领有勇有懦，军队有强有弱。李世民每战必亲自挑选精锐，作为主力，选用有经验的悍将指挥，并亲自统率，多以精骑为主，冲陷敌阵，反复冲杀，以局部胜利带动全局胜利。在围攻洛阳战役中，更有发展。李世民选精骑、悍将组成“玄甲”，名将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等均在其内，虎牢之战就是靠这支精悍部队战胜窦军的。

（六）善于猛打、穷追，歼敌彻底

前面曾说过，李世民作战不是一见敌人就想打，但一经开战，就力求全胜。所以能如此，除上述各点外，李世民极富有猛打、穷追，彻底歼敌的精神。这与他个人的勇敢果决、不避艰险、顽强泼辣的战斗作风是分不开的。浅水原、柏壁、虎牢等战莫不如此。特别是柏壁之战，更为典型，一昼夜追击二百里；一日八战八胜；两日不食，三日不解甲等等。现代战争和古代战争条件虽已有很大不同，但这种战斗作风仍是同样需要的。

（七）善于运用骑兵

古代战争以戈矛刀剑为武器，双方将兵要直接接触，战胜敌人除赖部队英勇、技术娴熟外，速度快、冲击力强，首赖骑兵，故李世民很注重骑兵的建设，并亲自掌握运用。他以精骑为他主力中的主力，每战必亲自统率，用在主要方向上，利用快速冲杀造成敌阵混乱，继之以迅猛的追击，求得全胜。

综合上述，李世民确具有较高的军事才能。当然，也应该认识到，他的卓越指挥艺术，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且旧史是地主阶级人物写成的，也难免有夸大之处。但李世民确是头脑冷静，勇敢果决，有谋善断，从谏如流。他自己总结他在统一战争中的经验说：

“朕自兴兵，每执金鼓，必自指挥。习观其阵，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对其强，以吾强对其弱。敌犯吾弱，追奔不逾百数十步，吾击其弱，必突过其阵，自背反击之，无不溃，多用此而制胜，思得其理深也。”〔37〕

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总结。正因为李世民重视敌情，善于分析敌情，从而作出正确判断，进行正确的作战指导，所以常能取得胜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

“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作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的正确的指导作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38〕

注　释

〔1〕 西魏建立府兵制，置二十四军，设六柱国统之，后宇文泰总领全军，亦称柱国，后又设不领兵柱国一，时称八柱国。

〔2〕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3〕〔5〕 《资治通鉴·隋恭帝义宁元年》

〔4〕 《贞观政要》卷八《辩兴亡》

〔6〕〔7〕〔8〕〔10〕〔12〕〔14〕〔15〕〔16〕〔18〕〔19〕〔20〕〔21〕 《资治通鉴·隋恭帝义宁元年》

〔9〕 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11〕 《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13〕《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17〕〔29〕〔31〕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22〕 《孙子·九变篇》

〔23〕〔24〕〔25〕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26〕 《孙子·军形篇》

〔27〕〔28〕〔30〕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

〔32〕〔33〕〔34〕〔35〕〔36〕 《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37〕 《通典·兵十一·必攻其易》

〔38〕旧版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8页

第二十一章　唐平安史之乱的战争

李渊父子建立唐朝后，以隋为鉴，经过“贞观之治”，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以后武则天、李隆基（即唐玄宗）又继续进行了一些改革，人民生活安定，户口大增。到开元年间（玄宗前期年号）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了高峰。但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在迅速发展，统治阶级的腐朽面急剧膨胀，终于导致了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

第一　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

一、天宝危机

唐玄宗前期，在除掉韦后和太平公主之后，他稳定了统治，发挥了卓越的政治才能，力图革除积弊，任用贤相，裁汰冗官，抑制贵族，励行法治，挽救了财政危机，巩固了边疆，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史家常积此为“开元之治”。

可是玄宗在位年久，自以为大功已成，当享安乐，骄奢之心不断增长，而求治之志日渐衰退。他疏直谏，亲奸倿，内廷宠信高力士，外廷重任李林甫和杨国忠；自己则骄奢淫逸，不理朝政，一切消极因素都随之泛滥起来，终于使开元之治转化为天宝之乱。

二、府兵寝坏，边防多事，造成外重内轻之势

唐初的府兵制，是与均田制相结合的。充当府兵的，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轮番到京师担任宿卫。遇有战事发生，则要应征作战，兵甲衣粮均自备；战争结束，

则“兵散于府，将归于朝”。〔1〕全国共设折冲府六百多个，其中大多数都设在京城附近，关内一道就有二百多府，连同河东、河南三道共有五百多府，约占兵府总数的80%。这些折冲府平时均归中央十二卫及东宫六率统率。这就形成了“重首轻足”，“居重驭轻”〔2〕的战略形势，既避免了武将擅兵的弊病，也利于唐廷控制四方。

均田制的破坏，枯竭了府兵的来源。唐代对贵族官僚授永业田的数额很高，高宗以后贵族官僚集团空前膨胀，占去了越来越多的耕田。唐代对土地买卖的限制也比较松弛，地主阶级凭借权力，用种种方法加紧剥削农民，兼并大量土地，计口授田就逐渐难以实施。农民无法生存，有的沦为官僚地主的佃户，有的逃亡他乡。这样，府兵的来源就日趋枯竭，开始是“宿卫不能给”，继而是“无兵可交”，以至“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并废矣”。〔3〕另一方面，从唐太宗晚年起，边防战争频繁，规模日益扩大，戍边的兵额不断增加，瓜代的府兵不足，戍守的时间就愈来愈久。高宗时就开始募兵，以补不足。武则天采取募兵、发奴、就地组织团结兵等办法，以解决兵源问题。到唐玄宗时，与契丹、突厥、吐蕃、南诏不断发生战争，仅死于进攻南诏的前后就达二十万人。天宝八载（公元749年），“折冲府至无兵可交”〔4〕，于是只好停止上下鱼书（指征发兵马的凭证）。这样从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到地方武装就全部为募兵所代替。从此，士兵成为职业的雇佣兵，武将专兵的局面就逐渐形成了。

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开始称为“节度使”，但还不是官名，以后“都督”、“节度”之名，参差互见。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已成为正式官职了。到唐玄宗时，由于边防战争的需要，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在其所辖的地区内不仅是最高军事长官，还兼管地方行政和财政，集军事、政治、经济大权于一身。正因为有了这些条件，安禄山才能以“峙兵积谷”〔5〕，才敢于发动叛

乱。

天宝初年，玄宗在边境设立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节度使，岭南五府、长乐二经略使，东莱、东牟二守捉。当时，唐王朝分布在全国的军队共有五十七万人，而在各节度使指挥下的兵力就有四十九万人，约占全国总兵力的86%。唐王朝在广大的内地所能直接控制的兵力只有八万人，约占总兵力的14%。兵力配置的内外比例为内一外六，而且在军队质量上，又是精兵猛将多聚于西北，一反唐太宗时"重首轻足"、"居重驭轻"的战略配置，而成为"内轻外重"了。

自初唐兴盛以来，边防将帅都任用素有重望的名臣，而且都是"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6]以免其权力过重，形成尾大不掉，其功名显著者则调入朝中为宰相。对于蕃将，虽才略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也不专大将之任，并都派大臣为使，加以控制。可是到了玄宗开元时期，由于玄宗好战喜功，担任边防将帅者常数十年不换，开始"久任"；皇子如庆、忠诸王，宰相如萧嵩、牛仙客，开始"遥领"；盖嘉运、王忠嗣专制数道，开始"兼统"。这样，唐初防止边将擅权的一套制度，已破坏殆尽。宰相李林甫深知少数民族的将领不识汉文，无法做宰相，故主张用少数民族的将领为边防将帅，杜绝边将入相之路，以确保他宰相的位置。李林甫对唐玄宗上奏说：

> "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7]

唐玄宗既求边功，又怕边帅与廷臣结党，李林甫的建议正合其意，因此多重用蕃将为边防将帅，如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安禄山等，对安禄山更是让他身兼数职，宠幸有加。这样就为安禄山发动叛乱铺平了道路。

三．安禄山蓄谋反唐

安禄山是营州柳城的混血少数民族人，懂得六种少数民族语言，性狡黠，善逢迎，开始当过管理边境贸易的小吏“互市郎”，后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所录用，靠俘虏、屠杀契丹等少数族人和逢迎贿赂不断得到提升。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升为平卢节度使（治营州、今辽宁朝阳）；天宝三载（公元744年）兼任范阳节度使（治幽州，今北京市）；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又兼河东节度使（治太原，今山西太原市）及闲厩、群牧等使（主管马政）。唐代对整个北方的三镇重兵十八万三千九百人（占当时全国兵力五十七万人的32%强）已全部为安禄山所掌握。

安禄山曾几次入朝，看到唐廷承平已久，武备废弛，国家重兵分散各地，且都远在边地戍守，而近三分之一的兵力则握在自己手里；又见唐廷政治腐败，高官、厚禄、兵权、地盘无不可用贿赂、逢迎的办法得到，因而对唐廷由轻视而转为阴谋叛乱，以夺取唐朝的天下，并为此秘密地进行了长期的准备。

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他为了掩盖自己的叛乱阴谋，制造种种假象，对唐玄宗百般献媚，借以表示自己忠于唐玄宗，以获取对他的信任。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正月，安禄山已任平卢节度使，入朝时玄宗常常接见他，并对他特别优遇，他乘机上奏说：

> “去年营州虫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愿使虫食臣心；若不负神祇，愿使虫散’。即有众鸟从北来，食虫立尽，请宣付史官。”〔8〕

他编造的谎言，十分可笑，但玄宗却被他蒙蔽，信以为真，并认为他憨直诚笃。他还在唐玄宗召见时上奏说：“臣生长蕃戎，宠荣过甚，无异材可用，愿以身为陛下死。”〔9〕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玄宗在勤政楼设宴，命杨铦、杨锜、杨贵妃三姐妹与安禄山叙兄弟，而安禄山却请作贵妃之子。玄宗与贵妃并坐，安禄山先拜贵妃。玄宗问是何礼，安禄山故意慌忙转拜，

并说："胡人先母而后父。"[10]玄宗甚喜。玄宗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安禄山深知唐玄宗喜边功，屡次诱骗奚、契丹来会，然后加以坑杀，动辄数千人。同年十月，安禄山一次就献奚人俘虏八千人，以此迎合玄宗之所好。

唐玄宗重用奸佞权诈之辈，宠信阿谀奉承之流。安禄山对此等人物大肆贿赂，希望他们在玄宗面前多说好话，以便能得到玄宗对他的宠信重任。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安禄山任平卢兵马使时，凡唐玄宗的使臣到平卢，安禄山都出重礼进行贿赂，这些人也都对玄宗说了安禄山的许多好话。御史中丞张利贞为河北采访使，到平卢时，安禄山大事奉承，并对其随从也进行贿赂。张利贞入朝，对安禄山大加夸奖。安禄山因此得升为营州都督，充任平卢军使，两蕃（指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安禄山的叛乱阴谋，许多人都有察觉，一再向玄宗提出。但玄宗常将这些奏章看作是对安禄山的妒嫉，对安禄山不仅不防，反而还予以同情和怜惜。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张九龄就说："禄山失律丧师，于法不可不诛。且臣观其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11]但唐玄宗不听，以为安禄山忠良，不能枉害。天宝六载(公元747年)，王忠嗣数次上言"禄山必反"，[12]玄宗不听。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安禄山入朝，杨国忠又说安禄山必反，玄宗又不听。同时太子李亨知道安禄山必反，也上言玄宗，唐玄宗仍不听。韦见素奏言，安禄山反迹已明，请召安禄山来京作宰相，以贾循为范阳节度使，吕知诲为平卢节度使，杨光翙为河东节度使，以分散安禄山的权势。玄宗开始同意，并已经草制，但后来唐玄宗仍扣留不发。甚至同年十一月，安禄山已发动叛乱，太原和东受降城（今内蒙古托克托南）都已奏报，而玄宗仍以为是忌恨安禄山的人所妄奏，不肯相信。

安禄山阴蓄异志，殆将十年，在发动叛乱之前，早已做好一切准备。唐玄宗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暗地建造雄武城，大

贮兵器，并派遣他的将领刘骆谷常驻京城，籍以探听唐廷动静。天宝十载（公元751年），安禄山收抚同罗、奚、契丹的投降兵卒八千余人，收养为“曳落河”（胡语：“壮士”之意），选拔骁勇善战者百余人为家僮，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二月，借口所部将士征讨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卓著功勋，请升迁将军五百余人，中郎将一千余人，籍以收买下属将士人心，树立个人威信，使其部下能跟随其一同叛乱。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二月，安禄山上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七月，安禄山上表献马三千匹，每匹执鞚夫二人，遣蕃将二十二人护送。河南尹达奚珣对此事怀疑，上奏玄宗，请转令安禄山，献马宜等待至冬季，朝廷派人去取，不必派兵护送。此时适辅璆琳受安禄山贿赂之事已暴露，故唐玄宗未准派兵献马。八月以后，安禄山秣马厉兵，屡犒士卒，决心发动叛乱。

第二　安禄山的突然袭击与唐廷的应变部署

一．安禄山反唐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安禄山蓄谋叛乱已久，他的方针可以概括为：秘密准备，突然袭击，夺取两京，以取代唐廷的统治。

为实现这一方针，曾有过一些谋议。谋士高邈对采用突袭的掩蔽手段曾建议：

> “声进生口（献马），直取洛阳，无杀（太原留守杨）光翙，则天下当未有知者。”

这一阴谋，被唐河南尹达奚珣识破，未能实施。关于战略部署，别将何千年建议：

> “令高秀岩以兵三万出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下朔方（今宁夏灵武），诱诸蕃，取盐（今陕西定边）、夏（今陕

西横山西）、鄜（今陕西富县）、坊（今陕西黄陵）。使李归仁、张通儒以兵二万道云中（今山西大同），取太原，团弩士万五千人入蒲关（今陕西大荔县黄河岸上），以动关中。劝安禄山自将兵五万梁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其意思是从河阳渡黄河），取洛阳。使蔡希德、贾循以兵二万绝海收淄、青（今山东临淄、益都），以摇江淮，则天下无复事矣。”〔13〕

此一战略指导因兵力分散，未被安禄山所采用。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最后确定，以“讨杨国忠为名”，倾全力取道河北，直取东、西两京。其战略部署如下：

——命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率一部防守范阳，确保其后方根据地；

——命平卢节度副使吕知海防守平卢，掩护其根据地的东北方面；

——命别将高秀岩防守大同（今山西朔县东北），防备朔方及太原方面的唐军；

——命平原（今山东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平原、博平（今山东高唐西南）兵七千人防守博平至平原一带地区，巩固河防；

——安禄山亲率主力十余万，夜间出发，秘密迅速南下，经河北直奔洛阳。

此外，在南下过程中，还作如下补充部署：

——派安忠志、李钦凑率领精锐一部进屯土门（今河北井陉），以阻太原唐军的东进；

——命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颜杲卿防守常山。

二、唐廷的应变部署

唐玄宗由于过分宠信安禄山，对安的叛乱毫不为备，京师空虚，无兵可用。这时海内承平已久，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骇震。唐廷闻变仓卒作出应变部署如下：

——以金吾将军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长史，王承业

为太原尹，就地募兵，控制要隘，阻止安军南进；

——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即日前往东京募兵，迎击安军；

——命卫尉卿张介然为新增置的河南节度使（领辖陈留、睢阳、灵昌、淮阳、汝阴、谯、济阴、濮阳、淄川、琅邪、彭城、临淮、东海等十三郡），并在安军前进方向上的各郡设防御使，组织地方军事力量阻击安军；

——命荣王李琬（玄宗第六子）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在京师募兵十一万，组成“天武军”，出潼关迎击安军，并以宦官监门将军边令诚为监军；

——命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今内蒙古五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

——命朔方、河西、陇右三镇，除留守城堡者外，由节度使亲自率领，限二十日内到达行营集结完毕。

三、安军长驱直进，袭占东都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九日，安禄山以讨杨国忠为名，率所部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十余万人，号称二十万，由范阳急速南下，向唐东、西两京发动突然袭击。

河北原来都是安禄山的统辖区域，大军所到之处，州县望风瓦解，或开城出迎，或弃城逃避，或被安军俘杀，无一敢于抵抗。十一月十九日，安禄山到达博陵（今河北蠡县南），留张献诚防守，自率主力继续向南进攻藁城（今同名）。十二月，安禄山到达灵昌（今河南滑县西南），利用河水结冰渡过黄河，攻占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及降卒万人均被杀死，所过残灭。安禄山以李庭望为节度使，留守陈留，自率主力攻陷荥阳，留武令珣防守，以其部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进袭武牢（即虎牢，今河南汜水）。

封常清到洛阳后，旬日之内，即募兵六万人，下令断河阳桥（洛阳东北黄河渡桥），以防安军骤至，自率军东援虎牢，迎击

安军。封常清所募之兵，仓卒征集，未经训练，经不住安军铁骑冲击，大败。封常清收集余众，再战于洛阳城郊葵园，又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均遭失败。安军遂于十二月十二日占领洛阳。此时高仙芝已率在京师的彍骑、彍骑及新募兵、边兵共五万人进驻陕州。封常清遂退到陕州与高仙芝军会合。封常清向高仙芝建议说：

“常清连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14〕

高仙芝同意这一建议，合军退守潼关，脩完守备。安军前锋至，不得入，安禄山乃命崔乾祐率军屯于陕州。本来关中人心惶惶，至此稍安。

封常清、高仙芝以新募败退之军，退守潼关，据险抗击，给唐廷赢得了稳定局势、调集边兵的时间，无疑是正确的。但唐玄宗却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谗言，以“以贼摇众”、弃陕地数百里和盗减军士粮赐的罪名，斩了这两个久任边帅、富有作战经验的大将。当时前线将士“皆大呼称枉，其声振地。”〔15〕

四、河北、河南军民奋起抗击

安军烧杀劫掠，“所过残灭”〔16〕，激起广大人民极大的愤慨。在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起兵带动下，河北诸郡除范阳、卢龙（今河北卢龙）、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县）、渔阳（今河北蓟县）、汲（今河南汲县）、邺（今河南安阳）六郡为安禄山所控制外，其余十七郡纷纷起兵，兵力共达二十余万，与安军展开激烈战斗，严重地威胁着安军的后方。

郭子仪、李光弼率朔方兵打败云中（今山西大同）安军高秀岩部的进攻，大破安军大同兵马使薛忠义于静边军（今山西右玉），挥师南下，故占马邑，接通了太原，威胁安军右侧背的安全。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安军围攻常山，颜杲卿率

军民昼夜备战，终因粮尽城陷，军民万余人被屠杀，颜杲卿被俘不屈而死。

二月，李光弼率步骑万余人，弓箭手三千东出井陉，支援河北军民，于二月五日收复常山。史思明闻讯率骑兵两万来争夺常山，李光弼据城抗击，激战四十余日。四月，郭子仪率军东援，与李光弼合兵十余万，反击史思明。从四月到五月，先后在九门（今河北藁城西北）、嘉山（今河北定县西）等地大败安军，仅嘉山一役，即歼灭安军四万人。李光弼遂进围史思明于博陵，于是渔阳路绝，安禄山不得不再次调兵增援史思明。

在河南方面，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唐置南阳（今河南南阳）节度使，以南阳太守鲁炅充任，率岭南、黔中、襄阳子弟五万人屯叶（今河南叶县西南）北，阻安军南下。

唐真源（今安徽鹿邑）令张巡在河南人民的支持下，在雍丘（今河南杞县）同安军令狐潮、李怀仙部四万余人展开激战，经六十多天、大小三百多次战斗，打退了安军的进攻，守住了雍丘，阻止了安军向东、南的发展，保障了江淮人民免受安军涂炭，并使江淮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运到关中。

双方的战略得失

安禄山率十余万人发动叛乱，其兵力虽只占唐总兵力的四分之一，但唐的“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17]广大内地包括两京只有八万人，河南、河北为数甚少，且承平已久，武备废弛，而天子禁军皆“市井负贩，无赖子弟”，[18]所以安军对两京及黄河南北唐军占着绝对优势。安禄山采取突然袭击的战略方针，乘内地空虚、边兵一时难以调集，一举直袭两京，从军事上看，是可能取胜的。

战略部署上，安禄山采取一路进兵，步骑精锐沿太行山东侧河北平原长驱直入，猛扑东都。从十一月九日出兵，十二月十二日袭占洛阳，只花了三十三天时间。这种部署的确为突然袭击赢

得了高速度。但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没有分兵夺取华北屋脊——河东，并由晋入陕，协同正面大军两路入关。不仅使唐廷易于在潼关、太行山一线组织防御，更使自己的右侧全完暴露，把两千里纵深变成两千里正面，使常山、范阳同样置于唐军威胁之下，从而在全战争过程中都使自己处于一路长蛇，处处被动挨打的地位，这是战略上的最大失着。

至于何千年的方案，四路进军，照顾两翼，着眼是好的，但不免兵力分散，降低了突然袭击所必须的进军速度。如果稍作修改，对两翼只以少部兵力实行牵制、掩护，集中主力分从河东、河北突袭两京，则是可取的。

唐廷在惊恐之余，仓卒应变：在河南、潞州、太原等地组织军民就地抗击；派封常清在洛阳开府库、募兵勇，组织防御；令高仙芝率京师凑集的五万人出潼关应战；令西北边兵限期调集京师；特别是初步看到了北方的重要地位，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等等。这些应变部署是恰当的。但封常清是新募屡败之兵，高仙芝虽有五万人，但飞骑、彍骑都是长安井市之徒，与安军训练有素的铁骑相比，强弱之势十分明显。这时长安空虚，封、高合兵退据潼关，依托天险的措施十分恰当，但唐玄宗听信谗言竟然斩了封、高二将，说明他这时被安军的突然反叛所激怒，已不能作出冷静的战略分析了。

河北军民在颜杲卿、颜真卿的带动下，奋起抗击，声势浩大，遮断了安军与范阳老巢的连系，加上李光弼、郭子仪及时率朔方兵出井陉，与河北军民声气相连，对安军威胁更大，使安禄山不得不两次派史思明回救河北，对牵制安军西进起了极大的作用。

第三　唐玄宗急于反攻失败，长安失守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二月，唐玄宗斩封常清、高仙芝后，以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将兵八万讨安

禄山。哥舒翰并封、高余部，号二十万，军于潼关。

安禄山本拟亲率军攻潼关，至新安（今河南新安），得知渔阳路断，乃返回洛阳，派兵回击常山。

唐玄宗天宝十五载（即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在前阻潼关、后断渔阳的不利情况下，进军的锐气骤减，迫不及待地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对长安主突方面，仅遣其子安庆绪率军攻潼关，旋即被哥舒翰击退；在河南，分兵向东、南进击，以求扩大地盘，囊括财富，并遮断唐廷江淮至关中的漕运；对河北则急图打通归路，稳定后方，改善不利态势。

安禄山曾斥责高尚、严庄说：

“汝数年教我反，以为万全。今守潼关，数月不能进，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止汴、郑数州而已，万全何在？！”

田乾真分析双方力量对比说：

“今四方军垒虽多（指唐军），皆新募乌合之众，未更行阵，岂能敌我蓟北劲锐之兵，何足深忧！”[19]

安禄山听后，稍为安心。

由此可见，安军势如破竹的有利形势已经终结，唐军正面和两翼的战线已趋稳定，西北边兵陆续到达，形势正向有利于唐廷的方向发展。但安军主力并未受到大的损失，仍控制着陕、洛一带；河北方面虽暂时对安军不利，但安军仍拥有相当强的实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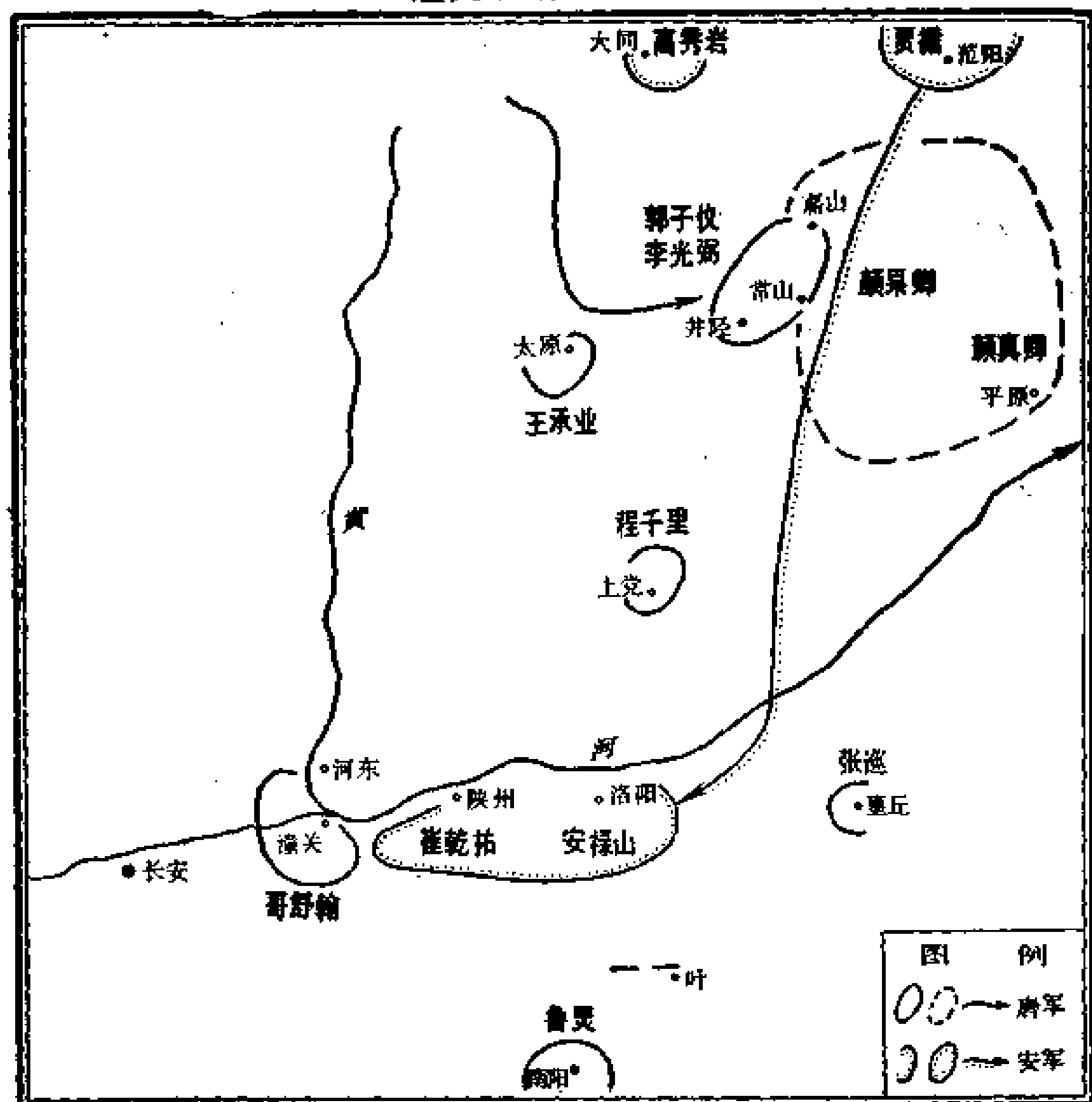
一．唐玄宗的战略决策

对安禄山的叛乱，唐玄宗的战略决策是迅速平叛。他给予荣王李琬和高仙芝的任务是“统诸军东征。”[20]

洛阳失陷后，唐玄宗给兵马副元帅哥舒翰的任务仍是敕“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21]。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宰相杨国忠轻信片面情报，说安军崔乾佑部在陕州“兵不满四千，皆羸弱无备”，[22]奏准唐玄宗，下令哥舒翰出关，进攻安军，以收复陕州、洛阳。哥舒

潼关战前战略形势图 （21·1图）



翰奏告玄宗：

“安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以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23〕

此一战略指导，与以前封常清、高仙芝的战略指导如出一辙，可以收到以逸待劳，守险挫锐之利。郭子仪、李光弼亦上奏

唐玄宗：

“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唯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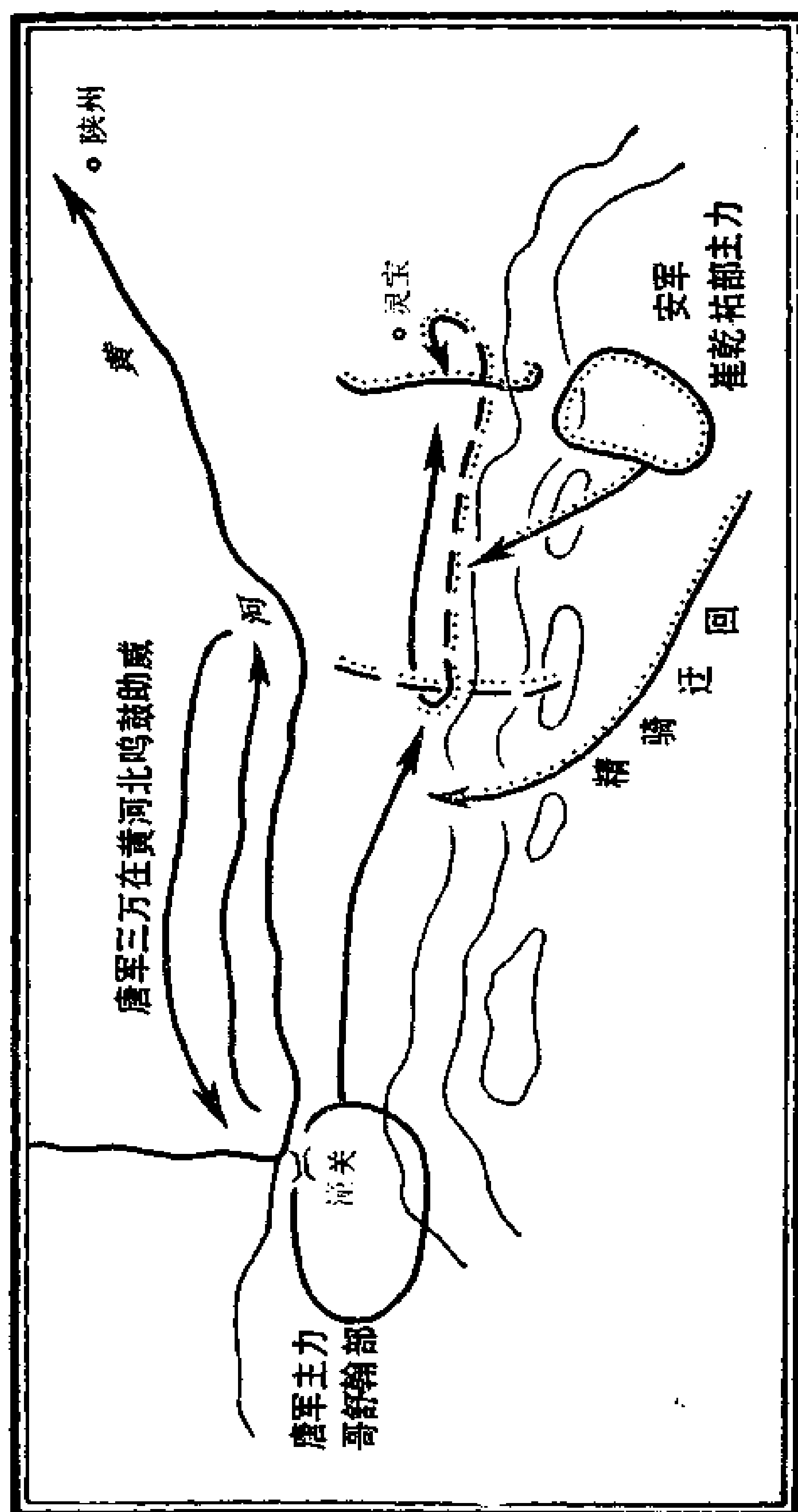
这一建议又与哥舒翰不谋而合，但却与唐玄宗迅速收复洛阳的意图相左，而杨国忠又奏告玄宗：“贼方无备，而翰逗留，将失机会！”[25]玄宗遂不顾哥舒翰、郭子仪、李光弼等大将的正确建议，一再派遣中使催促哥舒翰出关。哥舒翰迫不得已乃抚膺恸哭，于六月四日率兵出关。

二、潼关之战

唐军出潼关后，遇崔乾祐军于灵宝（今河南灵宝）西原。西原南靠山，北阻河，隘路长七十里。崔乾祐伏兵于险要处，正面只以万余人迎战，或疏或密，或进或退，唐军皆望之而笑。而崔乾祐则控精兵于其阵后。哥舒翰见安军兵少，促诸军前进。王思礼率精兵五万在前，庞忠率十余万人继之，哥舒翰率三万人在黄河北岸指挥。双方交锋后，安军收旗如将逃遁，唐军懈，不为备。不久崔乾祐的伏兵突然而出，从山上投下木石，击杀唐军很多。因路窄，唐军不能展开，进展缓慢，哥舒翰以毡车在前开路。过午，东风起，崔乾祐以草车数十辆，塞住毡车而烧之。顿时烟雾弥漫，唐军不能张目，聚弓弩乱射。日暮矢尽，才知当面并无安军。崔乾祐派同罗骑兵从南山迂回，击唐军之后。唐军首尾惊乱，不知所措，于是大败。士兵或弃甲藏于山谷，或被挤下河淹死，哥舒翰仅率数百骑西渡河逃入潼关。潼关前有三道堑壕，每道宽两丈，深一丈，溃兵入堑中，倾刻垫满，后到者踏尸而过，唐军退入关中的只八千人。崔乾祐紧追不舍，抢占了潼关。哥舒翰降了安军，河东、华阴、冯翊、上洛等郡（均在潼关西，渭水南北）防御使皆弃郡逃走，守兵溃散。

三．长安失守，玄宗奔蜀

潼关失守，长安乱成一团，唐玄宗只带杨贵妃姊妹及皇子皇孙，由陈玄礼率禁军掩护，悄悄弃城出延秋门而去，众至马嵬驿



潼关之战示意图

（今陕西兴平西），将士饥疲愤怒，因祸由杨国忠而起，将其击杀。唐玄宗出问，左右答以杨国忠反。唐玄宗只好慰劳军士，令军士归队。军士不应，陈玄礼说："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26]逼唐玄宗缢死杨贵妃，众怒始解，准备西行入蜀。唐玄宗的孙子李倓及当地父老数千人，劝太子李亨留在关中，说：

"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不顺应民心而抛弃群众），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27]

李亨转奏唐玄宗，玄宗分后军两千人给李亨，允其留下。

李亨子李倓又向李亨建议：

"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28]

李亨同意，率两千人赴灵武。

唐玄宗急于反攻的战略失误

潼关大败，长安失守，弄得几乎亡国，是唐玄宗一手造成的。

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进行了一番改革，开元之治，朝野歌功颂德，唐玄宗意满志得，以为基业稳固，可以安享太平。他不相信一个边帅敢于反对大唐天子，更不相信他一手提拔，宠信无比的安禄山会造他的反。一旦叛乱的消息证实，当然震怒不已。安军摧腐拉朽，长驱直进，特别是攻占东都洛阳，更无情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他的情绪是盛怒急躁，他的方针是早日平叛。他迫不及待地令李琬、高仙芝"统诸军东征"，"敕天下四面进兵，会攻洛阳"。《孙子》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

愠而致战。”唐玄宗却恰犯了这样的错误。本来封常清、高仙芝退据潼关，已经挡住了安禄山的战略奇袭，稳住了整个战线的锁钥部分，如果他不枉杀高仙芝、封常清，允许哥舒翰守险不出，安禄山是无法突破潼关防线的。

唐玄宗所缺少的正是指挥战争所必须的、冷静客观的战略分析。唐廷的人力物力确比安禄山强大得多，但承平日久，处在分散状态；唐军总额两倍于安军，但主力和精锐远在西北边防，远水难救近火，而安军却是集中的；唐廷当时可以使用的只是由井市之徒组成的禁军和新募之兵，而安军却是蓄谋已久，训练有素的强将悍兵，其中奚、契丹、同罗骑兵尤为骁勇。所以尽管总的力量对比唐远比安为强，但在陕、洛、潼关主要方向上，局部优势却在安军一边。叛乱发动后，安军一路势如破竹，陕洛主力并未受到多少损失。唐军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以压倒安军，就必须稳定战线，削弱安军，调集边兵，训练新军，完成各项作战准备。这就必须有一个为实施反攻创造条件的战略防御阶段。哥舒翰说得很清楚，“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从地理上说，封、高、郭、李、哥舒都看到了潼关的重要战略地位，它是屏蔽关中，制止安军西进，保障唐廷赢得时间的战略要地，也是支撑朔方兵东进颠覆安军巢穴的枢轴。经过前线将士的极力苦战，河南、河北军民的奋起抗击，朔方兵的及时东出，已经拖住了安军的后腿，制止了安军的发展，形成了初步稳定的战线，使形势开始向有利于唐廷的方向转化，而这条战线的锁钥又正是潼关。在当时形势下，出关反击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唐玄宗根本不承认当时在陕洛主要方向上，安禄山军力比自己强大，根本不接受采取战略防御而后转入战略进攻的建议，他所需要的是开关出击，会攻洛阳，直捣范阳，一举成功。用兵以主力碰主力，已是拙劣的战略，何况他更是以劣势的兵力去硬碰优势的敌人呢！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

安军占领潼关后，止军十日不进，进入长安后，又不组织追击，使唐玄宗得以安然入蜀，这当然也是重大错误。主要原因是

安禄山的战略眼光短浅，当时他只想巩固所占领的两京并接通河北老巢，消化它所掠得的财富，赶紧做他的大燕皇帝。至于彻底颠覆唐朝的“雄心”，则已大大地衰退了。

第四 唐军稳定战局，准备反攻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部将孙孝哲占领长安。这时玄宗西逃，指挥瘫痪，形势对安军非常有利。然而安禄山除继续派兵回救河北，南侵江淮之外，既不追击唐玄宗和太子李亨，又不扩张战果，继续西进，以切断唐廷南北的连系。安军在关中南不逾武关，西不出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不过云阳（今陕西咸阳北）。安禄山日夜酗酒，专以声色、宝货为事。搜捕宦官、宫女，每获数百人，即以兵卒护送至洛阳。“命搜捕乐工，运载乐器、舞衣，驱舞马、犀、象，皆诣洛阳”，[29]供他享乐。其部将也忙于抢掠宫中珍宝和民间财物“禄山闻襄日。百姓乘乱多盗库物，既得长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财尽掠之。又命府、县推按，铢两之物无不穷治，连引搜捕，支蔓无穷，民间骚然。”[30]这个武装掠夺集团的内部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七月下旬，随从安禄山叛乱的同罗、突厥军驻于长安苑中，其酋长阿史那从礼率五千骑，窃厩马二千匹，逃归朔方，企图联合诸胡，盗据边地。于是长安骚乱，市里为空，京畿豪杰往往杀戮安军官吏，遥应唐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

一、唐肃宗整军灵武

七月，李亨率侍从官员步骑两千到达灵武。灵武地处黄河河套上游，水草丰盛，是朔方节度使的驻所，历来是控制西北的边防重镇，又是南下关中，东出晋冀的战略要地。七月十二日，李亨在灵武即帝位，即唐肃宗。从此肃宗就以灵武为基地，调整战略部署，整军经武，准备反攻。

唐玄宗亦于七月到达成都。

关于新的战略方针，有过下述谋议：朔方留后杜鸿渐等奉笺于李亨说：

“灵武兵食完富，……北收诸城兵，西发河、陇劲骑，南向以定中原，此万世一时也。”

杜鸿渐在平凉北境迎接李亨时又建议说：

“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31〕

李亨采纳了各项建议，他的战略方针可以归纳为：“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以“克复两京，削平四海。”〔32〕

同月，郭子仪率兵五万自河北至灵武，肃宗又征河西兵五千，安西兵七千至灵武。至此，“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复兴之望矣。”〔33〕

根据上述战略方针，李亨先后调整战略部署如下：

——以李俶（肃宗长子）为天下兵马元帅，李泌为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以郭子仪为武部尚书；

——以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即太原）留守，确保河东；

——以周泌为河西节度使，彭之耀为陇右节度使，吕崇贤为关内节度使；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郭英乂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以巩固西线；

——以鲁炅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贺兰进明为河南节度使，张巡为河南节度副使，来瑱为淮南西道节度使，高适为淮南节度使，以确保江、淮；

——以第五琦为江淮租庸使，山南五道度支使，保障江淮租庸换成轻货，溯江、汉而达洋川（即洋州，今陕西西乡），然后陆运至扶风；

——以豳王守礼之子承寀为敦煌王，与仆固怀恩(朔方将)出

使回纥请兵。

二、李光弼守太原

在安军占领长安后，进围博陵的郭、李大军撤回河东，后郭子仪又率朔方兵至灵武，太原仅李光弼率团练不满万人防守。于是史思明再次夺占常山，打通了后方连络线。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正月，安军四路进攻太原：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上党，高秀岩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阳，共十万人。

李光弼率军在太原城外凿壕自固，扼守城外要点，做墼（土坯）数十万。安军开始攻城时，李光弼以墼增垒于内并用于修补城垒。史思明等部围攻月余不下，遂挑选一部精锐，声东击西，明示攻外围要点，实则企图乘隙袭取太原，但由于唐军防守严密未能得逞。

安军用云梯、冲车等并在城边堆土山攻城，唐军挖地道在地道口潜伏，俟安军接近城墙，突出捕杀。李光弼又制作大炮（抛石器）发射巨石轰击安军，死伤甚众，安军被迫后退。李光弼为打破安军的围困，派人挖地道到安军营下，预先挖好陷坑，以诈降为手段，掩护数千人出城，俄而安军营下地陷，死者千余人，安军惊乱，唐军乘机击之，俘斩万计。

正在这时，洛阳发生宫庭政变，安禄山的宠妾段氏，欲代安庆绪立其子安庆恩为太子。安庆绪与中书侍郎严庄合谋，刺杀了安禄山，自立为帝。安庆绪令史思明归守范阳，留蔡希德继续围攻太原。

二月，李光弼亲率敢死队出击，大破蔡希德军，歼敌七万余人。蔡希德仓皇撤逃。安军进攻太原宣告彻底失败。

李光弼守太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巩固了唐军的北段战线，确保了唐军进出河北、直捣范阳的有利出发地位。从战役战斗来看，它又是一次以主动出击为主要手段的以弱胜强的城市保卫战范例。

三、张巡守睢阳

与太原之战同时，安庆绪为了向江淮方向发展，以尹子奇为河南节度使，率兵十三万进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唐太守许远告急，张巡率兵三千进入睢阳，合兵六千八百余人，在睢阳人民支援下，与安军展开激战。张巡负责指挥作战，许远负责后勤保障。战斗连续十六昼夜，有时一天之内打退安军二十次冲击，俘安军将领六十余人，毙伤二万余人，守军士气大振。

三月，尹子奇再聚众进攻睢阳，张巡激励将士，亲执战旗率兵直冲安军营垒，安军大败，被歼三千，溃退数十里。五月，尹子奇增兵再犯，战斗更为激烈，张巡为迷惑并疲惫安军，夜间在城内鸣鼓整队，作出击之势，使安军通宵达旦整装备战；天明后，则寝兵绝鼓，安军彻夜困乏，见城中没有动静，遂解甲休息；张巡乘机率将军南霁云、郎将雷万春等十余将领，各率五十骑，突然出城，袭击安军，直冲到尹子奇大旗之下。安军大乱，被歼五千余人，南霁云射中尹子奇左目，几乎将其活捉，尹子奇带伤收军败退。

七月，尹子奇又集兵数万围攻睢阳，由于外无救援，存粮将尽，战士挖树皮充饥，兵员锐减至一千六百人。安军以云梯、钩车攻城，张巡率兵出城烧毁安军攻城器材，并在城外挖三道深壕，立木栅阻击安军进城。战至八月，守军只剩六百余人，但仍坚守不懈。

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在临淮（今江苏盱眙），许叔冀、尚衡在谯郡（今安徽亳县）、彭城，皆拥兵不救，虽张巡派南霁云突围告急，贺兰等无动于衷。

十月，城中粮尽，有人主张突围东走，但张巡、许远认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且我众饥羸，走必不达。……不如坚守以待之。"[34]仍率军民继续苦战。十月九日，终因寡不敌众，且将士多病，被安军攻破，许远被俘，张巡、南霁云、雷万春等三十六将均被杀。

睢阳之战，守城达十个月之久，"前后大小战凡四百余，杀

贼卒十二万人”，[35]是英勇顽强与城同存亡的著名战例。此役，有力地掩护了唐廷江淮租庸的西运，保障了江淮人民免受安军涂炭，并歼灭了安军十余万，大大改变了唐、安兵力对比，它的战略意义是十分巨大的。其主动出击的战法与太原相似，而壮烈则尤过之。

太原、睢阳之战，稳定了唐军的两翼，大量歼灭了安军，改善了兵力对比，保障了江淮物质西运，赢得了可贵的时间，唐军的反攻准备已经完成，睢阳陷落时，郭子仪的反攻大军已收复长安了。

第五　唐军收复两京

随着反攻准备的逐次完成，唐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十月，唐肃宗移驻彭原（今甘肃庆阳西南）。

同月，宰相房琯自请将兵收复两京，唐肃宗同意。房琯命李光进、刘贵哲、杨希文率军分三路进攻长安，遇安军安守忠部于咸阳以东的陈涛斜。房琯效古法，用车战，以牛车两千乘，马步夹之。安军纵火鼓噪，人畜大乱，三路均败，唐军死伤四万余人。杨希文、刘贵哲投降安军。

一、唐军的战略反攻计划

同年十二月，唐肃宗问计于李泌：“今敌强如此，何时可定？”李泌说：

“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

肃宗再问：“何故”？李泌说：

“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即安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

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指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可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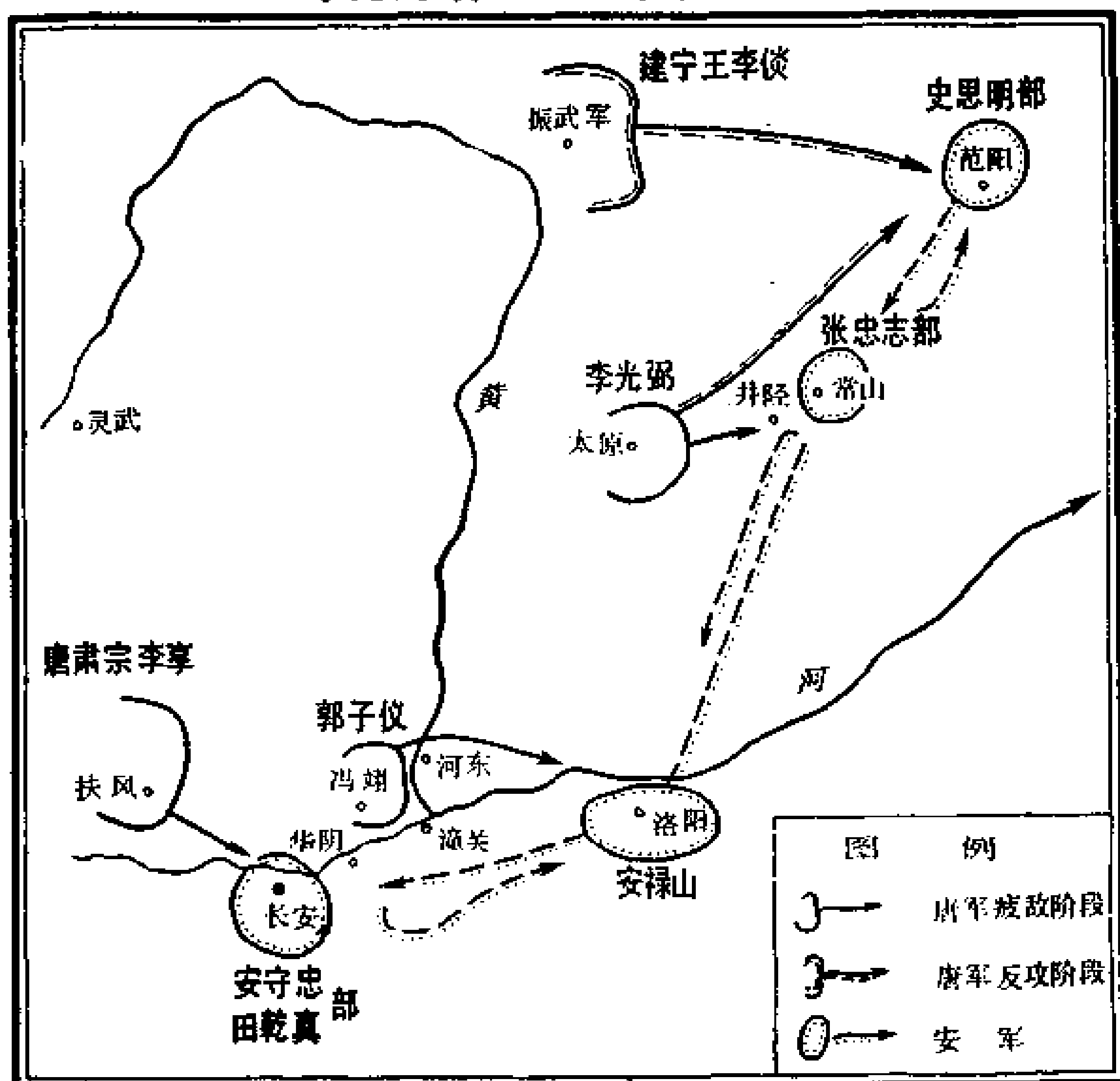
李泌这一计划很有远见，他针对安军自长安至范阳一路长蛇的被动态势，采取先疲后歼的战略步骤：首先有计划地分击其头尾，使其来回疲于奔命；第二步命李倓出塞北，李光弼出井陉，合击范阳，覆其巢穴；最后大军四合，聚歼安军。这是一个充分利用自己有利形势，抓住敌人弱点，一劳永逸的歼灭战计划。唐肃宗对李泌的形势分析，即两年内可以平定安乱，大为高兴，但对李泌的整个计划却未置可否。

郭子仪认为“河东（指河东郡，治蒲州，今山西永济西）居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37〕企图先占领河东，为反攻创造有利条件。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潜遣人入河东，策动唐降将反正，一举击败崔乾祐，占了河东。随即又派兵南渡黄河，袭占了潼关，斩首五百级，但立足未稳，被安庆绪击破，死者万余人，退保河东。安守忠将二万骑来夺河东，又被郭子仪击败，斩首八千级，俘五千人。

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二月，肃宗进驻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都已到达，江、淮庸调也已到达洋川。（今陕西洋县）。李泌请派遣安西及西域之兵按前述战略计划，迂回塞北，自归（今宁夏境内）、檀（今河北密云）南取范阳。但肃宗说：

“今大军已集，庸调亦至，当乘兵锋捣其腹心，而更引

李泌的战略反攻方案示意图　（21-3图）



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38〕

李泌再申述理由说：

“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锐，攻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克。两京春气已深，贼收其余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官军必困而思归，不可留也。贼休兵秣马，伺官军之去，必复南来。然则征战之势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

肃宗却说：

> "朕切于晨昏之恋（意思是说切盼早日迎唐玄宗回长安，实际上是想尽快收复长安，还居宫阙），不能待此决矣（我决心已定，等不及你去搞大迂回）。"〔39〕

话都说清楚了，唐肃宗的反攻决心也明确了，他要正面进攻长安，李泌的方案已遭否决。

二、郭子仪第一次反攻长安

同年四月，唐肃宗以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军经凤翔与王思礼合军进屯长安城西的潏水（向北流入渭水）西岸，安军安守忠、李归仁部屯于长安城西，双方相持七日。五月，安军伪退，唐军全部出击，安军骁骑九千从两翼夹击唐军，唐军溃败，军资尽弃，郭子仪退保武功。此役唐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骑兵，战役纵深很浅，没有战役预备队，两翼没有保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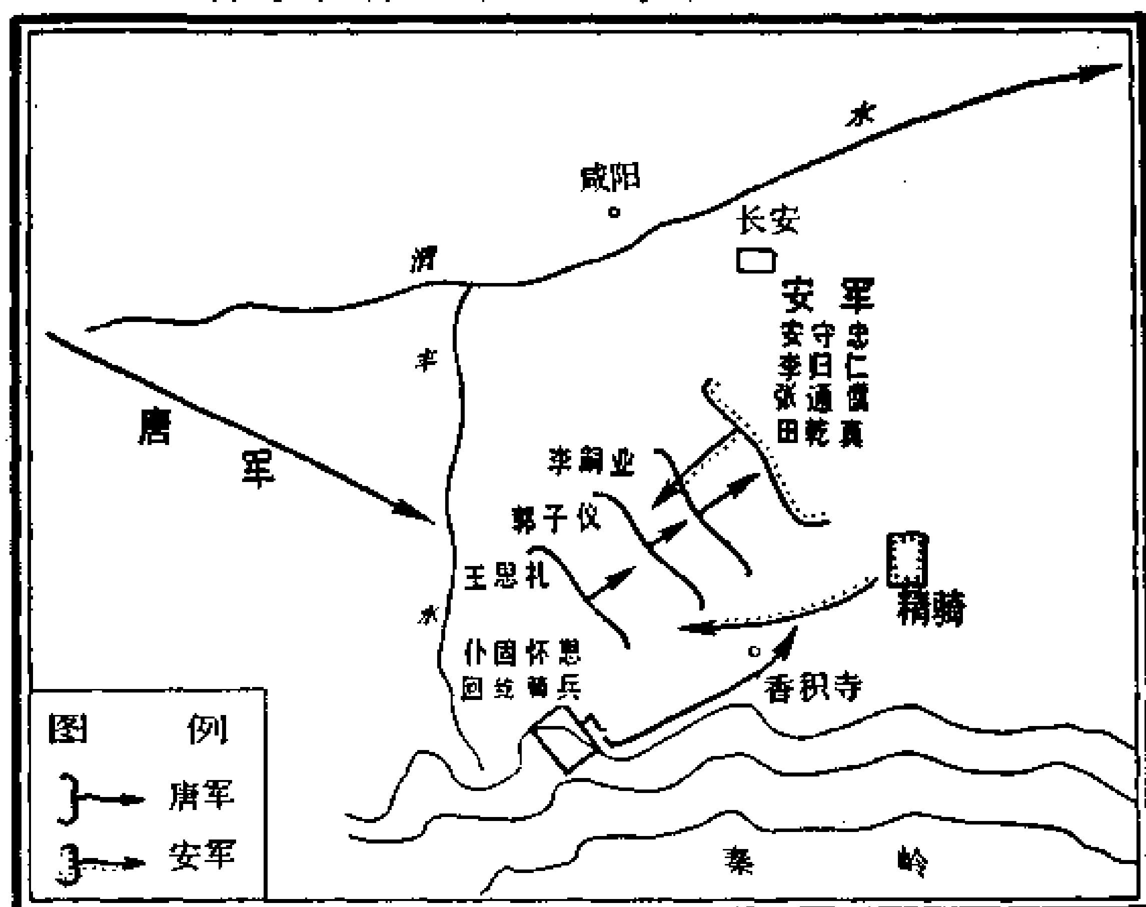
三、郭子仪第二次反攻长安

同年九月，唐军调整补充就绪，所借回纥骑兵，由怀仁可汗之子叶护率精兵四千到达凤翔。唐肃宗下令以李俶、郭子仪为天下兵马正副元帅，统朔方军及回纥、西域军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从凤翔出发，再次反攻长安。

郭子仪以李嗣业为前军，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在长安城南、香积寺北、沣水（潏水以西，北流至咸阳入渭）东岸列阵。安军十万在长安城南列阵。安军李归仁出阵挑战，唐军出击，逼近安军阵线。安军全线出击，唐军退，安军突入，唐军惊乱，安军争抢辎重，李嗣业率军反击，阵势稍定，李嗣业率前军执长刀如墙而进。安军精骑伏于阵后，企图绕袭唐军之后，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引回纥骑兵击之，翦敌殆尽。李嗣业乘势配合回纥骑兵出安军阵后，与正面大军夹击安军，自午至酉，斩首六万级，安军大溃，余众走入城。

仆固怀恩建议李俶乘胜追击，李俶不同意，认为军队疲劳，需休息，等明天再追。仆固怀恩说："归仁、守忠，贼之骁将，

郭子仪第二次反攻长安示意图 （21-4图）



骤胜而败，此天赐我也，奈何纵之！使复得众，还为我患，悔之无及！战尚神速，何明旦也！”〔40〕请之再四，李俶终不同意。天明，发觉安守忠、李归仁、张通儒、田乾真等已乘夜率军东走。唐军收复长安。

此役，郭子仪接受了前次失败的教训，加大了战役纵深，成三个梯队，又有了回纥骑兵，用作战役预备队，能及时查明安军精骑迂回唐军阵后的企图，以回纥骑兵歼灭之。李嗣业又能抓住战机，包围安军，协同回纥骑兵，配合正面大军，前后夹击，因而取得了胜利。李俶不同意乘胜追击，充分反映出皇室的保守思想，深怕唐军追击引起意外战斗使夺回长安的企图落空，所以宁可纵敌东去也不愿乘胜追击。

四、收复洛阳

唐军进入长安三日后，李俶才率主力东进。郭子仪率部克潼

关，王难得破武关，克上洛郡（今陕西商县）。安军张通儒等率军退保陕州。安庆绪尽发洛阳兵，命严庄率领与张通儒所部共阻唐军，这时安军兵力尚有步骑十五万。

同年十月，郭子仪率军东进与安军在新店（今河南陕县西）遭遇。安军依山而阵，郭子仪军初战不利，以回纥骑兵自南山而下袭安军侧背，安军溃走。郭子仪入陕州，遣仆固怀恩分道追击。

安庆绪得知主力溃败，仅率精骑三百、步兵千人，弃洛阳，渡黄河，逃往邺城（今河南安阳）。

唐军收复洛阳及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河内（今河南沁阳）、陈留等郡，安军已呈土崩瓦解之势。由于唐肃宗急于迎唐玄宗还朝，并大封功臣，对安军未组织追击，给了安军在河北收集残部，重整旗鼓的机会。

唐肃宗的正面反攻计划

唐玄宗潼关决策错误，以致主力被歼，长安陷落，他自己西行入蜀，一走了之。当时关中已失去有组织的抵抗。由于河西、陇右之兵大量东调，吐蕃军队正在向东扩张。如果不是吐军尚未察觉唐朝内部发生如此重大的变故，而不敢大举深入；如果不是安禄山止军不追，大唐帝国有被东西两方击穿而南北隔绝的可能。唐肃宗即位灵武，在李光弼守太原，张巡守睢阳的有力保障下，组织力量，整军经武，经过两次失败，终于实现了“收复两京”的战略目标，对于重整大唐帝国是有功劳的。但由于唐肃宗在反攻计划上缺乏战略眼光，只看到象征封建统治的帝都的重要性，急图还都以号令全国，而忽视了歼灭安军有生力量对于整个战争的决定作用。他拒绝了李泌很有见地的关于先使安军疲于奔命，继以主力直捣其老巢，然后四面包围而聚歼之的反攻方案，而采取了正面进攻，一路进军的反攻计划，逐次攻略长安、潼关、陕州等要点，形成了连续的攻城夺关战，未能尽歼安军主

力，却付出了较高的代价，又未能乘胜追击，以致夜长梦多，使战争出现反复而延长了战祸。唐肃宗指责李泌的方案“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可是战争经过表明，恰恰是唐肃宗自己犯了欲速而不达的毛病。

回纥骑兵强悍，在收复两京战役中，起了重大作用，但中原人民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唐肃宗因欲迅速收复京师，曾与回纥有约：“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41]在收复西京后，叶护欲实施前约，广平王李俶在叶护马前跪拜说：“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42]故回纥攻入东京后，大肆烧杀抢掠，死者无数。

第六　唐九节度使围邺与史思明再下河南

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月，安庆绪退至邺城，李归仁及精兵曳落河、同罗、六州胡数万人皆溃归范阳，史思明招降之。不久，蔡希德率兵自上党（今山西长治），武令珣率兵自南阳，田承嗣率兵自颍川，分别到达邺城，又招募河北诸地团练散兵，合兵六万余人，军势复振。

十二月，安庆绪对史思明势力强大深有所忌，于是派阿史那承庆和安庆忠前往范阳征兵，并秘密图谋史思明。判官耿仁智和裨将乌承玼、信都太守乌承恩都劝说史思明降唐，不必同安庆绪“与之俱亡”，史思明同意，以所部十三郡、兵卒八万降唐。河东节度高秀岩亦随之降唐。肃宗以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并派内侍李思敬与乌承恩去宣慰，使其率所部征讨安庆绪。乌承恩所至宣布诏旨，由是河北大部为唐军所有。

李光弼以“思明终当叛乱，而承恩为思明所亲信（史思明曾任乌承恩之父平卢军使乌知义部下列将），阴使图之；又劝上以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赐阿史那承庆铁券，令共图思明”。[43]唐

肃宗从之。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乌承恩事泄。于是史思明杀乌承恩再次反唐。这样就在河北形成了安庆绪、史思明两个互相矛盾又互相勾结的反唐集团。

一、邺城之战

唐肃宗在收复洛阳后，迎唐玄宗回长安，大封宗室、功臣，直至将近一年后，才调集军队进攻安庆绪。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肃宗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淮西节度使鲁炅、兴平节度使李奂、滑、濮节度使许叔冀、镇西（河西已改称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郑、蔡节度使季广琛、河南节度使崔光远及平卢兵马使董秦（后赐名李忠臣）率步骑兵二十万进攻安庆绪。又命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泽、潞节度使王思礼率部协助进攻，以宦官开府仪同三司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实际上就是节制各节度使。观军容之名从此开始。这时回纥又派骨啜特勒率骁骑三千前来助战，唐肃宗命朔方左武锋使仆固怀恩率领随同大军讨安庆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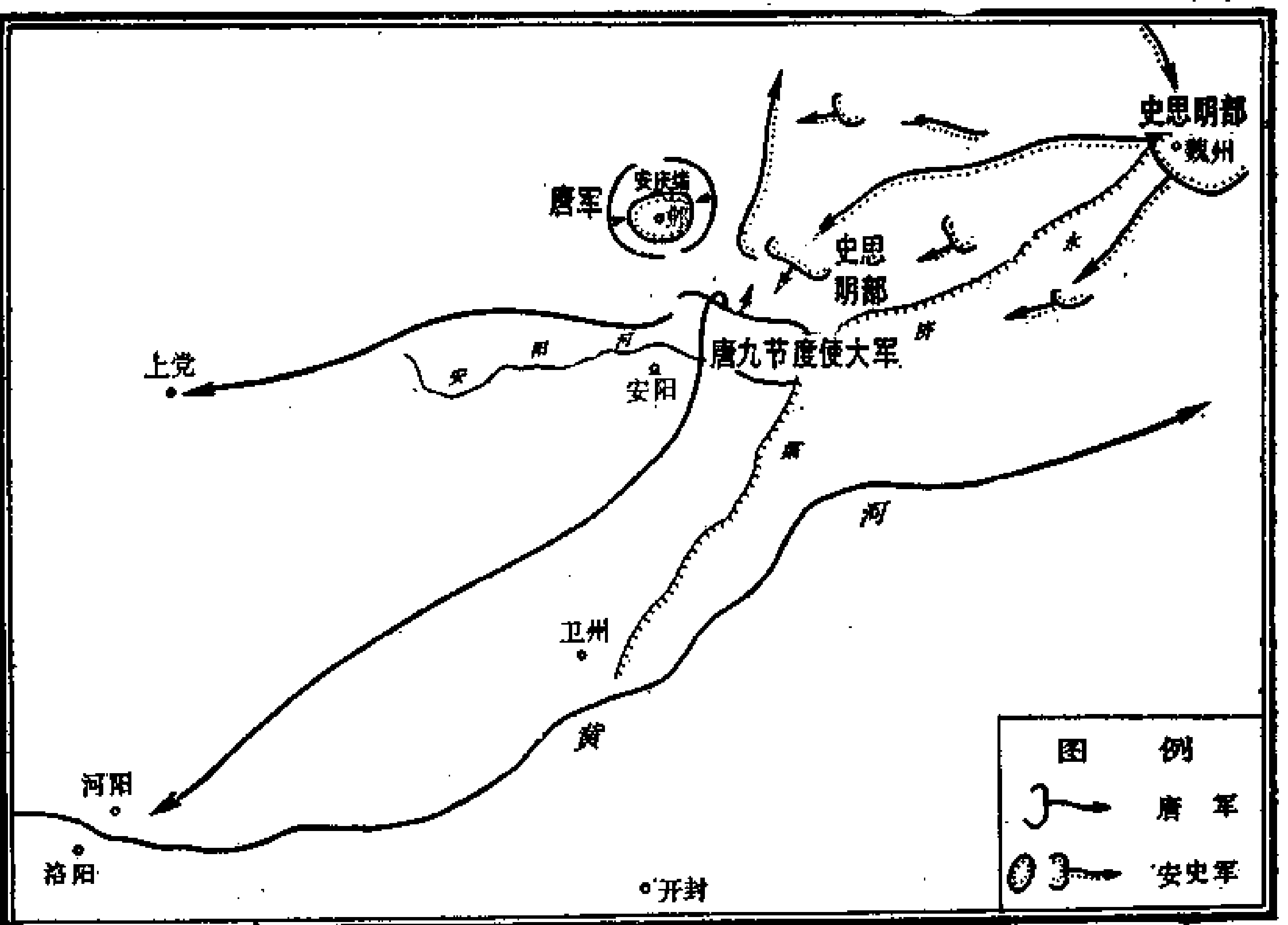
十月，郭子仪、鲁炅、季广琛、崔光远和李嗣业等部渡河北进，击败安军，攻克卫州。安庆绪败走邺城，郭子仪等乘胜追击。许叔冀、王思礼及河东兵马使薛兼训都先后到达。唐军在邺城西愁思岗再败安军，歼安军三万余人，安庆绪入城固守，郭子仪等围攻邺城。李光弼亦率兵到达，形成九节度使围攻邺城，同时分兵一部攻取邻近各郡县。

安庆绪急向史思明求救，且自愿以皇位相让，史思明从范阳率兵十三万援救邺城，但不敢遽进，先遣李归仁率步骑兵一万进出滏阳（今河北磁县），遥为声援。

十一月，唐军遣崔光远攻占魏州（今河北大名），史思明为争夺魏州，大军分三路南下。十二月，魏州被史思明攻占。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史思明在魏州城北自称大圣燕王，并按兵不进，观衅而动。

李光弼认为：

邺城之战示意图 （21-5图）



“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日引久，则邺城必拔矣”。[44]

此一战略指导，遭鱼朝恩否决，未能实施。唐军九节度使自肃宗乾元元年十月至乾元二年二月，用了引水灌城等办法，仍未能攻下邺城。唐军“既无统帅，进退无所禀，……城久不下，上下解体。”[45]

史思明见战机成熟，率军自魏州逼近邺城，使诸将距城五十里疏开扎营，每营以鼓三百面击之，扩大声势，威胁唐军。又每营选精骑五百，昼夜轮番四出抄掠。唐大军云集，供应物资来自江、淮、并、汾，每日舟车相继于道。史军多遣壮士窃唐军名号，妄杀督运官兵，运者骇惧远遁；对唐军舟、车集中地，则纵火焚之。唐“诸军乏食，人思自溃”，[46]于是史思明率大军直抵城下，求唐军决战。

三月初六，唐军九节度使号称步骑六十万，布阵于安阳河（即洹水，流经安阳北）北，史思明率精兵五万前来迎战。唐诸军以为是游军，轻敌麻痹，漫不在意，及至史思明发起猛烈冲击时，李光弼、王思礼、许叔冀、鲁炅才率部迎战。战斗激烈，双方死伤各半，鲁炅中流矢受伤。郭子仪率军继后，未及列阵，狂风大作，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咫尺不相辨，两军皆大惊。唐军向南溃退，史军向北溃退，各弃甲仗，辎重无数。郭子仪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郭子仪遂断河阳桥（河阳在河南、河北、河中沙渚各有城，主城在河北，均南北朝时所建，有浮桥相连，是南北交通要道），退保东都。各节度使溃归本镇。仅李光弼、王思礼整勒部伍，全师而退。

十二日后，史思明自沙河（在邺城北二百余里）收集部队进入邺城，诱杀安庆绪及高尚、崔乾祐等，收编其军队，接管其州县，派安太清率五千人占领了怀州，留其子史朝义守邺城，自率军返范阳，以巩固其根本。

唐、史双方得失

安庆绪败退河北，史思明投降，对唐是很有利的。这时，唐军应利用史思明，合力解决安庆绪，然后再图史思明。过早想除史思明，以致事机败露，史思明降而复叛，是不明智的。

史思明在安庆绪求援时，进出魏州，观衅而动，就当时史、安对立却又必须合力抗唐的情况来说是恰当的。过早投入战斗，唐众史寡，难以取胜；如按兵不动，让唐军先解决邺城，再来消灭自己也不行；只有置史军于魏州，才能使安庆绪有援可待，不致绝望投降，又可把安庆绪拖得筋疲力竭，也可使唐军师老兵疲，然后以新锐之师一举胜唐。

李光弼以主力东出，逼史思明出战的建议是高明的。安庆绪只几万人，困守孤城，粮尽必破，无须几十万大军围攻。唐军逼魏州而阵，以逸待劳，如史思明出战，可操胜算；如史不出，则邺城日久必拔，然后合军击史，亦可操胜算；如史思明退回范阳，则对唐军更有利。唯独大军猬集邺城，久攻不下，而任强敌在侧面伺机而动，对唐军最不利。可是宦官鱼朝恩却否决了李光弼的建议。

邺城之战，史思明抓住了唐军师老兵疲、士气涣散的有利战机，疏开列营，以扩大声势；遮断粮道，以进一步瓦解唐军；然后集中精锐，猛击唐军，都是可取的。

唐军失败的原因是：不设统帅，无法协调各军行动，而观军容使却有权掣肘，使将帅丧气；几十万大军猬集邺城，造成师老兵疲，加上粮道被扰，搞得士气涣散。

二、河阳之战

史思明返范阳后，于四月自称大燕皇帝，改范阳为燕京，准备再次南下。唐肃宗以郭子仪功高震主，阴忌之。邺城败后，遂以李光弼代为朔方节度使、天下兵马副元帅。

李光弼率五万骑驰赴东都，立即整顿部队，巡视河防，准备

迎击史思明。李光弼治军素严，号令整肃，将士惮之。

同年九月，史思明留其子史朝清守范阳，命诸郡太守各率三千人随己南下，军分四路渡过黄河，会攻汴州。唐汴滑节度使许叔冀、濮州刺史董秦战败投降，史军攻占汴州，乘胜西进。此时李光弼已收缩兵力退至洛阳，与诸将商讨战守之策。洛阳留守韦陟认为洛阳不可守，应“留兵于陕，退守潼关，据险以挫其锐”。[47] 李光弼则认为：

“两敌相当，贵进忌退，今无故弃五百里地，则贼势益张矣。不若移军河阳，北连泽潞，利则进取，不利则退守，表里相应，使贼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势也。”[48]

判官韦损又提出：“东京帝宅，侍中奈何不守？”李光弼说：

“守之，则汜水、崿岭、龙门（均洛阳外围）皆应置兵，子为兵马判官，能守之乎？”[49]

议决，李光弼率军收洛阳城中油、铁等军需物资运至河阳坚守，命韦陟、李若幽率官属、吏民西撤。史思明进入洛阳，只得一座空城，其他一无所得。

史思明见李光弼据守河阳，控制东都，乃退驻白马寺（今洛阳城东）南，在河阳南筑月城与唐军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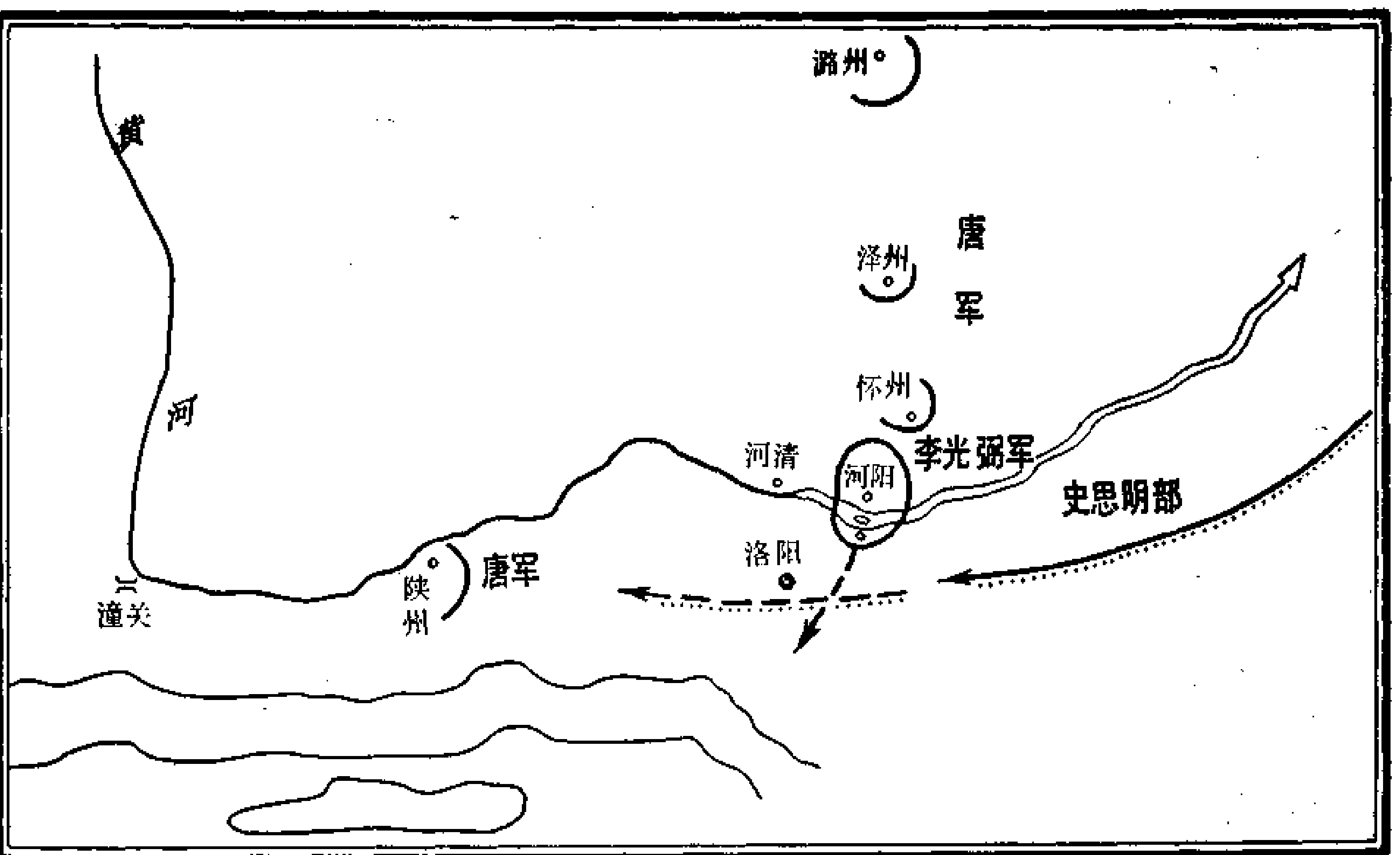
从乾元二年十月到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四月，史思明多次进攻河阳三城，均被李光弼率军击败。李光弼已占稳河阳，其“猿臂之势”制止了安军的西进。

三、唐肃宗再次反攻洛阳失败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有人说：“洛中将士（指史军）皆燕人，久戍思归，上下离心，击之，可破也。”陕州观军容使鱼朝恩深信之，多次建议唐肃宗攻取洛阳。唐肃宗遂“敕李光弼等进取东京。”李光弼上言：“贼锋尚锐，未可轻进。”但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亦“言东都可取”。[50]于是中使相继，督李光弼出击。

李光弼守河阳的战役企图示意图

（21-6图）



李光弼不得已，命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以仆固怀恩会同神策节度使卫伯玉攻洛阳。

李光弼命仆固怀恩在邙山依险列阵，但仆固怀恩却在平原列阵，李光弼下令移阵于险阻之处，仆固怀恩又加以阻止，史思明乘唐军列阵未定，挥军直薄，唐军大败，死者数千人，军资器械弃之殆尽。李光弼、仆固怀恩率朔方军渡河走保闻喜（今山西闻喜），鱼朝恩、卫伯玉奔还陕州，李抱玉亦弃河阳北走，河阳、怀州均被史军占领。唐廷闻败大惧，增兵固守陕州。

李光弼兢兢业业稳定下来的陕、洛形势，终于毁于一旦。

史思明大捷后，对西线转取攻势，企图乘胜入关。以其子史朝义为前锋，经崤山北道，趋陕州、潼关；自率大军取道崤山南道趋潼关。三月，史朝义率军至礓子岭（在陕州东），被唐军卫伯玉部击败，史朝义数进兵，皆失败。

史思明猜忌好杀，群下稍不如意，动至诛族，人不自保。史朝义是其长子，但史思明爱其幼子史朝清，常想杀长子立其幼子，左右颇泄其谋。史朝义攻陕失败，史思明欲问其罪，史朝义便与亲信密谋，先下手杀了史思明，自立为帝。然后密令在范阳的张通儒等杀了史朝清等数十人，内部互相攻杀，混战数月，死者数千人。史思明所部节度使皆为安禄山旧将，多数不服史朝义的调遣，史朝义集团遂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再也无力从洛阳西进了。

李光弼的"猿臂之势"与唐肃宗的再次急于反攻

安庆绪得以重新在河北收集力量，重整旗鼓，是因为唐廷没有利用占有河东的有利态势，采用先疲后打，直捣范阳，然后大军四合而歼之的李泌方案；没有在进攻两京的同时，命李光弼出河东，采取钳形攻势；收复东都后，止军不进几达一年之久。这些战略上的失着孕育了战争的大反复，导致了九节度使邺城之败和史思明再下河南。

李光弼守河阳是一次以劣制优巧妙成功的防御战役指导。着眼点他自己已说清楚了：唐大败之后，兵力不足，史军新锐，难以守住洛阳；但洛阳、潼关方向事关唐室安危，又不能任史军长驱西进；唯一的办法是“移军河阳”，即守住依托黄河 城小易守的河阳，以控制洛阳，虎视安军侧背，使其主力不敢贸然西进；“北连泽潞”，是把自己的后方甩到黄河以北，去依托晋南。他自称为“猿臂之势”，即立足河阳，一手抓泽潞以为依托，一手控制洛阳，以阻安军西进。看起来让开了正面，实际上却控制了陕洛大道 从而改变了自己不利的地位。

反攻洛阳的失败是潼关之败的翻版。史思明的主力与安禄山的主力一样，都没有遭到大的损失；哥舒翰主张坚守潼关，李光弼主张坚守河阳；唐玄宗和唐肃宗都过低地估计了敌人，迫不及待地要收复洛阳；其结果也一样，都使大好形势毁于一旦。

第七 唐代宗的反攻

唐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唐玄宗李隆基，肃宗李亨相继病死，代宗李俶（后改名豫）即位。十月，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代宗长子）为天下兵马元帅，以仆固怀恩领诸军节度行营，统各路大军再次会攻洛阳。

唐军在洛阳北郊大破史军，歼史军六万人，俘二万人。唐军占领洛阳及河阳城，史朝义率余军渡河北逃。

唐军乘胜追击，连克郑、汴、滑等州。史朝义会合田承嗣部共四万余人在卫州抗击唐军，又被唐军击破。史朝义的邺郡节度使薛嵩以卫、相、洺、邢四州向唐李抱玉投降，史朝义的恒阳节度使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向唐河东节度使辛云京投降。唐军进入史军军营，按其部伍更代其将领。但不久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又恢复史军将领原来的职位，唐廷“亦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因而授之。”(51)

唐代宗以仆固怀恩为河北副元帅，率唐军继续北追。至下博（今河北深县东南）东南，再次大破史军。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去幽州调兵，守将田承嗣以莫州降唐。唐军仆固瑒、侯希逸、薛兼训等率兵三万继续追击。史朝义退至范阳，当时史军范阳节度使李怀仙已降唐，史朝义不得入城，又退至广阳（今北京市房山县东北），又不得入。最后退至温泉栅（今河北卢龙境内）时，李怀仙的追兵赶到，史朝义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在枣林中自缢而亡。于是河北平定，一场持续近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

唐胜安败的主要原因

唐王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历时约八年，最后唐朝虽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但黄河流域的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唐朝元气大伤，中央集权大为削弱。这场战争不仅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而且开始了一个半世纪藩镇割据、武人专横的局面，并一直继续到唐亡，是我国历史上一次沉痛的教训。

安禄山起兵反唐，其企图是夺取全国统治权，以大燕王朝代替大唐王朝。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中央政权平定地方反对势力的战争。

安史集团是一个武装掠夺集团，它没有任何政治主张，它的目的仅仅是掠夺，包括上自称王称帝的全国统治权，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通财产。所以它所到之处，烧杀劫掠，所过残灭，使广大人民感到安军比唐王朝更坏，从而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其规模之大、抗击之坚，在历来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中是罕见的。另一方面，这个武装集团既然以掠夺为目的，它的内部斗争当然也非常残酷。

唐廷不惜以洗劫两京子女玉帛为代价，借用回纥骑兵平叛，也充分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本质。

唐朝是一个强大的王朝，从唐太宗经武则天到唐玄宗，还处

在王朝的兴盛时期，它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都是强大的。虽然唐玄宗后期骄奢淫逸，糜费了许多国家资财，虽然安禄山突然反唐时，唐廷在河北、河南及两京地区兵力对比处于很大的劣势，但总的力量对比却大大的优于安禄山。只要能争取到一定时间，它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调动人力物力，如收西北边兵和调江淮财富，取得优势，压倒安史。

唐玄宗父子的战略失误

就战略而言，唐玄宗父子都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敌人，都犯了急于求成的毛病。他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反攻洛阳，只看到皇室的眼前利益，只想早日收复京师，示天下以危而复安，好尽快恢复奢侈安乐的宫廷生活，结果欲速不达，反而延长了战祸。

采用正面进攻也是战略上的失策，同样出于急于求成的毛病。他们不懂得包围、迂回、打歼灭战对于取得战争彻底胜利的重大意义。

唐玄宗父子的另一毛病是猜忌将帅，信任宦官。安禄山的反叛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形成。他们看郭子仪、李光弼都有一个安禄山的影子，以后的唐朝皇帝也大都如此，直到唐亡。

急于求成、正面进攻和宦官制军这三条，是唐廷在军事上的主要失误。因此，战争虽然胜利了，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使战争拖了近八年之久，而且还留下了安史余孽，贞观、开元盛世已一去不复返了。

史朝义溃败时，安史余部纷纷降唐，这是形势的必然。唐的平叛战争已进行了几达八年之久，已经筋疲力竭，接纳这些降将以尽快结束战争，从策略上讲是无可非议的。但战争结束后，唐廷没有以重兵监临这些降镇，逐步采取措施以收回各镇的财权、兵权，甚至任其收罗残余，扩大势力，这就成了唐廷在政治、军事上的重大错误，导致了长期的藩镇之乱。

注　释

〔1〕《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2〕《陆宣公奏议》卷十一《论关中事宜状》

〔3〕〔4〕〔5〕《新唐书》卷五十《兵志》

〔6〕〔7〕《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六载》

〔8〕《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二年》

〔9〕《新唐书》卷二二五《安禄山传》

〔10〕《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六载》

〔11〕《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12〕《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六载》

〔13〕《新唐书》卷二二五《安禄山传》

〔14〕〔15〕〔16〕《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

〔17〕〔18〕《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八载》

〔19〕《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元年》

〔20〕〔21〕《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十四载》

〔22〕〔23〕〔24〕〔25〕〔26〕〔27〕〔28〕〔29〕〔30〕〔31〕〔32〕〔33〕《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元载》

〔34〕〔35〕《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二载》

〔36〕《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元载》

〔37〕〔38〕〔39〕〔40〔41〕〔42〕《资治通鉴·唐肃宗至德二载》

〔43〕《资治通鉴·唐肃宗乾元元年》

〔44〕〔45〕〔46〕〔47〕〔48〕〔49〕《资治通鉴·唐肃宗乾元二年》

〔50〕《资治通鉴·唐肃宗上元二年》

〔51〕《资治通鉴·唐代宗广德元年》

第二十二章　唐平藩镇的战争

第一　唐代藩镇割据的形成

在史朝义战败北走，唐仆固怀恩率军向河北追击时，史军瓦解之势已经形成，史军余部为保存实力，纷纷向唐军请降。这时平叛战争已进入第八年，唐王朝也打得精疲力竭。同时因军队庞大，主要将帅功高望重，皇室对将帅的猜忌也日益加深。郭子仪被解除军权，闲置不用；李光弼拥兵徐州，不敢入朝，忧虑而卒；最后一个副元帅仆固怀恩忧心忡忡，企图保存安史余部，以便拥兵固宠。在各种原因凑合下，唐廷接受了史军余部的投降，仍任他们为节度使，并下令："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1〕。

唐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廷授史军降将张忠志（奚人，后赐名李宝臣）为成德军节度使，治所恒州。

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唐廷任命史军降将田承嗣为魏（今河北大名北）、博（今山东聊城东北）、德（今山东陵县）、沧（今河北沧州东南）、瀛（今河北河间）五州都防御史（当年六月升为魏博节度使），治所魏州。任命降将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治所幽州。任命降将薛嵩为相（今河南安阳）、卫（今河南汲县）、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东南）、贝（今河北清河西北）、磁（今河北磁县）六州节度使（后改称昭义节度使）。

在平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由于西北边兵大量东调，吐蕃乘机步步深入，占领了河西和陇右。代宗广德元年七月，平叛战争刚

刚结束，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共二十余万人大举东进。十月，入据长安达十五天之久，大掠京畿，唐代宗逃往陕州避难。郭子仪收众由商州（今陕西商县）向长安挺进，吐军才撤出长安，引兵西走。

与此同时，唐代宗恐军权旁落，对将帅猜忌日甚，仆固怀恩终于在吐蕃侵入长安后的第二年，即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在河东举兵叛唐，纠合吐蕃、回纥两次进逼奉天(今陕西乾县)。唐代宗不得已，只好起用郭子仪为副元帅率军抗击。仆固所部均为郭子仪朔方军旧部，闻郭来皆无斗志，仆固怀恩病死途中。郭子仪又说服回纥反戈与唐合击吐蕃军，吐军势孤，向西退走，但以后不断入侵，仍然是唐王朝的主要威胁。

当史朝义败逃时，唐廷为尽快结束战争，收降史军余部，并采取妥协羁縻措施，暂时保留他们的地位，不是不可以的。但战争结束后应该有步骤地削减以至收回他们的军权，接受安史之乱的教训，分散军、政、财大权，避免节度使包揽一切，以加强中央集权，逐步恢复“居中驭外”的布局，才能巩固统一的局面。由于吐蕃入侵与仆固之叛，唐代宗又无中兴之才，只知依赖宦官，猜忌功臣，不仅没有采取削藩集权的有力措施，反而欺软怕硬，对强镇姑息迁就。而河朔四镇却乘机加紧收刮钱粮，收集安史余党扩军筑城，各拥劲卒数万人，以便对抗唐廷。

同时，为节度使权位的继任问题，藩镇又与唐廷展开了由唐廷任命还是父死子继或将士拥立的反复较量。

山南东道节度使来瑱被宦官程元振陷害，流放赐死；裨将梁崇义鼓动将士，杀左兵马使李昭、节度副使薛南阳，在襄州（今湖北襄阳）自立为山南东道节度使，然后上报唐廷。唐廷姑息迁就，下诏任命他为襄州刺史，领山南东道节度留后。平卢、淄青兵马使李怀玉起而效尤，因其节度使侯希逸喜营塔寺，不得众心，于是李怀玉驱逐侯希逸而自任留后，唐廷也不得不答应，并赐名为李正已。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成德节度使李宝

臣、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相卫节度使薛嵩、卢龙节度使李怀仙等自派文武将吏，不交纳贡赋，并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结为婚姻，互为表里，对抗唐廷。唐廷不能制止，藩镇割据的局面由此形成。

在全国范围内，除唐玄宗时已有的边防十个节度使外，在平叛过程中，为了作战和筹兵筹饷方便，在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又增添了一批节度使，如关内、兴平、泽潞、河中、郑陈、滑濮、河南、山南东道、淄青等节度使。为抗击吐蕃又在河西、陇右、四川设置了若干节度使。甚至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战略要地也设置了节度使，如荆南、淮南、镇海、岭南。到唐德宗时，全国已有四十八个节度使，〔2〕于是“自国门（指京师）以外，皆分裂为方镇矣”。〔3〕

第二　唐代宗讨魏博田承嗣的战争

田承嗣，卢龙人，安禄山的死党，降唐后受任魏博节度使。他深知要保存自己的官爵、地盘和实力，必须有一支强大的军队。为此，他收刮户口，召集安史余孽，悉数扩充军队，以魏博等五州之地，竟拥军十万之众。又选骠悍者万人组成亲军，称为“牙兵”，“父子世袭，姻党盘互，悍骄不顾法令”，“有不慊辄害之无噍类”，蛮横霸道、滥杀无辜。所谓“长安天子，魏府牙军”〔4〕，它是田承嗣对抗唐廷，割据拔扈的工具，也是镇压人民，慑服将士，控制军队的工具。田承嗣“沈猜阴贼”“性著凶诡”〔5〕，充分利用唐廷欺软怕硬、姑息迁就的弱点，巧取豪夺，得寸进尺地获取权力、官爵和地盘。

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正月，田承嗣奏准命名其所统辖的军队为“天雄军”。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六月，卢龙节度使李怀仙被幽州兵马使朱希彩、经略副使朱泚及其弟朱滔所杀，朱希彩自称留后。闰六月，唐代宗密诏成德节度使李宝

臣讨伐朱希彩，不胜。十一月，唐廷不得已乃任命朱希彩为卢龙节度使。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朱希彩得位后更加骄横，残虐将卒，被部属杀死。经略副使朱泚夺取兵权，策动军士拥立，自称权知留后，唐廷不得已，又任命朱泚为幽州卢龙节度使。田承嗣见唐廷如此腐朽无能、姑息放任，由此野心大增。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正月，昭义（即相卫）节度使薛嵩死，唐廷以其弟薛崿为留后，田承嗣想暗中引诱其将领投效自己，于九月为安、史父子立"四圣祠"，以示念旧，还向唐廷要求加宰相职称。唐廷派内侍孙知古前往劝说其毁去祠堂，并于同年十月加田承嗣同平章事（即宰相）。唐代宗大历九年（公元774年）三月，代宗为了宠络田承嗣，又以帝女永乐公主为田承嗣子田华之妻，从此田承嗣就更为骄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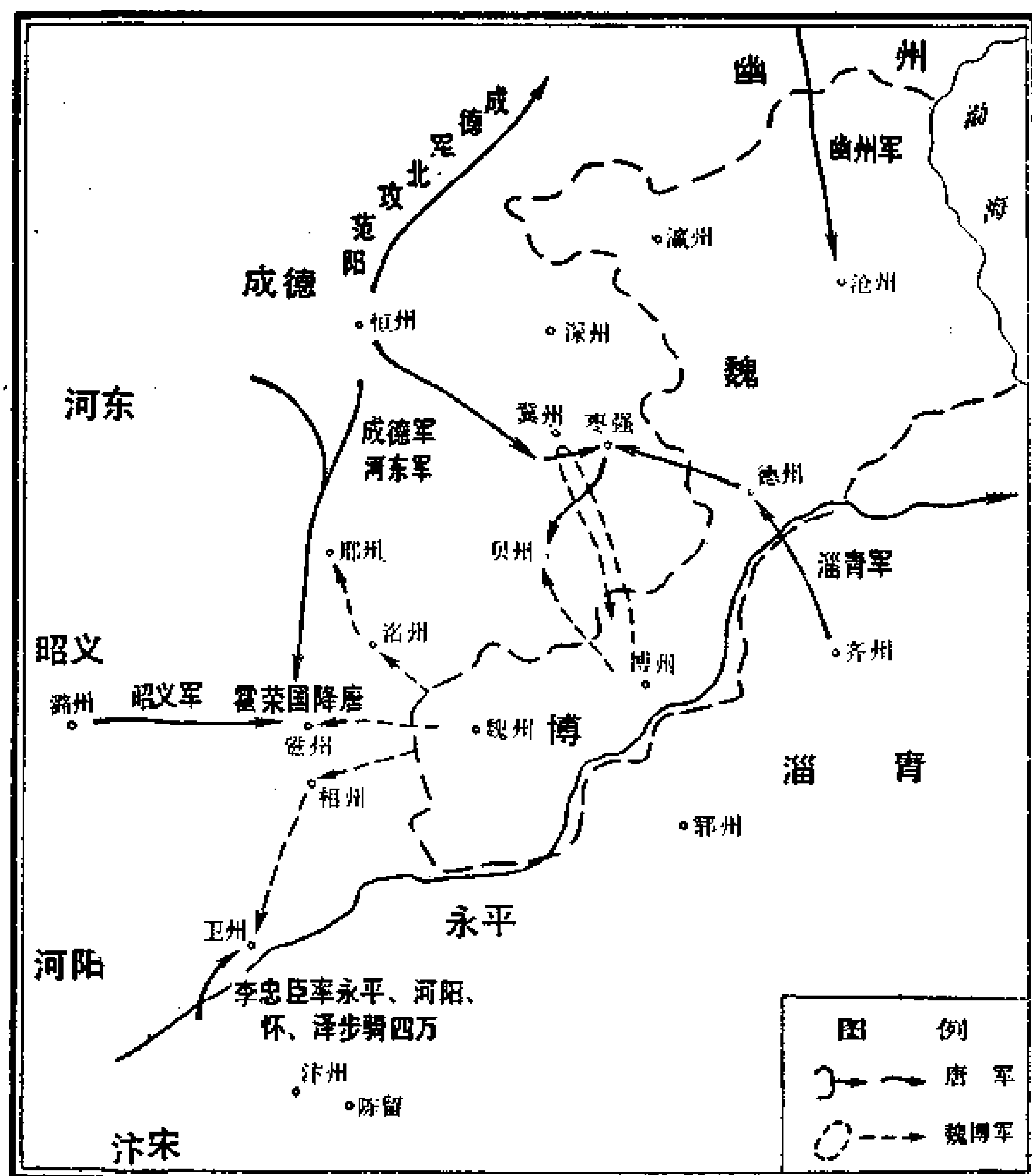
唐代宗大历十年（公元775年）正月，昭义军兵马使裴志发动叛乱，驱逐昭义节度留后薛崿，率其众投效田承嗣。田承嗣声言救援，率兵进攻相州，并占领之。代宗派遣内侍孙知古前往魏州，命田承嗣各守封疆。田承嗣拒不受命，且派大将卢子期进攻洺州，杨光朝进攻卫州，杀死邢州刺史薛雄，尽占相、卫、邢、洺四州之地。当时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素为田承嗣所轻视，李宝臣之弟李宝正又被田承嗣所杖杀，李宝臣与田承嗣关系十分恶化。及田承嗣抗命，独占昭义四州之地，李宝臣、李正己就上表请讨田承嗣。唐廷也想利用这一良好时机，就在四月下令讨田承嗣。

一、唐廷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唐廷的战略方针是利用各道节度使与田承嗣的矛盾，命魏博四周节度使从四面包围田承嗣而歼灭之。唐代宗大历十年（公元775年）三月，下令贬田承嗣为永州刺史，派华州刺史李承昭为昭义留后。"命河东、成德、幽州、淄青、淮西、永平（辖滑、亳等州）、汴宋、河阳、泽潞诸道发兵前临魏博，若承嗣尚或稽违，即令进讨。罪只承嗣及其侄悦，自余将士弟侄苟能自拔，

一切不问”。〔6〕命幽州节度使朱滔（此时朱泚已入朝防秋，由朱滔继任）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河东节度使薛兼训由北向南进攻；命淄青节度李正己、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及其他各道节度使由南向北进攻；昭义节度使由西向东进攻。

唐代宗讨魏博示意图　（22-1图）



二、田承嗣的战略、策略运用

田承嗣对抗唐廷征讨的战略、策略可以归纳为：充分利用、甚至制造各节度使之间的矛盾和他们与唐廷的矛盾；并用谋略手段和军事打击，来拆散唐廷所凑成的节度使联军，破坏唐廷的围攻，必要时上表归顺，以获得喘息时间，然后伺机再动，使战事旷日持久，不了了之。其战略、策略的具体运用如下：

（一）战局不利时上表归顺

唐廷下达讨伐令后，有关节度使开始行动。唐代宗大历十年（公元775年）五月，田承嗣的磁州守将霍荣国投降唐廷。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攻占德州(今山东德州市)，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永平、河阳（今河南孟县）、怀（今河南沁阳）、泽（今山西晋城）步骑兵四万进攻卫州。六月，田承嗣派其部将裴志清进攻冀州（今河北冀县），裴志清率众向成德节度使李宝投降，田承嗣自率大军围攻冀州。李宝臣命其部将张效忠率精锐骑兵四千前往抵御，自率大军随后跟进。田承嗣恐被大军所围，不得已烧毁辎重撤回博州。此时唐廷诸道兵马已四面合围，田承嗣见诸将多叛，大为恐惧。八月，田承嗣"遣使奉表，请束身归朝"。[7]这仅仅是一条缓兵之计。但唐廷却允其所请，暂时停止了进攻。不久，田承嗣又派遣其部将卢子期进攻磁州，西南方面战争又起。九月李宝臣军、李正己军在枣强（今河北枣强）会师，向南进围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魏博有被切成南北两段的危险。

（二）挑拨平卢、成德军将士，以消除魏博被切断的威胁，破坏唐军的围攻

田承嗣出兵救援贝州，并使其兵卒分别伪装为成德、平卢兵卒，互传成德、平卢薪饷，赏赐有厚薄，制造矛盾，从事挑拨。平卢兵卒听说成德薪饷、赏赐优厚，乃发出怨言，李正己恐部下有变，率兵退走。李宝臣见李正己退走也跟着退走，魏博被切断的威胁，随之消除。李忠臣听说此事，也撤出对卫州的包围，南

渡黄河，屯驻阳武（今河南原阳）。唐军的包围圈遂在东北与西南两个方面形成缺口，战局顿趋缓和。

（三）表示投靠平卢，使李正已按兵不进，瓦解了唐军南线的攻势

十月，田承嗣又派其部将卢子期进攻磁州。李宝臣与昭义留后李承昭由北、西两方面前往救援，在清水（在磁县西北）附近大破卢子期军，将其活捉后送京师问斩。此时河南诸将又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附近大破田承嗣派往黄河以南活动的田悦（田承嗣之侄）所部。因此田承嗣大惧，派遣使者持所辖境内的户口、甲兵、谷帛之数告诉李正已说：

承嗣今年八十有六，溘死无日，诸子不肖，悦亦孱弱，凡今日所有，为公守耳，岂足以辱公之师旅乎！”〔8〕

李正已听后，非常高兴，于是按兵不进。河南诸道兵因此也都不敢前进，南方战事暂停，田承嗣也就消除了南顾之忧，摆脱了被围攻的不利形势，得以集中力量，从事对北方的作战。

（四）勾引李宝臣转去进攻背后的卢龙节度使朱滔，又瓦解了唐军北线的攻势

李宝臣援救磁州有功，唐廷派遣中使马承倩前往嘉奖慰劳，李宝臣赠礼，遭受马承倩诟骂，甚感羞惭。兵马使王武俊对李宝臣说：

今公在军中新立功，竖子尚尔，况寇平之后，以一幅诏书召归阙下，一匹夫耳，不如释承嗣以为己资。”〔9〕

从此李宝臣遂有玩寇之意。田承嗣深知李宝臣想获得其故乡范阳，因而派人对李宝臣说：

“公与朱滔共取沧州（这时李宝臣、朱滔正派兵会攻沧州），得之，则地归国，非公所有。公能舍承嗣之罪，请以沧州归公，仍愿从公取范阳以自效。公以精骑前驱，承嗣以步卒继之，蔑不克矣。”〔10〕

李宝臣甚喜，于是与田承嗣同谋，秘密图取范阳，田承嗣也

在境上部署兵力。李宝臣与朱滔果然打了起来，唐廷围攻田承嗣的北翼遂被瓦解。

（五）一纸降表使唐廷讨田之役草草收场

十二月，田承嗣奏请入朝，李正已也屡次为田承嗣上表，请准其自新。唐代宗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二月，田承嗣再次遣使上表，奏请入朝。代宗已知李宝臣与朱滔交战，无法进讨田承嗣，于是只好下诏赦免田承嗣罪，恢复其官爵，听与家属入朝，其所部抗拒朝命者，一概不问。

田承嗣的降表仅仅是一纸空文，他根本不肯入朝。随后由于汴宋留后田神玉病死，都虞侯李灵曜发动叛乱，田承嗣派兵进攻滑州，并派其侄田悦进军汴州，以援救李灵曜。于是唐廷震怒，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再次下令讨田。因各道都自有打算，按兵不动，田承嗣又再次上表请罪，唐廷无可奈何，只好又一次赦田承嗣，并悉复其官爵，还免其入朝。

三、唐代宗讨田无功的原因

田承嗣悍然发动兼并昭义的战争，破坏了河北人民的和平生活，破坏了唐王朝的统一局面，也危及了邻镇的自身安全而遭到邻镇的反对，所以唐王朝下令讨田是名正言顺的。但由于客观条件不足，主观上又犯了许多错误，结果讨伐无功，只好草草收场。

（一）力量不足，缺乏准备

唐王朝在安史之乱后，又经受了吐蕃入侵和仆固怀恩的叛乱，京畿和黄河南北都搞得凄凉不堪，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宫廷又发生政变，宦官李辅国率禁兵杀死张皇后，唐肃宗受惊而死，代宗李豫即位。代宗和肃宗一样，依然是依靠宦官，猜忌功臣。这时吐蕃仍是西方的主要威胁，唐廷还不得不使用大量军队来防止吐蕃入侵。在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唐代宗不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进行切实整顿，以恢复经济，积蓄力量，加强中央集权，为削藩平叛准备条件，而仅仅依赖邻近藩镇的军力，就轻率

地下令讨田，这当然是难以取得彻底胜利的。

（二）缺乏一支精锐的中央直辖军

唐廷未能组建或筹集一支精锐的中央直辖军，作为讨田的骨干力量，而一支中央直辖军是贯彻统帅意图、掌握战争主动、影响战争进程、保证完成战略战役任务所必需的。由于没有这样一支军队，藩镇各有各的打算，田承嗣才能施展他的阴谋诡计，破坏藩镇联军的围攻。

（三）没有设立统一的指挥

不设统一指挥的统帅，除一纸讨伐令外，均由受命藩镇各自为战，也是讨伐无功的重要原因。实施分进合击、四面围攻的战略、最重要的是统一指挥，协同动作，否则各自为战，分进而不能合击，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也不能实施协调一致的围攻。特别是成德、卢龙、平卢等三心两意的藩镇，要打就打，想停就停，就更加乱套了。唐肃宗在平安史之乱时，对九节度使围邺，因不设统帅而功亏一篑。唐代宗在讨田时没有接受教训，对九节度使围攻田承嗣，又不设统一指挥的元帅，结果重蹈覆辙。

（四）唐代宗色厉内荏，庸怯无能

由于唐代宗软弱无能，每当胜利在望时，他总是轻信田承嗣的悔过自新而停止进攻，使田承嗣有了喘息的时间，任其施展欺骗手段。在讨田的整个过程中，田承嗣由于部将投降，作战失败或态势不利，前后有三次上表唐廷请罪：第一次是在唐代宗大历十年（公元775年）八月；第二次是在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二月；第三次是在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实际上，田承嗣上表唐廷之日，正是他即将失败之时，唐廷若能坚持进讨，则胜利可望。但代宗每次都准许他悔过自新，恢复其官职，停止对他的讨伐，使得田承嗣的诡计屡屡得逞。本来，代宗在田承嗣为安、史建立“四圣祠”时，就应下诏声讨，但他只是派人劝说毁祠。田承嗣还提出要加宰相官号，代宗不仅同意，还以永乐公主嫁与田承嗣之子田华为妻，籍以笼络，结果适得其反，田承嗣

变本加厉更为强横了。代宗如此欺软怕硬，实际上是奖励藩镇强横不法，田承嗣的叛乱，实在是代宗的过分迁就所导致的。

这次讨田之役，唐廷不仅毫无所获，反而大大地暴露了它的软弱无能。在节度使心目中，唐廷的威望更低了，割据抗命的胆子也就更大了。经过讨田承嗣和平李灵曜，成德、平卢等强镇地盘更加扩大，军力也更加强盛。成德李宝臣增加了冀、沧二州。拥兵达五万之众。淄青李正己新得曹、濮、徐、兖、郓五州，兵力增加到十万之众。田承嗣的力量也没有减弱。强镇割据的形势进一步巩固了。

第三　唐德宗平四镇的战争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唐代宗死，唐德宗李适（kuò）即位。当时唐朝内忧外患、局势混乱。他想革除代宗弊政，于是整顿吏治，疏斥宦官，崇尚节俭，杜绝贿赂，整理财政，改革税制，推行两税法，使唐廷的财政收入得到大量增加。他又改善与吐蕃、回纥的关系，企图一举扫除藩镇割据、父死子继的状况，加强中央集权，以中兴唐室。但唐德宗刚愎自用，轻举妄动，对功臣将帅的猜忌则更甚于肃宗、代宗，因此虽有良好的愿望，结果却搞得几乎不可收拾。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唐德宗任用代宗时权相元载的余党、理财能手杨炎为宰相。代宗杀元载时理财专家刘晏曾参与密议，杨炎要为元载报仇，在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指控刘晏奏事不实，使德宗屈杀了刘晏。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淄青李正己和诸镇谋反，接连上表责问杀刘晏的罪名，唐廷无话可对，陷入窘境。

成德镇的李宝臣、淄青镇的李正己、魏博镇的田承嗣和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早就商定，要确立子孙世袭制，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田承嗣死后他的侄子田悦继位，李宝臣、李正己代请朝廷加以任命，代宗予以认可。成德李宝臣死后，他的

儿子李惟岳继位，也请唐廷承认。有的朝臣进言说："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德宗想革除旧弊，他说：

"贼本无资以为乱。皆借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11〕

坚决不许。田悦又为李惟岳代请，也不许。田悦和李正己均派遣使者至李惟岳处，密谋抗命之策。从此成德李惟岳、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悦与山南东道梁崇义为争取子孙世袭而互相联合，出兵和唐廷作战，形成"四镇之乱"。

一、双方的战略企图

唐德宗即位之初就革除弊政，锐意削藩，四镇既连兵抗命，一场平藩战争就逐步展开了。

唐德宗的战略企图是：和边击藩，集中力量一举进击成德、魏博和山南东道，以粉碎叛镇连兵抗命和子孙世袭。

为改善与吐蕃、回纥的关系，消除后顾之忧，唐德宗派韦伦为太常少卿出使吐蕃，并集中战俘五百人，赐给衣物，遣返吐蕃，于是双方暂时言归于好。唐德宗又派京兆少尹源休册封顿莫加为回纥武义成功可汗，双方关系也得到改善。

唐德宗为进行平藩战争，下令从朔方、关内、太原，西至蜀汉，南尽江、淮、闽、越调集兵力，并从京西抽调防秋（防吐蕃入侵）兵一万二千人戍关东（指洛阳及其以东地区）。

成德、魏博、淄青和山南东道的战略企图是：连合作战，以确保独立和世袭。先下手抢占邢、磁和临洺（今河北永年西），消除成德、魏博接合部上的威胁，并据守徐州的甬桥（在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附近）、涡口（涡河入淮之口，在今安徽怀远县东）和襄阳，切断淮、汉粮道，破坏唐廷的战争准备和粮食补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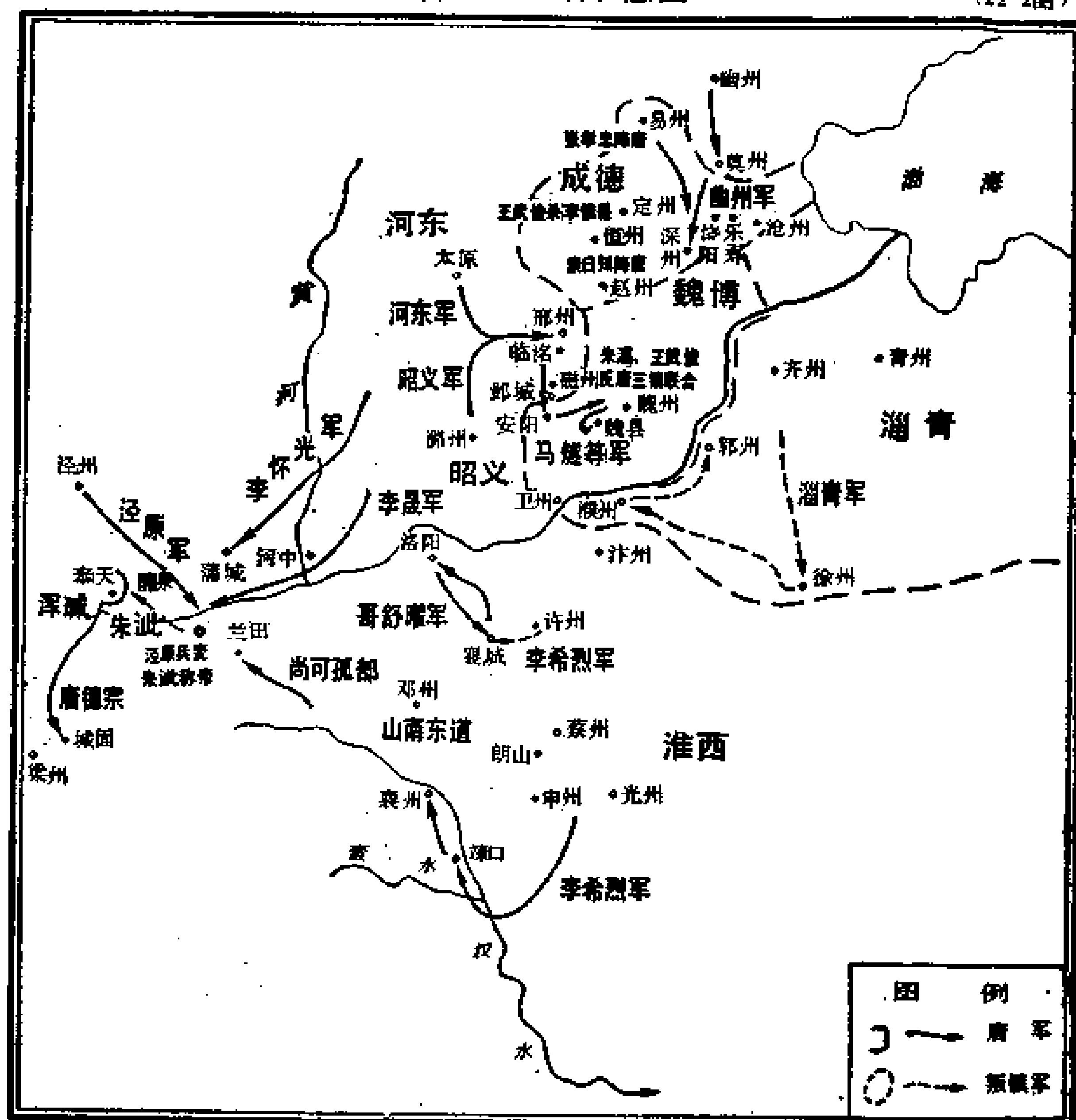
二、作战经过和双方的战略运用

（一）河北战场

1.魏博方面

唐德宗平四镇示意图

（22-2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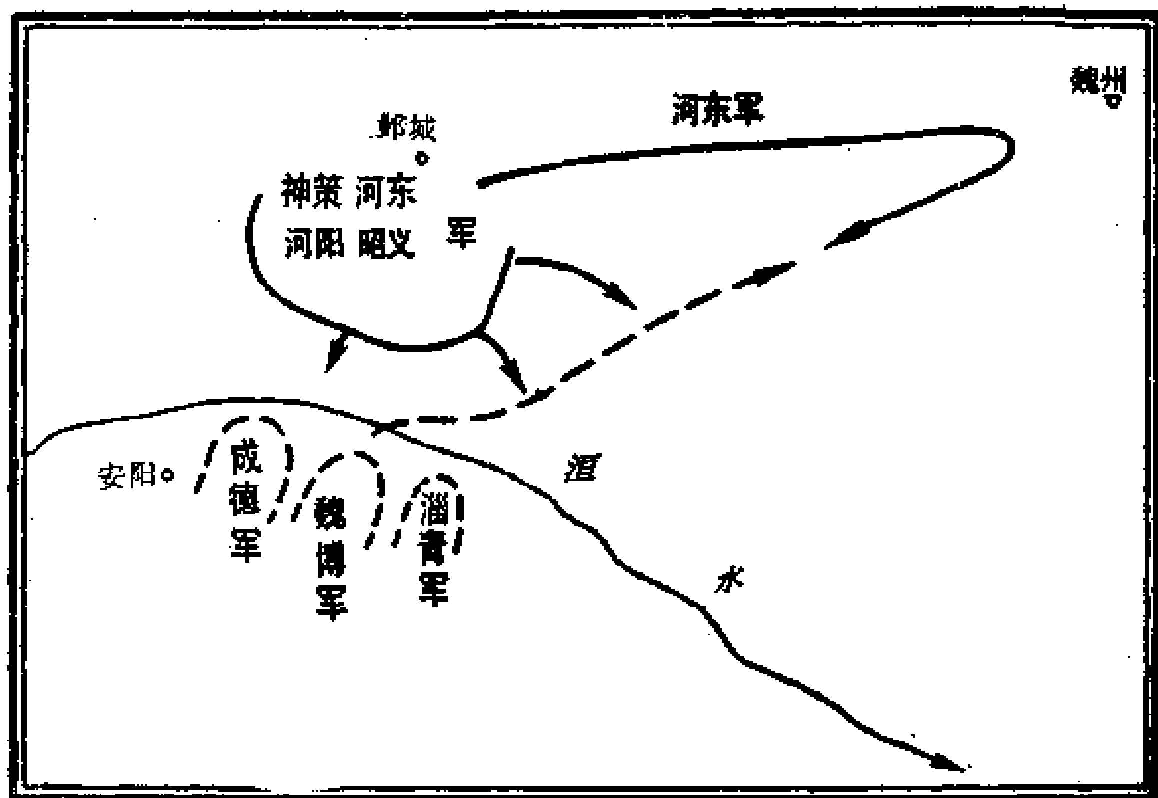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五月，四镇决定连兵抗命后，魏博田悦即派遣其兵马使孟佑率步、骑五千北助成德李惟岳，并认为“邢、磁如两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12〕首先对唐廷的突出部（即成德、魏博的接合部）发起进攻，命康愔率八千人围攻邢州（今河北邢台），命杨朝光率五千人往邯郸（今河北邯郸）西北，切断昭义唐军增援邢、洺的进路，田悦自己率主力数万围攻临洺（今河北永年县西）。唐军坚壁而守。

七月，唐廷命河东节度使马燧为魏博招讨使，率步骑二万，会同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合兵八万援救邢州，临洺，进攻田悦。临洺之战，唐军大捷，斩首万余级，田悦连夜撤退，临洺、邢州解围。田悦向李纳（时李正己已死，由其子李纳统领军务）和李惟岳求救，李纳派兵万人，李惟岳派兵三千前往援救。田悦收容散兵得二万余人，合军防守洹水（即安阳河，在安阳北）南岸，淄青军位于其东，成德军位于其西，首尾相应。唐廷调河阳节度使李艽率兵加强该方面，马燧率诸军进至邺城（即临漳），与李艽会合。

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正月，马燧率诸军进至洹水北岸，田悦坚壁不战，唐军乏粮。马燧率军东趋魏州，诱田悦出战，田悦中计，率步骑四万渡洹水尾追马燧军。马燧回军反击，神策、昭义、河阳三军同时投入战斗，田悦军大乱，溺水而死者不可胜记，唐军斩首二万，俘三千余人。

马燧与李抱真不和（李抱真要杀怀州刺史杨铢，铢逃至马燧处，马燧奏其无罪，由此二人发生嫌隙），马燧屯驻黎阳仓口（今河南内黄县楚旺镇附近），李抱真屯驻平邑浮图（今河南安阳县东回龙镇东），在田悦军大败之际，互相观望，迁延不进，致使田悦连夜率残兵千余人撤至魏州。魏州守将李长春有意降唐，闭关不纳，以俟唐军。挨至天明，才开城放田悦入城。田悦入城后杀死李长春，据城而守。田悦入城十余日后，马燧才率诸军到达魏州城下，攻之不克，战争停滞下来。

洹水之战示意图　　(22-3图)



2．成德方面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六月，唐廷在派马燧等军进击田悦的同时，命幽州节度使朱滔进攻成德李惟岳。

八月，朱滔军南下抵莫州（今河北雄县南），成德镇易州（今河北易县）守将张孝忠降唐，唐廷下诏以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正月，朱滔、张孝忠继续南下攻占束鹿（今河北束鹿东北），进围深州（今河北深县西），大破李惟岳军，李惟岳退回恒州（今河北正定）。赵州（今河北赵县）守将康日知，举赵州降唐。李惟岳派成德兵马使王武俊率军击康日知，闰三月，王武俊反戈突入恒州，杀李惟岳降唐，成德平定。至此，河北略定，只田悦坚守魏州未下，战局对唐军甚为有利。

3．朱滔、王武俊叛唐，幽州、成德、魏博三镇联合

成德既定，唐德宗匆忙下诏三分成德镇：以张孝忠为易、定（今河北定县）、沧（今河北沧州市东南）三州节度使；王武俊

为恒、冀（今河北冀县）都团练观察使；康日知为深、赵都团体观察使，以德（今山东德州东南）、棣（今山东惠民东南）二州改隶幽州，并令朱滔还镇。这时，深州在朱滔控制之下，朱滔请将深州划归幽州，德宗不许。

王武俊以手诛李惟岳，认为功在张孝忠、康日知之上，而位却在张之下，对唐廷极为不满，朱滔得不到深州亦对唐廷不满。

田悦困守魏州，得知上述情况后，乘机遣使到朱滔处挑拨说：

> “且今上志欲扫清河朔，不使藩镇承袭，将悉以文臣代武臣，魏亡，则燕、赵为之次矣，若魏存，则燕、赵无患。”

朱滔素有异志，闻之大喜。田悦又遣使到王武俊处说：

> “俟平魏之日，使马仆射（指马燧）北首，朱司徒（指朱滔）南向，共相灭耳”“三镇连兵，若耳目手足之相救，则他日永无患矣！”〔13〕

王武俊闻言也甚喜，于是三镇联合（此时梁崇义已被唐军击灭），朱滔率步骑二万五千，王武俊率步骑一万五千南救田悦。朱滔又遣使诱说张孝忠，但孝忠不从。

唐廷知朱滔、王武俊叛，诏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朔方及神策军步骑一万五千，加强讨田悦的唐军。

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六月，马燧、李抱真、李晟等唐军与田悦、朱滔、王武俊等叛军战于魏州城北的愜山。李怀光军刚到达战场即仓卒出击，被王武俊引二千骑冲断，唐军大败，溺死于永济渠的不可胜数，马燧率诸军退保魏县（魏州西三十五里）。

十一月，朱滔等在魏州筑坛结盟，以朱滔为盟主，朱滔称冀王、称孤，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均称寡人。

（二）淄青战场

永平军节度使李勉原辖汴（今河南开封），宋（今河南商邱）、滑（今河南滑县东）、亳（今安徽亳县）、陈（今河南淮

阳）、颍（今安徽阜阳）、泗（今安徽盱眙北）七州。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正月，唐廷下令划出宋、亳、颍三州为宣武军，以刘洽为节度使，又将郑州划归永平军，以东都留守路嗣恭为怀（今河南沁阳）、汝（今河南临汝）、陕（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河阳三城节度使，命永平节度使李勉为都统，辖刘洽、路嗣恭二节度使，以防淄青军。

十月，徐州刺史李洧（李正己的堂兄）请以徐州归唐廷，并上表说，“徐州不能单独抵抗纳（李纳），乞领徐、海、沂三州观察使（时海、沂二州已为李纳占据）”，[14] 唐廷不准。淄青李纳派其将王温、魏博将信都崇庆攻徐州，李洧遣使告急。

十一月，唐宣武节度使刘洽、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滑州刺史李澄、朔方大将唐朝臣等率军大破淄青、魏博军于徐州城下，江淮漕运又畅通无阻。李纳率军退守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二月，刘洽率军进攻濮州，克其外城。李纳派人请求悔过自新，德宗意欲赦免其罪，宦官宋凤朝对德宗说：“纳势穷蹙，不可赦”。[15]德宗乃囚禁李纳的使者于禁中。李纳见朝廷不肯赦，于是返回郓州（今山东省东平县），与田悦等合力抗唐。

（三）山南东道战场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六月，进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为南平郡王，加汉南、汉北兵马招讨使，督诸道兵讨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

八月，梁崇义发兵攻江陵（今湖北江陵），大败而归，收兵守襄（今湖北襄樊市）、邓（今河南邓县）。

李希烈率军沿汉水北进，会合诸道兵。梁崇义派翟晖、杜少诚迎击李希烈军。李希烈大破梁军于蛮水（经湖北南漳南流入汉水）、疎口（今湖北宜城西北），翟晖、杜少诚请降。李希烈派二将先赴襄阳慰谕军民，梁崇义闭城拒守，守军开门争出，梁崇义投水而死，山南东道遂平。朝廷以河中尹李承为山南东道节度

使。

（四）淮西李希烈反唐，五镇联盟

李希烈进爵扩地，野心大增。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十一月，李希烈率所部三万人移镇许州（今河南许昌），派亲信诣李纳、朱滔，密谋共袭汴州。李纳数派游兵南下渡汴水迎淮西军。从此东南转输又不敢沿汴渠、蔡水西上，东南粮馈又断。

此时，朱滔、王武俊离镇远出，供给专赖魏博，日益困弊。得知李希烈军势很盛，对唐廷有怨，于是共遣使至许州，劝李希烈称帝。李希烈于十二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正月，李希烈遣军陷汝州、尉氏（今河南尉氏），围郑州，游骑至彭婆（今河南洛阳南），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

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各上表李希烈，称臣、劝进。

四月，唐德宗以神策军使白志贞为京城招募使，招募禁兵以讨李希烈。

唐德宗以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勉为淮西招讨使，以哥舒曜（哥舒翰之子）为东都、汝州（今河南临汝）节度使、招讨副使，讨李希烈。哥舒曜率军至襄城（今河南襄城）南之颍桥镇，遇大雨，还保襄城。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李希烈率兵三万围攻哥舒曜于襄城。唐德宗命宣武节度使李勉及神策将刘德信率兵救援。九月，李勉派唐汉臣率兵万人去救襄城，并派刘德信率兵三千前往协助。李勉上奏唐德宗说："李希烈精兵皆在襄城，许州空虚，若袭许州，则襄城围自解。"[16]随即改命唐汉臣、刘德信二将率兵前往进攻许州。未行数十里，唐德宗派遣宦官斥责李勉遣背诏命，二将狼狈退回，遭到淮西伏兵邀击，死伤过半。唐汉臣退往大梁（今河南开封），刘德信退回汝州。李希烈游兵剽掠至伊阙（今河南洛阳南）。李勉又派其将李坚率兵四千，去协助

防守东都，被李希烈切断其后路，李坚不能退回。宣武军从此不振，襄城更加危急。

（五）泾原兵变，朱泚称帝

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十月，唐廷征调泾（今甘肃泾川北）原（今甘肃固原）等诸道兵东救襄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兵五千路过京师，天雨寒甚，因得不到犒赏，众怒，扬言说："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闻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相与取之。"[17]于是军士哗变，攻入京城。德宗率后妃及宦官仓皇出走，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泾原叛兵拥朱泚（曾任泾原节度使）为主，诸镇援救襄城之兵未出潼关者也叛回长安，投顺朱泚，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

面对这种情况，唐廷采取如下应变措施：

——左金吾大将军浑瑊到达奉天，浑瑊素有威望，人心稍安。德宗以浑瑊为京畿、渭北节度使，白志贞为都知兵马使，守奉天；

——唐德宗遣中使到魏县行营告急，对成德的作战不得不暂时中止，河东节度使马燧引兵回太原，河阳节度使李艽引兵回河阳，泽潞节度使李抱真退屯临洺；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率军回救长安，十一月到达蒲城（今陕西蒲城），有众五万；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率军还救长安，到达东渭桥，有众万余人；

——神策兵马使尚可孤率众三千自武关入援，夺占蓝田；

——河东节度使马燧遣行军司马王权及其子马汇率军五千到达中渭桥。

朱泚自东、南、西三面进攻奉天，围攻经月，由于浑瑊坚守危城，朱泚终不能克。十一月，朱泚兵在醴泉（今陕西礼泉）被李怀光击败，退守长安，奉天解围。

此时李希烈攻占襄城，哥舒曜退保洛阳。

（六）朱泚未平，李怀光再叛

李怀光性粗疏，从山东来时一路上曾几次说宰相卢杞和赵赞、白志贞等人是奸佞，应该诛杀。卢杞害怕，奏请德宗命李怀光乘胜进攻长安，不必入奉天相见，以免延误进攻时日。李怀光自以为解奉天之围有大功，对此很不高兴，屯兵不进，并数次上表，揭露卢杞等罪恶。

十二月，德宗不得已被迫贬卢杞等为南方远州司马。又派人至田悦、李纳、王武俊处、赦免其罪，并以高官厚禄与之。王武俊、田悦、李纳撤去王号，上表谢罪。但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称楚帝，改元“武成”。

唐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李怀光因逼迫唐廷驱逐卢杞，内心不安，屯兵咸阳，心生异志，遂与朱泚通谋，德宗被迫仓皇逃出奉天。

三月，唐德宗至城固，（今陕西城固），唐军韩游瓌率兵驻邠宁，戴休颜驻奉天，骆元光驻昭应（今陕西临潼），尚可孤驻兰田，都接受李晟的指挥，李晟军势大振。唐德宗原拟逃往成都，因此留在汉中。李晟用忠义激励全军，决心坚强，威信大增。韩游瓌率兵在奉天与浑瑊会师，与李晟东西相应，威胁长安。五月，李怀光、朱泚等在长安之战中被李晟、浑瑊等击败，李怀光逃往河中（今山西永济），朱泚逃往泾州，长安遂告克服。六月，朱泚逃至彭原西城屯，被其将梁庭芬射坠坑中，为韩旻等斩杀。七月，德宗返回长安。

唐德宗贞之元年（公元785年）三月至八月，马燧与浑瑊会师，屡败李怀光军，进攻河中。八月，河中守将纷纷投降，李怀光不知所为，自缢而死。朱泚、李怀光之乱遂告平定。

德宗贞元二年（公元786年）正月，李希烈部将杜文朝进攻襄州，二月，山南东道节度使樊泽迎击并将其活捉。三月，李希烈副将进犯郑州，被义成节度使李澄击破。李希烈兵势日衰，且生疾病。四月，其大将陈仙奇派医师陈山甫毒死了李希烈，并杀其兄弟、妻子，率众降唐，唐廷以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

至此，唐德宗讨四镇和由此而引起的讨李希烈、朱泚、李怀光的战争宣告结束。但这场战争打了五年，耗资不可胜记，战事滋蔓，战火越烧越旺，从河北打到河南，从河南打到关中，终于打进了长安宫阙。最后虽然在浑瑊、马燧、李晟等将努力下平息了这次战祸，但原定粉碎藩镇子孙世袭的战略目的丝毫也没有达到。对成德镇，唐廷不得不满足王武俊的欲望，任他为恒、冀、深、赵节度使；对魏博田悦反而加官进爵，授检校左仆射；对李正己的儿子李纳不得不承认为平卢（即淄青）节度使。淮西镇，虽然陈仙奇毒死李希烈投降了唐廷，但三个月后，李希烈的死党吴少诚又杀了陈仙奇，自为留后，唐廷又不得不给予承认。

不仅如此，唐德宗还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下诏罪己"赦天下"，制曰：

> 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力役不息，田莱多荒……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罪实在予，永言愧悼。……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

这表明唐德宗讨四镇是完全失败了。

三、唐德宗平藩失败的原因

首先在政治上，德宗即位后虽然想振作一番，对改革财政作出了成绩，但他刚愎自用，喜逢迎，恶直谏，对功臣的猜忌一如肃宗、代宗、他信任权相元载、卢杞，冤杀了理财专家刘晏。政论家、翰林学士陆贽直言不讳地指出德宗"有轻待人臣之心"，"有独驭区寓之意，谋吞众略，有过慎之防"，"严束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规"，"上好胜必甘于佞辞，上耻过必忌于直谏"，"由是才能者怨于不任，忠荩者忧于见疑，著勋业者惧于不容，怀反侧者迫于及讨，驯致离叛，构成祸灾"。[18]

唐德宗虽有平藩之志，但缺乏一套切实可行的平藩政策。如

对藩镇未能实行区别对待，做到有所“讨”，有所“不讨”，有所“赦”，以瓦解藩镇联军，孤立最凶悍狡滑的藩镇。甚至李纳兵败请降，还囚使拒降，把李纳赶回叛镇阵营。藩镇击平后，对其所辖州、郡、兵马，或分，或收，也缺少缜密妥善的步骤和措施。不是仓卒处理，如三分成德，酿成王武俊、朱滔之叛，使河北大好形势毁于一旦；就是听之任之，如令李希烈讨梁崇义，任其吞并坐大，以致平了一个梁崇义，又叛了一个李希烈。由此可见，没有一套正确的平藩政策，单靠军事进攻，靠以藩制藩，是不能成功的。

军事上的错误也不少。唐德宗志大才疏，急于求成，未经充分准备，就仓卒下令，同时向魏博、成德、山南东道发动攻势，势散力分，谈不上战略运用；以后又由于措施失当，使战火一再扩大，步步陷入被动。不仅朔方、河东的精锐长期困在河北，天子禁军、神策六军李晟、哥舒曜、刘德信等也悉数调出关外，于是长安空虚，失去了控制局势、应付事变的能力，继于酿成泾原兵变和朱泚、李怀光起自肘腋的叛乱，搞得几乎不可收拾。唐德宗无可奈何，只好下诏罪己，起用李泌、陆贽等名臣和浑瑊、李晟、马燧等良将，使局势危而复安，但唐朝的国力和唐廷的威望已更加下降了。

除此之外，唐德宗刚愎自用，不懂军事却喜欢瞎指挥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正如陆贽所指出的那样："锋镝交于野而决策于九重之中，机会变于斯须而定计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碍，否臧皆凶。"〔19〕淮西招讨使李勉想以围魏救赵"之计，派唐汉臣、刘德信率军去攻许州以救襄城，被德宗斥为违背诏命，二将狼狈退回，结果中伏失败就是一例。

第四　唐宪宗平藩镇的战争

唐宪宗李纯（德宗的孙子）于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八月

即位。这时唐朝的经济和军力已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财政上推行“两税法”以来收入大为增加；陇右、关中、河东、三川（西川、东川、山南东道）、江淮及河南大部分节度使听命唐廷；中央禁军已扩大为左右神威、左右羽林、左右龙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等十军，其中尤以神策为盛，多达十五万人。唐与吐蕃、回纥的关系也趋于缓和，使唐廷减少了西顾之忧。

这时藩镇中实力最强，对唐廷威胁最大的是成德王士真、魏搏田季安、淄青李师道和淮西吴少诚。

以上表明，唐宪宗即位时已有了比德宗时较好的平藩条件。

唐宪宗在用人和纳谏两点上比唐德宗强，他选拔的宰相和翰林学士（可以参与朝议，宰相常从翰林学士中选拔），多数比较称职，如杜黄裳、武元衡、李绛、裴度、白居易等人。唐宪宗一般地也能纳谏和接受建议，但在某些重大决策问题上也常极为固执，而在宠信宦官这一点上则和肃、代、德相差无几。

一、平藩的战略方针和平西川、夏绥、镇海

（一）平藩的战略方针

唐宪宗即位后，藩镇抗命有扩大之势。宪宗刚登基，西川节度使韦皋病死，节度副使刘辟自立为留后，并求任命他为节度使。唐宪宗不允，任命山南东道节度使袁滋为西川节度使，征刘辟到京师任给事中。刘辟不受征，阻兵自守，袁滋畏其强，不敢进。唐廷无奈，只好以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刘辟得寸进尺，进一步要求兼三川节度使，唐廷不许，刘辟遂发兵攻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今四川三台）。

这样，唐廷已忍无可忍，但用兵征讨必须慎重，因此展开了一场廷议。公卿多认为“蜀险固难取”，不主张用兵，独宰相杜黄裳主张用兵。他分析建议说：

“德宗自经忧患，务为姑息，不生除节帅（不勉强任命节度使）；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军情所与则授之。中使或私

受大将赂，归而誉之，即降旄钺，未尝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举纲纪，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则天下可得而理也。”

他认为，“辟狂戆书生，取之如拾芥耳！”既以法度制裁，征调刘辟入京，刘辟抗命而守，更进攻东川，应即以武力制裁。他建议：

“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留军，辟必可擒。”

唐宪宗同意杜黄裳的意见，“命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将步骑五千为前军，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将步骑二千为次军，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同讨辟。”[20]

杜黄裳这一分析判断，反映了唐廷的战略方针：“必欲振举纲纪（恢复中央集权），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镇”，不从，则依情况用兵讨之。

西川是唐廷的后院，地位十分重要，从来听命唐廷，唐廷亦多以重臣为节度使，是唐朝宰相回翔之地。刘辟抗命不从，基础薄弱，有可能一举击灭。

（二）平西川刘辟

高崇文治军有方，“练卒五千，常如寇至”，[21]受命后立即出发。唐宪宗元和元年正月，率军经斜谷、兴元（今陕西汉中）、阆州（今四川阆中），直趋梓州。二月，严砺克剑州（今四川剑阁），高崇文入梓州。

刘辟在德阳（今四川德阳）北之鹿头关，连为八栅，屯兵万余人以拒唐军。六月，高崇文由东向西，派骁将高霞寓攻占鹿头关东的制高点万胜堆，破刘辟军于德阳，并攻占汉州（今四川广汉）。严砺亦破刘军万人于绵州（今四川绵阳东）之石碑谷。唐军已对鹿头关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鹿头关粮道被切断。九月，鹿头关守将仇良辅、绵江栅守将李文悦率士卒万余人投降。于是高崇文挥军直下成都，刘辟率数十骑西逃，为唐将高霞寓所擒获。高

崇文很注意军纪，“屯于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惊”，[22]西川遂定，高崇文槛刘辟送京师。

（三）平夏绥杨惠琳

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奉召率军讨淮西，败于溵水而还，不朝觐而去。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宰相杜黄裳以韩全义出征无功，骄蹇不逊，直令致仕（辞官），另派李演为夏绥节度使。夏绥留后杨惠琳（韩全义之甥）勒兵拒命。唐廷会河东等镇发兵进讨。夏州兵马使张承金斩杨惠琳，传首京师，夏绥平。

（四）平镇海李锜

镇海（辖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治润州，今江苏镇江）李锜是唐宗室，因贿赂宦官得任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又多积奇宝，奉献德宗，结交权臣，遂于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任镇海节度使。

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夏、蜀既平，藩镇惕息（畏惧），多求入朝”。[23]李锜亦不自安，假意请求入朝。宪宗允许之后，他一再拖延，又上表称疾，请延至岁暮入朝。时唐宪宗整饬纲纪，宰相武元衡说：“陛下初即政，锜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锜，将何以令四海！”[24]于是下诏征李锜入朝为左仆射，李锜遂反。

唐宪宗以淮南（治扬州，今江苏扬州）节度使王锷统诸道兵为招讨处置使，调宣武（治汴州，今河南开封）、武宁（治徐州，今江苏徐州）、武昌（治鄂州，今湖北武昌）、宝歙（治宣州，今安徽宣城）及淮南兵会于宣州，乘上流之势以临润州；令江西兵出信州（今江西上饶）；浙东兵出杭州，从北、西、南三面合击李锜。

李锜以宣州富饶，派四院随身兵马使张子良等三将率兵三千抢先去占宣州。张等见唐军四集，知李锜必败，与李锜的外甥裴行立密谋效顺唐廷。张等三将返军攻城，裴行立举火为内应，里

应外合，擒了李锜，械送京师。镇海平定。

唐宪宗即位后，一举击平三镇，唐廷威信大增。这表明当时唐廷是有力量来执行先绳之以法，然后举兵击之，以“振举纲纪”的方针的，发兵征讨时对形势的分析也是正确的。刘辟是“狂戆书生”，夏绥镇小力弱，李锜众心不附。他们的共同点是：三镇历来都是唐廷控制的方镇，反唐伊始，基础薄弱；三镇周围都是受唐廷控制的节镇和州郡，形势孤立，外无援兵。因此大军压境，三镇内部顷刻瓦解。对唐廷来说，打的是弱镇又是孤镇，所以能够一击成功。

三镇的平定，增强了唐宪宗削平藩镇的信心，但同时也使他熏熏然起来，滋长了轻敌的心理。

二、急于削平强镇成德，劳师无功

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月，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王武俊之长子）死，其子副大使王承宗自为留后。唐宪宗乘平三镇余威，“欲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乘王士真死，欲自朝廷除人，不从则兴师讨之”，宰相裴垍不同意，久议不决。宪宗以此问翰林学士，李绛等分析说：

> “河北不遵声教，谁不愤叹，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自武俊以来，父子相承四十余年，人情贯习，不以为非。……又范阳、魏博、易定、淄青以地相传，与成德同体，彼闻成德除人，必内不自安，阴相党助”，如兴师四面攻讨，彼等必“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而劳费之病尽归国家矣。今江、淮水(灾)，公私困竭，军旅之事，殆未可轻议也”。〔25〕

左军中尉吐突承璀（宦官），逢迎上意，想乘机夺宰相裴垍权，请率军往讨，一时议而不决。

李绛看到了“革河北诸镇世袭之弊”关系到淄青和河北各镇的切身利害，必“阴相党助”，如以各镇之兵讨成德，必然“按兵玩寇，坐观胜负”，这是很有见地的。

七月，卢龙节度使刘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田承嗣之孙）

病，唐宪宗再次提出讨成德问题，他对群臣说：

“今刘济、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死），岂可尽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时当平！”

李绛等再次进言说：

“群臣见陛下西取蜀，东取吴，易于反掌，故谄谀躁兢之人，争献策划，劝开河北，不为国家深谋远虑，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势与二方异。何则？西川、浙西皆非反侧之地（历来不是反抗唐廷的地方），其四邻皆国家臂指（听命）之臣。刘辟、李锜独生狂谋，其下皆莫之与，辟、锜徒以货财啖之，大军一临，则涣然离耳。……成德则不然，内则胶固岁深，外则蔓连势广……邻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闻代易，必合为一心，盖各为子孙之谋，亦虑他日及此故也。万一余道或相表里，兵连祸结，财尽力竭，西戎、北狄乘间窥窬，其为忧患可胜道哉！济、季安与承宗事体不殊，若物故之际，有间可乘，当临事图之；于今用兵，则恐未可。太平之业，非朝夕可致，愿陛下审处之。”〔26〕

这些分析都十分中肯。

正在这时，淮西吴少诚又病重，李绛等提出了先定淮西的建议：

“少诚病必不起。淮西事体与河北不同，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邻，无党援相助；朝廷命帅，今正其时，万一不从，可议征讨。臣愿舍恒、冀（指成德）难致之策，就申、蔡（指淮西）易成之谋。”

又指出，如果现在去打成德，以后淮西有事，又不得不用兵，势必陷入两面作战，造成“南北之役俱兴，财力之用不足”，〔27〕到那时再去赦成德，就晚了。

李绛等提出避免两面作战，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唐宪宗没有采纳。

八月，在唐廷讽示下，王承宗上表请献德（今山东德州）、棣（今山东惠民东南）二州，于是唐廷下令任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另派德州刺史薛昌朝为保信军节度、德、棣二州观察使。

本来事情已这样暂时妥协，但魏博田季安却不甘心唐廷推行割地削藩政策，暗中加以阻挠。薛昌朝本是王氏的女婿，唐宪宗任昌朝为保信军节度使，以接管德、棣二州，意在安抚王承宗。但田季安为挑起事端，遣使向王承宗挑唆说，"昌朝阴与朝廷通，故受节钺"，[28]于是王承宗派兵擒薛昌朝而囚之。唐宪宗令王承宗释放薛昌朝还镇，王承宗不听。

十月，唐宪宗下令削夺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河中、河阳、浙西、宣歙等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会同邻近各镇讨王承宗。

翰林学士白居易等群臣极言不应以宦官为制将、都统，唐宪宗不得已，削去四道行营兵马使官职，改处置使为宣慰使，但统军进讨如故。

同月，吐突承璀兵发长安，各镇之兵也分道前进。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正月，卢龙军南下，占饶阳（今河北饶阳东北）、束鹿（今河北束鹿），至乐寿（今河北献县西南）久围不下。魏博、淄青、泽潞暗通成德，他们各取一县后，即止军不进，使王承宗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吐突承璀。吐突承璀威令不振，屡战屡败，左神策大将军郦定进战死，军中气夺。白居易多次上言，请罢成德之兵。延至七月，王承宗上表"乞输贡赋，请官吏，许其自新。"[29]唐宪宗也以师久无功，不得已下诏赦免王承宗，复成德节度使，德、棣二州归还成德。

此役历时十个月，动用兵力近二十万，耗资七百余万缗，劳民伤财，损兵折将，一无所获。[30]

三、同时进攻淮西、成德

（一）进攻淮西

唐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

（吴少诚部将，少诚死，少阳杀其子而取代之）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以病闻，自领军务”。[31]

宰相李吉甫重申李绛“申蔡易成之谋”，于是唐宪宗决意讨淮西。十月，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蔡（今河南汝南）招抚使，以内常侍崔潭峻为监军，督宣武等十六道兵讨吴元济。

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初，南路鄂岳军（鄂岳观察使所部，治鄂州，今湖北武昌）、北路忠武军（治许州，今河南许昌）颇有进展，获得一些小胜；但西路严绶本部小胜后疏于防备，遭淮西军夜袭，败于磁丘（今河南泌县东北），退五十余里，保唐州（今河南泌阳）；东路寿州团练使令狐通被淮西军击败，退保寿州（今安徽寿县）。

严绶“无他材能……厚赂宦官以结声援，拥八州之众万余人屯境上，闭壁经年，无尺寸功。”[32]

吴元济见唐军四面进攻，乃派人向成德王承宗、淄青李师道求救。王承宗、李师道几次上表请赦吴元济，宪宗不许。李师道派兵三千前往寿春（今安徽寿县），表面扬言协助唐廷进讨淮西，实际却是支援淮西。李师道为了策应淮西，又派人烧毁东都钱帛三十余万缗匹，谷三万余斛，人心恐惧。群臣多请停止进讨淮西，宪宗不许。六月，李师道又派人刺杀主张征讨淮西的宰相武元衡，击伤御史中丞裴度。有人请罢免裴度官职，以安定成德、淄青两镇的情绪。宪宗征讨淮西的决心非常坚定，反而提拔裴度为宰相。裴度认为：

> “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业已讨之，两河藩镇跋扈者将视此为高下，不可中止。”[33]

宪宗很同意，将用兵之事完全委托裴度。

九月，宪宗命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以代严绶。

十月，唐宪宗将山南东道分为两节度，命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今湖北沔阳西南）、郢（今湖北京山）、均（今湖北均县

西北）、房(今湖北房县)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隋（今湖北随县）、邓（今河南邓县）节度使。高霞寓专事攻战，李逊调赋供饷。

（二）再攻成德，陷入两面作战

唐廷在宰相武元衡被杀后，误认为是成德王承宗所指使（后来查明是淄青李师道所为）。七月，下诏数王承宗罪，绝其朝供。

这时魏博田弘正（即田兴，田季安的部将，季安死，其子幼弱，兵变，拥立田弘正，弘正不受，上表待命，唐廷以田弘正为魏博节度使）倾向唐廷，屡上表请讨成德，唐廷允其进屯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十二月王承宗纵兵四掠，卢龙、横海（治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义武三镇争上表请讨王承宗。

唐宪宗准备攻成德，宰相张弘靖谏曰："两役并兴，恐国力所不支，请并力平淮西，乃征恒冀。"唐宪宗不听，张弘靖辞官。

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正月，下令削王承宗官爵，令河东、幽州（即卢龙）、义武、横海、魏博、昭义六镇及振武（治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和林格尔）军二千人讨成德。

二月，进攻开始，魏博、卢龙、昭义、横海等镇都有进展，取得一些胜利，各歼成德军一、二千人，并夺占了一些要点。但由于不设统帅，行动极不协调，各镇又"互相观望"，[34]随后反遭成德军各个击破，义武军败于恒州，奔还定州；昭义军败于柏乡（今河北柏乡），退回本镇；横海军退路被截，退回沧州。

这时淮西方面，由于诸军都统韩弘"欲倚贼自重，不愿淮西速平"，[35]各路军只好各行其是。自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十一月到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十月，东路寿州团练使李文通在固始（今河南固始）击败淮西兵，占领鏉山(今河南沈丘东)；北路行动积极，陈许（即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与河阳节度使马重胤及河东、魏博、宣武等镇兵击败淮西军于小溵水（今河南郾城北），占领溵水，数战于陵云栅（郾城东北），歼灭淮西兵五千余人，宣武军于郾城破淮西兵二万，歼三千余人；西路唐、邓节

度使高霞寓先败淮西兵于朗山（今河南确山），歼千余人，随后大败于铁城（即文城栅，今河南遂平西南），仅以身免。“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36]高霞寓素悍勇，平西川立有战功，至此大败，不得不上报。南路鄂岳军攻破申州外城。

唐廷闻铁城之败，“中外惊愕”，宰相入见，劝唐宪宗罢兵。宪宗认为“胜败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37]唐宪宗这一决心是正确的。随即命知枢密梁守谦为监军，督李光颜等各军进攻淮西，以袁滋为彰义节度使，中、光、蔡、唐、随、邓观察使，以代高霞寓。

袁滋至唐州，撤掉斥候，命其兵不得犯淮西境，于是吴元济进围新兴栅（当在唐州东北）。袁滋竟“卑辞以请之，元济由是不复以滋为意”。[38]唐廷得知后，又以李愬（李晟之子）代袁滋为唐、随、邓节度使。

（三）停止攻成德，专攻淮西

唐廷对成德用兵，“兵十余万，回环数千里，既无统帅，又相去远，约期难一，由时历二年无功，千里馈运，牛驴死者什四五。”

宰相李逢吉及朝士多上言：

“宜并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其胜势，回取恒冀，如拾芥耳！”[39]

唐宪宗犹豫甚久，到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五月，下令停止对成德用兵，并命各节度使还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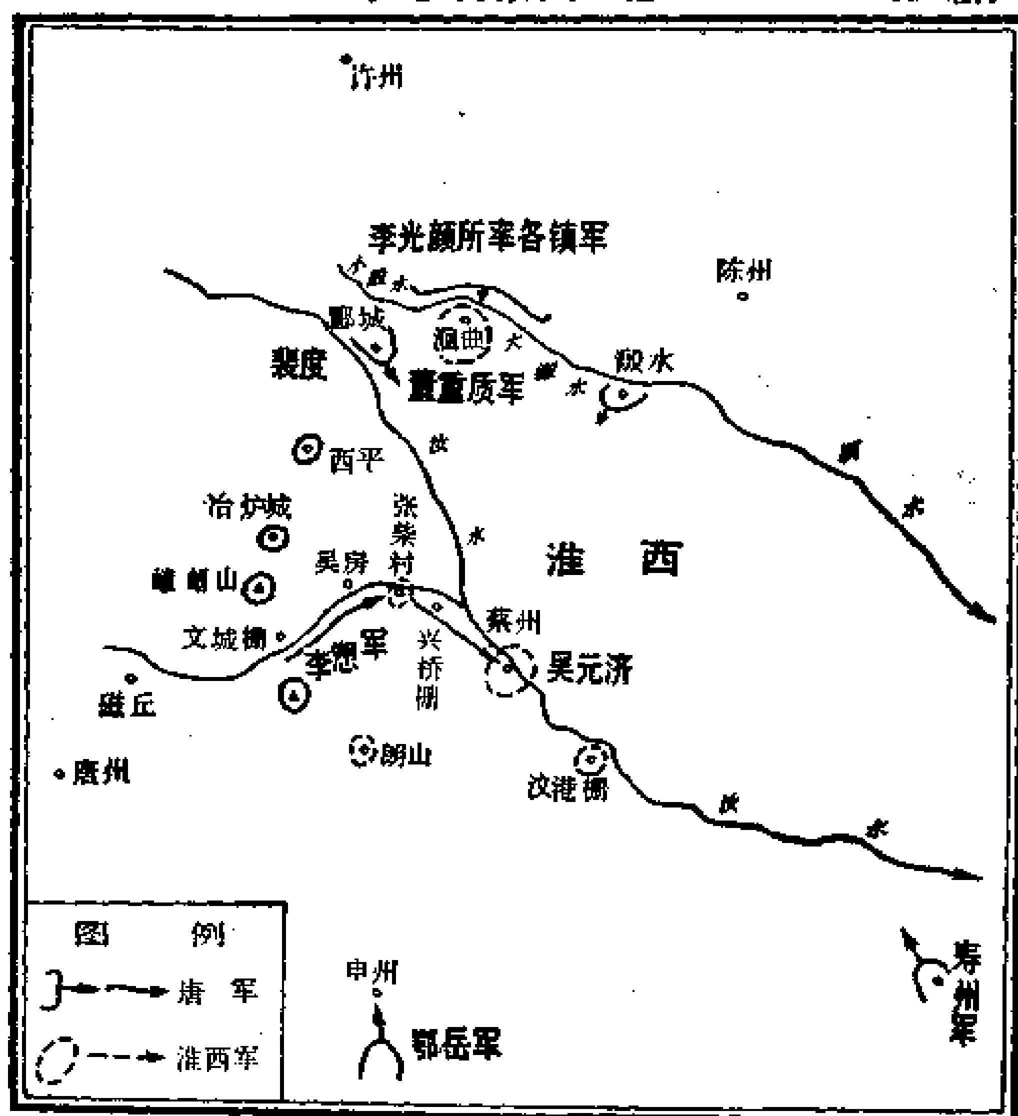
四、李愬袭蔡州，擒吴元济

（一）李愬的袭击准备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正月，李愬到达唐州，当时该方唐军在大败之后，“士卒皆惮战”，李愬亲自巡营慰问，“伤病者存恤之”。

为了麻痹淮西，李愬故意“不事威严”，他对众将说：“吾故示之以不肃，彼必以吾为懦而懈惰，然后可图也。”[40]淮西曾

李愬袭蔡州示意图 (22-4图)



击败高霞寓、袁滋二帅，又轻视李愬名位不高，对唐州方向遂不为备。

为增加军力，李愬报准唐廷，调来步骑二千人。

淮西由于长期战争，生产破坏，民多无食，又不满吴元济的残暴统治，逃到唐军营区的有五千多户，李愬责成各县妥善安置抚养，并派兵保护，使淮西军民士气大受影响。

二月，唐军俘获淮西骁将丁士良，李愬给以官职，丁士良献计擒了文城栅（今河南遂平西南）谋主陈光洽，迫降了文城栅守

将吴秀琳及众三千人，大大削弱了淮西西线的防御。李愬问取蔡之计于吴秀琳，吴说：

"公欲取蔡，非李祐不可。"〔41〕

李祐乃淮西骁将，有勇略，守兴桥栅（蔡州西北）。

李愬设伏擒获李祐，加以优待，任命他为指挥自已牙队（即卫队，三千人）的六院兵马使。李祐感激李愬对他的信任，不断为袭取蔡州出谋献策。李愬对降军家属也给予生活上的照顾，每得降卒，必亲自询问，从而逐渐摸清了蔡州的险易虚实。

从三月至五月，李愬先后袭占了蔡州外围的一些要点：蔡州西及西北的马鞍山、路口栅、嵖岈山、冶炉城和西平等地，与郾城（今河南郾城）李光颜部取得了联系；蔡州以南的白狗、汶港、楚城各栅、断切了蔡州与申、光二州的联系。

五月，李愬派兵攻朗山，遭淮西军内外夹击，受了一些损失，诸将都感到懊伤，但李愬不以为意。九月，李愬亲率军攻吴房（蔡州西北，今河南遂平），克其外城。守军保子城不出，李愬引兵诱之，淮西将孙献忠率骁骑五百突出追击，唐军大惊，将退，李愬亲督军力战，杀死了孙献忠。诸将劝李愬乘胜攻子城，李愬不许。事后诸将问李愬：

"始公败于朗山而不忧，胜于吴房而不取…… 敢问其故？"

李愬答曰：

"朗山不利，则贼轻我而不为备矣。取吴房，则其众奔蔡，并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42〕

（二）北路唐军加强对蔡州的压力

北路李光颜所率河阳、宣武、河东、魏博、忠武等军是进攻淮西的主力，与淮西军夹溵水（今河南郾城北，东流入颍水）而阵。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三月，陈、许兵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渡溵水，据要地为城，于是其他各军相继皆渡，进逼郾城，李光颜击败淮西军三万人，歼其十之二三，淮西所属郾城

令董昌龄、守将邓怀金举城以降。吴元济大惧，这时淮西北线要冲洄曲（溵水于北回曲，亦名时曲）由董重质（吴少诚之婿，吴元济的谋主）防守，吴元济恐洄曲不守，悉发亲近及蔡州守卒以加强董重质。至六月，吴元济见“其下数叛，兵势日蹙，”[43]上表谢罪，请束身归朝。唐宪宗许以不死。但吴被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挟制，不能出境。

（三）宰相裴度亲往前线督师

七月，因诸军讨淮西四年不克，馈运疲弊，牛多死于运输，老百姓甚至以驴耕田，唐宪宗深感困难，以此问宰相。李逢吉等“竞言师老财竭，意欲罢兵”，独裴度不语。宪宗问之，答曰：

“臣请自往督战。”“臣誓不与此贼俱生，臣比观吴元济表，势实窘蹙，但诸将心不一，不并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诣行营，诸将恐臣夺其功，必争进破贼矣。”

宪宗很高兴，令裴度兼彰义节度使、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八月，裴度至郾城，奏“诸道皆有中使监阵，进退不由主将，胜则先使献捷，不利则凌挫百端。”[44]请悉去之，唐宪宗允准。于是悉去监军，诸将战多有功。

（四）李愬雪夜袭蔡州

九月，李祐向李愬建议说：

“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虚直抵其城。比贼将闻之，元济已成擒矣。”

李愬很同意，将此计划密呈裴度，裴度深为赞赏，说：

“兵非出奇不胜，常侍（李愬有左散骑常侍官衔）良图也。”[45]

十月初十，风雪阴晦，李愬利用这一有利天气，命降将李祐、李忠义率突将三千为前锋，自将三千人为中军，以李进诚率三千人为后军，秘密出发，将士均不知去向。行六十里，夜间，到达张柴村（吴房东南），全歼守卒及烽子（管烽火的兵）。休息进食后，留五百人守栅，以防洄曲淮西军回救蔡州，另以五百人向南方朗山方向警戒，自率主力乘夜冒雪向东南急进。至此才向军士

宣告，要“入蔡州取吴元济”。[46]是夜天寒雪大，人马冻死者相望，但军令甚严，众不敢违。夜半，雪更大，行七十里，近城处有鹅鸭池，李愬令击之以混军声。

自吴少诚抗命，唐军已三十多年不到蔡州，所以蔡州毫无防备。四更，李愬率军到达城下，李祐等爬城而进，杀门卒，开门迎入大军，城中毫无知晓。吴元济闻唐军传呼李愬号令，才登牙城抗拒。李进诚攻破外门，蔡州人民争扛柴草助唐军烧南门，门坏，擒吴元济。当时洄曲尚有董重质所率精兵万人，李愬厚抚其家属，派董重质的儿子前往招降，李光颜军进占洄曲，收降了董重质部。申、光二州守兵二万亦不战而降，淮西遂平。

淮西平定后，唐廷下令讨淄青李师道，淄青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归顺唐廷。成德王承宗病死，部众推立其弟王承元，承元摄于唐廷军威，上表归降。至此，四分五裂的局面宣告结束，唐廷又恢复了统一。但由于唐宪宗以为大功告成，收刮钱财，恣意骄侈，迎佛骨，求长生，历史上有名的韩愈谏迎佛骨而遭贬一事，就发生在这时。朝臣、谏官受到冷落，宦官则更得到宠信。因唐宪宗不再采取进一步收回节度使财、兵、任免等权的措施，以彻底消灭藩镇割据，为时不久，藩镇叛乱再起，并一直延续到唐王朝灭亡。

综 合 论 述

唐宪宗平藩镇，关键是在战略上如何选择进攻目标。是先弱后强还是先强后弱；是打孤立的还是打成片的；是集中力量打一个还是两个拳头打人，失败和成功都取决于对此选择的正确与否。

一开始，先打西川、夏绥、镇海，它们都是孤立而基础薄弱的，所以都成功了。

成德是割据几十年根深蒂固的藩镇，唐宪宗又是从关连到许多藩镇切身利益的世袭问题开刀的，而成德周围的卢龙、易定、魏博、淄青又都是同父死子继相互关连的，很明显，打成德是平藩

镇的难点。李绛等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认为当时不宜攻成德。待吴少诚病危，李绛就主张先打淮西，因为淮西四周皆“国家州县”，比成德好打得多,等淮西平定,再打成德不迟。否则就会“南北之役俱兴”，陷入两面作战。但唐宪宗在顺利平定西川等三镇之后，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听不进这些建议，还是先从成德开了刀，而且还以宦官吐突承璀为统帅，结果动用了近二十万人的兵力，打了十个月，劳师无功，只好自己下令收兵。以后，吴少诚果然死了，吴元济自为留后，唐宪宗下决心打淮西，这当然是恰当的。但可惜命帅不当，严绶、韩弘、袁滋不是养寇自重，就是胆小怯战，结果也无进展。在吴元济四处求援下，李师道施展种种诡计以牵制唐廷。唐宪宗开始以为是王承宗派人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后来又由于王承宗四出掳掠，魏博、卢龙、横海、义武纷纷上表请讨成德，在进攻淮西持而不决的情况下，再一次下令讨成德，又陷入了两面作战。打了一年半，在各镇拖延应付，徒耗巨额资粮，并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只好下令再一次停止进攻成德，以便集中力量进攻淮西。这个决心虽然下得迟了，但毕竟还是正确的。

唐宪宗的可取之处，是打淮西的决心始终不动摇，在武元衡被刺，高霞寓大败，李逢吉以“师老财竭”要求罢兵的不利情况下，都坚持了下来，最后重用裴度、李愬，撤掉监军，终于取得了胜利。

李愬雪夜入蔡州擒吴元济，是一次成功的奇袭作战，是一次从次要方向取得淮西胜利，进而导致全国平藩胜利的典型战例。李愬的计划和措施，如查明敌情，重用降将，麻痹对方，瓦解敌军民士气，利用雪夜远程奔袭等都很出色。而李光颜从北线对淮西的强大压力，使吴元济不得不倾全力去支援洄曲，则是李愬奇袭成功的客观条件。

唐代藩镇割据，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五代又是唐代藩镇割据的继续，如果算上五代，那就是两个世纪。割据时间如此之长，

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的。造成长期割据的主要原因，是安史乱后，唐廷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都大大下降，失去了“居重取轻”、“居中驭外”之势，唐廷的力量已不足以镇慑四方。加上政权日益腐朽，贵族官僚集团愈来愈大，兼并土地，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宫廷和官僚生活糜烂，挥霍无度，皇帝猜忌功臣，依赖宦官，形成南衙北司之争，官僚集团内部又有朋党之争，这些都使唐廷的力量更为软弱。

握有军、政、财大权的节度使制度为藩镇割据铺平了道路。飞扬跋扈、据地抗命的藩镇，唐廷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对听命唐廷的藩镇，则颇愿容忍。而谁听命、谁抗命却又变化无常、此起彼落。这也是藩镇割据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唐廷的以藩制藩政策就是由此产生的。

唐廷对藩镇的容忍，是因为他们互相制约，可以抵销力量。藩镇虽有利害相同之处，但也有互相矛盾之处。他们有各自的地盘，谁也不允许别镇侵占他们的土地，兼并他们的地盘，一个藩镇的扩大就是另一藩镇的缩小，就威胁到邻镇的安全，他们既不愿别镇被唐廷削平，也不愿别镇比自己强大，这就限制了藩镇力量的过于扩张。他们尽管搞得很跋扈，但都不足以威胁唐廷的存亡。这种情况对一个强大的王朝来说当然是不允许的，但对于力量大大下降的唐廷来说，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容忍的。

藩镇起到了分散军权的作用，唐廷对藩镇用兵一百多年，打了数不清的仗，但每次用兵除了少量神策军外，绝大部分都是藩镇之兵，以听命藩镇之兵打抗命藩镇之兵，他们虽然有保存实力、阳奉阴违的毛病，但他们自成系统，是地方兵，甚至是父子兵，皇帝所派的都统、招讨使，都只能使用它而不能干预它的内部事务，任何将帅都不能兼并这些军队而成为一支足以威胁唐廷存在的大军。从唐肃宗以后的皇帝，最怕的就是有人利用皇帝给他的军权来反对皇帝自己，如安禄山这样的人物，所以他们猜忌功臣，不允许郭子仪、李光弼、李晟等优秀将帅久握兵权。而分散军

权，使将帅互相制约，则是他们所欣赏的。他们以为再加上以宦官掌握禁军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节度使都有自己的地盘，以自己的人力、物力养活自己的军队。他们的地盘就是防区，他们可以监视悍镇，也可以防吐蕃入侵。唐廷调用镇兵从事征讨，只需补助一些粮饷，给予一些犒劳。这对收入有限、开支庞大、机构无能的唐廷来说，为应付频繁的战争，是方便可取的。

唐廷自身腐朽软弱，不得不容许节度使制度的存在，甚至推行“以藩制藩”的政策，而藩镇的态度变化无常，这就使削藩战争有始无终，遥遥无期。最后由唐廷的宣武节度使朱温，窃夺了农民起义的果实，结束了唐廷的统治。

注　释

〔1〕《资治通鉴·唐肃宗宝应元年》

〔2〕李吉甫撰《国计簿》称：唐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7年）时，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

〔3〕《新唐书·兵志》

〔4〕《新唐书·卷二一〇·罗绍威传》

〔5〕《新唐书·卷二一〇·田承嗣传》

〔6〕〔7〕〔8〕〔9〕〔10〕《资治通鉴·唐代宗大历十年》

〔11〕〔12〕〔14〕《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二年》

〔13〕〔15〕《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三年》

〔16〕〔17〕《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四年》

〔18〕《资治通鉴·唐德宗建中四年、兴元元年》

〔19〕《资治通鉴·唐德宗兴元元年》

〔20〕〔21〕〔22〕《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元年》

〔23〕〔24〕《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二年》

〔25〕〔26〕〔27〕〔28〕《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四年》

〔29〕《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五年》

〔30〕《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七年》

〔31〕〔32〕〔33〕〔35〕《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九年、十年》

〔34〕〔36〕〔37〕〔38〕《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一年》

〔39〕〔40〕〔41〕〔42〕〔43〕〔44〕〔45〕〔46〕《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

第二十三章　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

唐末，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压迫下，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终于爆发了黄巢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这次起义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所以义旗一举，到处响应，声势浩大，发展迅猛，人数最多时曾达到一百万人。起义军南征北战，行程两万里，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基本上冲垮了唐朝的统治基础。只是由于义军在胜利进军的同时也犯下了难以弥补的过失，才让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得以苟延残喘，并使叛徒朱温轻而易举地夺得了政权。

兹就起义战争中的流动作战、主力决战、建立根据地、攻守长安和围攻陈州等问题作一些战略得失的探讨。

第一　起义初期的流动作战

唐末，土地兼并激烈，皇帝、贵族、宦官、官僚恣意霸占农田。他们荒淫奢侈，挥霍无度。唐僖宗好音乐，喜宴游，宫廷有乐工达五百人之多。每次游幸，内外随从达十余万众，所费不可胜计。连年用兵南诏（今云南一带），更是军资浩繁。赋税、兵役、劳役有增无减，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加上多年水利失修，黄河中下游，水、旱、蝗灾不断，赤地千里。唐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关东（指潼关以东）大旱，几乎颗粒无收，流民成群，饿殍遍地，“天下百姓哀号于道路，逃窜于山泽，夫妻不相活，父子不相救。”[1]人民再也生活不下去了。

在唐懿宗即位同一年（公元859年），就爆发了浙东裘甫起义，攻占过浙东许多州县。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又

有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一路打回徐州，河南、山东、淮南的许多小支农民起义军纷纷参加，起义军发展到二十万人，占领过两淮广大地区。起义的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终于爆发了黄巢所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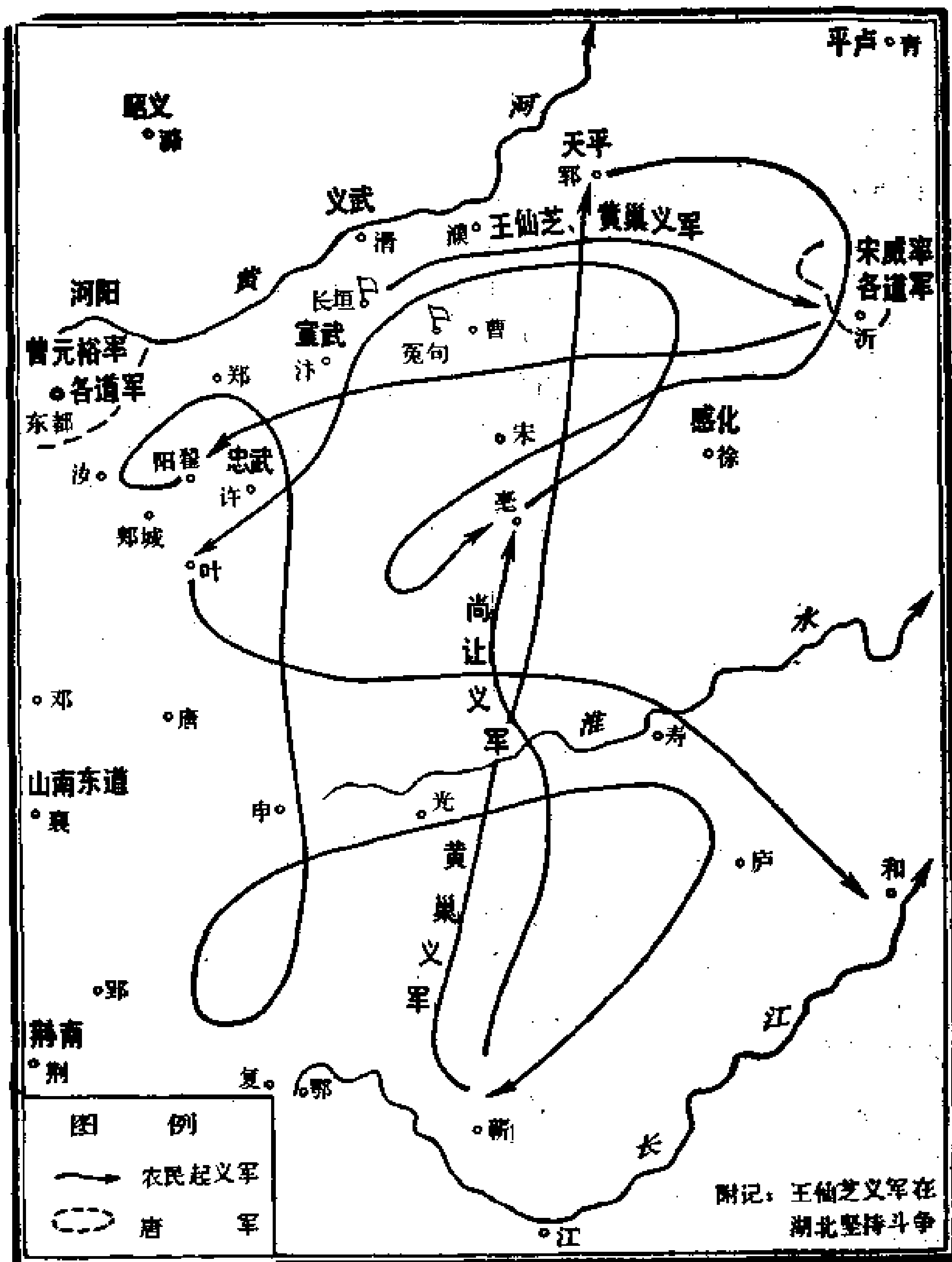
唐僖宗乾符二年（公元875年）正月，王仙芝领导数千人在长垣（今河南长垣）起义。六月，黄巢也领导数千人在冤句（今山东荷泽西南）起义，响应王仙芝。

王仙芝打出“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2〕的旗号，反唐廷，均贫富，深得人民拥护，“民之困于重敛者争归之”。〔3〕从山东到淮南，人民到处聚众响应，数月之间就连克濮（今山东濮县）、曹（今山东定陶），迅速发展到数万人，击败天平节度使薛崇，攻击州县，横行山东。十二月，起义军进攻沂州。

唐廷闻报惊震，急忙调淮南（驻杨州）、忠武（驻许州，今河南许昌）、宣武（驻汴州，今河南开封）、义成（驻滑州，今河南滑县东），天平（驻郓州，今山东东平北）等镇节度使派兵镇压，并以平卢节度使（驻青州，今山东益都）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指挥禁军三千、甲骑五百及诸道兵，在沂州（今山东临沂）一带形成了镇压起义军的主力。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七月，义军在沂州受挫，损失较大。王仙芝及时采取了撤退、分散、隐蔽的措施，避免了唐军的围歼。宋威以为义军巳被消灭，奏报王仙芝巳死，遣返各镇人马。唐廷闻报，百官入贺。但三日后，州县又报仙芝尚在，攻击如故。唐廷只好再次下令，调集各镇兵，“士皆忿怨思乱”，〔4〕一时难以集中。这就给了义军以迅速恢复、发展的机会。八月，义军突然跳出山东进入河南，攻占阳翟（今河南禹县西北）、郏城（今河南郏县），开始了流动作战。

义军这一战略转变是正确的。这时义军初起，人数虽多，但极大多数都是饥民，缺乏组织训练，势不能与强敌宋威集团硬

王仙芝、黄巢起义军进军路线示意图 (23-1图)



拼。山东以北有强大的河朔三镇（魏博、成德、幽州），以南有不久前镇压了庞勋起义的武宁（即感化节度使，驻徐州，今江苏徐州）节度使，东方是海。河南虽然藩镇林立，但忠武、宣武、义成三镇兵调去山东后就空虚了。义军进入河南，即甩开了宋威集团，获得了机动的自由；又进逼东都（唐以洛阳为东都），威胁唐廷的心腹重地，打乱了唐廷的军事部署。

唐廷慌忙以左散骑常侍曾元裕为招讨副使，命忠武镇发兵攻击义军，调昭义（驻潞州，今山西长治）、义成、山南东道（驻襄州，今湖北襄阳）、邠宁（驻邠州，今陕西彬县）、凤翔（驻凤翔，今陕西凤翔）等镇兵守卫东都、陕州、潼关及汝（今河南临汝）、邓（今河南邓县）要路，阻止义军西进。九月，义军攻克汝州，活捉了刺史王镣，东都震动。当义军攻占阳武（今河南原阳），进军郑州，在中牟受挫时，立即摆脱了前有重兵堵击，后有追兵的不利形势，转锋南向，向唐朝军事力量较为薄弱的荆、襄进军。

在唐代，西起山南东道的襄州和荆南的荆州（今湖北江陵），东到淮南的扬州之间的广大地域，军事力量比较薄弱，宋威、曾元裕又都被甩在了河南，因此义军进入湖北后，发展极为顺利，连克申（今河南信阳）、光（今河南潢川），复（今湖北沔阳西南）、郢（今湖北京山）、庐（今安徽合肥）、寿（今安徽寿县）、舒（今安徽潜山）等州，形势对义军十分有利。

可惜，当十二月义军进攻蕲州（今湖北蕲春南）时，王仙芝受唐廷诱降，准备接受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的官位。黄巢等广大将士极力反对，王仙芝虽未敢接受招降，但义军团结受到破坏，黄、王就此分手。

黄、王分手后，黄巢领兵单独作战。这个时期义军的作战时间和地点，史料记述不一，矛盾很多。但大体上说，黄巢是北上了，回到鲁西、河南流动作战。王仙芝则始终在湖北坚持斗争，其部将王重隐、曹师雄、柳彦章、徐唐莒等部渡江进入江西，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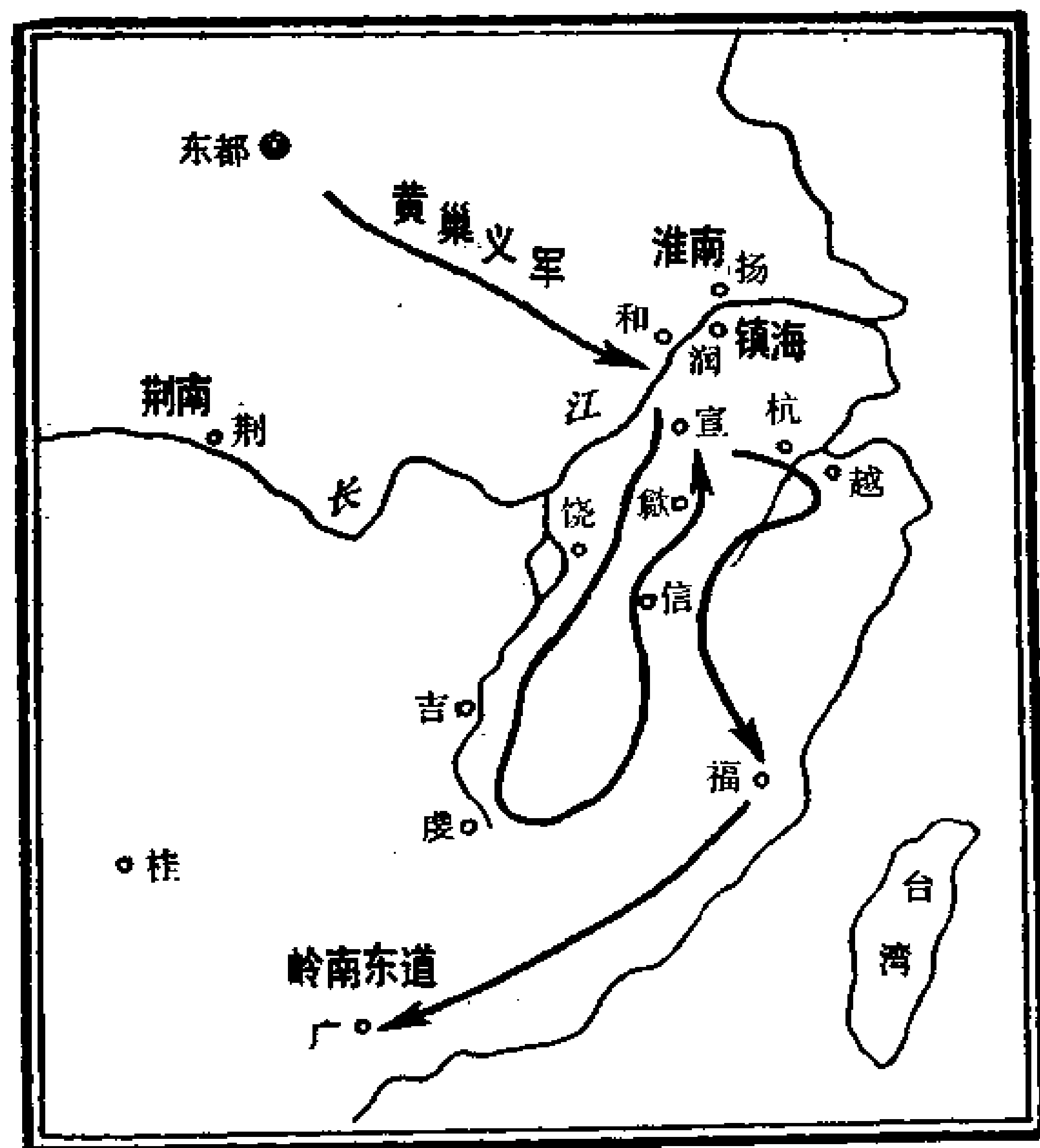
破洪州（今江西南昌）、江州（今江西九江），转战在湖南和宣（今安徽宣城）、润（今江苏镇江）之间。王仙芝继续动摇不定，曾派蔡温球、楚彦威、尚君长去洽降，被宋威中途劫获，遭唐廷杀害。王仙芝坚持到乾符五年（公元878年）二月，被追踪下来的曾元裕军击败于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五万人壮烈牺牲，王仙芝也被杀害。

黄巢跳出鄂东，率军北上，另辟战场，无疑是必要的。黄巢是在鲁西起义的，战士多山东人。久离故土，战士思乡，而重返鲁西又便于补充兵员，扩大队伍。这时山东唐兵力较为空虚，各镇兵或随宋威"淹留亳州"，或随曾元裕"拥兵蕲、黄（今湖北黄岗南）"，[5]或被调去浙东镇压王郢的起义军。因此黄巢返回鲁西，就于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初一举攻克郓州，杀掉了天平节度使薛崇。三月，攻占沂州，再次转战豫、鄂；十一月又进入山东，连克匡城（属滑州）、濮州，部队迅速扩大到数万人。

王仙芝失败后，尚让率余众到亳州（今安徽亳县）与黄巢会合，推黄巢为王，号"冲天大将军"并改元"王霸"，部署官属。[6]两支转战中原最强大的义军统一起来了，事权归一，士气大振。改元署官，标志着黄巢要推翻唐朝建立自己政权的目标明确了。

黄巢率军自亳州北上，攻克沂、濮。乾符五年(公元878年）三月，由滑州经宋、汴之境南下，进攻叶县（今河南叶县）、阳翟等地，再一次威胁东都。待唐廷以张自勉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把尚在荆、襄的曾元裕调回洛阳，并调河阳（驻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宣武、昭义、义成等镇兵猬集东都的时候，黄巢就率大军挥师南下，直插淮南，渡过长江，把起义的烈火烧到了广大的江南。义军利用了王仙芝余部在江南的战果，乘虚猛进，连克虔（今江西赣县）、吉（今江西吉安）、饶（今江西波阳）、信（今江西上饶）等州。辽阔机动战场的开辟，有利于义军进一步发展，并严重地威胁着唐廷的经济命脉，使唐廷陷入了更大的

黄巢起义军进军江南示意图 （23-2图）



困境。

高骈出身于大官僚家庭，当过神策军的高级将领，曾率唐军进攻南诏（今云南一带），镇压过四川兵变，是唐僖宗倚重的将帅，也是宰相卢携一派的王牌。当义军首次进入湖北时，高骈即由四川调任荆南节度使。黄巢渡江后，唐廷又把他调为镇海（驻润州，今江苏镇江）节度使。乾符五年八月，黄巢进攻宣州（今安徽宣城）不克，转入浙东，攻克 杭 （今浙 江杭州）、越（今

浙江绍兴）二州。高骈立即派大将张璘、梁缵分道追来。义军数战不利，为了保存实力，黄巢遂率军开山路七百里，由浙东进入福建。十二月攻占福州（今福建福州市）。福建观察使韦岫弃城逃走。义军占领了福建全境，并率军进入广东，乾符六年（公元879年）九月，一举攻克广州（今广东广州市），俘获了岭南东道（驻广州）节度使李迢。两广全部为义军所掌握。

黄巢所率领的起义大军，在唐代的心腹地区鲁、豫、鄂、皖转战达三年之久，接着进军江南，据有岭表，猛烈地冲击着唐廷的统治基础，破坏了唐廷的经济来源，成功地保存了自己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是一次伟大的、成功的流动作战。当时唐廷拥有包括节镇兵在内的近百万大军，初起的起义军为什么能够发展壮大并成功地进行流动作战呢？根本的原因是唐廷腐朽透顶，阶级矛盾尖锐，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所以义军到处得到人民的拥护。从战略上看，义军也有若干成功的条件：

（一）藩镇割据，互相矛盾

藩镇割据是唐代一大肿瘤。自安史之乱起，藩镇之祸一直连绵起伏，直至唐亡。唐宪宗平淮西后虽曾出现过一时表面的统一，但藩镇的势力并未铲除。有的长期割据，父死子继；有的在力量尚小时，服从朝命，一旦羽毛丰满就公开抗命；很多藩镇时叛时降；只部分节度使始终由唐廷掌握。从唐穆宗到懿宗的五十多年间，唐廷与藩镇又进行了多次战争。藩镇内部的变乱也不断发生，既然节度使可以反抗朝廷，节度使的部将一旦兵权在握，当然也可以除掉节度使，自称留后。唐廷无力处理，只好承认既成事实。因此节度使对唐廷多半心怀异志，力图自保，唐廷调他们出兵，他们一般只是应付差事，只有在危及他们自身利益的时候，才肯认真出力。藩镇相互之间，也勾心斗角，互相戒备。所以，唐廷与藩镇的总兵力虽有百万之多，但能够调集的则为数不多。正如黄巢所分析的那样："藩镇不一，未足制己"。[7]

（二）唐廷的军政重心与经济命脉不一致

在唐代，首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是政治重心，唐廷掌握的禁军都在关中。开始设置节度使，是为了西、北守边，后来为了平安史之乱和对付安史余孽，以藩制藩，节度使设置逐渐增多。此时，在全国共有四十八个藩镇，[8]其中绝大部分都在北方黄河流域，而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广大地域，则只有东川、西川、荆南、淮南、镇海、岭南等少数几个节度使和若干观察使。但唐代的经济却以南方发展较快，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安史乱后，黄河流域战争频繁，经济多次遭到破坏，且北方藩镇多拥兵自立，不向唐廷纳贡，所以唐廷的经济来源就不得不依靠江南。这就形成了唐廷在政治、军事上北重南轻，在经济上南重北轻的局面，为起义军向南方流动作战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南衙、北司之争和朋党之争，使唐廷指挥中枢软弱无力

南衙指政府机关在宫城之南，北司指宦官的办事机关在皇宫之北。南衙、北司之争，就是朝官和宦官之争。唐初使用宦官有一定限制，唐玄宗以后，宦官的势力明显扩大，他们左右朝政，操纵文臣武将的任免升降，甚至可以废立皇帝。从穆宗到昭宗八个皇帝，"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9]中央禁军由宦官统领，命将出征必派宦官为"监军使"、"观军容使"，弄得将帅无权，事事掣肘。唐文宗想依靠朝官以诛宦官，结果失败，反使朝官大批被杀。后来许多朝官就不得不听命于宦官，以保全名利地位。在朝官之间也有朋党之争，最有名的牛僧儒和李德裕两派之争，称"牛李党争"，反复多，时间长，影响很大。在黄巢起义过程中，以宰相卢携为首的一派，内靠宦官田令孜，外托神策军出身的高骈，与以宰相王铎、郑畋为首的另一派斗争十分激烈，甚至在皇帝面前争吵。一派掌权就排斥另一派，如卢携上台，就把王铎、郑畋所任命的关东节度使统统换掉。这些唐廷内部的倾轧，使唐的指挥中枢软弱无力，也为义军流动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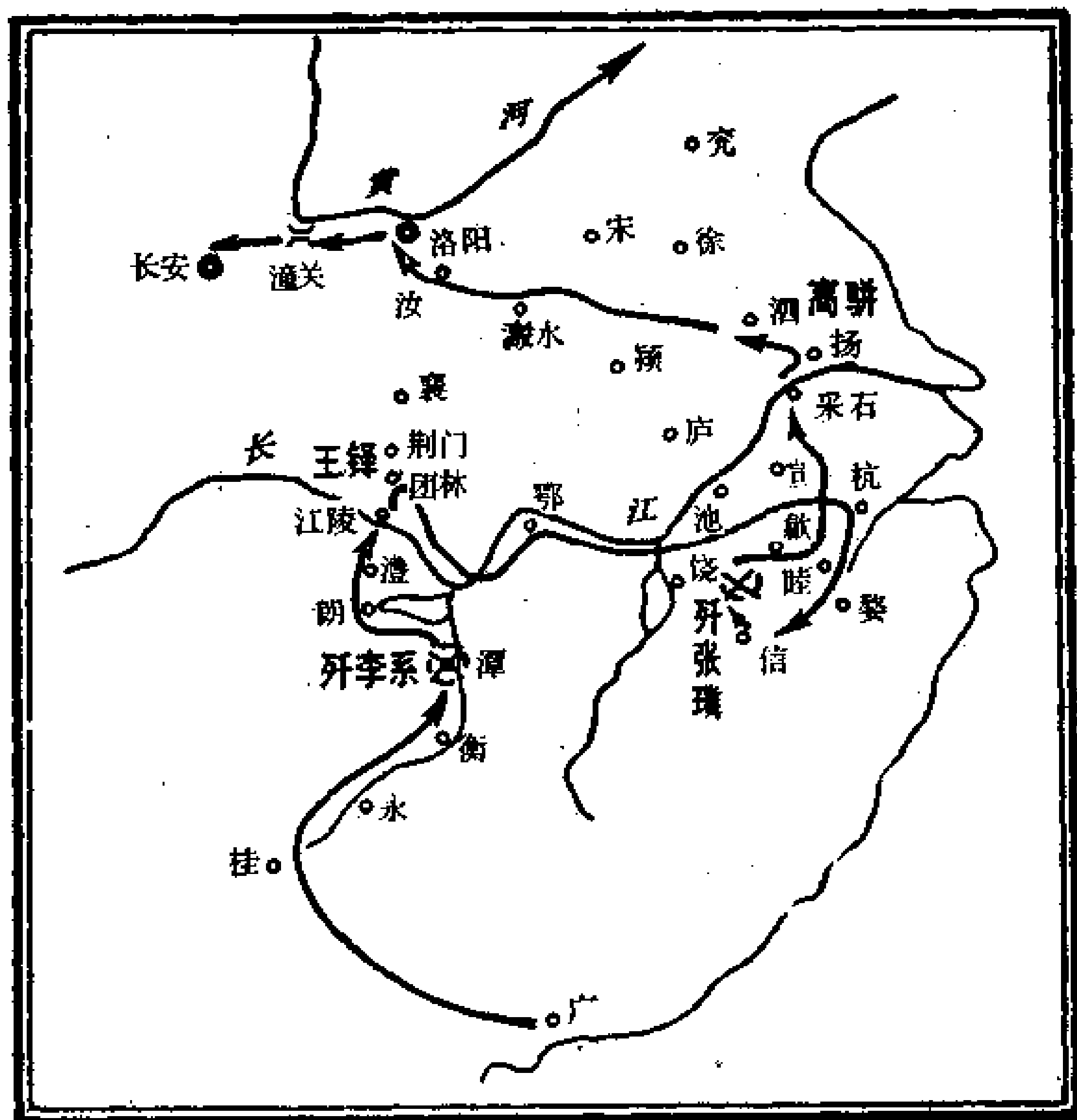
唐代后期，由于财源枯竭，实行盐、茶、酒专卖，不准私贩，以致盐价猛涨，广大贫民被迫冒险去贩卖私盐。这些盐贩，一旦被官府抓到，一律处死。盐禁愈严，反抗愈烈。盐贩就组织盐帮，进行武装贩运。他们翻山越岭，绕村避镇，熟悉山川形势，道路关隘，并具有与官府巡卒作斗争的经验。黄巢“世鬻（贩）盐，富于货（财）。善击剑骑射，稍通书记，辨给（口才敏捷），蓄养亡命”。[10]他是贩盐世家，交游极广，是盐帮中的著名领袖。许多勇敢有为的盐贩自然成了起义军的骨干。这是起义军流动作战能够成功的主观条件。充分利用这些主客观条件，避实击虚，保存自己，削弱敌人，成功地进行流动作战，则归功于起义军的战略运用。

第二　潭州、信州两次决战

黄巢占领广州后，士气高昂，部将多主张“北还以图大事”。[11]起义军夺占两京，推翻唐廷的战略目标更加明确了，于是一面休整部队，一面准备北伐。黄巢以“义军都统”的名义发布文告，宣称即将入关（指潼关），痛斥宦官专权，纲纪败坏，官吏贪污，铨选失才，提出“禁刺史殖财产，县令犯赃者族”[12]的口号，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他们纷纷参军，使义军的力量大大增强。

乾符六年（公元879年）四月，唐廷在焦急惊慌中，拼凑兵力，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阻止义军北上：以宰相王铎为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兼荆南节度使，坐镇江陵，并以名将西平王李晟曾孙李系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率精兵五万及“土团”（地主武装）守潭州（今湖南长沙），阻止义军由广州、潭州、荆、襄、东都主要战略方向北上，李系实际上是王铎的前敌总指挥；另调高骈为淮南节度使，驻屯扬州，以阻止义军由江南、淮南、河南战略方向西进。

黄巢起义军北伐路线示意图　（23-3图）



（一）潭州战役

乾符六年十月，义军开始北伐，沿潭、荆战略方向直指两京。首先对潭州实施远程奔袭。自桂州（今广西桂林）编大筏数千，乘暴水沿湘江而下，经永（今湖南零陵）、衡（今湖南衡南）等地，以疾风暴雨之势，于当月二十七日到达潭州城下。[13]李系"有口才而实无勇略"，[14]不敢出城作战。义军只一日即攻克潭州，全歼守敌精兵及"土团"共十余万人，流尸蔽江，李系仅以身免，逃往朗州（今湖南常德）。闰十月，尚让率军乘胜

追击，号称五十万，攻克澧州（今湖南澧县东南），进逼江陵。

招讨都统王铎把主要兵力和指望押在李系身上，自己随带大批姬妾舞女，在江陵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李系惨败，王铎丧胆，留刘汉宏守江陵，自己逃往襄阳。十一月，义军占领江陵。

义军占领江陵后，随即沿汉水西岸北趋襄阳，前锋一万人到达团林驿（今湖北荆门南）。这时襄阳（即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蓉纠合江西招讨使曹全晸屯兵荆门（今湖北荆门），阻挡义军北上。刘巨蓉率精兵在树林中埋伏，曹全晸率轻骑挑战，佯装败退。义军前锋放手直追，在进到荆门附近时，队伍已不成行列。刘巨蓉伏兵齐发，义军先锋大败，向江陵溃退，主力被溃兵一冲，也乱不成军。《新唐书·黄巢传》说"执贼渠十二辈"；《全唐文·大赦庵记》说"斩俘一十七万"。黄巢只得收集余部，放弃江陵，改变方向，沿江东下。

荆门之战，只是前锋的一次战斗。由于义军大捷之后，思想麻痹，前锋中伏失败。当时，如果部队组织严密，指挥恰当，战局是可以挽回的，但由于义军队伍庞杂，战斗纪律不严，一受挫败即溃不成军，使大好形势成为昙花一现。

（二）信州战役

王铎逃离江陵后，唐廷撤了王铎宰相和招讨都统的职务，郑畋也外调为凤翔节度使。宰相卢携一派掌权，见义军沿江东下，以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把镇压义军的赌注又押到了高骈身上。高骈既为统帅，立即传檄征天下兵，共搜罗兵员七万人。

义军重整旗鼓，沿江东下，攻克鄂州（今湖北武昌）外城，转战江西、浙江，占领过饶、信、池（今安徽贵池）、宣、歙（今安徽歙县）等十五州，又发展到二十万人。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四月，高骈派悍将张璘率主力渡江南下进攻义军。这时疾疫流行，义军屡战不利，王重霸等

先后降了高骈。张璘乘胜攻陷饶州，义军退守信州。义军的处境虽然比较困难，但黄巢斗志坚强，沉着应战，巧妙地运用策略，转败为胜，又一次取得了决战的胜利。

黄巢为了麻痹高骈，创造战机，一面整军备战，一面“以金啗璘”，[15]致书高骈，求其保奏请降。这时唐廷昭义、感化、义武（驻定州，今河北定县）等援军正赶往淮南，高骈得黄巢书，认为义军屡败，疾疫流行，损失很大，自己兵力足够，对其威胁利诱必能成功，怕赶来增援的诸道兵分了自己已到手的功劳，就上奏义军不日可平，“不烦诸道兵，请悉遣归。”[16]黄巢等这几支唐军渡淮北返时，突然向高骈挑战，高骈中计，只好仓促令张璘向义军进攻。义军早有准备，一举击破唐军，全歼其精锐并杀死了张璘。于是义军声威大振，士气倍增。六月，连破睦州（今浙江建德东）、婺州（今浙江金华）、宣州，七月乘胜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渡江，进围天长（今安徽天长）、六合（今江苏六合），直逼高骈的驻地扬州。高骈自知不敌，还有故意让义军“纵横河、洛、令朝廷耸振”[17]之意，于是决扬州西面的陈登水，诡称中风，令诸将严阵自保。

信州决战对全局有决定意义，唐廷以高骈为统帅，倚高骈为长城，调兵遣将，“倚以为重”。[18]高骈精锐被歼，龟缩扬州，为义军渡淮西进，直取两京敞开了大门。唐廷手忙脚乱，七拼八凑，也无法阻挡义军西进。这次决战，黄巢不仅策略运用巧妙，利用战果跨江渡淮，乘胜猛进也十分及时。

第三　进军长安

义军北上，所向无敌。九月，击破唐廷仓促调来泗州（今江苏盱眙）守淮的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曹全晸所部六千人。唐廷由徐州、许昌等地调赴溵水（今河南商水西南）阻止义军的河南各道兵互相杀戮，一哄而散。在汝州防守的泰宁节度使（即

沂、兖、海节度使，驻兖州）齐克让急忙率军撤回兖州。

义军渡淮后，黄巢进号"率土大将军"，[19]发檄文警告各道藩镇和官吏说："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20]义军纪律严明，封建史学家司马光也不得不承认义军"所过不掳掠"。[21]人民群众自动加入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六十万人，一路长驱直进，毫无阻挡。广明元年十一月，唐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出降，"闾里宴然"。[22]这时，部分义军攻克申州，进入颍（今安徽阜阳）、宋、徐、兖之境，唐官吏纷纷逃亡。唐庐州（今安徽合肥）刺史郑綮为保持地盘，写信给黄巢，请义军不要去庐州。[23]长安已在惶惶不可终日之中。

义军形势大好，胜利的局面已清楚地展现在义军面前。如何正确分析形势，转变战略，发展胜利，竟其全功，是至关紧要的，可以说是战略转变的十字路口，也是研究黄巢起义战略得失的关键所在。

义军初起时，力量薄弱，而唐廷和藩镇的军力却很强。这时避实击虚，进行流动作战是完全正确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力量的不断壮大，就有可能也有必要建立根据地，以建立政权，着手解决土地问题，恢复经济，从而使义军能源源得到根据地人民人力、物力的支持，作到进有所据，退有所守，占一地就巩固一地（并不排斥必要时部分的放弃），使唐廷的地盘失一块少一块。这样，才能逐步积蓄力量，最后改变总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对比，彻底战胜敌人。

义军的队伍也有一个精炼提高，以适应战斗要求的问题。义军数量很大，号称几十万，但很多都是随军的老弱妇幼。他们随军转战，以求安全并到处就食，这在义军初起时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义军的发展壮大，这个问题就必须加以解决。拖家带眷的军队战斗力必然会受到很大影响，也很难严明战斗纪律。只有适时建立根据地，把老弱妇幼安顿好，从事一些生产劳动，同时严

格按照战斗要求，逐步把军队锻炼成为一支真正的战斗部队，才能完成义军所担负的推翻封建王朝的历史使命。

潭、信决战，义军歼灭了唐主力，不仅夺取了战场上的主动权，有效地改变了兵力对比情况，也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在到达岭南以前，唐主力没有受到多大损失，那时建立大片巩固的根据地的可能性较小。义军占领广州后，已摆脱了唐军的威胁，开始有了建立根据地的可能，但也存在不利条件，如言语不通、风俗各异、水土不服、疾疫流行、军力受到削弱等。且远在岭南，对中原威胁不大。义军志在灭唐，急于北伐而不肯逗留两广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如此，若当时留下一支力量适当的军队，以控制和开发两广，应该说是可行的，也是有利的。大军北伐时，部将鲁景仁因病不能随队，带了一千骑兵留在连州（今广东连县），曾与道州（今湖南道县西）瑶族起义首领蔡结、何庚等互相倚仗，并吸收工商四五千人占领了连州，又与郴州（今湖南郴县）起义军首领陈彦谦、永州起义军首领唐行旻联合反抗唐廷。[24]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力量再留大一些，和当地的起义军及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在湖南、两广建立根据地也不是不可能的。

潭州大捷，王铎、李系所率的唐主力一举被歼，北起荆襄，南至交广，均已在义军有效控制之下，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更大了。这一广大地区生产破坏较少，离中原又不远，如能在此建立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以主力直取两京，是非常有利的。可惜荆门一战，转胜为败，令人惋惜。

信州大捷，一举歼灭了高骈的精锐，义军一下发展到六十万人，渡江渡淮，如入无人之境。东都唐军出降，潼关以东尽入义军掌握。徐、兖一带的唐廷官吏都弃城逃走。从荆、襄以东到扬州以西也都是空虚的。这时义军如能在进军长安的同时，以一部封锁扬州，以一部略取南阳、荆、襄，占领这一广大地区为根据地，设官分职，加以巩固，则政治、经济、军事的优势都在义军

这一边，摧毁唐廷就指日可待了。可惜义军某些将领由于流寇思想作怪，依然攻一城弃一城，六十万大军蜂拥进入长安，把已经到手的东西统统甩掉了，成为导致最后失败的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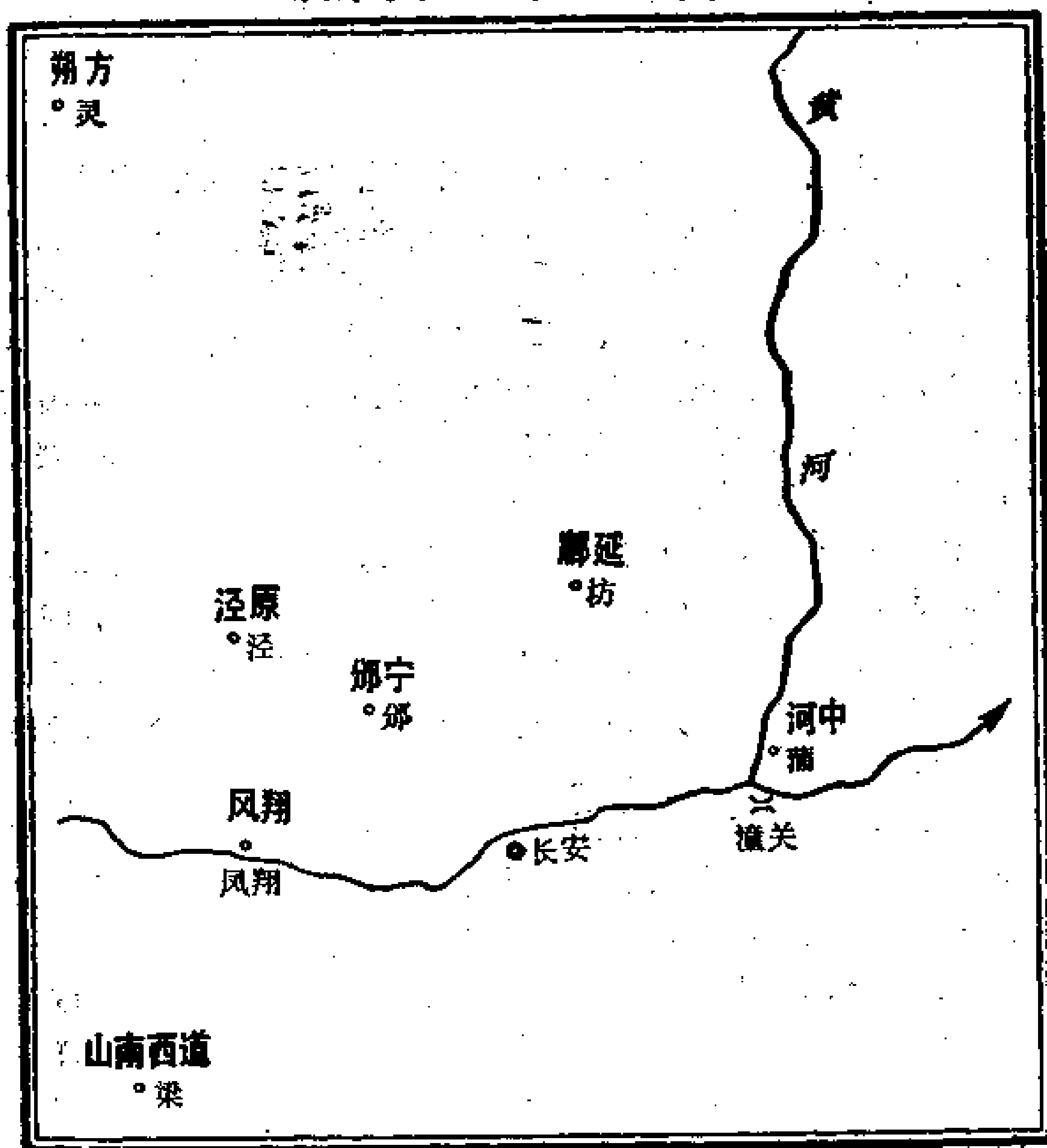
义军占有东都后，破竹之势已成，夺取长安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当时的关键是以彻底摧毁唐朝统治和建立全国政权为着眼，选好战略目标，确定所需的部署。

从地形和唐军的部署看，渭水流域是个盆地，其四周，陕北、陇石、汉中、潼关都是山地，整个关中象一口锅，长安是这口锅的锅底。关中是唐代朝廷所在地，除中央禁军外，四周有不少节镇拱卫京师：北面有鄜延（驻坊州，今陕西黄陵东南）、邠宁（驻邠州，分陕西彬县）、泾原（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夏绥（驻夏州，今陕西横山西）、朔方（驻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镇；西边有凤翔镇；南边有山南西道（驻梁州，今陕西汉中）；东面除潼关外，黄河对岸的河中镇（驻蒲州，今山西永济）也是关中的屏障。

当时义军由于缺乏全局着眼和对战略形势的分析，没有以摧毁唐朝的统治，以整个关中，包括首都长安、中央禁军和周围节镇为进攻目标，而仅仅以长安一地为目标，采取了六十万大军一路涌入长安的部署，钻进了锅底。加上其他方面的失策，以致后来陷入被困在长安的处境。

当时义军如果留置必须的部队控制关东，主力以整个关中，包括长安、中央禁军和周围节镇为战略进攻的目标，在南阳、潼关、龙门广正面上，部署绝对优势兵力，分路击破周围节镇，包围唐廷及其禁军而聚歼之，使江淮、河南、关中连成一片，建立全国政权，然后分遣义军略取晋冀，平定川鄂，这样少数节镇虽欲负隅顽抗也无济于事了，唐朝的统治就有可能被摧毁。

唐末关中形势示意图　（23-4图）



第四　两占长安

义军占领东都后，唐廷慌了手脚，太监头子田令孜只好硬着头皮亲自指挥，派张承范率神策军驰赴潼关。神策军是唐代的禁军，军士都是长安的富家子弟，平日作威作福，毫无训练，听说

要打仗，父子相对而泣，多以金帛雇贫民顶替。神策军到潼关的当日，黄巢的六十万大军已直抵关下。义军从南面禁坑（平时为收税方便，禁人往来的潼关南面山谷）迂回，前后夹击，一举攻克潼关，唐军溃散。

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十二月五日，义军前锋进入长安。唐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百官到灞上迎接义军，唐僖宗只带着五百神策军慌忙逃出长安。义军“甲骑如流，辎重塞途，千里络绎不绝”，人民夹道欢迎。义军宣布说：“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25]义军将财物分给贫苦百姓，对唐宗室、权贵、富商则恨之入骨，抓到即杀，没收他们的田地、住宅和财产。

十二月十三日，黄巢在长安建立政权，国号大齐，改元“金统”。他任命了中央政府的官吏，规定唐官三品以上停任，四品以下登记投降的留用。为镇压唐官吏的反抗阴谋，处死了唐广德公主、驸马都尉于琮、宰相豆卢瑑、崔沆、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等一批隐匿不降和假投降的官吏。

黄巢入宫做了皇帝，许多起义将领也做了大官，他们缺乏深远的政治眼光，以为起义已“大功告成”，滋长了安享富贵的思想。在近三个月时间内，未对唐军采取军事行动。

唐僖宗十二月五日逃出长安后，行动迟缓，第二日才到咸阳（今陕西咸阳），只跑了四十里路。九日到婿水驿（今陕西洋县西北），平均每天只走五、六十里。如果义军分兵汉中即可以一网兜住；就是到达长安后派数千精骑追击，唐僖宗也万难逃脱。

义军亦未追歼散在关中的数万神策军和剪除周围藩镇，甚至对近在咫尺的凤翔也未采取行动，只是传檄四方，指望唐军望风归降。

不少节度使在唐僖宗逃走后，也曾惶恐不安，陷入迷惘，“天下藩镇，多持两端”。[26]在黄巢招降下，忠武节度使周岌、河中节度使李都、留后王重荣、平卢节度使王敬武、夏绥节

度使诸葛爽等都曾投降过黄巢。可惜黄巢没有继之以军事接管，这些首鼠两端的降将，在形势一变时，又都纷纷投唐加入了围攻义军的行列。

原宰相、凤翔节度使郑畋，到斜谷进谒逃亡中的唐僖宗，表示了忠心。唐僖宗命他纠合临近各道，阻止义军西进，力图恢复王业，并给了他便宜行事的特权。从此，郑畋就在凤翔策划反攻。他一面收集关中禁军，一面号召西北藩镇共反义军。在唐僖宗逃蜀后，藩镇与唐廷的矛盾缓和下来，而与义军的矛盾则日趋尖锐。他们在郑畋号召下，又在流亡皇帝周围团结了起来。

黄巢金统二年（公元881年）正月，唐僖宗到达成都，重建了中央政府。三月，下令以郑畋为京城西面诸军行营都统，以泾原节度使程宗楚为副都统。

黄巢曾两次派出使臣到凤翔招降，第一次被凤翔监军袁敬柔虚伪地应付了过去；第二次使臣被郑畋杀害。到三月黄巢才派尚让、林言、王播领兵五万去攻凤翔。由于义军有了轻敌麻痹思想，行动不密，王播所率的三万先锋军“鼓行而前，无复行伍”，[27]被唐军诱进中伏，大败于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牺牲两万余人，其余义军撤回长安。

这次龙尾陂之役对义军影响很大。义军方面本来三个月无所作为，让唐僖宗逃往四川，让郑畋在凤翔整军备战，已经开始转入被动，这次兴师问罪，又未能集中兵力，周密计划，既不明敌人情况，也不明自己队伍斗志方面的变化，行动又迟缓失密，结果招致失败，使士气受到很大挫折。与此同时，在东方，黄巢命朱温率军夺取邓州，俘获了刺史赵戎。邓州地位重要，可以控制宛、襄，东出两淮，并切断山南东、西两道间的连系，着眼无疑是正确的。可惜也是兵力不足，五月就被忠武监军杨复光击败，失了邓州，退守离长安不远的兰桥（今陕西兰田东南），东西两面的攻势都失败了。从此“东西不过岐（今陕西岐山）、华（今陕西华县），南北止及山河（指秦岭、终南山和渭水），”[28]攻守

易势，陷入了被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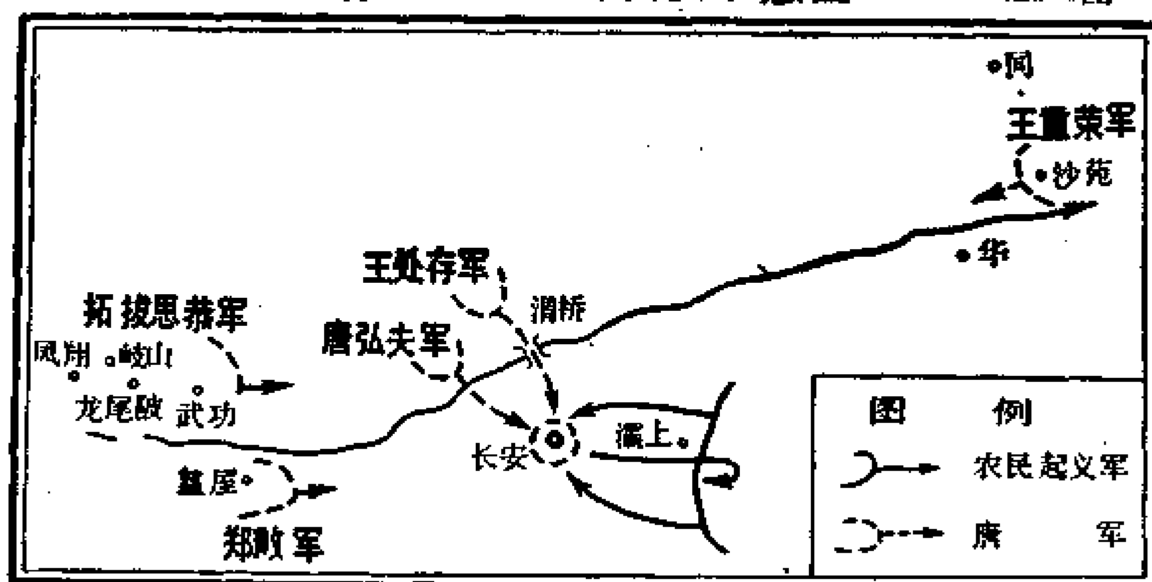
唐军方面从此站住了脚跟，士气提高，藩镇积极前来参战。四川本来是富庶之地，加上各道贡赋源源送去，又有了人力、物力的补充，整个形势开始向有利于唐廷的方向转化。

龙尾陂之役后，唐军乘胜尾追，麇集长安近郊，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长安。行军司马唐弘夫屯渭北；降了义军又反叛投唐的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屯沙苑（今陕西大荔南）；义武节度使王处存屯渭桥（今陕西西安北）；夏绥节度使拓拔思恭屯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郑畋屯盩厔（今陕西周至）。郑畋，程宗楚指挥各部唐军不断向长安进逼，企图一举夺回长安。

金统二年五月，黄巢察觉唐军初胜骄横，诸军凑集号令不一，都想争先入城以抢头功，纵兵掳掠，就决意撤出长安，伏军灞上，派人觇视城中，伺机反击。果然，唐军以为义军战败逃去，程宗楚首先入城，唐弘夫急起跟进，王处存也连夜入城。唐军疯狂掳掠妇女、财物、占领宅第。井市流氓也乘机抢劫，长安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黄巢见反击时机已到，先令大将孟楷袭击程宗楚军，接着分兵从各城门突入长安。程宗楚、唐弘夫均被义军击毙。官兵掠得了无数珍宝财物，“重负不能走，死者十八九”。[29]唐军一败涂地，退守武功。义军扩大战果，重新占领了长安及其周围各要点。义军给黄巢上尊号为“承天应运启圣睿文宣武皇帝”。[30]

义军这次反击非常成功，带有决战的性质。唐军在受重创之后，一时无力进攻；义军士气重振，扭转了被动不利的局面。可惜义军未能集中兵力组织新的进攻战役，从内线转为外线，把战役胜利发展成为战略胜利，彻底击破唐军的包围，改变被困于长安的局面。这次反击的胜利，只是延长了占有长安的时间而已。

黄巢起义军反击长安示意图 （23-5图）



第五 退出长安，顿兵陈州

从金统二年下半年到金统三年（公元882年）上半年，义军不断主动出击。金统二年秋击败唐军，收复华州，击毙了天平节度使曹全晸；十一月击败唐鄜、夏二军，进占富平；金统三年二月收复同州；五月黄巢亲率大军西攻兴平，唐军被迫后撤。但这些都是局部的胜利，并未能使全局改观。

金统三年正月，唐廷重新调整部署，撤掉了高骈诸道行营兵马都统的职务，同意郑畋辞去行营都统，改命王铎为诸道行营都统。四月，唐军再次逐步向前推进：王铎亲率两川（指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军屯灵感寺（今陕西西安南）；泾原军屯京西；义武、河中军屯渭北、邠宁、凤翔军屯兴平；保大（即渭北节度使，驻鄜州，今陕西富县）、夏绥军屯渭桥；忠武军屯武功，在北、西、南三面形成了包围。

金统三年出现了三件不利于义军的大事。

一是粮荒。长安官僚密集，人口众多，粮米本来就依赖江淮

转运。藩镇乱后，生产屡遭破坏，依赖更甚。自从义军占领长安，双方大军云集，百姓逃亡，存粮有限，早就出现粮荒。义军放弃关东，得不到外地半点接济。到金统三年粮荒就严重了，斗米竟值三十缗，甚至一斗黄金难换一斗米。义军的战斗力大大地削弱了。

二是成令瓌、朱温叛变投敌。金统三年春，义军处境日益困难，潼关守将成令瓌，率部四万人，骑七千人，逃往楚州（今江苏淮安），投降了高骈。〔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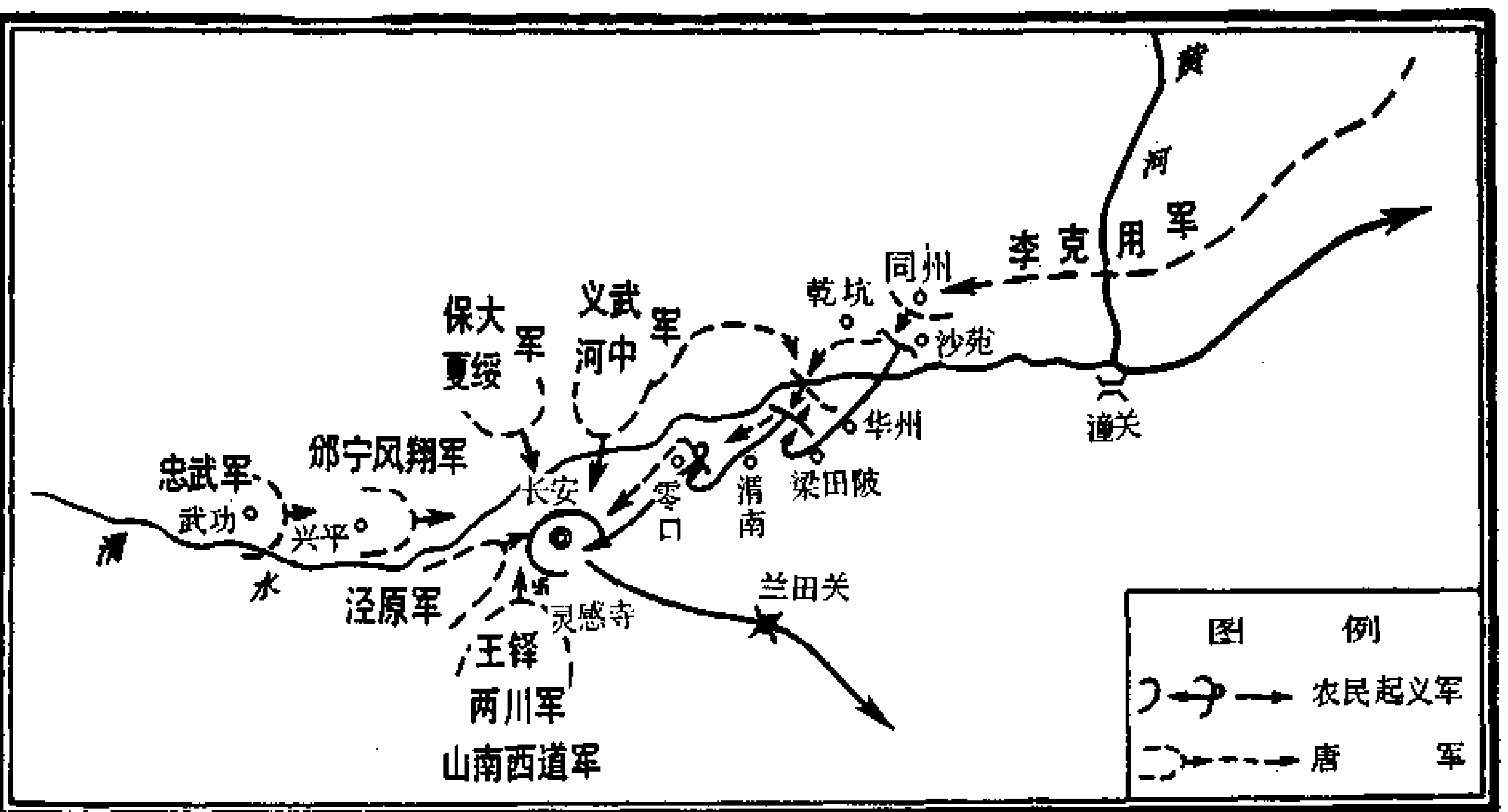
同年八月，同州刺史大将朱温去夺取唐河中军途经夏阳（今陕西合阳东）的粮船，被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率军包围。朱温多次向黄巢求援，由于当时东西两线都在紧张战斗，调不出部队去增援，朱温早对胜利失去信心，救兵不至更怨黄巢。在投机分子谢瞳挑拨下，朱温杀了监军严实、大将马恭，率部投降了王重荣，并认其为“舅”。唐廷闻报惊喜万分，都统王铎立即承制授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唐僖宗更加朱温为左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副招讨使，并赐名“朱全忠”，从此朱温就成为唐廷镇压义军的一只狼犬。接着华州刺史李详亦企图投敌，虽被黄巢之弟黄邺镇压下去，但不久黄邺又被李详的部将王遇赶走，王遇还是投降了唐朝。

成、朱投敌，不仅削弱了义军，失去了潼关和同、华二州，使东方门户洞开，更严重的是动摇了义军的斗志。至此，唐军的四面合围就完成了。

三是沙陀兵参战。沙陀是我国西北的一支游牧部落，李克用是沙陀贵族李国昌的儿子，有时出兵为唐廷效力，有时起兵反唐。唐廷看到义军实力还强，靠节度使联军难以迅速镇压下去，就起用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令李克用速带沙陀骑兵参战。沙陀本骑兵善于骑射，慓悍善战。金统三年十二月，李克用率骑兵四万到达同州参战，形势对义军更加不利。金统四年（公元883年）正月，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洛水渭水之间）一战，因地处

黄巢起义军防守长安示意图

（23-6图）



沙滩，利于骑兵驰突，义军黄揆部战败退却。李克用进至乾坑（今陕西大荔西），纠合王重荣、王处存、杨复光等军乘胜进兵。二月，黄巢派尚让等率十五万人，在梁田陂一带与敌交战，战斗异常激烈，义军浴血奋战了整整一个下午，数万义军壮烈牺牲，被迫撤出战斗。李克用进围华州。这是一次双方主力的决战，义军难以在长安坚守已成定局。三月，黄巢派尚让率兵救华州，在零口（今陕西临潼东四十里）被李克用、王重荣击败，华州陷落。四月黄巢亲自率军与李克用军战于渭南，义军连战皆败。黄巢决定撤出长安，先派三万人去扼守蓝田道，以掩护义军向东南撤退；自己率主力于金统四年（公元883年）四月八日退出长安，经蓝田关（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九十里）、武关（在今陕西商南县西北）向东而去。

黄巢率义军十五万人由陕入豫，声称要向徐州进军。

前锋孟楷率军进击蔡州（今河南汝南），唐奉国军（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诚。孟楷转向蔡州东北的陈州（今河南淮阳）进攻。陈州刺史赵犨是义军的死敌，他预先完城堑、缮甲兵，在周围六十里内坚壁清野。孟楷进至项城（今河南沈丘）时，遭到赵犨的袭击，前锋全军覆没，孟楷也牺牲了。黄巢痛心于亲密战友的牺牲，决心与赵犨势不两立，遂与秦宗权合兵二十万围攻陈州，同时袭占了河南、山东的几十个州县。从金统四年六月到金统五年（公元884年）四月，赵义军围攻陈州达三百天之久，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伤亡极大，士气沮丧。河南本来是重灾区，至此树皮草根都已吃尽。从金统四年十一月起，唐宣武节度使朱温、忠武节度使周岌、感化节度使时溥先后率部投入战场，救援赵犨。金统五年四月，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又率部赶到战场，一齐向义军发起进攻。义军在太康（今河南太康），西华（今河南西华）等地数战不利。五月，大雨如注，平地水深三尺，义军军营为水所漂，乃解围北撤，向汴州方向而去。李克用率河东及忠武军向东北追击。八日，义军在汴州以西，中牟以北

的王满渡过汴河时，被李克用追及，唐军乘义军半渡而击，义军溃散。尚让、李谠、霍存、葛从周、张归霸等临危变节，[32]投降唐军。黄巢率残部越过汴水，经封丘、匡城退入山东。在李克用、时溥所部追击下，黄巢最后只剩下亲故数人，他见大势已去，于金统五年（公元884年）七月，在泰山虎狼谷（今山东莱芜境内）自刎。

义军撤出长安时还有十五万人，如把这十五万人转至广阔的江南去重整旗鼓，还是有希望的。但黄巢却把这十五万人尽耗在与义军生死无关的陈州城下，教训极为惨痛。义军撤出长安后，唐廷忙于修缮宫室，重返故都，论功行赏，对义军无暇追击。直到金统四年底，围攻陈州半年之后，经赵犨多次呼救，朱温等部才前去救援。义军如善于运用这三百天时间去开辟新的战场，重建新的军队，时间也是充裕的。义军在平原地对付不了沙陀骑兵，但如转移到湖广、江南，沙陀骑兵就无能为力了。总之，义军如再次向南方进军，最后的胜负实难逆料。

论起义战争的战略目标、战略阶段和战略转变

黄巢起义战争这场伟大的革命风暴，纵横万里，横扫了大半个中国，基本上冲垮了唐朝的统治基础，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新唐书·南诏传》也承认"唐亡于黄巢"。但义军最后还是失败了，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从战略上看，有些问题很值得研究。

黄巢起义军的战略目标是推翻唐朝，夺取全国统治权，但对这个战略目标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却又模糊不清；对照顾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对照顾各个战略阶段和完成战略转变，也存在重大缺陷。

战争的第一个战略阶段（从乾符二年到六年），是义军求生存和发展的阶段，也是流动作战的阶段。义军一开始就提出"天补平均"的称号和"横行天下"[33]的主张，表达了对唐代封建腐朽统治的强烈不满和摆脱封建压迫的坚强决心。当时义军初

起，力量还很弱小，而唐廷和藩镇的军力却很强大，唐廷对起义军也尚未引起重视，这一战略阶段的任务是保存自己和求得发展。但到了乾符二年底，唐廷在惊震之余，调动禁军和河南各道兵前来镇压，义军的生存就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这时义军改变战略，乘虚蹈隙，采取规模日益增大的流动作战是正确的。从乾符三年八月到乾符六年五月的三年时间内，义军在唐代的心腹地带鲁、豫、鄂、皖反复冲搏，并直捣富庶的江南，把宋威、曾元裕、张自勉等唐军主力兵团拖得精疲力竭，使唐代的地方政权，统治秩序、生产关系和经济命脉受到极大的破坏。起义军一路撒下了革命的火种，鼓舞了贫苦农民的斗志，不仅成功地保存了自己，而且大大地扩大和增强了自己的队伍，终于胜利地到达了岭南。这一阶段的胜利，使起义军摆脱了被敌人围剿、追剿的被动局面，改变了敌我强弱的对比，赢得了战争主动权，迫使唐廷不得不转为战略防御，拼凑力量于谭、荆，以求"塞岭北之路，拒黄巢"[34]北伐。

战争的第二个战略阶段（从乾符六年到广明元年十二月），是义军的战略进攻阶段。它的任务是推翻唐朝的统治，严格地说，这是一个没有依托，没有根据地支持的战略进攻阶段。这个阶段进行了两次北伐和两次决战，是一个取得伟大胜利的阶段，但也是一个潜伏下严重战略危机的阶段。这时义军将士一致要求"北还以图大事"，夺取两京，推翻唐朝统治的战略目标已完全确定了。谭、信两次决战歼灭了唐军主力，义军跨江渡淮，攻占两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由于对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关系，对战略转变所提出的要求，对各个战略阶段的相互关连，对推翻唐朝统治的确切含义，对建立全国政权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等，都缺乏必要的认识和思想准备，因此这个胜利是不稳的，短暂的，失败也紧随着胜利而来。

战略进攻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它必须依靠政治和经济的支持。几十万大军实行几千里战略进攻，没有政治、经济的可靠支

持是难以实现的，即便实现了也是难以巩固的。

在当时条件下，巩固胜利成果，建立根据地，建立政权，组织人民，组织生产，在可能范围内满足农民的要求，安顿老弱妇幼，精练部队，使义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战斗部队，使义军能得到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并随着战略进攻的胜利发展，不断地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就是军事与政治、经济关系的具体体现。如果占一地弃一地，不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即便夺占了两京，也难以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甚至难以长期保存自己。

荆门前锋失利，导致全军溃败，主要是由于义军拖家带眷，组织松散，战斗纪律不严所引起的。义军失利后，不得不再次向长江下游流动作战，不能很快恢复攻势，则是由于退无所据，得不到根据地后备力量及时的补充。

起义军的战略目标是推翻唐朝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全国政权。战略进攻阶段的下一个战略阶段应该是建立全国政权并肃清残留的敌人。前一阶段必须考虑下一阶段，并为之准备条件。为了彻底推翻唐朝的统治，就必须摧毁它的国家机器，包括抓住它的王室，打烂它的政府，歼灭它的军队（包括禁军和藩镇的军队），占领它的国土，解放它统治下的人民，以自己的国家机器代替唐朝的国家机器。这些要求只有随着战略进攻的胜利发展，进一步巩固一步，不断地扩大和巩固自己的根据地，直至取代唐朝的一切。这些要求，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都不是不能办到的。可惜义军认识不到军事和政治、经济的关系，认识不到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考虑不到下一战略阶段的要求，而且还存在着流寇主义思想，不愿做艰苦细致的建立根据地的工作，以为一占首都长安就可万事大吉，全国就可以传檄而定。这就是义军占一地弃一地，六十万大军涌入长安一隅之地，不追击唐僖宗，不进攻各藩镇，把胜利进军变成陷入困境，以致终于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

战争的第三个战略阶段本应是建立全国政权并肃清残敌，由

于前一阶段没有达到战略目标，形势就开始逆转，形成了另外一个战略阶段，即攻守易势，力量对比发生再变化的阶段。唐僖宗逃到成都，重建了小朝廷，“首鼠两端”的藩镇，又团结在唐廷的周围，除长安一隅外，全国各地又重返唐廷统治之下，江淮财富也源源运入四川；西北藩镇在郑畋策划下，重新取得外线优势，形成了对长安的包围，一言以蔽之，优势又转到了唐廷一边。义军则由主动变为被动，从优势转为劣势，陷入了缺粮的困境。

由于形势出现逆转，战争的第四个战略阶段就只能是战略退却了。从当时情况分析，义军虽连战失利，但退出长安时还保存了十五万军队。长安这个断粮的城市，丢了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战争的漩涡，只限在关中附近，中国之大，不愁没有旋回余地。当时如果有一个正确的情况判断，重新选择战略目标，首先是退却目标，例如江南，总结经验，到那里去重整义军，建立根据地，然后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再决胜负，都是可能办到的。当然，如果早在江南建有根据地，情况就更好了，因为退有所据，比较容易扭转局势。但即便重新做起，时间也是有的，只是艰苦一些而已。唐军占领长安后，并未追击东去的义军，直到大半年之后，邻道兵才去救援陈州。义军利用这段时间去开辟根据地，还是来得及的。可惜义军退出长安后，就失去了奋斗的目标，盲目地在陈州围攻了三百天，耗尽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一切机会，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尽管如此，义军对历史的功绩是不会减色的，它在中国农民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从战略角度看，义军所创造的机动灵活的大规模流动作战，濮州、信州和反击长安几次战略性决战的卓越的战役指导，和信州大捷后乘胜猛进的战略追击，都是光彩夺目，值得后人认真学习的。

注　释

〔1〕《全唐文》卷八〇四

〔2〕《通鉴考异》卷二三引《续宝运录》

〔3〕《资治通鉴·唐僖宗乾符二年》

〔4〕〔5〕《资治通鉴·唐僖宗乾符三年》

〔6〕〔7〕《新唐书·黄巢传》

〔8〕根据《新唐书》藩镇表，广明元年共有都防御使一个，观察使十个，节度使三十七个，共藩镇四十八个。

〔9〕《新唐书·僖宗纪》

〔10〕《新唐书·黄巢传》

〔11〕《资治通鉴·唐僖宗乾符六年》

〔12〕《新唐书·黄巢传》

〔13〕《通鉴考异》卷二四引《实录》

〔14〕《资治通鉴·唐僖宗乾符六年》

〔15〕〔16〕《资治通鉴·唐僖宗广明元年》

〔17〕〔18〕《新唐书·高骈传》

〔19〕《新唐书·黄巢传》

〔20〕〔21〕〔22〕《资治通鉴·唐僖宗广明元年》

〔23〕《新唐书·郑綮传》

〔24〕《新唐书·邓处纳传》

〔25〕《资治通鉴·唐僖宗广明元年》

〔26〕《旧唐书·王铎传》

〔27〕《资治通鉴·唐僖宗中和元年》

〔28〕《旧唐书·王铎传》

〔29〕〔30〕《资治通鉴·唐僖宗中和元年》

〔31〕《桂苑笔耕集》卷五《奏诱黄巢下贼成令瑰状》

〔32〕《资治通鉴·唐僖宗乾符四年》、《旧唐书·僖宗纪·秦彦传》、《新唐书·李罕之传》、《桂苑笔耕集》卷三、卷十二

〔33〕《资治通鉴·唐僖宗乾符三年》

〔34〕《资治通鉴·唐僖宗乾符六年》

隋唐五代时期战略运用的特点和发展

隋唐是继南北朝长期分裂、民族大融合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强大封建王朝。北方经济由恢复走向发展，南方经济加速开发逐渐超过了黄河流域。隋唐的政治、军事制度，吸取了北朝的优点，使封建的中央集权更趋完善，给了以后的各王朝以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大融合吸取了北方各民族朴实、强悍的风尚，冲击了魏晋以来清谈颓废的社会风气，出现了务实的进取精神，推动着中国的封建社会继续向前发展。

唐是繁荣强大的朝代，文治武功都有重大成就。唐代疆域已超过了西汉鼎盛时期的疆域，是当时世界上版图最大、势力最强的封建国家。在战略运用上，也出现了一些新颖突出的内容，不少战争战役的指挥艺术是很出色的。

一、杨坚的谋略

杨坚非常重视在战争指导上运用谋略，以分化、瓦解、麻痹、削弱敌人，使军事行动起到事半功倍之效，甚至达到单纯采用军事手段所难以达到的目的。杨坚在对突厥和对陈的战争中，分别采取了长孙晟和高颎关于运用谋略的建议，他们的建议都是在深入了解敌人内部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而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离强合弱"已成为运用谋略的一条原则，以后明成祖朱棣也运用这一谋略来对付鞑靼和瓦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崔仲方在他所献平陈计划中，分析了长江上下游陈军可能的行动，提出了两个作战方案：如下流陈军精兵去增援上游，"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下流陈军"拥众自卫"，则"上江诸军鼓行以前"。从制订计划来说，分析可能出现的情

况，预定若干作战方案，是丰富了计划的内容，使作战计划能更好地适应变化着的情况。允许下流诸将“择便横渡”，从指挥的角度来说，预定在某些情况下，下级可以依照情况机断行事，也是对作战指挥的一个发展。

二、李世民战略运用的特点

（一）在统一中原的战争中

李世民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和胆识，但善于用将，善于采纳众议，善于亲自影响战役的进程，善于总结经验。唐王朝建国的大部分战争，特别是关键性的几次大战，都是在他的指挥下取胜的。他常常在敌我力量对比不相上下、甚至敌方稍占优势的情况下获得胜利。李世民是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军事统帅。

李世民即位不久，曾总结他在统一战争中的经验说：

> “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这里李世民首先说明，指挥官必须亲临前线，观察敌情，以查明敌阵的强点和弱点。李世民的确每战都这样做了，而其他将帅则很难做到这一点。正因为李世民亲自观察，确切地掌握了敌阵的弱点，他就可以正确地选择主突方向，并把他的精锐集中在主突方向上。

有时李世民为查明敌情，还实施了威力侦察。虎牢之战，窦军自辰至午，“阵久卒饥”，命宇文士及率三百骑自北至南从窦阵前驰过，以确切查明窦军的士气，体力和军纪，判明发起冲击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他的每战必亲自观察敌情，在阵前实施威力侦察，都是前所未有的。

隋唐时两军交战，战斗队形基本上仍是方阵，依赖制式的阵形行列、严格的战斗纪律和统一的进退号令，驱使士兵向敌阵冲击。这种几万人乃至十几万人的大方阵最怕一个“乱”字，如果

乱了阵形行列，将抓不住兵，兵离开了伍，不辨方向位置，指挥的号令就不起作用了，结果只能是一个“溃”字。因此，如何突破敌阵，造成敌人的溃乱而歼灭之，就成为古代实施进攻能否取胜的关键。即便在现代，如何突破敌人的防御，也仍然是实施进攻首要的课题。李世民通过丰富的战争实践，总结了解决这一课题的行之有效、屡试不爽的宝贵经验。

李世民指出：“强当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

李世民的“强”，主要是指骑兵，他自己就善骑射，经常亲率精骑冲锋陷阵。李世民很善于选锋和用锋，“秦王世民，选精骑千余骑，皆皂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这就是他的锋，具有无坚不摧的突击力，用它来突破敌阵、撕开口子，特别是突破敌阵的弱点，是无不成功的。

把主突方向指向敌阵的弱点，是李世民非常成功的战役指导。弱点包括敌军素质上的弱点、地形上的弱点和阵式态势上的弱点。李世民不仅善于亲观敌阵，选择敌阵的弱点，而且善于制造敌人的弱点。霍邑之战，李世民在城南列阵，让李建成在城东布阵，诱宋老生离城东出，从而造成了宋军暴露侧背的弱点。浅水原之战，李世民命梁实、庞玉在浅水原列阵，诱宗罗睺向东进攻，也是为李世民亲率精锐自北原而下，冲击薛军侧背创造条件。

李世民在突开敌阵口子以后，便继之以突贯返击，把敌阵搅得大乱。窦军的几十万人就是这样被搅垮的。

亲自观察，以自己的精锐攻敌弱点，攻敌侧背，然后突贯敌阵而返击之，这几条的确是李世民非常成功的战役指导。

李世民常在敌众我寡的条件下，首先组织防御战役，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改变力量对比，然后转入进攻，一战而胜，完成战

略进攻的任务。这一手也是很出色的。

薛举进攻长安、宋金刚进攻河东和窦建德援救洛阳，开始锐气都很盛，而李世民却都在以寡击众的条件下一战而胜。他的战略运用可以概括为：据险、坚壁、挫锐，待敌饥疲意沮而击之。其中据险、坚壁是关键所在。首先，组织防御的地区必须选择好，既要利于持久防守，又要能控制敌人的进路和威胁敌人的后方。以柏壁为例，李世民从龙门实行侧敌渡河，占据柏壁，等于在敌人腰眼上顶上一个拳头，使宋军主力不敢南下河东，而后方的汾、隰又受着唐军的威胁，进退两难，宋军徘徊了四、五个月，无计可施，终于粮食吃完，不得不仓卒撤退，给了李世民以可乘之机。其次坚壁不出，时机不到决不轻举妄动，也很重要。

李世民的穷追不舍也给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是他战略运用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追击宗罗睺、和宋金刚都是不顾疲劳，连续作战，不全歼敌人决不收兵，这种顽强的战斗作风是很值得称许的。

（二）在统一边疆的战争中

突厥是南北朝后期的北周、北齐和隋、唐在北方最主要的威胁，它不仅经常南下入侵中原，而且插手中原政向，扶植割据势力，破坏国家的统一。隋唐之际，北方的割据势力如刘武周、梁师都、高开道、薛举、李轨、王世充等，都曾得到突厥的支持，以对抗唐王朝统一中原的努力。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刚即位，突厥颉利、突利两可汗亲率十余万骑深入渭北，直抵渭水便桥，严重地威胁唐首都长安的安全。不反击突厥，消除威胁，唐王朝想安定社会秩序，休养生息，恢复经济是根本不可能的。

李世民为了反击突厥，接管突厥领地，恢复西域故地，重开丝绸之路，先后进行了对东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昌、龟兹和西突厥等的战争。由于编写力量有限，本书未能将李世民统一边疆的战争择要选为专题。兹将统一边疆战争中在民族政策上、军事上

有所发展的地方，扼要地作些介绍。

李世民在民族政策上采取"爱之如一"和"绥之以德"的政策。

李世民在贞观二十一年总结他自己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成功经验时说了五条，其中第五条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次年，在四夷君长争相入朝时，又说："汉武帝穷兵三十余年，疲敝中国，所获无几，岂如今日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乎"！〔2〕他还说过，唯独魏征劝我"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此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朝贡。"〔3〕这些话中当然有相当大的自我吹嘘的成份，而且他的出发点仍然是统治边疆、"役使"少数民族，但他毕竟已认识了歧视政策的坏处，认为不应过多的采用武力和高压政策，比之他以前的统治者，特别是东汉统治者对羌族的那种奴役杀戮政策，那就高明得太多了。

"爱之如一"、"绥之以德"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在边庭大量设置羁縻州，任命本民族首领为都督或刺史，统率原来的部落。只要求少数民族贵族"善守中国法，勿相侵掠"。〔4〕对战败者。"全其部落，顺其土俗"，"救其死亡，援以生业，教之礼义"，〔5〕只罪为首一人，并指派同族其他贵族为新的首领；对为首者亦不杀戮，而是另授官职，为东突厥战败，颉利可汗被俘获后，授以右卫大将军之职。〔6〕大量选拔少数民族优秀人才为唐军将帅，予以充分的信任，如突厥的阿史那社尔被任为出征龟兹的行军统帅，位在汉将之上；阿史那忠被任为右骁卫大将军，担任"宿卫四十八年"之久〔7〕；少数民族文武官员"布列朝廷，五品以上，有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8〕这些是其他朝代所没有的。

在军事上，李世民大量使用少数民族的军队。例如对东突厥、吐谷浑、高昌的战争都使用了突厥兵；贞观二十一年曾"发

铁勒十三部及突厥骑十万讨龟兹；唐高宗永徽二年，梁建方、契苾何力率兵击西突厥时，唐军即由秦、成、岐、雍府兵三万人及回纥五万骑组成。

在用兵上，李世民尽量保留少数民族军队的战法和特点。少数民族军队"劲马奔冲"，宜用于进攻；汉军"强弩犄角"，宜用于防守。保留少数民族军队的特点，可以收奇正相辅、出奇制胜之效。

李世民大量起用少数民族将帅和大量使用少数民族军队，是由于他们熟悉敌情、地形和风土人情，便于适应战场的环境，可以大大减少汉军的长途跋涉、长期戍守和长途馈运。因此，在多次统一边疆的战争中，李世民都能够以较小的代价获得空前的战果。

三、平藩战争中战略运用的特点

（一）加大进攻部署的纵深以防敌迂回包围

郭子仪第一次反攻长安，由于进攻纵深较浅，在安军伪退时全部投入战斗，结果遭到安军骁骑的两翼包围而溃败。在郭子仪第二次反攻长安时，接受了这一教训，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加大进攻部署的纵深，组成前、中、后三军，形成三个梯队；二是以精锐的回纥骑兵组成战役预备队，准备对安军骑兵实施反包围。这些措施的针对性很强，终于击溃安军，收复了长安。从此，以骑兵组成战役预备队就成了骑兵部队的一项主要任务。

（二）防御战役必须以积极防御为方针

在平安史之乱的战争中，李光弼守太原，张巡守睢阳都提供了积极防御极好的战例。他们的共同之点是攻守结合，多次主动出击，大量杀伤敌人，挫伤敌人的士气，破坏敌人的进攻准备。张巡坚守了十个月之久，杀伤安军尹子奇等部十二万人。李光弼不仅守住了太原，并大破安军蔡希德部，歼敌达七万人。

李光弼守河阳是积极防御的一种新的样式。李光弼的任务是守住陕、潼大道，阻止史军西进，但守洛阳必守外围，守外围

需很大兵力，而李光弼都只有从邺城撤下来的两万人。为了以仅有的兵力控制住陕潼大道，李光弼决心撤出洛阳空城，坚守背靠黄河、城小而坚的河阳城。河阳既可控制陕潼大道，又可以控制洛阳，且河阳三城有浮桥相连，可以依托晋南以通馈运。因此，坚守河阳是李光弼完成任务的最佳方案，李光弼自己称之为“猿臂之势”，拿现代的军事术语来说，就是占领侧面阵地。

（三）李愬袭蔡州是奇袭最典型的战例

李愬袭蔡州，做到了“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都是切实有效的，雪夜袭蔡州时机也选得很好，所以能兵不血衄的攻破蔡州，活捉吴元济，成为奇袭成功的典型战例。这一胜利虽然是在次要方向上取得的，但却带来了平淮西全局的胜利；平淮西成功，震慑了抗命的强藩，导致了唐宪宗时全国一时表面的统一。

四、农民起义战争战略的发展

黄巢起义进行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这对农民起义战争的战略是一个发展。赤眉起义，由于关中缺粮，在东归时遭到刘秀的截击而失败。黄巾起义，由于困守一地，终被可以从全国范围调动人力、物力的东汉王朝所镇压。黄巢起义接受了不应困守一地的教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流动作战，壮大了自己，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破坏了江淮富庶地区的政治、经济基础，使唐廷束手无策。但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战略转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最后还是遭到了失败。

注　释

〔1〕《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
〔2〕《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二年》
〔3〕《贞观政要．卷五·诚信》
〔4〕《资治通鉴·贞观四年》
〔5〕《资治通鉴·贞观四年》
〔6〕《资治通鉴·贞观六年》
〔7〕《新唐书·阿史那忠传》
〔8〕《唐会要》卷七十三《安北都护府》

第五篇 宋、辽、金、元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第二十四章 宋统一中国及对辽的战争

第一 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宋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分裂妨碍经济发展，不符合人民利益，所以分裂腐朽的势力，终将为统一进步的势力所代替。一部中国历史证明，统一一直是历史的主流，分裂只是短暂的插曲。中国自秦汉统一全国到北宋，这一千多年中出现过东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几次分裂的局面。五代先后更替了梁（朱温）、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和后周（郭威）五个朝代；同时，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和河东（今山西境内）地区，先后建立了前蜀（王建）、后蜀（孟知祥）、吴（杨行密）、南唐（李昪）、吴越（钱镠）、武平（原为马殷建立的楚国，南唐灭楚后，楚将周行逢等赶走南唐军队所建）、南平（高季兴）、闽（王审知）、南汉（刘龑）和北汉（刘崇）等十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此外，还有幽州的刘守光和凤翔的李茂贞尚未计算在内。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彻底改变分裂割据的局面，实现了基本的统一和安定。这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而且与当时的客观形势和赵宋集团的主观努力是分不开的。下面对赵宋王朝建国时期主要战略决策及运用的得失，略抒所见。

五代十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兵连祸结，篡夺相继，战乱、黑暗、开倒车的时代。这些统治者称兵构乱，穷征暴敛，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祸。战争大部分发生在黄河流域，即原来生产发展的中原地区。如后梁朱温与太原李克用、凤翔李茂贞、蔡州（今河南汝南县）秦宗权等的战争；后唐李存勖对朱友贞（后梁末帝）和幽州刘守光的战争；郭威灭河中、永兴、凤翔三镇的战争；以及契丹不断南下，进行的屠杀和掠夺（石晋末年曾深入到大梁开封）等等。这些战争使得人民老弱的死于运输，少壮的死于兵锋，不仅严重地破坏生产，而且户口也大量减少。据《宋史地理志》载：北宋初人口只有九十六万户，以后平定南方诸国和北汉，也只达到三百零九万户。据《辽史·地理志》估计，在五代末，燕云诸州人口不过二十几万户。对照《资治通鉴·唐纪十三》所载，在唐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中国郡县人口多达九百零六万九千多户，可见经过六百多年，人口锐减，剩下的仅约原有的三分之一。“北至卫滑（河南北部），西及关辅（陕西中部），东尽青齐（山东东北部），南出(长)江淮，州镇存者仅保一城，极目千里，无复烟火。”[1]这就是当时悲惨的写照。在农业科技不发达的古代，人口是重要的生产力，也是统治阶级赋税徭役所由出，农业经济是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基础，在生产破败，人口凋耗的情况下，不仅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那些统治者王朝的寿命也不可能长久，最长的后梁不过十六年，最短的后汉只有四年。长期战乱，人民要求统一，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北宋的统一事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它得到了渴望统一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后周世宗柴荣，雄才大略，励精图治，采取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加强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力量，在恢复中原地区生产上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另一方面，这时南方诸国相对来说战争较少，局面比较中原安定，生产遭到破坏比北方轻，恢复生产也比较快。自远古以来，经济、文化的中心总是离不开黄河流域，但这时已

经南移到长江流域，这个变化早在东晋、南北朝时就已开始，到五代则形成不可逆转的经济格局。如南唐、吴越两国人口就超过一百二十万户，〔2〕可见江南两浙人口已相当于整个华北。，在生产工具无大变化的条件下，人口的增加与减耗，足以看出其生产力的发展与衰退。中唐以来，中朝统治者已经靠“辇越而衣，漕吴而食”，即他们的穿衣吃饭，都仰给于江南两浙了。五代时，尽管政治上分裂成许多国家，经济上却互相倚赖，虽有困难，但南北地区的贸易往来仍然存在，经济联系的程度远远超过三国、南北朝时期，只要中原地区稳定，南北统一的时机就会来得快一些。

赵匡胤凭借掌握后周的审政权力，发动“陈桥兵变”在“市不易肆”的情况下，夺取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北宋。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实现统一。当时历史背景和现实形势，对赵宋消灭割据，进行统一斗争是有利的。

北宋的建立，是后周世宗柴荣未竟的统一事业的继承。柴荣先后攻取了后蜀在陕甘南部的秦、凤、成、阶四个州和南唐的淮南十四个州，削弱了这两个割据政权的力量，取得了战略开进地区。接着又收复被契丹夺去的瀛、莫，易六州，取得了比较有利的地势，加强了北面防御契丹南进的三关阵地。后周拥有一百一十八个州的全部疆土，东临海，西至秦陇，南临长江，北在山西、河北中部与北汉、契丹相持；有经过柴荣整顿的精锐禁军二十多万兵力，比起当时尚存的割据诸国，已占有地广、人多、兵精各方面的优势。这些都为赵匡胤统一中国准备了有利条件。

北宋建立后，割据诸国多弱，惟契丹独强。当时周围并存的割据政权如下：

后蜀：在西南巴蜀地区，据地四十六州，人口五十三万四千多户，与宋金、凤、阶三州（今陕西安康、凤县和甘肃武都）相对峙；

南唐：在长江以南，据今江苏、安徽大部及江西共二十二

州之地，人口六十五万五千多户；

吴越：在两浙地区，辖地十四州，人口五十五万六百多户；

武平：在湖南地区，据地十六州，人口九万七千三百多户；

南平：在荆州地区，据地三州，人口十四万二千三百户；

南汉：在岭南地区，据地六十州，人口十七万二百多户；

闽：在福建地区，人口十五万一千九百多户。

这些地区，物产丰富，农业工商业都有一定的发展，但统治者都非创业君主，大都君暗臣庸，骄奢暴敛，人民嗟怨，而且他们军备失修，兵力不大，甚至“兵不识旗鼓，人主不知存亡”，大都追求享乐，各图自保。因此，上述割据势力，是不难攻取的对象。

北汉：在河东北部地区，占有并、汾、忻、代等十二州之地，人口三万五千多户。国土虽小，但士卒强悍，并得到北方契丹的支持，对宋抱有强烈的敌意，威胁着宋西北面的侧背。

晚唐时期，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契丹族，贵族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北侵室韦，西取突厥故地，东并渤海，于后梁末帝贞明二年（公元916年）称帝，国号契丹，以后改称辽国，并曾一度复称契丹，以上京临潢府（内蒙古巴林左旗境）为国都。契丹尽有长城以北之地：东边和东北边，占有原来唐朝黑水都督和渤海都督府所辖女真等族聚居的黑龙江南北广大地区；西边占有原来唐朝安北都护府所辖突厥、回鹘等族人民先后聚居的蒙古沙漠南北广大地区。五代时继续向南扩张，进入长城以南，先后进占营州（原在辽宁朝阳、唐失故地后，侨置于燕地，辽改为广宁县，今河北昌黎）、平州（今河北卢龙），从后晋石敬瑭手里取得幽（燕）云十六州（河北山西北部），又攻占河套南部的丰、胜六州，深入到大清河、易水至山西句注山以北广大地区。控区内人民包括契丹、汉、女真、回鹘等族，是一个幅员辽阔统治着多民族的政权。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公元947年），辽耶律德光攻入开封，灭后晋而据中原，把开封周围几百里蹂躏

得人烟断绝、城邑残破，人民到处组织义军起来反抗，开封东面的宋、亳、密三州（今河南商丘、安徽亳县、山东诸城）最先被义军收复，北面的相州和澶州（今河南安阳、濮阳）也相继被起义民兵攻占。耶律德光惊惧说，“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被迫撤兵北走。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公元951年），辽穆宗耶律璟(小字述律)继位，耽酒嗜杀，不恤国事。当柴荣收复三关时，其臣下欲以失地追究责任，他却认为：“三关本汉地，今复还之，何失之有。”国人名之曰睡王。他在位十九年中，对中原的后周、北宋基本上采取守势。而在这段时间里，正是北宋削平割据诸国用兵的有利时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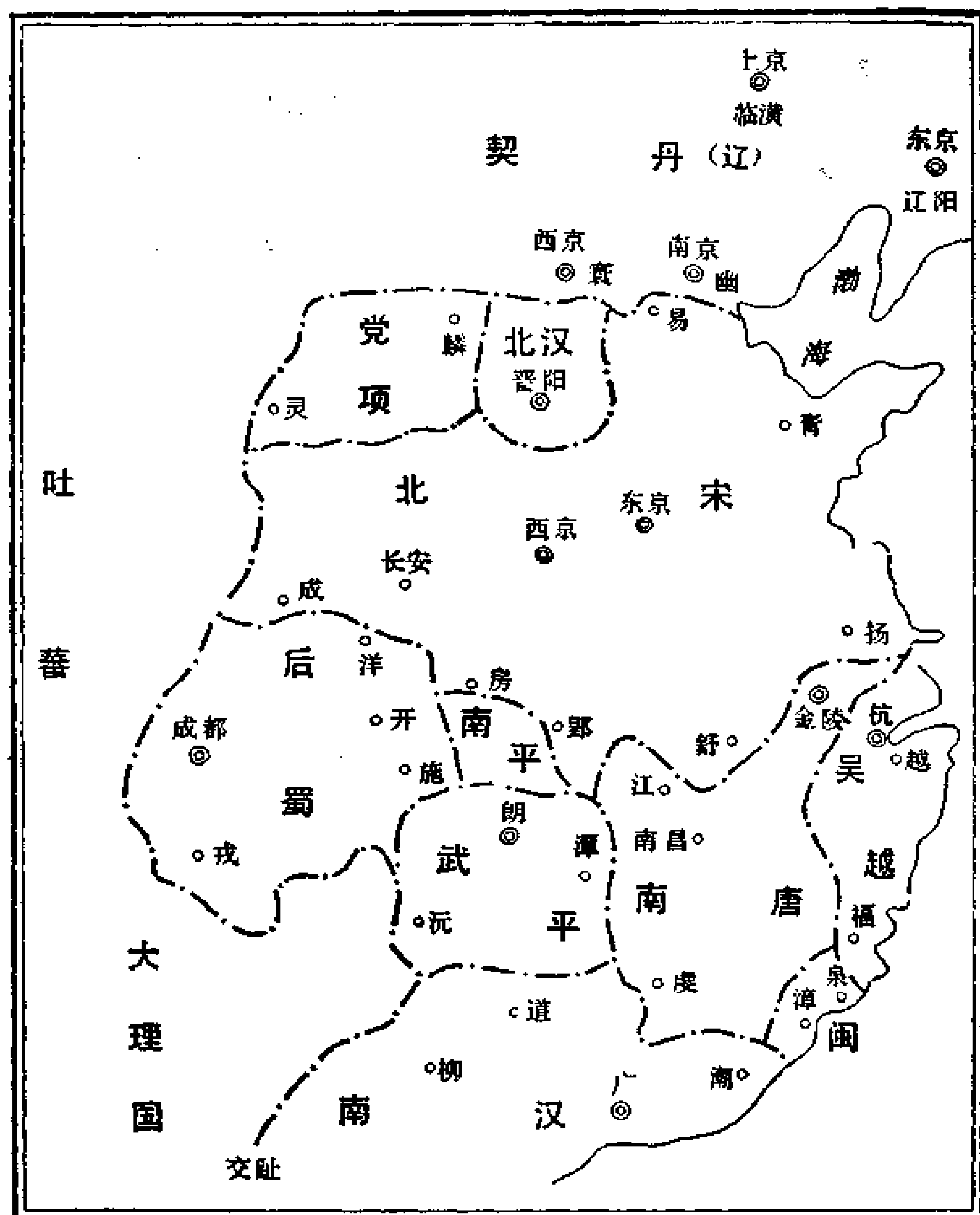
此外，西北宁夏及陕甘各一部地区的党项羌族（后来建立西夏国）贵族拓拔思恭，在唐末以助镇压黄巢有功，得授定难节度使，赐姓李，据有宁夏五州之地。五代时，仍与中朝和好，子孙均受官爵。北宋初，与宋关系是平和的。

西南方的吐蕃族，唐时曾为患中朝政权的西疆秦陇川一带。九世纪中叶，由于内部不靖，已衰竭，退居西藏，一部散居在甘肃和青海的西部。

西南方另一个大理国，据有云南全境和四川西南部，并曾攻入广西、贵州西部边境地区。晚唐时，这地区统治者与唐朝发生过长期的战争。自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唐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双方恢复和好。五代时，中原动乱，对它已“鞭长莫及”。

上述情况表明，除契丹构成对宋的强大威胁外，其他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对宋并无威胁，至少在北宋初建时是这样的。如果政策运用得当，还可能对宋统一事业产生助力，如西夏在建国前，曾不止一次派兵助宋攻北汉。这些都是赵匡胤统一中国的有利条件。

北宋初建时割据诸国位置示意图 （24—1图）



第二　北宋建国时期的重要战略决策

宋欲统一中国，必须消灭割据和收复幽（燕）云，而收复幽云，必先攻取北汉，攻取北汉必然连及契丹。对选择攻取先后的对象问题，当时赵宋集团和以后历史家有不同的看法。如后来北宋著《新五代史》的欧阳修曾说过：

> “夫兵法决机因势，有不可失之时。世宗南平淮甸，北伐契丹，乘其胜威，击其昏殆。世徒见周师之出何速，而不知述律有可取之机也。是时述律以谓周之所取皆汉故地，不足顾也。然则十四州之故地，皆可指麾而取矣，不幸世宗遇疾功业未就！”

这番议论，显然是由于不满宋取代后周政权以后，没有把北伐事业提到优先地位而说的。我们认为从强者下手，即先北后南的方针，好处是在北方取得胜利后，南方孱弱诸国，可以兵不血刃地传檄而定，以后南方即使用兵，也可解除遭受两面夹击的危险；先北后南在攻取北方时，遭受南方诸国采取积极进攻夹击的公算比较小；击灭北汉可除去在契丹卵翼下深入河东阻碍中国统一的一大障碍，趁述律沉缅酒猎而无远略时收复幽云，可推进到长城一线，据险守边。但关键是取决于当时的条件，特别是力量对比，以权衡其利害轻重和事机缓急。北宋初建时，北汉即联合代北诸部攻掠宋之河西（今陕西北部），并策动昭义节度使李筠反宋。赵匡胤平李筠后曾有先攻北汉的拟议，其武胜节度使张永德和谋臣赵普等却劝说赵匡胤采取后周时王朴的献策：

> 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与吾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既得江北，则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则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燕地必望风内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惟河东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诱，当以强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败，力竭气沮，必未能为边患，宜且以为后图，俟天下既平，然后伺

间，一举可擒也。”〔3〕

这即是先南后北的方针。姑存北汉以为缓冲，用游兵扰其农事以削弱之，用间破坏其与辽的关系，俟削平南方诸国然后攻取。赵匡胤采纳了这些建议，决定实行先南后北，各个击破，消灭割据，再图收复幽云，统一中国的战略方针。我们说，这是适合当时主客观条件唯一可行的正确方针。第一，北宋初建时的国力，并没有对北汉、契丹取得必胜的把握，周世宗柴荣收复三关时，是由于辽穆宗耶律述律不以为意和守城汉降将的投降，并没有和辽国大交兵。辽骑兵当时在幽州北面，周的诸将亦不赞同深入而遂攻幽州；第二，中原地区经济虽已开始恢复，但单凭这一地区的人力物力，来支持对契丹大规模的作战是不够的；第三，当时民心尚不稳定，如乾德元年（公元963年）谣传宋将北征，河南人民便有大量惊逃的现象；第四，先南后北，先弱后强，有“兼弱攻昧，胜敌益强”，即克敌而壮大自己的好处，当时南方诸国，不仅容易攻取，而且经济发达，是北宋取给的物力来源，取得南方，才可以补充力量，再打北方，取胜的成算就大了。赵匡胤对当时具体情况是有认识的，他曾对其弟光义说过：“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及广南、江南，即国家富饶矣”。〔4〕同时，北宋处四战之地，在战略上居于内线，必须避免两面或多面作战的不利形势出现，如果先攻北汉及辽，万一攻势顿挫，连兵不解，南方诸国乘虚合力来攻，北宋就难以善其后了。因此，先南后北的方针是稳妥的。

赵匡胤目睹五代的篡夺“演出”，对唐末以来武臣横猾难制，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情况，非常警惕，很害怕“黄袍加身”的故事重演，夺他的皇统，曾问计于赵普：

>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计长久，其道如何？”

赵普献策说：

"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5]

赵匡胤完全同意赵普的献策，采取了"削藩"和"整军"内外并举的策略。在消灭现存割据政权的过程中，他逐步实施一系列"强干弱枝"和"守内虚外"的军事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严防武臣及地方复辟割据势力，其目的就是既要统一中国，又要加强中央集权，杜绝统治阶级内部叛变，永保赵宋帝统。为此他策定了战略上三项重大决策：

平定反侧，改革军政，集中皇权；

先南后北，各个击破，消灭割据；

规复幽云，统一中国，对付契丹。

第三　平定反侧，改革军政，集中皇权

赵匡胤代周后，对原来后周握有兵权的武臣、节度使，采取三种不同的措置：公开反抗的就断然镇压和出兵讨伐，如韩通、李筠、李重进；听命的都予以加官晋爵，如石守信、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及其他节度使等；态度暧昧的实行监视和收买，如郭崇、袁彦、杨承信和杨定璋等。这是其巩固皇权的第一招。

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治潞州，辖有潞、泽、沁（今山西长治、晋城、沁县）三州，有兵三万余，地居太行山脊，"高屋建瓴"，俯瞰河南河北，北邻北汉，战略地位重要。赵匡胤给他加官中书令，没有笼络住。北汉刘钧乘机密约李筠反宋。

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治扬州，辖有淮河以南十一州之地，地势平坦，险要仅恃淮水一堑，粮食充足而兵力寡弱。当李筠起兵反宋时，他派亲吏翟守珣北行，联结李筠反宋。但翟守珣却向赵匡胤告了密。

昭义和淮南分居宋都开封的西北和东南，如果"二凶并举"，南北合势，宋便会处于背腹受敌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宋

王朝初建，人心未空，假使兵事牵连，横生枝节，其他敌对势力乘机卷入，宋将捉襟见肘，应付困难，甚至会动摇初建的王朝统治基础。

赵匡胤的方略是避免二凶并举，以最快的行动予以各个击破。他得知李筠变起的第三天，即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十九日，就命将出兵，派石守信等为前军，西向洛阳，从孟津渡河，经怀州（今河南沁阳）急进，扼天井关（山西晋城县南太行山口），不让李筠下太行。接着命慕容延钊等率兵由东路西向潞州，与石守信等会合夹攻。同时对契丹和北汉方面也加强了警备和牵制的部署。这时赵匡胤军的主力仍持重未发，实乃考虑扬州方面是否同时并举和观察其他敌对势力的动静。在得到翟守珣告密，收买其劝阻李重进暂缓发动，其他方面亦无行动情况后，才于五月十九日决定亲征，渡黄河、逾太行，与石守信等军会合进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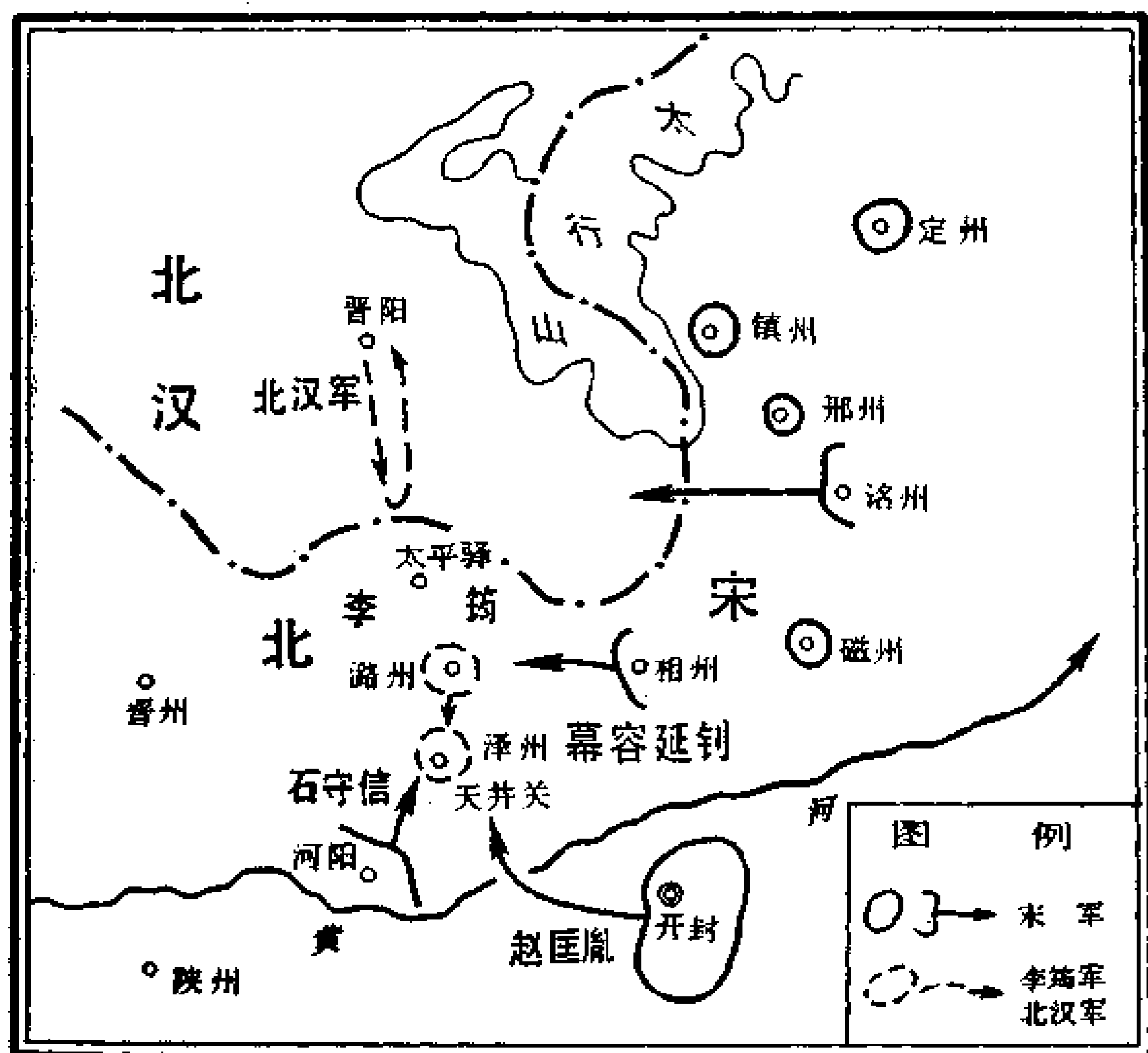
李筠胸无成算，愤激兴兵，连结北汉而又互相猜忌，结援扬州又不待时并举，尤其是不听从事闾邱仲卿“下太行，据洛（阳）邑，东向以争天下”的建议，结果导致失败。如果执行这个战略，抢先出天井关而南，则可背靠太行，以河东为大后方，避免以弱势兵力过早决战，传檄天下，待合纵势成，然后合力以攻宋，尚或有成功的可能。赵匡胤出征时，对赵光义说了几句交底心里话：

> “是行也，朕胜则不言；万一不利，则使赵普分兵守河阳（在今河南孟县境），则另作一家计度。”(6)

这说明当时局势的严重，赵匡胤也没有必胜的信念。可惜李筠计不出此，建隆元年四月李筠袭占泽州，留其长子守节守上党，自己率众南下时，宋石守信军已抢先占了天井关。这时李筠主观上还寄希望于已归顺效忠于宋的禁军旧部倒戈相助，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未免太天真了，其失败在未交战前已经可以预见，连“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也谈不上。李筠军一遇宋师，即大败于泽州之南，退据泽州固守，又无外援，很快就被攻破，筠自焚

而死。留守潞州的李守节，也不得不献城出降。赵匡胤自四月十九日部署出兵至六月十九日解决战局，恰好两个月。

宋平定李筠作战经过示意图　(24—2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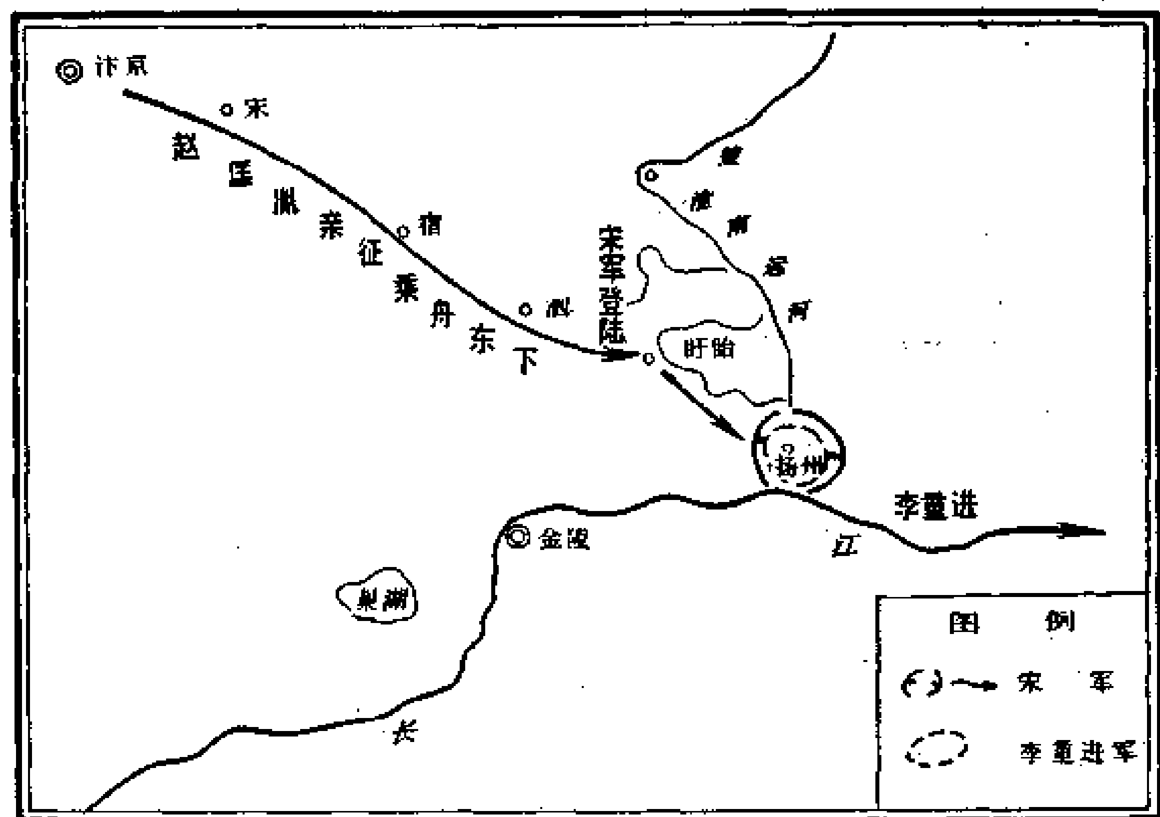


李重进失机取败也是无可避免的。他惑于翟守珣缓期举兵的奸计，犹豫不决，求援南唐也未得助。正如南唐冯延鲁论李重进所说：

“大丈夫失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时不可耳。方中朝受禅之初，人心未定，上党（指李筠）作乱，君不以此时反，今人心已定，乃欲以数千乌合之众，抗天下精兵，借使韩（信）白（起）复生，必无成理。”〔7〕

九月，在李筠败后三个月，李重进才举兵起事。赵匡胤派石守信等率前军先行，自率主力于十月二十四日从开封乘船东下，在泗州（今江苏泗县）登岸，十一月十一日抵扬州，以山压卵之势，即日破城，重进自焚。赵匡胤在短期内实现了各个击灭二李的作战方略，为消灭割据，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宋平定李重进作战经过示意图　（24—3图）



唐末以来，藩镇节度使权力太大，有地有兵有钱粮，还有兼禁军将领的，而禁军从后周以来，是一国唯一能战的队伍。五代时是武人的天下，不仅节度使都兼领数州，即使中央直辖的各州，也照例用武人掌州事，成为祸乱的根源。赵匡胤鉴于此，在定下内外并举消灭割据的方针后，便千方百计削弱地方节度使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平定李筠后开始，到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平蜀，逐步实施了一系列军政改革，完全实现了赵普建议的“强干弱枝”的战略意图，建立起中

央军事集权制度。

首先从整军开始，多方加强禁卫部队，削弱地方军力。北宋采募兵制，大量兵源来自地方农民，特别是灾荒之年，募集农民当兵，防其穷极暴动。宋廷规定“兵样”，责成诸州把骁勇精练的士卒收归禁军，剩下的充当地方厢兵。禁军平时“列营京畿，以备宿卫”，同时也“分番屯戍，以捍边圉”，使之“内外相维”。并定“更戍法”，每年轮换戍边，使“往来道路，习勤苦，均劳逸”。这样不仅割裂了部队官兵建制关系，而且京师重兵与分屯诸道的兵力互相制约，从而达到“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患；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8〕的目的。其次是解除中央禁军高级将领和地方节度使的兵权，在中央用“杯酒释兵权”许以长远保持富贵的办法，迫使禁军将领石守信等交出兵权，原禁军中“殿前司”和“侍卫司”的最高军职不再派人担任；对地方节度使，则陆续召回京师，解除兵柄，赐给第宅，长留不遣；复以知州代方镇，用文臣知州事。禁军平时的训练，由资历浅的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兵都指挥使（合称三衙）担任；募兵调兵权则归枢密院，枢密院由皇帝直接掌握。这样就把军权收归于皇帝。出征时，将帅由皇帝临时指派，一切方针大计，由皇帝授予。事定之后，兵归宿卫，将归本职。其实质就是把带兵、调兵、用兵的权力分开，如北宋李纲所说：“在祖宗（指宋初）之时，枢密院掌兵籍虎符，三衙营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这就使之互相牵制，便于皇帝从中驾驭，军事将领就难以用手中权力来实现割据夺权的野心了。

在改革军制的同时，宋还对政权机构进行改革，实行“分化事权，互相牵制”的策略，将中央机关分为政事、军务和财政三大系统，设参知政事、枢密院、三司使以分宰相之权，并使之互不通气，分别直接对皇帝负责。对地方以“文臣知州县、复设通判贰之〔9〕”，文臣以中央官员身份到地方做知州，规定三年一任，不得连任，当地人不得在本省做官。各州由皇帝派通判监察

知州的行动，重要文告非通判连署不生效，通判可以直接向中央奏事。地方死刑案件，须经中央复核。这样把地方生杀大权也褫夺了。平蜀后又设各道“转运使”，把财权收归中央。至是“强干弱枝”战略决策全部实现，武将节度使只是一名武官，不能危及大局；宰相文臣们也无从造成门阀势力，篡夺皇权。终宋之世，不仅没有出现武人割据的复辟，也没有出现权臣篡代的局势。不仅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混战局面，而且对以后的历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其积极意义上说，这是不流血地消灭割据的成功战略。

但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亦有害，矫偏过激虽可收功于一时，也种下后来的隐患。北宋改革后的军事制度，分割军政军令权力和军队建制，对武人猜忌过甚，将帅无权，临时组建起来的作战队伍，将不知兵，兵不亲帅，必然要削弱战斗力，不利于御敌战胜。军事配备上实行“守内虚外”政策，精兵皆聚集在中央，地方守兵兵力寡弱，外敌入侵，无力捍御，等到中央援兵到来，早已失地千里。而中央禁军在事权分裂相互掣肘的制度下也日渐失去应有的力量，成为战斗力低下的部队。宋代国势积弱，外患最重，国防最差，国土最狭，屈辱事敌之事也最多，实与“强干弱枝”的军事制度密切相关。

第四　先南后北，各个击破，削平割据

赵匡胤智虑深沉，好问多谋，久历戎行，习知兵事，城府在胸，谋定而动，选将用间亦颇具匠心。在确定北守南攻决策后，用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相配合，胁降与武力并举的手段，策定了对各方面的作战指导。对北方强大的契丹，在战略上取守势，选派得力将领，加强三关，即河北霸县益津关、雄县瓦桥关、高阳草桥关（另一说是霸县东信安镇淤口关）、瀛州（今河北河间）、常州（今唐县西北倒马关）、易州（今河北易县）棣州（今山东

惠民）等要地的防守；并运用策略争取媾和；免税准许契丹人入境市货，诱以高利，力求息事安边；多置间谍，侦察敌情，每有扰边，预为设伏击走之。

对依附契丹的北汉，战略上暂取守势，使屏蔽西北二边，成为宋与契丹、党项的缓冲；但在战术上取攻势，每岁以游兵扰其农事，收其边邑，逐步削弱其国力，为以后攻取创造条件；并选将派兵控制太行山，加强防守晋州（今山西临汾）、隰州（今山西隰县）、昭义（今山西长治）等要地，以保障南进时侧背的安全。

对西北党项，当时关系虽未破裂，鉴于李彝殷在公元951年曾遣使奉表于北汉，防其守鼠两端，为战略全局计，选将派兵屯延州（今陕西延安）、环州（今甘肃环县）、原州（今甘肃镇原）、灵武（今宁夏灵武南）、庆州（今甘肃庆阳），并用威慑与和平两手，力戒边境生事以和羌人，保持西北边境的安宁。

对南方诸国，依先弱后强的步骤，对较强的南唐，先以策略进行羁縻，采取优礼它的君臣，加强与它给聘往来，赈济其灾荒，尊重其主权疆界。送还其来归的叛臣等手段以安抚之。同时积极训练水军备战，待平定西方和南方诸国后，再对其威逼劝降或包围而攻取之；然后继续南下，谋取吴越和闽越。

对国力最弱的南平、武平，授给他们官爵，侦察了解其政情、地理、兵事，伺机以重兵突袭，一举攻略，为进军巴蜀、广南取得进军的开进地。

上述作战指导方针是正确的，特别是对西北两面加强了有力的防御，“自此累年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取荆（州）湖（南）、川（巴蜀）、广（岭南）、吴（江南）、越（两浙）之地。”〔10〕

一、平定南平、武平

湖南的武平，都朗州（今湖南常德），宋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九月，统治者周行逢死，少子周保权嗣立，大将张文表

反叛，据潭州（今湖南长沙）。周保权一面派兵讨张文表，一面向南平和宋乞师求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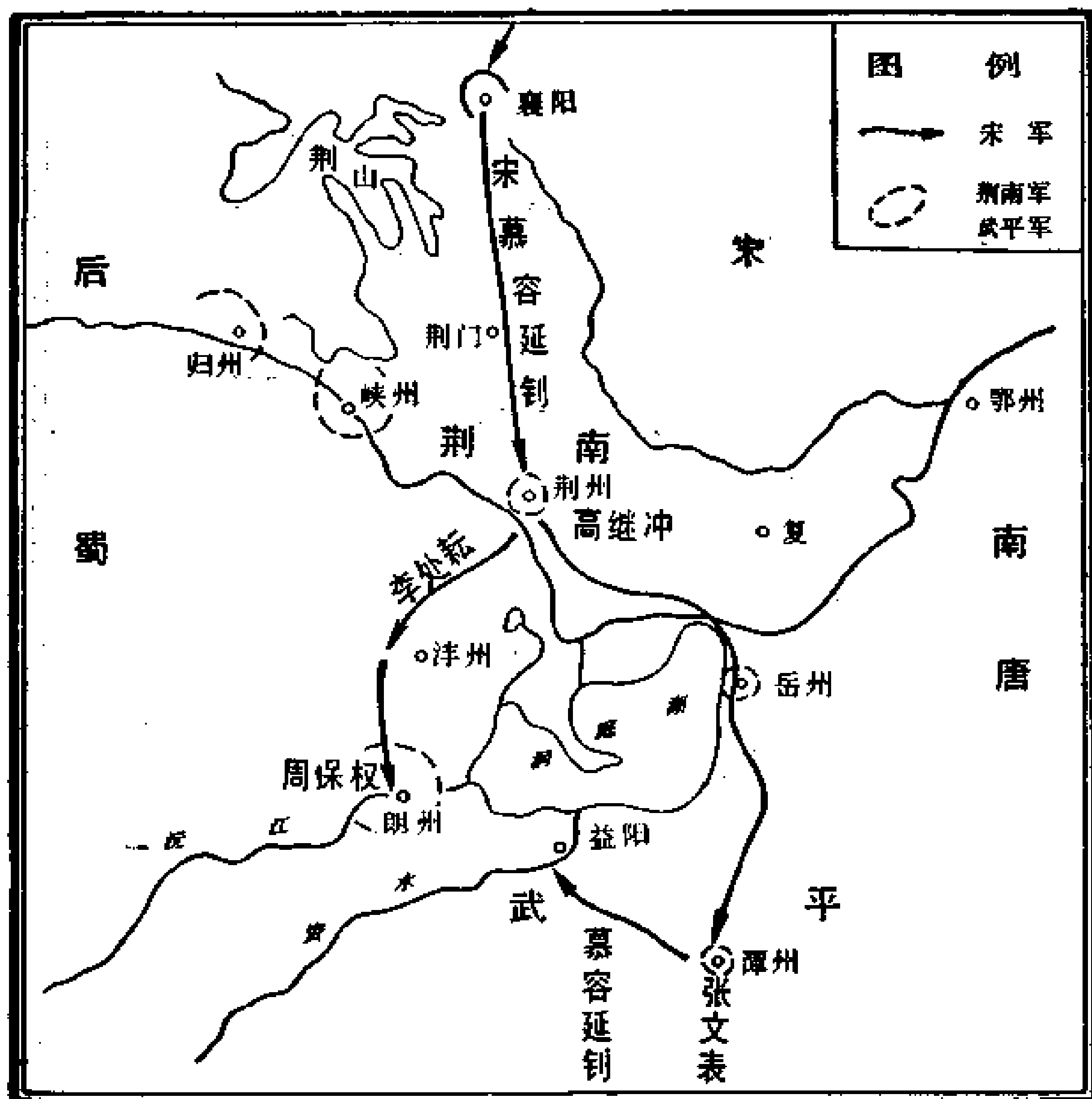
荆南的南平，都荆州（今湖北江陵），统治者高保勖也在这年十一月死，高继冲继立。赵宋早已侦知南平虚实；它们以暴敛来贡奉四方，国穷民怨，形势分裂，兵仅三万。赵匡胤趁湖南武平求援的时机，决定以假援灭武平，假道灭南平一举两得的计策，一面正式任命周保权、高继冲分别继任节度使，并令荆南派三千水兵攻潭州而迷惑之；一面派慕容延钊、李处耘率兵于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正月以讨张文表为名，假道荆南向湖南进军。这两个弱小割据者，国事腐败，战守皆难。当高继冲还在疑虑未决之际，二月上旬，强大的宋师已兵不血刃地袭占了江陵，高继冲被迫投降，荆南平。这可说是"兵不厌诈"，"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达到了"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的成功战例。宋师继续指向第二个作战目标，兵分两路，直下湖南。这时武平军已击破潭州杀死张文表，宋军两次击溃武平军的微弱抵抗后，三月中旬占领朗州，俘周保权，次第平定周氏残余势力，灭了武平。

北宋削平这两个割据政权后，扩大了疆土，把力量伸入到长江以南地区，东胁南唐，西逼后蜀，南瞰南汉，对尔后的作战，取得了更加有利的地位。经济上也由于取得了这两个地区，直接控制了荆、湖米谷，成为漕运聚济北方的要地。

二、平定后蜀

后蜀偏安于四塞之地，又是物产丰富之国，国境崇山环绕，道路险隘，虽不如诗人李白所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样的形容，但在军事上确是易守难攻之地。而北宋灭后蜀仅用两个多月时间即奏功，这是为什么呢？蜀主孟昶承父业，军政不修，骄奢厚敛，其溺器亦装以七宝，蜀民皆怨。正如赵匡胤所说的："自奉如此，欲无亡，得乎！"[11]当北宋取荆、湖，屯兵归、峡（今湖北秭归、宜昌地区）时，孟昶才感到危惧。宰相李昊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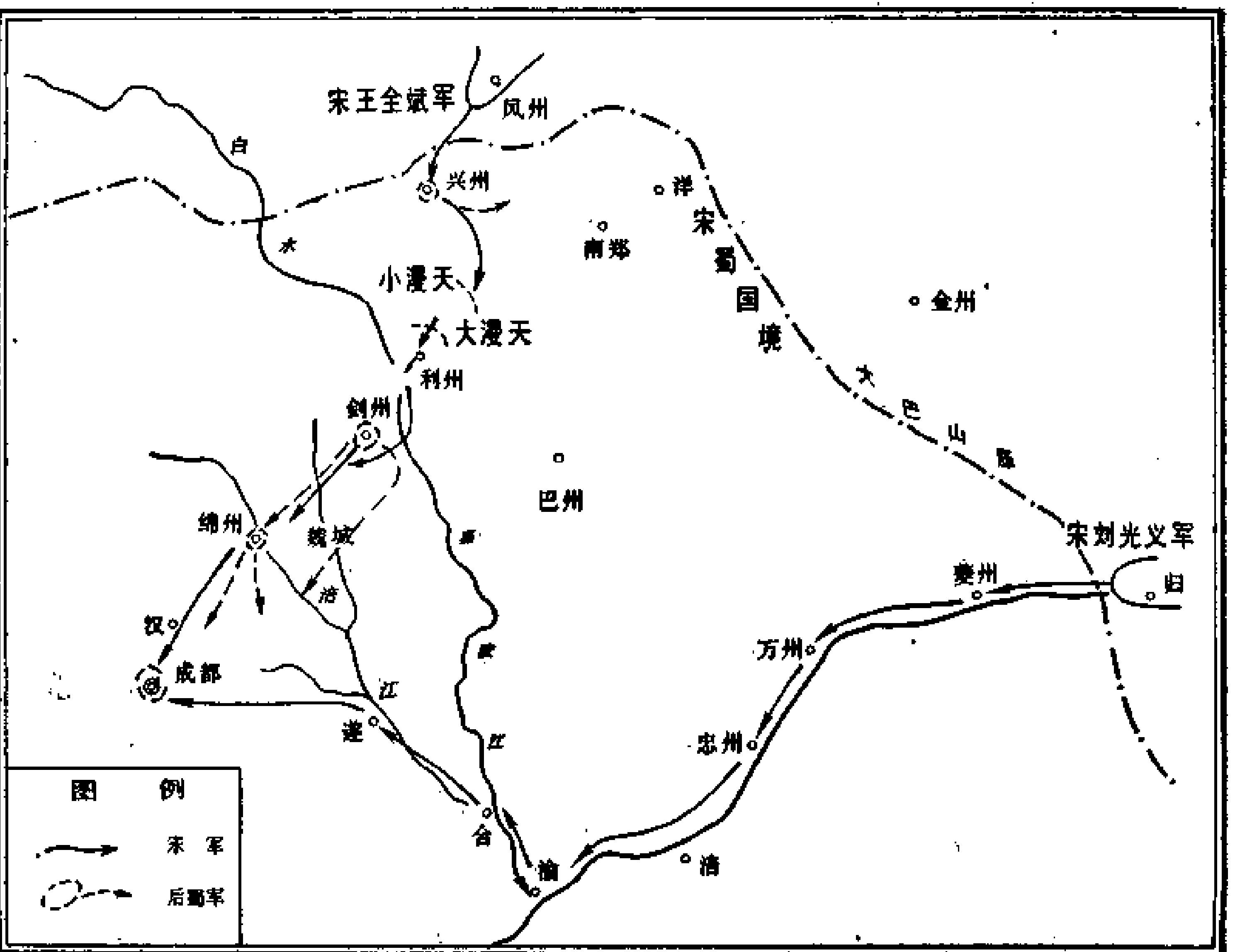
宋平荆南、武平作战经过示意图 （24—4图）



和，主张向北宋进贡以求保持现状。这种设想不切实际，能战才能言和，赵匡胤卧榻之旁，是不容他人鼾卧的，割据者已经到了该灭亡而归于统一的时候了。知枢密院事王昭远坚决主战，孟昶接受了他的建议，派出孙遇、赵彦韬等间行联结北汉，约其渡黄河南下攻宋；并说蜀军增兵褒城、汉中，预定出黄花（今陕西凤县）和子午谷（谷长六百里，南口在洋县东，北口在西安南），取关右（函谷关以西之地）与北汉会师夹击。这是个不知

宋平定后蜀作战经过示意图

(24—5图)



敌、我、友三方情况的狂妄计划：北宋取得政权已四年，内部安定，国力军力都处在上升时期，以西南一隅之地的后蜀，加之军政暗弱，人心离散，而欲进击地大人多、兵精君明臣贤（当然是相对于后蜀而言）的北宋，怎能操胜算呢？即使蜀军能够进出关右，该地区残破远远超过三国时代，不能就地给养，势必加重运输补给，后蜀能比蜀汉时更有准备吗？诸葛亮治蜀时，政治修明，军备严整，出师与曹魏争关右，仍未得志，而且也不敢采取魏延出子午谷袭长安的冒险行动。王昭远自比诸葛亮，只是狂夫梦呓罢了。再说所连结的友军，北汉刘钧自知土地兵马不及宋之十一，只能采取守势，他曾说过不敢越团柏谷（今山西太原南）南下，怎能期望他下太行，渡黄河以争中原呢？这个计划恰好犯了《孙子》兵法所指出的“不知彼，亦不知己，每战必殆”的错误。

赵匡胤久谋伐蜀，战前作了周到的准备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十一月，赵匡胤亲自校阅禁军，汰弱留强，悉成精锐；加紧制造船舰，亲自督练水军，作好溯江入蜀的准备；次年四月，又责成诸州造轻车供运输，派张晖到凤州(今陕西凤县)准备伐蜀兵事。张晖把侦察到的蜀地兵要地理和军兵戍守情况拟具攻蜀计划上报。后蜀派出联结北汉的专使赵彦韬等中途叛蜀，将机密及后蜀的山川形势、道路和守备情况，画图献给北宋。北宋不仅己方有了充分的准备，而且对敌情也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得以奠定胜利的基础。

乾德二年（公元964年）十一月，宋分两路攻蜀：王全斌、王仁赡等为北路，出凤州，南下入蜀；刘光义、曹彬为东路，出归州、溯江西上，合步骑六万人及水军，两路直指战略目标成都。赵匡胤特别申明纪律，行军“所至，毋得焚荡庐舍，驱略吏民，开发丘坟，剪伐桑柘，违者以军法从事[12]”。这就更能争取蜀地人民的支持，使作战顺利而加速地发展。

后蜀以王昭远为主将，率兵北上迎击宋师王昭远自比诸葛亮夸口说：“吾此行何止克敌，当领此二、三万雕面恶少儿，取中原

如反掌耳。”可悲的是蜀军既不能战，也不能守，连吃败仗，弃寨逃跑。王昭远庸怯低能，自比诸葛亮的豪情，一变而为手足无措、据床痛哭的丑态了。

宋北路军十二月在兴州（今陕西略阳）击败蜀军抵抗后，连克西县（今陕西勉县西）、三泉寨（今勉县西南七十里）、大漫天寨（今四川广元东北三十五里），蜀军大败溃逃，王昭远引军来援，三战皆败，退保剑门（今四川剑阁县北）。这时宋东路军袭破锁江（夔州南），占领夔州（今四川奉节县）打开了溯江入蜀的大门。次年（公元965年）正月，宋北路军克剑门，俘王昭远。孟昶派其子元喆率兵北援，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得知剑门失守，仓皇逃回成都。宋东路军亦连战皆胜，相继收降万（今四川万县）、施（今湖北恩施）、开（今四川开县）、忠（今四川忠县）、遂（今四川遂宁）各州。宋东北两路军直指成都。孟昶见大势已去，派人到魏城（今四川绵阳东北）向宋军投降。

这次战争，宋军仅用了六十六天时间，就取得灭蜀的胜利。主要是由于战争的胜败决定于战斗力的强弱，强大的一方必然战胜弱小的一方。这里所说的战斗力，是指自然的人文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在作战上的综合，包括战前的积聚和临战的发挥在内。战史中常见有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现象，实际上必然是在关键的时机和决战的地点胜方凝聚了大于败方的战斗力，在全局看虽小虽弱，在决胜点上必大必强，从无例外。战斗力的培养和运用，历来都是军事家创造性的艺术。《孙子·计篇》总结有五事七计：“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以此作为衡量战斗力的标准，则北宋得正数，后蜀得负数，“吾以此而知胜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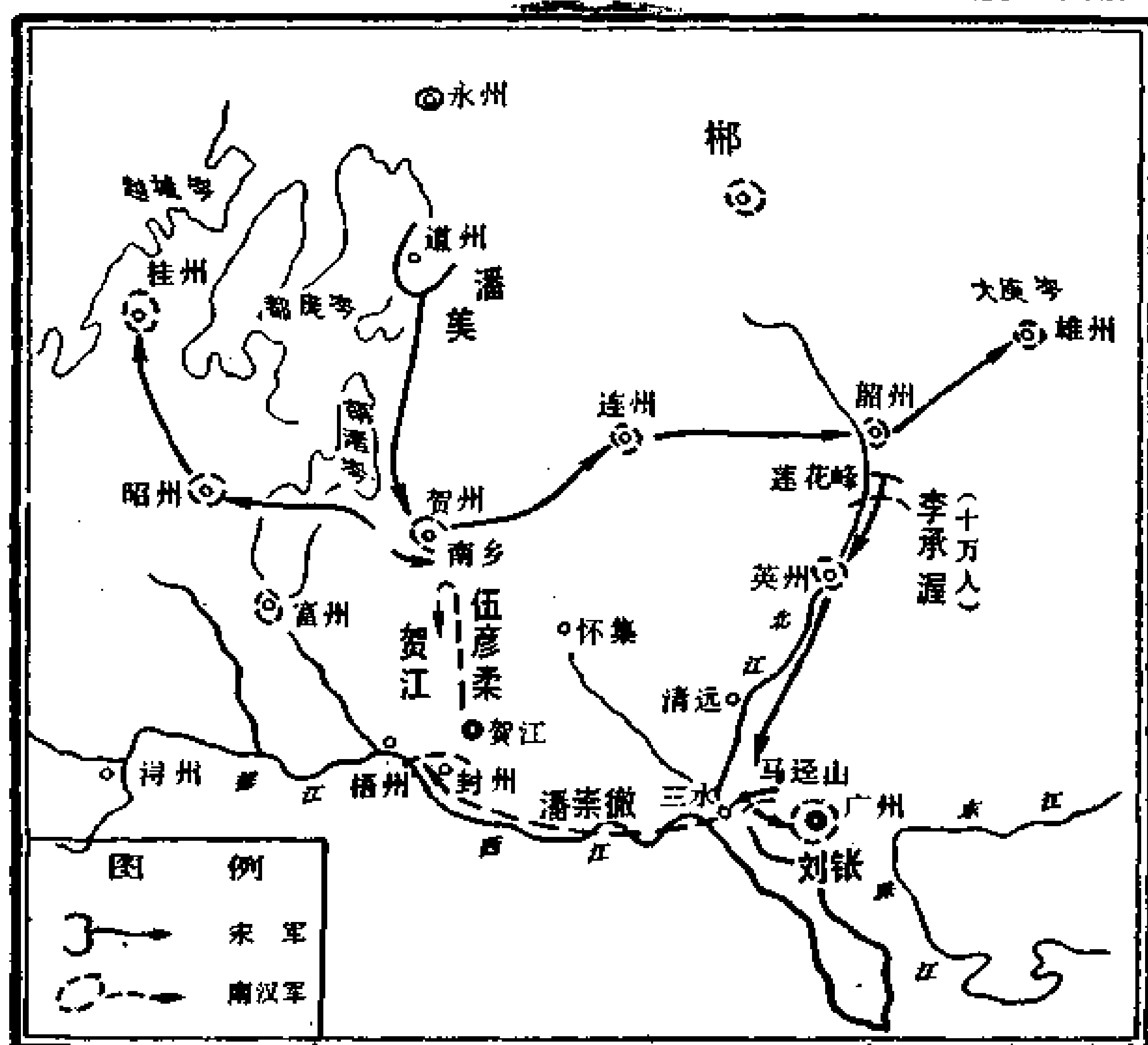
三、平定南汉

南汉地处岭南，唐末以来，中原多故，干戈不及，得以偏安

五十余年。十世纪五十年代，乘湖南楚国之乱，夺占楚南部地，遂跨有岭北。末主刘鋹昏暴骄奢，不恤国政，信谗嗜杀，重敛于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极尖锐。后周世宗显德四年（公元957年），南汉曾遣使纳贡于后周，因道路受阻，未能到达汴京，已有坐待亡国之叹。

赵匡胤平湖南后，以潘美为潭州防御使，备御南汉。乾德二年（公元964年）九月收复南汉以前夺去的湖南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北宋两次北征北汉无功后，又恢复执行“先南后北”战略，转锋南向。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六月，以王明为荆湖转运使，积极准备南伐的补给，并令南唐主书谕刘鋹称臣于宋，归

宋平定南汉作战经过示意图 （24—6图）



还前夺去湖南的旧地。张不听，并于次年九月派兵攻道州（今湖南道县）。赵匡胤以反击为名，派潘美为贺州（今广西贺县东南）道行营都部署，征诸道兵赴贺州集中，进攻南汉。

这次战争，潘美在战役指挥上灵活机动，采取声东击西，调动敌人，出敌不意地变换进攻路线的打法是成功的。宋军围攻贺州时，用围城打援战术，在南乡（贺县南信都）设伏歼灭南汉伍彦柔的援军，转而攻下贺州。扬言将沿贺江、西江顺流东下，调动了刘鋹主力三万人由潘崇彻率领至贺江口（今广东封川县西北二十五里）、潘崇彻即拥众自保。潘美把南汉军引至贺江口后，为了解除后方的威胁，即转头北向，取昭州（今广西平乐）、桂州（今广西桂林），肃清侧背；又东向取连州（今广东连县），造成刘鋹认为宋军只收复贺、昭、桂、连四州原湖南旧地，不会再向南进的侥幸心理。潘美却出其不意地自连州进逼韶州（今广东曲江），击溃南汉十余万人于莲花峰（今广东韶关市南）；占韶州，取雄州（今广东南雄）。在作好对东北面南唐的警戒部署后，转头沿大北江路线南下英州（今广东英德），进军广州，拒绝刘鋹乞和缓师，在马迳山（今广州市西）用火攻击破南汉最后的抵抗而取得全胜。刘鋹在计穷无奈的情况下出降。

历来从西北方向攻取广州的进军路线有三条可供选择：一是沿贺江、西江东下，经封川、三水；二是由贺州经怀集、清远；三是沿北江，经韶州、英州、从化。第一条路线，由于宋军没有水师，将受西江上游浔江而来的背后攻击，难以保障顺流东下。第二条路线，仍未远离调动贺江口的南汉主力潘崇彻部侧背的威胁。取第三条路线从北向南，把自己的后方连络线放在郴州、韶州方面，不仅稳妥可靠，而且有发挥宋军步骑兵的长处和出敌不意之利，置潘崇彻三万人于使不上力的境地，因而取得韶州后，潘崇彻也率部投降了。

四、平定南唐

南唐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后主李煜，德轻志懦，好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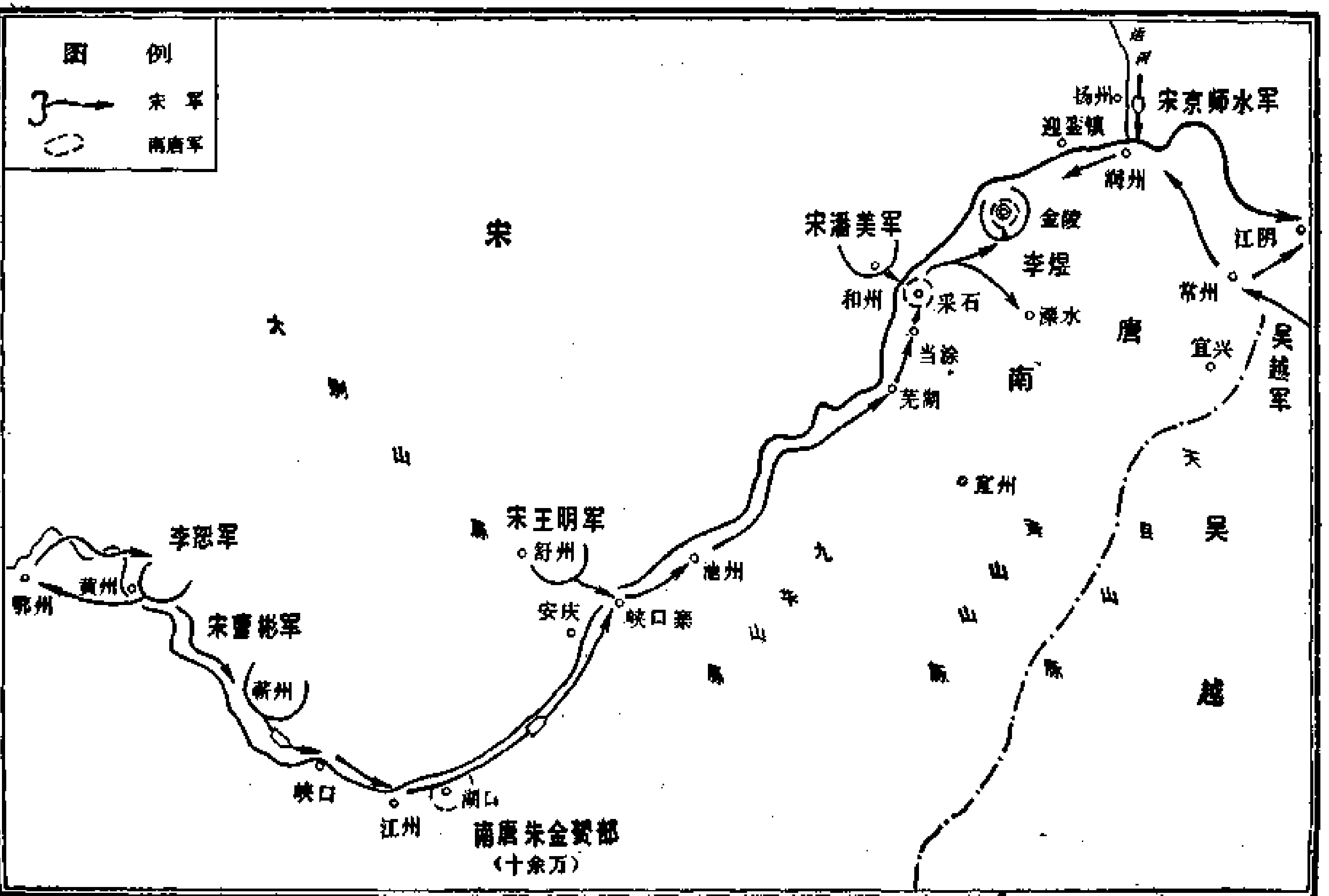
信佛，恣声色，荒国政。在其父李璟时，所得楚国地又复失，还失掉江北的淮南十四州，国势大削。对宋的国策，外示畏服，修藩臣礼，内缮甲兵，阴为战守。当宋师征南汉时，其南都留守林仁肇密请乘宋远道师疲，淮南戍兵甚少的时机，给他领几万兵，收复江北旧境，据淮河以御宋师。沿江巡检卢绛也献策，由其诈叛去投吴越，乘机先灭吴越，绝吴越为宋犄角合力攻唐的后患。这两个建议都不失为预以御宋的好主意，而南唐主不能用，甘于跼促江南，倚长江与宋为邻。当时，自武昌以东江面，实际上已是南唐与宋共有。这就形成了南唐守江不守淮，门户洞开，两手伸开在千里以上漫长的江面上，江北敌情侦防俱难，备多力分，处处薄弱。宋平南汉后居其北西南三面，吴越在东，南唐已处在四面被围的不利战略态势之中。

赵匡胤对"卧榻之旁"的南唐，并用文武两手策略：外示恩信，多方羁縻，内图兼并，积极备战，以谋攻取。在取代后周之后不久，即派宋延渥领舟师巡长江，试探南唐动静；在平李重进后，跃兵于迎銮镇（今江苏扬州西南长江北岸），对南唐派来的犒师使臣冯延鲁说要乘胜渡江，却又说宋与南唐大义已明，不致用兵，真真假假加以迷惑。在平定南方其他诸国的过程中，尽力争取其中立，如送还其叛臣和叛逃者；拨粮救济南唐灾荒；追谥李璟帝号；授其弟从善为泰宁节度使，赐宅第于开封；还投其所好，派人去讲佛法，使其不理政事。平南汉后，即加紧用兵的准备：用反间使李煜毒杀反宋的将领林仁肇；派卢多逊出使南唐，骗取江南的图籍，尽得江南地理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的情况；用樊若水所献策，预造通向采石矶（今安徽当涂北）的浮桥；在荆、湖造大舰和黄龙黑船数千艘备用；约连吴越出兵从东面助攻；命薛居正等兼淮、湘、岭南、蜀转运使，准备后勤补给。又于开宝七年（公元974年）三月派人跟辽国达成和议，解除后顾之虑。总的说来，战争准备是充分的。

开宝七年九月，北宋马步军开始秘密向湖北江陵一带集中，

宋平定南唐作战经过示意图

(24—7 图)



十月发战船自开封东下。其进攻部署：曹彬等率马步军战船由荆南沿江东下攻金陵；潘美率步骑集结和州，准备从采石渡江，会合曹彬军攻金陵；吴越钱俶从东面进攻金陵，宋派丁德裕率禁军步马兵千人为前锋并监吴越军；京师战舰沿汴水东下，经扬州，入长江进行牵制；以王明为池州（今安徽贵池）至岳州（今湖南岳阳）江路巡检战船都部署，牵制南唐西部兵力。十月赵匡胤令曹彬等水陆军十万人发动突然袭击，自荆南发战舰东下。南唐沿江屯戍部队，还以为是宋军每年例行巡边，只坚壁自守，奉牛酒犒师。宋军乘机越过南唐屯兵要地湖口（今江西湖口），在池州以西峡口寨登陆，沿长江南岸东进，歼灭南唐沿江守军，连续占领池州、铜陵、芜湖、当涂等地。闰十月末，曹彬等击败南唐军两万多人于采石矶；十一月，把事前准备好的架桥器材移到采石矶，三天内架好横跨长江的浮桥。江北岸宋潘美军和辎重迅速渡到南岸，扩大战果、击败南唐杜真等两万人的反攻，战况发展顺利。至开宝八年（公元975年）二月，曹彬、潘美军连破江南兵于白鹭洲（今江苏江宁县西南江中）、新林港，分兵下溧水，大军进到秦淮（河名今江苏南京东南），在城下败江南兵十余万，进围金陵。至四月，东面吴越王钱俶部已先后攻下常州、江阴、宜兴等地，正进攻润州（今江苏镇江）。李煜最初虽然知道宋军来攻，但相信谋臣们所说“坚壁以老宋师”，无庸忧虑，终日仍在后苑与僧道讲经诵易，不问军政，军书告急，皆莫得通。主兵事的皇甫继勋，但愿李煜早降，凡将士请出城击宋师的，反被杖责拘禁，以致金陵被围一个多月，李煜才发觉，慌忙调防守湖口的朱金赟率军入援，而朱因受宋王明的牵制，迟迟未发。九月，润州又失，外围更急，金陵危在旦夕。十月，李煜一面派人到开封求宋缓师，一面催促朱金赟迅速来援。朱不得已率众十五万，分乘巨舰木筏沿江东下，在皖口（今安徽安庆西南）与宋刘遇、王明等部相遇，纵火烧宋军、宋势不支，后因北风突起，火势反烧南唐军，南唐军全部被歼，朱金赟自杀。

曹彬等宋将执行赵匡胤使自归顺，不须急攻的方针，围困金陵八九个月之久，至十一月才发起攻城，破金陵，俘李煜，灭了南唐。

北宋灭南唐的准备工作，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灭南汉算起，历时四五年，从开宝七年部署进攻开始，也用了十四个月，从心理战到军事进攻，从用间到后勤战具，都准备得较充分。反观南唐，虽说是内缮甲兵，阴为战守，而表现出来的却是“无为、待亡”。对敌方行动盲无所知，战守皆无成算，主兵者皆庸懦之辈，外无援师，内不能守。所谓坚壁以老宋师，正合赵匡胤的设想：为保存江南财富以为国用，尽量避免过多的战争破坏，四面合围，围而不歼，围城打援，援绝必降。金陵被围多时，李煜仍未发觉，其昏庸误国，史亦罕见。后代史家给他评定说：“作个词人真绝代，可怜不幸作君王。”李煜的确不是适于主持国政的人物。

五、四伐北汉

刘崇在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公元951年）称帝于晋阳（今山西太原），依附契丹，与中朝为敌。子刘钧继位后，曾出兵支持李筠反宋。此后一直采取守势，不敢深入宋地，住守险隘，不惜据城一战以图存。但在战术上也不断派兵袭扰宋边境，以谋自固，遇宋师来攻，即乞援于契丹。宋乾德六年（公元968年）七月刘钧死，养子刘继恩继位，宰相郭无为专权，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非常激烈。

宋自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夏决定北守南攻战略后，常以游兵掠扰北汉边邑，平蜀前双方发生过十多次战斗。较大的有乾德元年（公元963年）八月，宋取得乐平（今山西昔阳），设立平晋军；十二月又收复北江的辽、石二州（今山西左权、离石），辽国以六万兵驰援，宋才退出石州；乾德四年（公元966年）二月，北汉又收复辽州。宋平后蜀之后，北汉边寨守将来降者渐多。辽穆宗控区内的黄室韦、乌库等部相继叛离，内部多事。宋经过三年多的休整，赵匡胤认为刘钧死后北汉内部扰攘不安，

“取乱侮亡”有机可乘，遂改变先南后北的方针，转锋北向，展开两次大举进攻北汉的战事。

（一）一伐北汉

开宝元年（公元968年）八月，赵匡胤命李继勋、党进、曹彬等将兵伐北汉。九月，郭无为杀何继恩另立何继元。宋李继勋等败北汉兵于铜锅河（在今太原东南），进迫太原，焚烧太原延夏门。辽派耶律述烈率军来援北汉。十一月，李继勋等以辽援将至，仓皇退回。

（二）二伐北汉

赵匡胤以李继勋师出无功，决计再举，加派了阻击辽援军的部署：以何继筠屯兵石岭关（今山西阳曲东北），阻击北面来援的辽兵；以韩重赟急驰赴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县）阻击东趋太原的辽兵。开宝二年（公元969年）正月，调发各路军储，诸路兵进屯潞（今山西长治）、晋（今山西临汾）、磁（今河北磁县）等州。二月，李继勋等部先开赴太原；三月赵匡胤自领大军进迫太原，筑长围立寨从四面攻城。北汉派刘继业等乘夜出城攻东西寨均被击退，但北汉恃有辽援，守御坚定。宋竟壅汾、晋二水灌城。四月，辽两路出兵援北汉，一路自石岭关，一路向定州，先后均被击退败走。两路辽援虽已退去，但宋强攻太原城仍未得手，大将石汉卿等战死，顿兵坚城之下，士卒多病。辽又派北院大王乌珍率精骑利用夜暗间道进出太原之西，威胁颇大。赵匡胤听从谋臣李光赞等建议撤兵。闰五月，分兵屯镇州、潞州，迁移太原附近人民万余家到山东、河南。北宋军撤退时，北汉乘势出击，得宋遗弃的辎重、粮食甚多。

（三）三伐北汉

北宋两次伐北汉无功后，又转锋南向，先后平南汉和南唐，南方基本平定。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八月，赵匡胤命党进、杨光美、牛思进、米文义等率兵分五路攻太原，又遣郭进等分攻忻、汾（今山西汾阳）、代、沁、辽、石等州，所向克捷。九

月，击败北汉兵于太原城下，北汉急求辽军来援，辽耶律沙、塔尔等将兵救北汉。十月二十四日赵匡胤死。十二月宋师撤回。

（四）四伐北汉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四月，漳泉（原闽国）割据者陈洪进献所管地归朝。接着，吴越王钱俶也被迫交出政权。至此，赵宋王朝从公元963年起，历十五、六年时间，完全削平南方割据势力，可以集中力量，谋求消灭北汉和对付契丹了。赵光义鉴于以往三次伐北汉无功的教训，战前积极进行作战准备：

1．加紧练兵，亲自校阅禁军，讲武习战，“甲兵之盛，近代无比”(13)；

2．令晋、潞、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永年）、镇、冀（今河北冀县）六州，制造兵器和攻城器械；

3．派大员管运输给养，督诸州储运军粮。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正月，赵光义集群臣讨论用兵北汉问题，他问曹彬说：

> “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而不能克，岂城壁坚完，不可近乎？”

曹彬主张立即进攻，认为：

> “世宗时，史超败于石岭关，人情震恐，故师还。太祖屯兵甘草地中，军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垒不可近也”。现“国家甲兵精锐，人心欣戴，若行吊伐，如摧枯拉朽耳。”

宰相薛居正等不同意上述意见，他们认为：

> “世宗举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坚壁不战以致师老而归。及太祖破契丹于雁门关南，尽驱其人民分布河洛之间，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愿陛下熟虑之。”

赵光义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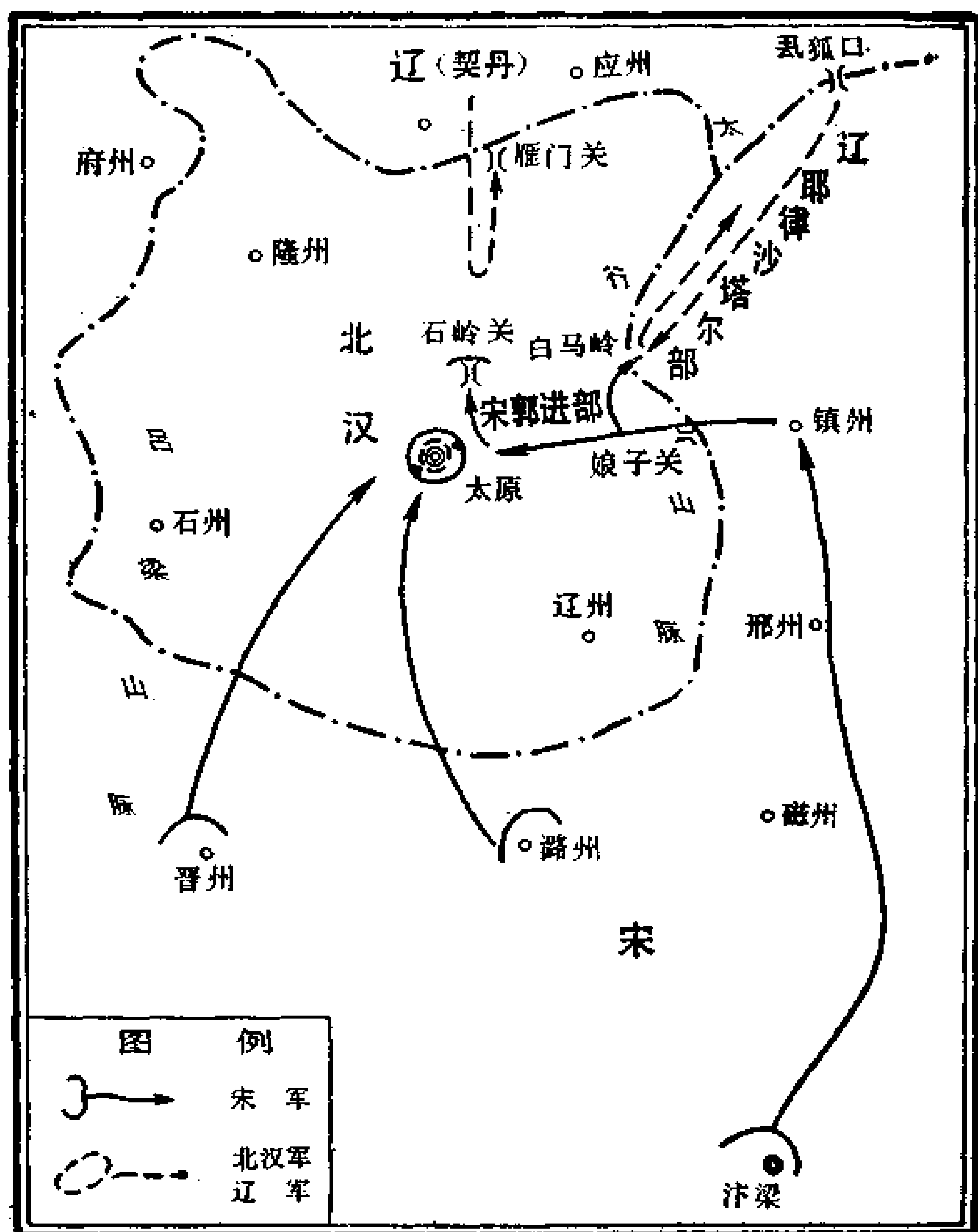
“今者事同而势异，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14〕

上述议论都只限于攻取北汉的一面，没有深入连及契丹的一面。原来北守南攻方针的着眼，曾计算到留北汉“当西北二边”以作缓冲的考虑。时至今日，取北汉必须计及直接对付契丹问题，以前三次伐北汉，辽都来援兵，灭北汉后，不能不对契丹的战守问题，认真作全面考虑。如果继续与契丹保持和议，则应有策略上的措置；如果“惟有战耳”（赵光义语），也须有和契丹直接展开作战的准备。这时宋君臣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思想上作战上的准备，没有明确这次作战的有限战略目标，播下了因胜而骄，立即进攻契丹招致失败的种子。

赵光义决计进兵北汉，定下了攻城阻援的方针。以潘美、崔彦进、李汉琼、刘遇、曹翰等军分四面攻太原城；对攻城器械以及后勤补给都派大臣主其事；以郭进部担任石岭关方面阻击契丹援军。二月，赵光义率军自汴京出发，遣兵分别攻取太原外围州县。三月，郭进部在白马岭（山西盂县北）大败辽东路军耶律沙、塔尔部，塔尔部多人战死。辽西路援军由大同南下，得知东路败讯，自动撤走。至四月，宋军陆续攻下太原外围州县，太原益形孤立，太原守将相继出降。刘继元在外援不至，内部厌战的情况下，五月初五日上表请降。北汉平。

北宋四伐北汉，三次无功，第四次才取得胜利，是什么缘故呢？北汉依附契丹，以河东一隅之地，民力、兵力、财力都有限，与地大物博的北宋长期相持，二十年来，战事不息，厚敛奉事契丹，战守都大耗国力。宋在二伐北汉后迁其居民万家徙河洛，使北汉几乎是一户养一兵，经济上陷于枯竭穷困，国势每况愈下，公元977年，已乞粮乞战马于契丹。加之旧臣多以疑见杀，人心携贰，刘钧时代的士卒强悍，人心固结的情况，早已变化，因此，宋平蜀后边寨投降者日见增多。北宋一伐北汉时，由于未作阻援部署，辽援将至即忙撤回。第二次赵匡胤亲征，虽已

宋征北汉作战经过示意图 （24—8图）



打败契丹援军，但援仍继至，在冷兵器时代，兵器性能主要是杀伤力而缺乏破坏力，对付坚城垒寨使用的炮车即掷石机，效用亦极微，攻坚城是靠挖地道和架梯攀登。如果守城者战志不懈，粮械不缺，外援又不绝，常能支持很长时间；倘能制造战机，振奋士气，还可能转败为胜，如齐田单守即墨，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这次宋军壅水灌城，虽然使用了一个特殊的攻城战法，但攻城一百多天也未攻下，就是守城者城外援兵不绝，城内战志未懈；攻者顿兵坚城受到疲敝消耗而未奏功。第三次因赵匡胤死，宋师撤回。第四次，赵光义之所以奏功，攻下太原，主观上是战前准备比较充分；客观上契丹南京留守枢密院使韩匡嗣不相信宋必攻北汉，“卒不设备”，以致白马岭一败之余，不能再发兵救北汉；同时，当太原将下时，北汉宣徽使范超、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万超相继出降，致仕太仆射马峰亦劝刘继元出降，战志涣散，已难再战。

第五　规复幽云十六州的对辽作战

宋平南唐后，赵匡胤不接受群臣请加尊号，说：“燕（指幽云十六州）晋（指北汉）未复，可谓一统太平乎”。可见他对平北汉和收复幽云，是视为统一范畴的事，认为太原未下，幽云未复，赵宋王朝统一事业尚未成功。赵匡胤在位时，规划收复幽云的谋略，见于史传的主要有二：一是赎买政策，把削平割据政权得来的帑藏金帛和三司常赋的岁余，存入“封桩库”。他曾说：

> “石晋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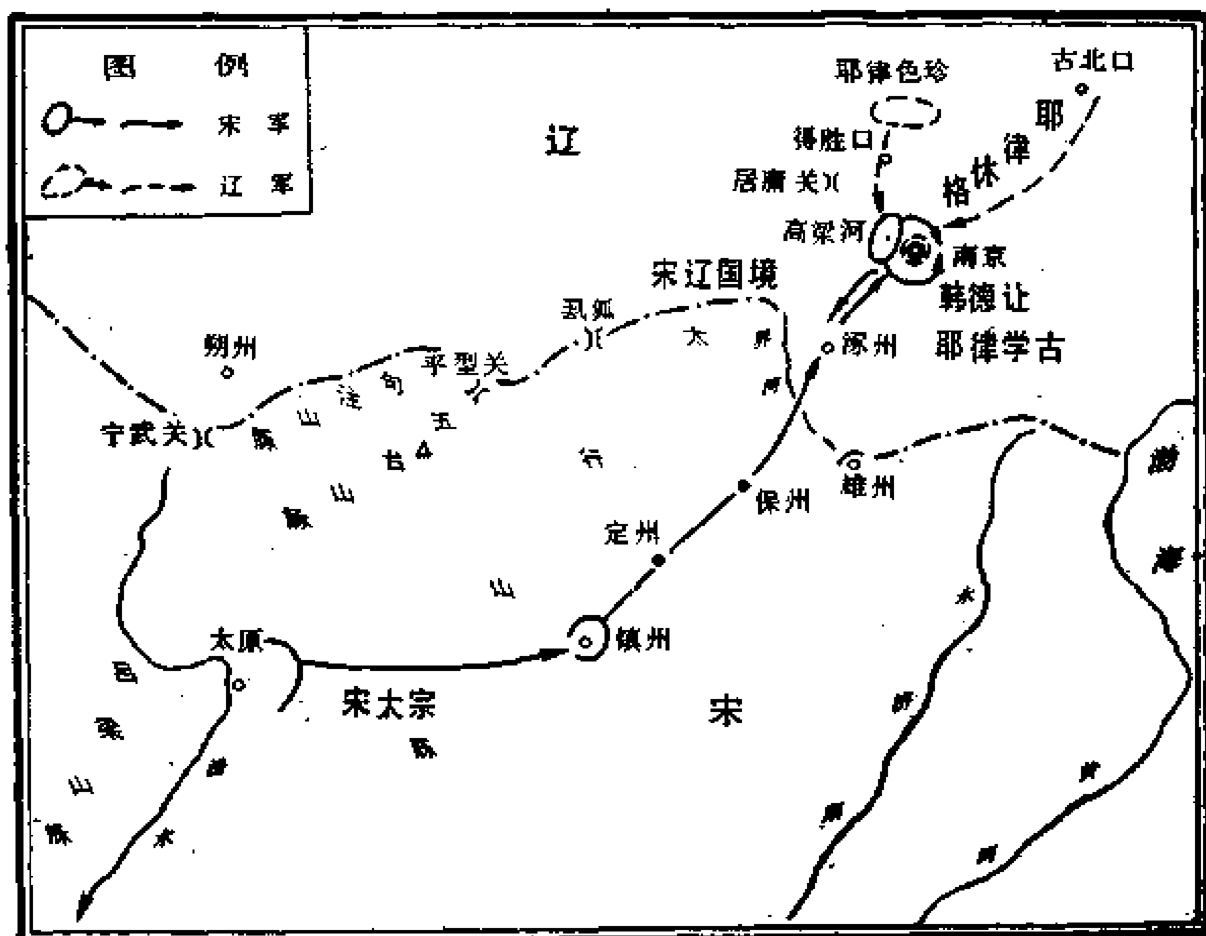
二是迁都避战，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四月赵匡胤拟迁都洛阳，并说：

“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16〕

其弟光义与群臣切谏，极言迁都非便，匡胤才放弃迁都主意，但说：“不出百年，天下之民力殚矣。”意思是开封四战之地，为对付契丹必多养兵以为战守，大耗国力。赵匡胤死得太早，没有看到他如何散财养勇，积极备战以收复幽云的谋划，只给人留下求安保守的印象。但其赎买幽云的设想，在当时宋辽国力对比下谋求和平解决幽云问题，还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赵光义在阻止迁都时说“在德不在险”，也不过是一句空话，并没有看到他修德备战，认真作出收复幽云对付契丹的筹谋和必要的准备，其两次攻取幽云作战的表现，就是最好的说明。

一、高粱河之战

宋辽高粱河之战示意图　（24—9图）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宋平北汉后，赵光义在事前无准备的情况下，企图乘胜立即转取幽蓟。诸将多以师疲饷匮，皆不欲行；而赵光义偏听崔翰的怂恿，认为乘此破竹之势，取幽州甚易，时不可失。于是决计在镇州集中兵力，立即进攻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六月十三日，部队尚未全部进到集中地，赵光义就迫不及待地命宋军自镇州北进。十九日进入辽境金台顿（今河北保定市）；翌日辽岐沟关（河北涿县西南）刺史以城降，并击败辽北院大王耶律希达部于沙河（今河北易县南的易水）。宋军继续北进，辽南院大王耶律色珍部控制了得胜口（今北京市昌平北），宋军先胜后败，稍退。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以城降，宋军进到幽州城南。廿六日宋以宋渥、崔彦进、刘遇、孟玄喆领兵四面攻城，辽将多降。七月辽顺州（北京市顺义）、蓟州（今同名）皆降，幽州形势危急。但是，辽南京留守韩德让和耶律学古能在危急中安定人心，整修守备以待援军。宋师一部虽曾一度乘夜登上城垣，亦被击退。这时辽耶律色珍和希达等部在清沙河（今北京市昌平境）北面，为幽州声援。辽于六月末并发五院军，以耶律沙和休格等率领，进援幽州。七月初六日，耶律沙援军到达幽州与宋军战于高梁河（北京市西直门外），耶律沙军少卻将退；入夜，耶律休格骑兵赶到，士卒手持两个火把，宋军惶惑，休格与原集结在清沙河以北的耶律色珍等部分左右翼夹击宋军，幽州城内耶律学古也开城出击。宋军大败，死万余人，辽军乘胜追至涿州，宋丧失资粮军械甚多。

高梁河之战，赵光义被河东之战胜利冲昏头脑，战略决策轻率，不知彼又不知己，打无准备之仗而招致失败，违背了“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兵法原则。契丹地广兵多，尤其骑兵见长，幽州又是一座坚城和辽南进的重要战略基地，为辽势所必守必争之地，每次宋伐北汉时尚且出兵救援，攻其南京，怎能忽视其援兵！因此，攻幽州特别需要查明辽战略预备队的动向和部署足够的阻援力量，占领得胜口等战略要地，此其一；幽州是坚

城，从镇州出发，要经过攻取辽守备的外围州县的战斗，不存在出其不意奇袭取城的条件，这就必须备好充足的攻城器材，此其二。两者宋军都未准备，单凭热情盲动，所谓机不可失，不过是主观臆测，并非实在情况，不慎兵事如此，安得不败。再说宋军经过几个月河东之战，兵力已有相当消耗，封建时代招募来的职业兵，得不到打胜后例行的赏赐，士气松懈是常有的，以不足的兵力和士气不高的疲兵去攻坚城、斗强敌，是不可能取胜的。即使徼倖得以攻下幽州，辽后援相继来争，能否保住也成问题。赵匡胤对收复幽云问题，曾与赵普有一段对话。他把曹翰画的幽云地区形势图给赵普看，并问曹翰能不能攻下这个地方。普反问，曹翰可以攻，谁人可守？匡胤答，就让曹翰来守罢。普又问，他死了，谁来接替呢？匡胤沉默一会说，这真可谓深谋远虑了！〔17〕可见对付契丹必须作长远计划和充分战备，要预见到不是打一次战役即能解决问题的。高梁河之战，宋军由于没有周密作阻援部署，在攻城的紧要关头，敌援相继而来，造成很大的被动，被迫用攻城兵力对付援军，致使无足够兵力封闭守军的出击，反而受到辽军三面夹击大败。

高梁河战后，契丹了解宋军的战斗力并不强大，曾几度南进。主要的有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九月，辽兵南向镇州，在满城被宋将刘廷翰等合击而败还；翌年三月，宋将杨业败辽兵十万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北）；十月，辽主贤自将兵围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境），击败列阵于水南的宋军，追至莫州（今河北任丘北）还军；又次年（公元981年）五月，辽在河北、山西方面先后三路南进扰边。直到公元982年九月，辽景宗耶律贤死，圣宗耶律隆绪继位之后，对峙线上才获得短期的平静。

二、岐沟关之战

高梁河败后，赵光义含耻结愤，每欲再举收复幽云，以图雪耻振威。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冬和翌年夏，曾两度再谋大举北征，因李昉等谏阻而罢。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知雄

州贺令图等相继上言：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倖用事，国人怨疾，请乘衅以取燕蓟。光义信之，又发动了收复幽云的对辽战争。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契丹耶律隆绪十二岁继位，母肖绰（史称肖太后）摄政。肖绰“明达治道，闻善必从，故群臣咸竭其忠，习知军政。”〔18〕她在摄政之初，就采取一些增强民族团结的措施，如薄敛和量刑方面把汉人与契丹人拉平，缓和了辖区内民族间矛盾。同时任命北院大王休格为南京留守，总南面事。休格积极发展农桑，大修武备，整顿边防，多派间谍，佯言国内空虚，欺骗北宋守边将领。如贺令图父子之辈根本不了解辽真实情况，主观臆断屡请出师北征。宋参知政事李至反对，认为幽州乃战略要地，契丹的右臂，必然以全力抗争，我们的粮食和攻城器材都缺乏准备，战争没有胜利把握，应有充分准备，切谏慎重用兵。〔19〕赵光义没有采纳李至的意见，甚至连宰相也没有商量，就在这年（公元986年）正月，决定兵分三路北攻。

东路军，以曹彬为主将，崔彦进为副，另一路以米信为主将，杜彦圭为副，率领十多万兵出雄州，指向幽州；

中路军，以田重进为主将，出定州，攻取飞狐（今河北涞源）、蔚州（今河北蔚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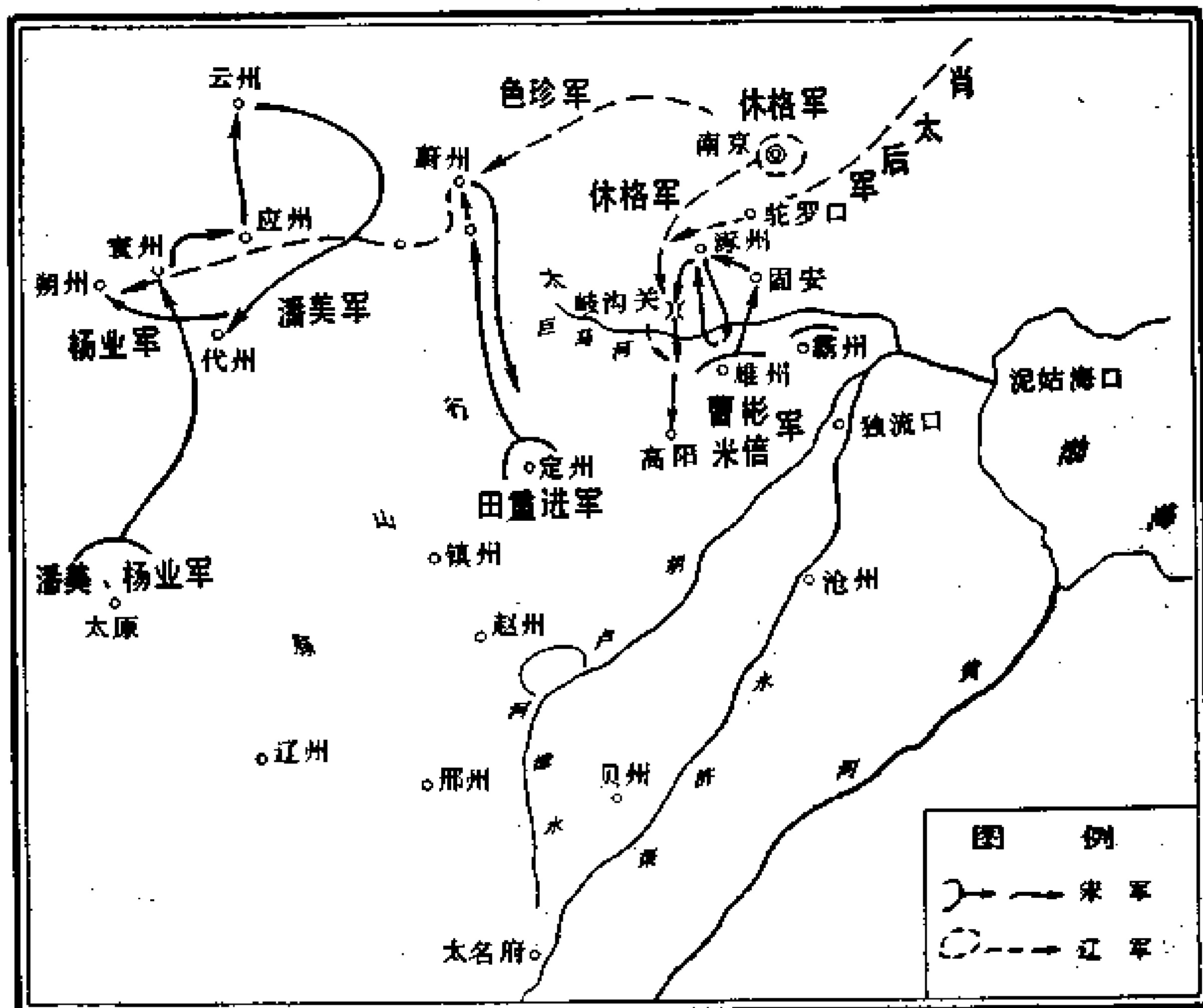
西路军，以潘美为主将，杨业为副，出雁门，攻云州（今山西大同）、朔州（今山西朔县）、寰州（今朔县东马邑镇）和应州（今山西应县）。

曹彬等出发前，赵光义对他们指示方略：

“潘美之师，但令先趋云应，卿等以十余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贪小利而要敌。敌闻大兵至，必萃劲兵于幽州，兵既聚，则不暇为援于山后矣。”〔20〕

从这段指示中可以看出赵光义的战略意图是：西路军先攻取山后诸州（新、妫、儒、武、云、应、朔、蔚、寰等州，即山西北部并连结河北西北部边地），东路军先扬言攻幽州，持重缓

宋辽岐沟关之战示意图　（24—10图）



行，等西路军、中路军东进会师，再合攻幽州。

辽得知宋军发动进攻后，即以南京留守耶律休格当曹彬之师；同时下令征诸州兵赴援幽州；随后，以耶律色珍为山西兵马都统当田重进、潘美之师；以勤德守备平州（今河北卢龙）海岸，巩固后方；肖太后与耶律隆绪率总预备队进驻幽州，催促诸部兵以为应援。辽的战略意图可概括为：以一部兵力对付宋中西两路，主力抗击威胁幽州最大的东路军，尔后再向山后转用兵力。

宋各路军发动进攻后，中路军于三月破辽兵于飞狐南，四月攻蔚州，辽将李存璋杀其主帅举城投降。西路军三月在寰州击破

辽兵后，寰、朔、应州的守将先后举城降，四月又克云州。东路军亦于三月初连克固安（今河北固安）、新城（今河北新城东南），十三日攻占涿州。赵光义接到捷报后，对曹彬东路军进展过快，违背“持重缓行”的作战意图，深感惊讶，担心辽军截断东路军粮道。当曹彬向涿州进攻时，辽南京留守耶律休格认为，在援兵未到之前，应避免与宋决战，先采取疲惫消耗宋军的方针，以小分队活动困扰宋军，并深入宋军后方伏击，断其粮道。曹彬在涿州十多天，因给养困难，不得已退师雄州。赵光义得报后，又认为大敌当前退军就食，甚为失策，亟命东路军不再撤退，令其：

> “引师缘白沟河（即拒马河）与米信军接，按兵蓄锐以张西师之势。待（潘）美等尽略山后之地，会（田）重进东下趋幽州，与彬、信合，以全师制敌。”[21]

这时曹彬部下诸将，听说中西两路军连下州县，屡战屡胜，都想邀功倖进，曹彬控制不住，于是补充粮食后，再向涿州进攻，沿途受到辽耶律格林逐次的阻击，宋军且战且行，行动迟缓。时正天气炎热，途中缺水，士卒到达涿州，已经困乏不堪。这时肖太后和耶律隆绪率领的总预备队也自幽州进到驼罗口（今涿县东北五十里），正向涿州前进，准备会同耶律休格的主力钳击宋军。曹彬见形势严重，决心向西南撤退。耶律休格以全力追击，五月初三大败曹彬军于岐沟关（涿县西南拒马河北）。宋军连夜溃渡拒马河南逃，被辽军追及，溺死无数。全部退至沙河北岸，正造饭时，又被辽兵追及，宋军人马自相践踏，死者过半，遗弃兵甲军资如山积，残部退到高阳（今河北高阳县）。

赵光义得知岐沟关战败后，为避免中西两路再被击破，即令中路军退驻定州，西路军退驻代州。

六月初，辽军向西转用兵力，先后攻占了丑飞狐、蔚县、应州、寰州等地。宋西路军潘美为掩护雁门关以北人民向南撤退，在兵力对比悬殊情况下，迫令杨业领兵自代州向朔县出击。杨业

孤军进攻，陷于陈家谷口（朔县南），全军覆没。杨业重伤被俘不屈，绝食三日而死。至此，宋王朝的军队全线溃退，再次遭到惨重的失败。

赵光义两次以收复幽云为目标对契丹的攻势作战，均告失败，不仅损失惨重，也暴露了赵宋王朝军事上的弱点，给尔后对辽作战带来被动和不利的影响。歧沟关战败后，北宋统治者由于内部矛盾逐渐加剧，以及新兴的西夏的威胁，从此结束了收复幽云对契丹的攻势，转而采取守势战略，不再积极图谋去收复失地了。为此，把河北中部一些河流，加以疏浚沟连，使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今塘沽长达九百里的地区，遍布塘泺，筑堤储水，借以遏制契丹铁骑南犯。

辽在两次击败宋军以后，看到北宋统治者的无能，转而采取攻势，时常派骑兵南下掠夺。宋太宗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和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7年），契丹军先后大举南下，占领了宋的涿州、祁州（今河北安国）和新乐（今河北新乐东北）等地，并企图进一步直逼开封，要挟北宋作城下之盟。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闰九月，辽圣宗和肖太后全力大举南下，但一入宋境，即遭到猛烈抵抗，契丹军绕道保州、定州，不克，又东攻瀛州（今河北河间），被宋军打死打伤三万多人。其后，契丹军虽然乘隙进到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但契丹主将兰陵郡王肖达兰被射死，士气受挫，加之在其后的“河朔皆城守”，宋城池多未易手，王超所率的劲兵仍在中山，契丹有后顾之忧，因而顿兵澶州城下，不敢南渡黄河。宋真宗赵恒在辽军进逼下惊惶失措，准备南逃。以宰相寇准为首的抗战派坚决主战，把犹豫的赵恒强行护送到澶州，指挥军事，宋军在皇帝临阵鼓舞下，士气高涨。契丹本就没有决胜信心，于是双方在相持中进行和议。赵恒只盼契丹尽快撤走，就答应送给契丹每岁银币十万两，绢帛二十万匹，契丹军撤走。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澶渊之盟”。银绢成为北宋人民长期沉重的负担！

此后，契丹民族的统治者，一方面由于内部统治的不稳定，另一方面也感受到中原人民奋勇抗战的力量，不敢再举南下。因此，在后来相互对峙的一个世纪中，宋辽大体上维持着和平状态。

北宋又一次在岐沟关败于契丹，主要原因是准备不足和情况不明。赵光义在高梁河失败后，并没有把对付契丹、修德备战放在重要日程上，却是亟谋修补失去的“明君贤主”的形象，非常失策地促成党项羌族李继迁的叛离，导致了宋夏战争；此外还不必要地对交州用兵，消耗国力，削弱了对契丹的作战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赵光义对契丹的情况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时契丹肖太后摄政，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处在复兴向上时期，对外作战也取得很好战绩，北服女真、东慑高丽，兵强马盛，其势益强。赵光义闭耳塞听，没有深入调查研究敌情，就一厢情愿地作出有机可乘的判断，不听李至谏阻，甚至不和宰相计议，就定下错误的决心，轻率用兵。对关乎国家兴衰的战争大事如此草率，史亦罕见。在战略指导上，赵光义争取外线优势，三路分兵合击，幽州，要求东路主力“持重缓行”，吸住辽军主力，待西路攻占山后，再三路合攻幽州的战略意图是可取的，但缺乏实现这一意图的具体措施。宋军居于战略外线，对战略目标幽州作向心合击，就必须规定各路军在分进时期避免遭受敌人各个击破的统制线，规定在没有形成合击态势之前，各路军不得单独越过此线，以免招致被各个击破的危险。但赵光义在给东路军的行动指导上只说“持重缓行”，而没有明确必须在中路西路到达一定地线后，东路军才能进出的地线。比如说，让曹彬这路战略展开于雄州、霸州之线，以一部佯攻幽州，牵制和疲敝敌人，等到西中路解决山后方面任务后转锋东向，进出到利害转换的一定地线后，东路军主力再北进合围幽州，先歼其有生力量，进扼长城各要隘，阻止契丹援军南下，然后攻取幽州城，这样取得胜利是可期的，至少不致于东路军被各个击破而全局皆输。再说曹彬由于冒进缺

粮而退回雄州时，也改善了东路军突出易遭各个击破的态势，并未违背整个战略意图，它可以吸引契丹军南下，为中西两路进攻创造有利条件；若契丹转用兵力向西，可再向幽州前出，威胁幽州，伺机夺取。可惜赵光义只知强敌当前，不应撤退，不知某些失误，如能因势利导，往往也可以造成敌人的错觉，同样贯彻其原定的方针。而曹彬也没有很好理解赵光义"缘白沟河与米信军接"，待中西两路会合东出"以全师破敌"的指示，反而受诸将怂恿，再次过早裹粮北进，不顾沿途遭到阻击，以疲兵二进涿州。当听到契丹主力来了，又不敢就地抵抗，慌忙南撤。宋军这支十多万人的主力，就这么被来回拖垮了。曹军以步兵为主，在敌骑兵集团骤至的情况下，仓卒进行敌前退却，也是遭到惨败的重要原因。宋此次击辽，从战略计划上看也存在重大缺陷。收复幽云不仅是这两个地区的问题，宋军不可避免地还必须与契丹主力交锋，进而摧毁契丹的主力，然后才能进据长城险隘，保住幽云。这就必须用较长时间认真作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储足粮食和备具军用物资；训练一支强大的纪律严明而将士协和多能善战的军队，特别是强大的骑兵部队和强大的战略预备队，以满足对付契丹骑兵和连续作战的需要，谋定而动，先胜而后求战，立足于不败之地。例如西汉时代的匈奴，比北宋初期的契丹强大得多，汉武帝所以能战胜匈奴，使"漠南无王庭"，就是靠充分作好战争准备，积蓄了充足的战备物资，特别是训练了强大的骑兵。赵光义不借鉴前人成功的经验，又不广采谋臣有益的建议，昧于彼我情势去指导战争，安得不败。

契丹这次获得胜利的主因：一是战略方针正确，居内线态势的幽州，趁宋各路军合击之势形成之前，集中力量各个击破其一路，选定受威胁最大的宋军主力东路军为主要对象，在平坦开阔战场上发挥骑兵的优势，以己之长、击敌所短。二是战役指导符合整个战略方针的要求，耶律休格在援兵未到前，采取削弱和疲敝敌军的手段，断其粮道，使宋东路军陷于行动困难的苦境，赢

得了调集援兵的时间，为决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是耶律休格善于掌握战机，对慌乱撤退的宋东路军，实行放胆的追击，乘其溃乱，击其惰归，取得追击战的重大胜利。

评赵宋王朝的几个战略问题

公元960年始建的北宋，在主客观有利形势下，正确策定先南后北削平割据谋求统一的战略方针，到公元979年平定割据诸国，结束唐末以来五代十国分裂混战局面，基本上统一了中国，开创了赵宋王朝三百年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在前代基础上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经济，使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有其历史积极意义的。但是，宋的统一又是不完全的，当时与宋并存的政权，北有辽（契丹），西有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并未恢复到汉、唐时代的局面，最明显的是幽云未复，连赵匡胤自己也承认未达到“一统太平”。

战略方针策定后，在执行中出现情况变化，局部或全部变更作战计划是可能的。但这种情况，必须是带全局性根本性的情况。比如说，影响敌我力量对比和战机的紧迫性，导致战局发生变化的情况，是应该调整原定的战略决策的。如果仅是某些枝节上出现新情况，贸然改变既定的战略方针，则往往是失策的。赵匡胤在平后蜀以后，企图乘北汉内部争夺王位之隙，改变先南后北的方针，转锋先灭北汉。这样改变是轻率的，结果虽然击退了契丹援军，包围了太原，并采取引水灌城的办法，但契丹援军继续来到，宋军顿兵城下多生疫病，减耗了战斗力，因而不得不撤兵。其实北宋在未统一南方之前，并不具有超过北汉与契丹的实力，后来高梁河、歧沟关两次对辽作战失败证明了这一点。即使这次灭了北汉，也只能更加速与契丹直接对垒的局面。宋实力未壮大起来，战争准备不足，在北方连兵未解的情势下，难免南方诸国乘机起衅，如宋平南汉时，南唐林仁肇也曾建策取淮南即其一例。如果形成两面作战，则难以善其后了。差幸赵匡胤能及时停止北

攻，继续执行先南后北的决策，可谓知机，“亡羊补牢，时尚未晚”。

赵匡胤对西北方面羁縻党项，优给爵赏，以求安边；对契丹谋以“封桩库”积聚财帛，赎买幽云，否则充分备战而后求战的谋路和设想，是基于当时形势和力量对比作出的，知己知彼，切合实际。可惜他在“烛影斧声”中早死，其弟赵光义刚愎自用，继位后，一失于急谋攻辽而失败，再失于逼反党项，兵连祸结百余年。宋在高梁河战败后，公元982年五月，赵光义令党项羌族首领李继捧挈家入朝，企图消灭这一割据势力，激发了其弟李继迁的叛离。从此党项与宋为敌，结连契丹为援，称夏国王，公元1032年，元昊称帝。西夏以和战两手策略，与宋长期对抗，“战”以扩地，拓土至二十二州（位于陕甘宁地区），给了宋以极大的威胁；“和”以索宋银绢，使宋财力枯竭。北宋在对辽、夏两面作战的困境中，国力军力日益困弱不振。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公元1126年北宋亡于金。正所谓一着之差，祸延百岁。

国家军队有对内维持社会安定和对外保卫领土主权两种职能。北宋建军的重点放在对内，即严防武人叛乱和镇压农民起义的作用上，而忽视了对外守土御敌的职能。赵光义就直截了当的说过：

“国家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22〕

因而实行一套“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的军事制度。这一制度结束了中唐以来武将割据的局面，不仅两宋没有出现分裂割据，以后几朝虽有统治阶级的内部叛乱，但都未能形成分裂割据局面。这一制度，对强化封建中央集权，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执行者过于死板，具体措施不断深化，形成一套所谓祖宗家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削弱了抗击外部入侵的力量。加上北宋采取募兵制，造成多养兵而战斗力日弱的后果。兵源主要来自农兵和失业流民，特别在灾荒之年，大量招募饥民当兵，扩大

额，造成冗兵冗费。据《宋史·兵志》载：宋太祖开宝年间（公元968—976年）士兵总数为，三十七万八千人；太宗至道年间（公元995—997年）为六十六万六千人；真宗天禧年间（公元1017—1021年）为九十一万二千人；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1048年）为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可见军队数量的增大是惊人的。据梅尧臣《田家语》一诗记载，北宋和西夏作战时，陕西路每家出一丁，唯留跛的盲的，"跛盲不能耕，死亡在迟速"，结果是国家收入的"六分财，兵占其五"〔23〕。这对社会经济生产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北宋"积贫、积弱"以致亡国，军事制度的"矫枉过激"也是其重要原因。

注　释

〔1〕《资治通鉴·唐僖宗中和四年》
〔2〕《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开宝八年、宋太太平兴国三年》
〔3〕《资治通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
〔4〕《东都事略·孟昶传论》
〔5〕《续资治通鉴长编·建隆二年七月》
〔6〕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一
〔7〕《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建隆元年》
〔8〕《宋史·兵志》
〔9〕《宋史·职官志》
〔10〕《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建隆三年》
〔11〕《续资治通鉴·宋太祖乾德四年》
〔12〕《续资治通鉴·宋太祖乾德二年》
〔13〕《续资治通鉴·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
〔14〕《续资治通鉴·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
〔15〕《续资治通鉴·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
〔16〕《续资治通鉴·宋太祖开宝九年》
〔17〕《东都事略·赵普传》
〔18〕《辽史·后妃传》
〔19〕《续资治通鉴·宋太宗雍熙三年》
〔20〕〔21〕《续资治通鉴·宋太宗雍熙三年》

〔22〕《宋史·宋绶传》

〔23〕陈襄：《古灵先生集》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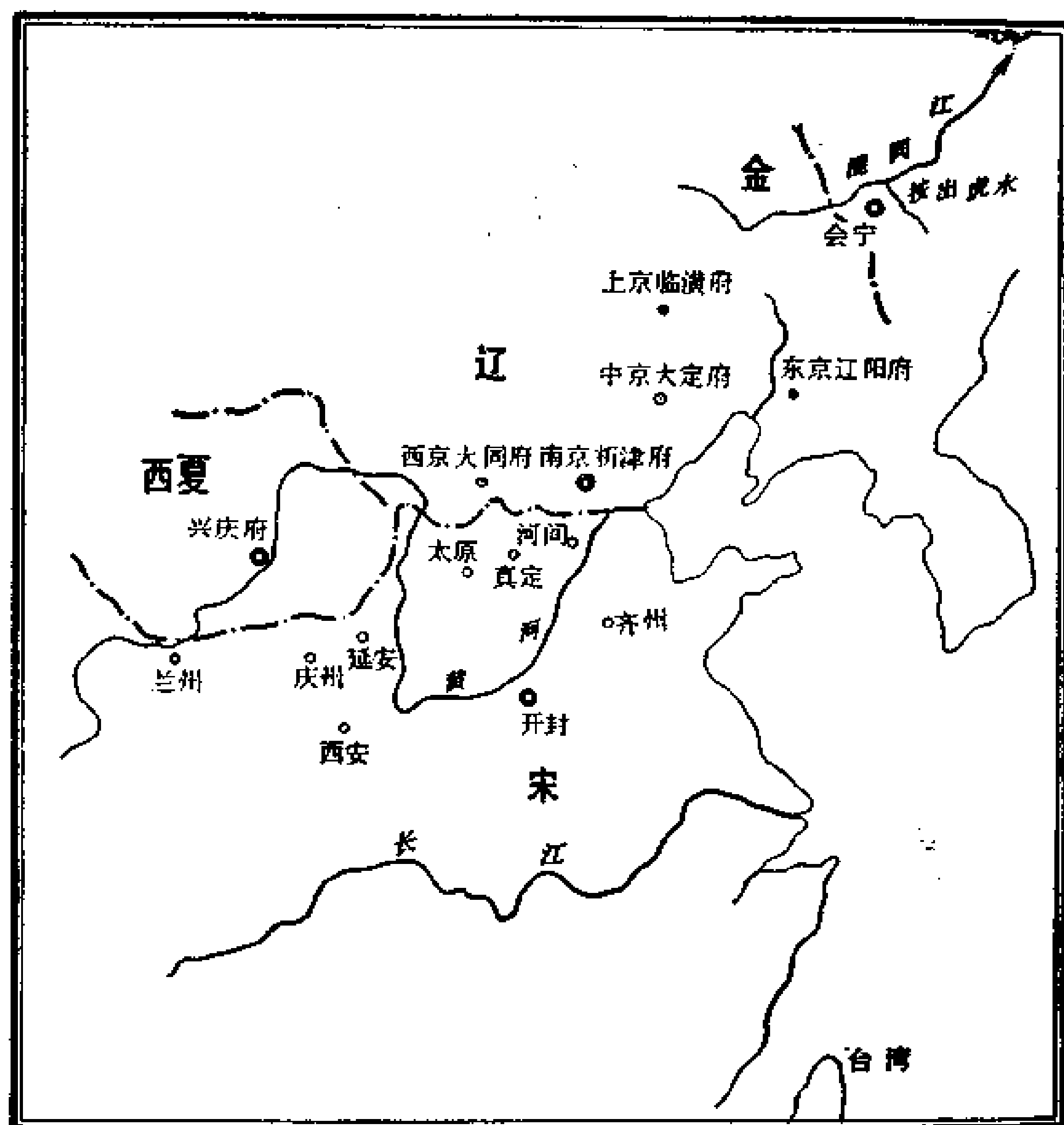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章　金灭辽和北宋的战争

第一　金、辽、北宋三国形势概述

一、女真族的兴起和金王朝的建立

女真族，源于唐代黑水靺鞨，五代时称为女真。五、六世纪以来，就居住在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以及长白山麓。八、九世纪内，属于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十世纪二十年代辽灭渤海后附属于契丹。辽为削弱和分化女真族，把其中数千户强宗大族迁徙到东辽河以南，编入辽的户籍，设官统辖，称为熟女真（或称北女真、南女真）。未被迁徙的女真人仍留居在粟末江（今松花江）之北，宁江州之东北，户口十余万[1]。各自结成部落，小的千户，大的数千户，自选酋长，互不相属，虽处在辽统治下，但不编入辽的户籍，称为生女真。十一世纪之初，生女真中的完颜部就已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东南阿什河）一带地区，从事渔猎农牧，并且能够烧炭炼铁，人口繁殖和生产发展较其他部落快，逐步成为生女真中最强大的部族。完颜部的首领成为辽王朝所封的生女真节度使，他们一方面接受辽朝的官号，但不肯系于辽籍，另方面利用辽的势力征服周邻部落而壮大自己，逐步统一，号令各部。到十一世纪末，完颜部已先后征服五国部（今黑龙江省依兰以东，乌苏里江以西）和今松花江外呼兰河沿岸的诸部落以及居住在吉林省宁古塔和敦化的诸部落；进军阿疏城（今吉林省延吉市布尔哈图河，纥石烈阿疏所居），取得今延边一带地方。至是“法令归一，恢复洪业，尽服四十七部之众。”[2]势力所及，北到今黑龙江两岸，东达日本海，东南至今图们江、鸭绿江流域。

金、辽、宋三国形势图 （25—1 图）



辽朝从天祚帝继位后，对生女真的压榨、勒索越来越重，除每年征取马匹、海东青和土特产等之外，还额外掠夺或贱值强购，并拘辱生女真人称为“打女真”。而且经常派遣一些“银牌天使”到生女真各部落，到处索要美女伴宿，“由是诸部皆怨叛，潜附阿骨打，咸欲称兵以拒之。”〔3〕

完颜部蓄志图辽，久有准备。盈哥（金穆宗）继位当部首领时，即重用欢都，“凡图辽事专委之”〔4〕，征纥石烈部时其酋长阿疏（苏）往诉于辽，辽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不听，取其城；宋政和二年，阿骨打在头鱼宴上抗辽主命不起舞，归来后即欲伐辽。他与完颜部古噜纳有一段对话：

“辽名为大国，其实空虚，主骄而士怯，战阵无勇，可取也，吾欲举兵而西，君以为如何？”

“以公英武，士卒乐为用。辽帝荒于攻猎，政令无常，易与也。”〔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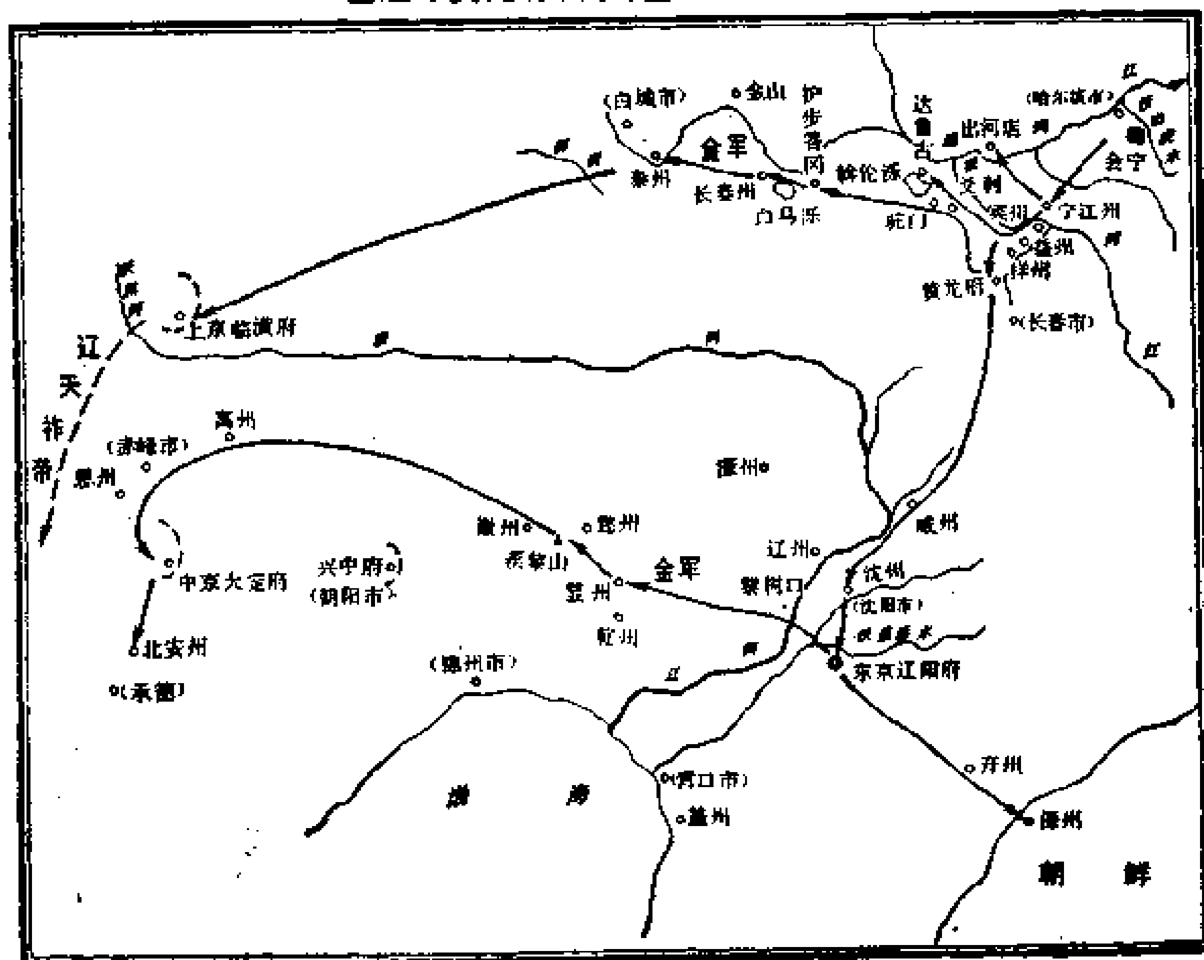
此后阿骨打相继派人赴辽索归对完颜部阻兵为难的阿疏（苏），侦察辽朝虚实，了解辽主骄肆废弛的情况，并且召所属备冲要、建城堡、修兵器，加紧战备。辽天祚帝也发浑河（在辽宁东部）北诸军增加东北路统军司（治所在长春州，今吉林大安以西）的守备。阿骨打决定乘辽兵未集，先发制人，集诸部兵得二千五百人。

宋徽宗政和五年（辽天祚帝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九月，阿骨打誓师反辽，进军宁江州（今吉林扶余县东石头城子）。这时辽天祚帝正在庆州（治所在今内蒙巴林右旗西北察罕木伦河源之白塔子）围猎，闻报略不介意，只派海州（治所今辽宁海城）刺史高仙寿率渤海兵应援。十月阿骨打占领宁江州，俘辽防御使大药师努，纵之使招谕辽人叛辽。

十一月，辽主得知失宁江州后，以司空尚嗣先为东北路都统，发契丹、奚军、禁兵共七千人赴屯出河店（今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站以南原肇州故城）。女真军来会，与辽军隔江对峙，乘

夜潜渡混同江（即鸭子河，今松花江在今吉林扶余县附近一段），拂晓乘辽军不意而袭击之，辽兵溃败，士无斗志。辽将肖敌里等收拾败军营于斡邻泺（在出河店西）东，又被女真军所袭，士卒死伤甚多。到是岁末，辽的宾州（今吉林农安县东北万金塔东北二十余里的东小城子），咸州（今辽宁铁岭北）祥州（今吉林农安东北）及铁丽（骊）（旧县名，今为黑龙江省铁力县）部俱降于女真。至是，辽朝部署防范女真族的军事防线—北起出河店，中经黄龙府、咸州，南到东京辽阳府—北头已被女真突破。

金进军黄龙府及东、上、中京概况图　（25-2图）



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金太祖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正月，阿骨打由于“大功已建”，为“系天下心”，从其弟吴乞

买等的劝进和渤海人杨朴的献策，即皇帝位，改名旻，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国号大金，改元收国。旻对群臣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由此可见，金王朝建国就已怀有灭亡辽朝的决意。

二、辽朝后期出现的衰亡前兆

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契丹酋长耶律阿保机始称帝，建立契丹国；子德光嗣立后改国号曰"辽"，役属和兼并周边部族，南掠中朝汉地，至圣宗耶律隆绪统和二十二年（公元1004年）与宋订立"澶渊之盟"后，基本上结束了南侵的战事。辽盛时建有五京六府，即上京临潢府（治今内蒙巴林左旗南），中京大定府（治今内蒙宁城西大明城）和兴中府（即慕容氏龙城，今辽宁朝阳），南京析津府（治今北京市西南），东京辽阳府（治今辽宁辽阳市），西京大同府（治今山西大同）。州军城一百五十六，县二百零九。国土万里：东至于海，西至金山（蒙古新疆交界的阿尔泰山）及流沙（宁夏居延海），南界鸭绿江经燕云十六州（今河北大清河含河间、任邱，至易水以北，亘山西句注山以北），北至胪朐河（蒙古克鲁伦河）及黑龙江。是从五代到北宋与中原王朝并存的北方大国。

道宗耶律洪基在位时（公元1055—1100年），统治阶级内部不断内讧残杀；所属各族人民不堪忍受日益严重的阶级剥削和民族奴役，掀起反抗；他又佞佛饭僧，浪费国力。正如历史给他总结的：

> "群邪并进，贼及骨肉，诸部浸叛，用兵无宁岁。唯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发者三千人，崇尚佛教，罔知国邮，辽亡征见矣"。〔6〕

天祚帝耶律延禧继位后，游畋无度，拒谏饰非，"自是辽廷诸臣益务为柔佞"，原已存在的各种矛盾更加激化，阶级关系更加紧张。加之穷奢极侈，赏赐无节，弄得国用不给，上下穷困。由于吏治败坏，民不堪命，出现大批流民。人民结愤积怨，群起

抗争，不仅边郡，甚至在东京、上京、西京地区的许多地方，也燃起了燎原大火。天祚帝虽然把许多起义镇压下去，但辽朝也精疲力尽，衰败而不振了。

三、北宋末期的腐朽统治

宋代建国初期，为了纠正五代藩镇的祸乱弊害，采取了一系列集权中央的措施，其中最主要而且影响深远的有两条：一是"强干弱枝"的政治体制，一切权力集中中央，实则为集中于皇帝；二是"守内虚外"的军事政策，防内重于攘外，对内凶狠，对外屈让。由此所造成的恶果，在宋太宗赵炅时期即已显露出来，高梁河、歧沟关之战的失败，即与此有关。这两次战役之后，宋对辽一直是采取守势战略。宋真宗赵恒景泰元年（公元1004年），当辽圣宗耶律隆绪和肖太后领兵南侵时，屈辱地签订了"澶渊之盟"，输纳岁币银绢给辽，基本上维持了一百一十六年双方没有构兵的局面。但宋与西夏在西北边陲的战争，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起直至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亡国，这一百四十多年仍然时断时续，和战都未解决矛盾。战则路远师疲，宋军行动补给都极困难，且常因此招致作战的失利；和则以"岁赐"物资图得暂时稳住敌对的局势。对辽对夏的和、战都大大消耗国力，成为国家人民沉重的负担。加以宋代官多、兵多所造成的冗费，到宋仁宗赵祯皇祐以后（公元1049年至1063年），财政收入已不足以支出。正如叶适《水心别集·卷十一》所描述的："极天下之大，而无终岁之储"。赵匡胤时期有岁余积存在封桩库的好景已不复存在了。

北宋中期，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范仲淹等，以及宋神宗赵顼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王安石等，两度试行振弱救贫的新政改革，终以积弊太深，阻力太大，先后被政权内保守势力以"守祖宗大法"为辞而反掉，没有取得成效。北宋积贫和积弱的局势，不仅没有改善，而且每况愈下了。

北宋晚期，十二世纪开头的二十五年，是宋徽宗赵佶的统治年代。赵佶是个荒淫腐朽透顶的皇帝，他宠任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等一批奸佞人物，君臣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专干一些误国害民的勾当，只图享乐敛括货财，不修军国大事，致民政、军政、财政比前更见败坏。正如宋人黄震所说："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7〕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每月支出的官俸兵饷达一百二十万贯，比宋神宗元丰年间（公元1078—1085年）的三十六万贯超出很多，加以赵佶君臣提倡"丰亨豫大"，奢侈浪费，北宋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更加严重，于是千方百计厚敛于民，无恶不作。人民挣扎在赋税繁苛、官吏侵渔的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各地人民蜂起反抗，大者北有宋江、南有方腊为首的起义军。周边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已渐看清北宋王朝的腐朽衰弱，皆怀觊觎问鼎之心，北宋王朝败亡的危机更加深化而迫近了。

第二　金灭辽之战

完颜旻建金灭辽的意图，基本上是根据渤海人杨朴的献策：

> "大王创举师旅，当变家为国，图霸天下，谋为万乘之国，非千乘所能比也。诸部兵众皆归大王，今力可拔山镇海，而不能革故鼎新，愿大王册帝号，封诸藩，传檄响应，千里而定。"〔8〕

金初没有文字，没留下成文的整套的战略计划，但从完颜旻和近臣议论军政大计和所下的诏令，以及战争过程所证实了的金灭辽的战略，可得如下的概念：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相辅相成。军事上采取攻势战略，政治上以和议佐攻战，伐谋伐交，麻痹、孤立敌人；提出"女真渤海一家人"，明诏优恤降人、战俘，采用化敌为用，胜敌益强的方针。

金从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至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用十年时间，进行了一系列的大小战役，先后攻略黄龙府和五京六府及其所属州县，最后追擒辽天祚帝，取得亡辽的全胜。

一、攻略黄龙府及达鲁古城和护步答冈战役

金朝建国后，决意首先攻略辽在东北面的军事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收国元年正月初五，完颜旻（金太祖阿骨打）亲率一军攻益州（今吉林农安东北），辽军弃城走保黄龙府。这时，辽都统耶律鄂尔多（讹里朵）等率骑兵二十万、步卒七万在达鲁古城（今吉林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塔虎城）集结，企图乘金军南攻黄龙府之际，进出宁江州拊金军侧背。完颜旻借辽主遣使约和，收集围攻黄龙府的兵力转向达鲁古城迎战，于这月二十九日进逼达鲁古城。金军趋高阜列阵，命“宗雄（谋良虎）以右翼先驰辽左军，(辽)左军却。(金)右翼出其（辽军）阵后，辽右军皆力战；洛索（娄室）、尼楚赫（银术可）冲其坚，凡九陷阵，皆力战而出。（金）宗翰（粘罕）请以中军助之，金主使宗斡（斡本）往为疑兵。宗雄已得利，击辽右军，辽兵遂败；（金军）乘胜追蹑至其营，会日已暮，围之。黎明，辽军溃围出，（金军）逐北至阿噜（娄）冈（达鲁古城以西），辽步卒尽殪（死）。”“金并得其耕具，以给诸军。”[9]完颜旻为了安抚新占领地区人民，休整部队，在占领达鲁古城后，于二月将军队撤回根据地会宁。辽军经此次大败之后，其饶州（治今内蒙赤峰市北）渤海摩哩（古欲）等反，自称大王，辽主不得不派兵前往镇压。

金太祖看到辽的黄龙府有重兵防守，坚不易拔，七月令银术可、娄室等率军围城，切断其与外界的交通联系，并征服韩州（今辽宁昌图北八面城）附近的九百奚营部，击败辽行军都统耶律讹里朵收集残兵万余的三次反攻。至八月底，城中战力渐竭，金太祖率军亲征，由会宁根据地出发，过混同江，与娄室、银术可等一起围攻黄龙府，一个月后（九月）攻占府城。

辽天祚帝在宋徽宗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金太祖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听到黄龙府被金军攻占并将来攻长春州时，这才慌忙下诏亲征。他以肖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奴为副，率骑步兵十余万，号称七十万东下。在长春州集中后，以耶律章奴率精兵二万为先锋；以围场使阿不为中军都统，率步骑兵十万分五路经驼门东下；另遣都检点肖胡笃为都统，率步骑兵二万为别军东出宁江州。发数月粮，“期必灭女真”。

此时，辽、金之间仍在继续进行毫无结果的谈判，使者屡有往还，实际在窥探对方国内的情况。完颜旻得知辽军东下，亲自率军二万御之，剺（割破）面痛哭，励众死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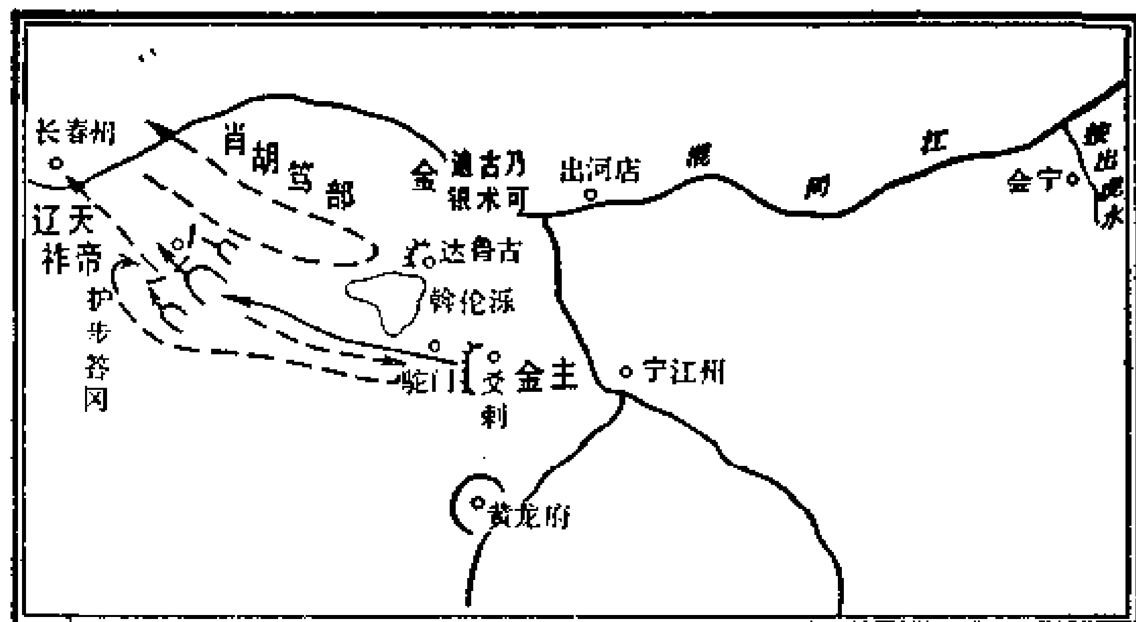
十二月，当辽大军进至驼门，别军（肖胡笃）步骑兵进至斡伦泺时，完颜旻在爻剌（在驼门以东）与诸将会议，决定遣迪古乃，银术可率一军镇守达鲁古，以御辽之别军，亲率主力在爻剌深沟高垒，窥伺战机。

辽军在东进过程中，辽御营副都统耶律章奴潜回上京，发动政变。辽军刚到前线（驼门），天祚帝闻讯，立即下令退兵。完颜旻得报，即令诸军追敌，轻装急进，击败辽的先锋军，辽御营退行三十里，金军已将追及，天祚帝以军心皆愿一战，遂再传令进军。各军不明真象，“军中汹汹”，虽遣使督进，仍“迟疑不行”。金军追及辽御营中军于护步答冈，逼使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不得不整军迎战。完颜旻认为“彼众我寡（时金军只有二万），兵不可分。视其中军最坚，辽主必在焉。败其中军，可以得志。”遂命右翼先向辽军进攻；又命左翼合而围攻之。经过激烈战斗，辽军溃乱，金中军在辽军阵中纵横驱驰，辽军大败。“死者相属百余里，获舆辇、帝幄、兵械、军资、宝物、马牛不可胜计[10]。”战败的天祚帝率领残兵退到长春州。

辽别军都统肖胡笃听到中军御营战败，亦从斡伦泺退走。

辽天祚帝征集优势大军，“期必灭女真”，但当章奴叛逃后，天祚帝退、战不定，引起军心混乱，遂致失败。正如《吴

金、辽护步答冈决战示意图 （25-3图）



子·治兵》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辽之失败，实由辽天祚帝指挥失误所造成。

反观完颜旻临战戒惧，剺面流血、仰天痛哭以励众死战，并能集中兵力并力一向，见利不失，追击果断，与天祚帝恰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的胜败都不是偶然的。

这次作战的结果，全军尽获辽军所有辎重、马牛，达到胜敌益强。战败的辽天祚帝，不仅丧失大军，且加剧了契丹统治阶级内部的公开分裂；所属各族人民更纷起反叛。从此，辽军不能再对金军采取战略攻势，即使组织有效的全面防御也无足够的力量了。

二、攻略辽东京辽阳府及春、泰、显（蒺藜山战斗）等州

（一）南攻东京

宋政和五年（辽天庆五年，金收国元年，公元1115年）末，辽天祚帝亲征失败后，各地叛乱乘虚而起，上京、中京、东京辖区内相继出现不稳的情况，使辽国处在备多力分的不利形势。其中东京辽阳府爆发的渤海人高永昌叛乱，对辽、金在辽东方面的胜败具有重大的影响。

宋政和六年（辽天庆六年，金收国二年，公元 1116 年）正

月，辽将渤海人高永昌据东京辽阳府，自称大渤海国皇帝，起兵反辽，广招渤海人，声势渐大。辽天祚帝派北院枢密使肖韩家奴及张琳招募辽东两万饥民编组军队，前往镇压。结果无功，退回沈州。

渤海高永昌派人诣金乞求援助，完颜旻遂派斡鲁统诸军南下，使人告高永昌：

“同力取辽固可。东京近地，汝辄据之，以僭大号，可乎？若能归款，当处以王爵”。[11]

高永昌惧，使家奴喈喇诣金师，请去僭号称藩。斡鲁知其诈，统军与阇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统斡鲁古等南下向东京进军。

金军首先在沈州（今辽宁沈阳市）击破辽张琳军，攻下沈州，张琳军退守辽州（今辽宁新民东北辽滨塔）金军乘胜向东京进发，在沃里活水（今太子河）击败渤海军，渤海军退守辽阳城，金军逼城进攻。高永昌率队出城，向南突围，率五千骑奔长松岛（在今辽宁盖县西海中），旋为部属捕送于金军处死。于是辽之东京所属州县及辽籍女真皆降于金，辽东半岛遂为金所有。

完颜旻鉴于辽曾向高丽求援，为切断他们的联系，曾派萨里罕（撒里喝）攻辽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久不克，金主增兵助萨里罕。保州本高丽地，高丽兵已在城中。萨里罕于同年八月攻占保州。

（二）北下春、泰

长春州（今吉林大安西）是辽上京临潢府经过泰州（今吉林白城市东南）到女真根据地会宁交通大道上的军事要地，设有辽东北路统军司，也是辽防御女真的军事基地。因此，这里成为辽、金双方的必争之地。

宋政和七年（辽天庆七年，金天辅元年，公元1117年）正月，完颜旻得知辽天祚帝已将长春州、泰州方面的辽军抽回去镇压章奴的叛乱，防务空虚。决定立即出兵。以完颜杲（斜也）为经略都统，率领宗雄、宗干、娄室等将兵一万攻占了长春州、及

其以西的泰州。

都统完颜娄在率领主力进攻泰州的同时，完颜宗雄、完颜宗干及娄室分兵进攻泰州的属县金山（在泰州附近），并招抚附近的诸部族，女固脾室（皮室）四部及渤海人等相继来降。在攻降泰州后，移城中积粟赈济各部，然后把各部移到金的内地安置。

长春州，泰州一带归入金的版图后，金在军事上控制了直通辽上京道的咽喉要地。同时，通往兴安岭西各部的交通大道，也完全在金的控制之下，该地出产的马匹等，使金军得到充足的补给。这些都为金军向辽发展进攻，准备了有利条件。

辽军屡败之后，天祚帝下令凡有杂畜十头以上者悉数从军，命耶律淳为秦晋国王统诸路兵马都元帅，募军抗金。耶律淳招募辽东饥民二万余人，组成"怨军"八营，别选燕、云、平路禁军五千人，武勇军二千人。于八月出关，十月到达乾州（今辽宁北镇西南闾阳驿）十三山（站）集结。另以耶律佛顶都统统率显州（今辽宁北镇）路军和濠州（今辽宁彰武附近）、懿州（今辽宁阜新东北塔子营村北）路军，守辽河防线，防御金军从辽阳和沈州方面向辽西地区的进攻。

（三）西取显州

宋政和七年（辽天庆七年、金天辅元年，公元1117年），七月，辽军以沈州为目标，自黎树口（今辽中县满都户以东渡口）渡辽河，展开进攻。金将迪古乃率军奋勇抵抗，娄室、娄卢火（宗盘）和咸州都统斡鲁古率军来援，击退辽军。

九月耶律淳朝见天祚帝回到军中，同金开始和平谈判。金完颜旻除坚持送还阿疏外，还提出：

"汝等诚欲请和，当废黜昏主（天祚帝），择立贤者，副朕吊伐之意，然后可议和约。不然，当尽并尔国。"〔12〕

金以谈判做为麻痹辽方、准备进攻的一种策略，同时积极布置西进准备，以娄室、迪古乃之军增援斡鲁古军，进一步加强军

力。十二月，金在辽阳待机的斡鲁古军，即突然发起进攻，渡过辽河进追显州。

辽守显州的怨军将领郭药师率军迎战，并对金军进行夜袭，结果失败，退守州城。辽军总帅耶律淳闻报，自懿州率怨军南下。金斡鲁古军复与娄宝、迪古乃军会合，两军主力相遇于徽州（今辽宁阜新）的蒺藜山（今辽宁北镇义县之北）经过激烈战斗，辽军战败，向西南逃去。辽总帅耶律淳率残部向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市）方向撤退。

金军在蒺藜山击败辽军后，便转而围攻显州，与守军激战数日后，军士神笃逾城先入，烧佛寺，烟焰扑人，守陴者不能立，诸军乘之，遂占领州城，然后分兵深入东京道各地，乾（今辽宁北镇西南闾阳驿）、懿、豪、徽、成（今辽宁阜新以北）、川（今辽宁北票西南）、惠（今内蒙喀喇沁旗）等州皆降。

当时，辽天祚帝在中京大定府，闻辽军又败，"昼夜忧惧"，准备逃跑。辽总帅耶律淳在战役后又向金军请和，都统斡鲁古只是重复了送还阿疏的要求，暂把军队停留在显州待命，未乘胜追击辽军，袭取中京。后金太祖以"辽帝在中京，可追袭而不追袭"为罪状，免去斡鲁古咸州路都统的职务。

赏罚严明，就是说有功必赏，赏不逾期；有罪必罚，罚当其罪，这是维系军心士气，保持战斗力的必要手段。历代兵家都要求为将帅者认真运用这种手段，使其成为治军的要则。完颜旻因斡鲁古不乘胜向中京追袭辽天祚帝，坐失战机而加以罪责，无疑是正确的。而耶律延禧对肖嗣先失职，造成丧军（几乎全军复没）失地（丢掉防金要地出河店），就没有按军律治罪，以致造成极坏的影响："诸军相谓曰，战则有死无功，退则有生无罪。故士无斗志，见敌辄溃。"〔13〕这又成为金、辽统帅优劣胜败的一个鲜明对比。

辽东京所属州县为渤海遗民居住地，渤海人与女真同一祖源于靺鞨。阿骨打曾说："女真，渤海本同一家。"〔14〕完颜旻这

样说，是出于建金灭辽的战略构想，为的是扩大女真族血缘关系面，统一内部，使辽东地区成为灭辽的巩固基地。完颜旻从高丽人手里夺取保州，也是为了这一目的。因此，高永昌据辽阳建号称国，在金人之先取东京是完颜旻绝对不允许的，金必须可靠地控制辽东作为西向进攻的基地。

辽天祚帝在护步答冈失败后，国内变乱迭起，已面临两条战线夹攻的局面，即对内要平叛用兵，对外要抗御金军的进攻，因此对金的攻势作战不得不改为守势。但在金军南下攻取东京时，把组成的“怨军”放在正面堵击金军向西发展进攻，而抽调在北面春州、泰州兵力去镇压叛乱，实属失策。如果把主力放在东北春、泰地区、向涞流水方向金根据地进出，不仅可以威胁金军侧背，而且可以牵制金军向南深入和向辽西发展进 攻。 辽 军不图此策， 结果正面堵击不成， 以致遭蒺藜山之败并又失显州； 春州、泰州空虚反为金军所乘，南北皆败，很明显，这是由作战方向选择和兵力重点措置失当造成的。

三、册封和议和金攻略辽上、中、西三京

（一）册封和议

宋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正月，完颜旻为安抚四 方 降 者和巩固所占地区，进行大举攻辽的准备，采纳杨 朴 的 献策，向辽提出议和条件，主要是：册封金为大金国，金主为大圣大明皇帝，辽帝以兄事金帝；归还上京、中京、兴中府三路州县，岁贡方物，并交出与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辽天祚帝在屡败之后，从大臣肖奉先等言，为求弭兵以缓和内 外 交 困的局势，初四日派耶律努克（奴哥） 等去金议和， 往返讨价还价凡七 次。金也派遣乌凌阿（乌林答）来辽迎册封。直至宋徽宗宣 和 二 年（辽天庆十年，金辅国四年， 公元1120年） 三月， 辽的册封没有使完颜旻息兵言和， 而他已取得时间并作好战备。 于是， 完颜旻便借口册文无 “兄事” 之 语， 不言 “大 金” 而 云 “东怀”， “语涉轻侮”， 拒绝与辽议和。并即下动员令，令咸州统

军司治军旅，修器械，具数以闻，预定四月二十五日开始进军，令斜葛留兵一千镇守咸州，令阇母以余兵来会于浑河（今内蒙白城市西南），和议遂绝。

（二）金攻略辽上京

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四月，完颜旻亲军攻辽，五月在浑河集结后，分三路进攻辽上京。完颜宗雄率一军先趋上京临潢府（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左旗南），遣人持诏谕城中劝降。辽上京守将固守拒战。完颜旻亲临城下督攻，阇母首先登城，攻占外郭。辽上京留守挞不野以城降，遂克上京。这时，辽天祚帝已由中京逃往燕京。

金主进军至沃黑河（黑河，在今内蒙赤峰市巴林右旗地境）以地远时暑，军马罢乏，遂班师。金分诸路猛安、谋克之民万户屯泰州，以婆卢火统之，赐耕牛五十戍之，以固边防。

（三）金攻略辽中京

宋宣和三年（辽天祚帝保大元年，金天辅五年，公元1121年）正月，辽朝统治集团内部又发生了内讧和倾轧。

辽天祚帝诸子在各贵族的支持下，阴谋争夺皇位。北院枢密使肖奉先诬告耶律余睹等人谋立晋王，尊天祚帝为太上皇。天诈帝诛杀有关人员，副都统耶律余睹引兵千余逃至咸州，向金国投降。

自耶律余睹来降，金对辽政权内情更加了解。完颜宗翰建议完颜旻，乘辽主失德，中外离心，兴师袭取，时不可失。金主完颜旻遂令咸州都统司："治军以俟师期"。[15]

十二月，完颜旻命完颜杲（斜也）为内外诸军都统，以完颜昱（蒲家奴）、完颜宗翰（粘罕）、宗斡（斡本）、宗望（斡离不）、宗盘（蒲卢虎）等副之，耶律余睹为前锋，全军渡辽河而西，趋辽中京（今内蒙赤峰市宁城西）。完颜旻并下诏："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16]又进一步明确把中外一统作为战争的目的，暴露出不仅灭辽且有

灭宋的蓄谋。

辽中京守将闻知金军将至，欲焚刍粮徙居民遁去。奚王肖锡默则欲退保山西。金帅完颜杲得知辽人无斗志，乃留下辎重率轻骑疾趋，遂于宋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公元1122年）正月十三日攻克高州（今赤峰东敖汉旗）、恩州（今内蒙赤峰市喀喇沁旗锦山镇东汐子）、回纥（在中京以北）三城。同月十五日进至中京，辽兵皆不战而溃，金军遂克中京。

二月，金完颜宗翰率偏师趋北安州（今河北承德市平泉），与娄室、徒单绰里合兵，大败奚王霞末，遂降北安州。

这时，刚从中京逃至燕京（今北京市）的天祚帝，听到中京失陷，又忙出居庸关（在今北京市西北），逃至鸳鸯泺（今河北张北西北）。旋闻余睹引金军来追，便听从肖奉先谗言，认为余睹的目的是欲立子晋王为辽主，杀子即可退金师。结果杀子后金军不但未停追，反致人心更加解体，被迫又率卫骑五千余自鸳鸯泺逃往西京大同府。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认为“女真虽能陷我中京，终不能远离巢穴，越三千里直捣云中也”。

至此，辽朝“天下郡县所失几半”〔17〕。

（四）金攻取山西，穷追天祚帝

金军袭占辽中京后，金主完颜旻原拟暂停攻势，俟秋后大举。二月，金将完颜宗翰得知辽天祚帝“杀其子晋王，众益离心，西北、西南二路兵马皆羸弱，不可用”，遂向总帅完颜杲（斜也）建议：

> “辽主穷迫于山西，犹事畋猎，不恤危亡，自杀其子，臣民失望。攻取之策，幸速见谕。”

完颜杲还报曰：

> “顷奉诏旨，不令便趋山西，当审详徐议”。〔18〕

宗翰决定独断发动进攻，再报以“辽人可取，其势已见，一失机会，后难图矣。今已进兵，当与大军会于何地，幸以见报。”完颜杲遂同意进军。〔19〕

金军攻略西京及追击辽天祚帝示意图

（25-4图）

大定府
金　军
羊城泺
（沽源）
辽　天　祚　帝
南京析津府
（北京市）
石辇驿
金　军
夹山
辽天祚帝
辽天祚帝
鸳鸯泺
（张家口）
归化
金　军
白水泺
丰州
（呼和浩特）
金　军
居延
天德军
（乌拉特前旗）
金　军
辽夏联军
辽天祚帝
西京大同府
应州
武州

完颜杲、宗翰率军分道在羊城泺（今内蒙沽源北）会师。完颜宗望、宗弼（兀术）率百骑为先锋尾敌先行，企图捉俘以了解天祚帝之所在。

辽天祚帝闻金军将出青岭（今辽宁凌源西）以西，遂由西京逃往白水泺(今内蒙察哈尔右翼前旗北)。宗翰、宗幹以精兵六千袭之，完颜希尹为前锋，倍道兼行，一日三次击败辽军。辽天祚帝逃至漠北（今内蒙呼和浩特一带），又闻金军将近，计不知所出。肖奉先请天祚帝先往夹山（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大青山），辽主遂弃辎重，乘轻骑进入夹山。

（五）金军攻占西京

金军以一军跟踪追击辽主天祚帝，以一军向西京大同府进军。金军经过地区，辽各城守军皆无斗志，辽西南路招讨使所在地丰州（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及附近各州均降。

辽将耿守忠援西京，金军宗翰、宗雄、宗幹等率军至，宗翰军冲辽军中央，使其余部队下马从旁射之，大败辽军，占领西京。接着，金总帅完颜杲分遣诸将招抚来降州郡及诸部族，沙漠以南部族皆降。辽天祚帝由夹山又逃往讹莎烈(今内蒙固阳到武川一带)。

金军攻占西京后，金帝完颜旻命谙班勃极烈完颜晟（吴乞买）监国；六月，自率军征辽。

这时，夏主乾顺派大将李良辅率军三万，赴援辽天祚帝，在天德（今内蒙乌拉特前旗北境）会合辽军与金军交战，被金军击败。此后，在宋宣和六年（辽保大四年，金天会二年，公元1124年），西夏主向金称藩，金主也以西面边地给夏，双方言好。

宋宣和四年八月，金主率军至鸳鸯泺，闻辽主在大澳泺（今河北张北西北），乃自将精兵万骑追袭之。完颜昱（蒲家奴）、宗望率军四千为前锋，昼夜兼行，追及辽天祚帝于石辇驿，军士至者才千人。天祚帝调集在鸳鸯泺之肖特末、马哥等部二万五千人，方治营垒。金宗望不待诸军到齐，即挥军进击，短兵相接，被辽军围困数重。辽天祚帝以为金宗望军兵少必败，遂与妃嫔登

高阜观战。降金的耶律余睹指辽天祚帝麾盖以示金将，宗望等率精骑奔袭。辽天祚帝大惊，仓皇逃遁，辽军遂溃。宗望复挥军追之，至乌里质驿（在石辇驿西），天祚帝弃辎重逃窜，擒辽都统肖特末而还。

完颜旻追击辽天祚帝所率残军，至居延（今内蒙乌喇特前旗北），不及。率军经归化（今河北宣化）东还幽蓟。

请册封虽出于杨朴的建议，但利用和议以佐攻战，则是完颜旻在战略上的匠心独运。以和议争取一定的时间，对内部对敌人都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也都是必要的。就内部说，金建国两年（公元1115、1116年）中拓土从松花江到鸭绿江间广大地域，新降附的各族人民众多，尤其是战后“辽东诸州，盗贼蜂起，掠民以充食”，亟待平定安抚。为此，完颜旻曾于建国次年正月下诏：

> “自破辽兵，四方来降者众，宜加优恤。自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罪。仍官其酋长，且使从宜居处。”〔20〕

安抚降众、安定后方，是下一步大规模灭辽作战，壮大战争力量所必需的，这些都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对敌人来说，请封和谈可以麻痹敌人，促使昏庸的天祚帝更加骄纵懈惰，不修军政，加剧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其内讧叛乱；索取辽与邻国交往的文书，窥其内幕，有利于实行伐谋伐交。完颜旻的议和，完全是为了削弱对手，壮大自己，为灭辽战争战略利益服务。争得时间，完成战备后，便断绝和谈转为进攻了。

反观辽朝最高统治集团对册封和议又是怎样认识的呢？当金遣使来请封议和时，君臣们却都怀着“可以弭兵”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当然，在战争中双方都不具备“一战成功”的条件，出现打打、谈谈的过程，是常见的，这种谈和只是为了取得尔后更好地打的条件。真正的和谈，必须是双方力量基本平衡，双方都不能以“打”来达到消灭对方的目的，谈和对双方都有一定的好

处才能实现，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敌对者给对方以任何恩赐和平的可能。对辽来说可悲的是不利用这屡败之后得来的可以喘息的机会，奋发图强，修明内政，整顿军旅，团结对敌，以图反攻；没有制定一套可行的抗金的全盘战略计划，低首下心，“卧薪尝胆”，以恢复壮大自己的战力，而是盲目骄大，只在文字上玩弄“东怀”和兄事等末节，欲不败亡，是不可能的。

金军以辽四京（上京临潢府、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南京析津府）和天祚帝耶律延禧为作战目标，集中兵力，并力一向，目标简单，便于协同。而辽朝的军事力量却是分散的，辽军主要是二帐（御帐亲军、宫卫骑兵）和五京（御帐亲军和宫卫骑兵多在五京），因此金军采取集中兵力，逐次攻略的攻势，先后指向四京，既是攻其要害，又是攻其分散的军事力量，以致辽军不能抗衡，每失一京，则所属州县就相继或降或被占。

金完颜旻这种“并力一向”的用兵思想，不仅适合当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也符合我国古代一些军事家从战争实践中认识到的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这一重要的原则。《淮南子》就指出：“五指之更弹，不如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强调“合则势张，合则力强，合则气旺，合则心坚。”〔21〕尤其弱军对强军的作战，更为重要。

四、宋联金图燕，天祚帝被擒辽亡

（一）宋、金“海上盟约”

早在宋徽宗政和元年（辽天祚帝天庆二年，公元1111年），宋徽宗赵佶就派童贯等出使辽朝。童贯在卢沟时，燕人马植向其献取燕之策，他很赏识，遂改其名为李良嗣，带回汴京。李向宋廷陈说辽天祚帝耶律延禧荒淫和政治腐败，女真对辽恨之入骨的情况，建议从登莱过海，与女真结好，相约攻辽，这样就可取得燕地。宋徽宗赵佶听后非常高兴，又赐良嗣姓赵，遂委童贯负责与女真通好事宜，令监司、帅臣不得干预。从此，便开始了联金图燕的一系列活动。

宋徽宗重和元年（辽天庆八年，金天辅二年，公元1118年），宋遣武义大夫马政以买马为名，从山东登州（今山东蓬莱）过海到东北探听虚实。次年，金遣李善庆、索多（撒睹）、勃达等人带国书并北珠等方物使宋报聘。至宋宣和二年（辽天庆十年、金天辅四年、公元1120年）二月，宋复使赵良嗣赴金，约其夹攻辽，取燕京旧地。九月，金又遣萨喇、哈噜等至宋，宋再遣马政随哈噜持国书赴金。赵良嗣与金主最后约定：

1．宋金夹攻辽国，长城以北的辽中京大定府由金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南的燕京析津府，由宋负责攻取，不如约，即不得地。

2．夹攻辽胜利后，宋收回燕京一带汉地，宋将原来输辽的岁币如数转给金朝。

3．宋金不能单独与辽讲和。

这就历史上的宋、金“海上盟约”。

当时，宋廷大臣们纷纷上言反对攻辽，认为“减一弱虏而与强虏为邻，恐非中国（中原）之福，徒为女真之利”。[22]“不守两国盟约，辄造事端，诚非庙算”。“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强敌蓄锐，伺隙以逞其欲。”“极言辽不可攻，金不可邻，异时金必败盟，为中国患。”[23]乞诛王黼、童贯、赵良嗣等建议者。宰相王黼则认为“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今而不取燕、云，女真必强，中原故地不复为我有”。赵佶最后采纳了王黼、童贯的意见，议遂决。

宋、金“海上盟约”订定后，宋廷调集在西北的重兵，准备出师攻辽。这时，正值北宋统治区内的农民起义连续在南北各地爆发，尤以宋宣和二年在浙江爆发的方腊起义，声势更大。

宋徽宗赵佶命童贯率领准备攻辽的军队前往镇压，至宋宣和三年（金天辅五年，公元1121年）四月，才结束这场镇压而回师。

（二）宋军第一次进攻燕京

宋徽宗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公元1122年）正

月，金军攻克辽中京大定府，辽天祚帝由燕京向鸳鸯泺、西京大同府方向狼狈逃窜。三月，辽朝留守燕京的燕王耶律淳被南府宰相李处温及耶律大石等拥立为帝，遣使来宋告即位，且言免岁币，结前好。宋君臣认为辽国分崩离析，败局已定，如不出兵，燕京势必为金军占领，就难以收复旧地。遂仓促命令童贯领枢密院事，充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种师道为都统制，率军十五万北伐。昏庸的宋徽宗认为辽已面临败亡，只要宋军一到，就可不战而得燕京；即使辽能称藩成为属国也可；假如辽方进行抵抗，就"按兵巡边，全师而还"。[24] 宋徽宗并不打算真正以武力攻取燕京。

以童贯为首的宋军将帅，自以为是"吊民伐罪"，只要大军压境，辽方不是迎降，就是发生内变，叛附宋军，竟下令"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25]根本不作战斗准备，反而限制了军队的作战行动。

五月，宋军分兵两道北进：种师道总东路军，趋白沟（今河北拒马河），辛兴宗总西路军，趋范村（今河北涿县西南）。耶律淳遣耶律大石、肖干（回离保）率军三万余人迎拒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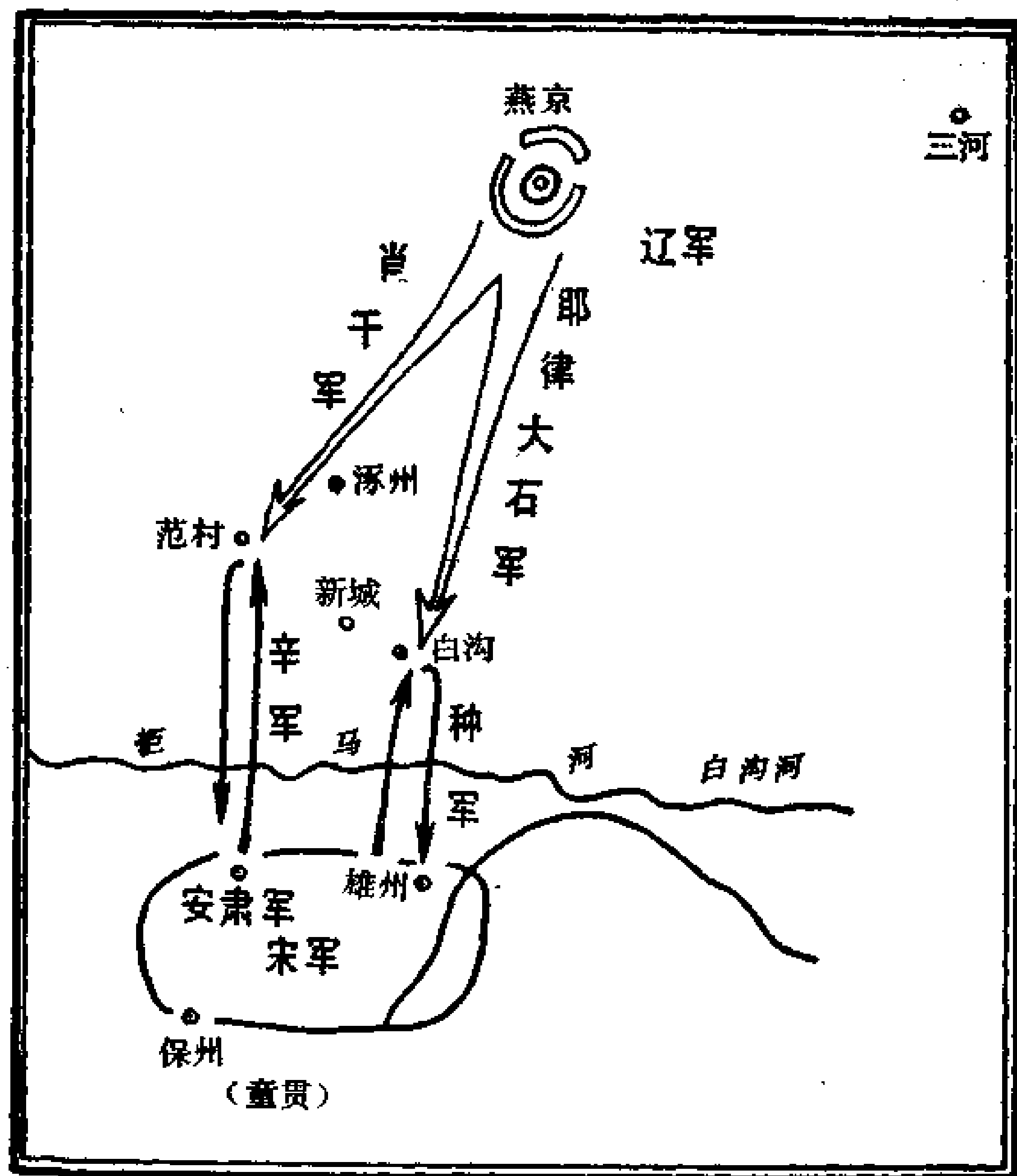
种师道军至白沟，前军被辽军战败，士卒多伤，遂退回雄州（今河北雄县）；辛兴宗军与辽肖干军战于范村，亦败。

宋徽宗赵佶听到宋军战败，赶快下诏"班师"，第一次的攻燕京作战就这样结束了。

（三）宋军第二次进攻燕京

宋宣和四年（辽保大二年，金天辅六年，公元1122年）四月，金军西进跟踪追击天祚帝，天祚帝率少数残骑窜入沙漠地带的夹山，金军攻占辽西京大同府。七月，自立于燕京的耶律淳病死，宋赵佶又命童贯、蔡攸治兵，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率兵二十万，再出雄州向燕京进军。

宋军第一次进攻燕京示意图 （25—5图）



九月，辽知易州（今河北易县）高凤和驻守涿州（今河北涿县）的常胜军（即怨军）将领郭药师率八千人投降宋朝，为宋军打开了进军燕京的道路。

辽主军国事的肖太后闻郭药师率军降宋，大为恐惧，即遣肖容、韩昉奉表向宋称臣。昉等见童贯、蔡攸于军中，说“女真蚕食诸国，若大辽不存，必为南朝忧！唇亡齿寒，不可不虑[26]！”童贯拒绝辽的求和。

童贯遣刘延庆将兵十万出雄州，以郭药师为向导，渡白沟。至良乡（今河北良乡），被辽肖干军设伏战败，遂隔卢沟河（永定河）对峙，闭垒不敢进攻。郭药师认为辽军全力出战，燕京必虚，提出愿率奇兵五千绕道迂回袭击燕京的作战方案，并要刘延庆派刘光世军为后援，延庆许之。于是宋将高世宣、杨可世与郭药师率军六千夜渡卢沟河，奔袭燕京。天将明，常胜军先头五千骑从东面迎春门突入城内，大军继至，阵于悯忠寺。肖干急遣三千精兵返回燕京救援，与宋军进行巷战。刘光世军逾约不至，郭药师军失援战败，与杨可世弃马缒城逃出，伤亡过半，高世宣战死。

宋刘延庆军于卢沟河南，辽军分兵断宋军饷道，扬言以精兵冲中坚，左右翼为应，举火为期，尽歼宋军。延庆闻报甚惧，天明望见卢沟河北的火光，竟认为辽军来袭，慌忙烧营撤军，退保雄州。辽军纵兵追击，宋兵自相蹂躏死者无数，遗弃军资达百余里，把自神宗熙丰以来所储的军器、物资丢失殆尽。宋军第二次进攻燕京就这样结束了。

（四）童贯暗约金军攻打燕京

本来应由宋军攻占的燕京，由于宋军将帅无能，却被辽的残余军队所打败。童贯为了掩饰攻燕京的败绩，派人暗中约金军攻打燕京。女真统治者早有“中外一统”的野心，十月，完颜旻得信后即率军从奉圣州（今河北涿鹿）东进，宣告燕京官民，“降者赦其罪，官皆仍旧”。[27]

宋军第二次进攻燕京示意图（25—6图）

十二月，完颜旻以完颜宗望(斡离不)率七千骑为先锋，主力分三路：迪古乃军攻得胜口（今北京市昌平北）；婆卢火军攻居庸关（今昌平西北）；另一路由紫荆口(今河北易县西)攻易州，以迂回昌平。辽居庸关守军不战而溃。金军南下，入燕京，据城垣。辽宰相大臣奉表请降，肖太后（德妃）与肖干出古北口逃向天德。至是辽的五京皆为金有，辽亡。

（五）宋接管燕云地区的交涉

金军攻占燕京后，宋向金开始交涉燕云地区的接管问题。

女真贵族在攻占燕京的过程中，看到宋军腐败，将领无能，掠夺财富的欲望激增，从灭亡辽朝进而企图夺取富庶的中原地区。于是寻找种种借口，欺压赖账，不想履行归汉燕地的原约。还在燕京尚未攻下时，他们就提出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营（今河北昌黎）三州不是石晋割给契丹的土地，不应归还宋朝；还以宋朝出师失期为由，表示不再据原约把山前、山后十七州之地归还宋朝，只答应将燕京及其所辖六州二十四县还给宋朝，但在这一地区的金银财物及契丹人都要归金朝所有。而西京大同府之地，须俟辽主天祚帝拿获，再与宋朝。对这一要求，宋廷以"暴师日久，各不稳便"作为自己屈膝妥协的理由，满口答应下来，愿意每年除与金朝岁币四十万外，另加一百万贯（每贯千文）作为燕京"代税钱"（见《会编·卷十三》）。

宋朝统治者的一再退让，更助长了女真贵族的野心。女真贵族扬言如果宋朝不按他们的要求办事，就要对宋朝发动进攻。只是由于当时金军正在追捕辽天祚帝，新占领地区还不稳定，所以女真贵族在得到宋朝的上述许诺后，把燕京及所属六州（顺、檀、涿、易、蓟、景）的财富和数万民户，席卷而去，把几座空城交给宋朝，而平、营、滦三州及山后各州始终不肯还给宋朝。

关于对辽西京大同府一带地方的交涉，宋朝"请加币以求山西诸镇"。[28]金太祖完颜旻特许交还西京土地并民户，而且只要宋朝出犒军费，作为金军攻占西京的代价，同意将西京及武、应、朔、蔚等八州划归宋朝。但是这个协议还没有来得及执行，金太祖就病死了。女真贵族拥立完颜晟（吴乞买）即帝位（金太宗）。不久，宋朝依据协议索取西京大同府及武、应等八州土地。当时驻西京的将领宗翰（粘罕）只答应给宋朝武、朔二州。过后不久，反而进一步提出宋朝破坏盟约，"招纳叛亡"，连武、朔二州也不还了。

（六）金军追擒辽天祚帝，辽亡

金军退出燕京后，完颜晟率军回会宁，由斡鲁、宗望等领军追

击西逃的辽天祚帝。宋宣和五年（辽保大三年，金天辅七年，公元1123年）四月，金军攻青冢塞（今内蒙呼和浩特市昭君坟侧），大败辽军。

次年（公年1124年）七月，辽天祚帝得阴山室韦谟葛失军，自以为“天助”，企图出兵收复燕云。耶律大石谏阻，不听。大石即率所部西走，自立为王，在伊犁、锡尔两河流域间，凭借回纥的力量，建立国家，中国史书上称它为“西辽”。

耶律大石出走后，辽天祚帝强率诸军自夹山出兵，准备南下武州（今山西神池），在奄遏下水（今内蒙凉城附近）被金军击败，辽将纷纷降金。宋宣和七年（辽保大五年，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正月，辽天祚帝应党项舒和伦之邀，奔西夏，越过沙漠向西逃窜。金军跟踪穷追，天祚帝过天德军至应州（今山西应县）新城东六十里处，被金将娄室部擒获。统治北中国达二百一十九年的辽朝遂告灭亡。

析宋联金夹辽的战略决策

燕云地区西起山西与内蒙交界处，沿河北和北京北部向东，达渤海之滨，沿线山岭蜿蜒，形势险要，有不少关隘控扼南北交通孔道。在这地区以南就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大平原，可见燕云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公元936年石晋割燕云赂契丹以来，中原王朝失去一条抗御北方铁骑南侵的重要防线达三百余年（到元王朝建立）。北宋君臣谋求收复燕云，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赵佶和童贯在战略、策略和措施上失当，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招致更大的灾祸。

对宋、金订立“海上盟约”，夹攻辽朝，当时宋廷朝臣意见发生分歧，主要如下：

一、夹攻论。宰执蔡京、王黼、童贯等当权人物认为：中国与辽虽为兄弟之邦，然百余年间，彼之所以开边慢我者多矣。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今而不取燕云，女真必强，中原故地将

不复我有[29]！其着眼于借金人之力，以复燕云，是很明显的。

二、坐观论。少宰郑居中反对与金夹攻辽，并认为“不守两国盟约，辄造事端，诚非庙算”，主张“不宜幸灾而动，待其自毙也”。[30]

安尧臣上书论燕云事，曰：“宦寺专命，倡为北伐，燕、云之役则边衅遂开；……恐异时唇亡齿寒，边境有可乘之衅，强敌蓄锐伺隙，以逞其欲，此臣所以日夜寒心，伏望思祖宗积累之艰难，鉴历代君臣之得失，杜塞边隙，务守旧好，无使新起之敌乘间以窥中国”。[31]

三、援辽论。中书舍人宇文虚中从强弱、攻守的形势诸方面考虑，认为“用兵之策，必先计强弱，策虚实，知彼知己，当图万全。今边圉无应敌之具，府库无数目之储”，且中国与契丹讲和，今逾百年，自遭女真侵削以来，向慕本朝，一切恭顺。今舍恭顺之契丹，不羁縻封殖，为我藩篱，而远逾海外，引强悍之女真以为邻域。女真借百胜之势，虚喝骄矜，不可以礼义服，不可以言说诱”。且“以百年怠惰之兵，当新锐难抗之敌”，“臣恐中国之祸，未有宁息之期也”。[32]

高丽国王俣曾寄语宋徽宗赵佶曰：“闻天子将与女真图契丹。苟有契丹，犹足为中国捍也，女真虎狼，不可交也，宜早为之备。”[33]他劝宋徽宗“存辽”、救辽，以为宋捍边。

蔡京、童贯所坚持的夹攻论，没有考虑当时宋、辽、金三方的实力对比和形势发展的可能后果，特别是不依靠自己的力量，妄想借金人之力以收复燕云，是错误的。结果开衅助金，自毁屏藩，不仅不能收复燕云，反而暴露弱点，加速了金兵南下。

郑居中等的坐观论比前者明智些，可以消除辽的后顾之忧以全力抗金，对消一些金的军力和延缓辽的败亡，但缺少充实国力、加强战备等积极措施，其最后结果也好不了多少。

宇文虚中和高丽国王的援辽论，在情况判断上，指出“唇亡齿寒”的宋辽关系，明确了辽是“中国边捍”的看法，也看到了

金的"强悍"和"新锐"，无疑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援辽"的方法恰当，措施适度，可以指望为宋赢得一些时间。

但关键的问题是加强宋自己的国力，宋廷如能改弦更张，力图振作，整军经武，养精蓄锐，调集重兵加强边防，则和辽、援辽所赢得的时间才有实际意义，观衅而动才有实现的条件。否则，宋、辽、金战争的结局，仍然是难以改变的。

第三　金灭北宋之战

一、金、宋作战计划和部署

金在灭辽战争节节胜利中，日益滋长着掠夺土地、人民、财富的野心。宋宣和五年（金天会元年，公元1123年），金太宗完颜晟继位后，拒不交还燕云山前山后大部汉地，积极进行南下侵宋的准备：政治上收罗辽朝勋贵以为金用，安抚收买占领地民心，以及连结西夏；军事上收刮契丹、奚、汉、渤海、回鹘、鞑靼、党项等人以扩充军队，特别是骑兵；用外交掩蔽军事行动，侦察宋廷情况和战地兵要；在东面平定辽降将张觉据平州（今河北卢龙）通宋复辽的事变后，即屯重兵于平州、营州（今河北昌黎）地区，作为战略开进地，在西面仍占据云州（今山西大同）和山后大部州县，作为屯军及经略南侵的基地。

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完颜晟下诏南下侵宋。兵分两路：西路从云州下太原，东路自平州入燕山。作战目标首先掠取大河以北的河东、河北广大地区；第二步西路军从太原下洛阳，绝宋西兵援路，且防宋徽宗奔蜀；东路军下燕山、真定，直趋东都（今河南开封），其兵力部署如下：

完颜杲（斜也）国相兼都元帅，居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

西路军：以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粘罕）为主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右都监，统兵六万，自

云中攻河东（山西），入太原。东路军：以左监军完颜宗望（斡离不）为主帅，完颜昌（挞懒）为六部路都统，阇母（多昂摩）为南京路都统，刘彦宗为汉军都统，统兵六万，自平州入燕山（按当时金军战时编制：路主帅——都统——万户——军帅（或猛安）——亲管猛安——谋克。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军帅以上无定制）。

宋徽宗赵佶对金人即将南侵缺乏应有的警惕和必要的战备，仍迷信牺牲“子女玉帛”从屈让中可以求和平，甚至当金兵发动进攻已连破檀州（今河北密云）、蓟州（今河北蓟县）时，还派出太常少卿傅察赴迎金贺正旦使于玉田。宋的战略方针没有改变，仍为与辽对峙时所采用的专守防御。其部署：以辽降将郭药师率所部长胜军守备新赎回的燕山府六州；在平州地区起用曾暗中连结叛金的辽将张觉，但当张觉失败来投时，宋杀张以谢金人，使降宋的辽军因而解体；在河东（山西）方面，由于大部州县未复，宋边防前线的麟州（今陕西绥德西北）、府州（今陕西府谷）、武州（今山西神池）、朔州（今山西朔县）、代州（今山西代县）等，由各州守军防守，在前线后方纵深中，河北方面以中山（今河北定县）、真定（今河北正定），河东方面以太原，作为第二线的抵抗中心。各府州城驻有厢军若干指挥，每指挥编额五百人。[34]北宋后期的禁军实行“将兵法”，每路置若干“将”。）宋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河北置三十七将。[35]宋神宗后期，河东“团成十二将”。宋哲宗时，“添置第十三将”。[36]“将”设正将、副将各一人，所领的兵力不等，大致每将自几千人至万余人，实际是“兵额多缺”。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三月，宋廷为监视可疑的郭药师，在河北置四总管：以辛兴宗在中山，王元在真定，杨惟忠在瀛州（今河北河间），王育在大名，同时作为河北的二线防御。以上部署总的说来，仍然是夹辽图燕败后的防御部署，并没有着眼于防金南侵而有所调整加强。

二、金军第一次南下袭宋

宋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金军东西两路军同时由平州府、云中府分向燕京、太原发动进攻。

东路宗望军主力越过玉田，另一路军败宋军于古北口，破檀州、蓟州。宋知燕山府蔡靖派郭药师、张令徽及刘舜仁率长胜军及宋军四万五千人迎战金军于白河（今北京市通县东二十里北运河），张令徽率宋军先遁，金军乘胜进击。郭药师亦大败，退回燕京，后率所部兵劫执蔡靖及都转运使吕颐浩降金。宗望挟蔡靖及吕颐浩随军以临各州县，燕山府所属悉为金有。金军尽取宋在该地的军实，得马万匹、甲胄五万、兵七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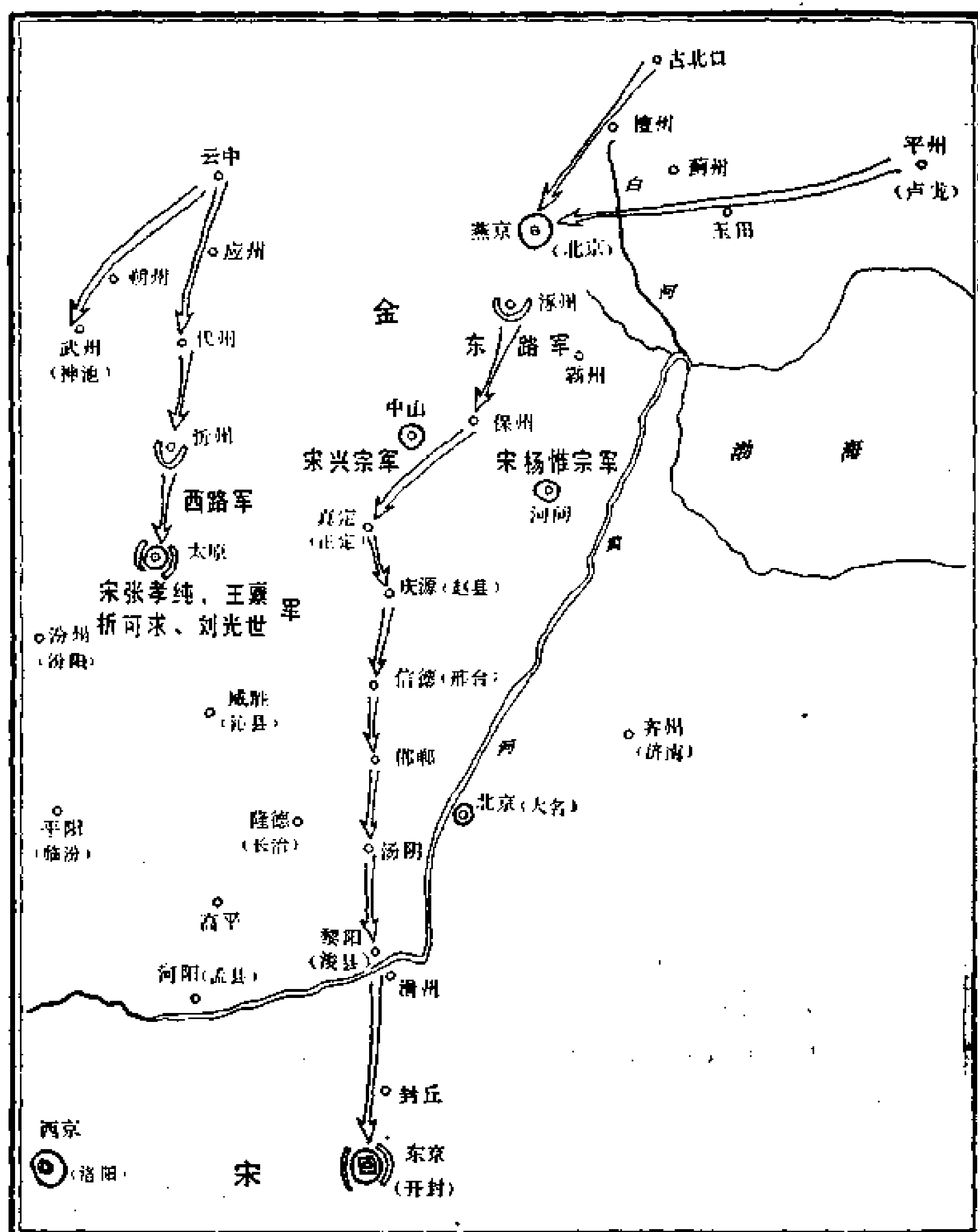
西路宗翰军由云中南侵。宋在河东各城防守的有山后汉儿十万余人，这支军队是宣抚司招燕云之民，置之内地而组成的，由于军食不足，由饥而怨，复受官军辱骂，其心益贰。当金军进迫朔州时，守将孙翊出战，汉儿开门献城于金；金军至武州，汉儿又擒守将李嗣本以降；及至忻州（今山西忻县），州守开门迎降。十二月十八日，金军破石岭关，进至太原城下。太原军民在知太原府张孝纯、守将王禀率领下，英勇抗御，固守待援。宋将折可求率麟府军、刘光世率鄜延军四万人来援太原，在汾河以北被金军击败，死伤万余人。

宗望得郭药师，益知宋朝虚实，用郭为向导。十二月十四日，以宋都开封为目标，向南进军。十八日攻保州（今河北保定）、安肃军（今河北徐水）不克；继续南下，击败宋军于隘口；二十一日围中山，城坚不下；绕道于二十二日陷真定；二十四日陷庆源府（今河北赵县）；接着破宋信德府（今河北邢台），是月末金东路军至邯郸，西路军仍被太原军民阻击在太原城下。

当金军两路大军南下的消息不断传到宋廷后，素无对金战争准备的宋朝君臣惊慌失措，战、守、逃争议不决。十二月二十二日赵佶还派出通直郎李邺使金求和；同日以内侍梁方平率禁军卫士赴守黎阳（古津渡，故址在今河南浚县东南，古黄河北岸），

金军第一次南下示意图

（25～7 图）



二十六日以何灌领二万兵协同梁方平守浚州（今河南浚县）河桥，并以李纲为兵部侍郎规划东京城守，召熙河、秦凤经略使姚古、种师道率本路军入援，命京东、淮西募兵入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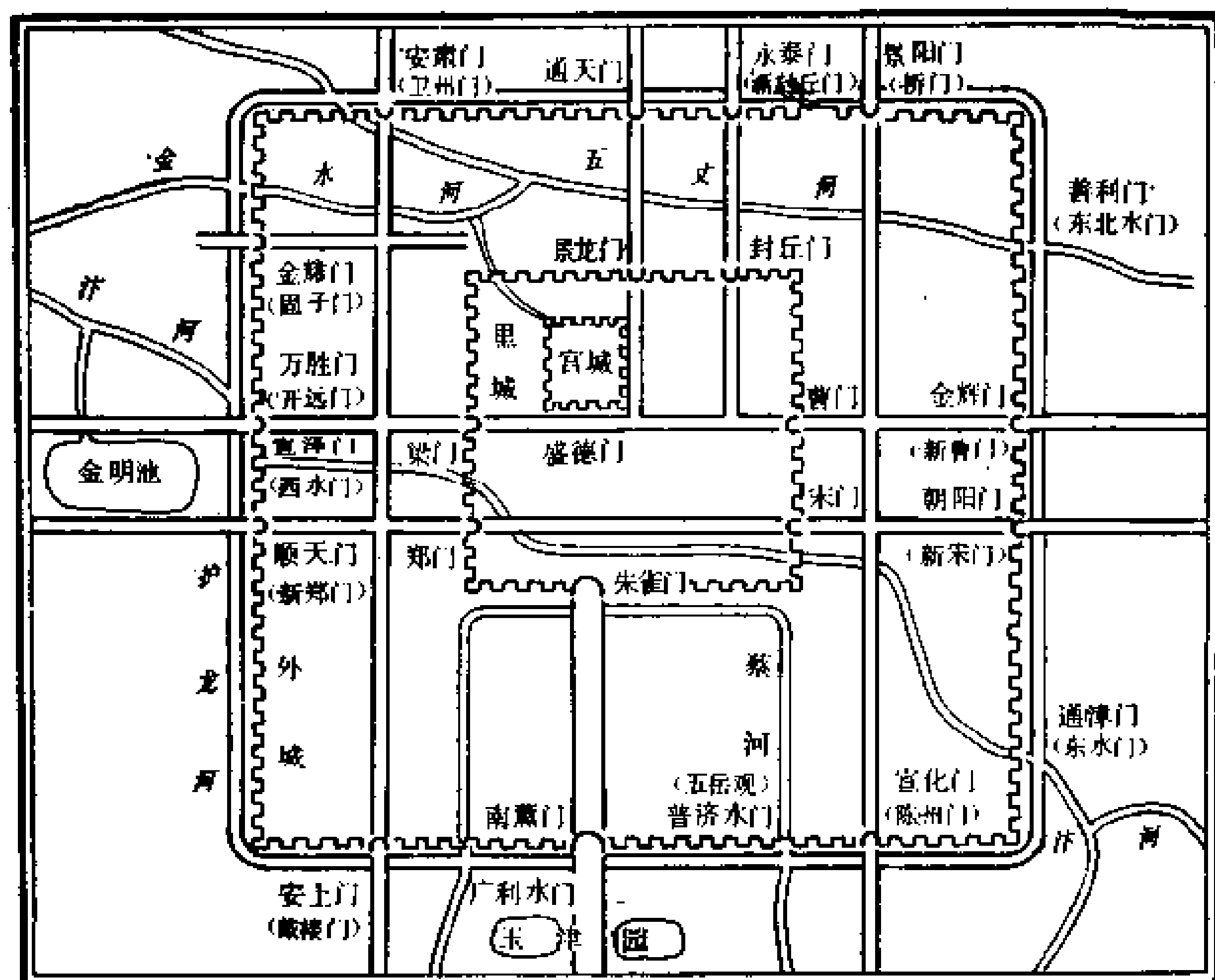
宋徽宗为了欺骗人民，撤销了民愤极大的内外制造局和括地增赋的“西城所”，废止了“花石纲”，并下了“罪已诏”。为了便于他向金陵逃跑，任命太子赵桓为开封牧，以“监国”的名义替他抵挡金兵。在吴敏、李纲等大臣的坚持下，徽宗不得不传位给太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

金东路军自邯郸派出郭药师率二千骑兵为先遣队南下，郭部疾驰三百里，于宋靖康元年（金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正月初二至浚州地，侦知宋州县无备，宗望即遣完颜宗弼（兀术）取汤阴、攻浚州。时宋梁方平率禁兵方抵黄河北岸，饮酒取乐，不作战守准备，金军骤至，仓皇放弃浚州溃奔。守黄河南岸的何灌部，在北岸宋军尚有几千人未过桥时，即烧毁黄河浮桥，不战而逃，南岸空无一个守兵。金军先后搜集到只能乘坐六、七人的小船十多条和稍大的几条船渡河，连续五天，才渡过骑兵，步兵犹未集结即南进，随渡随行，无复行伍，尾随宋溃军之后，直向宋都开封挺进。

浚州失守，金兵渡河，正月初三夜，宋徽宗赵佶连夜率一些内侍及随后赶来的童贯、高俅辈逃出开封，向东南亳州（今安徽亳县）、镇江方向逃命。钦宗赵桓这时去留之计犹未决定，大臣中主逃、主战之议不一。以白时中、李邦彦为首的主逃，去襄樊或西奔关中；李纲、范祖禹等主战（守开封），力陈出逃非计。初六日赵桓巡视军营，决定固守，命李纲为亲征行营使，负责开封的防务，并遣使督催诸路勤王兵入援。李纲受命后，积极组织军民备战，加紧城防守备，练兵备械，仓卒完成，而金军已进到东京城下了。

正月初七日，金军进至开封城外，在西北郊的牟驼岗集结，获得该地天驷监所养马两万匹和大量刍豆。是夜金军攻宣泽门

宋 东 京（开封）图　　（25—8图）



（西水门），李纲临城指挥抗御，斩获一百多人，金人知有备而退去。金宗望希图乘虚突入汴京不成，即并用诱降与攻城两手，初八日遣使谈和，进行讹诈，提出索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牛马万头、表缎百万匹，尊金帝为伯父，归还在汉的燕云人，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以宰相、亲王为质等苛刻条件。初九日，金兵攻通天、景阳、卫州等门。李纲亲自督战，派勇士缒城出战，自清晨一直战到傍晚，杀获数千，何灌力战死，击退了金军的强攻，胜利地保卫住汴京。金军于攻城的同时，并派遣游骑掠京畿诸县，但东明、太康、雍邱（杞县）、扶沟、鄢陵等要点均未攻下，仍不能阻断宋勤王之师来援东京。

正月十四日以后，宋各地勤王大军相继来到，种师道、姚平仲率泾原路(治渭州，今甘肃平凉)、秦凤路（治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军亦到，范琼率万骑亦自京东赶来，至二十一日已达二十余万人。统制官马忠引京西募兵至，击败顺天门外的金军。于是金军收敛游骑，围城部队亦向北移，集中于牟驼岗，增垒自卫。

宋各路援兵到来后，李纲建议统一城内城外军队的指挥权，以便协同作战。但宋钦宗赵桓却决定另设宣抚使司，以种师道为宣抚使，指挥勤王援军和原李纲指挥的城外前后两军；亲征行营使李纲，则指挥左、中、右三军和其它城内守军。城内城外军队不相统属，互不“关报”，势难合力。

李纲献策说：

“扼关津，绝粮道，禁抄掠，分兵以复畿北郡邑，俟彼游骑出则击之，以重兵临敌营，坚壁勿战，如周亚夫所以困七国者，待其粮尽力疲……纵其北归，中渡而后击之。”

种师道亦认为：

“金人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归乎！”“三镇不可弃，城下不可战。朝廷固坚守和议，俟姚古(军)来，兵势益甚，然后使人往谕金人……如此两三返，势须逗留半月。重兵密迩，彼必不敢远去劫掠。孳生监（原宋城外屯粮地）粮草渐竭，不免北还，俟其过河，以骑兵尾袭。至真定、中山两镇，必不肯下。彼背腹受敌，可以得志。”〔37〕

李纲和种师道对敌情的判断和保卫汴京的作战方针是正确而稳妥的。但宣抚司都统制姚平仲主张速战速决，提出“夜叩金营，生擒宗望”〔38〕的作战方案。宋钦宗赵桓以为姚平仲骁勇善战，夜袭必能一举成功，促种师道出战，师道则奏请缓八日后其弟师中军到再行动。钦宗以为太晚，姚平仲私计，恐功名尽归种氏兄弟，请求先行袭击。于是在二月初一夜袭金营，由于谋已泄漏，金先设备，故为所败。李纲率左右军将士出救，与金人战

于幕天坡（祥符县西），以神臂弓射退敌人。种师道复建议：

“劫寨已误，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初二）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犹不胜，然后每夕以数千人扰之，不十日，敌人遁矣。”〔39〕

钦宗赵桓和宰相李邦彦等不仅畏懦不能用此建议，而且把失败责任推到李纲、姚平仲（在逃）身上，罢李纲的官，撤销行营使司，另以蔡懋为守御使总领汴京城防，并派使臣和割地专使带着“国书”和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等到金营谢罪。在姚平仲袭金营的前夜或当夜，金军先头部队已开始向河北撤退。蔡懋代李纲主城防事后，下令不准将士在金人攻城时“辄施矢石”。二月初五日，太学生陈东等数百人上书于宣德门，要求恢复李纲、种师道官职，罢免宰相李邦彦等。开封人民数万人并起声援太学生，赵桓被迫无奈，只得宣布恢复李、种官职，复以李纲为右丞，充京城四壁防御使。

金东路军主帅宗望看到自己孤军顿兵于坚城之下，汴京主战军民力量仍不可侮，河北州城仍多在宋手，退路时刻有被切断的危险，而且宋朝已允割三镇并赔款，以肃王赵枢为质，基本上已满足了要求，因此不待取足金银，就于二月初九日匆匆率大军北撤。〔40〕种师请求乘金军渡黄河时半济击之，宋钦宗不许。李纲请准以万余人，分数道尾随监视金军出境，并令将士得择便进攻金军。宋军追及金人于邢台、赵县间，但遭到主降派宰执们的责难，强令撤军。李纲力争复追，金军趁机安然撤走。

金军北去，东京解严，宋廷上下怡然，逃跑的宋徽宗又从镇江回到汴京。宋钦宗赵桓也以为天下太平，下令四川、福建、广南东路、荆湖南、北路及京西州郡的勤王军停止救援，各归本路；对李纲等数上的御敌备边、防金复犯的建议，均不用。

金西路宗翰军自云州发起进攻后，与东路宗望军并无战役上的协同，也没有相互联系。当东路军自汴京开封北撤时，西路军仍在围攻太原，得知宗望与宋议和，讨得金银不少，宗翰便亦派

使到宋京索讨，未遂。二月中旬，宗翰留银术可部围太原，自率军南下。适平阳（今山西临汾）义军叛去，攻破威胜军（今山西沁县南），宗翰遂引金人入南北关（南关在沁县西北，北关在祁县东，两关相连号南北关），破隆德府（今山西长治），十七日进至高平（今山西晋城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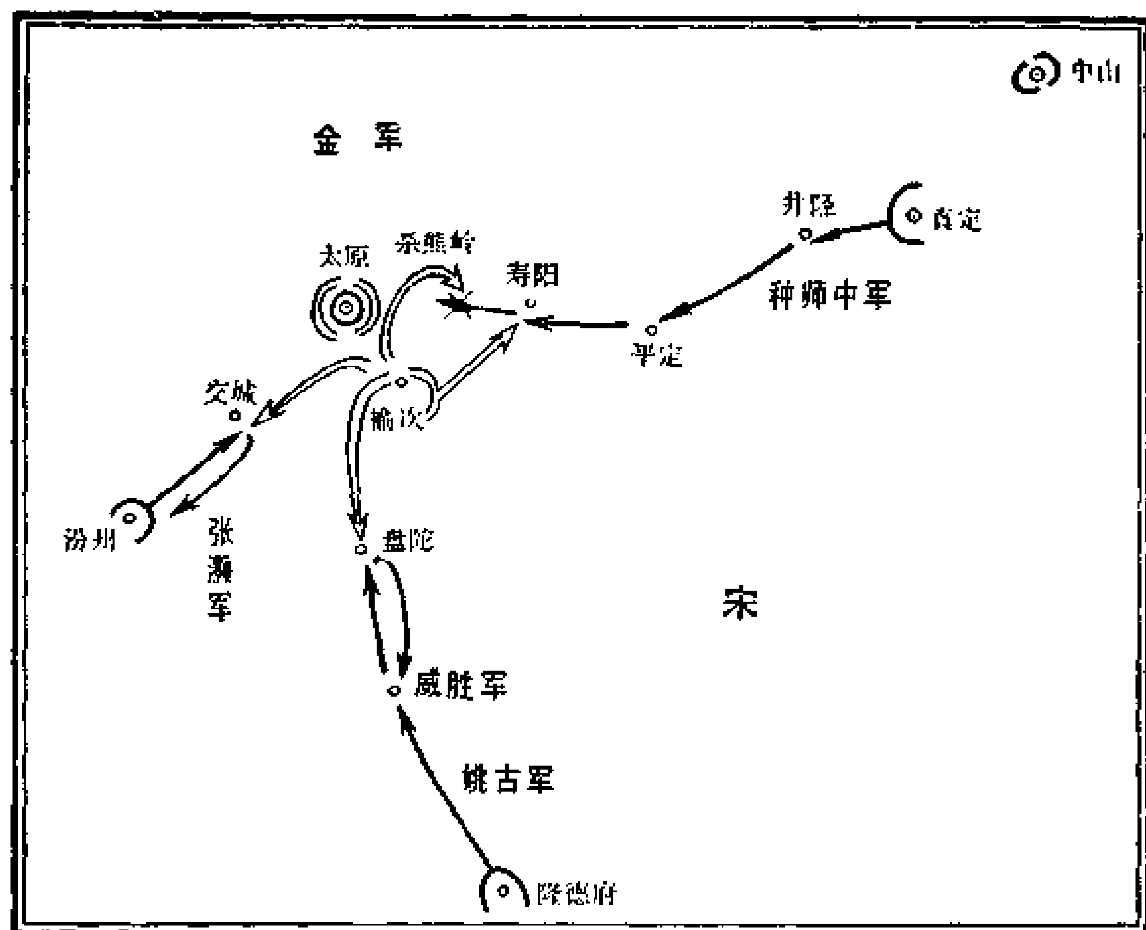
宋廷因宗望军方由汴京解围撤走，而宗翰军又将南来，举朝震惧，于是又遣使至宗翰军中，许割三镇讲和。宗翰回军太原城下，出示割太原诏书，宋知府张孝纯拒不受诏。宗翰攻取文水、盂县（今山西今县），扩大占领地区，以孤立太原，留银术可继续围困太原，自还云中。东路军撤经中山、河间时，两镇军民亦拒不受命，固守抗敌。宗望军又向中山、河间展开围攻。

三月十六日，赵恒又下诏固守三镇，命种师道为河北河东宣抚使，驻滑州（今县）；姚古为制置使，种师中为副，姚古领兵援太原，师中援中山，河间。种师中进兵逼宗望军，宗望舍中山、河间撤军回燕京，分屯安肃、雄、霸、广信境内。至三月二十五日，姚古以兵复隆德、威胜，扼南北关。

四月中，宋廷命种师中率军由井陉（今山西井陉）进出河东，与姚古军由隆德府，张灏军由汾州（今山西汾阳）北上，互为犄角，共解太原之围。五月，种师中留辎重于真定，率军过井陉经平定军（今山西平定），乘势收复寿阳、榆次等县。时姚古、张灏等军皆未行动，遂还屯真定。当宗翰避暑回云中，留兵就地畜牧时，宋知枢密院事许翰误信谍报以为金将撤兵，几番催促进军，责备师中“逗挠”不进。种师中乃约姚古及张灏分道俱进，自己率军轻装再次西出。当进至寿阳的石坑时，遭到金将活女部的袭击，五战三胜，转战至榆次的杀熊岭。这时姚古军才到达威胜军，统制焦安妄传金宗翰大军将至，姚古、张灏皆失期不前。师中军士卒饥疲，敌悉众攻师中的右军，右军溃，前军亦奔，师中犹率亲军力战，自卯至巳，士卒发神臂弓却敌，而犒赏不及，众愤散，所留仅百余人，师中身被四创，力竭战死。金军乘胜

南进，迎战姚古军于盘陀（戍名在今山西祁县东），古兵溃保隆德。接着，金军又在交城击败张灏军。宋军第一次救援太原，结果失败。

宋军三路救援太原示意图　　（25—9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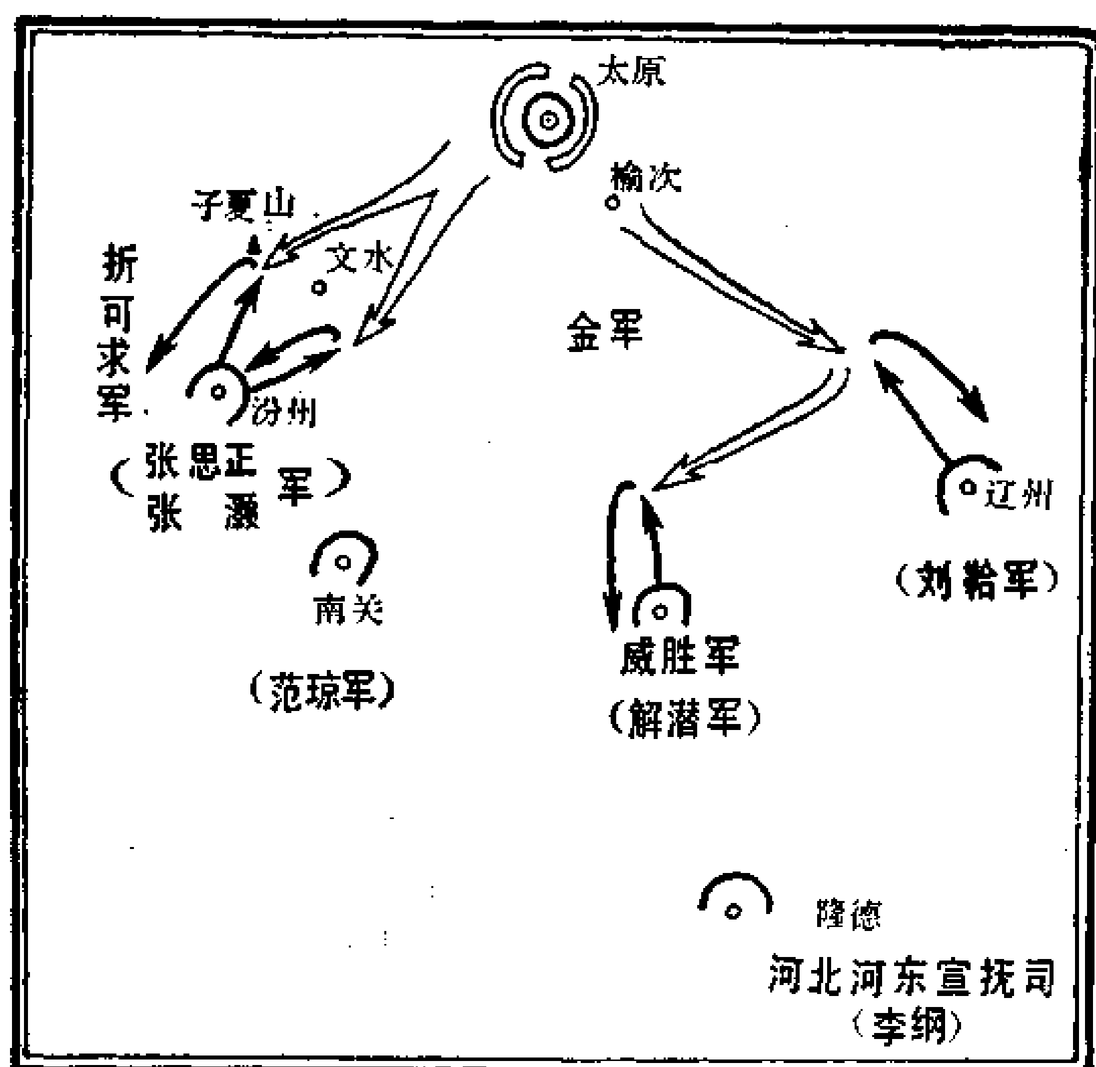
宋军第一次解太原之围受挫后，主和派耿南仲等又力主割三镇求和。李纲坚决反对。六月，耿南仲即提请以李纲代替老病告归的种师道为宣抚使，蓄谋排挤李纲出朝。李纲明知是借事坑害，以“书生不知兵”，“恐误国事”〔41〕坚辞，奏章十余未得应允。朝臣甚至以秦昭王令白起自杀的故事相威胁，李纲不得已受命，时宣抚司兵仅一万二千人，兵少马缺，诸事均未集，李纲请延缓行期，被钦宗斥为拒命。八月，李纲被迫出发河阳，训练士卒，修整器甲；继又进驻怀州（今河南沁阳），造战车，等防秋

兵到来后，进军太原。但钦宗却下诏罢减所集秋兵，接着下诏促令进军太原。

李纲只好在隆德府召集会议，决定四路并进，以制置副使解潜部屯威胜军；宣抚副使刘韐部屯辽州（今山西左权）；幕官王以亭．都统制折可求、张思正等部屯汾州；范琼屯南北关，约期诸路同时向太原进去。但是，各路主将皆受皇帝御书，事皆专达，进退自由，宣抚使空有节制之名。因此，当进军太原之役发起后，刘韐部先从辽州进军，被金军集中主力迎击，首先败绩。解潜部由威胜进军，遇金军阻击于关南，亦大败。张思正领军十七万与张灏军（第一次进军后回屯汾阳）夜袭金娄室军，战于文水，小胜；次日大败，死数万人。折可求部亦溃于子夏山（今山西汾阳县北，上有石室，相传为子夏所居）。宋军分道进兵，互不协同，遂被金军各个击破。

金与宋联合攻辽图燕过程中，窥伺到宋廷君懦臣庸，兵不习战，是不难攻掠和可侮的对象，于是在亡辽的当年，即以有限的兵力，分东西两路南下攻宋。西路军受阻于太原坚城下，东路军舍既定的作战目标——中山、河间不攻，绕坚城，渡黄河，孤军深入，奔袭宋都开封。在离开封十天路程时，宋李纲才临危受命，组织城防，匆促完成守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宋军也多次挫败了金军的进攻。这充分证明，金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强大战力，而且金东西两路中间隔着太行山，战役上并无连系协同。当时宋各路勤王援兵相继到达开封近郊的已达二十万人。金军攻城不下，抄掠近畿亦受胁迫，处境日趋危殆。正如种师道所指出的，“金人不知兵，岂有孤军深入人境而能善归乎！”不仅如此，金军顿兵在开封城下，野无可掠，多一天不走，危险加重一天。这次金东路宗望军得以避免覆军而北去，关键在于宋廷的投降派帮了忙，专出些“馊主意”，不惜土地、金帛，谄敌求和；既不用李纲、种师道知兵之将“疲老金师而后去之”的建策，也不许派兵追蹑、监视金军北撤。因此，金军这次的战略计划和作战

宋李纲四道解救太原之战示意图（25—10图）



行动，从军事上说是冒险侥倖，非宗望能兵，实赵信太无能而已。另一方面，金人以和谈佐攻战，却是成功的。他们利用了宋廷君臣畏敌如虎，只知屈让以为身谋的怯弱心理，让其自己扼杀开封军民的斗志，摈弃主战派李纲，种师道"坚壁勿战"、击其饥归的正确战略指导。金军在军事上无力得到的果实，却在诱和中得到，这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这次宋金战争，宋廷失败，首要是由于战前缺乏抗金的战略措置，临战又丧失抗战的斗志。当和平相处百余年的辽朝败亡

后，已面临女真贵族积极准备南侵的严峻局势，宋徽宗赵佶君臣却毫无警惕和戒备，没有及时调整战略防御部署，照旧把对付西夏作为重点，而在北方对金的漫长战线上，兵力却很薄弱。比如说：缓和与西夏的关系，抽调陕、甘方面防夏的宋军，集中京畿以南的兵力，加强山西、河北和黄河河防；控置有力的机动兵团；作好京城保卫部署，这些都是当时局势要求起码应有的布置。可悲的是，赵佶辈只知"丰亨豫大"歌舞升平，竟然在命童贯率大军镇压方腊起义之后，又命内侍梁方平率禁军去镇压山东、河北的农民起义，而对迫在眉睫的金兵入侵却熟视无睹。当宋廷尚在庆祝以高额代价屈辱地换来燕山几座空城时，金人已挥戈南下践踏宋地了。

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宋不仅未能收复燕云十六州以恢复长城防线，甚至连燕京、大同也丢了，这两地成为金兵南下的补给基地和出发地位。在这种形势下，三镇已成为黄河以北的中坚支柱，只有依托三镇才能重建雁门、三关防线。三镇以南，山西方面尚可巩固上党以屏蔽洛阳，但河北方向，一马平川，铁骑可以长驱直进，而黄河又冬季水浅，渡口众多，宋都开封已直接暴露在金军突然袭击的矛头之下。可以这样说，不守三镇，宋朝的最后防线黄河就难以确保。

金兵南下时，三镇军民奋勇抗击，坚守待援，民气十分激昂。三镇的得失，不仅关系到抗金的战略部署，更影响着全宋军民的人心士气。宋廷万万不该在宗弼孤军深入，顿兵坚城，无计可施而开始北撤之际，答应割让三镇，而应该全线转入反攻，下令勤王大军挥戈北上，击其惰归，解三镇之围，重建抗金防线，准备迎击金兵再次南下。

金军主力北还后，赵恒迫于主战派的压力所采取的援晋部署，仍然是遥控分制，使将帅无权，行动不一，结果被为数不多的金娄室军各个击破。更有甚者，宋廷竟然在危急情况下，极力迫害坚守汴梁、力挽狂澜的李纲，仅此一端就可以看出，北宋的

覆灭和二帝的被掳，决不是偶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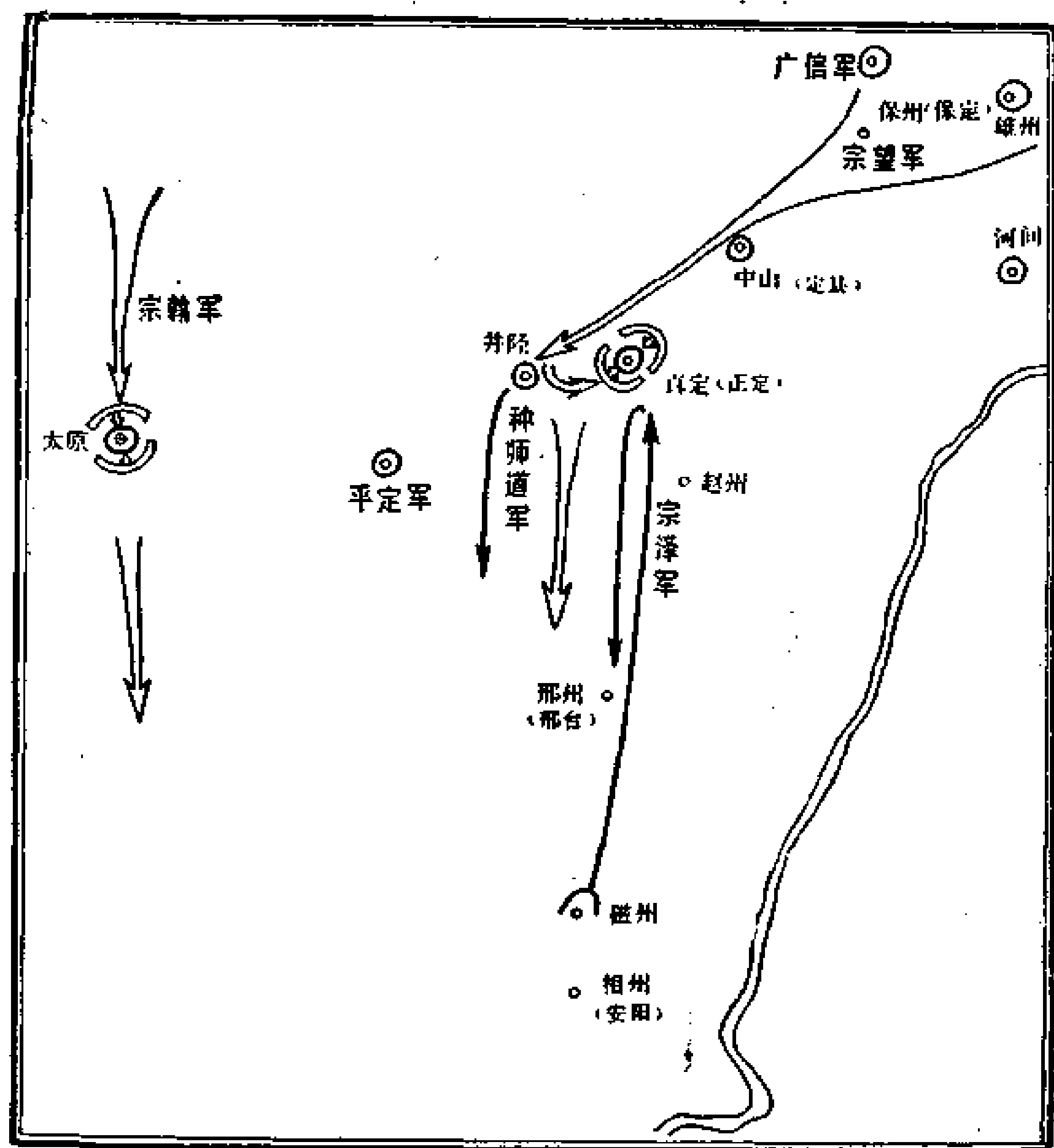
三、金军第二次南下灭北宋

金东路宗望军退回燕山府后，朝臣中主战派李纲、吕好问等力请集兵防秋，加强战备，采取防金再犯和保卫京师的必要的战略防御措施但，均遭到钦宗的搁置和耿南仲等投降派的反对。因此，残破的河东、河北，除原来守城部队外，仅控制有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种师道（接替李纲再次出任此职）所属的部队。

女真贵族第一次南下袭宋虽然没有得逞，但其大大膨胀了的掠夺野心，更趋狂炽。西路军仍在围困太原期间，东西两路金军即开始积极进行再度南侵的战争准备：征调燕山、云中、中京等八路民兵编入诸万户（军制中一级），充实兵力；在东面把前占高丽的保州（北朝鲜平安北道义州）还给高丽，争取其奉表称藩，安定后方；在西面，金军第一次南下袭宋时，西夏曾举兵应金牵制河东宋军，攻占宋镇威城(朔州西南，宋初与辽分界处)，旋被金完颜希尹(固新)袭占，为争取西夏再度配合攻宋，许割边地给夏诱胁夏人再向麟（今陕西神术北）、府（今陕西府谷）、丰（今陕西府谷西北）三州的城堡进行牵制性的进攻，使宋西北方面军队不能东调，以利于金军长驱南下。对宋的方针仍用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政治上以和谈佐攻战，瓦解宋君臣兵将的抗金斗志，军事上借和谈掩蔽进攻，以进攻逼宋投降。进军部署仍然是军分两路：同年八月十四日，以右副元帅宗望为东路军主帅，自保州（今河北保定）直趋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以左副元帅完颜宗翰为西路军主帅，主力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南下，加速攻取太原，后继续南下；计划在渡过黄河以后，两路会师东京。

金军长期围困太原，屡攻不下，多次诱降均未得逞，这次期在必取，乃集中兵力，专门制造攻城器械，轮番强攻。宋守将王禀率领军民誓死固守，直到城中粮尽，以弓弩的筋、甲、树皮和草茇充饥，大多数已饿得不能走路，拿不动武器时，才于九月

金军第二次南下攻太原、真定示意图 (25—11图)



初三日城陷。宋将王禀犹率领军民巷战，身被刺数十枪，最后投水自杀。

金东路军分两路南犯，金将耶律铎破宋军三万于雄州(今河北雄县)，高六、董才破宋兵三千于广信（今河北徐水西），遂趋中山，先锋将那野破宋军七千于中山北境。

时宋河东、河北路宣抚使种师道自领四万兵于井陉（今河北

井陉），为东援真定、西援太原的策应。金宗望攻下雄州、广信后，与种师道战于井陉，在击败种师道后，转攻真定。这时真定府宋守军不满二千人，在知府李邈和守将刘翊的率领下，奋起抗击，昼夜搏战。李邈前后上三十四章请援，宋廷一直搁置不应，最后只派宗泽率河北义兵赴援。宗泽到达真定外围，由于兵力过少，未能解围。到十月初五日，真定城破，刘翊犹率军民巷战，力尽自杀，李邈被执北去，不屈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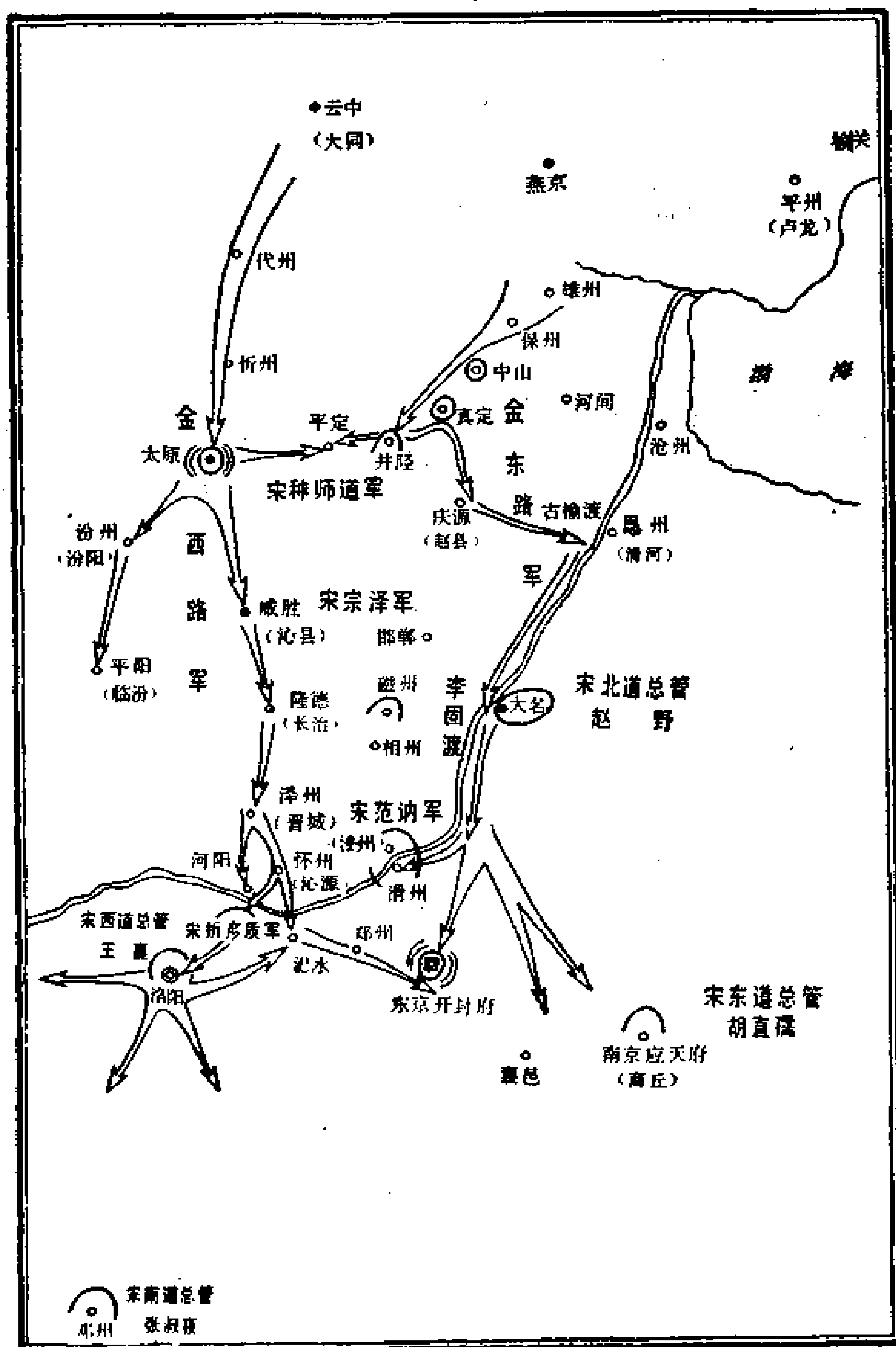
金东路军陷真定又降所属五县后分兵攻中山。并与西路宗翰军约期会师汴京，于十月中旬继续南进。知中山府陈遘坚守中山，明年二月被部将沙振杀害，沙振又被帐下卒执杀。

在金两路大军不停进攻的情势下，以宋钦宗为首的投降派，一直幻想以满足金人不断加码的割地、金帛、人质等等要求，便能屈辱求存，不但没有调集援军增强前线和加强纵深防御，反而把主战有功者如李纲、吕好问等贬斥出朝，并不断向金军派出乞和使臣。太原、真定失陷后形势日趋危急，逼得宋钦宗下哀诏，征四方兵，并分全国二十路为四道，于三京及邓州建总管府，分总四道：知大名府（北京）赵野总北道、知河南府（西京、今河南洛阳），王襄总西道、知邓州府（今河南邓县），张叔夜总南道、知应天府（南京，即今河南商丘）胡直孺总东道，事得专使，财得专用，官得专授。

金西路军攻下太原后，遣一军攻破汾州（今山西汾阳），于十月二十四日陷宋河东道南部重镇平阳府（今山西临汾），掩护西路军主力南下：降威胜军（今山西沁县），陷隆德府（今山西长治），遂取泽州（今山西晋城）。接着派出娄室为先锋军向南急进，破天井关（今山西晋城南），下太行，陷怀州（今河南沁阳），击破宋军万人后直趋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这时，河阳有宋宣抚副使折彦质所率十二万兵守黄河，李回率援军万骑亦至，与金军夹河对垒。金将娄室率先锋军主力到达后，以为宋军“亦盛，未可轻渡”，遂用虚张声势的办法，“以观其变”。集

金军第二次南下灭宋示意图

(25—12图)



中所有战鼓，彻夜鸣击，折部十二万兵被鼓声吓得连夜溃逃，李回亦奔还京师。宗翰遂引军渡河，于十一月十二日渡河完毕，进趋西京（今河南洛阳）。宋知河阳燕瑛、河南留守西道都总管王襄皆弃城走，金军占领西京。金军分军趋潼关，阻隔宋西北军来援之路，并遣娄室军南趋颍昌（今河南许昌），追击王襄的西道军。主力继续东进，会同由汜水关（今河南汜水）渡河的金军，直袭宋河防军之背，宋军皆溃。郑州降于金，宗翰军直扑汴京。

金东路军自真定南下，接替种师道的宋河北、河东宣抚使范讷率五万兵进至滑州(今河南滑县)浚州(今河南浚县)，一带守河；宗泽率军屯磁州（今河北磁县)军势颇盛。金宗望乃不再沿第一次南下路线渡河，遣千骑向磁州活动，牵制宗泽军；大军东向经恩州（今河北清河）折而向南趋大名，于十一月十六日在李固渡（在大名西）渡河。渡河后，宗望派达懒率一部兵力向东南趋宋南京(今河南商丘)，掩护主力向开封进军，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至城下，屯于刘家寺。两河宣抚使范讷知金军渡河，拥军北走。

在金军南下途中，宋钦宗不断派出使臣去金营求和，金人佯与谈判，不断提高价码，宋廷“凡有所求，悉从其请”，[42]从“割让三镇”，以”黄河为界”，直到奉衮冕、车辂等御宝给金太宗完颜晟，并尊其为伯父[43]。但金军奔袭开封如故。这时，宋西南两道援兵，已被主和派宰执唐恪、耿南仲遣回，于是四方无一兵到京，城中只有卫士及弓箭手七万人。宋廷将京城诸营兵万人分作五军，作为总预备队，随时应援京城各方面的作战。前军控置在顺天门，左军、中军控置在五岳观，由姚友仲指挥；右军控置在上清宫，后军控置在景阳门内，由辛承宗指挥。另集五万七千人分任京城四壁守御，各置提举官员负责指挥。同时遣使以蜡书间行出关去相州，任命原派去使金求和的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率河北宋军来援，并以京兆路（治所今陕西长安）安抚使范致虚为陕西五路宣抚使，督勤王军入援开封。

十一月二十七日，东路金军开始攻通津门，宋军也出城焚烧金军营寨。二十八日南道总管张叔夜率勤王兵至，屯于南门外，于闰十一月初九日率兵入城。东道总管胡直孺率军入卫汴京，与金军挞懒部战于拱州（今河南睢县），兵败被俘。

闰十一月初一日金宗望军又攻善利门，宋统制姚友仲率左军、中军支援守城部队，击退金军。初二日金宗翰西路军到达城下，屯于青城（青城有二，一在开封府城北，一在城南，为宋南北郊斋宫），其势益盛。于是合军猛烈进攻东城。宋将刘延庆率军御之，置九牛炮轰炸金军云梯，制止金军登城。金军知东城难攻，遂转移兵力转攻南城。先掘洞以掩蔽，并运薪、土填护龙河，架桥进攻。统制姚友仲选锐卒下城，分布弩炮，又在城上设虚栅，集中射手，箭如雨下，金军不能越桥，进攻受挫。金军又加造火梯、云梯、壕桥、撞竿、鹅车等攻城器械，准备再兴攻势。

十四日，金军准备进攻朝阳门，宋军士三百余缒城出战，杀敌数百，复缒而上。金军筑高达百尺的望台，下视城中，以飞火炮焚烧城墙上的楼橹；宋军将士随毁随修。金军又造云梯，施大轮，并以革掩蔽，继续攻城；宋军将士出钩竿拄之，使不得进，近者以钩矛取之，发火焚梯，金军屡攻屡被击退。

金军复用鹅车进攻北城；宋军以九牛弩射之，一发击穿三人，金军攻势又挫。金军又在南城进攻，张叔夜与范琼分别指挥部队袭击金营，焚烧其炮架。金军以骑兵来袭，宋军未成阵而奔溃，自相践踏，溺护龙河死者千人。

宋军经过几番激烈作战，兵力减耗很大，城内兵可用者只有卫士三万，但也十失五、六，勤王兵又不至，时值大雪天寒，士卒冻栗不能执兵器，仍勉力向敌挑战，以示有为。金军久攻不克，加紧实施“既打又谈”的策略，一面加紧攻城；一面派使入城“议和”和借粮，改低要求皇帝出盟为亲王宰执前往议和，以麻痹宋廷，懈怠军民斗志，并用借粮来加速消耗汴京存粮，陷军民于饥饿无力抗御的处境。

赵宋统治集团在外无援兵，内无战力的时候，不敢依靠人民力量来抗金，而根据丘浚感事诗中："郭京、杨适、刘无忌，尽向东南卧白云"两句虚无的话，于市人中找到无赖郭京等人，组成所谓"六甲正兵"、"六丁力士"、"北斗神兵"等等，认为依靠神兵"可以生擒金二帅，而扫荡无余"。〔44〕

宰相何栗屡催郭京出战，郭京再三延期。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风雪大作，郭京终于命令七千七百七十七个"神兵"出战，郭京与张叔夜坐在城楼上，大开宣化门，观"神兵"出城攻击金军。金兵分四翼迎战，"神兵"溃败，时城门急闭，"神兵"堕死在护龙河者填尸皆满。郭京藉口说下城去"作法"，带着残兵南逃。金军趁势登城，四壁宋军皆溃，金军焚南薰诸门，宋统制姚友仲死于乱军。四壁守御使刘延庆夺门出奔，为金军追骑所杀。统制何庆言、陈克礼，中书舍人高振力战，与其家人均被害，京城遂破。汴京军民愤激万分，拥到驿馆杀死金使，聚众讨领甲胄和武器准备巷战。金军"剑兵不敢下"，据四面城垣而守。于是女真贵族又重弹"和议"的老调，声言"议和退师"，宋廷投降派又为其所骗，用他们自己的言行，瓦解了汴京军民的斗志。金军达到不经激烈战斗而完全占领汴京的目的，逼宋钦宗到金营请降，扣为人质，叫他下诏，罢勤王兵，割两河，输金帛。

十二月，宋康王赵构设大元帅府于相州，有兵万人，分为五军渡河进至大名。副元帅宗泽以二千人与金人力战，破金人三十余寨，渡河与赵构合，请速入援。接着知信德府梁扬祖以三千人至，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部皆在麾下，兵威稍振。可是这时宋钦宗派曹辅带诏书至，说"金人登城不下，方议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动。"〔45〕宗泽极言金人狡计，是为缓兵之计，宜速入援。但投降派耿南仲、汪伯彦正在军中，力为阻难，劝赵构派宗泽先行，实际是排挤宗泽趋澶渊，使其不得参与元帅府事。

宋陕西五路宣抚使范致虚，会陕西制置使钱盖帅十万兵赴

援，得知汴京破，钱盖和西道总管王襄逃走。范致虚独与西道副总管孙昭远、环庆帅王似、熙河帅王倚率步骑号二十万趋汴京。致虚勇而无谋，军中事皆听于赵宗印，而宗印实不知兵。师出武关至邓州千秋镇，金将娄室以精骑冲之，宋军不战而溃，死者过半。王似、王倚、孙昭远留陕府，致虚收余兵入潼关。至此，诸路勤王军除宗泽一军仍战斗在大名、开德地区外，其余或退或溃，康王赵构拥兵八万向东远去东平（今山东东平）。

面对金军的进攻，赵恒严禁人民“以防护为名，于炉头打造兵器”，[46]还将掩杀金兵的李宝等十七人斩首示众，不准抗金，这充分暴露了宋朝廷的腐朽。

女真主将惧怕宋州郡抵抗生变，放宋钦宗赵恒回宫，要他遣使诏谕各地“无得轻动”，并搜括金银、绢帛，不仅宗室官宦，所有戚里民户、杂使倡优均被搜括殆尽。

女真贵族利用腐朽的宋廷君臣，经过一个多月的讹诈和掠夺，在政治上物质上满足贪欲后，由金帝完颜晟下诏废宋道君太上皇赵佶及宋钦宗赵恒为庶人，强迫他们到金营（青城）拘留起来。三月初七日立通金的张邦昌为大楚皇帝，都金陵（今江苏南京），目的是利用这个傀儡为其统治黄河以南的宋朝旧域，先巩固已占领的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统治，尔后再议南侵。

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三月二十八日，金东路军经滑州，四月初一日西路军经郑州渡河北撤，掳去道君皇帝赵佶、钦宗赵恒以及后妃、亲王、太子、宗室、朝官等三千余人北去。汴京所有金帛珍宝玩物、法驾仪仗、礼乐器具、天文仪器、皇家所藏书籍、天下册府地图等等均被洗劫一空。这就是史称的“靖康之祸”。北宋皇朝建国一百六十七年。至是被女真奴隶主贵族覆灭了。

宋、金战略及其成败原因

金军第二次南下作战，改善了前次两路军互不协同以致东路

军孤军深入的缺点，东西两路同时发动攻势。西路军攻下河东战略要点太原；东路军首先击破处于东西两路军中间的宋在两河唯一的一支机动部队种师道军，消除了尔后相互协同和长驱南下的主要障碍，然后围攻真定、中山，解除后顾之忧，使东西两路军得以约期南下，并肩前进，在两个方向上强渡黄河。

西路军打下太原后，以一部向汾州、平阳方向进攻，主要是掩护西路军的右侧，防止陕西方面宋军出击；主力经上党、天井关、直奔河阳渡口。宋各府州守军或降或溃、金西路军迅速前出到黄河北岸。

金东路军避开磁州、浚州宋有备方向，直趋恩州折而向南，急趋大名李固渡渡河，长驱直下汴京。孙子说：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47]《金史》论赞宗望曰：“席卷而南，风行电举，兵无留难，再阅月而汴京围矣。所谓敌不能与校（较）者耶。”“《管子》曰：‘径于绝地，攻于恃固，独出独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谓乎！”[48]

金东、西两路军先后到达汴京，兵力处于优势，在构成围攻正面的同时，派军东向南京（应天府），据洛阳，趋潼关，南向颍昌（今河南许昌），构成宽广的对外正面，击破来援宋军，从而保证了主力围攻汴京的成功。

女真贵族利用宋廷割地求和的方针，继续采用“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不断向宋廷提出和议的条件，直到最后金军攻占汴京城墙，不敢下城进行巷战时，还大弹“和议”的老调，声言议和可以退军，以瓦解汴京军民的斗志，骗宋廷为金军收括财宝，并骗得宋钦宗赵桓亲赴金营上降表而加以扣留，将宋帝宗室大臣一网打尽。所谓“以和议佐攻战”，其实质是以“和议”为烟幕弹，诱惑宋朝君臣放松警惕，丧失斗志，最后一举歼灭的一种手段。“兵不厌诈”，宗翰、宗望并用军事压力和政治欺骗，达

到了纯军事力量未能取得的战果。

以宋钦宗赵桓为首的赵宋统治集团，在战争危急存亡的关头，制定不出团结御侮的正确战略，只有采取割地、纳币甚至逃跑和屈膝投降的政策，断送了北宋皇朝的统治。韩琦曾说过："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49〕"割地、宝器、卑辞、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把国家治好）为足"。〔50〕宋钦宗不去大力谋求治道，图强自立，终于落个臣虏国亡、家破身辱的结局。

由于赵佶亲信蔡京、童贯等"六贼"，纵容他们长期把持朝政，宋廷中鲠直忠贞之士所剩无几，金军第一次南下围汴京时，全仗李纲和种师道等人坚决主张抗金，才阻止了宋钦宗赵桓逃跑，保住了汴京。但在金军北撤后，李纲即受主和派陷害，被无故撤职，赶出朝廷。正如太学生陈东上书所说，宰执重臣"庸缪不才，忌嫉贤能，动为身谋，不邮国计，所谓社稷之贼也"。这种局面的造成，北宋皇朝统治集团的头子——赵佶、赵桓是应负主要责任的。

有论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女真兴起时社会仍停滞在奴隶制，生产力远不如已经进到和大大发展了封建社会生产力的辽和宋先进，为什么落后的生产力、落后的民族、竟能打败生产力先进的国家？我们认为直接决定战争胜败的是战斗力，战斗力包括自然的人文的物质和精神在作战中发挥出来的综合力量。生产力只是战斗力构成中一个因素，远非全部因素，更不是决定的因素。《孙子》开宗明义第一篇《计篇》就提出"五事、七计"，来校计敌我的战斗力，并且说，"吾以此知胜负矣"。试就其中关系战斗力至大的万众一心、杀敌致胜的"道"来分析："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女真在反辽战争中，初起时是被压迫民族反对统治者的正义战争，上下同欲，谋求摆脱辽的压榨，万人一心，战志坚而战斗力强。加之女真采取猛安、谋克制度，军民一体，壮者皆兵，易于动员管理。阿骨打曾下令，作战有功，奴隶可以改变地位，成为平民，

这对从事战争者有极大的鼓舞。此后灭辽侵宋，虽然战争性质已经改变，但女真贵族以爵禄和掠夺土地、财帛、奴隶作为诱饵，在对手不强的条件下，仍能鼓动大小奴隶主勇跃参加战争。反观辽之所以失败，原因虽多，主要是“失和”。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到了末期，不仅所属诸部人民叛离，而且契丹统治集团内部也自相残杀，相继出现反叛和投敌。《吴子》指出：“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和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辽金战争中，辽方这四不和俱全，如辽天祚帝亲征，在护步答冈正图决战之际而御营副都统章奴潜回上京发动政变；天祚带诸子争立，自戕骨肉；都统耶律伊都为大臣肖奉先所谗而率部降金等等。

至于北宋之所以败亡，主要是政治腐败，收括过甚而遭到广大人民的反对，又畏金如虎，执行斥地求和的错误方针，但传统军事政策的恶性发展，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丧失警惕和斥地求和，前面已经评过，这里主要就宋代的传统军事政策申论几点所见。

宋代传统的军事政策，从赵匡胤起至以后历代君王，都是用心在“重内患，轻外忧”上，认为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若奸邪为内患，就非常可怕了。以此为中心，就采取了一系列自行削弱自己军队战斗力的措施。兹举其主要的如下：一是把军权过分集中于皇帝，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统兵的将领没有作战的指挥权，必须按照远离战场的皇帝的指示作战。如此次为支援被金兵围攻的太原，曾派种师中和李纲两度进兵，都由于统一指挥大权在宋钦宗手里，各路宋军由赵恒直接控制，没有配合而失败。二是重文轻武，用文人典兵，而文人知兵能兵的毕竟很少。如第一次金人南侵消息传到汴京，宰执们包括枢密使在内惊慌失措，只想逃跑，投降、割地请和，惟有兵部侍郎李纲主战守汴，结果还因有功而遭罪斥！三是对武将猜疑不信任，把指挥监督军队大权交给宦官。这次以童贯为领兵主帅，联金图燕出谋划策的是

他，领兵攻燕屡打败仗的是他，勾结金人引狼入燕的是他，听到金人南侵，最先逃跑的也是他。宋军的精锐禁军又交内侍梁方平统率，以致黄河防线一触即溃。相反，对领兵的武臣，则有功必抑，有权必夺。如李纲以亲征行营使守汴有功，种师道勤王之师到城外，理应使城内外宋军统一指挥，才能发挥战力，但赵桓却把指挥权分割为二，城内城外宋军各自不相统属，并把李纲指挥的半数兵力划归种师道。他的用心是怕李纲功高权重夺他王位，在兵临城下，败亡迫在眉睫的关头，仍然忘不了这条"祖训"！最后一条是兵多而不能战。宋朝实行募兵制，募来的兵多是贫苦农民和城市失业游民，历年训练松懈，多数不习战事，正如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五月，欧阳修上疏所说："今沿边之兵不下七、八十万，可谓多矣。然训练未精，又老弱虚数，十人不当一人，是七、八十万之兵，不得七、八万人之用，加之军中统制支离，分多为寡，兵法所忌，此所谓不善用兵者虽多而愈少，故战而常败。"君如此，臣如此，兵如此，其败亡是很难避免了！

注　释

〔1〕见《三朝北盟会编·女真古肃慎国》

〔2〕《大金集礼》卷三

〔3〕《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4〕《金史·欢都传》

〔5〕《续资治通鉴·徽宗政和三年》

〔6〕《续资治通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7〕《宋史·黄履传》

〔8〕《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9〕《续资治通鉴·宋徽宗政和五年》

〔10〕《辽史·天祚帝》、《金史·太祖纪》

〔11〕《金史·斡鲁传》

〔12〕《金史·斡鲁古传》

〔13〕《续资治通鉴·宋徽宗政和四年》

〔14〕〔15〕〔16〕　《金史·太祖纪》

〔17〕 《辽史·天祚帝帝纪三》

〔18〕〔19〕 《金史·宗翰传》

〔20〕 《续资治通鉴·宋徽宗政和六年》

〔21〕 《白豪子兵罍》卷五

〔22〕 《三朝北盟会编》卷八

〔23〕 《续资治通鉴·宋宗徽宣和四年》

〔24〕 《三朝北盟会编》卷五

〔25〕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

〔26〕 《续资治通鉴·宋徽宗宣和四年》

〔27〕 《金史·太祖纪》

〔28〕 《金史·宗翰传》

〔29〕〔30〕〔31〕 《续资治通鉴·宋徽宗宣和四年》

〔32〕 《宋史·宇文虚中传》

〔33〕 《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复燕云》

〔34〕 《文献通考·卷五十六》

〔35〕 《续资治通鉴长编·熙宁八年》

〔36〕 《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四年、元符二年》

〔37〕〔38〕〔39〕 《续资治通鉴·宋钦宗靖康元年》

〔40〕 金东路军北撤日期，《金史》说初三日"金军退"，《宋史》说初九日"金引军北去"，《东都事略》说十一日"金军退"。今从《宋史》说。

〔41〕 《续资治通鉴·宋钦宗靖康元年》

〔42〕〔43〕 《靖康要录》卷十二

〔44〕〔45〕 《续资治通鉴·宋钦宗靖康元年》

〔46〕 《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二年》

〔47〕 《孙子·虚实第六》

〔48〕 《金史·宗望传》

〔49〕 《兵鉴全集》卷一

〔50〕 《吕氏春秋·始览》

第二十六章　金与南宋的战争

第一　金灭北宋后的形势和南宋政权的重建

一、北宋亡后的形势

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金军俘虏宋徽宗赵佶、宋钦宗赵桓二帝北去后，黄河以南及陕西等广大地区依然还在宋朝的统治管辖下。即使是河东、河北，金军也只打开了通往开封的两条道路，没有力量占领广大地区。当时河东仅失太原等七郡，河北仅失真定等四郡，其余州府的军民都还坚守城池，中原各地人民纷纷组织武装抗金，拿起刀枪，顽强战斗，写下了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雄伟篇章。他们活跃于大河南北、太行东西，成为反抗金军的重要力量。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八字军——曾被张所任命为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的王彦，率领部分义军转入太行山区，坚持斗争，称为八字军，得到两河人民的积极响应。八字军与金军大小数十百战，威震燕赵，有力的牵制了金军的南侵。

红巾军——起初在晋城、长治一带活动，后来扩大到河北、陕西等地，声势浩大，组织严密，“心协力齐，奋不顾死”，屡败敌人。金军痛恨红巾军，逐捕甚急，红巾军的队伍反而日益扩大。

五马山义军——五马山在今河北赞皇县境内，首领是武翼大夫赵邦杰和保州廉访使马扩。后来他们找一个自称信王赵榛的人做主将，加强号召力，义军发展到十余万人，在河北、山西等地产生很大影响。

梁山泊水军——梁山泊起义农民，遭到宋军镇压后，继续以

梁山泊为据点，坚持斗争。金军南侵，中原沦陷，以张荣为首的水军，在淮东形成一支强劲的抗金力量。

处于金军后方幽燕地区的人民，也配合中原人民，纷纷起义，反抗金朝的统治。这就迫使金朝统治者不得不把主要兵力用来继续进攻河东、河北的要地河中（今山西永济）、河间（今河北河间）、中山（今河北定县）等地，以确立对两河（河东路、河北路）的统治。靖康二年四月，金西路军攻破陕州；五月，又攻取河中府，取河东西南、西北诸州，分屯太原、河中、安邑诸地。

金东路军主帅完颜宗望（斡离不）死，以右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代之。一面进攻河北诸城，一面分据磁州（今河北磁县）、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准备再次南下侵宋。

这时北宋禁军已所剩无几，勤王各军有的溃散，有的自找出路，北宋中央及地方官员有的逃走，有的据城自保，中原一片混乱。

面对上述情影，宋朝士大夫阶级和人民为了抗金，都希望能建立起一个巩固的政权，组织起一支正式的、有战斗力的武装。

二、宋高宗赵构即位重建政权

宋靖康二年五月，康王赵构在南京（河南商丘）即帝位，重建南宋皇朝，改元建炎，史称“南宋”。赵构就是南宋第一个皇帝宋高宗。

宋高宗首先任命宰执，以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黄潜善为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以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张浚为摄太常少卿，并重任命各主要府州的文武官员。

关于建都何处，宋高宗及黄潜善、汪伯彦一伙人主张“巡幸东南”，即把都城迁到更安全的“东南要会”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市）去。〔1〕

李纲则认为，开封是“宗庙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应该准备回开封“驻跸”。〔2〕如果因为开封一时残破，未便久

留，则可进行修葺。在修葺期间，都城可暂迁长安、邓州（今河南邓县东南）或襄阳，反对迁都建康。

李纳又从军事上考虑，建议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随时三幸”，使金人难以选择进攻目标。朝廷里议论甚多，争论不决。但放弃中原，逃往东南的主张，在朝廷中始终占着优势。

三、南宋重建宋军

宋高宗置御营司、统辖五军，以黄潜善兼御营使，将他在相州任天下兵马大元帅时所招募的义士，收容的勤王军，救援太原的部队和太原、真定等地奔向商丘的溃兵（约万人），以及宗泽率领来会的万人，编组为五军（左、右、前、中、后军）。御营司设都统制，各军设统制、副统制。以王渊为都统制，韩世忠、张俊、苗傅等并为统制官，又命刘光世为五军都提举。这是南宋重新建立军队的开端。

四、南宋对金战、和方针的争论

南宋从政权建立时起，就开始进行可耻的投降活动。宋高宗赵构及黄、汪一伙完全没有抗金的勇气和决心。他们认为，北宋皇朝那样的国力尚且被金军击溃，初建的南宋政权更休想与金抗争。他们一心想用屈膝投降的办法来换得金对自己政权的承认。赵构明知道他的父兄是不可能回来的，但他却借着探望及迎请二帝为名，不断派使者到金朝去试探投降条件。在朝廷内部，他们公开说当时二帝被掳在金，不议和会使二帝遭害，〔3〕公开主张“割地厚赂以讲和”。

抗战派的代表人物李纲则认为，女真贵族一向以和议迷惑宋廷，以致使北宋灭亡，今天如果仍以“和议”为是，“是将以天下畀之于敌而后已”。他认为女真贵族的贪婪是永远满足不了的，即使“割天下之山河，竭天下之财用”，也绝不可能满足金人的无穷欲望，退让投降只能更助长其凶焰。“故今日法勾践尝胆之志则可，法其卑辞厚赂则不可”。因此，李纲坚决主张“一切罢和

议”、“专务自守之策”，加紧备战，以三年以后，能“雪振古所无之耻”。

至于迎请二帝的问题，李纲认为，只要宋内部加紧准备，坚决抗金，一旦国势强盛起来，二帝自然不待迎而自回，“不然，虽冠盖相望，卑辞厚礼，终恐无益”〔4〕。因此，他反对利用遣使为名去进行投降活动。

五、南宋重建抗金防御和采取的有关战略措施

宋高宗即位之初，在李纲坚持下，曾作了一些准备抗金的活动，派遣统制官马忠和张换各率所部五千人自恩州（今河北故城东南）北进，袭击河间、雄州（今河北雄县）的金军；遣薛广率所部三千人自内黄(今河南内黄)过河，会合河北山寨义军，去收复滋州、相州等地；张琼率所部三千人自开州（今河南濮阳）西渡河，会合水寨义军与薛广部互为声援。这可以看出，南宋初建时，尚有巩固河南，与金军争夺两河的战略企图。但宋高宗赵构的宠臣黄潜善、汪伯彦一伙，顽固地坚持投降路线，赵构也想逃往东南，“偷安岁月”，于是争夺两河的战略企图就被放弃了。由于黄、汪二人都“不餍人望”，对各路军民没有号召能力，宋高宗只好利用李纲在金军第一次包围开封时坚决抗金所获得的声望，帮助南宋朝廷支撑一下局面，所以任命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侍郎。

李纲认为：当前的形势是欲战不能，欲和不可，应立即整顿混乱局面，改革军政，先行防御（“专以守为策”），待局势改善，士气振作之后，再考虑反攻。他主张沿河、沿淮、沿江建置帅府，“以扼其冲”，又把州郡分为要郡、次要郡，各固定驻扎不同数目的军队，分守要点；并在江淮、沿江制造战船、编练水军，以阻止金军南下。他又认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在于经略、控制“国之屏蔽”的河北、河东，只要这两个地区防务巩固，“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5〕

李纲还建议在两京及关陕、河北流民中募兵各十万人，轮番

到行在（临时都城）担任卫戍；购置马匹以扩充骑兵；制造“决胜战车”以克制金军骑兵；以及劝富民出钱助军等等[6]。

李纲的这些措施，可以看出他的战略方针是：重整军备，建立一支可靠的武装力量，经略、控制两河，利用河、淮、江三大障碍而固守河南及江淮，以巩固南宋的统治。宋高宗赵构正需要有一支可用的武装，以稳定自己初建的统治，因此，当李纲建议采取这些措施时，都予以同意。根据李纲的推荐，高宗任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在大名府置司；任命傅亮为河东经略副使，在陕州置司，以联络当地义军，经营两河，抗击金军。并任命宗泽为东京（开封）留守，负责保卫开封；范讷为南京（商丘）留守；钱盖为陕西经抚使。

对于南宋政权的建立，李纲、宗泽跟朝野士大夫一样，无比欢欣，都希望它奋起抗金，完成中兴事业。但事与愿违，这些愿望后来都落了空。

六、南宋对待两河、中原人民抗金武装的政策

李纲在抗金斗争中，从一开始就依靠人民武装力量的支持。李纲认为两河军民奋起抗金，是为“朝廷坚守”，同意御营副使张慤所说的“河朔之民，愤于兵乱，自结巡社”，应该组织起来，“寓兵于农”，使合力抗击金军的意见。他劝宋高宗下手诏，鼓励两河军民继续抵抗，又建议以张所、傅亮经制两河，使他们先招募民兵，逐步进军收复失地。

黄潜善、汪伯彦等投降派对两河人民的抗金斗争，完全采取敌视态度，称他们为“盗贼”，是心腹之患。赵构刚一即位，黄、汪等即建议“罢诸盗及民兵之为统制者”，选择精锐编入官军。李纲竭力陈述：“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7]他极力主张利用人民的力量来抵御金军。

李纲推荐宗泽做东京留守，宗泽在开封联结两河山寨忠义民兵以后，上书高宗说：

“山寨忠义之民，相应者不啻百万……愿陛下早降回銮

之诏……中兴之业，必可立致。”〔8〕

但黄、汪及其党羽，竭力攻击李纲建议设置的河北招抚司和河东经制司，说招抚使设立后，河北“盗贼”更多，应速罢废。傅亮才出发十天，黄、汪就指责他逗留不进。宋高宗遂罢免张所、傅亮、废除招抚、经制两司。

七、宋廷罢免李纲，逃往扬州

从南宋政权一建立，朝廷内部就存在着抗战派与投降派的斗争。李纲被任为宰相以后，加强了抗战派一方的力量，对各项重大战略措施，都积极实行。但是，以宋高宗为首的投降派，握有“皇权”至上的法宝，李纲不久即被罢免。

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及其党羽，为打击、排斥坚持抗金的李纲，说李纲“为金人所恶，不宜为相”；“名过其实，有震主之威，不可以为相。”李纲也以辞去相位表示与投降派势不两立。宋高宗就以李纲建议“募兵、买马”，准备抗金是“骚扰”为罪名，指使朱胜非起草诏书，说李纲“狂诞刚愎”，实为渡河之忧，“设心谓何，专制若此！”遂罢李纲。李纲当了七十五天宰相。就被罢官。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说：

> “纲在位则措置两河，兵民稍集，纲去则经制、招抚罢，而两河无兵矣。纲在位则伪臣、叛党稍正典型，纲去则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

李纲确实是一身系天下之安危，他的一系列言行表明，他不愧为两宋之际抗金的中流砥柱。

李纲被罢免后，他所制定的抗金措施全被废除。赵构和黄、汪为首的投降派控制了军政大权，十月间即实现南逃计划，南宋朝廷全部逃到扬州。这个逃跑行动，等于向金人表示：南宋朝廷已经决定放弃中原了。

第二　金军第一次全面南侵和宗泽保卫东京

一、金军全面南下的战略企图和部署

宋高宗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十月，宋高宗赵构自商丘出发去扬州，中原人心动摇，将士离心。金太宗完颜晟以傀儡张邦昌被废为借口（金军掳徽、钦二帝北去时，立张邦昌为楚帝，张居位三十三日，因众议不容退位，后南宋责令张邦昌自尽），不待河北、河东州郡尽皆攻占，同意完颜宗翰（粘罕）的意见，下诏南侵。十二月，征集燕京八路民兵，一面留军两河，继续进攻那里的抗金武装；主力由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统一指挥，从陕西、河南、山东分三道向南宋发动全面进攻：

——东路军由右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及其弟完颜宗弼（兀术）率领，自燕京经沧州(今河北沧州市东南)渡河攻山东；分遣阿里、蒲卢浑分军进攻淮南。

——中路军由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率领，自云中（今山西大同）下太行，由河阳（今河南孟县）渡河攻河南；分遣银可术（尼楚赫）等率军攻汉上（今湖北襄樊市）。

——西路军由陕西路都统完颜娄室、副都统撒离喝（萨里干）、黑锋（合富）率领，渡河经同州（今陕西大荔）攻陕西。

金军又在燕京造船准备以水师由海道进攻江淮。

金军的主要战略企图是乘乱进军，夺取陕西、河南、山东战略要地，相机进出两淮，为尔后大举攻宋准备条件，使南宋不能在黄河以南恢复统治，隔开宋军与河北义军的连系，以便扫荡并巩固河北。

十二月初八，各路金军开始行动。

二、金西路军长驱入陕

完颜娄室率西路军自慈州(今山西吉县)隰州(今山西隰县)南下到达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利用夜暗从上流履冰偷过，

袭占韩城（今陕西韩城）。宋将刘先弼放弃华州(今陕西华县)，退保邠(今陕西彬县)、岐(今陕西岐山)。金军随即破同州（今陕西大荔），围永兴（今陕西西安市），经略副使傅亮投降。宋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正月，金军进入长安。尔后，金军主帅娄室乘胜挥军西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并分军北上袭扰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市）及陕（河南陕县）、华、陇（今陕西千阳）、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州，陇右震动。

金娄室军主力向巩州（今甘肃陇西）西进时，在新店被宋军伏兵打败，陇右都护张严东出追击金军。宗翰率军自河南西向入关以援金西路军。

鄜延经略使王庶号召军民起来抗击金军，陕西人民纷纷组织义军不下十余支。金军望见渭河南岸义军满野，不敢渡河。金西路军于四月撤军东归。

三、金东路军进攻山东

金东路军一部先自沧州(今河北沧州)渡河攻棣州在乐安（今山东广饶）击败宋马括军二十万，于（今山东惠民），主力由完颜宗辅率领，在乐安（今山东广饶）击败宋马括军二十万。宋建炎二年正月，阇母部攻陷潍州（今山东潍坊市）、宗弼部攻陷青州（今山东益都）。二月，金东路军“留大军夹河屯田而还”。[9]

四、金中路军进攻河南、宗泽保卫东京

金中路军主力在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以北集结，监视在河阳的宋军，遣万户银可术（尼楚赫）渡河，向河阳宋军背后进攻，宋军溃退。金主力渡河攻占汜水（今河南汜水镇），准备攻略开封。宋西京留守阵昭远弃城南逃，中路军乘虚占领西京。宋建炎二年正月，宗翰命银可术军继续南下，攻陷汝州（今河南临汝）、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北）、房州（今湖北房县）、邓州、唐州（今河南唐河）、蔡州（今河南汝南）等地。

东京开封是抗金斗争的前哨，也是支援两河军民抗金斗争的重要基地。这个曾经是北宋政治中心的东京，经过金军的洗劫，已

非常残破，秩序异常混乱，各路来的勤王兵也无纪律约束，物价腾贵，人民生活痛苦万状。宗泽到开封府后，立即着手整顿：首先是安定人心，接着又开始稳定物价，开封的市面逐渐恢复正常。原东京留守范讷被劾落职，宗泽升为东京留守兼知开封府。

宗泽非常重视两河人民的抗金斗争，积极与两河人民武装力量建立联系：有在濮州（今山东鄄城）一带十分活跃拥众号称七十万的义兵首领王善所部；集中在开封一带的义军杨进、丁进、王再兴、李贵等人领导的义军十余万人。宗泽动以忠义，王善等深受感动，愿为国家效力，开封外围的军势，顿时大振。

宗泽对开封四面的城壁，选派统领负责防守，把招募来的义军分隶四壁统领指挥，还把开封的丁壮组织起来，作为后备力量。

在开封的周围，根据地形特点，建筑了二十四个坚固堡垒，各驻兵防守，保卫开封。

沿黄河一线，宗泽率领部队在黄河南岸建筑了一层一层象鱼鳞一样的纵深阵地，派兵驻守。还挖了许多又深又宽的壕沟，设置障碍物，以阻拦金军骑兵的进攻。宗泽为抗击金骑兵的冲击，特地制造一千二百辆“决胜战车”。

由于宗泽的悉心经营及开封军民的努力，一个坚固的防御体系，仅用五个月时间就基本完全了。

金军中路军渡过黄河，完颜宗翰自率主力向开封进逼，企图一举攻下开封。

金军攻略开封的部署是：对开封正北面的坚固防御，只用一部兵力加以牵制；派银可术率军南下各州府，切断开封与豫南各郡的联系；金东路军一部，协同西路军主力从东西两个方向夹击开封。

宗泽为对付金东、西两路军向开封逼进，派统制官刘衍、刘远各率兵三万、战车二百辆，分头去增援滑州（今河南滑县）、郑州（今河南郑州市）。

金完颜宗弼攻下青州后，又率领金东路军一部向开封进犯，

沿途遭到宋军的坚决抵抗和坚壁清野，得不到给养，不久就撤回河北。

宋建炎二年正月，金中路军从郑州向开封进犯，统制官刘衍在开封以西的板桥与金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终于击败金军，乘势收复延津（今河南延津）、胙城（今河南汲县东南）等地。

二月，金中路军再次纠集主力进犯开封。宗泽立即派统制官李景良、阎中立及统领郭俊民率军万余，西出抗击金军，由于轻敌大意，行军无戒备，被金军击败。

金军乘宋军退回开封的机会，出兵进攻滑州。宗泽派部将张伪率五千精兵去增援滑州。张伪突然袭击几万金军，使金军受到严重损失。接着宗泽又派统领官王宣率五千精骑前往增援，击退了金军的进攻。宋军将士虽作出了相当大的牺牲，但终于战败金军，保住了滑州。

此后，金军对开封采取小股骚扰，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

三月，金中路军焚掠西京，驱赶洛阳、襄阳、郑、蔡等十余州的人民迁到河北。宗翰"分留将士夹河屯守，而还师山西。"[10]金军的这次攻势基本上结束了。

在金军第一次全面南侵的攻势结束以后，宗泽由于忧愤成疾，于七月疽发于背而死去。临终前一日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临终时还连呼三声"过河"！念念不忘抗金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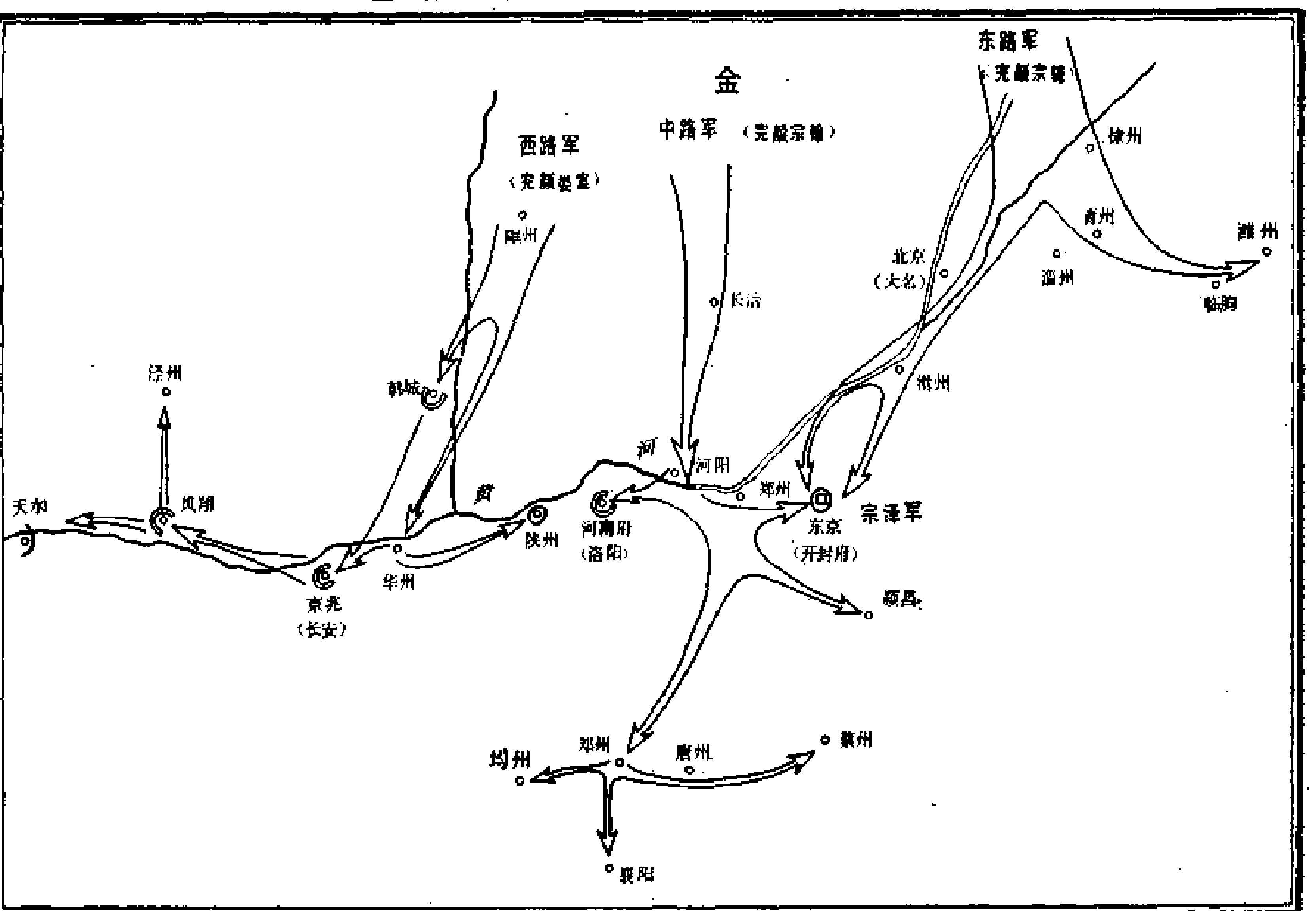
宗泽保卫开封期间，非常重视连络忠义民兵，两河义军奋起抗击，又一次掀起了抗金高潮。宗泽死后，后继无人，两河民兵再一次被镇压下去。

宗泽领导开封军民的英勇斗争及两河人民对金军的坚决抗击，不仅保卫了宋都东京，更重要的是，粉碎了金军进犯江淮的计划。

宗泽在赵构一意南逃的情况下，看到了民气激昂，义军可用，抓紧时机，在很短的时间内，有计划地完成了开封及其外围

金军第一次南下中原和宗泽保卫东京示意图

(28—1图)



防御阵地的构筑，把一个被废弃了的北宋政治中心，筑成一个重要的抗金堡垒，采取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依托坚城，多次主动出击，破坏了金军攻略开封的计划，为保卫东京，挫败金军的攻势，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　金军第二次全面南侵

一、形势和金宋双方的战略决策

（一）一般形势

流亡在扬州的南宋朝廷，始终仇视人民，把义军看做“盗贼”，把抗战领袖看做野心家。他们不但不支持北方的抗金斗争，反而加以破坏，使英勇的北方军民从孤立苦撑到逐渐走向失败。宋高宗赵构南逃扬州后，人心动摇，其中有一部分首领见大势已去，逐渐由抗金转为割据自立。

宗泽死后，宋廷以“酷而无谋”的杜充任东京留守。杜充到东京后，一切措施与宗泽相反，义军首领们感到十分失望，于是纷纷散去。

八字军首领王彦到扬州见黄潜善、汪伯彦，反对和议，请求利用两河人心，大举北伐，因而受到降职处分，带去的八字军也划归御营指挥，留在河北的无人指挥，遂逐渐瓦解。五马山寨的首领马扩到扬州，宋廷只命他做河北应援使，金军出动军队围攻五马山，这个河北抗金中心被消灭了。

在这种形势下，两河、山东、陕西尚未失陷的州、府，孤立无援，也纷纷陷落。

（二）金第二次南侵的决策和部署

金太宗完颜晟闻宗泽死讯，南宋朝廷逃往扬州，北方义军无人支援，人心士气极度混乱，遂决定再次南下攻宋。完颜晟表示康王走到哪里，就打到哪里，象金军追击辽天祚帝耶律延禧那

样，要一举灭掉南宋。

在议论南下战略时，东、西两路军将领的意见发生分歧：河北(东路军)诸将主张停止用兵陕西，集中兵力于潼关以东南下；河东（西路军）诸将反对，认为陕西与西夏为邻，事体重大，兵不可罢；东路军元帅右都监阇母主张先定河北，然后再南进；宗翰提出："初与夏人约夹攻宋人，而夏人弗应。而耶律大石在西北交通西夏。吾舍陕西而会师河北，彼必谓我有急难。"并且"河北不足虞，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几种意见，议而不决。完颜晟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两用其策，他说：

"康王构当穷其所往而追之。俟平宋，当立藩辅如张邦昌者。陕右右地，亦未可置而不取。"〔11〕

于是采取东西俱进的方针，以扬州为东路军的主要进攻目标，追击宋高宗赵构，摧毁南宋政权；以延安为西路军进攻目标，隔断西夏与南宋的联系。

宋建炎二年八月，完颜晟以宗翰为统帅，其南下部署如下：

——西路军以完颜娄室为主帅，婆卢火为监军，率军攻略陕西五路，隔断西夏与宋的联系；牵制四川、陕西的宋军，以利于主力南下；

——宗翰率中路军与完颜宗辅率东路军，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会合后，渡河南下，并力向扬州进军；

——命银可术留守太原，耶律余睹留守云中，镇守后方。

预定金军歇暑以后，八月开进，十一月大举南下。

（三）宋廷的应战部署

南宋统治者闻金军将再次南下，于十月间急忙部署江淮防务：

——命左将军韩世忠率军自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推进至东平（今山东东平）；

——命中军统制官张俊率军自东京（开封）移往开州（今河南濮阳），以阻击金东路军南下；

——命马扩为河北应援使，号召河北军民策应韩、张两军作战；

——命扬州宋军修城浚壕，加强防御；

——命江淮诸军加紧练习水军；

——命沿江州府控制长江各渡口，封锁公私舟船，夜间停泊南岸，以防金军突然进行偷渡；

——在陕西方面，以知延安府王庶节制陕西六路军马，泾原经略使曲端为置制司都统制。

在此同时，黄潜善、汪伯彦把持的南宋朝廷也做了继续南逃的准备，派孟忠厚先护送隆裕太后去杭州。

二、金西路军进攻延安

宋建炎二年八月，金西路军娄室军首先发动攻势，经解州（今山西解县）渡河，破宋军于华州，遂取下邽（今陕西渭南北）。又败宋军于蒲城（今陕西蒲城），破宋军于同州。另路攻占丹州（今陕西宜川），遂向延安进军。

十一月，金军攻破延安后，娄室率军自绥德（今陕西绥德）渡无定河进攻晋宁军（今陕西佳县境），知晋宁军徐徽言据城而守。宋守将折可求以麟（今陕西神木北）、府（今陕西府谷）、丰（今陕西府谷西北）三州投降金军。次年二月晋宁军陷落，徐徽言殉职。

三、金东路、中路军并力南下

十月，完颜宗辅（讹里朵）率金东路军在清平（今山东清平西）击败宋河北应援使马扩军，向濮州前进。马扩南归。

宗翰闻东路军已开始进军，遂率军在黎阳渡河，与宗辅率领的金东路军在濮州会合。宗翰军围攻濮州，宋将姚端出其不意，率部出城夜袭金营，直攻中军，宗翰慌忙逃命。

金宗弼（兀术）军攻开州（今河南濮阳），不能下，也转而与宗翰军会攻濮州。宋濮州守军在两支金军的围攻下，坚守三十三天之久，在十一月中旬才被金军攻破。金军破濮州后，又接连攻

占开州、相州、大名等地。

这时，宋廷正派魏可赶往澶渊（今河南濮阳）向金求和。东京留守杜充决黄河口，以图阻止金军的进攻。从此黄河改道，由泗入淮。于是，金军转攻大名、东平。宋济南知府刘豫在杀害抗金将领关胜后，向金军完颜昌（挞懒）投降。此后，西起相州北至沧州，东至青、潍间各州府，先后都为金军所攻占。

金军攻陷东平后，宗翰于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公元1129年）正月，转锋南向，急趋宋高宗赵构所在的扬州，在金军攻占徐州后，宗翰派拔离速、耶律马五率一万骑兵组成快速部队，在泗州（今江苏盱眙）渡淮河，直奔扬州；又以精骑五千自滕县（今山东滕县西南）奔袭临淮关（今安徽临淮关）；宗翰自率主力向淮阳军（今江苏邳县东）前进，寻求韩世忠军而攻击之。

由于寡不敌众，韩世忠被迫率军南撤。在沭阳，韩世忠弃军走盐城，军中无主，遂相继溃散。

四、金军袭扬州后北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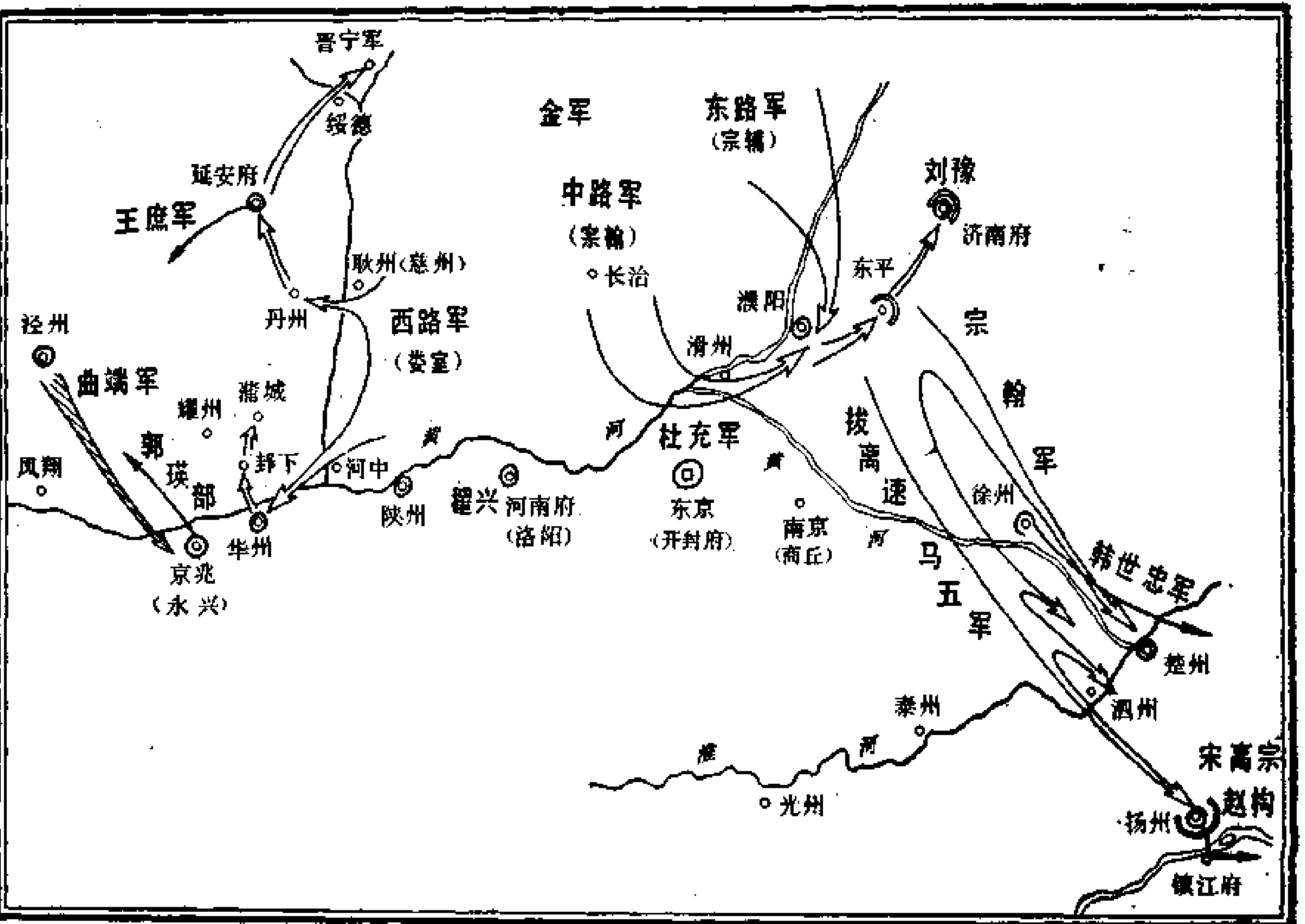
宋廷逃到扬州后，无所作为，对整个战局情况不明，黄潜善、汪伯彦"皆无远略"，对防淮还是守江迟疑不决。沿淮的军队士气低落，往往未战先溃。宗翰军在沭阳击溃宋韩世忠军后，乘势进占楚州（今江苏淮安）。这时快速部队已进至天长（今安徽天长）。

赵构在扬州得知消息后，也不通知黄、汪，立即带了御营都统制王渊、宦官康履等几个人狼狈出逃，从瓜州（今江苏扬州市南）乘小船逃往镇江。金将马五率领的先头骑兵，当天傍晚进抵扬州，听说宋高宗赵构过江南逃，立刻追到瓜州渡口，因无舟船，又兼大雨连降，平地水发，道途泥泞，马步俱不能进，只好停止追击。

宗翰派出快速部队，千里奔袭扬州，目的是捉获宋高宗赵构，一举消灭南宋政权。但由于赵构逃得快，没有达到追袭的战略目的。而江淮人民又纷纷起来抗击金军，尤其是李在打起五马

金军第二次南下中原东追赵构，西攻延安示意图

(20—2 图)



山寨义军和红巾军的旗号，在扬州以北的宝应等地组织义军抗击金军，给在扬州的金军造成不小的威胁，加上金军主力远在徐州一带，拔离速率领的快速部队随即北归。扬州被抢劫一空。

金中、东路军在南下途中，受到两淮军民的袭击，人马疲困，遂在“自争玉帛子女，饱其负载”以后，仅留一部兵力在江淮等地，主力撤军北归。

宗翰第二次全面南下，东追赵构，西攻延安，转战半年，从表面上看，似乎还取得一些战役上的胜利。但实际上西线虽占延安，陕西五路不久却放弃；东线金军沿用“穷追”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战略，“穷追”赵构，却因塞北、江淮条件各异而徒劳无功。结果东西两线在战略上都未取得成果。

第四　金军第三次全面南侵，渡江追击赵构

一、宋廷渡江后的情况和防御部署

（一）南宋渡江后的情况

宋高宗从扬州渡江南逃后，放弃了原来要迁都建康的计划，从镇江经常州、苏州、秀州（今浙江嘉兴市），直奔杭州。

由于宋高宗宠信黄潜善、汪伯彦，对金军南侵毫无防备，造成了扬州大溃败的局面。宋高宗迫于朝廷的舆论，不得不罢免两人宰相的职务。

御营都统制王渊曾极力主张把行都设在杭州，兼之他和宦官康履由扬州撤退时，用几百只船舶装运家产，人们对他们的愤恨达到极点。征营士兵都来自黄河流域，不愿逃跑退避，而赵构反把力主南迁杭州的王渊提升为同金枢密院事（枢密院副长官），这更使得所有部队兵士怨恨不已，其中护送皇帝后妃到达杭州的苗傅和刘正彦所率领的部队，则更为愤恨。

宋建炎三年三月，苗傅、刘正彦利用部队官兵对赵构的怨恨，发动兵变，杀死了王渊和康履等人，逼令赵构宣布退位，加

以幽禁，把赵构的一个不满三岁的儿子立为皇帝，另请隆裕太后孟氏垂帘听政。吕颐浩、张浚、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官员起兵，拥护宋高宗赵构复辟。四月初，迫使苗傅、刘正彦同意赵构复位。吕颐浩任宰相、张浚任知枢密院事。苗傅、刘正彦出走，被韩世忠追杀。

苗、刘兵变事件刚过，宋高宗赵构就派杜时亮和宋汝为出使金军请和，他致书完颜宗翰说：现在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諰諰然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劳师以远涉而后为快哉。”[12]赵构的无耻哀求，终未得到金统治集团的理睬。

金军两次全面侵宋，都已分兵攻略陕西。当时，陕西五路诸将彼此不相统属，各自为战，以致被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这时知枢密院事张浚向宋高宗赵构建议：“中兴大业，当自关陕始”。“如金军先发制人，经陕西而窥川蜀，东南半壁，也将难保。”张浚并且自告奋勇向高宗“请身任陕蜀之事，置司秦州（今甘肃天水）”。高宗立即答应他的请求，任命他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并特别允许他到川陕之后，“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13]

宋建炎三年五月，宋高宗赵构颁发任命张浚前往关陕的诏书，命他即日起程，并命王彦率八字军随同前往。

闰八月，宋高宗在建康召集文武商议行都所在，张浚、吕颐浩建议建都武昌；张俊、辛企宗请自岳鄂去长沙；韩世忠认为“国家已失河北、山东，若又弃江淮，更有何地！”主张不应再退。宰相吕颐浩放弃始建武昌之议，认为“金人之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目标）。今当且战且避，但奉陛下于万全之地。”于是部署防守长江，“防淮之议遂格”。[14]宋高宗向临安“且战且避”。

（二）江防部署

宋高宗赵构决定专守长江，派杜充以执政大臣的头衔，任建康行宫留守，全权负责长江防务。由东京带来的陈淬、郭仲荀、岳飞、戚方等部队和张俊一军，随宋高宗赴行都杭州，其余王瓁、刘光世、韩世忠等军，都留归杜充指挥。其江防部署如下：

——建康行宫留守杜充率军十余万人镇守建康；

——刘光世率军镇守太平（今安徽当涂）、池州（今安徽贵池），以后又移屯江州（今江西九江），以屏蔽南昌；

——韩世忠率军镇守镇江；

——辛企宗守吴江（今江苏吴江），陈昌恭守福山（今江苏常熟北），王琼守常州（今江苏常州市）；

——邵青为水军统制，率领一支为数不多的水军，布防于江上。

宋廷弃守淮河，长江天险已与金兵所共有，首尾数千里，难以处处设防，因此，弃淮守江是错误的。

二、金军南下的战略目标和部署

宋建炎三年二月，金军北撤后，一面派刘豫为京东、京西、淮南等地安抚使，利用傀儡军队控制河南；一面积极做渡江南下的准备。八月，乘南宋江防尚未巩固之际，决计大发燕云、河朔民兵十余万人，任命完颜宗弼（兀术）为统帅，分兵三路南下：

东路军——由左监军完颜昌（挞懒）率领，继续攻取山东、淮北，掩护中路宗弼军的左侧后的安全；

中路军——由宗弼亲自率银可术、布甫噶苏、托巴嘉、王伯彦等将领，率女真精骑、渤海军及汉军经淮西，直趋长江渡江南下，消灭南宋政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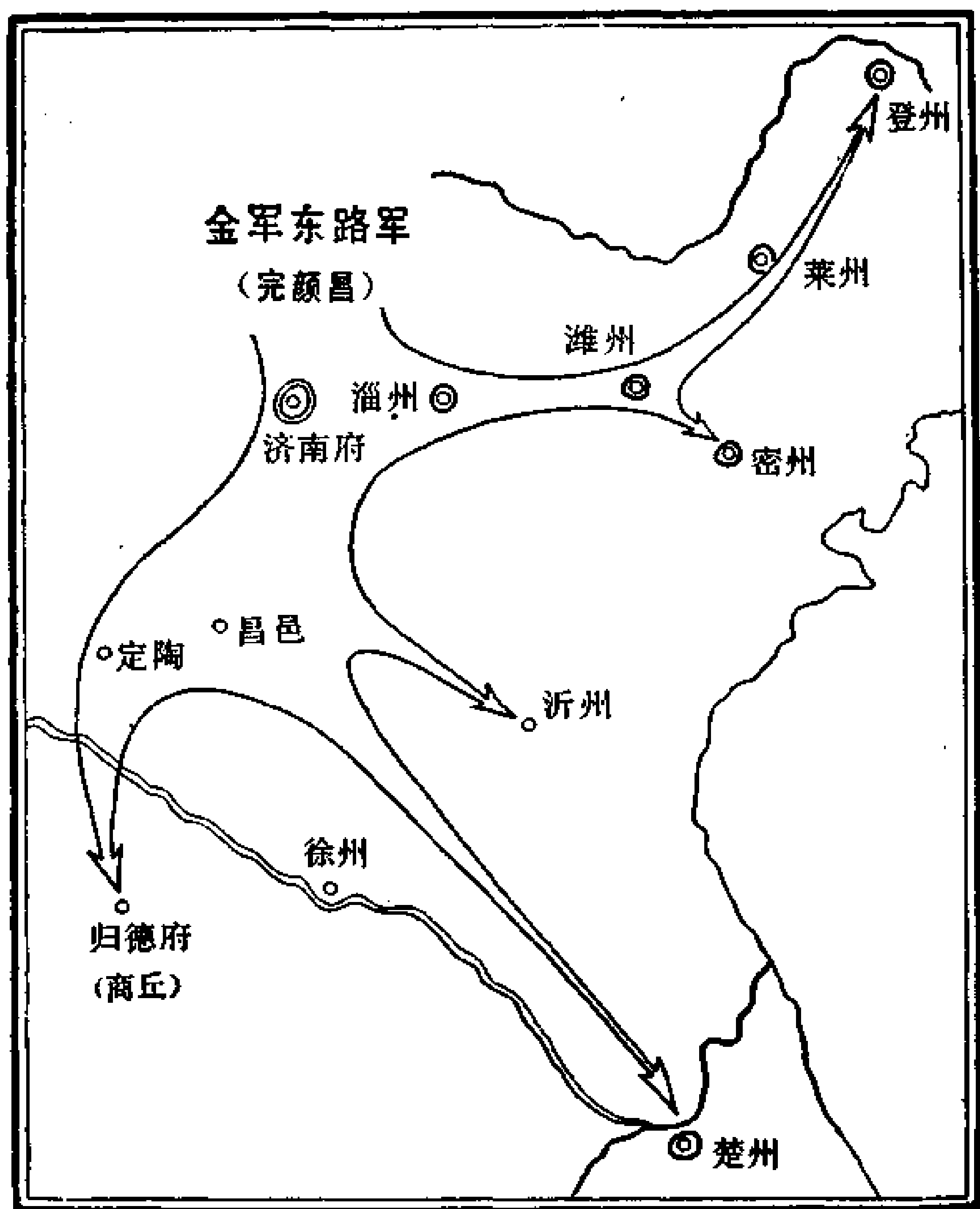
西路军——由陕西都统完颜娄室率领，仍攻陕州、长安。

三、金东路军掩护中路军战略左翼

宋建炎三年九月初，为保障中路宗弼军的战略左翼，完颜昌指挥东路军先向山东进攻，破登（今山东蓬莱）、莱（今山东掖县）、密（今山东诸城）等州，并在梁山泊（今山东寿张县东南

金军第三次南下东路军（完颜昌）进攻山东掩护战略东翼示意图

（26—3图）



梁山下）造舟，准备由海道窥江、浙。另路金军降单州（今山东单县），下兴仁府（今山东定陶），破南京（今河南商丘），后又转军攻沂州（今山东临沂）。东路军主帅完颜昌屯兵昌邑（今山东金乡西），相机进攻楚州，以策应中路军。

四、金中路军南下渡江穷追赵构

金中路宗弼军从楚州至亳州间渡淮南下。十月，前军攻占寿春（今安徽寿县），得知宋隆裕太后在南昌，宗弼乃分遣拔离速率军西取光州(今河南潢川)南下渡江，追袭宋隆裕太后；宗弼亲率主力急趋和州南下渡江。东路军完颜昌亦自昌邑下徐州向楚州前进。

拔离速等率军于十月由光州进至黄州，寻得一些小船，又拆了房屋，编成木排，在黄州渡江。宋荆湖沿江制置副使王义叔引舟遁去。金军渡江后，经大冶（今湖北大冶）直趋南昌。原驻江州的刘光世，置酒高会，及闻金军渡江，不敢抵抗，仓皇率军逃向南康军（今江西星子）。

由宗弼率领的中路军主力，十月上旬攻下和州后，挥军在采石（今安徽当涂境内）渡江，但遭到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守臣郭伟率军抵御，五战皆败，强渡不成。金军转往慈湖镇（今安徽马鞍山市北）渡江，又被郭伟军所战败。遂又东趋马家渡（慈湖镇以北）渡江。

当金军攻入和州时，建康留守杜充只下令淮南清野，而不在大江以北布置防御；他把所辖的部队都部署在建康府城内外，连长江以南沿岸的防御力量也极薄弱。当金军于十一月下旬转移到马家渡渡江时，宋水军拦江截击，力竭败退。杜充急派都统制陈淬和岳飞、刘经、戚方、扈成等率三万人去堵击，并派王𤫉率所部一万三千人前往增援。

金军万户大臭率队渡江后，攻击南岸少数宋军，陈淬率军赶到后，即进入战斗。金军后续部队陆续渡江，发展进攻，双方展开激烈的战斗，互有胜负。不料这时，王𤫉突然率部南逃，使前

线宋军受到影响，被金军击败，都统制陈淬战死，岳飞、刘经等部也全部溃散，金军遂得以陆续渡江。

杜充得知金军渡江，诸军溃散，连夜率三千人逃往真州（今江苏仪征）。

金军到达建康城下，宋知建康府陈邦先向金军投降。

驻扎在镇江的韩世忠军，在探知金军企图在采石渡江的消息之后，把储积的物资装上海船，连同全军人马，退往江阴（今江苏江阴），待机长江口。

长江下游被金军突破，南宋的长江防线土崩瓦解。

宋廷采取“且战且避”的逃跑军事路线，放弃守江必守淮的正确战略，退守长江南岸，又置重兵于守城，不采取“半渡而击之”的战术，使金军得以在江北从容部署，边探边渡，轻而易举地跨过了长江天堑。宋廷的逃跑主义思想，严重地影响了诸将的防御作战，如刘光世未战先遁，陈邦先不战而降，使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得以长驱深入。

江西方面拔离速渡江急袭南昌后，分兵进攻抚州（今江西抚州市）、袁州（今江西宜春），主力沿赣江向南追击隆裕太后。

宋隆裕太后于十一月初由南昌出发，南逃经吉州（今江西吉安）、太和（今江西泰和），到万安（今江西万安）舍舟登陆奔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公元1130年）。二月，金拔离速军为避开刘光世军的袭击，自袁州转向湖南潭州(今湖南长沙)。宋湖南帅臣向子禋率军民守潭州，金军攻城，八日城陷，掠掳六日，屠城而去。至四月，金军过江经荆门（今湖北荆门）、宝丰（今河南宝丰）北还。

宗弼率金军主力在马家渡渡江后，经广德军（今安徽广德）、湖州（今浙江湖州市）向临安急进。沿途虽遭到岳飞、刘经等部在溧水、广德附近地区的堵截，金军并不恋战，直扑临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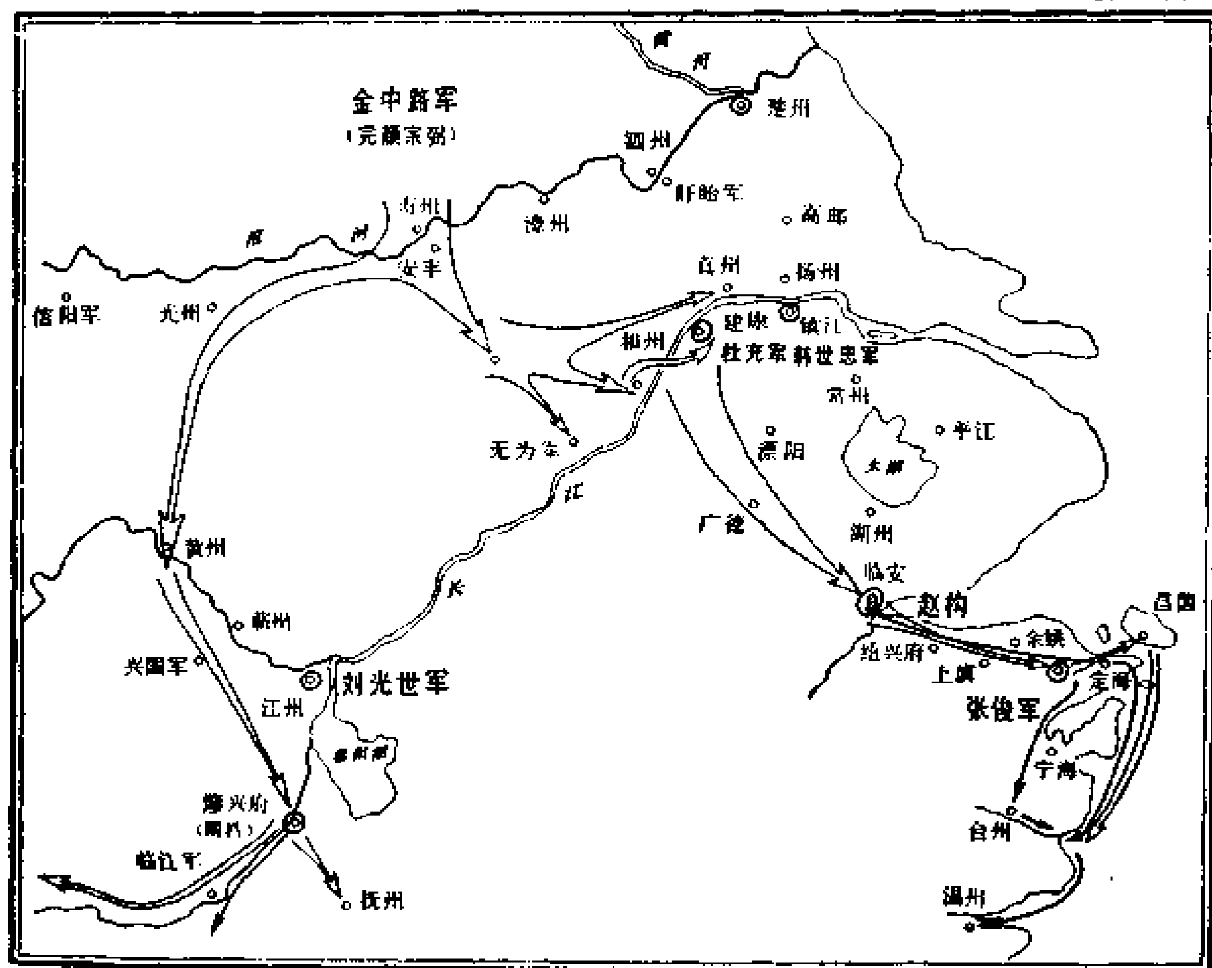
宋高宗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闻金军渡江，决意下海逃跑。

十二月宗弼军攻临安，赵构自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奔定海（今浙江镇海），出海逃走。宗弼军攻占临安后，遣阿里、蒲里浑率军追击赵构，渡曹娥江，与宋明州守军张俊、杨沂中等部发生激烈战斗，金军被阻。不久，金军再兴攻击，又败，遂退屯余姚（今浙江余姚）。

金援军赶到，会攻明州，张俊率军南走台州（今浙江临海）。赵构又从海上奔台州、温州（今浙江温州市）。金军破明州，急趋定海，舟师渡海侵昌国（今浙江定海）南追。因遇大风雨，又被宋水师的大船冲散，蒲里浑派人到临安向宗弼报告“搜山检海已毕”，退据明州。

五、金中路军北撤和黄天荡之战

金军第三次南下中路军（完颜宗弼）“穷追”赵构示意图 （26－4图）



金军虽据明州，但茫茫大海，不见赵构踪迹；河湖交叉，不利骑兵驰骋；加以气候卑湿，将士不服水土，难以继续进军。特别是岳飞军屯驻宜兴，韩世忠军据长江口，金军归路有被截断的危险。宗弼只好决定早日撤军北归。因掳掠的财物过多，陆路无法运输，于是取道大运河，水陆并行，破秀州（今浙江嘉兴市）、陷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占常州(今江苏常州市)，准备自镇江渡江至瓜州北撤。

（一）韩世忠截击金军的黄天荡之战

这时，宋浙西制置使韩世忠以前军驻青龙镇（今上海市青浦县境），中军驻江湾（今上海市江湾），后军驻海口（今上海市吴淞镇）。韩世忠知金军深入，必不能久留，乃制造海船，训练水军，并把步军改为能进行水战的劲旅。二月初，宋韩世忠军八千人乘海船百余艘，装载粮器甲，赶回镇江，准备截击企图渡江北撤的金军。

宋建炎四年三月，金宗弼军到达镇江，运河在这里入长江处，已被宋军用破船堵塞。韩世忠全军登上战船，停泊在江心的焦山、金山下，扼住了金军的归路。宗弼出动小船进入江中接战，展开了激烈的战斗。韩世忠挥军英勇进击，"乘风使篷，往来如飞"，韩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士气倍增，打得金军狼狈不堪。宗弼无奈，只得向韩世忠借道，表示愿意丢下在江南掳掠的财产和人口。韩世忠严词拒绝，提出必须放回徽、钦二帝，归还领土。宗弼无计可施，乃率船队沿长江南岸西上，企图伺机偷渡，韩世忠也率艨艟大舰，沿长江北岸与金军且战且行，最后把金军逼进到建康东北七十里的死水港黄天荡中。宋军舰队堵死出口，金军多次突围，均告失败，整整在那里困了二十余天。

宗弼采纳了奸细王某的建议，出动大军，掘通老鹳河故道《金陵志》和《读史方舆纪要》都说老鹳河在今南京栖霞山东北一带），开渠三十里，逃出了黄天荡，到达建康，韩世忠军溯江而上，在建康北面江面又把金军截住。双方在长江里又进行几次

水战，金军仍然无法突破宋军舰队建立的水上防线。这时又有人教宗弼乘无风宋军海船行动不便时，用小船靠近宋军船舰施放火箭，使宋军舰队“不攻自破”。宗弼待天晴风止，以小船出江，韩世忠指挥舰队迎战。金军船小，无风使浆，其疾如飞；宋军海舰大，无风行动不便。金军以火箭射宋舰帆篷，火烘日曝，烟焰蔽天，舰船被焚，人马坠江者，不可胜数，韩世忠只好顺水退军。金军追击，在杨家洲遇长芦崇福院僧人普伦及百姓千人，驾无数小船抵御金军。宋军退还镇江。金军亦退回建康渡口，与完颜昌所派向南挺进支援中路军的托会军在江北会师，屯于六合。

黄天荡之战，宋军虽以失败而结束，但韩世忠军以八千人与金军十万人大战四十余天，这不能不是宋金战争史上的一大奇迹。“兀术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亲识，必相持泣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免”[15]的情况，嚣张气焰受到了一次重大的打击，“自是不敢复过江矣”。

（二）岳飞军收复建康

金军主力北撤以后，建康成了金在江南仅存的桥头堡垒。金守军在钟山、雨花台构筑大寨，开凿两道护城河，在山下挖洞，“陆增城垒，水造战船”，[16]企图长久屯驻，以为异日渡江的桥头阵地。

浮海归来的宋廷，暂住越州，将盘踞建康的金军视为莫大威胁。宋高宗为此调动兵力，命令张俊负责收复建康。可是卑怯的张俊不敢向建康前进一步。勇敢承担收复建康重任的，只有岳家军。

四月，岳飞军由宜兴向建康尾击金军，斩获甚多。

从四月到五月，岳家军同在建康的金军进行几十次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最后岳家军和建康府前通判钱需所收集的乡兵一起，收复建康。

建康之战历时半个多月，杀敌三千多人，擒俘千户留哥，即俘金兵三百多人。这是岳家军的首次大胜利。

（三）赵立军在楚州阻截金军

金宗弼军由建康北撤六合，准备引舟经运河北撤。时知楚州兼楚、泗州涟水军镇抚使赵立在楚州（今江苏淮安），扼住金军归路，宗弼约东路军完颜昌会攻楚州。七月，宗弼率两万精兵前往陕西。

八月，金军围攻楚州甚急，赵立遣使向宋廷求援。宋廷仅遣刘光世、岳飞等部渡江北上，企图逼金军渡淮北撤。

九月中旬，完颜昌挥军大举攻城，昼夜不停；赵立率军坚守。后赵立不幸被金军炮石打碎头颅。众以参议官程括代理镇抚使，继续坚守。由于楚州被围已久，城中绝粮。九月底，金军攻进楚州城，宋楚州军民在巷口设置砖垒，扶伤巷战，使金军付出重大伤亡。最后，一些民兵首领奋勇突围而出。

楚州蔽遮江淮，扼控运河，赵立率军民力战，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浩然正气。

这次金宗弼率主力渡江南侵，企图"穷追赵构"，必欲俘获而后已，但经过半年的追击作战，备受艰难，最后不得不撤回淮北，这是金太宗完颜晟"穷追"战略的破产，也是宋金战争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六、金西路军进攻陕、陇

（一）陕州之战

宋建炎三年九月，金西路军在主帅完颜娄室率领下，渡过渭河，进攻长安，宋经略使郭炎逃走，金军进入长安。

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治兵于兴元（今陕西汉中市），以图中原。张浚上奏说：

> "汉中实形势之地"，"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17〕

十二月，金西路军主帅娄室率军数万，出关东攻陕州。陕州由李彦仙率军驻守，建炎元年李彦仙组织义军，结寨自保，次年收复陕州，军势大振，宋廷授李彦仙为陕州知州兼安抚使。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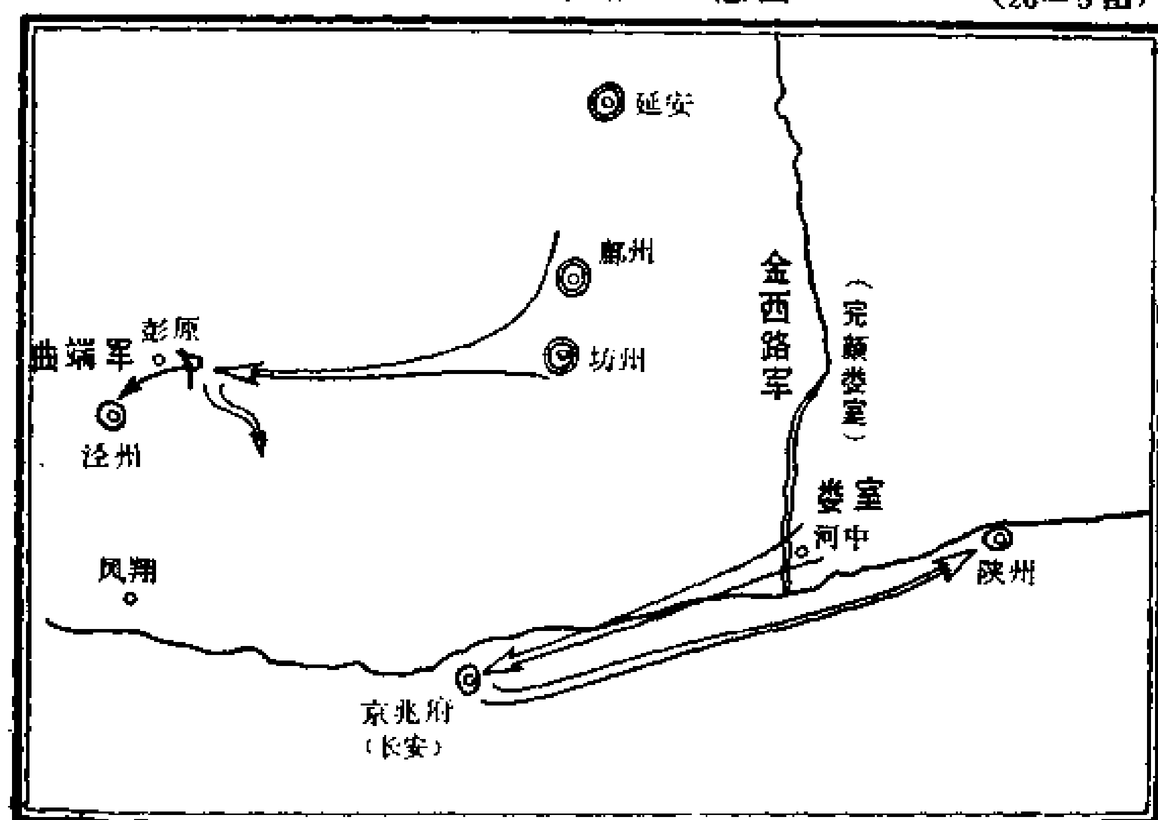
来攻，李彦先向张浚求援，并提出撤出陕州，北趋河东，“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岚、石（今山西岚县、离石）西渡河，道鄜、延以归”[18]的方案。张浚要求李彦仙空室清野，据险保聚，死守陕州。

李彦仙遂增陴浚隍，利器械，积粮食，鼓士气，且战且守，人心益坚。至十二月，娄室、银可术、折可求合兵进攻陕州。张浚从间道送去金币，使其犒军，并命都统制曲端率泾原军往援。曲端迟迟不进。

金西路军自宋建炎四年正月初开始猛攻陕州，分为十队，轮番进攻，使用鹅车、天桥、火车、冲车等多种攻具，均为守城军民所击退。但陕州被围日久，食尽，且官兵战斗伤亡殆尽。正月中旬，城被攻破，李彦仙犹率兵士巷战，最后渡江北走，负伤殉

金军第三次南下西路军（完颜娄室）进攻陕西，策应中路军示意图

（26—5图）



难。

（二）金军进攻陇东

娄室军攻破陕州后，三月，乘胜进犯陇东。宋将曲端、吴玠等部在邠州（今陕西彬县）等地阻击金军，互有胜负。最后宋军退守泾州(今甘肃泾川)。金军亦退军而去。

第五　“以僭逆诱叛党”——金立刘豫为帝

金军第三次南下，完颜昌军受挫于淮东；中路渡江追宋隆裕皇后的拔离速军在北撤途中，在汝州宝丰被宋将牛皋率民兵打败，悍将耶律马五被俘；宗弼的主力穷追无功，北撤时又受挫于黄天荡，而此时金军后方占领区也极不巩固，形势迫使金朝统治者不得不改变其战略和策略。

金朝统治者看到降金的宋济南知府刘豫父子对内能镇压人民的抗金活动，对南宋能开展诱降活动，遂于宋建炎四年七月，利用刘豫为傀儡皇帝，国号齐，都大名府，后又迁到汴京，统治旧黄河以南地区。

金朝统治者指望建立伪齐，让刘豫来勾引南宋一批无耻之徒，投奔伪齐，充当鹰犬，或以此来引诱南宋内部的投降派，从中破坏抗金，企图以此来达到他们在战场上不可能达到的占领和统治南宋领土的目的。

同时，他们还派内奸打进宋廷。金朝最高决策者在“黑龙江之柳株”开会，讨论如何才能灭亡南宋问题。他们认为，灭南宋单凭军事力量是不够的，“不可以威取”，必须想方设法从南宋内部进行破坏。并认为“只有（秦）桧可用”，“若纵其归国，必是得志，可济吾事。”[19]于是要秦桧回南宋后，“俾结和议为内助”，[20]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事业。

第六　宋金战争的重点向川陕方向转移

一、双方的战略企图和宋张俊经略川陕

陕西的战略价值很大，宋军守可以屏障四川，进便于反攻中原，且宋朝精兵猛将，大多在这个地区；金军如占领陕西，既可隔断宋与西夏联系，又可进图四川。所以，这个地区是宋、金双方非争夺不可的。

早在宋建炎二年夏秋间，金廷议论用兵先后时，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就曾主张先取陕。但当年金西路军未能给宋军以歼灭性打击，所以陕西州县又多归附宋朝。次年，宗翰又建议向陕西增加兵力，以加强攻势。

宋建炎三年十月，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到达兴元，着手布置川陕方面抗金的军政事宜。十一月到达秦州（今甘肃天水），"置司节制五路诸帅"，规定各路帅臣，各专一职，互不兼领；撤换那些文人帅臣，"诸路帅臣，悉用武人"。[21]他很注意搜罗人才，并且重用他们：请刘子羽参议军事；以王彦为前军统制；因曲端素有威名，承制拜他为威武大将军、都统制；经参军刘子羽的推荐，擢"素负材略"的吴玠、吴璘为统制、武副尉，命"掌帐前亲兵"；张浚因素知赵开善于理财，即"承制以赵开兼宣抚处置使司随军转达使，专一总领四川财富"。[22]

张浚实行上述抗金措施后，初步改变了"关陕无备"及"陕西诸帅，皆不相下，动辄喧争"[23]的局面。

正当金军渡江南下，深入江南的时候，张俊急忙整顿军马，准备东下"勤王"。后得知金军已撤回江北，才回到汉中。此时，宋廷因金军仍留两淮，害怕秋后再次渡江南侵，就命令张浚在陕西发动攻势，以牵制金军。张浚不顾西北本身的条件，积极进行进攻准备，把主张"十年乃可议战"的宣抚处置司都统制曲端罢官，命令诸路宋军分道向关中集中，准备尽快发动攻

势。

金军得知张浚在陕西集中各路宋军时，预感宋军将要发动反攻，飞调宗弼率两万精兵前往增援，并派右副元帅完颜宗辅统一指挥陕西军事。不论陕西战事胜负如何，这一调动本身，便是张浚“牵制金军”战略的成功，江南的压力减轻了。

二、宋、金富平大战

宋建炎四年秋七月，完颜宗弼率精兵二万由六合急趋陕西。

八月中旬，张浚派统制、吴玠率军攻占长安，接着又收复鄜延路诸州县。九月，张浚指挥各路兵马，共骑兵六、七万，步兵十二、三万，号称四十万，向东开进。张浚到邠州（今陕西彬州）督战，宋军很快推进到富平（今陕西富平）集结。

宋军前线总指挥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刘锡。权永兴军经略使吴玠军已占领长安；环庆路经略使赵哲收复鄜延路诸州县；熙河路经略使刘锡、秦凤路经略使孙偓、泾原路经略使刘锜，均集结于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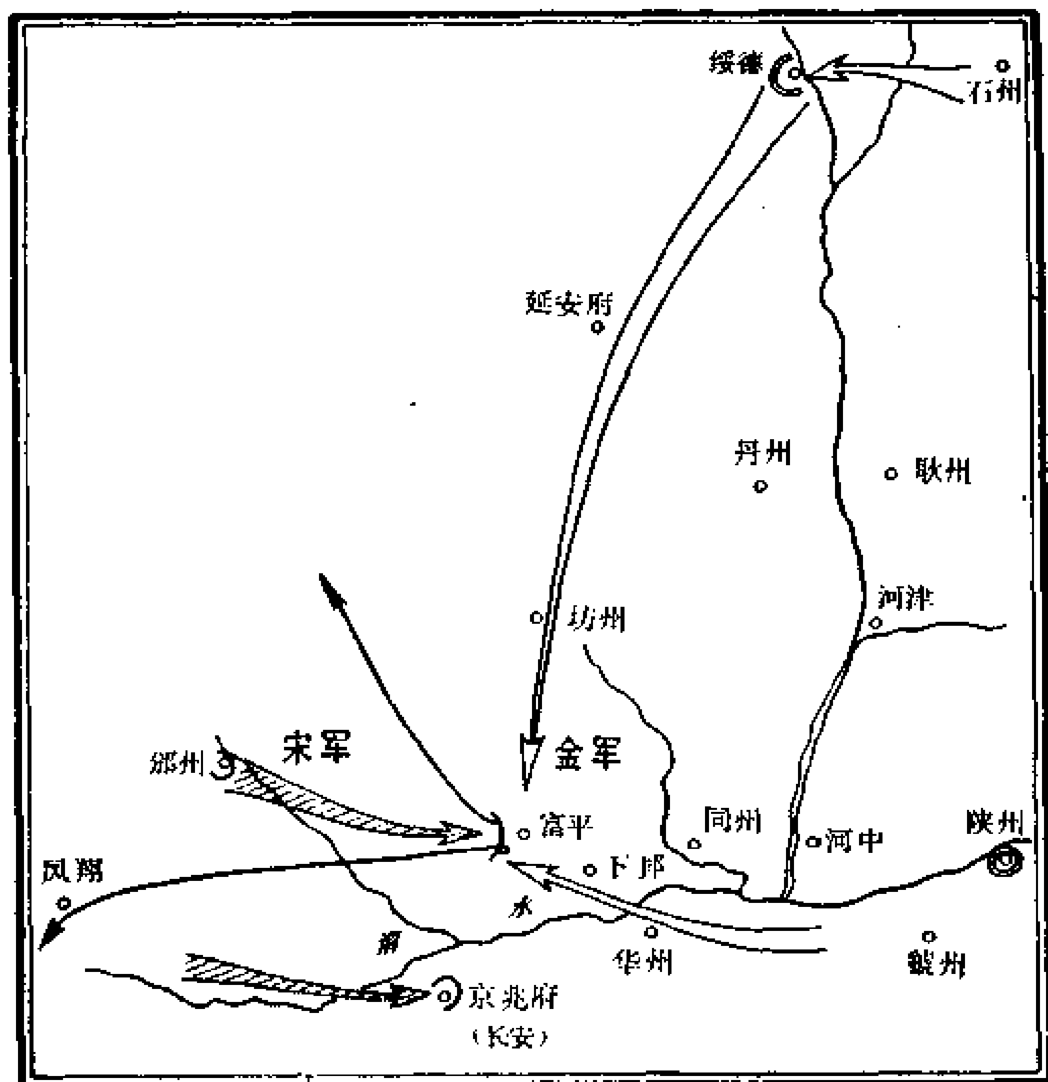
金军主帅完颜宗辅，辖有娄室军和由六合赶来的完颜宗弼军。

当宋军在富平集结时，金宗弼正率军星夜驰骋，已至下邽（今陕西富平东），威胁宋军的翼侧，而娄室军尚在绥德军（今陕西绥德）抗拒鄜延方面的宋军。宋诸路将领请乘金军未集而迎击之，张浚不许，乃约期与金军会战。书往，金军不答。书数往，而娄室军已驰至富平以北，与宗弼军形成合击宋军之势。

宋军都统制刘锡约诸将商议战役方案，吴玠认为“兵以利动，地势不利，将何以战？宜徙据高阜，使敌马冲突，吾足以御之”。秦凤路提点刑狱公事郭浩曰：“敌未可争锋，当分地守之，以待其弊。”诸将则曰：“我师数倍于敌，又前阻苇泽，敌有骑不得施，何用他徙！”遂未采纳吴玠的意见。时诸路农民运送粮草，络绎于途，至营地，以每州县自为小寨，以车马为掩护，相连不绝。

九月二十四日，宋军按原定计划列阵。金军以宗弼军在左，娄室军在右，准备进攻。娄室选三千骑兵与宋军对阵，令诸军各带土囊，填平沼泽，打开进路，直冲农民小寨。农民奔乱不止，践踏诸路之营阵，诸军亦乱。金军遂乘势冲击泾原路军，经略使刘锜身先士卒御之，战斗自辰至未（下午），胜负不分。宗弼军发起冲击后，突入宋军阵中，曾一度被宋军围困，几不得脱，大将韩常也被箭射伤。这时娄室军又转攻环庆军，军势复振。时环庆路经略使赵哲擅离指挥岗位，将士望见尘起，惊奔，众大呼“环庆赵经略先走”！宋军遂溃，一直逃到邠州。金军所获军

金西路军入陕和富平大战示意图 （26-6图）



资，不可胜数。

富平大战以宋军溃败结束。张浚追究责任，斩了赵哲，贬斥刘锡。这时各军新败，不能再战，只得下令各归本路。金军乘势尽取关中之地。张浚从邠州退到秦州，再退兴州（今陕西略阳），辎重焚弃，将士散亡，随行的只有亲兵千人。五路相继沦陷，陕西大震。为巩固蜀口，张浚命吴玠率军守和尚原，关师古等集结熙河军于岷州（今甘肃岩昌），孙偓等集结泾原、凤翔军于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凤州（今甘肃凤县）。

宣抚使司幕僚有人主张退往四川夔州，参议军事刘子羽坚决反对。他说："议者可斩也，宣抚使岂可过兴州一步！系关陕之望，安全蜀之心。"[24]张浚采纳他的主张，留在兴州。部众将士听说宣抚司留在蜀口，都引军来归。于是又收容十多万人，重整旗鼓，使人心逐渐安定下来。

富平大战是宋军首次集中大兵团主动进攻的一次大战役，它打乱了金军的战略部署，迫使金朝把金军主力宗弼军从数千里外的江淮战场转调到西北战场，并被牵制在那里，因而解除了金军再次渡江南下，对南宋朝廷的直接威胁，为南宋政权的稳定和巩固作出了重大贡献。从此以后，东起淮水、西到秦岭的战线渐渐稳定下来，金军再也无力渡江南下，宋廷已摆脱了经常逃亡的局面。清人全祖望论及这一战役的历史意义说："川陕虽挫，而东南高枕无事矣。"[25]他清楚地看到，富平之战是宋、金战争战略形势转变的关键。

张浚主动进攻牵制金军，以减轻金军对东南战场压力的战略行动，是应该肯定的。但张浚志大才疏，不谙战法，刚愎自用，在与金军决战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不知暂避决战，用其他方法牵制敌人；即使进行决战，也应乘金娄室军未到达之前，先击破宗弼军。张浚不采取诸将先击破宗弼军的意见，而采取约期会战的迂腐办法，是导致富平之战战役上失败的主因。

富平大战宋军战役上之所以失败，也由于各路军未能密切配合，互不救援；张浚未能亲临前线指挥，刘锡指挥无力，赵哲临战脱逃。

富平大战宋军固然损失惨重，金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以致战胜之后无力追击。金人把富平之战看做是“四战皆败”之一，名为胜利，实同失败一样。

三、金军重点进攻蜀口

（一）富平大战后宋、金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双方的战略

富平大战以后，淮南的金军撤退，川陕战局虽然还很紧张，而东南的形势却显然有了转机。伪齐政权的建立，是金军无力再次大举南侵的标志，但宋廷看不到这些形势好转的趋势，仍害怕触怒金朝，竟把刘豫的伪政权叫做“大齐”；北上求和的使者继续一批批地被派出去。

南宋政权建立以来，虽偏安江南一隅，国家财力大减，但行政机构精简集中，适应新形势的皇帝中央集权又建立了起来。

在军事方面，建炎以来已在战争中形成了几支新的军队，它们由北宋留下的和收容起来的军队、收编的义军和招募的士兵编成。战争锻炼了这些军队，宋军的实力正在逐渐壮大。

宋高宗赵构即位之初，设御营司以统一指挥前、后、左、右、中五军。随着战争的发展，部队逐渐扩大，又增设五军，形成御前五军和御营五军，由各军都统制或统制统率，分屯前线各地，称为屯驻大军。后又罢御营司，改御前五军为神武军，御营五军为神武副军，屯驻如故，虽都归枢密院统率，但实际兵权仍掌握在诸大将手中。

当金军窜扰大江南北的时候，各地出现了许多各式各样的武装部队，他们既反对封建的地主阶级，更反对金军的掠夺烧杀。宋廷对自发的武装部队，一概看成是“盗贼”，采取了以镇压为主、收编为辅的政策，大大限制了抗金武装的扩大。

富平大战以后，南宋政府稍得喘息的机会，为了巩固自己的

统治，便乘机发动几乎全部军事力量镇压各地日益增多的农民起义。在整整四年（公元1130年至1134年）中，除了洞庭湖的杨幺起义军一支外，其他农民起义军，已经基本被消灭了。

金朝统治者鉴于连年以主力南侵场无功而还，伤亡日增，深感单凭军事力量不能达到灭亡南宋的目的，也在改弦更张，改变政治和军事战略。

在政治方面，实行“以谮逆诱叛党”即设置傀儡政权的政策。在中原地区立刘豫为傀儡，作为金宋之间的缓冲地带，把新攻下来的河南、关陕地区交给伪齐刘豫管理，以欺骗中原人民；并利用刘豫与南宋对抗，以节省兵力，集中军事力量镇压后方抗金义军，对南宋发动新的攻势。刘豫招收了一些南宋降将如李成、徐文之流，在中原强制签军，组成了数量很大的伪齐军，在淮河沿岸及西京洛阳以南地区与宋军相对抗。

女真贵族从来“用兵，惟以和议佐攻战”，〔26〕现在又“以谮逆诱叛党”，立刘豫为傀儡皇帝，同时，还采纳宗翰精心策划的“归秦桧于宋”〔27〕的阴谋，让他从南宋内部来破坏抗金力量。

在军事战略上，金朝由于兵力不足又力量分散，在广大的正面上，难以集中优势兵力以取得所企求的战果，决定对东南暂时停止全面进攻，竭尽全力企图由陕入川，然后顺流东下，形成对南宋的包围。就是说，在两淮正面皆取守势，而在陕西方面继续发展攻势，由过去的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金军大约经过半年的调整，终于又全力以赴地发动了争夺蜀口的三次大战。

此时金军已攻占了陕西六路（鄜延、环庆、秦凤、泾原、熙河和永兴路），只有汉中地区，陇南的阶、成、岷、凤、洮五州和凤翔的和尚原及陇州的方山原两个军事要点，还保持在宋军手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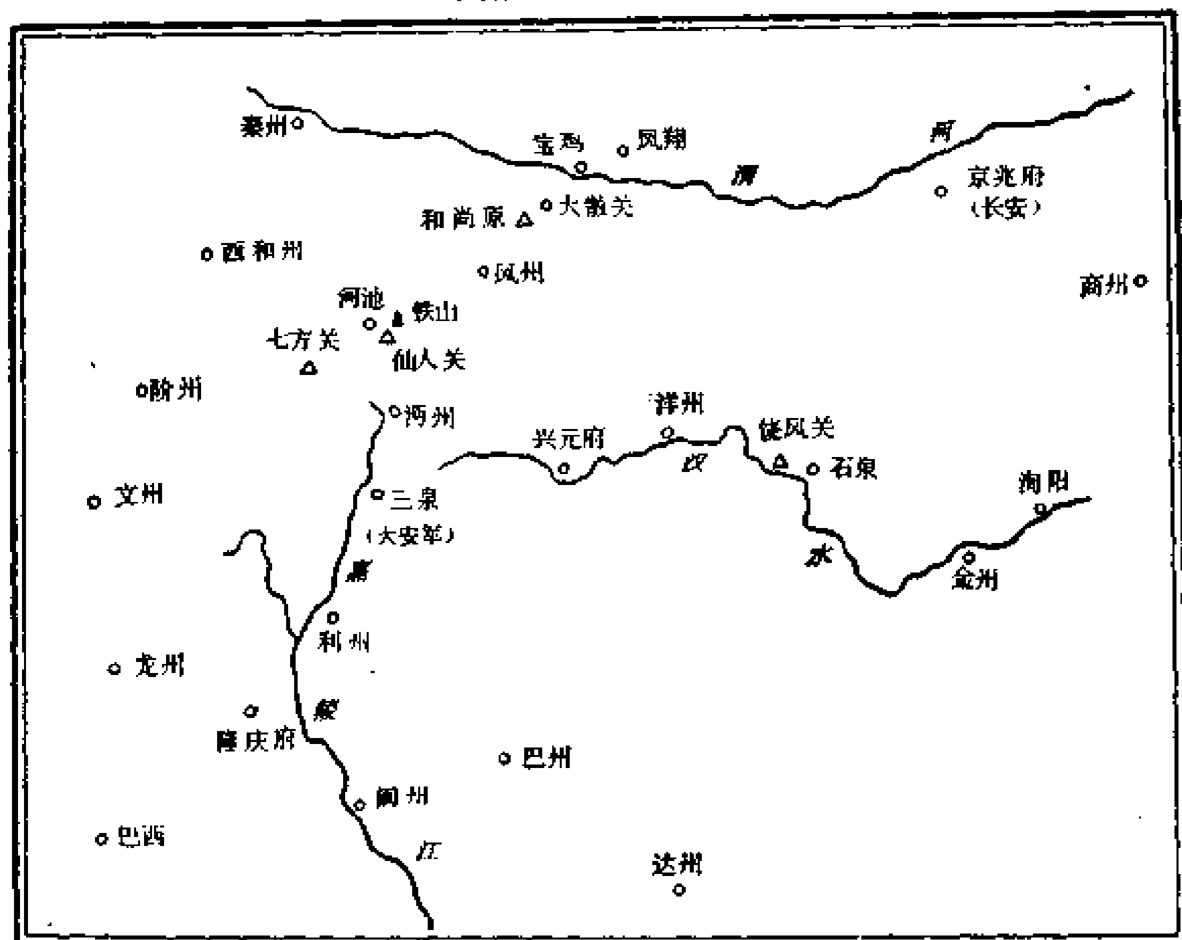
（二）和尚原之战

和尚原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从渭水流域越过秦岭进入汉中

的重要隘口之一。“金军得之，可以睥视汉川；宋军得之，可以下兵秦雍。”〔28〕所以，在富平大战以后，宋五路陷没，张浚（宣抚处置使司已迁阆州）在重新部署防御的时候，即预定派富有作战经验的陕西诸路都统制吴玠镇守和尚原。

吴玠在和尚原收集在富平战后溃散的军队，“积粟缮兵，列栅为死守计”。〔29〕

川陕三隘形势图　（26 7图）



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公元1131年）三月，金将没立（摩哩）率领一部金军向和尚原作试探性的进攻，结果为宋吴玠军所击败。

五月，金军数万骑又对和尚原宋军进攻，兵分两路，企图夹击和尚原宋军。一路由没立率领，自凤翔向南进攻；另一路由乌鲁、折合率领，绕道阶州、成州，出散关，由西向东进攻。当时

和尚原宋军只有“散卒数千”，而且“军储匮乏”，“人无固志”，甚至有的将领阴谋劫持吴玠兄弟去投金军。吴玠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毫不气馁，及时召集诸将，“励以忠义，歃血而誓”，使诸将大为感动，精诚团结，“为备益力”。[30]

金军乌鲁、折合率军先期到达，列阵于和尚原北山，因山谷中道路狭窄多石，马不能行，遂弃马步战。吴玠军利用有利的地形奋力战斗，击败乌鲁、折合军。

后三日，金没立军到达箭筈关，没立亲自率军进攻宋军，同样被吴玠军所击退，两路金军未能会合。

十月，金陕西都统娄室卒，由完颜宗弼任西路军统帅。他会合诸道及女真军计十余万人，由宝鸡架起浮桥，结连珠营，垒石为城，准备完毕即渡过渭水，猛攻和尚原宋军。

吴玠命诸将选择强弓硬弩，轮流射击，号“驻队”，“矢接发不绝，且繁密如雨[31]”。金兵却，吴玠出奇兵进行邀击并截断金军粮道；在金军撤退必经道上设置伏兵。金军至，伏兵出击，金军大乱。吴玠又挥军夜袭，金军不支，乃撤退。宋伏兵突起，金军且战且退，“将士多战殁”。[32]“俘馘首领及甲兵以万计，宗弼中流矢二，仅以身免。”[33]

这次和尚原争夺战，金兵损失很大，“其徒销折，十存三四，往往扶舁呻吟而归。至于兀术，尚以箭疮，吊攀其臂。兀术之众，自此不振”。[34]

（三）饶风关之战

金军在和尚原大败后，宗弼回到燕山养伤，新任陕西经略使完颜杲（撒离喝）屯兵凤翔，与吴玠军相对峙，暂时停止进攻。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为了防备金军再次进攻，重新进行防御部署：

——川陕宣抚处置使司设在阆中（今四川阆中西北）；

——知兴元府刘子羽驻兴元；

——吴玠军驻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南），吴璘一军驻和尚

原；

——王彦军驻金州（今陕西安康）；

——关师古军驻熙河（今甘肃临洮）。

张浚与诸将“约，金人以大兵犯蜀，即三帅（刘、吴、王）相为应援。”[35]

和尚原战后一年，金廷认为发动新攻势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宋绍兴三年（金天会十一年，公元1133年）正月，再次“大举图蜀”，企图攻取剑阁外十三州。陕西经略使完颜杲鉴于“和尚原天险，吴玠备御严密，屡攻不胜”（《大金国志·卷八）》，决定避开和尚原，而先指向通往汉中的重要门户——金州。企图由金州而入兴元，由兴元而入四川，从而达到“以奇取蜀”[36]的目的。其部署：

——以宋叛将李彦琪驻秦州，以牵制吴玠军，用少数游骑出熙河，以牵制关师古军；

——完颜杲亲率主力采取迂回战略，经商州（今陕西商县）南下，从东面进攻兴元。

完颜杲率领主力自长安向东南经商州，进攻洵阳（今湖北旬阳），在沙会泺击败宋军王彦军的抵抗后，沿汉水西上，占领金州。

守卫兴元的刘子羽，听到金州陷落，一面命统制田晟扼守由金州通兴元的关口——饶风关，一面向吴玠告急。吴玠立即率数千人马，自河池一天一夜奔驰三百里，先金军到达饶风关。宋军吴玠、王彦、田晟三部不到两万人，拒守饶风关隘口。

二月，金军以数倍的兵力猛攻饶风关。“金军被重铠，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则二人拥后，先者既死，后者代攻”。宋军居高临下，吴玠命将士用强弓硬弩向下射击，用大石滚压。双方连续激战六昼夜，多次打退金军的进攻。其后由于叛徒带领金军一支部队从小道绕到饶风关背面高地，居高临下，两面夹攻，一时宋军混乱，纷纷溃退。金军攻占饶风关后，立即进军兴元，准备向西

川进军。

宋军在饶风关战败后，吴玠军退守仙人关，吴璘军也放弃和尚原，到仙人关与吴玠军会兵一处，筑垒防守。王彦军退守达州（今四川达县），刘子羽军退至险要的三泉（即大安军，今陕西沔县西南）潭毒山，筑垒固守。张浚派王庶前往巴州（今四川巴中）组织军民抗金，巩固米仓山的防御。

金军经过饶风关作战，部队也伤亡过半。完颜杲知宋军在川北已有准备，吴玠仍留在后方的仙人关，威胁金军后路安全，遂退回兴元。在这里停留一个多月，进退两难，最后，于四月间自兴元经斜谷向凤翔撤退。

吴玠派部袭击金军退却部队，因山高路险，金兵跌到山涧中有千人，所有辎重全部抛掉。于是刘子羽进军收复兴元、洋州等地，王彦部败金军于询阳，乘胜收复金州等地，恢复了战役开始前的态势。第二次争夺蜀口之战，又暂时告一段落。

金军这次战略迂回进攻饶风关，发“重兵，悉趋陕西，志在吞蜀”。[37]虽出敌不意，集中优势兵力攻占饶风关，深入兴元，但未预料到宋军撤退主动，井然有序，吴玠军退守仙人关，王彦退守达州，刘子羽在三泉潭毒山布置防御，王庶又到巴州组织军民，重建了守蜀的坚强防线。金军无力继续突破而陷入不利态势，不得已退出兴元回军凤翔。这次作战，金军由于没有预先计划好占领兴元后，下一阶段如何入蜀的作战方案，结果弄得进退失据，而以失败告终。

（四）仙人关之战

饶风关战后，宋、金双方都重新作了部署。

这时，张浚、刘子羽已被召回朝，由川陕宣抚处置使王似和卢法原暂时代替。王、卢二人接受上次张浚布防分地不够具体，责任不够明确的教训，乃将陕蜀之地，分为四个防区，责令诸将防守。

从秦州到洋州（今陕西洋县）一带，由利州路阶、成、凤州

制置使兼都统制，吴玠负责守备，驻仙人关。

自金州、房州到达州、巴州一带地区，归镇抚使兼本部都统制王彦负责守备，驻扎在达州。

四川西部的文州、龙州（今四川平武东南）到威州（今四川汶川）、茂州（今四川茂县）一带地区，由知绵州兼绵、威、茂州、石泉沿边安抚使刘锜负责守备，屯驻在巴西（今四川绵阳）。

甘肃南部自洮州、岷州到阶州、成州一带地区，归熙河路马步军总管关师古负责守备，驻扎在武都。

吴玠的防区，正扼由陕入川的要道，和尚原和仙人关都在这一地区，是金军入川的必经之路，是防御金军入川的主要防御方向，因此地位十分重要。

吴玠早已考虑到和尚原远离川边，运粮困难，在宋绍兴三年十二月，金军再度来攻时，已自动放弃。吴玠"度敌必深入"，及早做好了仙人关战守准备。

仙人关（在今陕西凤县和略阳交界处）处有两条重要交通要道，一条向西北直抵秦州，一条向东北直至和尚原。吴玠见"仙人关外，地形平衍，引水纵横，名地网，以遏敌冲"。[38]另在仙人关侧预筑堡垒，叫做"杀金坪"。因"杀金坪"距仙人关较远，"前阵散漫"，又新修了第二隘。

宋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公元1134年）二月初，金完颜宗弼与陕西经略使完颜杲、伪齐四川招抚使刘夔，率领十万大军，进攻仙人关。金、宋两军大战于仙人关下。金军自铁山（即中子山在今徽县南三十里）"凿崖开道"，"循岭东下"。吴玠以万人扼守要冲，吴璘亦率领精兵从七方关（仙人关西）倍道而来，辗转七昼夜，才到仙人关与吴玠军会合，于是大战开始。

金军集中优势兵力，首先进攻吴玠军的营垒，被击退。又以云梯进攻关上堡垒，被杨政部以撞竿撞碎其梯，以长矛刺之。宗弼集中攻击一点不能成功，乃分军为二："宗弼阵于东，将军韩

常阵于西南”，[39]从两面夹攻仙人关。吴璘率队居中策应，左右应战。宋军激战甚久，将士疲惫，被迫退守第二隘。

金军见宋军后撤，进攻更猛。宗弼挥军“人被重铠，铁钩相连，鱼贯而上”。[40]吴玠命吴璘以“驻队”矢如雨点般地向下射击，打击金军。第二天，完颜杲部用火攻西北楼，宋将姚仲拒之。吴玠急命部将田晟、杨政率精兵用长刀大斧冲入金阵，左右砍杀。双方激战到晚，宋军“布火四山，大震鼓随之”，“垒中兵大出”。[41]吴玠命统领王庆、王武率精锐士卒，分执紫、白色旗帜闯入金营，金将韩常被射伤左眼，金军惊溃宵遁。宋军又派队劫横山寨，并在河池设伏，扼金军退路，又败金军。宋军乘胜收复凤、秦、陇州。这样，金军第三次争夺蜀口的大规模战役以宋胜金败而宣告结束。

这次金军进攻仙人关，其入蜀的决心，比上两次都大。《大金国志》记载说：

> “是举也，大金决意入蜀，自撒离喝以下，尽室而来。既不得志，遂还凤翔，授士田，为久留计，自是不复轻动矣。”[42]

蜀口三战，宋胜金败的主要原因，是宋将士的精诚团结和顽强战斗。尽管宋军兵力处劣势，但经过吴玠等将领的主观努力，团结御敌，终于打败了比自己强大的敌人。

宋人胡世将所纂的吴玠墓碑记载：吴玠“御下严而有恩，视卒之休戚如己，而同其甘苦，故人乐为之用”。吴氏兄弟身为西北高级将领，能够比较接近人民和爱护兵士，因而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川陕人民连年运来粮食，支援保卫蜀口的几万大军，这场战争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可能取胜的。

在金军“专以铁骑取胜”的情况下，吴玠深深理解孙子说的“地形者，兵之助也”[43]的道理，和“步兵利险阻，骑兵利平旷”[44]的作战规律。西北高山险阻，显然对金军大骑兵集团作战不利，而对宋军步兵有利。吴玠“每战必先占高原必胜之

地”，〔45〕按兵据险，居高临下，使得金军“铁骑”的特长无从发挥，处处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吴玠守蜀口，不是消极固守而是以积极防御为指导思想，以战为守，经常以出击、伏击、截击粮道、进行夜战。冲入敌营短兵相接等手段，积极地打击敌人，北宋的军事学家许洞说：

> “用寡者宜险隘，宜昏夜，宜短兵，宜致死，宜进退迅速，宜烦数（经常）变化。……险隘则敌众有所不得施，夜战则不测我之多寡，短兵则深入敌阵而薄敌，致死则百不当我之一，疾速则敌欲捍御而不及，变化则敌不知我之方向。”〔46〕

使得金军众无所用，勇无所加，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受敌之虞，退有首尾难救之患。这些都是宋军在防御蜀口时，从被动转为主动的积极防御的一些战法。

吴玠兄弟在长期抗金斗争中，根据敌我长短，创造出一套抗金作战的有效战法。吴璘所著兵法中指出：“金人有四长，我有四短”。金军的四长是：骑兵、坚忍、重甲、弓矢。四长之中，尤以骑兵、坚忍为中国所不及，至于重甲尤其是弓矢，中国比起金人实有过之。吴璘“集番汉之所长兼而并用之，以分队制其骑兵；番休迭战，制其坚忍，制其重甲；以劲弓强弩制其弓矢”。〔47〕吴璘据此创造出“番休迭战”和“叠阵法”，以制胜金军的特长。

“番休迭战”（一作“更战迭休”）战法，是针对金军战士“坚忍”，临阵之时前赴后继，善于连续突击而制定的。宋军编成若干梯队，轮番作战，轮番休息，得以逸待劳，以静制动。

“叠阵法”是“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强弓，跪膝以俟；次神臂弓（一人可以使用的弩，力能射透铁甲）。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七十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凡阵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更替之；遇更替，则鼓为之节，骑出两翼，以蔽（掩护）于阵前，阵成骑兵

退。谓之三叠阵”。[48]这种创造性的战法，是抗击金军铁骑和重甲步兵冲击的有效手段，丰富了祖国的军事宝库。

蹋口之战，粉碎了金军由陕入川的战略企图。金朝统治者鉴于“穷追赵构”的战略不能收效，“改弦更张”，在政治上，实行“以僭逆诱叛党”的策略，立刘豫为傀儡皇帝，作为金、宋间的缓冲地带；在军事战略上，停止对江淮的大规模攻势，转移兵力，“先事陕西，略定五路，然后竭尽全力，由陕入川；再顺流而下，掩举吴越（东南）”，消灭南宋政权。这一战略转变又因吴玠军的猛烈抵御而遭到挫折。金军损失人马很多，士气受到严重打击，金国统治者这才知道南宋的实力，未可轻视。

正如《系年要录》上所说：

> “金人始犯中原，有掳掠，无战斗，计其从军之费及回日，所获数倍。自立刘豫之后，南犯淮，西犯蜀，生还者少，而得不偿费，人始患之。”[49]

南宋军民在多次抗金战斗中，激发了抗战的热情，积累了一定的抗战经验，涌现了一些优秀的将领和大批能战的部队，出现了“人材日经事，兵将日练习，天下之心稍怒，忠义之气渐振，咸思效死敌”的大好形势。金、宋双方的强弱对比，正在向着有利于宋的方向转化。

但南宋统治者却对这一强弱转化的形势熟视无睹，依然畏金如虎，继续在政治上妥协乞和，在军事上消极抵抗，但求偏安。

第七　岳飞军收复襄阳，金伪联军再犯两淮

一、形势和宋廷的决策

宋建炎四年九月，伪齐迁都开封，统治旧黄河以南地区；次年，金又将新占领的陕西地区也划为伪齐的辖区。刘豫置招讨司于宿州（今安徽宿县），引诱南宋的叛逃分子。这年五月，南宋

叛将李成带领几万人马，在蕲州投降伪齐。宋绍兴三年南宋水军都统制徐文，以海船六十艘，官军四千人，自明州渡海抵盐城（今江苏盐城），投降伪齐，给南宋的海防以极大威胁。宋绍兴四年，刘豫又出兵陕西，宋熙河路总管关师古战败投降，伪齐尽有洮岷之地，伪齐势力影响所及，遍及中原。

自伪齐政权建立之日起，伪齐统治区人民不断掀起反对伪齐的斗争。伊阳（今河南嵩县）人翟进兄弟，组织地方民兵，战斗在洛阳周围，不断打击金军。伪齐派军配合金军将伊阳山寨攻陷。其子翟琮联合屯驻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市）的镇抚使李横和随州（今湖北随县）知州李道，向伪齐发动进攻，得到牛皋、彭玘等起义军的援助，克复了汝州、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信阳军（今河南信阳）等地。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使翟琮军很快攻占了“东至郑州，西至京兆”的广大地区。

翟琮和李横军从西面和南面向开封进逼，刘豫的伪齐政权岌岌可危，慌忙向金朝求援。三月间，金统帅宗弼会合李成的二万伪军，在开封西北的牟驼冈同宋军进行战斗。李横、牛皋等军没有铠甲，被金军重甲骑兵击溃。到十月为止，邓州（今河南邓县）、随州、襄阳等重要据点相继失陷，连处在第二线的郢州（今湖北钟祥）也被金军攻占。

襄阳在战略上有重大意义。宋人保住襄阳，进可以出击中原，退可以掩护长江中游地区。现在落到金伪手里，宋朝从汉水通陕西的水路被截断。金军再前进一步，就可以进攻荆州（今湖北江陵）、鄂州（今湖北武汉市），完全切断东南和四川的联络线。因此，襄阳是势所必争的战略要地。

伪齐刘豫占领襄阳、郢州后，准备在下一年大举南下。李成还派使者去洞庭湖，企图联合杨么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策划南北夹攻，先占荆、湖、再顺流东下，消灭南宋政权。[50]

宋绍兴元年至二年，岳飞忠实执行南宋皇朝“荡清内寇”的任务，转战于湖广、江右地区，讨伐李成，镇压虔、吉农民起义

军，因而得到宋高宗赵构的赏识和信任。宋绍兴三年九月，岳飞任江西路、舒、蕲州制置使，神武后军统制，驻扎江州。岳飞认为只有力争在绍兴四年麦收前，先发制人，击破李成，收复襄阳，才能粉碎伪齐南北夹攻的计划。他屡次上奏宋廷，建议进兵襄阳。

宋绍兴四年，宋朝君臣为收复襄阳事，多次进行讨论。宰相朱胜非认为：

"襄阳上流，襟带吴、蜀，我若得之，进则可以蹙贼，退则可以保境。今陷于寇，所当先取。"〔51〕

最后，决定由岳飞率军出师，韩世忠屯泗上为疑兵进行牵制，刘光世派兵增援出陈、蔡，合势并进，互为犄角。王瓔仍按原布置牵制杨么农民起义军。宋廷给岳飞下达命令要旨如下：

——任命岳飞兼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原湖北安抚使司统制颜孝恭和崔邦弼的部队，以及荆南镇抚使司的部队，都归岳飞"节制使唤"；

——命岳飞指挥所部，在麦熟前克复京西路的襄阳、唐、邓、随、郢四州和信阳军；

这次出师，只能以此六郡为限，如敌人"逃循出界，不须远追"，亦"不得张皇事势，夸大过当，或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却致引惹"；

——收复襄阳等六郡后，由岳飞差官防守，"或用土豪"或用归将牛皋等人；大军回长江沿岸屯驻。

总之，宋高宗反击襄阳的战略企图是收复战略要地襄阳，改善秦岭、淮水防线中央部分的态势，但也害怕触怒金人，极力避免把金军进攻的重点再次吸引到江淮方向上来。

二、岳飞军收复襄阳

岳飞所部的兵力，已扩充到二万八千六百多人，暂归岳飞"节制"的部队有六千多人。总共能用于进攻襄阳的兵力，约三万五千人左右。

伪齐在襄阳府及六州部署的兵力，每地多者不过一千人，少者五、六百人。然而到了四、五月间，为了准备麦熟后大举南侵，兵力陡增。

岳飞军从江州移到鄂州，又从鄂州陆续渡江北上。刘豫很重视最南端的要地郢州的防务，令荆超率伪军一万多人（其中有少数金军）防守。

宋绍兴四年五月初，岳家军向郢州城伪齐军发起进攻，歼敌七千人，收复郢州。

岳家军攻克郢州后，岳飞乘胜分兵两路：张宪和徐庆向东北方向进攻随州；自己亲率主力往西北方向猛攻襄阳。

襄阳伪齐守将李成仓皇弃城逃循。岳家军兵不刃血，进入襄阳。

张宪和徐庆攻随州城，未能攻下。得牛皋和董先两员新统制的支援后，攻下随州城，歼灭伪齐军五千人。

伪齐政权得知岳家军已攻占郢州、襄阳、随州，急忙调集伪军，还请来金占领军与河北、河东的签军，集结在襄阳东北的新野（今河南新野）、胡阳（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枣阳（今湖北枣阳）以及唐州、邓州等地，号称三十万大军。李成得到增援后，自新野回军向岳家军反扑。

岳飞命统制王万率部屯清水河，诱敌深入。六月，岳飞指挥大军击败李成军。李成再次集结兵力，进行反扑。岳飞迎战，李成军经不起岳家军的猛攻，一败涂地，从此再也不敢窥伺襄阳了。

李成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开封，伪齐刘豫连忙向金廷求援。完颜宗弼自大败于仙人关后，主力损折很大，金军首领又不耐酷热，只派遣一名二等将领刘合孛堇会合李成，拼凑陕西、河北蕃，伪数万人，在邓州西北扎下三十多个营寨，企图阻止岳家军向北进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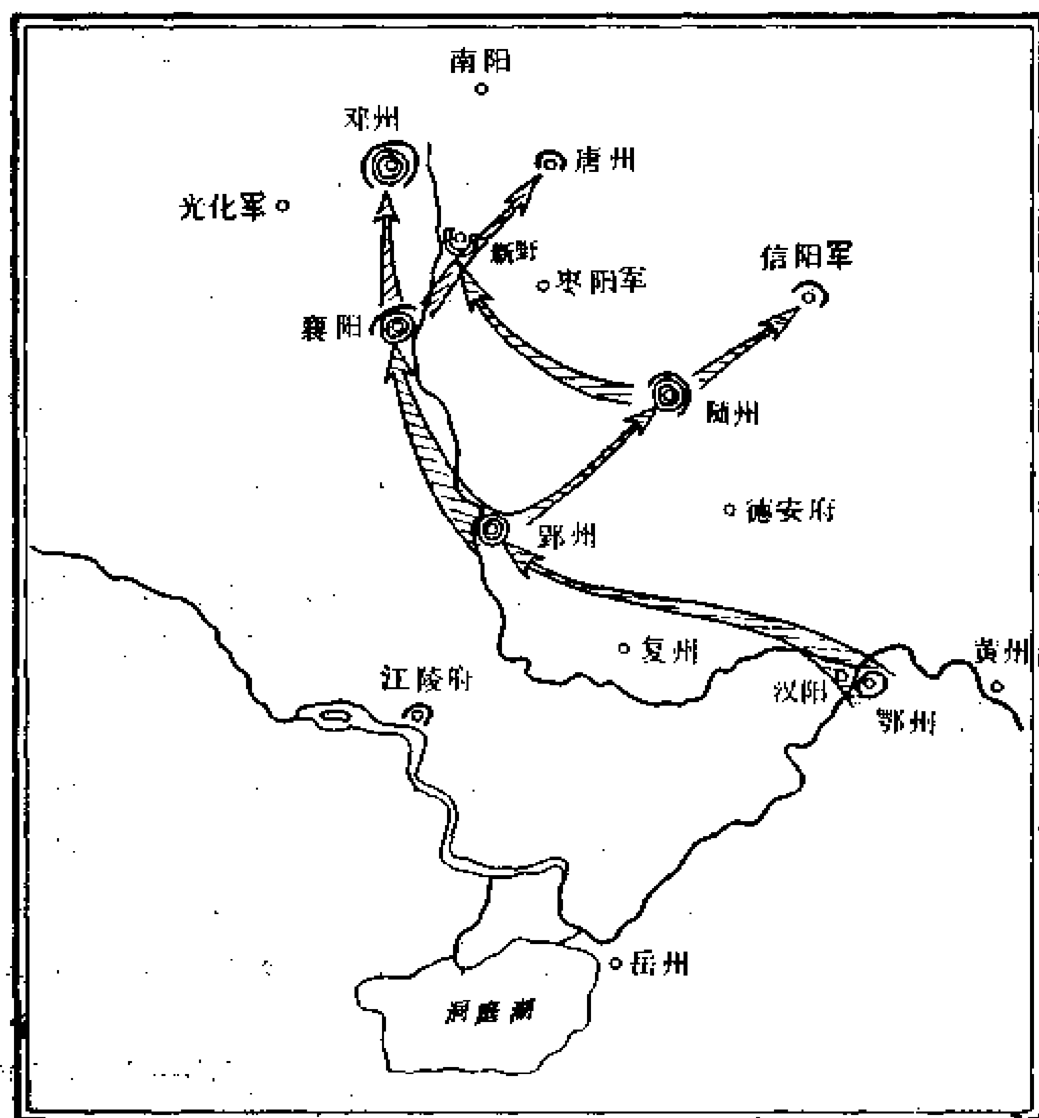
岳飞为继续收复唐、邓、信阳三军州，在作了一个多月的周密准备后，派遣王贵和张宪分别自光化军、横林分路向邓州急

进。七月十五日，王贵与张宪军在邓州城外与数万金、伪齐联军发生激战。后续董先、王万部又以骑兵伺隙突击，一举击破金，伪齐联军，金将刘合孛堇只身逃窜。伪齐将高仲率残兵退守邓州城。岳家军猛烈攻城，一举攻破邓州。

岳飞在攻破邓州后，又收复唐州。同一天，湖北路安抚使司统制崔邦弼等也率军攻下信阳军。

在收复襄阳六郡的作战中，岳家军交战的对手虽不是金军主力部队，但这次作战却是南宋头一次经过战斗收复大片失地，

岳飞军收复襄阳六郡示意图　（26—8图）



也是南宋建国八年以来进行局部反击作战的第一次大胜利。

岳家军在抗金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鄂州是荆湖北路的首府，雄峙大江中游的重镇，已正式成为岳家军的大本营，襄阳六郡则成了岳飞反攻中原的前进基地。宋廷升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担负防守中部战场的重任。

（三）金、伪齐联军再犯两淮失败

宋绍兴四年九月，刘豫遣使见金太宗完颜晟，提出扩地南到长江的计划：

> "若假兵五万，下两淮，南逐五百里，则吴越（指南宋）又将弃而失之。……使山东唇齿之势成，晏然无南顾之患，则两河自定。"[52]

金主遂以完颜宗辅为左副元帅，完颜昌（挞懒）为右副元帅，调渤海、汉儿五万以策应伪齐军。完颜宗翰仍驻西京（大同），以镇燕、云。又命右都监完颜宗弼率前军南征。刘豫亦命其子诸路大总管、尚书左丞相刘麟领东西道行台尚书令，率伪齐军与金军联合南侵。

金、伪齐诸将最初议定，大军自顺昌（今安徽阜阳）趋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以攻历阳(今安徽和县)。伪齐签军制置使李成认为：签军兵民尽起山东，饷道辽远，又有岳飞军自襄阳攻侧背之虑，不如沿汴河直捣泗州（今盱眙，西北淮河北岸），渡淮之后，以大军扼盱眙，据其津要，再分兵下滁（今安徽滁县)、和、扬等州。尔后大治舟舰，分军西从采石攻金陵；东从瓜州攻京口。又另遣军东下，掠宋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楚的粮米，以供军食。[53]于是改变了进军路线。

金军骑兵自泗州趋滁州，步军自楚州下承州(今江苏高邮)，分两路南下。

宋廷得知金、伪齐联军即将南犯，"举朝震恐"。很多人建议宋高宗解散"百司"，远遁避敌。唯宰执赵鼎反对，他说"战而不捷，去未晚也"。于是擢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仍兼

枢密院事，作了如下部署，准备“临江决战”。

宋高宗至平江（今江苏苏州市）督师，扬存中将禁军扈从。

参知政事孟庚为行宫留守，留精兵三千驻临安；后宫至温州（今浙江温州市）泛海赴泉州（今福建泉州市），其他宗室自行避走后方州郡。召东南诸道军赴行在（临安），沿途布置朝廷归路。召复张浚为知枢密院事，赴镇江督师。

淮东路宣抚使韩世忠，率军四万五千（实三万人），自镇江进驻扬州。

浙西、江东宣抚使张俊，率军二万，屯采石。

江东、淮西宣抚使刘光世，率军四万（实三万），屯马家渡（公元1129年宗弼由此渡江趋建康）。

江西制置使兼荆南制置使岳飞，率军二万三千人，屯鄂州。

沿江制置使郭仲荀兼总领海船，屯明州。

另派魏良臣、王绘等出使金营，向金乞和，甚至又作了下海逃跑的准备。

九月末，完颜昌率东路金、齐军渡淮，占领楚州，韩世忠军从承州退回镇江。宋廷即命张俊率军往援韩世忠军，命刘光世军移驻建康，韩世忠军又渡江进驻扬州。

韩世忠军进驻扬州后，利用宋使魏良臣通过两军战线而金军没有防备的情况，挥军北进，行至扬州西北大仪镇附近，设伏二十余处。金军聂儿孛堇命挞也率军五百直趋扬州，行至大仪镇，进入伏击地区，埋伏的“背嵬军”[54]突然发起冲击，用长柄斧上劈人胸，下斩马足，打死大批金军将士，活捉金军万户挞也、千户、百户长及兵士二百多人，夺得战马数百，衣甲、器械等物二千余件。

韩世忠又命解元等部埋伏在承州，待金军进入伏击地区后，宋军猛烈出击，一日十三战，大败金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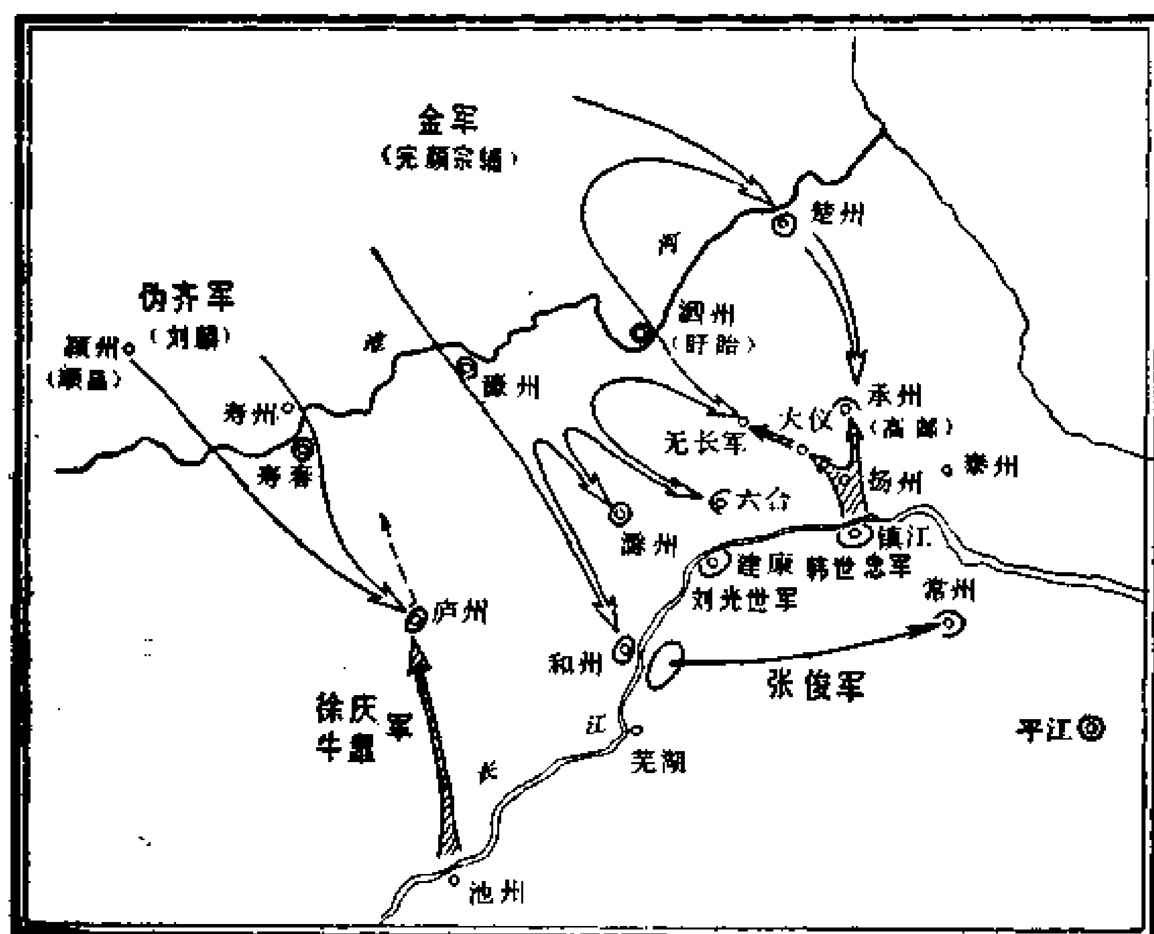
韩世忠军另一路，又败金军于真州、天长。韩世忠率军追击金军到达淮河，金军惊溃，互相践踏，溺水死者甚众。

十月间，金西路军攻破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滁州，前锋进至六合。宋廷再次调整防线：韩世忠退守镇江，张俊军移守常州，刘光世军退守建康，准备凭借长江天堑，阻遏金军渡江。张浚建议调岳飞军出援淮西，以牵制金军。

另路伪齐军自顺昌下寿春。宋知庐州仇悆派军前去阻击，不料全军覆没，金军遂围庐州。十二月，伪齐刘麟增兵进攻庐州，金完颜宗弼率军跟进，庐州形势十分危急。

岳飞奉到应援淮西的命令后，即派徐庆、牛皋率二千多骑兵为前锋，自率八千为本队，疾驰淮西。徐庆、牛皋率部队及时赶到庐州后，留一部守城，其余出城迎击伪齐军。不足二千的宋军骑兵，以少击众，所向披靡。这时金军先头部队也赶来加入战

金、伪齐联军南犯江淮示意图　(26—9图)



斗，迭进迭退，战斗异常激烈，终于敌不过岳家军骑兵的冲击，狼狈溃退。牛皋率骑兵追击三十多里，沿途金军人马自相践踏，死伤甚多。金宗弼、伪齐刘麟军等退驻濠州，完颜昌军退驻泗州。

金、伪齐联军，东线败于承州，西线败于庐州，退驻泗州、濠州一线。时值岁末严寒，粮道不通，又传来金太宗完颜晟病危的消息，于是，完颜宗辅、完颜昌、宗弼慌忙撤军北归。刘麟接到金军退军的命令，立即丢弃全部辎重，昼夜兼程，一口气逃奔三百多里。

金、伪齐联军撤退后，宋军部分军队向北追击，乘势收复盱眙、光州等地，淮南之地尽皆收复。

第八　张浚反攻，伪齐南犯，金、宋议和

一、张浚的反攻

宋军对金、伪齐联军南犯的战争，已能够进行局部反击并取得一些胜利；对付统治区内的"游寇"和镇压各地人民的武装反抗，也大致取得了成功。到宋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公元1135年）秋后，南宋政权已较稳固，对金也已具备转取攻势的条件。

宋廷把直辖的正规部队一律由神武军改称行营护军。张俊的神武前军改称中护军，韩世忠的神武左军改称前护军，岳飞的神武后军改称后护军，刘光世的御前巡卫军定名左护军，吴玠所统的宣抚司部队定名右护军，王彦的八字军定名前护副军，杨沂中的神武中军也改称殿前司军。于是吴玠、岳飞、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便成为南宋的五大帅，分别统率着五支大军。这五大帅都担任宣抚使、招讨使等要职，形成"战区"的设置。

（一）南宋的战略企图和部署

当时，南宋朝廷是由赵鼎、张浚分任左右相，赵鼎主持政

务，张浚主管军务。张浚是主战派，他看到南宋对金和伪齐的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洞庭湖的杨么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又被岳飞镇压下去，南宋政权也逐步稳定下来，于是他向宋高宗赵构建议说："敌势未衰，而刘豫复据中原，为谋叵测"，请"亲行边塞，部分诸将，以观机会。"[55]宋高宗许之。

宋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公元1136年）二月初，张浚以右相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的身份，与各路将领在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商议后张榜声讨刘豫叛逆之罪，决定反攻中原的部署如下：

——京东宣抚使韩世忠由承州，楚州出兵，夺取淮阳军（今江苏邳县）；

——淮西宣抚使刘光世驻庐州，牵制伪齐军；

——江东宣抚使张俊军进驻盱眙，准备策应韩、刘两军；

——杨沂中率领殿前司军为后翼（总预备队），随时准备支援各军；

——湖北、京西招讨使岳飞军进驻襄阳，以图中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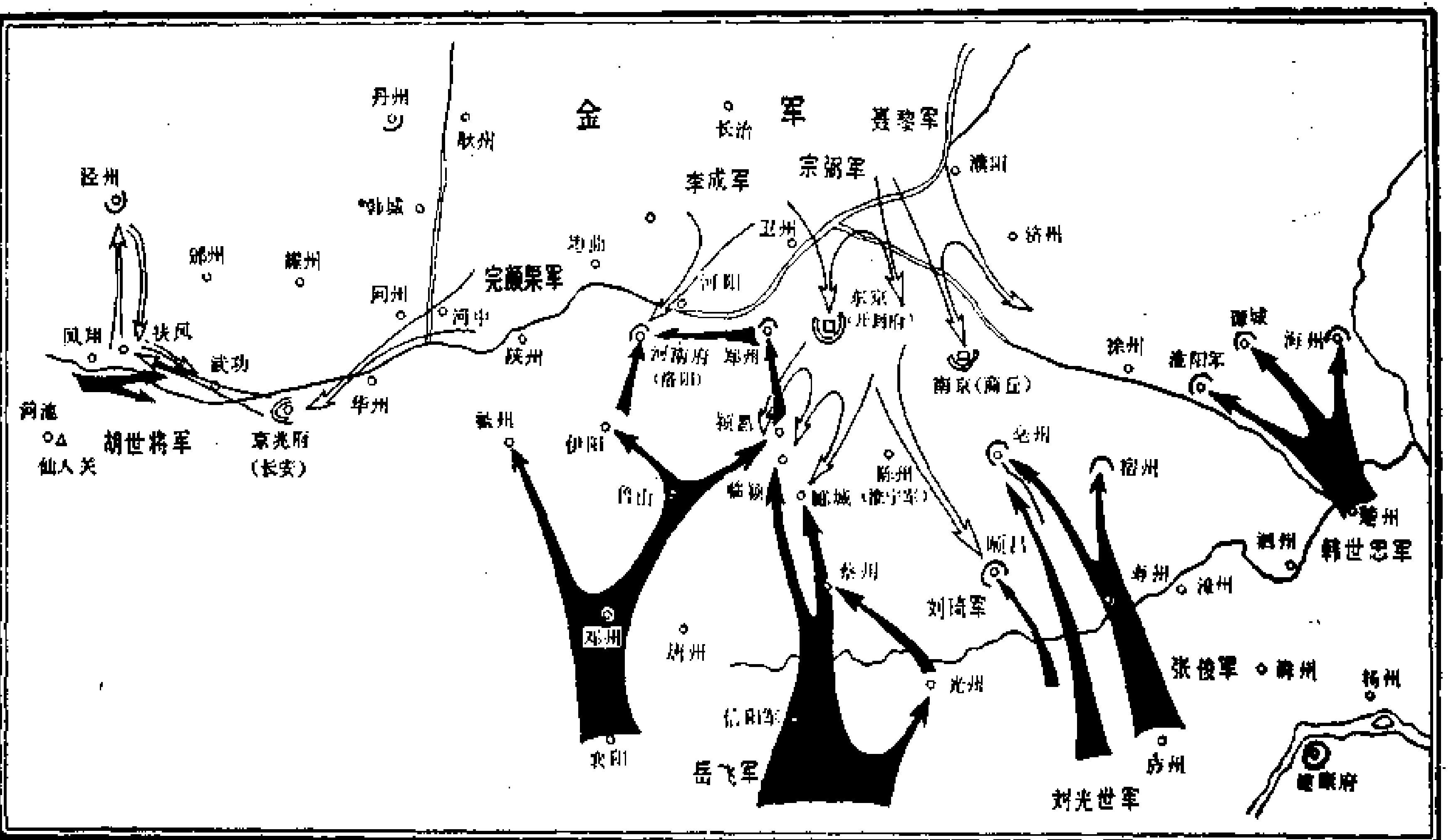
这个反攻部署，实际上是以韩世忠和岳飞担任主攻，两翼前进，中间（张、刘军）策应。但策应牵制的部队兵力雄厚，而担任主攻的两翼韩、岳军反而不能形成重点。这说明张浚以都督诸路兵马的名义所部署的反攻，是小心翼翼的，是局部的，仍是以重兵防卫临安为主。

（二）反攻经过概要

韩世忠立即开始行动，二月中旬即率军渡淮，经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二十五里），进围有金重兵防守的淮阳军，猛攻六天。金完颜宗弼与伪齐刘猊率军来援，反击韩世忠军。韩世忠率军突围南撤至楚州，准备与襄阳的岳飞军东西协同，再兴攻势。

韩世忠攻势受挫后，深感兵力不足，向宋廷要求得到张俊军的支援。经过一番周折，宋廷决定杨沂中军支援韩军，于六月前率队进驻泗州。

金军败盟南下和宋军全面反击示意图 (25—14图)



张浚以盛夏将逝，又是金军南侵的季节，遂决定暂停攻势，转入防秋，命刘光世军自太平进驻庐州，与盱眙的张俊军和楚州的韩世忠军在淮上形成鼎立的形势，“先图自守以攻其师，而后乘机进击”。

岳飞为了出其不意，于七月开始北进。命左军统制牛皋为前锋，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攻占镇汝军（今河南鲁山），锋芒直指汴梁，以吸引伪齐对该方向的注意。牛皋占镇汝军后，向东横扫颍昌府（今河南许昌市）的伪齐军，直下蔡州，焚烧伪齐军积聚的粮草、器械，然后退回唐州。

岳飞在牛皋军的掩护下，亲率主力向豫西虢州（今河南灵宝）方向进击。八月初，王贵、董先等率军攻占虢州及其附近地区。

王贵率军继续西向，又恢复商州（今陕西商县）全境。

虢州和商州是中原战场的要冲，可北扼黄河，东入洛阳，西攻关中。岳飞军攻占虢州和商州，从中间切断了河南与陕西的伪齐统治区。伪齐在惊慌之余，急忙派军骚扰岳家军的后方，攻击德安府应山县，劫掠邓州的高安镇，企图牵制岳家军。

岳家军王贵的副将杨再兴击败几千伪齐军夺占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伊阳（今河南嵩县），缴获粮食二万石，夺取一个马监，获战马上万匹，大大充实了岳家军的骑兵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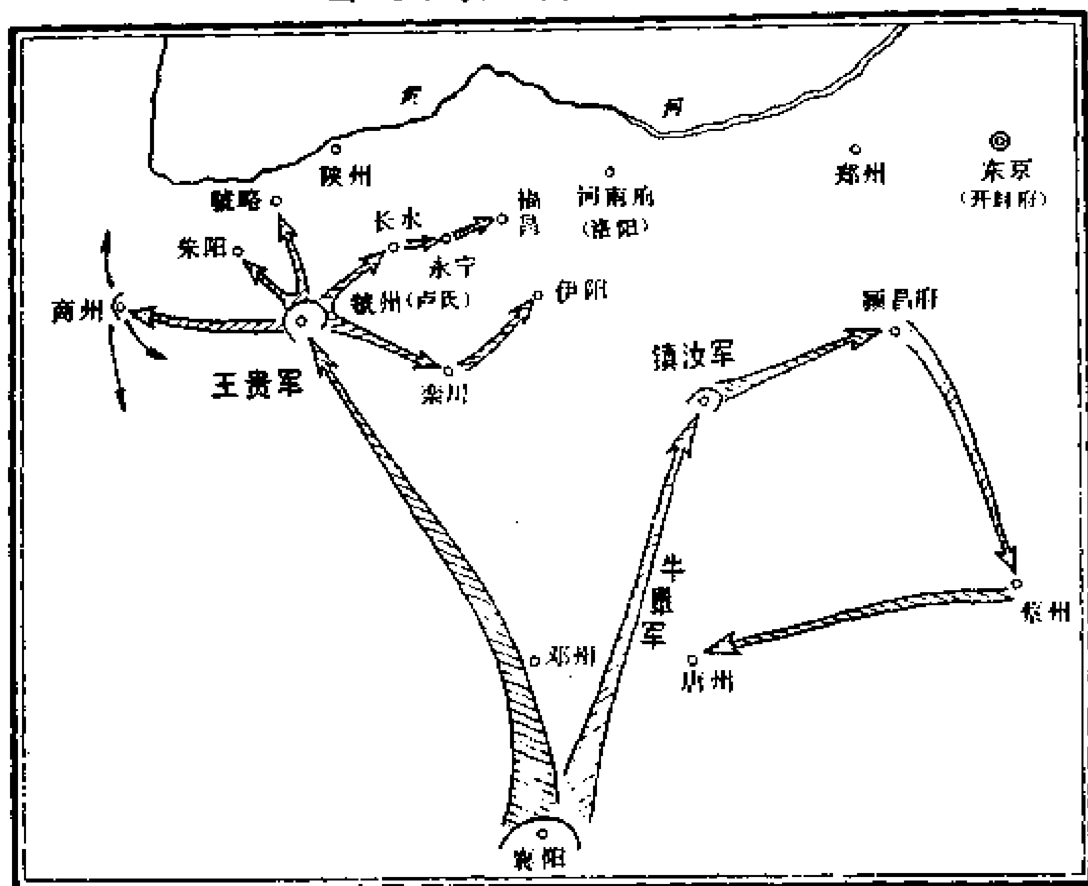
岳家军长驱商虢，是南宋立国十年来首次攻达黄河之滨。岳家军已逼近西京洛阳，本可乘胜收复洛阳，但宋高宗赵构下诏要他班师。岳飞也因孤军深入，外无援军，粮食不继，只好中途撤军。收复商虢成了这次张浚北伐的唯一战果。

二、伪齐的南犯

（一）伪齐军的作战企图和部署

南宋军队的调动（开进）和韩、岳两军的开始反攻，使得伪齐惊恐万状，急忙向金廷求援。此时，金太宗完颜晟已死，金熙宗完颜亶立即召集诸将商议对策。金朝领三省事宋国王宗磐（蒲

岳飞军长驱商虢示意图 （26—11图）



卢虎）认为：太宗之所以要立刘豫，是指望他能够“辟疆保境”，使金朝得以“安民息兵”。可是，刘豫进不能攻，又不能守，兵连祸结，不但使我们达不到目的，而且现在还要去支援他，我们从中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金熙宗于是决定对刘豫的请求置之不理，只派宗弼“提兵黎阳以观衅（看机会）”。〔56〕实际上是让刘豫去抵消南宋的军力，以便伺机南下，击败宋军。

刘豫见金朝不肯出兵，只好自己征集了三十万大军，打着金军的旗号，孤注一掷。宋绍兴六年九月，军分三路，南下入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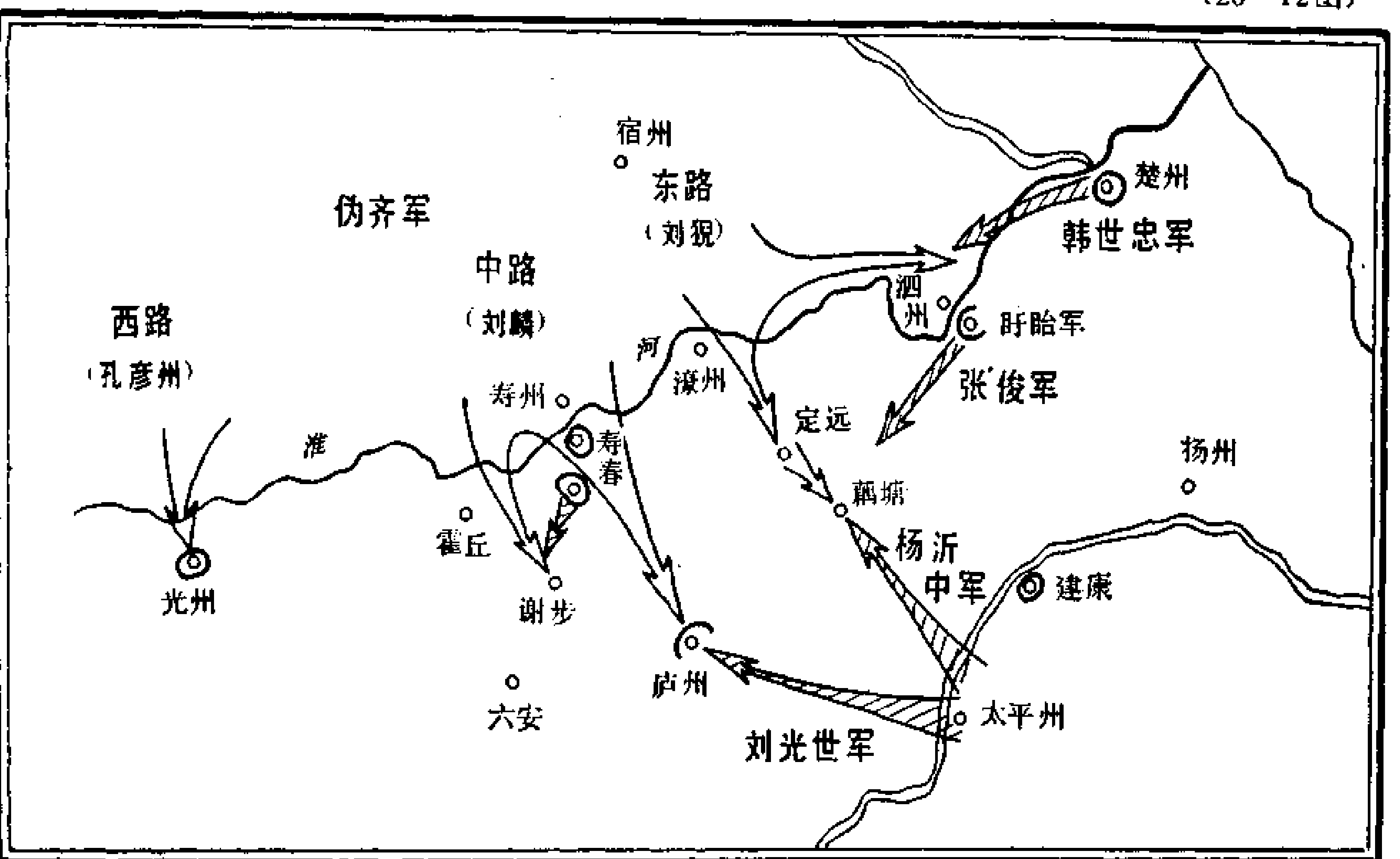
东路——由刘猊率领，从涡口（今安徽怀远东，涡河入淮处）渡淮河，进攻定远；

中路——由刘麟率领，号称十万，由寿春攻庐州；

西路——由孔彦舟率领，由光州进攻六安（今安徽六安）。

伪齐南犯和宋军迎战示意图

(26—12图)



伪齐军于九月下旬开始南下，刘猊率领的东路军进到淮东，就被韩世忠军所阻止，不能前进，只好退到顺昌，准备集结兵力，向淮西进犯。

刘麟率领的中路大军，在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寿春之间渡过淮河，张俊由盱眙派军拒之。

（二）宋廷惊恐南撤和张浚坚守两淮

伪齐军色厉内荏的攻势，吓坏了宋廷不少文臣武将。驻守淮西的张俊和刘光世听到金伪齐军汹汹南下，就虚报敌情，张俊准备放弃盱眙，刘光世奏称庐州难以坚守。这时，宋高宗正接受张浚建议去建康抚慰三军，到达平江。随行的左相赵鼎、知枢密院事折彦质，对于张浚的反攻计划和赵构驻跸建康，本不赞同，当听到张俊、刘光世的谎报，误认为是金军全力向南进攻，他们乘右相张浚去前方督师的机会，向宋高宗提出“令张俊、杨沂中合兵扫荡，然后退师还南，为保江之计。”[57]

匆忙做出三项决定：第一，允许刘光世、张俊的部队撤回长江以南；第二，火速调岳飞军东援淮西；第三，行在撤回临安。这些决定，当然正中赵构的下怀。

张浚由前方返抵镇江后，得知此次伪齐军南下并无金军配合，而刘麟中路军不过六万人，他正要部署各路大军进行反击，接连接到赵鼎等人的七、八封书信，方知宋廷判断错误，惊慌失措。于是，张浚连忙上奏说：

“若谓诸将渡江，则无淮南，而江之险与敌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江南岂可保乎！今淮西之寇，正当合兵掩击；况士气甚振，可得必胜。若一有退意，则大事去矣。又，岳飞一动，则汉襄有警，复何所制！”[58]

宋高宗赵构得到张浚奏报，才“释然无忧”，同意张浚的意见。张浚用宋高宗的名义，严令正在撤退的刘光世军重返前线。

刘麟探知刘光世把庐州驻军撤回到太平州的消息，便率领伪

齐军向庐州前进。但时机稍迟，刘光世的大军已奉命转回庐州，另遣统制官王德、郦琼率精兵自安丰军（今安徽寿县）出谢步（今安徽安丰南），击破由霍邱（今安徽霍邱）东进的伪齐军。伪齐军再攻寿春，又败。

是时，伪齐刘猊军数万，越过定远向南急驰，企图自宣化（今江苏江浦东北）犯建康。宋杨沂中军破刘猊军前锋于越家坊（今安徽定远南）。

十月，杨沂中军至藕塘(今安徽定远东南)，与伪齐刘猊军遭遇。刘猊军据山险列阵，矢如雨下。杨沂中遣催锋军劲骑五千突入敌阵，伪齐军溃乱。杨沂中以主力从正面进入战斗，亲率精骑绕出伪齐军翼侧。适江东宣抚司前军统制张宗颜亦率军自泗州西来，击其背后，伪齐军大败。张俊大军复由盱眙向西截击刘猊军，刘猊仅率数骑逃脱，伪齐将领数十人被俘，降者万计。刘麟在顺昌闻刘猊军败，拔寨北撤。王德军乘势追击，至寿春而还。是役，两路所得伪齐舟船数万艘，车数千辆，器甲金帛钱米及军需品，不可胜计。

是时，伪齐西路军正围光州未下，闻刘猊军败，亦撤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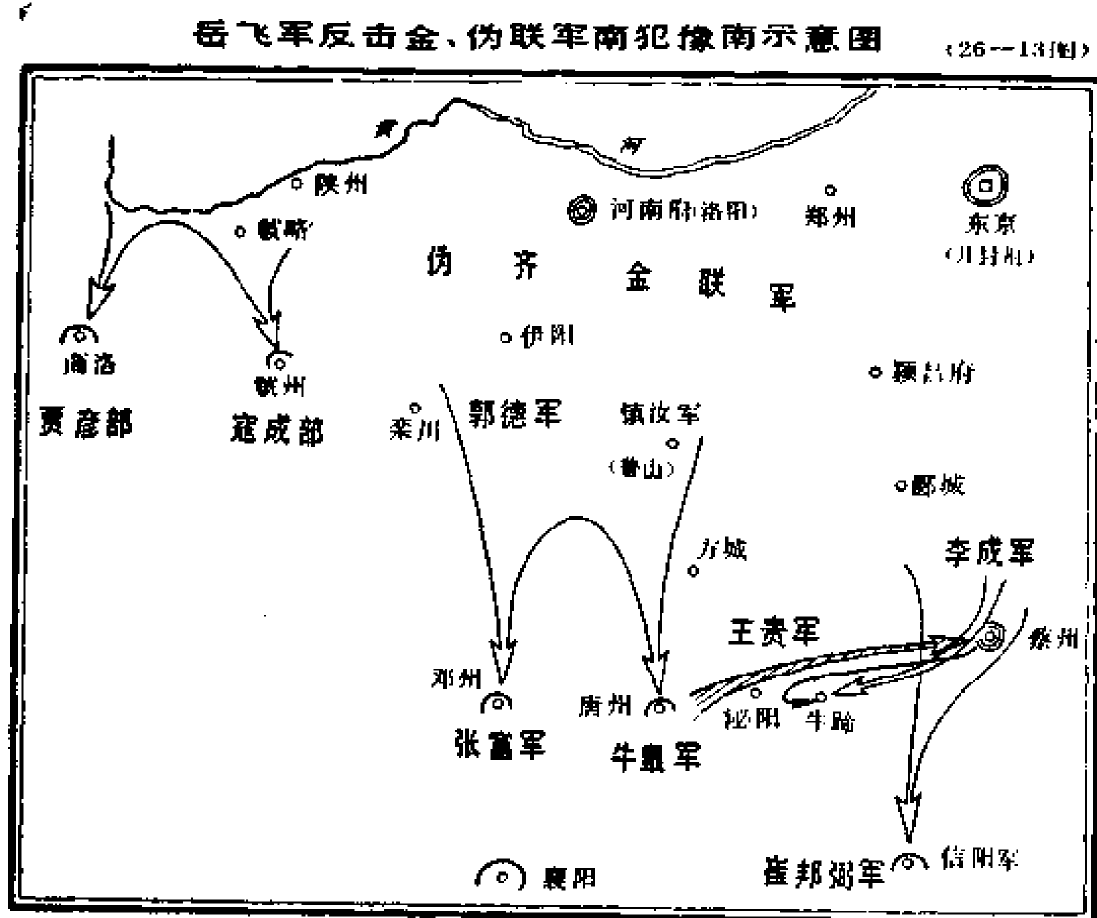
（三）金、伪联军犯豫南，岳飞军反击获胜

当伪齐军进攻庐州时，宋高宗和左相赵鼎都怕张俊、刘光世的军队守不住长江下游，遂命岳飞军支援淮西。当岳飞军东下到达江州时，伪齐军已被打退。宋廷急命岳飞回军。由于岳飞被抽调去支援淮西，致使襄阳等地前线兵力不足，伪齐认为有隙可乘，便于十月底与金军联合向岳家军的防区发动进攻，企图击溃岳家军，“直造鄂州”。

从十月底起，金伪齐军在陕东河南战线上多路向岳家军防区发动攻势，全线发生激烈战斗，岳家军贾彦、寇成、张宪、牛皋、崔邦弼、王贵等部，在商州、虢州、内乡、唐州等地英勇奋战，挫败了金、伪齐军各路的进攻。

岳飞从江州回师鄂州后，立即率军赶到前线，部署反击：决定利用王贵军已突入伪齐蔡州地界，先进军蔡州。由于蔡州城壁

严整，濠深且宽，伪齐军主力设下埋伏，岳飞当机立断，下令撤军。伪齐李成、孔彦舟等十将率军追来，王贵指挥骑兵反击，击退了伪齐军。但李成等得到增援后，继续追击，又被岳飞指挥部队击退。当伪齐军退到牛蹄（今河南泌阳东北九十里）时，被岳家军追上击破，俘虏伪齐将领几十员，兵士几千名，战马三千匹。岳家军主力安然撤回。



岳飞军反击金、伪联军南犯豫南示意图 （26—13图）

岳家军的留置部队在商州到信阳军的广大地区受到金、伪齐大军突然进攻后，英勇奋战，显示了这支军队强大的战斗力。宋廷嘉奖这次作战的诏书中说：

“加兵宛、叶之间，夺险松柏之塞”，“至于牛蹄之役，尤喜虎斗之强，积获齐山，俘累截道。”〔59〕

这反映了这次反击的实际情况。

三、金、宋绍兴九年“和议”

宋、金战争从公元1131年起，双方力量对比已发生显著的变化，金军在战争中大大削弱。公元1135年，金、伪齐联合攻宋的失败，更加暴露了金军战斗力的下降。正如金将韩常所说：

“今昔事异，昔我（金）强彼弱，今我弱彼强。所幸者，南人未知此间事耳。”〔60〕

伪齐军几次南犯惨败，使金廷大失所望，认为刘豫不仅不能替金军看守河南，对付宋军，反而兵败求援，使金军不断损兵折将，因而金廷企图取消伪齐政权，通过直接诱降，迫使宋廷纳款称臣，以达到使用军事手段未能达到的目的。

宋廷在击败伪齐军的反击后，张浚独揽朝政，并引荐秦桧为枢密使。张浚撤了骄惰不战的淮西宣抚使刘光世，以王德为淮西军都统制，命兵部尚书兼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往淮西抚慰诸军。吕祉密奏请撤副都统制郦琼等官职，事泄，郦琼杀吕祉，劫持所部四万人渡淮降伪齐，造成淮西局势混乱。张浚以处置失当被迫辞去相位，赵鼎再次出任左相。第二年，宋高宗以秦桧为右相，他无视战争形势所发生的有利于南宋的重大变化，仍一心一意与秦桧合谋，不断派出使臣向金朝乞和，要求取代刘豫的地位，对金称臣纳贡。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春，宋高宗派王伦去向完颜昌乞求：“河南地，上国既不有，与其付刘豫，曷若见归。”〔61〕只要金朝肯答应他的讲和要求，其他一切条件都可以接受。

这时金熙宗初即位，女真贵族各派系互相倾轧，经激烈争夺，完颜昌（挞懒）、宗磐（蒲卢虎）、宗隽（讹鲁观）等主和派把持了朝政。

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公元1137年），金熙宗废刘豫，取消伪齐政权。完颜昌（挞懒）等人主张把原伪齐统治的河南、陕西地区交给南宋，要南宋向金称臣，贡纳岁币，实质上也

是要把南宋变为和伪齐一样的属邦。金熙宗采纳了这一建议。这一年冬，完颜昌送宋使王伦回宋，要他带口信给宋高宗赵构：

“好报江南，既道涂（途）无壅（阻），和议自此平达。”〔62〕

王伦回宋，转达完颜昌的意思，愿意归还“梓宫”（皇帝的棺材）、皇太后和河南诸州。宋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秦桧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正式作了宰相。接着金使乌陵思谋南下谈判，不消几个月，和议就谈得差不多了。

这正式投降的阴谋，不能不激起南宋军民和爱国官吏的无比愤怒，反对投降的斗争立即在江南展开。

在宋廷内部，爱国官吏词严义正地指斥秦桧。更多的官吏提出反对议和的主张。宋高宗虽然决计屈膝求和，但不能不考虑拥有重兵的大将的态度。于是诏韩世忠、岳飞和张俊到临安，以便做笼络和说服工作。

岳飞明白地表示：“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人讥。”岳飞朝见宋高宗后，又上奏说：

“不可与和，缘虏人羊犬之性，国事隙深，何日可忘？臣气綦兵复三京陵寝，事毕，然后谋河朔，复取旧疆，臣之愿也。”〔63〕

韩世忠在枢密副使王庶到江淮视师时，已积极要求出兵反攻。宋高宗这次召见，他的态度更加激昂。后来他又连上十多件奏疏，坚决反对和议，“恳求”举兵决战，“但以兵势最重去处，臣请当之。”〔64〕

唯有“任数避事〔65〕”的张俊，视高宗召见为迎合上意的最好时机，对高宗和秦桧的求和活动表示绝对支持，从而成为宋高宗最宠信的大将和秦桧最得力的帮凶。

宋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冬，宋高宗和秦桧为了压制不同政见，加紧进行求和活动，决定更动宰执。左相赵鼎

和参知政事刘大中虽主张议和，但同时也主张要加强防守，与屈膝投降不同，当然也得下台。秦桧引进党羽孙近为参知政事，独揽中枢大权。

十二月，由宰相秦桧代表宋高宗，接受金朝皇帝的册封。

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公元1139年）正月，宋廷正式宣布与金达成和议，其内容如下：

1．宋对金称臣；

2．宋每年向金贡纳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匹；

3．金归还原来刘豫统辖的河南、陕西之地；

4．金归还徽宗灵柩及韦太后。

宋、金和议达成后，宋高宗和秦桧为了安定民心，粉饰太平，宣布“大赦天下”。而且为了拉拢朝臣，还命百官进庆贺表，并给予加官进爵。

南宋广大臣民对和议的实质早已一目了然。南宋名义上收回了河南、陕西之地，但实际上却变成了金的属国。这一和议受到抗战派将领们的反对和抵制。岳飞对所授予的新官衔“开府仪同三司”，几次上疏，力辞不受，并沉痛地说：“今日之事，可忧而不可贺”，“不可论功行赏，取笑敌人。”〔66〕吴璘也拒不进呈贺表，并公然直说：璘等“不能宣威灵，亦可愧矣，但当待罪称谢则可”〔67〕。韩世忠更在洪泽镇设下伏兵，等待金使经过时“劫之，以坏和议”〔68〕。但走漏消息，金使改变了路线，结果此计未成。

由于王伦与金议和有“功”，宋高宗赵构赐给他同进士出身、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接着，又任命他为东京留守，与金交接地界。三月，东、南、西三京及河南、陕西诸州郡，由金朝“赐还”南宋，这次和议宣告完成。

宋廷为接收河南、陕西地，分河南为三路：京畿路治东京，以王伦为东京留守兼权开封府尹，郭仲荀为副留守兼节制军马；河南府路治西京，以观文殿学士孟庾为西京留守兼知河南府；应天府路治南京（商丘），以资政殿学士路允迪为南京留守兼知应

天府。刘光世为陕西宣抚使，吴玠为四川宣抚使。

金右副元帅完颜宗弼交割地界后，渡河还祁州（今河南安国），移汴京行台于大名。应交割的州军官物，大都被运往河北。

第九　金败盟南下和宋军的反击

一、金败盟南下，双方的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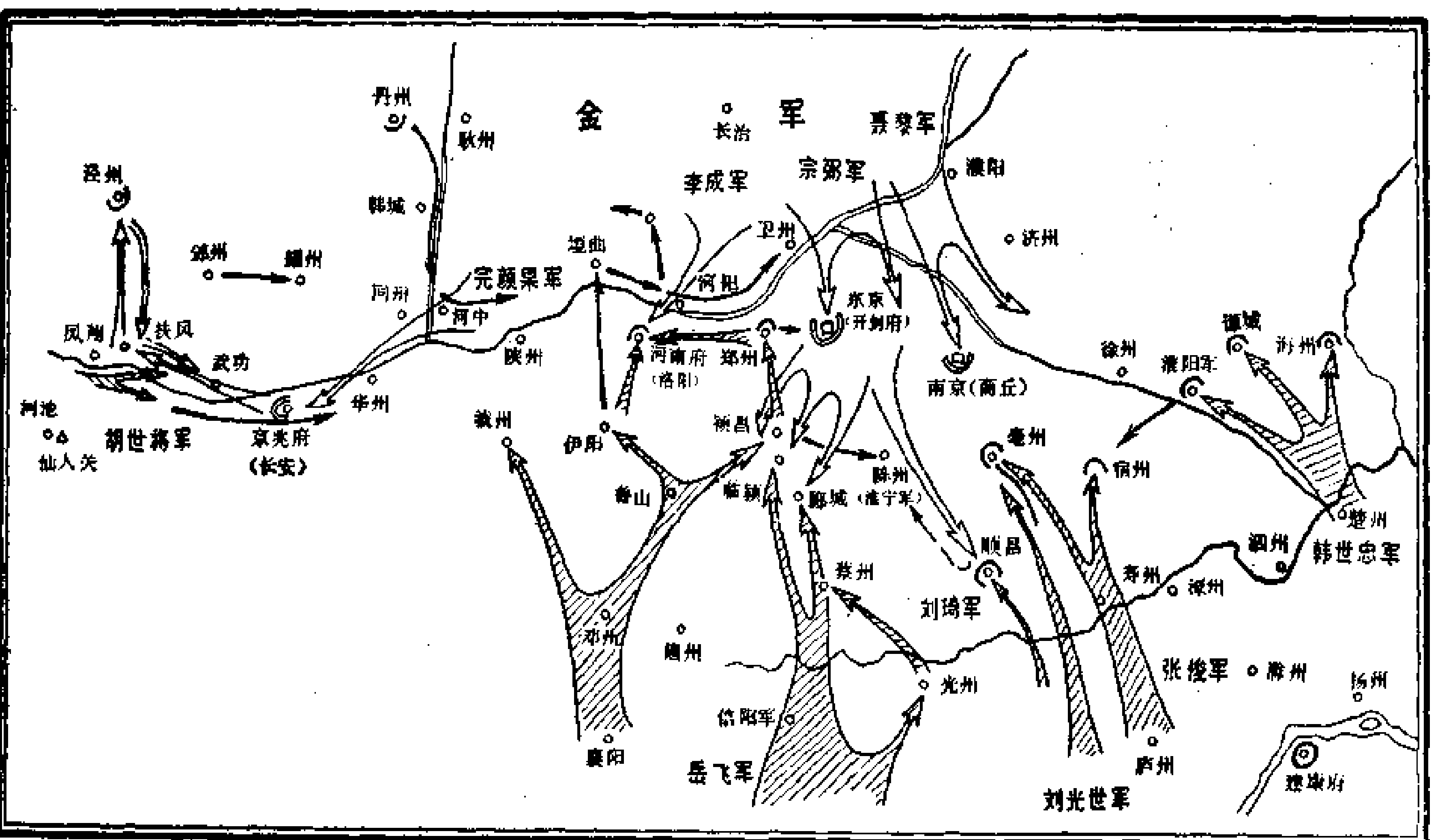
（一）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夺权斗争

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斗争非常激烈。金熙宗完颜亶是金太祖完颜旻（阿骨打）的孙子，朝中大臣多半是伯叔一辈，其中完颜宗弼是金太祖旻的儿子，关系最亲；完颜宗磐（蒲鲁虎）、完颜宗隽（讹鲁观）等是金太宗完颜晟（吴乞买）的儿子，稍远一些；完颜宗翰（粘罕）关系更远一些，完颜昌(挞懒)辈份最长而关系最疏。由于女真贵族要逐渐向中央集权帝国转变，皇权与依照旧俗权力极大的贵族便发生了矛盾。于是，金熙宗完颜亶首先杀死宗翰的亲信高庆裔，致宗翰愤恨而死。宗翰一派势力被排斥以后，完颜昌与宗磐、宗隽一派掌握了大权，他们也威胁着金熙宗完颜亶的皇位，金熙宗也非把他们除掉不可。

宋绍兴九年，金熙宗完颜亶首先以“谋反”罪名杀了宗盘等人，紧接着完颜昌被派往燕京（今北京市）去做行台左丞相，到任不及一月，又以“与宋交通，倡议割地”的罪名而被逮捕，押到完颜宗弼军营也被杀害了。于是宗弼、宗斡（斡本）等人掌握了大权。

宗弼升为都元帅，晋封越国王，领行台尚书省如故，宗斡升为太师，领三省事如故，晋封为梁宋国王。政治、军事大权，均掌握在宗弼、宗斡手中。

宗斡和宗弼在当时也都主张议和，但议和的基础（条件）是不归还河南、陕西。完颜昌、宗磐被杀后，金熙宗完颜亶下诏：



金军败退南下和宋军全面反击示意图
(26—14图)
金
军
长治
李成军
宗弼军
濮阳
济州
丹州
泾州
韩城
陇州
同州
完颜杲军
河中
垣曲
卫州
河阳
东京(开封府)
南京(商丘)
徐州
淮阳军
凤翔
扶风
武功
陕州
河南府(洛阳)
郑州
华州
京兆府(长安)
河池
仙人关
胡世将军
虢州
伊阳
颍昌
亳州
宿州
鲁山
临颍
郾城
陈州(淮宁军)
楚州
泗州
韩世忠军
顺昌
蔡州
寿州
濠州
刘锜军
邓州
唐州
光州
张俊军
滁州
扬州
信阳军
襄阳
岳飞军
庐州
刘光世军
建康府

"诸州郡军旅之事，决于帅府。民讼钱谷，行台尚书省治之，"由宗弼总其事。同时，在重新夺回河南、陕西问题上，以太师宗翰为首的各官员都取得一致意见：

> "赵构蒙再造之恩，不思报德，妄自鸱张，祈求无厌，今若不取，后恐难图。"〔69〕

于是，金熙宗在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公元1140年）五月，诏命都元帅府兴师问罪，尽复疆土。

（二）金军的战略企图和部署

在金与南宋的战争已形成相峙的局面下，金朝统治者这次南下主要是"恢复"河南，陕西地。金军南下统帅完颜宗弼在出军前，已做了充分准备，取得了汉人（南宋降将）一些将领的支持与合作，乘南宋接收河南、陕西立足未稳之际，采取四道出兵，全面进攻的战略，企图一举"收复"河南、陕西地。其部署如下：

——聂黎（乌禄）孛堇出山东；

——骠骑大将军知冀州李成攻河南；

——左监军完颜杲（撒里喝）自河中入陕西；

——都元帅完颜宗弼亲率精兵十余万与知东平府孔彦舟、知博州郦琼、前知宿州赵荣、自黎阳（今河南浚县）渡河取汴京。

同时，金朝还要宋使回到宋朝，按约索取"岁币"，提出宋朝必须用金朝年号等无理要求，以进行挑衅。

（三）宋廷的谋议和应变措施

宋高宗于宋金议和后，在河南，陕西不派重兵屯驻，州县官员多是旧时伪齐人员，对金朝内部实际情况，也不了解，王伦出使金朝，得知宗弼图谋完颜昌，即向宋廷报告，建议"乞令张俊守东京，韩世忠守南京，岳飞守西京，吴玠守长安，张浚建都督府尽护诸将，以备不虞。"宋高宗把王伦的建议拿给宰执大臣看，秦桧反对这个坚守河南、陕西的战略部署，也不作应变准备，只是急催王伦北去。〔70〕

韩世忠见金朝发生政变，金在淮阳军的戍兵和屯田兵士都已撤回，主张先发制人，乘虚掩击。宋高宗说他是武夫粗人，“不识大体”，“若乘乱幸灾，异时何以使敌国守信义”，[71]不予理睬。朝臣们也纷纷上疏，要求加强战备，秦桧则诬为“外间有匿名书，诽毁朝廷，”[72]横加制止。

金军攻盟南下，对一向极力宣扬金人信义甚著的宋高宗来说，是当头一棒。赵构无奈，只好以“夷狄之人，不知信义”的话来为自己遮羞。同时还发表声讨檄文，悬赏擒杀兀术（宗弼），急忙诏谕驻防外地大军，作应战准备，并给韩世忠、岳飞等大帅加官晋爵，又颁布诏旨：

“仰诸路大帅，各尽忠力，以图国家大计，以慰遐迩不忘本朝之心，以副朕委任之意。”[73]

二、金军全面南下，战争发起

完颜宗弼军于宋绍兴十年五月渡河南下进军汴京。宋东京留守孟庾率官属迎拜。金军进入开封后，分兵略地，于是宋知兴仁府（今山东曹县西北）李师雄、知睢宁府（今河南睢阳）李正民、南京留守路允迪等在数日之间，均先后向金军投降。汴京近畿诸郡，均望风款附。

李成军至西京，权留守李利、副总管孙晖弃城逃走。

完颜杲军从河中渡过黄河，入同州，向长安挺进。永兴军副都管郝远开门迎降，金军直趋凤翔，企图将川陕宋军拦腰截成南北两部。五月下旬，金军前锋到达凤翔的石壁寨时，为吴璘部姚仲率军打败，退回武功。

由于南宋在河南、陕西没有进驻重兵，州县地方官吏多系旧时伪齐人员，所以，金军一到，立即投降。一部分官吏，虽然决心抵抗，但被束缚手脚，无能为力。不到一个月时间，金军又夺去了根据和议由金归还南宋的全部河南、陕西之地，并继续进兵威胁淮南。

（一）金宗弼军进攻淮西——顺昌之战

宋绍兴十年五月，南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侍卫马军司军（原王彦的八字军）一万八千人，由临安沿水路赴东京。行至涡口时，得知金军已占领开封，刘锜立即命令诸军舍舟登陆，兼程前进。五月中旬进抵顺昌（今安徽阜阳），得知金军已进占距顺昌三百里的陈州（今河南淮阳）。

顺昌北濒颍水，南临淮河，东接寿州，西接蔡州，是屏障淮河的要点，通往东京的要道。刘锜率军于五月十八日开进顺昌城，与顺昌知府陈规共同商定坚守顺昌城的计划。刘锜还察看顺昌城周围的地形，决心保卫顺昌，抗拒金军。

刘锜命诸将分守四门，将城外居民迁入城内，为免民房被金军利用，全部焚毁；派出斥堠（侦察）并依靠当地人民为向导，不断侦察金军的行动；整修壁垒，以废车轮辕埋于城上加强防御；又在城上设置便于观察、射击的望孔；于近城外筑有小城“羊马垣”，以垣为阵，可用强弩射击敌人，并预置伏兵；分派部队轮流休息。同时，又号召当地人民协力抗金。经过六昼夜的努力，初步完成了顺昌城的防御准备。

五月二十五日，金军游骑数千渡过颍河，进逼顺昌城外。宋军伏兵活捉金军千户阿赫等二人，了解到金军韩常军在距城三十里的白沙涡（今安徽阜阳西北）扎寨。刘锜便乘其初至，派兵千余乘夜袭击，首战告捷。

二十九日，金军龙虎大王突合速和三路都统葛王完颜褒等率三万余人援兵赶到包围顺昌，发起攻城。宋军用劲弓强弩还击，金军被迫后撤。刘锜抓紧战机，乘势以步兵出击，金军溃乱，渡河溺死甚众，一部被宋军俘虏。宋军凭城坚守，并两次乘雷雨夜间袭击金军，经过四天奋战，打败金军第一次进攻。

金完颜宗弼在汴京得知金军进攻顺昌失利的求援战报，率军十万余，从汴京急趋顺昌，并以一部下蔡州，掩护主力进攻顺昌。

宋刘锜得知金宗弼军前来增援召集诸将研究作战方案。有人

恐力量不及，主张速乘舟南撤。刘锜制止说：

> “朝廷养兵十五年，正欲为缓急之用，况已挫敌锋，军威稍振，虽多寡不侔，然有进无退。兼敌营近三十里，而四太子（宗弼）又来援，吾军一动，被敌追及，老小先乱，必至狼狈。不唯前功尽废，致敌遂侵两淮，震惊江浙……不如背城一战，死中求生可也。”〔74〕

众将都同意这一意见，表示愿奋力一战。次日，将东门外停泊的舟船悉沉河内，示以死战到底的决心。

六月初九日，宗弼率军到顺昌城下，见城墙简陋，轻蔑地说：“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75〕当即下令次日早饭后开始攻城，并宣布破城之后，子女玉帛，悉听诸将掳掠，男子则一律处死。

初十天明，金军十余万越过颍河浮桥，合围顺昌。刘锜分派一部兵力分布在城上，另外则每五千人分作一队，轮番出城应战，只要城上守军认为战机已到，发擂击鼓，出击的部队就出城突入金军阵内，击杀金军。宗弼指挥步军在正面进行冲击，再以精锐骑兵（拐子马）从左右翼进行包围攻击，最后使用亲军铁浮图(“重铠全装”——重甲骑兵）进行驰骤冲击。宋军每人携带一个竹筒和大斧等兵器，竹筒中装满煮豆，突入金军阵内，把筒撒在地上，金军战马在饥饿之时，就要低头吃豆，马脚又为竹筒绊搅，无法进行战斗。这时，宋军用大斧、大刀砍杀，一马被砍，人马皆仆，前后左右，互相蹂践，金军被打得毙尸倒马，纵横枕藉，损伤十之七八，攻势顿挫。

这时正是酷暑之季，金军人不解甲，马不解鞍，昼夜作战，疲惫不堪，锐力大减。刘锜还在颍水上流及草中施放毒药，金军人马饥渴，饮食水草者均中毒病倒。刘锜乘中午及金军疲备之时，率军出城，袭击金军，戒令勿喊，以短兵极力与战。

宗弼见顺昌城坚，屡攻不下，士卒又多疾病，不得不改变决心，移营城西，掘壕列营，企图长期围困顺昌宋军。适值大雨，

平地水深尺余。宋军利用雨天，乘金军移营未稳，大举夜袭，重创金军。

十二日，宗弼被迫率金军撤离顺昌退回汴梁，顺昌保卫战至此胜利结束。

当金军还在围城之际，秦桧奏请召锜“择利班师”。〔76〕刘锜以正在与金军作战，“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77〕

顺昌之战，宋军以不足两万兵力抗击金军十余万步骑军的进攻，其获胜的主要原因：一是军民同心协力，全军上下，有誓死抗金的决心，刘锜所部原是王彦的“八字军”，斗志尤为坚强。二是城邑虽小，但粮食储备等作战物资丰富；由于迅速加固城防工事，有较坚固的防御设施可以依托。三是不断派出探马、斥堠，及时了解金军的动向，根据掌握的敌情，利用宗弼轻敌的心理，派出间谍欺骗敌人；抓住金军远来疲惫不惯酷暑、阴雨的弱点，采取积极防御的战役方针，抓住一切有利机会，积极出击，大量杀伤金兵，不断破坏金军的攻城准备；采取各种抗击和杀伤金军骑兵的战法，击败了金军用以制胜的铁塔兵和“拐子马”。

刘锜军在顺昌初战胜利，有力地打击了金军的猖狂气焰，振奋了宋军的士气，并鼓舞了宋军在其他方向的作战，为南宋全线反击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刘锜在顺昌抗御金军之际，宋高宗曾令韩世忠派轻骑取宿州，张俊派队往援，岳飞派骑兵兼程至光、蔡、陈、许等州策应。

六月，宋高宗授韩世忠太保，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授张俊少师，淮西宣抚使；授岳飞少保、京湖、京西宣抚使，兼河南、北诸路招讨使；刘锜任沿淮制置使；胡世将为四川宣抚副使；刘光世为三京招抚处置使，以援刘锜。

因此，在顺昌大战的同时，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各军分道出击：韩世忠收复了淮阳军海州、怀仁（今江苏赣榆）；王德军收复宿州；张俊军连破金军，攻占亳州；岳飞军败

金将韩常于颍昌，收复淮宁府，形势对宋军极为有利。

六月中旬，顺昌之战刚刚结束，赵构害怕触怒金人，幻想恢复和议，迫不及待地下令各路大军立即转为守势，并派朝臣到各军中传达"兵不可轻动，宜班师"[78]的旨意，各军不得不停止反击，顺昌大捷后的大好形势就这样被赵构断送了。

（二）金完颜杲军进攻陕西

金军自河中渡河入同州后，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在河池，遣田晟守泾原，孙渥守熙河，遣左护军都统制吴璘率兵两万，赴宝鸡渭河之南，分据要害，以拒金军；并以都统制杨政、郭浩部为后援。

六月上旬，吴璘致书金左副元帅完颜杲约期会战，完颜杲以三千骑兵直冲宋军，都统制李师颜以骁骑击退之。金军退入扶风（今陕西扶风）守城，李师颜等又率军攻城，破之。完颜杲亲自率军，与宋军战于百通坊（今扶风西南）再次被宋军打败。隔在渭河北岸的郭浩军，在解了耀州（今陕西耀县）之围以后，又派郑建充调集渭北其他宋军攻下了醴州（今陕西醴泉东），配合吴璘等军夹击金军。

金完颜杲军屡次被宋军打败，于闰六月，尽集在凤翔的金军，北攻泾州。宋泾原经略使田晟率泾原军及右护军御之。田晟据山为阵，乘金军壁垒未成，派兵掩杀，连战皆捷。后金军绕道至田晟军背后，田军一部虽然惊溃，然而主力"右护军"万人奋力拚战，歼灭大量金军。金完颜杲只得又退守凤翔，不敢出战。宋军也因粮尽退守仙人关。泾州之战，西路金军主力受到沉重打击，被金军隔在渭河以北的宋军，得以全师而还，保存了川陕宋军的有生力量。

川陕宣抚副使胡世将饬令修筑蜀口诸隘及梁（今陕西南郑）、洋（今陕西洋县）一带山寨；又分遣吴璘等防守自白石（今青海西宁东南）至秦州地区；以杨政等部屯宝鸡、盩厔（今陕西周至），准备抗击金军自长安凤翔方向来攻。

七月，胡世将派军深入金军后方，进袭长城下的金军，鄜延路安抚使也遣官兵千人，舟百艘，自丹州（今陕西宜川）顺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毁金军所造的浮桥，袭击潼关。此后又遣军渡河，袭击中条山的金军营寨。于是，陕西方面的战争，呈胶着状态。

三、岳飞军进军中原

（一）进军部署

金军主力围攻顺昌之际，宋高宗急令岳飞救援顺昌；接着又命令岳飞军向中原进军，说“右可图复京师，左谋援关陕，外与河北相应，此乃中兴大计”。[79]岳飞按照其以襄阳为基地，“连结河朔”，直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部署进军。

岳飞将大军分成援淮军、游击军、野战军和留守部队四部分：

援顺昌选遣军，前军统制张宪，游奕马军统制姚政率军最先出发，驰援顺昌。

游击军深入金军后方，京东路以李宝和孙彦率领的部队担任。另两支部队，一支由梁兴、赵云和李进率领，另一支由董荣、牛显和张峪率领，渡河北上，联络两河义军，抗击金军。

野战军是挺进中原的正规作战部队，由武赳、郝义等将领带领轻装步兵，出虢州与陕州忠义军首领吴琦、商州知州邵隆会合，切断金在中原的宗弼军与在陕西的完颜杲军的连系，掩护岳飞主力的左侧背；岳飞亲率主力向京西路前进。

后方留守部队包括全部水军，负责江西路江州至江东路池州（今安徽贵池）的江防，保障湖北，江西和江东三路的安全。

六月初，岳飞大军由襄阳、鄂州开始进军。

当宋高宗、秦桧知宗弼自顺昌败回开封后，就立即要求各路大军转取守势，以便对金妥协投降。六月下旬，宋廷派司农少卿李若虚赶到德安（今湖北安陆）岳飞军前“计议军事”，传达宋高宗赵构、宰相秦桧的旨意：“兵不可轻动，宜班师”。岳飞断

不听从。李若虚知道岳飞的进军计划已经部署好了，军队已经出动，他激于大义，毅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80〕于是岳家军继续向中原进军。

（二）扫荡开封外围作战

金宗弼军败于顺昌后，退回汴京，命大将韩常率军守颍昌，翟将军率军守淮宁，三路都统阿鲁补守应天府（商丘）。金军企图以颍昌、淮宁、应天作为汴京的外围防线，宗弼和龙虎大王军控制在汴京作为总预备队，相机打击宋军的进攻。

闰六月，岳家军经过战斗准备后，发起攻势，最初的作战目标是扫荡汴京外围。

十九日，张宪率领前军在离颍昌四十里的地方，击败金韩常军，夺占了颍昌府城，会同牛皋、徐庆等军，击溃金翟将军的部队，乘胜占领淮宁府城。

二十五日，金韩常军得到汴京派来的增援部队，企图夺回颍昌城。岳家军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马军统制姚制分头直冲敌阵，金军大败。

金军在汴京外围的三个要点，顷刻之间被岳家军拔除两个，剩下一个应天府（商丘），原属张俊军战区。岳飞期待张俊和刘琦两军北上，以便集中兵力与金宗弼大军进行决战。

二十五日，中军统制王贵派将官杨成率部攻克郑州，一部突入汴京西南的中牟县，杀死很多敌人，夺取大量战马、器甲。

七月一日，中军副统制郝晸率军直指西京，击败金李成军，光复了西京（洛阳）。中军统领苏坚率部与坚持在西京的李兴取得联系，并肩作战，攻占西京所属的五个县城，接替郝晸防守洛阳。

不到半月时间，岳家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胜利地完成了扫荡汴京外围防线的作战计划。

（三）郾城之战

顺昌战后，张俊军从亳州后撤，刘锜军虽未遵命南撤，但仍

驻军顺昌，也不敢违诏北进。岳家军随着收复地区的日益扩大，兵力也日益分散，再加孤军深入，形势十分不利。为此，岳飞不得不缩小正面，在郾城（今河南郾城）、颍昌集结兵力，暂取守势，待机 转 入 进攻。金宗弼看到有机可乘，不待岳家军集结完毕，抢先发动大规模的反击作战，集中兵力打击岳家军。

七月初八，金宗弼得到盖天大王赛里（完颜宗贤）等率领的生力军的增援后，纠集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完颜宗贤、昭武大将军韩常等精锐骑兵一万五千，直扑郾城，企图乘宋军在郾城兵力薄弱，一举歼灭岳家军的指挥中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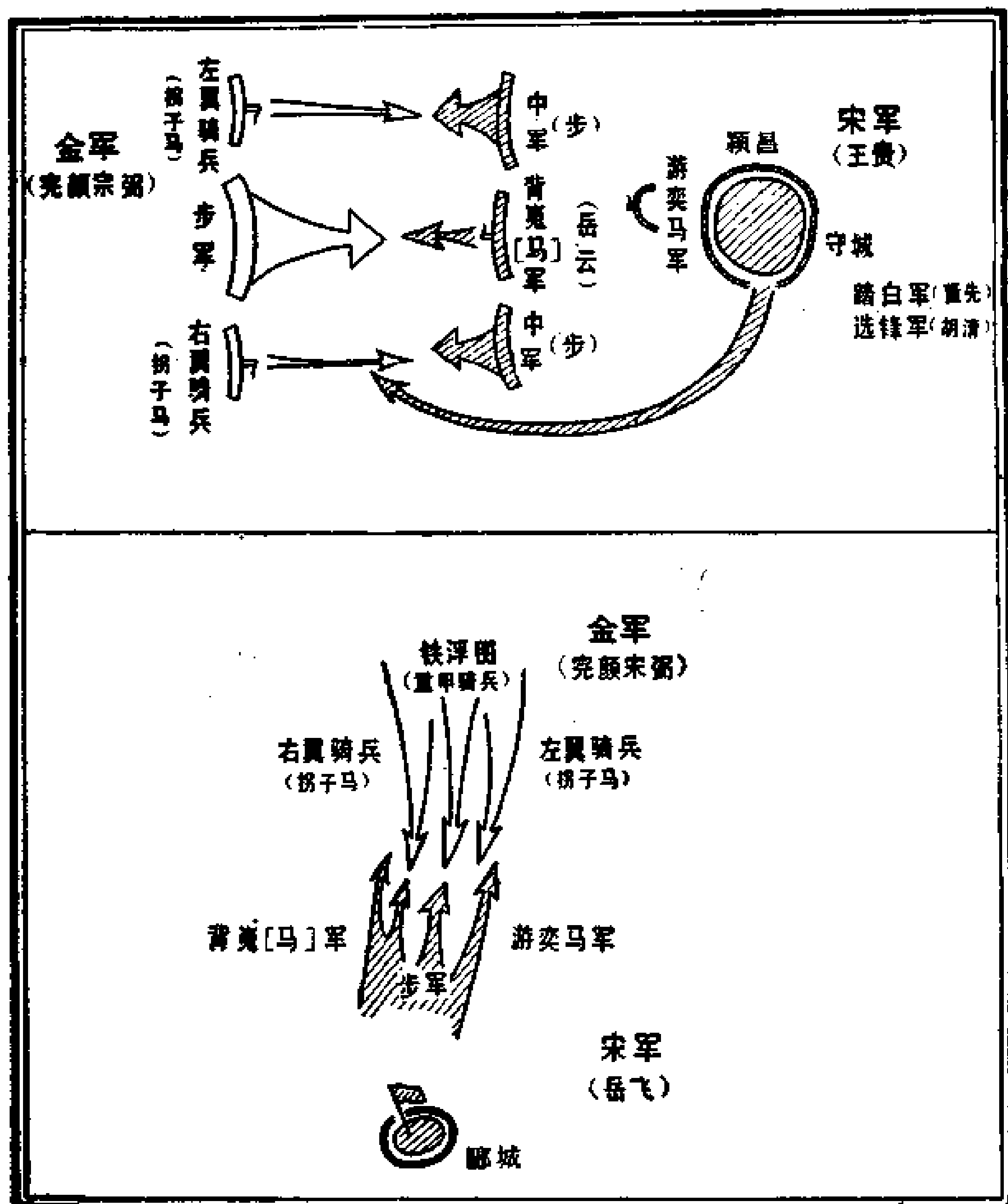
岳飞指挥的只有背嵬军和游奕马军的一部。岳飞首先遣岳云率领背嵬军和游奕马军出战，“或角其前，或掎其侧，用能使敌人之强，不得逞志于我”，在旷野平原上与金军铁骑（拐子马）展开激战。统制官杨再兴单骑突入金阵，欲直擒宗弼，不获，杀金军百十人，身被数十枪。金宗弼又以“铁浮图”军（重甲骑兵）投入战斗，企图突贯宋阵。岳飞即令步兵进入战斗，手 持 麻 扎刀、提刀、大斧等锐利兵器，上劈敌人，下砍马足，与金军重甲骑兵展开了一场“手拽厮劈”的肉搏战。

当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岳飞亲率四十骑突出阵前， 左 右 开弓，箭无虚发。将士们看到大帅亲自出马，士气倍增。战至天黑，金军退出战斗，狼狈向临颍方向撤退。

郾城之战是宋军步、骑兵对金军“铁骑”的一次较量。在此以前宋、金战争的所有作战中，宋军的步兵在平原开阔 地 总 是敌不住金军铁骑的冲击。韩世忠、刘琦军在大仪镇、顺昌曾经使步兵以长枪、大刀、竹筒等办法去对付金军骑兵，取得了一些胜利，但还不能与金集团骑兵对战，这次岳飞以步骑兵在野战中击破金军骑兵集团，还是宋金战争中的第一次。

岳飞是很重视骑兵的。岳家军主要通过战场上缴获 的 大 量马匹，组成相当强的骑兵部队，光背嵬军的马军，就有 八 千 多骑[81]。游奕马军也是骑兵部队。在郾城之战开始时，由岳 飞 令

宋金郾城、颍昌之战示意图 （26—15图）



背嵬军和游奕马军出击，与金军引以为骄傲的主力骑兵集团进行搏战，同时以手执麻扎刀、提刀、大斧的步兵迎击金宗弼的亲军重甲骑兵（铁塔兵），这种以步制骑和以骑制骑的战法，充分显示了岳家军的勇于拚搏和善于拚搏。

（四）颍昌之战

金宗弼大军由郾城后撤，集结在郾城和颍昌之间的临颍县境，隔断了岳家军和颍昌王贵军的联系，伺机再兴攻势。

七月十三日，前军统制张宪等部先后从淮宁府等地赶到郾城。岳飞令张宪率领背嵬军、游奕马军、前军等部向临颍前进，寻求与宗弼大军决战。前锋三百骑进抵临颍南小商桥时，突然与金军遭遇。宗弼指挥金军包围宋军，宋军进行殊死战斗，将官杨再兴等三百骑士全部牺牲，金军也遭到沉重打击，无力再同张宪大军较量。宗弼遂留下八千人守临颍，自率主力乘夜北撤，准备转攻颍昌。

十四日，张宪指挥大军进攻临颍金军，经过激烈战斗，金军战败，向颍昌、尉氏（今河南尉氏）方向撤退。

金宗弼在颍昌城西集中了镇国大王、韩常和四个万户共三万骑及龙虎大王突合速、盖天大王赛里的十万步兵准备攻城。同时派出五千骑兵在临颍东北，牵制张宪大军，掩护金军主力攻击颍昌王贵军，企图一举歼灭之。

岳飞判断金兵可能攻颍昌，便令岳云驰赴颍昌增援，颍昌共有宋军三万余人。十四日统制王贵命董先率踏白军、副统制胡清率选锋军守城，自己和姚政、岳云等率中军游奕马军、背嵬军出城迎击金军。

金军在城西列阵，以步军在正面，拐子马在两翼，发动进攻，王贵命岳云率背嵬军首先驰击金步兵，中军也以严整的队形掩蔽背嵬军的两翼前进，与金军左右翼拐子马展开搏战，自辰至午，鏖战激烈。守城的宋将董先和胡清看到双方已战到白热的程度，也率军出城从外翼冲击金军。金军不支，宗弼收容败军向开封撤

退。此役当阵杀死金军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千户五人，活提金军大小首领七十八人，俘虏二千多人，杀死五千人、缴获战马三千匹，金、鼓、旗、枪、器甲之类不计其数。

郾城和颍昌两战，是岳家军第二次北进中原关键性的大战。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岳家军依靠将士的强劲勇敢，沉着坚定，经过壮烈的战斗，击破优势的敌人，终于获得重大胜利。

金完颜宗弼率领的军队是金军中的精锐部队，他从第一次南下围开封起，依靠他的"铁骑"重甲兵（铁塔兵）和拐子马，屡立奇功。但在绍兴元年以后，在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战中，每次都以战败而告终。在此以前，宗弼军未同岳家军进行过大的较量，这次才真正领教到岳家军的威力，以至发出哀叹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五）抗金义军胜利出击

正当岳家军在中原战场连战皆捷之时，插入敌后的游击军，也与当地民众和义军密切配合，袭击金军，切断道路，收复了许多州县。

京东路李宝和孙亮的部队，从五月就在兴仁府（今山东菏泽）一带打击金军，有力地支援刘锜军在顺昌的作战。

忠义军兵马统制孟邦杰，奉命扫荡京西大河以南的金军，他一举攻取永安（今河南巩县南），又向西北攻克孟津，金军逃过黄河。

梁兴为执行岳飞的"联结河朔"的计划，渡过黄河，重返太行山，在两河地区重新燃起了抗金的烽火。游击军袭击金军，攻克垣曲（今山西垣曲东南）、王屋（今河南济源西），在当地民众的配合支援下，声势很大，又攻占了绛州（今山西新绛）、翼城（今山西翼城）、泽州（今山西晋城）、沁水（今山西沁水）等地，并向东深入到怀州（今河南沁阳）和卫州（今河南汲县）之境。

王忠植领导的河东路人民抗金武装，克复了岚州（今山西岚

县北）、石州（今山西离石）、保德军（今山西保德）等十一个军州，活跃于河东路北部。

在河北路的岳家军忠义统制赵俊也派兵过河，会合忠义统制乔握坚的部队，收复了赵州（今河北赵县）。磁州（今河北磁县）、相州（今河北安阳）、开德府（今河南濮阳）、冀州（今河北冀县）、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等地的人民也都揭竿而起。

大河以北的抗金健儿已发展到四十万人以上，大家都以“岳”字作旗帜，盼望大军早日渡河。父老百姓们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羊，“以馈义军”。金朝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岳家军和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奇观。北宋兵学家许洞说：

“游兵者，谓其兵无定在也。必士果锐而骑超捷，将勇悍而善应变。时而东复时而西，时而出复时而入；敌怒而迎，我引而退，敌倦而息，我临而扰；击其左复击其右，击其前复击其后，击其懈驰而无备，仓卒难救；抄其谷食，焚其积聚，劫其辎重，袭其要城，取其别营，绝其要道；或朝或暮，伺敌之隙，乘间取利，飘忽迅速，莫可踪迹。于我为军之声援，于敌为彼之后患，夫使贼腹背均患，进退维谷，则不难于翦除。”〔82〕

（六）功废一旦，挥泪撤军

当中原战场和敌后战场都连战告捷之时，岳飞根据双方形势，提出宋军全线转入反攻的要求。他在《乘机进兵札子》中说，金军屡败，宗弼已命令“老小渡河”，最近又调八千人渡河北逃，“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83〕

但是，宋高宗赵构只求偏安江南，成为金的属国也就满足了。所以，他对岳飞要求全面反攻的回答是“措置班师”。秦桧还串通张俊，让他不等朝廷正式下令，先把部队从亳州、宿州撤

到淮南，使岳飞军孤军突出，不得不奉诏后撤。韩世忠见张俊退兵，也只好把正在围攻淮阳军的部队撤回楚州。川陕的宋军主力也已退守川陕边境。秦桧还以顺昌原属京西路为由，要岳飞军“严为守备”，把刘琦军调回镇江。岳飞一再要求让刘琦军仍驻守顺昌，反对“措置班师”，指出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84〕宋高宗赵构根本不予理会，而且还下诏“不许深入”。

这时，金完颜宗弼的十万大军驻扎在开封附近，企图进行最后抵抗。岳家军的先头部队分由临颍、颍昌向朱仙镇方向推进，前锋五百铁骑抵达朱仙镇一带时，与金军一度交锋，击败了金军。

秦桧看准时机，迫不及待地向宋高宗提出让岳飞军“班师”的建议，说岳飞军“孤军不可留”，还唆使殿中侍御史夏汝辑上奏说：

> “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飞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85〕

班师一不至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的下怀，于是，大致在郾城之战的同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正当岳飞前锋到达朱仙镇时，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金字牌递发的班师诏，要大军班师，岳飞本人去临安朝见皇帝。

岳飞接诏后，悲愤已极，但又不得不奉诏“班师”。岳飞愤慨地说：

> “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86〕

为防止金军乘势追击，岳飞宣称进攻开封。七月十七日，岳家军主力自郾城、颍昌撤军。

一次接近胜利的战争，就这样被宋高宗、秦桧断送了。

以岳飞军为主的南宋反击作战，各条战线连战皆捷。金军主力完颜宗弼所部，在顺昌受挫于刘琦军，在郾城、颍昌又被岳家

军打败。他不禁哀叹"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准备尽弃辎重，渡河北撤。在此有利的大好形势下，宋军本可由反击作战而发展为全面反攻，收复黄河以南地区，进军河北。但宋高宗赵构、秦桧竟然下诏"班师"，以致前功尽弃。尽管如此，岳飞进军中原的作战毕竟是南宋广大军民抗金战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岳飞为实现反攻中原的夙志，深谋远虑，与北方义军密切连系，确立了"连结河朔"，长驱以取中原，南北夹击金军的方针，并相应地采取了进据襄阳，发展屯田，屏蔽江左，建立巩固的后方，壮大力量，疲惫金伪，然后提兵直趋京、洛，长驱恢复中原的战略步骤。历史证明，根据当时情况和人民的要求，岳飞所策定的方针和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

岳飞军之所以能战胜金军，主要是由于：

岳飞训练出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掠虏"的严明纪律。岳家军战斗力之强，在南宋正规军中是罕有的；岳家军军纪之好，不但为南宋诸军之冠，在中国古代各皇朝的军队中也是少有的。

岳飞重视人民的抗金力量，提出"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策动、联络和支援两河抗金义军，与岳家军的军事行动互相呼应或配合作战，夹攻敌人。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也是少有的。

岳飞具有进攻的作战思想。宋军以步兵为主，难以对付强大的骑兵集团，长期以来，怯弱的宋军习惯于分兵防守，不敢向敌人进攻，消极防御成为传统战略。南宋初期著名将帅如吴玠、韩世忠、刘琦，虽都能指挥积极的防御战役，但只有岳飞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当宗弼集中优势兵力抢先发动进攻时，岳飞在郾城、颍昌两役中，在战役战斗上仍然采取进攻，以自己的精骑与优势敌骑对冲，从而取得了在野战中摧破敌骑兵集团的辉煌胜利，体现了"直捣黄龙"，光复故土的决心。岳飞不愧是一个卓越的统帅和民族英雄。

四、金军再侵淮西

（一）金军再次南下，以战逼和

宋绍兴十年七月，岳家军奉命班师，整个战局发生逆转。是年秋、冬间，完颜宗弼到燕京朝见金熙宗，在返回开封后，立即检点粮草，调集兵马，又作大举南下的准备。

由于宋各路大军奉诏“班师”，金军达到了“收复”河南、陕西的战略目的，下一步便是如何在军事上、政治上向南宋施加压力，促成更有利于金的南北和议。为此，金朝一方面放还过去扣留的宋使二人，以示愿意与南宋议和；另一方面，又发兵渡淮，企图用武力压迫南宋接受投降条件。

宋绍兴十一年（金天眷四年，公元1141年）正月，完颜宗弼选定宋军防守最薄弱的张俊军防守的淮西战区，集中九万大军企图一举突破淮河防线，直抵长江，胁迫南宋政权就范。

宋在淮西战区有三支大军：淮西宣抚使张俊军八万人，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军三万人，淮北宣抚判官刘琦二万人，总兵力大于宗弼军，要抵御金军的进攻，照理说是不成问题的。

金军由开封附近向南开进。正月中旬，以孔彦舟率军为先锋，宗弼亲率韩常等军为主力，一举越过淮水，攻占寿春，然后分军趋濠州、滁州、庐州南下。

宋淮西宣抚使张俊在宋廷的催促下，急忙由建康率军渡江迎击，同时宋廷还急令驻扎在太平州的淮北宣抚制官刘琦军渡江去防守庐州。

刘琦率军到达庐州后，见庐州残破无法防御，只好南撤。金宗弼率军进入庐州后，遣骑兵追击。刘琦退至巢县南，找一个依水据山的地形列阵以待。张俊军淮西宣抚使都统制王德，由采石渡江，收复含山州（今安徽含山）、巢县、全椒（今安徽全椒）等地北进。宋廷又调岳飞军星夜去江州，相机策应，使金军腹背受敌。一面又急遣淮北宣抚付使杨沂中率殿前司兵马军三万驰援前线。

（二）柘皋之战

金将韩常、完颜宗敏（阿鲁补）闻宋大军渡江迎战，乃率部徐徐后退至柘皋（今安徽巢县西北）。其南有河，西通巢湖。金军十余万人，分左右两军，在柘皋夹道而阵，以待宋军。

张俊部王德和杨沂中、刘琦三军会合后，继续向庐州推进，至柘皋，刘琦部搭桥令重甲步兵先过，掩护大军渡河。翌日，杨沂中军由上流涉浅而进，不利稍却。王德、田师中军由便桥过河猛冲金军右翼劲骑，金军一将领被射中落马，宋军鼓噪而进。金军拐子马从两翼向宋军冲击，上流杨沂中军以步兵万人执长斧，并列前进，奋勇冲击，金军大败。王德、刘琦军进行追击。金军向寿春撤退，宋军遂复庐州。

此役，刘琦令重甲步兵先过桥占领桥头堡，掩护主力过桥；王德率军过桥猛冲列阵的金军劲骑；杨沂中以步兵持长斧如墙而进大破金军拐子马，都是很可取的。

（三）濠州之战

金军在柘皋战败后，完颜宗弼又挥军急攻濠州。张俊令刘琦军先班师，自采石渡江还驻太平。张俊与杨沂中率军“耀兵淮上”。

三月九日，张俊、杨沂中军北上距濠州六十里，闻濠州已被金军攻破，急召还刘琦军，在黄连埠（今安徽嘉山西）据险扎营，堑地栽木，准备抗击金军的进攻。

张俊又遣百骑往濠州侦察，归报濠州全无金军。张俊遂使刘琦留守营寨，遣王德与杨沂中率二千骑兵先趋濠州，并从两军中选出精锐万余跟进。次日午时，宋军先头部队进至城西，埋伏在北门外的金军突然上城并由两翼出击。宋军慌乱撤退，“南奔无复纪律”。金军跟踪追击，宋步军见马军先退，亦皆溃奔。金军乘胜猛追，宋军步兵不得脱，被杀伤甚多。留在黄连埠的张俊和刘琦闻讯后，亦皆拔寨南撤。

当濠州被金军围困时，宋廷命岳飞东援，岳飞亲率八千背嵬

军铁骑为前锋，由黄州过江后到达舒州（今安徽潜山），得知战局变化的消息，即倍道兼程北上。当进到庐州时，岳飞遣人与张俊联系，张俊告以“敌已渡淮”北去。岳飞得报后，立即奏报宋廷，宋高宗以《御札》回复说：

“虏已渡淮，卿先在舒州听候朝廷指挥，此以见卿小心恭慎，不敢专辄进退，深为得体。”

张俊贪功冒进，遭致失败，反诬刘琦作战不力，岳飞逗留不进。由于赵构、秦桧的庇护，张俊并未受到处分。

四、削夺大将兵权，冤杀岳飞，再次达成绍兴“和议”

柘皋战后，金军在回军途中，虽然冲破濠州并击败了援濠的张俊、王德、杨沂中等军，但总的来说，金军并未达到兵临长江的目的。于是金军北撤，宋军南归。宗弼不得不承认金军已失去优势，遂改变战略，决意讲和。

宋高宗和秦桧感到阻碍讲和的是握有重兵抗金坚决的大将如岳飞、韩世忠等，因此，决意设法解除诸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要解除诸大将的兵权，不仅是为了要议和，而且也是出于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这后一条是赵宋皇朝恪守不渝的家规。

宋绍兴十一年四月，宋廷以论功行赏为名，召韩世忠、张俊、岳飞到临安，宣布任韩世忠、张俊做枢密使，岳飞做枢密副使，剥夺了他们的兵权，留朝任职。七月又解除了刘琦的兵权。接着淮东、淮西、京湖三宣抚司被撤销，三宣抚司统制官以下都冠以“御前”两字，直接听候三省、枢密院取旨调发。又置淮东、淮西和湖广三总领，分掌各路上供财赋，供办诸军钱粮，并规定总领还要“节制”诸军，负责报发朝廷与各军间的往返文件，预闻军政，实际上起着监军的作用。

八月，秦桧唆使其党羽弹劾岳飞，毁谤他“自登枢府，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和淮西之役“坚拒明诏，不肯出师”，以及倡言楚州“不可守”等。宋高宗立即解除岳飞枢密副

使的职务，发表他任万寿观使的闲职。

秦桧一伙随后就着手罗织诬陷岳飞的罪状。秦桧伙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王俊，诬告岳飞谋反，制造冤案。

十月，金完颜宗弼为了迫使宋廷加速投降，又出兵攻占泗州、楚州。秦桧、张俊因怕有碍投降活动的进行，竟然不派兵渡江抵御，反而把坚决抗金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狱中，接着又把韩世忠罢官。金军在毫无阻挡的情况下，渡淮南进，直到长江边的六合，致书南宋朝廷，进行虚声恫吓，声言如不及早投降求和，就要渡江南下。宋高宗赵构、秦桧马上哀求宗弼"先敛兵，许敝邑拜表阙下"。

十一月，在宋使魏良臣再三叩头，哀求甚切之下，金完颜宗弼许以淮河为界议和。宋金东自淮水中流，西以大散关为界，京西割唐、邓二州，陕西割商、秦二州之半给金。宋向金称臣，每年向金纳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四）。金州封赵构为帝，在册文中说："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87〕

宋金虽签订了绍兴"和约"，但宗弼原先提出的"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88〕"的要求，还未实现。宋高宗、秦桧怕金朝以此作为借口破坏和议，在绍兴十一年（金熙宗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冤杀岳飞父子和部将张宪于狱中。

宋高宗以割地、纳贡、称臣和杀岳飞的高昂代价，才换得了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金方既无力南下，又满足了贪欲，于是双方维持了一个较长时期相对稳定的局面。

第十　金完颜亮南侵

一、海陵王南进的准备和部署

金朝与南宋议和后，利用有利时机，恢复、发展北方的社会生产和进行必要的改革。金熙宗完颜亶晚年酗酒乱杀，宋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完颜亮乘机夺了帝位。金海陵

王完颜亮继承和发展了金熙宗完颜亶时的恢复、发展生产与打击守旧势力的政策；但在对宋关系中却违背了金熙宗完颜亶所签订的和约，经过十年准备，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南宋的战争。

金海陵王完颜亮想做中国的正统皇帝，把统一全国作为奋斗的最大目标。但海陵王企图统一江南的想法，并没有取得统治集团内部的一致支持。由于海陵王对不同意见采取高压政策，把对宋战争的争论发展为对不同意见者的诛杀，这就削弱了海陵王的统治力量，并潜伏下激化内部矛盾的危机。

金海陵王完颜亮为做好侵宋准备，于宋绍兴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公元1159年）遣使分往各路、府，籍诸路猛安部族及州县渤海丁壮充军，共二十七万人，分为二十七军。命工部省尚书在通州督造战船，命诸路总管府督造兵器，将诸路旧存兵器全部集中到中都（今北京市），并大括天下骡马。结果劳力被摧残，农田被践毁，"天下（指金统治区）始骚然矣"。[89]

金海陵王于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夏前往开封，接着金廷也迁到这里。这时金军陆续集中，设立三道都统制府及左右领军大都督，指挥三十二军，以神策、神捷等为名，军置总管、副总管及巡察使，副巡察使，分属左右领军大都督及三道都统制府。其南下攻宋部署如下：

左领军大都督——以太保枢密使完颜昂为都督，尚书右丞李道副之，御史大夫徒单真为左监军。

右领军大都督——以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大都督，判大宗正事乌延蒲卢浑副之，同判大宗正事徒单永年为右监军。

以上总兵力二十余万，由海陵王亲率为东路，从寿州进攻淮南。

浙东道水路——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都统制，益都尹郑家为副，率战船数百艘，兵七万，于十月十八日由胶西（今山东胶县）经海道入钱塘江，以趋临安。

中路——以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扑散乌

著副之，率军十万自蔡州趋荆、襄，并分兵自光州趋黄州、武昌，另分兵自邓州直捣金州（今陕西安康），以策应川陕及江淮方面的作战。

西路——以河中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张中彦副之，率军五万，由凤翔趋散关，以取四川。

另以徒丹真率军二万趋淮阴。

南侵的作战指导：西路、中路先发动攻势，“声东击西”，以牵制两淮宋军，然后海陵王亲率主力向淮西进行突破；渡江后，在水军的配合下，直扑临安，企图一举灭宋。

二、南宋的应战准备

宋绍兴二十九年末，南宋朝廷得知金军将南侵的消息，宋高宗一面立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赵瑗为皇子；一面派同知枢密院事叶义问出使金朝，探听动静。吏部员外郎虞允文判断金军必分五路：出蜀口，出荆襄者，止以兵牵制宋军；淮东沮洳，非用骑之地；它日金军主力，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随后宋廷确悉金军即将南侵，便开始进行部署：

——以刘琦为淮南、江南、浙西制置使，节制诸路军马，担任江淮地区抗击金军的重任；

——以成闵率军三万前往武昌，防守长江中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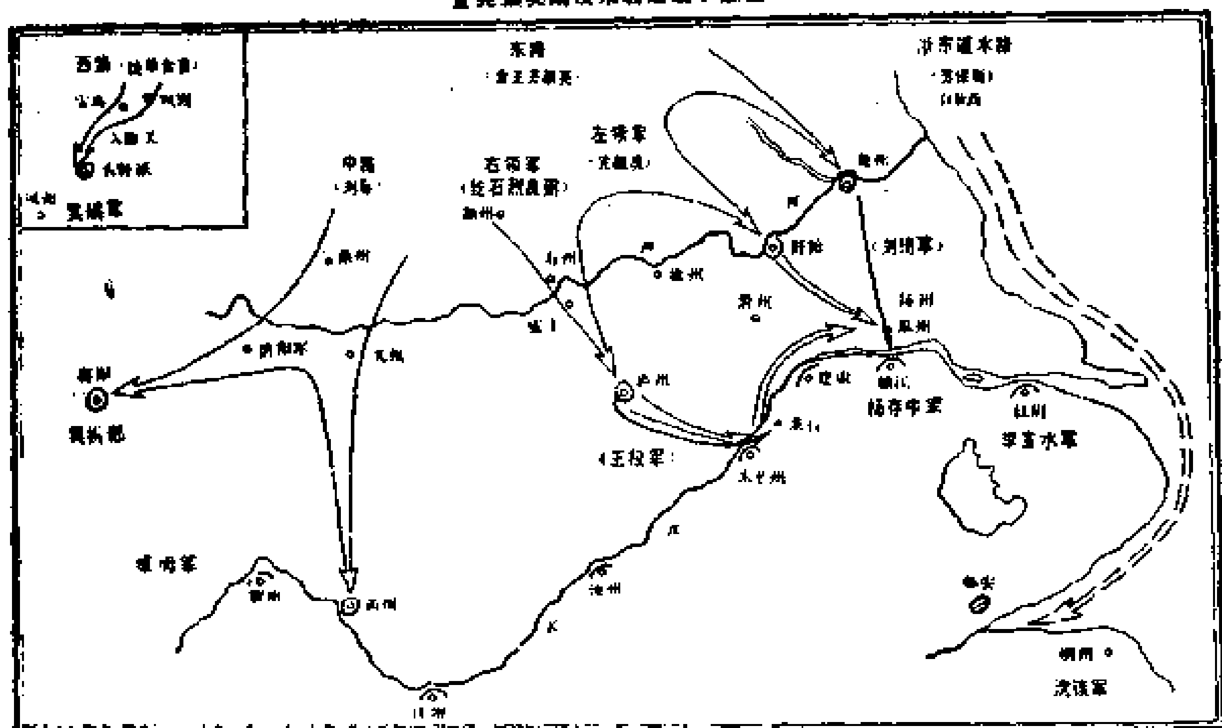
——以吴璘为四川宣抚使，负责川陕防务；

——以沈该为沿海制置使，判明州，负责沿海防御金水军的突然袭击；

——将各地部队分别集中于明州、平江、池州、太平州、江州、荆南、峡州等地，以增强海防、江防的兵力。

三、金军的进攻和采石之战

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八月，金西路军首先发动攻势，自凤翔入大散关，宋吴璘军到仙人关，拒止金军于蜀口之外。金中路也开始向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光州（今河南潢州）发动攻势。同时另向淮阴发动牵制性的攻势。



金西、中路军发起攻势后，金海陵王完颜亮率主力开始向两淮进军。左、右领军渡淮后，分军向盱眙、庐州前进。

金左领军所部，败宋军于盱眙，宋刘琦军退回扬州。金军向杨州挺进，又连败宋军，宋军退保长江北岸的瓜州。

金右领军向庐州前进。宋军放弃庐州，退保长江南岸。金海陵王到达和州。

金水军在密州（今山东诸城）胶西县陈家岛遭宋李宝指挥的水军袭击被歼；向川陕进攻的金西路军受到宋四川宣抚使吴璘军的痛击；中路由唐、邓南侵的金军，也因宋军早有防备，再加上金军所积粮草被焚，被改调淮东。

十月，金军临江的消息传来，临安一片惊慌。文武官员纷纷把家眷送走，宋高宗又想逃亡海上。左相陈康伯、太傅杨存中力言“不可”，并说“今日之事，有进无退”。〔90〕于是，宋廷决策继续拒敌；并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视察江淮军，以虞允文为参谋军事，派部队加强长江沿岸各要点的防御。

这时，湖北京西制置使成闵指挥诸军进攻金军，以为淮西声援。十月下旬攻蔡州，击破金军。刘琦军退至瓜州后，与追击的金军激战四天，因病重留将守瓜州，与金军对峙，刘琦还守镇江。

时建康告急，以判潭州张浚改判建康府，调池州都统制李显忠为建康都统制，以邵宏渊为池州都统制。瓜州被金军攻陷后，宋廷急派御营宿卫使杨存中赴镇江措置江防事务，一面命淮西军北进，以威胁金主力军的侧背，江州右军统制李贵率军至颍河，进攻颍昌。

十一月初，宋廷再次调整太平、采石方面的部署，以李显忠代淮西制置副使王权统率退采石的宋军，命中书舍人参谋军事虞允文往芜湖，催李显忠赴任并犒军。虞允文到采石时，在采石的宋军已经没有统帅，将士无人指挥，形势十分危急。虞允文毅然负起抗击金军渡江南侵的重任，立即组织部队，鼓舞士气，沿江布防。

金海陵王在和州准备大军由采石渡江，因金军舟小，稍有犹豫。后又决定派总管阿林、阿萨率舟师先渡。船队由杨林口进入长江，逼近南岸。虞允文已先令步骑列阵于江岸，又命宋舰载兵泊中流击之。民兵驾驶海鳅船冲敌船，金船队被冲成两段，宋舰并击金船，船上金兵多死，其逃回北岸者，均被完颜亮迁怒杀死。金海陵王初战失败，只得退回和州。

虞允文判断金军虽败，明日必再兴攻势，遂连夜组织防御。天明后，金军又开始渡江，宋舟师扼住杨林口用齐射将其击退，一部分上岸的金兵，皆陷泥淖之中。宋舟师从上流而下，烧毁金军船只三百艘，上下夹击，金军又遭惨败。金海陵王连日失败，知在采石无法渡江，乃准备移师瓜州，改在瓜州渡江。

四、金海陵王移军扬州，兵变被杀

几天后，李显忠自芜湖赶至采石，与虞允文相会。虞允文判断金军转移至扬州，必争瓜州，京口防御兵力不够，必须加强，

要李显忠分军一万六千人，驰援京口，虞允文也往京口。随即，杨存中，成闵率军皆至，防御京口的大军共约二十万。

十月，金本部发生政变，金世宗完颜雍在辽阳（今辽宁辽阳市）即皇帝位后，进至中都燕京，黄河以北都已归附完颜雍。海陵王完颜亮后退无路，金水军又被宋军歼灭，利用水军进攻临安的企图已告破灭。在进退失据之际，海陵王决定孤注一掷，妄想在瓜州渡江占领江南地区，再作后图。于是命令全军三日内全部渡江南侵，否则处死。

宋杨存中、虞允文到京口后亲临江边布置防务，分军守滁河口，屯军下蜀。虞允文、杨存中检阅水师，命战士于江中试踏车船，绕金山三周，踏往瓜州。适金海陵王至瓜州，命将士持弓射船，宋船回转如飞，俱不能中。金军大惊，认为宋军有备，建议退回扬州，徐图再举。海陵王不听，反而虐杀将士，于是军中人心动摇。

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部尚书神武军都总管耶律元宜等组织部分将领率部起事，与其子王祥、武胜军都总管徒单守素、猛安唐括乌野等将士袭击海陵王营帐，海陵王完颜亮被乱箭射死，尚书右丞李通等皆被杀。完颜元宜行左领军副大都督事，令使者杀太子光英于南京（商丘），率大军北还。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下侵宋，以自身的毁灭而告终。

十二月初，金东路军北撤，宋军收复两淮地区。中路金军也退，抗金义军配合宋军收复洛阳及嵩州（今河南嵩县），耿京义军也在金军后方打击金军。总之，宋金战场上的形势对宋军极为有利。

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下失败后，金世宗完颜雍将南下的军队北撤，把从河北、山东、陕西征来南下的步兵都放免还家，由都元帅完颜昂在山东经略边事，暂时把主要兵力用来巩固内部和镇压北方契丹族人民的起义，对南宋转为防御。

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公元1162年）正月，金议和使者将到临安，宋高宗赵构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91〕三

月间，金使到达临安，左相陈康伯等不顾宋高宗一再表示要继续推行纳贡称臣的政策，强制金使以对等的地位对待南宋君臣。这是南宋建立三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主战派扬眉吐气。但是，宋高宗既害怕金军，又难于继续推行投降政策，进退两难。六月初，只好传位于赵昚（即赵瑗，瑗改名玮，又改名昚），是为宋孝宗。

宋金采石之战，不仅挽救了南宋王朝覆灭的命运，稳定了南北对峙的局面，而且还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敌强的范例，对后世的反侵略战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金完颜亮发动的这场师出无名的战争，加剧了社会矛盾，不仅遭到劳动人民的反对，而且也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满和分裂。在军事战略上，轻敌冒进，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横渡天堑长江又无充分准备，以致有采石之败。后来改变渡江计划，移师瓜州，舍狭就宽，舍易就难。这种侥幸取胜的心理，当然是靠不住的。而金海陵王完颜亮又自以为是，臣下正确的意见不愿采纳，自己错误的作法不肯改正，性情多疑，任意杀戮，以致人人危惧，激化了矛盾，酿成巨变，身死军败。

南宋方面，这次战争开始，金军即南临大江，完全是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专持和议，不搞战备的恶果，南宋最后能以少胜众，转危为安，首先是南宋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被迫应战，正义的力量得到正确的使用。在军事战略方面，宋军各条战线基本上得到配合，挫败金军其他方面的进攻，使金完颜亮率领的主力成了孤军，为采石之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特别是虞允文等人及时抓住战机和临危不惧，敢于负责的精神，对战争全局起到了决定作用。

明代史学家张溥论及此事说：

> “亮死雍立，金乱宋治，不乘此时定都建康，招合义师，正国体、复故疆，而犹逊词修贺，反辔临安，悲哉构也。”〔92〕

广大军民浴血奋战得来的采石大捷，被宋高宗赵构抛弃完了。

第十一　赵眘、张俊北伐和“隆兴和议”

一、宋廷和战不决，贻误战机

宋孝宗赵眘还是皇子时，就主张抗金。即位后随即任命张浚为江淮宣抚使，统一指挥江淮的军事。随后又追复因坚持抗金而被害死的岳飞的官爵，并起用由于反对乞和而被贬的胡铨等，大大鼓舞了抗金士气。但是参知政事史浩是太上皇宋高宗安插在赵眘身边的主和派，他不断散布求和的言论，阻挠张浚的抗金部署。是战是和，使宋孝宗赵眘徘徊不定。七月，宋孝宗不顾张浚的反对，听从主和派史浩的意见，派使臣前往金朝通报即位之事，因金朝坚持旧的屈辱条件，致无结果而回。宋孝宗转而倾向张浚，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张浚极力劝说宋孝宗北伐以恢复中原，但遭到已升为右相兼枢密使的史浩的一再反对。张浚恐怕失去战机，建议抢在金兵秋季南侵前，及早进军。为了避免史浩的阻挠，宋孝宗同意绕过内阁和枢密院，由张浚单独部署北伐。

从宋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金世宗完颜雍即位海陵王被杀起，到次年九月，金军主力一直在北方镇压内部叛乱，这正是宋军乘机北伐的大好时机。但是，由于宋高宗、史浩一再阻挠，直到宋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公元1163年）四月，张浚才在宋孝宗的支持下准备北伐，已拖延了两年时间，而这时金朝的形势有了很大的改善。

金世宗完颜雍基本上继承了金熙宗完颜亶和海陵王完颜亮时已推行的改革政策，调整了民族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并为摆脱上京旧势力的影响，加强对汉地的统治，把都城迁往中都（燕京）。

金世宗完颜雍的皇位稳定之后，将金军主力纥石烈志宁所部调到商丘，做好了南侵准备；随后又命左丞相仆散忠义前往南京（今河南开封市）指挥南侵的金军。金军抢在宋军之前作好了进攻的准备工作，南宋北伐的大好时机已经错过了。

金军南侵的战略目的是：宋"若归侵疆，贡礼如故，则可罢兵"，"如必欲抗衡，请会兵相见。"[93]宋、金双方的争执是改为平等地位还是依照旧约的问题，因此，双方都无大的战略企图。

二、宋军北伐，败于宿州

宋军在张浚的部署下，开始了北伐战争。第一步遣招讨使李显忠军出濠州趋灵壁（今安徽灵壁），副招讨使邵宏渊军出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趋虹县（今安徽泗县），然后会攻宿州（今安徽宿县）。

五月，李显忠军攻占灵壁，邵宏渊军攻占虹县，接着又攻占宿州，并击败了金军纥石烈志宁军的反攻。金孛撒自汴梁率步骑十万来攻宿州，亦被宋军击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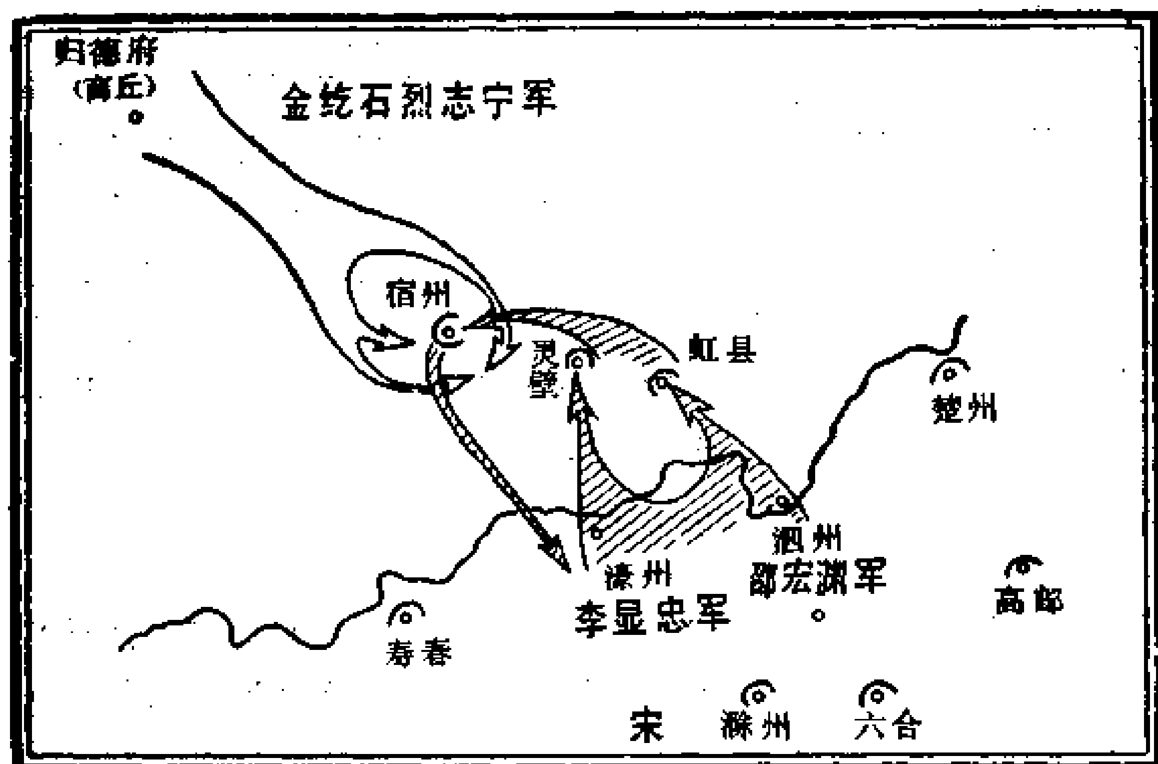
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合诸军再攻宿州，宋军出城列阵迎战。

由于邵宏渊与李显忠不和，在战斗紧张关头，邵宏渊不但按兵不动，而且还散布流言，动摇军心，中军统制周宏及邵宏渊之子邵世雄等将率部逃跑。李显忠败退入城，宋军"自相蹈藉，僵尸相枕"，不得已乘夜率队突围南撤。金夹谷清臣率军追击，至符离（今安徽宿县境内）又大败宋军，宋军损失惨重。张浚的北伐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了。

时张浚在盱眙，一面命刘宝为镇江都统制，防守镇江，一面到泗州抚慰北伐将士。然后上书自劾，请求致仕（退休），并上书请通好于金。宋孝宗赵昚斥之以"方败而求和，是何举措"！遂下诏亲征，命张浚留任。张浚乃以魏胜军守海州，陈敏军守泗州，戚方军守濠州，郭振军守六合，以滁州关山要地和高邮、巢县为主要据点，集中水军于淮阴，马军于寿春，抗御金军的南

侵。

宋孝宗赵昚北伐宿州之战示意图　（26—17图）



三、“隆兴和议”

张俊北伐失败，主和派乘机攻击张浚，宋孝宗将张浚降职使用，又起用主和派汤思退为右相兼枢密使。同年八月，金朝来书索取海、泗、唐、邓四州，仍要求宋向金称臣，和议未成。至十月，金朝为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命仆散忠义、纥石烈志宁再次出兵，攻占盱眙及濠州、和州、滁州等地，再次兵临长江。这时张浚病死，汤思退坚持议和，太上皇赵构又在背后支持，宋孝宗只好派使臣赴金，以下列条件议和：改金、宋的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疆界仍维持以淮水到大散关一线；“岁贡”的名称改为“岁币”，数量由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减为二十万两(匹）。

由于金世宗完颜雍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来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又鉴于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败亡的教训，加上如果南宋主战

派上台，南侵也未必能够取胜，因而也希望签订和约。这个新约史称“隆兴和议”，虽使南宋对金的关系略有改善，但仍然是个屈辱的和约，是主战派和主和派妥协的产物。

隆兴和议以后，宋孝宗对宋金的不平等关系，一直感到非常愤慨，他依靠虞允文积极备战，准备以武力改变现状。此后宋金关系虽然仍发生过一些波折，但终宋孝宗之世，未发生过大的战争。宋宁宗时，外戚韩侂胄总揽军政大权，又进行过一次仓卒的北伐，称为“开禧北伐”，由于宋军缺乏训练，大部将领缺乏坚强斗志，这次北伐也很快失败了，金军再次兵临长江北岸。主和派史弥远掌握了大权，以韩侂胄的首级和增加岁币十万两等条件，结束了这次战争。从此南宋的国力就更为衰弱了。

金宋战争的性质

女真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所建立的政权是中国分裂为几个政权的历史时期内，同时并存的民族政权。它灭掉辽朝和北宋，又从南宋统治者手里夺取了大片土地，建立了版图辽阔的金皇朝。

当女真族进入中原时，就开始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急速转变，这是飞跃的进步。但在另一方面，它所进行的战争仍带有很大的掠夺性，给高度发展的南宋封建文明，带来了大破坏和大倒退，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严重地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给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从北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金军分道南下时起，金与赵宋皇朝为了争夺中国的统治权，断断续续进行了一百多年的战争。在女真贵族屠杀、掠夺和奴役的威胁下，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保卫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封建文明，也促进了女真等落后民族的封建化。因此，南宋广大军民起来反抗金军入侵是正义的。

金宋双方军事力量的消长与军事战略的转变

在十二世纪最初三、四十年内，女真族的生产方式较之汉族地区虽远为落后，但女真贵族的军事力量却发展得很快。在进入华北地区后，女真凭藉其强大的草原骑兵进军中原，过黄河，破汴京、掳获徽、钦二帝，灭掉了北宋皇朝。

金朝在灭北宋的战争中，并未经过激烈的重大战役，就轻而易举的击败了北宋军队。金统治者乘战胜的余威和南宋政权初建之机，集中全部军事力量，沿袭灭亡北宋“长驱直进”和俘获辽天祚帝的“穷追”战略，全面南下，企图一举追获宋高宗赵构，摧毁南宋政权并取而代之。

南宋方面，由于政权刚刚建立，黄河（三京）防线已崩溃瓦解，虽有河北广大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义军和中原地区残存的北宋部队奋力抗金，但北宋的中央禁军（正规军）已基本溃散，留置在西北对抗西夏的重兵也难以迅速东调。所以，战争初期军事力量的对比是金军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南宋统治者在强大的战略进攻面前，采纳李纲的建议，支援河北、河东义军，重建黄河防线，企图阻止金军的长驱直入，这是符合当时广大军民的愿望的；当无法一时打破金军的进攻，不得不先避开不利的决战，以待有利时机而实施的战略退却也是允许的。但战略防御不应是消极防御，战略退却并不是逃跑，而是为了创造有利于反攻的条件。宋高宗赵构的战略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

宋高宗赵构已经患有严重的恐金病，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制定的防御战略是受他政治战略——斥地求和的方针制约的，因而是消极的。从战争一开始他就把他的政治战略一直贯彻在整个三十七年的对金战争之中。

金军以有限的兵力在东起山东、西至陕西的广大正面上，和东线多水、西线多山不利于骑兵驰骋的条件下，对南宋实施了

战略进攻。它虽然掳获了大量子女玉帛，攻占了中原的一些战略要地，但并未达到擒获赵构、歼灭南宋军队和消灭南宋政权的战略目的。而金军自己却不断遭到南宋广大军民的抵抗和打击，伤亡的累计数字不断增加。金朝统治者经过实施三次强大的南下攻势以后，才认识到想一口吃掉南宋的狂妄企图难以实现，继续分散兵力在广大正面上进攻，是徒劳的。于是它改变战略以刘豫为傀儡皇帝，命他在河南招降纳叛，以对抗两淮和中原的宋军，使金军得以休整和稳定后方，在陕西方面调集兵力，实施重点进攻。金军企图集中兵力，打开蜀口，以取得外线的有利态势，夺取两川，控制长江上游，然后顺流而下，略取江右，分阶段地逐次实现它的战略目的。

宋廷派张浚经略西北，集中在西北的南宋军队，发动了带有战略性的进攻战役，尽管富平之战在战役上遭到失败，但在战略上却获得了成功。金朝统治者不得不抽调在江淮的金军主力宗弼军急赴陕西，以应付张浚发动的攻势。于是在江淮战场金军主要战略进攻方向上，对南宋的压力大为减轻，使南宋赢得了可贵的时间来稳定政局，整饬军备，确立了川陕、京湖和江淮三个战区，分兵防卫、互相支援，金宋双方的优劣形势开始有了转变。

金朝统治者企图集中兵力突破蜀口，打了三年，结果被南宋吴玠、吴璘军以卓有成效的山地防御所挫败，金军遭到了重大的损失。与此同时，在京湖和江淮战场，南宋一批优秀的抗金部队和将领逐渐在战争中成长。他们顺应两河和中原人民抗金的强烈愿望，大量吸收义军扩大队伍，使南宋军队不断从抗金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扭转了过去一触即溃的局面。如吴玠军抗住了金军主力完颜宗弼军的强大攻势；岳飞、韩世忠军不仅可以战胜刘豫的伪齐军，有时也能以防御作战打败金军的进攻和发动局部反击。岳飞军收复襄阳六郡和向豫西、伊洛出击，逼使金朝统治者废弃无能的刘豫，使金统治者利用刘豫“以中国攻中国”的企图破灭，也表明宋军的作战能力继续增强。金宋双方力量对比，正日

益朝着有利于宋军的方向发展。

金统治者利用宋高宗赵构的失败主义情绪和只求保存赵家王朝的心理，在军事力量已不占优势的条件下，仍然以战逼和并败盟南下，企图夺回河南、陕西后再兴和议。但在顺昌遭到南宋刘锜军的坚强抵抗而受到挫折；在郾城、颍昌则遭受岳飞军的猛烈反击而一再失败；两淮战场的韩世忠、张俊军以及在陕西的胡世将军也都全线出击，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宋金战争出现了南宋军队由全线反击发展为战略反攻的有利形势。

可悲的是宋高宗赵构害怕将帅权重尾大不掉，只想保住赵宋小朝廷的统治，宁愿偏安江左，而一味妥协求和，用尽一切办法，制止这种有利形势的发展，如"措置班师"、收回大帅的兵权、杀害卓有战功的抗金名将岳飞、抑制抗金将领的进取等等，自己削弱了已经转为优势的南宋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他就这样以屈辱求和、屈膝称臣、割地纳供的高昂代价，来维持南宋王朝的腐朽统治和换取偏安江左的享乐生活。

事实上，这时金军已无力再发动新的大规模攻势，在两河及中原人民不断斗争的情况下，不得不以主力来巩固已占领的地区。这样，双方大规模的战争行动，实际上已经停滞下来，大体上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以后完颜亮的冒险大举南下，和南宋张浚、韩侂胄条件不足的两次北伐，都很快以失败而告终，双方都无力改变南北对峙的局面。

由于金宋双方统治者都同样日趋腐朽，双方都无力打破南北相峙的局面，但又相互敌对，使当时蒙古族得以乘机崛起，最后金、宋先后亡于蒙古（元），中国又重新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南宋的政治战略与军事战略

北宋是赵匡胤在五代纷乱、军人专政、互相篡代的情况下，发动军事政变取代北周而建立的。宋太宗赵光义就认为"外忧不

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制定出防内重于防外，“强干弱枝”的政治方针。

北宋统治者着意提倡重文轻武，以文制武，对将帅防范和猜忌，不敢委以全权，授以重兵。在战时则干预将帅的军事指挥，甚至对将帅的指挥作战进行遥控，实行“将从中御”，以加强对将帅的绝对控制。

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也是通过由宰执大臣草拟、自己亲笔书写手诏，来指挥前线军事的。如刘锜率军在顺昌遭受金军围攻，秦桧为宋高宗起草“御札”，要他“择利班师”；岳飞胜利进军中原，也是因十二道金牌递到的手诏，而被迫班师的。《六韬·龙韬》说“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宋朝的“将从中御”，达到了严格控制将帅的目的，但却成为宋朝军队作战无力和积弱的重要原因。

议和苟安也是赵宋的传统国策。金灭辽后开始南下时，宋徽宗赵佶不组织军事抵抗，一味遣使求和，结果弄得二帝被俘，北宋灭亡。宋高宗赵构不仅不接受北宋灭亡的教训，反而更加畏金如虎，在金军大规模攻势下，丧魂落魄，仓皇奔命，宁愿接受极其屈辱和苛刻的条件，以求偏安江南。甚至当金优宋劣的力量对比已经转变，多次出现南宋军队转为战略反攻的大好时机的形势下，宋高宗赵构仍然抱住屈辱求和不放，他既怕触怒金人，又怕将帅权重，尾大不掉，竟下诏班师，任凭大好形势，白白付之东流。宋孝宗即位，意图振作抗金，废除屈辱和约，但太上皇赵构仍然暗中掣肘，使宋孝宗不能有所作为，赵构确是一个始终坚持屈辱求和的典型统治者。

南宋的军事（战争）历史表明，在妥协求和和“强干弱枝”的政治战略影响下，它的军事战略只能是消极防御。

宋廷从建立以来，并未明确地制定过一贯的军事战略方针。然而依据抗金战争的史实，可以用“以战求和”的消极防御战略加以概括。它表现为：分兵把口，保存实力（以张俊军为更

甚），战只是为了掩护逃跑或者希望金军知难而止，为和谈争取较宽的条件。他们不敢让军队主动出击，稍有胜利立即加以制止，深怕惹怒金人而破坏了和谈。因此，他们喜欢曲迎上意如张俊那样的将帅，对岳飞、韩世忠等积极抗金，善于作战而又威望日高的将帅则深为忌恨，非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是由于这一条军事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在抗金战争中锻炼、成长了一批军队，造就出一批优秀的将帅；尽管由于爱国军民的奋力作战，改变了敌我强弱的对比，出现了战略反攻的大好时机，南宋统治者仍然熟视无睹。他们只求皇权永固，宁可屈膝求和，偏安江南，也绝不让战略防御发展为战略反攻而触怒金人。这就是宋太宗赵光义所说的"外忧不过边事……若为内患，深可惧也"的最好注解。

岳飞、韩世忠等名将在抗金战争中的功绩

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等著名将领，在南宋与金的战争中，坚决抗金，指挥部队开创新的战法，多次击溃、击败金军的主力，保卫了人民的利益，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韩世忠在黄天荡只以八千水军堵截金军，利用长江天堑和宋军水战的特长，打得金主力宗弼军狼狈不堪，不敢再言渡江；又在大仪设伏，击杀金军聂儿孛堇的先头骑兵，为屏蔽江南作出了重要贡献。刘锜军在顺昌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他率领八字军孤军守城，多次主动出击，打败金宗弼的十万大军，成为积极防御的典型战例。吴玠、吴璘兄弟率军坚守蜀口，依山据险，创造了"番休迭战"和"迭阵法"等新战法，击败了金宗弼主力的进攻，保障了四川和宋军左翼的长期稳定。他们都为南宋的抗金斗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不愧为南宋抗金的著名将领。

岳飞站在抗金斗争的前列，组织和领导了抗金军民，坚持了正义的抗金斗争，保卫了南宋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文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他不愧是南宋抗金将领中的杰出代表。

岳飞具有以进攻为主的战略思想，他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反击作战，是在当时具有恢复故土的决心和能力的将领。他以“尽忠报国”来激励士气；他严格治军，严格训练，并在战争中锻炼出一支纪律严明、能打硬仗和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尤其是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纪律，在封建时代是非常罕见的。

长期以来，宋军习惯于对金军骑兵集团的进攻采取守城或布阵防御。岳飞能突破宋军传统战法的束缚，以高昂的士气、优秀的战斗素质和对付敌骑的有效战法，在野战条件下，以进攻手段与宗弼的主力骑兵集团展开拚搏，并进而压倒敌骑，战胜金军，使金人也不得不承认“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这种气吞山河、灭此朝食的战斗气概，在战争史上是罕见的。这种进攻的军事思想，在宋金战争中也是罕见的。

注　释

〔1〕〔7〕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
〔2〕〔3〕〔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
〔5〕 《宋史·李纲传》
〔6〕 《建炎进退志》卷三
〔8〕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五
〔9〕 《金史·世纪补·睿宗纪》
〔10〕 《金史·宗翰传》
〔11〕 《金史·宗翰传》
〔12〕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
〔13〕 《中兴圣政》卷五
〔14〕 《续资治通鉴·宋高宗建炎三年》
〔15〕 《大金国志》
〔16〕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八
〔17〕 《续资治通鉴·宋高宗建炎三年》
〔18〕 《续资治通鉴·宋高宗建炎三年》
〔19〕 《大金国志》卷二十四
〔20〕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二十
〔2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六

〔2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八
〔2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九
〔24〕《续资治通鉴·宋高宗建炎四年》
〔25〕《鲒埼亭集》外编卷三十七
〔26〕《大金国志》卷七
〔27〕《大金国志》卷六
〔28〕《宋史·杨存中传》
〔29〕《宋史·吴玠传》
〔30〕〔31〕《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元年》
〔32〕《金史·宗弼传》
〔3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八
〔34〕《大金国志》卷七
〔35〕《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五
〔36〕〔3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十一
〔38〕《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上
〔39〕《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四年》
〔40〕《宋史·吴玠传》
〔41〕《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四年》
〔42〕《大金国志》卷八
〔43〕《孙子兵法·地形篇》
〔44〕《宋史·岳飞传》
〔45〕《静宁州志》卷八
〔46〕《草庐经略》卷五
〔47〕《宋史·吴玠传》
〔48〕《宋史·吴璘传》
〔4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三
〔50〕《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二
〔51〕〔52〕《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四年》
〔53〕《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十
〔54〕背嵬军是宋军统兵将帅的亲军，是宋军的精锐，参看《辞海》。
〔55〕〔56〕〔57〕〔58〕《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六年》
〔59〕《金佗稡编》卷一
〔60〕《大金国志》卷七
〔61〕《宋史·王伦传》

〔6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七

〔63〕《三朝北盟会编·岳侯传》

〔64〕《宋史·韩世忠传》

〔65〕叶适：《水心别集》

〔66〕《宋史·岳飞传》

〔67〕〔6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五

〔69〕《金史·宗弼传》

〔70〕《玫瑰录》卷九十五

〔7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一

〔7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三

〔73〕《金佗粹编》卷四

〔74〕《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十年》

〔75〕〔7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六

〔77〕《宋史·高宗本纪》

〔78〕《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十年》

〔79〕《金佗粹编》卷二

〔80〕《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十年》

〔81〕《金佗粹编》卷八、卷二十二

〔82〕《草庐经略》卷七

〔83〕《金佗粹编》卷十二

〔84〕《宋史·岳飞传》

〔8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七

〔86〕《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七

〔87〕《金史·宗弼传》

〔88〕《金佗粹编》卷二十

〔89〕《金史·李通传》

〔9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

〔9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六

〔92〕《宋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四

〔93〕《金史·仆散忠义传》

第二十七章　元灭南宋的战争

第一　宋、金、蒙三国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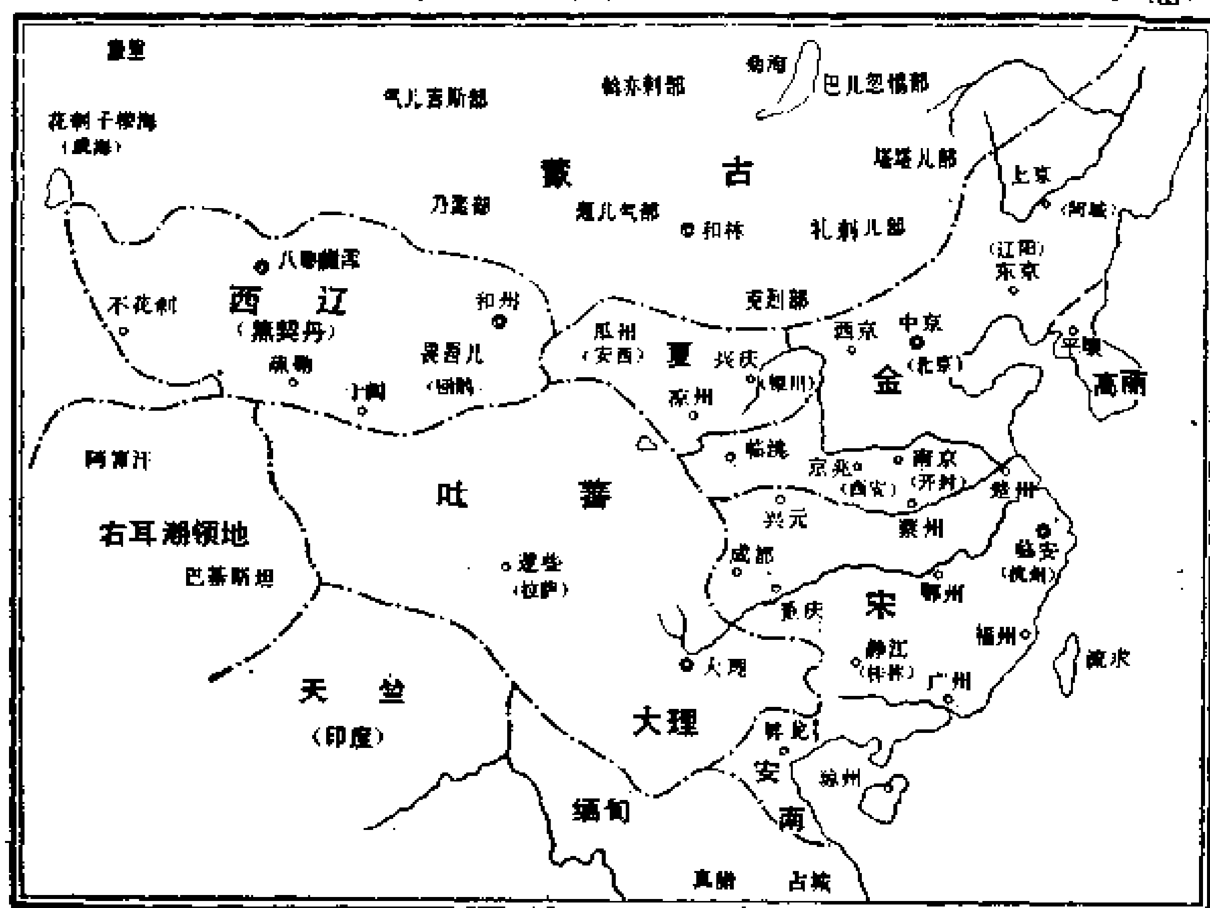
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元年，公元1206年），宋宁宗赵扩最后一次伐金失败求和后，宋金维持南北相峙的局面，整个中国有六个民族政权：在东北和华北是女真族的金国；宁夏、陕西、甘肃一带是党项族的西夏；新疆及其迤西是维吾尔和契丹族的西辽；西藏、青海等地区是吐蕃；云南、贵州地区是大理；秦岭及淮水以南地区是以汉族为主的南宋；漠北地区的蒙古族则正在崛起。

在十二世纪末叶，当南宋和金国在淮南大战方酣的时候，原来在金统治下的蒙古各部，在斡难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鄂嫩河）会盟，部族领袖铁木真被推为汗，号称成吉思汗。从此，成吉思汗把蒙古诸部落建立成为一个统一的“大蒙古国”。

蒙古地区统一后，成吉思汗不断向外扩张、掠夺。这时，中国境内和西亚与蒙古毗邻的有金、西夏、西辽、花刺子模（今苏联的中亚细亚）及阿富汗等国，它们的经济文化都比蒙古发达，都正处在内部矛盾尖锐，统治阶级濒于衰亡的阶段。因此，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为了满足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贪欲，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对外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

蒙古统治者在宋嘉定二年（蒙古成吉思汗四年，公元1209年）发动了一次对西夏的战争，迫使西夏屈服于蒙古。宋嘉定四年又发动了对金国的战争，经过三次进攻，于宋嘉定八年（蒙古成吉

十三世纪初叶中国形势示意图 （27-1图）



思汗十年公元1215年）占领了金国的首都中都（今北京），金廷迁往南京（汴梁）。

宋嘉定十一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三年，公元1218年）蒙古又征服了西辽，打开了西征花剌子模的道路，与金朝进入暂时休战的状态。次年，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灭花剌子模后，即进入阿哲儿拜占（今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各儿只（今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越过太和岑（今苏联北高加索），进入斡罗思（今苏联俄罗斯共和国），击败了斡罗斯与钦察诸部联军。在控制了中亚各地和钦察草原（黑海、高加索、黑海以北地区）以后，成吉思汗把这些地区分封给自己的三个儿子。这些分地，和留给幼子拖雷的漠北地区一样，当时都是大汗统一管辖下的部分。

成吉思汗回军后，亲率大军南下，打算先取西夏，然后灭

金。宋宝庆三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经过一年多的战争之后，终于灭亡西夏。宋宝庆三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公元1227年）七月，"灭国四十"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病死。

金廷撤出中都前，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发动政变，杀死金主卫绍王，立完颜珣为帝，是为金宣帝。金宣帝逃往南京汴梁后，任用权臣术虎高琪，政治腐败，经济破产，内部分崩离析，人民起义不断高涨，金廷已走向全面崩溃。

南宋自宁宗"开禧北伐"失败后，主和派史弥远按照金廷开出的条件，以主张北伐的韩侂胄的首级及其他屈辱条件与金达成了"嘉定和议"，从此，史弥远独揽大权，胡作非为。宋宁宗死时，史弥远废原定的皇位继承人赵竑，立皇侄赵昀为帝，即宋理宗。史弥远以拥立有"功"，与同党郑清之继续把持朝政，政治上更趋腐败，经济上则加紧收刮。军队人数不足，训练废弛，战斗力日益低落。

蒙古贵族在推选窝阔台继承汗位的忽里勒大会上，确定以灭金为目标，由窝阔台汗亲自指挥。在随后的几年内，蒙古军陆续攻占了金朝控制下的关中和山西部分地区。

宋绍定四年（蒙古窝阔台汗三年，公元1231年）蒙古军经过充分准备之后，按照成吉思汗临死前的指示，分三路进攻金都汴京。

窝阔台汗为推毁金朝的统治，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和南宋建立暂时的友好关系，于宋绍定五年（金正大九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公元1232年）遣使约南宋攻金和假道宋地，并重申前议，许灭金后把黄河以南地方归还南宋。腐朽怯懦的南宋统治者，本身没有力量赶走金朝统治者，也忘记北宋联金灭辽的历史教训，对新兴强大的蒙古贵族邀约结盟未加拒绝。

蒙古主力西路军以拖雷为统帅，绕过金朝的军事重镇潼关，自宝鸡出汉中，强行通过南宋管辖的地区，沿汉水而下，经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北上，采取大迂回战术，突

然出现在金军后方。金朝十分惊慌，急忙抽调防守黄河和潼关的主力部队十万余人前来抵挡。两军在邓州一带遭遇，蒙古军只有三万人，但采取袭扰战术，避免与金军正面交锋，使得远道而来的金军十分疲劳，不能得食，又不得休息。这时，中路蒙古军乘虚自白坡（河南孟津县境内）渡过黄河，威胁汴梁。金军得消息，仓皇北撤，当退到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时，被两路会合的蒙古军团团围住。这时突降大雪，气候寒冷，金军僵冻无人色，几不成军。拖雷故意放开一面，让金军逃跑，在追击过程中，将金军几乎全部歼灭。蒙古军乘胜进围汴京。

第二　蒙宋联合灭金和收复三京之战

一、蒙宋联合灭金

这次窝阔台攻金，是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进行的。成吉思汗攻破燕京得力于汉人地主的帮助，他认为灭金需要汉族政权的助力，所以遗嘱要约宋共同灭金。窝阔台汗即位后，几次派人约宋攻金。南宋朝廷有些大臣如赵范认为联蒙攻金于己不利，但以京湖制置使、权臣史嵩之等为首的大臣都以为是可遂复仇之举。宋理宗赵昀听从了联蒙灭金的意见，幻想灭金之后，收复河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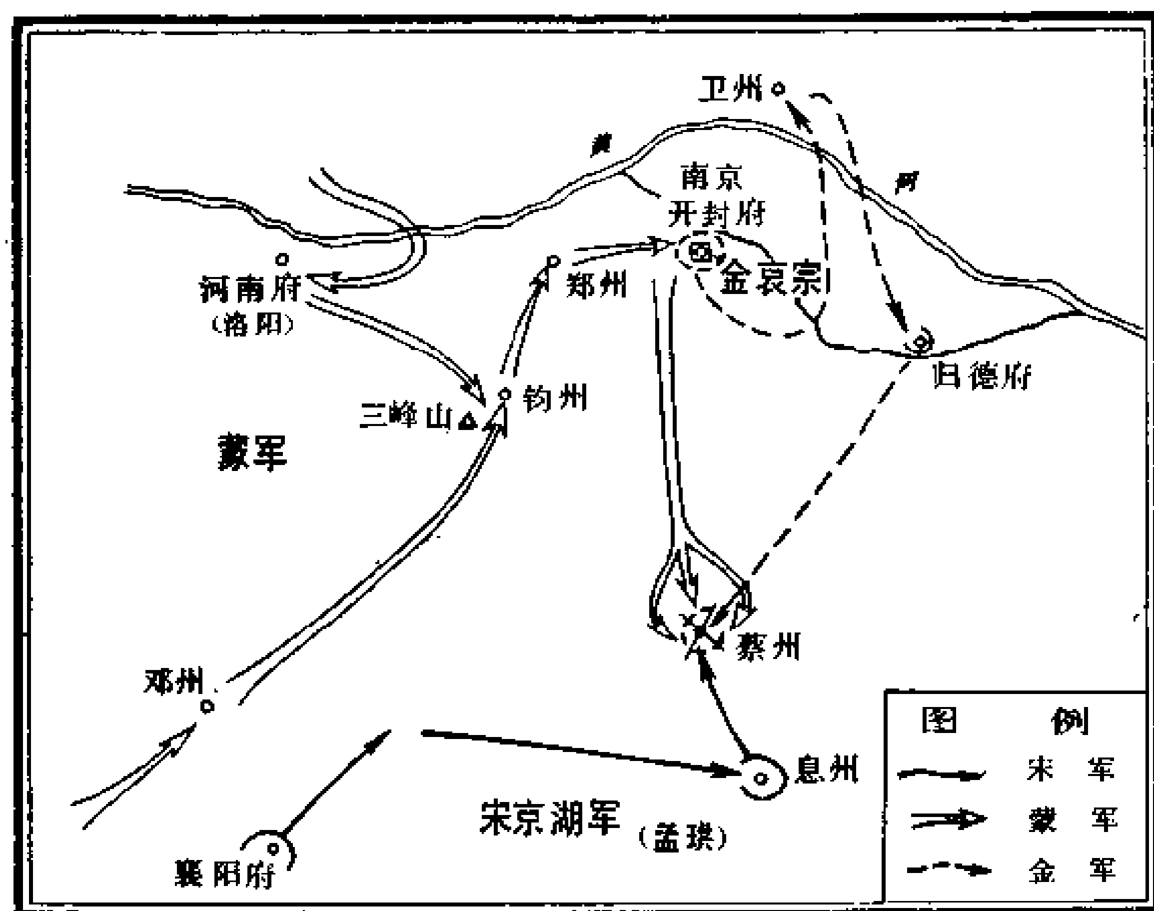
宋绍定五年（蒙窝阔台汗四年，公元1232年），蒙古军围攻汴京十六昼夜，未能攻下，金哀宗弃汴京逃至归德。次年四月，蒙古军入汴京。六月金哀宗又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金军自唐、邓攻光化（今湖北老河口市西北），企图迎哀宗入蜀。南宋京西路兵马钤辖孟珙击破金军，俘降七万人，金申州（今河南信阳）安抚以城降，随后孟珙又攻下寿州（今安徽寿县）、唐州等地。金哀宗见宋朝助蒙攻金，急派员去宋朝谈和说：

“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1]

宋廷不明此理，竟加拒绝。

八月，蒙古又遣使去宋，约攻蔡州。南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派京西兵马钤辖孟珙、江海等率师两万，运军粮三十万石助蒙军合围蔡州，宋军攻南面，蒙古军攻东、北、西面。十二月，宋军决柴潭入汝水，用薪草填潭，开始攻城，接着蒙军也从三面攻城。时蔡州被围三月，城中粮尽。次年正月元旦，宋军列云梯攻南城，万众竞入，大战城上，金南门守军弃门逃走，孟珙率主力突入城内，接着蒙古军也进入城内。金哀宗知金朝将亡，在幽兰轩中自缢，金亡。

蒙宋联合灭金蔡州之战示意图
（公元1232年正月-1234年正月）　　（27—2图）



二、南宋收复三京之战

根据蒙古与南宋联合灭金的盟约，灭金以后，河南地均应归宋。但是，宋理宗端平六年（蒙古窝阔台六年，公元1234年），

蒙古统治者负约不肯归还河南全部地区，只还给宋陈、蔡二州之地。南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不敢据理力争，反而以陈（今河南淮阳）、蔡西北之地许蒙古，撤军还守江汉，以谋自保。蒙古也以刘福为河南道总管，撤军北去。

时宋理宗赵昀方始亲政，也考虑到北宋联合攻辽的教训，力谋自保之策。淮东制置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黄河）据关（潼关），收复三京（东京开封、中京洛阳、南京商邱)”。而朝臣多以蒙军气盛锋锐，怕“我师若往，彼必突至，非唯进退失据，开衅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长驱以争空城，得之当勤馈饷，后必悔之”。〔2〕宋理宗赵昀君臣正陶醉于灭金的“胜利”之中，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等人力赞用兵北伐，企图利用灭金和蒙军后撤的机会，一举收复三京，以振国威。于是蒙宋战争的兵端又起。

这次宋理宗北伐就是所谓“端平入洛”。是年六月，宋廷命淮东安抚制置使、淮西制置副使赵范移司黄州（今湖北黄冈），刻日进军；命知庐州全子才率淮兵万人，赵葵自滁州（安徽滁县）率淮西兵五万取泗州（今安徽盱眙西北），会师汴京（今河南开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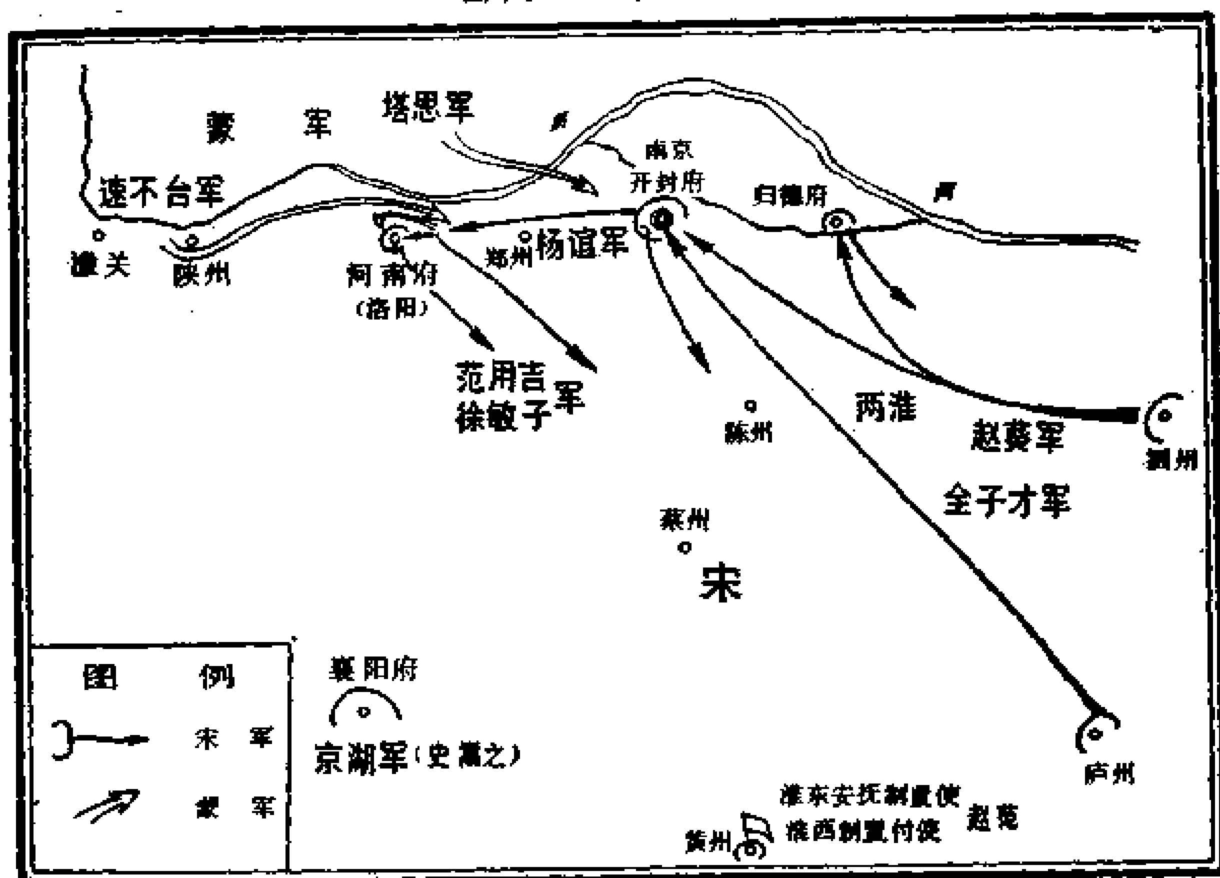
全子才军将至汴京，赵葵率军继至，这时蒙军大部撤走，汴京空虚，蒙古留守汴京诸将杀崔立迎宋军入城。宋军虽粮饷未集，仍命钤辖范用吉、监军徐敏子领兵一万三千，先趋洛阳，又命杨谊率庐州强弩军一万五千，继之而进，仅各给五日粮。

七月，徐敏子所遣前军二百人至洛阳城下，有民众三百余家登城投降，徐敏子遂帅师进入洛阳城。时汴堤决水泛滥，粮运不继，所复州县又皆空城，宋军前军进入洛阳后，军食告竭。蒙古窝阔台汗闻之，遂命塔思率军南下，急趋河南；命正在陕州一带的速不台军，立即回军洛阳。

宋军后继部队进至洛东三十里，方散坐就食，蒙军前锋突至，宋扬谊军仓卒无备，师无纪律，部队立即奔溃。八月，蒙军

兵临洛阳城外立寨，城内宋军无粮，又见后继部队覆没，遂突围出走，弃洛而归。是时，赵葵、全子才军仍留汴京，因史嵩之不运粮接济，而蒙军又决黄河寸金淀（今河南开封北），以淹宋军，遂皆退军南归。所谓收复三京之举，至此宣告幻灭。蒙古借口南宋败盟，出兵南下。宋理宗赵昀急忙下诏罪己，并派通好使前往蒙古议和，但蒙古进攻南宋的计划并不因此而停止，蒙宋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

宋蒙"收复三京"之战示意图
（公元1234年六—八月）　　（27—3 图）



宋理宗收复三京的决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虽然据河守关，西连川陕是一条很有利的防御地带，但战略决策必须根据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对方的行动规律，并考虑到以后的战略阶段，才能慎重地作出，仅仅凭主观愿望和地略上的优点就作出决策，难免是轻率的。

蒙古军是大骑兵集团作战，其特点是机动性大，进退迅速，突击力强，能作大纵深突破和战略迂回，但雨季机动力不能发挥，也不耐潮湿和酷暑，一般都在秋高气爽的季节开始大规模战略进攻，而在春雨降临前结束，其主力撤往北方休整避暑，以便秋后再来，前线州郡多交降军看守。因此，对宋军来说，在蒙古主力北撤后，如发动攻势，就不能只考虑如何收复三京，更为重要的是考虑收复之后如何恢复并固守这些城垣残破、人口稀少、粮食奇缺的战略要地，屯聚足够的粮食和防御器材，建立纵深内的后方防御地带，控制若干机动部队以适时支援这些要地并抗击骑兵集团的冲击。不考虑这些问题，不进行周到的准备而仓卒去收复三京，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南北朝时，对河南的收复和防守是有历史教训的。宋文帝刘义隆在公元430年和450年两次北伐，企图收复黄河南岸的金镛、虎牢、滑台、碻磝四镇，都遭到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大骑兵集团的进攻而失败，情况与这次宋理宗收复三京十分相似。宋理宗、赵范等都没有从历史教训中吸取教益。

宋廷意见不一，宋理宗竟只令淮西军收复三京，而不令京湖军依托豫西山地去收复西京洛阳，容忍史嵩之不顾大局不供应淮西军食粮，其失败就更难避免了。

第三　蒙古窝台汗对南宋的全面进攻

一、双方的战略企图和部署

宋蒙开衅后，宋廷上下震恐。南宋统治者继承北宋防内重于防外以巩固其统治的基本政策，对蒙古的来侵仍然采取妥协投降、“斥地求和”的方针；在军事上采取消极的专守防御战略。

宋廷沿用过去抵御金军大骑兵集团作战的经验，在东起楚州（今江苏淮阴）沿淮水西至四川利州（今四川广元）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组织两淮（淮东制置使赵葵、淮西制置使史嵩之），

京湖（京湖制置使赵范辖京西南路、荆州北路）、四川（四川制置副使赵彦呐、辖利州路、潼川路、成都府路、夔州路）三个战区（阃），分别控制扬州、襄阳、蜀口三个战略要地。因两淮地处临安（今浙江杭州）正面，又利用长江天险，设置沿江战区，作为战略上的第二线防御。在建康控制禁军精锐部队，作为第一线三个战区的支援力量，又将两淮战区与沿江战区合为江淮战区，由沿江制置使陈韡统一指挥，以卫临安。同时还扩建水军，设立沿海战区，造船练士，随时成军，以控制淮、汉、长江。

宋廷还诏令：京湖、四川、两淮制臣（制置大使）、帅臣（安抚制置大使），练兵恤民，存粮缮器，经理营屯，控制险要，严加守备，常如敌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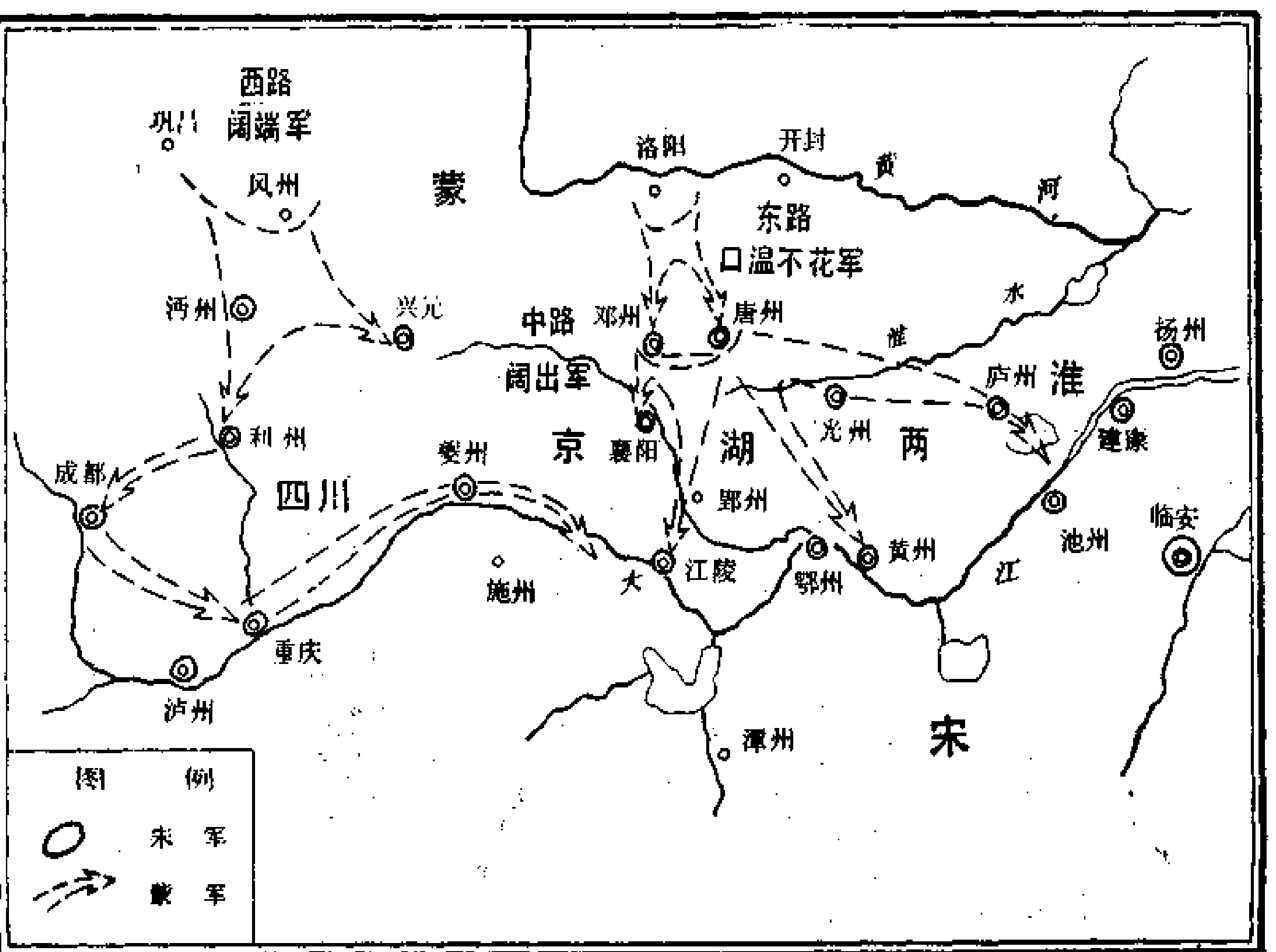
蒙古攻宋战略，早在成吉思汗举兵南进之初就有谋议。金朝降将郭宝玉献计说："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蕃，勇悍可用，宜先取之。"[3] 力劝蒙古统治者锐意经略西南（青海、西藏、云南），利用当地各民族潜在的人力物力，扫灭金朝，尔后图宋。到窝阔台汗灭金之后，蒙宋直接对峙，但长江天堑难以飞渡，必须先取四川，顺流东下，才能直取江左，一举灭宋。因而位于长江上游、物博人稠的四川，已成为蒙宋必争之地。

在窝阔台汗统治时期，蒙古统治者的军事行动是四出远征，但重心在西方。宋端平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公元1234年）七月，正在宋出兵收复三京的时候，蒙主窝阔台已蓄意南下灭宋，他说：

> "先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指金）、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唯东南一隅（指南宋），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4]

宋端平二年，蒙主派遣拔都、贵由、蒙哥等率大军第二次西征，遣唐古进攻高丽，六月命皇子阔端等率军南下攻宋。其攻宋部署如下：

——以皇子阔端与元帅塔海纠合西夏、女真、回回、吐蕃等部，



蒙古（窝阔台汗）攻宋战略企图示意图

（公元1235年）

（27—4图）

取西道由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入蜀（今四川）；

——以三子阔出与忒木䚟、张柔等，取中道进攻襄（今湖北襄阳）、鄂（今湖北武昌）；

——以宗王口温不花，察罕等取东道，略取江淮，企图渡过长江，然后进入江南作战。

南下三路大军悉选蒙古、契丹、汉军精锐编组，三军编组既毕，分别向宋境进发。

二、蒙宋两军在三个方向上的攻防作战

（一）蒙东路口温不花进攻江淮

宋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七年，公元1235年）七月，宗王口温不花率东路军先攻唐州（今河南唐河）、邓州（今河南邓县）。次年十月，口温不花军由豫南攻占固始，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舒城)、光州（今河南潢川），直下黄州（今湖北黄冈），游骑自信阳（今河南信阳）直趋庐州（今安徽合肥），淮西形势十分紧急。宋廷诏令淮西制置使史嵩之率军援光州，淮东制置使赵葵率军援庐州，沿江制置使陈韡率军趋和州（今安徽和县），共援淮西。蒙古东路军另一主帅察罕率军转攻定远（今安徽定远）、六合（今江苏六合），又攻真州（今江苏仪征）。知真州丘岳率军抗击，乘胜出战，蒙军稍却。丘岳又在三处设伏，设炮石击蒙军，并选勇士袭击蒙军兵营，焚其庐帐。蒙军避免攻坚，撤军北去。

蒙军此次进入淮西，轻而易举地攻破了南宋的江淮防线，只是由于长江天堑和真州等地的据城力战，才使蒙军攻势受阻，知难北撤。

宋嘉熙元年（蒙古窝阔台汗九年，公元1237年）十月，蒙古口温不花军攻破光州、复州（湖北沔阳西），再次南攻黄州。宋京湖制置使史嵩之派襄阳都统治孟珙率军赴援。蒙军被孟珙击退，又转攻安丰军（今安徽寿县南），宋知军事杜杲缮城守御，力拒蒙军。蒙军以火焚楼橹，宋军随陷随补。宋池州（今安徽贵

池）都统制吕文德率军突破蒙军包围入城，与守军合力抵御，蒙军攻城失利，只得退走。

宋嘉熙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十年，公元1238年）九月，蒙古察罕率军号称八十万进围庐州（今安徽合肥），企图破庐后在巢湖造船，进攻江南。宋知庐州杜杲练州师扼淮河，派精锐部队扼守要害；六合人赵时梗也率领淮东、淮西民兵参加庐州的作战。杜杲复在高楼上置炮位，击中蒙军筑起的高坝后，率军出战。蒙军攻城不逞，察罕遂率军北撤。宋军再一次挫败了蒙军渡江南下的企图。宋廷以杜杲守庐州有功，诏加淮西制置使。

蒙古察罕率军改攻滁州（今安徽滁县），淮东知招信军（今江苏盱眙北）余玠率领精锐部队来援，蒙军又转攻招信军，被余玠回军击败。知镇江府吴潜也组织民兵夜渡长江，劫蒙军营寨，蒙军不断遭受打击，再次北撤。

宋嘉熙四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三年，公元1240年）二月，蒙将张柔等军又分道南侵，越过淮河，进到长江北岸，劫掠和州、滁州、扬州，并攻入通州（今江苏南通），屠杀人民，劫掠财物而去，两淮战事暂告平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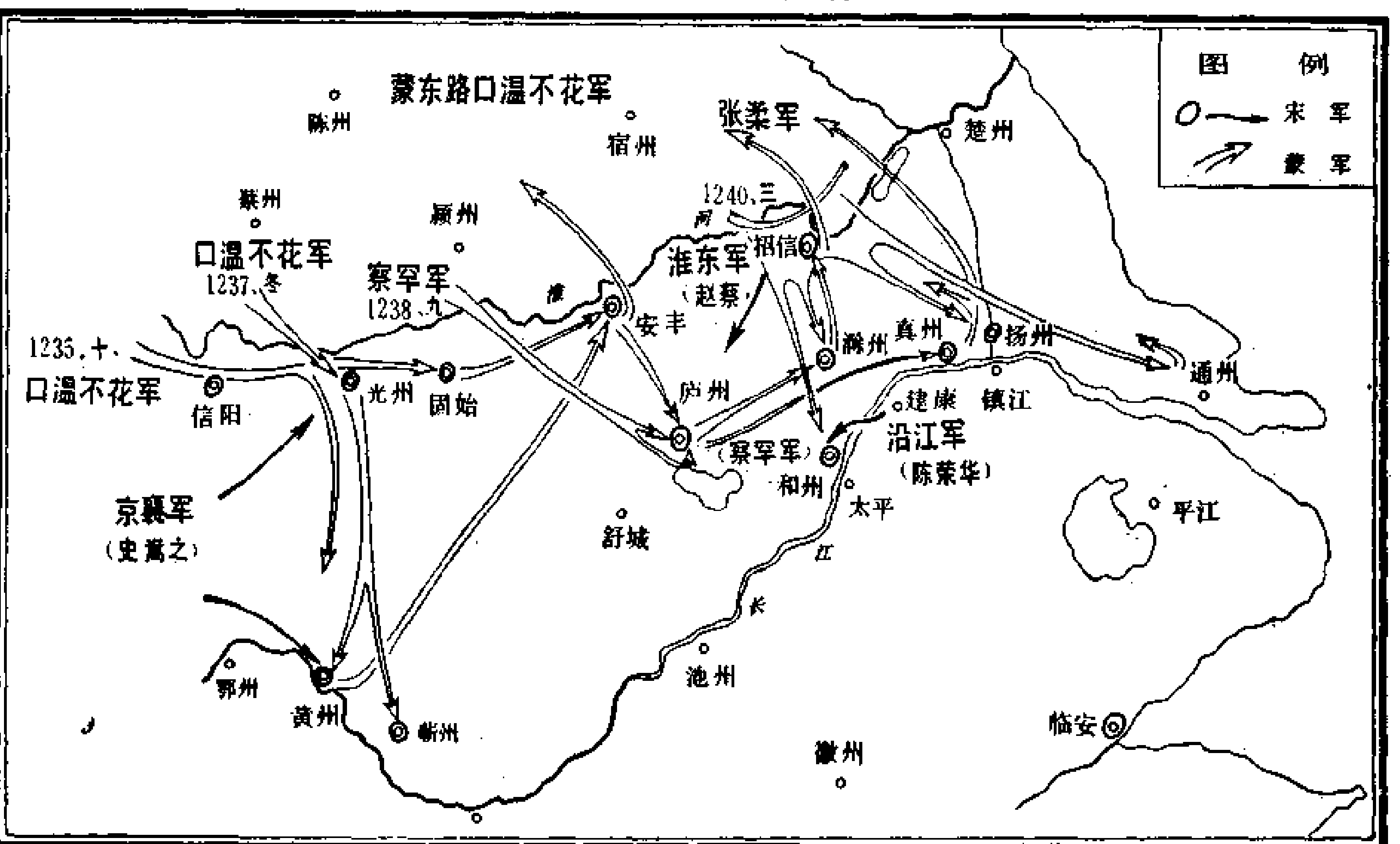
（二）蒙中路阔出军侵入襄汉

宋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七年，公元1235年）七月，蒙古中路阔出军在东路口温不花军的掩护下，进攻宋郢州（今湖北钟祥）诸砦、京山（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安陆）等地，遭到南宋水、陆军的联合抵御，蒙军携去人民和牛马数万后退走。当蒙军进入信阳、光州等地时，当地农民曾在“义军头目”和“牛社总首”们的领导下，进行抵抗，到处截击蒙古军队。在京湖北路中，乡民丁壮这样屯聚相保的行动，处处皆有。

次年（公元1236年）二月，蒙古窝阔台汗派军增援阔出军，继续南侵，攻占郢州。三月，宋京湖制置使赵范统御无能，所辖南北军互相争斗，北军主将王旻、李伯渊等焚劫襄阳仓库，叛降蒙古，南军将领李虎乘乱劫掠，襄阳一空。自岳飞收复襄阳以来一

江淮战区（东路）蒙宋攻防作战示意图

（公元1235年十月—1240年二月）　　（27—6图）



百余年的积蓄——粮食、军器及各种物资，一旦皆尽。襄阳的陷落，不仅使宋军在物资上蒙受重大损失，更重要的是失去长江中游防线的战略屏障，使蒙军得以在京西、淮西大片土地上大肆骚扰、劫掠，民不堪命。

十月，蒙古中路军主帅阔出死于军中。十一月蒙军将领忒木䚟（特穆尔岱）率军进攻江陵（今湖北江陵）。这时，蒙军又分路进攻复州（今湖北天门）、枝江（今湖北枝江）、监利（今湖北监利），编造木筏，准备渡江南侵。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遣襄阳都统制孟珙率军救援江陵。孟珙命令部队改变旗帜和颜色，循环往来，夜间以无数火炬照明长江。于是，连破蒙军二十四砦，夺还被俘人口二万，使中路蒙军南侵的锋芒顿挫。

宋嘉熙元年（蒙古窝阔台汗九年，公元1237年）十月，蒙古口温不花军自光州下复州，转攻黄州，孟珙率军还救，击退蒙军。

宋嘉熙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十年，公元1238年），宋廷任孟珙为荆湖制置使，令其收复襄阳。孟珙指挥诸军收复郢州，克荆门军（今湖北荆门），三战皆捷，次年三月相继收复信阳军、樊城、襄阳，襄阳地区遂被收复。这是宋蒙战争以来，南宋军队第一次按计划收复失地。孟珙认为襄樊为朝廷根本，应大力经理，他招纳降人，编组忠卫、先锋等军。从此不仅荆、襄形势稳定，而且还可以抽调兵力支援两淮和四川方面的作战。

由于西路蒙军长驱入川，乘势直逼施（今湖北恩施）、黔（今四川彭水），企图东出湖湘，于是孟珙率军转向西面作战，进复夔州（今四川奉节），粉碎了蒙军中西两路会合，跨有长江，然后沿江东下的作战计划。

宋嘉熙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公元1239年）十二月，宋廷以孟珙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勘察，修复内隘，别作十隘于外。沮水本自城西入江，孟珙筑障使其东流，绕过城北入于汉水，并构筑水库蓄池，于是三百里间渺然巨浸，限制了蒙古

骑兵的行动，江陵得到巩固。

第二年（公元1240年），孟珙又在京湖大兴屯田，招集散民为军，选壮士杂于官军教之。一年后，民皆知战守，善驰逐。无事则植戈而耕，敌至则悉出以战。孟珙又分派部队袭击蒙古造船设备，以粉碎其攻势的潜力，由是京湖战区日益巩固，以后近十年间，蒙军屡次围攻襄樊，终未得逞。

（三）蒙西路阔端军攻略四川

阔端军在入川之前，先向盘踞巩州（今甘肃陇西）的金朝残余汪世显部进军。为隔断汪世显与南宋的连系，于宋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七年，公元1235年）八月，派军进占河池（今甘肃徽县）、阶州（今甘肃武都西北）、西梁（今陕西勉县西）和成州（今甘肃成县）、凤州（今陕西凤县西北）。又进攻沔州（陕西略阳），宋利州统制曹友闻军击败蒙军数万后，据守仙人关以掩蔽蜀口。

十月初，蒙古阔端大军进至巩昌（今甘肃陇西），金巩昌总帅汪世显向阔端投降。阔端任命汪世显为巩昌等二十四城便宜都总帅，随军南征四川。

1．蒙西路军攻破成都，两川残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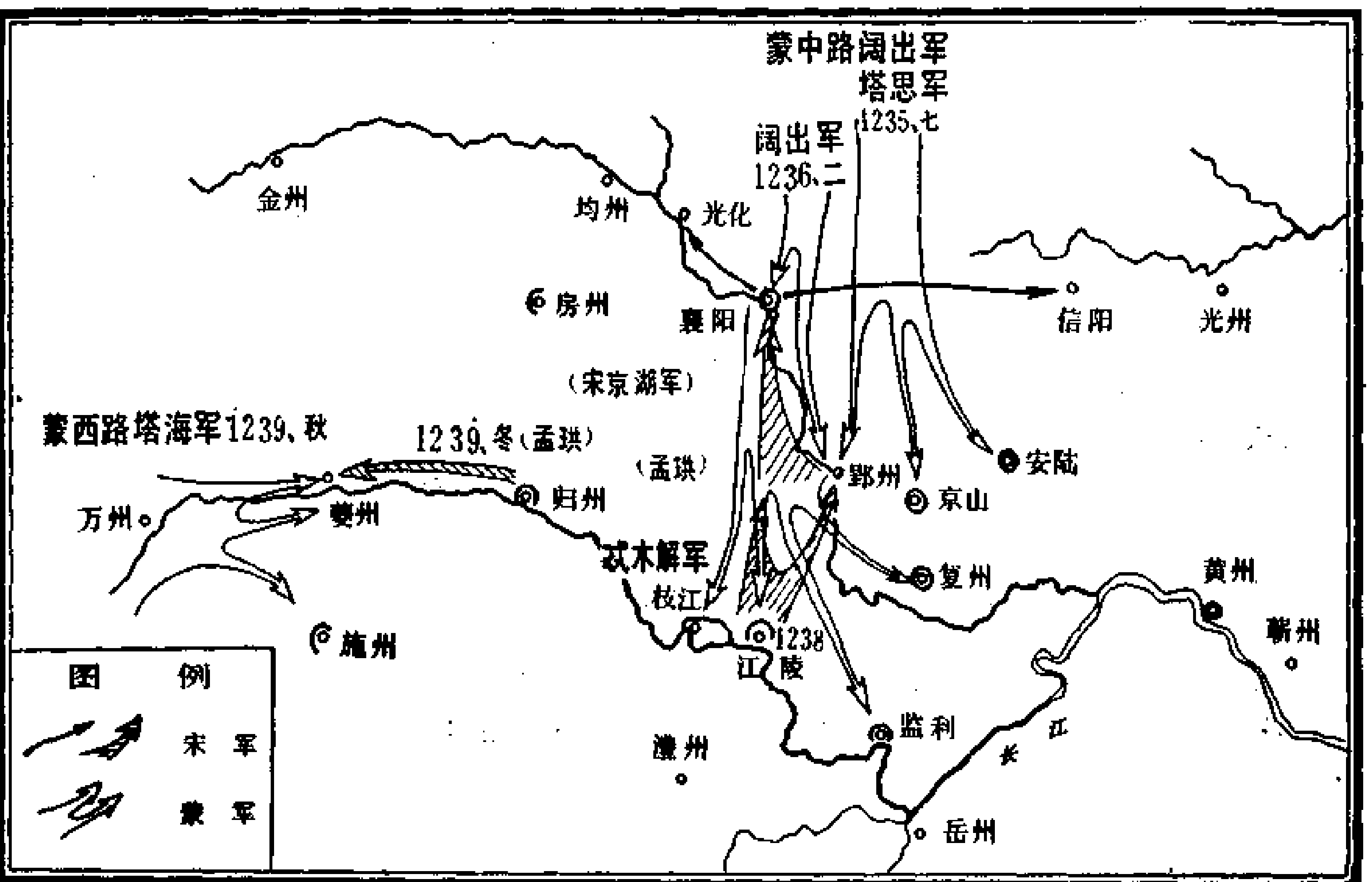
宋端平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八年，公元1236年)八月，阔端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率蒙古、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等族部队，大举入蜀。蒙军入大散关，经凤州东南土关隘，击败宋军兴元(今陕西汉中)戎司都统李显忠军，占领兴元。“欲冲大安”（阳平关南，今四川宁强西北），企图沿金牛道（起自陕西勉县西南，至四川剑阁）攻入四川。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调利州统制曹友闻控制大安军以保蜀口。曹友闻部退守阳平关，在关外设伏，蒙古军至，内外夹击，血战壮烈。宋军寡不敌众，在蒙古铁骑围攻下，曹友闻部全军战殁。这是蒙军入蜀以来所遭遇的最激烈的战斗。阳平关一失，蜀口被蒙军打开了。

宋军残余部队集中在利州（今四川广元）、剑门（今四川剑

京湖战区（中路）蒙宋攻防作战示意图

（公元1235年七月—1239年冬）

（27-6图）



阁北），抗击蒙古军。蒙西路军主帅阔端决定以一部避开剑门，派诸王穆哥（末哥）率领一军从阳平（今甘肃文县西北）绕剑门以西，直趋成都。阔端亲率主力进攻利州、剑门、约期会师成都。

十月初，蒙军先头部队破利州朝天关（今四川广元北），入利州，阔端出奇兵攻占剑门关。十月中旬以后，各路蒙军进至成都附近。

成都是西蜀的重地，是四川制置使的所在地。但成都历来“师少堞坏”，无险可守，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丁黼，仅率不足千人守卫成都，制置使赵彦呐早已率诸司退往川东，成都成为孤城一座。十月，阔端率主力攻成都，丁黼集合将士，作孤注一掷，乘夜往西门外劫寨，因寡不敌众，宋军战败，丁黼被射杀。制司参议王翊组织军民“共击北兵”。二十四日，阔端率大军自东门入城，成都失陷。

阔端又分兵四出，整个四川都受到摧残和破坏。“五十四州俱陷破，独夔州（今四川奉节）一路及泸（今四川泸州市）、果（今四川南充北）、合（今四川合川）数州仅存”〔5〕。

这时蒙中路主帅阔出死于军中的消息传来，阔端除留下元帅塔海继续在蜀境骚扰外，自率主力离开四川北归，不久蒙军全部退出蜀境，四川相继恢复正常秩序。南宋统治者看到四川残破，明确表示要以“保蜀”、“救蜀”为急务，在政策上也作了某些调整。宋理宗赵昀起用经验丰富的李埴为四川宣抚史，李埴在“创残之余”，以“绥抚为急”，〔6〕招集流民复业，供给耕牛、种子，优与赈赡，恢复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终于使蜀中局面渐次恢复。

蒙西路军主帅率主力从四川内郡撤退时，在蜀边建立两个旨在控制四川的战略基地，一个设在兴元，一个设沔州之石门、阶州之两水，派军驻守，既用以扼“陇蜀之冲”，〔7〕又便于南下掠夺、破坏，不让四川变成南宋的后方基地，并便于继续进攻，以东出夔门。

宋嘉熙元年（蒙古窝阔台汗九年，公元1237年）六月，蒙古塔海率军自凤州出发，攻取仅存于陕南的宋军孤立据点金州（今陕西安康）。继取大巴山水道，进窥川东的达州(今四川达县)，开州（今四川开县)，进逼瞿塘（四川奉节东)。宋守云安（今四川云阳西北）、白帝（今四川奉节东）关隘的部队，未战先逃，十一月下旬蒙军一度进至巫山(今四川巫山)地界。由于宋军拥有水上优势，陈兵长江南岸，蒙军无法向南岸和长江中下游推进。

宋嘉熙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十年，公元1238年）冬，蒙军西路元帅塔海指挥蒙军再次入川攻取隆庆（今四川阆中)、资州(今四川资中）等地，进入西川。在彭州（今四川彭县）竹溪与寻江（今四川灌县)击败宋军，接着先后攻破了邛崃（今四川邛崃)、碉门（今四川天全西)，直至黎（今四川汉源)，雅（今四川雅安市），到达大渡河边。

2．蒙西路军攻破重庆夔州但沿江东下的企图失败

宋嘉熙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公元1239年）夏，蒙古都元帅塔海和秃薛率的蒙军，进攻东川地区，按竺迩部沿嘉陵江南下，直取重庆。汪世显部越渠江而东，攻下开州，进抵万州（今四川万县）。南宋守军退至万州南岸，凭江设防，汪世显在北岸布舟佯渡；主力在万州西湖滩乘夜以革舟渡过长江，击溃南岸宋军，顺流而下，破夔州，抵巫山。十二月下旬又破施州（今湖北恩施）。

京湖制置使孟珙，先以军屯峡州（今湖北宜昌市西北）、归州（今湖北秭归）、松滋（今湖北松滋）等地，增置营寨，分布战舰，预为防备。又增兵归州隘口万寿谷，以为夔州声援。另遣兵间道至均州（今湖北均县），防备侧翼。

蒙军渡湖滩东下后，孟珙即忙向督府告警。南宋朝廷以“夔门重地，尤当加意”，〔8〕由淮东、西、沿江制司“调兵三万”，〔9〕从下游进援四川。沿三峡向东推进的蒙军，在归州大垭寨与知峡州孟璟所率之军相遇，受阻不得进。接着，宋军又击

败蒙军于巴东（今湖北巴东）。塔海知宋军有备，于次年春，由涪州（四川涪陵）退出四川北返。

宋廷为对付“上流警急”，进一步调整四川的防务。宋嘉熙四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二年，公元1240年）二月，任命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并节制归、峡、澧州（湖南澧县）军马。

在孟珙的统一提调下，四川防务开始有了一些改善。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坐镇西川，在成都、汉州等旧城基础上，“复立其城”[10]。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彭大雅驻守重庆，披荆棘，冒矢石，苦心经营重庆城防，初步奠定了重庆城的防御规模。

宋淳祐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三年，公元1241年）十月上旬，蒙古都元帅塔海、汪世显率军入川，掠地至成都。陈隆之坚守成都十余日，誓与成都共存亡，部将田世显开北门投降，蒙军突入城内，陈隆之被俘后不屈被害。各路蒙军四出攻掠，共破成都、汉州、嘉定、泸州、叙州（今四川宜宾市）等二十城。这次“两川之祸”，宋军“阵亡者众”。“蒙军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11]是年窝阔台死，乃马真后称制。

宋淳祐二年（蒙古乃马真后二年，公元1242年）正月，蒙古将耶律末哥率骑兵三千，自京兆（今陕西西安市）取道商州（今河南商县）、房州（今湖北房县）入蜀，进攻泸州（四川泸州市），全蜀为之震动。四川宣抚使孟珙命重庆出兵援救泸州，又派军从三峡进屯涪州，节节进行防御。在宋军严密防守下，耶律末哥攻破泸州的企图未能得逞。十二月，蒙将按竺迩又率军入蜀，经遂州（四川遂宁）、泸州，一举袭破叙州（四川宜宾）。宋都统杨大全领水陆军迎战，死于阵中。

3．蒙宋战争停滞

自从蒙军把四川作为重点而接连发起进攻以来，四川防御累累失败，形势岌岌可危，于是宋理宗以孟珙为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四川安抚使兼知夔州，以“当夔、峡要害”，调淮东安抚制置副使余玠为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全面负

四川战区（西路）蒙宋攻防作战示意图

（公元1236—1241年十月）

（27—7 图）

责四川防务。余玠全面规划，选择险要地形修筑城堡，以为久守之计，当地军民也有了安土之心。窝阔台汗死后，其妻乃马真氏临朝称制，也无暇全面，主动地部署对宋战争，虽曾派蒙汉军进攻两淮和四川的一些地方，但战斗规模不大，战果甚微。南宋朝廷也没有利用他们称之为“敌虏乖离”，“胡运”衰落的大好时机以图恢复。所以，蒙宋战争基本上暂时处于停止状态。

窝阔台南进双方的战略运用

这次蒙古南侵战争，窝阔台的战略企图是“躬行天讨”，征服南宋。战争进行了七年之久，除烧杀破坏外，未能取得积极成果，最后以窝阔台病死而中止。

蒙军到处烧杀掠夺，破坏生产，给南宋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南宋广大军民同仇敌忾，对蒙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这是蒙军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

蒙军的战略部署是大军分三路南侵四川、荆襄和两淮，企图夺取长江上游，沿江东下，会合中、东两路，直取临安。蒙军这一战略是沿用了灭金的战略，即：广正面、大纵深的掠夺破坏，以孤立进攻目标；实施战略迂回，求歼敌军主力。

由于黄河以南的地形不同于黄河以北，南宋蜀口、襄阳、淮河防线，西段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峡谷，东段地处淮河下游，水道众多，且城镇林立，后方还有长江天堑，都不利于大骑兵集团的作战。南宋军队经过百年抗金战争，在大量义民参加下，虽然宋廷的“守内虚外”政策和妥协求和方针抑制着宋军的发展提高，但军队素质仍然有所改善，战斗经验特别是抗骑兵突击的经验也有了积累。宋军依山、靠水、守城而战，便于长期坚持，蒙军难以聚歼宋军。蒙军进攻正面达数千里，兵力分散，各路大军难以协同，战略后方又相距过远，不能持续作战。所以长驱而进，年复一年都不能成功。阔端的战略迂回，也由于高山险阻，与中路隔绝，迂回路线又过长，在宋军阻击下，损耗日增月累，后方难

以补充，前锋虽已到达夔门，但出口被孟珙遮断，只好收军北撤。

南宋根据多年抗金经验，依托有利地形，已形成一条颇为巩固的东西防线。西方初恃秦岭，次扼川边岷山、米仓山、大巴山之险；东路沿淮河设防直达黄海。只中间襄阳以东至大别山一段通过较易，但襄阳依托汉水，城坚水环，历来是屏蔽江汉的战略要地，如加强一些外围坚城，再配置几支精锐的机动部队，中段也是不难防守的。宋军如能坚持这条防线，阻滞并大量杀伤蒙军，然后以控置的战略预备队，抓住有利战机，实施坚决的反击，挫败蒙军的进攻是完全可能的。但宋廷和战意见不一，“外而诸帅，内而二相，不能协和”，各战区间也不能“各释私憾”[12]，互相应援，皆消极自保，完全处于孤立被动的局面。由于惧怕人民，不仅不能发动人民，反而束缚人民的手脚，削弱了抗击蒙军进攻的力量。这就必然导致战略上的消极防御，使两川、湖广、两淮人民遭受惨酷的战祸。

第四　蒙哥汗大举攻宋

一、宋廷的战略调整和各战区的防御措施

（一）宋廷的战略调整

南宋统治者自南渡以后，恃长江的险阻，才得以偷安江左。南宋赵范上书宰相史弥远说：

> “有淮则有江，无淮则长江以北港汊芦苇之处，敌人皆可潜师以济，江面数千里，何从而防哉。”[13]

左司谏李宗勉上言：

> “均（今湖北均县）、房（今湖北房县）、安（今湖北安陆）、蕲（今湖北蕲春）、光化（今湖北老河口北）等处，兵祸甚烈，然江面可藉以无忧者，犹有襄州（今湖北襄阳）……襄州失则江陵危，江陵危则长江之险不足恃。”“所谓

欲保江南，先守江北也。”〔14〕

宋廷鉴于蒙军数出四川，认为“上流可忧”〔15〕，今日救蜀为急，而长江之险，上流之势，全在于蜀，如四川不守，则长江天险已为双方所共有。遂定下守下游先守上游，守长江必守淮、汉的战略防御方针。

宋廷根据这个方针，加强了两淮、京湖、四川三个战区制置使的权力，统一指挥辖区内的部队；一再令各战区固地设险，坚守防御要点；并谕勉各战区务要相互协同支援，规定“四川急则荆阃（京湖战区）援之，和（安徽和县）、濡（安徽巢县）急则江阃（沿江战区）援之，真（江苏仪征）、泰（江苏泰州）急则淮阃（淮西战区）援之”。〔16〕

（二）各战区的防御措施

1．江淮战区

两淮和沿江战区是临安的屏障。南宋朝廷竭力加强这方面的防御力量，在军事重镇的战略要点，加筑城寨，增加守备兵力；令极边州郡，开浚水道，去城百里之间，三里挖一沟，五里掘一洫（洫：xù序，田间水道），以限制蒙古骑兵的长驱奔袭；〔17〕还制造轻捷战船，编组游击军（机动部队），水、步各半，以备随时调遣，支援各地。

2．京湖战区

京湖战区地处长江中游，是南北要冲。蒙军一旦突破，则长江防线就被拦腰切断。孟珙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时，早就筹划战守。他在秭归、汉口之间大兴屯田。为了防止蒙军经四川向湖湘实施战略迂回，孟珙曾采取“藩篱三层”的防御部署：在夔（今四川奉节）设一军，负责涪州（今四川涪陵）以下江面防御，为第一层；长江以南的鼎（今湖南常德）、澧（今湖南澧县）为第二层；辰（今湖南沅陵）、沅（今湖南黔江）、靖（今湖南靖县）、桂（今广西桂林）为第三层。各要点驻兵三千、五千、万人不等。〔18〕他还注意多造战船，对军队进行水陆协同作战训练，大

大巩固了当时京湖的防务。可惜孟珙于宋淳祐六年（蒙古贵由元年，公元1246年）去世，继任者为宋理宗贾贵妃之弟、权臣贾似道，京湖防务就日趋松弛了。

3．四川战区

四川是南宋抗蒙战争财力、物力供应的重要基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由于蒙古窝阔台汗锐意争夺四川，四川形势危急。宋淳祐二年(蒙古乃马真后元年，公元1242年)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入蜀前，曾到江陵拜访四川安抚使孟珙，商议四川防务，向他学习“藩篱三层”的防御布署。余玠本人早年曾在名将赵葵幕中，同蒙军战于汴城、两淮，功绩卓著。余玠入蜀后，在政治上革除弊政，选配称职官员，接纳四方有志之士，安抚军民；在经济上，减轻徭役赋税，举办屯田，以备军粮。他继承彭大雅的防蜀经验，采纳冉氏兄弟修筑山城，移合州城于钓鱼山的建议，并推而广之，以重庆为中心，根据蒙军历来入川路线，在嘉陵江、渠江、涪江、沱江、岷江和长江两岸的雄峻山峰建立许多依山制江的据点，棋布星分于四川境内，控扼水陆要道，构成了一个全面的纵深防御体系。在嘉陵江沿线有苦竹、大获、运山、青居、钓鱼、多功；在渠江沿线有得汉、平梁、小宁、大良；在涪江沿线有普州（今四川安岳）铁峰城以及沱江沿线的云顶城等山寨据点。又在西起嘉定（今四川乐山市），东抵夔门，岷江、长江沿线的嘉定、凌云、载云、神臂、重庆、天生、白帝、瞿塘以及梁山的赤牛构筑山城，以防卫长江。其中又以“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19]。这些山寨互相联系，前后支援，交相掩护。这一防御体系以重庆为防御中枢，“如臂使指，气势联络”[20]，能长期坚守，大量消耗进攻之敌，为赢得时间，调集机动部队实施反击创造了条件。这些山城后来的沦陷，大多是由于守将叛降，真正被蒙军攻破的并不多。

余玠所筑的山城修成以后，还统一作了兵力部署，调整防区，收缩兵力，把各军防守的据点确定下来：利戎司（利州军）

驻云顶，以备外水（沱江、岷江）；金戎司（金州军）驻大获，沔戎司（沔州军）驻青居，兴戎司（兴州军）驻钓鱼城，以备内水（嘉陵江）。其余山寨城堡，均拨给适当兵力担任守备。防守城寨的兵力，除四大戎司外，还有利、阆、剑、巴、得汉诸军总数达二万人，占蜀军总兵力的一半。重庆帅司另外控置安西、保定、飞捷三军作为策应各地的机动力量。

为了做到军政结合，军民结合，平战结合，耕守结合，余玠决定把平原丘陵地区屡遭蒙军骑兵蹂践的一些无险可守的府州治所和当地居民，都迁入附近的山城，使“军得守而战，民安业而耕，士有处而学”〔21〕。

经过上述部署整顿，余玠依托这一防御体系，领导四川军民抗击蒙军的不断袭击，还多次派军袭扰蒙军入川的军事基地——汉中。

余玠守蜀有功，宋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被任命为兵部尚书，仍领四川。宋淳祐十二年（蒙古蒙哥汗二年，公元1252年），蒙军汪德臣部掠成都，逼嘉定，余玠率部力战，打退了蒙军的进攻。由于余玠凡上疏多“词气不谨，帝不能平”，近臣诬其“不知事君之礼”，左相兼枢密使谢方叔攻击他失利州士卒心，宋宝佑元年（公元1253年）玠被召还朝，七月余玠暴卒。但也有人说余玠是被迫服毒自杀的。〔22〕

宋理宗赵昀任命知鄂州余晦为四川宣谕使。蒙军来攻，余晦接连战败，四川形势又转趋不利。京湖、四川后继无人，情势日益严重。

此外，宋廷在夔门（四川奉节）设置指挥机构，在归州（今湖北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置重兵，准备策应四川方向的作战。并扩建水军，以保卫长江并适时进入汉水及长江上游，以支援各战区的作战。

二、蒙哥汗攻宋的战略准备、方针和部署

（一）攻宋的战略准备

余玠在四川构筑山城示意图

（27-8图）

窝阔台汗死后，蒙古贵族内部争夺汗位期间，乃马真皇后及贵由汗先后执政，对南宋只有一些局部的侵扰。蒙哥汗继位时，蒙古“大旱，河水尽涸，野草自焚，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在被征服各国，蒙古诸王及各部经常遣使去征求货财，“驿骑络绎，尽夜不绝”，“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连年征伐，“百姓疲弊”。[23]

蒙哥汗从中原地区军民抗战的教训中，意识到要进一步控制南宋统治下的广大地区是一场更为艰巨的战争。因此，蒙哥汗以汗弟忽必烈管理漠南（蒙古大沙漠以南）军政，开府于金莲川（今河北沽源）。忽必烈以察罕统两淮等处蒙、汉军；以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汉等军。在东起清口（江苏淮阴西南）、桃园（今江苏泗阳北），西至穰（今河南邓县东南）、邓间地区和四川利州、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地分兵屯田，筑城列障，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的流窜掳掠而据地设官，发展生产，“诏括户口”，“始隶州县”，以进行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线相对稳定的战争。同时大量使用投降的金军，招收北方汉人地主武装，跟随蒙军南下作战。

蒙哥汗“锐志图宋”，他吸取了窝阔台汗全面进攻，兵力分散，难以突破南宋长江防线的教训，根据宋军坚守蜀、襄、两淮正面的情况，采取先取大理的战略步骤，以便“绕道西南，攻其腹背”，且绕出江源上游，使失去天堑之险”。[24]宋淳祐十二年（蒙古蒙哥汗二年，公元1252年）六月，命忽必烈率军进军云南，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转战川滇的进军。

忽必烈先命汪德臣率部入川，掠成都、薄嘉定，为大军入滇开道。宋宝祐元年（蒙哥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征滇大军离开临洮，到达忒刺（今甘肃迭部与四川若尔盖接壤之达拉沟）地方，分兵三路前进。兀良哈台率西路，忽必烈亲率中路，诸王抄台、也只烈率领东路。蒙军经四川西境过大渡河、金沙江，进攻大理。大理国王段兴智出奔，蒙军占领大理。是年底，忽必烈

留兀良哈台部继续攻取大理国未降各部，自己率军班师北返。经过将近一年的征战，兀良哈台平定了“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蛮等三十七部”[25]。宋宝祐四年（蒙古蒙哥汗六年，公元1256年）八月，蒙哥汗命兀良哈台可以便宜行事，与四川蒙军会合。兀良哈台北出马湖江（今四川屏山）与利、阆的蒙军汪德臣部会于合州（今四川合川）。蒙哥汗加兀良哈台为大元帅，命还镇大理，悉置郡县。次年兀良哈台攻破安南，安南王陈日煚遁入海岛，请降。

宋宝佑二年（蒙古蒙哥汗四年，公元1254）年初，巩昌便宜总帅汪德臣奉命在利州修建城池，发展屯田，不断派军出剑阁向宋军各隘口、寨堡进攻，进一步向南扩展，深入蜀境。利州筑城，在于“欲为取蜀之计”。[26] 这一行动的成功，不仅堵死宋军北进的大门，使之“不敢越足北向”，而且奠定了蒙军节节进取蜀中的基础。

（二）蒙哥汗南下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在蒙军立城利、阆，兀良哈台平定云南，接通四川之后，蒙哥汗认为大举灭宋的时机已经成熟，遂于宋宝祐五年（蒙古蒙哥汗七年，公元1257年）八月召开御前会议，同意诸王、附马等请求伐宋的建议，采取“出蜀攻其上游”[27]，顺流东下，与南下的忽必烈、北上的兀良哈台会师鄂州，然后东下临安，一举灭宋的战略方针。但汗弟忽必烈及其副手张柔、谋臣郝经等人都不赞成立即攻宋。他们认为“彼(南宋) 今未有败亡之衅，我乃空国而出，诸侯窥伺于内，小民凋敝于外”，“见其危，未见其利”[28]。这是因为当蒙哥得拔都的支持入为大汗时，巳引起窝阔台系及察合台系诸王的不满，内部矛盾日益加深；并且经济力量也不够充足，所以忽必烈等认为一举灭宋的条件尚未具备。但蒙哥汗仍坚持大举灭宋的决定，于次年二月命汗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自己亲率三路大军，倾国南下，大举灭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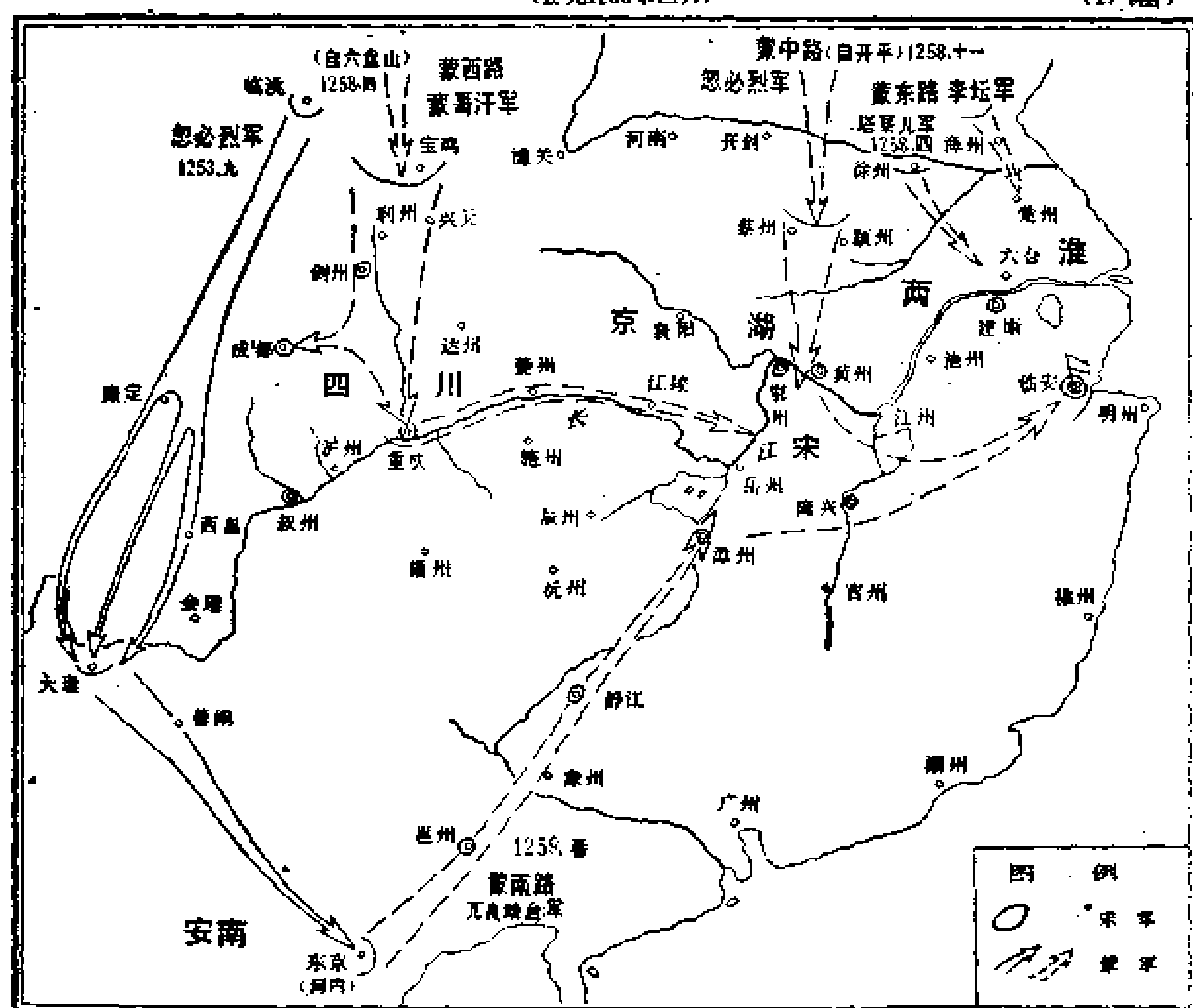
——西路由蒙哥汗亲率蒙军主力，先攻占四川，然后出夔门；

——中路由忽必烈率领南下襄、鄂，另派塔察儿攻取荆山（湖北汉水西岸）以分宋军；

——南路命兀良哈台从交、广引兵北上，西、中、南三路会师鄂州，囊括京湖，再攻取临安（浙江杭州），另派李坛率军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涟水军（今江苏涟水），以为牵制。

蒙古（蒙哥汗）攻宋战略企图示意图

（公元1258年二月）　　（27-9图）



对这一进军部署，忽必烈和他的副手、谋士们都认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后可以用奇，岂有连百万之众，首尾万余里"，可以取胜的，不同意蒙哥汗分散兵力的部署。他们也不同意主力迂回四川的方案，认为主力西出四川，必"限以大山深

谷，扼以重险莽阻，迂以危途缭径。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彼之因险以制奇则易；况于客主势悬，蕴蓄情露，无掳掠以为资，无俘获以备役……虽有奇谋秘略，无所用之。……所谓强弩之末不能射鲁缟者也”。[29]“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椅其背，大业可定也”。[30]另外也有人主张以一军出襄、邓，一军出寿春（今安徽寿县），一军出淮扬（今江苏扬州）的方案。但这些不同意见均未为蒙哥汗所采纳。

三、蒙西路军攻占西川和钓鱼城之战

（一）蒙西路军攻占西川

宋宝佑六年（蒙古蒙哥汗八年，公元1258年）二月，蒙哥派元帅纽璘、阿答胡率西路前军攻略成都。宋四川制置使蒲择之遣安抚使刘整守遂宁江箭滩渡（今四川遂宁）；命杨大渊等守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及灵泉山（今四川遂宁东十里）；自率军守成都。蒙西路前军击破各地宋军，长驱直进，攻占成都及附近州县，留兵戍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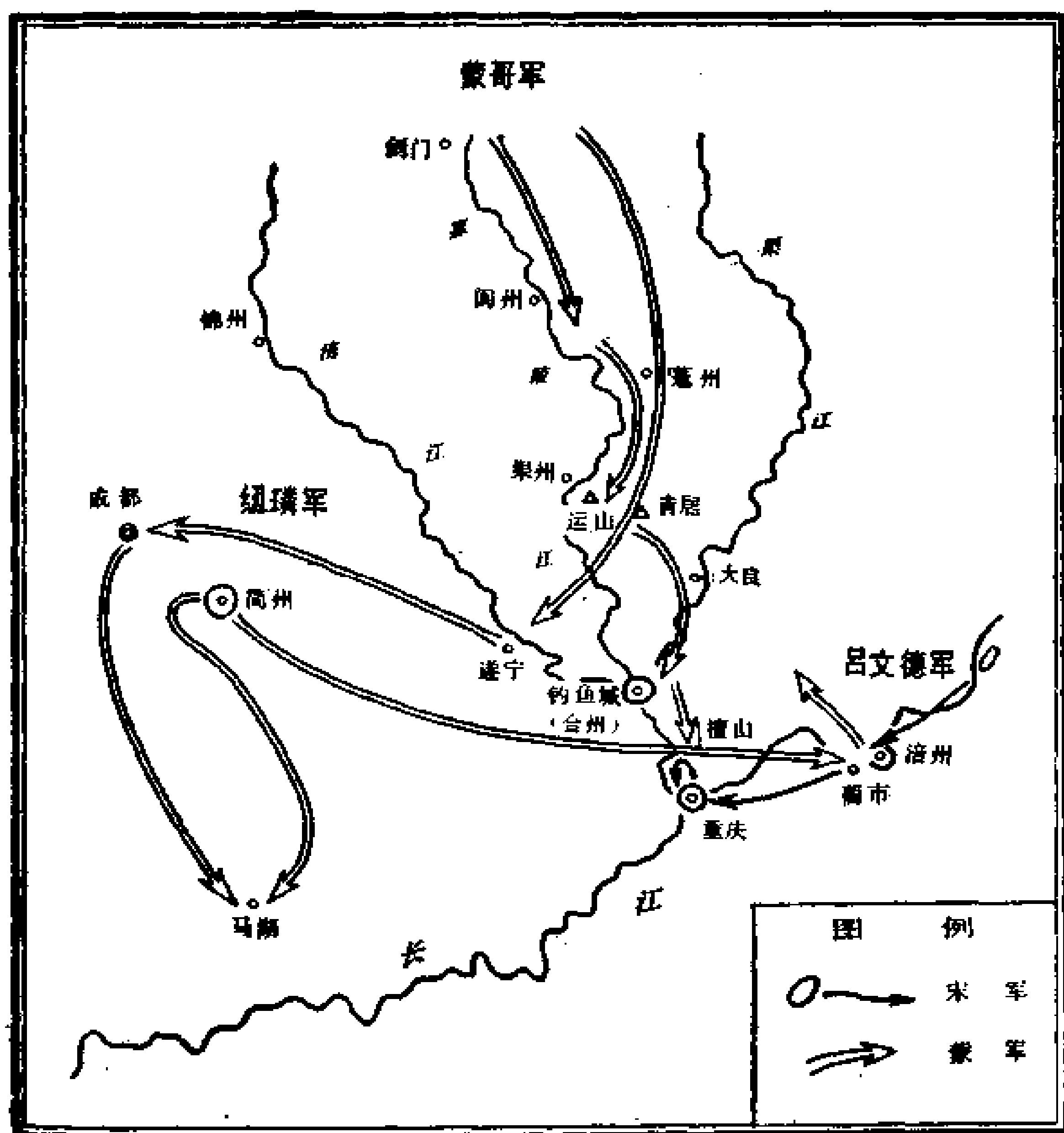
四月，蒙古主亲率西路主力四万人，经六盘山分路入川。一路自六盘山经陇州（陕西千阳）入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走金牛道入川；一路越米仓道（自陕西汉中以南，循汉水支流濂水谷道和嘉陵江支流巴江谷道，到四川巴中地区）而进；一路由渔关（今陕西略阳西）经沔州（今陕西略阳）南下。

蒙哥汗于十月初进抵剑门。蒙军经过激战，先后占领苦竹隘（今四川剑阁北）、长宁山（今四川苍溪西北）、鹅顶堡（今四川剑阁南二里）。大获山（今四川苍溪东南）、运山（今四川蓬安县境）、青居山（今四川南充南三十五里）、大良坪（今四川广安东北）等要隘。隆州（今四川仁寿）、雅州（今四川雅安）等地也被攻占。守将杨立、王佑、施泽等战死，杨大渊、刘渊、张大悦、王仲等降。到年底，“川蜀之地，三分我（蒙古）有其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数十州而已。”[31]宋四川制置使蒲泽之退守重庆。

十二月，蒙哥汗进驻青居山（今四川南充南）。入川的西路军，转战于孤城峭壁之间，逢山必争，遇城必战，苦战经年，疲惫不堪，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到达钓鱼城下。

蒙军主力攻略四川示意图

（公元1258年二月—1259年二月）　　（27—10图）



（二）钓鱼城之战

余玠事业的继承者王坚任合州知州后，动员合州所属石照、汉初、巴川、赤水、铜梁五县十七万人，把钓鱼城修得更加巩固

完善。秦、巩、利、阆等州不甘受蒙古统治奴役的人们，都纷纷迁到钓鱼城来，使得这座山城成为拥众十万的屹然巨镇。守城的兵力达万人左右。

早在宋嘉熙四年（公元1240年）彭大雅修筑重庆城时，就曾命合州知州甘闰修筑钓鱼城。嗣后，余玠采纳招贤馆冉琎、冉璞兄弟关于修筑此城的建议，“积粟以守之，胜于十万师远矣”[32]。经余奏请宋理宗，任冉璞为合州通判州事，委以再修钓鱼城的重任。

钓鱼城地势险要，视界开阔，它位于嘉陵、涪、渠三江汇合处，是嘉陵入长江的咽喉，控制着三江上游的广大扇形地区，屏蔽着战略要地重庆。山城四周悬岩拔地，山上桧柏葱茏，两侧绝壁，其路宛若刀刃，仅容一人通行，易守难攻。

城墙三面临江，依托壁立陡绝的悬岩而建，南北面又各筑一条一字城伸至嘉陵江边，隔断了东面丘陵至江边和水师码头的通道，保障了水师及其码头的安全，便于水师阻止敌方渡江攻城，并保持与合川城的连系。城辟八门，城内还储备了不少粮食，建有营房和校场。西门之内有一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又开小池十三所，共九十二眼，春夏秋冬，足备不干。这座山城城坚、粮丰、水足，具备长期坚守的必要条件。

蒙哥汗到青居山后，就派人到钓鱼城劝说王坚投降。王坚决意抗蒙，将说降人晋国宝公开正法，以激励军民同仇敌忾，誓死一战，从而创造了战史上坚守孤城达十六年的空前战绩。

宋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公元1259年）二月，蒙哥亲率大军到达钓鱼城下，准备先攻下钓鱼城，然后进攻重庆。其攻城部署如下：

——命纽璘进占长江沿岸，在涪州（今四川涪陵）的蔺市（涪陵西）架起浮桥，在重庆下游的铜锣渡（今重庆以东二十里）夹江据岩为垒，阻断自长江下游来援的宋军的进路，并威胁牵制重庆的宋军；

——派遣南宋降将杨大渊等为先头部队，进攻合州旧城，李忽兰吉出动战船，劫夺钓鱼城沿江舰船；

——命史天泽军在城南夹嘉陵江而阵，专门封锁嘉陵江江面，阻止重庆宋军来援；

——将汪德臣部部署在城的西南方，负责夺取城外山寨，另遣郑温率军四千在钓鱼山周围巡逻。

战斗开始后，蒙军从东面猛攻新东门（土地垭门）与护国门（小寨门）之间的一字城，同时猛攻镇西门（西门）。两战不克，受挫回师。三月，蒙军从东、北、西三面对东新门、奇胜门（范家门）和镇西门外的“小堡”发起强攻，再次失利。

四月上、中旬，接连出现二十天的大雷雨，蒙军暂时停止攻城。二十二日，蒙哥汗督军强攻护国门，败归石子山。二十四日夜，蒙哥汗率军绕道从西北进攻外城，一度登上城头，杀伤很多宋军兵士，但终被击退。

五月，蒙军继续攻城，但屡攻不克，士气大为低落。而此时城内军民则群情激愤，斗志高昂。守将王坚白天率军抵抗，夜晚不时派兵袭击蒙古军营，使蒙军难于应付。

在蒙军进攻钓鱼城不久，宋廷把抵抗不力的四川制置使蒲择之调出，任命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率军援蜀。六月，吕文德率舟师万艘，溯江而上，进至涪州。经力战乘风冲破蒙军浮桥，数战皆克，进入重庆。

接着吕文德以艨艟巨舟千余艘，溯嘉陵江而上，救援钓鱼城。蒙军迎战于槽山（今四川合川南）西，不利，蒙哥汗命史天泽击之。当时宋军以战舰三百艘停泊在黑石峡东，而以轻舟五十艘为先锋，向北进逼，与蒙军的船只相距一里多路。蒙哥汗在东山（四川合川东）指挥两万蒙军夹江而阵，进行堵截。史天泽分军为两翼，在两岸“跨江注射”，他本人则亲率舟师，“顺流纵击”，三战皆捷，夺得宋军“巨舰数百艘”，[33]宋军败回重庆。

蒙军在钓鱼城军民的顽强抗击下，损失甚重，加以天气炎热，疾疫流行，使蒙军战斗力大为降低。当蒙哥汗召集会议时，来阿八赤以“蜀地岩险，重庆、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筑之城，依险为固，今顿兵坚城之下，未见其利”[34]，建议只留少数军队监视重庆及和州，而把主力开出夔门，和忽必烈、兀良哈台在鄂州会师，直下临安；有的将领还曾经酝酿北归，使蒙哥汗进退都感到为难。

钓鱼城坚守数月之久，给蒙军以很大的打击，也给南宋军民以极大鼓舞，连远在临安的宋理宗赵昀也不得不承认，“王坚婴城固守，百战弥历，节义为蜀列城之冠”。

七月初，久旱高温，酷暑难熬，疫疾作祟，蒙哥汗又派汪德臣率军再攻钓鱼城，汪德臣到阵前劝降，中石负伤，攻势又挫。蒙哥汗急于攻下钓鱼城，命建瞭望台，准备使用飞车窥探城中情况。当蒙哥汗亲自指挥蒙军升起飞车时，城内宋军发炮，巨石纷飞，台摧人亡，在附近的蒙哥汗也中了飞石（一说中了炮风），身负重伤，在送往晋云山寺休养营地途中，死于金剑山温汤峡（重庆北温泉）。

蒙哥汗死后，诸王莫哥派人前往鄂州向忽必烈告讣，由他儿子阿连台扶柩并率领随蒙哥汗征蜀的蒙军，向北撤退。蜀江北岸的局势顿时缓和下来。

九月，宋廷宣布“合州解围”，升王坚为宁远军节度使。十月，又以“蜀道稍宁”，诏谕四川守臣“恤军劳民”，“庶底兴复”。[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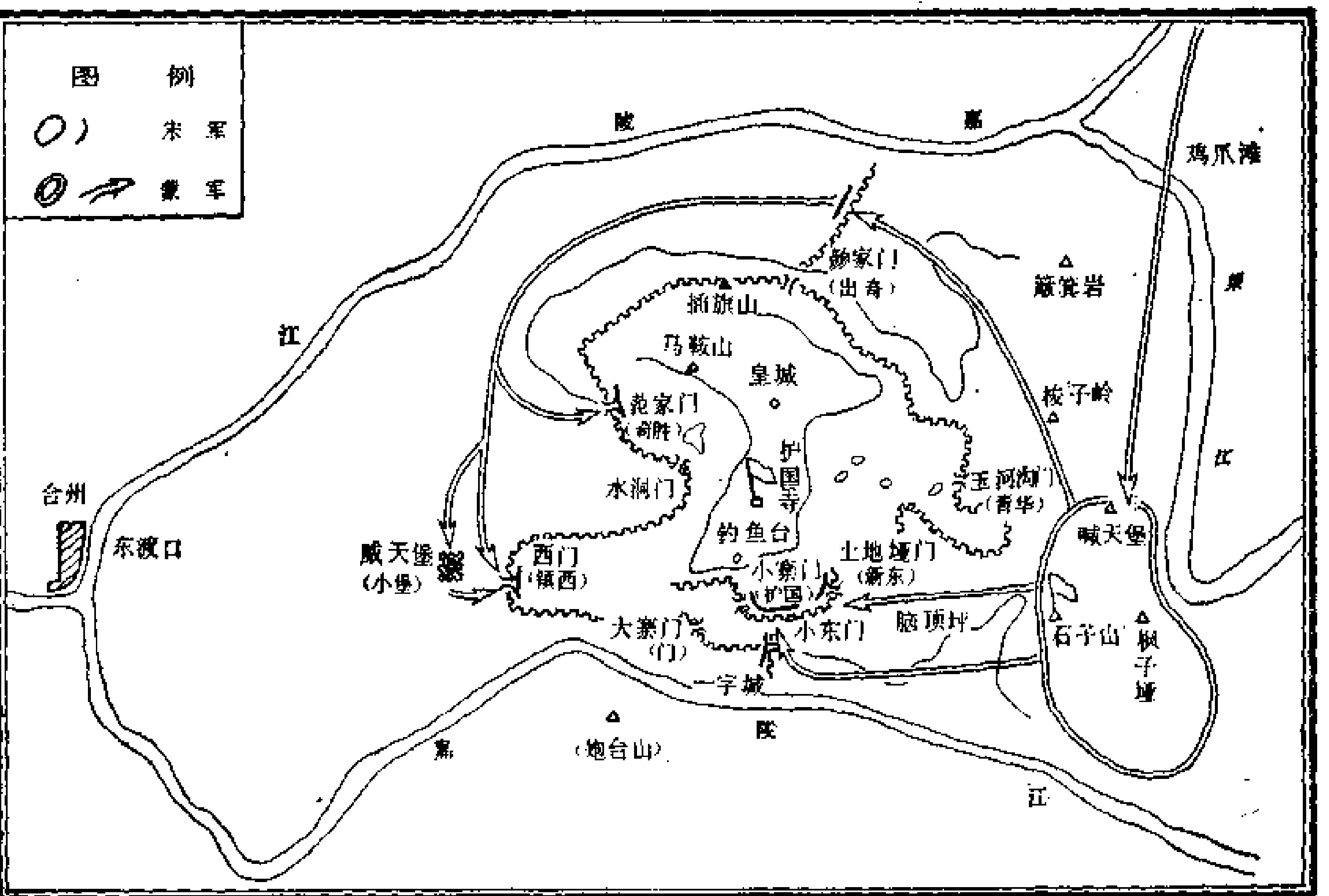
四、鄂州攻防战及贾似道援鄂

（一）忽必烈率军南下

当蒙军南下发动进攻后，两淮战场紧张的消息传到临安，宋廷十分恐慌，曾准备迁都四明（今浙江鄞县）去避难。七月，蒙哥汗在合州战死，西路军解围北归，两淮战事也趋于沉寂。这时，忽必烈率中路军南下，战事重心又转到京湖地区。

蒙宋钓鱼城攻防作战示意图
(公元1259年二—七月)

(27—11图)



忽必烈在宋宝祐六年（蒙古蒙哥汗八年，公元1258年）十一月就从开平（内蒙古正兰旗）出发，翌年八月渡过淮水，分军为二，忽必烈率队由大胜关（今湖北大悟东北），张柔率部由虎头关（今湖北麻城北）而进，沿边宋军皆退。八月底，蒙军进至黄陂，前锋前出至长江北岸。九月，蒙哥汗死讯至，诸王请忽必烈"北还以系人之望"〔36〕。这时，忽必烈企图立下战功，以增加争夺汗位的资本，不从诸将"未可渡"的建议，冒险挥军在阳逻堡（湖北黄冈西北）以西三道渡江，以火器击败宋军江上水军，到达长江南岸，然后以主力冲向鄂州，同时以一部兵力向东南攻占临江（今江西清江西南）、瑞州（今江西高安），并以水军进至岳州（今湖南岳阳），以掩护主力围攻鄂州。

当蒙军南下重心移到京湖地区后，宋廷在惊慌之余，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援鄂措施，以巩固中游而保卫东南。至九月，宋理宗才下诏"勉谕诸阃进兵"，拿出内府大批缗钱、银、帛犒军，派员前往淮东、沿江战区调兵增援中游。十月，罢黜贪狠误国的右丞相丁大全，而以贾似道为右相兼枢密使，依靠他率军应援鄂州；同时命江东西宣抚使赵葵移司信州（今江西上饶），指挥饶、信、袁、临、抚、吉，隆兴军民，抵御蒙军的东窥临安；命沿江制置使马光祖率军移司江州；沿江制置副使史严之率军移司寿昌军（今湖北鄂城），应援鄂州；调吕文德为京湖安抚使，率军由重庆回军鄂州；并以湖南安抚使向士璧指挥岭广军队集中于潭州（今湖南长沙），负责广西边防，以制止蒙古兀良哈台军的北上。这时，宋军云集聚鄂州，"军容甚盛"，使贾似道抵御蒙军进攻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鄂州攻防战

蒙军渡江后，主力西进至鄂州城下，即开始对鄂州发动猛烈的进攻。忽必烈在城东北压云亭立望楼，高可五丈，以了望城内行动。在蒙军连续猛攻下，南宋军民和爱国将领发挥了争取抗击胜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鄂州"作木栅环城，一夕而成"，并

始终坚守城池，没有使蒙军得手。十月，城东南角被蒙军攻破，鄂州军民又筑一层以进行抵抗，蒙军又被英勇的守城军民击退。

鄂州守将权州事的都统张胜，率领军民誓死坚守，毫不动摇。接着各地援军陆续到来，贾似道也率领两淮大军屯兵汉阳军（今湖北汉阳）。鄂州军民倍受鼓舞，张胜出城袭击蒙军，不幸战死，高达等将领继续领导军民坚决守城。尽管张柔等又“作鄂车”洞掘其城，别遣勇士先登，攻其西南陬”，虽屡次破城，但皆被击退。

（三）蒙南路军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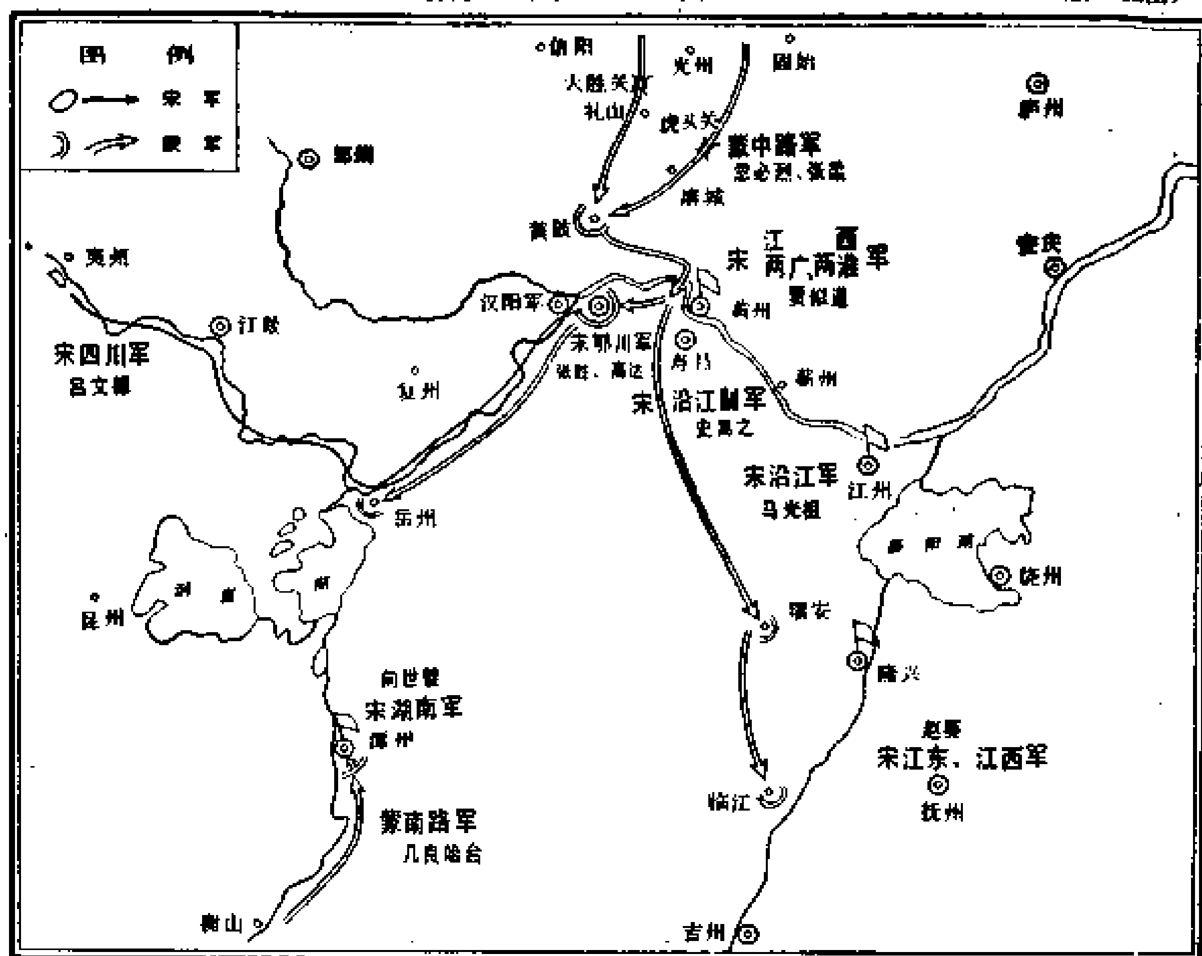
早在宋宝祐五年（蒙古蒙哥汗七年，公元1257年)春，宋荆湖南路安抚大使兼知潭州李曾伯移回静江（今广西桂林市），这实际是建立新的西南战区，以阻止在云南的蒙军北上。但李曾伯没有针对蒙军行军作战的特点进行部署，只以宋军六万屯在几个州城，消极固守，没有采取互相应援的措施。

宋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公元1259年）兀良哈台率骑兵三千，蛮僰万人，破横山寨（今广西南宁东），辟老苍关，略宋广南西道，击破宋军六万，经贵州（今广西贵县）、象州（今广西象州），回捣静江府、略辰（今湖南沅陵）、沅（今湖南芷江），向潭州急进，迂回数千里，大小十数战，至是兵力疲弊。十一月，虽击破湖南向士璧军直抵潭州城外，但潭州守将向士芷极力守御，并派军在南岳市袭击兀良哈台后军，战事呈胶着状态。

（四）贾似道乞和忽必烈北归

十一月，南宋各路援军云集于鄂州四周与蒙军相峙，重兵集于江南，为防备蒙军乘势东下，宋理宗赵昀命贾似道由汉阳移司黄州。当蒙军围攻鄂州紧急的时候，贾似道不但不指挥各路援军采取积极行动，向蒙军进攻，反而密派一个叫宋京的人，到蒙军中“请称臣，输岁币”[37]。忽必烈已掌握贾似道的底细，假意加以拒绝，表示非攻鄂州不可。这就把贾似道更吓得不知所措。

蒙宋鄂州方面作战示意图
（公元1258年十二月—1259年） （27—12图）



此时，更为焦急不安的却是忽必烈。自蒙哥汗在合州战死后，“国内空虚”，“诸王莫不觊觎神器”，一旦有人“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38〕事实上，他的幼弟阿里不哥已经在准备“行皇帝事”了，他自己虽然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然而鄂州的战事胶着难解，不能抽身，若冒险“突入江浙，捣其心腹，闻临安、海门已具龙舟，则已徒往，还抵金山（今江苏镇江），拚命求出，岂无韩世忠之俦”；并且鄂州、汉阳难于攻取，“区区一城，胜之不武，不胜则大损威望”。忽必烈权衡轻重，又在他的心腹幕僚郝经的建议下，遂“断然班师”。到十一月底，他假称要打临安，企图再压贾似道，求得有利的和约，骗过宋军，

以为脱身之计。

忽必烈“兵向临安”的消息，再一次使贾似道“大惧”，只是在知道蒙哥汗确实已死的消息后，才使他“意稍解”。他又认为有了求和的资本，连忙再派宋京去蒙古军中求和，许以“北兵若旋师，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各二十万”[39]。忽必烈见目的已达，答应贾似道的议和条件，急忙还军青山矶（今湖北武昌东北），起程北归。

在忽必烈仓卒引军北还的时候，蒙古南路兀良哈台军在潭州被阻，且被截断“归路，不得通过”[40]。忽必烈急派合儿鲁兀将铁迈赤率步骑三千自岳州南下迎接，兀良哈台军才得引军北撤。

贾似道在蒙古军队北归以后，马上捏造自己的战功，谎报大捷，欺骗宋廷和舆论，并且叫自己的清客撰文颂扬自己。贾似道不仅隐瞒了他向蒙古乞和的事实，反而说是由于自己的指挥，“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41]。

蒙军在新生州（今湖北黄冈境内）架设浮桥引兀良哈台军北还。在蒙军绝大部分早已渡过江北，只剩下少数后卫的时候，贾似道命夏贵以水军断浮桥，俘杀蒙军七百余人，把这当作自己莫大的战功，上奏给宋理宗赵昀。这个昏庸的皇帝居然认为贾似道“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给予重赏，甚至命令“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42]。简直把贾似道说成是使南宋起死回生的伟人，夸奖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炙手可热的右丞相贾似道，既然已经权倾朝野，就对那些不顺自己心意的人开起刀来。对真正防守有功的将领如向士璧、曹世雄、高达等人施行排挤、陷害以至杀戮；对于只能谄事贾似道的人如吕文德等人，在论功行赏的时候，却使其名列前茅，授以重任。这种黑白颠倒的行径，使南宋军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政治、军事形势日益恶化。

评蒙哥南进蒙宋双方的战略

蒙哥进攻南宋的战略思想仍然是迂回包围。这一战略在蒙军灭金和初攻南宋时就已采用，而且它一直可以追溯到蒙古民族的狩猎生活。蒙哥的汉族谋士郝经曾总结说：

> “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众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猎，猎取之若禽兽然”。〔43〕

从历史上看，江淮水多，易守难攻，历来从北方攻略江南，如晋武帝平吴、隋文帝灭陈、宋太祖平南唐，都是先取四川，跨有长江，然后顺流而东。

降蒙的南宋叛将也同样持这种看法。如降将杨大渊就曾向忽必烈献策：“取吴必先取蜀”；降将刘整向忽必烈建议两条攻打南宋的计策，其中一条就是“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

蒙哥汗吸取了窝阔台失败的教训，更彻底地贯彻了迂回包围的战略思想，对南宋实施主力迂回。其第一个战略步骤是在他即位的第二年派忽必烈攻略云南，占据云南及其附近地区，作为远出西南的战略据点，收刮“西南诸蕃”的人力物力，俟蒙宋正面战场决战时机成熟，就可以奇兵出广西拊京湖宋大军之背，然后直下临安。这一战略步骤与次年派旭烈兀西征中近东，建立伊儿汗国也不无关系，是很有远见的。

蒙哥汗八年，蒙哥汗实行第二个战略步骤，亲率主力攻略四川。第三个战略步骤是预定次年（蒙哥汗九年）秋，忽必烈自河南南下，兀良哈台从云南北上，协同从四川东下的蒙哥主力聚歼京湖宋军，会师鄂州。

从实际经过来看，入川蒙军已攻占川北、川西，只重庆、合川和川东尚在宋军手中。当时来阿八赤曾建议：与其在合州久困，不如以兵牵制之，大军乘锐“水陆东下，破忠（今四川忠县）、涪、万、夔诸小郡”，再“出荆楚，与鄂州渡江诸军合势。

如此则东南之事一举可定”〔44〕。这个意见是很有战略眼光的，照此办理，蒙哥宏伟的战略计划可能实现。可惜蒙哥汗没有接受。

蒙哥亲自率军攻钓鱼城是一个战略错误。首先大军不该顿兵坚城，合川并不是不能绕过的要隘。其次，三路大军的统帅不应把自己局限在一次战斗中达数月之久，而忽视了对全局的战略指导。他被入川以来遇坚必攻，非破即降的情况所吸引，滋长了遇坚必摧的思想，非攻下钓鱼城不可，以致负伤身亡。一着不慎，导致了满盘皆输。

《蒙兀儿史》著者屠寄认为蒙哥汗应居中路，指挥各路蒙军，而不应亲自去迂回四川。他评论说：

> “车驾舍中道而取四川，弃野战之长，违北族之性，聚数十万众，冒盛暑而攻合州，顿兵坚城，累月不下，情见势拙，以身殉之。所谓千金之弩，为鼷鼠（小鼠）而发，甚矣其不知兵也”。〔45〕

这一看法是很有道理的。

钓鱼城军民在守将王坚率领下，发挥了抗蒙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长期准备所积蓄起来的优势，舍生忘死，孤军备战，赢得了守城战的胜利，并导致了全局的胜利，延长了南宋二十年寿命，是值得赞扬的。

通过这次战争还可以吸取一条教训，工事虽好，必须有斗志旺盛的部队来防守；还必须有一支精锐的机动部队，依托山寨群，以阻击，伏击、袭击等手段，支援各寨或寻机歼敌，否则余玠的防御体系虽好，落到蒲择之那样庸劣的主帅和杨大渊、张大悦这样怕死的守将手里，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合州、潭州、鄂州都是坚守孤城的典范，他们对这次战争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

忽必烈孤军深入，胶着于鄂州坚城之下；兀良哈台归路被截，兵疲气沮。此时南宋大军云集，形势的发展对南宋有利，右丞相

兼枢使贾似道如能坚守鄂州吸住蒙军，以湖南向士璧军截断兀良哈台军的归路，以水军控制长江，截断蒙军北撤之路，集中兵力，依次击灭忽必烈军和兀良哈台军，是完全可能的，至少也可以再打一个黄天荡之战。如能再接再励，乘胜转入全面反攻，则实现“恢复三京，守河据关”的最初战略企图也是可能的。可惜南宋统治者，只知保全皇位，苟且偷安，权相贾似道一味卑辞求和，欺上瞒下，以致大好形势白白付之东流。

第五　忽必烈南下灭宋

一、忽必烈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全面展开灭宋准备

忽必烈北归后，于宋理宗景定元年（蒙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春，在开平召集支持他的蒙古贵族，利用传统的“忽里勒台”（部落首领会议）形式登上汗位。

忽必烈从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连年的激烈反抗中，认识到要巩固他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进而战胜南宋，必须改变统治方式。因此，他在即位之初，就接受汉族地主阶级士大夫分子的建议，吸取中原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加强中央集权，推进封建化的进程。他设官分职，在中央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地方分行省、路、府、州、县，实行分级管理。在经济上奖励农桑，恢复经济；抽税刮丁，禁止屠杀。宋景定五年（元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忽必烈又在中原地主阶级的支持下，取得了对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顽固保守势力战争的胜利。为了便于控制中原人民，密切与中原汉族地主阶级的关系和便于进行灭宋准备，又把统治中心由开平迁到燕京（北京）。宋咸淳七年（元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元”，称皇帝。

在军事方面，忽必烈鉴于蒙军几次南下，骑兵不便于在水道纵横的地形上机动，又没有比南宋更加强大的水军的教训，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开始在汉水上游造战船、练水军。以后又在

各地建立了许多水军，使元军不特有“北马”的优势，而且也兼具“南船”之长，为尔后长驱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蒙古中书平章政事宋子贞曾上言：

> “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46]

忽必烈颇然其说，于是对南宋之降官降将，升官晋爵，大量编组汉军。

在四川方面，忽必烈利用刘整叛宋降蒙的影响，又试图攻下钓鱼城。但钓鱼城军民坚决抵御，蒙军仍无进展。于是蒙军抛开久攻不下的钓鱼城，东攻夔州。宋守军顽强抗击，援军也陆续入川增援，战事互有胜负。宋咸淳二年（蒙古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宋军从蒙军后方夺回开州（今四川开县），牵制蒙军东进。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宋军反攻到成都地区，双方又打成相峙的局面。蒙军在四川试探性的进攻，前后七年未能得手，于是忽必烈决心改变进攻南宋的战略。

二、忽必烈汗改变进攻战略

早在公元1259年忽必烈向鄂州进军时，就有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杜瑛认为，全面进攻或出四川，必至兵力分散，难以用奇，“若控襄樊之师，委戈下流，以捣其背，大业可定矣”[47]。郝经也建议“以一军出襄邓，一军出寿春，一军出淮扬”。千户郭侃也建议”先取襄阳，既克襄阳，彼扬、庐诸城，弹丸地耳。置之勿顾而趋临安，疾雷不及掩耳，江淮、巴蜀不攻自平”[48]。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忽必烈最后采纳刘整攻宋方略，宜“先攻襄阳，撤其扞蔽”[49]的建议，决心先攻襄阳，作为打破蒙宋对峙的突破口。于是征调诸路兵马，命兀良哈台子阿术与刘整督率诸军攻略襄阳，同时在四川进攻嘉定、重庆、泸州等地，以牵制宋军，不使宋军东下应援。

蒙军兵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若在各个战略方向上全面进攻南宋，必至兵力分散，在四川、京湖、江淮三大战区就不可能

尽克坚城，何况前方还有长江拦阻，所以只能采取集中兵力，先破一点，然后全线进击的方案。而要实现这一方案，突破点选在哪里，也就是在哪个方向上实施主要突击，就成了关键题。四川方面虽有上游之利，但地势险远，多年试攻，未能奏效。江淮方面，河道众多，城镇林立，是南宋重兵所在，前有长江天堑，水阔江深，难以逾越。而襄樊方向，在三大战区中相比，较便于大军进攻。襄樊地处汉水中游，既便于利用上游及唐、邓各支流制造战船、训练水军，又便于顺流南下，直达长江；尔后水陆并进，同样具有四川居上流、跨长江的有利形势，但却缩小了正面，集中了兵力；接着再隔开四川，向东席卷江左，也同样可收包围宋军主力的效果。所以以襄鄂为主要突击方向，确实是利多弊少。

三、鄂州战后南宋的概况

蒙军从鄂州北归后，贾似道欺上瞒下，捏造战报，进一步攫取了南宋的军政大权，并大大麻痹了南宋朝野对边防的警惕。南宋君臣“酣歌深宫，啸傲湖山，玩岁愒日，缓急倒施”，[50] 丝毫不顾及民族利益和人民生活，一味“颂说太平……不复加意边事”[51]。

南宋统治者为满足其荒淫无度的生活，在郡县收买官田，弄得地少的农户家破人亡。又以清丈土地、杜匿税收为名，“行经界推排法于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税，而民力益竭”，各地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宋廷财政亏缺，又依靠增发纸币来作为“和籴”的支付手段。结果是：纸币滥发，物价上涨，军粮不足，南宋经济陷入重重危机之中。南宋的士兵同样受到残酷的剥削，“饥寒窘用，难责死斗”[52]，连元朝将领阿术也认为宋兵不及往日善战。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大官僚地主阶级无意抗敌，事先迎降，以保富贵。贾似道陷害、打击抗击蒙军有功将领，致使其中有些人投奔蒙古。

总之，南宋在贾似道等人统治下，已成土崩瓦解的局面，政治局势和军事形势江河日下。

忽必烈就汗位后，曾遣翰林侍读学士郝经为国信使，入宋告即位，并提出与贾似道鄂州讲和之议。贾似道深恐其泄露真相，遂命拘留郝经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又给了忽必烈以新的借口。

四、襄樊攻防战

（一）蒙军攻略襄樊的战略指导及措施

襄阳自宋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被岳飞收复以后，即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这里“生聚繁庶”，仓库里积贮钱谷、金银、盐钞甚多，军器有二十四库，城池坚深，守御完备，其雄厚富实的情况，为南宋沿边诸城之冠。襄阳被汉水环绕，不利于进攻行动，又可与樊城互为支援，相互转用兵力。在其南还有江陵及鄂州。可以集中重兵来支援襄樊作战。蒙宋自开战以来，除南宋北军将领王旻以城降蒙军，不久经孟珙收复外，以后蒙军几次攻打襄阳，均未得手，所以忽必烈汗遣诸将攻襄阳，“命毋攻城，但围之以其自毙”[53]，“深沟高垒，期于坐困”[54]。为实现这一长围久困，以待其自毙而后夺取的战略，忽必烈采取了两次重要措施：构垒筑堡，彻底围困襄阳，遮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阻止南宋军队增援襄阳。

刘整看准了宋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可以“利诱”的弱点，派人送给吕文德玉带，要求在襄阳城外设置榷场，进行互市贸易。吕文德有勇无谋而贪利，竟然答应了这一要求。接着，蒙军又以安丰（今安徽寿县南）榷场为盗所掠等借口，要求在襄阳城外榷场筑土墙加以保护。吕文德上报宋廷，同样得到允诺。于是，蒙军“筑土墙于鹿门山（襄阳南三十里），外通互市，内筑堡壁”。接着又筑堡于白鹤山（襄阳南十里），派兵戍守，“以遏南北之援”，并不断派出骑兵，在襄阳城外四处抄掠。至宋军发现蒙军的真正意图，吕文德已后悔莫及，榷场筑垒遂成为围困襄阳的起点。

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围攻襄阳的战

幕拉开，蒙古都元帅阿术即率兵五万，进逼襄阳，察看地形，并抄掠沿江诸郡。是年底，蒙军已在襄阳东边的白河口（白河入汉水处）开始修筑城堡。次年，蒙军又在万山（襄阳西十里）、鹿门山等处兴筑城堡。根据史天泽的意见，蒙军在襄阳城外筑起长围，西起万山，南包襄阳南二十里的百丈山，尽鹿门山而止，使南北不相通，堵死了襄阳以南的陆路交通。蒙军又逐步紧逼，向北推进到襄阳南九里的岘山、三里的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互诸堡，逼近襄阳。这年十一月，蒙军又在汉水西岸构筑新城，与汉水东岸的鹿门堡遥遥相对，成为控制襄阳南面汉水通道的主要据点。与此同时，蒙军"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军援者不能进"[55]。蒙军还在灌子滩（襄阳南三十里汉水中）立栅，以遮断从汉水南来的水路。到宋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无论水上陆上，蒙军都对襄阳形成了层层包围，从此襄阳与外地之联系全部遮断，军粮、援军不能再入襄阳，蒙军基本上完成了对襄阳进行长期围困的部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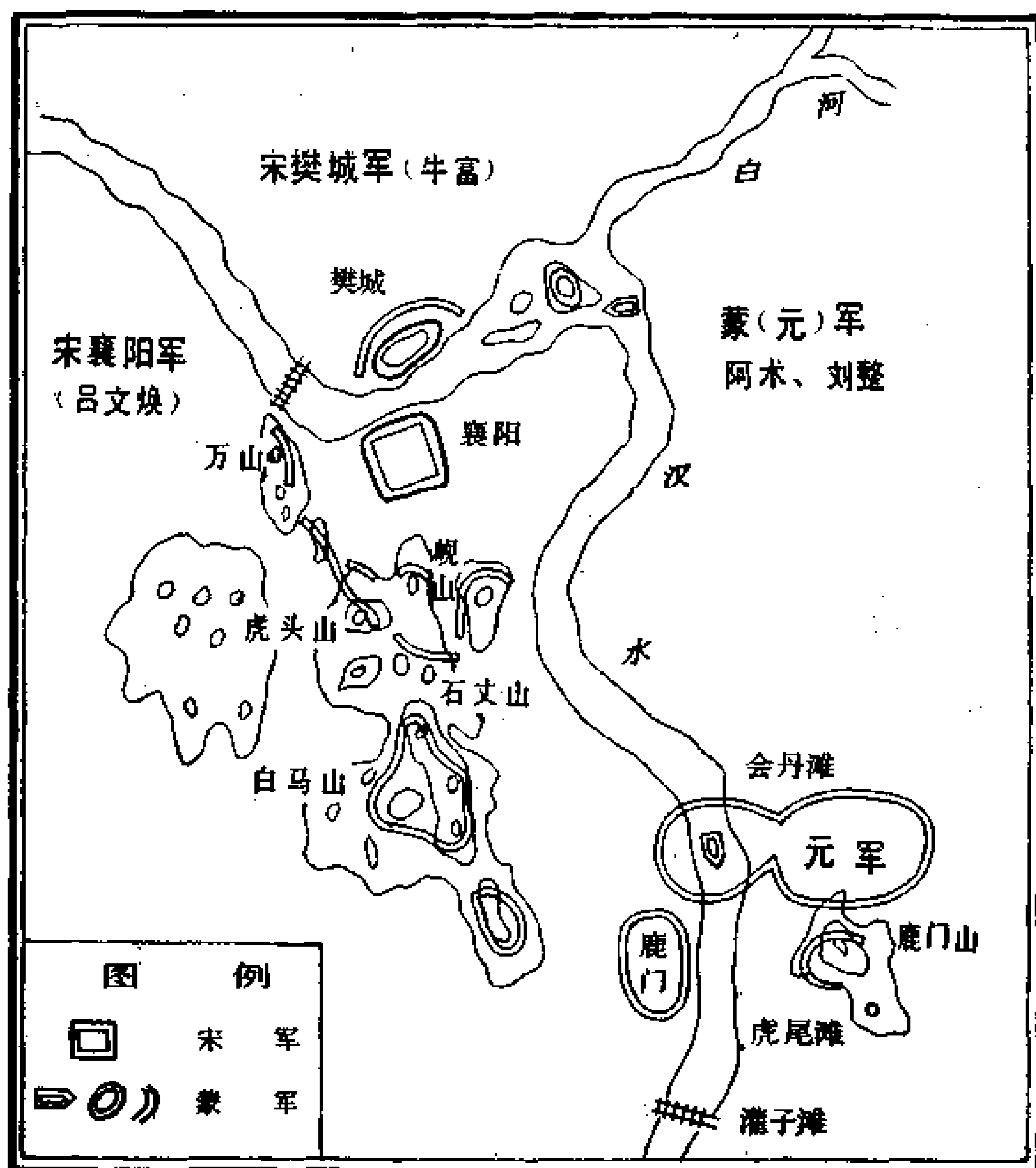
进攻襄阳坚城需要大量步兵，忽必烈调来刘整与阿里海牙所率领的汉军并征发民兵二万，与蒙古骑兵配合作战。蒙古为收刮人力物力，支援大军进攻，成立了河南行中书省，开府岘首（襄阳东南三里），负责江汉、两淮方面对宋的战争。忽必烈又派重臣史天泽及枢密副使驸马忽剌出至襄阳，协助阿术等筹划围困襄阳事宜。

（二）宋军出击及救援襄阳

当蒙军在襄阳外围构筑堡寨及长期围困时，驻守襄阳的宋军进行了多次出击，试图打破蒙军的包围。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宋兵自襄阳来攻沿山诸寨，阿术分军御之，斩获甚众"[56]。可见争夺沿山诸寨的战斗是相当激烈的。公元1269年，阿术亲率一万五千人扼守万山、射垛冈、鬼门关等"樵苏三路"，宋荆鄂都统唐永坚从水路出击，结果在那里被俘。到公元1270年初，宋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史吕文焕亲率步骑

蒙军围困襄阳、樊城示意图

（公元1267年十二月—1268年十二月）　（27—13图）



万余人、兵船百艘，进攻万山堡，亦为蒙古万户张宏范等率兵击败。这一切说明，单靠襄阳守军的力量，已无法打破蒙 军 的 包围。

与元朝统治者的处心积虑相比，宋廷一伙对襄阳这一战略要地根本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元军已开始对襄阳展开围攻的

情况及对整个战局发展的严重性，也没有作出认真的反应。甚至襄阳被围已经三年，南宋的平章军国重事贾似道还不曾向宋度宗赵禥报告，并伪说“北兵已退”。又没有对襄阳组织过确实有效的救援，仅仅由京湖及沿江派出一些部队对襄阳进行规模不大的救援。

宋咸淳五年（蒙古元至六年，公元1269年）三月，宋派京湖都统张世杰率步骑舟师援襄，水陆并进，与蒙军大战于赤滩圃（襄阳东南），宋军败绩。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乘汉水春潮上涨之机，轻舟载粮至襄阳城下，但惧蒙军掩袭，仅能“与守将吕文焕交语而还”。这是宋正规军援襄战斗比较成功的一次。

这年七月，大霖雨，汉水上涨，夏贵率水军袭击蒙军于郢州新城附近的虎尾州，被蒙军水军击败。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贾似道之婿）又以水军援助夏贵，进至灌子滩（襄阳鹿门山南），亦为阿术所败。

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三月，蒙将刘整与阿术计议：

“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57]

他们向忽必烈汗上奏说：

“围守襄阳，必当以教水军，造战舰为先务。”[58]

忽必烈同意他们的计划，于是“造船五千艘，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得练卒七万。”[59]这是蒙古军队的一个重要变化，说明在水战上已取得了显著成就，夺了宋军所长，补了蒙军所短，使整个襄阳战局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

在蒙宋襄阳战争进入决战的紧张时刻，宋廷派名将李庭芝出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兼夔路策应使，全面负责江汉防务，督师援救襄阳。可是，宰相贾似道又允许派在那里的殿前副都指挥使范文虎所率的军队，不受李庭芝节制，一切行动由宋廷直接指挥。

宋咸淳七年（蒙古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六月，范文虎得

到“赐犒师钱一百五十万”，不得已统率殿前司及两淮水军十万，沿汉水进至鹿门。蒙古都元帅阿术夹江东西为阵，别令一军趋会丹滩（今襄阳东南汉水中），冲宋军前锋。范文虎逆战不利，大败溃退。七月，襄阳守将吕文焕遣将出击蒙军百丈山（今襄阳南二十里）堡垒，遭到蒙军反击，失败而回。

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三月，元军攻破樊城外廓，宋守军二千余人全部壮烈牺牲，樊城形势格外紧张。当时襄阳城内，在物资供应上已极艰难。五月，宋廷诏京湖制置使李庭芝移屯郢州（今湖北钟祥），将帅悉率部驻新郢（汉水南岸与郢州城隔江相对）及均州（今湖北郧县东）河口，招募“襄、郢西山民兵之骁悍善战者”〔60〕，作援襄战斗的最后努力。

西山区地处前线，这里的人民过去饱受金军的侵扰，今又受蒙军的杀掠，有着保卫乡土、保卫国家、援救襄阳、打退蒙军的坚强意志。李庭芝在清泥水（源于均、房，向东北，在襄阳西北流入汉水）制造轻船百艘，招募民兵三千，求得民兵都辖张顺、张贵为都统，于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五月，乘汉水方生，顺流放舟，击破元军重重封锁，到达襄阳，但张顺已壮烈牺牲。城中断绝外援五年，闻救兵到来，“踊跃过望，勇气百倍”。当时张顺、张贵率领的三千农民武装，在人数装备上都大大劣于包围襄阳的元军，也大大劣于由范文虎等将领所率领的南宋援襄的正规部队。但这些不畏强敌，誓死卫国的民兵，却打败了敌人，完成了范文虎等南宋将领所无法完成的任务，为襄阳增加了一批斗志高昂的守城战士。他们突出地表现了南宋广大人民抗蒙不屈的顽强战斗精神，在当时艰苦的战局中赢得了一次令人注目的胜利。

被元军牢牢围困五年的襄阳，要打退敌人，解除包围，决不是消极守住城池所能达到的。尽管襄阳号称“城坚池深，兵储支十年”，但在激烈的攻守战中，兵员、武器、军需、民用总会枯竭。在张顺、张贵援襄以前，城中虽然还有积粟，但已“乏盐、

蒙(元)宋襄阳攻防作战示意图

(公元1268年正月-1273年六月)　　(27—14图)

均州
唐河
牛富
光化
樊城
张顺
张贵
民军
蒙(元)军
枣阳
襄阳
夏贵军
吕文焕
张世杰军
随州
宋
郢州
荆门
峡州
范文虎军
京
湖
江陵
(李庭芝)
汉阳
鄂州
复州
岳阳

图例
宋军
蒙军

薪、布帛”；至于兵力补充，自被围以来，仅有张顺、张贵这一次。后因天气干旱，汉水渐涸，元军在汉水中沙洲上加紧构筑工事，使襄阳向外传递消息也很困难。范文虎屡与李庭芝的制府发生龃龉，“莫能并力，坐视而已”[61]在这种危境中，张贵主动要求突出重围去与郢州宋军取得联系，约定时日南北夹击。张贵率领所部民兵，冲击江上索链，破围前进，使元军纷纷“辟易”，经奋勇血战，终于到达与范文虎约定会师的龙尾州。可是懦怯怕死的南宋殿前副都指挥范文虎，由于“风雨惊疑”已于前二日违约南退三十里，使刘整、阿术得以先据龙尾州，拦截这支不到三千人的南宋民兵。由于众寡悬殊，张贵所带的民兵全部壮烈牺牲。最后一次打通襄郢联系的作战，就这样失败了。这对襄阳南宋军民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南宋统治者恣意享乐，极不愿听边事战况，襄阳守将屡次告急求援，权臣贾似道始终不再出兵救援，在这种黑暗的统治下，南宋广大爱国军民坚决抗敌的意志和力量，被压得几乎无从显现。张顺、张贵等三千民兵的英勇斗争事迹，说明如果不是这种压抑，当时的整个局势决不会落得那样境地。

（三）元军攻破樊城、襄阳

宋军援襄失败后，襄阳局势便急转直下。元军将领在长期围困和进攻襄樊作战的过程中，逐步看到宋军防御的特点。当时“襄樊两城，汉水出其间，宋兵植木江中，联以铁索，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以为固”[62]。根据这一特点，虽然樊城外郭已破，仍能从襄阳机动兵力守住内城。元万户张宏范要求元帅府立即切断襄樊之间的浮桥，以利于元军的进攻。元军在发动总攻之前，由河南行省召开一次将领会议，征询破襄阳之策。最后，元军将领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攻襄必先取樊，而取樊则必须首先毁掉襄樊之间的浮桥。于是，都元帅阿术派出水军断锁、锯木、毁桥，使襄阳城内宋军无法支援樊城。

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正月，元军分五道

攻樊，宋军不顾大雪和天寒地冻，猛击城下元军。樊城南面江面上水战亦相当激烈，元军乘风纵火，宋船百余只被烧毁。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元军用回回炮打掉了樊城角楼，焚毁了外栅，攻入城内。经过十四个昼夜的激战，元军攻破樊城。宋侍卫马军司统制牛富率死士百人进行巷战，渴饮血水，以死殊斗，直到身被重伤，失去战斗力为止。牛富被俘后，义不受辱，在战棚内以头触柱不死，又投火自焚而亡。其他将领亦多战死。元军屠城时，在城军民全部遇难。

樊城破后，襄阳守将吕文焕又向临安告急。贾似道阴使人上奏说：

> “顾襄未必能顾淮，顾淮未必能顾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为得。”〔63〕“若推至来年春夏之交，则调一大将统三万兵船直捣颍（今安徽阜阳）、亳（今安徽亳县）；又调一大将统三万兵、直捣山东。……则襄围不解，臣未之信。”〔64〕

在贾似道的阻挠下，宋廷仍然不肯出兵救援襄阳。

二月，元军对襄阳发动猛烈的进攻，以回回炮击中樵楼（城门上高楼），“声如震雷，城中汹汹”。斗志不坚的南宋知襄阳、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在元军百计招降下，投降了元朝。襄阳破后，宋荆湖都统范天顺不肯降元，自缢而死。轰轰烈烈的襄樊战斗，至此结束，前后坚守达六年之久。

襄阳之战，是主要战略方向上的一次关键性战役，双方都投入了主力，它的得失，关系到战争全局的成败。当时蒙古贵族所建立的大蒙古国（元朝），正处于从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大发展时期，确实生气勃勃。蒙古骑兵长于野战，又大量使用汉将汉军，造舰练士，建立水军，弥补了自己的短处，加上大量使用新火器于攻城，虽花了六年时间，但减少了伤亡，锻炼了步军和水军，使蒙军兼有宋军之长和长江之利，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已处于压倒优势。

南宋方面，尽管南宋统治集团腐败无能，但在长期抗金及抗蒙斗争中，仍然锻炼出不少有才能的将领和战斗力较强的军队，加上它的经济技术发达，物资供应充分，因此，也能进行一些比较顽强的战斗。更为重要的是，南宋人民长期遭受金、蒙军队的掠夺和压迫，支援宋军抵抗蒙军的意志十分坚决。这不仅从张顺、张贵及三千民兵援襄战斗中表现出来，而且在襄樊军民的战斗行动中也有强烈的体现，这是南宋襄樊保卫战之所以能坚持六年之久的关键所在。

由于南宋统治者昏庸腐朽，高级将领各怀私心，“在廷无谋国之臣，在边无折冲之帅”〔65〕，从襄樊作战一开始，就从未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充分利用其训练有素的水军和充盈的物资，组织有效的援襄，以粉碎蒙军围困襄阳的战略。京湖将领对襄阳未能采取积极行动，以致襄阳之围不能解除；襄阳守军虽有几次出击，但由于众寡不敌，特别是没有援军的配合，均遭失败。《尉缭子·守权第六》说：“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襄阳外面没有可靠的援军配合，襄阳守军就没有把握守住襄阳，这都是南宋单纯防御消极战略所造成的。在蒙（元）方面，忽必烈汗却能在唐邓一带驻兵耕垦，“立屯田保甲，以实边鄙”。调集大军，以襄阳为突破口，采取围困的战略，果断地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襄樊来，向步、骑、炮水协同作战迈出了新的一步，完成了政治、经济封建化，蒙汉骑步并重和建立水军的三大战略转变，为灭宋建国创造了条件。

此外，蒙军果断地采取破浮梁以先取樊城的战术，在攻取樊城后，又使用回回炮轰击襄阳，逼降襄阳守将吕文焕，充分体现出技术力量优势在战斗中所起的作用。

综上可见，决定襄樊战役胜败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勃兴的元朝在政治上比垂死的南宋有进取心，能够锐意改革，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其次是南宋以消极防御来抗拒蒙（元）的积极进攻，无法改变其被动局面；再其次是战役指导上，特别在援襄行动上，

南宋一再失误。南宋襄樊战役的失败，使南宋守淮汉、守上游的战略遭到破坏，长江险阻已不再可恃了。

五、元军南下临安

（一）元军南下临安的战略

襄樊之战，尽管宋军坚持六年之久，但毕竟失败了，这对南宋统治集团的打击是非常沉重的。宋度宗赵禥在诏书中说："襄阳六年之守，一旦而失，军民离散，痛切朕心。"[66]但他和权相贾似道却又不愿采取有力措施以挽回败局。尽管从襄阳南逃的军民痛哭流涕，揭发范文虎援襄不力、昏庸荒淫等罪行，但因事情牵连贾似道，所以范文虎只受了降官的轻罚。而力主抗元的李庭芝却被罢了官，其部将有的被贬到广南。[67]宋廷这种是非颠倒，纲纪败坏的情况，正象元将刘整估计的那样：

"襄阳破，则临安危矣"！"文焕送款，亡征具矣"。[68]

元军攻下襄阳时，忽必烈正有事于北方，征讨诸叛王，拟暂不南下。阿术及副帅阿里海牙等得胜回朝，都向忽必烈建议乘胜灭宋，阿里海牙说：

"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汉水上流已为我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69]

阿术也说：

"臣略地江淮，备见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时不再来。"[70]

忽必烈召姚枢，许衡等汉人幕僚商议，都说"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正是时机"。此时元军凭着其优势的兵力、巩固的后方和掠夺到的丰富物资，完全有力量由荆襄顺流而下，直扑南宋的首都临安。于是忽必烈决定任命伯颜、史天泽总领诸道大军二十万，军分两道，大举伐宋。

元军南下布势是：丞相伯颜与平章政事阿术率西路军，以襄阳降将吕文焕的水军为先锋，由襄阳沿汉水进占鄂州，然后顺长

江东下，进攻临安；东路军由左丞相合答、董文炳率领，以降将刘整的骑兵为先锋，由淮西进取扬州，牵制南宋的两淮军；对于四川，只留少数兵力进行牵制，而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兵器于鄂州方向，乘虚顺汉水进入长江，一举从中央突破南宋的长江防线。同时为诱骗南宋，把刘整故吏放回，交出刘整的书稿，内有早已过时的取江南的两个建议："其一曰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曰清口（今江苏淮阴）、桃园要冲、宜城其地，屯山东军以图进取"[71]元的目的是要转移宋廷的注意力于东西两翼。而宋廷误以为真，急忙令淮东制司往清口择地筑城，以备元军；并注视四川的战事发展。

为策应中路进攻襄阳，在四川境内的元西川军、东川军向四川境内的南宋诸山城发动牵制性的进攻，并在成都设置行省，指挥东川军和西川军。

（二）元军攻陷鄂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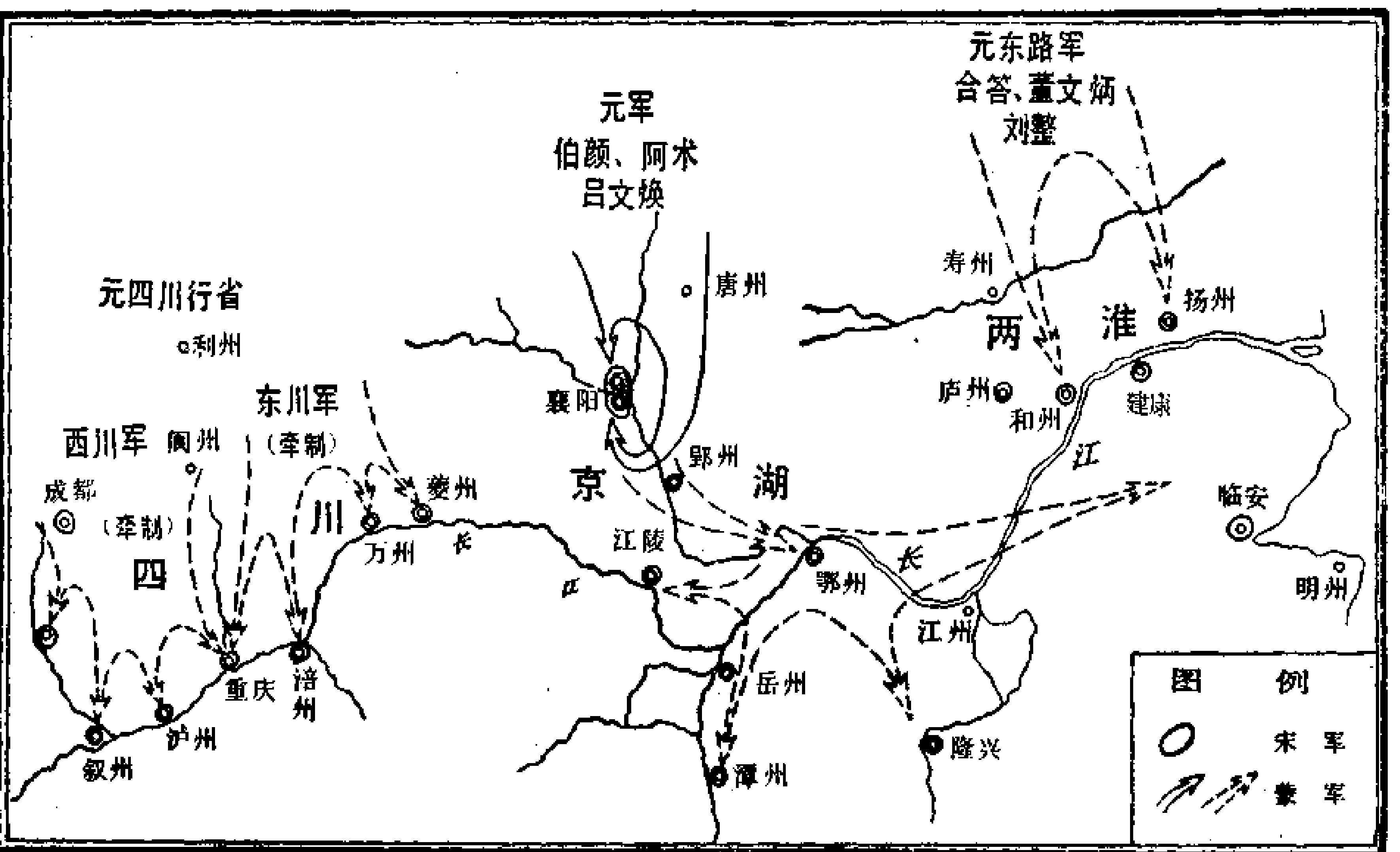
宋咸淳十年（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九月，元军二十万集结于襄阳，分军三路，水陆并进，以两路分别进攻荆南（湖北江陵地区）各地，并保证主力的两侧安全，伯颜与阿术亲率步、骑、水军沿汉水及两岸南下鄂州。

南宋自襄阳失陷后，将沿江九郡兵力尽集于郢州东西两城，在汉水中设置障碍，夹以炮弩，以京湖都统张世杰率军守之，企图阻止元军顺汉水南下。

九月，伯颜大军自襄阳至郢州，张世杰率宋军十余万守郢州及新郢，夹汉水而阵，水面战舰密布，夹以炮弩。元军袭城，被张世杰力战击退，元军不能进。伯颜采纳所俘当地人关于水军绕过郢州的意见，利用汉水旁的水沟，拖船入藤湖（郢州以南），再转入汉水，顺流而下。[72]宋军见元军绕过，乃派队追击，又被元军击败。于是元军破沙洋（今湖北荆门东南沙洋）、新城（沙洋以南），经复州（今湖北天门）至江汉交界处的蔡店。

当元军迂回郢州南下后，南宋急调淮西水军由沿江制置副使

元（忽必烈）灭南宋战略企图示意图　（27—15图）



夏贵率领到达鄂州附近，分扼长江要害。都统王达以精兵八千守阳逻堡（今湖北黄冈西），扼元军东下之路；京湖宣抚使朱禩孙率水师由荆来援，游弋于长江江面，阻止元军进入长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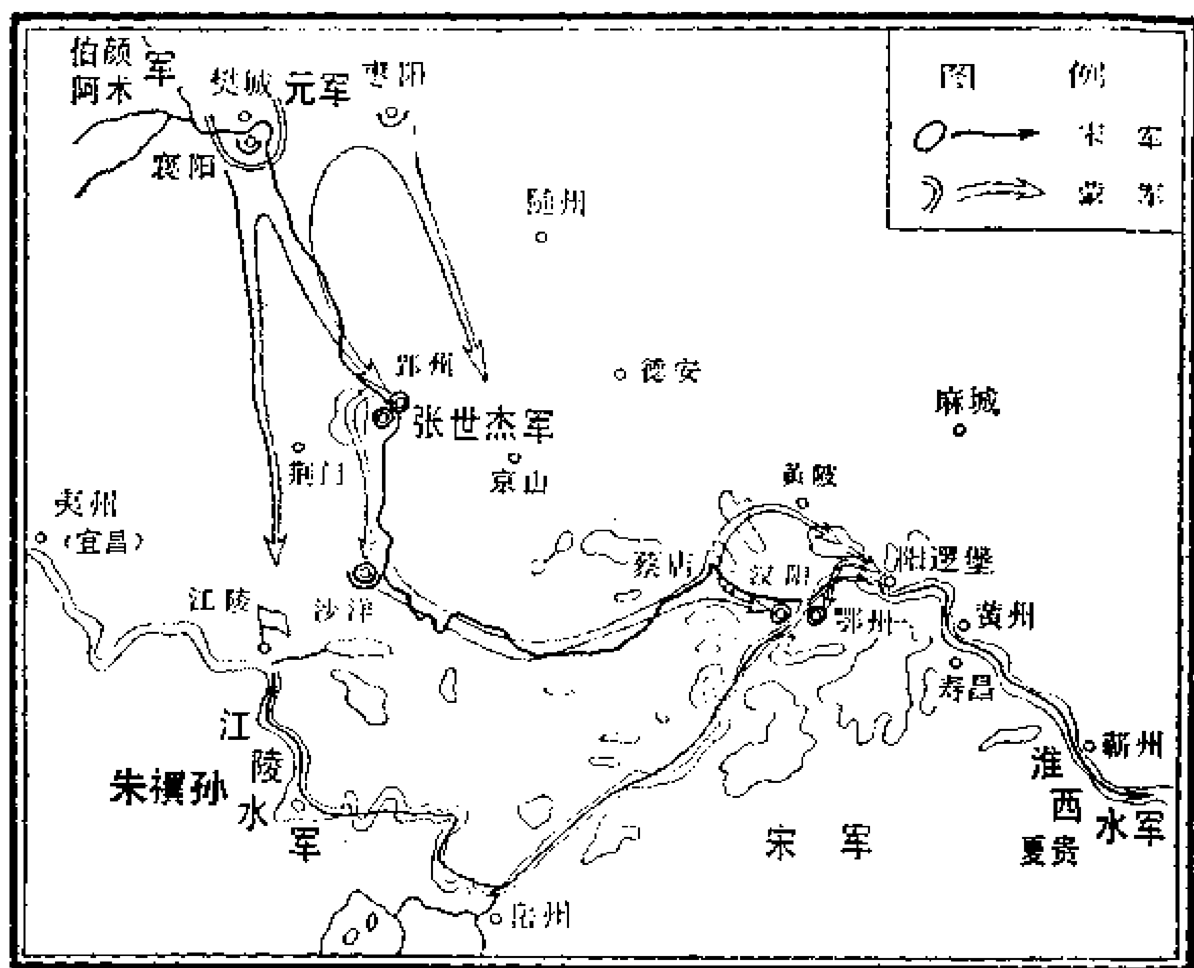
元军前锋到达蔡店后，见宋军战舰密布，不能渡江。伯颜围汉阳，声言由汉口渡江，宋军夏贵移水军援汉阳。伯颜暗中以奇兵倍道夺沙芜口（阳逻堡西），一面秘密自汉口开坝引船入沦河，转沙芜口以达长江。接着，元步骑数十万人，战舰万艘，相继集中于大江北岸。伯颜遂以白鹞子（船名）千艘进攻阳逻堡，夏贵又率众援之。伯颜乃命阿术率三千骑兵出宋军不意挽舟西上四十里，在青山矶乘雪渡江，击败宋荆鄂都统程鹏飞，直抵鄂州东门，在大江上架起浮桥。夏贵闻元军渡江，遂率三百艘东逃，阳逻堡亦被元军攻破。伯颜率军渡江，进逼鄂州，朱禩孙率军退还江陵，南宋汉阳军及鄂州守将相继投降。

元军此次由襄阳南下，用水军沿汉入江，以步骑兵夹江掩护水军，长驱南下，这种水、步、骑协同作战的运用，能适应各种地形击破宋军沿江的阻击。元军还声东击西，调动宋军，极力运用迂回战法，绕过宋军坚固据点，较为顺利地取得了鄂州之战的胜利。

（三）元军进军建康

元军攻占鄂州后，伯颜命阿里海牙率军四万镇戍鄂州，继续进攻南宋的鄂南、湖南和广西等地，自与阿术率大军顺长江水陆并进。南宋黄州、蕲州、江州等将，皆以城降元。这时，宋廷陷入极度混乱状态，荒淫无度的宋度宗赵禥已死，年仅四岁的赵㬎即位，太皇太后谢道清主政，一面催促贾似道出兵抵御，一面下哀痛诏，要各地起兵勤王。南宋官员们奉诏起兵的极少，知安庆府范文虎反而率领南宋殿前军投降元军。

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正月，贾似道在朝野舆论压迫之下，督诸路精兵十三万出师江上，还随带大批装载金帛辎重的船只，舳舻衔接，百有余里，进至芜湖。二月，夏



元宋鄂州之战示意图

（公元1274年九—十二月）（27—16图）

贵也率淮西水军来会。贾似道并不积极准备作战，而是先遣返元军俘虏，再遣使向伯颜请求称臣奉币，愿意实行鄂州的议和条件，高级将领们也都动摇观望。但伯颜并不接受贾似道的请求，继续进军东下。

此时，元军又攻陷池州（今安徽贵池），贾似道知道求和不成，才遣步兵都指挥孙虎臣率兵七万屯于丁家州（今安徽铜陵东北）大江两岸，遣夏贵以战舰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贾似道自己指挥后军驻于距前线二百里的鲁港（今安徽芜湖西）。

元军前锋与宋军接触后，伯颜扬言要火焚宋舰，宋军昼夜提防，不敢采取攻势。元军主力从池州出发，进至丁家州，伯颜向

将士说："敌众我寡，宜从计胜"。于是，他命令元军造大筏数十，船上放满柴禾，以威吓宋军。然后指挥左右翼万户出步骑军夹岸前进，在长江两岸安置炮位，猛轰宋水军中坚；阿术指挥元军水师用"刬船"数千艘顺流乘风直进，冲击宋军船队。夏贵乘扁舟不战先逃，贾似道见状，惊愕失措，遂鸣金收军。阿术又挥军横击深入，宋军大溃。伯颜再以步骑兵左右击之，杀溺死者不可胜计，缴获战船、军资、器械无数，元军获得辉煌战果。

宋军夜退至珠金沙（今安徽繁昌凤凰山北麓），贾似道召夏贵等将领议事，但"诸军胆落"，无以为战。夏贵率部弃舟登陆北走庐州，贾似道与孙虎臣弃军单舸奔扬州。第二天，溃兵蔽江而下，不复成军。

经此一战，宋水陆主力全部瓦解，元军乘胜以一部趋饶州（今江西波阳）入江西，主力经采石（今安徽芜湖东）直下建康，镇江、宁国、隆兴（今江西南昌）、江阴守臣皆弃城遁走，太平（今安徽当涂）、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守将俱以城降元。

贾似道逃回扬州，上书请迁都，太皇太后谢道清降意已决，不许。时沿江制置大使建康留守赵溍弃城南逃，勤王之师，仅有由郢州撤回的张士杰部及江西安抚使文天祥集合的两万义军而已。宋德祐元年三月，伯颜率领元军兵不血刃地进入建康。

镇戍鄂州的元将阿里海牙率军溯江而上进攻岳州（今湖南岳阳），击败宋军，乘胜攻江陵。四月初，元军攻陷沙市，宋京湖四川宣抚使朱禩孙、湖北制置副使高达等以江陵降。

（四）元军进入临安

元世祖忽必烈对宋王海都在金山（阿尔泰山）举兵，甚为担心。在伯颜进入建康报捷时，欲暂缓图宋，并以"时暑方炽，不利行师"，命"俟秋再举"。[73]伯颜奏曰：

"宋人之据江海，如兽保险；今已扼其吭，纵之则逸而逝矣"。[74]

忽必烈遂诏伯颜以行中书省驻建康，于是伯颜分兵四出，以

元宋丁家洲之战示意图

（公元1275、二）　　　　（27—17图）

略定建康周围要地，并准备进攻临安。忽必烈又命阿术北趋扬州，与东路军连系，断绝淮南宋军来援；并分兵略镇江、无锡、常州、平江（今江苏苏州）、金坛、广德军等地。

四月，阿术分兵攻扬州，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遣将出战，不胜，入城死守。阿术筑长围以困之，元军水军则集结于瓜州，控制长江及运河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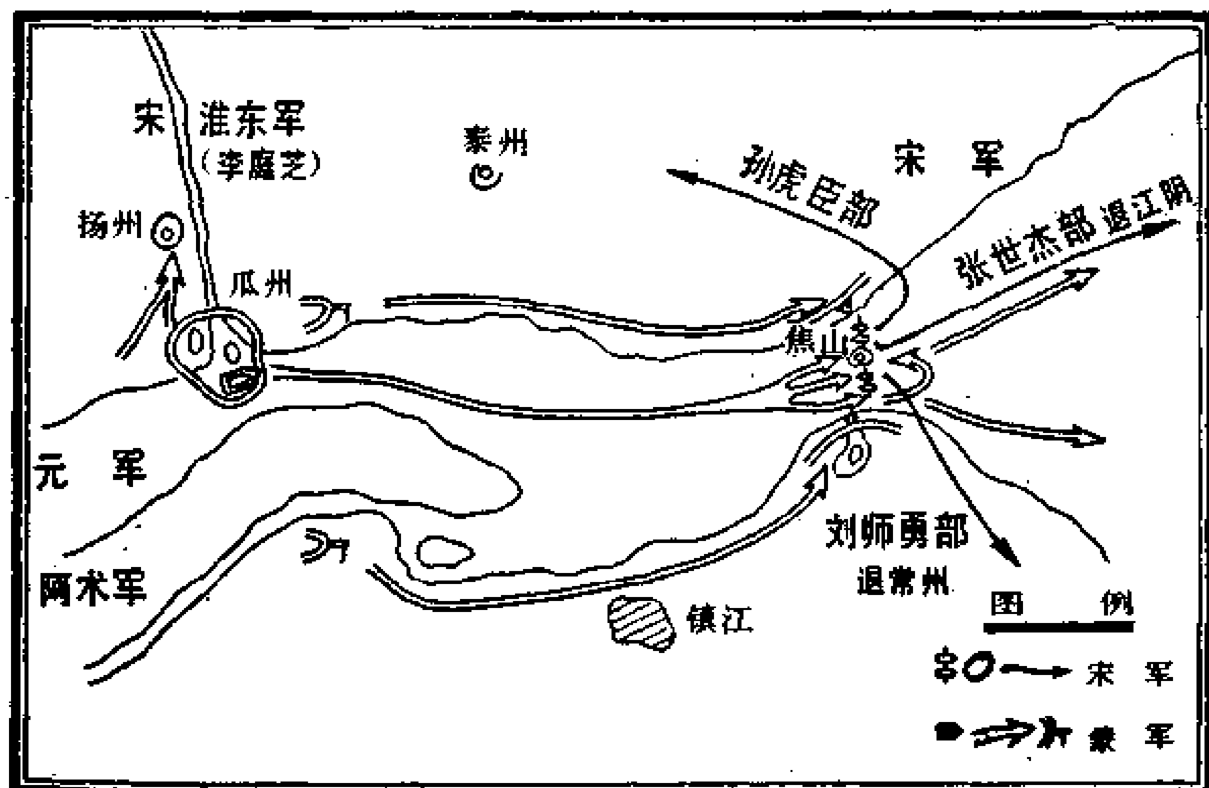
宋廷见元军渐逼临安，形势危急，急忙在吴江（今江苏吴江）、独松关（今浙江余杭西北）、四安镇（今浙江长兴西南）

等地配置军队，以御元军。同时命令张世杰统都督府各军，向镇江方向反攻元军，以策应淮东方面作战。

张世杰派队进军广德、平江、常州、金坛等地，七月初，集结刘师勇、孙虎臣等部，出舟师万艘于焦山（今江苏镇江江中）以东江面上，以每十船为一方，联以铁锁，沉碇（锚）江中，非有号令，不得起碇，准备与元军决一死战。元将阿术登石公山（今镇江东象山）望之，曰：“可烧而走也”。遂以步骑军护江两岸，先以水军一部绕出宋军舰之后，主力分成三队，分向宋军舰队左右及正面冲击，继之又乘风飞火箭，烧宋舰风蓬，烟焰蔽江。宋船队仓皇不能起碇，前军争投水身死，元将张弘范、董文炳、刘国杰复以锐卒横冲，后军尽皆散走，不复成军。刘师勇退守常州，孙虎臣率残余回泰州；张士杰退到江阴夹滩，收集残兵，重新组织抵抗，又被元军追兵打败，只好率残余出江入海。

元军进攻扬州及元宋焦山之战示意图

（公元1275年七月）　　（27—18图）



焦山之战，是宋军以其最后一点力量，作孤注一掷的决战。宋军在大败之余，军心士气均未恢复，又联舟沉碇，不仅失去机动，遭到火攻时亦无法应付，结果"哀军"奋战，终不免战败军溃，南宋首都临安与淮东之连系被截断，扬州孤立，临安垂危。南宋小朝廷的命运，就此已决定了。

是年夏，伯颜至上都向元帝忽必烈面陈形势，乞复进兵攻宋。忽必烈遂拜伯颜为右丞相，率军直下临安。伯颜调淮东都元帅孛鲁欢、副都元帅阿里伯的淮东军，加强左丞相合答率领的东路军，不久它们与阿术率领的西路军会师淮安。

九月，伯颜以阿术与博罗欢（孛鲁欢）攻略淮东，以阿里海牙攻湖南，以万户宋都解及吕师夔等取江西，以截断南宋东西的连系，自率元军主力，分军三道进军临安：

——阿剌罕与奥赤鲁为右军，以步骑军自建康出广德、四安镇、趋独松关；

——董文炳、姜卫为左军，率水军出江入海，以范文虎为前导，取道江阴、趋澉浦（今浙江海盐境）、华亭（今上海松江境）；

——伯颜及阿塔海为中军，以吕文焕为向导，经常州南下，沿运河进兵。

这时，南宋皇朝执政者太皇太后谢道清，已决定"苟存社稷，称臣，非所较也"。南宋宰相陈宜中、留梦炎都主张妥协投降。为了讨好叛将吕文焕，追封吕文焕为和义郡王，升他侄子吕师孟做兵部尚书，妄想用这些办法来铺平与元朝的谈判道路。当元军接近临安外围时，宋军望风而走，宋廷急调文天祥、张士杰等入卫临安。文天祥与张士杰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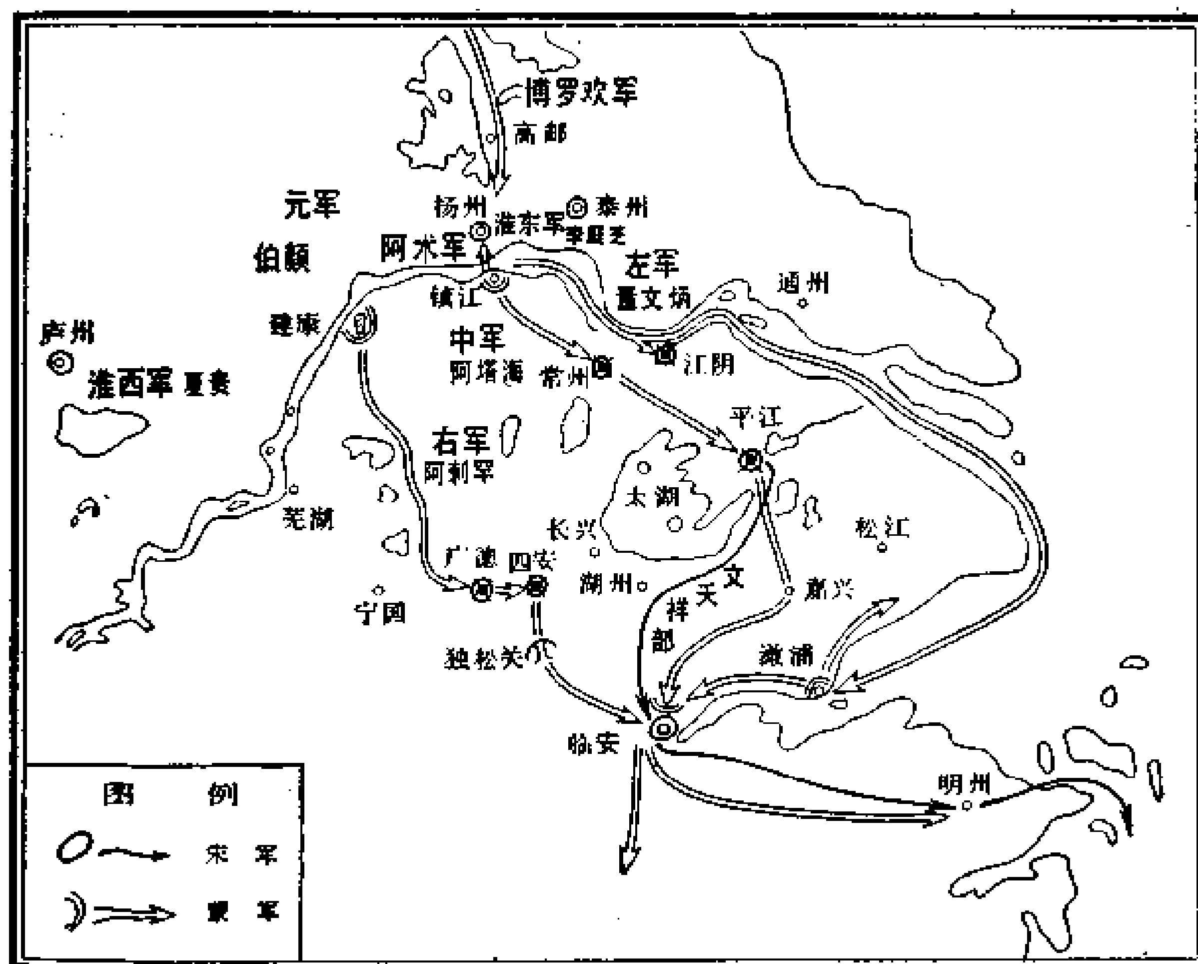
"淮东州郡坚守江北，闽广各路金瓯无缺，敌孤军深入，并不足惧，今勤王兵马，尚有数万，尽可决一死战，万一得捷，命淮东出兵截杀后路，国事便有转机。"〔76〕

但宰相陈宜中怕触怒元军欲和不得，便请出太皇太后下诏，

以“王师务宜持重”为辞，搪塞了事。接着派出使者，先求退兵修好，次求称侄纳岁币，再求称侄孙，最后愿意称臣纳贡，“乞存境土，以奉蒸尝”。伯颜利用南宋统治者委曲求全的幻想，假意允许准备与宋谈判，一面却指挥军队，继续向临安急进。

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正月，临安外围诸路兵皆溃，元军进至临安东北皋亭山（今杭州市北）。南宋大臣有人以元军不许构和而请求迁都；文天祥主张发动临安义士，合力抵抗，决一死战；张士杰认为临安无望不如引兵入海，作卷土重来之计。但以太皇太后谢道清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已丧失抵抗意志，也不想再卷土重来，遂签署投降文书，送传国玺

元军三路攻略宋都临安示意图
（公元1275年十月—1276年正月）（27—19图）



和降表到元军营中，愿意把南方全部州郡送给元朝，元军遂不战而取得临安。

六、元军继续南下，扑灭各地军民抗元斗争，统一全国

元军进入临安，南宋朝廷覆灭，但各地抗战军民继续坚持抗元的战斗。

南宋原宰相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拥立皇子益王赵昰（九岁）和广王赵昺（六岁）逃到福州，拥立赵昰作皇帝，图谋抗元复宋。左丞相文天祥去元军谈判时被扣，在押解北上，途中逃脱。七月间，文天祥号召各地起兵，夺取江西。元军自江西及沿海进攻福建、广东等地，漳州、泉州、福州、广州相继投降。张世杰、陆秀夫等拥赵昰乘船至潮州在海上流亡。同年(公元1276年）末，阿里海牙也攻占了湖南、广西各地。

在临安陷后，夏贵以淮西全境降元，淮东扬州、真州等地宋将李庭芝、姜才拒不奉诏，坚持抗元。七月，李庭芝准备南下抗战，离开扬州城后被元军俘虏遇害，两淮全被元军肃清。

宋文天祥率部进入江西，接着攻下雩都、兴国。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部进攻兴国，文天祥败走循州（今广东龙川西），继续坚持斗争，后被叛徒陈懿出卖，被俘不屈，壮烈牺牲。公元1278年四月，赵昰病死，张士杰、陆秀夫又拥立赵昺，继续抗元。六月间，赵宋的小朝廷迁到大海中的厓山（广东新会南海中），作为最后的据点。

元朝以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率领水军和骑兵，海陆并下，进攻闽广，企图最后消灭宋军残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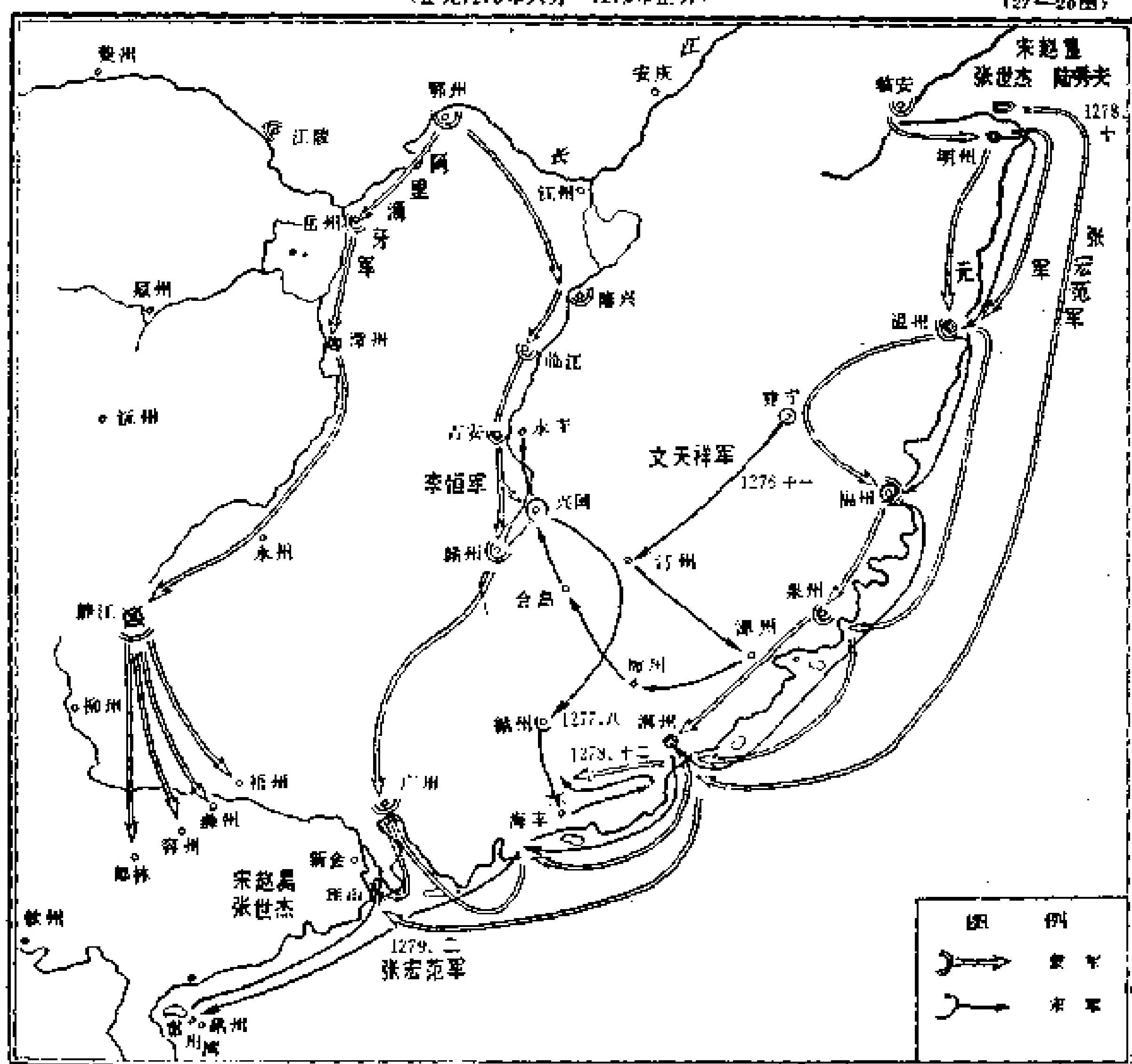
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正月，元水军大举进攻厓山。张弘范统领的元水军，共有战船五百艘，这时只到达三百艘；张世杰有战船一千艘，民兵二十余万。两军在海上对阵。张世杰把宋水军结成一字阵，用绳索将船只联结设防，赵昺、杨后和小朝廷的官员全部上船死守。元军用火攻，被宋军击退。正月底元军战船陆续到达，李恒也从广州领兵赶到。二月初

六日晨，元水军四面发起猛攻，宋军殊死作战。中午战斗稍停，俄而元军用炮石、火箭猛击宋舰，诸军四面进攻，突破宋军阵角，跳上宋船，短兵接战，宋军大败。陆秀夫见无可挽回，背起赵昺投海而死。战斗至黄昏结束。张世杰拥杨后乘小船突围出走，招集残部，图谋再举，四天后遇大风，海船覆没，张世杰等都死在海里。宋朝这支残存的抵抗力量，也完全覆没了。

元军攻占宋都临安后南下进军示意图

（公元1276年六月—1279年二月）

（27—20图）



公元1275年，元军大举向四川进攻，叙、泸、等地守臣相续投降，合州守将张珏坚持据守。十二月，张珏入重庆任四川制置使。1278年初，元军猛攻重庆，因寡不敌众，败后乘船东下，后被元军追杀。蒙（元）宋四十余年的长期战争，以宋败蒙（元）胜，结束了宋、辽、金、夏、蒙并存三百余年的局面，再次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国家。

忽必烈、伯颜在南进中的战略战役指导

蒙（元）宋战争主要有三个战场：一为四川，尤其是川东；一为江汉，重点在襄樊；一为两淮，抵抗最激烈的是扬州。窝阔台，蒙哥时期，蒙军占有川西后，把主力放在川东，企图顺江而下，进入江南作战。但宋军在重庆、合州等地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蒙军屡次不下，连蒙哥汗也在钓鱼城下受伤而死。忽必烈即蒙古汗位后，逐步把战争重点转移到襄樊战场上来。

顾言武曾说：“襄阳居楚蜀上游”，“东瞰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沔，北接京洛，水陆冲辏，转输无滞。……地利无敌焉。”〔76〕顾更进一步说：“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77〕在中国古代史上，每当南北政权对峙时，襄阳的战略地位就特为重要。蒙、宋战争中蒙（元）统治者对襄樊的重要性，从局部到全局，是逐渐认识的。

宋将刘整以泸州降蒙后，向忽必烈“首建取襄阳之策”〔78〕，认为“攻蜀不若攻襄，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下也。”〔79〕从此，忽必烈决心改变进攻战略，以占领襄阳作为打破蒙宋对峙局面的突破口，开始了灭亡南宋的新的战略进攻。对如何夺取襄阳，蒙军决定“括诸道兵围宋襄阳……以断宋粮道，且绝郢之救兵”〔80〕，即采取围困的战役方针。忽必烈调集阿术、阿里海牙、刘整、张弘范、史天泽、忽剌出、阿剌罕、唆都、李恒等一大批战将组织围攻；并造战船、练水军，在围攻襄樊几年间，耗

费至巨。忽必烈组织如此众多的人力物力于襄樊之役，使蒙（元）军已处于绝对优势，终于取得了对南宋的战略性胜利。

南宋统治者虽也认识到襄阳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但在苟安江南的基本国策指导下，既未能在东线西线转取攻势以牵制蒙军，又不能集中力量解襄阳之围，以致襄阳军民虽坚持危局，苦战六年，但最终还是城破被歼。襄阳的失败首先是战略的失败，是南宋决策者赵禥、贾似道的责任。在战役指导上也有许多错误，一是吕文德允许蒙军开榷场、筑城立堡，使蒙军得以在襄阳近郊获得立足之地；二是在蒙军尚未完成对襄阳的包围时，南宋水军还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几次援襄，兵力既不充分，行动又不坚决，以致全遭失败，丧失了摧毁蒙军围襄部署的时机；三是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督师援襄，但事权不一，范文虎竟与贾似道相勾结，牵制了李庭芝的援襄行动，从此外援断绝，襄阳守军只有孤军奋战，最后失败是无法避免的。

征服南宋、统一江南是忽必烈统一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伯颜是进军临安的统帅，是实现忽必烈统一大业的重要将领。伯颜率二十万大军水陆并进，向江南进发，在进军和作战的过程中，表现了他的军事组织和指挥才能。郢州之战，伯颜能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绕过宋军的坚固堡垒，直下鄂州；进攻时，又能采取正面佯攻牵制，主力迂回，从青山矶渡江，从侧后夺取鄂州的机动战法。丁家洲之战。伯颜组织了元水、步、骑军的协同作战，充分发挥火炮的威力，击溃了宋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接着乘胜直下临安，摧毁了南宋政权。通过上述几次作战，说明伯颜是一个多谋善战、指挥有方的军事统帅。元代人对伯颜的战略战术有很高的评价：

> “临戎制胜，规画经理，英谋独远，以之攻城野战者，某处宜攻，某处宜守，某时启行，某时利战，如此而成，如此而败，临机应变，间不容发。与夫兵家奇正分合之术，军骑卒伍之阵，山泽水陆之战，若合符节，信乎！其深于兵

矣。”[81]

这个评论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

忽必烈不仅任用和信任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对南宋的降将如刘整、杨大渊、吕文焕、范文虎等人给以足够的重视。

在襄樊战役中，南宋降蒙的泸州守将刘整是一个关键人物。刘整这位“尽知国事虚实”的骁将为忽必烈对南宋的战争出谋划策，对忽必烈平宋的整个战略计划，决定以襄阳作为战略进攻的重点，起了重要作用。南宋荆湖安抚制置使知江陵府汪立信曾指出，“刘整之祸，流毒至今”，[82]正是看到了刘整降蒙对襄阳战役的影响。

反之，南宋朝廷君昏臣暗，内无治国经济的宰辅，外无御侮抗敌的名将，任用贾似道、范文虎等这样的“人物”，只能加速其灭亡。

蒙、宋战争的性质

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为了满足“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贪欲，和“混一宇内”的野心，以种种借口，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优越的军事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向外军事进攻。在几乎整个十三世纪中，蒙古军队的铁蹄踏遍了东至黄海、西至多瑙河的亚欧广大地区，使许多国家遭到毁灭，无数人民蒙受刀兵之苦，在世界和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蒙古军队在南下进军过程中，使黄河南北地区的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惨遭杀戮，在一定程度上发泄了奴隶制度的残暴性和掠夺性。中原地区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和南宋军队的广大官兵，起来抗击蒙军的暴行，保护人民的利益，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应该受到称赞。元世祖忽必烈是蒙古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即位以后，认识到要维持与巩固自己的统治，进而灭宋夺取中国统治权，必须减少杀戮和掠夺，缓和中原各族人民的反对，推行封建化措施，恢复生产，抽税纳粮，以供军

需。因此，他不顾蒙古贵族中顽固保守势力的反对，依靠汉族地主阶级分子的帮助，采取“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并且陆续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来在进攻南宋时，也注意到减少战争的破坏和杀戮，从而得到部分汉族地主的支持，把掠夺战争逐步转化为与南宋统治者争夺中国统治权的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蒙（元）攻宋战略的演变

蒙（元）军南下攻宋，持续了四十五年之久，经历了窝阔台、蒙哥、忽必烈三个时期，才完成了由草原骑兵战略到骑、步、水、炮协同作战的战略转变，使之能够适应南宋这样一个多山多水，有发达的农业经济，有丰富的封建统治和战争经验，有一定抗击大骑兵集团作战方法的封建大国，并取得了对它的胜利。

窝阔台依靠蒙古铁骑，沿用蒙古灭金所采用的广正面，大纵深的掠夺破坏和迂回包围战略，在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全正面上发起进攻，企图越过长江，进入江南作战。由于当时蒙古四出远征，在中原的兵力并不比南宋优势，又实施广正面进攻，力量分散，且不适应黄河以南多山多水，气候炎热的地形条件，所以它失败了。

蒙哥即位后，吸取窝阔台失败的教训，开始据地设官，筑城列障，以巩固已得战果，避免因战争持续力不足而春去秋来；在进攻战略上仍以迂回包围为指导思想，但已明确了主要突击方向和战略步骤，集中主要力量，企图先占长江上游四川，然后顺流东下，会同忽必烈和兀良哈台合击鄂州，歼灭南宋京湖大军，进而直下临安，并为此先期派出一军经略云南，以便实现更深远的迂回。他的战略方案是宏伟的，也是可行的，但实施时不能驾驭全局，顿兵合川，因小失大，导致了全局的失败。

到忽必烈时，大量重用刘整、吕文焕等南宋降将，通过他们全面了解了南宋的战略企图、防御部署和军队的状况，系统地推行

了政治经济的封建化，以便收集中原的人力物力以支持战争；根据蒙古本身兵力的不足和损耗，以及使用骑兵在地形上的限制，大量使用汉军步兵和建立水军。在进攻战略上，则缩短战线，集中兵力，把主要突击方向转移到襄鄂方向上来，先取襄阳，由汉入江，使蒙军兼有宋军之长和长江之利，然后水陆并进，席卷江南，终于完成了所需的战略转变，取得了灭宋的胜利。

南宋失败的主要原因

十三世纪的蒙古以骠悍绝伦的骑兵，吸收了中原和西域的技术，野战奔袭，确有极大的威力，他们打到亚欧两州的大部地区，所向披靡。素以“积贫积弱”著称的南宋皇朝，似无侥幸取胜的道理。其实，南宋王朝继承了悠久的历史，具有丰富的统治基础和战争经验，山河险固，技术先进，经济发达，而不同于欧亚间的许多其他国家。自蒙宋开战以来，互有胜负，在多次作战中，南宋抗战将领和爱国军民，表现出英勇的抗敌决心和优秀的指挥艺术。如公元1234年，蒙宋联军攻破金国最后一个都城——蔡州时，首先破城突入的就是孟珙率领的宋军。在窝阔台汗南侵的数年中，有杜果保卫安丰，庐州的胜利，有孟珙收复襄阳和守卫夔门的成功。在蒙哥汗南下攻宋时，四川合州军民在王坚领导下坚守钓鱼城砣立不动，连蒙哥汗也死在钓鱼城下。忽必烈渡江进攻鄂州，遭到张胜、高达等将领率领军民的顽强抵抗，顿兵坚城。兀良哈台虽然进至潭州，完成一次大迂回作战，但最后损耗过大，退路被截，难以北归。此时南宋，正如文天祥所说的：“三江五湖之险，尚无恙也；六军百将非小弱也。”〔83〕只要南宋统治者能卧薪尝胆，励精图治，罢斥苟且误国的权臣，信任有智有勇的抗战将领，鼓励军民群起抗击，这场战争并不是注定要失败的。

南宋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元军的过于强大，而是在于：（一）南宋统治集团的横征暴敛和官僚豪强的兼并搜刮，造成了极为尖锐的阶级矛盾，政治腐败，经济崩溃，以致民困国

穷，国力削弱。（二）这个王朝的统治集团，充满着“斥地求和”的投降主义和逃跑主义的悲观政策；他们害怕人民，处处束缚人民的手脚，使强大的潜在力量不能发挥出来。（三）在军事上是单纯防御的消极战略，不积极抵御蒙（元）军的入侵，不利用有利战机转入反攻，坐守城池，只要蒙（元）军不过长江，威胁临安，就苟安江左，以保皇位。再加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使得南宋这样一个较为先进的封建大国，亡于比它落后的元朝统治者。

注　释

〔1〕《续资治通鉴·宋理宗绍定六年》
〔2〕《续资治通鉴·宋理宗端平元年》
〔3〕《元史·郭宝玉传》
〔4〕《元史·塔思传》、《续资治通鉴·宋理宗端平元年》
〔5〕《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6〕《宋史全文》卷三十二
〔7〕《元史·按竺迩传》
〔8〕《宋史全文》卷三十二
〔9〕《宋史全文》卷三十三
〔10〕张藻：《梁秉钧碑》
〔11〕阳枋：《字溪集·卷一》
〔12〕《续资治通鉴·宋理宗端平三年——嘉熙元年》
〔13〕《宋史·赵范传》
〔14〕《宋史·李宗勉传》
〔15〕《续资治通鉴·宋理宗淳祐二年》
〔16〕《续资治通鉴·宋理宗嘉熙三年》
〔17〕《续资治通鉴·宋理宗淳祐十二年》
〔18〕《宋史·孟珙传》
〔19〕牟子才《论救蜀急著六事疏》
〔20〕《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四
〔21〕阳枋：《余大使祠堂记》、《字溪集·卷八》
〔22〕《续资治通鉴·宋理宗宝祐元年》
〔23〕《元史·太宗纪》
〔24〕《元史新编·大理》

〔25〕《元史·兀良哈台传》
〔26〕《元史·宪宗纪》
〔27〕《元史·宪宗纪》
〔28〕〔29〕《元史·郝经传》
〔30〕《元史·杜瑛传》
〔31〕《元史·来阿八赤传》
〔32〕《宋史·余玠传》
〔33〕《元史·史天泽传》
〔34〕《元史·来阿八赤传》
〔35〕《宋史·理宗纪》
〔36〕《续资治通鉴·宋理宗开庆元年》
〔37〕《宋史·贾似道传》
〔38〕《续资治通鉴·宋理宗开庆元年》
〔39〕《续资治通鉴·宋理宗开庆元年》
〔40〕《蒙兀儿史》卷二十九
〔41〕《续资治通鉴·宋理宗景定元年》
〔42〕《续资治通鉴·宋理宗景定元年》
〔43〕《郝文忠公集》卷三十二
〔44〕《元史·来阿八赤传》
〔45〕《蒙兀儿史》卷六
〔46〕《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47〕《元史·隐逸·杜瑛传》
〔48〕《元史·郭侃传》
〔49〕《元史·刘整传》
〔50〕《宋史·汪立信传》
〔51〕《宋季三朝政要》卷四
〔52〕《桐江集》卷六
〔53〕《元史新编·阿里海牙传》
〔54〕《元史新编·吕文焕传》
〔55〕《元史·阿术传》
〔56〕《元史·世祖纪》
〔57〕《元史·刘整传》
〔58〕《元史·世祖纪》
〔59〕《元史·刘整传》
〔60〕〔61〕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

〔62〕 《元史·阿术传》
〔63〕 《宋史·贾似道传》
〔64〕 《续资治通鉴·宋度宗咸淳九年·考异》引《癸辛杂识》所载贾似道奏章
〔65〕 《宋史·陈仲微传》
〔66〕 《宋史·度宗纪》
〔67〕 《宋史·李庭芝传》
〔68〕 《元文类》卷四十一
〔69〕 《元史·阿里海牙传》
〔70〕 《元史·阿术传》
〔71〕 《宋史·度宗纪》
〔72〕 《续资治通鉴·宋度宗咸淳十年》
〔73〕 《蒙兀儿史·伯颜》
〔74〕 《续资治通鉴·宋恭帝德祐元年》
〔75〕 《宋史·文天祥传》
〔76〕 《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上》
〔77〕 《读史方舆纪要·湖广序》
〔78〕 《元史·廉希贤传》
〔79〕 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
〔80〕 《元史·张弘范传》
〔81〕 《平宋录》卷上
〔82〕 《宋史·度宗纪》
〔83〕 《宋史·文天祥传》

宋、辽、金、元时期军事技术的发展和战略运用的特点

一、军事技术的发展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立割据的局面，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加上北宋时期封建的租佃契约关系得到较大的发展，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经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北宋时期的农业、商业、手工业和造兵工业基础的矿业和冶炼业，都有显著的发展。军事工业规模相当庞大，中央直辖的有京师的南北作坊和弓弩院，地方诸州也设有军器作坊。

南宋统治的地区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但社会经济却仍然继续向前发展，完成了我国经济重心的南移。为了战争的需要，很快恢复并扩大了兵器生产的规模。

契丹和女真族进入经济高度发展的华北和中原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统治者不得不和当地较高的经济相适应，使封建的生产方式继续维持下去，并利用宋（辽）朝的成果，效法宋（辽）朝的制度，除了恢复生产外，还为战争的需要，设立了军器监，下辖军器库、甲坊署和利器监等机构，专门修治军器。

蒙古族生产虽然落后，但能利用、吸取先进民族的工业和军事技术上的成果，到建立元朝以后，军事技术有了很快的发展。

火药是我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到了宋代，由于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和战争的需要，火药已逐渐应用到军事上，使火器的制造有了新的发展。

宋代出现用火药制作的武器，有燃烧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

原始的管形火器。

燃烧性火器的主要性能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并参杂一些发烟和毒性药物，来烧毁敌军船舰、城门、门楼、营垒、障碍物和其他防御设施以及物资、仓库、粮草等，并起一些伤害敌人、迷盲敌人的作用。燃烧性火器主要有火箭、火枪、火球、火禽、火兽等。火箭、火枪和火球在北宋时就开始用于作战，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70年），宋军用火箭、火炮与南唐作战。以后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宋军与西夏兰州战役、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李宝袭击胶州湾陈家岛金水军根据地战役，都大量使用了火箭。

爆炸性火器是在燃烧性火球的基础上产生的。它的发展，弹体由纸弹、陶弹到铁弹，大约在十三世纪初，金军发明了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由抛石机发射，金人称为震天雷，宋人叫做铁火炮。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采石矶之战，虞允文用霹雳炮曾大败金军。金兴定五年(公元 1221年)，金军攻宋蕲州，曾用抛石机发射这种震天雷。蕲州战后，南宋也大量仿制。金天兴元年（公元1232年），蒙军围攻金都南京（今开封），金军用震天雷炸毁蒙军掩护挖城的牛皮洞子，“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火点着铁甲皆透”。

管形火器出现在南宋初期。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陈规守德安，发明一种用大竹制成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喷出火焰来烧伤敌人的管形火器，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原始管形火器。宋理宗开庆元年，寿春人创制了能发射“子窠”的突火枪。这种“子窠”可能是瓷片、碎铁子、石子之类东西，是管形火器使用弹丸的先河。由于用竹、木制成的火枪、火筒射程近，威力小，枪身容易烧毁炸裂，不能耐久使用，到十三世纪末，金属管形火器正式出现。我国解放后，已经发现两尊元代末期铸造的铜火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

在两宋至元末的四百年间，火药火器有相当的发展，并在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火器的质量和数量都受到当时生产水平的限制，体形笨重，行动不便，操作费时，安全性差，所以在使用上也受到限制。这时期火器的效力主要表现在燃烧力、爆炸力和精神上的震撼作用。对军队攻城能力有很大提高，在几次大的攻守城战中，如金辽开封之战、元宋襄阳之战都大量使用了火器。但在一般野战中，火器的使用还不普遍，对战略运用尚无明显的影响。

宋代架桥技术有了重大发展。北宋讨伐南唐时，由江南人樊若水向宋军提出在采石架桥的大胆建议。经过精确计算当时长江的深度和宽度，用大船互相排列起来，在长江上架成了第一座浮桥，使江北宋军得以顺利过江。在造桥过程中，南唐君臣认为长江自古无桥，根本不加重视。及至发现桥成，国都金陵已被宋军包围。长江架桥的成功，增加了强渡江河的手段，加速了军队及其装备过河的速度，长江大河已经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对江河攻防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我国有着悠久历史的造船业，这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需要，江南和东南沿海已成为宋朝造船业最发达的地区。到南宋时期，官私造船业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很大的发展。

二、北方“草原骑兵”战略的发展

晚唐衰乱，北方草原的少数民族乘机相继崛起，建立国家，先后有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诸民族，凭借其“草原骑兵”的强大威力，南下与中原皇朝争夺中国的统治权。

北方草原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都是逐水草而居，从事畜牧和狩猎，从小就骑马、射箭，养成了坚忍耐劳的习性。这些少数民族平时的狩猎生活与战时的军事生活是一致的，这是“草原骑兵”得以强大的基本条件。

由于“悉是骑军，故无步卒”，遂形成强大的骑兵集团，这

就便于充分发挥其本身的机动力、快速力和突击力，在战役、战斗上也宜于充分发挥其突然性。

（一）辽（契丹）骑兵集团作战的特点

辽（契丹）骑兵集团在战略防御时，善于内线作战，一般先分路诱致敌人，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将敌各个击破。宋辽歧沟关之战，是辽（契丹）军内线作战取胜的典型战例。

在进攻时，多采取分进合击。由于缺乏攻城能力，对敌方设防城池多绕而过之，或围而困之；对野战中列阵而待的敌主力兵团，则从四面实施连续突击，但并不配拚力战，如连续突击不能奏功，则采取各种办法，使敌饥疲困惫，然后在敌方退却紊乱时追歼之。

《辽史》兵志对辽骑兵战法有如下记述：

> "皇帝亲征……既入南界，分为三路……各路军马遇县镇，即时攻击。若大州军，必先料其虚实，可攻次第而后进兵。沿途民居、园囿、桑柘，必夷伐焚荡。至宋北京（河北大名），三路兵皆合，以议攻取，及退亦然。……军行当道州城，防守坚固，不可攻击，引兵过之。……敌方闭城固守，前路无阻，引兵进，分兵抄截，使随处州城，隔绝不通，孤立无援。……敌军既阵，料其阵势大小，山川形势，往回道路，救援捷径，漕运所出，各有以制之。然后于阵四面，列骑为队，每队五七百人，十队为一道，十道当一面，各有主帅。最先一队走马大噪，冲突敌阵，得利，则诸队齐进；若未利，引退，第二队继之。……诸道皆然，更退迭进，敌阵不动，亦不力战。历二三日，待其困惫……成列不战，退则乘之。"

辽军后期的进攻，发展为大纵深的穿插，钻隙而进，深入敌方腹地，袭击纵深内的战略目标，企图逼敌后撤或割地求和，为"澶渊之盟"。

辽（契丹）军通常九月出兵，还师不过十二月，战役时间既短，自然不能进行连续作战。按辽朝兵制，出师不组织后勤供应，“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1]。在对方坚壁清野，野无所掠之际，辽军也就无法持续作战。

（二）西夏（党项）骑兵集团作战的特点

西夏国土小、人口少，财力不足，本不足以与宋、辽抗衡。它在战略上是以弱敌强，因此实行高度的机动作战，采取“忽尔点集，并攻一路”，“动号十余万人”，集中一点，形成绝对优势，打歼灭战。故“彼常以十战一”，多打胜仗；而“官军（宋军）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独御贼锋，又不能并力掩杀”，于是连战连负。[2]

西夏（党项）军经常采用步、骑两军联合作战，一方面以分散的步兵扰乱、牵制、吸引敌人；另一方面则集中强大的骑兵集团，力求歼灭敌人。“用兵多立虚砦，设伏兵包敌，以铁骑为前军，乘善马重甲，刺斫不入；用钩索绞联，虽死马上不坠。”[3]“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4]或“先据胜地”，诱致敌师“将佐不能据险击归，而多信道趋利。方其疲顿，乃与生兵合战，以铁鹞子（亲军）冲”敌军，“继以步奚（步兵）挽强注射，锋不可当，遂致掩覆。”

西夏（党项）的防御战略是实施坚壁清野，缩短战线，放弃前沿阵地，纵敌深入；然后集聚重兵于重要战略地区，遣轻骑抄绝敌军馈运，俟敌粮断，一战而胜。

夏（党项）军作战的特点，在于利用广漠原野，敌进则退，敌退则进，敌驻戍不出，则窥俟良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速战速决，歼灭敌人，而其分进合击，百里奔袭，更发挥了夏军骑兵很大的机动性。所以，自李继迁叛宋后的百余年战争期间，夏不断和战并用；侵宋抗辽，终能与宋、辽昆峙而不衰。

（三）金（女真）骑兵集团的作战特点

金（女真）初兴之时，士兵“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

以能寒暑，征调遣事同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5〕金（女真）灭辽朝后，军队战力益大，乘胜进军中原，遂采取长驱直入，进行大纵深突破，直取敌方政治中枢，或对敌方首脑进行穷追的战略。

在进攻的过程中，金（女真）军能掌握后续梯队逐次进入战斗，提高进攻速度，增大突击力量。金（女真）军作战，“更进迭退，忍耐坚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胜不遽追，败不至乱”。〔6〕

在战役决战时，金（女真）军充分利用骑兵的机动力和突击力，采取两翼包围和中央突贯的战法。如在郾城与宋岳飞军决战时，先以拐子马在左右翼进行包围，再投入亲军（重甲骑兵，又称铁塔兵）进行中央突贯。

金军在缴获辽（契丹）军攻城器械和签“汉儿”为步军后，也有了一定的攻城能力。

金运用骑兵集团的战略，在辽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战略企图更为明确，以敌方首都为战略目标，进行广正面和大纵深的穿插突破，对敌国皇帝穷追不舍。为深入沙漠穷追辽天祚和渡江而南穷追宋高宗，企图捕获对方皇帝，占领对方首都，一举击灭对方，或迫使对方投降成为自己的属国。进攻能力提高了，坚忍耐久，能硬打硬拼，明确了以强攻取胜的思想；在战争中以拐子马、铁浮屠等精锐骑兵为决战手段，寻求敌主力兵团一决雌雄。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还不明确。如富平之战，虽然胜利了，但没有追歼溃敌；几次大规模南下，虽然突破了南宋的几道防线，达到了深远的纵深，但并未歼灭多少宋军，使宋军得以溃而复聚，在战争中日益强大。对敌方的设防城镇虽仍常弃而不顾、绕而过之，但对战略要地，则已能实施强攻，如顺昌之战和蜀口诸战。

（四）元（蒙古）骑兵集团作战的特点

蒙古军队“悉是骑军”。《蒙鞑备录》记载，“鞑人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且旦逐猎，乃其生涯，故无步卒，悉是骑军”。由于蒙古族以畜牧业为主，所以人人都能骑马放牧和狩猎，骑术都很高明。成吉思汗在他统辖的地区内，将“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7]这些军队“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则屯聚牧养”，[8]具有亦军亦牧的特点。

蒙古军队非常重视战马的训练和保养，对保持蒙古骑兵的战斗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蒙古的骑兵还有“从马”制度，“凡出师，人有数马，日轮一骑乘之，故马不困弊”。[9]这使蒙古军队增加了行军和进攻的速度，追击时，犹如天坠，会突然出现在敌军面前，退却如同电逝，即刻消失，敌军无法追击。

蒙古军队行军只带从马和羊群，“出入只饮马乳，或宰羊为粮”，“食羊尽则射兔、鹿、野豕为食，故屯数十万之师，不举烟火”。[10]

在平原旷野，没有大山深谷或重险荐阻，最适合蒙古骑兵往来驰突。蒙古骑兵可以由近而远，“俄顷千里”。这就是成吉思汗常常能够运用迂回包围、闪击作战战法，出奇致胜的重要条件。

蒙古军队一开始就采取攻势战略。以和林为中心，向四周作辐射攻略，以奇袭、迂回、包围为手段，先击破其周边近处的敌人，逐次向四周推进。

分进合击，包围敌人是蒙古军队作战的惯用战法。其对南宋作战，是五道出师，会师鄂州，再攻临安；蒙军二次西征波兰、匈牙利，也是五道分进，会师于布达佩斯。这种战法来源于蒙古民族在长期狩猎生活中所形成的围猎方式，把它运用于战争就是分进合击，包围敌人。正如郝经所分析的：蒙古诸汗时代，“国家用兵，一以国俗为制，而不师古。不计师之多寡，地之险易，敌之强弱，必合围把稍，猎取之若禽兽然。”[11]

在分进合击中实施大迂回作战，则是蒙古骑兵战略的突出特点。蒙古窝阔台汗攻金，取道宋汉中地区迂回金都汴京；蒙哥汗

攻宋，迂回云南，然后北上合击鄂州；蒙古二次西征波兰、匈牙利，以一军迂回到东普鲁士、捷克，然后会师，均为古今中外战争中运用大迂回战略的典型战例。

蒙古军队长于野战，惯于进行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灭敌军。如攻金时，在三峰山进行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歼灭了金军重兵集团，然后与渡过黄河的北路军会攻汴京（开封）。

成吉思汗在每次出征之前，必先利用商人或使人察知敌方的内部情况，事先作好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军时亦十分谨慎，列阵扎营，进退动静之间，都有周密的部署。

在临近敌阵时，常常"登高眺远，先相地势，察敌情伪，专务乘乱"。〔12〕待有机可乘，便挥军进攻，"交锋之始，每以骑队径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撞；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迂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面八方响应，齐力，一时俱撞"〔13〕。这种轮番冲击，四面合围的战法，常常能把对方冲乱，歼灭敌人。

蒙古军队极重视兵器装备的改进，当从金军手中缴获火药、火器后，便积极加以制造。故蒙军西征时，装备有一定数量的火器，对单纯使用冷兵器的中亚、欧洲诸国军队，在兵器装备上自然处于优势。

蒙古对南宋的长期战争，到元世祖忽必烈时，才完成了重大的战略转变：第一，将战略的主攻方向由四川转移到襄阳、鄂州方向，对京湖战略要点襄阳避免强攻，实施长围久困。第二，改变过去以骑兵集团为主的攻势战略，大量使用汉人，编练强大的水军和步军，采用水军与步、骑、炮兵联合作战的战法，顺汉沿江，直捣临安。元灭南宋的五次重大战役，即破襄樊之战，破夏贵大军阳罗堡之战，破贾似道大军的丁家洲之战，破张世杰水军的焦山之战以及最后的崖山海战，或是水陆协同作战，或是水军单独作战，可见水军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第三，改变故去那种

倏进倏退，弃地不守，单纯依靠掳掠剽劫来养活军队的做法。采取筑城列障，分兵防守，就地屯田等办法，使军队供给有可靠的保障，可攻可守，以支持长期的战争。元世祖忽必烈正是完成了这一战略转变，才使元军适应了攻略偏安东南的南宋的客观要求，从而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三、两宋抗击"草原骑兵"进攻战法的发展

（一）北宋抗击辽、夏、金骑兵集团的进攻

汉武帝刘彻为了反击匈奴，组建了强大的骑兵集团，才得以主动出击，在战略上转为攻势作战。唐太宗李世民也组建精锐的骑兵部队，使唐帝国威震西域。自中唐以后，由于丧失了西北产马地区，唐军遂变为以步兵为主，但又被迫大量向西北各民族买马。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宋代。

北宋时，宋军的马源主要来自与西北少数民族的贸易，数目远逊于唐朝极盛时期，所以，北宋禁军以步兵为主。但尽管骑兵数量不大，却仍然经常出现兵多马少，部分骑兵无马的情况。宋神宗赵顼时王安石变法实行保马法，分配保甲和富户养马，也未能改善战马的繁殖和饲养。加之宋朝总的方针是以步制骑，实行战略防御，认为组建、编练骑兵耗费巨大，"与虏相攻，必不深入穷追，驱而去之，及境则止，然则不待马而步可用矣。"〔14〕还有人甚至建议"损马而益步"。这种不重视骑兵建设的观点和做法，正是宋朝传统的消极防御战略的组成部分。

宋军长期沿用以步兵为主的传统战法，在对辽（契丹）战争中，为了抗击辽骑兵集团的四面冲击，四面防御的战阵（战斗队形）便应运而生。"阵而后战，兵法之常"。〔15〕就成为宋代的兵家格言，再发展就成为皇帝赐阵图，按图布阵进行作战。为抗击骑兵集团的冲击，在野战中采取四周防御的战阵是适宜的，为实施四周防御而制定出制式的阵图，也是需要的。但临战的部署，需要根据敌情、地形、任务等实际情况而定，那种"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16〕

不容有任何变通余地的作法，必然会限制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害多利少。

自宋太宗赵炅亲征幽州，高梁河之战大败，以及三路进攻幽云，在歧沟关、山后惨败后，面对辽（契丹）军的不断进攻，宋军无法应付，于是消极防御的战略便逐渐形成。为抗击辽（契丹）骑兵集团的进攻，开始开挖塘泊，兴置稻田，并“不以城邑大小，咸浚隍筑垒，分师而守”，待辽（契丹）骑长驱深入，“咸婴城自守”。在河北中部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市），东至泥沽海口（塘沽附近），东西九百里、南北六七十里的地段上，利用原有河道、塘泊，加以疏通，筑堤蓄水，设二十八寨，一百二十五铺戍军。又在州梁间构筑军城，遂形成了遏阻辽（契丹）骑兵集团南下的一条防御地带。

北宋对夏（党项）军的不断侵扰，在好水川战役失败以后，便完全改采守势战略，不敢轻言向西夏发动攻势。于是在沿边诸路宜于农牧、地位冲要的地区，构筑了五十多所城砦，“幅员数百里，楼橹相望，鸡犬相闻”。进筑城砦的目的，“一则要占据地利，逐步推进；二则亦欲招置弓箭手，耕凿种孳，使之自卫家室，渐减戍兵”。〔17〕

北宋末年金军第一次南下袭宋，兵围汴京，太常少卿、亲征行营使李纲认为金军骑兵集团的快速力和突击力非步军所能抵御，在他任河东、河北路宣抚使时，命令制造战车，以抵御金军骑兵。到南宋初年，宗泽保卫汴京时，也特地制造一千二百辆“决胜战车”，用以抗击金军。

（二）南宋抗击金骑兵集团的进攻

南宋政权初建时，宋高宗赵构收集起来的勤王军和由河北退下来的一些溃兵所组成的御营五军，还难以抗击金骑兵集团的进攻。后来由于抗金将士的努力，南宋军队在战争实践中素质有了明显的改善，创造了不少抗击骑兵集团进攻的战法，因而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

韩世忠军迎击金军，分军为五阵，设伏二十余处，在大仪镇引诱金军进入伏击阵地，埋伏的“背嵬军”突然发起冲击，用长斧上劈人胸，下斩马足，挫败了金军的先头部队。张浚指挥王德、杨沂中和刘琦三军，在柘皋以步兵万人执长斧，并列前进，击败金军拐子马从两翼的冲击。刘琦军守顺昌利用雷雨之夜，突然出城以近战袭击金军，杀伤金骑。在抗击宗弼主力攻城时，以竹筒装满煮豆，撒在地上，诱使金军战马吃豆，使其为竹筒所绊搅，无法进行战斗，步兵以大刀砍马足，打败了金军拐子马从左右翼的包围和铁塔兵（重甲骑兵）的正面冲击。这说明南宋军队已掌握了一些在野战中以步制骑的有效战法。

吴玠、吴璘兄弟利用山地，因山筑垒，并针对金军骑兵的特点，创造了一整套包括“番休、迭战”、“驻矢队”、“垒阵法”在内的以步制骑的战法，打退了金军的进攻，守住了蜀口。

岳飞是很重视骑兵的。岳家军主要通过在战场上缴获大量马匹，来组成相当强大的骑兵部队，光背嵬军的马军，就有八千多骑。在郾城大战开始时，岳飞首先派岳云率背嵬马军和游奕马军迎战金军左右翼拐子马，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再命步军手持麻札刀、提刀、大斧等锐利兵器，迎战金军铁塔兵——重甲骑兵，上劈敌人，下砍马足，展开了一场“手拽厮劈”的肉搏战，杀得金军尸横遍野，狼狈退出战斗。岳家军以压倒敌人的高昂士气和精良的训练，以骑兵对骑兵，以冲杀对冲杀，并与步兵的麻扎刀相配合，大破金军精锐的骑兵集团，开创了在野战中以进攻手段战胜金军骑兵的先例。

（三）南宋抗击蒙古骑兵集团的进攻

南宋末期在抗击蒙古骑兵集团的作战中，由于政治腐败，军队战斗力下降，不仅不能运用岳家军那样以骑制骑的战法，就是如韩世宗等军的以步制骑的战法也很少出现。

南宋军民为抗击蒙古骑兵集团的进攻，根据各战区地形的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抗击措施。在江淮方面，利用江淮水系，开

浚水道，在距城百里以内，三里挖一沟，五里掘一洫（田间水道），以限制蒙古骑兵的奔袭。又编组游击军（机动部队），水步各半，随时机动于江淮之间，以防不虞。同时沿淮河南岸各要点筑城，增加兵力以巩固要点，形成南宋抗击蒙军的主要防御方向。

京湖制置使孟珙在江陵利用河流湖沼，蓄水为障，兴建很多水库，既发展了水利，又限制了蒙古骑兵的行动，并以襄阳为中心，屯粮聚兵，形成坚固的战略要点，以控制江淮和四川的中间战略地带。

蒙古统治者高度重视进攻四川的战争。在半个世纪中，成吉思汗、窝阔台、蒙哥都曾把进攻的战略重点指向四川。宋余玠调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以后，采纳冉琎、冉璞兄弟修筑钓鱼城的建议，依山凭水，构成纵深的山城防御体系，成为遏阻蒙古骑兵的有效防线。

余玠的山城防御体系，是以"保蜀之根本"的重庆城为重心，控制渠、嘉、涪、沱四江，使蒙古骑兵难以沿江南下、打开通往夔门之路；并巩固"镇西之根本"的嘉定和"蔽吴之根本"的白帝城，以确保长江，拱卫重庆。

四川军民在余玠领导下所建成的山城纵深防御抵抗方式，在抗御蒙古骑兵集团的进攻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曾经纵横捭阖于亚欧大陆的蒙古铁骑，对此感到束手无策，难以施展其奔突的故技。余玠继承和发展了在此以前的设险守蜀的理论和实践，丰富了古代的军事宝库。但山城纵深防御体系，必须控制强有力的善于山地作战的机动部队，以适时策应各城堡的作战，并捕捉战机各个击破被山城体系互相隔开的敌人。只有这样，防御才能是巩固的和持久的。

总之，两宋时期在长期抗击"草原骑兵"的作战中，防御骑兵的战法有较大的发展，创造了遏阻敌骑冲突的种种有效手段。但大多战法只在消极防御上下功夫，不能象汉武帝刘彻、唐太宗、

李世民那样组织强大骑兵集团的反击，因而难以取得最后胜利。

（四）宋、蒙水军的发展

南宋统治者自南渡以后，对金和蒙古的战争皆在淮水、汉水和长江之间进行。南宋统治者为了偏安江左，保住长江天堑及防范金和蒙古由海路的进攻，对建设水军、修造战船和发展造船业比较重视。造船技术在这个时期也有显著进步。

特别是南宋杨么农民起义军在洞庭湖与南宋官军对抗时，创造了一种有二十四车、分为三层、高达十丈以上、可载千人的车船。这种车船装有激水轮子，开动起来疾速如飞，对造船技术作出很大的贡献。南宋方面也模仿起义军的车船，于是双方都竞造大车船。岳飞镇压杨么起义后，收编大批惯戏风涛的健儿，又获得一千多艘战船，于是“鄂诸水军之盛，遂为沿江之冠”〔18〕。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皆拥有一定数量的水军，都在宋金战争中发挥过一定作用。

宋廷除在沿江陆续设置水军外，还设置沿海制置司，负责海防。绍兴末年，完颜亮再次大举攻宋时，宋李宝率水军沿海北上，在青岛附近海域，用火攻奇袭。一举歼灭准备南下攻占临安的金朝舰队。这是中国古代一次著名的海战。

蒙宋战争时期，南宋设置沿江战区，控置强大的水军，作为总预备队，适时进行机动，以支援两淮、京湖和四川方面的作战。

元朝忽必烈采纳南宋降将刘整的建议，造舰船，练水军，在攻下襄阳后，水陆并进，顺汉入江，在丁家洲击溃宋水军，直捣临安，尔后东出大海，进军闽粤，崖山海上最后一战，终于覆灭了南宋政权，显示出元水军在造船、训练和指挥上都有一定的成就。

注　释

〔1〕《辽史·兵志》

〔2〕《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一三二

〔3〕 《东斋记事》卷二
〔4〕 《宋史·夏国传下》
〔5〕 《金史·兵志》
〔6〕 《宋史·吴玠传》
〔7〕〔8〕 《元史·兵志》
〔9〕〔10〕 赵珙：《蒙鞑备录》
〔11〕 郝经：《郝文忠公集》卷三十二
〔12〕〔13〕 彭大雅：《黑鞑事略》
〔14〕 《历代名臣奏议·宋祁》
〔15〕 《宋史·岳飞传》
〔16〕 《武夷新集》卷十
〔17〕 《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五一四、五〇五
〔18〕 《金佗粹编》卷六

第六篇　明清时期主要战争的战略

第二十八章　明统一中国的战争

第一　元末农民起义是朱元璋建国战争胜利的基础

一、元末农民起义动摇了元朝统治

元统治集团对人民的统治极为残酷，实行把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指南宋统治区内的人民）四个等级的民族歧视政策，土地兼并的情况超过其前代，使广大人民陷入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水深火热之中。皇帝成为全国最大的地主，不但控制着宋、金遗留下来的大量官田，还强占了大量民田，除强迫农民耕种其中的一部分外，用来赏赐贵族、大臣、寺院的，动辄百顷、千顷甚至万顷以上，如山东护圣寺两次得赐田三十二万顷。汉族地主也疯狂地兼并土地，有的大地主的田园，跨州连县。元朝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最重，租额往往在收成的八成以上。佃户对地主的依附也最强，地主可以干涉农民婚姻，役使他们的子女，有的农民甚至沦为奴隶和农奴，被称为“驱口”或“驱丁”，他们成为地主的私产，可以买卖，甚至卖到海外市场。元代赋税也很重，北方有所谓“丁税”、“地税”，南方有所谓“夏税”、“秋税”，此外还有水脚、藁钱、斗面、鼠耗等额外租税。元朝的徭役也十分繁重，一起集中在贫苦劳动者身上。元统治阶级人物还勾结汉族大地主和色目商人，以高利贷盘剥人

民，一年就本利相等，以后利滚利，叫什么“羊羔儿息”，还不上债，就以妻子儿女去抵偿。元廷还把掳去的几十万工匠，集中在官营作坊做工，这些工匠无人身自由，口粮又不足，生活极为困苦。

元朝的政治腐朽，军队衰败，也到了顶点。帝位争夺接连不断，二十几年中，就换了八个皇帝，整个统治集团成员都卷入内部纷争，政局极不稳定，政权往往落入权臣之手。如仁宗时，铁木达儿三次入相，把持朝政；文宗时，燕铁木儿独揽大权；顺帝时人只知有权臣伯颜，不知有皇帝等等。自武宗后的皇帝，个个荒淫昏庸，穷奢极欲。他们奉佛求福，大兴土木，挥霍无度。官吏的贪污，较前代也更突出。如史称：“数十年来风俗大坏，居官者习于贪，无异盗贼，己不以为耻，人不以为怪。其间颇能自守者，千百不一二焉。”〔1〕军队衰败，战斗力锐减，连有名的怯薛军，白天在宫门宿卫，晚上出去抢劫，也尤如匪盗。镇戍军不习武事，以致将官不懂战阵，士兵不会射箭。

在上述情况下，水利常年失修，黄河泛滥成灾，疫疾流行，两岸人民流离失所，饥民达到五百万人。加上其他地区由于土地兼并，赋税苛重等原因被迫离开农村的流民共达八百万人。由于阶级矛盾激化，在元朝统治的几十年中，农民对统治者的抗争，从没有停止过，终于发展成为以红巾军为主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红巾军首领刘福通，原是白莲教首领，颍州（安徽阜阳）人。他与另一白莲教首领河北永年人韩山童一直在北方地区秘密传教，宣传只有“明王出世”、“弥勒佛再生”才能使广大农民得到安居乐业的生活，作为组织农民起义的手段。为了发动群众起义，先以童谣散布，“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2〕，另暗埋独眼石人于黄河故道岸上。元廷当时怕黄河水灾影响漕运，征发十五万民工、两万戍军修治黄河故道。石人挖出后，正应童谣，人心震动。刘、韩借此发动起义，并假称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为南宋大将刘光世后人，以扩大

号召力。元惠宗（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韩、刘聚集教徒在颍上县（今安徽颍上）白鹿庄准备起兵，众推韩山童为明王。由于事机不密，为元军侦知，韩山童被杀，其子韩林儿逃往武安（今江苏徐州市境内）。刘福通率部经过苦战突围，出元军不意，攻占了颍州，起义军势力迅速扩张，“福通据朱皋（今河南固始西北），破罗山（今河南罗山）、上蔡（今河南上蔡）、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今河南确山），犯叶（今河南叶县）、午阳（今河南午阳），陷汝宁（今河南汝南）、光（今河南潢川）、息（今河南息县），众至十余万，元兵不能御。”[3]起义军官兵各以红巾裹头为记，故称红巾军或红军，又以烧香聚众，亦称香军。这支起义军活动于今安徽、河南、河北一带，是为北方红巾军。

同年八月，由彭莹玉组织，推徐寿辉为首领，在长江中游汉水以东的蕲（今湖北蕲春）、黄（今湖北黄冈）地区发动了南方红巾军起义。彭莹玉，即彭翼，袁州（今江西宜春）人，原是该地慈化寺僧人，人称彭和尚，是南方白莲教首领，长期借宗教掩护，从事反元活动。后被发觉，流亡淮西，在群众掩护下，不断在江淮地区发动起义。徐寿辉，罗田（今属湖北）人，本是贩布为业的商人。

先后响应红巾军起义而又打着红巾军旗号的还有：在湘、汉起兵的布王三（本名王权）、孟海马；在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起兵的芝麻李（原名李二，灾荒中散赈芝麻得名）；在濠州（今安徽凤阳）起兵的郭子兴等。布王三活动在南阳一带；孟海马活动于荆、襄地区。此外还有郭子兴，其先曹州人，家富饶，任侠，喜宾客，元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集少年数千人起兵，据有濠州，朱元璋就投在郭子兴的属下。芝麻李在刘福通起兵后，很快攻占了徐州。其他尚有不属红巾军、但起兵较早（公元1348年）的浙东的方国珍，淮东的张士诚等。

北方红巾军起兵后，元统治集团极为恐慌，先派素称精锐的

阿速军（回回军，即高加索军）进击红巾军，结果一败涂地。继派也先帖木儿率蒙古军二十万去镇压，这支队伍纪律很坏，沿路抢劫辎重千余车，全是金银财宝，但却十分惧战。一日夜间，有兵士以为红巾军来劫营，大声惊呼，致自相溃乱，红巾军获得很多战利品，壮大了声势。盐贩出身的张士诚，江苏泰州人，杀富家，招少年聚盐丁起兵，据泰州，活动至淮东一带，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在高邮建立大周政权，阻塞了元统治政权的粮运，影响了其盐税收入。元廷忙命镇压了芝麻李起义军的丞相脱脱率大军百万往围高邮，但途中因元廷内部斗争，脱脱被罢官，所部不战自乱，张士诚乘机出击，元军大溃，不少人投入红巾军。至此，双方力量对比，大大地向有利于起义军的方面转化。刘福通打听到韩林儿在武安山中，于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宋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二月，派人迎到亳州（今安徽亳县），建国号大宋，改元龙凤，称为小明王。中原各地红巾军于是都接受大宋领导。这时，元廷内部斗争不已，南北隔绝，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军事力量大为削弱，不得不依靠地主武装支撑残局。实际掌握红巾军领导权的刘福通，乃抓住战机，于至正十七年（宋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三路大军北伐，在军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4〕表明了要推翻元朝统治的坚定决心。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均绰号，真名不可考）率军渡河入太行山，连克太原、大同、兴和（今河北张北），继克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转而东向，攻占辽阳。左路由大刀敖、白不信、李喜喜等率领向关中挺进，连克商州（今陕西商县）、兴元（今陕西汉中）、巩昌（今甘肃陇西），转而围凤翔，其另一部又攻下宁夏。这一路后来入四川与明玉珍部合并。右路由毛贵率领，两年间攻占河南东北部和山东大部地区，又北取河北，进占蓟州（今河北蓟县），前锋一度抵大都（今北京市）附近，逼得元帝曾想北逃。在北伐顺利进军中，刘福通亲自率军攻占汴梁（今河南开

封），迁宋都于此。红巾军控制了中原和北方广大地区，已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

南方红巾军占领蕲州后，也建立了政权，拥徐寿辉为帝，国号天完。这支部队迅速扩大，曾提出过“摧富益贫”〔5〕的政治口号，转战鄂、赣、皖、浙几省，消灭很多元军，一度攻占杭州。其中彭莹玉起了很大的作用，后彭莹玉于元顺帝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在瑞州（今江西高安）遇害。同年底，天完都城蕲水（今湖北浠水）也被元军攻破。元至正十五年（宋龙凤六年，公元1355年），这支南方红巾军利用元军在高邮的失败，重整旗鼓，又取得很大胜利，迁都汉阳，政令达于两湖及皖、浙一带，接着徐寿辉又派明玉珍入川，攻克重庆。

二、朱元璋的政治目的和利用起义军的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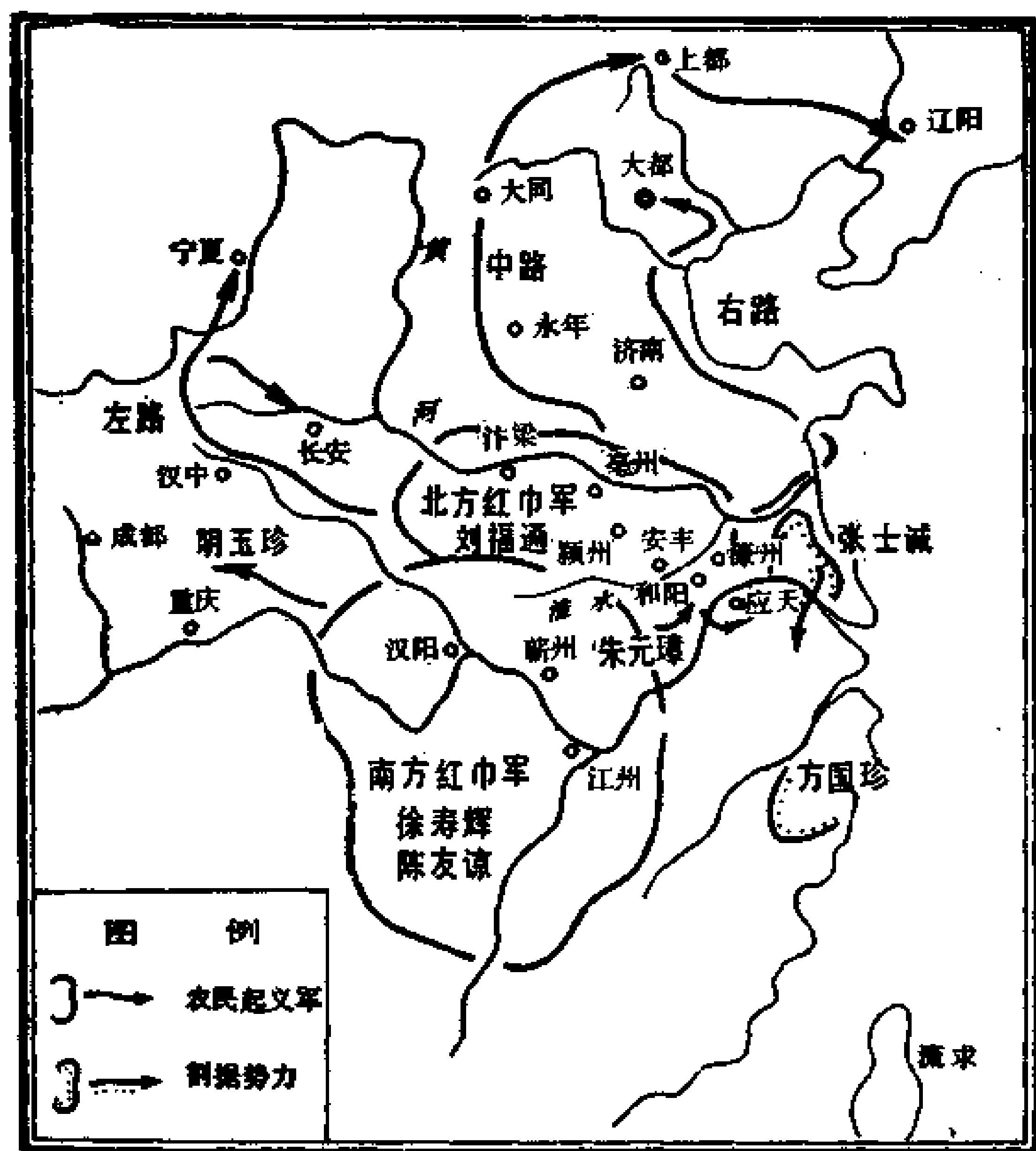
濠州的郭子兴是北方红巾军中较弱的一支，由于内部不团结，纪律也差，又缺乏粮草，外无援军，因而限制了它的发展。朱元璋是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人，出身贫寒，六亲俱断，在动乱年代，无以为生，曾入皇觉寺为僧，乞食四方，前后三年，走遍皖北、豫东、豫南各地。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投奔郭子兴军，先充亲军小头目，因作战勇敢有功，得到郭子兴信任，以义女马氏妻之，并升任镇抚。这时濠州在元军包围中，芝麻李在徐州牺牲后，其属下彭大、赵君用奔濠州，以致内部常有矛盾。朱元璋见局处濠州难有发展，乃率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南下。

朱元璋当时为什么参加起义军，在他与刘基论兴亡之道时有坦率的自白：

> “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从戎，欲图自全。”〔6〕

“欲图自全”，就是他投军的动机。但当时有元军，有地主军，有起义军，又有其他割据武装，他投入起义军，也含有反元的因素。他想图谋天下，建立新的封建王朝的政治目的，则是随

元末农民起义形势和发展示意图　（28-1图）



着他力量的发展逐步形成的。对此，朱元璋也有过自白：

“予当时不能自守于乡里，岂有意于天下乎，及群雄无所成，而予之兵力，日以强盛，势不容己，故有今日。”〔7〕

朱元璋何时有了图天下的政治目的，就历史记载，是在略取定远，冯国用、冯国胜兄弟来归之后。先是元顺帝至正十三年

（公元1353年），他还归故里，募兵七百人，徐达、汤和来归，算是有了自己的队伍。次年，朱元璋与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南略定远，用计降了驴牌寨民兵三千人，又袭击横涧山“义军”缪大亨部，得其兵二万人。这时，定远人冯国用、国胜兄弟率众来附。朱元璋认为自己具备了一定实力，遂开始有了图谋天下的政治目的。他曾问冯国用：“顾定天下，计将安出？”〔8〕此后，朱元璋率军继续南下，从元军手中拿下滁州、和阳（今安徽和县），势力有所扩大，但和红巾军、张士诚等比，仍相差很大。郭子兴死后，他接受大宋政权左副元帅的任命，军中一律用龙凤年号，但实际上仍是各行其是。朱元璋奉大宋龙凤年号，主要是因为自己力量还小，“念林儿势盛可依藉，乃用其年号以令军中”〔9〕。朱元璋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可利用红巾军的威望、声势，便于号召和增强势力；可缩小目标，减少群雄敌视；可利用红巾军与元军对抗，既受到红巾军掩护，又便于自己发展，坐收渔人之利。元顺帝至正十八年（宋龙凤四年，公元1358年），朱元璋打下婺州（今浙江金华），在那里设中书浙东行省时，还在省门外树两面旗帜，写着“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表示继续尊奉大宋政权。〔10〕但已不用红巾军的红旗而改用黄旗，公然表明朱元璋这支军队是独树一帜的，与红巾军有所区别。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宋龙凤十二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在红巾军与元军两败俱伤，而自己成为全国较强的武装集团时，杀韩林儿于瓜步（江苏六合境），最后抛掉了红巾军这块招牌，公开图谋建立封建政权了。

第二　朱元璋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步骤

一、占领建康和建立根据地

朱元璋为实现定天下之志，曾向冯国用问计，冯国用建议：

“金陵（亦称建康，元时为集庆路，今江苏南京市）龙

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11〕

朱元璋很同意他的意见。此后，李善长、胡大海、邓愈、常遇春先后来归，人才增加。但苦于久屯和阳，外有元军，内缺粮草，计划向江南发展，又无舟师。适在巢湖连结水砦以自保的廖永安、廖永忠、俞廷玉父子等率水师万人、船千艘来归，朱元璋遂决心渡江，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宋龙凤元年，公元1355年）五月，朱军渡江，攻占采石、太平（今安徽当涂）。当攻取太平时，当地名士陶安来迎，朱元璋问："吾欲取金陵，如何？"陶安对曰：

"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资明公也。"〔12〕

陶安之对，深合朱元璋意，聘陶入幕府参军事。朱军攻占太平后，元军"义兵"元帅陈野先率众来救，为朱军所败，全部收降。陈野先之降非本意，闻朱军将攻建康，私告其原属不要力战，等他脱逃后会合元军来对付朱军。朱元璋闻其谋，召陈野先来对他说："人各有志，从元从我，不相强也。"〔13〕然后纵之使去。朱军攻下溧阳（今江苏溧阳），陈野先收兵屯于板桥（今南京市西南），一面阴与守建康的元将福寿勾结，一面以信劝元璋，认为自古攻克建康，必赖舟师，不利步战，主张南据溧阳，直捣镇江，示元军以持久，可以不战而破。朱元璋知他在搞缓兵计，回信说：

"历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长江天堑，限隔南北，故须会集舟师，方克成功。今吾渡江，据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舍舟而进，足以克捷，自与晋、隋形同势异。足下奈何舍全胜之策，而为此迂回之计邪？"〔14〕

当朱军进攻建康时，陈野先果然与元军会合，拒战在秦淮河上。朱军进攻不利，当陈军追击时，陈野先为乡民兵袭杀，其子

兆先收众屯于方山（南京市东南）。时元军蛮子海牙以舟师在采石结寨，与建康互为犄角。但元军家属皆在和阳，为江所隔，军心不稳。常遇春常以奇兵分其势，而以主力正面进攻，每交战，出奇兵袭其后，纵火焚其舟船，元军大败，蛮子海牙仅以身免，建康遂陷于孤立。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宋龙凤二年，公元1356年）三月，朱元璋率诸将再次直攻建康，水陆配合，首先破陈兆先军，降其众三万六千人，并收用了陈兆先，择其骁健五百人作为护卫，这些人都惧不自安。晚上，朱元璋将原有亲军遣开，令这五百人担任护卫，只留冯国用一人侍卧榻旁，这批降兵很感动，都想报效图功。数日后，以这五百人为前锋，由冯国用率领，大败元军于蒋山（今南京市东郊），直抵城下。其他诸军也拔寨竞进，元军主帅福寿督战战死，建康守兵及陈军水师康茂才部均投降，获兵民共五十余万。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

朱元璋占领应天地区仅仅是夺取江南的开始，这时，东面有元将定定扼守镇江（今江苏镇江），地主武装青衣军张明鉴占据扬州（今江苏扬州）；东南有张士诚占据平江（今江苏苏州）、常州（今江苏常州）及浙西；南面有元将八思尔不花屯徽州（今安徽歙县）、宁国（今安徽宣城）；西南有徐寿辉军占领池州（今安徽贵池）。

对此，朱元璋利用北方红巾军正在不断发展，元军无力南顾的有利时机，立即向江南元军残余部队和地主武装发动进攻，以开拓和巩固根据地。朱元璋派徐达攻下了应天东方的屏障镇江，分兵占领金坛、丹阳，阻扼了东方张士诚的威胁。六月，派邓愈攻下广德（今安徽广德）。次年又分兵攻占长兴(今浙江长兴)、常州、宁国，控制了扬州、江阴、徽州、池州等地。元顺帝至正十八年（宋龙凤四年，公元1358年）再向浙东元军进攻，占领婺州（今浙江金华）衢州（今浙江衢县）、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朱军占领区已包括苏南西部、两浙及皖南广大地区。占有上

述各要点之后，根据地已初步巩固了。

朱元璋占据江南作为根据地，是他图天下的重要战略步骤。否则，以后的发展，是谈不上的。当时以江南为根据地，具有以下的有利条件：

1．金陵曾为数朝旧都，利于号召。

2．朱元璋军原屯滁、和，与长江一水之隔，进军方便，费力小，易于成功。

3．元军正受北方红巾军牵制，无力增援，其他势力各求自保，元军在建康形成孤立，机会难得。

4．占有建康，凭江依险，易守难攻，比较稳固，并便于向四方发展。

5．江南地区人口密集，物资丰富，有充足的人力、物力资源，有利于与群雄逐鹿中原。

二、积蓄力量，为统一全国作准备

在朱元璋夺占皖南时，休宁（今安徽休宁）儒生朱升来见朱元璋，提出了“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15]的著名建议，朱元璋很同意。当时元朝虽然内部矛盾重重，但总的军事力量仍然庞大；北方的刘福通、上游的陈友谅，力量均比朱元璋强；即使东方的张士诚也不比朱元璋弱。在当时情况下“高筑墙”，即先巩固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广积粮”，即在根据地内搞好政治经济措施，积聚人力，物力，支持长期战争；“缓称王”，即在强手逐鹿中，不冒尖，少树敌。这三句话，归纳起来就是积蓄力量，后发制人，可以看作是朱元璋政治上总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朱元璋也正是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才取得了全国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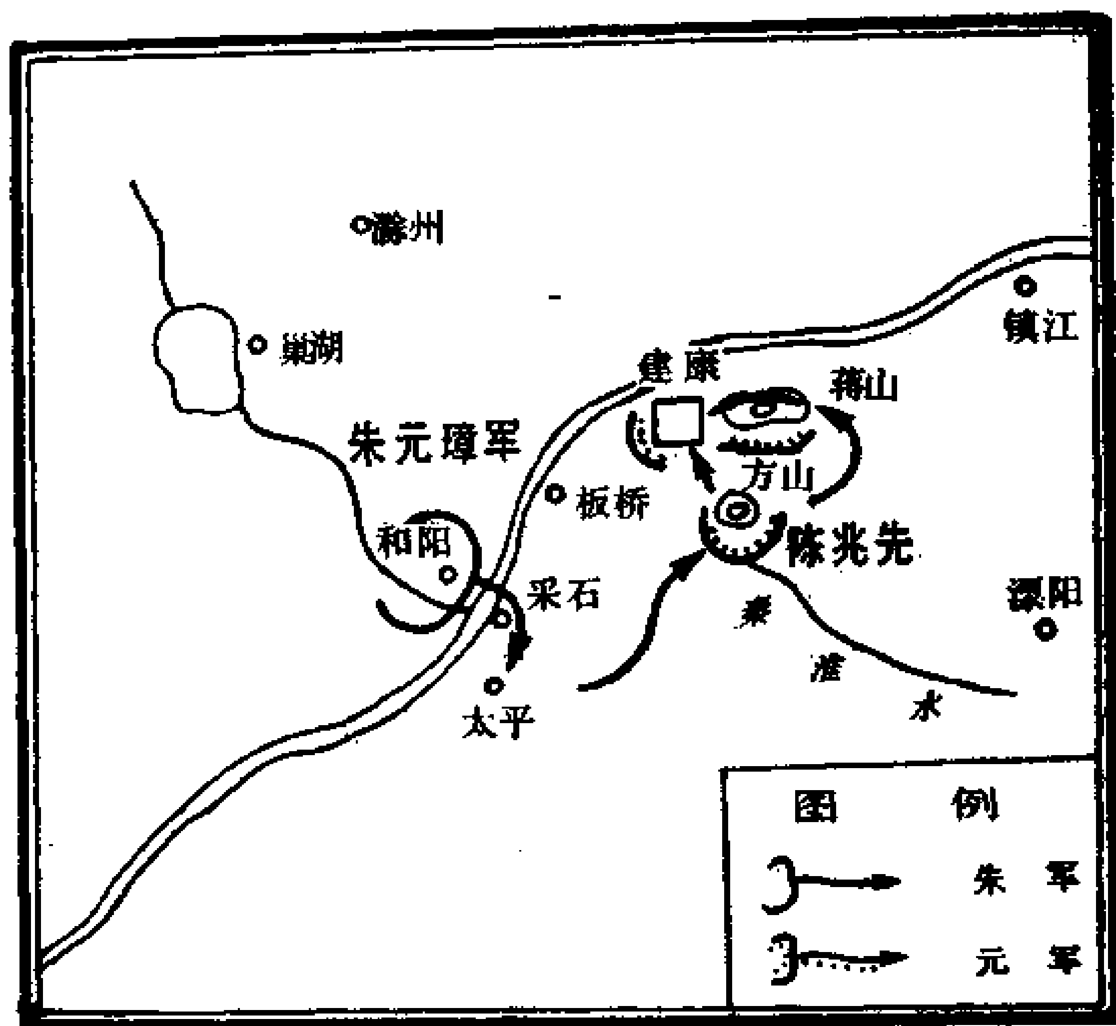
为了夺取全国统治权，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政治上：朱元璋在占领建康后，即召见元朝官吏和百姓，宣告说：

“元失其政，所在纷扰，生民涂炭。吾率众至此，为民除害耳。汝等各守旧业，无怀疑惧。贤人君子，有

能相从立功者，吾礼用之。旧政有不便者，吾除之。”[16]

朱元璋攻占建康经过示意图 （28-2图）



并说到做到，立即废除了元朝一些苛政，减免了一些赋税，于是人心大悦。以后凡攻占地区都废除元苛政，减轻人民负担。如渡江之初，军队粮饷都由总兵官就地解决，谓之“寨粮”，朱元璋将其取消，并命令部属凡是征粮、军需、差役等，均“务从宽俭”，并多次下令，对工商业的税收也“斟酌元制，去其弊政”[17]，以收揽人心，恢复经济。其次，他广收人才，如刘基、宋濂都是这一时期网罗的，他们在明建国战争中，出谋划策，都起过重要作用。朱元璋为了便于对根据地的统治，虽不称帝，但自称吴国公（到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称吴王），建立了

政权机构。他仍打着宋（红巾军）旗号，宣布文告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的名义，表示自己仍为小明王臣属，以免引人注意。对敌军，采用攻心战略，被俘将帅，听其去留，愿留的就任以官职。

经济上：朱元璋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垦荒屯田，要求大小将帅“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18]。又建立营田司，以康茂才为营田使，负责筹划和兴修水利，还建立茶盐课、制钱法，开冶炼，定渔税，以增加财政收入。此外，提倡节俭，开源节流，尽量减少财政支出，以积蓄物力。

军事上：重点注意提高军队战斗力，紧抓练兵。朱元璋除督促将帅注意军队训练外，自己时常巡阅部队，检查训练情况。又特别注意军纪，严明军令，每次出战都三令五申，凡有违犯者，一律严处。如徐达属下降人陈保二因诸将不爱惜士卒，怨叛而去，加以徐达攻常州不力，遂命自徐达以下，皆降一级以资惩罚。朱元璋亲侄朱文正守江西，所为多不法，乃令回建康问罪，本欲杀之，经马后苦劝而止，但杀其辅佐官员，并挑断了为朱文正办坏事的五十余亲兵的足筋。为了准备兵源，增强实力，下令选取民间丁壮，编为“民兵”，训练他们能耕自战，并设民兵万户府管理其事。

第三　采用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国

一、当时形势和战略方针

朱元璋以建康为政治中心，以江南为根据地，经过几年经营，物资丰富，军力增强，统治地区民心安定，生活有所改善，有了进行统一事业的条件。这时，他不仅把割据势力和元军作为进攻目标，甚至也把红巾军当作敌手看待。但若同时用兵，势必兵力分散，不可能取胜。于是先打谁，就成了首先考虑的问题。元

顺帝至正十九年（宋龙凤五年，公元1359年）前后，全国的形势是：

北方红巾军虽北伐初期曾取得重大胜利，但主力远征，中原空虚，红巾军政权所在地汴梁被元军攻破，刘福通小明王南走安丰（今安徽寿县），河南及山东大部分地区又为元军夺去，派出去的三路大军，也先后被元军各个击破，虽仍占有一些地方，但互不连系。北方红巾军已陷于不利的地位。

南方红巾军，元顺帝至正十七年（宋龙凤三年，公元1357年）九月，天完丞相倪文俊想杀徐寿辉未遂，反为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湖北沔阳渔家子，少读书，略通文义，曾为县小吏，后随徐寿辉起义。陈友谅杀倪文俊后，控制了徐寿辉。次年陈友谅先后攻占元军重镇安庆、龙兴（亦称洪都，今江西南昌）、瑞州、抚州、赣州、汀州（今福建长汀）、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势力有很大发展，在南方各个集团中兵力最强。

张士诚这时迁都平江（今江苏苏州），跨大江据有淮东、苏南、浙东富庶地区，其政治腐朽，且投降了元朝。但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宋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张士诚自称吴王后，与元统治者的关系又紧张起来。张士诚与朱元璋为争夺地盘，小战斗不断，各有胜负。

方国珍，浙江黄岩人，世以贩盐浮海为业，因被仇家告以通匪，杀仇家聚众数千人，入海抢劫船只，据有浙东南庆元（今浙江宁波市）、温州、台州，势力较小，几次降元，仅能自守，对朱元璋不构成威胁。

元统治集团虽取得对北方红巾军作战的一些胜利，但太子为争夺帝位与丞相矛盾加深，正酝酿政变。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将领察罕铁木耳和孛罗铁木耳，各拥兵自保，坐观变化。

其他有明玉珍（南方红巾军入四川的一支）在成都称帝，陈友定据福建，何真据广州，把匝剌尔密据云南。但都相隔较远，暂时不影响朱元璋统一全国的作战。

根据以上形势，朱元璋采取了先平定长江中下游陈友谅、张士诚两个集团，然后北上灭元的战略方针，以统一全国。

采取这个方针，在当时是势所必然，因为：

1. 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正在激化，无力干预南方，为朱元璋统一长江中下游提供了机会。

2. 威胁最大的对手是陈友谅、张士诚，他们在朱元璋的东西两侧，是肘腋之患，如不先统一长江中下游而贸然北伐，陈、张乘其后，就会有全盘失败的危险。

3. 陈友谅、张士诚正在企图合击朱元璋，朱不解决他们，他们也要向朱进攻。

4. 占有整个长江中下游后，地位更为稳固，人力、物力丰厚，然后乘胜北伐，就更主动，胜利就更有把握。

二、统一长江中下游的胜利

（一）先陈后张的战略决策

朱元璋统一长江中下游作战的对手，是西边的陈友谅和东边的张士诚。朱元璋既决定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而在统一长江中下游一局中，对两强也不能同时用兵，又有个先打谁的问题。朱元璋以此问计于刘基，刘基分析形势说：

> “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19〕

对于刘基这一先陈后张的谋议，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先打张士诚，理由是距离近，实力较弱。朱元璋同意刘基的意见，他还从敌方将帅的个性上分析陈友谅是“剽而轻”，正在扩张势力，骄而喜功；张士诚是“狡而懦”。若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必全力来攻，那就会受到夹击而“疲于二寇”；〔20〕如先打陈友谅，张士诚专意保守他自己的地盘，不会认真出兵相助，陈败后再收拾张就较容易了。所以最后决定先陈、后张的战略决策。为此，对东边的张士诚采取守势，命令所属固守江阴、常州、宜

兴、长兴各战略要地，并连络方国珍，借以牵掣张士诚。另外，积极整备军力，作西破陈友谅的准备。此时，陈友谅不待朱元璋的进攻，就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宋龙凤六年，公元1360年）闰五月，率舟师越过朱军所据的池州，攻占太平，夺取采石，直逼应天，并在途中杀徐寿辉，于军中仓促称帝，国号汉。随即率军还屯江州（今江西九江），作进攻应天的准备，并遣使约张士诚一同举兵击朱。

（二）江东桥之战初胜陈军

陈友谅稍加整备后，复由江州引兵东下，舟师十万[21]，其巨舰有名叫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等[22]，其势甚猛，应天震动。朱元璋的谋士们有的认为只有投降，有的主张弃城守钟山（今南京市东郊紫金山）决战，战不利再走。朱元璋认为都不是好主意，见刘基稳坐不语，乃引入内室问计，刘基说：

> "主降及奔者，可斩也！"[23]"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24]"贼骄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后举者胜，取威制敌以成王业，在此举矣。"[25]

朱元璋同意刘基的意见，决心以逸待劳，采用伏击来击败陈军。于是命元朝降将、陈友谅的老友康茂才，作书给陈友谅，又命一"旧尝事友谅"的仆人去送信，伪约为内应，建议他分兵三路，以分散其兵力，并催其速攻，称自己守江东桥（今南京市西郊），桥为木制，约定暗号为连呼"老康"。朱元璋乃连夜将江东桥易为铁制。有人自陈军中逃出，说陈友谅曾问新河口道路，朱元璋又急命赵德胜跨新河（今南京市西南）筑虎口城防守。朱元璋的伏击部署如下：常遇春等率军三万设伏在石灰山（今南京市幕府山）；徐达陈兵在南门外；杨璟屯兵在大胜港（今南京市西南三十里）；张德胜率水师出龙江关（今南京市狮子山南）；朱元璋亲率大军屯于卢龙山（今南京市狮子山），令各军严阵以待，自己在卢龙山指挥。此外，并预先命令胡大海自婺、衢出兵，威胁、牵掣陈军的后背。

陈友谅得康茂才信，信以为真，便不待张士诚答复，于元至正二十年（宋龙凤六年，公元1360年）闰五月，率舟师东下，直抵大胜港。杨璟率军阻击，陈友谅见新河港窄，仅能容三船入，乃以舟师从大江直扑江东桥。到达后发现桥非木桥，且连呼“老康”无人答应，乃知中计，仓促间令万人登岸立栅，准备防守。朱元璋见陈军已尽入伏击圈内，遂鸣鼓举旗，内、外、水、陆并出，时值潮落，陈军船大不得出大江，被杀和淹死的无数，七千余人被生俘，陈军诸将纷纷投降。朱军得大舰百余艘，战船数百艘。陈友谅乘小船逃回江州。朱军乘胜追击，夺回太平、安庆，并取得信（今江西上饶）、袁（今江西宜春）二州。

江东桥之战的胜利，不仅歼灭了来犯的陈军，且鼓舞了朱军士气，震撼了所有对手，为以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如以后进攻陈友谅时，张士诚不敢贸然出兵，就是一例。

江东桥之战，体现了朱元璋的胆略，在强敌骤至的情况下，他志在必胜，敢于伏兵城下，背城一战，正合兵法所谓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此役也体现了以逸待劳的战役指导。当初，有人主张先恢复太平以为牵掣，朱元璋认为：

> “太平吾新筑垒，濠堑深固，向使彼陆地来攻，必不能破，彼乃以巨舰乘城，为所陷，今往攻之，猝难拔。贼舟师十倍我，我顿兵坚城之下，进不能取，退不及援，失所据矣。”

又有人劝朱元璋亲自率军前出抗击陈军，朱元璋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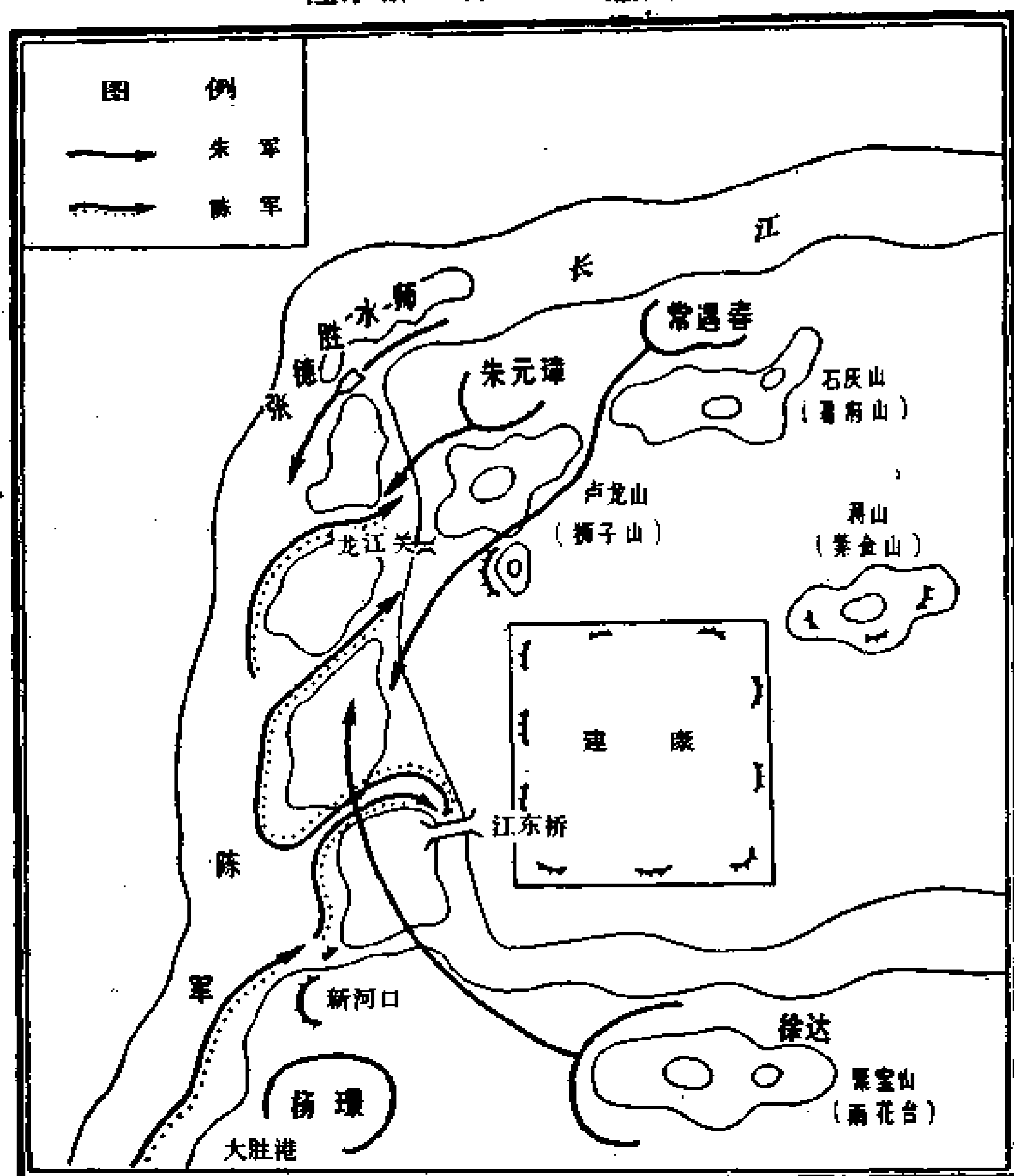
> “彼知我出，以偏师缀（牵掣）我，我欲与战，彼不交锋，而以舟师顺流下建康，半日可达。吾步骑急回，百里趋战，兵法所忌，皆非良策也。”

李善长对朱元璋命康茂才伪作内应，促陈军速来不理解，朱元璋说：

> “迟则二寇谋和，为害益大，何以支！今先破此贼，则东寇胆落矣。”〔26〕

由上可看出朱元璋对情况了解全面，分析透辟，因而能作出正确决策。此外，朱元璋伏击陈军的部署，也很周密。陈友谅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杀害徐寿辉，将士离心，而陈友谅却意满自得，求胜心切，以致轻进中伏。

江东桥之战经过示意图　（28－3图）



（三）与陈友谅决胜的鄱阳湖之战

元顺帝至正二十一年（宋龙凤七年，公元1361年），朱元璋亲率舟师溯江西上，在安庆大破陈军，进破江州，并乘胜占蕲、黄、兴国（今湖北阳新）、黄梅、广济等沿江要地。声威所及，陈军南昌守将以及余干（今江西余干）、龙泉、吉安（今江西吉安）陈军都请降。朱军又攻占饶、抚（今江西抚州市）二州，朱元璋亲去南昌部署，以朱文正率将镇守，自己率军回建康休整。陈友谅在称帝后，生活腐化奢侈，统治区内人心涣散，政令不一，军队疏于戒备。当朱元璋率军克江州时始知朱军西进，以为神兵自天而降，仓促间不能成军，不得不连夜奔武昌固守。陈军此次受挫，损兵失地，是以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至正二十三年（宋龙凤九年，公元1363年）二月，张士诚派吕珍率军围攻北方红巾军的最后根据地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小明王向朱元璋求援，刘基从巩固江南着想，认为“汉、吴（张士诚）伺隙，未可动也”[27]。但朱元璋认为“安丰破，则士诚益张，不可不救”[28]，乃亲率军渡江，救援安丰，三战三胜，吕珍败归，朱元璋遂移小明王于滁州，表面尊崇，实则监视。

同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北救安丰的机会，率水陆军号称六十万，占领吉安、临江（今江西新余东北）、无为（今安徽无为）等地，围攻南昌。陈友谅忿其地盘被朱军占去很多，想求朱军决战，制巨舰数百艘，外饰红漆，舰高数丈，上下三层，各设走马棚，下层设板房作障。有橹数十只置其中，皆以铁皮包之。船身坚固，上下层说话都互不相闻。据传大船可容三千人，小一点的容二千人。陈军上岸后，用云梯等攻城器材从四面八方向南昌发起猛攻。南昌朱军以诸将分守各门，凭坚固守，朱文正率精锐三千，往来策应，双方多有伤亡，但陈军终未把城攻克。同年六月，朱元璋已回应天，得知南昌告急，遂亲率舟师二十万驰援南昌，拟与陈军决一死战。同时命正在围攻庐州（今安徽合肥）

的徐达所部前来会师。朱军抵湖口后，企图将陈军堵塞于鄱阳湖中，乃派戴德以一军屯泾江口（今安徽宿松南），与湖口隔江相望；另以一军屯南湖咀（今江西九江东北），与湖口同扼鄱阳湖入江水道；又调信州（今江西上饶）兵去扼守武阳渡（今南昌南），截断了鄱阳湖南北出口。此时，陈军围南昌已八十五天，久攻未下，士气沮丧，闻朱元璋率大军至，陈友谅不得不解南昌之围，率水师入鄱阳湖迎战。朱、陈两军遭遇于鄱阳湖内康郎山水域。陈军以巨舰列阵，朱元璋对诸将说："彼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29〕乃编舟师为二十队，火器、弓弩依次排列，并规定诸将接近敌舰时，先发火器，次用弓弩，抵其船再以短兵击之。又鼓励诸将说：

"两军相搏勇者胜。友谅久围洪都，今闻我师至而退兵迎战，其势必死斗，诸公当尽力，有进无退。剪灭此虏，正在今日。"〔30〕

作战开始，朱军士气高昂，徐达、常遇春、廖永忠率部首先冲入敌阵，一时箭如雨集，炮声雷动，火光冲天，双方被焚、溺死者一、二万人。徐达部毙敌一千五百人，获巨舰一艘，俞通海乘风发火炮，焚毁敌船约二十余艘。但朱军损失也很大，死战将数员，军士多人。在激战中，陈军骁将张定边奋力逼近朱元璋指挥船，指挥船搁浅，陈军加紧围攻。危急中常遇春射中张定边，俞通海、廖永忠又以轻舟来救，陈军退去。朱军在初步获胜后，怕张士诚袭建康，派徐达回守建康，朱元璋亲自率军准备与陈军决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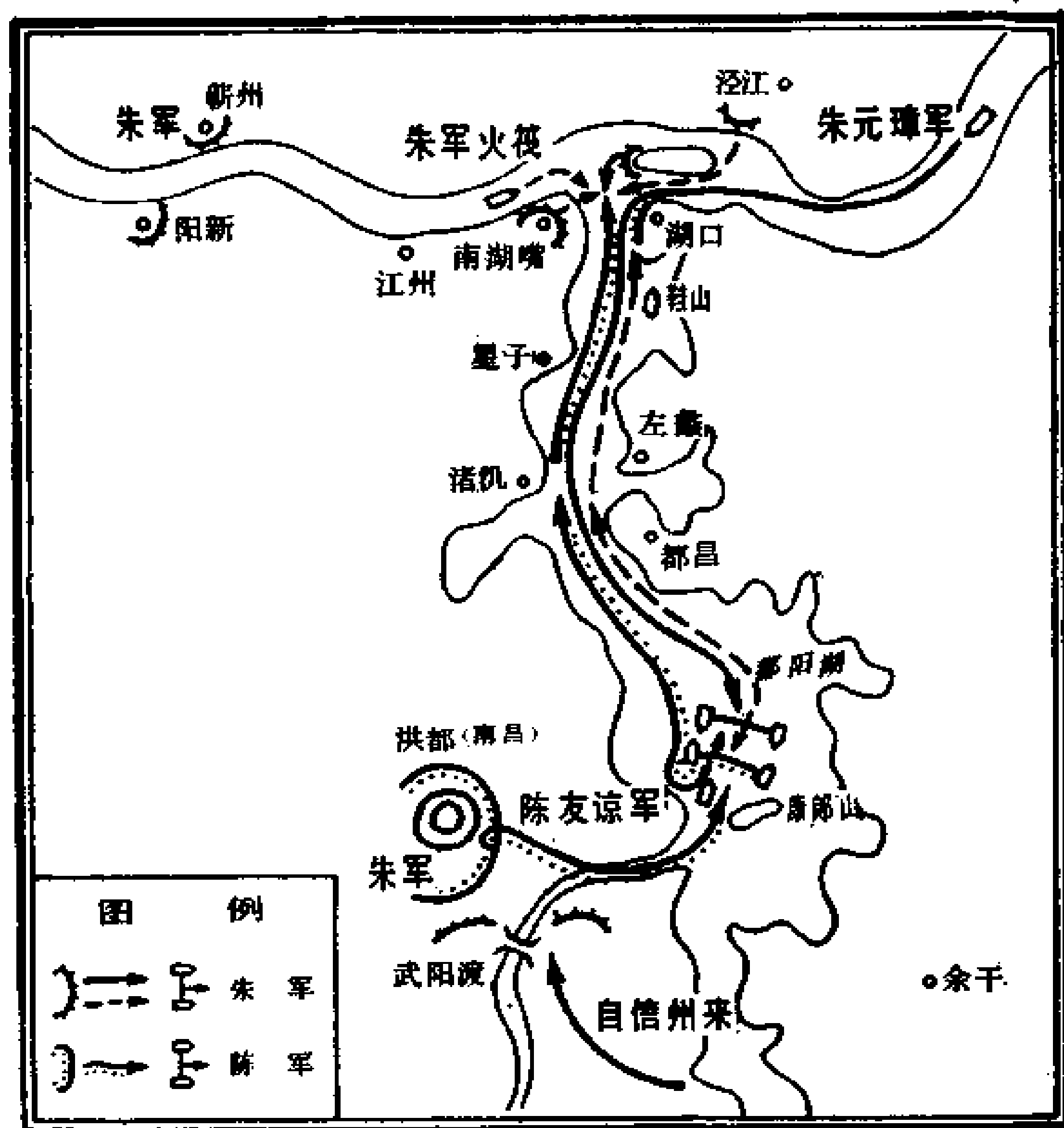
陈友谅军联舟布阵，船高势固，朱军船小，不利于仰攻，连战三日均受挫。朱元璋乃接受郭兴用火攻的建议，用七只小船满载火药，树立草人伪装军士，命勇士驾驶，利用黄昏乘东北风逼近陈军巨舰放火。风大火急，一瞬间即烧毁陈军水寨中数百艘船舰，陈军死伤过半，陈友谅之弟友仁、友贵均被烧死，陈军丧气。朱军又乘胜猛攻，杀伤陈军二千余人。次日，两军再战，朱元璋

指挥船又一次被围攻，亲兵将领换上朱的衣冠，当着陈军投进水中，以迷惑陈军。陈军以为朱元璋已死，稍向后退。朱元璋刚换乘，原船即中炮起火。第三日，陈军先头大船均被朱军击毁，朱军将领俞通海等乘六艘快船突入陈军船队，朱军遥望以为六船已复没，旋见六船于陈军大舰中绕出，因而士气大振，发起猛攻。激战大半天，陈军不支败退，遗弃的兵仗旗鼓，浮蔽江面。陈友谅企图退守鞋山（今江西湖口南大孤山），但被朱军扼住出口，只得收余众转取守势。朱元璋立即率军移驻左蠡（今江西都昌西北）控制上游，陈友谅也移泊渚矶（今江西星子南）。两军相持三日，陈军屡败，是打是逃，陈友谅犹疑不决。后见将士不断向朱军投降，朱元璋又屡来挑战，竟忿而将所俘朱军全部杀掉。而朱元璋却与之相反，不仅全部放还所俘陈军，并悼死医伤，进一步瓦解陈军士气。

朱元璋判断陈军可能突围入江，乃移军湖口，又派兵夺占蕲州、兴国，控制长江上游。经过一个月的激战，陈军士气更低，粮食奇缺。陈友谅无计可施，乃率船万余艘冒死突围，想从南湖咀进入长江，退据武昌。当行到湖口时，受到朱军舟师、火筏四面围攻，溃不成军；又遇到泾江口朱军伏兵截击，陈友谅中箭而死，陈军五万余人投降。陈友谅之子陈理乘间逃走，收残军退守武昌。元至正二十四年（宋龙凤十年，公元1364年）二月，朱元璋再次亲率军攻下武昌，陈理投降，遂尽有陈友谅故地。

鄱阳湖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较少的以水师为主的对战。朱军鄱阳湖之战的特点是以少击众，以小船对大船。朱元璋在兵力少、船舰小的情况下，取得了鄱阳湖决战的胜利。取胜的原因，首先是朱军士气旺盛，而陈军长期顿兵坚城，已师老兵疲，士气低落；其次在作战指导上，朱元璋利用陈军舰只巨大，不利进退，压迫陈军于鄱阳湖有限湖面决战，就占了主动地位，而陈军则始终处在被动地位；就部署而言，朱元璋首先派兵扼住湖口，截断了陈军水师的退路，使其陷入被围的困境，陈军只好以巨舰联

鄱阳湖之战经过示意图 （28-4图）



防，作困兽之斗，陆上也缺乏有力的配合；在作战方法上，朱军以多种火器、弓箭、白刃作有次序的配合，以小船对大船采用火攻。朱元璋自己在总结这次作战取胜原因时，认为主要在士气，他说：

“陈友谅兵虽众，人各一心，上下猜疑，矧（音审，况且）用兵连年，数败无功……”，而朱军“以时动之师，威不振之虏，将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鸷鸟搏击”。〔31〕

这是不错的。

从战略角度去分析，朱、陈在战略上各有一次失误。朱元璋的失误，是亲率主力渡江救安丰。这是一次冒险行动，如果这时陈友谅乘虚率舟师直袭建康，那末，朱元璋将在不利的情况下与陈友谅决战。事后朱元璋也自责说：

“我不当有安丰之行。使友谅乘我出，建康空虚，顺流而下，我进无所成，退无所归，大事去矣。”〔32〕

陈友谅的失误，在于战略眼光短浅。他乘虚而动，但却把进攻目标选在南昌，南昌当然重要，但并非朱元璋的根本。实质上陈友谅是缺乏径袭建康的胆识，而且时机也晚了一步，以致顿兵坚城，师老兵疲，决战失败。

朱元璋在用兵上，还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他看问题较为深透，如鄱阳湖之战胜利后，没有立即追击，却返回建康休整，第二年再率兵攻取武昌。事后，句容儒士戎简对此不理解，问朱元璋当时为何不直接追击，多费了力气，朱元璋答说：

“汝儒者，岂不闻复巢之下无完卵乎？当陈氏兵败，我岂不知乘胜蹴之。兵法曰：‘穷寇勿追。’若乘胜急追，彼必死斗，杀伤实多。吾故纵之，遣偏师缀其后，恐其奔逸。料彼残破之余，人各偷生，喘息不暇，岂敢复战。我以大军临之，故全城降服。一者士卒不伤，一者生灵获全，所得不已多乎？”〔33〕

朱元璋着眼于减少军队和人民的损失，分析了战败者的心理状态，算计到可以不战而克，结果损失小、收获大，见解的确高人一筹。

（四）东破张士诚军的战略决策和淮东之战

朱元璋占有武昌后，又攻占沔阳、襄阳等汉水流域要点，并派人与明玉珍修好，以巩固长江中游形势。这时，北方元统治集团矛盾日渐激化，太子迫皇帝禅位，皇帝、太子各结外援互相争斗。张士诚虽据有北到济宁，西抵汝（今河南临汝）、颍，东接大海，南到绍兴的广大地盘，但在陈友谅覆没之后，见朱元璋愈

战愈强，因而军心不稳。且张士诚降元，人民也不满意他的统治。他乘朱元璋击陈的机会，要求元帝封王不遂，气恼之余，自称吴王，不再向元交粮。

以上形势，都有利于朱元璋进击张士诚。朱、张多年接境，征战不断，时有胜负。张士诚趁朱元璋西征机会，曾进攻朱军边境，但均被击退。

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宋龙凤十一年，公元1365年），朱元璋决心东击张士诚，这是完成全国统一的又一重大步骤。他利用张士诚所据地区南北狭长，且被长江隔开，南北呼应困难的特点，决定采用"先取通（今江苏南通市）、泰（今江苏泰州）郡县、翦士诚肘翼，然后夺取浙西"[34]的战略决策。根据当时朱强张弱的情况，采用南北各个击破，以求必胜，是比较稳健的，而把主攻方向指向通、泰，便于和强大的长江水师协同作战，切断张军南北连系，使其从苏北到山东的广大地区孤立无援，易于略取，也切中张士诚的要害。战前，朱元璋还运用攻心谋略，一方面发布檄文，历述张士诚罪状，一方面严申纪律，禁止在攻战中掳掠烧杀，以瓦解张士诚统治区的军心，收附其民心。这篇檄文虽仍用"皇帝圣旨、吴王令旨"和"龙凤"年号，但文中却对农民军攻击诬蔑，暴露了朱元璋利用农民军自建封建王朝的野心。稍后，又借接小明王到建康为名，途中予以杀害，最后甩掉了农民起义军的招牌。

元至正二十五年（宋龙凤十一年，公元1365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常遇春为帅、水陆并进，进军江北，攻占海安，围攻泰州，击败张军自淮北来的援军，并擒其帅卫成。张士诚以舟师四百艘泊江北岸范港蔡港(今江苏沙州西)，另以小舟在孤山（今江苏靖江北）江中巡弋，目的在诱使徐达军回顾长江水寨（江阴附近，《明史·太祖本纪》说："二十六年春正月癸未，士诚窥江阴……"）以解泰州之围。朱元璋识破其谋，对徐达说：

"寇初驻范、蔡港，吾度其诈，今犹疑不敢即溯上流，为

诈益明，彼非有决机攻占之谋，徒欲分我兵势耳。宜遣廖永忠还兵水寨，而大军勿轻动，此寇徘徊江上，自老之师，乘其怠慢，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不战自溃。但宜谨备之耳。”〔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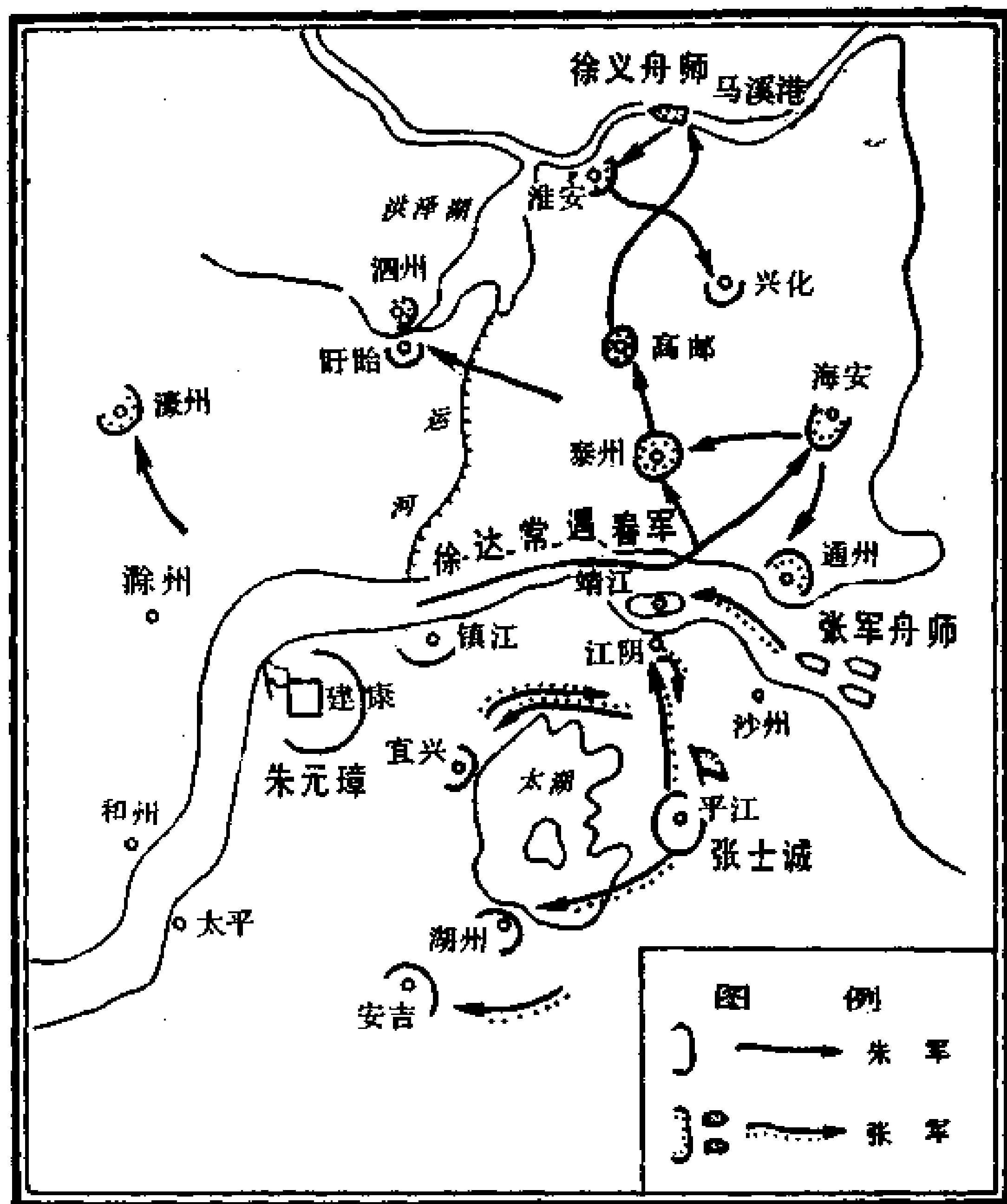
这是根据精辟的敌情分析而作出的正确作战指导。次月，果然攻克泰州，进围高邮。朱元璋为巩固淮东战果，令徐达镇泰州，令冯国胜统军围高邮。张士诚此时派兵攻宜兴，企图牵掣江北朱军。徐达亲率中军锐卒渡江南下，大败张军，俘三千人。随后张士诚又攻安吉、江阴，因朱军防守严密，未起作用。徐达自宜兴回江北后，会同各军攻高邮，一举而克。接着又会同常遇春转攻淮安。张士诚曾命徐义率舟师自海入淮，以解高邮之围。朱军攻淮安时，先袭破徐义军于马溪港（今江苏淮安东），再回师直抵淮安城下，张军守将献附近四州出降。徐达又回兵攻占兴化，韩政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其他各地望风而降，淮东之战遂以朱军胜利而告终。

朱元璋淮东之战的胜利，在于决策的正确。先打淮东，去其肘翼，使张士诚孤立江南，攻取就容易了。如先攻江南，江南是张士诚根本所在，必凭城固守，淮东张军或南下增援，或直取应天都容易旷日持久。对张士诚陈师范蔡，朱元璋判断敌情准确，不为假象所迷惑，以主力专攻泰州不舍，也是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

五、江南决战胜利，彻底消灭张士诚

朱元璋在平定淮东后，召集诸将研究如何转军消灭江南张士诚军，主要是时机问题和作战指导问题。在时机问题上，朱元璋主张乘胜转攻江南张军，不作战役休整。但李善长认为“宜俟衅而动”。又认为张军在江南势力牢固，物力资源丰富，立即进攻，不一定能取胜。朱元璋则认为，张军“败形已露，何待观衅？”〔36〕在作战指导上，常遇春主张直接攻张士诚都城平江。但朱元璋却认为，当时湖州（今浙江吴兴）有张军将领张天麒屯

淮东之战经过示意图　（28-5图）



守，杭州有潘原明屯守，与平江成犄角，屏障平江。如直攻平江，"若天麒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起，难以取胜。若出兵先攻湖州，剪其羽翼，然后进攻姑苏，必可稳取。"[37]

战争经过表明，朱元璋的见解是正确的。张军在淮东败后，士气低落，乘胜进攻，不给张军以喘息机会，可以节时省力。在作战指导上，仍采取去其肘翼，孤立腹心的办法，可以破坏张军互相应援的布局，易于奏功。

元顺帝至正二十六年（宋龙凤十二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仍以徐达、常遇春为帅进攻苏南、浙西，再次告诫将士，破城后不能烧杀，甚至连张士诚母墓也不准毁坏。八月，徐达、常遇春率大军二十万自应天出发入太湖，扬言攻平江，实则向湖州进军。朱军在粉碎太湖诸岛张军的抵抗后，突然前出到湖州城下而围攻之。张士诚忙派吕珍、朱暹、五太子等率军六万，去援湖州。吕珍等进至湖州以东的旧馆，不敢再进，筑寨而守。徐达派兵切断了吕珍的退路，连筑十垒，把湖州、旧馆都孤立了起来。九月，朱元璋又命李文忠自严州向抚州进军，以牵掣杭州张军。十月，徐达率军向旧馆张军发起进攻，全歼吕珍等六万人。十一月，湖州张军守将李伯升开城出降。朱军李文忠率水陆军攻占桐庐、富阳、余杭，声威所至，杭州守将潘原明以城降，绍兴、嘉兴也相继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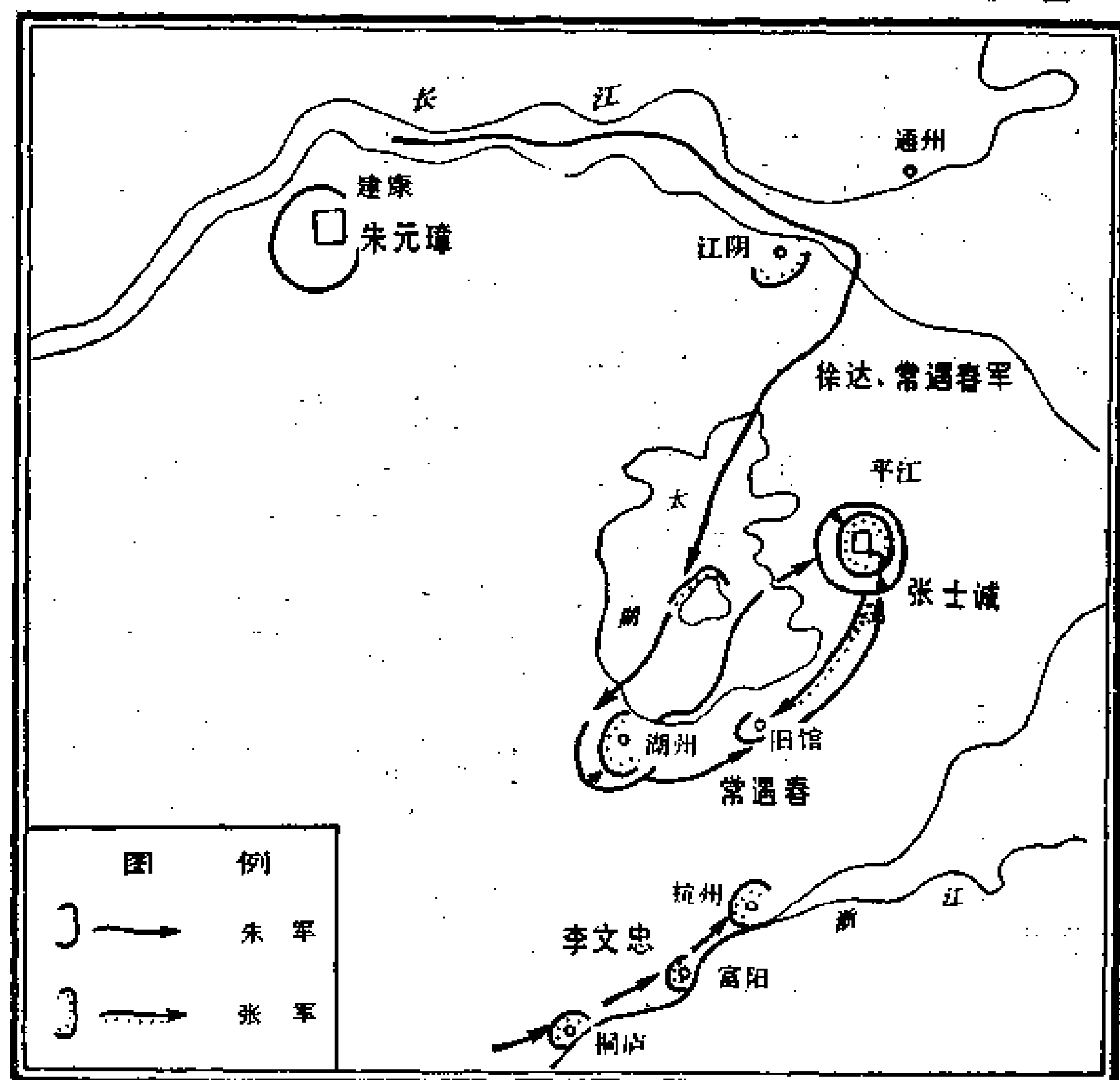
徐达率主力攻克湖州后，即转锋平江，附近郡、县都不战而降，遂围平江，张士诚凭城固守。对平江的攻取，朱元璋命徐达采用叶兑早先建议的"锁城法"，即"城固难以骤拔，则以锁城法困之。于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别筑长围，分命将卒四面立营，屯田固守，断其出入之路。"[38]徐达军据此在四面筑长围，又架木塔与城中塔齐高，筑敌楼三层，可瞰制城中，置弓弩、火铳于其上，又设襄阳炮轰击，城中军民震惊。张士诚不甘心失败，凭坚固守，相持数月不下。朱元璋乃授权徐达说：

"将在外，君不御，古之道也。自后军中行事，将军便

宜行之。”〔39〕

徐达遂改“锁城法”为力攻，张军无力抵御，几次突围均未成功。最后平江为朱军攻破，军民降者二十万人，并生俘了张士诚。随后朱元璋又派汤和、吴桢往讨盘据浙东的方国珍。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公元1367年）方国珍投降，朱元璋实现了统一长江中下游的目的。

朱、张军平江决战示意图　（28-6图）



朱元璋统一长江中下游的胜利，为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胜利，除政治、经济原因前已述及外，从军事角度探

讨，首先在于战略决策适合形势，先陈后张的作战目标选定合宜。朱元璋对敌情和敌帅个性了解深刻，认为先打陈友谅，张士诚不敢轻动，可以避免两面作战；反之，如先东后西，陈友谅会全力来袭，就难以避免两面作战；再者，两敌相比，威胁较大的是陈友谅，居上游形势，且不断进攻朱军边境，是较危险的对手，先打击它，也是势所必然。取胜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根据地巩固，可攻可守，人力、物力丰富。此外统一长江中下游诸役的胜利和朱元璋善于亲自指挥，敢于冒险犯难，纪律严明，内部团结，也都是取胜的原因。

三、北上灭元，统一全国

（一）战略方针和部署

朱元璋在统一长江中下游后，政治、经济上注意改革元朝弊政，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减少人民负担，以收揽人心，为北伐作好充分准备。南方虽尚有福建陈友定、两广何真效忠元朝，明升(明玉珍子)割据四川，但对朱元璋威胁不大。此时，元统治集团内争不已，关中诸将推李思齐为盟主，以反对扩廓帖木儿及孛罗帖木儿，兵连祸结，元帝更加腐化，醉生梦死；扩、孛之间，也为争权而不时争斗。元朝已四分五裂。

朱元璋分析当时形势，判定北上灭元的时机已经成熟，决定采取以一部兵力继续攻打福建、两广，主力立即挥师北伐，一举肃清南、北元军以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朱军此时已为全国最大的武装集团，地盘最大，兵力最强，也较得人心；在新胜张士诚之后，士气旺盛，具备了北伐的条件。朱军将领、谋士对朱元璋的战略方针都很赞成，惟在北伐的战略指导上，有不同设想。常遇春主张直捣北京大都，认为：

> “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可挺竿而胜也。都城既克，乘胜长驱，余皆建瓴而下矣。”

朱元璋不同意常的主张，认为“元都建百年，城守必固”，

打算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第二步“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最后一步“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并计划拿下元都后，再“席卷而下”，转兵西向，略取云中、九原以及关、陇等地，使天下大定。[40]诸将都同意朱元璋的战略主张，并据此作了如下部署：

——以徐达任征虏大将军为主帅，常遇春任征虏将军为副师，率水陆军二十五万，由淮入黄河、运河进行北伐；

——命邓愈以荆襄之兵北出河南，以分散元军兵力，策应主力作战；

——命胡廷瑞以江西为根据地，继续进攻福建；

——周德兴率两湖部队，进攻两广。

此外，向全国发布檄文，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和“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政治号召，利用民族矛盾和强调纪律来争取中原汉族人民对战争的支持。又揭露各割据势力是“假元号以济私”，是人民的巨害。同时还强调对各民族同等看待，蒙古、色目虽非汉族，“愿为臣民者”[41]都和汉族人民一样看待。

出兵之前，朱元璋召谕各将，鼓励慰勉，并指出他们的长处和不足之点。如认为徐达“持重有纪律，战胜攻取，得为将之体”，但指出必须“专主中军，运筹决胜，不可轻动”，还要他体会“将在军，君不御者胜”的道理；认为常遇春“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但顾虑他容易轻敌，指出曾亲见“遇春才遇数骑挑战，即亲出赴之”，劝诫他不要与“小校争能”等等。

出兵之前，又一次申明纪律，谕将士军行所至和破城之时都要“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42]。

朱元璋对北伐时机的选择，可以说是抓住了战机，战略方针也是对情况深入分析、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因而切合当时形势。

其具体部署，措施比较细致，特别是发布檄文，既有利于收附人心，也鼓舞了士气。他善于用将，重视教育将士，一再重申纪律，有力地保证了作战的胜利。在战略步骤上，他仍坚持一贯的去其肘翼、再擒腹心的指导思想，置自己于不败之地，避开了顿兵坚城师老兵疲之害，充分体现了他用兵持重的特点。

（二）决战胜利，全国统一

朱军的北伐，是完全照预定计划进行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徐达督诸军北进。盘踞在山东的元军，其指挥中心在益都（今山东益都），南托泰山、北依渤海，占有地利，但兵力分散，战力、士气都差。朱军的进攻，原可有两个方向，一是经沂州（今山东临沂）直取益都；一是由徐州北攻济宁（今山东巨野），济南，再东向益都。徐达考虑沂州守将王宣有可能争取，乃以主力经沂州北进，另以一部出徐州北上以掩护主力翼侧且牵掣元军。徐达率军克沂州后，莒（今山东莒县）、密（今山东诸城）、海（今江苏连云港市）各州县相继归降。朱元璋及时指示徐达：

> 闻将军已下沂州。如向益都，当遣精锐扼黄河要冲，断其援兵，可以必克。若益都未下，即宜进取济宁、济南。二城即下，益都、山东势穷力竭，如囊中物矣。”[43]

徐达按朱元璋的指示，派精锐往扼黄河（指黄河故道，即大清河）要冲，以一部由徐州攻东平（今山东东平）、济宁，自己率主力直攻益都。元军山东主帅普颜不花不能守，战死，朱军遂克益都，俘获士马具粮均以万计。济宁、济南也相继攻下，山东郡、县非逃即降，不及三个月，山东就平定了。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明太祖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建康称帝，国号明，建元洪武。二月，徐达率军经济宁溯黄河进攻河南，邓愈自荆，襄向河南策应，迫降了汴梁元将王保保之弟脱音帖木儿所部五万人于洛水北塔儿湾（河南偃师境），进占洛阳。嵩今河南嵩县）、陕（今河南三门峡市）、陈

（今河南淮阳）、汝（今河南临汝）各州相继攻下，元将李思齐、张思道弃潼关避入关中，明将冯国胜乘势抢占潼关、华州。至此，第二步作战计划宣告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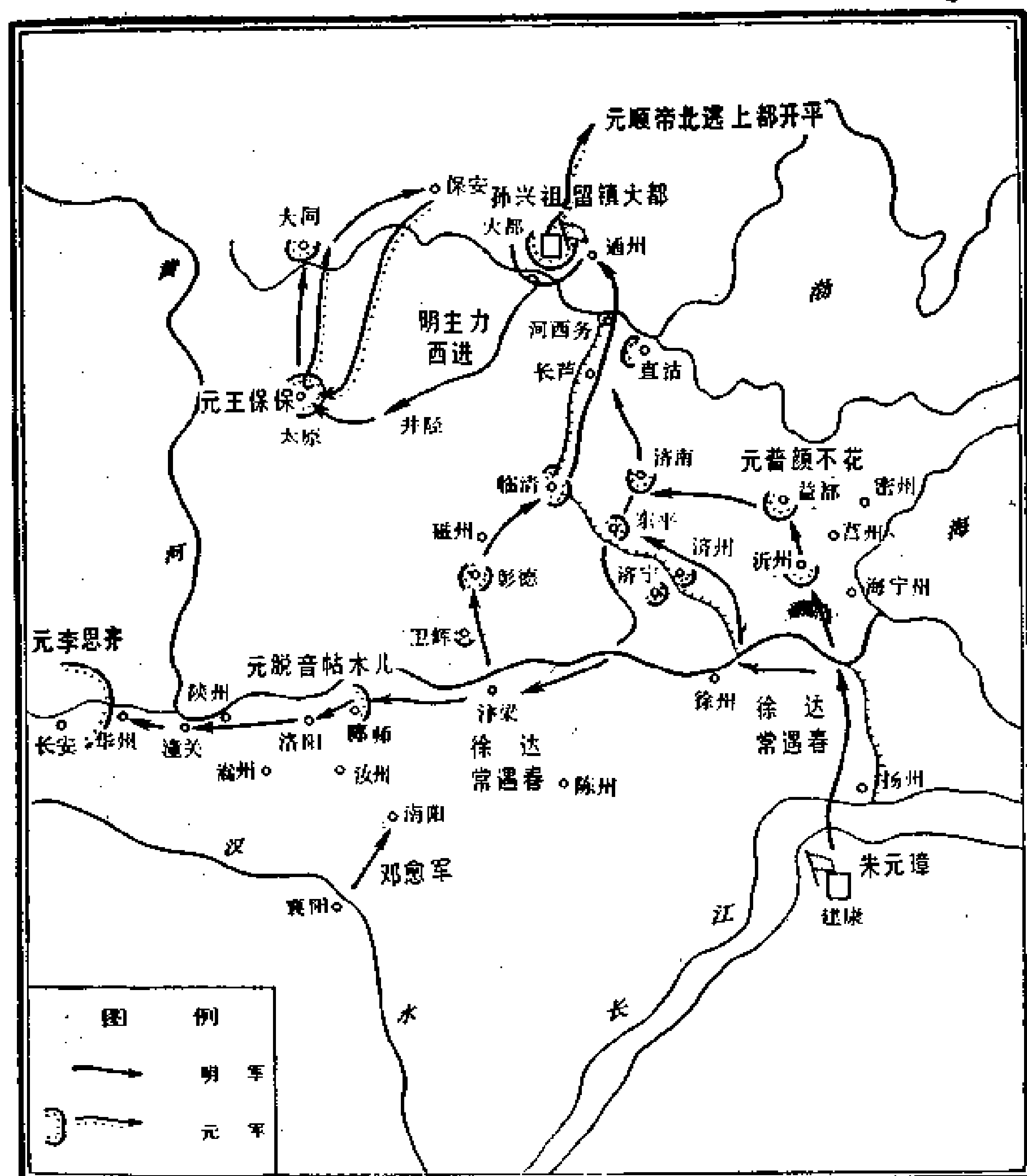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四月，朱元璋亲到汴梁，部署最后一步战略行动。此时元将王保保在太原观望，李思齐等避入关中，大都已无外援，南方明军已下福建，占领广州。徐达建议乘胜直捣元都，朱元璋表示同意，但指出：

> "北土平圹，利于骑战，不可无备。宜选裨将提精兵为先锋，将军督水陆之师继其后，下山东之粟以给馈饷，由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趋赵（今河北邯郸），转临清（今山东临清）而北，直捣元都。彼外援不及，内自惊溃，可不战而下。"[44]

朱元璋还指示攻下大都后，不要追击，但应防其回扰。

同年七月，徐达按朱元璋指示，以大军自汴梁渡黄河，连克卫辉（今河南汲县）、彰德（今河南安阳）、磁州（今河北磁县）、邯郸，转向临清。该地为卫河入运河之口，是历来船运北方的集散地。明军由临清水陆并进，攻占长芦（今河北沧县），控制了直沽（今天津市狮子桥西）出海口，沿北运河继续前进，大败元军于河西务（今河北武清东北），攻占通州，歼元军万余人，进逼大都。元顺帝仓促率后妃子女出居庸关逃奔上都开平（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八月初明军占领大都，并派兵分防长城各关隘。九月，留孙兴祖守大都，徐达、常遇春率主力经井陉（今河北井陉）、平定（今山西平定）向太原进军。太原元守将王保保原拟出雁门入居庸，进袭大都，行至途中，闻明军入山西，又急忙回救，于是两军在太原遭遇。明军乘夜袭之，俘敌四万人，王保保仅以身免。明军占太原、大同后，继又进军陕甘，并几次出兵漠北，追击残余元军。元朝九十多年统治，终于被推翻。随后，明军又进军西南，消灭了四川、云南的割据势力，朱元璋统一中国的大业宣告完成。

明军北伐决战经过示意图　（28—2图）



朱元璋取得北伐和统一全国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既有有利的客观条件，也作了积极的主观努力。有利条件主要是元朝在农民军沉重打击下，已四分五裂。其他各武装集团，有的互相争夺，有的只图割据自保，为明军各个击破提供了机会。在主观努力方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争取到人民的积极支持。元朝政治腐朽，对广大人民既有阶级压迫，又有民族压迫，失尽人心，所以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军后，所到之处，注意废除元朝苛政，努力发展生产，减轻赋税，改善人民生活。又强调军队纪律，对人民骚扰较少。且人民久经动乱，渴望统一过安定生活，故人民普遍支持朱元璋的统一战争。

2. 着眼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这是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朱元璋早有谋天下之志，但并不盲目地攻城略地，而是先建立和开拓巩固的根据地，以积蓄力量。当条件成熟时，才开始兴兵，因而物资丰富，军队精练，得以每战必克。

3. 战略方针，作战指导和部署正确。朱元璋对统一战争的战略方针以及作战指导和部署，都建立在充分掌握情况，正确分析情况的基础上，从战略方针到战役指导都积极主动而又稳妥，故能在群雄逐鹿、强手环伺的形势下，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走一步，成一步，打一个，歼一个，按预定方针逐次击灭对手，最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

4. 内部团结，将士用命，士气高昂，是战争胜利的另一重要因素。朱元璋所属重要将领，多是其乡里故旧，加以朱元璋善于用将，故团结较好，作战时个个奋勇。朱元璋对军队赏罚分明，也比较体恤士兵疾苦，因此军队具有高昂的士气。

第四　朱元璋在政治、军事上的特点

朱元璋出身贫苦，曾因衣食无着，当了和尚，流亡四方。所

以他深知民间疾苦，了解中原地区的山川形势，这对他以后在政治、军事上的活动，都有重大影响。

朱元璋读书不多，但他好学不倦，善于接受统治阶级的政治经验和教训，进军江南前后，接纳了不少地主阶级文士，虚心向他们请教，所以很快就能精通兵法、谋略，再经过战争的实际锻炼，就成了确具一定政治、军事才能的统帅之才，从而指导了统一战争的胜利。他在政治、军事上，确有一些特点：

一、政治方面

（一）重视争取民心

朱元璋十分重视收揽人心，这是因为他善于接受历史教训，他本人又出身穷苦，体会过劳动人民的痛苦，对人民较为同情。他曾带着儿子到建康郊区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对他儿子说：

> "汝知农之劳呼？夫农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户，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居处食用，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利，用之有节，使之不苦于饥寒。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堪命矣。"〔45〕

（二）重视广收人才，为其所用

朱元璋集团文臣、武将，人才济济，在建国战争中起了重大作用。他的主要将领，多为濠、滁起兵时乡里故旧。如至正十三年（公元1363年），他与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濠向外求发展，其中濠十六人，定远五人，五河二人，怀远一人，以后多为名将，是朱元璋军事上的主要助手。其中以徐达、常遇春战功最大。以后随着形势发展，降将也予重用。对网罗地主阶级文人，朱元璋更有突出表现。下滁州时，他就收用了冯国用、国胜兄弟及李善长。进军江南后，又收罗名儒朱升、陶安、刘基、宋濂、胡琛等人，他们有封建统治的经验，有谋略，襄助朱元璋对政治、军事出谋划策，各有不同成绩。其中，朱元璋对李善长最为信任，委

以后方重任，战后评功居第一，赞扬他“给军食，功甚大”“制词比之萧何”[46]。刘基是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朱元璋对他信任备至。朱升“缓称王”的建议，使朱元璋长期利用起义军招牌，隐晦了夺取全国统治权的企图，求得稳步发展，后发制人，终于建立了大明帝国，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他文士对制定典章，建立封建秩序，进行舆论工作，都各有不同贡献。

（三）运用攻心战略，瓦解敌军

朱元璋善于用攻心战略瓦解敌军，对所俘将兵，听任去留，不加杀戮。如鄱湖之战，陈友谅尽杀所俘朱军，而朱却悉数放返，并医其伤者，悼其死者，陈友谅很多部将不战而降。

（四）重视制造舆论，孤立敌人

为了孤立敌人，安定人心和争取人民支持，朱元璋很重视舆论工作。每兴兵，都根据不同对象，发出檄文。如讨张士诚时，檄文中宣布张的罪状，以争取苏南、浙西人心，孤立张士诚。又如北伐时，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号召，以鼓舞民心士气，合力灭元；另一面又宣布对蒙古、色目人的政策，以减少敌对情绪。

（五）善于运用谋略

这主要表现在朱元璋始终打着“龙凤”年号，打着起义军招牌，搞自己家天下的活动，以减小目标，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史学界对朱元璋此举，颇多议论，但作为战胜对手的谋略，此举对统一战争的胜利，无疑起了很大作用。又如当西击陈友谅时，他拉拢方国珍，稳定张士诚，麻痹北方元军；东攻张士诚时，争取四川明玉珍保持中立，使方国珍不出兵助张，都是策略运用的成功。但当张士诚攻安丰时，朱元璋为救安丰，怕两面受敌，曾想向元军求降；南下渡江攻太平时，为鼓舞士气，准破城后“抢掠”，而又暗嘱将领，有抢掠者杀之，这些作法，有失人心，是不可取的。

二、军事方面

（一）注意掌握军权，注重军队训练和军纪

朱元璋既有图天下之志，深知军队和军权的重要，一开始就注意掌握军队。除亲自选将、任将外，把军队交给自己的亲信统率，如徐达是他多年共患难的乡里之交，授以大将军印，主持出征，亲侄朱文正、外甥李文忠都分担方面重任，所以军权高度集中，实际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为了提高军队战斗力，他很注意军队的训练和纪律，常亲自到军中督训和检阅，治军严格，如有犯军纪者，亲信也不放过。如高邮之役，冯国胜受骗，致康泰等数百人被杀，朱元璋召国胜面责，打他十杖，令步行回营。徐达军攻常州不力，自徐达以下都各降官一等。其侄朱文正在南昌所为不法，也不稍宽贷。因而朱军能成为当时军权集中、号令一致、军纪严肃、战斗力强的一支军队。

（二）遇事有胆略，敢于冒险犯难

这一特点在对陈友谅江东桥、鄱阳湖两战中，表现尤为突出。江东桥大战时江南粗定，朱军尚未经过大战，在强敌骤至的情况下，朱元璋临危不惧，敢于背城一战；在鄱阳湖之战中，他能够抓住陈友谅不攻应天而顿兵南昌的战略错误和陈军船大水浅、离江入湖的有利战机，当机立断，进据湖口，与陈军决一死战，从而一举击败了强敌陈友谅。

（三）积极主动而又稳步发展

这是朱元璋战略运用战役指导的重大特点。朱元璋及时渡江，抢据应天；乘陈友谅战略失误，顿兵南昌，决心与之决战；以及破张士诚后立即挥师北伐等等，都体现了战略上的积极主动。但同时他用兵持重，从不急于求成。他善于运用各个击破战略，逐次消灭敌人；惯用先取肘翼，后攻腹心的作战指导，以稳操胜算、避免旷日持久。统一长江中下游的战略方针是这样，击张士诚的作战指导是这样，北上伐元也同样用此战略，都获得了成功。先取肘翼，可以破坏对方凭借中心坚城，与四方要点互相

应援的布局，避免陷入顿兵坚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体现了稳步求胜，确有独到之处。《明史·太祖本纪》说他“能沉几观变，次第经略，绰有成算”这是很恰当的。

（四）亲抓关键，力求必胜

朱元璋对重要战役，不仅自己策定作战计划和部署，且往往亲临指挥。以后因战区扩大，虽常委派徐达、常遇春为统兵元帅，但对战争过程中的关键性问题，都是亲自给予指导。如益都之役指示徐达派兵扼黄河渡口；夺取河南后，为部署北攻大都，他又亲至汴梁指挥、部署。

（五）善于运用舟师和水陆协同作战

朱元璋根据地在江南，必须依赖长江、运河向各方实施战略机动，且江南水泊交错，因此舟师作用突出。在进军和补给上，利用水路也比陆路快而省力。击陈友谅，全靠水师；灭张士诚，则水陆并用；北上灭元，舟师经淮入河，也做到水陆并进，迅速合围大都，使元顺帝仓促弃城而逃。

（六）有计划地补充兵员和军队供给

朱元璋在江南建立根据地后，即实行屯田制度，要求“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47〕。另简选丁壮，且耕且战，编为民兵，使“民无坐食之弊，国无不练之兵”〔48〕，因而能及时地补充兵员及军食，保障了战争的胜利。

注　释

〔1〕《吴文正公文集》卷十二

〔2〕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

〔3〕《明史·韩林儿传》

〔4〕《通鉴辑览》卷九十九

〔5〕《（嘉靖）邵武府志》卷二

〔6〕方觉慧：《明太祖革命武功记》

〔7〕《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二

〔8〕〔12〕〔13〕〔14〕〔16〕《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

〔9〕《明史·太祖本纪一》

〔10〕《国初群雄事略》卷一

〔11〕 《明史·冯胜传》
〔15〕 《明史·朱升传》
〔17〕〔18〕 《明太祖实录》卷六
〔19〕 《明史·刘基传》
〔20〕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21〕 《国榷》卷一
〔22〕 《国初群雄事略·汉陈友谅》
〔23〕〔25〕 《明史·刘基传》
〔24〕〔26〕 《明通鉴》前篇卷三
〔27〕 《明史·刘基传》
〔28〕 《明通鉴》前篇卷二
〔29〕 《续资治通鉴·元顺帝至正二十三年》
〔30〕 方觉慧：《明太祖革命武功记》
〔31〕〔32〕〔33〕 《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34〕〔35〕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太祖平吴》
〔36〕 《明通鉴》前篇卷五
〔37〕 吴宽：《平吴录》
〔38〕 《明史·叶兑传》
〔39〕〔40〕〔41〕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42〕〔43〕 《明史纪事本末》卷八《北伐中原》
〔44〕 《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八
〔45〕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四《开国规模》
〔46〕 《明史·李善长传》
〔47〕 《明太祖实录》卷十二
〔48〕 《明太祖实录》卷六

第二十九章　明代北部边防

第一　明代北部威胁来自蒙古贵族势力

蒙古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古族入据中原，建立元朝和以后的退居塞外，都属于中国内部各统治集团间争夺统治权的战争。在明朝统一全国后，蒙古族各贵族势力所发动的对明朝北部长期的攻扰和对明朝的多次出击，都妨碍了各族人民安定的生产，阻滞了社会的发展。

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七、八月间，朱元璋的北伐大军逼近元京大都（今北京市），元顺帝撤退到塞外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达里诺尔），明军顺利进入元京，从而宣告了元朝统治的结束。但当时从辽东半岛、黑龙江流域、兴安岭内外以至广袤的蒙古高原和西域，仍为蒙古贵族势力所控制，并以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和漠北的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作为战略基地，继续对明作战。元顺帝死后，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在明军追逼下，退据和林，历史上称为北元。这时退到和林的元大将扩扩铁木尔所部和由甘肃退据金山的纳哈出统率的近二十万兵力，成为蒙古贵族势力反攻复元的寄托。明太祖指挥明军不断进击退出塞外的蒙古贵族势力，实际上是明灭元战略进攻的延续。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明将冯胜等出击，粉碎了蒙古贵族势力的金山基地，纳哈出降明；次年，明将蓝玉等又击破北元主于捕鱼儿海（今内蒙古贝尔湖），俘其宗室、官属等七万人，北元主仅以身免，远走北方。从此，蒙古贵族势力渐趋衰弱，且内争不已，在二十余年里，六任首领都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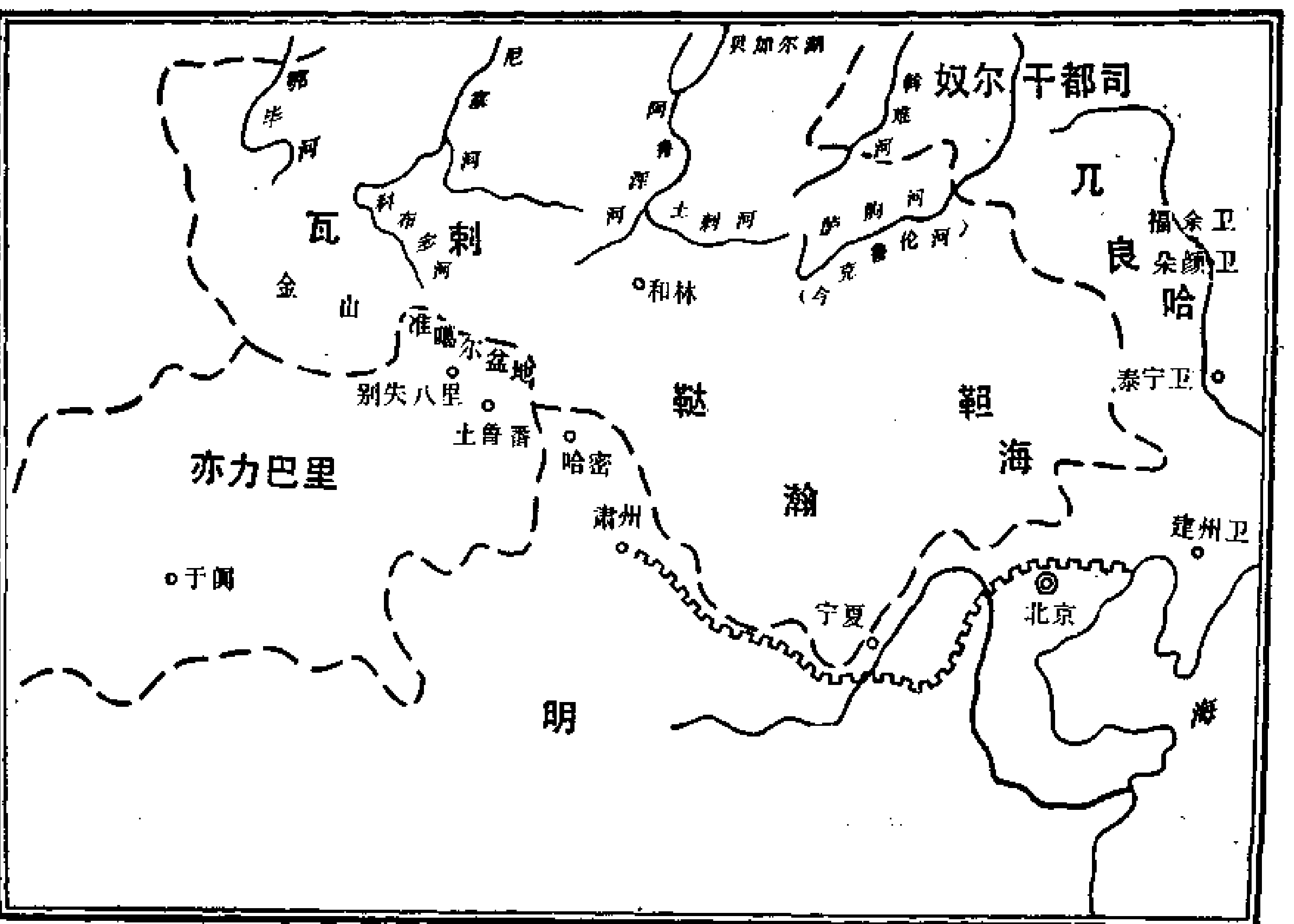
部下所杀。

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鬼力赤杀死元主坤帖木儿，废元朝国号，改称鞑靼，自为可汗，废去元朝的一切规章制度，最后结束了北元的统治。鬼力赤不是元帝的后裔，诸部不服从他的统御，阿苏特部领主阿鲁台崛起，袭杀鬼力赤，迎立坤帖木儿之弟本雅失里为鞑靼可汗。此时瓦剌部的势力有了很大发展，其首领马哈木也谋取可汗地位，于是鞑靼又分裂为鞑靼、瓦剌两部，长期进行争权夺利的战争。另一方面它们都伺机袭扰明北部辖境，严重地威胁着明边防的安全。

鞑靼是明初北部边防的主要对手，居住在蒙古高原东起克鲁伦河，北到贝加尔湖地域。由于明军的打击和与瓦剌分裂，势力有所削弱。但在明景泰五年（公元1454年）后，休养生息，逐步强盛，对明朝时叛时和。其侵扰明边境的主要战略方向，是由瀚海[1]与大兴安岭间走廊直指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鞑靼进扰时兵力常在十万骑以上。

瓦剌是蒙古族的一支，即成吉思汗时代的斡亦剌惕，其牧地原在叶尼塞河上游。术赤北征，斡亦剌惕部臣服于蒙古，以后一直接受元的分封，且与元皇室通婚。元末，瓦剌向西发展，游牧在阿尔泰山以西地区。其首领猛可帖木儿拥兵自立，称瓦剌王，据有今蒙古科布多河流域到新疆准噶尔盆地一带地区。猛可帖木耳死后，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三部分立，与鞑靼长期仇杀，并经常南下袭扰明朝边境。瓦剌势盛时，集中骑兵，也常在十万人以上，其对明境的侵扰，常是在沿瀚海南缘东进到兴和（今河北张北）附近集中，然后伺机南下。

蒙古贵族势力除鞑靼、瓦剌外，尚有兀良哈部。兀良哈即乌梁海，以元代乌梁海氏所居而得名，在朵颜山和嫩江流域游牧。当明军击败金山元军，纳哈出降明时，元朝的辽王、惠宁王及朵颜元帅相继向明归附，明廷乃就其所在地和军力，设置朵颜、福余、泰宁三卫，任其首领为卫指挥使、指挥同知等官，作为羁縻卫



明初北部边境形势示意图 （29-1图）

所，负责任明边防的外围。兀良哈三卫不断受到鞑靼的打击和勾结，一面归附明朝，一面又袭扰辽东甚至蓟东等地，因而也是明朝边患之一。

蒙古贵族势力自分裂后，虽未形成统一的军事力量，但对明时附时叛的情况长期存在，构成对明朝北部边防的严重威胁。

第二　朱元璋的民族政策确定了对蒙古各部的战略防御方针

明代对蒙古各部一直采用战略防御方针，这是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所确定的。朱元璋建国后，对民族歧视政策有所改善，对逃出塞外的蒙古族各部采用"羁縻"和分而治之的政策，以求边区的安定。各少数民族只要愿归附明朝，在政治上和汉族人民同等对待。早在朱元璋北伐的檄文中就宣告：

"……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仪，愿为臣民者，与中华之民抚养无异。"〔2〕

因而，当元顺帝北逃后，大量蒙古、色目人留居中原，从事各项工作和劳动。对一些没有生产工具和失去依靠的蒙古人，还把他们迁住在北京附近，以从事农垦。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一次就迁徙了三万二千八百多户，并允许他们和汉人通婚，一起生产劳动。其后，又把一些归附的元军官兵安排到南京，选其精壮为"驾前先锋"，以示信任，对其中上层分子，还留朝任用。可见，明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各居边境，永安生业"。〔3〕朱元璋怕其后世不遵循他的民族政策，还在其《皇明祖训》序言中昭示：

"……四方诸夷，皆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成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以

于天和，此甚不可。”

朱元璋这段话，表明他对边境少数民族采取的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由此确立了战略防御的方针。对这一方针，朱元璋曾概括为“修武备，谨边防。来则御之，去不穷追”[4]。明代历朝边防，始终贯彻了这一方针，只是由于形势发展和具体情况不同，执行的方法有所差异而已。如朱元璋采取过在塞前歼灭来犯之敌的战略计划，朱棣采用了以攻代守的战略。从政治上说，“华夷一家”的民族政策，有利于各民族的生产和发展，这一政策当时在内地已收到了明显的效果。邱浚曾形容其情况说：“国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处诸州者，都已更易姓名，杂处民间”，“久之固已相忘，而亦不易识别之也。”至于“羁縻”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是针对当时蒙古各族仍在继续骚扰和威胁北部边境的情况和基于“彼势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矣”[5]的认识而制定的，以防止蒙古各族兼并扩大而增加对边境的威胁。这一政策在朱棣（成祖）时期运用较为成功，如兀良哈三卫在“靖难之役”[6]中立过战功，对牵掣鞑靼、瓦剌也起过一定作用。又如朱棣在对蒙古贵族势力整个作战过程中，始终采取分化、孤立，扶弱抑强的办法。朱棣为了孤立鞑靼，封瓦剌的几个首领为王（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许其入贡互市；当瓦剌势力有所发展，鞑靼被其击败，其首领阿鲁台被迫降明时，朱棣也封阿鲁台为和宁王。

就军事方面来说，根据当时形势，也只能采取防御战略，因为：

1. 明处于建国初期，内部需待巩固。

2. 蒙古族占有大漠南北广袤地域，回旋余地大，统治根基深，不是单靠军事手段可以解决的。

3. 塞外作战，主要靠精骑，明朝起自江南，“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全国“可战之马，仅得十万”，[7]尚无大规模骑兵作战的条件。

所以，明朝采用战略防御的方针是适合当时情况的，是正确

的。

第三　明初边防的战略部署和措施

在确定对北方蒙古贵族势力采用战略防御的前提下，朱元璋、朱棣父子运用争取归附，加强战备的策略。在政治上主要是遣使通好，崇以高位（先后封各蒙古贵族势力首领为王），并允许贡市，并广设羁縻卫、所，安置归附的蒙古族官兵，目的在求得对他们的松散的统治。在军事上，其主要部署和措施如下：

一、由王子守边到天子镇边

这一部署最足以说明明代对边防的重视程度。朱元璋认为："自古重边防，边安则中国无事，而四夷可以坐制。"〔8〕他即位之后，分封诸子为王，为防蒙古贵族势力卷土重来，命他们各率重兵，镇守北方：燕王朱棣镇守北平（北京市）；宁王朱权镇守大宁（内蒙古宁城西）；谷王朱橞镇守宣府（今河北宣化）；代王朱桂镇守大同；晋王朱棡镇守太原。其中以朱棣兵力最强，权力颇重。朱权也拥有精兵，史籍中描述他"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骑兵，皆骁勇善战"〔9〕。当然，朱元璋在建国之后，疑忌功臣，不愿将兵权委之异姓，也是分封诸子为王的原因之一。"靖难之役"后，朱棣即位，他鉴于诸王掌兵之害，收回了诸王的兵权，有些藩王则移到内地安置。他对北部边防更为重视，把首都迁到北京，由王子守边发展到天子镇边，对整个明代抗击蒙古势力南下，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靖难之役"朱棣是从北京起兵登上皇位的，燕地是他基础所在，迁都北京也是为了巩固其统治。

二、改革军制，加强军力

朱元璋建国后，对军制作了重大改革，即实行卫、所制。这是吸取隋、唐府兵制经验结合明初具体情况而制定的一种新军

制，使兵源、粮源、防务结合为一体，士兵出自军户。边疆卫所，三分守备，七分屯田；临边险要，守多于屯；僻远输运困难的地区，屯多于守，各依情况而定。这样，兵役成为世兵制，明初军户约有二百万户，每户出兵作一人计，就保障了全国经常维持有二百万军队，可以满足边防和其他方面的需要。卫、所屯田，不仅能自给，还有富余。

卫、所的设置，与防务相适应，“度要害地，系一郡者设所，连郡者设卫”。卫的兵力为五千六百人，设指挥；每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人，以千户为长；千户下辖十个百户所，以百户为长；百户下设两总旗，每总旗辖五小旗，每小旗有士兵十人。明初，全国有“内外卫三百二十九，守御千户所六十五”[10]。

明初，除王子、天子镇边外，还以重兵备边，在中枢设左、右、前、中、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卫、所军队。后军都督府辖大宁、万全、山西、陕西诸都司及山西行都司和北直诸军，均为备边军力。当时北部边防兵力约占全国兵力的二分之一，约有一百多万，有卫二百五十余，所近九十个。朱棣即位后，在京师禁军之外，又设京军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五军营分步、骑兵为中军，左、右掖，左、右哨；三千营是由兀良哈部所选三千精骑组成；神机营是装备有火枪、火炮的火器部队。三大营既是京军的主力，也是北部边防的机动兵力。每当朱棣亲征时，朱棣居大营，五军营围绕大营驻扎，步兵在内，骑兵居外，神机营又居于外，神机营之外是长围，形成方阵。这种部署，是热兵器开始大量出现于战场时，步、骑和火枪、火炮协同作战的一种新战法。

三、高筑城垒

明代为了备边，修缮了长城，并规定边防驻军，都要筑城防守，设高墙以防敌，建房舍以屯兵，一般还要求有存粮、修械的设施。高墙要求能居高临下，以便于观察、射箭。下墙设隘口，以利交通和射击。明初，明的军力和蒙军对比处于优势，仅限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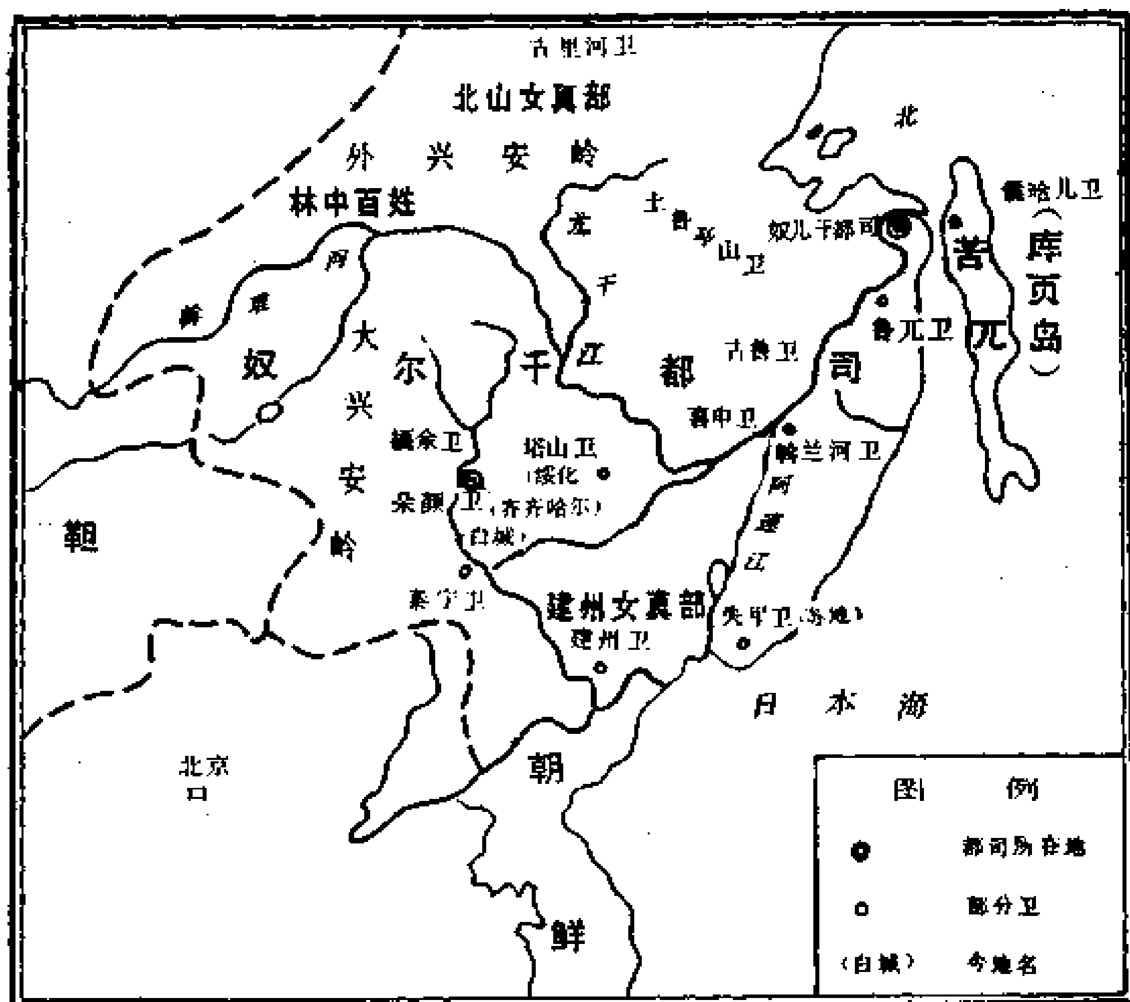
对长城的修补和屯军建筑营垒；到明的中后期，瓦剌、鞑靼入侵的次数增多，规模逐渐扩大，明朝曾多次加固、增修长城及加强沿边工事。成化九年(公元1473年)余子俊请增筑偏西一段长城，长约一千七百余里。到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近百余年间，长城先后大修十八次，使长城总长达六千七百余里，做到了五里一堡，十里一屯，烽火相接，攻守可以互相支援。自山海关至鸭绿江边，还筑有蜿延不断的边墙，以防女真向西发展。

四、建立奴儿干都司及哈密卫，巩固了北部边防的战略两翼

朱元璋、朱棣父子对北部边防的战略两翼极为重视，在对蒙古用兵过程中，就着手经营。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朱元璋将在金山降附的蒙元残部安置在兀良哈，设泰宁（今黑龙江白城市一带）、朵颜（今黑龙江安达市一带）、福余（今黑龙江齐齐哈尔市一带）三卫，既可羁縻蒙元残部，又可保障北部边防的右翼。以后朱棣进一步深入女真所居地区，成立建州（今辽宁新宾西南）等卫。不久将在东北的羁縻卫所统一在奴尔干都司管辖之下，其卫所分布在整个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东至苦兀（库页岛），北至黑龙江以北广大地区，都司治所设在奴尔干城（黑龙江入海处,奴儿干都司的建立,进一步巩固了北部边防的右翼,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开发和东北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朱元璋在灭元战争中，无力西顾，对西域各民族，只有遣使修好，多给钞币，目的在切断西域各族与蒙古贵族势力的连系，减轻左侧背的压力。朱棣即皇帝位后，加紧对西域的经营。哈密的安克帖木儿遣使来朝，朱棣封他为安顺王。明廷几次遣使出西域以至中亚，都得到哈密的护卫。瓦剌、鞑靼一度插手哈密，由于明朝的经营，未能得逞。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明朝正式建立了哈密卫，并以汉人辅佐安顺王脱脱（安克帖木儿为鬼力赤所杀，由其子继任）。哈密卫的建立，切断了蒙古贵族势力与西域的联系，保障了明王朝北部边防的左翼，成为西陲重镇和控制西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中心。

奴尔干都司辖区示意图　（29-2图）



五、改进兵器，建设骑兵，重视训练

明初，由于手工业和冶炼技术的发展和进步，改进了一些兵器，提高了军队战斗力。永乐年代，火器多以赤铜和生铁铸成，据《明史·兵志》记，枪炮"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神机枪不能连发，所以其枪手以五人为一伍，一、二人负责用枪，三、四人负责装药，射程可以达到百步以外。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朱棣还规定自开平到怀来、宣府、万全、兴和一线，所有山顶，都要预置五个炮位，以增强边境的防卫。

因为作战对象是蒙古骑兵，所以明积极推行马政，以建设骑兵。初设太仆寺专管马政，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先后在陕西、甘肃设苑马寺，又令人民普遍养马，规定每五户养马一匹，每年上交国家马驹一，江南则十户养马一匹。其后又计丁养马，即十五丁养马一匹，十六丁以上养马二匹；有事就征发，每七户出马一匹。进而又规定北方每五丁养马一匹，可免半年田赋，沿边卫所，各军户均养马一匹，租粮全免。这样大力推行马政的结果，使明廷的骑兵大有增强，在对蒙古贵族势力作战中，起了一定作用。

明代对军队训练的重视和要求，也超过其前代。为培养军事人才，规定府、州、县都要办武学。明廷所设国子监（太学），也是培养文、武人才并重，并在科举中设武科，以选用将才。对军队训练除要求各级负责督饬教练外，还制定"京操"制度，皇帝亲自检视军队训练情况。

六、疏通运河，保障南粮北运

明代军屯，虽然保障了军食，但因征战频繁，影响了屯种；二是大规模用兵，仅靠当地粮食，不敷所需，故朱元璋、朱棣父子很重视南粮北运问题。为此，疏浚运河，以保持一条自南京到北京的漕运线，并设专门的机构去管理。这条南北长约两千多里的漕运线，与东西数千里的北部边防线形成直角，其交会点在北京。漕运线和边防线的关系，如同人身的大动脉，如果没有它，边防线就失去了生命力。另外，还设法利用海运和陆运，有专门担任运输的军队和船只。朱棣用兵漠北时，还使用过数以万计的武刚车和骆驼，以担任粮运。明代，军队补给，平、战时都由户部担任。朱棣用兵漠北时，户部曾放弃一切工作，专力于战事的输运、补充。这说明明代对及时补充前方军食的重大战略意义，已有充分的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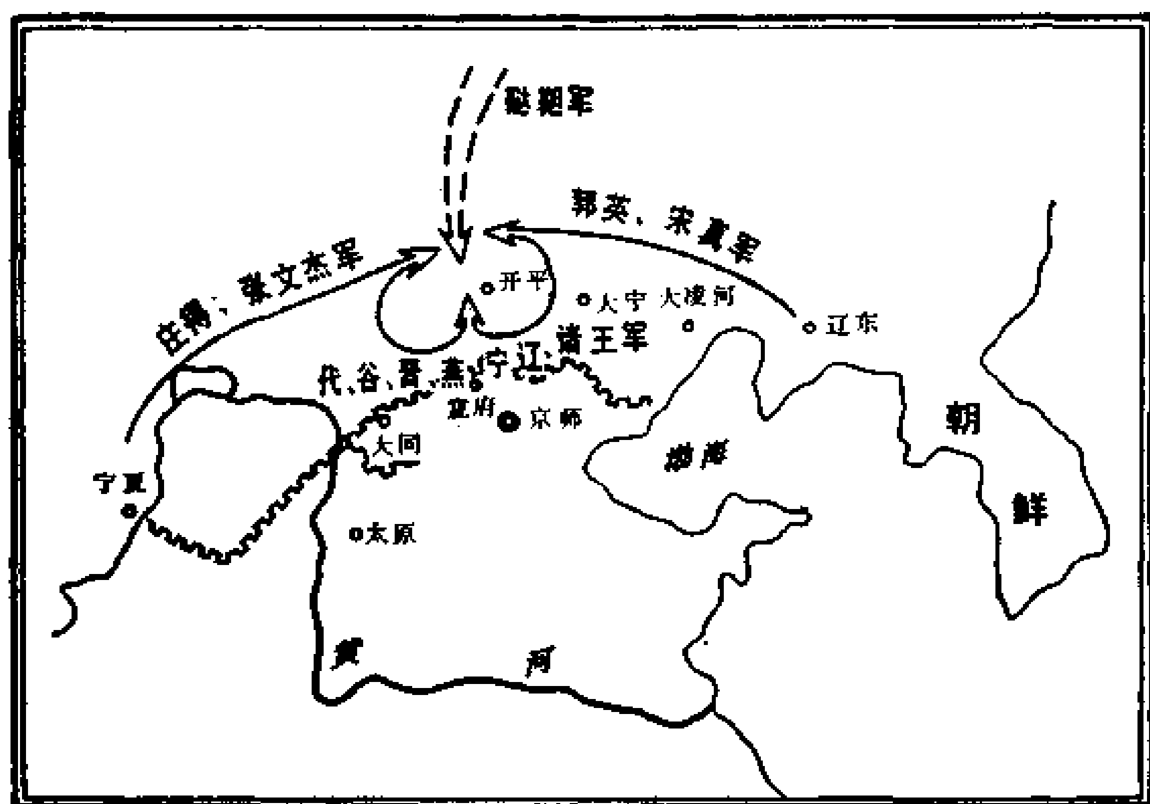
以上部署和措施，对明初巩固边防和出军作战，都起过极大的作用。

第四　朱元璋的塞前歼敌计划

朱元璋时，蒙古贵族势力经过明军的打击，虽已明显削弱，但他们仍依靠广袤的蒙古草原，蓄积力量，不断南下。为此，朱元璋积极加强北部防务，并重视塞外大宁、开平两战略据点的经营，以加大战略防御纵深，是具有远见的。朱元璋在临终前，仍谆谆以北部边防为念，曾亲授朱棣以塞前歼敌计划说：

> “北骑南行，不寇大宁，即袭开平。可召西凉都指挥张文杰，庄得、开平都督宋真、宋晟，辽东武定侯郭英等，皆以兵会。辽王以护卫军悉数北出，山西、北平亦然。令郭英、宋真翼于左，庄得、张文杰翼于右，尔与代、辽、宁、谷王居于中，彼此相护，首尾相救。兵法：‘示饥而实饱，外钝而内精。’尔实察之。”〔11〕

洪武塞前出击示意图　（29-3图）



这是一个积极的战略防御作战方案，其目的在歼敌于塞外，使明境内不受干扰和破坏。它依托塞前开平、大宁等据点，阻止并吸住来犯之敌，调集明军主力，从左右两侧实施向心突击，以聚歼敌人，体现了朱元璋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积极战略防御思想。这一计划的最大特点，是在战略防御中，以进攻的手段，求歼来犯之敌于主要防线之前，是积极防御中最有力的作战方案。这个方案虽未实施，但明军的部署和防御工事的设置都是按照这一战略企图来布置的。

第五　朱棣五次塞前出击

“靖难之役”后，朱棣取得了明朝统治权力，他一方面稳定政权，恢复经济；一方面派使持币、帛去与鞑靼修好，以求得边境安定。但鞑靼统治者仍然企图恢复元朝的统治，一面称臣纳贡，一面不断南下袭扰。这时鞑靼首领本雅失里新立不久，众心不附，且与大臣阿鲁台分权，内部并不巩固；外受瓦剌袭击，被迫迁徙到胪朐河（蒙古人民共和国克鲁伦河）一带，虽然有相当实力，但处境困难。

“靖难之役”时，朱棣曾袭取宁王于大宁，得到兀良哈三卫的相助。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朱棣迁大宁都司于保定，以其故地并给兀良哈，以酬其功，“约以为外藩，居则侦保，警则捍卫”[12]。这是战略上的一大失着。大宁一撤，开平孤立，兀良哈并非诚心归附，这就为以后的边防留下了很大的隐患。

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六月，朱棣以鞑靼杀明使者郭骥为理由，乘鞑靼处境困难，派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精骑十万，出击鞑靼。出师前，朱棣告诫丘福：用兵要慎重，出开平后，虽不见敌，也要如临大敌，“日夜严谨瞭备，敌至则出奇兵以击之”[13]。并说：“毋失机，毋轻犯，毋为所绐（骗）。一举未捷，俟再举，尔等慎之。”[14]但是丘福没有听从朱棣的告诫，

轻敌冒进，被鞑靼谍者欺骗，亲率先头部队深入敌境，被鞑靼军重重包围，全部覆灭，其主力不得不退回塞内。

丘福的失败，使鞑靼的士气大增，朱棣不甘任其坐犬，决心亲自率军出击，企图用以攻代守的战略，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自永乐八年到二十一年（公元1410—1424年）的十四年间，先后五次亲自率军出塞，其中四次以鞑靼和兀良哈为对象，一次以瓦剌为对象。前三次规模较大，后两次因鞑靼首领避而不战，无功而返。作战地区主要在斡难河（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嫩河）、忽兰忽失温（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阔滦海（黑龙江满州里东南）和屈裂儿河（内蒙古科尔沁右翼前旗境）附近。朱棣每次进军都是沿北京、开平、应昌的交通轴线。以下就五次出击概述如下：

一、第一次出击，胪朐河、斡难河之战

朱棣第一次出击，用了近半年时间准备，主要是调整部署，加强边防；选调兵马，整顿战备；作好出击粮、水物资准备。

永乐八年（公元1401年）二月，朱棣亲率京军及卫、所征调兵马号称五十万，分中军、左右哨、左右掖，合称五军，出居庸关，经宣府、万全到达兴和。鞑靼闻明军出塞，甚为恐慌，鞑靼可汗本想与阿鲁台一同向西转移，阿鲁台为避明军，却率部东去，尚未与明军接触，就造成了鞑靼的分裂。次月，明军继续前进，经答鲁城（今内蒙古正镶白旗西）、赛罕山（今内蒙古二连浩特东）、广武镇（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赛因山达东北），五月初到达胪朐河上游南岸。所经各地，均未发现鞑靼军，于是又沿胪朐河南岸东进，俘鞑靼散骑，知其内部分裂和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已西逃到兀古儿扎河（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勒吉河）的情况。朱棣遂命部队乘夜渡河，以一部兵力筑城于江边，控制渡口，自己率轻骑携二十日粮秣急进。十余日到达兀古儿扎河，知本雅失里又已北逃，遂不作休整，昼夜急进。到斡难河南岸追及本雅失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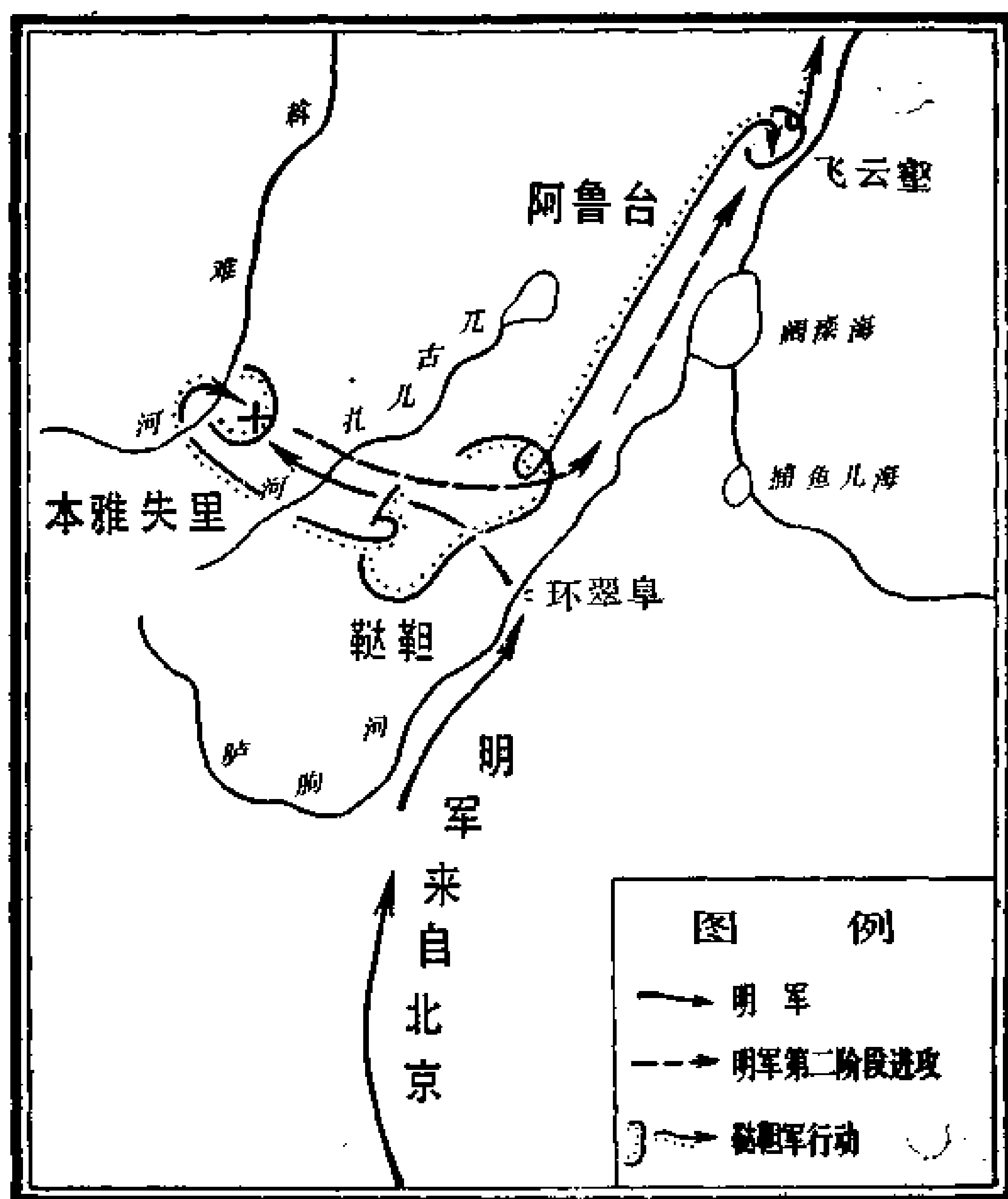
部，朱棣率军登山布阵，挥军一击，鞑靼军溃败，明军俘获无数，仅贵族男女就有百余口，本雅失里仅余七骑渡河北逃。朱棣对俘获人员不仅纵还，还给以粮食、牲畜，并招降余众加以安抚。此后，朱棣乘势东击阿鲁台。五月下旬，率军回胪朐河，沿河东进，经阔滦海北进，六月初到飞云壑（阔滦海东北），据骑哨侦知阿鲁台率部匿山谷中，朱棣越山向阿鲁台进逼。阿鲁台初有降意，但内部意见不一，犹疑未决。朱棣利用时机，先以数百骑挑战，阿鲁台以数千骑迎战，朱棣亲率精骑千余直冲敌阵，阿军大败，死伤甚众，阿鲁台仓皇北逃，明军追击百余里，并以神机枪毙鞑靼诸王以下百数十人。这时明军因水、粮两缺，将、兵多病，不得不撤军回塞，循原路回北京。

明军第一次出击，历时五个月，由于朱棣亲征，兵力强大，先声夺人，促成了鞑靼的分裂。明军虽远出塞外，但计划周密，粮运及时，保障了军事行动。朱棣身先士卒，注意掌握情况和分析情况，能够不失时机，直击鞑靼主力，因而取得了击破鞑靼主力的胜利。此外，朱棣释抚降众，对瓦解鞑靼，收附人心也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第二次出击，忽兰忽失温之战

鞑靼被明军击败后，势力转弱，阿鲁台遣使向明纳贡。此时瓦剌兴起，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瓦剌首领马哈木率部东进，击败鞑靼并杀死了本雅失里，占领了鞑靼原所据的和林地区。阿鲁台表示愿为先驱以击瓦剌。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朱棣封阿鲁台为和宁王，利用他对抗瓦剌。马哈木率军进至胪朐河，扬言进攻阿鲁台，实际上是企图南进以威胁明边境。朱棣整顿防务，调集兵力，筹措物资，于永乐十二年（公元1414年）三月，亲率马步军五十万，以瓦剌为目标再次出击。这次用兵的部署大体同于第一次出击，并命长孙朱瞻基随行。行军途中，几次休整，稳步前进。六月初，朱棣率军进至撒里怯儿（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先头部队在三峡口（撒里怯儿以北）与瓦剌军相

朱棣第一次出击
胪朐河、斡难河之战示意图 （29-4图）



遇，并将其击退。从俘获中得知瓦剌军主力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东南），离三峡口只百余里，朱棣遂率军急进，到忽兰忽失温东侧，瓦剌军据山迎战。朱棣登山侦察，发现瓦剌军兵分三部，朱棣派铁骑挑战，诱瓦剌军下山，也将明军区分成三军，分攻其三部。中军柳升率神机营，发射铳、炮击毙瓦剌军数百人，朱棣亲率铁骑乘势冲杀，迫使瓦剌军中部后退，明左军又以神机炮轰击据山抗击的瓦剌右部，给予很大杀伤。明右军与瓦剌军左部战斗激烈，相持不下，互有伤亡。朱棣乃以精骑分向左右两军增援，大败瓦剌军，杀其王子十余，士卒数千人，瓦剌军向北溃退。明军追击到土剌河，又生俘瓦剌军数千人。至此，朱棣接受长孙朱瞻基的建议，下令班师，循原路返回北京。

朱棣第二次出击，先期集中了优势兵力，并利用鞑靼和瓦剌的尖锐矛盾，较好地掌握了战机。忽兰忽失温之战，明军较好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不仅杀伤较多，更重要的是震慑了瓦剌军的士气。朱棣又控制了骑兵作为机动部队，得以在决战的关键时刻投入战斗，并及时转入追击扩张战果，击破了瓦剌军主力，取得了胜利。

瓦剌军以骑兵为主，其特点是长于在辽阔的草原上进行机动作战。但这次作战，瓦剌军舍长取短、据山固守，以致惨遭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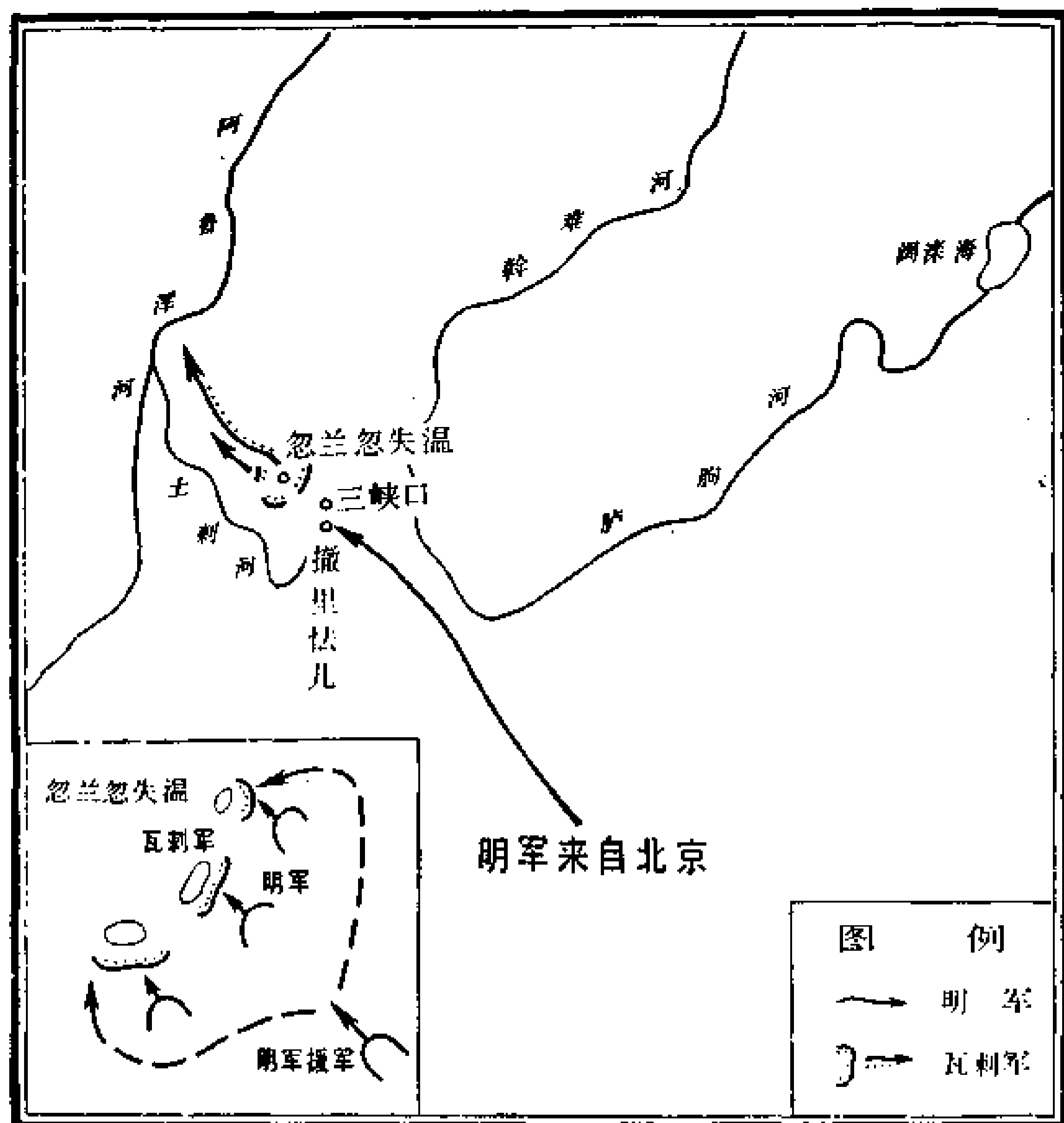
三、第三次出击，阔滦海和屈裂儿河之战

阿鲁台表面归附明廷后，鞑靼经过几年休养生息，势力有所恢复。阿鲁台趁瓦剌新败，出兵击败瓦剌，控制了兀良哈的朵颜山地区，力量日趋强大，经常侮谩明朝使者和侵扰明边境重镇。为此，朱棣一面加强边塞防守，一面转而扶植瓦剌，遣使去安抚瓦剌几个首领，使其牵掣鞑靼。而阿鲁台则勾引兀良哈部多次袭击大宁、开平、兴和等明边区重镇。

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明廷正式迁都北京后，朱棣决意第三次出击，并以鞑靼为作战对象。对此，明户部尚书夏原吉

朱棣第二次

出击忽兰忽失温之战示意图 （29-5图）



等多数大臣认为“兵不当出”，“比年师出无功。军储十丧八九，灾眚（音胜，错误之意）迭作，内外俱疲，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也力言“军兴费绌”[15]，不宜大举用兵。朱棣不仅不听，反下夏原吉、吴中于狱，方宾畏罪自杀。

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年）二月，朱棣命张辅担任运粮出

塞，区分为前运和后运，前运随军行动，分别以车辆、畜力运输；后运在大军后跟进。各以骑兵千人，步兵五千人为护运部队。前、后两运共动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余辆，挽车民伕二十三万五千余人，运粮三十七万石，沿途分别贮存。

三月，阿鲁台率军攻陷兴和，杀明守将王焕。朱棣率大军第三次出塞，直趋漠北，企图直捣鞑靼腹心。阿鲁台闻讯，乘夜放弃兴和北逃。时明军已进至鸡鸣山（今河北怀来西北），诸将建议立即追击，朱棣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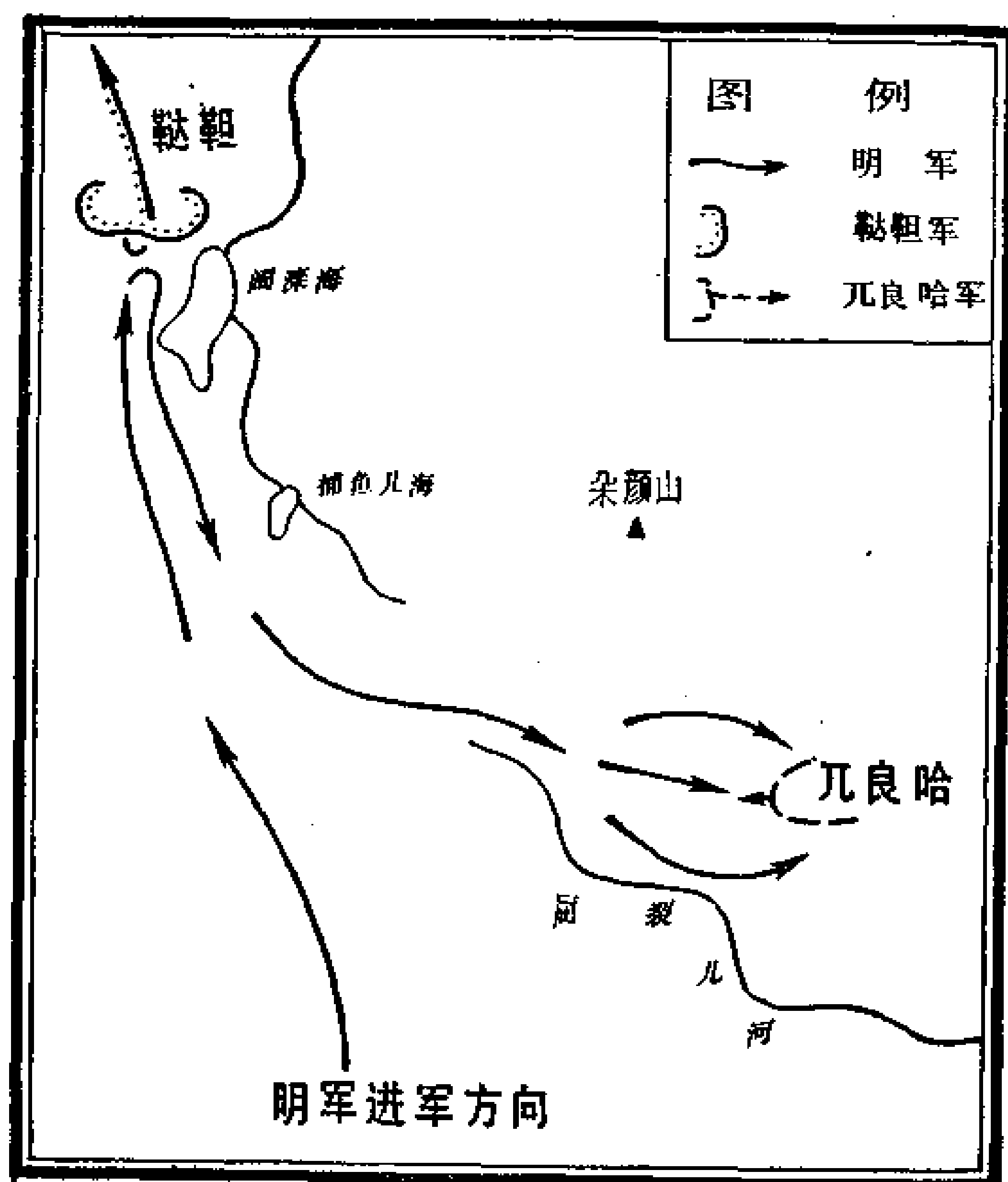
“彼非有他计，譬诸狼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徒劳。少俟草青马肥，道开市，逾应昌（今内蒙克什克腾旗西），出其不意，直抵窟穴，破之未晚。”〔16〕

四月中，明军进至龙门（河北宣化东北），得鞑靼所弃战马两千匹，复至云州（河北赤城北），略作休整，再经独石（辽宁沽源南），过偏岭（独石北）经隰宁（辽宁沽源南）到开平，复进至应昌。朱棣以应昌以北地势更平旷，为免遭袭击，令军队结方阵而进。此时，得知鞑靼兵袭万全，诸将请兵救援。朱棣认为是鞑靼的牵掣行动，不予置理，继续进军。七月初，明军先头部队进到阔滦海北侧时，阿鲁台已尽弃辎重、牲畜，远走避战，明军乃俘其牲畜，毁其辎重而返。

朱棣认为鞑靼所以敢于进犯，乃恃兀良哈为其羽翼的关系，因而在回师途中，兵分五路进击兀良哈。自己率精骑先行，主力续进，向东南越过朵颜山，进抵屈裂儿河东。适遇兀良哈军数万之众，驱牛马车辆而来，朱棣命骑兵左右夹击，自己率部队自正面冲杀，兀良哈军死伤数百人。该地为西临河东面环山的谷地，明军乃依山立营。朱棣登山发现兀良哈军散而复集，便派兵迂回其右，断其归路，又派兵出其左，并以神机铳弩埋伏于密林中。当兀良哈军突围时，四面合击，伏弩尽发，兀良哈军大溃，明军追击三十里，杀其首领数十人，俘牲畜十余万头。朱棣又派出骑兵五千，深入屈裂儿河东北山谷，击败兀良哈军的另一部，俘千

余人及大量牲畜。至此，兀良哈余部纷纷请降，明军于九月初返师回北京。

朱棣第三次出击阔滦海和屈裂儿河之战示意图　（29-6图）



朱棣第三次亲征，打击了鞑靼侵扰的锐气，归途击败兀良哈，使鞑靼更趋孤立，取得了一定战绩。在击败兀良哈时，作战指导亦很正确，即采用包围、设伏等方法，所以能一举击溃。但

用兵时间长，人力、物力消耗巨大，有些得不偿失。朱棣不听臣下劝阻，一意亲征出击，使明朝的人力、物力、财力濒临内外俱疲的困境。

此后，鞑靼又多次南下侵明边境。为此，朱棣又先后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4年）二十二年（公元1425年）连续作第四、第五次出击，均因鞑靼避而不战和明军补给困难，无功而返，朱棣本人也病死在第五次出击的回军途中。

朱棣五次出击的战略得失

朱棣五次出击塞外，其目的在求战略主动，打击鞑靼和瓦剌的气焰，保障边防安全，说明他重视北部边防和有保卫边防的决心。朱棣的出击既不以占领蒙古贵族势力的领地为目的，也不着眼于俘获人马、物资，而是以以攻为守的手段，达到边境安全的目的。这种积极防御的战略，虽未能完全解除蒙古贵族势力对边境的威胁，但抑制了它的袭扰。在明初，蒙古贵族势力始终未能侵入塞内，因而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朱棣五次出击的最大成就。其在战略运用上，有以下得失：

1. 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并用。朱棣五次出击的全过程，也是分化蒙古贵族势力的全过程，是“分则易制、合则难图”策略的贯彻，始终是拉一个，打一个，使蒙古贵族势力未能形成统一的力量。而明军在每次出击中，只限于打击一个目标，军力集中，收效显著。

2. 用兵持重，不冒进，适时回军。明军远程出击，地形不熟，条件艰苦，朱棣考虑到士气和补给，在进军时不冒进，采取持重态度，及时休整，整饬纪律，鼓励士气，作好补给。在完成一定任务后，又掌握利在决战不利持久的原则，及时回军，因而几次出击，都没有受多大损失。

3. 朱棣亲自领兵出击，本身就具有战略意义，可以震慑敌方，收先声夺人之效。

4．物资准备周到。大军远出不毛之地，粮、水全靠后方运送，故每次出击，物资的周到准备，实为先决条件。明军每次出击，物资准备都是倾全国之力，且计划周密，如区分前运、后运和保障输运安全，都有具体措施。由于物资准备周到，保证了粮、水不缺，使军事行动得以顺利进行。

5．明初，边防采取积极的战略防御，有时采用以攻为守的战略，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不是每次都要皇帝亲自领兵，是不是每次都需要几十万兵力，是不是需要一再反复进行，是值得研究的。朱棣亲自领兵，直接原因是丘福的出击失败，而丘福的失败在于不听朱棣叮嘱而轻敌冒进。如换一个统帅，可能会产生不同结果，这是一个用将问题，而并非必须皇帝亲自领兵，才能取得出击的胜利。朱棣的一生，是亲自掌握边防的一生，占用了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奠定了北部边防的基础，防止了蒙古贵族势力卷土重来，其功绩是应予肯定的。但多次亲征，势必劳民伤财，大量消耗国力，从而对后世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皇帝亲征，使用的兵力往往容易偏大，朱棣每次出击，兵力常达五十万人。兵力大了，军食和所需运输力量就更大，一而再，再而三，国家人力、物力的消耗和其成就相比，就显得得不偿失。夏原洁指出："比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其长孙朱瞻基也批评他只靠个人英武，勤于用兵，使国力消耗过大。这些当时人对朱棣五次出击的评价，都是很恰当的。

第六　明中期边防削弱导致"土木之变"

一、瓦剌民族的兴起和对明边境的威胁

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瓦剌首领马哈木死，其子脱欢继任首领，成为瓦剌各部中势力最强的一支。起初，瓦剌在明军和鞑靼的压力下，被迫向西而发展，几年间，势力就扩张到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吉尔吉斯草原一带。继而转兵东向，攻杀了鞑靼首

领阿鲁台，瓦剌的另外两个首领也被脱欢杀死，从而统一了瓦剌、鞑靼两部，立元后裔脱脱不花为鞑靼可汗，脱欢自为丞相，掌握实权。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脱欢死，其子也先立，自称太师，掌握实权，除不断率兵袭击明朝边境外，还多次围攻哈密，威胁已归附明朝的甘肃各部酋长，设"甘肃行省"，阻断了明朝和西域各族的往来。此后，又东征兀良哈，使其归附，势力空前强大，严重威胁着明朝北部的安全。

二、明中期政治的腐朽和对边防处置的错误

当蒙古贵族势力逐渐统一而强盛的同时，明朝政治、经济、军事力量逐渐削弱，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的抗争不断发生，政治极不稳定。朱瞻基死后，由年幼的朱祁镇（英宗）即位，信任宦官王振，掌握朝廷军政大权。王振不但不整顿边防，反与也先勾结，"以藻饰太平为名，赏赍金帛无算，凡所请乞，亦无不予"[17]。瓦剌使者由五十人增多到二千多人，大量收买了箭，私运出塞。王振的党羽、大同镇守太监郭敬也私造大量箭镞给予瓦剌以易马匹，无人敢于过问。王振、郭敬还任意侵占明军屯田，造成卫、所士兵的逃亡。边境防务，日渐虚弱。在这种情况下，明廷又听从王振意见，对叛明的云南麓川（今云南陇川西南）宣慰使思任发一再兴兵讨伐，最后历十二年。有一次发兵达十五万人，运粮民夫多至五十万，从而不得不抽调北部边防兵一部参加，导致了全国的骚动。这种忽视北部边防，轻易对南方边陲用兵的作法，朝中有很多大臣反对。如侍读刘球就曾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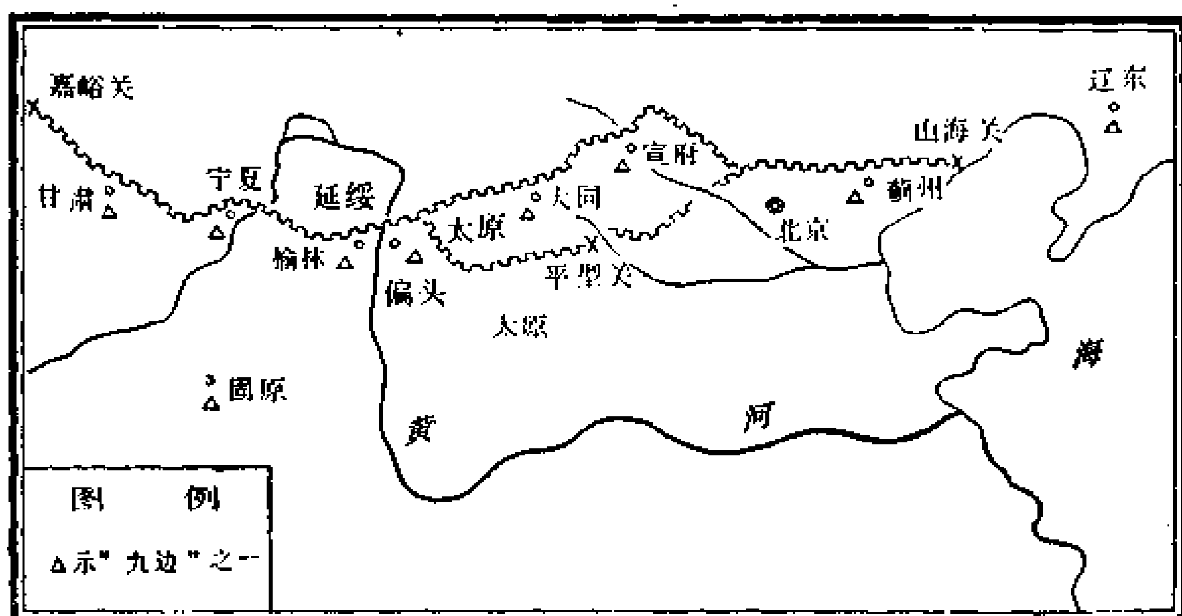
> "思任发僻居南徼，以边将失驭，致动大兵，陛下特降玺书，原其罪衅，使得自新，甚感德也。乃诏旨甫下，忽大举兴师，今南方水旱相仍，军民交困，若复动众，纷扰为忧。且卫特拉（瓦剌）世为边患，近虽稍抑，部曲尚强，今乃移甘肃守将，以事南征，卒然有警，何以为御。臣望陛下急罢麓川之师，专备西北。"[18]

这些较正确的意见，反忤了王振的意图，他不仅不从，反因

此杀了刘球，明廷处理军政的乖谬，达于极点。

北部边防削弱的另一原因，是朱棣时代种下的祸根。朱棣只注意以攻为守的战略，忽略了边境的防御，特别是由于“靖难之役”得到兀良哈之助，不惜将大宁故地尽付与兀良哈为酬，指望兀良哈能防守大宁，成为明廷的藩篱。殊不知兀良哈并非诚心归附，以致贻患无穷，这是朱棣在战略上最大的失误。因为大宁和东胜卫(内蒙古托克托)的内迁，使开平两侧暴露而陷于孤立，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不得不将开平迁到独石（河北赤城北）。这样塞前二三百里纵深的前进保障地区都交给了鞑靼、瓦剌，使长城一线的主要防御地带直接暴露在鞑靼、瓦剌进攻矛头之下，而开平地区则成了鞑靼、瓦剌军有利的进攻出发地域，占有了战略上的主动和行动上的自由。他们想袭击何处就袭击何处，想什么时候行动就什么时候行动，明军则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由朱元璋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九个边防重镇这时已成为九个前沿据点，即所谓“九边”。九边之后，已无防御纵深，一处被突破，就可直接威胁北京。朱元璋所设想的塞前出击计划已不存在，明朝的北部边防陷入了全面的消极防御。

“九边”形势示意图　（29-7图）



三、“土木之变”，朱祁镇被俘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也先借口明廷侮慢贡使、拒婚和削减马价，率各部分兵四路向甘州、大同、宣府、辽东入侵明边境。也先亲率主力进攻大同，企图诱明军西出，然后相机消灭；其余各路，意在牵掣明军，等主力胜利后，会攻北京。瓦剌军先后击败明军于猫儿庄（今山西阳高西北）、阳河口（今山西阳高西北）。警报传到北京，明廷一片混乱，虽然作了一些应变部署，但士气低，官兵畏战。瓦剌北路军先占独石，后破永宁（今河北延庆）；瓦剌东路军曾包围镇静堡（今辽宁黑山西北），明将赵忠坚守，瓦剌军撤围大掠边寨屯、堡；进攻甘州的瓦剌西路军进展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对战略决策纷争不已。权宦王振以其家乡在蔚州（今河北蔚县），怕为瓦剌所掠，且想借机炫耀权势，极力主张朱祁镇亲征，妄图以此吓住瓦剌军。邝野、于谦等认为六师不宜轻出；吏部尚书王直也率百官再三劝阻。但朱祁镇均不听，决意亲征，以迎击瓦剌军。

明军在训练、装备不足，将不知兵、兵不习武器，武器因多年存库，多有朽坏的状况下，收集丁勇，号称五十万。七月，朱祁镇留其弟朱祁钰留守京师，下令亲征，军务都由王振操纵指挥。明军经居庸关（今北京市昌平西北）向大同进军。连日风雨，营中夜间常发生惊扰，未到大同，就已缺粮。随军大臣屡请回师，都为王振所拒。八月初，明军到大同，也先为诱明军出塞，自动向塞处撤军。王振本拟继续进军，但听到其亲信郭敬述说阳河口惨败情况，乃决心撤军。由大同回北京，有两条路可走，北路经宣府较近，南路经紫荆关较远。王振为让皇帝经其家乡，以资炫耀，决定经南路回师。南路虽较迂远，但受瓦剌军袭击的威胁较小，本无不可。可是军行已四十里，王振又害怕军过蔚州，损害其庄园田耕，改令全军北上，由北路回师。这样，就使明军侧背完全暴露在瓦剌军袭击之下。

也先得知明军撤退，跟踪追击。在宣府，击败了明军后卫部队；在鹞儿岭（今河北涿鹿西北），又设伏击破明军增援部队四万人。八月中旬，明军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二十里）一带，因候王振的辎重车千辆，未抢先入占怀来城（土木堡东南），王振又拒绝了邝野等请皇帝先驰入居庸关并派精兵断后的建议，当晚大军在旷野露营。也先率军追到土木堡附近，四面合围，控制了土木堡西北及其以南要点。土木堡地势较高，明军掘地二丈无水，堡南有河，但在瓦剌军控制之下，明军处于饥渴交困的窘境。瓦剌军次日佯退，诡称议和。王振以为和议将成，命令大军南移就水。明军争先恐后，阵势混乱，瓦剌军以劲骑趁势四面冲杀，明军大溃，死伤数十万，随行大臣五十余人都死在乱军之中，朱祁镇为瓦剌军所俘。在此稍前，明将樊忠恨王振专权误国，击杀王振，然后冲杀瓦剌军数十人后战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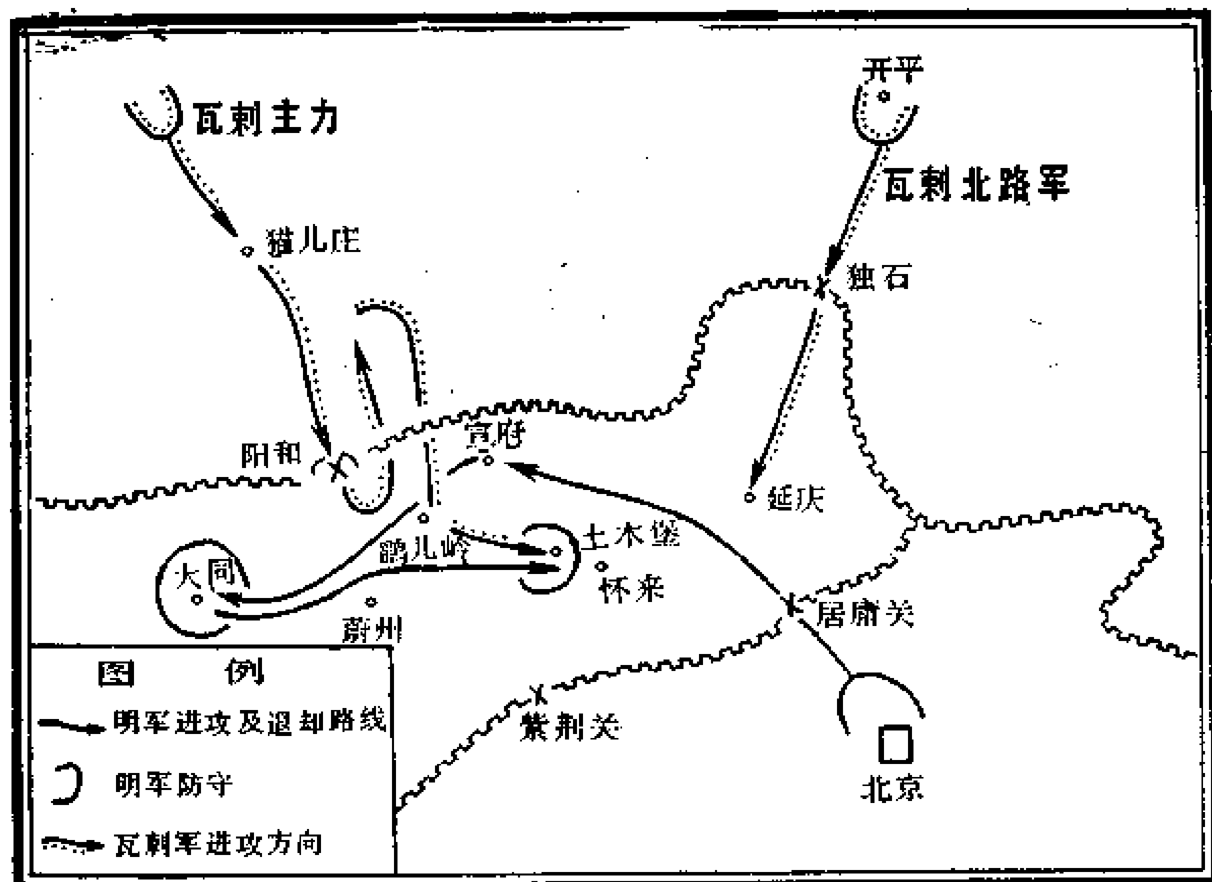
“土木之变”是明朝建国以来，北部边防作战最大的一次惨败。是政治腐朽，宦官专权，五十万大军任由王振轻举妄动，任意摆布的结果。

这次瓦剌军分四路进击，明军处于战略内线，且以步兵为主，又缺乏训练，不利于在野战中与瓦剌骑兵交战。正确的对策，应是坚壁清野，坚守京师和拱卫京师的重要边镇卫所如大同、宣府、居庸关、密云等战略要点，不断派军阻击袭扰瓦剌军及其后方，进行持久作战。同时在京师调集重兵，在瓦剌军悬军深入，攻城受挫，兵疲意沮，粮草不济时与之决战，并选派精锐部队，远出其后，断其归路。如果这样，是可能战胜瓦剌军的。但在王振的怂恿下，明军却倾师而出，恰恰中了瓦剌诱明军出战之计，数十万大军，又轻易在行军中改变路线，置大军于缺水之地，在敌军环伺之下轻率移营，造成军队混乱，这种如同儿戏的拙劣指挥，其失败是必然的。

瓦剌军在此次作战中，采取了诱明军出战的战略指导，避开了

它不长于攻城的短处，发挥了善于野战的长处，战略运用是成功的。以诈和促成明军移营就水而陷入混乱，然后四面合击的作战指导也很灵活。

“土木之变”作战经过示意图　　（29~8图）



第七　于谦保卫北京，明朝转危为安

“土木之变”后，皇帝被俘，明廷失去主宰，主力被歼，虽还有京师疲卒十万，而执戈之士不过万人。明朝统治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腐败的明廷陷入一片混乱，皇亲国戚搜集财宝，企图赎回朱祁镇，达官富户忙于携带细软，逃离京师。如何坚持危局，成了当时的首要问题。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中旬，明皇太后命皇弟朱祁

钰监国，召群臣议战守之策。翰林侍讲徐珵主张“请幸南京”，兵部左侍郎于谦怒斥之，说：“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19]朝议遂定。这时瓦剌军正挟持朱祁镇以皇帝的名义令各镇守将开城出降，朱祁钰虽奉命监国，但皇帝犹在，遇事不敢决断。于谦等文武大臣洞察瓦剌的计谋，多次力劝朱祁钰即皇帝位，以粉碎瓦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诡计。九月初，皇太后终于下诏命朱祁钰即皇帝位，改年号为景泰。朱祁钰随即任命主战派大臣于谦为兵部尚书，总揽战守大计，同时下令抄斩了王振全家及其党羽，大大鼓舞了民心士气。于谦是一个爱国将领，素慕文天祥的品质，比较注意民间疾苦，注意改良政治。于谦就任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其大要如下：

1. 政治上整顿吏治，惩办王振余党和撤换京畿附近各府、县不称职的官吏；派员到京畿附近各府、州、县安抚军民；捕捉混入京畿的瓦剌奸细，安定社会秩序。

2. 整顿军队，加强训练。首先调集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畿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收容“土木之变”中溃散官兵等入卫京师。又派人到各地选募精壮，充实军力。

3. 整备和改良武器。集中京师和各地工匠，昼夜赶制和改进兵器、战车，并收集“土木之变”中散失的大量武器、车辆，又从南京调入库存军器，装备京营。

4. 筹集粮食，以备应用。派人到各地征调民夫并动员军民合力将在通州屯集的数百万石粮食运集京师。

此外，还整备和加强了大同、宣府、居庸关、紫荆关等各要点的守御。

经过以上整顿和准备，京城守军很快增加到二十二万人，京师防卫力量加强，秩序恢复，军民团结，士气大振。

十月，瓦剌首领也先见明廷不肯屈服，采纳投降的明太监喜

宁的建议：

> “以送上皇为名，至边关胁诸将开关，召总兵镇守官出，见则留之，可以得志。京师空虚，长驱直入，必将南迁，大都可有也。”[20]

瓦剌军挟持朱祁镇向北京大举入侵，也先率主力从小路破紫荆关，直逼北京。于谦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召集诸将商议防卫北京的作战方案。都督石亨主张退据城内，关闭所有城门，“坚壁以老之”。于谦认为不可，他说：“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决定命诸将率京营二十二万人列阵于九门之外，以待瓦剌军。于谦戴盔披甲，身先士卒，与石亨、范广等率军屯德胜门外“以当贼冲”，并慷慨挥泪，激励三军，同时颁布临阵军令：“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21]。于是，军民奋发，决心保卫京师，背城一战。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直扑北京，列阵于西直门西，明军击败其先锋，歼数百人。十月十二日，也先借送还朱祁镇为由，诱骗明廷派于谦、石亨等主将去谈判以便扣留，并索金币以万万计。这时主和派朝臣大倡和议，朱祁钰派人去问于谦，于答以“今日止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22]。朱祁钰遂定下了奋战的决心。次日，也先乘大风雨，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率部先伏于城外空房内，以少数骑兵佯败诱敌，也先以万骑追击，明军伏兵尽出，神机营火炮齐发，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于城下，杀伤甚众。也先转而率军攻西直门，明将孙镗迎战不利，赖城上神机炮、火箭猛射，且德胜门、彰仪门（今北京广安门）方向明军分兵来援，迫使瓦剌军后退。十四日，瓦剌军又进攻彰仪门，于谦命守将毛福寿将城外西南街巷堵塞，在要路埋伏神铳、短枪、正面由武兴、王敬率部迎战。明军前队先以神铳轰击，后以短兵搏击，又将瓦剌军击退。此时，监军太监为争功，率数百骑自明军阵内驰出，造成明军阵势混乱，瓦剌军又回军反击，明军颇有损失。城中居民见情势危急，纷纷登上屋顶，投掷砖石，协助明军支撑，援军

也及时来到，再一次击败了瓦剌军的进攻。

瓦剌军连日进攻京师各门屡遭失败，其进攻居庸关的一路五万人连攻七日不克遁走，守军追击，斩获无算。也先又得知明勤王军将陆续来到，后路可虞，只好拔营夜遁，挟朱祁镇由良乡（北京市房山东北）向紫荆关方向退去。

于谦发现也先挟朱祁镇先撤，命石亨等集中火炮轰击瓦剌军营，毙伤瓦剌军万余人。明军分路追击扫荡，石亨等在清风店（今河北易县西），范广等在固安，杨洪在霸州（今河北霸县），各歼瓦剌军一部，也先率余部退回塞外，明军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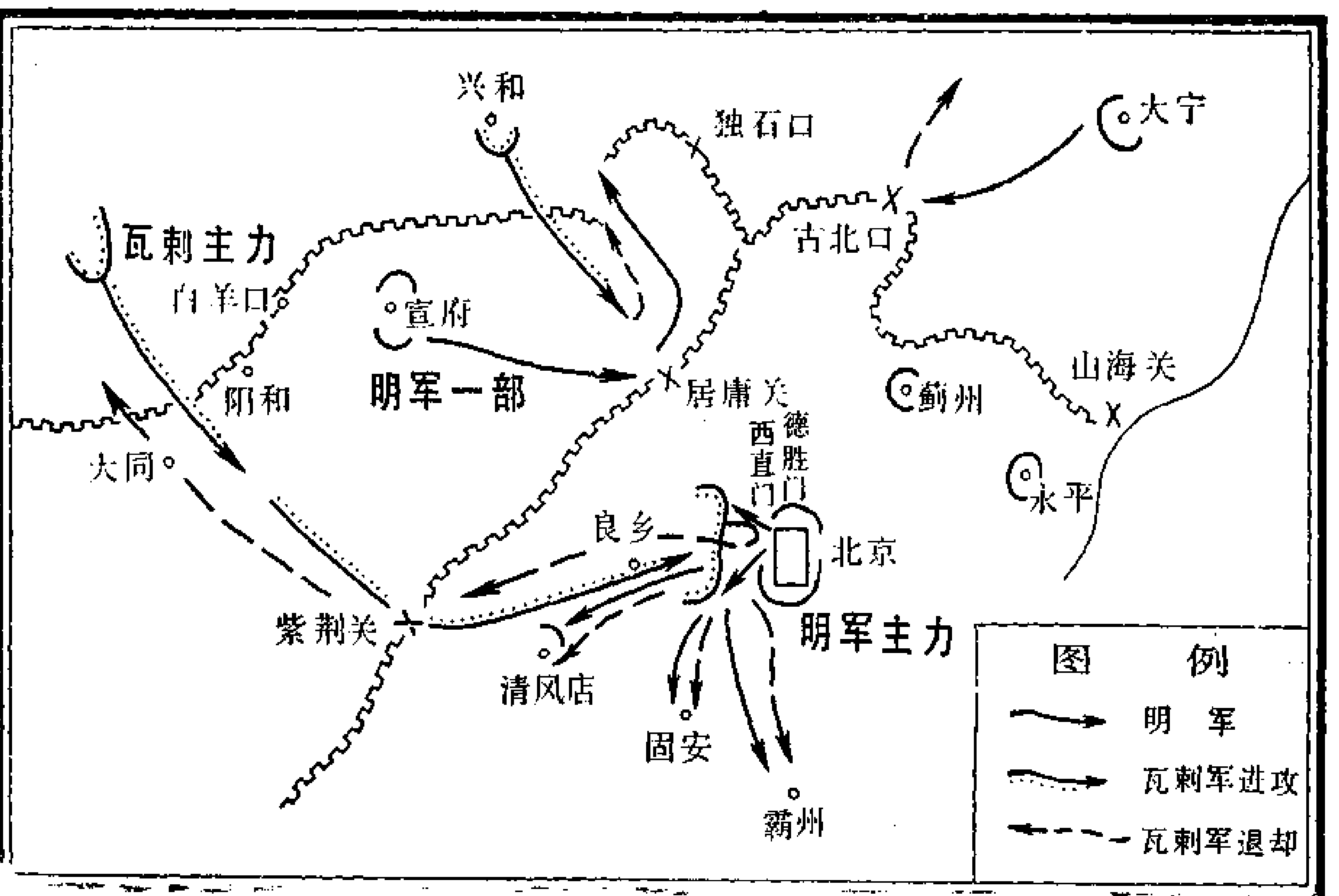
明朝北京保卫战的胜利，首先决定于战争的正义性。瓦剌军的入侵及其掠夺行为，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反对，因而敌忾同仇，军民一心，奋力抗战，士气极盛，这是致胜的首要因素。明廷的战略决策也很正确，于谦等大臣本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针对也先挟持朱祁镇以为要胁的阴谋，拥立新君，并作出坚守北京，保卫京师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否则，明廷南迁必会使北方人民遭受极大的苦难，明朝的统治能否继续存在也大成问题。北京保卫战是明朝中期长期消极防御下的积极抗击行动，它扭转了北方边防的不利形势，使明朝的统治得以转危为安，其意义是至为重大的。以下仅就战役指导方面明军所以能迅速取胜的原因，提出几点看法：

1. 以己所长，击敌之短。明军长于运用火器，以步兵为主，守城是其所长。而瓦剌军以骑兵为主，惯于野战，短于攻城，虽大军猬集，也无可奈何。

2. 攻守结合，力争主动。明军处于防御地位，如仅靠守城，就给了瓦剌军在城外以行动的自由，城内明军与外围明军以及援军就难于连系协同，时间久了，军民粮、水不济，形势难免不起变化。明军采用攻守结合，主动出城列阵迎战，就争得了主动，鼓励了士气，也给瓦剌添了后顾之忧。所以攻、守结合，是

北京保卫战经过示意图

（29-9图）



明军击败瓦剌军的直接原因。但也应指出，这种主力出城列阵迎战的战法，是在明军拥有大量火器，能够支援步兵挫败敌骑冲击和瓦剌缺少火器不能大量杀伤明军的条件下采用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列阵作战也就未必可取。

3．善于伏击，也是作战指导上的成功之处。如瓦剌军攻德胜门时，明军先在空屋中设伏，然后诱瓦剌军进入设伏圈击之，因而取得了初战的胜利。

4．善于步、骑协同和短兵与火器的配合运用，在北京保卫战中，很多场合，步骑兵协同和兵器运用配合很密切，对杀伤和击败敌人，起了很大作用。于谦认为瓦剌军所依靠的是只是骑兵，往往利用明军火器齐发后装药的间隙，进行冲杀。所以在训练中就要求若与敌人对阵，先用弓弩，继用火药爆炸；当敌人误认为火药已用尽而猛冲时，则火炮、火铳、火箭、弓矢齐发，给以大量杀伤；再继之以大军冲杀，乘敌人立足不稳，分调精锐马军用长枪、大刀、劲弩射、砍，步军用团牌、腰刀一齐冲入敌阵，或刺其人马，或砍其马足等等。

最后，无可否认，于谦在北京保卫战中对战略决策、作战准备和战役指导都起了主导作用。他忠勇果决，坚持抗战，尽力帮助朱祁钰定下抗敌决策，又就当时有限的时间，作了较周到的准备。在作战中于谦身先士卒，亲临前线，指挥合宜，不愧是北京保卫战中的核心人物，得到当时和后世的广泛赞扬。

瓦剌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战争的非正义性，受到广大人民反对。战略上判断失误，挟朱祁镇以要胁明廷之计不能得逞，孤军深入，使自己陷入不利地位，且兵器、火器不及明军，缺乏攻城能力，也都是战败原因。

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后，明朝军民士气大振，于谦利用有利形势，加强了边防及京营的建设，使明王朝北部边防一时得到稳定。瓦剌军虽又连续发动过三次大规模入边，但都遭到了失败。

第八 议 复 河 套

明朝在北京保卫战后，由于于谦对北部边防采取积极态度，在约八年时间里，边防尚称稳定。景泰八年（公元1475年）于谦在“夺门事件”（朱祁镇利用朱祁钰病重夺门复位）中被杀害，这是因为支持朱祁镇复位的多为北京保卫战时主张妥协投降的人物，对于谦的积极抗战和拥立朱祁钰，怀有仇恨，必欲杀之而后快。于谦死后，北部边防又陷于松弛无备的状态。当时人描绘其情况说：

> “边官守臣，因循怠慢，城堡不修，甲仗不利，军士不操习，甚至富者纳月钱而安闲，贫者迫饥寒而逃窜。”〔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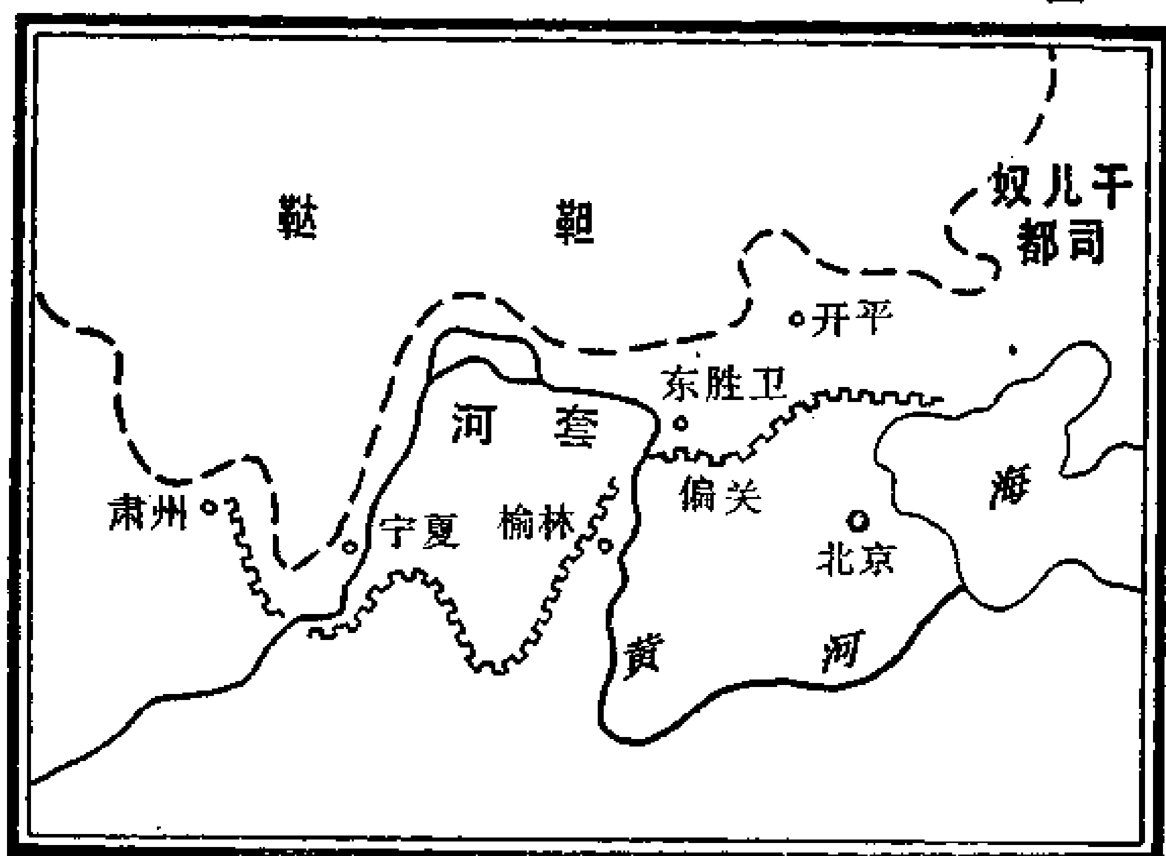
北京保卫战后不久，瓦剌首领也先为其阿剌知院所杀，另一首领孛来又击杀了阿剌，从而瓦剌势力日衰。这时鞑靼势力又渐渐兴起，立原鞑靼首领脱脱不花之子麻儿可儿为可汗，号称小王子。孛来和别部毛里孩各拥部众，自成部落。鞑靼各部袭扰明边境，或在辽东、宣府、大同；或在宁夏、庄浪、甘肃，来去飘忽自由。天顺五年（公元1461年）鞑靼部将阿罗出潜入河套，以为根据地，后毛里孩，也入据河套，“遂为边境门庭之害”。

河套，三面依托黄河，土地肥饶，可以耕桑，密接陕西榆林，东抵山西偏关，西至宁夏镇（宁夏银川市），东西宽达二千里，是明朝北部肃州、宁夏、偏关、大同、居庸关防线的中央部分。弃守河套就在这条防线的中央开了一个大豁口，给了鞑靼一个极好的水草丰盛的前进基地，使鞑靼获得了进袭陇右、陕北、山西的行动自由。

任由鞑靼入据河套，是继明初大宁、开平先后弃守，对塞外广大地区全部放弃之后，又一次重大的战略错误，使明北部边防陷入更大的困境。成化年间，鞑靼各部出没河套，东来西向，骚扰边境，杀掠人畜多以千百万计。弘治初，鞑靼小王子自称达延

汗，统一了大漠南北蒙古贵族势力，实力增强，对明边境的威胁更大。嘉靖初，达延汗后裔俺答崛起，努力最强，率众经常袭扰直隶、山西、陕西边境。

河套形势示意图，（29-10图）



明朝君臣在上述情况下，也知边患加重的根源在鞑靼据有河套，故从成化到嘉靖，历经四朝，收复河套之议成为主要战略争议。前后八十二年，多次议复套，多次罢复套，多次调兵遣将，又几度中途停止。主张复套的多为爱国将、相；而反对复套的，多为权宦、奸佞，他们或图苟且偷安，或借边患以自重。因而复套之议，实质上是主战派与投降派之争。复套之议起自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当时大学士李贤等奏称：

“河套与延绥接境，原非敌人巢穴。今毛里孩居处其中，出没不常。苟欲安边，必须大举而后可。乞令兵部会官

博议，进兵搜剿，务在尽绝。”〔24〕

宪宗朱见深原同意这个建议，筹划复套，后以鞑靼请入贡而罢。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都御使王越再次请复河套，明廷以赵辅为总兵，准备复套，又以赵病而罢。这说明明廷复套的决心是不坚决的，只是迫于朝议，应付敷衍而已。以后又有多次复套之议，都无结果。及至武宗朱厚照即位，权宦刘瑾专政，排斥了坚持复套的三边总制杨一清，从此无人敢再言复套。嘉靖中期，边患更重，鞑靼多次入侵，劫掠杀伤无数，总督三边侍郎曾铣复作复套之请，他认为：

> “贼据河套，侵扰边鄙将百年。……窃尝计之：秋高马肥，马矢劲利，彼聚而攻，我散而守，则彼胜；冬深水枯，马无宿藁，春寒阴雨，壤无燥土，彼势渐弱，我乘其弊，则中国胜。臣请以锐卒六万，益以山东枪手二千，……携五十日饷，水陆交进，直捣其巢。材官驺发，炮火雷激，则寇不能支。此一劳永逸之策，万世社稷所赖也。”〔25〕

曾铣的建议，有方略，有办法，是个积极的战略方案。但有些人却认为，深入险远，谈何容易，因而主张“筑墙”，复套之议又不能行。在此以后，曾铣曾督兵出塞袭河套鞑靼，小有胜利，遂又重提复套之议，大学士夏言也支持他的主张，但权臣严嵩欲谋相位，因灾异疏陈得失，诬曾铣启开边衅，误国家大计，世宗朱厚熜遂罢夏言之官，逮曾铣到京。这时俺答又合众入套，声势更张，有入犯情势，严嵩为激怒皇帝，说是曾铣“启衅”所致，杀了曾铣、夏言，凡支持复套的臣僚，也都受到不同的惩治，复套之议遂告停止。

曾铣为嘉靖时名将，有机略，不仅积极主张复套以安边，还创造了“慢炮”之法，即炮形如斗，中藏机巧，抛置前线，等敌人拾到视为奇物聚观之时，突然爆炸，杀伤力很大。他还叫人挖地丈余，置火药其中，上覆以石，石上敷土，敌人经过，触到发火机关即爆炸，也能大量杀伤敌人，尤如近代的地雷。曾铣、夏言

之死，时人都为之不平。

复套实质上是在战略防御中以反突击来恢复主要防御地带，但明廷议论八十年而不决，说明明朝中期对北部边防消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已濒临放之任之的境地。这是边患不止的主要原因。

第九　西和东守的战略运用

鞑靼自俺答兴起后，连年入侵，其用兵规模，动辄数十万人。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率军由蓟州入塞，当时明廷由权相严嵩总揽大权，严嵩苟且惧敌，不敢出战，俺答军直逼京师，大掠八日而去，史称“庚戌之变”。以后俺答又多次入侵，几次造成京师震动，明廷始终难以摆脱消极被动局面。嘉靖末期，严嵩罢相，首辅由徐阶充任，着手整顿边防，起用杨博，先后任蓟辽、宣大总督及兵部尚书，边防略有起色。

万历初，张居正任首辅，神宗朱翊钧年幼，一切朝政委之居正，张居正慨然以天下为己任，首先加强中央集权，整顿吏治，改进法制。其最重要的变法是“一条鞭法”〔26〕，把赋役的各项名目合并成为一条，化繁为简，便于征收，使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减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民的负担，减少了征收手续和官吏舞弊的机会，对发展经济和稳定政治起了积极作用。

张居正在对鞑靼的边防战略上，仍本“外示羁縻，内修战守”的方针，但运用上更加灵活。他在加强战备的基础上，成功地采用西和东守的战略，获得了北部边防一时相对的稳定。

一、西线议和，影响深远

隆庆年间，蒙古贵族势力内部也起了一些变化，俺答长期侵扰边境，虽获得了不少子女玉帛，但本身损耗很大，蒙古族人民

出现了厌战情绪。张居正更是想在巩固边防的基础上，通过和谈来改善民族关系。他多次命令边将，要抓住时机和俺答议和。宣大总督王崇古认真实行了张居正的方略，不断派人到鞑靼地区宣传和从优安抚来归的番汉军民。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因聘三娘子为妻被祖父所夺，来投降明朝。是否接受其投降，有两种不同意见。阁臣高拱、张居正积极主张接纳，借此与俺答谋和，但朝中多数人怕引起更大事端，反对接纳，有的甚至主张全部杀掉，以绝后患。张居正在关键时刻，一方面要大同总督王崇古慎重处理，一方面亲向穆宗朱载垕面陈原委利害，取得皇帝同意，才慑服了反对派，接纳把汉那吉投降并下诏授为指挥使。

把汉那吉归降之后，俺答亲率重兵来索取，朝野震动。反对派认为是接纳把汉那吉引来了祸患，以致兵临城下。张居正这时要求王崇古檄诸道兵严阵以待，并"坚持初议，审定计谋，毋为众言所淆"。[27]大同巡抚方逢时遣译者鲍崇德去告俺答，可以用明叛将换回把汉那吉，俺答盛气待之，鲍崇德对俺答说：

"朝廷待尔孙甚厚，今称兵，是速之死也。"

俺答心动，屏人语曰：

"我不为乱，乱由（赵）全等（明叛投鞑靼的官员）。天子若封我为王，长北方诸部，孰敢为患？即死，吾孙当袭封，彼衣食中国，忍背德乎？"[28]

不久俺答缚赵全等来献，王崇古遂遵旨以皇帝命礼送把汉那吉出境。俺答上表称谢，明廷封俺答为顺义王。三娘子历配鞑靼三王，掌握兵权，威望甚著，一直为明朝"守边保塞"，也封为忠顺夫人。这次和约保持了较长时间，在几千里长城线上，边防基本稳定达几十年之久，对汉、蒙两族人民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清人魏源曾对这段历史作了恰当的评述，他认为：

"高拱、张居正、王崇古，张驰驾驭，因势推移，不独

明塞息五十年之烽燧，且为本朝（清朝）开二百年之太平。仁人利溥，民到于今受其赐。”〔29〕

为了巩固汉、蒙这种和平关系，张居正、王崇古等还极力推行“封贡通市”政策，规定每年贡马一次，并在大同、宣府、山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地选十一处进行互市。对于蒙古其他各部，也相继建立“封贡通市”关系，鞑靼所部得以顺利地以马、杂畜和皮毛向汉族人民换取布帛、茶叶、粟豆和铁锅等物，使生产得到发展，生活得到改善。以后俺答在汉人及明廷帮助下，建立归化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逐渐发展为蒙古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中心，并在城郊开垦农田，定点居住，发展农业，由游牧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使蒙古族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总之，两线的和议为蒙、汉民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张居正、王崇古等个人所起的作用，也应予肯定，他们不愧为封建时代有识见的政治家。

二、东线蓟镇以守为主、辽东以攻代守

嘉靖年代，鞑靼用兵方向逐渐东移，蓟镇与辽东地处“九边”的右翼，守京必守蓟，守蓟必守辽，蓟辽已成为北部边防的战略重点。西线和议成功后，其战略地位更为重要。

当时奴尔干都司已经解体，福余卫亦不复存在，朵颜、泰宁两卫时叛、时服，建州等女真族逐渐兴起，也伺机入侵。西线和议后，脱离俺答的东部鞑靼土蛮（小王子徙幕东方后，称土蛮）、插汉（元裔、居插汉儿地，即开平以东地区）等部仍不断南下掠夺，因而自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后，战事多集中在辽东方向。针对当时情况，明廷的战略指导是：集中力量，防守东线。蓟镇以守为主，辽东以攻代守。

（一）巩固蓟镇的防守

隆庆以前，蓟镇防务十分虚弱。隆庆初，土蛮联合兀良哈三卫合力攻蓟州，大掠蓟东永平府（河北卢龙）及附近各地，三日始去，京师震动。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戚继光调任蓟镇总

兵，整顿边防，他把整备、训练、作战结合起来，仅二、三年时间就卓见成效。他的办法是：

1．调整部署建立适合作战的组织。戚继光对当时蓟镇的军队，淘汰老弱，革去虚额，改变部署，将边兵区分为十二路，每四路合为一营，分驻在边塞正面，兵力约四万。另由大名、真定、井陉调督府标兵三万加以训练，作为机动兵力，也分三营，令总兵、游击率领，每年春、秋两季，防务紧张时，移至近边，适时机动。所有部署，都注意控险扼要，不分散兵力。另外，为了有利于抗鞑靼骑兵作战，还组建攻守兼用的车营。戚继光所建的车营由车兵、步兵、骑兵合成，有合同战斗的特点，就是四人推挽一车，车上有佛朗机、鸟铳、火箭等火器，战则各车结成方阵，马步兵居中，车前设拒马等轻便障碍。敌人进攻，首先以火器发射，稍近，步兵排拒马于前，运用长枪、狼筅（竹制兵器）杀敌，敌退则以骑兵追击。

2．结合实战要求严格训练。戚继光重视军队训练，要求严格，针对边兵原来纪律松弛的严重情况，特调浙兵三千来蓟，为蓟兵训练作示范并加强基层。训练中，大雨滂沱，浙兵屹立不动，使蓟兵惊讶不止。在浙兵带动下，纪律迅速好转。另方面，训练各兵种学会运用各种兵器，学会在各种地形都能战斗，如平原应用车战，山林险隘，应有步战，半险半易，应用马战，这样，马、步、车既能协同作战、又能就各自的长处，进行特种地形战斗。

3．增固边墙，适于守战。边墙虽经多次修缮，但拘于成规，收效不大。戚继光针对明军多持火器，但塞外北风甚厉，明军处于下风的特点，一面加高、加厚原有边墙，在墙两面设垛口，冲要地段设重墙，一面在长城上增修敌台（空心台）。长城上旧有砖石小台，彼此既不连系，又不能掩蔽士卒、储存军火器具，敌人居高临下时，小台很难固守。戚继光遂重修敌台，险要处数十步或数百步一台，一般是一百四、五十步到二百步筑一台，要求相近两台，能互相连系。敌台一般高三、四丈，周围十

二丈到十七、八丈，台分三层，四面设箭窗，上层有垛口，每台可驻兵三、五十人，可贮存必要的军械、粮食。每台设百总一人，专管调度、攻守；设台头、台副各一人，专管军械、辎重。当敌进攻时，烽火报警，登台迎战，台下军队与台上军队配合作战。平时，在敌台附近屯田，以解决军食。到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止，敌台共修成一千零十七座，大大加强了防卫力量。

戚继光在蓟镇的战备，受到了实战的考验。万历元年（1573年），朵颜首领董狐狸率部连续两年，多次向边墙进攻，均未得入塞，最后一次为戚继光所击败，俘其弟长秃，董狐狸率部长亲族三百人叩关请罪，发誓不再侵蓟，因而“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晏然”。他训练的军队“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30]。戚继光虽未经大战，但数十年间，由于边防巩固，遏止了鞑靼入侵，和西线和议同样取得了保障边防的战略效果。

（二）辽东的以攻代守

辽东地处关外，北靠原奴尔干都司，东临朝鲜。辽东都司（治所辽阳）所辖区域成为明朝在东北方向的屏障，直接掩护着蓟镇的右翼。辽东情况十分复杂，建州（今辽宁新宾西南）卫和海西（今松花江流域）各卫女真族势力自东向西，兀良哈三卫的朵颜、泰宁势力由北向南，土蛮由插汉地区向东，不时向辽东进攻，三者虽互有矛盾，但在攻明的辽东一点上是一致的。面对以上形势，明军显得虚弱无力，从嘉靖到隆庆初，十年间损失了殷尚质、杨照、王治道三个主将。隆庆初，明廷任命李成梁为辽阳主将，他英毅骁健，富有胆略，面对几部强敌，他的兵力虽只有七万余人，但运筹有方，一面加强防务，一面整顿军队。在连年作战中，他大都采用以攻为守的战法，而在攻势中，又善于运用牵掣其正面，以精兵直捣其老家的战术。老家是对方家属及物资聚集地区，对方很敏感，往往因此不得不放弃进攻而退保老家。如泰宁部进攻时，李成梁出丁字泊堡（今辽宁沈阳市以北）塞二

百里，捣其老家，迫使泰宁部首领速把亥率部败逃。又如当女真阿台部进攻到沈阳的浑河时，李成梁从抚顺东出百余里，火燃其老家古勒寨（今抚顺市西），射杀阿台，从而歼灭了这部女真势力。李成梁在辽东二十二年中，几乎战争不停，他就这样运用以攻为守的战法，稳定了辽东的防务，成为蓟镇的有力保障，其中有十次大捷，都是运用这一战法而取胜的。李成梁在辽东以攻为守的战法，达到了战略防御的目的。但连年战争，人民受到灾难，国力受到损失，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李成梁单纯注意军事打击，没有从政治上贯彻"外示羁縻、内修战守"的边防方针，以致战事不断，仇恨日深，国力不断下降。李成梁后期，"贵极而骄，奢侈无度。"最后甚至掩败为胜，杀良冒功，为辽东局势伏下了极大的危机。

从整体看，由于执行西线和议与东线攻、守相结合的战略，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北部边境获得了几十年基本上的稳定，蒙古鞑靼、瓦剌始终未能成为明朝的大患。

对明代北部边防的几点看法

明代，北部边防始终是居首位的大事，有较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值得进行探讨。

第一，民族政策是决定边防方针的依据。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又多集聚在边境地区，对少数民族采取什么态度，决定了边防战略的方针。朱元璋政治眼光较远，他当时虽是胜利者，但对蒙古族人民抱着"华夷一家"的团结态度，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朱棣虽然多次主动出击塞外，但不以占地和俘虏人畜为目的，实质上是以攻代守，以战求和，仍然是朱元璋方针的继续。正统以后政治腐败，国力日降，积极防御变成了消极防御，给北方沿边人民带来了长期的苦难。嘉靖年间更陷入了北防鞑靼，南防倭寇的困境。直到隆庆时，张居正入阁为相，在改革政治的基础上，采取了西和东守的方针，断然不顾众议，与

俺答达成和议，使西线边防保持了长期的安宁。他继承了朱元璋“华夷一家”的民族政策，是有利于蒙、汉两族人民的，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第二，国内政治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边防是否能够巩固。明初，国内政治、经济都处在上升阶段，国力较强，既有力加强边防，也有力主动出击，以保证边境安全。明正统以后，宦官擅权，政治腐败，国力衰弱，边防也随之削弱，以致造成皇帝被俘的惨况。隆庆年代，政治有所改善，国力有所恢复，重用贤相、名将，一时出现了“中兴之势”，就能在边防巩固的条件下，争取到边境的一时和平。

第三，边防必须采用积极防御、消极防御只能被动挨打。毛泽东同志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消极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防御都应该是积极的。朱元璋的塞前出击计划，虽未实施，但具有边防积极防御的典型性。就阵地说，在主要防御地带之前，在主要防御方向上，有开平、大宁等战略据点，阵地前几乎有近三百里的纵深，左右又有奴尔干和哈密有力的依托，防线巩固，具有很大的韧性；在部署上，集全国兵力之半，分区守备、控制要点，相互支援，敌人来犯，力求能集中机动兵力歼敌于主要防御地带之前，是深得积极防御的要领的。朱棣的以攻为守，则更富有积极性，但必须选择战机，严格控制出击的次数和规模，以免过多地消耗国力。朱棣改革军制，建立三大营，作为明廷直接掌握的战略预备队，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是很可取的。然而放弃大宁导致开平后撤，逐步失去了富有韧性的塞前三百里纵深，使长城“九边”直接暴露在敌骑进攻矛头之下，则是战略上的重大失误，成了正统以后北部边防长期陷入消极防御的重要原因。

第四，明代后期，出现了一些具有创造性的将领，他们能及

时总结经验，改进火药、火器，改善部队编成，改进战法，加强训练。如曾铣的创造爆炸物及地雷，戚继光的加筑敌台，编成车营，进行兵种、兵器的协同训练，都对增强边防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也说明，边防设施和战法都不能一成不变，应根据实战经验和战场上出现的新情况，及时总结，及时改进。

注　　释

〔1〕 地处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内蒙古北部，是广大荒漠、草原地区，亦称"瀚海盆地"，以其广漠无垠，浩瀚如海而得名。

〔2〕 《圣明经世文编》卷七十三邱浚：《区处畿甸降夷》

〔3〕 《明太宗永乐实录》卷二八、卷一四

〔4〕 《明史》卷九十《兵志二》

〔5〕 《明通鉴·成祖永乐九年》

〔6〕 朱元璋死后，长孙朱允炆即位，即建文帝，以北方诸王势力过大，与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决定削藩。燕王朱棣以入京诛奸为名，发动政变，史称"靖难之役。"

〔7〕 《明太祖实录》卷二五三

〔8〕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9〕 《明史》卷一一七《宁王传》

〔10〕 《明史》卷九十《兵志二》

〔11〕 《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

〔12〕〔14〕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设立三卫》

〔13〕 《明太宗实录》卷九十四

〔15〕 《明鉴·卷二，成祖文皇帝》

〔16〕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一《亲征漠北》

〔17〕〔18〕 《明鉴·英宗皇帝》

〔19〕〔20〕〔21〕〔22〕 《明通鉴·英宗正统十四年》

〔23〕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一五

〔24〕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八《议复河套》

〔25〕 《明史》卷二〇四《曾铣传》

〔26〕 《明史·食货志》

〔27〕 《张太岳文集》卷二十二《答王鉴川策俺答之始》

〔28〕 《明通鉴·穆宗隆庆四年》

〔29〕 魏源：《圣武纪》卷十二《武事余纪》

〔30〕 《明史·戚继光传》

第三十章　明代东南海防

第一　明初对日本的政策和海防方针

日本和我国，隔海相望，隋唐时期两国友好关系有很大发展。元代由于忽必烈曾东侵日本，两国关系受到影响，但民间的交往一直未中断过。

明初，明廷忙于解决国内矛盾，且蒙古贵族势力时谋复辟，故军事上的注意力在北部边防。而对海防方面的日本，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谋求与其友好相处，宣布对日本为不征国，先后派杨载、赵秩、祖阐、克勤等出使日本，表示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保持友好通商的愿望，并在宁波、泉州、广州设立三个市舶司，主要是负责管理对日本的贸易。但日本当时仍然处在南北朝封建割据的混战状态中，在其内战中失败一方的诸侯武士和海盗相勾结，构成所谓倭寇，利用中国有事的机会，不断侵扰中国的山东、江苏、浙江、福建沿海地区，掳掠人民财物，对中国海防造成严重威胁。对此，明除政治上交涉外，军事上也严加戒备，并予以打击。如洪武七年（1374年）倭寇屡侵濒海州县，朱元璋一方面派人去交涉，一方面并派吴桢任总兵官率江阴四卫的官兵出海到琉球洋面俘获倭寇兵船，在经济上罢市舶司以示制裁。朱棣即位后，明朝国力有了很大发展，为了提高国威，加强和日本连系，扩大海外贸易，恢复和加强停止了的三处市舶司，开放海禁，并派赵居任等出使日本。这时的日本，南北朝已统一，商业资本更有发展，急于扩大和中国的贸易，于是也派使者到明廷。经过商谈，两国的贸易制度确定下来，即："十年一贡，人止二百，船止二艘"〔1〕，由明廷发"勘合"（贸易凭证）给日本的

足利幕府，凭此进中国港和上岸贸易。明宣德时，这种规定有所扩大，改为船三艘，人三百。这只是政府间的交往（日本称贡物，明廷称回赐），实际上“贡物”外的私货何止十倍，民间由于海禁开放互相往来的频繁和贸易数额的巨大，更是难于统计。日本主要以硫磺、苏木、刀、扇、漆器、金银换取中国的瓷器、绸缎、布帛、针、银钱等物。在此期间，中日双方基本上是友好的，但倭寇仍间有入侵活动。日本为表示诚意，曾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自动捕捉海盗首领送明廷，明廷会其带回自行惩处。

明初，虽然由于国力转富强，且开放海禁，政治上采取友好政策，倭寇为害并不严重，但与明初朱元璋、朱棣父子在军事上重视海防采取“严加整备、近海歼敌”的海防战略方针是分不开的。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就曾命靖海侯吴祯以方国珍所部温、台、庆元（浙江宁波市）三府军士和蓝秀山无田粮之民充船户者，凡十一万一千七百余人，隶名卫为军，以加强沿海卫所水军实力，并严禁滨海居民私自驾船出海，以免为倭寇所勾引。次年，德庆侯廖永忠建议说：

> “东南倭寇负禽兽之性，时出剽掠，扰濒海之民。陛下命造海舟，翦捕此寇，以奠生民，德至盛也。然臣窃观倭夷鼠伏海岛，因风之便，以肆侵略，来若奔狼，去若惊鸟。臣请令广洋、江阴、横海水军四卫添造多橹快船，会将领之。无事则沿海巡徼，以备不虞。倭来则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为内寇，不可得也。”〔2〕

朱元璋也同意他的办法。从而使水军和沿边卫所力量都有所增强。洪武十七年（1384年），倭寇屡侵浙东，朱元璋命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镇，继又命江夏侯周德兴修建福州，漳州、泉州、兴化（福建莆田）四郡，筑城、练兵，以防止倭寇入侵，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倭寇入侵上海，这时汤和已“请老”，朱元璋命他去整饬海防，击退倭寇，汤和请派习于海事的

方鸣谦同去，朱元璋问方以防倭之策，方鸣谦说：

“倭海上来，则海上御之耳。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寨垒错置其间，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登之意）岸。其兵，则藉近海民四丁取一以充，无烦客兵也。”〔3〕

朱元璋同意他的建议，并命汤和主持海防的整备和练兵事宜。汤和到浙江，就浙东西沿海地理形势设卫、所，筑城五十九个，就地选壮丁五万八千余人，担任戍卫。汤和初到浙江时，先集民丁三万五千人筑城，尽收沿海诸县钱粮和赎罪人款作役使费用，但开支浩大，人民不免受扰，颇以为苦。有人告和曰：“民讟（怨）矣，奈何！”汤和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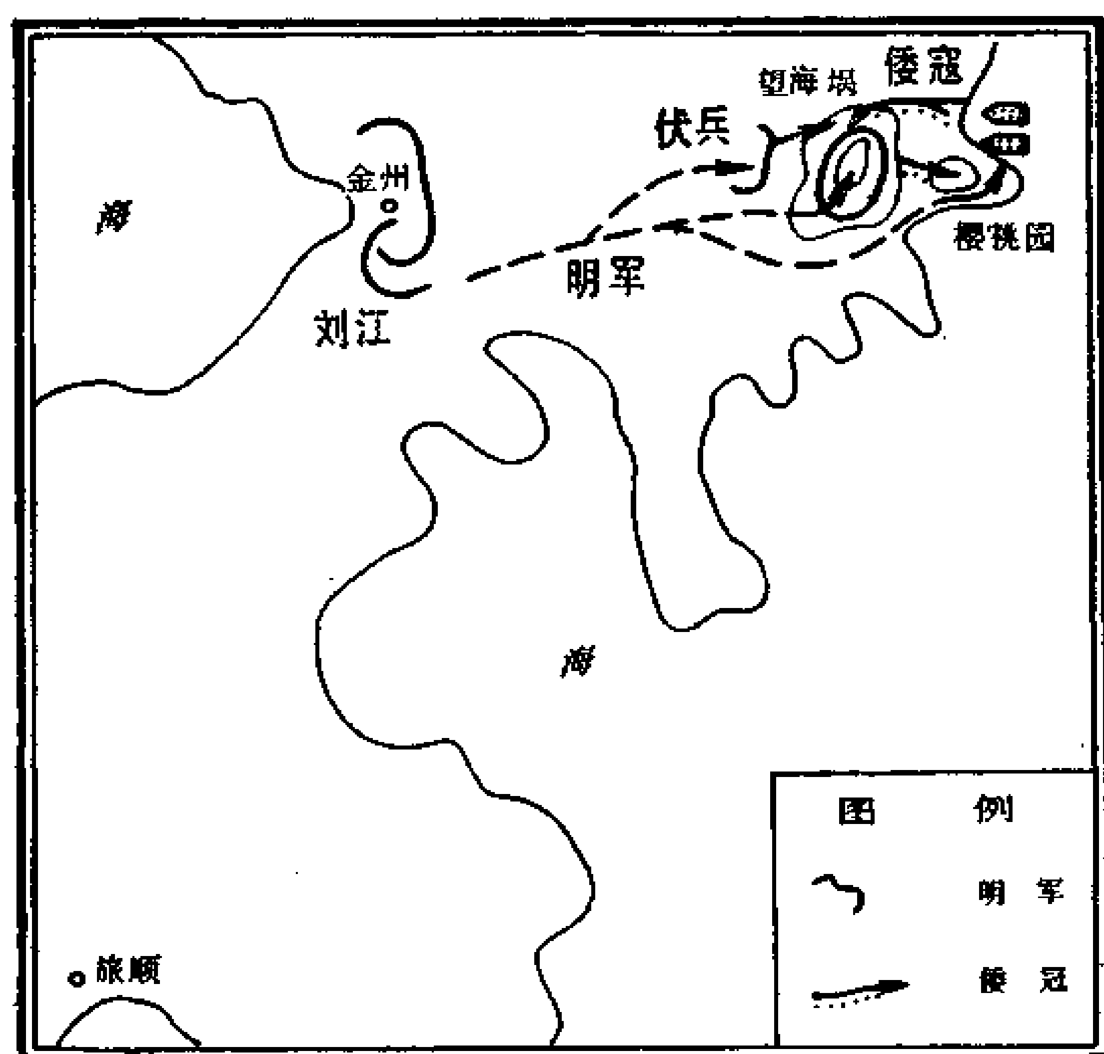
“成远算者不恤近怨，任大事者不顾细谨。国无备，及干戈铤，井里将墟，余何有焉！”〔4〕

因而一意筑城，不顾众议，及至城成，海防大为巩固。同年，复命江夏侯周德兴巡视福建、福兴、漳、泉四郡要害，筑海上十六城，籍当地民为兵，并增置巡检司四十五个，分隶在沿海各卫，以增强福建沿海的海防。永乐十四年（公元1416年）又置辽东、旅顺口、望海埚、左眼、右眼、三手山、西沙州、山头、瓜牙山敌台七所。此后，倭寇虽时有进犯，但均未得逞。永乐初，明廷继续加强海防设施及加强海上搜捕，如永乐四年（1403年）平江伯陈瑄督海运到辽东，回程遇倭船，追至朝鲜海域，焚其船，杀溺而死者甚众。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中军都督刘江守辽东，防卫不严，致倭寇入寨，朱棣欲杀刘江，既而赦之，使图后效。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刘江已任辽东总兵、都督，遂大破倭寇于望海埚（今辽宁金县东北）。

望海埚处辽东半岛之顶端，可驻军千余，洪武初就在此建堡，当倭寇入侵必经之处，堡以石垒成，设烟墩了望。刘江巡视到此，哨兵告以东南海面夜有灯光，刘江判断倭寇将至，乃派马、步军上堡守备。次日，倭寇二千余分乘船直抵望海埚下，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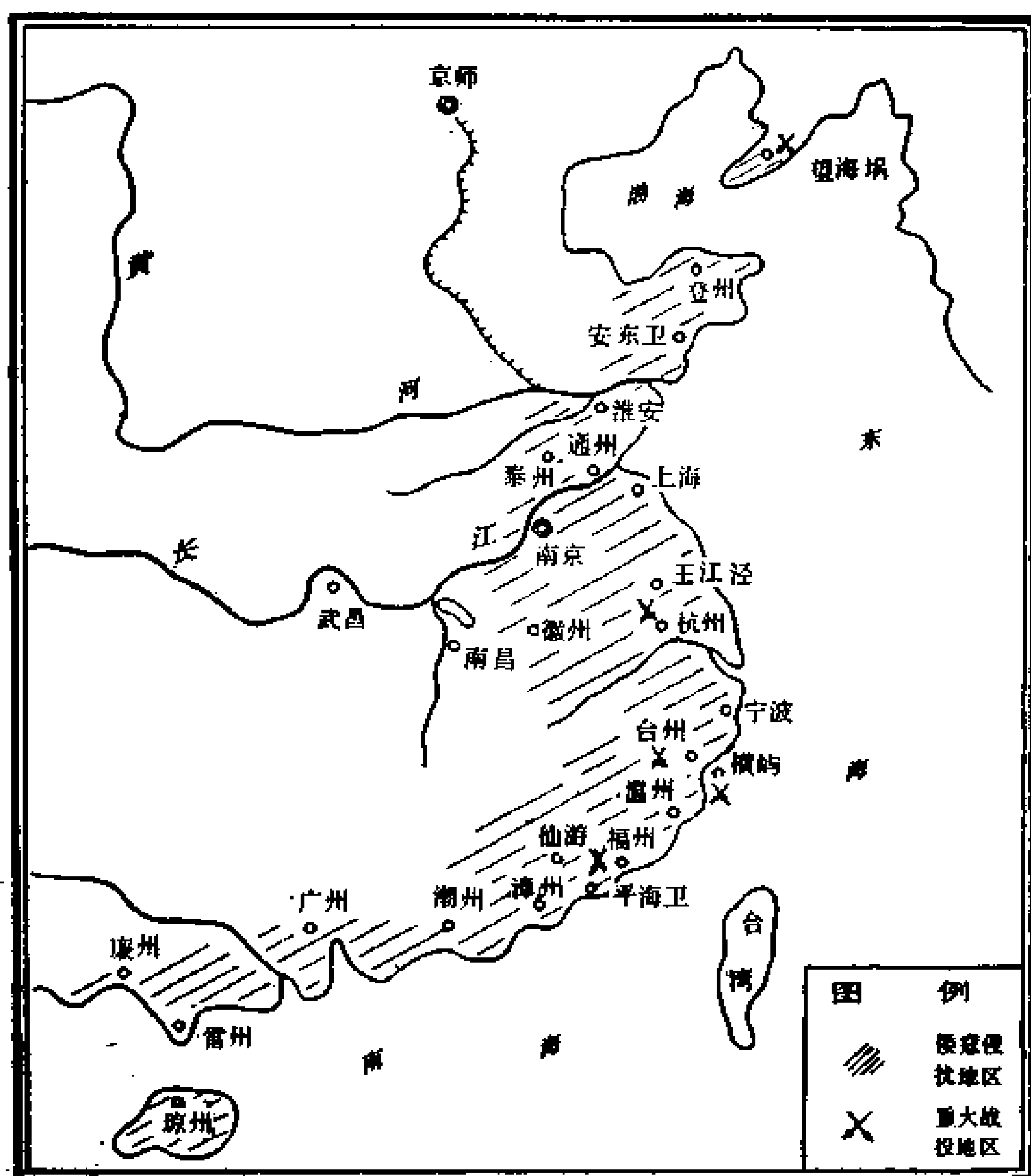
岸后鱼贯而进。刘江以一部兵力埋伏山下，派精兵潜至倭寇停船所在，断其归路，并约定一见信号，奋力合击，果将倭寇合围，倭死伤甚多，残敌奔入埚下樱桃园空堡，明军又围之。将士请进堡剿杀，刘江不许，在堡西留一缺口，诱其奔逃，然后两翼夹击，大败倭寇，生俘数百，杀千余人，无一人逃回。望海埚之战是明初防倭最大的一次胜利，除刘江的作战指挥机动灵活外，还说明明初海防工事的巩固，卫所军队有一定战斗力。

望海埚之战示意图　　（30—1图）



永乐年代，朱棣除继续执行严加海防戒备，倭来即歼的方针外，政治上仍不断地力求与日本友好。朱棣就皇帝位时，日本王源道义遣使来入贡，朱棣赐以冠服文绮，并给金印。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派礼部员外郎吕渊等出使日本，表示修好。在此之前，太监郑和等持赏诏谕各海国，日本首先表示归附。但日本封建统治者虽表面表示归附，接受贸易条件，但执行颇不彻底。一是贡期不按限期，二是船数、人数远远超出规定，还暗携武

倭寇侵扰地域示意图　（30-2图）



器，乘机扰掠。因明初海防巩固，兵力强威，虽倭寇不断侵扰，直到嘉靖以前约一百五十年间，未构成大患。这也应该说是明朝在政治上争取友好共处，军事上严加整备和近海歼敌方针运用的结果，事实证明这些方针是正确的。

明初海防的成功，就军事上来说，主要有以下因素：

1．海防准备充分

古人有云："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司马法·仁本第一》）朱元璋在即位之初，当北方多事之日，仍不忘沿海海防，注意舟船制作，建设水军；设立沿海及岛屿以水军为主的卫、所，建筑城、堡及寨；制作适于海战的兵器械材等等。明水军在建国过程中就具有一定基础，有过显著的战绩和经验，如灭陈友谅、灭四川明昇都有赖于水军。加以朱元璋、朱棣父子对海防的经营，海防准备充分，成为海防安全的最有力保障。

2．海防组织体系完整

明建国后，实行卫、所制。沿海卫、所，各属所在省都司，而在中央，又设五军都督府分辖各省都司。每卫有兵力五千六百人，为建制单位，屯田、戍守均统一于卫所。此种制度，体现于沿海卫、所、有熟悉当地地形，习惯海上生活和善于战斗的特点。而中央都督府对统御各省都司，也有所侧重，如左军都督府辖浙江、辽东、山东都司，侧重于海防，又前军都督府除辖有福建、广东都司外，还设有主要负责海防的福建行都司，说明也是侧重于海防。遇有战争，除戍守兵力，另抽部队，命将支援，在中央有京军三大营，作为强有力的战略预备队。因而海防组织体系是完整有力的。除此，对海防的临时性任务，为巡视、筑城等等，还常派熟悉海防情况的得力官员协助，以补组织体系的不足。

3．近海歼敌的海防方针恰当

朱元璋的战略防御思想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由此产生近海歼敌的海防方针，是合乎规律的。按当时生产水平和条件，能

使郑和率庞大船队远下南洋，说明明已具有相当的造船能力。但当时边防的重点在北方，采用近海歼敌，就无需建立大量的远洋船只，可以节约很大国力。在沿海地区采取近海歼敌的方针，可以用较少的财力和兵力，戍守广大的地域，敌来，则近海歼之，不使入寇内地，因而是适合当时情况的。

4．有适当的防御纵深

近海歼敌，应首先考虑使敌人不能近陆，故防御纵深应建立在海上，岸边则为最后一道歼敌线。明初的海防层次是：以船队巡逻海上，查明了敌情并寻机歼敌；及敌渗入近海，则赖岛上的水寨与水军配合，歼灭敌人；如不能如愿，则在敌近岸时，由水军与岸上守兵相配合给以迎头痛击。这种防御层次，使海防的水陆军能依托近海岛上的水寨与陆上的卫所进行有机配合，形成有一定深度的防御纵深，又把重点置于近海，成为近海歼敌的重要条件。明初，倭寇虽时有入侵，但一般均被歼在防御纵深之内，因此危害不大。

第二　嘉靖年间的对倭战争

一、倭寇的猖獗和入侵的特点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日本的南朝虽然被北朝所灭，但在长期的战乱中，许多溃兵、败将以及失去生产依据的浪人，逃亡在海上，他们和中国的冒险商人相互勾结，对中国沿海进行袭扰。此后，日本幕府不能控制国内各封建领主和诸侯，发生了近百年的内战，即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各大名（势力较大的名主）都拥兵自重，支持倭寇向外掠夺，以补充各自军费的不足。同时日本的经济也在发展，刺激了大名们的需求，需要更多的中国商品，因而中国商人也不顾明廷法纪，与倭寇勾结，进行私运、偷运。倭寇因战乱影响且受到大名们支持，数量大增，又有中国巨富、豪商的暗中帮助，一时十分猖獗。此外，明英宗以

后，政治日趋腐朽，到嘉靖时，权臣严嵩擅权，包庇通倭官员和奸商，也是倭寇猖獗的重要原因。由于政治朽败，土地兼并严重，农民被迫流亡，一部分为倭寇所利用。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采用禁止和日本通商的政策，触及到国内豪强、奸商等的利益，他们便与倭寇勾结起来，扰乱海境内外，历史上称为"从倭"、"假倭"，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十之七"[5]。倭寇猖獗的直接原因还是在于海防的废弛。明中期以后，屯卫制度被破坏，卫、所大量缺员，如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卫、所缺员已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到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卫、所人员仅有原额的百分之二十了。而尚存的人员，兵多属老弱，不习军伍，军官则是世胄纨袴，不懂军事。沿海战船敝败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且只余有原数的二、三。这样的海防情况，使倭寇的猖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倭寇不同于一般海盗，他们有一定的组织，有武器和物资的供应来源，具有一定战斗力。倭寇惯于用重箭、长枪和双刀，长于近战，善人自为战，勇于冲锋，习用设伏。

倭寇常以日本萨摩等岛为根据地，乘可载百人左右的大船泛海。大举入侵时，船可多至数十只，人数可达数千人以至两万人。他们入侵步骤常以近海岛屿为巢穴，然后分兵侵掠州、郡，围攻城池。上层一般无统一的领导，但下层组织严密，纪律甚严，常以三十人以下的小股攻掠村落，以海螺作信号，注意协同、配合。常引诱本地人作向导，派出斥候查明情况，然后有层次地展开兵力，也常驱使难民作前锋以侦查情况。倭寇对沿海地区侵扰，常选明军不易展开的地域，使明军不能及时集中和策应。

倭寇对被俘人民极为残酷，部分被押去日本做奴隶，部分被迫参加寇群。这些人常被剃去头发，抹以油彩，割去舌头，使不能说话，作战时，驱为前队。至于倭寇所到之处，对沿海居民的烧杀淫掠，就难以尽述了。

二、"争贡之役"后明廷的战略失误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五月，日本的诸道争贡，造成内讧，自相斗杀，并抢掠宁波沿海的一些郡邑，杀了明廷一些备倭的将领，其中有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鏜、百户胡源等，不仅浙中警报四起，明廷也大为震动，历史上称之为“争贡之役”。其简单经过：起初，宁波人宋素卿奔日本投倭，曾随日使者源永寿来贡，被其从父认出，报当地守臣，守臣据以上报，没有结果。此时，日本统治者源义植因年幼无法制御群臣，群臣争相求贡中国，强索符证，其左京兆大夫内艺兴派僧人宗设，右京兆大夫高贡派僧瑞佐和宋素卿先后到宁波。按惯例，日本贡货到港，市舶司检查货物和宴待来使，都依先后顺序。此次，瑞佐实后至，但宋素卿狡诈，贿赂市舶太监，先检视瑞佐货物，并待之如上宾；宗设对此不平，乃与瑞佐仇杀，市舶太监又因宋素卿的关系暗助瑞佐，并支援以武器，但宗设势强，除劫掠外，追杀瑞佐，复追宋素卿至绍兴后才退去。在这样情况下，明廷犯了两个战略性的失误，一是罢废市舶司；二是杀了反走私的朱纨，放任走私，从而导致了倭寇的进一步猖獗。

“争贡之役”后，给事中夏言认为“倭患起于市舶”〔6〕，明廷信之，遂罢市舶司。这一失误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洪武时也曾与日本断交，但市舶司不废，因市舶司之役，关系国家经济利益和海防安全，所谓“迁有无之货，省戍守之费，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也”〔7〕。明廷自以太监掌市舶司，谋利常为太监所吞，且勾结倭寇，为患地方，整顿市舶司是必要的。如今停了市舶司，但禁止不了私下贸易，反给了豪门、地主、奸商等以大发横财的机会，鱼肉了当地人民，政府也得不到好处。自罢市舶后，日货先寄商家，奸商不给货款，多者万金，少者数千，索急了奸商即远避而去。后又寄货贵官、豪门家，而他们比商家更为奸诈，倭人近岛而居，坐索货款，日久乏食，就出没在海上为盗。沿海贫困农民以及不得志的地主、官吏也附之，成为假倭。真、假倭相结合，真倭利用假倭作掩护和向导，

进行劫掠；假倭又与官吏、豪门相勾结，大规模走私，从而使海上无安宁之日。国家不得不动用武力以解决沿边倭乱，既失去经济收益又付出巨大的军费。所以说停市舶司是战略性的重大失误。

嘉靖中期由于倭寇猖狱，事权分散，如巡按御使杨九泽所言："浙江宁、绍、台、温皆滨海，界连福建之福、兴、漳、泉诸郡。虽有巡海付使、备倭都指挥，而海寇出入无常，两地官弁不能通摄，制御为难。"〔8〕他主张派重臣尽统沿海诸郡军事，以统一指挥，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部署。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派都御使朱纨巡抚浙江，兼管福建的福、兴、漳、泉、建宁五府海道。朱纨尚未到任，盘踞在宁波、台州诸近岛的倭寇已登陆，攻掠沿海诸郡、县，焚毁官、民居处无数。朱纨到任后，首先擒斩私通倭寇的土豪、恶霸近百人，因为他认为祸源在假倭，曾说："去外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群盗易，去中国衣冠盗难。"〔9〕朱纨下令禁海，凡沿江"双樯艅艎（可用以走私的大船）"，尽令毁之，不从者杀，并日夜练兵甲、严海防，几次攻破沿海岛屿上盘踞的倭寇。此时，浙人通倭的多出入在宁波、定海间，闽人通番的多在漳州、浯屿间出入。朱纨认为不严禁通倭走私，海上不会有安宁，故严禁通倭走私，这在当时应说是正确的战略措施，也是打击真、假倭勾引的最好行动。嘉靖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三月，倭寇劫掠至诏安，朱纨派副使柯乔等捕获通倭豪门、土劣九十六人，并立即处决，然后上报朝廷。这就触及到与倭寇有关连的豪门贵族的利益，他们在朝廷中的代理人事相攻击朱纨有"擅杀"之罪，并放任走私活动，朱劾遭到弹劾愤而自杀。明廷破坏了反走私以致放任走私，是又一次重大战略失误。由于明廷的一误再误，致使嘉靖年间沿海倭患愈演愈烈。

三、明加强海防和王江泾之战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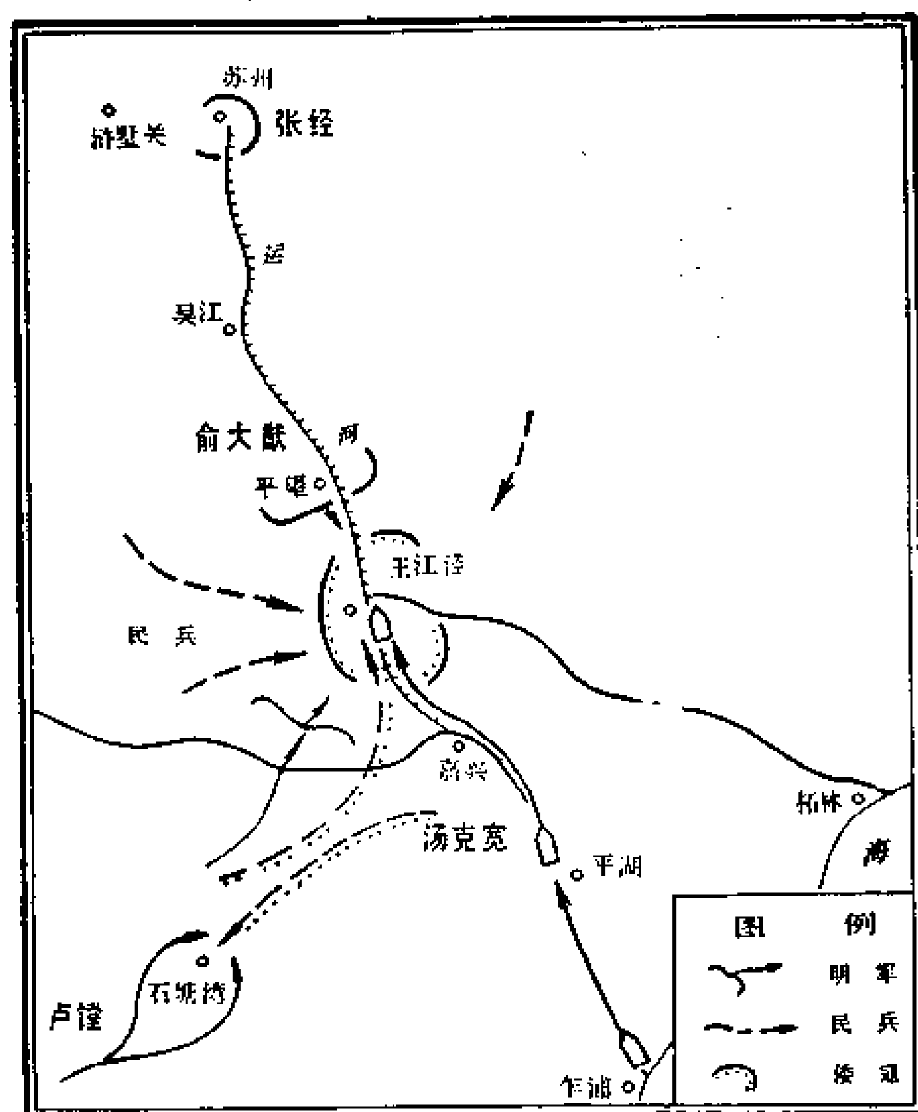
朱纨死后，真、假倭活动更为嚣张，他们以上海附近的柘林

镇，浙江的乍浦为根据地，把部众分为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的大、小多股，四出劫掠。这一带沿海地区为富庶之地，人口密集。倭患猖獗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遭杀害，财富被掠夺。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明廷又恢复了市舶司，以缓和倭患。同时不得不加强海防，命巡抚山东都御使王忬巡视浙江兼辖福建滨海诸府，节制诸军，加强海防。王忬到任后，任命参将俞大猷、汤克宽为主将，辖所属将兵，分布沿海各镇堡，严加防御。此后年年与倭寇战争不断，互有胜负。王忬调离后，明廷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改命前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南直隶、浙、闽凡六省，专任剿倭军事。明廷起用得力将帅，加强海防，统一了事权，改变了明海防长时缺乏统一筹划和兵力分散的局面，在战略上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权臣严嵩以其义子赵文华赴江南"祭海神"并区处防倭军事。这时倭寇正由柘林犯乍浦、海宁、崇德、德清等地，张经因此调湖南、两广"狼兵"、"土兵"尚未到达，"持重不发"，拟俟所调部队到达后，发动进攻，一举歼灭该寇。赵文华竟密告张经"不时进兵""养寇失机"。正在这时，张经发动了王江泾之战。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五月，张经判断盘踞在柘林附近的倭寇两万人，有窜犯王江泾（今浙江嘉兴北）的企图，决定采用分进合击的战役指导，歼灭该寇于嘉兴、平望（今江苏吴江南）一带，此时，所调部队已到达，张经派卢镗率领由南向北，迫使倭寇进入王江泾水网地区，并指示他，如敌向杭州方向窜走，就尾追不舍；命汤克宽率水师由乍浦向嘉兴以北进攻；张经率副将俞大猷驰赴苏州，在平望阻击。各部都按预定计划行动，卢镗首先歼敌一部于石塘湾（今浙江桐乡西南），并尾追敌人迫使该寇向嘉兴以北逃窜；汤克宽率水师经内河向王江泾方向前进，张经、俞大猷在平望，予倭寇以重创，迫使其向王江泾回窜。此时，卢镗率军攻其前，俞大猷率军追之于后，汤克宽率水军击之于中路，附近各县民兵也赶到助战，形成四面合围的局

面，因而大败倭寇，歼敌约一千九百余人，仅三百余残敌逃走。

王江泾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30-3图）



王江泾之役的胜利，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乍浦、金山卫、吴淞、崇明一带地区，是倭寇登陆后最大的一个巢穴，海上有舟山群岛作为依托，由此西上可以劫掠大江南北，威胁明代的留都南京。王江泾之役的胜利，打击了倭寇的气焰，迫使倭寇不得不向浙、闽沿海转移，从而缩短了明朝抗倭的战线，保障了长江三角州财富之区的安全，保卫了明代东南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南京。主帅张经分析和判断情况正确，把主要突击方向指向苏、松、杭地区，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待歼灭此寇后，再由北而南

逐次击灭浙、闽沿海倭寇。这一指导从战略上看是很恰当的，也是成功的。但张经却遭到赵文华的诬陷，明廷昏暗，颠倒是非，反将张经处以死刑，使刚有转机的抗倭战局重又陷入困境。

四、运用瓦解"假倭"策略的成功

明嘉靖中期，假倭队伍扩大，如能瓦解假倭队伍，可以孤立真倭，对抗倭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以汪直为首的假倭势力较强，在长江口到杭州湾的岛屿上盘踞，各股互相支援，其余麻叶、徐海、陈东等也各有一定实力。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倭寇屡犯浙东州县，时胡宗宪总督沿海军务，和赵文华定招抚计，对假倭进行分化瓦解。明廷也指示："亟图方略，或剿或抚，便宜行之。"[10]宗宪与汪直同乡里，打算招抚他，派人去日本，找到汪直的养子汪激，通过汪激去说服汪直，汪直的母妻均囚在金华狱中，并命释放，给以厚金，动之以情，汪直果然产生降意，但以通贡市作条件，为明廷所拒绝。五月，假倭徐海、陈东、麻叶连兵围桐乡，胡宗宪对他们进行分化、离间，解了桐乡之围，又使徐、麻、陈互相攻杀，命徐海擒了麻、陈来献，再策动陈的部下攻徐海，徐海跳海死，明军乘机进攻，两浙寇患渐平。汪直仍率部据宁波之岭港，胡宗宪以书召之，汪直要胡派一贵官为质，胡立派指挥夏正前往，汪留其养子汪激守岭港，自己来见胡宗宪，胡将汪直送去杭州交巡按御史王本固，王擒斩之。汪激率部窜犯闽、广。

胡宗宪的"招抚计"，实际上招而不抚，用的多是计诱和离间之计，在军事进攻配合下，对击平两浙倭寇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但如果能有招有抚，对胁迫从寇和改恶向善的能赦以不死，予以适当安置，则对瓦解假倭可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综观上述，嘉靖年代，倭寇猖獗，作战频繁，明军有胜有负，在战略运用上，有得有失。明廷注意到分区防守，但兵力分散，缺乏统一指挥，更没有一个总的战略方针。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开始改善这一状况，先后选派了朱纨、王忬、张经、胡

宗宪等，担任沿海备倭统帅，这无疑是正确的，他们对抗倭战争都作过一定贡献。但明廷用将不专，且轻信权臣诬陷之词，致很有才略的朱纨、张经于死地，明廷没有认真分析倭寇猖獗的原因，误认倭患“起自市舶”因而停了市舶，由此反而招致了大规模走私和假倭的增加，是战略上的最大失误。此外备倭作战，统一指挥，分区防守，有力的机动部队，都属于战略性部署，缺一不可。但强有力的机动部队，在很长时期内都未得到解决。张经注意到了这问题，从两广、湖南调来部队，取得了王江泾之役的大捷。后来戚继光意识到这个道理，经他多次建议，直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才得到总督胡宗宪的许可建立新军，成为以后抗倭作战中有名的“戚家军”。

第三　戚继光编练新军积极抗倭

戚继光是将门之后，世袭为登州卫指挥佥事。嘉靖三十四年，调任浙江都司佥事，次年七月，升任浙江都司参将，管辖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军务。戚继光首先看到卫、所制度日趋腐朽，而“客兵（外省部队）”战斗力不强，纪律不佳，当时民间谚语说：“宁遇倭贼，毋遇客兵；遇倭犹可逃，遇兵不得生！”[11]因而主张就地募兵，训练新军。并依据自己的军事思想去教育军队；根据地形、敌情特点去编组军队，改进战法。同时加强海防整备。由此，戚继光在抗倭战争中取得一系列胜利，成为历史上爱国名将之一。

一、戚继光的战术思想

嘉靖后期，卫所腐败，兵员严重不足，水军力量薄弱，已无法贯彻明初“近海歼敌”的战略方针，戚继光针对当时具体情况，对海防主张水陆兼备、陆上歼敌为主的方针，并树立“大创尽歼（指歼敌主力）”、“杜其再至”[12]的指导思想，这和当时有些人常常采取的“待其饱载归，浮海击之”[13]的消极应付相

比，是积极的。

戚继光用极朴素的语言，说明军队、人民、倭寇的关系，他说：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14]教育士兵捍卫地方，保障人民，成为他训练新军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

戚继光熟习兵法，但又不拘泥于兵法，主张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因敌制宜。他要求部属作到灵活、齐勇、快速并重：灵活，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严守“营阵之制”，特殊情况下允许部属临机应变；齐勇，就是要求统一指挥，统一号令，统一行动；快速，就是要求军队行动敏捷，能迅速集中兵力以应战机。

戚继光善于以局部优势，各个击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还善以伏兵、侧击、截击等方法包围敌人。

戚继光在作战指挥上，主张正奇互用，长短结合，他说：

“如贼来冲，或二三人，或五六人，我兵俱伏旗息鼓，器械俱偃肃不动，彼冲至六七步外亦不动，贼必退去。渐益前来，如加至百十以上，炮手照依对敌次第，俱随牌立于濠岸高土之上，如令打放，空者复装，饱者续放，放者方装，装者又发。如此则虽终日，炮放不乏，必无放尽而无炮之失。弩射手坐于岸土之下，亦如令，间名准射，射者后续，亦不歇竭。再至十步之内，方才长牌听鼓，堵墙而进；枪刀短棍，夹牌而入。大营相应，金鼓火炬，此节制正战也。战间，翼击以分其力，游伏以疑其事，出奇以乘其众，更番妙处，俱在临时制变，将所自出。”[15]

戚继光重视敌情侦察和分析。他认为：“倭性人自为战，善于抄出我后，及虽大败，随奔随伏，甚至一二人经过尺木、斗壑亦藏之。”因而“凡遇林木人家过溪转角之处……即留一队或一哨，守其必出之口”，遇大村落，即行包围、搜索，一面主力追击，麦田茂草，则留一队分散搜索。他总结说：敌有伏兵，“我有搜守之法而伏无所用也”[16]。戚继光每临战，都还派出远、近程侦探，使敌情了然于心，并据以进行分析，制定若干作战方案，以泥土制成模型（类今日的沙盘），和将领们共同研究对策。

戚继光在选定攻击重点时，常以真倭为主要目标，他认为真倭消灭了，假倭自会瓦解。

二、戚继光编练新军及其战备

（一）招募和编练新军

戚继光认为要消灭倭冠，必须建立一支英勇善战、训练有素、服从指挥、精干有力的新军。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秋，浙江义乌的进行一场大规模械斗，戚继光发现他们勇猛而有血气，如果把这些因私怨而兵戎相事的群众引导到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抗倭战争中来，必将发挥出巨大作用。他遂以“杀贼保民”为号召，本在精不在多的要求，在义乌、金华等地精心选募。他所选招的士兵，注重品质，“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第一可用只是乡野老实之人……乡野愚钝之人，……诚信易于感孚，忾气易于振作”，以威压之，以恩收其心，结之以至诚，恩威以相济，“是故遵命奉法，临事用命，所以成天下之功。”[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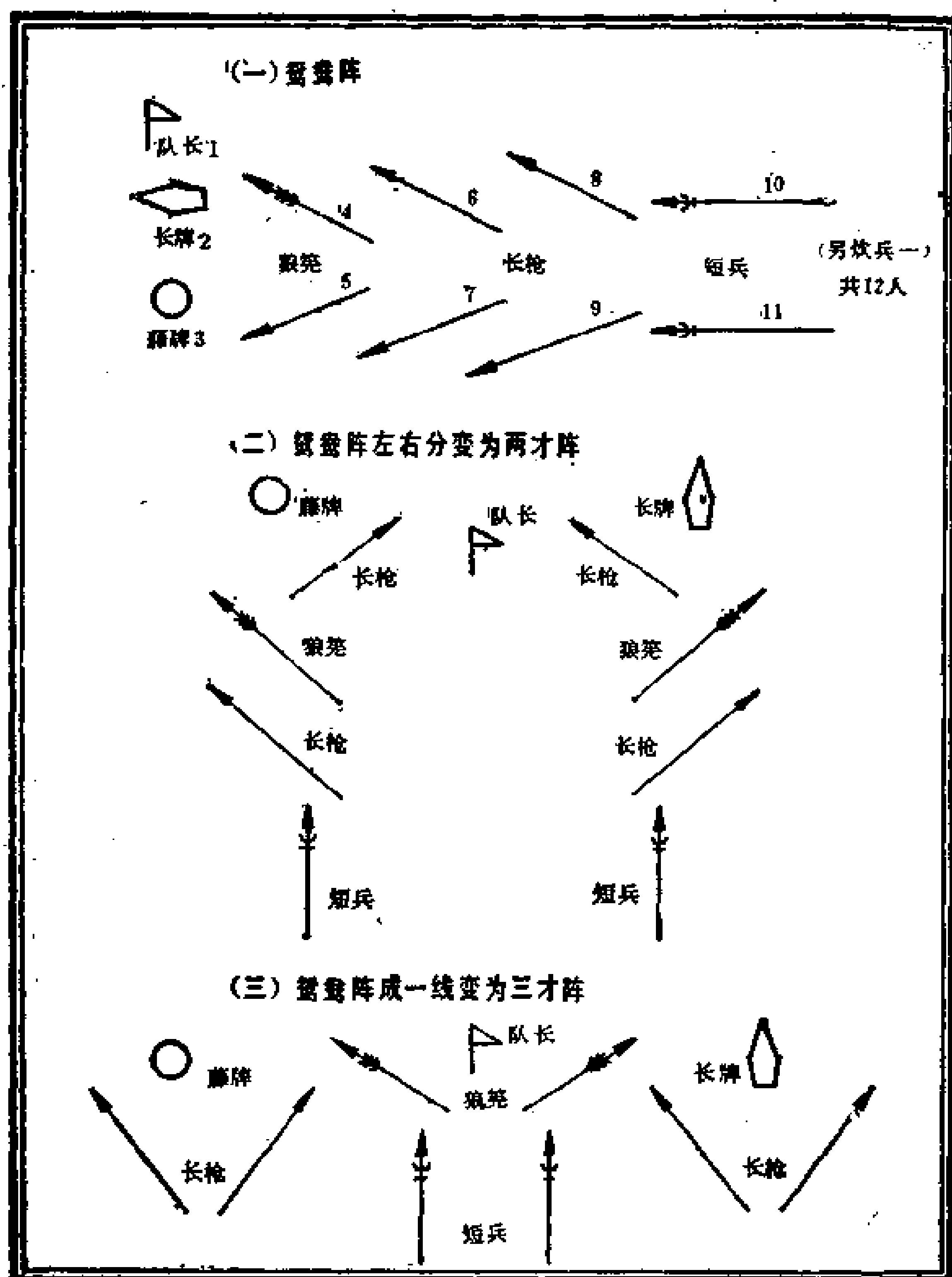
不久，一支由王汝龙、朱珏为首，以义乌、金华农民和矿工为基础的三千人的新军建成，经过两个月训练，遂成劲旅。

戚继光依据海防地形、倭寇战法等特点对兵制有所创新，即以“鸳鸯阵”战斗队形为基础，以十二人为一队，作为最基层的战斗集体，四队为一哨，四哨为一官，四官为一总，每总约八百人。总设把总，官设哨官，哨设哨长，队设队长，层层节制，十分严谨。

以“鸳鸯阵”法为依据，队是一个有长短兵器相结合，可以独立行动和作战的最小单位。在与敌人接触时，可按敌情和地形，迅速变化为“鸳鸯阵”、“两才阵”或“三才阵”。“鸳鸯阵”法最前为队长；后二人，一执长牌，一执藤牌，长牌手遮拦敌人重矢、长枪，以掩护后队前进，藤牌手配有标枪、腰刀，亦可近战；再次二人，各执狼筅，掩护执牌手；后四人为长枪手，每两支长枪照应一牌一筅；最后二人用短兵器，为长枪刺不上敌人，即冲上去近搏。“两才阵”、“三才阵”是根据情况又将小

队再分开，以便机动。这些阵法运用灵活，组织简单，其组成、变化参看下图。

鸳鸯阵及其变化示意图 （36-4图）



以鸳鸯阵（队）为基础，再配上鸟铳手、弓弩手、火箭手即组成一官（大营），每官的四哨，有正兵、左右翼和伏兵，每哨的四队，也是可分可合，有正有奇。

戚继光练兵，要求严格，进退有序。首先，给以思想教育，其内容已略如前述。其次，是严格的技艺训练，戚继光主张技艺要实用，反对什么花枪、花刀、花棍之类不切实际的技艺。他按照士兵的年龄，体力，授以不同武器，予以不同训练：年少敏捷的授以藤牌；年富力强、老成持重的授以狼筅；有勇气的健壮士兵授以长枪，其余则授以叉、耙、棍、刀等短兵器。除要求个人精通所用兵器的技艺外，还训练多兵卒的配合动作，求得密切协同。再次，为阵法训练，主要是鸳鸯阵法的训练，要求在个人技艺熟练的基础上，配合默契，变化灵活，适应战机。戚继光要求军队纪律严明，团结一致。他对纪律教育的实施，贯穿在整个训练过程和战斗过程之中。他要求官兵患难与共，官长要能以身作则；要求军队爱护民众，作到不砍伐树木，不毁坏田地，烧毁民房，严禁奸淫、抢掠。戚继光对部属赏罚严明，作到该赏的虽仇亦奖，该罚的虽亲也不免。如一次行军遇雨，戚继光严命不入民房，全军鹄立雨中；又如他第二个儿子，在战场上临阵回顾，立即命令斩首，以严肃纪律。

戚继光对兵制的改进和阵法的训练，不仅为其以后抗倭作战打下基础，对我国军事学术的发展，也具有一定意义。

（二）周密的作战准备

戚继光在编练新军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周到的抗倭准备，其主要是：

1．调整部署，整顿卫所

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明政府根据倭寇入侵路线一般是自苏松而宁、绍而台、温的情况，将宁、绍、台分为宁、绍和台、金、严两区，以缩小正面，加大纵深。此时，戚继光调任参将，负责台、金、严三州防守，有海境数百里，是倭寇侵扰频繁的地

区。戚继光按照水陆兼备、陆上歼敌为主的方针，将所辖军队派驻在松门（浙江温岭东）、海门（浙江海门）要地进行重点防守，并请准增设台、金佥事，以兼管台、金、严三州兵备。戚继光对辖区卫、所，严加整顿，其一是严申军纪，作到令行禁止，上下一致；其二惩治刁顽官兵，使各级军官负责任事，改变军队风气；其三厚恤阵亡将兵，以激励士气，其四清查辖区户口，均摊差役，使卫、所经济来源不致困乏。经过整顿，卫、所面貌有所改变，仅松门一卫三所，在一年间又召回士兵千余，从而增强了防卫和生产力量。

2．加强对海上的警戒

戚继光重视监视敌行动和发现敌情，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行动，故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制定“伏路条约”，令各卫所都要组成伏路（搜索敌情）官军，遇有敌情，迅即上报，从而加强了海境警戒，得以及时掌握敌情。

3．增修战船，加强水军

倭寇的战船和水战技术，都逊于明军，故歼敌于海上实为公认的办法，但明廷限于人力、财力，无力建设强大的水军。俞大猷就曾建议以陆师的经费一半，去建设水师，未被明政府采纳。因而戚继光只能在辖区内，就力之所及，责成地方制新战船四十四艘，部署于海上；以指挥胡震率两哨（每哨十艘），负责松门一带防守；以指挥任锦率两哨，负责海门一带的防守；以指挥沈禄为中营领战船四艘，防守港口。当时的战船有以下几种类型：福船，吃水一丈二、三尺，配有一门发熕（火炮）、六座佛郎机炮等火器，靠风力行驶大洋深水中，倭船较低小，乘风下压，因而常能战胜；海沧船，小于福船，吃水七、八尺，配有四座佛郎机炮等火器，作战能力差于福船；苍山船，吃水五、六尺，配有两座佛郎机炮等火器；后又将苍山船改为稍大，称改艟艄。每关（两哨）二十艘船，各有福船八、艟艄八、海沧四。三种船比较，风大又风顺，沧不如福，苍不如沧；风小又逆风，福不如沧，沧又不如苍。水军按五船编为一小哨，操于水寨，战于江

海，分前、后、左、右、中配置，可登陆如鸳鸯阵对敌，多一船为倚托，其功倍于步兵。另有开浪、八桨船、网船等。开浪头尖，吃水三、四尺，四桨一橹，可坐三、五十人，不论风潮顺逆，其驶如飞，可作哨探之用；八桨船，左右共十六桨，一橹，速度更快；网船，吃水七、八寸，可容二人，配鸟枪二支，其形如梭，可以拖拽上岸，用之于里港、窄河，动以百数，集如蜂蚁，既可作战，又可随时登陆行动，甚为灵活。

三、戚继光抗倭作战的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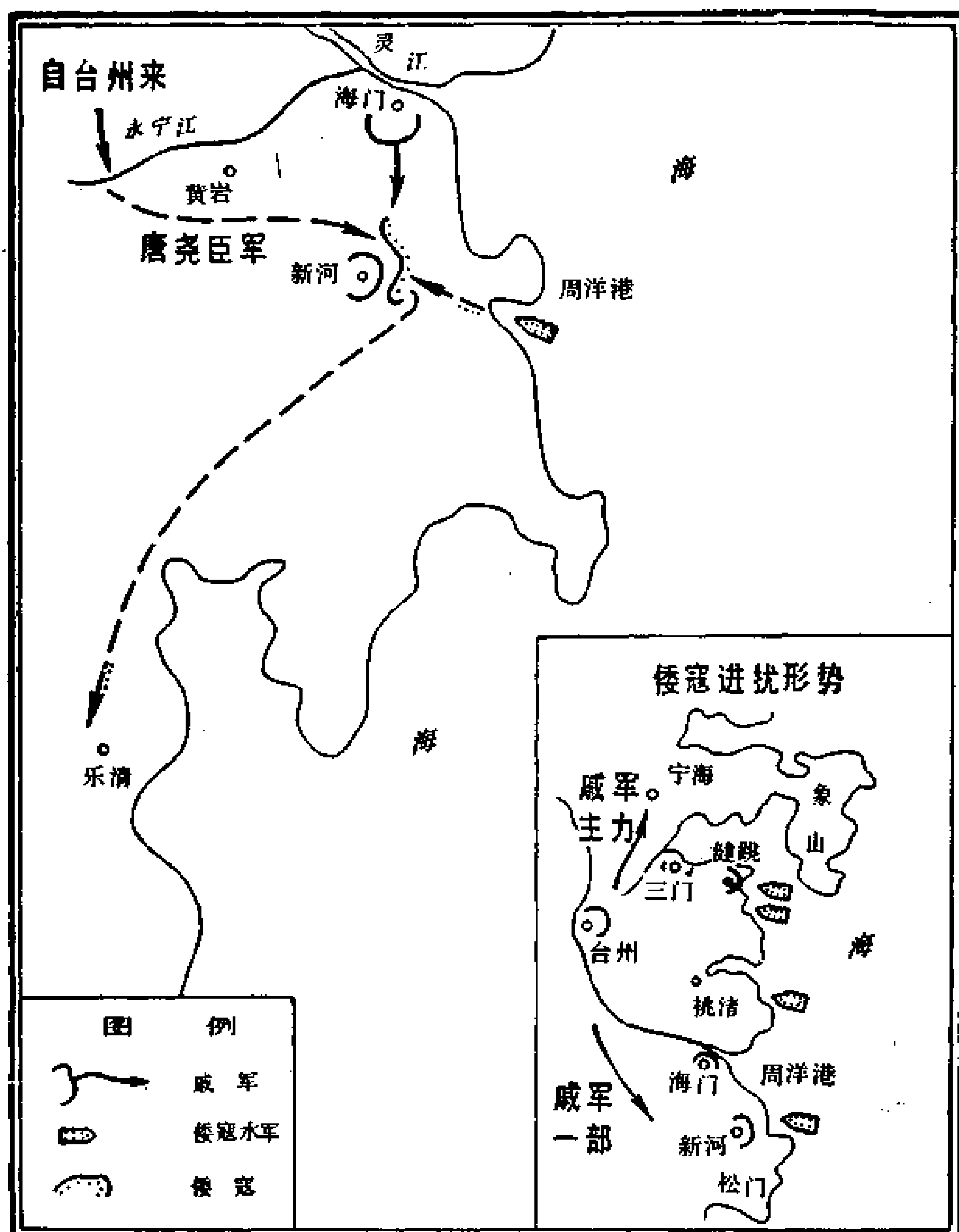
（一）台州之战

1．新河战斗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初，倭寇船五十艘，兵力两千余人集于宁波、绍兴外海，伺机入侵。戚继光亲督水师巡视海上，倭寇不敢轻动，曾一度离去。四月中旬末，倭船十六艘停泊于象山海口，继而从奉化（今浙江奉化）东南登陆，当晚窜至宁海（今浙江宁海）以北，大肆掠扰。戚继光判断这是倭寇有意诱戚军自海门、松门北上远出，然后进犯台州（浙江临海），遂一方面加强台州、海门、新河守备，一方面派任锦率水军去海上设伏，自己率主力去宁海迎击倭寇。倭寇发现上述情况，分兵三路进犯台州，一路指向桃渚，一路指向新河，主力有船十八艘，兵力约二千，泊于健跳（今浙江三门东南）。不久，倭寇迫近新河、守兵不多且多老弱，倭寇在城外抢掠，城内人心惶恐。戚继光夫人动员妇女上城列阵，配合守军防御，一时旌旗招展，枪声、杀声大起，倭寇误认城中有备，不敢贸然进攻。戚继光得知情况后，在新河寇急、宁海寇多的形势下，断然只派唐尧臣救援新河，自己率主力进剿宁海之敌。新河之敌经唐尧臣的进击，死伤甚众，余寇窜往乐清。

戚继光不为倭寇多路分兵所迷惑，仅以一部兵力援新河，而以主力打击危害最大的一路，既有利于消灭敌人，又避免为敌人所调动，陷于被动，其作战指导是正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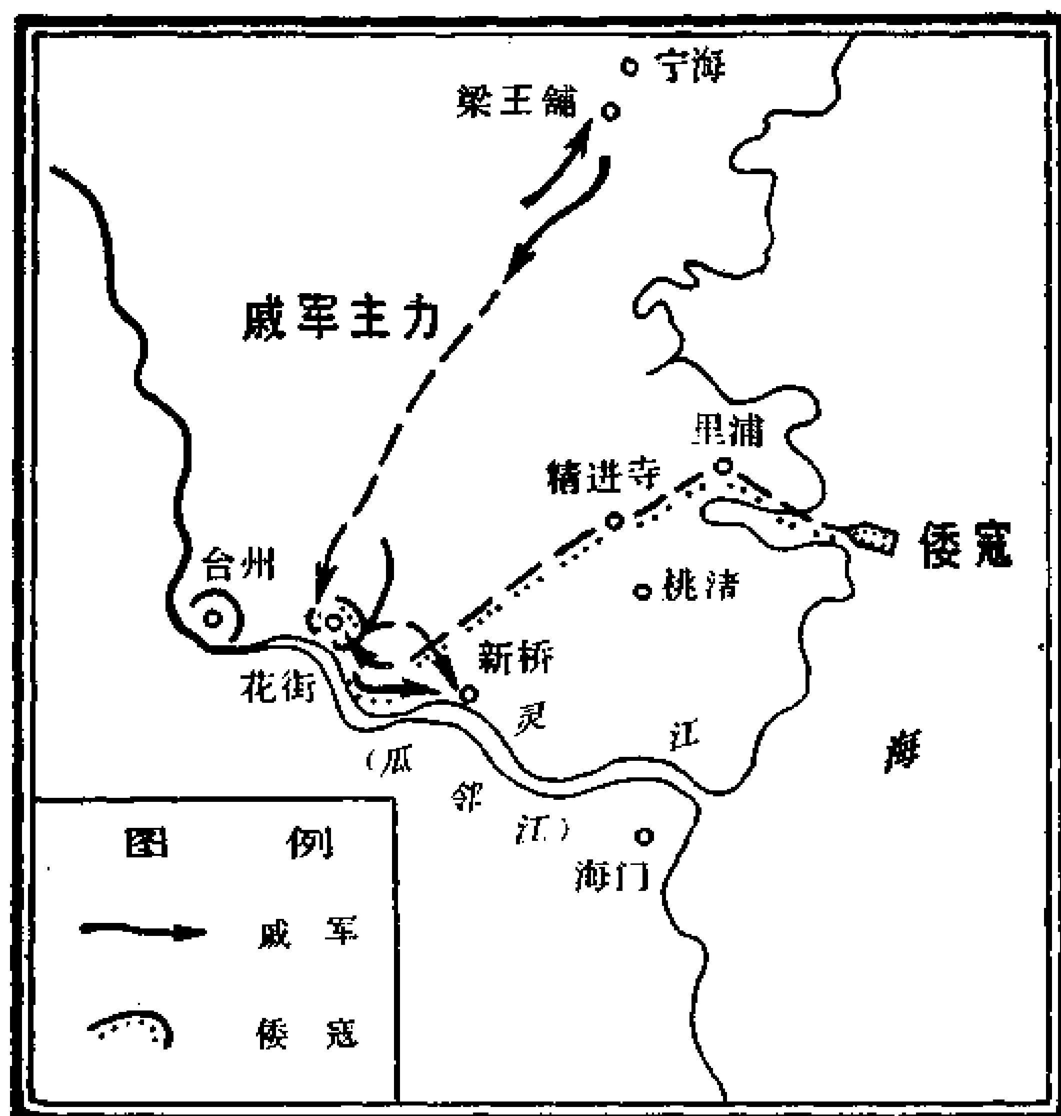
新河战斗经过示意图 （30-5图）



2．花街战斗

当新河战斗将结束时，戚继光率军已进抵宁海西南的梁王铺，接唐尧臣急报，知自桃诸东北登陆的倭寇一部，不犯桃渚而向台州前进，已抵精进寺（距台州一百二十里）。戚继光以台州为腹心要地，遂乘夜急行军赶救台州。当得知倭寇已抵距台州仅数里的花街时，不顾部队饥疲，不作休整，立即向花街进袭。倭寇前队以一字阵迎战，戚军火器队轮番发射，毙倭寇多人，敌势顿挫，戚军左、右两路奋勇冲杀，毙敌更多。倭寇企图改变阵势，戚伏兵和包抄部队尽出，倭寇遂大溃败，一部被压迫于瓜邻

花街战斗经过示意图　　（30－6图）



江，[18]一部被压迫于新桥（今临海东十五里），多数淹死于水中。

花街战斗毙敌近四百人，俘获武器甚多，救出被俘男女五千余人。花街战斗体现出戚军训练有素、英勇耐劳的特点，它在远距离急行军之后，在饥疲交加的情况下，能立即投入战斗而战胜敌人，确是难能可贵的。戚继光情况判断准确，决心果断，力争主动，并运用夹击、伏击、包抄等战法，力求全歼敌人，其作战指导，是极为出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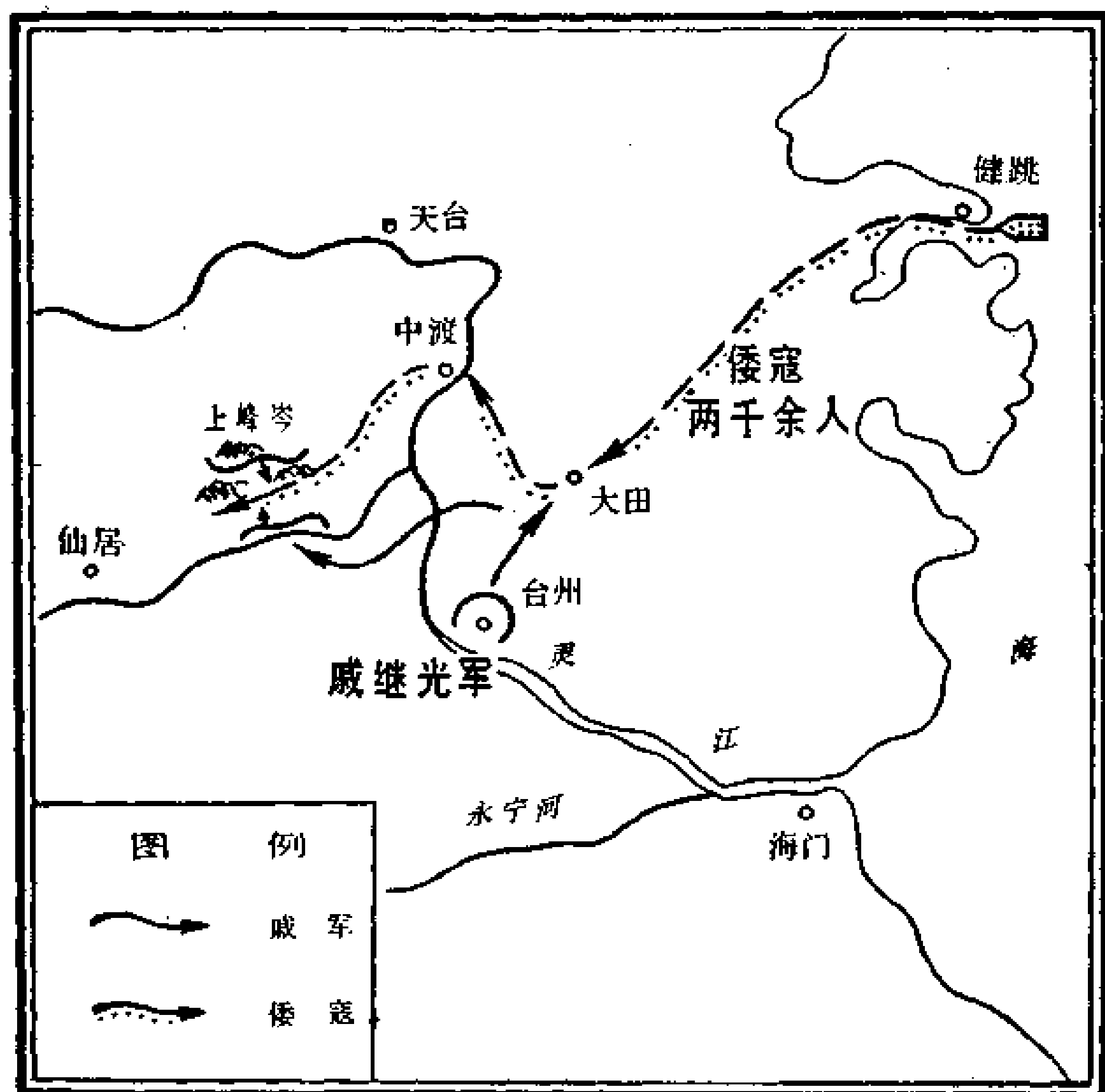
3．上峰岭战斗

四月下旬，泊于健跳及其附近的倭寇两千余人登陆，五月初进抵大田（今临海东北），四处抢掠。戚继光当时掌握兵力只有一千五百人，与敌相比，处于劣势。但他判断敌将犯台州，相信自己军队的战力和士气，决心主动迎击，并要求部署：前锋只管向前冲杀，敌死者由后队割取首级；战利品归全军所有，不战而争财物者杀；军中高树白旗，凡倭寇胁从空手投白旗下的，不罪释放。戚军在大田岭与倭寇遇，因雨未交锋。

倭寇见戚军有备，乃从小道趁雨西窜，欲往仙居，进扰处州（今浙江丽水）。戚继光判断敌将在中渡（今临海西北）渡河，往上峰岭、白水洋西犯。上峰岭是一个狭长的谷地，便于伏击，戚继光乃率军从大路（比小路近二十里）奔往上峰岭设伏，令全军伪装隐蔽以待敌至。果然，倭寇两千人以一路队形通过狭谷。当其通过约半数时，戚军发起猛攻，敌仓皇应战，乱作一团。戚军四面合击退据上界岭的敌人，另在山头树立白旗，招降胁从，得数百人，上界岭的敌人被全歼，俘敌首领五人，缴获各种兵器约一千五百件，而戚军只牺牲三人。

上峰岭战斗，戚军以少击众，获得胜利，其主要原因，是戚军熟悉地形，判断敌人行动准确，因而能主动选择有利战场，以伏击全歼敌人。其次，对于敌长达二十里的行军纵队，用拦腰截断、分割围歼的办法，也很合机宜。

上峰岭战斗经过示意图　（30-7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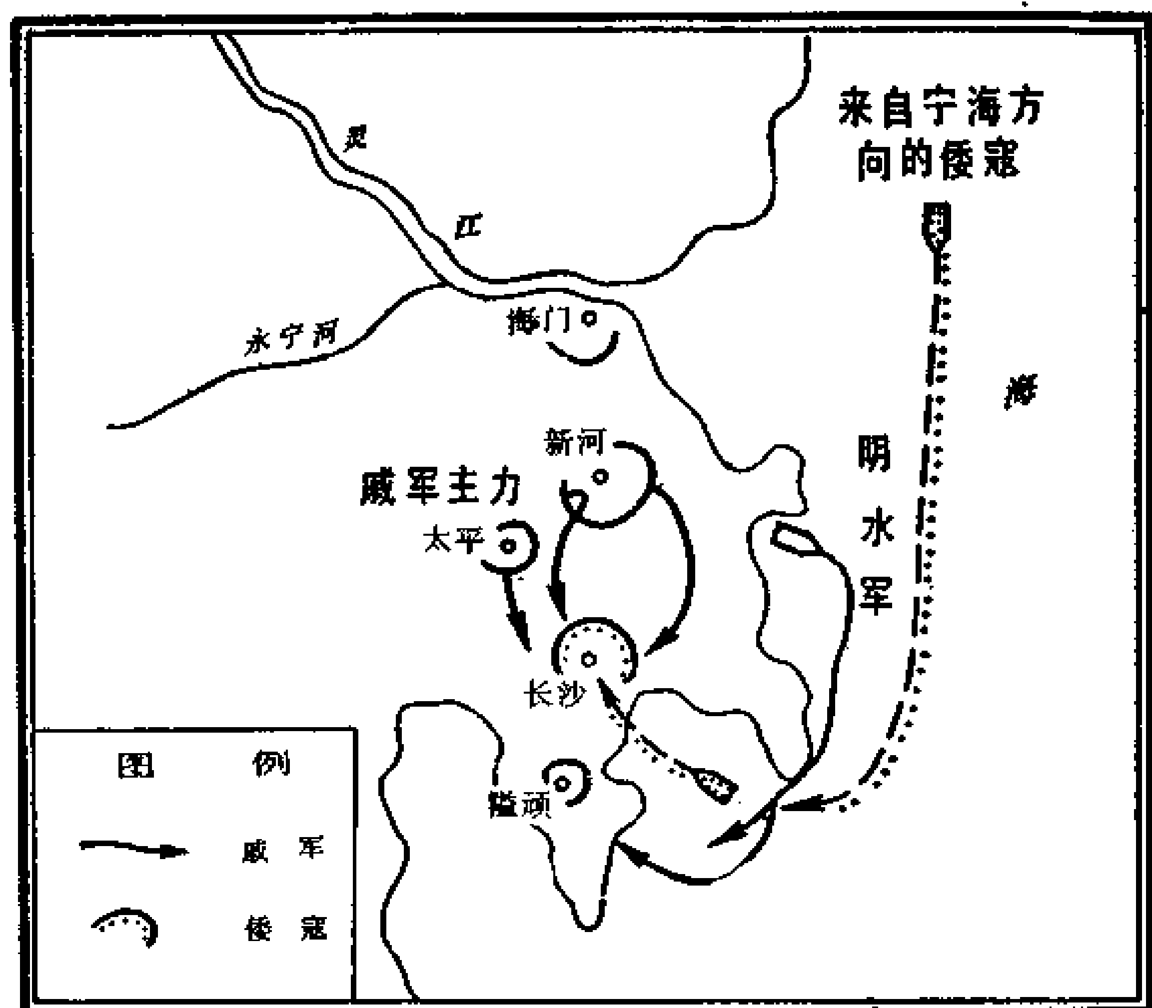


4．长沙战斗

上峰岭战斗后，原自宁海撤向海上的倭寇，又聚集二千余人，于五月中旬在长沙（今浙江温岭东南）登陆，筑垒设营，有长期盘踞迹象，戚继光判断它们将北扰太平（今温岭），南侵隘顽（今温岭南）。戚继光这时驻军新河与诸将讨论敌情，诸将都认为长沙地理位置重要，不能容倭寇盘踞。于是，戚继光以一部兵力从海上增防隘顽，一面部署兵力，从陆上、海上水陆配合，围歼长沙倭寇。二十日拂晓，戚军进至长沙北，偃旗息鼓，分三路

出敌不意，迫近敌巢。倭军慌乱异常，迎战不利，纷纷夺船溃逃，但船只已为戚军奇兵焚毁，只有投海逃遁。这时飓风忽起，波浪汹涌，泅海倭寇多被淹死，海滩残敌也被全歼。

长沙战斗经过示意图　（30-8图）



长沙战斗，倭寇大部死于海中，缴获各种兵器三千二百四十多件，夺回被劫掠的大批财物，救出被掳男女一千二百余人。战前倭寇分兵外出抢掠的兵力三百人，趁夜乘船外逃，也被明水军歼灭。这次战斗，水陆配合，突然袭击，烧其船只，截其归路，收到全歼的效果。

台州之战，历时仅一个月，经过以上四个战斗的胜利，彻底消灭了企图进扰台州地区的倭寇，对平息倭寇对浙江的侵扰，起

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卢镗、牛天锡也分别率兵歼灭了进扰宁波、温州一带的倭寇，打击了倭寇的气焰。

台州之战，戚继光率亲练新军独当一面，首次获得了重大胜利。此次战役，既体现了戚军的训练精良，士气旺盛，军纪严明，作战英勇，也反映了戚继光用兵积极、主动，每战力求全歼敌人的作战指导。他面对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始终保持冷静头脑，注意分析敌情，掌握地形特点，积极迎击，以伏击、包围的战法，每战歼敌一部，积小胜为大胜，直至全歼敌人。戚继光在选定作战目标时，不为现象所迷惑，决不轻易分散兵力，而是集中力量打击危害最大的目标，然后依次各个消灭敌人。台州之战的胜利，还在于发挥了水陆兼备，陆上歼敌为主的思想，陆战可以扬长避短，且地形熟悉，易得人民配合，支援。相反，倭寇深入内陆，地形不熟，处处遭到人民群起反抗，相应地减少了战斗力，且弃船就陆，失去了机动能力。台州之战的胜利，锻炼了戚军，提高了士气，为戚军以后在抗倭战争中发挥主力作用，打下了基础。

（二）横屿之战

倭寇在侵扰浙江的同时，也窜扰福建，曾先后攻下福清（今福建福清、福安（今福建福安）、福宁（今福建霞浦）、宁德（今福建宁德），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又攻陷永宁（今福建晋江县永宁），因而北起福宁，南到漳州沿海，均受其害。位于宁德的横屿和福清的牛田以及莆田的林圩，倭寇侵扰的据点。

当倭寇在浙江被戚军击败后，其余部窜至福建，配合福宁，连江（今福建连江）之寇，攻扰寿宁（今福建寿宁）、政和（今福建政和）、宁德等地。从广东北来的倭寇，攻陷了玄钟所（今福建诏安东），进扰龙岩、大田等地。于是，福建全境告警，情势危急。当时福建空虚，将领无能，抗倭有成绩的爱国名将俞大猷已被调往江西去镇压张玉连等农民起义，于是明廷不得不调戚继光军南下抗倭。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秋，戚继光从浙江温州率军七千人入闽。戚继光认为横屿是倭寇在福建北部的根据地，应该首先攻取，再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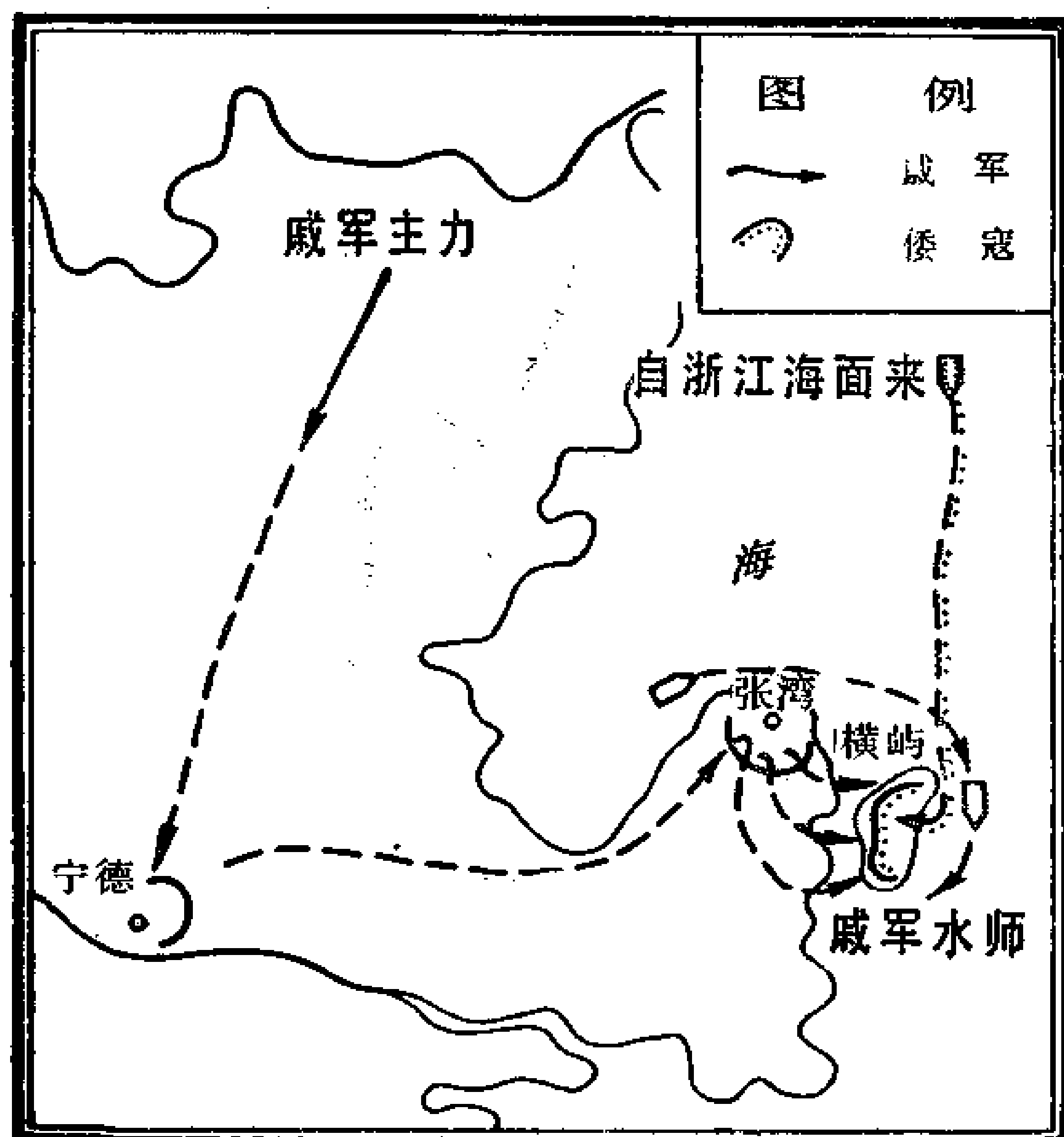
横屿位于宁德东三都澳海域，是孤悬海上的一个小岛，西面距陆地较近，潮涨时汪洋一片，潮退时变为浅滩，但淤泥充聚，难以通行，所以倭寇认为明军陆师不可能徒涉，以此作为侵扰沿海的巢穴，经过倭寇长时经营，防御工事坚固。倭寇在岛上山顶结巢，在山腹建筑巨屋，岛四周遍布坚固木栅，并严密控制渡口、港湾和村镇。岛上的居民一部分被胁从，一部分被屠杀。倭寇据横屿四出抢掠，使“宁德一路，上下三百余里，三年渺绝人迹”〔19〕，宁德全境已一片荒凉。

戚继光率军于八月初一抵达福宁。次日，即会同当地官员和诸将会商进讨计划，决定先抚定横屿外围被胁从的群众，然后伺机进攻。这一措施甚著成效，仅张湾一地，就有原从倭寇流劫的数千居民，表示愿反戈一击；为倭寇收集情报的人员，也愿充任向导。明军利用这些人进一步了解地形和倭寇的部署情况，知道横屿地形具有易守难攻的特点，如用水师，易于搁浅，步兵进攻，过淤泥滩地，前进困难。但最后仍决定利用戚军士气高，耐劳苦，英勇善战的长处，采用以陆上进攻为主，水师为辅的作战方针。戚继光亲率主力由宁德兵分两路从陆上通过淤泥滩进攻；左、右翼各以一部防守重要渡口，防止敌人流窜；令水师都司张汉率舟师泊横屿以东海面，以便夹攻。陆上以张湾为进攻出发地，且鉴于宁德到张湾沿途杂草丛生，茂密过人，戚继光命令部队边行军、边割草，结扎成束，以备进攻时填铺淤泥滩之用。戚继光选择初八小潮，退潮后处处可见海滩的有利时机发动进攻。先在前一日，将部队推进到张湾，组织部队追悼被倭寇杀害的民众，以争取民心。又告谕将士，此次行动是利用退潮，到彼岸后，潮水复涨，是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许失败，以激发士气。初八日八时，戚军按预定部署，向横屿进攻，部队列成鸳鸯阵，边前进边

以干草铺路，戚继光亲自击鼓为令，每百步一休息，并借以整顿队形，经过几次休息就到达横屿。

倭寇沿山麓列阵以待，原想借明军立足未稳，赶入海中，但经不起戚军的三面冲击，陷入混乱。此时，原留在陆上防倭流窜的王汝龙部也主动请战，投入战斗。戚军士气高涨，山上山下，杀声震天，倭寇大败，有的被杀，有的投海，消灭敌人千余，捣毁倭寇巢穴，救出被掠去的男女八百余人。

横屿之战经过示意图　（30-9图）



横屿之战是戚军入闽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戚继光在选择作战目标上，首先着眼捣毁倭寇的巢穴，使其失去侵扰的凭借，击中了要害，是具有远见的。横屿之战得到群众特别是被胁群众的很大帮助，否则军队初到，地形不熟，敌情不明，就要花费较多的时间，不能收到速战速决之效。以后戚继光每战必宽释胁从的人以为己用，成为戚继光作战指导的特点之一。横屿之战还体现了戚继光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敢于进攻，善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和部署的细致周密。横屿之战采用了水陆并举，四面围攻，又体现了戚继光每战必求"全歼"的一贯用兵思想。

戚继光在横屿之战后，不作休整，率军继续向盘踞在牛田（今福建福清南）的倭寇进攻。根据"兵不厌诈"的原则，戚军扬言远师疲劳，要加休整，以麻痹倭寇。牛田为倭寇另一海边巢穴，戚继光由宁德连夜进军，乘牛田倭寇不备，乘夜直袭倭寇大营，杀伤过半，残敌向林墩（今福建莆田南）窜去。戚继光留兵一部，清理牛田战场，亲率主力又直袭林墩，使倭寇无喘息机会。林墩也是倭寇海边据点之一，与牛田南北相望，工事坚固，戚军于午夜抵近倭寇营寨，立即发起进攻，敌人于睡梦中仓卒应战，乱不成军，戚军杀伤倭寇数千人，占领了林墩。戚军入闽不到两月，连克倭寇所凭籍的三个海边据点，狠狠地打击了倭寇的侵掠气焰。但戚军军力也受到一定损失，考虑到未来抗倭任务还很艰巨，且浙籍将士思归，部队也需要休整补充，遂于十月回军浙江。

（三）平海卫之战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冬十月，倭寇侦知戚军回师浙江，又凑集兵力，再次猖獗起来，一路攻陷福宁、政和，一路围攻福建富庶繁华的府城兴化（今福建莆田）。因兴化城池坚固，围攻月余不下。明政府命广东总兵官刘显率兵由江西赴援，当时刘显的主力部队正在江西镇压农民起义军，入闽的先遣队只有七百人，又是长途奔驰，疲惫不堪，难以战胜倭寇，故屯兵兴化城东三十里的江口桥迎仙寨，以防倭寇窜扰省城福州。刘显派兵

八名去兴化送信联系，被倭寇擒杀，倭寇利用其明军服装，伪造信件，混入兴化，诡称“今夕且息铃柝，我有所谋”，[20]城中信以为真，放松戒备。冒充明军的倭寇乘夜杀死守城明军，大批倭寇自兴化西门缘梯进城，明军溃乱，军民坚守月余的城池轻易被占，兴化是福建经济发达之地，而且“诸村落一钱寸帛皆在城中”。[21]倭寇进城后肆意抢掠，四野一空。次年的月底，因城中掠夺已尽，倭寇自动放弃兴化，奔守崎头（平海卫西北）。明都指挥欧阳深率兵追击，二百余人中伏死亡，倭寇又趁势攻占了平海卫（今福建莆田东南的半岛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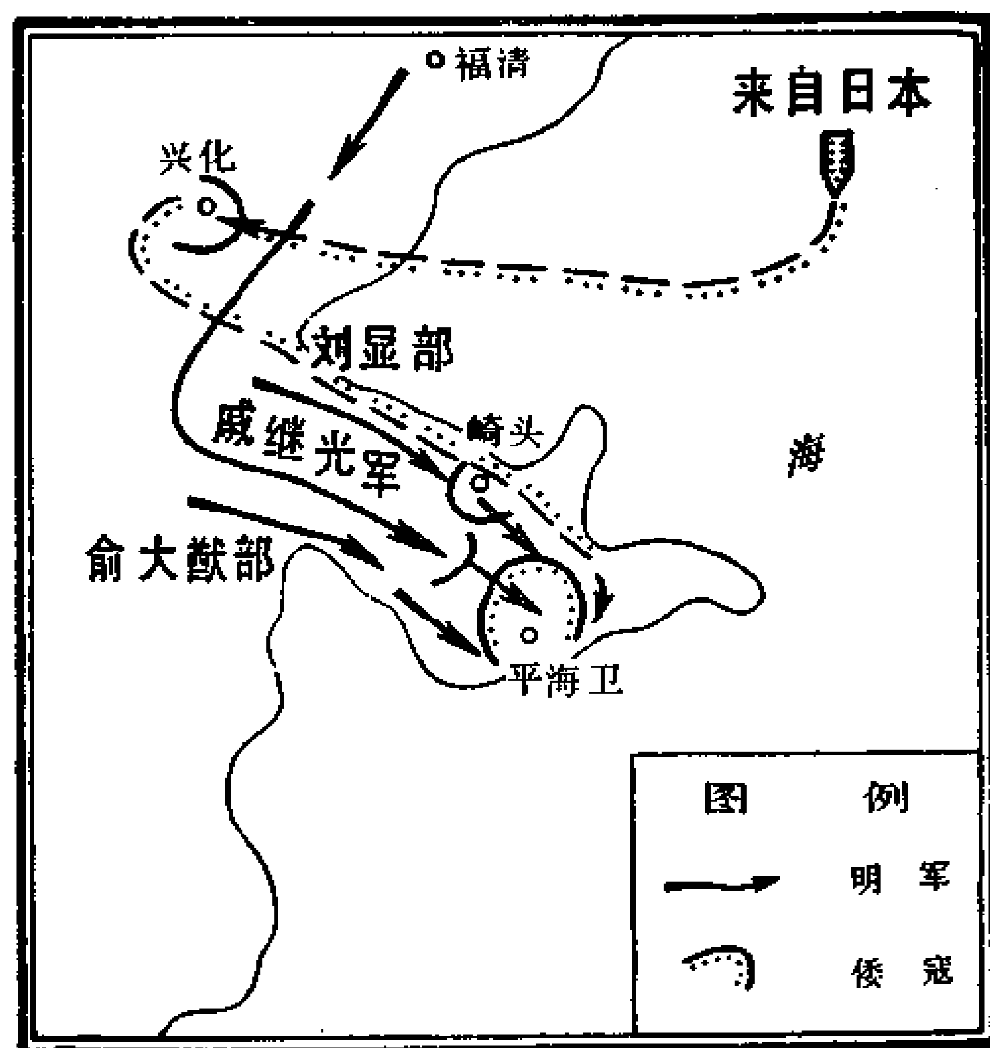
兴化府的陷落，震动了明政府，因自抗倭战争以来，很少有府城被陷的情况。明廷对此十分重视，下令撤去原福建巡抚游震得的职务，改以谭纶继任并提督军务，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调台、温、福兴、福宁副总兵戚继光再次率军入闽，会攻兴化倭寇。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正月，俞大猷率新募兵六千人会合刘显部迫近平海卫建栅筑垒，防止倭寇逃窜，并等待戚军到达。

戚继光得到再次入闽命令后，于二月又到义乌募兵，仅十六天就募到精壮万余人。三月向闽进发，边行军，边训练，四月中旬进抵福清，写信给谭纶报告情况并请共协调诸军行动。谭纶在战地召集几个主将商讨进剿方案，戚继光请求“身当中哨，刘、俞犄角”。谭纶从其请，决定戚继光部为中军，从正面进击；俞大猷部为右军，刘显部为左军，配合中军，从两翼进攻倭寇。

戚军分兵三路，乘夜进至待机位置，略作休息，拂晓直迫倭寇营垒。敌人发现后，两千余人拥出营垒，以百余骑兵作前锋迎战戚军。戚继光亲自指挥，命前队齐放火器，一时炮声震天，火光四起，倭寇骑兵大乱，但步兵仍在顽抗。这时左、右刘、俞两军赶到，同时发起冲击，倭寇抵御不住，退据营垒。明军继续围攻，并因风纵火，在很短时间内就攻破了平海卫倭寇营垒，整个作战只用了四、五个小时。此役共歼倭寇二千四百五十余人，缴

获各种兵器三千九百六十余件，救出被掠去男女三千余人。次日，又派兵搜剿余寇，擒杀一百七十余人。

平海卫之战作战经过示意图 （30-10图）



平海卫之战是一次速战速决的歼灭战。其所以取得胜利，首先是集中了可能集中的优势兵力，二是在谭纶统一指挥下协同密切，战前准备充分；三是运用了正面突击与两翼包抄的战法；四是三支军队均具有抗倭作战经验；五是明军作战英勇，士气旺盛。戚继光军在这次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战后评功以戚继光居首。

（四）仙游之战

平海卫作战胜利后，戚继光又先后肃清了几部分残倭，福建的倭患暂告平息。戚继光因对倭作战有功，明政府提升他为总兵，镇守福建并兼管浙江金、温两府水陆军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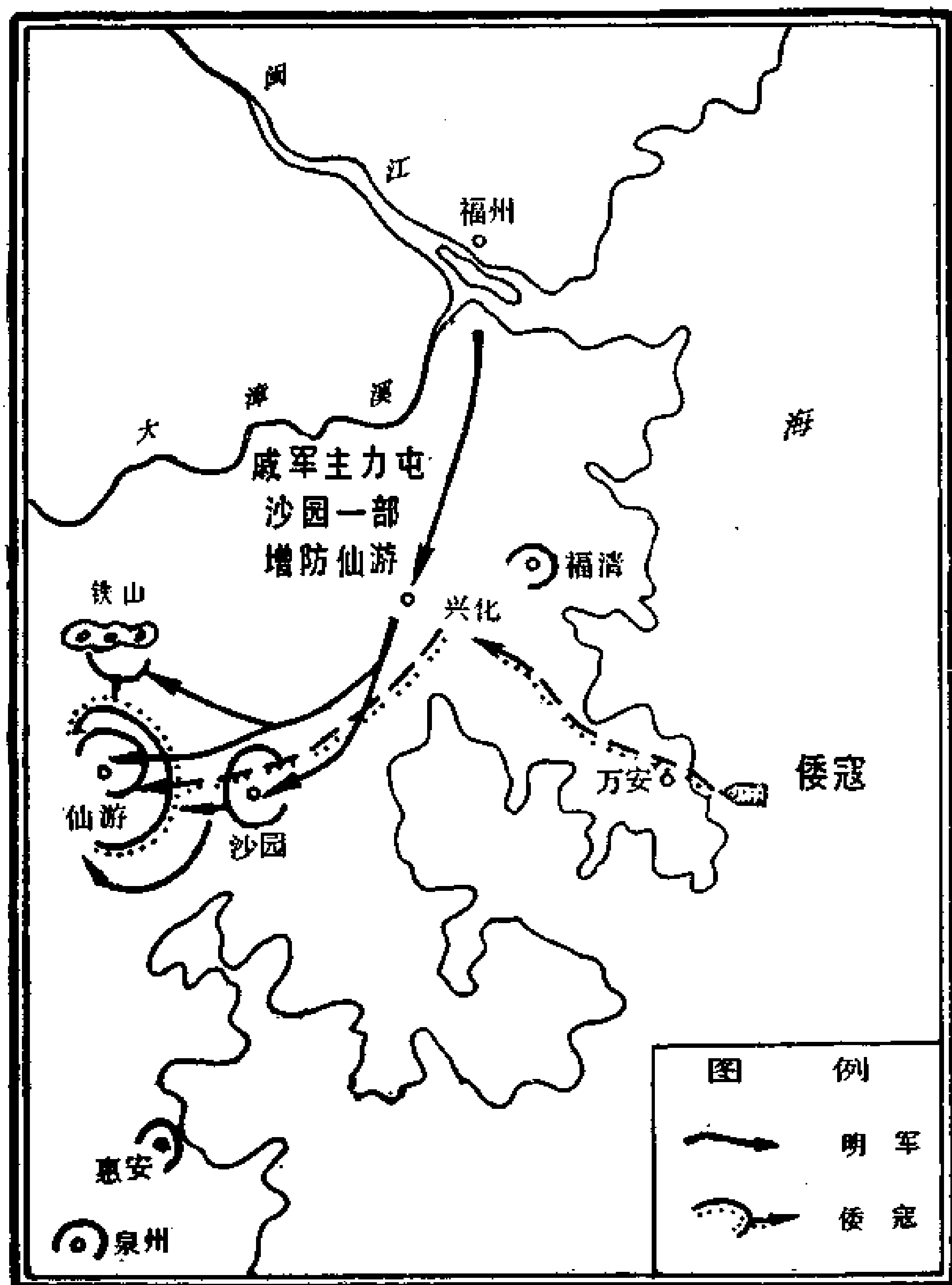
戚继光为加强陆上防务，将所部陆军分为八营，并调整了驻地：即北路二营，驻福宁；中路二营，驻福清；南路二营，驻漳州、泉州；以二营作机动部队，另以一部驻守福州，全部兵力合计为六千四百人。其次，加强海上防卫能力，恢复了南日山、铜山等水寨，将已修好的兵船九十二只配给各寨。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月，发现大批倭船在台山（福建台山岛）集结，并有些倭船不时南下活动侦查扰乱，判断其总兵力当在二万七千人左右，福建倭情又紧张起来。戚继光令各水寨严密注视倭情发展，对少数敌人则擒斩之，时仅一月，消灭零星倭寇约三千人。

十一月，倭船在几日间先后在兴化、连江以东海岸登陆，并即南下。戚继光判断其意图是侵扰仙游，一面调回浙轮休的部队回闽；一面亲自率兵南下，屯驻兴化，并以亲兵二百为先遣队兼程进入仙游；同时令沿海各卫所加驻防备。十月初六，真倭万余人层层包围了仙游城，此时城内只有原省的民兵二百五十人和戚继光新派去的守兵二百人。戚继光权衡兵力对比，自己所掌握的兵力，尚不及倭寇之半，故决心以仙游为支撑，牵掣敌人，等主力集中后，再谋歼敌。戚继光为确保仙游，以一部兵力在仙游城北铁山据险设垒，以牵掣攻城的倭寇；又以精兵五百逼进敌垒，作牵制性进击；戚继光还亲率军进至仙游东的沙园，不时作出进剿姿态，发铳呐喊，以倭寇不能专心攻城；另选精兵六百，进屯敌垒附近，遍设疑兵，既防倭寇四处掳掠，又不使其专意攻城；为加强城中的防守，戚继光又选派一百余人乘夜进城，并每夜向城中运送火药；戚继光还命人制作后膛很薄的木炮，装满火药，有意弃在途中，倭寇得之施放，后膛爆炸致死数百人。

为防止倭寇逃窜和增援，戚继光对仙游外围也作了周密部

戚军在仙游附近牵制倭寇行动示意图（30—11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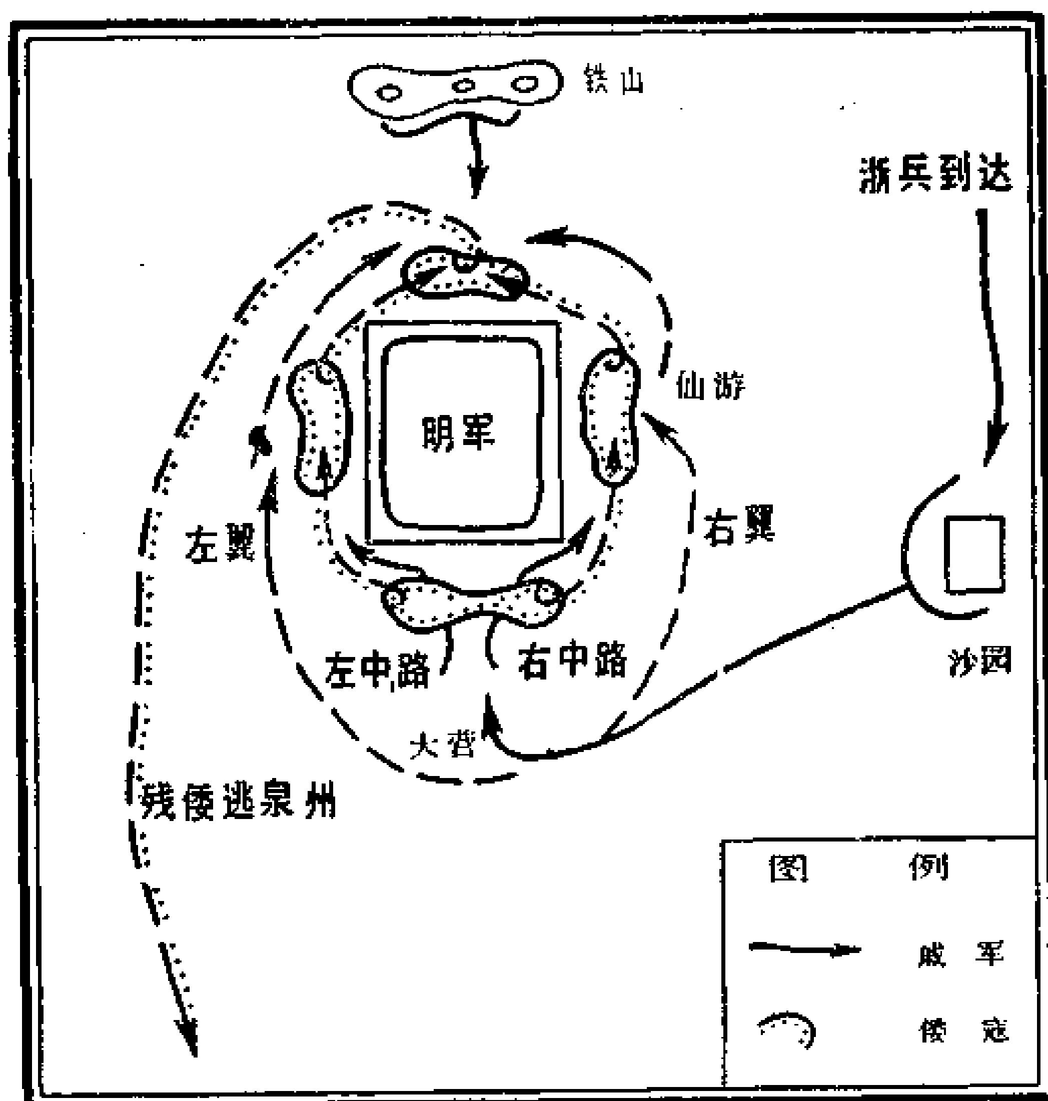
署。由于明军在仙游凭城固守，内外协力，倭寇几次强攻无效，企图诱降，戚继光命伪与周旋，以争取时间。就这样，使倭寇攻城不下，逃窜不能，遂陷入困境。但戚继光的浙兵，因浙督抚的留难，迟迟不到，情况也不顺利。

十二月下旬，浙兵六千余人到达，戚继光决心转入进攻，但考虑到和倭寇兵力对比仍构不成优势，不能同时进攻倭寇在仙游四周的营垒，决定以主力先攻南垒，南垒攻破后再转用兵力，攻取其余各垒，各个歼灭敌人。

戚继光将主攻部队区分为中左路、中右路和大营正兵，攻取南垒。同时派出左、右翼奇兵向倭之西垒、东垒进行牵掣力攻击，以防倭东、西垒兵力支援南垒。另以一部兵力在铁山作疑兵，牵掣倭北垒行动。以红、黄、蓝、白大旗区别各部，以免混乱。并告戒部属防止中伏，注意搜查敌情；遇有草覆土松，先要试探，免落陷阱；要求速进速胜，不可贪财争功，贻误战机；要分清诱敌和进击的信号。

戚军乘夜按部署行动，拂晓，大雾，戚军突然迫近城下倭营。这时倭寇正结队以“吕公车”（高出城丈余，每车可容百人，以几层竹木围成，外裹棉毡可蔽炮火）攻城，情势危急。戚军适时赶到，中右路直冲倭寇南垒，倭寇不得不停止攻城，迎击戚军。在中右、中左两路协力奋击下，倭寇大败，退入南垒。戚军四面包围，拔除其木栅，以火焚垒，当即杀伤数百倭寇，余众向东垒逃窜，中右路乘胜追入东垒，在右翼部队协力下，夹击东垒倭寇。中左路也与左翼部队配合，夹击倭之西垒。于是戚军得以迅速焚毁倭之南、东、西三垒，杀敌千余人，余寇均溃奔北垒。戚继光亲率军击北垒，又大破之，遂解仙游之围。此役，共杀寇近五百人，缴获甚众，并救出被掠男女三千余人。余寇仓皇向泉州方向逃窜，戚军尾追不舍，经过几次战斗，倭寇又遭到重大伤亡，残余倭寇只得由漳浦方向逃窜到海边夺船逃遁。至此，福建倭患才告平息。

戚军仙游歼倭示意图　（30-12图）



仙游之战，是戚继光在抗倭作战中取得关键性胜利的一役，大煞了倭寇气焰，使其不敢再轻易侵扰。谭纶对戚继光这一战役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

> “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22]

戚继光所以取得仙游之战的胜利，首先在于善于掌握情况、分析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如当倭寇自台山南下时，即判断敌

将入侵仙游，及时向仙游增加兵力，并亲自率军南下，以应付敌人。戚继光总的着眼，既要解仙游之围，又要歼灭敌 人。但在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兵力居劣势的情况下，戚继光既不贸然进攻，又能采取各种积极措施，支援守城民兵守住仙游。他还千方百计拖住倭寇，防其他窜，为后续部队到达歼灭该敌制造了条件，这一作战指导是很成功的。当浙兵到达后，戚继光为避免分散兵力，在兵力仍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采用集中兵力，先歼一部，再及其余的作战指导，也很卓越，因而迅速取得了胜利。

明代海防和抗倭战争的几点经验教训

由明代抗倭作战中不难看出，只要国力强盛，政治、经济的运用恰当，有一定的海防建设，求得海疆的安定是可能的。一旦发生战争，则还须依靠军民结合，共同抗敌，才能取得胜利。明代海防和抗倭战争的主要经验教训是：

一、巩固的海防应以强大的海军为基础，以歼敌于海上为海防的战略思想，使敌无法登陆入侵，方为上策。明嘉靖以后，政治腐败，水军不仅没有发展，原有的也多破旧不堪，这是造成倭患猖獗的重要原因。如仙游之战以前，虽已知倭寇在台山岛聚集力量，但水军无力出击，只好坐等其入侵。倭寇在海上，机动方便，可以自由选择登陆的时间和地点，占有很大的主动，给陆上防守部队的配置和运用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一支强大的海军显得十分重要。依靠海军才能歼敌于海上，不许倭寇占领岛屿以为巢穴，作为登陆的基地和跳板。假使嘉靖时仍有郑和下南洋那样强大的舰队，倭寇是不敢为患的。正因为嘉靖时水军弱小，戚继光才不得不因时制宜以水陆兼备，陆上歼敌为主为作战指导思想，在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平倭作战。

二、在海军弱小的情况下，也必须建立陆海军密切协同，守岛、守陆有机连结，并控制有强大机动部队的防御体系，把防御推向海上，以建立较大的防御纵深。明代的倭寇常利用沿海岛屿

作为登陆的跳板和入侵内陆的巢穴，所以在水军无法阻歼敌军于海上时，仍可配合海岛防御阻歼敌军且免被敌所利用；坚守海岛可以大量杀伤敌人，同时也给了陆上以充分准备的时间；陆上的卫所是歼敌的最后防线，这样形成的防御纵深，加上机动部队的及时支援，就有了歼敌于海滩的可能。所以，朱元璋时在沿海重要岛屿上构筑水寨部署守军的做法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可惜以后卫所兵力不足，这些水寨多数早已废弃了。

三、在重要战略方向上必须配备有省力的战略预备队。明代对防倭作战无统筹计划，倭患稍减，即任意将抗倭有经验的部队他调，一旦有事，又临时拼凑兵力，因而往往贻误战机。张经认识到仅仅依靠浙、闽卫所难以完成平倭任务，在当时北方鞑靼频繁入边，明三大营不可能南调的情况下，临时从两广湖南抽调"土兵"以应急用，在王江泾大捷中曾起了重要作用。但"客兵"言语不通，地形人情都不熟，纪律很差，素质也不强，时间一长，就遭到当地军民的反对。戚继光的新军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他和俞大猷两军成了明廷在东南沿海抗倭的战略预备队。正是依靠这两支军队，明朝才取得了平倭的胜利。

四、消灭来犯的倭寇必须具有"大创尽歼"、"杜其再至"的指导思想。戚继光的这一思想一直贯彻到他的战役、战术指导上，每战力求全歼敌人，由战役的胜利，保证了战略任务的完成。这是戚继光关心全局、眼光远大的表现，也是戚继光所以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和爱国英雄的关键所在。当时有另外一批将领，目光短浅，无全局观点，只顾个人得失。其表现，一是不求有功，只求无过，认为敌人入侵，将其压迫到海上，就算完成任务；二是只顾自己地区，自己任务的完成，不考虑友军，不关心抗倭的长远利益，有事时既不主动和友军协同配合，反而加以留难，实际上是帮助了敌人，如仙游之战，戚继光的浙兵就是受浙省督抚留难而迟迟未到，几乎影响战役的胜负。

五、针对海上敌情、地形的特点组训军队，是战胜敌人、保

卫海防的重要条件。海防无论就敌情和地形来说，都有其特点，如不根据这些特点相应地组织训练，就难以保障海防的巩固和战争的胜利。就敌情论，倭寇船小而低，行动灵活，海上、内河均可航行无阻，而明军船只多大而高，虽在海上顺风时能压倒倭船，但在逆风和进入内河时航行缓慢，常反为灵活的倭船所制。又倭寇常以二、三十人为小队分开进行独立作战，而明军的原有编组，就不能适应倭寇的战法。戚继光在这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改进，足为后世所法。他编组新军，根据敌情、地形特点，发明鸳鸯阵，以小分队利用火器和长短兵器的协同配合，在复杂地形各自为战，从而使这支新军成为驰骋海疆、连败倭寇的劲旅。

注　　释

〔1〕《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2〕《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沿海倭乱》

〔3〕〔4〕《明鉴·太祖高皇帝》

〔5〕〔6〕〔7〕〔9〕《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五

〔8〕《明通鉴》卷五十九《世宗嘉靖二十六年》

〔10〕《明通鉴》卷六十一《世宗嘉靖皇帝三十五年》

〔11〕黎光明：《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兵考》

〔12〕《戚少保年谱》卷一

〔13〕《戚少保年谱》卷一

〔14〕《纪效新书·谕兵紧要禁令篇》

〔15〕《纪效新书·或问篇·对敌说》

〔16〕《纪效新书·操练营阵旗鼓篇》

〔17〕《纪效新书·束伍篇》

〔18〕瓜邻江，失考。判断为今灵江。

〔19〕《戚少保年谱》卷三

〔20〕〔21〕《玄览堂丛书》续集《记变》

〔22〕《谭襄敏公奏议》卷二《请行赏罚以励人心疏》

第三十一章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战争

第一　明末的农民大起义

一、时代特点及起义主要原因

明代中叶，中国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农耕技术有所提高，经济作物较前增多；手工业高度发展，从事铁、钢、银、染、织、窑等工匠的手工业者大批出现；有了出卖劳动力的雇工；有了高利贷；货币普遍使用，租税也全部改为银子，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商业经济日益兴旺繁荣。但是这种繁荣极为短暂。由于贪得无厌、荒淫腐朽是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的本性，所以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的贪婪和压榨也水涨船高。首先表现在追求奢侈享受上，消费幅度越来越大，穷奢极欲，挥金似土。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为皇子册封冠婚，袍服费即用银一千二百万两。[1]皇宫每年费用高达六百万两，占明王朝通常年税收入一千四百六十万两[2]的七分之三。仅脂粉钱一项，每年就要四十万两。皇帝如此，文武官僚、豪绅富室也莫不如此，“万历以后，迄于天、崇，民贫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3]

统治阶级奢侈享受的寄生生活，反过来又刺激他们积敛货币和兼并土地的欲望。囤积财宝、窖藏金银，成为豪富巨室的通症。至于土地的兼并，更达到空前的饱和程度。仅宗室皇庄田，明末就有二十万顷以上。官吏豪绅、富商大贾同样“求田问舍无底止”[4]。宦官魏忠贤兼并的土地，超过一百万亩[5]。其他“田之多者千余顷，即少亦不下五、七百顷”[6]。河南曹、褚、苗、范四家地主的年收入，即够九边十年的军饷。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其中一部分成为佃农、雇工、奴

仆，一部分冒生命的危险逃入山林开荒、采矿，而大部分则逃亡他乡成为游民。

统治阶级的奢侈、聚敛，导致政治上的极端腐朽。其特点之一就是贪官遍地，贿赂公行。万历帝朱翊钧带头在宫内拷掠宦官逼令献宝，[7]各级官吏纷纷效尤。甚至公开标价出售官爵，文官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武官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8]连崇祯朝的首辅大学士周延儒都是用钱买来的。[9]这种用钱买来的官吏，焉得不贪？崇祯朝的户科给事中韩一良说："彼厚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文官"则剥民脂膏，去百而求偿其千，去千而求偿其万。黎民几何不困"。武官"则侵渔刍粮，或支之不及其时，或散之非常其数，军士安得而不弱"[10]。崇祯帝朱由检曾给他的文武臣僚作过一个评语，"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爱钱"[11]，基本符合实际情况。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一方面加剧了阶级矛盾，成为爆发农民起义的导火线；一方又严重削弱了明军的战斗力。遭受将领克扣、虐待和王朝欠饷、压迫的明军士兵，当然不肯为统治阶级卖命，因此曾发生多次兵变，有的则直接参加了农民起义，成为起义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王朝政治极端腐朽的特点之二，就是宦官专政和派系斗争，使已经濒于绝境的统治危机更为加深。

就在明王朝国势日衰、实力渐弱的同时，我国辽东地区的女真族正在兴起，在努尔哈赤领导下，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汗国，不断对明王朝发动进攻，经常长驱直入，深入到山东、河北、山西地区，进行掠夺。为了保持统治权，明王朝不得不支付庞大军费。因辽东战事，每亩增辽饷银九厘，至崇祯时，除辽饷外，又有剿饷、练饷等加派，合称三饷。万历末年，每年加征军费二百八十万两，此时已达二千万两。所有这些负担，都转嫁到农民头上，导致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从明中叶以来，地区性起义连续不断。至明末，社会经济陷于崩溃，"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12]。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不仅成

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而且成为破坏生产力的主要因素，它已经到了非以革命暴力冲决不可的地步。农民大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二、农民起义首先在陕西爆发

宋、元之后，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陕西已变为经济落后的地区。农业产量既低，手工业也极不发达。但由于它是边防重地，又是明都通往四川、云南的主要通路和西北驿站的总枢纽，所以与商业经济联系密切。当地居民以低价卖出本地生产的毛皮、棉花等产品，以高价买回布匹、食盐等日用品，商品资本以高利贷的形式进入农村，“春放秋收”，子或敌母”，以致造成“闾阎贫穷，甚于它省”〔13〕。农民大量破产，剥削重于江南。江南地区失去土地的农民，还可以当手工业者、雇工或矿工等，而陕西失去土地的农民，多数靠当兵吃粮或当驿卒谋生。由于拖欠军饷，到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时延绥、宁夏、固原三镇士兵已有三十六月未领到分文饷银，〔14〕边防镇兵靠卖儿鬻女、典盔当甲来维持生活。明兵部尚书卢象升至边防检阅部队，曾将当时军队惨状报告朱由检，他说：

> “多兵罗列武场，金风如箭，馁而病、僵而仆者且纷纷见告矣。每点一兵，有单衣者，有无裤者，有少鞋者，召见之不觉潸然泪下。”〔15〕

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如何生活下去。驿卒为官府转送物资，传递公文，虽然艰苦，但尚可免强度日。但至崇祯二年，明王朝为节省开支，大量裁减驿卒，〔16〕于是大量驿卒失去活路。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明末的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而陕西的各种矛盾又最为突出。长期以来，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辗转流亡，成为遍布各地的流民，大量失业的驿卒和无法生活下去的逃亡士兵，又加入到流民之中，起义迫在眉睫，一触即发。

就在社会矛盾发展到极端尖锐化的同时，从崇祯元年至崇祯三年，陕西地区又连续三年大旱灾。据马懋材当时向朱由检的报

告说："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自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最后发展到"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17]人民生活已恶化到如此悲惨地步，而明王朝官吏竟继续逼迫人民缴纳赋税，广大农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于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爆发了。

三、陕西农民起义概况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三月，白水农民王二，郑彦天等率领饥民数百冲入澄城，杀死了催粮逼税的知县张斗耀，首举义旗，揭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次年（崇祯元年），陕西各地农民，纷纷起义，风起云涌，遍及全省。最著名有王嘉胤、高迎祥（闯王）、王大梁、张存孟（不沾泥）等。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军由喜峰口突入遵化，明都戒严。由山西、延绥、甘肃等地奉命驰援的边兵，因缺饷哗变，逃回山、陕，参加义军。张献忠也于当年在延安米脂十八寨起义。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李自成在米脂县也率众起义。李自成是米脂县双泉里人，幼年曾因家贫一度出家为僧后又为当地姬姓家牧羊。成年以后，在本县银川驿充当驿卒。因明王朝裁驿失业，又受乡官艾姓的迫害，遂领导失业驿卒在本乡起义，不少饥民响应附和，遂成一队，参加了张存孟部。延绥明军神一元、神一魁等，亦于二月间发动兵变，参加起义军行列。二、三年间，起义军发展到一百多部，活动于陕西五十多县地域内，以致明王朝哀叹："全陕无宁宇矣"。

起义军的成员，开始主要是饥民，以后有大量明军边兵参加。边兵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有马匹、兵器，又有一定的军事技术，他们参加起义，增强了起义军的实力。正如谷应泰所说："溃兵得饥民则响导既精，饥民得溃兵则壁垒益厚"。[18]随着形势的发展，这些由明军士兵参加起义的人员，逐渐成为各起义军的骨干，形成领导力量。由于他们长期脱离生产，多为游民出

身，是“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19]。所以在起义初期，各部起义军分合不定，四处流动，时叛时降，基本上是为求生而战斗，既无坚定的政治原则，也无明确的战略目标。

第二　带有游击战性质的流动作战

——农民军反围剿、图生存阶段

（天启七年——崇祯十三年）——

一、转战陕晋

从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王二首义至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起义军的活动中心在陕西。当时明王朝正在辽东战场与后金军作战，不论兵力还是财力，都难以集中全力镇压陕西起义军，遂采用了剿抚并施以抚为主的战略方针，[20]命三边总督杨鹤执行。在这三年内，部分起义军被镇压，也有不少起义军接受了明王朝的招抚。但陕西连年灾荒，十室九空，如何安排几十万就抚人员的生活，就成了明王朝的一大难题。由江南运粮来陕，不仅困难重重，而且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崇祯三年，朱由检曾派吴甡带十万两白银赴陕西“赈饥抚贼”当时人李继贞就认为：“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斗米七钱，亦止活三十日耳。”[21]何况即使有钱，也难以买到粮食。起义军将士逐渐认识到就抚并非出路，于是先后纷纷再起，明王朝剿抚并施以抚为主的战略破产。杨鹤为此入狱，洪承畴继督陕西，改用“以剿坚抚”、“先剿后抚”的战略方针，[22]集中重兵攻陕西起义军。在洪承畴的进攻下，神一元等首领战死，加以陕西地主储粮业已告罄，各部义军先后渡河东进。从崇祯四年至六年、起义军活动中心由陕西移至山西，张献忠（八大王）、罗汝才（曹操）、马光玉（老回回）、王自用（紫金梁）等各部有二十余万人马、号称三十六营。此时起义军已由极度分散、各自为战的作战

阶段，进入相对集中、互相呼应的作战阶段。张存孟于崇祯四年四月间降明，其部属大多不愿降明而归于李自成。李自成遂率之投高迎祥，高此时亦在山西。

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间，起义军流动于晋南一带，曾攻破大宁、隰州（今山西隰县）、泽州（今山西晋城）、寿阳等城，进逼太原；并曾进入豫北、攻破修武，包围怀庆(今河南沁阳)。明王朝一面命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守晋东南，山西巡抚许升臣驻汾州（今山西汾阳）分守晋西北；一面调京营及直隶、陕西、四川兵组织围剿。

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五月，三十六营起义军主力部队均进至磁州（今河北磁县）附近。明军左良玉部从东南、曹文诏部从西北、两面夹攻起义军。王自用在武安南尖山作战中负伤而死，所部尽归李自成。过去李部仅千人，至此遂拥有两万多众，成为一支独立的起义军主力部队。

二、南下豫楚

崇祯六年十一月间，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马光玉等各部二十四营、十余万人，在明军攻剿下，转移至济源、怀庆、林县、涉县之间地区。当时形势是：明京营禁旅倪宠部及汤九州部，已跟踪进至林县一带；明军左良玉部及邓玘部，在怀庆附近；山西、保定的明军也正向这一地区逼近，起义军已处于明军包围之中。起义军为摆脱被动局面，突然移师南下，先后由济源西南长泉附近踏冰渡过黄河、消灭河防明军袁大权部于渑池野猪鼻，进入明军较为薄弱的豫西和湖北武当山区。这一行动，打破了明军的围剿企图，跳出内线又夺得了战役、战斗上的主动权。

此时，留在山西，陕西的起义军，如王刚、王之臣、通天柱等为明军诱杀。钻天哨、开山斧等各部，据守一地，企图久驻，亦为明军消灭。

起义军渡河后，以郧阳为中心，分为若干部往来穿插于豫、

楚、川、陕之间，利用明军分兵守境，互不协同，仅以驱走起义军为战斗目的的弱点，进行流动作战。李自成部在郧阳、竹溪、房县一带活动。

明王朝为改变各省明军“事权不一，互相观望”的不利状况，改用集中兵力，全面围剿的战略方针，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任命陈奇瑜为五省总督，统一指挥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及四川的明军。并将郧阳巡抚蒋允仪撤职查办，而以卢象升代之。陈奇瑜的作战部署是：命河南巡抚玄默率军屯卢氏，湖广巡抚唐晖率军屯南漳，郧阳（今湖北郧县）巡抚卢象升率军屯竹山、陕西巡抚练国事屯商州（今陕西商县），自驻均州（今湖北均县、郧县之间）指挥，企图分进合击，一举歼灭各部起义军。起义军发觉明军企图后，立即向西转移，先后均进至兴安（今陕西安康）、汉中及商雒山区（今陕东南商县、洛南一带山区）一带活动。明军的围剿计划，又告失败。

当年底，朱由检撤陈奇瑜之职，令洪承畴继任总督，指挥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及保定，真定等四省二府的明军，限令半年内消灭陕西的起义军。当洪承畴调集各省明军分路进入陕西，准备再次组织围剿时，除李自成部仍坚持在陕西、甘肃一带进行流动作战外，其他各起义军，都已转进至河南地区。洪承畴率明军主力出关追击，而各起义军则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正月由河南分路向三个方向转进：一部西进汉中入甘肃，一部渡河北上入山西，一部东进入凤阳，焚毁皇陵。俟洪承畴指挥之明军于三月间到达河南时，各部起义军又相继进入陕西。洪承畴寻求决战扑空，匆匆回军关内，李自成部在宁州（今甘肃宁县）、真宁（今甘肃正宁）两歼明军，阵斩艾万年，逼死曹文诏，使洪承畴“仰天恸哭”，使官军“闻之夺气”。尔后又破咸阳，进逼西安，活动于西安以西地区。马光玉、高迎祥、张献忠诸部，乘洪承畴新败于宁、真，主力又为李自成部牵制，无力顾及关外之机，再度东进，进入河南。

明王朝此时也已认识到，“我至豫而贼走秦，我走秦而贼又走楚豫”[23]的格局，是难以实施全面围剿的。于是又改变战略，采用划分战区重点攻剿的方针。任命卢象升为直隶、山东、河南、湖广、四川五省总理，统关、辽兵，赐上方剑，便宜行事，专制中原；而命洪承畴专治西北。各自负责，协同作战。

当年冬，李自成部在兴平、武功、中部（今陕西黄陵），宜君地区多次作战失利，遂南走汉中。张献忠、高迎祥等部在洛阳附近亦连续三次战败。北走豫北。

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正月，高迎祥、张献忠部围攻滁州（今安徽滁县）、卢象升率军驰援，起义军战败，撤围走河南。卢象升指挥明军紧跟高迎祥部不舍，在朱仙镇高部又遭左良玉部明军阻击，兵力损失过半。高部遂向郧阳地区转移。二月间在裕州（今河南方城）又被追击的明军击败。张献忠及高迎祥残部皆进入陕西汉中地区。

明王朝为加强陕西的军事力量，派孙传庭为陕西巡抚，与专制关内的洪承畴共同负责陕西军事。孙传庭驻屯西安，全力对付汉中一带的高迎祥、张献忠等部，而洪承畴则专力对付活动于陕北地区的李自成部。

七月间，高迎祥率部向西安进逼，在盩厔（今陕西周至）为孙传庭军包围，苦战四日，战败被俘牺牲。余部共推李自成继高迎祥为闯王，并受其节制。

与此同时，清军自喜峰口入边，连续攻破昌平、宝坻等十六城，京师戒严。朱由检急调卢象升率军驰援，并改任卢为宣大总督，而以王家桢代五省总理，中原地区的军事压力减轻。在河南地区的马光玉部和在汉中的张献忠部又乘机复起，两部会师进入湖广，并联合罗汝才部等共二十余万人，沿江东进，分散活动于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太湖、潜山、霍山一带。

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朱由检再撤去王家祯，任命熊文灿为五省总理，并增派禁军一万二千人，由熊直接指挥，对农民军

组织新的围剿。

李自成部由陕西进军四川，曾攻破县城十余座。但由于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春由四川返陕时，在洮河一带遭到洪承畴和孙传庭军的袭击，败走岷州（今甘肃岷县）、礼县（今甘肃礼县）。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亦为左良玉军击败，负伤退至郧襄山区的谷城。熊文灿遂改围剿为招抚，刘国能（闯塌天）、张天琳（过天星）等先后降明，张献忠、罗汝才等也伪降就抚，分别在谷城、房山休整。李自成率残余部队活动于川陕边境山区。农民起义一时陷入低潮。

当年九月，多尔衮、岳纳等率清军分两路由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进入明边，明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京师戒严。洪承畴、孙传庭奉命率军入卫北京，明军在西北地区的兵力减少。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张天琳等先后再起，破房县、保康等地。七月，两部联合设伏于房县罗猴山，痛歼左良玉部明军。熊文烁因之被判死刑。朱由检派兵部尚书杨嗣昌亲督大军围剿起义军。崇十三年（公元1640年）春张献忠、罗汝才先后败于玛瑙山（今四川万源北）和夔州（今四川奉节），部队溃散。夏收后又陆续集中，会师巫山，挺进四川，杨嗣昌率明军主力追击入川，李自成抓紧这一有利时机，于十一月间由陕南渡汉水入商洛，再进至淅川（在今河南淅川西南）、内乡一带。当时正值河南久旱，大量饥民参加起义，李自成部很快又发展至数万人。

农民战争初期的流动作战应当肯定

古代农民起义，一般是迫于饥饿和压迫，才不得已起而造反，谋求生存。在初期，战争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占主导地位，起义部队的后勤供应全部取之于敌，靠劫夺官府和地主的粮食、财富进行补充。又由于兵力与官军相差悬殊，所以无法在一个地点长期坚持，只能打到哪里、吃到哪里。正如当时人顾山贞所说：起

义，“发难于延安府，而蔓衍于各省。望屋而食，奔走不停，未尝据城邑为巢穴，故曰流贼”。“流贼飘浮无常，往来靡定”[24]，这当然有流寇主义的因素在内。但从军事角度来看，却有其必要性，基本上应该肯定。

从天启七年到崇祯十三年这一阶段，就农民战争的整体而言，优势的明军处于战略攻势地位，而弱小的农民军则处于反围剿，求生存的地位。在这样的战略形势下，农民军为了保存并发展壮大自己，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带有游击战性质的流动作战与明军斗争。其主要特征就是：各支农民军时分时合，忽东忽西，以高速度、大机动的速战速决的袭击手段打击敌人。

战争初期，农民军辗转于优势敌人的围剿、追击之中，如果停止流动，势必被迫在不利的条件下，与敌人作战，将丧失战役、战斗上的主动权。只有以高速度大踏步的流动，来往穿插于敌军之间，寻找敌人空虚、薄弱的地点进行袭击，才能调动敌人、疲惫敌人，使自己经常处于战役战斗上的主动地位。在有利时机，形成战斗、甚至战役上的局部优势，出其不意乘其无备，打击敌人，削弱敌人，并在战斗中发展壮大自己，达到逐渐转变力量对比和造成有利的战略格局。因而，这种流动作战，不但能在敌人围、追、堵、剿中保存自己，而且能不断壮大自己，为下一战略阶段创造和准备条件。

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军的流动作战，是极为恐惧的。曾当过明王朝兵部尚书的张缙彦在崇祯十一年任户部主事时有过一个奏疏，他分析农民军的特点说：“贼之得势在流，而失势在止”，并举了农民军王嘉胤、神一元等部皆因“守而不去”致被歼，过天星、老回回等部皆因“流而不居”[25]才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例子。事实也证明，农民军的流动作战，确实对明王朝威胁极大；而且农民军本身，在战斗实践中也逐渐成长，由单纯的“避兵逃窜”，到“官军多则窜伏，少则迎敌。”在这一阶段的后期，农民军打过不少的漂亮战役。如崇祯十三年，杨嗣昌集中明军精锐

部队，企图围剿农民军，而张献忠从夔州长驱入川，破数十州县，半年之间行程六千，牵着杨嗣昌的鼻子，将明军的主力全部引入四川，而张献忠部却以一日夜三、四百里的高速度，大踏步地挥师东返，在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时间和地点，一举击破襄阳，逼死杨嗣昌，从而改变了整个战略格局。当时人就评论农民军“其来也如风雨骤至；其去也如鬼蜮之难知。故数月间或驰江北，或趋楚豫，蹂躏三省，令官兵追遂不暇，即孙子所云：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避实而击虚之法”。[26]也有人说农民军“东西数千里游食自如，我(指明军)无所不守，彼无所不攻，如水入破瓮，无可抵塞”。[27]

正是这种“官兵多则窜伏，少则迎敌，搜山清野则突出郊关，及列阵平原又负险深箐，贼为主（掌握主动权）、兵反为客（被动）”[28]的带有游击战性质的流动作战，使明王朝在十三年中数易统帅，而陈奇瑜、洪承畴、卢象升、杨嗣昌等的围剿，均遭到失败。所以说，农民军的流动作战，基本上应当肯定。

第三　带有运动战性质的流动作战

——李自成战略转变阶段（崇祯十四年—十六年）——

经过长期的斗争，分散流动作战的各支起义部队，逐渐向集中流动作战发展。至崇祯十三年底止，原来的七十二营等百多支起义部队，已汇合为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为首的几支农民强大武装，而其中尤以李自成部的战斗力更强。多次起伏反复的战争实践，使李自成积累了一定的作战经验，趋于成熟。在战略运用和战役指导上，都达到了古代农民战争史前所未有的高度。他非常注意吸收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农民军，牛金星、宋献策、李岩等，都是这时加入李自成的部队的。

战争并非单纯的军事斗争。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而且取决于人心的向背。参加了农民军的知识分

子们，向李自成提出了“行仁义、收人心”〔29〕和“据洛河取天下”〔30〕的建议，为李自成所采纳，作为他的战略方针。这就使争取人心的政治斗争与打击敌人的军事斗争更紧密的结合起来，从而使农民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行仁义，收人心

明代末期，由于土地的高度集中，大批农民失去土地，已使阶级矛盾激化。而朱由检登上皇帝宝座之后，不但未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来缓和矛盾，相反却变本加厉地推行掠夺收刮政策，造成“农怨于野，商叹于途”〔31〕的状况，加上明军到处烧杀淫掠的残暴行为，使已经激化了的矛盾更为加深，迫使广大人民群众起来反抗。李自成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顺应广大人民反抗明王朝横征暴敛和残酷压迫的迫切要求，采取了一系列以收人心为中心的战略措施。从历史事实来考察，主要有以下几项：

1．制定了以均田免粮为中心的政治纲领。均田的详细办法、史无明文；由于当时处于紧急的战争状态，是否真正执行，尚难绝对肯定。仅个别资料有分地主土地的记载。〔32〕至于免粮，在新占领的一些地区，则确曾实行过。〔33〕

2．提出了以“剿兵安民”为中心的革命口号。如攻占洛阳时，杀福王朱常洵，“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34〕并向群众宣布“王侯贵人，剥穷民无视其冻馁，吾故杀之，以为若曹”，〔35〕攻占承天（今湖北钟祥）后，移檄黄州：“为剿兵安民事，明朝昏主不仁，宠宦官，重科第，贪税敛，重刑罚，不能救民水火，日罄师旅，掳掠民财，奸人妻女，吸髓剥肤。本营十世务农善良，急兴仁义之师，拯民涂炭”。〔36〕既揭露了明王朝腐朽黑暗的统治，指出其压迫人民的种种罪行，又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农民军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

3．颁布了以“平买平卖”为中心的群众纪律。进入河南以来，李自成严戢部伍，整顿军纪，规定了严格的群众纪律。如“攻城略地不居室庐，各寝处一幕布”，〔37〕不淫妇女，不杀无

辜，不掠资财和"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等。[38]李自成部农民军实施供给制，个人不准藏带钱财，作战所获财物，全部归公。部队军需品，除取之于敌外，多以公用银钱购买。

4．大力开展瓦解敌军的宣传工作，在争取群众的同时，李自成又大力发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如"大兵到处、开门纳降者，秋毫无犯，在任好官，仍前任事，若酷处人民者即行斩首"。[39]宣传"降者不杀"[40]，"献城纳印者给以爵禄[41]"等；并以檄文，牌示、布告、书信等多种方式敦促明军将士认清形势，不要负隅顽抗，争取他们起义、投诚。

由于李自成采取了以上措施，达到了收人心的目的，得到了

二、据河洛，取天下

崇祯十三年十一月间，李自成乘河南明军防务空虚之机，进入豫西，连破宜阳、永宁、新安三城，人民群众“从自成者数万”[45]，部队迅速扩大。李自成遂按照“据河洛，取天下”的方针，从“官兵多则窜伏，少则迎敌”发展为开始向明军主力部队和明王朝的战略要点进行机动性的进攻。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一月间，李自成军攻占重镇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紧接着张献忠、罗汝才联军也甩开入川的杨嗣昌部明军主力，大踏步地机动返楚，于二月间攻占襄阳，杀了襄王朱翊铭。明军统帅杨嗣昌因“连失二郡，丧两亲藩，度不免，遂自尽”[46]。四月间，洪承畴率八总兵十万人出援锦州时，也为清军全歼。陷于两面作战苦境的明王朝，在东西两个战场上均遭到沉重打击。遂在“灭奴先灭寇”[47]的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东守西攻的战略方针。对清军改为单纯防御，并暗示兵部尚书陈新甲派马绍瑜与皇太极秘密谈判，企图与清军议和，以便抽调吴三桂部精兵转用于西战场；同时集中一切尚可集中的兵力，继续向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军进行围剿。因而在西战场上，李自成军与明军的实力对比，暂时仍处于劣势。李自成攻下洛阳后，曾“置官留银，企图作开国始基”，[48]主观上希望以洛阳为基地，以改变无后方流动作战的局面。但客观上这种守土不流的愿望，尚不能立即实现。在明军进攻下，还无力固守大城市。李自成军转攻开封时，洛阳又为明军攻占。所以李自成军在进入河南后的第一年，基本上没有建立地方政权。攻下城市后，往往下令折毁城墙，集中兵力与明军进行运动战性质的流动作战，至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三歼明军主力后，才在河南建立地方政权，“每得一城，辄分兵防守，且严禁抢掠”。[49]当年七月间，罗汝才与张献忠产生矛盾，率部归附李自成。李自成部军力更为强盛。崇祯十四至十六年的一年半时间内，李自成部三攻开封，并在流动作战中，五次歼灭或击溃明总督傅忠龙、汪乔年、孙传庭、杨文岳等所

率明主力部队，改变了西战场的战略形势，站稳了脚跟，使农民战争更向前发展了一步。

兹将李自成部入据河洛的五次战役简况及李自成的战役指导概述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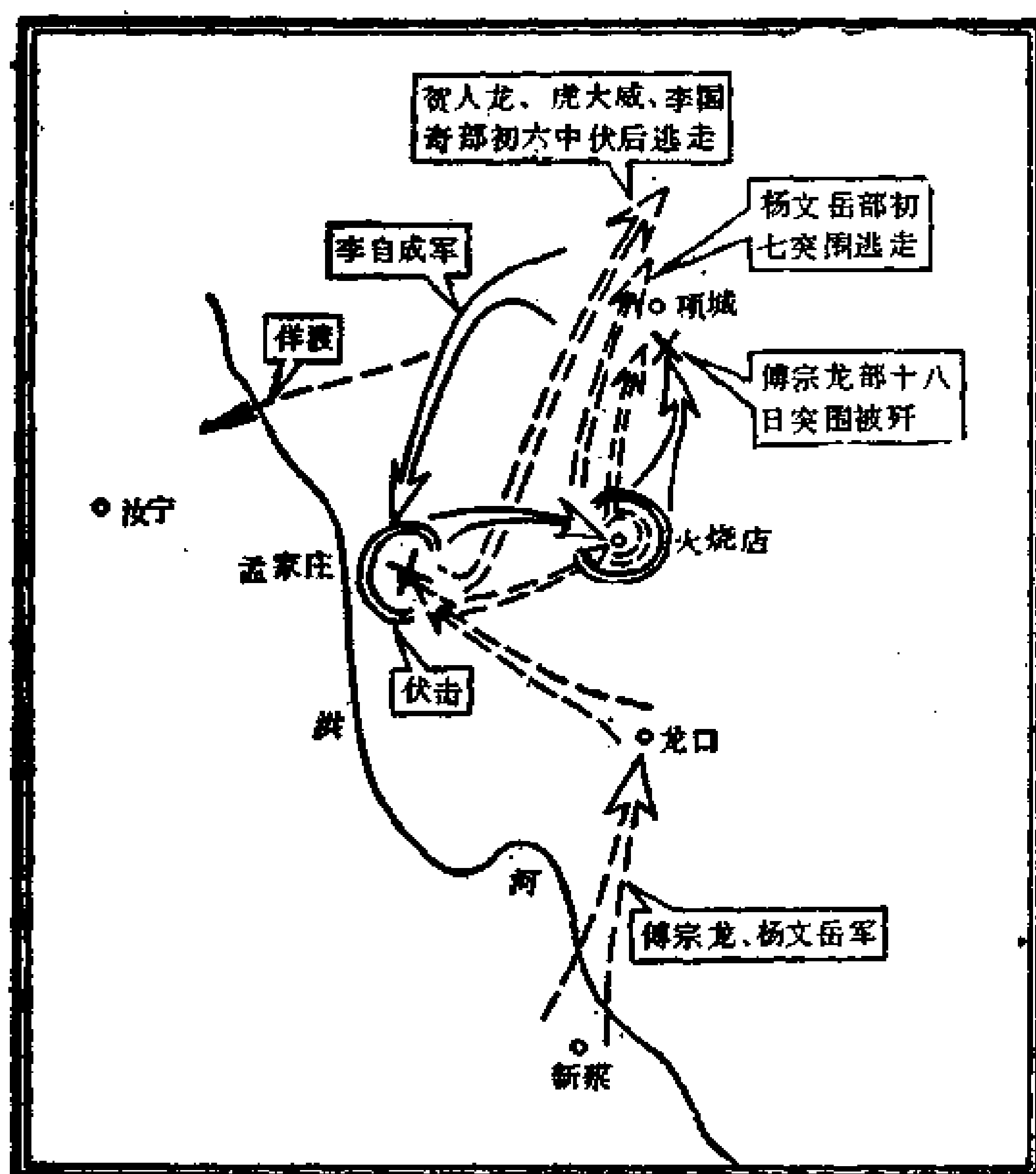
（一）孟家庄之战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正月，李自成部攻下洛阳后，即围攻开封，攻七昼夜未克，遂东破归德（今河南商邱）再转进至豫西地区。当李自成主力离洛阳后十余日，洛阳又为明军攻占，李自成所留城守邵时昌被杀。七月初，李自成部攻左良玉部于淅川。此时罗汝才部来附，遂联军进逼邓州（今河南邓县）。驻屯于禹州、郾城一带的保定总督杨文岳，率总兵虎大威部明军，以急行军驰援邓州，在湍河北岸击败李自成部。李、罗联军乃转移至项城（今河南项城南）附近地区。

九月间，陕西总督傅宗龙率贺人龙、李国奇两部明军出关，与杨文岳、虎大威部明军会合，二督三总兵共约四万人集结于新蔡地区，搭浮桥渡洪河北趋项城。李自成侦知明军动向后，遂在洪河上游亦架浮桥，佯作向汝宁（今河南汝南）撤退，而将李罗两部精锐尽伏于孟家庄（汝南东）两侧森林中。杨文岳、傅宗龙等判断李自成新败，去汝宁（今河南汝南）系怯敌避战，于是率军急追。初六日中午到达孟家庄时，人困马乏，解鞍休息。李自成所设伏军乘其不备，突然发动攻击，明军大乱。贺人龙部先逃，虎大威、李国奇两部亦随之逃走。杨文岳、傅宗龙率余部退屯火烧店，被李自成军包围。初七日夜，杨文岳复率所部突围逃走，仅剩傅宗龙孤军独守。李自成军掘壕围困。至十五日，傅军粮尽；十八日傅宗龙率残部六千余人突围向项城逃走。李自成军跟踪追击，将其全歼，并俘获傅宗龙，十九日杀于项城之下。这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的第一次大捷，也是农民军战场上第一次俘虏明王朝的总督，因而李自成军士气更加高涨。

孟家庄之战示意图

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九月　　(31—1图)



（二）襄城之战

李自成歼灭傅宗龙部后，乘胜连下商水、南阳、禹州等地，杀明唐王朱聿鏌、延津王朱常淦等。豫西南各州县大部为李自成军攻克。十二月间再度包围开封。朱由检责令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率军出关，与左良玉部合击李自成军并解开封之围。李自成军久攻开封不下，侦知左良玉军已由汝南北上来援，遂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正月十五日撤开封之围，移军南下，十八日将左

良玉军包围于郾城。开封地区的明军丁启睿、杨文岳等部，均不敢出兵救援。汪乔年率贺人龙、郑嘉栋等部于二月间出潼关，闻左良玉被围，遂留步兵于洛阳，自率两万骑兵兼程前进，经郏县直趋襄城，企图与左良玉部协同，夹击李自成军于郾城以北地区。二月十二日夜，汪乔年部进至襄城，分三部宿营于城东四十里处。

李自成得知汪乔年、贺人龙等到达襄城，认为不能“纵之深入，使两军得合”，判断“人龙千里奔命，士马罢敝，吾乘其疲，破之必矣。已破人龙，则良玉自溃”。[50]遂决心转移兵力，乘敌不备袭击立足未稳的汪乔年军，乃留一部兵力监视郾城左良玉部，自率李、罗主力连夜北上。十三日进至汝河，立即向汪部发动袭击。汪乔年等不料李自成军突然出现，仓皇应战，其总兵张国钦战死，两部明军均自行逃走，汪乔年被迫率残部退入城中防守。李自成军包围襄城，经五日战斗，二月十七日将城攻破，俘杀汪乔年，全歼城内明军。十九日挥军南下郾城，企图乘胜再歼左良玉部，但李自成围攻汪乔年时，左良玉已弃郾城逃走。这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的第二次大捷。李自成在两年内两破陕西明军，俘获马匹两万，收降明军数万，声势更振。接着，又乘势连破西华、陈州（今河南淮阳）、太康、归德等二十几个州县，于四月底三围开封。

（三）朱仙镇之战

李自成军第三次包围开封城之后，朱由检连续下诏责备督师丁启睿，严命急救开封。丁启睿不得已，乃与总督杨文岳合兵，统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四镇明军约十余万人援开封。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三日[51]，其先遣部队到达朱仙镇附近的水波集地区，于沙河沿岸连营四十里，虚张声势，号称四十万，企图迫使李自成军撤围。

李自成留部分兵力监视开封明军，自率李罗两部主力南下迎战，屯驻于朱仙镇，并采取了三项措施：（1）派部队截断沙河

上流水道，断绝明军水源，使其陷于困境，不能持久。（2）堆土丘数座，上建炮台，以便居高临下炮击敌营。（3）将明军营地通往各处的道路全部破坏，挖掘深壕以断绝明军粮道与退路。

明军四镇系临时凑集，内部矛盾重重，已经发展为拥兵自重的各镇将，根本不愿听从督抚等文官的指挥。当李自成初到时，左良玉就不肯出战，认为农民军"锋方锐，未可战也"。丁启睿虽提出"汴围已困，岂能持久，必击之"[52]的命令，但各镇拒不执行，互相观望，不敢出击。经七天的炮战，明军伤亡甚多，兼以缺少粮、水，至二十三日晚，左良玉首先撤逃。李自成发现征候后，认为如迎头截击，左军必然死战，遂决定让其逃走，然后从背后击之。当夜，左军果然擅自撤走，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李自成以少数兵力拦击，故意示弱，接战即退，而率主力跟踪左军骑兵之后。左军误认已经突出包围，只想迅速脱离战场，疾驰奔逃。到达李自成军所挖长壕之处遇阻，官兵争先下马越壕，部队失去掌握。李自成军乘机发起冲击，左军大乱，自相践踏，全军被歼，左良玉仅率极少数亲兵逃回襄阳。左军一败，其他各军相继逃跑，全军溃败。李自成军乘胜追击，歼灭大部，丁启睿逃至汝宁。

朱仙镇之战，是双方带有决战性质的一次战役。李自成军歼敌十万，获战马两万匹。基本上摧毁了明军在河南东部战场上的主力集团，迫使明军在战略上进一步陷入被动。

（四）冢头之战

朱仙镇大捷后，李自成返军开封，加紧围攻。此时河南境内已无明军主力集团，朱由检将解围希望寄托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身上，遂下令促其早日出关击李自成。在其尚未准备就绪之时，李自成军攻开封将破。开封守军恐城破有罪，乃用推官黄澍之谋，约黄河北岸的明河北巡按严云京，于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九月十五日夜掘开黄河大堤，水淹李自成军。黎明时河水骤至城下，营于城西南的李自成军急移高地，营于城东北的迁

移不及，溺死万人。十六日水势愈大，开封城内外尽入水中。十七日北岸明军以船接走明周王朱恭枵及其他官员，城内全部被淹，死者不下数十万，生者不及百分之一、二，黄河由此改道。

九月底孙传庭率陕西明军进至潼关。李自成得知这一情报后，率李、罗两部全军西进，准备迎击。孙传庭进至郏县，侦知李自成已率军西来，乃设三伏以待，并以牛成虎一军在前，佯为败退，企图诱李自成军进入伏击阵地。李自成率本部先至，与明军接战追击中伏，陷于苦战。此时罗汝才部尚未到达，李自成被迫向东退却，明军追击不舍。李自成采取“利而诱之”、“乱而取之”的手段，令部队沿途遗弃衣甲、财物。明军争夺财物，队形紊乱。到达冢头附近时，罗汝才率部赶到，遂协同向明军发动反击，明军大败溃逃。此役斩杀明军副总兵以下军官七十八人，歼敌数千，获大批火炮。孙传庭率军退回陕西。这是进入河南后李自成第四次大胜明军。明军进击时，李自成军采青柿充饥，所以历史上也称柿园之战。

（五）汝宁之战

冢头之战后，明军在豫鄂地区只剩下汝宁的杨文岳和襄阳的左良玉两个兵团，李自成军不断发展壮大，数达百万，声势之盛，空前未有。计划先进攻左良玉，夺取襄阳。有人建议：“杨督以真、保之兵在汝宁，若摄吾后，非良策也。良玉新败，必不敢救汝宁，盍先取之”[53]李自成认为这个判断和建议符合实际，遂决心先打杨文岳。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闰十一月，李自成军进攻汝宁，十二日晚到城郊。杨文岳侦知李自成军南下，即部署保定兵于城西，四川兵于城东，拟在必要时实施两面夹击，以确保汝宁城。李自成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以一部兵力牵制城西保定兵，而以主力进攻城东四川兵。激战一昼夜，川兵败溃。接着又转移主力进攻城西，保定兵亦被击溃，总兵虎大威被击毙于城楼。杨文岳收集残部退守城垣。李自成军于十四日晨发动总攻，将士以门

板挡矢石，以云梯登城，激战至中午，突破西门，攻入城中，俘杀杨文岳，并俘明崇王朱由𣚴及世子朱慈辉。这是李自成进入河南后第五次大败明军。

杨文岳军是河南境内仅存的一支明军，消灭了他，从军事上说，已基本上实现了“据河洛”的战略目的。但从建立根据地的角度看，却还“据”得不彻底。主要是还有大批地主分乡武装在控制区内没有悉数扫清。如蕲、黄四十八寨、洛阳的李际遇，汝宁的沈万登，南阳的刘洪起等，各拥兵数万；至于小的山寨，更是林立各地。它们依违于明军和李自成军之间，随风转舵，骑墙观望。不消灭他们，河洛地区势难巩固，必然留下隐患。

攻下汝宁后，李自成立即向襄阳进军，沿途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左良玉军据汉水南岸，并结水寨防守。李自成以一部兵力在正面用火力牵制敌人，而以主力迂回至樊城以西七十里的白马滩渡过汉水，向襄阳进攻。左良玉军在大肆劫掠后逃奔武昌，李自成军于十二月初三占领襄阳。

正确的战略决策与灵活的战役指导

这一阶段是由反围剿、图生存向战略进攻过渡的战略转变阶段。李自成在战略上采取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方针，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而集中兵力，实施带有运动战性质的流动作战，以保障战略目标的实现，也完全符合当时的客观形势。前一阶段，也曾获得过不少战役、战斗的胜利，但一般规模不大，属于局部性质，且仅限于击溃明军，对战争全局影响不大。这一阶段的战争胜利，规模较大，带有全局性质和决定意义。经过这一阶段的作战，明军与李自成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质的变化。李自成不仅在河洛地区已能站稳足跟，而且基本上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李自成之所以能够在河南获得在这一阶段的战争胜利，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但占主导地位的是主观因素。

从客观上说，主要因素有二：一是阶级矛盾尖锐与特大灾荒。

河南是明藩王最多的省份。有周、赵、伊、徽、郑、唐、崇、潞、福等九王，都拥有大量庄田。如考城共有地三千一百八十六顷，而周王一府即占有一千二百余顷。其他官僚缙绅，也都在数百顷以上。所以阶级矛盾本来就极为尖锐，再加以发生了三百年来从未有过的特大灾荒，人民冻饿交加，死亡过半，达到“人相食，草木俱尽”的悲惨境地。可是明王朝不仅没有采取任何拯救人民的措施，反而变本加厉地强征三饷，以致“农怨于野，商叹于途”，连一些地主阶级中，下层的知识分子，也有的被迫投奔起义军。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实在无法生活下去，遂相继起义，如老当当、一斗谷、杆子、宋江、一条龙、袁营、老袁营、李振海等，众皆万余至数万。这给李自成的发展壮大，准备了雄厚的群众条件。二是张献忠军和清军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牵制了大批的明军主力，以致河南空虚，给李自成军造成了顺利发展的大好机会。后来朱由检虽然调动大量明军来河南，但也无法集中绝对的优势兵力围剿李自成军。这又给已经发展壮大了的李自成军创造了消灭河南明军的可能性。

客观上虽然有了发展和胜利的有利条件和可能性，但如何运用这些条件和促使这些可能性变为现实，则主要靠主观能动性的正确发挥，使主客观一致起来。李自成在河洛地区获得这一阶段战争胜利的主观原因，概括来说，就是战略决策正确和作战指导灵活。

李自成出身驿卒，社会经验比较丰富，他知道要图大事、取天下，没有文化知识，不能利用前人的战争经验，特别是历代农民战争的经验，就难以取得战争的胜利，更不可能达到取天下的战略目的。所以他非常重视吸收同情农民革命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加农民军，并任用他们为军师、辅、弼等参谋性职位，甚至任用个别人为统兵的将军，[54]使他们的知识才能为我所用。同时让他们“日讲经一章，史一通”，并“讲孙吴兵法”，帮助自己学习。这对李自成军的发展壮大和获得这一阶段的战争胜利，

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李自成进入河南后，接受牛金星、李岩等知识分子的建议，决心将战略目的由图生存转向取天下，开始向建立根据地的方向转变，并采取一系列加强政治工作的战略性措施，都非常正确，对壮大自己、孤立敌人和获得战争胜利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在这一阶段作战中，李自成的作战指导机动灵活，充分体现了他卓越的指挥艺术。主要表现为：

第一，善于集中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孟家庄、朱仙镇和冢头等各次战役，李自成都能实施大踏步的前进与后退；每战都掌握"我专而敌分"[55]的原则。集中兵力打明军一路，"数万人为一队，飘忽若风雨"，[56]所以屡得胜利。当时的统治集团也已认识到，"今日之失，正在贼聚而攻，我散而守，故处处无坚城"。[57]

第二，善于选择进攻时机和打击目标。进攻时机和打击目标，一向是战术运用上的重要课题。李自成善于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紧抓战机，打击对我最有利的目标。例如朱仙镇之战时，左良玉是明军中战斗力比较强的一支部队如将他歼灭，则其他明军自然瓦解，目标选定了，如何掌握打的时机呢？李自成决定纵左良玉突围，俟其军队失去控制，由强转化为弱时，再从背后击之。再如襄城战役时，李自成分析左良玉新败之余，不敢出击，而汪乔年军对己威胁较大，遂迅速转用兵力，北上袭击汪乔年。

第三，善于根据具体情况采用不同战法。李自成用兵"向称善攻，不用古法（不机械地搬用古代兵法）"[58]，随时了解和掌握战场上变化不定的敌我双方情况，灵活地变换自己的战法。河南五次大捷，互不相同，各有特点。例如孟家庄之战是佯怯示形，伏击歼敌；襄城之战是"攻其无备，出其不意"[59]，朱仙镇之战是"避其锐气，击其惰归"[60]；冢头之战是"利而诱之，乱而取之"[61]；汝宁之战是先各个击破外围主力，再环攻坚守城内残敌，的确掌握了"兵因敌而制胜"[62]的原则。

第四，进据关中，径取北京，推翻明王朝

——李自成战略进攻阶段（崇祯十六年—十七年）——

一、先取关中，再向京师的战略方针

（一）建立政权

李自成占襄阳后，一方面高举“剿兵安民”的大旗，宣布“三年不征，一民不杀”[63]的政策，加强政治宣传，一方面分兵南下，略取府县，加强军事进攻。李自成率主力向东南、攻占云梦、黄陂等县，进至汉阳；一路沿汉水南下，破承天（湖北钟祥）；一路由荆州渡江、连破松滋、石首、监利等城；一路远入赣西，进占德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席卷荆、襄六府各州县，所向披靡。退据武昌的左良玉、仓皇再逃九江。至此，河南南部五府七十八州县和攻占的荆襄六府各州县，已连成一片。李自成没有继续向东、南方向发展，崇祯十六年二月初返回襄阳，建立大顺政权。初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后改称新顺王。中央设左辅、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职官，地方设防御使及府尹、州牧、县令等职官。据统计，当时有七十七州县建立了大顺政权。[64]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李自成对军队也进行了整编，区分为中央直辖的战略机动部队和地方卫戍部队两种。机动部队是主力，共五大营。对军队的整编在名称与编制上受明军五大营的影响，但实际内容并不尽同，具有农民军的特点。五大营即中，左、右前、后五军营。其中中军营是亲军，是全军的核心。中军营统帅为权将军，是军事最高长官，领导和指挥五大营。中军营下属五标营，每标营下属二十队，其他大营下属两标营，每标营下属十六队。队是大顺军的基本编制单位，每队约二百五十人左右，其中骑兵约五十人，步兵约二百人。冲锋陷阵的是骑兵，称精兵或精骑；步兵是骑兵的助手和后勤兵。每名骑兵隶属四名步兵，负

责养马、做饭、管理衣甲兵器及放哨等勤务。每名骑兵有马二至四匹，作战时轮流骑用，以免马力不继。一般情况下，步兵不冲锋陷阵，但在防御、追击或战斗紧张时，当然也要参加作战。骑兵由步兵中升补，步兵中还有一部分少年儿童兵。另外有大量随军家属。五大营计有骑兵约一万二千，步兵约四万余，连同家属子女大约三十万。当然，上述数字系各种材料综合推测而来，不可能十分准确。

地方卫戍部队，是从主力部队中抽调编成。共置襄阳、荆州、承天、南阳、郑州等十三卫，任命高一功、任光荣等为卫将[65]。不算各县武装共约三万人，连同家属约十五万。在襄阳、邓州，南阳等地区，还将没收的明王朝庄田和豪神官僚的大量土地，分配给驻守各卫军及其家属，实施屯田。[66]

正当大顺政权建立之际，李自成军内部发生分裂。罗汝才一贯习惯于"横行天下为快"的流动战，对李自成设官分守建立政权的方针不理解，又不肯屈居人下，再加以明军的离间和二人生活作风上的不同，双方早已产生矛盾。建立政权时，罗汝才、贺一龙、马守应等，见重要军职全部授与李自成本部名将，更产生离心倾向。李自成认为他们有联合反对自己的可能，于是采取了先下手为强的措施，于三月间杀罗汝才和贺一龙，造成军心混乱，有的首领降明，有的部队解散，有的脱离大顺军。经七天处理，才结束了两人部属的安抚工作。这一事件，在当时对军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曾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看，也伏下了一定的消积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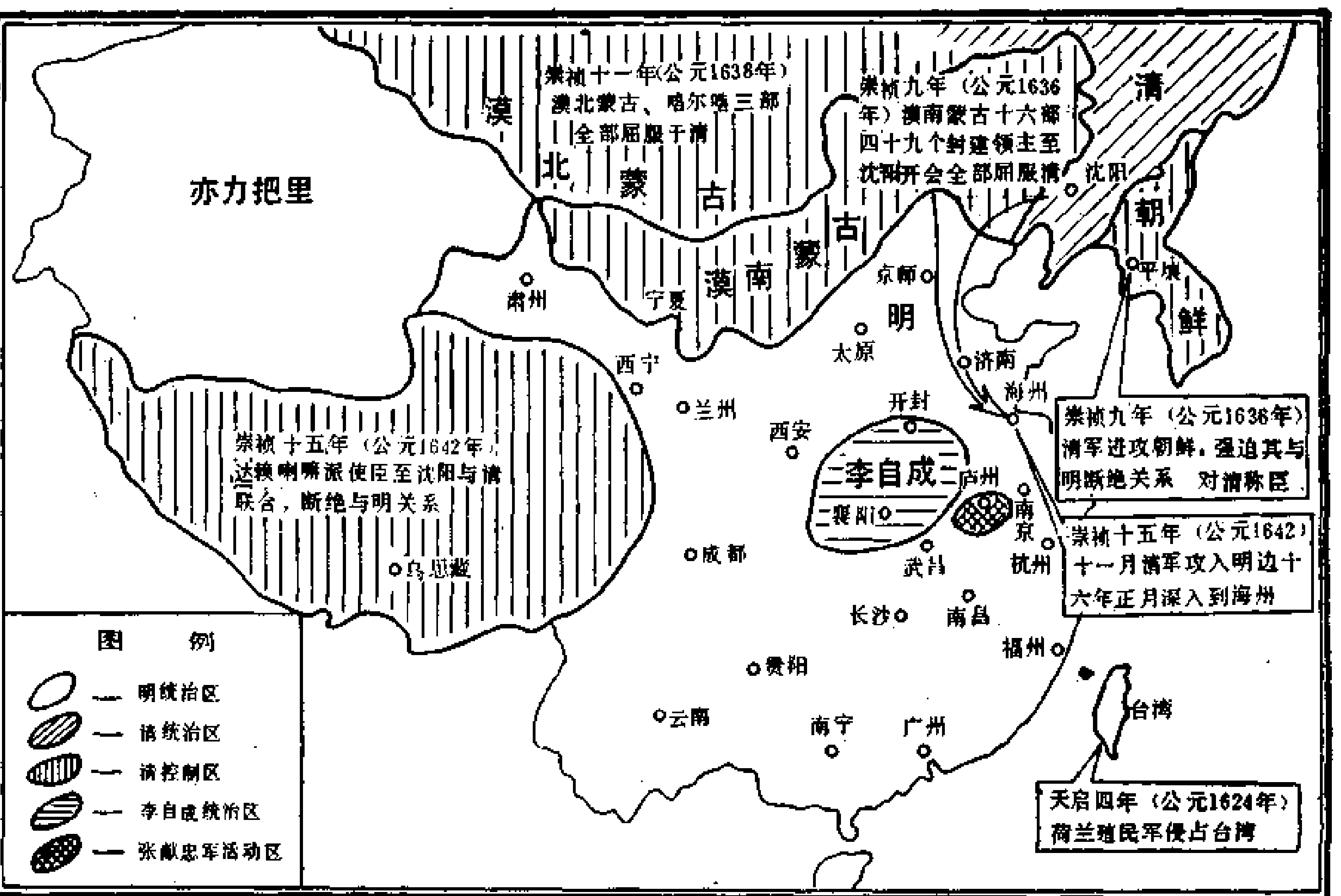
（二）当时形势

正当李自成军进逼武昌，又突然回军襄阳，而左良玉却仓皇东逃之际，原活动于安徽各地的张献忠军乘机攻入黄海、蕲州、广济一带，并乘胜攻占武昌。六月间，在所占地区设兵部尚书、五军都督府与二十一州、县官等中央、地方官职，建立了政权。

李自成建立襄阳政权时全国战略形势示意图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二月

（31-2图）



后金政权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改国号为清，继续巩固和扩大其统治，此时已西向消灭了察哈尔部林丹汗，统一了漠南蒙古（内蒙古）及漠北蒙古（外蒙古）；北向平定了索伦部博木博果尔的叛乱，统一了黑龙江流域各部；东向击败了朝鲜，迫使其归服称臣；并连续派军南进，越过明边，进攻畿南，山东等明朝腹地。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十一月，清军第五次进入明边，崇祯十六年正月，曾一度深入到海州（今江苏东海），四月撤回关外。这次入边，攻破畿南、山东八十八州县，掠走十六万人及大批财物。

明军经河南五次战役后，主力已丧失殆尽，大江以北，仅存吴三桂、左良玉及孙传庭三个主力兵团。吴三桂驻守宁远（今辽宁兴城）防御清军，无法抽调；左良玉屡遭失败，已不敢与李自成军交锋；江南明军，尚未形成大的兵团，又有张献忠军的牵制，暂时不会对李自成军形成威胁。只有关中的孙传庭集团，虽经冢头战败，但未受歼灭性打击，尚有机动能力及一定的战斗力。总的来说，当时的形势。对李自成是有利的。

（三）战略方针

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标志着他的战略转变已经完成。下一步如何办才能达到“取天下”的政治目的，就成了李自成必须立即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李自成召开了重要军政官员会议，研究今后的战略方针。

左辅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走京师”；礼政府侍郎杨永裕主张先取金陵，截断明王朝的漕运粮道，然后再乘机北伐；吏政府从事顾君恩认为：

> “先据留都，势居下流，难以济事，其策失之缓。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不如先取关中，为元帅桑梓之邦，且秦都二百山河，已得天下三分之二，建国立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后向京师，方为全策。”〔67〕

这个方针的中心，是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先取关中为根据地，并向北发展，利用三边的明兵壮大自己的军力；第二步再经山西取北京，推翻明王朝。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建议，决心将主力转向豫西，作入关的作战准备。

二、决战郏县，直下关中

（一）郏县之战

孙传庭自冢头战败退回陕西后，感到自己现有兵力非大顺军之敌，且未经训练，不敢出关。因李自成杀罗、贺而率部投降孙传庭的原罗汝才部将王龙建议说：

> “贼势大，不可敌，然襄阳野如赭，百万之众何以供，五月后必大饥，因其饥而攻之，可不劳而定”。[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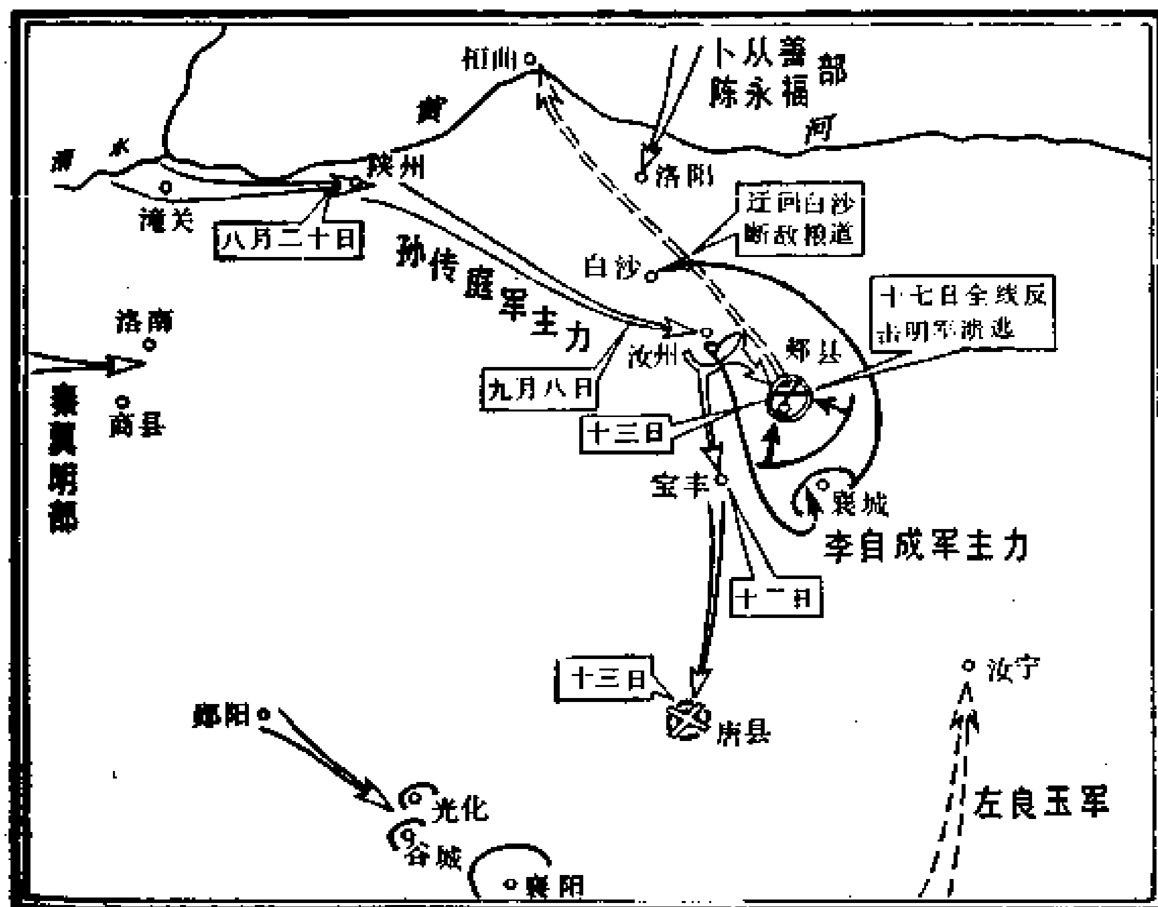
于是孙传庭决定坚守潼关，增军积粮，俟大顺军饥疲时再集中兵力反击。但朱由检急于收复河南，不断催他出兵河南，进攻襄阳。孙传庭不得不放弃原计划，调集兵力，准备出关。朱由检又增派蓟辽总兵白广恩、四川总兵秦翼明部归其指挥。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七月下旬，孙传庭军开始行动。他的战役企图是南、北、西三个方向分进合击，将大顺军主力歼灭于襄城、郏县地区。他的战役布势是：自率总兵牛成虎、白广恩、王定，副总兵高杰各部及两千辆“火车”（有火炮火枪的车辆）为主力、出潼关，趋洛阳，命河南总兵卜从善、陈永福先期至洛等候，与主力会合后，转军南向汝州（今河南临汝）；命总兵秦翼明率所部出商（今陕西商县），洛（今陕西洛南），掩护主力右侧背，与主力部队配合，东进郏县；命总兵左良玉率所部自九江北上汝宁（今河南汝南）；并命郧阳明军进攻襄阳附近的光化、谷城，以为牵制。

李自成进军豫西的目的，就是打算夺取关中，但由于孙传庭“九边精锐，悉隶麾下，又据潼关之险”[69]，所以才不得不作一定准备。今闻孙传庭出关来战，正好以逸待劳，遂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针，将主力集中隐蔽于襄城、郏县之间，而以

老弱迎战。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八月六日，孙传庭率军出潼关，从陕州至郏县间所有县城，大顺军均不设防，只以少数部队与敌接触，一战即退。二十日孙传庭至陕州，因李自成杀罗、贺而投孙传庭的原罗汝才部将杨承祖，招诱大顺军都尉李养纯叛变，泄露了大顺军老营在唐县（今河南唐河）、指挥部在宝丰（今河南宝丰）、主力精锐尽在襄城附近等机密。这时张献忠的大西军正进军长沙，左良玉部又重新占领了武昌三府二十一州县，形势对明军转趋有利。

郏县之战示意图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八、九月　　（31-3图）



九月八日，孙传庭进至汝州（今河南临汝）。李自成率步、骑万余迎战，与明军战于宝丰、郏县之间，投降孙传庭的罗、贺旧部“皆致死力战”〔70〕，李自成败走。孙传庭渐有骄意，不待粮车

到达，即率军急进，于十二日攻占宝丰，十三日攻占郏县，并分兵一部攻陷唐县，将大顺军家属全部屠杀。此时，长沙为张献忠攻克。原计划北进夹击大顺军的左良玉部，被朱由检派去追赶张献忠军，不能按预定计划北上，而西路秦翼明部亦停止于商洛不进，于是孙传庭军成为孤军。

李自成在襄城坚壁清野，深沟高垒，坚守不战，并派一部精骑迂回至汝州、白沙（今河南伊川附近）之间，切断孙传庭军的粮道。孙传庭求战不得，欲退不能，完全陷于被动。相峙五日，至十七日夜，孙部士兵因饥饿发生混乱，大顺军乘机发动全线反击，明军溃逃。战车营士兵弃车奔命，以致车马塞道，明军更为混乱，溃不成军。大顺军紧跟追击，一日夜追逐四百里，明军死亡四万余人，辎重装备尽失。孙传庭与高杰仅收集散亡士兵数千骑，由垣曲渡河走黄河北，复南渡经阌乡还潼关。明军在关中的最后一个主力集团被大顺军彻底击溃。这一带有决战性战役的胜利，不仅为大顺军进占关中扫除了障阻，也为尔后进军北京，推翻明王朝奠定了基础。

（二）攻占关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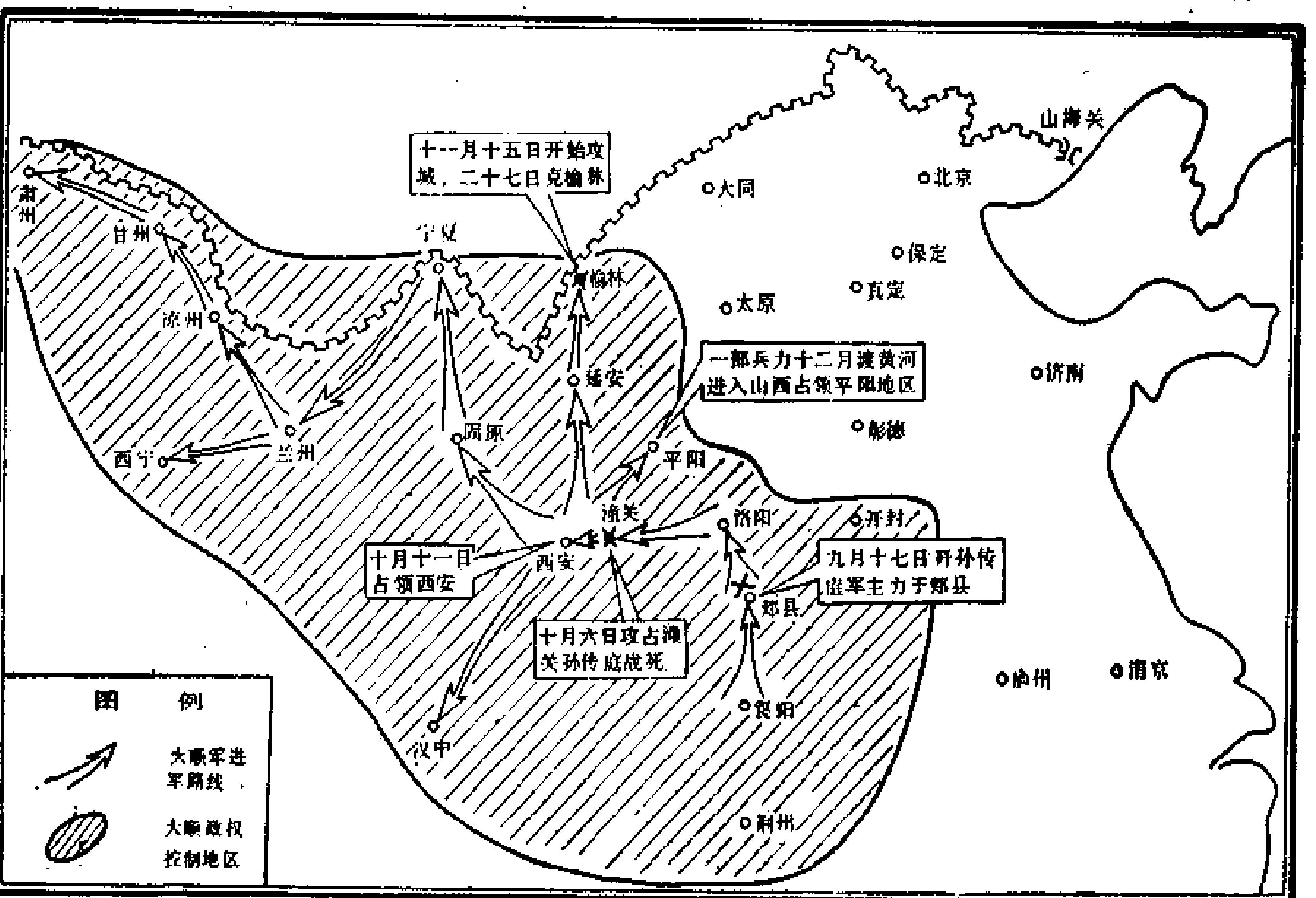
孙传庭逃回后，收集残部，企图自保。但军心已散，将不用命，朱由检又派宦官十数人随军督战。孙传庭被迫自率残部守潼关。李自成在洛阳地区稍事整顿，即率主力直趋潼关，并派刘希尧率右营军由南阳出淅川攻商、洛，迂回关中。

崇祯十六年十月六日，大顺军开始进攻潼关。李自成率军由正面进攻，派李过率后营军由南侧攀山迂回至潼关侧背，两面夹击，攻占潼关，孙传庭战死。初八日，左路刘希尧军亦攻占商州。大顺军遂以破竹之势进击西安，明军闻风而遁，十一日占领西安。李自成即派田见秀、刘宗敏、李过等，分别率兵追击逃走的明军，迅速占领了延安、汉中、固原等城。十一月又攻占榆林，十二月占领兰州、甘州、肃州西宁等地，并派一部兵力进入山西，占领了平阳（今山西临汾）等城。至此，秦、陇全境及山

李自成军攻占关中示意图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九至十一月

(31-4图)



西西南部地区，全为大顺军控制，三边明兵也大都为大顺军收编。顾君恩方案的第一战略步骤，从军事上说已基本完成。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初，李自成改西安为西京，正式定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他扩大政权组织，制历，铸钱，并改以策论开科取士。同时进一步整顿军队，汰弱留强，在将领中实行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改变老营家属随军作战的习惯，将老营家属安置于各地，不再随军。当时精兵号称百万。此外还普遍展开以暴力强迫豪强巨绅献金助饷的活动。

三、进军北京推翻明王朝

李自成进军关中，平定秦陇之时，张献中正转战江西、湖占，向四川进军，牵制了左良玉部及江南其他明军。北方明军主力，仅有吴三桂一个集团约四万人，在宁远与清军对峙。李自成在西安扩建政权、整顿军队之后，决定立即实施战略计划的第二步，部署刘芳亮率左营大军经平阳东越太行山进出豫北，尔后转军北上，经真定（今河北正定）从南面进攻北京；李自成自率主力部队十余万，由龙门东渡黄河，北趋太原，尔后经大同、宣化进攻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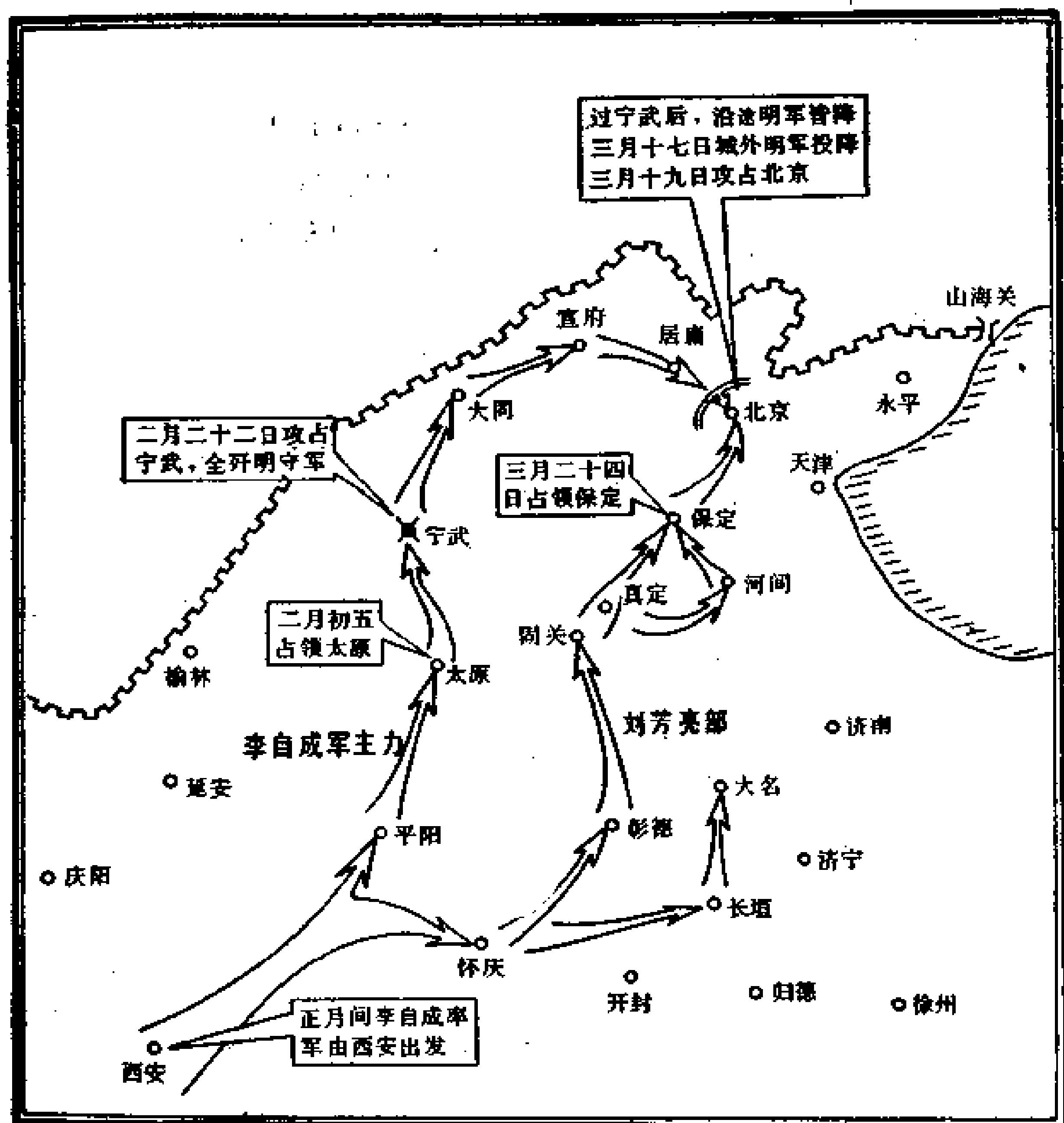
明帝朱由检得知大顺军略定三秦，进入山西，异常惊恐，采用李明睿的建议，准备南迁南京。密令天津巡抚冯元飚以漕舟三百艘停泊大沽待命，并计划在淮安、济宁增设重兵，以为途中接应，掩护南行。[71]

清帝顺治得知大顺军占领关中并准备北上时，即与李自成写信，建议联合，“协谋努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72]。李自成断然拒绝，未予答复，但对清王朝也要争夺全国统治权的企图，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大顺军在进军北京之前，先派人传送檄文，揭露明王朝的罪恶，同时宣布“三年免征，一人不杀”[73]的政策。人民纷起响应，李自成进军极为顺利。李自成所率部队，二月一日渡黄河攻占蒲州（今山西永济），连克太原、代州（今山西代县），一路

李自成军进军北京示意图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至三月　　　　（31-5图）



势如破竹。唯至宁武，苦战四日，伤亡万余方克。至三月一日，已进占大同。此时，刘芳亮所部也已由怀庆（今河南沁阳）北上，经固关（今河北井陉）到达真定，他派出的两支东进部队，也分别进出至河南长垣、滑县和河北河间，形成对明军运河交通线的威胁。朱由检不料大顺军进展如此神速，南迁的准备尚未就

绪，他害怕大顺军劲骑急追，遂放弃南逃计划。三月六日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下诏令其放弃宁远，迅速率兵驰援北京。吴三桂家在辽东，士兵也多为辽东人，因连年与清军作战，当地居民和士兵家属均不愿留在辽东，所以吴三桂将宁远居民及家属等共约五十万人尽皆迁徙入关。每日只行数十里，至十六日方到山海关。此时，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主力已占领昌平，逼近北京。

北京是明王朝的统治中心，经营达二百多年之久，城防工事坚固，防御设施齐全。但由于明王朝末期政治腐败透顶，军队濒于瓦解，至此已无力组织有力的防御。明军在京卫戍部队，按名额尚应有六万余人，但许多皇亲国戚的家丁冒领饷银，形成大量空额，加以军心动摇，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大顺军于十七日驰抵北京时，城外明军三大营首先投诚，城内防守力量更加薄弱。李自成曾派投降太监杜勋等入城劝告朱由检投降，但未成功。十八日傍晚，预先潜入城内的大顺军侦察人员，策动守彰仪门的太监开门献城，大顺军入彰仪门（西直门）占领京城。十九日晨，皇城亦被攻破，朱由检自缢于景山，明王朝的统治，终于被大顺军所推翻。刘芳亮所率南路的大顺军，亦于二十四日占领保定后进入北京。

人心所向导致军事上的迅速发展

经过河南五次战役之后，在兵力及军队战斗力的对比上，大顺军已开始向优势转化。特别是郏县一战，歼灭了孙传庭的主力部队之后，更掌握了战争主动权，从而转入战略进攻。在这一阶段中，不论是第一步骤的进据关中，或是第二步骤的进占北京，大顺军都是以破竹之势，所向无敌。崇祯十六年十月破潼关，五日后即进入西安，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席卷三边，尽有关陇，解除了北上的后顾之忧。次年二月开始北进，又仅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进军一千多公里，攻下明王朝经营了二百多年的坚固设防城市北京，推翻了明王朝，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在军事上能

够如此迅速的发展，除了军事本身的原因外，政治上的人心所向，应当说是主要原因。

在军事上，李自成的战役指导相当卓越。如郏县之战，孙传庭被迫倾师来战，并带有两千辆火车组成的车营，企图进行决战。在当时的情况下，大顺军如硬碰硬地决战，则胜利并无把握，即使能够战胜，也必然伤亡极大。李自成采取了佯败诱敌的灵活战法，使其轻入，然后坚壁清野，固守不战，待其顿兵坚城之下，锐气已挫之际，出奇兵去白沙断其粮道与退路，使其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再全面出击，从而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正符合《孙子兵法·虚实篇》所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原则。再如由西安向北京进军时，李自成的作战指导也极正确。当时明军判断他必然出山西，经保定直取北京。因为这样走路途近，而且明军防守力量也较薄弱，易于突破。明廷认为宣大重兵所在，无须多虑，"朝廷之忧则在保定，不在宣大，且谓保定不支，犹可调宣、大兵之半以援畿辅也。"于是"命辅臣统禁旅出保定。"〔74〕但李自成的行动却完全出乎明军意料之外，他部署刘芳亮部由南路经保定攻北京，而自己却率主力从明军认为"必不犯天下重兵处以入"的方向，由太原挥军北上，攻宁武、大同、宣府，经居庸关迂回北京。事实证明，这种出敌不意的作战指导思想，是非常成功的。

通过多年的战争实践，李自成在战役指导上，确实已相当成熟；军队的战斗力也大为提高；又在军力对比上居于优势，掌握了战争主动权，所以这一阶段的军事发展特别迅速。但这是重要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如占领西安后向外围扩大统治区时的榆林之战，孤立无援的少数明军坚守孤城，不肯投降，大顺军制将军李过以七万之众，激战十三天，才以相当大的代价将城攻破。再如李自成自率主力由太原北上时的第一个关塞宁武，守将周遇吉不肯投降，猛攻五日，伤亡万余，才将该城攻破。从山西到北京，要经过大同、宣府、居庸关等许多军事重镇，假如都象榆

林、宁武的明军那样顽抗，那么大顺军军力再强，也不可能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前进一千多公里，直下北京。据说李自成在强攻宁武时曾因死伤甚多，有所犹豫，“夜既深忽报大同总兵姜瓖降表至……坐甫定，而宣府总兵王承胤表亦至，且以百骑来迎”[75]，才决定继续前进。

从历史事实看，这一阶段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在于政治方面，即人心所向这一决定性的因素。自从李自成执行“行仁义，收人心”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争取群众、瓦解敌军的正确措施以来，群众不仅“见贼而喜”，还主动为大顺军进行宣传，以致“民皆附贼而不附兵”。连明王朝的官吏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如郧阳巡抚李乾德给朱由检的奏本中说：

> “连年大旱、百姓逃亡，十存四五，仅留皮骨，而官府以粮饷紧急，尽力追呼，将领以虎狼爪牙，无端掳掠，小民痛恨深入骨髓，汹汹思逞已非一日。贼固明于此也。因其所恶，与之以好，假为不杀掳，不催科……故所到之处，望风迎顺。”[76]

广大明军士兵，也心向大顺政权，不肯与大顺军作战，并散布失败情绪，或者不战而走，或者哗变投降。如大顺军攻宣府时，“巡抚朱之冯悬赏守城，无一应者”[77]；大顺军攻北京城时，明军守城者不用命，鞭打都无济于事，等等。正是在这种内部士不用命，外有大顺军强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大量明军官将为了个人出路，也相继停止抵抗，向大顺军投诚。如攻西安时，副总兵王根子开东门迎；攻宁夏、总兵官抚民开门降；攻固原，总兵白广恩降；攻汉中，守将贺珍降；攻太原，守将张雄为内应等等。总之，从大顺军攻破潼关到占领北京，除榆林、宁武二城是经过激烈战斗才占领外，其余各城，包括明军重镇宣府、大同、居庸等，都是不战而下。所以说李自成在这一阶段中能够在军事上飞跃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人心所向。

大批明官吏、军将的投诚，从军事上来看，对大顺军获得军

事胜利，起了极为有利的作用。但从政治上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也是促使农民战争走向自己的反面，由反封建转向封建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　决战山海关，退出北京城

——李自成战略退却阶段（顺治元年—二年）——

一、李自成进京后的形势发展

北京明政府被推翻之后，全国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江南明军拥福王朱由崧为帝，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政权，宣布“君父之仇，志在必报”，准备“悉简精兵，直指秦关”，决心与大顺军对抗到底；辽东清政权的统治者们，也已决定乘机入据中原，并认识到“我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78〕，正集中兵力，积极做进关与大顺军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准备；此时张献忠率大西军正在四川顺利发展，扩大其统治区；吴三桂率所部已越过山海关，正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李自成进北京后，住入宫内，各营将帅则分据各勋戚府第，数万军队也全部集中于城区，居于民宅。在军事、政治上，李自成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1．派居庸关投诚的明将唐通率所部八千人及左懋泰部去山海关接代明总兵高第守山海关。2．动员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写信与吴三桂劝降，同时命唐通携带大量金银慰问吴三桂，并封其为侯。3．派郭开、白邦政等各率两千人南下山东、淮北，协助、掩护所派地方官吏到该区接收政权。4．派人持书信去江南招降左良玉、刘清泽等南明军。5．成立“比饷镇抚司”，由刘宗敏和李过主持，将旧明勋戚文武大臣集中拘押于各营，按家产、罪行，由各营将帅严刑追赃。6．封官、制礼，扩大中央政权机构，开科取士，招揽人才。

二、山海关之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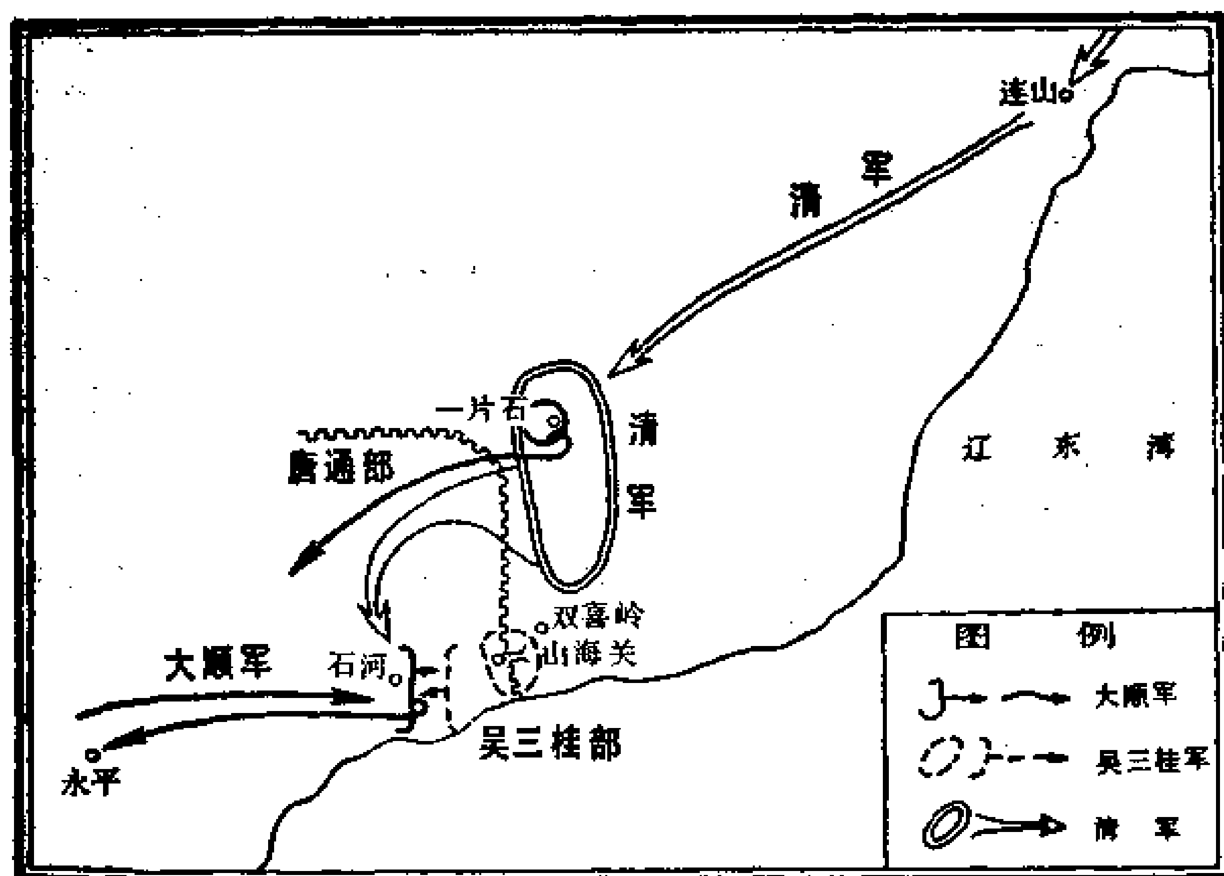
吴三桂率部援京，进入山海关后，得知大顺军已攻占北京，遂

停止不前，将部队集中于永平（河北卢龙）地区。在当时形势下，江北各地已归顺李自成，江南方面消息不通，吴三桂处于孤立地位，只有两条出路，不投李自成就投清政权，独立存在，势不可能。降清固然容易，皇太极曾数次写信劝降，并通过其私人关系，命明降将张存仁、祖可法、裴国珍、以及吴三桂之兄吴三凤和舅父祖大寿等写信劝降；但吴三桂认为降清并非最好出路，均“答书不从”。所以在接到放弃宁远的命令后，将当地民众及官兵家属五十万人全部迁徙关内。正当吴三桂孤处永平，进退失据之时，唐通持李自成封其为侯的诏书及犒军的金银等物到来，吴三桂遂决心归顺大顺政权。〔79〕山海关总兵高第也同时投诚，唐通接防了三海关。四月初，吴三桂得知李自成在京大肆“追赃”，严刑拷打勋戚大臣，又误闻吴襄也受刑将死，全家受辱，遂降而复叛，立即率军东退，击走唐通，占领山海关，并写信给清统治集团，要求他们出兵，联合进攻北京大顺军。

以多尔衮为首的清统治集团，于三月六日得知吴三桂放弃宁远，判断大顺军已迫近北京，立即决定“修整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80〕。四月四日拟定了南取中原的战略方针，四月七日誓师太庙，以多尔衮为统帅，率满、蒙八旗主力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沈志祥等汉军共十余万人，于九日离沈阳南下，预计仍由喜峰口、墙子岭一带入边直趋北京。十五日进至翁后（今辽宁阜新附近），遇到吴三桂请兵的信使。多尔衮闻讯大喜，次日即复信吴三桂，答应他的要求，并以“必封以故土，晋爵以藩王”〔81〕为诱饵，要求吴三桂投诚。山海关依山傍水，形势险要，扼关外、内地之孔道，是京畿东北方面的主要屏障，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过去清军曾多次企图“打开山海，通我后路”〔82〕，都未成功。也正由于山海关控制在明军手中，所以清军六次入边，都不能在中原立足。现在吴三桂主动请兵，多尔衮等当然不必再按原计划路线前进，决定先占领山海关这个战略要点。

李自成于四月十一日得知吴三桂叛变，本拟派刘宗敏、李过率军收复山海关，但当时“二将耽乐已深，无斗志”，不得已“乃下令亲征”〔83〕。并携带吴襄，准备招降。四月十三日，李自成率精兵六万由北京出发。十七日到达永平。经休整及了解情况后，派唐通、白广恩率所部迂回至关外一片石（在山海关北约三十里）〔84〕，切断山海关与辽西走廊的通道。二十一日，大顺军进至山海关西的石河地区（距关城约十里，今燕塞湖一带），与吴三桂军激战半日，吴军退还山海关城。当大顺军迫近山海关时，吴三桂曾再次派人敦促清军速进。多尔衮在连山（今辽宁锦西）接到吴三桂的促兵信，遂兼程前进，一日夜急行二百余里，于二十一日到达一片石，击退唐通、白广恩部后，进至距山海关二里的欢喜岭地区。吴三桂当夜出城与多尔衮会面，剃发投降。二十二日大顺军与吴三桂军再战于石河地区，激战至中午，吴军已

顺清山海关之战示意图　（31-6图）



渐感不支，清军骑兵乘东北大风之利，迂回至大顺军的左侧背，突然发起进攻。大顺军在清军与吴军的夹击下，溃退永平，二十三日再战于永平，大顺军又败，李自成遂率军退回北京。

三．退出北京后的作战概况

李自成于四月二十六日退回北京，开始企图固守北京城，曾下令拆毁城外关厢民房。后经考虑又认为："北兵势大，城中人心未定，我兵岂可久屯在此。即十北京不敌一秦中险固，为今之策，不若退处关西，以图固守。"[85]遂改变决心，放弃北京西退。当时以新败之余，如困守北京，则外有强敌进攻，内有反对势力，且不少陕西老兵"涕泣思归，无有斗志"，何况李自成自率主力出征，没有部署强大的第二梯队，若被困于北京，关中军队势难来援，极可能陷于孤军被围的困境。应当说，李自成放弃北京的决心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补即帝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撤离北京，向西南作战略转移。多尔衮命吴三桂与清军谭泰、黎玉田部合兵追击。大顺军于五月三日在定州（今河北定县）北、五日在真定（河北正定）北两次阻击，皆为吴军击败。李自成遂按预定的战略，部署山西防务，以确保关中。其部署是：命张天琳负责大同及晋北地区防务，以一部精兵固守固关，命陈永福负责太原及晋中地区的防务，[86]命刘伯忠负责长治及晋东南的防务；命刚由河南到来的大将袁宗弟，率右营大军驻屯平阳（山西临汾）地区为战略机动部队。[87]李自成于六月初返回西安。吴三桂追至固关时，人马已极疲困，大顺军防守又严，即回师北京。

当大顺军作战失利，退走晋陕时，山东、河北、河南等地旧明官员及地主豪绅，乘机叛乱，向各地大顺军地方部队发动突然袭击，捕杀大顺官员。如旧明宣府巡抚李鉴，五月五日袭杀大顺守将黄应选；明降将姜瓖，于五月十日袭杀大顺军大将张天琳，占领大同、宁武、代州等城降清；旧明御史卢世雄，袭杀大顺防御史阎杰；旧明兵部职方司主事凌駉，袭杀大顺防御史王皇极，等

等。南明政权的军队也乘机向豫南、荆襄一带进攻，南明参将丁启光，于五月十六日前后，连陷商丘、宁陵、考城、夏邑、拓县等县。开封、息县、光山、信阳、南阳、桐柏等诸县，也都叛离大顺政权。散留在河北、山东、豫南等各地的大顺军人员，都被迫西撤。在大顺军中央直辖部队中的明降军，也散去数万。这时大顺政权的统治区大为缩小，仅有陕西一省，三边的青、甘、宁一带和山西大部、以及豫西、川北、襄阳、荆州、承天、德安四府，其余均先后失守。

李自成返回西安后，为了巩固山西及豫西地区，接受教训，将控制区的大批旧明官绅押解至陕西安置，使其远离故土，无法在本乡兴风作浪。并"派征铜、布、翎毛"，"打造盔甲"，"日事招练"，[88]准备秋后反攻。

七月间，李自成至平阳部署军队，分两路沿黄河南北东进，企图收复河南及河北南部地区：北路为主力，越太行山向彰德（今河南安阳）；南路出潼关向洛阳。另外命太原、陕北方面的大顺军，一出固关，一向宣大，以牵制河北境内清军。至十月间，主攻方向颇有进展，洛阳以西和顺德（河北邢台）以南地区，不少县城为大顺军收复，并在怀庆地区柏香镇大败清军，杀清总兵金玉和。但山西方面太原为清军攻破；驻守河曲（今山西河曲南）、保德的唐通，叛变投清；由陕西向宣大出击的部队，亦在府谷一带受阻，退回绥德、延安。川北方面，绵州（今四川绵阳）为张献忠大西军攻破，守将马科退保汉中，整个形势对大顺军不利。

清统治集团知道夺取全国统治权的主要障阻是大顺军，认为"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破此，则大业成矣"[89]。因而暂置南明于不顾，集中兵力先攻李自成。十月下旬，清军分两路向大顺军发起全面进攻：英亲王阿济格率吴三桂、尚可喜等，由大同迂回塞外，进攻榆林、延安，并命山西清军分一部率唐通部由保德渡河入陕，牵制大顺军、豫亲王多铎率孔有德、耿仲明等

由河南怀庆进攻潼关，企图南北夹击，将大顺军歼灭于西安地区。

南路清军连败大顺军，尽占豫西，迫近潼关。李自成速率主力来援。大顺永昌二年（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正月初，大顺军连续三天出击，均为清军击退。初九日，清军在红衣大炮火力掩护下，开始攻潼关城。经三日夜激战，清军于十二日突破关城，大顺军组织万骑实施反冲击，亦未能阻止住敌人的攻势，遂退回西安。此时大顺军宁夏守将陈之龙降清，北路清军已渡河入塞包围了延安。西安处于腹背受敌境地。李自成判断西安已不能守，遂决心放弃关中，向豫南荆襄地区转移。

正月十三日大顺军撤离西安，经蓝田、出武关，于二月间到达内乡。但多铎部清军已先期到达河南，南阳各地皆为清军所有。李自成不得已率军去襄阳。在清军追击下，三月间又放弃襄阳沿汉水南下武昌。四月下旬，再放弃武昌沿长江向九江东进。此时，高一功、李达部虽已由延安地区撤至汉中一带，但未能与李自成所率主力会合。清军阿济格部又紧追不舍，李自成部沿途在邓州、德安、武昌等地八次阻击，皆未成功，大将刘宗敏、军师宋献策均先后在战斗中被俘而死。有些部将，如李好、刘忠等投降了清军。牛金星、宋企郊等也乘机逃走，形势对李自成更为不利。李自成在前有南明军阻拦，后有清军追击的情况下，决心摆脱敌人，保存实力，让清军与南明军直接接触，遂在武昌、九江之间突然弃舟登岸，经保安、金牛（均在今湖北黄石西）南下。五月四日进至通山九宫山，李自成率二十余亲兵视察地形时，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程九伯的乡团袭击，不幸牺牲。[90]余部三十几万，在高一功、李过、郝摇旗等率领部下，后与南明抗清军何腾蛟等部联合，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措施失当，造成山海关决战失败

山海关战役，是李自成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退却的一个转折

点，是大顺军与清军的初次交锋，但也是大顺军与清军带有战略决战性质的一次战役，对我国历史的进程，影响很大。曾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扫中原明军，推翻了明王朝近三百年统治的李自成大顺军，为什么会在这次战役中惨遭失败，并从此一蹶不振呢？各方面的因素当然很多，但如仅从军事角度就战役本身而言，则是大顺军在兵力对比上处于劣势，并失去了战争的主动权。

辽东总兵吴三桂，率四万人守宁远，经常与清军作战，是北方明军中较有战斗力的一支主力部队。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阿巴泰率清军入边，连破十八城深入至山东境，当其北归出边时，明将多不敢战，吴三桂率兵入关阻击，曾获得一些小的战斗胜利。崇祯十六年，济尔哈朗率清军进攻宁远，也为吴三桂击退，所以号称“关宁铁骑”。山海关之役时，吴三桂除本部人马外，山海关总兵高弟的一万多人也归他指挥，总兵力约五万左右。李自成东征兵力，连同唐通等部，也不过八万左右，并不占绝对优势。何况吴军是以逸待劳，又有坚城为依托，而大顺军则是远程进击，又缺乏后续力量，所以三月二十一日，两军激战半日，李自成并未能将吴三桂击败。二十二日又激战半日，此时吴军虽已“几乎不支”[91]，但经过两日激战，大顺军当然也遭到相当损失。乘大顺军久战疲惫之际，多尔衮率十几万已经休整一日夜的精锐骑兵，迂回到大顺军左侧背，与吴三桂军合力夹击，不论是兵力对比还是士气对比，双方都相差悬殊，以致大顺军伤亡数万，损失大将十五人，被迫撤退。

就战役本身而言，其原因固如上述，但如深究一步，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应当说是由于骄傲轻敌，情况判断错误和措施失当所致。

李自成刚到北京，立即派唐通等率军进驻山海关并招降吴三桂、高弟，这说明他对山海关的战略地位和吴三桂军可能起的作用，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但由于在整个战略进攻阶段，军事发展特别顺利，除榆林、宁武两地明军据城顽抗外，其余各地明军大

部望风而降，因而滋长了骄傲轻敌思想，误认为大局已定，其他明将也必然传檄可定，不仅没有考虑吴三桂敢于对抗，清军会来进攻，更没有考虑清军会与吴三桂联合起来。所以事先只有以和平手段而没有以战争手段解决吴三桂与山海关问题的准备，更没有对抗清吴联军的准备。在军事布置上也缺乏有效的预防性措施，仅派明降将唐通率所部八千人去山海关接防，这就无法保证在情况发生变化时能稳定山海关方面的局势。假如能派一得力大将，率一部主力同唐通部进驻山海关这个战略要点，则吴三桂叛变的可能性就会相对小些；即使吴三桂敢于叛变，在大顺军占有山海关的形势下，也有可能在他与清军会合前将其消灭。但李自成没有这样做，甚至当发觉吴三桂降而复叛时，也没有认真地研究情况，对其与清军联合的可能性丝毫未予考虑，还认为吴三桂军“可靴尖踢倒耳！且三桂与北兵久相仇杀，必不相救。即或来救，北兵驻满洲，衣粮马匹器械，尚需整顿而来，旷日累月”[92]。因而向山海关进军时根本就没有与清军作战的准备。对李自成来说，山海关之战，是仓促出师，是一次没有准备的战略性战役，所以才陷于被动地位，遭到惨败。

如果再深入一步分析，不难看出，产生山海关战役的关键性事件，是吴三桂的降而复叛。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做的呢？主要原因是李自成在对待地主阶级、特别是对待旧明官僚的政策上有些过激，策略上不够灵活。大顺政权实行“免征”和减赋的政策，政府和军队的费用，除了依靠屯田收入和接收明政权的仓库外，主要靠向官僚缙绅征收财物，进入北京之前，是区别对待的：对罪大恶极的分子，坚决镇压，没收财产；对一般地主官僚，则按其家产、收入和罪行程度，要求他们捐输一定数量的钱粮；对敢于抗捐的，才以暴力手段严刑追赃。这种政策是正义的，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必须的。但如掌握不好，也易于产生副作用。大顺军进入北京之后，一方面由于因胜而骄，在执行政策上不谨慎了，一方面还由于根本未准备在北京建都，长期立足，因此，在

处理问题上也就无所顾忌了。不但没有正确地掌握政策、尽可能多地争取一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士的拥护，以稳定局势，对付清军的可能进攻，反而扩大打击面，过多地树立敌人，使已经投降的大批归顺官吏惊恐怕逃走。当时人就曾说：

“先日秦晋士民惟愿寇来归欵，今遭窘辱，又望兵临，愿作内应，希得复仇雪耻”。[93]

吴三桂投向大顺政权，主要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官僚地位与财产，甚至还希望利用手中的四、五万军队在新的政权中爬得更高一些。当他突然发现大顺政权的政策对自己极为不利，连父亲、家属都成为阶下之囚时，遂产生一百八十度的变化，降而复叛，投向早就以官爵地位向其诱降的清政权，从而导致了这次根本不在李自成作战计划之内的山海关之战。

第六　对李自成战略的几点看法

战略是对战争总体进行的筹划和指导，它既有空间上的整体性，又有时间上的长远性；战术（包括战役法）则是对战役、战斗的安排和实施，在空间上带有局部性，在时间上带有短暂性。战略居于主导、统帅地位，战术则居于辅助、从属地位。战争的胜败，主要并首先决定于战略是否正确。如果在战略上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即使战术上是比较正确的，甚至在战役、战斗上得到一些胜利，最终仍难免使战争归于失败。

李自成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农民领袖之一，他既有坚强的战斗意志，又有卓越的指挥艺术，曾领导百万大军，打过许多有声有色的漂亮胜仗，并以破竹之势歼灭过大量的明军，推翻了明王朝近三百年的封建统治。但是，与清军在山海关一战之后，即从此形势逆转，一蹶不振，走向失败，致使几乎已经到手的全国统治权，为清统治者夺去。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当然有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因系，但如仅就战略角度而言，则由

于李自成在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上存在有重要的缺点和错误。

从崇祯三年李自成二十五岁起义革命到崇祯十三年期间，他虽然逐渐成长为一支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并在农民战争实践中逐渐成熟，指挥过不少出色的战斗；但他毕竟不过是众多农民军领袖中的一个，而且时起时伏，有过胜利也有过失败，基本上处于争取生存的阶段。他所进行的流动作战，也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自发性，还没有、也不可能产生驾驭战争全局的战略。崇祯十三年冬进入河南时，形势发生变化，李自成开始有了自己的战略方针，在军事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在战略上由被动地位逐渐转变为主动。崇祯十六年初，在襄阳建立政权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已发展为农民起义军中的头号主力，并在湖广、河南占领了一大片统治区，推翻明王朝的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于是李自成制定了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略方针。尔后在军事上飞速发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攻占了明王朝的政治中心——北京。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虽然曾有过“退处关西，以图固守”的战略企图，但形势飞转直下，已不可能实现这一企图。以下就李自成在河南和襄阳的两个战略方针，分别提出几点看法：

一、河南方针符合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

李自成在河南定下了“行仁义，收人心”，“据河洛，取天下”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总的来说是正确的，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但从长远看，在其内容与实施上还存在着不全面、不彻底的缺点。

说“河南方针”是正确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转变战略的时机合适。腐朽没落的明王朝，在农民军和清军的连年打击下，到崇祯十三年时，已焦头烂额，[1]内外交困，加以内部矛盾重重，党争不已，虽然在表面上明军仍居于优势，暂时还掌握着战略上的主动权，但实际上已精疲力竭，濒于灭亡。连当时的地主阶级分子们也多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如郑廉就曾哀叹说：“是时，明室之亡久矣，外则防边，内则剿

寇，元饷无兵而将不用命。士大夫袖手高谈，各立门户。虽贤者不免，不知圣人之处此尚有何计转移耶！”[94]李自成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明确地定下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决心，并根据这个政治目的制出相应的战略方针，使自己的军事行动有计划、有步骤地向着推翻明王朝封建统治的目标前进，应当说是正确的、及时的。同时也说明，与同时代的其他农民军领袖相比，李自成要更高明一些。

第二，在河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决策正确。据河洛的“据”，实际就是放弃那种带有流寇主义成分的无后方作战方式，创造条件建立地方政权，实行武装割据，为进一步发展农民战争打基础。“据河洛”，就是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建立临时革命根据地。李自成从商洛山中突出武关时，人数不多，当时首先的、主要的任务是如何发展壮大自己，并在一个地区站稳脚跟。河南是当时阶级矛盾最为激化的地区之一，土地高度集中，人民负担极重，又值特大灾荒，人民无法生活，万余至数万一支的起义农民，遍于黄河两岸，这对李自成军的发展壮大，极为有利。当时明军主力被张献忠牵制在四川境内，河南防务空虚，可以趁机在短期内攻下大批县城，拔除了这些“钉子”，对李自成军立足河南和与明军周旋，也极为有利。河南地处中原腹心，战略地位重要，便于向外发展。如明王朝就意识到李自成“原欲盘汴洛，北渡黄河而窥赵魏，东走萧砀而掠淮阳，西阨阌灵而谋函谷，南渡宛汝而瞰湘汉。”[95]

第三，加强政治工作，使其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的措施正确。战争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96]。战争的胜败，不仅仅取决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还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对比和民心的向背。农民起义军和它所进行的战争，是反抗地主阶级压迫和封建剥削的，从理论上说，当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与愿望，是正义的战争，应当得到人民的拥护与支持。但这还只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在

实际战争中能不能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能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还要看这支军队实行的政策是什么，对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持什么态度。李自成针对当时当地人民的现实情况，开展了一系列争取人心的政治工作，不仅争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对兵源、给养、兵器的供应，对军队士气和战斗力等，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争取了大量明军士兵和一些军官的同情和响往，达到了瓦解敌军的目的。李自成这一战略的正确性，是得到了战争实践的证明的。

李自成战略的"河南方针"主导方面是正确的。但从长远看，在其内容与实施上还存在着不彻底和不全面的缺点，主要是根据地的建设不巩固。李自成进入河南以后，在主观上虽然对根据地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并在能够立足的情况下开始设官分守，建立地方政权，但所建的政权，并没有在当地群众中扎根开花，没有使自己的统治区成为真正的革命堡垒，仅仅形成军事控制区，极不巩固。原因有二：

第一，没有认真培养自己的政权骨干。派至地方的官员，除少数是参加起义多年的农民军人员外，大多数是刚刚投诚过来的旧明官吏和举人、秀才等，没有经过必要的政治教育，就让他们去掌握政权。他们是为了谋求个人出路才投向李自成的，其中多数既无实际从政的经验与能力，又未经过革命战争的考验与锻炼，而且也不了解、不愿意认真执行农民军的政策。这种矛盾，在军事迅速发展、战争节节胜利的时期还不明显，甚至在分化敌人方面还能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当革命走入低潮、军事形势逆转、战争走向失败的时候，就急剧暴露，许多官员不是叛变就是被地主杀害，以致所建各地政权迅速崩溃，起不到根据地的作用。

第二，没有将统治区内的反动武装彻底清除。例如李自成开始向关中进军的时候，他所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荆襄、河南地区中，还有相当数量的乡团，占据山寨土围，未被肃清，如洛阳

的李际遇，汝宁沈万登，南阳刘洪起和蕲黄四十八寨等。有的表面归顺李自成，向大顺军输送粮食，但暗与明军勾结，大顺军的统治力量稍一薄弱，就乘机叛乱。当大顺军由北京退至陕西，大顺政权的统治区已丧失过半的时候，李自成虽然接受教训，采取了防范措施，将剩余统治区内的一些旧明官僚豪绅迁至陕西，企图控制局势，可惜为时已晚，实际作用不大。

二、襄阳方针缺乏驾取战争的全局观点

李自成在襄阳制定了“先取关中，再向京师”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如果仅作为推翻明王朝的战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应当肯定，实践对此已作出了证明；但如果作为夺取全国统治权——即“取天下”的战略方针，则在内容与实施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应当否定，实践对此也作出了证明。

作为推翻明王朝的战略，之所以说它正确，主要有以下三点：1．孙传庭是北方明军仅存的两个主力集团中的一个，消灭了孙传庭集团，对北京的战争来说，具有决定义意；而且因此可以“无后顾，长驱而东”[97]，避免两面作战的危险。2．关中是明政权的西北重镇，据有关中，当时西方已无威胁，向东可以控制中原，与河南荆襄连成一片，据此北入京，南取川，从战略形势上看，是可以成为推翻明王朝的根据地的，且三边各地还分散屯戍有相当数量的明军，占领了关中，还可收编三边明军，扩大自己的军队，以加强军事实力。3．占领西安后，不待明军调整好布署，不使其有时间重新组织北京的防御或逃往江南，迅速挥师北上，取道宣大，迂回北京，符合“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98]的用兵原则，从而达到了消灭北京明王朝的战略目的。

李自成的政治目的是“取天下”，推翻了北京的明王朝，并不等于取得了全国统治权，这是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决定的。战略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根据李自成的政治目的来检验他的战略，则不难发现这是一个不正确的、失败的战略。从制订到实施，

都存在着错误和缺点，最根本的是缺乏驾驭战争的全局观点。什么是战争的全局？毛泽东同志认为："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并指出："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99]李自成的襄阳方针，考虑军事本身多、考虑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等其他方面少；就是在军事本身，也只是照顾到如何推翻已经腐朽了的北京明王朝，而没有照顾到辽东方面刚刚兴起的对手清政权，更少照顾到江南方面的两种政治、军事力量——张献忠的大西军和残留的明军。在战争过程上，只照顾到占领北京前各阶段怎么办，而没有照顾到占领北京、消灭掉明王朝中央政权后办什么，怎么办。这样的战略，是不能保证取天下的政治目的得以实现的。缺乏全局观点的突出表现，是昧于形势，无视清军的存在。

李自成进入河南就定下了"取天下"的方针，既然要取天下，就应该、而且必须注意天下的形势及其发展。首先，清政权的存在李自成应该知道：早在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就建立了后金政权，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改称大清，连年与明军作战，这是举国上下皆知的大事；正由于连年与清军作战，才有了辽饷，并且一再增加，使人民无法负担被迫起义；还由于军饷不足，才造成援辽明军不断发生兵变，加入起义队伍；就连裁减驿卒也是为了将裁驿之银转用为与清军作战的明军军饷。这些事都与李自成息息相关，何况崇祯十五年前，中原农民军的每次大的起伏，差不多都和清军的攻势和明军的调动有关，甚至清军还给李自成写过信；怎么能如此忽视清政权的存在呢？！其次，清军战斗力较明军为强，李自成也应该知道：辽东战场，明军节节败退，整个辽东地区除宁远外，全部为清军攻占；在中原战场与农民军作战曾经占过上风的一些明军大将，死于对清作战，甚至投降清军，这也是尽人皆知的大事；何况清军

五次进入中原，如入无人之境，深入到河北、山东，甚至曾到达淮河，作为一个准备“取天下”的农民军统帅，李自成不应当不知道。再次，清军也有入据中原的战略企图，灭明之前它是大顺军客观上的盟军、灭明之后它将立即变为大顺军的主要敌人，这一点李自成也应当了解。顺治元年正月二十七日清给李自成的信件中，多尔衮已明确提出要与李自成“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李自成怎么能不清楚清军的政治目的呢？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李自成及其决策人物们仍然昧于当时的全国形势，没有照顾到清军这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以致造成战略上的失策，这是李自成在与清军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中终于失败的军事上的根本原因之一。至于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只不过是执行这个缺乏全局观点的战略的结果。其实早在李自成进军北京的胜利中，就已经孕育着失败的因素了。

明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的失败，明军作战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处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之中，“寇急则调边兵以征寇，东夷急又辍剿寇之兵将以防东夷。卒之两患益炽，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100〕李自成如果注意到清政权的存在，注意到清军的战斗力较强，注意到清政权也要入据中原夺取天下，那么他就必然会预见到消灭北京明王朝后，一定要和清军发生战争，也一定会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一次慎重的衡量，估计一下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力量连续进行两次决战，即在消灭了北方明军之后，在扫清江南明军和处理好张献忠大西军关系的同时，击败并消灭清军。事实上李自成的军事实力还远不足以完成这个战略任务。假如李自成能正确的判断出这一点，他就不一定匆匆忙忙地进军北京，取明军腹背受敌的地位而代之，与锐气方盛的清军过早地直接对抗，将自己置于北与清军作战、南与江南明军作战的内线，何况自己西北根据地的南方还存在着一个尚未处理好关系的张献忠大西军。因比他当时应暂缓北上，利用明、清的矛盾，让明、清两军继续苦斗下去，而自己则下力气巩固和扩大现有统治区，发展

经济，加强军事实力，尔后再创造条件，选择有利时机北上夺取北京，与清军决战，那样也许有可能改变战争的结局和历史的进程。

退一步说，即使为了取得号召天下的有利地位，有必要迅速占领北京时，也应该在进军北京之前就制订出下一战略阶段，即占领北京之后如何巩固和如何抗击清军的方针和计划来。但从李自成进入北京前后的史实来看，他始终也没有这样一个指导战争全局的方针与计划。

有这样一种看法，如果李自成在北京时处理好与吴三桂的关系，他就不会降而复叛；他如果不叛降清军，也就不会发生山海关之战；没有山海关之战的失败，照样可以接替明王朝的政权统治全国。从战役本身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如从战略方面看，就并非如此。固然，不发生山海关之战就不会有山海关的失败，但没有山海关的失败，并不等于能安安稳稳地接代明王朝的政权而统治全国。根本原因是还有一个清政权的存在。

进军关内、入据中原是清政权的既定方针。李自成占领北京后，双方的战争不可避免。清军很早就有了入据中原的企图与计划，特别在崇祯十五年松锦战役中消灭北方明军主力十万人之后，认为“一统之业，朝夕可定”〔101〕，更积极筹划与准备南进。吴三桂未降清前，进军北京的军事行动就已开始，如果吴三桂不降清，清军也必然要按预定计划由山海关以西进入长城，进攻北京。从李自成在京的兵力、士气、战斗力和军事部署以及他毫无与清军作战的思想准备等情况来看，他能否战胜清军，大成疑问。双方战争一旦开始，就决不是短期内可以结束的，李自成在得不到江南粮饷供应，所占地区又养不起过多军队和支持不了长期战争的情况下，如何取得统一全国战争的胜利呢？何况还有南明政权和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存在。

清统治集团不同于明统治集团，清军也不同于明军，战争的对手不同，战争的进程与结局也会不同。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很

多，仅就李自成与清统治者双方的战略指导进行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差别来。如前所述，李自成在制定战略时，缺乏全局观点，始终无视清政权的存在。而清统治集团在决定战略时，却始终注视着农民军。崇祯六年，农民军还在到处流动，处于反围剿、图生存的阶段时，清贝勒豪格就主张招收农民军，利用他们的力量打击明王朝；[102]崇祯十五年，锦松战役后，李自成在河南迅速发展，正处于战略转变的阶段时，皇太极又想与农民军取得联系，结为盟友，共同打击明王朝；[103]崇祯十七年初，正当大顺军长驱北上，处于战略进攻阶段时，多尔衮又写信给李自成，以平分天下为诱饵，要求与李自成合作，共同消灭明王朝；当李自成占领了北京，沉浸于战争胜利的喜悦之中，忙于准备登基当皇帝的时候，多尔衮却认为时机已成熟，乘李自成立足未稳之际，集中全力，倾国而出，进击北京的李自成大顺军。

李自成占领关中，从军事上判断北京有可能攻下后，没有考虑其它方面和以后阶段，就立即部署北进，进攻北京，消灭了北京的明朝廷。松锦战役后，明军主力被歼，北京空虚，清军几次入边，都进出至北京城郊，从军事角度看，有攻占北京的可能。但皇太极却不同意当时就占领北京，他考虑的不仅仅是北京一地、一时情况，而是从长远出发，进行了全面考虑。皇太极说：

> “得之易，守之难，不若简兵练旅以待天命。”[104]“取燕京如伐大树，须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扑。”[105]

从上述几点可以清楚的看出李自成与清统治者在战略指导上的高低之分。

战争是发展变化着的，能否随着战争的发展变化，及时修改或补充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以适应新的情况，达到主客观基本一致，这也是影响战争进程与结局的重要因素。在这个问题上，李自成也不如清统治者灵活。

李自成在河南时制定了收人心的战略方针，对农民实行“不纳粮”或“三年不征”等政策，甚至以“从我可富贵”相号召；

对官僚豪绅则实行没收财产和追脏助饷等政策，这在该阶段完全正确，获得了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由于当时兵员不多，机构不大，又以流动作战为主，这种政策基本上也可以维持军队的供应。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有了广大统治区和百万大军，建立了正式的大顺政权后，仍然以过去的政策为主，不加以补充或修改，就必然难以适应新的情况。李自成之所以急急忙忙进占北京，委任军将严刑追赃和听任军纪废弛不管也与此不无关系。权将军刘宗敏就曾说过：

“军兴日费万金，若不强取，安从给办。”〔106〕

清军原本没有固定薪饷，士兵的武器装备、马匹等，全由自备；战争俘获归于个人，所以清军一贯的政策是掠夺，所到之处，抢掠一空。但当进军北京，准备夺取全国统治权时，却根据新的形势，围绕政治目的，制定了新的战略和策略，及时改变政策：从灭明转变成为明君复仇为号召，以起用一切旧明官员为手段，争取地主阶级与己合作，同时实行收人心的方针；从进入关内开始，清军实行薪饷制度，严禁士兵劫掠，并不许军队入城住宿，至甚还开仓济贫。多尔衮就曾说过：

“昔为敌国，今为一家，我兵进关，若动人一株草，一颗粒，定军法处死。”〔107〕

在战争中根据发展情况，正确地处理好敌友关系，也是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之一。清统治者一向以明军为自己的主要敌人，但他在与明军作战时，一方面想争取李自成为我所用，一方面已预料到李自成将是与自己争夺全国统治权的主要对手，作了思想准备。北京明王朝一覆灭，立即将过去曾多次企图争取过来的客观盟友李自成作为主要敌人；并与过去的主要敌人携手联合，共同打击李自成。甚至与南明政权也互通信使，进行谈判，以争取他们成为短暂的盟友。李自成在这方面也不如清统治者。他始终只考虑到明王朝这个敌人，北京明王朝灭亡后，主要矛盾改变了，他并没有相应地调整自己的政策，以减少旧明官吏、明军和

中小地主阶级的敌对情绪，更没有把清政权当作当时的主要敌人来对待，以致遭山海关的失败。退出北京、准备防守关中时，本应认真考虑一下敌、友问题，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以对付当前的主要敌人——清军，可是李自成仍对当时形势缺乏正确认识，不仅没有设法与张献忠联系、合作，以巩固自己的后方，反而出兵汉中，进攻川北，造成与张献忠的矛盾，导致战争，败回汉中。以上事实都说明李自成在战略指导上同样缺乏全局观点。

此外，李自成选择关中地区为根本战略基地，也是一个重要的缺点。首先，关中地区经济残破，物力、财力都不足以支持较长时间的战争，就连最根本的吃饭问题也难以解决，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无法养活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及其家属。西汉时期，由于汉武帝刘彻大力兴修水利和推广较进步的农具和技术，西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大为发展，名列全国先列，是我国当时最富饶的经济中心地区。但由于以后不断的战争破坏，至隋唐以后，随着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全国的经济中心逐渐移向东南，关中已变为经济落后地区。特别是由于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土地日渐贫瘠，气候太冷的矛盾也显示出来，“春当种而冻弗解，秋未收而霜已降”，“必须数亩之地，仅得一亩之入”〔108〕。因为生产水平低，关中地区的农民常常不能依靠农耕度日，多去当兵吃粮。明初驻军主要靠军屯自养，但仍有“债运粮料之例”〔109〕，及至明末，军屯、商屯均已败坏，关中明军，全靠外地转输粮饷。李自成百万大军的粮饷如何筹办呢？更何况这个地区的灾荒特别严重，从万历到崇祯的七十年中，雨雪霜雹成灾的约五十次，蝗灾十八次，瘟疫五次，水灾六十三次，旱灾三十二次，有二十五年大饥荒，人民“死于道路者不计其数”〔110〕。选择这样的地区作为战略基地，显然是极不合适的。占领关中后，不俟占稳脚跟就急忙进军北京，就可能与缺粮有关。

其次，关中的地理位置，从某些角度看已失去战略中心的重要价值。汉、唐时期，国内民族间的主要矛盾焦点在西北方，以

关中为战略基地，驻屯重兵，可以西控河西、西域；北控河套、漠南；东控巩洛及黄河中、下游，可以控制全国战略形势的发展。但至宋、元之后，由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国内民族间的矛盾焦点逐渐移向东北。明初永乐帝朱棣实行“天子守边”，迁都北京，就是为了适应这种民族发展的趋势。但当时经济中心已不是北京而是江南，所以明王朝一直不敢放弃南京，仍留下一整套中央政权机构，并大力重修会通河，以打通漕运，由江南向北京运输粮食。宋元以来再也没有哪个王朝建都西安，也与此有关。李自成只看到关中地势险要，没有看到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和形势的发展，选择关中为战略基地，当然是难以支持新的顺清战争的。

如果李自成对当时的战略形势有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制定并实施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看，是可能获得战争胜利，并掌握全国统治权的。当然，李自成的失败，已是历史事实，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作为战略研究，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探讨一下采取什么战略才有取得战争胜利的可能性，还是很有意义的。

李自成襄阳战略最主要的缺点和错误，一是忽视清政权的存在，因而违背了“先胜而后求战”的古老兵法原则，在没有作好与清军进行决战的准备时，就过早地进军北京，使自己处于直接与清军接触、而又两面受敌的被动地位。二是选择了一个财力、物力特别是连粮食都不足以支持与清军进行较长时间战争的根据地。假如李自成能清醒地认识清政权这个对手，和襄阳制定战略方针时，能吸取杨永裕和顾君恩建议的合理部分，先取关中，再据金陵，相机北上，建都北京，也许能避免上述缺点和错误。

攻占关中是必要的。当时北方明军唯一可以用作战略机动而又有一定战斗力的主力，就是陕西的孙传庭部。如果不消灭这个集团，襄阳河南的统治区，就时时处于威胁之下，主力不论东进、北进或南进，都有后顾之忧。特别是当孙传庭被朱由检逼出

潼关，遭到郏县之战的歼灭性打击之后，更必须乘胜追歼，决不能再容他有时间收集边兵整顿军队，重新组织防御。李自成的作战指导是完全正确的。但攻取关中后，不应以关中为根本战略基地，作长治久安的打算，应在收编三边明军后，留一大将，率一部军队镇守，把关洛连成一片，这样既可保障自己的左翼安全，避免后顾之忧，又对京师造成威胁，可作为将来进攻北京的一个暂时性根据地和出发地区。当时明军在北方只剩下吴三桂一支主力部队，既要防御清军，又要守卫北京，是无力组织大的战役进行战略性反攻的。那时如果李自成亲率主力或派出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沿汉水、长江直取金陵，逐步把根本战略基地转移到长江下游来，并不是不可能的。可以分析一下长江中、下游的明军情况。明王朝用以防守长江、阻止大顺或大西军东进的明军主力，只有在武昌的左良玉部不足十万人；至于驻屯九江的新设“江督”袁继咸，只是个光杆总督，“从门人吴允复贷四千金，招致官兵数十名”上任的，到任后实际统领的人马仅三千五百人。左良玉部在朱仙镇被李自成歼灭后，“招纳亡命，收集溃军，得数万人”，对李自成的大顺军极为害怕，所以崇祯十五年十二月李自成攻襄阳时，左良玉不战而退武昌。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占领汉阳准备攻武昌时，左良玉又不战而逃九江。甚至当李自成已经失败，由陕西撤至湖北时，左良玉仍然不敢交战。何况崇祯十七年正、二月间，左良玉的部队大部在湖南境内正与张献忠的大西军作战，李自成如东下、左良玉腹背受敌，决不可能阻止大顺军东进。

占领金陵后，可开辟江南地区为根据地。这里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是我国“财富之区，天下仰给”，仅以粮食一项来说，除自给外，每年还可调北京三百二十多万石。如果把陕西、河南统治区与长江流域连成一片，陕豫兵源充足，江南物力、财力雄厚，就有了建军、扩军和进行长期战争的物质基础。然后把握住有利战机，挥师北上，在消灭明军的同时，就照顾好下一阶段的

对清战争，就可以“立足于不败之地”。

注　释

〔1〕《明史·王德完传》

〔2〕《万历会计录》卷一（转引自袁庭栋：《张献忠传论》）

〔3〕《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十三

〔4〕刘同升：《限田均田议》，载《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

〔5〕《明万历实录》卷三四〇

〔6〕《豫变纪略》

〔7〕《明史·李沂传》

〔8〕《皇明经世文篇》四

〔9〕《明季北略》

〔10〕《国榷》卷八十九

〔11〕《石匮书后集》卷十六

〔12〕《明史·王宗沐传》

〔13〕《松窗梦语》

〔14〕《明季北略》卷五

〔15〕《卢忠肃公奏议》卷八

〔16〕《明史·庄烈帝本纪》

〔17〕《明季北略·卷五》

〔18〕《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

〔19〕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20〕《崇祯长编》卷四十二

〔21〕《绥寇纪略》卷一

〔22〕《平寇志》卷一

〔2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

〔24〕《客填述》及《明代档案》

〔25〕《流寇志》卷三

〔26〕《明季北略》卷十七

〔27〕《怀陵流寇始终录》

〔28〕《怀陵流寇始终录》

〔29〕《明季北略》卷十三

〔3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十三

〔31〕《明史·左懋第传》

〔32〕查继佐《罪惟录·李自成传》：“……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丁耀

亢，《出劫纪略·保存残业示后人存纪》："闯官莅任……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远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户，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业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亡无恒产。……于是有接子庄之占，草桥庄之占，石桥后疃乔沟之占……"又明清档案中顺治二年《史书》也载有山东武举历宁"避闯南下，所有田产……悉为……小民瓜占"等事。

〔33〕说法不一，有"不纳粮"、"止征一年"、"三年免征"等说法。但实际上并非全部不纳粮，更不是永远不纳粮。见王兴亚：《李自成赋税政策研究》，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34〕《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八《李自成之乱》

〔35〕《绥寇纪略》卷八

〔36〕《平寇志》卷六

〔37〕《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

〔38〕《明季北略》卷二十

〔39〕《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40〕《石匮书后集》卷十六

〔41〕《国榷》卷九十九

〔42〕《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

〔43〕《石匮书后集》卷十四

〔44〕《平寇志》卷六

〔45〕《明史·李自成传》

〔46〕《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张献忠之乱》

〔47〕《明清史料》甲编第九册

〔48〕顺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

〔49〕《守郧纪略》

〔50〕《石匮书后集》卷六十三

〔51〕从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五月说。

〔52〕《流寇志》卷六

〔53〕《怀陵流寇始终录》

〔54〕李自成在建立襄阳政权前，他的主力部队五营十三卫将帅中，只有一个参加李自成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李岩，其余全是农民军老战士。说明李自成是充分认识到武装力量的重要性的。

〔55〕《孙子兵法·虚实篇》

〔56〕《国榷》卷九十八

〔57〕《荆驼逸史·明亡述略》

〔58〕《怀陵流寇始终录》

〔59〕《孙子兵法·计篇》

〔60〕《孙子兵法·军争篇》

〔61〕《孙子兵法·计篇》

〔62〕《孙子兵法·虚实篇》

〔63〕《平寇志》卷八、《明季北略》卷二十

〔64〕柳义南：《李自成纪年附考》

〔65〕《绥寇纪略》卷九

〔66〕《罪惟录》卷三十一；《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载《明巡视陕西茶马御史徐一论题本》

〔67〕〔68〕《流寇志》卷八

〔69〕《明季北略》卷十九

〔70〕《豫变纪略》卷七

〔71〕《平寇志》卷八，《绥寇纪略·补遗》

〔72〕《明清史料》丙集

〔73〕《平寇志》卷八

〔74〕《天问阁集》中

〔75〕《小腆纪年附考》卷三

〔76〕《清代档案丛编》第六辑；崇祯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李乾德题本。

〔77〕《平寇志》卷八

〔78〕《清世祖实录》卷四

〔79〕《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等

〔80〕《清世祖实录》卷三

〔81〕《清世祖实录》卷四

〔82〕《清代内阁档案·天聪四年正月上谕》

〔83〕《甲申传信录·李闯始末》

〔84〕郑川水等：《一片石战场不在山海关西》，载《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三期。

〔85〕《明季北略》卷二十

〔86〕《明清史料》丙编第五本

〔87〕康熙二十一年《平阳县志》卷十三

〔88〕《垣曲县志》，顺治元年七月《通政使王公弼启本》及顺治元年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启本》。转引自顾诚：《关于李自成"流寇主义"的商榷》一文，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第二辑。

〔89〕《清世祖实录》卷五、《东华录·顺治二年》。

〔90〕康熙四年修《通山县志》；《烈皇小识·何腾蛟》；《逆闯伏诛疏》；费

密：《荒书》

〔91〕《庭闻录》卷一

〔92〕《吴三桂纪略》

〔93〕《甲申纪事》附录：《副总兵刘世昌塘报》

〔94〕《豫变纪略》卷三

〔95〕《枢垣初刻·襄阳再陷疏》

〔96〕毛泽东：《论持久战》

〔97〕《国榷》卷九十九

〔98〕《孙子兵法·地篇》

〔99〕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00〕《幸存录》上

〔101〕《清太宗实录》卷六十四

〔102〕《清太宗实录》卷十四

〔103〕《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

〔104〕《啸亭杂录》卷一

〔105〕《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二

〔106〕《平寇志》卷十

〔107〕《临榆县志》卷八

〔108〕《小腆纪年》卷一

〔109〕《甲申传信录》卷六

〔110〕《绥寇纪略》卷九

第三十二章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及与明争夺辽东的战争

第一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

一、女真族和努尔哈赤

女真族是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与中原地区的部落联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据文献记载，当时称肃（息）慎，曾向舜朝贡。[1]周武王灭商时，向周"贡楛矢石砮"等兵器。[2]周时中原的统治者们认为："肃慎、燕、亳，吾北土也。"[3]汉、晋时称挹娄，南北朝时称勿吉，隋时称靺鞨，唐时曾建立过渤海地方政权，五代时称女真。契丹族建立辽王朝时（公元947年），将女真分为两部：开原以北的称生女真，隶属于北枢密院；以南的称熟女真，隶属于南枢密院，这一部分很快即与契丹族融合。辽天祚帝时期，生女真完颜部开始兴起，在阿骨打领导下，统一了女真各部，逐渐强盛，于辽天庆四年（公元1114年）举兵反辽，次年建立了金王朝。经过十年的战争，灭掉了辽朝，遂即挥师南进，又于金太宗天会五年（公元1127年）灭北宋。后蒙古族兴起，于蒙古太宗六年（公元1234年）为蒙古所灭。元朝时，进入长城内的女真人已与汉族人融合，留在东北地区的分属于辽阳行中书省和奴儿干东征元帅府管辖。明王朝灭元后，按照分布的地区和经济发展程度，将女真族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归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管辖。

建州本是唐时渤海政权的一个州名，位于绥芬河流域，建州女真就居住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绥芬河流域。海西原是元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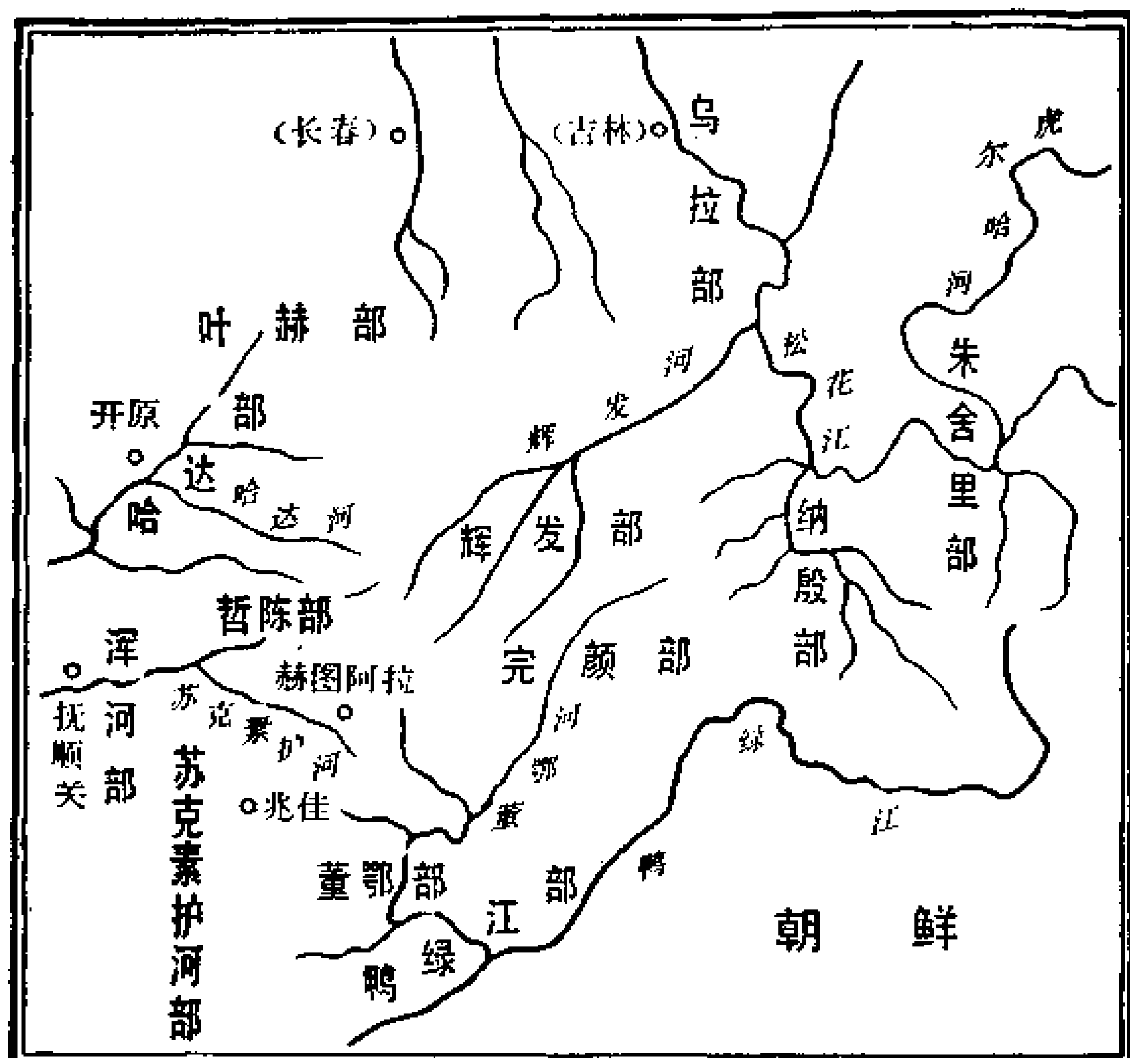
对松花江下游地区的称谓，海西女真就居住在今吉林扶余县北松花江两岸一带。“野人”一词带有贬义，是明王朝统治阶级对暂时处于发展低阶段少数民族的卑称，“野人”女真分布在广大的黑龙江两岸地区和库页岛等地。

明初女真三部之间，不断发生兼并与掠夺战争，特别是“野人”女真，时常侵袭海西、建州两部。海西和建州两部为了摆脱侵扰，寻求更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并加强与辽东经济发展先进地区的联系，遂逐渐南迁，向汉族聚居的辽东地区靠近。经过一百多年的辗转迁徙，至嘉靖以后，建州女真定居于浑河、苏克素护河地区，已发展为五部：苏克素护河部、浑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和哲陈部，此外，长白山三部：讷殷部、鸭绿江部和朱舍里部也是建州女真的分支。海西部定居于叶赫河、辉发河地区，已发展为四部：乌拉部、叶赫部、辉发部和哈达部，也称为扈伦四部。

在元朝时，建州女真共有五个万户府。其中斡朵里万户府万户〔4〕猛哥帖木儿，在元亡后归顺明王朝，朱棣（永乐帝）任命他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就是他的后裔（六代孙）。努尔哈赤在青少年时期，曾参加过生产劳动，到深山老林中采集人参、蘑菇以及药材等土特产品，去抚顺市场出售。据说还曾给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当过侍从亲兵。〔5〕所以他结识很多汉人，并接受了汉族文化，对明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以及当地的地理、地形等情况，非常了解和熟悉，这为他以后的发展和进行战争，准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建州女真各部中，以王杲势力最强，曾经“犯辽阳，劫孤山，略抚顺、汤站，前后杀指挥王国柱、陈其孚……等凡数十辈。”〔6〕并大举进攻辽、沈，公开反抗明王朝的统治，后被李成梁击败，杀于北京。王杲之子阿台，继续反明，不断攻扰浑河两岸地区。李成梁率明军围之于千古勒寨（辽宁新宾西北）。苏克素护部的尼堪外兰和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均率

明末建州、海西女真各部分布图　（32—1图）



部随明军作战。尼堪外兰骗"诱城内人出，不分男妇老幼尽屠之"，[7]觉昌安和塔克世因与阿台有亲戚关系先进城劝降，在混乱中也被明军误杀。明王朝即让努尔哈赤袭职为建州左卫指挥使。

二、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略及战争经过概要

努尔哈赤袭职时，女真"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8]。建州内部也是"攘夺货财，兄弟交嫉"[9]。广大女真人民迫切希望能结束这种分裂割据、互相仇杀的局面，实现统一，以便安定地生产和生活。

但明王朝统治者的一贯政策，则恰恰相反，力图制止女真族的统一，防其力量强大，无法统治，采用“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10]的分而治之的民族歧视政策。

努尔哈赤雄心勃勃，袭职之初，即“阴有并吞诸部之志”[11]，企图统一女真各部。但当时他不过是建州女真苏克素护部中的一支极小的力量，不仅执行分而治之的强大明军可能进行干涉；就是海西四部也远较他力量强大，不会坐视其发展壮大；何况建州各部也并不甘心归他领导。努尔哈赤面对上述形势，接受了王杲等过早与明军对抗终遭歼灭的教训，于是对明佯示服从，暗图利用矛盾，联大击小，逐步蚕食各部，最后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的。他的战略计划，大致可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先统一建州，建立可靠的战略根据地，以充实、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第二步再消灭海西等部，统一整个女真。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努尔哈赤特别强调、并始终掌握两个原则：一是在力量尚不足以与明军对抗之前，决不与明王朝直接冲突，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对明王朝佯示忠顺“并与辽东明将盟誓刻碑，表示“欲与大明国昭告天地以通和好”[12]以避免明军的武装干涉。一是政治争取与军事打击紧密结合，即采取所谓“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13]的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缩小敌对面和扩大己方的力量。

努尔哈赤的战略措施主要有二：一是随着力量的不断增加，逐步建立一支有一定编制、一定纪律和有坚强战斗力的武装部队。在此之前，女真各部还没有形成具有固定编制和纪律的正规军队，作战与狩猎一样，“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14]仍残留有浓厚的原始部落战争形态。各族党屯寨之间，既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也没有统一的约束手段，战斗编组也只不过是分为左、中、右三军。[15]这种状况，当然不能适应统一女真战争的需要。努尔哈赤首先将原来部落出猎时临时推选的牛录额真（十人之长）[16]改为基本战斗单位的军官；[17]后又规定每牛录为三百人。[18]不久，随着人员的增加和战争的需要，又按武

器装备和作战性能将军队区分为四个部队，即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19]和能射军[20]。此外还制定了作战纪律和赏罚制度，要求人人遵守，实行信赏必罚。终于建立了一支"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势如风发，凡遇战阵，一鼓而胜"[21]的军队。二是努力发展经济，保证后勤供应。努尔哈赤起兵之初，兵员很少，后勤供应还不太难。随着军事力量的增加和战争规模的扩大，后勤供应就成为一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重要问题。努尔哈赤对此极为重视，他认为没有粮食，军队就无法作战，而且士兵还会叛变逃亡；武器装备不足，军队也无法作战，就是敌人来攻时进行防御也很困难。[22]所以他一方面努力发展农业生产，通过"朝贡"及"马市"换回铁制农具及耕牛，利用流入汉人的先进耕作技术，提高生产力，并制定一些保护和促进生产的政策，如将生产不好的牛录额真的农奴拨归生产好的牛录额真等；一方面发展商业、贸易，开发统治区的土、特产品，如人参、貂皮……等与汉人互市，"借贡兴贩，显以规利，"[23]并开始建立采矿、冶炼等手工业及军工生产，如费阿拉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24]所造军械，质量甚好，"兵所带盔甲、面具、臂手、悉皆精铁，马亦如之。"[25]还相对地提高工匠的社会地位，如努尔哈赤认为金银、珍珠并不是宝，饥不能食，冷不能穿，只有贤人和"制造物品的工匠，才是真正之宝。"[26]虽然当时的工匠，在政治上基本上仍处于工奴地位，但由于努尔哈赤重视和享有较农奴为高的物质待遇，所以对建州女真的手工业生产，特别是对于军工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努尔哈赤于袭职为明王朝建州左卫指挥使的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五月，即以报祖、父之仇为名，率兵百人击败尼堪外兰，并占领图伦城（萨尔浒之东，界凡口之南），开始了他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当年又占领了萨尔浒城(今辽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附近)，很快统一了他所在的苏克素护河部。尔后又逐渐向外

部扩展。先选距离较近而力量又较弱的目标进攻，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灭萲鄂部，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击败浑河部，万历十五年和十六年（公元1587、1588年）又先后灭掉哲陈部和完颜部，统一了建州本部。在进行战争的同时，为了避免或缓和与当时较他远为强大的海西部的矛盾和冲突，他先后与叶赫部、乌拉部结亲，并与哈达、辉发订了婚约，以便能集中兵力，逐次，逐个地击破建州各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对努尔哈赤来说，“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27]经过五年多的战争，努尔哈赤以武力将相互争长的“各部环满州而居者，皆为剷平。”[28]这时，努尔哈赤的兵力，已由遗甲十三副、士兵百人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29]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之后，继续向长白山各部扩展。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又兼并了鸭绿江部。不久，日本发动了“假道朝鲜，西征中国”[30]的侵略战争，明王朝与朝鲜被迫联合进行自卫反击，辽东明军主力大部进入朝鲜，留守的明军无力对努尔哈赤进行军事遏制。同时，努尔哈赤曾分别向明王朝和朝鲜李氏王朝请求允许他领导所部参加反击日本的战争，两个王朝虽未允其所请，但均为他伪装忠诚的外表所蒙蔽，更加放松了对他的警惕。[31]努尔哈赤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积极进行征服长白山其他两部的战争准备。

建州的统一和努尔哈赤的强大，很快引起海西各部的不安。正当努尔哈赤积极备战时，海西叶赫部主纳林布禄联合了哈达、乌拉、辉发、蒙古科尔沁……等九部，组成三万联军，分兵三路向努尔哈赤发动进攻。努尔哈赤分析了敌情，判断：“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但伤其一、二头目，彼兵自走。我兵居少，拼力一战，可必胜。”[32]遂抢先占领古勒山（今辽宁新宾县上夹河乡胜利村），以立险扼要，以逸待劳，集中兵力，重点出击，求得歼敌一部，从而击破联军的战役指导，于万历二十

一年（公元1593年）九月间，取得了古勒山战役的重大胜利，[33]并乘势一举消灭了朱舍里和讷殷，统一了长白山各部。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力量，改变了建州与海西的力量对比，并开始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这次战役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进行的第一次带有决战性质的战役。

努尔哈赤乘古勒山大捷的有利形势，按其预定的战略计划和原则，开始实行第二步骤。一方面与海西北邻的蒙古科尔沁部通好，并先后娶其两贝勒之女为妻，以连姻手段孤立海西，一方面寻求机会以武力一个一个地消灭海西各部。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利用哈达和叶赫的矛盾和哈达正遭饥荒的机会，出军消灭了哈达部。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乘乌碣岩大败乌拉军之机，又消灭了乌拉部保护下的辉发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再灭掉乌拉部。海西四部中最强大的叶赫部，见其他三部相继为努尔哈赤所消灭，又不断遭到努尔哈赤军的进攻，遂采用依靠明军、结好蒙古的方针，抗击努尔哈赤的进攻。并向明万历帝上书说："哈达、辉发、乌拉已被征取，今复征取叶赫，将吾诸申（女真）部落完全征取后，即征取汝之明国。"[34]请求明王朝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努尔哈赤的进攻。这时明统治集团的看法不一：如明辽东巡抚张涛，认为努尔哈赤和叶赫部的战争，是因私怨相互仇杀，并非努尔哈赤有"犯顺之意"，主张不保护叶赫；而多数人已看到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已威胁了明王朝的安全这一事实，如蓟辽总督薛三才所奏：没有叶赫即难保开原，没有开原则难保辽东，努尔哈赤的势力日渐强大，如再任其扩展，则必然要进犯明王朝。明统治集团终于看清了形势，决定改变战略目标，由支持努尔哈赤、打击叶赫，转变为保护叶赫、遏制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在进攻叶赫时，仍按以往的原则，力求取得明王朝的谅解、支持或中立，出军以前，曾派第七子阿巴泰等求质于明王朝，但被明王朝拒绝。当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攻入叶赫乌苏城时，明军即派两游击将军率兵千

人协助叶赫防守叶赫城；今吉林伊通西南四十里；同时派使者通知努尔哈赤，不许他进攻叶赫，并指出如不停止进攻叶赫，就是有意侵犯明王朝。努尔哈赤判断自己暂时还无力与明军对抗，不得已只好暂缓对叶赫的进攻。

在进攻海西各部的同时，努尔哈赤还根据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原则，将军事进攻与联姻、赏赐、移民、封官等政治攻势结合起来，派军队到建州女真最初居住过的松花江下游及黑龙江流域，招抚或征服“野人”女真的东海部和黑龙江等部。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止，除了在明军直接保护下的叶赫部，以及边远地区部分“野人”女真尚未为努尔哈赤所统治外，“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语言俱征服。”〔35〕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掌握了对明佯示忠顺，避免与明军直接作战的原则。明军误杀其父、祖，他虽痛恨明军，但却仅以力弱而又懦怯的尼堪外兰为敌手，并接受明王朝的官职，还将侵扰明军防地、杀死明将的牧木河部首领克五十斩献明军，送还被他们掳去的汉人。因而明王朝升他为都督佥事。〔36〕他并为此去北京谢恩。此后又曾六次亲到北京朝贡，〔37〕既可以侦察、了解明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情况，又可以表示忠诚，麻痹明王朝对他的警惕。因而明王朝对他相当信任，先后晋升他为左都督和龙虎将军，从起兵至基本统一女真，没有受到明军的直接武力干涉。且被认为是“忠顺学好，看边效力”〔38〕的忠诚地方将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统治集团没有把努尔哈赤看作为潜在的重要敌人，而把海西的叶赫部作为心腹大患，多次以重兵进攻叶赫，予以严重打击。叶赫和努尔哈赤都有统一女真各部的条件、力量和企图，而且在开始时叶赫的实力远较努尔哈赤雄厚。但由于他的战略不够明智，过早地公开抗拒明军，致屡遭歼灭性打击，造成海西和明军双方实力都大为削弱，客观上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战争铺平了道路。这是努尔哈赤能够从小到大，以弱

胜强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他的战略策略运用的巧妙之处。

三、建立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使满族迅速地形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39]东北地区的经济也有所发展。努尔哈赤为了加强其统治，在新的形势下，一方面开始实行向封建化转变的政策，将一部分战争俘虏用为农奴；一方面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加强自己的权力。早在刚刚统一建州本部时，即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在费阿拉（辽宁新宾西南）“自中称王”，[40]即在自己本部内称王，但同时接受明王朝所授都督佥事官职，对外则仍以明建州左卫将领的身份出现。当其征服了长白山三部，完全统一建州之后，为扩大其统治机构，费阿拉规模太小，已不能担当建州政治、经济、军事中心的任务，乃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30年）将都城迁至距费阿拉南八里的赫图阿拉（辽宁新宾老城），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41]，但对明王朝仍称臣进贡，保持隶属关系不变，说是为朝廷看守边疆，[42]当其征服了海西（除叶赫外）、东海及黑龙江等部，基本上统一了东北女真，由小变大，由弱转强，军事实力已足以与明军对抗之时，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在赫图阿拉称汗登位，建立了后金政权，建元天命，成了与明王朝中央政权相抗衡的东北地方民族政权。

努尔哈赤为了尔后与明军作战，夺取辽东地区，积极进行了战备。除加强政权、法制外，主要是进一步完善军事制度，加强军队建设。随着军队的不断增多，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已将兵种分编的四个作战单位，改为合成编组按旗帜区分的四个作战单位。但当时仍以牛录为基本建制单位，还没有更大的建制单位。至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因“归附日众，乃析为八”，正式建立了八旗制度。规定五牛录为一甲喇，五甲喇为一固山，即一旗，计七千五百人。努尔哈赤为八旗的最高统帅，并另有巴牙喇（直属精锐亲兵、卫队）五千余骑。各旗旗主（固山额真）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也各有巴牙喇若干名。总计当

时兵力约七万人左右。这种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盖隶于旗者，皆可以为兵”[43]，出则为兵，入则为民，无事耕猎，有事征调的行政、军事、生产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东北地方政权，对于满族社会的发展，对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加强和巩固我国东北的边防，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所进行的、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是进步的战争。

第二　努尔哈赤与明军争夺辽东的战争

一、萨尔浒之战

(一) 努尔哈赤袭击抚顺，揭开与明战争的序幕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以后，并未停止其扩大统治区域的脚步，将其预定战略又发展了一步，积极进行夺取明辽东地区的战争准备。当时明王朝的情况，从表面上看，不论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都远较后金政权强大，似乎处于战略优势地位，但实际并非如此：经过援助朝鲜、反击日军的战争，明军在人力、物力上都损耗极大；辽东当地明军在不断进攻叶赫的战斗中，军力也有所削弱；何况更重要的是，由于明王朝政治的腐朽，府库空虚，党争不已，致使在辽东这一重要战略方向上的防务，愈来愈废弛。如军队饷银被各级官僚侵吞，军队缺粮少饷，装备陈旧，缺乏训练，士兵逃亡甚多，辽东边防军名额十余万，因逃亡及将帅吃缺自肥，实数不过四万多；而且这些战斗力不强、士气不振的军队，又分屯于北起开原、南至鸭绿江口以及辽河地区、辽西走廊等各边防和内部要点，形成兵力分散，处于易被各个击破的不利地位。

这时蒙古已形成三大部：漠西（厄鲁特）、漠北（喀尔喀）和漠南蒙古。漠南蒙古紧邻后金，其中察哈尔部最为强大，它与

明王朝的关系异常密切，企图借明王朝的支持统一漠南蒙古，明王朝也企图借察哈尔部遏制后金的扩展，所以察哈尔部不断出兵攻击与后金有联系的科尔沁部。至于朝鲜方面，因明王朝曾出军入朝援助其反击日本侵略军，所以李氏王朝对明王朝非常感激和亲近，尽管努尔哈赤曾多次拉拢朝鲜，但朝鲜不为所动，仍坚决从属于明王朝，对努尔哈赤持敌视态度。

面对上述情况，努尔哈赤在仍执行其原定战略方针的同时，采取了以下两项带有战略性的措施：一是继续加紧派军招抚或征服"野人"女真尚未归顺的各部，以彻底统一东北地区，并利用"野人"女真强大的人力资源，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一是利用察哈尔部与其他各部间的矛盾，加强与科尔沁等部的联系与同盟，以解南进时的后顾之忧。

经过两年多的军事及政治活动，到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时，努尔哈赤就统一了"野人"女真的使犬、诺洛等路和东海沿岸散居未服的其他诸部；科尔沁蒙古首领，也亲到赫图阿拉与努尔哈赤结了同盟，并与喀尔喀蒙古联了婚，将舒尔哈齐的女儿嫁与巴岳特首领的儿子恩格德尔。恩格德尔前曾派喀尔喀蒙古五部之使到赫图阿拉通好，贡献驼马，并尊称努尔哈赤为"昆都仑汗"（尊敬的王）。

当年东北地区遭受严重灾害，"民间饥困之患近古所无，流离道路，饿殍相望"，而"胡地尤甚，饥饿已极，老弱填壑，奴酋（努尔哈赤）令去觅食。"[44]努尔哈赤本来已认为自己的军事力量已足以与明军抗衡，漠南、漠北蒙古又大部与己结盟，可以掩护自己的右翼，准备南进；再遇上这样严重的灾荒，为了将女真人的不满和怨恨引向明王朝，遂转变战略方向，发布了"七大恨"[45]文告，进行政治动员，决心向明统治区进攻，扩大统治区域并掠夺汉人的财物、粮食、牲畜等，以缓和后金的社会矛盾。

努尔哈赤进攻明统治区的第一个目标是抚顺。他将兵力部署

为两路：左路军四旗兵力攻玛哈丹堡及东州堡（今辽宁抚顺县东玛哈丹河西岸），右路军四旗兵力及巴牙喇由努尔哈赤率领直趋抚顺。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四月间，两路后金军同时由赫图阿拉出发。抚顺是建州部与明互市的重要场地，努尔哈赤对这里的地形、情况非常熟悉。他采取智取与硬攻相结合的战法，将先遣部队伪装为商人，到抚顺要求贸易，俟抚顺军民被诱出城后，内外夹击，全歼明军，占领了抚顺。明游击李永芳投降后金。同日，左路军亦攻占东州及玛哈丹堡。

抚顺失陷后，明辽东巡抚李维翰急调总兵张承荫率兵万人反击后金军。努尔哈赤分三路迎击，全歼明军，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器装备无数；并抢掠小堡、庄屯五百余处，[46]掠人畜三十万（多为牲畜），毁抚顺城而还，按军功将所掠财物分配给八旗官兵。

努尔哈赤起兵三十五年，这是第一次正式与明军作战。由于初战告捷，掠获极多，从而刺激了后金统治集团的更大贪欲，也鼓舞了他们进一步向明统治区进攻的意图。五月间，又攻破抚安、白家冲（均在辽宁铁岭东南）等十一个城堡，抢走所有存粮。七月间，再入鸦鹘关袭破清河城，明守军副将以下八千余人全被屠杀。附近各堡居民及官兵均弃城逃走。后金军拆毁所有城堡，运走所有粮食、财物。

（二）明王朝进攻赫图阿拉的战略决策、战争准备及明军的战役布势

抚顺的失陷，使明“举朝震骇”，神宗朱翊钧这才感到“辽左覆军陨将，建州势焰益张，边事十分危急”。[47]经廷议，最后决定从关内征调十万大军，并征调朝鲜、叶赫军各一部，与辽东守军会合，进攻赫图阿拉，以期一举消灭后金政权。

为实现上述战略决策，明王朝的战争准备主要有以下几项措施：

——选任将帅。起用早已引退在家的原援朝战争明军统帅、“熟谙辽事”的杨镐为进攻后金的最高统帅（辽东经略）；起用因贿赂罪已罢官在乡、曾两次入朝作战的勇将刘綎和原三边勇将杜松为出关明军将领（总兵）。

——征集兵力。征调福建、浙江、四川、山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地明军到辽东集中。至萨尔浒战役开始时，据巡按辽东陈王庭奏称，各地援辽兵力，“据臣亲查点过，主客军丁各四万有奇，”[48]另外从朝鲜征调一万、叶赫征调二千。

——增赋筹饷。兵部提出调兵十万，需饷银三百万，请发库藏，明帝不允；再请二百万，仍不允。最后朱翊钧下令借大工及马价各五十万作为军饷。但兵多饷少，无济于事。不得已由户部奏请加派田赋，每亩加三厘五毫，全国共增加二百余万，称为“辽饷”，转嫁到农民身上。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征派，第二、三年继续增加，达每亩九厘，每年增加人民负担五百二十万。[49]在广宁设辽东饷司，掌管军饷。

——补充武器。由兵部、工部共同负责，检查、试验库存盔甲和大将军、佛朗机、虎蹲炮、三眼铳、火箭等各种火器，选堪用者送辽东装备部队。又从山西、陕西借调大型火炮三百尊，配属给出关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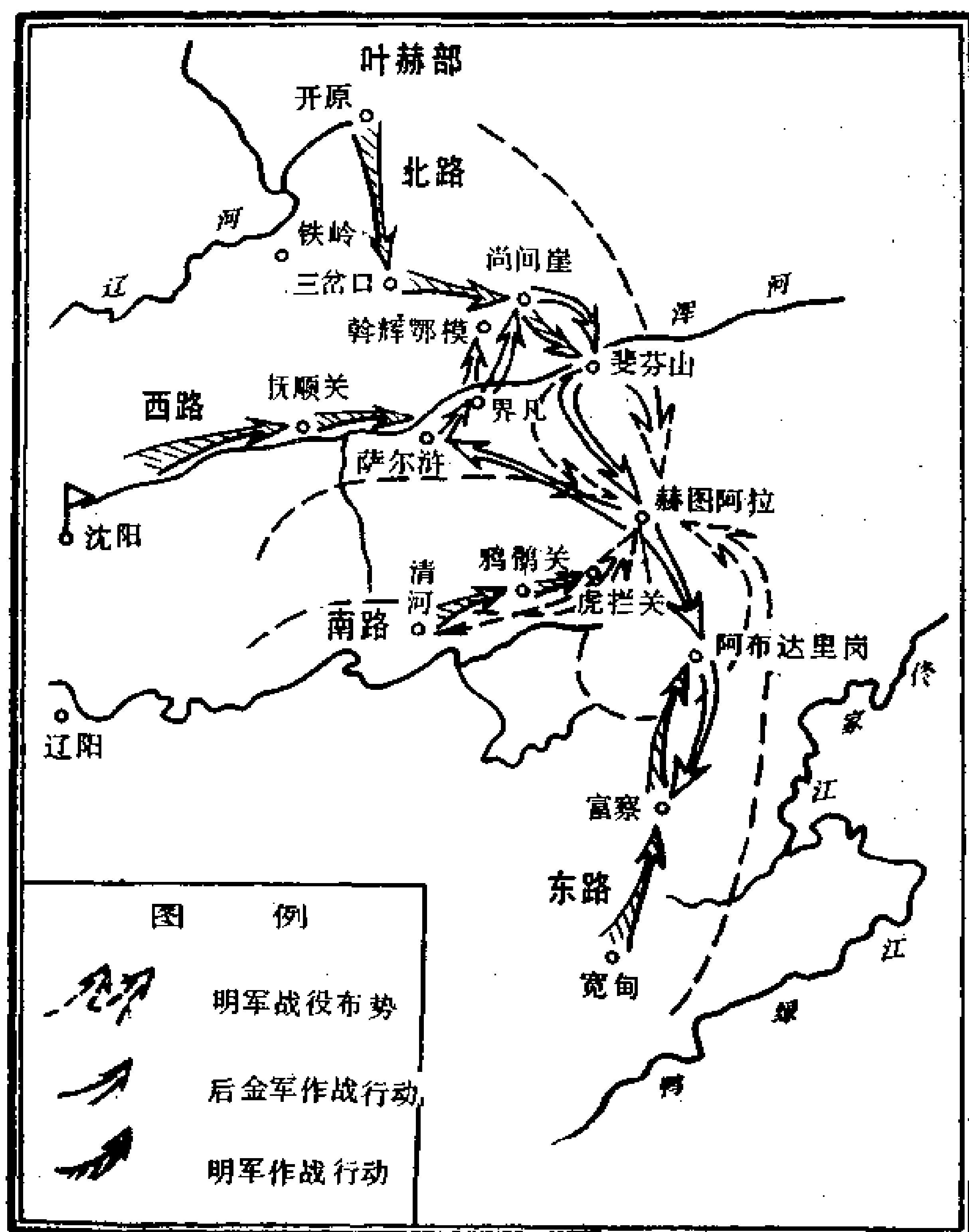
经过九个月的准备，至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二月，各路军队大部已陆续到达辽东。当时明军总兵力，包括朝鲜、叶赫军共约十万人，[50]号称四十七万。杨镐的作战方针是：兵分四路，以赫图阿拉为进攻目标，分进合击、约期会师，企图一举围歼努尔哈赤后金军于其都城。其战役布势是：

北路军（开原路）：以原开原总兵马林为主将，率辽东军二万，并配属叶赫兵二千，集结于开原、铁岭，出三岔口（今辽宁铁岭、抚顺间），从北面向赫图阿拉进攻。

西路军（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率河北等地明军近三万人，集结于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北岸入苏克素护

萨尔浒之战示意图

（明万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三月四日）（32-2图）



河谷，从西面向赫图阿拉进攻。

南路军（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率辽东军二万余人，集结于辽阳，由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向赫图阿拉进攻。

东路军（宽甸路）：以总兵刘綎为主将，率山东、浙江等地军兵一万余人集结于宽甸，并指挥朝鲜都元帅姜弘立所率一万三千朝鲜军，出凉马甸（今宽甸东北）、经富察（今辽宁桓仁南）北上，从东面向赫图阿拉进攻。

另以总兵祁秉忠率一部兵力守辽阳，以总兵李光荣率一部兵力守广宁（今辽宁北镇），杨镐坐镇沈阳指挥。

（三）努尔哈赤的战役指导及作战经过概要

明军于二月十一日集各路高级将领在沈阳誓师，预定二十一日分头出发，适逢大雪封路，改于二十五日以后出发。明军尚未出动，后金军已全部了解了明军情况。据当时明御吏冯嘉会说：

> “我师进剿，出揭发抄，略无秘密，以致逆奴预知……又闻奴酋狡黠异常，不但辽左机事，尽为窥瞰，而长安邸报，并用厚赀抄往，盖奸细广布，则传递何难。”[51]

努尔哈赤侦知明军的作战部署后，集合八旗主开会，决定“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52]即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方针来对付明军的分进合击。遂将全部兵力集中于赫图阿拉地区，待机迎击明军，同时向各关隘要道派出大批侦骑，以便及时获得明军行动的情报。

明军于十一日在沈阳誓师时，已暴露了它的腐朽：祭旗时以战刀宰牛，竟三割方断；将军在校场驰马试槊，竟因木柄蠹朽而折断，可见其兵器的腐麻程度。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等，不问前方敌情、军心、地形、天候等情况如何，一味催促杨镐迅速进军。两员真正有作战经验的老将杜松和刘綎，都曾以准备不够充分、兵未调齐及大雪封路为理由，要求缓期进攻。杨镐大怒，说：“国家养兵，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

事。”[53]遂悬朱翊钧所赐尚方宝剑于军门。命各路军必须于三月二日到达距赫图阿拉大约一百二十里二道关南北之线，同时向赫图阿拉作向心进攻。

三月一日辰时，努尔哈赤从侦骑来报得知：杜松军于二月二十九日夜出抚顺关；刘綎军于二月二十八日未刻出宽甸以北之边墙北上。即对情况作了如下判断："明军之来信矣。我国南路驻防之兵有五百人，其南路兵来即以此拒之。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54]遂决定以大贝勒代善率本旗为先行，自率主力在后，立即出发向抚顺方向迎击杜松军。正在此时，侦骑又报清河路明军已出。代善对情况作了进一步分析："清河之界，道途偪仄，地势崎岖，纵有兵来，未能骤至，我兵宜先往抚顺以逆敌兵。”[55]遂未变更决心全军急驰西进。

杜松是明军著名勇将，"守陕西与胡骑大小百余战，无不克捷。”[56]但鲁莽无谋，并非帅才，他骄傲轻敌，为贪首功，率军先出抚顺口，日驰百余里，直抵浑河岸。部下请求宿营，他执意不肯，将辎重、炮车等重型装备全部遗留河北，领先徒步渡河，比作战日期早一日到达并超出进攻出发地位二道关，三月一日即前出至萨尔浒，形成孤军突出。他不考虑与其他各路军的协同，也不考虑自己的重型装备尚未到达，又将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在萨尔浒山下结营，一部由自己率领进攻吉林崖界凡城，企图抢占制高点以控制战场，将自己置于分散和仰攻的不利地位。当时界凡城虽只有少数后金兵及筑城壮丁防守，但由于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杜松进攻未能得手。

努尔哈赤率军急驰至铁背山（萨尔浒东）时，见杜松兵力分散，攻势受挫，遂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以两旗兵增援界凡城，集中六旗兵力进攻萨尔浒。他认为：应"先破萨尔浒山所驻之明兵，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57]努尔哈赤率主力进攻萨尔浒明军时，明军尚未构筑工事，仅凭少数车辆构成车阵，

抵不住后金骑兵的冲击，而且兵力悬殊，很快为后金军消灭。努尔哈赤立即转兵从后方进攻杜松军。杜松前有两旗后金军阻击，后方又来了后金军主力，被迫仓促收缩兵力，结阵防守，被后金军包围。经血战，杜松部明军全部被歼。

马林军于三月一日晚进至萨尔浒西北三十余里之富勒哈山附近，得知后金军与杜松军战于吉林崖，未敢前进，转为防御。在尚间崖、斐芬山两处结营，构筑工事。当夜，杜松军留置河北的后营游击龚念遂部，亦向马林军靠拢，率炮车营结营于斡辉鄂模，与马林部形成三角阵地。努尔哈赤在歼灭杜松军后，立即于三月二日转兵向马林进攻。对明军三营，仍用各个击破战法，先以骑兵冲击龚念遂营，很快将其歼灭后，再攻尚间崖马林营。经激战，除马林率数骑逃走，其余全部被歼。最后进攻斐芬山潘宗颜营，亦很快将其歼灭。叶赫军刚进至中固城（今辽宁开原铁岭间平顶堡附近），闻明军败，大惊逃回。至此，明北路军全部被歼。

努尔哈赤连歼明西、北两路军后，得知刘綎军正向富察前进；李如柏军已进至虎拦关。遂决定以一部兵力阻止李如柏军，而以主力在赫图阿拉以南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岗地区伏击刘綎军。努尔哈赤坐镇赫图阿拉指挥。

刘綎于二月二十五日提前从宽甸出发，途遇大雪，路上又有后金军设置的障碍，加以军粮缺少，所以行动迟缓。杜松、马林两军被歼灭后，刘綎军全然不知，刚进至距赫图阿拉约百里的深河。三月四日，大贝勒代善已率领后金军主力全部转移至阿布达里岗设伏地区，遂命原阻击刘綎军的五百骑兵，改为诱敌深入，并派人伪装杜松通讯人员，向刘綎通报杜松军已进至赫图阿拉附近的假情况，约其迅速进军。刘綎催军急进。阿布达里岗一带，山路险隘，马不能成列，兵不能成伍，只得单行前进。当刘綎军进入伏击圈时，后金军突然发起进攻，将该部分割为数段，全部歼灭，刘綎力战身死，朝鲜军在富察（距阿布达里岗十里）被迫投

降后金。

明军统帅杨镐，得知西、北、东三路明军均已被歼，急令李如柏的南路军撤退。李如柏部队行动迟缓，不与其他各路协同行动，进至虎拦关（鸦鹘关东）即按兵不动。接到杨镐的命令，慌忙撤退。后金游骑二十人乘机一冲，李部竟被冲乱，自相践踏，“死者千余”。〔58〕

明军以十万之众，四路分进合击，在不到五天的时间里，三路被全歼，仅一路逃回，彻底失败。明军方面战死的将领有总兵刘綎、杜松以下三百一十余人，战死军兵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丧失马、骡、驼共二万八千六百余匹，〔59〕损失武器装备军需无数。而后金军仅损失二千余人。双方损失之悬殊，为战争史上罕见的战例。

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战争史上的一次关键性战役，是一次带有战略性的决战。从此以后，双方在辽东的战略主动权易手，优劣易势，明军由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防御，后金军则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清帝弘历（乾隆）曾对这次战役的意义作过恰当的评论，他说：萨尔浒一战，使“明之国势益削，我之武烈益扬，遂乃克辽东，取沈阳，王基开，帝业定”。〔60〕

双方在战役指导上的主要得失

后金军在萨尔浒决战中获得胜利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就军事来说，最主要的是后金军的统帅、努尔哈赤的战役指导正确，他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粉碎了明军优势兵力的分进合击，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从总的兵力对比看，明军十万，且装备了大量火器，后金军七万，主要装备为弓箭刀矛等冷兵器，显然明军占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明军以分进合击的态势，对赫图阿拉作向心攻击，努尔哈赤居内线作战地位，如果据城防守或分路迎战，都必然处于劣势兵力与优势敌人作战的困境。只有趁敌人分进而不能协力之

际，集中所有兵力，造成局部优势，迅速击破分进中的一路敌人，然后逐次转用兵力各个击破其他各路，才有胜利可言。努尔哈赤深明此理，他充分运用自己骑兵部队的快速机动性，抱定“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在空间、时间上集中兵力，逐次歼灭各路明军终于完全粉碎了明军的分进合击。这在战争史上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内线作战战例。

当然，要把努尔哈赤这种指导思想变为现实，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保证，例如：

——必须有周密的侦察，准确的情报，确实掌握敌人的行动，才能据之决定自己的作战计划及行动；

——必须对作战地区的地形、天候等影响作战行动的各种情况十分了解，能精确地计算出距离、时间等因素，才能正确地决定打击的顺序；

——必须有足够的机动能力，保证在敌人到达“利害变换线”之前，就能集中兵力歼敌一路，然后逐次转用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必须有较强的战斗力，能在各个击破时速战速决；

——必须选择好第一次打击目标，保证初战胜利，使尔后的逐次歼敌得以顺利进行。

努尔哈赤的部队和作战指挥，完全符合上述要求，因而取得了萨尔浒之战的胜利。

明军失败的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明王朝政治腐朽，造成军备废驰、士气不振和战斗力弱等是根本原因，但如仅就萨尔浒之战本身而言，明军统帅无能和指挥失当则是失败的主要和直接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战役企图与兵力不相适应。明军的战役企图是速战速决、一举歼灭后金政权。但它所使用的兵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是不够的。后金军在此之前是打一仗兵力扩大一次，战斗经验与士气也相对提高一次，至萨尔浒之战时，总兵力已超

过七万，而且正处于上升阶段，并可全部集中使用。明军调集在辽东的总兵力虽有十万，但来自全国各地，质量参差不齐，情况互不熟悉。以这样一点有限的优势，企图深入敌区，速战速决，一举歼灭后金，实在是力不从心，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2．在情况不明、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急于求胜。“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61]这本来是一切军队统帅都必须遵循的一条普遍的规律，但明军的决策人物，却完全违背了这个法则：既未考虑敌军兵力集中，骑兵为主，机动性强，善于野战，又是在自己的统治区内作战，地形熟悉，以逸待劳等有利条件；又未考虑己方兵力优势甚微，又调自各方，除辽东驻军外，多数来自数千里外的四川、江浙和西北三边，长途跋涉，已极疲惫等不利因素，统帅杨镐不仅没有给以适当的休整，甚至不待集中完毕就急于发动进攻；至于地形、气象条件，在这次战役中是极为重要的，荒山老林，人迹稀少，天寒地冻，大雪封山，加上南方调来的军队，人地两疏，就大大的增加了军队运动的障碍和友邻之间的隔绝程度，为分进合击计划的制订和执行，增加了很大的难度，这是战役指挥官必须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的问题，但杨镐为了急于发动进攻，恰恰未予考虑，全凭主观愿望指导作战并祈求胜利。这种既不作周密考虑和准备而又盲目轻敌的“先战而后求胜”的作战指导，是完全违背“先胜而后求战”[62]的兵法原则的，这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3．战役部署兵力分散，使敌有实施各个击破的可乘之机。杨镐的战役布势和作战计划，假如脱离开当时的条件来看：四路出兵，分进合击，根据里程远近规定不同的出发时间，还规定了进攻出发地区和进攻开始的时间，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如果结合当时、当地的地形、气候、交通状况，以及双方兵力、士气和机动能力等条件来看时，则显然是一个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纸上谈兵。实施分进合击，首先就必须考虑和预防敌人的各个击破。在兵力部署上，应使每一路部队都有足够的兵力和手段，在友邻部

队到达的最大限度时间内，抗击并吸引住当面之敌，以便友邻部队能及时赶来支援，合击敌人。但杨镐却完全没有考虑努尔哈赤有可能利用它机动力强和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集中全力来各个击破自己分进中的军队，从而将仅仅在数量上略占优势的兵力，不分主次，地部署在正面、纵深均达数百里的四个方向上形成了分散兵力，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

4．放弃战场指挥，始终被动挨打。实施分进合击，从部队开始分进起，就必须始终保持统一、有效、不间断而又及时的指挥，使分头行动的各路军队，能够随着战况的变化，密切协同，相互配合，以形成整体力量去打击敌人。但杨镐没有组织任何协同动作，坐在远离战场二百多里的沈阳，完全不了解战场发生的情况，也没有任何战场指挥，杜松军孤军突出，未予制止；杜松军受到攻击时，马林军距离甚近，不过二、三十里，也未能指挥马林军投入战斗；直至杜、马二军被歼，还未向李如柏、刘綎通报战况，给予必要的补充指示，以致刘綎军被诱、入伏、被歼。——杨镐组织这么大的、带有决战性质的战役，却连必要的战役预备队也没有控制，以致无法根据战况的需要，适时将战役预备队投入战场，掌握主动，影响战役的进程。（祁秉忠部部署在远离战场三百多里的辽阳，其目的是"守"，是掩护沈阳的侧背，并不是控制的战役预备队）。以杨镐这样的作战指挥，又遇到努尔哈赤那样的对手，明军的失败，当然是不可避免的了。

二、沈、辽之战

（一）努尔哈赤攻占开原、铁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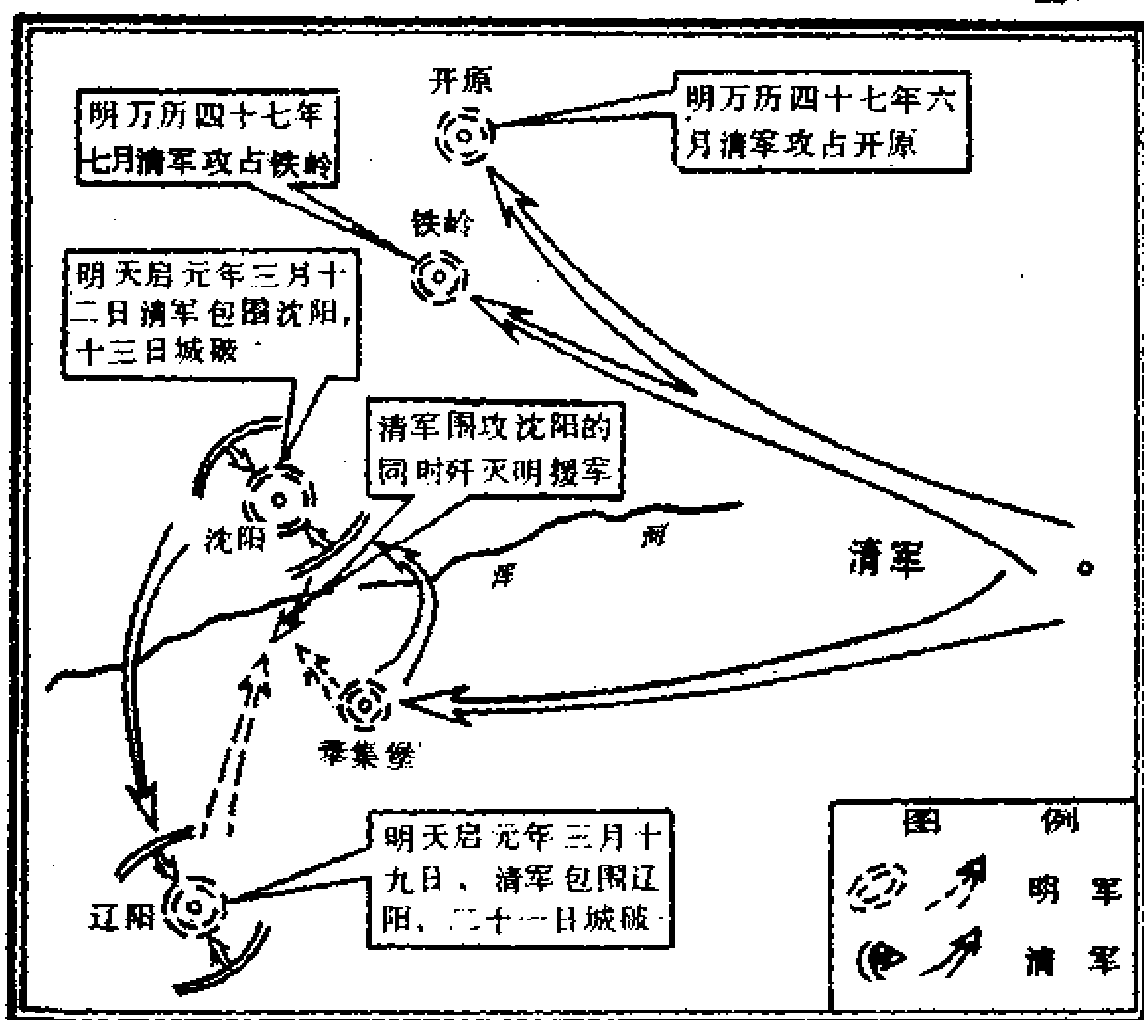
萨尔浒战役的失败，震动了整个明王朝，有的官员竟收拾行李细软准备送眷属南逃。北京九门晨开午闭，部院官员轮流值门，稽查出入行人，防止奸细潜入。在一片埋怨声中拿不出任何扭转辽东局势的有效对策。

努尔哈赤将部队稍事整顿后，当年六月即乘势继续西进，率军四万进攻开原。开原是明军在辽东的北翼军事重镇，但守军将

领是刚在萨尔浒战败逃回的总兵马林，指挥能力既差，而军队又缺粮少饷，士气低落。努尔哈赤派间谍和情报人员潜入城内，已经摸清了明军的情况和行动规律。遂趁开原守军到城外牧马的时机，突然乘虚围城，马林等仓惶登城防守。预先潜入的女真人“开门内应”，〔63〕后金军突入城中，马林以下城中明军，全部被杀。明辽东经略王在晋认为：“开原未破而奸细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非徒斗力也”〔64〕。后金军占领开原后，纵掠三天，然后焚毁城内房屋，满载所掠财物、粮食至界凡城，分配给八旗各部官兵。

沈辽之战示意图

（明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天启元年三月）（32-3图）



七月间，努尔哈赤又率兵五万攻铁岭。守军参将丁碧被后金说降，当后金军攻城时，“参将丁碧开门迎敌”〔65〕。后金军占领铁岭后，乘胜于八月间攻灭叶赫。至此，努尔哈赤进军沈、辽的道路已经打通，侧背威胁亦已解除。

（二）熊廷弼经略辽东

开原、铁岭战前，明王朝即决定起用熊廷弼代杨镐为辽东统帅。熊廷弼于七月末到达辽阳，此时，开原、铁岭已失，辽东一片混乱，防御基本解体。据熊廷弼当时向朱翊钧的报告说：

> “辽东现有兵四种：一曰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一曰额兵，开原一道全额已亡，即臣标下两翼亦并全亡……。一曰募兵，佣徒厮役，游食无赖之徒，岂能惯熟弓马，……领饷有名，及闻警而去其半。……一曰援兵，各镇挑选，谁肯以强人壮马来，谁肯以坚甲利刃来，……弱军羸马，朽甲钝戈，不堪入目。……今一二见在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收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战。……现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图充步军，以免出战。……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至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66〕

熊廷弼面对辽东残破的现实，认识到新败之余，军事力量对比上已远远劣于后金，在战略上不能再取攻势。他坚决反对朝中那些根本不懂军事，不了解辽东实情，而又妄自尊大，空唱高调的大臣们所提的“进剿”方针，主张“坚守渐逼之策”，实施积极的战略防御：在叆阳、清河（今辽宁抚顺东南）、抚顺、柴河（今辽宁铁岭东）、三岔儿（今辽宁抚顺市北）、镇江（今辽宁丹东东北）各重要边口，设置重兵，构筑坚强工事，形成能够相互支援的防御体系；无警就地操练，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相应

援；同时选拔精锐，组成若干骑兵小分队，乘间深入到敌人统治区，捉哨探，捕零骑，扰耕牧，破坏敌人的生活、生产、轮番出击，使敌人疲于奔命，不得休养生息，逐渐削弱敌人的锐气；自己则整顿部队，积蓄力量，然后再相机转为反攻。〔67〕

熊廷弼镇辽一年多，按照他的战略方针，大力整顿军务，严肃军纪，修城筑堡，制械练兵。除请国家拨发武器装备外，自造大炮三千余门，百子炮数千尊，三眼铳七千余支，盔甲四万五千余付，枪刀等冷兵器二万四千余件，火箭四十二万余支，火罐等十余万个，双轮战车五千余辆，〔68〕并屯田积粮，组织生产，使濒于溃散状态的明军逐步得到巩固，使陷于混乱状态的辽东逐渐得到稳定。努尔哈赤曾进行过几次试探性进攻，如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六月，后金军两万，分两路袭抚顺、奉集堡（今辽宁沈阳东南）。八月，努尔哈赤亲率军进至沈阳附近。九月，又派军攻蒲河（今辽宁沈阳市北）等地，抢掠粮食，均被明军击退。不敢轻于进攻。据当时人说：

> "经略熊廷弼……任事才十余月耳，而辽阳三颓城如新，丧胆之人复定，至奉集、沈阳二空城今日严然重镇矣。"〔69〕

虽然熊廷弼在辽东功绩卓著，但明王朝的政治腐败已极，统治集团内的"党争"愈演愈烈，大臣间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互相攻讦。熊廷弼性情刚直，不肯曲意奉承，得罪不少大臣，于是成为党争中的攻击目标。当时明王朝正处于发生重大政治变化时期，朱翊钧病死，朱常洛继位，仅一月，又因吃"红丸"药死去，其子朱由校继位（熹宗天启帝），熊廷弼就在此时，因所谓"废群策而雄独智"，"出关逾年，漫无定画"，以及"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70〕等等莫须有的罪名，被迫解职，由袁应泰继他为辽东统帅。

（三）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

袁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用兵非所长，规画颇疏"，〔71〕他

到任后，一反熊廷弼的做法，熊法令严，他宽其法；熊采战略防御方针，他主战略进攻方针，准备大举进攻后金；并变更了熊的防御部署，撤换了十余员将官，造成军心混乱；他还招降了一万多蒙古及女真流民，安置在辽阳、沈阳二城之中，混入了大批后金军间谍。努尔哈赤此时已经灭了叶赫，征服了“野人”女真的使犬部（居住在今乌苏里江下游地区、松花江与黑龙江会流处混同江两岸）及使鹿部（居住在混同江下游以东滨海地区及库页岛），完全统一了东北女真，并将大量“野人”女真迁至建州地区，编入八旗，用为亲兵，实力空前强大，兵力已发展为十万人。虽然明王朝利用察哈尔林丹汗企图统一蒙古，因而与努尔哈赤产生的矛盾，增加林丹汗的岁币，[72]并把漠南蒙古各部的岁币全交由林丹汗控制，以使察哈尔部与后金对抗，从侧方牵制后金军的行动。但努尔哈赤已与科尔沁部结成较牢固的联盟，有科尔沁部与察哈尔部对抗，足以免除右侧威胁。于是努尔哈赤紧紧抓住明最高统治者易人，辽东统帅易人，军心涣散，边防紊乱的有利时机，开始向沈阳、辽阳地区进攻。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二月，努尔哈赤开始向明军发动进攻，首先攻击沈、辽之间的军事要点奉集堡，企图切断沈、辽间的联系，但未能攻下。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以四旗担任阻援，而以主力包围沈阳。熊廷弼主持辽东军务时，沈阳城防工事已构筑得相当坚固，“城外浚濠，伐木为栅，埋伏火炮”，濠底还插有尖头木桩。沈阳守军分隶于贺世贤、尤世功两总兵。十三日努尔哈赤派兵挑战，贺世贤不依托城防工事进行坚守，而是恃勇出战，后金兵诈败诱之，贺世贤率军轻进，结果中伏被四面夹击，当其退至沈阳西门时中箭力战而死。后金军以云梯，楯车加紧攻城，尤世功也战死在东门外。袁应泰收降的蒙古、女真人突然叛变，砍断吊桥索，放金军入城，军民被杀七万，沈阳为后金占领。

沈阳被围攻时，辽阳和奉集堡、武靖营（今辽宁沈阳市西

南）明军均先后来援，在浑河附近与后金军四旗兵遭遇，血战一日，大部战死。这次作战，虽因兵力薄弱而明军被歼，但经过熊廷弼一年多的整顿，已能勇于与后金军作战。明统治集团认为：

“自奴酋发难，我兵率望风先逃，未闻有婴其锋者，独此战以万余人当虏数万，虽力屈而死，至今凛凛有生气。”〔73〕

努尔哈赤攻下沈阳，击破明两路援军后，袁应泰即将奉集堡等地明军收缩在辽阳，企图集中兵力固守。三月十九日，后金军包围了辽阳城。辽阳是辽东首府，东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城防工事极为坚固。但袁应泰亦未依托工事进行防御，而亲督五总兵出城五里处结阵与后金军对战。此时后金已将所获明军火器装备于八旗军，交战时先以大量火器射击，然后以骑兵冲击。明军阵乱溃退，一部退至城关，一部逃鞍山。次日在城关又苦战一日，明军两总兵战死，全部退入城内。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对辽阳城发起总攻，激战一日，至傍晚，小西门火药起火，收降的蒙古、女真到处放火，各军所住窝铺及城内草场俱被焚烧，守城军士溃乱，在内奸接应下，后金军由小西门突入城中，袁应泰自杀，辽阳为后金占领。“辽阳既下，其间东之三河、东胜……青台峪等大小十余城官兵，俱剃发降。”〔74〕“河东十四卫生灵尽为奴属”，〔75〕努尔哈赤由赫图阿拉迁都于辽阳。

明军多步兵、火器，长于守战，短于野战，后金军多骑兵，善弓矢，长于野战，短于攻坚，为什么竟能在十日之内连续攻占明军两大设防坚城？除了政治、军事上的其他原因外，单就作战指导来说，努尔哈赤决策正确，而袁应泰则恰恰相反。努尔哈赤采用诱敌出战的方针，使双方长，短易势，力求野战中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这是非常正确的决策；此外，他还善于用间，战前先派间谍潜入敌人内部，战时起来里应外合击败明军，如当时人说：沈阳、辽阳“城中受虏间金，开门引入，……盖奴贼攻城非所长，前后陷入城堡，皆用计行间云。”〔76〕从抚顺到辽阳，莫不如此；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努尔哈赤此次攻明作战的进军方向颇具

战略卓见，为了攻取沈、辽，夺取辽河以东广大地区，他没有直接从东向西攻击沈阳，而是首先袭占开原、铁岭，然后由北向南进攻沈、辽，这样就可以避免两面作战。沈、辽既得，辽河以东诸城堡自然已成囊中之物，垂手可得了。袁应泰在战守决策上，一反熊廷弼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坚守渐逼之策"。熊廷弼筑有坚固的城防工事，又有大量火器，但袁应泰囿于以守城为怯的传统看法，不依托工事、发扬火力，据城坚守，以发挥一己之长，待敌攻城顿挫后再开城出击；却出城野战，使自己的长处化为乌有，使敌人的长处得以发挥，焉得不败。特别是抚顺，开原，沈阳都因被诱出城，或出城迎战而遭到失败，前车之鉴比比皆是，但袁应泰仍以仅有的五万余兵力，离开坚城，到郊外五里处与优势敌人交战，结果重蹈覆辙。其次，在收容蒙古、女真饥民、流民事件上，也丧失了应有的警惕，给予后金以可乘之机。沈阳、辽阳乃辽东重镇，竟将大量蒙古、女真流民安置于此，终于遭致里应外合、城破军歼的恶果。

三、广宁之战

沈、辽既破，明王朝又是举国震惊，朝臣议论纷起。阁臣刘一锦说："庙谟之胜，只在用舍得人，即如熊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不知何故首倡驱除。"[77]熹宗朱由校也认为："熊廷弼守辽一载，未有大失，换过袁应泰，一败涂地。"[78]于是下诏二次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

熊廷弼仍坚持他的战略方针，针对后金军短于攻坚，缺乏水军，后方不稳，占领地区大而兵力不足等弱点，提出了"三方布置策"，其主要内容为：

——集中辽东陆军主力，扼守广宁（今辽宁北镇），加强城防工事设施，使之成为可战可守的前沿基地，从正面与后金军对峙，并牵制其主力的行动；

——以天津为基地，集中水军主力，随时准备经辽东湾、由辽河口溯河北上，进击后金辽阳附近地区。

——在登州（今山东蓬莱）建立舰船基地，集中一部水陆两栖部队，随时准备经黄海、由鸭绿江口溯江北上，袭扰后金以赫图阿拉为中心的腹心地区。

——除以上三方面外，另组建游击骑兵小分队，并派遣间谍等潜入敌后，进行扰乱和破坏，以动摇其军心、民心；

——将辽东统帅部设在山海关，以节制三方，统一事权，使各方面的行动能相互协调、配合。俟后金军疲惫，或因水军的袭击而回师内顾时，再进行出击，第一步先收复辽阳。[79]

除上述三方面的布置外，熊廷弼还认为："三方建置须联络朝鲜"，请朱由校派遣使臣入朝慰问，要求他们"尽发八道之师，连营江上（鸭绿江），助我声势"。并请求将逃入朝鲜的辽阳四卫难民，"招集团练，别为一军，与朝鲜军合势。而我使臣即权住义州（朝鲜新义州东北），控制联络，俾与登、莱声息相通。"[80]此外还准备招募东山（本溪附近）矿工，组建义军。

当时广宁巡抚是新由广宁分守升任的王化贞，他"为人骏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他拟定的防御部署是："沿河（指辽河）设六营，营置参将一人，守备二人，画地分守。西平（今辽宁台安南，辽河、浑河汇合处以西二十里）、镇武（今台安西）、柳河（今辽宁北镇南）、盘山（今北镇东南）诸要害，各置戍设防。"[81]这一方案的实质，是分散兵力，将步骑两万，沿三岔河（辽河、浑河汇合后至营口入海一段）一百二十里一字摆开，每数十步设一窝铺，驻军六人。这种毫无军事常识的江河防御分散直接配备，当然要受到熊廷弼的反对。熊廷弼批评说："东兵过河，所置地仅里许，窝卒仅百许，空散二万众于沿河。"[82]怎么能阻挡后金军的渡河进攻呢！？他认为：

"河窄难恃，堡小难容，今日但宜固守广宁。若驻兵河上（三岔河）兵力分则力弱。敌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西平诸戍亦不能守。河上止宜置游徼兵，更番出入，示敌不测。不宜屯聚一处，为敌所

乘。自河抵广宁，止宜多置烽堠；西平诸处止宜稍置戍兵，为传烽哨探之用。而大兵悉聚广宁，相度城外形势，犄角之营，深垒高栅以俟。盖辽阳去广宁三百六十里，非敌骑一日能到。有声息，我必预知。断不宜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也。”〔83〕

这一段极其精辟的分析完全击中了王化贞方案的要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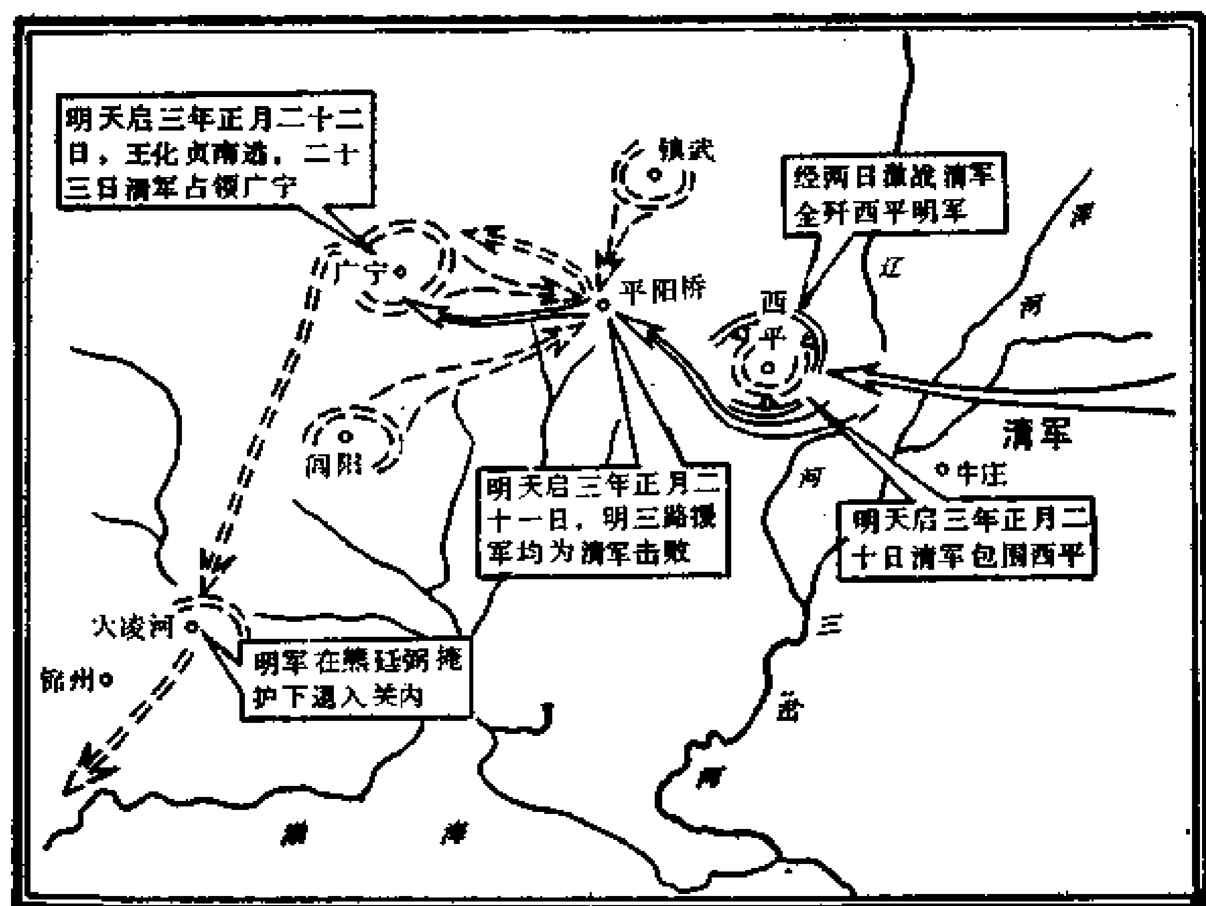
熊廷弼与王化贞在防务上的分歧，实际上是两种作战指导思想的反映：熊廷弼是集中力量坚守广宁以控制辽西走廊，俟后金军疲惫、钝挫时进行反击；王化贞则是守住辽河，企图不让后金军过来。很明显，三岔河（辽河下游）河窄水浅，障碍程度有限，难以固守；何况兵力分散，更是用兵之大忌。熊廷弼提出集中兵力守广宁的方案是符合实际的，是可取的。广宁城高濠深，工事坚固，附近又有山可作依托，二者可形成互为支援的犄角之势，对以骑兵为主，善于野战的后金八旗军来说，是有可能先挫其攻势，然后再击其惰归的。

熊、王在防务上的分歧，与朝中政治上的党争纠缠在一起，互相诋毁，事事龃龉。王化贞是兵部尚书张鹤鸣等一派的人，又有阉党的支持，因而在朝中得到信任和支持，在党争中处于有利的一方。他拥兵十余万，兵权在握；而熊廷弼名为辽东统帅的经略大臣，王化贞也受其节制，但实际上只有从北京带去的京营选锋五千人可供指挥，根本无法实现他的战略设想，成为徒有虚名的经略。

随着“经、抚不和”的事态发展，逐渐由防御上分散与集中的分歧演变为战与守，即进攻与防御的分歧。由于王化贞所派都司毛文龙由皮岛（今朝鲜椴岛）出发突袭镇江（辽宁丹东东北）成功，因而他过高地估价了这次战斗的胜利，认为河东失地亦可轻易收复，于是力主进攻。他将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蒙古兵的支援与李永芳的反正上，认为有“虎墩兔兵四十万”相助，再有李永芳（原为明抚顺所游击，后降后金，佯允王化贞为内应）为

内应，必可“不战而取全胜”。向朱由校报告说：“愿以六万人进战，一举荡平”〔84〕“仲秋八月，可高枕而候捷音。”〔85〕但他对军务，如士兵、马匹、兵器、粮秣、营垒等一概不问，甚至兵士们“执棍而立”，或“沿村乞食，弓刀卖尽”他也不管，只是一味说大话。熊廷弼对毛文龙袭破镇江之事，看法和估价正与王化贞相反。他认为：“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86〕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对于王化贞的进攻方针，更是极力反对，坚主防御，他认为“辽人（指毛文龙等）不可用，西部（指蒙古军）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87〕双方的意见，针锋相对。

广宁之战示意图
（明天启三年正月）　　（32-4图）



十月间，河上冰封，人马可踏冰渡河。广宁人传说后金军将乘机渡河来攻的消息，人心惶惶，纷纷思逃。王化贞遂分兵布防，命令总兵刘渠率兵两万守镇武（今辽宁台安西），总兵祁秉忠率兵一万守闾阳（辽宁北镇南），付总兵罗一贵[38]率兵三千守西平，另以一部兵力守镇宁（辽宁北镇东），企图以此四个军事据点为屏障，保卫外围，确保广宁。努尔哈赤占领沈、辽后，一方面休整军队，一方面注视着明军情况。当其侦知明军经抚不和，战守不定等情况后，决定乘机西进。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正月十八由辽阳出发，二十日经牛庄渡过三岔河，包围了西平。罗一贵据城固守，后金军猛攻未下。王化贞命刘渠、祁秉忠和其亲兵将领孙德功分由镇武、闾阳、广宁出援西平。努尔哈赤分兵一半阻援，二十一日，与明三路援军在平阳桥遭遇。孙德功此时已准备投降后金军，他率领的广宁兵一冲即逃，造成全军溃败，刘渠、祁秉忠战死，镇武、闾阳兵全部被歼。后金军以二十余倍于守军的兵力集中火力与攻城器械，组织多次猛攻西平，三千余明守军与之血战两日，矢尽援绝，全部战死。后金军亦损失惨重。

孙德功逃回广宁后，即封银库、封火药，准备迎接后金军入城。王化贞仅率一二人狼狈逃走，在大凌河与由右屯前来接应的熊廷弼相遇，以熊部五千兵掩护王及溃散军民数十万退入关内。努尔哈赤于二十三日进占广宁。

广宁兵败，明王朝再次大震。这本来是明政治腐败、用人不当造成的结果，但熊廷弼却成为党争的牺牲品，被判死刑，并传首九边；王化贞也下狱听勘，至崇祯五年方判处死刑。

后金军占领广宁后，又连续攻下义州（今辽宁义县）、锦州、大凌河……等四十余城、堡。掠走财物，烧毁广宁城，将辽河以西的人民全部驱赶至辽河以东。新的辽东经略王在晋上疏说：“东事一坏于清（河）、抚（顺），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坏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三坏为残局，

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89〕

广宁之战明军战败的原因，固然主要是明政治腐败，经抚不和，受党争的影响。但从军事角度看，王化贞的战略错误则是直接、主要的原因。经过萨尔浒及沈辽之败，明方军力不足，士无斗志，将无战心，民心不稳；努尔哈赤的八旗劲旅一胜再胜，并于攻取辽阳后即迁都于此，足见其进取的雄心。在这样的形势下，能守住辽河以西地区，已为不易，而王化贞既不掌握敌军实况，又不了解本军军情，更不能据以权衡利害，竟企图依靠不可靠的蒙古军支援及李永芳反正来侥倖进攻取胜，岂是用兵之道！“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怎么能这样轻率从事呢。兵法说：“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90〕王化贞的指挥错误，正在于此。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之策”，从当时辽东的具体情况看，比较起来还不失为基本上符合客观实际的稳妥方案。虽然后人概括他的方案为“守定而后战”，〔91〕但它的重点和实质，是在于守，而不在于战，即确保广宁，以控制辽西走廊，这当然是必要而正确的，也是有可能实现的。至于方案最后所提乘敌内顾、出击收复辽阳的一段话，只是一个远景规划，也可能是为了避免朝中政敌的攻讦而说的，事实上条件并不具备，很难实现。这是因为：1．水军在陆上作战的能量受到限制，登、莱水军，乘虚进入辽东半岛，只能起到牵制骚扰作用，企图以此来吸引足智多谋、作战经验丰富的努尔哈赤以主力东向内顾，其可能性不大。2．熊廷弼自己也知道：“三方布置必使兵马、器械、舟车、刍茭无一不备，而后克期齐举，进足战，退亦足守。”〔92〕但事实上当时明王朝在人力、物力、财力、军力上，短时间内实在难以完成他所要求的“二十余万”大军进攻所必需的装备。保卫辽河以西地区兵力尚感不足，若欲以进攻手段击败努尔哈赤的主力部队，从而收复现在后金的首都辽阳，又谈何容易。何况明王朝的政治腐败已达极点，在党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事事掣肘，阻力重重，更

难实现这一战略企图。以后熊廷弼自己也写了《三方布置策有名无实疏》上奏朱由校，承认该方案不能实现。其实当熊廷弼履任之初，发生了经抚不和而兵权又实际掌握在王化贞手中之时，明军的失败即已成定局。兵法说：

> “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上下齐心协力）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93〕

明军五者均不具备，怎么可能获得胜利呢！

如何选择进攻发起时机，是战略战术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努尔哈赤在这次作战中选择的进军时机非常有利。当时正值明军经抚不和，在作战方针上攻守不一，朝中两派又互相攻讦，熊廷弼有职无权，王化贞有兵无能，广宁军备废弛，官兵思想混乱，又恰逢冰封季节，河流不成障碍，正是发起进攻的最好时机。加以用间成功，内应有人，所以才较顺利地取得战役的胜利。

四、宁远之战

广宁败后，明军放弃关外各要点撤入关内。兵部尚书王在晋继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孙承宗任兵部尚书。孙承宗从辽东作战失败中得出一条教训，就是必须选有军事才能的人为边将，又必须尊重边将的军权。他上疏说：

> “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

他选拔年青的袁崇焕为将领，任山海监军。王在晋对袁也颇为器重，命他为宁前兵备佥事。但王、袁二人在战略方针上产生了根本性的分歧，王在晋主张直接守山海关，为加强其防御强度，请求在关外八里铺一带筑重关，以四万人守之；袁崇焕主张坚守关外，屏障关内，营筑宁远，徐图大举。袁崇焕以监军身份两次向当时的首相叶向高报告，提出自己的方针。叶向高无法“臆度”决定，孙承宗乃自请亲往现地解决。他到关后，详细了解了当地实际情况，认为八里内守兵八万，前关与后关联结在一

起，对作战不利，更重要的是直接守关过于消极，他说："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94〕他支持袁崇焕、阎鸣泰的意见，建议将防御阵地前沿推进至宁远（今辽宁兴城）、觉华岛（今兴城南菊花岛）一带。但王在晋坚持己见。孙承宗返朝后上奏说：

"与其以百万金钱浪掷于无用之版筑（指修八里铺重城），曷若筑宁远要害以守。八里铺之四万人当宁远冲，与觉华犄角。敌窥城，令岛上卒旁出三岔，断浮桥，绕其后而横击之。即无事，亦可收二百里疆土。总之，敌人之帐幕必不可近关门，杏山之难民必不可置膜外。"〔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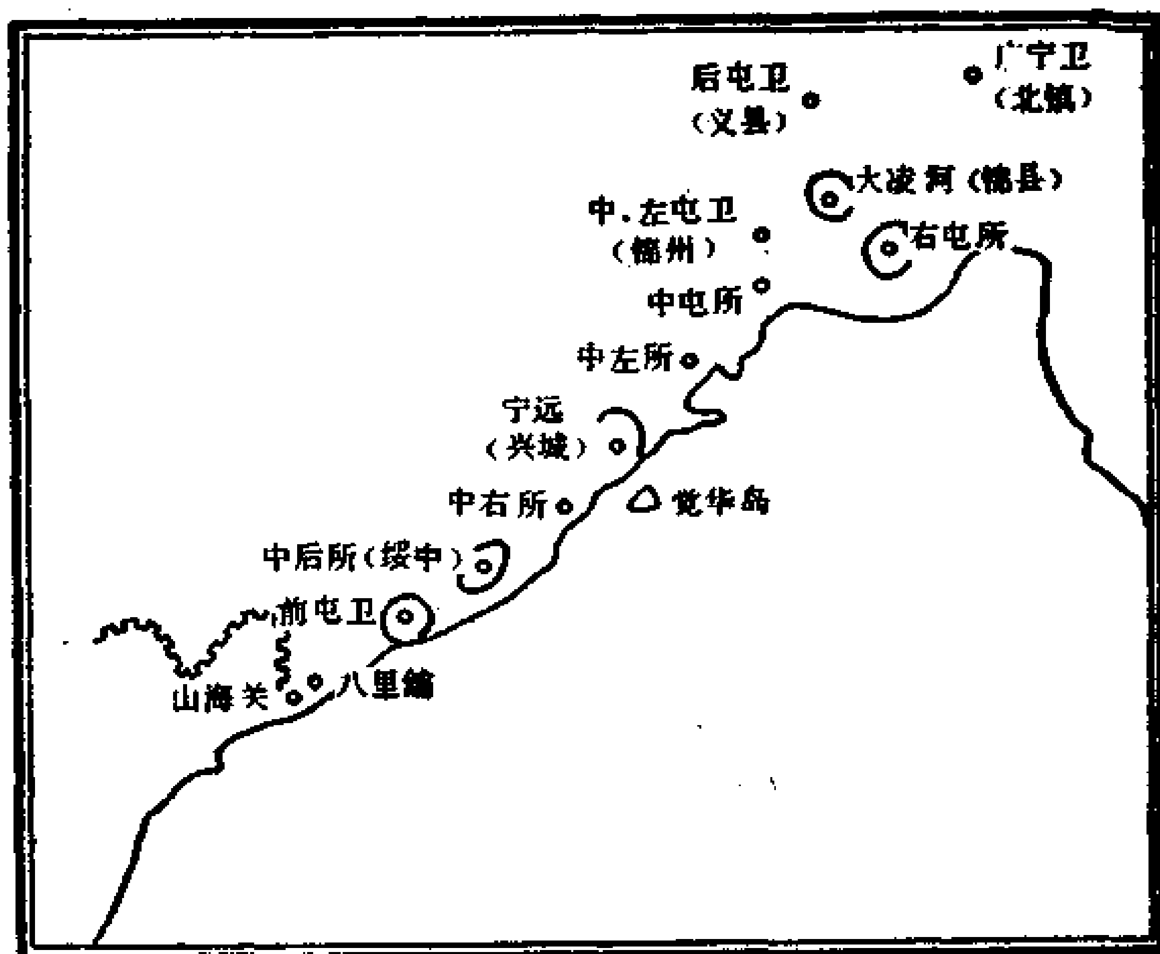
不久，又面奏王在晋"不足任"，朱由校即调王为南京兵部尚书，命孙承宗以原官督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

孙承宗到任后，即积极整顿防务，并按预定方案将阵地逐渐向前推进，"初移之中前为四十里，再移之前屯为七十里，又再移至中后为百里，又再移之宁远为二百里。"〔96〕并将前哨推进至右屯、大凌河（辽宁锦县）一线。在军队内部则定军制，建营垒、练火器、治军储，缮甲兵、筑炮台和招兵买马、组建骑兵等、辽东形势逐渐好转。

正当袁崇焕在孙承宗支持下在宁远筑城，加强战备的时候，明统治集团的党争又直接影响了辽东军事。魏忠贤掌权，贬斥东林，将与东林有关的孙承宗排挤罢官，以高第继任兵部尚书及辽东经略。孙承宗在关四年，成绩显著，"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大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97〕使努尔哈赤无隙可乘，关东人民得到安定生活，免遭战乱之苦。

高第到任之后，又蹈袁应泰的复辙，一反孙承宗、袁崇焕过去的作法，命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诸城守军，将器械、枪

明孙承宗关于宁远防御配置示意图　（32—6图）



炮、粮秣等移至关内，准备放弃关外四百里。担任宁前道的袁崇焕竭力反对，认为“三城已复，安可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亦失保障”〔98〕。但高第不仅不听，反进而要撤守宁、前二城。袁崇焕表示：“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99〕高第无奈，“乃撤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入关，委弃米粟十余万。而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100〕

善于掌握进攻时机的努尔哈赤，侦知经略易人及大撤退的狼狈情况后，抓住战机，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正月十四日，率十三万大军向辽西走廊进军。二十三日进抵宁远。宁远守军共

一万余名，袁崇焕面对强敌，后无援兵，处境极为不利。他与众将会议，决定不出城迎战，而集中兵力严守城防。将射程远、威力大的红夷炮设置城上；规定防区，分地防守，互相支援；坚壁清野，尽焚城关民居，将居民转移至城内；组织巡逻队，昼夜派人守卫街道巷口，防止内奸、敌探；组织后勤服务队，供应饮食，输送弹药。

努尔哈赤派人诱降，为袁崇焕严词拒绝。二十四日后金军开始攻城，主攻方向为西南城角。袁崇焕派祖大寿率预备队加入战斗，明军依托工事，充分发挥火器威力，以大炮、火铳等实施密集火力射击，并以炸弹、火球等投掷。后金军伤亡惨重，其挖城军士亦为明军用铁绳系火烧死。从清晨至深夜，城下尸体堆积。二十五日努尔哈赤再督军攻城，激战终日后金军仍败。并有书记载说努尔哈赤在进攻时受伤。二十六日派军攻破觉华岛，焚战船二千余艘，全歼明军。二十七日解围撤走。宁远之战，以明军胜利、后金军失败而告结束。这是明军在辽东战争发生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也是努尔哈赤四十年战争生涯中的第一次失败。他"自二十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101]返至沈阳（已于去年迁都于此），悒悒不乐，当年七月患痈疽，八月十一日病死。

努尔哈赤过去攻城，多以诱敌出城，在野战中歼其主力和派遣间谍、先期潜入城内，战时里应外合而取胜。这次袁崇焕采取坚壁清野，据城固守的方针，又无夺门的叛民和内应的奸细，致努尔哈赤不能发挥自己的长处。努尔哈赤骄傲轻敌，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采用硬攻，违反了他自己所讲的攻城必操胜算而后动的原则，结果导致失败。袁崇焕依托城防工事，充分发挥火器的杀伤作用，组织周密的城防战斗，坚决不出城野战，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这种作战指导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因而取得胜利。

除军事上的直接原因外，政治因素也起了很大作用。努尔哈赤占领辽、沈、广宁等广大地区后，为加强其对汉人的统治，用

极残酷的手段强行实施剃发、移民、查粮、劳役等民族压迫政策，大肆屠杀，如在镇江将不愿剃发的男人全部杀死，将其妻子一千余人分赏官兵为奴隶；在义州（今朝鲜新义州东北）一次就将不愿迁移的汉人杀死三千多人；甚至逐户清查存粮，凡每口平均有粮不足五升而又没有牲畜的汉人降为奴隶，以后又下令杀死。这些暴行，引起明和后金两统治区内的辽东人民的不满和恐怖，从而促使宁远居民拼死与军队团结抗击后金军的进攻，大大提高了宁远明军的战斗力。

努尔哈赤的战略战术思想

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继承祖辈遗甲十三付起兵，当时不过百人，在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的情况下，经过三十多年的战争，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后金政权，兵力发展到七万人。进而又向明王朝进攻，夺占了沈、辽地区。以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尚处于发展低阶段，而人口又远远少于明统治区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竟敢于向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庞大中央政权——明王朝发动战争，并使它“合四海之力不能支”，为清王朝的建立奠基立业，这当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直接、主要的原因，则是战争的胜利，而战争胜利的获得，又是和努尔哈赤的战略决策适合客观实际，作战指导符合战争规律分不开的。

努尔哈赤的家庭出身、社会经历以及他个人的刻苦努力，使他不仅接受了先进的汉族文化，并开拓了眼界，磨炼了意志，丰富了智慧，而且学得了我国汉、蒙、女真族的优秀军事遗产。青年时就“好看三国、水浒二传，自谓有谋略。”〔102〕他的一生是在战争中渡过的，可以说是身经百战。其中由他亲自指挥的重要战役、战斗共十次，〔103〕九次全胜，只最后一次宁远战役是失败的。绝对的常胜将军是不存在的，九胜一负，而且大多数战役都是处于战略劣势情况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因而，应当说努

尔哈赤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当然，他也是一位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杰出的政治家。

努尔哈赤在进攻乌拉的一次战斗中，曾将乌拉比喻为大树，用以教导他的儿子皇太极等说："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104]这就是形成他的战略战术的根本指导思想。其实质是：紧抓主动权，不断打击、孤立主要敌人，造成局部优势，以逐渐削弱、降低敌人的战斗力，逐渐壮大、提高自己的战斗力，由量变发展为质变，改变强弱形势，最后消灭敌人。这种思想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他起兵之初，人不过几百人，地不过数十里，要想在互争雄长的混战中站稳脚跟并进而统一女真，甚至后来还与财力、物力、人力、疆土等都远远超过自己的明王朝相抗衡，如果没有这种准备持久作战、逐步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是根本不可能达到他的政治目的的。

努尔哈赤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了利用矛盾、联小击大，远交近攻，先弱后强、逐步蚕食各部、最后达到统一的战略方针。努尔哈赤企图统一女真各部，最主要的矛盾是明军是否干预、制止。明王朝统治各少数民族的政策是"分而治之"，即"分其枝，离其势，互令争长仇杀"。虽然当时明王朝政治上已腐朽透顶，经济上已濒于崩溃，内部又矛盾重重，军队战斗力较前下降，开始走向灭亡；但它毕竟是一个统治全国二百多年的中央政权，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当时还没有达到土崩瓦解的程度，对于兵少地微，尚未统一女真的努尔哈赤来说，仍然是一只活老虎，如果以主要力量对付努尔哈赤，则努尔哈赤的统一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他之前和同时，企图统一女真而力量又较他强大的大有人在。如建州部的王杲、阿台，叶赫部的清佳砮、杨吉砮等，都因为反对明王朝的干涉、公开与明军对抗而被歼灭。努尔哈赤从别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战略上始终避免与明军公开对抗，并采用一切手段骗取明王朝的信任与支持，使这种可能的敌对因素变为有利因素，"借中朝名号耀东方，"[105]在女真各部

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还从明王朝得到经济上的支持，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与此同时，尽力与蒙古科尔沁、喀尔喀部各首领联姻、结盟；与朝鲜交好缓和矛盾。这就把来自三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明王朝威胁，减至最小限度，使他可以专心致力于女真各部的统一。从战略角度看，这是他能够顺利地完成统一女真的关键所在。在对女真内部也同样采取这一方针，征服建州各部时，积极与当时最强大的海西四部结盟，娶叶赫首领杨吉砮的女儿为妻，先后以二女一侄嫁给乌拉首领布占泰，并与哈达、辉发订立婚约，终于赢得了时间，统一了建州。然后再由小到大、先弱后强地逐个消灭海西四部。等到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军事实力已足以与辽东明军抗衡时，才以“七大恨”为借口，将进攻矛头指向明王朝。同时还进一步笼络蒙古、朝鲜，以尽可能缩小敌对面，防止多面作战，解除后顾之忧。

努尔哈赤的另一战略思想。是主张智取谋伐，不劳兵力。努尔哈赤在建立了后金政权的第三年（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曾向各统兵的贝勒们颁发了他写的兵法。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征伐之道，贵在计谋。以不劳己、不累兵之智谋为上。倘不劳我兵而胜者，诚为智巧谋略之良将也。若劳我兵力，虽胜何益？征伐之道，以我无些须之损而取胜，是为善之善者也。”〔106〕这是他一生作战经验的总结。基本上已达到了他所处时代对一般战争规律所能认识到的高度。当时的兵书上说：“攻围、战、守、御五者，因敌以制变，斯胜矣。故拔敌之城而非攻也，致敌之降而非围也，寝于庙堂之上而非战也，散于原野之间而非守御也。如不得已而必至于用兵，则不多旅，不久师，不暴卒，不角力，惟谋以为之本”。〔107〕是和他的战略思想一致的。

在他的兵法中，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战法，也有具体的论述。例如他说：在野战时，“若我众敌寡，我兵潜伏幽邃之地，毋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是中我计也；诱而不来，即详察其城堡远近，远则尽力追击，近则直薄其城，使壅集

于门而掩击之。倘敌众我寡，勿遽近前，宜予退以待大军。俟大军既集，然后求敌所在，审机宜，决进退”。至于对城市的攻坚战，“当视其地之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损名矣”。从他经历的各重要战役来看，他确是在上述战术思想指导下指挥作战的。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在战争中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机动灵活地对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战法，以求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胜利。

努尔哈赤战略思想的又一特点是善于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集中兵力，是古今中外用兵的重要原则。早在春秋时期，《孙子兵法》就提出了“我专而敌分”和“以众击寡”的命题；〔108〕至战国时，《六韬》对此又有发展，认为用兵必需兵权专一、行动统一，达到兵力集一，才能“独往独来”，保持行动的自由，掌握战场主动权。〔109〕努尔哈赤指挥的各次战役，都符合上述战争指导规律，都体现了他用兵的特点。特别是萨尔浒战役，他紧紧掌握“凭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原则，“独往独来”，以各个击破的战法，打破了四路明军的分进合击，是他战略战术思想的典型体现。这正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110〕

努尔哈赤久历战阵，率其八旗劲旅纵横驰骋于东北大地，一向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不料在六十八岁时，竟在宁远遭到用兵四十余年来的第一次惨败。其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除了人心向背，三年未战将领有所懈怠，士兵斗志不高，特别是对手袁崇焕指挥正确，措施得当等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努尔哈赤在指挥上因轻敌而犯了错误，违背了客观战争规律，违背了自己一贯的战略战术思想。他在既“无夺门之叛民”，又无“内应之奸细”的情况下，去进攻城防工事与火力密切结合的坚城。我们都知道“在运动中(野战)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大量的骑兵。在阵地战中则相反，骑兵或者不起任何作用，或者只起次要作用。……”〔111〕努

尔哈赤以己之短，击敌之长，终于导致失败，造成终生遗憾。

注　释

〔1〕《史纪·五帝本纪》

〔2〕《国语·鲁语下》

〔3〕《左传·昭公九年》

〔4〕万户，官名。金初设置，为世袭军职。元代相沿，为万夫之长，总领于中央枢密院，驻于各路者，则分属于行省。万户府下属千户所。

〔5〕见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一，《辽筹》下册《题熊侍御疏牍叙》；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阿桂：《清开国方略》；徐乾学：《叶赫贝勒家乘》等书。

〔6〕《清史稿·王杲传》

〔7〕〔8〕〔13〕〔22〕〔32〕《满洲实录》卷一

〔9〕《老满文上谕》

〔10〕《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类》

〔11〕〔53〕〔56〕〔91〕《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辽左兵端》

〔12〕〔2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14〕〔35〕《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三

〔15〕猛哥帖木儿时的战斗编组即为左、中、右三军。《李朝世宗实录》二十年七月载："如有兴兵之事，则必使凡察领左军，权豆领右军，自将中军。……"

〔16〕牛录是满语箭的意思，额真是满语主的意思，牛录额真即箭主。《满洲实录》卷三载："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

〔17〕牛录额真改为官名，最早见于《满洲实录》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万历十二年的记载（公元1596年）。

〔18〕《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擢鄂尔果尼，罗科为牛录额真，统辖三百人"。

〔19〕串赤为牛皮盾牌。

〔20〕《李朝宣祖实录》二十二年七月："左卫长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兄弟……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军）：一曰环刀军，二曰铁锤军，三曰串赤军，四曰能射军。间间练习，胁制群胡。"

〔23〕《明神宗实宗》万历四十年

〔24〕程开祜：《筹辽硕画·东夷奴儿哈赤考》卷首

〔25〕《明经世文编·辽左阽危已甚疏》

〔26〕《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十三。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二十一

〔28〕《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29〕《李朝宣祖实录》二十八年十一月："老乙可赤（努尔哈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努尔哈赤之弟速尔哈赤）麾下五千余名。"

〔30〕《日本外史》

〔31〕《李朝宣祖实录》二十九年

〔33〕此按《满州实录》卷二所载时间。《三朝辽事实录》记古勒山之战比此晚两年，兵力也较此书为多，说联军七、八万人。

〔34〕李德启：《满文老档之文学及史料》，转引自李鸿彬：《论满族英雄努尔哈赤》。

〔36〕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

〔37〕《明神宗实录》万历二十一年闰十一月（内阁文库本），二十五年五月，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年十二月，三十年六月，三十六年十二月。转引自阎崇年：《努尔哈赤传》。

〔38〕《明神宗实录》三十六卷（内阁文库本）

〔39〕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的基础上形成的。随着满族的形成和不断扩大，满族才成为这个族的称谓。以往皆称女真、诸甲等，至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清太宗皇太极才下令"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

〔40〕《李朝宣祖实录》二十二年七月："老乙可赤（努尔哈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

〔41〕朝鲜《东国史略事大文轨》卷四十六。转引自《清史论丛》第一集。

〔42〕同上。努尔哈赤向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呈文："有我奴尔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里边疆"。

〔43〕《清朝文献通考·兵考》

〔44〕〔76〕朝鲜《光海君日记》九年二月，十三年三月。

〔45〕"七大恨"的内容各书所载不同，因清屡次修改之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较早，原文为："吾父、祖于大明禁边，寸土不扰，一草不折，秋毫未犯，彼无故生事于边外，杀吾父、祖，此其一也；虽有祖、父之仇，尚欲修和好，曾立石碑，盟曰'大明与满洲皆勿越禁边，敢有越者，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盟言，大明背之，反令兵出边卫夜黑（即叶赫），此其二也；自清河之南、江岸之北，大明人每年窃出边，入吾地侵夺，我以盟言杀其出边之人，彼负前盟责以擅杀，拘我往谒都堂使者纲孤里，方吉纳二人，逼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其三也，遣兵出边为夜黑防御，致使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此其四也；将吾世守禁边之钗哈（即柴河）、山七拉（即三岔）、法纳哈（即抚安）三堡，耕种田谷不容收获，遣兵逐之，此其五也；边外夜黑是获罪于天国，乃偏听其言，遣人责备，书种种不善之语

以辱我，此其六也；哈达助夜黑侵我二次，吾返兵征之，哈达遂为我有，此天与之也，大明又助哈达逼令反国，后夜黑将吾所释之哈达掳掠数次，夫天下之国互相征伐，合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死于锋刃者使更生，既得之人畜令复返，此理果有之乎？天降大国之君，宜为天下共主，岂独吾一身之主？先因糊笼（即扈伦）会兵侵我，我始兴兵，因合天意，天遂厌糊笼而佑我也，大明助天罪之夜黑，如逆天然，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妄为剖断，此其七也。凌辱至极，实难容忍，故以此七恨兴兵。"

〔46〕 《满文老档·太祖》卷二

〔47〕 《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六年

〔48〕 《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内阁文库本）

〔49〕 《明史·食货志》

〔50〕 兵力数字说法不一。今据《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主客出塞官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余员名；"《光海君日记》十一年二月乙亥："都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领三营兵马一万三千人，自昌城渡江；"《明史纪事本末·辽左兵端》："叶赫以二千骑赴三岔。"合计约十万人。

〔51〕〔63〕 《明神宗实录》万历四十七年

〔52〕 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

〔54〕〔55〕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

〔57〕〔60〕 乾隆书《萨尔浒战事碑文》

〔58〕 《清史列传·武理堪传》

〔59〕〔64〕〔65〕〔69〕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

〔93〕 《孙子兵法·谋攻篇》

〔61〕 《孙子兵法·地形篇》

〔62〕 《孙子兵法·形篇》

〔66〕〔67〕〔68〕〔82〕 《熊襄愍公集》

〔70〕〔80〕〔81〕〔83〕〔85〕〔87〕〔92〕 《明史·熊廷弼、王化贞传》

〔71〕 《明史·袁应泰传》

〔72〕 岁币，即明王朝以赏赐名义，每年给蒙古贵族首领的定额物资和金银。原来每年给林丹汗四千两，此时已增至四万两。

〔73〕〔75〕〔77〕〔78〕〔79〕〔84〕〔89〕 《明熹宗实录》卷八、卷三、卷二十

〔74〕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

〔86〕 后金军占领辽河以东地区后，金州、复州等卫军民及东山矿工，多结寨固守，以待明军。毛文龙袭破镇江后，很快即为后金军收复。努尔哈赤因而迁怒于辽东人民，大肆杀掠。各卫军民被迫逃至朝鲜境内，据铁山死守，曾杀伤后金军三、四千人。但终以孤立无援，兵力悬殊，被后金军歼灭。

〔88〕 此据《明史稿》、《三朝辽事实录》及《满洲实录》等书；《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及《明通鉴》作罗一贯。

〔90〕 《孙子兵法·计篇》

〔94〕〔95〕〔97〕 《明史·孙承宗传》

〔96〕 孙承宗：《高阳集》卷十九

〔98〕 《明史·袁崇焕传》

〔99〕〔100〕 周文郁：《边事小纪》卷一

〔101〕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102〕 黄道周：《博物典汇·四夷》卷二十

〔103〕 古勒山之战，哈达之战，辉发之战，乌拉之战，清抚之战，萨尔浒之战，叶赫之战，沈辽之战，广宁之战和宁远之战。

〔104〕 《满洲实录》卷三

〔105〕 彭孙贻：《山中闻见录》

〔106〕 《满文老档·太祖》卷六

〔107〕 何守法：《投笔肤谈》上卷《本谋第一》。

〔108〕 《孙子兵法·虚实篇》："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109〕 《六韬·武韬·兵道》："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来独往。……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

〔110〕 毛泽东：《论持久战》

〔111〕 斯大林：《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第三十三章　明、清争夺辽西及清军入关的战争

第一　宁远战役后的形势发展及明、清（后金）双方的战略

萨尔浒之战，开始改变了辽东明军与后金军的力量对比，明军陷于被动，而后金军则由对明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开原、铁岭、沈阳、辽阳以及广宁等军事重镇，相继为后金军攻占。努尔哈赤认为“既征大明，岂容中止”〔1〕，为了进一步扩展和巩固既得的胜利，乘辽东明军统帅易人，新任经略高第放弃锦州，松山等前进要点，将主力撤至山海关的有利时机，率军西进，企图一举攻占明军在关外的残存各要点，进逼山海关。不料在宁远却遇到明军的顽强抵抗。袁崇焕以不足两万之众，困守孤城，充分发挥火力与城防工事相结合的优势，终于重创后金军，迫使努尔哈赤解围撤退。努尔哈赤戎马一生，屡战皆克，晚年竟遭此败，精神颇受打击，当年八月，即在郁郁不乐中因病去世，由其第八子皇太极嗣位为汗。皇太极执政后，继续执行努尔哈赤进攻明军的战略计划，以夺取全国统治权，但由于形势的发展，皇太极的战略已较努尔哈赤有了许多重要的变化。

一、明王朝面临的战略形势及辽东明军的战略方针

宁远之战结束后，明军乘势又将阵地推进至锦州一线。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后金军再度包围锦州、进攻宁远，又被明军击退。由于明王朝内部党争的原因，袁崇焕

竟被免职。当年朱由校病死，朱由检即位为帝，他于次年（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再度起用袁崇焕“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并赐“尚方剑”，“假以便宜”。宁远两次战斗的胜利，虽然还不可能完全改变辽东明军的被动局面，但已迫使后金统治集团不敢轻易发动对明军的进攻，赢得了巩固和加强辽西走廊防御体系的宝贵时间。不过此时王嘉胤，高迎祥等领导的农民大起义，已经风起云涌、轰轰烈烈地在陕西地区爆发。地方报警、请兵的报告，不断送到北京。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力量均已日趋衰微的明王朝，又开始陷入内外交困、两线作战的更为不利的战略地位。

袁崇焕任辽东明军统帅之后，在熊廷弼、孙承宗等经营的基础上，继续执行积极的防御战略。他的战略方针是：

>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2〕

也就是他过去所说的：

> “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3〕

这个方针的实质，就是主要依靠辽东人民为兵源来保卫辽东；依靠军、民的屯田生产来维持军、民的生活；在作战原则上，以防御为主，以乘机出击为辅，也可适当的运用和谈以推迟敌人的进攻，争取时间，加强战备；至于防御本身，他认为明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这一方针基本上符合当时辽东的客观实际情况，是防御后金军进攻的较为现实的方案。根据这一方针，袁崇焕以宁远、锦州为重点，修复大凌河（辽宁锦县），小凌河（锦县东南），右屯（锦县东）等各城，增派部队防守；形成能相互支援的纵深防御，以控制辽西走廊。并在该地区兴办军、民屯田，招抚各地流民参加生产，恢复经济，建立行政组织。

二、后金政权面临的战略形势及皇太极的战略方针

努尔哈赤去世之后，在大贝勒代善的支持下，皇太极登上了汗位。他执政后，雄心勃勃，决定承袭努尔哈赤未竟的遗志，把入主中原、夺取明王朝的全国统治权作为他的基本战略目标。但主要以军事力量建立和维持的后金政权，由于发展迅猛，内部矛盾也随之处处露头，事实上当时已处于“邦家不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皇太极面临的战略形势，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相当严峻；形势如不好转，战略目标难以实现。从后金政权统治区的内部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政治上矛盾严重

首先是满洲贵族与广大汉族人民之间的矛盾严重。满洲贵族以征服者自居，把生活在后金统治区内的汉族人民看成是自己的战利品，使他们饱受残酷、沉重的民族压迫，不少人以逃亡、投毒、暗杀以至武装暴动等方式进行斗争。其次是农奴主与广大农奴之间的阶级矛盾严重。后金新兴的军事贵族农奴主，差不多都是由奴隶主刚刚转化而来，仍带有浓厚的奴隶主阶级的色彩，对农奴的阶级压迫和经济剥削，异常沉重，许多农奴必须为主人承担繁重的差役，甚至父、孙三辈同时服役，这当然要激起广大农奴的反抗和逃亡。第三是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相当尖锐。努尔哈赤死前，因继承人褚英被废，为协调与解决后金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和斗争，制定了八和硕贝勒共同主政的制度，即所谓“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理”。[4]战争中抢掠的人口财物，也是由八旗旗主平均分配，“有人必八家分养，地土必八家拓之，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也不容贝勒”，“贝勒事事掣肘”，皇太极“虽有一汗虚名，实无异正黄旗一贝勒。”[5]实行这种带有军事民主制残余的倒退制度，当然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的需要，从而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并反映了集权与分权的严重矛盾。

（二）经济上困难重重

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不仅施行屠杀、移民等错误的政策，造成人口大量逃亡，土地荒废；即对尚留在后金统治区的汉族人民推行的“计丁授田”，也是将他们从自由农民下降为封建农奴，不可避免地要损害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明王朝和朝鲜李氏王朝对后金又采取了封锁与禁运政策，致使后金“银两虽多，无处贸易，是以银贱而诸物腾贵”，加以遭受天灾，“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人有相食者”。〔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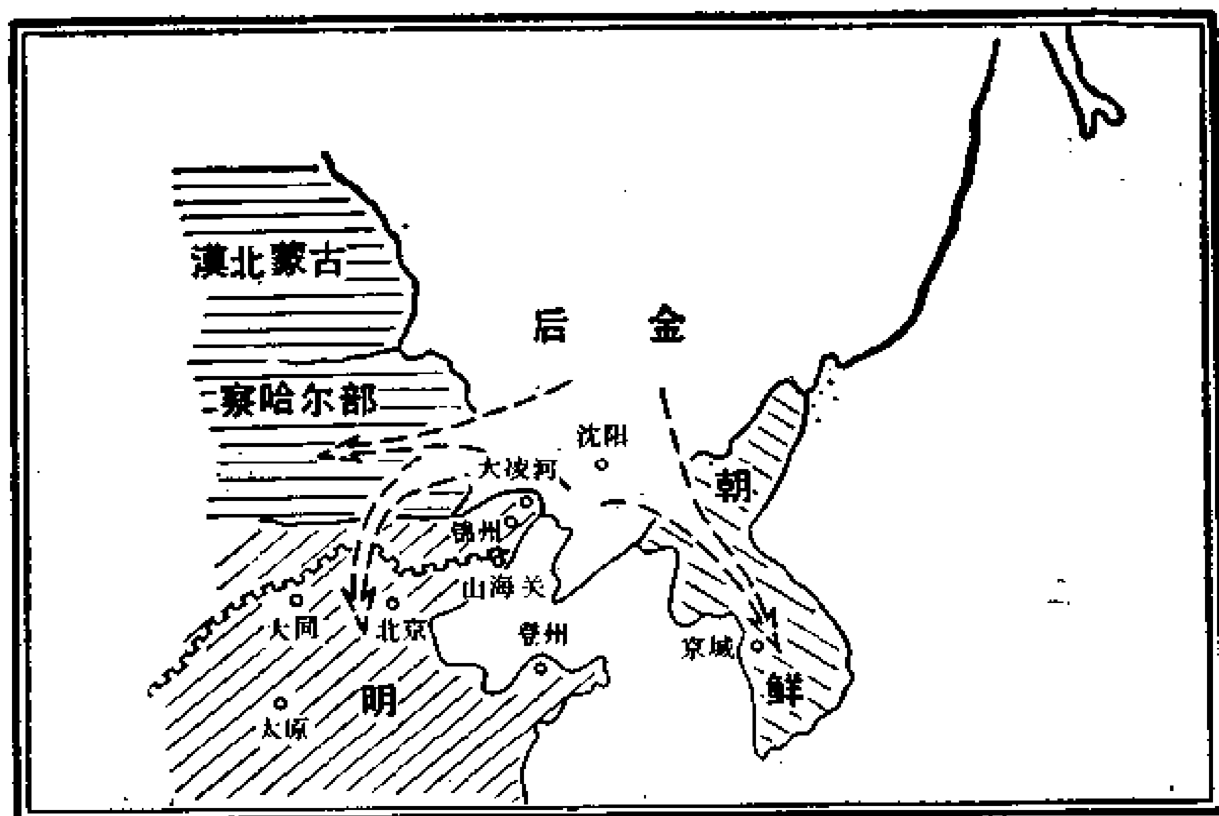
（三）军事上官兵士气下降

由于后金政权长期不断地进行战争，大批青壮年被征从军，按照八旗制度，战士的马匹及武器装备，均由个人负担，以至他们为出战“卖牛典衣，卖马制装，家私荡然”。〔7〕许多人“闻有征调，各抱妻孥相哭，祖昔之勇健悍鸷，稍有间矣”。〔8〕两次宁远之败，固然主要是作战指挥上的错误，但也反映了后金军队已经不是每战必胜的常胜军了。

以上是后金政权面临的内部形势，它面临的外部形势，同样也并不乐观。

首先，西邻蒙古方面，蒙古的地理位置，东接后金，西南连明，是双方争取的对象，具有举足轻重之势。明王朝尽力拉拢漠南蒙古最强大的察哈尔部林丹汗，支持他统一漠南各部，并每年给他岁币八万多两，企图利用蒙古与后金对抗。努尔哈赤虽然非常重视与蒙古的关系，曾在萨尔浒之战前，与喀尔喀五部结盟，约定合谋抗明，但这种口头上的盟誓，并不牢靠。当努尔哈赤与明军进行萨尔浒、沈辽、宁远等各次战役时，喀尔喀五部非但没有出兵帮助后金，相反地却多次背盟协助明王朝袭扰后金军的后方。只有科尔沁部，因需要后金军帮助它反抗察哈尔部的兼并，与努尔哈赤联姻结好，关系较密。但它的力量尚不足以自保，只能在后金与察哈尔部之间起一定的缓冲作用，并不能解除后金来自蒙古的威胁。总之，纵观努尔哈赤一生，虽然认识到了蒙古的重要性，并在战略上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总的成效并不太佳，未能完全达到自己的战略企图。

皇太极嗣位时战略形势及战略企图示意图
（公元1627年）　　（33-1图）



其次，东邻朝鲜方面，朝鲜与明王朝的关系一向十分亲密。特别是经过共同抗击日本入侵的壬辰战争之后，关系更为密切。努尔哈赤深知朝鲜在后金与明的战争中必然站在明王朝一边，但他为了不陷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所以虽曾以武力对朝鲜进行过威胁，但总的来说，仍是以拉拢、结好为主要策略。采取了许多措施，争取朝鲜背叛明王朝或保持中立。可是朝鲜李氏王朝不为所动，坚决拒绝，始终保持与明王朝的亲密关系，对后金采取敌视立场。

再次，明王朝方面，由于朱由检执政后放手重用袁崇焕，辽西走廊的防御体系日渐巩固。在宁远大捷的基础上，辽西明军不仅不再后退，反而逐步向前推进，重占锦州、大凌河等地区，并企图伺机恢复辽东。毛文龙等以朝鲜的铁山、皮岛等为根据地，经常以游击战术袭扰后金后方。

皇太极对当时后金面临的外部形势，是有所认识的。他说：

“汉人、蒙古、朝鲜与我四境逼处，素皆不协，且何国不受讨于我，积衅既深，辄相窥伺。”〔9〕

可见后金是处于明、蒙、朝三方的战略包围之中，从而使后金的安全受到威胁，假如一旦三方在战略上采取联合行动，对后金来说形势是十分危险的。皇太极对当时面临的形势，虽然有所认识，决心改变努尔哈赤执政时所实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方针。但当时仍是八和硕贝勒共同主政，许多人对努尔哈赤的过分依赖武力的缺点并未完全认识，皇太极本人对后金和明军的军事力量也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在他即位不久，即于明天启九年。（后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五月，亲率十五万大军进攻宁远、锦州。当时袁崇焕等守宁远，赵率教等守锦州，按照袁崇焕的方针，充分利用新修的坚强工事和与之相结合的强大火力，坚守不出，经激烈战斗，后金军攻城受挫，伤亡惨重，济尔哈朗、萨哈廉及瓦克达等重要贝勒多人受伤，再一次重复了努尔哈赤生前所犯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后金统治集团不得不认真分析形势，重新制订适合于客观实际的战略方针。

以皇太极为首的统治集团，认真分析了后金政权面临的内、外形势之后，认为要实现入主中原的战略目标，决非短期内单凭武力征服所能达到，必须作长期多方面的准备，而当前的主要任务，则是巩固和增强自身的实力。结论是“我国处南朝之大计，惟讲和与自固二策而已。”〔10〕实质就是通过和谈手段，争取时间解决面临的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达到自固的目的，尔后再相机发动对明的大规模战争，夺取全国统治权。正如后金朝臣高士俊所说，这是“借小心以图大事，假退步以求前进。”〔11〕皇太极的这个“讲和与自固”的战略决策，应当说是正确的，其实质是积极的。用武力建立和维持的后金政权，内、外矛盾重重，如不及时予以妥善解决，连是否能继续维持现状都成问题，哪里还谈得上夺取全国统治权呢。当时也有人对此持有不同政见，认

为明王朝统治不稳，朱由检初登帝位，明军又腐败不堪，主张大举攻明，以转移内部注意力的方式解决内部矛盾并一举灭明。这种意见显然是不合实际的。其他不论，仅以明王朝这个对象来说，虽然由于政治腐朽，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已经爆发，但其统治区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农民起义刚刚兴起，尚未形成致命威胁，以后金力量，企图一举灭明，谈何容易。以全军之众，攻一宁远，尚不可得，何况全国？！甚至有时都不能阻止明军对其后方腹地的袭扰。如努尔哈赤去世前不久，明军曾分由山海关及宁远两路夜袭耀州（今辽宁营口北），毛文龙并曾袭击过萨尔浒城。正如后金一位大臣所说：

“南朝虽师老财匮，然以天下之全力，毕注于一隅之间，盖犹裕如也。”〔12〕

皇太极接受二攻宁远的教训，说的更为深刻，他说：

“天予我以有数之兵。若稍亏损，何以前图？”

并指责主速进军的将领“是为敌人而损我兵”，是“以空言赚我而望敌人善”；〔13〕他还对共同执政的贝勒说：

“谓朕宜速出师以成大宗，此亦不达时势之见……若人心未和，虽兴师动众，焉能攻城必克，野战必胜。今以速出师为言者乃小人之浅见。”〔14〕

当然，皇太极的“讲和与自固”，仅仅是为了达到入主中原这个总战略目标而采用的阶段性战略方针，是下一阶段大举攻明的战争准备阶段。所谓“自固”，就是采用一切措施（包括战役、战斗上的进攻手段），不断削弱、疲惫敌人，以充实、壮大自己巩固与发展自己的实力，为大举攻明的进行战争准备；所谓“讲和”，只不过是争取完成战争准备的时间和麻痹对手掩护战备的手段而已。

第二　后金为巩固内部采取的政治、经济措施

皇太极为了争取时间解决后金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即汗位之初，就发动了和谈攻势。努尔哈赤去世时，明宁远巡抚袁崇焕为侦察后金动态，曾派傅有爵及留南木坐（李喇叭）前来吊丧。皇太极乘机派方吉纳等随傅去宁远，送给袁崇焕一封要求双方和好的信。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初，再给袁去信，提出谈和条件，当年冬，还向明帝奉书，希望议和。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皇太极在给袁崇焕的书信中，未书后金天聪年号，只写己巳年，表示顾遵明正朔以示求和诚意，随后又七次致书求和，直到这年末，皇太极率军入边，兵临北京城下时，还致书明帝，示以欲和。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公元1630年），袁崇焕在皇太极反间计下被朱由检杀死，皇太极继续向明锦州守将祖大寿求和。甚至寄信给大同、宣府等地明将求和。此外，皇太极还通过朝鲜、蒙古向明王朝转达他希望和谈的意愿，虽然多次均为明王朝拒绝，但皇太极始终不放弃议和的旗号。主要目的就是麻痹明统治集团，争取时间，解决面临的问题，进行攻明的战争准备；其次也有造成明不愿议和的表象以为借口激怒将士，团结内部。皇太极的这一策略，完全达到了目的。在大搞与明议和的幌子掩护下，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和军事行动等战略性措施，经过十年经营，扭转了面临的严峻形势，为下一阶段大举攻明创造了有利条件。皇太极的战略措施是逐渐形成的，在政治、经济方面主要是：

一、改善汉人政治地位，推行编户为民政策，以缓和民族和阶级矛盾

努尔哈赤对汉族人民，基本上是“抗拒者被戮，俘取者为

奴”的政策，皇太极则强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15]，”并果断地把努尔哈赤实行的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的政策，改变为每备御（后金官称）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将大量汉族奴隶解放为个体农民。当然，皇太极这样做，并非从汉族人民的利益出发，而是认为“此四处降民，为汉人未降者所瞩目，岂可令其失望。”[16]目的是在政治上收抚人心，缓和当前的民族、阶级矛盾，巩固后金的统治秩序，也为尔后进攻明王朝时减少汉族人民的反抗预作准备。

二、保护农业生产，发展社会经济，以逐步加强战争潜力

皇太极在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的同时，积极推行奖励和保护农业生产的政策。他认为：“劝农讲武，国之大经，”[17]对缺少耕牛等生产资料的农民，“给以牛具”，使能“乘时耕种；”[18]取消努尔哈赤时发布的不许迁移的禁令，对“无荒耕种”或“有洼下不堪耕种、愿意迁移者，听之。”[19]并下令停止了“有妨农务”的大规模建筑工程，规定以后“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20]还陆续发布了一系列保护农业生产的法令，使出征、狩猎、修路、筑城等事，都不得妨碍农耕。并禁止滥派民夫，使“徭役勿累贫民。”[21]此外，还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技术，以提高生产力。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为尔后发动大规模攻明战争，提供了可靠的物资保证。

三、提高汗位，集中兵权，以保证战争指挥权的统一

努尔哈赤是把军政大权集中在他一人手里的。所以他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般地指挥作战。现在皇太极为汗，却由八和硕贝勒共同主政，由三大贝勒轮流掌权，事事掣肘，且兵权分散，不能统一，当然无法适应进行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只有兵权和指挥权得到统一，才能统一行动、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战争。皇太极要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当然会遇到阻力，不可能一蹴而

就。他采用逐步限制、削弱对手的方式，先免去三大贝勒按月轮流值班执政的权力，再废除三大贝勒和他平起平坐的制度，以提高汗位。然后以各种借口，用幽禁、撤职、处罚等办法，先后将威胁汗位的三大贝勒除去，独自控制了三 个 旗 的兵力，逐渐将军、政大权都集中到自己手中，为发动大规模攻明的战争，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四、扩大兵源，增设汉军及蒙古八旗，以加强军事实力

后金军队原来只有单一的满洲八旗，用之与明军进行大规模的战略性决战，显然力量不足。所以在孔有德、耿仲明等率明军投诚后，皇太极没有再用老办法，将他们分隶各旗管辖，而是保留其原建制，使用黑色旗帜，仍由孔、耿统率。形成满洲八旗以外的两支由汉人组成的军队。皇太极由此联想到这些汉军“谙水战，习地利，”〔22〕可补满洲八旗只擅骑射的不足。用它们与明军作战，“以汉攻汉，则无不可矣。”〔23〕于是在明崇祯六年（后金天聪七年，公元1633年），更进一步令满洲八旗各户下的汉人，十名抽一，组成汉兵一旗，也使用黑色旗帜；同时又将满洲八旗中的蒙古牛录，集中编成蒙古两旗。至明崇祯八年（后金天聪九年，公元1635年），征服察哈尔部后，仿满洲八旗制度，正式编立蒙古八旗，旗制与满洲八旗相同。另外，还不断颁布军事纪律、加强军事训练和加紧制造火器。天聪五年，王天相等研制出大型火炮，称“天祐助威大将军”；连同在战争中夺获明军的红夷大炮，都装备了部队，大大提高了后金军的战斗力。实施这一措施的结果，不仅为未来大规模攻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而且对加强汗权，削弱八旗旗主及贝勒们的权力，也起了极大的作用。

五、团结汉族知识分子及归顺的明朝官将，以逐渐削弱，瓦解敌人，壮大自己

刚刚形成的满族，对汉族而言，还是我国一个经济文化落后，人口稀少的民族。皇太极认识到要想入主中原，达到夺取全

国统治权的战略目标，并长期统治土地辽阔、人口众多、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汉族，没有汉族地主阶级、特别是它的知识分子和上层官僚集团的支持，完全依靠武力征服是不可能实现的。努尔哈赤一生征战，确实培养了一大批能征惯战的军事将领，但他们大都缺少政治眼光与谋略思想，正如当时人所说：我国之攻城破敌，斩将搴旗者，实不乏人；守地治民，安内攘外，概未多见。清宗室后人也认为，国初决策的统治集团人物，“半皆贵胄世爵，不谙世务。”〔24〕这种情况对以后的战争以及扩大统治区的需要极不适应。所以皇太极在不损害满族贵族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录用通过考试、推荐的汉人知识分子，并重用投诚投降的汉人官将，使皆为我所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无非使其感恩图报，赞襄治理，有裨于国家而已。因而，范文程、鲍承先、张存仁等，先后都成为后金统治集团的智囊人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也接踵而来，率军投诚后金。实行这一措施的结果，不但解决了人才不足的问题，在削弱、瓦解明军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使后金政权改变了单一满族政权的性质，成为以满洲贵族为核心，有汉、蒙封建地主阶级参加的联合政权，扩大了统治基础，同时还利用他们丰富的军事、政治知识和经验，为进行战争、夺取和巩固全国统治权，在设计和制定战略、策略上，发挥重大作用。

第三　后金（清）为解除后顾之忧，创造有利形势采取的战略措施

皇太极的战略战术思想，是从努尔哈赤那里继承来的。努尔哈赤曾教导他说：

“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然后能折。相等之国，欲一举取之，岂能尽灭乎？且将所属城郭尽削平之，独存其都城，如此则无仆何以主，无民何以为

君？”〔25〕

皇太极完全接受了这一见解，他的战略战术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为了伐倒明王朝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木”，皇太极采取了“以斧斤伐之渐至微细”的办法，逐次、逐个地剪枝斩根，不断削弱和孤立明王朝。其主要措施为：

一、以武力强迫朝鲜结盟，切断明王朝的右臂，解除东翼侧的威胁

努尔哈赤在世之时，后金与朝鲜始终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但双方矛盾却在不断的加深和激化。皇太极一向认为有一个与明王朝保持密切关系的朝鲜存在在自己旁边，对后金安全是个威胁；特别是朝鲜李氏王朝大量收容辽东逃民和允许明军在其领土上建立袭扰后金后方的军事据点，更不能容忍。早在努尔哈赤去世前，皇太极就主张在大规模进攻明军之前，先征服朝鲜，认为不可置朝鲜于不顾而先攻辽东。但当时努尔哈赤正致力于对明战争，不愿两线作战，所以没有采用皇太极的意见，对朝鲜主要仍用政治解决办法。皇太极执政后，决心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即位不久，就决定对朝鲜用兵。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正月，皇太极派阿敏、济尔哈朗等大贝勒率军三万攻朝鲜，并企图消灭以朝鲜铁山为根据地的毛文龙部明军。十四日攻下义州，又接连攻下铁山、定州、安州、平壤等城，半月之中占领朝鲜过半。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接受后金条件，于三月初签定了《江都条约》，与后金结为“兄弟之国”尊后金为兄，与明王朝断绝关系。毛文龙由铁山逃至皮岛，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被袁崇焕以通敌罪名处死，其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不久率部投诚后金，后金东翼侧的威胁，暂时得到缓和。

二、利用矛盾，征抚兼施，消灭察哈尔部，以切断明王朝的左臂解除西翼侧的威胁

察哈尔部林丹汗，在明王朝支持下，企图统一漠南蒙古。但因

其单纯依靠武力征服，行为残暴，各部多有不服。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公元1628年）初，喀喇沁部与鄂尔多斯、喀尔喀等各部的联军，在土默特部的落赵城（内蒙呼和浩特境内）与察哈尔部军队发生激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皇太极及时地利用蒙古内部的矛盾，尽力拉拢联军各部，以保护者的身分，在九月间与联军各部结成联盟。并亲率后金主力进攻察哈尔部，击败了林丹汗尚未恢复元气的军队追击至大兴安岭，取得了初战的胜利。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三月，皇太极再次率领后金与蒙古各部的联军远征察哈尔部。林丹汗不战而逃。弃本土西奔。皇太极为了加强对蒙古各部的控制和统驭，次年八月，对各部颁布了法令，使后金与蒙古的关系，由军事同盟性质转变为实际上的从属关系。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林丹汗在青海病死，皇太极又派多尔衮率精骑一万进击其余部。次年四月，在河套地区俘获了林丹汗的妻子和儿子额真。察哈尔部灭亡，漠南蒙古完全统一于后金政权。这样，后金不仅解除了西翼侧的威胁，扩大了兵源，而且打开了由北方迂回进入明边的通路。

三、避实击虚，迂回入边，深入明王朝腹地，以破坏性作战，削弱对手

根据剪枝的原则，征服朝鲜、蒙古以切断明王朝的两臂，解除后顾之忧，固然重要，但还必须不断打击、削弱明王朝本部的战争潜力和军事实力，才能进一步转变战略形势。但袁崇焕和他的辽西走廊防御体系，不仅是后金进军关内的主要障碍，而且是明军恢复辽东的前进阵地。它的存在对后金政权的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更不要说发展了，所以在整个准备阶段，皇太极把攻占锦西走廊和山海关作为他的重要目标。但前后两次强攻，均遭挫败，皇太极有鉴于此，认为山海关、锦州防守甚坚，攻之无益，当先深入内地，取其无备城邑，破坏明朝的战争潜力。于是决定避实击虚，迂回入边，深入到明王朝的腹地，实行“断根”性的

破坏。明崇祯二年（后金天聪三年，公元1629年），后金军进行第一次试探性的远征。八、九月间，先派济尔哈朗等率军攻掠锦州、宁远附近地区，以吸引明军注意力于锦州方面；十月间皇太极亲率主力及蒙古各部军，共约十万人，避开宁、锦正面，由沈阳向西北方向迂回，经都尔鼻（今辽宁彰武）、青城（今河北平泉北）转军南向，攻破大安口（今河北遵化东北）、龙井关（遵化北）占领遵化城。然后直逼北京。明王朝宣布"都城戒严"，征四方明军入卫。袁崇焕、满桂等先后率军到达京郊。朱由检误中皇太极的反间之计（皇太极制造与袁有密约共取北京的假情报），将袁崇焕逮捕下狱，袁部将祖大寿率军退走山海关，满桂则在与后金军作战时战死，北京被围。皇太极认为明王朝"疆域尚强，非旦夕可溃者"，若攻北京，则"得之易，守之难，"〔26何况孤军深入，若俟明各路援军到达，将陷于被动。所以决心不攻北京，一方面继续作出求和姿态，留书给朱由检，一方面转移兵力，东攻滦州、永平，企图由背后攻占山海关。后在进攻昌黎时受挫，两次增兵，皇太极亲自督军攻击，都遭到失败。遂留二贝勒阿敏统军驻守永平（今河北卢龙）、滦州、迁安、遵化，自率一部回沈阳，企图抽兵回来，再打开山海关，以打开通路。但不久阿敏即为来援明军击败，仓惶逃回沈阳。皇太极两面夹击山海关的企图虽未能实现，但了解了明军虚实，又以反间计除掉劲敌袁崇焕，对明军起了一定的削弱和破坏作用。

此后，皇太极在议和的幌子掩护下，不断采用军事手段对明王朝进行打击和破坏。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接受攻坚屡败的教训，用掘壕筑墙以困之的战法，包围大凌河城三个多月，逼降了明守军。当消灭察哈尔部的战争基本结束之后，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发动了第二次破坏性的远征战役，仍向西北方向迂回，经哈喇落木（今内蒙多伦东）分四路于七月八日由尚方堡（今河北万全北）、德胜堡（今河北万全）、独石口（今河北赤城北）、龙门关（今河

北赤城东)入边，“蹂躏宣、大五旬，杀掠无算。”[27]虽曾先后攻下应州（今山西应县）、代州（今山西代县）、延庆（今河北延庆西）等州县，但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攻占城镇，如进攻大同、宣化、忻州等设防城镇，发现城坚难攻即弃城不顾，而是为了掠夺财物、人口，破坏当地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动摇明王朝的根本。

经过八、九年的经营，皇太极采取上述对内，对外的各项措施，逐渐解决了面临的许多问题，后金内部的民族、阶级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社会经济也有所发展，从而使后金力量日益强盛，特别是扭转了战略上“四境逼处”的孤立被围形势，完全实现了预期的“自固”目标。正如皇太极在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祭告努尔哈赤时所说：

“臣于诸国，慑之以兵，怀之以德，四境敌国，归附甚众。……朝鲜素未输诚，今已称弟纳贡。喀尔喀五部举国来归。喀喇沁、土默特以及阿禄诸部落，无不臣服。察哈尔兄弟，其先归者半，后察哈尔汗携其余众避我西奔，未至汤古忒部落，殂于西喇卫古尔部落打草滩地，其执政大臣率属尽来归附，今为敌者惟有明国耳。”[28]

这番话是符合客观事实的。至此，皇太极更不愿只做东北地区的统治者，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已提上议事日程。于是皇太极弃汗称帝，改后金为大清。明清战争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　明、清争夺辽西的松锦之战

经过十年的经营，皇太极认为基本上已达到了“自固”的目的，不需再以“讲和”为掩护。于是改汗称帝。为避免刺激汉族人民因金灭北宋的历史而产生反感，又改国号金为清，改民族名称女真为满洲，并改元崇德。给明崇祯帝朱由检写信说：

“自古天下非一姓所常有，天运循环……岂有帝之裔常为帝，王之裔常为王哉。”[29]

公开向明王朝宣称要争夺全国统治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皇太极决定采用先关外、后关内，徐图渐进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说先夺取辽西走廊及山海关等各战略要点，使自己立于进可攻、退可守的主动地位，然后再相机进取，夺占中原及北京，消灭明王朝。

在攻明战略上，当时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主张置辽西走廊及山海关于不顾，由山海关以西长城各口入边，直取北京，认为北京是明王朝的首都，占领了首都则中原可以传檄而定；另一种主张由山海关以西入边，先夺取北京附近各州县，内外夹击夺取山海关，打通关内外的通道，然后再攻北京；第三种就是皇太极所采用的方针。〔30〕

从当时具体情况看，皇太极所采取的方针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后金军曾两次入边，也内外夹击过山海关，但由于明军在山海关内外都有重兵把守坚城，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甚至连在关内立足也办不到。在这种条件下，清军如绕过山海关深入关内，就有被切断退路、遭到歼灭的危险，而且明军还有乘虚袭击盛京的可能。正如正蓝旗加喇章京盛忠所说："年来我兵入关内，累次破城获捷而不得坐守其地者，皆因关门阻隔，首尾难顾，是以得城而不能保"。〔31〕所以前两种意见都不可取，何况即使能夺取了北京，如没有消灭明军主力，也不等于夺取了全国统治权。皇太极始终贯彻他从努尔哈赤那里继承来的战略战术思想，从稳健出发指导战争。他认为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大业，和建筑房屋一样，必须"基址坚固"，才能巩固而不"速毁"如果"苟且成工"，"则不久圮坏"。〔32〕

一、进一步削弱对手，为争取辽西决战的胜利进行准备

皇太极为了能集中力量夺占辽西走廊，以实现他的战略企图，在原来剪枝断根的作战指导基础上，采取进一步措施，积极进行与明军决战的准备。他除了不断扩充军力、将汉军也逐渐扩编为八旗以外，主要是以军事行动继续打击、破坏明王朝的军心

士气、战争潜力，和进一步控制朝鲜，以彻底消除西线作战的危险，确保后方安全。

(一) 清军第三次入边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五月，皇太极称帝后的第二个月，命武英郡王阿济格统兵八万，第三次进入明边。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仍然和过去一样，主要是打击、破坏明王朝的军心士气和战争潜力。所以皇太极指示出征的将领，对边内各城，“度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勿取”。[33]六月二十七日，清军分三路先后进入独石口，攻占了雕鹗、（今河北赤城南）长安岭（今北京延庆西北）二城。明统治集团判断清军可能仍沿第二次入边的路线，西进山西。于是部署军队加强由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至固关一线重要关口，以防止清军由山西方向进攻北京。不料清军并未西进，由延庆南下，进入居庸关，占领昌平，经沙河、清河直逼北京。明统治集团急调山西、山东等地明军驰援，同时“命文武大臣分守都门。”[34]但清军的战役目的，并非攻占北京，遂绕过京城，攻占文安、永清，至雄县后回军攻香河、顺义、怀柔等城。八月下旬，进出至密云、平谷一带。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清军围绕北京，“遍蹂畿内”。九月初由建昌、冷口（均在今河北迁安北）出边返回，这次入边，清军共破十二城，虏获人畜近十八万。由各地集中到北京的援军，在明兵部尚书张凤翼统率下，尾随清军之后，竟不敢与清军交战，任清军从容撤走。

八月上旬，皇太极按予定计划，判断阿济格军“今将出边”，认为“宜别遣大军往山海关进发”，“明国知我兵至，恐山海关有失，必来救援，武英郡王庶得乘隙从容出边”。[35]遂派多尔衮及多铎先后于八月十二、十三两日出发，分由中后所（今辽宁绥中）、锦州方向进逼山海关，以调动明军，保障阿济格军安全出边。多尔衮军在山海关以北地区，曾与明军发生小的战斗。九月初，在得知阿济格军已返回后撤回盛京。

（二）清军第二次进攻朝鲜

皇太极第一次进攻朝鲜后，虽然订了“兄弟之盟”，暂时缓和了朝鲜对后金的威胁，但朝鲜并未真正屈服，也没有真正与明王朝断绝联系。所以双方矛盾也没有真正解决，皇太极为彻底清除后顾之忧，遂以朝鲜屡败盟誓，助明害我为借口，于第三次入边战役一结束，立即发动了第二次对朝用兵。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十二月初，皇太极亲率十万大军渡过鸭绿江，直指朝鲜京城。朝鲜国王李倧退守南汉山城，为清军包围，来援朝军均被清军击败。皇太极派多尔衮攻占江华岛，俘虏了李倧的王子、王妃及一部分大臣，李倧被迫投降，签订了城下之盟。其主要内容是断绝与明王朝的一切交往，向清朝称臣，建立从属关系。次年二月皇太极撤军，从此，清王朝从根本上消除了两线作战的危险，解决了后顾之忧，不但可集中兵力与明军作战，而且从朝鲜获得了大量人力、物力，进一步增强了军事实力。

（三）清军第四次入边

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公元1638年）九月，皇太极又发动了第四次入边战役。这次入边的目的虽和过去仍然一样，但为了更沉重地打击明王朝，付与入边清军的任务纵深远较过去为大。皇太极的战役部署是：多尔衮统八旗左翼兵为东路军，由青山关（今河北迁西东北）入边；岳托统八旗右翼兵为西路军，由墙子岭（今北京密云东）入边；两路军在通州会合后，再南下中原腹地；皇太极自率一部兵力佯攻锦州、宁远，以牵制明军，“使其东西疲于奔命，首尾不能相顾，我西征将士得以从容直捣中原。”[36]九月末，两路清军按计划先后入边到达通州。北京再次戒严，关闭城门，传檄各省军队入援。清军根据战役目的，绕过北京，由良乡、涿州分兵八路向中原地区实施广正面的进击。东路军主力沿运河，西路军主力沿太行山，其他六路在中间，并肩南进。明督师卢象升率五千余人在畿南巨鹿（今河北邢台东

北）附近抗击清军，因孤军无援，被围战死，全军覆没。除此之外，清军所至，明军披靡。清军进出至畿南一带，攻掠了广平、顺德（河北邢台）、大名等地后，向东转移，进入山东。次年正月，攻破济南，尔后回师北上，经海丰（今山东无棣）、天津、迁安，于四月间仍由青山关出边。皇太极在进至中后所地区后，也还军盛京。这次入边战役，清军深入至中原腹地，转掠二千里，旌旗所至，无不如意，比前三次入边活动范围广；由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十月入边，至次年四月出边，在明王朝统治区停留了半年，比前三次入边延续时间都长；清军前后共与明军战斗五十七次，歼灭大量明军，攻破七十余城，虏获人畜四十多万，金银百余万两，比前三次入边战果大，因而，对明王朝的打击、破坏也更为沉重。

皇太极四次入边战役，突出地体现了他"徐图渐进"的战略思想，从加强自身军事实力和削弱敌人战争潜力两方面而来逐步实现其夺取全国统治权的目的。四次入边的行动，不仅消耗了明王朝大量有生力量，掠获了大批军事装备，严重地破坏了它的经济基础，而且锻炼了清军的作战能力，积累了与明军作战的经验，并从明军的腐败和怯战的事实中，极大地提高了清军的士气，从而提高了战斗力，为尔后与明军主力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松锦之战

经过第三、四次入边战役及征服朝鲜之后，皇太极认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与明军主力进行决战的条件已趋于成熟，于是准备集中兵力攻取辽西走廊明军各要点。但在清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不同的看法。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正月，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向皇太极所呈的奏章，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们认为当前的战略方向有三种选择：一是避开辽西正面，仍由过去入边之道直接攻取明王朝的首都北京，即所谓"刺心之着"；二是避开锦州、宁远等地各要点，直接攻取山海关，即所谓"断喉之着"；三是先取锦州等要点，尔后再取山

海关，即所谓“剪重枝，伐美树之着”。[37]很明显，这仍然是过去三种战略方针的翻版。但此时已有不少大臣看出入主中原的关键问题是辽西走廊。如镶红旗加喇章京段学孔说：

“自朝鲜以及诸蒙古悉归版籍，天命有归已可见矣。但不得遂意中原者，盖以关门之未开耳。关门未开，盖以关外之八城未得耳。”[38]

皇太极更是坚持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决心先夺取辽西走廊，遂将军事行动的重心转移至辽西方面。

辽西走廊，就是锦州至山海关间、自东北斜向西南的窄狭地带。它东北起锦州，西南迄山海关，西北依松岭，东南濒勃海。宽约四十余里，长约四百里，是沟通松辽平原与关内的咽喉通道。锦州地处辽西走廊的东北端，是明军在辽西的军事重镇。大凌河被清军攻破之后，锦州已成为明军辽西防御体系的前沿要点，战略地位极为重要。锦州南二十里为松山，松山西南十八里为杏山，杏山西南二十里为塔山，塔山西南四十里即明军在辽西的另一军事重镇宁远。宁远是锦州的依托，锦州是宁远的屏障，自松、杏、塔三城则是保障锦、宁间交通连系的重要军事据点。明军要守住山海关，就必须守住辽西走廊，要守住辽西走廊，首先必须守住锦州。同样的道理，清军要夺取辽西走廊，也必须首先攻占锦州。锦州于是成了明、清双方必争之地，从而引起了松锦之战。这次战役从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三月开始，至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四月结束，从战役过程来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围困锦州阶段、决战松山阶段和清军占领锦松等四城阶段。

（一）围困锦州

皇太极定下先取锦州的决心之后，即开始进行准备，首先决定以靠近锦州的义州为前进基地，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三月，派郑亲王济尔哈朗、贝勒多铎为左、右翼军主帅，率军往义州屯驻，修筑城垒并实施屯田，以保障清军的后

勤供应，免除长途运输军粮的困难。

锦州、宁运及松、杏等城，是明军重点设防的要点，从熊廷弼、孙承宗至袁宗焕，经过多年经营，辽西走廊的防御体系早已形成。各城防御工事设施都较为完备，火器、火药及军需粮草的贮备也较为充分，又有两次宁远防守战的胜利经验，明军多采用“凭坚城，用大炮”的、火力与城防工事密切结合的战术。所以清军多次进攻锦州、松山等城，都未能成功，有时还遭到相当的损失。如明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二月，皇太极率数万大军及四十多门红衣大炮强攻松山，激战数日，清军伤亡二千余人，始终未能攻下。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公元1640年）四月间，清军攻锦州又受挫，“军兵大半见败，大将数人亦致毙”，以致盛京（辽宁沈阳）“行街之人，多有遑遑不乐之色，城外远处，则坊曲之间，哭声彻天。”在这种情况下，究竟应如何夺取锦州，就成了清统治集团面临的重要课题。皇太极在战役指导上，采用了张存仁、盛忠等的建议，改速决、强攻为持久、围困并辅以攻心的方针。在围困上，也不是单纯消极的围困，而是贯彻“困中带战，战中带困”[40]的原则。张存仁认为：

> “今日情势，围困锦州之计实出万全。但略地易以得利，而围城难以见功……愿皇上鼓励三军之气，坚持围困之策，……远不过一岁，近不过数月，自有可乘机会。……伏愿皇上以屯种为本，时率精锐，直抵锦城，而令于蒙古，以为间谍之计（锦州守军有一部分蒙古兵），再多擒土人兵卒，广布招抚敕谕，探祖帅（锦州明军主将为祖大寿）心事招之，体文士性情以安之，……此攻心之策，得人得地之术也。”[41]

在当时情况下，围困、攻心战术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自宁远战役以来，明军继承了袁崇焕的战法，坚守城防工事，避免出城野战，即使必须出城战斗时，也是以坚城为依托，以车营为骨干（装备火器的人力战车）。致使以骑兵为

生的八旗清军无所用其长技。只有采取困围战法，才能断绝明军粮饷，迫使其瓦解、归降。当然，要采用持久围困的战法，就必须作好阻援、打援的准备，否则很难成功。

皇太极将全军分为两班，以三月为期，轮流担任围困锦州的任务，以防止将士过度疲劳及日久懈怠。当年冬，多尔衮担任围城指挥时，执行围困不力，封锁不严，致使“锦州卫添入汉兵”，因而他以“不能防塞之罪”，受到“罚银一万两，降职一等，夺所领军兵六百名，”[42]的处分。济尔哈朗继任指挥时较为认真，派兵拔掉锦州外围所有明军据点，割掉城外的农作物，断绝锦州守军与外界的连系。次年三月，皇太极又加强了围困措施，令诸军环城四面建立八个营垒，营地四周“内打栅木，外挑濠堑，”并以深沟将各营外濠联结起来，使锦州城与外界“水泄不通”，“人影断绝”。同时调朝鲜军前来参战。这样不仅可以达到持久围困的目的，而且可以防御明守军的反击与援军的解围。

锦州明军主将祖大寿，部属中有一部蒙古兵驻守外城，与明军素有矛盾。皇太极乘隙用间，派人招抚。蒙古兵将领吴巴什等准备倒戈内应。事泄为祖大寿得知，蒙古兵提前于三月二十四日发动叛变，在清军支援下击败明外城守军，外城遂为清军占领，锦州形势危急。祖大寿派人潜出请援，并根据当时清军情况，告诫援军不妄轻进，建议结东营以拒清骑兵。

（二）决战松山

通过清军四次入边和入边后不能立足的事实，明统治集团也已认识到清欲夺取全国统治权的企图和辽西走廊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崇祯十二年（清崇德四年，公元1639年），当西线战场农民军一时受挫，起义转入低潮时，便将在西线战场镇压农民起义有功的洪承畴提升为兵部尚书，总督蓟辽军务，并调兵筹饷，加强东线的军事力量。当清军开始在义州筑城、屯田时，洪承畴就判断清军将图锦州，遂部署祖大寿、吴三桂二总兵率所部向北推进，增防锦州、松山，以加强辽西走廊防御体系的巩固性。当清军包

围锦州之后，洪承畴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初，将其指挥部推进至宁远，并亲赴松山前线视察。他认为辽西现有明军，仍"寡不足御"，一方面采取小规模出击的办法，策应锦州守军，一方面报请朱由检增加援兵和粮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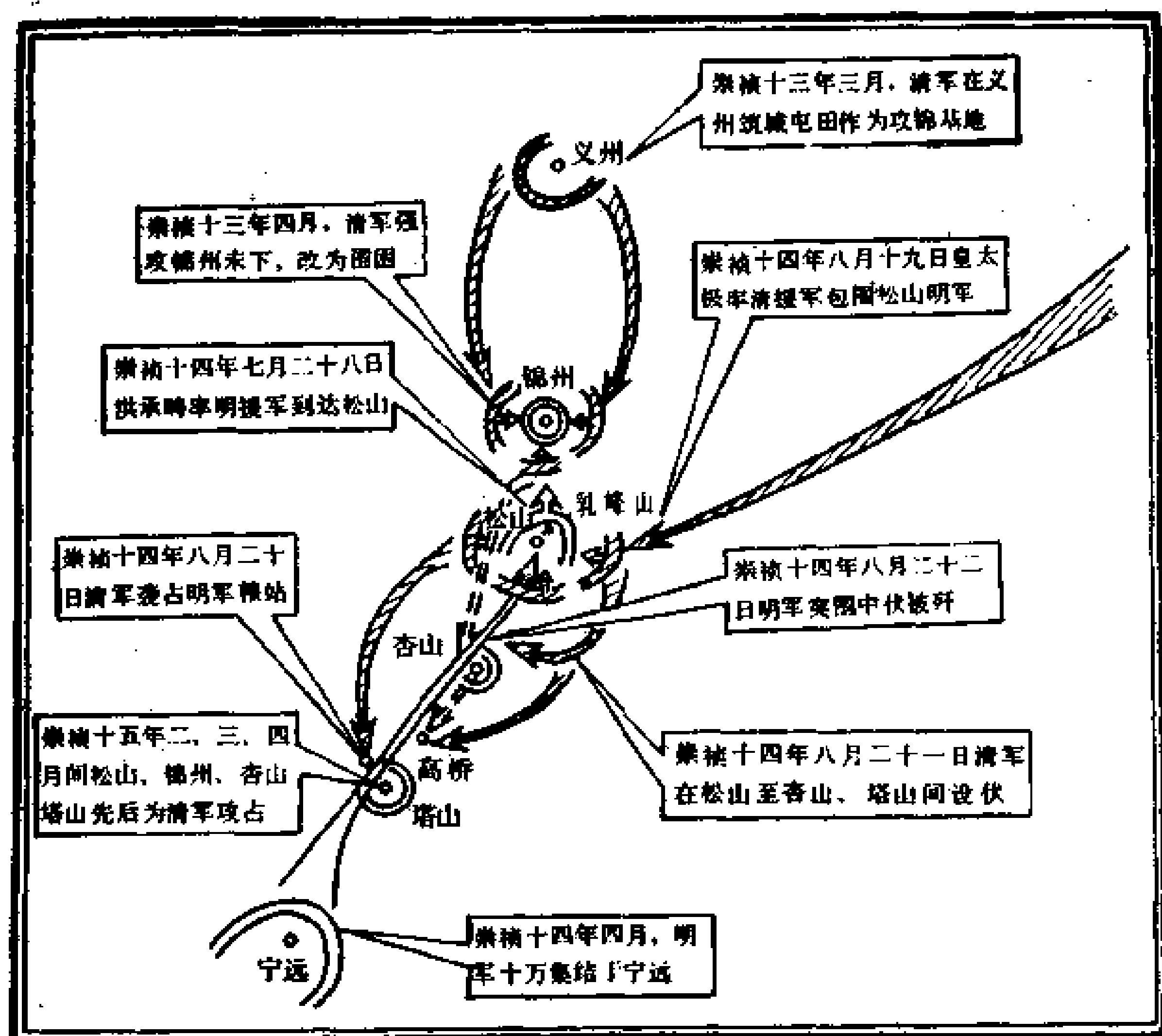
当清军开始围攻锦州时，张献忠部农民军正进军四川，逼近城都；李自成部农民军正进入河南，驰骋中原。当锦州危急时，张献忠部在四川开县大败明军后，正由四川转锋东向，攻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李自成部也已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正加紧围攻开封。西线明军被农民军打得焦头烂额，统帅杨嗣昌畏罪自杀。明统治集团接到洪承畴锦州告急的报告后，全面权衡了东、西两线战事的情况和得失，认为当前的主要威胁仍在东线，若锦州不保、辽西走廊及山海关失守，则首都北京将难以保住。因而决定仍将战略主要方向放在东线。由西线调宣府、大同诸镇兵马增援辽西。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三、四月间，明军已在宁远地区集结大军十万，号十三万。

在作战指导上，洪承畴采用了且战且守的战役方针，即避免过早地与清军主力进行野战决战，而是在加强各要点防守力量的同时，以宁远为基地，以松、杏等城为依托，在不脱离依托的条件下，与锦州守军协同，不断向围城清军进行反击，以消耗、疲惫敌人，尔后再相机寻求决战，解 锦 州 之围。在这一方针指导下，从四月到七月，明军曾多次依托松山据点进击锦州外围的清军，掌握了一定程度的战场主动权，获得了一些小的战斗胜利。如五月初三，洪承畴亲率部分兵力进至松山北岗，济尔哈朗与明军作战失利，"两红旗、镶蓝旗三旗驻营之地，为敌（明军）所夺"。[43]清军伤亡甚众。但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解锦州之围的战役目的。

明统治集团内部，对如何解锦州之围的战役方针，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以洪承畴为代表的统兵将领的主张已如上述；以新任兵部尚书陈新甲为代表的部分朝臣，以"兵多饷艰"为理由，主

明清松锦之战示意图

（公元1640—1642年）　　（33-2图）



张主力急进速战，迅解锦州之围。明帝朱由检的态度，基本上倾向于后者。五月间派兵部职方郎中张若骐赴宁远监军，又派兵部主事马绍愉至前线赞画军务。他们都是陈新甲的部属，附和陈的意见，主张速战速决。特别是到达宁远以后，看到锦州附近明军反击小有胜利，更加主张全军速进、与清军主力决战，并向朱由检报告“边兵可战”。朱由检遂密敕洪承畴刻期进军。

洪承畴迫于明帝旨意，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方针，率军急进，反击围困锦州的清军。在战役布势上，陈新甲主张分进合击、四面夹攻：一路出塔山趋大胜堡（锦州西北三十里）方向攻敌之西

北，一路出杏山经锦昌（松山西北二十里）而北迂回攻敌之北，一路出松山、渡小凌河攻敌之东，主力由松山攻敌之南。洪承畴接受了萨尔浒战役明军兵力分散被各个击破的教训，没有同意这一方案。准备集中兵力北上，俟集结于松山地域后，以部分兵力在两翼助攻牵制敌人，而以主力由正面实施中间突破。

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将辎重后勤分置于宁远、杏山及笔架山等处，自率吴三桂、王朴等八总兵所部步、骑十万，分两个梯队北进。二十八日进至松山及其以北的乳峰山一带。多尔衮等仓促迎战，"直冲汉阵，不利而退，清人兵马死伤甚多。"〔44〕双方交战数次，虽然未能解锦州之围，但此次"援锦大军用兵异于前，锦州围城之兵势不能挡"。〔45〕锦州城内明军，也乘机反击，收复了外城。战局逐渐向有利于明军的方向发展。此时马绍愉曾建议乘皇太极援军未到之前，迅速"乘锐出奇击之"，但洪承畴没有采纳。

皇太极得知"锦之围兵，屡战败衄，势将退北"〔46〕的情况和得到多尔衮等"急报请救"的报告后，立即于八月初七日派出第一批援军，同时"传集各路兵马，星集京师"，〔47〕并"悉索沈中人丁（十五岁以上满、蒙壮丁全部从军），西赴锦州"。〔48〕决定亲率全部兵力与明军进行决战。八月十九日到松山附近的戚家堡。

此时，明、清两军主力均已集结于锦、松地域，一场争夺辽西走廊的、带有战略性质的决战即将开始。这次明军是倾辽西之兵全力以赴，清军也是"空国而来"，双方都已投入最大可能使用的兵力，都没有战役的后续力量，而且兵力也基本相当。这场明、清双方都关系巨大的决战的胜负，就现阶段来说，主要决定于双方战役指导的优劣和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了。

松山的明军，高度集中：步兵立七大营驻屯于乳峰山，骑兵分三部驻屯于松山城东、西、北三面，都是深沟高垒。洪承畴的指导思想，仍然"且战且守"，"以守为战"，害怕兵力分散，一切从"稳"出发，实质上是消极自保，害怕被歼。

皇太极对明军的来援，早在意料之中，对整个战役指导方针及作战计划，也早已胸有成竹。汉军旗主石廷柱在七月间明军向宁远集结时提出的打援建议，基本上代表了皇太极的战役指导思想。其主要内容有三点：一是敌情判断。他认为锦州是辽西的"首镇"，守将祖大寿又是明军倚为长城的名将，现被我军围困，明王朝决不会置之不理，一俟秋凉，必集中重兵来援。二是打援准备。清军本来以三月为期分班轮换围困锦州，他建议目前担任围城战斗的部队"不必更换掣回"，将另一半兵力部署于义州"屯田之处，秣马驻防"，作为围城部队的策应，一旦敌援到达，可立即投入战斗。三是打援计划。他认为应分为两个步骤实施。第一步是力挫敌锋，发现援军到达，即集中兵力将敌包围，首先以四十门红衣大炮向敌营寨猛烈轰击，然后利用炮兵火力的效果，用骑兵实施集团突击，以期予敌重创，先挫其锋。第二步夹击歼敌。他分析"明援兵从宁远至松山，带来行粮不过六、七日，若少挫其锋，势必速退"，在敌人撤退必经的高桥隘路设伏，"凿壕截击"，另以劲兵追击，则敌人在前后夹击下，可能全部被歼。此外，他还将这次决战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说明王朝国运已衰，灾害频仍，内部又到处是农民起义，只要这次决战获胜，"定鼎之谟，在此一举"。[49]从以后战役进行的过程来看，皇太极基本上是按这一方案指导作战的。

皇太极在戚家堡开过作战会议后，即率有关将领赴前线勘察敌情、地形。他发现明军"大众集前，后队颇弱"，军队过度集中，没有后续力量，认为"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50]遂针对明军部署上过度集中的弱点，集中主力陈师于松山、杏山之间，自乌忻河南山至海，横截大路，绵亘立营。对明军构成包围，将通往松山的道路全部挖沟断绝，切断明军粮道及退路。

明军发现被清军包围，军心恐惧。二十日拂晓，明军向清军发动进攻，当日未分胜负。皇太极于当日派兵袭破笔架山，夺获明军粮草，明军士气更受影响。洪承畴害怕步、骑分驻被清军分

割，当天将乳峰山七大营步兵也全部撤至松山，使十万大军猬集在宽长不过三百米的小城四周，二十一日晨，明军再度向清军进攻，双方死伤相当，仍未能分出胜负。但明军将领多因被围及粮断而气馁，失去决战的勇气。正如当时人所说："汉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气挫势穷"。[50]当天战后，洪承畴召开军事会议，研究作战方案，不少将领都"因粮缺议回宁就食"。[51]在此情况下，洪承畴自己也因粮运断绝和将领怯战产生了动摇。特别是那位一直主张速战速决的监军张若骐，这时一反过去，竟同意返宁就食。洪承畴于是改变决心，决定南逃宁远。定于次日突围。

二十一日战后，皇太极已判断"今夜敌必遁"，[52]遂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凡明军退往杏山、塔山等的道路，全部派重兵把守，准备堵击。

洪承畴本预定次日突围，但此时军心业已涣散，将领"各怀异志"，部队已失去控制。总兵王朴于当晚擅自先逃，于是吴三桂、马科等各总兵均争先撤退，沿海向杏山逃奔。步骑兵自相践踏，在清军前堵、后追打击下，死伤极众。当明军争先突围时，总兵曹变蛟一军冲入皇太极营中，清军主力多已派出堵截明军，营内空虚，清"军中大惊"，惊扰达旦，形势几乎发生突变。可惜没有后续力量，曹变蛟又在战斗中受伤，只得退回松山，与总兵王廷召部会合后，随洪承畴撤入城中。吴三桂、王朴等人及六镇残兵，陆续逃至杏山城内，监军张若骐和马绍愉由小凌河口乘船从海上逃至宁远。皇太极判断逃入杏山的明军，必然再奔宁远，于是派军至杏山、宁远之间扼险设伏。不出所料，二十六日吴三桂、王朴等率残部由杏山向宁远转移，途经高桥中伏，死伤殆尽，吴三桂、王朴等仅以身免。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清军到处搜索，将明军溃兵全部歼灭，投海死者无数，明军被歼五万三千余人。

（三）清军占领松、锦等四城

皇太极在歼灭明军突围部队后，命济尔哈朗负责继续围困锦州，命阿达礼负责围困松山，命蒙古科尔沁亲王武克善等负责围困杏山及扼守高桥，防止被围明军向宁远突围。围城清军，筑墙挖壕，一如锦州。

洪承畴突围失败被困松山后，朱由检令他死守待援，徐图大举。但事实上此时明军在西线战场正吃败仗，追击李自成的四万多明军，在河南全部被歼，总督傅宗龙亦被俘杀，明王朝根本无力在短时间内再组织一支有足够兵力解松、锦之围的战略机动部队，结果对辽西未发一兵。洪承畴曾数次组织突围，均未成功。期望明王朝派兵来援，也杳无音信，粮食日益缺乏，发展到杀战马、人相食的凄惨境地。松山副将夏成德叛明降清，派人与清军相约，许为内应。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二月十八日夜，在夏部接应下清军攻入松山城内，洪承畴、王廷召、曹变蛟等均被俘，明军全部被歼。

清军攻占松山后，一面加紧对锦州的军事围困，一面加紧对祖大寿进行政治攻心战，派松山被俘的祖大乐入城向其兄祖大寿劝降。锦州此时被困将近二年，祖大寿见松山已失，援军无望，遂于三月十日率众出降。四月八日，清军攻塔山，次日城破，明军七千被全歼。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攻杏山，明守军七千投降。至此，持续两年的松锦之战，以清军大获全胜而告终。宁远以北四城及所有据点，全部为清军占领，辽西走廊基本上为清军所控制。

三、明、清双方胜败的主要原因

松锦之战，是皇太极为夺取全国统治权而发动的一次带有战略性质的决战。对明、清双方来说都具有生死存亡的巨大意义。松锦之战的胜利，使皇太极基本上实现了他战略总方针的第一步，为清军入关、入主中原、扫清了道路。明军的失败，使其主力精锐丧失殆尽，再也无力组织反击。同时，也大大削弱了在西线镇压农民军的力量，加速了它灭亡的过程。

清军之所以获得全胜，除了战略方针符合客观以外，就战役本身而言，主要是皇太极的战役指导较好：

（一）战役主攻方向正确

当夺取辽西走廊的方针定下之后，清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虽然暂时得到统一，但主要方向指向何处，打击目标选在哪里的问题并未解决。不少大臣认为主要方向应指向关门，先打山海关。如祖可法认为："我皇上欲取北京成大事，必先取关外各城；欲取关外各城，必先取山海"，攻下山海关，则"北京折其左臂，宁锦断其咽喉，关处各城不攻自服，……北京指日可得，大事不难成矣。"〔53〕再如姜新奏说："山海关乃北京之门户，蓟辽之咽喉也。北京之有山海关，犹秦之潼关，蜀之剑岭，虞虢之下阳也。潼剑不守而秦、蜀灭，下阳一举而虞虢亡，山海得则北京之门户不守，蓟辽之咽喉断绝，关外八城，不烦一矢，自来归顺。"〔54〕又如张存仁等也持有"要关外八城，必先取山海"〔55〕的看法。假如按照这些意见将主攻方向指向山海关，则必须迅速攻破关城，才能达到"断其咽喉"的目的，但事实上并不可能。宁远、锦州孤立关外，清军尚难以攻下，怎么可能设想越过宁锦向防御设施比宁、锦更为坚强的山海关重镇进攻、会一蹴而下呢？那时顿兵坚城之下，南有明援军在前，北有明坚城在后，四百里以上的道路均在明军控制之下，不但后勤补给困难，而且随时有被宁、锦明军切断之虞。那时腹背受敌、进退两难，恐怕不仅难以取胜，且有被歼的危险。皇太极没有为他们的意见所左右，坚持先取锦州，这是非常正确的。

（二）围困战术正确。

皇太极接受了过去攻宁远和攻大凌河的经验教训，采取屯田、轮换、挖壕、筑垒以及策反攻心等各种措施，对锦州实施围困，断绝明军粮饷、械弹、兵员等的补充，使之陷于绝境，使明军所持的火力与城防工事相结合的防御战术无法发挥，并可迫使明援军到自己选择的战场上来进行决战，使主客易势，以逸待

劣，掌握战役的主动权。

（三）打援作战指挥正确。

皇太极情况判断准确，预先即定下了打援腹案，胸有成竹，临危不乱，根据敌军的主要弱点和可能行动，指导极为适当，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首先是“隔”，包围锦州之初，就作好了隔开明援军的思想和物质准备，立营筑垒，坚决阻止明援军解锦州之围，这样就为清军主力到达进行围城打援创造了条件；其次是“围”，针对明军主力行动迟缓，害怕被各个击破、不敢展开而过度密集和携粮不多的弱点，以主力包围明援锦大军，采取先歼援军、再打锦州的作战指导，很有胆略和魄力；第三是“截”，判断明援军主力被围后，因缺粮难以坚持、必突围南撤，因而采取了全歼明援军的追击、截击等重要措施，极有预见。以上三点，皆击中了明军的要害，是获得这次战略性决战胜利的根本原因。

明军之所以失败，首先是明军统帅洪承畴的战役指导思想与明廷的战略指导思想相矛盾，没有贯彻明廷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当时明军困于东、西两线作战，兵力深感不足；能集中十万大军和八大总兵去解锦州之围，说明决心很大，是企图摆脱困境的重大战略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的战役指导方针，只能是速战速决。只有迅解锦州之围，歼敌一部，才能争取主动，使全盘棋子得活，以便下一步抽出兵力进行机动作战。十万大军长期耗在锦州战场，只能进一步愈陷愈深。洪承畴过于强调稳妥，缺乏积极进取精神，采用“且战且宁”的战役方针，实际上是力图自保，并不是想解锦州之围是完全违背全局战略利益的。

在战役指导上，陈新甲所提的广正面四路分进合击的方案，是一个既不知彼，也不知己的冒进方案。当时明军长于守城而短于野战，在总兵力并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实行分进合击是极为危险的。根据当时的战场形势，就明军的兵力而言，只能以歼敌一部速解锦州之围为战役目的，企图一举全歼围锦清军，是不自量力的表现。洪承畴没有采用这一方案而采用依托坚城、集中兵

力、实施中央突破方案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唯一可以速解锦州之围的可行方案。但洪承畴仅做到了依托坚城和集中兵力（过度的密集也是不适当的），而没有做到最重要的一环——中央突破，集中全力猛击锦南清军，歼灭该敌，抢在皇太极主力赶到前迅解锦州之围，仍然按“且战且守”的方针，逐次投入兵力，缓慢向前推进，给了清军半个月时间（从七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开始进攻，到八月十九日皇太极主力赶到戚家堡），让皇太极得以统率援军赶至战场，使自己陷于被动、被围，这是极为关键性的一步错误。

在战役进行过程中，洪承畴经常表现犹豫、动摇，缺乏统帅应有的果断精神，当激战两日、胜负未分时，虽然已被包围，但锐气尚存，仍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可能性时，作为统帅的洪承畴，不仅不能鼓舞士气、稳定军心，反而，受部属将领怯战情绪和监军张若骐想逃思想的影响，犹豫动摇，使研究决战的会议变为研究逃跑的会议，败坏了军心士气。这样的作战指挥，当然是要失败的，正如《吴子兵法》所说：

> “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一旦失误立即死亡），必死则生，幸生则死。其善将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烧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受敌（与敌决战）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

特别是在皇太极那样卓越的统帅为对手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此外，明军将领怯战怕死，关键时刻不肯拼搏，只想逃走，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至于广大明军士兵（包括少数将领），是不能负这次决战失败的责任的。不论守军还是援军，在具体战斗中，表现并不比清军差，并曾多次给清军以沉重打击。

四、战后局势的发展

明军在东线战场上的惨败，使明统治集团大为震惊；此时明军在西线战场上，也同样连遭惨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连续歼灭明军主力，并开始转变战略，攻下州县后，设官守地，

建立地方政权。明帝朱由检全面衡量了利害得失之后，认为农民军已变为明王朝统治的主要威胁，为避免两面作战，于是决心转变战略方向，改用东和西攻的方针，调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镇压农民军，对清则进行议和活动。早在杏山、塔山尚未失守之际，过去极力主张与清军决战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就秉承朱由检的意旨，派刚刚逃回的马绍愉出使清朝议和。皇太极在锦、松已下，塔、杏垂手可得之际，当然对和议不感兴趣，置之不理。塔、杏为清军攻下之后，五月间马绍愉再次携带朱由检的书信去盛京谈和。当时清统治集团内部有两种意见，满州贵族集团多认为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应拒绝和谈。汉族官僚集团则多认为：明寇盗日起，各方饥馑，兵力枯竭而仓廪皆虚，守边文武重臣，皆为我擒，兵将散失八九，今不得已遣使乞和，计必南迁，可允其纳贡称臣，划地以黄河为界。皇太极颇有战略眼光，他对李自成等农民军的发展极为关注，他不愿在这个时候攻取北京，致使自己与农民军直接冲突。而是企图让明军与农民军继续拚杀，互相削弱，自己保存和扩充实力，静观成败，尔后收拾残局，收渔翁之利。因而他既未采纳进攻北京的建议，也没有采纳压明王朝屈服、以黄河为界的建议，而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口头表示愿意议和，以促使明王朝集中全力去与农民军作战。

当时明向清请和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马绍愉带回皇太极同意议和的消息，不慎泄露，明统治集团的大多数官僚感到非常突然，于是舆论大哗，纷纷指责陈新甲，朱由检为保全自己的颜面，遂以陈新甲为替罪羊，处以死刑，于是和议夭折。

皇太极同意与明议和，并不是放弃他的战略企图，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战略企图的一种策略。现既然和议失败，于是继续执行他“伐大树必从两旁砍削”的剪枝断根的战略，于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十一月，发动了第五次深入明边的战役。以满、蒙、汉八旗（共二十四旗）兵力各一半，及

蒙古各部兵力共约十万余人，令阿巴泰与图尔格率领入边。为了贯彻他暂时不与农民军为敌、使农民军在客观上成为他灭明的盟军的策略，在出发前向阿巴泰指示说：

> “如遇流寇，宜云尔等见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如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56〕

十一月下旬，两路清军先后由界岭口（今河北迁安、抚宁交界处）、黄崖口（今河北古北口西）毁长城入边，攻破蓟州。然后经北京外围分兵南下，连破霸州、河间、永清等城，转入山东。至崇祯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春，进出至兖州地区后，在莒县、沂县会师，休息了一月，尔后仍分两路由山东、河北回师北上，一路经天津、北京南，一路经彰德、（今河南安阳）真定、北京北，至密云集中，攻占墙子岭，从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约一月时间，清军全部通过墙子岭出边返回盛京。这次入边达八个月之久，攻破大小城镇八十八座，俘人畜三十六万九千及大量金银物资。使京南千余里“一望荆榛，四郊瓦砾”，“民亡十之九”。不仅增加了清朝大量人力物力，削弱了明王朝的军事力量，而且严重地破坏了中原地区、特别是京畿地区的经济基础，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战争潜力，动摇和瓦解了明王朝的根本。正如当时人所说：“东夷（清）……所至屠掠一空，……国力耗竭，而事不可为矣。”〔57〕这也在客观上为李自成农民军进军北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正在明王朝东、西两线战场均遭惨败之际，西藏地方统治集团已认识到明王朝的覆灭已不可避免。于是断绝与它的隶属关系，投向清王朝。就在清军第五次入边的前夕，达赖五世、罗卜藏嘉木错派遣的使者经蒙古来盛京向清朝通好。西藏的归附，使清王朝的势力范围伸展到大西南，对明王朝造成了战略包围的声势。使皇太极实现其战略企图的距离，又缩短了一步。

由于局势的发展，清统治集团，又有不少王公大臣提出乘势直取北京的建议。皇太极仍然坚持其既定的方针，强调说：

"我克关外四城，再克山海，则北京可得，今未也"。[58]

正在皇太极积极进行夺取宁远等关外四城的战备时，他突然于崇德七年八月九日因病逝世。他六岁的第九子福临，在诸王争权的矛盾中，被推上皇帝的宝座，他就是顺治皇帝，睿亲王多尔衮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

第五　清军占领北京及进军关中

一、清军的战略转变及山海关之战

皇太极去世之后，以多尔衮为首的清统治集团，全盘继承了皇太极的遗志，积极准备夺取全国统治权。因而，皇太极的去世，并没有影响清王朝的攻明战争。福临即位后一个月，九月十一日，济尔哈朗就率军进攻辽西走廊南部四城。除吴三桂防守的宁远城未被攻下外，中后所、前屯卫及距山海关仅三十里的中前所三城，全为清军攻破。

当多尔衮侦知李自成的大顺军正向关中地区进军时，仍按皇太极在世时的既定战略，争取与农民军建立暂时的同盟，以利用农民军的力量打击明王朝。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公元1664年）正月，派人向李自成农民军送递国书，提出："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能混一区宇，富贵共之"。[59]当时李自成军正东渡黄河、向北京进军中，没有予以答复，也没有予以重视。

三月初，李自成军已迫近北京，明王朝统治集团乱作一团。朱由检急令吴三桂放弃宁远，率所部入关保卫北京。吴三桂率领军队、家属及当地民众于十六日至山海关。多尔衮亦于该日得知吴三桂部放弃宁远及李自成军逼近北京的消息，立即下令"修整

军器，储粮秣马，俟四月初大举进讨。”〔60〕多尔衮当时虽然还不知道李自成军三月十九日攻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但亦已意识到明王朝的覆灭即将来临。面对这种急剧变化的新形势，如何决定下一步的行动，就成了清统治集团的紧迫任务。内枢密院大学士范文程于四月四日上书多尔衮，提出了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略方针与计划。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情况判断。他分析明王朝西有农民军，东有清军，南境、北疆也都有“水陆诸寇”与“兵民煽乱”，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内部政治腐败，人民流离丧乱，复灭在即，正是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大好良机，必须抓紧战机，发动进攻，决不能坐失良机，“贻悔将来”。

——打击目标。他认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这次进攻的主要对象，应当是大顺军。至于明军，在目前情况下，是有“言归于好”，争取为我所用的可能的。

——政治策略。他认为要夺取全国统治权，仅仅在军事上打败敌人、占领土地是不够的。必须实行“严申纪律，秋毫无犯”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的安抚政策，以收揽人心，使汉族士大夫各阶层及人民大众都“为我所有”。如能作到这样，“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

——军事行动。他认为这次进攻，不论是直接攻取北京，还是“相机攻取”其他地方，都必须在山海关以西长城附近选择一个坚城作为据点，派重兵驻守，以代替山海关作为我军出入的门户，保障行动安全。〔61〕

范文程的建议为多尔衮所采纳，成为清军入关作战的指导原则。这在清军战略上，较过去有两个大的转变。一是重新决定敌、友。几十年来，清始终以明作为自己的主要敌人，对于农民军则视为自己客观上的友军。现在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两个多月以前还派人与之通好、企图建立暂时同盟以共同打

击明王朝的李自成大顺军，成了当前的主要敌人，而多年的主要敌人明军，则成了争取的对象。二是重新制订政策。过去五次入边作战，都是在“伐大木”的战略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目的是削弱明王朝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潜力，以动摇、瓦解它的根基。所以在关内地区对汉族实行的政策，主要是掠夺和破坏。这是当时的战略任务决定的。现在要定鼎中原、建立全国性政权，如仍实行过去那种不得人心的掠夺破坏政策，当然要和自己的政治目的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所以必须改为符合当前战略任务的招抚政策。这两个转变，对清军入关作战和占领北京，起了很好的作用，减少了许多阻力。

四月初九，多尔衮率满、蒙、汉大军十余万开始西进。十三日进至辽河，得知大顺军攻克北京、朱由检自缢、明王朝已被推翻的确息。被俘后降清的洪承畴向多尔衮建议，应计道里、限时日，辎重在后，精兵在前，由蓟州、密云近京处入边，直趋北京，以争取时间，防止大顺军稳定局势。十五日清军进至阜新附近的翁后时，接到吴三桂付将杨坤送来的请兵书，要求清军“直入中协（喜峰口、龙井关等处）、西协（墙子岭、密云等处），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62]企图共同夹击北京李自成部大顺军。清统治集团多年来的战略企图，第一步就是想占领山海关，见此机会，岂肯放过，多尔衮立即改变进军路线，昼夜兼程向山海关前进。并复信吴三桂同意合力进击大顺军，但要求吴三桂归顺，许以“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使“世世子孙，长享富贵”。[63]二十一日清军进出至山海关北。此时李自成亲率大顺军主力部队已将山海关城包围。当日晚，清军在一片石（山海关北三十里）击败了唐通部大顺军，吴三桂剃发降清。二十二日，清军协同吴三桂军，以优势兵力击溃李自成所率大顺军，跟踪追击，于五月二日进入北京。

二、清王朝定都北京后的战略措施

清军占领北京后，多尔衮即决定以北京为首都，建立全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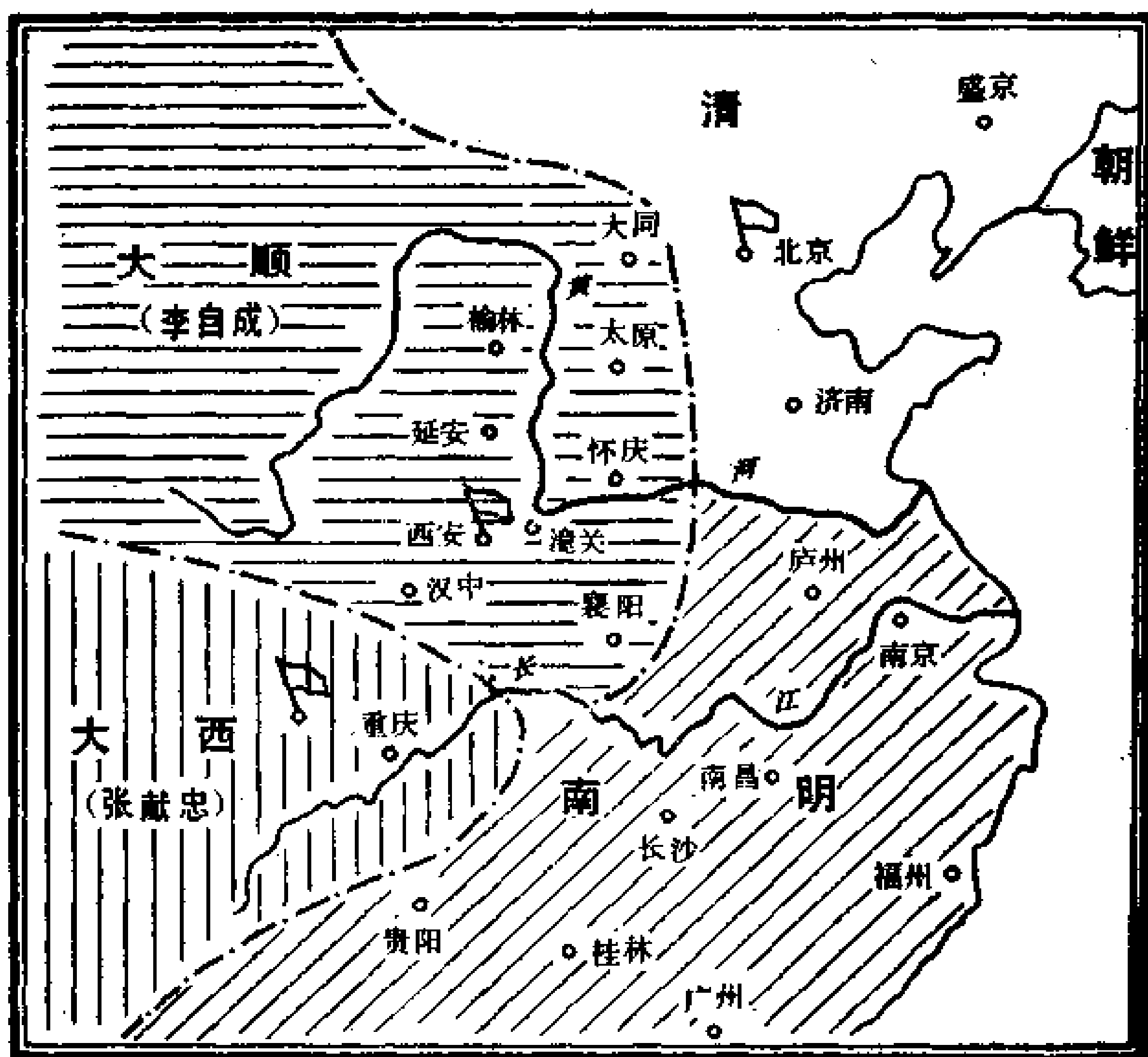
中央政权。当时有些满洲贵族王公，对此并不理解，反对迁都。如多尔衮的八兄阿济格就认为：

> “宜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所无后患。”

多尔衮严厉地批驳了这种毫无战略眼光的保守见解，下令“当即徙都，以图进取”。[64]积极筹备迎接顺治帝福临来北京“定鼎登基”，并将辽沈地区的大批满人迁至北京。

清军占领北京后战略形势示意图

(公元1644年5月)　　(33－3图)



清军占领北京的当月，明王朝在江南的官僚、军阀，拥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史称南明。这样，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存在着四个政权，也就是四个军事集团：北京的清政权，南京的南明政权，西安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和进入四川的张献忠大西政权。当时清军控制地区，除辽东外，仅有河北一省和山东一部，总兵力二十余万；大顺军主要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及河南、山西、湖北各一部，总兵力尚有四、五十万；大西军控制了四川东部地区，兵力也有四、五十万；其他地区，控制在南明军手中，总兵力号称百万。在这种形势下，清军的战斗力虽然较强，但要想在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同时击败三个在兵力数量上都超过自己的对手，统一全国，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以多尔衮为首的清统治集团，为了取得统一全国战争的胜利，根据入关前的既定战略，审时度势，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性措施，最主要的有以下两点：

一是团结汉族地主知识分子及故明官将。其具体措施为：1．为崇祯帝朱由检发丧，改变屠杀明宗室的传统做法，规定"故明诸王来归者，不夺其爵"。[65] 2．下令保护明陵，对明国诸陵春秋致祭，留用原守陵员户。3．开展尊孔活动，"遣官祭先师孔子"，令孔子后裔"仍袭封衍圣公"等。4．在不妨碍维护满族贵族特权的前提下，重用降官，降将，凡归顺者，"俱照旧录用"。以上这些做法，对充满儒家思想的封建士人，对从个人利害出发的官僚、军阀，都有很大的影响。大量明官、明将率明军投归清朝，大大改变了清军与各个对手们的力量对比。

二是争取民心，减少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具体措施为：1．整顿军纪，严格禁止士兵杀掠。过去八旗士兵没有固定薪饷，全靠作战掠获。入关时对士兵"各给两月饷米"，[66]以后成为定制。将军队驻屯北京城外，"使龙将等管门，严禁清人……出入"，[67]"凡军兵出入城门者，有九王标旗方得出入"；[68]严禁士兵进入民宅，"军兵之出入民家者，论以斩律"，[69]军队

皆“于道旁埋锅而爨，无辄入民家者”。[70] 2.轻徭薄赋，宣布“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71] 3.严禁贿赂，规定行贿营私，定行枭首。以上这些做法，虽然有的并未能认真执行，有的甚至仅为一纸空文。但对经过长期战乱和深受明王朝各种弊政之苦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仍有一定的影响，使清军在江北作战时所遇到的阻力相对减小。

三、清军进占关中之战

清军占领北京之后，除了在政治、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外，在军事上，一面派军进驻北京周围各要点，以巩固畿辅地区的统治，一面派军分两路向南推进，以扩大统治区。六月间，派巴哈纳、石廷柱等率军平定山东一路，派叶臣等率军平山西一路。在此同时，还派王鳌永、吴维华等，分去山东、山西进行招抚工作。这一切都是为下一步大举进攻作准备。

清统治集团，研究了当时的全国形势，制定了以李自成军为首要打击目标的先西北、后东南的战略方针。它的主要内容，基本上可以从顺天巡按柳寅东的建议中反映出来。他说：

> “今日事势莫急于西贼（指李自成），欲图西贼，必须调蒙古以入三边，举大兵以攻晋豫，使贼腹背受敌。又需先计扼蜀汉之路，次第定东南之局。”[72]

这个方针的中心，就是避免两线作战，集中兵力先击破占据西北关中地区、对清威胁最大的李自成军，然后再转用兵力于东南，消灭南明政权。

为了保障这一方针的实现，多尔衮采用了一贯的欺骗手法，故意放出愿与新建的南明政权议和的风声，传檄江淮一带说：

> “其有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者，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我朝，永怀继绝之恩，共敦睦邻之谊。”[73]

以争取南明军成为自己客观上的暂时盟友。南京的弘光政

权，果然上钩，不仅未命驻屯于江淮地区的数十万大军反攻清军，反而派左懋第为使臣，携带大量金银财物，到北京与清政权进行和谈。这就使清军得以放心大胆地将全部力量用于对李自成军的作战。

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公元1664年）十月，顺治帝福临在北京举行了即位典礼。此时山东、山西绝大部分地区已为清军控制。多尔衮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开始向关中地区的李自成军发动进攻。并认为这是一次关系到是否能统一中原的关键性战役，其进军部署为：

——命英亲王阿济格为北路军统帅，率八旗、蒙古各部兵及吴三桂、尚可喜等部，由大同附近出边，经内蒙迂回至榆林附近，再入边经绥德、延安向西安进攻；

——命豫亲王多铎为南路统帅，率八旗及孔有德、耿仲明等部，南下豫北，由怀庆附近渡河，尔后转锋西进，经潼关向西安进攻；

——命九月间降清的唐通，率所部兵力引导山西清军由保德渡河，以牵制陕北的大顺军，保障主攻方向北路军的行动。

十月下旬，两路清军先后开始行动。为了蒙瞒企图、麻痹大顺军，多铎部清军南下时，扬言进攻江南。至十二月间，北路清军已包围了榆林，进至米脂；南路清军在击败怀庆地区的大顺军后，由孟津渡河已逼近潼关。

顺治二年（大顺永昌二年，公元1665年）正月十二日，经十几日的激战，清军攻占了潼关。李自成在腹背受敌形势下，于十三日放弃西安，向河南、湖广转移。这时，原来归降大顺政权的故明官将，先后多又降清。困守榆林、延安的李过、高一功等部，在李自成放弃西安后，也被迫撤向甘肃，取道汉中，企图与李自成会合。[4]关中地区全部为清军控制。

大顺军主力被击败后，多尔衮重新部署军队，令阿济格追击李自成，令多铎进攻南明。李自成在清军追击下，于五月间在湖

北通山县九宫山，被地主武装袭杀，大顺政权覆灭。大顺余部，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率领下，分头南下继续抗清。

清（后金）军战略的几个特点

战争不但是作战双方经济能力和人力、物力的较量，而且也是双方能动性的较量。清（后金）政权地处我国东北一隅，不论经济资源还是人力资源，都远远不如广大的中原地区。但以全部兵力最高时不过二十万的八旗清军，却能接连击败在总兵力对比上都占优势的明军和大顺军两个对手，顺利地占领北京及中原北部地区，其原因除了政治、经济等诸因素外，专就军事角度而言，清统治集团决策人物制定的战略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客观实际，应当说是主要原因。从皇太极执政到多尔衮率军入关、开始在北京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史实中，可以看出清王朝的战略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根据自己的军事实力决定和选择各战略阶段的方针和目标

准确地判断形势，根据自身现有兵力，正确地估计哪些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哪些目标是不可以、或暂时不可以达到的，从而定下决心，制定出与自身军事实力相适应的作战方针，是每一个军事统帅首先应该遵循的一般原则。戎马一生的皇太极，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

皇太极从嗣位为汗时开始，就继承了努尔哈赤"既征大明，岂容中止"的遗志，确定了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政治目的。但如何才能达到这个总的战略目标呢？皇太极懂得"贪多嚼不烂"、"欲速则不达"的道理，根据自身的军事实力，作出自己的战略决策。当时明王朝虽然已经腐朽透顶，矛盾重重，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但农民起义才刚刚开始，还没有给明王朝造成严重威胁，以后金的有限兵力，企图通过一、二次作战，在短期内消灭明军、夺取全国统治权，那是不可能实现的妄想。皇太极采用了"伐大

木”的作战指导，以各种攻势行动，不断地削弱、孤立明王朝并加强自己；而且这些攻势行动，都是有限的，从不超过自身兵力所能达到的限度，逐渐使战略形势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转化，俟量变到一定程度，再抓住战机与对手以决定性的一击，从而逐步实现总的战略目标。皇太极的这一战略思想，是符合前述原则、也符合客观实际的。他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制定了战略各阶段的方针和目标。例如皇太极开始执政的阶段，在严峻的形势下，他能正视现实，不受“大举攻明”等议论的干扰，斥之为“不达时势之见”，毅然采用“讲和与自固”的战略方针，以“剪枝”为当前主要任务，正确地选择战略方向和目标，在和议掩护下，逐次击败朝鲜和察哈尔，切断明王朝的左右两臂，并解除自己后顾之忧，然后再集中力量对付主要对手明王朝。事实证明，他的这个方针是与他的兵力相适应的，因而他的企图也就能够实现。又如皇太极在达到自固目的、实力有所增长时，又否定了“直取北京”或“内外夹击夺取山海关”等力不从心的建议，采用了先关外、后关内、徐图渐进的战略方针，这也是考虑了自身兵力之后决定的。五次深入关内的远征作战，皇太极赋予部队的任务都是有限的，规定对城镇“度可取则取，不可取则勿取”，主要以抢掠人、畜、财物以破坏明王朝的战争潜力为基本目标；在实现了削弱明军并大大扩大了自己的实力之后，立即围困锦州，集中全力与来援的明军主力决战，取得了决定性的战略胜利。

二、重视心理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

在影响战争胜败的各种因素之中，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古代战争，尤其如此。所以历代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统帅，无不重视心理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孙子兵法·九变篇》所说的“覆军杀将，必以五危”“必死，可杀也；必生，可虏也；忿速，可侮也；廉洁，可辱也；爱民，可烦也”，就是对将帅心理影响战争的分析。毛泽东同志也曾指出过：战争中的“力量对比不但

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人心，就是人们的心理，就是人们的愿望和意向，同时也包括民族心理和军队士气。

满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在全国人口的总数中，所占比例甚少，如果得不到汉族地主阶级和广大汉族人民的合作，满洲贵族要想达到长期、稳定地统治全中国的政治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清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对此有一定程度的认识，所以在制定战略时，相当注意心理因素。以皇太极的“讲和与自固”方针为例，讲和，是针对明统治者“和则易为因循，易为怠惰”的心理。针对后金官兵“闻有征调，各抱妻孥相哭”的惧战心理而制定的。这既可以麻痹敌人，松懈其斗志；又可以将战争的责任推给明王朝不愿讲和，以激励清军士气。在自固措施中，皇太极也是考虑到广大来降汉民均“瞩目”于已降汉民的心理，而强调“满汉之人，均属一体”，注意安置好已降汉民的。至于针对明崇祯帝为人多疑而实施反间计等，更是重视心理因素的结果。多尔衮率军入关作战时，在收抚人心方面作的尤为出色，他一反过去不得关内人心的野蛮作法，把收抚人心作为保证战争顺利发展的重要手段，针对当时大多数汉人的心理，采取了大量的争取措施。例如当时人民痛恨明、清军队的扰民、害民行为，对李自成大顺军进入北京后的军纪废弛也极为不满，多尔衮就整顿军纪，严禁杀掠，实行军饷制度；占领北京时，令军队驻屯城外，除指定的部分警卫部队外，不准清军官兵随便出入北京；并规定军队不得进入民房，犯者处斩，连做饭也只能在“道旁埋锅而爨”。又如广大人民深受明王朝苛捐杂税、贪官污吏之害，多尔衮就下令“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还规定对犯赃官吏“立行处斩”等。虽然这些措施实行得并不彻底，但对饱受明朝弊政之害的广大人民来说，心理上的反抗情绪，肯定会因此而大大减少。多尔衮还针对汉族地主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正统观念和忠君、尊孔、崇儒等思想，为

崇祯帝发丧，以“复君父仇”为号召，将他们的仇恨心转移到大顺军身上；并在进城不久即“遣官祭先师孔子”，令孔子后人“仍袭封衍圣公”等。特别是针对大批旧明官僚要寻找出路而又对清存有疑惧的心理，下令“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其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仍以原官录用”；还下令说：“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附我朝，仍准录用”。以上这些措施，解除了一批旧明官将和地主阶级的抵触心理，并使他们愿意和满洲贵族统治阶级合作，由对抗力量，转化为联合力量。事实证明，由于清统治者重视心理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确实使清军入关作战及在北京建立全国性政权减少了很多的阻力。假如多尔衮以后不因战胜骄傲而轻视汉族人的民族心理作用，不犯强制下达“剃发令”等的错误，清王朝统一战争的胜利，也许会比史实更提前一些。

三、机动、进攻和集中兵力

机动是构成战略战术的基本因素之一，正确地运用机动，不但可以出敌不意和掌握战争主动权，而且可弥补兵力的不足。清军以骑兵为主，机动性强，所以皇太极、多尔衮等清军统帅，都非常重视机动作战。加以作战目的的需要和其他因素，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清军在战略上一个非常显明的特点，是只有战略进攻，在准备进攻战略阶段，在战役上同样也采取进攻方式。纵观皇太极和多尔衮的全部用兵，完全找不到实施战略防御的例子。在战役战斗上也是如此。例如西击察哈尔、东攻朝鲜以及五次大规模入边和松锦决战、山海关决战等，无一不是进攻。

清军在兵力使用上，基本上符合《孙子兵法·九地篇》所说“并敌一向，千里杀将”（集中兵力指向敌军一点，即可长驱直入擒敌杀将）的古老作战原则。从清军作战的史实中可以看出，每次都是集中兵力，打击一个目标，从来不冒两面作战的危险。集中兵力，并非仅仅集结兵力，洪承畴在松锦之战中，将十万大军猬集于一个狭小地域内，很难说是正确的处置。正确的兵力集

中，应当是集中兵力用于一点。目的在于破坏敌军的稳定性。在古代人密集方阵为主的战争中，一旦敌军的稳定性被摧毁，战争的胜利，即已在握，剩下的只是如何消灭敌人而已。清军在松锦之战及山海关之战等作战中，都是这样做的，并都获得了战争的胜利。

注　释

〔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2〕〔3〕《明史·袁崇焕传》

〔4〕〔6〕《清太宗实录》卷一

〔5〕〔7〕〔11〕《天聪臣工奏议》上

〔8〕《两朝从信录》卷三十

〔9〕《清太宗实录》卷九

〔10〕〔12〕《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

〔13〕《天聪实录稿》，转引自李鸿彬同志：《皇太极时期明清（后金）关系初探》，载《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14〕《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

〔15〕〔16〕《清太宗实录》卷一

〔17〕〔21〕《清太宗实录》卷十三

〔18〕《清太宗实录》卷十六

〔19〕〔20〕《清太宗实录》卷一

〔22〕《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四

〔23〕《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

〔24〕〔26〕《啸亭杂录》卷二

〔2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

〔27〕《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

〔28〕《清太宗实录》卷二十

〔29〕《清太宗实录》卷四十七

〔30〕《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二、《天聪臣工奏议》中

〔31〕崇德三年十二月初五《盛忠奏陈攻取山海关外八城策略事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32〕《清太宗实录》卷十四

〔33〕《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九

〔34〕 《明崇祯实录》卷九

〔35〕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

〔36〕 《清太宗实录》卷四十六

〔37〕 《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六

〔38〕 崇德三年十二月初六《段学孔奏陈攻取关外八城方略事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39〕〔42〕 《沈阳状启》

〔40〕 崇德三年十二月初五《孙定远奏陈攻取锦州、宁远等处战略事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41〕 《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一

〔43〕 《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六

〔44〕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45〕〔46〕 《沈阳日记》

〔47〕 《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

〔48〕 《清太宗实录》卷五十六

〔49〕 《明季北略》卷十八

〔50〕 《沈阳日记》

〔51〕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五

〔52〕 《清太宗实录》卷五十七

〔53〕 崇德三年十二月初二《祖可法奏陈攻取山海关之法事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54〕 崇德三年十二月初四《姜新奏陈攻取山海关之法以图北京事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55〕 崇德三年十二月初三《张存仁奏陈攻占山海关之法事本》，载《历史档案》1982年第2期。

〔56〕 《清太宗实录》卷六十三

〔57〕 《幸存录》上

〔58〕 《清史列传·祖可法传》

〔59〕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

〔60〕 《清世祖实录》卷三

〔61〕〔62〕〔63〕 《清世祖实录》卷四

〔64〕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65〕 《清世祖实录》卷五

〔66〕 《谀闻续笔》卷一

〔67〕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68〕〔69〕 《沈馆录》卷七

〔70〕 《定思小纪》

〔71〕 《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

〔72〕 《清世祖实录》卷五

〔73〕 《国榷》卷一二〇

第三十四章　郑成功抗清复台及清统一台湾的战争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郑成功开始抗清斗争，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他为了建立新的抗清根据地，击败了荷兰殖民军，收复了被荷兰强占达三十八年之久的台湾。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玄烨（康熙帝）派军击败了已经转化为割据势力的郑氏政权，迫使它接受招抚，结束了台湾与大陆的分割局面。郑成功抗清复台和玄烨统一台湾的战争，都是我国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我国历史的发展，有深刻影响。本文拟对这两次战争的战略，进行一点粗浅的分析与评价。

第一　郑成功抗清及收复台湾

明末清初，是我国历史上各类矛盾最为集中的一个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各集团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异常尖锐。反映在军事上，同时存在有三种武装力量，即清军、南明军和李自成、张献忠等领导的农民军。他们彼此攻战，争夺国家统治权；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外国侵略势力——荷兰殖民者的武装力量，侵占了我国的台湾，并不断向我东南沿海地区进行侵扰。郑成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动乱的年代里。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推翻了腐朽透顶的明王朝。东北地区满族地方政权清王朝，乘机入关，击败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迁都北京，企图夺取全国统治权。当时清军的主要进攻目标是农民军，对在南京新建的弘光南

明政权，则暂取妥协态度，制造和谈骗局，企图在彻底击败李自成的农民军后，再转而向南明军进攻。至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清军已消灭了弘光政权，占领了东南沿海地区；李自成也已壮烈牺牲，余部李锦、郝摇旗等在江西、湖南分别与南明永历政权的将领堵胤锡、何腾蛟等联合抗清；而福建南明军统帅郑芝龙却背叛南明投降了清朝。郑芝龙之子郑成功，与其父毅然决裂，率九十余人至南澳（今广东南澳岛）起兵，开始抗清。他主要活动于闽、粤的漳、泉、潮地区，与在湘、赣、云、贵等地抗清的南明军和农民军遥相呼应。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清军集中兵力由楚、蜀、粤分三路进攻云、贵，郑成功为策应西南战场的李定国军，率主力进军长江，攻略南京。次年，因战败撤回厦门。此时西南地区李定国军也已战败，清王朝统一全国的局面已经形成。郑成功遂转军东向，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率军收复台湾。次年，因心力交瘁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九岁。他自南澳起兵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大小战斗计八十二次，几乎无日不战，确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战斗的一生中，不但联合农民军同实行民族高压和屠杀政策的清军作战，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接受教训，采取一些有利于人民和生产的措施，更重要的是他还坚决同外国侵略武装作战，驱逐了荷兰殖民军，收复了祖国领土台湾，解除了外来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威胁，为尔后清朝统一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历史上，郑成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民族英雄。

郑成功起兵之初，仅数千之众，据弹丸之地，面对强大的敌人，却能发展壮大，坚持斗争十七年，在南京失败之后，犹能大破清军于厦门，击败荷军于台湾，取得了中国人民反对西方殖民者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保障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其原因固然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因素有关，但如仅从军事角度来看，则主要在于郑成功的战略基本正确。

一、战略方针符合客观实际

郑成功和他同时代、同阶级的一些抗清人物有所不同。当时抗清阵营中的地主阶级人物，有的根本没有坚定的政治目的，一切以个人利益为转移，将手握的重兵，作为私人工具，一旦形势变化，就叛变投敌，如左梦庚、方国安等；有的虽然政治态度坚定，抱有抗清决心，但又缺乏必要的军事才能，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以致先后均为清军消灭，如钱肃乐、瞿式耜等。郑成功不但有明确、坚定的政治目标，而且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符合实际的战略思想。他的政治目标，就是抗清复明，他的战略和策略，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因此，只能是军事观点从属于政治观点"。[1]为了研究郑成功的战略，必须先探讨他的政治观点和形成这种观点的思想基础。

抗清复明，是郑成功终身奋斗的政治目标，它的形成，并非一时的意气用事，而有着深厚的阶级、社会和思想根源。郑成功自幼接受儒家教育，青年时又颇得恩宠于南明隆武帝，所以忠君爱国的思想早已在他头脑中生根；清军在进军江南时，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2]的民族高压政策，并野蛮地进行烧杀劫掠，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以及"江阴屠城"等暴行，也不能不激起他反抗民族压迫、保卫汉族文化的强烈民族感情；再加以隆武帝被清军杀害、生母田川氏被清军逼死的君亲之仇，更进一步坚定了他抗清复明的政治立场。

郑成功在隆武时期，既统帅过军队，又经常来往于浙、闽、苏、赣等地，对敌我双方情况均有所了解。起兵之前，根据情况判断，就已经确立了他的基本战略思想。例如在他劝阻郑芝龙投清时，曾分析形势说：

> "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

还说：

“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3〕

再考察郑成功一生史实：十几年战斗生涯，未离东南沿海岛

郑成功起兵抗清时全国战略形势图

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

（34－1图）

屿，北上、南下，俱由海进，陆上行动，也不离海滨，他的部队最远到过德化（今福建德化），距海不过七、八十公里，可见郑成功的战略思想，是建立一支以水师为主的抗清军队，凭险设伏，进行两栖作战；以东南沿海岛屿为根据地，以海上贸易充裕饷源，俟发展壮大后再相机进取，最后达到复明的政治目的。

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看，这一方针是可行的。因为：1．福建沿海一带，是郑氏军队控制达二十三年之久的地区，近海岛屿及滨海州县，均为郑氏势力范围，容易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郑芝龙投清后，不少旧部散处海岛，可利用旧日影响进行招附，能迅速建立起部队；后备兵源潜力大，补充容易，有利于扩军。2．东南沿海地区，是当时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郑芝龙以海上贸易及海盗起家，数十年来不仅郑氏家族拥有大量商船进行海上贸易，而且控制了整个地区的贸易往来，任何商船都必须向郑氏缴纳税款。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既可从日本、吕宋等地换取军需、军械，又可充裕军饷来源，解决军队后勤供应问题。3．清军是一支新崛起的武装力量，组织严密，领导坚强，加以入关后连续胜利、士气旺盛，不但以摧朽拉枯之势击败明军，而且一再重创李自成农民军，战斗力颇强。但清军全赖弓马娴熟。东南沿海，利于舟楫，不利戎马，水战更非清军所长，建立水陆两栖部队，可以“避人之长，攻人之短；见己之所长，蔽己之所短”，〔4〕进可攻，退可守，易于保存自己，也利于消灭敌人。而且郑军久处该地区，地形熟悉，易收地利之效和机动之便。4．当时海防简单，沿海数千里，清军不可能处处设防，水师在海上机动方便，“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5〕可以任意选择进攻方向和登陆地点。且滨海多山，仅以福建而言，山地和丘陵即占全省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清军机动困难，防不胜防。实行两栖作战，可掌握战场主动权。5．从全国战略形势看，当时李自成部的李锦、郝摇旗等二、三十万军队，已与南明军联合抗清，正在湖广同中南战场清军主力，平南大将军勒克德浑及孔有德部激

战；张献忠部五、六十万军队，正在四川同西南战场清军主力、肃亲王豪格及吴三桂部血战；入闽清军主力、征南大将军博洛部在郑芝龙附清后，认为南明军瓦解、东南大局已定，残部不需主力，已挟郑芝龙返北京，福建已无清军八旗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易于发展壮大。

清军对于郑成功的战略，也是有所认识的。他们认为：

郑成功"之难于遽行扑剿者，缘彼以海为窟，以船为家，惟视风潮，瞬息千里。……在我沿海各讯处处可登。……我之兵力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分，我既备多而力分，贼乃以十数万全力之势如风雨骤至，乘间窥其一域。……是以我兵跋涉崎岖于崇山峻岭旬日之间者，贼艅挂船旦夕可至，我之士马未获与贼决战，而先已疲于奔命矣。"〔6〕

事实也证明了郑成功的战略总方针基本正确，在保存自己并发展壮大这一点上是达到了目的的。郑成功背父抗清时，"兵将战舰百无一备，往南澳召募"后，仅"有众三百人"，〔7〕占领了面积仅及厦门二十分之一的鼓浪屿小岛。但到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郑成功已控制闽、粤沿海，北起兴化湾，南至碣石湾，全长一千余里，岛屿一千余个；陆上漳、泉、潮、惠等地，也经常为其控制，与海岛连成一片。有精兵七十二镇，达二十万人。而与他同时抗清的各处义军和南明军，除张献忠农民军李定国部和李自成农民军李来亨部外，开始时有几万以至几十万的部队，均先后为清军消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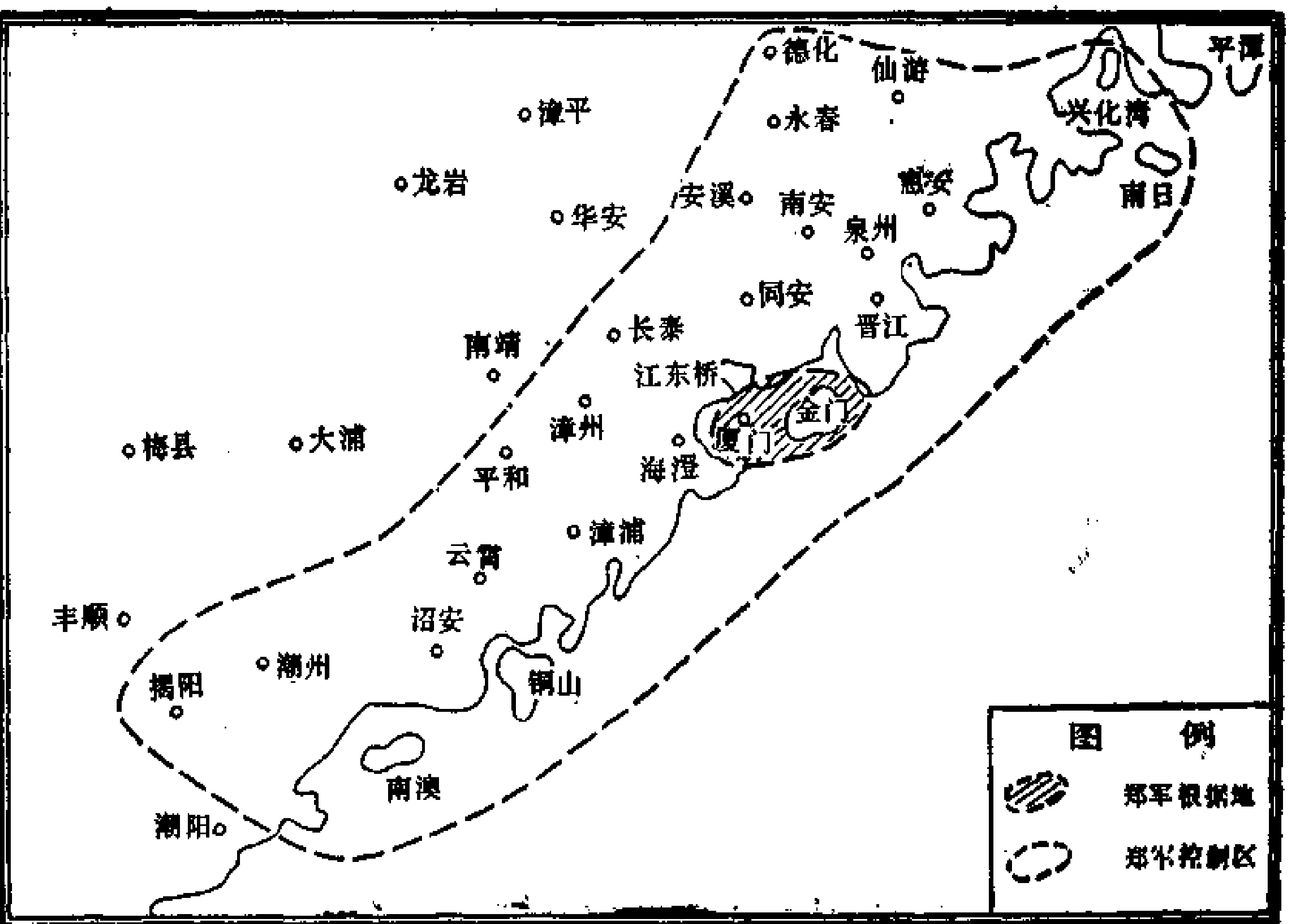
郑成功终身奉行上述战略总方针，在贯彻、实施上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顺治五年至十二年（公元1648—1655年）为第一阶段，即创建海上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的阶段；顺治十三年至十六年（公元1656—1659年）为第二阶段，即相机进取，北上进攻南京的阶段；顺治十七年至康熙元年（公元1660—1662年）为第三阶段，即转变战略，东向收复台湾的阶段。下面分项叙述。

二、创建海上根据地，发展壮大自己

（一）根据地思想的形成与相应的战略措施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军占领南京后，江南各地义军烽起，如太湖“白头军”，苏州“乌龙会”，建德了空和尚以及茅山卢家观，松山陈子龙，昆山顾炎武等，都起兵抗清。这种自发的抗清武装，几乎各县皆有，部众多者达二十余万，少者亦三、五万，声势浩大。但由于他们既无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又无严密的组织和精良的武器，特别是没有后勤供应的根据地，粮乏饷缺，仅凭一腔民族义愤和忠君热情来对抗训练有素、勇猛善战的八旗劲旅，当然不是敌手，先后均为清军消灭。郑成功深刻地认识到：没有稳定巩固的根据地，就无法生存，无法发展；没有武器精良、纪律严明的军队，就无法作战；没有充足可靠的后勤供应，就无法养兵。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三月，他曾上隆武帝“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的条陈。[8]但当时军政大权俱在郑芝龙手中，他已决意投清，当然不会实行。郑成功起兵后，在上述思想基础上，根据他的战略总方针，制定了第一阶段固本蓄锐的战略方针，即以金、厦二岛为核心，以漳、泉二州为屏障，建立稳固的海上根据地，充分利用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力、物力资源及海上贸易的财力资源，建立一支精锐的、以水师为主的两栖作战部队，等待有利时机，再图进取。为此，郑成功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具体情况、符合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措施，主要有以下几项：

——组建一支集中统一、军纪严明和勇敢善战的两栖作战部队。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之初，拥有相当庞大的兵力，仅驻守长江一线的部队，就有五、六十万。但军纪废驰，兵失节制，上下解体，形同乌合。在清军攻势面前，一触即溃，非散即降。郑成功有鉴于此，首先在组织上加强集中统一。郑军的战略单位是军和镇（营），军的统帅是提督，地位高于镇将，但军与镇并无建制上的隶属关系，统归郑成功直接领导和指挥。只在战斗编


郑成功经营海上根据地示意图
顺治四—十二年（公元1647—1655年）
（34-2图）
德化
仙游
平潭
兴化湾
漳平
永春
龙岩
华安
安溪
南安
惠安
南日
泉州
同安
晋江
南靖
长泰
江东桥
金门
厦门
漳州
梅县
大浦
平和
海澄
漳浦
云霄
丰顺
诏安
潮州
揭阳
铜山
南澳
潮阳
图 例
郑军根据地
郑军控制区

组时才产生配属关系。各军、镇（营）另设有政治性质的官员一人，称监督或监营，“凡有军机重务，必由报闻”，并选派储贤馆、育胄馆中的文士，担任各军、镇（营）的监纪，“从军出征，记录功罪，”直接向郑成功汇报；各军、镇（营）担任后勤工作的饷司，自成系统，不归军、镇（营）主将领导，也是直接由郑成功掌握，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体制。其次，严明军纪。郑军中颁有杀敌赏格，设“督阵官监同各镇出征战剿，授铁竿红旗一面，书‘军前不用命者斩，临阵退缩者斩，副将以下先斩后报，”〔9〕每次战役终了，进行民主评议，严格执行。如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清军偷袭厦门时，守将郑芝莞（郑成功之叔）怯敌逃走，被郑成功斩首，“诸将悚栗，兵势复振”；〔10〕小盈岭之战，奇兵营将杨祖中箭后尚奋勇杀清将一员，立即升为镇将。由于郑军令行禁止，军纪森严，从而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再次，强调精兵选将。郑成功认为：

> “兵之勇怯，在乎将领，如将领稍却，则兵虽勇亦不肯向前，如将领敢勇，虽弱兵必勉力赴敌，……故兵贵精而将尤贵乎选。”〔11〕

所以他平日及战时，均注意选拔勇敢善战的将士，实施严格的训练。制定“各镇合操法”、“水师水操法”等，按之操练并实行考试制度。郑成功特别重视水上作战的训练，即使陆军，也都配有船支并熟悉海上战斗，行动时一般不离舰船。由于郑成功采取了以上一些措施，军队战斗力大为提高。顺治三年至九年（公元1646—1652年），与清军的四十二次战斗，其中十七次是奋战得胜，四次是因有内应得胜，六次是无大战斗或主动撤回，只有五次是战斗失败。连清军将领也认为“战敌多矣，最难挫者莫如成功军。”

——经营海内、外贸易，成立制械造船机构，加强后勤保障。郑成功利用郑芝龙原来的商业基础，大力发展海内、外贸易，设立“五大商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处，经营财货，”同

时组建商船队，”以仁、义、礼、智、信五字号，建置海船，每一字号下各设有船十二只，”去“日本、吕宋、交趾、暹罗、柬埔寨、西洋等国”贸易[12]。运出中国内地各种产品，换回铜、锡、桐油以及“铜煸（jiàng匠，福建方言字）、腰刀、器械”等军用物资和其他商品。并在厦门“设局，督造军器、藤牌、战被、火箭、火筒、火罐等项”，[13]发展军火工业；还在厦门、山东、琅琦岛等处“打造战船”，以保障后勤供应。所造大战舰可容战士五百，所造商船在东海上也享有盛名，称为“国姓船”。所以“成功以海外弹丸之地，养兵十余万，甲胄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14]

——建立庞大严密的情报网。郑成功非常重视情报工作，以各地所设商行为掩护，开展情报工作。将情报人员派至敌人心脏，对敌人兵力、企图及行动等，一举一动均了如指掌。因而可以及时判断情况和定下正确的决心。正如当时人所说：

> “成功又遍布腹心于内地，凡督、抚、提、镇衙门，事无巨细，莫不报闻，皆得早为之备，故以咫尺地与大兵拒守三十余年，终不败事。”[15]

——利用水上机动、以攻为守，集中兵力，局部歼灭敌人，控制漳、泉地区。当时总的战略形势，清军已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长江以北及华东、中南等广大地域，在蜀、楚、赣、粤、江、浙等地均驻有重兵。郑成功局促东南一隅，兵少地微，与湖广、西南的抗清农民军、南明军都不能联合、会师，完全处于独力作战的地位。郑成功没有采取消积被动的作战指导，而是采用以战求存、以攻为守的积极作战指导，以集中兵力的手段，造成局部优势，在战役、战斗上主动寻敌进攻。从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至十二年（公元1655年），清、郑两军较重要的战役、战斗共四十二次，其中郑军主动进攻有三十五次。他的进攻目标，主要是金、厦外围漳、泉一带及其两侧滨海县城。虽然时得时失，未能

长期占领，但始终掌握着作战主动权，“指挥”清军往返应援，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无力组织对郑成功海上根据地的进攻。（顺治八年，郑成功率军南下广东时，清军曾袭占厦门一次。）金、厦二岛地处近海，战略纵深和战役地幅都很小，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如无漳、泉各据点为屏障，就直接暴露在清军威胁之下，势难持久。而且海岛缺少战略资源，特别缺少军粮和后备兵源，无法养活几万大军，当然更谈不上发展壮大，只有控制了漳、泉外围，才能“集兵裕饷，恢复有基。”〔16〕

（二）对关键性战役的灵活指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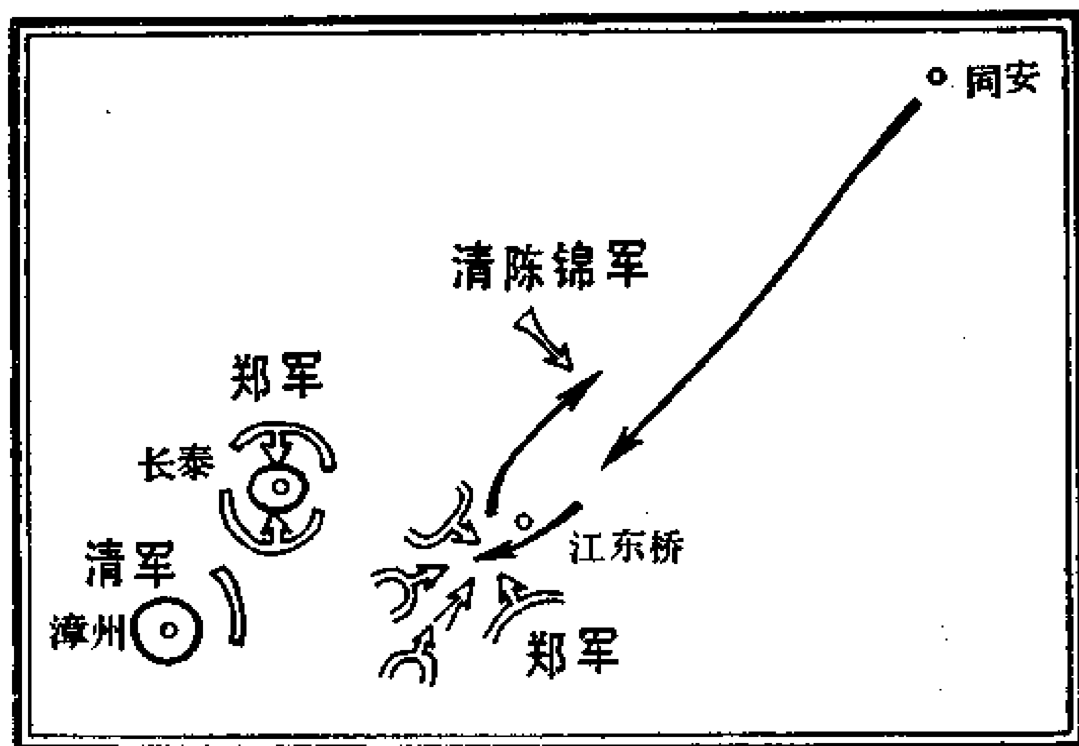
战争是运动中的敌对双方各种因素相互对立、依存、渗透和转化的过程。优秀的统帅能够根据敌我部队、地形和战场变化的具体情况，及时、恰当地决定自己的作战指导。郑成功抗清战争的第一阶段，有三个对郑成功来说是带有战略性的关键战役，都体现了上述原则，现分述如下：

1．江东桥伏击战

郑芝龙投清后，旧部分化瓦解，已不能形成整体力量。当时郑成功兵力尚少，仅占有南澳等几个小岛，大陆沿海州县俱为清军占领，所以清军认为东南沿海大局已定，郑氏各旧部迟早必将投降或解散。根本没有重视郑成功的决心和力量。更由于清军主力均在西南、中南地区与农民军、南明军作战，无力顾及福建沿海地区，所以当时清王朝对郑成功的战略是以沿海绿营防守要点，相机堵击，不使登岸，坐待穷困自降。郑成功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形势，一方面积极向闽、粤沿海州县进攻，措粮筹饷，扩充兵员；一方面谋划内部统一，杀死郑联，驱走郑彩，夺郑鸿达兵权，将海上原郑芝龙部船支和兵力，全部集中到自己手中，统一了海上各岛的领导权。遂集中兵力大举向漳、泉进攻。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五月、九月，两次以伏击战大败清漳州总兵王邦俊于磁灶、漳浦；十一月再以伏击战大败清福建陆路提督杨名高于小盈岭，连下海澄、漳浦、诏安、平和（均在今漳州以南，同

今名）等县，次年正月包围长泰（今福建漳州东北）。清浙闽总督陈锦于三月间率军来援，分由同安（今同名）、汀州（今福建长汀）、潮州（今广东潮安）和海上由四面向长泰外围郑军作向心进攻，企图一举消灭郑军。这是郑成功第一次与清军主力交战。郑成功分析了敌情，认为清军在总的数量上虽占优势，但均为绿营兵，战斗力不强，决心以少数兵力阻击北、西、南三个方向的清军，而集中主要兵力在江东桥迎击由同安前进的清军主力。以一部兵力前出敌后，准备断敌退路；以骑兵为预备队，准备扩张战果；而将主力分三部配置于江东桥东南丘陵地带道路两侧。三月十三日，清军向占领丘陵的郑军进攻，郑军严阵以待，俟清军进至中间位置时，郑成功下令出击，步兵由三面夹击清军，骑兵预备队则由中央插入，分割敌人。经半日激战，清军败退，在郑军追击部队与预设断敌归路部队的夹击下，清军全军被歼，陈锦仅率少数残兵逃回同安灌口，被部属杀死，携其首级投诚郑军。

江东桥伏击战示意图　（34-3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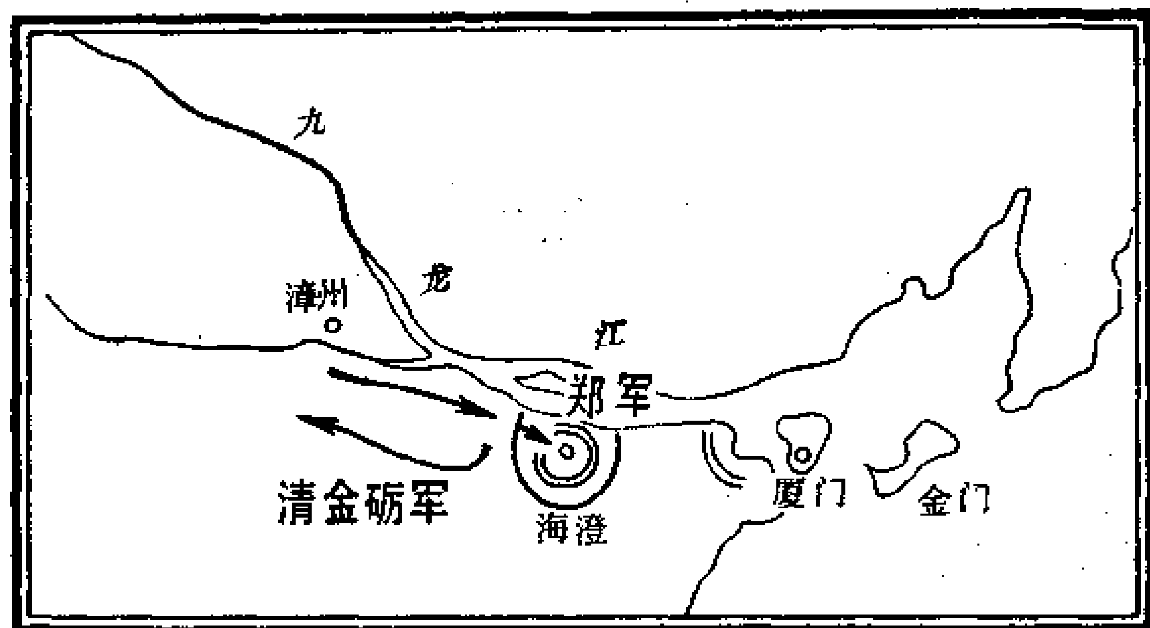
这一战役不但消灭了清军驻闽主力，巩固了以厦门为核心的海上根据地，为东南沿海地区的抗清战争打开了新的局面，对全国的抗清战略形势，也起了一定的影响。同年，张献忠部农民军也已与南明军联合，正在四川、湖南等地大败清军；李定国部全歼孔有德军，迫使孔有德自杀，紧接着又阵斩清帅敬谨亲王尼堪。东、西两战场的空前胜利，在政治上、心理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郑成功与李定国也从此相互有了认识，信使往还，结为战友，相约在抗清战争中互相配合。

2．海澄防守战

郑成功歼灭陈锦军后，即包围漳州，因缺乏攻城火器，围城五月，累攻不下。清军经过江东桥之战，重新估价了郑成功的力量，改用军事进攻与政治招抚相结合的战略。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九月，命固山金砺领浙、直满兵及汉兵共万余骑入闽来援，同时让郑芝龙派人劝降。郑成功决定仍以对待陈锦的战法迎击清军。金砺接受了陈锦失败的教训，自率主力由大路进攻，而另派一部兵力由右翼小路经长泰（漳州东北）向漳州迂回，企图包围郑军。郑成功急解漳州之围退守古县。金砺于十月初向古县发动进攻。郑军初次与战斗力较强的八旗清军作战，经不住骑兵大部队的冲击，伤亡镇将数员，败退海澄（漳州东南、九龙江南岸）。海澄是厦门的门户，也是向大陆进攻的滩头据点，掌握在谁手中，对郑军今后的发展关系至巨。郑成功在此之前，一贯以攻为守，习于野战。当时根据情况的发展，认识到自己与八旗主力部队进行野战对己不利，遂改变战法，决心依托城防工事进行防御，俟削弱敌人兵力及锐气后，再相机出击，歼灭敌人。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五月，清军对海澄发动进攻，依靠火力优势，连日以猛烈炮火轰击郑军，木栅俱被击碎，营垒整而又坏，官兵无可站立，损伤者多。郑成功一面进行战场动员，振奋军心，一面令士兵挖掘单人避弹坑和集体掩蔽部，以减少伤亡。（这是战争向堑壕体系发展的先河）当郑成功得到清军弹药即将

用完的情报时，判断敌人必将寻求决战，遂命神器镇官兵，将所有火药尽埋在外壕以内，以地道将引信引至城内，并下令官兵按统一号令出击。拂晓前清军发起冲锋，双方在发生肉搏。天亮时郑成功见清军大部已进入外壕内，即下令点发火药，将过壕清军全部消灭，然后指挥出击。清军精锐尽失，大败逃回。[17]

海澄防御战示意图　　(34-4图)



这一战役是郑成功与清军八旗主力部队的一次战力较量，是带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古县失败之后，这次如不能胜利，则不仅军力损失巨大，使厦门直接暴露在清军威胁之下，且士气将剧烈下降，严重影响郑成功战略方针的执行。这次背城一战、转败为胜的关键，是郑成功的政治动员和战斗指挥正确。但如更进一步探讨，则郑成功在古县失利之后，能审时度势、机动灵活地迅速转变战术，放弃自己一贯习用的野外设伏战法，改为依托城防工事防御，以弥补自己火力劣势和难挡敌骑兵冲击的短处，不能不说也是这次战役胜利的原因。

3．泉州港海战

清军攻海澄失败后，对郑成功的军事力量不敢再予忽视。但

当时清军总的战略方向仍为西南战场，正调兵遣将命洪承畴全面负责进攻李定国军，连驻南京的八旗部队也调往广东，所以抽不出兵力，无法顾及郑成功。加以过低地估计了郑成功抗清的决心和信心，错误地判断郑成功可能在郑芝龙的敦促和官爵引诱下妥协投诚，于是由军事进攻和政治招抚两手并用改为单纯用招抚策略。从顺治十年至十二年（公元1653——1655年），一再派遣钦差大臣到福建与郑成功谈判。郑成功复信其父表明自己的态度：

“盖自古大义灭亲，从治命不从乱命。儿初识字，辄佩服《春秋》之义。自丙戌冬父驾入京时，儿既筹之熟、而行之决矣。”

同时向部属说：

“清朝亦欲绐我乎，将计就计，权借粮饷，以裕军食。”〔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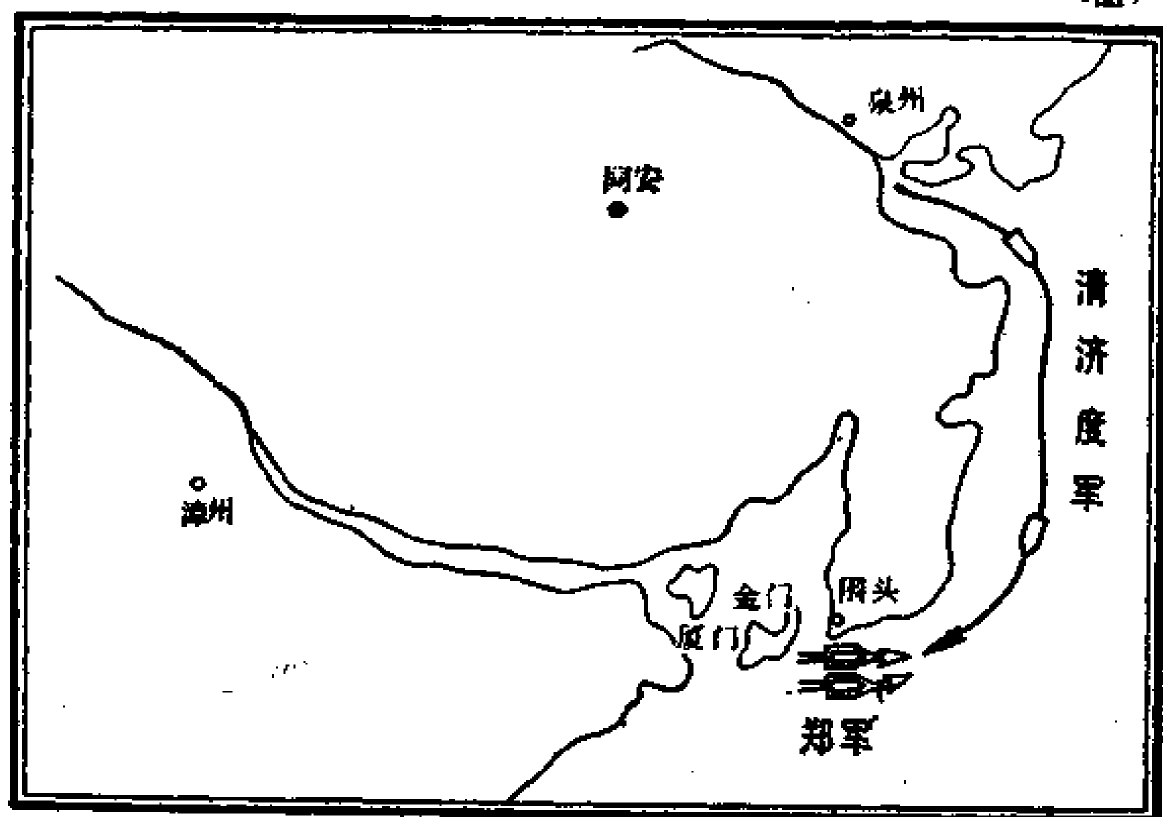
遂以和谈为掩护，争取时间，乘清军碍于和谈不愿作战之际，分兵向漳、泉等地征饷征粮，补充兵力，在厦门设六官、建政权，整训军队，修建战船，添设炮台，进行战备。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间，清、郑和谈破裂，清派定远大将军济度率军入闽，企图以武力消灭或迫降郑军。郑成功接受古县、海澄战役的经验教训，认为在大陆上与清军八旗部队作战难以取胜，决心尽撤福、漳、泉、兴之兵，返回海岛，以迫使敌人到郑军有利的海上战场作战。因而命令将漳州各县城墙全部拆毁，免为清军利用。同时派水师南攻揭阳、普宁（均在今广东汕头西），北攻温州、舟山，以牵制清军。

九月间清军集中泉州，因郑军均已由陆上撤走，欲寻郑军决战，只能由海上进攻。经长时间准备后，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四月方完成进攻部署：全军由泉州港入海，然后兵分三路，一路攻白沙（今福建晋江南），一路攻金门，主力攻厦门。郑成功将主力布置在围头附近迎击清军。由于八旗部队不习于水战，两军一接触，郑军即击沉清军大舰一艘，适又忽逢飓风，清军船

只全部吹散，不少为郑军焚毁或俘获，清军败退泉州。

泉州港海战示意图　　（34-5图）



郑成功根据敌我双方特点，以避敌之长、击敌之短的思想指导作战，尽撤陆上之兵，迫使清军不得不在郑成功予期的海上战场作战，迫使它以短击长，是这次轻易获得胜利的决定因素。“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19]，”正是郑成功作战指导的概括。战后相当一个时期，清军没有再以主力进攻海上郑军根据地，改用“海禁”战略，企图封锁沿海地区，以断绝郑军战略物资的来源。六月间下达了“申严海禁敕谕”：

“严禁商民船支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处斩，货物入官。”[20]

由于郑氏得到当地群众的支援，反而使郑成功获垄断之利。这就使郑成功得以安心进行战备，使相机进取的方针得以实现。

第一阶段有关战略的两点看法

（一）郑成功的战略方针基本上适合客观条件，达到了他第一阶段要创建军队和立足海疆的目的。郑成功起兵较晚，这时清王朝已占有中原地区和长江流域，由于农民军和南明军还在合力抗击清军，清军主力不得不使用在西南方向，才使郑成功得以实现他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

但立足海疆，两栖作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把自己局限在漳、泉、厦一隅之地，它只能在沿海地区获得局部性战役、战斗的胜利，而难以对全面战略形势产生较大的影响。在敌人水军不多，还没有掌握制海权之前，以海岛为根据地固然有利于军事上的进退，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可以随时、随处乘其不意、攻其无备地进行登陆作战；但由于海岛幅员太小，两栖部队不能远离海域，无法进一步扩大军事实力，也无法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长驱直进、深入大陆腹地与农民军、南明军配合作战。郑成功在东南沿海地区奋战近十年，胜仗很多，但最重要的战役胜利，如前述三个战役，也主要只能影响他自身的存在与兴衰，并不能予清王朝以更大的打击。所以尽管多次消灭当面清军，但都局限于漳、泉附近地区，且所占之地，旋得旋失，不能有更大的作为。更何况经过多年的拉锯战争之后，漳、泉地区人民死伤惨重，〔21〕财物损失巨大，生产严重破坏，战略物资日益缺乏，正如郑成功的参军潘庚钟所说：

> “漳泉沿边，数载争战，民亦苦极”，“边地虽得，亦不足以号召天下豪杰。”〔22〕

（二）郑成功在战略运用上缺乏全局观点。固本蓄锐，以谋发展，这当然是正确的，但郑成功过分着眼于局部性的固本，只顾自身的巩固和发展，而忽略了关系抗清战争全局的战略运用，缺乏与西南战场李定国军团结合作的积极性。立足海疆仅仅是郑成功事业的起点，立足海疆本身并不能达到抗清复明的战略目

标，必须与其他抗清力量团结一致，密切配合，才有达到战略目标的可能性。郑成功顾恋漳厦，不敢远出作战，配合李定国的攻势，是郑成功在战略上的重大失误。他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错是错在执行上，时机来了，不够果决。江东桥战役后，李定国就与郑成功取得联系，多次主动要求协同作战，但郑成功对于这个要求不太积极，使当时的战略局势颇受影响。

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李定国收复桂林后，第一次写信约郑成功会师，郑成功失期未赴；〔23〕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李定国由柳州东进广东，连破高州、廉州、雷州三府，包围了广州的门户新会，清军利用水军从海道向围城中供应粮食、补充援军。李定国军善于陆战而缺少船支和水上作战的经验，因此顿兵坚城之下，久攻不克，故约郑成功率军南下，共取广州，要求务于十月半前会师新会。郑成功九月间接到来信，十一月初方派兵南下，已经耽误了约期；他又未亲自率军前往，派出之将也畏缩不前，终于贻误战机，致李定国军败退南宁。这次战役对全局关系甚大：如清军战败，则东西两大战场联成一片，将使整个抗清战争的战略形势改观，清军各个击破的战略既难实现，而抗清内部的团结合作也会有所增强，在心理上对全国人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当然，李定国的失败有他自己的错误原因，不能完全由郑成功负责，但郑成功的不够积极和愆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郑的态度不够积极，除了过分重视自身原因外，可能还有情况判断错误的因素在内。从战后他与李定国的信件来看，他没有料到李定国以连战连捷的二十万精锐之师，包围仅有两万之敌的新会，竟会突然惨败。郑成功事后对自己战略上的失误是有所认识的，他非常懊悔，一面重责畏缩不前的将领，一面向李定国写信检讨，自称有罪，并开始转变态度，主动对协同作战提出新的要求，希望李定国重攻广东，联合对敌。可惜为时已晚，大局已无可挽回。广东、广西四十二县的广大地区重为清军占领，李定国也“力屈不能复出，西南之业衰矣”。〔24〕

三、相机进取，北攻南京

清军占领楚、湘、赣、粤等地后，抗清阵营内的主力，基本上只剩下西南李定国和东南郑成功两大军事集团，（另有李自成农民军余部，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由刘体纯领导，活动于川、鄂边境大巴山、巫山、武当山、荆山四大山系之间的地区，进行抗清，但已不是主力，对清王朝的威胁不大。）西南战场紧张之际，清军无力以主力对付东南，因而采取政治招抚的政策，以和谈手段对付郑成功。郑成功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情况，以为李定国大军二十余万，曾“两蹶名王，天下大震，”[25]又以破竹之势东进广东，使尚可喜、耿继茂坐困广州，一筹莫展，短期内整个战争局势不会有大的变化。所以对南进与李定国会师不够积极，专心致力于利用和谈发展自己。当得知李定国新会惨败、退回南宁的情况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预感有孤军作战的危险，遂一反过去的消极态度，决心扭转内线作战的不利地位，积极准备发动战略反击，进攻南京，以配合李定国军在西南战场的作战。

（一）积极准备北进，三次受挫延期

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郑成功定下进取南京的决心后，即着手进行准备：挑选精锐，扩建亲军，健全组织领导，加强军事训练，撤回漳、泉地区的军队，约李定国“迅师入粤”，“共抵金陵，聚首策勋”。他原计划第一步以十二镇兵力南下潮州，以十二镇兵力北上温、台并占领舟山。指导思想是从当前和尔后的需要考虑的。从当前战役说，可避免与济度的八旗主力部队，在不利于我的陆上战场作战，并从南北两翼牵制清军。从尔后战役说，可配合李定国军入粤和确保厦门至南京间的海上交通线。当泉州港战役击败济度后，得知李定国与孙可望发生内讧，李定国军入滇，清军正准备全力进攻李定国军，为挽救西南战局的颓势，郑成功决心立即北进攻取南京。遂调回南下部队，积极准备出发。正当此时，郑的部将黄梧献海澄投清。海澄不仅是厦

门的门户，也是郑成功长期经营的陆上后勤补给基地。存放有"铁甲十万副，谷可支三十年，藤牌、滚被、铳炮、火药，皆以数万计。"[26]失去了海澄，也就失去了北进的军需补给。八月间清军又攻下舟山，切断了北上通路，于是第一次北进计划遂告失败。

海澄失掉后，郑成功乘福建清军主力赴漳州之机，亲率主力袭击福州附近地区，主要是强征粮食和军需品，以补偿海澄之失。并征调大批民工在闽安"增筑土堡城寨，以为长久之计"。准备以闽安（今福建福州市东）代替海澄为新的后勤补给基地。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正月，"令取运船料，发各镇造、修战船，以赴北征"。四月，派人往浙江，招徕松门一带渔民为乡导，以便进取长江"。[27]经准备后，于七月开始北进，九月进至台州、海门一带。清福建总督李率泰侦知郑军主力北上，乃"攻其必救"，由漳州回军，水陆两路夹攻闽安。郑成功回救不及，经四昼夜血战，闽安失守，新积蓄的粮食、军械等物资又全部损失。清军乘势向厦门进军。郑成功既失去北进的辎重，又恐怕根据地有失，被迫停止北进，率军返厦。第二次北进计划也告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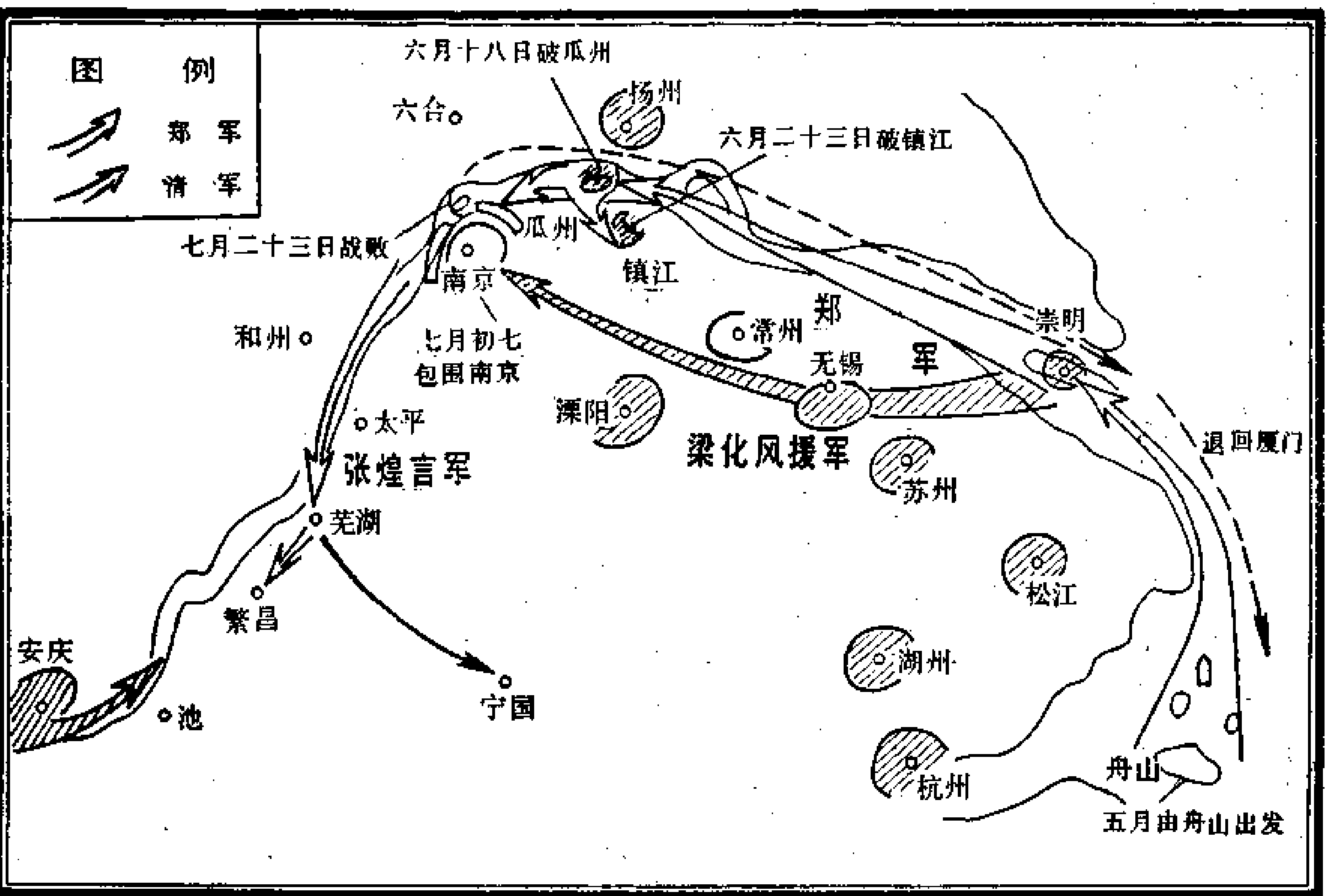
两次失败后，郑成功并未气馁，又着手进行准备。一面整顿军队，组建重甲步兵，[28]一面修整船支、军械，积蓄粮食、军需，改以海岛为后勤补给基地。同时向西南的永历帝汇报："欲躬督舟师，从瓜州、镇江而入，直取金陵，请命李定国、孙可望等领兵，由楚泛洞庭，会合恢复"。[29]并直接写信给李定国，请其立即出兵，"卷甲长驱，鼓行迅击，首尾交攻……表里合应"，以便"会盟畿辅"。五月间自厦门出发，七月进占舟山，八月进至羊山（今浙江杭州湾口外），忽遇飓风，"碎巨舰数十"，"溺死数千人"，武器、粮食损失无数。郑成功认为"今船支兵器损失，长江难进矣，须溜回舟山收拾，再作区处"。[30]这次北进，又被迫中止。

（二）进取南京，轻敌受挫

郑成功进军南京经过示意图

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五月至六月

（34－6图）



郑成功被迫停留舟山后，在浙江沿海夺船取粮，分派各提督就汛养兵派饷，造船制器，进行休整，并加强训练，考较弓箭。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三月，进攻定关（今浙江镇海）、宁波，将该处船支全部焚烧，以防主力北进后清军在海上切断其后方交通线。五月，郑成功率大小舰船两千余艘，兵将八十三营、水陆十七万大军，大举北进。六月至焦山，破瓜州，遂派张煌言率一部兵力溯江西上，越南京直趋芜湖，阻止清军水军来援。郑成功自率主力于二十三日攻克长江重镇镇江。七月四日继续西进，初七日包围南京。此时张煌言部已攻克芜湖，南京附近、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或降或克，势如破竹，俱为郑军占领，一时全国震动。

在局部出现抗清大好形势下，郑成功志得意满，认为南京指日可下，"属邑节次归附，孤城绝援，不降何待"。[31]清江南总督郎廷佐困守南京，八旗主力部队已去西南，城内兵力缺乏，遂伪称要降，派人送信与郑成功，请限一月期。[32]郑成功因轻敌误信诡计，既未阻止杭州、苏州、崇明等地援军入城，也未采取积极的进攻措施，顿兵城下近二十天无所事事，坐待敌降。以致军队战斗意志松驰，竟"日夜张乐歌舞"，[33]"释戈开宴，饮酒捕鱼为乐"。[34]

此时，西南战场的李定国军已经失败，进攻贵州的清军噶褚哈、马尔赛部已经回军荆州，东下来援，与南京守军取得了联系。由崇明来援入城的清总兵梁化凤，乘郑军丧失警惕、麻痹无备之机，于二十二日由凤仪门穴城而出，对郑军实施突然袭击。部署在凤仪门外的两镇郑军，全部被歼。二十三日，清军乘胜全力出击，郑军又因指挥、通讯失灵，各部互不联系，郑军被清军各个击破，纷纷溃逃。郑成功当机立断，迅速收军登船，撤出长江，返回厦门。张煌言孤军深入，在荆州清军攻势下，部队溃散，个人只身逃回浙江天台。南京战役以失败告终。

第二阶段有关战略的几点看法

郑成功在李定国新会战败之后，从全国抗清战争的全局出发，北上进攻南京以配合西南战场李定国作战，着眼是可取的，惜乎为时已晚，加以三次受挫延期，南京战役又指挥失当，终致损兵折将，失败而归，抗清战争的形势越发不利了。

从战略角度看，南京战役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丧失战机。这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新会之役是南方抗清战争的转折点，李定国战败后由于与孙可望内讧分裂，已回师云南，忙于保护永历小朝廷与孙可望兵戎相见。紧接着孙可望降清，泄露了西南抗清军的全部机密，"尽图山川迂曲及诸将情形、兵食多寡献之"。本来永历帝曾致书郑成功，命他北进，约期"以明年夏会南都"，另一方面"驰檄荆西，约王光兴、李来亨等（夔东十三家军）会荆州。号召四出，期大举出楚。而诸将吏兵民见可望北降，知虚实险易尽输于敌，皆摇摇无固志"。[35]形势已急转直下，清军乘机加紧进攻李定国军，以致西南、东南两战场各自为战，未能配合，使郑成功形成孤军作战。

再从战役角度看，郑军攻占镇江之后，未即乘胜进军，在原地滞留十日之久方才行动，使南京清军得以收缩兵力部署防务，也失去了突然袭取的有利时机，到达南京后因胜而骄，受敌愚弄，既不全面包围，也不部署攻城，更未控制城外各要点，坐视苏、杭、崇明等地清军入城。以致遭到城内清军的突然出击而遭致失败。

假如郑成功在战役指导上不犯错误，及时攻下了南京，也同样达不到预期的战略目的。因为在战略上配合李定国实施反攻的有利时机已经丧失，即便攻下南京也难以挽回败局。孙可望降清后，西南战局急转直下，清军分三路进攻，李定国率主力与清军卓布泰大战，连败于罗平、永昌（今云南保山），全线崩溃，精锐尽失，家属子女被杀，军民死丧三、四十万。李定国率残部逃

至中缅边境，大势已去，败局已定。进攻西南的清军主力已经于七月间经湖南北上，同时顺治又派“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都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统兵征剿郑成功。”[36]郑成功也只能弃城南归，否则将孤军被围于南京，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南京失败后，郑成功决心撤回厦门是明智的，当时不守镇江，曾受到当时和后代不少人的批评。如张煌言说：“初意石头（南京）师即偶挫，未必遽登舟，即登舟未必遽扬帆，即扬帆必且复守镇江，……距意延平王不但舍石头去，且弃铁瓮瓦城（指镇江）矣。”[37]当时张煌言陷师芜湖，有这些指摘是可以理解的，但并不是从战略全局考虑的。郑成功退至镇江时，罗子木痛哭流涕地向郑成功说：

“公何以非十年之力，辜天下望？”“公兵势尚强，奈何以小衄挫志。彼战胜而惰，转帆复进，南都必破，失此事机复欲再振，其可得乎”。[38]

这些议论都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的。郑成功能够在内线作战形势下与优势清军作战十三年，主要因素是清军战略重点始终在于西南，无暇东顾。现在李定国业已失败，远征西南的清军主力均已返回。如按张煌言、罗子木的意见留守镇江或返攻南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徐鼒说的好：

“山东之师冲其左，江楚之援掣其右，金陵郎廷佐、梁化凤捣其中坚，岂能全师返哉！”[39]

实际上只要长江航道被清军截断，郑军势将全军覆没，所以，郑成功不顾反对意见，毅然返军厦门的决策是正确的。

四、实施战略转变，东向收复台湾

（一）厦门保卫战及新战略方针的形成

郑成功南京失败之后，清统治者改变了对郑成功的政治招抚政策，决心以军事进攻将其消灭。命令原由北京南下增援南京的安南将军达素部跟踪入闽，并配属以浙江明安达礼部八旗军，同时调集江、浙、粤、闽沿海省份的绿营水军，统由达素指挥，企

图围攻厦门，一举全歼郑军于海上。

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三月达素到达泉州，开始集中部队、组织战斗。他的部署是：明安达礼率军由围头港进，福建总督李率泰与黄梧率军由海澄港进，达素与施琅率主力由同安港进，分进合击，围攻厦门。郑成攻认为清军“舍弓马长技，以与我争衡于舟楫波涛之间，”[40]是自失优势。决心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缩小战线，集中兵力，采用以攻对攻的战法与清军在海上决战。

五月十日黎明，清军开始进攻，激战竟日。达素所率主力部队，曾一度登上厦门岛。但终因不擅海战遭到歼灭性打击，突入岛上的清军全军被歼。总计死伤万余人，达素败退泉州。这次战役虽然获得胜利，但郑成功清醒地认识到清军决不会就此罢休，必然还要集中兵力来攻，由于已失去漳，泉外围，仅此“弹丸两岛，难以抗天下兵”。[41]遂决心改变方针，东进收复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企图，并非自现在开始，早在起兵之初就考虑过。这从他收复台湾后所写的《复台》诗中可以得到证明。他说：“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42]当时荷兰人文件中在公元1646年也有郑成功可能进攻台湾的记载。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荷兰在台湾的传教士报告东印度公司，说郑成功“企图窥伺台湾，最后占据那个地区。”郑芝龙旧部郭怀一于当年起义，荷兰人更认为“他们受国姓爷（郑成功）方面的鼓励”。[43]这一切都说明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思想早就存在，只是由于过去一直对付当面清军，未能顾及台湾。南京失败后，郑成功认识到清朝统一大陆之势已成，自身势弱力孤，金厦根据地难以持久，又恐荷军与清军联合夹击。经深入思考后，终于下定决心改变战略方针，收复台湾为新根据地，以便于持久抗清。遂不顾张煌言等人的反对，果断地由南京撤回。为避免两面作战，郑成功还企图以和谈手段暂与清军妥协，以便能集中兵力对付荷军，当退至吴淞口时，曾派蔡政往见清军提督马进宝，通过他去北京

奏请议和。到厦门后郑成功："广行招募旧时散逸将领官兵"，"修整船只，备造军器"。[44]并招聘了三百名熟悉台湾海港、地形情况的领航员，[45]作东进的准备。此时台湾荷军通事、郑芝龙的旧部何斌由台湾来厦，报告了有关荷军兵力部署等情况，并将绘有台湾航道、港湾、沿岸地形的地图献给郑成功，同时反映了台湾人民期待迅速驱逐荷兰殖民者的迫切心情与愿望，这更坚定了郑成功的决心。十二月蔡政自北京返回，报告"和谈不成……清朝委满将军达素带满汉万余骑前来剿海，另调浙、直、广东数省水师合剿"[46]的情况。郑成功当即召集会议，决定在清军入闽前派军攻台湾，以"安顿将领官兵家眷"。但不久得到达素先头到达泉州的情报，东进之行遂暂告中止，全力对付入闽清军。五月厦门保卫战胜利后，仍需准备清军的再次进攻，无暇分兵东进。直到十月，获得"达素回京，各水师尽调，俱搁在岸边"[47]的情报，才一方面派大批军队南下取粮，积极作东进的准备，一方面送信与荷兰总督揆一，故意示以无图台之心，以麻痹敌人。信中说：

阁下致疑于我对荷兰国之善意，猜想我正准备某些不利于贵国之敌对活动，显然，此乃出诸居心叵测者无稽之谈。我多年来与清朝交战，恢复国土，戎马倥偬，焉有余暇对此草莽丛生之小岛如台湾者采取敌对行动。"[48]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郑成功召集高级官将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自己改变战略方针、欲取台湾的决心。他说：

"去年虽胜达素一阵，清朝未必遽肯悔战，则我之南北征驰，眷属未免劳顿。前年何廷斌所进台湾图，田园万顷，沃野千里，饷税数十万，造船制器，吾民鳞集，所优为者。近为红夷占据，城中夷夥不上千人，攻之垂手可得者。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后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49]

部众虽有不同意见，但未能动摇郑成功收复台湾的决心。郑

成功新的战略方针，可以他自己的话概括为：以台湾为根据地，生聚教训，蓄积力量，尔后东征西讨，长期与清军对抗。

（二）台湾概况及荷军在台的部署

台湾省主要由台湾岛、澎湖列岛和钓鱼岛为中心的三个岛屿群所组成。陆地总面积约三万六千平方公里。其中以台湾岛最大，澎湖岛次之。远古以前，台湾岛本来是我国大陆一部分，万年前因气候变化，海洋水面上升一百多米，台湾才与大陆分离，形成海岛。

台湾位于我国东南海上，距厦门仅三百公里，南与东山、海南岛、南海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等群岛；北与马祖、大陈、舟山群岛构成一道屏障东南沿海的“七省之藩篱，”被称为“东南之锁钥”。历来外国侵略势力如荷兰、西班牙、日本、法国、英国、美国等侵略台湾的目的，均不仅为掠夺台湾当地资源，更重要的是企图以台湾为前进军事基地，从这里进一步侵略我国大陆，关系国防甚巨，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早在三国时，黄龙二年（公元230年），孙权就曾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余人航海到达台湾（当时称夷州）〔50〕，隋炀帝时，先后两次派羽骑尉朱宽和虎贲郎将陈棱等率平阳兵万余人到台湾（当时称流求）〔51〕，南宋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泉州知州汪大猷开始派兵长驻澎湖，当时隶属于福建泉州晋江县〔52〕，元世祖至元末（公元1290年前后），澎湖设巡检司管理台湾与澎湖。〔53〕明承元制不变。明代末叶，随着东南沿海商业资本的日益发展，闽、浙、台、澎地区相继出现一些海上武装贸易和海盗集团，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他未投明前，曾以台湾为根据地，并曾建立过一定规模的军事性质的政权机构。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前后，福建南部遭遇旱灾，郑芝龙“招饥民数万人”送台湾垦荒，并供给耕牛、农具、种子和生产资金等，对台湾的开发和发展有过一定的贡献〔54〕。

荷兰是“十七世纪的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叶，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在世界上占第一位。它的贸易投资比英国多十五倍，商船吨数占世界总吨数百分之五十，舰队实力远远超过英、法两国的联合力量，被称为“海上霸王”。[55]明末，正是它凭借军事力量大规模侵入亚州、进行掠夺的时代。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荷兰舰队司令韦麻郎率军首次侵入我国澎湖，并在当地筑城，企图久占。被明军都司沈有容部驱逐，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荷兰舰队司令雷约兹再度率军侵入澎湖筑城，并多次派舰队向我福建沿海侵掠。福建巡抚南居益派军进攻，荷军被迫撤走[56]。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荷军侵入台湾。由于当时明朝统治者正忙于镇压农民起义和与努尔哈赤后金政权作战，无暇顾及海上，因而荷兰殖民者得以开始其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荷军在台湾西南部大员岛（一鯤身）东岸修建了热兰遮城（中国当时称为台湾城或红毛城，约在今台湾省台南市、安平附近）后又在城西岸边修建乌特利支堡。郑成功起兵抗清后，为防备郑军来攻，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荷兰巴达维亚统帅部决定：“热兰遮城堡即在太平时期守军也不得少于一千二百名”。城外各地尚有分散荷军近千名。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郭怀一起义及得到郑成功可能进攻台湾的情报后，又在赤嵌筑普罗文查城。顺治十七年（公元1660年），荷军感到“台湾的末日和国姓爷的到来已经迫在眉睫”，[57]由巴达维亚派“樊特郎率领一支十二艘船的舰队，运载一千四百五十三人（其中士兵六百人）”[58]增防台湾，八月间到达。由于樊特郎与当时的台湾总督揆一意见分歧，樊看到郑成功十月十九日与揆一的信后，认为郑成功不可能进攻台湾，遂留下三艘战舰、六百名士兵及火药武器等军需品，自率其他船舰于顺治十八年正月间返回巴达维亚。

郑成功进攻台湾直前，荷军在台兵力主要均集中在热兰遮和普罗文查二城。北部基隆、淡水等地仅有少数部队。荷军自持船坚炮利，是当时世界头号军事大国，狂妄自大，看不起中国人

民。

> “他们相信中国人受不了火药的气味和枪炮的声音，只要放一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就会吓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虽然他们也时常听到关于国姓爷抗击清朝军队的勇敢事迹，证明其部下决非胆小之辈，但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姓爷士兵只不过同可怜的清军交过锋，还没有同荷兰人较量过，一旦和荷兰人交战，他们便会被打得落花流水”。〔59〕

荷兰人对台湾人民实行高压殖民政策，所有土地全部归荷兰所有，七岁以上收人头税，稍有不顺即以武力残酷镇压。有时将整个村庄“剿灭无孑遗。”郭怀一起义失败后，荷军血腥屠杀汉人近半月，杀一千八百余人，捕四千余人，占当时赤嵌地区人口大半以上。〔60〕人民对荷兰殖民者恨之入骨，迫切盼望郑成功的军队迅速进攻台湾，驱逐荷军；并有不少群众领袖人物与郑军有秘密连系。

（三）收复台湾之战

1．抓住有利时机，实施远程奔袭

收复台湾，是郑成功新战略方针主要的一环，方针既定，何时实施就成为必须慎重对待的重要问题。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正月，郑成功分析当时形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毅然向部属宣布自己的决心和企图，进行动员。郑成功选择的时机，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利的，主要有：

——舟山的明安达礼部和福建的达素部八旗部队，已于去年七、十两月先后撤回北京，东南沿海地区仅有清绿营军。这说明清军在厦门失败之后，又转为遏制战略，不准备在短期内再组织海上攻势；清顺治皇帝又于本年正月去世，按封建统治阶级传统惯例，暂时不可能对厦门采取大的军事行动。基于上述两种情况，可以判断东进时不会产生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危险。

——据情报得知，荷援军舰队司令樊特郎已于本月“率领军

官回到巴达维亚去了，支援舰队的船只又分散在各地。派来的援军还不到六百名”，又“都没有军官率领”，同时南贸易风即将开始，台湾船只无法顶风去巴达维亚请援，“只要封锁住进攻的消息，不让巴达维亚方面得知，就不用担心巴达维亚方面派兵前来”。[61]南贸易风对郑军东进固然有不利影响，但同远离数千里的巴达维亚比较，影响要小得多。由台湾去巴达维亚，最快亦需月半，而从厦门至台湾不过两天。一旦开始进攻，荷军将陷于孤立无援境地，郑军则可源源不断地增加援军和补充作战物资。

——郑军经过一年来的不断准备，兵力已全部集中，粮饷已征集完毕，军械船只大部已整修完了，三百名熟悉航道情况的响导已经配齐，台湾荷军情况及港口、潮汐等情况已经掌握，台湾人民也已做好接应登陆的一切准备。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郑成功将精选的三万余人集中于金门岛，进行临战准备。他的部署是：将进攻部队区分为两个梯队，郑成功自率主力精锐十二镇、两万五千人为一梯队，命镇守澎湖游击洪暄率本部及响导、领航员为前卫；其余六镇一万二千人为二梯队。留世子郑经率一部兵力守厦门，户官郑泰率一部兵力守金门，洪天佑等率一部兵力泊南日、围头一带，与金、厦互为策应，防止清军突然袭击。

三月二十二日由料罗湾出发，二十四日到达澎湖，即派舢板船两艘去台湾侦察敌情并与居民连系。因飓风阻止，至四月初一日晚[62]方开始向台湾进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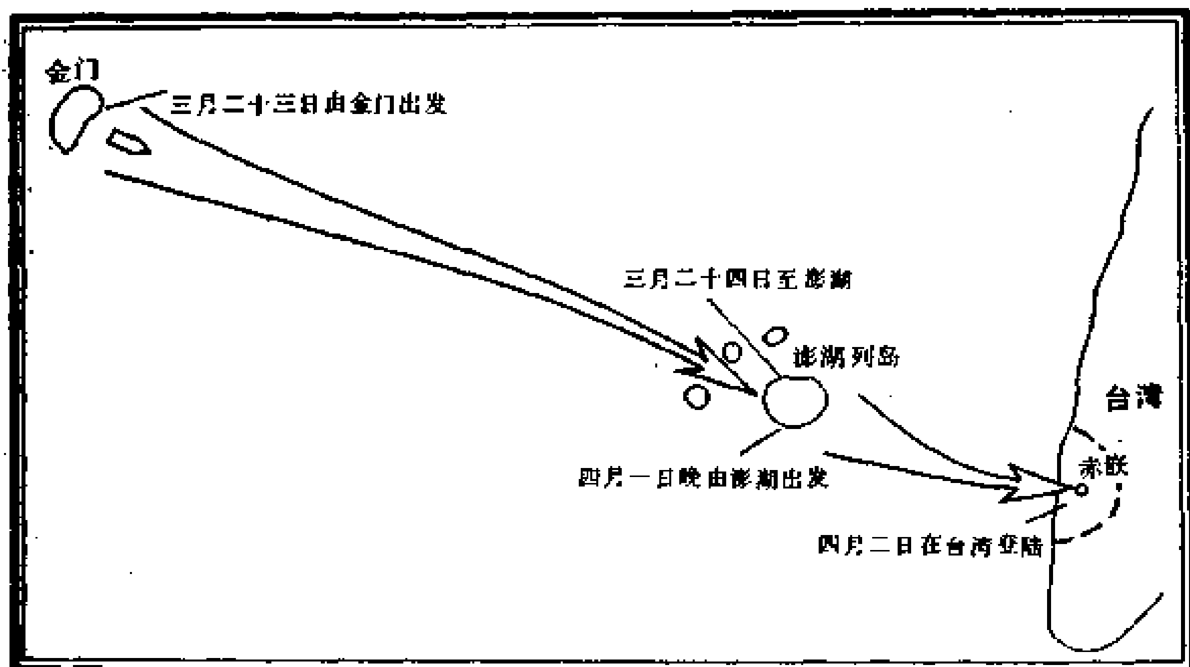
2．选择有利地点，进行登陆作战

荷军在台兵力共约二千余人，主力防守热兰遮城，一部兵力约二百余人防守普罗文查城。另有大战舰两艘、快艇两艘泊热兰遮城东侧江中。热兰遮城在一鲲身岛，北与北线尾、鹿耳屿，南与二鲲身……七鲲身连成一条防波堤，堤西为外海，堤东为内港，阔六里，长三十里，港名台江。一鲲身岛与台湾本岛赤嵌的普罗文查城隔江相对。由外海进入台江的道路，主要为一鲲身与北线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示意图

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三—四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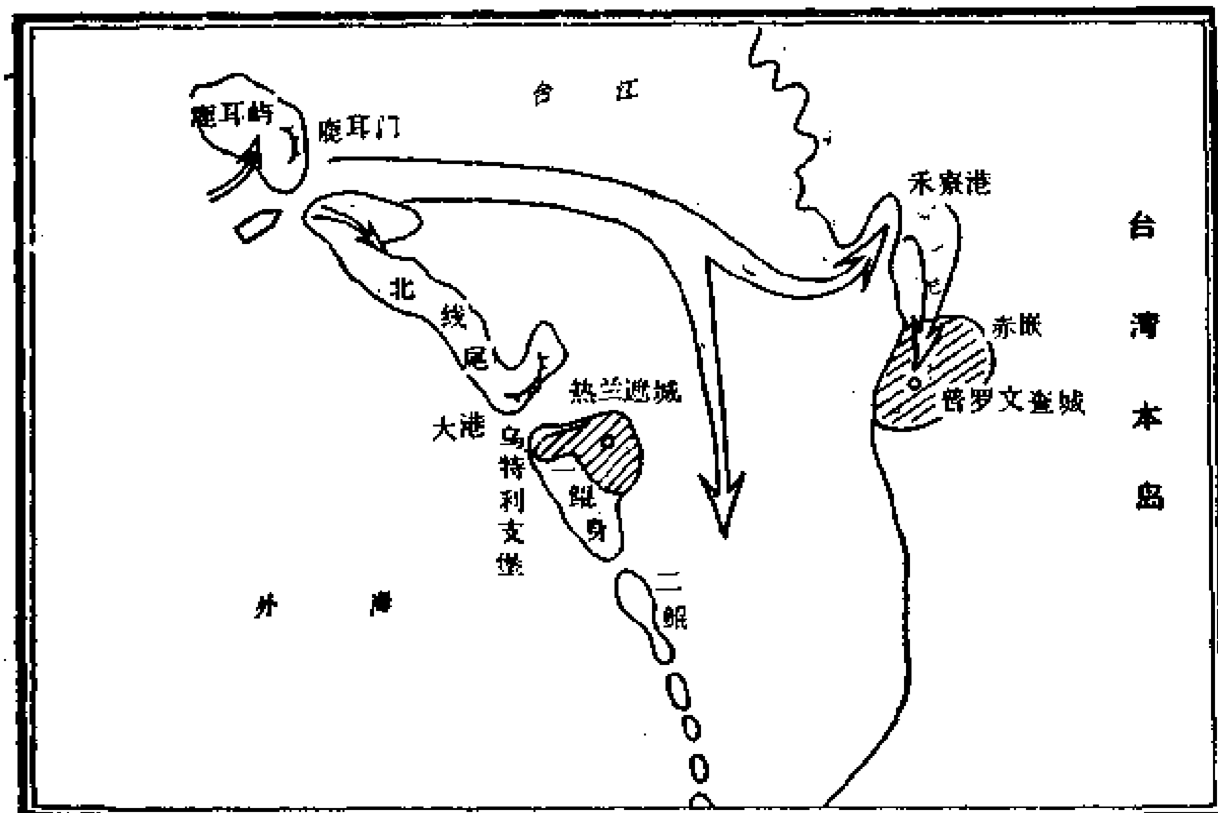
(34-7图)



郑成功收复台湾登陆作战示意图

顺治十八年四月二日

(34-8图)



尾之间的大港（又名南港），大船可通行无阻，但在荷军炮火控制之下，北线尾与鹿耳屿之间为鹿耳门港(又名北港)，过去亦为出入的门户，后因沙石淤浅，平时只能通行小船。荷军原在北线尾北端筑有热堡，控制鹿耳门航道，后因航道淤浅，热堡年久损坏，未再修建，仅盖小房一座，派“一名伍长、六名士兵驻守”，以监视鹿耳门港。

郑成功对台湾敌情及地形早已了若指掌，根据过去的腹案，拟定了一个避实击虚的登陆作战计划。其要旨是：不在一鲲身岛登陆，不攻敌人主力所在的热兰遮城，并避开敌人炮火控制的大港舰道，先以一部兵力乘小船登陆北线尾，监视荷军、掩护主力舰队行动；舰队主力乘涨潮之机，出其不意地由鹿耳门港进入台江，迅速切断热兰遮与普罗文查两城的连系，同时以主力在敌人未设防的禾寮港直接登陆本岛，进围兵力薄弱的普罗文查城，尔后再各个击破敌人。这是一个大胆而英明的作战方案，正如《孙子兵法》所说的：“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四月初二日晨，郑军舰队进抵鹿耳门外，郑成功亲自换乘小船、率一部兵力登陆鹿耳屿，勘察地形、敌情。中午潮涨时，按予定计划行动；午后在何廷斌及响导引航下，全部舰队驶入台江，主力即在禾寮港登陆，台湾人民纷纷前来接应。当时荷军总督揆一说：

> “随即有几千中国人出来迎接他们，用货车和其他工具帮助他们登陆。这样，不到两小时，大部分敌军已进入我们的海港，几千名士兵已经完成了登陆，其战船则驶抵我方两城堡——热兰遮城堡及普罗文查城堡之间。”〔63〕

郑军登陆后首先抢占了赤嵌街粮食仓库，防止荷军破坏，同时将普罗文查城包围。

荷军对郑军的突然出现和如此轻而易举地进入和登陆感到束手无策，进退维谷，一筹莫展。经过一段犹豫，为了摆脱被动局

面，荷军采取了以下措施：命令所有四艘战舰向已控制台江的郑军舰队攻击，恢复两城连系；派阿尔多普上尉率二百名荷军渡台江增援普罗文查城；派汤姆斯、贝德尔上尉率二百四十名荷军向已占领北线尾的郑军进攻，以控制鹿耳门港，切断外海与台江的通道。四月三日荷军开始行动：海战方面，荷军大败，最大战舰赫克托号被郑军以火船烧毁炸沉，斯·格拉弗兰号和向鹭号仓惶败逃日本，快艇马利亚号冒顶风逃往巴达维亚，荷舰队彻底瓦解；阿尔多普所率荷军，在郑军截击下，仅六十人进入普罗文查城，其余被迫撤回；贝德尔所率荷军，在郑军夹击下，遭到歼灭性打击，贝德尔以下阵亡一百一十八人，淹死一部分，仅约八十人得以退回。[64]至此，荷军三路出击部队，全部失败，热兰遮与普罗文查二城被郑军分割包围。

3．经过长期围困，荷军被迫投降

四月六日，普罗文查荷军司令描难实叮率所部投降，全岛人民掀起了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高潮。淡水、基隆、新岸地等郑军尚未到达的地区，也都发生了捣毁教堂和荷兰统治机构的事件，很多原荷兰人的黑人奴隶，也都参加郑军对荷军作战。荷兰在台湾的殖民统治迅速瓦解。二十七日，郑军对热兰遮城实施强攻，由于攻击部队荫蔽不良，伤亡较大，连续五日未能攻下。郑成功考虑孤城无援，强攻未免会有伤亡，即改变战法，将所有通向城堡的街道都筑起防栅，并且挖了一条相当宽的濠沟，以一部军队防守围困，而将主要兵力抽往各地建立政权和进行屯垦。

马利亚号快艇，“冒险逆着南贸易风沿菲律宾群岛航行，历尽艰险，足足花了五十天，才到达巴达维亚港外碇泊场。”向荷军统帅部报告台湾情况。荷军总部派考乌率战舰十艘、士兵七百人来台增援。六月二十九日到达台湾港外。因风浪过大，停海上二十八天方驶入港内与热兰遮城荷军会合。八月五日，荷军分水陆三路实施反击：以舰队主力向停泊在台江的郑军舰队攻击，使其不能策应陆上郑军；以四百名荷军出城由正面攻击市区郑军；

以两艘战舰迂回至市区郑军背后，用火力支援由正面进攻的荷军。由于郑军预有准备，战斗开始后仅一小时，就用火船烧毁了荷舰克登霍夫号，以密集的炮火击碎了科克伦号，还俘获了搁浅的两艘荷舰和三艘小艇，歼荷军近三百人。陆路荷军亦被郑军击败，退回城堡。在外援不能再增加的情况下，荷军病亡相继，斗志消沉。郑成功从荷军投诚军曹拉迪斯口中，了解到荷军情况，遂于十二月六日集中火力、兵力先攻下乌特利支堡，占领该高地，居高临下，使热兰遮城完全暴露在郑军炮火之下。十二日，荷军决定投降。经数日谈判，签订了十八条投降条约，规定荷军交出所有城堡、武器、物资，包括大炮一百五十尊，小铳四千支，可供五个月食用的粮食和价值四十七万一千五百荷盾的珠宝、现金。荷军残存的五、六百人，由最末一任荷兰总督揆一率领，分乘船舰八艘（内四艘是由郑军发还的）退出台湾。从此，台湾重新归还给中国，结束了荷兰人三十八年的殖民统治。

第三阶段有关战略、战术的几点看法

（一）决策东进，战略正确

郑成功转变战略，收复台湾的决策，在当时并非多数人所能理解，实施的阻力很大。不仅其部属中有人“颇有难色”，就是他的至友张煌言等也竭力反对。张煌言认为当时情况已转化为对郑军有利，不应东进攻荷，而应北进攻清。他给郑成功的信中说：

> “今虏首新斩（指顺治死），孤雏新立，所云主少国疑者，此其时矣；满党分权，离叛叠告，所云将骄兵懦者，又其时矣；且灾异非常，征科繁急，所云天怒人怨者，又其时矣。兼之虏势已居强弩之末，畏海如虎，不得已而迁徙沿海，为坚壁清野之计，致万姓弃田园、焚庐舍，宵啼露处，蠢蠢思动，望王师何异饥渴，我若稍为激发，此并起亡秦之候也。惜乎殿下东征……殿下诚能因将士之思归，乘士民之

思乱，回旗北指，百万雄师可得，而百什名城可下矣。又何必与红夷较雌雄于海外哉。”

甚至批评郑成功收复台湾“生既非智，死亦非忠”，“纵偷安一时，必贻笑千古。”[65]张煌言坚持抗清，最后被俘不屈而死，是一位很有气节的地主阶级抗清派人物，值得尊敬。他急于恢复明朝统治的心情也可以理解，但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对郑成功的批评，则不符合客观实际，也不够公平。

首先，郑成功收复台湾，决不是违背初志，为了偷生而逃走，仍然是抗清复明的继续。他在澎湖时向部下的庄严声明可以作证。他宣告说：

“本藩矢志恢复，念切中兴。前者出师北讨，恨尺土之未得；既而舳舻南还，恐孤岛之难居。故冒波涛，欲辟不服之区，暂寄军旅，养晦待时；非为贪恋海外，苟延安乐。”[66]

其次，根据当时的战略形势，郑成功不仅无力再度北进，即欲仍以金厦为根据地也难以持久。战争是敌对双方的生死斗争，各自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力图使局势变得有利于己。但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不断消长变化，当时西南战场上，永历帝已逃入缅甸，李定国军仅余少数残部局处于中缅边境一隅，已无所作为；原在川、陕、鄂交界处的夔东十三家军，两攻重庆均告失败，此时也失去了主动出击的能力。郑军孤军北伐，成功的可能性就很渺茫了。至于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不过是集权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并不影响大局，更非当时的主要矛盾。就以漳泉地区来说，因连年作战，已十室九空，失去了战略资源地的作用。加以郑军经过南京战役，兵力、物力都损耗极大，如不东取台湾，建立新的根据地，清军若调集兵力再度来攻，则近海的金厦二岛，也难持久。

再从经济、政治情况上看，当时与郑成功起兵之初的紊乱情况已大不相同。战争性质开始转化，抗清复明的旗帜，对人民已

没有多大的号召作用。清朝统治集团接受了明朝覆灭和农民军及各地人民英勇抗清的教训，开始改变初入关时的民族高压政策，采取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从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七月，开始根据不同情况减免部分田赋，下令“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及买米豆尽行蠲免”。（并未能彻底实行，但较明代已轻）还实行了召徕流亡，开垦荒田的政策，“以荒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民屯种，有主无力者，官给牛、种，三年起科”。[67]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随着战争逐渐减少而慢慢恢复。如顺治八年时全国登记的户口数为一千零六十三万余，耕地面积为二百九十万顷，至顺治十八年，户口已增至一千九百一十三万余，耕地面积五百二十六万顷。[68]十年间各增长约百分之八十。广大人民希望能安定地进行生产、生活，他们对战争已经厌倦。各地起义抗清的斗争，均已转入低潮。

郑成功掌握局部政权和指挥作战已历多年，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当然有深刻的理解。他力排众议，坚决东进的决策是正确的。何况从历史角度、从客观效果看，郑成功收复台湾，保障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和发展，使我国沿海地区免受西方殖民者的侵扰，对清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也为尔后玄烨统一台湾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亚洲人民反殖民斗争取得了第一次大胜利，鼓舞了东南亚各地人民的反殖民斗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西方殖民势力的东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二）登陆作战指导正确

荷兰是当时最强大的殖民国家，在武器装备上较郑成功的部队占很大的优势，又是以逸待劳、依托城堡进行防御作战。郑军能否获得登陆战的胜利，对于完成整个战略计划有很大影响。郑成功在战役开始前作了充分的准备：掌握了敌情、地形，了解了风信潮讯，征集了响导，布置了内应，并以“用而示之不用”的

手段写信麻痹敌人。然后选择有利的作战时机，有利的进军航路，有利的登陆地点，“攻其无备，出其不意”，〔69〕“批亢捣虚”〔70〕“违害就利”〔71〕，以突然袭击一举登陆，并立即切断荷军连系，完全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应当说郑成功的战役指导是相当高明的。

郑军登陆后迅即占领赤嵌市区和热兰遮市区，控制了粮食仓库，解决了当时最迫切的军粮问题，这对尔后的作战，影响甚大。“用兵制胜，以粮为先，”〔72〕荷军司令考乌曾说：

“国姓爷如果没有从该地获得如此大量粮食，其军队就会因饥饿而崩溃，或者不得不被迫撤退。”〔73〕

（三）围城待降，失之消极

郑成功强攻热兰遮城受挫后，立即改变为围困的决心是正确的。但也有不正确的一面。首先是又重复了南京战役的错误，“围而不严，封而不死”，没有切断城内荷军与海上的联系。荷援军八月到台时，竟可毫无阻碍地给城中补充军需、运出伤员，并联合进行反击。其次，在战役上采用了单纯的围困，没有组织积极的进攻战斗与之配合。如果早日实施后来荷军投诚军曹的建议，“充分利用围城内普遍存在的惊惶情绪和疲弱状态，不仅封锁，而且要用连续的攻击来彻底疲惫敌人，使其完全绝望”〔74〕，则胜利可能来得更快一些。

第二　玄烨统一台湾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政治目的，是建立新的抗清根据地，待机反攻大陆，恢复明朝，统一中国。但他于收复台湾的第二年就抱恨死去，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达到他的政治目的。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时，正是清朝第二代统治者爱新觉罗·玄烨登基之年。这位康熙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自幼雄心勃勃，力图有所作为。为了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他认为“天下

大权，当统于一”，[75]非常重视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终于统一了台湾。玄烨即位到统一台湾，经过了漫长的二十二年，其间随着形势的变化，清统治集团对台湾郑氏政权的战略重点，曾数度变化，军事进攻与政治招抚交互使用。在军事进攻方面，迟疑犹豫，决心不强，直到平定“三藩之乱”[76]后，玄烨才下定决心，排除干扰，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招抚同时并用，而以军事进攻为主的战略决策，胜利地完成了统一台湾的大业。

一、三藩之乱前清朝对郑氏政权的战略

（一）郑成功去世前后郑军概况

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后，立即大力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改赤嵌为安平，设一府（承天）、二县（天兴、万年）管理民政；实行鼓励垦荒、“寓兵于农”的政策，并积极帮助因清军实行“迁界”政策而流离失所的沿海人民移居台湾；建立“官田”、“私田”、“营盘田”[77]等三种封建土地所有制；设立乡塾，发展教育事业；还特别注意实施正确的民族政策，得到了汉族和高山族广大人民的真诚拥护，对台湾的开发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郑成功积极开发和加紧巩固这个新的战略根据地的政策，既不为他本阶级抗清派的南明遗老们如张煌言、徐孚远等所理解，更不为他的亲属、部属中贪恋舒适生活的将领如郑泰、黄廷等所接受。他们从各方面加以责难和反对。郑泰等竟发展到拥立留守厦门的郑经统兵抗拒郑成功，断绝台湾郑军的后勤供应，“不发一船到台湾，”[78]此时恰逢明永历帝在云南、郑芝龙全家十一人在北京分别为清朝杀害的消息传到台湾。正在病中的郑成功经不起这些沉重的刺激，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五月八日忿恚而死。

郑成功死后，郑军内部产生了争权斗争，在台将领拥护郑成功之弟郑世袭代理王位，郑成功之子郑经率军由厦来台，战败了拥护郑世袭的部队，继位为延平王，又将与拥护世袭有关的郑泰

拘禁致死，其弟郑鸣骏率兵八千、船二百余只，由金门去泉州投诚清军。郑经于巩固好个人地位后，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正月返回厦门。

二、“因剿寓抚”的方针和攻取金厦

清军在进攻金、厦被郑成功在海上击败之后，自度舟楫非已之长，不肯再以八旗部队渡海作战。在战略上由军事进攻改为经济封锁。将八旗主力尽撤回京，而以耿继茂所部和福建绿营兵防守沿海港口，用郑军投诚人员房星烨之策，“命户部尚书苏纳海至闽迁海，迁居民之内地，离海三十里，村社田宅，悉皆焚弃”，[79]筑短墙，立界碑，拨兵防守，出界者处死。这种消极的单纯封锁，除了使人民受灾而外，对郑军来说，不仅未能奏效，在当时条件下，反而为郑军增加了劳力资源和后备兵源，因迁界而失去家园的“闽、浙居民附舟师来归，烟火相接”，[80]大批逃往台湾。

郑成功死后，郑军内部矛盾加剧，“人心解散，镇营多叛”，[81]福建清军认为有机可乘，多主张变消极封锁为积极进攻。例如原郑军投诚将领黄梧上疏说：

> “郑经有伪总兵四十，断不宜招抚。彼众贼心未定，又未纠合完备，当应趁其慌乱犹豫之际，神速进兵剿灭之，如待其羽翼丰满，声势肆张之时，则又一郑成功矣。”[82]

又如原郑军投诚将领施琅上疏说：

> “海贼情形，今非昔比，郑成功已死，而郑经乃一顽童，难于成事……伪官兵各怀二心，未必顺从。自严敕边民内迁立界以来，其与贼私通接济者日少。……力竭穷蹙，每闻风声，慌乱不堪……若不趁此良机而取之，致失机缘，必将贻误谋略非浅。”[83]

当时西南李定国部已被消灭，夔东十三家军也正在巫山、巴东一带被清军围攻，接近被歼，清统治集团认为有可能将战略重点移向东南，同意黄梧、施琅等的判断和建议，决心采用“因剿寓抚”的战略方针，命令福建清军“审度形势，详筹机宜，相

机进剿”。[84]康熙二年九月间，荷兰远征舰队司令波特率战舰十六艘，士兵二千六百余人，侵入泉州港，清靖南王耿继茂与福建总督李率泰等议定，竟联合荷兰殖民军协同进攻郑军。荷兰殖民军企图消灭郑军后好再度侵占台湾，当然愿意插手于我国内战。十月二十日，清军发起进攻，其部署是：陆路提督马得功率郑军投诚部队郑鸣骏、杨富等部及荷舰队一部出泉州港；水师提督施琅与黄梧率各该部出海澄港；耿继茂所部与荷兰舰队主力出同安港；同时向厦门进攻。郑经率周全斌、黄廷等部出海迎战，两军在金门海上激战一日，郑军船多损坏，遂放弃金、厦，退守铜山（今福建东山岛）。

（三）“寓剿于抚”的方针使郑军瓦解

清军攻占金、厦后，乘郑军士气低落、众心离散之际，改用“寓剿于抚”的方针，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兵部、户部均派满、汉郎中各一员长驻江、浙、闽、粤四省，对郑军进行招抚。规定武将率部投诚、按原衔、原职授官；个人单独投诚，降四级任用，有立功表现者则只降两级；并规定武将可改任文官，以利于安置；士兵来归者，愿留军中则补缺给饷，愿归农者则交地方安插。当时郑军中不少人已看出清朝统一全国之势已成，继续抗清没有出路，加以军事上的失败，大批郑军向清军献岛投诚。如郑经得力将领、五军总督周全斌，前提督黄廷等数十员总兵官，都率所部投诚。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秋七月，管理福建安辑事务郎中贲岱疏报：

> “自康熙元年至三年止，合计投诚文武官三千九百八十五员，食粮兵四万九百六十二名，归农官弁兵民六万四千三百三十名口，眷属人役六万三千余名口，大小船九百余只……”[85]

郑军精锐，损失殆尽。郑经被迫放弃沿海诸岛，率残部撤回台湾。

此时西南夔东十三家军已被清军傅喀禅、李国英部消灭，郝

摇旗、袁宗弟等农民军领袖也为清军杀害。沿海岛屿既为清军占领，全国只剩下台湾郑军仍在与清军对抗。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等熟悉海上情况的官员，又上疏请求乘势追击，反对仅靠招抚。清统治集团决策人物决心"以郑攻郑"，命施琅率周全斌、杨富、林顺、何义等郑军投诚部队进攻台湾。康熙三年十一月、四年三月、五月，施琅三次进军，都因遇风退回金门。清统治集团怀疑施琅等仍与台湾郑军有连系，唯恐相互勾结为患更大，于是决定放弃军事进攻，裁撤福建水军，调施琅等郑军投诚将领去北京编入汉军八旗，将其部众分散至内地屯垦。在战略上仍以"寓剿于抚"的方针招郑军归附。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清朝派总兵孔元章至台湾招抚，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玄烨又亲下诏书派兴化知府慕容颜送至台湾，郑经也派柯平等来泉州，双方进行谈判。郑经要求清朝以外国之礼见待，互市通好，息兵安民。玄烨坚决不允。郑经此时虽然表面上仍奉早已不存在的南明年号，但实际上已经放弃了郑成功的复明立场，妄图长期分裂祖国，自立国家，这是完全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人民的愿望的。玄烨坚持全国统一的原则，完全正确。但当时玄烨缺乏海上作战的经验，还没有定下以武力平定台湾的决心，只好仍然采用消极而又成效不大的以经济封锁为主要内容的守势战略，与郑军隔海对峙。至"三藩之乱"时止，双方没有作战。郑经利用这段和平时间，招集移民，发展生产，对台湾的经济发展，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三藩之乱"时清、郑两军的战略

（一）郑军重占金、厦及东南沿海地区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末，吴三桂在云、贵首倡叛乱，进军湖广，迅速占领了沅州、衡州、长沙、岳州等地。次年，福建耿精忠，广东尚之信，广西孙延龄、四川郑蛟麟、陕西王辅臣等，先后均响应吴三桂起兵反清。吴三桂与耿精忠认为郑军兼有舟师及陆上作战部队，在台湾已经十年休整，必然兵精船多，企

图利用他由海上北进长江，切断清军南北联系。吴三桂给郑经写信说：

“殿下速整艨艅，大引舟师，迳取金陵，或抵天津，断其粮道，绝其咽喉。”〔86〕

耿精忠也约郑经：

以舟师由海上出江南，而己统陆师出江浙。”〔87〕

郑经遂进军厦门。郑经此时已经背弃了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政治目的，根本不考虑反清战争的全局，更无意为吴三桂等火中取栗，深入北方作战；他以扩大个人实力为目的，以“得尺即尺，时不可失”〔88〕的方针，向耿精忠控制的地区扩张，先后占领了泉州、漳州、潮州等地。

入关三十年的清军，已失去原来的锐气，统军的贝勒、将军，也缺乏老一辈将领的军事素养和战斗经验，面对叛军的攻势，节节败退，长江以南和陕、甘、川省，很快为叛军控制。“东南、西北、在在鼎沸。”〔89〕

年仅二十的玄烨，临危不惧，态度坚决，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决定以武力平定叛乱，定下剿抚并用，以剿为主，重点指向吴三桂的战略方针。亲自调兵遣将，指挥作战。从当时各路叛军的行动判断，吴三桂的战略企图是利用王辅臣、郑蛟麟部进攻川陕，从北路直接威胁北京；利用郑经、耿精忠部进攻江浙，切断清军南北联系；自率主力进至湖广、江西，与耿、尚、孙连结，割据江南。玄烨根据当时形势，决心先剪除两翼，再全力对付吴三桂，作了如下部署：命尚善、勒尔锦由湖北进攻湖南吴三桂军；命洞鄂、莫洛由陕西进攻四川，威胁吴军侧背；命岳乐进攻江西，阻止吴军与耿、尚两军会师；命杰书、付喇塔进攻浙江，命喇布镇守江南，防止郑经军北进长江。

参加叛乱的三藩、郑经和其他各部，都是一些以个人利害为转移的骄兵悍将，他们不相统属，没有统一的军事纪律相互约束，没有统一的指挥和战略，特别没有任何长远的政治目标，心

志不齐，各行其是。甚至自相攻打，争夺地盘。所以虽然起兵叛乱之初，声势浩大，但经过两年的战争，至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全国战略形势已发生变化。王辅臣在清军招抚的政治攻势下首先降清，西线叛军瓦解，“全秦悉定”。郑经在耿精忠三路出师浙江时，不仅不北进长江，反而在耿军后方吞并耿的军队，抢占耿的汀州等城。耿精忠在杰书军事进攻与政治招抚的双重压力下，也投降了清朝，回军福建进攻郑经。尚之信继耿降清，东线叛军瓦解。仅余郑经一部，屡战屡败，占领的泉、漳、兴、潮、惠、汀、邵七府全失，郑军被迫退守金、厦二岛。

（二）清军收复金厦，郑经撤逃台湾

叛军东西两线瓦解后，吴三桂军仍坚守岳州、长沙。玄烨集中力量于湖南战场，杰书率清军一部入粤，留闽兵力不多，又缺乏水军、船只，因而对郑经转取招抚政策。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两次派人与经郑谈判，郑经根据当时形势，判断清军无力渡海作战，均予以拒绝。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吴三桂在衡州称帝，郑经也乘机攻占海澄，向廉州，潮州进攻，并包围了泉州。但很快为清军击退，又撤回金、厦、海澄。从当时全国总的战略形势看，反清部队已只剩吴，郑两军，在相互远隔中均处守势，清军基本上已控制住战局，玄烨乃在两个战场积极进行全面进攻准备。对郑军方面：撤换福建全部文武官员，任命平浙有功的姚启圣为福建总督，吴兴祚为福建巡抚，原郑军投诚付总兵，在洞庭湖曾大败吴军的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军事上加紧建造舰船、训练水军；经济上加强封锁，再度迁界，“上至福宁（今福建霞浦），下及诏安，三十里量地险要，筑小寨，安守兵，限以界墙〔90〕；”政治上“广行招抚，以散其党，而孤其势，”〔91〕开展大规模的心理攻势：1、“大开修来馆于漳州，不爱官爵、资财、玩好，凡言来自郑氏者，皆延致之。”〔92〕率部投诚官员，“于原衔外酌量优加职衔。”一般士兵和平民，始终未剃发者赏银五十两，归清后又投郑、曾剃发者赏银三十两；“愿

效用者入伍食粮，愿归农者发回原籍安插得所；"[93]即使逃而复归，亦同样给赏，既往不究。2、下令保护郑军在大陆的家属亲眷，禁止挟嫌诬害，留在大陆的原郑军旧部，有才能武艺者，量才酌情任以官职。3、派遣大批间谍人员打入郑军内部，策动投诚和散布流言离间郑军团结等等。

郑军大将刘国轩，多次企图向大陆发展，均被清军击退。"界禁既严，私贩亦绝"，[94]郑军严重缺粮缺饷，更由于实行"毛丁"税[95]等苛捐杂税和强迫乡民当兵，激起群众不满，人心更加离散，士气更为低落，"降者日数百人"。[96]仅"自康熙十七年六月起，至十一月止，先后招抚过投诚伪官一千二百三十七员，伪兵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九名"。[97]郑军将领杨一豹，一次即"率领四镇伪官兵三万一千余员名倾心归顺"[98]郑军处境日益困难。

清军认为，"今练兵、抚贼、绝粮，贼势渐衰，正宜乘机剿灭"[99]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二月，清军以一部兵力集中同安，佯攻厦门，牵制郑军，而以水师提督万正色率主力进攻海坛（今福建平坛）。郑军水师副总督朱天贵战败南逃，清军乘胜追击，连下湄州、南日、平海、崇武诸岛。郑军"时久已无粮，尽皆溃退，国轩禁不能止。"[100]厦门守将吴桂，海澄守将陈昌，泗州守将康腾龙等相继献岛投诚；郑军水师统帅朱天贵也率文武官员及"二万余兵并船三百只"献铜山投诚。郑经仅率残部千余人逃回台湾。

三、玄烨统一台湾的战略

（一）玄烨的战略决策

吴三桂于称帝当年秋死去，其孙吴世璠在云南继立。清军乘机发动进攻，在湖南、广西、四川连连胜利。至康熙十九年，吴军被逼至云南一隅，失败已成定局；郑经逃回台湾后，清军进驻沿海各岛，重新开界，安插投诚官兵开垦，同时开始作进攻台湾的准备。次年正月，郑经病死，内部又产生夺权之事。郑经长子

克壄被缢死，由冯锡范等拥立次子克塽继位。郑军宾客司傅为霖暗通清军，送情报与姚启圣说："二月初一立秦舍，年十二，乃冯侍卫之婿，其叔聪舍摄政。陈(永华)、冯（锡范）互相争权，刘（国轩）拥重兵主外，叔侄相猜，文武解体，政出多门，各怀观望。若将现在舟师直抵澎湖，彼必尽扫境内兵属刘拒守，主幼国虚，内乱必萌，内外交并，无不立溃"，请速进兵台湾。郑军中军廖方潜逃漳州投清，亦"恳速发兵救民水火"，并带来台湾地图。〔101〕福建总督姚启圣认为郑军以台湾为根据地，随时可以向东南沿海地区进扰，不消灭郑军，海患不能消除，应乘机进攻台湾。水师提督万正色与总督姚启圣有矛盾，本来他是力主进攻的，见姚启圣请求亲率水军进攻台湾，却一反常态，"言台湾难攻，且不必攻。"〔102〕玄烨当机立断，将万正色调为陆路提督，任用一贯坚持统一立场、主张以军事进攻为主、智勇双全而又有丰富海上作战经验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命"与将军、总督等统舟师进取澎湖、台湾"。〔103〕

施琅于十月初五日到职，"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拥"，〔104〕积极进行战备。次年三月，向玄烨报告了作战方案，进军时间等，并请求统一指挥权，由自已"独任专征。"姚启圣也上疏玄烨，请求亲自率兵参加进攻台湾的作战，并要求由施琅率军攻澎湖，他率军攻台湾的淡水。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五月，清军集结铜山，在作战会议上对进攻发起时间上产生分歧：施琅拟趁南风立即进攻；姚启圣、吴兴祚则坚持应至十月趁北风进攻。双方"力争十余天"不能统一。部队无法行动，各部分返汛地。姚启圣和吴兴祚向玄烨上疏说施琅欲五月进军，"原非有机可乘，果有可破可剿者〔105〕，"恳请推迟到十月进军。朝中一些反对进攻台湾的大臣，如给事中孙蕙、御史徐元文等，均条奏"进取台湾宜缓"，"应敕该督、提暂行停止。"玄烨有所犹豫，拟"俟十月后再行定夺〔106〕。"施琅七月间又上疏玄烨，详细汇报"屡得旧时部曲密寄通报"所得到的台

湾情况，从兵力对比、士气人心等各方面分析了确有“可破、可剿之机。”认为不能单靠政治招抚，应以军事进攻为主，“因剿寓抚”如果按兵不动，专以招抚为主，则刘国轩等处于主动地位，断不肯就抚。他还说：“设水师镇营原为航海捣巢之用，今就中挑选精兵二万有奇，大小战船三百号，尽堪破贼，可以无用陆师”，仍恳请“独任臣以讨贼……勿限时日，风利可行，臣即督发进取。”〔107〕玄烨看过施琅的奏疏后，认为郑经既死，“余党彼此猜疑，各不相下，众皆离心，乘此扑灭甚易，进剿机宜不可停止。”又征求了议政王大臣们的意见，考虑“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行事”，完全“由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遂下令同意施琅独率水军，专任攻取，而令总督、巡抚“同心协力，攒运粮食，毋敢有误”。〔108〕

（二）施琅的作战指导

郑经退回台湾时，认为“澎湖为台湾门户，必须设重镇镇守”，即在各要点设置炮台，派兵防守。康熙四年施琅第一次进攻澎湖时，郑军又增设了一些防御工事。康熙二十一年五月，清军在铜山集中时，刘国轩判断施琅必先攻澎湖，遂自率精锐六千，增防澎湖。清军回汛后，刘国轩又率两千人返台垦荒。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初，在鹿耳门一带各港口要点修整工事，设置炮台，增强防务。五月，侦知施琅将趁风攻澎湖，遂又由军垦士兵中抽一部精壮，集中一部战舰，亲自率领至澎湖指挥作战。在各岛增设炮台十四座，在小船可能登陆的地方，“筑造短墙，安置腰铳”，加派士兵防守，以准备抗击清军登陆。战斗直前，澎湖共有水陆军兵力约万人，新旧舰船约百余艘。刘国轩在积极进行防御准备的同时，派人与姚启圣送信，希望按外国“如琉球等国之例称臣奉贡”，〔109〕罢兵谈和。玄烨此时当然更不可能同意郑克塽、刘国轩等分裂中国的谈判要求，遂下令施琅相机进攻。

施琅原是追随郑成功起兵抗清的主要骨干，“号知兵，自楼

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皆琅启之”，〔110〕战功甚多，是郑军中难得的将才。后因“颇持才而倨，”与郑成功发生矛盾，被郑拘留。施设法逃至郑鸿逵处，郑成功竟将其父、弟杀死，施琅遂投诚清军。他对郑军内部情况知之甚悉，更有不少旧部暗中与他连系，所以他情况判断准确，决心也比较符合实际。早在第一次任福建水师提督、率兵进攻台湾时，他就已拟定了指导作战的方案，这次再度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受权专征台湾，仍然准备按前定方案执行。其主要内容为：

——情况判断。郑军总兵力不过两万余人，半数以上担任军垦，缺乏训练；镇将又皆庸碌无能之辈，只有刘国轩一人是郑军中威望最高、能力最强的大将，郑军精锐，尽在他的手中。台湾本岛鹿耳门等各港口地势险要，均在郑军炮火控制之下；澎湖为台湾门户，是攻、守双方必争之地，但岛屿多而分散，海岸坡度较小，地形低平，易攻难守。如能将刘国轩部歼灭于澎湖地区，则郑军将望风而溃，台湾可不战而得。澎湖守兵约万人，但实际有战斗力的士兵，不过六千，可用于战斗的舰船也不过一百。清军有经过严格挑选和训练的精兵两万一千余人，绝大部分为先后投诚的郑军官兵，具有多年海上作战的经验，而且熟悉郑军惯用战法；新造战船较郑军船只坚固便捷，大小共二百三十八艘，其中大型战舰即达七十艘，在兵力对比上，质量、数量均优于郑军。

——战役决心。第一步任务，集中全力寻敌主力决战，以正面进攻，消灭刘国轩部于澎湖海面，占领澎湖诸岛。第二步任务，以大型战舰进泊台湾港(即原台江)口外“扼其吭”，牵制郑军；而以轻快船只分两路迂回：南路以一部分力由打狗港（今台湾省高雄市）登陆，北路以主力由蚊港(今台湾省台南县西)登陆，“附其背”，由侧后方进迫郑军，以期全歼郑军于承天地区。

——进攻时间。施琅仍决定在他原来选择的南风季节，于六月间发起进攻。他认为北风风势剧烈，起风后短期难以停息，如

不能一战而胜，则舰队易为大风吹散。海上行动，全靠风信，船只一旦吹散，很难立即集中，将处于被动不利地位，无法迅速再战。南风季节风轻浪平，特别是夏至前后二十多天，风力微弱，夜间尤静，可在海面上集中停泊，寻找敌人弱点，随时部署进攻。没有丰富的海战经验，不了解海上气象规律，是不可能产生这样的认识的。

——进攻路线。施琅一反由厦门出发的惯例，决定由铜山出发，径直往东，进至八罩（今台湾澎湖列岛八罩岛）后再折转北向，进攻澎湖。这样可利用南风，占据上风、上流，置敌军于逆风、逆流的不利地位。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六月二十四日，施琅率舰队由铜山开航，十五日到达八罩水道停泊，十六日组成纵队向澎湖进攻。郑军船队以横队迎战。清军先头战舰趁顺风冲入郑军船队，被郑舰包围。施琅迅速增援，内外夹击，经苦战方突围退至西屿头南海面停泊。施琅右眼受伤。十七日，清军占领八罩水道以南的虎井、桶盘等岛。十八日，施琅亲乘快船侦察敌情地形。接受第一次进攻的教训，改变部署，以一部兵力乘船五十艘由左翼驶入牛心湾牵制清军；以一部兵力乘船五十艘由右翼进入鸡笼屿、四角山（均在今台湾省澎湖本岛上），与正面主力协同夹击郑军；自率主力乘大战船五十六艘由中央进攻澎湖海面的郑军舰队；另以一部兵力乘小船八十余只为预备队，随主力船队后跟进。经三天整顿，二十二日按计划开始进攻。激战竟日，郑军全军复没，刘国轩仅率少数残部逃回台湾，清军完全占领了澎湖三十六岛。

澎湖之战，是清、郑双方带有战略决战性质的一次作战。经此一战，郑军主力丧失殆尽，众叛亲离的矛盾和人心向往大陆的情绪愈加深刻。郑军的失败已成定局。

清军能一战而胜，除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因素和兵力、武器装备占优势外，施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好，也是重要原因之

一。他掌握情报，判断情况，战役准备，兵力运用，进攻时间和进攻路线的选择，以及对气象、地形等自然条件的运用等，都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111〕施琅的战役指导，符合这一原则。

反观郑军统帅刘国轩的战役指导，则过于消极。当清军前卫舰队驶抵八罩水道时，邱辉曾建议乘清军“安澳未定，兵心尚摇”之机，率部邀击，刘国轩形而上学地接受了施琅第一次进攻澎湖被风吹散的经验，认为澎湖防守严密，清军难以登陆和进入港湾，停泊海面遇飓风将不战自溃，因而不同意邱辉先发制人、主动出击的建议。当施琅突围退到西屿海面停泊时，邱辉又建议乘胜向清军进攻，刘国轩又不同意，仍将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可期而不可必的飓风上，放弃了战场主动权，在战略、战役上都采取消极防御，两次失去了相对有利的战机。

（三）台湾归还祖国

刘国轩全军复没后，郑氏集团一片慌乱。施琅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郑军，采用了强有力的政治心理战，对投诚、投降人员，以礼相待，士兵发给钱粮，伤员予以治疗，愿归家者派小船送回台湾。这一措施，影响极大，原已失去斗志的郑氏集团成员，此时更不愿战，“台湾民众莫不解体归心，唯恐王师之不早来”。〔112〕郑军提督洪邦柱、镇将黄良骥以及中书官人郑德潇等，认为“今日澎湖失守，台湾势危，不如将大小战船及洋船，配载眷口兵士，从此山边直下，取吕宋为基业”。陈锡范同意去吕宋，而刘国轩坚决反对。此时玄烨通过施琅向郑氏集团招抚，劝告他们停止抵抗，放弃分裂，必将待以宽厚，“善为安插，务俾得所”。〔113〕恐郑军成员疑惧，特意宣布“煌煌谕旨，炳如日月，朕不食言。”〔114〕郑克塽认为“揆之天时、人事，悉已顺于清朝，若不见机，恐有不测，反为大丈夫之羞”。〔115〕终于在关键时刻作出了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决定，接受玄烨的劝告，归顺清中央政权。虽然为时稍晚，但仍不失为识时务的俊杰，对

全国的统一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郑氏集团归顺之后，全国范围内已无反清的政权和军事集团，清王朝实现了政权的统一。但台湾问题并未完全解决，清统治集团中对台湾的处理上又产生了分歧意见。有些无知大臣，认为台湾土地狭小，人口稀少，财赋无多，又远隔重洋，派兵驻守不仅糜费钱粮，而且鞭长莫及，竟荒谬地提出将台湾人民内迁大陆，在台湾不设军队，仅在澎湖设防的意见。深刻了解台湾战略地位和实际情况的施琅，坚决反对这种不设防的错误意见，他上疏玄烨，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详尽、精辟地阐述了台湾与东南海防的重要关系和设防与否的利害，其主要内容为：

——从军事上说明台湾的战略地位和对国防的重要意义。他说：

> "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

荷兰侵占和郑氏割据的六十年中，东南沿海边患不绝。如不驻军防守，终将为荷兰重行侵占，"必合党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未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虞。"如仅守澎湖，"则澎湖孤悬汪洋之中，土地单薄，界于台湾，远隔金、厦，岂不受制于彼而能一朝居哉？是守台湾则所以固澎湖。台湾、澎湖一守兼之，沿边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关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

——从政治上说明决不能将台湾人民迁入内陆而不设防，否则将加剧台湾人民与清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他说：

> "夫地方既入版图，土番、人民均属赤子。善后之计，尤宜周详。此地若弃为荒陬，复置度外，则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况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使渡载不尽，苟且塞责，则该地之深山穷谷，窜伏潜匿者，实繁有徒，和同土番，从而啸聚，

假以内地之逃军闪民，急则走险，纠党为祟，造舟制器，剽掠滨海，此所谓借寇兵而赍盗粮，固昭然较著者。”

——从经济上说明台湾大有发展前途，为了国家利益，决不能弃而不防。他说：

台湾“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鱼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实肥饶之区。”

最后他结论说：

“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彼中耕种，尤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籍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116〕

玄烨一生奉行的政治目的就是国家统一，他进行的主要战争和制定的所有战略，都是来源于这个政治目的。当他看到施琅奏疏，了解了台湾实际情况及其对国家统一及国防的重大意义以后，认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117〕遂决定在台湾建一府三县（台湾府，台湾、风山、诸罗三县），隶属福建。并于台湾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驻兵八千，于澎湖设副将一员，驻兵二千。自古即为我国领土的台湾，又重新归还祖国，在玄烨之手实现了统一。

台湾归还祖国，实现国家统一，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对我国历史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统一台湾，维护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巩固了东南地区的海防，保卫沿海四省不受外国殖民势力的侵犯。从十六世纪起，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一些最早的殖民主义国家，相继向东南亚地区扩张，不断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并相互争夺我国的台湾。郑成功击败荷军，收复台湾，曾给予这些殖民者以沉重打击。玄烨统一了台湾，使台湾与祖国大陆形成一个整

体。既保障了台湾的安全与经济发展，又捍卫了祖国的东南海疆。从统一台湾到鸦片战争的一百多年中，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没有再受到外国殖民势力的大规模入侵，从军事上看，收复台湾起了重大作用。

其次，统一台湾消除了东南的隐患，使玄烨得以集中力量对付北疆的沙俄侵略者。十七世纪中期，沙俄乘清军与明军作战，黑龙江流域防务空虚之机，越过外兴安岭，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先后侵占了雅克萨、尼布楚等地。玄烨在多次要求和谈均被沙俄置之不理的情况下，在收复台湾之后，决心派兵进行自卫反击，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二月，玄烨下令从台湾郑军中选拔了一部分精干士兵及双层坚实的藤牌，组成水师营及藤牌兵编入都统彭春所率的部队，于康熙二十四年开赴黑龙江，参加了收复被沙俄侵占的雅克萨之役，沙俄侵略军被迫投降并签订了尼布楚条约，收回了部分被侵占的土地，制止了沙俄对我黑龙江流域的进一步侵略，使东北边境获得了较长时期的安宁。

此外，统一台湾，对于密切台湾与大陆的连系，促进台湾本身的进一步开发和促进整个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总之，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它与祖国的关系是“统一则安，分裂则危。”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尊严，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向中国的扩张；而玄烨从郑氏手中统一台湾，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则是巩固了郑成功的成果，完成了郑成功企图统一中国而未能完成的大业，二者有其继承性与连接性，二人对祖国的统一，都有伟大的贡献。

对清、郑双方有关战略的几点看法

玄烨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文武兼备、具有雄才大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他终生奉行的政治目标就是统一中国，和巩固大清封建王朝。他曾亲自谋划和指挥过多次战争，制定了具有卓

识远见、符合客观实际的战略和策略。对台湾郑氏的战略，总的来说是较为成功的。以军事进攻为主，辅以政治招抚和经济封锁，终于统一了台湾，结束了台湾和大陆对峙的局面，实现了海峡两岸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对台战略的制订与执行和战略企图的顺利实现，除了战争性质的转化，人民要求统一以及军事实力、战争潜力远远超过郑军等各种客观因素外，玄烨的英明决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其主要表现为：

——他坚持国家统一的政治立场，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战略和策略。当实施政治招抚时，郑经、刘国轩等都曾多次要求"请按流球诸国例称臣进贡"，玄烨都坚决拒绝了这种分裂祖国的行为，并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土地，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是中国人民，怎么能和流球相比呢。当实施军事进攻时，有人满足于占领近海诸岛，对进取台湾持消极或反对态度，如玄烨亲政前，鳌拜等就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118〕为理由，完全放弃了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和军事行动；平定"三藩之乱"接近胜利时，玄烨提出"宜乘机规取澎湖、台湾"的正确主张，仍有大臣反对，竟说："天下太平，凡事不宜开端"，"征台湾宜缓"等。玄烨未为这些维持分裂现状的错误言论所动摇，坚决执行攻取台湾、统一全国的方针。郑氏集团在强大军事压力下接受招抚、归顺清朝后，有些大臣极错误地主张弃守台湾，玄烨从统一全国的政治立场出发考虑问题，坚决采纳施琅等人的正确主张，设官驻军，加强了台湾的防守和对台湾的统治。

——坚决任用能贯彻执行统一全国、平定台湾战略的人才为将领。"三藩之乱"后期，玄烨在以主力对付吴三桂的同时，就进行了平定台湾的准备工作，任命擅长以政治攻势瓦解敌军的姚启圣为福建总督，任命擅长水上作战的万正色为福建水军提督。不久即收复了金厦诸岛，将郑经赶回台湾。当发现万正色对进攻台湾转趋消极时，立即将万正色改任陆路提督，而起用一贯

主张“因剿寓抚”、即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招抚为辅的内大臣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并将认为台湾“断不能取”的宁海将军喇哈达调回北京，命姚启圣“统辖福建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以后又将进攻台湾的指挥大权全部授予施琅，使“可得行其志。”当时在任用施琅上，阻力甚大，“举朝大臣以为不可遣，去必叛，”[119]而玄烨不为所动。事后他曾当面对施琅说：“尔为内大臣十有三年，当时因尔系闽人（指郑军投诚者）尚有轻尔者。惟朕深知尔，待尔甚厚。其后三逆反叛，虐我赤子，旋经次年平定，惟有海寇游魂潜据台湾，尚为闽害，欲除此寇非尔不可，爰断自朕衷，特加擢用。”[120]施琅果不负信任，一举攻克澎湖，实现了玄烨统一台湾的战略企图。

清朝对台战略，前已说过，总的是比较成功的；但由于清统治集团决策人物及玄烨对台湾各种具体情况缺乏深刻了解，对海上作战缺乏必胜信心。如玄烨就自认为：“朕向于陆地用兵之处，筹算可以周悉，今海上情形难于遥度。”[121]所以在战略上，对军事进攻这个关键问题，长期徘徊犹豫，举棋不定，以致延长了统一台湾的时间。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清军攻占金厦，郑经撤回台湾时，郑军士气已经瓦解，大批将领投诚，郑军损失八、九，台湾兵力不过两万，此时清军仅投诚过来的兵力、船只就已超过台湾郑军；而且他们对郑军内部情况知之甚详，又娴于海战。当时派施琅乘胜进攻台湾是完全正确的。施琅在清水洋遇风折回后，清统治集团竟怀疑施琅有暗通郑军的可能，不仅下令停止一切进攻台湾的军事行动，将施琅等投诚将领调至北京或内地，将部队分散安置去内地屯垦，而且还下令撤裁福建水军，焚毁战船，完全放弃了军事进攻的方针，这样做完全是错误的。从康熙四年到“三藩之乱”的长达十年里，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军事行动，单纯派人招抚，希望郑经能自动放弃王位归顺清朝。这在当时情况下是极不现实的。施琅就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说：

“如专一意差官往招，则操纵之权在乎郑经一人，恐无

率众归诚之日。”〔122〕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对一个对抗性矛盾已发展到尖锐化程度的敌对政权，如没有强大的军事压力或足以将其歼灭的军事实力和战争手段作后盾，对方是不能轻易地自动归顺输诚的。即使不相信施琅等人及其部队，也决不应当毁船撤军。当年建造船只与训练水军，决不象现代那样复杂困难，已经统一了大陆，占领了近海岛屿，又无其他方面的敌人掣肘，仅以东南沿海地区的人力、物力，就不难建立一支绝对优势的水军，以攻取台湾。即以经济封锁政策而言，采取彻底摧毁沿海人民生产、生活的“迁界”政策是完全错误的，这说明封建统治阶级在这些问题上是绝不顾及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施琅对此曾表示反对，他说：

> “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据绝岛，而拆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123〕

要求“乘便进取，以杜后患。”但并未为玄烨亲政前的清统治集团所重视。迁界政策对收复台湾是有损无益的，它只能增加台湾的离心力而不会加大向心力。我们回顾一下晋平吴时羊祜的政策，他取信于民，招抚远近，力求消除对方的敌意，为尔后的军事进攻铺平道路，就可以看出“迁界”政策的拙劣了。以致“三藩之乱”时，已经衰落得“船不满百、兵不满万”的郑军，竟又能乘机卷土重来，占领了沿海七府，给平定“三藩”的战争增加了一定的困难。

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政治目的，是以台湾为根据地，生聚教训，培养实力，等待时机，以期最终恢复大明王朝的封建统治。郑经掌握台湾政权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已逐渐背离了郑成功的遗愿，以割据台湾、垄断东南海上贸易为政治目的。妄图使台湾长期与大陆处于分割状态、甚至希望分裂出去，这从郑经多次要求清朝“以外国之礼”对待，要求“如流球例”，等可以得到证明。因而，清、郑双方战争的性质，已转变为统一与分裂的战争，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政权之间的战争。郑经的战略，也必然

建立在他这个以分裂割据为目的的政治基础之上，实质是守势战略。恰好此时清军也是守势战略，所以才形成十年相峙的局面。

“三藩之乱”时，吴三桂、耿精忠都以为郑经经过十年的休养生息，必然在台湾练有强大的水军随时准备西进，所以才与他联合，请他由海上北进。郑军到达厦门后，耿精忠才发觉郑军兵寡船少，大失所望。

郑经虽然打着已经基本上失去号召力的反清复明的旗子参加了“三藩之乱”，但实际上他既无力与清军主力抗衡，也根本未打算恢复明王朝。他的战略方针就是乘机抢占地盘，扩大实力，最终达到割据台湾及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垄断海上贸易的政治目的。属于清军统治的地方也好，属于耿军统治的地方也好，只要能抢到手就去抢占。结果促使耿精忠再次降清，掉过头来进攻郑军。这种同床异梦的联合割据战争，当然是要失败的。

注　释

〔1〕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三卷（转引自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

〔2〕 韩菼：《江阴城守记》

〔3〕 江日升：《台湾外记》卷二75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 吴维顺：《兵镜吴子十三篇》

〔5〕 孙武：《孙子兵法·虚实篇》。多数版本为“出其所不趋”，今从出土汉简及《太平御览》。

〔6〕 《陈应泰揭帖》顺治十六年一月（清档案）

〔7〕 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一第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 《海上见闻录》定本卷二

〔9〕 杨英：《先王实录》永历九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0〕 黄宗羲：《赐姓始末》

〔11〕 《先王实录》永历十二年

〔12〕 史伟琦：《题报台湾情形并陈宜切断钱粮来源以破郑锦事本》（满文密档）

〔13〕 《先王实录》永历五年

〔14〕 郁永河：《海上纪略·伪郑逸事》

〔15〕 《海上纪略·伪郑遗事》

〔16〕 《先王实录》永历五年

〔17〕 《台湾外记》卷三；《先王实录》永历七年

〔18〕 《先王实录》永历七年

〔19〕 《孙子兵法·谋攻篇》

〔20〕 《明清史料·丁篇》

〔21〕 顺治五年清军攻下同安，屠城杀五万人；顺治七年郑军攻下和平寨，男女老幼尽杀之；顺治九年郑军围漳州数月，城内饿死数万人……等。李率泰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揭帖报告三次入闽情况："顺治三年间职随征开闽时，窃喜地方殷盛，甲于东南。比顺治五年，职领兵恢闽，视三年时已减其半。今则五年更十不存一矣。……计里则百家无一户之存，计户则百人无十人之活。……不意极殷盛之名疆，遂成极凋敝之危地。"

〔22〕 《台湾外记》卷四

〔23〕 李定国第一次与郑成功通信，有1650和1652年两种说法。现按郭影秋同志的说。见《新建设》1961年12期，《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一文。

〔24〕 邵廷采：《西南纪事》

〔25〕 刘献廷：《广阳日记》

〔26〕 《先王实录》永历十年

〔27〕 《台湾外记》卷四

〔28〕 郑成功挑选精壮士兵，身穿铁甲（铠、护臂、战裙、护膝），头戴铁盔、铁面（仅露耳、口、鼻，并绘鬼怪图形），为自己亲军。系郑军主力中的精锐。

〔29〕 《台湾外记》卷四

〔30〕 《先王实录》74页

〔31〕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

〔32〕 据《台湾外记》记载，郑成功到达南京时，朱衣佐向管效忠建议说："海贼虽是猖獗，其众不过数万，其船不过数百……可遣人卑辞宽限，以骄其志。然后设守御之策，征援兵破之。"管效忠即遣人向郑禀报说："大师到此，即当开门延入，奈我朝有例，守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宽三十日之限，即当开门迎降。"郑允其请。潘庚钟说："此乃缓兵之计，不可凭信，可速攻之。"郑成功却认为"自舟山兴师至此，战必胜，攻必取，彼焉敢缓吾之兵耶？彼朝实有定例，尔勿多疑。"潘庚钟又说："孙子有云：'卑辞者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欲降则降，岂恋内顾？决是城中空虚，速为进兵攻之，乃为上策。"但郑成功以"攻城为下，攻心为上"为理由，未接受潘的建议。

〔33〕 彭孙贻：《靖海志》

〔34〕 《小腆纪年附考》

〔35〕 王夫之：《永历实录·李定国传》

〔36〕 蒋良骐：《东华录》卷八（中华书局1980年版）

〔37〕 张煌言：《张苍水集·北征纪略》

〔38〕 邵廷采：《东南纪事·叶罗二客传》

〔39〕 《小腆纪年附考》

〔40〕 《先王实录》227页

〔41〕 《台湾外记》卷五

〔42〕 郑成功、郑经：《延平二王遗集》

〔43〕 C.E.S：《被忽视的福摩萨》（转引自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此书为当时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本人著。

〔44〕 《先王实录》222页

〔45〕 《被忽视的福摩萨》

〔46〕 《先王实录》222页

〔47〕 《先王实录》242页

〔48〕 《被忽视的福摩萨》附永历十四年十月十九日郑成功《致台湾长官书》

〔49〕 《先王实录》244页

〔50〕 《三国志·吴志》

〔51〕 《隋书·朱宽传·陈棱传》

〔52〕 周必大：《文忠集·汪大猷神道碑》

〔53〕 《元史·瑠求传》

〔54〕 《赐姓始末》

〔55〕 陈碧笙：《台湾地方史》

〔56〕 沈国元：《两朝从信录》

〔57〕 《被忽视的福摩萨》

〔58〕 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城日志》（转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

〔59〕 《被忽视的福摩萨》

〔60〕 据《台湾县志》载："国朝顺治十五年，甲螺郭怀一谋逐荷兰人，事觉被戮，汉人在台者遭屠殆尽"。

〔61〕 《被忽视的福摩萨》原注："台湾及其周围全部地区，一年中有半年风向从北方不停吹来，另半年则从南方吹来。北风始于十一月左右，称北贸易风，南风始于五月左右，称为南贸易风。"

〔62〕 《先王实录》记为四月初一黎明到达鹿耳门港外，三月三十日晚由澎湖开航；但据亲身参加的荷兰人当时的记载，为四月初一晚开航。《厦门大学学报》社科

版1962年一期，载陈国强：《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时间问题》一文，现从陈说。

〔63〕《被忽视的福摩萨》

〔64〕阿布列特·赫波特：《爪哇、福摩萨、前印度及锡兰旅行记》（转引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

〔65〕张煌言：《张苍水集·上延平王书》

〔66〕《台湾外记》158页

〔67〕《清世祖实录》

〔68〕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第一册

〔69〕《孙子兵法·计篇》

〔70〕《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71〕《吴子·图国第一》

〔72〕辛弃疾：《稼轩集钞存·美芹十论·屯田第六》

〔73〕《巴达维亚城日志》

〔74〕《被忽视的福摩萨》

〔75〕《清圣祖实录》卷275

〔76〕"三藩"指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的祖父耿仲明原为明将，投诚清朝后镇压农民军和消灭南明政权有功，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守云南，尚可喜被封为平南王守广东，耿精忠爵袭靖南王守福建。各拥重兵，渐为割据势力，其中以吴三桂势力最大。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清朝下令撤藩，吴三桂首先叛乱，次年，耿精忠和尚可喜之子尚之信相继响应吴三桂起兵叛清。历史上称之为"三藩之乱。"

〔77〕"官田"，种田之人称"官佃"，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种籽及生产资金，按上、中、下三等缴纳租赋，租额约为收成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私田"，即郑氏宗室及文武将吏招民自垦之田，亦称"文武官田"，也是按上、中、下三等缴纳租子，租率约与官田同。"营盘田"，即各镇军垦之田，自耕自食，无租税。

〔78〕《海上见闻录》48页

〔79〕《海上见闻录》47页

〔80〕查继佐：《东山国语·台湾后语》

〔81〕《海上见闻录》51页

〔82〕明安礼达等《题复海澄公黄梧密陈进攻厦门机宜事本》（满文密档）

〔83〕明安达礼等《题复施琅密陈进攻厦门事本》（满文密档）

〔84〕明安达礼等对施琅《密陈进攻厦门事本》所拟批示（满文密档）

〔85〕《清圣祖实录》卷12

86〕《台湾外记》217页

〔87〕 《海上见闻录》55页

〔88〕 《台湾外记》248页。

〔89〕 赵翼：《皇朝武功纪胜·平定三逆述略》

〔90〕 《海上见闻录》70页

〔91〕 姚启圣：《忧畏轩奏疏·题为特广招抚条例事本》

〔92〕 全祖望：《鲒埼亭集·令稽姚公神道碑铭》

〔93〕 《明清史料·丁篇：《吴达礼等题为汇报招抚投诚官兵并请议叙事本》

〔94〕 《海上见闻录》70页

〔95〕 "毛丁"即人头税。据《海上见闻录》载："百姓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每人月纳银五分，名曰毛丁。"

〔96〕 《海上见闻录》72页

〔97〕 《吴达礼等题为汇报招抚投诚官兵并请议叙事本》

〔98〕 宋德宜等《题复姚启圣特请议叙杨一豹事本》

〔99〕 清议政王等《题复姚启圣条陈平海机宜事本》

〔100〕 《海上见闻录》73页

〔101〕 《忧畏轩奏疏·题为报明郑经病故克　被杀等事本》

〔102〕 《海上见闻录》75页

〔103〕 《东华录》卷12

〔104〕 施琅：《靖海纪事·决计进剿疏》

〔105〕 《忧畏轩奏疏·题为遵旨沥陈平海机宜事本》

〔106〕 《汉文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107〕 《靖海纪事·决计进剿疏》

〔108〕 《汉文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初六

〔109〕 《东华录》卷12

〔110〕 《赐姓始末》

〔111〕 《孙子兵法·地形篇》

〔112〕 《海上见闻录》78页

〔113〕 《汉文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114〕 《清圣祖实录》卷111

〔115〕 《台湾外记》349页

〔116〕 《靖海纪事·恭陈台湾弃留疏》

〔117〕 《汉文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118〕 《清圣祖实录》卷112

〔119〕 《清圣祖仁皇帝圣训》

〔120〕 《汉文起居注》康熙二十七年七月十五日

〔121〕 《汉文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

〔122〕 《靖海纪事·尽陈所见疏》

〔123〕 《靖海纪事·尽陈所见疏》

第三十五章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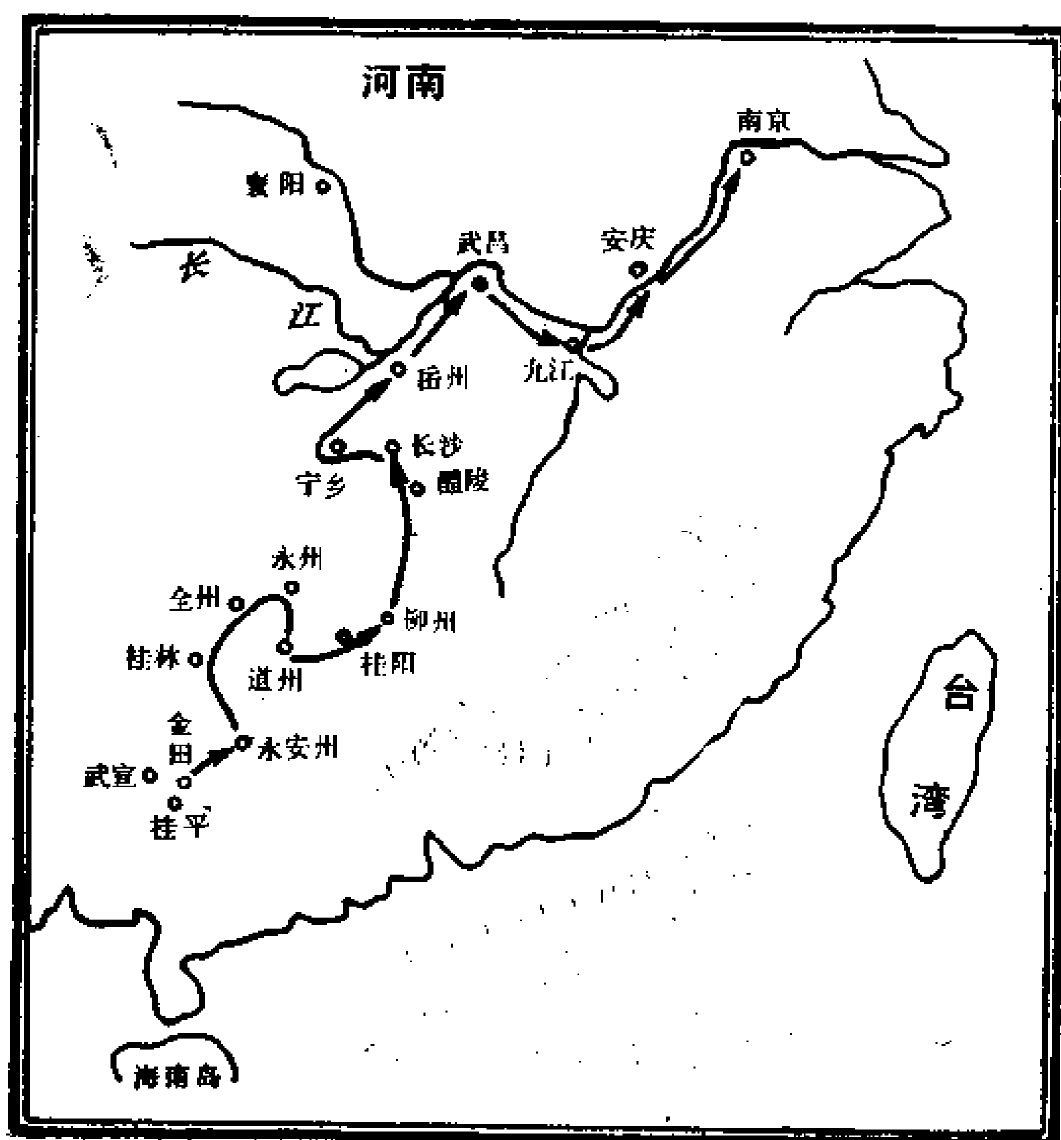
马克思指出："中国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两个结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增加了新税捐。"中国人民就是在这样的国内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外国帝国主义野蛮掠夺的双重压榨下，开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时期的。鸦片战争后，原已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外侮日逼的民族矛盾加在一起而更加激化，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全国各族人民反抗现状，要求变革的斗争，此起彼应，连续高涨。据《清实录》不完全统计，公元1843—1850年间就达七十多起，几乎遍及内地各省，尤其是两广和湖南，会党的势力十分活跃。

广东花县人洪秀全，冯云山用外来的原始基督教义和中国古代大同理想以及朴素的平等平均思想揉合起来，组织"拜上帝会"，称统治阶级和在精神上统治人民的一切神仙菩萨为"阎罗妖"，应予扫清；而以一个"天下凡间大共之父"的"皇上帝"为崇拜对象，提出要求政治、经济平等；反对压迫剥削的政治纲领。公元1844—1846年，冯云山、洪秀全等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以及附近州县汉、壮、瑶族贫苦劳动人民中进行宣传发动，经过两年多，发展了三千多人参加拜上帝会。公元1850年拜上帝会与地主武装团练的冲突日趋激烈，这时广西又发生大饥荒，天地会的起义更为增多，整个广西愈形动荡。洪秀全认为起义时机成熟，于这年7月发布动员令，令拜上帝会各地会众把财产变卖，结队投向金田村会集，赶造武器，编制营伍，设立公库，准备起

义。接着掀起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其发展之迅速如急风骤雨，很快就席卷半个中国，转战十八省，历时十四年，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反动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是我国历代农民战争史上前所罕见的。本文拟从军事战略角度，探讨太平天国的盛衰成败，从中吸取其历史的经验教训。

第一“专意金陵”，取得胜利

太平军进军金陵示意图　(35-1图)



公元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武装起义，建立太平天国，起义会众共一万多人，组成太平军，首先攻入武宣（今广西武宣）东乡，洪秀全自称天王，改元，立长子洪天贵为幼主[1]，并分封杨秀清等为五军主将。清王朝派乌兰泰等率军赶来围堵截击。9月15日太平军在平南（今广西平南）官村大败清军，乘胜于25日一举攻克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在这里洪秀全制订官制，颁布军律，分封杨秀清为东王，肖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各王均受东王节制。至是，太平天国政权，已经粗具规模。不过，称王封王过早，促使封建等级权利观念的滋长，脱离群众，忘掉起义宗旨，作为起义领袖的洪秀全以后逐渐蜕变像封建帝王，东王杨秀清的权力也过于集中，一场内讧分裂，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未始不是这个措施所种下的种子。

清王朝继续调集大军，以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向荣及乌兰泰为大将率部围困永安太平军，相持到公元1852年4月。太平军因粮草缺乏，遂乘一个雨夜奋勇从永安突围东出，在古苏冲（蒙山县东通昭平的谷道）至昭平县间的峡谷中伏击清军，杀清将四个总兵和歼灭兵丁一千多人，乌兰泰堕涧，接着又被炮击重伤，不久而毙命。[2]接着太平军突围后挥师北上，攻桂林不克，改攻全州（今同名）。在蓑衣渡，南王冯云山身先士卒，不幸中炮牺牲。太平军失去一位威望不次于洪秀全的重要领导人，是个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攻克全州后，太平军进入湖南，6月12日占领道州（今湖南道县），沿途群众踊跃参加，太平军发展到五、六万人。其中挖煤工人数千，他们长于开掘地道，乃组建成为土营，在以后的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道州休息整补一个多月，补充战具，编组"特设道州大旗营"。[3]这时，太平军内部展开了下一步进军方向问题的争论：许多广西老弟兄"怀土重迁"，不愿意向湖南腹地发展，要求由灌阳（今同名）南归广西，把反清斗争局限在狭隘的乡土地域里；以杨秀清为代表的一

派人反对这种保守观念，他们明确提出："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坚决主张继续北进，"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4〕，把进取江南作为当前战略目标。洪秀全确定了这个避实击虚，专意金陵的决策。我们说，这个战略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起义总该是以进攻求发展的，只有不断歼灭敌人，壮大自己，才能生存和胜利。如果起义军转回广西，保守在有限地区，终将被地广兵多的大敌所败灭。在"专意金陵"方针指导下，首先可以消除怀念乡土的意识，广大将士，义无反顾，一意把进取江南作为起义的首要任务，这样任务明，决心大，就奠定了上下一心，锐意进取的思想基础。其次，清王朝八旗兵、绿营兵都已非常腐败，江南富饶之区，承平日久，戒备空虚，义军钻隙急进，在江南觉醒了的人民响应下，到处风声鹤唳，清王朝在这地区的统治，必然土崩瓦解。义军风驰电掣般占领金陵，据江南财富之区作为根据地，壮大力量，掀起燎原之势，进而摧毁清王朝是可期的。再其次，清王朝虽然兵备废弛，但仍据守着许多坚固城垣，采取"略城堡，舍要害"，义军才可以避免攻坚，争取时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取金陵。特别是当时太平军攻坚手段不够，更应如此。但是，执行"舍要害"这一决策在执行时，没有从全局出发，兼顾到下一步战略的利益，机械的把到手了的要害统统舍弃掉！没有正确理解"舍要害"的实质是避免顿兵坚城，以便争取时间，袭占金陵。而金陵是将作为根据地的核心，非但不能舍弃而且还须加以巩固并图发展。为了保障金陵这个要害，就必须预先考虑到那些"该舍"那些"不该舍"，预先计及不该舍的应如何保持以便与下一步行动连系起来。譬如武昌、九江、安庆等地，对于将要作为根据地的金陵来说，地居上游，是不能舍的要害，势必要保持；但自己力量有限，备多则力分，所有要害都守，不特处处薄弱，也减少袭击金陵的力量，这该怎么办？应该有所舍也有所保，衡量当时形势和力量，舍比较次要而又无法守住的，对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应发动群众配合一部兵力

谋得暂时稳定，俟袭占金陵再适当给以加强，这总比尔后重新开始攻取有利得多。从历史上看：孙权念念不忘荆州，朱元璋一意先破陈友谅，他们就知道金陵上游要害的战略价值。太平军把巩固金陵必需的上游要地，统统舍弃，是错误的。这一点下面还将论及。

8月10日，太平军于夜间放弃道州，向东挺进。全军男妇共八万余人，先后克江华、永明、嘉禾、兰山、桂阳（今湖南南部，同今名），8月中旬克郴州（今湖南郴县）。郴州人民加入太平军的有两三万人。太平军本着略城堡、舍要害的战略方针，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直前夺取湖南省会长沙。当时长沙清军兵力薄弱，仅有兵勇几千人，西王肖朝贵率老兵二千人，经安仁、攸县、醴陵（今同名）偏僻小道北上9月11日傍晚抵长沙城下，在南门外高处架炮攻城。肖朝贵没有乘敌尚未发觉时直冲入城，错过了战机，一连攻城六昼夜未下。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立即率大队并带着土营从郴州兼程赶来，10月5日抵长沙。但清援军向荣等也于10月21日从桂林来到长沙周围，长沙共计有五万多人，敌军守备增强了。太平军土营几次轰倒城墙，却未能攻入城内，部队损失也很大，西王肖朝贵也中炮牺牲。太平军攻长沙五十多天不下，决定撤围西走。这次轻兵袭击长沙，决策未可厚非，但应派出足够兵力，以求一举得手；既未能乘虚袭取，就不应再事纠缠；拖延至五十多天，徒遭不必要的伤亡，这是不智的。

11月30日夜，太平军乘夜撤兵过湘水西上，克宁乡（今同名），12月2日占领益阳城（今同名），船户踊跃参军，得民船几千条，即越洞庭湖北上，12月13日占领岳州（今湖南岳阳），清守将提督博勒恭武先三天已弃城逃走。岳州是湘北水陆要冲，商船云集，太平军又收得船五千条和众多船户参军，在岳州组成了水营。这时太平军已发展到十多万人，并意外地获得旧存吴三桂大批军械火炮，改善了装备。

占领岳州是实现道州决策的关键一步，打开了北进武昌东下金陵的道路，尤其是获得船只组建水营，太平军添上了一条臂膀。

太平军在岳州休整四天后，分水陆两路直取湖北省城武昌。陆路由咸宁北上，纪律严明，受到沿途人民欢迎，一路势如破竹，抵达武昌东门外；水路进泊武昌江面，切断武昌与汉阳清军的联系。在击败清军后，于12月22日占领汉阳府，接着占领了汉口镇。并迅速完成围攻武昌的战斗准备，在平湖，武胜门外架设两座浮桥，控制了武汉一带长江的交通。清湖北巡抚常大淳，江南提督双福等军队全部龟缩在武昌城内。因此城外营垒炮台全被太平军占领，把武昌城九门包围。公元1853年1月12日太平军掘开文昌门地道，炸毁城墙二十多丈，从缺口攻入城内，占领武昌。武汉三镇是控制长江，汉水南北东西交通的冲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清王朝摸不清太平军此后进军方向，用撒大网方式部署防堵，重点放在防止太平军北上进军河南、直隶(河北省)。太平军在武汉休兵二十多天，补充军实，扩充军队，水师有船万只，水陆军发展近五十万人。

战略的最重要抉择是打击的战略目标，也就是进军的方向。太平军占领武昌后，内部又引起这个问题的争论，是照道州决策进军金陵，据为根本，然后再图进取；还是在武昌建都，并遣兵取道襄樊北进？[5]如果当时挥戈北上，比以后北伐，早三、四个月，有可能使清王朝措手不及，引起更大的震动。但是，奇袭不是决定战争胜败的经常因素，从武昌到北京行程两千里，要经过豫、鲁、冀广大平原，势必要与清军主力反复较量，义军尚未建立根据地，人力物力得不到补充，能否长期坚持，实在难说。即使义军能乘隙进入京畿，北京是满清的都城，平时就有一定防卫兵力，从关外、蒙古调集援军，路亦不远，义军进退两难，后果更难预测。而长江下游，较为空虚，太平军水陆并进，月余可达金陵，金陵偏处东南，清军调集不易，义军袭占而巩固之的可能是

很大的。江南又是财富之区，以此作为根据地，逐步壮大自己，然后挥师北伐，胜利是可以期待的。兼之，太平军新得大批船只所建的水师，如果北上，将使这些水师船只无用武之地，甚至重新沦入敌手。所以太平天国领导人决意利用水师顺流东下，坚持道州所定“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是恰当的。

杨秀清探悉长江中游敌人正忙于调兵遣将进行布防，为了争取军事上的主动，决定撤出武昌。公元1853年2月9日，太平军以号称百万之众，分水陆两路东下，向九江、南京进军。沿途发布《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等文告，申述民族大义，宣传起义宗旨。雄师夹岸，帆幔蔽江，相接数十里，沿途民众续有参加、声势浩大，清军莫不望风披靡，太平军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向南京胜利进军。3月8日前锋抵金陵城下，19日轰塌北城仪凤门城墙入城，杀死两江总督陆建瀛，第二天全部肃清南京清军。从起义发展情况来说，是非常顺利的，战旗所指，敌人败溃，实现了道州战略决策。但是，我们也须看到太平军从金田起义后，向武昌进军的过程中，弃地不守，是必要的。然而攻克武昌后顺流东下，一路所得各地，也一律放弃，让清王朝的官吏很快恢复了原来的统治机构，残杀起义群众，对保障金陵的长江上游要害也不注意保持，则是极为有害的。当时太平军如果对重要的战略要地，如地形险要和坚固的城池，酌派兵力驻守，组织当地群众反抗清王朝统治，扩大起义影响，以后金陵根据地的形势自然会得到辅翼而趋于巩固。然而太平军领导昧于此理，把保障金陵的上游要害一律放弃，以致定都天京以后，局限在江南一隅，受到敌人包围，增加不少困难。事实上，当太平军从广西北上时，清钦差大臣广西提督向荣，就率领盗魁张国梁等部尾随在后跟踪。在太平军克南京忙于建都之后第八天（3月27日），向荣也赶到南京，在城东孝陵卫建立了江南大营。4月16日，清钦差大臣琦善率胜保等所率直隶、陕西、黑龙江马步各军从河南来到扬州，逼退太平军，建立起江北大营。江南、江北大营紧紧卡住了天京的脖

子。但当时这两个大营的兵力还较薄弱，以后从江、浙两省搜刮财力人力加以补充，兵力才逐渐增大，构成了对天京很大的威胁。如果太平军在向荣尾随时，在武汉外围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伏击，突然给它一个回马枪，全歼或打得它一蹶不振是完全可能的。这样，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也可对保持金陵上游的战略要地起到有利的影响，而洪秀全、杨秀清计不及此，留下祸根，实可惋惜。

第二　天京决策错误，北伐西征两失

太平天国纪元三年（公元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并在此定都，改名天京，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南京，为时不过两年又三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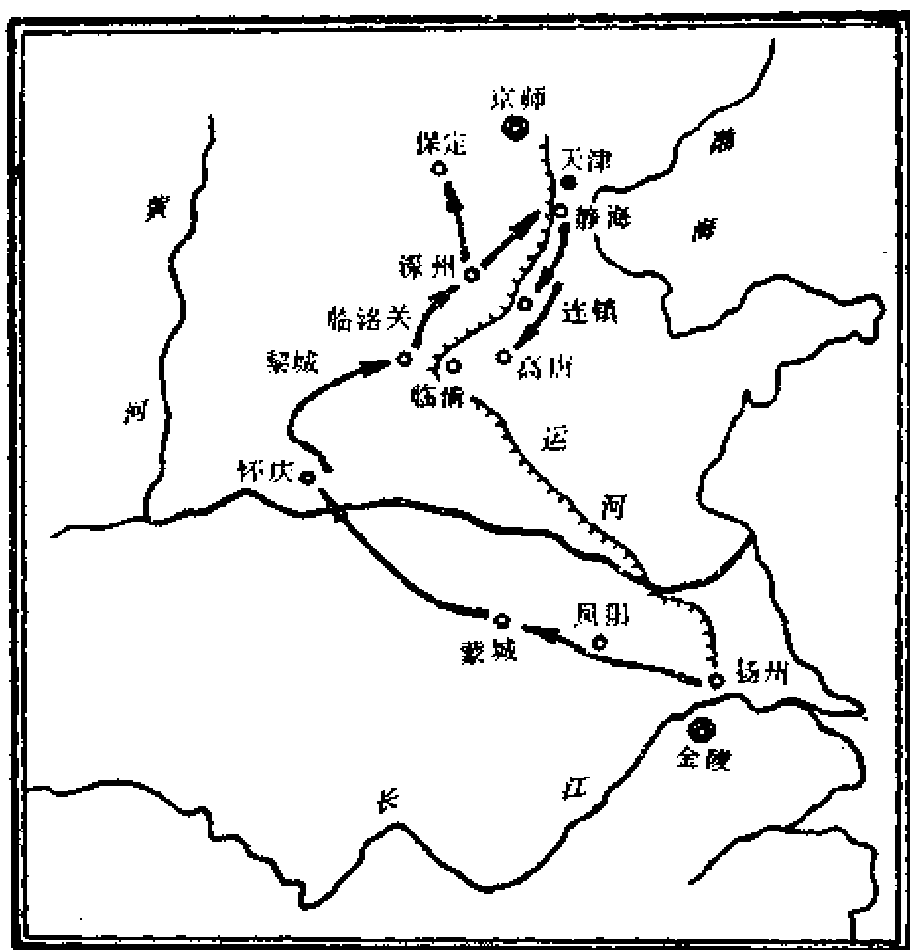
太平军既已定都，即面临下一步怎么办的战略问题：如果企图一举驱逐咸丰进而消灭清王朝，就必须北伐；如果要巩固天京根据地，就必须击灭尾追而来的清军并回师西征，重新控制长江上游战略要地；如果要先断绝清王朝的财源，就必须经营江浙。当时各地民众纷纷起义，形势对太平军是很有利的，可以预卜，太平军战略决策如果得当，无论北伐、西征或经营江浙，都可能获得更大的胜利。但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却同时开辟了天京外围、西征和北伐三个战场，采取平分兵力、三面出击的布局，违背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形不成有力的拳头，以致不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企图，反而消耗了自己，演变成为长期相持的局面，使清廷得以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而日趋被动，终于丧失了战略的主动权，而归于败灭。

下面分别就北伐、西征和经营江浙三方面问题展开探讨。

一、分兵北伐

攻克南京后，紧接着分兵于3月31日攻占镇江，4月1日攻占扬州两座重镇以拱卫天京。在占领扬州后才十天，4月10日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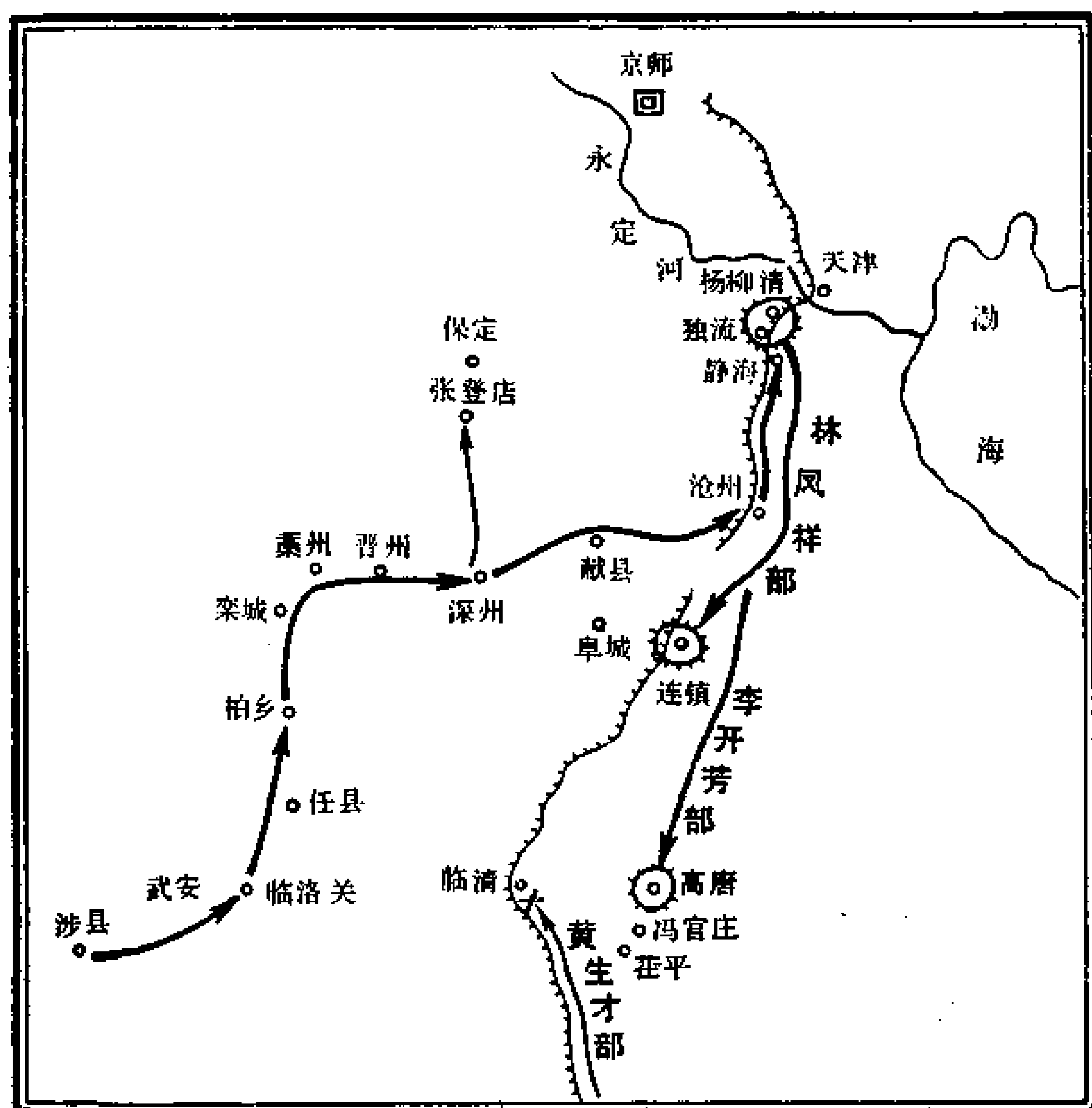
太平军北伐军经过路线概况图 （35-2图）



秀清就颁发诰谕令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率军两万多人北伐。洪秀全、杨秀清给北伐军指示："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夺地靡时日"。〔6〕5月8日林、李离开扬州挥师北上。13日，在六合的吉文元、黄益芸等也率军跟进。由六合出发的太平军北伐军二梯队，7月为清军所败，南归入安徽，与西征军会合。从扬州出发的北伐军，打了很多胜仗，受到沿途民众的热烈欢迎。北伐军经安徽的滁县、凤阳、怀远、蒙城（今同名）突入河南，从汜水抢渡黄河，7月8日围攻富庶而盛产火药的怀庆府（今河南沁阳），拟在此求得补充。因清军据城顽抗，又有援敌从各方赶来，9月1日遂撤围由济源进入太行山转入山西，连克晋东南各县，复从黎城东进直隶（今河北）涉县、武安（今同

名）。9月30日克临洛关（今河北永年），继而连克沙河、任县、柏乡（今同名），10月4日克赵州（今河北赵县），接着占栾城、藁城、晋州、深州（各州皆河北今县）。10月13日北伐军进抵北距保定六十里的张登店。

太平军北伐军转战河北示意图　　（35-3图）



当北伐军由山西进入直隶时，清王朝也加强组织防堵，北伐军占领深州的次日，咸丰帝抽出京营旗兵和察哈尔旗兵，会同由山西尾随而来的胜保所部，组成京畿防线，北京戒严。北伐军原拟由保定进攻北京的计划受阻，乃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改向天津进攻，克献县，占交河，沿运河北上，攻下沧州、青县。10月29日，太平军占领静海，分军攻克独流、杨柳青，进逼天京，北京为之震骇。清王朝从各地调集精锐部队，阻挡北伐军的北进，并截断其同后方的联系。北伐军孤军深入，缺乏后援，武器和粮食均无补充，又未备冬衣，斗争十分艰苦。清军掘开运河河堤，放水阻挡太平军的前进。并以满蒙旗兵向太平军反扑。太平军攻天津受阻，只得在静海、独流筑垒立栅坚守，急向天京请援。

北伐军据守静海、独流有三个月，其间，多次击败清军的来攻，也给了敌人不少的伤亡。但占领地区究嫌太小，东西两面又阻于水，附近没有大村庄，难以征集物资。兵员伤亡，无法补充。最困难的是缺粮少衣，而援兵不至，形势非常危急，势难再守。为此，北伐军于公元1854年2月开始南撤，3月10日占领阜城、连镇，与清军相持。李开芳率一军攻入山东高唐，以迎接天京前来的援军；林凤祥困守直隶连镇待援。而天京援军黄生才部，已于公元1854年4月在山东临清为清军击败，多数南归，少数到高唐会合李部。当时，林、李已分开，不能会合，势更孤弱，处境非常困难。公元1855年2月17日和3月7日，在将士饥极不能举刀矛的状况下，西、东连镇相继失陷，林凤祥仍奋勇率部突围，不幸中箭被俘，全军战死，无一投降。据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增订本《林凤祥传》记载林凤祥在北京就义时，“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表现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高贵品质。

清军全力合围高唐，李开芳部被困于城内，粮尽，3月17日，南走，进入茌平县冯官庄。清将僧格林沁引运河水灌屯，李部仅余八百余人，最后失败，全部覆没。北伐军血战两年，全军战

死，北伐失败了！

太平军以孤军北伐，转战六省，历时两年，震撼了清王朝的京都，牵制了大部敌军，在北中国掀起了革命狂飙，使统治阶级朝野为之惴惴难安，纵然失败，却留下农民战争闪耀着伟大光辉的可歌可泣的史迹。

但是，就当时整个战略决策而论，太平军首要的任务是各个击破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巩固天京及江南根据地。在未完成这一战略任务之前就仓卒分兵北伐，是非常失策的。攻克南京当然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一大胜利，但对清王朝来说，还不是致命的打击。第一，清王朝军事力量未被削弱，兵力对比，仍优于太平军；第二，清王朝政权系统未遭破坏，清帝还可以继续指挥各总督巡抚征税养兵，派兵“围剿”；第三，此时各地人民的反清起义，尚未形成全国燎原之势。在这种情势下以不足的兵力北伐，远道袭取北京，不仅难以成功，反而减弱天京兵力，也不能击灭卡住天京脖子的江南江北大营，以及更有力地经营长江上游以屏障天京。正因为太平军以有限的兵力，同时执行三方面重要的战略任务，遂至天京受困，西征北伐无功。

有人认为：太平军偏师北伐，一直打到天津附近，吓得咸丰以为“北京快要失陷，诏谕各省巡抚将皇帝的收入送到行宫所在地热河”。〔7〕清王朝势力在北方的空虚、腐朽可以想见。如果当时洪秀全、杨秀清能亲率主力部队乘胜长驱北上，清王朝势必措手不及，只能仓皇逃窜。到那时，全国反动势力，失掉了主子，即使凶恶如曾国藩也没法组织湘军来抵抗太平军了。再就当时兵力来说，太平军攻克南京时已号称百万。这数目可能夸大，但当时能作战的部队少说也有十几万，而这支部队经过三年来战争的锻炼，战斗力是很强的。至于清王朝，由于政治上的腐败，致使其军队软弱无能，一触即溃；同时，又配置在全国各地，兵力分散，当太平军定都南京时，清军还来不及调集。就将领来说，太平军有杨秀清、石达开那样的优秀的军事统帅，又有林凤

祥、李开芳、罗大纲等能征惯战的骁将。而清军从防堵太平军于永安、全州，到南京易手，已曾四换统帅（赛尚阿、乌兰泰、徐广缙、向荣），前后调集兵勇十余万，节节败退，清八旗、绿营战斗力之弱可想而知。还有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此时湘军之类的地主武装尚在组建之中，要到公元1854年初，湘军才正式建成，而在公元1853年10月，北伐军已经进逼天津、威胁北京了。从北伐军的进军迅速来看，当太平军主力挺进到北京城下决战时，北方地主阶级还来不及组成像湘军那样经过训练、武装精良，有战斗力的军队，而只能纠集那些残害人民、无力对付太平军的团练。再加上太平军锋芒所到，沿途民众纷纷响应，迎接义军，起义的胜利发展，又推动了各地风起云涌的反封建起义，各地的小刀会、天地会、捻军、回民等与太平军彼此呼应推动，势将迫使清王朝穷于应付，处境更为困难，力量更为分散。因此，太平军如能在攻克南京之后，着眼于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战略方针，以南京为根据地（而不是定都），同时，立即以主力北上，数以十万计的大军，兵临北京城下，那末，夺取清廷首都，驱逐咸丰，是完全可能的。以上说法，虽不失为一个集中主力作战的方案，比偏师北伐全军覆没的结果，将要好是可以预期的。

但我们认为，这种设想仍不是一个现实可行的正确作战方案，因为这完全把胜利建筑在奇袭成功“一厢情愿”的基础上的。“劳师袭远”敌人必知之而预先设防，北京城池坚固，外有援兵，奇袭成功的公算不大。即使付出很大的牺牲，攻克北京，清帝早已准备好转移到热河行宫去继续指挥，这样，太平军入北京，并没有使清帝的指挥瘫痪，全国大部分地区政权仍未反正，清军主力亦未受到损失，“勤王”之师将陆续到来，势将出现太平军在城内，城外是北京“南北大营”的局势；且太平军主力北去，金陵在江南，江北两大营和湘军等合力夹击下，如何能继续保持，实成问题；既不能保持，则攻入北京的太平军，就将成为无后方无根据地的军队，要想不陷入赤眉、黄巢入长安后的同样

困境，是很难的。就林凤祥、李开芳北伐的实际情况观察，把希望寄托于奇袭也是不现实的。为了补充粮弹，途中攻一个怀州，尚难得手，即使到达北京攻城，要一举得手更难。再说北伐军受领的任务是"师行间道，疾趋燕都"。这就要求部队大步前进，避实击虚，速战速决，尽量避免消耗兵力拖延时日，然而无后方的作战，势须就地解决粮秣、装备、弹药的补给，又不得不一再攻城，进行频繁的战斗，一直到10月才逼近天津。进攻受阻后便停在静海、独流，等待援军，未能再兴攻势。由于兵力有限，占地不广，又遇水淹阻隔，粮食难以征发，时届冬令，北方严寒，南人没有准备冬装，处境艰苦可知，北伐军到此，已达到攻势的顶点，此后只能转入防御了！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北伐军无补给机构，无辎重供应，食粮和其它军需物品，全靠征集，北方物资较少，如果太平军以十余万主力大军北伐，征集更非易事，前进速度至少不会比林、李偏师迅速。未抵北京而严冬已届，敌人不难采取"坚壁清野"对策，这样，北伐军既不耐北方冬寒气候，粮食又无从补给，处此困境，还需不断与各地"勤王"之师作战，则太平军，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虽然当时清王朝方面财政也很困难，军队腐化，战斗力不强，指挥官胜保与僧格林沁矛盾很深，在军事上弱点也很多。但是，清王朝政权当时毕竟还相当巩固，政令还能贯彻，统治地区远远大过太平天国，"竭泽而渔"，还有剥削之道，足以维持军用。军队人数较多，武器较好，物资条件远优于太平军。指挥官受命于清帝，一经朝廷切责，彼此阶级利害一致，不得不捐弃私嫌，而以对付太平军为重。所以，仅就北方军事而论，清军条件亦优于林、李北伐军。即使洪秀全、杨秀清亲率大兵北伐，迁延时日，冬季降临，野无所掠，纵然进抵北京城下，仍然困难重重，难以解决。由此可见，偏师北伐失败，全力北伐亦未见妥善。但不是说完全不应该北伐，只是派出的时机和执行的战略任务应有所不同，正确处理好这些问题，派兵北伐，不仅必要，而且对

军事发展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如果说太平军攻克南京后，首先击灭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在开展巩固天京根据地的同时，派遣一部兵力北进机动作战，而不一定要“疾趋燕都”，声称进攻北京而又避免和敌人决战，以流动作战的方式，横扫北方各地，放手发动民众，组织武装抗清，把清王朝在各地的政权打个稀巴烂，牵制住清王朝北方军队，无法南来。待天国政权在南方立稳脚跟后，然后兴师北伐，联合北方起义力量，会师北京，成功是可期的，至少要比孤军奇袭稳妥得多。

就战役指挥上看，北伐军也欠机智灵活，当天京援兵于公元1854年春在山东黄河边上战没时，北伐军仍然坚持不攻下北京誓不罢休的决心，以后分兵南下，固守山东高唐和直隶连镇八、九个月之久，使力量更加消耗而孤弱，终于被清军各个击破，全军覆没。根据当时北伐军的战斗力，如果及时突围南归，或奔向敌人兵力薄弱地区，流动作战，完全可能突破敌人封锁，从而保存一部分实力，驰骋于中原地区，鼓舞北方人民的起义反清斗争。这样既可牵制清军南下，又可适时策应西征军。则太平天国战略形势必然有利得多。可惜太平天国统帅在战略上措置失当，给予北伐军“疾趋燕都，毋贪攻城夺地靡时日”的任务下得过死，北伐军林、李又缺乏机断行事的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战术，保存自己与敌周旋，创造有利战机予敌以打击。计不及此，结果这一支坚强能战的北伐劲旅全部牺牲！这不能不说是太平军的严重损失，也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李秀成自述》说：攻克南京后，“此时天王与东王尚是计及分兵镇守江南，欲往河南，取河南为业”。如果执行取河南为业的计划，是否比以金陵为根据地有利，而避免一场北伐军的覆没呢？根据地的地理位置，当然与战略成败有密切关系，就当时历史形势分析，以江南为根据地比取河南为根据地，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1．江南北有长江天险可恃，东至海，西南两面皆山地，比河南四战之地巩固得多；2．江南富庶之区，供给太平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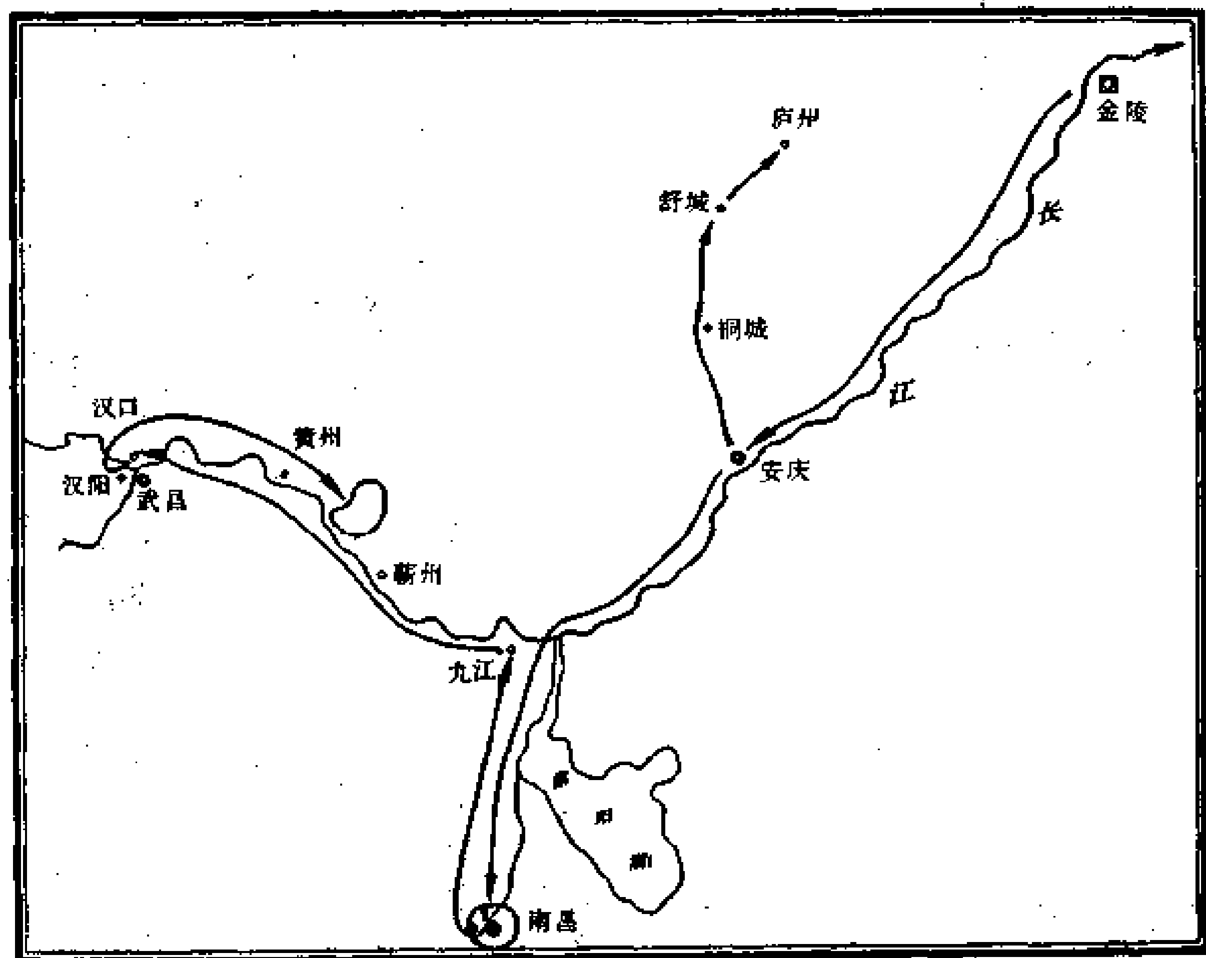
以百万称的军队眷属粮食军需，远远优于河南，几十万太平军要从河南取得经常的粮食保证，是颇成问题的。当二万多人的北伐军，路过河南，就曾发生过粮食困难。北伐军报告说："自临淮至朱仙镇，尽见坡麦未见一田，粮料甚难；兵将日日加增，……但欠谷米一事"。〔8〕3、太平军如以河南为根据，虽然靠北京较近，可以缩短北伐的进程，但正因为这样，势必碰到比长江下游强大得多的抵抗，这时清王朝已从满蒙调集八旗马队向河南集结；向荣这支清军也会尾随入河南，而且清军还将不断到来，受到南北夹击是很可能的。太平军当时水师优势，而尚未建立起骑兵部队，舍长就短，过早进入中原平野之地，受到强大马队的奔冲，难免要居下风。战争的胜败最根本的是决定于战斗力的强弱及其消长变化。太平军在金田揭竿突起，给了清王朝一个措手不及，战略奇袭取得了"专意金陵"的胜利。在这段进军过程中，虽然也给了清军的一些杀伤，但终究没有歼灭清军多少有生力量，从全国兵力对比或清军可以调集来跟太平军作战的后备力量来说，无论在兵员数量上，物资装备补充上都比太平军占优势（清常备军八、九十万，不计算地主武装团练在内）。清王朝还控制着全国的政权、财权，也正在组织湘军、淮军之类武装，来镇压人民起义。总之，太平军占领南京时，从双方财力兵力即潜在的战斗力对比上说，仍然是敌强我弱的形势。但清军分散在全国各地，太平军正应抓紧时机集中局部的压倒优势，各个歼灭清军，一个一个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转变战略上的强弱对比。比如说，先歼灭江南、江北两个大营（它们的兵力各为一万多人至两万多人，太平军这时能战的至少有十多万人）可惜的是太平军自行分散兵力，反而遭受敌人的各个击破！

二、分兵西征

要确保天京，就必须确保长江上游武汉、九江、与安庆三大据点。所以，在北伐的同时，太平军又派兵西征。公元1853年6月3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统领战船千余号

溯江西上。6月9日克安庆，6月24日围南昌。吉安等地民众起义响应，进军江西的赖汉英所部增至约万余人。由于清江西巡抚张芾等负隅顽抗，西征军三个月未能攻下南昌。杨秀清为了避免顿兵坚城，下令撤南昌围。

公元1853年太平军西征路线概况图　　(35-4图)



控制长江上游，为屏蔽天京战略上的要着，但已分兵北伐，兵力有限，便应逐步推进，先定安徽，次第及于江西、湖北，西征军克安庆后，又分军为二，胡以晃活动于安徽北部。赖汉英兵力不足，没有消灭南昌城外清军，将敌合围，也同攻桂林、长沙一样，敌方接济不断，城内外军队仍可自由调动。7月，太平军从南京派国宗、韦俊、石祥桢等率军进援江西，而曾国藩的湘军也派罗泽南等率援军到达南昌。8月下旬，赖汉英等击败湘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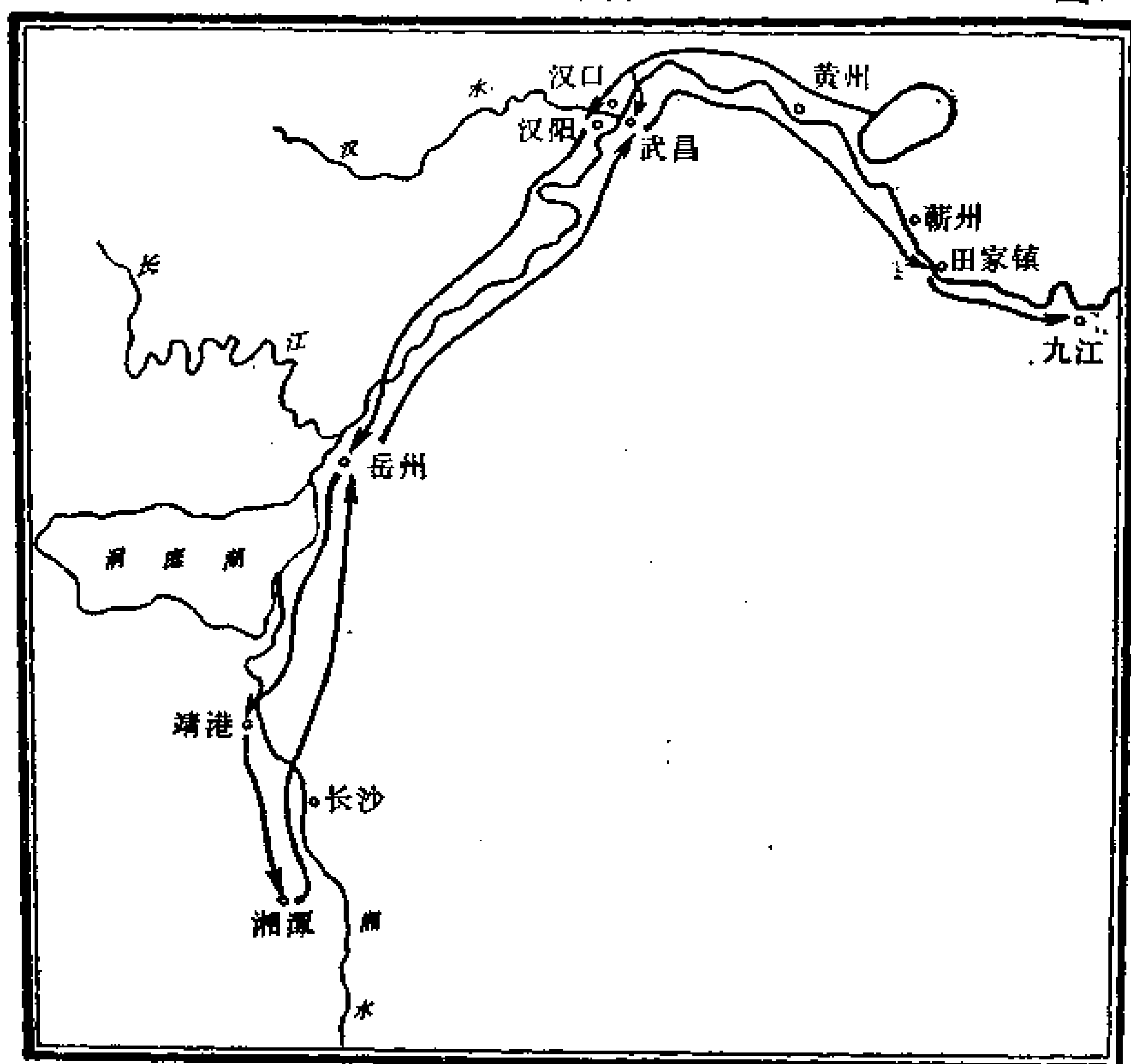
并占领南昌外围一些州县，但几度轰塌南昌城墙，都未能攻入城内，用兵三个多月未下，耽误时日，没有达成一定的战略目的而又改图别的了。

9月24日，太平军撤离南昌。29日韦俊、赖汉英等攻占九江，但赣南吉安等地人民义军却被湘军所击灭。10月，石祥祯、韦俊等继续进军湖北，几经战斗，20日占领汉口、汉阳，进逼武昌。但因扬州吃紧，天京受到威胁，西征太平军又主动退出汉口、汉阳，屯军湖北东部蕲州、黄州间。由安庆分军的胡以晃率领的一支太平军，一直在皖北活动，10月占集贤关，11月中下旬先后攻占桐城、舒城，12月12日胡以晃围攻皖北军事重镇庐州，（清安徽临时省会，今合肥市）。公元1854年1月14日克庐州，清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死。这一年太平军在皖南皖北共克二十二个州县，安徽成了太平天国比较巩固的阵地。

公元1854年2月12日，太平军石祥祯等统兵约四万人，再次大举进攻湖北，大败清兵，清湖广总督吴文鎔被迫自杀。16日太平军三占汉阳、汉口，留兵驻守；大军继取湖南，先后占领岳州、湘阴、靖港、宁乡、湘潭等地。4月在靖港之战，曾给曾国藩反扑的湘军以重创，打得曾国藩准备跳水自杀。但是4月末，湘潭这一决定性的战役，太平军遭到失败，损失船只一千多只，西征军开始由胜转败。岳州失守，退出湖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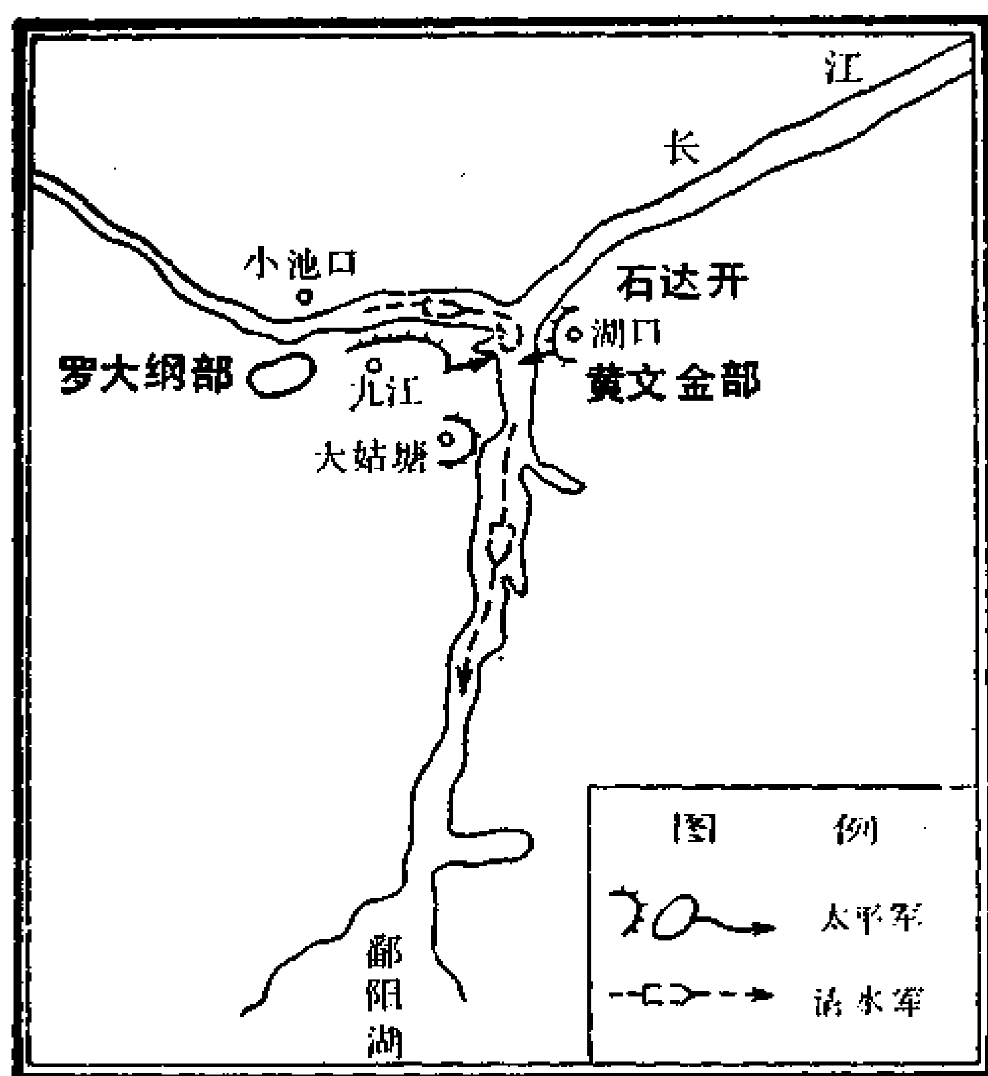
1854年6月26日，在湖北的太平军二次占领武昌。由于征湘之战失利，湘军乘胜大举反扑。10月14日，太平军武昌守将石凤魁、黄再兴不战而退出武昌，并遗弃四千船只在汉江中，被敌封锁焚毁。接着又大败于田家镇，太平军在田家镇又损失船只二千余只。曾国藩湘军水陆部队步步向东进逼，1855年1月3日开始对九江、湖口地区太平军采取包围。当太平天国西征军失利，退守田家镇时，洪秀全、杨秀清便派石达开、罗大纲等率军西援。这时太平军保卫九江、湖口的战前部署是：林启荣守九江，黄文金据湖口，罗大纲由北岸小池口渡过南岸，驻梅家州，石达开从

公元1854年太平军西征路线概况图　（35-5图）



安庆率援军驻湖口主持军务。南距九江四十里的大姑塘也有太平军分守。太平军总共兵力约两万余人，湘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西征的太平军引敌人水军三板战艇进入鄱阳湖内，封锁湖口，孤立在湖外江面的笨重的长龙、快蟹等大船，使内湖、外江敌船首尾不能相顾。经过1月29日和2月11日两次战斗，袭击湘军外江水师，烧毁大批敌船，曾国藩惨淡经营两年来的水师，顿时瓦解。曾国藩在一片慌乱中出逃，急得投水自杀，被随从捞起逃命。

湖口之战太平军部署示意图 （35-6图）



湖口之战胜利后，西征太平军又转入进攻，于公元1855年2月23日占领汉阳；4月3日第三次占领武昌。

公元1855年冬，石达开率军从湖北进入江西，占领了八个府城，五十多个县城，从而太平军控制了武昌、九江、安庆三大重镇。对保障天京的安全，支持长期起义战争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不小的，征湘失败后连吃败仗，至湖口之战胜利后才扭转败局。回顾太平军军事发展的过程，严格地说，西征是洪秀全、杨秀清缺乏战略全局计划所造成的。他们从岳阳水陆并

进、占领了武汉，挥师东向，九江、安庆望风归附，如果此时意识到长江上游对金陵的战略价值，设法歼敌而又不放弃这三大据点，发动群众，分一部兵力固守，则完全不必有重新西征这回事。再就这次西征本身来看，所赋予的战略任务与兵力也是不相称的。争取长江上游这三个点，要巩固起来，就必须控制三点周围的要点，并使这三个地域在战略上能互相策应，完全控制长江中游，否则，三个孤点是难以久守的。例如武昌这个点，必须西有荆州、南有岳州，北占襄樊，才能巩固。安庆、九江同样地应保有与它相连的面。胡以晃这支西征军占安庆后即在皖北扩大占领面是成功的，赖汉英这支西征军，攻南昌三月，功败垂成。如果增兵先行囊括江西，掩有皖南，与苏浙、上海，天京周围联成一大块，进退攻守，回旋有地，既可扩大天国的经济和扩军来源，更可断清王朝和曾国藩在东南取得军需的补给来源。然后再进军湖广，形势就大大不同了。可惜太平军统帅部以不足的兵力，冒进武昌、湖南，开始节节胜利，得地又不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政权，遂致处处分兵，致攻势达顶点，成为强弩之末，因而湘潭一战失利，遂连及武昌、田家镇连遭失败，既得的军事重镇武昌，又一次复失。直到石达开等增援，湖口之战后，才又三克武昌。可见前次放弃长江上游要地是错误的，以后争取这些要地，不一次派足够的兵力，采取先近后远逐步夺取，逐步巩固的方针也是失策的。太平军统帅部没有认识到占领金陵已结束了乘隙而进，"专意金陵"的战略阶段，转入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战略阶段，敌方已到处戒备，继续采取乘虚奔袭的作战方式，已经和当时主客观条件不相适应了，北伐如此，西征也如此。

第三　舍近求远，分兵冒进，得不偿失

太平军攻克南京仅八天，向荣就尾随来南京，在城东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琦善在扬州建立江北大营，两个大营威胁着天京

的安全。为了对付这两个大营，太平军必须留大部兵力和精锐部队卫戍京城。江苏、浙江、上海地方富庶，财源充裕，清王朝官吏的俸银，两大营招募兵员的军费，主要靠江、浙、沪三处供给。正如胡林翼所说，“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开始如果击破南北大营，不仅消除了天京的直接威胁，而且有利于平定江浙，削弱清王朝的力量，建立苏、浙、皖根据地。但是，对东部战场来说，太平军显然犯了消极防御的保守主义的错误。公元1853年底，太平军以放弃扬州增援北伐，以后又从西线调军再克扬州。这样不按内线作战原则，各个击破敌人，安定一方，再回师击破另一方，不先击灭威胁最大、迫近天京心脏的敌人，而先分兵远征，结果弄得处处被动应付，以致全盘皆输。

公元1853年9月，江苏天地会首领周立春领导青浦人民抗粮，攻占了嘉定。天地会的支派小刀会在广东匕首党首领刘丽川的领导下，同周立春取得联系，在上海发动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县，建号“大明太平天国”，派人与洪秀全联系未成。而太平军这时锐意北伐西征，兵力不足，无暇东顾去援助刘丽川起义军，坐失时机，致使这支起义军被清军勾结租界英、法、美侵略者，中外反动派合力所扼杀。反动军首先切断了上海县城的对外交通，围困上海达十七、八个月之久。公元1855年2月17日，起义军断粮才放弃县城，突围时，刘丽川和义军全部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清巡抚吉尔杭阿绞杀了上海起义军之后，接着便进攻镇江；同时江南大营更加紧围困天京，形势危急。洪秀全、杨秀清不得不从西线抽调石达开、秦日纲率主力回救，才于公元1856年4月和6月先后击溃了围困三年的江北、江南两个清军大营，天京第一次摆脱了兵临城下的局面。这时太平天国的军事形势，处在一个颇为有利的转折点：长江下游可以稍舒压力，上游仍保有武昌、九江、安庆三大据点，与湘军处于相持地位。江西占八府五十多州县；皖南赣北联成一片，统治区内比较稳固。湘军湖口战

败后，分防湖北、安徽、江西，一时尚难全面反扑；清军江南大营新败，也需要重新组织力量。这时太平军统帅部如果意识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和建立稳固根据地的重要性，集中兵力乘胜击灭苏浙之敌，占领这些富裕地区，对于敌我力量的消长，关系至大。可惜由于局面的好转，反而出现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个人权利的争夺，酿成难以补偿的天京事变，自相火并，使起义开始走下坡路！

从上述太平天国决策北伐、西征和回救天京三方面用兵的情况来看，太平军占领金陵后，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以建立地方政权、恢复生产、组织经济，安顿随军老幼，作为军事政治的指挥中心。攻占金陵并不等于已经建立了根据地，这只是取得了初步的政治、军事的胜利，清王朝仍拥有全国政权和地盘，“革命尚未成功”，艰苦的战斗正方兴未艾。但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却以为已经建立了基业，背上了可以在“小天堂”安富尊荣的包袱。从以后发展的事实证明，只定都而不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给尔后带来的不利和被动是非常明显的。既然决定作为国都，就应把巩固以天京为中心的根据地，作为全局首要的战略任务，集中全力，先歼灭向荣的江南大营，东取苏州、杭州、上海，西占安徽、江西，像朱元璋那样，先巩固，后发展，依托长江，建立以南京为中心的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抗击清王朝重兵的反扑，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同时加强与各省各地起义抗清力量的联盟，逐次歼灭清军，不断扩大占领地域，那末，太平天国夺取全国政权，代替清王朝是可能的。根据太平天国已定都南京的实际情况，我们倾向于这个战略决策。因为，太平天国当初定都南京时，正规能战部队少说也有十几万人，而且拥有一个强大的船队。向荣军到南京之初，仅有一万几千人，以兵力和士气而论，击灭向军是完全可能的。苏南的清军多数已由陆建瀛调往上海，苏州、常州防兵很少，唾手可得。至于杭州方面，当时守军仅旗兵一千六百余人，绿营二千余人，乡勇也不过三千

人，攻取杭州亦易得手。既得江南财富之区，再以主力西征北伐，胜券可操。而太平天国计不出此，放着卡住自己脖子的又易于歼灭的向荣江南大营不打，不取江南，却以有限的兵力，同时北伐和西征，以致天京长期受到威胁，北伐丧失精锐，西征未能取得预期战果，水师遭受惨重损失，丧失了战略的主动，这不能不说是洪秀全、杨秀清用兵的失着，给后来兵家留下了当时为什么不消灭向荣军，这个不解之谜。

第四　天京事变，攻守易势，终致败亡

公元1856年9月，正当太平天国取得军事胜利，斗争形势充满希望的时候，发生了“天京事变”即“杨韦内讧”。太平天国的力量，无论军事上、政治上、士气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清王朝则因此得到了喘息加强的机会。公元1856年12月21日，李续宾等攻陷武昌，太平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失守武昌，死伤万余人。接着，清军官文等又破汉阳，胡林翼乘势又攻下大冶等县。湘军从上游步步进逼，攻打九江。公元1858年5月19日，湘军李续宾部陷九江。太平军坚守九江达四年之久，由于外援不至而陷落，死万人。至此天京以上长江沿岸的主要军事据点，仅剩安庆一处。湘军既占九江，即续向安庆进逼。

在江苏，由于公元1856年太平军第一次打破江南大营不彻底，清军很快组织反扑：公元1857年、清军和春等攻陷镇江接着进攻天京，重建江南大营；德兴阿攻下瓜州，复陷扬州，重建江北大营。天京再度被围，形势日趋紧张。至公元1858年上半年，太平天国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所占的州县，大部分被迫放弃，所控制的地区，已经很狭小了。曾国藩等甚至估计在这年6、7月间即可攻下天京。洪秀全提拔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青年将领担任指挥官，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同时，各地的抗清斗争还在发展，清王朝统治下的湖北、江西等处人民也

纷纷起义，要求加入太平军，经过李秀成，陈玉成领导部队的奋力战斗，危急的局面有了转机，而趋于缓解。

公元1858年8月，李秀成召集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今桐城东南）举行军事会议，陈玉成也从湖北罗田、麻城一带赶来参加。会上“各誓一心，订约会战”，[9]确立了联合作战的方针，预定由陈玉成联合捻军从潜山、舒城进攻庐州、定远，李秀成回全椒整队，两军会合后同攻两浦以通天京。会后，陈玉成于8月23日攻克庐州，然后统军由店埠（今安徽肥东）、梁园、界牌而至滁州，与李秀成军会合。清德兴阿由浦口派军来攻，陈李联军大破之于乌衣（今安徽滁县东南），乘胜打到浦口，合攻江北大营而大破之，毙敌万余人，德兴阿由水路逃向仪征，陈李联军克复浦口，并收复了六合、和扬州，解除了天京北面的威胁。

这年10月，湘军一支主力李续宾部乘机自江西、湖北进犯安徽，围攻三河镇（今安徽合肥南）。三河镇是庐州屏障，又是太平军补给重地。李续宾素称凶悍，所部又为湘军精锐，企图攻占三河，破坏太平军的补给和牵制太平军在江北的行动。为此，陈玉成即从六合回师救援。李秀成也随后救应。11月，陈军进至庐江（今同名）。西北金牛镇，包抄李续宾部的后路，并令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合捻军南下，以断敌舒城，桐城方面的援军。李秀成军也适时到达战场，对敌军形成四面包围。激战后全歼李续宾部六千余人，李续宾自缢死，收复桐城、舒城一带地方。曾国藩哀叹说：“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10]可见这一战役给敌人的打击是沉重的。但从总的形势看，自“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在战略上已居于守势，为保卫天京这个沉重的包袱，实质上是进行以攻为守的作战。战役上指导是正确的，居于内线的太平军集中力量歼敌威胁最大的一路，陈玉成、李秀成合力作战，形成优于某一要歼击目标的兵力，截断敌军联系，四面合击，迅速解决战斗，取得了战役的全胜。但也由于战机紧迫，尚未完全歼灭江北大营之敌，即需转

用兵力以救三河镇，以致“破两浦清营未尽，后又复生”。[11]

公元1860年1月，清军江南大营已完成对天京的合围形势，天京“南北水旱两路，一线不通”，“京城困如铁桶一般”。[12]为了二次打破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是年2月，李秀成在安徽南陵（今同名）会合了李世贤军，由皖南进入浙江，奇袭杭州，引诱江南大营和春分兵出援杭州。调动敌人后，太平军于3月24日，主动撤出杭州。4月8日，太平军各主将在建平（今安徽郎溪）会议，确定了集中主力（陈玉成部也从江北南渡参加）解围天京的作战部署，即：李秀成军由溧阳、句容指向淳化镇、紫金山；陈玉成军由全椒南下，经东西梁山，渡江指向江宁镇、板桥、西善桥；另有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将领率部分别指向燕子矶、雨花台、高桥门各地，分路合击。4月27日，城内太平军见援军到达也分兵出击。5月2日，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清军江南大营正副主帅和春、张国梁等慌忙分头抵抗，终于难逃失败的下场。5月5日，清军二次重建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这次被彻底打垮了。太平军旋又破丹阳，张国梁战死，和春逃到苏州浒墅关也自缢而死。李秀成连克常州、无锡、苏州、嘉兴，并攻到上海近郊。因受到英、法侵略者及美国流氓召募外国流氓组成的洋枪队的袭击，退回苏州。苏南除上海一隅外，全入太平军掌握，形势为之一振。可惜太平军仍然没有总结过去执行错误决策的教训，在三河镇和二次歼灭江南大营形势转折的有利时机，放弃力保上游，旋得旋失的争城夺地方针，积极向苏浙发展势力，并由守势而转为战略攻势，采取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正确方针。

清王朝鉴于江南大营的惨败，绿营旗兵腐朽常败，把镇压太平军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公元1860年8月10日，清廷实授曾国藩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其时，湘军包围了安庆，太平军统帅部为了解安庆之围，制订了“围魏救赵”的作战方针，决定以大江南北太平军主力部队分南北两路直捣湘楚军老巢——武昌，

目的是迫使在安徽的敌军西撤，求得安庆围解，而保障天京的安全。基于这个企图，以驻在长江北岸的陈玉成部从安徽入湖北；驻在长江南岸的李秀成军经江西进入湖北；两军约期在公元1861年4月会师武汉。公元1861年3月18日，陈玉成的北路军已占领湖北黄州府，武昌敌方大起恐慌。李秀成的南路军于公元1860年12月1日占领黟县（今同名），进距祁门大营已只有几十里。曾国藩非常恐慌，又准备自杀，但李秀成由于情况不明，错误地估计湘军在祁门驻有重兵，不敢进击，就绕道浙江转入江西，直到公元1861年6月11日才到达武汉外围，破兴国州（今湖北阳新），这样就后于会师日期两个多月了。这时安庆被围攻情况危急，陈玉成被迫回救安庆，李秀成也退回浙江，会师武汉以救安庆的计划完全落空了。

在安庆外围，陈玉成与湘军展开激烈的战斗，终未挽回败局，公元1861年9月5日安庆陷落，太平军两万多人全部壮烈牺牲。清湘军沿长江两岸进逼天京。陈玉成退守庐州，公元1862年5月13日庐州又失，陈玉成走寿州，被奸细苗霈霖出卖被捕，壮烈就义，年仅二十六岁。从此，长江上游主要据点尽失，天京失去屏蔽。

太平军的安庆失守后，公元1861年底，清王朝又给曾国藩加官，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归其节制。曾国藩移驻安庆指挥。公元1862年6月，曾国藩统率的反动军队，分兵三路：一路由曾国藩率领主力从安庆攻天京；一路由李鸿章的淮军联合英国人戈登的洋枪队从上海进攻苏州，常州；一路由左宗棠率领从江西攻浙江。公元1862年6月，天京第三次被围，形势危急。李秀成计划尽量运粮接济天京，坚守二十四个月后，待敌疲再行破围。但洪秀全严令促李自苏回救，战斗自公元1862年10月13日开始，至11月26日前后共四十五天，与湘军大战而未能退敌。这时湘军采取节节严营，濠深垒固，木桩叠叠层层，以守为攻的战法。李秀成在天王命令下采

取硬攻破围，将士未带冬衣，兵粮无继，结果直接解天京之围未成。洪秀全又企图进攻上游敌人后方，迫使湘军回救，所谓“进北攻南”之战。这个决定纯系以保天京为唯一目的，幻想恢复上游已失地区。事实证明，这是个既不知彼亦不知己的“慌不择路”措施。这时安庆、庐州和南岸城镇已尽入敌手，这一带地区连年征战，残破无粮，又值冬季，野无所取；敌军“专守为稳，以逸待劳”；李秀成直解京围激战方罢，未经休整，即以饥疲之师，执行更艰巨的任务，实难求得成功。李秀成不由自主地被迫执行，于公元1862年12月8日过江，先收两浦，然后沿和州、含山、巢县、六安进军，强攻湘军营垒，又非数日可下，清军守城不出，严守为固。太平军求战不得，饥疲益甚。公元1863年6月13日，天京城外雨花台被曾国荃攻下，洪秀全又差官捧诏调李秀成回京。这次“进北攻南”之役，太平军前后共“失去战士数万余人”，局势更加危迫。在洪秀全错误战略指导下，导致了直解天京之围和“进北攻南”战役的失败，使太平军损兵折将，并丧失天京周围许多重要据点，天京局势更急。更严重的是，由于调李秀成“来京”、“过北”，使苏福省会苏州丧失了！公元1863年5月2日太平军据守的太仓失守，李鸿章的淮军和他纠合的戈登洋枪队加紧对苏州外围据点和苏州城的进攻，由于苏州太平军内部一些蜕化变质分子的叛降，主将慕王谭绍光被害，公元1863年12月4日苏州陷入敌手，太平军和民众被清军屠杀的达十多万人。

1864年3月31日，杭州又告失陷，太平天国处境已危如累卵。

苏州失陷后，太平天国已面临生死关头，即死守天京与城俱亡；或“让城别走”[13]另谋生路。公元1863年12月21日，李秀成提出了“让城别走”的主张，力劝洪秀全放弃江苏、浙江，向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发展。洪秀全不听。李秀成只好留在天京，担任防守天京的任务。

从以后赖文光与捻军联合，继续与清军作战这一史实证明，当时李秀成“让城别走”作战略转移，无疑是最后挽救危局的正确主张。当时太平军尽管一再遭受到重大挫折，但在长江南北仍然保有相当实力；浙江有康王汪海洋和侍王李世贤两部，兵力也相当强大。所以，如果洪秀全接受李秀成放弃天京的建议，到清军防务薄弱的地方去发展势力，组织民众，以求重振太平天国的声威，则当又是一番局面。可惜洪秀全斗志衰退，不纳良谋，那只能坐守待毙了。

天京被围以后，内外交通断绝，军民在粮尽援绝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公元1864年6月，洪秀全因病不肯服药死去。李秀成辅佐幼主洪天贵带领三四千名将士又坚守了一个多月。7月19日，天京陷落，李秀成突围，在南郊方山被俘，幼天王洪天贵逃到江西也被俘获，就义于南昌。

安庆失陷于湘军后，公元1862年初，陈玉成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率领一支太平军自庐州北上，渡过淮河，远征西北，招集兵众。这支部队经过安徽北部时，得到活动在皖、豫、鲁一带反清组织捻军的支援，并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清军。天京陷落以后，赖文光等抱定“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的宗旨，整顿捻军队伍，改步兵为骑兵，扩编为有几十万人马的一支大军，成为太平天国失败后农民抗清斗争的主力。公元1866年秋，捻军在河南许州（今河南许昌市）分成东西两支，东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统领，在中原地区进行流动作战；西捻军由张宗禹领导，挺进西北，与东捻军互相呼应。东西两支捻军辗转斗争到公元1868年秋，终因势单力弱，先后败灭。到这时，太平军和捻军（史家有称为新太平军的）转战十八省，历时十八年（含天京陷落后的四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最终失败了。

如果洪秀全采取“让城别走，另图发展”的战略转移方针，舍天京而与大江南北兵马合谋再起，统一指导斗争，其发展肯定会比赖文光联合捻军所开展的局面大，形势要有利得多，至少可

以使太平天国有重振旗鼓，争取胜利的可能。事在人为，战略指导恰当，转变被动局面是可期的。因此，我们说，天京危急时，洪秀全不肯让城别走，是不明智的。

历史的教训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内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外国侵略者的疯狂掠夺，使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在日趋激化，人民奋起反抗，斗争烈火燃遍了中国大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

洪秀全，出身农民家庭，初为塾师，曾醉心于科举功名，几度赴考落榜，是一个长期受到封建主义教育和旧的思想意识熏陶的知识分子。由于他接触农民群众，了解他们的疾苦，并受到他们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推动，在《劝世良言》的启发下，他用西方的宗教和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传统的理论作为武器，宣传动员群众，起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仍然是旧式农民战争的理论，仍未脱离宗教迷信和封建思想的窠臼。但是，它在起义前后动员人民起来反对清朝政府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却起着积极的作用。因此，金田起义后，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在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引下，很快取得了占领金陵（南京）的伟大胜利。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及其组成的最高领导集团由胜而骄，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本来有可能推翻封建旧王朝清政府的统治，反被中外反动统治势力联合起来镇压下去了，给后人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想在前面已作了探讨的基础上，综合简论三点，以作结语。

一、缺乏全局观点，战略决策失误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政治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一个“均贫富”、“等贵贱”、“天下一家，共享太平”[14]的理想社会。姑不论其设想的理想王国这个乌托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单就有可能取代清王朝的现实目标而论，以

洪秀全为核心的领导集团，在各战略阶段上都犯了一定的和严重的错误。道州决策“专意金陵，取为根本”这个方针，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在执行上也存在着两个对以后有重大影响的失误。一是缺乏全局观点，不能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需要。在实施“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方针时，把下一战略阶段巩固金陵和扩大根据地时所必须确保的上游战略要地。如武昌、九江、安庆也都弃而不顾，这当然是错误的。以后太平军化了很大力量，几次西征去夺回这些要点，但最终未能占住，就是这一错误的后果。二是缺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即打歼灭战的思想，太平军攻占武昌后，声势大振，沿江东下，号称百万，作战部队少说也有十几万人。这时沿江清军都是腐朽透顶的绿营兵，太平军的主力当然应该扬帆猛进，直袭金陵，但分出一部兵力去扫荡沿江两岸的清军，摧毁清廷的地方政权，收集粮食和作战物资是完全做得到的。那样，清廷以后恢复统治，收集兵粮就困难得多了。特别是对向荣那支清军，从广西一直尾随太平军直至金陵，这支清军在广西平南官村曾被太平军击溃过，它沿途收集残军，到金陵时也不足两万人。太平军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它长期在后面尾随，太平军如果用伏击等方法歼灭它是轻而易举的。可能太平军轻视这支清军，但轻视它就应吃掉它，对此，除了缺乏歼敌有生力量的指导思想之外，实在难以找到其他解释。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15]太平天国领导人在较顺利地攻克南京后，便过低估计清王朝的反扑势力，过高看待太平军自己的战斗力，以为只要兵锋一到，不需经过艰苦的战斗，就会取得预期的胜利。因而不把清军江南、江北大营作为主要的首先需要歼灭的对手，而径行各以不足的兵力分头北伐和西征。这一决策实际上是道州决策的翻版，企图仍以乘虚奔袭的方针，像夺占金陵那样袭占北京和夺回武昌。但这时的形势已和义军初起时完全不同，那时承平日久，江南空虚，所以道州决策是正确的。但这时清廷震惊，已开动全部统治机器来镇

压太平军。因此，再次采取乘虚奔袭的方针就免不了要碰壁了。在这里，同样也反映出太平军领导人缺乏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思想。当时清江南、江北大营刚刚建立，兵力各只一两万人，太平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它们是完全办得到的。当时，太平军只占领了南京一隅之地，既已定为根本，就必须加以巩固、扩大，使成为稳固的后方根据地，建立自己的政权，以使补给军需和补充兵员，有牢固的基地。这样，才能支持尔后的战争，或者说实现推翻清王朝的战略目标，像刘邦之有关中、明朱元璋之有江南那样。从敌我双方兵力对比来说，当时仍然是敌强我弱的形势，太平军正应当利用清军在全局上虽占优势，但在分散着的局部是劣势，而自己却至少有着集中的十几万能战兵力的优势，正应该采取各个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以南京为中心，首先歼灭江南、江北大营，然后横扫江南和相邻的江北之敌，各个击破清廷从各地调来的、逐次投入战场的清军，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然后北伐、西征，胜利成功的公算就非常大了。太平军由于指导思想和战略决策上的严重错误，从而逐步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由于清江南、江北大营卡着天京的脖子，北伐的失败和西征的失利，虽然夺回了部分地区，但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太平军以后的作战，实际上已从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而且由于政治上的失误和组织上的分裂，力量大为削弱，使敌人得以运用全国政权的优势日益强大起来。“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军已完全转入守势作战。虽然后起的优秀将领陈玉成、李秀成吸取了失败的教训，在内线作战中能够集中力量，打出不少像三河镇之役和二破江南大营那样成功的歼灭战，但由于政治上、战略上失误过多，已不能重振声威，扭转局势了。洪秀全主要是背着“小天堂”天京这个沉重包袱。天京没有成为支持向外扩展的根据地，反而成了牵制向长江上游发展和经营江浙的累赘。回顾天京从建都起，绝大部分时间是处在敌人包围状态下挣扎。最后在危如累卵时洪秀全仍拒绝“让城别走”另图发展

的战略，躺在"小天堂"里等待败亡。是非常失策的。

二、"天京事变"，同室操戈，自相残杀、分裂

洪秀全在金田起义之初，即自称天王，占领永安州后又封杨秀清等也各称王。这与起义的号召要"斩邪留正解民悬"，"天下一家，共享太平"，不分男女此疆彼界之私这些思想是不相称的。当时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解救，太平军刚刚开始打下一个小小的永安城，就迫不及待地封官、定爵，为走向封建化政权等级制度铺路，为思想变质脱离群众走上安富尊荣的生活开了绿灯。在公元1856年秋一破江南大营，斗争取得较好的发展时，发生了"天京事变"就不是偶然的了。所谓"天京事变"亦称"韦、杨内讧"，主要是杨秀清索封万岁，洪秀全命韦昌辉诛杨，后又诛韦，以及公元1857年石达开出走三件事。韦昌辉不仅杀了杨秀清一家人，〔16〕还消灭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石达开从湖北赶回天京后，韦昌辉又图对石杀害，石逃往安庆，但全家也被韦杀害。韦昌辉的残杀，激起了太平将士的极大愤慨，洪秀全又在天京军民协力下处死了韦昌辉，任命石达开"提理政务"。但洪秀全猜忌异姓，重用其两个哥哥仁发、仁达，封为安王、福王，参预政事，以干预、监督翼王石达开，且有图谋杀害之意。石不安位，率众二十余万人出京，于公元1857年6月2日，由铜井（在乌江对面）今江苏江宁县境渡长江入皖搞单干，以后在四川大渡河全军复没。这一分裂活动，使得太平军大伤元气，这是难以弥补的损失！从此太平天国开始走下坡路，"天京事变"成为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的转折点。领袖和领导集团，无论在平时或战时，无论在一般战争或革命战争，都是起着主导作用的，关系着事业的成败。正如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时说："因为当时洪秀全、杨秀清争皇帝做，所以太平天国的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那四部分基本军队，都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势力便由此大衰"。造成了军事上攻守易势，加速了天国的败亡。

三、无后方的作战，没有去积极争取同盟军，天国成为洪氏的家天下

太平军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军队没有健全的后方补给，军需粮械装备，主要靠就地征发，包括“打先锋”“纳贡”和购买，即缴获和没收反动派的财物和向民间摊派以及自身采购的。在大流动作战中这种因粮于敌就地补给的办法，遇到敌方经济封锁，“坚壁清野”，或者地方贫瘠、残破，难以征集时，就会给军队作战胜败造成巨大影响。如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和李秀成直接解天京之围失败后向皖北的行动，以及天京被围攻时，都因得不到足够的给养而遭到失败。历史上无后方作战的农民战争都吃过这个亏，太平军也不例外。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期（天京事变之前），斗争发展是比较顺利的，也推动了全国各地各族人民的起义，如天地会系统的反清斗争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到处爆发，公元1854年，胡有禄、朱洪英等在广西灌阳县建立“升平天国”。同年，陈开、李文茂等在广东佛山起义，翌年转入广西在浔州(今广西桂平)建立“大成国”。公元1853年9月，上海小刀会刘丽川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县。此外，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台湾都有哥老会、小刀会、天地会等各种支派的起义。在北方还有白莲教的斗争活动。公元1855年有贵州苗族张秀眉领导的苗族起义。黄淮地区有捻军。但洪秀全对这些反清起义的力量，并没有主动地积极争取，有计划地纳入统一斗争里去，以壮大自己的阵营，加强对敌斗争的有利发展。最明显的是对近在上海地区的刘丽川起义，没有派兵去支援，以致小刀会坚持几达两年，还是被中外反动联合势力镇压下去，太平军失去了靠近的一支有力的同盟军。即以捻军来说，也是在太平天国复亡后，才由赖文光与他们紧密的联合起来，得以延续斗争达四年之久。所以如此是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的历史局限，尤其是与洪秀全拜上帝教义里独尊上帝、排斥诸神的排他思想分不开的。

洪秀全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经济基础，农民小生产的阶级地位，传统封建思想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这种政制正包孕着皇权主义的因素。洪秀全本人的皇权思想是早就存在着的，前面说过，他在起义之初就醉心于封官、定爵，定下了严格的封建等级的条规。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的皇权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滋长，表现在他要把“小天堂”的权力，集中在以他为核心的洪氏家族手里，建立起他洪氏的家天下。据《李秀成自述》第一重用幼西王肖有和、第二重用王长兄洪仁发、次兄洪仁达，第三重用干王洪仁玕，第四重用驸马钟姓、黄姓”。可见用人唯亲，一反洪秀全以前自己规定的“选贤尚德”，“选贤与能”的用人原则，和他自己所宣传的世道原则，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采取了用人唯亲，以血统关系定爵禄和掌权。洪氏家族结帮自固，排斥异姓，一批无功无能的亲佞，高踞于出生入死的将士之上，尤其是洪秀全脱离群众，安富尊荣，比历代封建帝王并无逊色。在洪氏家族包围下自毁长城，“天京事变”的自相屠杀演成历代农民起义罕见的惨剧，从而使斗争走下坡路，而终于导致太平天国的灭亡。这个历史上的悲剧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注　　释

〔1〕 据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说，洪秀全称天王是在金田起义时。

〔2〕 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编第一册72页

〔3〕 《太平天国丛刊》（四）401页

〔4〕 张德坚：《贼情汇纂》

〔5〕 《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118页

〔6〕 《清史稿》洪秀全传

〔7〕 马克思：《亚洲与俄国》

〔8〕 《太平天国资料》第5页

〔9〕 《李秀成自述》

〔10〕 《曾国藩全集·书札八·复左季高书》

〔11〕〔12〕 《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

〔13〕 郦纯《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494页

〔14〕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

〔15〕 见公元1944年11月毛泽东同志写给郭沫若同志的一封信。

〔16〕 据1982年10月16日《南京日报》载：秦淮区在文物古迹普查中，发现了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的后代，访问了杨秀清的重孙女杨桂易。她说，杨秀清遭杀害后，为避免株连，长辈曾改姓张，所以，她曾名张桂易。她还谈了东王杨秀清的三太子隐藏在观音庙当和尚的一段往事。

第三十六章　清 代 海 防

第一　清政府建立海防前的形势

一、国际形势

鸦片战争以后，海禁大开，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以武力侵略中国，中国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势日趋衰落，世界上的大小侵略者接踵而至。当时的国际情况如下：

沙俄是最早的最富侵略性的殖民主义者，在鸦片战争以前他就占领了我国北方的大片领土。鸦片战争时他以公正保护者的面貌，充当北京条约的中间人以攫取利益。正当英法侵略者海军向香港调集时，它以西伯利亚的哥萨克部队缓慢地然而是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平尔山推向黑龙江岸。它不断地在我国西部地区加紧侵略，于1845至1854年侵占了我国西部地区的伊塞克湖及喀尔巴什湖以东以南的大部分地域。1851年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夺取了免税特权和领事裁判权。1857至1858年，它又勾结英法侵略者，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出兵占瑷珲，迫清政府签定瑷珲条约。1860年又迫清政府签定了《中俄北京条约》，1864年又迫签《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我西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占去。1882—1884年以《伊犁科塔界约》夺去我斋桑泊以东及以南约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以《续堪喀什葛尔界约》割去我帕米尔以西大部土地。马克思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区，沙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诺维

奇到尼古拉都一直企图占有这个地域。”〔1〕恩格斯也说“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2〕

英国侵略者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迫清政府订立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如《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以及虎门、黄埔等条约，使我国沿海大门及内河的许多地区都门户洞开，任其往来掠夺，他们还总结出了一条对清政府的经验，“华人难与说理，惟临之以威，可以惟我所欲为”。〔3〕他们本着这条经验逼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少的条约，除了已取得的在广州及沿海的势力范围外，进而又取得了长江航运权，尔后又借口其使馆人员玛加理率领武装人员侵入我云南省时被打死讹诈清政府，迫清政订下《中英烟台条约》，取得了在我国西南地区的特权和领事裁判权，英国侵略分子得意地说“这个条约标志着中国对外关系史中的第三阶段，重要程度仅次于1842年及1858年的条约。”〔4〕

以后他又逼清政府签定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把侵略势力伸入到西藏，于1894年强迫清政府订定《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又把侵略矛头指到云南内地，还在帕米尔高原占去一大块土地，使至今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这都是英国侵略者的所作所为。

英国侵略者把中国东南沿海，西南西藏及部分新疆地区都划为它侵略的势力范围，它和俄国一样是最早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

法国侵略者比英、俄侵略者来得时间稍为晚些，它伙同英国侵略者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法天津条约》，以武力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传教士为主要侵略工具，企图从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1862年他占领越南后，又想通过越南进一步向中国的广西及云南以扩大其侵略势力。

美国建国较晚，因而参与对中国的侵略也较晚，虽然它没有大

量派遣军队或以军事行动直接侵略中国，但它经常伙同其他侵略者胁迫清政府，以所谓“利益均沾”的手法，也取得同样的侵略效果。它同样参与了清政府对中国革命力量的镇压，同英法侵略者一样也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及关税等特权，并最早取得长江的内河航运权。它对中国同样垂涎三尺，特别是对台湾、朝鲜，它支持日本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琉球、以及朝鲜半岛。

日本侵略者是东方较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明治维新后伊藤博文上台，此时其国内的军阀们早已定下向我侵略的野心。有所谓南进政策，是主张向南洋发展；有所谓大陆政策，主张侵略中国东北、华北。按其南进政策必先侵占中国领土台湾，按其大陆政策必先侵占领朝鲜和我国的东北。田中奏摺即狂妄的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为此，它积极整军备战发展其海军、陆军，准备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

在这期间除上述侵略者的侵略外，其他较小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意大利、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家也都先后向清政府提出要“利益均沾”，他们都毫不费力地得到清政府的同等待遇，在中国取得了像英法等国的同样利益，像葡萄牙这样的小国也强占了我国领土澳门。

综上所述，这时期中国已经初步被帝国主义瓜分了，北方是俄国的势力范围，西南大部分地区、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是英国侵略者的势力范围，西南是法国侵略者的势力范围。当时清政府派驻英、法两国的公使薛福成说“由斯以观，中国东南两面大海绕之，其自东北以迄西南，则三强国之境绕之，防于海者，动虞诸国窥伺，防于边者，日与三国周旋。”〔5〕这些侵略者有的从边境蚕食、入侵，大部以“炮舰政策”从沿海入侵，逼迫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俄、英、法、美、日等国为了侵占中国的需要，时而联合行动，时而以各种面貌互相配合。有直接出兵的，也有以中立面貌出面调停的，及至清政府接受屈辱条件，则它们都要利益均沾。

有时为了分赃不均，也引起明争暗斗。清政府中某些官员就籍此提出“以夷制夷”的理论，妄想在列强矛盾的夹缝中求生存。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总方针是不变的，清廷自己没有力量，所谓利用列强的矛盾仅仅是一种幻想，到头来只能是以牺牲中国的利益而告终。

资本主义列强的武器装备，特别是海军舰队是殖民主义的急先锋。到十九世纪后半叶，由于机器工业的迅速发展，已能大量生产线膛枪和线膛炮，火炮的机动性，射速和有效射程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舰队也有了装备有线膛炮的蒸汽装甲舰，海军的战斗力大为提高。这些武器、舰只陆续装备了列强的陆军和海军，取代了过去所用的滑膛枪、炮和木帆船。使得资本主义列强的舰队能够更加横冲直撞，去敲开一个个生产落后的、闭关自守的国家的大门。

二、清政府内部的情况

鸦片战争以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并承认侵略者在中国享有种种特权而告结束。但是清政府中从皇帝到各级执政官员并没有从中接受应有的教训，认真去对付资本主义外国的侵略，一种苟安思想反而在他们中占了上风。主持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在签约时所说：“该夷……虽系贪得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码头，贸易通商而已，尚非潜蓄异谋”。〔6〕战争结束后，许多人也附合他的说法，如广东巡抚黄恩彤作《抚夷论》，其中说：“……其所以兵犯顺者，非谋逆也，图复其通商也”。〔7〕他们的认识就是：外国侵略者不会颠复清王朝的统治，仅仅是志在通商而已。

另一方面，鸦片战争给清政府的沉重负担，完全转嫁到农民群众身上，官吏的搜括，连年水、旱灾的侵袭，促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五十年代初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紧接着捻军、西北、西南少数民族起义，有力地冲击着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

英、美、法等国站在侵略者的立场，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最初尚持观望态度。等到弄清楚太平天国绝不承认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严正立场以后，为了确保并且扩大它们在中国的权益，就以“修约”为借口，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勒索，最后由英、法组成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侵略者进攻和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面前，它从维护封建专制政权出发，认为太平天国是“心腹之患”，而一切外国侵略者无非是“肢体之患”，“两害相权取其轻”，就“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曾国藩主张：“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8]六十年代初兴起的洋务运动，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

第二　清政府建立海防的过程

清政府建立海防的过程是与其洋务运动同时兴起的，洋务运动基本的或者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制造武器装备，特别是建立海军。所以海军的建立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发展，而海军的失败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清政府建立海防的过程大致有如下几个阶段：

一、对建立海防的思想认识阶段

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炮舰的轰击，惊醒了一些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行径，看到了列强的“船坚炮利”，也看到了清军的陈腐落后。他们初步认识到要“制夷”即打败列强的侵略，必须首先学习西方制造机器，武器和船舰的先进技术，以此来装备和改造清军，并建立海防。林则徐、魏源就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

林则徐，福建侯官人，嘉庆进士，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任钦差大臣到广东禁烟。他认识到英国侵略者决不肯放弃鸦片利益，禁烟必然会引起军事入侵，要禁烟就必须巩固海防，准备

打仗，从而产生了以武力反对入侵的积极防御思想。他认识到要打败侵略者首先要了解西方，为此他在广州开设译馆，翻译有关世界政治、地理、经济等资料，编成《华事夷言》、《四洲志》等书，研究英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作为制定防御方针的依据；他提出用海关银两"制炮造船"，想仿造外国船炮以赶上西人；他整顿水师，严肃军纪，提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八字"剿夷"要言；他秘密购置西洋火炮，新建和改装原有炮台，使岸炮坛至三百余门；他改装民船，改进船炮技术，训练水师，抽调内地营汛防兵，加强海岸防御等等。在抗击英国海军入侵珠江口的战役指导上，他的方针是："以战为守，以逸待劳"，[9]水陆结合，近海歼敌。即在岸炮掩护下，利用内河"水浅沙胶"，敌舰"运棹不灵"，以大小火船，烧毁敌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国的战列舰还是依靠帆力和铁木结构）；召募渔民、盐工加以训练，军民配合，歼灭上陆之敌。

魏源，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留心时事，究习历史，与林则徐、龚自珍等交游。鸦片战争时，曾参与两江总督裕谦幕府，筹划抗英战争，后退居扬州，见英舰溯长江内犯，"忾然触其中所积，乃尽发其椟藏，排比经伟"，[10]著成《圣武记》，想通过总结清代兴衰历史，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主张。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与被贬黜到浙江军前效力的林则徐相会于镇江，受林的委托编成《海国图志》一书，对他有关抵抗列强侵略的想法有所阐述。他明确的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11]的思想，他认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了解了夷情才能"师夷长技"，以达"制夷"的目的。他认为西方的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12]主张派人到外国船厂，火器局学习技艺，回来传授，以便迅速改变武器落后状况；他建议在广东虎门外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雇佣外国工匠，制造船炮。关于海防，他根据当时敌我海军实力悬殊的情况，认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

林则徐和魏源是鸦片战后，主张了解“夷情”，“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先进人物，林则徐更是清廷封疆大吏中的凤毛麟角，他们既不同于顽固派的盲目自大，“闭关自守”，也不同于投降派被西方的“船坚炮利”所吓倒。他们能够正视现实，主张为了抗击列强侵略而学习西方的技术。他们的主张，当时在清廷投降派的阻挠下，虽多数未能实现，但对以后的引进西方技术，造舰造炮和建设海防，都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

二、清廷为镇压太平天国而加强水师和建立军火工业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廷经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其反动、腐朽、无能，已暴露无遗。面对仍在蓬勃发展的太平军和捻军的革命运动，清廷如不设法打开困境，已很难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清政府中一部分掌握有实际权力的官僚，如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企图以兴办洋务来谋求出路，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洋枪、洋炮、洋船，创办了一批武器，舰只的制造工业，来加强清军的实力，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清廷与外国侵略者签订《北京条约》后，资本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取得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许多特权，它们已获得了能够干预和左右清廷政局的有利地位，它们欣赏清廷的妥协投降政策，愿意协助清廷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慈禧太后执政的清政府，也十分愿意借助资本主义列强之力，来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于是它们勾结起来，英、俄、法、美各列强拼凑起“常胜军”“常捷军”等洋枪队，直接开进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战场，并向清廷出售大量军火，派遣军官训练海军。

公元1860年曾国藩向清政府建议，要攻取苏、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师不能得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䜣及文祥认为自己设厂建船“非年余不成”，不如从外国购买“火轮船、剿办更为得力”，[13]于是买船活动开始。外国侵略者均纷纷乘机进一步插手，一面花言巧语推销其破烂废旧的船只，一面则千方百计设法控制中国海军的指挥权。英人总税务司赫德是最卖力的一个，他

说：中国现有两只火轮船，”并非打仗之船”，[14]而英国船价低而佳，提出愿为清政府购买。曾国藩及清政府都求之不得，认为购买外国船炮是“为今日第一要务”。[15]计划议定之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公元1862年从上海税银凑了八十万两，交正在休假的海关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购买中号兵船三只，小号四只。而李泰国居心叵测，用了一百零七万两银子私自为清海军招募了六百多水手和军官，建立了“中英舰队”，并擅自任命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以清政府的身份订立合同十三条，规定司令除皇帝外不接受任何人的命令，而皇帝的命令也还要李泰国的副署才能有效，皇帝的命令不合理，他可以不副署。这支舰队公元1863年开到中国，清政府官员得知其情后，“不胜诧异”，原来曾国藩已请准清政府同意，物色了统带兵船总指挥及水勇，拟派总兵蔡国祥统辖这支舰队，只等舰船一到“即操纵自如，指麾由我”。这样一来曾国藩、李鸿章均未抓到这支舰队的管辖权，大失所望。清政府碍于面子，准备修改章程将就接收过来。然曾、李等人均不同意，认为必须“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16]清政府只好赏阿思本银一万两，令其将船舰驶回英国变卖，还又补贴其三十七万两银子，才算了事。清政府最初买船就这样花了百多万两银子而一无所获。

洋务派见向外国买船吃了亏，因此即想自己造船，于是各派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以取得在清政府中的实力地位，纷纷开设军械厂及船厂。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了一所军械所，自己造船，费了很大的劲才造出一艘小轮船，但在军事却毫无用途。

三、清廷大规模建设海军和海防

（一）清廷第一次海防议，三洋海军初具规模

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发生了日本侵入台湾事件。琉球民船遇飓风飘流至台湾，被台湾牡丹社土著人劫杀五十余人。日

本硬说琉球是其属国，借此来向清廷责问。琉球的宗主权一向属中国，从明太祖以来，琉球均受中国册封。同治初，琉球国王尚泰嗣位，仍循例遣使表贡请册封。这次事件就引起了琉球归属问题。到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三月，日本竟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都督，率海军至台湾，击破土著人，杀死牡丹社的酋长，其他十八社长先后投降，台东几全被日本侵占。清廷闻警，声明台湾为中国属地，不许外人到台湾讨伐土著人，要求日本撤兵，日本不听。清廷一面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统福建舟师赴台湾，一面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谈判。由于清帝国海军弱小，李鸿章、沈葆桢被日本有两艘铁甲舰所吓倒，最终清廷妥协退让，以赔偿军费及抚恤费五十万两换取日本撤军了事，但琉球的宗主权已默认为日本所有了。

日本由于明治维新和建立了拥有部分铁甲舰的外洋海军，在列强争夺殖民地的东方崭露头角，竟然使历来以天朝自居的清廷不知所措，对清廷震动很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奕䜣，文祥等奏称："台事虽权宜办结，而后患仍在堪虞，亟宜未雨绸缪"，"揣日本情势，未能一日忘我，不能不豫之备"，"迅速筹议海防，并先为筹防日本"。[17]五月，清廷下诏："谕李鸿章等于总署条奏海防、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诸事，详议以闻"。[18]于是有关的大臣督抚纷纷提出建议，这就是第一次海防议。

李鸿章疏言："中国东、南、北三洋，请各设大兵船六艘，"根钵"（炮艇）十艘，合成四十八艘。三洋各需大铁船二艘。北洋驻烟台、旅顺等处，东洋驻长江口外，南洋驻厦门、虎门等处"。[19]并认为为了早日成军，"须在外国订造"。

江苏巡抚丁日昌拟了"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也建议沿海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每洋各放大兵船六只，小兵船十只。"三洋提督半年会哨一次"，使"三洋联为一气"，[20]并主张裁撤沿海原有船艇，节其经费以购置新式船只。由于沿海水

师大部分掌握在湘系军阀手中，因此丁日昌裁撤旧船的建议遭到湘系军阀的激烈反对。

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清廷决定，设立北洋大臣、南洋大臣，“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着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21]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沈葆桢疏请各省协款，各年拿南、北洋各两百万，专储为筹办海军之用。期十年成南洋、北洋、粤洋海军三支。尤恐缓不济急，请以四百万先解北洋，使成军后，再解南洋。[22]清廷乃于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五月确定：“先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俟力渐充，就一化三择要分布”。[23]以此作为海军的建设方针。

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湘系官僚左宗棠在镇压了太平军以后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摺，他说，“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24]要仿照西法于福州马尾山麓，频江设船厂，制造兵轮，用以装备海军。此建议为清廷所批准，设立了福州船政局。但未及兴工，左宗棠即调陕甘总督，他为继续控制福州船政局，推荐其心腹江西巡抚沈葆桢任福州船政大臣。沈到任后，即“购机器，筑船坞”，兴建福州马尾船厂，这是“中国海军萌芽之始”。[25]

福州马尾船厂设于马尾中岐山脚下，船厂聘请宁波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和法国洋枪队将领德克碑作正副监督，“一切事务，均责成两员承办”，[26]技术上也主要靠洋匠，厂内工人最多时达三千多人，每年费用达80万两，清政府投入了很大的财力，计划“于五年内完成”，到1869年该厂造成了一只“万年青”轮船，至公元1874年又造成了“湄云”、“福星”、“伏波”等十五艘兵船，至公元1884年共造了二十六艘兵船，但船的质量很差，不堪海战。

淮系官僚李鸿章为了争夺权力和扩充实力，也于同治四年

（公元1865年）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聘请外人，除制造枪炮外，也制造轮船。同时又在南京设立金陵制造局，把原设在苏州的洋炮局也并进去。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后，又把天津制造局（原系通商大臣崇厚所筹建）掌握在手里。江南制造局后来绝大部分改为造船，出厂了“惠吉”、“海安”、“操江”、“威靖”等六艘兵船。其中“海安”号，马力一千八百匹，排水量二千至三千吨，装备大炮二十余门，可载兵丁五百人。据外国记载：“这兵轮的各部分，除了螺轮和曲拐以外，都是局中自己所制造。”〔27〕

上述福州马尾船厂和江南制造局所造的船只，名义上是中国自建，实际上船材来自外国，所以李鸿章认为：自己虽然已经造出一些船，“然已费银百万有奇，物料匠工多自外洋购致，是以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28〕于是洋务派中又兴起了一股造船不如买船之风。在李鸿章为了早日成军，“须在外国定造”的思想指导下，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李鸿章就向英国订购四只炮船，取名为“龙骧”、“虎威”、“飞霆、“策电”，并代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从英国订购四只炮船，取名“镇东”、“镇西”、“镇南、“镇北”〔29〕，在此前后，广东和福建也从法、德、美等国购入“安澜”、“镇涛”、“澄清”、“绥靖”、“飞龙”、“镇海”、“澄波”、“建威”、“福胜”、“建胜”〔30〕等船，这样由北洋、南洋、福建、粤洋各自筹建舰队。

从公元1874—1884年8月，经过十年的惨淡经营，在中法马江海战之前，三洋海军已初具规模。北洋海军已有军舰十四艘，分驻大沽、旅顺、营口、烟台，管辖奉天（辽宁），直隶（河北）、山东海面。

南洋海军有军舰十七艘，分驻江宁、吴淞、浙江等地，管辖东南沿海海面。

福建海军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福建于70年代末，

凭福州船政局近水楼台首先建立，只有少数兵船购自美、法、英等国。1874年开始筹建海防时，已拥有炮船等十四艘，并开办了水师学堂，培养了一批如邓世昌、刘步蟾等优秀人才，这支舰队由福建船政大臣统辖，只在名义上属南洋大臣领导。

广东水师的历史较为悠久，早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在广州就购买火炮船武装水师抗英，1867年两广总督彭瑞麟从英国购买“安澜”等炮舰六艘以充实广东海军，至1884年广东水师已拥有军舰12艘，这支舰队归两广总督节制。

三洋海军（实际上是北洋、南洋、闽海、粤海四支海军）“各归节制，不相统辖”，北洋海军属李鸿章领导，是淮系势力控制，南洋和福建海军由湘系左宗棠、沈葆桢操纵。

评第一次海防议

第一次海防议在清海军建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首先清廷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日本所挑起的琉球、台湾事件，对抗击资本主义列强海上入侵的迫切性有所警觉，通过第一次海防议，加快了建立海军的步伐。对建立海军的目的，除了提高其每况愈下的威望，维持其摇摇欲堕的统治，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外，也具有了抗击资本主义列强入侵的职能，而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造枪买船，加强水师，只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有所区别。

清廷经过四年酝酿，最后定下“以一化三”为建设海军方针，这个方针是较为切实可行的：中国海岸线漫长，口岸、良港林立，划分三个海防区，建立三支能遂行战略任务的舰队是恰当的；清廷经济落后，财政据撷，集中有限的财力先建一支，等有了基础、有了经验，再“以一化三”，应该说是比较实际的方案；一支成军的舰队当然比三支不成军的舰队更适合于战争的需要，而先建北洋，以保卫京畿和渤海也为形势所必需。

建立机器制造业、军火工业、造船业、开办学堂、派遣留学

生，雇用外国技师、工人都是必需的，它们为建设清海军作出了贡献，为建立中国现代工业，造就了一批人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了加快建设海军的速度，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向西方订购一批具有较新技术水平的舰只，也应当是允许的。问题的症结所在是满清王朝腐朽的政治，贿赂横行，贪污成风，各级官吏既不懂科学又不懂军事，造船的代价高，质量差；买船则以次充好，滥竽充数，以致效果不佳，大大的阻滞了建设海军的速度。

这次清廷决策的最大缺陷是建设海军没有统一部署和指挥。清廷既要利用湘、淮两系军阀，又不甘大权旁落，于是设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分管海军建设。形成了各自为政，难以协调的局面。

海军经费主要用于北洋，南洋和闽、粤海军是由两江、浙闽、两广各督抚自行筹款，各自建设的。各舰队，各派系平时矛盾很深，战时互相观望，保存实力，不能统一调遣互相配合。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福建舰队全军覆没，中国最大，最早的造船厂也遭摧毁，南北洋及广东舰队，均坐视不救，互相推诿，充分暴露了这一缺点。

（二）清廷第二次海防议，建立海军衙门和北洋舰队成军

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法国侵略军入侵越南，中法战起。光绪十年七月法国舰队闯入福建闽江口，乘清廷一味求和，疏于戒备，突然袭击福建舰队，马尾一战，福建舰队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全军覆没（马尾海战经过参看三），引起清廷很大震动。

清廷认为："如果水师得力，互相应援，何至处处牵制？"〔31〕"法国恃其船坚炮利，（在中国）横行无忌"。〔32〕于是"深惩马江之失败，筹议海防善后事宜"。〔33〕展开了第二次海防议。

在这次建议中，清廷明确了几点：

——"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34〕决定大力扩建海军。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命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事务，沿海水师，悉归节制。并命奕劻、李鸿章会同办理，……而以李鸿章专司其事，设海军衙门于京师”[35]，对三洋海军实行统一指挥。

——采纳了李鸿章关于“水师还未练战，战舰尚须添购”的意见，加快了买船，特别是购置铁甲舰的步伐。李鸿章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认为：若无铁甲坐镇，仅恃已购之蚊（即根钵）、快、碰船（快速炮艇，专为冲击对方船只用）数只，实不足自成一队阻扼大洋。”[36]甚至说：“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37]。于是买船的规模扩大了。

这次海防议，清廷看到了清海军战斗力还弱，和铁甲舰在海战中的主力作用，也看到了各舰队互相观望，缺乏统一指挥，并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但清廷看不到马尾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清廷政治制度腐朽，大臣督抚指挥无能和妥协求和及“不可衅自我开”严重束缚舰队手脚的战略方针。

公元1885年除原有的向外国订购的船舰外，向德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舰，到达中国。“定远”、“镇远”，每舰排水量七千三百五十吨，有六千四马力，是清海军中两艘最大的铁甲舰。随后又向英国订购了“经远”、“来远”诸舰，也先后到达中国。一时北洋舰队的实力，急剧膨胀，至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北洋舰队已拥有铁甲船（主力舰）、快船（巡洋舰）、碰船（炮艇）、运船、通讯船、鱼雷艇等二十五艘，已大致配套，至此北洋舰队正式成军。（舰队编成及舰只的主要性能见附表1、2）

北洋舰队成军后，任命丁汝昌为提督，英国水师教官琅威理为海军总教习，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等分任各舰管带。舰队分中、左、右、后四队，整个北洋舰队由李鸿章指挥统辖。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清北洋舰队成军，并大致上已经配套，应该说已能够在中国海洋遂行战略战役任务。

由于清廷筹庆慈禧六十寿辰，挪用了海军经费；清廷中某些大臣不愿看到李鸿章的势力继续膨胀；北洋舰队的主要负责人李鸿章也意满自得，盲目乐观。所以，北洋舰队成军后不再增加大型舰只，也没有进一步完备辅助舰艇，清海军的建设停滞下来了；从西方买来的舰只和请西人设计建造的船坞、港口、炮台、由于各级官员的无知和贪污，以及西方商人的欺诈，所存在的各种隐患，海军事务衙门和北洋舰队的各级官员也没有去检查、寻找和设法弥补，北洋舰队的作战能力不仅得不到继续提高，它已有的作战能力也是经不起考验的。

清廷“以一化三”的海军建设方针，从集中财力，首先建立北洋舰队来说，是取得了成效的。但清廷并没有继续执行“化三”的方针，南洋、闽海、粤海三支舰队，是由两江总督，浙闽总督（湘系军阀）和两广总督自筹经费，自行建设的，它们的规模和作战能力无法和北洋舰队相比拟。海军事务衙门虽然建立了，但各有势力范围，李鸿章也并不关心其他舰队，李鸿章实际上也只能掌握北洋舰队，其他舰队的指挥使用依然是各自为政。

南洋、福建和广东舰队的概要情况如下：

南洋舰队除原在沈葆桢时由李鸿章所订的炮舰外，近几年几乎没有增购外国船只，但仍然以自造的和买进的船舰组成了“南洋舰队”。（其舰队的编组成和舰只的主要性能如附表 3）

福建舰队在1884年中法海战中全部覆没，以后又在马尾船厂制造了几只船舰，并向国外购买了几只小舰，组建了福建舰队。（其舰队的编成及舰只的主要性能见附表 4）

广东舰队近些年来也陆续向国外购买了少量舰只，组成了粤（洋舰队。其舰队编成及舰只的主要性能如附表 5 、 6 ）

海军的建立不仅仅只是有了一个舰队就算成军了，它还需要有军港、船坞、炮台等一系列的设施和建立训练、指挥等有关制度。清政府在建立海军舰队的同时，也着手逐次完成了下述各项任务：

1．建立海军基地及海岸炮台

海军舰队要有基地，供舰队停泊、补给和修理，也要有便于训练的一些设施。北洋舰队选择了旅顺、威海卫等地为基地，并将其建成为近化的军港。

旅顺口海军基地

大沽口原有一个船坞，规模太小，只能修理和建造小型船舰。李鸿章建议在旅顺修建大船坞，以修理铁甲船等大型舰只。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将工程包给法商德威尼承办，限三年完工，造价原定一百二十五万两银子，实际用了一百三十一万两。

旅顺地理条件好，水深不冻，可避台风，近山多石，可修船坞，口连大洋便于操练，"定远"、"镇远"均可停泊，极为适宜。军港建成后，李鸿章奏称"旅顺船坞极为坚固"，"其工程之艰巨，布置之详密，实所罕见"，在验收时又说"经逐加覆勘，工程做法一一符合"。实际上法商偷工减料，草率完成，上述评价完全是李鸿章无知和粉饰的谎言。

旅顺口，大连湾的海防工程是从1880年修建旅顺黄金山炮台开始的，为了保障停泊舰船及船坞的安全，从1880至1886年间，先后在旅顺西海岸建了威远炮台、蛮子营炮台、馒头山炮台、城头山炮台、老虎尾炮台；在东海岸建了黄金山炮台、模珠礁炮台、老蛎咀炮台、老蛎咀后炮台；又于口东老蛎咀炮台之东增设番岛炮台，先后共建十三座炮台。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以后，在旅顺口后路椅子山一带建椅子山、案子山、测望台三座陆路炮台；在其东南建有松树山、二龙山、大坡山等九座陆路炮台。共有炮百尊左右，其中绝大部分系德国克虏伯厂的产品。

南关岭左侧之大速湾，是旅顺口后路咽喉地带。为掩护南关岭，巩固旅顺后路，又在大连湾修建黄山、老龙头、和尚山西，中、东等海岸炮台，有炮二十尊。陆路设有徐家山炮台一座，有炮四尊，专顾后路。大连湾海岸炮台经六年之久的建筑，不但依山而立，颇称巩固，而且炮全是克虏伯厂的新式炮。该地区被誉

政府称为精华所在。以后又建水雷营驻守其间。

旅顺海军基地由德国陆军军官汉纳根设计，除少数专对后路的炮台外，所筑海岸炮台"专为备击洋面敌船而设"，[38]炮台只有前炮台，只顾海中，不能兼及后路，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但李鸿章之流毫无所知。与之相反，日本侵略者却对此一清二楚。

威海卫海军基地

威海卫基地是清海军北洋舰队的根据地，位于山东半岛北岸的烟台兴成山之间，与辽东半岛的大连、旅顺隔海相望，为渤海、京、津的门户。港湾三面环山，蜿蜒回抱，南北两岸如两臂伸入海中作半环形、口外横有刘公岛，形成海上天然屏障。刘公岛稍南有日岛，西南有黄岛等分布海中，港阔水深，适合大兵轮停泊，是海军的天然良港，也是常年不冻、形势险要的海军基地。清军在建立北洋水师的同时，即以此作为军港。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全面开始在此（包括刘公岛）建立海军提督衙门及各类炮台，弹药库等，驻有重兵把守。威海卫海军根据地，战略地位重要，它是渤海的咽喉，向南向东可控制中、朝、日之间的黄海海域，掩护山东、辽东至朝鲜西海岸的诸航道，控制着日本舰队北进通向辽东和朝鲜西海岸的诸航道。

为保卫此海军根据地，清廷在港湾南北两岸及刘公岛，日岛上均筑有新式炮台：在港湾南嘴，建有皂角嘴炮台、鹿角嘴炮台、龙庙嘴炮台、称为南邦炮台；港湾的北嘴建有北山嘴炮台，黄泥沟炮台，祭祀台炮台，称为北邦炮台；在刘公岛西端筑有黄岛炮台、东端有东风扫滩炮台、并有零星炮台数座、统称为刘公岛炮台；日岛设有日岛炮台；南北邦炮台的后路、还设有后路陆路炮台、各个炮台都配有不同口径的新式大炮，共约百多门，其中绝大部分是克虏伯厂制造的。

沿海炮台的设置

清政府在建立海军的同时，也在沿海重要海岸先后建立了不少的炮台，以保卫海岸、港口并支援海军的活动。但除了几个主

要港口设有新式大炮外，其余大多数均系旧式前膛大炮。（其炮台位置如附表7）

2．海军的训练和各种制度的建立

海军的训练方面，清政府也完全依赖外国，聘请外人作教习。先请英人琅威理任海军总教习，因为此时所购系英国船只。总教习有调派弁勇之权，是控制海军的重要职位。英德两国都在这一职位上激烈争夺，争相控制中国海军，特别是北洋舰队的指挥大权。因此这一职位的人选，一时为英国琅威理，一时为德国的德催林，式百令，他们挖空心思不择手段，争得难分难解。他们虽为教习，但对训练并不关心，北洋海军各船分布海口，“养而不教”，“演操多不合法”，〔39〕官兵每日迎送官员，训练阅兵礼节，纪律松懈，生活腐败，“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40〕

南、粤洋则更甚，“南洋兵船，迎送官员，拖船载勇，习以为常，无从训练，战备阙如”。〔41〕

海军的各种制度

也仿照英、德两国水军的章程抄袭订立而成。内列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考试、俸饷、恤赏、工需杂费、仪制等项，条目备细，十分正规，朝庭内外，多为之吹嘘捧场，张荫桓说李鸿章拟定的北洋海军章程，“内多酌用英国法”，“规模井然”，“武备日彰”〔42〕，奕劻也在奏摺中称“北洋海军，声势已壮”。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设立了海军学校，派出留学生，公元1876年就从闽局设立学堂中抽调制造学员十二人，艺徒七人，驾驶十二人，由法人日意格带领赴英法学习，如刘步蟾，林泰曾即是。以后又派了两次留学生，人数都很少。

另外在国内尚设有马尾、黄埔、天津等海校、武备学堂、水雷学堂。在大连和威海也分别设有水雷学校，都由外人主持教育，甚至在水雷学校每个部门都有一个外国人主持。

3．指 挥

清海军组成为三大洋舰队，实为四大洋。北洋归李鸿章指挥；南洋归曾国荃指挥；福建归湘系船政大臣指挥，实际上是由左宗棠在指挥；广东由另一军阀指挥，所以当时左宗棠说：“划为三洋，各专责成，则畛域攸分，翻恐因此贻误”。[43]不幸而言中，李鸿章身为海军衙门的实际负责人，他只抓住了北洋舰队，对其他舰队则不管不问，他只树他的声威，谋他个人的权势，置他洋于不顾。公元1884年福建舰队被法军全歼时，他以北洋舰队另有他任无法支援为借口，坐视其覆没。北洋舰队建成后，三洋海军指挥仍不统一，互不协同支援。

清海防和海军的建设概如上述，虽然海军的主力舰队——北洋舰队已正式成军，并有了其他三支小型舰队，但由于清廷政治腐朽，官吏贪污无能，实际上还存在着很多缺陷，可是清海军的实际负责人李鸿章毫无自知之明，他利用两次校阅的机会，乘机大吹大擂，炫耀他的成就，公元1891年校阅后向清政府奏称，“海军一支，规模略具，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44]至1894年中日海战之前，李鸿章的势力已达顶点，时值二次大检阅，南洋六舰（南深、南瑞、镜清、寰泰、开济、保民）和粤洋三舰（广甲、广丙、广飞、）均来参加。李鸿章邀请中外人士，将他的要塞，学校、铁路、船坞和大炮统统炫耀一番，并奏称，“北洋各舰……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定远、镇远、济远等船演放鱼雷，均能命中破的”。调“北洋兵舰小队登岸操演陆路枪炮、阵法，灵变纯熟，快利无前，各处洋操实无其匹”。“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陆路各防营，训练娴熟，枪法步伍最为严正”。沿海各处船坞、炮台，工厂、仓库“工程并极精坚，布置更臻完密”。[45]此时北洋舰队名声显赫，李鸿章踌躇满志，清政府最高统治者也认为“李

鸿章督率有方，水陆各营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各海口、炮台，船坞等一律坚固，办理渐著成效”。[46]正在这一片“颂扬”声中，使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的甲午战争已无情的到来了。

第三　中法马尾海战

一、战前形势

中国南方邻国越南，早在18世纪末叶即遭到法国的侵略，19世纪50年代，拿破仑第三的法国政府占领了南圻，70年代又把魔爪伸向北圻，企图将南越变为它的殖民地，以便进一步打通入侵中国西南地区的大门。法驻海防的领事土尔克向其传教士阐明必须占领北圻的理由时说：“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由于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州各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47]80年代初法国金融资本迅速发展，以残酷镇压过巴黎公社而起家的茹费理组阁，即发动对越南北部侵略。越南与满清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越南国王受满清皇帝册封，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清政府则对越南负有保护之责。这时法军入侵越南国王向清廷请援，但清政府在那拉氏把持下又对外实行妥协退让政策，派李鸿章与法谈判承认撤走在北越的部队。公元1883年法军侵入北圻，占领了河内并继续向北进攻，遭到刘永福黑旗军（广西边境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参加过天地会起义，因受清军逼迫，进入越南北部聚众耕牧，有众二千余人）的沉重打击，清政府派赴支援的部队却节节败退。公元1884年3月茹费理内阁不满前约，又派新大使向清政府提出，要完全撤除中国在北越的部队，并要越南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越南要求中国援助，李鸿章与法使特利古谈判终止。一月以后，法又派福禄诺与李谈判，在天津订了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占有全部越南以及中国撤军。法国在订约后又制造事端借故要求清政府赔偿军费二亿伍千万法郎（合银三千八百万两）。清政府认为太无理，但

仍以曾国荃为代表到上海与法公使巴德诺进行谈判，担任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也帮同法国人向清政府讹诈，谈判没有结果。七月法国以孤拔所率领的舰队，直入福建马江海港寻衅。清政府对于法国侵略者的上述挑衅行动仍然一意妥协退让，并希望他国出面调停，以息战争。负责谈判的李鸿章给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钦差大臣张佩纶指示“谈判尚有希望，衅不可自我开”。

二、双方的作战指导思想及部署

公元1884年7月14日，孤拔率领的舰队（见附表8），借“游历”为名，进入福建的海军基地——马尾港，受到清廷官员的“殷勤欢迎”。法军舰队进港后即毗邻中国舰只停泊，并经常以五、六艘军舰控制马江口及其江面，威胁福建造船厂及沿岸炮台、守军。

8月4日法军以军舰两艘会同停留在台湾海面的一只共三艘，由利士比指挥，在台湾基隆港登陆，被清守军击败。法国政府决定先歼灭并击毁福州马尾港内的清海军和造船厂，再集中力量夺取台北，然后北上进攻旅顺、威海等地，迫使清政府满足其侵略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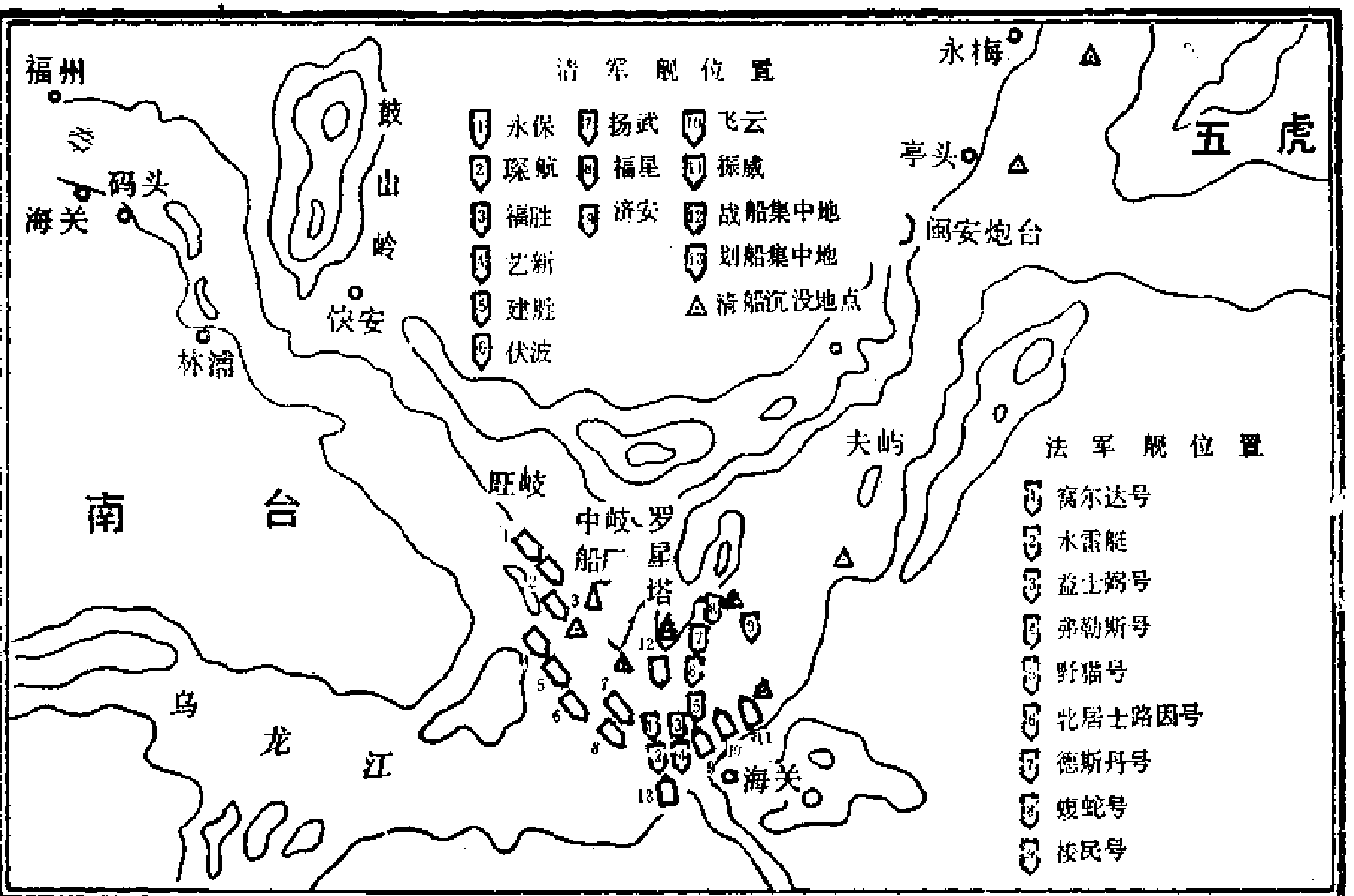
法军舰队进入马江的共十二艘，内有巡洋舰七艘，炮舰三艘，水雷艇两艘，总兵力约一千七百多人，其具体位置如下图。

清军执行李鸿章所指示的“彼若不动，我亦不发，静以待之”，〔48〕“衅不可自我开”的方针。清军官员大致分工如下：总督何璟和巡抚张兆栋负责福州省城的防守，福州将军穆图善扼守马江口的长门炮台；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和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指挥马尾一带水陆军并保卫军港及马尾造船厂。

当时马江两岸人民，纷纷要求先发制敌，吴大老愿率船只数十艘，装载硫璜火药、火罐、火箭等燃烧器材，火攻敌船，并表示，“若是官兵不愿抵抗，抗法的事我们愿承担起来”，林培基代表人民呈递“万民摺”，请求潜水破坏敌船，但是这些要求都遭到何如璋，张佩纶等人的扼制和拒绝，直到局势日益紧张，法

马江战斗前中、法舰队部署示意图

（36-1图）



舰挑衅十分明显时，始允许参加海陆军的战斗。

当时清军也慌忙作了如下的部署：

海军方面：以军舰九艘，商船两艘编成舰队：将主力旗舰“扬武号”等八舰停泊于罗星塔上游，东与法舰相拒；在我“扬武”号（旗舰）旁及其西南方面，以及船厂的铁水坪前汀泊的，尚有我之“伏波”号，“艺新号”、“福胜号”、“建胜号”、“永保号”、“琛航号”、等六艘。“振威”、“济安”、“飞云”三舰停泊于罗星塔下游，西与法军三艘巡洋舰首尾相接。另以旧式兵船八艘、炮船十艘及其他船艇编成两支船队，分别停泊于罗星塔南侧。

陆军方面：以步营11个营及部分炮队防守船厂和马尾港一带江岸；以11个营防守长门、金牌炮台。另有农民武装一千八百余人防守闽安附近南北江岸。由于清督抚、将军、大臣缺乏战备观念，对敌军企图从无明确判断，水陆各军缺乏统一组织和指挥，加之炮台陈旧，弹药不足，水陆总兵力虽数量上多于法军，但战斗力却不如。

8月17日，清政府迫于和谈无望，撤回上海谈判代表，但对马江则仅指示守军阻止法军舰开入和驶出，仍未解除不得主动出击的禁令，严重束缚了防军的手脚。8月19日法国侵略者在进犯马江的部署就绪之后，再度向清政府提出勒索赔款的最后通谍，限于48小时内答复，清政府拒绝答复。法政府即令其谈判代表谢满禄离开北京，以公使巴德诺留上海以伺机诱和。同时其殖民部长裴龙给孤拔的训令说“派遣你所有可能调用的船只到福州和基隆去，我们的用意定要拿住这两个埠口作质，如果我们的最后通谍被拒绝的话”。[49]法政府最后指示孤拔于23日退潮时发起进攻。

三、海战经过概要

1884年8月23日上午八时，孤拔把开战通知送给福州各国领事馆。至10时才向总督何璟发出14时开战的战书，何璟接战书后迟至十二时许才转给张佩纶。张佩纶竟请求法军延期开战。13时45

分，孤拔指挥舰队发起进攻时，清军仍无丝毫准备，连退潮时调过去的船头都未调转回来，而以船尾对敌，锚链均未拉起，清军就在这样昏聩的指挥下，遭到法军的突然袭击。

战斗打响后，在上游方面，孤拔以水雷艇分别进攻清"扬武"号旗舰及"福星"号运输舰，并同时炮击其他军舰。"扬武"号首被敌击沉，舰长兼舰队指挥张成泅水逃走，"福星"号未被击中，舰长陈英下令砍断锚链，调转船头发炮猛击孤拔坐舱，并开足马力冲入敌舰阵，给敌以严重打击，"建胜"、"福胜"两舰也跟着向下游冲去，但由于火力弱，速度慢，三舰先后被敌舰击沉，"福星"号舰长陈英、三副王涟壮烈牺牲，全舰官兵，大部分殉职，"福胜"号舰长叶琛在船尾中弹起火，自己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仍然指挥战斗，在船身沉没前还沉着地发射了最后一炮，他们都表现了昂扬的斗志和誓死卫国的爱国精神。在"福星"等船英勇战斗的同时，"伏波"、"艺新"两舰，因受重伤向上游福州方向退出战斗，"永保"、"航琛"两舰，最后也被法军击沉。

战斗在罗星塔下游的清舰"振威"号首遭法军从闽江口外急驶而来的"凯旋"号的袭击，"振威"立即起锚应战，被法军舰击中锅炉，起火下沉。"济安"、"飞云"两舰还没来得及起锚就被法军击沉。

停泊于罗星塔两侧的民船，逆风逆水，上驶困难，无法支援清舰作战，法舰在击沉中国舰队的同时，以猛烈的火力射击民船，这支由中国人民组成的江面武装力量，在火海中坚持战斗，他们以准确的火力，击中法军旗舰"富尔达"号，击伤了侵略头子孤拔，给了侵略者以应有的惩罚。但是，由于法舰炮火占优势，民船终于大部着火沉没。

江面战斗持续了三十多分钟，清舰队因毫无准备，仓促应战，大部分被法军击沉，但是广大的爱国官兵及参战军民，并没有被敌人所吓倒，他们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仍然奋不顾身，英

勇壮烈地反击敌舰，使上游方面的大部分敌舰受伤，其中重伤的两艘水雷艇逃往下游，如果不是受到美英帝国主义船只的掩护，必将沉入江底。入夜以后，沿江人民还用自己的木船装上引火药及其他材料，组织火攻船队，顺流燃烧冲击敌舰，也给了敌人极大的威胁。

8月24日法舰队部分舰只集中船厂江面，以密集火力轰击船厂，将工厂、仓库、及一条未完工的巡洋舰，全部摧毁。25日少数法军在罗星塔炮台登陆，未受到任何抵抗，就掳获三门克虏伯大炮而走。以后几天，法舰驶向下游，逐次袭击闽安附近两岸炮台，在我军民武装防守下未敢登陆。此时清军的将领，慌作一团，令守军堵塞海口，制止敌舰逃出马江口外，但长门守将穆图善未予实施。在23日激战中吓跑的清军会办海防大臣张佩纶，惊魂未定，束手无策，只知求援，对沿江战斗不加指挥。27日法军轰击长门、金牌炮台，击毁了金牌炮台。29日30日两天，法军佯作登陆姿态，掩护其舰队先后冲出江口。此次战斗，清军损失各种类型船只50余艘（其中军舰十一艘、商船十九艘）全国最大的造船厂毁于一旦，官兵牺牲二千余人，成为中国海军史上的首次惨败。

马江海战失败的原因

这次中法马江之战，在不到半小时的战斗中，整个闽海舰队全部被法军消灭，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清廷、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和福建前线大员的昏愦无知。

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兼谈判大臣，既负责外交又负责海防，他在实际上早已进入战争状态、法军正在借故扩大战争的情况下，仍电令张佩纶“衅不可自我开”，直到接法军最后通谍时，他还电何如璋“议和大有进步，所言必系谣传”〔50〕。临战还死抱着和谈幻想不放。当接到福建海军乞援电后，他又借口北洋舰

队船小，“不是敌法之铁舰大兵船”“若一抽调，旅顺必不能保”等托词，[51]坐视福建海军全军覆没。

福建前线负责防守的大员很多，平时浑浑噩噩不事战备，临战则互相推诿，贪生怕死。钦差大臣张佩纶，过去在北京当大学士时激烈主战，到了福建海防前线，就成为贪生怕死，懦弱无能的典型。在法舰进入马江的40多天时间里，他不仅不作战斗准备，反而压制广大爱国官兵及群众起来抗敌，一再告诫部队，“衅不可自我开”并下令不发给部队弹药，深怕军民起来抗敌，破坏了他的和谈美梦。直到法军袭击之前才勉强作了部署，但为时已晚。在接到法军开战通知后，竟请求法军延期开战，其颟顸无知，实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刚一开战他就临阵脱逃，放弃责守。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等也与张佩纶一样，战斗一打响就不知所措，先后逃之夭夭。他们应该对马江失败负完全责任。

只有广大的爱国官兵及人民群众站在坚决抗击敌人的一方，英勇战斗，不怕牺牲，尽到了他们应尽的责职。

第四　甲午中日海战

一、战前形势

日本侵略者自明治维新以来，就积极奉行对外扩张政策，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支持下，侵犯朝鲜和我国台湾，又于公元1879年正式吞并我国的属国琉球。从公元1885年起开始十年扩军备战，1893年正式成立日军战时大本营，作好了武力入侵朝鲜，进一步入侵中国的准备工作。

由于日本的北进政策与俄国的远东政策发生尖锐的矛盾，俄国一方面警惕日本对朝、中两国的扩张活动，另一方面又怕日本倒向英国而又极力拉拢。英国则想借日本的势力拒俄南下，与日本在伦敦签订条约以作支援，法德两国也想利用战争扩张势力，

因而日本就大胆地开始它的侵略行动。

公元1894年春，朝鲜全罗道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在日本的诱使和朝鲜封建王朝的请求下，派遣直隶总督叶志超率同太原总兵聂士诚统兵二千余人，由海道进驻朝鲜牙山。日本随即下达秘密动员令，暗地增加兵力，调动海军，并以保护使馆及护侨为借口，占领汉城并向牙山逼进，海军占领了釜山和仁川。接着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击沉中国派往支援牙山的兵轮，清政府被迫宣战，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这场战争，由陆、海两个方面组成，中日海战是中日战争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时间延续六个多月，主要进行了丰岛海战，黄海大海战（或大东沟海战）和威海卫海军基地保卫战。

二、双方的战略企图

（一）日军方面

日本帝国主义总的侵略目标是清政府的统治中心——北京，分三个作战期实施：

第一期：陆军的任务是占领全朝鲜，击败或牵制在朝的清军，引诱中国海军出援。日本联合舰队除配合陆军作战外，主要任务是歼灭北洋舰队主力，掌握黄海、渤海的制海权。

第二期：占领渤海湾两岸的辽东、山东半岛。

第三期：从渤海湾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野战军决战”〔52〕。

为达上述目的，根据情况的变化，拟定了三种可能的方案〔53〕：

1．如果顺利的占领了朝鲜，并控制了制海权，即出兵中国。

2．如果虽未能掌握制海权，但本国不受威胁，就暂保朝鲜。

3．假使海战失利，本国又受威胁，则调回赴朝日军，以防清军的袭击。

日本海军的战斗编成：

联合舰队（由日本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编而成）

司令官：伊东祐亨；下辖第一、二三游击队，联合舰队共辖下述舰只：松岛（旗舰）、岩岛、桥立、扶桑、吉野、秋津州、高千穗、浪速、千代田、高雄、筑紫、比睿、八重山、金刚、葛城、大和、武藏、天龙、爱宕、摩耶、天城、近江丸、山城丸、岛海、大岛、盘城等舰。

（二）清军方面

光绪继位后清廷分为“帝党”“后党”两派，互相争权，“帝党”对日主战，“后党”对日主和，时而“后党”得势，时而“帝党”得势，两党相争，事权不一。既无统一的统率机构，又无明确的战略方针。但“后党”掌握实力，最后还是慈禧说了算。

主和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的主张是：政治上“以夷制夷”，乞求英、俄、美等国出面制止日本发动战争，军事上则采取“避战保船”的方针。他采取了以下的措施：

1．下令孤立在朝鲜牙山的部队做必要的准备，但须“静守勿动”〔54〕。

2．不派援军，借口“我再多调，日也必添调”，唯恐战争扩大不好收场。

3．即电各国（英、俄、美），请他们出面调停，阻止日本开战。

此时中国驻朝鲜守军将领提出要先占领要地早立脚步，免为日军先得，叶志超当时提出三条：“上策是备战增援，中策是自动撤兵，下策坐守死地”，李鸿章即电令“切勿多事，各国正在劝和，或有办法，我不先与开战，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绌，切记勿忘，汝勿性急”〔55〕。

直到日军在朝鲜完成战略展开，取得了对在朝清军的压倒优势，朝野舆论哗然，纷纷要求清廷积极抗战，清廷才仓卒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条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并着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56〕

根据这一方针，清廷陆续增调陆军赴朝；令北洋舰队在黄海北部集结，扼守渤海海峡，策应在朝清陆军，并确保京畿门户的安全。

三、丰岛序战

此时赴朝的清军叶志超部，孤守牙山，处境十分困难。面对这一情况，清政府和、战两派互相攻击，清政府在主战派和舆论压力下，令李鸿章“一意主战，断不可意存畏葸”。这时李鸿章才应战。

光绪十年（公元1894年）7月23日李鸿章以重金雇英国“爱仁”、“飞鲸”、“高升”三只商船，运兵至牙山应援，并以“济远”、“广乙”、“操江”等舰护航至牙山内岛登陆。此时，日间谍已在天津贿买电报生得知开船的确切日期，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已接到其大本营的密令，即率军舰15艘，赶赴朝鲜西海岸巡弋。24日伊东即令其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率“吉野”、“浪速”、“秋津洲”三只巡洋舰侦察牙山海湾，并下令该湾附近如有优势的清廷舰队驻泊，可进而攻击之。三舰进至牙山口外之丰岛附近、25日8时左右，护送“爱仁”、“飞鲸”到达牙山后，准备去接护“高升”号的清舰“济远”“广乙”号，开出牙山驶抵丰岛海域。日舰采取不宣而战的卑鄙手法，向清舰发起突然袭击。“济远”、“广乙”在优势的日舰轰击下，被迫还击，仓猝应战，中日海军由此进入交战。双方炮击约一小时，“广乙”虽为闽厂所造小船，仍与敌进行激烈的战斗，并“击坏日本快船”。可惜炮弹太少，又孤军无援，在驶往朝鲜海岸时，触礁沉没。“济远”虽中弹较多，船上官兵仍冒着密集炮火，坚持战斗，大副、二副及十余名官兵均壮烈牺牲，因该舰系铁甲舰，虽受伤甚重但机器无损，旋即向西且战且退。敌舰“浪速”中炮甚多，左舷舵尾被打伤，日舰“吉野”衔尾追击，“济远”管带方伯谦，贪生怕死，躲在船中铁甲最厚处，先树起日本海军军旗，继又树起白旗以求饶命。日舰追击如故，愈追愈近，

舰上官兵激于爱国热情，群情恼恨方伯谦投降丑态及日舰的猖狂气焰，立就岗位，连发四炮，击中“吉野”要害，敌舰受到惩罚，立即逃走。此时，“济远”若能乘势转舵追击，势将取得很好成果，至少可以避免后来“高升”号被击沉的悲惨命运。可是方伯谦只顾逃命，竟丢下“高升”号不管，逃至威海，又谎报战功，说击毙日海军司令，大获全胜，骗得清廷奖金二千两，“告谕全军以为鼓励”。

“高升”号遇敌后，日舰企图将其劫走，清军官兵群情激奋，坚决拒绝，“宁愿死，决不接受侵略者的命令”〔58〕，最后为日舰所击沉，全船官兵在沉没前仍以仅有的武器与敌战斗，表现了临危不惧血战到底的气慨。“操江”号为木制小船，被日舰掳获而去。八月一日中日两国遂正式宣战。

四、黄海海战

丰岛海战后，留在朝鲜牙山的叶志超部，与日军稍一接触即率部逃至平壤，并谎报战功，李鸿章传令嘉奖并赏给二万两银子，并升任其为驻平壤清军总指挥。驻平壤的其他清军统领，得知叶志超饰败为胜，弃地邀赏，清廷是非不明，奖惩颠倒，人均无斗志。这时集结平壤的清军共有卫汝贵、左宝贵、丰升阿、马玉昆等部二十九个营，加上从牙山退至的平壤叶志超部六个营，共三十五个营，近两万人。由于叶志超行动消极，众军不服，加上天寒地冻，士无冬衣，贪官尅扣士兵粮饷，日军武器又较清军为优，形势岌岌可危。在三路日军分进合击下，清军马玉昆等部奋勇抵抗，左宝贵部血战尤烈，杀伤大批日军，最后壮烈殉国。日军乘虚混入玄武门，叶志超先降后逃，大军随之溃退，一直撤到鸭绿江边。

九月初李鸿章迫于帝令及社会舆论，为应援平壤战斗，令北洋舰队护送刘盛林所部“铭军”八营四千人，由海道运至大东沟，然后转由陆路赴朝，支援平壤清军。九月十七日北洋舰队于护送部队上岸后返航旅顺港时，于11时在大东沟海面遭遇日舰队，

于是黄海海战随即展开。

（一）双方的战斗准备及作战方针

日军方面：日海军自丰岛战斗后，多次掩护其陆军在朝鲜的"釜山""仁川"、"元山"诸地登陆，以扩大侵略，并将海军重新编组，其海军的作战指导方针为：配合侵朝陆军的进攻，从海上牵制清军；集中主要力量寻找北洋舰队主力决战，夺取全面的制海权。为此，采取了以下的一些活动：

1．自7月25日至9月12日先后四次护送兵船向朝鲜增兵。

2．为防清军的袭击，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率舰队主力及运输舰20余只，到威海卫海港及旅顺港口外海面进行挑衅活动，以诱使北洋舰队还顾其后方，解除在朝鲜海面运兵的威胁。

3．日海军联合舰队为了掩护陆军在仁川登陆并扩大侵略战争，放弃朝鲜隔音岛的临时抛锚地，改以长直路为根据地，以浅水湾（朝鲜南部忠清南道海面）为舰队集合点。

4．重新调整舰队的战斗编成如下表：

队别	舰船
本队	松岛（旗舰） 严岛 桥立 千代田 扶桑 比睿
第一游击队	吉野（旗舰） 秋津州 高千穗 浪速
第二游击队	金刚 葛城 大和 武藏 高雄 天龙
第三游击队	筑紫 爱宕 摩耶 鸟海 大岛
本队附属舰	八重山 盘城 天城 近江丸
鱼雷艇母舰	山城丸
附记	1．另有赤城及西京丸二舰随本队行动 西京丸号为日军海军军令部长桦山的观战座船 2．日本海军舰船及其性能看附表10

日海军军令部部长桦山资纪认为一切准备完毕，即令伊东率舰向大同江面前进，寻找中国舰队主力决战。伊东亲率本队及第一游击队向大同江进发。

清军方面：李鸿章在丰岛序战之前，就不愿与日海军作战，想通过外交手段议和。序战失败后，仍以“避战保船”为指导思想，坐视日军舰队的活动日益猖獗，只采取了以下消极措施：

1．命北洋舰队固守大同江口至威海卫间之西北海域，以舰队游弋其间，避免同日舰队进行海上交锋。

2．当日军诱使清军后顾对旅顺及威海港进行袭扰时，他却进一步限定清海军巡弋范围，从大同江口缩小至鸭绿江口并严令“无论事件如何，北洋舰队勿得再行出航于山东高角（成山角）与鸭绿江口划线以外”。

他采取以上消极措施的借口是：“北洋海军力量太弱，海上交锋恐非胜算”，只有“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北洋门户才能“恃以无虑”[59]，李鸿章这种思想代表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的主张，但是受到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的反对。光绪帝在宣战诏书中提出了一个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下令李鸿章派部队增援入朝作战部队，并派北洋舰队护航。

（二）战斗经过

北洋舰队由提督丁汝昌统率，参战的舰只有：定远、镇远、来远、经远、致远、靖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平远、广丙、共十二艘，另有蚊炮船两艘、鱼雷艇四艘。

公元1894年（光绪廿年）9月17日上午，北洋舰队护送援朝部队到达大东沟上岸后，准备返回旅顺。至11时许，发现日本舰队从西南方向来袭，遂下令起锚，准备迎战。12时许日舰队伪装美国舰只（挂美国旗）向清军扑来。12时50分，战斗正式打响，历时五个小时。

战斗一开始，日军舰队以单路纵队（鱼贯阵）向北洋舰队前进，速度快的第一游击队为先锋，本队在后（本队内尚有赤诚号

及西京丸号，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之纪乘西京丸号随本队观战），直向清军扑来。清舰队开始成“分段纵列”迎战，以“定远”、“镇远”两舰居前。此时清舰队指挥官丁汝昌向各舰作了如下的指示：1．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支援。2．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而为基本战术。3．诸舰务于可能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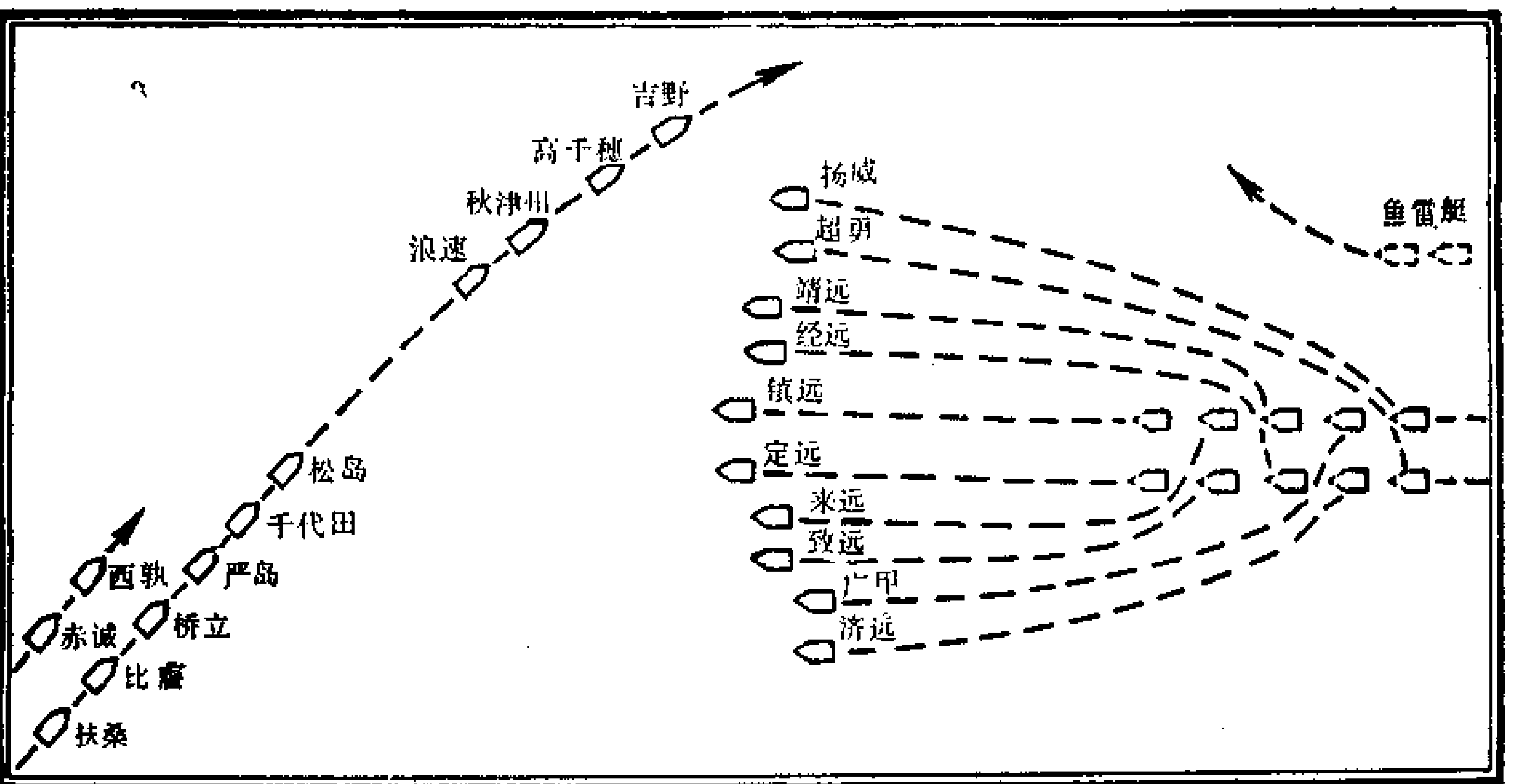
当见到敌舰队时，丁汝昌即变换队形，以“定远”“镇远”居中，其他各舰向两翼展开，成犄角雁行阵（即人字形队形）。双方接战后，日舰首先向清舰队中央攻击，但畏惧清舰队中的“定远”、“镇远”，即转向左以避二舰，改向清舰队右翼较弱的舰只“超勇”、“扬威”二舰攻击。这样就把舰队的侧面暴露于清舰队火力之下，开战三分钟，即被清舰击中“吉野”，“秋津洲”也随之中弹，死伤多人，日舰为摆脱不利态势即咬定“超勇”、“扬威”二舰不放，该二舰为木质包铁皮的旧式兵船，舰龄已在十三年以上，速力缓，火力差，终为号称“帝国精锐”的吉野等舰击中起火，退出战斗。战斗过程中指挥官丁汝昌身受重伤，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代理丁汝昌督战，沉着指挥。

此时，以“松岛”舰为首的日舰本队，驶至“定远”舰右前方，于是北洋舰队即向右旋4°，各舰均以舰首指向日舰本队，日舰“比睿”、“扶桑”、“西京丸”，“赤诚”诸舰因速力迟缓而落后，正好被清舰队插入其间，拦腰截为两段，对日舰队大为不利。清舰队抓住战机猛攻，“定远”一炮命中“松岛”，击毙其炮手数人。[61] 1时10分，“比睿”处境危急，慌不择路，冒险从“定远”及“来远”之间闯进清舰队，欲取捷径赶上本队，被“定远”击中起火，“赤诚”也中弹累累，死伤甚多，舰长板垣八太郎亦被击毙，但终免于难，被其逃出战阵。

午后2时左右，日舰第一游击队见本队后续部队诸舰危急，即回航营救，以左舷速射炮火猛烈射击，始救得“扶桑”回归本队，此时日舰本队也已从清舰队右翼行将绕至背后，清舰队将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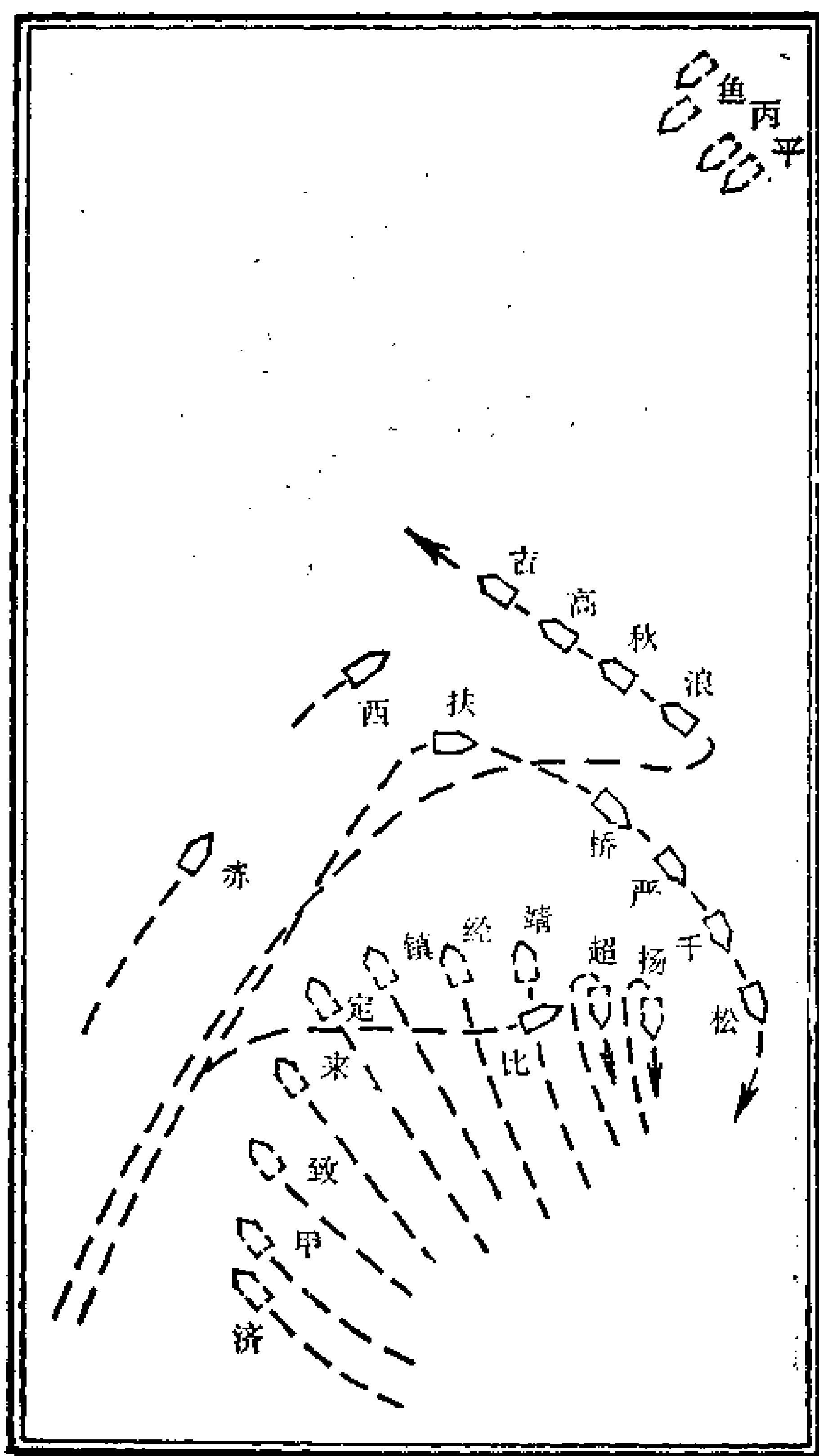
中日舰队展开队形示意图

（36-2图）



中日黄海海战示意图（一）

约12：30—13：30　　（36-3图）



入腹背受敌的境地，且由于“定远”信号装置为敌炮击中，无法指挥，只能各姊妹舰互相支援，各自为战，“来远”见“比睿”逃走，即起追击，被“比睿”发炮击中甲板引起火灾，其他各舰減速来救“来远”，“赤诚”与“比睿”则乘机加足马力逃跑，西京丸见此即发出两舰危急信号。伊东命第一游击队继续左转舵以猛烈炮火轰击清舰，以行掩护，二舰始乘机脱离战场，这时日舰本队已绕至北洋舰队背后，其第一游击队也驰至清舰队的前方，正好形成了对清舰队的前后夹击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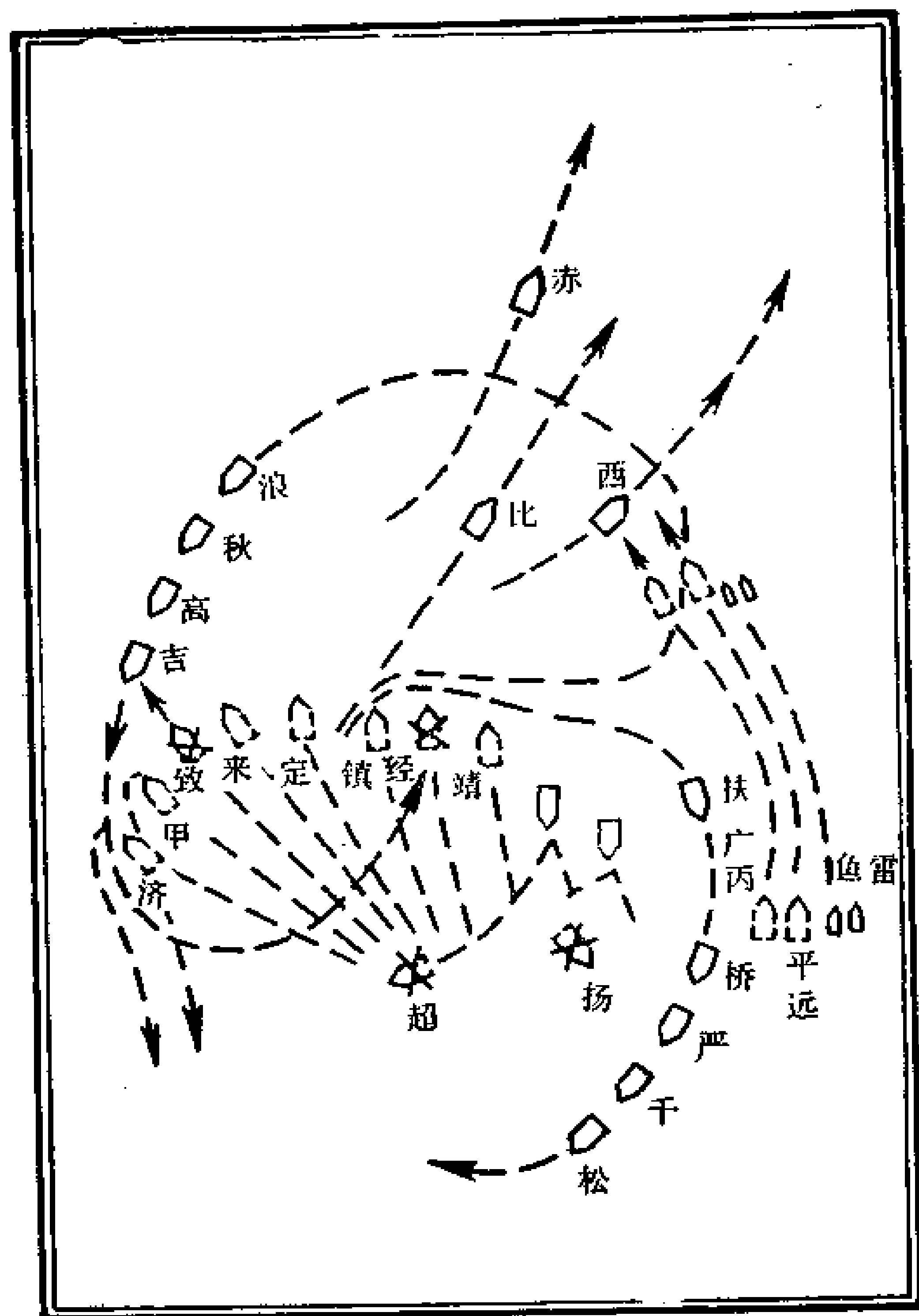
清舰队此时，虽处于不利态势，但各指挥员仍奋勇战斗，“定”、“来”二舰此时追击“西京丸”，将其击伤后又击中数发，“西京丸”被迫发出“我舵故障”信号，时遇我“广丙”、“平远”进入战斗，众舰围攻，将其再次击中起火，我鱼雷艇高速接近该舰，吓得坐在舰上观战的日海军军令部长桦山，瞑目待毙，[62]后因发多枚鱼雷均未击中，侥倖逃出战场。

清舰队右旋后左翼稍向前，特别是“致远”舰突出，弹将尽，正好日舰第一游击队先头巳绕至其前，管带邓世昌为保障主力舰“定远”的战斗，巳中弹累累，眼见吉野逞凶，因而下令开快车向其冲击，他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船，则我军可以集事（济事或成事），”[63]决意与之同归于尽，不幸为“吉野”鱼雷击中沉没，邓世昌落水后拒绝施救，与二百余官兵同时殉难。

“广甲”与“济远”结为战斗组，“济远”见“致远”沉没，临阵逃跑，“广甲”亦随之而逃，“济远”逃回大连湾，“广甲”搁浅后为日舰所击沉。日第一游击队欲追二舰，因相隔太远，即回头围攻北洋舰队右翼之“经远”舰，“经远”以一抵四，经过激战，为敌舰鱼雷所击中，管带林永升与全舰官兵殉难。清军此时损失“超勇”、“扬威”、“致远”、“经远”四舰，“济远”及“广甲”又临阵逃跑，共失去六舰，损失较重，形势不利。

中日黄海海战示意图（二）

约13：30—15：30　　　　（36-4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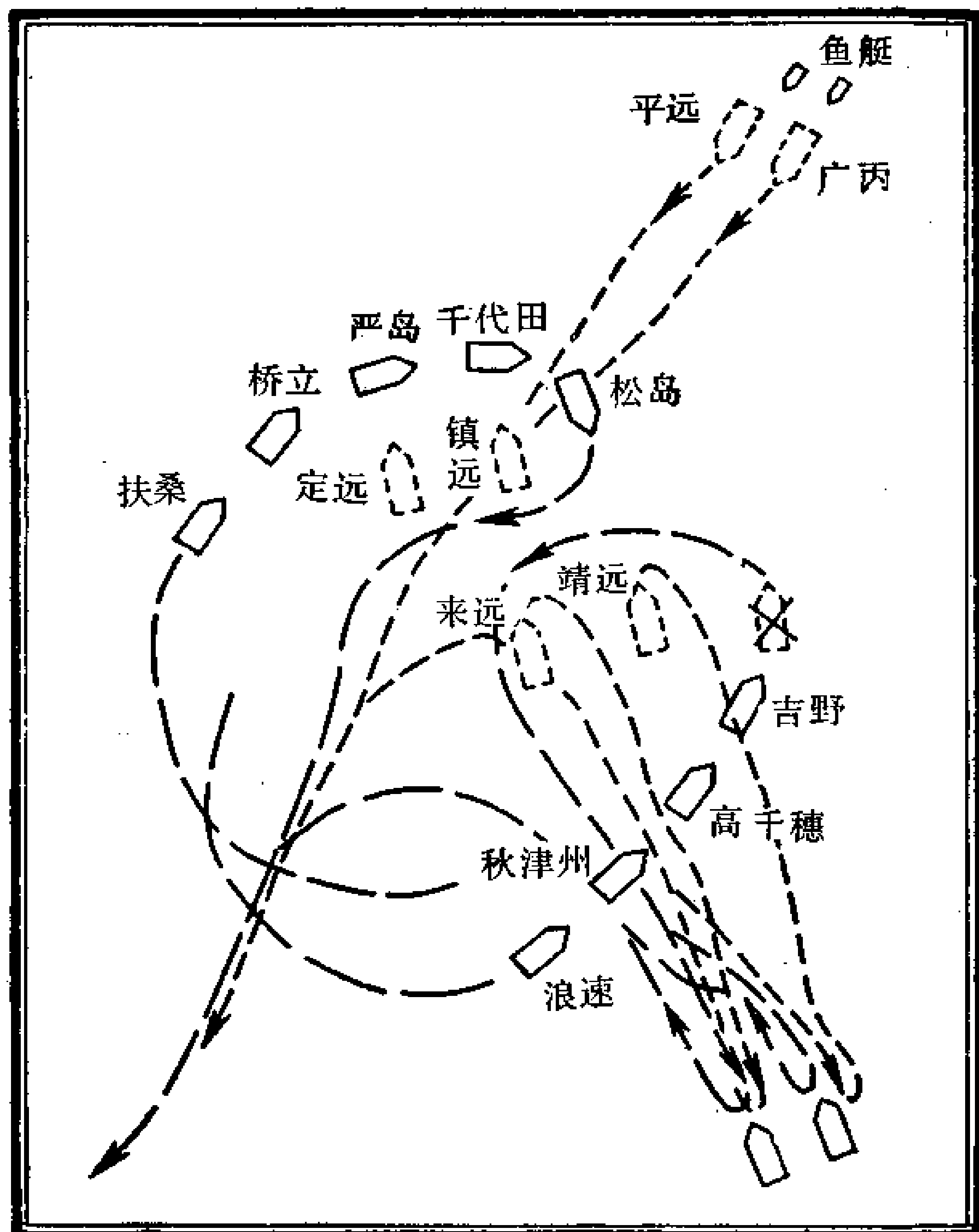
日舰此时尚有第一游击队四舰，加上本队“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等共有九舰。日舰队见清舰数少，企图将清舰分割开来，各个歼灭，即以第一游击队四舰包围“靖远”和“来远”二舰，以本队的五舰包围进攻“定远”及“镇远”二舰，战斗顿时分为二组进行。“定远”与“镇远”，在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坚定沉着的战斗，虽有三百多发炮弹落在二舰甲板上，二舰互相支援，激励士气，“定远”管带刘步蟾，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时刻变换舰向，使敌炮难于取准。“镇远”管带林泰曾不但开炮敏捷，在被击多次起火的情况下，仍沉着组织灭火，井井有序，敌方文件也截“镇远”前甲板，几乎形成绝命的大火，一将组织士兵尽力救火，虽弹丸如雨，仍欣然从事在九死一生中，毅然将火扑灭，终于避免一场灾难。〔64〕“镇远”坚持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3时30分左右，“镇远”以30厘米大炮击中日旗舰“松岛”号，引起舰上弹药爆炸，发出巨响，随即剧烈震荡，船体倾斜，大火延烧，死伤甚众，炮毁不堪用，舵机失灵，损丧严重，伊东挂起不管旗，令各舰各自为战。

“来远”、“靖远”二舰也自动组合，并力抗击敌第一游击队的战斗，二舰均受重伤，“来远”仓内中弹过多，“靖远”水线为弹所伤，进水甚多，二舰为了修补船仓漏洞及扑救甲板裂火，更为了使主力舰不分心而减轻其压力，二舰即奋力摆脱敌舰，离开作战海域，背靠海滩，抢占有利地势，一面抓紧抢救修补，一面用船首重炮（20厘米）对敌战斗，日舰虽追至，不敢近前。

5时左右，伊东见“松岛”已失去战斗力，只好将指挥班子移到“桥立”舰上，综观战场，“比睿”、“赤城”和“西京丸”不知去向，第一游击队远离本队，情况不明，本队五舰中、“扶桑”先受创，“松岛”完全丧失作战能力，“千代田”、“桥立”、“严岛”虽受伤轻，但决不是“定远”、“镇远”的对手，且“松岛”受创后、士气低落涣散，实已无力再战，伊东只好发

中日黄海海战示意图（三）

约15：30—17：30　　（36-5图）



出信号，令第一游击队归航，5时30分左右即率残队向南退去。

清军舰队，此时“靖远”、“来远”修竣归队，“平远”、“广丙”、及蚊炮船和鱼雷各艇，亦俱来到，“靖远”知“定远”桅台被毁，遂主动代理指挥各舰齐集，重振军威，定远、镇远、靖远、来远、平远、广丙等六舰及其他船艇鱼贯东行，尾追敌舰十余里，此时暮色苍茫，日舰害怕鱼雷袭击，遂向西南方向逃走，[65]北洋舰队也收兵驶归旅顺港。

黄海海战失败的原因

黄海之战历时五个多小时，其规模之巨大，战斗之惨烈，实为近代海战史中所罕见。战斗结束，日本舰队五舰受重伤，死伤约六百人。北洋舰队四舰被击沉，一舰自沉，一舰重伤，死伤约一千人。北洋舰队的损失虽然大于日本舰队，但是日海军并没有达到歼灭北洋舰队的目的。而且北洋舰队一直战斗到底，予敌重创后，还能乘势追击，整队返航。从整个战局来看日本舰队并未全胜，北洋舰队亦未全败。如果北洋舰队在战后迅速修整，把南洋舰队之“南琛”、“南瑞”等舰，编入北洋舰队，未始不能恢复战斗力，再次出海遂行海上各项任务。然而李鸿章在“避战保船”思想指导下，限制北洋舰队出海，把黄海、渤海制海权拱手让人，对整个战局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黄海之战的失利，首先在于战略上的错误。李鸿章视北洋舰队为私人政治资本，为了“挟兵自重”，“不敢轻于一掷”，没有决战思想。与此相反，日本侵略军的大本营决策，就已经把海军夺取制海权作为首要任务。它的全部侵略计划都以海军能否控制黄海、渤海制海权而定进退，所以它在海上就“不惜乾坤一掷”，寻求决战。黄海之战就是在不同的战略思想指导下，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北洋舰队初战受挫于丰岛，继而仓促应战于大东沟，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其次，黄海之战在战斗中所暴露的弱点，还在于北洋舰队的

装备、训练远远落后于日本舰队。当时海战的实力表现在：火力的强弱，装甲的厚薄，航速的快慢，以及鱼雷命中率的高低，和官兵的斗志等方面。其中火力和航速是决定因素。北洋舰队自1888年成军以后没有增添新舰，也没有更新和增添火炮。而日本舰队中“吉野”、“松岛”、“桥立”、“秋津洲”和“千代田”等五舰都是九十年代所造，航速超过清舰，弦侧速射炮多，火力也大大超过清舰。“定远”、“镇远”的首炮口径虽大，但射速很慢，发一炮，日舰即能发四十炮。而且清舰“各炮之不同式，配弹綦难”。[66]更因管理不善，防谍不严，炮弹掺沙不炸的事故屡屡出现。此外北洋舰队平时不注重实战训练，鱼雷、火炮命中率极低，多次有利时机都未能命中敌舰要害，以致日舰虽多舰受创而无一沉没。

黄海之战北洋舰队尽管存在上述不利条件，然而广大爱国官兵，除极少数民族败类以外，都能奋力拚击，视死如归，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五、威海卫海军基地保卫战

（一）战前形势及旅顺的陷落

清海军经过黄海大战后，将其受伤的船舰驶入旅顺港进行了修理，又补充了各舰船的兵丁，丁汝昌严督各舰船日夜操练各种动作，也进行了弹药的补充，整顿完毕后即驶入威海卫军港加强防守。日方也进行了整修，补充等工作，并将作战部署进行了调整。

旅顺港是清海军多年构筑的重要军港，位于斜伸入海的辽东半岛的南端，与山东半岛的威海港隔海相望，是渤海的锁钥，也是京畿的大门，若旅大有失，不但使威海失去依托，处境孤立，而且更直接威胁着清庭的安危。

旅顺的后路金州城，是其咽喉要地，如该地被敌所占，旅大的陆上连系便被切断。从金州至南关岭地带，有的地方中宽仅六、七里，象瓶颈一样，所以保卫旅大，必须守住金州。公元

1894年10月26日，日军第一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同时日第二军开始在花园口（今辽宁庄河西）登陆，即向旅大进攻。11月5日日军逼金州，旅大万分危急，清政府命李鸿章“即饬丁汝昌、刘步蟾等统率海军各舰，前往游弋截击，阻其后路”，〔67〕李鸿章则认为“丁汝昌海船现仅修好六艘，小雷艇仅二只可以出海，力量夙单，未便轻进”。〔68〕唯恐海军有损失。

后来海军提督丁汝昌，感到旅顺陷落，威海卫势必不保，遂亲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李鸿章训斥丁汝昌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69〕海军眼睁睁地看着日本海军护航并掩护日军在花园口登陆，进攻旅大。11月6日清军徐邦道部溃败日军攻破金州，7日清赵怀业部弃大连炮台逃跑，日军占领大连。清旅大前线总指挥龚照玙乘鱼雷艇逃往天津，旅顺清军互不统属，只徐邦道残部奋战一天，清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等三个统领都乘船逃跑，11月22日经营多年的海军基地旅顺落于敌手。在以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辽东半岛要点大部被日军占领，京畿直接受到威胁。

此时，清海军以威海卫港为基地，战斗力已逐渐恢复，其为日军所惧怕的“定海”、“镇海”等巨舰仍然完好。日海军不敢横行于直隶沿海一带，“无论进攻北圹与大沽中间之地，或进逼山海关附近之地，都有后顾之患”，〔70〕所以日军在占领旅顺后即准备在山东半岛登陆，攻占威海卫港，歼灭清海军主力，以便完全控制渤海，实施第三个战略步骤——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

（二）威海卫海军基地的设防情况

威海卫和旅顺大连两港是渤海湾的两座大门，实为京津门户。清海军多年来在此设防。这里有清海军的首脑部门——海军衙门，也有良好港湾，除原有的永久炮台外，于中日战争开始后，又添筑了许多炮台。在南邦炮台地区增添了摩天岭、莲子顶，以及马石山陆路炮台。在北邦炮台地区也添建了东里夼（矿）、棉

花山、遥了墩、老母顶、柴峰顶、佛顶山等陆路炮台。为防敌海军的突入，将南北两口都以数层的木栅及铁链并埋设水雷，以防其突入，口内宽阔，船舰活动自如。

在建港的同时，清政府即派绥、巩军各四营防守。以道员戴宗骞为统领，与分统刘树德率军四营守北邦炮台，分统刘超佩率四营驻南邦炮台。公元1888年刘公岛又设护军两营，由记名总兵张文瑄统领。以上诸营均归李鸿章指挥。战争爆发后，海防吃紧，山东巡抚又派福字两营驻北邦炮台，护、巩两军也各增募两营，陆军共有十六营，还有防守文登、宁海一带兵力，共有35营之多，总兵力近两万人。（见附表11）

现有海军兵力见附表12。

威海卫炮台设置见附表13。

丁汝昌在防守海港的布置中，一再考虑，若陆路后防有望，则能固守之；若后路有失，则难以坚持。他认为“威海卫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71]因此他多次向山东巡抚李秉衡关照，要认真部署后路兵力，加强陆路后方防御。但李秉衡终未予理采。

（三）威海卫之战双方的作战企图和部署

日军方面：日军计划从辽东半岛向山东半岛的荣城湾登陆，直趋威海侧后，以海陆夹击，攻占威海，全歼清海军，夺取黄海、渤海的制海权。

为达此目的，以陆军第二师团、第六师团约二万余人，在山东半岛，取远势登陆，从后路包抄威海港，登陆点选在离威海港30浬的荣城湾；以海军一部作出企图在登州（蓬莱）和秦皇岛登陆的模样，以制造假象，迷惑清军，海军主力在威海港正面监视并堵击清军舰队以掩护陆军的登陆。

日海军为配合其陆军的登陆，将联合舰队，重新区分为五队：“松岛”（旗舰）、“千代田”、“桥立”、“岩岛”四舰为本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舰为

威海卫港清军设施布防及南邦战斗、刘公岛沉船位置示意图

（30-6图）

北邦炮台

远遥墩炮台　遥远　林家岭　遥了墩炮台　西钦村　东钦村　西窑台　老母顶炮台　东河北　紫锌顶炮台　田村　佛山顶炮台　棉花山炮台　东里窑炮台　台庆　台庆礁炮台　黄泥沟炮台　北山嘴炮台　码头街　祭祀台炮台　神道口　威海卫　北竹岛　南竹岛　金线顶　公所后炮台　旗顶山炮台　东泓炮台　西口　黄岛炮台　铁码头　迎门洞炮台　南嘴炮台　日岛炮台　东口　威海卫港　戚家庄　望岛　北山　河北　长峰

皂埠嘴炮台　所城北炮台　鹿角嘴炮台　龙庙嘴炮台　白尺所　皂埠　海埠　杨枫岭炮台　卫家滩　沟北　谢家庄　岭后　摩天岭炮台　老北　姚子　莲子顶炮台　九家疃　老虎山　杨家滩　凤林集　凤山湾口　北虎口　四山后　打甲山　南虎口　宋家崖　青山顶　豹虎山　虎山　温泉汤　佛爷岭　不桥头集　丁家庄　刘家滩　鲍家村

南邦炮台　指挥刘超佩

右纵队　左纵队　日军

驻军营地

1 巩军新后营	9 绥军后营
2 巩军右营	10 绥军左营
3 巩军左营	11 绥军前营
4 巩军中营	12 绥军右营
5 巩军前营	13 护军副营
6 巩军新右营	14 护军前营
7 巩军副营	15 护军正营
8 巩军正营	16 护军后营

刘公岛　日岛　鹿角嘴

1 镇远
2 来远
3 威远
4 双桅帆船
5 靖远
6 定远中雷处
7 定远搁浅处
8 靖远沉没处

水雷营
船坞
铁线栅栏
水雷
照明灯
信号塔
码头
新式（临时）炮台（陆路）
永久炮台（海岸）



第一游击队；"扶桑"、"比睿"、"金刚"、"高雄"四舰为第二游击队；"大和"、"武藏"、"天龙"、"海门"、"葛城"五舰为第三游击队；"筑紫"、"爱宕"、"摩耶"、"大岛"、"鸟海"等五舰为第四游击队，另有鱼雷艇三艇队：第一艇队六只，第二艇队六只，第三艇队四只。

清军方面：清廷在旅大失守后，判断日军第一、二两军将在海军协同下，沿辽西走廊，进叩山海关，直取北京。故以重兵防守山海关到天津一线，以致山东半岛防务十分薄弱。山东巡抚李秉衡以不足两万人的兵力，在宁海（今山东牟平）、旧馆（今山东威海西）、威海、荣成等四方向上防止日军登陆，防御的重点是威海卫海军基地。清海军仍以李鸿章的"避战保船"为指导方针。

黄海大战后北洋舰队所有舰船均在修整补充完毕后停泊在威海卫基地。丁汝昌集各舰管带商讨御敌对策，他考虑："若远击接战，我力太单，彼船艇快而多，顾此失彼，即使丧敌数船，倘彼以大队急驶，封阻威口，则我船在外，进退无路，不免全失，威口亦危；若在口内株守，如两岸炮台有守，我船亦束手待毙，均未妥慎"。针对敌海陆进攻，认为应"依辅炮台，以取夹击之效"，〔72〕并拟定具体措施如下：

1．如敌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船艇可以出口迎击；若彼大船队前来，则我军舰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免敌舰驶入港内。

2．即使陆路包抄南北两岸，我舰尚可支撑攻击彼船，他认为"威海港地阔兵单，全恃后路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73〕，因此要求山东巡抚李秉衡认真部署后路兵力加强陆路后方防御。

3．倘两岸有失，台上之炮为敌用，则我军师船与刘公岛陆军惟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74〕

在日军登陆前，清廷已获得日军"将由成山登岸"〔75〕的确切情报，但负责山东防务的李鸿章和李秉衡均未认真对待，李秉

衡仅派腐朽不堪毫无作战能力的河防五营去荣城防守。

公元1895年1月13日李鸿章接到光绪帝关于北洋海军应“相机迎击，以免坐困”的谕旨后，指示丁汝昌等：“查倭如犯威，必以陆队由后路上岸抄截，而以兵船游弋口外牵制我师，彼时兵轮当如何布置迎击，水陆相依，庶无疏失，望与洋弁等悉心妥筹”。〔76〕

当日军开始在荣城登陆时，李鸿章曾指示丁汝昌：“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甲舰等退往烟台。”〔77〕

（四）威海保卫战经过概要

1895年（光绪廿一年）1月20日黎明，日军在荣城湾附近龙须岛登陆，清“河防营”一触即溃，日军顺利登陆并占领荣城，22日即全部登陆完毕，第二军司令部也设于此，决定：

1. 第六师团为右纵队（北路），沿荣（荣城），威（威海卫）大道经鲍家村等地，主攻南邦炮台。

2. 第二师团为左纵队（南路），沿荣烟（烟台）大道，经温泉汤，等地，切断南邦炮台清军退路。

25日日军开始进攻，2月29日左纵队推进至温泉汤，右纵队进抵距南邦炮台数里处，形成了对南邦炮台后路的包围。

1月30日对南邦炮台实行总攻，日军右纵队黎明即猛攻摩天岭炮台，该岭为南邦炮台的制高点，关系至为重要，清军仅1营守此炮台，与敌顽强战斗，多次进行激烈争夺，此时丁汝昌率舰队发排炮予以支援，终因众寡不敌，全部壮烈牺牲。营长周家思身中数弹仍继续战斗，壮烈殉国，摩天岭遂为敌占领。日军也死伤甚众，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亦被击毙。日战领摩天岭后，即以该炮台之炮掩护日军攻击扬风岭炮台及陆路其他炮台，继续进攻海岸炮台，日舰从海面配合炮击。龙庙嘴炮台、鹿角嘴炮台、皂埠嘴炮台等守军英勇抵抗，在大量杀伤日军，并击沉日舰一艘后先后被日军攻占。丁汝昌派鱼雷艇载敢死上岸炸毁了皂埠

嘴炮台。

在日军右纵队进攻的同时，左纵队也发动向虎口山的进攻，企图进占风林集切断清军南邦炮台的后路。清统领戴宗骞不战而退，将军队解散，自己逃至北邦炮台，但防守北虎口的七百余清军，坚守阵地，顽强战斗，打退敌人数次冲击，予以大量杀伤。

虎山守军也拼死抵抗，英勇杀敌，居高临下予日军大量杀伤。日军在风林集会合后，南邦炮台西撤道路被切断，陷于日军包围之中，恰在此时，丁汝昌指挥镇南、镇西、镇北、镇边等炮舰驶进岸边救援，突放排炮突袭日军，使其死伤惨重，仓皇后撤，南岸清军余部才得乘机突围而去，日军围歼企图未能得逞。

1月30日，一直停泊在荣城湾的日联合舰队二十一艘军舰（除留四艘警戒运输船）于凌晨二时开向威海，支援日军进攻南邦炮台。南邦炮台陷落后，威海港东口暴露，北洋舰队移至西口水域，于是日鱼雷艇得以破坏东口障碍物，并潜入港内袭击北洋船只。日联合舰队乃在鸡鸣岛(刘公岛以东约五公里)附近海域停泊、游弋，围困北洋舰队。以后三天因天气不好，仅留第三游击队封锁港口，其他船只均回荣城湾机动。日陆军利用南邦炮台向清军舰船射击，为了解除这一威胁，北洋舰队于31日集中来远、济远两舰的火力猛轰皂埠嘴及龙庙嘴炮台，将其八门大炮全部摧毁。

1月31日李鸿章电告丁汝昌、戴宗骞，北洋舰队应冲出威海，“设法保船”、“万一刘（公）岛不保，能挟数舰冲出，或烟台、或吴淞，勿被倭全灭，稍赎重愆”。[78]但丁汝昌却认为“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唯有船没人尽而已。旨屡催出口决战，唯出则陆军将士心寒，大局更难设想”。[79]因而没有执行这一指示。

2月1日下午日军开始进攻北邦炮台，为避开清军舰队的火力，从西路进攻。清西路提督孙万全奋力抵抗，因部下阎得胜临阵逃跑，被迫退至酒馆(威海西南约30公里)，日军即占领威海卫

城。2月2日日军又向北邦炮台进攻。北邦炮台设在威海卫城东北六里山上，形势险要，易守难攻。统领戴宗骞率绥军六营及南邦炮台溃退下来的两个营扼守。戴宗骞贪婪成性，虐待士兵，部下均恨之入骨，毫无战斗力。当得知南邦炮台失守后，大部官兵溃散逃跑。丁汝昌为使北邦炮台不致早委敌手，派管带吴敬宗率二百余水手前往助守，但未待日军进攻，守炮台的二营士兵并裹胁丁所派的水手均自动溃散，向西逃去，[80]整个北邦炮台只剩十九人。[81]丁汝昌亲率敢死队至北帮炮台南岸，一面追戴上船至刘公岛，一面派敢死队破坏大炮及弹药库，但未及毁炮而日军已至，日军一枪未发就占领了北邦炮台。李鸿章经营了多年的军事要地全委诸敌手。

此时北洋舰队外受日海军的封锁，内与陆地断绝联系，陷入完全包围之中，只有依托刘公岛继续战斗。刘公岛距威海卫城八里，距北邦炮台四里，南距日岛四里，拒南邦炮台九里。朝海一面岸高陡峻，无法攀登，岛上各种设施齐全，丁汝昌在战前作了长期准备。这时北洋舰队除黄海海战被击沉的外，尚有大小舰艇三十二艘。

2月3日日舰又一次猛攻，为北洋舰队所击退。经过几次战斗，日联合舰队感到从正面进攻极为困难，遂又用惯技以鱼雷艇偷袭。5日晨四时，日第二、三鱼雷艇队乘夜沿南岸潜入港内，直扑“定远”，被“定远”击沉，但“定远，也被其鱼雷所击中而受重伤，后来自行炸毁。6日其第一鱼雷艇又进港偷袭，“来远”、“威远”、“宝茂”中雷沉没。7日晨又以鱼雷艇六艘向东西两口同时冲击，三艘已冲入东口。丁汝昌见连日来海战，日舰受伤者亦有多艘，为了回击日军，命令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率鱼雷艇海龙，左一、二、三，右一、二、三等七艘乘炮战之际，出口袭击敌舰，王平贪生怕死，非但不袭击敌人，反而向西逃跑，后为敌舰所击沉和俘虏，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败类。

9日敌三十余艘舰排在东口外欲冲进港内，南北邦炮台亦开

炮夹击。丁汝昌登"靖远"舰督战，被皂埠嘴炮台击沉，丁为水兵救出。尽管如此，广大爱国官兵仍奋力抵抗，顽强战斗，观战外国人记载说：清军"仍奋勇发炮，虽多处受伤，一旦裹好后，坚决回到岗位上只手助战"。[82]在日舰围攻的同时，日酋伊东多次通过英舰队司令劝丁汝昌投降，均为丁所拒绝。其内部所聘英人马格禄与顾问美国人浩威煽动士兵水手哗变，要胁丁投降，亦被拒绝。最后丁见援兵不至，遂下令各舰毁舰以免资敌，但由于所雇外人及道员牛昶炳怕毁舰得罪日本军，无人下手，还唆使兵痞持刀威胁丁汝昌。丁汝昌及左翼总兵刘步蟾、统领张文宣、"镇远"管带杨用霖等人相继殉职。

马格禄等伙同牛昶炳盗用丁汝昌的名义由浩威起草向敌投降，12日派程璧光乘镇北舰送投降书至日本旗舰，14日无耻的牛昶炳与日军签定威海条约11条，将军舰11艘，刘公岛炮台和军器物资全部交与敌人。17日日军进驻刘公岛，清政府苦心经营近30年的北洋舰队至此全军覆没，耗费巨款所建设的最好军港悉委诸敌手。从此渤海南北门户均为日军所控制，清政府惶恐万状，深感"畿辅之防更急于关外"，[83]此时日本国内由于霍乱和水灾，严重妨碍其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正处于极端的窘迫中，极盼缔结和约，就连当时的日本外交大臣陆奥宗光也不得不承认国内海陆军备殆已空虚，而去年来继续长期间战斗之我军队人员，军需固已皆告疲劳缺乏，"内外形势早已不允许继续交战，"[84]因此不难想象，"威海战事如能稍作持久的话，对于中国来说必然是有利的"[85]，但清廷闭目不见这些情况，一味害怕帝国主义，迫不及待地派李鸿章赴日讲和订立"马关条约"，割了辽东半岛及台湾（包括澎湖及附近岛屿）与日本，并赔尝战费2万万两，还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商埠，给予航行、开厂等种种特权，又一次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中日甲午海战失败的教训

清代海防建设，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其目的在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进入七十年代后，日本侵扰台湾，吞并琉球，东南海防告警，第一次海防会议，就开始有了明显的御外意图。及至中法战争马江惨败，迫于形势，第二次海防会议后，就大量筹集经费，购制多种舰艇。八十年代中期后，海防规模初具，北洋舰队成军，要塞、海港、船坞也相继建立。自1888年以后，海防经费大量挪用营建颐和园，才停购船械。最后，这支由腐朽的清政府所建立的，由只图私利、畏敌怯战的腐败官僚李鸿章所统率指挥的北洋舰队，在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

尽管如此，但是清政府在近三十年中压榨人民血汗，投入巨额金钱所经营的海防建设，也为近代海军的建立，海军各类人才的培训，技术的引进，船舶、军火工业的创建，海岸防御的设施等方面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初步基础，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清政府建立的近代海军、经历了中法、中日两次战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战争中广大爱国官兵付出血的代价所取得的惨痛教训，自应铭记不忘。从战略角度看，下列各项尤须特别注意：

（一）战争中的“避战保船”为指导方针，不敢主动寻求决战，不敢夺取制海权，放弃有利战机，严重影响了整个战局。日本侵略朝鲜、中国，其先决条件就是要能够控制黄海、渤海的制海权。为此目的就要把全国海军组成联合舰队向中国北洋舰队寻求决战。本来当时日本海军实力也是有限的，除了九十年代新置五艘轻巡洋舰外，其余舰只战力不强，清海军有两艘铁甲舰为中坚，如能集中各洋舰队与之决战、胜负谁属，尚难逆料。这一点，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战前已有充分估计。即使北洋舰队单独应战，如能捕捉有利战机予敌重创，或者机动作战，与之周旋，日本海军也难以控制制海权，其整个侵略计划亦将受阻。以丰岛

海战为例，当时“济远”“广乙”两舰出发护航后，本来丁汝昌已集中舰队主力升火待发，以作两舰的后盾，如果不是李鸿章电令制止，则日舰“吉野”等三舰非逃即歼，清海军决不致序战失利。以后北洋舰队巡戈范围步步后退，最后，被限制在成山至鸭绿江口一线以内，把朝鲜西岸制海权拱手让人。以至从日本本土至朝鲜半岛的海道运兵通行无阻，影响了整个战局。黄海海战后，经过三个多月的修理补充，北洋舰队已大致恢复了战斗力，虽然损失了五条船，战力已逊于日联合舰队，但“定远”、“镇远”两艘大于日舰的铁甲主力舰仍在，这期间也完全有时间从南洋、粤洋舰队抽调战舰，补充北洋舰队，这时海战已移到渤海，北洋舰队不仅补给方便，而且可以得到海军基地岸炮的掩护，进可攻，退有据，而日本舰队则远离本土，补给费时，所以，在渤海与敌再次决战的条件并不是没有的。但李鸿章只图保船，既不敢令北洋舰队出海与日舰决战，又不敢放手支援旅大的战斗，让日舰得以步步进逼。最后，在争夺山东半岛的战斗中，日陆军必须渡海进行登陆作战，北洋舰队完全应该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海巡航，寻机袭击在航行中和换乘时的日运输船团，逼日联合舰队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北洋舰队决战，但李鸿章不懂登陆作战的弱点，他指示丁汝昌“有警时……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再损失”。[86]虽指示“应率船出”，但又限定“不许出大洋浪战”，虽然不许舰队离开威海岸炮掩蔽线去远出作战，对失去袭击日军于渡海及换乘的有利战机应负主要责任。而丁汝昌因黄海海战失利，受到清廷谴责，临战亦多顾忌。终于步步失利，最后炮台全失，陷入绝境。对此，李鸿章倒有“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的指示，可惜丁汝昌虽有必死的决心，但不敢出海一拚，以致全军覆没，除被鱼雷击沉外，悉数被日军俘去。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二）没有统一的作战方案和部署，战争中指挥紊乱，陆军不能协同，海军内部也不能协同。日本侵略朝、中两国蓄谋已

久，清政府战前既无统一的作战方案和部署，战争开始后，指挥又极其紊乱，后党主和、帝党主战、庙堂决策已不一致，下达的谕旨当然互有矛盾。李鸿章是实际上的统帅，他一意秉承慈禧的意旨，贯彻"避战保船"的方针。丰岛海战后，光绪帝严令海军出战，李鸿章下达给丁汝昌的电令是："即带九船开往汉江洋面，游巡迎剿"，但同时又说："惟须相机进退，能保全坚船为妥，仍盼速回。"[87]黄海之战后，清政府为了增强北洋舰队战力，曾电令南洋大臣刘坤一调"南瑞"等三舰到北洋助战，但是刘坤一以种种借口，抗旨不调，威海卫保卫战日军已从荣成湾登陆，北洋舰队腹背受敌，这时负责防务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不能集中兵力及时向登陆之敌进行反击，陆海没有统一指挥，不能互相协同。最后陆路炮台全失，海军孤立无援，致遭覆没。

（三）放弃主动，盲目指挥，不察敌情，不懂海军作战知识。这在李鸿章身上，表现极为突出。李鸿章是以镇压太平军，捻军起家的，他在作战中一贯师承曾国藩"以静制动""以主待客""后发制人"等以守为主的作战原则。马江海战之前，法国侵略军已经蓄意歼我福建海军，毁我船厂，而且法军舰队深入马江，与我舰衔尾相接，而李鸿章不作任何防范指示，只是严令"衅不自我开"。放弃主动权，无异束手待毙。他在中日战争中指挥近代化的海军和海岸要塞部队的作战，仍然墨守成法，一再要求海军"不得出大洋浪战"，他把限制海军的主动行动解释为"不敢轻于一掷"，他对海岸防御也只要求"各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88]"仍以扼要埋伏地沟为妥""坚持静伏，勿浪战，此为要诀"[89]等等都是他沿用陆战的消极防御的经验，限制海军主动出击或反击，把机动性强，火力大的海军置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四）停止海防建设，自取灭亡。十九世纪后期，欧洲一些工业急速发展的国家在历次国际战争的影响下，军事工业发展很快，舰艇、枪炮等武器的性能日新月异。当时，中日两国对新式

舰艇的补充都仰给欧洲英、法、德等国。日本为了实现侵华目的，于公元1885年起就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公元1890年后，以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十来建立和发展近代海、陆军，公元1892年提前完成了扩军计划，公元1893年起明治天皇又决定每年从宫庭经费中拨出三十万日元，再从文武官员的薪俸里抽取百分之十用来增加造船费用，公元1887—1893年同英、法购入军舰八艘，其中五艘是九十年代的产品，与此相反，清政府从1888年就因宫庭需款而停购船械，在关键时刻停止了海军的建设。尽管丁汝昌、刘步蟾等海军将领一再条陈请置新舰或改装旧舰，增购快艇，然而清政府忙于筹备慈禧六十寿辰，对海军的备战要求未予理睬，使北洋舰队舰只的舰速和火力归于劣势，导致了海战失败的后果。

注　释

〔1〕《马克思选集》第二卷3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7—39页
〔3〕范文澜著《中国近代史》上册172页
〔4〕马士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333页
〔5〕《庸庵海外文编》卷二15页
〔6〕《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2262—2263页
〔7〕《鸦片战争资料》第五册435页
〔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第17页；《曾文正公奏稿》第十二卷58页
〔9〕林则徐：《英船被逐出口仍在外洋逗留并拿获汉奸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一）第277—278页
〔10〕魏源：《圣武记·圣武记叙》
〔11〕魏源：《海国图志·原叙篇》
〔12〕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13〕《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222页
〔14〕《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222页
〔15〕《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254页
〔16〕《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268页
〔17〕《沈文肃公政书·遵旨筹商折》

〔18〕《清史稿·穆宗本纪》

〔19〕《清史稿》兵志七

〔20〕《洋务运动丛刊》第一册146页

〔21〕《清末海军史料·着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

〔22〕《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483页

〔23〕《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387页

〔24〕《洋务运动丛刊》第五册 5 页

〔25〕《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481页

〔2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20卷64页

〔27〕1872年上海英领事商务报告，转引自《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288页

〔28〕《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二十四卷，17页

〔29〕《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418—419页

〔30〕《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479—484页

〔31〕《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560页

〔32〕《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565页

〔33〕《清鉴》光绪十一年

〔34〕《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560页

〔35〕《清鉴》光绪十一年

〔36〕《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第三七卷32页

〔37〕《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第三七卷32页

〔38〕《中日战争丛刊》第二册233页

〔39〕《洋务运动丛刊》第二册515—516、550页

〔40〕《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63页

〔41〕池仲祜：《海军大事记》

〔42〕《洋务运动丛刊》第八册284页

〔43〕《洋务运动丛刊》第一册114页

〔44〕《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146页

〔45〕《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190—193页

〔46〕《洋务运动丛刊》第三册194页

〔47〕《越南人民抗法八十年史》71页

〔48〕《中法战争》第五册489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

〔49〕《中法战争》第七册225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5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

〔51〕《北洋大臣李鸿章来电》《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二十第9页
〔52〕日本参谋部《日清战史》第二卷16页
〔53〕誉田藏八《日清战史讲授录》7—8页
〔54〕《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261—262页
〔55〕《清季外交史料》卷91第6页
〔56〕《上谕》，《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6第2—3页
〔57〕《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77页
〔58〕《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20页
〔59〕《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72页
〔60〕《海事》第八卷第五期
〔61〕《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135页
〔62〕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第七编第四章141页
〔63〕川崎三郎《日清战史》卷三第67页
〔64〕川崎三郎《日清战史》卷三第69页
〔65〕《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171页
〔66〕王炳耀《甲午中日战争辑》《鸭绿江水战杂记》
〔67〕《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190页
〔68〕《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192页
〔69〕《中日战争丛刊》第一册69页
〔70〕川崎三郎《日清战史》卷五第6—7页
〔71〕《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320页
〔72〕《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320页
〔73〕《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2281卷28—29页
〔74〕《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319—320页
〔75〕《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314—316页
〔76〕李鸿章：《寄刘公岛丁提督、刘镇》，《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9第37页
〔77〕《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寄刘公岛丁提督》
〔78〕《复丁提督、张镇》、《中日战争》（四）320—321页
〔79〕《丁提督来电》、《中日战争》（四）316页
〔80〕〔81〕《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388—389页
〔82〕《中日战争丛刊》第六册321页
〔83〕《中日战争丛刊》第三册409页
〔84〕《中日战争丛刊》第七册177—178页
〔85〕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67页

〔86〕《中日战争丛刊》第四册302页

〔87〕《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16第31页

〔88〕《复威海丁提督、刘镇、张镇》电稿19

〔89〕《复戴道》电稿19

清代海防附表

北洋舰队的编成及舰只的主要性能表 附表1

队别	舰种	舰名	舰质	吨位	马力	速力(节)	火炮	鱼雷发射管	乘员	下水年代	制地
主力战舰	主力	定远	钢	7.335	6.000	14.5	22	3	331	1880	德
	主力	镇远	钢	7.335	6.000	14.5	22	3	331	1880	德
	巡洋	来远	钢	2.900	5.000	15.5	17	4	202	1887	德
	巡洋	经远	钢	2.900	5.000	15.5	14	4	202	1887	德
	巡洋	致远	钢	2.300	5 500	18	23	4	202	1886	英
	巡洋	靖远	钢	2.300	5.500	18	23	4	202	1886	英
	巡洋	济远	钢	2.300	5.500	15	18	4	204	1883	德
	巡洋	平远	钢	2.100	2.300	14.5	11	1	145	1889	闽
	巡洋	扬威	钢	1.350	2.400	15	12	无	135	1881	英
	巡洋	超勇	钢	1.350	2.400	15	12	无	135	1881	英
防卫战舰	炮舰	镇东	钢	440	350	8	5	无	55	1879	英
	炮舰	镇西	钢	440	350	8	5	无	55	1879	英
	炮舰	镇南	钢	440	350	8	5	无	55	1879	英
	炮舰	镇北	钢	440	350	8	5	无	55	1879	英
	炮舰	镇中	钢	440	750	8	5	无	55	1881	英
	炮舰	镇边	钢	440	840	8	5	无	55	1881	英
练习舰	练习舰	威远	铁骨木皮	1.300	840	12	11	无	124	1877	闽
	练习舰	康济	同上	1.300	750	12	11	无	124	1881	闽
辅助舰	练习舰	泰安	同上	1.258	600	10	5	无	180	1876	闽
	练习舰	镇海	同上	950	480	9	5	无	100	1871	闽
	练习舰	操江	同上	950	400	9	5	无	91	1865	沪
	练习舰	湄云	同上	576	400	9	4	无	70	1869	闽
附记	巡洋舰（由广东舰队调来）	广丙	同上	1.000	1.200	17	11	4	110	1891	闽
	巡洋舰	广甲	铁骨木皮	1.296	1.600	15	10	4	145	1887	

铅字为船的实际航速

北洋舰队鱼雷艇表

附表 2

艇名	吨数	速力	火炮	鱼雷发射管	乘员	下水年代
左队一号	108	24	2	3	29	1887
左队二号	108	19	2	3	28	1885
左队三号	108	19	2	2	28	1885
右队一号	108	18	2	2	28	1885
右队二号	108	18	2	2	28	1885
右队三号	108	18	2	2	28	1885
定远附一号	不详	15		2		1882
定远附二号	不详	15		2		1882
镇远附一号	不详	15		2		1881
镇远附二号		15		2		1881
中号		15	1			
捍雷		6	1			

南洋舰队的编成及舰只的主要性能表 附表3

队别	舰种	舰名	舰质	吨位	马力	速力（节）	火炮	鱼发射雷管	乘员	下水年代	制地
主力战舰	巡洋	环泰	铁骨木皮	2700	2400	15	16	2	213	1886	闽
	巡洋	镜清	同上	2700	2400	15	16	2	213	1884	闽
	巡洋	南瑞	钢	2200	2400	15	15		250	1883	德
	巡洋	南琛	钢	2200	2400	15	19		250	1883	德
	巡洋	开济	铁骨木皮	2200	2400	15	18		260	1883	闽
	巡洋	保民	铁	1477	2400	10	12		280	1884	
辅助舰	炮舰	策电	铁	400	310	9	4		61	1877	英
	汽船	飞霆	铁	400	310	9	5		61	1877	英
	运舰	威靖	木	1100	600	12.5	14		145	不详	沪
	运舰	测海	木	700	430	12.5	7		117	不详	沪
	练舰	登瀛洲	木	1258	600	10	11		158	1882	闽
	练舰	靖远	木	578	480	9	9		118	1872	闽
	炮舰	钧和	不详	不详	不详	不详	5		不详	1882	
	炮舰	金瓯	铁	195	不详	不详	7		53	1882	沪
	炮舰	虎威	铁	319	310	9	5		60	1876	英
	炮舰	龙骧	铁	319	310	9	5		60	1876	英

福建舰队的编成及舰艇的主要性能表 附表4

舰艇名	舰种	舰质	吨数	马力	速力	炮火	鱼雷发射管	乘员	下水年代
福靖	炮舰	钢骨木皮	1,000	1,200	17	7			1893
琛航	运输舰	木	1,450	600	10	8		107	1874
靖海	炮舰	木	578	480		7			1873
艺新	炮舰	木	240	170	9	5		58	1876
长胜	炮舰	木	195	340	10	1			1875
元凯	通信舰	木	1,258	600	10	9		84	1875
超武	通信舰	铁骨木皮	1,209	750	12	7		84	1878
伏波	运输兼通讯	木	1,260	600	10	7			1871
海镜	同上	木	1,450	580	10	3			1873
飞捷		铁	1,033	110					1890
福龙	航洋鱼雷艇	钢	115	1,500	23	2	3		1885

广东舰队的编成及舰只的主要性能表 附表5

舰名	舰种	舰质	吨数	马力	速力	炮火	鱼雷发射管	乘员	下水年代
广甲	巡洋	铁骨木皮	1,296	1,600	15	10	4	145	1887
广乙	巡洋	同上	1,000	1,200	17	11	4	110	1890
广丙	巡洋	同上	1,000	1,200	17	11	4	110	1891
镇东	炮舰	木	170	170		3			1867
广戊	炮舰	铁骨木皮	400		10	2			1888
广己	炮舰	同上	400		10				1890
广庚	炮舰	同上	400		14	6			1889
广辛	炮舰		400		11.2	2			
广玉	炮舰	同上	600	500	12.5	5			1891
广金	炮舰	同上	600	500	12.5	5			1890
广元	炮舰	同上		78	10	5			1886
广贞	炮舰	同上		78	10	5			1886
广亨	炮舰			65	9	5			1886
广利	炮舰			65	9	5			1886
广德	炮舰								
广镜	炮舰								
蓬洲海		铁骨木皮	800	500		6			1869
执中		木	500	300		6			1879
海镜清		铁骨木皮	450	310		6			1882
镇涛		同上	450	265	7	7			1867
安澜	炮舰	同上	400	265	7	7			1872
海东雄		同上	350	200	8	5			1882
海长清		木	320	200		4			1872
辑西		铁骨木皮	320	200		6			1872
联济		木	200	180		4			1883
广安		木	150	150		7			1867
澄波	炮舰	木	150	100	6	2			
神机	炮舰	木	150			3			1867
静波		铁骨木皮	150	100	6.5				
靖安		木	150	100	6	2			

广东舰队鱼雷艇表

附表 6

艇名	艇种	吨数	马力	速力	炮火	鱼雷发射管	下水年代
一号	航洋	50	700	18	1	2	1882
二号	航洋	50	700	18	1	2	1882
雷天	二等	26				1	
雷坎	二等	26				1	
雷兑	二等	26				1	
雷离	二等	26				1	
一号	二等	26				1	
二号	二等	26				1	
三号	二等	26				1	
四号	二等	26				1	
五号	二等	26				1	

清朝沿海各省炮台位置表

附表 7

1891年候补知县萨承钰奏报*

省 份	炮 台
台 湾	基隆 洋楼东 社寮山 淡水炮台 澎湖 西屿、大城北、金龟头 安平之鲲身 打古港南北各一 打古山
广 东	廉州角山上下各一、琼州镇琼炮台 虎门 东偏头炮台、沙角、仑山、归旗、白鹤鼻 西偏头炮台 大角、二角、蒲州 东 侧 鱼 珠、朱山、沙路、长州 镇南炮台 绥定 潮州 崎录 苏安山
福 建	厦门 龙角尾、武口 福州、福斗山 划鳅 射马 金牌 长门 龙崎 沪屿 闽安 闽安台、马尾厂 魁歧、狮鼻嘴
浙 江	乍浦口 天妃宫 观山寨 陈山咀 西山咀 澉浦 头围口 宁波 拦江、绥远、平远，靖远、镇远、宏远、安远、定远、威远 温州 龙湾汛、茅竹岭 盘石
江 苏	吴淞口 师子林
山 东	芝罘岛 通伸岗 威海（见威海战斗图）
河 北	山海关、临海、定远、铁门关、靖远、老龙岗、镇远 大沽江、威、镇、海、北岸炮台 北塘口、南岸炮台、北岸炮台 大沽海口后、镇海、备西、定沽
辽 宁	旅顺、东山黄金 旧鸡台、捞摸、珠蘸、芳峰嘴、西岸 大连 老虎尾、威远、蛮子营、馒头山、城头山、和尚岛、 徐家山、尾威老龙头、黄山、营口铁版、沙东

*清末，海军史料268～272页（上册）

马江战斗法国舰队表

附表 8

编号	舰名	舰种	排水吨数	马力	船员	舰炮火力	所受损害
1	凯旋号	二等装甲巡洋舰	4127	2400	410	6门后膛来福炮9　1门后膛来福炮7　6门后膛来福炮5	无
2	杜居土路因号	二等铁骨木壳巡洋舰	3189	3740	300	5门后膛来福炮7 5门后膛来福炮5	吊床寝网、船腹右舷被弹击穿
3	费勒斯号	二等木壳巡洋舰	2258	2790	250	15门后膛来福炮5	受伤
4	德斯丹号	同上	2236	2790	250	同上	受伤
5	窝尔达号	二等木壳轻型巡洋舰	1300	1000	160	3门后膛来福炮5 3门后膛来福炮4	无
6	野猫号	一等炮舰	452	不详	120	3门后膛来福炮5 2门后膛来福炮4	无
7	益士弼号	炮舰	471	不详	120	2门后膛来福炮5 2门后膛来福炮4	无
8	蝮蛇号	炮舰	471	不详	120	2门后膛来福炮5 2门后膛来福炮4	不详
9	梭尼号	二等木壳巡洋舰	不详	不详	不详	7门后膛来福炮	不详
10	雷诺堡号	同上	不详	不详	不详	7门后膛来福炮	不详
11	水雷艇（45号）	二等					受重伤
12	水雷艇（46号）	二等					同上
合计	12艘						
备注	法国舰队旗舰为窝尔达号孤拔负责指挥						

附表 9

马江作战的中国舰队表

编号	舰名	舰种	排水吨数	马力	火力	船员	所受损害等
1	扬武号	二等铁木壳轻巡洋舰	1608	1250	6门威斯窝斯式三吨重舷侧前膛炮 2门威斯窝斯式三吨半重前膛炮（船首尾各一） 1门八吨重旋转炮，在前舱后	200	先为鱼雷所炸，随后被焚烧而沉没，再炸毁。
2	伏波号	三等炮舰	1258	600	6门发发苏尔式四十五磅重炮弹舷侧炮； 1门十英寸前装滑膛炮。	150	逃避战斗驶行上游得以保存。
3	济安号	同上	1258	600	6门发发苏尔式四十五磅重炮弹舷侧炮； 1门阿姆斯特龙式四吨重旋转炮。	150	被烧毁而沉没。
4	飞云号	同上	1258	600	6门发发苏尔式四十五磅重炮弹舷侧炮。	150	同上
5	振威号	同上	578	480	4门发发苏尔式四十五磅重炮弹舷侧炮； 1门阿姆斯特龙式三吨半重旋转炮。	100	沉没
6	福星号	同上	585	400	2门发发苏尔式四十五磅重炮弹舷侧炮； 2门四十磅重炮弹舷侧炮； 1门威斯窝斯式三吨半重旋转炮。	70	沉没
7	艺新号	同上	260	不详	3门见习技师所制作供实验用小型黄钢炮。	30	保存
8	永保号	运输舰	1450	600	无炮，为冲撞他舰之用。	150	沉没
9	琛航号	运输舰	1450	600	同上	150	沉没
10	建胜号	字母型蚊子船	250	389	1门十磅大炮。	26	沉没
11	福胜号	字母型蚊子船	250	389	同上	26	沉没
合计	11		10205吨	5908马力艺新在外	44门	1202人	
备注	中国舰队旗舰为扬武号，张成负责指挥						

日本海军舰船及其性能表

附表10

舰名	舰种	舰质	吨数	马力	速力	炮数	鱼雷发射管	乘员	下水年代
松岛	海防	钢	4.278	5.400	17.5	31	4	355	1890
桥立	海防	钢	4.278	5.400	17.5	32	4	355	1891
严岛	海防	钢	4.278	5.400	17.5	32	4	355	1889
扶桑	装甲巡洋	铁	3.777	3.650	13	17	2	345	1878
吉野	巡洋	钢	4.267	15.968	23	34	5	385	1892
浪速	巡洋	钢	3.709	7.604	19	24	4	352	1885
高千穗	巡洋	钢	3.709	7.604	18	24	4	352	1885
秋津洲	巡洋	钢	3.150	8.516	19	22	4	314	1892
千代田	巡洋	钢	2.439	5.678	19	27	3	306	1890
高雄	巡洋	铁	1.778	1.622	15	5	2	226	1888
筑紫	巡洋	钢	1.372	2.433	17	7		177	1880
金刚	巡洋	铁骨木皮	2.284	2.535	13.7	9	2	321	1877
比睿	巡洋	同上	2.284	2.515	13.2	15	2	321	1877
筑波	巡洋	木	1.978	526	8	13		251	1851
八重山	巡洋	钢	1.690	5.400	20	9	2	126	1889
凤翔	炮舰	木	321	217	7.5	5		96	1871
天龙	巡洋	木	1.547	1.267	12	6		208	1883
葛城	巡洋	铁骨木皮	1.500	1.622	13	7		114	1885
大和	巡洋	同上	1.500	1.622	13.5	7		229	1885
武藏	巡洋	同上	1.500	1.622	13.3	7		230	1886
海门	巡洋	木	1.375	1.267	12	6		210	1882
天城	巡洋	木	926	720	11	7		159	1877
盘城	炮舰	木	708	659	10	4		122	1878
大岛	炮舰	钢	630	1.217	13	4		130	1891
摩耶	炮舰	铁	622	963	12	2		105	1886
爱宕	炮舰	钢骨铁皮	622	963	12	2		105	1887
鸟海	炮舰	铁	622	963	10.25	2		89	1887
赤城	炮舰	钢	622	1.963	10.25	10		126	1888

本表参照日本参谋本部：《日清战史》，日本海军军令部：《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川崎三郎：《日清战史》等书编制。

威海卫清陆军防守部署表

附表11

部队名称	统领	营名	驻地
绥字军	道员戴宗骞 分统刘树德	正营	西岸北竹岛村
		副营	西岸南竹岛村
		左营	威海卫城北门外
		后营	天后宫后
		前营	神道口西南
		右营	寨子村
巩字军	总兵刘超佩	中营	南岸沟北村
		前营	南岸城子村
		右营	皂埠嘴南
		左营	南岸海埠东夼
		后营	百尺崖所
		新右营	长峰寨村东北
北洋护军	总兵张久瑄	前营	刘公岛东疃北
		后营	刘公岛东疃北
		正营	刘公岛东疃北
		副营	刘公岛东泓西

参加威海卫保卫战斗的清海军舰艇

附表12

舰名	舰种	吨位	炮数	舰名	舰种	吨位	炮数
定远	主力舰	7,335	22	镇中	炮舰	440	5
镇远	巡洋舰	7,335	22	威远	练习舰	1300	11
来远	巡洋舰	2,900	14	镇边	炮舰	440	5
靖远	巡洋舰	2,300	22	康济	练习舰	1300	11
济远	巡洋舰	2,300	18	飞霆	汽船	440	5
平远	巡洋舰	2,100	11	宝筏	汽船		
广丙	巡洋舰	1000	11	鱼雷艇	左队1、2、3号	发射管	3
镇东	炮舰	440	5		右队1、2、3号	发射管	2
镇西	炮舰	440	5		定远1、2号	发射管	2
镇南	炮舰	440	5		镇远1、2号	发射管	2
镇北	炮舰	440	5		中号	发射管	2

威海卫炮台设置表

附表13

炮台名称	炮台区分	炮台位置	备炮种类及数量（门）					守军
			平射炮	引营炮	曲射炮	地阱炮	速射炮	
南帮炮台	海岸炮台	皂埠嘴	5		1			巩字军
		鹿角嘴	4					
		龙庙嘴	4					
	陆路炮台	谢家所	3					
		杨枫岭	4	16				
北帮炮台	海岸炮台	北山嘴	8					绥字军
		黄泥沟	2					
		祭祀台	6					
	陆路炮台	合庆滩	2					
		老母顶	4	2				
刘公岛炮台	海岸炮台	车泓	4	6			8	北洋护军
		迎门洞	1					
		旗顶山	4					
		南嘴	2	5	4		3	
		公所后		6		2	8	
		黄岛	4	2			3	
日岛炮台	海岸炮台	日岛	6			2		海军

明清时期火器的发展和战略运用的特点

一、明代火器的发展和国防设施达到了封建时代的最高点

明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冶炼业和手工业的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和战争对武器装备的需求，大大促进了科学技术和火器的发展。

宋元以来，研制和使用火器的规模日益扩大，品种日益增加，新的火器不断出现。继燃烧火器、抛射兵器、爆炸火器和竹制射管形器之后，到元代已经有了铜火铳。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它的出现，大大提高了火器的准确性、安全性和使用的便利性，并大大地提高了火器的杀伤力，从而使火器的使用比例不断提高，加速了取代冷兵器的发展趋势。

明代在宋元火器发展的基础上，又先后吸取了国外“神机枪”、“佛朗机”、“鸟铳”、“鲁密铳”等先进技术，进一步提高了火器的射击速度、瞄准命中精度、侵彻力和发射装置，促进了火器的广泛使用。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制造火器的局厂，不仅京营得到优先装备，一般部队及边防要地也得到了大量装备。

清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繁荣，在平定内乱和经略边疆的战争中，火器曾有过一度发展，但到了十八世约中叶以后，由于清统治阶级走上了腐朽没落的道路，一味强调“骑射乃满洲之根本”，思想保守，和实行民族压迫政策，严格限制了火器的制造和使用，使火器不仅未能向前发展，甚至还保不住明代已取得的成果。这时欧洲资本主义兴起，产业革命促进了火器制造的突飞猛进，清朝遂完全丧失了我国在世界上科学技术和火器制造方面

的领先地位，并日益落后，到十九世纪中叶，已不得不向外国购买火器，来镇压人民的起义了。

明代的军事学说和国防措施也有新的发展。随着火器、装备的大量使用和战争准备、实施的日益复杂，军事著作的分工也日趋细密，对军事理论、军事学术、军队训练、兵要地志和火器的制造及使用等各有专著，如何良臣的《阵记》，何守法的《投笔肤谈》、伊宾商的《白豪子兵䍃》，揭暄的《兵经百篇》，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顾祖禹的《读史方舆记要》和集其大成的《武备志》等。明承袭宋代，注意兴办武学，府州都有武学，国子监文武并重，科举也有武科。随着火器的进步，筑城也有很大的发展。明长城，特别是蓟镇一段是历代修筑长城的顶点，它已具有了观察、射击、消灭死角、掩蔽、内外通道、武器粮食储存和生活等一系列设施，主要府州城都修筑了砖城，大大增强了防御力，边防驻地皆筑有城堡。明代造船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当时居世界前列，南京北龙口（即龙湾）太仓刘家港都是造船基地，郑和下西洋的船多在龙江制造，最大的远洋船可载粮四五百石，郑和下西洋的远航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舰队。

二、明清时期战略战术的特点

（一）“缓称王”的战略思想

元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朱元璋是一支后起的又是比较弱小的武装力量，它必须与元王朝，农民起义军和割据势力三种力量相周旋，并在其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在这种特定条件下，朱元璋接受了朱升的献策，把“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特别是“缓称王”作为自己的战略思想是非常成功的。它着眼于一个“巧”字，即巧于隐蔽自己的政治企图，以免过早引人注目，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并在其掩护下发展壮大，突出一个“稳”字，即稳步发展，也就是如《明史》太祖本纪所说：“沈机应变，次第经略”，终于逐次消灭了各个武装集团，夺得了中国的统治

权。

（二）明北部边防和边防战略

明朝代替元朝，朱元璋只是赶走了元朝统治集团而未能把它消灭，元朝重新积蓄力量卷土重来的危险是严重存在的。朱元璋、朱棣都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明代北部边防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备的一条边防线。它有九镇作为边防要地，有长城作为主要防御地带，有强大的前进战略据点开平，有诸王掌握的强大的战略予备队，有巩固的两翼哈密和奴尔干都司，还有一条大运河作为可靠的补给线。

在积极防御的边防战略中，朱元璋的“塞前歼敌”计划，朱棣的“天子守边”和五次出击，张居正与俺答的和好相处，戚继光在蓟镇的坚强防御以及李成梁在辽东的“以攻代守”，即以远程奔袭对方的根据地来破坏对方的攻势等等。都具有鲜明的特色而大大丰富了边防战略、战术的内容。

明代的东南海防给了我们一些极为重要的战略启示，即巩固海防必须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控制强大的战略、战役预备队。

（三）清王朝建国在战略上的特点

清王朝战略运用最大的特点是以少胜多，即以十几万八旗劲旅消灭了明王朝这个庞然大物和拥众百万的李自成农民军，夺得了全国统治权。为了实现这一政治目标，在战略运用上反映出了许多特点，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都是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们三代及顺治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他们的战略既是一脉相承的，又具有各自的特色。

努尔哈赤战略运用的特点是集中兵力、主动进攻，包括萨尔浒之战这样的以各个击破粉碎明军的分进合击，正如他自所说的：“凭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1]萨尔浒之战是这一战略运用的典型战例，以后打开原、打沈阳、打辽阳亦无不如此。清军入关后，集中力量先对付李自成农民军亦复如此，是多尔衮对这一战略的继承。

皇太极所面临的形势已大大不同于努尔哈赤时代，努尔哈赤是统一女真和夺取辽东，而皇太极却要消灭明朝夺取全国统治权。为了消化、稳定和巩固新占领的整个辽东地区，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了大大削弱明朝的战争潜力，促使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时机早日到来，皇太极进行了长期的充分的战略准备。这一阶段战略上突出之点是实施了"剪枝刨根"的战略，正如皇太极自己所说的："欲伐大木，岂能骤折？必以斧斤伐之，渐至细微，然后能折。"[2]这种积小胜为大胜以改变力量对比的战略思想在战争史上尚未见过。当然，李自成农民军在中原大量拖住和歼灭明军，是实施这一战略极为重要的客观条件。为此，皇太极一共组织了五次大规模入边，并深入到河北、山东腹地。夺取大量人口、物质、焚烧房屋，摧毁城镇，大大削弱了明王朝的战争潜力，孤立了北京城。但皇太极并不急于攻取北京，他的企图是使明王朝还能发号施令，以动员其他地区的人力、物力，去镇压李自成和其他农民军，使明王朝在破坏战争和镇压战争中耗尽国力，而清王朝则坐山观虎斗，赢得时间，待机而动，这一战略完全符合一个新兴的幼小的军事集团战胜一个老大的军事集团的需要。这一战略已超出军事战略的范围，以政治经济措施去战胜对方了。

这一时期的松锦战役，又是一次包围歼灭敌方重兵集团的典型战例。

多尔衮是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的主要实施者，他在战略上突出之点是大量采取政治经济手段，以减低汉人的敌意和争取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这与忽必烈从南宋手中夺取全国统治权的战略运用很有相似之处。国内少数民族如匈奴、突厥、氐、鲜卑、契丹等部，都曾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鼎盛一时，但他们都只取得了部分中国的统治权，最多亦只是半个中国的统治权，只元、清两朝取得了完整的全国统治权。多尔衮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为崇祯发丧，打出为明帝复仇的旗号；尊孔、祭孔；大量任用汉

族地主阶级官僚知识分子；大量收编汉军；取消为广大人民深恶痛绝明末“三饷”；入关后禁入民房，禁入北京城，官兵开始实行薪饷制度，以及禁止杀掠（虽不能完全做到，后来甚至还有反复）等等，清王朝以一个人数很少的民族能够夺得全国统治权并不是偶然的。

（四）农民起义战争战略的发展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从小到大，转战黄河南北及荆襄地区，把明王朝打得支离破碎，一败涂地，最后进军北京，结束了明王朝的统治。李自成起义军是在大量歼灭了明军主力，彻底改变了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推翻明王朝的，其起义战争时间之长，歼灭明军主力数量之大，在农民战争史上是空前的。

李自成起义军已经超越了流动作战阶段进入了正规战阶段，在河南形成了一块明王朝不得不倾全力来争的根据地。李自成在河南反围剿作战中，集中兵力先后各个歼灭了付宗龙、汪乔年，杨文岳、孙传廷等主力兵团，打出了孟家庄、襄城、冢头、汝宁、郏县等出色的歼灭战，击毙了付宗龙、汪乔年，活捉了杨文岳等明镇压军的督抚统帅，从而彻底改变了双方兵力对比，奠定了尔后下关中，取北京的基础。战略上着眼于歼灭明军主力，在战役上善于打歼灭战，是李自成在战略运用上最主要的成就。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争是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它虽然被满汉地主阶级和外国反动势力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但它坚决顽强的战斗精神和杰出的战略指导是永不磨灭的。太平天国突出的战略运用，一是“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远程奔袭，“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一举夺占了清王朝经济最发达的江南财富之区，给清王朝的反扑镇压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二是在苏、浙、皖地区进行了成功的内线作战，仅管起义军未能彻底铲除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但毕竟形成了以金陵为中心的包括苏、浙、皖部份地区的根本地，在经历了残酷的内部争杀和分裂活动大伤元气的条件下，仍能长期坚持斗争，形成了陈玉成、李

秀成领导的两支战斗力很强的主力抗动兵团，掌握了内线作战的规律，打出了许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成功战役，三河镇之役和二破江北、江南大营是其中最成功的战役，对于太平天国后期能够继续坚持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五）水师作战

朱元璋与陈友谅鄱阳湖之战是一次水师决战，朱元璋在指挥水师战役上有独特之处，历史上赤壁之战、丁家洲之战都是水师决战，但以往的水战都是在江面上进行的，而鄱阳湖水战却是在水域辽阔、深浅不一的湖上进行的。朱元璋封锁水道，南塞武阳渡，北堵南湖咀，陈军退路被截，粮食不继，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朱元璋在鄱湖水浅，陈军船大的条件下，充分利用了自己船小，进退自如的有利条件，把小船分成许多波，与火攻相结合，采取了水上轻骑的连续突击，以顽强的战斗精神获得了水师决战的胜利。

郑成功和施琅各自组织了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战役，他们已懂得了利用潮汐和贸易风；郑成功又发动台湾人民起来反对外国侵略、成为得力的内应，这些在战争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六）后勤补给

朱棣北征几十万大军出塞，加上强弩火器、神机枪炮大量装备部队，后方供应比过去的战争繁重复杂得多。朱棣对此极为重视，采取了前屯和随带相结合的办法，顺利的完成了出塞千余里和大军返回的补给任务；朱棣又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专管后勤，把后勤提到了战略的高度，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出击任务的完成。

（七）戚继光的战术思想

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倭寇猖獗，守将不是各保防区，互不应援，就是“待其饱载归，浮海击之”，[3]说穿了就是把倭寇“送”下海了事。结果使东南沿海生灵涂炭，糜烂不堪。戚继光根据这一情况，针对倭寇利用海上机动，虚乘而入，有利则进，

不利则退，聚散不定，出没无常，使明军防不胜防的特点，提出“大创尽歼”、“杜其再至”[4]的战术思想，想一切办法在陆上歼灭倭寇的有生力量，力求打一仗歼一次，积小胜为大胜，终于自北而南，逐步肃清了倭寇的骚扰。

戚继光另一战术思想是因敌制宜，因地制宜，把这一思想贯彻到编织新军，装备武器，训练部队、创造战斗队形和战法的各个环节中去。过去的军事思想中尚未如此明确的反映这一点，这是戚继光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

三、火器大量使用于战场对战略战术的影响

（一）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明代“置兵仗、军器二局、分造火器”，能大量制造神机炮、襄阳炮、流星炮、石榴炮、连珠佛朗机炮、三出连珠炮，大兽布地雷炮、碗口铜铁铳、手把铜铁铳、大中小佛朗机铜铳、无敌手铳、鸟咀铳、快枪、九龙筒等数十种火器。“正德、嘉靖间造最多”明成祖时建京军三大营，其中神机营就是以火炮、火铳，劲弩装备起来的部队，这是明廷中央控置的战略预备队中的火器部队。“永乐十年诏自开平至怀来、宣府、万全、兴和诸山顶，皆置五架炮。”嘉靖八年造佛朗机炮，谓之大将军，发诸边镇。“各边自造，自正统十四年四川始。”[5]不仅京营神机营有火器，边镇部队也装备了火器，到明中叶“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

由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就大大提高了军队攻防和野战的战斗力。在攻城时，可以用来摧毁敌方的城垣营垒，“红夷炮，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裂石城，震数十里。”[6]并可用于杀伤城上守军，如徐达围攻平江张士诚时，以火铳、弓弩及铜将军炮大量杀伤城上守军，张士诚之弟士信即被铜将军炮击毙。在守城时，可用来大量杀伤攻城的敌人，如袁崇焕守宁远，“令闽兵发西洋炮（葡国输入）一发，决血渠数里，伤数百人”。[7]在野战中则用来大量杀伤敌人，为步骑冲击开路，也可用于堵截敌人

的突围。枪炮“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8〕戚继光说鸟铳是“击敌第一依赖。”

（二）火器的大量使用，使战斗队形有了疏开的趋势

明代在确定战斗队形时已经认识到要疏密适当。朱棣概括当时的阵法，认为“前锋要疏，后队要密，”“阵密则固，锋疏则达，”〔9〕第一线要适当疏开，适当疏开才便于遂行各项战斗任务。明代的军事理论家何良臣在他的著作《阵纪》中指出：“行列欲其疏朗”，“且列不可疏，疏则难应，亦不可密，密则难用，大约步兵一人占地两步，骑兵一人占地四步……”他认为疏密要适当，过疏难以互相应援，过密则难以发挥单兵及其火器，兵器的作用。这些原则，便于完成任务，便于发挥单兵及其火器的作用，便于互相支援，在现代条件下确定战斗队形时也是需要考虑的。

戚继光的鸳鸯阵就是基于这种考虑，针对沿海地形复杂，倭寇没有正规阵势，往往利用复杂地形，埋伏或突然杀出而制定的。

（三）火器的发展促进了协同作战的发展

军队的战斗编成，从最小的单位开始，就编入了建制的各种冷热、长短兵器，使小分队内部能够长短相辅，冷热结合，分队和兵种之间能密切协同，以完成所赋与的战斗任务。

戚继光新军能构成鸳鸯阵的骑兵队中，就编入了伍长充鸟铳手兼双刀手两名，长柄快枪手两名，镋钯手兼火箭手两名，刀棍手兼射手两名，大棒手兼弓矢手两名，队长一名，火兵一名。

步兵队则以藤牌手两名和狼筅手两名代替骑兵队中的刀棍手和大棒手。

戚继光守蓟镇，编练了七个车营，分驻建昌、遵化、石匣、密云、三屯、昌平等地。“每营有重车百五十有六，轻车加百，步兵四千，骑兵三千。十二路两千里间，车骑相间，可御敌数万。”〔10〕戚继光说：“敌以数万之众，势如山崩河决，径突

我军；我有车营，车有火器，终日打放不乏，不用挑壕而壕之险在我，不用依城而城已在营，要行则行，欲止则止。”[11]可以看出，戚继光的车营是步兵、骑兵、车兵（车是运载大型火器的工具，又是抗骑兵突击的障碍，接车可以成城）合成的、可以遂行战役、战斗任务的单位，是戚继光守蓟镇分置的战役预备队。从戚继光的鸳鸯阵和车营中可以看出，诸兵种必须合成和必须协同作战的概念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

（四）火力准备已开始运用

随着火器大量使用于战场，为了摧毁敌方的防御工事，给敌以重大杀伤，为步兵冲击准备条件，火力准备已开始被运用。明初鄱阳湖水战时，朱元璋规定“诸将接近敌舰时，先发火器，次用弓弩，抵其船再以短兵击之。”徐达攻平江时使用了火铳和襄阳炮，朱棣北征时以“神机营居前，马队居后”，[12]忽兰忽失温之战，安远侯柳升发射神机炮击毙瓦剌骑兵数百人，朱棣亲率精骑乘机冲击。戚继光在花街之战中命前锋以火器轮番齐射，毙倭寇多人，左右前锋将士奋勇冲击，毙贼斩酋。

注　释

〔1〕夏元彝《幸存录东夷大略》

〔2〕《满洲实录》卷三

〔3〕《戚少保年谱》卷一

〔4〕《戚少保年谱》卷一

〔5〕《明史·兵志》

〔6〕《明史·兵志》

〔7〕《读史兵略续编》卷一上

〔8〕《明史·兵志》

〔9〕《明实录·太宗实录》

〔10〕《明史·兵志》

〔11〕《练兵实纪杂集》卷四《登坛口授》

〔12〕《明实录·太宗实录》